

# 斯大林

權力的悖論

1878-1928

斯蒂芬·科特金 著 李曉江 譯

上



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

致約翰·伯克隆 (John Birkelund)

——商人、贊助人和歷史學同行



那些懂他的人相互間  
笑笑，搖了搖頭；  
可是，對我來說  
那是希臘語。

——莎士比亞：《裘力斯·凱撒》(1599)

# 目錄

## 上冊

	中文版序	xi
	前言及致謝	xv
	地圖	xix
<b>第一部</b>	第1章 帝國子民	15
<b>雙頭鷹</b>	第2章 拉多的門徒	35
	第3章 沙皇制度最危險的敵人	65
	第4章 立憲專制	97
<b>第二部</b>	第5章 愚蠢還是叛國？	163
<b>杜爾諾沃的</b>	第6章 卡爾梅克救星	201
<b>革命戰爭</b>	第7章 1918：達達主義和列寧	257
	第8章 階級鬥爭與黨國	323
	第9章 發現之旅	379
	註釋	451

## 下冊

第三部 衝突	第10章 專政者	633
	第11章 「把斯大林調開」	685
	第12章 忠實的學生	745
	第13章 勝利中的失敗	811
	第14章 西伯利亞之行	881
尾聲	如果當初斯大林死了	947
	譯後記	965
	註釋	967
	參考文獻	1101
	圖片出處	1151
	索引	1153

## 中文版序

毛澤東是現代世界最重要的人物之一，卻缺少一部權威傳記。當然，關於這位中共領袖的傳記已有很多，但沒有一部是基於對原始文獻的全面考察，因為那些文獻即便保存在檔案館，大多也不對研究者開放。對於毛澤東，傳記作家往往不得不依靠道聽途說和謠傳、官方的宣傳和神話，以及相當程度的猜測。毛澤東的一生只有一個階段可以憑借豐富的原始資料詳實地加以描述，那就是他與約瑟夫·斯大林 (Joseph Stalin) 互有來往的1940年代，研究者可以用上從前保密而現已解密的蘇方資料。毛澤東仍然籠罩在許多謎團之中。

斯大林的情況剛好相反。對於共產主義現代中國的到來，斯大林是第二重要的角色，僅次於毛澤東。可查閱的有關斯大林的第一手原始文獻，數量多得驚人，使得研究者能夠深入探索他的生活以及統治，這比起我們對毛澤東的瞭解簡直天差地別。事實上，關於斯大林，最大的挑戰不是有些文獻仍然保密、無法查閱，儘管這一問題在某種程度上的確存在；相反，挑戰在於文獻太多了。研究者必須閱讀並理解數百萬頁從前保密的材料，涉及斯大林的方方面面——從國內的高階政治到地緣政治，從經濟到文化與社會，而且是在全球的尺度上。斯大林已不再神秘。

不過，斯大林的傳記該怎樣構思和寫作呢？他是世界上最舉足輕重的人物之一，但他的早年可以說微不足道。斯大林來自俄羅斯帝國偏遠的邊疆地區，出生於一個比較貧困的家庭，而且，除了年輕時在格魯

吉亞一個氣象台短暫地當過氣象員之外，多年來一直沒有工作。他很幸運，上了正教會辦的學校，但沒能上大學，也沒有讀完正教神學院，沒有成為神父，在成年時也沒有真正的職業。他在沙皇俄國過着顛沛流離的生活，不斷受到政治警察的滋擾，被捕、坐牢和流放都是家常便飯。他多次從流放地逃脫，但又被送了回去。那時的斯大林幾乎沒有任何經濟來源，除了幾本書外身無長物。他錯過了前半生最重要的事件——第一次世界大戰，當時他被困在偏遠的東西伯利亞。要等到1917年秋天，在將近39歲的時候，他才過上穩定的生活，成為在俄國掌權的布爾什維克核心圈的一員。

這些情況意味着，任何斯大林的傳記都不應該專注於他那相當正常的童年和基本上無足輕重的青年時代的瑣碎細節——尤其是，所謂斯大林早年生活的細節，許多不過是傳說；而非事實。相反，有點悖論的是，斯大林的傳記一開始必須關注他所生長的更廣闊的世界，而在很久之後，在他掌權之後，又要關注他將要塑造的世界。不僅如此，正如讀者將會看到的，這部傳記甚至認為，在掌權之前斯大林的個性尚未完全定型，而斯大林的個性塑造了蘇聯的體制和世界的歷史背景。更確切地說，本書認為，掌權的經歷——建立和施行專政權力的數十年——形塑了斯大林並造就了日後世界所知的那個人。斯大林形塑了那種體制，那種體制也創造了斯大林。隨着時間的推移，斯大林其人與他所生長的世界越來越合而為一，這個過程起初很慢，但後來越來越強烈，直到最後，斯大林的傳記開始變得像世界歷史。

中國的讀者會進一步看到，本傳記的注意力集中於俄國在世界上的地位，以及中國在世界上的地位，因為在歐亞大陸的興衰變遷中它們的歷史軌跡有着深刻的關聯。歷經幾百年才聚合起來的沙皇帝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災難中解體了。而列寧，以及更大程度上斯大林，設法用新的形式再度將其聚合，即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蘇俄的行動者，其中許多來自西伯利亞，曾幫助蒙古革命者將外蒙古從中國分離出來，將其變為蘇俄的第一個衛星國（或附庸國）。此外，在布爾什維克奪權之後的第一個十年，斯大林以及其他蘇俄幹部深深介入了中國國內的政治，本書對此作了一些新的分析。莫斯科與北京之間爭奪在

整個歐亞大陸的影響力，既合作又競爭，時常針鋒相對。這種關係構成了延續至今的一段漫長歷史軌跡的一部分，斯大林在其中扮演了令人生畏的角色，並最終與毛澤東糾纏在一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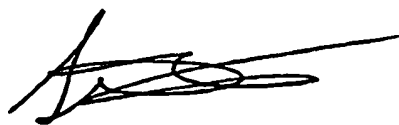
作者希望，《斯大林》第一卷能夠促進中國讀者從世界歷史的角度反思中俄關係，這一關係在近現代曾經歷種種影響深刻的事件，而將來也會見證許多程度更甚的曲折和轉變。

傑出的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能夠承擔我這部作品中文版的出版工作，令我由衷感激。這樣一項工作的規模和挑戰是巨大的，但陳甜和胡召洋為了確保給中國讀者提供準確流暢的版本，孜孜不倦地工作，他們的付出遠遠超出了職責所需。我非常感謝他們兩位以及出版社的其他同事。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是溝通中西方學術界的一座不可或缺的橋樑，能夠在這裏出版作品，對我來說是一份獨特的榮譽。

2022年4月

普林斯頓

斯蒂芬·考特金





## 前言及致謝

三卷本《斯大林》所講的故事，是俄國在世界上的權力和斯大林在俄國（被重鑄為「蘇聯」）的權力。在某些方面，本書力圖描繪一部從斯大林的辦公室展開的世界歷史（至少在寫作時感覺如此）。之前我曾以某個工業小城總體歷史的形式，從街頭層面對斯大林時代進行過個案研究。<sup>\*</sup>若從辦公室視角檢視更為廣闊的社會——住所的小策略（the little tactics of the habitat），<sup>†</sup>必然沒有那麼精細，但政權也構成了一種社會。此外，我早先的那本書關注的是權力的來源，行使的方式及後果，這本書也是如此。故事是從斯大林的辦公室開始的，但並不是從他的觀點開始的。當我們觀察他試圖在整個歐亞大陸及以外的地方撬動權力槓桿時，需要記住，在他之前的其他人也執掌過俄國的舵輪。而蘇聯處在同帝俄一樣困難的地理條件之中，同帝俄一樣受到強鄰的打擊，儘管從地緣政治來說，蘇聯面臨的挑戰更大，因為一些曾經屬於沙皇的領土分離出去，成了敵對的獨立國家。同時，相比之前的沙皇國家，蘇維埃國家擁有更現代和更意識形態化的威權主義制度結構，它是斯大林領導的；而斯大林突出的一點是，他能把熱忱的馬克思主義信仰和大國的

xi

---

<sup>\*</sup> 編註：指作者的專著 *Magnetic Mountain: Stalinism as a Civilizati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1)。

<sup>†</sup> 譯註：這一說法來福柯，他認為空間的歷史也是權力的歷史，從地緣政治的大戰略到住所的小策略都是如此。參見福柯《權力的眼睛》（嚴鋒譯，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第152頁。



感情，把反社會傾向和非凡的勤勉及決心，不可思議地結合起來。那位到1928年已不容小覷的人物，他是在甚麼時機、出於甚麼原因而崛起的？查明這些問題是本書的一大任務。另一任務則涉及如何看待單個的人，哪怕是斯大林，在歷史大潮中的作用。

xii 大戰略研究往往特別注重大規模的結構，有時會對偶然性或事件顧慮不周。與之相反，傳記研究則傾向於重視個體的意志，有時會對背後起作用的更大的力量失之考察。當然，傳記和歷史的結合可以相得益彰。本書的目的在於，詳細敘述大大小小的個人，是如何受限於他們的國家相對於別國的地位、國內制度的性質、觀念的強大影響、所處的歷史大勢（戰爭或和平，蕭條或繁榮）以及他者的作為或不作為；這些因素既成就了他們，也制約着他們。就連斯大林那樣的專政者，也只能在一定的範圍內作出選擇。歷史充滿了意外；結果出乎意料和不如人意是常事。歷史格局的改觀，通常並非肇端於那些設法或短或長地掌控它們的人，而嶄露頭角的恰恰是能抓住機會的人。陸軍元帥赫爾穆特·馮·老毛奇伯爵（Helmuth von Moltke the Elder, 1800–1891）擔任普魯士和德國的總參謀長達31年，他把謀略貼切地稱為「權宜之計」或隨機應變，也就是因勢利導的能力。我們將會看到斯大林機詐多謀，一次次地利用了看似不利的形勢。但斯大林的統治也說明，在極其罕見的情況下，個人的決定如何給整個國家的政治和社會經濟結構帶來急劇的變化，並造成全球性的影響。

本書既帶有綜合的性質，也是在俄國的許多歷史檔案館和圖書館以及美國最重要的相關資料館中進行多年原創性研究的成果。在俄國進行的研究收穫頗豐，但有時也會是果戈理式的：有些檔案館對研究者完全「關閉」，但那裏的材料卻照樣在流傳；同一個研究者以前可以查閱，或者可以在研究人員共享的掃描文件中看到的材料，現在突然看不到了。對檔案館之外的檔案材料進行研究往往更有成效。本書還對檔案材料和公開出版的原始文件的縮微膠卷和掃描件作了詳盡的研究。反映斯大林時代的資料，數量增加得非常快，單靠個人的力量幾乎無法窮盡。最後，本書利用了大量的國際學術文獻。例如，要是沒有亞歷山大·奧斯特洛夫斯基（Aleksandr Ostrovskii）對青年斯大林所作的嚴謹研究，很

難想像本卷第一部的樣貌；沒有瓦連京·薩哈羅夫 (Valentin Sakharov) 對所謂弗拉基米爾·列寧 (Vladimir Lenin) 「遺囑」的傳統解釋的尖銳質疑，也難以設想第三部會是甚麼樣子。弗朗切斯科·本韋努蒂 (Francesco Benvenuti) 早在俄國內戰期間就很有預見性地證明了托洛茨基的政治缺陷，而對於這一發現，我在第八章作了進一步展開；最終解開1920年代初牽扯到斯大林和列寧的格魯吉亞事件這一繩結的是傑里米·史密斯 (Jeremy Smith)，讀者們將會發現，第十一章我將史密斯的研究與自己的一些發現結合起來。還有其他很多學者也應單獨列出；他們和上述幾位學者一樣，在尾註中得到了感謝。(我援引的學者大多是根據檔案或其他原始資料提出論證的，而在閱讀他們作品之前或者之後，我本人也常常查閱那些文獻。) 至於我們故事中的主人公，對於探明他的性格和決策，他沒幫上甚麼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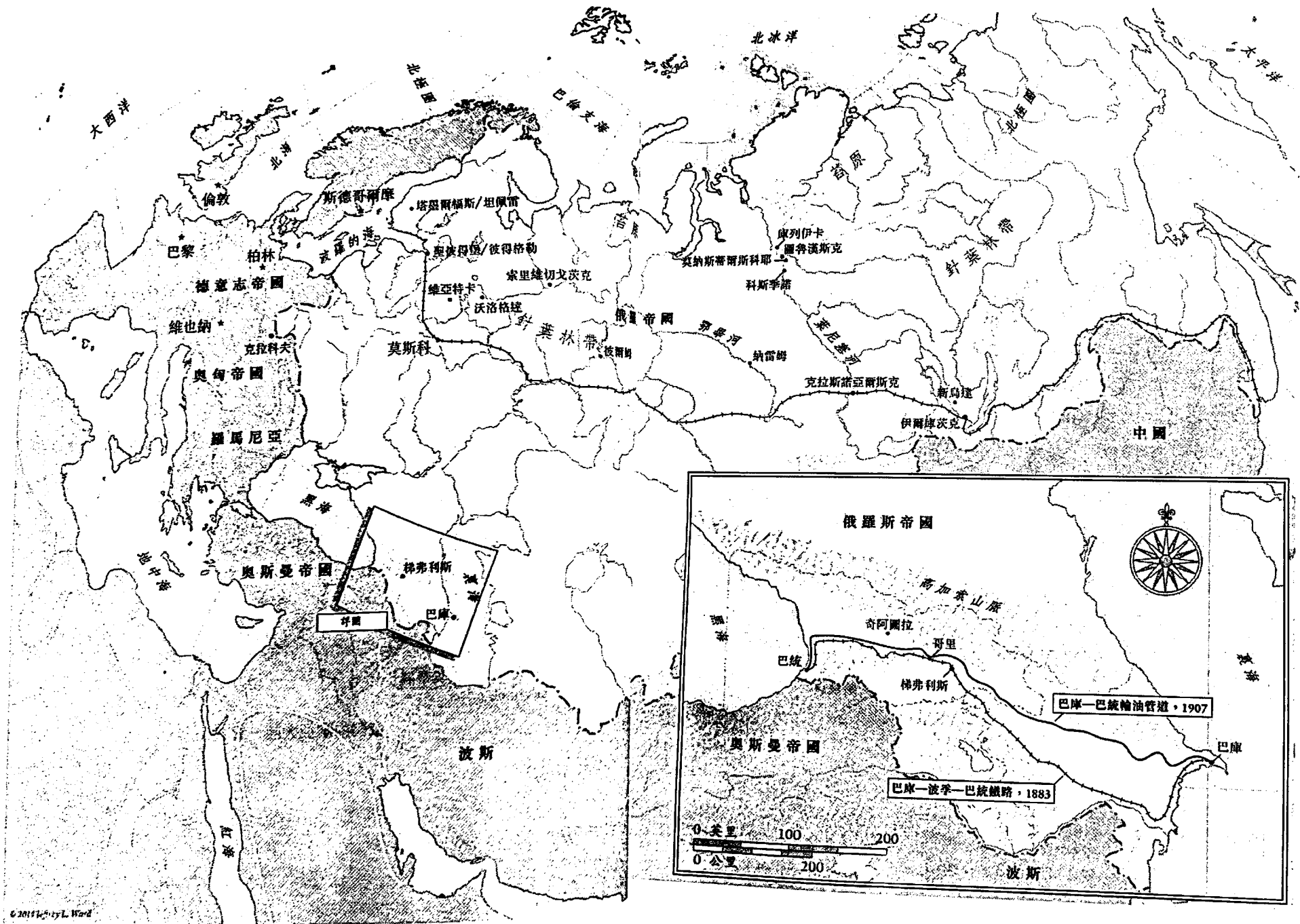
xiii

《斯大林》這部書緣於我的著作經紀人安德魯·懷利 (Andrew Wylie)，他的眼光可以說是出了名的好。企鵝出版社的編輯斯科特·莫耶斯 (Scott Moyers) 以出色而老練的手法不厭其煩地檢查了整部文稿，也讓我對書籍的瞭解大為增進。我在英國的編輯西蒙·溫德爾 (Simon Winder) 提出了一些很有洞察力的問題並給出了很好的建議。同仁們慷慨地提供了深刻的批評，對於內容的完善幫助很大。只是人數太多，無法一一致謝。我的研究和寫作還得到了從普林斯頓大學到紐約公共圖書館等許多優秀機構的支持。我有幸從1989年開始任教於普林斯頓大學，有大量的學術休假；紐約公共圖書館則是我幾十年來一直在發掘寶藏的地方，特別是我在圖書館中由瓊·斯特勞斯 (Jean Strouse) 負責的卡爾曼學者與作家中心待的那一年，收穫巨大。我還非常幸運地得到了一些基金會的資助，包括美國學術團體理事會、美國國家人文科學基金會和約翰·西蒙·古根海姆紀念基金會。最大的支持或許來自斯坦福大學的胡佛研究所。在那裏，我起先是加利福尼亞大學伯克利分校的訪問研究生，最後作為訪問教師參加了一年一度的保羅·格里戈里 (Paul Gregory) 蘇聯檔案工作坊，成為國家研究員，而現在則是聯屬研究員。胡佛研究所的檔案館無所不包，圖書館藏有不少珍本書籍——現在由埃里克·瓦金 (Eric Wakin) 管理得井井有條，對於研究20世紀的俄國/蘇聯來說，那裏依然是莫斯科以外的任何地方都無法企及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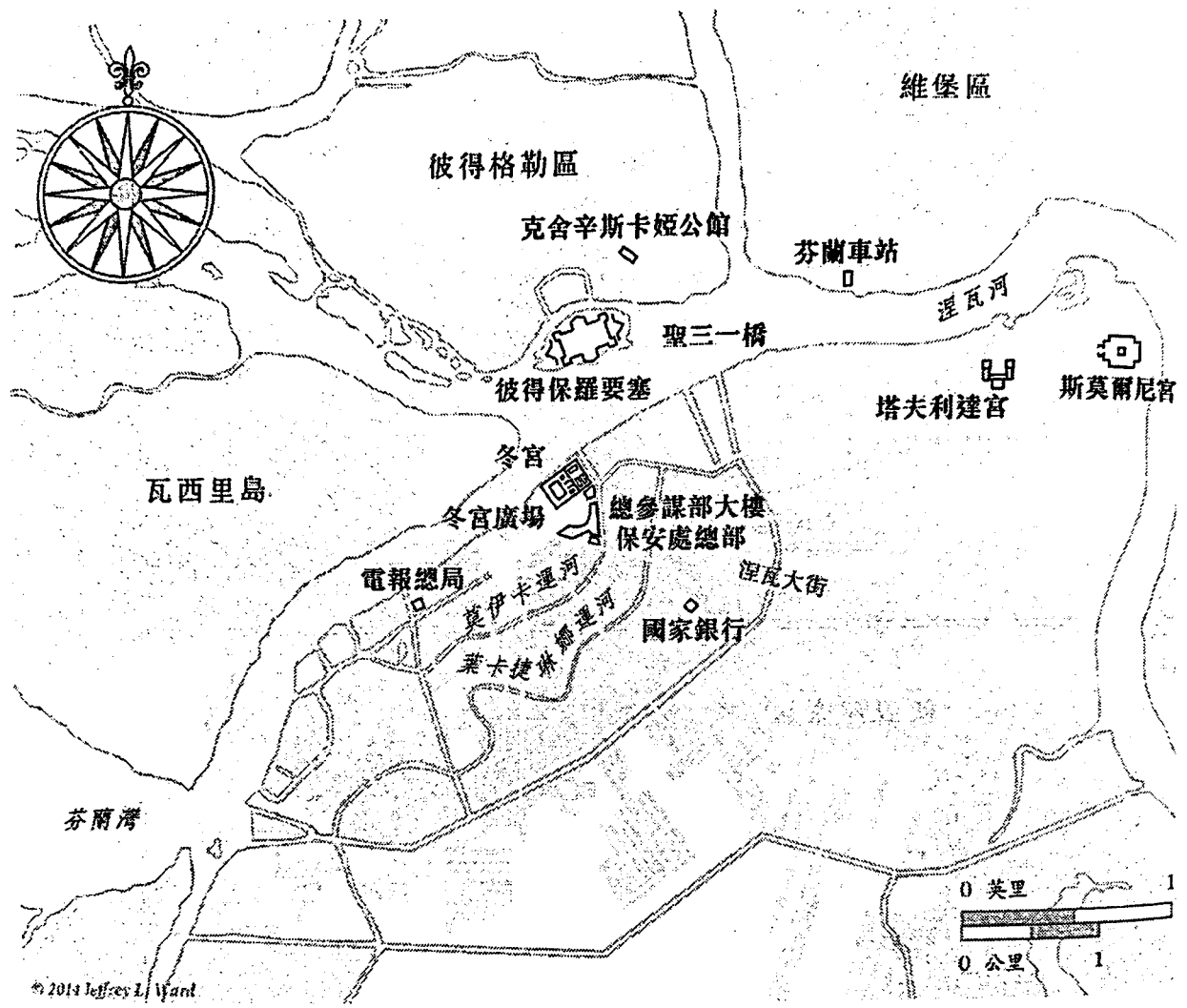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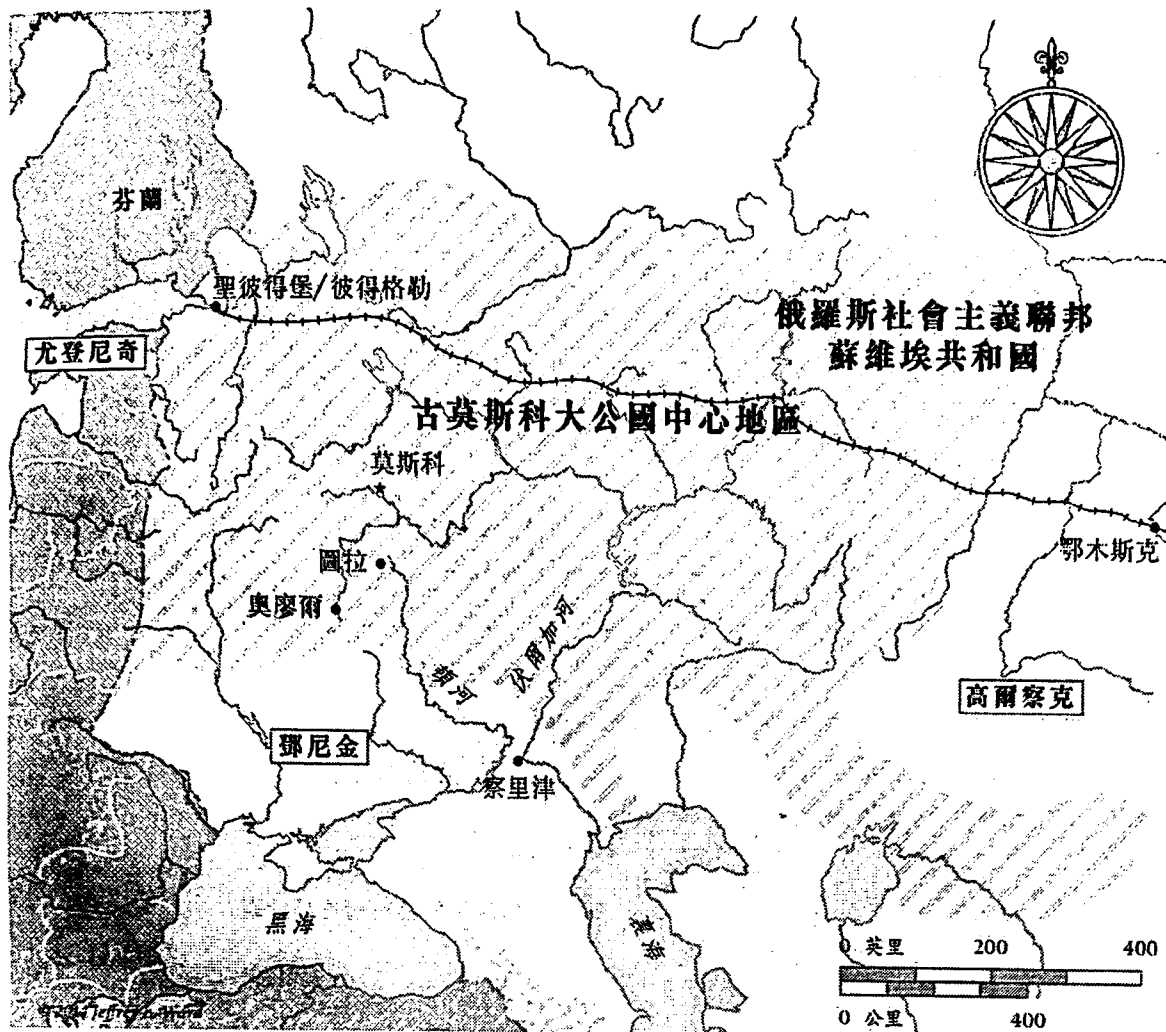
俄國的歐亞大陸，約1913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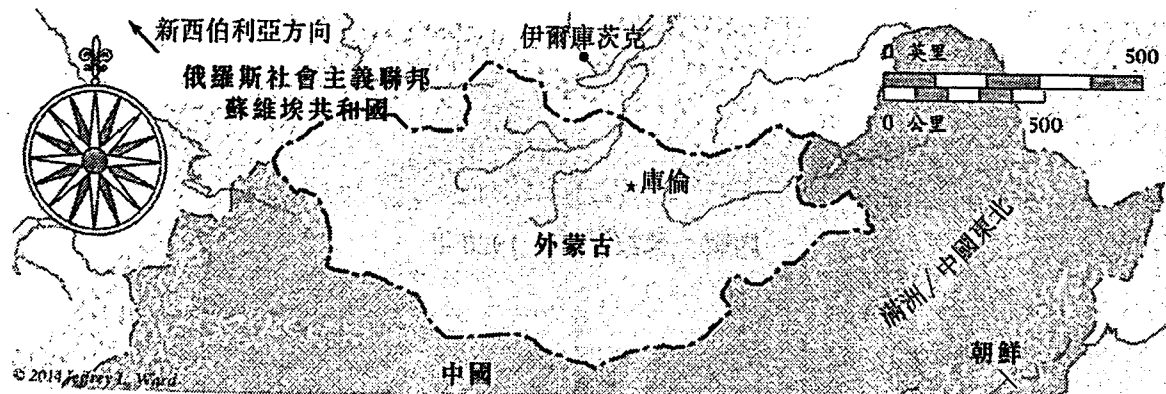
斯大林的活動範圍，1917年之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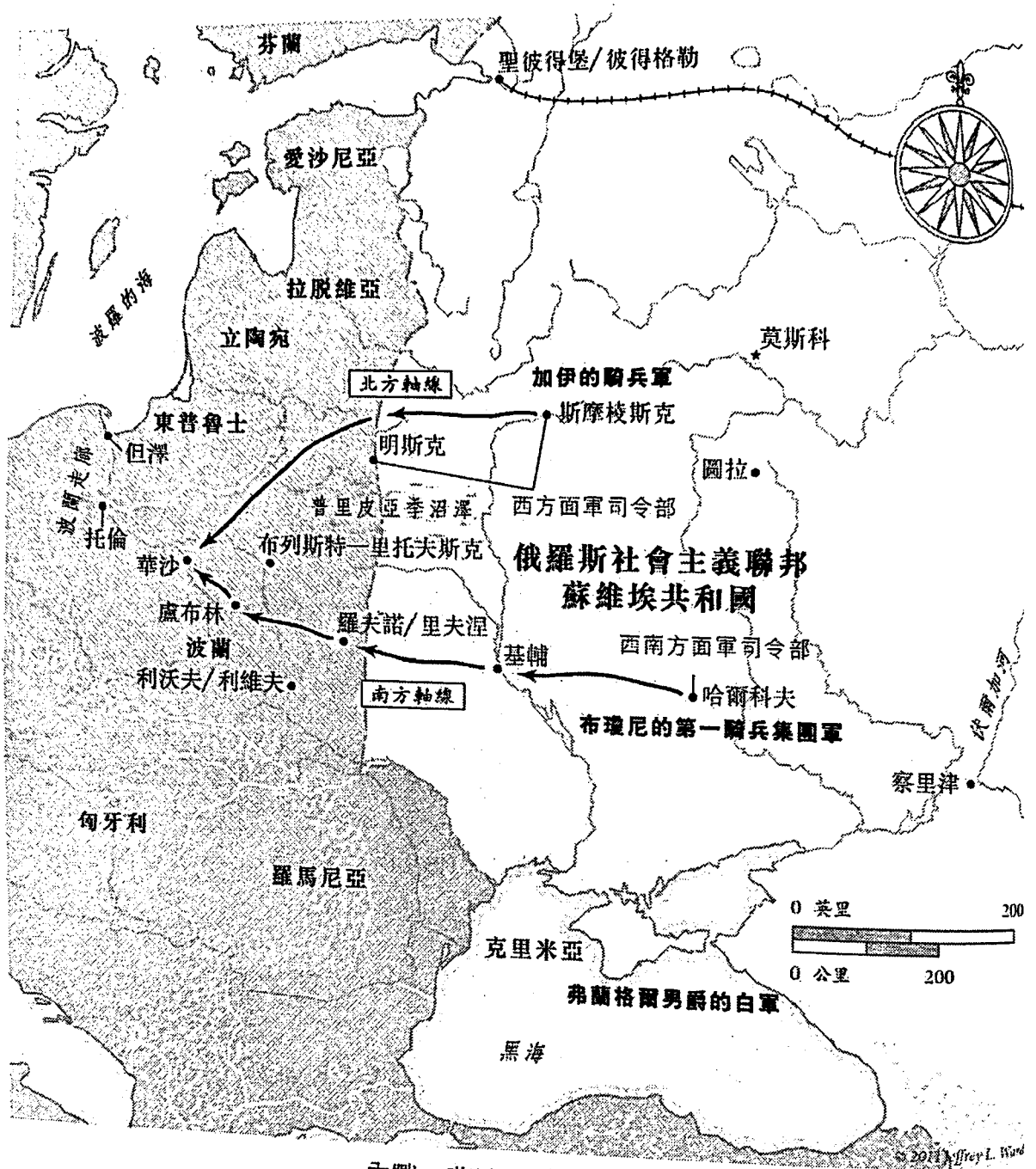
革命中的彼得格勒，1917年



內戰：中心地區，1919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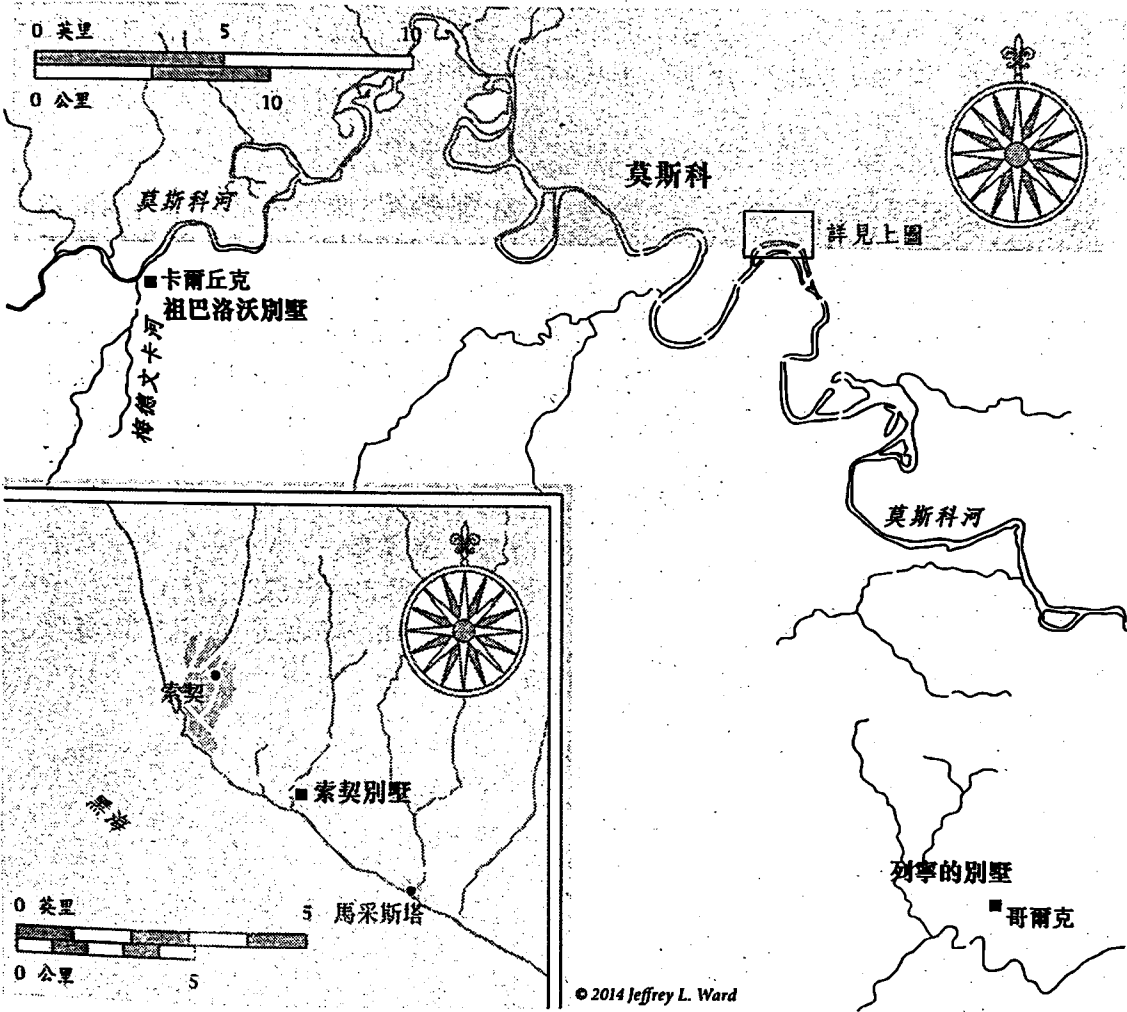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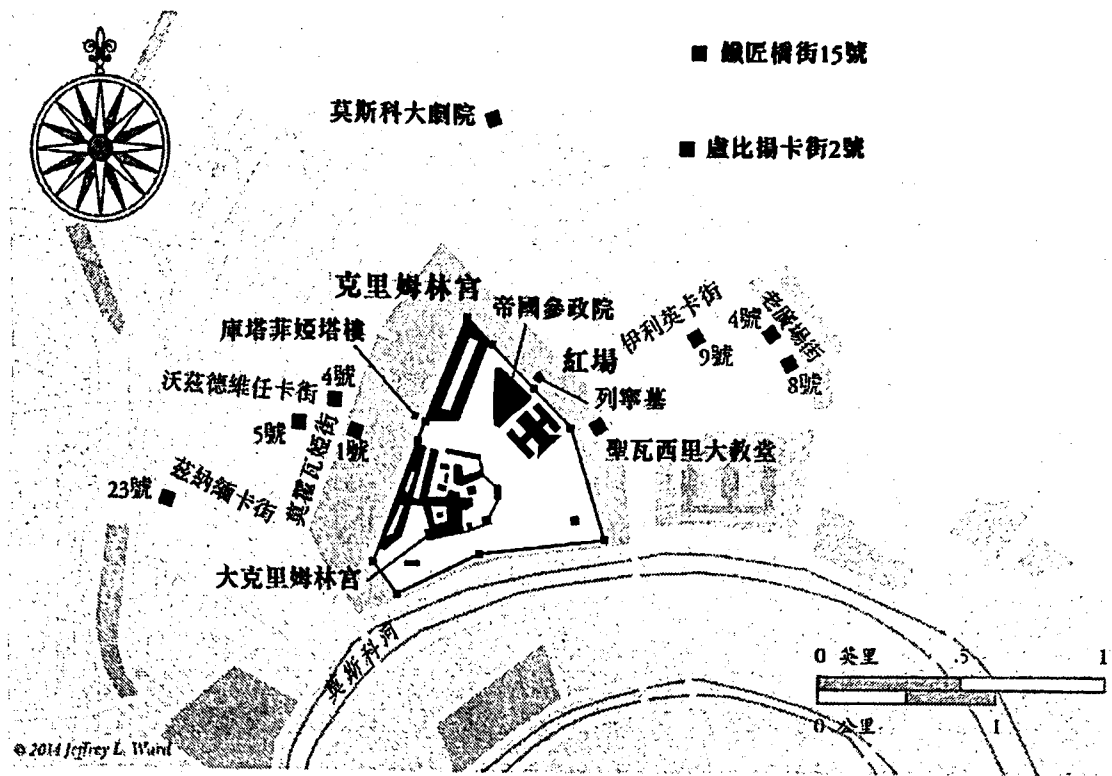
內戰：外蒙古，1921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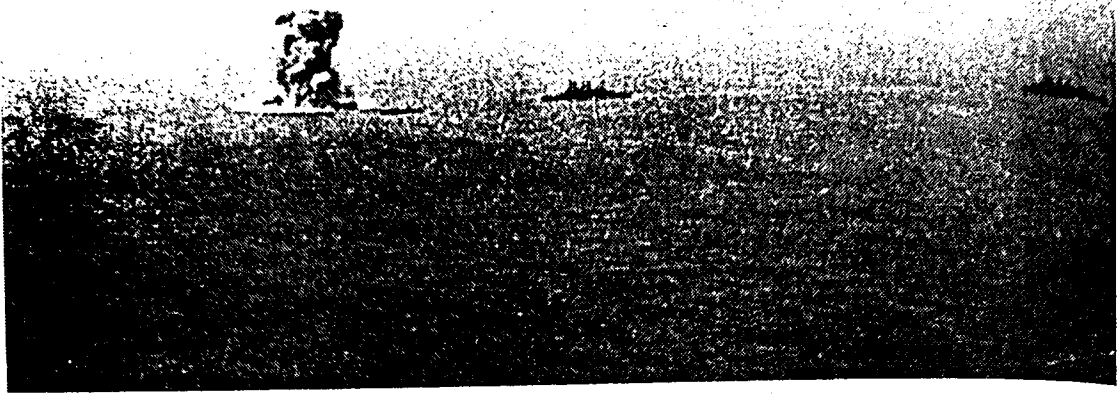
內戰：蘇波戰爭，1920年

© 2011 Jeffrey L. War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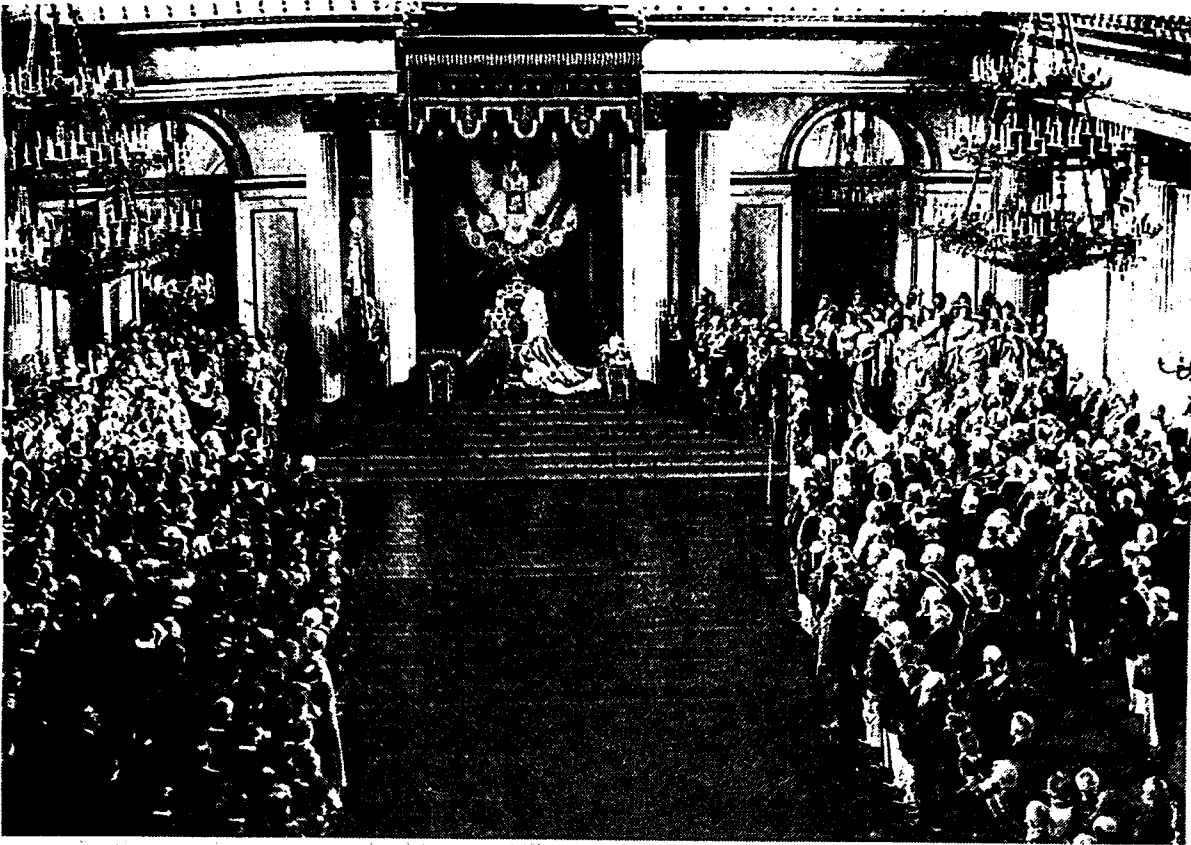
莫斯科市中心，1920年代



1 日本的崛起以及災難的初期跡象：俄國太平洋艦隊的旗艦「彼得羅巴甫洛夫斯克號」在亞瑟港外撞到兩枚水雷之後，俄日戰爭，1904年3月31日。為了挽回損失，俄國不遠萬里，派遣了波羅的海艦隊，但其戰艦旋即也被擊沉。



2 謝爾蓋·維特在新罕布什爾的酒店，1905年8月。維特支持修築跨西伯利亞鐵路，對引發與日本的戰爭負有部分責任，但在俄國戰敗後，他在新罕布什爾的樸茨茅斯通過談判簽訂了一份有利的和約。尼古拉二世任命他為俄國歷史上的首位總理，可又容不下他。



3 沙皇尼古拉二世在冬宮的覲見大廳主持國家杜馬(下院)的開幕儀式，1906年4月27日。對於允許成立俄國歷史上首個立法機關，沙皇很快就後悔了，於是，他就圖謀削弱或取締杜馬。

4 內務大臣彼得·杜爾諾沃。1905至1906年，他的政治鎮壓挽救了君主專制。他的一位同事在回憶時說他「小個子，肌肉發達，有膽量」。季諾維·格日賓(Zinovy Grzhebin)的這幅漫畫是描繪高官的系列諷刺畫作(《奧林匹斯》)之一。





5 彼得·斯托雷平(右數第二位, 身着白色制服), 基輔, 1911年8月, 當時尼古拉二世在慰問基輔省的農民。斯托雷平接替了維特的總理職務, 同時又接替了杜爾諾沃的內務大臣一職。不久, 斯托雷平在基輔歌劇院死於刺客之手。



6 君主專制空心化的隱喻：斯托雷平的國家別墅，1906年8月12日。在早期的這次未遂的暗殺中，28人死亡，其中包括總理15歲的女兒。攝影：卡爾·布拉(Karl Bulla)。



7 維多利亞女王(下排居中)和王室的親戚：德皇威廉二世(下排左邊，正抬頭向上看)，未來的俄國沙皇尼古拉二世(戴圓頂禮帽者)，德國科堡宮，1894年4月21日；這是在維多利亞女王的孫女、薩克森-科堡和愛丁堡孫公主維多利亞·梅利塔(Victoria Melita，「寶貝兒」)與德國黑森的恩斯特·路德維希(Ernst Ludwig)舉行婚禮的兩天後。維多利亞女王的外孫女和新郎的妹妹、黑森的阿利克斯剛剛答應了尼古拉的求婚，不久就成了俄國的亞歷山德拉。



8 六歲的皇位繼承人阿列克謝和他的海軍隨從安德烈·傑列文科，在皇太子母親的家鄉，一起騎着有特殊裝置的自行車，1910年8月。為了防止累着、甚至磕着——要是磕着了，這個患有血友病的小男孩就有可能因失血而死亡——阿列克謝也常常由人抱着。他這種威脅到生命的疾病是從母親那裏遺傳的，而他母親又是從維多利亞女王那裏遺傳的。



9 維薩里昂·「貝索」·朱加施維里。這是唯一一張已知的被認為是斯大林父親貝索的肖像。



10 葉卡捷琳娜·「凱可」·格拉澤，斯大林的母親。



11 左：斯大林出生的房子，哥里，格魯吉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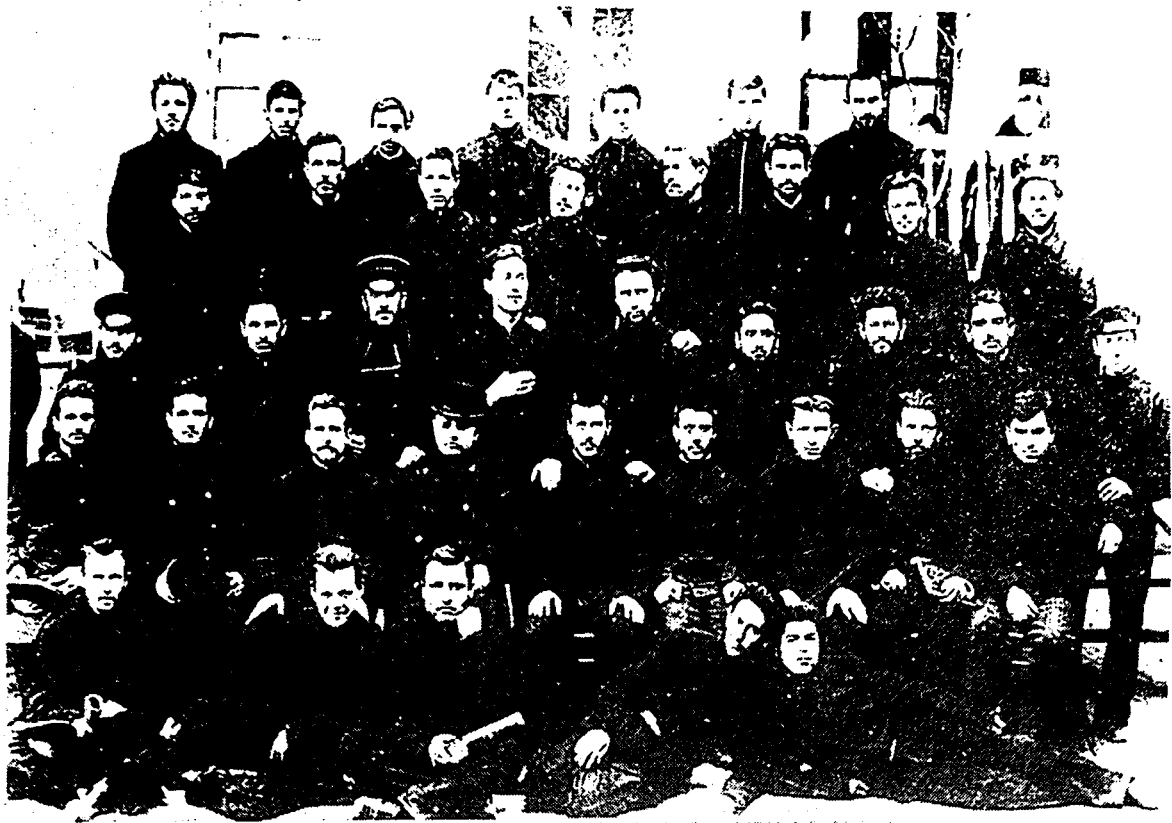


12 右：雅各比·「柯巴」·葉格納塔施維里，哥里的酒館老闆，謠傳他是斯大林的生父。他資助了斯大林上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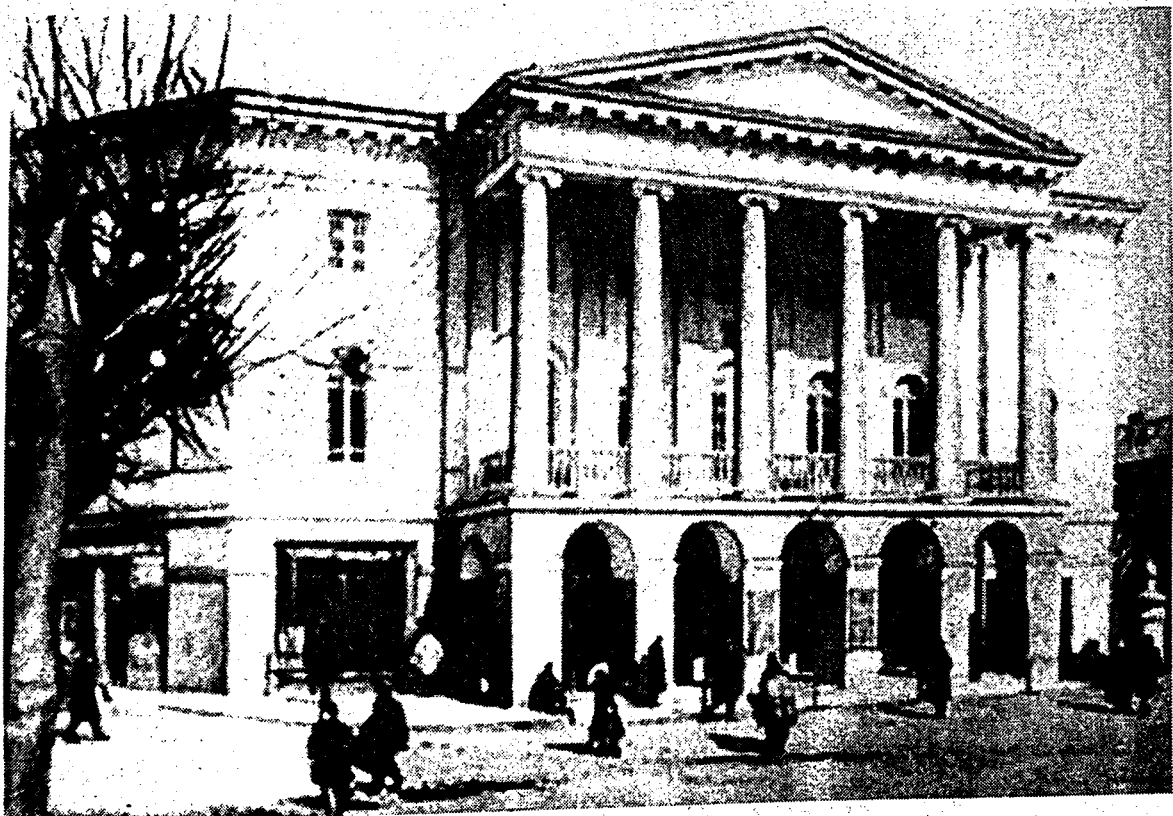


13 哥里教會學校的師生，1892年；13歲的約瑟夫·朱加施維里在最後一排正中間。這是已知的斯大林的第一張照片。





14 梯弗利斯東正教神學院的師生，1896年；朱加施維里（最後一排，左二）臉刮得乾乾淨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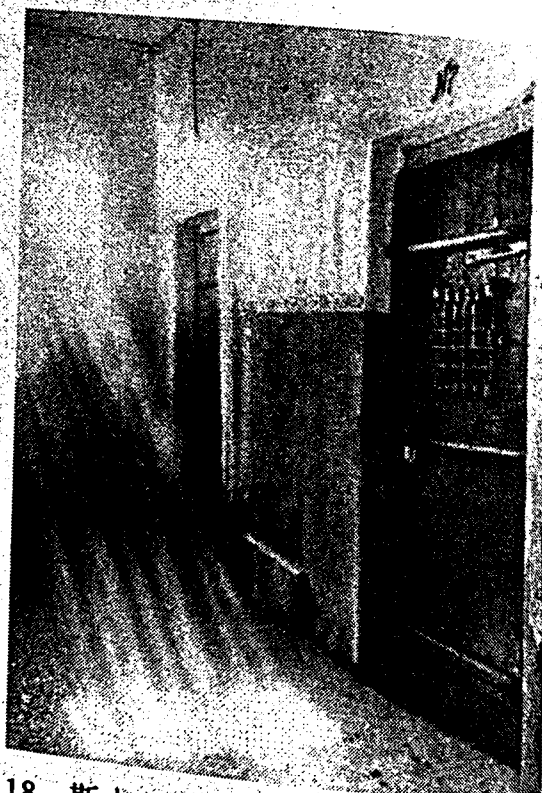


15 新古典主義風格的神學院大樓，別稱「石頭口袋」，在那裏的監視和告密的制度下，斯大林生活和學習了一段時間。

16 拉多·克茨霍維里 (1877-1903)，斯大林在馬克思主義和革命道路上的第一位導師。拉多是被沙皇監獄的看守殺害的，這是許多左翼人物遭遇的命運，本來也有可能落到斯大林頭上。



17 集體合照中斯大林的特寫，庫塔伊西監獄 (格魯吉亞)，1903年。



18 斯大林約1903年被關押在庫塔伊西監獄時的牢房。(攝於1949年)



19 不幸和苦難：斯大林在葉卡捷琳娜·「卡托」·斯瓦尼澤(生於1885年)的靈柩旁，1907年12月。她俘獲了他的心，卻在極大的病痛中離世。他們在前一年剛剛結婚。斯大林將還是嬰兒的雅科夫(生於1907年3月)託付給她的親屬撫養。



20 沙皇警察機關的犯罪嫌疑人斯大林的照片，巴庫，1910年3月30日。一般來說，斯大林在獄中的時間是這樣度過的：讀書、學世界語和闢謠——有關他是警方奸細的傳言雖然沒有得到證實，但從未停止。

第一部  
雙頭鷹

他的地位，在歐洲和亞洲、過去和未來都無人能及。這是世界上聲名最顯赫的人，也是最神秘莫測的人。

——亨利·巴比斯 (Henri Barbusse)  
《斯大林》(1935)



俄羅斯雙頭鷹棲居的地域之遼闊，過往或之後的國家無一能及。那裏不僅有聖彼得堡的宮殿和莫斯科的金色穹頂，還有講波蘭語和意地緒語的維爾諾\*和華沙，德意志人建立的波羅的海港口里加和雷瓦爾†，講波斯語和突厥語的綠洲布哈拉和撒馬爾罕（帖木兒墓葬所在地），以及太平洋附近薩哈林島上的阿依努人。「俄羅斯」包括肥沃的烏克蘭險灘和哥薩克村落，西伯利亞的沼澤和陷阱。其疆界遠達北極和多瑙河、蒙古高原和德意志。高加索山脈的屏障也被突破並圈入其中，讓俄羅斯延伸到黑海和裏海，與伊朗和奧斯曼帝國接壤。帝俄的宗教紛然雜陳，有大量的正教教堂、清真寺、猶太會堂、舊禮儀派教徒的祈禱堂、天主教堂、亞美尼亞使徒教會的教堂、佛教廟宇以及薩滿教的圖騰。帝國遼闊的疆域成了商人的樂土，最典型的便是草原的奴隸市場，以及後來伏爾加河流域的路口集市。奧斯曼帝國橫跨三個大陸（歐洲、亞洲和非洲），但20世紀初有些觀察家認為，橫跨兩個大陸的俄羅斯帝國既不屬於歐洲也不屬於亞洲，而是自成一體的第三種存在：歐亞大陸。話雖如此，威尼斯駐奧斯曼帝國大使（阿戈斯托·納尼〔Agosto Nani〕）形容奧斯曼帝國的話——「與其說是一個國家，不如說是一個世界」——也同樣適合俄羅斯。斯大林的統治將會給那個世界帶來巨變、希望和災難。

---

\* 譯註：波蘭語地名，現為立陶宛首都維爾紐斯。

† 譯註：德語地名，現為愛沙尼亞首都塔林。

斯大林生在高加索的貿易和手工藝之城哥里。他出身寒微，父親是鞋匠，母親做些漿洗縫補的營生。但是在1894年，他進了高加索第一大城市梯弗里斯的東正教神學院，學習成為一名神父。要是那年有個俄羅斯帝國的臣民睡着了，30年後醒來時就會遇到很多驚人的事情：到1924年，有個叫電話的東西隔着很遠的距離就能實現幾乎即時的交流，車輛不用馬拉也能行駛，人在天上飛，X射線可以看到人體內部。一種新的物理學設想原子內部有不可見的電子，而原子在輻射時會發生裂變。還有理論認為，空間和時間彼此相關，可以彎曲。女人，有的當了科學家，有的炫耀新奇的髮型和服飾，並以此為時尚。小說讀起來是夢幻般的意識流，僅僅描繪形狀和色彩的畫作也會得到很多人的讚賞。<sup>1</sup> 由於所謂的世界大戰\* (the Great War, 1914–1918)，全能的德國皇帝下台了，與俄國為鄰的兩大宿敵奧斯曼帝國和奧匈帝國消失了。俄羅斯本身基本完好，但其統治者出身卑微，而且來自帝國的邊疆。<sup>2</sup> 對於我們假想的這位沉睡30年並在1924年醒來的瑞普·凡·溫克爾 (Rip Van Winkle) † 來說，這樣的情形——一介平民，而且是格魯吉亞人，接過了沙皇的權杖——實在是太驚人了。

像斯大林那樣從帝國邊緣地帶走上權力的最高層，雖不常見，但也不是沒有先例。1769年，八個孩子中排行第二的拿破侖·迪·波拿巴 (Napoleone di Buonaparte) 出生在科西嘉。那是地中海上的一座島嶼，前一年剛剛(由熱那亞共和國)被併入法國。這個年輕人因而獲得一定的權利，可以進入法國的軍校。拿破侖從來沒有改掉自己的科西嘉口音，可他不但升為法國的將軍，還在35歲時成了法國世襲制的皇帝。平民阿道夫·希特勒 (Adolf Hitler) 的出生地完全在他日後統治的國家之外：他來自哈布斯堡王朝的邊疆，1871年德國統一時把那裏漏掉了。1913年，24歲的希特勒從奧匈帝國搬到慕尼黑，正好趕上加入德意志帝國的陸軍參加世界大戰。1923年，希特勒因為後來的所謂慕尼黑「啤

---

\* 編註：即第一次世界大戰，下同。

† 譯註：美國作家華盛頓·歐文 (Washington Irving, 1783–1859) 小說中的主人公，他沉睡幾十年，醒來時發現人間已經發生了巨變。

酒館暴動」而犯下叛國重罪，但一名有民族主義傾向的德國法官無視相關法律，沒有將這個並非德意志公民的人驅逐出境。兩年後，希特勒放棄奧地利國籍，成了無國籍人士。直到1932年，他才獲得德國國籍，當時他是以某種藉口入籍的（表面上是要擔任布倫瑞克的「土地測量員」，而布倫瑞克是納粹黨的選舉根據地）。次年，希特勒被任命為德國總理，走上了成為獨裁者的道路。按照希特勒或拿破侖的標準，斯大林的確是作為他所屬帝國的臣民長大的，因為早在他出生前77年格魯吉亞大部分地區就併入了俄國。儘管如此，他從卑微的邊緣地帶一躍而起仍然是不太可能的。

要解釋斯大林的專政政權，難度很大。他掌握着橫跨11個時區的所有人——戰前最高峰超過兩億人口——的生殺大權，就連沙皇俄國最偉大的專制君主也要自嘆弗如。這樣的權力在年輕的索索·朱加施維里(Soso Jughashvili)\*的傳記中是發現不了的。就像我們將會看到的，斯大林的專政統治是一些巨大的結構性力量的產物：俄國專制政治體系的演變；俄羅斯帝國對高加索的征服；沙皇政權對秘密警察的依賴以及與恐怖主義的牽連；歐洲社會主義的空中樓閣；布爾什維主義的地下密謀性質（沙皇專制的翻版）；儘管具備了所有條件，但俄國的極右勢力並沒有發展成法西斯主義；全球性的大國競爭，以及破壞力驚人的世界大戰。沒有這一切，斯大林永遠不可能和權力沾邊。除了這些大的結構性因素之外，還有一些偶然因素，例如沙皇尼古拉二世(Nicholas II)戰爭期間的退位，亞歷山大·克倫斯基(Alexander Kerensky, 1917年取代沙皇的臨時政府的最後一位首腦)的失算，布爾什維主義的許多左翼競爭力量的作為、尤其是不作為，列寧的多次中風和他在1924年1月的早逝，以及布爾什維克中斯大林的競爭對手的自負和愚笨。

還可以進一步設想，年輕的朱加施維里本有可能會像他的眾多鄰居一樣死於天花，或者被巴統和巴庫貧民區中特有的其他致命疾病奪走生命——他在那裏鼓動社會主義革命。警察機關的工作要是稱職，本來是

---

\* 編註·索索是斯大林的暱稱；約瑟夫·朱加施維里是斯大林的本名。詳見第一章。



可以判他到銀礦做苦役 (*katorga*) 的，而許多革命者都在那裏早早地死去了。朱加施維里本有可能在 1905 年革命後的鎮壓中成為法外處決的一部分，在 1906 至 1907 年間被當局絞死 (1905 至 1906 年間，有 1,100 多人被絞死)。<sup>3</sup> 或者，朱加施維里也可能由被他戴了綠帽子的很多同志殺掉。即便斯大林在童年或青年時死去，也不會阻止世界大戰、革命及混亂，後羅曼諾夫皇朝的俄國還是有可能出現某種形式的威權主義統治。但對於這位出身卑微的年輕人而言，他出人頭地的決心，他的機詐，他久經磨練的組織才能，將有助於改變 1917 年以來布爾什維克革命初期的整個結構性景觀。斯大林在布爾什維克專政內部殘酷、巧妙而又頑強地建立起了個人的專政。然後，他發動並完成了對整個前帝國血腥的社會主義改造，領導並打贏了人類歷史上最大的戰爭，讓蘇聯成為全球事務的中心。最終，就像我們將會看到的，一部斯大林的傳記要比其他任何歷史人物——哪怕是甘地或丘吉爾——的傳記更接近於一部世界史。



世界歷史是由地緣政治推動的。在各個大國當中，大英帝國對於塑造現代世界的作用首屈一指。1688 至 1815 年，法國人與英國人爭奪全球霸主地位。儘管法國的陸地面積更大、人口更多，英國卻主要憑藉更勝一籌的財力和軍力成為贏家。<sup>4</sup> 等到最後與其他國家聯手打敗拿破侖時，英國人已然成為統治世界的力量。此外，他們的崛起恰逢清王朝統治下中國的衰落，這使得英國在政治、軍事、工業、文化和財政上真正成為全球性的力量。經常用來形容帝國疆域遼闊的形象說法「日不落」，最初是與更早的西班牙帝國聯繫在一起的，但這個說法被用在了英國人身上，並與之緊緊相連。不過，到了 1870 年代，英國統治下的世界出現了兩道裂縫：一是奧托·馮·俾斯麥侯爵 (Otto von Bismarck) 統一了德國——這是由老毛奇用武力實現的。結果，就像閃電一樣，一個實力超群的新強國出現在歐洲大陸；二是日本的明治維新，給一個東亞的新強國注入了強勁的動力。突然之間，帝俄既要在不安定的西部邊界面對世界上最具活力的新強國，又要在人煙稀少的東部邊

界面對亞洲最具活力的新強國。俄國進入了一個新世界。這就是斯大林出生的世界。

就連我們稱之為現代性的那一套特徵，也並非某種內在的社會學過程——擺脫傳統——的結果，而是地緣政治惡性競爭的結果。在這種競爭中，一個國家必須在現代的鋼鐵生產、現代的軍隊，以及現代的、以群眾為基礎的政治體系方面，能與其他大國相匹敵，否則就會被碾壓，有可能淪為殖民地。<sup>5</sup> 保守派統治集團尤其要面對這些挑戰。眾所周知，卡爾·馬克思 (Karl Marx)，那位激進的德國記者和哲學家，對帝俄的影響要超過其他任何地方。但在斯大林一生中的大部分時間裏，是另外一個德國人，並且是個保守派，對帝俄的影響最大——他就是奧托·馮·俾斯麥。作為鄉紳，俾斯麥出身於勃蘭登堡東部一個信奉新教的容克家庭，他曾就讀於哥廷根大學，加入過兄弟會 (*Burschenschaften*)，並且是出了名的貪酒好色。1862年以前，俾斯麥從未擔任過任何行政職務，只做過駐俄大使和駐法大使。但不到十年，他就成了鐵血宰相，以普魯士為基礎打造了一個強大的新國家。普魯士作為有名的「尋找國家的軍隊」，終於找到了國家。與此同時，這位持右翼立場的德國總理還向各地的統治者展示了如何培育更廣泛的政治基礎、發展重工業和建立社會福利制度，以及如何為了維護現代的國家權力而在一干野心勃勃的大國中縱橫捭闔。

俾斯麥是幾百年一遇的政治家。他巧妙地打敗了德意志諸邦國內外的大量對手，挑起了三次快速、重大但有限的戰爭，先後擊潰丹麥、奧地利和法國，但為了保持均勢，他保留了多瑙河畔的奧匈帝國。如果勝券在握，他就製造攻擊的藉口，或從外交上孤立其他國家，誘使它們發動戰爭。他確保握有備選方案，並且讓這些不同的方案相互競爭。不過，對於德國的統一，俾斯麥根本沒有任何總體規劃，他的計劃乃是即興之作，並且部分是出於對國內的政治考量 (馴服普魯士議會中的自由派)。但他不斷地把環境和運氣發揮到極致，突破了結構上的限制，腳踏實地創造了新的現實。「與其說政治是科學，不如說是藝術，」俾斯麥後來說，「這門學科是教不會的。一個人必須具備這方面的天賦。要是執行不當，哪怕是最好的建議也沒有用。」<sup>6</sup> 他還把政治說成是打牌、

擲骰子一般帶有運氣成分的遊戲。「即便是這個世界上最精明的人，也隨時會像孩子一樣墮入黑暗」，對於自己1864年挑起的丹麥戰爭的勝利，俾斯麥如此評價。<sup>7</sup>他抱怨說這是「一件吃力不討好的事情……必須推算出一系列很可能發生的和不可能發生的情況，並根據推算制訂計劃」。俾斯麥不把希望寄託於美德，而是僅僅寄託於權力和利益。這種執政風格日後被稱為「實用政治」(*realpolitik*)。該說法是奧古斯特·馮·羅豪(August von Rochau, 1810–1873)提出的，他是德意志民族自由黨成員，對於1848年未能取得突破、推行憲法感到失望。實用政治原本是指，使用行之有效、切合實際的政治手段，去實現理想主義的目標。俾斯麥的風格更類似於俗話說的「以國家利益為重」——基於算計而不顧及善惡的國家利益。問題不在於原則，而在於目標；不在於是非，而在於手段。<sup>8</sup>俾斯麥遭受到普遍的憎惡，直到他最後取得輝煌的成就，因打敗法國、把奧地利變成附庸、統一德國而被捧到天上。

接着，俾斯麥又同奧匈帝國和意大利組建三國同盟(1882)，與俄國秘密簽訂再保險條約(1888)，得到了萬一發生衝突將保持中立的承諾，因而避免了與法俄兩線作戰的可能性，突出了新德國在歐洲大陸的掌控力。他的天賦屬於密室中的天賦。他講話的聲音不大、不自信，與公眾接觸也不多。此外，他不是統治者，行事要順着國王(和後來的皇帝)威廉一世(Wilhelm I)的意願。在那種極端重要的關係中，俾斯麥憑藉心理上的技巧和韌性，一直有效地操縱着威廉一世，他時而威脅說要辭職，時而又裝模作樣，擺出各種姿態。威廉一世實際上是個勤勉、體貼和聰明的君主，知道甚麼情況下該在政策上聽從俾斯麥的意見，知道該怎樣捋平鐵血宰相豎起的羽毛。<sup>9</sup>為了讓自己顯得不可或缺，俾斯麥的策略是在一定程度上儘量把事情複雜化，這樣一來，就只有他一個人知道是怎麼回事(這一點成了他人所共知的套路)。他總是把很多球拋在空中，而為了不讓球掉下來，他就要一邊不停地接球，一邊把更多的球拋上去。還有一點必須記住，俾斯麥得益於當時世界上最好的陸軍(以及或許是排在第二位的海軍)。

歐洲各地其他想要成為政治家的人，把俾斯麥的「政治藝術」當作學習的榜樣。<sup>10</sup>毫無疑問，從法治傳統深遠的倫敦的角度來看，俾斯麥是

個威脅。但是從聖彼得堡——那裏的挑戰是找到可以對付左翼極端主義的支柱——的角度來看，他就像救星。無論從哪個角度看，他在沒有群眾運動的支持，沒有突出的從政經驗，而且還要面對一批難以對付的利益集團的情況下，通過統一德國擴張了普魯士的勢力，這一點絲毫不遜色於過去兩個世紀以來任何一位領導人最偉大的外交成就。<sup>11</sup> 此外，俾斯麥間接地向自己戰勝過的那位統治者——法國的拿破侖三世 (Napoleon III) ——表示敬意，讓成年男性有了普選權，把保守派的政治命運寄託在農民的德意志民族主義上，以支撐議會的統治。「要是靡菲斯特\* 登上講壇宣讀福音，有人會因為這種祈禱而受到激勵嗎？」落了下風的德國自由派報紙憤憤地說道。俾斯麥還鼓動德國的保守派支持廣泛的社會福利立法，從而在策略上戰勝社會主義者。還有一個情況也進一步彰顯了俾斯麥統一大業的重要性，那就是剛剛統一的德國很快就迎來了經濟發展的高潮。這個國家似乎一夜之間就在現代工業的一些關鍵領域，比如鋼鐵和化工，超過了世界頭號強國英國。當英國開始陷入(相對)「衰落」的時候，俾斯麥的新德國卻在推動世界秩序的調整。德國「像一座巨大的鍋爐，」有俄國人評論說，「多餘的蒸汽產生得極快，因此迫切需要有一個出氣口。」<sup>12</sup> 正如我們將會看到的，俄國的統治集團，或者至少是其中比較能幹的那部分人，開始癡迷於俾斯麥。成為帝俄另外一隻雙頭鷹的，不是一個而是兩個德國人：俾斯麥和馬克思。



斯大林對我們來說似乎是太熟了。他的父親揍他；東正教神學院壓迫他；他產生了某種「列寧情結」，要超越自己的導師，然後又仔細研究過「恐怖的伊萬」，這一切導致數百萬人慘遭殺害——這種比較陳舊的形象早就沒有甚麼說服力了，哪怕是增加了對俄國政治文化和政治人物分析的高級版本也是如此。<sup>13</sup> 羞辱的確往往會使人變得野蠻，但斯大林的童年是不是像人們常說的那樣不堪回首，現在還不清楚。他身體

---

\* 編註：浮士德 (Faust) 故事中的人物，引誘人類墮落的惡魔。

畸形，多次生病，卻思想活躍，渴望自我完善，而且顯露出領袖才能。不錯，他是有點喜歡惡作劇。「小索索非常淘氣，」他的夥伴格里戈里·伊麗莎白施維里 (Grigory Elisabedashvili) 回憶說，「他喜歡彈弓和家裏做的弓。有一次，有個牧人正趕着牲口回家，索索跳出來，用彈弓射中了一隻牲口的頭。那頭公牛生氣了，牲口們互相踩踏，待牧人要追趕索索，他卻已經沒影了。」<sup>14</sup> 但和年幼的斯大林熟識的那些同輩表親們，一直跟他保持聯繫，直到他去世。<sup>15</sup> 斯大林的許多老師也活到了能寫回憶錄的年紀。<sup>16</sup> 此外，即使他的童年如同許多人片面描寫的那樣悲慘，這跟日後的斯大林也沒有多大關係。列夫·托洛茨基 (Lev Trotsky) 的做法對我們也沒有多大幫助。托洛茨基對斯大林不屑一顧，認為他不過是官僚主義的產物，是個「一般水平的委員 (*komitetchik*)」，也就是說，既趕不上真正的無產者，也不如真正的知識分子 (即托洛茨基)。<sup>17</sup> 斯大林的父母都是農奴出身，沒有受過正規教育，但他的家人，包括他飽受非議的父親，都很努力。斯大林的家鄉哥里，常常因落後而受人譏笑，卻給他提供了重要的受教育的機會。

較新的青年斯大林形象——採用了大量新近獲得的原始資料 (包括拉夫連季·貝利亞 [Lavrenti Beria] 1930年代徵集並塑造的回憶錄)——再現了那位能幹的學生和天才。不過，這些回憶錄也被用來描繪出一個讓人難以置信的傳奇人物，一個富有東方色彩的情種和充滿男子漢氣概的強盜。<sup>18</sup> 這樣做可以增加閱讀的趣味性，也含有一些可貴的新發現。不過，這種新的形象說服力也不夠。青年斯大林血氣方剛，不免沾花惹草。但他不是專門勾引婦女的浪蕩子。馬克思和恩格斯 (Friedrich Engels) 都有私生子——馬克思和他的女管家有染，恩格斯為了保護馬克思而聲稱自己是孩子的父親——但馬克思顯然不是因此史上留名的。<sup>19</sup> 年輕的薩達姆·侯賽因 (Saddam Hussein) 也寫詩，但這位伊拉克人在成為巴格達獨裁者的幾十年前，是個真正的刺客。青年斯大林是個詩人，但決不是刺客。他也不是甚麼高加索的黑幫老大，不管貝利亞認為這樣的形象多麼有利於討斯大林的歡心。<sup>20</sup> 青年斯大林在不同時期確實吸引過幾個小幫派的追隨者，但時間都不長。實際上，關於斯大林的地下革命活動，最重要的事實是，他在高加索根本沒有打下牢固的政

治基礎。斯大林到首都去的時候，身邊沒有薩達姆·侯賽因的那種「提克里特網絡」(Tikriti network)。<sup>21</sup> 經過審慎的檢查可以發現，青年斯大林在設立非法印刷所、煽動罷工和策劃財產侵佔剝奪方面，顯然都取得過成功。斯大林在1907年梯弗里斯大劫案中所起的幕後作用——此事得到庫恩·米克洛什的證實，並由西蒙·塞巴格·蒙蒂菲奧里作了精彩的描述——的確表明青年斯大林為了事業幾乎甚麼都願意做。<sup>22</sup> 但搶劫本身不是目的。社會主義和社會正義，連同他自己地位的提升，那是當時的事業。對於成為他終身使命的東西，沒有甚麼會讓他分心，少女、暴力和同志間的友情都不能。

9

本書不會去作跳躍性的猜測，也不會追求所謂的填補斯大林生平的空白。<sup>23</sup> 本書將小心地穿行於各種活靈活現卻不太可信的傳說中。由於政權的謊言、競爭對手的誹謗和文件的佚失，未來的斯大林在高加索從事地下革命活動的情況是一片混亂。<sup>24</sup> 但我們還是可以肯定地說，從社會民主黨隊伍內部的情況來看，認為斯大林特別奸詐地去出賣同志的說法是可笑的。斯大林既專橫(和列寧、托洛茨基一樣專橫)又暴躁(也和列寧、托洛茨基一樣暴躁)。他不會忘記受到的怠慢，這在盛行血仇文化的高加索司空見慣，在自戀者當中也很常見(自戀者是對許多職業革命家的另一種稱呼)。不錯，和大多數人相比，青年斯大林總是引起同事的反感，因為他不管自己的正式任務是甚麼，不管自己的成就如何，總想發號施令，然後又總把自己看作受委屈的一方。斯大林常常是愛交際的，但他同樣是喜怒無常和冷漠的，這讓他顯得疑心較重。通常情況下，對他有吸引力的是和他一樣的人：出身卑微的知識分子新貴。(他「身邊只有無條件尊重他和所有事情都順着他的人」，有位反對者後來寫道。)<sup>25</sup> 不過，在1905至1908年狂熱的革命歲月中，實際上青年斯大林主要是個時評家，為一些印數很少的出版物撰寫評論。但那些出版物是非法的，所以他總是東奔西跑，在警察的追蹤下往來於梯弗里斯、巴統、奇阿圖拉、巴庫和高加索的其他地方；此外還有塔墨爾福斯(俄屬芬蘭)、倫敦、斯德哥爾摩、柏林、維也納和歐洲的其他地方，以及歐俄北方的沃洛格達和東西伯利亞的圖魯漢斯克。<sup>26</sup> 未來的斯大林有一點比較特別，那就是他從未想過要移居國外。他的早期生活差不多

是地下革命者的典型生活：1901至1917年，總共大約有七年時間是在西伯利亞流放或者在某地坐牢，此外還短期去過幾次國外。尤其是在1908年之後，他窮困潦倒，到處求人施捨，心中忿忿不平，並同其他囚犯和流放者一樣，在百無聊賴中度日。

將會成為斯大林的那個人，既是俄羅斯帝國在格魯吉亞駐軍的產物——他父親搬到哥里就是為了給軍隊做鞋子；又是帝國行政官員和神職人員的產物，他們的俄羅斯化措施既讓斯大林有了受教育的機會，也在無意中放大了19世紀後期格魯吉亞的民族意識，而那種民族意識對他的影響是很大的。<sup>27</sup> 後來，斯大林的小兒子對他姐姐吐露秘密，說父親年輕時是格魯吉亞人——的確如此。「啊，可愛的國度，鮮花遍地/伊比利亞人的鄉村，充滿歡樂/所以你們，啊，格魯吉亞人，要用學習/把喜悅帶給自己的祖國」，17歲的朱加施維里在他的一首早熟、浪漫的格魯吉亞詩歌（〈清晨〉）中寫道。<sup>28</sup> 在人生的頭29年，他只用格魯吉亞文發表文章。「他說的是特別純正的格魯吉亞語，」有個在1900年遇到過斯大林的人回憶說，「他發音清晰，談吐風趣幽默。」<sup>29</sup> 當然，至少按傳統的觀點來說，斯大林作為格魯吉亞人實際上有點差勁：過於沒有榮譽感，對朋友和家人不能堅貞不二，不把舊債放在心上。<sup>30</sup> 不過，格魯吉亞是個多樣化的國度，未來的斯大林因此才學會了亞美尼亞口語。他還會一點世界語（創造出來的國際主義語言），學過德語（那是左翼人士的母語），但不精通，也讀過柏拉圖的希臘文原典。最重要的是，他的帝國語言——俄語——說得非常流利。結果，這位年輕人不僅喜歡格魯吉亞民族詩人紹塔·魯斯塔維里（Shota Rustaveli）的警句（「親密的朋友原來是比敵人還危險的敵人」），<sup>31</sup> 還喜歡安東·契訶夫（Anton Chekhov）悲憫動人、難以言傳的作品——他的《櫻桃園》（1903）描寫了投機商的斧子如何砍倒了小貴族的櫻桃樹（那處莊園和大宅賣給了一個庸俗的資產階級）。斯大林既沉浸在俄羅斯帝國之中，又沉浸在格魯吉亞的歷史中。

在俄國布爾什維克革命的背景之下，除了格魯吉亞人的出身之外，讓斯大林與眾不同的還有他對於自我完善的巨大熱忱。他狼吞虎咽地讀書，而作為馬克思主義者，他之所以這樣做，是為了改變世界。或許再也沒有甚麼比他強烈的政治宗派主義更突出了（即便是在一種有多達

三分之一的東正教教徒都支持宗教分裂的文化中)。他在青年時期變成了列寧主義的馬克思主義者，不僅跟沙皇制度鬥，還跟其他的革命派別鬥。<sup>32</sup> 然而，正如我們將要進行詳細檢視的，最終，對塑造斯大林及其後來的統治最重要的因素，只是他年輕時的部分遭遇，即帝俄國家和專制制度內在的運作、當務之急和幾次失敗。這段歷史涉及面太廣，要理解斯大林的早年生活就要有個適當的視角。但這也為把握他後來的巨大影響作好了準備。





# 第一章 帝國子民

我的父母是沒有受過教育的人，但是他們待我很不壞。

11

——斯大林接受德國記者  
艾米爾·路德維希 (Emil Ludwig) 的採訪，1931年12月<sup>1</sup>。

從恐怖的伊萬那時候算起，俄羅斯在四個多世紀裏平均每天擴張 50 平方英里<sup>†</sup>，最後囊括了以兩洋三海為界的廣大地區：太平洋和北冰洋；波羅的海、黑海和裏海。俄國最終擁有的海岸線長度超過了其他任何國家，俄國的艦隊可以停泊在喀琅施塔得和塞瓦斯托波爾，(最後)還有符拉迪沃斯托克。<sup>2</sup> 俄國的森林將其與歐洲連接起來，俄國 4,000 英里<sup>§</sup> 寬的草原將其與亞洲連接起來，並提供了一個有待發現的「新世界」。

雖然如此，俄羅斯帝國卻幾乎不具備任何存在的先決條件：它的大陸性氣候十分嚴酷，遼闊的開放性邊境(無邊的草原，無際的森林)守衛或治理的成本很高。<sup>3</sup> 此外，帝國的許多地方都位於極其遙遠的北方。(加拿大農業區的緯度總體上跟基輔相當，遠低於莫斯科或聖彼得

---

<sup>1</sup> 譯註：《斯大林全集》(人民出版社，1953-1956)第13卷，第101頁。

<sup>†</sup> 編註：約129平方公里。

<sup>‡</sup> 編註：即海參崴。

<sup>§</sup> 編註：約6,437公里。

堡周邊農莊的緯度。)土地雖多，可根本沒有足夠的人手耕種。專制制度依靠被稱為農奴制的一系列措施，逐漸把農民束縛在土地上。農民的流動性從未完全消除。農奴可以嘗試逃跑，一旦成功，通常就會作為稀缺的勞力，在別處受到歡迎，但農奴制作為一種強迫性的制度根深蒂固，直到始於1861年的農奴解放。<sup>4</sup>

12 俄國的對外擴張克服了重重阻力，改變了自身的族群和宗教構成。直到1719年，俄國的大俄羅斯人或許還佔70% (其中超過85%都是斯拉夫人)，但到了19世紀末，俄羅斯人只佔44% (其中斯拉夫人佔73%左右)；換句話說，大部分人口(56%)都不是大俄羅斯人。在其他斯拉夫人中，小俄羅斯人(或烏克蘭人)佔18%，波蘭人佔6%，白俄羅斯人佔5%。還有少量的立陶宛人、拉脫維亞人、愛沙尼亞人、芬蘭人、日耳曼人、格魯吉亞人、亞美尼亞人、韃靼人、卡爾梅克人和西伯利亞土著。1719年俄國根本沒有猶太人，但18世紀末對波蘭的吞併，逐漸讓猶太人在帝國總人口中佔到大約4%。按照法律，他們應該被限制在以前居住的、遭受吞併的地區(也有例外)——即從前的波蘭—立陶宛王國和西烏克蘭的部分地區，那些地方構成了猶太人居住區。<sup>5</sup> 他們不得擁有土地，這讓他們比其他俄國人更加城市化和專業化。雖然歷史的焦點都集中在俄國的500萬猶太人身上，但成為僅次於東正教基督徒的帝國第二大宗教群體的，卻是俄國的穆斯林，他們的存在要追溯到古莫斯科大公國。穆斯林是沙俄出生率最高的群體之一，最終超過1,800萬，佔總人口的10%以上。在俄國的穆斯林中，許多人講波斯方言，但大部分人講突厥語，結果，俄國講突厥語的人比「土耳其」奧斯曼帝國還要多幾百萬。

俄國的領土擴張往往是以犧牲奧斯曼土耳其人的利益得來的，比如對高加索的征服。那些比阿爾卑斯山還高的崇山峻嶺，像楔子一樣插在黑海與裏海之間，但在山脈兩側，在靠近海濱的地方，有容易通行的狹窄低地，就成了征服的通道。在高加索西部，受奧斯曼土耳其人統治的影響，突厥語長期充當交際中的通用語言；在東部則是波斯語，這是伊朗人統治的結果。1556年，忠於俄國沙皇的軍隊首次抵達裏海——恐怖的伊萬一度娶了一位高加索的突厥公主，但俄羅斯帝國直到1722年才從波斯國王手中奪取了裏海地區的主要定居點巴庫。<sup>6</sup> 還有，在

1860年代左右，俄國的將軍才佔領了整個高地。換句話說，俄國人進軍高加索是垂直進行的，實際上是繞着山脈在側翼兜了一個大圈子才上山，整個過程花了150年，犧牲了無數性命。<sup>7</sup> 在達吉斯坦（「高山之國」）——那裏跟英屬印度西北邊境的部族相似——鎮壓暴動的俄軍整村整村地屠殺當地人，逼迫他們交出暴動分子，而暴動分子又向當地的穆斯林復仇，指責他們勾結俄國。極具破壞力的還有斯拉夫農民定居者的斧子，他們搬到陡峭但非常肥沃的山谷，毀林種糧，而森林對反叛者至關重要，可以用來掩護。為了一勞永逸地解決問題，在1860和1870年代最後的征服行動中，50萬高加索山民大概有40萬逃到或者被趕到奧斯曼帝國。<sup>8</sup> 驅逐和屠殺——伴隨着斯拉夫農民的安家落戶——推動了俄國對高加索的同化，未來的斯大林這才生為俄國的臣民。

13

這種特別的帝國建構，獨一無二，造成了一大堆矛盾。所謂的舊禮儀派，也就是那些因拒絕承認改革後的正教會或俄羅斯國家，被驅逐或逃到「遙遠的」高加索的東正教基督徒，發現他們只有為「敵基督」，即俄羅斯帝國的軍隊提供服務才能生存下去。即便這樣，帝國的哥薩克突擊部隊——曾經自由而狂野的邊民，如今已成為專制制度的聖騎士——仍然長期得不到足夠的給養，為了購買武器，只能求助於他們想要降服的山民。反之，與帝國作對的山民穿着別致的切爾克斯卡（一種羊毛做的長外套，前胸兩側醒目地插着步槍子彈），也被招募到聖彼得堡，做了沙皇的侍從。<sup>9</sup> 最大的矛盾也許是，俄羅斯帝國主要是受邀介入高加索的：格魯吉亞的基督徒統治者要同時面對兩個敵人，即信奉伊斯蘭教的奧斯曼土耳其人和信奉伊斯蘭教的薩非王朝，便請求基督教俄國的保護。「保護」實際上是由附近機會主義的帝國代理人提供的，而且很快就在1801年和1810年採取了兼併的形式。<sup>10</sup> 俄國終結了格魯吉亞巴格拉季昂王朝，並用俄羅斯正教會的都主教（稱督主教）取代了形式上獨立的格魯吉亞正教會的牧首。可是，另一個矛盾的現象是，當地的「俄國」政府滿是格魯吉亞人，他們因為同是基督徒而得到優待。格魯吉亞精英得益於俄國的統治，獲得了新的強大工具，可以將其意志強加於較低的社會等級和高加索的其他許多民族。帝國就是這樣的，一連串的交易讓野心勃勃的人掌握了權力。

14 在俄羅斯帝國內部，格魯吉亞有它自己的帝業。<sup>11</sup> 按照 19 世紀後期的統計數據，850 萬高加索居民，穆斯林約佔三分之一，信奉東正教的佔一半，而在後者當中，格魯吉亞人（就語言來說）只有 135 萬。這個少數民族借助俄國的力量最終佔據了前所未有的統治地位。當然，受制於俄國的宗主權，格魯吉亞人遠非事事順遂。1840 年，在聖彼得堡的帝國當局下令，把俄語作為高加索唯一的官方語言。這之前俄國（1832）阻止了一起企圖復辟格魯吉亞君主制的陰謀（有些格魯吉亞貴族計劃邀請當地的俄國官員參加舞會並殺害他們）。陰謀分子大多被流放到俄羅斯帝國境內的其他地方，但他們很快就獲准返回格魯吉亞，繼續為俄羅斯國家服務，因為帝國需要他們。格魯吉亞精英大多成了親俄派，而且立場基本不變。<sup>12</sup> 同時，新的基礎設施建設也有助於克服障礙，加快俄國合併的速度。1811 至 1864 年，從弗拉季高加索（意思是「統治高加索」）的低地定居點開始，穿過高高的山隘——在似乎深不見底的峽谷之上——修鑿了一條重要的軍用公路直達首府梯弗利斯。在這個世紀結束前，外高加索鐵路會把黑海和裏海連接起來。最重要的是，工作機會吸引了很多格魯吉亞人學好俄語，而俄語是帝國的基礎設施建設中最主要的組成部分。格魯吉亞人記得並且反覆講述格魯吉亞英勇抵抗俄國征服的故事，但要是可以的話，他們也會同俄國的精英家族聯姻，也會津津有味地欣賞俄國的歌劇，也會渴望得到帝國的制服、頭銜、獎章等可以向人炫耀的東西，還有寬敞的國家公寓、旅行津貼以及作為「禮物」的現金。<sup>13</sup> 對精英們起作用的東西，下層社會也可以得到，但少一些，他們可以利用機會，前往高加索那些由俄羅斯正教會資助的新俄語學校就讀。好了，這就是未來的斯大林將要攀爬的帝國腳手架——為了與格魯吉亞人合謀完成征服、並借助正教會的力量實現俄羅斯化而搭起的腳手架。<sup>14</sup>

## 小城故事

未來的斯大林的家鄉哥里（意思是「山崗」），坐落在東格魯吉亞馬特克瓦里河（俄語稱「庫拉河」）河谷的連綿高地上，位於三條道路的交匯處，幾百年來一直是商旅的落腳點。三條道路一條向西通往黑海，一條

向東通往裏海，還有一條向北經茨欣瓦利隘口通往草原。<sup>15</sup> 換句話說，哥里一點也不偏僻。在小城的中心，在它最高的山崗上，有一座帶有黃色圍牆的13世紀的要塞。城外還可以見到一些遺址，是17世紀王公貴族的花園，那時的哥里叫做卡特利，是格魯吉亞的首都。不遠處還有著名的博爾若米礦泉水，擔任高加索總督的亞歷山大二世的弟弟在那裏建了一座夏宮。嚴格意義上的哥里，指的是古要塞遺址下方的老城。另外一個城區，即中心城區，有許多亞美尼亞和格魯吉亞教堂。第三個城區是俄羅斯人的居住區，那裏有帝國駐軍的兵營。<sup>16</sup> 1871年，這個交通要衝成了俄羅斯帝國的鐵路樞紐，連接了高加索首府梯弗利斯和(1828年從奧斯曼土耳其人那裏奪來的)黑海港口城市波季。1870年代，哥里的街道彎彎曲曲，又窄又髒。城裏的居民大概有7,000人，亞美尼亞人佔微弱多數，其餘的是格魯吉亞人，還有幾百個俄羅斯人和一些從附近的部族村落遷來的阿布哈茲人和奧塞梯人。哥里的商人跟伊朗、奧斯曼帝國還有歐洲通商。得益於商人的強勢存在，同樣也得益於正教會，哥里有四所學校，其中一所是教會當局於1818年創辦的兩層樓的教會學校，當時格魯吉亞剛併入俄羅斯帝國不久。<sup>17</sup> 結果，哥里居民的入學率達十分之一，而梯弗利斯是十五分之一——相比之下，整個高加索是三十分之一。<sup>18</sup> 對於出生在那座「山崗」上的男孩來說，通向未來的大門是敞開的。

未來的斯大林的父親維薩里昂·朱加施維里(Besarion Jughashvili, 1850–1909)，俄語中稱作維薩里昂(Vissarion)，簡稱貝索(Beso)，並不是哥里人。貝索的祖父(扎扎[Zaza])是農奴，曾因參與農民暴動而被捕，可能住在奧塞梯人的某個部族村落；貝索的父親瓦諾(Vano)也是農奴，在一個不到500人的名叫季季利洛(「大利洛」)的村子侍弄葡萄，貝索就出生在那裏。瓦諾常把葡萄運到十英里\*開外的梯弗利斯附近，但他不到50歲就死了。之後不久，土匪殺掉了瓦諾的兒子、一個小客棧的老闆格奧爾吉，於是，貝索就離開季季利洛，到梯弗利斯找工作。他在梯弗利斯一家亞美尼亞人開的店裏學會了鞋匠的手藝。貝索會說

---

\* 編註：約16公里。

一些亞美尼亞語、阿塞拜疆突厥語和俄語，至於他能不能寫自己的母語格魯吉亞語，現在還不清楚。從現有的材料看，大概是在1870年，在另一家亞美尼亞店主巴拉姆揚茨(Baramyants，俄羅斯化的名字叫做約瑟夫·巴拉莫夫(Iosif Baramov))的邀請下，當時20歲的貝索搬到了哥里。巴拉姆揚茨有一家製鞋作坊，接受委託給在哥里的帝國駐軍供貨。<sup>19</sup> 俄羅斯帝國需要駐防的地方很大。到1870年，守衛整個西伯利亞的只有1.8萬人，而哈爾科夫、敖德薩和基輔的駐軍有19.3萬人；華沙也有12.6萬人。在英屬印度需要6萬名士兵和1,000名警察的時候，高加索有12.8萬名帝國士兵。那樣一來，就有很多雙腳需要穿鞋。巴拉姆揚茨僱了許多手藝好的鞋匠，其中就有貝索。他似乎幹得還不錯，而且雄心勃勃。在哥里一個人稱「公爵」的釀酒的葡萄種植戶兼酒館(*dukhan*)老闆雅各比·「雅科夫」·葉格納塔施維里(Yakobi “Yakov” Egnatashvili)的資助下，貝索很快開了自己的鞋店，成了一個獨立經營的手藝人。<sup>20</sup>

貝索請人說媒，想要迎娶葉卡捷琳娜·「凱可」·格拉澤(Ketevan “Keke” Geladze)，據說她是個栗色頭髮的美少女，身材苗條，大眼睛。<sup>21</sup> 同樣，她既是農奴的後代，又是奮鬥者的後代。她的姓在南奧塞梯很常見，這使得人們猜測她還有奧塞梯人的血統，但她像貝索一樣，母語是格魯吉亞語。凱可的父親是個泥瓦匠和農奴，為某個富裕的亞美尼亞人照料花園，住在哥里城外的一個村子，娶的也是農奴，但他似乎在凱可出生前(或剛出生時)就過世了。凱可的母親設法讓女兒學會了讀寫，這一點並不多見，因為在那時候，格魯吉亞女性識字的很少。但凱可的母親也去世了，因此，這個姑娘是由她母親同是農奴的兄弟養大的。格魯吉亞的農奴制，即使按照俄羅斯帝國五花八門的標準來看，也非常奇怪：格魯吉亞的大貴族不但有隸屬於自己的神父，還有隸屬於自己的小貴族，而神父也可以有隸屬於自己小貴族。這其中的部分原因是，沙皇國家相當敬重豪爽的格魯吉亞貴族。格魯吉亞貴族佔格魯吉亞總人口的5.6%，而整個帝國的貴族佔總人口的比例是1.4%。1864年10月，高加索開始廢除農奴制，這比俄羅斯帝國的其他地方晚了三年。那大概是在凱可一家從村子搬到哥里的時候。「一路上多高興吶！」

她在晚年對採訪者回憶說，「哥里裝扮得跟過節似的，人山人海。」<sup>22</sup> 格拉澤一家解放了，但他們要面對另謀生路的挑戰。

1874年5月，凱可和貝索按照隆重的格魯吉亞儀式，在哥里的聖母升天大教堂舉行了婚禮，迎親隊伍熱熱鬧鬧、風風光光地穿過小城。<sup>23</sup> 貝索的恩人雅科夫·葉格納塔施維里是伴郎之一。克里斯托弗爾·恰爾克維阿尼神父(Kristopore Charkviani)是他們家的另外一位朋友，據說在婚禮上唱的歌非常好聽，結果雅科夫「公爵」慷慨地給了神父一筆小費：10盧布。貝索跟大多數識字或不識字的格魯吉亞人一樣，可以引用12世紀紹塔·魯斯塔維里寫的《虎皮騎士》中的句子。那是一部史詩，講的是三個有騎士精神的朋友幫助一位少女擺脫強迫婚姻的故事。貝索喜歡像高加索的男人一樣，穿着切爾卡西亞人長長的黑色外套，束一根皮腰帶，套上寬鬆的褲子，褲管塞進皮靴。誠然，就像大家知道的，他會把自己做鞋掙的錢用來買酒；還有，按照當地的習慣，他的顧客常常把自家釀的酒當鞋錢給他。可在凱可看來，儘管他身上有當地男人常有的毛病，這個手藝人還算是上進的。「在我的朋友當中，他被認為是個很受歡迎的年輕人，她們都夢想着嫁給他，」她對採訪者回憶說，「我的朋友們幾乎嫉妒壞了。貝索是個令人嫉妒的新郎，一個真正的格魯吉亞騎士，留着漂亮的小鬍子，穿得十分體面——而且像城裏人一樣特別精明。」貝索，她接着說，可能「與眾不同、古里古怪而且陰鬱」，但也是「聰明而驕傲的」。「在我的朋友當中，」凱可最後說，「我成了那個令人羨慕的漂亮女孩。」<sup>24</sup>

17

1878年12月，結婚的第四個年頭，夫婦倆有了一個兒子，名叫約瑟夫(Ioseb)，也就是未來的斯大林。當時凱可大概是20歲，貝索28歲。<sup>25</sup> 約瑟夫實際上是貝索和凱可的第三個兒子，這在格魯吉亞和東正教傳統中被看作是神的特殊禮物。但他們之前的兩個孩子都沒能活下來。貝索和凱可的頭生子米哈伊爾，1876年初在兩個月大的時候夭折了；第二個孩子(格奧爾吉)死於1877年6月，約六個月大。<sup>26</sup> 作為獨子長大的約瑟夫——在格魯吉亞語中的昵稱是「索索」(或「索謝洛」(Soselo))——後來才知道哥哥們夭折的故事。這個三口之家從一個奧塞梯的手藝人那裏租了一間磚木結構的小屋，位於哥里的俄羅斯人居住



區，靠近貝索為其做鞋的帝國駐軍的兵營。小屋只有90平方英尺\*，有一張桌子和四把凳子、一張木板床、一把茶壺、一隻箱子和一盞煤油燈。衣服和其他物品都放在開敞的擱板上。不過，屋裏有個地窖，可以從旋轉樓梯下去，那是貝索的作坊和存放工具的地方，也是凱可安頓索索的嬰兒室。<sup>27</sup> 換句話說，斯大林的人生是從地下室開始的。

儘管經濟上不寬裕，但朱加施維里一家的故事卻頗有些小城的田園色彩：手藝人、美人和(存活下來的)小男孩。據說凱可從來不讓他離開自己的視線。<sup>28</sup> 大約從兩歲開始，索索就不停地患上兒童常見的疾病(麻疹、猩紅熱)，凱可擔心再次失去孩子，經常到教堂祈禱。她的奶水不多，索索只好喝鄰居葉格納塔施維里太太以及馬紹·阿布拉米澤—齊哈塔特里施維里(Masho Abramidze-Tsikhitrashvili)的奶水。他就這樣長大了，而且活潑好動。「他是個頑強的孩子，」馬紹回憶說，「母親叫他，要是他不想答應，就不會停止玩耍。」<sup>29</sup>

### 地緣政治動盪，代理父親的幫助

小索索在格魯吉亞山城滿大街奔跑的時候，是不會注意到更廣闊的世界的，但就在他出生的那十年間，德國在凡爾賽的鏡廳——那裏是法國偉大的太陽王路易十四(Louis XIV)接待過許多德意志王公的地方——高調宣佈，成立德意志第二帝國。第一帝國是鬆散的神聖羅馬帝國。德國的統一在王公們之間引起的地緣政治動盪，再加上隨後的快速工業化，急劇地改變了俄國的地緣政治空間。不太引人關注但幾乎同樣影響深遠的是，1868年，日本的一群叛亂者推翻了江戶(東京)的德川幕府，為了使自己的叛亂行動合法化而在名義上「歸政」於閒居的、年號「明治」(意思是開明的統治)的天皇。這一過程一點都不順利，因為一些主要地區都反叛了。但是到1872至1873年，日本新領導層的重要成員幾乎全都出使過歐美，不僅親眼見識了先進世界的種種奇蹟，而

---

\* 編註：約8.4平方米。

且發現，先進世界不是鐵板一塊。日本的一些新領導人決定博採各國之長：相比起美國較為寬鬆的教育體系，法國的中央集權式教育體系對他們的吸引力更大，但他們最終選擇的陸軍體系不是法國的，而是由職業軍官和總參謀部組成的德國體系，海軍採用的是英式的。「知識，」明治天皇宣佈，「應當在全世界的範圍內尋找，並用來鞏固帝國政體的基礎。」這一說法概括了大國長期保持支配地位的秘密。當然，新式學校和從國外輸入的其他東西常常遭到抵制，為此就要借助國家的力量推動轉型。此外，日本隨後的工業化也無法跟德國相提並論。但日本的經濟仍然起飛了，而它作為一個新的強國在俄國側翼崛起，急劇地改變了亞洲的實力均勢。

同樣是在未來的斯大林出生的那十年，美國已經成為世界上最大的一體化的國家經濟體。只是美國剛剛經歷了內戰——內戰造成100萬人傷亡，3,200萬總人口中死亡60萬人。美國還開始採用鐵甲艦、用於偵察的空中氣球、塹壕戰以及射程較遠的步槍。（戰爭切斷了擔任《紐約每日論壇報》特約記者的德國人卡爾·馬克思的收入，因為該報對於歐洲事務不再感興趣了。）不過，與邦聯派的願望相反，北方的紡織廠並不依賴於南方供應的原棉（埃及和印度的種植者可以填補不足）。有些英國政治家，比如威廉·格拉德斯通（William Gladstone），為南方鼓勁，因為他希望削弱美國的實力，但英國政府從未承認邦聯的獨立。要是一個獨立的農業國在美國南方——現代世界最龐大的奴隸體系之一——獲勝並壯大起來，那英國人在20世紀必然失敗，整個的世界發展進程就會徹底改變。1860年，南方奴隸的價值是製造業或鐵路總投資額的三倍，是美國除土地之外最大的一筆資產，但最後獲勝的卻是工業化的北方，不是以奴隸為基礎的種植棉花的南方。1870至1900年，統一後的美國在經濟上完成工業化，規模擴大三倍（得益於來自非英語、非新教社會的大規模移民），形成了一個令人驚嘆的高潮，而隨着美國所佔全球產值的份額飆升到接近30%，就連德國和日本的快速發展相比起來也黯然失色。儘管在菲律賓和古巴發動了殖民戰爭，當時美國這個經濟巨人在很大程度上還游離於世界政治之外。但美國的力量已經開始隱隱約約地籠罩着世界體系，並將成為其中舉足輕重的因素。

這些與斯大林的出生及早年生活有關的重要地緣政治事實——統一的工業化的德國、穩固的工業化的日本、比世界歷史上任何一個大國都要強大的美國——將會動搖沙皇政權的核心，而且將來也會擺在斯大林面前。當然，年幼的索索·朱加施維里不可能知道正在塑造着他的世界的地緣政治進程。同時，在1880年代的哥里，驕傲的貝索·朱加施維里剛剛做了父親，他似乎幹得還不錯，僱了兩個學徒。兩人中有一個記得，這家人的日子過得好像很一般，吃的東西除了土豆和核桃餡茄子卷 (*badrijani niguzit*) 之外，主要就是赤豆 (*lobbio*) 和扁麵包 (*lavash*)，但在朱加施維里的桌子上，總是可以看到黃油。<sup>30</sup> 另一位學徒、只比索索小一歲的瓦諾·胡特希施維里 (Vano Khutsishvili) 有段時間就像收養的兄弟一樣。<sup>31</sup> 音樂充滿了這個家，凱可總是用複調和聲為索索唱些格魯吉亞民歌。貝索就像大部分格魯吉亞男人一樣，會演奏一些傳統的樂器，比如雙簧的杜讀管 (*duduk*，他在自己的婚禮上演奏過)。不過，貝索好像總是一副若有所思的樣子。現在幾乎找不到描寫他的第一手資料。有人回憶說，他「瘦瘦的，個子中等以上，長臉、長鼻子、長脖子，留有鬍鬚，頭髮烏黑」。後來，也有其他各種各樣的人被認為是斯大林的「親生」父親。但是有兩個親眼見過他們的人都認定索索和貝索簡直是一模一樣。<sup>32</sup>

不管貝索身為父親做得怎樣，也不管他跟凱可的結合起初的前景如何，這場婚姻解體了。多數傳記作家通常都按照凱可的說法，把婚姻的破裂歸咎於貝索的酗酒和心魔，斷言貝索要麼是個天生的酒鬼，要麼是在他的頭生子夭折後養成了借酒澆愁的習慣，而且一發不可收。<sup>33</sup> 有可能是這樣，但在最初的悲劇過後，尤其是在索索出生後，貝索的作坊好像還經營了一段時間。當然，有可能是他做的格魯吉亞傳統式樣的鞋子競爭不過歐洲的新式鞋子。<sup>34</sup> 但也有可能是仍然年輕漂亮的凱可招惹是非，跟一些已婚男人調情：雅科夫·葉格納塔施維里，哥里的酒館老闆和摔跤冠軍；達米安·達夫里舍維 (Damian Davrishevi)，哥里的警官；克里斯托弗爾·恰爾克維阿尼，哥里的神父——他們全都捲入了謠言，被說成未來的斯大林的生父。現在連凱可是否輕浮都弄不清楚，更別說放蕩了。在嫁給貝索這個手藝人的時候，她原本就懷有抱負，因而有可能是她看上了更體面的男人，也有可能是她成了他們的

獵物。<sup>35</sup> 目前還缺乏可靠的證據說明未來的斯大林的母親可能與他人有染。不過在當時，關於凱可放蕩的流言在哥里是傳開了。貝索開始罵兒子是「凱可的小雜種」，有一次他好像一邊想掐死自己的老婆，一邊罵她是「婊子」（一個很普通的形容詞）。<sup>36</sup> 據說貝索曾經有意砸壞葉格納塔施維里的酒館，並攻擊警察局長達夫里舍維，而達夫里舍維則有可能勒令貝索離開哥里。1884年左右，貝索真的去了梯弗利斯，受僱於亞美尼亞人開的阿傑利哈諾夫 (Adelkhanov) 皮革廠。

不管是誰的錯，這個家總歸是破了。<sup>37</sup> 到1883年，凱可和小索索開始了居無定所的生活，在此後十年裏至少搬了九次家，而這還不是這個男孩唯一的不幸。就在父親離開的同一年，小索索染上了天花。那次流行病給哥里的許多家庭都造成了嚴重的創傷，鄰居葉格納塔施維里的六個孩子死了三個。凱可向一位女信仰治療師 (faith healer) 尋求幫助。索索熬過了高燒，但臉上留下了永久的疤痕，還得了一個綽號「麻子」(Chopura)。有可能就是在這一時期(1884)，也就是索索六歲的時候，他的左肘和左肩開始畸形發育，影響了左臂的功能。人們提出了各種各樣的原因：乘雪橇或摔跤時出了事故；被馬車撞了，接着又因為傷口感染引起血液中毒。<sup>38</sup> 索索的確在哥里的羅馬天主教堂附近被一輛(在哥里)很少見的四輪馬車撞過，當時或許是因為他和其他男孩在玩膽小鬼遊戲，想要抓住車軸。<sup>39</sup> 不過，他的手臂萎縮可能還有遺傳方面的原因。要是那樣，肘部的狀況就會隨着時間的推移越來越糟。但凱可總是有辦法。為了維持兩人的生活，她為別人漿洗縫補衣服，為他們——包括葉格納塔施維里——收拾屋子，而索索也經常在那裏吃飯。1886年，她和索索搬到恰爾克維阿尼神父家的樓上，而後者是貝索以前的酒友。這次搬家可能是因為窮困所迫，但也可能是另有所圖：凱可懇求恰爾克維阿尼讓索索在1886年秋季——屆時他就快八歲了——進入哥里的教會學校。要是不行，她就央求神父，在神父幾個十來歲的兒子給他們的妹妹——她有可能成了年輕的斯大林的初戀對象——上俄語課的時候，讓索索也參加。

21

凱可的計劃成功了，當然，那也是因為索索自己上進。傳記作者們經常指出，未來的斯大林是哥里「街頭幫派」的頭目，彷彿在高加索

或是其他地方，街頭奔跑對男青年而言有某種特別的意義。<sup>40</sup>更準確地說，他的特別之處在於對讀書的熱愛和自學能力，這兩點推動着他不斷進步。1888年9月，他在將近十歲時和大約150個幾乎全都七八歲的男童一起，參加了教區學校的預備課程，這是格魯吉亞男童都必須參加的。預備課程要讀兩年，但他依靠自己的努力，將俄語學得非常好，只用了一年時間就通過了。1889年秋天，他開始在學校學習四年的主幹課程，好學和動聽的男中音為他贏得了學校的獎勵——對這個男孩來說，這是一件值得驕傲的事情。結果，至少在白天的部分時間他終於可以擺脫母親的控制了。但是在1890年1月6日主顯節——正教會是當作耶穌在約旦河受洗來慶祝的——期間，一輛失控的四輪馬車在哥里衝進旁觀的人群，而教會學校的唱詩班剛好就站在那裏。第二次挨撞！「索索想要跑到街對面，可沒來得及，」哥里教會學校唱詩班的老師西蒙·戈格利奇澤(Simon Goglichidze)回憶說，「馬車撞到了他，車上的一根連接用的杆子打在他的臉上。」<sup>41</sup>索索暈了過去，被人抬到家裏。未來的斯大林在11歲時離死亡有多近，我們永遠無從得知。<sup>42</sup>馬車夫被關了一個月。幸運的是，戈格利奇澤最後說，車輪只是從孩子的腿上輾過去，不是頭上。<sup>43</sup>但事故對於未來斯大林的步態造成了永久性的影響，讓他又得了一個綽號——「跛子」(Geza)。

貝索好像也回去了，帶着受傷的兒子到梯弗利斯就醫；凱可似乎陪着他們，還在索索康復期間搬到了醫院。<sup>44</sup>有可能就是這件事引發那個被反覆談論的故事，說貝索「綁架」了兒子，因為鞋匠堅決反對兒子上學。<sup>45</sup>事情的真相現在還不清楚。貝索似乎在一年前，即1889年，就已經放出話來，說是想要把兒子搶走，不讓他上學，但有可能經人勸說，並沒有那麼做(或者是被迫很快又把兒子還了回來)。但「綁架」也許只是指1890年的這樣一件事，即索索康復後，貝索就把他留在梯弗利斯，讓他在阿傑利哈諾夫皮革廠當學徒。那家大型企業是亞美尼亞大資本家格里戈里·阿傑利哈諾夫在1875年建立的，當時貝索還住在哥里。阿傑利哈諾夫出生在莫斯科，後來搬到梯弗利斯，在1870年代成為梯弗利斯由亞美尼亞人控制的信貸協會的會長。阿傑利哈諾夫工廠裝備了機器，從1885年開始，每年可以為帝國軍隊生產5萬雙鞋

和10萬件毛氈披風。皮革廠的年收入超過100萬盧布，這在當時當地可是一筆巨款。<sup>46</sup> 貝索和兒子在梯弗利斯老城區租了一間便宜的房子，一起走過馬特克瓦里河上的鐵橋去上班，途中要經過矗立在高峭壁上的中世紀麥捷希教堂，俄羅斯帝國已把那裏改成了監獄。<sup>47</sup> 像索索一樣，阿傑利哈諾夫的工人很多都是未成年人，通常是成年工人的孩子，他們的父親指望他們多掙點工資，這種做法在梯弗利斯的工廠很常見。<sup>48</sup> 換句話說，貝索是想讓兒子像他那樣學門手藝，這雖然自私，也算正常。<sup>49</sup>

由於自己父親的緣故，全世界無產階級未來的領袖與討厭的工廠生活產生了最初的衝突。阿傑利哈諾夫的工廠有醫務室，這是梯弗利斯其他皮革廠沒有的福利，但這裏勞動時間長、工資低而且工作不穩定。機械化一方面減少了貝索那種獨立手藝人的收入，另一方面也讓工廠需要的勞動力日漸減少。另外，阿傑利哈諾夫的成年鞋匠是一幫很粗暴的傢伙，會欺負年輕人。索索作為學徒，或許只能給一些老工人跑跑腿，連學習做鞋的機會都沒有。他肯定聞到過潮濕的地下室中腐爛的生皮所散發的惡臭，那可比他母親過去努力照料（卻未能照料好）他的那個地窖的氣味難聞了不知多少。要是索索·朱加施維里繼續待在阿傑利哈諾夫工廠，做一個當學徒的無產者，或者是跑掉，流落街頭，很可能就不會有未來的斯大林了。可正如所有的傳記作者都注意到的，凱可催促她在教會方面的熟人幫她把親愛的兒子要了回去。這一點跟克拉拉·希特勒(Klara Hitler)非常相似。克拉拉是虔誠的天主教徒，她希望兒子阿道夫成為神父，而凱可·格拉澤也相信兒子索索注定要成為正教的神父，這是廢除農奴制為他這種出身卑微的孩子打開的通道。<sup>50</sup> 這個孩子之所以能回到憑藉嚴格的學習和自我完善向上發展的道路，要歸功於他堅定的母親。

23

凱可毫不妥協。她拒絕了梯弗利斯教會當局提出的辦法：讓索索繼續跟父親待在一起，同時還讓他加入梯弗利斯教會學校的唱詩班。除了讓索索回到哥里，參加1890年9月開始的下一學年的學習，她甚麼都不願接受。<sup>51</sup> 在一個父權觀念根深蒂固的社會，她能戰勝自己的丈夫，既是因為家人朋友的支持——他們站在這個女人一邊——也是因為

孩子本人的支持；他在父母的拉鋸戰中，在做神父（上學）還是做鞋匠的問題上，選擇了上學，因而也選擇了母親。跟貝索不同，凱可為了讓他有衣服穿，為了讓他交得起學費，願意做任何事情。約瑟夫·「索索」·伊列馬施維里（Ioseb “Soso” Iremashvili）是在教區學校操場上摔跤時遇到未來的斯大林的，他回憶說他的朋友「只愛一個人，那就是他媽媽」。<sup>52</sup> 凱可也愛他。但我們不能把她理想化。她也喜歡發號施令。「斯大林的嚴厲是從他媽媽那裏遺傳的，」後來成了這位專政者衛隊中低級別成員（負責酒和食品）的另一位哥里時代的好友回憶說，「他的媽媽葉卡捷琳娜·格拉澤，是個非常嚴厲的女人，而且總的來說很難相處。」<sup>53</sup> 至於貝索，他似乎跟在老婆孩子後面回到了哥里。要是那樣，這可不是他第一次懇求凱可和解了。但1890年索索的康復和在梯弗利斯工廠當學徒這件事，標誌着他們的婚姻最終破裂。<sup>54</sup> 貝索拒絕給家人經濟上的支持（姑且不論這一說法的真假），而索索在回到哥里的學校後，因為家人無力支付25盧布的學費而被開除了。從現有的證據來看，雅科夫·葉格納塔施維里叔叔介入，還清了債務。

24 雅科夫叔叔成了索索尊敬的代理父親。<sup>55</sup> 有件事一直被人們津津樂道，那就是年少的斯大林曾經對一部有名的小說《弑父》（*The Patricide*，1882）十分着迷。小說作者亞歷山大·卡茲別吉（Aleksandre Qazbegi，1843–1893）是格魯吉亞王公的後代（他的祖父參與過俄羅斯對格魯吉亞的兼併，為此得到了一座山作為采邑）。被卡茲別吉的小說當成靶子的俄羅斯帝國當局將其列為禁書，結果反倒大大增加了它的吸引力。小說中，農民的兒子亞戈（Iago）和一位美麗的姑娘努努（Nunu），不顧家人的反對墜入情網，但是，一位與俄羅斯帝國勾結的格魯吉亞官員姦污了努努，以捏造的罪名把亞戈關進監獄。亞戈最要好的朋友柯巴（Koba）是一個勇敢、寡言少語的山民（*mokheve*），他發誓要報仇——「我要讓他們的母親哭泣！」——於是就為亞戈策劃了一次大膽的越獄行動。然而那位格魯吉亞官員的手下殺害了亞戈。努努也悲傷而死。立誓復仇的柯巴追蹤並處死了那位囂張的官員——「是我，柯巴！」——大致合理地伸張了正義。柯巴是小說中唯一的倖存者，比他的敵人和朋友活得都長。<sup>56</sup> 在青年斯大林的幾十個化名——包括短暫用過的貝索施維里（Besoshvili，意

思是貝索的兒子)——之中,「柯巴」用的時間最長。「他把自己叫做『柯巴』,而且不讓我們叫他別的名字,」兒時的朋友約瑟夫·伊列馬施維里回憶說,「當我們叫他『柯巴』的時候,他的臉上就會露出自豪、愉快的神色。」<sup>57</sup>這就是那個男孩。關於他,有個朋友回憶道,「作為他的朋友,我們經常看到索索……左肩略微前探,右臂稍有點兒彎曲,手裏夾着香煙,急匆匆地穿過街頭的人群。」復仇者「柯巴」(在突厥語中有不可屈服的意思)肯定要比「麻子」或「跛子」聽起來讓人舒服。但有必要強調的是,索索·朱加施維里的代理父親雅科夫·葉格納塔施維里的綽號也叫柯巴,那是他的格魯吉亞名字雅各比(Yakobi)的昵稱。

貝索的缺點我們已經說得太多了,而雅科夫·「柯巴」·葉格納塔施維里的支持卻說得不夠。索索·朱加施維里早年生活中的暴力也說得太多了。貝索打兒子是因為憤怒、屈辱或者根本就沒有原因;寵愛孩子的凱可也打兒子。(貝索打凱可,凱可有時也因為貝索喝醉了而把他痛打一頓。)<sup>58</sup>自然,人性中的相當一部分被父母一方或雙方打沒了。哥里並沒有某種特別暴力的東方文化。當然,在一年一度的復活節前一週禮拜一的紀念儀式上,為了讓人重溫1634年趕走波斯穆斯林的場面,夜裏必定會有一場全城參與的赤手空拳的打鬥。小城按族群分成不同的隊伍,拳手的數量達到上千人甚至更多,而為這種鬧哄哄的比賽擔任裁判的是一些喝得醉醺醺的神父。在成人加入之前,孩子們率先揮動拳頭,而這裏面不會少了索索。<sup>59</sup>但這種節日期間的暴力——魯莽地揮拳互毆,繼而草草地互相擁抱——是俄羅斯帝國的一大特色,從烏克蘭的市鎮到西伯利亞的村莊都是如此。哥里也絲毫不顯得突出。而且年少的斯大林所從事的其他一些暴力活動在男孩當中也很常見。摔跤比賽在哥里很受歡迎,而在操場的學生當中,瘦削而肌肉發達的索索雖然左臂萎縮,可力氣大得很,據說打起來十分勇猛——就是手段有點骯髒。據說即便是同最強壯的對手較量他也不會發怵,雖然偶爾會被打得暈頭轉向。但索索顯然是想贏得同他有名的代理父親一樣的名聲,因為在其族長的帶領下,葉格納塔施維里的族人都是哥里的摔跤冠軍。「小斯大林的拳擊和摔跤都小有名氣。」警察的兒子約瑟夫·「索索」·達夫里舍維(Iosif "Soso" Davrishevi)回憶說。<sup>60</sup>



相比之下，貝索的軌跡卻在繼續下行。在讓兒子重新回到阿傑利哈諾夫皮革廠的努力失敗後不久，他似乎就離開了那裏。他想要在梯弗里斯亞美尼亞人的巴扎(bazaar)\*擺攤修鞋碰碰運氣，好像也不成功。之後關於他的生活就沒有甚麼可靠的消息了；有人說貝索最後成了流浪漢，也有人說他在一個補衣店裏繼續幹着老本行。<sup>61</sup>未來的斯大林後來輕描淡寫地說到自己的「無產階級」出身，說那是因為他父親的社會地位每況愈下造成的。「我父親並非生來就是無產者，他開過店，收過徒，他是個剝削者，」1938年3月，他對紅軍指揮員說道，「我們生活得一點也不差。在我十歲的時候，他甚麼都沒了(razorilsia)，成了一個無產者。我要說的是，他對於成為無產階級的一員並不高興。他一直抱怨說他的命不好，成了無產者。但對他來說是不幸的事情，讓他變得一無所有的事情，卻成了我的一個優點(zasluga)。真的，這是件有趣的事情(笑聲)。」<sup>62</sup>事實上，貝索的名字從來沒有從季季利洛村社的名冊上劃掉，因此，他仍然是農莊的一員，貝索也把這一法律地位傳給了兒子(直到1917年，斯大林在沙皇政府國內通行證上的記錄都是如此)。這位未來的蘇聯領導人雖然從法律上來講是個農民，並且在事實上是工人的兒子，可他本人卻在凱可和雅科夫「叔叔」的支持下，地位不斷上升，進入了小知識分子的行列。

## 對上帝的信仰

1890至1891學年回到學校時，索索因為馬車事故而不得不留級，但他以更大的決心投入到學習中。據說他上課從不遲到，空閒時候都在埋頭讀書——這些後來的回憶，聽上去像是真的。<sup>63</sup>「他很能幹，總是第一個到班上」，他以前的一位同學回憶道，還說「他在所有的遊戲和娛樂活動中〔也〕都名列前茅」。有些同學還回憶說，當一些格魯吉亞男孩因為講母語而受到責罰面壁思過的時候，索索顯得很不服氣；有

26

---

\* 編註：集市、農貿市場。

些人記得，他毫不害怕為了別的同學去找身穿威風凜凜的國家制服（帶有金鈕扣的短上衣）的老師交涉。要是索索真的代表別的男孩跟老師交涉，有可能是因為他被綽號「憲兵」的俄語老師挑選為班長，負責加強紀律。作為中間人，不管他扮演了甚麼角色，所有老師，包括格魯吉亞族的老師，都喜歡索索的勤奮和熱心。<sup>64</sup> 他會唱俄羅斯和格魯吉亞的民歌，還有柴可夫斯基的歌曲；他學習教會斯拉夫語和希臘語；他被選中在教堂朗誦祈禱詞、唱聖歌。在學校獎勵給他的大衛〈詩篇〉上有這麼一段贈言：「因進步突出、行為優秀和在『詩篇』的背誦方面表現優異而獎給約瑟夫·朱加施維里。」<sup>65</sup> 有位同學對索索和唱詩班的其他男孩大加讚賞：「他們穿着白色的法袍，跪在地上，仰起頭，用天使般的聲音唱着晚禱，而其他男孩則匍匐在地，心中充滿來自天國的喜悅。」<sup>66</sup>

事情也有平淡的一面：儘管凱可一度在當地一家「高級」服裝店做過正式的女裁縫，最後在一間公寓（位於哥里的教堂大街）安頓下來，為了維持開銷，她要為學校打掃衛生（每月10盧布）。可能還在校長家裏做過傭人。<sup>67</sup> 但索索很快就因為學業優異而被免去學費，而且每月還能得到一些津貼，開始是3盧布，後來漲到3.5盧布，再後來漲到7盧布。這或許是最好的證據，說明這個單親家庭的孩子當時表現十分突出，是哥里最優秀的學生之一。<sup>68</sup> 1894年春天他畢業時年齡已經很大了，15歲半。他本可以更進一步，繼續到哥里師範學校學習。擺在面前的還有一個更好的選擇：唱詩班老師西蒙·戈格利奇澤即將調到梯弗利斯的沙皇亞歷山大師範學校，說他可以把自己在哥里的明星學生帶去，而且可以享受到夢寐以求的全額國家獎學金。這對一個貧困家庭來說非同小可。索索參加了梯弗利斯神學院的入學考試，想要成為神父。他在考試中幾乎科科優秀——《聖經》、教會斯拉夫語、俄語、教義問答、希臘語、地理、寫字（雖然算術不行）——獲得了錄取。夢想成真。梯弗利斯神學院，還有那座城市招收富家子女的世俗的精英高中，是高加索的最高學府，因為俄羅斯帝國政府不贊成在那裏辦大學。神學院六年的課程（通常從14歲開始）下來，至少可以做一名教區神父，或者在格魯吉亞農村做一名鄉村教師；對於那些還想往高處走的人來說，則可以把神學院作為跳板，到帝國其他地方讀大學。

由於弗洛伊德學說的傳播，傳記作品普遍開始突出苦難童年的影響。<sup>69</sup>哪怕是對於那些真的有過苦難童年的人來說，這種做法也顯得過於牽強。未來的斯大林的童年當然很不容易：疾病和事故，被迫搬家，經濟困窘，不爭氣的父親，關愛自己但十分嚴厲、謠傳是妓女的母親。但在成年之後，當這位專政者內心充滿怨恨，而那種怨恨又將決定他大部分革命同僚命運的時候，他並未對父母以及自己早年的經歷表示過特別的憤怒。克里姆林宮未來的領導人沒有經歷過恐怖的伊萬或彼得大帝 (Peter I) 童年時經歷的那種血腥的宮廷陰謀 (雖然他常把自己同他們相提並論)。伊萬三歲的時候父親生癩子死了，七歲的時候母親死於暗殺。恐怖的伊萬這位 (讓攝政們弄得) 成了孤兒的沙皇淪落到乞食的地步。親眼見到精英們以自己的名義爭權奪利、互相殘殺，讓伊萬擔心自己也很快會悲慘地死去。年輕的伊萬喜歡剪掉鳥的翅膀，喜歡把貓和狗扔出屋子。彼得大帝四歲時沒了父親。那以後，這個孩子的性命就處在同他父親的兩個寡妻有關的敵對宮廷派系的威脅下。彼得十歲時成為沙皇，落敗的一派發動叛亂，年少的他目睹母親的親戚和朋友被扔在舉起的長矛上。有些分析家的確是誇大了伊萬和彼得可怕的童年，為他們常常是殘忍的統治提供了偽心理學的解釋。不過，對於年少的朱加施維里，充其量只能說，他或許看到過父親曾經拿着刀追趕自己的母親。

同伊萬和彼得的經歷相比，未來的斯大林的童年苦難算得了甚麼？再來看看謝爾蓋·科斯特里科夫 (Sergei Kostrikov) 早年的生活吧，他後來在革命時的化名是基洛夫 (Kirov)，而且成了斯大林最親密的朋友。1886年出生於俄國中部維亞特卡省\* 一個小城的基洛夫，後來被認為是斯大林當政時期黨的領導人中最受歡迎的人之一，但他的童年十分艱難：七個兄弟姊妹有四個在嬰兒時就夭折了，父親是個不願

---

\* 編註：此處「省」所對應的原文「province」，指代了俄語裏兩個不同的行政區劃概念：一是 guberniya (英文翻譯為「province」或「governorate」，中文翻譯為「省」)，一是 oblast (英文為「province」，中文為「州」或「省」)。對於原文中的「province」，作者指明為 oblast 的幾處翻譯為「州」，其他均翻譯為「省」。

家人死活的酒鬼，母親死於肺結核時，他只有七歲。基洛夫是在孤兒院長大的。<sup>70</sup> 格里戈里·「謝爾戈」·奧爾忠尼啟則 (Grigol "Sergo" Orjonikidze)，斯大林的核心圈子中的另一位重要成員，身世也差不多。他的母親在他還是嬰兒時就去世了，十歲時，父親也去世了。相比之下，年輕的斯大林有一個寵愛他的母親，還有就像許多關於那一時期的回憶錄提到的各種各樣的良師。凱可娘家的很多人就住在附近，包括她的兄弟吉奧 (Gio) 和吉奧的孩子們 (凱可的另一個兄弟桑德拉 [Sandala] 後來被沙皇警察殺害了)。而即便是貝索在 1890 年的監護權大戰中失利之後，貝索家族的人 (他姐妹的孩子) 和斯大林也還有來往。<sup>71</sup> 家庭是格魯吉亞社會的黏合劑，索索·朱加施維里不但有他自己的大家庭，還有葉格納塔施維里一家 (和達夫里舍維一家) 給予的代理親屬關係。小城哥里的人互幫互助，形成了一個聯繫緊密的共同體。

除了大家庭和哥里的學校教育 (那是向上的通道)，未來的斯大林的童年還有一個更關鍵的可取之處：對上帝的信仰。他極度貧困的家庭必須每年給正教神學院交付昂貴的學費 (40 盧布) 和食宿費 (100 盧布)，還有作為校服的白色法衣的費用。16 歲的朱加施維里申請並且獲得了部分獎學金：食宿免費。<sup>72</sup> 凱可為學費的事情向索索的代理父親柯巴·葉格納塔施維里求助。大柯巴既然有錢把存活下來的兩個親生兒子送到莫斯科上中學，自然也供得起小柯巴 (索索)。但是，如果富有的葉格納塔施維里等人停止對索索的支持，或者神學院的俄羅斯人院長取消了部分國家獎學金，朱加施維里的學業就會陷入困境。他冒着很大的風險，拒絕了唱詩班老師戈格利奇澤安排的世俗師範學校的全額獎學金。這其中的原因想必在於，不僅凱可是個虔誠的人，就連她的兒子也是。「在他上學的頭幾年，」蘇聯時代出版的一本回憶錄承認，「斯大林是個非常虔誠的信徒，參加所有的宗教儀式，參加唱詩班……他不僅遵守所有的宗教禮儀，還總是提醒我們要去遵守。」<sup>73</sup> 在神學院的修士中間學習，或許未來的斯大林自己也想成為修士。但在俄羅斯帝國以及更廣闊的世界中發生的變化，開啟了一條截然不同的道路。<sup>74</sup>



# 拉多的門徒

其他人依靠我們的勞動為生；他們喝我們的血；壓迫者用我們的妻子、孩子和親人的眼淚來解渴。

29

——約瑟夫·朱加施維里散發的格魯吉亞語  
和亞美尼亞語傳單，1902年<sup>1</sup>

梯弗利斯美麗迷人，令人難以忘懷。5世紀時在一處山谷中建立的梯弗利斯——這是它的波斯名字，也用在俄語中——從6世紀開始就成了格魯吉亞歷代國王居住的地方，它比古基輔還要早幾百年，更別說暴發戶似的莫斯科或聖彼得堡。在格魯吉亞語中，或許因為傳說中的溫泉，這座城市被稱為第比利斯(意思是「溫暖的地方」)。「我不能不說，」一位19世紀的訪客熱情地說道，「哪怕是君士坦丁堡的浴場也趕不上這座城市的浴場。」<sup>2</sup> 1801年俄國兼併東格魯吉亞時，梯弗利斯約有2萬居民，其中亞美尼亞人足足有四分之三。到19世紀末，梯弗利斯的人口迅速增長，達到16萬，其中亞美尼亞人相對較多(38%)，其次是俄羅斯人和格魯吉亞人，還有少量的波斯人和土耳其人。<sup>3</sup> 城裏的亞美尼亞人、格魯吉亞人和波斯人社區依山而建，梯田一般的房子和層層疊疊的陽台，風格頗似奧斯曼巴爾干(Balkan)或薩洛尼卡(Salonika)。相比之下，建在平面上的俄羅斯人聚居區顯得十分突出，有寬敞的林蔭道，還有氣派的總督府、歌劇院、最好的古典中

學 (classical gymnasium)\*、俄羅斯正教教堂、俄國官員 (*chinouniki*) 和亞美尼亞上層資產階級 (*haute bourgeoisie*) 的私宅。在 1860 年代的大改革中，帝俄設立了市政管理機構，開始實行選舉權受限的選舉。在有資格參加梯弗利斯市政選舉的那些人當中，富裕的亞美尼亞人佔了絕大多數，結果，亞美尼亞商人控制了市杜馬 (duma)。但他們控制不了帝國行政部門，那是由指派的俄羅斯人、德意志人和波蘭人管理的，而且常常依靠格魯吉亞貴族，後者利用擔任公職的機會變得富裕起來。<sup>4</sup> 不過，由於僅佔城市人口的四分之一，一定程度上格魯吉亞人在自己的首都仍然處於下風。

城市的權力分配是件引人關注的事情。寬敞的戈洛溫 (Golovin) 大街——它得名於一位俄國將軍——綠樹成蔭，店招上不但有俄文，還有法文、德文、波斯文和亞美尼亞文。出售的貨物既有附近伊朗 (大不里士 (Tabriz)) 的地毯，也有巴黎的時裝和布哈拉的絲綢。伊朗的地毯可用來區分室內空間，巴黎的時裝和布哈拉的絲綢可用來彰顯社會等級。相比之下，在波斯要塞的廢墟之下，在亞美尼亞人和波斯人迷宮一般的巴扎裏，「大家就像在自家的臥室，洗頭、刮臉、理髮、穿衣、脫衣」，對於這些很容易讓人迷路的、擠滿了銀匠店和供應烤肉及廉價葡萄酒的小吃攤的地方，有本俄文指南說。<sup>5</sup> 韃靼人 (阿塞拜疆人) 的毛拉 (mullah) † 裹着綠色和白色的頭巾，波斯人穿着寬鬆的長袍，戴着黑色的毛皮帽子，頭髮和指甲染成紅色。<sup>6</sup> 有位觀察家描寫了一處典型的廣場 (自由廣場)——1890 年，索索·朱加施維里和父親一起在廣場附近暫住過一段時間——說那是「人和牲口、羊皮帽子和光頭、土耳其氈帽和鴨舌帽攪在一起的地方」，還說「大家吵吵嚷嚷、橫衝直撞、放聲大笑、賭咒發誓、推搡擁擠、唱歌、幹活、握手，操各種語言和口音」。<sup>7</sup> 但是，除了富有東方情調的喧鬧的街頭——這讓指南之類書籍的作者嘖嘖稱奇——從 1870 年代到 1900 年的那些歲月，還見證了鐵路和其他工業化措

\* 編註：指一種培養學生進大學接受高等教育的中學。

† 編註：意為「先生」或「老師」，伊斯蘭文化中的尊稱。

施帶來的翻天覆地的社會變化，以及在越來越多的雜誌和現代運輸方式所建立的聯繫的推動下，格魯吉亞民族意識的覺醒。到1900年，梯弗利斯已經形成了一個數量雖小卻很重要的知識階層，以及不斷壯大的產業工人階級。<sup>8</sup>

正是在這種日漸現代化的城市環境中，1894年回到梯弗利斯的朱加施維里進入了神學院並長大成人，不過他沒有成為神父，而是成了馬克思主義革命者。<sup>9</sup> 1880年代傳入格魯吉亞的馬克思主義，似乎提供了一個充滿確定性的世界。但朱加施維里不是靠自己發現馬克思主義的。意志堅定的激進分子、20歲左右的弗拉基米爾·「拉多」·克茨霍維里 (Vladimir “Lado” Ketskhoveli，生於1876年) 是未來的斯大林的革命導師，斯大林在回首往事時也稱自己為拉多的門徒。<sup>10</sup> 拉多出身於哥里城外一個鄉村神父家庭，在六個孩子中排行第五。在哥里的教會學校和後來的梯弗利斯神學院，拉多比朱加施維里高三個年級，在學生中威信很高。在拉多的影響下，年輕的朱加施維里——他已經是個精力旺盛的自學者——找到了自己終生的事業，要成為鼓動家和教師，幫助蒙昧無知的民眾認識到社會的不公並找到所謂的靈丹妙藥。

31

### 格魯吉亞文化民族主義者

同小城哥里相比，高加索首府是一派早期現代性的盛大景象，但約瑟夫·朱加施維里並沒有很關注這座城市，至少在一開始沒有。他身邊的世界，也就是神學院，別稱「石頭口袋」，是座四層的堡壘，帶有新古典主義風格的主立面。如果說那所最好的古典中學處在當地教育等級體系的塔尖，那這所對於寒門子弟來說更容易入讀的神學院也不差。大樓位於埃里溫廣場戈洛溫大街的南端，1873年，正教會把大樓從一位大糖商 (康斯坦丁·祖巴拉施維里 (Constantine Zubalashvili)) 手裏買來，做了神學院的新家。幾百名學生住在頂樓的開放式宿舍，每天過着按部就班的生活，通常是從早上7時到晚上10時。晨鐘響起，他們先做早禱，然後喝茶 (早餐)，課要一直上到下午2時，中午的正餐在3時，然後只能在外面待大約一個小時，5時點名，做晚禱，8時喝茶



(份量不多的晚餐)，做作業，熄燈。「我們感覺就像犯人一樣，關在兵營裏，白天黑夜轉個不停，」哥里的另外一個「索索」，同年輕的斯大林一樣從哥里教會學校進入神學院的約瑟夫·伊列馬施維里回憶道。<sup>11</sup>除了偶爾請假回一趟各自的老家，只有週日才有些空閒時間，不過也要等到正教儀式結束後，這就是說，要在石頭地磚上站三四個小時。出入劇院或其他褻瀆神明的地方是被禁止的。但有些學生會在晚點名過後冒險溜到城裏，儘管晚上要抽查宿舍，以便抓住自慰或者借助燭光看違禁讀物的學生。

對於這些習慣了家人的寵愛和無拘無束在街頭玩耍的十來歲的學生來說，按部就班的日子肯定讓人沮喪，但神學院還提供了很多跟同學一起熱情討論的機會，討論存在的意義和他們自己的前途，以及書本和學問上的發現。當然，重點是神聖的文本，以及教會斯拉夫語和俄羅斯帝國的歷史。約瑟夫·「索索」·朱加施維里——此時「約瑟夫」按照俄羅斯化的形式拼作 Iosif\*——顯得很適應，表現很好。他成了學校唱詩班的領唱男高音。這一成就十分突出，因為那些男孩要在禮拜和為禮拜所做的準備上花費大量的時間。他還成了一個如饑似渴的讀者，開始記下想法和觀點。在課堂上，他得到的成績大多是4分(B)，在宗教歌曲演唱方面得的是5分(A)，還因為偶爾在歌劇院演唱掙個5盧布。開頭幾年，他只是期末的作文和希臘語得過3分(C)。他在指揮上得了最高分(5分)。作為新生，朱加施維里在29人中排名第八；到二年級，他上升到第五。但在第三年，也就是1896至1897年，他(在24人中)的排名下滑到第16名，到第五年，他(在23人中)排在第20名，而且經文不及格。<sup>12</sup>由於教室座位是按學習成績安排的，他的課桌不停地向後移，離講台越來越遠。就連他摯愛的唱詩班也不再能引起他的興趣，這當中的部分原因在於經常發作的肺病(慢性肺炎)。<sup>13</sup>但他興趣減退和成績下滑的主要原因是，推動現代化的各種力量以及政治上的反作用所造成的文化衝突。

---

\* 譯註：原來拼作 Ioseb。

1879年，即朱加施維里出生後的第二年，兩位格魯吉亞貴族作家，伊利亞·恰夫恰瓦澤公爵 (Ilya Chavchavadze，生於1837年) 和阿卡基·策列鐵里公爵 (Akaki Tsereteli，生於1840年)，成立了格魯吉亞掃盲協會。格魯吉亞人由許多不同的群體組成，比如卡赫季人、卡爾特利人、伊梅列季人、明格列爾人，他們擁有共同的語言，恰夫恰瓦澤和策列鐵里希望通過學校、圖書館和書店，推動一體化的格魯吉亞文化的新生。他們保守的民粹主義文化綱領，絕對沒有不忠於帝國的意思。<sup>14</sup> 但是在俄羅斯帝國，從行政區劃的角度講，「格魯吉亞」根本不存在，有的只是梯弗利斯和庫塔伊西兩個省 (*gubernias*)，而且帝國當局態度強硬，書報審查人員禁止帶有「格魯吉亞」(*Gruziya*) 字樣的俄文出版物。部分原因在於很多書報審查人員不懂格魯吉亞文——書寫時用的既不是斯拉夫語字母也不是拉丁字母——實際上他們對於格魯吉亞文出版物還是非常寬大的，這就給格魯吉亞文的雜誌留下了許多空間。但是在推行俄羅斯化的梯弗利斯神學院，為了加強俄語教育，1872年就取消了格魯吉亞語教育。(格魯吉亞的正教儀式用的是教會斯拉夫語，它對於信眾而言非常難懂，在帝國那些以俄羅斯人為主的省份也是如此。) 從1875年開始，這所格魯吉亞首府的神學院就不再教授格魯吉亞歷史。神學院的二十幾個教師全都是俄國總督正式任命的，其中有幾個格魯吉亞人，但大部分都是俄羅斯修士，而他們之所以被特意派到格魯吉亞，是因為抱有強烈的俄羅斯民族主義觀點。(有幾個後來加入了極右翼團體。) 同時，除了另外招募告密者作為耳目，神學院還聘用了兩位專職學監，要對學生實行「始終如一、毫不鬆懈的監督」，哪怕在學生的自由時間也是如此。<sup>15</sup>

33

因為「不可靠」而被開除，這成了司空見慣的事情，但卻違背了神學院的教育宗旨。針對高壓管理，梯弗利斯神學院的學生——他們中許多人都是正教神父的兒子——(在1870年代) 開始編寫非法的時事通訊並成立秘密的討論「小組」。1884年，在梯弗利斯神學院有一個這樣的小組，其成員西爾韋斯特爾·「席爾瓦」·吉布拉澤 (Silibistro "Silva" Jibladze，他在神學院低年級時就帶頭造過反) 搥了俄羅斯人院長的耳光，因為那個院長罵格魯吉亞語是狗語。這些男孩十分清楚，格魯吉亞王國皈依基督教要比俄羅斯人早五百年，比羅馬人早一百年。吉布

拉澤被判處在懲戒營關押三年。後來在1886年發生了一件轟動整個帝國的事情：另外一名被開除的學生用傳統的高加索短劍 (*kinjal*) 刺殺了梯弗利斯神學院院長。<sup>16</sup> 六十多名學生被開除。「有人走得太遠，想寬恕這起刺殺事件，」格魯吉亞督主教向聖彼得堡至聖主教公會報告說，「所有人內心裏都表示贊同。」<sup>17</sup> 到1890年代，神學院的學生開始策劃罷課。在1893年11月的罷課中，他們要求改善伙食（尤其是在大齋期），取消蠻不講理的監視制度，設立格魯吉亞語系，有權利用格魯吉亞語唱讚美詩。<sup>18</sup> 正在走向俄羅斯化的教會作出的回應是，開除了87名學生，包括領導罷課的17歲的拉多·克茨霍維里，並在1893年12月關閉了學校。<sup>19</sup> 1894年秋天，神學院復課，有兩個班的一年級學生，分別是1893年和1894年招收的，而後者就是約瑟夫·朱加施維里所在的班級。

未來的斯大林剛來的時候，神學院的紀律依舊十分嚴厲，但也作了讓步，重新開設了格魯吉亞文學和歷史的課程。1895年夏天，在第一年過後，16歲半的朱加施維里帶着自己用格魯吉亞文寫的詩歌，未經神學院允許，直接找了從事出版工作的貴族伊利亞·恰夫恰瓦澤。恰夫恰瓦澤的《伊比利亞報》（伊比利亞指東格魯吉亞）的編輯，發表了朱加施維里的五首詩，署名是被廣泛使用的、代表「約瑟夫」（Ioseb / Iosif）的格魯吉亞語呢稱「索謝洛」。<sup>20</sup> 這些詩除了別的主題外，還描寫了（自然和人類中的）暴力與（鳥類和音樂中的）溫柔之間的鮮明差異，以及一位被自己的人民毒死的漫遊詩人。另一首詩是獻給青年斯大林最喜愛的詩人、格魯吉亞貴族拉斐爾·葉里斯塔維公爵（Rapiel Eristavi）50歲生日的。<sup>21</sup> 這位專政者後來說過，葉里斯塔維的詩「美麗、深情而悅耳」。他還說應該把公爵稱為格魯吉亞的夜鶯——這一角色或許是朱加施維里自己渴望扮演的。朱加施維里充滿深情的第六首詩〈老妮妮卡〉，1896年發表在《犁溝報》上，那是另一個名叫格奧爾吉·策列鐵里（Giorgi Tsereteli，生於1842年）的人擁有的雜誌。它描寫了一位帶有英雄色彩的賢人給「自己孩子的孩子訴說往事」。總之，朱加施維里也捲入了世紀末格魯吉亞激動人心的覺醒大潮。

影響青年朱加施維里的那種時代精神，在《蘇麗珂》（1895）——或《親愛的》——這首詩中得到了生動的表達，它講的是失去的愛人和失去

的民族精神。格魯吉亞掃盲協會的聯合創始人阿卡基·策列鐵里寫的《蘇麗珂》，配上音樂後成了一首膾炙人口的頌歌：

我徒勞地尋找愛人的墳墓；  
絕望讓我陷入悲哀的深淵。  
我忍不住哭泣着喊道：  
「親愛的，你在哪裏？」

荊棘叢中孤零零地  
佇立着一株可愛的薔薇；  
我雙目低垂，柔聲問道：  
「是你嗎，我的愛人？」

可愛的花兒低頭  
顫抖着表示同意；  
它那紅色的面頰，閃爍着  
清晨天空灑落的淚水。<sup>22</sup>

斯大林在成為專政者之後，經常用格魯吉亞語或翻譯後的俄語唱《蘇麗珂》（它以這種形式成了蘇聯電台一首情意綿綿的主要曲目）。但是在1895至1896年，他不得不向正在推行俄羅斯化的神學院當局隱瞞自己成功發表格魯吉亞語詩歌的事實。

當然，民族主義是那個時代的特色。1889年出生在奧匈帝國萊茵河畔布勞瑙附近的阿道夫·希特勒，幾乎從生下來開始就受到俾斯麥德意志帝國的影響。希特勒的父親阿洛伊斯 (Alois)，一個擁有奧地利國籍的熱忱的德意志民族主義者，在奧地利一側的幾個邊境小城做過海關官員；母親克拉拉是他的第三任妻子，對阿道夫關懷備至，因為她的五個孩子只活下來兩個，阿道夫是其中之一。希特勒三歲時隨家人一起搬到邊境對面德國的帕紹，並在那裏學會了用下巴伐利亞方言講的德語。1894年，他們全家又搬回奧地利（靠近林茨）。希特勒生在哈布斯堡帝國，基本上也長在哈布斯堡帝國，可是卻從未學會奧地利特有的那種德語。他後來養成了一種習慣，看不起使用多種語言的奧匈帝國，會和講奧地利德語的朋友一起唱德國的國歌《德意志高於一切》；他們相互打招

呼用的是德國人的「嗨」，而不是奧地利人的「你好」。希特勒到教堂去做禮拜，參加唱詩班，在母親的影響下說要成為天主教神父，但他主要還是想長大了做個藝術家。1900年，希特勒16歲的哥哥得麻疹去世，這對他似乎影響很大，他變得更加抑鬱、孤僻和懶散。他父親想讓他子承父業去做海關官員，便不顧他的意願，送他上了林茨的技術學校。希特勒在那裏跟老師們發生了衝突。在希特勒父親突然去世（1903年1月）後，他在學校的成績下滑，於是他母親就讓他轉學。希特勒後來（勉強）畢了業，並於1905年搬到維也納。他沒能考取那裏的藝術學校，只好過着波西米亞式的生活，無所事事，賣賣水彩畫，很快就花光了他那筆小小的遺產。但那種德意志民族主義傾向依然如故。相比之下，未來的斯大林會用他的民族主義，格魯吉亞這個小國的民族主義，換取更廣闊的天地。

## 學生政治

「要是他有了甚麼高興的事情，」一位曾經跟朱加施維里關係很近的同班同學佩季·卡帕納澤 (Peti “Pyotr” Kapanadze) 回憶說，他「就會打響指，大喊大叫，一隻腳跳來跳去」。<sup>23</sup> 在成績開始下滑的第三年（1896）秋天，朱加施維里加入了一個秘密的學生「小組」，領導者是個叫做賽義德·傑夫達里阿尼 (Seid Devdariani) 的高年級同學。他們的密謀一定程度上可能是出於偶然：朱加施維里連同其他幾位身體虛弱的同學，被安排在主宿舍區外面單獨居住，而他顯然就是在那裏遇見了傑夫達里阿尼。<sup>24</sup> 他們小組可能有十名成員，其中有幾個是哥里的。他們閱讀非宗教文獻，比如純文學和自然科學，這些書俄國當局不禁止，但神學院禁止——神學院的課程把托爾斯泰 (Lev Tolstoy)、萊蒙托夫 (Lermontov)、契訶夫、果戈理 (Nikolai Gogol)，甚至帶有救世色彩的陀思妥耶夫斯基 (Dostoevsky) 的作品都排除在外。<sup>25</sup> 那些世俗書籍，是男孩們從恰夫恰瓦澤的格魯吉亞掃盲協會開的所謂平價書店，或者從一家格魯吉亞人的二手書店弄到的。在回哥里的時候，朱加施維里還從恰夫恰瓦澤協會的一個成員經營的書攤那兒弄到了這類書籍。（未來的斯大林回憶說，那個攤主「喜歡開玩笑，還講了神學院生活的一些趣事」。）<sup>26</sup> 就像在俄羅斯

帝國幾乎所有的學校一樣，學生密謀者把這些書偷偷地帶進來在夜裏閱讀，白天就把它們藏起來。1896年11月，神學院學監在從朱加施維里那裏查到維克多·雨果(Victor Hugo)的《九三年》(講的是法國的反革命)之後，又沒收了他的一本雨果《海上勞工》的譯本。朱加施維里還讀過翻譯成俄文的左拉(Zola)、巴爾扎克(Balzac)和薩克雷(Thackeray)的作品，以及許多格魯吉亞作家的作品。1897年3月，他再次被抓住藏有違禁宣傳品：一本有悖正教神學理論的法國達爾文主義著作的譯本。<sup>27</sup>

跟大多數俄羅斯正教會的神父不同，神學院的修士們要獨身、素食，還要經常祈禱，竭力避免俗世的誘惑。但不管他們個人的犧牲、奉獻和學識如何，格魯吉亞學生對他們的印象是「暴君、反覆無常的利己主義者，心裏只想着自己的前途」，特別是升為主教(正教傳統中與使徒有聯繫的一種身份)之後。就朱加施維里而言，他對於神聖事務當然可能已經失去了興趣，但神學院的政策和修士們的行為在引起他的抵觸心理的同時，也加快了他的覺醒速度。他當時似乎被新提拔的學監、學生罵作「黑胖子」(*chernoe piatno*)的聖職修士德米特里(Dmitry)盯上了。身着黑袍、胖乎乎的德米特里，在成為學監(1898)前是神學院的經文教師(1896)。他雖是格魯吉亞貴族，俗名達維德·阿巴希澤(David Abashidze, 1867–1943)，卻顯得比抱有沙文主義傾向的俄羅斯修士還要憎惡格魯吉亞。當阿巴希澤為藏有禁書一事同朱加施維里當面對質的時候，後者公開指責神學院的監視制度，並罵他「黑胖子」，結果在黑魘魘的禁閉室被關了五個小時。<sup>28</sup> 後來，在斯大林大權獨攬的時候，他會生動地回憶起神學院「令人感到恥辱、滲入靈魂的秘密監視活動」。「早上9時，喝茶的鈴聲響了，」他解釋說，「我們進入餐廳，然後又回到自己的房間，而就在這段時間，有人動了我們放東西的箱子。」<sup>29</sup>

37

疏遠不是一下子發生，而是一個漸進的過程。朱加施維里過去那麼用功想要進去的神學院，此時正與他漸行漸遠。他所在的閱讀違禁作品的小組起初並沒有革命的想法。可那些神學家對於學生的好奇心非但不能通融和緩和——因為不管怎麼說，那都是些最優秀的純文學作品和現代科學著作——反而像畏懼甚麼東西似的，加以阻撓和迫害。換言之，煽動激進情緒的與其說是閱讀違禁作品的小組，不如說是神學院自身，

儘管它並不想那樣。托洛茨基在他的斯大林傳記中生動地寫道，俄國的神學院「以其駭人聽聞的野蠻習慣、中世紀的教育方式和把拳頭當成了法律而臭名遠揚」。<sup>30</sup> 是這麼回事，只是太簡單化了。許多——或許是大部分——俄羅斯正教神學院的畢業生都成了神父。格魯吉亞社會民主黨的主要人物，的確差不多全都是梯弗里斯神學院出來的，就像猶太工人總聯盟（崩得（Bund））的許多激進分子都出自維爾諾著名的拉比學館與師範學校<sup>\*</sup>，但其中的部分原因正在於這樣的地方提供了受教育的機會，讓人養成了嚴格自律的習慣。<sup>31</sup> 神學院的學生有成為帝俄科學家的（比如著名的生理學家、研究狗的條件反射的伊萬·巴甫洛夫（Ivan Pavlov）），神父的孩子也有成為科學家的（例如發明週期表的德米特里·門捷列夫（Dimitri Mendeleev））。正教神職人員通過他們的後代以及他們的教育工作，貢獻了整個俄羅斯帝國的大部分知識分子。神職人員給兒子或學生傳授了一種能夠經受住世俗化衝擊的價值觀，即努力工作、貧窮卻有尊嚴、關愛他人，以及最重要的：道德上的優越感。<sup>32</sup>

38 朱加施維里發現《聖經》中存在前後不一致，他研讀埃內斯特·勒南（Ernest Renan）的無神論著作《耶穌傳》的譯本，又放棄了聖職，但這並不意味着他就會自動成為革命者。革命的傾向並不是生來就有的。還需要再邁出一大步。就他而言，1897年的暑假他是在密友米哈伊爾·「米霍」·達維塔施維里（Mikheil “Mikho” Davitashvili）的老家村子度過的，「他在那裏瞭解到農民的生活」。<sup>33</sup> 在格魯吉亞，就如同在俄羅斯帝國的其他地方一樣，存在缺陷的農奴解放對農民沒有甚麼幫助，反而讓他們陷入了困境：要麼給從前的主人交納土地「贖金」，要麼給再度猖獗的山賊交納貢金。<sup>34</sup> 農奴解放倒是「解放」了貴族子女，他們沒有農奴要管理，便離開莊園去了城市，結果與農民出身的青年一起，承擔起了農民的事業。<sup>35</sup> 為了喚醒格魯吉亞，朱加施維里努力的方向逐漸發生了變化，他意識到格魯吉亞地主對格魯吉亞農民的壓迫：這個或許想過要成為修士的孩子，現在「希望做個鄉村教師」或長老。<sup>36</sup> 但是，他

---

\* 譯註：俄羅斯帝國在1847年成立的這間機構——維爾諾拉比學館與師範學校——有兩個分部，一是拉比學館，一是師範學校。

對社會不公的認識，是和他想要出人頭地的野心聯繫在一起的。在神學院的秘密小組中，朱加施維里同年長的傑夫達里阿尼既是好友，也是爭奪最高位置的對手。<sup>37</sup> 1898年5月，在傑夫達里阿尼畢業去了俄羅斯帝國在波羅的海地區的多帕特(尤里耶夫)大學之後，朱加施維里如願以償，接管了這個小組並推動它走上了更為務實的(政治)方向。<sup>38</sup>

約瑟夫·伊列馬施維里(Iosif Iremashvili)——神學院另一位哥里的「索索」——回憶說：「在他〔朱加施維里〕的童年和青年時期，一個人只要順着他專橫的意志，他就是個好朋友。」<sup>39</sup> 不過，大概就是在這段時間，「專橫的」朱加施維里有了一位主張變革的導師，拉多·克茨霍維里。1893年，拉多因為帶頭罷課被開除之後，就在當年夏天為恰夫恰瓦澤的《伊比利亞報》報道他老家哥里地區的農民在解放後的負擔問題；後來，按照慣例，拉多可獲允進入另外一所神學院，他也確實在1894年9月入學了(基輔神學院)。可是在1896年，拉多又被基輔神學院開除，而且還因為持有「犯罪性質的」宣傳品被抓了起來，在警方的監視下被遣送回老家。1897年秋天，拉多重返梯弗利斯，加入格魯吉亞馬克思主義小組，並到一家印刷所工作，學習排字，以便印刷革命傳單。<sup>40</sup> 他還同梯弗利斯神學院的學生重新建立了聯繫。克茨霍維里是他們之中公認的權威：他的照片(連同米霍·達維塔施維里和佩季·卡帕納澤的照片一起)掛在神學院學生朱加施維里寢室的牆上。<sup>41</sup> 雖然在恰夫恰瓦澤的格魯吉亞掃盲協會的平價書店可能有少量的馬克思主義書籍，而且其中可能還有一本馬克思本人寫的(《政治經濟學批判》，三卷本《資本論》的一部分)，但梯弗利斯在圖書方面跟華沙的差距還是很大的。<sup>42</sup> 從1898年開始，拉多成了推動青年斯大林思想轉變的主要力量——從被稱為民粹主義的典型的社會正義取向到馬克思主義的轉變。<sup>43</sup>

## 馬克思主義與俄國

出身於普魯士富裕中產階級家庭的卡爾·馬克思(1818–1883)，絕對不是現代的第一個社會主義者。「社會主義」(這個新詞)可追溯到1830年代，同「自由主義」、「保守主義」、「女性主義」等許多「主義」出



現的時間差不多，都是在1789年開始的法國大革命以及市場在同一時期的普及之後出現的。最早公開承認自己是社會主義者的人物之一，是紡織業巨頭羅伯特·歐文(Robert Owen, 1771-1858)，他試圖像父親一樣對待「他的」工人，通過提高工資、減少勞動時間、修建學校和住房、糾正陋習和酗酒，為員工創建一個模範社區。其他早期的社會主義者，尤其是法國的社會主義者，夢想着建立一個全新的社會，而不僅僅是改良社會狀況。貴族亨利·德·聖—西門伯爵(Henri de Saint-Simon, 1772-1837)及其追隨者，要求在財產公有而不是私有的條件下，由社會工程師將社會變得更加完善，變得友愛、合理、公正，就像新版的柏拉圖《理想國》。夏爾·傅立葉(Charles Fourier)別出心裁，認為勞動是存在的中心，應當得到促進而不是被非人化；為此，傅立葉設想出一個由中央來管理的社會。<sup>44</sup>可是，並不是所有的激進分子都贊成中央集權的權威：皮埃爾—約瑟夫·蒲魯東(Pierre-Joseph Proudhon, 1809-1865)抨擊銀行體系，聲稱大銀行家拒絕貸款給小業主或窮人，而且他還鼓吹應當把社會建立在合作的基礎上(互助論)，那樣一來，國家就沒有必要存在了。他把自己的小規模、提倡合作的方法稱為無政府主義。但馬克思連同其親密的合作者、英國工廠主弗里德里希·恩格斯(1820-1895)認為，社會主義不是一種選擇，而是由科學規律支配的大規模歷史鬥爭的「必然結果」，因此，無論喜歡還是不喜歡，現在的這個時代都注定要滅亡。

許多支持保守主義立場的人也譴責市場的罪惡，但在新經濟秩序的反對者中，馬克思別樹一幟，高度讚揚了資本主義和現代工業的力量。亞當·斯密(Adam Smith)關於蘇格蘭啟蒙運動的巨著《國富論》(1776)有力地證明了競爭、專門化(勞動分工)以及利己心對於推動社會進步的作用，但是在那本簡潔明快的小冊子《共產黨宣言》(1848)中，29歲的馬克思大談「蒸汽和機器」如何「引起了工業生產的革命」，以及「不斷擴大產品銷路的需要」如何「驅使資產階級奔走於全球各地」。<sup>45</sup>馬克思

40

---

<sup>44</sup> 譯註：《馬克思恩格斯文集》(人民出版社，2009)第2卷，第32、35頁。

在1848年當作既成事實來描寫的那些突破——現代的大工業和全球化——哪怕是在英國也要再等上幾十年，儘管在他童年的時候英國就開始向工業化轉型。但馬克思預見到了它們。馬克思對未來的看法和斯密不同，他認為全球資本主義將失去活力。1867年，他出版了日後的三卷本《資本論》中的第一卷，回應了英國古典政治經濟學家斯密和大衛·李嘉圖(David Ricardo)的觀點。馬克思指出，所有的價值都是人的勞動創造的，擁有生產資料的人剝奪了勞動者的「剩餘價值」。換言之，「資本」是從他人那裏剝奪的勞動。馬克思認為，所有者把他們非法獲得的剩餘價值(資本)投資於可以節約勞動的機器，結果促進了生產，增加了總財富，但也削減了工資，減少了工作崗位；勞動者陷入貧困——據馬克思說——資本卻日益集中在少數人手裏，阻礙了進一步發展。為了經濟和社會的繼續進步，馬克思要求廢除私有財產、市場、利潤和貨幣。

馬克思對法國社會主義思想(傅立葉、聖—西門)和英國政治經濟學(李嘉圖、斯密)的修正，靠的是德國唯心論哲學家格奧爾格·威爾海姆·弗里德里希·黑格爾(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所說的辯證法：那就是，按照矛盾的所謂內在邏輯，形式與其對立面發生衝突，以便通過否定和超越實現歷史的進步(揚棄[Aufhebung])。因此，從辯證法來看，資本主義由於自身的內在矛盾，將會被社會主義取代。馬克思認為歷史的發展大體上可以分為幾個幾段——封建主義、資本主義、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當一切都很充裕的時候)，認為起決定作用的原動力是階級，比如無產階級，他們將會推翻資本主義，就像據說是資產階級推翻了封建主義和封建領主一樣。在馬克思那裏，無產階級成了黑格爾的普遍理性的化身，成了所謂的「普遍等級」(universal class)，因為它遭受的苦難是「普遍的」\*——換句話說，不是因為無產階級本身就在工廠勞動，而是因為它是受害者，變成了拯救者的受害者。

馬克思打算把自己對於社會的分析變成銳利的武器，努力改變社會。1864年，他和一幫各式各樣有影響的左翼人士一起——包括一些無

---

\* 譯註：參見《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14—17頁。

41 政府主義者——在倫敦成立了一個名叫「國際工人協會」(1864–1876)的跨國組織，想把世界各地的工人和激進分子聯合起來。到1870年代，左翼批評者抨擊馬克思對於該組織的設想——「把所有的生產工具都集中在國家手裏，也就是集中在被組織起來成為統治階級的無產階級手裏」——是威權主義，結果引發爭吵和分裂。1883年馬克思在倫敦去世後(他也葬在那裏)，各社會黨和工人黨在巴黎成立了「第二國際」(1889)。第二國際用《國際歌》代替了1789年法國大革命中「資產階級共和主義的」《馬賽曲》作為社會主義的會歌，它的第一段開頭是「起來，全世界受苦的人」。第二國際還正式採用了紅旗。紅旗以前在法國出現過，它是和波旁王朝以及想要復辟的反革命分子的白旗相對的。不過，用的雖然是法國的歌曲和象徵物，作為已故的馬克思的信徒，德國的社會民主黨逐漸主導了第二國際。俄羅斯帝國的臣民——他們中的許多人都在歐洲流亡——將會成為德國人在第二國際中的主要競爭對手。

在俄羅斯帝國，在離無產階級的出現還有近半個世紀的時候，社會主義思想就已經被人們接受了，而它的大規模傳播，要歸功於一些自命的知識分子的內省。知識分子——字面意思是知識階層——作為受過教育但又有挫敗感的個體，起初出自貴族，但隨着時間的推移，其中也包括有機會進入中學和大學的平民。俄國知識分子同馬克思一樣，汲取了德國的唯心論哲學，只是沒有受到多少英國政治經濟學中唯物主義的影響。俄國的社會主義者組成了若干小組(俄語叫 *kruzhok*，德語叫 *Kreis*)，他們從自身尊嚴受到侵犯的意識出發，推己及人，捍衛所有人的尊嚴。走在前面的是亞歷山大·赫爾岑(Alexander Herzen)和米哈伊爾·巴枯寧(Mikhail Bakunin)，兩人彼此認識，都是19世紀中葉特權家庭的後代。兩人都認為，由於俄國有村社制度，農民可以成為社會主義的基礎。<sup>46</sup> 通過對(分隔成條狀的)農戶份地和其他生產資料進行定期的重新分配，村社提供了一種緩衝機制，可以依靠集體的力量，應對霜凍、乾旱等風險。<sup>47</sup> 很多農民並不生活在村社中，尤其是在東部(西伯利亞)以及西部和南部(烏克蘭)，那裏根本不存在農奴制。但是在俄羅斯帝國中部的那些地區，由於1860年代的農奴解放，村社的力量得到加強。<sup>48</sup> 就個體而言，無論是解放之前還是之後，村社的農民都不擁

有任何私有財產，於是，赫爾岑和巴枯寧那樣的思想家就以為，帝國的農民生來就是社會主義者，因此，他們認為，社會主義在俄國實際上可以在資本主義之前出現。1860年代農奴解放以後，那些自封的民粹主義者 (*narodniki*) 就是抱着這樣的想法深入俄國農村幫助農民擺脫落後狀況的。

42

民粹主義者感到急迫的是，資本主義已開始普及，因此，他們擔心獲得自由的農奴會變成工資奴隸，剝削性質的資產階級會取代農奴主的位置。同時，由於「庫拉克」(*kulak*) 或者說富農的出現，村社生活中的平均主義——它在很大程度上被理想化了——被認為受到了威脅。<sup>49</sup> 但是，就連貧農對外界那些自命為導師的人也抱有敵意。民粹主義的鼓動策略未能激起大規模的農民起義，此後有些人就轉向政治恐怖，想在城市激起大規模的起義(此舉也未能奏效)。不過，由於馬克思在俄國的影響越來越大，其他激進分子將希望從農民轉移到早期的無產階級身上。俄國馬克思主義之父格奧爾吉·普列漢諾夫 (Georgi Plekhanov, 生於1857年) 反對民粹主義的觀點——俄國擁有某種據說是與生俱來的社會主義傾向(農民村社)，因而可以超越資本主義。1880年，普列漢諾夫開始流亡歐洲(最終他流亡了37年)，但他在1880年代的著作《社會主義與政治鬥爭》(1883) 以及《我們的意見分歧》(1885)，傳回並影響了俄國。他主張不能跨越不同的歷史階段：不經歷資本主義，就不可能進入社會主義，因此，在社會主義革命之前，俄國也要首先來一場「資產階級革命」，無產階級必須幫助資產階級完成資產階級革命。<sup>50</sup> 這是馬克思曾經說過的。儘管馬克思晚年的確似乎承認，英國的經驗——那是他進行理論概括的基礎——可能不具備普遍意義；(從歷史的角度來說) 資產階級可能不是唯一進步的階級；俄國可能不需要經歷充分發展的資本主義階段。<sup>51</sup> 這種顯而易見的異端觀點跟馬克思對俄國經濟學家尼古拉·F·丹尼爾遜 (Nikolai F. Danielson) 的信賴有關。丹尼爾遜是他的知交，為他提供了有關俄國的書籍。不過，對於馬克思晚年在俄國問題上的準民粹主義觀點，瞭解的人並不多(這些觀點直到1924年12月才用俄文發表出來)。普列漢諾夫從馬克思主義立場出發對民粹主義所作的批判，對當時的知識界影響很大。

43 丹尼爾遜對此功不可沒。他與人合作，把馬克思的三卷本巨著《資本論》譯成俄文，此書在1890年代出版後吸引了相當多的讀者，其中包括未來的斯大林。1896年，隨着第三卷的出版，遲疑不決的俄國書報審查人員最終認定這是「科學」著作，而這就意味着此書可以在圖書館流通也可以銷售。<sup>52</sup> 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成為俄國一些大學中的科目，在世紀之交的帝國，就連莫斯科一家大型紡織廠的廠長也收藏了眾多關於馬克思學說的著作。<sup>53</sup> 俄國當時有100萬無產者，而農民有八千多萬。但馬克思主義卻取代民粹主義成了「答案」。

從1880年代開始，馬克思主義也傳到了俄國人控制的高加索。這其中的部分原因在於歐洲的左翼運動經由俄國傳播至此，以及俄屬波蘭的騷動。騷動的影響通過流放到高加索的波蘭人或者前往沙皇統治下的波蘭學習的格魯吉亞人傳到了格魯吉亞。格魯吉亞的馬克思主義也和同時代人的反叛活動有關。諾伊·饒爾丹尼亞(Noe Jordania)是高加索的普列漢諾夫。1869年，他出身於西格魯吉亞的一個貴族家庭，曾就讀於梯弗里斯神學院，並和席爾瓦·吉布拉澤——也就是1884年擯過俄羅斯人院長耳光的那位梯弗里斯神學院學生——等人一起，在1892年成立了「第三小組」(麥撒墨達西社)。他們的目的是要通過對比，顯示出自己這個公開主張馬克思主義的社團與伊利亞·恰夫恰瓦澤保守的民粹主義(「第一小組」)以及格奧爾吉·策列鐵里的民族(古典)自由主義(「第二小組」)的區別。饒爾丹尼亞在旅歐期間開始接觸普列漢諾夫和卡爾·考茨基(Karl Kautsky)的理論——考茨基出生於布拉格，是德國社會民主黨的主要人物。1898年，受格奧爾吉·策列鐵里之邀，饒爾丹尼亞接手《犁溝報》的編務。<sup>54</sup> 在他的領導下，《犁溝報》成為俄羅斯帝國第一份合法的馬克思主義報紙，在俄國國內強調自治、發展和格魯吉亞的文化自主(這一點同多民族的哈布斯堡王國中的奧地利社會民主黨相似)。沒過多久，馬克思主義的宣傳品——包括100本從俄文翻譯成格魯吉亞文的油印《共產黨宣言》——就被偷偷地運進梯弗里斯，給各個由朱加施維里那樣的青年激進分子組成的、範圍不斷擴大的高加索小組提供了支持。<sup>55</sup>

梯弗里斯成了他們正在組建的實驗室。這座被騷動不安的農村包圍着的城市，是由一些小商販、搬運工和手藝人組成的。登記在冊的

工匠有9,000人，大多在一兩個人的合作社。梯弗利斯大約有95%的「工廠」都是些作坊，工人不超過十個。但在幾個比較大的火車站和修理廠（它們是1883年開辦的），加上幾個產業化的煙草工廠和阿傑利哈諾夫皮革廠，倒是集中了一批無產階級，至少有3,000人（全省有12,500人）。梯弗利斯鐵路工人在1887年和1889年進行過罷工，1898年12月中旬他們再次罷工，時間長達五天——這是一次比較大的罷工，是拉多·克茨霍維里等幾個工人組織的。在那次從週一到週六的工作週抗議行動中，朱加施維里還在神學院。<sup>56</sup>但由於克茨霍維里的緣故，朱加施維里的神學院學生小組——他在1898年5月剛剛掌管小組——擴大規模，大概吸收了六名梯弗利斯火車站和修理廠的無產者。他們通常在週日開會，地點是梯弗利斯的納哈羅夫卡（納扎拉傑維）社區，那裏沒有人行道、路燈、下水道和自來水。<sup>57</sup>朱加施維里發表了關於「資本主義制度的結構」和「為了改善工人的地位必須開展政治鬥爭」的演說。<sup>58</sup>他通過拉多見到了狂熱的席爾瓦·吉布拉澤，吉布拉澤似乎教會了朱加施維里如何去做工人的鼓動工作，並給他分派了新的「小組」。<sup>59</sup>把朱加施維里介紹給諾伊·饒爾丹尼亞的可能也是吉布拉澤。

44

就像朱加施維里曾經找過《伊比利亞報》（該報後來發表了他的詩作）的貴族恰夫恰瓦澤，1898年的某個時候，朱加施維里也拜訪了《犁溝報》的饒爾丹尼亞。一副紳士加學者派頭的貴族饒爾丹尼亞，沒有表現出特別支持的樣子。他後來回憶說，那位年少魯莽的來訪者告訴他，「為了在工人中宣傳您的思想，我已經決定退學」。饒爾丹尼亞聲稱，他考了考年輕的朱加施維里政治和社會方面的問題，然後建議他回到學校，多研究些馬克思主義。這種居高臨下的建議當然不會被接受。「我會考慮的」，據說未來的斯大林是這樣回答的。<sup>60</sup>1898年秋天，朱加施維里真的追隨拉多·克茨霍維里的腳步，加入了格魯吉亞馬克思主義者的「第三小組」。

嚴格說來，「第三小組」算不上是政黨——政黨在沙皇俄國是非法的——但是在1898年3月，在馬克思主義的啟發下並且仿照德國的模式，在帝國猶太人定居區的小城明斯克郊外的一所私人木屋裏，召開了成立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即未來的蘇聯執政黨的「代表大會」。這是第

二次嘗試(之前在基輔的建黨沒有成功)。早五個月成立的猶太工人總聯盟為明斯克會議提供了後勤支持。出席會議的只有九個人，而且只有一個是真正的工人(以致有些與會者反對擬採用的黨的名稱，因為其中含有「工人」字樣)。\*1898年恰好是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共產黨宣言》發表50週年，代表們在三天的會議中也通過了他們自己的宣言，強烈譴責「資產階級」。為了便於流傳，他們決定對宣言進行改寫。這項任務交給了彼得·司徒盧威(Pyotr Struve，生於1870年)，彼爾姆省長的兒子、帝國法學院的畢業生。<sup>61</sup> («專制制度在有教養的俄國人的心靈、思想和習慣中製造了背叛國家的心理和傳統」，司徒盧威後來解釋說。) <sup>62</sup> 沙皇的政治警察對明斯克代表大會一無所知，但與會者早就上了黑名單，大多數不久就被捕了。<sup>63</sup> 弗拉基米爾·烏里揚諾夫(Vladimir Ulyanov)——人們更熟悉的稱呼是「列寧」——在得到1898年明斯克代表大會消息的時候，正因為散發革命傳單和陰謀刺殺沙皇，在被關押了15個月後，被流放東西伯利亞三年。明斯克會議實際上是革命前的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在俄羅斯帝國境內召開的唯一一次代表大會。<sup>64</sup> 但沒過多久，一群流亡歐洲的社會主義者，其中包括普列漢諾夫及其忠實的追隨者平哈斯·博魯赫(Pinchas Borutsch，又名帕維爾·阿克雪里羅得(Pavel Axelrod))和維拉·查蘇利奇(Vera Zasluch)，還有後起之秀尤利烏斯·「尤利」·策傑爾包姆(Julius “Yuly” Tserderbaum，又名馬爾托夫(Martov))和列寧，就在1900年12月出版了一份俄文報紙，起初在斯圖加特†。報紙名字叫《火星報》，就如同「星星之火將會燃成熊熊烈焰」這句詩說的，目的是要把俄國革命者團結在一個馬克思主義的綱領周圍。<sup>65</sup>

\* 作者原註：波里斯·埃傑爾曼(Boris Eidelman，主要的組織者)，斯捷潘·拉德琴柯(Stepan Radchenko)、阿龍·克列梅爾(Aaron Kramer)、亞歷山大·萬諾夫斯基(Aleksandr Vannovsky)、阿弗拉姆·穆特尼克(Abram Mutnik)、卡濟米爾·彼得魯謝維奇(Kazimir Petrusевич)、帕維爾·圖恰普斯基(Pavel Tuchapsky)、納坦·維格多爾奇克(Natan Vigdorichik)以及什穆埃爾·卡茨(Shmuel Kats，唯一的工人)。

† 譯註：應為萊比錫。

## 鼓動家和教師

未來的斯大林(像列寧一樣)把自己的「黨員身份」從1898年算起。回到神學院後，在1898至1899年的秋季和冬季，他違紀的次數越來越多：早禱遲到；舉行聖餐儀式時不守規矩(明顯早退，抱怨站的時間太長、腿疼)；請假回哥里後，返校晚了三天；不和老師(以前的學監穆拉霍夫斯基)打招呼；在教堂裏笑出聲；公開反對搜查；不做晚禱。朱加施維里受到訓斥，不得不在神學院的獨立房間關禁閉。1899年1月18日，他被禁止離開學校進入市區一個月，此事顯然和發現大批違禁書籍有關。(抓住的另外一個學生被開除了。) <sup>66</sup> 更嚴重的是，復活節短假過後，朱加施維里沒有參加期終考試。格魯吉亞教區的官方機構在1899年5月29日的記錄提到，朱加施維里「因不明原因曠考，被神學院開除(*uvolniaetsia*)」。 <sup>67</sup> 對於這次開除以及「不明原因」這種令人費解的說法，人們有各種各樣的解釋，包括斯大林自己(後來)吹噓的，他是「因為宣傳馬克思主義而被趕出了神學院」。 <sup>68</sup> 但是，在他成為統治者以前，他不止一次說過，當時學校突然要收取一筆他無力承擔的費用，還說，他在最後一年要失去部分國家資助。不過，他每次都對失去國家獎學金的具體原因避而不談。 <sup>69</sup> 似乎沒有任何現存的材料可以證明，他曾向葉格納塔施維里或其他幫過他的人求助。在正式的開除決議上根本沒有提到付不起學費的事情。不過，他的經濟狀況比較窘迫，這一點眾所周知(朱加施維里多次懇求院長給予資助)，所以，有可能是以學監阿巴希澤為首的那些維持紀律的人，藉着朱加施維里的貧困把他趕了出去。 <sup>70</sup>

46

1899年，朱加施維里被開除，四年後，阿巴希澤升為主教，這顯然是對其工作的肯定。 <sup>71</sup> 實際上，神學院的俄羅斯化政策是失敗的。高加索當局似乎在1897至1898年就已得出結論，認為梯弗利斯神學院正在損害俄國的利益，應當關閉(根據某個教師在回憶錄中的說法)。但教會並沒有馬上將其關閉，而是決定清洗格魯吉亞學生。 <sup>72</sup> 神學院把有不軌行為的學生名單交給了憲兵隊。 <sup>73</sup> 1899年9月，40至45名神學院學生被迫「自願」離校。不久，格魯吉亞學生就完全從神學院消失了。(神學院在1907年徹底關閉。) <sup>74</sup> 朱加施維里本來會在1899年秋天同大



批學生一起被開除，但阿巴希澤對他恨之入骨，將他單獨開除了。可是，我們仍然感到好奇，為甚麼朱加施維里的曠考原因不明，他顯然沒有申請補考又是為甚麼。一個可能的線索是：朱加施維里離開神學院那年，他或許已經做了父親，孩子是個女孩，名叫普拉斯科維亞·「帕沙」·格奧爾吉耶夫娜·米哈伊洛夫斯卡婭 (Praskovya "Pasha" Georgievna Mikhailovskaya)，她小時候長得跟他很像。<sup>75</sup> 朱加施維里的學生小組在梯弗利斯神聖的穆塔茨明達山的山腳下租了一間小屋，用於秘密聚會，但這些年輕的男人可能也把它用來幽會。<sup>76</sup> 斯大林後來在檔案裏收藏了一封來信，信的內容是有人要認他做父親。要是這種含有詳盡細節的證據可以被接受的話，那就可以說明，朱加施維里為甚麼會失去國家獎學金，為甚麼沒有申請補考和恢復國家獎學金。<sup>77</sup>

47 但傳記作者們注意到了一些更奇怪的事情。在被開除的時候，由於未能從事神職工作，也沒有為正教會服務（或者至少做小學教師），朱加施維里欠了政府六百多盧布——這是一筆鉅款。院長寫信給他，建議他到基層的教會學校當教師，但他沒有接受；可神學院似乎並沒有利用世俗當局逼迫他償還經濟債務。<sup>78</sup> 還有下面這件事：1899年10月，在沒有償還欠款的情況下，朱加施維里申請並獲得了神學院的官方文件，證明他已完成四年的學習（他的第五年尚未結束）。這名被開除的學生品行綜合得分是「優秀」（5分）。<sup>79</sup> 這些奇怪的事情——照理來說，這裏面有行賄的嫌疑——可能有意義，也可能沒意義。不管怎麼說，未來的斯大林可能已經過於成熟，在神學院待不下去了，他要比同學們大兩歲，已經深度參與到拉多的革命活動中。朱加施維里既然不準備做神父，那就似乎不可能讓神學院推薦他到大學繼續學習。據說朱加施維里對一個同學吐露了心聲，說這次開除是個「打擊」，但即便如此，他也沒有努力爭取留下來。<sup>80</sup>

朱加施維里依舊喜歡讀書，而且越來越想扮演教師的角色。1899年夏天他不在哥里，而是同好友、一個神父的兒子米霍·達維塔施維里，又一次在名為茨羅米的村子度過。拉多·克茨霍維里去看望過他們。警察搜查了達維塔施維里的家，但他的家人似乎提前得到了警告，結果甚麼也沒有搜出來。不過，米霍還是同其他許多人一樣，在

1899年9月「自願」離開了神學院。<sup>81</sup> 朱加施維里讓許多剛被神學院開除的學生加入他領導的自學小組。<sup>82</sup> 他還繼續召集工人開會並且為他們講課。後來，1899年12月，也就是在得到神學院學習四年的官方證明後不久——這份證明可能是他用來求職的——朱加施維里在梯弗利斯氣象台找到了一份有薪水的工作，那是政府的一個下屬機構。這是交了好運，同時也得益於他同克茨霍維里兄弟的交往：拉多的弟弟瓦諾·克茨霍維里在氣象台工作，而朱加施維里在1899年10月就已經和瓦諾一起搬了進去；湊巧的是，在氣象台的六名員工中，不久就有一個離開了。<sup>83</sup> 朱加施維里拿到的薪水相對來說還不錯：每月20至25盧布（當時高加索的平均工資是熟練工人14至24盧布，非熟練工人10至13盧布）。<sup>84</sup> 除了冬天剷雪夏天掃地，他還要記錄每小時的溫度和氣壓。未來的斯大林還花了大量的時間閱讀，成了一個熱忱的鼓動者。值夜班的時候，白天他就鑽研馬克思主義，或者給工人小組上課，他對此全情投入。

48

接下來的靈感來自對社會主義頭面人物的質疑。在同拉多·克茨霍維里——他有時夜裏就藏匿在氣象台——患難與共的時候，朱加施維里對饒爾丹尼亞的《犁溝報》產生了懷疑。作為一份合法刊物，《犁溝報》為了通過審查而必須有所克制，結果它提供了一種「摻了水的馬克思主義」，引起了更年輕的激進分子的憎惡。克茨霍維里和朱加施維里認為，《犁溝報》上的專欄文章對於真正的工人「毫無用處」。拉多渴望創辦自己的非法刊物，招募更多像朱加施維里那樣的青年宣傳家。<sup>85</sup> 饒爾丹尼亞及其支持者反對出版非法刊物，擔心那樣會連累到他們的合法刊物。在朱加施維里著文批評《犁溝報》表面上的馴服和不作為時，饒爾丹尼亞和編輯們拒絕發表。吉布拉澤和饒爾丹尼亞聽說，朱加施維里正在背地裏煽動大家反對《犁溝報》。<sup>86</sup> 但是，不管有甚麼樣的個人恩怨，真正的策略分歧才是關鍵：未來的斯大林和拉多都認為，馬克思主義運動的重點應當從教育民眾轉向直接行動。拉多率先行動起來，在1900年1月1日組織了一次梯弗利斯軌道馬車司機的罷工。司機們一天工作13個小時，掙90戈比，而且還要被扣掉一部分，作為工作場所的「罰款」。這座首府城市因罷工而陷入短暫的停頓，結果不得不提高工

資。這就是力量。不過，就像饒爾丹尼亞和吉布拉澤強調的，這樣做有風險。有個軌道馬車工人告發了拉多。1900年1月中旬，他好不容易才擺脫梯弗里斯的憲兵，跑到了巴庫。<sup>87</sup> 同月，朱加施維里首次被捕。幾週前，他剛滿21歲的法定成人年齡。

名義上的罪名是他父親貝索以前在季季利洛拖欠了稅款——貝索在三十多年前就離開了那個村子，但並沒有從名冊上正式除名。朱加施維里被關在麥捷希監獄，也就是懸崖上的那座城堡，他11歲時和父親一起到阿傑利哈諾夫皮革廠上班，路上要經過此地。似乎是米霍·達維塔施維里和其他朋友湊錢還清了貝索在村裏的欠債，朱加施維里才得以獲釋。凱可從哥里趕來，還一度要求跟他一起住在氣象台的宿舍——這肯定讓人覺得很尷尬。她「總是不放心兒子，」一位鄰居兼遠房親戚（瑪麗亞·基季阿施維里 (Maria Kitiashvili)）回憶說，「我記得很清楚，她總是到我們這兒，哭訴與她心愛的索索有關的事情，比如他現在在哪兒，憲兵有沒有把他抓起來？」<sup>88</sup> 不久，凱可本人就受到警方的監視，偶爾還被叫去盤問。憲兵為甚麼沒有逮捕當時就住在梯弗里斯的貝索，這一點現在還不清楚（約瑟夫偶爾會收到他父親親手做的靴子）。<sup>89</sup> 朱加施維里拿了神學院的獎學金，欠了國家的債務，可為甚麼沒有被抓起來，這一點現在也不清楚。不能排除是警方無能。但是，因為貝索的債務而被捕，的確有點像是藉口，實質上是對一個青年激進分子的警告，或者可能是一種策略，要給他打上記號：朱加施維里在警方檔案裏留下了照片。他回到氣象台工作，但他的非法政治演講還在繼續，他仍然受到監視。「根據密探的情報，朱加施維里是社會民主黨黨員，他和工人聚會，」警方的記錄說，「由於受到監視，他行為詭秘，走路時總朝後看。」<sup>90</sup>

## 地下鬥爭

同高加索的鬥雞、匪患以及賣淫（政治妓女及賣身妓女）相比，非法的社會主義煽動行為並不突出，至少起初是這樣。遲至1900年，受警方監視的梯弗里斯居民絕大多數是亞美尼亞人，之所以受到監視，

是因為警方擔心他們和境外奧斯曼帝國的同族保持聯繫。但是，僅僅在幾年之後，警方卷宗中的「政治」可疑分子大多就成了格魯吉亞人和社會民主黨人——卷宗有238份，其中包括朱加施維里的。<sup>91</sup> 1901年3月21日，警方突擊搜查了梯弗利斯氣象台。在搜查朱加施維里和其他員工的物品時，他並不在場。他可能是在不遠處看着，結果被發現，也遭受了搜身。<sup>92</sup> 但警方沒有逮捕他，大概是因為想繼續監視他，以便順藤摸瓜。不過，未來的斯大林的氣象事業終結了。他轉入了地下鬥爭，而且是長期的地下鬥爭。

除了私下給人輔導所得的報酬和依靠同事、女友以及他想要領導的無產者的接濟之外，朱加施維里此時沒有任何生活來源。他全身心地投入到密謀活動中，比如建立安全屋和創辦非法出版物，以便為罷工和五一遊行提供幫助。當時，「五一」已經成為全世界社會主義者的節日，以紀念1886年芝加哥的秣市騷亂，當時警察對爭取八小時工作制的罷工者開了槍。在梯弗利斯，1898年，鐵路工人舉着紅旗發動過五一遊行。起初的三次遊行都被限制在市區的範圍外，分別吸引了25人(1898)、75人(1899)和400人(1900)。對於1901年的五一節，朱加施維里參與策劃了一次沿戈洛溫大街的大膽而冒險的遊行，那裏是梯弗利斯的市中心。他在城裏工人最集中的地方——梯弗利斯鐵路總廠進行鼓動。沙皇警察搶先動手抓人，並佈置了帶着馬刀和長鞭的哥薩克騎兵，但至少還有2,000名工人和圍觀者公然向他們挑戰，高喊「打倒專制制度！」經過45分鐘的混戰和肉搏，鮮血浸透了高加索首府的大街。<sup>93</sup>

50

俄國社會民主黨人因從事革命活動而被沙皇警察流放到高加索——當然，他們在那裏可以幫助煽動革命活動——這讓朱加施維里遇到了米哈伊爾·加里寧(Mikhail Kalinin)等人。<sup>94</sup> 但26歲、好鬥的克茨霍維里仍然是與帝俄社會民主黨人聯繫的關鍵，也是朱加施維里的榜樣。拉多在巴庫搞地下鬥爭，而且真的辦了一份同《犁溝報》競爭的格魯吉亞文報紙，叫《鬥爭報》，這份言辭激烈的報紙從1901年9月開始發行。在談到1901年五一節梯弗利斯的流血衝突時，《鬥爭報》上一篇未署名的文章(1901年11-12月)毫不畏懼地說道，「今天我們在街頭遊行示威中所蒙受的犧牲，將來會換得百倍的補償」，還說「在鬥爭中犧牲的或從

我們陣營中抓去的每一個戰士，都會喚起成百成千的新戰士」。<sup>95</sup> 克茨霍維里和阿韋利·葉努基澤(Avel Yenukidze)、列昂尼德·克拉辛(Leonid Krasin)等在巴庫的社會民主黨人一同建立的地下印刷所，就隱藏在城裏的穆斯林居住區，代號「妮娜」——這是(格魯吉亞女守護神)尼諾在俄語中的說法。它還重印了最近創辦的俄文馬克思主義僑民報紙《火星報》，原件是由馬幫從中歐經大不里士(伊朗)偷偷帶到巴庫的。<sup>96</sup> 妮娜很快就成了社會民主黨在整個俄羅斯帝國最大的地下印刷所，這讓沙皇警方頭疼不已(1901-1907)。<sup>97</sup> 年輕的朱加施維里正是通過妮娜印刷所和拉多的《鬥爭報》開始瞭解到列寧思想的。列寧在到1901年底為止的總共13期《火星報》上，寫了很多言辭尖銳的(未署名)社論。<sup>98</sup>

51 克茨霍維里繞開饒爾丹尼亞，讓朱加施維里有了直接把握俄國社會民主黨脈動的機會，這讓他成了一名消息靈通的馬克思主義者和富有鬥爭精神的街頭鼓動家。後一種角色是同朱加施維里固有的喜歡自學的傾向以及他以啟發民眾為己任的使命感結合在一起的。不過，朱加施維里從自身的經驗出發，痛感工人往往並不懂得學習和自我完善的重要性。在1901年11月11日新成立的俄國社會民主工黨梯弗利斯委員會的一次會議上，他支持的不是工人黨員，而是半知識分子黨員，也就是像他自己和拉多那樣的黨員。他認為邀請工人入黨同「密謀」不相稱，會讓黨員暴露，有被捕的危險。列寧在《火星報》上宣傳過這一看法。他還寫了一本內容寬泛的小冊子，名叫《怎麼辦？》(1902年3月)，那是針對《火星報》小組中其他馬克思主義者的尖銳批評(1901年9月)所作的自我辯護。列寧的主張，即建立一個以知識分子為核心的政黨，很快造成《火星報》小組的分裂。<sup>99</sup> 與此同時，在梯弗利斯委員會1901年11月的會議上，大多數高加索社會民主黨人在表決時都贊成吸收工人入黨，反對朱加施維里類似於列寧的要求。<sup>100</sup> 不過，梯弗利斯委員會還是決定，把朱加施維里派到黑海的港口城市巴統，到工人中間做鼓動工作。<sup>101</sup>

<sup>95</sup> 譯註：《斯大林全集》第1卷，第22頁。

去巴統是一項很受人關注的任務。這座港口城市距離奧斯曼帝國的邊境只有12英里\*，是在1877至1878年的戰爭中同信奉伊斯蘭教的阿扎爾(阿扎利亞)的其他地區一起，從奧斯曼土耳其人那裏奪來的。在連接上俄國的外高加索鐵路以後，巴統成了輸出俄國裏海石油的終端。當時世界上最長的從巴庫到巴統的管道正在修建中(將在1907年投入使用)，而其贊助者——以炸藥出名的瑞典諾貝爾家族、以銀行業務出名的法國羅斯柴爾德(Rothschild)家族，以及亞美尼亞商業巨頭亞歷山大·曼塔什揚(Alexander Mantashyan，生於1842年，按照俄羅斯化的形式叫做曼塔舍夫〔Mantashov〕——試圖打破美國標準石油公司在向歐洲供應煤油的領域近乎壟斷的地位。<sup>102</sup> 朱加施維里也想利用石油業的快速發展來達到某些激進目的。(不久，《火星報》連同其他俄文馬克思主義宣傳品，就開始從馬賽經海路運抵巴統。) 這座港口城市已經有了工人的「週日學校」，是由「第三小組」的創始人之一尼古拉·「卡爾洛」·齊赫澤(Nikoloz “Karlo” Chkheidze，生於1864年)和伊西多爾·拉米施維里(Isidor Ramishvili，生於1859年)創辦的，兩人都是諾伊·饒爾丹尼亞的親密同志。

年輕的朱加施維里同工人打成一片。在工人當中，他「說話不像演說家那麼優雅」，一位抱有敵意的格魯吉亞同伴後來回憶說，「他的話堅定有力。他講話時諷刺挖苦，粗暴嚴厲，喋喋不休」，然後又「表示歉意說，他是在用無產階級的語言講話，無產階級沒有學會彬彬有禮或貴族的口才」。<sup>103</sup> 在一位熟人給朱加施維里在羅斯柴爾德石油公司找了份工作後，他的工人姿態就變得名副其實了。在那裏，1902年2月25日，由於客戶的需求減少，389名工人(總共大約有900名)被解僱，而下達通知僅僅提前了兩週，此舉在兩天後引發全面罷工。<sup>104</sup> 隨之而來的是大搜捕。高加索的軍事長官暗中對當地省長們說，工人的居住和勞動條件惡劣，社會民主黨的「宣傳」將會找到「合適的土壤」。<sup>105</sup> 此外，把參加抗議活動的工人遣送到他們老家的村落，只能加劇格魯吉亞農村

---

\* 編註：約19公里。

的叛亂風潮。<sup>106</sup> 3月9日那天，一群拿着石塊的人試圖把自己的同志從轉運的監獄裏救出來。「兄弟們，別害怕，」一名被關押的工人喊道，「他們不會開槍，看在上帝的份上把我們救出去。」警察開火了，至少打死了14人。<sup>107</sup>

「巴統大屠殺」在俄羅斯帝國各地引起了強烈的反響，可對朱加施維里而言——他散發了煽動傳單——所帶來的後果就是他在1901年4月5日的被捕\*。警方報告對他的描述是：「無業，住址不詳」，不過，他「是工人的教師」。<sup>108</sup> 朱加施維里對工人的鬥爭精神是否有影響，現在還不清楚。但對他的指控是，「挑起混亂和不服從上級權威」。<sup>109</sup> 巴統事件也引發了高加索社會民主黨不同小組間的仇恨，而這種仇恨將會糾纏着朱加施維里。梯弗利斯委員會派了達維德·「莫赫韋」·哈爾季施維里 (David "Mokheve" Khartishvili) 去那裏接替他。莫赫韋在梯弗利斯的時候就認為，只有工人才應該成為梯弗利斯委員會的正式成員，(朱加施維里一類) 知識分子不該有那樣的地位。莫赫韋到達巴統後，指責關押之中的朱加施維里故意挑起警方的屠殺。<sup>110</sup> 不過，朱加施維里關在牢裏的時候，巴統忠實於他的人們抵制了莫赫韋的權威。一份警方報告——根據線人提供的信息——評論說：「朱加施維里的專橫激怒了許多人，結果導致該組織的分裂。」<sup>111</sup> 正是在這次關押期間，朱加施維里開始頻繁使用「柯巴」的化名，意思是「向不公正復仇的人」。<sup>112</sup> 梯弗利斯委員會的成員對他非常憤怒。若是他們知道1902至1903年，未來的斯大林被拘押在巴統期間，曾以「越來越嚴重的咳嗽讓人喘不過氣來和12年前被丈夫遺棄並把我看作她唯一依靠的可憐老母親」為由，兩次央告高加索總督放了他，他們會更加憤怒。<sup>113</sup> (1903年1月，凱可也為兒子向總督求過情。) 如此沒有骨氣，要是被人知道，將會敗壞革命者的名聲。53 獄醫給朱加施維里做了檢查，但憲兵隊反對網開一面。<sup>114</sup> 在被捕15個月之後，1903年7月，柯巴·朱加施維里根據政府命令被判流放三年，地點是東西伯利亞說蒙古語的布里亞特。

---

\* 譯註：應為1902年4月5日。

1903年11月，在運牲口的火車車廂外面，可能是未來的斯大林第一次見到真正的冬天，見到了白雪皚皚的大地和冰封的河流。作為身在西伯利亞的格魯吉亞人，柯巴這位復仇者在首次嘗試逃跑時差點兒凍死。但到了1904年1月，他已經能夠成功地躲過村裏的警察頭目，趕了大約40英里\*的路到達鐵路線的終點，一路潛回梯弗利斯。<sup>115</sup> 關於此次逃跑，他後來講過三個不同的故事，其中一個是說，他不停地給人伏特加，搭上了某人的雪橇。實際上，未來的斯大林似乎是利用了真實或偽造的憲兵隊證件——這樣的花招增加了人們對他為何能很快逃跑的懷疑（他是不是投靠了警方？）。<sup>116</sup> 當他不在梯弗利斯的時候，那裏召開了代表大會，把南高加索社會民主黨人統一起來，並成立了有九位成員的「聯合委員會」；朱加施維里後來被增補進來。<sup>117</sup> 不過，他以前的巴統委員會故意迴避他。人們認為那裏的屠殺和政治分裂同他有關，而在他很快逃回來之後，人們不相信他，認為他可能是坐探。<sup>118</sup> 他受到警方的通緝，居無定所：回到哥里（他在那兒弄到了新的假證件），然後是巴統和梯弗利斯。他以前在巴統進行地下活動時的女房東兼情婦、22歲的娜塔莎·基爾塔娃—西哈魯利澤（Natasha Kirtava-Sikharulidze）拒絕陪他到梯弗利斯；他罵了她。<sup>119</sup> 在高加索首府，警方盯得很緊，朱加施維里一個月至少要換八次住處。他又一次遇到了列夫·羅森菲爾德（Lev Rozenfeld），人們更熟悉的名字是「加米涅夫」（Kamenev），後者幫他找到了藏身的地方。那處安全屋的主人叫謝爾蓋·阿利盧耶夫（Sergei Alliluyev），他是個被派到梯弗利斯的熟練技工，受僱於鐵路修理廠，已婚。（後來成為斯大林第二任岳父的）阿利盧耶夫家在梯弗利斯郊外，那裏是社會民主黨的會議中心，同時也收留那些暫時沒有遭到逮捕和驅逐的鼓動家。<sup>120</sup>

加米涅夫後來還給過朱加施維里一本馬基雅維利（Machiavelli）《君主論》的俄譯本（1869），雖然俄國的革命者幾乎用不着那位意大利的政治理論家。<sup>121</sup> 謝爾蓋·涅恰耶夫（Sergei Nechayev，1847–1882），農奴

---

\* 編註：約64公里。



之子和秘密的「人民報復會」創始人，1871年曾經說過，「所有能讓革命獲得勝利的都是道德的，所有妨礙革命的都是不道德的」。<sup>122</sup>



54 這就是在拉多的啟發下，未來那位專政者的早期革命歲月（1898-1903）：想要成為鼓動家和工人的導師；在梯弗利斯採取的五一節策略引發了流血衝突；為了同合法的馬克思主義報刊一爭高下而創辦了非法的馬克思主義報刊；受到指控說在巴統挑起警方的屠殺和分裂黨；在西格魯吉亞度過了很長一段艱難的牢獄生活；背地裏在高加索總督面前卑躬屈膝；在嚴寒的西伯利亞過了一段短暫的流放生活；被懷疑投靠警方；東躲西藏。幾乎是眨眼功夫，朱加施維里這位哥里的虔誠少年，就從把維克托·雨果的作品偷偷帶進梯弗利斯神學院，變成了全球社會主義運動的參與者，儘管只是一位不起眼的參與者。這其中的原因，很大程度上並不在於某種蔑視法律的高加索文化，而在於沙俄壓迫和不公正的現象非常嚴重。自認為正在陷入專制統治無底深淵的青年激進分子，繼續公開對抗政權。可是，就連那些一直反對採取這種做法的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主義者，比如《犁溝報》的饒爾丹尼亞和吉布拉澤，也很快採取了這種好鬥而冒險的辦法。沙皇的政治體系和帝國的狀況使得鬥爭日益尖銳。在高加索就如同在整個帝國一樣，左翼分子實際上越過了鼓動工聯主義的階段——同西歐相比，工聯主義在俄國直到很久之後還是非法的——直接主張用暴力推翻不公正的秩序。<sup>123</sup>

就連官僚們（在內部通信中）也意識到這種強勁的反抗勢頭：工廠的管理制度野蠻得無以復加；地主及其幫兇把解放後的農民當奴隸一樣對待；任何想要緩和這種狀況的努力都被當作叛國。<sup>124</sup>「一個人先是相信目前的狀況是錯誤、不公正的，」斯大林後來令人信服地解釋說，「然後決定盡自己的最大努力糾正這種狀況。在沙皇政權的統治下，任何真正想要幫助人民的嘗試，都會使人落到為法律所不容的境地；他會被當作革命者受到追捕。」<sup>125</sup> 如果說生活在沙皇制度下把朱加施維里和其他許多年輕人變成從事街頭戰鬥的革命者，那他還把自己視為啟蒙者——到此時為止，幾乎只以口頭的形式——以及受到排擠和打壓的後

起之秀，不僅要對付沙皇警察，還要反抗饒爾丹尼亞領導下的革命陣營中不瞭解狀況的當權者。<sup>126</sup> 在試圖領導舉行抗議活動的工人時，朱加施維里有成功之處，也有遭人詬病的方面。不過，他倒是證明了自己擅長把他那樣的年輕人培養成一個緊密團結的集團。「柯巴同其他所有的布爾什維克不一樣的地方在於」，有位抱有敵意的格魯吉亞流亡者回憶說，「具有無可置疑的更大的能量，能夠不知疲倦地努力工作，不屈不撓的權力欲，尤其是他具有自主精神的強大組織才能」，目的是培養「門徒，以便他可以通過他們……掌握整個組織」。<sup>127</sup>

55

不過，在朱加施維里獨立開展活動之前，拉多·克茨霍維里就為他樹立了勇敢的職業革命家的榜樣——與不公正作鬥爭，機智地從事地下活動，對沙皇警察的蔑視。<sup>128</sup> 列昂尼德·克拉辛認為拉多是組織天才。謝爾蓋·阿利盧耶夫認為拉多是高加索社會主義運動中最有魅力的人物。但是在1902年春天，在巴庫的社會民主黨人遭到大範圍逮捕後，只出了四期的《鬥爭報》停刊了。（它的競爭對手《犁溝報》不久也被查封。）1902年9月，克茨霍維里被捕，關在梯弗里斯的麥捷希監獄。拉多可能是在警察搜查其他人的住處時，因為擔心同志被捕，說出了自己的真實姓名而被捕的。站在牢裏的大號槍眼旁，對着獄友和過路者喊話的拉多，一個令監獄當局「害怕和憎恨」的「叛賊」(*buntar*)，似乎每天都在折磨着監獄看守。他試圖偷偷帶出麥捷希監獄的一張紙條，可能導致了阿韋利·葉努基澤的被捕。1903年8月，當拉多拒絕從窗子上下來時，一名監獄看守在發出警告後，從牢房的窗外開槍打死了27歲的拉多。<sup>129</sup> 人們後來在講到這個故事的時候說，拉多毫不理會看守的警告，一直高喊「打倒專制！」他似乎是心甘情願地，甚至也許是迫不及待地為革命事業獻身。

後來，從前和斯大林有聯繫的人的功勞幾乎全被抹殺了，但這位專政者沒有否認拉多獨立做出的革命功績，沒有否認拉多的存在。<sup>130</sup>（在描寫蘇維埃格魯吉亞的新聞片中有拉多出生的房屋。）<sup>131</sup> 這肯定同拉多犧牲得較早有關，但也突顯了一個事實，即約瑟夫·朱加施維里自己也可能遭遇和他的第一位導師同樣的命運：早早地死在沙皇的監獄裏。



## 沙皇制度最危險的敵人

整個俄羅斯帝國處於動盪之中，各階層人心惶惶。工人、學生、包括最高層的宮廷社會在內的貴族、實業家、商人、小店主，以及最底層但並非最不重要的農民，都是如此……在國外常有人建議，針對這種狀況，唯一可靠的辦法就是批准一部憲法；要是在這裏這樣做，結果幾乎肯定會是革命。

56

——奧匈帝國駐聖彼得堡使館隨員致維也納的備忘錄，1902年<sup>1</sup>

橫跨歐亞大陸的俄國是世界上最神奇的萬花筒，按照1897年的統計數據，它有104個民族，146種語言。實際上，整個帝國就像大雜燴。<sup>2</sup>在俄國，對帝國來說關鍵不在於多民族本身，而在於政治制度。通常認為，俄國現代的國家管理體系肇端於彼得一世或彼得大帝（Peter the Great，1682至1725年在位），儘管歸功於他的一些重大變化往往要追溯到他父親甚至祖父執政的時候。<sup>3</sup>西化也被認為是彼得的功勞，可他並不信任西方，只將其視為達到目的的手段，即技術性技能的來源。<sup>4</sup>彼得——他母親的遠祖是韃靼人——的確讓俄國在文化上更加歐化。制度方面，他仿照瑞典的模式，規範了國家管理。他還開始頒行「官階表」，作為階梯式的激勵措施，鼓勵人們爭取榮譽和特權，並向新人開放為國效力的機會。彼得把身份和出身分開，換句話說，把原本憑出身獲得的權利變成國家的賞賜，從而擴大了執政當局的權能。但他甚

57 麼都管，結果反倒破壞了自己的國家建設。就像有位外國大使說的，彼得「越來越覺得在整個國家，在他的血親和波雅爾當中無人堪當大任。所以他只好推開波雅爾貴族 (boyars, 他稱其為不忠實的狗)，親自挑起國家的重擔，着手建立一個不一樣的新政府」。<sup>5</sup> 1722年，彼得把自己升格為「皇帝」(最高統治者)，要求和(並不實際統治的)神聖羅馬帝國皇帝平起平坐。(他選擇了「全俄皇帝」這個稱號，而不是有人建議的「東方皇帝」。)最重要的是，彼得在一定程度上通過宮廷中的特殊入會儀式，比如假陽具縱樂\*和模擬婚禮，強化了他自己的角色——那些儀式突出了專制君主個人的中心地位和權力。<sup>6</sup> 讓俄國成為強國的願望同強烈的人格主義結合在一起。

彼得建設國家的方法還加強了俄國精英同專制權力的緊密聯繫。俄國從未形成一個羽翼豐滿並具有法人團體制度的貴族集團，這樣一種集團最終將會推翻絕對主義的統治(雖然在1730年終於有一些俄國貴族的確想那麼做)。<sup>7</sup> 不錯，俄國的貴族是積累了同奧地利甚至英國貴族一樣多的財富。而且跟奧地利和英國不同，俄國的貴族當中出現了一些享譽世界的文化名人，比如萊蒙托夫、托爾斯泰、屠格涅夫(Turgenev)、格林卡(Mikhail Glinka)、柴可夫斯基(Tchaikovsky)、拉赫瑪尼諾夫(Rachmaninoff)、斯克里亞賓(Scriabin)、莫索爾格斯基(Mussorgsky)。俄國的貴族還是一個開放的階層：哪怕私生子也可以獲得貴族身份(比如亞歷山大·赫爾岑)。但更大的區別是，作為君主立憲制中的統治階級，英國貴族獲得了政治經驗。俄國的農奴主在自己的莊園享有無上的權力，但其生活終究要仰仗專制君主的恩惠。在俄國，精英身份是用報效換來的賞賜，而這種賞賜也可以收回。<sup>8</sup> 除了從政報效君主外，為了保住自己的地位，俄國貴族還必須不停地工作。當然，在專制君主統治的幾百年中，俄國的特權家族大多存續下來。但並不是所有精英家族都能存續，在興旺發達和流放監禁之間，區別似

\* 編註：在彼得大帝的安排下，群臣拿着假陽具進行戲仿宗教的活動。

† 譯註：指1730年1月彼得二世去世後，最高樞密院的戈利岑家族和多爾戈魯基家族向準備繼位的安娜提出了一系列限制條件，包括未經樞密院同意，無權宣戰、徵稅或支出費用。

乎很隨意。<sup>9</sup> 俄國有地位、有勢力的人，其財產、有時甚至人身安全都要倚靠地位更高的庇護者來保護。

包括馬克思在內的許多觀察家斷言，「現代俄國不過是從莫斯科大公國演變而來」。<sup>10</sup> 他們錯了，彼得之後的俄羅斯及其首都聖彼得堡，更接近於歐洲的專制主義，而不是古莫斯科大公國。但上述事實沒有得到重視。俄國「冷漠的」小官僚、「愚蠢的」馬屁精和「膽小怕事的」國家獎章收藏家，成了文學作品冷嘲熱諷的對象，這方面最好的例子就是尼古拉·果戈理的《欽差大臣》。宮廷圈子也把俄國的新貴戲稱為「閣下」。除了那些回憶錄和果戈理的妙筆——這些仍然使歷史學家着迷——我們還可以發現一些其他的重要聲音。比如，鮑里斯·A. 瓦西里奇科夫公爵 (Boris A. Vasilchikov)，一個被選進自己莊園附近的地方自治會 (*zemstvo*) 的貴族和後來的普斯科夫省長，在入仕之前對帝國的官場同樣十分鄙視。「在擔任大臣的這兩年，我對彼得堡官場有了很高的評價，」他寫道，「在知識、經驗和履行職責方面，彼得堡各大臣官署和各部的工作人員水平都很高……此外，讓我印象很深的是他們勤奮工作的巨大能力。」<sup>11</sup> 當然，瓦西里奇科夫也注意到，帝俄工作人員很少有人擁有開闊的眼界，許多官員即便真有想法，也照舊四平八穩，不願冒險違背上級的意願。<sup>12</sup> 溜鬚拍馬達到驚人的程度。官員靠的是上學時的人脈、血緣和婚姻關係、小圈子，所有這些可以掩蓋過失和無能。但最重要的庇護者和保護人的權威，常常是源自成就，而不僅是人脈。事實雖不如果戈理編的故事那麼精彩，但不容抹殺：帝俄發展成了一個在財政和軍事上令人生畏的國家；實際上，它所能調動的資源，規模之大，肯定和作為對手的奧斯曼帝國或哈布斯堡帝國不相上下。<sup>13</sup>

58

遲至1790年代，陸地面積相當於俄國1%的普魯士有1.4萬名官員，而沙皇帝國只有1.6萬名官員，大學僅一所，而且才幾十年歷史。但在1800年代，俄國官員的增速是人口增速的七倍之多，到1900年已達38.5萬人，僅在1850年之後就暴增30萬人。不錯，在俄國飽受詬病的各個省長中，確實有很多人培養了突出的行政經驗和才能，但他們領導的省級機關聲望較低，稱職而且誠實的辦事人員嚴重不足。<sup>14</sup> 有些地方的治理極為薄弱：比如在費爾干納盆地，沙皇治下的突厥斯坦人口最

稠密的地區，至少有200萬居民，而俄國只安排了58名行政人員和區區2名翻譯。<sup>15</sup>總的來說，1900年，德意志帝國每1,000人就有12.6名官員，而帝俄仍然只有不到4名官員，這樣的比例反襯出俄國人口的龐大——1.3億對德國的5,000萬。<sup>16</sup>俄羅斯是個頭重腳輕的國家。<sup>17</sup>帝國各省大多交由地方治理，但其治理範圍受到帝國法律的限制，組織化程度也各不相同。<sup>18</sup>有些省做得很好，比如下諾夫哥羅德。<sup>19</sup>其他省，比如托木斯克，則腐敗嚴重，無法正常運轉。不稱職的現象在體系頂層最普遍。許多副手用陰謀詭計把上司搞下台，結果，此舉助長了把平庸之輩提拔到上層（至少是高級副手）的風氣，在沙皇任命大臣的時候，這一點表現得最明顯。<sup>20</sup>在俄國，要想成為公務員，是不需要像在德意志帝國和日本那樣參加考試的，但由於行政管理的需要，招聘漸漸開始以大學教育和專業知識為基礎。<sup>21</sup>俄國開始從所有社會階層中招募工作人員，成千上萬的平民通過為國效力變成了貴族，這條向上的通道將會收緊，但從來沒有關閉。

同時，與普魯士、奧地利、英國或法國的專制主義不同，俄國的專制制度一直到進入現代之後還延續了很長時間。普魯士的腓特烈大帝(Frederick II, 1772至1786年在位)自稱是「國家的第一僕人」，此說標誌着國家在君主之外的獨立存在。俄國的沙皇情願把價值一個西伯利亞銀礦的獎章頒發給國家官員，卻唯恐失去專制特權，不願承認國家在他們之外的獨立存在。哪怕是遭遇了最嚴重的危機，「專制原則」仍然保留下來。1855年亞歷山大二世繼位時，尼古拉一世(Nicholas I)給兒子的臨終遺言是：「我想把所有不愉快的事情和所有的麻煩一起帶走，好傳給你一個有序、平靜而幸福的俄羅斯。」<sup>22</sup>但尼古拉一世為了利用奧斯曼帝國正在收縮的機會，使帝國捲入了代價很高的克里米亞戰爭(1853-1856)。英國帶領一些歐洲國家聯手對付聖彼得堡，結果，亞歷山大二世損失了45萬名帝國臣民，在衝突行將演變為世界大戰的時候，無奈地接受了戰敗的事實。<sup>23</sup>慘敗後——這是俄國145年來首次戰敗——亞歷山大二世不得不同意進行一系列的「大改革」，包括遲來的農奴解放。（「自上而下要好過自下而上」，沙皇警告有顧慮的貴族們說，因為國家為貴族從農民那裏收取的巨額贖金不太能讓他們滿意。）<sup>24</sup>但

沙皇自己的專制特權依舊神聖不可侵犯。在國內，亞歷山大二世讓大學、新聞界和宮廷獲得了前所未有的自由，可一旦俄國的臣民想要行使公民的自由，他就開始阻攔。<sup>25</sup> 這位沙皇兼解放者，就像那時人們開始瞭解的那樣，拒絕頒行憲法，因為正如他的內務大臣說的，亞歷山大二世「實際上認為，那樣做會傷害俄羅斯並造成其解體」。<sup>26</sup> 但沙皇甚至不願把國家的法律用在國家官員身上，唯恐那樣會削弱專制君主的特權。<sup>27</sup> 對亞歷山大二世來說，准予某種程度的地方自治、司法獨立和大學自治，連同解放農奴一起，反倒讓維護專制君主的權力顯得越發緊迫。就這樣，「大改革」中成立議會的時機不幸錯過了，而在1860年代，以及後來的1880年代，本來是有可能成立議會的。<sup>28</sup>

為了不侵犯專制君主的特權，俄國不僅沒有議會，就連協調一致的政府也沒有。當然，亞歷山大二世曾經同意讓大臣會議來協調政務，但(1857年的)努力無果而終。實際上，沙皇不願放棄讓大臣繞過集體機關而在私下裏直接向他匯報的權力；大臣們串通一氣，阻撓政府改革，是因為他們不想放棄通過私下裏接近專制君主而獲得的影響力。<sup>29</sup> 大臣委員會的會議，就像帝國任何覲見的場合一樣，主要是努力把「專制君主的意志」神聖化，避免在決策中站錯隊帶來的災難。只有最巧妙的會議才能偶爾設法把某種想法當作沙皇自己的意願塞進去。<sup>30</sup> 同時，廷臣和「非正式」顧問還在繼續制定政策，甚至為各部門制定政策，而由於官僚作風，俄國政府的運轉依舊是既不協調也不公開。沙皇制度孱弱無力可又無藥可救：維護專制制度的必要舉措削弱了國家的力量。至於由此產生的政治體制，俏皮之人說得簡單明瞭：專制制度要靠不時的暗殺來緩和。1866年，狩獵季開始，頭六次都針對亞歷山大二世。1881年，他終於被炸得粉碎。亞歷山大三世幾次死裏逃生，其中一次是在他兒子、未來的沙皇尼古拉的連隊。1887年，在一次針對亞歷山大三世的陰謀失敗後，亞歷山大·烏里揚諾夫(Alexander Ulyanov)——地下組織「民意黨」的成員，同時也是當時17歲的弗拉基米爾(未來的列寧)的哥哥——拒絕了寬大處理的提議，結果被絞死。僵化的專制制度有很多敵人，包括約瑟夫·朱加施維里。但它最危險的敵人是自己。



## 現代性：地緣政治的當務之急

61 截止到世紀之交，帝俄至少發生過100起政治謀殺。此後的步伐加快，因為恐怖分子和刺客要的就是混亂——挑動警察去抓人殺人，而這，按照扭曲的恐怖主義邏輯，將會激起社會的反叛。接下來成為暗殺對象的皇室成員是亞歷山大二世的小兒子（同時也是尼古拉二世的叔叔）、莫斯科總督謝爾蓋大公（Grand Duke Sergei）——1905年，就在克里姆林宮之內，他被炸得身首異處。直到那一年，實際上政治活動在俄國仍然是非法的：政黨和工會被禁止；書報審查制度意味着幾乎沒有發表政治言論的機會，除非是朝官員的馬車扔「石榴」，眼看着血肉橫飛。（謝爾蓋大公的手指是在附近的屋頂上找到的。）<sup>31</sup> 作為回應，沙皇當局改組了政治警察，成立了一間可怕的新機構——「保安處」（*okhrannoye otdelenie*）。恐怖分子馬上給它起了個綽號，輕蔑地稱之為「奧赫拉恩卡」（*okhranka*），意思是「小小的保安處」。<sup>\*</sup>當然，不僅是俄國，歐洲的各個王朝（法國的波旁王朝和奧地利的哈布斯堡王朝）也都發明了這種「維護治安」的做法，藉助警察機關管理社會；比起歐洲同行，俄國的政治警察並不是特別窮兇極惡。<sup>32</sup> 保安處仿照法國人的做法，用「暗室」（*cabinets noirs*）暗中攔截郵件——特工人員在暗室裏用蒸汽熏開信件封口，讀取用隱形墨水寫的內容，破譯革命者的密碼（雖然那些密碼並不怎麼樣）。<sup>33</sup> 必然地，俄國的警察頭目發現他們的郵件也要接受徹底的檢查，於是，一些沙皇官員就故意給第三方寫信，在信中奉承自己的上司。<sup>34</sup> 雖說有俄國常規警察和憲兵隊的協助，但幽靈般的保安處從未達到經費更加充足的法國同行那樣的社會覆蓋面。<sup>35</sup> 不過，保安處的神秘放大了其影響力。

保安處很多特工都受過良好的教育，有點類似於「知識分子警察」，他們為批駁革命者的思想，對革命著作進行了編纂整理。<sup>36</sup> 特工們吸收國際上最新的諜報技術，使用倫敦警方的E. R. 亨利（E. R. Henry）指紋鑑識手冊和德國警方的檔案管理辦法。<sup>37</sup> 不過，反恐實際上是件髒活：

<sup>\*</sup> 譯註：為行文方便，下文凡提到奧赫拉恩卡的地方，都譯成保安處。

為了盡可能徹底地追蹤恐怖關係網，保安處往往只能讓恐怖分子的暗殺得逞。<sup>38</sup>更有甚者，許多保安處派出的臥底本身也搞政治謀殺，以便證明自己的忠誠並留在崗位上繼續監視。沙皇警察暗殺其他沙皇官員，這種卑劣的事情加劇了警察內部的派系傾軋。結果，保安處的高級特工自己也受到監視，儘管其中叛變的人比被自己的叛徒特工謀殺的人少。<sup>39</sup>沙皇尼古拉二世也看不上保安處，幾乎從不賞臉接見保安處的首腦。<sup>40</sup>保安處在宮廷裏幾乎沒有靠山，但卻是國家唯一真正跟社會有着緊密聯繫的那部分。此外，保安處和它理應打擊的恐怖分子糾纏不清，和它理應保衛的政權比較疏遠，但卻接連取得成功。<sup>41</sup>保安處用離間計讓真正的革命者受到懷疑，支持那些一旦得勢就會削弱恐怖組織的革命者。斯大林生前身後都沒能擺脫被說成警方奸細的謠言（對於這樣的指控，他的許多對頭都拿不出證據）。<sup>42</sup>列夫·托洛斯基也被懷疑同警方有勾結。<sup>43</sup>就像某個前保安處處長吹噓的：「革命黨……相互猜疑，結果到最後，沒有哪個同謀者還能相信別人。」<sup>44</sup>

62

可是，在生來暴躁的革命者和擅長幕後操縱的恐怖分子之間製造不和，根本救不了病入膏肓的沙皇統治。專制制度的核心問題不在於政治上受到抨擊，也不在於威權主義實際上同現代性無法兼容，而在於俄國專制制度的冥頑不化。沙皇制度扼殺了恰恰是它迫切需要的、並在某種程度上是它為了爭取成為強國而追求的現代性。<sup>45</sup>

我們所說的現代性，不是某種自然而然或自動形成的東西。它和一套很難具備的特徵有關：大生產、大眾文化、大眾政治。幾個最大的強國具備了這些特徵，這些國家反過來又迫使其他國家也要具備現代性，否則就要承擔相應的後果，包括戰敗並有可能淪為殖民地。從殖民者的角度看，（在大多數情況下）殖民地不僅是地緣政治上有價值的東西，而且用某個歷史學家的話說，還是「一種國家層面的炫耀性消費」——地緣政治地位的標誌，或者缺乏地緣政治地位的標誌，助長了國家競爭中的侵略性，正如受欺凌的國家所證明的那樣。<sup>46</sup>換句話說，現代性並不是社會學意義上從「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轉變的過程，而是一個地緣政治意義上的過程，是成為所謂的大國還是淪為大國犧牲品的問題。<sup>47</sup>

63

以鋼的生產體系的發明為例(1850年代)，鋼是鐵堅硬而有彈性的形態，使得武器發生了革命性變革，並通過改變運輸方式讓全球經濟成為可能。鋼快速發展的部分原因在於電動機的發明(1880年代)讓大規模生產成為可能：產品核心部件的標準化，生產線勞動的細分，機器代替人工，車間物流的重組。<sup>48</sup> 這些新的生產工藝讓全世界的鋼產量從1870年的50萬噸猛增到1900年的2,800萬噸。不過，美國佔1,000萬噸，德國800萬噸，英國500萬噸，鋼幾乎全部集中在少數幾個國家。此外還可以看一下主要化工產品的生產：用於提高農業產量的合成肥料，用於棉布生產的氯漂白劑，以及用於採礦、修築鐵路和暗殺的炸藥(1866年阿爾弗雷德·諾貝爾(Alfred Nobel)發明了硝化甘油炸藥)。隨着某些國家在現代工業方面的成功，世界開始分化為先進的工業化國家(西歐、北美、日本)和落後的原材料供應國(非洲、南美、亞洲大部)。

現代的競爭性特徵還包括金融和信貸工具、穩定的貨幣以及股份公司。<sup>49</sup> 但新的世界經濟在許多方面要依賴熱帶地區的農民，他們提供了工業國必需的初級產品(原材料)，同時又消費了很多用他們的原材料生產的商品。商業化促進了從自給到專門化的轉變，比如在中國，為了滿足英國棉紡廠的需要，大片用於自給農業的土地改種了棉花，市場的普及最終讓生產上的巨大增長成為可能。但市場的普及也降低了(可以最大程度地減少自給農業缺陷的)作物種植的多樣性，破壞了(可以提高生存幾率的)社會互惠網絡，這就意味着市場削弱了應對長時段周期性乾旱的傳統方法。厄爾尼諾氣流(太平洋水溫的周期性變暖)把高溫 and 潮濕輸送到世界部分地區，製造了對農業來說不穩定的氣候：除了嚴重的乾旱，還有暴雨、洪澇、滑坡和野火。結果造成三次嚴重的饑荒和疾病(1876-1879、1889-1891和1896-1900)，在中國、巴西和印度造成3,000萬至6,000萬人死亡。單是印度，就有1,500萬人死於饑荒，相當於當時英國人口的一半。自從14世紀的黑死病和16世紀給新大陸土著造成毀滅性後果的疾病以來，從未有過如此大的破壞。要是這種大規模的死亡發生在歐洲——相當於30次愛爾蘭饑荒，會被看作世界歷史的中心事件。除了商業化和氣候，還有一些影響因素，比如美國鐵路泡沫的破滅，導致對熱帶主要產品的需求急劇下降。尤其是

殖民統治者笨拙的種族主義統治，加劇了市場和氣候的不確定性。<sup>50</sup> 只有在1889年的埃塞俄比亞，絕對的匱乏才是問題；這些饑荒並不是「天災」，而是人禍，是世界由大國支配的必然後果。

現代性的力量可能會導致嚴重的管理不當。1870至1900年，印度遭受大饑荒，可輸出到英國的糧食卻從300萬增加到1,000萬，供應了英國小麥消費量的五分之一。1907年，一位在政府部門工作了35年的英國官員承認：「現在饑荒比以前更頻繁、更嚴重了。」<sup>51</sup> 但這要怪英國人自己。他們為了開發殖民地，在印度修建了第四大鐵路網絡，這項技術本來可以送來救濟，卻反倒把糧食運走。駐印度的英國總督立頓勳爵(Lytton)，堅決反對當地官員為儲備糧食或干預市場價格所做的努力。他要求羸弱不堪、奄奄一息的人們通過勞動獲得食物，因為他認為救濟食物會鼓勵人們偷懶(更不用說還要花費公共資金)。當饑餓的婦女試圖偷菜時，她們會被打上印記，有時還會被割掉鼻子或者打死。農村的暴民襲擊地主，搶劫糧店。英國官員注意到這種絕望的情緒並向國內反映。一份來自印度的報告指出，「一個瘋子把一個霍亂病人的屍體挖出來吃掉，另一個瘋子殺死自己的兒子並吃掉孩子的屍體」。由於中國清朝的統治者抵制修築鐵路，擔心鐵路被用於殖民滲透，賑濟饑荒的能力也很有限。聲勢浩大的農民叛亂爆發了。巴西有卡努杜斯戰爭，中國有義和拳(那裏的揭帖寫道：「天無雨，地焦旱。」)。但在當時，農民不可能推翻正式或非正式的帝國主義。

市場和世界經濟讓之前不可想像的繁榮成為可能，但世界上大部分地區還要經歷一段艱難的歲月才能領會到這一好處。當然，新的世界經濟並沒有席捲所有的地方。許多小塊地區還生活在這種機會和壓力之外。但世界經濟是大勢所趨。電力的發展使得對銅(線)的需求急劇增加，結果把蒙大拿、智利和南非都捲入了世界經濟。這樣的機會既可能走向剛剛發現的繁榮，也可能使其人民受制於世界商品市場上瘋狂的價格波動。影響是巨大的。除了幾次大饑荒，1873年奧地利一家銀行的倒閉居然引發了波及美國的經濟蕭條，造成大規模的失業，而在1880和1890年代，非洲先是因為歐洲大陸之外的經濟衰退而受到極大的破壞，繼而又被以現代性為武器的歐洲人瓜分吞噬。<sup>52</sup>

面對現代性的挑戰，帝俄的應對相當成功。得益於紡織業，帝俄成為世界第四或第五大工業強國，而單憑國土面積，它又成為歐洲的頂級農業生產國。但問題在於，俄國的人均GDP只有英國的20%、德國的40%。<sup>53</sup> 聖彼得堡擁有世界上最豪華的宮殿，但直到未來的斯大林出生時，俄國的人均壽命只有30歲，高於英屬印度（23歲），但和中國一樣，遠低於英國（52歲）、德國（49歲）和日本（51歲）。沙皇尼古拉二世統治時期，識字率在30%左右徘徊，低於18世紀的英國。俄國的統治集團十分清楚這些差距，因為他們經常訪問歐洲，但他們沒有把自己的國家列為三流，即我們所謂的發展中國家，而是列為一流。俄國的精英沒有太大的抱負，可在20世紀初，由於德國的統一和快速工業化，以及日本的壯大和工業化，他們的國家並沒有絲毫的喘息機會。當某個大國——軍事技術先進，軍官們有文化、有能力，士兵們士氣高昂，國內有運轉良好的國家機構和工程學校——突然叩打你的國門時，你不能哭着喊着說「不公平」。要衡量俄國在社會經濟以及政治上的先進程度，必須和最先進的對手比較。<sup>54</sup>

66 就連同時代的革命者也承認俄國處在兩難的境地。最先把馬克思《資本論》譯成俄文的尼古拉·丹尼爾遜，擔心自己更希望俄國走的道路——通過農民村社（一種權力分散的小規模經濟組織）朝着社會主義方向從容而自然地演變——會承受不了國際體系的壓力，而且俄國的資產階級也無法應對這一挑戰。「一方面，要是仿效英國緩慢的、歷時三百年的經濟發展過程，那俄國就有可能無法抵擋世界上各個大國的殖民統治，」丹尼爾遜在1890年代《資本論》俄文版的序言中寫道，「另一方面，要是抱着達爾文主義的態度輕率地引入『西式』自由市場和私有化，又有可能產生腐敗的資產階級精英和貧窮的大多數，同時，生產率卻沒有任何提高。」俄國似乎面臨着可怕的選擇，要麼被歐洲國家殖民化，要麼掉進新的不平等和貧困的深淵。<sup>55</sup>

對沙皇政權而言，好處大，代價也大。俄國統治者即使在「大改革」之後，也仍然感到財政上捉襟見肘，限制了他們在國際性事務上的抱負。克里米亞戰爭讓國家財政徹底陷入困境，但打贏對奧斯曼帝國的復仇之戰（1877-1878），則讓俄國花了更多的錢。1858至1880年，俄

國財務預算赤字從17億盧布飆升至46億盧布，這需要從國外，從俄國的地緣政治對手即歐洲列強那裏大量舉債。<sup>56</sup> 腐敗意味着國家有相當多的資金不知道用在甚麼地方。(把國家稅收當作私人收入，這在高加索——帝國財政的大漏洞——或許是最奇特的一幕。)<sup>57</sup> 當然，俄國逃脫了奧斯曼人的命運，後者在財政和地緣政治上成了歐洲庇護的對象；俄國也逃脫了大清國(1636–1911)的命運，大清國曾在俄國擴張的同時，讓中國的國土面積增加了一倍，結果卻一敗塗地，接受了一系列影響深遠的不平等條約，包括在俄國手裏接受的不平等條約。<sup>58</sup> 1900年代初，得益於對糖、煤油、火柴、煙草和進口商品的徵稅，特別是對伏特加的徵稅，俄國的財政預算有了結餘的跡象。(俄羅斯帝國酒類的人均消費要低於歐洲的其他地方，但國家卻對酒類銷售實行專營。)<sup>59</sup> 然而，與此同時，俄國的軍隊預算是國家教育投入的十倍。即使這樣，陸軍部還在不斷抱怨經費不足。<sup>60</sup>

想要成為有競爭力的大國這一願望所帶來的壓力，的確有助於推動俄國高等教育系統擴張，以培養國家工作人員、工程師和醫生。<sup>61</sup> 但讓專制制度害怕的，恰恰是它迫切需要的那些學生。當專制制度試圖阻撓大學自治的時候，學生們開始罷課，結果校園被封。<sup>62</sup> 1900至1905年，俄羅斯帝國的被捕者絕大多數都在30歲以下。<sup>63</sup> 與此類似的是，從1890年代開始騰飛的工業化進程，讓俄國有了很多現代的工廠，這些工廠對於國際權力來說至關重要，可產業工人為了爭取八小時工作制和合乎人道的生活條件也在罷工，結果工廠也被封掉了。專制制度非但沒有像莫斯科保安處一位聰明的處長率先嘗試的那樣，允許工人成立合法的組織並且設法籠絡他們，反而鎮壓正在由國家自身蓬勃發展的工業化源源不斷地製造出來的工人。<sup>64</sup> 在農村，收成依然是俄國經濟最重要的決定因素，在國內食品消費增加的同時，俄國的糧食出口依然滿足了歐洲許多地方的需求，儘管俄國耕地的產量相對較低。<sup>65</sup> 然而在1902年春天，在土地肥沃的南方波爾塔瓦省和哈爾科夫省，突然爆發大規模的農民叛亂。農民搶掠焚燒貴族莊園，要求減租以及森林和水道的自由通行權，小說家列夫·托爾斯泰為此幾次向沙皇請願。<sup>66</sup> 第二年，在西格魯吉亞的庫塔伊西省，在古利亞40平方

英里<sup>\*</sup>的葡萄園和茶園，沙皇愚蠢的鎮壓行動激起了農民的叛亂。起義令社會民主黨人非常意外，因為該省連一家工業企業都沒有。但在農民集中起來，提出要選出領導人並彼此宣誓效忠後，格魯吉亞社會民主黨試圖領導他們。在自治的「古利亞共和國」，給地主交的租少了，言論自由有了，警察也被新的「赤色」民兵取代了。<sup>67</sup>

帝俄有一億多農村居民，生活條件極其多樣。緊張的社會關係撕裂了所有在國際體系的逼迫下正在經歷現代化過程的國家。但是在俄國，專制制度在政治上對民眾的排斥，甚至是威權主義的手段，放大了社會的緊張關係。許多未來的革命者從面向農民的民粹主義轉向以工人為中心的馬克思主義，他們都面臨着重新思考。

### 在亞洲的慘敗

對俄國來說，由於其所處的地理位置，要想具備地緣政治所必需的現代性，就要付出更大的代價。英國遏制俄國的圖謀沒有得逞：在俄國領土上進行的克里米亞戰爭的失利，反倒促使俄國不但從中國手裏奪得了阿穆爾河<sup>†</sup>流域(1860)，還開始征服中亞(1860–1880年代)。但這些搶來的土地加劇了俄國面臨的挑戰：版圖的無序擴張和棘手的鄰國關係。和世界上另一個大陸國家不同，俄羅斯帝國不是安居於兩個大洋以及加拿大和墨西哥這兩個沒有惡意的鄰國之間。俄國同時與歐洲、近東以及遠東接壤。面對這樣的形勢，本就要在對外政策上謹慎行事。但俄國正是以易受攻擊為名，傾向於採取擴張主義政策：當忠於沙皇的軍隊奪取領土的時候，他們以為自己是在先發制人。一旦俄國用武力佔領了某個地區，其官員總是堅持要求再佔領下一個，以保住先前得到的好處。天命意識和缺乏安全感結合在一起，讓人頭腦發熱。

俄國在17世紀就擴張到太平洋，可是卻根本沒有開發其廣闊的亞洲地區。由於缺乏可靠而經濟的運輸系統，與遠東進行貿易的夢想沒

---

\* 編註：約為104平方公里。

† 編註：即黑龍江。

能成為現實。<sup>68</sup> 後來俄國修築了跨西伯利亞鐵路(1891-1903)，將帝國首都與太平洋連接起來。<sup>69</sup> (美國在1869年完成了貫通大陸的鐵路。)俄國的鐵路工程主要是出於軍事和戰略考慮，雖然軍方鼓動修築鐵路，但不是因為擔心日本，而是擔心中國。(反對修築鐵路的人主張加強海軍建設。)<sup>70</sup> 有些官員提出，要用武力推動西伯利亞的經濟開發(1890年，整個西伯利亞有687家工業企業，大多是作坊式的，而且近90%是食品加工和家畜業。)<sup>71</sup> 結果，在現代史上跨西伯利亞鐵路成了直到當時為止最昂貴的和平事業，巨大的損耗、非機械化作業、強徵的農民和苦役，所有這些都和同期修築巴拿巴運河的情況相似(也預示着斯大林宏偉的五年計劃)。<sup>72</sup> 俄國工程師曾經在1880年代被派到美國和加拿大考察，但他們在回國後沒能把需要更堅固的鐵軌和結實的道砟這些經驗派上用場。<sup>73</sup> 儘管如此，憑藉財政大臣謝爾蓋·維特(Sergei Witte)的毅力和巧妙的操作，這條鐵路還是克服了國內的反對和重重的困難建成了。

1849年，維特出身於梯弗里斯一個瑞典裔路德教家族(從他的父系而言)，該家族皈依了正教，並在帝國南疆成了為帝俄效力的中級官員。他母親家族的社會地位要高一些。維特分別在基希訥烏和敖德薩完成了中學和大學學業。在敖德薩，他開始了漫長的事業，管理敖德薩鐵路並從中獲利。1892年，也就是在1891年大饑荒之後，他到聖彼得堡就任財政大臣。當時維特年僅43歲，而且起初官階較低，說的是帶烏克蘭口音的俄語，到處被當作不受待見的「商人」(*kupets*)，但他卻成了世紀之交帝俄政界呼風喚雨的人物，甚至把對外政策納入到財政部的管轄範圍。<sup>74</sup>

當然，維特不能總攬一切。僅就國家行政部門來說，他就必須同內務部打交道，而內務部是保安處，也是警察的保護傘。在許多方面，俄國的治理，甚至俄國的政治，都是圍繞着內務部和財政部這兩大部門以及兩者之間的競爭進行。財政部和內務部都既想在中央擴張勢力，又想把觸手伸向地方。<sup>75</sup> 1902年，兩部門共同慶祝成立一百週年的時候，各自出版了一部自己的歷史。內務部講的是在國內，尤其是在俄國農村地區，它如何推行和維護秩序；財政部講的是它怎樣對俄國的自然資源和人力資源進行生產開發以獲得國家稅收。<sup>76</sup> 俄國絕對是個



農業國，卻沒有單獨的農業部，倒是有一個不斷發展而規模相對較小的部門負責土地事務（直到1905至1906年），而土地大部分屬於國家或皇室。<sup>77</sup> 交通（鐵道）部和工商部是作為強大的財政部的附屬機構存在的。到1900年代初，財政部掌握的預算資源要高出內務部及其警察部門數倍。<sup>78</sup> 財政部成了俄羅斯帝國內部龐大的官僚帝國。<sup>79</sup>

維特還要同宮廷周旋。他出身平平，舉止粗魯，而且娶的是猶太女人，所有這些都惹怒了宮廷階層。但這位長相特別、大腦袋、上身長而下身短的維特，卻在帝國預算問題上發號施令，為了填補國家金庫開始實行酒類專營。<sup>80</sup> 此外，他還大大拓展財政部最近積極推動工業化的一項舉措，靠的是吸引外資，讓法國人和德國人繼續鬥下去。維特認為外債可以刺激本國資本的積累。他也非常關心國家機器。最重要的是，維特強調地緣政治的當務之急是工業化。「不管迄今為止成果有多大，同國家的需要相比，同外國相比，我們的工業仍然非常落後」，  
1900年，為了敦促尼古拉二世繼續實行關稅保護政策，他在備忘錄中寫道。維特還說，「就連一個國家的戰備情況，也不僅取決於其軍事機器的完善程度，還取決於其工業的發展程度。」要是沒有積極的行動，他警告說，「我國工業的緩慢發展就會危及君主國偉大的政治使命的實現。」俄國的競爭對手就會在國外搶得先機，並對俄國本土進行經濟滲透，可能還有「成功的政治滲透」。<sup>81</sup> 同後來的斯大林一樣，維特也是以犧牲輕工業和絕大部分農村居民的福利為代價，着重優先發展重工業和大規模工業。為了掩蓋強加的負擔，維特的財政部故意發佈誇大的消費數據。<sup>82</sup> 巧的是，維特也是用鉛筆把指示直接寫在下屬的備忘錄上（「這事要再討論」、「寫份摘要」），也是工作到深夜，這兩點被認為是那位未來的蘇聯專政者的突出特點。維特還有一個習慣同後來的斯大林一樣，那就是到他那裏去的人要坐着，而他則在辦公室裏踱來踱去。

維特自以為是俄國的俾斯麥，他從鐵血宰相那裏得到的啟發是，利用國家推動經濟發展和現實主義的對外政策。維特也至少在口頭上擁護他所謂的俾斯麥「社會君主制」，即保守主義的社會福利綱領，目的是搶先一步，削弱社會主義的吸引力。<sup>83</sup> 維特擁有超強的行政能力以及頂級政治家所必須具備的強烈自尊心。<sup>84</sup> 除了聖安娜一級勳章——列

寧勳章在沙皇時代的前身，他還獲得過外國政府的九十多枚國家勳章（這在蘇聯時期是不可想像的）。相應地，他也利用財政部的資金，把獎章、國家公寓、鄉村別墅、旅行津貼和「獎金」發給自己的手下、盟友、宮廷小集團以及記者（因為作了有利的報道）。維特既從莫伊卡河畔的財政部大樓領略冬宮和冬宮廣場的美景，也頻頻光顧豐坦卡運河沿岸貴族豪宅的沙龍。在專制制度下，大臣幾乎不可能成為真正獨立的行動者。維特完全是仰仗沙皇的信任（*doverie*）。維特明白，權力的另一個關鍵是，要在有意不通聲氣的政府內部做到消息靈通。<sup>85</sup>這就需要在整個上流社會的頂層建立起廣泛的非正式網絡。（「作為大臣，」維特在財政部的繼任者寫道，「要是想維護自己部門的利益和自己的地位，他就別無選擇，只能在宮廷和彼得堡上流社會扮演某種角色。」）<sup>86</sup>換句話說，在沙皇政府中，陰謀層出不窮，原因不在個人，而在結構——維特深諳此道，他同保安處一些名聲不佳的人聯繫緊密，而他之所以花錢僱他們，是出於多種目的。他還讓財政部的手下偷聽並記錄競爭對手的談話，將談話內容整理後交給沙皇。十年來，維特在帝俄大權在握，招來競爭對手和社會上反對其嚴苛稅收政策的人無休止的抨擊。1903年，尼古拉二世終於失去了對他的信任，把他調到一個基本上是擺設的位置（維特「感覺高升了」，同時代的人說）。但他在財政部的十年，對歷史產生了重要的影響，讓他成了斯大林最重要的先行者之一。

71

維特效仿的不但有俾斯麥，還有身在非洲的同時代英國人、鑽石大亨塞西爾·羅茲（Cecil Rhodes，1853–1902），而維特把遠東視為實現他個人帝國夢想的地方。<sup>87</sup>為了縮短從聖彼得堡到終點符拉迪沃斯托克（意即「統治東方」）的路程，維特修築了跨西伯利亞鐵路南面的支線，正好穿過中國的滿洲。在「和平滲透」的口號下，他和一些俄國官員以為他們是在先發制人，防止與俄國競爭的其他帝國主義國家（英國、德國和法國）像瓜分非洲大陸一樣瓜分中國。<sup>88</sup>其他俄國官員堅持認為，要保住既得利益，武力征服就不能停止。為此，他們爭相獲得沙皇的支持，要比維特所謂逐步向中國境內推進的建議更進一步。陸軍部先是強佔然後又租借亞瑟港（旅順）——位於中國遼東半島的深水不凍港，伸入黃海，戰略地位十分重要。但總體上俄國在東亞不斷前移的態勢

——這也跟維特有關——直接觸犯的不是讓聖彼得堡精英們恐懼的歐洲列強，而是野心勃勃的日本帝國主義。<sup>89</sup>

無論從哪個方面來看，日本都不屬於世界領導者英國那樣的強國。日本的生活水平可能只有英國的五分之一，而且同俄國一樣，經濟上仍以農業為主。<sup>90</sup> 日本在1830年代的實際工資，若按米價衡量，可能只有英國的三分之一，到20世紀初仍然只有英國的三分之一。不過那也意味着，在英國快速發展期間，日本與頭號大國實際工資的增速旗鼓相當。<sup>91</sup> 日本依然在向歐洲輸出初級產品或原材料（生絲），但是在亞洲範圍內，日本輸出的卻是消費品。實際上，日本快速增長的貿易主要是轉向東亞，它似乎找到了通往西式現代性的捷徑，在東亞受到普遍的羨慕或者嫉妒。<sup>92</sup> 就像德國一樣，日本也在加緊建設海軍。（保守的現代化推動者俾斯麥在主政期間也是日本聲望最高的外國人。）<sup>93</sup> 另外，作為英國的盟友，日本非但沒有受制於非正式的帝國主義，反而在東亞率先轉向自由貿易，這可是強者的意識形態。在一場因朝鮮半島而起的戰爭中（1894–1895），\* 日本打敗中國並佔據了台灣。早在1890年代，對於日本大敗中國，俄國總參謀部在震驚之餘，開始制定應急方案，以應對可能與日本發生的戰爭。但部分是出於軍情機關在日本問題上的習慣——當然，主要還是因為種族偏見——俄國統治集團輕視「亞洲人」，以為征服他們是很容易的事情。<sup>94</sup> 日本總參謀部或許是為了降低風險，估計自己頂多只有五成勝算，而俄國統治集團則以為若是開戰，他們肯定會贏。<sup>95</sup> 英國海軍武官報告的情況也差不多：在東京，人們普遍感覺日本會「垮掉」。<sup>96</sup> 尼古拉二世是最應該瞭解情況的人。他在做皇太子的時候，曾有過一次（對俄國皇室來說）前所未有的東方壯遊（1890–1891），親眼見識了日本。那裏的刺客用刀在未來沙皇的額頭留下了永久的傷疤，差點兒要了他的性命。（與尼古拉同行的一位表弟用手杖擋開了第二刀。）但是作為沙皇，面對可能發生的戰爭，尼古拉輕描淡寫地把日本人當成了「默卡克」——一種短尾巴的亞洲猴。<sup>97</sup>

---

\* 編註：即甲午戰爭。

俄日雙方的談判代表本來試圖通過分贓來暫時妥協——日本承認滿洲是俄國的勢力範圍，俄國承認朝鮮是日本的勢力範圍——但雙方的「愛國者」都堅持認為，他們絕對需要同時擁有滿洲和朝鮮，失去其中的一個，另一個也保不住。要是俄國妥協，面對聯合起來的歐洲列強在東亞的步步緊逼，勢單力孤的日本有可能願意妥協，但日本不清楚俄國究竟作何打算。以亞歷山大·別佐布拉佐夫 (Alexander Bezobrazov) 為首的一幫宮廷陰謀家，為了發財而計劃以林業特許權的形式向朝鮮滲透，結果加重了日本的疑心。別佐布拉佐夫並不是大臣，但尼古拉為了顯示「專制君主的特權」，允許這位廷臣頻繁出入宮廷，故意利用別佐布拉佐夫來牽制包括維特在內的幾位大臣。尼古拉二世想法多變，不易溝通，他都沒有讓自己的政府瞭解情況，更別說徵求其成員的專業意見，這就使得俄國的遠東政策很不透明也很不連貫。<sup>98</sup> 在中止與俄國的談判之前，經過國內的長時間辯論和紛爭，日本統治集團決定全力以赴，發動一場預防性戰爭。1904年2月，日本與俄國斷交，攻擊了停泊在亞瑟港內的俄國艦船。這是為了趕在尋求可能的第三方調解之前就對行動遲緩的俄國巨人實施快速打擊，展示自己被低估的實力。<sup>99</sup> 日本人不但打敗了俄國的太平洋艦隊，還設法把步兵送上朝鮮半島，向俄國在滿洲的各個據點進發。震動強烈。「再也不能這樣活了。」就連極端保守的俄國報紙《新時報》也在1905年1月1日發表社論說。同一天，弗拉基米爾·列寧把專制制度龐大的軍事組織稱為「核已經爛掉的漂亮蘋果」。<sup>100</sup> 俄國派出波羅的海艦隊，繞過半個地球，航行1.8萬海里\*，終於在七個半月後的1905年5月抵達作戰海域，結果八艘由聖彼得堡的能工巧匠建造的現代戰艦，連同飄揚的軍旗一起，在對馬海峽被迅速擊沉。<sup>101</sup>

73

帝俄一向是軍事優先，羅曼諾夫家族又一向把自己的形象與合法性系於俄國的國際地位，因此，對馬之戰的打擊極其沉重。<sup>102</sup> 日本人在陸上也對俄國取得了驚人的勝利，包括奉天會戰，那是世界歷史上直到

---

\* 編註：約為3.3萬公里。

當時為止規模最大的會戰(合計投入62.4萬人)，而俄軍佔據了數量優勢。<sup>103</sup> 奉天會戰失利這一令人痛心的消息傳來的時候，正好是尼古拉二世的加冕紀念日。<sup>104</sup>

74 在可以證明專制制度合理性——爭奪大國地位——的競技場上的這次慘敗，不僅暴露出沙皇制度的政治缺陷，還造成了政治崩潰的危險。為戰爭生產武器的幾個軍工廠爆發罷工，結果到1905年1月8日，在俄國的戰時首都，電力和資訊(報紙)系統都癱瘓了。1905年1月9日，星期天，也就是遭日軍圍攻的亞瑟港陷落後的第七天，在納爾瓦凱旋門和涅瓦門外邊的工人階級街區，成千上萬的罷工工人及其家屬6時就集合在一起，準備到冬宮向「慈父沙皇」遞交請願書，要求召集立憲會議，改善工人生活，維護工人的權利和尊嚴。<sup>105</sup> 他們由一位保守派神父領頭，捧着東正教聖像和十字架，唱着聖歌——當教堂鐘聲響起時又唱起了《上帝保佑沙皇》。尼古拉二世已經去了他的主要居所、位於城外沙皇村的亞歷山大宮，因而根本沒有打算接見請願者。首都現有的臨時當局決定派軍隊封鎖市中心。神父率領的人群只走到西南方向的納爾瓦凱旋門。當他們想從那裏繼續前進時，帝國軍隊向他們開火了。幾十人倒下了，神父大喊：「再沒有上帝了，再沒有沙皇了！」在聖三一橋和亞歷山大花園等地，槍擊也阻止了赤手空拳的遊行男女和兒童。隨之而來的是恐慌，有些請願者被踩踏致死。當天在首都約有200人遇害，另有800人受傷，這其中有工人、主婦、兒童和圍觀者。<sup>106</sup> 聖彼得堡「流血的星期日」引發了規模更大的罷工、對酒店和槍械店的搶劫，到處是熊熊的怒火。

尼古拉二世的人民慈父形象一去不復返了。(「所有階級都譴責當局，特別是皇帝，」駐敖德薩的美國領事說，「現在的統治者完全失去了民心。」)<sup>107</sup> 1905年2月，沙皇含糊地承諾說，要設立一個通過選舉產生的「諮議性」杜馬或議會，這既讓保守階層驚慌，又不能平息騷亂。接下來的那個月，所有大學(再次)遭到封鎖。<sup>108</sup> 罷工者關閉了帝國鐵路系統，逼得政府官員只能從水路到郊外去覲見沙皇。1905年6月，水兵奪取了「波將金」號戰艦的控制權——該艦隸屬於黑海艦隊，而黑海艦隊是俄國在損失了太平洋艦隊和波羅的海艦隊後僅剩的海上力量——

並在到羅馬尼亞避難之前炮擊了敖德薩。「到處都是亂哄哄的」，警察部門的一位內部人士寫道，並稱政治警察的工作「陷入了停頓」。<sup>109</sup> 罷工浪潮席捲了俄屬波蘭、波羅的海沿岸地區以及高加索，那裏「整個行政機關都陷入了混亂」，格魯吉亞馬克思主義者的領袖饒爾丹尼亞回憶說，「集會、罷工和示威的自由在事實上得到了確立。」<sup>110</sup> 高加索庫塔伊西省省長站到了革命者一邊，喀山和波爾塔瓦兩省的省長精神崩潰，其他人不知所措。「為了讓人民能夠活得像人，你冒着生命危險，你殫精竭慮地維持秩序，結果你遇到的是甚麼？」薩馬拉省省長伊萬·布洛克(Ivan Blok)抱怨說，「充滿仇恨的眼光，好像你是甚麼惡魔和喝人血的吸血鬼似的。」過不多久，布洛克就被炸掉了腦袋。在一具傳統的敞開式棺材裏，他那扭曲的屍體被塞進制服，沒有頭，代替頭的是棉胎做的圓球。<sup>111</sup>

俄國的後方已經崩潰。戰爭雙方動員了大約250萬士兵，每一方的死亡人數都在4萬到7萬。(另有大約2萬中國平民死亡。)事實上，由於日本無法彌補自身的損失，像奉天會戰那樣的大勝，已經使東京瀕臨失敗。<sup>112</sup> 可即便尼古拉二世想要扭轉敗局，把戰爭打下去，他也沒有那樣的機會了。令人不解的是，日本人為甚麼沒有破壞跨西伯利亞鐵路——那是敵方人員和物資的主要運輸通道之一。<sup>113</sup> 但是，農民正在抗稅，後來破壞或毀掉了二千多座莊園。早在1905年3月，內務部就得出結論，說是由於暴動，歐俄的50個省有32個無法徵兵。<sup>114</sup> 俄羅斯國家資金周轉所仰仗的歐洲貸款也難以為繼，有違約的危險。<sup>115</sup> 1905年8月23日(西曆9月5日)，在美國總統西奧多·羅斯福(Theodore Roosevelt)的安排下，俄國和日本在新罕布什爾州的樸茨茅斯簽訂和約。受日本之邀出面調停的羅斯福，反倒一心限制東京在太平洋地區的勢力(預兆了未來將發生的事)。俄方代表是表現出色的維特。他再次大顯身手，在不利局面下儘量減少損失。<sup>116</sup> 俄國必須認輸，但不用支付戰爭賠款，唯一要放棄的領土是遙遠的薩哈林島(流放犯人的地方)的一半。不過，此次戰敗在國際上造成了巨大的反響(遠遠超過埃塞俄比亞在1896年打敗意大利)。俄國成為第一個在有組織、有計劃的作戰中，而且是在全世界的媒體面前，被亞洲國家打敗的主要歐洲國家。

在同時代的一則有代表性的評論中，有觀察家說，「一個非白人民族對一個白人民族」的勝利，這個消息絕對是「我們一生中發生過的或者有可能發生的最重要的事件」。<sup>117</sup>

## 左翼的派系鬥爭

76 駐斯德哥爾摩的日本武官此時正在花費大筆金錢，資助流亡歐洲的沙皇制度的政治對手，但他說的話顯得相當沮喪。「所謂反對黨全都是些秘密會社，在那裏面根本無法區分哪些人是政權的反對派，哪些人是俄國的密探」，這名武官向上級報告說。他還說，革命者——或奸細？——用的都是化名。但是從保安處截獲的郵件來看，其實他的工作完全沒有必要。<sup>118</sup> 俄國革命者從專制制度本身得到的幫助要多得多。俄國軍隊——這個維護帝國秩序的主要力量，要被派到境外，在中國和朝鮮的領土上與日本交戰，而俄國革命者卻不用打仗。哪怕是年過四十的已婚農民都成了徵兵的對象，居無定所、有犯罪前科的臣民，卻可以在國內自由地從事反叛活動。

27歲的未來的斯大林，就像沙皇警方的一份報告描述的（1904年5月1日）：

約瑟夫·維薩里奧諾維奇·朱加施維里：〔合法身份是〕梯弗里斯省梯弗里斯縣季季利洛村的農民；1881年出生，信奉正教，曾就讀於哥里教會學校和梯弗里斯神學院；未婚。父親維薩里昂下落不明。母親葉卡捷琳娜，住在梯弗里斯省的哥里城……外貌特徵：身高2阿爾申4.5韋爾紹克\*（約5英尺5英寸†），中等體格，相貌平常。<sup>119</sup>

\* 譯註：阿爾申 (arshin) 和韋爾紹克 (vershok) 是舊俄長度單位，分別為71.12釐米和約4.4釐米。

† 編註：約1.65米。

雖然出生時間(1878)和身高(5英尺6英寸\*)被記錯了，但這個讓人誤以為「平常」的人，就是因為參加政治活動而不用服兵役，同時還可以投身於風起雲湧的1905年暴動。俄國社會民主工黨格魯吉亞支部將他派往奇阿圖拉——西格魯吉亞一個地獄般的地方，那裏有幾百間小公司，共計僱傭了3,700名礦工和分揀、運送錳礦石的選礦工。

維特的父親，沙皇政府的一名中級官員，大概在19世紀中葉時在奇阿圖拉開過錳礦。<sup>120</sup>到了1905年，由於謝爾蓋·維特把俄國融入了新的世界經濟，那種作坊式的私有錳礦開始佔到全球錳礦石產量的50%。開採出來的礦石堆得很高，佔據了「天際線」。那些礦石要先進行沖洗——主要由婦女和兒童來幹——然後才能出口，用於德國和英國的鋼鐵生產。平均下來每天的工資只有可憐的40到80戈比，食物沾滿了錳礦的粉塵，「住房」是露天的(冬天工人就睡在礦井裏)，這種條件下的奇阿圖拉——用一位觀察家的話說——是「真正的苦役(katorga)」，可工人並沒有犯甚麼罪。<sup>121</sup>哪怕是按照沙皇俄國的標準，奇阿圖拉的不公平也很突出。但是當工人起來反抗時，政權卻召來帝國軍隊和右翼的民團。那些右翼民團自稱「聖戰旅」，但人們把它叫做「黑色百人團」。為了回應暴力攻擊，在朱加施維里的幫助下，社會民主黨的鼓動「小組」被改造成叫做「赤色百人團」的戰鬥隊。<sup>122</sup>到1905年12月，工人的赤色百人團在年輕而兇暴的激進分子的協助下，奪取了奇阿圖拉的控制權，因而也奪取了全球一半錳礦石產量的控制權。

77

就在上一年，朱加施維里還一直要求格魯吉亞社會民主工黨脫離全俄(帝國)社會民主黨，實現自主化——這或許是還在受到他在神學院反對俄羅斯化以及更寬泛的格魯吉亞反對俄羅斯化的影響。不過，在格魯吉亞的社會民主黨反對爭取民族獨立，理由是即使他們設法擺脫了控制，要是俄羅斯不能自由，格魯吉亞的自由也保不住。格魯吉亞的同志指責朱加施維里是「格魯吉亞的崩得分子」，並強迫他公開聲明放棄自己的主張。未來的斯大林寫了一篇〈信仰告白〉(1904年2月)，否認自己

---

\* 編註：約1.68米。



有單獨建立格魯吉亞黨的想法，並在社會民主黨各小組內部散發了70份。<sup>123</sup> 和年輕時的羅曼蒂克詩歌以及在拉多的《鬥爭報》上發表的沒有署名但後來被歸於斯大林的兩篇社論不同，〈信仰告白〉是他最初公開發表的文章之一（後來的黨史專家在搜集他的著述時沒有找到這篇）。接着他又用格魯吉亞文寫了一篇更詳細的文章，時間是1904年9至10月，名為〈社會民主黨怎樣理解民族問題？〉。這篇文章實質上是他評論事業的開始。朱加施維里把矛頭對準剛成立的社會聯邦黨，該黨設在巴黎的刊物要求格魯吉亞無論是在俄羅斯帝國還是社會主義運動中都要爭取自主。他強烈反對單獨建立左翼的「民族」政黨，並對格魯吉亞民族主義冷嘲熱諷。<sup>124</sup> 1905年4月，一份寫給巴統無產階級的小冊子指出：「俄國的社會民主主義不但要對俄國無產階級負責，還要對正在野蠻的專制制度壓迫下呻吟的俄國各族人民負責——它要對全人類，對整個現代文明負責。」是俄國，而不是格魯吉亞。<sup>125</sup> 信仰告白事件成了轉折點。

78 在此期間，朱加施維里組織奇阿圖拉的群眾直接行動，他幹得得心應手。在他的幫助下，幾乎所有的礦井都變成了社會民主黨各派的戰場，同時，他還把從前、尤其是在巴統搞地下活動時的忠誠分子安排進去。有些觀察家對他的小集團的強烈忠誠感十分驚訝。但是，被奇阿圖拉工人選作領袖的卻不是朱加施維里，而是一個又高又瘦、富有魅力的格魯吉亞青年，名叫諾伊·拉米施維里 (Noe Ramishvili，生於1881年)。拉米施維里之所以能夠贏得礦工的信任，部分是靠兜售高加索社會民主黨孟什維克派的觀點，認為黨內的普通工人具有至高無上的作用。<sup>126</sup> 朱加施維里屬於高加索社會民主黨布爾什維克派，他咒罵自己的競爭對手是在「討好工人」。<sup>127</sup> 在從奇阿圖拉給流亡歐洲的布爾什維克派領袖弗拉基米爾·列寧寫的報告中，他談到了這場生死攸關的鬥爭——不是反對沙皇政權的鬥爭，而是反對孟什維主義的鬥爭。<sup>128</sup>

布爾什維克和孟什維克的派系鬥爭是在兩年前的1903年7月，在倫敦一家俱樂部內召開的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第二次代表大會上爆發的（那是從1898年在明斯克召開九人成立大會以來的第一次代表大會）。在沙皇警察鞭長莫及的地方，代表們通過了黨章和黨綱（「社會革命的必要條件就是無產階級專政」），但兩個強勢人物列寧和馬爾托夫在黨的組織

問題上發生了衝突。事情的起因是列寧提議把《火星報》編輯部從六人減至三人(普列漢諾夫、列寧和馬爾托夫)，這是個合理的建議，卻在會場引起強烈的反響(會議記錄上記載了「威脅式的叫嚷」和大喊「可恥」)。分歧加深了。全俄社會民主黨把資本主義視為可以超越的罪惡，但馬克思主義認為歷史是按階段前進的，因此，大部分俄國馬克思主義者都支持黨內元老普列漢諾夫的看法，認為只有在首先進行「資產階級革命」並加速發展俄國資本主義之後，社會主義革命才能取得成功。按照這種看法，俄國工人應該首先幫助軟弱的資產階級實行憲政，幾十年後再超越資本主義，朝社會主義方向前進。但是，如果事實上工人沒有能力承擔這一角色怎麼辦？馬爾托夫抓住這點，認為「革命民主主義和社會主義這兩大任務的協調一致」，即資產階級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的協調一致，「是俄國社會的命運向俄國社會民主主義提出的難題」。<sup>129</sup>

工人在歷史進程中的作用這一問題已經造成德國社會民主黨的分裂。在德國，無產者正在形成的似乎不是革命意識，而只是工聯意識(同時，資本主義也沒有走向崩潰)，愛德華·伯恩斯坦(Eduard Bernstein)對此說得很清楚。他認為社會主義者應當支持改良和進化，經由資本主義實現社會主義，而不是圖謀消滅資本主義。伯恩斯坦的對手卡爾·考茨基指責他是馬克思主義的「修正主義者」，並堅持認為仍然要靠革命才能實現社會主義以及之後的共產主義。可在沙皇統治下的俄國，不允許採取伯恩斯坦的「修正主義」方法，儘管列寧一度也非常贊成——現在不贊成——因為工聯和憲政仍然是非法的。列寧敬佩考茨基，可自己卻走得更遠，主張採取密謀的手段，因為帝俄跟德國不同，對自由限制得很嚴。在《怎麼辦？》(1902)中，列寧預言，要是「讓少數跟帝國安全警察一樣訓練有素、經驗豐富的職業革命家去組織」，那革命是有可能的。<sup>130</sup> 他的立場被指責為不符合馬克思主義，實際上，

79

\* 譯註：「(革命運動領導者的組織)構成主要應當是以革命活動為職業的人……在專制制度的國家裏，我們越減少這種組織的成員的數量，減少到只包括那些以革命活動為職業並且在同政治警察作鬥爭的藝術方面受過專業訓練的人，這種組織也就會越難被「捕捉」……」《列寧全集》(第2版，人民出版社，1984-1990)第6卷，第118頁。

是被指責為布朗基主義——該說法得名於法國人路易·奧古斯特·布朗基 (Louis Auguste Blanqui, 1805–1881)，他不考慮群眾運動的效力，主張使用武力，由小集團通過臨時性的專政進行革命。<sup>131</sup> 但列寧在某種程度上不過是回應了俄羅斯帝國的工人強烈的鬥爭精神，比如1900年哈爾科夫的五一大遊行——他寫過這方面的文章——以及第二年奧布霍夫工人與警察的暴力衝突。不錯，有時列寧的確好像和伯恩斯坦一樣，說要是任由工人自行發展，他們只會產生工聯意識。但這讓列寧變得更加激進，而不是變得保守。從根本上來說，列寧想要建立一個由職業革命家組成的政黨，以戰勝組織完善的沙皇國家，因為後者的高壓政策讓普通的組織工作很難開展。<sup>132</sup> 可列寧沒能說服其他人：在1903年的代表大會上，儘管51名代表中只有4名真正的工人，但馬爾托夫的觀點——他主張建立相對於「職業」革命家而言更具包容性的黨組織——在表決時贏得微弱多數(28票對23票)。列寧拒絕接受表決結果，並宣佈成立一個他稱之為布爾什維克(多數派)的派別，因為他在別的次要問題上贏得了多數票。不可思議的是，馬爾托夫的多數派竟然默認了把自己稱為孟什維克(少數派)。

80 與1903年夏天的分裂有關的指控、反指控以及誤解，沸沸揚揚地持續了大半個世紀。保安處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好運：社會民主黨人發生了內訌！對社會民主黨的革命者來說，僅僅爭取免遭逮捕是不夠的，現在，他們一面要和社會革命黨之類的左翼對手競爭，一面還要和自己的黨在國內外所有委員會中的「另外一派」進行鬥爭，儘管有段時間他們很難說清楚布爾什維克和孟什維克的區別。<sup>133</sup> 當然，在革命者當中，宗派主義就同給人戴綠帽子一樣司空見慣。可列寧的分裂活動激怒了他一直以來的親密朋友馬爾托夫，還有馬爾托夫的盟友，因為他們剛剛同列寧一起暗中商量，限制俄國社會民主黨隊伍內部猶太人崩得的勢力(無產階級中猶太人很多，但獲准參加1903年社會民主黨代表大會的只有五位崩得代表)。<sup>134</sup> 接着，事情就公開了。馬爾托夫和他那一派拒絕各方的調解。列寧的觀點顯然同爭取運動的權力有關，但分裂的開始以及持續，至少部分原因在於個人。雙方在內部的辯論中開始惡言相向，指責對方撒謊和欺騙。

分裂的消息傳開，列寧受到嚴厲的譴責。1904年，羅莎·盧森堡(Rosa Luxemburg)——出生於波蘭的革命者，三年後才會和列寧碰面——批評列寧的組織觀念是「適合軍隊的極端集中制」。托洛茨基站在馬爾托夫一邊，把列寧比作天主教耶穌會修士埃馬紐埃爾·約瑟夫·西哀士——猜忌他人，固執己見，獨斷專行，聲稱要鎮壓所謂無處不在的煽動行為。普列漢諾夫很快把列寧稱為布朗基主義者。至於列寧，為了把對俄國社會民主工黨來說戰略地位十分重要而且人數眾多的高加索支部招至麾下，他在自己的根據地日內瓦勤奮工作，撰文指責黨的中央委員會(反對他的人)「卑鄙無恥」。本來他是很有可能成功的：不管怎麼說，列寧一派的許多成員都從歐俄流放到高加索，他們在那裏散佈了布爾什維克的影響。未來的斯大林——他錯過了1903年的倫敦代表大會(當時被關在沙皇的監獄候審)——1904年在梯弗利斯結識了列夫·加米涅夫，而加米涅夫是列寧一派的擁護者。但在1905年1月，格魯吉亞馬克思主義者的領袖諾伊·饒爾丹尼亞結束了在歐洲的流亡生活回到格魯吉亞，帶領絕大多數高加索馬克思主義者從列寧的立場轉向孟什維主義。早在1901年11月，朱加施維里就因為贊成建立一個小範圍的、以知識分子為中心的政黨而同饒爾丹尼亞有過衝突。現在，他再次和饒爾丹尼亞對着幹，仍然留在布爾什維克一派。因此，對朱加施維里來說，分裂的原因部分也在於個人。從理論上來說，列寧主義更看重職業革命家而不是工人的態度，也適合朱加施維里的性格和自我形象。

所謂列寧的個人影響總是被拿來解釋朱加施維里早年的忠誠：據說未來的斯大林對遠方的布爾什維克領袖仰慕已久。但是，即便他在遠處感覺到對列寧有些崇拜，他們的初次見面則讓這種感覺消退了不少。<sup>135</sup> 兩人的見面是在1905年12月，在俄屬芬蘭塔墨爾福斯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第三次代表大會上\*，朱加施維里是高加索布爾什維克派的三名會議代表之一。<sup>136</sup> 流亡瑞士的列寧是在1905年革命基本平息後，才在當年的11月返回俄國的。不到36歲的他差不多比朱加施維里大十

81

---

\* 譯註：應為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第一次代表會議或布爾什維克代表會議，見《列寧全集》第12卷，第400頁，註84，以及《斯大林全集》第6卷，第49頁。

歲。<sup>137</sup> (所有代表中的「元老」、來自高加索的米霍·茨哈卡雅 [Mikho Tskhakaya] 當時 39 歲。) 但朱加施維里在黨的代表大會\* 上注意到，各省代表，包括他自己在內，是如何抨擊年長的列寧的政策提案的；注意到這位布爾什維克領袖是如何以自己身在國外、不瞭解情況為由作出退讓的。「我本來希望看見我們黨的山鷹，看見一個偉大的人物，這個人物不僅在政治上是偉大的，而且可以說在體格上也是偉大的，因為當時列寧在我的想像中是一個魁梧奇偉的巨人。」斯大林後來回憶說，「當我看見他原來是一個和凡人毫無區別，簡直是毫無區別的、最平常的、身材比較矮小的人的時候，我是多麼失望呵……」<sup>138†</sup> (1906 至 1913 年，斯大林的文章只引用過兩次列寧的話。) 當然，列寧最終會成為斯大林不可或缺的導師，但要讓格魯吉亞人——以及左翼其他的大多數人——領會到列寧那種能夠改變歷史的意志力，還需假以時日。不管怎麼說，就在自詡為社會民主主義者的俄國革命黨人，為了即將到來的革命的性質問題 (是資產階級革命還是社會主義革命) 以及黨的組織問題 (是包羅廣泛的還是「職業的」) 而鬥得不可開交的時候，沙皇的政治權威已經迅速瓦解，這使得革命迫在眉睫。

## 瓦解與拯救

當朱加施維里正在奇阿圖拉組織赤色百人團的時候，1905 年 10 月 8 日，也就是在俄日和約簽訂之後，一場總罷工讓聖彼得堡陷入了癱瘓。不到五天，整個帝國就有一百多萬工人走上街頭，電報和鐵路系統停止運行，既沒有辦法在戰爭結束後把部隊運送回國——停戰後滯留在遠東戰場的俄國士兵仍有一百多萬——也沒有辦法用他們來維護國內的治安。10 月 13 日左右，聖彼得堡成立了蘇維埃 (或委員會)，作為協調罷工活動的委員會；它存在了大約 50 天，當中有兩週是由列夫·托洛茨基領導的，他剛流放歸來，是個多產的作家，也是個傑出的社會

\* 譯註：應為代表會議。

† 譯註：《斯大林全集》第 6 卷，第 49 頁。

民主黨人。<sup>139</sup> 10月14日發佈鎮壓警告，次日，當局宣佈在當年關閉首都那所頗具聲望的大學。統治集團中的一些人物，包括龐大的羅曼諾夫家族的一些成員，敦促尼古拉二世在政治上作出讓步，結束政權與社會的分裂。在整個歐洲，只有奧斯曼帝國、黑山公國和俄羅斯帝國還沒有議會。人們告訴沙皇，要支持那些有悖於專制原則的變化，要成立協調一致的政府。沙皇寫信給母親、出生於丹麥的皇太后：「大臣們像是膽小鬼，聚在一起商量怎樣讓所有大臣團結起來，而不是果斷地採取行動。」<sup>140</sup> 再次得勢而且贊成專制的謝爾蓋·維特剛從新罕布什爾的樸茨茅斯回來，他乘機向沙皇進言，要想拯救專制制度，可以有兩種選擇：要麼頒佈憲法、授予公民自由權，特別是成立協調一致的內閣制政府；要麼找人實行鎮壓。<sup>141</sup> 10月15日，尼古拉二世問他最信任的廷臣和維特的死對頭、主張採取強硬路線的德米特里·特列波夫(Dmitry Trepov)——他剛被任命為首都的總督——是否能夠在恢復秩序的同時避免屠殺平民。後者在10月16日答覆說：「暴亂已經到了不太可能避免流血的地步。」<sup>142</sup>

沙皇猶豫了。他讓人起草宣言，宣佈設立一個僅僅具有諮議性質的杜馬。<sup>143</sup> 證據顯示，他還向自己的叔叔尼古拉大公求助，要他接手獨裁權力，實行軍事獨裁。對此，後者答覆說，遠東戰爭已經讓軍隊元氣大傷，要是沙皇不同意維特的計劃，在政治上作出讓步，大公就會自殺。<sup>144</sup> 10月17日，尼古拉二世畫着十字，很不情願地簽署了於次日發表的〈關於完善國家秩序〉的宣言，「強制推行」——用專制的腔調說——公民權利和兩院制立法機關。國家杜馬不再像原來在2月建議的那樣是「諮議性的」，而是一個由選舉產生的「人民代表」組成的下院，儘管選舉權的覆蓋範圍較小——甚至比西班牙專制政府在1680年賦予其新大陸城市的權利還要小，但卻有頒佈法律的權利。年滿25週歲的男性公民——不包括士兵和軍官——擁有選舉權，但選舉要通過四個選舉人團進行，格外受到重視的是與個體農民相對的村社農民。<sup>145</sup> 與此同時，俄國的國務會議——由獲得任命的上層官員組成的諮議機構，到當時為止，就像伊利亞·列賓1903年的巨幅油畫所描繪的，基本上是個擺設——將成為上院。按照設想，上院會起到約束杜馬的作用。新國務會議有一半成員

將繼續由沙皇從以前的大臣、總督和大使中任命，而那些人，正如某內部人士描述的，都是「年高德劭，頭髮花白或謝頂，皮膚滿是皺紋，常常因為上了年紀而佝腰曲背，穿制服，佩戴着他們所有的勳章」。另一半將由一些指定的機構通過選舉產生，比如正教會、各省的地方自治會議、證券交易所以及科學院。相比而言，美國將通過第17修正案，準備在1911年實行參議員直選；而英國上院裏都是些世襲貴族。<sup>146</sup>

沙皇還破天荒頭一遭允許設立統一的政府，由總理負責，這一點遠遠沒那麼有戲劇性，但絕非無關緊要。謝爾蓋·克雷扎諾夫斯基 (Sergei Kryzhanovsky) 作為副內務大臣，奉命扼要說明了成立內閣的必要性及內閣的組織結構。他嚴厲指責俄國各部之間的「分裂」與內訌。他警告說，召開杜馬會議將會像1789年法國召開國民會議一樣，提供一個強大的論壇。政府必須強勢，並且要團結起來管住立法機關，否則君主制就會出現法國那樣的後果。但大臣們之所以想要有個強勢的政府，不單單是因為覺得需要管住立法機關。維特考慮的是普魯士模式，這種模式為首席大臣提供的權威可以控制個別大臣與君主之間的所有接觸，而俾斯麥充分利用了這種權威。<sup>147</sup>

或許，一個由總理來協調的強勢內閣，無論在哪個現代國家都顯而易見是必要的，但就全球來說，它的出現卻相對較晚。在英國，首相職務的起源很大程度上是偶然的，是因為漢諾威（德意志的一個邦國）不倫瑞克家族的喬治一世國王 (George I, 1714至1727年在位) 不會說英語（他一年中至少有一半時間在漢諾威），這樣一來，主持內閣會議的擔子就落到新設的首相或首席大臣頭上，這種做法後來成了慣例。從1849年到1852年，普魯士開始有了相當於首相的首席大臣以及由大臣組成的內閣，這是為了對付1848年突然出現的立法機關而臨時設立的。<sup>148</sup>（1857年俄國流產的內閣制政府甚至都沒有總理。）但英國的首相一職給了下院的多數黨領袖，這就意味着，他的地位不是由王室決定的，而是由選舉產生的議會多數決定的。普魯士首席大臣的任免則完全是由君主說了算，無需考慮國會（選民）中多數派的意見。

84

俄國仿照的不是英國——那是真正的議會制——而是普魯士。誠然，杜馬可以傳喚大臣匯報情況，但沙皇保留了任免大臣的絕對權力，

保留了立法的絕對否決權、解散杜馬和宣佈重新選舉的權限，還有宣佈軍事管制的權限。此外，外交大臣、陸軍大臣、海軍大臣和宮廷大臣都不歸總理管轄。這幾點讓尼古拉二世自欺欺人地以為——若是沒有維特的縱容也不會那樣——讓步並沒有違背他維護專制制度的加冕誓言。但他確實是違背了，俄國當時14位大臣的工作——上面列舉的除外——要由別人而不是沙皇來協調了。<sup>149</sup>

這個「別人」實際上就是維特，尼古拉二世選他作為俄國有史以來的首任總理。

尼古拉二世原本是讓維特起草《十月宣言》的，但維特太瞭解這位沙皇了，而且他很可能希望離那份文件遠點，就把起草宣言的差事交給了一位同事，這位同事當時正好在他家裏。<sup>150</sup>不過，維特對宣言草案作了修改，而且被普遍視為草案的主要推動者。<sup>151</sup>維特處於權力之巔，可他卻發現自己被懸在空中，得不到任何人的充分支持——受到刺激的統治集團不會，他們大多贊成不受約束的專制制度，而且他們也不喜歡維特的出身、壞脾氣和猶太妻子；社會基礎有限的立憲派不會，他們仍在等待起草和實施許諾的憲法；由選舉產生的聖彼得堡蘇維埃代表不會，他們往往認為杜馬是「資產階級」騙人的把戲；罷工罷課的工人和學生不會，他們總罷工、總罷課的勢頭是減弱了，但仍然渴望社會正義；叛亂的農民不會，他們乾脆把《十月宣言》理解為想要擱置土地的重新分配，結果造成新一輪的農村騷亂。<sup>152</sup>維特甚至得不到尼古拉二世的充分支持：尼古拉二世提拔了他，可又覺得他傲慢無禮。不過，純粹依靠個性的力量，尤其是努力保持消息靈通，維特實際上還是能協調好大部分政府部門的關係，甚至是對外政策和軍隊事務方面的關係，而這兩個部門的大臣按理來說是不用向總理匯報的。<sup>153</sup>

可是，不管維特的能力有多強，實行總理制以及承諾稍後召開杜馬會議，並沒能恢復公共秩序。相反，在《十月宣言》宣佈之後，反對活動變本加厲。實際上，拯救沙皇專制制度的是一個頑固的保守派官員，他曾因桃色醜聞和濫用警察權力而被解除職務。彼得·杜爾諾沃 (Pyotr Durnovó，生於1845年)，出身貴族世家，畢業於海軍學院，1860年代「大改革」時期在海軍服役，後離開海軍，擔任了很長一段時



間的警察司司長(1884–1893)。杜爾諾沃手下的一處「暗室」截獲了一封情書，是他自己的情婦寫給巴西大使館臨時代辦的，於是，他讓警察闖進那位外交官的住所並偷走她其餘的信件。那個女人把失竊的事情告訴了她的外交官情夫，後者又在宮廷舞會上告訴了沙皇亞歷山大三世。據說亞歷山大三世對他的內務大臣說：「24小時之內讓那個豬獃走人。」<sup>154</sup> 杜爾諾沃避居國外，看似永無出頭之日了。可是在1895年，在49歲的亞歷山大三世暴病身亡之後，杜爾諾沃竟然又東山再起，升為副內務大臣。1905年10月23日，維特不顧自由派的強烈反對和沙皇尼古拉二世的猶豫，任命他為代理內務大臣。<sup>155</sup> 不到三天，波羅的海水兵嘩變。到10月28日，杜爾諾沃鎮壓了那些水兵亂糟糟的嘩變，下令處死了幾百人。他打算在整個帝國都進行鎮壓，但維特(起初)堅持要求杜爾諾沃要在《十月宣言》的範圍內採取行動，因為這畢竟是沙皇簽署的。可杜爾諾沃很快就採取了更加嚴厲的措施，當然了，在這些措施似乎收到成效的時候，《十月宣言》的簽署者以及很多國家官員都非常滿意。「大家開始工作了，整個機器進入到高速模式，」保安處的某個高級官員回憶說，「逮捕開始了。」<sup>156</sup> 實際上，從沙皇承諾立憲(1905年10月)到六個月後頒佈基本法——尼古拉二世拒絕把它稱為憲法——杜爾諾沃手下的警察逮捕了數萬人(有些估計認為多達7萬)。<sup>157</sup> 杜爾諾沃還解除了很多位省長的職務，而且更重要的是，他迫使其餘的省長奪回了所有的公共空間。

杜爾諾沃顯得勁頭十足。1905年11月中旬，當新一輪的罷工潮讓郵政和電報系統陷入癱瘓的時候，他組織民間力量打破了困難局面。12月3日，即聖彼得堡蘇維埃號召工人從國有銀行取走存款的第二天，他逮捕了大約260名蘇維埃代表，佔代表總數的一半，其中還包括蘇維埃主席托洛茨基。許多官員警告說，這會激起1905年10月那樣的總罷工，但杜爾諾沃反駁說，展示力量會讓政治動向發生變化。1905年12月7日，莫斯科爆發起義，杜爾諾沃的批評者所說的似乎應驗了。但他去了皇村，向尼古拉二世匯報並請示——沒有同他(名義上的)上司、總理維特一起，杜爾諾沃不想同維特多費口舌，雖然維特此時也已改弦更張，贊成採取強硬手段。杜爾諾沃甚至沒有出席政府會議(大臣會

議)，也沒有解釋缺席的原因。<sup>158</sup> 可想而知，沙皇一心想恢復1905年前的做法，讓杜爾諾沃那樣的大臣私下裏直接向他匯報。尼古拉二世寫信給自己的母親——皇太后說：「內務大臣杜爾諾沃幹得很好。」<sup>159</sup> 現在，面對在俄國古老的首都發生的起義，杜爾諾沃下令鎮壓：約有424人被打死，2,000人受傷。<sup>160</sup> 整個俄羅斯帝國到處都在鎮壓。「我懇請你們，在這種情況以及類似的情況下，要下令使用武力，不要有絲毫憐憫，要把叛亂分子斬盡殺絕，要把他們的房子燒掉，」杜爾諾沃毫不隱諱地指示基輔省的官員，「在目前的情況下，只有用這些辦法才能恢復政府的權威。」<sup>161</sup> 在格魯吉亞，帝國軍隊用武力佔領了奇阿圖拉錳礦定居點，奪走了朱加施維里及其布爾什維克擁護者的政治基地。帝國軍隊和黑色百人團還擊潰了格魯吉亞孟什維克在古里安共和國的農民堡壘。世界上第一個由馬克思主義者領導的農民共和國垮掉了，但就像有位學者寫的，它「在亞洲的原野、山區和叢林」引起了迴響。<sup>162</sup> 可就眼下來說，到1907年年底，帝國各地群眾性的農民起義已經被撲滅。<sup>163</sup> 這一點非常不易。



俄國的專制制度起死回生。為了鎮壓國內的騷亂，總共投入近30萬軍隊，同對日作戰的陸軍數量差不多。<sup>164</sup> 要是俄國西側的兩個敵人——德意志帝國和奧匈帝國——決定抓住這個輕而易舉的機會，那就無法進行如此大規模的動員來鎮壓國內騷亂和維護政權。甚至用不着真的從西線發動進攻，只要進行動員，就會使沙皇政權癱瘓並且很可能走向滅亡。<sup>165</sup> 同樣關鍵的是，用於國內鎮壓的俄國軍隊，就是那批穿着制服的農民，他們在沙皇政權露出頹相時接連發動兵變。現在，當政權再次露出它的獠牙時，他們又開始用武力恢復國家秩序，對付造反的工人、學生和農民兄弟了。<sup>166</sup> 杜爾諾沃把他們整合起來。在歷史結構的大戲中，這是人的個性被證實起到了決定作用的重大時刻之一：換個差一些的內務大臣就做不到。在政權岌岌可危時，他的副手弗拉基米爾·古爾科(Vladimir Gurko)說得對，「是杜爾諾沃……拯救了它，他採取的是幾乎自主的政策，無情地迫害革命分子，一定程度上重建了國家的秩序」。<sup>167</sup>

但這個時刻也證實了對國家造成傷害的是政治家的才能而非短板。杜爾諾沃在俄國專制制度理應垮台的時候拯救了它，到頭來適得其反，讓國家在一場更糟糕的戰爭中發生了更糟糕的崩潰，這種崩潰將會成為建立激進新秩序的樣板。當然，如果杜爾諾沃異乎尋常的果斷和治安才能沒能在1905至1906年拯救沙皇制度，結果如何那就不得而知了。但有一點很值得懷疑，那就是六分之一個地球以及其他地方的歷史還會不會那樣悲慘，斯大林那種極端暴力的專制統治還會不會出現。不過，杜爾諾沃給俄國帶來的喘息期實際上是短暫而瘋狂的，充滿了四處瀰漫的不安全感。「在世界大戰之前很久，」有位同時代的人回憶說，「所有具有政治意識的人都感覺好像生活在火山口上。」<sup>168</sup>

## 第四章

# 立憲專制

我們厭倦透了。我們是忠誠的，不可能反對政府，但我們也不會支持現在的政府。無奈之下，我們只好袖手旁觀。這是俄羅斯生活的悲劇。

88

——政治右翼分子和反猶分子 A. I. 薩文科 (A. I. Savenko)，  
保安處截獲的私信，1914年<sup>1</sup>

看着那顆垂着的小腦瓜，你會覺得要是戳它一下，整本的卡爾·馬克思《資本論》就會像容器裏的氣體一樣，嘶嘶地冒出來。馬克思主義是他的棲息地，在那裏他戰無不勝。世上沒有任何力量可以讓他改變既定的立場，他對所有現象都可以從馬克思那裏找到合適的解釋。

——沙皇時期的前政治犯獄友談  
被關押在巴庫監獄的青年斯大林，1908年<sup>2</sup>

俄羅斯國家的形成，一方面是因為戰亂，因為它所處的地緣政治環境特別具有挑戰性，另一方面也是因為理想，尤其是君主專制的理想，但俄羅斯長期存在的專制制度一點也不穩定。彼得大帝之後的羅曼諾夫家族，差不多有一半君主是因為政變或暗殺，無奈地離開自己

的寶座。彼得本人的長子兼繼承人，因為抗命而被彼得處死（彼得兩任妻子所生的15個子女，有13個死在他之前）。繼承彼得皇位的是他的第二任妻子，波羅的海沿岸地區一個農民的女兒，號稱葉卡捷琳娜一世（Catherine I），再之後繼位的是他的孫子彼得二世（Peter II）。1730年，當彼得二世在婚禮那天死於天花後，羅曼諾夫家族的男性一脈就斷了。皇位傳給了彼得二世的親戚，先是他父親的堂妹安娜（1730至1740年在位），然後在宮廷政變中又傳給他的姑媽伊麗莎白（1741至1761年在位）。兩人誰也沒有留下男性繼承人。羅曼諾夫家族之所以沒有絕後，只是因為彼得大帝兩個長大成人的女兒，其中一個嫁給了荷爾施泰因—戈托爾普公爵。這讓羅曼諾夫成了一個同時具有德意志和俄羅斯血統的家族。成為彼得三世（Peter III）的卡爾·彼得·烏爾里希（Karl Peter Ulrich），是第一個帶有荷爾施泰因—戈托爾普和羅曼諾夫血統的人，也是一個低能兒。他在俄羅斯的重大場合身着普魯士軍服，在位六個月就在政變中被妻子廢黜。他的妻子名叫索菲·奧古斯特·弗里德里克·馮·安哈爾特—采爾布斯特，是德國一個小貴族的女兒，她繼位成了葉卡捷琳娜二世（Catherine II，或葉卡捷琳娜大帝）。她想要做一個開明的專制君主，讓高雅文化成為專制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斯大林後來仿效這一做法，也像葉卡捷琳娜二世一樣從莫斯科的帝國參政院發號施令）。德國人葉卡捷琳娜只是通過婚姻才成為羅曼諾夫家族的一員，但俄國的統治家族強調，從母系一脈來說，她與羅曼諾夫家族的淵源可以追溯到彼得，而且她只使用俄羅斯姓氏。1796年，葉卡捷琳娜的兒子保羅繼承了她的皇位，但保羅在1801年被暗殺；接着就是保羅的兒子亞歷山大一世（Alexander I，1801至1825年在位）；亞歷山大的弟弟尼古拉一世（1825至1855年在位）；1881年，亞歷山大二世在極度痛苦中死去，他的雙腿被恐怖分子炸得粉碎；亞歷山大三世在兄長突然死亡後成為繼承人，他在上台後於1894年39歲時死於腎病（腎炎）；最後是尼古拉二世。<sup>3</sup>

除了亞歷山大三世娶的是丹麥公主，也就是他已故兄長的未婚妻，所有從德國人葉卡捷琳娜傳下來的「羅曼諾夫」家族的後代，娶的都是德國出生的妻子。這樣的通婚讓幾乎所有的歐洲皇室都沾親帶

故。尼古拉二世的德國妻子、黑森—達姆施塔特公爵小姐阿利克斯·維多利亞·海倫娜·路易斯·貝阿特麗策 (Alix Victoria Helena Louise Beatrice, Princess of Hesse-Darmstadt)，是英國維多利亞女王 (Victoria) 最寵愛的外孫女。阿利克斯生於1872年，即德意志統一後那一年。她初次見到俄國的皇太子「尼基」，是在她姐姐埃拉和尼古拉的叔叔舉行婚禮的時候，當時她11歲，而他15歲。六年後，兩人再次相遇並墜入情網。沙皇亞歷山大三世和皇后瑪麗亞·費奧多蘿芙娜起初反對兒子尼古拉和那位羞澀、憂鬱的阿利克斯的婚事，儘管她是他們的教女。俄國君主中意的是有望登上法國王位之人的女兒，以便鞏固俄法之間新的同盟關係。至於維多利亞女王，她原本贊成阿利克斯嫁給聯合王國的威爾士親王，但她改變了主意。德皇威廉二世 (Wilhelm II) 從一開始就支持阿利克斯和尼基的婚事，因為他希望借此加強德俄之間的聯繫。不過，阿利克斯來到俄國時很不走運，正趕上沙皇亞歷山大三世的早逝。「她跟在靈柩後面向我們走來，」國葬儀式上，人們一眼就注意到她，「她帶來了壞運氣。」<sup>4</sup> 新皇后像人們希望的那樣 (由路德教) 改信了東正教，並取名亞歷山德拉 (Alexandra)。在她和尼古拉二世的蜜月期間，每天要舉行兩次東正教儀式並接待貴族們弔唁早逝的公公。她接連生了四個女兒，這一點也讓人們感到不安，因為按照葉卡捷琳娜大帝的兒子保羅一世 (Paul I, 1796至1801年在位) 執政時通過的帝國繼承法 (1797)，不允許再有女性佔據皇位。1904年8月，即婚後的第十個年頭，亞歷山德拉終於生下一個期盼已久的男性繼承人。尼古拉二世給男孩取名為阿列克謝 (Alexei)，這是他最喜歡的羅曼諾夫家族的早期統治者、彼得大帝父親的名字，而那要追溯到聖彼得堡建造前的莫斯科時代。

90

終於有了繼承人的尼古拉二世，一年多之後對於內務大臣彼得·杜爾諾沃的殘酷鎮壓非常滿意，但沙皇沒有收回《十月宣言》中說過的話。因此，1906年4月27日，新成立的國家杜馬在冬宮開幕，並仿照英國的習慣，由君主作了 (簡短的) 講話。尼古拉二世同表兄喬治五世國王 (George V) 長得出奇地相像。可面對佇立在聖格奧爾吉大廳的所有國內外要人和民選代表，沙皇在台上只說了200字，然後便是死一般的

沉默。<sup>5</sup> 俄國變成了前所未有的樣子，變成了立憲專制，可在這種體制下，「憲法」卻成了敏感詞。<sup>6</sup> 這種體制是自由和不自由的大雜燴。杜馬開會的地方是塔夫利達宮，那是專制君主葉卡捷琳娜大帝 1783 年賜給她的宮廷寵兒波將金公爵 (Potemkin) 的，因為他征服了克里米亞；在他死後，宮殿又從他的家族收回，最近則用作帝國劇院的道具倉庫。塔夫利達宮內部的冬園改成了擁有近 500 個座席的議事廳，名為「白廳」。雖然杜馬並不包括芬蘭大公國 (它有自己的立法機關)，以及中亞的希瓦和布哈拉這兩個小的「受保護國」，但許多俄國代表仍然對帝國代表的多樣性深感震驚，就好像首都的精英們一直生活在別的地方而不是帝俄。白廳之中，在尼古拉二世的巨幅肖像下，立憲主義的主要擁護者立憲民主黨 (卡傑特 [Cadet])，一個由莫斯科大學歷史學教授帕維爾·米留可夫 (Paul Miliukov) 領導的集團，成了反對派。<sup>7</sup> 哪些人——如果說有——擁護新的立憲專制，此時還不清楚。

91 在敦促沙皇成立杜馬這件事上，疲憊、虛弱且遭人輕視的總理謝爾蓋·維特出力比誰都多，可到了杜馬勝利開幕的時候，他卻要求辭職。<sup>8</sup> 作為俄國從 1890 年代開始的工業化浪潮的主要推動者，作為在 1905 年幫助彌合政權與社會裂痕的人，維特從中沒有得到甚麼特別的好處。尼古拉二世覺得維特陰險狡猾、沒有原則 (「我從未見過這種變色龍一樣的人。」)。<sup>9</sup> 對於維特幫助達成的政治讓步，沙皇馬上就後悔了，而且永遠都感到後悔。隨着維特的下台，杜爾諾沃也被迫辭職，他在對歷史產生了重要影響的內務大臣任上只幹了六個月，雖然尼古拉二世允許杜爾諾沃繼續拿他每年 1.8 萬盧布的工資，並給了他 20 萬盧布的一大筆現金作為禮物。(維特得到了鑲有鑽石的聖亞歷山大·涅夫斯基勳章。)<sup>10</sup> 杜爾諾沃的職務給了薩拉托夫省省長彼得·斯托雷平 (Pyotr Stolypin)，後者於 1906 年 7 月又設法兼任總理一職，從而取代了杜爾諾沃和維特兩人的位置。<sup>11</sup>

斯托雷平是一大發現。他身材高大，藍眼睛、黑鬍鬚，風度翩翩，儀表堂堂，和粗魯的維特不一樣。1862 年，他出生在德累斯頓 (當時他的母親正在那裏探望國外的親戚)，他的家庭是俄國的貴族世家。他的父親同著名的作家米哈伊爾·萊蒙托夫是親戚，有一把自己演奏

用的斯特拉迪瓦里琴，\* 還擔任過亞歷山大二世的副官和莫斯科大克里姆林宮的衛戍司令。斯托雷平的母親受過良好的教育，她父親是一位將軍，在克里米亞戰爭中指揮過俄國步兵，後來升任沙皇治下的波蘭總督。小斯托雷平的家庭很富有，他是在自家的幾處莊園裏長大的，莊園位於沙皇治下的立陶宛，那裏從前屬波蘭—立陶宛聯邦。他畢業於聖彼得堡帝國大學，學的是自然科學（而不是法律）。（發明元素周期表的德米特里·門捷列夫是斯托雷平的老師之一。）像斯大林一樣，斯托雷平十幾歲時得過一種怪病，一隻胳膊萎縮，寫字時要用他正常的左手來控制右手。畸形讓他無法像父母的親戚那樣從軍。<sup>12</sup> 但是在1902年，40歲的斯托雷平成了格羅德諾省省長。該省位於波蘭—立陶宛的西部邊疆，他自己的田產也在那裏。他是俄羅斯帝國最年輕的省長。1903年，他調任薩拉托夫省省長，薩拉托夫省位於俄國中部的伏爾加河流域，那裏的農村跟西部邊疆地區不一樣，它有村社，會定期對農民的條田進行重分（即「土地重分型」村社）。薩拉托夫還以政治騷亂出名。沙皇需要巡視該省的時候，斯托雷平費盡心思，讓沙皇周圍出現的盡是些畢恭畢敬的臣民。在1905至1906年的殘酷鎮壓中，斯托雷平證明自己是帝俄最有魄力的省長，一個既有勇氣又有遠見的行政領導，願意向聚集起來的群眾說明維護法律的理由，要是那樣還不管用，他就親自帶領軍隊進行鎮壓。斯托雷平的表現給廷臣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尼古拉二世因為他「堪稱典範的效率」發去賀電。

92

在尼古拉二世將其召到聖彼得堡郊外皇村自己居住的亞歷山大宮，告知要將他升任首都總理的時候，斯托雷平反對說，他不適合那麼高的職務，而且他也不瞭解首都的精英。或許是對斯托雷平表現出的謙遜和敬重心懷感激，沙皇眼含熱淚，緊緊地握住斯托雷平的雙手。<sup>13</sup> 此次握手被看作是——與其說是在事先的展望中，不如說是在事後的回顧中——一次本可以拯救帝俄的歷史機遇。作為在俄國手握大權、最有權威的官員之一，斯托雷平自然十分突出：一個在阿諛奉承的環境下充滿

---

\* 編註：意大利斯特拉迪瓦里家族(Stradivari)製造的弦樂器，是公認的史上最佳弦樂器之一。



自信的人，一個出色的演說家和管理者，一個少有的目光長遠的國家官員。「如果國家對於惡行不予以反擊，」斯托雷平在就職時表示，「那就失去了國家本身的意義。」<sup>14</sup> 事實證明，這個外省人善於贏得沙皇的信任，而且很快就開始讓聖彼得堡的整個權力集團黯然失色。<sup>15</sup> 然而，擺在他面前的任務十分艱巨。開啟現代性的關鍵不但在於鋼鐵產量和大生產——這些俄羅斯或多或少都設法做到了，還在於把民眾成功地吸收到政治體制中，也就是說，還在於大眾政治。

尼古拉二世在維特的竭力勸說下，兌現了《十月宣言》中承諾的準立憲主義，在這新的形勢下，斯托雷平決心充分利用杜爾諾沃的大膽鎮壓讓政權重新煥發生機。在斯托雷平擔任總理期間（1906–1911），他用自己的方式試圖徹底改造俄國的政治體制。但俄國政壇的保守派對立憲專制感到極其憤怒，完全反對斯托雷平為了創造出一個代表他們利益的政治體制所付出的努力。出於不同的原因，左翼——1905年起義的失敗和斯托雷平的鎮壓讓他們清醒過來——也陷入了絕望。當然，我們的主人公、左翼分子約瑟夫·「柯巴」·朱加施維里在斯托雷平執政期間取得了他最著名的革命業績。但那些煽動活動是否起了很大的作用，現在看來還很可疑。相比之下，斯托雷平改革的目標和所受的挫折，就像之前維特一樣，讓我們對未來的斯大林政權有了更多的瞭解。未來的斯大林是透過正統的馬克思主義稜鏡看待世界的，他對於斯托雷平所做的一切幾乎毫不理解。斯大林從未見過沙皇的這位總理，但在日後，他在很大程度上會步其後塵。

## 俄國（第二個）以俾斯麥自許的人

帝俄當時似乎有兩個主要特徵。首先，它的農業出口為德國和英國提供了糧食，但效率依舊很低：俄國的農作物產量在歐洲是最低的（比僅僅被視為「小兄弟」的塞爾維亞還低）；每英畝糧食產量還不到法國甚至奧匈帝國的一半。<sup>16</sup> 這讓農民似乎成了一個亟待解決的難題。其次，俄國的政治生活動盪不安、作繭自縛且瘋狂失智。精英階層的許多人，特別是尼古拉二世，本來希望1906年開始的選舉會產生一個保

守的、代表農民和君主派利益的杜馬。結果立憲民主黨贏得了選舉的勝利，這一點連他們自己也沒有想到。通過票箱獲得權力之後，俄國的古典自由主義者根本沒打算同專制制度合作，尼古拉二世也根本不想和他們妥協。<sup>17</sup> 另外，各個社會主義政黨雖然抵制了第一屆杜馬選舉，但他們改變立場，把幾十名代表選進了第二屆杜馬（部分原因在於農民的選票）。保安處自然要利用線人和電話竊聽監視那些代表。<sup>18</sup> 但政治警察對各方的政治爭鬥束手無策。杜馬混亂的立法程序加劇了這種互不相讓的局面。沒有任何現存機制可以區分議題的主次，結果所有問題都被當成立法問題，而不是政府平常的規章制度問題。還有，令人難以置信的是，杜馬對於立法的進展沒有任何固定的時間表；由代表們組成的眾多委員會要先對議案進行處理，然後才把它們提交杜馬討論，有些委員會會用18個月的時間仔細討論某項議案。當終於進入下一階段，就會在杜馬全體會議上再次對它們進行辯論，而且沒有時間限制。<sup>19</sup> 制度的失敗可能就在於這種程序性的細節方面，尤其是在相互對立的政治力量無法達成和解的時候。

從立憲民主黨的觀點來看，問題在於俄國的憲政革命沒有取消君主專制。實際上，僅僅過了73天，尼古拉二世就利用自己的特權，解散了首屆杜馬會議。根據基本法第87條，專制君主可以在立法機關休會期間下令頒佈法律。（這樣的法律，理論上要由立法機關在復會時批准，但它們在辯論期間依然有效。）<sup>20</sup> 1907年的第二屆杜馬更是一個發表反政府言論的平台，結果只被允許存在了不到90天。接着，1907年6月3日，斯托雷平讓尼古拉二世利用第87條，修改了有關選舉的規定，單方面進一步縮小了杜馬選舉權的範圍，而這種做法是基本法明文禁止的。<sup>21</sup> 立憲民主黨人驚呼「政變！」而他們正是斯托雷平此舉的兩個主要目標之一（另一個目標是那些更左的人）。這是政變。但從斯托雷平的觀點來看，立憲民主黨人也不是甚麼好人：1905至1907年，他們在反國家的恐怖活動中串通一氣，對恐怖活動表面上譴責，背地裏縱容。沙皇政府的許多低級官員因此而丟了性命。<sup>22</sup> 但是，宮廷陰謀家鼓動尼古拉二世結束杜馬「實驗」，而斯托雷平卻努力與立法機關合作，以便讓懸空的俄國政府有一個可以同君主專制兼容的政治基礎。「我們需

要的不是教授，而是鄉紳之類能把根紮在農村的人」，1908年5月，斯托雷平如是告訴英國俄羅斯研究的開創者伯納德·佩爾斯教授(Bernard Pares)。<sup>23</sup>

斯托雷平說得對，立法要想通過，需要的不只是沙皇與人民之間某種「神秘的統一」。同短命的前任謝爾蓋·維特一樣，他自以為是俄國的俾斯麥。「我絕不支持專制政府，」那位鐵血宰相對德國國會說，「就像我認為議會統治是有害的、是行不通的一樣，我認為議會合作，如果搞得恰當，是必要而且有用的。」<sup>24</sup> 俄國總理也接受議會，但不接受議會制(由議會控制的政府)，而俄國的杜馬同德國的國會一樣，顯然並不是一個力求具有代表性的代議機構。當然，德國的選舉權包容性要強得多：凡25歲以上的德國成年男子都有投票權。此外，由於帝俄第三屆杜馬的產生同1907年6月3日有關，它會一直籠罩在新的政變預言的陰影中，而那些預言成了不穩定的根源。但是在斯托雷平的算計中，為了獲得合法的資源，實現國家的現代化，這一切都是必須付出的代價。

95 同激進的青年斯大林在高加索看到的一樣，斯托雷平在薩拉托夫也看到了不公平現象：工人經常受傷，而且勞動時間長、勞動報酬低；貴族擁有大片的土地，衣衫襤褸的農民耕種的是很小的地塊。作為總理的斯托雷平開始實行影響深遠的社會改革。得益於俾斯麥策略中的第二個要點(仿效左翼的做法)，德國的產業工人不僅可以到有補貼的食堂就餐，還逐漸有了疾病、工傷和養老保險；斯托雷平希望，至少能在工人中間開始實行社會保障制度。<sup>25</sup> 不過，最重要的是，他想鼓勵農民放棄重分型村社，把耕地合並成生產效率更高的單位。

俄國精英往往把農民社會看作是落後的和異類的，一致決心要改變它。<sup>26</sup> (事實上，觀察家會把俄國政府視為一個截然不同的社會，它與整個帝國，尤其是與佔人口絕大多數的農民社會格格不入。)<sup>27</sup> 當俄國的權力集團開始相信農民在變得日益貧困的時候，這種精英觀點出現了變化，主要是經濟上的；少數官員，比如維特，早在擔任財政大臣時就認為「我國農民的貧困狀況」，是制約俄國工業化和地緣政治擴張的主要因素。<sup>28</sup> 斯托雷平更進一步，認為農民是決定政權性質的政治難題。這樣

的分析並非只與俄國有關。在普魯士，1820年代的改革者為了削弱法國革命的影響，曾提出擁有財產的農民是法律、秩序和國家唯一可靠的捍衛者。<sup>29</sup>這也正是斯托雷平的看法。至於農村騷亂，斯托雷平沒有將其歸咎於外界的「革命鼓動家」，而是一針見血地指出，原因在於農村低下的生活水平，並進一步指出，1905至1906年的農民騷亂大多是村社組織的。<sup>30</sup>此外，依照自己在沒有村社的西部邊疆地區的經驗，他得出結論，認為富裕的、個體主義的鄉村是和平的鄉村。因此，由1906年11月9日的法令啟動的土地改革，目的是提高農業生產力，並且在農民中形成一個獨立的有產階級從而消除農民騷亂的基礎，因為農民一旦有了國家的貸款和技術，就可以自食其力。換句話說，斯托雷平想要改變的，既包括農村的外觀——合併農莊，解決村社中分散的條田問題——又包括農村居民的心理。<sup>31</sup>

斯托雷平擔任總理期間，正是全球各國着力擴大國家職能的時候。從法蘭西第三共和國到俄羅斯帝國，各種類型的國家都在為實現其領土和市場的一體化而實施一些雄心勃勃的項目，比如修築運河、公路和鐵路。它們還通過補貼安家費、排乾沼澤、攔河築壩和灌溉農田等措施，鼓勵人們到新的土地上安家落戶。這種由國家主導的改造工程，包括基礎設施建設以及對人口和資源的管理，往往是先在海外領地（殖民地）進行試驗，然後再運用於國內；有時它是先在國內形成，然後再拿到國外或者被認為是帝國邊緣的地方。法治國家在國外的治理，常常採取非法治國家所特有的許多社會工程學實踐，但是在國內，自由主義秩序同威權主義秩序的區別在於，甚麼樣的做法被認為是可以接受的或者說可行的。<sup>32</sup>然而在國家主導的所有社會工程中，突出的問題在於，想要成為「技術官僚」的人很少認識到將（國內或帝國的）臣民轉變成公民的好處，更不用說必要性了。技術官僚們一般認為，「政治」會妨礙有效的行政管理。就此而言，斯托雷平想把農民，至少是「有實力而且頭腦清醒的」農民，按照與其他臣民同等的條件，吸收到社會政治秩序中的做法是激進的。毫無疑問，他是想給財產權賦予更大的意義，而不只是形式上的發言權。不過，這位總理的一個幕僚把他稱為俄國舞台上的「新現象」，想在部分更廣泛的民眾中尋求政治支持。<sup>33</sup>

這場改革其實是一次設計靈活的實驗，融入了先前多年的討論和努力，並為實施過程中的調整留下了餘地。<sup>34</sup> 但不論是剛出現的忠誠的自耕農的政治支持，還是斯托雷平所嚮往的經濟騰飛，結果都很難實現。當然，無論是在哪一種政治體制中，重大的改革都很艱難，因為制度比人們想像的還要複雜。事實證明，俄國農民的村社制度在實踐中要比批評者所認為的更加靈活。<sup>35</sup> 但是，村社在把土地劃分成不相連屬的條田時，需要同村裏的其他人協調一致，這樣就不僅抑制了對土地的投資——因為土地會被收走——也讓個人無法出售、出租、抵押或轉讓土地。村社依靠長期共同積累的資源，確實可以幫助農民在困難時度過難關，因而村社不願意看到任何成員的流失。由於改革，退出村社不再需要村社的正式同意。繁瑣的手續（法院的久拖不決）和緊張的人際關係，使得退出仍舊比較麻煩，但在改革中依然有不少人——歐俄1,300萬農戶中可能有20%——設法脫離了村社。一般來說，這些新的、私有的小土地所有者仍然只能繼續採取村社式的條田耕作方式。<sup>36</sup>（一戶人家的土地有時要分割成四五十塊條田。）除了其他因素，缺少土地測量員也意味着許多私有化了的農民，並不總是能夠把土地合併起來。<sup>37</sup> 最希望單幹的農民往往偷偷跑到西伯利亞，因為改革加強了對財產權的保護，極大地刺激了尋找新土地的移民活動，可那樣一來也降低了他們所離開的農莊的生產率。<sup>38</sup> 土地問題的複雜性讓人一籌莫展。但是在私有農莊甚至非私有農莊被合併起來的地方——合併是斯托雷平經濟改革的關鍵目標——生產率有了大幅度的提高。<sup>39</sup>

然而斯托雷平在經濟等領域的改革，到頭來碰到了政治為結構性改革設置的難以克服的障礙。斯托雷平只好在杜馬休會期間，利用基本法第87條緊急條款，啟動了大膽的農業改造計劃，結果招致擁有地產的權力集團強烈抵制。他們和其他人一起，阻撓斯托雷平為實現現代化而做出的努力。<sup>40</sup>

俄國總理不僅試圖改變農民的土地和信貸關係，建立工人工傷疾病保險制度，還想把地方自治的範圍擴大到信奉天主教的帝國西部地區，取消對猶太人的司法限制，擴大民事和宗教權利，並在大體上形成一個可以正常運轉的中央政府和常規的政治體。<sup>41</sup> 但他的政府發現，在法案

表決時，必須給許多當選的保守派杜馬代表行賄。就這樣，斯托雷平的關鍵立法還是無法通過。只有土地改革和免了水的工人保險變成了法律條文。保守派限制了斯托雷平騰挪的空間。他在一定程度上是自作自受：他絞殺了1905至1906年的革命，並在第二年把許多自由主義者和社會主義者趕出了杜馬，從而在準議會和沙皇任命的政府之間建立了可行的工作關係，但是，緊急狀態已經成為過去。在更深的層面上，他是判斷失誤。按照斯托雷平1907年6月新的選舉資格規定，從其改革綱領中獲益最多的社會集團，要麼被排除在杜馬之外，要麼在杜馬中人數大大少於損失最大的傳統利益集團，即土地貴族，但斯托雷平的選舉改革已成定局。<sup>42</sup> 換句話說，最認可專制制度的政治利益集團，最不認可為了實現現代化所作的改革。

### 原始的俄國法西斯主義

俄國的君主專制在培育政治基礎方面困難重重，這一點並不明顯。社會民主黨人的數量從1904年的區區3,250人猛增到1907年的大約8萬人，這當然屬於跳躍式的增長，但相對來說算不了甚麼。社會民主黨在講烏克蘭語的人口當中，尤其是在農民當中，幾乎無所作為，烏克蘭文的出版物近乎為零。在後來的烏克蘭領土上，該黨只有1,000名黨員。<sup>43</sup> 左翼的崩得，大部分成員不是來自帝國的西南（烏克蘭），而是西北（白俄羅斯和沙皇治下的波蘭）。儘管如此，即便算上崩得——大部分俄國社會民主黨人都不想同它建立緊密的聯繫——算上帝國中自成一體的波蘭和拉脫維亞相當於社會民主黨的各個政黨，以及半獨立的格魯吉亞社會民主黨，帝俄社會民主黨人的數量加起來可能不超過15萬人。<sup>44</sup> 相比之下，信奉古典自由主義（擁護私有財產、擁護議會）、據說在俄國根本沒有現實的社會基礎的立憲民主黨人，數量上升到12萬左右，而另一個主張立憲的政黨——比立憲民主黨偏右一點的十月黨，吸收了二萬五千多名黨員。<sup>45</sup> 代表農業無產階級利益的社會革命黨，1905至1907年沒能得到農民的有力支持，反倒吸引了城市工人，擁有至少5萬名正式黨員。<sup>46</sup> 但是同1905年11月成立的俄羅斯人民同盟相比，它們

都算不了甚麼。俄羅斯人民同盟是君主制的忠實擁護者並且信奉民族沙文主義；它在天使長米哈伊爾馬術場舉行集會，並由唱詩班歌唱《讚美上帝》和《神聖的沙皇》；到1906年，其成員已經發展到大約30萬人，其分支組織遍佈帝國各地，包括小城市和農村。<sup>47</sup>

99 革命暴動期間——自由主義的立憲主義在暴動中被推到前沿——當整個帝國都在渴望社會主義的時候，反自由主義的俄羅斯人民同盟的崛起成了一件引人注目的事情。到1905年為止，自命的愛國者在公開表達觀點時仍然受到法律的限制，因而只能滿足於宗教遊行時唱的讚美詩、紀念軍隊和勝利的儀式、皇家葬禮以及加冕典禮。此外，在革命之年，保守派大多自慚形穢，不願進入，更不用說掌控政治競技場。但俄羅斯人民同盟不同。<sup>48</sup> 作為俄國諸多聲名鵲起的右翼組織中最突出的一個，同盟把廷臣、專業人士以及教會人士——包括許多來自青年斯大林從前就讀的梯弗利斯神學院的人——和城市居民、工人以及農民聯合起來。除了愛國者，同盟還吸收了不滿分子和無所適從的人，並設法搶在左翼力量之前，在社會底層和中間階層大肆宣揚「為了沙皇、信仰和祖國」。<sup>49</sup> 被杜馬和國務會議中當權的右翼反對派弄得進退兩難的沙皇政權，似乎可以選擇發動草根階層。

俄羅斯人民同盟催生了新式的右翼政治。之所以說新式，不僅是對俄國而言，對世界上大部分國家也是如此。這種政治有一個新的基調，即指向大眾，指向公共空間，指向直接行動，它是原始的法西斯主義。<sup>50</sup> 同盟的成員和領導人，例如比薩拉比亞鄉村神父的孫子弗拉基米爾·普利什凱維奇 (Vladimir Purishkevich) ——他喜歡宣稱，「在我的右邊只有牆」——是反自由主義、反資本主義和反猶太人的（在他們眼中，這三者都是多餘的）。<sup>51</sup> 他們強調俄羅斯歷史道路的獨特性，拒絕模仿歐洲，宣揚要把東正教擺到對猶太人和天主教徒（波蘭人）至高無上的位置，要求「恢復」俄羅斯的傳統。同盟鄙視俄國政府畏首畏尾、一心只考慮自身的安全，他們將此視為缺乏鎮壓自由派（和社會主義者）的意志。同盟也憎惡努力走向現代化的國家，認為那無異於社會主義革命。同盟成員認為，必須由專制君主獨自統治，而不是讓官僚來統治，更不用說杜馬。同盟成員和被稱為黑色百人團的右翼組織成員存

在交集。黑色百人團因為迫害猶太人定居區的猶太人以及同帝國軍隊聯手鎮壓叛亂的農民和工人而臭名遠揚。俄國形形色色的右翼分子，起初發展緩慢，之後動員到令人吃驚的程度，到處散發小冊子和報紙，打着捍衛君主專制、正教和民族性，反對猶太人和歐洲文化入侵（比如說西方憲政）的名義組織集會。

面對右翼勢力的迅速發展，帝國中的社會主義者並沒有退縮。在左翼勢力反示威的威脅下，俄羅斯人民同盟往往只能在室內集會而且要派人查票，以防左翼恐怖分子混入，將裏面的人炸成碎片。左翼分子從卡爾·馬克思及其「歌中之歌」《共產黨宣言》（1848）中汲取了相當多的力量和凝聚力。但俄國右翼分子擁有真正的《聖經》經文和本應是真正爆炸性的材料——俄國一家右翼報紙向世人披露了所謂《錫安長老會紀要》。這份編造的、關於某個傳說中的猶太人組織的會議紀要，說猶太人正在策劃一個全球性的陰謀，一個明顯但不知何故未遭發覺的陰謀，那就是主宰世界，消滅基督徒。<sup>52</sup> 它最初是用俄文以連載的方式分九天（從1903年8月28日到9月7日）刊登在《旗幟報》（聖彼得堡）上，為該報提供經費的是內務大臣維亞切斯拉夫·馮·普列韋（Vyacheslav von Plehve），發行人是反猶分子、摩爾達維亞人帕瓦拉奇·克魯舍維阿努（Pavalachii Crușevanu，生於1860年），人稱帕維爾·克魯舍萬（Pavel Krushevan），他不僅在1902至1903年負責文本的編纂，還煽動了1903年基希涅夫（基希訥烏）的反猶事件，並在1905年成立了俄羅斯人民同盟比薩拉比亞支部。<sup>53</sup> 反猶主義，不管是真心實意還是譏諷嘲諷，反正是政治上的靈丹妙藥：不管甚麼事情，只要出了問題，都可以推到猶太人頭上，而且過去就是這麼幹的。在猶太人定居區和西部邊疆區（沃里尼亞、比薩拉比亞、明斯克），右翼分子差不多得到了農民的全部選票，而在中部的農業中心地區（圖拉、庫爾斯克和奧廖爾）——那裏是農村騷亂比較嚴重的地方——右翼分子贏得了大約一半的農民選票。<sup>54</sup> 實際上，對右翼政治勢力的同情，在廣大的帝俄各地都被激發出來。<sup>55</sup>

正如君主專制從一開始就拒絕使用「憲法」（甚至「議會」）一詞，俄羅斯人民「同盟」也不想被稱為「政黨」，而是把自己說成自發的運動，



是人民或老百姓 (*narod*) 的有機統一。即使這樣，聖彼得堡的政府高官還是不願長期接受這一運動。斯托雷平把暗中資助右翼組織及其反猶出版物——他的政府為許多報紙提供經費——當作權宜之計，但是在1906至1911年擔任斯托雷平內務部副手，負責給俄羅斯人民同盟之類的組織付款的謝爾蓋·克雷扎諾夫斯基，卻認為極右勢力的政治技巧和劫富濟貧的社會綱領，同左翼的各個革命政黨毫無區別。<sup>56</sup> 政府既沒有創建這些群眾團體，對它們也不放心。極右勢力對於社會公平的呼籲，哪怕大多屬於虛張聲勢，仍會令保安處將其視為又一個革命運動。保安處內部有些派系不理會這一政策，或者反其道而行之。但保安處特工基本上都認為，極右勢力的領袖「沒有文化」、「靠不住」，有必要對他們進行嚴密的監視。同激進的左翼政黨一樣，俄羅斯人民同盟也開列了對現任和前任政府官員的暗殺名單。<sup>57</sup> 斯托雷平是他們的目標之一。<sup>58</sup> 他有個在國內問題上很有影響的高級幕僚，從前是拉比，後來皈依了正教，是個反猶分子，但這位總理基於原則和策略上的考慮，想在居住、就業和教育方面適當放鬆對猶太人的限制，儘量不給猶太激進主義留下口實，而且還可以改善俄國的國際形象。<sup>59</sup> 斯托雷平終於觸怒了右翼的強硬派。

與俄羅斯人民同盟不一樣，許多右翼團體並沒有明顯的暴力傾向和太過露骨的煽動性言論，也沒有把自發維持治安的「兄弟會」武裝起來，去和左翼分子以及猶太人戰鬥，去刺殺公眾人物。但尼古拉二世和整個政權的其他人，對於支持者的大型公共集會心懷疑慮。沙皇和包括斯托雷平在內的大部分政府官員，對於政治動員中的公眾「缺乏秩序」的現象感到不滿，想讓政治從街頭回到權力的走廊。儘管支持現政權的保守派團體想要的不是右翼革命，而主要是復辟杜馬出現前的古老的專制制度，但拒斥街頭政治的態度沒有變。<sup>60</sup> 同樣重要的是，許多右翼組織本身即便得到允許甚至鼓勵，也不會願意代表政權去動員社會中的愛國選民：不管怎樣，哪種專制制度需要幫助呢？從某種意義上說，正是專制制度的存在本身，束縛了俄國不論是溫和的還是激進的右翼組織的手腳。<sup>61</sup>

大部分右翼分子都想要一種不帶星號\*的君主專制——也就是說，君主和百姓達成一種神秘的統一——因此，他們反對任何超出諮詢性質的杜馬以外的東西，但成立杜馬的恰恰是專制君主本人。這引起了右翼分子的困惑和分化。幾乎所有的右翼分子都認為，君主專制的存在本身就排除了反對的可能性，當然也排除了他們自己反對的可能性。「在西方，政府是選舉的產物，『反對』的概念是有意義的；在那裏，它是指『反對政府』；這是顯而易見而且合乎邏輯的，」彼得堡一家叫做《統一》的右翼週刊的編輯解釋說，「但是在這裏，政府是君主任命的，是得到他信任的……反對帝國政府就是反對君主。」<sup>62</sup>不過，許多右翼分子之所以鄙視斯托雷平，不過是因為他願意同杜馬搞好關係，儘管那是法律的要求，而且總理能夠操縱杜馬也是政府的勝利。對包括尼古拉二世在內的一些人來說，哪怕是總理的存在本身也是對君主專制的侮辱。<sup>63</sup>1906年8月，幾名穿着國家制服的刺客，在斯托雷平接待請願人員的國家別墅放置了炸彈，差點兒把他炸死。「到處是人體的碎片和血跡」，有目擊者在回憶這起造成27人當場死亡的事件時說。另一位目擊者注意到，斯托雷平「走進他被炸掉一半的書房，外套上沾滿灰泥，後脖子上還有墨漬。他的寫字檯檯面已經在爆炸中被掀掉，爆炸發生在大廳，距離書房大約30英尺†，結果墨水檯砸到了他的脖子」。幾個月後，在前總理維特的家裏也發現了一枚定時炸彈，儘管它沒能爆炸（計時鐘停了）。針對兩位擁護君主專制的保守派總理的兩次行動都沒有偵破；間接的證據表明，它們有可能與一些右翼小組有關。<sup>64</sup>

102

在這起未遂的暗殺事件中，斯托雷平的沉着果斷讓他名聲大噪，但他不得不把家搬進冬宮（靠近他的官署），感覺那裏要比豐坦卡運河畔的總理官邸安全。不過，警察機關要求這位俄國總理不斷改變進出路線。連進出冬宮都不安全了！許多心懷不滿的右翼分子希望，至少用杜爾諾沃或別的強硬人物來取代斯托雷平，以削弱或乾脆取消杜馬。與此同時，其他頑固的君主派——他們在原則上同樣反對選舉和政黨

---

\* 編註：星號指代潛在的信息、隱藏的意義。

† 編註：約9.1米。

——則組織起來，參加他們拒絕過的競選，希望杜馬不要被「反對派」利用（他們把自由主義者和社會主義者混為一談）。但接受杜馬的右翼分子成了其餘右翼分子的眼中釘。現代的街頭政治讓俄國的右翼勢力出現了分裂。<sup>65</sup> 注重議會參與的政治與注重暗殺的政治之間的鴻溝，根本沒有彌合。<sup>66</sup>

### 時評家

103 起初在受到杜爾諾沃的殘酷打擊時，派系林立的社會民主黨人曾試圖團結起來，一致對外。第一屆杜馬開幕前兩週，1906年4月10日至25日，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在「統一」的口號下，召開了第四次代表大會。為了讓流亡者參加，大會是在斯德哥爾摩這個境外的安全地點召開的。大會至少在表面上把不久前分裂的孟什維克派（62名代表）和布爾什維克派（46名代表），還有拉脫維亞和波蘭的社會民主黨以及崩得這些獨立的政黨重新團結起來。<sup>67</sup> 高加索社會民主黨——帝國中人數第二多的代表團，僅次於俄國社會民主黨——差不多已經統一了，因為高加索的布爾什維克人數很少。<sup>68</sup> 但政策層面的統一其實很難做到。斯德哥爾摩的11名高加索代表，只有朱加施維里是布爾什維克，可是在傷腦筋的土地問題上，他的大會發言竟然反對布爾什維克派的列寧提出的土地完全國有以及一位俄國孟什維克主張的土地市有。這位日後會推行農業集體化的人推薦的方案是，耕者有其田。朱加施維里認為，土地的重新分配有利於工農聯盟——這其實是他的格魯吉亞孟什維克對手的觀點。朱加施維里還認為，把土地分給農民，會奪取社會民主黨的左翼競爭對手、代表農民利益的社會革命黨的社會基礎——這是在重複另一位發言者的看法。<sup>69</sup> 這些建議給第四次代表大會留下甚麼印象，現在還不清楚。<sup>70</sup> 在以農民為主的俄羅斯帝國，把土地重新分配給農民這個決定性的議題，在俄國社會民主黨中暫時還沒有結果。

當務之急是黨的生存問題。1905年，孟什維克派和布爾什維克派在要想自衛就必須成立戰鬥隊的問題上意見是統一的：不管怎麼樣，不義的沙皇政府採取了恐怖手段。兩派還一致認為，為了獲得武器和黨

的活動經費，必須搞一些「剝奪」，而這往往需要結交地下犯罪勢力。<sup>71</sup> 結果就是，俄羅斯帝國在變成準憲政秩序之後，政治恐怖主義反倒越演越烈。

直到這時候，帝俄的警察數量仍然很少。城市裏很少見到警察的影子，而在城市之外，1900年，俄國近1億農村人口，只有不到8,500名警官和警佐 (*uriadniki*)。許多警官(在少數警佐的協助下)要在一千多平方英里的範圍內，「監督」5萬到10萬臣民。1903年，國家設立了警衛 (*strazhniki*) 的職務，約有4萬人部署在農村，此舉只是讓農村地區的警民比例變成了大約每2,600名居民有1名警察。薪水提高了，但仍然比較低，教育和訓練水平也是如此。粗暴、跋扈，再加上受賄，讓警察很不得人心。警察經常引發刑事案件或隨便抓人，並按照他們所謂的「拳頭法律」，加以肉體的虐待。農民出身的警佐，自以為大權在握，對待村民就像小暴君一樣。他們信奉的理論是，自己表現得越狠，就越有權威。<sup>72</sup>

104

1905年開始的大規模叛亂，促使警察機關大幅增員。但是在1905至1910年，小到鄉村警察，大到政府大臣，被恐怖分子和革命者打死打傷的沙皇官員超過1.6萬人(其中許多是被孟什維克的刺客打死打傷的)。<sup>73</sup> 還有無數的馬車夫和鐵路員工，即無產者，也一同丟了性命。警察機關的一位高級官員抱怨說，製造炸彈的詳細辦法「到處都知道，實際上，就連小孩都可以造出炸彈，炸死他的保姆」。<sup>74</sup>

左翼分子的政治恐怖讓整個沙皇官場心驚膽顫，但政權也進行了野蠻的報復。<sup>75</sup> 斯托雷平「扼住了革命的咽喉」。他的政府把幾萬人變成苦役或者流放國內。政府還開始設立特別臨時法庭，用從簡從速的審判，把三千多名受到指控的政治對手送上絞刑架，公開處死，以儆效尤，這種震懾人心的手段也被稱為「斯托雷平領帶」。<sup>76</sup> 對於官員到處遭到暗殺，沒有哪個政權會輕易放過，但法庭並未採用多少正當的程序。不過人們總算是明白了。說斯托雷平是俄國「頭號劊子手」的列寧等著名的革命家都逃走了，只是在1905年形勢(短暫)寬鬆的時候返回過俄國。<sup>77</sup> 從1905年開始，這些想要成為革命家的人又加入到居住在歐洲各地俄國人聚居區的大約1萬名僑民當中。流亡的左翼分子處在俄國駐

巴黎大使館下屬的保安處國外部的40名特工和25名線人的監視下。保安處國外部積累了大量的文件證據，記錄了流亡者所做的往往是微不足道的努力。<sup>78</sup>

柯巴·朱加施維里屬於那種不想逃往國外的忠誠的社會主義者。在斯德哥爾摩，他遇到了終生的朋友克利門特·「克利姆」·伏羅希洛夫(Klimenty "Klim" Voroshilov)，還有出身波蘭貴族的布爾什維克費利克斯·捷爾任斯基(Felix Dzierżyński)、俄國的布爾什維克格里戈里·拉多梅斯利斯基(Grigory Radomylsky，人們更熟悉的稱呼是「季諾維也夫」(Zinoviev))。朱加施維里也遇到了他在梯弗利斯神學院的老對手賽義德·傑夫達里安尼，他現在是格魯吉亞的孟什維克。1906年春天，朱加施維里從斯德哥爾摩返回高加索。他身着西服，戴了一頂派頭十足的帽子，捏着煙斗，就像歐洲人。只有抽煙斗的習慣後來保留下來。

105 回到高加索後，朱加施維里在一本格魯吉亞文的小冊子(1906)中報道斯德哥爾摩大會的情況時，對俄國有史以來的第一個立法機關不屑一顧。「誰若腳踏兩隻船，誰就是出賣革命，」他寫道，「誰不和我們一道，誰就是反對我們！可鄙的杜馬和它那些可鄙的立憲民主黨人正是腳踏兩隻船。它想調和革命和反革命，想把狼和羊豢養在一起。」<sup>79</sup>

朱加施維里還結了婚。<sup>80</sup>葉卡捷琳娜·「卡托」·斯瓦尼澤(Ketevan "Kato" Svanidze)，當時26歲，在梯弗利斯斯瓦尼澤三姐妹中年齡最小。朱加施維里與她相識，要麼是通過斯瓦尼澤夫婦的兒子、同是布爾什維克的阿廖沙(Alyosha，他娶了梯弗利斯的一名歌劇歌唱家)，要麼是通過神學院的老朋友米哈伊爾·莫諾謝利澤(Mikheil Monoselidze)，他娶了斯瓦尼澤姐妹中的另外一個——薩希科(Sashiko)。<sup>81</sup>斯瓦尼澤家在市中心，就在南高加索軍區司令部後面，被認為是革命者的非常安全的庇護所，因為沒人會懷疑那裏。在這個藏身的地方，邇裏邇邊的朱加施維里寫文章，和斯瓦尼澤姐妹談論書籍和革命中的趣事，無所顧忌地接待革命小組的成員。證據顯示，柯巴和卡托還在「埃爾維厄夫人工作室」

---

\* 譯註：《斯大林全集》第1卷，第232頁。

幽會——那是她們姐妹開的時裝店，因為她們全都是非常能幹的裁縫。1906年夏天的某個時候，卡托告訴他說她懷孕了。他答應娶她。可朱加施維里的證件是假的，而且還受到警方的通緝，要想締結合法的婚姻比較困難。幸運的是，他們碰到一個從前在神學院時的同學基塔·特希恩瓦列利(Kita Tkhinvaleli)，現在是神父，他答應在夜深人靜的時候(1906年7月16日凌晨2時)為他們主持儀式。在有十個人參加的「婚宴」上，新郎展示了他的歌喉和風采，主婚人(*tamada*)這一光榮的角色交給了米霍·茨哈卡雅，他從前也是梯弗利斯神學院的學生，現在是布爾什維克當中的資深政治家(當時39歲)。朱加施維里好像沒有邀請自己的母親凱可，儘管人們不太可能注意不到這個上了年紀的女人和年輕的新娘一樣名喚葉卡捷琳娜。<sup>82</sup>實際上，卡托跟凱可一樣虔誠，祈禱朱加施維里平安無事，但和凱可不一樣的是，卡托端莊嫻靜。

美麗而且受過良好教育的卡托，一個遠離奇阿圖拉錳礦礦塵的世界，要比未來的斯大林的幾個尋常女友高出一個等級，而斯大林對她也顯然十分傾心。<sup>83</sup>「我很奇怪，」米哈伊爾·莫諾謝利澤說，「索索對待工作和同志怎麼那麼嚴肅，對待妻子卻那麼溫柔、深情和體貼。」<sup>84</sup>但這種不得已締結的婚姻並未改變他對革命的執着。1906年夏天，幾乎是在剛剛偷偷舉行過婚禮之後，他就把有孕在身的妻子丟在梯弗利斯，動身去做地下工作。為防萬一，她沒有按照法律的要求，在自己的國內通行證上註明已婚。不過，憲兵隊不知怎的得到了消息，他們逮捕了卡托，罪名是窩藏革命黨。她當時已有四個月的身孕。姐妹們為一名高級警官製作過長袍，她的姐姐薩希科就找這位警官的妻子求情，設法把關了一個半月的卡托放了出來，交給警察局長的妻子監護。(斯瓦尼澤姐妹也為她製作裙服。)1907年3月18日，大約結婚八個月後，卡托產下一子。也許是為了紀念朱加施維里的代理父親雅科夫·「柯巴」·葉格納塔什維利，他們給小孩取名為雅科夫。據說未來的斯大林欣喜若狂。但他仍然很少回家。他跟別的革命者一樣，至少是跟那些還沒有被抓起來的革命者一樣，不停地東奔西跑，居無定所，並同左翼的對手作鬥爭。格魯吉亞的孟什維克控制了高加索的大部分革命刊物，但他開始成為發行量很小的布爾什維克出版物的頂樑柱，成了布爾

什維克一份接一份的格魯吉亞文報紙的編輯。就在雅科夫出生前，朱加施維里同蘇倫·斯潘達良(Suren Spandaryan，生於1882年)等人一起創辦了《巴庫無產者報》。他在時評方面找到了自己的事業。

不過，斯托雷平的凌厲攻勢——逮捕、處決和驅逐——讓革命運動受到嚴重的破壞。左翼分子近幾年來沒能組織起展示無產階級力量的「五一大遊行」，只能滿足於為眾多被捕同志的家人籌集一些錢和為過早離世的同志舉行「紅色葬禮」。格里戈里·捷里亞(Giorgi Teliya，1880-1907)是在鬥爭中失去的一位同志。捷里亞出生於格魯吉亞農村，在鄉村學校讀過幾年書，之後在1894年14歲時去了梯弗利斯，在鐵路上幹活，不到20歲就幫助組織了1898年和1900年的罷工。他先是被解僱，繼而被逮捕。同朱加施維里一樣，捷里亞也有肺病，但事實上他的肺病要嚴重得多：由於在沙皇監獄裏染上了肺結核，1907年不治身亡。<sup>85</sup>「捷里亞同志並不是甚麼『學者』」，在捷里亞老家舉行的葬禮上，未來的斯大林說，但他上過梯弗利斯鐵路工廠這所「學校」，學會了俄語，養成了愛讀書的習慣，是受人敬重的工人知識分子的典範。<sup>86</sup>「無窮的精力、獨立的精神、對事業的熱愛、英勇不屈的氣概、宣傳者的天賦」，對於業已殉難的朋友，朱加施維里說道。<sup>87</sup>他還透露，捷里亞寫過一篇重要的文章，叫做〈無政府主義和社會民主主義〉，它沒有發表，  
107 可能是被警方沒收了。格魯吉亞無政府主義者出現於1905年底到1906年初，他們是派系林立的左翼面臨的又一挑戰，至於如何應對，當時有過廣泛的討論。<sup>88</sup>從1906年6月到1907年1月，朱加施維里用了一個幾乎和捷里亞一樣的標題——〈無政府主義還是社會主義？〉——自己發表了幾篇文章，刊登在幾份同樣是格魯吉亞文的報紙上。

〈無政府主義還是社會主義？〉的水平根本無法和〈共產黨宣言〉(1848)或〈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1852)相提並論，後兩篇文章是卡爾·馬克思(生於1818年)這位時評家在差不多同樣年輕的時候寫的。但朱加施維里的幾篇了無新意的反對無政府主義的文章提到了許

\* 譯註：《斯大林全集》第2卷，第29、32頁。

多人的名字：除了馬克思，還有克魯泡特金、考茨基、蒲魯東和斯賓塞、達爾文和居維葉。<sup>89</sup> 它還表明，他在馬克思主義中找到了一切問題的答案。「馬克思主義不只是社會主義的理論，而且是一個完整的世界觀，是一個哲學體系，」他寫道，「這個哲學體系叫做辯證唯物主義。」<sup>90</sup> 「甚麼是唯物主義理論呢？」他用他日後有名的教義問答的風格問道。「舉一個簡單的例子來說，」他寫道，「假定有一個鞋匠開了一個小鞋舖，因為競爭不過大廠主，結果只好關門，到梯弗里斯皮鞋工廠老闆阿德里漢諾夫那裏當僱傭工人去。」這名鞋匠的目標是，朱加施維里繼續說道——他沒有提到自己父親貝索的名字——積攢一些本錢，再開自己的鞋舖。但是最終，這位有着「小資產階級」意識的鞋匠認識到他實際上是個無產者，永遠也無法攢夠資本。「鞋匠的意識，」朱加施維里得出的結論是，「終於隨着他的物質地位的變化而變化了。」<sup>91</sup> 因此，為了解釋馬克思的唯物主義概念（社會存在決定意識），未來的斯大林把自己的父親說成是一些歷史力量的犧牲品。聯繫到實際情況，他寫道：「無產者日夜工作，卻依舊貧窮。資本家不從事勞動，卻總是富有。」為甚麼呢？是因為勞動力成了商品，資本家掌握了生產資料。最終，朱加施維里斷言，工人會取得勝利。但他們必須奮勇戰鬥——罷工、抵制、怠工——為此，他們就需要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和實行「無產階級專政」。<sup>92\*</sup>

在這裏，我們對未來的斯大林有了更充分的瞭解：充滿鬥志；自信真理在握；能用通俗易懂的方式表達世界觀和實際的政治主張。他的觀念世界——馬克思的唯物主義和列寧的政黨理論——就像教義問答一樣缺乏新意，但卻有很強的邏輯性。

就在系列文章發表後，朱加施維里偷偷地越過邊境，參加了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第五次代表大會。大會於1907年4月30日至5月19日在倫敦城北的兄弟會教堂舉行。出席大會的重要人物的住宿安排在布盧姆斯伯里，但朱加施維里和大多數代表一起住在倫敦東區。一天夜裏他

\* 譯註：《斯大林全集》第1卷，第271-337頁。



喝醉了，在酒館跟一個喝醉的英國人發生了衝突，結果店主報警。多虧了會說英語而且十分機智的布爾什維克、人稱馬克西姆·李維諾夫 (Maxim Litvinov) 的梅厄·哈諾赫·莫伊謝維奇·瓦拉赫 (Meir Henoch Mojszewicz Wallach) 的求情，朱加施維里才沒有被捕。在世界帝國主義的首都，未來的斯大林還遇到了列夫·勃朗施坦 (Lev Bronstein，又名「托洛茨基」)，1905年彼得格勒\*蘇維埃風頭十足的前主席，但兩人彼此留下了甚麼印象，現在還不清楚。斯大林沒有上台發言；托洛茨基即便與孟什維克也是若即若離。<sup>93</sup>

據饒爾丹尼亞說，列寧當時正在進行一項秘密計劃：如果在黨內俄羅斯人裏布爾什維克和孟什維克的爭端中，格魯吉亞的孟什維克保持中立，列寧就讓高加索的布爾什維克作出讓步，讓格魯吉亞的孟什維克有在家鄉便宜行事的權力。沒有任何其他證據可以證明，列寧會出賣為了高加索的布爾什維主義事業付出了那麼多血汗的朱加施維里。<sup>94</sup> 列寧經常提議或達成一些他根本不打算兌現的交易。在這裏，不管怎麼說，饒爾丹尼亞後來流放時總想離間列寧和斯大林的關係。現在我們可以確定的是，當大會因為朱加施維里和其他幾個未經正式選舉產生的代表而爭吵起來的時候，吵鬧聲激怒了俄國孟什維克派的馬爾托夫，他大聲呵斥道：「這些人是誰？他們是哪來的？」——主持會議的列寧巧妙地讓朱加施維里等人成了「諮詢性質的」代表。

## 地緣政治定位

除了其他問題，斯托雷平還必須儘量不讓俄國的對外關係出現麻煩。當時的俄英關係特別緊張，而英國是一個全球性的大國，實力超群。英國人把他們國家財富的四分之一投資在海外，比如說為鐵路、港口、採礦等所有能想到的項目提供建設資金，而且全都在歐洲以外。實際上，就在美國和德國的製造業在許多領域超過英國人的時候，英

---

\* 編註：即聖彼得堡，1914年改名彼得格勒，1924年列寧去世後改名列寧格勒。但無論在歷史文獻裏還是在本書的表述中，都有混用的情況。

國人在世界的貿易流、資金流和信息流中，依然佔據主導地位。在海上，蒸汽貨船的噸位從1850年的200噸猛增到1900年的7,500噸，而英國人控制着全世界超過一半的海運業務。1900年代初，世界上有三分之二的海底電纜是英國人的，這讓他們在全球通訊中佔據了主導地位。國際上十分之九的交易都使用英鎊。<sup>95</sup> 與英國保持一致似乎非常符合俄國的利益，前提是那樣不會引起德國的敵意。

受1905至1906年敗給日本的影響，俄國國內曾就所謂的對外關係定位問題(我們將其稱為大戰略)有過激烈的爭論。聖彼得堡早在1892年就同法蘭西第三共和國結為防禦同盟，但巴黎並沒有為俄國在亞洲的戰爭提供幫助。反倒是德國，在俄日戰爭的困難時期與人為善，向俄國承諾保持中立，而且德國的盟友奧匈帝國也沒有在東南歐乘人之危。保守主義的再定位空間已然打開：脫離民主法國，轉向以「君主制原則」為基礎的同盟，而這就意味着俄國與德國以及奧匈帝國的結盟，類似於從前俾斯麥的三帝同盟。但俄國立憲民主黨反對。作為親英派，他們想要保持與實行共和制的法國的同盟，同時與奉行自由主義的英國恢復友好關係，從而鞏固俄國杜馬在國內的地位。<sup>96</sup> 1907年8月，也就是在斯托雷平的憲制政變、對杜馬選舉設置更為嚴格的限制條件兩個月後，他選擇了簽訂英俄協約。<sup>97</sup> 斯托雷平一定程度上屬於親德派，對英式的君主立憲沒有好感，但是在對外政策上，他的死敵立憲民主黨之所以得償所願，是因為與英國恢復友好關係似乎是確保俄國外部和平的最佳選擇，儘管在斯托雷平的心目中，並沒有排除與德國建立友好關係的可能性。<sup>98</sup> 這樣做非常合乎邏輯。而且1907年的英俄協約內容有限，主要是劃分在伊朗和阿富汗的勢力範圍。<sup>99</sup> 但是，由於同德國沒有一個類似的、哪怕是象徵性的條約，1907年不太起眼的英俄協約就顯示出了傾向性。

實際上，尼古拉二世和德國簽過一個條約：1905年夏天，頗有心計的威廉二世在一年一度的波羅的海巡遊期間，於7月6日(西曆7月19日)邀請尼古拉二世舉行秘密會晤，尼古拉欣然同意。德皇的目的是要建立一個以德國為中心的大陸集團。「誰都不知道[這次]會晤，」威廉二世在電報中用他們的通用語——英語——說道，「當我的客人們看到你的遊艇時，他們會感到非常榮幸。維利……好一隻漂亮的雲雀。」<sup>100</sup>

7月23日星期天的晚上，他在(維堡附近)俄屬芬蘭海岸挨着尼古拉二世的遊艇下了錨。第二天，德皇起草了一份有關共同防禦的簡短秘密協定，規定德俄雙方在其中的任何一方與第三國開戰時要互相支援。尼古拉清楚，與德國的這份條約違反了俄國與法國的條約，因而強烈要求威廉把它先拿給巴黎方面看一看，但德皇拒絕了。不管怎麼說，尼古拉二世簽署了這份比約克條約——按照它當時的稱呼。俄國外交大臣和謝爾蓋·維特(剛從新罕布什爾州的樸茨茅斯回國)非常震驚，堅持要求只有法國也在上面簽字，條約才能生效。尼古拉二世作了讓步，在維特起草的11月13日(西曆11月26日)給威廉二世的信上簽了字。信的大意是，在俄、德、法同盟建立之前，俄國會恪守它對法國的承諾。威廉二世大怒。德俄同盟不了了之。<sup>101</sup>

此次慘敗無意中突出了俄國與英國簽訂協約的重要性，因為與英國的協約似乎意味着一種牢固的地緣政治定位，相應地，也意味着保守派和親德派的失敗。而且由於英法已經訂有協約，俄英條約實際上就形成了一個三國協約，現在只要發生戰爭，三國中任何一個國家都有「義務」幫助其他兩個國家。由於德國領導的與奧匈帝國還有意大利的三國同盟的存在，英、法、俄之間的協定給人的印象更像是一個同盟，而不僅僅是協約。事態的發展進一步強化了這種感覺，即它們是兩個敵對的同盟。1908年，奧匈帝國從奧斯曼帝國手中吞併了斯拉夫人的省份波斯尼亞和黑塞哥維那。雖然從1878年開始，奧地利就一直佔領着波斯尼亞和黑塞哥維那，但義憤填膺的俄國右翼分子仍指責俄國未能對此次正式吞併作出有力的回應，說那是俄國「外交的對馬之戰」(類似於俄國波羅的海艦隊被日本擊沉的恥辱)。<sup>102</sup>有些右翼分子指控斯托雷平放棄了俄國在世界上的所謂「歷史使命」，但斯托雷平有一次在俄國官員的會議上表示，「國內形勢不允許我們採取積極的對外政策」，而且他態度堅決。<sup>103</sup>不過，考慮到英德之間的對抗以及歐洲兩個對立的聯盟體系，俄國加入三國協約還是有風險的，那些風險是由它無法控制的國際事態的發展造成的。

在亞洲，俄國依舊孤立無援，無法阻止日本可能進一步採取的侵略行動。1902年簽訂並在1905年擴大了範圍的英日同盟，後來在1911年

又再次續約。<sup>104</sup> 太平洋上的兩個海上強國雖然互相防備，但還是走到一起。這一方面是因為英國人和日本人都認為必須遏制俄國在亞洲——中亞以及滿洲——擴張，另一方面也是因為英國人覺得，他們的皇家海軍要保衛全球性的帝國有點勉為其難。於是，當日本人承諾不支持英屬印度的本土民族主義分子時，英國同意日本把朝鮮變成它的保護國，或者說殖民地。俄日戰爭期間，日本帝國的陸軍不但佔領了與俄國接壤的朝鮮，還遠遠地向北推進到長春，佔領了南滿（中國的幾個省）。在樸茨茅斯條約的談判中，美國起到了一定程度的遏制作用，但日本依然把俄國擠出了南滿，得到了（擁有亞瑟港的）遼東地區——那裏被日本人更名為「關東租借地」，控制了進入北京的通道。日本還接管了由俄國人修築的長春至亞瑟港段的中東鐵路，將其更名為「南滿鐵路」。日本在關東租借地和南滿鐵路沿線的平民人口迅速增加，到1910年已經超過6萬人。正如預料的那樣，因為要「保衛」國民、鐵路路權以及大量的經濟特許權，日本開始駐軍，並很快組建了一支特別部隊——關東軍。無奈之下，中國政府只好讓日本軍隊部署在中國的領土上，只是希望他們的存在是暫時的。但同時代的人看得很清楚，日本在南滿的勢力範圍將會成為其在亞洲大陸，包括向北朝着俄國方向進一步擴張的前鋒。<sup>105</sup>

因此，對外政策錯綜複雜的形勢所造成的困境，至少同君主專制在國內缺乏可靠的政治基礎一樣危機四伏。在內外交困的情況下，每一方面的困境都突顯出另一方面的重要性。實際上，俄國的兩種戰略選擇——站到法國和英國一邊對抗德國，或者冒着得罪法國和英國的危險，接受在德國主導的歐洲充當初級合夥人的關係——都有相當的風險。緩和與英國的緊張關係，同時儘量避免在倫敦與柏林之間作出明確的選擇，斯托雷平的這一做法是正確的，但在當時的情況下，他其實無力完成這項艱巨的任務。日本擺出的姿態令俄國的處境越發艱難。1907年以後，若是日本加大侵略的力度，英國對俄國不承擔任何義務，可要是英德之間的對抗加劇，俄國卻脫不了身。在1908年的巴爾幹問題上，斯托雷平採取的堅定的不干涉政策，並未改變對外關係發展戰略上的混亂局面。

## 走投無路的強盜

回到巴庫的朱加施維里，1907年5月在布爾什維克派的地下報紙《巴庫無產者報》上，報道了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第五次代表大會的情況。他指出，主導大會的是孟什維克，他們中許多人都是猶太人。「我們布爾什維克，」他在報道中寫下——他想起了另一位布爾什維克在大會上說過的話——「不妨在黨內來一次蹂躪猶太人的暴行」。<sup>106</sup> 這樣的話——它是某個來自俄羅斯帝國猶太人定居區的人說的，而朱加施維里是在重複別人的話\*——反映出到1907年的時候，由於1905年統一的希望破滅所產生的強烈的仇恨和挫敗感。值得注意的是，這是未來的斯大林用俄文發表的第一篇署名文章；他此後再也沒有用格魯吉亞文發表過任何東西。歷史記載中找不到任何可以解釋這一轉變的理由。一種可能是，未來的斯大林想要被同化。覆蓋俄羅斯帝國西北部的社會民主運動的大三角區，從聖彼得堡到莫斯科，再到沙皇治下的波蘭和拉脫維亞，在文化和人的外貌上類似於歐洲。往南在西南地區（猶太人定居區的南半部分），社會民主運動基本上沒有發展起來；再往南在高加索地區，它的發展勢頭強勁，但主要信奉孟什維克派的觀點。結果，朱加施維里及其布爾什維克派的同志，每參加一次重要的黨代表大會，都會接觸到完全歐化的文化，這時，他的格魯吉亞人外貌和濃重的格魯吉亞口音就顯得特別突出。社會民主黨布爾什維克派中的猶太人，俄羅斯化的程度往往很深，許多波蘭人（他們中有些是猶太人）和拉脫維亞人也是如此；後者的俄羅斯化程度即使不深，也看得出他們是歐洲人。因此，儘管俄國之外的其他布爾什維克也同俄羅斯人有一定區別，但朱加施維里在樣貌上明顯是亞洲人。他在1906年的黨代表大會後回去時穿着西服，可能就是出於這個原因。再往後，1907年他在報刊上發表政論文章時，突然不再用格魯吉亞文，而是用俄文，可能也是出於這一原因。

---

\* 譯註：「布爾什維克中曾有人（好像是阿列克辛斯基同志）開玩笑說，孟什維克是猶太人的派別，布爾什維克是真正俄羅斯人的派別，所以我們布爾什維克不妨在黨內來一次蹂躪猶太人的暴行。」《斯大林全集》第2卷，第53頁。

亞洲血統並不是這位高加索布爾什維克唯一引人注目或試圖引人注意的地方。由孟什維克主導的1907年的社會民主工黨第五次代表大會，以決定改變策略而著稱。雖然除了選舉範圍非常有限並且很少開會的杜馬之外，專制制度仍然禁止正常的、合法的政治活動，但孟什維克認為，採取戰鬥隊或「剝奪」的辦法不能推翻現存的秩序。相反，孟什維克想要突出文化工作（工人俱樂部和人民大學）和參加杜馬選舉的重要性。馬爾托夫認為，德國社會民主黨利用國會和其他場所開展的合法活動，在俾斯麥的反社會黨人法的打壓下堅持了下來。<sup>107</sup> 後來，五位高加索社會民主黨代表被選進杜馬，其中包括元老級的諾伊·饒爾丹尼亞。同時，第五次代表大會還對禁止「剝奪」的決議進行了表決。列寧和其他34位布爾什維克投了反對票，但它依然成了黨的法令。可就像1903年列寧在黨的組織問題上拒絕承認馬爾托夫獲勝的投票結果一樣，現在，列寧又同列昂尼德·克拉辛，一名工程師兼製造炸彈的高手，以及朱加施維里一起，違反黨的政策，策劃在高加索搞一次大的「剝奪」活動。<sup>108</sup>

1907年6月13日，在梯弗利斯市中心的埃里溫廣場，兩輛給國家銀行梯弗利斯支行運送現金的郵車，光天化日之下遭到槍擊和至少八枚自製炸彈的襲擊。盜匪搶走了大約25萬盧布的巨款（超過杜爾諾沃前一年因為拯救了沙皇制度而獲得的獎金）。此次公然打劫的規模算不上最大：前一年在聖彼得堡，在從海關大樓到國庫的途中，社會革命黨人襲擊了一輛防護嚴密的馬車，搶走了40萬盧布，這是1906年最大的一起出於政治動機的劫案。<sup>109</sup> 不過，1907年的梯弗利斯劫案，作為當年該省由各種團夥實施的1,732起劫案之一，仍然轟動一時。<sup>110</sup>

柯巴·朱加施維里沒有冒險親自出馬，但他參與策劃了這起劫案。在這夥強盜中（多達20人），很多人從奇阿圖拉打打殺殺的日子開始就是他的戰鬥隊的成員，有些人還要更早。那天在廣場上指揮的西蒙·「卡莫」·捷爾—彼得羅相（Simon “Kamo” Ter-Petrosyan，生於1882年），25歲，是個一半亞美尼亞血統、一半格魯吉亞血統的軍火販子，未來的斯大林從在哥里的時候就認識他。<sup>111</sup> 據說卡莫對「柯巴」「佩服得五體投地」。<sup>112</sup> 1907年6月13日，卡莫的幾枚「蘋果」把五個騎馬的哥薩

克衛兵中的三個、兩名銀行押運員和許多路人炸得粉碎。喪命的至少三十多人；還有大約二十多人因為四處亂飛的彈片而受了重傷。<sup>113</sup>卡莫乘着濃煙和混亂，親自動手，搶走了血跡斑斑的戰利品。他扮成一位格魯吉亞公爵，帶着(另一名同夥假扮的)新娘，乘火車(一等座)把錢交給了列寧，而列寧當時正隱匿在沙皇治下的芬蘭。(據列寧的妻子娜捷施達·克魯普斯卡婭(Nadezhda Krupskaya)說，卡莫還帶了糖炒的堅果和一個西瓜。)<sup>114</sup>儘管有故作勇敢和藐視社會民主黨政策的意思，但搶劫倒像是一種絕望之舉，有用強盜行徑徹底斷送掉社會民主黨事業的危險。不要忘了，俄羅斯國家銀行早有防備：它把連號的面值500盧布的鈔票號碼都作了登記，送到歐洲的各個金融機構。在埃里溫廣場搶來的鈔票對於布爾什維克的事業，即使說有，究竟作用有多大，現在還不得而知。「在梯弗利斯搶到的東西，」托洛茨基後來寫道，「沒有帶來任何好處。」<sup>115</sup>

對於是誰做下了這起劫案，急於向沙皇當局邀功的密探們提供了一大堆相互矛盾的說法，但保安處正確地猜出，是列寧幹的。感到風聲不對的列寧離開了他在沙皇治下的芬蘭的藏身處，於1907年12月再次流亡歐洲，而且看樣子要永遠流亡下去。有幾名布爾什維克被捕了，比如馬克西姆·李維諾夫，列寧讓他代表黨在歐洲兌換那些搶來的盧布。<sup>116</sup>逮捕導致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啟動了三次調查，而且前後有幾年時間。調查是孟什維克啟動的，他們看到了可以削弱列寧領導地位的機會。饒爾丹尼亞主持過一次內部調查。席爾瓦·吉布拉澤——他從梯弗利斯和巴統時開始，就是朱加施維里的老對頭——主持過另外一次。孟什維克得到一名沙皇郵政人員的證詞。這名接受賄賂並提供了有關郵車時間表內部情報的郵政人員，指認了朱加施維里。未來的斯大林當時可能被暫時開除出黨的隊伍。他到晚年時還感到痛苦，因為有傳聞說，他曾經是個普通的刑事犯，而且被黨開除過。<sup>117</sup>不管傳說中的黨的紀律聽證會結果如何，朱加施維里後來再也沒有在梯弗利斯住過。他帶着妻子卡托·斯瓦尼澤和幼子雅科夫，偷偷地搬到了巴庫。<sup>118</sup>

巴庫跟奇阿圖拉很像，只是規模大了許多。這座在裏海半島上的油港，既有令人驚嘆的天然圓形劇場和迷宮般的古代穆斯林定居點，

又有娛樂場、貧民窟、粗俗的私人宅邸——有個富豪的別墅就跟撲克牌一樣——以及由油井井架組成的充滿暴力的新城。<sup>119</sup> 1900年代初，沙皇俄國生產的石油佔到全球產量的一半以上，而且大部分是在巴庫。汨汨流出的石油和照亮周圍海域的火光，帶來了驚人的財富。巴庫火車站東面就是瑞典的諾貝爾兄弟建造的煉油廠，再往東則是羅斯柴爾德家族的石油貿易公司。工人們暴露在有害的化學物質中，12小時一班，辛苦地勞作，換來的只是兔籠一般的生活區和每月可憐的10至14盧布工資，而這裏面還要「扣除」廠裏提供的伙食的費用。按照高加索的標準，在巴庫，受壓迫的無產階級數量非常多：至少有5萬名石油工人。這批人成了朱加施維里那樣的激進的布爾什維克鼓動家特別關注的對象。<sup>120</sup>

朱加施維里在巴庫的革命業績不僅包括宣傳和政治組織活動，還有綁票、為敲詐勒索提供保護、海上搶劫，或許還包括下令暗殺了幾個被懷疑是奸細和叛徒的人。<sup>121</sup> 那他在這方面有多麼突出呢？即便是按照俄羅斯帝國1905至1908年野蠻的標準，政治謀殺在高加索也是件大事。而且革命者在高加索殺人的事情，多數是亞美尼亞的達什納克黨幹的，不是布爾什維克。達什納克黨，即「亞美尼亞革命聯盟」，1890年代成立於梯弗利斯，起初是為了解放他們在奧斯曼帝國的同胞，但很快也震動了俄羅斯帝國。<sup>122</sup> 讓保安處感到不安的還有無政府主義分子。未來的斯大林製造的混亂雖然算不上是最突出的，但他後來在回憶起巴庫的強盜生涯時仍然津津有味。「在石油工人中間的三年革命工作鍛煉了我，」他在1926年說道，「我受到了第二次戰鬥的革命洗禮。」<sup>123</sup> 這位未來的專政者很幸運，沒有受到「斯托雷平領帶」的款待。

「根據梯弗利斯的剝奪行動，」托洛茨基寫道，列寧「看中了柯巴，認為他是個能堅持到底或者帶領其他人堅持到底的人。」托洛茨基還說，「在反動的年代裏，〔未來的斯大林〕不屬於那幾千脫黨分子，而屬於少數幾百個不管怎樣，依舊對黨忠心耿耿的人。」<sup>124</sup>

---

\* 譯註：「在石油工人中間的三年革命工作，把我鍛煉成一個實際的戰士和實際的地方工作領導者……在巴庫，我受到了第二次戰鬥的革命洗禮。」《斯大林全集》第8卷，第155頁。



與此同時，巴庫有毒的環境讓他年輕的妻子卡托原本就虛弱的身體變得越來越差，結果在1907年12月，她因為斑疹傷寒或肺結核引起腸道出血，非常痛苦地離開了人世。<sup>125</sup> 在她的葬禮上，未來的斯大林據說要跳進她的墓穴。「我個人的生活完了」，有個朋友記得他可憐地大喊道。<sup>126</sup> 後來，據說他為忽略了妻子感到自責——這時他又把蹣跚學步的兒子雅科夫丟給卡托的母親和兩個姐姐，而且一丟就是14年。

他那激動人心的革命強盜生涯很快就結束了。1908年3月，朱加施維里又被關進巴庫的沙皇監獄，他在那裏學習世界語——有獄友記得他「總是帶着書」——但再次受到指控說他出賣同志（其他幾個革命者在他之後也被捕了）。<sup>127</sup> 11月，他又一次動身前往國內的流放地，那是俄國北方一個叫索里維切戈茨克的老皮毛收購站，「一座沒有柵欄的露天監獄」。<sup>128</sup> 在聖彼得堡東北幾百英里外的針葉林裏，500名住在木屋裏的流放者組成了一個聚居區，在那裏可以發現各種各樣令人厭倦的、有爭議的政治傾向和五花八門的犯罪經歷。得了嚴重的傷寒差點兒死掉的朱加施維里，同另外一個名叫塔季亞娜·蘇霍娃(Tatyana Sukhova)的流放者有了戀情，塔季亞娜後來談到，他那時窮困潦倒，習慣大白天躺在床上看書。「他經常開玩笑，同時，我們經常取笑其他一些人，」她強調說，「柯巴同志喜歡取笑我們的軟弱。」<sup>129</sup> 社會主義事業在1905年沒能取得突破，那以後柯巴同志的生活的確就成了一件傷心、甚至痛苦的事情。他美麗忠貞的妻子死了；兒子對他來說是陌生人。巴統(1902)、奇阿圖拉(1905)、梯弗利斯(1907)和巴庫(1908)，以及在俄屬芬蘭(1905)、斯德哥爾摩(1906)和倫敦(1907)的幾次黨代表大會，在令人振奮的歲月裏的所有這些成就，都是一場空。有些事情，比如搶劫郵車，到頭來適得其反。

1909年夏天，朱加施維里在塔季亞娜·蘇霍娃的幫助下，坐船逃離了悲傷的索里維切戈茨克。跟父親貝索一樣，他總是一副若有所思的樣子，而且漸漸養成了小心眼的毛病。格里戈里·「謝爾戈」·奧爾忠尼啟則後來會和其他人一樣，對這位格魯吉亞同鄉有透徹的認識，在斯大林成為專政者多年之前就說他「過度敏感」(*obidchivy kharakter*)。<sup>130</sup> (急性子的奧爾忠尼啟則知道自己說甚麼——他是所有人當中最過度敏

感的。)朱加施維里似乎很容易發火，而且同時代的許多人都覺得他城府很深，儘管(當時)沒有誰認為他有反社會人格。不過在那時候，未來的斯大林或許喜歡沉思、過度敏感、高深莫測，但他的生活並不值得羨慕。在他逃跑後不久，1909年8月12日，他的父親貝索死於肝硬化。參加葬禮的只有一個一起做鞋的人，是他闔上了貝索的雙眼。未來的專政者的父親埋在一座沒有標記的墳墓裏。<sup>131</sup>

這時候比較年輕的朱加施維里自己有甚麼成就呢？

平心而論，他的人生算得了甚麼？將近31歲，身無分文，居無定所，除了評論政治，別無所長，而他評論政治的方式還是非法的。他在報刊上寫過一些缺乏新意的馬克思主義文章。他學會了偽裝和逃跑，不管是用老辦法(穆斯林婦女的面紗)還是新辦法，而且他還像演員一樣，嘗試過多種角色和化名——「怪人奧西普」、「麻子奧斯卡」、「神父」、「柯巴」。<sup>132</sup>關於怪人、麻子奧斯卡和柯巴神父，最值得一提的或許是，他是自學成才的典範，總在不停地讀書。他無疑是把讀書當成了慰藉，同時依然決心要求上進和完善自己。他可以在自己的一小隊人馬中施展魅力，激發起強烈的忠誠感。可現在他那些人馬已經散去，他們後來誰也沒有大的作為。

117

就在老流浪漢貝索·朱加施維里悄無聲息地離開人世的時候，他的兒子、逃亡的流浪漢約瑟夫·朱加施維里正在前往聖彼得堡的路上。1909年秋天，他躲在謝爾蓋·阿利盧耶夫的家。阿利盧耶夫是個機修工，在梯弗里斯流放過，然後又回到首都，後來他在那裏經常為朱加施維里提供落腳的地方。(謝爾蓋的女兒娜佳最後成了斯大林的第二任妻子。)朱加施維里很快又從首都返回巴庫。在巴庫，保安處顯然是為了挖出他的地下網絡，在跟蹤了幾個月後，才在1910年3月將他再次抓獲。監禁、流放、窮困，這就是他從1901年3月被迫逃離梯弗里斯氣象台、從事地下工作以來的生活，而這樣的生活要一直持續到1917年。朱加施維里邊緣化的生存方式不是個人的失敗。帝國的許多革命政黨都十分脆弱，儘管俄國工人非常激進，農民也騷動不安。<sup>133</sup>保安處設法牢牢地控制着革命政黨，並成立了一些假的反對派小組，以削弱這些政黨的力量。<sup>134</sup>遭到滲透的社會革命黨人，尤其是其中主張

採取恐怖手段的一翼，到1909年實力已經大不如前。（他們中最厲害的恐怖分子葉夫諾·阿澤夫〔Evno Azef〕，曾經的貪污犯，綽號「黃金手」，實際上是被收買的奸細。）<sup>135</sup>

後來，在回過頭來重寫革命黨歷史的時候，失敗和沮喪被遺忘了，長期的監禁或流放變成了描寫英雄主義和勝利的驚心動魄的故事。「我們這些老一代人……90%仍受……以前從事地下工作的歲月的影響，」謝爾蓋·科斯特里科夫，又名基洛夫，後來對自己領導下的列寧格勒黨組織若有所思地說，「不僅是讀書，每在牢裏多關一年，都有很大幫助：正是在那裏，我們對所有事情都要思考和探討20次以上。」然而，科斯特里科夫生活的細節表明，地下工作頂多是苦樂參半。黨的隊伍中有很多混進來的奸細，私人關係也常常因積怨而受到損害。最大的問題往往是無聊。在多次被捕之後，科斯特里科夫在北高加索的弗拉季高加索安頓下來（1909–1917），他就是在那裏採用了「基洛夫」這個響亮的化名。這個化名或許跟傳說中的古代波斯國王居魯士（Cyrus，在俄語中就是「基爾〔Kir〕」）有關。他在一家有自由主義傾向的合法的俄文報紙（《捷列克報》）謀了一份穩定的工作——事實證明，那家報紙的老闆願意忍受警方的多次罰款。他一邊閱讀馬克思主義著作、雨果和莎士比亞的作品，以及俄國的經典作品，一邊結交專業技術人員。1911年，因為被發現以前在托木斯克的時候（他起初就是在那裏加入社會民主黨的）同一家非法的印刷所有牽連，基洛夫再次被捕，但被無罪釋放。他後來坦言，1917年以前，他感到遠離了帝國其他地方的精神生活，因而十分無聊——可他還不是生活在某個冰凍的荒原，而是氣候溫潤的地方，而且領着一份薪水，那種舒適是孤苦伶仃的朱加施維里只能在夢裏見到的。<sup>136</sup>

### 同樣地適得其反

由於保安處的緣故，1909至1913年實際上還比較太平，當然，這是相對於前些年的瘋狂來說的。<sup>137</sup> 整個帝國範圍內的社會民主黨人數目，從1907年頂峰時的大約15萬人，減少到1910年的不到1萬人。布

爾什維克派四處飄零，要麼流亡歐洲，要麼流放西伯利亞。帝俄境內只有五六個還在活動的布爾什維克委員會。<sup>138</sup>與此同時，到1909年，俄羅斯人民同盟發生分裂，整個極右翼運動的勢頭已經減弱。<sup>139</sup>斯托雷平在那一年開始同俄羅斯民族主義分子公然結盟，並把正教抬高為具有整合功能的國家信仰。他這樣做，除了政治算計外，也是出於自己內心的宗教信念。帝俄有近一億信仰東正教的臣民，約佔帝國總人口的70%。但東正教統一的程度不夠。「幾十年來我們一直在犯的錯誤，」1910年，謝爾蓋·維特在日記中寫道，「是我們自己仍然不承認，從彼得大帝和葉卡捷琳娜大帝那時以來，就已經沒有俄羅斯這回事了，有的只是俄羅斯帝國。」<sup>140</sup>當然，非俄羅斯人的民族主義和分離主義運動，相對來說還比較薄弱：武裝叛亂大多限於波蘭人和高加索的山地部族，波蘭人受到的懲罰是失去了單獨的憲法。對帝國的忠誠感依舊是強烈的，忠於俄國的各民族精英是一筆巨大的財富，儘管當時世界各地的民族主義風起雲湧。可正是斯托雷平所呼籲的那些支持者，即俄羅斯民族主義分子，製造了最大的政治分裂，因為他們想要強迫非俄羅斯人形成一個單一的俄羅斯民族。為了形成一個按照信仰（正教）來界定的單一的「俄羅斯」民族——按照設想，它包括大俄羅斯人、小俄羅斯人（烏克蘭人）和白俄羅斯人——民族主義分子推出了針對烏克蘭語言文化的嚴厲禁令。可想而知，這樣做只會進一步激發烏克蘭人的民族意識，激起他們的反抗而不是忠誠。這些做法跟我們在高加索梯弗利斯神學院等地見到的一樣有害。主張採取強硬手段推動俄羅斯化的人激起了民族主義運動，而這一運動原本是忠誠的，而且很大程度上限於文化方面。造成俄羅斯帝國動盪的，正是俄羅斯民族主義分子，而不是非俄羅斯人的民族主義運動。<sup>141</sup>

119

改革陷入停滯，斯托雷平求助於作為民族主義化身的正教，這既是軟弱的表現，又再次說明政權缺乏有效的政治基礎。俾斯麥沒有自己的政黨，卻能在德國中產階級和工人階級力量不斷壯大的情況下，控制了二十多年的立法議程。斯托雷平沒有自己的政黨，為打造俾斯麥式的議會聯盟所付出的艱苦努力卻沒有成功。要是斯托雷平雄心勃勃的現代化計劃在杜馬受阻，那它們最終只能仰仗專制君主的興致。當

然，俾斯麥在處理與國會的關係時非常精明，可鐵血宰相的努力最終也要取決於他同一個人的關係，即威廉一世。但俾斯麥是個心理學大師，讓德皇信賴他信賴了26年。（「在俾斯麥手下，皇帝很難做」，威廉一世曾經俏皮地說過。）<sup>142</sup> 斯托雷平處在一個更加專制的體制內，面對的是一個不太合格的專制君主，一個更像是威廉二世（他解除了俾斯麥的職務）而不是威廉一世的人物。尼古拉二世以及他的德國妻子亞歷山德拉，嫉妒這位為他們或者說為帝俄服務的最有才幹的官員。「你以為我喜歡總是看到報上說大臣會議主席做了這個……做了那個嗎？」沙皇對斯托雷平的繼任者可憐巴巴地說道，「不把我當回事？我甚麼也不是嗎？」<sup>143</sup> 斯托雷平死後，「專制君主」重申自己的權威，任命了幾個不太強勢的總理，鼓勵俄國的大臣拋開自己的政府。這麼做的部分原因在於尼古拉二世的個性。要是對哪個官員不太信任，亞歷山大三世會直說，而尼古拉二世卻甚麼也不說，只是對他不喜歡的人暗中使絆。他在大臣中間挑起沒完沒了的爭論，自己卻總是企圖袖手旁觀。如此的行為激起了官員對尼古拉二世無聲的和有時也不那麼無聲的憤怒，結果不但削弱了對他個人，也削弱了對君主專制的忠誠感。<sup>144</sup> 然而更深刻的行為模式同體制有關，而不是同個人有關。

尼古拉二世不能充當他自己的總理，部分原因在於，他甚至不屬於行政部門的一部分——從制度的設計來講，專制君主凌駕於所有部門之上——由他任命的俄國政府，根本不是他的專制權力的工具，只是他的專制權力的限制，儘管這有點奇怪。有些做法，比如故意加劇機構間以及私人間的競爭，鼓勵非正式的幕僚（廷臣）像正式的大臣一樣行使權力，挑動廷臣與大臣之間以及與正規機構之間的勾心鬥角，讓管轄權互相重疊等等，也不是從尼古拉二世開始的。<sup>145</sup> 結果是，對於有些事情，俄國有些部門是禁止的，另一些部門是允許的，就這樣故意互相使絆、互相拆台。俄國的官員，哪怕是非常高級的官員，對於一丁點的流言蜚語都津津樂道，卻不管那些傳言是多麼的不可靠或不合情理；那些販賣據說是來自「上面」的小道消息的人，可以把話傳到最有權力的人耳朵裏。大家已經議論紛紛了，大臣，甚至是名義上的總理，卻往往不能肯定，正在作出的決定是甚麼，怎樣以及由誰作出的決定。官

員們試圖去揣摩「信號」：他們是否得到沙皇的信任？聽說誰準備覲見沙皇了？他們有沒有可能很快獲得覲見的機會？同時，就像俄國的某個高級官員指出的，各部門總是覺得，無論甚麼事情，要想辦成，就要通過犧牲別的部門來擴大自己的權限。「領導政府各部門的，實際上是一幫換來換去的寡頭，」這位高級官員解釋說，「完全缺乏唯一的國家權威，以便朝着一個明確的、可以被認可的目標引導它們的活動。」<sup>146</sup>

斯托雷平整頓政府秩序的努力到頭來勞而無功，至於整頓國家秩序，就更不用說了。這期間，柯巴·朱加施維里度過了一段漫長而淒慘的生活，一段充滿失望而且常常是絕望的歲月。當然，得益於黨的代表大會或流放的共同命運，未來的斯大林開始認識布爾什維克革命隊伍中的幾乎所有高層人物——列寧、加米涅夫、季諾維也夫——還有其他許多人，比如費利克斯·捷爾任斯基。但斯大林1907年在梯弗里斯涉嫌搶劫，這讓他臭名遠揚，基本上成了一個反面人物——他後來不得不努力隱瞞這段經歷——結果只能逃往巴庫。1910年，為了獲得那裏的合法居住權，他試圖同一個名叫斯特凡尼婭·彼得羅夫斯卡婭 (Stefania Petrovskaya) 的女人結婚，但最終未獲允許，而是又被流放到北方的索里維切戈茨克。1911年底，他最近一次流放時的女房東、寡婦瑪特廖娜·庫扎科娃 (Matryona Kuzakova) 生下一個男孩，名叫康斯坦丁 (Konstantin)，而這個男孩很可能是朱加施維里的。<sup>147</sup>

未來的斯大林此時已離開了索里維切戈茨克，因為他獲准搬到沃洛格達，那個北方省份的「首府」。他在那裏繼續追求農婦，開始同另一個女房東離了婚的女兒、名叫索菲婭·克留科娃 (Sofia Kryukova) 的女傭交往，還跟謝拉菲瑪·霍羅舍尼娜 (Serafima Khoroshenina) 短期同居過，直到謝拉菲瑪流放期滿離開那裏。朱加施維里還同十幾歲的女學生佩拉格婭·奧努夫里耶娃 (Pelageya Onufrieva) 上過床。他還熱衷於搜集俄羅斯經典畫作的明信片。跟索里維切戈茨克不同，沃洛格達至少有公共圖書館，警察機關注意到，有段時間，他在107天當中到圖書館去了17次。他讀過俄國偉大的歷史學家瓦西里·克柳切夫斯基 (Vasili Klyuchevsky) 的書，訂閱過從西伯利亞寄給他的期刊。<sup>148</sup> 不過，這位因為饑餓而消瘦、受到監視的騷擾和突然搜查的羞辱的「高加

索人」——按照沃洛格達警察機關對他的稱呼——依然過着極度窮困的生活。拜保安處所賜，未來的斯大林的生活只能又一次滿足於一座外省圖書館以及一個未成年的女孩所帶來的安慰——他向她訴說過亡妻卡托的故事。年輕的佩拉格婭，在保安處那裏的代號是「時髦女郎」，實際上是朱加施維里在沃洛格達最親密的同志、布爾什維克彼得·奇日科夫(Pyotr Chizikov)的女友。奇日科夫的流放期已滿，但他和她一起留了下來。奇日科夫不但「分享」自己的女友，上級還交待他幫助「柯巴同志」逃走。<sup>149</sup> 1911年9月，朱加施維里拿着奇日科夫的合法證件，偷偷離開了沃洛格達，再次前往聖彼得堡。在沃洛格達(或西伯利亞)的窮鄉僻壤，沙皇警察的監視形同虛設，但是在首都和大城市，比如聖彼得堡、巴庫或梯弗利斯，保安處還是很警覺、很管用的。在首都，保安處立即對朱加施維里進行跟蹤，並在他到來的第三天把他逮捕了。

122 同樣是在1911年9月，當朱加施維里在聖彼得堡再次被捕的時候，在遙遠的南方，一個名叫莫爾傑哈伊·「德米特里」·沃格羅夫(Mordekhai “Dmitry” Bogrov)的24歲的律師和暗中受僱於保安處的無政府主義恐怖分子，在基輔歌劇院暗殺了斯托雷平，當時那裏正在上演尼古拉·里姆斯基-科爾薩科夫的《沙皇薩爾坦的故事》。俄國的頭號政治家是為了參加亞歷山大二世紀念牌的敬獻儀式而隨皇室南下的，他此時差不多已遭到孤立，而且有傳言說，他很快會被調往高加索或西伯利亞。<sup>150</sup> 事先有人反覆警告過斯托雷平，說有針對他的陰謀，但他還是去了，沒帶衛兵，因為他從來不帶衛兵，也沒穿防彈背心(雖說那時的防彈背心不怎麼樣)。「我們剛離開包廂」，尼古拉二世在給母親的信中說到第二次幕間休息的情況，「就聽到兩聲響，好像有甚麼東西掉了下來。我以為是劇院的玻璃砸到某人頭上，趕緊跑回包廂看是甚麼情況」，沙皇朝下面的樂隊一看，看到自己的總理站着，制服上滿是鮮血；斯托雷平看到尼古拉二世，抬起手，示意沙皇去安全的地方，然後畫了十字。幾天後，他在醫院去世。這是斯托雷平遇到的第18次暗殺。暗殺他的沃格羅夫被判有罪，並在槍擊事件發生後的第十天在他的牢房被絞死。據說沃格羅夫在左翼恐怖主義組織的同志已經懷疑他

和警方有勾結，而且他當時是拿着警方在演出開始前一小時才給他的通行證進入歌劇院的。這些細節引發的猜測是，俄國的極右勢力最終借保安處之手，幹掉了他們憎惡的保守派總理。這種未經證實卻有很多人相信的說法，證明了這樣一個事實，即那位總理根本沒有找到他想為專制政權尋找的保守主義的政治基礎。甚至在斯托雷平還沒有被暗殺的時候，他就在政治上被那些恰恰是他想要拯救的人毀滅了。<sup>151</sup>

沙皇政府沒有了斯托雷平，內部失調加劇，仍然無法取得一致的俄國右翼政治勢力則繼續指責「君主立憲」，就在這時，1911年12月，柯巴·朱加施維里再次被流放。<sup>152</sup>他又回到了偏遠的沃洛格達。但是，借黨內再次發生內訌的機會，這位格魯吉亞革命者突然上升到俄國布爾什維主義運動的最高層（雖說它當時不怎麼樣）。1912年1月，布爾什維克在布拉格召開了一次規模很小的黨代表會議——不是代表大會——在與會的20名代表中，列寧一派竟然佔了18名；除了兩名孟什維克外，社會民主黨非布爾什維克派的成員大多拒絕出席。代表會議根據一條不太站得住腳的理由，即老的黨中央委員會已經「停止運行」，授權自己召開代表大會並任命了一個新的（而且是清一色布爾什維克的）中央委員會。<sup>153</sup>實際上，布爾什維克派是正式要求統領整個俄國的社會民主工黨。列寧隨即在新的中央委員會的第一次全會上，決定缺席增補（被流放到沃洛格達的）朱加施維里為新的中央委員。布拉格會議還（為俄國境內的同志）成立了中央委員會「俄國局」——那是斯大林一直要求的，現在他被安排在裏面。斯大林成了可以瞭解到機密信息的十二名布爾什維克最高領導人之一，並且是其中的三名高加索人之一。<sup>154</sup>列寧為甚麼要提拔他，這一點現在還不太清楚。由於流放的地點不同（西歐和俄國東部），他們從1905年12月初次見面後，大約有六年時間，彼此幾乎再也沒有見過面。但是在1910年，當斯大林還在巴庫搞地下活動時，流亡的布爾什維克領導層就已經打算把他增補為中央委員。此事不知為何後來沒有了下文。1911年，格里戈里·烏魯塔澤（Grigol Urutadze），同朱加施維里一起坐過牢的格魯吉亞孟什維克，在列寧跟前說朱加施維里的壞話，提到他的非法的「剝奪」活動，以及他過去的所謂被巴庫黨組織開除的事情。「這沒有甚麼！」據說列寧當時大聲說



道，「我要的就是這種人！」<sup>155</sup> 如果列寧是這樣說的，那他就是在表揚斯大林認識到為了事業可以不擇手段。1912年進入中央委員會成了斯大林崛起中的一大突破，這讓他加入了列寧和季諾維也夫等人的行列——季諾維也夫是列寧在日內瓦流亡時的影子。

並不是只有列寧才堅持分裂主義和強硬路線，反對「改良派」社會主義者。<sup>156</sup> 年輕的意大利社會主義激進分子貝尼托·墨索里尼 (Benito Mussolini, 生於1883年) 是個窮苦的手藝人的兒子。這個手藝人給兒子起的名字，是為了紀念一位墨西哥革命者。1902年，墨索里尼遷居瑞士，在那裏做臨時工，可能見過列寧。墨索里尼肯定讀過列寧的一些文章。<sup>157</sup> 但他對意大利有自己的見解，他排斥經濟上的工團主義和議會制社會主義。1904年，墨索里尼要求「思想和意志的貴族」成為領導工人階級的先鋒隊（這種立場一直伴隨着他走向法西斯主義）。<sup>158</sup> 他在報紙上反覆宣揚這種思想。在列寧成立獨立的布爾什維克黨數月之後，1912年7月，不到30歲的墨索里尼，一名來自小鎮弗利的代表，因為在意大利社會黨代表大會上帶頭驅逐溫和的改良派社會黨人，一下子上升到意大利社會黨的領導層（墨索里尼的支持者被稱為毫不妥協的人，其中包括安東尼·葛蘭西 (Antonio Gramsci)）。<sup>159</sup> 「分裂是一件令人痛苦的事情，」為墨索里尼的行動叫好的列寧在《真理報》上寫道（1912年7月15日），「但是有時它是必需的，在必須分裂時，任何軟弱、任何『溫情』……都是犯罪……如果他們堅持錯誤，如果他們為了維護錯誤而組織集團，踐踏黨的一切決定，破壞無產階級大軍的全部紀律，那麼就有必要分裂。意大利社會主義無產階級政黨在清洗了工團主義者和右傾改良派分子以後，走上了正確的道路。」<sup>160</sup> 偏離常規的激進主義，不管是布爾什維克的還是早期法西斯主義的，都既是政治綱領，又是急不可耐的巷戰計劃。

124

要是沒有列寧的提攜，就無法想像斯大林在1912年會從荒涼的沃洛格達一下子進入新的清一色布爾什維克的中央委員會。可是，必須

\* 譯註：《列寧全集》第21卷，第435頁。

得說，列寧是個善於用人的人，不拘一格地用人，也包括斯大林，因為作為非俄羅斯人，斯大林可以增加他那一派的號召力。再說了，一連串的逮捕使得提拔一些人很有必要。但提拔斯大林並不只是做做樣子或者不得已而為之。斯大林不僅能起作用，而且忠誠：他能把事情辦成。還有一點很重要，即他是高加索這個孟什維克重鎮中的布爾什維克。當然，這次高加索還有兩人，謝爾戈·奧爾忠尼啟則和因好色而名聲不佳的蘇倫·斯潘達良（關於他有個說法，「巴庫所有的三歲小孩都長得像斯潘達良」），也進了布爾什維克的高層。奧爾忠尼啟則是列寧同俄羅斯帝國境內的布爾什維克聯絡的首席信使，1912年2月初，正是他去通知柯巴成了中央委員並且每個月有50盧布的黨的津貼——這筆錢不管有多麼受歡迎，也解決不了朱加施維里的困難，他依然要到處求人接濟。<sup>161</sup>不過，斯大林後來控制了奧爾忠尼啟則；斯潘達良去世得比較早。此外，伊萬·「弗拉基米爾」·別洛斯托茨基（Ivan “Vladimir” Belostotsky），五金工人兼勞動保險公司辦事員，也被同時增補為中央委員，但他很快就失蹤了。<sup>162</sup>換句話說，與後來人們的說法相反，斯大林獲得提拔決非偶然。列寧讓斯大林進了核心圈，但斯大林當時已經引起了關注，而且還將繼續證明自身的價值。他蟄伏了多年。

可想而知，列寧的社會主義對手們，比如崩得、拉脫維亞社會民主黨、孟什維克，紛紛指責布拉格代表會議不合法。不過，同樣可以想見的是，他們為了回擊而在1912年8月自己召開的黨代表大會也是四分五裂，變成了難以調和的派系鬥爭。<sup>163</sup>就在那個月的晚些時候，朱加施維里再次逃出沃洛格達，返回梯弗利斯，而截止到1912年夏天，那裏可能只有區區100名布爾什維克。他在成年後把幾乎所有的時光都耗在內訌上，現在就連他也開始主張社會民主黨人要「不惜一切代價」團結起來，而且還主張和所有反對沙皇制度的力量實現和解與合作。<sup>164</sup>他的立場的急劇轉變，證明了所有左翼政黨的前景都很黯淡。不過，說句公道話，就連名義上擁護君主專制的政治力量也走不到一起。

125

從僅僅五年前群眾騷亂處在頂峰時開始，斯托雷平瓦解帝俄左右兩翼政治力量的做法一直非常成功，但付出的代價是，未能建立起持久的治理形式。關於後者，許多觀察家認為，尤其是從事後來看，俄國

缺少治理形式的原因是，俄國天生就沒有能力締造一個民族(nation)。俄羅斯人在帝國1.3億人口中僅佔44%，而正教徒的數量雖說差不多有一億，可他們講的是不同的語言，俄語、烏克蘭語和白俄羅斯語，而且居住的地方不集中。凡是想在俄國國內進行民族主義動員的，都必須想辦法管理好國內相當數量的少數民族人口。不過，斯大林政權後來找到了辦法，能在重建的俄羅斯帝國培養起講不同語言的各個集團的忠誠感。對帝俄來說，最大的問題不是民族問題，而是君主專制。

無論是政治精英還是普通民眾，君主專制都沒能把他們整合起來，與此同時，1912年2月底，曾經被杜爾諾沃和斯托雷平鎮壓下去的鬥爭浪潮，又在遙遠的西伯利亞的密林深處爆發了。在伊爾庫茨克東北一千多英里的勒拿河畔(列寧從流放西伯利亞的時候開始使用的化名就源自這條河流)，金礦工人舉行罷工，抗議工時長達十五六個小時的工作日、微薄的工資(經常因為「罰款」而被扣發)、潮濕的礦井(礦工們全身濕透)、頻發的事故(每1,000名礦工就有700人遇到過事故)以及價高質劣的伙食。在公司商店裏當肉賣的臭烘烘的馬的陰莖，成了引發罷工的導火線。當局拒絕礦工的要求，於是，事件陷入僵局。4月，罷工進入第五週，被金礦買通的政府部隊開了過來，逮捕了由選舉產生的罷工委員會的領袖們(這些人是被流放的政治犯，而具有諷刺意味的是，他們希望結束罷工)。這樣做非但沒能使罷工平息下來，反倒促使人們更加堅決地遊行抗議，要求釋放被捕人員。面對大約2,500名赤手空拳的金礦工人，一隊大約90人的士兵，按照長官的命令開了火，打死至少150名工人，打傷的有一百多，許多人都是在試圖逃走時被士兵從背後射殺的。

126

這幅為了資本家的黃金而毀滅工人生命的畫面特別有效：在英國和俄國的股東中，有銀行家族、前總理謝爾蓋·維特以及皇太后。通過國內報紙的描述，勒拿金礦大屠殺的消息傳播開來——在俄國，對它的關注要遠遠超過同時期「泰坦尼克號」沉沒的消息——在1912年五一節當天和之後，在帝國各地引發了有30萬工人參加的抗議活動。<sup>165</sup>巨大的工潮令受挫的各個社會主義政黨大喜過望。「勒拿的槍聲打破了沉默的冰層，人民憤恨的河水再次奔流起來，」斯大林在報紙上寫道，「冰層

已經破裂。奔流起來了！」<sup>166</sup> 保安處也有同感。它在報告中說，「如此高漲的氣氛已經很長時間沒有出現了……許多人都在說，勒拿槍殺事件讓人想起了(1905年)1月9日的槍殺事件」(「流血的星期日」)。<sup>167</sup> 保守派因為屠殺事件而猛烈抨擊政府以及黃金公司的猶太人主管和外國股東。杜馬關於金礦區屠殺事件的調查委員會主席、左翼的杜馬代表兼律師亞歷山大·克倫斯基提供的一份繪聲繪色的報告，加劇了公眾的憤怒。

### 悲劇的秘密

就在右翼分子要求無條件地服從專制君主時，他們中的一些人也開始在背地裏幻想刺殺他。他們想要除掉皇帝，可尼古拉二世的兒子阿列克謝還是個孩子——俄國的法律規定，沙皇必須年滿16週歲——而且大部分右翼分子認為，攝政，也就是沙皇的弟弟米哈伊爾·亞歷山德羅維奇大公(Mikhail Aleksandrovich)，並不比尼古拉二世好，很可能還要差一些。<sup>168</sup> 但到了1913年，當帝國舉行紀念羅曼諾夫家族統治三百週年的盛大慶典時，這個虛弱的皇朝成了專制體制所能容許的忠誠的根基，獨一無二，無遠弗屆。三百週年紀念活動從2月21日開始，彼得保羅要塞鳴放禮炮21響——九年前同樣的禮炮聲宣佈了皇太子阿列克謝的誕生。接着是從冬宮到喀山聖母大教堂去的皇族隊伍。馬蹄聲聲，旗幟飄飄，教堂的鐘聲悠揚……在看到坐在敞篷馬車裏的皇帝和小阿列克謝時，歡呼聲震耳欲聾。在當晚的冬宮舞會上，女士們穿着古莫斯科大公國式樣的長裙，戴着中世紀俄羅斯婦女戴的名叫「科科什尼克」(*kokoshniks*)的高高的頭飾。第二天晚上，在首都多層的馬林斯基劇院，指揮愛德華·納普拉夫尼克(Eduard Napravnik)、男高音抒情歌唱家尼古拉·菲格納(Nikolai Figner)和列昂尼德·索比諾夫(Leonid Sobinov)，以及女芭蕾舞演員安娜·帕夫洛娃(Anna Pavlova)和馬蒂爾

127

<sup>166</sup> 譯註：「連納的槍聲擊破了沉默的冰層，人民運動的江河奔流起來了。奔流起來了！」《斯大林全集》第2卷，232頁。

達·克舍辛斯卡婭 (Matylda Krzesińska, 少女時曾是尼古拉二世的情人) 一同演出了米哈伊爾·格林卡的《為沙皇獻身》。

三百週年慶祝活動明顯忽略了公眾的參與。而且慶祝活動的焦點不是國家 (*gosudarstvo*)，而是俄國羅曼諾夫家族的著名統治者 (*gosudar*)。同時，俄羅斯巨大的版圖成了粉飾羅曼諾夫皇朝的主要工具。在喀山聖母大教堂——那裏裝飾着俄國繳獲的一百多件拿破侖的國家象徵物——舉行正教儀式的過程中，宣讀了一份在帝國所有教堂宣讀的皇帝詔書。「莫斯科大公國時代的俄羅斯開疆拓土，大俄羅斯帝國現已加入世界一流強國的行列。」羅曼諾夫家族的第18位君主尼古拉二世宣佈。<sup>169</sup> 在彼得·卡爾·法貝爾熱 (Peter Carl Fabergé) \* 工場專門訂制的紀念三百週年的復活節彩蛋上，雙頭鷹以及邊框鑲有鑽石的全部18位羅曼諾夫家族統治者的小型肖像熠熠生輝。這種小彩蛋特有的「玄機」是內藏一顆可以旋轉的地球儀，把1613年的俄國疆界和大大擴張了的1913年的帝國疆界兩相對照。<sup>170</sup> 不過，對於羅曼諾夫家族能否保住祖上的遺產，人們普遍感到懷疑。

1913年復活節過後，皇族為了表示慶賀，花了兩週時間重走了羅曼諾夫皇朝第一代沙皇米哈伊爾·費奧多羅維奇 (Mikhail Fyodorovich Romanov) 走過的路線，從莫斯科穿過中心地區，到達羅曼諾夫家族的祖產科斯特羅馬，然後回到莫斯科的凱旋門。科斯特羅馬的費奧多羅夫聖母——羅曼諾夫皇朝守護神——畫像的臉龐已經黑得幾乎看不清楚了，這可不是個好兆頭。<sup>171</sup> 但是，通過到17世紀祖先那裏尋根而變得大膽起來的尼古拉二世，再次圖謀終結立憲專制，取消杜馬的立法權，讓杜馬成為「合乎俄羅斯傳統」的純粹諮議性的機構。可是，他對這件讓自己和許多保守派非常渴望的事情猶豫不決。<sup>172</sup> 此外，儘管崇拜君主專制，但在君主制最忠實的擁護者當中，也瀰漫着不安的情緒。慶典是舉行了，但俄國上上下下還是有很多人開始懷疑，尼古拉二世是不是適合做一個統治者。「有君主專制但沒有專制君主」，亞歷山大·基

---

\* 譯註：俄國珠寶商，1846–1920。

列耶夫將軍 (Alexander Kireev)，俄國的廷臣和時評家，1902年就在日記中抱怨過，而這種情緒這些年來可以說範圍擴大了，就像漣漪一樣傳遞了整個帝國。<sup>173</sup> 有個宮廷副官看到羅曼諾夫家族前往喀山大教堂的隊伍後，認為「這群人愁眉苦臉」。<sup>174</sup> 龐大的俄羅斯帝國到頭來成了一個家族的事情，而這個家族似乎是氣數已盡。這不僅是說，尼古拉二世這人一貫保守，強調家庭、責任和信仰，虔誠地信奉「君主專制的理念」，而事實上自己又沒有實現這種理念的本錢。即使這位世襲的沙皇是個精明強幹的統治者，俄羅斯皇朝的未來還是會陷入困境。<sup>175</sup>

128

由於德國的亞歷山德拉公爵小姐從其外祖母、英國的維多利亞女王那裏遺傳下來的基因變異，俄國皇太子阿列克謝生來就患有血友病，這種無法治癒的疾病損害了孩子的凝血功能。皇太子的病屬於國家機密。但保密並不能改變阿列克謝或許在還沒有留下子嗣之前，就過早死亡的可能性。而且一個活得戰戰兢兢、磕在家具上都極有可能因內出血而去世的男孩，是不太可能成為一個充滿活力的、更不用說專制的統治者的。尼古拉二世和亞歷山德拉依舊不願意相信皇朝面臨着重重危機。阿列克謝的血友病，作為君主專制在深層次的結構性失敗之外的另一個不幸因素，實際上也是一個機會，可以直面專制俄國所面臨的艱難選擇，但尼古拉二世和亞歷山德拉本質上都是感情用事之人，不具備應有的冷靜和現實感，不會為了保住君主制而接受向真正的君主立憲轉型。<sup>176</sup>



立憲專制，適得其反。尼古拉二世不但處心積慮地阻撓自己同意設立的議會變成真正的議會，甚至阻撓行政機關變成真正協調一致的行政機關，認為那違背了君主專制的理念。「君主專制的政府」成了一種自相矛盾的說法，那是不受約束的神聖權力與行政管理的合法形式之間的衝突，是官吏之間的鬥爭，以決定是服從專制君主的「意志」，還是在法律法規的範圍內行事。<sup>177</sup> 因此，把帝俄的缺陷歸咎於「落後」和農民是錯誤的。斯托雷平之所以失敗，除了精英階層的不理解之外，首先是因為君主專制本身。他足智多謀，個性堅韌，但不斷受到沙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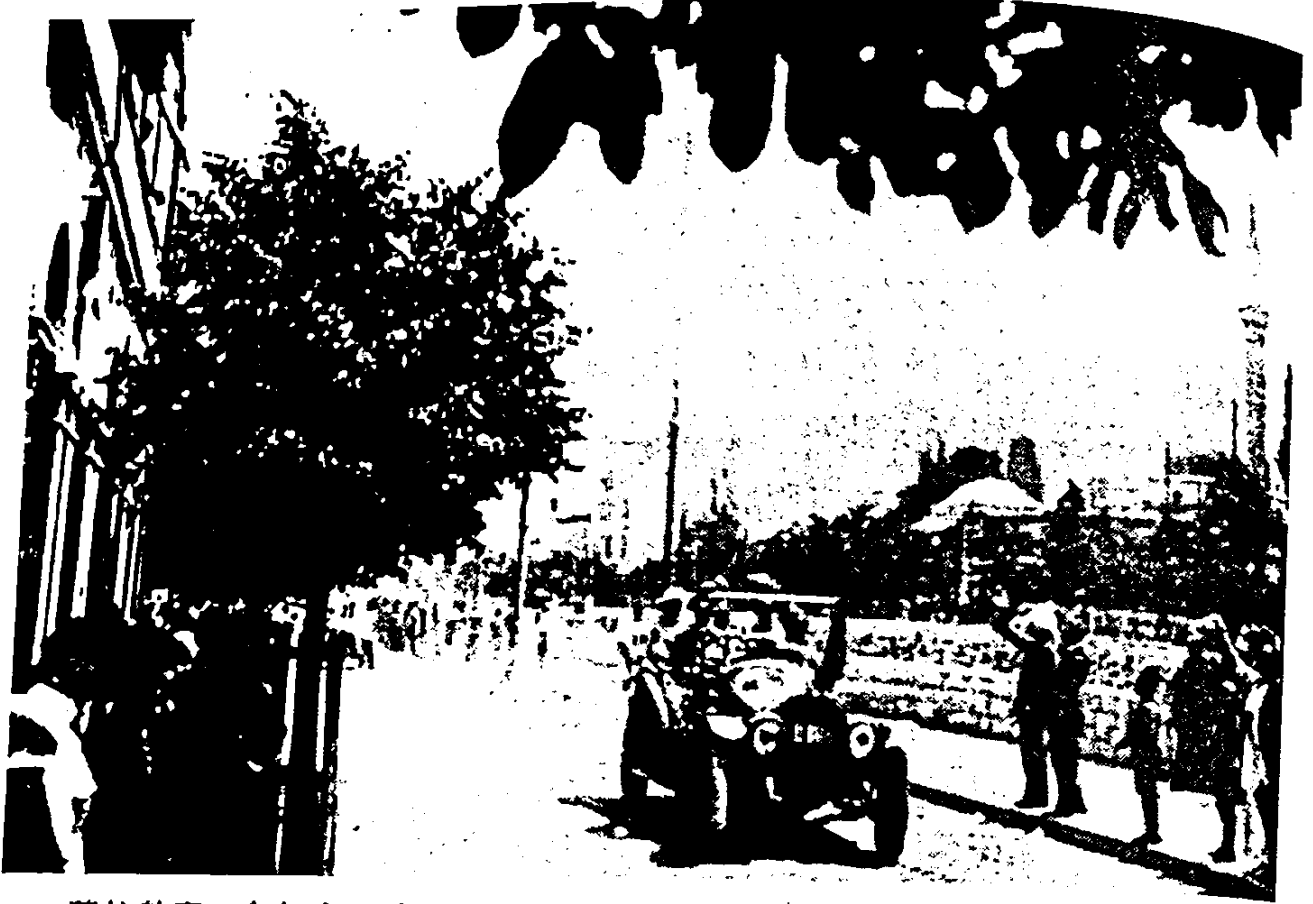
129 宮廷和右翼權力集團的阻撓，包括此時作為國務會議成員的謝爾蓋·維特的阻撓。<sup>178</sup> 權力集團不會允許斯托雷平推行完整的現代化綱領，讓俄國走上強大、繁榮的道路，以應對大量的地緣政治挑戰。「對於斯托雷平的死亡，我當然感到惋惜，」彼得·杜爾諾沃，斯托雷平在國務會議中的另一個死敵，1911年在右翼政客的一次會議上說，「但現在至少改革結束了。」<sup>179</sup> 的確如此：改革死了。同時，值得注意的是，斯托雷平基本上沒有考慮過直接向民眾發出呼籲，以便向冥頑不化的權力集團施壓，儘管他最終提倡的是一個廣泛的東正教「民族」。他忠於君主制，想把神授的專制權力與合法的權威，任性與法律，傳統與革新融為一體，但他依靠的是一個蓄意反對大眾政治的杜馬，目標是建立一個（像他自己那樣的）鄉紳的政權。有個被迫逃離俄國的難民在1928年移民國外時稱讚斯托雷平是俄國的墨索里尼，是第一個「東正教法西斯主義者」，是全民族的社會領袖。<sup>180</sup> 完全不是這回事。斯托雷平在總理位置上充滿矛盾的五年，缺乏一種根本性的意識形態，而且在他走出來對人民發表講話時，也依然是權力走廊中的政治家。

在國際事務上，斯托雷平事實上沒能避免採取同英國結盟對抗德國的立場。不錯，他是在政策上對保守派取得了不太可能取得的重大勝利，不顧外交事務不屬於自己正式管轄的範圍，克制住了俄國對巴爾幹等地的強烈欲望。<sup>181</sup> 可那種來之不易的克制注定是不能持久的。斯托雷平死後僅僅過了三年，一場世界大戰就爆發了。戰爭，再加上俄國格格不入的保守派以及羅曼諾夫家族隱秘的血友病，乾脆把俄國的立憲專制連同整個立憲主義全都拋到了一邊。即使這樣，俄國的法西斯主義還是沒能生根。<sup>182</sup> 如果有誰在1913年紀念羅曼諾夫家族統治三百週年時就被告知說，右翼的法西斯主義專政和左翼的社會主義專政很快就會在不同的國家掌權，他或她是否會猜到，奪取並掌握政權的將是四分五裂、分散在西伯利亞和歐洲各地的俄國社會民主黨，而不是在1912年的選舉中成為國會最大政黨的德國社會民主黨？反過來說，誰又會想到，反猶太人的法西斯主義運動最終成功發展起來的會是德國，而不是世界上猶太人口最多並且有臭名昭著的《錫安長老會紀要》的帝俄？<sup>183</sup>

把焦點集中在地緣政治和國內的高層政治而不是左翼的革命活動，可以揭示出帝俄最重要的真相：沙皇政權沒有一個牢固的政治基礎，以迎接國際競爭中的挑戰。結果政權只能越來越依賴政治警察，將其視為應對各種挑戰的首選工具。（詩人亞歷山大·布洛克在革命後研究過沙皇警察機關的檔案，認為他們是俄國「唯一能正常運轉的機關」，並驚嘆其「準確描述公眾心態」的能力。）<sup>184</sup> 濫用警力並不是因為喜歡保安處或警察機關的手段；相反，沙皇等人絲毫看不起他們那種人。<sup>185</sup> 倚仗政治警察，其實是因為在君主專制與立憲民主黨人之間存在難以調和的敵意，是因為沙皇體制非常厭惡以它的名義進行的街頭動員。在現代，只是瓦解反對者還不夠，一個政權還必須把支持者發動起來。一種體制，執意局限於有限的特權階層，依靠警察和由農民組成的軍隊，在現代根本算不上是一個政治體，對於一個想要成為能夠與列強抗衡的大國來說肯定不是。一個現代的、統一的政治體，需要的不只是旌旗、手捧聖像的遊行、複調讚美詩（〈耶穌復活頌〉）和1913年那種一直追溯到17世紀的莫斯科的尋根之旅。事實證明，杜爾諾沃在1905至1906年領導拯救君主專制的過程中，有能力緩解俄國的政治危機，但沒有能力改變根本的結構。同樣樂於使用鎮壓手段的斯托雷平，政治上更具創造性，但也觸及了沙皇制度的政治極限。就現代性而言，俄國君主專制的所有失敗，最大的莫過於它在威權主義大眾政治上的失敗。

專制俄國阻撓現代的大眾政治，結果把群眾，以及他們對社會正義的深切而普遍的渴望，交給了左翼分子。至於後者，包括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在內，極端的派系鬥爭讓他們四分五裂，政府的嚴厲鎮壓讓他們受到嚴重的削弱。在君主專制下，不但是俄國的法西斯主義，就連左翼的各個反對黨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失敗的。可斯托雷平死後還不到十年，這個出生於格魯吉亞的俄國社會民主黨人、時評家兼鼓動家約瑟夫·「柯巴」·朱加施維里，就取代了病怏怏的羅曼諾夫家族的繼承人，接手打造了一種奇特的專制權威，其權力之大，遠遠超過了帝俄的歷代君主或斯托雷平實際行使的權力。要說上述的結果無法預料，那就未免太輕描淡寫了。





21 薩拉熱窩，奧匈帝國波斯尼亞和黑塞哥維那的首府，1914年6月28日。哈布斯堡王朝的皇儲弗朗茨·斐迪南大公乘坐轎車駛近席勒熟食店附近的街角，而19歲的加夫里洛·普林西普在上次的暗殺陰謀失敗後正守候在那裏。大公改變了視察路線，但司機沒有接到通知，拐錯了方向，還讓車子熄了火。



22 正在服刑的普林西普，約1915年。



23 西伯利亞的庫列伊卡村，剛好在北極圈外。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斯大林的大部分時光在這裏度過。即使是在為時短暫的沒有積雪和寒風的季節，這裏的荒涼和與世隔絕也顯而易見。

24 西伯利亞流放者在圖魯漢斯克地區(面積要比英、法、德三國加起來還大)的行政中心莫納斯特爾斯科耶，1915年7月。戴着眼鏡的斯維爾德洛夫坐在前排，在他旁邊、戴帽子的是格里戈里·彼得羅夫斯基。斯大林在後排，戴着黑色的帽子。斯大林的右邊是列夫·加米涅夫，左邊是蘇倫·斯潘達良，後者在34歲時死在了這片冰凍的荒原。加米涅夫此時正在受到黨內的「審判」，因為他反對列寧關於布爾什維克要謀求俄國在軍事上的失利的觀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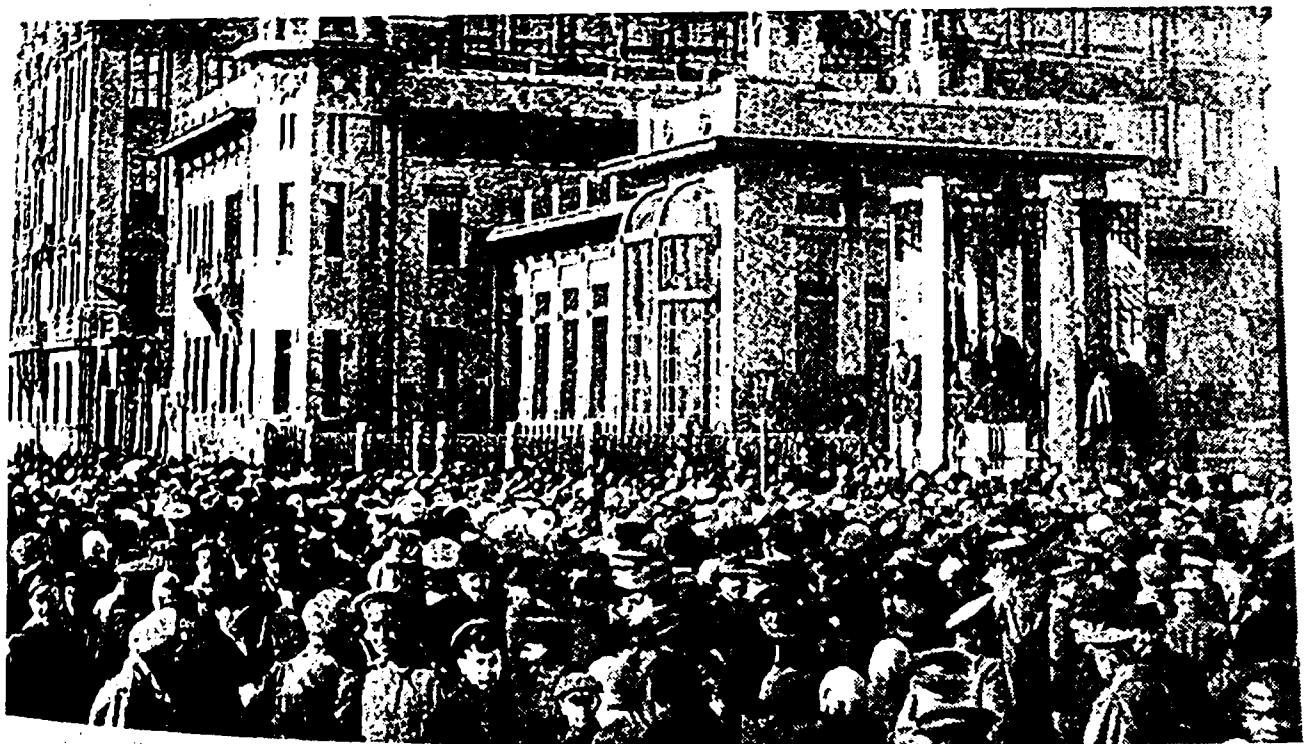
25 拉夫爾·科爾尼洛夫，帝俄軍隊最高總司令，1917年。克倫斯基寫道，科爾尼洛夫「很少光顧時髦人物的客廳，儘管這些人物對總參謀部的任何軍官都永遠敞開大門……人們認為他不太喜歡拋頭露面，甚至有點兒『不開化』」。實際上，愛國者們指望科爾尼洛夫去拯救俄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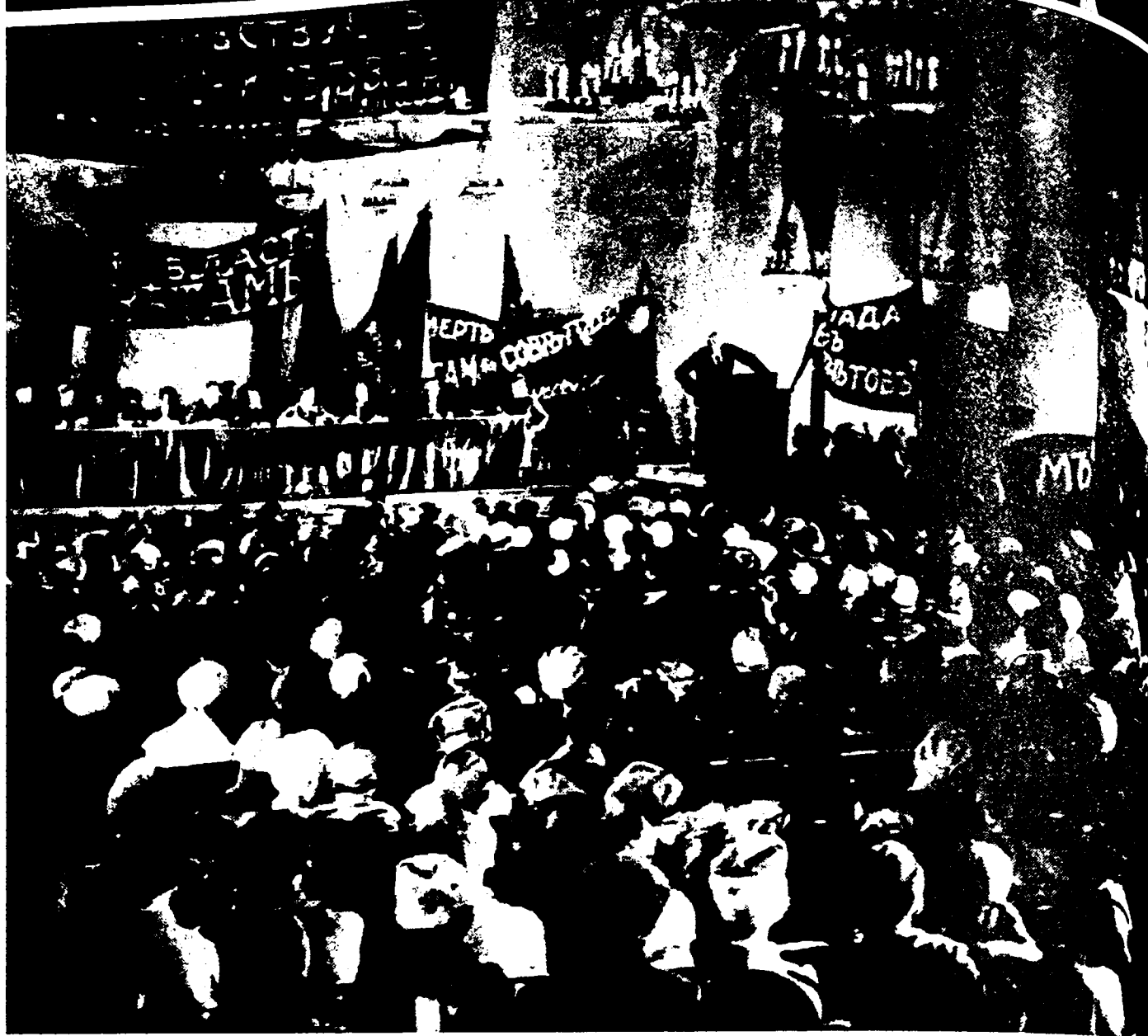
26 亞歷山大·克倫斯基和弗拉基米爾·列寧。同這兩位政治上的對手一樣，列寧照片的拍攝者帕維爾·朱可夫 (Pavel Zhukov)，恰好也是辛比爾斯克本地人。



27 馬蒂爾達·克舍辛斯卡婭，生於波蘭的俄國馬林斯基皇家劇院首席芭蕾舞女演員、尼古拉二世曾經的情婦，聖彼得堡，1900年。1917年，她的豪宅被佔用，在7月之前一直是布爾什維克的第一個總部。（這位芭蕾舞女演員移居法國，嫁給了她的兩個羅曼諾夫大公情人中的一個，活了將近一百歲。）攝影：雅科夫·施滕貝格 (Yakov Steinberg)。



28 這座新藝術運動風格宅邸的外觀。宅邸與冬宮隔河相望，戰略位置十分重要。列寧常常在小陽台上發表雷霆般的演說。



29 奪權：蘇維埃第二次代表大會，旗幟上的標語是「全部政權歸蘇維埃」，彼得格勒的塔夫利達宮，政變第二天的夜裏，1917年10月26日。攝影：帕維爾·奧楚普 (Pavel Otsup)。「當我進入大廳，」編年史家尼古拉·蘇漢諾夫寫道：「有個我不認識的人，謝頂、臉刮得乾乾淨淨的，站在台上激動地說着，大嗓門，有些嘶啞，粗聲粗氣，言語的最後往往突然加重語氣。哈！這是列寧。」

30 尤利烏斯·策傑爾包姆，人稱馬爾托夫，他在代表大會的第一天帶領孟什維克退出了會場，以抗議布爾什維克的政變。他在1918年抨擊斯大林，而且成了斯大林和列寧之間產生嫌隙的根源。





31 1918年初，彼得格勒斯莫爾尼宮的布爾什維克政府（人民委員會），列寧在中間，斯大林手托着臉，靠在牆上。左派社會革命黨人，比如郵電人民委員普羅什·普羅相（在列寧右邊），當時短暫加入了布爾什維克主導的政府。照片中沒有托洛茨基（他可能在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同德國談判）。

32 左派社會革命黨的領導人、著名的恐怖分子瑪麗亞·斯皮里多諾娃，彼得格勒，1917年。1918年7月，斯皮里多諾娃本來是有可能終結列寧的統治的，但她沒有。





Иосиф Виссарионович  
Сталин  
(1918г.)



Надежда Сергеевна  
Аллилуева  
(1917г.)

33 斯大林相冊中的一頁：他本人在1915年和娜佳·阿利盧耶娃在1917年的照片。他們是在1918年結婚的。那年秋天，斯大林把她作為自己的秘書帶到察里津。1918年，斯大林在察里津建立了一種地方性的個人專政，這預示着他日後會掌握全國的權力。



34 身着皮裝的陸軍人民委員、新任共和國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托洛茨基在喀山附近的伏爾加河上，1918年9月。列寧剛剛遭到槍擊，托洛茨基如旋風般返回莫斯科之後又到前線挽救局勢。



35 突厥斯坦方面軍司令員、人稱格里戈里·索柯里尼柯夫的吉爾希·布里連特(右三)和下屬拉扎·卡岡諾維奇(右二)以及當地的幾名布爾什維克突厥斯坦委員會委員在一起，1920年秋。卡岡諾維奇後來成了斯大林在中央機關的門徒，而索柯里尼柯夫則成了斯大林領導下的蘇聯財政人民委員，負責監管新經濟政策。



36 想要恢復大蒙古帝國的羅曼·馮·溫格恩-什捷爾恩貝格男爵。他無意中把外蒙古送給了蘇俄。攝於他被布爾什維克抓獲並受到審訊期間。照片上，他穿着蒙古袍，戴着帝俄的聖格奧爾吉勳章。據說他會把俘虜的心臟挖出來，放在用頭蓋骨做成的碗裏，當作獻給藏傳佛教神靈的祭品。





37 如林的槍刺。紅軍慶祝戰勝彼得·弗蘭格爾男爵指揮的最後一支白軍，克里米亞，1920年。

38 苦難。孱弱的帝國和過高的雄心，再加上巨大的失誤和頑固的成見造成了甚麼——饑荒的受害者，察里津，1921至1922年冬季。1925年，察里津更名為斯大林格勒。





## 第二部

# 杜爾諾沃的革命戰爭

從把所有災難都歸咎於政府開始，麻煩就來了。立法機關會對政府發起猛烈的攻勢，接着，全國出現革命鼓動，用社會主義的口號喚醒和召集群眾，先是分田地，然後分房產和所有值錢的東西。被打敗的軍隊失去了最可靠的士兵，在農民對於土地的原始慾望的裹挾下，士氣低落，無法充當法律和秩序的堡壘。立法機關和知識界的反對派……將無力阻止被他們自己喚起的民眾浪潮。

——彼得·杜爾諾沃論與德國開戰的後果，  
1914年2月致尼古拉二世的備忘錄

1905至1911年，除了俄國，墨西哥、卡扎爾王朝統治下的伊朗、奧斯曼帝國、中國和葡萄牙，也都發生了革命，這些國家的人口總數佔全世界的四分之一。每一場革命最後都開啟了立憲的進程。這是全球的重大時刻，在某些方面類似於1780年代，那時在美國、法國和加勒比海地區都爆發了革命。但20世紀初的憲政實驗，一個接着一個，很快就被破壞或顛覆了。(只有葡萄牙持續的時間長一點，歷經38位總理，直到1926年發生軍事政變。)自由很誘人，但是把自由制度化卻是另一回事。要爭取憲政，往往就需要俄國立憲民主黨(卡傑特)領袖帕維爾·米留可夫那樣的知識分子上台，然後把國家作為工具，將落後的社會變得現代化。然而，由知識分子領導的向現代躍進的古典自由主義夢想，撞上了社會的壁壘——由城市勞動人口和以村社生活為取向的大多數農村人口構成的社會壁壘。以令人羨慕的英國和美國為例，古典自由主義秩序早在大眾政治發端之前就制度化了。<sup>1</sup>事實證明，到20世紀初開始實行的憲政過於狹隘，無法滿足群眾的要求。與憲政相關的積極變化，往往由於社會的混亂而受到質疑。(1910至1914年，僅僅沙俄的歐洲領土上，有記載的農民騷亂就有大約17,000起。)<sup>2</sup>另外，有自由化傾向的知識分子雖然是受到歐洲先進國家的啟發，但歐洲列強卻成為阻撓政治開放的幫兇，支持中國、墨西哥和伊朗等地的「統治勢力」。在奧斯曼帝國，想要推動現代化的人背棄了自由化。中國的憲政實驗讓位於軍閥統治；墨西哥爆發內戰。<sup>3</sup>俄國也存在事實上的內戰(1905–1907)，只不過統治勢力贏了。

131

132

如果說20世紀初的俄國顯得與眾不同，那是因為其統治勢力在取得勝利的同時，士氣也瓦解了：他們不喜歡「立憲專制」這個結果，而且，他們雖然同沙皇關係密切，卻開始不尊重他。<sup>4</sup>與此同時，俄國有望發生的激進社會主義革命也深陷泥潭，可能比情況堪憂的憲政還混亂得多。社會主義者士氣低落，一方面是由於嚴厲的警察體制，另一方面是由於他們自己的派系鬥爭。更為根本的是，俄國的社會主義者雖然鄙視資產階級，但大多認為憲政是歷史發展的必然階段，因而他們支持的是憲政（「資產階級」民主），而不是社會主義。

「社會主義」，具體來說，意味着西伯利亞的那種生活。不錯，由於1913年慶祝羅曼諾夫家族統治三百週年的大赦，許多人都解除了國內流放。列夫·羅森菲爾德（加米涅夫）回到聖彼得堡，做了《真理報》的編輯。該報創辦於1912年1月布爾什維克主導的黨的布拉格代表會議，1912年4月22日開始出版；柯巴·朱加施維里撰寫了創刊號上最重要的文章，號召「無產階級……無論如何要聯合起來」。<sup>5\*</sup>在非法產生的中央委員會——清一色是布爾什維克——朱加施維里剛剛成為一名委員，他從流放地偷偷逃回聖彼得堡。但他在文章見報的當天中了保安處的埋伏，在夏天被趕到遙遠的科爾帕舍沃，那是西伯利亞北部偏遠地帶的一個村子，靠近納雷姆（在漢特語†中的意思是「沼澤」）。<sup>6</sup>1912年9月，他在冬季來臨前乘船逃走了，拿着一個波斯商人的護照，設法去哈布斯堡皇朝統治下的克拉科夫找到了列寧。在民族事務上，列寧自認為是黨內的一位頂級專家，但朱加施維里關於民族問題的研究讓列寧對他刮目相看。列寧寫信對高爾基（Maxim Gorky）說：「我們這裏有一位非常好的格魯吉亞人正在埋頭給《啟蒙》雜誌寫一篇大文章，他搜集了一切奧國的和其他的材料。」<sup>7‡</sup>〈馬克思主義和民族問題〉與朱加施維里僅有的另一篇長文（〈無政府主義還是社會主義？〉）沒甚麼兩樣，

133

\* 譯註：《斯大林全集》第2卷，第243頁。

† 編註：漢特是居住在俄羅斯中西部的土著民族。

‡ 譯註：《列寧全集》第46卷，第244頁。

一定程度上都是沿襲他人的看法。它在界定「民族」的時候，借用了德國人卡爾·考茨基提出的三個特徵（共同的語言、地域上和經濟上的聯繫）以及奧地利馬克思主義者奧托·鮑威爾（Otto Bauer）提出的一個特徵（共同的民族性格）。<sup>8</sup> 但這篇文章意義重大，因為在使用多種語言的俄羅斯帝國，它抓住了革命的一個關鍵問題，主要駁斥了奧地利馬克思主義者及其格魯吉亞孟什維克信徒的觀點。文章的意義重大，還在於其署名——「斯大林」（「鐵人」）。<sup>9</sup> 這個強悍而響亮的化名，不僅勝過「怪人奧西普」、「麻子奧斯卡」，或者帶有高加索特色的「柯巴」，也是俄羅斯化的。當這篇文章用俄文發表在《啟蒙》雜誌1913年3至5月那一期，「斯大林」已經再次回到聖彼得堡。在那裏，他在一次為國際婦女節募捐的舞會上再次中了埋伏，出賣他的是另外一名布爾什維克中央委員，名叫羅曼·馬林諾夫斯基（Roman Malinowski）。這人是個小偷，爬上了五金工人工會主席的位置，也是隱藏的保安處奸細。<sup>10</sup> 斯大林又被趕到了西伯利亞，加米涅夫最後也到了那裏。

在俄國國內，馬林諾夫斯基成了僅存的尚未被捕的布爾什維克高層領導。列寧讓他指揮俄羅斯帝國境內布爾什維克活動的整個組織。<sup>11</sup> 布爾什維克領袖認為，黨的成員只能是職業革命家——據說在不合法的情況下，這樣收緊條件是必要的；斯大林也持有相同的立場——這一觀點已經破產。公平地說，保安處也控制了同樣極具密謀色彩的社會革命黨的恐怖組織。<sup>12</sup> 疑心越來越重的俄國革命者，在照鏡子的時候「都弄不清他們自己是不是奸細」，布爾什維克尼古拉·布哈林（Nikolai Bukharin）後來回憶說。<sup>13</sup>

保安處的手法是很精熟，可君主專制還是沒有擺脫炸彈的威脅。在紀念羅曼諾夫家族統治三百週年的時候，聖彼得堡保安處一邊補充人手，一邊禁止人群聚集，因為他們擔心人們會搖身一變，打出紅旗，搞起示威活動。他們還擔心，沙皇會像他的祖父亞歷山大二世一樣遭到暗殺。<sup>14</sup> 「這座城市簡直成了兵營」，憲兵隊長回憶說。難道「專制君主」在他自己的首都也不安全嗎？過度嚴厲的管制給首都的慶祝活動蒙上了一層陰影。在1913年羅曼諾夫皇朝的慶祝活動中，雖然首次舉行的俄羅斯聖像展受到廣泛讚譽，雖然再度上演了莫傑斯特·穆索爾格斯基

(Modest Mussorgsky) 的兩部歌劇《鮑里斯·戈杜諾夫》和《霍萬斯基黨人之亂》，雖然同年5月的三百週年慶典在莫斯科達到了高潮，但精英們非常清楚，沙皇不能公開四處走動。



尼古拉二世的表兄，德國的威廉二世，1913年為他自己的「節慶之年」舉行了盛大儀式。這一年是這位54歲的德國皇帝執政25週年，是普魯士打敗拿破侖一百週年，儘管當初打敗拿破侖並佔領巴黎的是俄國人。德國想要展示它的皇朝和令人炫目的現代性。<sup>15</sup>一邊是德國在歐洲大陸的巨大影響力，一邊是聖彼得堡對恐怖活動的擔憂，在那位1905至1906年拯救了羅曼諾夫皇朝的人心中，這種對比非常強烈。

彼得·杜爾諾沃是用警察的眼光來看待外交事務的。<sup>16</sup>早在1904年，在他認為「毫無意義」的俄日戰爭爆發的時候，他就對自己的前任俄國內務大臣講過「一個天真的想法：用外交勝利來整頓國內的混亂局面！」<sup>17</sup>杜爾諾沃在1906年4月被免去內務大臣的職務之後，成了俄國上院（國務會議）右翼集團的領袖。憑藉這一位置，他開始破壞1905年後的憲政實驗（儘管實驗本身也不怎麼樣），專同斯托雷平作對。<sup>18</sup>杜爾諾沃以敢於當面而不是背後表達不受歡迎的觀點而著稱，而且他對沙皇也是這樣。<sup>19</sup>1914年2月，為了調整俄國的政策方向，他向尼古拉二世提交了一份長篇備忘錄，上層精英大概有50人收到了備忘錄。<sup>20</sup>有些人說只需要展示俄國的力量並且和英法聯手，就可以震懾德國，杜爾諾沃對此嗤之以鼻。<sup>21</sup>「就我們此時正在經歷的這段世界歷史來說，核心因素就是英德之間的競爭」，他解釋道，並且還說，英德之間的「生死較量不可避免」。他表示，原先只是俄英達成「諒解」的東西（協約），不知何故成了一種正式的盟約，而在英德衝突中是沒有必要選擇站在英國一邊的，因為在德俄之間，不存在根本的利害衝突。另外，跟外交部的人員不同——他們所遠離的沸騰的階級仇恨，杜爾諾沃這位前警察可是直接面對過的——他着重強調戰爭會在國內產生怎樣的災難性影響以及政府會受到怎樣的責難。「萬一戰敗，」他在1914年2月給尼古拉二世的上述備忘錄中寫道，「必然會出現形式最極端的社會革命。」杜爾諾沃

明確地預言說，貴族的土地會被剝奪，「俄國會陷入令人絕望的無政府狀態，結局難料。」<sup>22</sup>

同實力超強的德國開戰是可以避免的；俄國一旦戰敗會如何；俄國的精英們冒失地對君主專制施壓，只會帶來極端的社會革命——這些分析直率而冷靜。弗拉基米爾·列寧沒有一篇文章，哪怕是他後來論戰性的名作〈國家與革命〉（1917年8月），可以有杜爾諾沃那樣的洞察力。「沙皇制度勝利了，」列寧在談到1917年之前的歲月時寫道，「一切革命黨和反對黨都失敗了。消沉、頹喪、分裂、渙散、叛賣和色情代替了政治。」<sup>23</sup> 就革命者而言，這樣說基本正確。然而，儘管警察機關遏制了革命黨的勢頭，但工人的社會主義鬥爭精神（這種精神在1912年的勒拿大屠殺中復活了），特別是農民對土地的渴望所引發的騷亂浪潮（這種騷亂影響了軍隊），卻成了一種持久並且大得多的威脅。這一點，極端保守的杜爾諾沃要比想要成為職業革命家的那些人看得更清楚。從1900年開始一直到1917年，除了兩年之外（1905–1907），列寧完全生活在國外，主要是瑞士。托洛茨基在1902至1903年和1907至1917年也流亡國外。加米涅夫和格里戈里·拉多梅斯利斯基（季諾維也夫）1917年之前都在監獄、西伯利亞或歐洲度過了很長時間。列寧在社會民主黨內的那些宿敵，比如馬爾托夫和帕維爾·阿克雪里羅得，情況也是如此。俄國人數最多的左翼政黨社會革命黨的領導人維克托·切爾諾夫（Victor Chernov），1899至1917年一直僑居國外。杜爾諾沃不是從日內瓦、巴黎或柏林，而是從內部，尤其是從內務部內部去認識沙皇體制的。同生活在國外的人相比，甚至是同大部分生活在國內的人相比，他對君主專制的空心化看得更透徹。<sup>24</sup> 同樣重要的是，俄國權力集團的成員擔心社會底層會出現新的「普加喬夫式的」暴動，而杜爾諾沃則譴責俄國的上層階級，尤其是立憲民主黨，他們爭取政治權利，反對君主專制，卻沒有像他那樣意識到，好鬥的群眾一旦被煽動起來，就會走得更遠，會將他們全都吞沒。<sup>25</sup>

\* 譯註：〈列寧全集〉第39卷，第8頁。



可是，有先見之明的杜爾諾沃提出了甚麼建議呢？他竭力主張的，不是讓實行君主專制的俄國去和實行議會統治的英國結成「不自然的同盟」，而是要同政治制度相似的德國——它實行的是某種保守的君主制——結盟，並最終成為大陸集團的一員，而大陸集團還包括法國（後來設法同德國達成了和解）和日本。<sup>26</sup> 但是，怎樣才能實現那樣的局面呢？德皇準備由德國控制土耳其海峽，而俄國出口的糧食有75%要通過土耳其海峽，那裏對於帝國的繁榮至關重要。<sup>27</sup> 另外，從國內來說，杜爾諾沃傾向於像1905年那樣，再次進入緊急狀態，可是，就在他提交備忘錄的時候，俄羅斯帝國的1.3億臣民，已經有大約五分之二生活在軍法管制或特殊制度之下（「強化保護」）。杜爾諾沃忠於自己的原則，沒有採取右翼民粹主義的做法，用重新分配土地來贏得農民的支持。這並非因為他和國務會議或杜馬中的大多數人一樣，也擁有大量的土地（他沒有），而是因為他害怕混亂。<sup>28</sup> 他也不會公開指責民主制，而是承認它可能對有些國家合適。不過，他認為民主制會給俄國帶來分裂，俄國需要「穩定的權威」。<sup>29</sup> 但他的遏制策略——盡可能保留集中的權力，拒絕和杜馬合作，等待一位真正的專制君主來負起責任——是一種保持現狀的辦法。<sup>30</sup> 他自己明白，兩難的核心在於：政府需要通過鎮壓來爭取時間，但鎮壓又會讓更多的人離心離德，從而進一步削弱政權的社會基礎，結果就需要更多的鎮壓。「我們進了一條死胡同，」杜爾諾沃在1912年哀嘆說，「我擔心我們大家，連同沙皇一起，都出不去了。」<sup>31</sup>

要是與德國發生戰爭，哪怕是這位沙皇政權中還在世的最能幹的警察也回天乏術。<sup>32</sup> 不但是杜爾諾沃，斯托雷平也一直警告說，再有一次大的戰爭，那對於俄國和這個皇朝來說將會是致命的。<sup>33</sup> 更重要的是，杜爾諾沃明白，在世界大戰中垮掉，會讓隨後的一切大受影響。<sup>34</sup> 就像他所預言的，針對德國的新的戰爭確實成了一場革命戰爭，它果真給社會主義者幫了忙，果真造成了無政府狀態。「不管聽起來多麼荒謬，」孟什維克社會民主黨人費奧多爾·古爾維奇（Fyodor Gurvich，又名「費奧多爾·唐恩」〔Fyodor Dan〕）回憶說，「同俄國所有的『職業革命家』相比，沙皇官僚中極端的反動派對於各種力量的消長和即將到來的這場革命的社會內涵要領會得更快、更好。」<sup>35</sup>



對沙皇俄國的懷舊情緒，不管有多麼合乎情理，總歸是一種錯位：「立憲專制」根本就行不通，也不會發展成更好的事物，市民團體的發展永遠無法取代俄國缺失的自由主義政治制度，也無法勝過非自由主義的政治制度。<sup>36</sup> 在大批政黨以非法的形式突然間紛紛湧現的時候，左翼政黨是率先成立的：亞美尼亞革命聯盟（達什納克黨）（1898），波蘭社會黨（1892）、猶太人「崩得」（1897）、俄國社會民主工黨（1898）——它在1903年分裂成布爾什維克和孟什維克——猶太人社會民主工黨或錫安山工人黨（1900）、社會革命黨（1901）。1905年成立的有立憲民主黨或卡傑特（古典自由主義者），以及俄羅斯人民同盟（法西斯分子的雛形）等。<sup>37</sup> 對君主專制而言，所有這些組織起來的政黨，甚至是反社會主義分子，都很可惡。結果君主專制拒絕讓步，一律對它們，包括立憲主義者，實行打壓。戰時的激進化一方面引發了五花八門的暴力做法，另一方面也使得俄國奇特的政治譜系進一步左傾。「布爾什維克革命，」有學者敏銳地評論說，「把在1914至1921年的全歐大災難中幾乎普遍存在但為時不久的做法，變成了蘇維埃國家的永久特徵。」當然，就像那位學者接着所說的，那些帶有暴力色彩的做法，那種國家建設，是由觀念驅動的。<sup>38</sup> 並且不是隨便甚麼觀念，而是從頭到腳改造一切、建立社會主義人間天堂的幻想。這些具有超凡力量的觀念，反過來又因為像斯大林那樣被革命推上政治舞台的新人得到發揚光大。

對於一個來自小城哥里，從梯弗里斯、奇阿圖拉、巴庫和西伯利亞流放地一路上升到近乎權力的頂峰，並致力於把馬克思主義思想付諸實踐的格魯吉亞人來說，必須將整個世界夷平。也確實如此。在那些重大事件中，斯大林幾乎無所作為。和1905至1908年的瘋狂歲月或1917年3月之後的那段時間不同，從1909年直到1917年年初，在他的生活中，幾乎沒有甚麼值得關注的時刻。對於那幾年，大部分敘述要麼添枝加葉，使其顯得比實際情況更富有戲劇性，要麼就略過不提。雖然斯大林在此期間幾乎無所作為或者就是無所作為，可這段很長的時間對於俄國卻意義重大，對於世界實際上也是如此。要想理解斯大林在

1917年那個突發而又驚人的事件中扮演的角色，尤其是，要想理解他後來的整個政權，就必須對這段他在其中幾乎沒有起到甚麼值得關注的作用的重要歷史，進行深入的描繪和分析。不過，一旦真的接近了權力，斯大林就像一個具有天命意識的人，不屈不撓地戰鬥，而他所展示的革命才能，事實證明，特別適合那種橫跨歐亞大陸的環境。

現代的革命是驚天動地的事件。它讓人敬畏，因為成百上千萬的人站了起來，要求掌握自己的命運；它令人振奮，因為成百上千萬的人實現全新的團結，感覺到擁有無限的可能。但革命也是腐朽和崩潰的標誌，是一種統治體制的瓦解和另一種統治體制的草創。不管在街頭、兵營、工廠和戰場發生了甚麼或沒有發生甚麼，革命都是在中央和地方的權力走廊找到出路的。因此，必須研究高階政治\* 以及制度形成方面的核心事實、治理的做法與程序，以及影響權力行使的思維方式和存在方式。當然，高階政治在很大程度上要受到各種社會力量的影響，受到廣大群眾的行動和願望的影響，但政治並不能還原為社會的力量。實際上，儘管是誕生於歷史上最深入人心的革命，但是從舊的俄羅斯帝國中出現的新政權，甚至變得讓人民自己都無法理解。大眾參與的革命過程，到頭來產生的不僅有可能是、而且的確常常是一種狹隘的政權，這不是因為革命的「墮落」，或是因為好的意圖和好的開端被壞人或不幸的環境毀掉了，而是因為國際形勢處處在起着作用，因為制度不僅是從新世界的巨腹中也是從舊世界的碎片中產生的，因為觀念至關重要。對革命者而言，專政可以被視為罪惡，也可以被看作寶貴的手段；人可以被視為公民，也可以被看作奴隸，可以是有望改造的仇敵，也可以是與生俱來的敵人；私有財產可以被看作自由的柱石，也可以被看作奴役的基礎。一種有着深厚基礎、真誠追求社會正義的浪潮，可能會造成最嚴重的制度化的非正義，這一點取決於籠罩性的思想觀念和與之相伴的做法。成功的革命可能是一場悲

---

\* 譯註：高階政治 (high politics) 是政治學中的概念，指的是對國家生存至關重要的事務，比如外交、軍事、國家安全等；與之相對的低階政治 (low politics)，通常指和經濟、文化、社會有關的事務。

劇。但悲劇還有可能是地緣政治的宏大計劃。俄國的革命，和這個國家作為世界性大國長期存在的困境以及新的幻想分不開。那也將造就斯大林的品質。



## 愚蠢還是叛國？

這是甚麼，愚蠢還是叛國？（左邊有人說：「叛國！」〔另外有人說：〕「愚蠢！」大笑。）

——立憲民主黨（卡傑特）領袖  
帕維爾·米留可夫在杜馬的發言，1916年11月<sup>1</sup>

某個政權的滅亡通常並不是因為敵人的強大，而是因為保衛者的無能。

——列夫·季霍米羅夫（Lev Tikhomirov），  
俄國保守派理論家，1911年<sup>2</sup>

1910年，美國前總統（1901至1909年在任）西奧多·羅斯福在會見了德皇威廉二世之後，寫信對妻子說：「現在完全可以肯定，我們大家都沒有退路了。」<sup>3</sup>在德皇的前任兼祖父去世後（時年91歲），毫無經驗的威廉二世解除了75歲的總理奧托·馮·俾斯麥的職務。<sup>4</sup>這位年輕氣盛但沒有安全感的皇帝，旋即陰謀反對德國憲法和國會，並在對外政策上氣勢洶洶，激化了俾斯麥的統一所帶來的矛盾：在本身極易受到鄰國兩面夾擊的情況下，德國似乎又對鄰國構成了威脅。被稱為「最高統帥」的威廉二世拒絕續訂俾斯麥的所謂德俄再保險條約，結果無意中促成了俄法的和解，增加了德國兩線作戰的風險。<sup>5</sup>後來為了彌補這一錯誤，

140

威廉二世企圖誘使尼古拉二世簽訂比約克條約，不過沒有成功。接着就是德皇的海軍計劃。1913年，英國佔國際貿易的15%，德國緊隨其後，佔13%，因此，在這個全球貿易、尤其是重要的糧食進口日益互相依賴的世界，德國完全有權利建設一支海軍。<sup>6</sup>但威廉二世和他身邊的人異想天開，要在北海部署60艘戰艦。<sup>7</sup>此事推動了英國與法國，甚至與專制俄國的和解，雖然在1898年英法差點兒因為殖民地打起來。「皇帝就像氣球，」俾斯麥有次說過，「要是不把繩子拽緊了，你根本不知道他會飛到哪兒。」<sup>8</sup>

不過，一個巴掌拍不響，英國想在全球維護「日不落」的地位，這本身就具有侵略性。英國不得已——至少是暫時如此——把西半球的海上霸權讓給了崛起中的美國，把遠東的海上霸權讓給了暴發戶日本。（即便如此，皇家海軍的開支也要佔國家歲入的四分之一。）與此同時，英國在對外政策上一向最在意遏制俄國在波斯、中亞和中國對大英帝國構成的明顯威脅。由於俄國幅員遼闊，橫跨歐洲、中東和遠東，許多人將其視為全球唯一可以和大英帝國一爭高下的對手。<sup>9</sup>不過，早在1907年英俄協約簽訂以前，德國力量的上升就成了英國人關心的一個更為緊迫的問題。英德之間在經濟上和文化上聯繫密切。<sup>10</sup>但利益衝突也很激烈，而且和美國、日本的情況不同，英國不想讓德國強大起來。「在我看來，」寇松勳爵（Curzon）在1901年9月25日的一封信件中寫道，「在接下來的四分之一個世紀，國際形勢發展中最突出的地方，既不在於俄國的進步——那無論如何都是不可避免的——也不在於同法國的宿怨，而在於德意志帝國通過犧牲英國的利益得到的擴張；所以我想，不管是誰擔任英國的外交大臣，只要他願意好好地為自己的國家服務，就決不應該忽視上述考慮。」<sup>11</sup>一方是現在佔據主導地位的大國，一方是想在英國家門口的世界秩序中獲得一席之地之德國，要管控好兩者之間的對抗，需要雙方具備非凡的治國才能。<sup>12</sup>否則，對抗將引發軍備競賽，形成兩個具有同盟（或諒解）性質的敵對體系：協約國的英法俄對抗同盟國的德國和奧匈帝國。

同盟本身決不會引起戰爭，但算計和誤判是會的。<sup>13</sup>按照德國的判斷，戰勝英國的那條道路是要經過俄國的。就像英帝國主義者對俄國

在亞洲的擴張耿耿於懷一樣，德國軍方高層也把注意力集中在所謂俄國對歐洲的「威脅」上。從1860年代至1914年，俄德之間的GDP差距進一步拉大：例如，俄國1914年的鋼產量只有德國的25%，但俄國經濟同期增長了四倍。<sup>14</sup> 另外，德國軍方制訂計劃的人——他們的工作就是為可能發生的戰爭作好準備——不停地渲染俄國龐大的人口（約1.78億，而德國是6,500萬），以及俄國最近宣佈的、打算到1917年完成的重整軍備的強軍計劃。<sup>15</sup> 德國軍方高層認為，不能任由一個正在走向工業化的俄國，再加上歐洲的另外一個陸上強國兼俄國盟友的法國，選擇合適的時機在兩線發動進攻，同時，俄國在不久的將來就會構成威脅，必須予以先發制人的打擊。1914年5月，德軍總參謀長小赫爾穆特·馮·毛奇(Helmuth von Moltke the Younger)對奧地利軍隊的總參謀長抱怨說，要是「再等下去」，勢必會「貽誤戰機，同俄國拼數量是不行的」。<sup>16</sup> 德國急於發動一場所謂的自衛戰爭，打擊被認為現在還弱小，不久以後卻會變得不可戰勝的俄國。<sup>17</sup>

英國的誤判是個老問題。英國承諾要建立全球秩序，即「大英治下的和平」，卻沒有推行這種秩序的渴望或者資源，同時，英國令人眼紅的帝國主義政策招致各國的群起仿效，而這又反過來讓英國有了地緣政治方面的擔憂。「正是雅典的崛起和由此在斯巴達引起的擔憂使得戰爭不可避免。」古希臘歷史學家修昔底德寫道。公元前5世紀，科林斯和科西拉這兩個周邊的城邦爆發衝突，導致了雅典和斯巴達這兩大勢力之間的對決，這種對決既是它們都想要的，也是它們都會後悔的。俾斯麥把這樣的決定稱為擲出「鐵骰子」。以1914年為例，英國人並沒有仔細想過自己推波助瀾的那種對抗的後果。但是，雖然英德對抗是世界大戰的深層原因，俄國又是讓問題複雜化的關鍵因素，可戰爭的導火索並不像左翼分子和其他人期待的那樣，是在非洲殖民地問題上的對抗，而是在東歐，俾斯麥在1888年就警告說，那裏可能會因為「巴爾幹的某件該死的蠢事」而發生戰爭。<sup>18</sup> 在那裏，隨着奧斯曼帝國的收縮，其他幾個龐大的陸上帝國，即奧匈帝國、俄羅斯帝國和德意志帝國，就像不同的板塊一樣互相擠壓，小小的塞爾維亞斷裂帶就這樣引發了一場世界大戰和東線的俄國革命。



## 薩拉熱窩與國家聲譽

142

19世紀初，塞爾維亞脫離奧斯曼帝國，並在一個世紀後的兩次巴爾幹戰爭（1912–1913）中擴大了自己的疆域，但這兩次戰爭都沒有引發更大範圍的戰爭。誠然，奧匈帝國（從奧斯曼帝國那裏）吞併了波斯尼亞和黑塞哥維那，從而大大增加了自己的南斯拉夫人口，包括塞爾維亞人、克羅地亞人和波斯尼亞穆斯林。俄國沒能阻止的1908年的那次吞併，引發了波斯尼亞青年黨——一個致力於南斯拉夫人的事業的恐怖主義集團——無數次的密謀活動，想要推動南部斯拉夫人的獨立。1914年，波斯尼亞青年黨決定殺害奧地利在波斯尼亞和黑塞哥維那的首府薩拉熱窩的總督。但後來它的成員顯然是從報紙上得知，哈布斯堡王朝的皇儲弗朗茨·斐迪南大公（Franz Ferdinand）即將來訪，時間地點說得一清二楚，於是，他們轉而決定殺害大公。作為皇帝弗朗茨·約瑟夫（Franz Josef）的侄子，大公成為奧匈帝國的皇位繼承人純屬偶然，因為皇帝的兒子自殺了。許多觀察家都希望84歲的弗朗茨·約瑟夫——已經在位66年——甚麼時候能翹辮子，那樣一來，50歲的弗朗茨·斐迪南就可以嘗試整頓和穩定國內的政治局勢。畢竟這位妻子是斯拉夫人（捷克人）的大公，1913年曾經批評過奧地利軍隊的最高指揮官「好大喜功，想要征服塞爾維亞人和天知道的甚麼人」。

1914年6月28日，星期天，大公夫婦如期來到薩拉熱窩，而這天既是他們的結婚紀念日，也是塞爾維亞的聖維特斯節。當地的哈布斯堡王朝的總督，特意把訪問選在這個塞爾維亞的神聖日子。這節日是為了紀念1389年的一名塞爾維亞人設法在奧斯曼蘇丹的帳篷裏刺殺了他（接着，衛兵們也砍掉了刺客的頭顱）——當時，科索沃戰役已經打輸了，正是這場戰役終結了塞爾維亞帝國。<sup>19</sup> 弗朗茨·斐迪南坐着敞篷汽車，像事先公佈的那樣巡遊，分散佈置在沿途的六名波斯尼亞青年黨恐怖分子中的第一個沒有行動。第二個倒是向大公的汽車扔了一顆小炸彈，炸彈蹦到後面一輛車的車底爆炸，炸傷了兩名軍官，但皇儲還可以繼續趕路；剩下的陰謀分子仍然守在位置上，但誰都沒有動手。哈布斯堡皇儲在摩爾風格的薩拉熱窩市政廳發表了演說。這次大膽的暗殺行動搞砸了。

在市政廳，演說和儀式結束後，大公決定改變行程，到醫院看望被炸彈炸傷的人。在當天那些沒有採取行動的刺客當中，有一個波斯尼亞青年黨的成員，19歲的波斯尼亞塞爾維亞人加夫里洛·普林西普(Gavrilo Princip)。他努力鎮定下來，在薩拉熱窩弗朗茨·約瑟夫大街靠近莫里茨·席勒熟食店的地方佔據了一個位置，希望在弗朗茨·斐迪南餘下的行程中截住他。大公的司機不知道要去醫院，結果拐錯了彎，把車開向弗朗茨·約瑟夫大街。聽到呵斥後，他開始倒車，但車子熄了火，而且熄火的地方離普林西普只有大概五英尺\*的距離。普林西普兄弟姊妹八人，其中六人夭折，他自己也患有肺結核，人長得比較瘦小。他過去的梦想是成為詩人。突然間，歷史變得如此之近：他拔出手槍，向奧地利皇儲——他戴的頭盔飾有綠色的羽毛，非常顯眼——和他的妻子射擊(本來是想打總督的)。兩人幾乎當場死亡。

塞爾維亞剛打過兩次巴爾幹戰爭，死了至少4萬人，這個國家最不需要的就是再來一次戰爭。但是在全部由奧匈帝國臣民組成的波斯尼亞青年黨恐怖分子被抓獲後，有人證明說，他們是由塞爾維亞的軍情機關——那個無賴國家的無賴角色——暗中武裝和訓練的。<sup>20</sup>塞爾維亞總理沒有發起暗殺行動，但也沒有堅決反對，而且他制止不了塞爾維亞國內幸災樂禍的情緒，結果加劇了維也納的憤怒。「陸軍部前面的一大片地方到處都是人，」正在維也納流亡並擔任基輔一家報紙通訊記者的列夫·托洛茨基寫道，「這不是『公眾』，而是實實在在的人民，穿着破靴子，手指粗糙……他們揮舞着黃黑相間的旗幟，唱着愛國歌曲，還有人喊着『塞爾維亞人全都去死吧！』」<sup>21</sup>要是弗朗茨·約瑟夫皇帝對「薩拉熱窩暴行」不做點兒甚麼，那會助長將來的政治恐怖行動。但該做出何種程度的回應呢？1740年，哈布斯堡家族差點兒失去他們的國家，1848至1849年又一次差點兒失去他們的國家；1914年，他們遇到了就連多民族的俄羅斯帝國都沒有遇到的困難局面：奧匈帝國的11個主要民族，只有5個基本上都分佈在國內，其餘的6個民族，主體都生活在

---

\* 編註：約1.5米。

帝國的範圍之外。<sup>22</sup> 奧地利的統治集團決定打垮塞爾維亞，哪怕要冒着挑起歐洲全面戰爭的風險——實際上就是因為怕死而冒險自殺。

7月5日，維也納特使訪問柏林，請求德國幫助對付塞爾維亞人，返回時得到了德皇威廉二世的承諾——「全力支持」。還有個問題，就是要得到布達佩斯，即奧匈帝國匈牙利那一半的領導層的同意。7月23日，在經過與匈牙利幾位領導人的內部協商（他們是在7月9日坐船過來的）以及緊張的軍事準備後，維也納給貝爾格萊德下達最後通牒，列出十項要求，其中包括同意聯合調查小組在塞爾維亞境內接受奧地利官員的監督。除了這一條——這是對其主權的侵犯——以及另外一項，塞爾維亞政府有條件地接受了這些要求。即使到了這個時候，弗朗茨·約瑟夫皇帝仍有可能找到挽回顏面的台階。「沒有甚麼才能，」偉大的歷史學家雅各布·布克哈特（Jacob Burckhardt）在談到哈布斯堡這個在歐洲最偉大的家族時寫道，「但是具備友善、莊重和審慎，以及困厄時的忍耐和鎮靜。」<sup>23</sup> 情況不再是那樣了：由於感覺到君主制或許已氣息奄奄、時日無多，7月28日，維也納在歷史上首次以電報的方式宣戰。<sup>24</sup>

更大範圍的衝突並沒有自動出現。衝突升級與否，主要取決於兩個人，「維利」和「尼基」，他們按照血緣和姻親關係來講是表兄弟。威廉二世瞧不起尼古拉二世，他在1901年維多利亞女王的葬禮上對英國外交大臣說，沙皇「只配在鄉下種種蘿蔔」。<sup>25</sup> 德皇根本沒有預見到俄國的大悲劇。至於尼古拉二世，他還在觀望，認為「戰爭對這個世界會是災難性的，一旦爆發就很難停下來」。<sup>26</sup> 1914年上半年，在聖彼得堡和帝國的其他地方，比如巴庫油田，罷工比1905年以來的任何時候都多，而且工人在1914年7月變得尤其危險，部分原因在於，他們在鎮壓面前開始鋌而走險。杜馬在6月初夏季休會之前，一直拒絕通過政府預算中幾個非常重要的部分，包括國內負責鎮壓的內務部的經費。至於俄國的軍事實力，俄國的盟友法國和英國估計得過高，德國和奧匈帝國估計得過低，但還不如俄國人自己估計的那麼低。<sup>27</sup> 況且俄國和塞爾維亞連正式的同盟關係都沒有，尼基表弟是不會因為某種所謂泛斯拉夫主義的浪漫說辭開戰的。<sup>28</sup> 俄國官員要求塞爾維亞人對奧地利作出合理的回應。但底線是俄國不會允許德國羞辱塞爾維亞，因為那會損害俄國

的聲譽，尤其考慮到先前俄國在1908年未能阻止奧地利吞併波斯尼亞和黑塞哥維那。<sup>29</sup> 尼古拉二世決心制止已經開始動員的奧匈帝國，但不是為了塞爾維亞，而是為了俄國。

德國領導層在7月底對一份在最後關頭提出的倡議有過短暫的猶豫，但奧匈帝國拒絕了和平試探的想法——而德國是同意的。要是威廉二世後退一步，管住要仰仗於他的盟友奧匈帝國，尼古拉二世就會作出讓步，而不是面對表兄的挑釁、國內精英要求予以強硬回應的壓力以及國內騷亂，下令，然後又取消，最終在7月31日再次下令，進行全面動員。<sup>30</sup>

145

然而俄國決不是無辜的受害者。要求沙皇取消杜馬，或者是把它降格為只具有諮詢性質的機關，這類陰謀層出不窮，越演越烈。實際上，決定開戰是尼古拉二世的一個招數，可以間接地打擊他所鄙視的杜馬。戰爭可以讓他恢復沙皇與人民之間直接而神秘的聯繫（把上一年紀念羅曼諾夫家族統治三百週年的活動延續下去）。對於要派去送死的無辜的臣民，沙皇確實頗為內疚，但讓他欣慰的是，可以擺脫可惡的政治妥協和對君主專制理想的侵犯。尼古拉二世幻想國內會「像偉大的1812年戰爭中那樣」掀起愛國高潮。<sup>31</sup> 一份外省報紙也流露出這樣的妄想。它在談到戰爭時寫道：「不再有不同的黨派，不再有爭議，不再有政府，不再有反對派，只有團結一致的俄國人民，準備長期戰鬥下去，直到流盡最後一滴血。」<sup>32</sup> 這裏存在一個重大錯覺：為了維護俄國國際聲譽而進行的這場猶猶豫豫、半信半疑的戰爭，被想像成國內政治的勝利——冬宮廣場上，成群的人們匍匐在沙皇面前。帝國進一步擴張的夢想也在飛揚：這是百年一遇的良機，可以奪取土耳其海峽和奧斯曼帝國安納托利亞的亞美尼亞人地區，可以吞併奧地利講波蘭語和烏克蘭語的地區，可以擴張到波斯、中國新疆和外蒙古。<sup>33</sup>

把俄國戰爭與革命的傳統聯繫突然顛倒過來的並非只有尼古拉二世——戰爭不再被認為是革命的誘因，而是可以在某種程度上預防革命。<sup>34</sup> 在柏林，缺乏安全感也助長了對外擴張與鞏固國內政局的幻想。德國容易受到兩面夾擊，於是就有了一個以征服歐洲大陸為目標的防禦計劃，史稱「施利芬計劃」，該計劃得名於阿爾弗雷德·馮·施利芬伯

爵將軍 (Alfred von Schlieffen, 1833–1913)。起初，制訂這一計劃的部分原因是，想用一種大膽的方式去游說，以獲得更多的戰爭資源，後來，小赫爾穆特·馮·毛奇對它作了修改。它要用重兵，以巨大的弧形為行軍路線，穿過比利時，折向法國，同時還要作好準備，打垮俄國。它希望德國利用戰術上的出其不意、機動性和出色的訓練來克服數量上的劣勢。<sup>35</sup> 悲觀的德軍總參謀部不像有時承認的那樣，過多地幻想戰爭會在短時間內結束，但也不會承認戰爭不再是行之有效的政策工具。對他們來說，戰爭仍然是一種解決問題的辦法，可以一勞永逸地解決國家面臨的諸多難題，而且平民也是這樣看的。因此，為了支持奧地利對抗俄國，為了不輸掉與俄國的軍備競賽這個更大的目標，德國就要侵犯中立的比利時，而這樣做也就意味着與英國開戰。<sup>36</sup>

人們不太瞭解的一個事實是，與德軍總參謀部對應的英國海軍部，一直計劃着要打一場這樣的戰爭，讓德國的金融體系突然崩潰，從而使德國經濟陷入癱瘓，使軍隊喪失發動戰爭的能力。據說這是一套可以用很小的代價取得速勝的方案，相當於英國的施利芬計劃。海軍部搞垮德國的計劃是由人稱德薩特勳爵 (Desart) 的漢密爾頓·「哈姆」·卡夫 (Hamilton "Ham" Cuffe, 1848–1934) 領導的對敵貿易委員會制訂的。它不僅把戰爭遠遠擴大到軍事以外的領域，還以國家對自由市場經濟的大規模干預為前提。海軍部試圖控制戰爭期間懸掛英國旗幟的商船及其所載私人貨物的流動，審查所有的電報網絡，監督倫敦城的金融活動。由於英國擁有最強大的海軍，以及差不多可以壟斷全球貿易體系的基礎設施，海軍部自以為它能夠控制動盪對於英國自身經濟的影響。這一切都違反了國際法。1912年，英國內閣批准了海軍部的計劃，甚至預先授權，一旦戰爭爆發就實施該項計劃。在英國國內，關於戰爭的爭論所關心的問題是，英國能否在切斷德國海運、通訊和信貸的同時，避免捲入嚴格意義上的軍事行動（即把部隊派往歐洲大陸）。<sup>37</sup>

英國和德國差點兒退縮。直到獲悉俄國已經開始動員，威廉二世才下令全力備戰。<sup>38</sup> 1914年8月1日下午5時，德皇簽署動員令，但僅僅過了23分鐘，德國駐倫敦大使就發來電報。英國外交大臣愛德華·格雷爵士 (Edward Grey) 「剛剛打電話給我」，德國大使寫道，「問我要是

法國在俄德戰爭中保持中立，我可否保證，我們不會進攻法國。」<sup>39</sup>這不是跟彼得·杜爾諾沃給尼古拉二世的（沒有得到重視的）建議，即不摻和英德之間的爭吵差不多嗎？它說明倫敦夢想着把德國的勢力引向東方，去和俄國爭鬥，從而避免戰爭。倫敦傳來的信息比較簡略。格雷和德國大使只談了六分鐘。但電報似乎觸及了整個20世紀前半葉世界政治將會面臨的核心問題，同時也是將會令斯大林政權進退兩難的主要問題，那就是，德國向何處去？

147

德皇十分得意，8月1日的電報讓人喜出望外：三國協約分裂，那就少了一條戰線。格雷似乎是在暗示，在德國支持奧地利對付塞爾維亞，因而也就是在德俄反目的時候，英國，甚至法國，可以保持中立。馮·毛奇怒不可遏。中止德國縝密的戰爭計劃並（設法）把西線軍隊全部調往東線，由此造成的巨大的安全隱患與混亂讓他不能不提出抗議：「陛下，那做不到。幾百萬人的部署不是說辦就能辦好的。」<sup>40</sup>可隨後發來的一封電報似乎證實，如果德國只進攻俄國，那英國就會保持中立，威廉二世下令祝賀。德皇還打電報給自己的另外一個表弟英王喬治五世，承諾說德國的部隊雖然在西線還在（為保衛國家）繼續動員，但不會越過法國邊界。交易似乎達成了。但就在同一天晚上，英王傳來一個驚人的答覆。答覆是格雷起草的，聲稱格雷同德國大使的談話是個「誤會」。<sup>41</sup>這是不是英國人背信棄義？不，只是愚蠢。巴黎決不會坐視德國消滅俄國，因為那會改變歐洲大陸的均勢，對法國極為不利，而且不管怎麼說，法國對俄國負有條約所規定的正式義務。格雷認為德國是一艘沒有舵的戰艦，可他自己的行為也很莫名其妙——他此時才提出條件：柏林要想達成交易，避免戰爭，那德國也不能攻打俄國。盛怒之下，威廉二世命令如釋重負的馮·毛奇，繼續準備去佔領比利時。經他修訂的「施利芬計劃」啟動了。<sup>42</sup>

德國對俄、法宣戰；英國對德宣戰。<sup>43</sup>德國官員通過巧妙的宣傳，使得德國的戰爭令像是對俄國的「挑釁」所作的必要回應，因為是俄國率先動員的。<sup>44</sup>（後來斯大林也認可這個總體性結論——結果造成災難性的後果——認為任何動員，哪怕是為了震懾或自衛，都不可避免地會走向戰爭。）<sup>45</sup>

148 德薩特勳爵的計劃也啟動了，至少是初步啟動，儘管各金融集團、貿易部門和其他利益集團都強烈反對這一宏大的戰略。但1914年7月由於失去信心而出現了驚人的金融恐慌：倫敦各銀行開始要求還清短期借款，大量拋售持有的匯票，凍結倫敦市場；利率暴漲。在紐約，歐洲投資者大量拋售美國的有價證券並要求用黃金支付。然而，由於擔心發生戰爭，保險費率抬得太高，以至於黃金的海上運輸停止了，而全球金融體系正是以這種金屬為基礎的。「一槍沒打，財富毫髮無損，整個世界的信用體系就瓦解了，」拉扎德兄弟公司管理部門的一位主管在1914年秋天說，「證券交易所關門，貼現市場不景氣……全世界的商業停滯，貨幣短缺，英格蘭銀行的資源非常緊張。」保持中立的美國不會容忍英國讓全球經濟體系在其與德國的爭鬥中停止運轉。英國政府很快就放棄了讓德國經濟完全崩潰的企圖，轉而想用零敲碎打的方式實行經濟封鎖。這種做法沒有成功。由英國銀行提供資金並由英國船隻跨洋運往德國的商品和原料數量增加了。<sup>46</sup> 與此同時，英國向歐洲大陸派遣了一支陸軍部隊。

世界大戰看來不可避免了。幾十年來，德意志帝國的統治集團對於他們剛剛獲得的力量缺乏必要的謹慎；帝國主義英國則缺乏有遠見的、經驗老道的領導人，能夠接受並化解德國的力量。塞爾維亞有些人在策劃暗殺活動時沒有考慮後果。失去繼承人的奧匈帝國選擇了生死決鬥。德國統治集團看起來是為了支持他們唯一的盟友——陷入困境的奧地利，實際上卻是因為缺乏安全感，害怕在與其兩側大國的軍備競賽中落敗，尤其是原來虛弱的俄國，軍事實力不斷增長；於是，德國的統治集團就制訂了一個需要征服歐洲的防禦計劃。<sup>47</sup> 俄國賭上了一切，不是因為泛斯拉夫人在塞爾維亞的靠不住的利益，而是因為要是保不住塞爾維亞，就保不住俄國的聲譽。<sup>48</sup> 最後，英德到最後一刻還試圖通過犧牲俄國來達成雙邊交易，但沒能成功。（這種想法會一直存在。）如果說這一切還不夠，那還有一點，就是當時是夏天，總參謀長馮·毛奇在卡爾斯巴德度了四個星期的假，一直到7月25日，那是他那年夏天因為肝病第二次做長時間的溫泉療養；德國海軍元帥阿爾弗雷德·馮·蒂爾皮茨(Alfred von Tirpitz)在瑞士的一個溫泉療養勝地；奧匈帝國總

參謀長、陸軍元帥弗朗茨·康拉德·馮·赫岑多夫男爵 (Franz Conrad von Hötzendorf) 及其情婦在阿爾卑斯；德國和奧地利的陸軍部長也都在度假。<sup>49</sup> 另外一些結構性因素，比如高估了軍事攻勢的重要性，在奔向末日大決戰的過程中也起了重要作用。<sup>50</sup> 但是，要是聖彼得堡掌握了切實的證據，可以證明塞爾維亞情報機關確與大公被刺有關，沙皇就可能顧及自己的名譽，拒絕武力支持貝爾格萊德。<sup>51</sup> 要是普林西普及其同夥在暗殺任務搞砸後就收手回去，或者大公的司機事先知道計劃有變，要去醫院慰問傷者，世界大戰或許就不會發生。不過，發動戰爭總是跟決策者有關，即便那些決策者本身既是武裝起來的國家結構的產物，也是這一結構的主宰。1914年，歐洲各國的政客、軍人尤其是統治者，除了少數的例外——敏銳的彼得·杜爾諾沃、糊塗的愛德華·格雷——都渴望得到領土和地位，並在這樣一個所有人都認為對他們有利的時刻，相信(或希望)戰爭會解決自己國家內政外交的諸多難題，給統治注入新的活力。<sup>52</sup> 換句話說，當諸如司機在薩拉熱窩街頭拐錯彎之類的偶然事件，把世界大戰與和平的問題擺到極少數的幾個人面前時，他們有過猶豫，但仍然基於各種各樣的考慮——國家的聲譽、國家的擴張和政權的復興——選擇了戰爭。<sup>53</sup>

149

## 召喚列寧

1914年8月的衝突升級為一場世界大戰，部分原因在於，人們原以為國家是很容易征服的，但實際情況並非如此，衝突延長了。<sup>54</sup> 1914年深秋，世界大戰陷入僵局：英國，一定程度上還包括俄國，挫敗了德國想用先發制人的方式征服法國的企圖。從那以後，而且是從那以後的每一天，對於所有參戰國來說，接下來的選擇都是極其嚴峻的：要麼不顧無數白白死去的士兵，通過談判結束僵局；要麼再投入無數士兵，繼續謀求難以實現的決定性打擊。所有參戰國都選擇了後者。換句話說，如果說開戰的決定最初是由奧匈帝國做出，然後是德國、俄國和英國，那麼，把痛苦延長下去則是所有國家的決定。參戰的各國耗盡了金錢，但它們堅持要打下去。在52個月的戰爭中，世界上那些受教育



150 程度最高和技術最先進的國家的統治者，動員了6,500萬士兵。陣亡者達到900萬，負傷人數超過2,000萬，被俘或失蹤的近800萬——總共傷亡3,700萬。<sup>55</sup>

有兩年時間，英國人基本上都是讓法國人和俄國人去承受德國的打擊。<sup>56</sup>但是在1916年7月，在凡爾登血戰期間——那是德國人發動的，它採取了叫做消耗戰的新戰略，想用大量消耗法國人的方式來打破僵局——英國人在法國境內更往西的索姆河地區發動反攻。在最初的24小時內，英軍至少有2萬人陣亡，另有4萬人負傷。這是英國軍事史上陣亡人數最多的一天，而陣亡者中既有工人，也有貴族。在索姆河戰役就像凡爾登戰役一樣以僵局收場之前，陣亡和傷殘的英國人有43萬(每天3,600人)，法國20萬人，德國可能有60萬人。<sup>57</sup>在整個西線的1,000萬陣亡者當中，有800萬並不是由「工業化的殺戮」造成的，而是由一些廣泛採用的技術，比如小型的武器和火炮造成的。<sup>58</sup>不過，從25英里<sup>\*</sup>開外的地方(戰線的推進以碼<sup>†</sup>來計算)進行的火炮齊射，一旦擊中，當場就可以把士兵撕得粉碎。機槍不僅更加輕便，而且現在每分鐘可以發射600發子彈，還可以不間斷地連續射擊數小時，製造出奪命的彈雨。<sup>59</sup>毒氣燒灼着戰壕中士兵的肺，直到飄忽不定的風向把毒霧正好吹回到發射這種化學武器的一方，這是常有的事。(在所有參戰國中，俄軍因為沒有足夠的防毒面具，受到氯氣和芥子氣的傷害最大。)<sup>60</sup>在加入德國和奧匈帝國一邊的奧斯曼帝國，亞美尼亞人被控全體犯有叛國罪——勾結俄國，分裂東安納托利亞——結果遭到屠殺或被強行遷離邊境地區，造成80萬至150萬亞美尼亞平民死亡。在塞爾維亞，全國總人口足足損失了15%，對一次魯莽的暗殺來說，代價巨大；同時，塞爾維亞人侵入哈布斯堡王朝的領土卻未能點燃南斯拉夫人起義的大火，這說明當初促使維也納攤牌的那種擔憂是被誇大了。<sup>61</sup>德國人吹噓的海軍又如何？德國的海軍建設對於刺激英國人並把歐洲推向危險的境地可是起了很大的作用。整個世界大戰期間，德國艦隊與英國只交手過一次，

---

\* 編註：約40公里。

† 編註：1碼約0.91米。

那是在1916年夏天，在靠近丹麥海岸的地方，英國人在那裏損失的艦隻更多，但德國人後撤了，不願再拿自己的寶貝海軍冒險。

是戰爭本身而不是隨後糟糕的凡爾賽條約帶來了幾十年的可怕影響。「這場戰爭規模巨大，但卻無關緊要，」劍橋大學邏輯學家、英國首相的孫子伯特蘭·羅素(Bertrand Russell)解釋說，「沒有任何重大的原則受到威脅，雙方都未涉及任何人類的重大目標……英國人和法國人說他們是在為捍衛民主而戰，但他們不希望自己的話被彼得格勒\*或加爾各答的人聽到。」<sup>62</sup>除了害人不淺的偽善，布爾什維克領袖列寧現在深刻地認識到的，還有這樣一個事實，即士兵可以決定整個國家的命運。歐洲各國的統治者和將軍為了天曉得的原因，故意把千百萬人派去送死，而列寧則聲稱，他願意為了現在由於這場帝國主義戰爭而顯得比以往任何時候都要正當的事業——和平和社會正義——犧牲千百萬人。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中稱讚資本主義的蓬勃活力，但列寧強調的是它無限的破壞性：在他看來，這場戰爭表明，資本主義已經不可逆轉地耗盡了它過去擁有的進步潛能。而歐洲那些未能反對戰爭的社會民主黨人，儘管是馬克思主義者，但在他眼裏，同樣是不可救藥。<sup>63</sup>在國際範圍的社會主義者當中，列寧此刻表現得非常激進。「我還在『熱戀着』馬克思和恩格斯，任何對他們的惡意非難，我都不能漠然置之」，1917年1月，列寧從蘇黎世寫信給情婦伊涅薩·阿爾曼德(Inessa Armand)說。「不，這是真正的人！應當向他們學習。」†他在信的末尾批評了「考茨基派」，也就是被這場戰爭摧毀的社會黨第二國際(1889-1916)的傑出人物、德國社會民主黨人卡爾·考茨基的追隨者。<sup>64</sup>

列寧給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增添了效仿戰爭技術的政治觀念，而戰時的屠宰場也有助於用戰前所未曾有過的方式，證明這種政治觀念的有效性。<sup>65</sup>他的宣傳工作實在是太容易了。隨着戰事的日趨激烈，他撰寫了自己的奠基之作——《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1916)，吸收了英國人約翰·霍布森(John Hobson)和奧地利人魯道夫·希法亭

\* 編註：1914年，聖彼得堡更名為彼得格勒，後於1924年更名為列寧格勒。

† 譯註：《列寧全集》第47卷，第534頁。

(Rudolf Hilferding) 的觀點，認為資本主義要不是依靠在國外的剝削就註定要滅亡。但是，幾乎用不着讀列寧的書，也可以理解世界大戰與殖民掠奪之間的聯繫。1876至1915年，世界上大片的領土都換了主人，而且往往是用暴力的方式。<sup>66</sup> 法國成了一個全球性的帝國，面積比本土大20倍，而英帝國的面積是本土的140倍，殖民地的人口多達數億。在歐洲以外的地方，只有日本設法避開了歐洲人的進攻，並效法歐洲的掠奪政策，在海外建立了自己的殖民地。在德國控制的西南非洲，當殖民地的赫雷羅人起來反抗的時候(1904–1907)，鎮壓升級為種族滅絕——而且差點兒就成功了：德國消滅了多達75%的土著人。<sup>67</sup> 最臭名昭著的要數小小的比利時帝國——殖民地面積是本土的80倍——在1914年之前的數十年裏，為了橡膠和榮譽，奴役、殘害、殺害了大概一半的剛果人，多達1,000萬。<sup>68</sup> 但關於世界大戰，下面這點最重要：即便是在實行法治的國家，政客和將軍對待自己的公民也像對待殖民地的臣民一樣壞，而且往往更壞。索姆河地區的英軍指揮官道格拉斯·黑格爵士將軍(Douglas Haig)，毫不在乎他人性命，不管是敵人還是他自己的手下。「在如此偉大的事業中，三年的戰爭加上損失國內十分之一的男人，算不上多大的代價。」黑格在日記中寫道。要是英軍傷亡太小，那在這位將軍看來，就是喪失鬥志的表現。<sup>69</sup> 在民主法國，列強中唯一的共和國，1914年有360萬現役士兵，到1917年只剩下不到100萬。陣亡、負傷、被俘或失蹤的約有270萬。平民也一起遭殃。沒有哪個歐洲大城市被廢棄，因為這場世界大戰大多是在村莊和野外進行的，但國家「安全」現在意味着要從文化上摧毀敵人，就像德國人從一開始就在比利時表現出的那樣：圖書館、教堂和作為敵國化身的平民，成了轟炸和故意餓死的對象。<sup>70</sup> 「這不是戰爭，」一名負傷的印度士兵1915年從法國的戰場上寫信回家說，「這是世界末日。」<sup>71</sup>

### 應徵入伍的和擅離職守的

斯大林沒有參加戰爭。1914年夏天，36歲的他正在西伯利亞東北的圖魯漢斯克荒原，進入四年流放期的第二個年頭。這將是他度過的

時間最長的流放期，在靠近北極圈的地方要一直待到1917年。當局這次把他發配得離鐵路的終點太遠，沒法逃走。當作為歐洲菁華的兩代男人都被填進無底洞的時候，他只能與蚊蟲和無聊戰鬥。

布爾什維克高層誰也沒有到過前線。列寧和托洛茨基在國外過着舒適的流亡生活。1915年7月，列寧寫信給季諾維也夫說，「您是否記得柯巴的姓？」顯然，列寧是指柯巴的真名。季諾維也夫想不起來。1915年11月，列寧寫信對另外一位同志說，「懇請打聽一下（向斯捷普科〔·基克納澤〕或米哈〔·茨哈卡亞〕等人）『柯巴』的姓氏（約瑟夫·朱·……？？我們忘了）。此事很重要！！」列寧當時想做甚麼，現在還不清楚。<sup>72\*</sup>很快，他就忙於把征服了全球85%的地方†的力量，錯誤地歸結為經濟的不可阻擋的推動作用。衝突期間，托洛茨基穿梭於不同的國家，寫新聞隨筆，談論塹壕戰和戰爭的社會心理影響、美國以及許多歐洲國家的政治生活，還有社會主義運動在戰爭方面的政治主張，呼籲用建立「歐洲合眾國」的辦法來阻止衝突。<sup>73</sup>但斯大林，托洛茨基後來說，在這場世界歷史上最大的衝突中，在這場對國際社會主義運動造成衝擊的戰爭中，沒有發表過任何有影響的東西。這位在將來控制了所有思想的人，戰爭期間沒有留下任何思想，就連日記也沒有。<sup>74</sup>

153

極端的與世隔絕似乎是個原因。斯大林從荒涼的西伯利亞給流亡歐洲的布爾什維克寫過很多信，懇求把他要的書寄過來，尤其是關於民族問題的。他想以1913年的文章〈馬克思主義和民族問題〉為基礎，把自己在這方面的論文編成一個集子。戰爭開始前，1914年初，斯大林寫好並寄出一篇長文，〈論文化自治〉，但它被弄丟了（而且再也沒有找到）。<sup>75</sup>他（在1916年2月）寫信給加米涅夫，說他在寫另外兩篇文章，〈民族運動的歷史發展〉以及〈戰爭和民族運動〉，而且還附了內容提綱。他的目的是要解決帝國主義戰爭與民族主義以及國家形式之間的關係問題，為幅員遼闊的多民族國家提供理論依據。

\* 譯註：《列寧全集》第47卷，第137、226頁。

† 編註：這裏是指，在1914年，殖民國家及其殖民地和前殖民地的面積之和，佔據了地表面積的大約85%。

帝國主義作為〔……〕政治表現。「民族國家」舊框架的不足。這些舊框架的瓦解以及建立〔多〕民族國家的趨勢。結果出現了兼併和戰爭的趨勢〔……〕結果出現了民族解放的信念。與兼併原則對立的民族自決原則深入人心。小國（在經濟等方面）明顯的弱點……小國與中等國家完全獨立的存在不足，民族分離思想的徹底失敗〔……〕一方面是各國廣泛深入的聯合，另一方面是這些國家內部各民族地區的自治。〔……〕在爭取建立歐洲合眾國的過程中，這一點應當在多民族國家內部民族區域自治的宣言中表現出來。<sup>76</sup>

這些思想早於列寧發表的《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同（遭到列寧猛烈批評的）托洛茨基關於歐洲合眾國的文章在某種程度上是吻合的。但戰爭期間斯大林承諾的兩篇文章——他告訴加米涅夫它們「差不多寫好了」——根本沒有兌現。

與世隔絕並不是全部原因。在流放西伯利亞的時候，斯大林結識了未來的競爭對手揚克爾·「雅科夫」·斯維爾德洛夫（Yankel “Yakov” Sverdlov，生於1885年），下諾夫哥羅德雕刻師的兒子，他讀完了四年高中。同斯大林一樣，斯維爾德洛夫也是在1912年黨的布拉格會議後，被缺席選進布爾什維克中央委員會的。兩人都是被布爾什維克內部一個保安處奸細馬林諾夫斯基出賣的，有幾年時間都是在圖魯漢斯克度過的，包括在遙遠的庫列伊卡，一個或許只有三四十人的定居點。戰爭期間，斯維爾德洛夫在遙遠的西伯利亞寫了一本歷史小冊子，名為《大流放，1906-1916》，還有許多文章，比如〈國際工人運動史論文集〉、〈圖魯漢斯克地區論文集〉、〈資本主義的沒落〉、〈德國社會民主黨的分裂〉、〈西伯利亞戰爭〉。<sup>77</sup> 他還在信中透露了與斯大林的較量。「我的朋友〔斯大林〕和我在很多方面不一樣，」斯維爾德洛夫在一封郵戳上顯示是1914年3月12日寄往巴黎的信中寫道，「他是一個非常活躍的人，儘管年近四十，但對各種各樣的現象，還是保持了敏捷的反應能力。許多時候，在我感覺不到有任何問題的地方，他都提出了新的問題。從這方面來說，他比我更有活力。不要以為我把他擺在比我高的位置。不，我更優秀（*krupnee*），他自己對此心知肚明……我們打賭

下棋，我把他將死了，然後我們在深夜的時候分別。早上，我們又見面了，而且天天如此，因為在庫列伊卡，我們的人只有我們兩個。」他們曾合住過不長時間。「我們兩人」住在一間屋裏，斯維爾德洛夫寫信給他的第二任妻子克拉夫季婭·諾夫哥羅采娃 (Klavdiya Novgorodtseva) 說，「和我一起的是個老熟人，格魯吉亞的朱加施維里……他是個正派人，但在日常生活中過於自私。」很快，斯維爾德洛夫就受不了，搬了出去。「我們彼此太瞭解了，」1914年5月27日，他在給一個工程師革命者的妻子利季婭·貝塞爾 (Lidiya Besser) 的信中寫道，「最悲哀的是，在流放或監禁的條件下，一個人在你面前被剝得精光，甚麼都暴露無遺……現在這個同志和我住在不同的地方，彼此很少見面。」<sup>78</sup>

斯大林開始在這種與世隔絕、荒無人煙的環境中自得其樂。有流放西伯利亞的同伴淹死了，斯大林把他的藏書據為己有，壞了流放者的規矩，讓他只顧自己的壞名聲更響了。斯大林還繼續幹着流放的革命者的消遣活動，對農家女孩始亂終棄。他讓房東的女兒、13歲的利季婭·佩列普列基娜 (Lidiya Pereprygina) 懷了孕，在警方干預時，他只好發誓會娶她，可後來又背叛了自己的諾言；她生下一個男孩，那男孩不久便夭折了。(後來，斯大林記得他在西伯利亞養過一條狗，名叫季什卡，但卻忘了他的那些女伴和私生子。) 在圖魯漢斯克冬季的八個月，未來的專政者像周圍那些裹着皮毛的當地部落的男人一樣，靠從河裏的冰上鑿洞捕魚為生，並且長時間獨自在被大雪圍困的幽暗森林裏打獵。(「如果你生活在狼群中，」斯大林後來說過，「你必須表現得像狼一樣。」)<sup>79</sup> 暴風雪突然襲來，天昏地暗，差點兒要了他的命。作為曾經的鼓動者和教育者，他還在自己那窗戶沒有玻璃的冷颼颼的出租屋裏，對着當地的雅庫特人和漢特人發表長篇大論，徒勞地想讓他們加入革命鬥爭的行列。他有聽眾，但真正跟他談話的都幾乎沒有，更別說追隨者了。(斯大林的所謂高加索幫，不過是很小的一夥烏合之眾，而且早就散了，再也沒有聚到一起。) 他倒是策反了一名可憐的憲兵，是被派來監視他的。這名憲兵為他取郵件，陪他偷偷地看望分散在各個定居點的被流放的同伴。<sup>80</sup> 也有一位一同被流放的亞美尼亞人，名叫蘇倫·斯潘達良，由女友薇拉·施魏策爾 (Vera Schweitzer) 陪伴，沿着冰封的

葉尼塞河向北，長途跋涉來看過他。但極度貧困的斯大林主要是靠通信，向所有自己認識的人要錢要書。「向您，親愛的弗拉基米爾·伊里奇，致以問候，非常非常熱情的問候，」他寫信給列寧說，「向季諾維也夫問好，向娜捷施達問好！情況怎樣，您的身體還好嗎？我還跟以前一樣啃着麵包，而且刑期快過去一半了。有點無聊，但有甚麼辦法呢？」在給（彼得格勒的）阿利盧耶夫姐妹的求助信中，斯大林抱怨說「在這個該死的地方，大自然荒涼透了」。<sup>81</sup> 他和利季婭又生了一個男孩，名叫亞歷山大，他活了下來——那是他第二個活下來的私生子，但就像在索里維切戈茨克的第一個私生子康斯坦丁一樣，也被他遺棄了。

1916年底，斯大林接到入伍通知。但是在1917年1月，在坐着馴鹿雪橇經過六週的艱苦跋涉，從圖魯漢斯克穿過冰原來到西伯利亞南部克拉斯諾亞爾斯克的報到中心後，未來的專政者因為身體缺陷而被取消了服役資格。<sup>82</sup>

156

沙皇國家是怎麼回事，想把斯大林以及同他一起流放的烏合之眾徵召入伍？與大部分列強一樣，俄國在1870年代就通過了普遍兵役制。在那以後，有段時間各國並沒有出錢出力實現這種徹底的動員。在法國，應徵入伍的有一半會在第二年承擔非戰鬥任務，而在德國，可以被徵召入伍的，往往有一半不會報到。在俄國，適合應徵的人員有三分之二被免除兵役。隨着世界大戰的臨近，執行普遍兵役制勢在必行，但各國仍然感到兵力不足。<sup>83</sup> 儘管這樣，到戰爭爆發的時候，俄國還是把世界上最龐大的力量，1,400萬士兵，派上了戰場。英國和法國將其盟友的大軍稱為「壓路機」。另外，俄國不願徵兵引起的騷亂，單是在1914年下半年，就新徵召了500萬人。<sup>84</sup> 但是，就像整個軍官團在1914年非死即傷一樣，戰爭也吞噬了應徵入伍的士兵。至少有200萬俄軍士兵在戰鬥中陣亡。<sup>85</sup> 沙皇當局只好進一步挖掘兵源。<sup>86</sup> 1914年，帝俄總人口估計有1.78億，適合服兵役的近1,800萬，其中的1,500萬都會被徵召入伍。這是個龐大的數字，但是從比例上來說，卻要小於法國（4,000萬中的800萬）或德國（6,500萬中的1,300萬）。當然，戰爭期間俄國莊園的僱工減少了幾乎三分之二，俄國工廠的熟練工人也往往走光了。徵兵還帶走了俄國一半的小學教師（數量本就不多）。可俄軍在數量上

相對有限，意味着沙皇政權對這個廣袤帝國的控制力有限。俄國沒能充分利用那種讓德國指揮部膽寒的力量，也就是龐大的人口。<sup>87</sup>

可是，一旦上了戰場，俄國官兵的表現卻很好，儘管在一開始的時候，炮彈、步槍、子彈、衣服和靴子都短缺，而且情況比其他參戰國嚴重。<sup>88</sup> 1914年8月至12月，俄軍攻入德國的東側，並逐漸擊潰了奧匈帝國。在對陣奧斯曼帝國的軍隊時，俄軍的表現要遠遠好過英國人，他們在奧斯曼人錯誤地以為可以得到俄國穆斯林的響應而於1914至1915年冬季入侵俄國後，取得了最終的勝利。然而問題在於，回過神來的德國人打退了俄軍最初的進攻，並將俄軍包圍在(但澤東南的)坦能堡，接着又迫使俄軍後撤了300英里。<sup>89</sup> 到1915年底，德國人指揮的軍隊不但奪回了俄軍前一年在哈布斯堡王朝的加利西亞佔領的領土，而且還侵佔了俄屬波蘭——連同它的重要工業設施和煤礦——白俄羅斯大部以及(波羅的海沿岸的)庫爾蘭，從而威脅到彼得格勒。不過，從1914年到1916年，俄軍在東線纏住了同盟國的一百多個師；到1917年為止，俄國俘虜的德軍人數比英法兩國加起來還多。<sup>90</sup>

157

### 君主專制為革命作好了準備

參戰時的俄國有一部附加在君主專制上的沒有約束力的憲法；在杜馬與君主專制的對抗中，雙方都不體諒也不同情對方。<sup>91</sup> 尼古拉二世堅持君主專制，儘管它絲毫沒有讓他個人覺得開心，而且他其實並不適合扮演那樣的角色。<sup>92</sup> 不過，沙皇對立憲派常常佔據上風：杜馬很少被召集開會。它在1914年7月26日開過一天會——為的是批准戰爭撥款(走個過場)——在1915年1月26至29日開過三天會。<sup>93</sup> 1915年的撤退井然有序，給德國人留下深刻的印象(而且阻擋了德國人前進的步伐)，但仍被說成是一場潰敗，之後，尼古拉二世倒是把杜馬又召集起來開了會，後來在1915年8月，立憲民主黨首腦帕維爾·米留可夫成了六個

---

\* 編註：約483公里。



政黨聯合組成的「進步集團」的領導人。「進步集團」包括近三分之二的杜馬代表，它的目標是用代表們所謂的一個獲得信任的政府去加強俄國在戰爭方面的努力。<sup>94</sup>這在某種程度上意味着沙皇任命的內閣得到了杜馬的肯定，但內務大臣懷疑立憲派實際上是追求真正的議會制度，即一個能反映大多數選民意志的政府，因而指責杜馬主席米哈伊爾·羅將柯(Mikhail Rodzyanko)「愚蠢而且誇誇其談」，還說「你們就想湊到一起，提出各種各樣的要求：對杜馬負責的大臣，興許還有革命」。<sup>95</sup>與此同時，俄國的保守派也試圖用一個「保守聯盟」來對抗「進步集團」，但是在1915年8月，右翼分子失去了他們最重要的領袖之一，彼得·杜爾諾沃。他突發中風，昏迷不醒之後去世。<sup>96</sup>

158 比失去杜爾諾沃更重要的是，尼古拉二世繼續阻撓右翼政黨為了他的利益而組織起來，認為那是企圖「干涉」他的專制權力。<sup>97</sup>他甚至不讓私人秘書去安排自己負責的龐雜的事務和落實自己的決定，因為他擔心受制於秘書；結果這位「專制君主」的所有信件都是他親自拆封的。後來托洛茨基說過，羸弱的君主專制就該有這種羸弱的專制君主。在某種意義上的確如此。錯失了很多機會的亞歷山大三世曾經千方百計地突顯意志和權威；要是他沒有因病早逝，1914年他就是68歲。不過，在他統治時期的所有事實表明，他也會死死抱住君主專制及其缺乏連貫性的特點。對於大臣的任命，專制君主大權獨攬，無需議會的推薦和批准，結果，只要沙皇更看重表面上的忠誠和血統而不是能力，那就甚麼也做不了。1914年7月至1917年2月，俄國連換了四位總理和六位內務大臣，他們全都淪為笑柄。<sup>98</sup>（許多時候，有能力的官員漸漸都選擇敬而遠之。）對於1915年的軍事危機，大臣們起初十分沮喪。同時，尼古拉二世任命的將軍常常推卸他們自己造成的問題。<sup>99</sup>可以想見，針對1915年的危機，尼古拉二世作出的反應就是，暫停他所憎惡的杜馬的活動。與此同時，沙皇以為由他來親自擔任前線的最高總司令，就可以鼓舞部隊的士氣，並在更大範圍內鼓舞人民的士氣了。<sup>100</sup>1915年9月，尼古拉二世解除了身材魁梧的堂兄尼古拉大公的職務——尼古拉大公在家族中被稱為「尼古拉沙」(Nikolasha)，在民眾中是「尼古拉三世」——並搬到位於莫吉廖夫(Mogilyov)的大本營。

俄國的權力集團中凡有資格提出建議的幾乎全都反對這麼做。這其中，沙皇的12位大臣中有8人是以書面形式，另有2人是以口頭形式。他們擔心，戰爭投入每況愈下，現在會直接敗壞君主和君主制的名聲。他們的懇求是徒勞的：即使是壓倒多數的國家高級官員都無力糾正專制君主的意志。除非是君主自己回心轉意（這很少見），沙皇制度根本沒有提供任何糾錯機制。

沙皇有名的個性缺陷得到了充分而致命的表現。在距離令他惱火的俄國首都大約490英里\*的莫吉廖夫，尼古拉二世好像終於找到了他渴望但又難以尋覓的世界：「沒有政黨，沒有紛爭，沒有政府，沒有反對派……只有團結一心的俄國人民，準備長期戰鬥下去，直到流盡最後一滴血。」尼古拉二世帶着他的英國賽特犬長時間地閒逛，坐着他的勞斯萊斯到鄉村去，聽音樂，玩多米諾骨牌和單人紙牌，看電影——這讓人想起他曾經幾次離開聖彼得堡，避居克里米亞。沙皇偶爾也會讓人把阿列克謝帶到莫吉廖夫參觀，於是，皇儲就「到處扛着槍，邊走邊唱」，讓戰爭會議為之中斷。不錯，尼古拉二世是喜歡軍事慶典的浪漫氣氛，可他對於戰略戰術幾乎一無所知，但話又說回來，尼古拉沙（畢業於總參軍事學院）和德皇威廉二世也都一樣。尼古拉二世任命的總參謀長是才華橫溢的米哈伊爾·阿列克謝耶夫（Mikhail Alexeyev）將軍，他個頭較小，卻是「一支巨大的軍事力量」。<sup>101</sup> 同時，國內的戰爭動員和政治局勢也必須處理好，尼古拉二世跑到莫吉廖夫，實際上是把戰時的帝國首都交給了他的妻子，而不是交給維特或斯托雷平那種強有力的政治人物。<sup>102</sup> 被法國大使說成「總是愁眉苦臉，不知道在渴望甚麼，在興奮、疲憊……輕信和迷信之間變來變去」的亞歷山德拉，很樂意在人事和政策上指手畫腳，讓自己的「專制君主」丈夫接受既成事實。<sup>103</sup> 「不要擔心後方的事，」她寫信對他說，「不要笑話傻老婆子，她可是無形的當家人。」<sup>104</sup> 對俄國的國家官員和正在為祖國的存亡而戰的軍官團而言，對戰時政府的所見所聞就像是匕首刺入他們的心臟。

159

---

\* 編註：約789公里。

不管尼古拉二世有甚麼樣的個性缺陷，要論做一個專制君主，亞歷山德拉比他還要低上幾個檔次。再者，她是德國人。聽上去像德國地名的聖彼得堡已經改成了彼得格勒，但是，俄國已經陷入極端的間諜恐慌。「社會中沒有哪個階層可以保證說沒有間諜和叛徒。」有位軍事檢察官憤怒地說——他逮捕了幾百人，包括服役時間很長的陸海軍部長弗拉基米爾·蘇霍姆利諾夫將軍(Vladimir Sukhomlinov)。蘇霍姆利諾夫將軍沒有叛國，但對他的公審暴露出的根深蒂固的腐敗與無能被傳得沸沸揚揚，具有很大的破壞力和煽動性(那種危險而混亂的局面很像日後布爾什維克上台時的情形)。<sup>105</sup> 亞歷山德拉也不斷給尼古拉寫信，提到「背叛的大臣」和「背叛的將軍」。但是很快，有關「黑暗勢力」的傳言便落到她和她身邊人的頭上，其中就有格里戈里·拉斯普京(Grigory Rasputin，諾維赫(Novykh))。拉斯普京1869年出生於西西伯利亞，是貧苦農民的兒子，沒受過教育，俄文也寫得不好，是個神神叨叨的流浪漢和假冒的修士，卻被沙皇和皇后稱為「我們的朋友」，擠進了權力核心。謠傳他不但聞起來像山羊(因為不洗澡)，在性事中也像山羊。他同非法的赫雷斯蒂教派(Khylsty)有聯繫，他從該教派學會了如何讓人充滿喜悅(*radenie*)，或者「用罪孽的方式祛除罪孽」。拉斯普京建議信眾聽從誘惑，尤其是肉體的誘惑。他說：「如果沒有先犯下罪孽，我們怎麼可能懺悔？」<sup>106</sup> 宮闈秘事以漫畫的形式傳開了：拉斯普京善於播弄的手從亞歷山德拉裸露的乳頭伸了出來。那是編造的。不過，就像保安處指出的，他在飯店接近一些女歌手，並在開始談話時暴露自己的陽具。這個假冒的「聖人」欣然接受那些想要借重其宮廷影響的貴婦們的獻身，還給大臣們送去半通不通的政策備忘錄。拉斯普京睚眦必報，官員們擔心惹到他，就經常向他行賄，但也有少數人開始反擊。1914年6月29日，弗朗茨·斐迪南大公在薩拉熱窩遇刺的第二天，一個意圖行刺的女人——她同一位拉斯普京的對頭修士有聯繫，而那修士有宮廷中的大人物撐腰——用刀刺進了這位神秘主義者的肚子，拉斯普京的腸子流了出來，可沒有死掉。<sup>107</sup>

戰爭期間，俄國幾個最高級的政府大臣想把這個「西伯利亞流浪漢」趕出首都，竟然沒有成功。亞歷山德拉的態度很堅決。<sup>108</sup> 為甚麼？為

甚麼她要讓一個淫蕩的騙子和傳說中的德國奸細插手俄國的政務？答案有兩點。首先，雖說有各種傳聞，認為拉斯普京在借亞歷山德拉之手管理國家事務，但實際上卻是皇后利用了那個假修士，借他之口把她在人事和政策上的偏好說成是「上帝的意志」，好讓她想做的事情更容易被虔誠的尼古拉二世接受。在亞歷山德拉拿不定主意的時候，拉斯普京的影響就開始顯現了，可他自己也沒有任何明確而穩定的政見。<sup>109</sup>其次，血友病讓皇儲每天都有可能遭遇不測，內出血會流進關節、肌肉和軟組織，而且根本沒有現成的治療辦法，但拉斯普京可以設法緩解「小傢伙」的症狀。

尼古拉二世一家肯定是飽受折磨。他的大弟（兼第二順位繼承人）亞歷山大幼年時死於腦膜炎（1870）。二弟格奧爾吉大公是尼古拉二世童年的玩伴，1899年28歲時死了（沙皇保存了一盒格奧爾吉講的笑話，他把它們寫了下來，人們可以在宮中聽到他獨自大笑）。結果，尼古拉二世的幼弟米哈伊爾就成了皇儲，直到1904年阿列克謝出生，讓他成了第二順位繼承人，萬一尼古拉二世在阿列克謝成年（1920）前去世，米哈伊爾就出任攝政。後來發現，阿列克謝患有不治之症血友病。那是1912年秋天，就在沙皇治下的華沙的一處皇家獵場，八歲的阿列克謝在從船上下來時，磕到了自己的大腿。這件很平常的事情造成大量內出血，腹股溝旁出現了一個血瘤，血瘤開始感染並引發高燒（華氏105度\*）。生命垂危，但不能手術，因為手術時會流血不止。尼古拉和亞歷山德拉向他們最崇敬的聖像祈禱。他們還向拉斯普京求助。「上帝看到了你們的眼淚，也聽到了你們的祈禱，」他在回西伯利亞的途中打電報說，「小傢伙不會死的。」不可思議的是，在接到電報後，血就止了，高燒也退了，血瘤也消了。<sup>110</sup>醫生們非常震驚；沙皇夫婦對那位充滿魔力的聖人的信賴也越發堅定。對於拉斯普京與尼古拉以及亞歷山德拉建立的親密聯繫，米哈伊爾大公也起了作用。1912年秋天，當人們私下傳說已經給皇太子阿列克謝舉行臨終儀式時，作為第二順位繼

\* 編註：約40.6攝氏度。

承人的米哈伊爾，就好像有意要放棄繼承權，帶着情婦娜塔莉亞·武爾費爾特(Natalya Wulfert)——一介平民，同時還是離過婚的女人——巧妙地避開保安處，私奔到維也納。這樣一來，除了那個說不準能活多久的小男孩，再沒有別人了。<sup>111</sup>阿列克謝後來又發生過幾次危及生命的事情，比如從椅子上摔下來，打噴嚏使的勁大了，但每次都能靠拉斯普京的胡說八道使小男孩(以及小男孩的母親)鎮靜下來並把血止住。

神秘主義的思想和儀式盛行於俄國的特權等級，這一點跟歐洲各國的貴族一樣，可尼古拉和亞歷山德拉對皇朝前途的擔憂是完全合理的。但在歐洲的各個君主國，對宮廷事務保密屬於常例，所以俄國皇室拒絕透露那個可以解釋一切、或許本來還可以得到民眾同情的國家秘密。甚至連高級將領和政府大臣都不知道阿列克謝的實情。在由此造成的信息真空中，公眾到處都在津津有味地議論着那位假修士與亞歷山德拉的醜事以及他在宮中的奸黨。有關的傳說紛紛出版，它們對君主制的破壞作用，讓全部的所謂間諜(比如蘇霍姆利諾夫)都望塵莫及。街頭小販用《羅曼諾夫家族秘聞》、《格里戈里·拉斯普京的生平和歷險》之類印數達2萬到5萬的小冊子，幫助摧毀了羅曼諾夫家族的形象。印有圖畫的明信片、滑稽短劇、順口溜，還有笑話，向不識字的人們傳播着關於君主制的腐朽與叛國的故事。<sup>112</sup>「要是德國人已經接管了，」前線的士兵開始說，「打仗還有甚麼用？」<sup>113</sup>

162 最奇怪的是，儘管如此，到1916年的時候，在一些與國家行政部門聯繫密切的自發組織起來的公共團體協助下，俄羅斯國家的戰時經濟有了很大改觀。<sup>114</sup>在此之前，俄國的武器大部分都要從國外購買，而且士兵通常很難得到與自己的武器相匹配的彈藥——那些武器除了老掉牙的俄國別達納式，還有日本的有坂式、美國的溫切斯特式和英國的李一恩菲爾德式。<sup>115</sup>前線部隊缺少炮彈，缺少步槍，缺少制服，缺少靴子(軍隊每週需要25萬雙靴子)。<sup>116</sup>但在打了兩年戰爭後，俄國開始生產出數量充足的步槍、彈藥、無線電裝置和飛機。<sup>117</sup>1916年，俄國的經濟十分活躍，就業率、工廠利潤和股市都在上漲。阿列克謝·布魯西洛夫將軍(Alexei Brusilov)利用製造業的迅速發展和剛剛取得的對敵陣地空中偵察的優勢，在1916年6月發動了一次大膽的攻勢。從技術

上來說，作為俄國為了減輕英法的壓力（它們在凡爾登和索姆河陷入了苦戰）而發動的對德攻勢的一部分，他不過是實施側翼支援，打擊奧匈帝國。但布魯西洛夫在攻擊寬大正面\*的時候，採取了一種還比較粗陋的先進技術——炮兵與機動步兵的聯合作戰，結果僅僅用了幾週時間，就突破了奧匈帝國的防線，擊潰了它的後衛部隊。他的部隊殲滅了奧匈帝國近三分之二的東線軍隊：敵軍傷亡60萬人，被俘40萬人。<sup>118</sup> 驚慌失措的奧軍參謀長警告說：「必須儘快謀求和平，否則即使我們能夠倖存，也會受到致命的削弱。」<sup>119</sup> 結果反倒是德國陸軍元帥保羅·馮·興登堡 (Paul von Hindenburg) 被派去直接指揮哈布斯堡的軍隊——他稱之為「東線已知的最嚴重的危機」。<sup>120</sup>

「我們贏得了戰爭」，俄國外交大臣吹噓，但他又補充說「還要再打上幾年」。<sup>121</sup> 最後，俄國自己的將軍拆了布魯西洛夫的台。一名不服從命令的將軍甚至把精銳的帝國近衛軍——「從身體來說是歐洲最優秀的人形野獸」——開進沼澤，讓他們成了德國飛機的活靶子。<sup>122</sup> 另外，鐵路部門言而無信，布魯西洛夫的補給難以為繼。布魯西洛夫自身也損失慘重，傷亡和失蹤的俄軍多達140萬，而且沒有任何預備隊。最後的羞辱是拜羅馬尼亞所賜。正是因為布魯西洛夫的成功，羅馬尼亞才加入協約國，可是等到災難性的羅馬尼亞軍隊投入戰鬥的時候，布魯西洛夫又不得不去救援。不管怎樣，布魯西洛夫取得了協約國在整個戰爭中唯一的最佳戰績，因此，俄國國內的樂天派都指望1917年會成為接近軍事勝利的一年。但在政治方面，情況似乎越來越不穩定。「在我們的君主制國家，」有位從前的司法大臣在1916年說，「只有少數人是君主派。」<sup>123</sup>

很快，更有可能到來的似乎不是勝利，而是政治劇變。1916年秋天，彼得格勒郊外——後方部隊在那裏補充了尚未接受訓練的新兵，而那些新兵與工人的關係十分友好——發生了一連串的兵變，有些甚至是整團的士兵都參與了。<sup>124</sup> 尼古拉二世給這座作為皇朝象徵的火堆

163

\* 編註：寬大正面 (wide front)，與狹窄正面 (narrow front) 相對。

增添了許多燃料，把被指控為叛徒的蘇霍姆利諾夫——據說他得到了亞歷山德拉的支持——由囚禁改為軟禁。1916年11月1日，受人尊敬的帕維爾·米留可夫在杜馬發言中大罵政府，指責它對戰爭的領導不力。為表示強調，他用了一個響亮的說法：「這是愚蠢還是叛國？」許多代表不停地喊着「愚蠢」，其他人喊着「叛國」，也有不少人大聲叫嚷「都是！都是！」人們對米留可夫報以熱烈的掌聲。<sup>125</sup> 這種煽動性的言論被禁止發表，但杜馬中一位失望的君主派分子弗拉基米爾·普利什凱維奇，俄羅斯人民同盟的著名成員，讓人在前線偷偷散發了幾千份宣傳單。普利什凱維奇本人在杜馬中公開發指責政府大臣是「拉斯普京的玩偶」。在杜馬放假休會前的幾個小時，普利什凱維奇幫助謀殺了拉斯普京。陰謀的領導者是費利克斯·尤蘇波夫公爵 (Prince Felix Yusupov) 和沙皇的堂弟德米特里·帕夫洛維奇大公 (Dmitri Pavlovich)，另外還有英國情報機關的官員。幾天後，1916年12月19日，在首都冰凍的河水中發現了拉斯普京滿是彈孔的殘屍。<sup>126</sup> 尼古拉二世既如釋重負，又有點反感。<sup>127</sup> 但權力集團的許多人，在為這起轟動一時的「德國內奸」死亡事件歡欣鼓舞的同時，繼續敲響警鐘。亞歷山大·米哈伊洛維奇大公 (Alexander Mikhailovich) 在拉斯普京被謀殺後寫信給堂侄沙皇說：「聽起來可能有點奇怪，尼基，我們正在見證一場由政府推動的革命。」<sup>128</sup>

不可思議的是，戰爭期間，君主不在首都；同樣不可思議的是，一個假修士在君主不在的時候橫行宮廷；政府中進進出出的大臣都是些碌碌無為的小人物；所有報紙的頭版，所有的街角議會，還有杜馬，講的都是叛國的故事——君主專制的形象變得破爛不堪。「我不得不報告，」1917年1月，俄國最親密的盟友法國的大使莫里斯·帕萊奧洛格 (Maurice Paléologue) 打電報給巴黎說，「俄羅斯帝國現在是瘋子管理的。」<sup>129</sup> 人們在公開議論即將發生的宮廷政變，想着是尼古拉二世和亞歷山德拉兩人都被殺掉呢，還是只有亞歷山德拉會被殺掉。<sup>130</sup> 在大本營，阿列克謝耶夫將軍和高級將領們討論了他們是怎樣自行指揮布魯西洛夫攻勢的，並開始考慮在以前是不可想像的事情。但是，如果左翼勢力率先舉行暴動對付尼古拉二世怎麼辦？

## 最後最後一根稻草

革命就像地震：人們總在說要革命了，要革命了，結果它們有時候就真的發生了。整個1916年，包括到1917年初，保安處的幾乎所有分支機構都在警告即將發生革命（以及反猶大屠殺）。<sup>131</sup> 當時，革命的高層領導誰都不在俄國，列寧、馬爾托夫、切爾諾夫、托洛茨基都在國外，而保安處又讓許多居住在彼得格勒的不太重要的社會主義領導人都無所作為——若是後者還沒有因為政治失誤而無所作為的話。<sup>132</sup> 1917年1月9日是「流血的星期日」12週年紀念日，這一天，17萬罷工者齊聚首都，高喊「打倒賣國政府！」、「打倒戰爭！」，但這一天並沒有發生革命，因為很多人被捕了。1917年2月14日，首都的9萬工人舉行罷工，警方再次進行大逮捕。<sup>133</sup> 罷工在繼續；2月22日，普梯洛夫工廠因為工資問題而停工，導致成千上萬的工人走上了街頭。<sup>134</sup> 許多工廠因為缺少燃料而停產，結果，更多的工人空閒下來。就好像天意注定，在寒冷的1月過後，彼得格勒的天氣一反常態，變得暖和起來。2月23日這天是西曆3月8日國際婦女節，大約有7,000名低工資的婦女排着隊，走出彼得格勒的各個紡織廠，她們不僅高呼「打倒沙皇！」、「打倒戰爭！」，還高呼「麵包！」國際婦女節這天遊行的人為甚麼要麵包？與傳說相反，沙皇國家當時已經解決了戰爭中的大部分緊迫問題，布魯西洛夫攻勢的補給十分充足就證明了這一點（到1917年底，炮彈儲備總數將達到1,800萬枚）。<sup>135</sup> 但沙皇國家的糧食供應組織得不好。<sup>136</sup> 國家的糧食供應告急，可以說是壓垮駱駝的最後最後一根稻草。

俄國戰前提供的糧食養活了德、英兩國，其小麥出口佔全球的42%。帝俄就像一台輸出糧食的巨型機器，從筒倉到鐵路，把大量勞動果實千里迢迢輸送到遠方的市場，直到戰爭中斷了對外貿易——從理論上說，對外貿易的中斷，意味着有更多的糧食可用於俄國國內的消費（俄國國內的消費標準比較低）。<sup>137</sup> 當然，由於農民上了前線或進了城，糧食的播種面積略有下降，而且西部地區已淪為敵佔區。再者，軍隊的那些士兵，原先是種糧的，現在變成吃糧的——他們在1916年消耗



165 的糧食佔到全國可銷售糧食的一半；<sup>138</sup>但這不是問題的關鍵。幾乎被所有人拿來當替罪羊的運輸系統也不是主要問題。不錯，鐵路網絡是沒有組織好，沒有讓糧食在帝國境內的市場流通起來。可更根本的問題在於，許多農民拒絕把糧食賣給國家，因為糧價太低，而農民需要的工業品（比如長柄的大鐮刀）價格卻漲幅驚人。<sup>139</sup>更根本的問題或許還在於戰時的國家控制。在對商業活動根深蒂固的敵意的推動下，它排擠了受到詆毀但實際上必不可少的中間商（小糧商），而自己又沒能成為合適的替代者，結果擾亂了國內的糧食市場。<sup>140</sup>因此，到了1917年1月底，儘管俄國還有存糧，但從南方產糧區運到北方首都的糧食卻不到每天最低消耗量的六分之一。<sup>141</sup>政府此前一直拒絕實行配給制，因為它害怕這會讓人以為糧食供應難以為繼。但最後，2月19日，政府宣佈，從3月1日起，開始實行配給制。這樣做的本意是要緩和局勢，結果卻引發恐慌和搶購。麵包店的櫥窗被砸。有人看到，麵包店的人可能是為了投機，把貨全拉走了。彼得格勒的居民通過口口相傳還得知，許多麵包店因為麵粉不夠，一天只營業幾個小時，但是在高價餐館，卻總是吃到剛剛出爐的白麵包。<sup>142</sup>保安處的一個密探猜測說：「處於地下狀態的各個革命黨正在準備發動革命，可革命即使發生，也會像饑餓騷亂一樣，是出於自發。」<sup>143</sup>

在沙皇政府宣佈即將實行配給制後，僅過了四天，婦女們就為了麵包走上了彼得格勒街頭；而在她們遊行後不到七天，擁有幾百年歷史的俄國君主專制就瓦解了。

166 1917年冬天，俄國沒有發生1891年或1902年那樣的饑荒。那兩次仍讓人歷歷在目的饑荒，沒有導致政權被推翻。（1891至1892年的饑荒至少奪走了40萬人的生命。）<sup>144</sup>世界戰爭期間，德國的糧食短缺——部分原因在於英國的封鎖，為的是讓平民挨餓，從而擊垮德國的意志——在1915年秋末已經引發了幾次比較大的城市騷亂，而且這樣的騷亂每年都有，但德意志國家一直堅持到1918年德國政權輸掉戰爭。無論是反饑餓遊行還是總罷工，都還不是革命。誠然，社會主義鼓動家在湧向工廠和兵營，希望他們的觀點被人接受。<sup>145</sup>在首都，到處可以聽到像斯大林在梯弗利斯的每個五一節都要唱的那些革命歌曲，到處可以聽

到新式的稱呼（「公民」和「女公民」），尤其是關於戰爭中無意義的殺戮和高層政治腐敗的扣人心弦的故事，它們填補了沙皇制度中出現的精神空白，讓人民能夠團結一心。<sup>146</sup> 有些彼得格勒的示威者開始搶劫和酗酒，但其他許多人把毛巾、破衣服和舊毯子塞在外套下面，以對付預料中的哥薩克騎兵的鞭打。1917年2月底佔據彼得格勒街頭的喧鬧的人群是勇敢而堅定的。不過，即便他們往往是勇敢而堅定的，但革命卻很少發生。革命不是由街頭堅定的人群造成的，而是由精英集團拋棄現存的政治秩序造成的。罷工以及反饑餓的示威活動表明，專制政權已經成了空架子。幾乎沒有人會維護它。

關鍵在於，走上街頭的不僅是婦女：布魯西洛夫將軍在發出警告，軍隊只有不到十天的糧食——毫無疑問，他和其他將領是在責怪君主專制。「所有革命都是在上層開始的，」沙皇政府的一位官員寫道，「我們的政府成功地把國內最忠誠的那部分人變成了批評者。」<sup>147</sup> 在高層、甚至在羅曼諾夫家族的大公當中，想要鋌而走險、廢黜沙皇的陰謀迅速增多。早在1916年底，前杜馬主席亞歷山大·古契科夫（Alexander Guchkov）就和杜馬副主席聯合起來，主動與大本營商量，準備（設法）逼迫尼古拉二世讓位給阿列克謝，由米哈伊爾·亞歷山德羅維奇大公攝政，同時任命一個對杜馬負責的政府。（古契科夫的計劃之一就是「奪取」沙皇專列。）在一個類似的陰謀中，總參謀長阿列克謝耶夫將軍同格奧爾吉·李沃夫公爵（Georgy Lvov）商量，準備逮捕亞歷山德拉，如果尼古拉二世反對，就逼他讓位給尼古拉沙大公（當時在梯弗利斯）。更嚴重的是，1917年1月，在反饑餓示威和罷工活動之前，戰功卓著的亞歷山大·克雷莫夫中將（Alexander Krymov）請求與杜馬主席米哈伊爾·羅將柯以及一些經過挑選的杜馬代表舉行私人會晤，告訴他們「軍隊的情緒現在到了所有人都樂於聽到政變消息的地步。必須那麼幹……我們會支持你們的」。<sup>148</sup> 當然，要是工人不罷工，那就永遠無法知道，針對尼古拉二世的政變陰謀會不會有一個變成現實。但是，既然群眾已經佔據了首都街頭，精英們也就乘機拋棄了專制君主。

## 鎮壓與拋棄

167

在婦女們為了麵包走上街頭前夕，尼古拉二世曾經短暫回過位於皇村——就在首都外面——的亞歷山大宮，但是在2月22日，他又返回自己在莫吉廖夫的避難所。在那裏，他埋頭閱讀法國史中尤利烏斯·凱撒征服高盧\*的那一段。(儘管法國是俄國的盟友。)[在這裏，我的大腦比較輕鬆，絲毫不用為大臣和瑣事操心。]沙皇在2月24至25日寫信對亞歷山德拉說。<sup>149</sup>在那些無須為瑣事操心的日子，彼得格勒一半的勞動力，多達30萬的憤怒民眾，罷工並佔領了俄國首都重要的公共場所。亞歷山德拉作為沙皇瞭解騷亂情況的重要消息來源之一，對罷工者不屑一顧，認為那是「流氓鬧事，年輕男女到處奔走，叫嚷他們沒有麵包」。她讓丈夫放心，騷亂會隨着暖和得有點反常的天氣一同過去。<sup>150</sup>但沙皇還有別的情報來源。因為優柔寡斷而幾乎受到所有人嘲笑的尼古拉二世，從前線下達了一份毫不含糊的命令，要求準備鎮壓。

先前日俄戰爭在首都引發的大規模起義，聲勢嚇人，卻沒有成功。<sup>151</sup>尼古拉二世這次明顯掉以輕心，或許跟1905至1906年成功地使用武力有關。<sup>152</sup>當然，那是在彼得·杜爾諾沃掌權的時候，是在斯托雷平五年的發奮努力還沒有以失敗告終之前，是在拉斯普京的垮台剝奪了君主專制僅剩的一點點合法性之前。這次，負責首都安全的是彼得格勒軍區司令謝爾蓋·哈巴洛夫少將(Sergei Khabalov)。當然，他是一個坐辦公室的將軍，從來沒有在戰場上指揮過部隊。哈巴洛夫的助手包括亞歷山大·巴爾克少將(Alexander Balk)。巴爾克少將在被德國人趕出華沙後，被尼古拉二世任命為彼得格勒城防司令，因為其他所有候選人都不能就任。巴爾克是亞歷山德拉和拉斯普京的寵兒，聽命於內務大臣亞歷山大·普羅托波波夫(Alexander Protopopov)，那是俄國在13個月內的第五任內務大臣。後者反覆無常，口若懸河，沉溺於一連串的狂想，先前曾把自己的紡織公司搞得差點兒破產，現在則通過降神會聽從拉斯普京亡靈的指點。<sup>153</sup>尼古拉二世本來迅速就改了主意，想要

\* 編註：古羅馬地名，所在地區包括現今的法國、比利時等。

解除普羅托波波夫的職務，但經不住亞歷山德拉的反對。他寫信對她說：「我為普羅托波波夫的事感到抱歉；他是個好人，一個誠實的人，但不太果斷。現在把內務部交給這樣的人有點兒冒險。我懇求你不要把『我們的朋友』扯進這件事。這只是我的分內之事，我希望不要干涉我的選擇。」<sup>154</sup>

結果，這位讓人不放心的內務部長普羅托波波夫，反倒獲得了近乎獨裁的權力——「為了挽救局勢，可以做任何有必要做的事情，」沙皇告訴他。但普羅托波波夫不是杜爾諾沃。後來，任命普羅托波波夫時的任人唯親——他不僅受亞歷山德拉和拉斯普京寵幸，還是羅將柯和其他政府官員的寵兒——被當成了二月革命的替罪羊。<sup>155</sup> 但哈巴洛夫和巴爾克一直在準備鎮壓。不錯，在被普遍視為警察國家的俄國，1917年的時候在首都只有6,000名警察，人數太少，無法事先阻止大規模集會。但俄國出於軍事和政治目的，在後方養着龐大的衛戍部隊：單是駐守彼得格勒的就至少有16萬人，30英里\*之內還有17萬人。那是和平時期的兩倍。<sup>156</sup> 1905年，沙皇政權逃過一劫，當時整個聖彼得堡的衛戍部隊只有2,000人。<sup>157</sup> 1917年，後方龐大的軍隊不過是些士官生和沒有受過訓練的新兵，但首都的衛戍部隊大多是騎兵（哥薩克）和精銳的近衛部隊。這是一支令人生畏的力量。實際上，1917年2月初，之所以要從北方戰線分離出一個彼得格勒軍區，就是為了騰出部隊，平定預計會出現的國內騷亂。<sup>158</sup> 現在，那些示威活動就要開始了：2月24日早晨，人們再次為了麵包走上街頭。

2月25日晚上9時左右，尼古拉二世打電報給哈巴洛夫：「我命令你明天立即平定首都的騷亂。在這個與德、奧交戰的困難時期，是不能允許有這些騷亂的。」<sup>159</sup> 哈巴洛夫和巴爾克注意到，有些哥薩克在面對彼得格勒的抗議人群時猶豫不決。「2月25日這天完全被我們浪費了，」巴爾克後來回憶道，並且指出，「群眾感覺到當局的軟弱，於是變得肆無忌憚。」<sup>160</sup> 現在，有沙皇的命令在手，哈巴洛夫和巴爾克在2月

---

\* 編註：約48公里。

25日快到半夜的時候，通知政府大臣開會，討論第二天即將開始的鎮壓問題。疑雲籠罩着那處舉行政府會議的私宅。聽說要鎮壓，外交大臣建議，他們大家「立刻去見至高無上的皇帝，懇請陛下找別人來代替我們」。大臣們多數都傾向於盡力找到同杜馬達成妥協的方案。<sup>161</sup>但就在凌晨短短的幾小時，保安處動手抓捕了一百多位知名的革命者，而在當天(2月26日)晚些時候，接到命令的帝國軍隊向赤手空拳的示威者開了火，有些還動用了機槍。約有50人被打死，一百多人受傷(在一座300萬人口的城市)。<sup>162</sup>顯示武力似乎讓興高采烈的示威群眾泄了氣，也讓政府大臣們挺直了腰桿。<sup>163</sup>1917年2月26日晚上，保安處處長打電話給彼得格勒城防司令巴爾克，報告說他估計「騷亂的強度明天會減弱」。就像1906年一樣，鎮壓似乎起了作用。<sup>164</sup>

可這樣的自信不合時宜。保安處的分析家們說得對，1905至1906年，只是因為軍隊的忠誠才挽救了沙皇政權。而現在，有位保安處的密探推測說：「一切都取決於軍隊。如果他們不站到無產階級一邊，這場運動很快就會平息。」<sup>165</sup>可不妙的是，一支精銳的近衛部隊，帕夫洛夫斯基近衛後備營，試圖阻止殺害平民。另外一支近衛部隊，沃倫團的士兵執行了命令。<sup>166</sup>但那些沃倫近衛團的士兵連夜討論了他們殺害赤手空拳的平民這一問題，結果在2月27日，當人們再次大膽地在街頭聚集時，24,000名沃倫團的士兵站到了抗議者一邊。<sup>167</sup>突然倒戈的沃倫團士兵又跑到附近其他部隊的兵營，煽動其餘的首都衛戍部隊發動兵變。忘乎所以的叛亂分子洗劫並放火焚燒了保安處總部。<sup>168</sup>他們還把關在監獄的罪犯和同志放了出來——許多人都是在幾天前保安處的大搜捕中被抓的——並且闖進武器庫和兵工廠。武裝士兵開着搶來的卡車和裝甲車，在彼得格勒橫衝直撞，朝着任意方向胡亂射擊。<sup>169</sup>「我正在竭盡所能撲滅叛亂」，哈巴洛夫打電報給大本營說，但他也懇求他們「立即從前線派來可靠的部隊」。當天夜裏的晚些時候，他通知大本營說：「叛亂分子現在佔據了首都大部分地方。」<sup>170</sup>哈巴洛夫考慮用飛機轟炸俄國自己的首都。<sup>171</sup>實際上，當時的情況遠遠不是他所能控制的，進一步說，鎮壓的命令能否落實，也有賴於背後的政治權威，而沙皇的政治權威早已蕩然無存。<sup>172</sup>

事態迅速發展。野心勃勃而又懼怕群眾的杜馬主席羅將柯，慌忙打電報給莫吉廖夫大本營，報告首都的「無政府狀態」，敦促沙皇撤銷休會命令，好讓杜馬名正言順地召集會議並組建一個由杜馬領導的政府。「羅將柯這個胖子又給我發來一大堆廢話，我甚至不想搭理他」，尼古拉二世說道。<sup>173</sup> 在徒勞地等待沙皇答覆期間，杜馬的領袖們拒絕違背法律去擅自召開會議。但杜馬的兩名社會主義代表把420名杜馬代表中的大約50至70名鼓動起來，在杜馬固定的開會地塔夫利達宮——但在他們通常開會的富麗堂皇的白廳之外——召開「私人」會議。這些代表宣稱，自己不是政府，而是「國家杜馬恢復秩序臨時委員會」。<sup>174</sup> 與此同時，還是在塔夫利達宮，幾百名左翼分子，其中很多是在那天早晨從監獄放出的，召集會議，重新成立了1905年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蘇維埃。<sup>175</sup> 臨時委員會有了競爭對手。至於政府的各位大臣，他們打電報給莫吉廖夫大本營提出辭職，沙皇拒絕接受，但不管怎樣，大臣們就是不肯露面。「麻煩在於，在〔彼得格勒〕這個偌大的城市，竟然找不到幾百個同情政府的人，」杜馬的一名右翼代表回憶說，「實際上，對自己有信心，並且對自己要做的事情有信心的大臣，一個也沒有。」<sup>176</sup> 不僅是首都的街頭和衛戍部隊拋棄了君主專制，整個權力走廊也拋棄了君主專制。

170

## 背叛

尼古拉二世從警察機關的報告得知，彼得格勒的英國人，即自己為之投入戰爭的那個盟國的大使館，在幫助杜馬反對派對付他。<sup>177</sup> 2月27日，他在大本營收到幾封急電，包括他的弟弟、在阿列克謝未成年前可代為攝政的米哈伊爾大公的急電，請求他宣佈成立一個由杜馬代表組成的新的「獲得信任的政府」。<sup>178</sup> 沙皇非但沒有同意，反而責怪哈巴洛夫鎮壓不力，並做出兩個決定：首先，他將於次日清晨返回首都（乘坐列車要14至16個小時），準確地說，是返回首都郊外的皇村，他跟亞歷山德拉同孩子們都住在那裏；其次，從前線調來的一支遠征軍（800人），將由尼古拉·伊萬諾夫將軍（Nikolai Ivanov）指揮，乘車前往首都「建立

秩序]。<sup>179</sup> 總參謀長阿列克謝耶夫將軍還給其他許多部隊——至少八個團的作戰部隊——下了命令，配合伊萬諾夫的遠征。尼古拉二世授予66歲的伊萬諾夫將軍掌管政府各部的獨裁權力。<sup>180</sup> 但是，沙皇本人根本無法返回首都。杜馬臨時委員會的一位代表非常狡猾，故意散佈虛假信息，誇大鐵路工人的騷亂情況，讓沙皇專列來來回回，顛簸了近兩天時間。最後，他在3月1日晚上抵達普斯科夫北方戰線司令部。伊萬諾夫將軍順利到達皇村，但在此期間，他的上司阿列克謝耶夫將軍已經改變主意，打電報給伊萬諾夫，命令他不要在首都採取行動。接到報告說杜馬成立了臨時委員會和彼得格勒結束了無政府狀態的阿列克謝耶夫，現在反而開始敦促尼古拉二世同意成立由杜馬領導的政府。

普斯科夫的北方戰線司令魯茲斯基將軍 (Ruzsky)，早在阿列克謝耶夫之前就明確表示，支持成立由杜馬領導的政府；現在，既然有了阿列克謝耶夫的強烈要求，魯茲斯基就向自己的不速之客——最高統治者——施壓，要求他接受這一主張。<sup>181</sup> 尼古拉二世同意由杜馬主席羅將柯組建政府，但堅持要求政府對他而不是對杜馬負責。不過，在阿列克謝耶夫又發了幾封電報之後，沙皇終於同意成立一個對杜馬負責的政府。在阿列克謝耶夫的請求下，尼古拉二世親自給伊萬諾夫下達了(暫時)「原地待命」的命令，然後就回到車上休息了。<sup>182</sup> 經過這麼多年的頑強抵制，結果還是要做出讓步，同意實行真正的君主立憲和議會制，這讓沙皇十分痛心，徹夜難眠。<sup>183</sup> 失眠的尼古拉二世不知道，大概從凌晨3時半開始，魯茲斯基通過慢騰騰的直通電報，即休斯電報機\* (每小時能傳送1,400個單詞)，與首都的羅將柯溝通了四個小時。羅將柯傳來的消息讓這位將軍十分震驚：鑒於首都局勢的激進化，至少對尼古拉二世來說，實行君主立憲為時已晚。<sup>184</sup>

現在，得到魯茲斯基報告的阿列克謝耶夫親自出馬，聯絡全體戰線司令，勸他們「為了挽救軍隊」，支持尼古拉二世退位。每個戰線司令，只要抱着和總參謀長一樣的集體榮譽感，都要直接打電報到普斯

---

\* 編註：由大衛·休斯 (David Hughes) 設計的印刷電報設備。

科夫，請求尼古拉下台，同時把電報抄送阿列克謝耶夫。1917年3月2日上午的晚些時候，魯茲斯基將軍在阿列克謝耶夫的授意下，拿着與羅將柯的對話的錄音盤——內容是敦促沙皇退位，由皇太子阿列克謝繼位、米哈伊爾大公攝政——到沙皇的專列匯報。<sup>185</sup> 尼古拉二世聽過之後，走到車廂窗前，默然無語，然後說道，他「做好了下台的準備，要是為了俄羅斯的福祉必須那樣的話」。當時沒有做出任何決定。可是，大約在下午2時，各戰線司令發來電報，這其中包括布魯西洛夫和其他所有人，再加上阿列克謝耶夫，一致要求沙皇退位；魯茲斯基把這些電報拿給沙皇，沙皇畫了十字，並很快出來要求大本營準備退位詔書。要是尼古拉二世回到皇村，回到亞歷山德拉身邊，他是否會放棄自己神聖的使命，這一點永遠也無法知道。（「你孤身一人，沒有軍隊的支持，就像籠中的老鼠，你能做甚麼？」「老婆子」在3月2日打電報給他說。）<sup>186</sup> 此時已經下台的沙皇，像以往一樣，順從了命運的安排，內心極為痛苦。「我周圍盡是背叛、怯懦和欺騙！」尼古拉二世在日記中傾訴道。<sup>187</sup> 沙皇的日記表明，只是因為將領們的竭力勸說，他才決定退位。<sup>188</sup>

172

不管怎麼樣，這樣做都是背叛，儘管它裝作是為國着想。

那些高級指揮官畢竟是對沙皇宣過誓的，他們在違背自己誓言的時候，可能以為自己是在挽救軍隊。擅離職守的現象正在以每月10萬到20萬人的速度蔓延，結果擴充了抗議群眾和犯罪團夥的隊伍，堵塞了重要的鐵路車站。<sup>189</sup> 此外，二月叛亂已從彼得格勒蔓延到莫斯科和波羅的海艦隊，從而威脅到前線。<sup>190</sup> 早在俄日戰爭期間發生騷亂的時候，阿列克謝耶夫就曾認為，「自上而下的革命帶來的痛苦總歸要少於自下而上的革命」。<sup>191</sup> 但是，雖然文官中的許多精英人物都建議實行「軍人獨裁」，而且在那個時代也有這樣的先例，比如德國的魯登道夫將軍（Erich Ludendorff）事實上就是那樣做的，還有奧斯曼帝國年輕的土耳其軍官，可阿列克謝耶夫和俄國的軍人並沒有貪戀權力。<sup>192</sup> 這不是因為俄國的將軍對於自身接手民政事務的能力缺乏自信（為了管理戰爭，他們已經掌握了許多自己不該擁有的民政權力）。再者，從首都的總參謀部和海軍參謀部那裏，阿列克謝耶夫十分瞭解俄國文官領導人的無能和



推諉。但軍官們憎惡充當輔助性的治安力量和鎮壓國內叛亂那樣的髒活，認為它削弱了軍隊的軍事功能，玷污了軍隊的社會形象。此外，受到總參謀部突出軍事的風氣的影響，他們缺乏寬廣的政治視野。<sup>193</sup> 就這樣，為了平息首都戰時的動亂，為了挽救軍隊和戰爭投入，阿列克謝耶夫從杜馬臨時委員會那裏——它可以得到有名無實的新沙皇阿列克謝、一個模樣可愛的小男孩的幫助——看到了，或者說自以為看到了解決問題的辦法。<sup>194</sup> 他們的如意算盤注定要落空。



173 當時的俄國是個名副其實的大國，但帶有可悲的缺陷。不管要建立甚麼樣更好的體制，都必須首先閹割掉俄國那邪惡而陳舊的君主專制。激烈的英德對抗，喧囂的塞爾維亞民族主義，維多利亞女王傳下的血友病，羅曼諾夫宮廷的病態，俄國政府戰時糧食供應的混亂管理，為了麵包和正義而走上街頭的婦女和男人的決心，首都衛戍部隊的兵變，俄國大本營的背叛，在如此的洪流中，原則上、更別說實踐上已經過時的君主專制的滅亡是罪有應得。但世界大戰打破的並不是一個運轉正常的專制體制；戰爭是將一個早已千瘡百孔的體制徹底壓碎。

自封的杜馬臨時委員會不知道軍方的高級將領已經成功地迫使尼古拉二世退位，結果派了兩名代表到普斯科夫執行這項任務。這兩名特使都是終生的君主派，也是宮廷政變的老手：亞歷山大·古契科夫和瓦西里·舒利金 (Vasily Shulgin)。他們的臉都沒刮，尤其是舒利金，據說像個罪犯。<sup>195</sup> 「我既然同意退位，就必須確定你們已經考慮過這會給俄羅斯的其他所有人留下甚麼印象，」尼古拉二世對兩人說，「這會不會帶來危險的後果？」<sup>196</sup> 後果會有的。

到1917年2月，距離彼得·杜爾諾沃的去世已經有一年半，但他在1914年2月的預言即將成為現實：立憲派反抗君主專制，加快了大規模社會革命的步伐。列寧暫時還在國外，在德國人防線後面的中立國瑞士。斯大林作為在國內流放的無數政治犯之一，蟄伏在西伯利亞閉塞的阿欽斯克。在那裏，就跟俄羅斯帝國的幾乎所有地方一樣（包括他的家鄉格魯吉亞），二月革命的消息是通過電報傳來的（「一切都掌握在

人民手中」)。3月3日，當地的一個蘇維埃在克拉斯諾亞爾斯克，即該地區的中心城市，掌握了政權，開始逮捕當地的沙皇官員。斯大林一下子成了一個自由人，這可是近17年來頭一次。他登上西伯利亞大鐵路駛往彼得格勒的列車。到那裏約有3,000英里的路程。和他在一起的還有一同被流放的布爾什維克列夫·加米涅夫，以及他自己新交的女友薇拉·施魏策爾，她是布爾什維克中央委員蘇倫·斯潘達良的遺孀，34歲的斯潘達良因為肺病死在西伯利亞荒涼的圖魯漢斯克，那也是斯大林流放時待過的地方。1917年3月12日，未來的專政者抵達帝國首都，穿着西伯利亞氈靴 (*valenki*)，只帶了一台打字機。<sup>197</sup>



## 卡爾梅克救星

有些同志說，由於我國資本主義不夠發達，所以提出社會主義革命的問題是空想。如果沒有戰爭，如果沒有破壞，如果國民經濟的資本主義組織的基礎沒有動搖，那末他們這樣說是對的。

174

——約瑟夫·斯大林，  
布爾什維克黨代表大會，1917年7月底<sup>1</sup>

救救俄羅斯吧，心懷感激的人民會報答您的。

——一位立憲民主黨人對最高總司令拉夫爾·  
科爾尼洛夫將軍 (Lavr Kornilov) 大聲喊道，1917年8月<sup>2</sup>

「難以置信！」有流亡的革命者在讀到報紙上關於俄國君主制在二月革命中垮台的消息時驚呼，「真想不到，太不可思議了！」<sup>3</sup> 這位47歲的流亡者名叫弗拉基米爾·烏里揚諾夫，更常見的名字是列寧。他差不多在國外生活了17年。由於沙皇政府的高壓和腐敗的統治，由於它只讓少數人享有權利而貧窮卻無處不在，特別是由於它對人的尊嚴的蔑視，人們自然會迫切希望能有新的天地。依舊處在戰爭中的整個帝

---

• 譯註：《斯大林全集》第3卷，第162頁。

國，捲入了一場巨大而持久的政治集會，感覺一切皆有可能。<sup>4</sup>沙皇和皇朝在這場重要的戰爭中垮台，讓它想要解決的幾乎所有的治理難題都變得更加嚴重。當然，任何威權體制的垮台本身都不會帶來民主。憲政秩序的建立與維護，必須依靠群眾的支持和有效的治理工具。取代沙皇的臨時政府根本不具備上述條件。

175 混亂和希望一下子降臨到這個被戰爭撕裂的國度，新的經過改頭換面的群眾組織紛紛登場。<sup>5</sup>這其中不但有布爾什維克和其他組織那樣的革命團體，有各種草根蘇維埃和士兵委員會，更主要的是還有陸軍和海軍。1914年，俄羅斯帝國的1.78億人口分散在850萬平方英里\*的領土上，但戰爭將大約1,500萬帝國臣民徵召到一個大型組織中——俄國「壓路機」。一旦沒有了沙皇，這種前所未有的人口集中，就會讓政治活躍達到原本無法達到的程度，直到前線也出現了由選舉產生的代表組成的完備的代表大會。1917年中期，前線大概有600萬士兵。此外還有230萬已經完全被喚醒了政治意識的士兵，部署在後方各個衛戍區和帝國幾乎所有中心城市。<sup>6</sup>對於這幾百萬人來說，二月革命意味着「和平」，意味着似乎沒完沒了的世界大戰的終結，意味着新時代的來臨。

早在1917年之前，普通人民就欣然接受了勞資衝突不可調和的觀念，不過，他們說的往往不是階級本身，而是光明與黑暗、榮耀與侮辱。他們看待自己與主人的鬥爭，是從苦難、救贖和拯救的角度，而不是從資本積累、剩餘價值和馬克思主義的其他範疇出發的。<sup>7</sup>從農莊、工廠，再到軍隊、艦隊和權力走廊，隨着階級語言充斥着革命時期俄國所有書面和口頭的公共話語，情況發生了變化，就連信奉古典自由主義並努力超越階級（或者說非階級）的立憲民主黨人，也不幸地認為把二月革命界定為「資產階級」革命是正確的。<sup>8</sup>這就等於承認，二月革命本身並不是終點，而是途中的一站，最終的目的地是比自由主義憲政更進一步的新的革命。當已被結合成一個龐大組織的士兵和水兵，在1917年大規模地投身於政治活動時，俄國軍隊所要碾壓的就不是德國，而是這個國家本身的政治體制了。

---

\* 編註：約2,201萬平方公里。

考慮到1905至1906年軍隊在拯救政權方面的作用，考慮到可以期待它再次發揮這樣的作用，沙皇擲出鐵骰子的決定就是一場孤注一擲的賭博，把所有的賭注都押在群眾的愛國精神上。事實上，沙皇政權的致命缺陷是，它無力將群眾結合成一個統一的整體，但是，群眾因為戰爭而普遍地政治化，意味着1917年的憲政實驗如果還想有一點生路，需要納入的就不是一般的群眾，而是被動員起來的士兵和水兵。然而，如果說世界大戰在實際上重構了政治景觀，極大地深化了追求社會正義的傾向——這種傾向讓社會主義的願景在1917年之前便流行開來——臨時政府其實也缺乏應對挑戰的能力。除了羸弱的治理結構，它的整個象徵體系也非常失敗：沙皇時代的雙頭鷹，去掉皇冠，成了國家的象徵；新國歌《上帝保佑人民》用的是格林卡《上帝保佑沙皇》的調子。與諷刺臨時政府的漫畫一同出現的，是各種通俗的小冊子、歌曲和政治姿態，把資產階級說得一無是處，把受過良好教育、穿着體面和有文化的人說成是肥貓和騙子，就連俄國的《股市報》也嘲笑資產階級。<sup>9</sup>同時，1917年比1905至1906年表現得更加激進。《國際歌》、紅旗、紅色口號，以及雖然含糊但卻非常有吸引力的主張人民政權的綱領——「全部政權歸蘇維埃」——讓俄國的憲政革命淹沒在形形色色的左翼的革命文化中，淹沒在令人浮想聯翩的政治姿態與意象中。錘子和鐮刀，這個在1917年春天（此時離布爾什維克政變還有很長時間）出現的強有力的符號，很快就抓住了城裏人的渴望與農村人的渴望之間的聯繫（或者說，希望建立的聯繫），並加入了社會正義的可能性（即社會主義）。有位同時代的觀察家說得對，1917年政治情緒的特點是，「很多俄國人都有一種普遍的渴望，即無論如何都要宣佈自己是絕對的社會主義者」。<sup>10</sup>

「社會主義」怎麼就成了布爾什維主義，布爾什維主義又怎麼就成了列寧主義，這是兩個不同的問題。長期以來，歐洲社會主義的象徵性劇目一直在不斷發展，它既不是列寧和布爾什維克發明的，也不是因為他們才在俄國廣為流行的，而戰爭和二月革命又先後為它增添了豐富的額外動力。但是，即使說俄羅斯帝國早在1917年10月布爾什維克政變之前，就在城市街頭和鄉村，在前線和衛戍區，在邊疆區甚至國境之外的相鄰地區，經歷了頭腦和靈魂中的大眾社會主義革命，到

了1917年(以及此後)，布爾什維克將會想方設法宣稱社會主義革命的全部劇目都歸自己所有，實際上，他們確實在相當短的時間裏幾乎實現了壟斷。「革命」降臨到列寧頭上，而事實證明，他已經準備好抓住這個機會，即便布爾什維克核心圈中有許多人反對。

斯大林在1917年的作用是個有爭議的話題。尼古拉·蘇漢諾夫(Nikolai Sukhanov，希梅爾(Himmer))，對革命事態的發展無所不記的編年史家，本人是社會革命黨成員，妻子是布爾什維克。他的解釋總是讓人印象深刻，稱1917年的斯大林「灰暗模糊，不時發出一縷黯淡的光，沒有留下任何痕跡。關於他，真的再沒有甚麼好說的」。<sup>11</sup>蘇漢諾夫在1920年代初發表的說法完全弄錯了。斯大林深度參與了布爾什維克領導層最核心圈子中的所有討論與行動，在政變臨近和隨後發生的時候，在事態最緊張的時候，都可以見到他的身影。「以前我從來沒有見過他那個樣子！」達維德·薩吉拉施維里(David Sagirashvili，生於1887年)，一個同樣來自格魯吉亞的社會民主黨人回憶說，「他辦事很少會那麼匆忙和焦躁，正常情況下，他不管做甚麼都非常鎮定。」<sup>12</sup>尤其是，斯大林是布爾什維克宣傳機器中一個強大的聲音。(儘管有很多議論，而且大多是負面的，說他在紛亂的1905至1908年參與過「剝奪」，但是在地下工作中，他其實從一開始就是鼓動家和宣傳家。)1917年五一節那天，他寫道，「自從交戰國掠奪成性的資產階級把世界拖入血腥屠殺以來，已經快要三年了。」<sup>\*</sup>——這是他典型的煽動性社論之一。<sup>13</sup>他對黨內圈子和公眾發表了一次又一次演講，其中許多都刊登在報紙上。斯大林經常為布爾什維克的主要報紙撰稿，而經他之手發表的文章更多。<sup>14</sup>從8月到10月這段最關鍵的時期，他在《真理報》以及臨時代替它的《無產者報》和《工人之路報》上發表了大約40篇重要文章。<sup>15</sup>一下子寫了那麼多文章，這和他在戰爭開始後將近三年的沉寂形成了鮮明的對照。他的文章強調以蘇維埃的名義奪權的必要性。以蘇維埃的名義奪權，在列寧看來，就意味着權力掌握在布爾什維克手中。

---

\* 譯註：《斯大林全集》第3卷，第36頁。

要填補巨大的空白，就要重建新的權威和可以正常運轉的公共機構。這是一項艱巨的任務，而讓任務變得更加艱巨的是，當時戰爭還在進行。由此似乎可以得出意料之中的結論，即應該實行新的專政。但是，就像國家不會一下子實行民主一樣，它也不會一下子陷入專政。專政也得要建立和維護。除了有效的治理工具和積極的鎮壓措施，現代的專政，即少數人以多數人的名義進行的統治，不僅需要把群眾結合成一個統一的整體，還需要一套強大的象徵性劇目和信仰體系。<sup>16</sup> 在國家幾近崩潰的情況下，就如同1917年的俄國，要是認為可以在迅速蔓延的混亂中，建立起一種強勢的現代的專政，這種想法——或者恐懼——只能說是不切實際。不過，對於布爾什維克政權來說，關鍵在於，俄國的權力集團一直在尋找救星。為了阻止布爾什維主義的勝利而做出的種種努力，尤其是圍繞最高總司令拉夫爾·科爾尼洛夫將軍所做的努力，結果都適得其反，對於加強布爾什維主義的影響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1917年二月革命後群眾參與的結果，既和戰爭以及士兵心態的基本結構有關，又和反革命的幽靈有關，這一點與1789年後的法國革命頗為相似。對於布爾什維克來說，人們對反革命的擔憂是天賜良機。

178

### 自由和穩定的權威

俄國的憲政革命又一次獲得了廢黜專制君主的機會，而且這一次不同於1905至1906年。不過，臨時政府從誕生之日起，就籠罩在不祥和非法的陰影中。當時，尼古拉二世已經同意讓位給13歲的阿列克謝，並指定自己的弟弟米哈伊爾大公為攝政。大本營和杜馬主席羅將柯——全都是君主派——指望小天使一般的阿列克謝能讓國家團結起來，同時也可以讓他們放開手腳。但沙皇再次諮詢了自己的宮廷醫生，確認血友病無法治癒，而且那個病弱的男孩一旦登上皇位，尼古拉就要被流放，父子離散；所以作為父親的沙皇，衝動之下就剝奪了阿列克謝繼承皇位的權利，直接指定米哈伊爾繼位。<sup>17</sup> 可是按照1797年的繼承法，沙皇皇位只能傳給他的合法繼承人，在這裏就是尼古拉二世的長子，而像阿列克謝這樣的未成年人，是沒有權利放棄皇位的。<sup>18</sup> 指定米哈伊爾大



公繼位不僅不合法，而且根本就沒人想過，應該徵求大公的意見；3月3日，在彼得格勒與米哈伊爾大公倉促舉行的峰會上，立憲民主黨(卡傑特)領袖帕維爾·米留可夫強調傳統的重要性和維護國家的必要性，主張保留君主制；亞歷山大·克倫斯基，當時是杜馬的左翼代表，強調民眾的情緒，敦促米哈伊爾放棄繼位。<sup>19</sup>米哈伊爾在聽取了他們的意見後，經過反覆考慮，決定只有在即將召開的立憲會議要求他繼位的情況下，才會接受皇位。<sup>20</sup>就這樣，尼古拉二世的退位始於將領而終於政治家，俄國事實上變成了一個共和國。兩名法律專家匆匆起草了「退位」宣言，米哈伊爾大公在宣言中將「全部權力」轉讓給臨時政府，儘管他根本沒有權利轉讓。在政權更迭的混亂中，並非沙皇的米哈伊爾·羅曼諾夫的「退位」宣言，成了支撐未經選舉的臨時政府的唯一「法令」。<sup>21</sup>

179 實質上，革命必然會違反具體的法律條文。但就上述情況而言，11人實際上都是58歲的米留可夫(他本人掌管外交部)精心挑選的，他們所取代的，不僅是空心化的君主專制，還有杜馬——而他們正是來自杜馬之中。<sup>22</sup>這不是因為杜馬已經不合法了。到1917年3月為止，大部分前線士兵即使對杜馬不信任，也還是認可的。<sup>23</sup>杜馬是有缺點，但這些年來與君主專制的鬥爭已經為它贏得了一些聲望。有些杜馬成員在休會後成心挑釁沙皇，繼續召開會議。但臨時政府第一次會議(3月2日)紀要草案表明，聚集起來的這部分杜馬代表，考慮援引沙皇政府基本法中臭名昭著的第87條的規定，撇開議會進行統治；而立憲民主黨人曾為此猛烈抨擊過斯托雷平。第一次會議紀要還特別說明：「屬於君主的全部權力不應當看作是移交給了國家杜馬，而應當看作是移交給了臨時政府。」<sup>24</sup>實際上，臨時政府所要求的既有立法權，又有行政權，也就是要求把從前的杜馬(下院)、國務會議(上院，已經根據政府法令取消了)、大臣會議(行政機關，已經根據尼古拉二世的退位詔書解散了)和很快就退位的沙皇的各項權力集於一身。臨時政府起初是在杜馬的塔夫利達宮開會，很快就換到內務部，接着又換到金碧輝煌的瑪麗亞宮，那是從前大臣會議和國務會議召開正式會議的地方。與會者很少的杜馬「私人」會議(仍由米哈伊爾·羅將柯主持)一直開到1917年8月20日，臨時政府的部長們有時會不辭勞苦，跑到塔夫利達宮，和無所

事事的杜馬成員私下聊天。但立法機關根本不存在。杜馬成員請求讓立法機關合法地恢復運行，米留可夫和臨時政府的其他人不同意。<sup>25</sup>

這是怎麼回事？臨時政府並不是一幫好心好意但是被前所未有的經濟崩潰和布爾什維克的煽動活動搞垮的倒霉蛋。長期以來，舊制度內部的叛逆分子一直在要求君主立憲，要求成立一個「負責的」政府，即成立一個以議會多數派為基礎的政府，可他們一旦得勢，立馬就成立了另外一種懸在半空的中央政府。當3月2日米留可夫在塔夫利達宮葉卡捷琳娜圓柱大廳首次公佈臨時政府的全體成員名單時，有人突然插了一句：「誰選了你們？」「俄國革命選了我們」，米留可夫回答說，並鄭重表示，「一旦由人民通過自由選舉產生的代表對我們說，希望把我們的位置交給其他更值得信賴的人」，那他們就會讓賢。<sup>26</sup> 根本沒有人選他們，關鍵是，人們根本就沒有機會不去選他們。不錯，這個自封的政府的確承諾，「立即籌備召集以普遍、平等、直接和無記名的投票為基礎的立憲會議，並由它來決定政府形式和國家憲法」。這個政府還說，它沒有「絲毫以軍事形勢為藉口，設法拖延兌現那些改革措施的想法」。這樣一個通過普選產生的立憲會議——正因為如此，他們的政府才是「臨時的」——似乎讓杜馬成了累贅。<sup>27</sup> 但是在臨時政府存在的八個月裏，反覆說了四次（3月、5月、7月、9月），都沒有召開立憲會議。時局艱難不能作為不召開的理由。（1848年，法國的七月王朝垮台後不到四個月就召開了立憲會議。）相反，米留可夫和立憲民主黨故意阻撓立憲會議的選舉，因為他們私下十分擔心「厭戰的」士兵和水兵的投票，農民群眾就更不用說了。<sup>28</sup> 無憲法可依的立憲主義者並不想要選舉。二月革命是自由派的政變。

180

彼得格勒和莫斯科的一些古典自由主義者，在整個戰爭期間一直嚷嚷着要自己掌權，現在他們有權了，或者說，看似有權了。<sup>29</sup> 36歲的克倫斯基是首屆臨時政府中唯一的社會主義者，他先是擔任司法部長，然後是陸海軍部長，最後是總理，儘管他在1917年以前沒有擔任過任何重要的行政職務。他在日後寫道：「由於皇帝退位，政府機關的整個機制都被破壞了。」<sup>30</sup> 的確如此，但是，在贊成結束君主制的人當中，克倫斯基最積極。另外，臨時政府還故意煽動俄羅斯國家的解體。1917

181 年3月4日，臨時政府非但沒有從正在解散的沙皇警察中設法保住一支治安力量——當時首都的警察機關已被洗劫一空——反而正式撤銷了警察局和保安處，並把憲兵隊的軍官重新安排到軍隊。但是，新成立的準備代替警察的「民兵」絲毫不起作用：搶劫和社會崩潰的現象蔓延開來，結果傷害的不僅有富人，還有窮人，同時也抹黑了民主事業。<sup>31</sup>（可想而知，有些民兵組織的首領就是從前的罪犯，他們在動亂中逃了出來或者被放了出來。）1917年3月5日，臨時政府解除了所有省長和副省長的職務——他們幾乎是清一色的世襲貴族——這樣做一方面是為了打擊「特權」，另一方面是為了預防「反革命」。這些省級行政官員，有些已自動辭職，有些已在當地被捕。不過，大部分省長都參加了新的臨時政府的就職儀式，只是事實上被當作變節分子對待。<sup>32</sup> 臨時政府沒有任何地方分支機構，沒有人理睬它派往地方管理部門的「委員」。與此同時，那些地方部門乘機出面管理，可接着，往往就會被經濟和管理上的混亂壓垮。「舊制度」中唯一保存下來的主要公共機構是政府的各個部委以及軍隊。但中央的國家工作人員的影響力蕩然無存，更要命的是，在克倫斯基主政時期，臨時政府還搞亂了至關重要的軍隊。<sup>33</sup>

新俄國有一條不容忽視並且唾手可得的組織原則，那就是「革命」這顆指路明星。米留可夫決定不把杜馬作為政府根基，這讓通過選舉產生的彼得格勒蘇維埃有了可乘之機，扮演起議會的重要角色。彼得格勒蘇維埃——它的再次出現刺激了臨時政府的成立——在塔夫利達宮的影響越來越大，而塔夫利達宮是沙皇制度反對派的象徵，是當選代表的象徵。<sup>34</sup> 作為代議制民主和直接民主的混合物（好似雅各賓俱樂部），成員數量最後達到三千多人的彼得格勒蘇維埃，在人們的期望變得越來越激進的情況下，努力不辜負民眾的委託，然而最終就像我們看到的，還是沒有成功。<sup>35</sup> 實際上，在臨時政府還沒有宣佈成立的時候，衛戍部隊的士兵在接到杜馬軍事委員會要求他們返回附近兵營並遵守紀律的命令後，曾在1917年3月1日闖進蘇維埃的一次會議提出要求。憤怒的衛戍部隊士兵起初是打算向杜馬反映自己的要求，卻遭到粗暴的拒絕。<sup>36</sup> 「我不知道該和誰聯繫，也不知道該聽誰的，」有位士兵代表在那天向彼得格勒蘇維埃指責軍事當局，「甚麼都不清楚。給我們

說明白一點。」<sup>37</sup> 後來被稱作「一號命令」的文件，授權「由基層士兵選舉產生的代表組成的委員會」裁決官兵之間的關係，這就等於取消軍隊的正規紀律。事實上，叛亂的衛戍部隊已經在這樣做了。現在，前線的士兵和水兵，從法律上講，只有在接到的命令被認為同蘇維埃的法令不存在衝突的「範圍」內，才服從他們的軍官和臨時政府。<sup>38</sup> 3月9日，尼古拉二世曾經問過被派去說服沙皇退位的兩名君主派代表之一、新任陸海軍部長亞歷山大·古契科夫，那樣退位會不會引起甚麼不良的後果。現在，軍隊的「一號命令」公佈的時候，古契科夫才聽說有這麼回事。他打電報給前線大本營的阿列克謝耶夫將軍，報告說「臨時政府沒有任何實權，它的命令只有在蘇維埃允許的範圍內才能得到執行」，而蘇維埃則控制了「部隊、鐵路、郵政和電報」。古契科夫建議缺乏權威的政府集體辭職。<sup>39</sup>

臨時政府一共存在了237天，其中有65天花在組閣上（這比前後4個內閣存在的時間都要長）。還有一個困難在於，蘇維埃的實際權威也被普遍高估了。士兵委員會並不認為自己隸屬於蘇維埃。3月5日，臨時政府和蘇維埃聯合發佈「二號命令」，明確否認謠傳的選舉軍官的權利，重申了維護軍隊紀律的必要性，但「二號命令」沒有效果。<sup>40</sup> 托洛茨基有個著名的說法，稱上述局面是「雙重政權」，但它更像是「雙重自命政權」：一個是臨時政府，沒有立法機關，也沒有有效的執行機關；另一個是彼得格勒蘇維埃，充其量只能算是一個臃腫的準立法機關，而且它本身在法律上也沒有得到認可。

此外還存在第三個集團，即右翼政治集團。君主專制失敗，臨時政府取而代之，對於這一極為引人注目的事件，右翼政治集團一開始是接受的，但在抱有希望的同時也惴惴不安。<sup>41</sup> 二月革命期間，約有4,000名「舊制度」的官員被捕，其中許多是自首的，為的是免於被成群結隊的人撕碎。實際上，流血事件相對來說是比較少的：受傷的大概有1,300人，死亡169人，基本上都是在喀琅施塔得和赫爾辛基的海軍基地，那裏的普通水兵對軍官動用了私刑（因為有傳言說他們有叛國行為）。不過，二月革命後的報刊對右翼組織的攻擊升級，革命者襲擊了最臭名昭著的極右翼組織黑色百人團的辦事機構。（彼得格勒蘇維埃沒

收了一些右翼組織的印刷所，佔為己用。)尼古拉二世退位後沒幾週時間，弗拉基米爾·普利什凱維奇——1905年右翼組織俄羅斯人民同盟的創始人之一和暗殺拉斯普京的同謀之一——就在一本以打印稿的形式廣為流傳的小冊子中承認：「舊制度不可能恢復了。」<sup>42</sup>然而到了1917年7月，極右翼勢力又站穩了陣腳，普利什凱維奇特意列了一份名單，上面有俄國猶太革命者的真實姓名，並要求解散彼得格勒蘇維埃，「改組」  
183 「怯懦的」臨時政府。<sup>43</sup>而在不太極端的右翼，許多人不無道理地認為，自己在尼古拉二世的垮台過程中發揮了重要的作用，因而在新秩序中理應擁有一席之地，但是由貴族和地主、商界精英、教會官員、沙皇時代的國家工作人員、右翼軍官和形形色色自封的愛國者組成的各種社團，在1917年二月革命後，很難被新秩序接納。相反，傳統的保守派僅僅因為行使了合法的結社權就被指控為「反革命」。<sup>44</sup>權力集團中的大多數人還是想繼續擁護二月革命的，但那樣做實際上不被允許，結果，對他們的指控就變成了說甚麼就來甚麼的預言。

接下來還有帝國。沙皇的多民族制度剛被取消，帝國的許多邊疆區就宣佈自己是「在一個自由的俄羅斯中擁有自治權的」民族單位(不是省)，但它們接連發給首都臨時政府的急電往往得不到回覆，於是，這些邊疆區就開始慢慢走向事實上的獨立，比如芬蘭、波蘭、烏克蘭、高加索和波羅的海沿岸地區。「大家都覺得，」馬克西姆·高爾基在1917年6月寫道，「俄羅斯國家就像波濤中一艘破舊的駁船，正沿着它接縫的地方開裂，然後分崩離析。」<sup>45</sup>

當然，對於許多人來說，這種削弱的過程也是解放的過程。1917年5月1至11日，已經停擺的杜馬中的穆斯林集團召開了全俄第一次穆斯林代表大會——此舉是為了體現宗教和社會的團結——來自全國各地和各政治派別的與會者約900人(是預期人數的兩倍)，只有為數很少的穆斯林布爾什維克活動家拒絕出席。大會先是誦讀《古蘭經》經文，接着，臨時政府內務部國外宗教局局長S. A. 科特拉列夫斯基教授(S. A. Kotlarevsky)發表講話，承諾信仰自由和發展民族教育，同時呼籲建立一個統一的國家，而不是以不同的民族區域單位為基礎的聯邦制國家。許多穆斯林代表都表示失望。有些穆斯林代表，特別是韃靼的穆斯林

代表，主張建立一個由所有講突厥語的民族組成的單一國家（由韃靼人主導）；少數持泛突厥主義觀點的代表拒絕講俄語，雖然沒有哪一種突厥語是所有代表都能聽懂的。關於國家的組織形式，最終決議帶有折衷性質：「最能體現俄羅斯各穆斯林民族利益的政府結構，應該是以區域自治為基礎的聯合（聯邦）共和國；對於沒有領土要求的各穆斯林民族來說，應該得到的是一個以民族文化自治為基礎的人民共和國。」在主張婦女擁有平等的繼承權、反對多妻制的投票中，雖然有二百多名代表簽署了抗議書，可還是通過了，結果，俄國成了第一個這樣做的穆斯林人口大國。<sup>46</sup>

184

自由肯定是讓人陶醉的。<sup>47</sup> 帝俄的全體臣民取得了突破，有了種種前所未有的、與社會地位無關的公民權利：結社和出版自由、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地方機關選舉的普選權——對於這些權利，以律師和知識分子為主的臨時政府作了詳細的法律規定。<sup>48</sup> 克倫斯基喜氣洋洋地宣佈，俄國是「世界上最自由的國家」——從歐洲最後一個君主專制的國家變成了歐洲「最民主的政府」——而他說得對。<sup>49</sup> 但缺乏有效治理機構的自由終歸是不會長久的。它會招來各種各樣的冒險家和自封的救星。<sup>50</sup> 二月革命的自由的狂喜，僅僅過了幾個月，就變成了對「穩定的權威」的極度渴望。<sup>51</sup> 到了1917年夏天，立憲民主黨中許多著名的古典自由主義者都與傳統的右翼分子和極右翼分子一樣，把俄軍最高總司令拉夫爾·科爾尼洛夫將軍看作是救星。

科爾尼洛夫，1917年的時候47歲，身材矮小，瘦削而結實，臉長得像蒙古人，與中等個頭、體格健壯的39歲的朱加施維里一斯大林有很多相似之處。科爾尼洛夫也是平民——和列寧與克倫斯基這兩個小貴族不同——而且也出生於帝國的邊遠地區，具體來說，是出生於額爾齊斯河（鄂畢河的支流）岸邊的烏斯季—卡緬諾戈爾斯克（厄斯克門）。\* 他的父親是哥薩克，母親是一個受過洗的阿爾泰地區的卡爾梅克人（卡爾梅克人是突厥人、蒙古人以及其他被蒙古霸主征服的部落混合而成

---

\* 譯註：位於今哈薩克斯坦東部。

的)；他在帝國哈薩克草原的牧民中成長為一名東正教教徒。但是和斯大林努力淡化自己地道的格魯吉亞人身份並融入俄羅斯的環境不同，作為半個俄國人的科爾尼洛夫樂於張揚自己的異族身份，他的身邊簇擁著一群土庫曼衛兵：身披紅色長袍，頭戴高聳的皮帽，佩彎刀，用突厥語(科爾尼洛夫的突厥語說得非常流利)稱呼他們的首領為大波雅爾。科爾尼洛夫還有一點跟斯大林不同，那就是他上過俄羅斯帝國的軍校。他也是一名優等生，幾次被派往與阿富汗接壤的邊境任職，他從那裏率考察隊到過阿富汗、中國新疆和波斯；他後來又畢業於聖彼得堡的總參軍事學院。1903至1904年，斯大林幾番進出高加索的監獄和西伯利亞的流放地，科爾尼洛夫則被派往英屬印度任職，他在那裏以學習語言作幌子，準備了一份目光敏銳的關於英屬殖民地軍隊情報的報告。俄日戰爭期間，斯大林在格魯吉亞的錳礦煽動造反，科爾尼洛夫則因為在滿洲的陸戰中表現勇敢而獲得了勳章，之後，他就任俄國駐中國的武官(1907-1911)。在中國，他又一次在馬背上到處旅行考察，結識了年輕的中國軍官蔣介石。後來，蔣介石統一了憲政革命失敗後的中國，並統治了約20年時間。睿智而勇敢的科爾尼洛夫跟蔣介石非常相似。世界大戰期間，科爾尼洛夫指揮一個步兵師，並晉升為少將。1915年，科爾尼洛夫在掩護布魯西洛夫撤退時，做了奧匈帝國軍隊的俘虜，但他在1916年7月設法逃脫並返回俄國，獲得廣泛的讚譽和沙皇的接見。「他總是身先士卒，」布魯西洛夫在提到自己的下屬在戰場上的表現時說道，「所以在這方面，他贏得了手下的尊重與愛戴。」<sup>52</sup>

科爾尼洛夫的成長軌跡恰好與克倫斯基相反。後者的家庭來自俄國中部的辛比爾斯克，和烏里揚諾夫家是同一個地方。「我(和列寧)出生同樣的天空下，」克倫斯基寫道，「從同樣的高高的伏爾加河岸邊，我看到的是同樣的無垠的地平線。」克倫斯基的父親是教師，曾短期擔任過列寧以及列寧哥哥亞歷山大就讀的中學的校長；而列寧的父親作為辛比爾斯克省的督學，在老克倫斯基把家搬到塔什干之前就認識他。<sup>53</sup>列寧似乎準備像父親一樣，努力學習，拿到法學學位(喀山大學)，然後成為國家工作人員，可結果卻被開除了。與之相反，比列寧小11歲的克倫斯基，完成了法學學位的學習(聖彼得堡大學)，並獲得一份實

際的工作，擔任1905年沙皇政府鎮壓活動受害者的法律顧問，而且他那時已經加入社會革命黨。在臨時政府中，幾乎只有克倫斯基不害怕群眾。他培養了一種跟君主派類似的個人崇拜，使自己成了「人民領袖」(*vozhd' naroda*)——有點兒像公民之王。「在最風光的時候，他可以把震撼人心的巨大的道義熱忱傳遞給人們，」維克托·切爾諾夫寫道，「他可以讓他們笑，讓他們哭，讓他們跪倒，讓他們高飛，他自己也完全沉浸在當時的氣氛中。」<sup>54</sup> 匍匐在地的士兵和其他人一邊熱淚盈眶地禱告，一邊親吻克倫斯基的衣服。<sup>55</sup> 他開始習慣於穿着半軍事化的服裝——托洛茨基和斯大林後來也採用了這種式樣——然而克倫斯基沒有把自己比作拿破侖，而是比作米拉波伯爵(Mirabeau)，法國大革命期間試圖走中間道路的那位深受民眾歡迎的演說家。(米拉波1791年因病去世，他的葬禮同時也是巴黎先賢祠的落成儀式。可到了1794年，他的屍體被挖出來，墓穴給了讓—保羅·馬拉。)不過，隨着俄國陷入無政府狀態，克倫斯基也開始表示，需要有「穩定的權威」。在他主政時期，臨時政府開始在公民自由的問題上出爾反爾，釋放並重新起用了許多被捕的沙皇時代的內務部官員，但「穩定的權威」仍未找到。<sup>56</sup> 因此，科爾尼洛夫的吸引力急劇上升。「馬背上的男子漢」、俄國革命的拿破侖之類的美譽，紛紛落在這位卡爾梅克救星的頭上。<sup>57</sup> 到頭來，事實證明，軍事「反革命」的想法——一方面反映的是希望，另一方面反映的是恐懼——要比它實際上的可能性更為有力。

186

## 列寧的幫手

1917年，列寧的布爾什維克在組織上還顯得比較混亂，但在街頭戰鬥中卻十分強悍。<sup>58</sup> 現在，布爾什維克聲稱擁有約2.5萬名成員，這一數字無法核實(因為加入的方式往往不太正規)，但核心積極分子有近1,000人，高層領導可以坐滿一張會議桌(如果他們沒有被流放或關進監獄的話)。儘管如此，布爾什維主義還是在二月革命後成了首都的群眾現象：在彼得格勒小涅瓦河沿岸的兵工廠和機器廠，在法俄共同開辦的大型造船廠，在雜亂無序的普梯洛夫工廠，在彼得格勒的維堡區，都



集中了大量的產業工人，他們受到布爾什維克密集的鼓動攻勢的影響。換句話說，工人的激進情緒同布爾什維克黨的激進立場密切相關。尤其是維堡區，實際上成了一個自治的布爾什維克公社。<sup>59</sup>

布爾什維克黨部——斯大林也藏在那裏——起初設在一座「徵用的」新藝術運動風格的公館裏，屋內有枝形吊燈，還配有非常不錯的車庫。公館的地理位置極佳，不僅靠近維堡區，而且就在冬宮對岸。那座大院是從馬蒂爾達·克舍辛斯卡婭那裏強佔的，她出生在波蘭，是俄國馬林斯基皇家劇院的首席芭蕾舞女演員，之所以能有這座宅邸，要多虧她的幾個情夫：尼古拉二世（當時他還沒有結婚），與此同時還有羅曼諾夫家族的兩位大公。<sup>60</sup>（她後來聲稱在公館的花園裏認出了布爾什維克亞歷山德拉·柯倫泰〔Alexandra Kollontai〕，柯倫泰穿着她沒有帶走的貂皮大衣。）<sup>61</sup> 這種強佔別人房屋的行為是非法的，但臨時政府沒有警察，所以很難管治。在監獄裏建立的「無政府主義者和共產主義者同盟」強佔了已故的彼得·杜爾諾沃從前的一處別墅，就在緊鄰維堡區工廠的一個漂亮公園裏。<sup>62</sup> 除了維堡，布爾什維主義還在波羅的海艦隊發展了幾個重要的據點。波羅的海艦隊駐紮在赫爾辛基和彼得格勒附近的喀琅施塔得，容易受到布爾什維克（以及無政府主義和工聯主義）鼓動家的影響。而在布爾什維克鼓動家夠不着的地方，比如烏克蘭的工廠和黑海艦隊，有社會主義傾向的群眾並不認同布爾什維克黨。在廣闊的農村地區，布爾什維主義在整個1917年基本上都沒有甚麼影響（在參加全俄第一次農民代表大會的1,000名代表中，可以確認為布爾什維克的大概有20人）。<sup>63</sup> 同時，在1917年的時候，全俄穆斯林布爾什維克也只要一二十人。<sup>64</sup> 不過，布爾什維克的據點具有戰略意義，比如首都、首都衛戍部隊以及首都附近的戰線。

布爾什維克必須爭取自己的地位，而他們的確在一些巴掌大的地區做到了這一點。在那些小得可以親耳聽到斯大林等人不知疲倦做宣傳的地方，布爾什維主義擁有無敵的招募手段：萬惡的戰爭，以及關於富人對窮人的階級剝削的萬能解釋，這種解釋產生了超乎想像的共鳴。不過，戰爭並不會使布爾什維克穩操勝券。正如我們將會看到的，臨時政府的選擇不僅是不退出戰爭，而且還在1917年6月發動了一次損失

慘重的攻勢。<sup>65</sup> 這一決定給了那些最激進的政治力量機會，列寧使布爾什維克黨振作起來，準備從中獲益。

流亡蘇黎世期間，住在香腸廠附近一個獨立房間裏的列寧，曾經號召在戰爭中打敗自己的祖國，但他沒有受到法律的追究，反倒在1917年3月，作為沙皇統治的受害者成了臨時政府大赦的對象。不過，他沒有獲得返回國內的正式許可，因而仍舊困在德軍戰線的後方。<sup>66</sup> 為了回到俄國，他冒着被指控為德國奸細的危險，通過中間人暗中向德國求助，而正是那項可怕的罪名，極大地削弱了沙皇的專制統治。<sup>67</sup> 柏林方面為了推翻臨時政府，迫使俄國按照德國人的條件退出戰爭，此時正在用大把大把的金錢資助俄國的激進分子，尤其是社會革命黨人，所以對於幫助這位狂熱的布爾什維克領袖——「一個叫列寧的韃靼人」——很感興趣。<sup>68</sup> 不過，雙方都不想背上為敵對的德國人效力的罪名，因此，列寧穿越德軍戰線回到俄國時乘坐的是所謂鉛封列車，也就是說，他的車廂是鎖上的，而且一路上都是由中立國瑞士的中間人與德國當局打交道。列車於1917年3月27日（俄曆）從蘇黎世出發開往柏林，然後又開往波羅的海海岸。列車上有32位俄國僑民，其中19人是布爾什維克（包括列寧、他的妻子娜捷施達·克魯普斯卡婭、他從前的法國情人伊涅薩·阿爾曼德、季諾維也夫以及他的妻子和孩子），以及其他一些激進分子。<sup>69</sup> 社會民主黨中的孟什維克馬爾托夫和阿克雪里羅德不想冒險，害怕沒有得到臨時政府的允許就和德國人達成交易，背上叛國的罪名（這些孟什維克最後搭乘的是一趟比較晚的列車）。<sup>70</sup> 在這樁交易中，列寧唯一的義務就是去鼓動釋放被俄國扣留的德奧兩國的平民。他對於利用德意志帝國的後勤援助和經費去顛覆俄國並不感到愧疚；他還預見到德國國內也將因戰爭而爆發革命。列寧從未承認接受德國金錢的事實，但他不是德國奸細；他有自己的盤算。<sup>71</sup> 列寧讓那些布爾什維克商量一下，萬一按照臨時政府的命令，他們在俄國邊境被拘押並受到審訊怎麼辦，不過，這些擔心沒有成為現實。<sup>72</sup>（卡爾·拉狄克（Karl Radek）未被允許進入俄國，因為他持有的是奧匈帝國護照，是敵國的臣民。）法國是俄國的盟友，法國大使從本來可以阻止列寧回國的外交部長米留可夫那裏聽說了這件事。他憂心忡忡，認為那位布爾什維克

領袖的到來，是一個極其嚴重的新的危險。<sup>73</sup>但是在彼得格勒的芬蘭車站（位於「布爾什維克公社」維堡區），列寧沒有被逮捕。他是在1917年4月3日，即復活節的第二天夜裏11:10到達那裏的。列寧登上了一輛裝甲車的車頂，在專門裝上輪子的聚光燈下，對車站的一大群工人、士兵和水兵發表了演說，那些人都是頭一次見到他。

在廣袤的俄羅斯帝國，知道列寧的人很少。<sup>74</sup>在幾十萬個村莊中，有許多是到4月和春季解凍的時候才聽說了二月革命\*。列寧4月3日回來的時候，正趕上俄國國內開始出現大規模強佔土地的現象，那是1789年法國大革命中不曾聽說的。世界大戰前夕，俄國農民已經擁有了包括森林和草場在內的大約47%的帝國土地。他們在農奴解放後的40年，尤其是從1906年的斯托雷平改革開始，常常作為集體（村社），有時也作為個人，從貴族手裏購買土地。<sup>75</sup>但是，即便貴族的土地佔量已經減少到與農民大體持平，他們的人數也只佔總人口的2%，而農民要佔80%。<sup>76</sup>農民對重分全部土地的期待非常強烈，戰時的沙皇政府助長了這種期望：沒收生活在帝俄境內的德意志人的土地，而那些土地據說是要分給作戰勇敢的俄國士兵或者沒有土地的農民的。軍隊自作主張，承諾會給獲得勳章的士兵免費分配土地，結果有傳言說，到戰爭結束，所有士兵都會分到土地。<sup>77</sup>沙皇政府在戰爭期間沒收的耕地總共超過1,500萬英畝†，這些耕地是以極少的補償甚至無償從帝國最能幹的一些農民那裏沒收的，1916年嚴重的糧食短缺和1917年的麵包騷亂與此不無關係。<sup>78</sup>現在，農民開始有樣學樣，以他們所謂「土地平分社」（Black Repartition）的形式，強佔耕地、役畜和農具。臨時政府想要阻止這種行為，表示土地改革問題要等到即將召開的立憲會議再作決定。實際上，甚至在強佔成了一種群眾現象，而臨時政府根本無力阻止或扭轉這種趨勢的時候，臨時政府仍然拒不同意農民對土地的無償徵用。

多年來，農民為實現斯托雷平的夢想——成為獨立、富裕、擁有大型私有農莊的自耕農階層——而付出的巨大努力，在1917至1918年的

---

\* 編註：二月革命（俄曆2月23日）發生在1917年3月8日。

† 編註：約607萬公頃。

時候，幾乎一夜之間就化為泡影，沒有任何抵抗；相反，許多農民還故意縮小自己農莊的規模。<sup>79</sup> 就連一些比較小的私有農莊也在重新分配土地。村社重申了自己的權威。<sup>80</sup> 農民們一邊幹着違法的事情，一邊滿嘴的權利和公民身份。<sup>81</sup> 貴族莊園成了主要的攻擊對象。那些莊園在世界大戰期間之所以能夠維持下來，許多時候只是因為它們能從43萬戰俘中招到勞工，而在1917年的二月革命後，倘若哪個莊園因為缺少人手而閒置了，那按照農民的邏輯，佔有它就是合法的。<sup>82</sup> 實際上，強佔土地的事情有很多都不是一下子發生的；相反，農民們說的是貴族「多餘的」土地，是把「撿荒的」土地復耕——結果就越佔越多。但因為農民佔地的現象大多是整個村子以集體的名義進行的，在這樣的行動中，大家都有責任，大家瓜分搶來的東西，裝到自家馬車上，所以聚集起來的農民通常會變得和現場最激進的那些人一樣激進。激進分子總是催促鄉親們多拿一些，甚至把莊園主價值不菲的房子燒掉。收割機和風揚機太大，拿不走，才被留下，有時也會搗毀。至於禽畜，農民們常常把烤爐燒熱，殺雞宰羊，擺下豐盛的宴席。<sup>83</sup> 但到頭來，並不是所有的農民都能夢想成真：大概有一半的農民村社從革命中沒有得到一點土地，而在農民真正「得到」的土地中，大部分都是他們已經在租用的。有學者估計，直到1920年代，仍有大約11%的貴族地主在管理自己剩下的土地。<sup>84</sup> 不過，那也意味着絕大多數貴族地主的土地被「剝奪」了。農民不再給大地主交租，他們總共「剝奪」了大約5,000萬英畝\*的貴族土地。<sup>85</sup>

190

相比於這一巨變——農民自己的革命——列寧不過是單個的人。但他在1917年的作用非常關鍵。馬克思主義理論認為，歷史的演進是分階段的，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社會主義社會、共產主義社會，因此，在進入社會主義社會之前，必須先發展資產階級—資本主義社會階段。幾乎所有的布爾什維克都認為革命會最終朝着社會主義方向前進，但問題是在甚麼時候：他們激烈爭論的是，「資產階級」或「民主」革命階段是已經完成，還是要繼續進行，以便為社會主義革命作好

---

\* 編註：約2,023萬公頃。

準備。列寧並沒有打算馬上就躍進到社會主義，因為那樣做會褻瀆神明；而是主張不等到資產階級革命有充分的發展，現在就奪取政權，進而加快向社會主義前進的步伐——這一點，他後來稱之為「一隻腳踏進社會主義」。<sup>86</sup>

在彼得格勒的布爾什維克俄國局——「俄國」是與流亡國外的人（比如列寧）相對的——領導人是32歲的亞歷山大·施略普尼柯夫（Alexander Shlyapnikov）和27歲的維亞切斯拉夫·莫洛托夫（Vyacheslav Molotov〔Skryabin〕），他們（特別是莫洛托夫）對臨時政府不屑一顧，認為它是反革命。相反，斯大林和加米涅夫主張，為了把民主革命進行到底，要有條件地支持「民主」革命，也就是臨時政府。1917年3月12日，兩人從西伯利亞回到彼得格勒，誰也沒有獲邀加入俄國局，儘管斯大林得到了「顧問身份」。（他因為自己的「某些個人品性」而受到指責，這顯然是指流放西伯利亞期間對待同伴的負面行為。）<sup>87</sup> 第二天，同列寧一樣從一開始就是強硬派並且終生都是強硬派的莫洛托夫被排擠出去，斯大林成了俄國局的正式成員，加米涅夫成了《真理報》的編輯。<sup>88</sup> 加米涅夫和斯大林立即調整《真理報》的方向，從完全否認臨時政府，轉向與之進行帶有機會主義性質的合作。他們認為臨時政府是注定要滅亡的，但同時也肩負着重要的歷史任務。這讓身在遠方的列寧十分憤怒。他的第一封憤怒的來信，經刪改後刊登在《真理報》上，他的第二封來信乾脆被壓下來沒有發表。<sup>89</sup> 但接着他就回來了。

191 列寧在邊境上跟加米涅夫打招呼時笑着責備說：「你們在《真理報》上都寫了些甚麼？」<sup>90</sup> 即使到了這個時候，布爾什維克的喉舌仍然拒絕發表它自己領袖的提綱。1917年4月6日的布爾什維克中央委員會會議，毫不客氣地拒絕了列寧的提綱。不管怎麼說，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才剛剛開始，國家需要土地改革，需要退出戰爭，需要經濟改革，要是推翻了臨時政府，無產階級怎麼推動所有這些工作？（就像有布爾什維克說的，「民主革命怎麼可能結束了呢？農民還沒有得到土地呢！」）<sup>91</sup>

\* 譯註：《列寧全集》第29卷，第437頁。

加米涅夫特別指出，富裕農民和城裏的資產階級要把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進行到底，要為社會主義革命承擔大量的歷史任務。<sup>92</sup> 斯大林認為列寧的提綱是「綱要，其中沒有任何事實，因而不能令人滿意」。<sup>93</sup> 最後，《真理報》以列寧的名義在4月7日發表了十條〈四月提綱〉（約500字），但附有加米涅夫的編者按，以表明黨與其領袖的分歧。<sup>94</sup>

布爾什維克高層不主張強行奪權，彼得格勒蘇維埃更是如此。列寧還沒有回到俄國的時候，3月底，蘇維埃的代表們會聚一堂，成立了有72名成員的全俄中央執行委員會，以及各種各樣的部門，負責糧食供應、經濟、外交，從而宣稱彼得格勒蘇維埃對整個俄國的統治權。蘇維埃還保證說，會有條件地支持「資產階級」臨時政府（約有一半的布爾什維克代表投了贊成票）。<sup>95</sup> 4月3日，已經是彼得格勒蘇維埃主席的格魯吉亞孟什維克派社會民主黨人尼古拉·「卡爾洛」·齊赫澤，代表彼得格勒蘇維埃在芬蘭車站從前的沙皇接待室迎接列寧。到了外面，列寧指責彼得格勒蘇維埃與臨時政府合作，臨了還高呼「全世界社會主義革命萬歲！」接着便坐上裝甲車，去了克舍辛斯卡婭公館的布爾什維克總部。在那裏，深夜時分，列寧對圍坐在椅子上的大約70名布爾什維克派的成員發表了「雷霆般的講話」。<sup>96</sup> 第二天，在塔夫利達宮舉行的彼得格勒蘇維埃會議上，他重申了自己在〈四月提綱〉中的激進主張，認為可憐的俄國資產階級無力完成其歷史任務，俄國不得不加快步伐，從資產階級民主革命走向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革命。<sup>97</sup> 有一位布爾什維克在發言中把列寧比作無政府主義者巴枯寧（他和馬克思有過激烈的交鋒）。另一位發言者稱列寧的提綱是「瘋話」。<sup>98</sup> 就連列寧的妻子、1894年就已經認識他的娜捷施達·克魯普斯卡婭，據一位朋友說，也表示「恐怕，列寧好像是瘋了」——這樣說的一個理由或許是，他不再把她作為自己的主要秘書。<sup>99</sup> 然而另一位布爾什維克勸道：「等到列寧熟悉了俄國國內的情況，他自己就會拋棄他所有的那些解釋。」<sup>100</sup> 蘇維埃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同時也是格魯吉亞孟什維克）伊拉克利·策列鐵里，一邊據理反駁列寧的觀點，一邊伸出橄欖枝，說「不管弗拉基米爾·伊利奇的立場可能有多麼不可調和，我都相信我們是會和好的」，這時，列寧倚在欄杆上大聲說：「決不！」<sup>101</sup>

列寧不停地威逼自己的核心圈，有時也會在克舍辛斯卡婭公館的陽台上向門外的群眾發表講話。到1917年4月底，在布爾什維克黨的代表會議上，大多數人都支持列寧的決議案，這除了因為其他的忠誠分子支持自己的領袖，部分原因也在於，有時更為激進的外省代表的意見起了積極作用。<sup>102</sup>不過，列寧的政策雖然在4月底獲得正式通過，但對於在何時，甚至是否爭取建立蘇維埃政權，而不是完成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布爾什維克核心圈仍然存在分歧。列寧繼續堅持自己的觀點，要求抓住時機；他認為布爾什維克中央委員會遠遠落在群眾後面。（這在後來被證明是對的：發動群眾的確帶動了未來的精英，包括布爾什維克領導層。）<sup>103</sup>與此同時，起初同加米涅夫站在一起的斯大林開始成為列寧的重要同盟。

斯大林一直被錯誤地當作「錯過」十月革命的人而沒有受到認真對待。不錯，他好像真的沒有去芬蘭車站迎接列寧的歸來（這或許是因為他當時正在參加一個會議，想把孟什維克派的左翼拉到布爾什維克一邊）。<sup>104</sup>還有，斯大林對於列寧在4月3日提出的獨樹一幟的激進主張是抵制的（為此，他在1924年公開作了道歉）。<sup>105</sup>但是在4月底的代表會議上，斯大林作了到當時為止他在布爾什維克正式會議上的第一次政治報告，與加米涅夫分道揚鑣，站到了列寧一邊。「只有團結一致的黨才能引導人民走向勝利」，斯大林在《士兵真理報》上談到4月的代表會議時寫道。<sup>106</sup>但斯大林沒有低三下四地屈服：列寧要求土地國有化，斯大林則堅持認為農民應該得到土地——這一立場最終獲得了勝利。<sup>107</sup>斯大林還反對列寧把「帝國主義戰爭」變為「歐洲內戰」的口號，理由是除了土地，群眾還希望和平——結果，列寧現在也呼籲立即停戰。<sup>108</sup>這樣，斯大林一面維護自己及他人堅持的立場，一面設法忠於列寧。斯大林成為由九名委員組成的新的中央委員會候選人，而有些聲稱對他非常瞭解的高加索同志表示質疑，這時是列寧為他做的擔保。「我們認識柯巴同志好多年了，」列寧告訴有投票權的代表們說，「我們過去常常

193

\* 譯註 《斯大林全集》第3卷，第60頁。

在克拉科夫見到他，在那裏有我們的一個局。他在高加索的活動非常重要。他是個好幹部，負責過各種各樣的工作。」<sup>109</sup> 在中央委員會選舉中，斯大林得到97票，位列第三，僅次於列寧和季諾維也夫（他們兩個很快都成了逃亡者）。斯大林還取代加米涅夫成了《真理報》的編輯。

作為編輯兼時評家，斯大林有一種本領，能夠用簡單易懂的方式說明複雜的問題。很明顯，他為在3月時不同意莫洛托夫的觀點而向他道過歉——「你是所有人當中從一開始就最接近列寧看法的」——然後又利用他們生活上不分彼此的關係，搶走了莫洛托夫的女友。<sup>110</sup> 但斯大林很快就帶着自己的全部家當——打字機，還有幾本書和衣服，一起裝在從西伯利亞帶回來的柳條箱裏，搬到阿米盧耶夫家。阿米盧耶夫的女兒娜佳剛滿16歲，1917年夏末，她因為快要開學而回到家中。斯大林從1900年即娜佳出生的前一年開始（在梯弗利斯的時候），就認識阿米盧耶夫一家。他待她如同女兒一樣，給她、她的姐姐安娜(Anna)以及她們的朋友讀契訶夫的小說（〈變色龍〉、〈寶貝兒〉）。<sup>111</sup> 斯大林把自己在西伯利亞無聊、孤獨、絕望的流放生活，編成富有戲劇性的革命故事，讓姑娘們聽得着迷。她們叫他索索，而他也用昵稱來稱呼她們。她們的母親奧莉加·阿米盧耶娃(Olga Alliluyeva)喜歡斯大林——她可能同他有染——但不喜歡自己的小女兒愛上這位38歲的鰥夫。<sup>112</sup> 娜佳可能有點叛逆，包括對斯大林，但斯大林也注意到她對家務十分用心。不到十個月，他們的戀情公開了。<sup>113</sup> 但那都是以後的事情。至於現在，斯大林成了黨組織的元老和列寧主義路線的捍衛者。就連托洛茨基後來也承認：「為了讓〔布爾什維克〕黨團做好投票的準備，斯大林做了非常有益的幕後工作。」他還用一種居高臨下的口氣繼續說：「在說服一般的幹部，尤其是那些外省人方面，他的確有一套。」<sup>114</sup>

不過，那年4月在中央委員會嶄露頭角的，除了斯大林，還有32歲的雅科夫·斯維爾德洛夫。列寧在1917年4月7日終於見到了他本人，並開始交給他各種各樣的任務，而斯維爾德洛夫也都出色地完成了。斯維爾德洛夫1885年出生，長相文弱，留着稀疏的山羊鬍子，戴眼鏡，1902年在下諾夫哥羅德加入俄國社會民主黨，參與過1905年的革命活動，當時是在烏拉爾。1917年時，和斯大林相比，斯維爾德洛夫



更是完全隱身在幕後。他不擅長演說，但說話低沉有力，處事強硬。列寧讓他負責一個小的「書記處」，那是在1917年4月黨的代表會議上正式成立的。<sup>115</sup> 在關押於沙皇監獄和流放西伯利亞時(1906–1917)，斯維爾德洛夫就已經表現出一種特殊的才能，能把流放各地的同伴的真名、化名、居住地及外貌特徵記在腦子裏，根本無需把有可能連累他人的信息寫在紙上。他還兩次同斯大林合住(在納雷姆和庫列伊卡)，結果兩人產生了尖銳的衝突和某種程度的對立。<sup>116</sup> 但現在，兩人在並肩工作。事實上，由於他們把高談闊論的工作留給了季諾維也夫那樣的演講家，年輕一點的斯維爾德洛夫讓斯大林學到了很多黨建方面的東西。在克舍辛斯卡婭公館，只有區區六七名女性辦事員的斯維爾德洛夫，在斯大林的協助下，開始着手協調分佈廣泛的各個黨組織的行動。他一面接待絡繹不絕的來訪者，一面派人到各省的布爾什維克委員會，在當地創辦雜誌和招募人員，並在同外省人接觸時展示出靈活的手法。斯維爾德洛夫對細節極為關注，事必躬親，同時非常重視具體的行動。當然，就像1917年所有的政治運動一樣，布爾什維主義運動也是亂哄哄的。按照1917年的狀況，組織工作的目標不是也不可能是形成一個中央集權的、更不要說「極權主義的」政黨，而是在首都的黨代表會議上形成一個代表列寧立場的多數派。換句話說，通過操縱規則、說服和拉攏，斯維爾德洛夫向自己的幫手斯大林演示了如何去組織一個忠誠的列寧主義派。<sup>117</sup>

## 狂熱

列寧的狂熱成了當下(和永久)的傳奇，但在俄國的政治舞台上，幾乎人人都活在偏執的暴政之下。米留可夫在杜馬中猛烈抨擊君主專制在戰爭中的拙劣表現，他執着於這樣一種看法，即二月革命意味着一種要用更成功的方式把戰爭進行下去的普遍意願。因此，他反對土地改革，反對在取得軍事勝利之前召開立憲會議，甚至拒絕修改沙皇政府的帝國主義的戰爭目標，而按照沙皇政府沒有公開的戰爭目標，需要吞併君士坦丁堡和土耳其海峽、被德國和奧地利佔領的波蘭，以及其他

外國領土。結果這種狂熱造成了和他在1917年3月拋棄杜馬所造成的同樣嚴重的損害。至於社會民主黨孟什維克派的領袖，則是固執地認為，革命本質上是「資產階級的」，因此，他們不顧據說是他們所代表的廣大群眾的一再要求，拒絕爭取社會主義。孟什維克派很快就像1917年黨員數量增加最多的社會革命黨一樣，與立憲民主黨組成了聯合臨時政府。他們這樣做，不只是因為理論的緣故。部分原因也在於，1905至1906年的慘痛記憶還縈繞在溫和派社會主義者的心頭，警告他們切勿走向極端，以免激怒「反革命」。<sup>118</sup>但孟什維克的領導層堅持這樣一條馬克思主義的核心觀點，即社會主義必須等到俄國資本主義有了充分的發展，為此，就必須進行「資產階級革命」。<sup>119</sup>他們抓住「資產階級革命」不放，一邊在宣傳中經常敲打「資產階級」，一邊支持「資產階級」臨時政府。<sup>120</sup>

在俄國，從一開始就最能代表溫和派社會主義路線的政治人物是克倫斯基，他想把俄國的「資產階級」革命和「無產階級」革命結合起來，想超越不同的黨派，通過時而朝這個方向，時而又朝另一個方向搖擺，來保持左右的平衡。儘管他竭力想使自己成為雙方都不可或缺的人物，但可以想見，結果成了雙方都憎惡的對象。<sup>121</sup>布爾什維克在宣傳中散佈謠言說，克倫斯基對可卡因和嗎啡有癮，穿女裝，挪用公款——這樣的抹黑運動開始變得有鼻子有眼（甚至連英國陸軍部都信了）。<sup>122</sup>不過，這也讓人想到，克倫斯基起初受到各方人士的廣泛讚賞，其中包括羅曼諾夫家族的大公和蘇維埃的領導人。<sup>123</sup>克倫斯基在1917年的政治上的弱點，部分是個人的，部分是結構性的：他不是把自己的命運和彼得格勒蘇維埃連在一起，而是和臨時政府連在一起，結果，當臨時政府的無能暴露得越來越讓人無法忍受的時候，他自己的威信也蕩然無存。<sup>124</sup>就這樣，用冤家對頭列寧的挖苦話說，克倫斯基就是一個沒骨氣的職業「空談家」——列寧和這位備受關注的領導人幾乎沒有接觸。二人的初次也是唯一一次見面，是在彼得格勒一所軍校召開的全俄蘇維埃第一次代表大會上（1917年6月3-24日）。克倫斯基的表現，就算不能說是全然受制於法國大革命，也是着了魔。<sup>125</sup>「法國的1792年是怎樣結束的？它是以共和國的垮台和專政者的崛起而結束的，」克倫斯基在

蘇維埃代表大會上回應列寧時說道——這是指羅伯斯庇爾適得其反的恐怖政策和拿破侖的崛起，「俄國各社會主義政黨和俄國民主制度的問題在於，要防止出現法國那樣的結局，要保住已經取得的革命果實；要保證我們從監獄裏放出來的同志不要再關回去；要保證像列寧那樣——待在国外的人，有再來這裏發言的機會，而不是非得逃回瑞士不可。我們必須保證，歷史上的錯誤不再發生。」<sup>126</sup>

### 擲出鐵骰子

克倫斯基肯定是信心滿滿。在1917年6月蘇維埃第一次代表大會的選舉中，有投票權的代表共777名，布爾什維克黨的代表只有105人，社會革命黨285人，孟什維克248人。<sup>127</sup> 只有某種極富戲劇性的事件才會逆轉布爾什維克的命運。但是，恰恰在蘇維埃第一次代表大會召開期間，這種驚人的轉變發生了。那是俄軍的一次攻勢。

1917年，最令人費解的或許就是臨時政府為甚麼要在6月決定向同盟國發起進攻。俄國的城市到處都是傷殘士兵；由於農業生產混亂，由於莫名其妙地犧牲了那麼多男人，由於徵糧，農村有些地方開始出現饑荒。人們可能會以為，臨時政府的官員，尤其是卡傑特那樣的古典自由主義者——他們真心實意地崇尚自由——對於利用國家權力去徵兵和為了填飽軍隊的肚子而徵糧是深惡痛絕的。<sup>128</sup> 但要是這樣想，那就錯了。臨時政府不斷宣揚民主，但這並不意味着它一定就聽從士兵的反戰情緒，而自從沙皇垮台和「一號命令」頒佈以來，這種情緒已經表現得非常普遍。不過，人們仍然期望政治家們至少要留意野心家的私心。帕維爾·米留可夫只因說俄國在戰爭中「根本不想奴役或羞辱任何人」但還是會「充分信守對盟友的義務」，就在5月2日被迫退出由他親自命名的臨時政府（結果克倫斯基成了內閣的顯赫人物）。<sup>129</sup> 就連整個戰爭期間協約國最成功的一次攻勢——1916年的布魯西洛夫攻勢，最終也失敗了。何況德國最高指揮部1917年根本沒打算在東線採取任何新的軍事行動。無論是誰，只要頭腦正常，怎麼會認為俄國軍隊應該或者能夠在1917年發動攻勢呢？

發動攻勢根本不是因為之前有甚麼計劃。早在1916年11月，西線的協約國就在法國的一次會議上，再次向沙皇政府施壓，要它發動一次攻勢——在這種情況下，就是指1917年春季——以緩解西線戰場的壓力。<sup>130</sup> 尼古拉二世當時是同意的；與實行法治的協約國擁有相同的價值觀，而且事實上仰慕協約國的臨時政府決心兌現這一承諾。可現在，連法國人自己也無力發動攻勢：1917年5月底，在攻擊德軍防線失利後，法國軍隊發生大規模的兵變，113個步兵師中的49個牽涉其中。新上任的司令菲利普·貝當將軍(Philippe Pétain)採取的辦法是加強軍紀，但他也明白，法軍官兵會繼續保衛祖國，不過也就僅此而已。<sup>131</sup>

可是，就算沒有協約國不合時宜的施壓，克倫斯基仍然有可能出手。就在法國發生兵變之前，俄國的最高總司令米哈伊爾·阿列克謝耶夫——他曾力主由克倫斯基出任陸海軍部長——在巡視前線時發現軍紀廢弛，600萬至700萬士兵中，擅離職守的快超過100萬了。<sup>132</sup> 但阿列克謝耶夫重視俄國對其盟友的義務。他在一份總結高級指揮官的看法——他贊成那些看法——的秘密備忘錄中寫道：「軍隊的混亂對防禦和進攻同樣有害。雖然我們沒有充分的把握取得成功，但我們還是應該繼續進攻。」<sup>133</sup> 可克倫斯基認為阿列克謝耶夫是個「失敗主義者」，因而解除了他的職務，接替的是1916年的英雄布魯西洛夫將軍，而布魯西洛夫後來在巡視前線時，同樣發現士氣低落的情況。<sup>134</sup> 當然，希望總歸是有的。俄國情報部門推測，奧匈帝國的軍隊十分脆弱，就連德軍也熬不過下一個冬天，因此，一擊制勝的可能性還是有的。如果上述的推測屬實，為了在簽訂和約時有發言權，俄國就不能在打敗同盟國的過程中袖手旁觀：要是俄軍能在戰場上有良好的表現，協約國就不能不認真對待俄國的外交照會。<sup>135</sup> 不過，克倫斯基的主要出發點似乎在國內政治：他和俄國的一些將軍認為——或者說希望——攻勢會讓日漸瓦解的軍隊重整旗鼓並撲滅國內的叛亂。換句話說，俄國軍隊的瓦解本身成了發動攻勢的最主要理由。<sup>136</sup> 常言道，「前線的戰爭會換來前後方的安寧」。<sup>137</sup>

因此，臨時政府的確是心甘情願地把沙皇完全不得人心的戰爭變成自己的戰爭。當時只是陸海軍部長的克倫斯基來到前線，像尼古拉二

世以前那樣，把軍隊召集起來，聲嘶力竭、慷慨激昂地鼓動士兵為了「自由」而發動進攻。不止一個士兵打斷他說，「要是我必須去死，關於土地和自由的口號還有甚麼意義？」列寧的布爾什維克的鼓動人員湧向前線各個團和大約30支城市衛戍部隊，此舉既是為了削弱軍隊，也是為了擊敗他們的主要對手——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的鼓動人員。布爾什維克向非常願意接受他們觀點的士兵和水兵灌輸了大量淺顯易懂的激進思想，他們把戰爭說成是為了英國人和法國人的錢袋子而犧牲俄國人的生命。<sup>138</sup>「一個鼓動人員，」俄軍有個前線將領感嘆道，「就可以通過宣傳布爾什維克的理想，攪得整個團不得安寧。」<sup>139</sup>而在布爾什維克影響不到的地方，則有德國人的宣傳。「英國人，」一名俄國士兵拿着一份德國人的俄語報紙《俄國信使報》大聲讀道，「想讓俄國人為了英國——到處追求利潤的國家——更大的光榮，流盡最後一滴血。」<sup>140</sup>不只是可惡的戰爭——它導致專制制度的突然垮台——還有這場軍事攻勢，讓布爾什維克將自己的政黨與俄國最大的群眾組織——前線六七百萬士兵——的情緒聯繫起來，從而在「戰壕裏的布爾什維主義」這方面取得重大突破。<sup>141</sup>

要把國內的所有問題歸咎於克倫斯基很容易。為了打敗內部的敵人，他堅持向外部的敵人發動軍事攻勢，結果讓他這位「革命民主派」與沙皇還有從1914年開始這場屠殺的「反動派」成了一路貨色。然而，同樣令人吃驚的是，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集團控制的彼得格勒蘇維埃，甚至還有經過選舉產生的士兵委員會，都支持6月的軍事攻勢，而這樣做違背了他們聲稱自己所代表的士兵和水兵的意願。格魯吉亞孟什維克伊拉克利·策列鐵里，因為提出他所謂的「革命護國主義」而成了蘇維埃的最高領導人：要是俄軍（設法）繼續打下去，蘇維埃就會（設法）對協約國的民眾施壓，通過談判實現「沒有兼併」的和平。<sup>142</sup>社會革命黨領導人維克托·切爾諾夫表示支持，蘇維埃一些著名的孟什維克也是如此（儘管心存疑慮的尤利·馬爾托夫不支持）。但是，原計劃於1917年6月在斯德哥爾摩召開的國際社會主義者和平大會沒能舉行：英國和法國對「民主的」和平沒有興趣，他們要的是打敗德國。<sup>143</sup>撇開「和平」部分不談，策列鐵里的立場——雖然他反對兼併——等於是

把戰爭打下去，這和臨時政府的政策一樣。《真理報》饒有興趣地披露了一些私有工廠的戰時盈利數據，並把蘇維埃和臨時政府都說成是「資本家先生和銀行家先生」的「執行機關」。<sup>144</sup> 對群眾來說，彼得格勒蘇維埃和士兵委員會的立場難以理解：既然戰爭是帝國主義戰爭，為甚麼還要打下去？<sup>145</sup> 但更糟糕的是，蘇維埃中的大多數人為甚麼認為俄國應該發動進攻？溫和派社會主義者堅持與「資產階級革命」，也就是與臨時政府和立憲民主黨合作的原則。這其中的部分原因也是在於，在他們看來，攻勢會有助於增加俄國在與不好打交道的英法討價還價時的籌碼。<sup>146</sup> 非布爾什維克的社會主義者犯了致命的錯誤。

由於協約國拒絕靠談判結束這場很難取得決定性勝利的絞肉機一般的戰爭，戰略防禦態勢無論是對臨時政府還是對蘇維埃，都是唯一可行的政策。同時，俄國政府還可以嘗試通過談判，在可以接受的範圍內與德國單獨媾和，從而讓極左勢力失去動員民眾的武器。即便談判不成，責任也在德國人，那樣一來，政府就可以在在一定程度上名正言順地把戰爭打下去。對於同德國單獨接觸以及同協約國決裂，哪怕俄國的權力集團不能達成一致，也可以把威脅這樣做當作討價還價的籌碼，迫使協約國同意臨時政府的要求——要求提得有點晚，但至少是公開提出了——即在協約國間召開一次正式會議，討論、也許是重新定義戰爭的目標。<sup>147</sup>

早在1916年9至10月，當布魯西洛夫攻勢遭到遏制之後，沙俄就與德國在瑞典、丹麥、瑞士和科夫諾（被德國佔領的帝俄領土）有過幾次秘密談判，商討單獨媾和的問題。在聽到俄德談判的風聲後，英法改變態度，與俄國簽訂了新的財政協議，對俄國早已提出的一些要求終於作出讓步。<sup>148</sup> 俄國在資金和物資上要依賴其協約國夥伴，但是在1917年，俄國的優勢或許更大。就算那樣，當美國已經開始行動起來，投入西線戰場的時候，完全採取防禦態勢本來也可以讓俄國有一個觀望的機會。

6月18日（西曆7月1日），克倫斯基和蘇維埃的瘋狂賭博開始了，首先是直到那時為止俄國歷史上規模最大的炮火齊射：連續兩天沒有停息，動用了俄國工人階級（他們中的80%在生產戰爭物資）生產的大批

重炮和炮彈。起初取得了一些成功，尤其是科爾尼洛夫將軍指揮的部隊，但是許多俄國部隊拒絕向前推進；有些部隊甚至企圖殺害他們的指揮官，而其他部隊則召開會議，商量如何逃脫這個地獄。<sup>149</sup> 俄軍的主要突擊方向是奧匈帝國這個「軟柿子」，這是從1916年的布魯西洛夫攻勢中得到的經驗，但德軍這頭被驚醒的野獸發起了無情的反擊。<sup>150</sup> 俄國的無謂進攻不但使俄軍被打得七零八落，還讓德國人進一步深入到俄國的領土，佔領了烏克蘭。<sup>151</sup> 這一攻勢也讓蘇維埃和士兵委員會中的溫和派社會主義代表的威信化為烏有。<sup>152</sup> 在試圖勸說士兵們服從命令返回戰場時，蘇維埃執行委員會的委員們不僅挨了打，還被關押起來，這其中就有「一號命令」的起草者之一尼古拉·索科洛夫(Nikolai Sokolov)。「可以把整個1917年看作是一場政治戰，」有位歷史學家寫得好，「一方把革命視為結束戰爭的手段，一方把戰爭視為結束革命的手段。」<sup>153</sup>

### 克倫斯基的第一次未遂政變

1917年春天，回國後的列寧還處在俄國政壇的邊緣地位，左翼的邊緣。他攻擊克倫斯基，指責蘇維埃的其他馬克思主義者，但1917年的六月攻勢——它是克倫斯基在蘇維埃的支持下發動的——證明列寧的極端言論是正確的。極端言論不再極端了。非常能夠說明問題的是，就連才華出眾的列夫·托洛茨基也開始支持列寧了。

托洛茨基是顆流星。他和斯大林差不多完全同時代，出生在帝國的另一個角落——烏克蘭南部的猶太人定居區，距離黑海的港口城市敖德薩有200英里\*。他的父親達維德·勃朗施坦(David Bronstein)沒有受過教育，但憑藉勤勞成了一個成功的農民。在兒子出生的時候，這家人已經有了250英畝耕地†，同時另外還租了500英畝‡。<sup>154</sup> 托洛茨基的母親阿涅塔(Aneta)也是沙皇的忠實臣民。她有文化，但選擇了農婦的

---

\* 編註：約322公里。

† 編註：約101公頃。

‡ 編註：約202公頃。

生活。她把自己對知識的熱愛傳給了四個孩子(生了八個，只有四個活下來)。年輕的列夫曾經到猶太人小學讀書，儘管他不懂意第緒語，後來他又轉到敖德薩一所附屬於路德教會的德國人學校。他在班上名列前茅，只是因為針對一位瑞士的法語老師的一場學生鬧事而停學一年。接下來在尼古拉耶夫的一所學校，他一門心思學習文學和數學；見證者們回憶說他沒有任何親近的朋友。「勃朗施坦的個性就是，」那時候認識他的G. A. 齊夫(G. A. Ziv)解釋說，「想證明他的意志力，想超過所有人，不管甚麼方面總是最好的。」<sup>155</sup> 勃朗施坦17歲左右成了革命者。同斯大林一樣，他20歲不到就被捕(1898)並流放西伯利亞。1902年，他改成一個獄友的姓——托洛茨基——逃走，並在倫敦見到了當時還是盟友關係的列寧和馬爾托夫，那時他23歲。第二年，在影響重大的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第二次代表大會上，托洛茨基在有關黨的組織形式的爭論中站在馬爾托夫一邊，並在不久後撰文猛烈攻擊列寧。但托洛茨基從來沒有和孟什維克走得太近：他游離於所有集團之外。他長期生活在歐洲，在那裏給德國社會民主黨期刊投稿，與有着「馬克思主義教皇」之稱的卡爾·考茨基來往——他稱考茨基為「快活的白髮小老頭」——還同考茨基就恐怖活動的必要性進行過有名的辯論(「恐怖活動可以成為非常有效的武器，以對付不願退出舞台的反動階級」)。<sup>156</sup>

沙皇下台時，托洛茨基恰好在紐約。1917年4月，他動身返回俄國，但在途經加拿大時被捕，多虧了當時的外交部長米留可夫才被釋放，到達彼得格勒的芬蘭車站時已是5月4日，比列寧晚一個月。<sup>157</sup> 戴着夾鼻眼鏡、身體健碩、精神煥發、毫不妥協的托洛茨基立刻引起轟動。他在各大工廠和衛戍部隊的兵營四處活動，晚上大多是在冬宮對岸的首都摩登馬戲場。他的政論演說點燃了人們的激情。這個「光禿禿的昏暗的露天劇場，用懸掛在一根細溜溜的電線上的五盞小燈照明，從下到上，直到最頂層的一圈圈很陡的、滿是污垢的凳子，擠滿了士兵、水兵、工人和婦女，全都在聽，好像那是他們生活的依靠」，之前在哈佛大學讀書時就鼓吹共產主義的約翰·里德(John Reed)寫道。<sup>158</sup> 托洛茨基回憶說，「每一寸地方都擠得滿滿當當，所有人的身體都壓縮到極



限。小孩騎在父親的肩上，嬰兒在母親的懷裏吸着奶水……我從人縫裏擠到台上，有時還要從頭頂上托過去。」<sup>159</sup>當時有個社會民主黨人評論說，「這裏來了個偉大的革命者，人們覺得，列寧不管有多聰明，和托洛茨基的天賦一比，就顯得遜色了。」<sup>160</sup>事實上，列寧在5月10日就已經邀請托洛茨基加入布爾什維克。<sup>161</sup>多年來一直在毫不留情地嘲笑列寧，而且戰爭期間同他的思想分歧進一步變大的托洛茨基，在1917年夏天同意加入布爾什維克，轉向列寧主義，也就是說，他開始主張把政權立即移交給蘇維埃。

深層的結構性變化更為重要。俄羅斯帝國軍隊的各大組成部分加快了分裂的步伐，各個民族組建了事實上的軍隊——尤其是烏克蘭和芬蘭的民族軍，還有愛沙尼亞、立陶宛、格魯吉亞、亞美尼亞以及克里米亞韃靼人的民族軍——從而預示着帝國的瓦解。<sup>162</sup>臨時政府逐漸成了空架子。彼得格勒蘇維埃的聲譽，特別是士兵委員會的聲譽，受到很大的損害。但是在1917年7月，就在政局變得對列寧越來越有利的時候，布爾什維克黨差點兒全軍覆沒。7月2日，立憲民主黨人退出聯合臨時政府；7月3至5日，流言四起，說首都的衛戍部隊要被調往前線，結果彼得格勒發生了一場稀裏糊塗的暴動，一個機槍團和一些喀琅施塔得水兵捲入其中。這些士兵和水兵打着「全部政權歸蘇維埃」的口號，與布爾什維克黨的基層激進分子聯手，佔領了首都的幾個重要樞紐。打死打傷的有數百人。克倫斯基當時在前線。7月4日，一大群人聚集在塔夫利達宮，要求同蘇維埃領導人見面；當社會革命黨領導人維克托·切爾諾夫出現的時候，一個水兵高喊：「你這狗娘養的，政權交給你，你就接着。」叛亂分子扣押了切爾諾夫，所以必須把他救出來。<sup>163</sup>但在傍晚時分，一場讓人睜不開眼的傾盆大雨驅散了人群。<sup>164</sup>布爾什維克高層猶豫不決，不知道要不要抓住這個機會，結果克倫斯基迅速組織反擊，以發動武裝叛亂和收受外敵經費為名，指控他們犯有叛國罪。這一招借力打力非常漂亮。

布爾什維克在接受偷偷運進來的德國經費，這一點現在是沒有任何疑問。布爾什維克黨每天總共要印三十多萬份報紙；單是《真理報》就發行了8.5萬份。與資產階級報紙（在首都每天有150萬份）或社會革命

黨和孟什維克兩者的報紙(70萬份)相比，布爾什維克的出版量只能算是小零頭，但布爾什維克黨還要出版幾十份小冊子和幾十萬份傳單，這些都要有經費支持。<sup>165</sup> 證明列寧等布爾什維克黨人拿了德國人金錢的證據材料刊登在7月5日的俄國報紙上。「現在他們要槍斃我們了，」列寧對托洛茨基說，「這是對他們最有利的時候。」<sup>166</sup> 7月6日早晨，臨時政府的反間諜局搗毀了《真理報》編輯部和印刷所。俄國士兵襲擊了布爾什維克的「堡壘」(克舍辛斯卡婭公館)，那裏的大約400名全副武裝的布爾什維克投降。莫斯科中心城區的民兵隊長安德烈·維辛斯基(Andrei Vyshinsky)，未來的斯大林恐怖統治中的劊子手法官，簽發了對包括列寧在內的28名最高層的布爾什維克黨人的逮捕令。<sup>167</sup> 列寧聞訊逃走：先是在斯大林的幫助下，悄悄躲到阿米盧耶夫家，然後又同季諾維也夫一起去了俄屬芬蘭。民間的說法是，斯大林親自給列寧刮了鬍子，讓他看上去像個芬蘭農民。<sup>168</sup> 列寧要求把他的幾本筆記帶給他，結果就在那個避難的地方寫出了《國家與革命》；他在1917年8至9月完成了書的正文。該書認為，所有國家都是階級統治的工具，任何一種新的階級政權(比如說工人階級)都需要創造出它自己的國家形式——「無產階級專政」——以便在過渡時期鎮壓舊統治階級的殘餘勢力並且分配資源。<sup>169</sup> 與此同時，臨時政府的兩個部門也搜集了大量材料，準備以叛國罪公開審判列寧及其同志。<sup>170</sup>

這樣一來，陸海軍部長克倫斯基的軍事攻勢雖然慘遭失敗，但是由於他對布爾什維克發動的攻勢，1917年7月似乎成了轉折點。克倫斯基想要反敗為勝。被關進監獄的布爾什維克等激進分子總共有將近800人，包括差點兒被私刑處死的加米涅夫，但是沒有斯大林(原因不明)。<sup>171</sup> 7月6日——當時正在公開抓人——那位陸海軍部長從前線返回首都，並於次日接管整個政府，因為名義上的總理格奧爾吉·李沃夫公爵辭職了。李沃夫說：「為了拯救國家，現在必須解散蘇維埃並朝人民開槍。這種事我幹不了。克倫斯基可以。」<sup>172</sup>

可是，消失在莫斯科一家療養院的李沃夫錯了：不是克倫斯基，而是拉夫爾·科爾尼洛夫的時刻到了。7月7日，克倫斯基把科爾尼洛夫晉升為西南戰線司令。7月12日，克倫斯基宣佈，由於軍紀敗壞，在前

線恢復死刑。他還在兩天後加大了軍隊書報檢查的力度。當時對於由誰來執行這些措施並不清楚，但是在7月18日，克倫斯基解除了布魯西洛夫將軍的職務，並建議由科爾尼洛夫擔任俄軍最高總司令。在接受克倫斯基的任命前，科爾尼洛夫徵求了其他將領的意見。早在1917年3月，當科爾尼洛夫取代被捕的謝爾蓋·哈巴洛夫將軍成為彼得格勒軍區司令的時候，就執行過逮捕皇后亞歷山德拉的命令，但是在1917年4月，當科爾尼洛夫試圖動用軍隊鎮壓首都騷亂的時候，蘇維埃聲稱只有它有權指揮衛戍部隊，於是科爾尼洛夫只好取消命令；心生厭惡的科爾尼洛夫要求調往前線。在前線，士兵們對他們的長官提出要求，結果在1917年6月，當俄國士兵拒絕推進的時候，他在奧軍防線上撕開的缺口便前功盡棄。前線對俄國士兵採取的恐怖措施很快就演變成針對平民的劫掠與暴行，甚至是更嚴重的違紀行為。<sup>173</sup>不過，科爾尼洛夫仍然要求後方的衛戍部隊削弱士兵委員會的力量並恢復死刑。7月16日，克倫斯基在大本營的會議上，從總參溫和派將領那裏也聽到了類似的請求。<sup>174</sup>科爾尼洛夫進而要求在軍事行動和人事決定上擁有完全的自主權，並要像魯登道夫將軍在德國那樣，制定工業上的戰爭動員計劃。<sup>175</sup>7月21日，科爾尼洛夫如最後通牒一般的條件被透露給新聞界，使他在右翼勢力中聲望大增。<sup>176</sup>克倫斯基口頭上答應了科爾尼洛夫的條件，於是，後者接任最高司令一職，但是當陸海軍部起草文件、準備滿足科爾尼洛夫的條件時，克倫斯基卻遲遲沒有簽字，一直拖到8月，引起科爾尼洛夫的憤怒和懷疑，而克倫斯基此時對自己提拔的這個人也越來越不放心。<sup>177</sup>

1917年7月26日至8月3日，布爾什維克召集了一次黨代表大會，這是他們自1907年以來的第一次。（這是第六次，如果算入上一次在俄國本土召開的1898年成立俄國社會民主黨的明斯克代表大會。）與會代表大約267人（其中有表決權的代表157人），許多是來自外省，他們因為受到逮捕的威脅而齊聚在彼得格勒相對安全、到處都是工廠的維堡區。由於列寧和季諾維也夫不能公開露面，加米涅夫和托洛茨基也被關進了監獄，斯維爾德洛夫便在斯大林的協助下組織了此次大會。他們做了很細緻的工作，從前線近30個團以及彼得格勒近90個工廠和衛

成部隊單位中選舉了代表，而那些代表的情緒比較激進。斯大林致開幕辭並作了主政治報告——那是最受人關注的工作。「他穿着樸素的灰色短上衣和靴子，說話聲音不大，不緊不慢，十分沉穩」，有見證者寫道，並提到斯大林的格魯吉亞人身份，說同一排的另外一個同志「在報告人帶着特殊的口音，用一種不知怎麼的顯得特別柔和的聲調說出某個詞的時候，忍不住露出一絲微笑」。<sup>178</sup> 斯大林承認，「時機不成熟的」七月起義造成了嚴重的損失。不過，他也輕蔑地自問自答說：「臨時政府是甚麼？」「它是傀儡，可悲的屏風，它的背後是反革命的三根支柱：立憲民主黨人、軍事小集團和協約國的資本。」爆發必然會到來，他預言說。

205

大會最後一天，在討論根據其報告所作的決議草案時，斯大林反對葉夫根尼·普列奧布拉任斯基 (Yevgeny Preobrazhensky) 要求參照西方革命的提議。「很有可能，俄國正是開闢社會主義道路的國家，」他插話說，「從來沒有一個國家在戰爭條件下像俄國一樣具有這樣的自由，也從來沒有一個國家嘗試過實行工人監督生產。此外，我國革命的基礎比西歐廣闊，在西歐，無產階級是同資產階級面對面孤軍作戰的，我國工人卻有貧苦農民階層的支持。最後，德國的國家權力機關要比我國資產階級的不完善的機關優越得多……必須拋棄那種認為只有歐洲才能給我們指示道路的陳腐觀念。有教條式的馬克思主義，也有創造性的馬克思主義。我是主張後一種馬克思主義的。」<sup>179</sup>

這次引人注目的爭論顯示出斯大林的敏銳程度，而他的這種敏銳幾乎從未得到認可。他的主張獲得了通過，有關俄國社會主義革命的勝利「要以西方無產階級革命為前提」的修正案被否決。

由於斯大林的精闢分析以及他總體上對於俄國的高度關注——這一點是列寧所沒有的——列寧的戰鬥精神即便在他本人沒有參會的情況下也佔了上風。<sup>180</sup> 不過，列寧仍然面臨受到審判的危險，而當斯大林告訴大會代表說，在某種條件下，列寧還有季諾維也夫有可能接受

---

\* 譯註：《斯大林全集》第3卷，第174頁。

審判時，他受到了嚴厲指責。但布爾什維克黨人預計會受到的審判沒有成為現實。克倫斯基覺得，同科爾尼洛夫的對決比和列寧的較量更重要。<sup>181</sup>

## 克倫斯基的第二次未遂政變

206 克倫斯基在7月中旬曾經提出，8月中旬要在古都莫斯科召開國務會議，受邀參加的有實業家，地主，所有的前杜馬代表，地方治理機關、高等教育機構、蘇維埃和農民團體的代表，以及軍隊高級將領——參會者約2,500人，會議地點是莫斯科大劇院。<sup>182</sup>那是一座宏偉的劇院。似乎是為了證實自己的權威，克倫斯基8月12日開幕那天的講話特別有力。他好像原本是打算利用此次會議把俄國各派的政治力量「團結」起來，雖然報紙上半開玩笑地說，他來到莫斯科這個為沙皇加冕的地方，是想「給他自己戴上皇冠」。蘇維埃的報紙用階級的標識抱怨說，「晨禮服、雙排扣常禮服和漿洗過的襯衣，鶴立雞群於那些（平頭百姓穿的）側繫帶俄式上衣」。<sup>183</sup>但是就蘇維埃而言，它已經從分到的代表名額中排除了布爾什維克，因為後者拒絕承諾服從蘇維埃的集體決定（包括是否舉行罷工）。莫斯科的工人不服從蘇維埃，在開幕當天舉行了為期一天的自發罷工，布爾什維克聲稱這是他們組織的。<sup>184</sup>「電車停運」，《消息報》報道說，「咖啡店和飯館關門」——包括大劇院內部的餐廳。煤氣工人也罷工了，結果城裏一片黑暗。<sup>185</sup>

8月13日，星期天，科爾尼洛夫從前線抵達莫斯科。在亞歷山德羅夫斯基（後來的白俄羅斯）車站，他那些披着紅色斗篷的土庫曼人跳到站台，抽出馬刀站成幾排，場面非常搶眼。在一表人才的士官生和俄國的三色旗的海洋中，穿着軍禮服的小個子科爾尼洛夫出現了，迎接他的是雨點般的鮮花。他像沙皇一樣接見了等候在那裏的達官顯貴和士兵，隨後，這位將軍乘坐一輛敞篷轎車，率領他那由20輛小轎車組成的車隊，浩浩蕩蕩地穿過城市，一路引來陣陣歡呼，其中包括他（像所有沙皇做過的那樣）停在伊維爾斯卡婭神龕那裏向聖母瑪麗亞聖像祈禱的時候。晚上，身為卡爾梅克人的俄軍最高總司令接見了絡繹不絕的

祝福者，其中有前總參謀長和最高總司令阿列克謝耶夫將軍、立憲民主黨領袖米留可夫以及極右翼領袖普利什凱維奇。<sup>186</sup>

這是個非常有趣的時刻：俄國遭受重創的整個權力集團的國務會議；把布爾什維克排除在外的左翼代表；外敵征服的危險迫在眉睫的祖國；再加上幾個爭相成為救星的人。

在8月14日的會議上，主持會議的克倫斯基將最高總司令請上講台。為使科爾尼洛夫的隆重亮相顯得合情合理，特意安排他的一位哥薩克支持者發表墊場的煽動性演說。<sup>187</sup>「我們丟掉了整個加利西亞，我們丟掉了整個布科維納」，卡爾梅克救星告訴大家，並且警告，德國人正在攻打位於通往俄國首都道路上的里加。科爾尼洛夫要求採取有力的措施。<sup>188</sup>大劇院右側的過道爆發出熱烈的掌聲，左側悄無聲息或者發出噓聲。此次大會本可以成為一次機會，扭轉俄國的頹勢並把權力集團團結起來：有些實業家想讓國務會議變成一個永久性的機構。擁護秩序和權威的蘇維埃成員本可以成為籠絡的對象，從而造成左翼的分裂。早在8月9日的《工人和士兵報》上，斯大林就警告說，「反革命需要有自己的議會」，一個資產階級和地主的機關，是在未經農民選舉的情況下成立的，打算取代尚未召集的作為「全俄人民的唯一代表」的立憲會議。<sup>189</sup>四天後，在莫斯科國務會議開幕當天，斯大林寫道，「『救星』先生們在籌備莫斯科會議時，曾裝做他們是在召集一個不決定任何問題的……『普通會議』。但是，這個『普通會議』漸漸變成了『國務會議』，後來又變成了『最高會議』，而現在……要把會議變成……『長期國會』。」<sup>190</sup>然而，克倫斯基除了喋喋不休的三天講話外，對於莫斯科國務會議根本沒有長遠的計劃。<sup>191</sup>會議沒有形成任何制度性的東西。

即便從象徵意義上來說，它也是失敗的。國務會議非但沒有表現出充滿愛國精神的團結，反而（像米留可夫後來說的）證明「國家被分裂成兩個不可調和的陣營」。<sup>192</sup>更糟糕的是，不止斯大林，所有左翼報刊在評論參加此次會議的貴族、實業家和軍人的表現時，都發出更加歇斯

207

\* 譯註：《斯大林全集》第3卷，第181-182頁，斯大林這篇文章的發表日期為1917年8月8日。

† 譯註：《斯大林全集》第3卷，第189-190頁。

底里的警告，認為「反革命」的威脅已迫在眉睫。作為此次會議的幕後人物，克倫斯基得出同樣的結論。「莫斯科會議後，」他後來回憶說，「對我而言很清楚的一點是，下一次政變會來自右翼，而不是左翼。」<sup>193</sup>

208 克倫斯基提升了人們對冒失方案的期望，可這些期望很快就破滅了——要怪就怪他自己。前線的全面崩潰繼續威脅着俄羅斯國家的生存，許多立憲派，比如米留可夫、李沃夫和羅將柯，都傾向於由科爾尼洛夫來發動軍事政變，雖然他們擔心他缺少民眾的支持而且不瞭解政權的實際情況。他們的計劃或者說幻想是，讓科爾尼洛夫用武力「恢復秩序」，可能要實行軍事獨裁，然後在有利的時機召集立憲會議。<sup>194</sup> 與科爾尼洛夫晤談的阿列克謝耶夫將軍、亞歷山大·高爾察克海軍中將 (Alexander Kolchak, 6月前一直擔任黑海艦隊司令) 等人也有類似的想法，想要強行恢復秩序。科爾尼洛夫當然考慮過對臨時政府和蘇維埃發動政變，以鎮壓預計會發生的布爾什維克政變，絞死列寧及其助手，解散蘇維埃，也許還想讓他自己至少臨時性登上權力的寶座。<sup>195</sup> 但這似乎是個糟糕的選項。一個想要策動軍事陰謀的人根本沒有任何可靠的通訊保障：司機、傳令兵、報務員都會把可疑的活動報告給士兵委員會和蘇維埃。<sup>196</sup> 所以，科爾尼洛夫選擇了與臨時政府合作。他正確地判斷出後者無力掌控局面。不過，克倫斯基的確告訴過科爾尼洛夫，他想要一個「強有力的權威」，而且與政府合作就可以合法地調動軍隊。早在8月6至7日，科爾尼洛夫就得到克倫斯基的批准，命令第三騎兵軍軍長亞歷山大·克雷莫夫中將把部隊從西南(羅馬尼亞前線)調到大盧基(普斯科夫省)。克雷莫夫的部隊，其中有些被稱為「野蠻師」，包括來自北高加索的穆斯林山民(車臣人、印古什人、達吉斯坦人)，他們被認為是整個陸軍中最可靠的部隊，而且在前線執行過政治任務。<sup>197</sup> 8月21日，就像科爾尼洛夫在莫斯科國務會議上警告的那樣，里加陷落，於是，克倫斯基授權科爾尼洛夫調動彼得格勒附近戰線的部隊保衛首都，鎮壓預計將發生的布爾什維克政變——布爾什維克被認為是德國的奸細。此次行動依舊是暗中進行的。

溫和派社會主義者還在主張既不也不：既不和反革命極右勢力做交易，也不和要奪權的極左勢力做交易。<sup>198</sup> 但布爾什維克卻欣然接受了

兩極對立，認為那是不可避免的。「二者必居其一！」斯大林在1917年8月25日寫道：「或者同地主和資本家在一起，那就是反革命的完全勝利。或者同無產階級和貧苦農民在一起，那就是革命的完全勝利。妥協和聯合的政策是注定要破產的！」<sup>199</sup>。

科爾尼洛夫指揮下的、顯然是得到克倫斯基批准的克雷莫夫部隊的調動，為的是先發制人，對付預計將發生的布爾什維克政變，並以軟弱得不可救藥的臨時政府的名義強化政治權威，這導致了克倫斯基和科爾尼洛夫的突然攤牌。從1917年8月26至31日正式調動開始以及在那之後，分析家們作了表面上截然相反的兩種解讀。<sup>200</sup> 一是認為那是科爾尼洛夫的暴動，打着保衛臨時政府的幌子，自己想當上獨裁者。二是認為那是克倫斯基的無恥挑唆，想趕走科爾尼洛夫，讓他自己成為獨裁者。兩種解讀都對。<sup>201</sup>

一系列錯綜複雜的信息、以信使和假冒的信使與科爾尼洛夫作了一番溝通之後，大約在8月26日星期六午夜時分，克倫斯基緊急召集內閣會議，要求授予自己「全權」(vlast')，挫敗反革命陰謀。臨時政府的部長們集體辭職。<sup>202</sup> 差不多就在那時，8月27日星期天凌晨2:40，科爾尼洛夫打電報給政府，大意是，為了撲滅首都即將發生的布爾什維克起義，按照已經達成的意見，克雷莫夫中將的部隊「將於8月28日傍晚在彼得格勒近郊集合。請求在8月29日對彼得格勒實行戒嚴」。<sup>203</sup> 早晨4點，克倫斯基打電報給科爾尼洛夫，解除他的職務。在大本營，總參謀部人員認為命令要麼是偽造的，要麼表明克倫斯基已被極左分子扣為人質。科爾尼洛夫讓克雷莫夫加快速度。在首都，各種各樣天真的顯要人物想要充當此次「誤會」的調解人，但克倫斯基拒絕了他們。8月27至28日，報紙以特刊形式發表了克倫斯基簽署的聲明，指控最高總司令犯有叛國罪。<sup>204</sup> 憤怒的科爾尼洛夫打電報給所有的前線司令，稱克倫斯基是騙子，是在布爾什維克的壓力下「按照德軍總參謀部的計劃」行事的。科爾尼洛夫的公開抗訴很有針對性地自稱是「哥薩克農民的

209

\* 譯註：《斯大林全集》第3卷，第244頁。



兒子」，並表示「只想拯救大俄羅斯。我發誓要帶領人民，直到打敗敵人，召開立憲會議，人民將在立憲會議上決定自己的命運並選擇新的政治制度」。<sup>205</sup> 克倫斯基轉而向蘇維埃求助，要它召集力量，徹底打敗「反革命」。鐵路線上，工人和專門派來的穆斯林鼓動人員騷擾了克雷莫夫野蠻師。托洛茨基後來寫道：「那支奮起抵抗科爾尼洛夫的軍隊就是日後發動十月革命的部隊。」<sup>206</sup> 實際上，當時沒有發生任何戰鬥。<sup>207</sup> 在得到克倫斯基保障人身安全的承諾後，8月30日夜裏，克雷莫夫乘汽車進入彼得格勒，接受總理召見。後者要他向軍事法庭報告情況。然後，克雷莫夫去了一處私人住所，開槍自殺了。<sup>208</sup>

斯大林為打垮反革命而歡呼，但又警告說，反革命還沒有被徹底打敗。「反對地主和資本家，反對將軍和銀行家，保衛俄國各族人民的利益，爭取和平，爭取自由，爭取土地——這就是我們的口號，」他在8月31日寫道，「成立工農政府——這就是我們的任務。」<sup>209\*</sup> 已淪為階下囚的前沙皇尼古拉二世，私下裏表達了對科爾尼洛夫未能建立軍事獨裁的失望。「我當時是第一次聽到沙皇後悔自己的退位」，宮廷教師皮埃爾·吉利亞爾 (Pierre Gilliard) 回憶說。<sup>210</sup> 在任何企圖發動的政變中，就連許多內部人士也覺得結局難料、不知所措，因而大多是在政變開始顯現勝利跡象的時候，才會兌現支持政變的諾言。<sup>211</sup> 8月28日，協約國表示，它會支持俄國國內為了實現國家「團結」而做出的努力，因為那是聯合作戰的一部分；俄國工商界本來是會支持科爾尼洛夫的。但科爾尼洛夫甚至都沒有離開莫吉廖夫的前線大本營。<sup>212</sup> 這是一場奇怪的、要依靠克倫斯基合作的軍事政變，而克倫斯基在科爾尼洛夫有機會出賣他之前，實際上就出賣了科爾尼洛夫。<sup>213</sup> 但克倫斯基在八月對付科爾尼洛夫的這步棋，是他的第二次未遂的政變，先前那次流產的七月政變對付的是列寧和布爾什維克。

1917年夏天，是否存在真正的右翼群眾運動，可以被喚醒並且最後或許還可以統一起來，這一點永遠無法知道。不過，從一份名為《小

---

\* 譯註：《斯大林全集》第3卷，第256頁。

報) (為「小」民或普通人辦的) 的右翼期刊——創辦於1914年，發行人是阿列克謝·A. 蘇沃林 (Aleksei A. Suvorin, 波羅申 [Poroshin])，他的父親是俄國著名的保守派政論家——的故事中，可以得到關於群眾的一些深刻的認識。作為一份粗俗的、語法上不甚講究的報紙，《小報》用大白話對實際生活中發生的大事小情作了精彩的記錄，並在彼得格勒的底層民眾中，比如工人、士兵、傷殘軍人、失業人員、交不起房租的人、遭到商人剝扣的人，總之就是戰時首都的大部分人中，贏得大量的支持者。它對日常生活的描寫能讓讀者笑出淚來，它還對精英階層中政治上的膽小怕事之徒大加諷刺。《小報》對俄國各社會主義政黨持反對態度，在臨時政府發佈通緝令之前就要求逮捕列寧。它猛烈指責臨時政府和克倫斯基的無能和怯懦，鼓吹更加大膽的戰爭兼併計劃，要求把政府的領導權交給強人 (特別是海軍中將高爾察克)。它還用「拉比諾維奇」之類為人熟知的代號公開蘇維埃中猶太人的比例\*。彼得格勒蘇維埃認為《小報》是「對猶太人進行集體迫害的出版物」，因而強烈呼籲印刷工人不要印它。但是到1917年6月，《小報》的發行人量攀升到10.9萬份，比《真理報》還多，讀者範圍覆蓋首都的衛戍部隊、附近的海軍基地和工廠。儘管如此，現在仍無法知道，它的人氣主要是因為粗俗的娛樂內容，還是因為要求把政權交給「強人」。<sup>214</sup>

科爾尼洛夫失敗後，這份報紙失去了人氣。但《小報》甚至在那之前就開始給自己貼上了「社會主義」的標籤——差不多就像早期的國家社會主義分子——儘管它並不太相信社會主義。這種三心二意的做法，有力地表明右翼的任何運動，要想有所作為，就必須是「社會主義的」。某種形式的社會主義成了政治景觀中無可避免的東西。然而，社會主義也是促使科爾尼洛夫以及其他的右翼政治人物採取行動的罪魁禍首之一。戰爭讓社會主義幾乎成了一種普遍的渴望，從而極大地壓縮了俄國右翼力量的選擇空間。結果，科爾尼洛夫想用來恢復秩序的工具本身，也就是軍隊，現在成了比以往任何時候都重要的社會主義革命的工具。<sup>215</sup>

211

---

\* 譯註：拉比諾維奇是俄國德系猶太人的姓，意為「拉比的兒子」。

## 遁逃

不幸的克倫斯基。克倫斯基知道迫切需要加強中央權威，但他兩面派的做法把自己逼到了進退兩難的境地：要麼倒向總參謀部（要想阻止左翼的政變就不能沒有他們），要麼倒向通過民主選舉產生的蘇維埃（在他看來也就是群眾，他非常渴望得到群眾的支持）。<sup>216</sup> 可是，由於他倒向蘇維埃並讓科爾尼洛夫蒙受了恥辱，權勢人物徹底拋棄了臨時政府；少數人甚至開始希望，通過外來干涉拯救俄羅斯。<sup>217</sup> 大本營的兩名將軍拒絕了克倫斯基的緊急要求，不願接替被撤掉的科爾尼洛夫的職務。這位完全破產了的總理——別說議會，他連政府都沒有——無奈之下，只好指示俄軍服從科爾尼洛夫的命令。「一個被控犯有叛國罪的最高總司令，」科爾尼洛夫在談到自己時說道，「卻因為無人願意接任而奉命繼續指揮軍隊。」<sup>218</sup>

有些內部人士竭力勸說克倫斯基辭職，把位置讓給阿列克謝耶夫將軍。但那位36歲的律師卻自己任命自己為軍隊最高總司令，並讓阿列克謝耶夫將軍——他剛剛被當作「失敗主義者」解除職務——擔任總參謀長。這個安排跟尼古拉二世在位時一樣。阿列克謝耶夫考慮了三天才同意克倫斯基的要求；在任命阿列克謝耶夫九天後，克倫斯基解除了他的職務。<sup>219</sup> 原先11人的懸在空中的臨時政府，只剩下了1人。克倫斯基任命自己為新的五人委員會主席，類似於法國大革命（1795–1799）中的五人督政府，五人督政府想在極左和極右之間走中間的政治道路；俄國的冒牌「督政府」名義上存在了幾個星期。<sup>220</sup> 克倫斯基的行動，尤其是軍事攻勢，是在1917年6月開始的，而現在，1917年8月，整個政治景觀都改變了：右翼垮掉了，左翼生氣勃勃，而且整個左翼都在朝着越來越左傾的方向發展。

還在7月的時候，布爾什維主義一度跌入谷底。<sup>221</sup> 剛加入布爾什維克的托洛茨基和加米涅夫一樣在蹲監獄，列寧則和季諾維也夫一樣，藏在芬蘭人的穀倉裏。如此一來，就剩下了斯維爾德洛夫和斯大林。要是沒有東躲西藏的列寧和關進監獄的托洛茨基，這兩人是否還能領導布爾什維克黨奪取政權就難說了。布爾什維克的喉舌《工人之路報》是代

替被查封的《真理報》的，斯大林是《工人之路報》的編輯和撰稿人，斯維爾德洛夫則努力維持組織的團結，說服外省同志拿出他們黨務工作的實例（傳單副本、黨籍詳情），然後再給他們傳達指示。<sup>222</sup>但要說領導整個革命，那可是在街頭和戰壕進行的壯舉？

事態發展的政治方向是沒有任何疑問了。7月底、8月初，黨的第六次代表大會成功召開，取消了「全部政權歸蘇維埃」的口號，但接着，8月底，早就在預料中的「反革命」突然出現。<sup>223</sup>在要求改變階級政權時，「全部政權歸蘇維埃」的口號又恢復使用了。據說，統治階級無力推動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這種革命對於社會主義來說是必要的）；相反，他們現在是公開的反革命。將軍不會帶來和平。銀行家不會帶來經濟改革。地主不會帶來土地重新分配。資產階級事實上過於軟弱。必須奪取階級政權，否則所有得到的——整個革命進程——就會失去。工農必須成為革命的領導力量。<sup>224</sup>社會革命黨、甚至孟什維克的最左翼，現在也第一次接受了這一綱領。「在科爾尼洛夫暴動的日子裏，」斯大林主編的《工人之路報》後來解釋說，「政權已經轉歸蘇維埃。」<sup>225</sup>

克倫斯基和科爾尼洛夫的失敗徹底扭轉了布爾什維克的頹勢。<sup>226</sup>就在科爾尼洛夫同其他許多高級軍官在莫吉廖夫大本營束手就擒的時候，被囚禁的布爾什維克，凡是沒有自行逃走的，幾乎都獲釋了，最主要的是，這其中包括托洛茨基（9月3日，他在交了3,000盧布的保釋金後被放了出來）。9月25日，即克倫斯基關於「督政府」的荒唐想法被收回的同一天，托洛茨基成了彼得格勒蘇維埃的主席。從囚犯一躍進入民眾機構的高層，說明布爾什維克新近在該機構佔據了驚人的多數。（布爾什維克在莫斯科蘇維埃代表中也佔據了多數。）同樣引人注目的是，按照克倫斯基的命令發下去抵抗科爾尼洛夫的4萬支步槍，大部分落到工人手裏——在此之前，工人總的來說沒有武裝——而這些「赤衛隊」中的許多人現在都站在布爾什維克一邊。在1917年9月6日的文章中，斯大林公開承認克倫斯基和科爾尼洛夫事件帶來的好處：「馬克思認為1848年德國革命力量薄弱的原因之一，是那裏沒有能鞭策革命並在鬥爭的烈

火中加強革命力量的強大的反革命。」<sup>227\*</sup> 在俄國，斯大林強調說，以科爾尼洛夫為代表的反革命的出現，證實了必須「和立憲民主黨人決裂」，也就是說，必須和臨時政府決裂。9月16日，斯大林在另一篇重要的社論中提出了一個響亮的要求——立刻把全部政權交給蘇維埃。「革命的基本問題是政權問題，」他解釋說，「革命的性質、進程和結局完全取決於政權操在誰手裏，哪個階級掌握政權」，因此，社會主義者應當以無產階級的名義，掌握俄國革命的方向。<sup>228†</sup>

經過「七月那些日子」的痛苦失敗後——此後布爾什維克遭到大逮捕——許多人對於任何形式的暴動都缺乏信心，害怕招來滅頂之災。但列寧從他在芬蘭的藏身處傳來了瘋狂的指示，要求立刻發動政變，理由是「真正無政府狀態的浪潮將會比我們更強大」。<sup>229‡</sup> 俄國股市暴跌。逃兵和罪犯四處搶掠。「在羅斯托夫，市政廳被炸，」那年秋天莫斯科的一家報紙解釋說，「在坦波夫省，農村地區發生了迫害猶太人的事件……在高加索，許多地方發生了大屠殺。在伏爾加河沿岸的卡梅申斯克附近，士兵們搶劫了火車……」<sup>230</sup> 同1917年2月一樣，買麵包的長隊又出現了。<sup>231</sup> 負責糧食供應的官員們商量軍隊復員的問題，因為他們無法提供足夠的糧食。<sup>232</sup> 克倫斯基同名義上恢復了的臨時政府內閣的各個部長一起，搬到了比較安全的冬宮，他自己就住在從前亞歷山大三世住的地方，睡的是沙皇的床，用的是沙皇的辦公桌；他的裝腔作勢受到了更加辛辣的嘲諷，而且嘲諷不僅來自憤怒的右翼——他們散佈流言，說他有猶太血統，並且暗中為德國人工作。<sup>233</sup> 很快又出現了拉斯普京式的謠言，說克倫斯基同尼古拉二世的一個女兒有染。（克倫斯基已經和妻子分居。）這一切刺激了列寧。「我們在彼得格勒有數千名武裝工人和士兵，他們能夠一舉佔領冬宮、總參謀部、電話局以及各大印刷廠，

214

\* 譯註：《斯大林全集》第3卷，第260頁。

† 譯註：《斯大林全集》第3卷，第282頁。

‡ 譯註：列寧在1917年10月1日（14日）給中央委員會、莫斯科委員會、彼得堡委員會以及彼得格勒和莫斯科的蘇維埃布爾什維克委員的信中表示：布爾什維克「應當立即奪取政權。只有這樣，才能挽救世界革命……才能挽救俄國革命（不然真正無政府狀態的浪潮將會比我們更強大），才能挽救戰爭中的幾十萬人的生命」。《列寧全集》第32卷，第332-333頁。

他在10月7日再次堅持說。克倫斯基將「不得不投降」。<sup>234\*</sup> 斯大林轉載了列寧信中可以公開的部分，並反覆強調，工人、農民和士兵必須提防克倫斯基和科爾尼洛夫發動新的叛亂。「反革命，」斯大林在10月10日早晨發表的文章中敦促說，「正在動員起來——準備反擊吧！」<sup>235†</sup>

但中央委員會還在拖延，於是，10月3至10日的某個時候，列寧冒險從芬蘭回到彼得格勒；10日那天，在一處用作安全屋的私人住宅，戴着假髮和眼鏡而且剃掉了鬍鬚的列寧，自7月以來頭一次參加了中央委員會會議。中央委員會的21名委員，只有12人到場。斯維爾德洛夫作了報告，他提到據說民眾普遍支持暴動。經過幾乎一整夜的激烈爭論，12人當中有10人投票贊成列寧立刻發動政變的主張；加米涅夫和季諾維也夫反對。斯大林站在列寧一邊，對決議投了贊成票——決議是用鉛筆寫在一張從小孩的寫字簿上撕下來的紙上，大意是「武裝起義不可避免，起義時機完全成熟」。不過，日期沒有定下來。（「甚麼時候可以舉行這次起義還不確定，也許是在一年之內」，米哈伊爾·加里寧在10月15日那天寫道。）<sup>236</sup> 10月18日，加米涅夫和季諾維也夫在一份發行量很小的報紙上表示，他們反對政變——這實際上就是泄露了正在計劃發動政變。<sup>237</sup> 列寧用極其憤怒的語氣寫了一封信，稱他們是工賊，要求開除他們。<sup>238</sup> 斯大林在其主編的布爾什維克最重要的報紙上允許季諾維也夫作了和解性的回應，並加了編者按。「就我們而言，我們希望，既然季諾維也夫發表了聲明……就可以認為這件事到此為止了，」這段匿名的編者按說，「列寧文章的尖銳口氣並不能改變如下事實，即從根本上來說，我們仍然是一條心。」<sup>239</sup> 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或許有可能成為兩個盟友，以削弱新近得勢的托洛茨基。

列寧藏身的福法諾娃夫人的家裏沒有電話，克魯普斯卡婭忙前忙後，帶着列寧的文件和口信向中央委員會施壓。<sup>240</sup> 10月10至25日，列

---

\* 譯註：列寧〈危機成熟了〉一文寫於俄曆9月29日，10月7日的《工人之路報》轉載了文章的部分內容，此處所引並不在10月7日轉載的範圍之內。參見《列寧全集》第32卷，第277-278頁。

† 譯註：《斯大林全集》第3卷，第347頁。

寧跟托洛茨基只見了一次，是10月18日在他藏身的私人住宅，但那一次就夠了；在10月20日的中央委員會會議上，托洛茨基嚴厲斥責斯大林企圖在黨內充當和事佬，結果，委員們表決通過了加米涅夫的辭職請求。托洛茨基成了比中央委員會還要重要的執行列寧意志的工具。布爾什維克被克倫斯基趕出了克舍辛斯卡婭公館（用托洛茨基尖刻的話說，就是「某個宮廷芭蕾舞女演員的安樂窩」）。他們在斯莫爾尼宮——所專門為年輕的貴族女子準備的淑女學校——駐紮下來，和塔夫利達宮相比，那裏在首都東面更遠的地方。被趕出塔夫利達宮的蘇維埃也搬到了斯莫爾尼宮。在那裏，蘇維埃的中央執行委員會以一票的優勢（13對12），批准成立了負責防禦的軍事革命委員會，它在10月12日又得到蘇維埃全體會議的批准。<sup>241</sup> 成立武裝機構的想法最初是孟什維克提出的，理由是，可以穩住騷動不安的衛戍部隊，保衛首都，抵禦德國人的進攻。但托洛茨基會在列寧的敦促下，撇開只剩下空殼的臨時政府，用軍事革命委員會為布爾什維克服務。現在，一切都變得對列寧有利起來。

全俄蘇維埃第二次代表大會定在10月20日，這個時間安排得太巧了，於是，托洛茨基想出一條妙計，在召開大會的同時奪取政權，這樣一來，既可以讓其他所有的社會主義者不得不接受既成事實，又可以讓奪權帶上必不可少的合法色彩。<sup>242</sup> 當時有很多代表似乎不太可能準時趕到彼得格勒，因此，溫和派社會主義者在10月17至18日迫使蘇維埃中央執行委員會把大會延期到10月25日——這一點對布爾什維克非常關鍵，因為他們有了準備政變的時間。<sup>243</sup>（軍事革命委員會到10月20日才召開第一次會議。）<sup>244</sup>「蘇維埃政府將終結戰壕的苦難，」據見證者蘇漢諾夫說，10月21日，托洛茨基告訴聽眾當中的士兵和水兵，「蘇維埃政府會分配土地，消除國內混亂。會把國家中的一切都分給窮人和戰壕裏的士兵。要是你，資產者，有兩件皮毛大衣，那就給一件士兵……你是不是有一雙暖和的靴子嗎？那就待在家裏。工人需要你的靴子。」蘇漢諾夫還說：「當時提出一個決定，即在場的有哪些人贊成為了工農的事業流盡最後一滴血？……成千的聽眾齊刷刷地把手舉了起來。」第二天，摩登馬戲場發生了同樣的一幕，托洛茨基在那裏要求人們宣誓效忠：「如果你們支持我們讓革命走向勝利的政策，如果你們為

這項事業貢獻你們全部的力量，如果你們在這項偉大的事業中毫不猶豫地支持彼得格勒蘇維埃，那就讓我們宣誓忠於革命。要是你們支持我們說出的這一神聖的誓言，請把你們的手舉起來。」<sup>245</sup> 蘇維埃第二次代表大會召開前夕，10月23日，托洛茨基領導下的軍事革命委員會要求首都衛戍部隊只聽從它的指揮。它通過派駐衛戍部隊各團的政治委員命令它們「做好戰鬥準備」。<sup>246</sup> 不過，軍事革命委員會對於接下來應該怎麼辦仍然沒有把握。

216

10月24日下午，斯大林告訴前來參加代表大會的布爾什維克代表，軍事革命委員會內部對於可以採取的行動路線有兩種不同的看法：一種是，「我們應該立刻組織起義」；另一種是，「我們應該加強自己的力量」。黨的中央委員會的多數人，他暗示說，都傾向於後者，也就是等等看。<sup>247</sup> 克倫斯基又一次幫了大忙，下令逮捕布爾什維克的高層人物——在科爾尼洛夫潰敗後被他放掉的那些人——並查封兩份布爾什維克報紙：《工人之路報》和《士兵報》（為平衡起見，也查封了兩份右翼報紙）。10月24日，一群士官生和民兵當着斯大林的面銷毀了剛剛印出來的報紙，砸壞了印刷機，但斯大林手下的工作人員跑到斯莫爾尼宮報告說遭到攻擊，於是，軍事革命委員會派去部隊並讓印刷機重新轉動起來。<sup>248</sup> 為了保衛革命而組織的防禦變成了進攻。有傳言說，城裏有「可疑的」部隊在調動——科爾尼洛夫分子！——於是，赤衛隊佔領了火車站，控制了橋樑，奪取了電報局。當政府切斷連接斯莫爾尼宮的電話線時，軍事革命委員會就奪取了電話局，重新接通線路，並切斷冬宮的聯繫。當斯莫爾尼宮的照明出現問題時，赤衛隊就佔領了發電廠。托洛茨基後來說過一句俏皮話：「正如你們也許會說的，當時克倫斯基政府能做的只有暴動。」<sup>249</sup>

事實上，不管怎樣，布爾什維克本來就可以說自己有權掌握政權，因為根本沒有甚麼力量可以阻擋他們。他們居然稀裏糊塗地奪了政權，是因為臨時政府說垮就垮，就像自吹自擂的專制制度說垮就垮一樣。<sup>250</sup> 赤衛隊——被描寫成「一群擠作一團的男孩，穿着工人的衣服，拿着上了刺刀的槍」——沒有遇到抵抗，結果到10月24日的傍晚，就控制了首都的大部分戰略要點。<sup>251</sup> 那天夜裏，克倫斯基解除了彼得格勒軍區司



令格奧爾吉·波爾科夫尼科夫上校 (Georgy Polkovnikov) 的職務，但後者沒有理睬將他解職的命令，而是通過軍用線路打電報給大本營的總參謀部：「我報告，彼得格勒的形勢險惡。沒有出現街頭示威和動亂，但是正在進行有計劃的抓人以及佔領公共機構和火車站的行動。根本沒有人執行命令。士官生未作抵抗就擅離職守……不能保證不會有人企圖控制臨時政府。」<sup>252</sup> 這名上校說得對，但是，那天夜裏布爾什維克究竟召集了多少衛戍部隊士兵和非正規武裝，現在還不清楚，也許就區區1萬人。<sup>253</sup> 阿列克謝耶夫將軍後來聲稱，他在彼得格勒有1.5萬名軍官，其中有三分之一隨時準備保衛冬宮，但他的建議未被採納。（結果，軍官們都喝醉了。）<sup>254</sup> 彼得格勒衛戍部隊沒有全都參與布爾什維克政變，但更重要的是，他們沒有保衛現存秩序。<sup>255</sup> 附近的北方戰線司令V.A.切列米索夫將軍 (V. A. Cheremisov)，迫於在其司令部附近成立的軍事革命委員會的壓力，撤銷了之前派遣援軍解救冬宮的命令。<sup>256</sup> 成了空殼的臨時政府召集到的全部防衛力量只是一些婦女和兒童：清一色由婦女組成的「決死營」（有140人）和幾百名不太情願的年輕的士官生——他們得到了一支自行車部隊的協助；零零星星幾個哥薩克；還有40名傷殘軍人，他們的指揮官有兩條假腿。<sup>257</sup>

## 列寧和托洛茨基

1917年10月，俄國總共有1,429個蘇維埃，其中農民代表蘇維埃455個，從而形成了一場聲勢浩大的草根運動，但它們的命運在很大程度上掌握在兩個人的手裏。10月24日晚上10時左右，列寧不顧中央委員會繼續隱蔽的指示，動身前往斯莫爾尼宮——戴着假髮，臉上纏着繃帶，假裝受了傷。一支士官生巡邏隊攔住了他和他唯一的保鏢，但他們打量了一下這位故意把自己弄得邋裏邋遢的布爾什維克領袖，沒有把這個看起來像醉鬼的傢伙扣起來。列寧沒有通行證，只能悄悄地溜進斯莫爾尼宮；一到裏面，他就開始大叫要馬上發動政變。<sup>258</sup> 他這話是白說了，因為暴動早就開始了。但在第二天夜裏，蘇維埃第二次代表大會被推遲了，軍事革命委員會的武裝力量在幾乎無人守衛的冬宮

外面沒有採取行動；代表大會不能再等，最後在夜裏10:40開幕。斯莫爾尼宮帶有柱廊的會堂以前是供學校演出用的，此時集中了650至700名代表，他們幾乎淹沒在香煙的煙霧中。布爾什維克（最大的黨團）有300人多一點，倒向布爾什維克一邊的左派社會革命黨人有近100人。有500多名代表認為「全部政權歸蘇維埃」的時機已經成熟，但對於布爾什維克造成的既成事實，許多人感到憤怒，尤其是溫和派社會主義者。<sup>259</sup>衰弱而又笨拙的孟什維克領導人尤利·馬爾托夫，用顫抖而沙啞的聲音——肺結核（或癌症早期）的徵兆——提出一個決議，要求「和平解決」，並立即通過談判成立一個具有包容性的「由所有民主黨派組成的政府」。馬爾托夫的決議在「雷鳴般的掌聲」中獲得一致通過。<sup>260</sup>但接着，布爾什維主義的批評者站了起來，猛烈指責他們「背着代表大會」搞陰謀詭計，準備逮捕臨時政府並煽動「內戰」，結果，為了表示自己不贊成布爾什維克，大部分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代表退出會場。「破產分子，」托洛茨基對着他們的背影喊道，「滾到你們該去的地方，滾到歷史的垃圾堆去吧。」<sup>261</sup>

「馬爾托夫默默地走着，頭也不回——到出口才停下。」他的一位孟什維克同仁鮑里斯·尼古拉耶夫斯基（Boris Nicolaevsky）回憶說。維堡區的一名年輕的布爾什維克狂熱分子說了一句讓那位孟什維克領袖震驚的話：「我們原本以為，馬爾托夫至少會跟我們在一起。」馬爾托夫回答說：「總有一天你會明白你捲入的這樁罪行。」然後他揮揮手，離開了斯莫爾尼宮的會堂。<sup>262</sup>

經過幾個月來在報紙、兵營、工廠、街頭和起居室的公開討論，布爾什維克的暴動結束了，在絕大多數居民知道它發生之前就完成了。10月25日，彼得格勒的電車和公交車正常運營，商店開門營業，劇院也在演出（費奧多爾·夏里亞平\*〔Fyodor Chaliapin〕演唱了《唐·卡洛》）。帝國各地的人們，不管是基輔還是符拉迪沃斯托克，對於首都發生的事情都不知情或只是略知一二。不過，政權逐漸落到蘇維埃手裏，這一點早

---

\* 譯註：1873-1938，俄國著名歌唱家。

就很明顯了：早在1917年夏天，喀琅施塔得海軍基地就成了蘇維埃統治下事實上的小型共和國。塔什干蘇維埃儘管拒絕接納穆斯林成員（穆斯林佔當地人口的98%），但在彼得格勒布爾什維克政變之前就奪取了政權。<sup>263</sup> 最晚到1917年9月，情況根本就不是幽靈般的臨時政府還能不能存在下去的問題，而是在首都誰會取而代之的問題。1917年8月的莫斯科國務會議——有望成為權力集團（未經選舉）的立憲會議——本來是有可能成為競爭者的，但這樣一個現成的機會被白白浪費了。取代臨時政府的機會留給了彼得格勒蘇維埃。因此，關鍵在於，誰會在蘇維埃佔據優勢？在這方面，布爾什維克的運氣太好了。在彼得格勒，就和其他大多數在戰時駐紮了大量衛戍部隊的城市一樣，克倫斯基在6月的自殺式攻勢，在8月先是慫恿然後又出賣科爾尼洛夫，把蘇維埃拱手送給了布爾什維克。托洛茨基的主意——利用新成立的軍事革命委員會給蘇維埃第二次代表大會造成布爾什維克奪權的既成事實——鞏固了突然得到的政治優勢。<sup>264</sup> 但反對布爾什維克政變的社會主義者無意中幹了剩下的事情——他們退出了會場。<sup>265</sup>

後來對於「起義的藝術」談論得很多，特別是托洛茨基。蘇維埃代表大會開幕當天的夜裏（10月26日）凌晨2時過後，在和代表大會同時召開的彼得格勒蘇維埃特別會議上，托洛茨基宣佈，彼得格勒蘇維埃軍事革命委員會的武裝力量終於在冬宮找到了臨時政府的部長們，他們坐在桌子周圍束手就擒。（布爾什維克黨內反對政變的加米涅夫，向蘇維埃代表大會通報了逮捕的消息。）裝腔作勢的阿納托利·盧那察爾斯基（Anatoly Lunacharsky）向大會宣讀了列寧寫好的移交政權的宣言（署名是「彼得格勒蘇維埃軍事革命委員會」），暴風雨般的歡呼聲不時打斷他的聲音。經過討論，在場的左派社會革命黨人同意擁護這一法令，只需要作一個小小的改動；一位重新回到會場的孟什維克國際派代表要求作出修正，認為成立的政府要盡可能吸收最廣泛的力量，但他的建議未獲採納。凌晨5時左右，以布爾什維克和左派社會革命黨人為主的仍然留在會場的代表，以壓倒性的優勢通過了移交政權的決議：僅有2票反對，12票棄權。<sup>266</sup> 早上6時左右，開幕的會議已經持續了大約7個小時，代表們休會，略事修整。當時沒有任何正常運轉的政府。軍事革

命委員會的布爾什維克把從前的部長們押送到彼得保羅要塞潮濕的牢房裏，那些牢房在科爾尼洛夫和克倫斯基事件之前一直關滿了布爾什維克。<sup>267</sup>不過，赤衛隊實際上根本沒有對冬宮發起過「猛攻」：他們最後只是在沒有遇到抵抗的情況下，翻過了沒有上鎖的大門和窗戶，許多人徑直奔向那些出名的、史上最奢侈的酒窖。<sup>268</sup>為了防止發生搶劫而新派去的赤衛隊，不但沒起作用，反而把自己也灌醉了。「我們想要往酒窖裏灌水，」現場的布爾什維克武裝的領導人回憶說，「但消防員們……反倒喝醉了。」<sup>269</sup>

不過，關鍵在於，克倫斯基由於虛榮心作怪，把自己和代理「部長們」搬進了冬宮，從而把臨時政府與暴虐的沙皇統治中心永遠地聯繫起來。這種象徵性的聯繫，有助於把布爾什維克的十月政變——借助於猛攻冬宮的神話故事——描寫成推翻舊制度的連續的過程，把二月革命與十月革命結合為一個整體。

220

這時的列寧甚至還沒有在蘇維埃代表大會現身。他的最終出現——掌聲雷動——是在10月26日晚上9時左右，在第二次（也是最後一次）會議開始之後，而且仍像他在穿過首都前往斯莫爾尼宮時那樣，為了避免被抓住而扮成底層人。（為了掩人耳目，列寧習慣戴一頂工人戴的帽子，這頂帽子從來沒有摘下過，哪怕是在他後來穿上「資產階級」西服的時候。）<sup>270</sup>「列寧，偉大的列寧，」約翰·里德寫道，「他身材不高，但很結實，肩膀上扛着個已經謝頂的大腦袋，前額凸出……衣着破舊，褲子顯得太長。」<sup>271</sup>認識他的人不是很多。從人種上來說，列寧主要是俄羅斯人，但也有日耳曼人、猶太人和卡爾梅克人血統。與科爾尼洛夫同年出生的列寧，現在已完全步入中年。他「個子不高，寬寬的肩膀，瘦而結實，」聖彼得堡的作家亞歷山大·庫普林（Alexander Kuprin）說道，「他看上去既不好鬥和讓人反感，也不顯得思想深刻。他顴骨較高，眼睛有點斜……額頭飽滿，但並不像縮小的照片中那樣誇張……他兩鬢稀疏，但從鬍鬚仍然可以看出他年輕時有過怎樣一頭火紅的濃髮。他的雙手又大又難看……我不停地看着他的眼睛……他的眼睛比較細，而且總是眯起來，這無疑是他為了掩飾自己的近視而養成的習慣，而這，以及他眉毛下迅速的一瞥，讓他有時也斜着眼睛，顯得有點

狡詐。」<sup>272</sup> 布爾什維克格列布·克爾日扎諾夫斯基 (Gleb Kryzanowski) 對列寧矮小的身材和眼睛有着相似的印象 (「不同尋常的、銳利的、充滿內在力量和能量的、黑黑的、棕色的」)，但覺得他的容貌很不尋常——「一張黝黑、帶有亞洲人特徵的令人愉快的臉龐」。<sup>273</sup> 雖然外表不如小個子科爾尼洛夫那麼像亞洲人，也不像他那樣精瘦，但列寧的臉看起來還是有點像蒙古人。

瞧，這就是俄國的卡爾梅克救星。

221 這位布爾什維克狂熱分子在暴風雨般的掌聲和《國際歌》的歌聲中，宣讀了立即與「一切交戰國的人民及其政府」實現和平的法令。<sup>274</sup> 列寧還宣讀了土地法令——沒提土地的國有化，而是支持農民對土地的私人 and 集體佔有。針對有人提出的反對意見，認為土地法令背離了布爾什維克長期堅持的綱領，而且是從已經退出大會的社會革命黨人那裏剽竊而來，列寧反駁說，「誰擬訂的不都是一樣嗎？我們既是民主政府，就不能漠視下層人民群眾 (*narodnye nizy*) 的感受，即使我們並不同意。」<sup>275</sup> 土地法令未經討論就通過了。

列夫·加米涅夫，蘇維埃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巧妙地撤銷了托洛茨基譴責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上退出會場的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那份言辭激烈的決議。在列寧出現之前，在蘇維埃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 (10月25-26日) 和第二次會議 (10月26-27日) 的間隙期，加米涅夫做了大量的工作，試圖就同左派社會革命黨人共同成立聯合政府一事達成一致，但社會革命黨人不願把其他所有的社會主義者排除在外。結果，就在蘇維埃代表大會第二次即最後一次會議快要結束的時候，凌晨2時半左右 (10月27日)，加米涅夫宣佈成立一個清一色布爾什維克的「臨時」政府。孟什維克國際派的鮑里斯·阿維洛夫 (Boris Avilov) 站起來預言說，一個全部由布爾什維克組成的政府既不能解決糧食供應危機，也不能結束戰爭。他還預言說，協約國不會承認一個由布爾什維克壟斷的政府，後者將被迫與德國單獨媾和，並付出沉重的代價。阿

---

\* 譯註：《列寧全集》第33卷，第20頁。

維洛夫提議，把那些已經退出會場的由選舉產生的蘇維埃代表請回來，並和他們一起組成一個全部由社會主義者組成的民主政府。阿維洛夫的提議未被採納，只得到四分之一（150）在場代表（600）的支持，儘管就連布爾什維克當中也有很多人非常同情他的立場。<sup>276</sup> 反對和「叛徒」做交易最積極的是托洛茨基。<sup>277</sup>

托洛茨基給人的印象是風度翩翩——亂蓬蓬的黑髮，藍眼睛，知識分子的夾鼻眼鏡，還有大力士一般的寬肩膀——但他代表列寧對公眾施展了他的超凡魅力。列寧的力量是神秘的。「我覺得有點意外的是，一個對於自己遼闊的祖國的命運影響如此深遠的人，不管對他的思想有甚麼樣的看法，給人的印象竟然如此謙遜，」一個到訪過斯莫爾尼宮的芬蘭人說，「他說話非常樸實、自然，他的舉止也是。如果不瞭解他，那就永遠無法理解他必定擁有的那種力量……這個房間與斯莫爾尼宮其他任何一個房間沒有甚麼兩樣……牆刷成白色，有一張木頭桌子和幾把椅子。」<sup>278</sup> 列寧的政治工具不是氣派的建築、官僚系統和電話網，而是思想和人格。「列寧……之所以能夠徹底掌握對1.5億人口的統治權，完全在於他的人格魅力，」一位敏銳的外國觀察家後來指出，「這種魅力感染了所有接觸過他的人。」<sup>279</sup> 1917年，列寧很少拋頭露面。亞歷山大·施略普尼柯夫，1917年春天列寧回國時布爾什維克黨在國內的領導人，十月政變之前、期間和剛結束的時候都在住院（他被電車撞了）；他對於事態發展沒有任何影響。但列寧的確起了作用，雖然他在1917年沒有視察過軍艦上的水兵或戰壕裏的士兵，可大部分水兵和士兵都聽說過他。他有時也發表公開演講，比如說在克舍辛斯卡婭公館的陽台上，或者在彼得格勒蘇維埃慷慨陳詞，因此，在5月的時候，激進的工人們打出的旗幟上寫道：「列寧萬歲！」但是，在1917年4月3日回到闊別近17年之久的俄國後，這位布爾什維克領袖很快就不得不避居俄屬芬蘭。

從1917年7月初遭到緝拿開始，列寧就處於地下狀態，連續躲藏了近四個月，一直到10月24日。<sup>280</sup> 在那段關鍵時期，別說是群眾，就連布爾什維克的核心圈他甚至都幾乎沒有面對面地見過。這就好像一個住在地下墓穴裏的基督徒，有生之年突然冒出來成了教皇。大部分政

治人物之所以能夠取得輝煌的成就，基本上都是靠拼湊起廣泛的同盟，而且往往是跟一些很不可靠的夥伴，但列寧不是這樣。他拒絕合作，製造了越來越多的敵人，可還是成功了。當然，他在職業革命家的隊伍裏培養了盟友——像托洛茨基、斯維爾德洛夫和斯大林那樣的忠實擁護者。列寧源源不斷的辯論文章首先在革命者當中進一步提升了他的影響力，而那些革命者繼而又在群眾中宣揚列寧的思想和政治立場。事實證明，列寧下筆簡潔有力，罵人功夫着實非常高明，善於對革命進程以及理論依據進行粗略、總括式的分析。<sup>281</sup> 但不管列寧有着怎樣的超凡魅力和概括才能，他的影響力主要還是由於事態的發展對他有利。他始終執着於一種看似瘋狂的行動路線，這種路線後來逐漸讓他佔據了優勢。列寧似乎是政治意志的化身。

223

作為馬克思主義者，托洛茨基相信所謂的歷史規律，但他後來不得不承認，沒有列寧，就沒有十月革命。<sup>282</sup> 至於列寧，他從來沒有明確地表示過，這話也一樣適用於他不可或缺的得力助手托洛茨基。其他人倒是這樣說過。「我告訴你們，我們應該如何對付這些人，」絕望的自由英國的武官阿爾弗雷德·諾克斯將軍 (Alfred Knox)，在對美國的一位紅十字會官員提到列寧和托洛茨基時說道，「我們應該斃了他們。」這是在10月20日，即預計會發生的布爾什維克政變真正發生的前夕。那位自作聰明的紅十字會官員回答說，「可你們面對的是幾百萬人。將軍，我不是軍人。可你們面對的不是軍事局面。」<sup>283</sup> 實際上，那位紅十字會官員錯了：他把要召開的蘇維埃第二次代表大會勢所必然要獲得的權力和布爾什維克獨自奪取的權力混為一談。本來是可以用幾發子彈就阻止布爾什維克暴動的。



「俄國革命，」羅莎·盧森堡說，「是世界大戰中最重大的事件。」<sup>284</sup> 如果戰前就從立憲專制 (constitutional autocracy) 變成君主立憲 (constitutional monarchy)，是否足以把民眾融合為一個穩定的政治體，這一點永遠也不得而知。我們確實知道的一點是，長期以來，頑固的尼古拉二世以及幾乎整個權力集團，不肯為了挽救君主制而放棄君主

專制，結果，失靈的君主專制一旦垮台，國家機構也一下子土崩瓦解。自由和國家崩潰成為同義詞，在這樣的背景下，古典自由主義者的機會來了。1917年2月的自由派政變，表面上是推翻了君主專制，實際上是推翻了杜馬。它預示着1917年10月的布爾什維克政變表面上是推翻了臨時政府，實際上是推翻了蘇維埃。兩次政變似乎都集中體現了當時民眾的情緒，兩次政變又都與民眾的期望相反，讓民意基礎十分狹隘的集團上了台。另外，民眾的情緒並不是靜止不變的：世界大戰極大地推動了民眾情緒的激進化。誠然，革命的歷史表明，千禧年式的希望<sup>285</sup>必然是無法滿足的，這自然會使民眾的情緒變得激進起來。如果說俄國有讓人意外的地方，那這種意外不在於民眾變得越來越激進，而在於權力集團和軍方高層變得越來越軟弱。

俄國一向是警察國家，繁重的治安任務主要依靠軍隊，但俄國不僅在1917年3月就失去了警察，從那以後也失去了軍隊。「除非由軍隊或警察發動政變，除非政府武裝的抵抗意志受到削弱，」歷史學家阿德里安·利特爾頓(Adrian Lyttelton)指出——他說的是意大利，但也同樣適用於俄國——「否則，要在一個現代國家用『武力』奪取政權永遠行不通。」<sup>286</sup> 世界大戰，尤其是1917年的軍事攻勢，所起的作用不僅在於加快了民眾激進化的步伐，它還拔去了軍隊作為維護秩序的力量的毒牙。從維堡、赫爾辛基到普斯科夫——臨時政府稱之為「腐爛的三角區」——戰爭期間在陸軍和艦隊中存在的激進情緒，成了布爾什維主義必不可少的傳播基礎。「十月事件在首都也許是一場『政變』，」有歷史學家寫道，「但在前線，它是一場革命。」<sup>287</sup> 那些政治化的武裝力量主要由農民構成，所以，不管他們是不是在軍隊服役，都是在進行他們自己的革命。「一個領土無限廣闊的國家，人口稀少卻飽受耕地匱乏之苦，」立憲民主黨杜馬代表瓦西里·馬克拉科夫(Vasily Maklakov)頗有後見之明地說道，「農民階級在別的國家通常都是維護秩序的堡壘，在1917年的俄國卻表現出革命者的特徵。」<sup>288</sup> 但士兵和水兵的革命與布爾什維主義是自

\* 編註：這是指，希望在一場大災難或者革命性的事件之後，社會將發生根本性的變化。



覺地聯繫起來，而農民革命與布爾什維主義僅僅是偶然結合在一起的。不久，農民革命就與布爾什維主義發生了衝突。

在布爾什維克黨的內部，彼得格勒政變的方式產生了持久的影響。加米涅夫和季諾維也夫反對政變，這在後來成了他們終身的污點。當斯大林的調解被托洛茨基毫不客氣地拒絕之後，斯大林對這位新貴，對備受關注、才智過人的托洛茨基的怨恨一下子爆發了。他怒氣沖沖地宣佈要辭去黨報的編輯職務。「俄國革命淘汰了不少權威人士，」在提出辭職的當天，斯大林輕蔑地寫道，「革命的威力也表現在它不對『名人』打躬作揖，而要他們為它服務，如果他們不願意向它學習，那就會把他們拋到九霄雲外。」<sup>289</sup> 中央委員會沒有批准他的辭職，但他甚至在政變成功之後，仍舊忿恨不已。<sup>290</sup> 托洛茨基後來在流亡時稱斯維爾德洛夫是「十月起義的總書記」，這話戳到了（時任）總書記斯大林的痛處。托洛茨基後來還為反對暴動的加米涅夫辯解說他在政變中起了「非常積極的作用」，並刻意補充說斯大林的作用不明顯。<sup>291</sup> 這顯然不是事實。的確，托洛茨基、加米涅夫、列寧和盧那察爾斯基全部在具有歷史意義的蘇維埃第二次代表大會上講了話，而斯大林卻沒有。但在大會開始前的10月24日，斯大林向蘇維埃中的布爾什維克代表發表了講話，而從講話來看，他對於為政變所作的軍事和政治準備顯然瞭如指掌。另外，他在整個1917年，尤其是那年的夏天和秋天，做了大量的評論和編輯工作。<sup>292</sup>

225

斯大林發表的文章用簡單易懂的語言對革命作了解釋，包括在蘇維埃代表大會期間。「在革命的最初幾天，『全部政權歸蘇維埃！』是一個新口號。」他在《真理報》（10月26日）上寫道——這是指1917年4月初的那段時間。由於科爾尼洛夫暴動，「8月底，情況發生了急劇的變化……在七八月間氣息奄奄的後方的蘇維埃和前線的士兵委員會現在『突然』又復活起來。它們復活以後就在西伯利亞和高加索、芬蘭和烏拉爾、敖德薩和哈爾科夫等地奪取政權……於是彼得堡『一小群』布爾

---

\* 譯註：《斯大林全集》第3卷，第370頁。

什維克在4月間宣佈的『蘇維埃政權』，在8月底幾乎獲得了俄國各革命階級的公認。」他認為由蘇維埃掌權不同於臨時政府那些把社會主義者送進內閣的沒完沒了的變動。「政權歸蘇維埃，——這就是說從下到上徹底清洗後方和前線的所有一切政府機關……政權歸蘇維埃，——這就是說建立無產階級和革命農民的專政……公開的、群眾性的、在大眾面前實行的、沒有陰謀和幕後活動的專政。因為這種專政用不着掩飾：它將毫不留情地對付那些……加劇失業的同盟歇業資本家和那些抬高糧價、製造饑荒的投機銀行家。」某些階級製造了苦難，某些階級會帶來拯救。「這就是『全部政權歸蘇維埃！』這一口號的階級實質。對內政策和對外政策中的事件，戰爭的延長和對和平的渴望，前線的失敗和保衛首都的問題，臨時政府的腐敗……破壞和饑荒、失業和疲敝，——所有這一切都不可遏止地引導俄國各革命階級去奪取政權。」<sup>293</sup>「各階級」怎樣行使權力，這還需拭目以待。

斯大林的格魯吉亞同鄉、社會民主黨人達維德·薩吉拉施維里從1901年開始就認識他，那時薩吉拉施維里14歲，而未來的斯大林23歲。他的成長過程同斯大林差不多——父親不在身邊、沉浸在格魯吉亞殉難者和民族詩人的傳說中、憎惡帝俄官員和佔領軍、欽佩格魯吉亞為正義而戰的法外之徒並且加入了革命小組——但他成了孟什維克。不過，政變後，當薩吉拉施維里拒絕和自己的孟什維克同伴一起抵制由布爾什維克主導的蘇維埃時，斯大林在斯莫爾尼宮的走廊裏，「把他的手非常友好地放在我的肩上，並〔開始〕用格魯吉亞語和我說話。」<sup>293</sup>鞋匠之子、來自俄羅斯帝國邊緣地帶的格魯吉亞人朱加施維里——斯大林，由於地緣政治和世界大戰，由於許多重大的決定和機緣巧合，也由於他自己的奮鬥，已經在世界上最大的國家的首都，成了未來新的權力結構中的一部分。在當選為新的蘇維埃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的布爾什維克黨人的名單上，斯大林排在第五位，後面是斯維爾德洛夫，前面是列寧、托洛茨基、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sup>294</sup>更為突出的是，斯大林

226

\* 譯註：《斯大林全集》第3卷，第353-356頁。

是列寧允許進入自己在斯莫爾尼宮布爾什維克總部私人住所的僅有的兩個人之一。後來的事實證明，這種親近和信任十分關鍵。

## 第七章

# 1918：達達主義和列寧

這一次讓我們試着不去做正確的事。

227

——猶太裔羅馬尼亞詩人薩穆埃爾·羅森施托克 (Samuel Rosenstock)，  
又名特里斯坦·查拉 (Tristan Tzara，意為「在我的國家是悲哀的」)，  
〈達達主義宣言〉，1918年<sup>1</sup>

盧那察爾斯基緊緊抱着腦袋，額頭貼着窗戶玻璃，站立的姿勢顯得十分絕望。

——克里姆林宮衛戍司令帕維爾·馬爾科夫 (Pavel Malkov)，  
1918年8月30日<sup>2</sup>

在10月的布爾什維克政變以及緊隨其後的那段時間，幾乎沒有街頭慶祝活動，這與1917年2至3月以及之後那些興高采烈的日子形成了鮮明對照，可列寧不到一個星期就在為雕塑家們擺姿勢了。甚至在這場瘋狂的暴動發生以前，幾乎沒有人認為它會長久。1917年夏天，俄國差不多所有政治派別的報刊一直在散佈這樣一種看法（就如帕維爾·米留可夫1918年回憶的）：「布爾什維克要麼決定不去奪權，因為他們沒有希望保住權力，要麼，如果他們真的奪了權，也只能堅持最短的時間。在非常溫和的圈子裏，後一種實驗甚至被看作是十分可取的，因為它

會『治好俄國布爾什維主義的狂熱病』。<sup>3</sup>許多右翼分子公然歡迎布爾什維克政變，認為左翼分子很快將自取滅亡，但在滅亡之前，會首先清理掉可鄙的臨時政府。<sup>4</sup>當政變發生的時候，人們依然大吃一驚。接着，列寧選擇成立內閣政府，而不是將政府一概廢除。第二次蘇維埃代表大會，至少是那些仍然留在會場的人，批准了成立清一色布爾什維克的政府。誠然，人民委員會不是由「資產階級」部長，而是由「人民委員」(commissar)組成的。這個名稱來自法語 *commissaire*，而最初則源於拉丁語 *commissarius*，意思是更高權威(在這裏就是指「人民」)的全權代表。<sup>5</sup>但它會長久嗎？二月革命中敢於取代沙皇的幾個「臨時」人物(米留可夫、克倫斯基)，已經被拋到一邊。<sup>6</sup>軍隊的高級指揮官們，要麼淪為階下囚，要麼陷入絕望，比如拉夫爾·科爾尼洛夫，比如在戰爭中任職時間最長也最成功的總參謀長米哈伊爾·阿列克謝耶夫(他被迫逮捕了科爾尼洛夫)。在非布爾什維克社會主義者當中，想要成為政治替代者的人，比如維克托·切爾諾夫和他的社會革命黨、尤利·馬爾托夫和他的孟什維克黨，似乎也已被踩在腳下。但是在1918年——由於在2月份從儒略曆(東正教曆法)改成格里高利曆(西曆)，這一年成了俄國上千年歷史中最短的一年<sup>7</sup>——布爾什維克看上去也注定要「被拋到九霄雲外」。<sup>\*</sup>

這個自封的「政權」，頂層只有四個人：列寧、托洛茨基、斯維爾德洛夫和斯大林。他們都有政治罪的犯罪紀錄，卻沒有任何行政經驗。(人民委員會的15名成員在沙皇時期被囚禁和流放的時間加起來有兩百年。)他們在散發着黴味的斯莫爾尼宮——18世紀那種為年輕的貴族女子進入社交界做準備的淑女學校——靠幾張桌子和破沙發安頓下來。在列寧又小又髒的房間對面，有一個比較大的空間，人民委員會的委員們在那裏來來往往；他們起初根本沒有開過任何正式會議。列寧的房間有一面沒有油漆的木製隔牆，裏面有一個打字員(秘書處)，還有一個給話務員用的小儲物間(通訊網絡)。從前的女院長仍舊佔着隔壁房間。斯維爾德洛夫指派的一名水兵成了斯莫爾尼宮新任的衛戍司令，

\* 編註：參考第六章、第254頁斯大林論「革命的威力」。

他在校園周圍匆忙佈置了一道防線，開始一個房間一個房間地肅清整棟大樓。<sup>8</sup>但是，列寧的第一輛公務車，一輛1915年製造的「蒂爾卡—梅里」牌豪華轎車（從前屬於沙皇），被一支消防隊從斯莫爾尼宮偷走，打算賣到芬蘭弄些錢。（斯捷潘·吉利〔Stepan Gil〕——一個一流的司機，同時也是一個十分健談的人，過去為沙皇開車，現在是列寧的首席司機——帶人追查此事，竟然把車找了回來。）<sup>9</sup>「那時沒人知道列寧長甚麼樣子，」克魯普斯卡婭後來回憶說，「我們晚上經常到斯莫爾尼宮周圍溜達，沒人認得出他，因為那時候根本沒有畫像。」<sup>10</sup> 13名人民委員把「辦公室」設在斯莫爾尼宮，並試圖到他們準備接任的部門宣示權威。<sup>11</sup> 被任命為民族事務人民委員的斯大林，沒有任何沙皇時代或臨時政府的部門可以去接管。<sup>12</sup> 他的副手斯坦尼斯拉夫·佩斯特科夫斯基（Stanisław Pestkowski）——他是十月政變中奪取電報中心的波蘭布爾什維克小分隊的成員——在斯莫爾尼宮碰巧找到一張空桌子，就在上面用圖釘釘了一條手寫的招牌：「民族事務人民委員部」。<sup>13</sup> 據佩斯特科夫斯基說，他們的房間靠近列寧的房間，所以「在一天之中」，列寧「往往會多次召見斯大林，也會到我們的辦公室把他叫走」。<sup>14</sup> 列寧或許是喜歡繼續待在幕後，據說他曾主動要求把主席的位置讓給托洛茨基，但托洛茨基沒有接受。<sup>15</sup> 結果，托洛茨基成了「外交人民委員」，在樓上弄到一個房間。那個房間以前是負責管理姑娘們的「樓層女教師」的住處。斯維爾德洛夫繼續負責布爾什維克的黨務。<sup>16</sup>

229

起點很低，但很快成了世界上最強勢的專政體制之一，這樣的變化簡直讓人難以置信。列寧其實是個小冊子作家。他在1918年的身份是「人民委員會主席兼記者」，他掙的稿費（1.5萬盧布）超過了工資（1萬盧布）。<sup>17</sup> 托洛茨基是個作家，也是個滔滔不絕的演說家，但在治國理政方面同樣沒有經驗，沒有受過訓練。斯維爾德洛夫得益於父親的雕刻手藝，懂一些文書偽造的技術，同時也是一個優秀的政治組織者，但在制定政策方面毫無經驗。斯大林也是一個組織者、煽動者，有段時間還做過強盜，但主要工作是報刊編輯——自從他20歲不到在梯弗利斯幹過不長時間的氣象員以來，民族事務人民委員實際上是他的第一份正式工作。

現在，專制俄國的四個產兒發佈了一連串紙面上的法令：「廢除」法律、文官官階和法院的社會層級體系；宣佈「將所有僱傭工人和城鄉窮人納入社會保險」；宣佈成立最高國民經濟委員會，對糧食和農具實行國家壟斷。這些法令用了許多術語，比如「生產方式」、「階級敵人」、「世界帝國主義」、「無產階級革命」。以弗拉基米爾·烏里揚諾夫—列寧的名義公佈並由斯大林等人代為簽署的這些法令，宣稱具有「法律效力」。<sup>18</sup> 與此同時，政權沒有任何經費和工作人員。托洛茨基多次想接管外交部大樓和工作人員都沒能成功。<sup>19</sup> 11月9日，他第一次去那裏（位於冬宮廣場6號），迎接他的先是嘲笑，接着便是大批人員的離職。不錯，他的手下最後是在外交部的保險櫃裏找到了一小筆現金，但斯大林為了給自己的部門籌措經費，讓佩斯特科夫斯基從托洛茨基那裏弄了3,000盧布。<sup>20</sup> 不久，佩斯特科夫斯基透露說自己以前在倫敦學過一點經濟學，然後就被任命為「國家銀行行長」。<sup>21</sup> 員工們用嘲笑把他轟走了，到頭來，他又回到斯大林那裏。

任命無事可做的佩斯特科夫斯基為央行行長以及許多類似的決定，帶有荒誕色彩，令人想起名為達達主義的新行為藝術中的挑釁。「達達」是一個非常貼切的無意義的字眼，它產生於世界大戰期間的中立國瑞士，在一個叫做「伏爾泰酒館」的地方，並且主要在猶太裔羅馬尼亞流亡者當中。巧合的是，這家蘇黎世的小酒館（鏡子胡同1號）同列寧在戰爭期間流亡時的寓所（鏡子胡同14號），剛好在同一條街上。達達派的詩人兼挑釁者特里斯坦·查拉興許還跟列寧下過棋。<sup>22</sup> 達達主義和布爾什維主義產生於同樣的歷史關頭。達達主義的發起者用拼貼畫、蒙太奇、現成的物品、木偶戲、聲音詩、噪聲音樂、怪誕電影，以及為他們所嘲笑的新媒體搬演的一次性的惡作劇，對可惡的世界大戰、驅動它的卑鄙的利益集團以及冷漠的商業精神進行冷嘲熱諷。達達現象出現在多個國家，在柏林、科隆、巴黎、紐約、東京以及梯弗利斯都很活躍。達達藝術家，或他們中的許多人更偏愛的稱謂「反藝術家」，並沒有把比如說重新定義為「泉」的小便器，同一種新的、更好的政治混為一談。<sup>23</sup> 查拉作詩的方式是，把報紙上的文章剪成小條，裝在袋子裏搖晃，然後倒出來，攤在桌上。另一位達達藝術家在演講的時候，故意讓自己說

的每一個詞都淹沒在震耳欲聾的列車汽笛聲中。這些策略和充滿學究氣、過於政治化的列寧相距甚遠：列寧及其發佈的有關新秩序的法令是沒有諷刺意味的。但布爾什維克法令在頒佈後也墮入了帶有達達風格的無政府狀態。

如果說沙皇秩序的崩潰是革命，那革命就是一場崩潰。戰爭期間沙皇退位所造成的巨大權力真空，就像一記悶棍，讓臨時政府的行家們暈頭轉向。「阿列克謝耶夫將軍對時局的特點概括得很好，」布爾什維克政變前夕，臨時政府的一名財政官員在日記中寫道，「不幸的根源不在於混亂，而在於缺少政治權威 (*bezvlastii*)。」<sup>24</sup> 10月之後，聲稱擁有廣泛權威的組織，如同先前一樣，紛紛冒了出來，但「缺少權威」的狀況越發嚴重。布爾什維主義也因為深刻的內部裂痕、行為失控和人事更替而混亂不堪，列寧的政治直覺要遠勝過俄國革命中的其他領導人，卻無法克服在功能上如同達達藝術中那震耳欲聾的汽笛聲的事物，即讓布爾什維克獲得名義上的權威的那種人為的破壞與混亂。有些強大的集團，比較突出的是鐵路工會，堅決要求列寧和托洛茨基退出政府；在東線取得軍事勝利的德國，看起來很快就會徹底地征服俄國；布爾什維克新的政治警察首領，在近似於反布爾什維主義的左翼政變中被扣為人質；還有一位刺客，把兩顆子彈射進了列寧的體內。到1918年夏天，有四條戰線發生了反政權的武裝叛亂。可是，列寧及其由托洛茨基、斯維爾德洛夫以及斯大林組成的核心圈，仍然設法保住了布爾什維克的政治壟斷。

231

布爾什維克專政當然不是純屬偶然。正如我們看到的，社會主義在俄國的政治景觀中佔據了決定性的地位。在俄國，軍隊和軍官團中的右翼勢力，比其他農民佔人口絕大多數的國家要弱，而且跟別的地方不一樣，俄國缺少非社會主義的農民政黨。造成這種狀況的原因，部分在於舊的右翼權力集團在土地問題上的固執和純粹的愚笨。此外，布爾什維克能獲得壟斷社會主義事業的機會，俄國的其他幾個社會主義政黨也貢獻不小。列寧不是政治綿羊中的獨狼。列寧處於布爾什維克在大城市和俄國中心地區擁有龐大的政治基地，且牢牢把握核心地區的頂層。不過，布爾什維克專政並不是自動出現的，哪怕是



在帝俄的一些名義上歸他們管轄的地方也不是。專政是一種創造的行動。那種創造不是對於意料之外的危機的反應，而是深思熟慮的戰略，是列寧不顧布爾什維克許多高層人物的反對所採取的戰略。早在全面內戰爆發之前，實行專政的決心就存在了。實際上，這種決心是引發武裝衝突的原因之一（這是同時代人普遍強調的）。但這決不能理解成是布爾什維克建立了有效的治理體系。事情遠非如此。布爾什維克壟斷是和行政管理上以及社會生活中的混亂一同出現的。列寧的極端主義加劇了這種混亂，引發了越來越深刻的危機，而他反過來又用危機為自己的極端主義辯護。舊世界的大崩潰——不管給現實中成百上千萬的人帶來了怎樣的痛苦——都被布爾什維克理解為進步：毀滅得越徹底越好。

232 人們會以為，這種混亂足以推翻那個演戲一樣政府。單是糧食的供應問題就導致君主專制的突然垮台並暴露出臨時政府的無能。但壟斷和無政府狀態事實上是可並存的，因為布爾什維克的壟斷帶來的不是控制，而是不讓其他人去發揮作用、去阻止混亂。<sup>25</sup> 布爾什維主義是一種運動，一種包羅萬象、毫無約束、武裝的無政府狀態，它屬於水兵和街頭的戰鬥小組、工廠的工人、墨漬斑斑的抄寫員和鼓動員，以及想要掌握官印的工作人員。布爾什維主義也是一種幻想，一個勇敢的新世界，富饒而幸福，一種對人間天國的渴念，伴以充滿荒誕精神的法令。1918年，世人見識了達達的玩世不恭，見識了布爾什維克無意中帶有達達風格的執政實驗，見識了有很多觀眾參與其中的表演藝術。處在中心的是決心超乎尋常的列寧，緊隨其後的是斯大林。斯大林成了列寧的全能副手之一，準備好要承擔一切任務。

## 壟斷

馬克思主義的國家理論是比較粗糙的，除了巴黎公社（1871）之外，幾乎沒有提供甚麼指導，而馬克思對巴黎公社既有讚揚也有責備。巴黎公社總共只存在了72天，它給無產階級專政的思想帶來了啟發（在1891年《法蘭西內戰》的再版序言中，恩格斯寫道，「你們想知道無產階

級專政是甚麼樣子嗎？請看看巴黎公社吧。這就是無產階級專政」\*。）<sup>26</sup> 巴黎公社帶來啟發的地方還在於它具有群眾參與的特點。不過，馬克思指出，公社社員在本該趕緊集中力量徹底打敗凡爾賽資產階級政權時，卻為了組織民主選舉而「失去了寶貴的時機」，同時，他們沒有奪取法蘭西國家銀行並徵用其保險庫，結果，那些錢被拿走，成了凡爾賽鎮壓公社的軍費。<sup>27†</sup> 1908年在日內瓦的一次紀念巴黎公社成立37週年和馬克思逝世25週年的集會上，列寧重申了馬克思的觀點，認為公社半途而廢，沒有對資產階級斬草除根。<sup>28</sup> 不過，巴黎公社的浪漫主義魅力仍然存在。1917年和1918年初，列寧設想過一個以巴黎公社為原型的國家，實行「自下而上的民主……沒有官吏、沒有警察、沒有常備軍的民主。由全民普遍武裝的民兵來擔任公務」。<sup>29‡</sup> 這無意中也成了一個與達達主義相似的地方。直到1918年4月，列寧仍然堅持，「公民應該普遍參加審判工作和國家管理。對我們來說，重要的就是普遍吸收所有的勞動者來管理國家。這是一項艱巨的任務。但是，社會主義不是少數人，不是一個黨所能實施的」。<sup>30§</sup> 可是，一旦由於布爾什維克政變而突然有了四面受敵的感覺，列寧就不再把巴黎公社當作令人鼓舞的榜樣了，巴黎公社成了一個純粹警示性的故事，說明對敵人決不能心慈手軟。<sup>31</sup> 結果，敵人變得沒完沒了。

233

「和平、土地、麵包」，「全部政權歸蘇維埃」，在這些動人的口號背後，在機關槍的背後，列寧以及布爾什維主義的擁護者們，始終覺得處在危險之中。政變那天早晨，1917年10月25日，蘇維埃第二次代表大會還在召開，亞歷山大·克倫斯基乘坐兩輛汽車——其中一輛是在附近美國大使館的前面「借」來的——逃離了彼得格勒，名義上是準備到前線調來可靠的部隊。<sup>32</sup>「抵抗克倫斯基，他是科爾尼洛夫分子！」布爾什維克發出呼籲說。實際上，克倫斯基在前線只找到克雷莫夫中將第三騎兵

\* 譯註：《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人民出版社，1956-1974）第22卷，第229頁。

† 譯註：《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第202、206-207頁。

‡ 譯註：《列寧全集》第29卷，第271頁。

§ 譯註：《列寧全集》第34卷，第49頁。

軍的幾百名哥薩克士兵，而克雷莫夫正是被克倫斯基指控犯有叛國罪並在與他談話後自殺的那位科爾尼洛夫的部下。<sup>33</sup> 10月29日，在彼得格勒城外的戰鬥中，死傷的至少有200人——比二月革命或十月革命的傷亡人數還多——結果，士氣低落的騎兵殘部，面對彼得格勒軍事革命委員會召集的幾千名穿着五顏六色服裝的赤衛隊員和衛戍部隊士兵，根本不是對手。<sup>34</sup> 克倫斯基僥幸再次逃脫，流亡國外。<sup>35</sup> 其他的反布爾什維克分子把首都的士官生召集起來，奪取了阿斯托里亞飯店（布爾什維克的一些高層人物住在那裏）、國家銀行和電話局，但這些學生兵也不經打。<sup>36</sup> 儘管這樣，布爾什維克仍在一直擔心「反革命」，尤其是（法國大革命中）1792年8月那段時間外敵入侵似乎助長了內部顛覆活動的情況。<sup>37</sup> 「我仍然記得，」達維德·薩吉拉施維里回憶說，「我在斯莫爾尼學院走廊裏看到，幾個布爾什維克領導人的臉上佈滿了焦慮。」<sup>38</sup> 焦慮反倒加重了。

234

儘管成立了清一色布爾什維克的人民委員會，可俄國大多數社會主義者仍然主張成立完全由社會主義者組成的政府，這一立場在許多布爾什維克當中也很明顯。列夫·加米涅夫是布爾什維克中央委員、蘇維埃中央執行委員會亦即蘇維埃代表大會常務機構的新任主席——此前奪權就是打著蘇維埃代表大會的名義。政變期間，加米涅夫試圖把大部分左傾的社會革命黨人，可能還有其他社會主義者，組成一個革命政府，此後他仍然想那麼做，因為他擔心，一個僅僅由布爾什維克組成的政權是注定要失敗的。後一種可能性在10月29日那天加大了，當時，鐵路工會的領導層以將會帶來嚴重後果的罷工相威脅，下了最後通牒，要求成立完全由社會主義者組成的政府，以防發生內戰。<sup>39</sup> 此事正趕上人們被克倫斯基可能會打回來的消息弄得人心惶惶的時候。鐵路罷工在1905年一度讓沙皇當局陷入癱瘓，現在，它也會阻礙布爾什維克去保衛自己。在衛戍部隊代表會議上——也是在10月29日那天——列寧和托洛茨基呼籲當天出席會議的（51個部隊單位中的）23個部隊單位提供支持，反擊「反革命」。<sup>40</sup> 但加米涅夫、季諾維也夫以及其他布爾什維克高層人物，卻正式同意，允許社會革命黨人和孟什維克加入人民委員會。<sup>41</sup> 雖然孟什維克中央委員會經過表決，同意進行談判，成立全部由社會主義者組成的政府，政府成員包括布爾什維克黨人，但鐵路工會堅

持要求成立把托洛茨基和列寧完全排除在外的政府。加米涅夫及其盟友向布爾什維克中央委員會提議，列寧仍然留在政府，但主席的位置讓給其他人，比如社會革命黨領導人維克托·切爾諾夫。布爾什維克黨人只保留幾個次要的部長職務。<sup>42</sup>

列寧似乎正在失去對黨的控制。1917年11月1日，布爾什維克的一份報紙在顯著位置刊登了一篇社論，宣佈左翼的各社會主義黨派達成一致，還說布爾什維克一向把「革命民主主義」理解為「所有社會主義政黨的聯合……而不是一黨統治」。<sup>43</sup> 在列寧看來，加米涅夫是準備放棄十月政變的果實。但是，托洛茨基、斯維爾德洛夫和斯大林使得列寧能夠擊敗這樣的挑戰。還是在11月1日，在自成一統的布爾什維克彼得堡委員會會議上——中央委員一般不出席這樣的會議——列寧指責加米涅夫努力與社會革命黨以及孟什維克結盟的行為是背叛。他說：「此事不值一提。托洛茨基早就講過，這樣的聯合是行不通的。他理解這一點，打那以後，再也沒有一個理解得更好的布爾什維克。」列寧過去分裂了社會民主工黨，現在，他又威脅要分裂布爾什維克。「如果要分開，那就分開好了，」他說，「如果你們擁有多數，掌握了權力……我們就去水兵那裏。」<sup>44</sup> 托洛茨基提議只和左派社會革命黨人談判，他們正處於分裂並成立獨立政黨的過程中，可以成為布爾什維克的初級合夥人。「權威就是力量，」托洛茨基大聲說道，「我們的權威來自少數服從多數。這是不可避免的，這就是馬克思主義。」<sup>45</sup> 同一天，在緊接着召開的布爾什維克中央委員會會議上——當時莫斯科還不在布爾什維克手中，但克倫斯基領導的哥薩克向彼得格勒進軍的威脅已經消除——列寧對加米涅夫大發雷霆，因為後者為了聯合當真在進行談判，而不是以談判為幌子，派援兵到莫斯科奪權。列寧要求停止所有談判，要求布爾什維克直接向群眾呼籲。加米涅夫反對說，鐵路工會擁有「巨大的權力」。斯維爾德洛夫從策略的觀點出發，反對中止談判，但也建議逮捕鐵路工會領導層的成員。<sup>46</sup> (斯大林沒有參加11月1日的會議；後來在那天夜裏，他倒是參加了被推遲的蘇維埃中央執行委員會會議；會上，爭論依然在繼續。)<sup>47</sup>

235

1917年11月2日，列寧毫不妥協的立場變得更加堅定，當天，親布爾什維克武裝以「蘇維埃政權」的名義，最終奪取了莫斯科的克里姆

林宮。莫斯科市中心的武裝衝突你來我往地打了一個星期，全部居民中只有極少數捲入其中，雙方大概各有15,000人；布爾什維克這邊陣亡228人——這比其他地方都要多。保衛政府的人損失不詳，「對克里姆林宮和莫斯科其他地方的炮擊沒有給我們的部隊造成損失，但正在造成對古蹟和聖地的極大破壞，造成和平市民的死亡」，他們的停火公告——相當於宣佈投降——這麼說。<sup>48</sup> 再說彼得格勒，第二天，加米涅夫和季諾維也夫得到蘇維埃中央執行委員會的支持，就成立完全由社會主義者組成的政府這一問題繼續進行談判，但是，由於克倫斯基被擊退，莫斯科已經到手，列寧與托洛茨基、斯維爾德洛夫、斯大林、捷爾任斯基以及另外五人分別談話，並讓他們簽署了一份決議，譴責布爾什維克中央委員會中的「少數派」放棄壟斷政權這一做法是「背叛」。<sup>49</sup> 因為政策分歧而指控共同度過了多年的地下鬥爭、囚禁和流放生活的親密同志是叛徒，只有列寧才幹得出來。

236 若是加米涅夫要列寧攤牌並讓他去水兵那裏，歷史也許就不同了。可加米涅夫非但沒有指責列寧是個狂熱的瘋子，沒有奪取對中央委員會的控制權，沒有利用成立完全由社會主義者組成的政府這一深受歡迎的想法，設法將工廠、街道、布爾什維克地方黨組織以及其他社會主義政黨召集起來，反而放棄了自己在布爾什維克中央委員會的位置。季諾維也夫和另外三人也辭去了職務。<sup>50</sup> 包括阿列克謝·李可夫(Alexei Rykov, 內務人民委員)在內的幾名布爾什維克退出了人民委員會。「我們認為必須成立完全由蘇維埃政黨組成的社會主義政府，」他們宣佈說，「我們認為除此之外只有一條路：依靠政治恐怖來維持一個純粹由布爾什維克組成的政府。」<sup>51</sup> 就這樣，列寧在布爾什維克內部的反對者把兩個十分關鍵的機構——中央委員會和政府——讓給了他。

還有彼得格勒蘇維埃中央執行委員會，那是由加米涅夫擔任主席的，而且它在許多人看來，是新的最高機構：列寧曾經親自起草過一份決議，確認人民委員會是蘇維埃中央執行委員會的下屬機構，決議獲得1917年10月第二次蘇維埃代表大會的通過。<sup>52</sup> 但是在11月4日，列寧去了蘇維埃中央執行委員會，對執委們說，他們對人民委員會沒有合法的管轄權。就此事將進行表決，結果可能會對列寧不利，但他突然

又堅持說，他、托洛茨基、斯大林以及另外一名在場的人民委員也要投票。在實質上是對自己政府的信任投票中，4名人民委員投了贊成票，3名溫和派布爾什維克投了棄權票，結果，列寧的動議以29票對23票獲得通過。<sup>53</sup> 如此一來，清一色的布爾什維克政府就脫離了立法機關的監督。列寧沒有罷休：11月8日，他在布爾什維克中央委員會會議上，強迫加米涅夫辭去蘇維埃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職務。<sup>54</sup> (同一天，季諾維也夫放棄了自己的立場，重新加入布爾什維克中央委員會。這個月還未結束，加米涅夫和李可夫就放棄了自己的主張，但列寧並沒有馬上接受他們。) 列寧迅速採取行動，讓斯維爾德洛夫被任命為新的蘇維埃主席；斯維爾德洛夫僅以5票的優勢贏得了這個重要職務。

作為不可或缺的組織者，斯維爾德洛夫顯得比以前更加突出了。他現在同時擔任布爾什維克黨的書記和蘇維埃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並且巧妙地把後者變成了事實上的布爾什維克機構，將其會議的目的「定位」在獲得想要的結果。<sup>55</sup> 此外，斯維爾德洛夫還做到了加米涅夫過去沒能做到的事情：他連哄帶勸，讓左派社會革命黨人以少數派的角色加入了布爾什維克控制的人民委員會，目的是分化反布爾什維克的社會主義者。<sup>56</sup> 從1917年底到1918年初，左派社會革命黨人崛起的速度之快，或許僅次於1917年夏秋的布爾什維克。原因很明顯：帝國主義戰爭在繼續，倒向更激進的左傾政策的過程也在繼續。12月至1月，甚至有傳聞說，有些左派布爾什維克黨人想要聯合左派社會革命黨人發動新的政變，逮捕列寧，成立新政府，而新政府的領導人大概是「左派共產主義者」格里戈里·「尤利」·皮達可夫(Grigory “Yuri” Pyatakov)。左派社會革命黨人加入人民委員會讓鐵路工會無法建立起反布爾什維克壟斷的統一戰線，他們想要成立完全由社會主義者組成的真正的聯合政府，這一努力也沒能成功。左派社會革命黨人加入中央政府還鞏固了布爾什維克在各省的地位。<sup>57</sup> 1917年10月，布爾什維克實際上沒有任何土地綱領，他們抄襲的是社會革命黨人的土地綱領；斯維爾德洛夫公開承認，革命前，布爾什維克「在農民中根本沒有開展過任何工作」。<sup>58</sup> 在這樣的背景下，左派社會革命黨人提供的不僅有立竿見影的策略優勢，還有長遠的政治前景。<sup>59</sup>

大部分左派社會革命黨人都把自己看作是初級合夥人，而不是真正的聯合政府中的一分子，而且他們主要是在契卡（「全俄肅清反革命及怠工非常委員會」）任職或者作為軍事委員派駐軍隊。在此期間，列寧意在壟斷權力的政治攻勢勢頭不減，還把目標對準公共領域。十月政變前，他曾抨擊書報檢查制度是「封建的」和「亞細亞的」，但現在，他認為「資產階級」報刊是「危險性不下於炸彈和機關槍的武器」。<sup>60</sup>從1917年10月底到11月，列寧查封了約60種報紙。是的，在貓抓老鼠一般的追逐中，如同以賽亞·柏林調侃的，自由派的報紙《白天》被封掉後，很快又改成《晚上》出現了一段時間，然後是《夜》，再然後是《午夜》，最後是《漆黑的夜》，之後就永久停刊了。<sup>61</sup>明顯持左翼立場的報紙也成了打擊對象。「歷史在重演」，右派社會革命黨人的報紙《人民事業報》不滿地說——該報在沙皇統治時期曾經被關停過。<sup>62</sup>一些左派社會革命黨人也對布爾什維克的書報檢查制度十分憤慨。根據布爾什維克的法令，這些鎮壓措施屬於「臨時性的，一旦局勢正常就會逐步取消」，可「正常」的局勢當然是再也不會出現了。<sup>63</sup>

## 沒有國家的狀態

238

托洛茨基回憶起來毫不掩飾，「從宣佈推翻臨時政府那一刻起，列寧就在大大小小的事務中扮演起了政府的角色」。<sup>64</sup>的確如此，可就在列寧在包括斯莫爾尼宮和塔夫利達宮在內的彼得格勒地區大搞政治壟斷的時候，在更廣大的地區，權威卻在進一步碎片化。政變加快了帝國解體的速度。從1917年11月到1918年1月，就像冰山在海水中坍塌一樣，帝俄也在一塊接一塊地脫落——芬蘭、愛沙尼亞、拉脫維亞、立陶宛、波蘭、烏克蘭、格魯吉亞、亞美尼亞、阿塞拜疆。這些從前的邊疆省份變成了它們自己宣稱的「民族共和國」，剩下一個截頭去尾的「蘇維埃俄國」，同國內大部分已開發地區的關係都是懸而未決。作為民族事務人民委員，斯大林不得不盡力控制這種解體的趨勢，例如，同剛剛獨立的芬蘭簽訂劃界條約（比較危險的是，國界離彼得格勒很近）。俄國中心地區各省也都宣佈自己為「共和國」——喀山、卡盧加、梁贊、烏

法、奧倫堡。有時候，這樣做是自上而下推動的，比如頓河蘇維埃共和國，那是希望可以堵住德國人的嘴，防止他們打着維護「自決」的名義發動武裝干涉。<sup>65</sup> 不管成立的原因是甚麼，省立共和國根本統治不了自己名義上的領土，因為各縣各村也都宣佈自己至高無上。在這種近乎徹底的權力下移中，各種各樣的「人民委員會」紛紛登場。莫斯科的「人民委員會」根本就沒打算將自己隸屬於列寧的人民委員會，而且還聲稱對周圍的十幾個省份擁有管轄權。「由於有幾個類似的人民委員部並存，人民和〔地方〕機構就不知道該找哪一個，只好同時與兩個層級打交道」，一位觀察家抱怨說。他還說，原告們「一般既向省級的人民委員部提起上訴也向中央的人民委員部提起上訴，哪個判決有利就認為哪個合法」。<sup>66</sup>

地方機構承擔起——或根本沒有承擔起——基本的治理職責，名義上的中央當局則在搜尋金錢。早在10月25日下午，另一位波蘭的布爾什維克維亞切斯拉夫·明仁斯基 (Wiaczesław Meżyński) 就帶着一支武裝小分隊去過俄羅斯國家銀行，此後又去過多次。<sup>67</sup> 曾在巴黎里昂信貸銀行幹過一段時間出納的明仁斯基是新任的「財政部事務人民委員」，就好像在新秩序下根本不會有常設的財政人民委員部而只有沒收充公一樣。他的行動引發了財政部和俄羅斯國家銀行員工的罷工。<sup>68</sup> 私人銀行也關了門，而在武力的威脅下重新開門之後，又拒絕承兌布爾什維克政府的支票和匯票。<sup>69</sup> 明仁斯基最後乾脆搶劫了國家銀行，把500萬盧布擱在斯莫爾尼宮列寧的桌上。<sup>70</sup> 他的搶劫啟發了布爾什維克的官員和冒充布爾什維克官員的騙子，去奪取更多存放在銀行的財物。在此期間，租用銀行保險箱的人受到威脅，說財物會被沒收，於是，他們只好露面進行登記，可當他們拿來鑰匙，財物還是被沒收了：外幣、金銀、首飾、未鑲嵌的寶石。<sup>71</sup> 在1917年12月的時候，債券利息的支付(息票)和股票分紅實際上結束了。<sup>72</sup> 1918年1月，布爾什維克拒絕承認沙皇時代所有的內外國債，據估計在630億盧布左右。這是一筆巨款，其中對內發行的大概有440億盧布，對外發行的有190億盧布。<sup>73</sup> 不管會在意識形態上引起多大的震動，他們都完全沒有能力支付國債的利息。<sup>74</sup> 衝擊波影響到國際金融體系，盧布被逐出歐洲市場，俄國失去了國際融資



渠道。國家的金融體系不復存在。工業貸款停止。<sup>75</sup>「錢荒」很快就會困擾着這個國家。<sup>76</sup>

上億的俄國農民一直在忙着瓜分貴族、皇室、教會和他們自己的土地（作為斯托雷平改革的受益者，許多農民的產業現在都被「剝奪」了）。<sup>77</sup> 俄國當時的經濟學家鮑里斯·布魯茨庫斯（Boris Brutzkus，出生於拉脫維亞）認為，1917至1918年的農民革命是「充滿原始憤怒的群眾運動，這類運動在世界上從未見過」。<sup>78</sup> 然而平均下來農民似乎只多分了1英畝\*耕地。有些人對於新分的條田心存疑慮，這些土地沒能跟自己原來的耕地合併起來，可能會被別人要走。（有時候，要去耕種新分到的土地就必須走很遠的路，結果他們就自動放棄了那些土地。）<sup>79</sup> 但農民不再交租了，在農民土地銀行欠的債務也一筆勾銷。<sup>80</sup> 總的來說，大動盪加強了重新分配型的村社和既不僱傭別人也不受僱於人的中農的地位。<sup>81</sup> 重新分配土地的功勞有多少要歸於布爾什維克，現在還很難說，儘管列寧當初是順手抄襲了社會革命黨人深受歡迎的土地法令。（社會革命黨人在同立憲民主黨人聯手為臨時政府工作的時候，基本上放棄了立刻重新分配土地的主張。）布爾什維克的農業人民委員宣稱，土地法令「就像是對群眾發出的戰鬥口號」，而且他還說了一句發人深思的話：「佔地是既成事實。要從農民手裏收回土地，無論如何也行不通。」<sup>82</sup> 土地法令刊登在所有報紙上，並且還出了小冊子（返鄉士兵的土地法令是同日曆一起發的，這樣一來他們就不會拿土地法令來捲煙抽了）。<sup>83</sup> 但是在俄羅斯帝國，私人土地集中程度最高的是波羅的海沿岸地區、西部各省、烏克蘭和北高加索，所有這些地方都不在布爾什維克的控制範圍之內。要讓農民轉向布爾什維主義，一紙法令不夠，還需要很多別的辦法。

由於農村地區的騷亂和暴力，已經因為戰爭而受到嚴重破壞的城市糧食供應變得更加嚴峻了。遠離糧食主產區的彼得格勒，甚至還有莫斯科，配給的口糧到了食不果腹的地步——大約每天220克麵包。<sup>84</sup> 燃

\* 編註：約0.4公頃。

料和原料一同開始消失，工人只好由協管工廠變為接管工廠（「工人的控制」），只要能維持工廠的運轉就行，但這些做法往往都失敗了。和至少600萬國內難民相比，整個無產階級的數量——頂峰時有300萬人左右，而此時正在不斷減少——要少很多，而要是算上逃兵和戰俘，難民數量或許多達1,700萬。<sup>85</sup> 這個龐大的臨時人口常常化身為劫掠小城市和農村的武裝團夥。<sup>86</sup> 在城市，赤衛隊的非正規武裝和衛戍部隊繼續給公共秩序製造混亂，而布爾什維主義除了赤衛隊之外，根本沒有別的治安力量。前線士兵每個月大概可以得到5盧布，赤衛隊員每天就可以得到10盧布，相當於工廠工人的日工資，但許多工廠已經關門，不再發工資了。於是，赤衛隊員，也就是用步槍或剛剛搶來的武器武裝起來的工廠工人，數量迅速膨脹。<sup>87</sup> 佩戴和未佩戴紅袖章的劫掠者，把首都無數宮殿的酒窖當作目標；有些人「悶死和淹死在酒裏」，有目擊者寫道，而其他人則放槍取樂。<sup>88</sup> 1917年12月4日，政權宣佈成立打擊酒後肇事委員會，負責人是投奔布爾什維克的沙皇軍官弗拉基米爾·邦契-布魯耶維奇(Mikhail Bonch-Bruевич)。「對擅闖酒窖、倉庫、工廠、貨攤、商店、私人住所者，」蘇維埃的報紙威脅說，「無需任何警告，就會用機關槍撕碎。」——這擺明了是要使用不受限制的暴力。<sup>89</sup>

但政權發現了一個更大的威脅：據說舊政權的工作人員在策劃一場「總罷工」。許多留用的官員已經在罷工，話務員、甚至藥劑師和中小學教師也在罷工；到各部上班的大多只是些清潔工和看門人。<sup>90</sup> 12月7日，人民委員會成立了第二支應急力量，即「臨時性的」全俄肅清反革命及怠工非常委員會，按照俄文首字母的縮寫稱為「契卡」，總部設在格羅霍瓦婭大街2號。「現在，戰爭開始了——面對面地戰鬥到底，不是生，就是死！」契卡首腦費利克斯·捷爾任斯基，帶有貴族血統的波蘭布爾什維克，對人民委員會說。「我認為，我需要的是一個讓革命者與反革命分子算帳的機關。」<sup>91</sup> 捷爾任斯基（生於1877年）在沙皇時代曾經被關押和流放西伯利亞達11年之久，等他有了出頭之日，牙齒已經沒幾顆了，局部面癱使他在微笑時嘴巴歪斜，但他對正義充滿了激情。<sup>92</sup> 契卡成立不到兩個星期，就逮捕了大約30名所謂的陰謀分子——據說屬於一個叫做「政府工作人員工會聯盟」的組織，然後利用從他們

那裏沒收來的地址簿又逮捕了一批人。其他工作人員——他們的工資、住所、口糧和自由都岌岌可危——放棄了反對新政府的立場。<sup>93</sup> 然後，布爾什維克在1月的大部分時間都在爭論，是否該讓這些「資本主義的工具」和「怠工分子」恢復他們在政府中的職務。

俄國的革命者當中，大部分人覺得這個新的政治警察機構極其可惡，就連布爾什維克的許多骨幹也這麼認為。<sup>94</sup> 許多無恥之徒，包括一些罪犯，都加入了契卡，而他們的職責往往不僅僅或不完全是政治鎮壓。契卡還把打擊「投機」作為自己的任務，但該部門本身便是作為一大投機者出現的。<sup>95</sup> 「他們尋找反革命分子，」一位在早期目睹過契卡搜捕行動的人寫道，「再把值錢的東西拿走。」<sup>96</sup> 倉庫裏堆滿了用強制手段無償收繳的貨物，這些成了「國家財產」，接着又會被分送給官員和朋友，或者賣掉。1918年5月中旬，在擁有3萬人口的伏爾加河畔的製革業中心博戈羅茨克成立了契卡，但在5月29日那天，契卡大樓遭到攻擊，受到嚴重破壞。從省會下諾夫哥羅德派來的小分隊執行了處決任務。「我們沒收了價值20萬盧布的金銀物品和價值100萬盧布的羊毛，」契卡報告說，「工廠主和資產階級逃走了。委員會決定沒收那些逃跑者的財產，再賣給工人和農民。」<sup>97</sup>（所謂「工人和農民」可能包括黨的頭頭和負責治安的官員們。）當有人指控契卡和布爾什維克當局有搶掠行為的時候，他們常常推得一乾二淨，儘管列寧想出了一個方便的託詞——「我們掠奪掠奪者」。<sup>98</sup>

242

為所欲為的遠不只是契卡。「所有希望『國有化』的人都這樣做」，新成立的最高國民經濟委員會的一名官員回憶說。<sup>99</sup> 在破壞穩定方面，沒收和投機所帶來的混亂，實際上在某種程度上要超過真正的反革命陰謀。同時，契卡在保障安全方面的作用還是個問題。早在1918年1月，列寧的汽車就遭到過機槍從後面掃射（兩顆子彈打穿了擋風玻璃），斯莫爾尼宮也受到過炸彈恐嚇。<sup>100</sup> 到了2月，契卡宣佈，為了消滅「反革命大患」，有權執行就地處決。這樣的公告看上去既像是恐慌，同時也是對「資產階級」自由的蔑視。<sup>101</sup> 後來，契卡在1918年中期的一份自我評價中說：「我們實力不強、能力不足、知識不夠，而且（非常）委員會的規模很小。」<sup>102</sup>

## 選舉

這便是處於沒有國家的無政府狀態的布爾什維克壟斷：工廠閒置；荷槍實彈的醉漢和到處搶劫的赤衛隊員；遭到蓄意破壞的金融系統；消耗殆盡的糧食儲備；左派社會革命黨人模糊的初級合夥人身份；低能的秘密警察，忙於盜竊財物和他們恰恰應該予以打擊的投機活動；除此之外，還有臨時政府垮台前終於定下的、從1917年11月12日開始的立憲會議選舉。<sup>103</sup> 這其中充滿了諷刺的意味：俄國立憲民主黨過去在民主選舉的問題上舉棋不定，因為他們對農民、士兵、水兵和工人的選舉結果不放心，可現在，獨斷專行的列寧卻決定實行民主選舉。<sup>104</sup> 立憲會議召開在即，那樣一來，對於清一色布爾什維克的人民委員會持反對立場的社會主義者就會受到削弱。同時，不管怎麼說，不少布爾什維克高層人物都以為他們穩操勝券。布爾什維克黨當然也在發力。他們壓制其他競爭者的宣傳，在自己的報刊上攻擊別的候選人，指責社會革命黨人（「披着羊皮的狼」）、孟什維克派社會民主黨人（「為反革命開路的資產階級奴僕」）以及立憲民主黨人（「資本主義掠奪者」）。大規模的恐嚇與欺騙的舞台似乎搭好了。但不可思議的是，俄國經歷了有史以來的第一次真正意義的普選。

243

投票的組織工作事實上極其繁重，這或許是這個國家的公民自半個世紀前農民解放以來規模最大的事業。由16名真正獨立的成員組成的全俄選舉委員會負責監督整個流程，由法官代表、地方政府機構（類似於沙皇時代的地方自治機關〔*zemtsvos*〕但也稱蘇維埃）代表，以及參加投票的群眾代表所組成的地區、縣和村社委員會負責地方選舉的監督工作。鎮、區、縣的選舉委員會擬定選民名單：只要年滿20週歲，不分男女。<sup>105</sup> 約有4,440萬人跨越遙遠的距離，在戰爭期間，在75個選區，在前線和艦隊（近500萬士兵和水兵參加），用無記名投票的方式參加了選舉。在德佔區（沙皇統治下的波蘭、芬蘭和波羅的海沿岸地區），還有控制力嚴重不足的俄屬突厥斯坦，根本沒有舉行選舉，而有些地區的選舉結果最後丟失了。直到1917年11月28日，即原定正式召開會議的時間，選舉工作仍未完成，因此，已經公佈的會議開幕時間只能推遲，

而此舉又引發立憲會議的保衛者當天在塔夫利達宮遊行示威。列寧的回應是，提出一項法令，稱立憲民主黨的主要政治家是「人民公敵」（這項罪名最初是布爾什維克的對手用在列寧等人身上的），認為在他們就任之前必須逮捕他們。<sup>106\*</sup> 布爾什維克的中央委員，除了一個人，全都支持列寧11月28日關於打擊立憲民主黨人的決議，而那個人就是斯大林。<sup>107</sup> 斯大林為甚麼會不同意，現在還不清楚。不過，布爾什維克中央委員會在第二天以其特有的方式，頒佈了一項秘密法令，正式確立新的政治秩序，授予列寧、托洛茨基、斯維爾德洛夫和斯大林決定「所有緊急問題」的權利。<sup>108</sup> 可是，有甚麼不算緊急問題呢？

儘管有鎮壓和對專政權力的維護，可此次選舉畢竟帶來了表現民意的機會。<sup>109</sup> 當然，從兩大首都之外的整個歐亞地區來看，有學者指出，直到1918年中期，人們對特定機構（蘇維埃、士兵委員會、工廠委員會）的忠誠度，仍然遠高於對特定政黨的忠誠度。<sup>110</sup> 但這一點正在起變化，因為民眾可以在選舉中選擇不同的政黨。生活在農村地區，而且根本沒有非社會主義政黨可選的五分之四的人口，把票投給了主要面向農民的社會革命黨，使之獲得巨大的多數，差點就到了登記選票總數的40%，接近1,800萬票。同時，另有350萬票投給了烏克蘭社會革命黨。還有45萬票投給了俄國左派社會革命黨人（他們是在候選人名單產生後才分裂出來的）。在最肥沃的農業區，以及整個農村地區，社會革命黨人的總票數最多，那裏的投票率也非常高，達到60%至80%。相比起來，在城市大約為50%。社會革命黨人得票率最高的是西伯利亞，那裏以農業為主，幾乎沒有工業。

社會革命黨人贏得了選舉。但其內部的分裂表明，社會主義繼續朝着激進化方向發展的趨勢仍然非常強大（烏克蘭社會革命黨人比俄國社會革命黨人還左）。社會民主黨獲得的選票也相當多，儘管孟什維克派得到的不多；只有格魯吉亞孟什維克的情況不錯，得到66萬票（30%是在高加索）；俄國孟什維克只得到130萬票，不到總票數的3%。相

---

\* 譯註：《列寧全集》第33卷，第123頁。

比之下，社會民主黨的布爾什維克派獲得了1,060萬票，佔總票數的24%。布爾什維克在八個省的得票率超過50%。布爾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分享了軍隊的選票，各得40%左右。但是，有一點很能說明問題，在沒有受到布爾什維克鼓動影響的黑海艦隊，社會革命黨人和布爾什維克的得票率是2：1，而在波羅的海艦隊——那裏很容易受布爾什維克鼓動人員的影響，布爾什維克以3：1佔據上風。在西方集團軍群和北方集團軍群，以及在大城市的衛戍部隊，布爾什維克以絕對優勢獲勝，在莫斯科和彼得格勒駐防士兵中的得票率達到80%。因此，正如列寧本人後來承認的，首都及其附近的士兵和水兵（穿制服的農民）的選票拯救了布爾什維主義，使之沒有被社會革命黨人徹底擊敗。<sup>111</sup>

非社會主義政黨只得到350萬票，其中約有200萬票歸立憲民主黨。其得票率不足5%。不過，值得注意的是，在立憲民主黨人得到的選票中，有近三分之一——50萬票左右——是在彼得格勒和莫斯科登記的。布爾什維克在兩個首都得到了近80萬選票，而立憲民主黨在那裏的得票數位列第二（同時，在38個省會城市中有11個超過布爾什維克）。因此，布爾什維主義最牢固的據點同時也是「階級敵人」最牢固的據點，布爾什維克之所以一直擔心即將發生「反革命」，原因就在這裏。<sup>112</sup>最重要的一點或許在於，無論在哪裏都看不到有組織的右翼政治活動。在「革命民主主義」、土地重新分配以及和平的氣氛下，俄國選民一邊倒地支持社會主義——各個社會主義政黨總共得到超過80%的選票。<sup>113</sup>

245

布爾什維主義的選舉結果的確比非布爾什維克黨人預期的要好。從某種意義上說，從前的俄羅斯帝國大概有一半在選舉中支持社會主義但反對布爾什維主義：看來選民想要的是不受布爾什維克操縱的人民政權、土地以及和平。然而，從另一種意義上說，在國家的戰略中心（彼得格勒和莫斯科），在一些關鍵性的軍人選民中（首都衛戍部隊和波羅的海水兵），布爾什維克贏得了選舉的勝利。這對列寧來說足夠了。其他政黨和團體還沒有完全領會到他的分量，更重要的是，還沒有領會到布爾什維主義大眾政治的威力（在1917年夏天的前線已經顯示出來）。「誰看不出來我們擁有的根本不是『蘇維埃』政權，而是列寧和托洛茨基

的專政呢，誰看不出來他們的專政靠的是被他們矇騙的士兵和武裝工人的刺刀呢」，社會革命黨人尼古拉·蘇漢諾夫1917年11月在其主編的《新生活報》上感嘆說，而列寧很快就把該報關停了。<sup>114</sup>但是，從根本上來說，這不是矇騙，雖然布爾什維克說過很多推諉搪塞的話，也要過很多花招。實際上，列寧的專政同許多群眾一樣，主張一種深入人心最高綱領：無論如何都要結束戰爭；願意看到用武力「保衛革命」，願意看到窮人對富人毫不含糊的階級鬥爭——他們之間的立場有分歧，但也相互吸引。列寧從民眾的激進主義中汲取了力量。<sup>115</sup>

1918年1月5日下午4時，期待已久的立憲會議在從前杜馬所在的塔夫利達宮的白廳開幕了，但氣氛卻有點兇險。布爾什維克在大街上佈滿了忠誠的武裝人員和大炮。有傳言說，供電會被切斷——社會革命黨的代表是帶着蠟燭來的，還說警車已經上路。大廳裏，旁聽席上擠滿了吵吵鬧鬧的水兵和搗亂分子。震耳欲聾的起哄聲、拉動槍栓的哧啾聲以及上刺刀的吧嗒聲，使得演講不時被打斷。<sup>116</sup>將近800名代表贏得了席位，其中社會革命黨人代表370至380人，布爾什維克代表168至175人，另有左派社會革命黨人代表39至40人，孟什維克和立憲民主黨人代表各17人，但後者已被宣佈為非法，因而沒有出席，許多孟什維克代表也沒有到場。<sup>117</sup>關鍵是，烏克蘭社會革命黨人沒有參加會議。由於有這些缺席的和被捕的，實際參會人數在400至500之間。<sup>118</sup>列寧在用簾子隔開的從前政府的包廂裏觀察情況。<sup>119</sup>代表席上，布爾什維克黨團由30歲的尼古拉·布哈林領導，約翰·里德對他有過生動的描寫：「個子不高，紅鬍子，眼裏充滿狂熱——他們說他『比列寧還左』。」<sup>120</sup>代表們推選社會革命黨主席維克托·切爾諾夫為大會主席；布爾什維克支持左派社會革命黨人瑪麗亞·斯皮里多諾娃(Maria Spiridonova)，一個聲望很高的恐怖分子，她得票也不少，有153票，比切爾諾夫少91票。布爾什維克要求限制立憲會議範圍的動議沒有獲得通過(237票對146票)。列寧讓自己的一名擁護者，波羅的海艦隊水兵的首領，宣佈布爾什維克代表退出大會；左派社會革命黨人的代表，包括斯皮里多諾娃，後來也退出了。<sup>121</sup>大會開了約12個小時，凌晨4時左右，波羅的海艦隊的一名水兵登上主席台，拍了拍切爾諾夫的肩膀

(或拉了拉他的袖子)，大聲說，布爾什維克海軍人民委員「要求到場的人離開大廳」。當切爾諾夫回答說「如果你不介意，那要由立憲會議來決定」時，這位水兵說：「我建議你們離開大廳，時候不早了，衛兵們累了。」<sup>122</sup> 切爾諾夫匆忙就一些法律進行了投票，在早晨4:40休會。後來在當天下午(1月6日)，當代表們趕來繼續開會時，衛兵們不讓他們進去。<sup>123</sup> 俄國的立憲會議只開了一天就結束了，而且再也沒有開過。(就連會議紀要的原件後來也被人從切爾諾夫僑居布拉格時的住所偷走了。)<sup>124</sup>

布爾什維克根本不是在背地裏威脅。<sup>125</sup> 「我們不會同任何人分享權力，」在立憲會議召開前，托洛茨基就該問題寫道，「如果我們半途而廢，那就不是革命，而是流產……是虛假的歷史分娩。」<sup>126</sup> 選舉中，社會革命黨在西南戰線、羅馬尼亞戰線和高加索戰線都獲得了決定性的勝利，但其領導層沒有把部隊帶到首都，甚至沒有接受彼得格勒衛戍部隊想要提供的武裝援助。<sup>127</sup> 一些社會革命黨領導人在原則上放棄使用武力；他們最苦惱的是，如果動員士兵自願保衛選舉產生的立法機構，那會讓布爾什維克找到解散它的藉口，可布爾什維克不管怎樣都會解散它。<sup>128</sup> 在農村地區，根本沒有感覺到保衛立憲會議的必要，那裏的農民革命已經掃蕩了沙皇時代的整個官場，從省的總督到地方警察和地方長官，取而代之的是農民自治。<sup>129</sup> 在首都，數萬名抗議者，包括工廠工人在內，遊行到塔夫利達宮，試圖拯救立憲會議，但忠於布爾什維克的武裝向他們開火。<sup>130</sup> 這是自1917年2月和6月以來，俄國城市首次有平民由於政治原因遭到槍殺，但布爾什維克並沒有因此而受到懲罰。

247

彼得格勒蘇維埃的存在有助於削弱民眾對立憲會議的忠誠意識。<sup>131</sup> 列寧把布爾什維化的蘇維埃說成是「更高形式的」民主——不是在英法受到稱頌的程序民主或資產階級民主，而是體現了社會正義和(底層)人民權力的民主。這種觀點在俄國影響廣泛，雖然遠遠不是所有人都贊成列寧充滿偏見的做法，把社會主義者佔壓倒多數的立憲會議等同於「資產階級」民主。<sup>132</sup> 為了進一步印證這一觀點，斯維爾德洛夫主導的蘇維埃中央執行委員會把全俄蘇維埃第三次代表大會提前安排在1月10日，剛好在立憲會議被解散之後。<sup>133</sup> 許多代表為了表示抗議而拒絕參



加，但那些出席會議的代表以事後表決的方式把強行解散立憲會議這一行為合法化了。<sup>134</sup>

## 托洛茨基的失敗

和平！所有國家，所有民族立即實現普遍的和平：布爾什維主義之所以得到民眾的支持，首先是因為它承諾退出可惡的戰爭。可是在蘇維埃第二次代表大會上，列寧突然開始含糊其詞了。「新政權會盡一切努力，」他承諾說，「但我們不是說，把刺刀往地上一插，一下子就可以結束戰爭……不是說今天或明天就可以締造和平。」<sup>135</sup>（報紙在刊登他的講話時刪掉了這些內容。）大會通過的「和平法令」——沒有提到美國，但提到了英國、法國和德國，說它們是「這次戰爭中三個最大的參戰國」——建議所有交戰國停戰三個月，立即進行談判，締結公正、民主、沒有割地、沒有賠款的和約。（布爾什維克的其他公告鼓動這些交戰國的公民推翻政府。）<sup>136</sup> 列寧和斯大林用無線電報向俄國部隊下令停戰，這是多此一舉。列寧給德軍指揮部發了一封建議無條件停戰的明碼電報，雖然他知道，協約國也會收到這條電文（當協約國收到時，會更加確信列寧是德國的奸細）。英法拒絕承認布爾什維克政權，對和平法令以及托洛茨基的正式聲明都未作出回應。協約國倒是給俄軍的野戰司令部發送了公報。<sup>137</sup> 在此期間，托洛茨基手下的一名水兵在搜查俄國外交部的保險庫時，找到了沙皇與英法簽訂的兼併性的秘密戰爭條約；托洛茨基公佈了這些文件，並譴責協約國是「帝國主義者」。<sup>138</sup>（協約國的報紙幾乎無一例外，都沒有轉載被曝光的內容。）<sup>139</sup> 對於步步緊逼的德軍，當時仍不清楚該怎麼辦，如果還有辦法的話。

設在（彼得格勒西南400英里†處的）莫吉廖夫的俄國大本營沒有參與十月政變，但革命使他們陷入了混亂。他們在1917年2月請求沙皇

---

\* 譯註：「我們從來也沒有許過願，說把刺刀往地上一插，一下子就可以結束戰爭。」（列寧全集）第33卷，第58頁。

† 編註：約644公里。

退位，結果加快了革命的步伐。1917年11月8日，列寧和托洛茨基通過無線電報命令俄國的代理最高總司令、41歲的尼古拉·杜鶴寧將軍(Nikolai Dukhonin)——曾任科爾尼洛夫的參謀長——與德國人進行單獨的停戰談判。杜鶴寧拒絕執行這種背叛俄國盟友的命令。為了說明「反革命」想要把戰爭繼續打下去，列寧讓人把往來通話分發給所有部隊。他還讓32歲的尼古拉·克雷連柯(Nikolai Krylenko)接替杜鶴寧的職務，而直到當時為止，克雷連柯依然是俄國軍官團中軍銜最低的軍官(準尉)。<sup>140</sup> 1917年11月20日，他帶着一列車擁護布爾什維克的士兵和水兵趕到莫吉廖夫。杜鶴寧正式向他移交權力。<sup>141</sup> 杜鶴寧沒有逃跑，也沒有阻止科爾尼洛夫將軍和其他沙皇高級軍官的逃跑——自從1917年9月向克倫斯基的手下投降之後，他們一直被關在附近的修道院。發現科爾尼洛夫等人跑掉之後，憤怒的士兵和水兵向倒臥在地的杜鶴寧又是開槍又是捅刀，並在此後幾天把他的屍體剝光，當作練習的靶子。<sup>142</sup> 克雷連柯要麼是無力制止他們，要麼是不想制止。這名準尉與他之前的阿列克謝耶夫將軍以及布魯西洛夫將軍不同，他沒有巡視整個戰場，就得出了如下看法：俄軍不是士氣低落，而是根本就沒有士氣。

不過，德國也有理由謀求和解。德俄士兵通過自行協商實現停戰的做法開始在東線各處蔓延開來。一些專家預言，1917至1918年冬天，德國後方會出現糧食短缺和民眾騷亂，而這些麻煩對於奧匈帝國來說更為嚴峻。西線與法英的激戰還在繼續，現在美國又加入到協約國一邊。魯登道夫決定集中所有兵力，在西線發動一場大型的春季攻勢，那樣一來，從東線騰出的兵力或許就可以派上用場。所有這些考慮，再加上希望鞏固其在東線的巨大收穫，讓同盟國在1917年11月15日(西曆11月28日)接受了布爾什維克的停戰建議以便開始談判。<sup>143</sup> 布爾什維克提倡的是普遍的而不是單獨的和平，可協約國一再拒絕加入談判，因此，托洛茨基和列寧在同一天宣佈：「如果協約國資產階級最終迫使我們(與同盟國)單獨媾和，那責任在於它們。」<sup>144</sup> 至於談判地點，布爾什維克建議放在仍由俄軍控制的普斯科夫(那裏也是尼古拉二世宣佈退位的地方)，但德國選擇了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要塞，那裏從前是沙俄的領土，現在是德軍的指揮部。<sup>145</sup> 在那裏，很快就於12月2日

(西曆12月15日)簽署了停戰協議。(德國馬上就違反協議，把六個師調回到西線。) <sup>146</sup> 一週後，和談開始。

一到那裏，布爾什維克的卡爾·拉狄克——他出生在哈布斯堡王朝統治下的倫貝格(利沃夫)，當時名叫卡爾·索貝爾森——就對列車車窗外的德國普通士兵大作反戰宣傳，鼓動他們反抗自己的指揮官。<sup>147</sup> 拉狄克弓着身子，抽着煙，坐在桌子對面的是德國外交大臣理查德·馮·屈爾曼男爵(Richard von Kühlmann)和東線德軍參謀長馬克斯·霍夫曼少將。談判開始那天在軍官食堂舉行的晚宴上，俄國代表團的一名成員，一個左派社會革命黨人，欣然為會議的東道主巴伐利亞親王利奧波德元帥(Leopold)重演了她刺殺沙皇總督的過程。布爾什維克代表團團長阿道夫·越飛(Adolf Joffe)——奧地利外交大臣奧托卡爾·采爾寧伯爵敏銳地注意到他是個猶太人——表示：「我非常希望也能在貴國喚起革命。」<sup>148</sup> 俄國猶太人定居區和高加索的左翼庶民就這樣擺好了架勢，準備同顯赫的德國貴族以及世界上最令人生畏的軍事集團的軍閥們過招了。<sup>149</sup> 起初有一些誤會，之後事情就明朗了：布爾什維克「沒有賠款和割地的和平」這一要求永遠不會得到滿足；德奧代表團以「自決」為由，要求俄國承認波蘭、立陶宛和西拉脫維亞的獨立，而它們都是同盟國在1914至1916年間已經佔領的地方。<sup>150</sup> 看來布爾什維克代表團的唯一希望是，等待德國和奧匈帝國國內由於戰爭的壓力而突然爆發革命(假如戰爭沒有讓協約國後方首先崩潰的話)。<sup>151</sup> 到了第二輪「談判」，列寧派的是托洛茨基，這樣做既是為了引起關注，也是為了拖延時間。<sup>152</sup> 布爾什維克得到德國人的允許，可以對談判的情況進行報道，這樣一來就能公開地大擺姿態。托洛茨基在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的表現讓他在國際上聲名鵲起。在德國人長篇大論地抨擊布爾什維克對政治反對派的鎮壓時，托洛茨基始終面帶微笑。輪到他講話了，他脫口而出：「我們逮捕的不是罷工者，而是把工人關在外面的資本家。我們沒有朝要求得到土地的農民開槍，而是逮捕了想要朝農民開槍的地主和軍官。」<sup>153</sup>

250

不久，托洛茨基打電報給列寧，建議中止談判，不要簽訂和約。「我要跟斯大林商量，然後給你答覆」，列寧在電報中說。答覆的結果是在1918年1月初休會，乘此機會，托洛茨基返回彼得格勒進行磋商。

1月8日，也就是強行解散立憲會議兩天後，米哈伊爾·邦契—布魯耶維奇——列寧的平事人弗拉基米爾·邦契—布魯耶維奇的兄弟——也剛剛提交了一份官方報告，警告「再有幾天，軍隊就會出現大饑荒」，布爾什維克中央委員會召開會議，商討德國問題。<sup>154</sup>先前列寧在強烈主張政變的時候，曾堅稱德國即將發生革命，但現在，他的口氣變了：世界革命依然是夢想，他說，而俄國的社會主義革命卻是事實；為了挽救後者，他強烈主張不管德國人提出甚麼樣的條件都要接受。<sup>155</sup>托洛茨基反對說，德國不會再開戰，沒有必要投降。但是，尼古拉·布哈林領導下的自詡為左派布爾什維克的小集團——其中包括捷爾任斯基、明仁斯基和拉狄克，卻提出俄國應該重啟戰端。他們認為列寧的看法是失敗主義的看法。結果，中央委員會的意見分成三種：投降（列寧）；拖延並虛張聲勢（托洛茨基）；開展革命游擊戰以加快歐洲革命的進程（布哈林）。在1月9日的會議上，16名有投票權的中央委員，只有3人支持列寧，而這3人當中最突出的就是斯大林。

斯大林反對說，「托洛茨基的立場是不能叫做立場的」，還說，「現在西方沒有革命運動，不存在革命運動的事實，而只有可能性。但是我們在實踐中不能單單依靠可能性。如果德國人開始進攻，那就會加強我國的反革命」。他還指出：「十月間我們談論過……神聖戰爭，因為當時有人向我們說，單單『和平』兩個字就能掀起西方的革命。可是這種說法沒有得到證實。」<sup>156\*</sup>相反，布哈林開始承認，「托洛茨基的看法，即等待柏林和維也納工人的罷工，是最正確的」。托洛茨基的提議（「停止戰爭、不簽和約、復員軍隊」）在這一天以九票對七票獲得通過。<sup>157</sup>列寧在會後寫道，大多數人「沒有考慮到條件已經發生變化，而這種變化要求我們迅速而急劇地改變策略」。<sup>158†</sup>這就是列寧，對俄國溫和派社會主義者絲毫不肯讓步，卻要求共產黨人低三下四地遷就德國的軍國主義分子。

\* 譯註：《斯大林全集》第4卷，第26頁。

† 譯註：《列寧全集》第33卷，第256頁。

1918年1月10日召開了蘇維埃第三次代表大會(一直開到18日),其中,布爾什維克代表略佔多數(到大會結束時,1,647名代表中有860名布爾什維克,因為有很多代表正在陸續趕來)。會議在塔夫利達宮舉行,會上通過了一項決議,在蘇維埃法令的所有新版本中,凡涉及最近被解散的立憲會議的內容一律取消。斯大林作為民族事務人民委員作了報告,同時,大會還正式成立了「俄羅斯社會主義聯邦蘇維埃共和國」。在談到立憲會議時,斯大林的結論是:「在美國,選舉是普遍的,但是執掌政權的是億萬富翁洛克菲勒的傀儡……難道這不是事實嗎?是的,我們已經埋葬了資產階級的議會制度,馬爾托夫分子要把我們拖到三月革命時期去是枉費心機的(笑聲,掌聲)。我們工人代表必須使人民不僅成為投票者,而且成為統治者。執政的並不是選舉者和投票者,而是統治者。」<sup>159</sup> 托洛茨基作了關於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談判的報告。「當托洛茨基結束他的偉大的講話時,」一名英國的狂熱分子報道說,「這場由俄國工人、士兵和農民參加的大型會議中,他們起立並……唱起了《國際歌》。」<sup>160</sup> 不過,儘管存在贊成革命戰爭的傾向,但大會沒有通過任何有約束力的決議。1月17日(西曆1月30日),托洛茨基返回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繼續拖延時間。

次日,布爾什維克中央委員會在彼得格勒就是否召集黨的代表會議討論可能單獨媾和的問題發生了爭論。「要召開甚麼代表會議?」列寧呵斥道。斯維爾德洛夫認為無法及時組織一次全黨的代表會議,因而建議與各省代表協商。斯大林深感黨缺乏明確的立場,便在一定程度上推翻了自己原來的意見,認為「中間觀點,也就是托洛茨基的立場,給了我們一條擺脫困境的道路」。斯大林建議「讓持不同觀點的人有更多表達的機會,並召開會議以取得明確的立場」。<sup>161</sup> 托洛茨基有一點是正確的:正在崩潰的不是只有俄國的戰爭投入。同盟國也承受了巨大的壓力:在德國,罷工潮遭到鎮壓,但英國的封鎖造成的大規模匱乏依然如故;奧地利正在懇求德國,甚至懇求保加利亞,提供緊急的糧食

\* 譯註:《斯大林全集》,第4卷,第34頁;編註:「三月革命」即1917年的二月革命(俄曆2月,西曆3月)。

援助。<sup>162</sup> 可是，德國人在此期間也翻出了一張王牌：被稱為中央拉達 (Rada)\* 的烏克蘭政府——是社會主義者但並非布爾什維克——派出的代表團出现在了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德國最重要的文職官員把這群二十多歲的人稱作「黃毛小子」(Bürschchen)，但是在1月27日(西曆2月9日)，德國爽快地和他們簽訂了條約，<sup>163</sup> 儘管俄國的赤衛隊此時已經推翻了基輔的中央拉達。<sup>164</sup> 中央拉達的代表們承諾給德國和奧地利提供烏克蘭的糧食、錳和雞蛋，以換取軍事援助來對抗布爾什維克武裝，在奧地利的加利西亞和布科維納成立魯塞尼亞(烏克蘭)自治區。(奧地利的采爾寧稱之為「麵包和約」。)<sup>165</sup> 不管烏克蘭知識分子和政治人物的願望是甚麼，對德國來說，獨立的烏克蘭就是一個工具，用來對付俄國和支持德國在西線的戰爭投入。<sup>166</sup>

看來烏克蘭是已經收入囊中了，德國代表團得意洋洋。第二天(1月28日，西曆2月10日)，托洛茨基到達，發表了譴責「帝國主義」的長篇講話，德國代表團將其視為布爾什維克投降前的空談。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談已經進行了大約50天；俄國軍隊實際上已不復存在。但托洛茨基非但沒有在現實面前低頭，反而在發言的最後宣佈採取「不戰不和」的政策。也就是說，俄國退出戰爭，同時拒絕簽訂和約。沉默片刻後，坦能堡大捷的策劃者、德國的霍夫曼少將嘟囔了幾句，但「聽不清楚」。<sup>167</sup> 布爾什維克代表團出門上了列車。「在返回彼得格勒的途中，」托洛茨基回憶說，「我們都以為德國人不會發動進攻。」<sup>168</sup> 布列斯特給蘇維埃首都發了關於「和平」的含糊其詞的電報，彼得格勒又給前線發了電報。前線士兵激動得又是唱歌，又是鳴槍慶祝「和平」。<sup>169</sup> 1918年1月31日，托洛茨基在一片歡呼聲中回到斯莫爾尼宮。(由於開始採用西方的格里高利曆，所以在俄國，第二天是2月14日。)列寧將信將疑，不知道托洛茨基葫蘆裏賣的甚麼藥。從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發給維也納的外交電報讓精疲力竭的哈布斯堡王朝首都準備歡慶勝利：大街上人頭攢動，彩旗飄揚。<sup>170</sup>

---

\* 編註：烏克蘭語，意為「集體會議」、「議會」。

253 但德國的將軍們堅持認為，不實行軍事佔領，就不會得到承諾中的烏克蘭糧食。2月13日，即托洛茨基回到斯莫爾尼宮的同一天，興登堡元帥在德國戰爭委員會會議上指出，停戰協議並沒有帶來和約，因此不再有效；他強烈主張採取「打垮俄國人〔並〕推翻其政府」的政策。德皇同意了。<sup>171</sup> 在得到已被推翻的中央拉達的允許後，大約45萬人的同盟國軍隊開進了烏克蘭。（在加利西亞，講波蘭語的居民因為對烏克蘭的承諾而爆發了憤怒的騷亂；哈布斯堡王朝指揮下的進入烏克蘭的波蘭軍隊脫離出來，成了他們自己的武裝力量。）<sup>172</sup> 與此同時，從2月18日開始，也就是在托洛茨基採取戲劇性行動的八天後，一支德國軍隊（52個師）在兩週內推進了125英里\*，橫掃俄國北部，佔領了明斯克、莫吉廖夫和納爾瓦，彼得格勒門戶大開。「這是我經歷過的最滑稽的戰爭，」霍夫曼在談到自己的行動（代號「霹靂」）時指出，「派上幾個步兵，帶上幾挺機關槍和一門大炮，坐上火車到下一站，佔領它，逮捕布爾什維克，再派一支小分隊，坐上火車繼續前進。」<sup>173</sup>

## 浩罕大屠殺

在從前的俄羅斯帝國範圍內，決定其他地方事態發展的，既不是德國對協約國的地緣政治，也不是托洛茨基和列寧言辭尖銳的二重唱。主要由斯拉夫移民和衛戍部隊組成的塔什干蘇維埃，在1917年10月23日發動第二次嘗試，成功奪取了政權，這個時間甚至比布爾什維克在彼得格勒的政變還早。11月中旬在那裏召開的蘇維埃代表大會，實際上沒有一個代表是當地土生土長的。<sup>174</sup> 「從俄國內陸省份派來的士兵，舊政權在從我們人民手中沒收的土地上安置的農民，以及習慣於用居高臨下的傲慢眼光看待我們的工人，突厥斯坦的命運此時就是由這些人決定的」，一個叫做穆斯塔法·肖凱一貝格（Mustafa Choqai-Beg）的穆斯林首領回憶說。<sup>175</sup> 塔什干蘇維埃代表大會以97票對17票，拒絕讓穆斯林

---

\* 編註：約201公里。

擔任政府職務。<sup>176</sup> 與此同時，自認為理所當然應該為民眾代言的烏理瑪穆斯林學者，集中在塔什干的另外一個地方，召開他們自己的代表大會，並按照向殖民地當局請願的習慣，通過投票以壓倒多數決定，向塔什干蘇維埃請願成立更具代表性的地方政治機構，因為「塔什干穆斯林……佔人口的98%」。<sup>177</sup> 同時，另一幫自詡為現代派的穆斯林——人稱「扎吉德」——看到了壓倒傳統烏理瑪的機會，便在1917年12月初在浩罕召開會議。浩罕是一座有城牆拱衛的城市，俄羅斯人在34年前才佔領那裏。此次大會有近200名代表，其中包括來自附近人口稠密的費爾干納盆地的150名代表。大會在12月11日作出決定，宣佈「與俄羅斯聯邦民主共和國結合在一起的突厥斯坦的地方自治」，同時鄭重承諾「盡一切可能」保護當地的少數民族（斯拉夫人）。<sup>178</sup> 他們成立了臨時政府，選舉產生了參加立憲會議的代表團，並專門為非穆斯林保留了三分之一席位。大會還就是否與反布爾什維克的草原哥薩克結盟問題進行了辯論。結盟的建議使代表們產生了分歧，但要想繼續輸入糧食，那似乎就是無法避免的唯一選擇，因為按照沙皇政權的要求，當地農民此前幾乎全部改種棉花了。

254

浩罕自治政府的代表於12月13日前往塔什干，宣佈他們在蘇維埃政權領土上的存在。那天是週五（穆斯林的聖日），恰好是穆罕穆德的生日。幾萬名男子，許多都裹着白色的頭巾，拿着綠色或淺藍色旗子，朝着城裏的俄羅斯人居住區開去。隊伍中甚至有許多烏理瑪。遊行要求停止進屋搜查、停止徵用，還衝擊監獄，釋放了塔什干蘇維埃關押的囚犯。<sup>179</sup> 俄羅斯士兵向人群開槍，打死了幾個人；更多的人死在倉惶逃散的時候。<sup>180</sup> 囚犯被抓回來處死。

浩罕自治政府的領導層以在帝俄接受過教育的穆斯林知識分子為主，他們請求俄國首都的布爾什維克當局，「承認實行自治的突厥斯坦臨時政府是突厥斯坦的唯一政府」，並授權立即解散塔什干蘇維埃，因為「它違背民族自決的原則，依靠對我國的當地居民抱有敵意的外國人」。<sup>181</sup> 民族事務人民委員斯大林作了答覆。「各蘇維埃在其內部事務上擁有自主權，並依靠他們的實際力量履行自己的職責，」他寫道，「因此，突厥斯坦當地的無產者無需向中央蘇維埃當局請求解散突厥斯



坦人民委員會。」他還說，如果浩罕自治政府覺得塔什干蘇維埃必須解散，「如果當地的無產者和農民有這樣的力量，他們應該自己用武力去解散。」<sup>182</sup>這是在公開承認中央的布爾什維克無能為力，承認武力在決定革命結果方面的作用。可是，沙皇時代殖民地衛戍部隊留下的武器自然是掌握在塔什干蘇維埃手中。浩罕自治政府想要拉起一支民兵隊伍，但沒有成功（勉強招募了60名志願者）。它沒有稅收，同草原哥薩克和布哈拉酋長國聯絡的外交使團也一無所獲。在布爾什維克解散立憲會議後，浩罕自治政府試圖誘使塔什干蘇維埃召集突厥斯坦立憲會議——那樣一來，穆斯林自然會重新成為佔壓倒地位的多數。2月14日，塔什干蘇維埃動員當地的衛戍部隊、來自奧倫堡草原的其他士兵、亞美尼亞達什納克黨人以及武裝的斯拉夫工人，去粉碎這個「冒牌的自治政府」。他們開始圍攻浩罕老城。不到四天就攻破城牆，開始屠殺城裏的居民。被殺害的穆斯林估計有1.4萬人，其中許多是被機槍打死的；該城在洗劫之後被焚毀。<sup>183</sup>塔什干蘇維埃借此機會加緊徵收糧食儲備，結果引發了饑荒。饑荒中死亡的可能達到90萬人，還有大批人逃往中國新疆。<sup>184</sup>後來，斯大林和布爾什維克黨人在實際工作中不再把革命同反殖民問題結合在一起了。

## 投降

對馬克斯·霍夫曼少將率領的德軍來說，根本沒有可靠的布爾什維克武裝擋在他們向東推進的道路上。「不管是對於我們或是從國際社會主義的觀點來看，保存這個……共和國是高於一切的」，2月18日，即霍夫曼率領德軍重新開始推進的那天，列寧在中央委員會會議上說。<sup>185</sup>對列寧來講，反正割讓布爾什維克尚未控制的領土是值得付出的代價，而且在他看來，只是在世界革命到來之前暫時割讓那些領土。可是在一開始，列寧又一次沒能得到多數中央委員的支持。斯大林再次站到列

---

\* 譯註：《列寧全集》第33卷，第257頁。

寧一邊。「我們想直截了當，直奔事情的核心，」斯大林在2月18日中央委員會會議上說，「德國人在進攻，我們沒有任何武裝，是時候說必須恢復談判了。」<sup>186</sup> 這番話等於是明確反對托洛茨基的立場。托洛茨基一直是個搖擺不定的人物，現在依然如此。在他1月中旬返回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之前，列寧曾和他有過一次密談；兩人明顯都堅持自己的看法，但列寧問了托洛茨基一個尖銳的問題：要是德國人真的重新開始進攻而在德國的後方又沒有爆發革命起義，怎麼辦？會不會迫不得已簽訂屈辱的和約？很明顯，托洛茨基表示同意，如果真的出現這些情況，他不會反對列寧贊成的按照德國人的條件接受一個懲罰性和約。<sup>187</sup> 而現在，托洛茨基遵守承諾，撤回自己的反對票。這讓列寧以七對五的多數（有一票棄權），贊成立即投降，反對支持「革命戰爭」的人。<sup>188</sup>

256

一份由列寧和托洛茨基簽署的、同意原來條件的無線電報發給了德國人。<sup>189</sup> 但德國人沒有答覆；霍夫曼少將繼續進軍。2月21日，德國軍隊開始介入芬蘭內戰——在那裏，十月政變分裂了帝俄軍隊的軍官。（德國軍隊幫助卡爾·古斯塔夫·曼納海姆將軍〔Carl Gustav Mannerheim〕領導的芬蘭民族主義分子打敗了赤衛隊，推翻了布爾什維克支持的芬蘭社會主義工人共和國。）<sup>190</sup> 當初沒有立即接受德國人的條件，現在看來就像是一場豪賭。除了烏克蘭和南方哥薩克人的地盤（450萬人）之外，「蘇維埃政權」似乎到處都沉浸在勝利的喜悅中，但柏林方面的沉寂，讓1918年2月18日，即德軍在東線重新發動進攻的那一天，似乎會成為社會主義革命的轉折點。<sup>191</sup> 後來證明，當時每個人都覺得這是戰爭中最糟糕的一幕。比以往任何時候都要絕望的列寧，讓托洛茨基試探一下協約國，試圖請求法帝國主義者挽救社會主義革命，使其免遭德帝國主義者的毒手。<sup>192</sup> 「我們在把黨變成糞堆」，布哈林流着淚對托洛茨基大聲說道。<sup>193</sup> 「包括列寧在內，」托洛茨基回憶說，「我們大家都認為德國人已經和協約國達成協議，要打垮蘇維埃。」<sup>194</sup> 要是那樣，托洛茨基和布哈林都難辭其咎。

最後，2月23日早晨，對於布爾什維克的投降，信使送來了德國人的答覆：德國採取的是最後通牒的形式，其條件比托洛茨基提出的不戰不和要苛刻許多。當天下午，中央委員會心情沉重地召開會議。斯維

257 爾德洛夫詳細講述了德國人的條件：除了裏海的石油以及芬蘭和愛沙尼亞的幾個具有戰略價值的波羅的海港口——這些地方都被德國控制了，蘇維埃俄國還必須承認德國佔領下的糧倉烏克蘭的獨立。另外，布爾什維克必須解除所有赤衛隊的武裝，讓海軍退役，並支付巨額賠款。換句話說，德國人在繼續往布爾什維主義大投賭注的同時，還在對其進行遏制和壓榨。布爾什維克必須在48小時內接受最後通牒，而這48小時已經在德國人遞送文件的過程中耗去大半。列寧說「這些條件必須接受」，否則他就辭職——他是以書面形式（在《真理報》上）發出上述威脅的。<sup>195</sup> 斯維爾德洛夫支持列寧。但托洛茨基和捷爾任斯基強烈主張拒不接受。布哈林也是。另外一個強硬的左派人物稱列寧是唬人的，說「沒有理由被列寧的辭職威脅嚇倒。沒有弗·伊〔列寧〕，我們也必須掌握政權」。就連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談期間始終都是列寧最忠實盟友之一的斯大林，也開始躲躲閃閃。他建議說「不簽訂和約但開始和談，那是可行的」，還說「德國人是在誘使我們拒絕」。這本有可能成為一個取得突破的時刻，打破列寧的擅權，因為當時斯大林使天平發生了傾斜。但列寧反駁說「斯大林是錯誤的」，並重複了他始終堅持的主張，認為應該接受德國人的苛刻協定，以挽救蘇維埃政權。斯大林短暫的動搖結束了。這其中的原因部分在於托洛茨基改變立場，站到列寧一邊。托洛茨基指出，加米涅夫第一次去〔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的時候，條件是最好的，要是加米涅夫和越飛那時簽訂和約就好了。不管怎麼說，「現在情況十分清楚了」。由於四票棄權——關鍵是，這當中包括托洛茨基——列寧在斯維爾德洛夫和斯大林的支持下，在中央委員會的表決中以七比四勝出。<sup>196</sup>

塔夫利達宮那邊，蘇維埃中央執行委員會正在開會，與會的包括非布爾什維克黨人，比如左派社會革命黨人中一個比較大的派別，還有一些孟什維克。深夜時分，爭論再起，一直持續到2月24日早晨，而德國人的最後通牒在這天上午7時就要到期了。當列寧登上講台的時候，迎接他的是「賣國賊！」的嘲諷聲。「給我一支10萬人的軍隊，一支在敵人面前不會發抖的軍隊，我就不會簽訂和約，」他回應說，「你們能招募到一支軍隊嗎？」凌晨4時半，向德國人的協定屈服的決議以116票贊

成、85票反對、26票棄權獲得通過：投反對票的大部分是左派社會革命黨人。<sup>197</sup> 列寧急忙讓人用皇村的專用無線電發報機給德國人發去照會。<sup>198</sup> 無論是托洛茨基還是核心圈的其他人，都不願回到布列斯特一里托夫斯克簽訂屈辱的和約。這項任務落到了格里戈里·索柯里尼柯夫(Grigory Sokolnikov)頭上。證據顯示，他曾建議讓季諾維也夫去，後來自己又「自願」前往。<sup>199</sup> 布爾什維克代表團回到了布列斯特一里托夫斯克，但只能被迫等待，而德軍卻在1918年3月1至2日佔領了基輔，讓中央拉達政府重新上台，還替土耳其提出了新的要求，讓俄方在高加索的領土問題上作出更多的讓步。和約是在3月3日簽訂的。「現在你們得逞了，」拉狄克對霍夫曼少將憤怒地說道，「但最終協約國也會把一個布列斯特一里托夫斯克那樣的條約強加給你們。」<sup>200</sup> 拉狄克說對了：很大程度上正是因為布列斯特一里托夫斯克條約，協約國開始確信，對德意志帝國不能手軟，需要擊敗它，而不是用談判的方式實現和平。

258

托洛茨基聰明反被聰明誤，結果現在他辭去了外交人民委員的職務(列寧後來任命他為陸軍人民委員)。但以前那個不顧一切發動十月政變的列寧，現在卻因為委曲求和而飽受詬病。<sup>201</sup> 俄國被迫放棄了130萬平方英里\*的領土——這些領土比兩個德國還大，是幾個世紀以來帝俄付出了很多人力物力，從瑞典、波蘭、奧斯曼帝國等手中搶來的。割讓領土讓俄國失去了四分之一的人口(約5,000萬人)、三分之一的工業以及超過三分之一的耕地。<sup>202</sup> 現在，德國在名義上控制了一個指向東方、從北冰洋一直延伸到黑海的巨大的楔子。同樣引人注意的是，德意志帝國和奧匈帝國的臣民獲得了不執行布爾什維克國有化法令的豁免權——這意味着他們可以擁有私人財產並在蘇俄境內從事商業活動——而且財產被沙皇政府沒收的德國國民現在會得到賠償。布爾什維克必須將其陸海軍復員，並停止國際宣傳(德國人認為布爾什維克的宣傳要比俄國的軍隊危險得多)。<sup>203</sup> 在俄國歷史上從來沒有哪個政府拱手讓出那麼多的領土和主權。

---

\* 編註：約337萬平方公里。

大難臨頭的氣氛籠罩着彼得格勒。一年前的1917年3月2日，尼古拉二世的退位讓人忘乎所以，當時沙皇問過兩位杜馬代表一個尖銳的問題：「不會有甚麼後果吧？」僅僅五個月前，1917年10月27日，孟什維克國際派的鮑里斯·阿維洛夫在布爾什維克政變期間的蘇維埃第二次代表大會上曾經站出來預言說，清一色的布爾什維克政府既不能解決糧食供應危機也不能結束戰爭，協約國不會承認一個由布爾什維克壟斷的政府，而且布爾什維克會被迫接受德國單獨的、苛刻的和約。這一天到了。雪上加霜的是，俄國的戰時盟友現在開始實行事實上的經濟封鎖，並很快會扣押俄國的海外資產。<sup>204</sup>

列寧的黨出現了分裂，人心惶惶。<sup>205</sup> 1918年3月5至8日，黨的第七次(緊急)代表大會在塔夫利達宮召開，出席大會的代表只有46人(在1917年夏天召開的上一次黨的代表大會有近200名代表)。自詡為「左派共產主義者」的代表反對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條約，而他們在1917年的暴動中曾是列寧最堅強的後盾。布哈林和其他左派布爾什維克甚至創辦了一份新雜誌，叫做《共產主義者》，這明擺着是為了公開抨擊那份「下流的」和約。他們還在代表大會上發言，敦促對德意志帝國發動「革命戰爭」。列寧完成了黨的更名，從「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布爾什維克)」變成「俄國共產黨(布爾什維克)」，同時，他懇求黨接受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條約。激烈的爭吵持續了三天。列寧指出，他的反對者因為拒絕接受德國人起初提出的比較有利的條件而引發了這場災難。他在表決中以30票贊成、12票反對、4票棄權(這其中仍然有托洛茨基)而獲勝。<sup>206</sup> 然而此次表決在許多方面只是確認了領袖的權威：列寧堅持簽訂和約，但他已不再相信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條約中的讓步能夠阻止德國人向彼得格勒推進。2月24日，即列寧打電報接受德國人條件的那天，霍夫曼少將佔領了普斯科夫。普斯科夫在俄國首都西南150英里\*處，而且在直達首都的鐵路線路上。2月26日，列寧批准了一項秘密命令，放棄俄國革命的首都。這真是太諷刺了。1917年10月初，克倫斯基的臨時政府為了安全起見，決定從彼得格勒遷往莫斯科，結果斯

---

\* 編註：約241公里。

大林主編的布爾什維克報紙《工人之路報》指責克倫斯基賣國，把首都交給德國人。<sup>207</sup> 當時克倫斯基放棄了自己的想法。<sup>208</sup> 可現在，又一次像列寧的批評者早就預言的那樣，他不僅把一切都交給了德國人，還準備放棄俄國首都。

### 逃跑然後穩住陣腳

布爾什維克的疏散準備是瞞不住的，因為報紙頭版上的相關傳言已經說了很長時間。1918年2月底，美國和日本的外交使團為了安全起見已經遷往沃洛格達，而法國人和英國人則試圖轉道芬蘭和瑞典全部撤離俄國，結果只有英國人成功了，法國人最後也留在了沃洛格達（斯大林在那裏流放過）。為了確保列寧的安全，弗拉基米爾·邦契—布魯耶維奇（Vladimir Bonch-Bruевич），設在斯莫爾尼宮一個房間裏的政府「情報部門」的主席，施展了一些計謀：將蓋有「人民委員會」字樣的貨物在客運中心很顯眼的地方裝車，同時在黑夜的掩護下，從彼得格勒城南一座廢棄的車站偷偷調來一輛從前的皇家專列。邦契—布魯耶維奇派了兩隊互不相識的特工（保安處的作風），對這條不再使用的支線進行監視，在附近的「茶」室偷聽，並散佈消息說，正在給派往前線的醫生準備一趟列車。有些車廂裝載了燃料木材、打字機和電話；為了裝載汽車而增加了幾節平板車。邦契—布魯耶維奇還用兩節車廂裝滿了布爾什維克黨的文獻（不包括他自己的私人藏書）。<sup>209</sup> 3月10日星期天的晚上，這趟秘密列車關閉燈光，搭載列寧、他的妹妹和妻子、詩人葉菲姆·普里德沃羅夫（Yefim Pridvorov，又名傑米楊·別德內（Demyan Bedny））、斯維爾德洛夫、斯大林、帶着一隻手提箱的契卡首腦捷爾任斯基以及一隊衛兵離開了。另外兩趟列車，裏面乘坐的是蘇維埃中央執行委員會的委員們（他們中許多都不是布爾什維克），在後面遠遠地跟着，不知道自己前方是甚麼。讓人着急的是，在彼得格勒東南75英里<sup>\*</sup>處，列寧的列車因為與一趟載有復員士兵的列車不期而遇而受到延

260

---

\* 編註：約121公里。

誤。直到列寧的列車離莫斯科不到三站的時候，邦契—布魯耶維奇才通知了莫斯科蘇維埃。3月11日晚上8時，列車到達莫斯科。列寧受到一小群「工人」的迎接。他向莫斯科蘇維埃發表了講話，然後在金色的國家大飯店安頓下來，隨行的一隊報務員也住在那裏。<sup>210</sup>

這趟最重要的列車運來的是，直到1918年3月為止的「國家」：列寧本人、幾個忠實的助手、布爾什維克觀念和傳播這些觀念的工具，還有武裝衛兵。

261 這支武裝衛兵特別不同尋常。1918年1月中旬，在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談期間——當時德國人正在暢通無阻地向東進軍——曾經發佈過一個緊急號召，要「從工人階級中有階級覺悟的和最優秀的分子中間」組建一支國防力量，但號召沒有甚麼效果。<sup>211</sup> 列車上把革命護送到新首都莫斯科的，是沙皇陸軍中的拉脫維亞步兵。世界大戰前，俄羅斯帝國陸軍拒絕明確支持民族部隊；直到1914至1915年，當局才允許成立捷克斯洛伐克人、塞爾維亞—克羅地亞人以及波蘭人的自願「軍團」，它們是由戰俘組成的，那些戰俘想要重返戰場，幫助解放哈布斯堡王朝統治下的同胞。芬蘭人沒有得到這樣的許可，但是在1915年8月，俄國允許成立了兩個由清一色志願人員組成的拉脫維亞旅，以利用他們對德國的仇恨。到1916至1917年，兩個拉脫維亞旅已經擴大到大約18,000人，八個團（最終是十個團），每個團都用一個拉脫維亞城市來命名，但這裏面也有匈牙利人、芬蘭人等等。在1916至1917年的冬季作戰中遭遇了嚴重傷亡後，他們轉而反對沙皇制度。他們大多是無地的農民或小佃農，因而積極擁護社會民主黨。到1917年，他們的祖國脫離俄國，並被德國佔領了。不過，他們威信很高的指揮員約阿基姆·瓦采季斯上校（Jukums Vācietis，生於1873年）——他出身於沙皇統治下的庫爾蘭一個無地的農民家庭，在八個孩子中排行老六，他的俄語老師在學生時代就是一個激進的民粹主義分子——決定，把士兵帶到布爾什維克一邊。<sup>212</sup> 列寧列車上的拉脫維亞警衛們，在布爾什維主義和「被拋到九霄雲外」之間，是唯一一支受過訓練、用途廣泛的力量。

其他幾趟開往莫斯科的列車運來了很多急需的東西：海軍參謀人員帶來了檔案、地圖、辦公設備、家具、窗簾、地毯、鏡子、煙灰缸、火

爐、廚房用具、盤子、燒茶壺、毛巾、毯子和聖像，可以數得出來的共有1,806件。<sup>213</sup> 外交人民委員部的一趟列車運來的是從帝國保險庫中拿來的「金質的高腳酒杯和鍍金的湯匙、餐刀之類的東西」。<sup>214</sup> 但是在莫斯科會怎麼樣，還要再看一看。「資產階級圈子幸災樂禍，覺得造化弄人，我們正在實現斯拉夫主義者永恆的夢想——還都莫斯科，」季諾維也夫說道，「我們深信，遷都不是長久之計，不得不遷都的那種困難局面是會過去的。」<sup>215</sup> 莫斯科人民委員會根本沒抱僥倖心理，他們在彼得格勒政府到達的當天，迅速宣佈自己「獨立」。列寧任命了一個由他本人、斯大林以及斯維爾德洛夫組成的委員會，以壓制那個並立的所謂「莫斯科沙皇國」的氣焰。<sup>216</sup>

與此同時，所有人都加入了搶房大戰。莫斯科就像一個雜草叢生的村子，崎嶇不平的鵝卵石街道又窄又髒，根本無法和彼得格勒巴洛克風格、又直又寬的大街相比，而且莫斯科沒有現成的可供行政部門使用的大型建築。<sup>217</sup> 莫斯科蘇維埃中央執行委員會佔用了總督官邸；留下莫斯科蘇維埃自己去爭奪曾經豪華而現已破敗的德累斯頓大飯店（在總督官邸的街對面）。有些蘇維埃中央執委會委員搬進了國家大飯店（它被更名為「蘇維埃1號樓」），但是更多的人最後住進了莫斯科主幹道特維爾大街上的柳克斯飯店。<sup>218</sup> 國家行政部門的駐地大多比較分散：為了消除工業領域中的無政府工團主義（anarcho-syndicalism）\* 傾向而新成立的最高國民經濟委員會，要了80幢建築，而這些建築原先幾乎都不是準備用來辦公的。<sup>219</sup> 陸軍人民委員部佔用了並不豪華的紅色艦隊飯店，也在特維爾大街，另外還佔用了亞歷山大軍事學校、紅場上的商業街，以及莫斯科基泰格羅德那些最好的地方——基泰哥羅德是克里姆林宮附近的一個帶有圍牆的商業區。工會理事會在莫斯科河外側的岸邊得到了一幢18世紀的新古典主義風格的育嬰堂，還在莫斯科從前的貴族俱樂部得到了一些豪華的接待場地。契卡將大盧比揚卡街上的雅科爾（鐵錨）公司和勞埃德俄國分公司這兩家私人保險公司的財產據為己

262

---

\* 編註：無政府主義的分支，關注勞工運動，主張以工人民主自治的新社會來取代資本主義和國家。



有。<sup>220</sup>可以想見，這種搶奪絲毫不會顧及臉面：當莫斯科黨組織委員會的委員們去佔領一個通過互換而得來的設施時，他們發現，廚房設備和電話線已被人從牆裏拆走，燈泡也不見了。

莫斯科最豪華的大都會飯店是新藝術運動的傑作，原先是打算做歌劇院的。這幢建築是由鐵路實業家兼藝術贊助人薩瓦·馬蒙托夫(Savva Mamontov, 1841-1918)委託建造的，在他以欺詐罪進了監獄之後，項目作了變更，於是就有了這家1905年開張的飯店。戰爭讓飯店幾乎面目全非。革命後，它被收歸國有，更名為「蘇維埃2號樓」，250個房間擠滿了新政權的新貴。門口有衛兵把守，開始實行通行證制度；裏面到處是臭蟲和首長，還有他們的親朋好友和情婦。埃夫拉伊姆·斯克良斯基(Yefraim Sklyansky)，托洛茨基在陸軍人民委員部的第一助手，在不同樓層為自己那幫人強佔了幾處住所。布哈林住在這裏，他未來的情人、當時還是孩子的安娜·拉莉娜(Anna Larina)也住在這裏(他們相遇時她4歲，而他29歲)。外交人民委員格奧爾吉·契切林(Georgy Chicherin)和外交人民委員部的不少工作人員安頓得特別好；許多人在這裏還有辦公室。貿易人民委員部得了間兩室小套房，配有浴缸。雅科夫·斯維爾德洛夫把蘇維埃中央執行委員會的接待處安排在樓上，而該機構的正式會議則在廢棄的宴會廳舉行。在因為缺少燃料而變得黑暗、寒冷的首都，這家曾經的豪華飯店成了一個又髒又破的地方。走廊裏的豪華地毯上，有小孩的便溺和成人的煙頭。廁所和浴缸尤其讓人噁心。住在裏面的精英們會為了國家不定期發放的食物包裹(*payok*)而激烈地扭打。包裹裏面可能還有衣服，甚至是令人垂涎的大衣。同時，這個設在「蘇維埃2號樓」裏的「政府」，只要是能拿得動的東西都有人偷。<sup>221</sup>它遲遲沒能成為歌劇院。

263

權力中心也在其餘的地方建了起來。為了把人民委員會安頓下來，可供選擇的有城裏中世紀的建築「紅門」附近一家供貴族婦女住宿的飯店，或者是中世紀的克里姆林宮，但當時人們沒怎麼考慮克里姆林宮，這一方面是因為年久失修，另一方面是因為其政治影響——俯瞰紅場的救世主塔樓上的大鐘，報時的旋律依舊是《上帝保佑沙皇》。<sup>222</sup>不管克里姆林宮和古莫斯科沙皇國有着怎樣的聯繫，或者是如何年久失

修，它有高牆，有可以鎖上的大門，因而是最適合做權力中心的地方。在國家大飯店住了一個星期後，列寧把指揮部搬進了克里姆林宮一處精美的建築：葉卡捷琳娜大帝吩咐為她在莫斯科期間建造一處住所，結果就有了為帝國參政院（俄羅斯帝國的最高司法機構）建造的這幢新古典主義風格的建築，它的幾間寬敞、豪華的辦公室後來留出來做了法庭。想要成為律師但未能如願的列寧，把辦公室設在上面那層（三樓）從前的檢察總長的套房裏。<sup>223</sup>緊挨着克里姆林宮門外的練馬場成了政府的車庫，儘管大部分官員乘坐的都是從平民那裏徵用的雪橇和四輪馬車。<sup>224</sup>斯維爾德洛夫的門徒、斯莫爾尼宮衛戍司令帕維爾·馬爾科夫成了克里姆林宮新的衛戍司令，他開始把修士修女們清理出救世主門內的男女修道院。馬爾科夫還佈置了列寧的辦公室，找了裁縫給政要提供衣服，開始儲存食物。<sup>225</sup>在克里姆林宮騎兵大樓從前騎兵司令住的地方（現在分隔開了），列寧得到了一個帶有兩間房的套房作為住所。托洛茨基和斯維爾德洛夫也搬進了騎兵大樓。「列寧和我就住在對門，共用一個餐廳，」托洛茨基後來寫道，並吹噓說，「列寧和我在走廊裏一天要碰面幾十次，還互相串門，商量事情。」（突然間，他們可以吃到很多當時已停止出口的紅魚子醬。）<sup>226</sup>到1918年底，又有大約1,800人（包括家屬）住進了克里姆林宮。

斯大林也加入了空間爭奪戰。他打算給民族事務人民委員部佔下西伯利亞大飯店，但最高國民經濟委員會已捷足先登。（「這是極少數斯大林吃虧的情況之一」，佩斯特科夫斯基溫和地說。）<sup>227</sup>結果，斯大林得到了幾幢私人的單門獨院的小房子，那是契卡搬到保險公司大樓後留下的。與此同時，就在遷都前，2月底或3月初，他似乎同16歲的娜捷施達·「娜佳」·阿利盧耶娃（Nadezhda “Nadya” Alliluyeva）結了婚，阿利盧耶娃的父親、熟練工人謝爾蓋·阿利盧耶夫革命前在梯弗利斯和聖彼得堡曾經長期為斯大林提供避難的地方。<sup>228</sup>她還是個孩子，而且特別真誠。（「在彼得格勒真的很餓，」在快嫁給斯大林之前，她寫信給另一個布爾什維克的妻子說，「他們每天只發八分之一磅的麵包，有一天甚麼也沒發。我甚至詛咒過布爾什維克。」）<sup>229</sup>她的親戚們注意到，夫妻倆在婚姻最初的「蜜月」階段就開始吵架了。<sup>230</sup>斯大林給她寫信用的是昵稱（「*ty*」），

而她用的是正式稱呼（「*ты*」）。\* 他讓她在部裏做自己的秘書（第二年，她調到列寧的秘書處並且入了黨）。<sup>231</sup> 由於某種原因，夫妻倆在克里姆林宮沒有和列寧、托洛茨基以及斯維爾德洛夫一起住在騎兵大樓，而是住在為莫斯科大克里姆林宮提供服務的一座不太起眼的三層輔樓裏。他們的房間是在二樓僕人住的地方，在所謂的「小姐走廊」，有三扇不透光的窗子，新地址是共產主義大街2號。<sup>232</sup> 斯大林向列寧反映公用廚房和外面汽車的噪聲太大，要求在晚上11時過後，禁止克里姆林宮的汽車駛過拱門，因為從拱門開始就是生活區（這或許表明，斯大林當時還不像後來那樣患有失眠症）。<sup>233</sup> 同列寧和斯維爾德洛夫一樣，斯大林在帝國參政院大樓也有一間政府辦公室，但這位格魯吉亞人很少過去。

### 最嚴峻的日子：1918年春天

265 當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條約在名義上結束了東線的戰爭狀態的十天以後，德軍佔領了遙遠的黑海岸邊的敖德薩。從次日即3月14日開始，全俄蘇維埃第四次代表大會在莫斯科召開，目的是正式批准這一和約。此前在一片「猶大……德國奸細！」的吵嚷聲中，蘇維埃中央執行委員會已經通過表決，建議批准和約——表決只不過是斯維爾德洛夫操縱的結果，即使這樣，也只是勉強通過（投棄權票和反對票的佔多數）。<sup>234</sup> 在代表大會上，和約能不能得到批准也令人擔憂。「假如兩個朋友夜間在一起走路，突然遭到十個人的襲擊，」列寧試圖同代表們講道理，「如果其中一個人被壞蛋們攔住了，另外一個人怎麼辦呢？他不能去援救；如果他跑掉，能說他是叛徒嗎？」<sup>235</sup> † 臨陣脫逃，這根本不能說服人。不過，在有表決權的1,232名代表中——其中布爾什維克795名，左派社會革命黨人283名——有784人投票贊成批准和約，261人反對，剩下的大約175人投了棄權票或沒有投票。<sup>236</sup> 「左派共產主義者」

\* 編註：「*ты*」和「*вы*」均為俄語中的第二人稱代詞，前者用於指代家人和好友，後者則是正式稱呼。

† 譯註：《列寧全集》第34卷，第98頁。

投了棄權票。但布爾什維克的初級合夥人、左派社會革命黨人都投了反對票，宣佈自己的黨「不受和約中條款的約束」並且退出了人民委員會（兩個月前，他們剛剛參加人民委員會）。列寧在投票前甚至沒敢透露和約的全部內容。「要求我們批准和約，可我們有些人連和約文本都沒有看到，至少無論是我還是我的同志都沒有看到，」孟什維克領導人尤利·馬爾托夫指責說，「你們知道你們簽訂的是甚麼嗎？我說的不是……秘密外交！」<sup>237</sup> 有些重要的情況馬爾托夫還不知道：列寧瞞着蘇維埃代表大會的代表，授權托洛茨基與駐俄國的美、英、法代表們密商，想要得到協約國的保證，支持抗擊德國人，為此，列寧已經答應，想辦法不讓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條約獲得通過。

仍然把列寧和托洛茨基看作德國奸細的協約國政府沒有理睬這一建議。<sup>238</sup> 但英國海軍的一個中隊，一支象徵性的力量，已於3月9日在俄國西北（北冰洋）海岸的港口摩爾曼斯克登陸，目的很明確，就是要反擊威脅到俄國摩爾曼斯克鐵路和軍用倉庫的德國以及芬蘭的軍隊。從更廣的角度來說，英國人和法國人想在東線重燃戰火，不讓德國把東線部隊調往西線。隨着同盟國開始佔領並榨取烏克蘭的資源，這一願望變得非常強烈。換言之，英國人的干涉一開始不是為了推翻布爾什維主義，而是為了削弱同盟國剛剛獲得的軍事優勢。<sup>239</sup> 但起初在很大程度上是為了不讓德國人奪取俄國的軍用倉庫而採取的先發制人的行動，隨着時間的推移，變成了一場投入不足的戰役，以對抗想像中的共產主義對英屬印度的威脅。<sup>240</sup>

就列寧和托洛茨基而言，他們起初是歡迎協約國軍隊在俄國登陸以抗衡德國的。在1918年4月2日的人民委員會會議上，由於德國人即將佔領哈爾科夫，斯大林建議改變政策，同烏克蘭中央拉達建立反德軍事同盟——兩個月前，布爾什維克剛剛推翻了烏克蘭中央拉達，一個月前，德國又將其恢復。<sup>241</sup> 托洛茨基突然改變立場與協約國代表談判，斯大林的建議是對此的補充。托洛茨基的談判除了想讓協約國幫助培訓鐵路操作人員和提供設備外，還想讓他們幫助組織和訓練剛成立的紅軍。三天後，日軍以「保護」日本國民為由，在符拉迪沃斯托克登陸。列寧和托洛茨基強烈反對——這是不請自來的武裝干涉。

急於打破英日同盟的德國一度慫恿日本干涉俄國。日軍登陸帶來了一種可能性：基於共同利益，從東西兩翼包圍並佔領俄國，進而使俄國處於殖民依附的地位。儘管其階級分類有種種迷霧，列寧十分清楚德日有可能結盟，就像他明白英德之間以及美日之間的國家利益不可調和一樣。<sup>242</sup>但列寧竭力勸說英國和法國——遙遠的美國就更不用說了——同共產主義俄國結盟，以對付德國和日本。1917年的分裂沒有讓蘇俄的戰略地位與帝俄的戰略地位有甚麼不同。但過去和現在的重大區別在於，帝俄的部分領土已經分離出去，而且會被敵對國家用來對付俄國。

斯大林此時正在忙於處理這些失地所帶來的問題。1918年3月19日，他寫信給高加索的布爾什維克，敦促他們加強巴庫的防禦。一週後，他在《真理報》上發表文章，指責非布爾什維克的左翼分子（〈戴着社會主義假面具的南高加索反革命分子〉）。<sup>243</sup>3月30日，斯大林通過休斯電報機對塔什干蘇維埃負責人談到突厥斯坦的形勢發展。4月3至4日，《真理報》刊登了對他的採訪，談到他正在制訂的憲法草案，該草案計劃採取聯邦制結構並將蘇維埃俄國更名為「俄羅斯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Russian Soviet Federated Socialist Republic, RSFSR）。<sup>244</sup>4月9日，斯大林給喀山、烏法、奧倫堡以及塔什干的蘇維埃發了一封電報，電報刊登在《真理報》上，指出自決原則已經「失去了革命意義」，因此可以撤銷了。4月29日，人民委員會任命斯大林為俄羅斯社會主義聯邦蘇維埃共和國全權代表，與烏克蘭中央拉達談判簽訂和約。同一天，德國人在東部又臨時變卦，背叛條約夥伴烏克蘭中央拉達，扶持了一個由帕夫洛·斯科羅帕茨基將軍領導的烏克蘭傀儡政權，並特意用了一個古老的名字「蓋特曼」。但斯科羅帕茨基的暴政，以及奧地利和德國的佔領，激起了農民的暴動和多方的混戰。<sup>245</sup>「當德國軍隊進入烏克蘭時，他們發現一切都亂了套，」一名德國官員報告說，「相鄰的村

267

\* 譯註：《斯大林全集》第4集，第47-62頁。

† 譯註：《列寧全集》中文版譯為「俄羅斯社會主義聯邦蘇維埃共和國」，《斯大林全集》中文版譯為「俄羅斯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在本書中，除直接引用《斯大林全集》中文版內容外，一律採用《列寧全集》中文版譯名。

子，外面挖了壕溝，為了爭奪從前地主的土地而互相攻打，碰到這樣的事情一點都不稀奇。」<sup>246</sup> 牽制了近50萬佔領軍的承諾中的糧食儲備沒有兌現。

斯大林在烏克蘭組織的支持布爾什維克的行動幹得也不成功，但是，表明他變得越來越突出而且重要的一個信號——同時也表明尤利·馬爾托夫放棄針對列寧——就是馬爾托夫舊事重提，指責斯大林是轟動一時的1907年梯弗里斯郵車大劫案和1908年輪船搶劫案的同謀。馬爾托夫在孟什維克刊物上撰文指出，斯大林「曾經因為和剝奪行動有牽連而被黨組織開除」。<sup>247</sup> 斯大林向革命特別法庭控告馬爾托夫誹謗，並在4月1日的《真理報》上否認那些罪名，說「我斯大林從來沒有被傳喚到任何黨組織的紀律委員會面前。特別是，我以前從來沒有被開除過」。他還以強烈的諷刺口吻說道：「除非手中握有證據，否則人們是沒有權利提出馬爾托夫提出的那些指控的。僅僅根據道聽途說就中傷別人是

不誠實的。」<sup>248</sup> 4月5日，特別法庭在滿滿一屋子人面前開庭了。在要求把案件移交給有陪審團參加的民事法庭被拒絕之後，馬爾托夫繼續採取攻勢，請求給自己搜集證據的時間。因為當初為了保密，黨沒有留下文字記錄，但是有證人可以支持他的說法，所以他要從一些格魯吉亞的布爾什維克那裏搜集書面證詞，比如說伊西多爾·拉米施維里，他在1908年負責調查斯大林的案子：參與了1908年的輪船搶劫案並差點兒將一名知道斯大林底細的工人打死。斯大林反對，他說沒有足夠的時間等候證人。不過，法庭依然把起訴馬爾托夫的程序推遲了一週。據有些人的說法，孟什維克鮑里斯·尼古拉耶夫斯基前往高加索搜集證據，帶回了拉米施維里和席爾瓦·吉布拉澤等人的書面證詞。然而，一回到莫斯科，據說尼古拉耶夫斯基就發現，該案所有其他的記錄都不見了。斯維爾德洛夫和列寧——他欽佩馬爾托夫，儘管他們之間存在分歧——幫助了結了此次審查。<sup>249</sup> 1918年4月18日，特別法庭裁定馬爾托夫犯有誹謗罪，但只是對他進行了訓誡；這個月還沒有結束，裁決就被取消了。<sup>250</sup> 5月11日，在幕後督辦馬爾托夫案件的斯維爾德洛夫，倒是讓蘇維埃中央執行委員會批准關閉了那份孟什維克報紙，理由是總在刊登虛假信息。<sup>251</sup> 但斯大林做過強盜，這一點人們不會忘記。<sup>252</sup>

## 捷克斯洛伐克軍團的叛亂

阿列克謝耶夫將軍，尼古拉二世的前總參謀長和後來的最高總司令，在1917年2月之後組建過一個秘密的軍官網絡；在布爾什維克政變後，他把他們召集起來，成立了新切爾卡斯克頓河哥薩克中的「志願軍」。<sup>253</sup> 志願軍起初只有400至500名軍官。科爾尼洛夫也在其中，而他本人就有哥薩克背景。在從莫吉廖夫附近的監獄逃跑後，他喬裝打扮，穿着農民的破衣服，拿着偽造的羅馬尼亞護照跑到南方。<sup>254</sup> 61歲的阿列克謝耶夫患了癌症，便把軍事指揮權交給48歲的科爾尼洛夫，儘管兩人互不相容。從1918年2月中旬開始，由前沙皇軍官、哥薩克和士官生組成的科爾尼洛夫軍隊屢遭重創。為了尋找避難所，他率領幾千名志願軍冒着大雪，穿過荒涼的草原，朝東南的庫班方向進發，除了搶劫所得，幾乎沒有可以禦寒充饑的東西。被俘的志願軍的眼睛會被挖出來，而他們也以眼還眼。（「越是恐怖，越是要爭取勝利！」科爾尼洛夫勉勵說。）<sup>255</sup> 經過可怕的「冰雪行軍」——八天走了700英里——疲憊不堪的倖存者終於到達庫班的首府葉卡捷琳諾達爾附近，結果發現，佔據這裏的不是哥薩克，而是具有數量優勢的紅軍。一名將軍（卡列金）已經開槍自殺。1918年4月12日，科爾尼洛夫也被打死了，當時，一發炮彈擊中了他設在農舍的司令部，他被埋在坍塌的天花板下面。「一團白灰騰了起來」，一名參謀在回憶時提到科爾尼洛夫的房間；當他們把將軍的身子翻過來，看到彈片扎進了他的太陽穴。<sup>256</sup> 白軍很快就逃走了，擁護布爾什維克的部隊把他的殘屍挖出來，拖到葉卡捷琳諾達爾的大廣場，放在垃圾堆上燒掉了。<sup>257</sup> 「可以有把握地說，」列寧興奮地誇口說，「內戰基本上已經結束。」<sup>258†</sup> 實際上，俄國內戰才剛剛開始。

269

科爾尼洛夫並不是當月死去的唯一值得關注的人物：加夫里洛·普林西普在哈布斯堡的泰雷津要塞監獄（未來納粹的特雷津施塔得）去

\* 編註：約1,127公里。

† 譯註：《列寧全集》第34卷，第218頁。

世了，他因為在薩拉熱窩刺殺了奧地利皇儲而要在那裏服刑20年。營養不良、疾病和胳膊截肢所引起的失血，讓23歲的結核病人普林西普變得虛弱不堪，死時體重只有88磅\*。七百歲的哈布斯堡帝國只比他多活了幾個月。<sup>259</sup>

至於俄國內戰，它是在人們完全沒有料到的地方突然發生的。俄國在世界大戰中俘獲了大約200萬同盟國的囚徒，大部分是奧匈帝國的臣民。<sup>260</sup> 世界大戰後期，由於預估到要是協約國獲勝，就會有一個新的祖國——捷克斯洛伐克，大約4萬名戰俘和逃兵組建了捷克斯洛伐克軍團，為沙皇服役並參加了克倫斯基1917年的六月攻勢。1917年12月，他們被交給法國人指揮。<sup>261</sup> 托洛茨基打算利用這些士兵（他們傾向於社會民主黨）作為新建紅軍的核心，但巴黎方面堅持將軍團士兵運往西線的法國。<sup>262</sup> 俄國西部最近的港口阿爾漢格爾斯克（位於彼得格勒以北750英里†處）3月份還處於冰封狀態，因此，要將這支武裝部隊經西伯利亞送到符拉迪沃斯托克，再從那裏乘船前往法國。<sup>263</sup> 但是德國按照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條約的規定，要求布爾什維克阻止並解除捷克斯洛伐克軍團的武裝。捷克斯洛伐克軍團還沒有趕到西西伯利亞的鄂木斯克的時候，協約國方面又要它掉頭前往西北的摩爾曼斯克和阿爾漢格爾斯克，趕走在那附近的德國人。同時，日本人突然變卦，拒絕用船把軍團士兵從符拉迪沃斯托克運往西線，這樣既可以幫德國人一把，又可以把西伯利亞留給自己。軍團士兵只想同奧地利人以及德國人作戰，對於如此的反覆勢必十分警惕。在充滿懷疑的氣氛中，1918年5月14日，在（烏拉爾東部的）車里雅賓斯克，當一趟載有奧匈帝國的匈牙利戰俘的俄國列車停靠在捷克斯洛伐克軍團乘坐的列車旁邊時，騷亂爆發了。謾罵聲不斷。一名匈牙利人扔出金屬物件，砸傷了一名捷克人；捷克人襲擊了那趟列車，吊死了扔東西的那個匈牙利人。車里雅賓斯克的蘇維埃在調查時拘留了幾名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5月25日，托洛茨基打電報說：「要把所有在鐵路上發現的武裝的捷克斯洛伐

---

\* 編註：約40公斤。

† 編註：約1,207公里。



270 克人都就地槍決。」<sup>264</sup>這項愚蠢的命令永遠也不會執行。但是，捷克斯洛伐克軍團因為懷疑布爾什維克想把他們交給德國人，便佔領了車里雅賓斯克，然後又接連佔領了奔薩（5月29日）、鄂木斯克（6月7日）、薩馬拉（6月8日）、烏法（7月5日）、辛比爾斯克（7月22日）等，直到控制了整個跨西伯利亞大鐵路以及伏爾加河流域的大部分地區，面積在從前俄羅斯帝國的三分之二以上。<sup>265</sup>他們征服的領土比世界大戰中的任何一方都多。<sup>266</sup>

捷克斯洛伐克軍團原本並沒有想同布爾什維克開戰或者推翻他們，但他們帶有自衛性質的佔領造成了權力真空，從1918年5月到6月，整個伏爾加河地區和西伯利亞有十幾個反布爾什維克團體宣示自己的存在。<sup>267</sup>在德國已經佔領和尚未佔領的沙俄土地上，也紛紛成立政府，這其中包括高加索，英國人派了一支遠征軍在那裏的油田附近登陸。德國人佔據了烏克蘭，捷克斯洛伐克人佔據了西西伯利亞，哥薩克佔據了頓河流域，志願軍佔據了庫班，在這樣的形勢下，布爾什維克所在的俄國中心地區的糧食已經吃完，而秋收還早着呢。5月29日，人民委員會任命斯大林為特命南俄全權代表，任務是為正在挨餓的兩個首都莫斯科和彼得格勒籌措糧食。「他裝備了一整列火車，」佩斯特科夫斯基回憶說，「他帶了休斯電報機、飛機、小額現金、武裝小分隊和一些專家。我陪他去了車站。他的情緒很高，對勝利充滿信心。」<sup>268</sup>6月6日，斯大林抵達伏爾加河畔的察里津。如果反布爾什維克武裝佔領了察里津，那他們就可以切斷所有的糧食供應，並建立起從烏克蘭到烏拉爾和西伯利亞的聯合戰線。<sup>269</sup>這項任務牽涉甚廣，大大超出與各個非俄羅斯民族打交道的職能，而斯大林在布爾什維克政權中扮演的角色也勢必會發生改變。但與此同時，由於捷克斯洛伐克軍團的叛亂，布爾什維克當時又沒有真正的軍隊，這個政權能不能生存下去，似乎越來越成問題了。

### 並非政變

列強當中只有德國承認布爾什維克政權，並且在莫斯科的一處豪華私人宅邸設有事實上的大使館。那處宅邸在阿爾巴特街附近一條僻靜

的巷子裏，從前屬於一位德國糖業巨頭。1918年4月23日，47歲的威廉·米爾巴赫伯爵 (Wilhelm Mirbach，生於1871年) 帶着確保俄國不與協約國恢復友好關係的使命，作為大使回到莫斯科——沙皇時期，他曾在大使館工作，後來又在彼得格勒為交換戰俘的問題同布爾什維克談判。米爾巴赫一直報告稱，布爾什維克政權「不會長久」，只要派德軍借道愛沙尼亞施加「一點點軍事壓力」，就可以將其推翻。這位伯爵公然向君主派集團獻媚，認為他們可以取代布爾什維克，而且他的行為舉止就好像莫斯科已經在德國的佔領之下。<sup>270</sup> 大部分布爾什維克以同樣的方式作出了回應。「德國大使來了，」《真理報》寫道，「不是作為友好民族勞苦階級的代表，而是作為一幫軍人的全權代表，他們極端傲慢，到處殺戮、強姦和搶掠。」<sup>271</sup> 5月1日國際勞動節，德軍推進到克里米亞的塞瓦斯托波爾海軍基地，那裏是黑海艦隊的司令部。5月8日，德國人佔領了頓河盆地的羅斯托夫，在那裏，他們支持逐漸聚集起來的反布爾什維克武裝。擁護布爾什維克的武裝不得不撤離，他們設法將沒收的金幣、珠寶以及其他貴重物品運往莫斯科，一共裝了三個木箱、一個金屬匣子和六隻皮口袋。<sup>272</sup> 兩天後，在一次只有數人參加的中央委員會會議上，格里戈里·索柯里尼柯夫，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條約的簽字人，認為德國在布列斯特和約簽訂後發動進攻違反了和約，因而強烈建議與英法重建正式的同盟關係。<sup>273</sup>

271

除了波蘭，德國還佔領了從前沙皇政權的17個省。流言四起，說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條約存在秘密條款，說德國人對蘇維埃政府的政策橫加干涉，報紙還警告說德國人即將佔領莫斯科和彼得格勒。實際上，德國指揮部當時的確認為，集中力量向這兩個首都突然發起進攻是可行的。然而就在此時，1918年5月中旬，當德國人距離彼得格勒不到100英里\* (在納爾瓦)、距離莫斯科不到300英里† (在莫吉廖夫) 的時候，他們停了下來。<sup>274</sup> 甚麼原因？列寧對柏林持續的綏靖起了作用。同樣重要的是，德國的統治集團認為入侵是多餘的：布爾什維主義看來

---

\* 編註：約161公里。

† 編註：約483公里。

是氣數已盡。5月16日在克里姆林宮受到列寧接見的米爾巴赫在當天向柏林報告說，那位布爾什維克領袖「一直保持着無窮的樂觀精神」，但是，米爾巴赫接着又說，列寧「也承認，他的政權雖然完好無損，可敵人的數量增加了……他的自信首先是基於這樣的事實，即只有執政黨掌握了有組織的權力，而其他（政黨）只是在拒絕現政權這方面達成了一致」。在米爾巴赫5月16日關於列寧困境的報告上，德皇威廉二世寫道：「他完了。」<sup>275</sup>

272 在這種背景下，雅科夫·斯維爾德洛夫試圖推動共產黨的復興——它似乎正在衰退。1918年5月18日，他發佈了一項決議，強烈主張「應當在某種程度上把我們的工作重心轉移到黨的建設上來」，並明確要求「所有黨員，不管其工作和職務如何，都要直接參加到黨組織中，並且不應背離相應的中心黨組織下達的黨的指示」。<sup>276</sup> 然而服從中心黨組織仍然很難做到。與此同時，列寧的策略是，讓柏林方面注意分析成本與收益。「如果德國商人明白了靠戰爭從我們這裏甚麼也得不到（因為我們會把一切都燒掉），而且通過經濟往來得到了好處，那麼您的政策將會繼續取得成績。」1918年6月2日，他吩咐即將被派往柏林的新任蘇俄使節阿道夫·越飛說，「我們可以給德國人提供些原料。」<sup>277</sup> 但是對於已經把烏克蘭這個糧倉納入囊中的德國政府來說，大獎依然是巴黎。德國駐莫斯科大使6月4日警告柏林說，布爾什維克有可能撕毀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條約（「這些人的行動絕對不可預測，尤其是在絕望的時候」），然而這位大使傳遞的主要信息是，布爾什維主義已經奄奄一息（「饑荒正在向我們襲來……燃料儲備越來越少……布爾什維克非常不安，很可能是感覺到他們的末日快到了，所以老鼠們開始逃離這艘正在下沉的船隻……他們也許是想逃到下諾夫哥羅德或葉卡捷琳堡……」）。<sup>278</sup> 德國外交人員此時正在同沙皇政權和臨時政府中一些過氣的政治人物接觸，商量復辟事宜。<sup>279</sup> 6月25日，在給柏林的另外一份報告中，米爾巴赫再次預言布爾什維主義即將覆滅。<sup>280</sup>

• 譯註：《列寧全集》第48卷，第170頁。

與此同時，布爾什維克在柏林的做法同米爾巴赫在莫斯科的專橫跋扈如出一轍。因為有了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條約，錘子和鐮刀的旗幟飄揚在菩提樹下大街7號，即從前沙皇政府的大使館。越飛這個富商的兒子，是個狂熱的「左派共產主義者」，拒絕向德皇遞交國書。他在大使館內宴請斯巴達克同盟\*和德國其他的左翼分子，並給德國社會民主黨輸送金錢，公然打算推翻德意志帝國政權。蘇俄大使館集中了幾百名工作人員，包括一些被列為隨員的鼓動者，他們分頭參加德國社會主義組織的會議。越飛還散發武器，而那些武器往往是通過外交郵袋弄進來的。<sup>281</sup> 6月28日，魯登道夫將軍再次敦促把布爾什維克趕出俄國，那樣德國就可以扶植傀儡政權。但這根本沒有考慮到，德國人即使是在西線也缺少後備部隊。德國外交部的頭腦比較冷靜，反對這種荒唐的建議：布爾什維克已經支持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條約了，柏林還需要甚麼呢？而且，外交部人員還說，俄國國內各種反布爾什維克的力量並不隱瞞他們對協約國的同情。魯登道夫用甚麼樣的親德集團來代替布爾什維克呢？德皇沒有同意魯登道夫的請求，甚至還允許布爾什維克把他們的許多拉脫維亞步兵調到東部的伏爾加河流域，去打擊國內的敵人。<sup>282</sup> 列寧對德國的忠誠得到了回報。<sup>283</sup> 但是在莫斯科，人們對德皇拒絕魯登道夫的建議，反對入侵俄國以結束布爾什維主義的統治並不知情。在莫斯科，人們看到的是專橫跋扈的米爾巴赫，那是同德國軍國主義可惡的夥伴關係的實實在在的象徵，在這種情況下，左派社會革命黨人覺得必須有所行動。

273

左派社會革命黨人因為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條約而退出了人民委員會，但並沒有放棄他們在契卡的重要職務，也沒有退出蘇維埃中央執行委員會。1918年6月14日，布爾什維克從中央執行委員會開除了幾名當選的孟什維克和右派社會革命黨人，並且關停了他們的報紙。「馬爾托夫一邊用他那結核病人的病怏怏的嗓音咒罵着『獨裁者』、『波

---

\* 編註：由卡爾·李卜克內西、羅莎·盧森堡等德國社會民主黨左派創立，是反對帝國主義戰爭，主張重建工人階級的國際組織。原稱「國際派」，因古羅馬奴隸起義領袖斯巴達克斯而得名。

拿巴分子』、『篡位者』和『搶奪者』，一邊抓過大衣想要穿上，但他的手抖得厲害，套不進袖子，」有位在場的布爾什維克回憶說，「列寧面色蒼白，站在那裏看着馬爾托夫。」但一位左派社會革命黨人突然大笑起來。<sup>284</sup> 這個分離出來的小黨聲稱擁有超過10萬名相對堅定的黨員。<sup>285</sup> 這同布爾什維克的30萬黨員比起來要少很多，但在一個約1.4億人口的國家，兩者都微不足道。布爾什維克雖然佔有數量優勢，但許多同時代的人希望，或者說擔心，在6月28日即將召開的蘇維埃第五次代表大會上，左派社會革命黨人會憑藉其越來越受人支持的反布爾什維克立場，在當選代表中佔據多數。在左翼的社會主義激進派中，除了布爾什維克之外，有沒有別的選擇呢？

左派社會革命黨中央委員會決心在代表大會上提出一項決議，譴責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條約，號召採取（堂吉訶德式的）游擊戰爭，就像在烏克蘭開展的那種反抗德國佔領的游擊戰爭。<sup>286</sup> 6月24日，斯維爾德洛夫將代表大會的開幕時間推遲到7月初，屆時他就可以炮製出更多的布爾什維克代表。（斯維爾德洛夫還藉故將所有孟什維克和右派社會革命黨人開除出蘇維埃中央執行委員會。）6月28日至7月1日，左派社會革命黨人召開第三次黨代表大會，決定和德帝國主義進行鬥爭，保衛蘇維埃政權，同時取消人民委員會，由蘇維埃執行委員會進行統治。<sup>287</sup> 與此同時，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斯維爾德洛夫，在工人選民相對於農民（左派社會革命黨人的支持者）已有的額外權重之外，果真炮製出幾百名可疑的蘇維埃代表。7月4日的晚上，代表大會在莫斯科大劇院開幕，與會代表中有表決權的1,035人，其中共產黨代表678人，左派社會革命黨代表269人，其他的88人基本上屬於無黨派代表。<sup>288</sup>（左派社會革命黨和共產黨各有約200名沒有表決權的代表，加上他們，與會代表達1,425人，其中三分之二年齡在20到30歲之間；與會代表過去由於

<sup>284</sup> 譯註：按照《列寧全集》中文版第34卷第196條註釋的說明，出席1918年7月4至10日全俄蘇維埃第五次代表大會的有1,164名有表決權的代表，其中布爾什維克773名，左派社會革命黨人353名，最高綱領派17名，無政府主義者4名，孟什維克國際主義派4名，其他黨派成員3名。烏克蘭、拉脫維亞和外高加索等被佔領區也有代表出席。

政治原因而在監獄裏度過的時間加起來總共有1,195年。) <sup>289</sup> 明顯造假決不是引發反布爾什維克憤怒情緒的唯一原因：來自烏克蘭、拉脫維亞和南高加索的代表講述了德帝國主義在佔領區的恐怖行徑和對資源的掠奪。「打倒米爾巴赫！」、「打倒布列斯特和約！」左派社會革命黨人高呼，而德國大使作為嘉賓就坐在前面的包廂裏。被激怒的托洛茨基反駁說，所有想要重新挑起與德國的戰爭的「外國帝國主義間諜」，都「該就地槍斃」。<sup>290</sup>

左派社會革命黨最受關注的領導人瑪麗亞·斯皮里多諾娃，過去力主同布爾什維克聯合，但對她來說，最後的那根稻草已經在1918年6月壓了下來，當時布爾什維克派出了武裝小分隊，到農村「徵」糧。她怒火中燒，公開批評布爾什維克的政策。<sup>291</sup> 列寧明確地講：「我們把你們的土地社會化綱領載入我們〔1917年〕10月26日的法令，也許是個錯誤。」<sup>292</sup> 在布爾什維克靠弄虛作假造成的多數否決了左派社會革命黨人提出的譴責對德和約的決議時，列寧故意挑逗左派社會革命黨人：「假如有人願意退出蘇維埃代表大會的話，那就請便吧！」<sup>293</sup>† 但他肯定會大吃一驚：左派社會革命黨人的領導層知道，反對布列斯特和約的決議有可能無法通過，所以決定喚起民眾，採取恐怖行動，「打擊德帝國主義張揚跋扈的代表」，疏遠德國與蘇俄的關係。<sup>294</sup> 就這樣，如同第二次代表大會成了布爾什維克政變的誘因，蘇維埃第五次代表大會成了左派社會革命黨人採取行動的誘因。

7月4日晚上，斯皮里多諾娃給20歲的雅科夫·布柳姆金(Yakov Blyumkin)下達了任務，要暗殺德國大使米爾巴赫伯爵。<sup>295</sup> 布柳姆金，敖德薩猶太店員之子，1918年4月來到莫斯科，像許多左派社會革命黨人一樣在契卡工作，是當時的大約120名僱員(包括司機和外勤人員)之一。<sup>296</sup> 他在反間諜部門工作，德國大使館也在其職責範圍內。7月5日，斯皮里多諾娃在莫斯科大劇院的主席台上，指責布爾什維克斷送革命，而且不顧列寧在她身後發出的嘲笑聲，發誓說，她會像她在沙皇時代做

275

\* 譯註：《列寧全集》第34卷，第478頁。

† 譯註：《列寧全集》第34卷，第463頁。

過的那樣，「重新拿起手槍和手榴彈」。<sup>297</sup> 會場大亂！一顆手榴彈在莫斯科大劇院樓上的某一層爆炸，但主持大會的斯維爾德洛夫阻止人們湧向出口。<sup>298</sup>

第二天，按照計劃，蘇維埃代表大會要在當天下午晚些時候繼續開會，布柳姆金在攝影師尼古拉·安德烈耶夫(Nikolai Andreyev)的陪同下，帶着費利克斯·捷爾任斯基簽發的證件來到德國大使館，那樣，他們就有權請求緊急會見大使。在大使館，著名哲學家同時也是外交官的一等秘書庫爾特·里茨勒(Kurt Riezler)表示，他會代表大使接見他們。(里茨勒是德國外交部的重要人員之一，1917年應對過把列寧用鉛封列車運送回國的秘密談判。)<sup>299</sup> 然而米爾巴赫下來接見了這兩人；布柳姆金從公文包裹拿出勃朗寧手槍，連開三槍沒有打中。當米爾巴赫逃走時，那位攝影師從背後向大使射擊——證據顯示，是擊中了他的後腦。布柳姆金扔了一顆炸彈，然後，兩位刺客跳出窗外，上車逃走了。下午3:15左右，米爾巴赫身亡。<sup>300</sup>

斯皮里多諾娃和左派社會革命黨人希望政治謀殺會挑起德國的武力回應，迫使布爾什維克重新開戰。代表大會要在下午4時繼續，當列寧正在同托洛茨基、斯維爾德洛夫以及斯大林商量對策的時候，克里姆林宮的電話響了。邦契—布魯耶維奇傳來德國大使館遇襲的消息；列寧命令他趕往現場。<sup>301</sup> 拉狄克、新任外交人民委員格奧爾吉·契切林，還有捷爾任斯基也去了。德國人要找列寧。這位布爾什維克領袖下午5時左右同斯維爾德洛夫一起趕到大使館，瞭解謀殺的詳情並致哀悼之意。德國大使館的武官覺得列寧看上去嚇壞了。<sup>302</sup> 或許是害怕德國為了報復而發動進攻？

列寧現在知道，正是那個為了保衛布爾什維克革命而成立的組織——契卡——捲入了反對他們的陰謀。布柳姆金放下了他的證件，於是，捷爾任斯基沒帶衛兵便驅車前往三聖巷的契卡兵營，之前有人在那裏見到了布柳姆金。到了那裏，契卡首腦發現了左派社會革命黨的整個領導層，他們解釋說布柳姆金是按照他們的命令行動的。「事已至此，」他們告訴捷爾任斯基，「布列斯特和約無效了；同德國的戰爭是不可避免的……就讓它像在烏克蘭一樣在這裏開始吧，我們會轉入地

下。你們可以繼續掌權，但不能再聽命於米爾巴赫了。」<sup>303</sup> 儘管捷爾任斯基在布爾什維克中央委員會會議上反對過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條約，但仍然下令把他們全都抓起來；結果他們反倒把捷爾任斯基扣為人質。<sup>304</sup>

聽到契卡首腦被抓的消息，列寧「面色蒼白，就像他在發怒或事態陡生變故時所一貫表現的那樣」，據邦契—布魯耶維奇說。<sup>305</sup> 列寧召來契卡的馬丁·拉齊斯 (Mārtiņš Lācis)，一個30歲的拉脫維亞人，出生時名叫亞尼斯·蘇德拉布斯 (Jānis Sudrabs)，讓他頂替捷爾任斯基。<sup>306</sup> 當拉齊斯出現在大盧比揚卡街的契卡總部時——那裏像往常一樣，由左派社會革命黨人控制的契卡戰鬥小分隊守衛——水兵們要向他開槍。只是由於捷爾任斯基的副手、人稱亞歷山德羅維奇的左派社會革命黨人彼得·亞歷山德羅維奇·德米特列夫斯基 (Pyotr Alexandrovich Dmitrievsky) 說情，才救了拉齊斯一命。<sup>307</sup> 要是拉齊斯，或許還有捷爾任斯基被「就地槍斃」(用托洛茨基在兩天前發怒時的話說)，那布爾什維克政權或許就破產了。事實上，列寧和斯維爾德洛夫想過放棄克里姆林宮。<sup>308</sup>

由於晚上要繼續召開蘇維埃第五次代表大會，斯皮里多諾娃去了莫斯科大劇院，準備宣佈俄國「從米爾巴赫手裏獲得了解放」。她身着黑色長裙，胸口別着紅色康乃馨，手拿一把鋼製的小勃朗寧手槍。<sup>309</sup> 但會議時間推遲，到處都亂哄哄。那天(7月6日)晚上8時左右，流言四起，說武裝的拉脫維亞人包圍了大劇院。在這種氣氛下，四百多人的整個左派社會革命黨黨團，包括嘉賓在內，都上樓討論局勢去了。布爾什維克黨團撤到了其他區域(有些可能已經被放出劇院)。<sup>310</sup> 「我們當時坐在房間裏等着你們來抓我們，」布哈林告訴某個左派社會革命黨人說，「既然你們沒有，那我們就決定把你們抓起來。」<sup>311</sup> 至於契卡中的左派社會革命黨人，他們派水兵上街，打算抓些布爾什維克人質，而且的確從路過的汽車中抓了二十多個，捷爾任斯基和拉齊斯也還在他們手裏。列寧發現，莫斯科衛戍部隊不準備保衛布爾什維克：大部分士兵要麼保持中立，要麼站在反對德國的左派社會革命黨人一邊。「今天下午3時左右，一個左派社會革命黨人用炸彈炸死了米爾巴赫，」列寧打電報給察里津的斯大林，「這起暗殺事件顯然是符合君主派或英法資本



家利益的。左派社會革命黨人……逮捕了捷爾任斯基和拉齊斯，並且發動反對我們的暴亂。我們今天夜裏就採取無情的鎮壓行動，並向人民說明全部真相：我們正處在〔與德國的〕戰爭的邊緣。」<sup>312</sup> 第二天，斯大林回電說，左派社會革命黨人是「歇斯底里」。<sup>313</sup> 他說得對。

但反擊沒有把握。為了抗擊捷克斯洛伐克人的叛亂，為數很少的靠得住的紅軍部隊，許多都派到了東部。大約在7月6日的午夜，列寧召見拉脫維亞人的最高指揮員、矮壯的約阿基姆·瓦采季斯上校。「克里姆林宮一片漆黑，空蕩蕩的」，瓦采季斯在回憶時提到了人民委員會的會議室，最後，列寧在那裏出現了，並問道：「『同志，我們能堅持到早晨嗎？』」問了這個問題後，列寧就一直盯着我。<sup>314</sup> 瓦采季斯大吃一驚。他同情左派社會革命黨人，本來至少可以決定保持中立，那樣一來，布爾什維克或許就在劫難逃了。但他自己就同德國人打過仗而且傷亡慘重，那是在1916年聖誕節期間，所以，重新開戰根本沒有吸引力。（無論如何，俄國根本沒有軍隊可以重新開戰。）再說，他希望德意志帝國政權會像以前俄國一樣，因為戰爭而垮台，既然如此，為甚麼要白白犧牲士兵的生命呢？瓦采季斯並不知道的是，列寧連他也不信任：那天夜裏接見他的半小時前，列寧叫來了派到拉脫維亞人那裏的兩名政治委員，得到保證說瓦采季斯是忠誠的。

當時也不清楚，拉脫維亞普通士兵願不願意為布爾什維克而戰。7月6日，左派社會革命黨人一直在等待米哈伊爾·穆拉維約夫(Mikhail Muravyov，生於1880年)中校的到來，他是左派社會革命黨人中的主戰派，俄羅斯人，拉脫維亞步兵的另外一名指揮員，但他沒有出現在首都。<sup>315</sup> 不過，瓦采季斯在見過列寧後，準備在7月7日凌晨趁天沒亮的時候，對左派社會革命黨人實施反擊，但那天剛好是拉脫維亞的民族節日施洗者聖約翰節，該國步兵決定為了慶祝節日到莫斯科郊外的霍迪恩卡遠足，<sup>316</sup> 結果根本沒有拉脫維亞人、赤衛隊或任何人在出發地點集合。<sup>317</sup> 進攻只好等到天亮。契卡武裝部隊是由左派社會革命黨人、

---

\* 譯註：《列寧全集》第48卷，第227-228頁。

前波羅的海艦隊水兵德米特里·波波夫(Dmitri Popov)指揮的；他們駐紮在莫斯科市中心帶有圍牆的基泰哥羅德，總共有600至800人，大部分是水兵。為了攻打他們，瓦采季斯後來聲稱，他集中了大約3,300人(其中俄羅斯人不到500人)。<sup>318</sup> 拉脫維亞人後來說，波波夫的部隊裝備比他們好，有重炮、幾十挺機關槍和四輛裝甲車。「波波夫的手下佔領了一排房屋，」瓦采季斯解釋說，「將其加固為工事。」事實上，波波夫——他的隊伍中除了水兵之外還有許多芬蘭人——一直想着要為己方招募更多戰士，並期待着布爾什維克會要求談判。但瓦采季斯沒有要求談判，而是下令運來了152毫米的榴彈炮，想把波波夫和契卡的據點，甚至連同裏面的捷爾任斯基一起夷為平地。<sup>319</sup> 當炮擊開始給那幢房子以及相鄰的建築物造成毀滅性的打擊時，波波夫及其手下開始逃跑(他們扔下了捷爾任斯基)。對於戰鬥持續的時間有不同的說法(或許是很多個小時，或許是40分鐘)。雙方陣亡十人左右，負傷的約有50人。幾百名左派社會革命黨人被捕。<sup>320</sup> 大約有13人，其中包括斯皮里多諾娃，被送進克里姆林宮的牢房。下午4時，人民委員會自信地宣佈「暴亂……平定了」。<sup>321</sup>

278

契卡對左派社會革命黨人立即採取反政變措施，加強布爾什維克的壟斷地位。<sup>322</sup> 契卡查抄了非布爾什維克報刊的編輯部並砸毀印刷設備。<sup>323</sup> 布柳姆金逃往烏克蘭。但很多被布爾什維克關押的左派社會革命黨人，包括救了拉齊斯一命的亞歷山德羅維奇，未經審判就被立即處決；布爾什維克公開宣佈的槍斃人數大約有200人。<sup>324</sup> 全國各地的左派社會革命黨人絕大多數僅僅是改換門庭，加入布爾什維克黨。與此同時，沒有了左派社會革命黨代表，蘇維埃代表大會在7月9日繼續召開，托洛茨基向代表們詳細報告了「暴動」的情況。<sup>325</sup> 事實上，一個名叫普羅什·普羅相(Prosh Proshyan)的社會革命黨人，大概在7月6日午夜的時候，曾經去電報局宣佈，「我們殺死了米爾巴赫，人民委員會已經被捕」。短期擔任過郵電人民委員的普羅相向全國發出了一系列混亂的電報，其中一封稱社會革命黨是「目前的執政黨」。<sup>326</sup> 但是，除了這次由個人主動採取的行動外，不存在任何左派社會革命黨人的政變。左派社會革命黨的領導層在事變之前和期間已經多次明確地說過，他們

是準備用武力來保衛自己而不是要奪權：他們的暴動是代表蘇維埃政權「反對帝國主義分子」（德國），不是反對布爾什維克。<sup>327</sup>

左派社會革命黨事件與七個月前1917年10月列寧的政變形成了鮮明的對照。就如1917年一樣，1918年夏天，政權也是放在那兒待人奪取：左派社會革命黨人對列寧和布爾什維克的勝算決不低於列寧當初對克倫斯基的勝算。左派社會革命黨人在契卡任職，一度完全控制了契卡。他們通過鼓動工作贏得了大部分衛戍部隊的支持，而且握有克里姆林宮的通行證，包括進入帝國參政院即列寧辦公地點的通行證。<sup>328</sup>但左派社會革命黨人缺少某種關鍵的東西，也就是意志。列寧一心想奪取並掌握政權，而事實證明，他的意志在布爾什維克政變中是決定性的，正如同現在在左派社會革命黨人並非政變的行動中，缺少意志事實上也是決定性的。

列寧曾經無情地追逐個人的權力，儘管不是因為權力的緣故：驅使他的還有通過革命實現社會正義的幻想，以及在他繼續攻擊許多同時代人，說他們是瘋子的時候，對於自己的正當性抱有的據說是科學的（馬克思主義的）信念。<sup>329</sup>但列寧在對付社會主義者中的對手方面，運氣一直很好：人多勢眾的右派社會革命黨維克托·切爾諾夫，在首都衛戍部隊主動提出用武力保衛立憲會議的時候退縮了；孟什維克的尤利·馬爾托夫，死抱着歷史的「資產階級階段」，即便並沒有資產階級；列夫·加米涅夫以前反對布爾什維克政變，試圖用全都由社會主義者組成的聯合政府取代布爾什維克的壟斷，但後來卻乞求重新加入布爾什維克中央委員會。而現在，事實證明瑪麗亞·斯皮里多諾娃根本不是列寧的對手。<sup>330</sup>1918年，年僅34歲的斯皮里多諾娃是唯一廣為人知的左派社會革命黨領袖，而且還是1917至1918年間各種政治力量中唯一的女性領導人。長期以來，這樣的身份讓她養成了一種優越感（「戴着夾鼻眼鏡，情緒始終處於亢奮狀態，就像漫畫版的雅典娜女神」，有德國記者評論說）。<sup>331</sup>但她肯定不缺勇氣。1906年26歲時，她就開槍打死了鎮壓1905年農民叛亂的一位沙皇警長，為此，她被判在東西伯利亞終生服苦役。在囚禁和押送期間，她遭到毆打和強姦，這其中，把煙頭摠在她裸露的乳房上算是最輕的。她有勇氣。她可能還很有政治眼

光：與絕大多數左派社會革命黨人不同，與自封的左派布爾什維克黨人也不同，斯皮里多諾娃支持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條約。「簽訂和約不是因為……布爾什維克，」她敏銳地指出，而是「因為貧窮、饑荒，還有全體人民都受夠了、厭倦了，不想再打了。」<sup>332</sup>但列寧和斯維爾德洛夫幾次三番利用她的誠摯。現在，1918年7月，她出人意料地讓他們處在她的掌握下，可她並沒有推進自己最初的戰略並抓住機會。

與此同時，布爾什維克對左派社會革命黨人的反擊在對該黨的秘密「審判」中達到了高潮。斯皮里多諾娃只判了一年，而且後來還獲得特赦。<sup>333</sup>但一個曾經強大的政治力量現在失去了鋒芒。<sup>334</sup>左派社會革命黨人的代表不在了，蘇維埃代表大會在最後一天（7月10日）通過了一部憲法，宣佈「中央和地方的全部政權歸蘇維埃」，並號召「消滅一切人剝削人的現象，完全消除把社會劃分為不同階級的現象，無情鎮壓剝削者，建立社會主義的社會組織，使社會主義在所有國家獲得勝利」。

280

### 暗殺：已遂和未遂

羅曼諾夫家族的人還活着，因此，不管是對布爾什維克的公審來說，還是對想要爭取自由的反布爾什維克力量來說，都是一個潛在的有號召力的因素。尼古拉的弟弟米哈伊爾大公先是被克倫斯基逮捕，後來又被布爾什維克解送到烏拉爾（彼爾姆）的一座監獄。在那裏，1918年6月13日凌晨，五名契卡武裝人員，在一名過去在沙皇監獄服過刑的老恐怖分子的帶領下，策劃了一起陰謀：為了處死大公而誘使他逃跑。米哈伊爾大公彈痕累累的屍體被放在熔爐裏燒掉了。布爾什維克不敢承認處死了大公，便散佈謠言說，米哈伊爾已被君主派放跑了。<sup>335</sup>至於尼古拉，臨時政府決定把他和他的家人流放到國外，但蘇維埃反對，而且不管怎麼說，尼古拉和亞歷山德拉兩人的表哥、英國國王喬治五世，撤銷了同意為他們提供庇護的聲明。<sup>336</sup>因此，克倫斯基把俄國皇室軟禁在托博爾斯克的總督宅邸（尼古拉的列車被偽裝成「紅十字會」列車並插上了日本國旗）。<sup>337</sup>流放西伯利亞的象徵意義產生了反響。當有傳言說，前沙皇活得很舒服而且君主派陰謀要把他解救出去的時候，烏

拉爾蘇維埃決定把尼古拉轉移到葉卡捷琳堡。但是在1918年4月，斯維爾德洛夫派了一名信得過的特工把他從托博爾斯克帶到莫斯科。當曾經的沙皇乘坐列車途經葉卡捷琳堡時，烏拉爾的布爾什維克們劫持了他，把他安頓在一個叫做尼古拉·伊帕季耶夫(Nikolai Ipatyev)的退休陸軍工程師的宅邸。他們在宅邸四周圍上柵欄，並配備了一大群衛兵。在莫斯科，列寧讓手下搜集材料，準備審判尼古拉，報刊上對此也進行了討論，但審判不斷「延期」。<sup>338</sup>「那時候，」托洛茨基在談到有關審判的秘密討論時說道，「列寧的情緒相當低落。」<sup>339</sup>

281 到1918年7月，捷克斯洛伐克軍團越來越逼近葉卡捷琳堡，於是，烏拉爾的布爾什維克軍事委員到莫斯科去商量烏拉爾的防禦問題——可能還有尼古拉及其家人的問題。7月2日，人民委員會委派一個委員會起草法令，將羅曼諾夫家族的財產國有化。兩天後，新成立的葉卡捷琳堡的契卡接替了當地的蘇維埃，承擔沙皇一家的警衛工作。尼古拉顯然生活得很困惑；他發現了帝俄時代偽造的臭名昭著的反猶小冊子《錫安長老會紀要》，講的是猶太人的全球性陰謀，現在他把它讀給自己的德國妻子和女兒們聽；共產主義或許就是猶太人的陰謀？<sup>340</sup>不久，契卡粗製濫造了一封君主派用法語寫的信件，內容是策劃一場陰謀，解救沙皇並讓他復辟。以此為藉口，在1918年7月16日萬籟俱寂的夜裏，在沒有正式指控的情況下——更別說審判——行刑隊對尼古拉、亞歷山德拉、他們的兒子阿列克謝(13歲)、他們的四個女兒(年齡在17歲到22歲不等)、家庭醫生以及三個僕人執行了死亡「判決」。領導這支11人的行刑隊的，是雅科夫·尤羅夫斯基(Yakov Yurovsky)，一個猶太女裁縫和一個玻璃安裝工(也是盜竊嫌疑犯)所生的十個孩子中的老八。手槍射出的彈雨在半地下室四周的磚牆上亂蹦，連行刑者也被燙傷了(有的後來成了聾子)。阿列克謝僥倖沒死，呻吟着，但尤羅夫斯基上前近距離射殺了他。沙皇的女兒們有的身上藏着首飾，首飾擋住了子彈，結果她們被刺刀剝成了碎片。尤羅夫斯基的行刑隊把屍體埋在葉卡捷琳堡北面12英里\*處的一個村子(科普佳基)的土路附近。他們把疏

\* 編註：約19公里。

酸倒在屍體上，讓死者面目全非、難以辨認，然後焚燒並單獨掩埋了阿列克謝和沙皇的一個女兒（被誤以為是亞歷山德拉）的屍體。同一天，7月19日，尤羅夫斯基到莫斯科去匯報。<sup>341</sup> 布爾什維克中央政府根本不承認自己負有責任，說那是烏拉爾的布爾什維克幹的。<sup>342</sup> 布爾什維克政府在公佈沙皇死訊的那天——謊稱阿列克謝和亞歷山德拉還活着——還發佈了（六天前通過的）將羅曼諾夫家族的財產收歸國有的法令。<sup>343</sup> 「人民沒有露出悲痛或同情的跡象，」前沙皇總理弗拉基米爾·科科夫佐夫（Vladimir Kokovtsov）寫道——公佈沙皇死訊的那天，他正坐在彼得格勒的電車裏——「沙皇的死訊是在一片得意的笑聲、嘲諷聲和卑劣的評論聲中宣讀的。」有些乘客說：「早就該死了！」<sup>344</sup>

草草處死羅曼諾夫一家，而且沒有進行公開的政治審判，反映的是一種絕望的情緒。布爾什維克完全沒有能夠真正承擔作戰任務的軍事力量，嘗試組建一些像樣的軍隊也困難重重，因為士兵們為了弄到糧食都分散了，甚至變成了打劫的。就連值得信賴的拉脫維亞人也在另謀出路。「當時以為，俄國中部會變成自相殘殺的戰場，布爾什維克政權大概要保不住了」，拉脫維亞人的指揮員瓦采季斯在提到1918年夏天時回憶說。他擔心「拉脫維亞步兵會全軍覆沒」，便開始同勁頭十足的里茨勒進行秘密談判——里茨勒是個代辦，臨時接替已故的米爾巴赫。里茨勒擔心布爾什維克垮台並被親協約國的政權所取代，便暗中敦促德國，以「保護」使館的名義，調動一個營的擲彈兵，發動政變，在莫斯科扶植一個同樣對柏林友好的政府。<sup>345</sup> 列寧拒絕他們入境（他倒是同意調些德國人來，分成小組，不穿制服）。<sup>346</sup> 不管怎麼說，里茨勒在柏林的德國外交部的上級認為，根本沒有必要放棄列寧，列寧已經讓俄國陷入了癱瘓而且依然忠於德國。<sup>347</sup> 但里茨勒仍希望通過拉脫維亞步兵的倒戈，讓布爾什維克垮台——拉脫維亞步兵部隊負責克里姆林宮的警衛工作——於是，他找到一幫拉脫維亞人，他們願意接受他的建議而且一心想回到被德國佔領的祖國。假如拉脫維亞人被遣返，瓦采季斯承諾說，他們會在德國同布爾什維克攤牌時保持中立。<sup>348</sup> 但魯登道夫將軍破壞了里茨勒的談判。他認為要是把拉脫維亞步兵遣返回去，拉脫維亞就會受到布爾什維克宣傳的毒害。德國國防軍再一次幫助挽救了布爾什維主義。

1918年7月25日，捷克斯洛伐克軍團和反布爾什維克武裝佔領了葉卡捷琳堡，而此時距離尼古拉被埋在那裏還不到一週。<sup>349</sup>「協約國收買了捷克斯洛伐克軍，反革命暴動猖獗一時，整個資產階級竭盡全力要推翻我們」，列寧於次日寫信給德國革命者克拉拉·蔡特金 (Clara Zetkin) 說。<sup>350</sup> 1918年8月，與布爾什維克的願望相反，英國人從摩爾曼斯克 (布爾什維克曾邀請他們在那裏登陸) 轉移到更大的港口阿爾漢格爾斯克，希望將其作為一個更好的行動基地，與捷克斯洛伐克軍團合兵一處，重新開闢對德作戰的東線戰場。流言四起，說協約國武裝會向南面750英里†處的莫斯科進軍。<sup>351</sup> 草草建成的北方鐵路線一片恐慌。「我們中沒有誰會懷疑，布爾什維克的末日已經來臨，」一位竟然混到副貿易人民委員之職的奸細 (他由前沙皇將軍米哈伊爾·阿列克謝耶夫派到莫斯科) 寫道，「在布爾什維克政權周邊已經形成了包圍圈，我們當時都覺得布爾什維克逃不掉了。」<sup>352</sup> 北有英國人，而且很快還有美國人 (抱着不同的目標)；東有捷克斯洛伐克軍團和其他反布爾什維克武裝，他們佔領了喀山 (8月7日)；南有得到德國援助的反布爾什維克武裝，他們正在向察里津推進，以便和東面的反布爾什維克武裝連成一片；西面則有德國人，他們佔領了波蘭、烏克蘭和波羅的海沿岸地區，而且還應芬蘭政府之邀，在該國駐紮了一支力量。列寧以及核心圈中的人們考慮放棄莫斯科，遷往更深的腹地下諾夫哥羅德。<sup>353</sup> 布爾什維克官員還開始為自己的家人申請前往德國的外交護照和旅行證明；金錢被轉移到瑞士銀行。<sup>354</sup>

283

列寧會不會從哪裏來就回哪裏去？「布爾什維克在公開談論自己的日子已經不多了。」新任德國大使卡爾·黑爾費里希 (Karl Helfferich，地位在里茨勒之上) 說——他當時在催促柏林與時日無多的布爾什維克斷絕關係，同時，出於安全原因，他不敢離開自己在莫斯科的駐地。<sup>355</sup>

可列寧提出了直到當時為止最大膽、最冒險的計劃。就在英國遠征軍在阿爾漢格爾斯克登陸的當天——當地的政變讓一個非布爾什維克

\* 譯註：《列寧全集》第48卷，第253頁。

† 編註：約1,207公里。

的人物上台——列寧派外交人民委員到德國大使館，請求德國採取他這位布爾什維克領袖長期以來一直擔心的行動：向俄羅斯帝國首都彼得格勒方向入侵。「考慮到公共輿論的狀況，與德國建立公開的軍事同盟是不可能的，但採取類似的行動是可能的」，格奧爾吉·契切林告訴黑爾費里希說。這位人民委員不是要德國人佔領彼得格勒，而是保衛它，是向摩爾曼斯克和阿爾漢格爾斯克進軍，打擊協約國軍隊。另外，在南方，契切林要求德國人不要再支持反布爾什維克武裝，而是調部隊過去攻打他們。黑爾費里希向柏林報告說：「契切林明確表示，讓德國在南方和北方出兵的要求直接來自列寧。」<sup>356</sup> 雖然對於德國人會不會佔領彼得格勒本身一直存在爭論，但是在1918年8月27日，蘇俄簽訂了一份新的、條件更加苛刻的和約，作為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條約的「補充」。列寧同意放棄愛沙尼亞和利沃尼亞（立陶宛）；將巴庫油田生產的25%的石油賣給德國；將黑海艦隊的使用權交給德國；提供60億馬克，即一半的黃金儲備，用於賠償。德國承諾送來煤、步槍、子彈、機槍，並撤出白俄羅斯——資源已經枯竭的德國所作的承諾，甚至不及印刷這些承諾所用的紙張有價值。<sup>357</sup> 三項秘密條款——儘管布爾什維克譴責資本主義的「秘密外交」——允許德國在俄國北方和南方採取軍事行動，打擊協約國軍隊，並把英國人趕出巴庫，為此，德國獲得了在巴庫登陸的權利。<sup>358</sup>

列寧就像正在傾覆的船隻底部生的水鏽一樣，緊緊依附於德意志帝國。如果說在謠言四起的1914至1917年，想像中的沙皇宮廷投靠德國人的行為根本不是真的，那麼，在1918年，布爾什維克向德國人屈服的卑劣行徑則是再真實不過了。8月27日的條約比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條約更可恥，而且是列寧自願簽訂的。他是想用行賄達到自己想要的結果：既可以讓德國人不去推翻政權，又可以讓他們幫助挫敗協約國推翻政權的企圖。「既然存在利益上一致的地方，」列寧用手寫的方式——那樣就可以不讓秘書們知道——寫信給布爾什維克駐瑞典的使節說，「要是不利用它，那我們就是白癡。」<sup>359</sup> 德國人方面同樣心懷鬼胎。他們決心像外交大臣說的那樣，「為了我們的利益而盡可能地與布爾什維克合作或者說利用他們，只要他們還掌握着政權。」<sup>360</sup> 8月，布



爾什維克匯出了承諾的1.2億金盧布賠款中的第一筆(9月會支付更多的賠款)。

為了挽救形勢，拉脫維亞人的指揮員瓦采季斯上校被派到喀山，幫助紅軍收拾殘局。1918年8月30日，列寧寫信給托洛茨基，說如果不能奪回喀山，就槍斃瓦采季斯。<sup>361</sup> 當天夜裏晚些時候，星期五，這位布爾什維克領袖前往位於莫斯科工廠區——那裏集中了大量的工人——中心位置的米歇爾遜工廠發表演說。在莫斯科，星期五是「黨的節日」，官員們會在晚上分頭到城裏的各個地方，在工人和士兵的群眾大會上發表演說。列寧到了莫斯科後，從3月到7月，已經在莫斯科以及緊鄰的周邊，在大約140場這樣的集會上做過演說。<sup>362</sup> 他去米歇爾遜工廠時——那是他當天的第二場公開演說——除了自己的司機之外(他留在車裏)，沒有帶任何衛兵。當時許多人都有暗殺布爾什維克高層人物的想法。證據顯示，1918年，英國秘密情報局人員要求一名在俄國出生的英國間諜，找個適當的理由採訪斯大林，以便混進去刺殺他(那名英國間諜聲稱他拒絕了這一要求)。<sup>363</sup> 8月30日那天早晨，彼得格勒契卡主席莫伊謝伊·烏里茨基(Moisei Uritsky)，又一位投奔布爾什維克的前孟什維克，在冬宮廣場前沙皇政權的總參大樓被暗殺了(廣場後來改成了他的名字)。捷爾任斯基為了監督事件的調查工作而離開莫斯科。<sup>364</sup> 列寧之前在米歇爾遜工廠發表過四次演說。那天晚上，會場——製造手榴彈的車間——擠滿了人。但列寧直到很晚的時候還脫不開身，最後只好在晚上9時——離原定的開始時間已經過了兩個小時——先派人替他給人們講話。大約45分鐘過後，列寧的車來了，他馬上登上講台。「同志們，我不會說很長時間，我們有個人民委員會的會議」，他開頭說，然後就發表了一個小時的長篇講話，主題是「資產階級專政與無產階級專政」。聽眾提了很多尖銳的問題(按照慣例，是以書面形式提交的)，但列寧說沒有時間回答。「我們的出路只有一條，」他總結說，並號召大家拿起武器保衛革命，「不勝利，毋寧死！」<sup>365</sup>

285

\* 譯註：《列寧全集》第35卷，第84頁。但該卷第45條註釋中說，「傍晚7時30分，列寧講完話離開該廠時，在工廠院內遭到了……槍擊」。

列寧出來了，但在快要進入等候他的汽車時，他撲倒在地，胸部和左臂中彈（子彈穿過了他的肩膀）。司機斯捷潘·吉利和工廠委員會的幾位委員把他放在車的後座上。列寧面色蒼白，雖然綁了止血帶，可鮮血還是汨汨地往外流，而且還有內出血。<sup>366</sup> 他們駛往克里姆林宮。當電話打到克里姆林宮時，衛戍司令馬爾科夫從大克里姆林宮沙皇的藏品中拿了幾個枕頭，帶到帝國參政院列寧的住處——受傷的領袖已送到那裏。誰都不知道怎樣止血，結果列寧因失血和疼痛而暈了過去。<sup>367</sup> 克里姆林宮車庫負責人趕忙出去找氧氣罐：花了80盧布從附近的特維爾大街A. 布洛赫和H. 弗賴曼藥店租了個氧氣罐，又花了55盧布從另一間更遠的藥店租了一個。（這位汽車部門負責人在報告中寫道：「這錢是我自己掏的，我要求還給我。」）<sup>368</sup> 虛弱不堪的列寧第一個要見的，是他昔日的情婦伊涅薩·阿爾曼德，她帶着女兒一起趕來了。<sup>369</sup> 邦契—布魯耶維奇命令克里姆林宮的警衛保持高度戒備。<sup>370</sup> 斯維爾德洛夫召來一位名醫；在此期間，邦契—布魯耶維奇的醫生妻子薇拉（Vera），為列寧量了脈搏並注射了嗎啡。<sup>371</sup>

再來說說米歇爾遜工廠。在逃的費佳·羅伊德曼（Feiga Roidman，又名范尼·卡普蘭〔Fanya Kaplan〕）被認定為刺客，在附近的一個電車站被扣。<sup>372</sup> 作為一名28歲的右派社會革命黨人，她在剛開始審訊時就招認了，但堅持說跟他人無關，儘管她近乎失明，而列寧是在暗處被擊中的。（原本打算執行此次暗殺行動的，有可能是一個叫利季婭·科諾普列娃〔Lidiya Konopleva〕的同謀——無政府主義的社會革命黨人，卡普蘭的競爭對手——或別的甚麼人。）<sup>373</sup> 斯維爾德洛夫以蘇維埃中央執行委員會的名義，指責右派社會革命黨人是「英法的走狗」。<sup>374</sup> 邦契—布魯耶維奇打電報給托洛茨基（當時在東南戰線的斯維亞日斯克），報告列寧的體溫、脈搏和呼吸情況。<sup>375</sup> 托洛茨基趕緊返回莫斯科。1918年9月2日，他在蘇維埃中央執行委員會會議上發表講話，稱列寧不僅是「新時代的領袖」，還是「我們革命時代最偉大的人」。儘管他承認，馬克思主義者相信的是階級而不是個人，但仍認為，要是失去列寧，那將是極大的損失。托洛茨基的講話後來刊登在報紙上，並印成小冊子廣為散發。<sup>376</sup> 同一天，政權宣佈成立共和國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是

托洛茨基。第二天，斯維爾德洛夫命令克里姆林宮衛戍司令馬爾科夫處死卡普蘭。馬爾科夫執行完命令後，就在克里姆林宮的亞歷山大花園，用一隻金屬桶焚燒了屍體。<sup>377</sup> 9月4日，瓦采季斯非但沒有被槍斃，還被提升為紅軍總司令。普通的拉脫維亞步兵對於布爾什維克的專政行為越來越失望。<sup>378</sup> 瓦采季斯又一次同德國人接觸，想讓他的士兵回到拉脫維亞，但再次被斷然拒絕。<sup>379</sup>



從一開始，當新政權着手清除建築物上沙皇時代的標誌並推倒舊的雕像時——比如說克里姆林宮的亞歷山大二世雕像和基督救世主大教堂外面的亞歷山大三世雕像——布爾什維克的冒險行為能不能長久就受到了懷疑。列寧等人用繩子鄭重其事地拆毀了克里姆林宮中紀念1905年被暗殺的莫斯科總督謝爾蓋（·羅曼諾夫）大公的巨型正教十字架。<sup>380</sup> 在這些位置，後來立起了達爾文、丹東、亞歷山大·拉吉舍夫等左翼萬神廟中人物的雕像。1918年9月12日，即遭到槍擊數天後，列寧給教育人民委員阿納托利·盧那察爾斯基寫道，他「非常氣憤……街頭沒有馬克思的半身雕像……我要責備你這種嚴重的疏忽。」<sup>381</sup>

布爾什維克開始為莫斯科的街道更名：復活廣場改成革命廣場；舊的巴斯瑪納亞大街變成了馬克思大街；普列奇斯堅卡大街變成了克羅波特金大街；大尼基塔大街變成了亞歷山大·赫爾岑大街。<sup>382</sup> 1918年，在莫斯科最大的主幹道特維爾大街上，位於莫斯科大劇院和小格涅茲德尼科夫巷交界處的比姆—博姆咖啡館總是熱鬧非凡。咖啡館屬於小丑組合比姆和博姆（Bim and Bom）的創始成員伊萬·拉敦斯基所有（Iwan Raduński他此時充當比姆，與梅奇斯拉夫·斯坦涅夫斯基（Mieczysław Staniewski）搭檔）。這對有名的組合可以追溯到1891年，擅長伴以音樂

\* 譯註：此處據作者引文譯出。列寧在1918年9月18日給盧那察爾斯基的電報中說：「今天聽了維諾格拉多夫關於修建半身雕像和紀念碑的報告後，非常氣憤……街頭沒有馬克思的半身雕像……鑒於這種不能容忍的玩忽職守的態度，我宣佈給您警告處分……」（《列寧全集》第48卷，第353頁。

的辛辣諷刺。在布爾什維克的新首都，博姆咖啡館經常爆滿，裏面的人物形形色色，有政界的（孟什維克領導人尤利·馬爾托夫、年輕的左派社會革命黨人雅科夫·布魯姆金），也有藝術界的（作家伊利亞·愛倫堡、扮演馬戲團小丑的弗拉基米爾·杜羅夫）。這家咖啡館難免引起莫斯科犯罪分子的注意，其中有一個人，謊稱咖啡館同一條街上的莫斯科總督宅邸是自己的住宅，將其賣掉後把賣房所得據為己有。不過，當那些無禮的諷刺家開始嘲笑新的布爾什維克政權時，觀眾當中的拉脫維亞步兵就朝天開槍，追打比姆和博姆。觀眾大笑，以為這是在表演。小丑們後來被逮捕了。<sup>383</sup>

儘管有這種出於本能的鎮壓，儘管有遠大的計劃，這個自封的政權在1918年還是跌入了低谷。莫斯科流言四起，說列寧死了，而且已被偷偷埋掉了。季諾維也夫在1918年9月6日的公開演說中提到列寧，稱他是「人類迄今為止所知道的最偉大領袖，是社會主義革命的使徒」，並把列寧著名的《怎麼辦？》比作福音書。這種有意無意地把列寧神聖化的說法，讓人聽上去覺得不太吉利。<sup>384</sup> 邦契—布魯耶維奇不顧列寧的反對，趕緊安排人在克里姆林宮的院子裏為他拍攝室外影像，以證明他還活着。那是列寧的第一部紀錄片。<sup>385</sup> 與此同時，布爾什維克宣佈實行恐怖政策，以「粉碎反革命九頭蛇」。<sup>386</sup> 為了起到震懾作用，季諾維也夫後來宣稱，在彼得格勒槍斃了500名「人質」——對那些被關押的前沙皇官員的處決是安排在公共場所。<sup>387</sup> 在1918年的紅色恐怖中，兩個月之內就至少處死了6,185人。從1825年到1917年，被俄國法院判處死刑的有6,321人，但並沒有全部執行。當然，要搞清楚沙俄時期到底處死了多少人，也不是件容易的事情：例如，1830年鎮壓波蘭起義的時候，通常是在司法體系之外進行的；1905至1906年間被軍事法庭判處死刑的人，一般也不計入「正常的」統計數據。儘管如此，紅色恐怖的規模之大還是很明顯的。<sup>388</sup> 而且當時為了加強效果，還故意公開誇大其影響範圍。「社會革命黨人、白衛軍以及其他冒牌的社會主義者的罪惡的冒險行為，迫使我們採取群眾性的恐怖行動，以回應工人階級敵人的罪惡用心」，契卡副主席雅科夫·彼得斯（Jēkabs Peteršs）在《消息報》上憤怒地說道。同一期的《消息報》上還刊登了斯大林的一



則電報，號召組織「公開的、經常的、群眾性的恐怖行動來鎮壓資產階級」。<sup>389</sup>

288 布爾什維主義認為自己關於資本主義和階級鬥爭的核心信念是毋庸置疑的，以至於任何手段，哪怕是撒謊和就地槍決，都不僅方便，而且在道義上是必要的。帶有示威性質的紅色恐怖，就像從前法國發生的，會給敵人，同樣也會給剛剛開始擁護布爾什維克的人，造成難以磨滅的印象。<sup>390</sup> 在面臨覆滅的危險時，布爾什維克利用「反革命」的幽靈，讓人民群眾心甘情願地為了建立一個真正的國家而拼死保衛「革命」。1918年夏天和秋天的那種在世人看來像是政治達達主義的東西，很快就將成為延續多年、雄心勃勃的專政。<sup>391</sup>

## 第八章 階級鬥爭與黨國

隨着停戰協議的簽訂，世界大戰正式結束了……但是從那時候開始，所有我們經歷的和仍將經歷的，其實都是世界大戰的延續和演變。

289

——彼得·司徒盧威，(白軍佔據的)頓河畔羅斯托夫，  
1919年11月<sup>1</sup>

所有軍事專家身邊都必須有政委，而且手裏要拿着左輪手槍。

——列夫·托洛茨基，陸軍人民委員，1918年<sup>2</sup>

除了1917至1918年的壟斷，布爾什維克還在1918至1920年創立了一個國家。人們往往忽視其中的差異。強行剝奪其他黨派的統治權，不等於就能夠施行統治和控制資源。新國家的形成除了要靠給人民造成的震懾或強制徵兵，還要靠對物資(糧食、建築物及貴重物品)的掠奪、沒收和再分配，這些都以革命的階級鬥爭觀念反映出來。由此產生的政權，有學者評論說，「必然意味着一個迅速形成的官僚系統，用來剝奪舊的所有者並管理剛剛剝奪的財產」。<sup>3</sup>很多時候，即便那些官僚本人不是留用人員，也會沿用沙皇政權或臨時政府的做法。不過，這是一個非常特殊的國家：類似於匪幫的武裝政治警察；到處插手，並在擴張官僚

勢力的過程中擊敗了無數競爭對手的糧食人民委員部；劃撥戰利品而且自身就靠戰利品為生的分配機關；擅離職守的現象非常嚴重的龐大的紅軍；效率低下但由於處在緊急狀態而越來越等級森嚴的黨，如九頭蛇一般吸收和調配人員；還有宣傳機器，估計在1918年已擁有5萬名積極分子，可以利用的手段有報紙、海報、滑稽短劇、電影和鼓動列車，活動範圍基本上限於城市和軍隊。<sup>4</sup>儘管有各種蘇維埃和革命法庭，但這是一個幾乎完全行政化的國家，各種相互競爭的行政部門紛紛索要權力，無論是中央還是地方，「委員」和「委員」爭權，委任的和自封的爭權。尤其是，這個新國家的存續得益於內戰，大多數國家都是如此，但它在和平時期依然把鎮壓叛亂當作主要目標。<sup>5</sup>內戰並沒有讓布爾什維克變異；內戰塑造了他們，實際上還把他們從達達主義和1918年的險些「被拋到九霄雲外」之中拯救出來。<sup>6</sup>當然，在內戰全面爆發前，布爾什維克就公開採取了剝奪和恐怖政策。但內戰提供了機會，對「剝削階級」和(國內外)「敵人」的鬥爭得以加強並且合法化，掠奪性的手段表面上讓人感覺是合法的、迫不得已的和充滿道義熱情的。<sup>7</sup>「統治階級，」就像列寧解釋的，「決不會將自己的權力交給受壓迫階級。」<sup>8</sup>因此，權力必須靠武力不間斷地索取，而不是一次性地索取。「奪權」要每天重新上演。<sup>9</sup>

同列寧一樣，斯大林確實嚮往隨着國家締造而出現的種種宏大標誌，但是對於國家的偶像崇拜，起初並沒有推動布爾什維克的國家建設。<sup>10</sup>世界大戰和革命所造成的巨大破壞也不是推動力量。相反，一些觀念或者說思維習慣，特別是對市場和一切資產階級事物的憎惡，以及不受約束的革命手段，通過不斷的自我強化，加重了這場災難。<sup>11</sup>許多政權都以形勢緊迫為由，為軍法管制、就地處決、集中關押和沒收財產作辯護，但他們通常並沒有把私人貿易完全當成非法行為，沒有宣佈工業的國有化，沒有按照階級(是工人還是「非勞動人員」)來分配口糧，沒有號召「貧農」和工人去剝奪富農，沒有因為世界上的幾個主要國家是資本主義國家(「帝國主義者」)就想着顛覆它們。布爾什維克的國家

<sup>4</sup> 譯註：《列寧全集》第36卷，第125頁。

建設起初是拼命想要解決過去遺留下來、並在後來變得越來越嚴重的城市缺糧問題，但每一個挑戰都被當作反革命問題而被歸咎於某人某地。「以從反革命手中挽救革命的名義」，這個時候的無數文件都是這麼開頭的，接着就是指示：「徵用」麵粉、汽油、槍枝、車輛和人員。<sup>12</sup>「今天是革命一週年，」一名前沙皇官員評論說（他說的是二月革命），「一年前，幾乎人人都是革命者，而現在，幾乎人人都是反革命。」<sup>13</sup> 反革命這個概念帶來了持久的影響。

291

無情的階級鬥爭構成了列寧思想的核心。在他看來，世界大戰不可逆轉地證明，資本主義已經喪失了繼續存在的權利。但是，蘇維埃國家並不是帶着全副武裝從列寧的額頭蹦出來的。廣大民眾有一種本能的仇視資產階級的傾向——剝削者與被剝削者的對立，有產者與無產者的對立——這給進行全面動員以保衛革命和同反革命作鬥爭，既提供了動力，也提供了合理性。想一想1918年夏末在伏爾加河畔的卡梅辛斯克，一個擁有許多鋸木廠、磨坊和西瓜的商業小城發生的革命吧。「契卡對所有大資產階級都作了登記，當時他們被關在一艘駁船上，」充當地方政治警察的那群人驕傲地宣佈，「白天〔犯人們〕在城裏幹活。」根本沒有人向當地那些保衛革命的人解釋過，「資產階級」是些甚麼人，他們為甚麼是敵人。當時卡梅辛斯克駁船上的「資產階級」中突然有人病倒，契卡同意從附近的薩拉托夫來的一位醫生給他們打針。醫生建議為病人提供更好的口糧並且不要再讓他們從事強制勞動，感到懷疑的契卡人員決定調查醫生的來歷，結果發現他是冒名頂替的。「現在他也在船上」，那名特工得意地說道。<sup>14</sup> 用來關押「階級異己分子」的駁船在伏爾加河的上下游都有——給人印象最深的莫過於斯大林在察里津的時候——就像從前在俄羅斯帝國到處都是和駁船差不多的監獄一樣。<sup>15</sup> 這種經過意識形態調整的實踐，催生了駁船監獄，讓幾萬名新人在幾千個地方把一個不負責任的新政權牢牢地保護起來。<sup>16</sup>（為了劫掠「資產階級」，不關心政治的匪徒和投機分子也行動起來。）由社會主義的革命邏輯衍生出來的針對「反革命」的暴力行動激起了人們的憤慨。「各省的權力屬於甚麼人？」1918年秋天，一名憤怒的部級官員問道，「是屬於蘇維埃和它們的執行委員會，還是屬於契卡？」<sup>17</sup> 答案是再清楚不過的：當同樣在伏爾加河流



域的薩馬拉省的農民表示，他們想要重新選舉當地的契卡領導人時，契卡人員亮出了武器。有個農民因為害怕而想要逃走，一名16歲的契卡人員從後面開槍把他打死了。「特別要注意這一點並請把它登在報上，」有農民強烈建議，「這裏的傢伙想打死誰就打死誰。」<sup>18</sup>

292 這是個取得重大突破的時刻：從下到上，以及在兩者的中間地帶，革命的階級鬥爭觀念與實踐造就了蘇維埃國家。馬克思談到解放和自由，但他也談到了階級鬥爭。革命要成功，人類要擺脫束縛取得進步，就必須砸爛與「資產階級」以及資本主義有關的一切。所有妨礙消滅資產階級和資本主義的障礙也必須清除，這其中包括其他的社會主義者。當然，決不是說所有人都捲入了這種極度的混亂。絕大多數人只是想靠撿破爛、坑蒙拐騙和逃離家園活下去。但也有相當多的人想要投身於當下的革命，成立公社、建托兒所、寫科幻小說。「生活的所有方面——社會的、經濟的、政治的、精神的、道德的、家庭的——都敞開了大門，等待人們加以有目的的改造，」伊薩克·施泰因貝格 (Isaac Steinberg) 寫道，「到處都充滿蓬勃的熱情，想要創造出與『舊世界』截然不同的新事物。」<sup>19</sup>但在這種烏托邦中，階級原則從根本上來說是不寬容的。許多一心為人類服務的布爾什維克開始覺得，他們為結束苦難和抹平社會等級所作的奮鬥，其結果卻適得其反。意識到這一點讓有些人痛心疾首，但對於大多數人來說，這只是革命進程中的一個小站。<sup>20</sup>真正的革命者中混進了投機分子，革命的苦行者中混進了騙子，他們一起以社會正義和富饒新世界的名義，把無能、腐敗和虛張聲勢推向了哪怕是在沙皇俄國也很罕見的高度。<sup>21</sup>

與布爾什維主義對抗的農民游擊部隊，在指責市場不公的同時，也從自己控制的農村強行徵糧，像紅軍一樣成立類似的組織，甚至部署部隊準備對付平民並利用政委來確保忠誠。反布爾什維克的白軍也有負責內部秩序的部隊，也徵糧，也有政治委員，也像老百姓哀嘆的那樣使用恐怖手段。<sup>22</sup>但布爾什維克和他們的敵人不同，他們吹噓對所有事情都有無所不包的、科學的解答，還花費大量資源傳播自己的意識形態。政黨思維把布爾什維主義與歷史進程等同起來，結果，所有的批評者，哪怕同樣是社會主義者，都被歸為反革命。同時，在那樣的戰亂年代，

要把工業、運輸、燃料、糧食、住房、教育和文化一起管好，革命者面臨着缺少專門知識的問題，可他們對於擺脫困境的辦法在意識形態上又極為厭惡：他們不得留用作為階級敵人的沙皇時代的「資產階級專家」，這些人往往憎惡社會主義，但願意幫助重建荒蕪的家園。對於布爾什維克，沙皇將軍兼臨時政府陸海軍部長亞歷山大·韋爾霍夫斯基 (Alexander Verkhovskiy) 在十月政變剛結束時就很有預見性地寫道：「這些人雖然承諾了一切，但甚麼也不會兌現——不是和平，而是內戰；不是麵包，而是饑荒；不是自由，而是掠奪、無政府狀態和殺戮。」<sup>23</sup> 但韋爾霍夫斯基很快就加入了紅軍。與之形成鮮明對照的是，幾乎所有來自德國舊政權的留用人員，在與魏瑪共和國合作時都極為猶豫。但是與新政權合作的沙皇專家，哪怕忠心耿耿也得不到信任，因為他們是「資產階級」。要仰仗被視為階級敵人的人，這一點塑造了，實際上也扭曲了，蘇維埃俄國的政治和公共機構。懂業務但政治上得不到信任的人，要同政治上可靠但業務能力不行的人結對子，先是在軍隊，繼而在從鐵路到學校的所有公共機構。<sup>24</sup> 這種在無意中形成的做法，讓每個「資產階級專家」都有一名共產黨員盯着，甚至在紅軍經過訓練、成為專家之後還繼續存在，從而造成一種永久性的「黨國」二元體制。

這個革命國家變得越來越強勢，但本質上仍然是拼湊的、混亂的。監督是非正式的，時有時無。施泰因貝格，一個在1918年短命的聯合政府中擔任過司法人民委員的左派社會革命黨人，試圖約束「肅清反革命、怠工和投機非常委員會」專橫的權力，但沒有成功。不過，僅僅官場內訌還不能打敗他。1918年3月遷都莫斯科的時候，中央契卡只有131名僱員，其中普通士兵35人、司機10人，其他許多是秘書或通訊員，特工大概有55人。<sup>25</sup> 「預算」就放在他們的口袋或手槍的槍套裏。再說了，為莫斯科單獨設立一個契卡，對中央機關是有害的。誠然，到1918年8月，即便在左派社會革命黨人被大量趕出契卡之後，首都的政治警察都已經增加到683人。<sup>26</sup> 但更重要的是，到1918年夏末，據《消息報》說，在38個省以及更基層的75個縣 (*uezd*) 都有了地方性的契卡。<sup>27</sup> 此外，鐵路部門也成立了單獨的契卡，以便同覆蓋面很廣的鐵路網中到處存在的「反革命」作鬥爭。紅軍成立了負責保衛工作的契卡「特

294 別部」。沒有任何人協調或控制這些政治警察。地方性的契卡和形形色色類似契卡的組織，大多是自行設立的。比如卡梅辛斯克的駁船，再比如葉卡捷琳堡的契卡——它「設在普希金大街7號；那是一座兩層的小樓，有個很深的地窖，裏面塞滿了犯人」，在那裏工作的一名特工人員寫道，「白軍軍官和神父像沙丁魚一樣，同把糧食藏起來不肯上交的農民緊緊地擠在一起。每天夜裏我們都『清除掉』一些『寄生蟲』。」——也就是把犯人從地牢裏帶上來，到院子的另一邊槍斃掉。這名特工還說，由於沒收「資產階級」的財產，「有很多五花八門的東西：珠寶首飾、鈔票、小飾品、衣服、食物。我們把所有東西擺在一起，然後分掉」。<sup>28</sup>總的來說，政治警察的情況一團糟，腐敗，而且各幹各的。<sup>29</sup>但「契卡」不僅是正式的國家機構，還是一種冷酷無情的思想傾向，它預設了階級敵人的存在並要求不擇手段地鏟除他們。<sup>30</sup>對政治警察持批評態度的社會主義者，比如施泰因貝格，總是被告知，就地處決是「臨時」措施，在階級鬥爭取得勝利之前、世界革命發生之前、或者是在到達其他某個階段之前使用。同時，契卡人員說，歷史會原諒過度的嚴厲，但不會原諒過度的軟弱。私刑和假公濟私——又名階級鬥爭——既敗壞了這項事業的名聲也激勵了好鬥分子。在充滿熱情的幻想的驅使下，暴力性的混亂成了某種「管理」方式。

帝俄地緣政治空間的破裂，以及內戰中許多事件在歐亞大陸的一端到另一端同時上演，讓敘述成了一件不容易的事情。（愛因斯坦說過：「時間存在的唯一理由，就是不會讓一切事情同時發生。」）接下來我們要講到斯大林在察里津的專政（1918），共產國際的成立（1919），凡爾賽條約（1919），德國、匈牙利和意大利的左翼革命或近乎革命的事件，以及戰況不斷變化的紅白大戰（1919-1920），東部各民族代表大會（1920），重新征服突厥斯坦（1920），坦波夫等地的大規模農民暴動（1920-1921），喀琅施塔得水兵暴動（1921），第十次黨代表大會，征服格魯吉亞的戰爭（1921），以及蘇維埃俄國在蒙古建立第一個衛星國。就連這樣一幅巨大的全景畫，也不足以全面敘述所發生的一切。單一的俄國沒有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下子冒出的許多國家。在這些國家中，自封的政府旋生旋滅（基輔易手19次）。將這一破裂的空間結合在

一起的，是國家權威的重建、俄羅斯化的深厚遺產、思想觀念以及伴隨着這一切的陰謀和人脈網絡。這裏，我們將會看到斯大林逐漸嶄露頭角，成為政權中僅次於列寧的顯赫勢力。「毫無疑問，」托洛茨基後來寫道，「同許多人一樣，斯大林的性格深受內戰的環境和經歷的影響，影響他的還有後來使他得以建立個人專政的整個集團……以及上升為指揮員和管理者的整個工農階層。」<sup>31</sup> 俄國內戰產生了一大批人物、公共機構、社會關係和激進的行動。在這場風暴中已經可以看出斯大林未來實行個人專政的可能性。

295

### 紅軍和白軍，軍官和糧食

拉夫爾·科爾尼洛夫將軍1918年4月死後，他從前的一個獄友，安東·鄧尼金中將 (Anton Denikin, 生於1872年)，掌握了志願軍的軍事指揮權。鄧尼金的母親是個裁縫，波蘭人，父親是個俄羅斯族的農奴，因為當兵 (通常要服役25年) 而獲得「解放」，他本人先後做過阿列克謝耶夫將軍、布魯西洛夫將軍，最後是科爾尼洛夫將軍的參謀長。他起初想隱瞞充滿魅力的科爾尼洛夫的死訊，因為擔心志願軍會大批倒戈。<sup>32</sup> 但鄧尼金的軍隊現在集結了超過1萬人，佔據了南方的庫班河盆地。當身患癌症的阿列克謝耶夫也去世之後 (1918年10月8日)，鄧尼金又獲得了政治領導權。與他在南方的高升相似的還有西北的尼古拉·尤登尼奇將軍 (Nikolai Yudenich, 生於1862年)，一位宮廷低級官員的兒子，曾經是與奧斯曼帝國作戰的俄國軍隊的指揮官，「身高5英尺2英寸、體重約280磅，(他的)體形就像一輛雙門小轎車，兩條腿短得不容易注意到」。<sup>33</sup> 尤登尼奇利用分離出去的愛沙尼亞作為避難所，建立了第二個、也是比較小的一個反布爾什維克根據地。最後還有亞歷山大·高爾察克 (生於1874年)，父親是炮兵少將，而他本人則是俄國歷史上最年輕的海軍中將 (在1916年獲得晉升)，他作戰勇敢而且充滿愛國熱情，最喜歡的讀物據說是《錫安長老會紀要》。<sup>34</sup> 1918年，他訪美無果後，經由符拉迪沃斯

\* 編註：身高約1.57米，體重約127公斤。



296 托克返回國內，但是在他前去加入南方志願軍的途中，11月16日，鄂木斯克(西西伯利亞)發生政變，社會革命黨人上台。兩天後，西伯利亞的哥薩克逮捕了那些社會主義者，邀請高爾察克擔任俄國「最高執政」。高爾察克答應了，把他的新職務稱為「十字架」，但他把自己晉升為海軍上將，儘管那裏離最近的港口也有3,500英里<sup>\*</sup>，而且沒有艦隊。<sup>35</sup>

高爾察克(東方)、鄧尼金(南方)和尤登尼奇(西北)領導的三個獨立的反布爾什維克集團，誣稱「人民委員」都是德國的特務和猶太人，褻瀆了俄國的愛國者和正教徒所珍愛的一切。布爾什維克反唇相譏，說他們的敵人是「白軍」，這種顏色使人聯想到法國1789年之後反對革命、擁護君主復辟的那些人。在「白軍」的幾個領導人中，根本沒有人想要復辟君主制。<sup>36</sup>但他們的確想要顛覆社會主義革命。

白軍的領導人組建軍隊的任務看上去還比較容易，但他們必須招募跟自己截然不同的軍官。1914年參加世界大戰的俄國軍官團，主要是總參軍事學院的畢業生(比如阿列克謝耶夫、科爾尼洛夫、鄧尼金)以及帝國近衛軍的精英，87.5%的將軍和71.5%的參謀人員都生於貴族之家。(儘管大部分人根本沒有任何財產。)<sup>37</sup>但俄國單是在世界大戰的頭兩年，就損失了6萬多名軍官。與此同時，帝俄及之後臨時政府的軍官隊伍卻猛增到25萬人。無論是替補的還是新招募的，絕大多數都出身農村和城市底層家庭。<sup>38</sup>(除了猶太人，凡是稍微受過一點正規教育的俄國適齡男子幾乎都能成為軍官。)<sup>39</sup>這些出身低微的沙皇軍官許多都變成了小暴君，他們虐待士兵比出身上層的軍官還厲害。<sup>40</sup>但他們的社會背景自然使他們不會採取反社會主義的立場。換句話說，世界大戰的災難不僅使布爾什維克勉強發動的政變成為可能，還增加了保守勢力武裝反抗布爾什維主義的難度。與此同時，白軍還讓自己原本就很困難的任務難上加難，因為他們拒絕承認農民奪取的土地，疏遠了潛在的群眾基礎。要不是因為有哥薩克——他們人多勢眾，最終支持鄧尼金，可仍然不願離開頓河和庫班的家鄉，到別的地方去打仗；要不是因為有

---

\* 編註：約5,633公里。

捷克斯洛伐克軍團——他們依然不願離開烏拉爾和西伯利亞，除非是為家鄉而戰（但有時也為高爾察克而戰）；要不是因為有協約國提供的軍事援助，根本不會有白衛運動。

其實，紅軍的誕生也是困難重重。<sup>41</sup> 起初，布爾什維克只想招募工人，不想要農民，因為那是他們不信任的階級，但這種想法不切實際，只好作罷。<sup>42</sup> 另外，絕大多數布爾什維克也不想要從前的沙皇軍官：士兵和水兵發動革命就是要反抗他們的權威。事實上，共產黨中的左派，還有孟什維克批評者，反對「波拿巴式的人物」領導的常備軍，呼籲建立一支忠於蘇維埃的、民主的民兵隊伍。<sup>43</sup> 但新任陸海軍人民委員、沒有受過任何專門軍事訓練的托洛茨基（他從來沒有當過兵），強烈主張建立一支由真正的軍人領導的職業軍隊。<sup>44</sup> 後來，托洛茨基說過，以推動民主化著稱的1917年的「一號命令」是「二月革命中唯一有價值的文件」，但是在紅軍中，他決不允許民主。<sup>45</sup> 1918年3月，過去扳倒了沙皇的士兵委員會被正式取消。<sup>46</sup> 托洛茨基還呼籲從前的沙皇軍官，甚至將軍，重新來服役，並在第二天發表的報紙採訪中表示，「沙皇時代的後遺症以及不斷加深的經濟混亂削弱了人民的責任感……必須阻止這種狀況。在軍隊中就和在蘇維埃艦隊中一樣，紀律就是紀律，士兵就是士兵，水兵就是水兵，命令就是命令」。<sup>47</sup> 他還堅持認為：「我們必須要有一些瞭解戰爭科學的老師。」<sup>48</sup> 斯大林是反對「軍事專家」最堅決的人之一。但列寧贊成托洛茨基必須實行專業化的觀點，並使之成為官方的政策。<sup>49</sup> 不過，斯大林等人繼續反對資產階級專家。<sup>50</sup>

因此，紅軍獲勝的關鍵——軍事專家和徵召入伍的農民——仍然飽受叛變的質疑。可到頭來，農民革命在很多方面影響了整個內戰的面貌，而大量吸收從前的沙皇軍官則影響了整個蘇維埃國家的面貌。

大部分參加內戰的前沙皇軍官都投奔了反布爾什維克軍隊，歸鄧尼金的大約有6萬人，歸高爾察克的有3萬人，歸其他指揮官的有1萬人。<sup>51</sup> 但打到最後，在紅軍中服役的有7.5萬人左右，在大約13萬人的布爾什維克軍官團中佔一半以上。更突出的一點是，沙皇時代的總參謀部中，約有775名將軍和1,726名其他軍官都一度加入了紅軍。<sup>52</sup> 他們的動機各不相同，從愛國、保留軍隊編制、充足的報酬和口糧，到愛心

298 被扣為人質的家人，不一而足。他們會忠心嗎？這個問題曾經促使臨時政府開始讓「政委」同留用的沙皇軍官團並肩工作，布爾什維克將這一做法推而廣之。<sup>53</sup> 各層各級的指揮員都要搭配至少一名政委，與此同時還設立了由上級任命的「政治部」，負責文書和宣傳工作。<sup>54</sup> 布爾什維克政委的權力包括，「防止任何反革命行動，不管它可能源自哪一方」，逮捕「違反革命命令的人」。<sup>55</sup> 軍事上的決定由軍官們單獨負責，但在實踐中，這些決定只有在指揮員和政委都簽名之後才能生效，這就為政委干預純粹的軍事事務打開了方便之門。<sup>56</sup> 軍政關係緊張成了一種通病。<sup>57</sup>

結果就出現了一場奇怪的內戰：白軍推開農民，想從底層招募軍官去同社會主義者作戰；紅軍把指揮崗位交給沙皇軍官，儘管只是在有武裝警衛監管的前提下，儘管只是不情願地招募農民。若是白軍欣然接受農民革命，若是紅軍把前沙皇軍官全都趕到白軍那邊，列寧、托洛茨基、斯大林等人就會再次流亡，或者被吊在路燈桿上。

在這種狂熱的政治氣氛下，俄國內戰在許多方面都是一場城市對農村的戰爭，是一場糧食（小麥、黑麥、燕麥、大麥）爭奪戰。<sup>58</sup> 不過，無論是糧食供應上的失敗甚或採用徵糧的辦法，都不是源自布爾什維主義。早在1916年秋，沙皇政府的農業部就開始實行徵糧指標制（*prodnazverstka*）。按照這種制度，以固定價格徵收的糧食指標被攤派到省，省又攤派到縣，如此這般，一直攤派到村。可以想見，這樣做並不成功。1917年3月，在麵包遊行導致沙皇突然垮台之後，臨時政府成立了一個專門負責糧食供應的部門，宣佈除了給農民留下固定的、最低限度的糧食之外，對糧食分配實行國家壟斷。但省區兩級的供應委員會弄不到糧食，同時，農民拿到手的貨幣卻在因為通貨膨脹而貶值（消費品反正是基本買不到）。<sup>59</sup> 彼得格勒之所以還能有吃的（儘管吃得很差），只是因為在碼頭、公路和鐵路上，到處都是商販——往往只能提心吊膽地坐在列車車廂的頂上——他們無視國家壟斷，從農村往城市倒賣糧食。1917年8月底，就在克倫斯基和科爾尼洛夫攤牌的時候，臨時政府突然把國家代理人付給農民的糧價提高了一倍，這樣的讓步被國內批評者稱為「徹底投降」，然而在當時別說是麻袋和火車車皮，就連紙幣的供應都跟不上。臨時政府要靠農民的合作去解決城市和軍隊的糧

299

食問題，但在土地問題上卻不願滿足農民的要求。<sup>60</sup> 1917年10月16日，照理說，在收穫之後的這個月糧食很充裕，可臨時政府（最後一任）糧食部長卻似乎很絕望地說，「我們不要再想着靠游說……現在絕對必須改用強制的辦法」。<sup>61</sup> 戰爭，再加上對糧食供應實行國家管制未果，使得國家採取了沒收和分配這種比較拙劣的形式。<sup>62</sup>

布爾什維克對私商更不能容忍，他們決定強制推行臨時政府的失敗做法，對糧食實行國家壟斷，同時還用階級的詞彙將其重新裝飾一番，以得到「貧」農的幫助，找到藏糧食的地方。貧農們沒有響應號召，但事實證明，布爾什維克的強制措施要有力得多。<sup>63</sup> 儘管如此，這項按照人為制定的價格攤派納糧指標，以換取根本就不存在的工業品的基本政策，仍然無法滿足城市和軍隊的糧食需求。1918年初還沒有紅軍，可到了當年12月，紅軍數量已達到驚人的60萬，至少從要求的口糧來看是這樣；無事可做的人在挨餓。<sup>64</sup> 承諾能吃飽肚子有助於推進徵兵工作，但承諾能不能兌現，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結果，許多士兵和大部分普通人之所以還能有吃的，那是因為很多人都變成了非法的私商（並非總是心甘情願）。<sup>65</sup> 一份非布爾什維克報紙一邊挖苦說，「形形色色的委員會的幾十萬個委員們需要吃飯」，一邊提供了一個合乎邏輯的建議：在糧食領域恢復合法的自由貿易和自由價格。<sup>66</sup> 實際上，解決問題的辦法本該如此，但在當時，它仍屬於異端邪說。

可以說列寧根本就不理解俄國的農業、土地利用、流動勞工和農民村社的實際運作，至於市場的激勵作用，那就更不用說了。1918年1月底，他任命托洛茨基做了存在時間很短的糧食和運輸特別委員會主席；之後不久成立了糧食人民委員部，農學院畢業的亞歷山大·瞿魯巴（Alexander Tsyurupa）在2月25日被任命為糧食人民委員。列寧建議說，所有農民都必須點名交糧，沒有照做的「要當場槍斃」。瞿魯巴，甚至還有托洛茨基，沒有執行。<sup>67</sup> 列寧繼續嚴厲譴責那些「有餘糧而不把餘糧運到收糧站者」，並宣佈他們是「人民的敵人」。<sup>68\*</sup> 同月，政權宣佈實

\* 譯註：《列寧全集》第34卷，第295頁。



行「糧食專政」，並向在戰爭中變得「又肥又富」而「現在拒絕把麵包給饑餓的人民」的「糧食投機商、富農、吸血鬼、擾亂分子、受賄者」宣戰。<sup>69</sup>捷爾任斯基和盧那察爾斯基警告說，這樣做會危及布爾什維克同農民的關係，但列寧沒有理睬他們的意見。<sup>70</sup>到了冬天，隨着內戰的全面展開，布爾什維克作出讓步，放棄了對富農和投機商進行嚴厲打擊的官方政策，回到從前按固定價格交納義務糧以換取工業品的政策。<sup>71</sup>不過，他們實際上仍在繼續以階級鬥爭的名義，派人攔截私商並武裝徵糧，斯大林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崛起的。<sup>72</sup>

### 不只是牢船：斯大林在察里津（1918）

內戰期間，沒有哪個地區比伏爾加河流域更關鍵，因為那裏是糧食和兵員最主要的來源地，同時也是把高爾察克（烏拉爾和西伯利亞）和鄧尼金（頓河和庫班）這兩支規模較大的白軍分割開來的戰略要地。<sup>73</sup>沒有哪個地方比伏爾加河與察里津河交匯處的察里津更能體現出階級鬥爭的革命力量。察里津既是俄國東南部最大的工業中心（有15萬人口），也以濃縮的形式展現了革命的歷程——那裏在1917年2月還沒有布爾什維克，到1917年9月就被布爾什維克控制了，而當時彼得格勒還沒有發生政變。<sup>74</sup>對高加索與莫斯科之間的糧食和原料運輸而言，紅色察里津是重要的鐵路樞紐，但它的西邊緊挨着廣袤的頓河流域和庫班河流域，而那裏是哥薩克的地盤，也是志願軍和白軍在南方的根據地。<sup>75</sup>紅色察里津周圍的軍事形勢岌岌可危，但莫斯科和彼得格勒的工人隔一天才能領到區區4盎司\*麵包，所以，位於產糧區中間的察里津似乎是解決問題的辦法。為了領導南下的徵糧隊，列寧挑選了工人出身的堅強的布爾什維克、勞動人民委員亞歷山大·施略普尼柯夫。同列寧的關係變得密切起來的瞿魯巴，建議把斯大林也派去。最後，施略普尼柯夫有事耽擱在莫斯科，斯大林只好獨自前往：1918年6月4日，他帶着

301

---

\* 編註：約113克。

460名武裝人員離開莫斯科，兩天後抵達察里津火車站。<sup>76</sup> 他的角色實際上就是南方的布爾什維克首腦，要為北方的首都解決吃飯問題。已是中央政府（或人民委員會）高級成員的斯大林，被任命為「南俄糧務領導者」。糧食危機以及為了緩解糧食危機而碰巧讓斯大林單獨負責武裝糧隊，使得他能夠再次上演在巴統（1902）、奇阿圖拉（1905）和巴庫（1907）有過的英勇行為，但這一次的影響要大得多。

列寧當時已經任命安德烈·斯涅薩列夫（Andrei Snesev，生於1865年）為紅色察里津的總司令。斯涅薩列夫做過沙皇軍隊的參謀，臨時政府掌權時晉升為中將，後自願加入紅軍。1918年5月27日，他帶着由列寧簽署的人民委員會委任狀，作為新任命的負責人，來到新成立的北高加索軍事人民委員部所在地察里津。由於紅色武裝正在瓦解，斯涅薩列夫便開始從當地游擊部隊的散兵游勇中創建一支真正的軍隊，其中許多人都是剛剛被不斷推進的德國國防軍從烏克蘭趕出來的，就像流寇一樣。斯涅薩列夫在給中央的第一份報告中表示（5月29日），急需更多的軍事專家。<sup>77</sup> 但是在6月2日，察里津的一名政治委員告訴莫斯科，當地人「幾乎沒聽說過成立紅軍的消息……在這裏，我們有一大堆司令部和頭頭，從基層的到特設的和最高指揮部的」。<sup>78</sup> 這是在斯大林到達四天後。

斯大林沒有去當地的法蘭西飯店，而是住在一節停靠着的列車車廂裏，還像指揮員那樣穿了一件無領短上衣——那種因為克倫斯基而出了名的半軍事式樣的衣服——還讓當地鞋匠為他做了一雙黑色的高筒靴。<sup>79</sup> 斯大林把不到20歲的妻子娜佳也帶在身邊；她穿着軍服，擔任他的隨行「秘書」。早在他的第一個工作日，即6月7日，他就向列寧誇口說，當他「抽乾」這個富饒的地區，他會發去八趟裝滿糧食的直達列車。他還說，「請放心，我們的手決不發抖」。同時，斯大林抱怨說：「如果我們的軍事『專家們』（飯桶！）不蒙頭睡覺，遊手好閒，線路就不會被切斷；如果線路恢復，那也不能歸功於軍事專家，而是由於反對了他們。」<sup>80</sup> 6月10日，列寧向「所有辛辛苦苦的勞動者」發佈公告說，援助

---

<sup>76</sup> 譯註：此處作者引用的內容實際上分屬兩份不同日期的文獻，即1918年6月7日斯大林在察里津給列寧的電報和1918年7月7日斯大林在察里津給列寧的信；另外，在《斯大林全集》中文版裏，6月7日給列寧的電報中並無「抽乾」一說。參見《斯大林全集》第4卷，第104-106頁。

302 的糧食很快就到：「派到察里津領導頓河和庫班河地區所有糧食供應工作的人民委員斯大林，已經給我們發來電報，說儲備了大批糧食，他希望很快運往北方。」<sup>81</sup>事實上，沒過幾個星期，斯大林就向北方發出了第一批運糧列車，據說大概9,000噸，儘管斯大林發往北方的糧食總數是多少還不清楚。不過，他就像承諾的那樣，對任何事和任何人都不能姑息。他頻頻打電報給列寧，答應繼續運去糧食，並對執行類似任務的其他官員滿懷怨恨，稱他們是破壞分子。<sup>82</sup>

這個趾高氣揚的鞋匠兒子最重要的工具之一，就是察里津的契卡。它於1918年5月剛剛成立，那時佔據了一棟俯瞰伏爾加河的兩層宅邸。上面一層用於辦公和住宿，下面一層分隔成幾間牢房。那些牢房很快就塞滿了犯人，他們被打得不省人事地「認了罪」。契卡的打擊對象包括「資產階級」、神職人員、知識分子以及沙皇軍官——他們中的許多人響應當地的號召加入了紅軍。工人和農民要是敢批評，或是有人說他們批評了這種隨意抓人打人的行為，也會被當成反革命抓起來。<sup>83</sup>關於契卡暴行的流言為它增添了幾分神秘色彩：哈爾科夫的契卡據說會剝下受害者的頭皮，葉卡捷琳諾斯拉夫的契卡會用石頭砸死受害者或者把他們釘在十字架上，而克列緬丘格的契卡會把受害者釘在尖樁上。<sup>84</sup>在察里津，據說契卡用手鋸鋸斷人的骨頭。<sup>85</sup>當時在察里津已經是地區契卡首腦的亞歷山大·I.切爾維亞科夫(Alexander I. Chervyakov，生於1890年)，表現得就像暴君。他和他的穿着皮衣的打手們算了他們的舊帳，包括與其他契卡特工人員的舊帳，但現在，他們都聽命於斯大林。<sup>86</sup>有位見證人，布爾什維克費奧多爾·伊利英(Fyodor Ilin，他根據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說中的人物名，用過「拉斯科爾尼科夫」(Raskolnikov)這個名字)回憶說，「在察里津，斯大林就是一切」——該地區契卡事實上的首腦，而且很快也成為該地區紅軍事實上的首腦。<sup>87</sup>

斯涅薩列夫建立了一支2萬人的地方紅軍隊伍，並在察里津至葉卡捷琳諾達爾鐵路沿線爆發激烈戰鬥的時候，組織察里津周圍的防禦。<sup>88</sup>但斯大林此時正在處心積慮地想要撤換這位前沙皇軍官。7月10日，他打電報給列寧說：「南方糧食很多，但是要得到這些糧食，必須有一個不受軍用列車、各集團軍司令員等阻撓的健全機構。」因此，斯大林的

結論是：「從工作利益着想，我必須有軍事全權。這一點我過去提過，但是沒有得到答覆。好吧。在這種情況下，我將自己作主，不經形式手續把那些損害工作的集團軍司令員和政治委員撤職……我決不因為沒有托洛茨基的公文而不去行動。」<sup>89</sup> 這種公然藐視陸軍人民委員權威的行為讓托洛茨基十分意外。他在7月17日打電報給斯大林，指出斯涅薩列夫應該留在司令員 (*voenruk*) 的位置上，但是，「如果你認為保留斯涅薩列夫軍事委員的職務不合適，那就告訴我，我會把他調走。托洛茨基」。<sup>90</sup> 斯大林迫不及待地接受了這一讓步。7月19日，用當地的三人革命軍事委員會取代斯涅薩列夫及其北高加索軍事委員職務的批文到了。這三人是：斯大林；察里津布爾什維克的頭號人物謝爾蓋·米寧 (Sergei Minin)，他是神父的兒子，同斯大林一樣，也曾是神學院的學生；以及當地的另外一名官員。在莫斯科發來的命令上還有這麼一句：「發來的這封電報得到了列寧的批准。」<sup>91</sup> 列寧需要糧食。<sup>92</sup> 斯大林需要不受托洛茨基節制的自主權。

303

斯大林現在把斯涅薩列夫的作戰處據為己有。一張7月22日的清單列出的物品有：打字機（「雷明頓牌」）一台；電話（城市線）一台；電話（察里津司令部）一台；桌子四張；藤椅七張；鋼筆三支；鉛筆五支；文件夾一個；垃圾桶一個。<sup>93</sup> 斯大林認為斯涅薩列夫是托洛茨基的人，因而曾經強迫他把兩支軍隊統一歸克利姆·伏羅希洛夫指揮。<sup>94</sup> 伏羅希洛夫出生於盧甘斯克，同察里津契卡的亞歷山大·切爾維亞科夫一樣，老家都在頓巴斯煤礦。伏羅希洛夫在1906年黨的第四次代表大會上同斯大林見過（他們住在同一個房間）。他的出身同樣低微：母親是給人洗衣服的，父親在礦上和鐵路上做工。伏羅希洛夫八歲時就輟學伺候牲口、學做鎖匠。1917年8月，他從切爾維亞科夫手中接管了盧甘斯克市的杜馬，掌管到1918年2月，烏克蘭成為德國人的天下，於是他開始打游擊，而這也成了他最初的軍事經歷。<sup>95</sup> 他和其他赤衛隊員一起從烏克蘭撤到察里津。作為一個優秀的騎手和射手，一個真正的

<sup>89</sup> 譯註：《斯大林全集》第4卷，第108-109頁。

無產者，他在普通士兵中有些名氣，但決不是一個戰略家。「從個人來講，伏羅希洛夫並不太具備一名軍事長官所必須具備的素質，」斯涅薩列夫在1918年7月給托洛茨基寫道，並且還說他「不遵守部隊指揮的基本規則」。<sup>96</sup>但斯大林和伏羅希洛夫一起極力主張的防禦計劃是，把察里津北面防線的部隊調到其南面和西面發動進攻。進攻在8月1日如期開始。不到三天，察里津就失去了同莫斯科的聯繫；部隊不得不調回城市的北面。斯大林寫信給列寧（8月4日），把責任推給斯涅薩列夫留下的「攤子」。<sup>97</sup>

304 斯大林讓人逮捕了斯涅薩列夫和各式各樣沙皇時代的軍人，這是清除「軍事專家」行動的一部分，而「軍事專家」也包括當地的整個炮兵指揮部，連文書都算。<sup>98</sup>契卡總部前有一條河，他們被關在河裏停泊的一條駁船上。托洛茨基派了一名助手、西伯利亞人阿歷克謝·奧庫洛夫(Alexei Okulov)調查此事。奧庫洛夫釋放了斯涅薩列夫(他被派到了別的地方)，同時批評了斯大林和伏羅希洛夫。托洛茨基還發了一封措辭嚴厲的電報，命令察里津允許沙皇軍官們幹他們的工作，但斯大林在電報上寫道，「不予考慮」。<sup>99</sup>關在船上的大約400名被捕人員，很多都在1918年夏天被餓死或槍斃了。

斯大林此時還在緊張地進行另一項針對高層的燃料遠征隊的陰謀。燃料在莫斯科也十分緊缺，因此，為了弄到石油，列寧讓最高經濟委員會的布爾什維克K. E. 馬赫羅夫斯基(K. E. Makhrovsky)組織一支遠征隊，帶了1,000萬盧布的現金到北高加索的格羅茲尼煉油廠。在交通人民委員部的黨外技術專家N. P. 阿列克謝耶夫(N. P. Alekseev)以及捷列克省(北高加索)的蘇維埃負責人謝爾蓋·基洛夫的陪同下，馬赫羅夫斯基的油罐專列於7月23日左右抵達察里津，準備從那裏前往格羅茲尼。斯大林對他們說，向南的鐵路線已經落到車臣的叛軍和捷列克的哥薩克手中。馬赫羅夫斯基向他索要在察里津發現的燃料未果，便返回莫斯科匯報，把空的油罐列車和鎖在手提箱裏的1,000萬盧布留給了自己的妻子和黨外專家阿列克謝耶夫。8月13日，基洛夫以斯大林的名義向馬赫羅夫斯基的妻子討要那筆錢。她拒絕了，然後偷偷地同阿列克謝耶夫商量，把錢藏到一個新的地方。8月15日，馬赫羅夫斯基回到察里

津。為了那1,000萬以及相關的事務你來我往地又爭執了一番，8月17日的夜裏，斯大林讓人逮捕了阿列克謝耶夫，並在馬赫羅夫斯基的陪同下，把阿列克謝耶夫交給了契卡。對他的指控是策劃一起牽連很廣的奪權陰謀。他的同謀據說很多，有前沙皇軍官、塞爾維亞軍官、社會革命黨人、工聯分子、托洛茨基的一名「將軍」、前臨時政府官員。<sup>100</sup>「所有專家，」據說契卡頭子切爾維亞科夫認為，「都是資產階級，而且大部分是反革命。」<sup>101</sup>

馬赫羅夫斯基本人也被抓了起來。對於他那由列寧簽發的政府委任狀，察里津契卡拒不認可。「同志，不要說中央，也不要說地方必須服從中央，」據馬赫羅夫斯基（呈交給列寧）的描述，審訊人員伊萬諾夫對他說，「在莫斯科，他們有他們做事的方式，而在這裏，我們有我們自己做事的方式……中央不能甚麼事都對我們發號施令。我們要讓中央聽從我們的意志，因為在地方上是我們掌權。」<sup>102</sup>當月的晚些時候，在當地的蘇維埃想要調查察里津契卡隨意抓人殺人的行為時，後者阻止了他們，聲稱自己得到了中央的授權。實際上，他們執行的是斯大林的命令。斯大林最後放掉了馬赫羅夫斯基，但他也得到了自己想要的：燃料遠征隊的錢、車輛和所有其他東西。<sup>103</sup>

305

斯大林同伏爾加河上下游的其他人一樣，把犯人關在船上，可他有的不只是牢船。他領導下的察里津契卡大肆宣揚，發現了準備資助反革命的幾百萬盧布；隨後是大逮捕，處死了「由右派社會革命黨人和黑色百人團軍官組成的阿列克謝耶夫反革命白衛分子陰謀」的23名領導人。<sup>104</sup>根本沒有審判。阿列克謝耶夫被打得渾身是血，然後同他的兩個兒子（其中一個才十幾歲）一起被槍殺了；其他被關押的，不管是出於甚麼原因，或者根本就沒有原因，也被扯進了這起「陰謀」。斯大林充分利用了報刊的力量。他（在8月7日）把當地的《北高加索軍區新聞報》改為面向大眾的《革命士兵報》；（1918年8月21日的）「特別」版及時宣佈了「挫敗」阿列克謝耶夫「陰謀」的消息。「斯大林對鼓動工作寄予厚望，」察里津紅軍指揮部的參謀、前沙皇軍官阿納托利·諾索維奇上校（Anatoly Nosovich）寫道，「他經常在有關軍事藝術的爭論中說，關於軍事藝術的必要性，所說的一切都很好，但是，如果世界上最有才能的

指揮員缺乏依靠鼓動工作正確地培養起來的具有政治覺悟的士兵，那可以肯定，他是對付不了數量雖小但積極性很高的反革命分子的。」<sup>105</sup>

在爆出「阿列克謝耶夫陰謀」的重大新聞時，新選出的頓河哥薩克的阿特曼(首領)彼得·克拉斯諾夫將軍(Pyotr Krasnov)已經率領軍隊包圍了察里津，但斯大林處決犯人並不是因為恐慌。<sup>106</sup>許多人都在擔心哥薩克有可能進入這座紅色城市，而他卻在利用「反革命」的幽靈去激勵工人，恐嚇試圖與布爾什維克為敵的人。在一場政治秀中，契卡強迫「資產階級」在城市周圍挖防禦戰壕，並在眾目睽睽之下，在說要處死他們的竊竊私語中，反擰着雙臂把犯人從「牢船」押往監獄。據說當時到處都有通風報信的人。<sup>107</sup>最主要的是，斯大林領導下的契卡消滅「敵人」的行為釋放出一種強烈的、帶有宣傳性質的信號：據說在克拉斯諾夫的白軍包圍察里津期間，為了讓哥薩克佔領這座城市，革命內部的敵對分子正在策劃暴動。<sup>108</sup>(這在後來叫做第五縱隊。)從這裏，1920和1930年代無數捏造的審判——在1937至1938年的大恐怖中達到頂峰，已經露出了一點點影子。

斯大林的工作方法深受階級觀念的影響。為了打通生死攸關的鐵路線，他甚至想把寥寥幾個對鐵路線真正比較瞭解的技術專家抓起來或就地處決，因為他們是階級異己分子，而階級異己分子就是破壞分子。當然，他還沒有目光短淺到反對所有前沙皇軍官的地步。<sup>109</sup>但他依靠那些新提拔上來的、像他本人一樣來自「人民」的人，只要他們忠於自己。無產者出身的伏羅希洛夫(生於1881年)，沒有露出任何想要踏着斯大林向上爬的意思。伏羅希洛夫後來認為，斯大林的做法是「對後方無情的清洗，是鐵腕管理」——在布爾什維克當中，這根本算不上惡行。

大概就是在這個時候(1918年8月)，在喀山落到白軍手中之後，托洛茨基去了喀山附近的斯維亞日斯克，在那裏認識了前沙皇軍隊的上校、拉脫維亞人指揮員約阿基姆·瓦采季斯，並把他提拔為紅軍最高總司令(該位置一直空缺)。<sup>110</sup>托洛茨基還認識了伏爾加河艦隊司令費奧多爾·拉斯科爾尼科夫以及兩名委員伊萬·斯米爾諾夫(Ivan Smirnov，「西伯利亞的列寧」)和阿爾卡季·羅森格爾茨(Arkady Rozengolts)。喀

山戰役中的這幾個人，後來成了托洛茨基手下的一個小集團，類似於斯大林的察里津幫。<sup>111</sup> 為了挽救行將崩潰的戰線，托洛茨基命令：「如有哪支部隊擅自後退，第一個被槍斃就是政委，第二個就是指揮員……膽小鬼、只顧自己的人和叛徒也逃不過挨槍子。」<sup>112</sup> 因此，托洛茨基對斯大林有意見，不是因為斯大林的過分殘忍，而是因為他在軍事上的業餘和不服從命令。就斯大林而言，他對來自遠方的軍事命令感到憤怒，在他看來那些命令沒有考慮到「當地的情況」，所以他才擅自改變莫斯科送給南方高加索戰線的軍需物資的用途，關押並槍斃軍事專家，想要依靠赤衛隊式的武裝工人守住城市。

在察里津時，斯大林的個性暴露得十分充分：對階級觀念和無師自通抱着極其偏執的態度；固執而易怒；注意政治上的教訓但軍事上比較無知。托洛茨基注意到斯大林在軍事上一知半解、任性而且易怒，但其他方面就不甚了了。除了伏羅希洛夫，幾乎沒有別人對斯大林有全面的認識。但有一個人「看穿了」斯大林，那就是前沙皇軍官諾索維奇（生於1878年）。諾索維奇出身貴族，1918年加入紅軍，同年秋天投奔白軍，從而逃過了斯大林為階級異己分子和批評者準備的斷頭台，他的叛逃讓斯大林更加堅信自己對於軍事專家的看法是正確的。<sup>113</sup> 「斯大林在選擇實現目標的手段時不會猶豫，」諾索維奇（化名A.「黑海人」）在他當時揭露紅色陣營的報道中寫道，「聰明、精明、受過教育而且詭計多端，（斯大林）是察里津及其居民中的邪惡天才。各種各樣的徵用，將住戶掃地出門，伴隨着無恥偷盜的搜查、逮捕以及其他針對平民的暴力行為，在察里津是很平常的事情。」對於格魯吉亞人的真正任務——不惜一切代價搞到糧食——以及紅色察里津所面臨的真正威脅，諾索維奇說的是對的。他看到的不僅有斯大林對於絕對權力的渴望，還有他對於事業絕對的獻身精神：斯大林從自己人那裏竊取了1,000萬盧布和一支車隊，不是為了個人享受，而是為了保衛革命；他在沒有證據或未經審判的情況下處死「反革命分子」，不是因為要逞威風或者恐慌，而是將這當作一種激勵群眾的政治策略。「公正地說，」諾索維奇最後表示，「任何舊的行政官員都不如斯大林那樣充滿活力，而他無論如何都要把事情辦好的能力也值得學習。」<sup>114</sup> 可察里津仍舊危在旦夕。



## 斯大林被召回和化險為夷

1918年8月30日，當列寧在莫斯科米歇爾遜工廠遭到槍擊後，斯大林同斯維爾德洛夫通了電報，知道自己的恩主傷勢十分嚴重。<sup>115</sup>因為斯大林和托洛茨基都不在莫斯科，斯維爾德洛夫便負起責任；他身材瘦小，說話渾厚有力，是會場上的權威，但名望遠不及列寧。托洛茨基的威信僅次於列寧，斯大林的名聲也在上升，但兩人彼此的敵意很深；斯維爾德洛夫既不能化解他們的分歧，也無法超過兩人當中的任何一個。三人只能祈禱列寧能夠康復，那是布爾什維克存亡的關鍵。

308 隨着列寧逐漸康復，托洛茨基和斯大林之間的對立變得越發嚴重。1918年9月11日，北高加索軍區更名為「南方戰線」，同時，斯維爾德洛夫將斯大林召到莫斯科；9月14日，斯大林到達莫斯科，並在第二天見了斯維爾德洛夫和列寧。9月17日，在斯大林也一同出席的共和國革命軍事委員會會議上，托洛茨基任命前沙皇軍隊少將帕維爾·瑟京(Pavel Sytin)為南方戰線司令員(南方戰線不僅僅是一個地方，還類似於一個集團軍群)，也就是伏羅希洛夫的上級。<sup>116</sup>9月24日，斯大林回到察里津；三天後，他向列寧抱怨說，察里津的彈藥完全空了，而莫斯科一點都沒有運過來(「這是某種犯罪性的掉以輕心，簡直就是叛變行為。如果這樣拖下去，我們無疑將輸掉南方的這場戰爭！」)<sup>117</sup>同日(9月27日)，斯大林向軍方索要大批新武器和10萬套制服(超過了當地部隊的數量)，而且言辭激烈地威脅道：「我們宣佈，如果這些要求不能儘快滿足，我們將被迫停止軍事行動並撤到伏爾加河的左岸。」<sup>118</sup>

1918年9月29日，瑟京少將來到察里津；斯大林和米寧隨即阻撓他行使任命指揮員和發佈作戰命令的權利，反對他把戰線司令部轉移到察里津城外以確保與莫斯科的聯繫的計劃。<sup>119</sup>10月1日，斯大林正式要求用伏羅希洛夫取代瑟京。<sup>120</sup>同日，斯維爾德洛夫發來一封措辭嚴厲的電報：「共和國革命軍事委員會的所有決定」——也就是托洛茨基的所

\* 譯註：《蘇聯歷史檔案選編》(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2)，第1卷，第212頁。

有決定——「對戰線各革命軍事委員會都具有約束力」。<sup>121</sup> 托洛茨基向斯維爾德洛夫抱怨(1918年10月2日)，並直接給斯大林和伏羅希洛夫下令(10月3日)，不要干涉軍事事務。<sup>122</sup> 同日，斯大林寫信給列寧，喋喋不休地指責他的死敵。「問題在於，一般說來托洛茨基不大喊大叫指手畫腳是不行的。」斯大林寫道，「在布列斯特，他以自己漫無節制的『左』的姿態打擊事業。在捷克斯洛伐克人的問題上，他也……以自己那種大喊大叫的外交姿態損害了事業。現在，他又在紀律問題上以其固有的裝腔作勢進行新的打擊，更何況托洛茨基強調這種紀律實際上是由於前線的一些傑出活動家識破了『無黨派』反革命分子陣營中的軍事專家的陰謀詭計。」<sup>123\*</sup> 實際上，雖然托洛茨基認為革命會徹底地改變一切，甚至語言，但他堅持認為革命並沒有改變戰爭：同樣的戰術、後勤保障和基本軍事組織仍然是有效的。<sup>124</sup> 在軍事事務方面，斯大林是左傾主義者，不管前沙皇軍官的表現如何，都對他們進行無情的階級鬥爭。斯大林在10月3日給列寧的信裏最後假惺惺地說道，「我不是吵鬧和醜劇的愛好者」，「現在應該——還為時不晚——制止托洛茨基，讓他遵守秩序」。<sup>†</sup> 斯維爾德洛夫認為應該婉轉一點，但是在10月4日，托洛茨基從南方別的地方打電報給斯維爾德洛夫，並抄送列寧，說「我堅決主張召回斯大林」。<sup>125‡</sup>

309

衝突的結果自然是托洛茨基和斯大林各自請求列寧撤掉對方。

感到疑惑而憤怒的托洛茨基指出，在南方戰線，紅軍的數量是白軍的三倍，可察里津仍然形勢嚴峻。<sup>126</sup> 「伏羅希洛夫能夠指揮一個團，不能指揮5萬人的集團軍。」托洛茨基在10月4日要求召回斯大林的電報中寫道，「但我還是把他〔伏羅希洛夫〕留下擔任察里津第10集團軍司令員，條件是服從南方戰線司令員瑟京的指揮。」托洛茨基威脅說，「如果明天還不執行，我就把伏羅希洛夫和米寧送上法庭，並將此情況通報

\* 譯註：《蘇聯歷史檔案選編》第1卷，第213頁。

† 譯註：《蘇聯歷史檔案選編》第1卷，第214頁。

‡ 譯註：《蘇聯歷史檔案選編》第1卷，第216頁，註1。

全軍……沒有時間來進行外交談判。察里津要麼服從，要麼離開。」<sup>127</sup> 10月5日，斯維爾德洛夫再次指示斯大林、米寧和伏羅希洛夫要執行托洛茨基的命令。<sup>128</sup>

列寧同意托洛茨基召回斯大林的要求——察里津不能丟，但拒絕了托洛茨基處分斯大林的要求。「我收到斯大林從察里津動身來莫斯科的消息，」斯維爾德洛夫打電報給托洛茨基說（10月5日），「我認為現在必須對察里津那幫人保持最大的謹慎。那裏有很多老同志。在態度強硬、毫不妥協的同時必須儘量避免衝突。不用說，我只是在表達我的意見。」<sup>129</sup> 斯維爾德洛夫很有分寸地表達了他對斯大林的判斷，同時要求托洛茨基適可而止。10月6日，斯大林動身前往莫斯科，並在10月8日見到列寧。<sup>130</sup> 在察里津，10月7日那天，米寧主持的有五十多個地方黨組織、蘇維埃和工會積極分子參加的會議通過了一項決議，建議對起用前沙皇高級將領一事，召開「全國代表大會，重新審視和評估中央的政策」。外省人要求中央委員會撤銷這項政策，此舉一方面說明，在1918年的時候，權力沒有完全集中到中央，另一方面也說明地方上的人相信有斯大林「罩着」（或充當保護人）。<sup>131</sup> 然而斯大林在莫斯科的日子並不舒心：他被解除了南方戰線的職務，雖然為了安撫他，又任命他為共和國中央軍事委員會委員。<sup>132</sup> 現在，斯大林在同托洛茨基聯繫的時候，必須要在電報上寫上「軍事委員會委員斯大林」致「軍事委員會主席」。<sup>133</sup>

310

大概在10月11日，斯大林又回到了察里津，而且證據顯示，是在斯維爾德洛夫的陪同下，而斯維爾德洛夫的目的是想緩和當地紅色陣營內部的緊張關係。<sup>134</sup> 白軍在1918年10月15日打到了察里津郊區，在紅軍總司令瓦采季斯發給伏羅希洛夫同時抄送瑟京和托洛茨基的電報中，這一天的局勢被說成是「災難性的」；瓦采季斯責備伏羅希洛夫不配合他的上級瑟京。<sup>135</sup> 斯大林在10月19至20日決戰正酣的時候離開了察里津，而且再也沒有回去。托洛茨基趕來代替他以及挽救這座城市的防禦工作。<sup>136</sup>

---

\* 譯註：同上註。

後來保住、但只是勉強保住察里津的不是托洛茨基，而是德米特里·日洛巴(Dmitry Zhloba)。他的15,000人的「鐵軍」離開高加索前線，16天走了500英里\*，偷襲了沒有防備的白軍後方。<sup>137</sup> 10月25日，「鐵軍」把哥薩克趕過頓河。<sup>138</sup> 四天後，斯大林向莫斯科蘇維埃全體會議報告了形勢一度是如何危急。<sup>139</sup> 實際上，要是在1918年秋天丟掉察里津，除了永久的名譽損失之外，他可能還要受到政府的調查和處分。<sup>140</sup>

### 世界的轉折點(1918年11月-1919年1月)

喜歡豪賭的並不是只有列寧。德國指揮部就接連嘗試了一系列的豪賭：試圖打贏機動性戰爭的施利芬計劃(1914)、為了耗盡敵人的資源而在凡爾登採用新的消耗戰戰略(1916)、為了打破英國的海上封鎖而實施無限制的潛艇戰(1917)、為了製造混亂並促使俄國退出戰爭而把列寧送回國；以及在德軍取得東線的勝利後，接着又於1918年3月21日在西線大舉進攻。<sup>141</sup> 到了6月，西線德軍已經距離巴黎不到37英里†，近到足以用「大貝爾塔」重炮去轟擊巴黎的程度。但德國國防軍付出了100萬人傷亡的代價，卻沒能拿下法國的首都。<sup>142</sup> 潛艇戰招致美國部隊的加入，他們開始以每月12萬人的速度抵達法國(美國已在1917年初參戰，當時共有15萬隨時可應令出征的士兵)。與此同時，加拿大、澳大利亞、新西蘭、印度和南非也派兵代表英國參加軍事行動，而且比美國後來派的還多，結果在1918年8月，得到增援的協約國開始反攻。是的，由於布列斯特和約——或者更確切地說，由於柏林主動違背自己在條約中所禁止的行為，德國向西線調動了50萬軍隊，從而使那裏的兵力從150個師增加到192個師。<sup>143</sup> 但是到1918年9月28日，負責西線攻勢的副總參謀長埃里希·魯登道夫告訴自己的上司、陸軍元帥保羅·馮·興登堡，德國取勝無望，因為沒有可以投入戰鬥的後備力量。魯登道夫沒有提到的是，在發動西線攻勢期間，混亂的東線佔領

311

---

\* 編註：約805公里。

† 編註：約60公里。

區拖住了近100萬德國國防軍士兵，從東線佔領區非但沒能獲得資源，反而消耗了他們的力量。<sup>144</sup>（單是為了讓烏克蘭的鐵路恢復通車，德國就輸出了8萬噸煤。）魯登道夫後來拿布爾什維主義及其對德國軍隊的「傳染」做替罪羊，哀嘆說：「我過去時常夢想這場〔俄國〕革命，以為它會大大減輕我們的戰爭負擔，可現在，夢想突然以一種始料未及的方式變成了現實。」<sup>145</sup> 但就如有學者解釋的，「打敗作為軍人的魯登道夫的那個人，與其說是〔協約國最高總司令〕福煦元帥，不如說是作為政客的魯登道夫」。<sup>146</sup>

在此期間，為了拯救正在撤退的國防軍——他們遍佈在從法國到烏克蘭的外國領土上——焦頭爛額的魯登道夫建議向協約國要求立即停火，但德國新內閣的文官們不同意。文官們考慮進行全民總動員，作最後的抵抗，這同後來所謂在背後捅刀子的說法恰好相反。<sup>147</sup> 魯登道夫很快就改變求和的想法並辭去了職務；內閣也從未設法動員平民。

11月9日，列寧在新古典主義風格的莫斯科大劇院，高興地對參加第六次全俄蘇維埃代表大會的代表們說：「我們從來沒有像現在這樣接近國際無產階級革命。」<sup>148</sup> 同一天，堅定的君主派興登堡以及德國指揮部的其他人，因為擔心國內會發生他們送列寧回俄國煽動的那種革命，便向德皇施壓，要求他退位。威廉二世讓人把他的專列轉軌，越過邊境進入荷蘭，在人身安全得到保障之後，立即簽署了一份正式的退位聲明。<sup>149</sup>（和被處死的表弟尼基不同，維利的壽命很長，在流亡中獲得善終。）接着就是在1918年11月11日，在福煦元帥位於前線附近的法國森林中的專列上簽署了停戰協議。停戰協議要求各地德軍立即撤出——在從前的俄羅斯帝國境內的除外，德軍要繼續留在那裏等待協約國的下一步命令。<sup>150</sup> 兩天後，莫斯科單方面宣佈廢除布列斯特和約以及1918年8月的補充和約（連同補充和約中的60億盧布的賠款，只是賠款已經支付了一部分）。<sup>151</sup>（獲勝的協約國很快就迫使德國宣佈，正式放棄布列斯特和約。）經過了可怕的52個月，世界大戰結束了。列寧心情大好，

312

\* 譯註：《列寧全集》第35卷，第114頁。

釋放了在押的非布爾什維克社會主義者，並於1918年11月30日讓孟什維克黨重新成為合法的政黨。<sup>152</sup>

戰爭帶來了巨大而深遠的影響。在美國和英國，戰時GDP都提高了，但是在奧地利、法國、奧斯曼帝國以及俄國卻下降了30%至40%。<sup>153</sup>在各參戰國，世界大戰讓稅收和國家對經濟的控制達到了史無前例的水平，而且後來大多沒有降下來。<sup>154</sup>除了戰爭中有850萬人死亡和近800萬人被俘或失蹤外，全球還有5億人染上流感並至少有5,000萬人死亡，足足佔全世界人口的3%（有些人估計死亡人數高達1億）。<sup>155</sup>約有2,000萬人返回家鄉時都受過不同形式的重傷。150萬英國士兵落下殘疾（殘疾軍人的補助標準是：失去右臂的每週16先令，失去右手和前臂的11先令6便士，失去左臂的10先令，臉部毀容的甚麼也沒有）。在德國，約有270萬人在回國時都帶有戰爭造成的殘疾，同時，戰爭還製造了50萬寡婦和120萬孤兒。為了維護公共秩序，更別說也是為了還債，士兵和寡婦得到了撫恤金。由於戰爭的影響而採取的其他緊急社會政策還包括緊急住房法令——在無奈之下開始實行永久性的政府管制。在戰爭的刺激下，失業保險、疾病救濟金、生育及喪葬補助，擴大為原始形態的福利國家。俄羅斯帝國的損失有：死亡200萬人，受傷250萬人。<sup>156</sup>俄國人當中染病的估計有240萬人，被俘有390萬人——投降的人數之多，相當於其他參戰國戰俘數量的總和。<sup>157</sup>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托洛茨基才嘲諷「天主教徒和教友會教徒口口聲聲說的人的神聖性」，而列寧也以贊同的口吻引用了馬基雅維利的話，大意是「暴力只能用暴力來回答」。<sup>158\*</sup>

接受德意志帝國的幫助返回俄國，在彼得格勒發動政變，與德國單獨媾和，列寧的幾次豪賭成功了。俄國和德國，戰爭中的兩個對頭，313現在都失敗了，兩國提供了一種很有啟發性的對比。列寧承認：「戰爭使人得到了許多教益，它不僅使人知道人們要遭受痛苦，而且使人懂得，佔上風的總是擁有高度的技術裝備、組織性、紀律性和精良的機器

---

\* 譯註：《列寧全集》第35卷，第252頁。

的人。」<sup>159</sup>\* 同時代的很多人都說魯登道夫（出生於1865年）和列寧（出生於1870年）兩人的方法有相似之處，就跟戰爭時期德國的政策同布爾什維克的政策總的來說很相似一樣。<sup>160</sup> 東歐的德國佔領軍的辦法是人口登記、財產充公、徵兵及胡亂發佈法令，在陷入自己造成的管理混亂的同時，卻要求獲得無限的權力。但與布爾什維主義不同，戰時德國在東歐的統治並沒有從政治和文化上把民眾組織起來。也沒有創辦任何使用本地語言的報紙和學校，用以影響和塑造當地社會。相反，德國人一心想着如何讓本國公職人員沉浸在德意志文明（*Kultur*）中，唯恐他們受到當地習俗的影響。要不是因為當地有說意第緒語並能很快成為德國人翻譯的猶太人，那些德國霸王恐怕都沒有辦法交流。<sup>161</sup> 德國人根本沒有把激發大眾參與作為首要的目標，他們也沒有建立群眾組織。德國在東歐的經驗不僅證明了布爾什維主義應該在多大程度上歸功於世界大戰，還證明了布爾什維主義在多大程度上強於軍事佔領。<sup>162</sup> 另外，把魯登道夫在立陶宛、西白俄羅斯和拉脫維亞的私人王國同斯大林在察里津相比較，可以發現斯大林展示出與魯登道夫完全相反的才能：軍事上業餘，但政治上老道。

斯大林的門徒、駐防察里津的第10集團軍司令員伏羅希洛夫還在堅持。<sup>163</sup> 起初，最高總司令瓦采季斯想要解除他的職務，可托洛茨基儘管堅決要求立即撤掉謝爾蓋·米寧（「執行的是極端有害的政策」），卻表示要是給伏羅希洛夫身邊派個得力的人，可以讓伏羅希洛夫留任。<sup>164</sup> 但不久托洛茨基便打電報給斯維爾德洛夫，要求把伏羅希洛夫也撤掉（「沒有表現出任何主動精神，淺薄，缺乏才幹」）。<sup>165</sup> 與此同時，瓦采季斯的態度卻有所鬆動，表示他並不太反對讓伏羅希洛夫去指揮烏克蘭的紅軍（可能對於那個位置他根本沒有其他人選）。<sup>166</sup> 托洛茨基大怒。「妥協是必要的，但不能隨意妥協，」他向列寧申辯說（1919年1月11日），「實際上，察里津那幫人全都集中在哈爾科夫……我認為斯大林對察里津幫的保護是個危險的潰瘍，比軍事專家的背叛和賣國更壞

---

\* 譯註：《列寧全集》第34卷，第108頁。

……伏羅希洛夫，連同烏克蘭人的游擊習氣、缺乏教養和蠱惑人心，那是我們在任何情況下都要不得的。」<sup>167</sup>

伏羅希洛夫和托洛茨基之間的敵意讓前者對斯大林來說十分重要。伏羅希洛夫、米寧及其手下為了報復而開始暗中散佈托洛茨基的謠言，說這位陸軍人民委員同沙皇的將軍們關係很近，正在把共產黨員交給行刑隊，那可是叛變的苗頭。<sup>168</sup>（斯大林可以把對托洛茨基不利的話直接報告給列寧。）左派共產主義者，比如主編《真理報》的尼古拉·布哈林，則利用察里津幫繼續他們自己的反托洛茨基活動，以實現軍事組織的「民主化」。<sup>169</sup>托洛茨基被迫進行還擊。他在1919年初嘲笑「蘇維埃新官僚」，說這些官僚「在他們的任務面前發抖」，嫉賢妒能，不願學習，還為自己的過失找替罪羊。「這是對共產主義革命事業的真正威脅……是反革命的真正幫兇。」<sup>170</sup>這成了托洛茨基後來批判斯大林主義的要點。

列寧把斯大林突然調離察里津，但是對於這位自己的格魯吉亞門徒，很明顯仍然十分信任。1919年1月，他把斯大林派到一個新的熱點地區，烏拉爾的維亞特卡，去調查彼爾姆及其周圍地區為甚麼會落到海軍上將高爾察克手裏。<sup>171</sup>與斯大林一起去的是契卡的捷爾任斯基，而且斯大林依然帶着妻子娜佳，還有娜佳的姐姐安娜·阿利盧耶娃（生於1896年）；捷爾任斯基的貼身秘書斯坦尼斯拉夫·雷傑恩斯（Stanislaw Redens，生於1892年）也是波蘭人，他愛上斯大林的大姨子，很快娶了她。至於紅軍在彼爾姆的潰敗，斯大林和捷爾任斯基先後提交了三份報告，強調紅軍的極端混亂和當地人對政權的敵意（因為徵糧），但每次的報告都推卸責任，先是責難托洛茨基，然後是瓦采季斯。他們的報告刻意列出了紅軍方面叛逃到白軍那邊的前沙皇軍官。報告中也承認布爾什維克政權應避免把「太年輕的」同志或黨內「煽動家」派去監督沙皇時代的指揮員——或許是由於列寧干預的緣故，這個說法相比於斯大林早先的強硬路線緩和了一些。<sup>172</sup>在此期間，1月19日星期日那天，列寧去見正在莫斯科郊外的新鮮空氣和樹林中養病的克魯普斯卡婭時，他的勞斯萊斯被三名武裝士兵搶走了。剩下的路，這位革命領袖只好同他的妹妹、司機（斯捷潘·吉爾）以及一名衛兵一起徒步跋涉了。<sup>173</sup>



## 凡爾賽 1919：反常現象

315

在載入史冊的諸多和約中，受批評最多的幾乎要數凡爾賽條約了。巴黎和談從1919年1月18日（德國統一紀念日）開始，於1919年6月28日（弗朗茨·斐迪南大公遇刺五週年那天），在凡爾賽的鏡廳，也就是德意志帝國宣告成立的地方結束。37個國家派去了代表（有的還不止一個）；處理種族及領土要求相關議題的有各種各樣的專家委員會；報道會議進程的記者有500人，但決定會議結果的只有三人：大衛·勞合一喬治（David Lloyd George，英國）、喬治·克列孟梭（Georges Clemenceau，法國）和伍德羅·威爾遜（Woodrow Wilson，美國）——他是普林斯頓大學教授，也是第一位出訪歐洲的美國在任總統。78歲的克列孟梭想要削弱德國在經濟實力和人口方面的優勢；勞合一喬治想要通過犧牲德國的利益來實現英國在殖民地和海軍方面的目標；威爾遜則在設想一種穩固而永久的和平，儘管他慫恿法國對德國施以懲罰。最終的內容包括440條，其中開頭26條是關於新的國際聯盟的，其餘414條涉及所謂由德國獨自承擔的戰爭罪。德國不得擁有超過10萬人的軍隊，不得擁有任何軍用飛機，而且喪失了包括割讓給法國的阿爾薩斯和洛林在內的13%的領土、海外殖民地及商用船隊。法國本來還想把萊茵蘭分開，但勞合一喬治不同意；結果萊茵蘭成了非軍事區。德國西普魯士的大部分地方都劃給了剛剛重建的波蘭，以德意志人為主的但澤成了「自由市」，而且在德國的領土間形成了一條所謂的波蘭走廊，從而把德國的東普魯士分隔開來。為了給法國和比利時提供重建資金，為了給英國提供償還所欠美國戰爭貸款的資金，德國要賠償1,320億金馬克，這在當時相當於314億美元或66億英鎊。（大約相當於2013年的4,400億美元。）<sup>174</sup>

就如同那位狂妄的布爾什維克卡爾·拉狄克當初在布列斯特向德國談判代表預言的那樣，德國把布列斯特和約強加給俄國，成了明顯帶有懲罰性質的凡爾賽條約的一大依據。在此期間，凡爾賽條約中的條件甚至在西方也受到公開的指責。法國的福煦元帥表示，「這不是和約，而是為期20年的停火協議」。<sup>175</sup> 不過，與布列斯特和約中的帝俄不

同，德國沒有被肢解。(勞合一喬治在談到德國的時候說，「我們不能既讓它受到嚴重的削弱又指望它支付賠款」。)而且後來與其他戰敗國簽訂的條約，即與奧地利簽訂的聖日耳曼條約(1919年9月10日)、與保加利亞簽訂的納伊和約(1919年11月27日)、與匈牙利簽訂的特里亞農宮條約(1920年6月4日)以及與土耳其簽訂的塞夫爾條約(1920年8月10日)，有些方面更為苛刻。(只有土耳其人拿起武器，設法修改了條約內容。)由勝利者主導的凡爾賽條約，不管它如何把戰爭罪單獨歸於德國，肯定是有缺陷的。它一邊把自決和民族奉為神聖，一邊又推動版圖的重新劃分：凡爾賽條約以及與之相關的一系列條約，讓6,000萬人有了他們自己的國家，同時讓另外2,500萬人成了國內的少數民族。(無國籍的人也一下子增加了許多。)愛德華·貝奈斯(Edvard Beneš)\*和托馬斯·馬薩里克(Tomáš Masaryk)†犧牲匈牙利的利益，讓新的捷克斯洛伐克獲得了額外的領土，雖然兩國曾經站在輸掉戰爭的奧地利一邊並肩戰鬥過。羅馬尼亞也通過犧牲匈牙利的利益，得到了大片由不同民族混居的土地。但如果說匈牙利是匈牙利人天經地義的祖國，那根據民族自決原則，為甚麼要把那麼多匈牙利人塞到其他地方？猶太人根本沒有獨立的祖國，結果在所有國家都屬於少數民族。自決原則並不適用於英國和法國這兩個帝國統治下的任何殖民地民族，而這兩個帝國都擴大了：1919年，單是英帝國就擴大到四分之一個地球。許多戰利品都同殖民地有關，比如礦產資源豐富的非洲新領地，還有中東的新油田。新的捷克斯洛伐克的首任總統托馬斯·馬薩里克，稱凡爾賽和會是「建在一大片基地上的實驗室」。

不管凡爾賽條約在原則上存在多大的漏洞，從強權政治的角度來看，它完全是失敗的：美國人要回家，英國人要後退，而和德國緊挨着的法國人承擔不了落實條約規定的重任。<sup>176</sup>懲罰性和約只有在齊心合力地執行時才具有懲罰性，而當時缺的就是齊心合力。這一切已經夠

---

\* 譯註：1884–1948，捷克政治家，一戰後先後擔任過捷克斯洛伐克的外交部長、總理和總統等職。

† 譯註：1850–1937，捷克政治家和哲學家，捷克斯洛伐克的第一位總統。

要命的了，但是，即便在列強放棄凡爾賽體系之前，它就是建立在一種暫時的反常現象——德俄兩強同時解體的基礎上的。這兩種狀況都不可持久；到頭來哪一個都不會。

到1917年為止，俄國在世界大戰中對協約國的貢獻還沒有得到承認。英國人原以為，為了打敗德國，俄國「壓路機」將同法國一起承擔大部分作戰任務（和傷亡），那樣一來，英國就可以只負責補給和軍費，但是，把俄國人當作英國傭兵和炮灰的做法引起了難以消弭的怨恨，因而不得不放棄。<sup>177</sup> 與此同時，英國發現自己陷入了一種要依賴於盟友的戰略要務的境地，這讓它很不習慣，於是倫敦在戰後開始追求一種不即不離的大戰略，而這種戰略，除了源自世界大戰的經驗，還源自由來已久的偏好（隔岸觀火）和優先考慮的重點（帝國）。<sup>178</sup> 至於此時此地的布爾什維克俄國，協約國不知道如何是好。福煦主張發動先發制人的戰爭，克列孟梭鼓吹遏制（建立防疫帶）；勞合一喬治認為可以通過貿易來軟化布爾什維主義，英國政界的其他人物想要逐步削弱左翼的威脅。<sup>179</sup> 對於英國的某些帝國主義者來說，他們樂於見到俄國被迫放棄對高加索的統治，並希望強化魯登道夫在東線採取的分裂俄羅斯帝國的政策，但其他英國人對德國抱有戒心，他們寧可讓俄國重新統一，以作為一種制衡的力量。結果，雖然凡爾賽條約大談「布爾什維克病菌」的傳播，但它對俄國遠不如對德國那麼關注。可這兩個國家事實上是分不開的。<sup>180</sup> 德國的政治精英大多拒絕接受凡爾賽的裁決；和會接納了格魯吉亞、阿塞拜疆、亞美尼亞和烏克蘭的代表，而蘇維埃俄國卻被拒之門外，這就讓莫斯科有理由不承認會議結果的合法性。在德俄兩國努力恢復其大國地位的過程中，凡爾賽條約把矛頭對準德國同時又忽視了俄國，這就把兩個棄兒推向彼此的懷抱，從而奠定了斯大林的世界的基礎。<sup>181</sup>

### 成為眾矢之的的人民委員

布爾什維克試圖立即對凡爾賽發起反擊。1919年1月24日，他們通過電報向全世界發出邀請函；3月2日，約50名共產黨人和其他左翼人士組成的半國際性集團出席了在莫斯科召開的會議，並成立了第三

(共產黨)國際或者叫共產國際。克里姆林宮帝國參政院又長又窄的米特羅法諾夫大廳的地板鋪上了豪華地毯，窗戶也掛上了色彩鮮艷的簾幕，但是在這個非常寒冷的地方，火爐卻因為缺少燃料而成了擺設。來自莫斯科黨組織的約50名特邀代表列席旁聽。「代表們在明顯是從某個咖啡館借來的搖搖晃晃的桌子旁的破椅子上坐了下來，」一名法國共產黨員回憶說，「牆上有一些照片：第一國際的創始人馬克思和恩格斯；仍然受到尊敬的第二國際的領袖們，他們中的大部分都已經不在。」<sup>182</sup> 由於協約國的封鎖和內戰造成的混亂，前往蘇維埃俄國其實很困難；只有九名代表是從國外來的。有幾個左翼政黨把「委託書」交給了生活在莫斯科的個人。即使這樣，也只有34位與會者持有代表大約20個國家(其中很多都是從前沙皇帝國的一部分)的共產黨或近乎共產黨的政黨的證明文件。列寧、托洛茨基、斯大林、契切林、布哈林和季諾維也夫是有表決權的代表(六個人共有五票；斯大林簽發了他們的委託書)。<sup>183</sup>「參加過舊的第二國際代表大會的人，」某俄共黨員在《真理報》上評論說，「會感到十分失望。」<sup>184</sup> 不過，隨着越來越多與會者的到來，此次會議通過表決大膽地把自己確定為第三國際成立大會。托洛茨基的筆端迸發出喜悅之情。「沙皇們和神父們，莫斯科克里姆林宮的古代統治者們，我們要說，從來沒有想到，有一天，現代人類中最革命的的部分的代表們會匯聚在它的灰牆之內」，他在第三國際代表大會閉幕那天(3月6日)寫道。而且他還說：「我們是世界歷史上一個最偉大的事件

的見證者和參與者。」<sup>185</sup> 列寧原計劃在柏林公開召開此次會議，但德國社會民主黨人反對。<sup>186</sup> 在莫斯科，列寧讓季諾維也夫(他能說點德語)擔任執行委員會主席，拉狄克也是執行委員會委員，他曾在德國和瑞士上過大學，受過羅莎·盧森堡的影響，後來又反對她，接着又回過頭來幫助她成立了德國共產黨。<sup>187</sup>「代表們」通過了列寧譴責「資產階級民主」和贊成「無產階級專政」的提綱，而這恰恰是同德國社會民主黨爭論的焦點。左翼陣營的裂痕——此時已經在全球範圍內制度化了——再也沒能彌合。<sup>188</sup>

在此期間，已經計劃好緊接着共產國際會議之後，在3月16日晚召開俄共第八次代表大會，會議只開半場，以便讓代表們參加巴黎公

社(1871)的紀念活動，但是在3月8日，視察奧廖爾的雅科夫·斯維爾德洛夫發着高燒返回了莫斯科；他再也沒有完全恢復。傳言紛紛，要麼說是因為他在寒冷的室外給工人講話，要麼說他是在廠裏被一個工人用重物擊中頭部打死的。實際上，斯維爾德洛夫是死於斑疹傷寒或流感。<sup>189</sup> 據托洛茨基所述，3月16日那天，列寧從克里姆林宮的住處打電話給這位陸軍人民委員說，「『他走了。他走了。他走了。』(有一會兒，我們都拿着聽筒，彼此都可以感受到電話另一端的沉默。然後我們就掛斷了。再也沒說甚麼。)」<sup>190</sup>

斯維爾德洛夫被埋葬在紅場上，在靠近克里姆林宮宮牆的地方，為他舉行了布爾什維克首個重大的國家葬禮。由於他的去世，紀念巴黎公社的活動取消，黨代表大會也推遲兩天。3月18日，即葬禮後的當晚，在帝國參政院圓形的葉卡捷琳娜大廳(它後來以斯維爾德洛夫命名)，俄共第八次代表大會開幕。托洛茨基也缺席了：由於形勢「極其嚴峻」，經中央委員會批准，他已重返前線。他還要求所有紅軍代表返回前線，但他們提出抗議，結果獲准自行決定；許多紅軍代表留下來參加了此次代表大會。<sup>191</sup> 開幕當晚，列寧在講話中稱讚斯維爾德洛夫是對全黨來說「最主要的組織者」。全體起立。<sup>192\*</sup> 部分是由於斯維爾德洛夫的能力，也由於紅軍的建立，從一年前的上一次代表大會以來，黨的規模擴大了一倍。出席大會的有受邀嘉賓以及301名有表決權的代表和102名有發言權的代表，代表蘇維埃俄國(220,495)以及芬蘭、立陶宛、拉脫維亞、白俄羅斯、波蘭——它們當時並不受蘇俄的統治——的313,766名黨員。<sup>193</sup> 對五百多名與會者的調查表明，17%是猶太人，近63%是俄羅斯人，但這一情況並不能改變人們的印象。<sup>194</sup> 白軍和其他的布爾什維克反對者把該政權貶稱為，有一支「猶太佬」紅軍(托洛茨基的「猶太佬布爾什維克」政權。<sup>195</sup>

大會的主要議題之一是普遍起用前沙皇軍官。這項有爭議的政策同托洛茨基有關，因為他不在，列寧只好為他辯護。爭論了很久，也

\* 譯註：《列寧全集》第36卷，第115頁。

很激烈(3月20–21日)。<sup>196</sup> 列寧在開幕當天就解釋過這件事。「組建紅軍完全是一個新問題，甚至在理論上是從來沒有提出過的」，他在3月18日說，還說布爾什維克黨人正在進行試驗，但「不武裝保衛社會主義共和國，我們就不能生存」。<sup>197\*</sup> 因此，蘇維埃俄國需要一支紀律嚴明的正規軍，這就需要具有豐富知識的軍事專家。列寧知道，他必須改變大廳裏所有共產黨人的想法，他擁有同他們一樣的階級觀念，但遠比他們靈活。於是，這位布爾什維克領袖就讓自己指派的人在大會上作報告，使用「凶險」(*grozno*) 這個詞來描述前線的形勢，還用了一幅整個會堂都可以看到的大型彩色標識地圖來說明這一點，並把責任歸咎於不正規的游擊習氣。<sup>198</sup> 不過，爭論也提到了加入紅軍隊伍的前沙皇軍官的叛變問題(那不過是少數幾個人，而為紅軍服務的軍官有幾萬人)。<sup>199</sup>

另外，托洛茨基也發表了幾篇文章，為起用前沙皇軍官辯護，但這些文章的邏輯比較粗暴，缺乏政治敏感性，令反對者越發憤怒。「好吧，你們能給我，今天就給我，十名師長、五十名團長、兩名集團軍司令和一名方面軍司令，而且全都是共產黨員嗎？」<sup>200</sup> 大會前夕，托洛茨基還發表過為軍事政策辯護的「提綱」，現在又讓格里戈里·索柯里尼柯夫為它們辯護；左派共產主義者弗拉基米爾·斯米爾諾夫(Vladimir Smirnov)提出反駁。<sup>201</sup> 索柯里尼柯夫試圖證明，危險不在於前沙皇軍官，而在於農民。被稱作「軍事反對派」的批評者們，除了伏羅希洛夫，幾乎找不到哪個無產者可以接替前沙皇軍官的指揮職務，於是他們就建議加強政委和共產黨在紅軍中的作用，在這一點上，托洛茨基通過索柯里尼柯夫作了讓步。這樣，政策問題就在不知不覺中轉變為如下問題：加強政委的作用是否就意味着更有力的政治控制，或者用斯米爾諾夫的話說，「在軍隊的指揮上起到更大作用」。<sup>202</sup> 如此一來，分歧就縮小了，不過，原則方面的激烈爭論(贊成或反對起用「軍事專家」)仍然主導了那幾場會議。<sup>203</sup>

320

---

\* 譯註：《列寧全集》第36卷，第124、125頁。

斯大林先是讓伏羅希洛夫為察里津的事情接受批評，然後自己發言，說歐洲擁有真正的軍隊，所以要想抗衡，就必須建立「一支充滿紀律精神、有組織得很好的政治部……的正規軍」。不久前，不是別人，正是科爾尼洛夫在1917年8月的莫斯科國務會議上提出一個得到廣泛支持的觀點：「只有一支依靠鐵的紀律團結起來的軍隊」才能拯救俄羅斯。<sup>204</sup> 其次，斯大林還流露出對農民的敵意：「我必須說，那些在我們軍隊中佔多數的非工人分子——農民——不會自願為社會主義而戰的。許多事實都說明了這一點。」<sup>205</sup> 在強調紀律和不願意接受農民方面，他同托洛茨基的觀點相似。但斯大林沒有提到托洛茨基的名字。<sup>206</sup>

1919年3月21日，列寧再次發言。「有時他朝聽眾的方向往前走一兩步，然後退後，有時他又低頭看着桌上的筆記，」有親歷者回憶說，「當想要強調最重要的地方或者表示不能接受軍事反對派的觀點時，他就舉起一隻手。」<sup>207</sup> 列寧承認：「斯大林在察里津槍斃人，我就認為這是個錯誤」。†這話有意思：槍斃人是個錯誤，不是犯罪。<sup>208</sup> 但現在，在進一步瞭解了情況之後，列寧承認這並不是錯誤。不過，他沒有接受斯大林的含沙射影的說法——陸軍人民委員部迫害伏羅希洛夫，而是指名道姓地批評了斯大林的門徒：「伏羅希洛夫同志的過錯在於他不願意拋棄舊的游擊習氣 (*partizanshchina*) 。」<sup>209</sup> ‡列寧的猛烈進攻讓「軍事反對派」只有招架之功，而且很可能對投票結果產生了影響。3月21日，贊成中央委員會提綱(由托洛茨基起草並得到列寧的支持)的有174票，贊成軍事反對派提綱的有95票，3票棄權。<sup>210</sup> 投票後，勝利在握的列寧成立了一個五人協商委員會，三人來自獲勝一方，兩人來自失利一方；3月23日，他們一起確認了對托洛茨基提綱的某些細微改動。<sup>211</sup>

斯大林在表決時站在列寧一邊。<sup>212</sup> 在給前線的托洛茨基的電報上斯大林也簽了字——電報告訴托洛茨基他的提綱已經獲得通過，這顯然是列寧做了工作，想讓兩人和解。<sup>213</sup> 下諾夫哥羅德有位黨的官員，叫

\* 譯註：《斯大林全集》第4卷，第221頁。

† 譯註：《列寧全集》第36卷，第172頁。

‡ 譯註：《列寧全集》第36卷，第174頁。

拉扎爾·卡岡諾維奇 (Lazar Kaganovich)，他在當地報紙上的一篇文章中預見到這種政策上的妥協，文章摘要被刊登在《真理報》上，它反駁對軍事專家的反對意見，同時也警告說不要「過分相信」他們，還建議黨要嚴密地監視他們。<sup>214</sup> 卡岡諾維奇最初崇拜托洛茨基，但很快就成了斯大林最重要的助手之一。

軍事上的爭論幾乎掩蓋了大會的另一主題：燃料或糧食短缺。反對者嘲笑布爾什維主義是強盜行徑，還說它是「貧窮和饑餓的社會主義」。剛剛成為契卡部務委員的蘇倫·馬爾季羅相 (人稱瓦爾拉姆·阿瓦涅索夫) 對代表們說：「現在，廣大群眾……要求我們的不是進行有關麵包的鼓動工作，而是提供麵包。」<sup>215</sup> 從一個急劇收縮的經濟體中弄到的糧食，大部分都給了兩支「軍隊」：一支在戰場，一支在辦公室。<sup>216</sup> 糧證上面按照階級明確規定了可以分到的糧食數量，但卻常常拿不到供應，因為布爾什維克的糧食人民委員部弄到的糧食還趕不上1916至1917年的沙皇俄國。<sup>217</sup> 就算國家的代理人弄到的糧食再多，被嚴重破壞的鐵路也無法將其全部運到城市，就算糧食真的運來了，也沒有足夠的勞力卸下來，而且正常開工的磨粉廠也很少。與此同時，以國家的名義徵用的糧食，大約有80%都被拿到黑市裏私下出售。<sup>218</sup> 為了活命，人們紛紛逃離城市，世界大戰期間曾經增長到200萬的莫斯科人口，下降到100萬以下。<sup>219</sup> 即便如此，城市的糧食仍然十分緊缺。<sup>220</sup> 餘下的城市居民別無選擇，只好儘量避開攔截小分隊，冒險到農村買糧並把糧食弄回來，這被稱為「裝袋子」。(當莫斯科魯緬采夫博物館〔後來的列寧圖書館〕的官員、歷史學家尤利·戈蒂爾 (Yuri Gothier) 1919年從特維爾講完學回去時，他在日記中對此行收支狀況的記錄是「30磅黃油」。) <sup>221</sup>

322

非法的小型私人貿易維持着這個國家的生命，但官僚的假公濟私卻讓它有窒息的危險。中央委員維克托·諾金 (Viktor Nogin) 要求代表大會的代表們注意「有關酗酒、淫亂、腐敗、搶劫以及黨的許多公職人員玩忽職守等駭人聽聞的事實，以便引以為戒」。<sup>222</sup> 大會批准成立了新的國家監察人民委員部 (後改名為工農檢查院)；大會之後，過了幾個星期，斯大林在擔任民族事務人民委員的同時，又被任命為監察人民委員，他最終掌握了廣泛的調查權，可以監督中央和地方的國家行政機關。



作為黨綱規定的最高機關，代表大會還選舉產生了新的中央委員會，即在兩次代表大會之間的黨的執行機構。新的中央委員會包括19名委員——列寧在首位，其餘的按字母順序排列——以及8名候補委員。代表大會採用了新的黨綱（一直沿用到1961年）。足足有50名代表投了托洛茨基的反對票，這一數字遠高於其他任何候選人。<sup>223</sup> 他最親密、忠實的支持者之一阿道夫·越飛未能再次當選（而且再也沒有當選）。托洛茨基已經成了眾矢之的，對他專橫跋扈的「管理」的對立情緒，將會擴大到會議代表的範圍之外，出現在基層黨組織的討論中。<sup>224</sup>

代表大會還正式確立了規模較小的「政治局」和書記處，以及新成立的規模較大的「組織局」的地位。就如列寧解釋的，「組織局管調配人員，政治局管政治問題」。<sup>225\*</sup> 政治局有五名有表決權的委員——列寧、托洛茨基、斯大林、列夫·加米涅夫、尼古拉·克列斯廷斯基(Nikolai Krestinsky)——和三名候補委員（沒有表決權）：季諾維也夫、加里寧、布哈林。<sup>226</sup> 克列斯廷斯基接替斯維爾德洛夫的書記職務。同時，斯維爾德洛夫的防火保險櫃被送到克里姆林宮衛戍司令的倉庫，仍然還鎖着。裏面裝有沙皇時代的金幣——數量有108,505盧布、黃金製品、珠寶（共計705件）、總額達75萬盧布的沙皇時代的紙幣，還有九本外國護照，其中一本是斯維爾德洛夫的名字，布爾什維克似乎也害怕這些落到白軍手裏。<sup>227</sup>

## 統治勢力

323

凡爾賽在爭吵，世界在改變，而且會有更多的改變，連法國、英國和美國的大人物都沒有注意到的改變。隨着1919年的到來，戰爭引發的通貨膨脹掏空了中產階級的積蓄，許多人只好拿家具乃至鋼琴去換幾袋麵粉或馬鈴薯，飯店外面甚至有老兵徘徊，想要討得一點殘羹剩飯。柏林和中歐的許多城市成立了「委員會」（蘇維埃），其目的主要

---

\* 譯註：《列寧全集》第38卷，第292頁。

在於公共秩序的重建以及食物和水的分配，但空氣中也可以聞到革命的氣息。<sup>228</sup> 人民渴望的不只是填飽肚子，還有結束窮兵黷武和戰爭、警察的橫行霸道和政治鎮壓，以及可惡的貧富差距。1918年12月，從羅莎·盧森堡——出生於沙皇俄國的波蘭猶太革命家——領導的斯巴達克同盟起義誕生了德國共產黨。<sup>229</sup> 就在盧森堡獲釋並幫助成立德國共產黨之前，她在德國布雷斯勞的監獄裏抨擊了列寧和布爾什維主義。她寫道：「只給政府的擁護者以自由，只給一個黨的黨員以自由——就算他們的人數很多——這不是自由。自由始終是持不同思想者的自由。」<sup>230</sup> 但盧森堡對德國社會民主黨的改良主義抨擊得更猛烈。<sup>231</sup> 她根本沒有機會展示，要是社會主義革命成功了，會怎樣兌現她對於自由的承諾。1919年1月，在德國共產黨的參與下，工人們行動起來，舉行總罷工，柏林有50萬工人遊行，接着就是有爭議的武裝起義；起義遭到鎮壓，力主起義的卡爾·李卜克內西(Karl Liebknecht)和反對起義的盧森堡遇害。這讓人想到，列寧和托洛茨基在1917年並沒有被暗殺。殺害這兩位德國共產黨領袖的是所謂的「自由軍團」，這是由前線回來的士兵組成的極右翼民族主義民兵組織，是德皇下台後那個搖搖欲墜的政府召來對付左翼分子的。一起被殺害的還有大約100人；「自由軍團」也死了17人。

相比之下，在慕尼黑，庫爾特·艾斯納(Kurt Eisner)，一個有着猶太血統的德國記者，企圖把新的草根委員會——蘇維埃，與議會制度調和，這是克倫斯基的方式，但他也失敗了。反倒是從社會民主黨分離出來的一個新黨，再加上一些無政府主義分子，在1919年4月7日宣佈成立了巴伐利亞蘇維埃共和國。六天後，德共接管了巴伐利亞蘇維埃共和國，清空監獄，開始組建紅軍(從失業者當中招募士兵)，並給莫斯科發去電報報捷。4月27日，列寧回電表示祝賀並提出建議：「工人是否已經武裝起來？資產階級是否已被解除武裝？……資本家在慕尼黑的工廠和財產以及慕尼黑郊區的資本主義農場是否已被沒收？小農的押

324

\* 編註：〈論俄國革命〉，殷敘彝譯，《盧森堡文選》下卷(人民出版社，1990)，第500頁。

金和地租是否已經取消？是否已把所有印刷所和紙張沒收，用來印刷通俗的傳單和群眾性的報紙？……是否已把所有銀行拿到手裏？是否扣留了資產階級的人質？」<sup>232</sup> 可是，從1919年五一節開始，大約3萬名「自由軍團」的武裝分子，加上9,000名德國陸軍的正規部隊，很快就鎮壓了巴伐利亞蘇維埃共和國。<sup>233</sup> 激戰中有一千多名左翼分子被打死。（艾斯納被一名右翼極端分子殺害）。德國革命不是布爾什維克式的極左革命，德國在魏瑪召集的立憲會議（1919年2—8月）產生了一個由中左翼力量主導的議會共和國。反自由主義的右翼勢力繼續進行動員。<sup>234</sup>

類似的一幕也在意大利上演。意大利名義上是世界大戰中的戰勝國，但損失慘重，徵召的500萬士兵總共傷亡了70萬，預算赤字達120億里拉，多次發生大罷工和佔領工廠事件，有的北部城市還出現了接管政權的現象。這種形勢刺激了處於萌芽階段的被稱作法西斯主義的右翼團體——一個組織嚴密、以保衛國家對抗社會主義威脅為宗旨的戰鬥聯盟。1919年3月21日，以共產黨人庫恩·貝拉（Béla Kun）為首的蘇維埃共和國在正在大面積喪失領土的匈牙利宣告成立。庫恩曾經作為戰俘在俄國待過並見過列寧。幾個月前，在莫斯科的一家飯店，他同匈牙利黨的核心人物達成和解，可是一回到匈牙利，他就和其他領導人一起被關進監獄。受命組建政府的匈牙利社會民主黨人決定同共產黨人聯合起來，以獲得俄國的軍事援助，恢復匈牙利在1918年以前的帝國疆界。庫恩「徑直從牢房走上了部長崗位，」有觀察家寫道，「他在監禁期間受過嚴刑拷打，臉上傷痕累累，十分渴望復仇。」<sup>235</sup> 列寧熱情讚揚匈牙利革命。1919年五一節那天，布爾什維克黨人滿懷希望地說：「今年之內，整個歐洲都將屬於蘇維埃。」<sup>236</sup> 布達佩斯政府發佈了一大堆法令，對工業、商業、住房、運輸、銀行以及40公頃以上的土地實行國有化或社會化。教堂和神父、莊園和貴族都受到了攻擊。共產黨人還成立了一支由拉科西·馬加什（Mátyás Rákosi）領導的赤衛隊，警察和憲兵也加入其中。庫恩企圖在維也納發動政變（他的僱傭兵放火燒了奧

325

---

\* 譯註：《列寧全集》第36卷，第311頁。

地利議會)。但當庫恩想要和莫斯科以及紅軍部隊正式結盟的時候，托洛茨基答覆說他實在抽不出人手。<sup>237</sup>沒關係，庫恩讓赤衛隊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去收回斯洛伐克，入侵羅馬尼亞去收回特蘭西瓦尼亞。一位外國記者指出：「他〔庫恩〕一次又一次地用煽動性的演講把群眾集結起來。」<sup>238</sup>但「革命攻勢」失敗了，共產黨人在1919年8月1日辭職。庫恩逃往維也納。133天的共產黨共和國結束了。（「要想革命，無產階級就需要對資產階級實行最冷酷無情的專政」，就在流亡前，庫恩不滿地說道。）8月3至4日，羅馬尼亞軍隊開進布達佩斯。海軍少將霍爾蒂·米克洛什（Miklós Horthy，像西伯利亞的「海軍上將」高爾察克一樣）在匈牙利這個內陸國家初步建立了一支國民軍，它的部隊開始對左翼分子和猶太人實行白色恐怖，殘殺了至少6,000人。在羅馬尼亞人撤兵並且把從糖和麵粉到火車頭和打字機在內的所有東西一掃而空之後，霍爾蒂很快便自封為「匈牙利王國攝政」，並成立了一個右翼獨裁政府。<sup>239</sup>

### 1919年的白軍攻勢——托洛茨基的沉浮

在俄國，有望成為統治勢力的，是東方、南方和西北三支不同的白軍，他們在戰場上並未遇到多少困難。就像布爾什維克（以及布爾什維克之前的保安處）一樣，白軍也成立了「情報部」，收集秘密線人——難民、演員、鐵路職員和產科醫生——提供的關於主流政治情緒的報告，但他們根本沒有有效地利用這一情報機關。<sup>240</sup>他們「對社會問題既不理解也沒有表現出任何興趣，」白衛運動中有位政治活動家抱怨說，「他們的興趣全在於軍事權力，他們的希望全集中於軍事勝利。」<sup>241</sup>在「統一而不可分的俄國」的口號下，白軍在少數民族的領土上活動，卻拒絕正視這些民族的理想，拒絕同烏克蘭或其他反布爾什維克力量結盟。<sup>242</sup>鄧尼金的軍隊，特別是烏克蘭的反布爾什維克軍隊，對猶太人犯下的暴行給白衛運動打上了深刻的印記。<sup>243</sup>單是在烏克蘭，1918至1920年就發生了1,500多起屠殺猶太人的事件，多達12.5萬猶太人死亡，他們「被殺害在路上、田野裏和列車上；有時全家都被打死了，連留下來訴說他們遭遇的人都沒有」。<sup>244</sup>白軍對待英國和法國的恩主表現得自以為是，

而且從未減輕他們對德國的敵意。<sup>245</sup>另外，白軍部署在中心地區的外圍，從烏拉爾和西伯利亞開始，向西穿過南方草原，直到彼得格勒郊區，形成一條5,000英里\*長的、不連貫的環形包圍圈，給後勤保障和通信聯絡造成巨大困難。兩條主要的戰線，即鄧尼金的南方戰線和高爾察克的東方戰線，始終未能連接起來。<sup>246</sup>鄧尼金和高爾察克始終未能會合。

不過，缺少聯合，缺少盟友，缺少民眾支持的白軍在1919年發動了一次攻勢，對布爾什維克控制下的莫斯科大公國的中心地區構成了威脅。<sup>247</sup>攻勢兵分三路：1919年春，高爾察克從東面向莫斯科方向推進；1919年春夏之交，鄧尼金從南方也向莫斯科方向推進；1919年秋，尤登尼奇從北面向彼得格勒推進。每次進攻都只是在前一次進攻已經難以為繼的情況下才開始。

高爾察克手下大約有10萬人。雖然這位海軍上將不諳陸戰，可他的軍隊依然在向西推進，而且讓紅軍沒有料到的是，他們竟然在1919年3月佔領了烏法，把布爾什維克的東方防線截成幾段，還威脅到了伏爾加河流域中部的喀山和薩馬拉。（之所以會同意托洛茨基不參加黨的第八次代表大會而返回前線，就是因為這一原因。）不過，米哈伊爾·伏龍芝(Mikhail Frunze)，一名從工人成長起來的34歲的指揮員，整頓紀律並領導反攻，於1919年5月擋住了高爾察克推進的勢頭。<sup>248</sup>可就在此時，鄧尼金開始行動了。他的「志願軍」已更名為「南俄武裝力量」，兵力增加到15萬人，既有哥薩克，又有在烏克蘭招募的農民，給養由協約國提供。<sup>249</sup>參謀出身的鄧尼金從來沒有指揮過龐大的野戰部隊，但事實證明，他是一位令人生畏的軍事家。1919年6月12日，他的部隊佔領了烏克蘭的哈爾科夫。6月30日，他們佔領了察里津。（「匪徒們把它團團圍住，」《真理報》〔在1919年7月1日〕悲憤地說道，「英國和法國的坦克佔領了工人的堡壘……察里津陷落了。察里津萬歲！」）<sup>250</sup>1919年，鄧尼金總共消滅了近20萬指揮和裝備都很拙劣而

---

\* 編註：約8,047公里。

且常常餓着肚子的紅軍。在鄧尼金勝利進入察里津並出席城裏的正教大教堂舉行的宗教儀式後，7月3日，他「命令我們的武裝力量向莫斯科進軍」。<sup>251</sup> 托洛茨基像以往一樣，把從伏爾加河流域到烏克蘭草原的反布爾什維克戰線的形成，歸咎於紅軍的游擊習氣。他的看法是有道理的。儘管托洛茨基已經下過命令，不讓伏羅希洛夫再擔任集團軍司令，但是在1919年6月，他仍然得到了指揮烏克蘭第14集團軍的職務，並且很快就致使哈爾科夫失守，被鄧尼金的部隊佔領。伏羅希洛夫被押送革命特別法庭候審。該法庭後來的結論是，他不適合擔任高級指揮職務。（「我們都知道克利姆，」烏克蘭軍事委員和伏羅希洛夫的朋友莫伊謝伊·魯希莫維奇〔Moisei Rukhimovich〕指出，「他是個勇敢的傢伙，但指揮一個集團軍還是算了吧。頂多一個連。」）<sup>252</sup> 至於被佔領的察里津，它之前也是伏羅希洛夫的轄區。但是，接連兩次敗給白軍卻讓伏羅希洛夫集團——托洛茨基在布爾什維克內部的敵人——膽子越來越大。

托洛茨基很少在陸軍人民委員部露面，管理那裏的是才二十多歲的埃夫拉伊姆·斯克良斯基，他畢業於基輔大學醫學院，煙癮很大，管理能力很強，用休斯電報機與前線保持聯繫。<sup>253</sup>（「哪怕是在凌晨2時或3時給他打電話，也會發現他還在工作」，托洛茨基後來寫道。）<sup>254</sup> 托洛茨基住在自己的裝甲列車上，那是1918年8月他急着趕往斯維亞日斯克的時候倉促造好的。<sup>255</sup> 列車需要兩台引擎並備有武器、制服、氈靴以及準備作為獎品發給作戰勇敢的士兵的手錶、雙筒望遠鏡、單筒望遠鏡、芬蘭刀、鋼筆、雨衣和煙盒。車上有印刷室（其設備佔了兩節車廂）、電報站、無線電台、發電站、圖書室、宣傳鼓動隊、裝有卡車轎車和油罐的車庫、軌道維修隊、浴室以及秘書處。還有一支12人的衛隊，負責尋找食物（野味、黃油、蘆筍）。供托洛茨基起居的那節車廂又長又舒適，以前是帝國鐵路大臣的。開會是在餐車。<sup>256</sup> 士兵們從頭到腳都是黑色的皮革製品。那時候的托洛茨基，黑頭髮，藍眼睛，穿着當兵的穿的無領短上衣（現在叫做沃日傑夫卡〔*vozhdevka*〕）。他在車上下了12,000多道命令，還寫了無數的文章，其中有很多是為列車的報紙（《在路上》）寫的。<sup>257</sup> 整個內戰期間，斯大林實際上也在不停地奔波，

328 而且他也有一輛列車，但是沒有廚子和速記員，也沒有印刷室。托洛茨基的列車行駛了6.5萬英里\*，發起動員，加強紀律，鼓舞士氣。<sup>258</sup>列車還逐漸成為一支獨立的軍事部隊（參加過13次戰鬥），享有神話般的地位。「列車到來的消息，」托洛茨基後來回憶說，「也會傳到敵人的戰線那裏。」<sup>259</sup>不過，他的到來也意味着一連串的命令，而這些命令在下達時，別說是同當地的紅軍指揮員商量，往往就連通知都沒有。<sup>260</sup>與托洛茨基發生衝突的，遠不只是伏羅希洛夫一個人。<sup>261</sup>

1919年7月3日，即鄧尼金下令向莫斯科進軍那天的一次充滿仇恨的中央全會上，矛盾終於爆發了。<sup>262</sup>此前斯大林一直在強烈要求解除約阿基姆·瓦采季斯的職務。瓦采季斯是紅軍最高總司令，與托洛茨基關係密切。1919年5月底6月初，斯大林在彼得格勒戰線揭露了一起軍事專家的「陰謀」，促成了7月全會的召開。<sup>263</sup>就瓦采季斯而言，他對於不停地指控像他那樣的前沙皇軍官是破壞分子感到十分氣憤，但他同另一個前沙皇上校、野心勃勃的謝爾蓋·加米涅夫（Sergei Kamenev，與列夫·加米涅夫無關）也有衝突。加米涅夫是東方面軍司令，他想進入西伯利亞追擊正在撤退的高爾察克，可他的上司、有托洛茨基支持的瓦采季斯，卻擔心會中圈套。托洛茨基撤銷了加米涅夫東方面軍司令的職務，但在其繼任者、一位前沙皇將軍十天內五次改變主攻方向後，他又同意讓加米涅夫官復原職。<sup>264</sup>（對於較大的戰略問題，托洛茨基後來承認，加米涅夫的看法是正確的。）現在，被撤職的成了瓦采季斯。證據顯示，托洛茨基建議由米哈伊爾·邦契—布魯耶維奇接替瓦采季斯的職務，但他的建議未能通過。謝爾蓋·加米涅夫成了新的總司令。<sup>265</sup>與拉脫維亞人瓦采季斯不同，加米涅夫是俄羅斯人，而且要年輕八歲。列寧也單方面徹底調整了共和國革命軍事委員會，將其成員從大約15人驟減為6人，並將總部從謝爾普霍夫（在首都南面60英里†處）搬到了莫斯科，這樣，他就可以施加更有力的控制；他還把托洛茨基的幾個忠實支持者趕出了委員會。斯大林也被調整了出去。主席仍是托洛

---

\* 編註：約10.4萬公里。

† 編註：約97公里。

茨基，副主席斯克良斯基；其他的還有謝爾蓋·加米涅夫、人稱謝爾蓋·古謝夫 (Sergei Gusev) 的雅科夫·德拉布金 (Yakov Drabkin，他是加米涅夫的人，起初是斯大林的死敵)、伊瓦爾·斯米爾加 (Ivar Smilga，另一位拉脫維亞人) 以及列寧的副手阿列克謝·李可夫。<sup>266</sup> 由於爭奪總司令職務失利，再加上他自己主管的機構未經協商就遭到清洗，托洛茨基遞交了辭呈，要辭去在軍隊和黨內擔任的所有職務。7月5日，中央委員會拒絕接受他的辭呈。<sup>267</sup>

謝爾蓋·加米涅夫的晉升於1919年7月8日生效。<sup>268</sup> 第二天，當時又回到前線 (在沃羅涅日) 的托洛茨基接到通知說瓦采季斯已經被捕——距離這位拉脫維亞人從左派社會革命黨人手中挽救了布爾什維克政權將近一年時間。對斯大林的代理人伏羅希洛夫進行紀律處分的理由是正當的 (拱手讓出哈爾科夫)，逮捕托洛茨基的代理人瓦采季斯的指控是含糊的：同白衛分子有勾結。瓦采季斯很快被釋放了，高層的某個人沒有讓斯大林的詭計得逞，但這是對托洛茨基的警告。<sup>269</sup> 這可是奇恥大辱。<sup>270</sup>

329

托洛茨基喜歡把自己描寫成置身於這一切之外，就好像布爾什維克政權內部的權力鬥爭沒有引起沒完沒了的誹謗和污蔑似的。有位契卡高級官員，維亞切斯拉夫·明仁斯基，有一次到托洛茨基的裝甲列車上拜訪時私下裏告訴他，斯大林「對列寧等人含沙射影地說，您在自己周圍聚攏了一幫人，他們都特別敵視列寧」。如果是斯大林，那他會馬上拉攏這位有權有勢並對自己抱有同情的契卡人員，可托洛茨基說，他非但沒有那樣，反而訓斥了明仁斯基。<sup>271</sup> 就算如此，斯大林也不是唯一一個在暗中講托洛茨基的壞話，說前沙皇軍官準備帶部隊反水的人。莫斯科收到大量的告狀信，狀告陸軍人民委員為人傲慢、在軍事決策上把舊軍官的作用捧上天，這似乎暴露出他缺乏階級觀念。<sup>272</sup> 就連受到指控說有托洛茨基撐腰的那些沙皇軍官也對他非常不滿，因為他看不起他們的循規蹈矩，外加同他相比知識面比較狹窄。<sup>273</sup> 由於列寧的緣故，1919年夏天的軍事危機讓托洛茨基的反對者從僅僅四個月前黨的第八次代表大會上的失敗中得到了補償；雖說有點兒晚，可列寧還是控制了中央委員會，哪怕不是為了使軍官們服從黨，至少也是為了肯定黨和軍官的雙重領導是革命的一項特殊成就。<sup>274</sup> 但是，如果說列寧感到他的



陸軍人民委員過於自我膨脹，那這位布爾什維克領袖也在繼續利用各種機會表明，托洛茨基仍然不可或缺。例如在1919年，為了把心懷疑慮的馬克西姆·高爾基爭取過來，列寧說，「再找個能用不到一年的時間就組織了一支幾乎是模範軍隊並贏得軍事專家尊敬的人給我看看。我們有個這樣的人。」<sup>275</sup>要是列寧在1919年7月讓斯大林那幫人完全打敗托洛茨基，那另外一場戰鬥的結局，也就是對白軍內戰的結局，或許就不一樣了。<sup>276</sup>

330 托洛茨基趕往岌岌可危的南方戰線與鄧尼金對陣，因為謝爾蓋·加米涅夫，帝國總參軍事學院的畢業生，制訂了一個計劃，沿頓河向察里津方向反攻，從側翼包圍鄧尼金並切斷他和他的主要根據地之間的聯繫。在托洛茨基的支持下，瓦采季斯主張穿過比較友好的頓涅茨克煤田（那裏不但工人多，鐵路也很發達），而不是穿過哥薩克的地盤——在那裏，紅軍的進攻會讓反布爾什維主義的居民團結起來。包括斯大林在內的政治局，支持謝爾蓋·加米涅夫的計劃。結果，在鄧尼金向前推進，進攻紅軍兵力空虛的莫斯科附近的中部地區時，他奪取了基輔，佔領了幾乎整個烏克蘭。10月13日，鄧尼金的部隊奪取了距離首都只有240英里\*的奧廖爾（約有從德國邊境到巴黎那麼遠，可以體現俄國人對距離的感知）。10月15日，政治局推翻了自己的決定，轉而贊成——儘管有點遲——瓦采季斯和托洛茨基原來的作戰計劃；斯大林此時也承認，托洛茨基的意見是對的。<sup>277</sup>經過奧廖爾北面的激戰，托洛茨基使數量是敵人兩倍的紅軍重整旗鼓，開始利用白軍戰線拉得過長等弱點。就在此時，尤登尼奇的部隊，1.7萬人加上6輛英國提供的坦克，從愛沙尼亞向彼得格勒方向推進，先後佔領了加特契納（10月16-17日）和彼得格勒郊外的皇村。天寒地凍再加上沒有糧食，讓彼得格勒的工人紛紛從閒置的工廠逃往農村，城裏的人口一下子從230萬減少到150萬。<sup>278</sup>有名的工人階級的維堡區，1917年的「布爾什維克公社」，從6.9萬人減少到5,000人。<sup>279</sup>「一隊隊近乎衣衫襤褸的士兵，步槍用繩子拴

---

\* 編註：約386公里。

着，吊在肩膀上，邁着沉重的步伐，走在自己部隊的紅旗下，」一位親歷者在提到1919年的彼得格勒時說道，「那是一座又冷又餓，充滿仇恨和苦難的大都市。」<sup>280</sup> 列寧建議放棄這座從前的首都，那樣就可以把紅軍用來保衛莫斯科；他的建議得到了彼得格勒黨組織的首腦季諾維也夫支持。托洛茨基，還有斯大林，堅持認為應該竭盡全力保衛「革命的搖籃」，如有必要，就進行街頭的肉搏戰。<sup>281</sup>

關鍵時刻，白軍的「最高執政」、海軍上將高爾察克，拒絕承認芬蘭獨立，結果芬蘭領導人卡爾·曼納海姆拒絕為進攻彼得格勒的尤登尼奇提供軍隊和芬蘭的軍事基地，同時，協約國也拒絕提供支援。<sup>282</sup> 托洛茨基趕往西北戰場——隨之而來的還有增援部隊，因為尤登尼奇部隊未能控制住鐵路線——抵擋住了白軍的攻勢。「托洛茨基來到前線的效果立竿見影：正常的紀律得以恢復，軍政機構也都動員起來迎接挑戰，」作為一名主要的政治委員，米哈伊爾·拉舍維奇(Mikhail Lashevich，生於1884年)解釋說，「托洛茨基的命令清晰而明確，誰都不許例外，所有人都要全力以赴，準確、迅速地執行作戰命令，讓人感到有了堅定有力的指揮……托洛茨基清楚所有的細節，他把火熱的、永不枯竭的幹勁與驚人的毅力投入到每一項工作中。」<sup>283</sup> 尤登尼奇被打敗了，他的部隊被趕回到愛沙尼亞並被解除武裝、扣押起來。他本人則移居法國的里維埃拉。<sup>284</sup> 鄧尼金雖然有9.9萬人的作戰部隊，但能夠召集起來作為先頭部隊向莫斯科方向發動進攻的只有2萬人，同時，由於整個戰線拉得過長，從他們在庫班的根據地算起有700英里\*，因而在部隊向前推進的過程中，就暴露出很大的缺口。<sup>285</sup> 在奧廖爾附近，鄧尼金孤注一擲進攻莫斯科、把戰線拉得過長的賭博也失敗了。<sup>286</sup> 到1919年11月7日，即革命兩週年的時候，剛剛40歲的托洛茨基一下子取得了輝煌的勝利。同僚們用紅旗勳章，即蘇維埃俄國最高級別的國家獎章，來表彰他的裝甲列車以及他個人。據托洛茨基說，列夫·加米涅夫建議授予斯大林同樣的殊榮。「憑甚麼？」據托洛茨基說，米哈伊爾·加里寧

331

---

\* 編註：約1,127公里。

表示反對。會後，布哈林把加里寧拽到一邊說：「難道你還不明白？那是列寧的主意。要是別人有而他沒有，斯大林就活不下去。」斯大林沒有出席在莫斯科大劇院舉行的慶祝儀式，而在宣佈授予他紅旗勳章的時候，幾乎沒有人鼓掌。托洛茨基受到熱烈的歡迎。<sup>287</sup>

## 白軍的失利

彼得格勒和莫斯科保住了。高爾察克在伊爾庫茨克(東西伯利亞)成了階下囚，未經審判就在1920年2月7日凌晨4時被行刑隊處決，他的屍體被踢下在安加拉河的支流烏沙科夫卡河的冰面上鑿出的洞裏，那條大河成了這位上將的墳墓。<sup>288</sup>「最高執政」是唯一被俘的白軍高級領導人。與高爾察克一同消失的還有帝俄的黃金。世界大戰前夕，沙皇俄國擁有大約800噸黃金，那是當時世界上最大的黃金儲備之一。1915年初，這批黃金從國家銀行的金庫疏散到喀山等地保管，但其中大部分都在1918年被捷克斯洛伐克軍團搶走。(托洛茨基槍斃了讓喀山和帝俄黃金落入敵手的紅軍指揮員和政委。)最後，這筆財寶輾轉落到高爾察克手裏——480噸金錠以及14個國家的金幣，價值超過6.5億盧布，用了36節車皮運到西伯利亞的鄂木斯克。有傳言說，它被沉入貝加爾湖，也有傳言說，它被日本政府搶走了。<sup>289</sup>實際上，高爾察克在他的幾次戰役中已經胡亂分發了近2億盧布的黃金，剩下的大多經符拉迪沃斯托克偷偷地運到上海銀行，準備移居國外時再用。<sup>290</sup>鄧尼金沒有為解救高爾察克採取任何措施。他的軍隊在奧廖爾北面大敗之後就一路南撤。1920年3月，他們陸續來到克里米亞半島，收攏了大約3萬殘兵。鄧尼金被迫將指揮權交給彼得·弗蘭格爾男爵中將(Pyotr Wrangel)，然後逃往巴黎。帶有德意志血統的弗蘭格爾男爵不久前還只指揮一個騎兵師。他是個瘦高個兒，很誇張地穿了一件切爾克斯卡(*cherkeska*)，即北高加索的那種黑色長袍，外面帶有兩個交叉的子彈袋。換了領導人，而且在克里米亞有(臨時)落腳點，可白軍還是完了。

針對白衛運動這個最後的據點，斯大林向托洛茨基報告說，將發佈命令，「徹底消滅弗蘭格爾匪幫的軍官團」。命令發佈並得到執行。

因為「肅清了克里米亞半島上的白軍軍官和留下的反間諜人員，除掉了30名省長、50名將軍、300多名上校以及同樣多的反間諜人員，總數達1.2萬人的白色分子」，紅軍指揮員被授予紅旗勳章。<sup>291</sup> 總的來說，對於這場紅白大戰，現在根本沒有可靠的傷亡數字。紅軍的陣亡人數估計高達70.1萬人；白軍陣亡人數從13萬到該數字的很多倍不等。<sup>292</sup> 缺少可靠的數據本身就說明對陣雙方不但不把人命當回事，而且管理能力非常有限。

紅軍的勝利並不能說明它的戰略有多麼正確，相反，它犯了很多錯誤。<sup>293</sup> 贏得戰爭也不是因為情報。<sup>294</sup> 取勝也不是因為後方的生產。為了恢復軍工生產和補給，布爾什維克成立了數不清的「中央」委員會，這些委員會又不斷改組，結果事情越來越糟。<sup>295</sup> 他們以前嘲笑沙皇政府的補給問題，但沙皇國家裝備的軍隊是戰場上紅軍的十倍以上，而且沙皇國家還給紅軍提供了補給。舊政權積攢的1,100萬支步槍、7.6萬挺機槍和1.7萬門野炮，有20%至60%都在世界大戰中保存下來，而這筆巨大的遺產幾乎全部落到紅軍手裏。<sup>296</sup> 1919年，蘇維埃俄國僅僅製造了46萬支步槍（相比之下，沙皇俄國在1916年生產了130萬支）、152門野炮（1916年的產量是8,200門）和18.5萬發炮彈（1916年的產量是3,300萬發）。<sup>297</sup> 1919年，紅軍擁有大約60萬支能夠使用的步槍、8,000挺機槍和1,700門野炮。（由彼得大帝創建的）圖拉工廠每月大約能生產2,000萬發子彈，而紅軍的消耗是7,000萬至9,000萬發。<sup>298</sup> 波蘭一位密切關注蘇俄事務的觀察家約瑟夫·皮爾蘇茨基（Józef Pilsudski，我們會在下一章談到他）在1919年紅白大戰之前，正確地告訴英國大使說雙方軍隊的質量同樣低劣，可紅軍還是迫使白軍撤往黑海方向。<sup>299</sup>

關鍵是，布爾什維克只需要守住陣地，而白軍則需要把他們趕走。<sup>300</sup> 鐵路樞紐、軍需倉庫、兵營以及舊的沙皇軍隊的中央管理核心，都位於紅軍佔據的兩個首都和中心地區。<sup>301</sup> 另外，能夠投入戰場的白軍士兵不到30萬（南方16萬，北方不足2萬，東方可能有10萬），而紅軍的作戰人員最多時達80萬。是的，1918至1920年，蘇維埃俄國作為動員對象登記在冊的人口——550萬，其中有40萬是所謂的勞動軍——可能有多達一半沒有報到或者是擅離部隊，但那些被徵召入伍的人並沒

有叛逃到對方那裏，而是逃離了戰爭（尤其是在農忙季節）。<sup>302</sup>此外，紅軍可以得到補充，因為他們佔據的是俄國中心地區，擁有大約6,000萬人口，其中大多是俄羅斯族，這一數量比歐洲當時任何一個國家的人口都多。白軍基本上是在帝國的邊疆區，控制的人口約有1,000萬，其中很多是非俄羅斯族。<sup>303</sup>至於英、法、美的干涉，他們並沒有派出足夠多的士兵推翻布爾什維主義，但他們確實派了軍隊，這一事實恰恰給布爾什維主義的宣傳幫了忙。<sup>304</sup>

紅軍的後方也保住了。許多人，尤其是政權本身，預計顛覆政權的力量會很強。1919年夏天，通過線人和仔細的檢查，契卡發現了一個叫做「民族中心」的地下網絡，成員包括莫斯科和聖彼得堡的前政客和沙皇軍官，他們在陰謀策應鄧尼金。<sup>305</sup>列寧在得到消息後，指示捷爾任斯基「要迅速、果斷地進行較大規模的逮捕」。<sup>306</sup>1919年9月23日，契卡宣佈處決67名間諜和破壞分子。<sup>307</sup>兩天後，兩枚炸彈炸穿了莫斯科黨部舞廳的窗戶，那是一棟兩層的大宅，位於列昂季耶夫巷，從前是烏瓦羅娃伯爵夫人的，1918年左派社會革命黨人的假政變失敗後，布爾什維克把它從後者手裏沒收了；來自莫斯科各區的大約120名共產黨積極分子和鼓動人員被召集起來，參加揭露「民族中心」的演講。據有些人的說法，列寧原計劃是要到場的（實際上沒去）。12人遇害（其中包括莫斯科黨組織書記弗拉基米爾·扎戈爾斯基〔Vladimir Zagorsky〕），55人受傷（其中包括布哈林）。契卡當即懷疑是白衛分子的報復，於是在9月27日宣佈，處決一些同「白衛分子陰謀」有關的人員。契卡很快發現，扔炸彈的罪犯是一個無政府主義者（得到了一名熟悉這棟建築情況的左派社會革命黨人的協助）。為了找出無政府主義分子藏身的地方，整個首都進行了大搜捕，同時還警告工人階級保持警惕。<sup>308</sup>內部的大規模顛覆行動根本沒有出現。

紅軍的領導層也作出了貢獻，儘管其方式十分複雜。列寧一次也沒有視察過前線。他是在帝國參政院用地圖、電報和電話跟蹤瞭解內

\* 譯註：《列寧全集》第49卷，第69頁。

戰形勢的。<sup>309</sup> 他能夠保持克制，沒有擔任最高總司令，一般也不干涉制訂作戰計劃，不過還是犯了幾個最大的錯誤，或者說，對於這幾個最大的錯誤他難辭其咎。沒有誰把勝利歸功於他。但是有三個重大的時刻，可以從中感受到列寧在與白軍的鬥爭中起到的至關重要的領袖作用：從1918年初開始，他支持托洛茨基起用前沙皇軍官，包括高級軍官；1918年10月，他沒有讓托洛茨基取得對斯大林的決定性勝利；最重要的是，1919年7月，他也沒有讓斯大林取得對托洛茨基的決定性勝利。<sup>310</sup> 至於托洛茨基，他的貢獻也很複雜。在插手軍事行動的問題時，他犯過錯誤，而且他的干預讓許多政委和指揮員十分憤怒，但他也使廣大指戰員變得有組織、有紀律、有鬥志。<sup>311</sup> 托洛茨基擅長鼓動，而且在這方面顯得十分突出，這一點雖然在內部招致怨恨，卻為政權提供了巨大的力量。<sup>312</sup> 斯大林的作用現在仍有爭議。他把察里津搞得亂七八糟，可有些重大任務，列寧仍然要派他解決（烏拉爾、彼得格勒、明斯克、斯摩棱斯克、南方）。真正的缺陷和瓶頸到處都是，但是在斯大林的報告裏，很難把事實和誇大其詞或捏造區分開來。每次在揭露反蘇維埃的「陰謀」時，每次在違背莫斯科直接下達的命令時，每次在指責除自己之外的所有人時，他都是滿腹委屈，覺得別人不理解自己，覺得別人中傷自己。然而，托洛茨基回憶說，他問過南方面軍革命軍事委員會的另外一名中央委員，要是沒有斯大林，他們能不能行。他得到的回答是：「不行，我不能像斯大林那樣施壓。」<sup>313</sup> 「這種『施壓』的能力，」托洛茨基得出結論說，「正是列寧在斯大林身上很看重的。」——話裏帶刺，不過比較準確。<sup>314</sup>

不過，說到底，白軍在政治上存在嚴重缺陷。<sup>315</sup> 白軍根本沒有超出無政府主義軍閥的水平，甚至還趕不上魯登道夫將軍的佔領軍。<sup>316</sup> 在白軍的頭腦中，「政客」就是克倫斯基那樣的笨蛋和叛徒。<sup>317</sup> 高爾察克建立「軍事獨裁」，承認沙皇時代的國債和法律，譴責「分離主義」，下令把工廠還給它們的主人，把耕地還給貴族。<sup>318</sup> 但政府根本不存在，不管是軍政府還是別政府，因為軍官集團和政客集團都在忙於政治謀殺和假公濟私。<sup>319</sup> 「軍隊的組織渙散，」有觀察家在談到高爾察克糟糕的1919年攻勢時寫道，「最高司令部的無知而輕率的計劃；政府的腐敗

與不和，以及野心勃勃、自高自大的傢伙當道；……社會中的恐慌、自私、貪污受賄和各種各樣可惡的事情。」<sup>320</sup> 尤登尼奇迫於英國的壓力，才在西北隨便成立了一個政府，製造出由君主派和社會主義者(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他們彼此間都不信任，更不用說信任君主派了)組成的意識形態怪物。鄧尼金的政治夢想是，超越不同政見，實行「臨時的」軍人統治；1917年的經驗讓他相信，在俄國，民主等同於無政府狀態(他說，立憲會議是在「普遍瘋狂的日子」出現的)。<sup>321</sup> 鄧尼金的恩主英國的代表團在1920年2月對他說，「要是你到了莫斯科，那將是一場徹頭徹尾的災難，因為你身後的佔領區得不到鞏固」。<sup>322</sup> 只有弗蘭格爾——當時已經太晚——任命了幾個真正的平民部長，支持地方自治，正式承認從前帝俄領土上的各個分離主義政府，承認農民對於土地的所有權，但他的土地法令(1920年5月25日)要求耕者為他們已經控制的土地向他的政府交稅。<sup>323</sup>

336 缺少政府機構削弱了白軍的力量，而白軍在思想領域的失敗則讓這一點變得更加嚴重。有效的赤色宣傳給白軍打上了軍事冒險分子、外國走狗和復辟分子的標記。白軍開展了他們自己的宣傳攻勢、閱兵儀式和有正教神父祈福的部隊視察活動。他們的紅、白、藍三色旗，即1917年之前的俄國國旗，上面常有正教聖徒的畫象，而其他的旗幟則帶有骷髏圖案。白軍模仿布爾什維克的做法，也派出鼓動列車。但他們的口號——「讓我們成為統一的俄羅斯民族」——缺乏說服力。<sup>324</sup> 在別的地方，比如信奉羅馬天主教的巴伐利亞、匈牙利和意大利，當左翼革命或微型革命爆發的時候，部分是受到布爾什維主義幽靈的刺激，這些地方開始右轉。實際上在整個歐洲，包括反對共產主義的社會民主黨人在內，統治勢力仍然處於上風。顯然，政治結局的關鍵不在於戰爭期間的破壞、君主制的垮台、軍隊的嘩變、罷工、地方蘇維埃的建立，或者是左翼分子直接採取行動奪取政權，而在於有組織的右翼運動和可靠的農民軍隊是強是弱。寡不敵眾的白軍儘管徹底脫離了農民，但還是指望民眾發起暴動，加入他們。<sup>325</sup> 但是，與意大利、德國以及匈牙利的情況不同，白軍甚至沒有試圖在右翼民粹主義的基礎上，重新發起反左運動，他們中甚至沒能出現一個霍爾蒂那樣的人物。「在心理上，

白軍表現得就像甚麼事也沒發生一樣，然而他們周圍的整個世界已經坍塌了，」彼得·司徒盧威觀察到，「這種心理狀態仍然停留在從前那個已經不復存在的環境之中，沒有甚麼比這對『白衛』運動的傷害更大了……在革命中，只有革命者才能找到自己的路。」<sup>326</sup>

## 公職人員坐天下

在為一次未能發表的講話準備的筆記中，列寧是這樣看待內戰的：「國內戰爭教育和鍛煉了〔我們〕（鄧尼金等等都是很好的教員；教得很認真；我們所有優秀的公職人員（*rabotniki*）都參加過軍隊）。」<sup>327\*</sup> 列寧說得對。此外，威權主義不是副產品。工廠委員會、草根蘇維埃、農民委員會、工會以及群眾革命中其他組織的可悲命運，並不讓人覺得不可思議。在劇烈的「一體化」（*Gleichschaltung*）<sup>†</sup>過程中（正如一位研究布爾什維克早期國家建設的歷史學家給這種類似於後來納粹政權的過程所取的一個貼切的說法），布爾什維克竭力接管或鎮壓草根組織。<sup>328</sup> 就連許多當選的蘇維埃代表，也開始把經由選舉產生的草根機構看作行政管理的障礙。<sup>329</sup> 但是，將常常採取獨立形式的基層政治表達列為打擊目標，都植根於一些核心信念。列寧政權用來作為自己存在理由的，不是自由的最大化，而是生產的最大化。「無產階級專政，」就像托洛茨基大聲宣佈的，「在生產資料領域的表現在於，廢除私有財產」——不是在於工人對工業的控制或者是採取其他方式參與決策過程。<sup>330</sup> 管制（*contrôle*），俄語中吸收的一個法語詞彙，其含義從工人對工廠運營情況的自發控制，轉變為官僚機構對工廠和工人的控制。<sup>331</sup> 這其中起推動作用的觀念是超越資本主義和建設社會主義，而集中的國家權力是完美的工具。

行政機器從混亂中產生，反過來又製造混亂。大力推行層級制在很大程度上是源自對規範化和可預測性的渴望。政權不但在治理方

337

\* 譯註：《列寧全集》第43卷，第324頁。

† 譯註：作為納粹的術語，這個詞是指對德國社會中的方方面面實行強制的統一管理與控制。



面，而且在自我管理方面，都在經歷一段艱難時期。在財政人民委員部，單是在1920年10月的一次內外勾結的劫案中，就有超過2.87億盧布不見了蹤影。<sup>332</sup> 一個通過沒收建立起來的政權開始沒收它自己的財產了，而且從未停止。內戰結束時出版的城市指南《紅色莫斯科》的作者們評論說：「所有革命都有一個儘管短暫卻很醜陋的特點：各種各樣的惡棍、騙子、冒險家以及純粹的罪犯紛紛登上舞台，他們懷着這樣那樣的罪惡目標依附於政權。他們對革命的危害巨大。」<sup>333</sup> 然而，理想主義和機會主義之間的界線往往非常細。革命是社會地震，是大地開裂，可以讓形形色色的新人湧現，擔任他們若非如此就得等上幾十年才能擔任、或者永遠都不可能擔任的職務。革命的使命是和他們對於自身命運的意識交織在一起的。

布爾什維克政變後，重建可以正常運轉的國家政權就成了頭等大事，這也是能讓布爾什維克黨人不至於「被拋到九霄雲外」的事情，但是，要供養那些受益者，需要耗費相當數量的國家預算，這還沒有把他們的假公濟私算進去。大約有5,000名布爾什維克及其家人在克里姆林宮和莫斯科市中心幾個最好的飯店住了下來。內戰期間，他們共同佔用了相當多的服務人員，消耗了相當多的資源。他們的住處——不僅僅是列寧的——需要生爐取暖，儘管很難弄來燃料。在克里姆林宮內部，  
338 他們有託兒所、俱樂部、醫務室和浴室，以及一些「不對外公開的」中心，可以分發食品和衣物。（托洛茨基聲稱，1919年，他在人民委員會的「合作社」發現有高加索葡萄酒，想讓人搬走，因為嚴格說來，他當着斯大林的面對列寧說，酒是不許賣的，但據說斯大林反駁說，高加索的同志沒有酒是不行的。）<sup>334</sup> 相比於沙皇時代的皇室和高級貴族，布爾什維克的精英們得到的補貼，比如公寓、別墅、小汽車、食品，根本算不上奢侈，可是由於戰火的蹂躪與貧窮，這些福利就顯得特別突出和惹眼。<sup>335</sup> 公職人員的特權成了一個痛點，其範圍遠遠超出了中央政權。「我們割斷了與群眾的聯繫，結果很難獲得他們的好感，」1919年7月，圖拉省的一名布爾什維克寫信對列寧說，「以前黨內那種同志般的精神徹底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種新的個人統治，黨的首腦掌管一切。受賄現象氾濫：要是不受賄，我們共產黨的幹部簡直活不下去。」<sup>336</sup>

機關中也有着充沛的理想主義，但「官僚主義」的迅速蔓延讓革命者感到震驚。粗俗、惡毒、推諉、貪污公款、相互傾軋、爭奪權力的「官僚主義分子」突然間變得無處不在。<sup>337</sup>但這場革命的許多悖論之一在於，所有的「社會力量」，不管是異己的（資產階級、富農、小資產階級），還是友好的（工人，有時也包括農民），都可以說是一個階級，唯獨當權的那個不能說是一個階級。



從象徵的角度講，紅與白的二元對立——布爾什維克黨人與其他所有人的對立，包括二月革命的發動者和非布爾什維克社會主義者——規定了新政權的性質。這一點在革命三週年紀念日那天（1920年11月7日）有着戲劇性的表現。當時，彼得格勒再現了「猛攻冬宮」的一幕，參與人數遠遠超過原本的事件，演出的有6,000至8,000人，觀眾10萬人。表演中，在那座巴洛克風格的大型建築前面，在世界上最大的公共空間之一的巨大廣場上，佈置了兩座大型舞台，一紅一白，中間有拱橋相連。晚上10時，號聲響起，宣告行動開始，約500人的樂隊演奏了名為《羅伯斯庇爾》的交響曲，繼而是《馬賽曲》。泛光燈照亮了右側舞台，可以看到臨時政府、寶座上（！）的克倫斯基，還有部長、白軍將軍和有錢有勢的資本家。克倫斯基一邊指手畫腳，誇誇其談，一邊收受大袋大袋的金錢。突然，探照燈照亮了左側的舞台，那裏有一批剛剛下班、精疲力竭的群眾，其中許多人都因為戰爭而變成了殘疾。他們亂哄哄的，可一聽到有人喊「列寧」或高唱《國際歌》的旋律，就聚攏在紅旗周圍，組成了一支紀律嚴明的赤衛隊。拱橋上，武裝鬥爭開始了，赤衛隊在鬥爭中佔得上風。克倫斯基乘坐小汽車逃往舊政權的堡壘——冬宮，但赤衛隊還有觀眾們緊追不捨。他男扮女裝逃脫了，但群眾對冬宮發起了「猛攻」。大約150盞大功率投影燈照亮了冬宮，透過一扇扇巨大的窗戶，可以看到一幅幅啞劇般的戰鬥畫面，直到所有窗戶的燈光都變成紅色。<sup>338</sup>只要對那種狂熱稍有質疑，就會像克倫斯基和其他溫和派社會主義者一樣，被歸為白色陣營，結果白色陣營的人數不斷擴大。

在制度方面，壟斷性質的布爾什維克政權不但組成了國家，而且還因為大量吸收前沙皇軍官而變成了一個黨國。關於那些政治監察人員，托洛茨基解釋說，紅軍中的「政委制」，是「要充當腳手架的……我們會一點一點地拆掉這個腳手架」。<sup>339</sup> 然而，不管政委們是如何頻繁地要求把自己撤掉，上述的拆除從來都沒有發生。<sup>340</sup> 相反，名為維亞切斯拉夫·莫洛托夫的中央黨務官員很快就在一本小冊子中吹噓，治理國家的任務使得蘇俄共產黨如何不同於其他政黨。在諸多創新中，他特意指出把政委安插到技術專家身邊的做法，而且不僅是在紅軍中，所有的經濟和行政機關都是如此。<sup>341</sup> 黨國這樣的事物在沙皇俄國是不曾有過的。紅與專的二元並存，即便是在絕大多數國家官員、軍隊軍官和學校教員都成了黨員後，也會繼續存在，成為官員數量激增和浪費的又一根源。

傳統上認為，托洛茨基在俄國內戰中起到的作用比十月政變時還要突出。在公眾的想像中，他無處不在，他的列車裝載的是紅軍和勝利。但是，人們長期抱有的那種看法，即托洛茨基要遠遠強於斯大林，並沒有相關事實可以證明。<sup>342</sup> 無論是斯大林還是托洛茨基都非常激進，但是在前沙皇軍官問題上，斯大林推行的「無產階級」路線，激怒了托洛茨基（托洛茨基的憤怒又啟發了斯大林）。當然，斯大林不是排斥所有的軍事專家，他只是排斥「階級異己分子」。對他來說，階級異己分子包括具有貴族血統的人和1917年前就獲得高級軍銜的人，而托洛茨基也主張，不僅要培養初出茅廬的新人，還要培養從前的士官。<sup>343</sup> 對此，托洛茨基聲稱，1918年，前沙皇軍官佔紅軍指揮和行政人員的四分之三，到內戰結束時，據他所說，他們僅佔三分之一。<sup>344</sup> 然而，不管總數到底有多少，起用前沙皇軍官和其他領域的「資產階級」專家，都使得已經普遍存在的對於托洛茨基的負面看法聚集起來，結果，在他立下赫赫戰功的內戰中——這比人們通常以為的要早很多——他已成為眾矢之的，成為那個他幫助贏得勝利的政權內部所普遍厭惡的對象。同時，斯大林在內戰中的角色——敲腦袋——相當重要，這一點就連托洛茨基也是承認的。<sup>345</sup> 1918年在察里津那段時期——那時候的形勢無論是對於紅軍還是對於斯大林個人來說都極為艱難——預示着斯大

林日後的做法：用渲染「敵人」的陰謀和公開處決的辦法來加強紀律並贏得政治上的擁護。

托洛茨基是猶太人，但就像俄羅斯帝國中幾乎所有的知識分子以及革命者一樣，他是被俄羅斯文化完全同化的猶太人，而且他還有雙引人注意的藍眼睛，鼻子也不高，可他聲稱，他感到自己的猶太人身份是一種政治上的缺陷。農民當然知道他是猶太人。<sup>346</sup> 在俄國的美國紅十字會負責人稱托洛茨基是「自耶穌基督以來最偉大的猶太人」。白衛分子的雜誌談的都是「布爾什維克的猶太佬政委」和托洛茨基領導的「猶太佬紅軍」。<sup>347</sup> 1919年，托洛茨基收到一名朝鮮族俄共黨員的來信，其中提到有傳言說：「祖國被猶太政委們征服了。國家的所有災難都被歸咎於猶太人。他們說共產黨政權得到了猶太智囊、拉脫維亞步兵和俄羅斯白癡的支持。」<sup>348</sup> 倫敦《泰晤士報》斷言（1919年3月5日），猶太人佔據了蘇維埃俄國四分之三（！）的領導崗位。蘇維埃俄國的許多共產黨員把「斯莫爾尼」（Smolny）說成「西莫爾尼」（Shmolny，即Jewish中的「sh」），把主席團（presidium）唸成「普列日蒂姆」（prezhidium〔Jewsidium〕）。<sup>349</sup> 托洛茨基在自己的檔案中保存了一本1921年的德國畫冊，裏面有所有猶太布爾什維克的畫像，為那本書作序的是阿爾弗雷德·羅森堡（Alfred Rosenberg）。<sup>350\*</sup> 農民們也知道他是猶太人。他在後來提到作為一個猶太人的自知之明，以說明他為甚麼在1917年拒絕列寧的建議，沒有擔任內務人民委員（即政權警察）。<sup>351</sup> 不過，他接受了讓他擔任的一些別的高級職務，而他的猶太人身份對於那些職務有多大的妨礙，現在還不清楚。高層當中，只有格魯吉亞人朱加施維里一斯大林沒有猶太血統。列寧外婆的猶太人身份那時沒人知道，但其他領導人是猶太人，這在當時眾所周知，可這並沒有妨礙他們：季諾維也夫出生時叫做「奧夫謝伊—格爾申·拉多米斯爾斯基」，用的是他母親的姓「阿普費爾鮑姆」；加米涅夫出生時叫做「列夫·羅森菲爾德」，父親是猶太人；他倆的妻子都是猶太人。<sup>352</sup> 托洛茨基—勃朗施坦之所以成為眾矢之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不只因為猶太人身份。

341

---

\* 譯註：1893–1946，德國人，納粹的意識形態理論家。

與托洛茨基不同，斯大林從未在引人關注的爭論——比如布列斯特和約問題——中公然挑戰列寧，儼然與之平起平坐，激起他的憤怒。斯大林的確經常在政治上惹是生非。<sup>353</sup> 可是，對於斯大林為了震懾敵人和贏得工人的支持而濫用恐怖手段，列寧不會反感，因為作為一種給予政治教訓的方式，列寧提倡先開槍再問問題。（列寧支持托洛茨基槍斃逃兵的嚴厲措施，即使他們是黨員。）列寧也不傻：他看穿了斯大林的個性，以自我為中心，喜歡搞陰謀詭計，但列寧看重的是，斯大林既有堅定的革命信念，又能辦事，適合需要全力以赴的革命性的階級鬥爭。在政權內部的各個小集團中，斯大林對於列寧的作用顯而易見。「身居高位的布爾什維克，」副貿易人民委員阿爾卡季·博爾曼 (Arkady Borman) 回憶說，「可以分為兩類：列寧的門徒和剩下的人。前者在部門內部的衝突中感覺到地位穩固、安全，並且總是佔據上風。」<sup>354</sup> 斯大林既是列寧小集團中級別最高的成員，後來又自成一派，而他那一派與列寧的一派在人員上有部分重疊。相對應地，托洛茨基一派與列寧的一派則不存在重疊，結果便成了那位布爾什維克領袖的靶子。（野心勃勃的季諾維也夫有自己的小集團，在彼得格勒。）內戰期間，斯大林可以用向列寧求助的辦法，不聽命於托洛茨基，儘管後者的職務是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接下來我們將會看到，時移勢易，輪到托洛茨基為了避免在黨內聽命於斯大林而向列寧求助了。斯大林的權勢擴張已經領先了許多，但其實還只是開始。

## 第九章

# 發現之旅

我對俄國瞭解很少。辛比爾斯克、喀山、彼得堡、流放，差不多就這樣！

342

——大約1908年在卡普里島，當有人談到俄國農村時列寧這麼回答。

見馬克西姆·高爾基回憶錄<sup>1</sup>

各個蘇維埃共和國孤立的存在是不穩固不牢靠的，因為資本主義國家威脅着它們的生存。第一、各蘇維埃共和國國防的共同利益，第二、恢復被戰爭破壞的生產力的任務，第三、產糧的蘇維埃共和國給予不產糧的蘇維埃共和國必要的糧食幫助，——這三者絕對要求各個蘇維埃共和國建立國家聯盟，這是免遭帝國主義奴役和民族壓迫的唯一道路……

——以斯大林報告為基礎的黨的第十次代表大會決議，

1921年3月15日<sup>2</sup>

---

<sup>1</sup> 譯註：《蘇聯共產黨代表大會、代表會議和中央全會決議彙編》（第二分冊）（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98-99頁。

343 革命和內戰是在俄羅斯帝國這樣一個橫跨歐亞兩大洲，且成分極其複雜的國家爆發的。不過，從民族主義觀點來看，這個國家在治理上並未帶來特別困難的挑戰。帝俄過去根本沒有格魯吉亞和烏克蘭這兩個「共和國」；嚴格說來，烏克蘭人甚至不存在（他們是「小俄羅斯人」）。誠然，過去帝俄支持兩個所謂的受保護國（布哈拉、希瓦），芬蘭享有一定程度的自治，可帝國其餘部分卻被分成若干個總督轄區（*gubernii*）。後來，由於世界大戰、德國的軍事佔領和內戰，芬蘭、波蘭、立陶宛、拉脫維亞和愛沙尼亞紛紛獨立，紅軍沒能再次征服其中的任何一個。世界大戰、軍事佔領和內戰還催生了烏克蘭、白俄羅斯、格魯吉亞、亞美尼亞和阿塞拜疆，它們倒是全都被紅軍再次征服了，但這些民族共和國仍然保留了國家的某些重要特徵。民族問題一下子成了中心問題。

世界大戰使政治景觀發生了無可挽回的變化。三個主要的陸上帝國都解體了，不過，跟奧匈帝國以及奧斯曼帝國不一樣，俄國死而復生，雖說不是全部，也不是以同樣的形式。讓俄國與眾不同的，並且在某種程度上把俄國內戰變成了成功收復從前帝俄領土戰爭的，是若干工具和觀念的結合：共產黨、列寧的領導（實際的和象徵的）、布爾什維克後來才發現的聯邦制的辦法、世界革命——不僅僅是俄國革命，它讓「自決」成了一個靈活的概念——的幻想以及斯大林的謀略。帝俄的許多政治人物，從沙皇時代的右翼政治家彼得·斯托雷平等人到左翼的斯大林等人，再加上中間的立憲民主黨，都認為有必要採取地方自治和民族自治的形式，但必須是在一個強大的國家（*gosudarstvennost'*）領導下。<sup>3</sup> 斯大林是如何得出上述結論的，這是他在內戰的艱難歷程中不太為人所知的方面；它也是布爾什維克的國家建設中令人費解的一大成就。

「十月革命一開始，」列寧在1918年11月說道，「對外政策和國際關係的問題就成了我們最主要的問題。」<sup>4</sup> 布爾什維主義不只是一項關於國

\* 譯註：《列寧全集》第35卷，第150頁。

家建設的事業，還是一種可供選擇的世界秩序。布爾什維克訴諸聯邦制，在向殖民地人民發出的響亮號召中，承認對蘇俄歐亞地區的各附屬民族擁有正式的繼承權。<sup>5</sup> 國家結構、國內的少數民族政策、殖民地政策以及對外政策緊緊地聯繫在一起。

作為俄國曾經的敵人，德國承認新的蘇維埃國家，但它後來垮掉了，而作為俄國曾經的盟友，英國和法國現在成了對手：它們承認阿塞拜疆、亞美尼亞和格魯吉亞這幾個新的獨立共和國，卻不承認蘇維埃俄國。但是大波蘭和大羅馬尼亞這兩個凡爾賽條約的大贏家，作為蘇俄最直接的對手出現在西側。在另一側，俄國從前的遠東地區正處於日本軍隊的佔領下，這其中的原因部分在於美國總統伍德羅·威爾遜請求日本出兵，參加計劃由11國的2.5萬名士兵組成的遠征軍，拯救捷克斯洛伐克軍團並保衛西伯利亞的軍用倉庫。日本人起初拒絕武裝干涉俄國，但在1918年卻派出了比請求它派出的還要多的軍隊，目的除了反共，還想奪回歷史上失去的領土。日本在蘇俄遠東地區陷入了與眾多不同敵人的纏鬥，佔領軍增加到7萬多，引發了國內分歧，並付出了很高的代價——約1.2萬人的死亡和近10億日元的軍費。不過，在美國人1920年撤出符拉迪沃斯托克之後，日本人卻留了下來。<sup>6</sup> 於是，日本、波蘭、羅馬尼亞和英國，聯手在各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周圍形成了一個包圍圈，儘管如同我們將會看到的，由於再次征服了南高加索，蘇維埃革命在伊朗取得了短暫的突破，在蒙古取得了永久的突破。

344

到1921年，再次征服的戰爭的結局差不多明朗了。各蘇維埃共和國的總人口約有1.4億，其中俄羅斯人約7,500萬，而在6,500萬非俄羅斯人當中，操突厥語和波斯語的約3,000萬。在蘇維埃國家的總人口中，農民在1.12億左右。民族問題實際上也是農民問題，他們在俄國歐亞地區每一個民族中都佔絕大多數。

紅軍戰勝白軍的基礎不在農民本身，而在共產黨員。<sup>7</sup> 1919年清黨時，記錄在案的黨員有將近一半被開除；1920年新一輪的清黨中，超過四分之一的黨員被踢了出去，但黨還是在不斷壯大。<sup>8</sup> 黨從(1918年3月的)34萬人擴大到內戰結束時的70萬人，紅軍中的黨員數量也從4.5



萬人發展到30萬人。農民不起決定作用，可他們在任何時候都要佔到紅軍士兵的四分之三，儘管往往並不是出於自願。農民士兵經常帶着槍擅離職守。他們也使用獵槍和土法製造的武器。1920至1921年，在烏克蘭，在伏爾加河流域、頓河流域和庫班河流域，在坦波夫省和沃羅涅日省，尤其是在西西伯利亞，至少有20萬農民拿起武器反抗布爾什維克的苛政，紅軍在1920年9月開始復員也為暴動增添了新的力量。政權的回擊非常殘酷，但它也作出了重大讓步。1921年，農民迫使列寧結束徵收制，而列寧則迫使黨的第十次代表大會通過了所謂的新經濟政策，允許農民出售他們種植的大部分糧食。沒收行為並未停止：一個建立在階級鬥爭的思想和實踐基礎上的國家，需要時間來適應新經濟政策。但是在歐亞地區的大部分地方，內戰帶來的不僅是布爾什維克的壟斷性的黨國，還有承認民族身份的聯邦，以及合法化的市場（這要感謝與之同時的農民革命）。

「萬花筒」根本不能形容歐亞地區內戰的複雜多樣，尤其是在1920至1921年。歐亞地區需要從地理上去理解。在俄語中就如在德語和英語中一樣，「歐亞」這個詞出現於19世紀晚期，指歐洲加上亞洲，但是在20世紀初，其含義變成了與兩者截然不同的神秘的事物。<sup>9</sup>一小群別出心裁的知識分子，他們因為革命而流落國外——而且恰好是烏克蘭人、波蘭人和立陶宛人，突然宣稱從地理和種族構成上來說，已瓦解的俄羅斯帝國融匯了東方基督教和草原的影響，形成了一種新的超越性的綜合體。「俄羅斯人以及那些屬於『俄羅斯世界』各個民族的人，既不是歐洲人，也不是亞洲人，」這些逃往西方的流亡者在其宣言《到東方去》（1921）中寫道，「正與我們周圍的本土文化和生活元素融合在一起的我們，毫不羞愧地宣佈說，我們是歐亞人。」<sup>10</sup>他們的歐亞是從莫斯科實行統治的，經濟上自給自足，政治上民有（demotic，屬於人民所有，但和民主不同），據說是某種類似於交響樂的統一體。<sup>11</sup>就像我們將會看到的，同時也像斯大林充分認識到的——因為他當時正在處理多樣性問題——沒有甚麼觀念比這更荒謬了。斯大林欽佩大俄羅斯民族和俄羅斯工人階級，而且他一貫主張中央集權和黨的統治（即階級）高於民族利益，但他也承認，必須因應不同的民族創造出新的吸引力和制度。<sup>12</sup>之

前他在民族問題上的核心觀點是語言平等和行政管理的本土化。<sup>13</sup>當然，俄共企圖通過接納民族國家，來得到本地人的擁戴，而這件事的另一面就是，這些國家中有民族傾向的共產黨人獲得了實現自己抱負的手段。要是真的如同僑民們幻想的，存在一個「歐亞人」綜合體，那斯大林的一生就會簡單許多。

俄國內戰相當於某種「發現之旅」，雖然與克里斯托弗·哥倫布以及瓦斯科·達伽馬不同，俄國內戰中的航海者並未越過真正的海洋。一群令人眼花繚亂的人物在舞台上飄然而過：波蘭元帥約瑟夫·皮爾蘇茨基和波蘭布爾什維克約瑟夫·溫什利赫特(Józef Unszlicht)；留着八字鬚的紅色哥薩克首領謝苗·布瓊尼(Semyon Budyonny)和亞美尼亞騎手、人稱加伊·德米特里耶維奇·加伊(Gai Dmitrievich Gai)的蓋克·布日什基揚(Haik Bzhishkyan)，他是米哈伊爾·圖哈切夫斯基(Mikhail Tukhachevsky)的親密戰友；兩位韃靼穆斯林共產黨人、彼此都想置對方於死地的薩希卜·加列伊·賽義德—加利耶夫(Sahib Gareï Said-Galiev)和米爾賽義德·蘇丹—加利耶夫(Mirsäyet Soltangäliev)，以及巴什基爾非共產黨人艾哈邁德—扎基·瓦利季(Akhmetzaki Validi)，他阻截了蘇丹—加利耶夫的韃靼帝國主義；丹增(Danzan)和蘇赫—巴托爾(Sükhbaatar)，兩位蒙古民族主義分子，他們相互合作，直到後來拔刀相向；想讓波斯擺脫外國影響的溫文爾雅的米爾扎·庫丘克汗(Mirza Kuchek)，還有在德黑蘭領導右翼分子暴動的冷酷的禮薩汗(Reza)；人稱薩法羅夫(Safarov)的白俄羅斯猶太人、在突厥斯坦擔任委員的格奧爾吉·沃爾金(Georgy Voldin)，以及拉脫維亞人、老派的契卡人員雅科夫·彼得斯，他在突厥斯坦差點兒毀掉偉大的無產階級指揮官米哈伊爾·伏龍芝的事業；農民叛亂的領袖亞歷山大·安東諾夫(Alexander Antonov)及其布爾什維克對手弗拉基米爾·安東諾夫—奧弗申柯(Vladimir Antonov-Ovseyenko)，後者攻佔冬宮並逮捕了臨時政府成員，卻無力平息坦波夫農民的怒火；強調工人作用的兩位布爾什維克亞歷山大·施略普尼柯夫和亞歷山德拉·柯倫泰，他們是共產黨的黨內反對派領袖；有民族傾向的烏克蘭共產黨人米科拉·斯克雷普尼克(Mykola Skrypnyk)以及格魯吉亞共產黨人菲利普·馬哈拉澤(Pilipe Makharadze)

和布杜·姆季瓦尼 (Polikarp “Budú” Mdivani)；容易被人遺忘的駐守喀琅施塔得要塞的前沙皇少將亞歷山大·科茲洛夫斯基 (Alexander Kozlovsky) 和不易被人遺忘的前沙皇哥薩克軍官、波羅的海地區的德意志人、想要繼承成吉思汗事業的羅曼·馮·溫格恩—什捷爾恩貝格男爵 (Roman von Ungern-Sternberg)。可主要人物，甚至比列寧還重要的主要人物，卻是那位格魯吉亞人，他在民族問題上是斯托雷平轉世。斯大林追求的是國家主義議程，想把保留宏大的中央集權國家和容許民族差異結合起來，並毫不留情地打擊分離主義，儘管他無論是在長相還是在事實上，都是典型的邊疆地區的人。<sup>14</sup>

民族問題在內戰中始料未及的重要性，讓斯大林得以大權在握，並同列寧建立了緊密的工作關係。兩人常常受到堅決反對民族主義的強硬派布爾什維克和具有民族傾向、反對中央集權的布爾什維克的夾擊，於是，他們試圖實行一種切實可行的聯邦制，既合乎馬克思主義原則，又考慮到現實狀況與地緣政治要求。<sup>15</sup>

### 意外的聯邦主義者

347 1917年的政變有四個口號：和平、土地、麵包，還有民族自決，但民族自決的觀念長期以來讓左翼分子傷透了腦筋。「工人的民族性不是法國的、不是英國的、不是德國的民族性，而是勞動……」馬克思在早年寫道，「他的政府不是法國的、不是英國的、不是德國的政府，而是資本。他的領空不是法國的、不是德國的、不是英國的領空，而是工廠的領空。」<sup>16</sup> 但馬克思在晚年因為「愛爾蘭問題」而改變了自己的立場；第一國際的綱領含有自決權。<sup>17</sup> 卡爾·考茨基的文章〈現代民族〉(1887)成了馬克思主義者的首次重大嘗試，它闡明了如下正統觀點：資本主義的商品關係造就了民族，而民族將會隨着資本主義一起消失（這篇文章在1903年被譯成俄文）。1908至1909年，羅莎·盧森堡概

\* 譯註：《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256頁。

述了馬克思主義在民族問題上的強硬立場。她也認為資本主義催生了民族主義，分裂了國際無產階級，把他們跟統治階級捆綁在一起，但她認為除了被剝削的工人階級，其他人沒有自決權——這樣的立場在使用多種語言的東歐，對於專注於階級問題的左翼來說很有吸引力。<sup>18</sup> 後來在奧匈帝國出現了一種對立的馬克思主義觀點。奧匈帝國的奧托·鮑威爾等人提出了一個詳盡的綱領，主張與地域無關的「民族文化自治」，試圖把民族問題同階級問題調和起來。<sup>19</sup> 斯大林的文章〈民族問題和社會民主黨〉(1913)，反對奧地利馬克思主義者用資產階級的民族(文化)代替階級鬥爭的企圖(盧森堡主義)。例如，他質問穆斯林地主和毛拉們憑甚麼代表勞苦的穆斯林講話，並且指出，許多所謂的「文化」(宗教、搶婚、罩面紗)都是要廢除的。斯大林具體針對的目標是奧地利馬克思主義者的「民族文化自治」在高加索引起的反響(饒爾丹尼亞和格魯吉亞孟什維克)。他堅持認為自治只應是區域性的(也就是說，不能擴大到祖國領土之外的國民)。不過，最後他也承認，民族主義有助於爭取到容易受民族主義訴求影響的工人，從而為解放全世界無產階級服務。<sup>20</sup> 列寧——斯大林反駁奧地利馬克思主義者的文章曾被誤認為是受他之託——抨擊的對象是盧森堡，1914年她在日內瓦俄僑雜誌上發表了一篇文章，對民族主義不屑一顧。<sup>21</sup> 列寧區分了壓迫民族的民族主義和被壓迫民族的民族主義(比如愛爾蘭人的事業，那對馬克思產生過影響)，部分贊同自決權，而且與只出於策略考慮的斯大林不同，他還出於道義和政治的考慮：被壓迫民族勞苦大眾的解放。<sup>22</sup> 在列寧看來，一個人不能既主張社會主義又主張帝國主義(大國的民族壓迫)。

348

有馬克思主義傾向的相關著述就是這些，彼此口誅筆伐：以正統派考茨基(主張多數主義的德國公民)、強硬派盧森堡(被德國同化的波蘭人)、溫和派鮑威爾(主張多元民族主義的奧匈帝國臣民)為一方，以斯大林(被帝俄同化的格魯吉亞人)和列寧(主張多數主義的俄國臣民)為另一方。在俄國內戰的現實背景下，這些思想成了一個更大的戰場。

布爾什維克的成員體現了帝俄極為突出的多民族特點(就像本書按照原文給出的人名所證明的)，但這些布爾什維克也是被徹底俄羅斯化

的(就像他們的名字更典型的拼法所表明的)\*。不過，他們認識到俄羅斯民族與俄羅斯帝國是不一樣的。托洛茨基是個俄羅斯化的猶太人，他從十分消極的文化角度描繪了俄國，認為俄國人民需要「與亞細亞方式、與17世紀、與神聖的俄羅斯、與聖像和蟑螂的徹底決裂」。<sup>23</sup>† 列寧猛烈抨擊大俄羅斯沙文主義，認為那是一種特別的罪惡，這種罪惡「使他們(勞苦大眾)腐化墮落，鮮廉寡恥，讓他們習慣於壓迫異族人民，習慣於用一些貌似愛國的虛偽言詞來掩飾自己可恥的行為」，不過，他也承認，在俄羅斯族人當中可能會出現一種大眾化的民族主義。<sup>24</sup>‡ 斯大林過去激烈地批評過俄羅斯化。「呻吟叫苦的有俄國境內被壓迫的各民族和異教徒，其中包括那些被逐出鄉土而其神聖情感蒙受傷害的波蘭人和芬蘭人，歷史賦予他們的權利和自由都被專制制度蠻橫地踐踏了。」他用格魯吉亞文在《鬥爭報》上寫道(1901年11-12月)，「呻吟叫苦的有經常受迫害受侮辱的猶太人，他們甚至被剝奪了其他俄國庶民所享有的微不足道的權利，即隨處居住的權利、就學的權利、供職的權利等等。呻吟叫苦的有格魯吉亞人、阿爾明尼亞人以及其他民族，他們被剝奪了開辦本族學校的權利、在國家機關中工作的權利，他們不得不服從專制政權所瘋狂推行的、可恥的、壓迫少數民族的俄羅斯化政策。」<sup>25</sup>§ 但斯大林很快就放棄了這種格魯吉亞民族主義立場，還在1904年9月的《無產階級鬥爭報》上否認民族特性或民族精神的存在。<sup>26</sup> 到1906年，仍用格魯吉亞文寫作的他認為，民族自治會把「我國(格魯吉亞)與俄羅斯割裂，卻與亞洲的野蠻落後聯繫起來」。<sup>27</sup> 因此，列寧反對俄羅斯沙文主義，而斯大林則擔心除俄羅斯人之外的其他民族的落後狀態，並開始把俄羅斯人

---

\* 編註：在原書中，非俄羅斯人的名字是按照其原有的拼法。例如，斯大林是格魯吉亞人，其姓氏「朱加施維里」在書中按照格魯吉亞語拼作「Jughashvili」。如果用俄羅斯化的拼法，是「Dzhugashvili」，後者是英文世界更常見的拼法。也可參看作者在〈參考文獻〉中的說明。

† 編註：《文學與革命》(劉文飛等譯，外國文學出版社，1992)，第80頁；托洛茨基用聖像與蟑螂來指代傳統的俄國。

‡ 譯註：《列寧全集》第26卷，第111頁。

§ 譯註：《斯大林全集》第1卷，第17-18頁。

的監護作用視為提升其他民族的手段——這樣的想法可能和他在俄羅斯正教學校的經歷有關。<sup>28</sup> 事實證明，這種差別非常重要。

憑藉其格魯吉亞人出身和1913年的文章，斯大林成了黨內核心集團中公認的民族問題專家，是決定蘇維埃國家結構的最重要的人物。首屆布爾什維克政府設立了一個由他領導的民族事務人民委員部，這一點決非偶然。<sup>29</sup> 俄羅斯帝國在戰爭與革命中的瓦解，造成了一種極其特殊的局面。革命的倖存者突然發現，廣闊的俄國歐亞地區只有很少的無產階級，或者根本就沒有。為了尋找同「世界帝國主義」以及「反革命」作鬥爭的盟友，黨不得不在某些地區，尤其是在沒有工業的地區，甚至是在確存在無產階級的地區，與「資產階級」民族主義分子建立暫時的同盟。首先在這方面作出努力的是波蘭語地區：早在1917年11月，為了招募波蘭共產黨員並讓波蘭繼續留在蘇維埃俄國，民族事務人民委員部就成立了一個負責波蘭事務的下屬機構，儘管政權當時根本沒有控制任何波蘭領土，而且世界大戰的各交戰國已經不斷加碼，許諾讓波蘭成為一個獨立國家。監督波蘭蘇維埃化計劃的是斯大林的副手、波蘭人斯坦尼斯拉夫·佩斯特科夫斯基。他那頑固的盧森堡主義觀點只是加劇了波蘭左翼力量的分裂，造成了地方蘇維埃同各地波蘭人的委員會之間的摩擦。<sup>30</sup> 事態的發展表明，波蘭不僅是一個民族，它本身就是一個地緣政治要素。民族事務人民委員部成立了一些下屬機構，分別負責立陶宛、亞美尼亞、猶太人、白俄羅斯等等的事務，但民族事務人民委員部和斯大林的注意力特別集中於俄國歐洲和亞洲部分的穆斯林地區，集中於尋找聽話的穆斯林合作者。負責穆斯林事務的下屬機構成立了，但其領導人想要解決的是他們自己的問題：一個把從前沙皇俄國幾乎所有的穆斯林都包括在內的「自治的」韃靼里亞。為了維持某種政治控制，斯大林起初在1918年5月對大韃靼里亞計劃是支持的，但很快就加以阻撓，認為它危險，與布爾什維克的壟斷格格不入，對爭取非韃靼穆斯林的忠誠是有害的。<sup>31</sup> 雖說斯大林對俄國的歐洲和亞洲部分十分熟悉，但對問題的認識也有個過程。

作為斯大林的主要工具，聯邦制在布爾什維克當中起初幾乎沒有人支持。在美國革命中，聯邦主義者是那些支持強勢的中央政府的人。

350 在法國革命中，為了反對絕對主義國家，聯邦主義者想要削弱中央權力。對排斥聯邦制的馬克思產生影響的是法國人的理解。（無政府主義分子贊成寬鬆、分權和聯邦制。）<sup>32</sup> 列寧曾經寫道（1913）：「馬克思主義者當然反對聯邦和分權」，同年，他在一封私信中進一步解釋說，他「在原則上反對聯邦制」，因為「它削弱經濟聯繫，它對一個國家來說是不合適的形式」。<sup>33</sup> 斯大林在1917年3月發表了〈反對聯邦制〉，認為「聯邦制在俄國不會解決而且不能解決民族問題，它只能用堂吉訶德式的掙扎來扭轉歷史車輪，把民族問題弄得錯綜複雜起來」。<sup>34</sup> † 可車輪已經扭轉了，而且很快。1918年，掌握了權力的斯大林承認聯邦制——不是沙皇時代的強迫的統一，而是「俄國各民族和各部落勞動群眾的兄弟般的自願聯合」——是必要的，但只是臨時措施，是社會主義的「過渡」階段。<sup>35</sup> ‡ 1918年4月1日，蘇維埃俄國的憲法起草委員會匆匆拼湊起來，斯大林是唯一在人民委員會兼職的成員；他寫的提綱成了7月3日公佈的文件草案的基礎，並提交中央委員會批准。在7月4至10日的蘇維埃代表大會上，該憲法得到正式通過——大會是在左派社會革命黨人在莫斯科發動準政變期間召開的。<sup>36</sup> 蘇維埃俄國正式成為俄羅斯社會主義聯邦蘇維埃共和國（Russian Soviet Federated Socialist Republic, RSFSR）。<sup>37</sup> 「聯邦」這個詞出現在憲法標題和最初的原則中，但是沒有出現在具體說明治理機制——聯邦如何實踐——的文本中。<sup>38</sup> 儘管如此，在組成俄羅斯社會主義聯邦蘇維埃共和國的大部分「自治」實體迅速落入白軍和其他反布爾什維克力量手中之後，蘇維埃俄國仍然是一個聯邦。

在布爾什維克方面，為聯邦制提供基本理論依據的是斯大林。按照他的看法，聯邦制需要有一種辦法，把許多民族的人民融為單一的一體化國家。「在那些居民文化落後的邊疆地區，蘇維埃政權遠沒有能夠成為這樣的人民政權。」他在《真理報》上寫道（1918年4月9日）。他認為布爾什維克的任務是通過建立「地方學校、地方法院、地方行政機

\* 譯註：《列寧全集》第46卷，第380頁。

† 譯註：《斯大林全集》第3卷，第27頁。

‡ 譯註：《斯大林全集》第4卷，第68頁。

關、地方政權機關、地方社會政治機關和教育機關」，並「保證在社會政治工作的各方面有使用地方的、為邊區勞動群眾所熟悉的語言的充分權利」，讓群眾同「資產階級」民族主義分子斷絕聯繫。<sup>39\*</sup> 換句話說，斯大林的理解是不僅僅提供指導：儘管大俄羅斯擁有更高級的文化並對各族人民伸出援手，各族人民仍需要使用當地語言的教育和宣傳，需要參與管理他們自己的事務。在這裏，共產黨明白了過去的俄國正教傳教士在帝國邊遠地區弄明白的道理：必須使用帝國的各種地方語言來教授《聖經》，那樣才會讓異教徒去閱讀並皈依基督教。共產主義也是如此。這不是正教傳教士對布爾什維主義產生直接影響的問題，而是在類似環境中採取了類似辦法的問題。<sup>40</sup> 斯大林表現得就像實際上的傳教士。

351

黨內民族問題的首次大討論發生在1919年3月黨的第八次代表大會上。大會還再次肯定了任用沙皇軍官的做法。這種任用必須要有政委，結果便固化了黨國二元結構。在民族問題上，布哈林、皮達可夫等左派共產主義者在大會上要求採取盧森堡主義的強硬立場（取消民族自決的口號）。<sup>41</sup> 聯邦制畢竟是孟什維克、崩得分子、亞美尼亞達什納克黨人和烏克蘭非社會主義的民族主義分子的主張。列寧回答說，民族是「客觀」存在的，「事實擺在那兒，不承認不行」。<sup>42</sup> 表決結果承認，民族主義是一種「必要的惡」，列寧的主張獲得了勝利。大會甚至把自決原則寫進了共產黨的綱領中，儘管它沒有採用斯大林的表述（「勞動群眾的自決」），而是主張抱着「歷史觀點和階級觀點」的自決。實際上，斯大林對於這一表述是可以接受的，因為它意味着，如果一個民族從資產階級民主制轉變為蘇維埃民主制，那麼無產階級就是那個應該獲得自決權的階級，但要是從中世紀制度轉變為資產階級民主制，那「資產階級」民族主義分子就可以參與到政治聯合中。<sup>43</sup> 但第八次代表大會影響最為深遠的是在決議中嚴格確認了黨的非聯邦性質。「俄共及其領導機關的一切決議，黨的各個部分（不分其民族成分）必須無條件地執

---

\* 譯註：《斯大林全集》第4卷，第69、70頁。



行。」該決議寫道，「烏克蘭、拉脫維亞、立陶宛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享有黨的區域委員會的權利，完全隸屬俄共中央。」<sup>44\*</sup> 就這樣，第八次代表大會在保留了聯邦國家的同時，進一步確認了黨的非聯邦性質。換句話說，聯邦制必須從屬於「無產階級」。

## 東歐的霸權

352 從1795年到1918年，波蘭是不存在的。約瑟夫·皮爾蘇茨基(生於1867年)出身貴族，同費利克斯·捷爾任斯基一樣畢業於維爾諾中學，曾是一名主張波蘭獨立、反對沙皇統治的政治恐怖分子，站在同盟國一方參加過世界大戰，但因拒絕向德國宣誓而被關進監獄。1918年11月8日，也就是在距離簽訂停戰協定還有三天的時候，德國人把他放了；他沒有像一年前的列寧那樣返回彼得格勒，而是乘列車返回華沙。當波蘭在被瓜分123年之後重新出現在地圖上的時候，其邊界還不確定。六種毫無價值的貨幣還在流通，更別提還有分屬三個已經不存在的帝國(奧地利、德意志和俄羅斯)的官僚系統；犯罪、饑餓和斑疹傷寒到處肆虐。<sup>45</sup> 藉助談判，新的國家元首皮爾蘇茨基不僅讓德國的其他部隊撤出了魯登道夫控制的地區(許多部隊都把他們的武器留給了波蘭人)，還讓德國衛戍部隊撤出了華沙。他還成立了一支專門從事偵察和破壞活動的部隊，叫做「波蘭軍事組織」，並在法國的幫助下，開始拼湊起一支軍隊。「從下到上，差不多一切都需要重建」，剛剛從德國戰俘營放出來充當教官的法國人夏爾·戴高樂(Charles de Gaulle)寫道。<sup>46</sup> 從1919年初開始，為了反擊有擴張主義思想的布爾什維克和地方民族主義分子，臨時拼湊的波蘭軍隊佔領了過去由沙皇統治的白俄羅斯、立陶宛和烏克蘭的部分領土，包括加利西亞的油田。<sup>47</sup> 到1919年秋天，波蘭人主動提出，願意為英國拿下莫斯科，投入的軍隊是50萬人，每天的開支計劃在60萬至100萬英鎊；結果誰都不願出這筆錢(英國人仍在

\* 譯註：《蘇聯共產黨代表大會、代表會議和中央全會決議彙編》(第一分冊)，第567頁。

支持鄧尼金)。<sup>48</sup> 1919年12月，皮爾蘇茨基試探了巴黎的態度，看能否支持波蘭人對布爾什維主義發動一場大的攻勢；法國覺得波蘭有望成為維護凡爾賽秩序的東方堡壘，但它只是作了模稜兩可的答覆。<sup>49</sup> 蘇俄人也向法國發出呼籲，並幻想能從魯登道夫周圍的圈子得到德國軍方的幫助，打擊波蘭人。<sup>50</sup> 到最後，波蘭和蘇維埃俄國很大程度上都靠自身的力量打了一場戰爭。

1919至1920年的波蘇戰爭反映的是相鄰國家的一連串邊境武裝衝突——羅馬尼亞和匈牙利是因為特蘭西瓦尼亞，意大利和南斯拉夫是因為里耶卡(舊稱阜姆)，波蘭和德國是因為波茲南和波美拉尼亞，波蘭和捷克斯洛伐克是因為西里西亞。特別是大羅馬尼亞，因為君主制原封未動，成了蘇俄西南邊境一個新的大國。但華沙和莫斯科的衝突更大，是爭奪東歐霸權的全面戰爭，對兩次世界大戰之間那段時期的局勢產生了深刻的影響。<sup>51</sup> 它對布爾什維克的國內政治也產生了深刻的影響。

353

沙俄時期，流亡在外的列寧和皮爾蘇茨基都在哈布斯堡王朝統治下的克拉科夫生活過，而且是同一時期、同一街道。甚至在導致列寧哥哥被處死的那場暗殺亞歷山大三世的陰謀中，皮爾蘇茨基也被捕了。但是，曾是歐洲最大國家的波蘭——立陶宛聯邦(1569-1795)與世界歷史上最大的國家俄羅斯帝國，二者在版圖上的重合啟發了兩種相互競爭的帝國主義。<sup>52</sup> 上台後，列寧和皮爾蘇茨基彼此都向對方提出了基本屬於騙人的和平倡議，一邊野心勃勃，一邊聲稱自己是在採取防禦性的軍事行動。列寧把「資產階級的」波蘭看作是反對凡爾賽秩序的重要革命戰場：要麼充當協約國干涉社會主義俄國的跳板——這是必須防止的，要麼成為布爾什維克在德國發動革命的走廊。<sup>53</sup> 作為社會民主黨人和波蘭民族主義者，皮爾蘇茨基現在添加了元帥頭銜，他要的是一個疆域縮小的俄國和一個大波蘭——與白俄羅斯、立陶宛一起組成一個由波蘭主導的「聯邦」，並與小的、獨立的烏克蘭結盟。<sup>54</sup>

歷史上屬於烏克蘭的地方曾在不同時期、以不同的方式屬波蘭——立陶宛聯邦和帝俄的一部分。1918年，它從三個陸上大帝國的解體中看到了自己的機會，但與波蘭的情況不同，凡爾賽的決策者拒絕承認烏克蘭獨立。德國的傀儡政府、布爾什維克俄國和波蘭，再加上鄧尼金將軍，

來來往往，但是在那些競相提出的對主權的聲索中，農村地區對於任何想要成為統治者的人來說，都是無法治理的。1920年4月，被罷免的烏克蘭民族主義運動領導人西蒙·佩特留拉(Symon Petliura)——他的所謂的「督政府」控制了很小部分烏克蘭領土，而他本人則在華沙避難——與皮爾蘇茨基訂立了被稱為華沙條約的軍事同盟。為了在反抗布爾什維克、爭取烏克蘭獨立的鬥爭中得到波蘭的援助，佩特留拉放棄了對(以利沃夫/利維夫為中心的)東加利西亞的領土要求，並因此而受到那裏講烏克蘭語的多數派嚴厲指責。波蘭民族主義分子根本就反對烏克蘭的存在，面對他們的鼓噪，皮爾蘇茨基認為，波蘭軍隊不可能在廣闊的烏克蘭的全境都駐軍，而且考慮到俄羅斯帝國主義的歷史，「要是烏克蘭不獨立，波蘭也絕對獨立不了」。同時，他代表波蘭對西部擁有大量講烏克蘭語人口的地區提出了領土要求。<sup>55</sup> 後者包括他的故鄉維爾諾/維爾納/維爾紐斯，而立陶宛和白俄羅斯也想得到那裏。此外，波蘭人已經佔領了明斯克，而白俄羅斯甚至某些立陶宛人也對那裏提出了領土要求。(白俄羅斯在鼎盛時期包括帝俄的格羅德諾、維爾納、明斯克、莫吉廖夫和維捷布斯克幾個省；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在格羅德諾省。)

在莫斯科，在那些有待考慮的重大問題中，為了讓蘇維埃俄國先慶祝列寧的50歲生日，推遲了原定於1920年4月22日的反波蘭示威活動。政權的兩份主要報紙幾乎都用來專門給布爾什維克領袖祝壽了，托洛茨基、季諾維也夫、布哈林和斯大林都寫了頌詞，熱情讚揚列寧消滅了敵人。<sup>56</sup> 但是在4月23日政權開會時，斯大林竟然斗膽談到了列寧犯過的政治錯誤，包括他嚷嚷着要在蘇維埃代表大會召開前發動十月政變，當時人們沒有對他的要求讓步。斯大林說：「他微笑着，狡黠地瞅着我們說：『是的，恐怕是你們對。』」列寧並不害怕承認自己的錯誤。<sup>57</sup>

同一天，列寧向波蘭發出和平倡議，表示願意割讓整個白俄羅斯和烏克蘭大部。<sup>58</sup> 該倡議讓波蘭軍隊要是再向東推進就成了無端的侵略。如果皮爾蘇茨基接受列寧的和平倡議，那波蘭元帥要麼會在布爾什維克

---

\* 譯註：《斯大林全集》第4卷，第281頁。

不能兌現承諾時揭穿它的騙局，要麼會無需動手就把波蘭邊界東移很多。皮爾蘇茨基沒有接受列寧的和平倡議，而是在4月25日擲出鐵骰子，派遣大約5萬名波蘭士兵開進了歷史上屬於烏克蘭的地方——這樣做據說是為了搶在布爾什維克發動攻勢之前先發制人。<sup>59</sup> 在烏克蘭民族主義武裝的協助下，皮爾蘇茨基的軍隊於1920年5月7日佔領基輔，並宣佈從俄國的壓迫下解放了烏克蘭。事實上，布爾什維克為了點燃俄國人反抗波蘭人的熱情並保存紅軍的實力——紅軍當時正在向北方集結——未經戰鬥就放棄了這座東斯拉夫人的母城。

從皮爾蘇茨基向東進軍的行動中，列寧看到的不是彌賽亞式的波蘭民族主義運動，而是世界帝國主義的詭計，所以在布爾什維克的宣傳中，這成了一場階級衝突。「聽着，工人們，聽着，農民們，聽着，紅軍戰士們，」托洛斯基宣稱，「波蘭貴族 (*szlachta*) 和資產階級已經向我們發動了戰爭……消滅波蘭資產階級。在它的屍體上，我們已經和波蘭工農結成了聯盟。」<sup>60</sup> 但托洛茨基本人私下警告說，不要指望波蘭工人會發動聲援性的起義。<sup>61</sup> 一直關注着這個民族主義政權的斯大林也初步表達了自己的懷疑。他在《真理報》上寫道（1920年5月20日和26日），鄧尼金和高爾察克沒有「自己的」後方，與之相比，「波蘭軍隊的後方是單純的，民族方面團結的……當然，波蘭後方在階級方面不是單純的……但是，階級衝突還沒有達到使民族一致的感情被衝破……的程度。」\* 在波蘭人當中，民族感情勝過了階級感情，不可思議但卻是真的。雖然有一點斯大林是同意列寧的：他也認為有協約國在為波蘭撐腰。<sup>62</sup> 皮爾蘇茨基魯莽的進攻乍看起來確實像是有這麼回事。而且英國陸軍部最後給皮爾蘇茨基送來了步槍和大炮；這些槍炮是前一年訂下的，但是在新的背景下，看上去就像是英國在支持波蘭「入侵」。實際上，法國人還有英國人都對皮爾蘇茨基1920年春天向東發動的攻勢非常不滿。

355

不管這場衝突是民族內部的衝突、民族間的衝突還是階級衝突，它

\* 譯註：《斯大林全集》第4卷，第286-287頁。

都是世界大戰在軍事上的餘波。世界大戰期間，為同盟國作戰的波蘭人可能有800萬；在沙皇軍隊中作戰的有200萬。<sup>63</sup>波蘭人此時仍舊穿着奧地利或德國的制服——他們在上面別了一個白鷹徽章。許多在西線做了戰俘的波蘭人穿的是法國制服。紅軍士兵有許多穿的是沙皇軍隊的制服——除了帶有紅星的尖帽子，他們還在衣服上繫了一根紅帶子。有些波蘭人也穿着從前沙俄的制服。

至於戰場，它就像一個三角形，三個角分別是西面的華沙、北面的斯摩棱斯克和南面的哈爾科夫。普里皮亞季沼澤在三角形的裏面，這就意味着要是向西推進，只有走這個森林密佈的沼澤地區的兩側：北面的斯摩棱斯克—維爾諾—格羅德諾—華沙—線（它反過來就是拿破侖進軍的路線），或者是南面的基輔—羅夫諾—盧布林—華沙—線（蘇俄人把它交給了西南方面軍）。兩條線最終匯合在一起，但它們在後方缺少一個基地或指揮中心，這就使紅軍的行動變得複雜了。<sup>64</sup>但波蘭人長驅直入，打到基輔，使自己遠離家鄉，戰線拉得過長，很容易遭到反擊。俄方在戰場上做出改變，投入了1919年秋天為對付哥薩克而成立的第一騎兵集團軍。這些哥薩克紅軍的首領是謝苗·布瓊尼，一個高大威猛的騎手，過去是沙皇軍隊的軍士長，因作戰勇敢而得到過聖格奧爾吉勳章。伏羅希洛夫是第一騎兵集團軍的政委，這意思是說，他們上面的庇護者是斯大林。他們的數量增加到18,000人，都是些從前的哥薩克、游擊隊和土匪。他們中有一些年輕的指揮官，比如格奧爾吉·朱可夫（Georgy Zhukov，生於1896年）和謝苗·鐵木辛哥（Semyon Timoshenko，生於1895年）。托洛茨基像他一貫的那樣表現得十分傲慢：在視察了這支騎兵部隊後，這位陸軍人民委員把它稱為一幫由「阿特曼首領」率領的傢伙，還說「他指向哪裏，那幫人就會打到哪裏：今天為紅軍打仗，明天為白軍打仗」。<sup>65</sup>但是，布瓊尼和他那為對付可怕的哥薩克白軍騎兵而成立的軍隊，1920年2月在東南方向的新羅西斯克把鄧尼金的軍隊趕進了大海。他們的策略是，把高度的機動性與巨大的規模結合在一起：先是試探敵人的弱點，然後把所有的兵力集中起來，直插敵人的後方並大肆破壞，給敵人造成恐慌，使他們不得不後撤，接着便施以兇猛的襲擊，讓後撤變成一場潰敗。為了從新羅

西斯克趕到西南前線，紅軍的第一騎兵集團軍騎着馬向西走了750多英里。<sup>66</sup> 1920年5月底，波蘭情報人員從飛機上發現了紅軍騎兵的戰馬在途中揚起的漫天塵土。<sup>67</sup>

在紅軍騎兵橫掃烏克蘭之前，1920年4月29日，紅軍最高總司令謝爾蓋·加米涅夫寫信給列寧，請求讓米哈伊爾·圖哈切夫斯基擔任波蘭戰役的戰場總指揮。<sup>68</sup> 圖哈切夫斯基不僅僅是貴族，他的家族世系可追溯到12世紀曾為基輔羅斯大公效力的一個神聖羅馬帝國貴族。他的母親是農民。1914年，他以班級第一的成績畢業於亞歷山大軍事學校並選擇了謝苗諾夫近衛團，那是帝國兩個隸屬於宮廷的、歷史最悠久也最負盛名的近衛團之一。「他是一個體形很勻稱的青年，相當傲慢，覺得自己天生就是幹大事的」，有朋友回憶說。<sup>69</sup> 另一位同班同學回憶，圖哈切夫斯基對低年級生顯得很霸道，「大家因為害怕，都想躲開他」。(據說三個由他訓練的學員自殺了。)<sup>70</sup> 世界大戰期間，圖哈切夫斯基在1915年6月被德軍俘虜，成了5,391名被俘的俄軍軍官之一。與很快逃脫的拉夫爾·科爾尼洛夫將軍不同，圖哈切夫斯基在慕尼黑外面的英戈爾施塔特戰俘營(戴高樂也關在那裏)受了兩年半的折磨。就在布爾什維克奪權的前幾天，他設法回到了俄國，很早就自願加入紅軍，甚至入了黨(1918年4月)。<sup>71</sup> 1918年夏天，白軍在辛比爾斯克俘虜了他，但年輕的布爾什維克積極分子約納瓦·瓦列伊基斯(Jonava "Iosif" Vareikis)救了他。<sup>72</sup> 1918年夏天，圖哈切夫斯基在辛比爾斯克(列寧的故鄉)大敗白軍；1919年，他又在烏拉爾山區取得勝利，把高爾察克的軍隊趕到西伯利亞，其殘部後來在此地被殲滅。<sup>73</sup> 到1919年12月他在總參軍事學院發表講話，扼要介紹「革命戰爭」理論的時候，已是公認的紅軍最高指揮官。1920年春，他的聲名更加顯赫，當時他作為高加索方面軍司令，幫助擊潰了鄧尼金的軍隊。1920年他27歲，和他的偶像拿破侖進行傳奇般的意大利戰役時的年齡相同。基輔落到波蘭人手裏的那個星期，他趕到斯摩棱斯克的西方面軍司令部，開始集結力量準備對西北方向實施重大打擊。

357

---

\* 編註：750英里約1,207公里。

另一名前沙皇軍官亞歷山大·葉戈羅夫 (Alexander Yegorov, 1883年出生)——五金工人、中校，曾經從伏羅希洛夫手中接管並丟掉了察里津，然後又把奧廖爾丟給了鄧尼金，但接着就發動了戰績輝煌的反攻——擔任了西南方面軍的最高指揮官，而斯大林剛剛被任命為那裏的委員。西南方面軍的任務包括剿滅克里米亞的弗蘭格爾白軍殘部，但現在還要承擔反攻波蘭的任務。1920年6月3日，斯大林打電報給列寧，要求要麼同弗蘭格爾立即達成停戰協議，要麼就全力猛攻，迅速將其粉碎。列寧驚駭地寫信給托洛茨基（「這顯然是空想」）。托洛茨基十分惱怒：斯大林繞過他這個共和國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直接找了列寧。「您的進攻克里木的建議事關重大，」列寧承認，「我們必須……極慎重地加以考慮。」<sup>74</sup> 在弗蘭格爾問題上並沒有立即做出決定。6月5日，布瓊尼的騎兵在烏克蘭突破了波蘭人的防線。「我們已經拿下基輔」，6月12日，托洛茨基興奮地說道。他還說：「撤退的波蘭人破壞了客運和貨運火車站、電廠、供水網以及弗拉基米爾大教堂。」他建議公開這些罪行，在國際上對波蘭人施加壓力，不讓他們在撤退時破壞更多的基礎設施。<sup>75</sup> 與此同時，推進中的紅軍劫掠和凌辱他們在途中遇到的一切：教堂、店舖、住宅。「紅軍士兵光顧後留下的記號，」有作家解釋說，「一般都是屎，拉在家具上、畫上、床上、地毯上、書上、抽屜裏、盤子上的屎。」<sup>76</sup>

358 1920年6月24日，斯大林在哈爾科夫西南方面軍司令部，向一份報紙公開表達了對波蘭戰役作戰目標的懷疑。「其中一部分人不滿足於前線的勝利，叫喊『向華沙進軍』；」他說的顯然是針對圖哈切夫斯基，「另一部分人不滿足於只是防衛我們的共和國，使它免受敵人進攻，傲慢地說，只有打到『紅色蘇維埃華沙』，他們才能罷休。」<sup>77</sup> 但是，這樣的懷疑消失在連戰連捷所帶來的過度樂觀的情緒中。「工人革命的戰士們！」7月2日，圖哈切夫斯基在斯摩棱斯克的西方面軍司令部發佈的一道由西方面軍兩名委員伊瓦爾·斯米爾加和約瑟夫·溫什利赫特聯合簽署的命令中說，「報仇的時候到了。我們的戰士正在從整條戰線上發

\* 譯註：《列寧全集》第49卷，第398-399頁；克里木即克里米亞。

† 譯註：《斯大林全集》第4卷，第295頁。

起進攻……那些參加戰鬥的戰士們粉碎了高爾察克、鄧尼金和尤登尼奇……讓受帝國主義戰爭蹂躪的土地見證革命怎樣用血向舊世界及其走狗清算舊帳吧……世界革命的命運將會在西方決定。在波蘭白軍的另一邊，是通向世界大戰的道路。在我們的刺刀上，我們會為勞苦大眾帶來幸福與和平……向維爾納、明斯克和華沙——進軍！」<sup>78</sup>

八天後，布瓊尼在南方徹底趕跑了波蘭軍隊，佔領了皮爾蘇茨基在烏克蘭戰役發起點羅夫諾城的司令部以及該城極富象徵意義的凡爾賽飯店。<sup>79</sup>（列寧喜歡指責波蘭是凡爾賽條約的「私生子」。）紅軍現在打到了布格河畔，那條河是大部分波蘭語地區和大部分烏克蘭語地區粗略的分界線。<sup>80</sup>雖然圖哈切夫斯基已經下令向華沙進軍，但紅軍方面的戰略仍然沒有確定。托洛茨基、斯大林、捷爾任斯基和拉狄克——他在柏林的監獄裏關了一年剛剛回來，人們覺得他對波蘭事務十分瞭解——認為進攻華沙不會成功，除非波蘭工人階級發動起義，而那種可能性很小。<sup>81</sup>斯大林在《真理報》（1920年7月11日）上公開警告說：「在弗蘭格爾的危險還沒有消除以前，就說『向華沙進軍』和一般地說我軍的勝利是鞏固的，那是可笑的。」<sup>82\*</sup>然而，就在那天，明斯克被圖哈切夫斯基指揮的軍隊攻陷。波蘭政府再次向協約國求援。法國政府雖然還在對皮爾蘇茨基的魯莽感到生氣，可還是建議展開反布爾什維克的行動；英國在7月11日向布爾什維克遞交了由外交大臣寇松勳爵簽署的照會，建議在西部地區按照有利於蘇維埃俄國的領土狀況停戰，在克里米亞（弗蘭格爾的避難所）與弗蘭格爾停戰並設立中立區，同時嚴厲警告說，不要越界進入「人種學意義上的」波蘭領土。照會想把波蘇邊界定在布格河以東大約50英里的地方（實際上就是1797年普魯士與帝俄的邊界線）；日後這條邊界線被稱為寇松線。<sup>83</sup>波蘭人大為震驚：英國人似乎是放棄了被波蘭人視為「歷史上就屬於他們的」祖產（不管在1920年的時候，生活在那裏的是甚麼人）。<sup>84</sup>對列寧來說，這就像是英國人想要按照處理直布羅陀的方式兼併克里米亞半島，從而用一把白色波蘭那樣的匕首指

\* 譯註：《斯大林全集》第4卷，第302頁。



向赤色的蘇俄；7月12至13日，他敦促斯大林「猛烈加強攻勢」。<sup>85</sup>

戰場上的勢頭有助於實現列寧的願望：第一騎兵集團軍已經推進到波蘭境內。在布瓊尼的一個騎兵師，有個來自敖德薩市區的小伙子名叫伊薩克·巴別爾(Isaac Babel，生於1894年)，他有寫日記的習慣，後來他利用自己的日記創作了一些短篇小說，收在《紅色騎兵軍》裏，把他們的殘暴行為變成了詩。<sup>86</sup>圖哈切夫斯基在北方同時進行的推進也是由騎兵打頭。那是人稱加伊·德米特里耶維奇·加伊(生於1887年)的蓋克·布日什基揚領導的第三騎兵軍。他出生在波斯的大不里士，父親是亞美尼亞人，母親是波斯人，他們是從高加索移民過去的，但是在1901年又回到梯弗利斯。加伊在世界大戰中為俄國打過仗。按照第一騎兵集團軍的模式組建的加伊的第三騎兵軍，雖然兵力只有前者一半，而且也沒有一座巴別塔來讓它的功績永垂不朽，但其覆蓋範圍和推進速度卻是布瓊尼騎兵軍的兩倍，而且面對波蘭人集結的主力，他們反覆突破對方的戰線。加伊本人的馬上技藝比不上布瓊尼，但令人恐怖的戰術卻和布瓊尼不相上下，而且他更勝一籌的地方在於知道如何把騎兵用作步兵前面的突擊力量。<sup>87</sup>(這將是歐洲歷史上最後一場倚重騎兵的重要戰爭。)列寧迫不及待地指示為了簽訂條約正在和立陶宛民族主義分子談判(條約在7月12日簽訂)的外交人民委員格奧爾吉·契切林：「所有這些讓步都不重要……我們必須佔領和蘇維埃化……我們必須確保我們首先要把立陶宛蘇維埃化，然後把它還給立陶宛人。」<sup>88</sup>事實上，加伊把波蘭人趕出了維爾諾/維爾納，並於7月14日搶在立陶宛民族主義分子前面進入了該城。<sup>89</sup>次日，加伊得到了他的第二枚紅旗勳章。<sup>90</sup>

7月14日，謝爾蓋·加米涅夫向陸軍人民委員托洛茨基建議，不管政府對待寇松照會的立場怎樣，既然波蘭人在逃跑，「繼續軍事行動對於開始和談是比較有利的」。<sup>91</sup>兩天後，中央委員會集中討論了寇松照會等議題；斯大林是唯一缺席的政治局委員，當時他在哈爾科夫的西南方面軍司令部。托洛茨基力主談判，理由是紅軍和國家已經因為戰爭

\* 譯註：《列寧全集》第49卷，第462頁。

而精疲力竭。<sup>92</sup>但大多數人都支持列寧的意見，拒絕協約國的調停，想繼續展開軍事行動。<sup>93</sup>7月17日，列寧打電報給前線的兩位最高委員斯大林和斯米爾加（西方面軍），誇口說他的政策勝利了，並指示他們「迅速執行命令，發動猛烈攻勢」。<sup>94</sup>加伊的部隊在7月19日佔領了格羅德諾。為全面瞭解戰局，紅軍最高總司令謝爾蓋·加米涅夫抵達西方面軍在明斯克的新司令部；大約在7月22日午夜，他命令圖哈切夫斯基務必在1920年8月12日之前佔領華沙，也就是說，距離紅軍發動此次戰役只有六週時間。<sup>95</sup>

360

列寧是靠譴責「帝國主義」戰爭上台的。要是他接受寇松照會作為簽訂和平協議的基礎——不管是出於他本人的意願，還是因為發生了甚麼無從想像的事情，使得托洛茨基和斯大林聯起手來，以他們有根有據的懷疑向政治局施壓——那波蘭人也會被迫很不情願地接受寇松照會。那樣一來，烏克蘭、白俄羅斯大部和立陶宛就會交到蘇俄手裏。列寧沒有那樣做，而是夢想着點燃整個歐洲的革命烈火。他擲出了鐵骰子。

### 列寧的狂想

7月23日，莫斯科成立了一個由少數波蘭布爾什維克組成的「波蘭革命委員會」，其中包括兩名契卡人員捷爾任斯基和溫什利赫特。同一天，斯大林的西南方面軍將其作戰方向從盧布林—華沙突出部調整為更南面的利沃夫/利維夫，那是加利西亞東部的首府。<sup>96</sup>這樣做的原因部分在於北方的突出部攻勢進展十分順利。此外，東南歐的大國大羅馬尼亞的軍隊已經鎮壓了匈牙利蘇維埃共和國，佔領了過去屬於沙俄的比薩拉比亞並和蘇俄軍隊發生了衝突；斯大林想要震懾羅馬尼亞軍隊。<sup>97</sup>托洛茨基也擔心羅馬尼亞會發動進攻，因為紅軍已經越過寇松線。因此，佔領利沃夫/利維夫可以保障蘇俄與羅馬尼亞接壤的側翼安全，為列寧打算在中歐進行的進攻性的、由軍隊來實施的革命化過程提供一個基地。為了讓英國人承認蘇俄而正在倫敦談判的列夫·加米涅夫，寫信給列寧要求趕緊佔領利沃夫/利維夫，因為寇松已經承認它是俄國的，而且它是通往匈牙利的門戶。<sup>98</sup>7月23日，列寧寫信給斯大

林，輕率地談到蘇維埃化要一直進行到意大利半島的目標：「季諾維也夫、布哈林和我還認為，應該立刻在意大利發動革命……匈牙利應該蘇維埃化，或許還有捷克和羅馬尼亞。」斯大林遷就了列寧的意見，第二天從哈爾科夫回答說，「不在意大利鼓動革命」簡直是「犯罪」，「我們需要在帝國主義把它的破馬車一點一點修好……並發起決定性攻勢之前就起錨上路。」斯大林還說波蘭實際上已被「打敗」。<sup>99</sup>

全速前進：7月30日，在北方的斯摩棱斯克—華沙一線，波蘭革命委員會把總部設在一座徵用來的貴族豪宅中，從那裏可以俯瞰比亞韋斯托克城，而城裏的大多數居民恰好都講意第緒語。<sup>100</sup> 這幾個外來的波蘭布爾什維克在此宣佈，他們是社會主義波蘭的「臨時」政府。<sup>101</sup> 當地政府和社區組織被解散。工廠、地主財產和森林被宣佈「國有」。店舖和倉庫（多數為猶太人所有）遭到搶劫。<sup>102</sup> 「為了你們的自由和我們的自由！」波蘭革命委員會的宣言宣佈。<sup>103</sup> 8月1日，圖哈切夫斯基的幾個集團軍突破波蘭人的防線，佔領了極富象徵意義、距離華沙只有120英里\*的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他的突擊式進攻——其目的在於施加軍事和心理壓力——正在把敵人包圍起來，而加伊也在右翼躍進，以殲滅任何撤退的波蘭士兵。加伊的騎兵很快就衝到華沙西北的托倫附近，距離柏林只有150英里†，但是他接到命令，不要越過德國邊界。<sup>104</sup> 與此同時，向前推進的紅軍不得不靠搶掠來補充給養，而且其人員也在逐漸減少。「有些人赤着腳，其他人綁着樹皮裹腿，還有人穿的是某種橡膠製品」，有觀察家在談到紅軍的普通士兵時說。波蘭小鎮的一位堂區神父——他不太支持蘇俄——在談到紅軍入侵者的時候表示：「一看到這群忍饑挨餓、衣衫襤褸的烏合之眾，就不禁心生憐憫。」<sup>105</sup> 此外，固執的圖哈切夫斯基一發覺冒進使得自己的左翼嚴重暴露，就和謝爾蓋·加米涅夫採取補救措施，準備向北急調葉戈羅夫和斯大林的西南方面軍部隊，把它們交給圖哈切夫斯基指揮。<sup>106</sup> 但是，準備把西南方面軍的力量調給西方面軍沒能實現。

---

\* 編註：約193公里。

† 編註：約241公里。

戰場在快速向前發展，這時是否還應該不顧困難繼續猛攻，布爾什維克對此有了分歧。英國政府威脅說要武力干涉或制裁布爾什維克，於是，8月2日，政治局（在斯大林缺席的情況下）討論了與「資產階級波蘭」達成和平協議的可能性。但對於列寧來說，波蘭問題和克里米亞問題差不多，它們是以倫敦為首的世界帝國主義的兩個立腳點。所以，現在作出的決定是，戰鬥會繼續下去，但應該把西南方面軍分成不同的部分，一部分轉歸南方面軍（對付弗蘭格爾），其餘的則併入圖哈切夫斯基的西方面軍（對付皮爾蘇茨基）。然而斯大林和葉戈羅夫不同意。8月3日，列寧給斯大林寫道：「我不十分理解，為甚麼您對劃分戰線不滿意。講講您的理由。」列寧最後堅持要求「儘快消滅弗蘭格爾」。<sup>107</sup> 第二天，列寧徵求斯大林的意見。「坦率地說，我不知道您為甚麼需要我的意見」，斯大林不耐煩地回覆說（8月4日），並表示「波蘭已被削弱，需要喘息的時間」，不能由和談來提供這個喘息的時間。進攻波蘭雖然不是他的主意，可現在正在進行。<sup>108</sup> 8月5日，中央委員會召開全會，再一次支持政治局的決定，繼續展開軍事行動；謝爾蓋·加米涅夫傳達了命令。<sup>109</sup>

362

但是，斯大林手下準備北調的主力部隊、此時已傷痕累累的布瓊尼第一騎兵集團軍被包圍在遠離華沙的利沃夫/利維夫。他們在8月6日突出重圍，但據說是「精疲力竭，無法移動」，想要休整幾天以恢復元氣。此外，布瓊尼想再次包圍並佔領利沃夫/利維夫。<sup>110</sup> 而且葉戈羅夫和斯大林——他們該去同弗蘭格爾作戰——實在不想把他們的寶貝騎兵讓給圖哈切夫斯基。<sup>111</sup> 8月7日，列寧打電報給斯大林，說有關繼續對波蘭展開軍事行動一事，「您對弗蘭格爾的勝利將有助於消除中央內部的猶豫，」但他又說，「許多事情還取決於華沙及其命運」。<sup>112</sup> 8月10日，圖哈切夫斯基的部隊逼近華沙郊區。<sup>113</sup> 把布瓊尼派去同圖哈切夫斯基會合似乎沒有必要。第二天，列寧再次打電報給斯大林：「我們已經獲得巨大的勝利，如果再擊潰弗蘭格爾，就會得到全勝……請你們

\* 譯註：《列寧全集》第49卷，第482頁。

† 譯註：《列寧全集》第49卷，第486頁。

也盡一切努力，無論如何在這次突擊中全部收復克里木。現在一切都決定於此。」<sup>114</sup> 8月11日和12日，加米涅夫再次下令，要求西南方面軍的部隊把作戰方向從利沃夫/利維夫改為盧布林。<sup>115</sup> 斯大林公然抗命，沒有理睬謝爾蓋·加米涅夫(關於盧布林)的命令和列寧(關於弗蘭格爾)的指示。<sup>116</sup>

斯大林當時在想甚麼？托洛茨基後來推測說，由於圖哈切夫斯基即將拿下華沙，那斯大林至少想要得到利沃夫/利維夫，所以，他「是打他自己的戰爭」。<sup>117</sup> 可是，不管斯大林如何好面子，那時不拿下利沃夫/利維夫似乎是愚蠢的。蘇俄的報道把西方面軍向華沙的輝煌進軍說成是獨自進行的，給西南方面軍的調令幾乎沒有意義，布瓊尼等人能不能及時趕到華沙附近，沒甚麼區別(紅軍方面此時預計會在8月16日左右佔領波蘭首都)。<sup>118</sup> 再說，為了獲得革命的跳板，列寧當初是同意斯大林去佔領利沃夫/利維夫的。不過，謝爾蓋·加米涅夫在8月13日那天再次下達調動部隊的命令。<sup>119</sup> 斯大林和葉戈羅夫回覆說，他們的部隊已準備就緒，要攻打利沃夫/利維夫，「不可能」改變作戰任務。<sup>120</sup> 8月14日，為了當面澄清此次爭端，斯大林被召到莫斯科。(最終在8月20日那天，布瓊尼很不情願地放棄了圍攻利沃夫/利維夫——這是一個戰略失誤，結果僅僅是今天被調往一個方向，明天又被調往另一個方向。)<sup>121</sup>

363 但最令人感到好奇的一點是，圖哈切夫斯基接到命令，不要直接進攻華沙，而是兜了一個圈子，到華沙的西北方向。其中部分原因是為了切斷協約國從但澤和波蘭走廊給波蘭人的補給，但主要還是為了把這些地方交給德國。從政治上來說，德國在憎惡共產主義和為對付波蘭而尋求國際援助之間搖擺不定。一名波蘭官員評論說，德國政府「不可能將其以消滅波蘭為目標的對外政策，與在很大程度上由對斯巴達克同盟起義的恐懼主導的國內政策調和起來」。<sup>122</sup> 事實上，德國政府一心想重新劃定邊界，但只能依靠和平手段，而在所有可以借用的力量當中，偏偏紅軍打算自願恢復1914年的德國邊界——為的是給凡爾賽秩序致

• 譯註：《列寧全集》第49卷，第494頁。

命一擊。前線的紅軍指揮官甚至告訴德國觀察員，他們準備同德國一起向法國進軍。<sup>123</sup>

列寧在想甚麼？1920年7月19日至8月7日，在有關波蘭軍事行動的關鍵決策期間，列寧一直在歡欣鼓舞地忙於共產國際的第二次代表大會；出席大會的代表有二百多人，遠遠多出之前1919年3月成立大會上的那一點人。<sup>124</sup> 到達彼得格勒的時候——那是社會主義首次取得突破的地方——他們在斯莫爾尼的「大廳」中受到盛情款待，並和工人一起參加了遊行，然後在從前的股票交易所看了一場古裝戲，表演者有幾千人，戲名叫《兩個世界的壯麗景象》。列寧在大會的開幕講話中預言說，凡爾賽條約會遭遇與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條約相同的命運。<sup>125</sup> 當代表們來到莫斯科繼續開會的時候，據說布爾什維克當局召集了那個紅色首都的25萬名工人去歡迎他們（參加歡迎儀式的工人是有報酬的，然後還可以到食堂參加小型宴會）。<sup>126</sup> 大會在從前的弗拉基米爾大廳繼續進行，那是這座中世紀的克里姆林宮的覲見大廳。（代表們住在傑洛沃伊德沃爾〔Delovoi Dvor〕，那裏以前是莫斯科的商務大飯店。）列寧的《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寫於1920年4月，6月用俄文發表，7月用德文、英文和法文發表；代表們人手一冊，非布爾什維克的社會主義者幾乎都成了它的批評對象。更直接的是，大會會議是在一幅超大的波蘭地圖下召開的。一有消息傳來，紅軍的進展情況就會標到這幅地圖上去。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列寧在7月23日的電報中對斯大林興奮地談到，要打過波蘭去，還說「共產國際的形勢非常好」。<sup>127</sup>

364

在共產國際代表大會之前，剛剛舉行過一些大規模的示威活動，反對在朝鮮和中國的殖民主義，同時，雖然除了俄國，代表人數最多的是德國、意大利和法國，但和共產國際第一次代表大會相比——那時它的亞洲代表還不多，只有中國和朝鮮的少數流亡者——第二次代表大會的亞洲代表至少有30人。列寧強調說，「現在全世界已經劃分為兩部分，一部分是為數眾多的被壓迫民族，另一部分是少數幾個擁有巨量財富和強大軍事實力的壓迫民族」，\*而蘇維埃俄國正在領導着這場鬥爭。在共

\* 譯註：《列寧全集》第39卷，第229頁。

產國際代表大會上他沒有明說的是，從1917年起就已經是他盟友的德國，應該幫助粉碎世界帝國主義和凡爾賽秩序。

圖哈切夫斯基之所以輕兵冒進，要為德國收復但澤和波蘭走廊，原因就在這裏。在列寧的鼓動下，圖哈切夫斯基在華沙北面的部隊孤軍深入，沒有後備力量，而且左翼完全暴露（左翼離華沙最近）。他只能假設或者說寄希望於正在撤退的皮爾蘇茨基不會重新集結力量。皮爾蘇茨基把所有的波蘭軍隊都撤到華沙的各個出入口，雖然讓圖哈切夫斯基的冒進變得更加容易，但也爭取到時間。不過，這位波蘭元帥後來聲名掃地：他在1914年前導致自己的政黨陷入分裂，他在世界大戰中的軍團遭到拘押，他對烏克蘭的入侵造成了對波蘭的入侵。協約國當時已經像列寧和圖哈切夫斯基一樣，把他當作政治和軍事上的廢物扔掉了。但就在布爾什維克以為華沙會被拿下的那天早晨（8月16日），皮爾蘇茨基發動了反攻：五個師在圖哈切夫斯基的左翼撕開了一個近100英里\*的口子，不到24小時就推進了40英里†，而且沒有遇到紅軍。皮爾蘇茨基開始懷疑這是圈套，於是乘車視察前線，想要找到敵人。到了晚上，波蘭人已經深入到圖哈切夫斯基的後方，繳獲了幾門準備運往前線攻打華沙的蘇俄重炮。

365 驚天霹靂！到8月17日，《真理報》上一篇沒有注意到事態發展的報道還在說：「波蘭白軍在工農武裝的連續打擊下正在向後逃跑。」同一天，從哈爾科夫被召回到莫斯科的斯大林，請求解除自己所有的軍事職務。在明斯克司令部的圖哈切夫斯基到晚些時候才弄明白，波蘭人突破了他的左翼，於是他下令撤退。「多年來他提到那天時總是說一下子老了十歲」，一位同時代的人說道。<sup>128</sup> 謝爾蓋·加米涅夫到8月18日半夜之後才打電話給明斯克，問波蘭人的反攻為甚麼會來得如此突然，這說明他自己對於情況很不瞭解。<sup>129</sup> 8月19日，列寧絕望地懇求拉狄克——他剛被增補進準備在華沙就職的「政府」：波蘭革命委員會——「既然您到捷爾任斯基那裏去，那就請您堅持更迅速、更有力地無情鎮

---

\* 編註：約161公里。

† 編註：約64公里。

壓地主和富農，而且要利用地主的土地和森林實際幫助農民。」<sup>130</sup>可在第二天，列寧通知在倫敦的列夫·加米涅夫，「我們未必能很快攻下華沙」。<sup>131</sup>《真理報》（8月21日）嘆息道：「就在一週前，來自波蘭前線的報道還讓人充滿希望。」加米涅夫回電：「像往常一樣，刺刀政策『由於未曾料到的情況』而失靈了。」這是不加掩飾地責備列寧。<sup>132</sup>

皮爾蘇茨基取得了一場大勝——「維斯瓦河畔的奇蹟」。在隨後的潰退中，圖哈切夫斯基失去了他五個集團軍中的三個，其中一個被殲，兩個逃跑；另有兩個集團軍損失嚴重。<sup>133</sup>這是一次驚人的失敗，而這樣的失敗常常會導致軍事生涯的終結。加伊帶着他著名的騎兵逃到德國的東普魯士，他們在那裏被解除武裝並逮捕。<sup>134</sup>受到指責是難免的。因為在最後攻擊華沙時紅軍的總兵力是13.7萬人，在克里米亞和利沃夫/利維夫的軍事行動中的紅軍加起來共有14.8萬人，這些部隊被認為是決定性的缺失因素。結果葉戈羅夫和斯大林沒有調動它們。<sup>135</sup>儘管要及時調動布瓊尼的騎兵決不是項簡單的任務。1920年9月1日，政治局接受了斯大林辭去軍事職務的請求。<sup>136</sup>把他的抗命當作替罪羊是一條現成的路。皮爾蘇茨基的軍隊還在向東進軍。

## 東方各民族

在南高加索（俄語稱外高加索），在奧斯曼帝國和俄羅斯帝國同時解體後（就亞美尼亞而言，是在與奧斯曼人的軍事衝突後），亞美尼亞東部、阿塞拜疆北部以及格魯吉亞都成了獨立的國家。但是在1920年4月27日，布爾什維克紅軍未經戰鬥就佔領了巴庫，那是木沙瓦特黨人或阿塞拜疆民族主義政府的首都，它的旗幟上有代表突厥文明的藍色、代表伊斯蘭的綠色和代表歐洲社會主義的紅色。當亞美尼亞人同阿塞拜疆人在名為卡拉巴赫的有爭議的山區發生集體衝突，阿塞拜疆人決定把他們總共3萬士兵中的2萬人派去的時候，格魯吉亞的布爾什維克

366

<sup>0</sup> 譯註：《列寧全集》第49卷，第510頁。

<sup>1</sup> 譯註：《列寧全集》第49卷，第516頁。



格里戈里·「謝爾戈」·奧爾忠尼啟則（總政治委員），以及無獨有偶，正是圖哈切夫斯基（軍事指揮官）就找到了發動進攻的機會。<sup>137</sup> 另外，巴庫有一個穆斯林居住區的獨有特點，即那裏的產業工人相當多，其中有些人是布爾什維克黨，因此歡迎紅軍的到來。實際上，就像斯大林和托洛茨基曾經達成過的共識，巴庫是一個跳板。1920年5月18日拂曉，為了得到之前由白軍領導人鄧尼金控制而現在屬於伊朗境內英國佔領軍的俄國艦船和彈藥，一支由大約13艘炮艇組成的蘇俄海軍部隊入侵伊朗，炮艇上的人兼有蘇俄水兵、蘇維埃阿塞拜疆的步兵和騎兵，以及巴庫伊朗族的碼頭工人。<sup>138</sup>

指揮登陸的是費奧多爾·拉斯科爾尼科夫和奧爾忠尼啟則。他們的理由是，英國人可能會把那些艦船重新裝備好，再投入到對紅軍的行動中。但現在，英國軍隊交出了所有的東西，並撤向內陸的德黑蘭。「英國的殖民政策遇到安扎利工人國家的真正的軍隊，結果失敗了」，嫁給了拉斯科爾尼科夫的蘇俄記者拉里莎·賴斯納（Larissa Reisner）寫道。<sup>139</sup> 5月24日，米爾扎·庫丘克汗（生於1880年）——長期活動於伊朗北部吉蘭森林的反殖民主義的立憲運動領袖，既反對俄國的也反對英國的干涉——經過勸說，決定利用紅軍入侵的機會和布爾什維克反對帝國主義的主張，宣佈自己為吉蘭省波斯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首腦。<sup>140</sup> 入侵部隊中隨行的外交事務官員列夫·加拉罕（Lev Karakhan）打電報給莫斯科說，「勞苦人民和資產階級民主派應當以波斯自由的名義聯合起來，要把他們鼓動起來反對英國人，並把英國人趕出波斯」。不過，他告誡說由於那裏欠發達，先不要完全蘇維埃化。<sup>141</sup> 但外交人民委員格奧爾吉·契切林向列寧表達了他的不滿，認為此事是「斯大林的吉蘭共和國」而不予考慮。<sup>142</sup>

367 庫丘克汗的聯合政府——極左派和立憲派、無政府主義分子和庫爾德首領、反帝國主義者和俄羅斯人——是不穩定的，而且他不肯承擔列寧那種專制君主的角色；實際上，他在1920年7月離開該省首府（雷什特）回到森林，讓蘇俄特工人員和伊朗共產黨接管了政權。<sup>143</sup> 在伊朗的布爾什維克考慮將他們由庫爾德人、亞美尼亞人、伊朗森林游擊隊員以及邊境兩側的阿塞拜疆人組成的1,500人雜牌游擊部隊與紅軍

增援部隊結合，向德黑蘭進軍。由於伊朗人的反對，計劃未能通過。但是，為在伊朗北部的成功而興奮不已的奧爾忠尼啟則，從1920年7月底開始，幫助發起並籌劃了為期一週的東方各民族代表大會。大會在巴庫召開，那裏現在成了莫斯科在裏海的陳列櫃，用於向穆斯林發出呼籲。<sup>144</sup>

東方各民族代表大會是在共產國際領導下召開的到當時為止最大的一次會議。大會從1920年9月1日開始，即布爾什維克在西部的戰爭中慘敗於波蘭後不久。共產國際此次大會針對的是土耳其、亞美尼亞和波斯「被奴役的人民群眾」，同時，就好像是收到信號一樣，1920年8月20日，協約國強加給戰敗的奧斯曼帝國的塞夫爾條約，宣佈了英國人和法國人在近東問題上的強制命令：確認協約國在奧斯曼境內的石油和商業特許權，德國人在那裏的產業由協約國接管，從宣佈託管和保護關係開始，瓜分奧斯曼的領土——這是協約國的秘密的戰爭目標之一。在此期間，近1,900名代表在巴庫會聚一堂，其中有60人是女性。人數最多的是講突厥語和波斯語的代表，接下來是亞美尼亞人和俄羅斯人，然後是格魯吉亞人。印度代表團（有15人出席大會）和中國代表團（8人）也來了。有相當多的大會代表，或許是多數大會代表，都不是共產黨人，而是激進的民族主義分子。<sup>145</sup> 大會宣言要求，「把全人類從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奴役的枷鎖中解放出來」。<sup>146</sup> 俄語講話隨即被翻譯成阿塞拜疆的突厥語和波斯語。卡爾·拉狄克、匈牙利流亡者庫恩·貝拉和美國人約翰·里德作了發言，但主要的演講者是共產國際的主席季諾維也夫。「兄弟們，」他大聲說道，「我們號召你們進行聖戰，首先是反對英帝國主義！」（紛紛鼓掌，長時間地高呼「烏拉」。大會成員站了起來，揮舞他們的武器。發言者有段時間無法繼續講下去。所有代表都起立鼓掌。人們高喊「我們發誓」。）<sup>147</sup>

在殖民地問題上，共產國際的政策實際上是有分歧的。列寧認為，由於殖民地無產階級的規模有限，那裏的共產黨需要同資產階級民族主義分子聯合起來，把殖民地人民從帝國主義列強手中解放出來。但其他人，比如來自孟加拉的馬納本德拉·納特·羅易（Manabendra Nath Roy）堅持認為，殖民地的共產黨人應該準備自己奪取政權。有些

代表認為，第一種戰略並不排除在適當的時候向後者轉變。<sup>148</sup>但羅易對巴庫代表大會不屑一顧，拒絕出席，說那是「季諾維也夫的把戲」。<sup>149</sup>

斯大林沒有出席巴庫大會，因為波蘭戰爭還在繼續，但他憑藉民族事務人民委員的身份，在布爾什維克高層當中是同蘇維埃俄國少數民族共產黨人接觸最多的。<sup>150</sup>這倒不是說，他喜歡和那些有着無窮無盡怨言和要求的各族代表爭吵個沒完沒了。他的副手斯坦尼斯拉夫·佩斯特科夫斯基在談到這位人民委員時回憶說，斯大林會玩失蹤，而且做得很巧妙，說了句「就一小會兒」，人就不見了：「躲在斯莫爾尼——後來是克里姆林宮的某個隱秘的地方。要找到他是不可能的。一開始我們常常等他。但到最後我們就休會了。」<sup>151</sup>後來在內戰期間，斯大林幾乎總是在前線。<sup>152</sup>即便是真的出現在部裏的時候，他往往也會破壞工作人員為了將制定政策的過程變得規範而付出的努力（他在決策中的獨斷專行激起了他們的不滿並向中央委員會反映）。<sup>153</sup>對於阿塞拜疆、白俄羅斯或烏克蘭這些地方，民族事務人民委員部是沒有管轄權的，所有這些地方即便是在重新蘇維埃化的時候，從形式上來說，都是獨立於蘇維埃俄國的。民族事務人民委員部的權限也不包括蘇維埃俄國的大多數人口（俄羅斯人）；相反，它只涉及俄羅斯社會主義聯邦蘇維埃共和國中22%的少數民族人口。但是在上述問題上，斯大林培養了一幫穆斯林激進分子。他們被戲稱為「蘇維埃伊斯蘭教教法的信徒」，尤其是巴什基爾人艾哈邁德—扎基·瓦利季（生於1890年）和韃靼人米爾賽義德·蘇丹—加利耶夫（生於1892年）。

生活在裏海以北的韃靼人和巴什基爾人——他們是世界上最北面的穆斯林——都是講突厥語的民族，但韃靼人不遷徙、數量遠比巴什基爾人多，巴什基爾人則仍然過着半遊牧的生活。他們彼此雜居。韃靼人蘇丹—加利耶夫出生在（巴什基里亞的）烏法附近的一個村莊，父親是圖書館（*maktaba*）的教師，他在父親的小學學習時採用的是以穆斯林現代化改革家自詡的伊斯梅爾·加斯普林斯基（Ismail Gasprinski）的「新方法」。除了韃靼語和阿拉伯語，蘇丹—加利耶夫的父親還教他俄語，這讓他進了喀山師範學校。很多韃靼精英，包括很多韃靼布爾什維克，都是從那所學校出來的。<sup>154</sup>1917年，針對其他穆斯林指責他與布爾什

維克合作的背叛行為，蘇丹—加利耶夫解釋說：「他們還對壓迫印度、埃及、阿富汗、波斯和阿拉伯的英帝國主義宣戰。他們還奮起反抗奴役摩洛哥、阿爾及爾等非洲阿拉伯國家的法帝國主義。我怎麼就不能支持他們呢？」<sup>155</sup> 在遭到白軍進攻時，蘇丹—加利耶夫幫助組織喀山的防禦，儘管他在俄國國內公然主張鞭韃帝國主義，並鼓吹泛圖蘭主義——他的野心從喀山延伸到伊朗和阿富汗、土耳其和阿拉伯，斯大林仍然讓他成了俄國最引人注目的穆斯林共產黨人，任命他為東部各民族共產黨組織中央局負責人。在非正式的場合下，他被稱為穆斯林共產黨主席，儘管根本不存在那樣的實體。至於突厥語言文學專家、巴什基爾人瓦利季，他不是共產黨人，而是溫和派的社會主義者和巴什基爾愛國者，他通過不同的方式得到了斯大林的庇護：在內戰中與高爾察克鬥爭的艱苦歲月，瓦利季主動提出，不再帶領自己的6,500名巴什基爾士兵和白軍一起對抗紅軍，而是相反，調轉槍口攻打海軍上將。針對和瓦利季在莫斯科的談判，斯大林在《真理報》上發表了一篇帶有拉攏性質的文章，〈我們在東部的任務〉（1919年3月2日），強調說蘇維埃俄國有3,000萬講突厥語和波斯語的居民，「民族成分非常複雜，文化落後，他們不是還沒有脫離中世紀，就是不久以前才進入資本主義發展的階段……文化不發達和生活落後的現象不是一下子就能消除的，這些現象在東部蘇維埃政權的建設中仍然（將來還會）發生影響」。<sup>\*</sup> 這是一個有待解決的難題。<sup>156</sup>

在斯大林和巴什基爾人談判期間，剛好先後召開了共產國際第一次代表大會和黨的第八次代表大會。在莫斯科，瓦利季發現，和他碰到的持反民族主義強硬立場的盧森堡主義者相比，「列寧和斯大林看起來真的非常積極」。瓦利季還見到了托洛茨基，注意到斯大林和托洛茨基彼此厭惡（並搶着討好他）。他還發現斯大林精於挑唆。瓦利季後來回憶了之後不久在烏克蘭的時候，斯大林如何邀請他去自己在內戰中乘坐的沙皇時代傳下的專列。「我們喝了格魯吉亞葡萄酒，吃了烤雞，」瓦利

<sup>\*</sup> 譯註：《斯大林全集》第4卷，第210-211頁。

季寫道，「斯大林很親切。他的話說到了我的心坎裏。他說他是一個東方人，他是專門為我們東方人，即被蹂躪的小民族的代表工作的。我們所有的不幸都是托洛茨基造成的——他把托洛茨基叫做猶太國際主義者。他〔斯大林〕十分理解我們，因為他是一位格魯吉亞作家的兒子<sup>157</sup>，本人就是在民族的背景下長大的。他指責俄羅斯人的沙文主義並詛咒他們。他像列寧一樣，說我應該在全俄層面工作，不要太多參與到一個小民族的管理：所有民族都會逐漸獲得權利。」<sup>158</sup> 這種亞洲人的姿態是斯大林不太為人所知的一面。<sup>158</sup>

瓦利季在白軍按計劃發動春季攻勢前夕背叛了高爾察克，所得到的獎賞是成立巴什基爾蘇維埃社會主義自治共和國，並於1919年3月20日，即黨的第八次代表大會召開後的第三天簽訂了協議（列寧匆匆簽訂協議，為的是向大會展示成果）。過去是白衛分子的巴什基爾軍隊的指揮官們，一下子有了合法的身份，成立了巴什基爾革命委員會——對於這樣大的轉變，雙方誰也不相信。<sup>159</sup>（瓦利季後來承認，他是瞞着下屬同蘇俄當局談判的。）<sup>160</sup> 帝俄統治時期，巴什基爾人從來不是農奴，而且能夠保有自己的軍隊。他們約有200萬人口，遍佈烏拉爾山脈西南面的山坡上。巴什基爾自治共和國的地圖是瓦利季繪製的，他不僅把領土放到最大限度，還把巴什基爾族的人口估計到最大，以便盡可能少地包括俄羅斯移民。結果就有了小巴什基里亞。<sup>161</sup> 但韃靼民族主義分子仍然非常憤怒：他們的夢想，也就是以巴什基里亞為中心的大韃靼里亞，受到了致命的打擊。<sup>162</sup>

斯大林在1919年成立巴什基爾共和國，就像早先韃靼—巴什基爾失敗的婚姻一樣，並不是深思熟慮之後形成的戰略，想要在民族問題上分而治之；相反，它是臨時想出來的，目的是分化反布爾什維克的力量。<sup>163</sup> 然而，實際上災難卻接踵而至。一大群俄羅斯以及其他非巴什基爾族的共產黨人進入該地區，他們直接或間接地破壞了自治：他們是在為建立共產主義世界而戰，不是為了某個小民族的「權利」。同時，

<sup>157</sup> 編註：原文如此（斯大林是鞋匠的兒子）。

當地的紅軍軍官把協議理解為投降，於是就開始解除巴什基爾士兵的武裝並把他們關押起來，結果引起了反抗。此外，大批紅軍騎兵開始了大規模的搶劫、殺人和強姦。他們的最高指揮官——不是別人，正是加伊——試圖約束這種違紀行為，但收效甚微（後來他受到指責說，作為一個亞美尼亞人，他可能是故意縱容反穆斯林行為）。<sup>164</sup> 瓦利季請求讓巴什基爾人的部隊保持完整，這遭到了加伊的拒絕，可到頭來，巴什基爾第一騎兵團設法自行恢復了建制——不過是在高爾察克那邊。瓦利季絕望地打電報給斯大林，告訴他那些誤會和暴行。（遠在莫斯科的斯大林邀請他商量對策。）<sup>165</sup> 只是由於白軍的推進才阻止了紅軍的暴行，但是在白軍被再次趕走之後，紅軍開始向巴什基爾人「復仇」。流血事件和相互指責引起了全國的爭論，促使政治局於1920年4月任命了由斯大林負責的巴什基爾委員會。瓦利季被召到莫斯科，並被告知那裏需要他的幫助。實際上，這顯然是為了把瓦利季和他在巴什基爾的根據地隔離開來。斯大林告訴他，是托洛茨基決定把他扣在莫斯科，瓦利季在東部省份不斷提高的威望讓托洛茨基和捷爾任斯基感到不放心。<sup>166</sup> 瓦利季會見了巴什基爾「委員會」。加米涅夫告訴他，他們正在擴大巴什基里亞的範圍，把烏法等地也包括進去，而那些地區恰恰是俄羅斯人佔多數。<sup>167</sup> 1920年5月19日頒佈了有關巴什基爾自治嚴格的限制條件：巴什基爾軍隊的補給、財政以及其他很多方面，都直接隸屬於俄羅斯社會主義聯邦蘇維埃共和國。<sup>168</sup> 政治局不得不宣佈，巴什基爾自治共和國「不是一個偶然的、臨時的現象……而是俄羅斯社會主義聯邦蘇維埃共和國的一個有機的、自治的部分」——這說明各方面的人都在懷疑。<sup>169</sup>

巴什基爾的有限「自治」成了一種模式。1920至1923年，俄羅斯社會主義聯邦蘇維埃共和國在其領土上成立了17個民族自治共和國和省。<sup>170</sup> 接下來是韃靼里亞。即便（暫時）沒有巴什基里亞，蘇丹—加利耶夫也會再試一次，讓列寧接受一個泛突厥國家——韃靼里亞，與突厥斯坦和哈薩克草原連成一片並由韃靼人領導，有點兒類似於皮爾蘇茨基想像中由波蘭人領導的包括白俄羅斯和立陶宛在內的聯邦。但事與願違，1920年5月27日宣佈成立了一個小的韃靼蘇維埃社會主義自治共和國，只包括俄國境內420萬韃靼人中的150萬（不但把國內四分之

三的韃靼人排除在外，還讓韃靼人在巴什基里亞佔了多數)。<sup>171</sup>另外，斯大林讓薩希卜·加列伊·賽義德—加利耶夫(生於1894年)而不是蘇丹—加利耶夫做了韃靼政府的首腦，前者在韃靼里亞之外的穆斯林中威望要小得多，民族主義傾向也少一些，更聽話一些，而且是蘇丹—加利耶夫的死敵。賽義德—加利耶夫很快就指控蘇丹—加利耶夫企圖搞暗殺；蘇丹—加利耶夫回應說，所謂的暗殺是假的，只是為了敗壞他的名聲；莫斯科的調查實際上沒有得出甚麼結論，只是弄清楚了一點：賽義德—加利耶夫把大量的時間浪費在喝茶鬥嘴上。<sup>172</sup>蘇丹—加利耶夫及其擁護者仍然決心利用他們掌握的一切手段，把喀山變成東部的穆斯林首府。<sup>173</sup>相反，瓦利季及其擁護者密謀放棄他們的官職，武裝反抗蘇維埃政權。1920年6月，他們隱秘地消失了，在突厥斯坦加入「巴斯馬赤」(Basmachi，這個詞可能源自突厥語 *basmacı*，指邊疆地區的土匪、強盜，類似於哥薩克；講俄語的人通常用它來指從事游擊戰爭或其他反布爾什維克政權抵抗活動的穆斯林。)在巴什基爾蘇維埃社會主義自治共和國，憤怒的俄羅斯共產黨人——他們讓反革命分子跑掉了——清洗了剩下的巴什基爾官員，並開始再次實行針對巴什基爾人的恐怖政策。<sup>174</sup>背叛的醜聞是有可能損害斯大林的政治生涯的，因為不管怎麼說，瓦利季被認為是他的門徒。

1920年9月，當東方各民族代表大會在巴庫開幕的時候，到處都找不到米爾賽義德·蘇丹—加利耶夫——他是最初的倡議者之一，而且是受邀講話的。原來是斯大林不讓他出席大會。但瓦利季卻逃過契卡的搜捕，乘火車和其他交通工具從突厥斯坦一路趕到巴庫，參加了東方各民族代表大會，儘管政治警察正在巴庫挨家挨戶地搜捕他。<sup>175</sup>9月12日，瓦利季寫信給列寧、斯大林、托洛茨基和李可夫，譴責蘇俄的少數民族政策和沙皇的殖民做法差不多，並反映說斯大林欺騙了他。他認為格魯吉亞人是「一個玩弄人的虛偽的、戴着面具的專政者」。斯大林企圖把瓦利季騙到莫斯科——據說讓人給他傳話，說他「比蘇丹—加利耶夫更聰明、更有活力」，是「一個非同凡響、強而有力的人，有性格，有意志力，是一個實幹家」，說他已經證明了自己「可以用巴斯馬赤來創建一支軍隊」。瓦利季始終沒有被抓到。<sup>176</sup>

## 中亞方舟

此時在從前沙皇統治下的突厥斯坦，出現了多個企望獲得政權的權力中心。布爾什維克在土庫曼人中間的統治因為受人憎惡而在1918年被迅速推翻，取而代之的是一個反布爾什維克的外裏海政府，它基本屬於無產階級政府，但迫切需要徵糧，結果也引起民變，外裏海「政府」淪為幾個城市中的幽靈一般的存在。在西伯利亞與高爾察克作戰的紅軍部隊將其趕走，突襲並佔領了梅爾夫和阿什哈巴德（1919年7月）、克孜勒阿爾瓦特（1919年10月）以及最後，土庫曼人的首府克拉斯諾沃茨克（1920年2月）。在更遠的內陸地區，另外一個重要的權力中心是塔什干，它被當地以斯拉夫人為主的蘇維埃所控制。這個蘇維埃就像我們看到的，在1918年2月屠殺了穆斯林的浩罕自治政府。塔什干蘇維埃在1919年1月的內部暴動中逃過一劫。暴動是陸軍人民委員發動的，那位陸軍人民委員處死了當地的14名高層共產黨員，然後，據一位英國親歷者說，就「開始喝得醉醺醺的」，結果被滯留在那裏的一支由匈牙利戰俘組成的小分隊幹掉了。<sup>177</sup> 大張旗鼓的紅色恐怖殺害了大約4,000人，這還不包括因為缺糧而餓死的人。恰好在這個時候，1919年2月12日，斯大林指示塔什干蘇維埃：「必須提高各勞動階層的文化水平，對他們進行社會主義教育，發展當地語言的文學，使當地最接近無產階級的人參加蘇維埃組織，吸收他們參加管理邊區的工作。」<sup>178</sup> 外來的紅軍到達了塔什干，指揮官是農民出身的小伙子米哈伊爾·伏龍芝，他的母親是俄羅斯人，父親是摩爾達維亞人。他的父親是個醫護兵，曾經在沙皇統治下的突厥斯坦服役，伏龍芝就是在那裏出生的。伏龍芝沒有受過任何專門的軍事訓練，但是在1919年11月，他開始加強平叛措施，鎮壓巴斯馬赤抵抗運動。<sup>179</sup> 突厥斯坦最後的權力中心是希瓦和布哈拉這兩塊小的「埃米爾領地」(emirate)†，它們在沙俄時期享有特殊的地位，1917年後並不受紅軍的控制。兩塊領地

373

\* 譯註：《斯大林全集》第4卷，第204頁。

† 編註：「埃米爾」是阿拉伯國家的貴族頭銜，意為「掌權者」，突厥歷史上也使用過。



就像是在全副武裝的強盜面前，擺在玻璃下面、沒有保護措施的璀璨珠寶。

布哈拉在中亞穆斯林的內心世界中有着崇高的地位，是伊斯蘭傳統學問的中心，也是蘇菲派長老的中心。布爾什維克內部有些人警告說，武力奪取布哈拉會帶來嚴重的後果。<sup>180</sup>「我認為從軍事上來說，粉碎他們的軍隊不是難事，」1920年春天，即將離任的突厥斯坦委員會外交事務代表格爾什·布羅伊多(Gersh Broido)寫信對列寧說，「但那樣就會造成持久戰的局面，持久戰會證明紅軍不是解放者，而是佔領者，布哈拉的游擊勇士們會成為保衛者……反動派會利用這種局面。」他警告說軍事佔領甚至會把穆斯林和突厥民族廣泛地聯合起來對抗蘇維埃政權。<sup>181</sup>但伏龍芝是不會被嚇住的。首先被佔領的是希瓦，之後在1920年6月，花刺子模人民蘇維埃共和國宣佈成立。然後，1920年7月24日，伏龍芝寫信給列寧解釋說，至於布哈拉，如果等待它從內部發生革命，那要很長時間，所以他強烈敦促「從外部進行革命」。<sup>182</sup>在紅軍最終向華沙推進的同時，攻打布哈拉的準備工作也在進行。從1920年8月30日開始，在一小幫突厥共產黨人策劃「起義」並請求「幫助」之後，紅軍動用了大約15,000名士兵襲擊布哈拉埃米爾領地。布哈拉人的數量——包括非正規軍——至少是紅軍的兩倍，但紅軍擁有更好的武器，包括11架飛機，結果他們轟炸了這座老城裏年代久遠的清真寺和光塔、客店、聖壇和陵墓。9月2日，紅軍奪取了埃米爾雄偉的雅克城堡，接着便是大規模的縱火和搶掠——絲綢長袍、珠寶，甚至石頭。女眷們的命運就難說了。9月4日，伏龍芝下達停止搶劫的命令，並以處決相威脅，但他卻把製作精良的劍和其他戰利品據為己有。最大的一批戰利品據說是從埃米爾的地窖裏發現的，是該王朝幾個世紀積攢下來的，估計含有價值1,500萬盧布的黃金；這批財寶被裝車「轉移」到塔什干。埃米爾本人逃往阿富汗，而他可能已經把自己的部分財寶運走了。<sup>183</sup>他是最後一位仍在世界上某個地方當統治者的12世紀蒙古成吉思汗的直系後裔。

伏龍芝被調往克里米亞。他指揮的軍事行動很快就趕走了弗蘭格爾男爵的白軍，永遠結束了白軍的抵抗，從而為這位紅軍指揮官贏得了非凡的軍事榮耀。但是，給伏龍芝調離突厥斯坦蒙上陰影的是，莫斯

科接到報告說，伏龍芝的部隊對布哈拉進行了可恥的搶劫和無端的破壞。<sup>184</sup>搶劫黃金的消息傳遍了東部，損害了蘇俄人的名聲。<sup>185</sup>契卡駐突厥斯坦全權代表雅科夫·彼得斯，背着伏龍芝寫信給捷爾任斯基和列寧，報告了違反軍紀的行為。在整個歐亞地區，紅軍內部都在爭奪戰利品和胡作非為的特權——警察機關的特工人員與軍隊的軍官，黨務人員與警察，中央全權代表與地區掌權者。揭發材料淹沒了莫斯科；「添麻煩的」人遭到貶黜或者乾脆被槍斃。但這種算舊帳的做法很少達到突厥斯坦的那種程度，而且似乎很少涉及重要的原則。

來自俄國西北端波羅的海沿岸某地區的拉脫維亞人彼得斯（生於1886年），奮起反對來自俄國西南端黑海沿岸某地區的摩爾多瓦人伏龍芝——他（1885年）出生於遙遠的東部，靠近帕米爾高原的比什凱克。彼得斯決不是工於心計的野心家，想要從這條艱難的道路爬上事業的頂峰：他已經到了絕頂，有着契卡創始人的顯赫名聲；他甚至短暫代任過捷爾任斯基的契卡主席職務（在左派社會革命黨人政變期間，當時捷爾任斯基已被扣為人質）。當然，彼得斯不是沒有篡改過事實，比如，他在黨內的自傳材料說，自己是貧農的兒子，而在更早的時候，他曾經對一位美國記者說他的父親擁有大量的土地，而且還有僱工，但所有人都那樣做。（女人總是覺得他是「一個熱情、聰敏、活潑的小伙子，有一頭黑色的鬚髮，鼻子上翹，使他的臉像問號，一雙藍眼睛充滿柔情」。）<sup>186</sup>彼得斯對革命和階級鬥爭中的檢舉揭發沒有絲毫顧忌。1919年在彼得格勒的時候，他處決過從前舊政權的大批要人：通過電話簿確認身份，然後派人上門。但是，作為老派人物，他對腐敗是不會容忍的。在布哈拉遭到洗劫後，他逮捕了紅軍戰地指揮官別洛夫，結果發現他有一麻袋的金、銀和錢。<sup>187</sup>於是，彼得斯讓手下攔住並包圍了伏龍芝的列車。「昨天晚上，」伏龍芝在1920年9月21日怒氣沖沖地給塔什干寫道，「除了我自己和〔格列布·〕博基（Gleb Boki），整個隊伍都受到了搜查，令我在下屬面前蒙羞。」

伏龍芝堅持說，塔什干當局對於被他沒收並裝到列車上的所有布哈拉的貴重物品都有清單，彼得斯也有。莫斯科黨組織書記維亞切斯拉夫·莫洛托夫親自出面，撤銷了彼得斯成立的革命法庭，通過黨的

中央監察委員會悄悄處理掉了這件事情。不過，捷爾任斯基讓他最信任的一位特工人員，「不要聲張，不要驚動任何人，列一個清單，說明布哈拉埃米爾的黃金散落何處，又是如何散落的（落到誰手裏了，有多少）」。<sup>188</sup> 此事結果如何，現在還不清楚。

1920年9月24日，突厥斯坦「蘇維埃社會主義自治共和國」正式宣佈成立。<sup>189</sup> 接着，10月8日成立了布哈拉人民蘇維埃共和國，與花刺子模成了一對。在突厥斯坦的這些事變中，斯大林幾乎沒起甚麼作用，但他採取的行動很快就對中亞的命運產生了決定性影響。與此同時，在他未來個人專政中的大量高級官員，都在征服突厥斯坦的過程中嶄露頭角或在仕途上更進一步。例如，後來在斯大林當權時擔任黨的監察委員會主席的瓦列里安·古比雪夫(Valerian Kuibyshev)，1920年春天和夏天是突厥斯坦委員會的主席，致力於深化布爾什維克的統治和制訂征服埃米爾領地的計劃。同伏龍芝一起服役的博基，後來在斯大林當權時執掌關鍵的密碼部。在突厥斯坦軍隊的總政治部負責信息登記部門的年輕特工人員亞歷山大·波斯克列貝舍夫(Alexander Poskryobyshev)，當時還不為人知，後來成了斯大林的高級助手，在專政體制的核心崗位幹了幾十年。另一位年輕的共產黨特工人員拉扎·卡岡諾維奇，作為高級黨務官員在1920年9月被派往突厥斯坦。<sup>190</sup> 同月，格里戈里·索柯里尼柯夫(又名吉爾希·布里連特)取代伏龍芝成了突厥斯坦方面軍和共產黨突厥斯坦局負責人。在塔什干，索柯里尼柯夫接着就開始了當地的金融改革，取消了毫無價值的地方貨幣，預示着日後斯大林主政時他作為財政人民委員在莫斯科進行的全國性金融改革。在突厥斯坦，索柯里尼柯夫還取消了徵收制，選擇了實物稅——此舉後來在莫斯科被稱為新經濟政策。突厥斯坦是政策實驗室，是布爾什維克事業的方舟。

## 沒有榮耀

輸掉戰爭總會引起政治上的連鎖反應。波蘭戰爭失敗的創傷還在作痛，列寧就在1920年9月22日，在莫斯科召開的黨的第九次代表大會上，對着241名代表(其中116人有表決權)作了關於波蘭戰爭失敗問

題的長篇報告。他斷言，由於紅軍打敗了白軍——那些協約國的幫兇——「與世界帝國主義的戰爭的防禦階段結束了，我們可以而且有義務去利用這種軍事形勢發動進攻性的戰爭」。「用刺刀進行的試探」原本是為了弄清楚在「世界帝國主義整個體系的中心」波蘭，以及在德國，革命的條件是否真的成熟，但是碰巧「準備得很不好」。不過，列寧仍然高興地得出結論，「我們已經破壞了凡爾賽條約，我們一遇到合適的機會就會粉碎它」，因為「雖然我們的首次失敗就是徹徹底底的失敗，我們還是會再三地繼續從防禦政策轉向進攻政策，直到把他們全都永遠地消滅掉」。<sup>191\*</sup> 對列寧的政治報告甚至沒有表決（自掌權以來，這在黨的會議上還是頭一次），而且他甚至沒有費心出席（9月25日的）閉幕會議。<sup>192</sup> 《真理報》對列寧9月22日報告的敘述省略了談到「進攻戰」或試圖「對波蘭進行蘇維埃化」的地方，對於「慘重的」「巨大的」「前所未聞的失敗」提都沒提。<sup>193</sup> 在大會討論中，拉狄克公開責備列寧，而其他人也跟着那樣。維護中央委員會革命主張的責任落在了斯大林肩上。突然，托洛茨基斥責斯大林誤導中央，因為後者報告說，撤退中的波蘭軍隊已經喪失了全部戰鬥力。托洛茨基還斥責斯大林破壞此次戰役，沒有執行調動部隊的命令。接着，列寧也猛批自己這位格魯吉亞門徒。

377

第二天（9月23日），斯大林堅持要求答覆托洛茨基和列寧的指責，向大會透露說他對發動深入波蘭腹地的戰役表示過懷疑。<sup>194</sup> 事實上，向華沙進軍是圖哈切夫斯基和謝爾蓋·加米涅夫指揮的。列寧當然是此次潰敗背後最主要的責任人，但現在他並不支持斯大林，不怪自己把革命形勢估計得過於樂觀，而怪軍事推進操之過急。<sup>195</sup> 實際上，要是圖哈切夫斯基提前三天趕到華沙，那他猛打猛衝的作戰計劃或許就會截住混亂中的波蘭軍隊。<sup>196</sup> 但是，即使佔領了華沙又能怎樣？<sup>197</sup> 圖哈切夫斯基守住華沙的可能性並不比皮爾蘇茨基守住基輔的可能性大。紅軍事先就知道，自己不可能守住所佔領區，所以就沒打算那麼做，但列寧要打仗的理由——激起波蘭工人的起義——是無效的。<sup>198</sup> 紅軍從波蘭方面只收

---

\* 譯註：作者引文的部分內容可見於《列寧全集》第39卷，第277頁。

容了少量的逃兵；就連烏克蘭人和白俄羅斯人參軍的都不多。至於波蘭共產黨，其黨員總數非常少。別說是與大多數農民建立聯盟，哪怕是想得到工人的擁護，它還要和猶太工人組織崩得、社會民主黨以及龐大而獨立的波蘭工會團體展開競爭。<sup>199</sup> 波蘭革命委員會只是在比亞韋斯托克/別洛斯托克地區建立了基層組織，存在了不到一個月。<sup>200</sup> 連在比亞韋斯托克/別洛斯托克的波蘭革命委員會中央負責人也警告說，由於整個民族團結一致，所以不要指望鼓動波蘭工人革命。<sup>201</sup> 列寧忽視了他們的警告。

至少列寧後來在私下裏表現出了悔意。<sup>202</sup> 但圖哈切夫斯基此後多年都不曾後悔。<sup>203</sup> 「資本主義的波蘭同蘇維埃無產階級革命之間的鬥爭正在歐洲的範圍內展開」，他在關於戰爭的演講中聲稱——演講中有一段內容的標題是「來自國外的革命」(*izvne*)。「所有關於波蘭工人階級的民族感情因為我們的進攻而覺醒這種廢話，都只是由我們的失敗造成的……輸出革命是可能的。資本主義歐洲的基礎已經動搖了，要不是我們的戰略失誤和在戰場上的失利，波蘭戰爭就會把1917年的十月革命與西歐的革命連接起來。」<sup>204</sup> 圖哈切夫斯基不點名地指責斯大林。<sup>205</sup> 但是其他人，尤其是沙皇的參謀軍官鮑里斯·沙波什尼科夫(Boris Shaposhnikov)——不久他就成了紅軍的參謀長——明確指責西南方面軍，即葉戈羅夫和斯大林，違背了兩條戰線互相策應的原則。<sup>206</sup>

因此，情況就是：列寧對形勢嚴重誤判；沙皇貴族圖哈切夫斯基推波助瀾，讓蘇維埃俄國犯下大錯，為點燃「來自國外的革命」之火而發動進攻性戰爭，接着又在多年之後聲稱那並不是一個大錯；無產者出身並對這種冒險行為提出過警告的斯大林，因為不服從命令而成了替罪羊。<sup>207</sup>

回到戰場上，蘇俄人交了好運。1920年10月7日，波蘭軍隊重新奪取了皮爾蘇茨基的家鄉維爾諾，但圖哈切夫斯基在後撤時設法在世界大戰的戰壕那一帶穩住了紅軍的陣腳（「進攻華沙後，我們撤到了明斯克」，他後來寫道）。<sup>208</sup> 1920年10月12日，精疲力竭的雙方同意在里加簽訂停戰協議（18日生效），邊界設在寇松線以東125英里\*。同一天，共

---

\* 編註：約201公里。

產國際的負責人季諾維也夫在德國哈雷出席了獨立社會民主黨特別代表大會，目的是分裂他們並將其左翼併入由德國共產黨組成的小黨。在此時的德國國會，獨立社會民主黨代表有103人，社會民主黨是278人，共產黨是2人。季諾維也夫遭到魯道夫·希法亭和列寧在孟什維克中的老對手馬爾托夫的有力反駁，但是在一個裝飾着各種蘇維埃徽章的大廳裏，投票結果符合莫斯科的預期。<sup>209</sup>「我們要繼續前進，徹底消滅貨幣，」季諾維也夫解釋說，「我們要用商品來支付工資。我們要引入不收費的有軌電車。我們有免費的公共學校，免費吃飯（儘管眼下伙食很差），免租金的公寓，免費的照明。我們正在最困難的條件下非常緩慢地實現這一切。我們必須不停地戰鬥，但我們有出路，也就是計劃。」<sup>210</sup>德國當局此前竟然給季諾維也夫發放了簽證，但現在就毫不猶豫地把他驅逐出境了。可到了12月，89萬獨立社會民主黨人中，有30萬人加入德國共產黨，使後者的人數達到35萬。<sup>211</sup>在歐洲的心臟地帶，突然出現了一個人數眾多的共產黨。<sup>212</sup>與此同時，德國社會民主黨受到極大的削弱，後果十分嚴重。

至於羅馬尼亞，當時沒再發生任何直接的武裝衝突，但是在1920年10月28日，在布加勒斯特，協約國承認了大羅馬尼亞對比薩拉比亞的兼併；蘇維埃俄國拒不承認該條約，要求進行全民公投，但這一要求被忽視了。<sup>213</sup>

379

相比於波蘭人，紅軍陣亡和重傷的有2.5萬人；波蘭人陣亡可能有4,500人，受傷的2.2萬人，失蹤1萬人。<sup>214</sup>紅軍另有14.6萬人在波蘭和德國境內被俘；在被波蘭人囚禁期間，他們中有多少人死亡，現在仍眾說紛紜，可能在1.6萬至1.8萬之間（有1,000名戰俘拒絕回國）。蘇俄境內的6萬名波蘭戰俘，約有一半人活着返回了家鄉（有2,000人拒絕回國）。<sup>215</sup>為了自我安慰，列寧聲稱：「我們雖然沒有獲得國際勝利，即對我們來說是唯一可靠的勝利，但是卻給自己爭得了能夠同那些……資本主義列強並存的條件」。<sup>216</sup>當然，像那樣的條件根本就沒有爭得。

---

• 譯註：《列寧全集》第40卷，第23頁。

至於皮爾蘇茨基——在犧牲了那麼人之後，到頭來他又回到了和他入侵烏克蘭之前差不多的情況，他覺得這場有數萬人死亡和傷殘的戰役不值一提，「有點像小孩子的混戰」。<sup>217</sup>

在此期間，紅軍沒有等到春天就從西南方向的波蘭戰線調動了大批部隊去打擊弗蘭格爾。1920年11月7日，即革命三週年那天，米哈伊爾·伏龍芝率領13.5萬人向克里米亞半島發動了聯合進攻。「今天我們可以慶祝我們的勝利了」，在莫斯科大劇院召開的三週年慶祝大會上，列寧說道。<sup>218</sup> 很快，弗蘭格爾就真的下令全部撤向土耳其海峽和君士坦丁堡。11月13至16日，從塞瓦斯托波爾、雅爾塔和克里米亞的其他港口，126艘船搭載着大約15萬士兵、家屬以及其他平民離開了俄國；弗蘭格爾乘「科爾尼洛夫將軍號」離開了。<sup>219</sup> 契卡在那些留下的人中間大顯神威，處死了包括婦女在內的幾千人。<sup>220</sup> 就這樣，在「白色」波蘭想要取代蘇維埃俄國成為東歐大國的野心受挫後不久，俄國國內的白軍被徹底消滅了。斯大林沒有獲得任何榮耀：消滅弗蘭格爾的任務原本是交給他的，但他因為波蘭戰役而辭去了軍事職務。

### 民怨沸騰的冬天(1920–1921)

380 與農民更加疏遠的白軍，無意中給布爾什維克幫了很多忙，可一旦白軍不再是戰場上的威脅，布爾什維克就要直接面對老百姓中憤怒的大多數了。看似矛盾的是，就像有歷史學家說的，「與波蘭簽訂和約以及消滅弗蘭格爾，從共產黨人的觀點來看，在心理上是不利的」。<sup>221</sup> 形勢的發展消除了直接的威脅，同時也暴露出政權好挑事卻又無能的一面。1918年的危機是靠動員內戰克服的，1919至1920年的軍事危機很大程度上是由於白衛運動在政治上的失敗解決的，而1920至1921年秋天和冬天爆發的，是一場在很多方面更加深刻的新的危機：蘇俄的人民不僅饑寒交迫，飽受疾病之苦，還充滿了怨恨。像所有極端的暴力一樣，

---

\* 譯註：《列寧全集》第40卷，第1頁。

戰爭，尤其是內戰，極大改變了個人的選擇與行為，來自和平時期的政治「擁護」的概念並不那麼容易適用。<sup>222</sup> 但是，被剝奪以及某種程度的幻滅，有可能比四年前尼古拉二世統治時的二月革命前夕還要嚴重。

農民遭受各方軍隊的侵擾，因而至少在他們開拔之前，不得不選擇歸順。「白軍來來往往，還有紅軍以及其他許多沒有顏色的軍隊」，就像作家維克托·什克洛夫斯基 (Viktor Shklovsky) 用詩一般的語言總結的那樣。<sup>223</sup> 當然，農民很清楚，白軍想讓以前的老爺回來，同時還不承認民族差別，但農民也痛恨布爾什維主義的徵兵徵糧。在歐亞地區各個地方，早在1918年中期，農民就開始普遍抵制布爾什維克的徵糧運動。<sup>224</sup> 徵糧小分隊開始動用的不但有步槍，還有機關槍，有時還有炸彈。即便如此，農民仍在反擊。「許多村莊現在都充分地武裝起來，結果，徵糧到頭來很少有不死人的」，有報紙報道說。「一隊饑餓的『游擊隊員』攻擊了運糧的火車，」1918年，《真理報》在談到烏法時說道，「他們先是破壞了鐵軌，然後向火車上的衛兵開火。」<sup>225</sup> 顯而易見的選擇是，允許通過市場激勵制度解決糧食供應危機，鼓勵農民繳納固定稅，並保留他們辛苦得到的利潤。但是在布爾什維克當局的眼中，農民要求自由貿易是愚昧無知的表現。<sup>226</sup> 不過，農民在繼續提醒所有人，他們開始了自己的革命。

1920年8月，正當列寧幻想着征服波蘭，進而推翻整個凡爾賽秩序的時候，正當圖哈切夫斯基在華沙北部的曠野損失了自己軍隊的時候，在莫斯科東南350英里\*處的坦波夫，農民叛亂開始了。起初只是少數叛亂者打死了徵糧隊的一些隊員，然後又打退了布爾什維克的幾次報復行動；到1920年秋天，當地的反叛力量擴大到8,000人。他們領頭的名叫亞歷山大·安東諾夫 (生於1889年)，革命前為了給社會革命黨籌集經費，幹過剝奪工作 (他曾經被捕並在西伯利亞做過苦役)；在布爾什維克的暴虐統治下，他重操舊業，搞起了地下恐怖活動。叛亂農民中很多都在沙皇軍隊或紅軍中幹過，後來又擅離職守 (駐守在小城市的部

381

---

\* 編註：約563公里。



隊有可能也做過戰俘，伙食很差)。叛亂者把各村莊結合成一個網絡，稱為「貧苦農民聯盟」。他們打入坦波夫的契卡，用游擊戰術襲擊政權的工作人員和軍事設施。他們有時穿着紅軍制服，以秘密的無記名投票的方式成立了一個作戰司令部，偵察工作幹得很好，而且有一個強大的鼓動部門。坦波夫叛亂者的代表大會正式取消了布爾什維克政權的權威性，號召爭取「真正的社會主義革命的勝利」以及確保農民的土地所有權。<sup>227</sup> 在坦波夫農民的要求中，最有意思的一個方面也許是「不分階級，所有人在政治上一律平等」。<sup>228</sup> 政權只是隱約知道正在發生的事情。最高總司令謝爾蓋·加米涅夫向政府報告說，坦波夫和沃羅涅日、薩拉托夫等省的饑民，正在懇求地方當局從收糧站那弄些穀種。他還報告說，有幾次「人群遭到機槍掃射」。<sup>229</sup> 儘管有加米涅夫表現出的這種理解，但由於受到階級鬥爭成見的影響，莫斯科並不瞭解農村地區所發生的災難的程度，結果政權把農民合理的不滿條件反射般地稱為「富農、土匪和逃兵的暴動」。

全權代表、1917年猛攻冬宮的領導者弗拉基米爾·安東諾夫—奧弗申柯1921年2月趕來整頓當地士氣低落的契卡，加強攻勢，包圍並殲滅農民軍，可單靠鎮壓是無法挽救局勢的。後來證明，當時的收成很差，政治騷亂已迫使糧食人民委員部在13個省份「暫停」糧食收購。<sup>230</sup> 2月9日傳來報告說，在西伯利亞農村也出現了巨大的武裝騷亂風潮，切斷了鐵路聯繫和糧食運輸。<sup>231</sup> 四天後，一個契卡工作組在談到坦波夫時寫道：「目前的農民暴動和以往的區別在於，他們有政治綱領，有組織，有計劃。」<sup>232</sup> 瓦西里·烏爾里希(Vasily Ulrich)是1921年初被派到坦波夫的令人生畏的革命法庭高級官員，他就招人痛恨的徵糧隊的情況向莫斯科報告說：「除了引起更多的敵意和造成更多的叛亂，他們甚麼也得不到。」不過，烏爾里希不是笨蛋。他建議說，表現出忠於蘇維埃政權的農民應該得到獎勵，好讓「那些說蘇維埃政權對農民只索取、不給予的社會革命黨的鼓動人員閉嘴」。<sup>233</sup> 於是，1921年2月，坦波夫省取消了按照固定價格強制交納定額糧食的政策，取而代之的是實物稅，它允許農民保留自己的大部分糧食用來售賣，這是到當時為止在一省範圍內非常重大的讓步。<sup>234</sup>

## 「沒有布爾什維克的蘇維埃」

在農村發生叛亂的同時，城市也出現了大規模的罷工。<sup>235</sup> 當時在商店裏可以買到的消費品只有1913年的五分之一。仍然留在彼得格勒的工人要被迫從事沒有報酬的額外「義務勞動」(povinnost')。接着，當局在1921年2月12日宣佈，因燃料不足，臨時關閉93座工廠，甚至包括著名的普梯洛夫工廠，結果，近3萬名工人面臨失業和完全失去口糧(不管有多麼粗劣)的危險。<sup>236</sup> 當十天後許多工廠重新開工的時候，一些勞動集體突然舉行罷工，公開要求結束共產黨的專政，回到用真正的自由選舉產生蘇維埃的做法。<sup>237</sup> 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集團發表了反布爾什維克宣言；契卡錯誤地指責非布爾什維克社會主義者煽動罷工，好像工人自己就不能反對政權的壓迫政策和無能似的。2月24日，就在幾千人開始出現在街頭時，彼得格勒黨組織領導人格里戈里·季諾維也夫和彼得格勒契卡逮捕了大批非布爾什維克社會主義者(大概有300名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派遣年輕的軍校學員用朝天開槍警告的辦法驅散遊行隊伍，並宣佈戒嚴——就像差不多四年前，在尼古拉二世統治時期，沙皇將軍哈巴洛夫在同一座城市做過的那樣。罷工的工人被鎖在工廠外。同時，該市突然發放額外的口糧，還撤銷了在通往農村的道路上攔截糧食的小分隊。不過，除了流血的傳聞外，戒嚴的消息也傳到了附近的喀琅施塔得要塞，那裏距離彼得格勒20英里，\*在芬蘭灣的一座島上，是波羅的海艦隊司令部所在地。<sup>238</sup>

383

1917年臨時政府執政期間，喀琅施塔得從來不存在「雙重政權」，只有蘇維埃，當時的要塞是一個迷你型的社會主義國家。1921年，島上除了3萬平民之外，還有水兵和紅軍士兵組成的1.8萬人的守備部隊。3月1日，他們中的1.5萬人聚集在喀琅施塔得的錨廣場，並以壓倒優勢通過了一項決議，提出15點內容，明確要求貿易自由以及「對工人、農民、無政府主義者、左翼社會黨派實行言論和出版自由」†——也

\* 編註：約32公里。

† 譯註：《蘇聯歷史檔案選編》第7卷，第34頁。

就是說，不是對資產階級，甚至也不是對右翼社會黨派。水兵們還要求「政權歸蘇維埃，不歸黨」。<sup>239\*</sup> 只有兩位在場的布爾什維克官員反對決議，趕來向水兵講話的全俄蘇維埃主席（國家元首）米哈伊爾·加里寧也被轟下台，並在自己是否可以繼續發言這一問題上失去表決權。一個社會主義政權面臨着自己的武裝力量中堅定的社會主義者的叛亂。

3月1日深夜，水兵們成立了一個臨時革命委員會，負責監督島上的秩序，並準備用自由、公正、有多個候選人的無記名投票，選舉產生喀琅施塔得蘇維埃。第二天在教育之家（以前的工程師學校），斯捷潘·佩特里琴科（Stepan Petrichenko，生於1892年）——「彼得羅巴甫洛夫斯克號」戰列艦上的文書，曾是共產黨員，但在「重新登記」中失去了黨員資格——召開了有202名代表參加的會議，會議主席團成員全部是黨外人員。要塞中的共產黨員趕到黨的總部，要求得到250枚手榴彈，但那天晚上，大部分黨員和契卡特工人員都從冰面撤到陸上，結果，革命委員會沒有流血就上了台。第二天，莫斯科政權發表了由列寧和托洛茨基簽署的聲明，譴責叛亂事件是「白衛軍的陰謀」，是法國情報機關煽動的，通過的是「極端反動的社會黨決議」。<sup>240†</sup> 有些契卡特工人員準確地報告了水兵們的要求：「出版自由，取消阻擊隊，實行貿易自由，通過全面而秘密的投票改選蘇維埃。」<sup>241‡</sup> 但布爾什維克的政治警察把水兵們留在彼得格勒的妻子和孩子抓起來作為人質，封鎖該島，切斷所有通訊聯繫，並從飛機上散發傳單：「你們被全面包圍了……喀琅施塔得沒有任何糧食，沒有任何燃料。」「你們聽到的是謊言，比如說彼得格勒如何支持你們……」<sup>242</sup> 與1917年不同，水兵們沒有辦法把暴動的真實情況告訴外界。政權利用新聞壟斷誹謗叛亂者，以保衛革命這一無產階級崇高目標的名義，召集忠實的支持者，鎮壓無產階級水兵和士兵。此外，與1917年不同，當局擁有可靠的鎮壓工具——契卡。

是否繼續進攻，奪取南岸的奧拉寧鮑姆和北岸的謝斯特羅列茨克以

384

\* 譯註：《蘇聯歷史檔案選編》第7卷，第92-93頁。

† 譯註：《蘇聯歷史檔案選編》第7卷，第30頁。

‡ 譯註：《蘇聯歷史檔案選編》第7卷，第48頁。

擴大該島防禦範圍，關於這一問題喀琅施塔得共和國內部爆發了激烈爭論；革命委員會否決了這種計劃。水兵們的行為坦坦蕩蕩，他們實踐着自己信奉的理想，在（1917年喀琅施塔得蘇維埃主席主編的）喀琅施塔得報紙上全文發表了蘇俄的幾乎所有政府公告，並派代表團到彼得格勒談判；布爾什維克當局逮捕了談判人員（他們後來被處決了），發起惡毒的誹謗運動，還下達最後通牒，命令對方投降——就像水兵們指出的，這些做法就跟壓迫性的沙皇政權一樣。<sup>243</sup> 1921年3月5日，政治局把「清算」此次起義的任務秘密交給了圖哈切夫斯基，並將進攻日期定於3月8日，即黨的第十次代表大會開幕那天（大會日期從3月6日延後到10日）。3月5日下午，托洛茨基乘坐裝甲列車來到彼得格勒——僅僅幾個月前他在那裏打敗了尤登尼奇；陪同這位陸軍人民委員的是圖哈切夫斯基和謝爾蓋·加米涅夫。<sup>244</sup> 3月7日夜裏對喀琅施塔得實施炮擊，凌晨5時，多路進攻發動了，紅軍步兵（許多都披着白床單）越過冰封的白色芬蘭灣。但是，越過幾英里冰面發動的猛攻被打退了。「水兵陣地有人守衛，他們開火對炮擊進行了還擊。」圖哈切夫斯基向謝爾蓋·加米涅夫不安地報告說。<sup>245</sup> 托洛茨基打電話問是怎麼回事。<sup>246</sup> 他得到了一個令人震驚的消息：儘管是專門挑選的，但最可靠的紅軍部隊仍然猶豫不前。<sup>247</sup>

同樣是在3月8日早晨，代表着超過70萬共產黨員的近900名代表（其中604人有表決權），齊聚莫斯科參加黨的第十次代表大會，在紅旗下宣佈「無產階級」的勝利。<sup>248</sup> 莫斯科大劇院寬闊的花壇和五層包廂被擠爆了。白軍被趕走了——埋在土裏了，關進監獄了，或者流亡了，但大規模工業自1913年以來下降了82%，煤產量是1913年水平的四分之一，電是三分之一。<sup>249</sup> 與波蘭的作戰暴露出紅軍的經濟基礎薄弱，而要想重建，就要休養生息。<sup>250</sup> 政治方面，非農業勞動力自十月政變以來已經從360萬下降到150萬，其中手藝人超過三分之一，結果在這個工人國家，只剩下95萬產業工人。<sup>251</sup> 與該數字形成強烈對比的是，公務人員可能達到240萬人。除了波羅的海艦隊的水兵，彼得格勒等地的工人也在要求與1917年布爾什維克鼓動人員向他們主張的同樣的綱領——「全部政權歸蘇維埃！」——但現在明確要求，不要布爾什維克黨員參加。農民也以真正的人民政權的名義拿起了武器。世界革命沒能成為

現實；相反，在蘇維埃俄國周邊嘗試的幾次革命都被鎮壓了。更糟糕的是，列寧遭到黨內一些小集團有組織的反對。當然，黨內反對他的力量一直存在：在地下鬥爭年代，馬爾托夫和孟什維克反對列寧關於黨和策略的觀點；1917年，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反對奪權；1918年，布哈林和「左派共產主義者」反對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條約；1919年，「軍事反對派」反對起用沙皇軍官。但現在，一個自封的「工人反對派」——為首的是兩位堅定的布爾什維克，亞歷山大·施略普尼柯夫和亞歷山德拉·柯倫泰——在要求「黨內民主」和維護工人權利的真正的工會。

列寧對工人反對派十分惱火，但不管怎樣，他本人還是給了它充分的機會來表達批評意見。根據中央委員會的決定，從1920年11至12月開始，黨的報刊一直在刊登有關工會問題的激烈的爭論文章。<sup>252</sup> 在黨的會議大廳之外的這種公開爭論很不尋常。實際上，它可能是列寧挑起的，目的是讓托洛茨基到處鼓吹其不得人心的「擰緊螺母」的工作方法，自取其辱。托洛茨基要求工會成為國家的臂膀。列寧似乎同季諾維也夫合謀，先引誘托洛茨基上鉤，然後予以反擊（季諾維也夫看不起托洛茨基）；斯大林也對托洛茨基進行了反擊。<sup>253</sup> 在代表大會上，列寧贏得了政策之戰：工會既沒有被國家化（托洛茨基），也沒有獲得自治（施略普尼柯夫）。但事實上列寧贏得不容易。<sup>254</sup> 「同志們，」他在開幕詞中寫道，「……我們竟幹出了搞黨內辯論和爭論這種奢侈行為。」<sup>255</sup> 這意思是說，要結束這種「奢侈行為」。列寧還怒氣沖沖地對施略普尼柯夫說，應該用步槍來對付他的言論。<sup>256</sup> † 與施略普尼柯夫不同，托洛茨基沒有像支持者強烈建議的那樣，為此次代表大會成立一個正式的派別，但列寧對他的嘩眾取寵沒有好感。「同志們，今天托洛茨基同志同我爭論時特別客氣，他責備我，或者說稱呼我是一個非常謹慎的人，」3月14日，列寧在他的一次比較溫和的發作中對代表們說，「我應當感謝他的這種恭維，但是我沒有辦法用這個來回敬他，這是很遺憾的。」<sup>257</sup> ‡

386

\* 譯註：《列寧全集》第41卷，第2頁。

† 譯註：《列寧全集》第41卷，第42頁。

‡ 譯註：《列寧全集》第41卷，第45頁。

##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之間的關係

可想而知，在黨的第十次代表大會上，斯大林的工作是民族問題。在1919至1920年與鄧尼金等白軍的戰鬥中，紅軍以蘇維埃政權的名義重新征服了烏克蘭，但俄羅斯社會主義聯邦蘇維埃共和國感到責無旁貸，在1920年12月28日與烏克蘭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簽訂了所謂聯盟條約，那是與不同的蘇維埃共和國簽署的許多類似的條約之一。<sup>258</sup>不過，條約的名稱雖然是聯盟，可俄羅斯社會主義聯邦蘇維埃共和國和烏克蘭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並沒有確立總括性的聯盟公民身份或者可以管理各成員國的最高機構，它們雙方在國際關係上繼續各行其是。像蘇維埃俄國一樣，蘇維埃烏克蘭接着也在1921年底之前，同波蘭、奧地利、立陶宛、拉脫維亞、愛沙尼亞簽訂了很多國與國的條約。<sup>259</sup>烏克蘭在布拉格、柏林、華沙、維也納保留了駐外使團，而且往往是和俄羅斯社會主義聯邦蘇維埃共和國的使團在同一棟建築；烏克蘭還在莫斯科設立了代表機構。<sup>260</sup>在黨的代表大會召開前夕，斯大林發表了針對尚未一體化的各蘇維埃共和國之間關係問題的提綱。他認為締結條約的方式已經「沒有後勁」了——實際上才剛剛開始，並要求採取新的方式。「任何一個單獨的蘇維埃都不能認為自己能保證不會在經濟上枯竭，不會在軍事上被世界帝國主義打敗，」他寫道，「因此，各個蘇維埃共和國孤立的存​​在是不穩固不牢靠的，因為資本主義國家威脅着它們的生存……從『本族的』和『異族的』資產階級手中解放出來的各民族蘇維埃共和國，只有聯合成緊密的國家聯盟才能使自己生存下去，才能戰勝帝國主義的聯合力量……」<sup>261</sup>不過，這樣一個一體化的國家，需要俄羅斯以外的共和國，比如說烏克蘭，作出重大讓步。<sup>262</sup>

在3月10日黨的代表大會報告中詳細闡述這些提綱時，斯大林主張按照俄羅斯社會主義聯邦蘇維埃共和國的聯邦模式，建立「蘇維埃共和國聯邦」。他批評了正在成為自己競爭對手的外交人民委員契切林的看法，並稱讚「烏克蘭、阿捷爾拜疆、土爾克斯坦和其他邊疆地區的國

<sup>258</sup> 譯註·《斯大林全集》第5卷，第18-19頁。

387 家制度]\*，但警告說泛伊斯蘭主義和泛突厥主義是一種「傾向」，它植根於過去的民族壓迫——他不認為那是一種有待接受的、帶有前瞻性的綱領。<sup>263</sup> 斯大林的講話似乎沒有產生多大影響。托洛茨基和季諾維也夫沒有出席，而是在彼得格勒忙於鎮壓喀琅施塔得叛亂。這位格魯吉亞人在台上用他特有的口音，輕聲細語地講着——那時還沒有麥克風。在禮貌性的鼓掌之後，斯大林的心腹、主持會議的克利姆·伏羅希洛夫建議休息。「要是不休息，」伏羅希洛夫告誡代表們，「我們這裏就必須嚴厲禁止走來走去、看報紙和其他不耐煩的行為。」

伏羅希洛夫接着又宣佈，鑒於喀琅施塔得的局勢，原定計劃有變，代表們晚上不用開會，可以去莫斯科大劇院。他對他們說：「今天，大劇院會上演《鮑里斯·戈杜諾夫》，只是沒有夏里亞平。」<sup>264</sup> 原本伏羅希洛夫自己可以扮演那個角色，但他很快就要出發前往喀琅施塔得。

顯然是突厥斯坦代表團的40名代表聯名請願，要求人稱薩法羅夫的格奧爾吉·沃爾金（生於1891年）作有關民族問題的聯合報告。格奧爾吉·沃爾金出生於聖彼得堡，身上有一半亞美尼亞血統，一半波蘭血統，喜歡有時戴工裝帽，有時戴英式遮陽帽。他隨伏龍芝一起去了突厥斯坦，並很快擔任黨的突厥斯坦局負責人。現在他作了一個凌亂的聯合報告，承認「在〔東部的〕邊疆地區，我們沒有強大的革命運動」，同時，「在突厥斯坦，共產黨只是在十月革命之後才出現」，所以黨內充斥流氓惡棍。<sup>265</sup> 薩法羅夫要求「糾正」斯大林的提綱。在討論過程中，發言者之一、阿塞拜疆黨組織官員、亞美尼亞人阿納斯塔斯·米高揚（Anastasy “Anastas” Mikoyan）也對斯大林的觀點提出了質疑。他認為「在斯大林同志的提綱裏，對於我們應該怎樣處理邊疆地區的階級問題，怎樣準確認定這些民族的階級結構，甚麼也沒有說」。雖然米高揚等人再三強烈建議，必須考慮當地的條件，可布爾什維克黨人仍在試圖通過意識形態來思考和行動。<sup>266</sup>

\* 譯註：在3月10日的報告中，斯大林說，「在舊制度下，沙皇政權不努力也不可能努力發展烏克蘭、阿捷爾拜疆、土爾克斯坦和其他邊疆地區的國家制度」。參見《斯大林全集》第5卷，第31-32頁。「阿捷爾拜疆」即阿塞拜疆，「土爾克斯坦」即突厥斯坦。

當討論突然中斷的時候，比斯大林年長六歲的烏克蘭共產黨人米科拉·斯克雷普尼克在席位上插話說：「民族問題很重要，也很困難；斯大林同志在他的報告中完全沒有解決這個問題。」<sup>267</sup>但是，受到斯大林講話折磨的斯克雷普尼克沒有發言的機會。薩法羅夫也沒有總結發言的機會。最後講話的是斯大林，他嚴厲批評了林林總總的反對意見。「我接到一張條子，上面說我們共產黨員似乎在人為地培植白俄羅斯民族，」他說道，「這是不對的，因為白俄羅斯民族存在着，它有着和俄羅斯語言不同的語言，因此，只有使用白俄羅斯本族的語言，才能提高白俄羅斯人民的文化。大約五年前，關於烏克蘭，關於烏克蘭民族，也有人說過同樣的話……可是很明顯，烏克蘭民族存在着，發展它的文化是共產黨員的義務。違背歷史是不行的。」<sup>268</sup>

388

大會表決決定，採納斯大林的整個提綱作為基礎，成立一個17人的委員會，以便作進一步的行動。他的基本觀點，即「各民族蘇維埃共和國，只有聯合成緊密的國家聯盟才能使自己生存下去，才能戰勝帝國主義的聯合力量」——表明了他將堅決採取的行動。<sup>269</sup>黨的代表大會之後不久，1921年4月11日，斯大林把突厥斯坦蘇維埃社會主義自治共和國併入了俄羅斯社會主義聯邦蘇維埃共和國。

### 「農民的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條約」以及黨的「統一」

在工會和民族問題之後，黨的第十次代表大會轉向了荒蕪的、民怨沸騰的農村中間存在的問題。西伯利亞代表團在到莫斯科去的時候，就像有代表回憶的，曾經「武裝到牙齒」，因為他們要經過的地區，到處都是手持原始武器的叛亂的農民。<sup>270</sup>在列寧的倡議下，3月15日早晨選舉了新的中央委員會之後，大會通過決議，不僅在坦波夫，而且在整個蘇維埃俄國都實行實物稅。實物稅將會低於最近的定額，而且在完稅後，不管農民剩下甚麼糧食，他們都可以按照市場價出售，而這就意味着私

\* 譯註：《斯大林全集》第5卷，第38-39頁。



人貿易的合法化。<sup>271</sup>「我沒有必要來詳細論述為甚麼要作這種修正的問題。」列寧對大會解釋道。他還說：「毫無疑問，在一個小農生產者佔人口大多數的國家裏，實行社會主義革命必須通過一系列的過渡辦法，這些辦法在……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裏，是完全不需要採用的。」<sup>272</sup>

389 非法的私人貿易至少佔到糧食銷售量的70%，但仍有人反對私人貿易合法化。有關定額制相對於稅收及私人貿易的優點，從1918年開始就不時地在爭論，最後幾乎總是以斷言無產階級需要「領導」農民結束（這就意味着要通過徵糧來養活城市）。<sup>273</sup> 1920年2月，為了鼓勵人們增加種植面積，托洛茨基建議實行實物稅，因為這種稅制意味着成功的農民（富農）不會受到懲罰，但他沒有提到要同時實行自由貿易，只是說「商品交換」（*tovarobmen*）和「勞動義務」。他主張國家干預（*dirigiste*）的提綱被否決了。<sup>274</sup> 誠然，由於坦波夫暴動，就連狂熱的左傾分子布哈林也開始認為需要作出讓步。<sup>275</sup> 但對於會場上大多數人來說，列寧的建議是一個沉重的打擊，因為與1920年的托洛茨基不同，他承認，要實行實物稅，就必須把私人貿易合法化。<sup>276</sup>

實行新政策的必要性顯而易見，但人們卻灰心喪氣。「究竟是怎麼回事，共產黨難道可以承認貿易自由，可以實行這種自由嗎？」列寧當着代表們的面自問道，「這裏是否有不可調和的矛盾呢？」他沒有回答，只是說問題「非常困難」。<sup>277</sup>† 但不管在理論上有多麼棘手，列寧依然認為，這個遭到戰爭蹂躪的國家絕對需要喘息的時間。要打破他幫助建立的東西，即打破由於濫用武力所造成的惡性循環——給城市供應的糧食減少，武裝徵糧活動增多，糧食變得更少——他的領導作用至關重要。<sup>278</sup> 在當天（3月15日）晚上的會議中，當受人尊敬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家達維德·梁贊諾夫（David Ryazanov）很貼切地把向實物稅和自由貿易的轉變稱為「農民的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條約」時，列寧獲得了擺脫困境的良機。<sup>279</sup> 當然，與德國簽訂的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條約在黨內遭到普遍反對，但它很快證明列寧是正確的。列寧再次如願以償。

\* 譯註：《列寧全集》第41卷，第50頁。

† 譯註：《列寧全集》第41卷，第54頁。

在與農民簽訂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條約的同時，列寧對於政治批評者毫不妥協。3月16日，即黨的第十次代表大會的最後一天，出了一件意外的事，其影響一點都不比向私人貿易合法化的轉變小：列寧再次作了演說，並在講話中支持「關於黨的統一」的決議。決議要求，擁有各自綱領的集團立即解散，否則就會被開除出黨。（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工人反對派的出現正是允許公開討論工會問題和根據「綱領」選舉大會代表的結果。）換句話說，最主要的派別分子列寧，現在想要終結所有派別（除了他自己的）。「我認為這個問題不需要談很多」，在開始施行實際上使「反對派」處於非法地位的統一決議時，他再次言不由衷地說道。<sup>280</sup> 大會代表們的表決結果是，413票贊成，25票反對，2票棄權。<sup>281</sup> 卡爾·拉狄克以其特有的直率和睿智說道：「如果贊成這項決議，我覺得它很可能會被用來對付我們。」不過，他還是贊成「關於黨的統一」的決議。他說：「要是中央委員會覺得有必要，那就讓它在危急的時候採取最嚴厲的措施對付黨內最優秀的同志吧。」<sup>282</sup>

390

黨的第十次代表大會有着廣泛而重大的意義，這其中包括，它見證了斯大林勢力的擴張。斯大林不會指望像托洛茨基在黨的代表大會上那樣引人關注，但他在全黨面前大膽地抓住了一個最重要的問題——各蘇維埃共和國之間模糊不清的關係——並且準備採取有力手段，讓這些關係朝着更加緊密的方向發展。政治方面，斯大林在工會這個大問題上緊跟列寧，而且總的來說，在組織上勝過了他的競爭對手托洛茨基。在列寧列出新的中央委員會名單時，他沒有讓托洛茨基的支持者獲得提名候選的機會：伊萬·斯米爾諾夫、尼古拉·克列斯廷斯基、列昂尼德·謝列布里亞科夫(Leonid Serebryakov)、葉夫根尼·普列奧布拉任斯基。取代他們的是莫洛托夫、伏羅希洛夫、奧爾忠尼啟則、葉梅利揚·雅羅斯拉夫斯基(Yemelyan Yaroslavsky)、格里戈里·彼得羅夫斯基(Hryhory "Grigory" Petrovsky)——他們都跟列寧很合得來，與斯大林的關係也很近。跟斯大林關係同樣很近的謝爾蓋·基洛夫、

---

\* 譯註：《列寧全集》第41卷，第88頁。

瓦列里安·古比雪夫和弗拉斯·丘巴爾 (Vlas Chubar) 成了候補中央委員。代表大會後，新的中央委員會隨即召開會議，選出了由列寧、斯大林、托洛茨基、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組成的政治局，莫洛托夫現在成了「責任書記」，這是一個有可能起到關鍵作用的崗位。<sup>283</sup> 由於托洛茨基不停地爭論和挑事，列寧正在高層幫助建立一個反托洛茨基的派別，而這個派別將會落到斯大林手裏。政權上層的內部人物在使用「斯大林派」(*stalinisty*) 這個說法時，把它看作了「托洛茨基派」(*trotskyisty*) 的對立面。<sup>284</sup>

### 白衛分子、帝國主義者和社會革命黨人

391 對喀琅施塔得水兵來說，這一切都很遙遠。到黨的代表大會即將落幕的時候，非黨的「喀琅施塔得共和國」已經存在了15天。政權動員並裝備了幾個省的大約1,000名武裝的共產黨員，還從莫斯科派了一趟專列，搭載了由伏羅希洛夫率領的200多名參加黨代表大會的代表，他們是新近由2.4萬人組成的平叛力量的一部分。<sup>285</sup> 此外，這些被動員起來的代表還聽到傳言說，幾百名試圖對要塞發起強攻的軍校學員已經死在冰面上。人們感到擔憂。<sup>286</sup> 3月16日，即「關於黨的統一」的決議獲得通過的那天，圖哈切夫斯基發動了第二次打擊。先是炮擊，接着是步兵的猛攻。經過激烈的巷戰，這座城市於3月18日早晨被政權的武裝力量佔領。幾天前，水兵的領導層曾向芬蘭政府請求政治避難，並很快得到肯定的回覆，允許8,000名參與叛亂的水兵乘船逃走——儘管托洛茨基通過契切林向赫爾辛基發出了警告。<sup>287</sup> 有多少喀琅施塔得人在交戰中喪生，現在仍不清楚。<sup>288</sup> 紅軍陣亡1,200人；代表大會的代表有2人死亡，23人受傷。<sup>289</sup> 芬蘭政府和蘇俄政府一同消除了芬蘭灣冰面上的屍體。處理喀琅施塔得起義的革命特別法庭後來判處2,103人死刑；另有6,459名水兵被關進勞改營。

3月18日，莫斯科的布爾什維克舉行紀念活動，慶祝巴黎公社成立50週年——巴黎公社被鎮壓後，立即處決的大約有3萬人。對於這件頗具諷刺意味的事情，當時有沒有人發表過意見，現在仍不清楚。<sup>290</sup>

幾天後，列寧在政治局會議上與托洛茨基私下交換了便條，提到解散波羅的海艦隊問題。它不但要消耗大量的燃料和糧食，而且在將來還有可能成為政治上的麻煩；托洛茨基堅持認為要有一支海軍。<sup>291</sup>

就在喀琅施塔得開始遭到嚴重破壞的那天（1921年3月16日），經過漫長的談判，蘇維埃俄國與英國簽訂了貿易協議。<sup>292</sup> 蘇俄人已經展示出某種外交實力。1921年2月21日在哥薩克白軍和英國人的幫助下，通過暴動在德黑蘭取得政權的禮薩汗，迅速在波斯宣佈廢除現存的英國與波斯條約，並簽訂蘇俄與波斯友好條約，條約規定英蘇雙方都要撤軍。獨立的阿富汗為防止英國的再次入侵，與蘇維埃俄國簽訂了條約。阿塔圖爾克（Ataturk）\*的土耳其開始與蘇俄人談判，並在三週後簽訂了條約。<sup>293</sup> 所有這三個條約——波斯（2月26日）、阿富汗（2月28日）和土耳其（3月16日）——都在外交上承認了蘇維埃俄國。英國情報機關僱傭了一位有名的沙俄密碼專家，可以破譯莫斯科的密碼，因而當契切林否認蘇俄干涉波斯事務時，英國知道他在撒謊。列寧被截聽到說，「討厭的勞合一喬治在騙人時毫無羞恥。他說的話一句也不要相信……」<sup>294</sup> 儘管如此，到3月中旬，英國內閣仍然認為，「俄國雖然發生了一連串事件」——喀琅施塔得、坦波夫，「但蘇維埃政府的地位是絕對牢固和穩定的」。<sup>295</sup> 莫斯科把初步的貿易協議當作是在政治上得到了這個老牌帝國主義強國的實際承認。英國商品也有助於讓蘇維埃俄國的農民出售他們的糧食（那樣就會有東西可買）。<sup>296</sup>

與英國簽訂了貿易協議之後，3月18日，蘇俄人終於和波蘭在里加簽訂了和約，和約也意味着外交上的承認。<sup>297</sup> 不過，里加條約並沒有化解俄波之間的新仇舊恨，也沒有改變它們在東歐的野心。<sup>298</sup>

世界上現在有八個國家承認了蘇維埃俄國的存在：伊朗、阿富汗、土耳其、波蘭、立陶宛、拉脫維亞、愛沙尼亞和芬蘭。俄羅斯社會主義聯邦蘇維埃共和國也同烏克蘭那樣的其他的社會主義蘇維埃共和國建立了條約關係。不久之後，德國予以外交上的承認，但與此同時，共

\* 編註：即穆斯塔法·凱末爾·阿塔圖爾克（1881-1938），土耳其共和國的締造者。

產國際的季諾維也夫和布哈林，在作為共產國際代表居住在德國的匈牙利人庫恩·貝拉的慫恿下，決定玩火：1921年3月21日，德國共產黨人開始了極其愚蠢的奪權行動。<sup>299</sup> 暴動被粉碎。<sup>300</sup> 新設立的特別法庭對4,000人做出判決。德共的黨員總數幾乎少了一半，只剩下18萬人。莫斯科的布爾什維克把失敗歸咎於「反革命」，其中包括德國社會民主黨人希法亭，他在幾個月前徒勞地反對過季諾維也夫讓獨立社會民主黨人加入德國共產黨的要求。<sup>301</sup> 在7月12日的共產國際代表大會上，(當時)已經受到嚴重削弱的德國共產黨最後完全成了俄國人的下級。<sup>302</sup>

393 形形色色的敵人讓布爾什維克越發心神不寧。列寧在黨的第十次代表大會上說，喀琅施塔得起義是白軍將領和社會革命黨人領導的，「這種小資產階級反革命勢力無疑要比鄧尼金、尤登尼奇和高爾察克合起來還要危險，因為在我國，無產階級佔少數」。<sup>303\*</sup> 對水兵的反革命指控中，最重要的一環落在島上的前沙皇少將亞歷山大·科茲洛夫斯基身上。他為紅軍服務，是一位優秀的參謀軍官和炮兵專家，波羅的海艦隊司令費奧多爾·拉斯科爾尼科夫曾經獎給他一枚手錶，以表彰他「在與尤登尼奇的戰鬥中的勇敢和功績」。<sup>304</sup> 契卡正確地報告說，科茲洛夫斯基少將不是喀琅施塔得革命委員會的成員，但仍荒唐地堅持認為「他是運動的主要領導者」。<sup>305</sup> 科茲洛夫斯基逃到了芬蘭(他在芬蘭的維堡做了一名俄語教師)。不久，列寧警告說，在歐洲，俄國的流亡者有70萬人，「現在歐洲沒有一個國家裏沒有白衛分子」。<sup>306†</sup> 當然，布爾什維克自己的隊伍中有7.5萬名從前的沙皇軍官，包括幾百名從前的沙皇將軍，而且布爾什維克恢復了資本主義的自由貿易。契卡實際上是沒有能力組織針對喀琅施塔得事件中的社會革命黨人和「協約國間諜」的大型公審的。<sup>307</sup> 但捷爾任斯基仍在內部的評估報告中認為：「只要蘇維埃俄國還是共產主義革命的孤立的中心，並處於資本主義的包圍中，它就需要採取強硬措施，鎮壓白衛分子的冒險行為。」<sup>308</sup>

\* 譯註：《列寧全集》第41卷，第19頁。

† 譯註：《列寧全集》第41卷，第129頁。

孟什維克領導人尤利·馬爾托夫同列寧一起創辦過俄僑最早的馬克思主義報紙《火星報》。他於1920年10月離開俄國，參加德國左翼分子在哈雷召開的重要會議，結果被禁止回國：他得了重病，很快去了黑森林的一家療養院，但他在1921年初自己新辦的僑民報紙《社會主義通報》上繼續提出尖銳的批評。馬爾托夫強調，列寧有勇無謀，想把波蘭蘇維埃化卻未能成功，結果「許多原本不屬於波蘭的領土被割讓給波蘭帝國主義，損害了俄國勞動階級的利益」。<sup>309</sup> 在喀琅施塔得問題上，他也責備列寧。<sup>310</sup> 尤其是，他指出孟什維克黨人自始至終都是正確的——在俄國開展社會主義革命的時機不成熟，這一點已被列寧犯下的諸多錯誤、對政治鎮壓的依賴性和朝三暮四的農民政策所證明。<sup>311</sup> 可是，馬爾托夫再次開始了流亡生活，列寧卻端坐在克里姆林宮。「讓那些希望玩議會活動、立憲會議和非黨代表會議遊戲的人到國外去好了，請你們到那裏去，到馬爾托夫那裏去，」1921年4月，列寧在《論糧食稅》的小冊子裏大發雷霆，「而我們則要把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不論他們是公開的或裝扮成『非黨人員』的，統統關進監獄。」<sup>312</sup>

與此同時，在坦波夫，即使是在作出讓步實行實物稅之後，農民們也沒有停止叛亂，而是一邊襲擊軍火庫，一邊繼續招兵買馬，甚至到相鄰省份（薩拉托夫、沃羅涅日）招募新的支持者。他們除了搶糧和牲畜，還搶人，把隊伍擴充到二萬多人。<sup>313</sup> 1921年4月，實力大增的游擊隊員竟然在戰鬥中多次打敗紅軍。全權代表安東諾夫—奧弗申柯在數次報告中懇求莫斯科增派援兵。4月26日，埃夫拉伊姆·斯克良斯基向列寧建議，「派圖哈切夫斯基去平定坦波夫暴動」；列寧表示同意。<sup>314</sup> 圖哈切夫斯基的權力並沒有因為未能奪取華沙而受到削弱。<sup>315</sup> 政治局給了他一個月的時間「清算」坦波夫叛亂。<sup>316</sup> 5月6日，他在緊鄰坦波夫的一座火藥廠設立了司令部，宣佈準備發動步步為營的「打擊戰役」，使用機動力量消滅叛亂分子，然後由步兵佔領清剿過的村莊，讓叛亂分子無處容身。大多由城市居民組成的超過10萬人的紅軍部隊各就各位，

譯註：《列寧全集》第41卷，第229-230頁。

和他們一起的還有契卡的特別小分隊。通過公開處決、扣押人質和大張旗鼓地把整村的人驅趕到集中營，到1921年6月的第三個星期，叛亂分子只剩下少數的游兵散勇。<sup>317</sup>為了把殘餘的叛亂分子趕出森林，「消滅所有藏在森林中的人」，圖哈切夫斯基動用了大炮、機槍和氯氣。<sup>318</sup>5至6月，被打死的農民至少有1.1萬人；紅軍損失2,000人。幾萬人被驅逐或埋葬。「匪徒們自己已經開始認識到……蘇維埃政權意味着甚麼。」集中營負責人在談到改造計劃時寫道。<sup>319</sup>列寧的副手阿歷克謝·李可夫注意到了相關的共產黨人在坦波夫的野蠻行為，想讓圖哈切夫斯基收斂一些，不要疏遠了農民，但謝爾蓋·加米涅夫卻力主堅持下去：「總的來說，自從任命圖哈切夫斯基同志到坦波夫指揮以來，事實證明，他採取的所有措施都是完全合適和有效的。」<sup>320</sup>

叛亂分子的領導人亞歷山大·安東諾夫逃走了。契卡知道他夢想着把右派社會革命黨人和左派社會革命黨人以及立憲民主黨人統一起來，於是就放風說，將會於1921年6月28日在莫斯科召開反布爾什維克游擊運動全體「代表大會」。三名右派社會革命黨人的「代表」，其中有兩個是契卡的特工人員，堅持要求安東諾夫參加此次大會。他沒有參加，但是有大批安東諾夫分子中計被捕。（安東諾夫在沼澤森林裏躲了近一年時間，最後由於一個藥劑師的密報而暴露了位置，於1922年6月一個村子裏交火時被打死；他埋葬在當地的契卡總部——坦波夫的一座修道院內。）<sup>321</sup>

## 化解格魯吉亞的民族主義

395 1920年11月，在東方各民族代表大會兩個月後，斯大林來到巴庫。8日，他給列寧打電報說：「有件事情是可以肯定的。必須向亞美尼亞邊界迅速調動部隊，而且有必要讓他們進入埃里溫。奧爾忠尼啟則正在按照這一精神進行準備。」奧爾忠尼啟則此時尚未得到莫斯科的授權。<sup>322</sup>1920年秋，土耳其軍隊入侵從前屬於沙俄帝國的亞美尼亞，那裏此時名義上是由被稱為達什納克黨的亞美尼亞民族主義分子統治，但五十多萬難民、流行病和饑餓讓它飽受困擾。<sup>323</sup>11月28日，奧爾忠

尼啟則和斯大林密謀派遣軍隊，越過俄羅斯與亞美尼亞的邊界，發動「起義」，（「遵照亞美尼亞勞苦群眾的意志」）宣佈成立亞美尼亞蘇維埃共和國。和阿塞拜疆的木沙瓦特黨人一樣，達什納克黨人屈服了。<sup>324</sup>蘇俄對亞美尼亞的征服差點引發與土耳其的戰爭，但是，亞美尼亞再次被征服，受到最直接影響的是格魯吉亞。

從1918年開始，斯大林的祖國一直由具有孟什維克傾向的格魯吉亞社會民主黨統治，他們按照以（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為優先的原則，不通過蘇維埃——蘇維埃被他們取締了——而通過議會進行治理。<sup>325</sup>格魯吉亞總理是孟什維克諾伊·饒爾丹尼亞。正是他在1898年讓當時一心想參加社會主義運動的20歲的斯大林回校讀書，並在1904年再次羞辱斯大林，迫使他放棄「格魯吉亞崩得主義」——主張成立正式獨立的格魯吉亞社會民主黨和獨立的格魯吉亞國家。<sup>326</sup>但接着就是世界大戰、革命和帝國解體，以及格魯吉亞孟什維主義蛻變為格魯吉亞民族主義的工具。<sup>327</sup>列寧和契切林為了得到英國的正式承認，已於1920年5月7日簽訂條約，承認獨立的格魯吉亞孟什維克國家，並保證不干預它的事務。<sup>328</sup>不過，作為交換，格魯吉亞政府在一份秘密附件中同意讓共產黨在其領土上的活動合法化。布爾什維克在高加索的代理人，其中包括一個叫做拉夫連季·貝利亞的年輕特工，因此而迅速行動起來，準備顛覆這個孟什維克國家。<sup>329</sup>正當格魯吉亞人在莫斯科等待簽訂最終版的條約時，紅軍佔領了阿塞拜疆。而在亞美尼亞再次被征服後，布爾什維克武裝實際上已經包圍了孟什維克的格魯吉亞。

列寧以及布爾什維克其他高層人物對於孟什維克的看法是既鄙視又恐懼。誠然，俄國的孟什維克並沒有被禁止參加蘇維埃第八次代表大會（那是他們最後一次參加蘇維埃代表大會）。大會是在1920年12月22至29日召開的。正是在那次大會上，在冰冷、昏暗的莫斯科大劇院，列寧透露了一項異想天開的計劃——實現俄國的電氣化。<sup>330</sup>但是，早在1917年10月的蘇維埃第二次代表大會上就把孟什維克和右派社會革命黨人扔進了歷史垃圾堆的托洛茨基，告訴與會的2,537名代表說，「由於內戰的結束，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就特別危險，必須毫不留情地打擊他們」。捷爾任斯基也這麼看。孟什維克領導人費奧多爾·唐恩指



出，列寧在講話中列出了一長串與蘇維埃俄國簽訂和約的國家，但卻漏掉了格魯吉亞。<sup>331</sup>事實上，列寧此時正暗中敦促，在處理格魯吉亞的民族感情時要特別慎重，這顯然是他接受了波蘭慘敗的教訓。列寧明確命令奧爾忠尼啟則，不許「自行解決格魯吉亞問題」。<sup>332</sup>

不過，對武力奪取格魯吉亞的必要性，托洛茨基和斯大林的意見倒是一致的，就像之前在利用巴庫作為革命跳板的問題上他們也是意見一致。<sup>333</sup>實際上，在格魯吉亞問題上，斯大林沒有表現出半點猶豫，而在波蘭問題上，他曾幾次三番猶豫不決。除了憎惡格魯吉亞孟什維克，他對於採取激進政策明確提出了一個戰略上的理由。「高加索對革命所以具有重要意義，不僅在於它是原料、燃料和糧食的產地，」他對《真理報》的記者說（1920年11月30日），「而且還在於它位於歐洲和亞洲之間，特別是位於俄國和土耳其之間，並且有幾條在經濟上和戰略上極重要的道路。」<sup>334</sup>特別是，斯大林認為孟什維克的格魯吉亞提供了「一個外國干涉和佔領的區域」，即侵略者進攻蘇俄中心地區的跳板，這明顯增加了事情的緊迫性。<sup>335</sup>

許多布爾什維克預計，格魯吉亞孟什維克政府會因為它自身的不得人心和無能而垮台，因而建議等待民眾起義。可格魯吉亞共產黨只有1.5萬人，不是一支真正可以依靠的本地力量，而孟什維克至少有7.5萬人，並且還可以得到工人的支持。<sup>336</sup>在莫斯科，人們紛紛指責孟什維克政府的危害性——比如支持北高加索反蘇維埃叛亂分子——這時，反對採取軍事行動的意見開始動搖。1921年2月14日，列寧放棄謹慎的立場，最終允許奧爾忠尼啟則佔領格魯吉亞。實際上，2月11至12日，身在當地的奧爾忠尼啟則就同莫斯科的斯大林和托洛茨基計議好，從亞美尼亞派紅軍進入格魯吉亞，並在不同民族雜居的爭議地區洛里，策劃了一場由亞美尼亞和俄羅斯叛亂分子發動的「起義」。「起義」成了紅軍全面入侵的藉口。<sup>337</sup>2月15日，紅軍從阿塞拜疆全面入侵格魯吉亞。2月16日，格魯吉亞布爾什維克菲利普·馬哈拉澤宣佈成立格魯吉

\* 譯註：《列寧全集》第49卷，第736頁，註259。

† 譯註：《斯大林全集》第4卷，第360頁。

亞蘇維埃共和國，並向蘇維埃俄國請求「援助」。2月25日，紅軍進入梯弗利斯（為免遭炮擊，梯弗利斯已被放棄）。

奧爾忠尼啟則在自己的家鄉格魯吉亞做了伏龍芝在其家鄉突厥斯坦做過的事情。「蘇維埃格魯吉亞萬歲！」奧爾忠尼啟則在給莫斯科的電報中欣喜若狂。斯大林對於摧毀協約國的僕從也是洋洋得意。但列寧——他在1917年曾因為不允許俄國的其他社會主義者加入革命政府而威脅要辭職——現在指示奧爾忠尼啟則，要儘量與被打敗的格魯吉亞孟什維克組成聯盟。<sup>338</sup> 列寧這樣做似乎是因為他覺得，在「小資產階級的」格魯吉亞，布爾什維主義的政治基礎比較薄弱。此外，他似乎還覺得紅軍入侵給蘇俄人的國際聲譽蒙上了陰影：格魯吉亞事件在歐洲社會民主黨人中間引起了廣泛的關注。1921年3月3日，感到為難的奧爾忠尼啟則打電報給列寧：「正在盡一切可能增進與格魯吉亞知識分子的接觸與理解。」<sup>339</sup> 但奧爾忠尼啟則覺得，謹小慎微是一種失敗的政策。<sup>340</sup> 不管怎麼說，格魯吉亞孟什維克拒絕了列寧成立聯合政府的建議。

格魯吉亞不是波蘭，從軍事意義上來說肯定不是，而且南高加索三個不穩定的小共和國缺少波蘭那樣的國家，可以讓它們像波羅的海沿岸地區的三個小共和國一樣，緊隨其後走向獨立。格魯吉亞孟什維克原先指望倫敦和巴黎，但兩個協約國沒有伸出援手，法國只是答應移交之前白軍留下的、現存放在伊斯坦布爾倉庫裏的生鏽的卡賓槍和機槍。就在梯弗利斯陷落當天，格魯吉亞的幾位部長還在巴黎懇求法國政府提供軍事援助。<sup>341</sup> 英國人的眼睛盯在裏海的石油上，以前他們為了不讓德國得到石油，曾經派過一支遠征軍，但後來發現，長期佔領高加索的代價太大，問題太複雜。「我現在是坐在一隻火藥桶上，成千上萬的人想要引爆它」，英國專員從梯弗利斯寫信給妻子說。<sup>342</sup> 外交大臣寇松竭力勸說自己的政府，在南高加索和波斯北部保持英國代價不菲的軍事存在，以防俄國重新征服，但是和寇松一樣反對布爾什維克的陸軍大臣溫斯頓·丘吉爾認為，如果俄國繼續分裂，將來德國的勢力就有可能再次擴張到整個東歐，或許還有地中海東部。<sup>343</sup>

英國人撤出了巴庫和梯弗利斯，一路向西到達巴統，接着就永遠離開了高加索（1920年6月7日）。格魯吉亞人慶祝英國人的離開，認為那

是對帝國主義取得的勝利。巴統飄揚着格魯吉亞的旗幟，但是，由於法國人的猶豫再加上英國人的撤離，格魯吉亞人的命運只能由莫斯科和安卡拉決定了。<sup>344</sup> 土耳其的穆斯塔法·凱末爾 (Mustafa Kemal) 優先考慮的是兼併亞美尼亞人居住的省份 (卡爾斯、阿爾達漢)，而不是援助阿塞拜疆的突厥同胞，而且他把蘇維埃俄國看作是反抗凡爾賽秩序的盟友 (差不多是和蘇德恢復友好關係同時)。<sup>345</sup> 在紅軍從東、北兩個方向入侵格魯吉亞時，土耳其人從南面向前推進，目的是奪取港口城市巴統，而那裏的格魯吉亞領導人在紅軍到來之前就逃走了。1921年3月11日，法國的「埃內斯特·勒南號」軍艦已把格魯吉亞的黃金儲備、教會珍寶以及檔案文件運往伊斯坦布爾，準備轉運法國。<sup>346</sup> 五天後，土耳其宣佈兼併巴統。但孟什維克格魯吉亞的1萬名士兵設法解除了土耳其人在巴統的一支2,000人的小規模守備部隊的武裝。<sup>347</sup> 為了不讓土耳其人得逞，3月22日，在孟什維克的默許下，紅軍開進巴統。<sup>348</sup> 三天後，法國和意大利的軍艦把孟什維克政府、軍事指揮機構以及難民，從他們之前趕走英國人的同一座港口運到了伊斯坦布爾。<sup>349</sup>

在此期間，斯大林疾病纏身，身體虛弱，在飲食上享受特殊的待遇。1921年3月15日，娜佳·阿利盧耶娃寫信給加里寧，說「這個月的食品包裹裏有15隻雞 (專門給斯大林的)、15磅土豆和一輪奶酪」，但「已經吃掉10隻雞，而這個月還有15天。因為需要特殊的飲食，斯大林只能吃雞」。她請求把每個月雞的數量增加到20隻，土豆增加到30磅。<sup>350</sup> 3月25日，斯大林做了闌尾切除手術。<sup>351</sup> 列寧讓助手給斯大林送了「四瓶最好的波爾圖葡萄酒。必須在手術前給斯大林補補身體」。<sup>352</sup> 但是，斯大林當時還患有其他疾病，可能和斑疹傷寒有關，也可能和處於非活動期的慢性肺結核有關，因為革命前他得過肺結核 (斯維爾德洛夫患有肺結核，斯大林在西伯利亞流放時和他合住一間屋子；在青黴素出現之前，這種病根本無法治癒)。1921年4月，政治局命令斯大林去做溫泉療養，因此，1921年5至8月，他是在北高加索的納爾奇克度過的。<sup>353</sup> 列寧給奧爾忠尼啟則發了幾封電報，詢問斯大林的健康狀況和醫生的意見。

399

在斯大林療養期間，正好是山那邊的南高加索政局持續動盪的時候。1921年4月10日，在魯斯塔維里大街的梯弗利斯歌劇院召開了一

次約有3,000名工人代表和工人參加的會議，會議通過的決議敦促布爾什維克革命委員會捍衛格魯吉亞的獨立和自決權，同時要求讓所有並非意在推翻政權的社會主義組織合法化，甚至要求組建獨立的格魯吉亞紅軍。這樣的情緒只會加強。為了讓自己的同胞屈服於他們的布爾什維克新主人，奧爾忠尼啟則急需得到幫助。於是，他邀請斯大林到山這邊的梯弗利斯。斯大林慨然應允，參加了1921年7月2至3日的高加索局全體會議。奧爾忠尼啟則在會上作了政治形勢報告。<sup>354</sup>7月5日，在梯弗利斯召開的另一次有工人參加的大會上，斯大林在講話的開頭「以革命的名義向梯弗利斯的工人致意，強調他們的領導作用」，但會場上招呼他的是一片嘲笑聲，說他是「叛徒」和「兇手」。主要的發言人、格魯吉亞馬克思主義元老伊西多爾·拉米施維里的講話贏得了熱烈的掌聲，他指責斯大林和布爾什維克的武力征服。梯弗利斯的工人領袖亞歷山大·德格布阿澤 (Alexander Dgebuadze) 對斯大林說：「誰讓你來這裏的？我們的條約怎樣了？拜克里姆林宮所賜，這裏流了血，而你卻談友誼！索索，你在給我倆開玩笑呢！」<sup>355</sup>聽眾唱起了歌頌格魯吉亞自由的歌曲。<sup>356</sup>

當天晚上，在自己的家鄉和老地盤格魯吉亞遭到當眾羞辱之後，斯大林讓契卡逮捕了一百多名當地的孟什維克社會民主黨人，其中包括拉米施維里和德格布阿澤，塞滿了沙皇時代的麥捷希監獄以及下面那座較新的拘留所。(當斯大林發現童年時代的朋友、現在是格魯吉亞孟什維克的索索·伊列馬施維里也被逮捕的時候，他讓人把他放了，還邀請他見面，但伊列馬施維里拒絕了——他把斯大林視為叛徒——後來他帶着青年斯大林在哥里時的秘聞一起移居國外了。)<sup>357</sup>

7月6日，斯大林來到當地的布爾什維克黨部，訓斥格魯吉亞領導層(菲利普·馬哈拉澤、馬米亞·奧拉赫拉施維里 (Mamiya Orakhelashvili)、布杜·姆季瓦尼)，並在梯弗利斯黨組織全體黨員大會上發表講話。「我記得在1905年至1917年期間，南高加索各民族的工人和全體勞動者中間呈現出一片兄弟般團結的景象，當時阿爾明尼亞工人、格魯吉亞工人、阿捷爾拜疆工人和俄羅斯工人兄弟般地團結在一個社會主義大家庭中。」按照會議記錄，斯大林如此說道，「而現在，當我到達梯弗里斯之後，使我感到驚奇的是南高加索各民族工人之間過去的

那種團結已經沒有了。民族主義在工人和農民中間增長了，對其他民族同志的不信任情緒加深了。」他把這種「侵略性的民族主義精神」歸咎於格魯吉亞孟什維克、阿塞拜疆木沙瓦特黨人和亞美尼亞達什納克黨人三年來執政的結果，號召格魯吉亞布爾什維克「同民族主義作無情的鬥爭，恢復……那種兄弟般的國際主義關係」。<sup>358</sup> 斯大林還談到為遏制三方的民族主義情緒而成立南高加索聯邦的想法，該想法遭到強烈反對。<sup>359</sup> 事實證明，格魯吉亞布爾什維克的民族主義情緒一點也不比被推翻的孟什維克的民族主義情緒小。實際上，隨着波蘭、芬蘭和波羅的海三國的分離，格魯吉亞人還有烏克蘭人的民族主義情緒是最難平息的。1921年之後，從政治上和精神上對於斯大林的家鄉格魯吉亞的征服，對他個人的專政也產生了巨大的影響。

### 蘇俄的第一個衛星國

當作者們通過回溯一位早年的精神變態和殺人兇手來為斯大林作傳時，他們的作品讀起來像在描寫與他同時代的羅曼·馮·溫格恩—什捷爾恩貝格男爵。<sup>359</sup> 這位野蠻而瘋狂的男爵1880年代出生於奧地利，母親是德國貴族，父親是波羅的海地區的德意志人、一個古老貴族家庭的後裔，但這個男孩就像他參加過十字軍東征的祖先一樣，是在帝俄波羅的海沿岸地區長大的。他加入帝俄軍隊，在東部貝加爾地區和阿穆爾地區多民族的哥薩克部隊服役，並在世界大戰中因為作戰勇敢而屢立戰功。他也因為任性而受到過處分。勇敢，殘忍，他的這種特點部分是來自參加十字軍東征的條頓騎士，但據說他還曾對朋友吹噓，總有一天，他會成為中國的皇帝，甚至有可能恢復成吉思汗橫跨歐亞的宏大的蒙古帝國。男爵娶了一位19歲的滿洲格格，這讓他又有了一個身份——滿洲人。他是堅定的君主派，憎恨布爾什維主義的瀆聖行為，於是便拼湊了一個所謂的「野蠻師」，由東西伯利亞的哥薩克、韃靼人、蒙古人和藏人等組成，在內戰中向紅軍發動聖戰，但是在高爾察克被打敗

<sup>358</sup> 譯註：《斯大林全集》第5卷，第76-77頁。

之後，他在滿洲尋求避難。1920年10月，男爵率領他那800人的小小的「野蠻師」，從滿洲跋涉數千英里，進入外蒙古——它過去是中國的一個省，直到1911年由於清朝滅亡而獲得事實上的獨立，但在1919年，中國軍隊再次佔領那裏並實行了恐怖的統治。中國人廢黜了蒙古的世俗統治者、活佛博克多格根(Bogd Gegen)，他在藏傳佛教中的地位僅次於達賴喇嘛(在拉薩)和班禪喇嘛，男爵的目的是恢復那位活佛的地位。但是在1920年10月底、11月初，溫格恩—什捷爾恩貝格未能拿下中國人據守的蒙古首都庫倫，守衛庫倫的部隊多達12,000人。在處決了逃兵之後，他退到蒙古東部，在那裏收容了很多從東西伯利亞過來的白軍潰兵，另外又招募了想要解放這個佛教國度的蒙古和藏族部隊，搶劫過往的中國商隊，滿足他的大煙癮，因勇敢、殘暴而聲名大振。被他用鞭子抽得皮開肉綻的士兵會被送去醫治，傷好之後再接着用鞭子抽。有時候，男爵會把人捆起來，燒他的頭髮；有時候，他會往人的鼻孔裏灌水，往直腸裏灌松節油。<sup>360</sup>

1921年2月初，溫格恩—什捷爾恩貝格再次向庫倫發動進攻，他的手下大約有1,500人，而中國士兵至少有7,000人，但這一次，在吉利的農曆新年那天(2月4日)，他勝利了。<sup>361</sup> 清理大約2,500具屍體花了幾天時間，其中大部分都帶有馬刀的傷口。隨即便是搶劫。遠道而來的中國援軍遭到阻擊，丟下幾百頭駱駝運來的武器、給養和銀元。<sup>362</sup> 2月21日——同一天，未來的國王禮薩汗在德黑蘭發動右翼政變，四天後，奧爾忠尼啟則從孟什維克手中奪取了格魯吉亞的首都梯弗利斯，八天後，喀琅施塔得爆發起義——溫格恩—什捷爾恩貝格在蒙古首都舉行隆重的儀式，讓博克多格根重新上台。<sup>363</sup> 在蒙古人和藏人的奉承中得意洋洋的男爵，開始四處捕殺布爾什維克政委、猶太人和身體有缺陷的人。名單上列出的目標有846人，其中猶太人38人，他們都被就地處決。<sup>364</sup>

長期以來，俄國商人和冒險家已經滲透到通往中國的門戶——外蒙古。現在，布爾什維克政權把一個阿爾泰人(衛拉特)、負責共產國際蒙藏部的謝爾蓋·鮑里索夫(Sergei Borisov)，和一個「顧問」小組一起派到庫倫。<sup>365</sup> 鮑里索夫來自一個信奉薩滿教的民族，佛教徒一度試圖讓他們皈依(他本人讀的是俄國正教學校)。他的目的是與蒙古民族主義分子結

成聯盟，後者已經和東西伯利亞布里亞特的布爾什維克有過接觸。蒙古民族主義分子有兩個集團。一是東庫倫集團，由海關低級官員丹增(生於1885年)領導，他是一個貧窮婦女的私生子；該集團的成員包括蘇赫一巴托爾(生於1893年)，他19歲就成了博克多格根軍隊中的機槍團團長。另外一個集團叫做「領事山」(庫倫主要由俄國人居住的區域)，比較激進，由博多(Bodoo，生於1895年)領導，他是一所俄國學校的蒙語教師；集團成員有喬巴山(生於1895年)，他做過喇嘛，是一位逃離寺院的貧窮婦女的私生子，在做雜役時碰到了一所俄國翻譯學校的校長，他先是在那裏上學，然後又到東西伯利亞首府伊爾庫茨克接受進一步教育。<sup>366</sup> 1920年6月25日，兩個集團在丹增的帳篷裏聯合起來，成立了蒙古人民黨，目標是：「清算對我們的宗教和民族抱有敵意的外來的敵人；恢復失去的權利並真正復興國家和宗教；……全面關注窮人和地位卑微的群眾的利益；過上既不壓迫他人也不受他人壓迫的生活。」<sup>367</sup> 他們同意鮑里索夫的意見，決定派代表團到莫斯科請求幫助。<sup>368</sup> 1920年11月，由七人組成的蒙古代表團抵達蘇俄首都，會見了列寧和斯大林。<sup>369</sup>

這時，博克多格根已經重登汗位，庫倫也已被溫格恩一什捷爾恩貝格佔領。1921年3月1至3日，蒙古人民黨在邊界蘇方一側的特洛伊茨科薩夫斯克(恰克圖)召開大會，最後那天的代表有26人。<sup>370</sup> 為了推翻溫格恩一什捷爾恩貝格，他們成立了一個臨時革命委員會和由大約400名騎兵組成的人民革命軍，這支部隊集中在西伯利亞的東南部；接着，他們在3月18日——同一天，布爾什維克與波蘭簽訂和約——越過蘇蒙邊界，紅軍部隊跟在後面。<sup>371</sup>

403 用共產國際的話說，在蒙古，根本不存在「革命形勢」，但溫格恩一什捷爾恩貝格男爵佔領蒙古成了天賜良機，為布爾什維克的入侵及革命暴動提供了藉口。到1921年春，蒙蘇聯軍打擊蒙古「反革命基地」，打擊溫格恩一什捷爾恩貝格以對蒙古牧民大肆「徵用」為生的軍隊的攻勢，本身已經在進行了。5月21日，溫格恩一什捷爾恩貝格發佈公告，「以俄羅斯合法的主人、全俄皇帝米哈伊爾·亞歷山德羅維奇」的名義，號召西伯利亞的俄國人起來反抗布爾什維主義，並發誓「消滅政委、共產黨員和猶太人」。<sup>372</sup> (儘管尼古拉二世的弟弟米哈伊爾大公

1918年已經在彼爾姆被處死了。)6月16日，政治局才批准發動「革命進攻」。一份「請求」蘇俄軍隊援助的官方文件被炮製出來。蘇赫一巴托爾和紅軍部隊在1921年7月5至6日佔領了庫倫。<sup>373</sup>

斯大林在遠離莫斯科的地方度假。在格魯吉亞的首都梯弗利斯，有人對他起哄，說他是布爾什維克的帝國主義分子。在格魯吉亞和蒙古事件發生的同時，共產國際恰好在莫斯科召開第三次代表大會，大會的主題之一就是民族解放。「這裏我還想強調一下殖民地運動的意義，」7月5日，列寧對來自五十多個國家的605名代表說，「十分明顯，在未來的世界革命的決戰中，世界人口的大多數原先為了爭取民族解放的運動，必將反對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它所起的革命作用也許比我們預期的要大得多。」落後國家一下子成了革命的領導者（「全場活躍以示贊同」）。\*而且就像蘇維埃俄國「為東方各民族爭取自身獨立提供了有力支持一樣，東方各國在我們共同反對世界帝國主義的鬥爭中也是我們的盟友」。<sup>374</sup>7月11日，蒙古再次宣佈獨立。在此期間，溫格恩一什捷爾恩貝格的部隊在前往西伯利亞的途中，順便俘虜或打散了大批中國人，但未能如願在西伯利亞本地挑起反蘇維埃起義，因此他只能四處逃竄；共產國際的報告把他的手下說成是「投機分子、嗎啡成癮者、鴉片鬼……以及其他反革命勢力中的渣滓」。<sup>375</sup>據見過他最後一次行軍的人說，男爵「垂頭喪氣，騎着馬，走在隊伍前面。他沒戴帽子，幾乎沒穿衣服。在他赤裸的胸上，用一根明黃色的繩子掛了許多蒙古人的護身符和小飾物。他看起來活像是史前的猿人」。<sup>376</sup>

溫格恩一什捷爾恩貝格在一次暗殺陰謀中逃過一劫（他的帳篷遭到機槍掃射），但是在1921年8月22日，他被活捉並交給紅軍，他向抓住他的人透露了自己的身份。<sup>377</sup>證據顯示，他的蒙古顧問逃走時帶走了1,800千克的金銀珠寶，這些珠寶被藏在了河底下。一支隊伍把男爵押送到西西伯利亞的首府新尼古拉耶夫斯克。†那裏的審訊證明，他「心理上絕對不健康」。<sup>378</sup>

\* 譯註：《列寧全集》第42卷，第41-42頁。

† 譯註：後更名為新西伯利亞。



列寧用休斯電報機從莫斯科下令召開公審大會——大會本來是要在莫斯科開的，但是被稱為「西伯利亞列寧」的伊萬·斯米爾諾夫堅持認為，在當地審判的影響更大。<sup>379</sup> 1921年9月15日，鄂畢河岸邊諾沃尼古拉耶夫斯克最大的公園中，在用木頭建造的夏日劇場裏，幾千人參加的公審大會開始了。男爵出現時穿着他的黃色蒙古袍，胸前戴着帝俄的聖格奧爾吉十字勳章。大約六個小時過後，他被判犯有如下罪行：為日本人工作，想要建立一個中亞國家；企圖復辟羅曼諾夫皇朝；拷打；反猶；以及暴行。他只否認與日本人有勾連。<sup>380</sup> 當天晚上或次日凌晨，他被當地的契卡處死。<sup>381</sup> 他的瘋狂讓其他人得到了好處。男爵不僅代表蒙古人把中國軍隊趕出了蒙古，而且他的劫掠和野蠻還幫助趕走了中國的農民移民——1911年，其數量約有10萬人，但是到1921年，只剩下8,000人。<sup>382</sup> 1921年9月14日，蒙古政府發表聲明，不承認中國的宗主權。<sup>383</sup> 契切林代表蘇維埃俄國發表了一份模稜兩可的聲明，它沒有直接否認中國的宗主權，但實際上承認了蒙古的獨立。<sup>384</sup>

無論是對於蒙古的獨立還是蘇俄的第一個衛星國的建立——比二戰後的東歐早得多——馮·溫格恩—什捷爾恩貝格的貢獻都是歷史性的，因為在他被打敗之後，紅軍就留了下來。<sup>385</sup> 1921年9月，讓蘇俄外交人民委員部措手不及（它正試圖與中國建立外交關係）的是，一個以丹增為首的蒙古代表團抵達莫斯科，這其中包括26歲的蘇赫—巴托爾。蒙古人是要尋求財政、基礎設施和武器方面的援助，同時還想討論與蘇維埃俄國的領土爭端以及即將到期的帝俄經濟特許權問題。<sup>386</sup> 從1921年10月26日開始，在大都會飯店連續開了五次會。來自布里亞特的共產國際官員鮑里斯·舒米亞茨基（Boris Shumyatsky）在11月2日對列寧解釋說，別說社會主義革命，他們能進行資產階級革命就不錯了，因為蒙古要落後蘇維埃俄國兩個世紀：將近一半的男性人口是喇嘛廟的僧人，唯一的權威人物是活佛博克多格根。但舒米亞茨基補充說：「蘇赫—巴托爾是陸軍部長，平民，是蒙古方面新出現的。儘管年輕，卻極為勇敢……是蒙古人民黨中最活躍的人物之一，也是優秀的演說家……完全傾向於蘇維埃俄國。會說一點俄語。」<sup>387</sup> 11月5日，已經宣佈廢除沙俄所有秘密條約的蘇俄政府，自己也同外蒙古簽訂了不平

等的條約。<sup>388</sup> 紅軍部隊「獲邀」駐留，兩個政府也互相承認——不是兩個國家，這是為了不過分得罪中國。舒米亞茨基起草了文件（在斯大林執政時期，他將負責電影業）。在博克多格根仍然作為名義統治者的同時，蒙古實行君主立憲，但也屬於「新型的人民民主」。<sup>389</sup>



歷史上從未有過在如此廣闊的區域進行的內戰。與世界大戰相比，俄國內戰中的戰役和再次進行的領土征服戰爭，規模都不算大，但是在1918至1923年，那裏卻有800萬至1,000萬人喪生。其中十分之九是平民。死於斑疹傷寒、傷寒、霍亂、流感以及饑餓的人可能比死於敵人炮火的人還多。無數在戰場上受傷的士兵都因為缺少戰地醫生、藥物、轉移途徑以及醫院而死亡。另外，多達20萬人成了紅色恐怖的犧牲品，而成為白色恐怖犧牲品的至少有5萬人。財富損失也很巨大。1921年的經濟產量甚至不到1914年前的六分之一；1921年的糧食收成是1913年的一半。<sup>390</sup> 1913年，俄國是世界上的糧食出口國；1923年，俄國出現了人吃人的現象。<sup>391</sup> 另外，醫生、科學家、教師、藝術家等等，紛紛移居國外，總共大概有150萬人，而且（與1789年後的法國不同）其中大多數後來再也沒有回到俄國，他們把歐俄的文明帶到了全世界，並對蘇維埃俄國的對外政策造成很大的影響。在國內，出現了不是一種，而是兩種強大的結構：一是農民革命，它讓白軍磕壞了牙齒，二是布爾什維克專政，它被迫同意「農民的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條約」。一貫喜歡賭博的列寧用後者又賭了一把。他後來說，1921年春天在經濟上遭到的「失敗」，要比高爾察克、鄧尼金或皮爾蘇茨基造成的軍事上的失敗「嚴重得多」。<sup>392</sup> 不過，可悲的是，列寧在1921年3月黨的第十次代表大會上，不顧黨內相當一部分人的反對作出讓步，實行實物稅，承認私人貿易的合法性，儘管對於挽救政權來說不算太遲，但是對於挽救鄉村裏的遍地餓殍來說，則來得太遲了（這是第十章的主題）。

---

\* 譯註：《列寧全集》第42卷，第184頁。

406 俄羅斯人與歐亞人之間的搏鬥也是一場經濟戰，因為戰場上的每次推進都會帶來戰利品：糧食、私酒、布匹、靴子、煤油，或者像布哈拉那樣，黃金。士兵或其他武裝人員奪取的紀念品通常會出現在剛剛形成的黑市上。打家劫舍也是常事。在紅軍控制的地方，市場上可以買到紅軍各種各樣的軍用違禁品（步槍、機槍、炮彈）。有時，武器並不是來自戰場，而是直接來自倉庫或火車站，做生意所需付出的代價不過是給官員和衛兵行賄。革命取締了市場，結果把包括政權在內的整個國家都變成了非法市場交易的從業者。「新經濟政策，」國家計劃委員會的一位官員評論說，「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而是從罪惡的土壤中長出來的，是從十月革命消除資本主義制度的『罪孽』中形成的。」<sup>393</sup> 以雪崩一般的法令確立合法市場多少有點奇怪，這些法令在1921年4至7月紛湧而至，勉強允許這樣那樣的私人活動。（1921年8月9日的法令要求國家代理人執行那些法令。）<sup>394</sup> 然而，以往那種強制剝奪財產的做法並沒有很快消除。<sup>395</sup> 新經濟政策有關財產問題的法律，對於共產黨統治下的市場關係，在許多方面仍然模稜兩可。

民族政策同樣十分混亂。在布爾什維克的統治集團中，斯大林多次表現出他最重視俄國歐亞地區的防衛作用。他精通民族事務，自信在這一領域足以指導列寧。<sup>396</sup> 但是在波蘭民族主義問題上，列寧忽視了斯大林的警告，為了輸出革命而在西部發動了一場不幸的軍事攻勢。<sup>397</sup> 波蘭在1920年大勝蘇維埃俄國，讓接受民族主義的「必要的惡」有了明顯的地理上的重要性：烏克蘭蘇維埃共和國和白俄羅斯蘇維埃共和國——那是斯大林參與建立的——現在似乎成了遏制波蘭擴張的力量。<sup>398</sup> 但是，就在波蘭民族主義變成了一個外部難題並在內部產生影響的時候，同樣強大的格魯吉亞民族主義卻被化解了，而這在很大程度上是靠斯大林的謀略。怎樣控制這樣的民族主義並將其用來為共產黨的目標服務，是他一直考慮的問題。從根本上來說，他是一個在階級問題上毫不妥協的人，但也知道與少數民族共產黨人妥協的必要性，雖然當他感到那些地區會被蘇俄的外部敵人用來削弱甚至入侵蘇維埃國家時，是不會容忍分離主義的。<sup>399</sup>

407

列寧形成了一種截然不同的成見：在大俄羅斯與各個較小民族的交往中，普遍存在即便不能說是暴力，至少也是傲慢和赤裸裸的歧視，而這在他看來，顯示出蘇維埃俄國不好的一面。1921年9月9日，阿道夫·越飛給列寧發了一封憂心忡忡的電報，聲稱在突厥斯坦，兩位布爾什維克官員之間的政策分歧點燃了俄羅斯人與當地人之間的仇恨。列寧在9月13日回覆時要求提供更詳細的信息（「要事實，事實，事實」），並在最後說：「取得當地人的信任；取得三倍、四倍的信任；證明我們不是帝國主義者，我們不能容忍這種傾向存在——這對我們的整個世界政策（*Weltpolitik*）是極其重要的。這是一個世界性問題，是毫不誇張的世界性問題……這個問題將影響印度，影響東方，這可開不得玩笑，要千倍地慎重。」<sup>400</sup>。

大概就是在這個時候，列寧開始說了一些有着十分重要的理論意義的題外話。1921年，他說布爾什維克只是完成了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他們還沒有到達社會主義。<sup>401</sup> 社會主義在俄國何時、尤其是如何真正建成的問題，隨着世界革命出人意料的失敗，隨着內戰的「發現之旅」暴露出的落後程度和已經支離破碎的歐亞地區普遍的絕望情緒，變得愈發尖銳了。

斯大林想要繼續弄清楚全球的革命前景，包括戰爭與革命的關係。在拉狄克1920年寫的一本著作上面，他寫道：「在俄國，工人和士兵聯合了起來（因為和平未能實現），而在德國，他們卻沒有，因為那裏和平已經實現。」<sup>402</sup> 在季諾維也夫1920年的一本《戰爭與社會主義運動中的危機》上，斯大林寫道：「沒有這次（1905年俄國被日本）戰敗，也不會有俄國革命。」<sup>403</sup> 表達這些觀點的時候，剛好是在紅軍成為革命的工具，再次征服從前的帝國邊疆地區——烏克蘭、突厥斯坦、南高加索——以及蒙古之前。<sup>404</sup> 在和契切林私下交換意見的時候，他流露出某種悲觀的情緒。「您對我在信中談到的對東方國家的經濟政策提出的反對意見，是以對我們自己經濟狀況的極端的悲觀情緒為基礎的，認為協約

---

\* 譯註：《列寧全集》第51卷，第322、323頁。

408 國資本現在會滲透到東方各國，而我們對此卻無能為力，」契切林給他寫道（1921年11月22日），「但情況並非如此。我們在討論的是一個相當漫長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我們是不會原地不動的。即使在那些與西方資本有機地聯繫在一起的國家，民族資產階級在協約國資本的猛攻下也不會那麼快地投降認輸，它們之間將會進行長期的鬥爭。」契切林提到了羅馬尼亞、土耳其、波斯和埃及。但斯大林沒有被說服。「當然，在將來的某個時候我們會慢慢擺脫經濟上遭受的嚴重破壞，那時候，我們就可以討論在這些國家的經濟行動了。」不過，與此同時，盧布的交換價值卻在不斷下跌，蘇維埃俄國沒有任何可供出口的東西，貿易差額不理想，而且缺乏足夠的黃金。斯大林認為，蘇維埃俄國最好開發國內與東方接壤的地方——突厥斯坦、西伯利亞、阿塞拜疆。<sup>405</sup>

1921年底，斯大林公開表露出悲觀情緒。「世界資產階級對無產階級革命的『害怕』或『恐懼』（如他們在紅軍進攻華沙時所表現出的）已經煙消雲散。」他在《真理報》上寫道（1921年12月17日），「與此同時，歐洲的工人幾乎每次得到蘇維埃俄國的消息都會表現出的那種無限的熱情，也在消失。」從地緣政治的角度說，俄國在世界上的勢力因為內戰而在總體上減弱不少。與英國達成的來之不易的貿易協議是一頂帶刺的桂冠。「不應忘記，貿易的和其他各種各樣的代表團和協會源源來到俄國，一方面是做生意並幫助俄國，另一方面這些也是世界資產階級最好的情報員，因此，現在世界資產階級對蘇維埃俄國，對它的強弱比過去任何時候都知道得清楚，這種情況下，一旦發生新的武裝干涉就有非常嚴重的危險。」斯大林寫道。除了日本，他還指出波蘭、羅馬尼亞和芬蘭，甚至土耳其和阿富汗都是可怕的挑戰。<sup>406\*</sup> 獲勝的蘇維埃俄國遭到包圍和滲透。它在竭力同資本主義列強暫時妥協的同時，也通過新經濟政策努力在國內與資本主義達成和解。杜爾諾沃的革命戰爭產生了自相矛盾的結局。

---

\* 譯註·《斯大林全集》第5卷，第95、96-97頁。

## 第一部 雙頭鷹

741

- 1 Kern, *Culture of Time and Space*.
- 2 Rieber, "Stalin: Man of the Borderlands."
- 3 "Polozhenie o voenno-polevykh sudakh"; Rawson, "The Death Penalty in Tsarist Russia."
- 4 Brewer, *Sinews of Power*.
- 5 Kotkin, "Modern Times."
- 6 Pflanze, *Bismarck*, I: 82. 「政治是一門有着無限可能的藝術」，俾斯麥的這句名言並沒有直接的出處，據說是他在1867年8月11日對邁爾·馮·瓦爾德克 (Meyer von Waldeck) 所說。(轉引自Amelung, *Bismarck-Worte*, 另見Keyes, *Quote Verifier*.) 但在俾斯麥有案可稽的思想中，這一觀念隨處可見。
- 7 Pflanze, *Bismarck*, I: 242.
- 8 Pflanze, *Bismarck*, I: 81-5; Steinberg, *Bismarck*, 130-2.
- 9 Steinberg, *Bismarck*, 198.
- 10 俾斯麥特別不能滿足於一味地安享榮耀，結果他的不安分常常讓自己陷入不必要的麻煩，就像他不停繞來繞去的戰術使自己失去騰挪的空間一樣。在與德國天主教的文化鬥爭 (*Kulturkampf*) 中，他給自己製造了最大的困難，一項沉重的、勝負難料的任務。Waller, *Bismarck at the Crossroads*.
- 11 Steinberg, *Bismarck*, 184, 241 (引自 *Kölnische Zeitung*).
- 12 Prince S. N. Trubetskoy, 轉引自 Riabushinskii, *Velikaia*, I: 96.
- 13 Tucker, *Stalin as Revolutionary*. 有關批評，參見Suny, "Beyond Psychohistory." 貝索喝醉了就狠揍自己的兒子，這方面主要的原始材料見於Iremashvili, *Stalin und die Tragödie*. 同樣是哥里人、和斯大林一起就讀於梯弗里斯神學院的伊列馬施維里成了一名孟什維克，並在1921年10月和另外60人一起被驅逐到德國。他的書提供了第一手資料，回憶了斯大林的童年時代，分析了這位未來專政者的心理。部分是為了彌補無法獲得原始資料的缺憾，塔克在他的第一卷中也採取了心理分

- 析的方法，這是可以理解的。在塔克的第二卷中，斯大林被描寫成一個統治者，個性偏執，就和其他偏執的統治者、尤其是恐怖的伊萬一樣，而且他從俄國的政治文化中吸取了偏執的統治風格的基本要素。Tucker, *Stalin in Power*. 塔克在2010年去世時尚未完成設想中的第三卷也就是最後一卷。
- 14 RGASPI, f. 558, op. 4, d. 665, l. 14; Stalin Museum, 1955, 146, 1–11 (伊麗莎白施維里); Dawrichewy, *Ab: ce qu'on*, 82–4. 斯大林後來回來了，把幾千萬牲畜變成了集體財產。
  - 15 「在他晚年的時候，他總是接濟他們」，有位學者在提到斯大林時指出。Rayfield, *Stalin and His Hangmen*, 8.
  - 16 1931年9月，當斯大林獲悉他在神學院的歷史老師、時年73歲的尼古拉·馬哈塔澤(Nikolai Makhatadze)被關在梯弗利斯的麥捷希監獄時，這位專政者命令貝利亞把他放了。RGASPI, f. 558, op. 11, d. 76, l. 113.
  - 17 Trotsky, *Stalin*, 61–2. 為托洛茨基和斯大林寫過傳記的伊薩克·多伊徹，繼托洛茨基之後把斯大林列為「幾近半流浪狀態的落魄者」，也就是說，算不上真正的知識分子。Deutscher, *Stalin*, 24–6.
  - 18 Montefiore, *Young Stalin*. 蒙蒂菲奧里的書讀起來像小說。
  - 19 Wheen, *Karl Marx*.
  - 20 Montefiore, *Young Stalin*, 10.
  - 21 只有拉夫連季·貝利亞後來調到莫斯科是全靠斯大林，但貝利亞跟斯大林不同，他打造了一部巨大的高加索機器，而這部機器——這一點也跟斯大林不同——他是隨身帶到了莫斯科並使其遍佈蘇聯。
  - 22 Kun, *Unknown Portrait*, 74–5; Montefiore, *Young Stalin*, 3–16. 關於劫案的問題，艾米爾·路德維希在1931年採訪斯大林時寫道：「這是唯一一個他不願回答的問題——除非是說，他是用置之不理的方式來回答。」“Iz besedy,” *Bol'shevik*, 42–3.
  - 23 在撰寫傳記這個行當中，有些成就最突出的從業者把填補空白看作是必不可少的。參見Hermione Lee, *Virginia Woolf's Nose*.
  - 24 格魯吉亞社會民主黨的檔案已經佚失。Van Rec, “The Stalinist Self,” 263, n18 (引自斯蒂芬·瓊斯(Stephen Jones)2006年8月的私人通信)。
  - 25 Arsenidze, “Iz vospominaniia o Staline,” 219. 另見一同被流放到西伯利亞的鮑里斯·伊萬諾夫(Boris Ivanov)的說法，Tucker, *Stalin as Revolutionary*, 160–1。
  - 26 斯大林在參加1920年3月烏克蘭共產黨第四次代表會議時填過一份調查表。他在表中聲稱，從1902年到1913年，他經歷過八次被捕、七次流放和六次逃脫。同年晚些時候，在為瑞典社會民主黨的刊物撰寫的文章中，斯大林說自己經歷了七次被捕、六次流放和五次逃脫。這就是他的一些官方傳記存在混亂的根源。Ostrovskii, *Kto stoial*, 7. 2004年的這一版跟較早的那版(Olma, 2002)略有不同。
  - 27 青年斯大林上學的時候正好是亞歷山大三世在位期間(1881–1894)，當時帝國的所有小學都被置於至聖主教公會的領導下，以擴大正教在教育領域的影響(其實這種影響已經很大了)。Istoricheskii ocherk razvitiia tserkovnykh.
  - 28 Rayfield, “Stalin as Poet.”

- 29 De Lon, "Stalin and Social Democracy," 169.  
 30 Service, *Stalin*, 27; King, *Ghost of Freedom*, 183–4.  
 31 Pokhlebin, *Velikii pseudonym*, 76; Iremashvili, *Stalin und die Tragödie*, 18.  
 32 Ostrovskii, *Kto stoial*; RGASPI, f. 71, op. 10, d. 273 (Vladimir Kaminskii, "An Outline of the Years of Childhood and Youth of Stalin"); Rieber, "Stalin as Georgian: the Formative Years," 18–44; Jones, *Socialism*. 斯大林筆名和化名的清單可見於Smith, *Young Stalin*, 453–4。所有「姑娘」——到1918年為止有十個，還不包括兩個妻子——的名單可見於Montefiore, *Young Stalin*, xxviii。

## 第一章 帝國子民

- 1 路德維希問獨裁者，他成為職業革命家，是不是因為童年受到了虐待。斯大林不可能承認他對革命的忠誠是因為童年時代的怨恨，但他的否認聽起來仍然是實話。"Iz besedy," *Bol'shevik*, 轉載於 *Sochineniia*, XIII: 104–23 (at 113)。  
 2 Mitchell, *Maritime History*.  
 3 Lieven, *Empire*, 204.  
 4 Blum, *Lord and Peasant*; Raef, *Understanding Imperial Russia*; Hoch, *Serfdom and Social Control*.  
 5 de Madariaga, *Russia in the Age*; Klier, *Russia Gathers her Jews*.  
 6 Bushkovitch, "Princes Cherkasskii."  
 7 Baddeley, *Russian Conquest*; Allen, "Caucasian Borderland," 230; Gammer, *Muslim Resistance*.  
 8 有些定居在北高加索的低地地區而沒有越過邊境。Degoev, *Kavkaz i velikie*; Barrett, *Edge of Empire*; Breyfogle, *Heretics and Colonizer*; Jersild, *Orientalism and Empire*.  
 9 King, *Ghost of Freedom*, 140. 臭名昭著的帝俄高加索總督阿列克謝·葉爾莫洛夫 (Aleksii Ermolov, 1771–1861) 將軍——他抱怨說「這個山區到處都是不服管教的人」——在巡視各處的時候會穿着本地的服裝，佩戴高加索的手工製品。  
 10 Avalon, *Prisoedinenie Gruzii k Rossii*; Gvosdev, *Imperial Policies*. 另見Allen, *History of the Georgian People*; 以及Atkin, "Russian Expansion," 139–87.  
 11 「格魯吉亞人，」有位學者寫道，「有理由感謝俄國的統治。」Rayfield, *Stalin and His Hangmen*, 3. 到1915年，當地人口已達1,150萬，包括南高加索(外高加索)和北高加索。  
 12 Lang, *Last Years*; Jones, "Russian Imperial Administration." 另見Suny, *Georgian Nation*, 70–3.  
 13 Zubov, *Kartina Kavkazskogo*, I: 151. 有位早期的外國觀察家稱梯弗利斯是「第二個聖彼得堡」。Van Halen, *Memoirs*, II: 167.  
 14 關於斯大林作為帝國邊民的諸多方面，參見Rieber, "Stalin: Man of the Borderlands."  
 15 *Kavkaz: spravochnaia kniga storozhila*, 60; Azhakov, "Gorod Gori"; Sidorov, *Po Rossii*, 460–77; Gorkii, "Prazdnik shiitov"; Bukhnikashvili, *Gori*.



- 16 Mgaloblishvili, *Vospominaniia*, 11, 14.
- 17 Gogokhiia, "Na vsiu zhizn' zapomnilis' eti dni," 7.
- 18 1920年2月的地震破壞了這座城市。在四百多頁的1927年版高加索旅遊指南中，哥里只有一頁多一點，它特別指出了這座小城的古代遺址和負有盛名的桃子，但完全沒有提到斯大林的出生地。Batenina, *Kavkaz*, 395–6.
- 19 Kun, *Unknown Portrait*, 19, n. 30.
- 20 V. Kaminskii and I. Vereshchagin, "Detstvo," 24–5.
- 21 Montefiore, *Young Stalin*, 19 (引自 GF IML, f. 8, op. 2, ch. 1, l.143–6; M. K. Abramidze-Tsikhatatrishvili). 正式的結婚日期(不是訂婚日期)有時被說成是1872年5月，蒙蒂菲奧里採用了這一說法(引自 GF IML, f. 8, op. 5, d. 213 [沒有頁碼]以及 RGASPI, f. 558, op. 4, d. 1, l. 1)。假如他們是在1872年結婚的，那他寫的「結婚九個月之後，1875年2月14日」(22)就讓人費解了。在蘇聯的原始材料中，對斯大林母親出生年份的正式說法也各不相同，有時候說是1860年。她似乎至少要大上兩歲，而按照她訃告中的說法，她要大四歲(生於1856年)，這顯然是為了讓她結婚時年齡顯得大一點：16歲(如果是在1872年)或18歲(如果是在1874年)。Zaria *vostoka*, June 8, 1937.
- 22 Kaminskii and Vereshchagin, "Detstvo," 24–5 (伊麗莎白施維里); Montefiore, *Young Stalin*, 21 (引自 GF IML, f. 8, op. 2, d. 15, l.2–15; Keke's unpublished "memoirs"). 凱可的回憶是由L. 卡斯拉澤(L. Kasradze)在1935年8月記錄的，當時她已年近八旬。據蒙蒂菲奧里說，這部「新發現的回憶錄」「塵封」了70年。奧斯特洛夫斯基用的是與凱可的「談話」，他註明的談話日期是在1935年5月，參見他的 *Kto stoial*, 2002。
- 23 關於在哥里的婚禮。參見 Suliashvili, *Uchenicheskie gody*, 24–8。
- 24 Montefiore, *Young Stalin*, 19–20 (引自 GF IML, f. 8, op. 2, d. 15, l.2–15; 凱可未出版的「回憶錄」)。
- 25 斯大林後來把自己的出生年份從1878年推後到1879年。RGASPI, f. 558, op. 4, d. 61, l. 1. 直到1920年底，他給出的出生日期還是1878年12月6日，但是在1922年，他的一名助手發佈了「更正」，將其改為1879年12月21日，這個日期就成了正式的日期。Izvestiia *TsK KPSS*, 1990, no. 11: 134 (托夫斯圖哈)。斯大林為甚麼選擇不同的日期，現在還不清楚。對斯大林出生日期的進一步討論，參見 Kun, *Unknown Portrait*, 8–10, 60; 以及 Rieber, "Stalin, Man of the Borderlands," 1659.
- 26 按照一些道聽途說的記述，1875年還生過一個女孩，只活了一週，但沒有任何證據可以支持這一說法。
- 27 Kaminskii and Vereshchagin, "Detstvo," 27–8.
- 28 Zhukov, *Vospominaniia*, III: 215.
- 29 RGASPI, f. 558, op. 4, d. 665 (阿布拉米澤—齊哈塔特里施維里)。
- 30 Ostrovski, *Kto stoial*, 93 (引自 Dato Gasitashvili, GF IML, f. 8, op. 2, ch. 2, d. 8. l. 196, 200); Kaminskii and Vereshchagin, "Detstvo," 30 (伊麗莎白施維里)。另見 GF IML, f. 8, op. 2, ch. 1, d. 10, l.23–47 (戈格利奇澤); 以及 Iremachvili, *Stalin und die Tragödie*, 8–10.

- 31 胡特希施維里 1939 年寫給斯大林的信：RGASPI, f. 558, op. 11, d. 722, l. 51.
- 32 Lobanov, *Stalin v vospominaniakh*, 13–4 (D. Papiashvili); GF IML, f. 8, op. 2, ch. 1, d. 53 (Aleksandr Tsikhataatrishvili); Kaminskii and Vereshchagin, “Detstvo,” 26; Ostrovskii, “Predki Stalin.” 「維薩里昂這人非常古怪，」另一個見過他的人回憶說，「他中等個子，皮膚黝黑，長眉毛，黑色的大鬍子，表情嚴厲，走來走去的，看上去比較陰鬱。」RGASPI, f. 8, op. 2, d. 1, l. 48 (N. Tlashadze). 在哥里的斯大林博物館掛着一幅唯一已知的貝索的照片，那是老年時期的，可能是他，也可能不是。
- 33 Montefiore, *Young Stalin*, 25–8. 儘管蒙蒂菲奧里非常認同凱可在她的「回憶錄」（採訪）中對貝索浪蕩行為的敘述，但他也提供了同凱可的一面之詞相矛盾的證據材料，可以證明她「粗俗的毛病」。
- 34 Dawrichewy, *Ah: ce qu'on*, 26–7. (達夫里舍維是那位哥里警察的兒子。)
- 35 按照謝爾戈·貝利亞（拉夫連季的兒子）不太可信的說法，據說凱可有一次告訴謝爾戈的母親，「在我年輕的時候，我給人收拾屋子，要是遇到了好看的小伙子，我可不會浪費機會。」Beria, *Beria My Father*, 21.
- 36 Dawrichewy, *Ah: ce qu'on*, 30–5.
- 37 Ostrovskii, *Kto stoial*, 88–9; Service, *Stalin*, 17. 斯大林從不酗酒，而且儘管他年輕時在兩性關係上比較隨便，但卻漸漸地變得十分謹慎。
- 38 Ostrovsky, *Kto stoial*, 89 (引自“Detskie i shkol'nye gody Iosifa Vissarionovicha Dzhugashvili [Stalina]”；GF IML, f. 8, op. 6, d. 306, l. 13; Gori. d. 287/1, l. 2).
- 39 Suliashvili, *Uchenicheskie gody*, 9–16.
- 40 「雅科夫小時候很頑皮，一點也不安分，」斯維爾德洛夫的妻子回憶說，「他為街頭所有的孩子組織遊戲。」Sverdlova, *Iakov Mikhailovich Sverdlov* [1976], 60.
- 41 Ostrovsky, *Kto stoial*, 99 (引自 GF IML, f. 8, op. 2, ch. 1, d. 10, l. 57); Kaminskii and Vereshchagin, “Detstvo,” 37 (戈格利奇澤)。
- 42 Kaminskii and Vereshchagin, “Detstvo,” 37 (伊麗莎白施維里)。
- 43 Ostrovskii, *Kto stoial*, 93–4 (引自 GF IML, f. 8, op. 2, ch. 1, d. 10, l. 57; Simon Goglichidze; “Detskie i shkol'nye gody Iosifa Vissarionovicha Dzhugashvili,” GF IML, f. 8, op. 6, d. 306, l. 13).
- 44 Ostrovskii, *Kto stoial*, 101 (引自 GF IML, f. 8, op. 2, ch. 1, d. 48, l. 14–5; E. K. Jugashvili, May 1935). 戈格利奇澤的回憶說索索不到兩週就回去上學了，這顯然有誤——如果是這樣，他為甚麼留級呢？
- 45 *Pravda*, October 27, 1935. 關於貝索讓索索輟學的年份，回憶錄中存在衝突。比如，斯大林的奶媽和鄰居馬紹·阿布拉米澤回憶說，貝索在二年級時——那就是在 1891 至 1892 年——就威脅讓索索輟學，而她的丈夫和雅科夫·葉格納塔施維里都盡力勸說貝索不要那樣。Kaminskii and Vereshchagin, “Detstvo,” 43–5.
- 46 *Novoe obozrenie*, January 6, 1891; Khoshtaria-Brose, *Ocherki sotsial'no-ekonomicheskoi*, 46–7.
- 47 麥捷希要塞可以追溯到 5 世紀，但多次遭到破壞，包括 1690 年代波斯國王對它的破壞，那以後俄羅斯帝國就在 1819 年把它改建成監獄。蘇聯統治時期，它一直

- 是監獄，直到1934年成為格魯吉亞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的藝術博物館（後來又成了科學研究所）。1959年，麥捷希要塞被拆除。
- 48 Makharadze and Khachapuridze, *Ocherki*, 143–4.
- 49 關於「綁架」這件事情，人們經常引用唱詩班老師戈格利奇澤的說法，而且因為索索上學時的表現，他後來也備受稱道。他的說法給人留下的印象是，好像貝索就是容不了索索學習：「一想到兒子要去上學而不是學手藝，這位父親就很生氣。於是，在一個晴朗的白天，維薩里昂趕到哥里，把索索交給了阿傑利哈諾夫工廠。」Lobanov, *Stalin v vospominaniakh*, 20.
- 50 Trotsky, *Stalin*, 9.
- 51 Kaminskii and Vereshchagin, “Detsvo,” 45（戈格利奇澤）。
- 52 Iremashvili, *Stalin und die Tragödie*, 5–6. 斯大林第二次婚姻所生的女兒斯維特蘭娜小時候知道凱可，但不知道貝索。她後來說，斯大林「喜歡母親要遠遠超過他父親」。Alliluyeva, *Twenty Letters*, 204.
- 53 Loginov, *Teni Stalina*, 56. 引自帕維爾·魯西施維里（Pavel Rusishvili）。魯西施維里第一次見到斯大林是在1938年春天，在莫斯科近郊的扎列恰別墅，當時在一起的還有另一幫格魯吉亞人，包括達塔·加西塔施維里（Data Gasitashvili）和葉格納塔施維里兄弟以及貝利亞。斯大林剛進別墅就用格魯吉亞語說「願上帝保佑各位健康」（Loginov, 60–1）。在莫斯科受到斯大林接見時等了好長時間的加西塔施維里，在哥里住在一間帶有鐵床的單間（他的兒子們佔據了不大的起居空間的其餘部分）。
- 54 Ostrovsky, *Kto stoial*, 94–5; RGASPI, f. 558, op. 4, d. 669（卡帕納澤）；GF IML, f. 8, op. 2, ch. 1, d. 48, l.14–5（E. Jugashvili, May 1935）。
- 55 Mgeladze, *Stalin*, p. 242（引自古拉姆·拉季施維里〔Guram Ratishvili〕，他是雅科夫·葉格納塔施維里的孫子）。
- 56 Lang, *Modern History*, 114–5; Tucker, *Stalin as Revolutionary*, 80–81; Montefiore, *Young Stalin*, 63.
- 57 Iremashvili, *Stalin und die Tragödie*, 18. 年少的斯大林是在甚麼時候讀的那部小說，現在還不清楚。1893年，也就是在他進入格魯吉亞首府神學院的前一年，窮困潦倒的卡茲別吉死在了格魯吉亞的一家精神病院，但恰夫恰瓦澤寫了一則著名的訃告。
- 58 Iremashvili, *Stalin und die Tragödie*, 14; Alliluyeva, *Only One Year*, 360（「母親總是打兒子，而她的丈夫又總是打她」）；以及Alliluyeva, *Twenty Letters*, 153–4, 204.
- 59 Kaminskii and Vereshchagin, “Detsvo,” 49–50；關於斯大林參加拳擊賽的情況：RGASPI, f. 71, op. 10, d. 273, l.86–8.
- 60 Dawrichewy, *Ab: ce qu'on*, 82; Iremashvili, *Stalin und die Tragödie*, 5; Kaminskii and Vereshchagin, 29–32, 48–50（B. Ivanter, A. Khakonov）。「葉格納塔施維里家族的人作為摔跤手非常有名，整個卡特里都知道，」據說未來的斯大林在回憶時說，「但排名第一、同時也最強的是雅科夫。」Montefiore, *Young Stalin*, 38–9（引自Candide Charviani, “Memoirs”〔未出版的手稿〕，3）。關於哥里的街頭文化，參見Suliashvili, *Uchenicheskie gody*, 41–6.

- 61 Smith, *Young Stalin*, 28–9 (引自胡佛研究所檔案中的一份1909年8月的俄國警方報告); Montefiore, *Young Stalin*, 57, 70. 關於梯弗利斯自由廣場附近亞美尼亞人的巴扎, 參見Nadezhdin, *Kavkazskii krai*, 318–9.
- 62 斯大林繼續說道:「記得在十歲的時候我感到很不開心, 因為父親破產了, 沒想到40年後, 這成了一件對我有好處的事情。但這種好處完全不是我掙來的。」RGASPI, f. 558, op.11, d. 1121, l. 49–50, 轉載於 *Istochnik*, 2001, no. 2: 54–5.
- 63 Ostrovskii, *Kto stoial*, 96 (引自 GF IML, f. 8, op. 2, ch. 1, d. 1, l. 228–9, 236–9; Pyotr Adamishvili).
- 64 Kaminskii and Vereshchagin, “Detstvo,” 36 (伊麗莎白施維里), 41 (戈格利奇澤); “Neopublikovannye materialy iz biografii tov. Stalina,” *Antireligioznik* (Khabelashvili). 年少的斯大林的語文老師是弗拉基米爾·拉夫羅夫 (Vladimir Lavrov)。
- 65 Kaminskii and Vereshchagin, “Detstvo,” 41–2; Iremashvili, *Stalin und die Tragödie*, 7–8.
- 66 GF IML, f. 8, op. 2, ch. 1, d. 10, l. 23–47 (戈格利奇澤), d. 54, l. 202–15 (Kote Charkviani); Montefiore, *Young Stalin*, 43–4.
- 67 Kaminskii and Vereshchagin, “Detstvo,” 34 (伊麗莎白施維里).
- 68 談到這一點的不但有斯大林時代國內的回憶錄, 還有移居國外的伊列馬施維里的書 *Stalin und die Tragödie*, 8. 另見 Suliashvili, *Uchenicheskie gody*, 13.
- 69 Rank, *Trauma of Birth*; Horney, *Neurotic Personality*; Horney, *Neurosis and Human Growth*; Erikson, *Young Man Luther*; Tucker, “Mistaken Identity”; Tucker, “A Stalin Biography’s Memoir,” 63–81.
- 70 *Tovarishch Kirov*; Kostrikova and Kostrikova, *Eto bylo*; Sinel’nikov, *Kirov*.
- 71 Rayfield, *Stalin and His Hangmen*, 8.
- 72 Ostrovskii, *Kto stoial*, 109. 格魯吉亞有三間神學院; 第三間在庫塔伊西。
- 73 “Neopublikovannye materialy iz biografii tov. Stalina,” *Antireligioznik* (Girgory Glurdzhidze).
- 74 Dawrichev, *Ah: ce qu’on*, 47, 60. 達夫里舍維當警察局長的爸爸把他送到了梯弗利斯最好的。

## 第二章 拉多的門徒

- 1 Ostrovskii, *Kto stoial*, (2002), 197.
- 2 Cameron, *Personal Adventures*, I: 83. 另見 Wagner, *Travels in Persia*, II: 119.
- 3 Badriashvili, *Tiflis*; Chkhetia, *Tblisi*. 1897年的統計數字是159,590人。其中有4.7萬亞美尼亞人, 但是到1910年, 在30.3萬總人口中, 亞美尼亞人增長到12萬, 超過了40%。 *Pervaia vseobschaia perepis’ naseleniia Rossiiskoi imperii*, xi–xiv; *Kavkaz: Opisanie kraia*; Suny, “Tiflis,” 249–82. 1970年, 這座城市的人口以格魯吉亞人為主。
- 4 梯弗利斯當時有六種亞美尼亞文報紙、五種俄文報紙、四種格魯吉亞文報紙。Bagilev, *Putevoditel’ po Tiflisu*. 關於帝國的市政管轄權, 參見 Seton-Watson, *Russian Empire*, 662–3.

- 5 Moskvich, *Putevoditel' po Kavkazu*, 246. 據說納里卡拉要塞最早可追溯到公元4世紀波斯人統治時期，但這個名字帶有突厥語風格，而且是源自蒙古人統治時期(公元13世紀)；1827年的地震摧毀了這座要塞。
- 6 Baedeker, *Russia: A Handbook*, 465–71.
- 7 Anchabadze and Volkova, *Stary Tblisi*, 98–9. 在梯弗利斯，據說「一個希臘人騙得了三個猶太人，但一個亞美尼亞人騙得了三個希臘人。」
- 744 8 Makharadze and Khachapuridze, *Ocherki*, 66, 114–7; Khachapuridze, "Gruziiia vo vtoroi," 46–66; Suny, *Georgian Nation*, 124–43.
- 9 Rieber, "Stalin as Georgian: The Formative Years."
- 10 Tucker, *Stalin as Revolutionary*, 89–90.
- 11 Joseph Iremashvili, *Stalin und die Tragödie*, 16–7. 另見 Gogokhiia, "Na vsiu zhizn' zapomnilis' eti dni," 14–5.
- 12 RGASPI, f. 558, op. 4, d. 21, d. 29, d. 665. 詳細的敘述可見於 Kun, *Unknown Portrait*, 26.
- 13 Kun, *Unknown Portrait*, 27 (引自 RGASPI, f. 558, op. 1, d. 4327 : 申請書的日期是 1898 年 6 月 3 日)。
- 14 Parsons, "Emergence and Development," 2689. 恰夫恰瓦澤在 1907 年被人謀殺，這一案件至今未能告破。
- 15 Jones, *Socialism*, 52; "Gruzinskii ekzarkhat," IV: 197–209; Kirion, *Kratkii ocherk*; Agursky, "Stalin's Ecclesiastical Background," 4.
- 16 Manuil (Lemeshchevskii), *Die Russischen Orthodoxen Bischöfe*, II: 197–207 (at 203); Makharadze, *Ocherki revoliutsionnogo dvizheniia*, 57–8; Lang, *Modern History*, 109. 菲利普·馬哈拉澤，1890 年長達一週的罷課運動的領導者之一，被准予畢業，而吉布拉澤則被開除了。殺人的學生是約瑟夫·拉賈施維里 (Ioseb Lagiashvili)，被殺的院長是帕維爾·丘傑茨基 (Pavel Chudetsky)。
- 17 轉引自 Souvarine, *Stalin*, 14–5.
- 18 Zhordania, *Moia zhizn'*, 11–15; Uratadze, *Vospominaniia*, 58–9.
- 19 "Iz zaiavleniia," 174–5; Makharadze, *Ocherki revoliutsionnogo dvizheniia*, 57–8.
- 20 Ostrovskii, *Kto stoial*, 112 (引自 GF IML, f. 8, op. 2, d. 52, l. 198–9: I. Tsintsadze).
- 21 Rayfield, "Stalin as Poet" ; *Sochineniia*, XVII: 1–6.
- 22 Rayfield, *Literature of Georgia*, 3rd ed., 182–3.
- 23 RGASP, f. 558, op. 1, d. 655 (Kapanadze).
- 24 Ostrovskii, *Kto stoial*, 125 (引自 GF IML, f. 8, op. 2, ch. 1, d. 12, l. 176: Devdariani); RGASPI, f. 558, op. 4, d. 665, l. 128 (Parkadze); Iremashvili, *Stalin und die Tragödie*, 17. 伊列馬什維利也屬於傑夫達里阿尼的小組。成了哲學家的傑夫達里阿尼在 1937 年被貝利亞的手下槍殺。根據現有的材料，他的手稿《格魯吉亞思想史》不復存在。Rayfield, *Stalin and His Hangmen*, 49.
- 25 Iremashvili, *Stalin und die Tragödie*, 16–7. 另見 Darlington, *Education in Russia*, 286–8.
- 26 De Lon, "Stalin and Social Democracy," 170. 從姆加洛布利施維里 (Mgaloblishvili) 那裏也可以弄到這類書籍。他畢業於梯弗利斯神學院，1870 年代回到哥里，帶回

- 了一批藏匿的格魯吉亞文書籍，這批書籍成了一個事實上的圖書室。他和其他人建立了一個民粹主義小組。這個小組不可避免地遭到警方的滲透。警方在1878年實施了逮捕。(同樣重要的是，這些活動家們發現，農民對城裏人漠不關心。) Mgaloblishvili, *Vospominanii*, 120. 警方在哥里還搗毀了一個與聖彼得堡民意黨聯繫不太緊密的「武裝密謀組織」。一個在「土地與自由」社的啟發下，由神學院學生組成的行為不太出格的小組，一直堅持到1890年代。其成員包括城裏的幾個貴族子弟以及一個叫做阿爾森·卡拉納澤 (Arsen Kalanadze) 的農民後代，他經營的書攤歡迎教會學校和神學院的學生。G. Glurdzhidze, "Pamiatnye gody," 18.
- 27 Kaminskii and Vereshchagin, "Detstvo," 71.
  - 28 1898年秋，阿巴希澤學監記錄了下面這件事：「在搜查某些五年級學生物品期間，約瑟夫·朱加施維里 (V. I.) 屢次大着嗓門對學監們說話，言語中表示對搜查的不滿……」Kaminskii and Vereshchagin, "Detstvo," 65, 84. 另見 "Neopublikovannye materialy iz biografii tov. Stalina," *Antireligioznik* (Razmadze).
  - 29 "Iz besedy," (經進一步的修改) 轉載於 *Sochineniia*, XIII: 104–23 (at 113). 關於這些搜查，另見 Glurdzhidze, "Pamiatnye gody," 20; Kaminskii and Vereshchagin, "Detstvo," 66 (Vano Ketskhoveli).
  - 30 Trotsky, *Stalin* [1946], 10.
  - 31 Jones, *Socialism*, 51, 309, n11. 另見 Chelidze, *Iz revoliutsionnogo*.
  - 32 Manchester, *Holy Fathers*. 神父的兒子佔帝國人口的百分之一。
  - 33 RGASPI, f. 71, op. 10, d. 273, l. 185; Rieber, "Stalin as Georgian," 34. 達維塔施維里移民到萊比錫。
  - 34 在哥里，據說塔拉謝·姆加洛布利施維里為了保護農民，組織了地方民團。Mgaloblishvili, *Vospominaniia*, 35–6, 37–9.
  - 35 Jones, *Socialism*, 22–6.
  - 36 RGASPI, f. 71, op. 10, d. 273, l. 201–2 (Grigory Elisabedashvili). 年輕的斯大林幫助伊麗莎白施維里準備1898年夏天的考試。
  - 37 斯大林時代的回憶錄顛倒了雙方的角色："Neopublikovannye materialy iz biografii tov. Stalina," *Antireligioznik* (Razmadze).
  - 38 Ostrovskii, *Kto stoial*, 139 (citing GF IML, f. 8, op. 2, ch. 1, d. 12, l. 181: S. Devdariani); RGASPI, f. 558, op. 1, d. 665; Iremashvili, *Stalin und die Tragödie*, 21.
  - 39 Iremashvili, *Stalin und die Tragödie*, 5–6.
  - 40 拉多可能是經亞歷山大·楚盧基澤 (Aleksandr Tsulukidze) 的介紹加入第三小組，而後者是在1895年加入的。Berii and Broido, *Lado Ketskhoveli*, 9–10; Khachapuridze, "Gruzia vo vtoroi," 66; V. Ketskhoveli, "Druz'ia i soratniki tovarishcha Stalina," 75–86.
  - 41 RGASPI, f. 71, op. 10, d. 272, l. 67.
  - 42 *Katalog Tiflisskoi Deshevoi biblioteki*, 15, 17. 另見 RGASPI, f. 71, op. 10, d. 273, l. 179 (Ignatii Nonoshvili).
  - 43 RGASPI, f. 71, op. 10, d. 273, l. 85 (Parkadze); Uratadze, *Vospominaniia*, 15. 有關拉多是如何引導斯大林從事地下鬥爭的，參見 Tucker, *Stalin as Revolutionary*, 89–90.

- 44 Riasanovsky, *Teaching of Charles Fourier*.
- 45 Marx and Engels, *Communist Manifesto*, 64–5, 67.
- 46 Malia, *Alexander Herzen*. 另見 Randolph, *House in the Garden*.
- 47 俄國農民有三種制度化的存在方式：依靠貴族的私有土地生活的農奴(約42%)，生活在租用的國有土地上的國有農民(約53%)，以及隸屬皇室、地位介於農奴和國家農民之間的宮廷農民(約5%)。Kabuzan, *Izmenenie v razmeshchenii*. 另見 Crisp, “State Peasants”; Deal, *Serf and Peasant Agriculture*.
- 48 農民的土地所有權是以村社份地的形式獲得的，並由村社集體付給貴族贖金，而森林(燃料)和草場(放牧牲畜)的所有權，仍由貴族掌握，這是農民一直感到不滿的根本原因。但是，從長遠來看，即便就改變耕地的所有權模式而言，農奴解放到底起了多大作用，現在依然存有爭議。Gershchenkron, “Agrarian Policies”; Hoch, *Serfdom and Social Control*; Gattrell, *Government, Industry, and Rearmament*; Mironov, *Gosudari i gosudarevy liudi*. 1865年的國有農民土地所有權改革以比較低的價格分配給了他們同樣的土地。
- 49 Wortman, *Crisis of Russian Populism*.
- 50 Baron, *Plekhanov*; Baron, “Between Marx and Lenin”; von Laue, “The Fate of Capitalism in Russia.”
- 51 Marx and Engels, *Selected Correspondence [1944]*, 354–5. 另見 Shanin, *Late Marx*.
- 52 “Tsensura.”
- 53 Liadov, “Zarozhdenie legal'nogo,” 107ff.
- 54 Zhordania, *Moia zhizn'*, 8–9, 13, 25, 27.
- 55 Gorgiladze, “Rasprostranenie marksizma v Gruzii,” V: 472.
- 745 56 Makharadze, *Ocherki revoliutsionnogo dvizheniia*, 53, 72–3; Ostrovskii, *Kto stoial*, 141 (引自 GARF, f. 124, op. 7, d. 144, l. 1–6).
- 57 Ostrovskii, *Kto stoial*, 130–1; *Sochineniia*, VIII: 173–4.
- 58 RGASPI, f. 71, op. 10, d. 273, l. 195–7. 斯大林未來的岳父把他第一次接觸工人的時間正確地定為 1898 年。Sergei Alliluev, “Vstrechi s tovarishchem Stalinym,” 154.
- 59 *Sochineniia*, VIII: 174; Rieber, “Stalin as Georgian,” 35–9; Jones, *Socialism*, 71–5.
- 60 Jordania, “Staline, L'Écho de la lutte”; Vakar, “Stalin.”
- 61 司徒盧威接着又在 1905 年 10 月與他人共同組建了立憲民主黨，當時組黨變得合法了。
- 62 Struve, “Istoricheskii smysl russkoi revoliutsii i natsional'nye zadachi.”
- 63 參加會議的九個人，有一個死於 1911 年；有五個在 1917 年革命後不久便離開了俄國；一個在 1922 年離開俄國；兩個(包括埃傑爾曼)在斯大林的清洗中被處決。Medish, “First Party Congress.”
- 64 四年後在俄屬波蘭的比亞韋斯托克召開的第二次「成立」大會失敗了。
- 65 Carr, *Bolshevik Revolution*, I: 6–7; *Vsesoiuznaia Kommunisticheskaia Partiiia (b) v rezoliutsiiakh* (6th ed.), I: 7–10. 1900 年 1 月，當列寧在西伯利亞流放期滿之後，他和年輕的妻子娜捷施達·克魯普斯卡婭(他們是在 1898 年 7 月結婚的)搬到普斯

- 科夫，但沒過幾個月就去了德國，開始了在國外的流亡生活。Service, *Lenin*, I: 80-1; Carr, *Bolshevik Revolution*, III: 3.
- 66 RGASPI, f. 558, op. 4, d. 53, l. 2, 157 以及其他沒有編號的材料; d. 60, l. 1-4; Kaminskii and Vereshchagin, "Detstvo," 84-5 (Talakovadze); Ostrovskii, *Kto stoial*, 140-1 (被開除的學生是瓦西里·克爾巴基阿尼 (Vasily Kelbakiani)).
- 67 GIAG, f. 440, op. 2, d. 64, l. 7ob; *Dukhovnyi vestnik gruzinskogo ekzarkhata* (June 15-July 1, 1899), no. 12-13: 8; Kaminskii and Vereshchagin, "Detstvo," 86.
- 68 這是斯大林在1932年黨的調查表中寫的，而它也成了黨內的標準說法。RGASPI, f. 558, op. 1, d. 4349, l. 1; Aleksandrov, *Iosif Vissarionovich Stalin*, 10; Yaroslavsky, *O Tovarishe Staline*, 14; *Istoricheskie mesta Tblisi*, 29; Tucker, *Stalin as Revolutionary*, 91. 斯大林的母親後來想要承擔責任，說是她不讓他上學，因為他得了肺結核。實際上，凱可對他被開除非常憤怒。Smith, *Young Stalin*, 54 (引自H. R. 尼克博克 (H. R. Knickerbocker) 對凱可的採訪, *New York Evening Post*, December 1, 1930); GF IML, f. 8, op. 2, ch. 1, d. 32, l. 258-9 (Mariia Kublidze).
- 69 這些話分別是在1902年(在巴統監獄)、1910年(在巴庫)和1913年說的。Ostrovskii, *Kto stoial*, 142-3 (引自GIAG, f. 153, op. 1, d. 3431, l. 275; RGASPI, f. 558, op. 4, d. 214, l. 9ob); Montefiore, *Young Stalin*, 73 (引自RGASPI, f. 558, op. 1, d. 635 and f. 71, op. 10, d. 275).
- 70 Kaminskii and Vereshchagin, "Detstvo," 84; Montefiore, *Young Stalin*, 70-3. 阿巴希澤似乎在1898年秋天就想開除朱加施維里，但沒有成功。RGASPI, f. 558, op. 4, d. 665, l. 211-2 (Vaso Kakhanishvili); GF IML, f. 8, op. 2, ch. 1, d. 10, l. 141 (Gogokhiia); *Zaria vostoza*, August 12, 1936 (Gogokhiia); GF IML, f. 8, op. 2, ch. 1, d. 47, l. 126-7 (Talakovadze).
- 71 由於其極端的親俄立場，1905年，阿巴希澤不得不被調離格魯吉亞。他在烏克蘭(波多里亞)、突厥斯坦和克里米亞服務。1914年，他在克里米亞加入海軍，成為黑海艦隊的隨軍牧師。1918年，他拒絕承認格魯吉亞教會恢復獨立。內戰期間，他支持白軍和弗蘭格爾的軍隊，並在1919年移居國外。1920年代末，他重新在基輔露面——多年之前，他正是在那裏的神學院畢業(1896)——並成為一名隱修士，更名為安東尼。他設法逃過了給烏克蘭神職人員帶來滅頂之災的歷次清洗，後來又在納粹佔領期間倖存下來。紅軍收復基輔後不久，1943年12月，他自然死亡。他被安葬在基輔洞窟修道院，並立有大理石墓碑。Manuil (Lemeshchevskii), *Die Russischen Orthodoxen Bischöfe*, III: 27-8; Agursky, "Stalin's Ecclesiastical Background," 10.
- 72 Agursky, "Stalin's Ecclesiastical Background," 6 (引自Anonymous, *Iz vospominanii russkogo uchitelia pravoslavnoi gruzinskoi dukhovnoi seminaris* [Moscow, 1907]); 以及 Durnovo, *Sud'ba gruzinskoi tserkvi*.
- 73 Kun, *Unknown Portrait*, 30.
- 74 RGASPI, f. 71, op. 10, d. 73, l. 153-4; Kaminskii and Vereshchagin, "Detstvo," 62-6. 到1900年，據說300名學生中只有50個格魯吉亞人，而到了1905年，只有4名格魯吉亞學生畢業。庫塔伊西神學院1905年關閉。



- 75 1938年，帕沙丈夫的姑姑為了她侄媳婦的事情寫信給斯大林；信通過內務部(V. 伊萬諾夫〔V. Ivanov〕)在1938年4月16日交給了波斯克列貝舍夫。信裏特意提到斯大林母親知道孩子的存在，而黑眼睛的帕沙在丈夫、孩子和母親去世後已經沒有了親人。1938年3月，證據表明帕沙曾想要拜訪斯大林，她把自己多年來的照片和給他的信件的副本交到他的秘書處。她過去一直住在薩拉托夫省，卻在莫斯科突然消失——無疑是被捕了。Ilizarov, *Tainaia zhizn'*, 284–7 (引自RGASPI, f. 558, op. 11, d. 775, l. 9–13)。斯大林讓人把帕沙丈夫姑姑的信保存在他的檔案裏。「索索同志年輕時對某人感到有點同情，但持續的時間不長」，格里戈里·伊麗莎白施維里隱晦地說。RGASPI, f. 558, op. 1, d. 655.
- 76 Gogokhiia, “No vsiu zhizn' zapomnilos' eti dni,” 13); Montefiore, *Young Stalin*, 72–3.
- 77 有人回憶說朱加施維里在復活節假期後開學時就沒去上學，而是回了哥里老家，那時考試還沒有開始。RGASPI, f. 558, op. 4, d. 665, l. 381 (Talakovadze); GF, f. 8, op. 2, ch. 1, d. 47, l. 126–7.
- 78 Kun, *Unknown Portrait*, 32–3; Ostrovskii, *Kto stoial*, 146–7 (引自GIAG, f. 440, op. 2, d. 82, l. 59; RGASPI, f. 558, op. 4, d. 65, l. 3–3ob).
- 79 RGASPI, f. 558, op. 4, d. 65, l. 1–4; Vano Ketskhoveli, “Na zare sozdaniia partii rabocheho klassa,” *Zaria vostoka*, July 17, 1939: 3.
- 80 Dawrichewy, *Ah: ce qu'on*, 67. 伊列馬施維里聲稱，他想勸朱加施維里放棄離開神學院的念頭，因為那樣就意味着放棄了上大學的機會，但朱加施維里認為當局是不會讓他上大學的，他不管怎樣都要投身革命。Iremashvili, *Stalin und die Tragödie*, 23–4.
- 81 GF IML, f. 8, op. 2, ch. 1, d. 48, l. 164 (Elisabedashvili); d. 12, l. 28–9 (P. Davitashvili).
- 82 Montefiore, *Young Stalin*, 79; van Rec, “The Stalinist Self,” 266, 引自G. Elisabedashvili, l. V. Stalin State House Gori-Museum Fond, f. 3, op. 1, d. 1955/146, l. 1–11, 20–31 (格魯吉亞文).
- 83 GF IML, f. 8, op. 5, d. 429, l. 170 (Vano Ketskhoveli); Vano Ketskhoveli, “Na zare sozdaniia partii rabocheho klassa”; “K istorii fabrik i zavodov Tblisi”; Berdzenishvili, “Iz vospominanii”; RGASPI, f. 558, op. 4, d. 651, l. 50–3.
- 84 Jones, *Socialism*, 91.
- 85 V. Ketskhoveli, “Druz'ia i soratniki tovarishcha Stalina,” 75–86; Jones, *Socialism*, 71–2.
- 86 Iremashvili, *Stalin und die Tragödie*, 22; Vakar, “Stalin”; Tucker, *Stalin as Revolutionary*, 87–8.
- 87 RGASPI, f. 71, op. 10, d. 273, l. 240; Vano Ketskhoveli, “Iz vospominanii o Lado Ketskhoveli,” *Zaria vostoka*, August 17, 1939: 3; *Lado Ketskhoveli*, 76, 109–10.
- 88 “Neopublikovannnye materialy iz biografii tov. Stalina,” *Antireligioznik* (Kitiashvili).
- 746 89 Montefiore, *Young Stalin*, 70. (據凱可堂姊妹安娜·格拉澤〔Anna Geladze〕的說法).
- 90 RGASPI, f. 558, op. 4, d. 72, l. 5; Ostrovskii, *Kto stoial*, 160; Rieber, “Stalin as Georgian,” 39; Galoian, *Rabochee dvizhenie i natsional'nyi vopros v Zakavkaz'e*, 10–2.
- 91 Jones, *Socialism*, 70, 99.

- 92 Ostrovskii, *Kto stoial*, 161 (引自 GF IML, f. 8, op. 2, ch. 1, d. 15, l. 245: N. L. Dombrovskii).
- 93 *Lado Ketskhoveli*, 24; Jones, *Socialism*, 100–1; Tutacv, *Alliluyev Memoirs*, 49–51.
- 94 在斯大林早年，另外一個關鍵人物是當時32歲的維克托·庫爾納托夫斯基，斯大林1900年在梯弗利斯遇到了他。庫爾納托夫斯基見過列寧。Medvedev, *Let History Judge*, 30.
- 95 1938年，貝利亞認為這篇文章是斯大林和克茨霍維里合寫的。斯大林後來說自己是這篇文章的唯一作者——文章被譯成俄文，名為〈俄國社會民主黨及其當前任務〉。Sochineniia, I: 11–31 (at 27); Beriia and Broido, *Lado Ketskhoveli*, 17–33. 斯大林還假稱自己是《鬥爭報》上第一篇(未署名的)社論的作者。Sochineniia, I: 4–9; Deutscher, *Stalin*, 56–7; Jones, *Socialism*, 315.
- 96 “Podpol’naia tipografiia ‘Iskra’ v Baku (Materialy Vano Sturua),” 137–8; Yenukidze, *Nashi podpol’nye tipografii na Kavkaze*, 24; V. Ketskhoveli, “Druz’ia i soratnikitovarishcha Stalina,” 75–86; Lelashvili, “Lado Ketskhoveli,” 87–90; Jones, *Socialism*, 72–3. 沙皇政治警察發佈通告，懸賞清除革命印刷所——這引發了印刷所數量的虛報——但是有一個政治警察頭目聲稱他清除了十間，卻沒有拿到賞金。Martynov, *Moia sluzhba*, 100, 313–4.
- 97 Makeev, “Bakinskaia podpol’naia tipografiia ‘Nina’ (1901–1905),” XVII: 90–109; Arenshtein, “Tipografiia Leninskoi ‘Iskry’ v Baku”; N a lbandian, “‘Iskra’ i tipografiia ‘Nina’ v Baku,” XXIV: 3–30; Sarkisov, *Bakinskaia tipografiia leninskoi ‘Iskry.’*
- 98 Faerman, “Transportirovka ‘Iskry’ iz-za granitsy i rasprostranenie ee v Rossii v 1901–1903 gg.,” 54–92; Koroleva, “Deiatel’nost’ V. I. Lenina po organizatsii dostavki ‘Iskry’ v Rossiiu (dekabr’ 1900 g.–noiabr’ 1903 g.);” *Podpol’nye tipografii Leninskoi ‘Iskry’ v Rossii*; V. Kozhevnikova “Gody staroi Iskry” .
- 99 Lih, *Lenin Rediscovered*; Carr, *Bolshevik Revolution*, I: 11–22; Ulam, *The Bolsheviks*, 160–216.
- 100 Arkomed, *Rabochee dvizhenie*, 81–4 (at 84); Talakavadze, *K istorii*, I: 62; Rieber, “Stalin as Georgian,” 39; Talakavadze, *K istorii*, 62–3; Jones, *Socialism*, 106; van Ree, “Stalinist Self,” 267 (引自 GARF, f. 102, op. 199, d. 175, l. 93). 證據顯示，阿爾科梅德(真名S. A. 卡爾吉安(S. A. Kardjian))在1901年11月的發言引起了斯大林的反對，反對讓工人加入。阿爾科梅德的書第一版是在1910年移居國外時出的，但1923年版(只是增加了一些註釋)是在蘇聯時期出的，並設法巧妙地不點名批評了斯大林。
- 101 RGASPI, f. 70, op. 10, d.273, 292. 斯大林的反對者聲稱，黨的特別法庭把他從梯弗利斯委員會開除了，因為他陰謀反對席爾瓦·吉布拉澤。但這一說法在警方的監視記錄裏未發現任何佐證。根據監視記錄，朱加施維里沒有出席1901年11月25日梯弗利斯委員會的會議，但沒有提到開除。事實上，朱加施維里似乎是在1901年11月被選進梯弗利斯委員會的(九名委員之一)。Ostrovskii, *Kto stoial*, 169–73. 關於所謂的開除，參見Vakar, “Stalin”; Jordania, “Staline, L’Écho de la lutte,” 3–4; 以及 Uratadze, *Vospominaniia*, 67. 席爾瓦·吉布拉澤對斯大林特別不滿。1921

- 年，在布爾什維克的武裝力量重新征服高加索之後，吉布拉澤沒有選擇移居國外，而是組織孟什維克的地下活動。他在1922年2月的猝死顯然是因為健康問題；他的同志們將其遺體從「從事密謀活動的住處」搬走，但梯弗利斯的布爾什維克秘密警察把遺體沒收了。據說貝利亞跟此事有關（貝利亞當時在格魯吉亞契卡，並在1922年11月成為格魯吉亞契卡的首腦）。吉布拉澤要是有墳墓的話，墓地的位置現在依然是個謎。Urutadze, *Vospominaniia*, 278.
- 102 Tolf, *The Russian Rockefellers*. 曼塔舍夫生於梯弗利斯，長於伊朗的大不里士。Esadze, *Istoricheskaia zapiska ob upravlenii Kavkazom*; Mostashari, *On the Religious Frontier*.
- 103 Arsenidze, "Iz vospominaniia o Staline," 220–1.
- 104 那以後不久，大概是在1902年新年，這座機械化的工廠發生了一起火災，接着發生了一次小規模的罷工，然後又是一次大規模的罷工。有謠言說，24歲的朱加施維里為了籌集革命經費，讓人在羅斯柴爾德公司縱火，然後利用工人罷工進行敲詐，交換條件是以後減少縱火。這種說法是異想天開。事實上，羅斯柴爾德的工人撲滅了火災，可是領到額外補償的只有工頭，這激起了人們的怒火。另外，從1902年1月31日開始的第一次大罷工發生在A. I. 曼塔舍夫的公司，當時一名工人的工資被扣，據說是因為和工友談論工作上的事情。到1902年2月18日，由於工人對工作條件和懲罰制度的要求部分得到了滿足，曼塔舍夫公司恢復運營。
- 105 高加索的軍事長官下令對工人的居住條件進行內部調查，結果就有了具有歷史意義的第一手資料：Makharadze and Khachapuridze, *Ocherki*, 137–8 (存檔報告的日期是1903年3月28日)。
- 106 一大批參加抗議活動的曼塔舍夫工廠的工人被趕回他們老家的村子。那些村子許多都在古利亞（西格魯吉亞），這使得那裏在1902至1906年間正在發展的農民運動越演越烈。Jones, *Socialism*, 102, 129–58.
- 107 罷工開始後，庫塔伊西省的軍事長官要求工人復工；他們拒絕了。32人被捕，等候遣送。其他工人唱着革命歌曲遊行到監獄，要求要麼把他們的工友放了，要麼把大家都抓起來。這些工人被騙進轉運監獄的營房。工人們怒火中燒，導致流血衝突。Batumskaia demonstratsiia, 9–11, 99–103 (Teofil Gogoberidze), 177–202, 203–41 (at 207); Arkomed, *Rabochee dvizhenie*, 110–8.
- 108 GARF, f. 102, op. 199, d. 175, l. 47–8.
- 109 朱加施維里可能在某個時候回過梯弗利斯，去了他的朋友卡莫的住處，讓他幫忙裝配一台非法的印刷機。「卡莫是這方面的專家」，格里戈里·伊麗莎白施維里興奮地說。Ostrovskii, *Kto stoial*, 174–80; Zhvaniia, *Bol'shevistskaia pečat' Zakavkazia nakanune*, 70; Chulok, *Ocherki istorii batumskoi kommunisticheskoi organizatsii*, 39–52. 據說一個叫姆什韋奧巴澤 (Mshviobadze) 的列車員用制服、帽子和提燈幫斯大林喬裝打扮，偷偷把他從巴統帶到了梯弗利斯。RGASP, f. 558, op. 1, d. 655; Kun, *Unknown Portrait*, 4.
- 110 Van Ree, "The Stalinist Self," 270 (引自 RGASPI, f. 124, op. 1, d. 1931, l. 11: Todriia recollections); *Batumskaia demonstratsiia*, 98–9 (Todriia).

- 111 Rayfield, *Stalin and His Hangmen*, 26; Kun, *Unknown Portrait*, 59; Alliluyeva, *Vospominaniia*, 37, 168.
- 112 Pokhlebin, *Velikii pseudonym*, 47–50. 蒙蒂菲奧里利用回憶錄中的材料，把朱加施維里描寫成「巴統監獄的主要頭目，控制自己的朋友，恐嚇知識分子，買通看守並和罪犯交朋友」。Montefiore, *Young Stalin*, 103. 可以比較一下烏拉塔澤流亡後寫的回憶錄：「在我們出來放風、大家都走到監獄院子中這個那個角落的時候，斯大林獨自一人，小步前後走動，要是有人想跟他說話，他就會張開嘴，露出他冷冷的笑容，偶爾說上幾句。」Uratadze, *Vospominaniia*, 65.
- 113 Ostrovskii, *Kto stoial*, 194; RGASPI, f. 558, op. 4, d. 619, l.172, 轉載於 *Sochinenia*, XVII: 7–8.
- 114 醫生名叫格里戈里·埃利阿娃 (Grigol Eliava)。1903年初，在等待流放的時候，25歲的朱加施維里本來會被徵召加入沙皇軍隊，但是在家裏一位很有勢力的朋友的干預下，被免除了兵役。Ab: *ce qu'on*, 31.
- 115 Alliluev, *Proidennyi put'*, 109.
- 116 他前腳回來，梯弗利斯社會民主黨人後腳就遭到大逮捕，這更加讓人覺得他的突然返回比較可疑。Ostrovskii, *Kto stoial*, 212–6; RGASPI, f. 558, op. 4, d. 537, l. 21 (M. Uspenskii); *Perepiska V. I. Lenina.*, II: 114–5.
- 117 Makharadze and Khachapuridze, *Ocherki*, 71; Chulok, *Ocherki istorii batumskoi kommunisticheskoi organizatsii*, 70–2.
- 118 Ostrovskii, *Kto stoial*, 214 (引自 GF IML, f. 8, op. 2, d. 4, l. 53: Makharadze, and ch. 1, d. 6, l. 231: Boguchava); Arsenidze, "Iz vospominanii o Staline," 218.
- 119 Ostrovskii, *Kto stoial*, 216 (引自 GF IML, f. 8., op. 2, ch. 1, d. 43, l. 217: Sikharulidze); Montefiore, *Young Stalin*, 123 (引自 GF IML f. 8, op. 2, ch. 1, d. 26, l.22–6: Sikharulidze, and d. 26, l.36–9: Sikharulidze).
- 120 Alliluev, *Proidennyi put'*, 108–9.
- 121 *Machiavelli, Gosudar'*.
- 122 Tun, *Istoriia revoliutsionnykh dvizhenii v Rossii*.
- 123 Makharadze, *K tridsatiletiiu sushchestvovaniia Tiflisskoi organizatsii*, 29.
- 124 Jones, *Socialism*, 183–4.
- 125 Davis, "Stalin, New Leader"; Davis, *Behind Soviet Power*, 14. 有關戴維斯的內容，詳見第十三章。在羅伯特·塔克寫的斯大林傳記中，他強調了斯大林的馬克思主義信仰，這樣做無可厚非，但他對於斯大林向馬克思主義立場的轉變，說得有點簡單化和戲劇化：「階級鬥爭的宏大主題……過去和現在的社會是一個巨大的戰場，兩大敵對階級——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被困其中並作殊死的搏鬥。」實際上，就像斯大林本人解釋的，僅僅是因為生活在帝俄，就把許多青年變成了馬克思主義者。Tucker, *Stalin as Revolutionary*, 115–21.
- 126 《斯大林全集》收錄的頭兩篇文章是1901年發表在《鬥爭報》上的兩篇未署名文章。除了浪漫主義詩歌之外，他的第一篇署名文章發表在1904年9月1日。*Sochineniia*, I: 3–55.

- 127 Arsenidze, "Iz vospominaniia o Staline," 235–6.
- 128 關於作為「老同志」的拉多，另見 Yenukidze, *Nashi podpol'nye tipografii na Kavkaze*, 5, 24; 以及 Rieber, "Stalin as Georgian," 36–7.
- 129 Alliluev, "Moi vospominaniia," 173–5; Boltinov, "Iz zapisnoi knizhki arkhivista," 271–5; Ulam, *Stalin*, 38. 在克茨霍維里遭到槍殺後，副省長趕緊趕到監獄。一小隊哥薩克迅速把屍體運走掩埋了。Beria and Broido, *Lado Ketskhoveri*, 201–18 (esp. 214).
- 130 Beria and Broido, *Lado Ketskhoveri*, 這是斯大林恐怖時期在高加索出版的；Guliev, *Muzhestvennyi borets za kommunizm*.
- 131 RGAKFD, ed. khr. 15421 (1937).

### 第三章 沙皇制度最危險的敵人

- 1 Ascher, "The Coming Storm," 150. 這位名叫 C. 金斯基 (C. Kinsky) 的使館隨員是阿洛伊斯·萊克薩·馮·埃倫塔爾 (Aloys Lexa von Achrenthal, 1854–1912) 大使的手下。
- 2 Kabuzan, *Russkie v mire*.
- 3 Hughes, *Peter the Great*, 11.
- 4 Klyuchevsky, *Peter the Great*, 257, 262–5.
- 5 引自 Bushkovitch, *Peter the Great*, 210; 譯自德語，稍作修改。
- 6 Peterson, *Peter the Great's Administrative and Judicial Reforms*; Anisimov, *Reforms of Peter the Great*; Zitser, *Transfigured Kingdom*.
- 7 1730 年，兩個貴族家族限制皇權的嘗試——設置登上皇位的條件——之所以失敗，主要是因為其他貴族家族的反對。Waters, *Autocracy and Aristocracy*.
- 8 Hellie, "Structure of Russian Imperial History." 斯大林統治時期，這種效忠的義務，其範圍已經從國家工作人員和軍官擴大到工廠管理人員、集體農莊主席、科學家、作家、音樂家甚至芭蕾舞演員。
- 9 Raeff, "Bureaucratic Phenomenon"; Raeff, "Russian Autocracy"; Cherniavsky, *Tsar and People*, 82–90; Taranovski, "The Politics of Counter-Reform," chap. 5; Lieven, *Aristocracy in Europe*. 勒多內認為，當時俄國的確形成了具有自我意識的統治精英。LeDonne, *Absolutism and Ruling Class*. 另見 Torke, "Das Russische Beamtentum."
- 10 引自 Yanov, *Origins of Autocracy*, vii.
- 11 Vasil'chikov, *Vospominaniia*, 142–4, esp. 227–8; Lieven, "Russian Senior Officialdom," 221.
- 12 Vitte, *Vospominaniia* [1960], III: 460.
- 13 Dickson, *Finance and Government*.
- 14 Robbins, "Choosing the Russian Governors," 542; Robbins, *Tsar's Viceroys*; Keep, "Light and Shade."
- 15 *Otchet po revizii Turkestanskogo kraia*, 38, 47; Khalid, *Politics of Cultural Reform*, 60. 斯拉夫人常被送到突厥斯坦以示懲戒，而該地區差不多完全成了殖民地。沙皇政權

想要把塔什干變成其治下的模範城市，但是在19世紀末，從倫敦到印度很可能都比從聖彼得堡到突厥斯坦容易。

- 16 Zaionchkovskii, *Pravitel'stvennyi apparat samoderzhavnoi Rossii v XIX v.*, 221–2; Troitskii, *Russkii absoliutizm i dvorianstvo v XVIII veke*, 212–6; Rogger, *Russia in the Age of Modernization*, 49–50; Figes, *A People's Tragedy*, 46. 嚴格說來，醫生、大學教授、工程師以及其他許多專業人員，都屬於國家官員，這樣一來，這些數字和比較就不太精確了。根據另外一種說法，到1900年為止，從事行政事務的有52.4萬人。Freeze, "Reform and Counter-Reform," 170–99 (at 186). 到1912年為止，據說俄國每60名城市居民就有1名工作人員，而農村居民每707名才有1名工作人員。Rubakin, *Rossia v tsifrah*, 64.
- 17 Hoetzsch, *Russland*, 270.
- 18 Häfner, *Gesellschaft als lokale Veranstaltung*. 另見 Starr, *Decentralization and Self-Government*.
- 19 Yevtuhov, *Portrait of a Russian Province*.
- 20 Polovtsov, *Dnevnik*, I: 477; Suvorin, *Dnevnik*, 25, 327; Lamzdorf, *Dnevnik*, 310. 另見 Rogger, *Russia in the Age of Modernization*, preface.
- 21 參見科科夫佐夫 (Kokovtsov) 的評論，Lieven, "Russian Senior Officialdom," 209 (引自 TsGIAL, f. 1200, op. 16/2, d. 1 and 2, s. 749); Lieven, *Russia's Rulers*, 292. 貴族們強烈反對亞歷山大一世統治時期開始採用的考試制度；1834年，考試制度被取消。
- 22 Taishchev, *Imperator Aleksandr Vtoroi*, I: 140.
- 23 Baumgart, *Crimean War*, Stephan, "Crimean."
- 24 Rieber, "Alexander II"; Rieber, *Politics of Autocracy*.
- 25 Miliukov, *Ocherki po istorii Russkoi kul'tury*, I: 145–9. 關於俄國的自由主義，參見 Leontovitsch, *Geschichte des Liberalismus*; Fischer, *Russian Liberalism*; Karpovich, "Two Types of Russian Liberalism," 129–43; Raeff, "Some Reflections"; Pipes, *Peter Struve*; Shelokhaev, *Russkii liberalizm*. 748
- 26 Valuev, *Dnevnik P. A. Valueva*, I: 181. 其中的一個擔心是，議會會成為波蘭貴族的跳板。
- 27 Pravilova, *Zakonnost' i prava lichnosti*; Wortman, "Russian Monarchy and the Rule of Law" 國家工作人員只有在得到其上級批准的情況下才可以受到起訴和審判。Korkunov, *Russkoe gosudarstvennoe pravo*, II: 552.
- 28 1860年代以及1880年代又一次沒能頒行憲法和設立立法機關，對於由此造成的長遠影響，參見 George F. Kennan, "The Breakdown of the Tsarist Autocracy," 載於 Pipes, *Revolutionary Russia*, 1–15.
- 29 Makarov, *Sovet ministrov Rossiiskoi Imperii*, 41.
- 30 Dolbilov, "Rozhdenie imperatorskikh reshenii."
- 31 Chavchavadze, *The Grand Dukes*, 128.
- 32 Lauchlan, *Russian Hide-and-Seek*, 57–74. 另見 Laporte, *Histoire de l'Okhrana*; Monas, *The Third Section*, 40–1; Hingley, *The Russian Secret Police*; Zuckerman, *The Tsarist Secret Police*,

- Ruud and Stepanov, *Fontanka 16*; Peregudova, *Politicheskii sysk Rossii*; 以及 Shchegolev, *Okhranniki i avantiuristy*.
- 33 Vasilyev, *Ochrana*, 41, 55, 57. 到1913年為止，一共有七個暗室。Kantor, "K istorii chernykh kabinetov," 93. 保安處負責破譯密碼的頭目後來受僱於蘇維埃秘密警察。Hoare, *Fourth Seal*, 57. 基輔保安處的特工卡爾·西韋爾特 (Karl Zivert) 發明了一種方法，可以不破壞封蠟就取出信件，這種技術後來傳給了克格勃。Kahn, *Codebreakers*. 梯弗利斯的暗室在1905年短暫關閉過，那裏有七名工作人員。
- 34 當杜爾諾沃在1905年底成為內務大臣時，他發現了一封被截獲的信件，那封信是他自己寫的，他在信中命令，不許拆看他自己的郵件。Lauchlan, *Russian Hide-and-Seek*, 122. 另見 Gurko, *Features and Figures*, 109. 按照俄國的法律，嚴格來說，拆看他人郵件是違法的；暗室工作人員都使用代號來指稱自己。但他們在1908年被一位名叫 M. E. 巴凱 (M. E. Bakai) 的前高級僱員揭露出來。
- 35 Daly, *Autocracy Under Siege*, 105. 俄國人數最多的警察類別是憲兵隊，有1萬到1.5萬人。
- 36 Monas, "The Political Police," 164–90. 莫斯科保安處處長祖巴托夫 (Zubotov) 開始採取最新的記錄方式、建立人體測量學的檔案並設立省級分支機構。他於1917年自殺。Zhilinskii, *Organizatsiia i zhizn' okhrannago otdeleniia*, 120.
- 37 Lauchlan, *Russian Hide-and-Seek*, 167, n77.
- 38 瓦西里耶夫講了一個名叫斯廖托夫 (Sletov) 的人的故事。斯廖托夫帶了行動小組來到聖彼得堡，準備暗殺尼古拉二世。他的一個熟人是保安處的線人。不過，斯廖托夫的計劃雖然引起了最高警察當局的注意，可他並沒有被逮捕。警方的考慮是，保安處可能還不知道這起陰謀的其他參與者。於是，警方就讓人警告斯廖托夫，說他已暴露，希望促使他的整個小組逃跑以便對其加以監視。對皇帝的直接威脅被化解了。雖然有些逃掉的人將來還會進行政治暗殺，但至少現在警方可以確信，這些人全都在他們的掌握之中。Vasilyev, *Ochrana*, 71–2.
- 39 Vasilyev, *Ochrana*, 71–2; Lauchlan, *Russian Hide-and-Seek*, 221; Ruud and Stepanov, *Fontanka 16*, 125–51. 瓦西里耶夫解釋說，招募的密探過着雙重生活，他們有時會突然精神失控，以致「警方的官員常常會被為他們效力的密探殺害，而那些密探在當時一直顯得絕對可靠」(*Ochrana*, 77–8)。
- 40 Lauchlan, *Russian Hide-and-Seek*, 90–1. 1905年單獨設立了一個負責宮廷安全的機構 (okhrana)；當時規模大得多的保安處 (okhranka) 並不叫 okhrana。斯大林後來不但遇到監視他的幾位警察頭目，甚至還遇到過幾位刺客。
- 41 Pipes, *The Degaev Affair*. 聯合起來的社會革命黨直到1905年12月至1906年1月才在俄屬芬蘭召開了第一次正式的代表大會。Sletov, *K istorii vozniknoveniia partii sotsialistov revoliusionerov*, 76–8.
- 42 Levine, *Stalin's Great Secret*; Smith, *Young Stalin*; Brackman, *Secret File*. 雖然費了很大的力氣，但無論是尼古拉·葉若夫還是拉夫連季·貝利亞，似乎都沒有找到令人信服的、可以證明所謂斯大林是為保安處工作的文件材料。而像羅曼·馬利諾夫斯基等人，他們還在世的時候就被揭露出來與保安處有聯繫。Montefiore, *Young Stalin*, xxiii.

- 43 托洛茨基後來遭到指控，說他在1905年向警方出賣聖彼得堡蘇維埃，並從1902年開始就成了保安處的密探。Shul'gin, *Chto nam v nikh ne nraivitsia*, 281; Volkogonov, *cmc Trotsky*, 40. 在對托洛茨基的起訴書中，斯大林沒有採用葉若夫和貝利亞報告的材料，這或許是因為它也會讓人聯想到有關斯大林的種種傳聞。雅科夫·斯維爾德洛夫當時也受到懷疑。Lipatnikov, "Byl li agentom okhranki Sverdlov?" 後來，加米涅夫也被指控同保安處有聯繫。Trotsky, *Stalin*, 221; Slusser, *Stalin in October*, 201-4.
- 44 Vasilyev, *Ochraha*, 96. 另見Daly, *Autocracy Under Siege*, 117-23.
- 45 有位學者總結得很好：「舊政權根本沒有領會現代產業經濟的需要。」Gatrell, *Government, Industry, and Rearmament*, 326. 對沙皇時期經濟業績的比較研究，參見Gregory, *Russian National Income*.
- 46 Gann, "Western and Japanese Colonialism," at 502.
- 47 Kotkin, "Modern Times."
- 48 Fridenson, "The Coming of the Assembly Line to Europe," 159-75; Hounshell, *From the American System to Mass Production*.
- 49 Conant, *Wall Street and the Country*; Feis, *Europe: the World's Banker*.
- 50 Davis, *Late Victorian Holocausts*.
- 51 Cotton, *New India*, 83.
- 52 Headrick, *Tools of Empire*.
- 53 當時俄國的工業產值只有美國的10%。Gregory, *Before Command*, 17-22.
- 54 當威廉·富勒問「在18世紀和19世紀初，俄國政權很成功地將其軍事資源轉化成權力，而此後同樣的事情卻很不成功，這是怎麼回事以及為甚麼」時，他在俄國國內的因素中找到了答案。但實際上，他可以參考其他大國取得的進步。從軍事角度來說，俄國的成敗也總是相對的。Fuller, *Strategy and Power*, xiv.
- 55 Kingston-Mann, "Deconstructing the Romance of the Bourgeoisie." 1893年，丹尼爾遜用化名發表了他自己的答案，那是對馬克思的俄式解讀：Nikolai-on, *Ocherki nashego poreformennogo obshchestvennogo khoziaistva*.
- 56 *Rossia: Entsiklopedicheskii slovar'*, 192-209. 1903年12月，英國首相亞瑟·鮑爾弗(Arthur Balfour)指出了這樣一個顯而易見的事實，即「俄國的優勢在於其龐大的人口和不易進攻的領土。劣勢是財政。」Neilson, *Britain and the Last Tsar*, 242.
- 57 1888年，帝國用在格魯吉亞的年度開支據估計有4,500萬盧布，而格魯吉亞的財政收入只有1,800萬。Kondratenko, *Kratkii ocherk ekonomicheskogo polozhenia Kavkaza po noveishim ofitsial'nym i drugim otchetam*, 77.
- 58 Hickey, "Fee-Taking"; van de Ven, "Public Finance."
- 59 Crisp, *Studies in the Russian Economy*, 26-8; Babkov, "National Finances," 184; Dmitriev, *Kriticheskie issledovaniia o potreblenii alkogoliia v Rossii*, 157.
- 60 Fuller, *Strategy and Power*; Pogrebinskii, *Ocherki istorii finansov dorevolutsionnoi Rossii*, 176. 到1913年為止，在俄國政府的開支中，軍事佔30%。這要低於18世紀時的60%，當時國家在人力資本上（教育、健康等等）的投入近乎為零。Gatrell, *Russia's First World War*, 8; Kahan, *The Plow*, 336.



- 61 Rieber, "Persistent Factors," 315–59; LeDonne, *Russian Empire and the World*.
- 62 Daly, *Autocracy Under Siege*, 108–10; Spiridovich, *Zapiski zhandarma*, 81–2.
- 63 Aleksander I. Spiridovich, "Pri tsarskom rezhime," Gessen, *Arkhiv russkoi revoliutsii*, XV, at, 141. 另見 Pipes, *Russian Revolution*, 4.
- 64 Schneiderman, *Sergei Zubatov and Revolutionary Marxism*.
- 65 Gregory, "Grain Marketings and Peasant Consumption"; Goodwin and Grennes, "Tsaria Russia."
- 66 Sukennikov, *Krestianskaia revoliutsiia na iuge Rossii*.
- 67 Jones, *Socialism*, 129–58; Shanin, *Rots of Otherness*, II: 103–7.
- 68 Borzunov, "Istoriia sozdaniia transsibirskoi zhelezno-dorozhnoi magistrali."
- 69 Westwood, *History of Russian Railways*; Westwood, *Historical Atlas*.
- 70 Marks, *Road to Power*, 35–41.
- 71 *Sibir' i velikaia zhelznaia doroga*, 211; Putintsev, "Statisticheskii ocherk Tomskoi gubernii," 83–4. 1880年代，西伯利亞在俄國黃金產量中所佔的比例已經在下降，但仍有80%。
- 72 Marks, *Road to Power*, 184, 217; McCullough, *Path Between the Seas*, 173, 610. 蘇聯早期的計劃制定者把這條鐵路視為先驅：Grinevetskii, *Poslevoennye perspektivy Russkoi promyshlennosti*, 62.
- 73 Kann, "Opyt zheleznodorozhnogo stroitel'stva v Amerike i proektirovanie Transsiba," 114–36.
- 74 Kaufman, "Cherty iz zhizni gr. S. Iu. Witte"; McDonald, *United Government*, 11–30.
- 75 Yaney, "Some Aspects of the Imperial Russian Government."
- 76 *Ministerstvo vnutrennykh del; Ministerstvo finansov, 1802–1902*.
- 77 國土部(1837–1894)變成了「農業與國土部」(1894–1905)，後來又變成「土地開墾與農業總局」(1905–1915)。*Sel'sko-khozyaystvennoe vedomstvo*. 從形式上來說，單獨的農業部只存在於戰爭期間(1915–1917)。
- 78 Yaney, "Some Aspects of the Imperial Russian Government," 74.
- 79 Kuropatkin, *Russian Army*, I: 139–40.
- 80 von Korostowetz, *Graf Witte*, 20.
- 81 "Dokladnaia zapiska Witte Nikolaiu II"; von Laue, *Sergei Witte*, 1–4; von Laue, "Secret Memorandum."
- 82 Von Laue, "High Cost."
- 83 Wcislo, *Tales of Imperial Russia*, esp. 104–11.
- 84 Gurko, *Features and Figures*, 56–61; Wcislo, *Tales of Imperial Russia*, 144–53; Urusov, *Zapiski tri goda*, 588. 另見 Harcave, *Count Sergei Witte*.
- 85 Romanov, "Rezentsiia," 55.
- 86 Lieven, *Russia's Rulers*, 139 (引自 *Novoe vremia*, September 9, 1915: 3).
- 87 Iswolsky, *Recollections of a Foreign Minister*, 121; Gurko, *Features and Figures*, 259.
- 88 Romanov, *Rossia v Man'chzhurii*, 11, n2; Geyer, *Russian Imperialism*, 186–219.

- 89 Malozemoff, *Russian Far Eastern Policy*. 另見 Schimmelpenninck, *Toward the Rising Sun*.
- 90 Williamson, "Globalization," 20.
- 91 O'Rourke and Williamson, *Globalization and History*.
- 92 LaFeber, *The Clash*, 67; Aydin, *Politics of Anti-Westernism in Asia*, 81.
- 93 Gann, "Western and Japanese Colonialism," at 503.
- 94 Sergeev, *Russian Military Intelligenc*, 31–52; Fuller, *Strategy and Power* 328–9. 1899年，有位俄國官員嘆道：「要是俄國的外交官更警覺一些，更主動一些，他們在1894至1895年的(中日)戰爭期間，就可以同日本秘密達成諒解，共同瓜分遠東。」轉引自 Lensen, "Japan and Tsarist Russia," at 339, n9.
- 95 Westwood, *Russia Against Japan*, 22; White, *Diplomacy of the Russo-Japanese War*, 142–3; Nish, *Origins of the Russo-Japanese War*, 241–2.
- 96 Ferris, "Turning Japanese," II: at 129.
- 97 Ukhtomskii, *Puteshestvie na Vostok ego imperatorskogo vysochestva gosudaria naslednika tsarevicha*; Shin, "The Otsu incident."
- 98 McDonald, *United Government*, 31–75; Esthus, "Nicholas II"; Gurko, *Features and Figures*, 264; March, *Eastern Destiny*, 173–84.
- 99 Koda, "The Russo-Japanese War."
- 100 *Vpered!*, January 1, 1905; Pavlovich, "SSSR i vostok," 21–35.
- 101 尼古拉在日記中寫道：「現在，關於整個分艦隊在兩天的戰鬥中幾乎全軍覆沒的可怕消息，終於得到證實。」*Dnevnik imperatora Nikolaia II* (1923), 201.
- 102 Lieven, *Empire*, 159.
- 103 Menning, *Bayonets Before Bullet*, 152–99; Nish, "Clash of Two Continental Empires," I: 70.
- 104 *Dnevnik Imperatora Nikolaia II* 1991, 315.
- 105 Trusova, *Nachalo pervoi russkoi revoliutsii*, 28–30; Field, "Petition Prepared for Presentation to Nicholas II."
- 106 Gapon, *Story of My Life*, 144, 180–8; Gurko, *Features and Figures*, 345; Galai, *Liberation Movement in Russia*, 239; Pankratova, *Revoliutsiia*, IV: 103, 811, n112; Zashikhin, "O chisle zhertv krovavogo voskresen'ia"; Ol'denburg, *Istoriia tsarstvovaniia Imperatora Nikolaia II*, I: 265–6.
- 107 Heenan, 轉引自 Askew, "An American View," 43.
- 108 Savich, *Novyi gosudarstvennyi stroi Rossii*, 11–14; Daly, *Autocracy Under Siege*, 168–9; Verner, *Crisis of Russian Autocrac*, 182–217.
- 109 Martynov, *Moia sluzhba*, 59.
- 110 Zhordania, *Moia zhizn'*, 44. 1905年的頭十個月，為了恢復秩序，至少出動軍隊 2,699次(相比之下，1900年只有29次)。
- 111 Robbins, *The Tsar's Viceroy*, 230–2 (引自 I. F. Koshko, *Vospominania gubernatora [1905–1914 gg.]: Novgorod, Samara, Penza [Petrograd, 1916]*, 83–8). 1904年7月，高加索總督戈利岑(Golitsyn)在一次恐怖襲擊中受傷身亡。接替他的是精力充沛的伊拉里

翁·沃龍佐夫伯爵 (Illarion Vorontsov)，一位馬主兼石油投資商，他和沙皇關係密切，結果成了總督 (該職位已經恢復)。沃龍佐夫在1905年請求辭職，但被迫留任 (直到1915年)。

- 112 Westwood, *Russia Against Japan*, 135, 153.
- 113 谷壽夫 (Tani Toshio) 在他有關這場戰爭的秘史的書中，認為責任在於日本的情報機關，而羅伯特·瓦利恩特則認為應歸功於俄國人的防衛。Valliant, "Japan and the Trans-Siberian Railroad," 99.
- 114 Fuller, *Strategy and Power*, 403–4; Steinberg, *All the Tsar's Men*, 121.
- 115 Geyer, *Russian Imperialism*, 234–6.
- 116 White, *Diplomacy of the Russo-Japanese War*, 227ff.
- 117 Aydin, *Politics of Anti-Westernism*, 71–92 (at 73: Alfred Zimmern of Oxford University), 另見 Barraclough, *Introduction to Contemporary History*.
- 118 明石元二郎 (Akashi Motojirō)，《落花流水》 (*Rakka ryūsui*)。保安處截獲了他的郵件並出版了一本小冊子——《革命的陰暗面：日本經費與俄國的武裝暴動》 (1906)，詳細披露了那位大佐的活動。 *Iznanka revoliutsii: Vooruzhennoe vozstanie v Rossii na iaponskie sredstva* (St. Petersburg: A. S. Suvorin, 1906)。這本小冊子10戈比一本。明石被從德國召回，獲任命為日本在殖民地朝鮮的憲兵首腦，在那裏率先採取了那種讓他出名的鎮壓手段。
- 119 Roy A. Medvedev, "New pages from the Political Biography of Stalin," 載於 Tucker, *Stalinism*, 199 (at 200–1)。阿爾申等於16韋爾紹克，相當於28英寸。
- 120 Von Laue, *Sergei Witte*, 40.
- 121 轉引自 Makharadze and Khachapuridze, *Ocherki*, 135。另見 Chakhvashvili, *Rabochee dvizhenie*, 63.
- 122 除了朱加施維里之外，高加索赤色百人團的組織者還包括米霍·茨哈卡雅、菲利普·馬哈拉澤、米霍·博恰里澤 (Mikho Bocharidze)、布杜·姆季瓦尼和孟什維克派的席爾瓦·吉布拉澤。 Talakavadze, *K istorii*, I: 143; Parkadze, "Boevye bol'shevistskie druzhiny v Chiature v 1905 gody," 46–50。另見 Montefiore, *Young Stalin*, 112; 以及 van Ree, "The Stalinist Self," 275–6.
- 123 "Predislovie k pervomu tomu," 載於 *Sochineniia*, I: 10; XVII: 622–37 (斯大林自己的描述，見於瓦西里·D. 莫恰洛夫 [Vasily D. Mochalov] 1945年12月28日在克里姆林宮一次會議上所做的筆記)；Service, *Stalin*, 54–5 (引自謝爾蓋·卡夫塔拉澤 [Sergei Kavtaradze] 未公開發表的格魯吉亞文回憶錄)；Tucker, *Stalin as Revolutionary*, 140–1.
- 124 "Kak ponimaet sotsial demokratiia natsional'nyi vopros?," *Sochineniia*, I: 32–55 (引自 *Proletariatis Brdzola*, Sept. Oct. 1904)。另見 Tucker, *Stalin as Revolutionary*, 140–1.
- 125 RGASPI, f. 71, op. 10, d. 183, l. 111, 轉引自 van Ree, *Political Thought of Joseph Stalin*, 69.
- 126 拉米施維里後來在巴黎被蘇聯特工暗殺。參見 Chavichvili, *Patrie, prisons, exil*。恰維施維里 (1886–1975) 是社會民主黨記者，移民後從事與國際聯盟有關的記者工作。

- 127 Ostrovskii, *Kto Stoial*, 231–6 (引自 GF IML, f. 8, op. 5, d. 320, l.2–2ob); Trotsky, *Stalin*, 59; Tucker, *Stalin as Revolutionary*, 104. 1904年11月底，在梯弗利斯召開的第一次外高加索布爾什維克代表會議上，朱加施維里是12名代表之一。他們成立了單獨的「高加索局」（現在還不清楚朱加施維里是不是一開始就是其中一員），討論了即將於1905年4月在倫敦召開的布爾什維克代表會議——它被托洛茨基稱為「布爾什維主義的立憲會議」。在倫敦的4名高加索（布爾什維克）代表是加米涅夫、茨哈卡雅、賈帕里澤（Japaridze）和涅夫斯基。朱加施維里當時還在奇阿圖拉。RGASPI, f. 558, op. 4, d. 651, l.226–7 (M. Chodrishvili); *Perepiska V. I. Lenina*, III: 215–22; Tararuta, "Kanun revoliutsii 1905 g. na Kavkaze,"; Moskalev, *Bol'shevistskie organizatsii Zakavkaz'ia Pervoi ruskoi revoliutsii i v gody stolypinskoi reaksii*, 72; Ostrovskii, *Kto stoial*, 223.
- 128 RGASPI, f. 558, op. 4, d. 649, l. 361 (S. Khanoian, *Zaria vostoka*, January 24, 1925); op. 1, d. 938, l.5–8; Jones, *Socialism*, 122; Talakavadze, *K istorii*, 119–20; Bibineishvili, *Kamo*, 70; Chavichvili, *Patrie, prison, exil*, 68–9, 71–9, 88–9, 92, 113, 116–7; Ostrovskii, *Kto stoial*, 231–6; van Ree, 271; *Sochineniia*, I: 99–103.
- 129 Getzler, *Martov*, 219, 引自 Martov, *Vpered' ili nazad?* (Geneva, 1904), 2.
- 130 PSS, VI: 126–7.
- 131 「誰有刀槍，誰就有麵包」，出自布朗基之口的這句話，出現在墨索里尼早期的社會主義報紙《意大利人民報》的報頭上。
- 132 Lih, *Lenin Rediscovered*. 利赫取得了許多突破，他還證明了列寧距離考茨基歸根結底沒有那麼遠。後者在1899年寫道：「社會民主黨是富有鬥爭精神的無產階級政黨；它要做的就是啟發和教育無產階級，把它組織起來，想盡一切辦法擴大它的政治和經濟力量，佔領一切能夠佔領的陣地，從而讓它強大和成熟起來，並最終使它能夠奪取政權並推翻資產階級統治」（87–88）。
- 133 Ulam, *The Bolsheviks*, 193–4.
- 134 Sapir, *Fedor Il'ich Dan*, 50–5. 曾經和馬爾托夫一起幫助列寧反對崩得分子的費奧多爾·唐恩，也是把列寧最初的幾本《怎麼辦？》（1902）放在手提箱夾層裏偷偷帶進俄國的人之一。整個1940年代，移居國外的唐恩始終認為布爾什維主義和孟什維主義是互補的而不是對立的。參見Liebich, "Menshevik Origins." 警察也在追捕崩得分子。從1903年6月至1904年7月，有近4,500名崩得成員被捕。Minzeles, *Histoire générale du Bund*, 119.
- 135 Iremashvili, *Stalin und die Tragödie*, 21–3; Arsenidze, "Iz vospominaniia o Staline," 235; 以及 Tucker, *Stalin as Revolutionary*, 99, 133–7. 「要是沒有列寧，」斯大林本人晚年若有所思地說，「我還是個唱詩班的男生和神學院的學生。」當然不是這麼回事：朱加施維里在瞭解——如果說有點瞭解——列寧之前，早就離開了唱詩班和神學院。Mgeladze, *Stalin*, 82.
- 136 Himmer, "First Impressions Matter." 1905年11月26至30日，在梯弗利斯召開了俄國社會民主工黨高加索聯盟代表會議，與會者討論了布爾什維克和孟什維克統一的必要性，並選出三名代表參加即將舉行的第五次黨的代表大會（譯註：此處說法有誤，應為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第一次代表會議或布爾什維克代表會議。）：朱

- 加施維里、彼得·蒙京 (Pyotor Montin) 以及格里戈里·捷利亞。RGASPI, f. 558, op. 4, d. 655, l. 185 (G. Parkadze). 這次代表大會本來是準備在聖彼得堡召開的，但內務大臣杜爾諾沃 12 月 3 日對聖彼得堡蘇維埃成員大肆逮捕，迫使會議更改地點。Ostrovskii, *Kto stoial*, 242–5.
- 137 列寧和克魯普斯卡婭將在 1906 年 8 月避居沙皇治下的芬蘭，接着又在 1907 年 12 月再次流亡歐洲。
- 138 Stalin, “O Lenine,” 轉載於 *Sochineniia*, VI: 52–64 (at 54). 另見 Souvarine, *Stalin*, 82; Trotsky, *Stalin*, 69; Dawrichewy, *Ab: ce qu'on*, 160, 212–3.
- 139 Medvedev, *Let History Judge*, 97. 聖彼得堡蘇維埃在 1905 年成立的詳情現在還有爭議。Voline, *Unknown Revolution*; Trotsky, *1905* [1922]; Trotsky, *1905* [1971]. 另見 Samoilov, *Pervyi sovet rabochikh deputatov*.
- 140 轉引自 Verner, *Crisis of Russian Autocracy*, 234; “Perepiska Nikolaia II i Marii Fedorovny.”
- 141 Maksakov, “Iz arkhiva S. Iu. Vitte” and “Doklady S. Iu. Vitte Nikolaiu II,” 107–43, 144–58; Gurko, *Features and Figures*, 396; Verner, *Crisis of Russian Autocracy*, 228–33; Witte, *Samoderzhavie i zemstvo*, 211. 1908 年，在被問到對專制制度所作的政治改革時，據說維特是這樣回答的：「我頭腦裏有部憲法……但至於我心裏……」說到這裏，他朝地上吐了口唾沫。Pares, *My Russian Memoirs*, 184.
- 142 Trepov, “Vespoddancishaia zapiska D. F. Trepova.”
- 143 Mehlinger and Thompson, *Count Witt*, 29–46.
- 144 Vitte, *Vospominaniia* [1923–24], III: 17, 41–2; Pilenko, *At the Court of the Last Tsar*, 97; “Zapiska A. F. Redigera o 1905 g.” *Krasnyi arkhiv*, 1931, no. 14: 8. 大公起初是支持鎮壓的，但他的想法變了。“Zapiska Vuicha,” in Vitte, *Vospominaniia* [1960], III: 22.
- 145 *Svod zakonov Rossiiskoi imperii*, I: 2; Savich, *Novyi gosudarstvennyi stroi Rossii*, 24–5; Ascher, *Revolution of 1905*, II: 63–71.
- 146 Borodin, *Gosudarstvennyi sovet Rossii*; Iurtaeva, *Gosudarstvennyi sovet v Rossii*; Korros, *A Reluctant Parliament*; Gurko, *Features and Figures*, 22–3. 到尼古拉二世開始執政時，國務會議中被任命的委員已經從 35 人增加到大約 100 人，但其中積極參與的只有不到 40 人，而沙皇也沒有義務一定要向他們諮詢。在整個尼古拉二世統治時期，共有大約 215 人被任命為國務會議委員，其中有超過三分之二的委員要靠薪水而不是繼承的財富為生，所以並不真正獨立。
- 751 147 McDonald, *United Government*, 83–6 (引自 RGIA, f. 1544, op. 1, d. 5, l. 3–9 [Kryzhanovskii] and l. 270 [Witte]). 另見 Doctorow, “Introduction of Parliamentary Institutions.”
- 148 Brunck, *Bismarck*, 36.
- 149 有關各部的情況，參見 Yaney, *Systematization*, 286–318. 當政府大臣在國家杜馬(或作為上院的國務會議)會議上發言時，他們開頭要說這樣一句話，「承蒙皇帝俯允」。這是為了表示，即便是匯報情況也是皇帝的恩典。
- 150 起草人是國務會議成員阿列克謝·奧博連斯基 (Alexei Obolensky)。 *Iuridicheskii vestnik*, 11/3 (1915): 39 (A. S. Alekseev).
- 151 Verner, *Crisis of Russian Autocracy*, 434; McDonald, *United Government*, 10.

- 152 Maslov, *Agrarnyi vopros v Rossii*, II: 159–60; Perrie, “Russian Peasant Movement.”
- 153 McDonald, “United Government,” 190–211. 維特並未擁有作為一名總理所應擁有的正式權力，但他憑藉強有力的個性，在某種程度上主導了鬆散的大臣會議（1906年4月解散）。
- 154 Gerassimoff, *Der Kampf*, 67; Gerasimov, “Na lezvii s terroristami,” II: 139–342 (at 183–4); Vitte, *Vospominaniia [2000]*, II: 288, III: 74–5, 619. 維特回憶說那位外交官代表的是西班牙。
- 155 證據顯示，維特當時是想讓杜爾諾沃擔任副內務大臣，但杜爾諾沃拒絕了。Urusov, *Zapiski tri goda*, 589–92; Gurko, *Features and Figures*, 180, 406, 411–2; Vitte, *Vospominaniia 2000*, III: 71–2; Daly, *Autocracy Under Siege*, 173–4.
- 156 Martynov, *Moia sluzhba*, 59. 1912至1917年，馬丁諾夫負責莫斯科保安處。
- 157 Santoni, “P. N. Durnovo,” 118–20; Ascher, *Revolution of 1905*, II: 22. 1906年的俄國基本法仿照了普魯士和日本的憲法，而後兩者都沒有實行真正的議會統治。Miliukov et al, *Histoire de Russie*, III: 1123–4; Doctorow, “Fundamental State Law.”
- 158 Gerasimov, *Na lezvii*, 52; D. N. Liubimov, “Sobytiia i liudi (1902–1906 gg.),” RGALI, f. 1447, op. 1, d. 39, l. 464; Beletskii, “Grigorii Rasputin,” no. 22: 242; Gurko, *Features and Figures*, 410.
- 159 “Nikolai II—imperatritse Marii Fedeorovne, 12 ianvaria 1906,” 187.
- 160 Keep, *Rise of Social Democracy*, 251–2; Engelstein, *Moscow 1905*.
- 161 Pankratova, *Revoliutsiia*, V, ii: 76–7.
- 162 Shanin, *Rots of Otherness*, II: 278–9.
- 163 Shestakov, *Krest’ianskaia revoliutsiia*, 50.
- 164 Ascher, *Revolution of 1905*, II: 157–8. 應徵入伍的農民實際上是再次陷入了農奴制：不僅是在暴君一般的軍官手下，還要被迫去種地，自己製作衣服和工具。
- 165 Fuller, *Strategy and Power*, 138–9.
- 166 Bushnell, *Mutiny amid Repression*. 另見 Fuller, *Civil-Military Conflict*, 144–55. 1906年5月至7月，兵變重新開始（總數再次超過200），而舊秩序似乎又要壽終正寢了。
- 167 Gurko, *Features and Figures*, 7. 另見 Daly, *Autocracy Under Siege*, 176; 以及 Lieven, *Russia’s Rulers*, 216.
- 168 Stepun, *Byushee i nesbyusheesia*, 304.

#### 第四章 立憲專制

- 1 Loukianov, “Conservatives and ‘Renewed Russia,’” 776 (引自 A. I. Savenko to N. K. Savenko, April 28, 1914: GARF, f. 102, op. 265, d. 987, l. 608).
- 2 Vereshchak, “Stalin v tiur’me”; Tucker, *Stalin as Revolutionary*, 117. 這些回憶錄寫於1928年1月，而不是1930年代，而且是發表在流亡者的出版物上，不是蘇聯官方出版物，這就增加了它們的可信度。

- 3 Borges, "The New Czar."
- 4 Gilliard, *Thirteen Years*.
- 5 Tagantsev, *Perezhitoe*, 35–6. 另見 Kokovtsov, *Out of My Past*, 129–31.
- 6 M. A. Taube, "Vospominaniia," 171, ms., Bakhmeteff Archive, Columbia University. 關於該機構的結構，參見 Szeftel, *Russian Constitution*; 以及 McKean, *Russian Constitutional Monarchy*.
- 7 Maklakov, *Pervaiia Gosudarstvennaia Duma*, 59–117; Emmons, *Formation of Political Parties*, 21–88.
- 8 Mehlinger and Thompson, *Count Witte*, 313–29.
- 9 身材高大的維特碰巧和亞歷山大三世一模一樣，而看上去酷似維特的亞歷山大三世的肖像——就掛在尼古拉二世的書房裏——親切有加而又沒完沒了地責備這位沙皇相比乃父的不足，但這些都無濟於事。尼古拉二世後來說，他在聽到維特死訊的時候，心中有一種「真正的復活節般的平和」（還有其他因素）。維特則說：「我是天生的君主派，我希望為君主而死，但我希望不再有尼古拉二世那樣的沙皇。」Anan'ich and Ganelin, "Opyt kritiki memuarov S. Iu. Vitte," 298–374 (at 299); Vitte, *Vospominaniia* [1960], III; 336.
- 10 Borodin, *Gosudarstvennyi sovet Rossii*, 49; Aldanov, "Durnovó," 39.
- 11 與斯托雷平當上總理有關的種種陰謀現在依然不太清楚。Russkie vedomosti, July 1, 1906: 2 (米留可夫); Kokovtsov, *Out of My Past*, 146–56; Shipov, *Vospominaniia i dumy o perezhitom*, 445–8, 457; Miliukov, *Vtoraia Duma*, 226; Miliukov, *Vospominaniia* [2000]: 380; Ascher, *P. A. Stolypin*, 110–14.
- 12 當時做過各種手術但都沒能矯正這種畸形。Ascher, *P. A. Stolypin*, 15.
- 13 Ascher, *P. A. Stolypin*, 44–6, 88–90, 94–6; Fallows, "Governor Stolypin," 160–90; Waldron, *Between Two Revolutions*, 189, n30 (RGIA, f. 1276, op. 3, d. 959, l. 75).
- 14 Sidorovnin, *Stolypin, zhizn' i smert'*, 197; Daly, *Watchful State*, 34.
- 15 Kryzhanovskii, *Vospominaniia*, 209–21.
- 16 Robinson, *Rural Russia*, 130; Hindus, *Russian Peasant*, 91–2.
- 17 Mehlinger and Thompson, *Count Witte*, 288–41.
- 18 Shchegol'ev, *Padenie*, V: 406, 411, 415 (Kryzhanovsky); Lauchlan, *Russian Hide-and-Seek*, 115–23; Ruud and Stepanov, *Fontanka 16*, 111–6.
- 19 Waldron, *Between Two Revolutions*, 106–14.
- 20 沙皇每年只有兩個月是必須召集杜馬的。另外，有充分的證據表明，維特的繼任者、總理格雷米金 (Goremykin) 與尼古拉二世合謀讓杜馬開會，只是為了敗壞它在公眾心目中的聲譽。杜馬被解散了，格雷米金也被解除了職務。Verner, *Crisis of Russian Autocracy*, 332–4. 即便在有了杜馬之後，尼古拉二世在與德國大使談到君主專制時還說：「對於欠發達國家來說，根本不可能有別的制度，因為群眾需要有一隻堅定而粗暴的手去統治他們……在這裏，我是主人。」Roger, *Russia in the Age of Modernization*, 19, 引自 Seraphim, *Russische Porträts I*: 250.
- 21 Ascher, *P. A. Stolypin*, 205–7. 根據新的選舉法，(選舉人團中) 三分之二的選舉人來自貴族和擁有地產的商人，三分之一來自農民以及城市居民和工人。帝國有的

- 地區，比如突厥斯坦，整個地區都沒有代表。Harper, *New Electoral Law*; Doctorow, "The Russian Gentry." 尼古拉二世似乎把1907年6月3日的新選舉法視為復辟不受約束的君主專制的第一步。Wortman, *Scenarios of Power*, II: 527. 752
- 22 Stockdale, "Politics, Morality and Violence."
- 23 "Memorandum by Professor Pares respecting his Conversations with M. Stolypin," 載於 Lieven, *British Documents on Foreign Affairs*, VI: 180-4 (at 183). 另見 Waldron, *Between Two Revolutions*, 58-62.
- 24 引自 Klemm, *Was sagt Bismarck dazu?*, II: 126.
- 25 Steimetz, *Regulating the Social*; Beck, *Origins of the Authoritarian Welfare State*; Hennock, *Origin of the Welfare State*.
- 26 Kotsonis, *Making Peasants Backward*.
- 27 參見喬治·亞尼 (George Yaney) 在《體制化》(*Systematization*) 中給人以豐富聯想的、別具一格的解釋。
- 28 Vitte, *Vospominaniia [2000]*, I: 724 (給沙皇的信)。另見 Macey, *Government and Peasant*.
- 29 Gagliardo, *From Pariah to Patriot*, 238-42.
- 30 Karpov, *Krest'ianskoe dvizhenie*, 94-7; Frierson, *Aleksandr Nikolaevich Englehard's Letters*; Leroy-Beaulieu, *Empire of the Tsars*, II: 45-6; Kofod, *Russkoe zemleustroistvo*, 23.
- 31 Pallot, *Land Reform in Russia*, 31.
- 32 因此，籠統地談論「高度現代主義的」治理方式是極其錯誤的。Scott, *Seeing like a State*.
- 33 Ascher, *P. A. Stolypin*, 11 (引自 S. E. 克雷扎諾夫斯基)。
- 34 Yaney, "The Concept of the Stolypin Land Reform."
- 35 關於同時代人普遍指出的村社在經濟上的靈活性，參見 Grant, "The Peasant Commune," esp. 334-6; Nafziger, "Communal Institutions"; 以及 Gregory, *Before Command*, 48-50. 約有80%的村社屬於「土地重分型」；其餘的——大多在波蘭—立陶宛邊疆地區——屬於世代相傳型，在那裏，使用權更好，同時也存在一定的轉讓權。在波羅的海沿岸各省或西伯利亞，根本沒有農民村社。
- 36 Atkinson, *End of the Russian Land Commune*, 71-100; Pallot, *Land Reform in Russia*; Dubrovskii, *Stolypinskaia zemel'naia reforma*. 但另見 Blobaum, "To Market! To Market!"
- 37 Davydov, *Vserossiiskii rynek v kontse XIX-nachale XX vv. i zheleznodorozhnaia statistika*. 另見 Tarasiuk, *Pozemel'naia sobstvennost' poreformennoi Rossii*. 另外，農民幾乎沒有甚麼馬匹：1912年的一項評估指出，36.5%的農戶沒有馬匹，40.4%的有一到兩匹，1.9%的有四匹或以上。Jasny, *Socialized Agriculture*, 147-9.
- 38 Chernina et al., "Property Rights." 有時候情況相反，村社自身為了合併鄰近的農莊而突然不再把土地劃分成條田。Yaney, *Urge to Mobilize*.
- 39 Dower and Markevich, "Do property rights in Russia matter?"
- 40 1906年11月的土地改革，還有其他的一些措施，在1910年6月獲得杜馬和國務會議的正式通過，也得到沙皇的批准。Polnoe sobranie zakonov Rossiiskoi imperii, XXXI, no. 33743: 746-53. 沙皇直到斯托雷平死後才批准工人保險法案。



- 41 1907年的選舉將範圍從各專業領域中的貴族(立憲民主黨)轉變為外省地方自治機關中的土地貴族,這使得後者可以對抗斯托雷平想要擴大和開放地方自治的企圖。Wcislo, *Reforming Rural Russia*. 另見 Weissman, *Reform in Tsarist Russia*.
- 42 Diakin, "Stolypin I dvoriantsvo"; Waldron, *Between Two Revolutions*, 115-77, 182-3; Borodin, *Gusdarstvennyi sovet Rossii*.
- 43 Elwood, *Russian Social Democracy*.
- 44 Lane, *Roots of Russian Communism*, 11-155, 21-8; Zimmerman, *Politics of Nationality*. 1901年11月,梯弗利斯委員會正式成為俄國社會民主工黨格魯吉亞支部,實質上是和俄國黨聯合起來,儘管並沒有失去自身的獨立性。社會民主黨在杜馬的代表主要來自高加索——擅長演說的策列鐵里、祖拉博夫、馬哈拉澤和拉米施維里。Jones, *Socialism*, 223; Kazemzadeh, *Struggle for Transcaucasia*, 187.
- 45 Emmons, *Formation of Political Parties*, 146-7.
- 46 Perrie, *Agrarian Policy*, 186. 社會革命黨聲稱有35萬人「經常受到黨的影響」。Radkey, *Agrarian Foes*, 61-3.
- 47 Rawson, *Russian Rightists*, 59, 62; Spirin, *Krushenie pomeschchikikh i burzhuznykh parti*, 167; Stepnaov, *Chernaia sotnia*, 107-8.
- 48 Rogger, "Formation of the Russian Right: 1900-1906," 66-94.
- 49 Löwe, "Political Symbols." 另見 Bohon, "Reactionary Politics in Russia"; Brock, "Theory and Practice."
- 50 Brunn and Mamatey, *World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891. 同時代與之類似的,只有19世紀末20世紀初哈布斯堡家族統治下的維也納對工人和中產階級下層進行的右翼的街頭動員和選舉動員,而維也納是另一個使用多種語言的帝國的首都,這個帝國也在一個王朝治下並擁有龐大的猶太人口。Schorske, *Fin-de-Siècle Vienna*, 116-80.
- 51 Liubosh, *Russkii fashist*.
- 52 在它發表在聖彼得堡的報紙上之後,1905年,謝爾蓋·尼盧斯(Sergei Nilus)又以書籍的形式發表了該「紀要」的擴充版。他抱怨說沒人把它們當回事。布爾什維克革命後,尼盧斯繼續留在俄國,最終作為該「紀要」的發表者出了名。他雖然多次被捕,但都得以釋放。他死於1929年。Cohn, *Warrant for Genocide*, 90-8.
- 53 De Michelis, *Non-Existent Manuscript*. 這一發現取代了下述假說,即那份滿是污言穢語的「文件」是在保安處的幫助下,以一些法國的反猶小冊子為基礎編纂而成的,而那些小冊子則是在1890年代德雷福斯案以及第一次猶太復國主義國際代表大會(巴塞爾,1897)的影響下產生的。Rollin, *L'apocalypse de notre temps*.
- 54 Rawson, *Russian Rightists*, 75-106, 172-224.
- 55 基輔作為一個講波蘭語的猶太城市,四周是信奉東正教的講烏克蘭語的內陸地區,那裏的右翼分子起了示範作用,他們在1906年利用街頭鼓動和選舉控制了市杜馬。被西南地區講烏克蘭語的農民選進國家杜馬的代表,幾乎全部是(信奉東正教的)俄羅斯民族主義分子。Hillis, "Between Empire and Nation"; Meir, *Kiev*. 關於保守派在1912至1913年為了組織起來而做出的努力,參見 Diakin, *Burzhuziia*, 54-55, 169-70.

- 56 Kryzhanovskii, *Vospominaniia*, 153–4.
- 57 Lauchlan, *Russian Hide-and-Seek*, 278–80.
- 58 *Krasnyi arkhiv*, 1929, no. 32: 180.
- 59 Ascher, *P. A. Stolypin*, 121–7, 173–4; Ascher, “Prime Minister P. A. Stolypin”; Geifman, *Thou Shalt Kill*, 99–100.
- 60 Rogger, *Jewish Policies*, 232; LöweLöwe, *Antisemitismus und reaktionäre Utopie*.
- 61 Rogger, “Russia,” 443–500.
- 62 Kuzmin, *Pod gnetom svobod*, I: 170.
- 63 Loukianov, “Conservatives and ‘Renewed Russia’”; Newstad, “Components of Pessimism.”
- 64 Kokovtsov, *Out of My Past*, 164–5; Gurko, *Features and Figures*, 497–8; Ascher, *P. A. Stolypin*, 138–42; Lauchlan, “The Accidental Terrorist.”
- 65 沙皇的最後一任保安處處長否認參與過迫害猶太人的活動，但他認為猶太人是奸商——「他們除了做生意或買賣之外，簡直不習慣用任何別的方式謀生。」Vasilyev, *Ochrana*, 101.
- 66 Rawson, *Russian Rightists*.
- 67 有表決權的代表有112人，其中62人傾向於孟什維克，42人傾向於布爾什維克；其餘的還包括崩得以及波蘭、立陶宛、拉脫維亞、烏克蘭和芬蘭的社會民主黨代表。格魯吉亞人在全部孟什維克代表中佔四分之一，但他們對俄國孟什維克派的反覆無常十分警惕。Jones, *Socialism*, 213.
- 68 有位重要的學者說格魯吉亞是「1917年之前俄羅斯帝國社會民主運動最成功」的地方。Jones, *Socialism*, xi. 饒爾丹尼亞後來宣稱，高加索的社會民主運動是帝國其他任何地方都比不了的多元文化運動，但此說並不屬實。Zhordaniia, *Moia zhizn'*, 38–9.
- 69 建議採取這一立場的還有布爾什維克的代表S. A. 蘇沃林 (S. A. Suvorin)。Chetvertyi (ob"edinitel'nyi) s"ezd RSDRP, 339; Zhordaniia, *Moia zhizn'*, 34; Arsenidze, Nicolaevsky Collection, box 667, folders 4–5 (1961年7月對阿爾謝尼澤 (Arsenidze) 的採訪); Jones, *Socialism*, 63–4, 69, 95–6, 124. 阿爾謝尼澤在1906年4月第四次代表大會召開的那個月被捕。
- 70 後來，在朱加施維里變成斯大林和專政者之後，與他在斯德哥爾摩旅館同住一個房間的俄羅斯人、布爾什維克克利姆·伏羅希洛夫，想起的不是那位格魯吉亞人的政策建議有哪些內容，而是他在私下裏能夠背誦普希金以及翻譯成俄文的莎士比亞、歌德和惠特曼的作品。在伏羅希洛夫的回憶中，在斯德哥爾摩的時候，未來的斯大林「很壯實，個子不高，和我差不多年齡，黝黑的面孔，上面有些不太看得出來的麻子，可能是小時候得天花留下的」。當然，伏羅希洛夫還發現斯德哥爾摩時的斯大林「目光如炬」，並且「精力充沛、快活、充滿活力」。Voroshilov, *Rasskazy o zhizni*, 247. 伏羅希洛夫最初是在1920年代撰寫未發表的回憶錄並說起這些往事的。RGASPI, f. 74, op. 2, d. 130; op. 1, d. 240. 另見Trotskii, *Stalin*, I: 112. 斯大林的突出之處還有，他不像饒爾丹尼亞或奧爾忠尼啟則那樣，出生於西格魯吉亞的鄉村貴族家庭。Ostrovskii, *Kto stoial*, 568–72.

- 71 Smith, *Young Stalin*, 197; Geifman, *Thou Shalt Kill*, 222–5.
- 72 Weissman, “Regular Police.” 1889年，帝國還開始在農村實行所謂的地方長官制度 (*zemskie nachal'niki*)；他們也被人看不起。Beer, *Kommentarii*.
- 73 在沙皇政權的最後幾十年，據說在政治恐怖中被打死打傷的總共至少有1.7萬人。Geifman, *Thou Shalt Kill*, 21, 264, n57, 58, 59; Hoover Institution Archives, Boris Nicolaevsky Collection, box 205, folder “Lopukhin,” protocol 37: 59–66.
- 74 Spiridovich, *Istoriia bol'shevizma v Rossii*, 120.
- 75 Geifman, *Thou Shalt Kill*, 249.
- 76 Lauchlan, *Russian Hide-and-Seek*, 245 (引自 GARF, f. 102, op. 295, d. 127, 以及 Hoover Institution Archives, Nicolaevsky Collection, box 205, folder Lopukhin, protocol 37: 59–66). 1825至1905年，因為政治罪行被處死的不到200人。政府為到東方定居的農民提供了特別貨車，用來裝運一起帶過去的牲畜和農具。(在蘇維埃時代，這些「斯托雷平貨車」會被安上鐵柵欄，用來押運囚犯。)
- 77 V. I. Lenin, “Stolypin i revoliutsiia,” *Sotsial-Demokrat*, October 18, 1911, 載於 *Sochineniia*, 2nd and 3rd ed., XVII: 217–25.
- 78 設在巴黎的保安處國外部成立於1884年；柏林的機構存在的時間是1900至1905年。Lauchlan, *Russian Hide-and-Seek*, 103; Agafonov, *Zagranichnaia okhranka*; Patenaude, *Wealth of Ideas*. 1901年的時候，俄國在國內流放的只有3,900人。在國內被警方列為調查對象的，1889年有221人，到1910年有1.3萬人。Lauchlan, *Russian Hide-and-Seek*, 153 (引自 Hoover Institution Archives, Okhrana Collection, box 157, folders 2–6).
- 79 “Sovremennyi moment i ob”edinitel’nyi s”zed rabochei partii,” *Sochineniia*, I: 250–76, 410, n74 (at 250–1).
- 80 GF IML, f. 8, op. 2, ch. 1, d. 43, l. 154 (Aleksandra Svanidze- Monoselidze).
- 81 1905年9月回去的時候，他躲在梯弗利斯的斯瓦尼澤家，但他以前可能也在他們家躲過。Kun, *Unknown Portrait*, 341 (引自 RGASPI, f. 558, op. 4, d. 651: Elisabedashvili). 老斯瓦尼澤靠在鐵路上工作為生，但他也是地主，而卡托的母親(謝波拉)則出身格魯吉亞貴族；他們把兒子阿廖沙送去德國學習，這說明家裏還是比較富裕的。
- 82 Ostrovskii, *Kto stoial*, 235–5 (引自 Gori, d. 287/1, l. 8–9: M. M. Monoselidze); Dawrichewy, *Ah: ce qu'on*, 228; Tucker, *Stalin as Revolutionary*, 107; Alliluev, *Khronika odnoi semi*, 108.
- 83 斯大林後來在沃洛格達流放時的少女女友佩拉格婭·奧努夫里耶娃說，「他告訴我他有多愛她，失去她對他來說有多難。『我那時太痛苦了，』他告訴我，『因此，我的同志們把我的槍拿走了。』」Kun, *Unknown Portrait*, 117 (引自 RGASPI, f. 558, op. 4, d. 547). 另外，據說斯大林對自己再婚後所生的女兒斯維特蘭娜也講到過卡托：「她非常可愛和漂亮，她融化了我的心。」Montefiore, *Young Stalin*, 159 (引自羅莎蒙德·理查德森 [Rosamund Richardson] 掌握的斯維特蘭娜的採訪錄音).

- 84 Ostrovskii, *Kto stoial*, 253 (引自 Gori, d. 287/1, l. 14; M. Monoselidze, d. 39/2, l. 49–50; Berdenoshvili, d. 146/2, l. 61; Elisabedashvili; GIAG, f. 440, op. 2, d. 39, l.36–7), GF IML, f. 8, op. 5, d. 213, l. 43–4, RGASPI, f. 71, op. 1, d. 275, l. 31, GF IML, f. 8, op. 2, ch. 1, d. 43, l. 155; A. Svanidze-Monoselidze); Montefiore, *Young Stalin*, 160 (引自 GF IML, f. 8, op. 2, ch. 1, d. 34, l. 317–54; Monoselidze).
- 85 Gegeshidze, *Georgii Telia*, 34–9.
- 86 「工人強烈的求知欲和追求社會主義的熱情卻日益增長，」列寧在1899年寫道，「工人中間的真正英雄人物也不斷出現，他們雖然生活環境極壞，在工廠中從事着使人變蠢的苦役勞動，但是有頑強的個性和堅定的意志來不斷學習，學習，再學習，使自己成為覺悟的社會民主黨人，成為『工人知識分子』。」(譯註：《列寧全集》第4卷，第234頁。) Lenin, *Sochineniia*, 2nd and 3rd eds., IV: 258.
- 87 "Pamiati tov. G. Telia," *Sochineniia*, II: 27–31 (Dro, March 22, 1907). 米霍·茨哈卡雅也在墓前發表了講話，之後不久，他就被迫移民，去了日內瓦。Gegeshidze, *Georgii Telia*, 41–2.
- 88 我們永遠無從得知，斯大林從捷里亞的文章中借鑒了多少，或者他對捷里亞的文章進行了多少打磨。「它們就是在那裏，在印刷所，在我的膝蓋上，斷斷續續地寫出來並匆匆付印的」，斯大林後來聲稱。Ilizarov, *Tainaia zhizn'*, 240–1. 最初的四篇刊登在1906年6月和7月的《新生活報》上。該報被查封後，那四篇文章按照編輯的要求，用「通俗易懂的語言」重新發表在1906年12月和1907年1月的《新時代報》上。1907年2月又在《我們的生活報》上發表了四篇文章，該報也很快被查封了，還有四篇於1907年4月發表在《時報》上。 *Sochineniia*, I: 294–372; 最初四篇文章的原版收在附錄中(373–392)。斯大林還在文章被收進全集之前對它們作了「修改」，儘管他說是沒有。參見瓦西里·莫恰洛夫(Vasily Mochalov) 1945年12月28日的便條， *Sochineniia*, XVII: 625–6. (莫恰洛夫是馬克思恩格斯列寧研究院斯大林辦公室的負責人，他和研究院院長V. S. 克魯日科夫(V. S. Kruzhkov)有矛盾。研究院在格魯吉亞的下屬機構還參與了尋找原件和俄文翻譯的工作。)斯大林去世後，在昆采沃別墅發現了他的全集第一卷的長條校樣(編註：某些尚未定稿的書刊，由於需要經常改動，可以先排成不合版面的長條，這種狹長的未經拼版的校樣就是「長條校樣」)，上面有他用彩色鉛筆在〈無政府主義還是社會主義？〉上留下的記號。斯大林刪去了兩篇序言，即全集編輯的序言和他自己的序言。 Ilizarov, *Tainaia zhizn'*, 228 (引自 RGASPI, f. 558, op. 11, d. 911, l. 15; d. 910, l. 5ob).
- 89 大約也是在這段時期，普列漢諾夫1894年寫的諷刺性的小冊子《無政府主義和社會主義》出了擴充的第二版。普列漢諾夫的小冊子原來是用法語寫的，並被翻譯成德語、英語和俄語(2nd ed. Moscow: V. O. Karchagin, 1906)。朱加施維里的文章沒有引用普列漢諾夫的觀點。私下裏，在普列漢諾夫對《怎麼辦？》提出批評之後，朱加施維里寄給身在國外的列寧一封帶有迎合性質的信，其中寫道：「此人不是完全發了瘋，便是心懷仇恨和敵意。」(譯註：《斯大林全集》第1卷，第47–48頁) *Sochineniia*, I: 56–7. 1938年，斯大林再版了普列漢諾夫的《論一元論歷史觀之發展》，保留下來的副本上有這位專政者做的記號。

- 90 *Sochineniia*, I: 297 [修改過的], 375 [原來的].
- 91 *Sochineniia*, I: 314–6.
- 92 *Sochineniia*, I: 331, 344–5, 348, 368.
- 93 Souvarine, Stalin, 109. 托洛茨基聲稱，他是1935年才從蘇瓦林的(法文版)傳記中得知斯大林參加了倫敦代表大會。Trotsky, *Stalin*, 90.
- 94 Zhordania, *Moia zhizn'*, 53; Service, *Stalin*, 66.
- 95 1865至1871年，在法國的倡議下，討論了設立單獨的歐洲央行和發行被稱為「歐元」的單一貨幣的計劃。但英國人和德國人抵制。相反，為了確保可兌換性和穩定的匯率，德國人在1870年代在金本位問題上與英國人聯手，其他國家也加入其中(日本是在1897年)。Einaudi, *Money and Politics*.
- 96 Jablonowski, "Die Stellungnahme der russischen Parteien," 5: 60–93.
- 97 從英國方面來說，與俄國的和解得益於「愛德華時代的人」(出生於1850至1860年代)取代了「維多利亞時代的人」(出生於1830至1840年代)。「維多利亞時代的人」不滿俄國在中亞的滲透，而「愛德華時代的人」是在俾斯麥完成統一大業和威廉德國崛起後成年的。Neilson, *Britain and the Last Tsar*, 48–50, 267–88.
- 98 McDonald, *United Government*, 103–11.
- 99 有些無法解決的議題，比如西藏問題，就被擱置起來。Churchill, *Anglo-Russian Convention*; Williams, "Great Britain and Russia," 133–47; Ostal'tseva, *Anglo-russkoe soglashenie 1907 goda*.
- 100 Bernstein, *Willy-Nicky Correspondence*, 107–8.
- 101 McDonald, *United Government*, 77–81. 《消息報》(1917年12月29日)後來公佈了這個形同虛設的條約。另見Nekliudov, "Souvenirs diplomatiques"; Bompard, "Le traité de Bjorkoe"; Fay, "The Kaiser's Secret Negotiations"; Feigina, *B'orskoe soglashenie*; Vint, *Vospominaniia* [1922], II: 476–81; Iswolsky, *Recollections of a Foreign Minister*, 40–3; 以及Astaf'ev, *Russko-germanskie diplomaticheskie otnosheniia*.
- 102 Bogdanovich, *Tri poslednikh samoderzhavtsa* [1924], 461.
- 103 Pashukanis, "K istorii anglo-russkogo soglasheniia," 32; de Taube, *La politique russe*, 118. 在對外政策上，或許只有另一個傑出的右翼分子完全同斯托雷平一樣謹慎，那就是他在國內問題上引人注目的保守主義的批評者杜爾諾沃。但後者並不能完全諒解斯托雷平——他甚至不負責外交和軍事事務(那是沙皇的特權)——1908年巧妙地避免讓俄國重複外交上的不幸的做法。McDonald, *United Government*, 151.
- 104 Nash, *The Anglo-Japanese Alliance*; O'Brien, *The Anglo-Japanese Alliance*; Daniels et al., "Studies in the Anglo-Japanese Alliance."
- 105 Coox, *Nomonhan*, 1–16.
- 106 "Londonskii s'ezd Rossiiskoi sotsial-demokraticheskoi rabochei partii (Zapiski delegata)," 載於 *Sochineniia*, II: 46–77 (at 50–1), 刊登於《巴庫無產者報》，1907年6月20日和7月10日。
- 107 Getzler, *Martov*, 124.

- 108 根據梯弗利斯神學院從前的學生和哥里的神父之子索索·達夫里切武 (Soso Dawrichewy, 有很長時間保安處都以為他和卡莫是同一個人), 對朱加施維里而言, 這不是他第一次, 也不是最後一次幹這種事。Dawrichewy, *Ah: ce qu'on*, 174-5, 177, 181, 213, 237-8.
- 109 Gerasimov, *Na lezvi s terroristami*, 92.
- 110 高加索軍事長官還報告說, 1905年和1906年, 當地的搶劫和暗殺導致1,239人死亡, 還有差不多數量的人受了重傷。Geifman, *Revoliutsionnyi terror*, 21, 34-5, 228.
- 111 米克洛什·庫恩 (Miklós Kun) 找到了黨內對李維諾夫處分的檔案, 證明斯大林參與了這起劫案。Kun, *Unknown Portrait*, 74-80. 另見Montefiore, *Young Stalin*, 3-16 (除了許多別的資料, 它還引用了斯大林妻子的姐姐薩希科·斯瓦尼澤未發表的回憶錄), 178-91. 保存下來的關於埃里溫劫案的保安處檔案已經經過清洗。Bordiugov, *Neizvestnyi Bogdanov*, II: 120-42. 卡莫從另一名郵政職員吉戈·卡斯拉澤 (Gigo Kasradze) 那裏得到了郵車的內部情報。
- 112 GF IML, f. 8, op. 2, ch. 1, d. 7, 1.64-84 (G. F. Vardoyan); *Perspektivy*, 1991, no. 6: 51-7; Geifman, *Revoliutsionnyi terror*, 163-4; Ostrovsky, *Kto stoial*, 257; Avtorkhanov, *Proiskhozhdenie*, I: 183-6; RGASPI, f. 332, op. 1, d. 53. 卡莫上過三年學。在卡莫的妹妹約瓦麗婭·胡圖盧施維里 (Javariya Khutulushvili) 後來的回憶中, 談到了他對斯大林的崇拜: Kun, *Unknown Portrait*, 75; *Perspektivy*, 1991, no. 6: 51-7; Ostrovskii, *Kto stoial*, 257; Avtorkhanov, *Proiskhozhdenie*, I: 183-6; RGASPI, f. 332, op. 1, d. 53. 另見Urtadze, *Vospominaniia*, 130-2, 163-7; Smith, *Young Stalin*, 193-211; van Ree, "The Stalinist Self," 275-6; van Ree, "Reluctant Terrorists?"; 以及Montefiore, *Young Stalin*, 7 (引自Candide Charkviani, "Memoirs," manuscript, 15).
- 113 根據民間的傳說, 在到處是屍體和一片混亂的情況下, 有那麼一會兒, 搶劫似乎亂了套, 直到假扮成軍官的卡莫駕着他自己的四輪馬車穿過硝煙, 撿起大部分放錢的袋子, 然後把趕來的警察指向錯誤的方向。Medvedeva Ter-Petrosyan, "Tovarishch Kamo," 130. 有2萬盧布落在馬車裏; 有個車夫想把另外9,500盧布揣進自己口袋, 但是被抓住了。
- 114 Wolfe, *Three Who Made a Revolution*, 393-4; Geifman, *Revoliutsionnyi terror*, 164; Krupskaya, *Reminiscences of Lenin*, 155.
- 115 Trotsky, *Stalin*, 109.
- 116 Martov, *Spasiteli ili uprazdniteli?*, 22-3.
- 117 Bibineishvili, *Kamo*, 30-1, 371. 勇敢的卡莫的下場是一再被關進精神病人的囚室; 1922年, 他在梯弗利斯被一輛蘇維埃官員的小汽車軋死了, 當時他騎着一輛自行車。他的左眼已經在1907年5月被自己的炸彈炸壞了, 這可能是造成事故的原因之一。
- 118 朱加施維里可能到國外看過列寧, 分別是在1907年8月 (斯圖加特) 和1908年1月 (瑞士)。
- 119 Reiss, *The Orientalist*, 11-3; Hone and Dickinson, *Persia in Revolution*, 158-68.
- 120 Ordzhonikidze, "Bor'ba s men'shevikami," 42. 很多穆斯林工人都是來自伊朗北部省份的阿塞拜疆族的季節性打工者, 有的合法, 有的非法。Alstadt, "Muslim

- Workers,” 83–91；以及 Chaqueri, *Soviet Socialist Republic of Iran*, 24–25, 沙克利估計，伊朗北部20至40歲的成年男子，有20%至50%的人最終都會越過邊境工作一段時間，主要是在俄國的高加索地區。
- 121 Vereshchak, “Stalin v tiur'me,” 1306; Vereshchak, “Okonchanie,” 1308.
- 755 122 沙皇政權也導致達什納克黨轉而反對俄國，部分原因在於1903年沒收亞美尼亞的教會財產（尼古拉二世不得不在1905年取消了這項政策）。Suny, *Transcaucasia*, 166–7; Suny, *Looking Toward Ararat*, 48–9, 92.
- 123 “Otvēt na prīvetstviia rabochikh glavnykh zheleznodorozhnykh masterskikh v Tiflise,” 載於 *Sochineniia*, VIII: 174–5. Suny, “Journeyman for the Revolution.”
- 124 Trotsky, *Stalin* [1985], I: 158, 163.
- 125 Montefiore, *Young Stalin*, 190–3（引自斯瓦尼澤家族的回憶錄和對斯瓦尼澤的一位表親的採訪）。
- 126 Dawrichewy, *Ah: ce qu'on*, 35; GDMS, f. 87, d. 1955-146, l.51–6 (Elisabedashvili). 關於這場婚姻，很長時間以來最主要的消息來源都是移居國外的孟什維克伊列馬施維里，他聲稱參加了卡托的葬禮，而且他還指出，卡托的死是轉折點，使斯大林「失去了任何道德約束」。Joseph Iremashvili, *Stalin und die Tragödie*, 30–40.
- 127 RGASPI, f. 558, op. 4, d. 655, l. 18.
- 128 Arsenidze, “Iz vospominaniia o Staline,” 224; Deutscher, *Stalin*, 110.
- 129 RGASPI, f. 558, op. 4, d. 647 (Sukhova).
- 130 Dubinskii-Mukhadaze, *Ordzhonikidze*, 92.
- 131 RGASPI, f. 71, op. 1, d. 275, l. 23; Smith, *Young Stalin*, 28–9; McNeal, *Stalin*, 336, n15; Kun, *Unknown Portrait*, 18. 斯維特蘭娜說他是在酒館打架被刺死的，但沒有任何證據可以證明這一說法。Alliliyeva, *Twenty Letters*, 153 n. 1939年，斯大林命令梯弗里斯黨組織不要搜集貝索的歷史信息。
- 132 在社會民主黨人——斯大林的所謂同志——中間，他被當作「列寧的左腳」而沒有人理睬。Arsenidze, “Iz vospominaniia o Staline,” 223.
- 133 工人階級比較激進，但革命政黨比較虛弱，關於這一點，參見McKean, *Sr. Petersburg*.
- 134 Daly, *Autocracy Under Siege*, 117–23.
- 135 阿澤夫當時已經成為社會革命黨戰鬥組織的首腦。根據有些說法，在從保安處領取報酬期間，他還監督執行了28次針對政府官員的成功的恐怖襲擊；保安處根本看不透他的動機和忠誠度。1909年，他逃到德國，讓社會革命黨一片混亂、深受打擊。「阿澤夫」成了整個沙皇體制的隱喻。Nicolaevsky, *Aseff*; Schleifman, *Undercover Agents*; Geifman, *Entangled in Terror* Daly, *Watchful State*, 81–109.
- 136 Biggart, “Kirov before the Revolution”; Mostiev, *Revoliutsionnaia publitsistika Kirova*; Kirilina, *Neizvestnyi Kirov*.
- 137 Daly, *Watchful State*, 110–1.
- 138 Shukman, *Lenin and the Russian Revolution*, 126.
- 139 Shchegol'ev, *Padenie*, VI: 176–7 (N. E. Markov).

- 140 Vitte, *Vospominaniia* [1960], III: 274–5; Hosking, *Russia*, 479.
- 141 Jones, “Non-Russian Nationalities,” 35–63; Thaden, *Russification in the Baltic Provinces*; Weeks, *Nation and State*; Woodworth, “Civil Society”; Staliunas, *Making Russians*; Kryzhanovskii, *Vospominaniia*, 128. 關於俄羅斯民族主義與沙皇國家之間的不相容性，參見 Kappeler, *Russian Empire*, 238–42. 1867 年的「妥協」造就了奧地利和匈牙利的二元君主制，這之後哈布斯堡帝國的匈牙利那一半開始實行有害的馬扎爾化，在此過程中也發生過類似的一幕。
- 142 Steinberg, *Bismarck*, 3 (引自 Karl Heinz Börner, *Wilhelm I, deutscher Kaiser und König von Preussen: eine Biographie* [Berlin: Akademie, 1984], 221).
- 143 Kokovtsov, *Iz moego proshlogo*, I: 282–3.
- 144 McDonald, *United Government*, 10, 209, 213.
- 145 Rieber, *Politics of Autocrat*.
- 146 Gurko, *Features and Figures*, 30. 30 年前也有人說過類似的話，參見 Stead, *Truth about Russia*, 199–200.
- 147 “K. Kuzakov—syn I. V. Stalina,” *Argumenty i fakty*, 1995, no. 39: 12. 阿利盧耶夫一家聽說了農婦瑪特廖娜和私生子的故事，又告訴了斯維特蘭娜。Alliluyeva, *Only One Year*, 330.
- 148 Gromov, *Stalin*, 34–9.
- 149 在斯大林的個人檔案裏保存了一張佩拉格婭·奧努夫里耶娃和彼得·奇日科夫的照片：*Izvestia TsK KPSS*, 1998, no. 10: 190. 奇日科夫 1912 年回到自己父母那裏之後不久就去世了。當時他才二十出頭。佩拉格婭於 1955 年去世；她的丈夫福明 (Fomin) 當時被捕了。
- 150 休·奧貝恩 (Hugh O’Beirne)，一位在英國駐聖彼得堡大使館長期任職的官員，1911 年 6 月向倫敦報告說，斯托雷平「情緒低落」，他的位置「不穩」。Neilson, *Britain and the Last Tsar*, 74. 另見 Chmielski, “Stolypin’s Last Crisis.”
- 151 Pipes, *Russian Revolution*, 183–91; Hosking, *Russian Constitutional Experiment*, 136; Shchegolëv, *Padenie*, VI: 252 (Guchkov). 1913 年 1 月，尼古拉二世結束了對包括 A. I. 斯皮里多維奇 (A. I. Spiridovich) 在內的與暗殺有牽連的警方官員的審訊。
- 152 Ostrovskii, *Kto stoial*, 321–47.
- 153 VI (Parizhskaia) Vserossiskaia konferentsiia RSDRP. 關於 1912 年的布拉格代表會議是否創立了一個獨立的布爾什維克黨，參見 Lars Lih, “1912.”
- 154 在布拉格代表會議上當選為中央委員的包括列寧、季諾維也夫、馬林諾夫斯基 (保安處奸細)、菲利普·戈洛曉金 (Filipp Goloshchyokin)、D. 施瓦爾茨曼 (D. Schwarzman) 以及斯大林的兩位高加索同事，格魯吉亞人奧爾忠尼啟則和亞美尼亞人蘇倫·斯潘達良；被增補為中央委員的是斯大林和伊萬·別洛斯托茨基，不久之後又增補了格里戈里·彼得羅夫斯基和雅科夫·斯維爾德洛夫。
- 155 Uratadze, *Vospominaniia*, 234.
- 156 這一點是派普斯提出的，他也是參考了許多人的看法。參見 Pipes, *Russia Under the Bolshevik Regime*, 248–9.



- 157 De Felice, *Mussolini*, 35n; de Begnac, *Palazzo Venezia*, 360; Balabanoff, *My Life as a Rebel* 44–52.
- 158 Gregor, *Fascist Persuasion*, 49.
- 159 Gregor, *Young Mussolini*, 35; Falasca-Zamponi, *Fascist Spectacle*, 42–3.
- 160 PSS, XXI: 409. 戰爭爆發後，1914年11月，墨索里尼改變立場，宣佈支持意大利政府參戰，結果被開除出社會黨，而他提出的理由是，民族是不能不考慮的。
- 161 從1912年開始，除了布爾什維克黨的津貼外，斯大林偶爾也會得到發表文章的稿酬，以及紅十字會為政治犯提供的資助。不過，他仍然會寫信給幾乎所有的熟人，請求給他寄吃的和穿的。「我沒有辦法，只能開口提這事」，1913年，他寫信給情人塔季亞娜·斯洛瓦京斯卡婭 (Tatyana Slovatinskaya)。「我沒有錢，就連吃的也快沒了。」她寄了一個包裹，為此，他寫信說，「我不知道如何報答你，我親愛的甜心！」很快，他又開始跟她要東西了。RGASPI, f. 558, op. 4, d. 5392. 1920年代，為了報答她，斯大林在中央委員會的秘密部門給她安排了一個職務，那裏是他最重要的地盤。1937年，她的女兒被關進監獄，女婿被處決，她自己(連同兩個孫子)被趕出精英們居住的堤壩上的房子(編註：指莫斯科河畔的一座高級公寓，位於莫斯科市中心。)·Khlevniuk, *Stalinskoe poluburo*, 307.
- 162 Kun, *Unknown Portrait*, 127–8; Trotskii, *Stalin*, I: 192–3.
- 163 *Pisma P. B. Akselroda-Iu. O. Martovu*, I: 292–3.
- 164 Jones, *Socialism*, 221.
- 165 Melancon, *The Lena Goldfields Massacre*, Haimson, “Workers’ Movement After Lena.”
- 166 Montefiore, *Young Stalin*, 246 (引自《明星報》，未註明出處)。
- 167 Melancon, *The Lena Goldfields Massacre*, 155.
- 168 Mintslov, *Petersburg*, 111, 231; Rogger, *Jewish Policies*, 225; Bogdanovich, *Tri poslednikh samoderzhtsa* [1990], 493; Podbolotov, “Monarchists Against their Monarch.” 早在1903年，貝爾格萊德衛戍部隊的軍官們就曾攻佔塞爾維亞王宮並殺死了他們的國王——俄國右翼分子注意到了這一事實。「是不是該讓你們知道一個秘密？」黑色百人團的領袖和尼古拉二世的心腹B. V. 尼科利斯基 (B. V. Nikol'skiy) 1905年在日記中吐露了心事，「我認為要讓沙皇清醒過來自然是不可能的。他比無能更糟！他——願上帝寬恕我——根本就甚麼也不是！……我們需要像塞爾維亞人那樣。」Nicol'skii, “Iz dnevnika,” 77. 「我對君主派政黨不抱任何希望了，」基輔的一名右翼教授寫信給莫斯科的同事說，「要掌握權力，他們需要真正的君主，但我們有的只是可憐的牛奶凍一樣的人物。」Y. A. 庫拉科夫斯基 (Y. A. Kulakovskii)，載於 Shevtsov, *Izdatel'skaia deiatel'nost' russkikh nesotsialisticheskikh partii*, 26.
- 169 Nazanskii, *Krushenie velikoi Rossii*, 76–7.
- 170 Suvorov, *Trekhsotletie doma Romanovykh*; *Moskovskie vedomosti*, February 23, 1913: 1; Wortman, *Scenarios of Power*, II: 439–80.
- 171 Syrtsov, *Skazanie o Fedorovskoi Chudotvornoi*. 費奧多羅夫聖母像，也稱作黑聖母，後來被革新派接管了。革新派1928年在莫斯科修復了這幅聖母像。1944年，當該

- 教派被解散的時候，正教會收回了這幅聖像；它現在還在科斯特羅馬，雖然布爾什維克炸毀了原來安放它的地方（科斯特羅馬的聖母升天大教堂）。
- 172 Semevskii, *Monarkhiia pered krusheniem*; Shchëgolëv, *Padenie*, IV: 195–6.
- 173 Rossiiskaia Gosudarstvennaia Biblioteka, otdel rukopisi (RGB OR, f. 126 (Kireevikh-Novikovikh), k. 13 (Dnevnik A. A. Kireeva, 1900–1904), l. 131. 幾年後，基列耶夫還是會這樣抱怨：「這位君主……狀態太不穩定，要靠他是不行的。」RGB OR, f. 126, k. 14, l. 343ob (1908年12月22日)。另見 Elpatevskii, *Vospominaniia*, 264.
- 174 Wortman, *Scenarios of Power*, II: 464, 466 (Ivan Tolstoy).
- 175 Anan'ich and Ganelin, "Nikolai II"; Lieven, *Nicholas II*; Mark D. Steinberg in Steinberg and Khrustalëv, *Fall of the Romanovs*, 1–37; Warth, *Nicholas II*.
- 176 Rogger, *Russia in the Age of Modernization*, 22–3.
- 177 Remnev, *Samoderzhavnoe pravitel'stvo*, 6, 471.
- 178 維特的支持者後來聲稱——他們說得不錯——他在斯托雷平之前就建議把農民從村社的束縛下解放出來，並建議讓農民擁有私有財產和公民權；但這些支持者往往沒有指出，在斯托雷平推動相關立法之後，維特就在國務會議中反對它。對兩人的比較，參見 Struve, "Witte und Stolypin," III: 263–73.
- 179 就像在1911年12月告訴英國的伯納德·佩爾斯教授的那樣："Papers Communicated by Professor Pares, December 23, 1911," 載於 Lieven, *British Documents on Foreign Affairs*, VI: 185–8 (at 187).
- 180 Goriachkin, *Pervyi russkii fashist*.
- 181 McDonald, "A Lever without a Fulcrum," 268–314.
- 182 法西斯主義會在俄國的移民中盛行起來。這方面的文獻很多，參見 Markov, *Voiny temnykh sil*. 作為狂熱的反猶分子，馬爾科夫（杜馬兩兄弟當中的弟弟）變成了一名納粹。
- 183 Rogger, *Jewish Policies*, 190.
- 184 Daly, *Watchful State*, xi, (引自 I. Blok, "Poslednie dni starogo rezhima," 載於 Gessen, *Arkhiv russkoi revoliutsii*, IV:13).
- 185 政權「當時的處境很危險」，從前的某個副內務大臣解釋說，「正常情況下，沒有哪個政府願意採取革命者採取的辦法，因為在政府手中，那樣的辦法會成為雙刃劍。」Gurko, *Features and Figures*, 437.

## 第二部 杜爾諾沃的革命戰爭

- 1 作為法治國家，英國從1832年開始，直到1912年才實現了從極其有限的投票權（限於有產男性）到全體男性擁有投票權的轉變。
- 2 John Channon, "The Peasantry in the Revolutions of 1917," 載於 Frankel, *Revolution in Russia*, at 117.
- 3 Kurzman, *Democracy Denied*.

- 4 季娜伊達·吉皮烏斯(譯註：Zinaida Gippius [ 1869–1945 ]，俄國女詩人、劇作家和小說家。)在1915年8至9月的日記中寫道：「右派——他們甚麼也不懂，甚麼也不幹，也不讓別人幹。中間派——他們懂，但他們甚麼也不幹，而是等待(等待甚麼?)。左派——他們甚麼也不懂，卻像盲人一樣行動，雖然不知道要去哪裏，也不知道最終的目標是甚麼。」*Siniaia kniga*, 32.
- 5 “Nashi tseli” [未署名], *Pravda*, April 22, 1912, 載於 *Sochineniia*, II: 248–9.
- 6 Souvarine, *Stalin*, 133.
- 7 *PSS*, XLVIII: 162.
- 8 Medvedev, *Let History Judge*, 820–1.
- 9 這篇文章在次年出了單行本 (St. Petersburg: Priboy, 1914)；《斯大林全集》所收錄的內容作了很大的改動，載於 *Sochineniia*, II: 290–367. 另見 Fel’shtinskii, *Razgovory, Bukharinym*, 10.
- 10 到1912年4月為止，莫斯科保安處的工資名冊上大約有55名革命者。Smirnov, *Repressirovanoe pravosudie*, 101–3.
- 11 Wolfe, “Lenin and the Agent”; Lauchlan, *Russian Hide-and-Seek*, 254; Vladimir Ilyich Lenin, “Deposition in the Case of R. V. Malinovsky: Protocols of 26 May 1917, N. A.,” 載於 Pipes, *Unknown Lenin*, 35; Elwood, *Roman Malinovsky*.
- 12 Luchinskaia, *Velikii provokator Evno Azef*; Geifman, *Entangled in Terror*. 1909年，阿澤夫在自己保安處奸細的身份暴露之後逃到德國，在那裏一直被關押到1917年，次年死於腎病。
- 13 “Vystuplenie N. I. Bukharina,” 78. 在英國小說家 G. K. 切斯特頓 (G. K. Chesterton) 的小說《代號「星期四」》(1908)中，有分別以一週中七天的名稱為代號的七個無政府主義者，他們計劃炸毀布萊頓碼頭，結果發現原來大家都是警方的奸細。
- 14 Lauchlan, *Russian Hide-and-Seek*, 194.
- 15 Smith, “Monarchy Versus the Nation.”
- 16 俄國外交部的工作人員對杜爾諾沃擔心的社會仇恨很不瞭解。Gurko, *Features and Figures*, 481–562 (特別是有關 A. P. 伊茲沃利斯基和 S. D. 薩佐諾夫的評論).
- 17 杜爾諾沃致普列韋，載於 D. N. Liubimov, “Sobytiia i liudi (1902–1906 gg.),” *RGALI*, f. 1447, op. 1, d. 39, l. 461.
- 18 *Novoe vremia*, April 26, 1912; Aldanov, “Durnovó,” 39–40; Lieven, “Bureaucratic Authoritarianism.” 杜爾諾沃擔任公職的記錄 (RGIA, f. 1162, op. 6, d. 190, l. 82–109) 可見於 *Al'manakh: Iz glubiny vremen*, 1995, no. 4: 151–65. 另見 Borodin, “P. N. Durnovó”; Shikman, *Deiateli otechestvennoi istorii*; and Glinka, *Odinnadtsai' let v Gosudarstvennoi Dumy*. 斯托雷平和杜爾諾沃幾乎從1904年兩人剛認識開始就成了對頭。Ascher, *P. A. Stolypin*, 48–9.
- 19 據其副手弗拉基米爾·古爾科說，「在包括維特在內的那一時代的政治家中，杜爾諾沃是非常突出的，因為他消息靈通，有獨立思想，敢於表達自己的觀點，而且對事態發展有政治家一般的領悟力。」Gurko, *Features and Figures*, 413–5.

- 20 McDonald, "The Durnovo Memorandum."
- 21 Lieven, *Russia and the Origins*, 5.
- 22 杜爾諾沃還認為戰爭不會很快結束。他預見到意大利、土耳其和巴爾幹地區各國將會加入哪些陣營，甚至預見到日本和美國會如何發揮作用。布爾什維克在尼古拉二世的文件中發現了杜爾諾沃的備忘錄，葉夫根尼·塔爾列 (Evgeny Tarle; 譯註：1874-1955，蘇聯歷史學家。) 1922年發表過它的一個版本：*"Zapiska P. N. Durnovó Nikolaiu II."* 另見 Tarle, "Germanskaia orientatsiia i P. N. Durnovó." 完整的英文譯本見於 Golder, *Documents of Russian History*, 3-23. 俄日戰爭期間，維特在與尼古拉二世的通信中討論軍事失敗時也曾疾言厲色。Dillon, *Eclipse of Russia*, 294-5 (自稱是直接引自維特給他的一封信)。
- 23 Lenin, *Detskaia bolezn' "levizny" v kommunizme* (Petrograd, 1920), 轉載於 PSS, XLI: 3-90 (at 10).
- 24 早在戰爭爆發前的1913年，M. F. 馮·科滕 (M. F. von Kotten) 就報告說，精英們普遍人心惶惶，覺得「1905年的可怕景象會再次成為現實」。Korbut, "Ucher departamentom politzii opyta 1905 goda," 219. 1914年4月，V. V. 穆辛-普希金 (V. V. Musin-Pushkin) 伯爵在寫給他岳父的信中總結了宮廷裏的氣氛：「大部分資產階級圈子都傾向於革命，外省的情況比首都更糟。毫無疑問，所有人都感到不滿。」這位伯爵還說，「最蠢、最讓人氣惱的是，不滿沒甚麼理由可講」(!)。Cherniavsky, *Prologue to Revolution*, 12-3.
- 25 M. O. Gershenzon, 載於 Shagrin and Todd, *Landmarks*, 81; Paléologue, *An Ambassador's Memoirs*, III: 349-50.
- 26 事實上，無論是英國人還是法國人，都不相信俄德會長期對抗，因為在聖彼得堡和柏林之間不存在根本的利益衝突。但是在俄國，主要的親德派謝爾蓋·維特和杜爾諾沃都不再掌握大權，不足以影響尼古拉二世。聖彼得堡的親德情緒減弱，這構成了1914年2月杜爾諾沃備忘錄的背景。Lieven, "Pro-Germans"; Bestuzhev, *Bor'ba*, 44-6.
- 27 Fischer, *War of Illusions*, 334-6.
- 28 杜爾諾沃從前的副手指出，這位上司「不能理解人民內心深處的東西」。Gurko, *Features and Figures*, 415.
- 29 「治理國家要嚴厲，」杜爾諾沃在1910年底曾經解釋說，「正義本身要服從更高的國家利益的需要……沙皇必須要威嚴〔令人敬畏〕，但也要仁慈，威嚴是首要的，仁慈其次。」*Gosudarstvennyi Sovet: stenograficheskiĭ otchet, sixth session December 17, 1910*, col. 595; Lieven, "Bureaucratic Authoritarianism," 395, n25.
- 30 Lieven, *Russia's Rulers*, 277-308.
- 31 「繼承人的疾病，皇后的易怒，君主的優柔寡斷，拉斯普京的出現，總體而言政府的施政策略缺乏系統性，」國務會議中另外一名右翼分子亞歷山大·瑙莫夫 (Alexander Naumov) 回憶說，「所有這一切都迫使正直而嚴肅的公共官員去思考現狀，謹慎展望一個不確定的未來。」Naumov, *Iz utselevshikh vospominaniĭ*, II: 214-5 (包括所引杜爾諾沃的話)。

- 32 多年之後，在移民中流傳着這樣一則故事，說沙皇曾經邀請杜爾諾沃擔任總理，掌管政府權力。「陛下，」據說杜爾諾沃反對，「無論是作為政府首腦還是內務大臣，我的辦法都不能立竿見影，只有在若干年後才能收效，而這若干年將會紛亂不堪：解散杜馬、暗殺、處決，或許還有武裝暴動。您，陛下，是不可能接受這種局面的，您會解除我的職務；在這種情況下，由我來主政毫無好處，只有害處。」認為杜爾諾沃會再次試圖贏得尼古拉二世的信任然後婉拒接掌權力的邀請，這完全是異想天開。不過，這段杜撰出來的、據說是他說過的話，的確反映出他以及其他的人實際上有多麼灰心。Vasil'chikov, *Vospominaniia*, 225; Lieven, *Russia's Rulers*, 229–30.
- 33 Mal'kov, *Pervaiia mirovaia voina*, 99.
- 34 Mendel, "Peasant and Worker." 門德爾是在評論利奧波德·海姆森(Leopold Haimson)的觀點，後者那篇有影響的文章認為，俄國革命不可避免，因為在俄國社會存在雙重的對立：工人與其他社會群體之間的對立，以及受過良好教育的群體與君主專制之間的對立。Haimson, "Problem of Social Stability."
- 35 Dan, *Origins of Bolshevism*, 399. 初版為俄文(1946)，是流亡的唐恩在紐約去世前夕出版的。
- 36 Hosking, *Russian Constitutional Experiment*. 新的研究參見McKean, "Constitutional Russia," 以及彼得·加特列爾(Peter Gatrell)的回應(82–94)。在非自由主義的政治秩序中，市民社會是無法存在的，但學者們仍然以為在沙俄存在市民社會，理由主要是存在各種協會，但這些協會幾乎無法保障公民權利，對國家也幾乎沒有甚麼影響力。Walkin, *Rise of Democracy*; Bradley, *Voluntary Association*; Ely, "Question of Civil," 225–42.
- 37 Shelokhaev, *Politicheskie partii Rossii*.
- 38 Holquist, "Violent Russia," 651–2.

## 第五章 愚蠢還是叛國？

- 1 *Rech'*, December 13, 1916, 翻譯並轉載於 Golder, *Documents of Russian History*, 154–166 (at 164).
- 2 Tikhomirov, "Nuzhny li printsipy?," 69.
- 3 Morris, *Colonel Roosevelt*, 56.
- 4 「皇帝就像打發傭人一樣讓我捲鋪蓋走人。」這位忿忿不平的前總理寫道。後來，俾斯麥進行了報復，用「威廉一世忠實的德意志僕人」作為自己的碑文。Steinberg, *Bismarck*, 454–5, 463, 480. 德皇解除俾斯麥的職務和尼古拉二世對待維特的做法差不多。
- 5 Kennan, *Fateful Alliance*.
- 6 Offer, *The First World War*, 324–30. 美國在國際貿易中位列第三，佔11%。Kennedy, *Over Here*, 298.

- 7 Steinberg, *Yesterday's Deterrent*.
- 8 引自 Paul Kennedy, "The Kaiser and Weltpolitik: Reflexions on Wilhelm II's Place in the Making of German Foreign Policy," 載於 Röhl and Sombart, *Kaiser Wilhelm II*, 143-68 (at 155). 另見該書的 (1-62) J. G. Röhl, "Introduction" 以及 "The Emperor's New Clothes: A Character Sketch of Kaiser Wilhelm II"; Hull, *Entourage of Kaiser Wilhelm II*; 以及 Hewitson, "The Kaiserreich in Question."
- 9 Neilson, *Britain and the Last Tsar*.
- 10 McClelland, *German Historians and England*; Sontag, *Germany and England*; 以及 Conrad, *Globalisation and Nation*.
- 11 引自 Ronaldshay, *Life of Lord Curzon*, III: 117.
- 12 Kennedy, *Rise of the Anglo-German Antagonism*, 360.
- 13 總論戰爭原因的著述，在許多方面都是由第一次世界大戰的例子發展而來的。Blainey, *The Causes of War*, Howard, *The Causes of Wars*. 可惜，關於戰爭原因的政治學文獻不久前走進了死胡同，而且現在還沒有完全走出來：Fearon, "Rationalist Explanations for War." 比較有幫助的有 Jervis, *Perception and Misperception*.
- 14 Gatrell, *The Tsarist Economy*, 31-2.
- 15 Stone, *The Eastern Front*, 42; Knox, *With the Russian Army*, I: xix.
- 16 Fischer, *War of Illusions*, 400; Berghahn, *Germany and the Approach of War*, 181. 「俄國不斷在發展，」德國總理特奧巴爾德·馮·貝特曼·霍爾韋格強調說，「它像夢魘一樣壓在我們身上。」另見 Pollock, *Creating the Russian Peril*; 以及 Mombauer, *Helmuth von Moltke*. 英國造船業建造戰艦的速度是俄國的兩倍，成本是俄國的一半，但英國自己給自己增加負擔，要控制全世界的航道。Gatrell, *Government, Industry and Rearmament*. 758
- 17 Wohlforth, "The Perception of Power"; John C. G. Röhl, "Germany," 載於 Wilson, *Decisions for War*, at 33-8.
- 18 Halévy, *The World Crisis*, 24-5; 另見 Crampton, "The Balkans," 66-79.
- 19 Fay, *The Origins of the World War*, II: 335; Albertini, *Origins of the War of 1914*, II: 74-88; Dedijer, *The Road to Sarajevo*; Vucinich, "Mlada Bosna and the First World War," 45-70; Zeman, *The Break-Up*, 24-34; Remak, *Sarajevo*; MacKenzie, *Apus*, 123ff. 早在1910年6月3日，波格丹·熱拉伊奇 (Bogdan Žerajić, 一名22歲的塞爾維亞人) 就曾試圖刺殺弗朗茨·約瑟夫皇帝；12天後，熱拉伊奇又企圖刺殺當時的波斯尼亞和黑塞哥維那總督馬里揚·韋雷沙寧 (Marijan Verešanin) 將軍。熱拉伊奇在失敗後自殺。
- 20 Mark Cornwall, "Serbia," 載於 Wilson, *Decisions for War*, 55-96.
- 21 Trotskii, *Sochineniia*, XVII/1: 190.
- 22 弗朗茨·約瑟夫咄咄逼人的姿態，讓有些人想起了15年前英國人在布爾戰爭中的行為，當時倫敦害怕失去對整個南非的控制，就發明了集中營，試圖消滅「傲慢自大的」南非白人民居。Lieven, "Dilemmas of Empire," 187.
- 23 Wandruszka, *House of Habsburg*, 178.

- 24 奧地利的決策受到了嚴厲的批評 (Taylor, *The Struggle for Mastery*, 521; Williamson, *Austria-Hungary*, 211)。但也有人對奧匈帝國賭博式的做法作了機敏的辯護，參見 Schroeder, "Stealing Horses," 17–42。當英國在1914年8月3日宣戰的時候，不到四分鐘，遠東的英軍指揮官就通過電報知道了。
- 25 Newton, *Lord Lansdowne*, 199.
- 26 Lieven, *Russia and the Origins*, 77–80。對尼古拉產生了影響的不僅可能有杜爾諾沃和倒臺的俄日戰爭，還可能有俄屬波蘭銀行家伊萬·布洛赫 (Iwan Bloch) 引起廣泛討論的六卷本《未來戰爭》 (*Budushchaia voina*, St. Petersburg: Efron, 1898)。最後的第六卷被譯成英文，書名是《未來戰爭及其技術、經濟、政治的聯繫：戰爭是否不可能？》 (*The Future of War in Its Technical, Economic, and Political Relations: Is War Now Impossible?* New York: Doubleday & McClure, 1899)。
- 27 Ropponen, *Die Kraft Russlands*; Fuller, "The Russian Empire," 110–20.
- 28 戰爭一開始，俄國外交大臣就向塞爾維亞施壓，要求割讓馬其頓地區的領土 (倫保加利亞)。Paléologue, *An Ambassador's Memoirs*, I: 22–23 (1914年7月23日的日記)。
- 29 Albertini, *Origins of the War of 1914*, II: 352–62; Lieven, *Russia and the Origins*, 139–51, Spring, "Russia and the Coming of War," 57–86。阿爾貝蒂尼在概括性的敘述中非常突出的一點在於，對俄國的原始資料掌握得十分詳盡。
- 30 Turner, "The Russian Mobilization in 1914," 252–66; Geyer, *Russian Imperialism*, 312–3, Sazonov, *Vospominaniia*, 248–9 (薩佐諾夫是當時的外交大臣)。有關文件可參見 "Nachalo voiny 1914 g.: podennaia zapis'."
- 31 Hans Rogger, "Russia in 1914." 亞歷山德拉在一封給尼古拉的信裏異想天開地認為，戰爭「振奮了精神，淨化了呆滯的心靈，造成了情感上的團結」，並認為這場戰爭「從道德上說是健康的戰爭」。Pares, *Letters of the Tsaritsa*, 9 (September 24, 1914)。尼古拉二世是在冬宮陽台上公開宣戰的，有關這方面的情況，參見 Vasilyev, *Ochrana*, 36。
- 32 這份報紙還說，「在這裏，第二次偉大的衛國戰爭開始了。」Gatrell, *Russia's First World War*, 18。關於1914年德俄兩國新聞界的戰爭鼓噪，參見 Fischer, *War of Illusions*, 370–88。「為甚麼戰爭總的來說是邪惡的而單單這次不知為何是好的呢？」聖彼得堡的女詩人季娜伊達·吉皮烏斯在1914年8月的日記中寫道。Gippius, *Siniiaia kniga*, 12。
- 33 正如約翰·勒多內所言：「這些不是當權者的目標，他們已被德國的威脅搞得暈頭轉向了。」當然，鮑里斯·諾爾德 (Boris Nolde) 說得很對，俄國的帝國主義戰爭目標不是決定宣戰的推動因素，那些目標是在戰爭開始後出現的。然而它們的出現並不是突如其來的。主要的當事人之一、俄國前外交大臣亞歷山大·P·伊茲沃利斯基 (Aleksandr P. Izvolsky) 事後企圖為俄國辯解，認為俄國採取行動只是因為擔心德國稱霸歐洲。LeDonne, *Russian Empire and the World*, 366–7; Boris Nolde, "Tseli i real'nost' v velikoi voine," 81–6; Izvolsky, *Memoirs*, 83。
- 34 「俄國政府這麼長時間以來一直在反對戰爭，就是因為擔心它的社會影響，」有學者寫道，「而現在參戰也是出於同樣的理由。」McDonald, *United Government*, 207。

- 35 Zuber, *Inventing the Schlieffen Plan*. 另見 Snyder, *Ideology of the Offensive*, chapters 4–5; 以及 Sagan, “1914 Revisited.”
- 36 Förster, “Dreams and Nightmares: German Military Leadership and the Images of Future War,” 343–76 (esp. 360, 365, 372); Herwig, “Germany and the ‘Short War’ Illusion,” 688; Snyder, *Ideology of the Offensive*, 112, 122–24; Howard, *The First World War*, 28–9; Offer, “Going to War in 1914.”
- 37 Lambert, *Planning Armageddon*. 施利芬之所以認為必須速勝，有一個理由是，由於戰爭會給經濟帶來新的限制，要維持一場消耗戰是不可能的。Albertini, *Origins of the War of 1914*, III: 369ff.
- 38 Clark, *Kaiser Wilhelm II*, 214–18.
- 39 大使卡爾·馬克斯·利赫諾夫斯基侯爵 (Karl Max Lichnowsky) 致柏林，1914年8月1日，載於 *Die deutschen Dokumente zum Kriegsausbruch*, 2nd ed., 4 vols. (Berlin: Deutsche Verlagsgesellschaft für Politik und Geschichte, 1922), III: 66; Albertini, *Origins of the War of 1914*, III: 171–8, 380–6; Berghahn, *Imperial Germany*, 282–3. 關於德皇的擔心與克制，參見 Stevenson, *Cataclysm*, 21–35.
- 40 Tuchman, *Guns of August*, 99 (引自馮·毛奇的回憶錄).
- 41 Nicolson, *King George V*, 328–9 (引自皇家檔案館中格雷的筆記); Young, “The Misunderstanding of August 1, 1914.”
- 42 Von Moltke, *Erinnerungen*, 21; von Zuehl, *Erich von Falkenhayn*, 58–9.
- 43 按照1907年10月達成並於1910年1月26日生效的協議，國際法要求在戰爭開始前必須先行宣戰。
- 44 「〔德國〕政府，」海軍內閣首腦在日記中讚許地寫道，「非常成功地使我們成了受到攻擊的一方。」Berghahn, *Germany and the Approach of War*, 213ff.
- 45 A. J. P. 泰勒有個出名的說法，稱之為「按照時間表開始的戰爭」，並錯誤地把責任歸咎於動員，甚至斷言列強中誰都不想發動戰爭。參見 A. J. P. Taylor, *War by Timetable*.
- 46 英國政府具備實施封鎖的有利條件，但沒能協調好相關的許多部門。經濟戰從英國大戰略的基石變成了後來附加的東西。Lambert, *Planning Armageddon*, quote at 189 (Robert Brand). 另見 Ferguson, *Pity of War*, 189–97; 以及 Ferguson, “Political Risk”
- 47 針對泰勒說的「和平會讓德國在幾年內佔據歐洲的統治地位」，弗格森反駁說，如果英國保持中立，那接下來最壞的情況是，法國被迫接受一種溫和的德式和平，而比利時則可以保全。Taylor, *The Struggle for Mastery*, 528; Ferguson, *Pity of War*, 168–73, 442–62.
- 48 Lieven, *Russia and the Origins*, 142–3.
- 49 這不是要為馮·毛奇開脫：1915年6月，在被埃里希·馮·法爾肯海因 (Erich von Falkenhayn) 取代後，自大的馮·毛奇私下對朋友抱怨說，「在這場由我準備並發動的戰爭中被指責說無所作為，這讓人不痛快。」一年後，他死了。Mombauer, “A Reluctant Military Leader?,” 419.
- 50 Stevenson, *Armaments*; Van Evera, “The Cult of the Offensive.” 另見 Dickinson, *International Anarchy*.



- 51 Lieven, *Russia and the Origins*, 139–40. 關於榮譽，參見 Offer, “Going to War in 1914”
- 52 對決策情況的概述，參見 Hamilton and Herwig, *Decisions for War*.
- 53 有着巨大影響的塔奇曼的《八月炮火》，其特點是利用回憶錄（而不是當時尚未公開的檔案），把重點放在政治家們身上。參見 Strachan, *The First World War* [2004], 68; Strachan, *The First World War* [2003], I: 4–162; Stevenson, *Cataclysm*; 以及 Van Evera, “Why Cooperation Failed.”
- 54 Christensen and Snyder, “Chain Gangs,” 66.
- 55 Horne, *A Companion to World War I*, 249. 「依我拙見，要是我可以這麼說的話，現在的歐洲各國全都瘋了。」在離戰爭還有幾年的時候（1911），加拿大總理（威爾弗雷德·勞里埃〔Wilfrid Laurier〕）就已經說過。轉引自 Offer, *The First World War*, 268.
- 56 French, *British Strategy*, xii, 200–1.
- 57 Pearce, *Comrades in Conscience*, 169; Keegan, *The First World War*, 278–99; Ferro, *The Great War*, 91–2. 另見 Prior and Wilson, *The Somme*.
- 58 Edgerton, *The Shock of the Old*, 142–6.
- 59 Ellis, *Social History of the Machine Gun*.
- 60 Haber, *The Poisonous Cloud*, 243.
- 61 Gumz, *Resurrection and Collaps*.
- 62 Russell, *Justice in War Time*, 13–4.
- 63 Harding, *Leninism*, 8–11, 113–41.
- 64 *Bol'shevik*, 1949, no. 1, 轉載於 PSS, XLIX: 377–9 (at 378); Lih, *Lenin*, 13. 利赫的著作充滿了原創性的洞見，但可惜，他把列寧描寫成一個主流的歐洲社會民主黨人，有點像尼采的英文譯者沃爾特·考夫曼（Walter Kaufmann），把那位激進的德國思想家理解成一個美式的自由主義者。
- 65 「愛國主義精神只是零星地表現出來，而在1915年，就幾乎完全看不到了……德國人相當清楚他們在戰爭中要和甚麼人作戰，但不知道為誰而戰、為何而戰。」Jahn, *Patriotic Culture*, 134, 173. 戰時的愛國主義是上層社會的情緒：Gurko, *Features and Figures*, 538.
- 66 Lieven, *Empire*, 46.
- 67 Hull, *Absolute Destruction*, 5–90.
- 68 Hochschild, *King Leopold's Ghost*.
- 69 Prior and Wilson, *The Somme*, 222; de Groot, *Douglas Haig*, 242 (引自 Haig, “Memorandum on Policy for the Press,” May 26, 1916).
- 70 Kramer, *Dynamic of Destruction*. 有位歷史學家說過，「協約國，尤其是英國人，想方設法讓人以為，他們是不得已才採取殘忍或是不擇手段的行動，而德國人似乎總以此為樂。」事實上，最初在比利時的無緣無故的暴行儘管有誇大的成分，但確有其事。Taylor, *The First World War*, 57.
- 71 Omissi, *The Sepoy and the Raj*, 117–8.
- 72 PSS, XLIX: 101, 161.

- 73 Thatcher, *Leon Trotsky*, 212. 另見 Martynov, “Ot abstraktsii k konkretnoi deiatel'nosti”; 以及 Thatcher, “Trotskii, Lenin, and the Bolsheviks.”
- 74 *Bulleten' oppozitsii*, August 1930, no. 14: 8; Trotsky, *Stalin School of Fabification*, 184–5. 《斯大林全集》第2卷收錄的最後一篇文章的日期是1913年1至2月，第3卷收錄的第一篇文章的日期是1917年3月。Medvedev, *Let History Judge*, 37.
- 75 Van Ree, “Stalin and the National Question,” at 224, 237, n64 (引自 RGASPI, f. 30, op. 1, d. 20; f. 558, op. 1, d. 57); Shveitzer, *Stalin v turukhanskoi ssylke*. 甚至在斯大林準備他的全集時，這篇沒有發表的文章——據說是用手書寫滿了兩本練習冊——也沒能找到。RGASPI, f. 558, op. 4, d. 62, l.308ff, 424.
- 76 Van Ree, “Stalin and the National Question,” 225 (引自 RGASPI, f. 558, op. 1, d. 54, d. 56).
- 77 Sverdlov, *Izbrannye proizvedennye*, I: 386–90.
- 78 *Krasnoarskii rabochii*, July 25, 2003 (引自 Gosudarstvennyi arkhiv Krasnoarskogo kraia): [http://www.krasrab.com/archive/2003/07/25/16/view\\_article](http://www.krasrab.com/archive/2003/07/25/16/view_article); *Pechat' i revoliutsiia*, 1924, kn. 2: 66; Sverdlov, *Izbrannye proizvedennye*, I: 276–7. Volkogonov, *Stalin: Politicheskii portret*, I: 51. 另見 Sverdlov, *Iakov Mikhailovich Sverdlov* [1985], 171–208.
- 79 這是引用了1938年10月的一句話：*Istoricheskii arkhiv* (1994), no. 5: 13; RGASPI, f. 558, op. 11, d. 1122, l. 55. 關於他發誓娶那位姑娘的事情，參見 *Istochnik*, 2002, no. 4: 74.
- 80 那些藏書是杜布羅溫斯基 (Dubrovinsky) 的。1929年，當那位名叫米哈伊爾·梅爾茲利亞科夫 (Mikhail Merzlyakov) 的憲兵，因為從前當過沙皇警察而要被逐出所在的集體農莊時，他寫信給斯大林。斯大林給該村蘇維埃寫信說：「米哈伊爾·梅爾茲利亞科夫執行警察頭子交給他的任務是照章辦事，但不像一般的警察那樣起勁。他沒有暗中監視我。他沒有為我的生活帶來不幸，也沒有對我威逼恐嚇。我經常不在，他也能容忍。有幾次他還對自己上級所下的很多命令和指示表示不滿。我認為我有責任向你們證實這一點。」RGASPI, f. 558, op. 4, d. 662.
- 81 Kvashonkin, *Bol'shevistskoe rukovodstvo*, 21 (RGASPI, f. 558, op. 1, d. 53, l.1–3; Feb. 27, 1915); Allilueva, *Vospominaniia*, 118. 安娜是謝爾蓋·阿利盧耶夫的另外一個女兒。RGASPI, f. 558, op. 4, d. 662. 斯大林當時在庫列伊卡 (1914–1916)，他後來告訴當地的兒童說：「我煩躁不安，有時大喊大叫，日子很艱難。」TskhidNI Krasnoarskogo Kraia, f. 42, op. 1, d. 356, l. 22.
- 82 Ostrovskii, *Kto stoial*, 414–8. 因為是猶太人，斯維爾德洛夫也逃過了戰爭。
- 83 Best, “The Militarization of European Society,” 13–29.
- 84 雖然俄國士兵散佈在大約800萬平方英里 (編註：約2,072萬平方公里) 的領土上，但他們大多是靠步行，帶着馬或牛拉的大車走上戰場的。1914年，所有俄國的應徵入伍者要想到達動員的地點，走的距離平均下來都要超過德國、奧匈帝國或法國的應徵入伍者的三倍。Knox, *With the Russian Army*, I: xxxiii; Dobrorolski, *Die Mobilmachung der russischen Armee*, 28; Golovin, *Voennye usilia Rossii*, I: 51, 61, II. 69–71; Brusilov, *Moi vospominaniia*, 76; Danilov, *Rossia v mirovoi voine*, 191–2; Rostunov, *Ruskii front*, 100–1.

- 85 他們中許多人都死在前往遠離前線的後方醫院途中，當時他們被「堆放在貨車車廂的地板上，沒有採取任何醫療救護措施」。在送到醫院治療的500萬俄國士兵中，大概有一半人是在戰鬥中負的傷，其餘的是因為疾病——斑疹傷寒、傷寒、霍亂、痢疾——或者凍傷，而凍傷常常需要截肢。Virubova, *Memoria of the Russian Court*, 109. 另見Miliukov, *Vospominaniia*, II: 199; Rodzianko, *Reign of Rasputin*, 115-7.
- 86 在沙皇統治下的突厥斯坦，除了必須以低於市場價的價格為軍隊提供馬匹和家畜之外，1916年又開始實行徵兵制度，結果引發全面叛亂。暴力衝突導致大約2,500名俄羅斯人死亡，至少30萬草原游牧人口遷移，其中有許多越過邊境逃到了中國。Piaskovskii, *Vosstanie 1916 godu*; Kendirbai, "The Alash Movement," V: at 855; Pipes, *Formation of the Soviet Union*, 84. 戰爭期間，大英帝國統治下的印度、埃及、愛爾蘭以及其他地方也發生了叛亂。
- 87 Stone, *The Eastern Front*, 215.
- 88 Showalter, *Tannenberg*.
- 89 Golovine, *The Russian Army*, 220-1. 另見Polivanov, *Iz dnevnikov i vospominanii*, 186.
- 760 90 Stone, *The Eastern Front*, 12, 93. 成立於1912年的俄國空軍，在1914年可能擁有360架飛機和16艘飛艇，是當時世界上最龐大的空中力量，但由於缺少零配件，大部分時間只能窩在地面，聽憑德國人四處調動而沒有發覺。
- 91 Ol'denburg, *Gosudar' Imperator Nikolai II Aleksandrovich*; 後被擴充成Ol'denburg, *Istoriia tsarstvovanie Imperatora Nikolaia II*; 並被譯作Ol'denburg, *Last Tsar*。當時不只是杜馬。「帝國當局與市民社會的對立是我們政治生活中最大的災難，」農業大臣亞歷山大·克里沃舍因(Alexander Krivoshein)在戰爭期間嘆息說，「只要政府和社會堅持把對方看作兩個敵對的陣營，俄國的前途就仍然很危險。」引自Paléologue, *La Russie*, I: 289. 1914年2月，克里沃舍因以健康原因為由，謝絕出任首相。
- 92 Gurko, *Features and Figures*, 19; Mamontov, *Na Gosudarevoi sluzhbe*, 144-5, 151-3; Masolov, *Pri dvore imperatora*, 11-12; Lieven, *Nicholas II*, 117; Figs, *A People's Tragedy*, 15-24.
- 93 杜馬開會的時間還包括1915年7至8月戰爭開始一週年的時候，1916年2至5月，以及1916年11月至1917年2月。
- 94 Gurko, *Features and Figures*, 576. 「我們必須戰鬥，因為政府是由一些惡棍組成的，」屬於民族主義政黨的瓦西里·舒利金解釋說，「但既然我們不打算到街壘去，我們就不可能把其他人鼓動起來。」Lapin, "Progressivnyi blok v 1915-1917 gg.," 114.
- 95 Shchegol'ev, *Padenie*, VII: 116-75 (羅將柯，關於馬克拉克科夫) at 124. 另見Gurko, *Features and Figures*, 521-2. 謝戈廖夫的書是「沙皇政權的大臣及其他負責人非法行為特別調查委員會」的成果，該委員會由臨時政府成立，布爾什維克中止了委員會的工作，但出版了它的部分材料(那些材料是由詩人亞歷山大·布洛克抄寫的)。
- 96 國家為杜爾諾沃的葬禮花了4,000盧布。

- 97 Kir'ianov, *Pravye partii*; Kir'ianov, *Pravye partii*.
- 98 參見 Eroshkin, *Ocherki istorii*, 310.
- 99 Gal'perina, *Sovet ministrov Rossiiskoi imperii*; Cherniavsky, *Prologue to Revolution*. 在西部靠近前線的幾個地區，俄國大本營的確把文官政府撇在了一邊（儘管文官政府不怎麼樣），但是，從管理上講，軍人幹得也好不了多少。Graf, "Military Rule behind the Russian Front."
- 100 Jones, "Nicholas II"; Ol'denburg, *Last Tsar*, IV: 38–42; Brusilov, *Soldier's Note-book*, 267–8; Gurko, *Features and Figures*, 567–71; Golder, *Documents of Russian History*, 210–1. 就像維特說到尼古拉二世時講的，「神秘主義的輕霧使他所看到的一切發生了折射，放大了他自己的作用和他本人。」Dillon, *Eclipse of Russia*, 327（引自據說是對維特的採訪）。
- 101 Gourko, *War and Revolution*, 10–1; Mikhail Lemke, *250 dnei*, 149; Fuller, *Civil-Military Conflict*, 41.
- 102 Jones, "Nicholas II."
- 103 這些說法出自莫里斯·帕萊奧洛格，引自 V. Kantorovich, *Byloe*, 1923, no. 22: 208–9.
- 104 *Letters of the Tsaritsa*, 114, 116 (1915年8月22日)。
- 105 Fuller, *Foe Within*; Shatsillo, "Delo polkovnika Miasoedova"; Knox, "General V. A. Sukhomlinov."
- 106 Fülöp-Miller, *Rasputin*, 215; Radzinsky, *Rasputin File*, 40.
- 107 宮廷否認他的淫蕩。Viroubova, *Souvenirs de ma vie*, 115. 薩拉熱窩暗殺事件發生在西曆6月28日、俄曆7月15日；刺殺拉斯普京未遂事件發生在西曆6月29日、俄曆7月16日。暗殺者是希奧尼婭·古謝娃 (Khionia Guseva)，察里津人。
- 108 Kokovtsov, *Iz moego proshlogo*, II: 40; Beletskii, *Grigorii Rasputin*, 32–6.
- 109 Kilcoyne, "The Political Influence of Rasputin."
- 110 Massie, *Nicholas and Alexandra*, 199–202; Fuhrmann, *Rasputin*, 93–8; Radzinsky, *Rasputin File*, 187. 阿列克謝左腿神經萎縮，在1913年夏天給他造成極大的痛苦，但1912年那種嚴重的危險已經過去了。Gilliard, *Thirteen Years*, 28–30. 吉利亞爾是阿列克謝的家庭教師，沒有人告訴他阿列克謝的病因。
- 111 Crawford and Crawford, *Michael and Natasha [New York]*, 122–46.
- 112 Figs and Kolonitskii, *Interpreting the Russian Revolution*, 10; RGIA, f. 1278, op. 10, d. 11, l. 332; Maylunas and Mironenko, *A Lifelong Passion*, 529.
- 113 Grave, *Burzhuaziia nakanune fevral'skoi revoliutsii*, 78. 另見 Wildman, *End of the Russian Imperial Army*, I: 156.
- 114 關於他所謂戰時的俄國社會組織的「近似於國營的綜合企業」，參見 Holquist, *Making War*, 4. 劉易斯·西格爾鮑姆指出，相對於其他大國，與「先前處於國家機器之外，甚至對國家機器抱有敵意的社會利益集團」的合作，「在戰時的俄國是最不充分的」。但這個說法很可能並不符合1916年的情況。Siegelbaum, *Politics of Industrial Mobilization*, xi.

- 115 Lincoln, *Passage through Armageddon*, 61.
- 116 Zagorsky, *State Control of Industry*, 46; Maurice Paléologue, *La Russie*, I: 231–2.
- 117 Stone, *The Eastern Front*, 227; Pogrebinskii, “Voенно-promyshlennye komitety”; Gronsky and Astrov, *The War and the Russian Government*.
- 118 阿列克謝耶夫反對布魯西洛夫採取「寬大正面」接敵的方式，而是竭力主張他應該攻擊一個12英里（編註：約19公里。）的狹窄正面，但布魯西洛夫堅持自己的計劃，而按照他的設想，這可以使敵人摸不着頭腦，不知該把預備隊投入到哪裏。Brusilov, *Soldier's Note-book*, 204–75; Brusilov, *Moi vospominaniia*, 237; Hart, *The Real War*, 224–7; Knox, *With the Russian Army*, II: 432–82; Rostunov, *Russkii front*, 321–3; Rostunov, *General Brusilov*, 154–5; Dowling, *The Brusilov Offensive*.
- 119 Stone, *The Eastern Front*, 243.
- 120 不過，他還寫道，「在我們與俄國人交手時，有時候必須搬走敵人在我方戰壕前留下的成堆的屍體，那樣才可以保證，當敵人再次發動潮水般的進攻時，不會妨礙到射擊。」Von Hindenburg, *Out of My Life*, I: 193; II: 69. See also Asprey, *German High Command*.
- 121 引自 McReynolds, “Mobilising Petrograd’s Lower Classes,” 171.
- 122 Knox, *With the Russian Army*, II: 462–9; Lyons, Vladimir Mikhailovich Bezobrazov, 103–10.
- 123 Daly, *Watchful State*, 180 (I. G. Shcheglovitov).
- 124 Fleer, *Rabochee dvizhenie*, 309.
- 125 Rezanov, *Shturmvoi signal P. N. Miliukova*, 43–61; Ol’denburg, *The Last Tsar*, IV: 99–104; Bohn, “Dummheit oder Verrat?”; Lyandres, “Progressive Bloc Politics.” 米留可夫後來試圖為自己的謊言辯護：Miliukov, *Vospominaniia*, II: 276–7; Diakin, *Russkaia burzhuziia*, 243. 另見 Riha, *A Russian European*; and Stockdale, *Paul Miliukov*.
- 126 Pipes, *Russian Revolution*, 261–6; Golder, *Documents of Russian History*, 166–75. 普利什凱維奇已經受到公開指控，說他想把尼古拉二世趕下台。“Sovremennoe pravosudie,” *Dym otechestva*, 1914, no. 22: 1–2. 英國大使喬治·布坎南聽信了在俄國宮廷有德國間諜，而英國秘密情報機關的一名特工似乎是同謀的傳聞，因而擔心俄國人會單獨去和德國媾和。證據顯示，奧斯瓦爾德·雷納 (Oswald Rayner) 中尉，尤蘇波夫在牛津上學時的熟人，當時就在謀殺現場，而且第二天還和尤蘇波夫共進晚餐。雷納在聖彼得堡的上司之間的談話表明，他有可能同謀殺有關。Cook, *To Kill Rasputin*.
- 761 127 Voikov, *S tsarem*, 178; Pipes, *Russian Revolution*, 266–7. 刺殺者根本沒有受到審判。
- 128 V Mikhailovich, *Kniga vospominaniia*, 186; Mikhailovich, *Once a Grand Duke*, 184. 亞歷山大·米哈伊洛維奇是尼古拉二世的祖父、沙皇亞歷山大二世的弟弟 (米哈伊爾·尼古拉耶維奇大公) 的兒子。尤蘇波夫公爵，謀殺拉斯普京的兇手之一，是亞歷山大·米哈伊洛維奇大公的女婿 (譯註：亞歷山大·米哈伊洛維奇大公的妻子是尼古拉二世的妹妹謝妮亞，所以沙皇又是他的內兄。)
- 129 Lincoln, *Passage through Armageddon*, 312 (引自 “Télégramme secret de M. Paléologue au Ministère des Affaires Etrangères,” AdAE, Guerre 1914–1918, Russie, Dossier Générale no. 646: 78–9).

- 130 Buchanan, *My Mission to Russia*, II: 41.
- 131 莫斯科的保安處處長馬丁諾夫 (Martynov) 指出，群眾情緒激進，不是因為外界的鼓動者，而是因為政府的錯誤、沙皇威望下降以及宮廷醜聞。“Tsarskaia okhrana o politicheskom polozhenii v strane v kontse 1916 g.,” *Istoricheskiĭ arkhiv*, 1960, no. 1: 204–9; Pokrovskii and Gelis, “Politcheskoe polozhenie Rossii nakanune fevral’skoi revoliutsii v zhandarmskom osveshchenii,” 節錄自 Daniels, *Russian Revolution*, 9–12.
- 132 “Fevral’skaia revoliutsiia i okhrannoe otdelenie.” 「所有政黨的有威信的領導者一個也不在場。他們全都在流放、監禁之中，或是在國外。」 Sukhanov, *Russian Revolution*, I: 21.
- 133 Burdzhakov, *Vtoraia russkaia revoliutsiia*, 90–1, 107–8.
- 134 David Longley, “Iakovlev’s Question, or the Historiography of the Problem of Spontaneity and Leadership in the Russian Revolution of February 1917,” 載於 Frankel, *Revolution in Russia*, 365–87.
- 135 Manikovskii, *Boevoe snabzhenie russkoi armii* [1923].
- 136 Kimitaka, “Sōryokusensōto chihōtōchi.”
- 137 Anstiferov, *Russian Agriculture*.
- 138 Kitanina, *Voina, khleb i revoliutsiia*, 70–1.
- 139 Kondrat’ev, *Rynok khlebov*, 137–8; Holquist, *Making War*, 31–2.
- 140 Lih, *Bread and Authority*; Holquist, *Making War*, 44–6. 戰前俄國生產的糧食只有三分之一流向市場，而且其中有一半用於出口。
- 141 Kondrat’ev, *Rynok khlebov*, 127; Struve, *Food Supply in Russia*, 128; Zhitkov, “Prodfurazhnoe snabzhenie russkikh armii”; Pavel Volobuev, *Ekonomicheskaia politika Vremennogo Pravitel’stva*, 384–7; Yaney, *Urge to Mobilize*, 408–19; Kitanina, *Voina, khleb i revoliutsiia*, 217–8.
- 142 Lih, *Bread and Authority*, 12; “Gibel’ tsarskogo Petrograda,” 7–72. 「我們的麵粉廠裏有糧食，但麵粉廠根本沒有燃料，」莫斯科的市長說，「有麵粉的地方沒有車皮可以運送，而有車皮的地方又無貨可運。」引自 Diakin, *Russkaia burzhuziia*, 314.
- 143 這位密探警告說：「因為沒完沒了地排隊而心力交瘁的母親們……看着餓得奄奄一息的生病的孩子的母親們，也許比米留可夫和同盟，也就是杜馬「進步集團」的先生們更想來一場革命。」但這種說法低估了米留可夫。Hasegawa, *February Revolution*, 201 (引自 GARF, f. POO, op. 5, d. 669 [1917], l.25–33); Shchegol’ev, *Padenie*, I: 184 (Khabalov).
- 144 Gatrell, *Russia’s First World War*, 170.
- 145 Mil’chik, “Fevral’skie dni.”
- 146 Kolonitskii, *Symvoly vlasti i bor’ba za vlast’*, 14–37. 理查德·沃特曼認為：「在1917年2月尼古拉二世實際離開寶座之前，象徵意義的退位早就發生了。」Wortman, “Nicholas II,” 127. 另見 Steinberg, “Revolution,” 39–65; 以及 Figs, *A People’s Tragedy*, 307–53.
- 147 Gurko, *Features and Figures*, 546. 另見 Kir’ianov, *Pravye partii*, II: 604–46; 以及 Sadikov, “K istorii poslednikh dnei tsarskogo rezhima,” 241–2.

- 148 Diakin, "Leadership Crisis"; Diakin, *Russkaia burzhuaziia*, 300–2; Golder, *Documents of Russian History*, 116; *Sovremennye zapiski*, 1928, no. 34: 279 (Maklakov); "Aleksandr Ivanovich Guchkov rasskazyvaet," *Voprosy istorii*, 1991, nos. 7–8: (at 205); Rodzyanko, *Reign of Rasputin*, 244–5, 253–4; Gleason, "Alexander Guchkov"; Pares, *Fall of the Russian Monarch*, 427–9; Katkov, *Russia, 1917*, 215; Hasegawa, *February Revolution*, 187. 派普斯對這些陰謀論不屑一顧，認為都是胡扯。 Pipes, *Russian Revolution*, 269–70.
- 149 Steinberg and Khrustal'ev, *Fall of the Romanovs*, 72; Hynes, *Letters of the Tsar*, 315 (1917年2月24日); *Journal intime de Nicholas II*, 93.
- 150 Steinberg and Khrustal'ev, *Fall of the Romanovs*, 73 (亞歷山德拉致尼古拉，1917年2月25日); *Journal intime de Nicholas II*, 92. 哈巴洛夫發給大本營報告彼得格勒騷亂情況的第一封電報是在25日晚上6:08收到的，但阿列克謝耶夫可能到26日才向沙皇匯報。 Sergeev, "Fevral'skaia revoliutsiia 1917 goda," 4–5; Martynov, *Tsarskaia armiiia*, 80–1.
- 151 「甚麼革命？」首都的布爾什維克重要人物、從1915年起就是中央委員的亞歷山大·施略普尼柯夫譏諷說——他在1917年2月25日對於工人的情緒也有近距離的觀察。「給工人一塊麵包，運動就結束了！」Hasegawa, *February Revolution*, 258 (引自 Sveshnikov, "Vyborgskii raionnyi komitet," 83–4). 另見 "Gibel' tsarskogo Petrograda," 39–41; Shchegol'ev, *Padenie*, I: 191–4 (Khabalov); II: 231–3 (Beliaev).
- 152 Voikov, *S tsarem*, 195–200.
- 153 Chermenskii, *IV Gosudarstvennaia Duma*, 196, n4, 201; Daly, *Watchful State*, 189–92; Pares, *Fall of the Russian Monarchy*, 378–81, 393–96, 416–19.
- 154 Fuhrmann, *Complete Wartime Correspondence*, 6. 還有被稱作「笨蛋」的陸海軍部長米哈伊爾·別利亞耶夫，尼古拉二世說他「極其軟弱，做事總是退讓」。Hasegawa, *February Revolution*, 160–3.
- 155 巴爾克後來帶頭指責哈巴洛夫和別利亞耶夫，說他們優柔寡斷。 *Poslednie novosti*, March 12, 1921.
- 156 "Gibel' tsarskogo Petrograda," 32; Burdzhakov, *Vtoraia Russkaia revoliutsiia*, 96; Wildman, *End of the Russian Imperial Army*, I: 121.
- 157 Ascher, *Revolution of 1905*, I: 225.
- 158 Burdzhakov, *Russia's Second Revolution*, 91–3. 鎮壓首都街頭抗議活動的應急方案可能並不需要召回前線部隊——這或許是組建獨立的彼得格勒軍區的結果。Hasegawa, *February Revolution*, 163.
- 159 尼古拉二世給哈巴洛夫將軍的電報沒能保存下來。我們只有哈巴洛夫的證詞。參見 Shchegol'ev, *Padenie*, I: 190–1. 比照 Martynov, *Tsarskaia armiiia*, 81.
- 160 "Gibel' tsarskogo Petrograda," 38.
- 161 "Gibel' tsarskogo Petrograda," 39–41; Shchegol'ev, *Padenie*, I: 191–4 (Khabalov), II: 231–3 (Beliaev).
- 162 *Kak russkii narod zavoeval svobodu*, 8.
- 163 在打算同杜馬妥協之後，僅僅過了幾個小時，政府大臣們現在就主動動用沙皇的權威，準備讓杜馬休會！卡特科夫推斷說，政府首腦尼古拉·戈利岑(Nikolai

- Golitsyn) 握有一份沙皇簽發的、沒有註明日期的要求杜馬休會的指令，於是就擅自填寫了日期。Katkov, *Russia, 1917*, 287. 另見 Vasilyev, *Ochrana*, 215.
- 164 Sukhanov, *Zapiski*, I: 53, 59. 另見從警方的角度所作的描述，Daly, *Watchful State*, 201-6.
- 165 Budzhualov, *Russia's Second Russian Revolution*, 161; Budzhualov, *Vtoraia russkaia revoliutsiia*, 182. 當保安處試圖對武裝力量的政治可靠程度進行監督時，軍方高層因為覺得自己的榮譽感受到冒犯而進行了抵制。即使對軍隊進行監視，也不會有什麼用。Lauchlan, *Russian Hide-and-Seek*, 333-6. 762
- 166 有些帕夫洛夫斯基近衛營的士兵被關了起來。「沙皇制度的堡壘出現了一道危險的缺口」，蘇漢諾夫寫道。Sukhanov, *Russian Revolution*, I: 29. 關於2月26日的衝突，巴爾克回憶說，他的辦公室來了一大幫對局勢憂心忡忡的警察機關和國家的官員。「和他們談了事態的發展，沒有發生國家政變。騷亂是有的，但俄國在過去這些年經歷了多次騷亂，而我們作為內務部的工作人員，是非常鎮定的：雙方要想避免犧牲那是不可能的，我們對此已習以為常，可沒想到，最後軍隊不願意鎮壓叛亂。」“Gibel' tsarskogo Petrograda,” 42-3.
- 167 K. I. 格洛巴切夫 (K. I. Globachev) 將軍的話：Ganelin, “The Day Before the Downfall,” 245-55; Ganelin et al., “Vospominaniia T. Kirpichnikova,” 178-95. 1916年12月，頓河地區的哥薩克拒絕向那些丈夫在前線的女人們開槍，參見 Engel, “Nor By Bread Alone,” 712-6.
- 168 “Fevral'skaia revoliutsiia i okhrannoe otdelenie,” *Byloe*, 29, January 1918: 175-6.
- 169 Hasegawa, *February Revolution*, 233-8. 「在那些天，我不知道自己看到過多少次撞人的事情」，一個叫維克托·什克洛夫斯基 (Viktor Shklovsky) 的裝甲車司機回憶說。Shklovsky, *Sentimental Journey*, 16.
- 170 Sergeev, “Fevral'skaia revoliutsiia 1917 goda,” 8 (2月27日哈巴洛夫給尼古拉二世的電報，發出的時間是中午12:10，收到的時間是中午12:20)，15-6 (2月27日哈巴洛夫給阿列克謝耶夫的電報，發出的時間是晚上8時，收到的時間是夜裏12:55).
- 171 2月27日晚上，材料顯示，巴爾克請求內務大臣允許自己和部隊一起撤到皇村。「甚麼，你這個城防司令，想要撤出彼得格勒？那是怎麼回事？」Shchëgolëv, *Padenie*, II: 149-50 (Protopopov). 註：普羅托波波夫把日期弄混了。
- 172 最後一任沙皇警察局長瓦西里耶夫寫道，「要鎮壓叛亂在當時根本不可能」——他說得對。但是和在他之後的許多人一樣，他錯誤地把這種不可能的原因歸結為在首都沒有可靠的軍隊，認為「如果有幾個可靠的團，很容易就可以維持彼得堡的秩序」。Vasilyev, *Ochrana*, 221.
- 173 Shchëgolëv, *Padenie*, V: 32-49 (Frederiks) (at 38).
- 174 Bublikov, *Russkaia revoliutsiia*, 17; Kantorovich and Zaslavskii, *Khronika fevral'skoi revoliutsii*, 28-9; Skobelev, “Gibel' tsarizma”; Browder and Keresnsky, *Russian Provisional Government*, I: 41-7; Abraham, *Kerensky*, 131-2; Chermenskii, “Nachalo vtoroi rossiiskoi revoliutsii,” at 99. 另見 Lyandres, “On the Problem of ‘Indecisiveness’.”



- 175 *Izvestiia*, February 28, 1917, 載於 Golder, *Documents of Russian History*, 287–8; Avdeev, *Revoliutsiia 1917 goda*, I: 41; A. Blok, “Poslednie dni tsarizma,” *Byloe*, 1919, no. 15: 28. 1915年11月成立了一個「中央工人小組」，作為戰爭工業委員會與工人之間溝通的橋樑。蘇維埃的另外一個來源是彼得格勒所有社會主義政黨的領導小組，它是在1916年11月開始聯合的，二月革命之前和二月革命期間經常開會。Melancon, *Socialist Revolutionaries*, 256–64.
- 176 Shul’gin, *Dni*, 127. 最後一任總理尼古拉·戈利岑公爵（1916年12月上任），曾經稱病並懇求尼古拉二世不要任命他。Shchēgolēv, *Padenie*, I: 331 (Golitsyn). 另見 Gippius, *Siniia kniga*, 75–6（日記，1917年，2月25日）。
- 177 Voikov, *S tsarem*, 175.
- 178 Browder and Kerensky, *Russian Provisional Government*, I: 86; Lyandres, “O Dvortsovom perevorote ia pervyi raz uslyshal posle revoliutsii . . .,” 252.
- 179 尼古拉二世不僅提到「驚慌的表現」，還提到阿列克謝耶夫要求任命一位「非常得力的」將軍，擔起恢復秩序的責任。Steinberg and Khrustalēv, *Fall of the Romanovs*, 83. 另見 Beckendroff, *Last Days*, 2–3.
- 180 Martynov, *Tsarskaia armiia*, 114–5; Spiridovich, *Velikaia voina i fevral’skaia revoliutsiia*, III: 240ff; Shchēgolēv, *Padenie*, V: 317–8 (Ivanov); Katkov, *Russia, 1917*, 315–6; Hasegawa, *February Revolution*, 461–4.
- 181 Hasegawa, *February Revolution*, 473–92.
- 182 Martynov, *Tsarskaia armiia*, 145; Sergeev, “Fevral’skaia revoliutsiia 1917 goda,” 31; S. N. Vil’chkovskii, “Prebyvanie Gosudaria Imperatora v Pskove 1 I 2 marta 1917 goda, po razskazu general-ad”utanta N. V. Ruzskogo,” *Ruskaia letopis’*, 1922, no. 3: 169. 阿列克謝耶夫已經自行下令讓伊萬諾夫停止行動。Sergeev, “Fevral’skaia revoliutsiia 1917 goda,” at 31.
- 183 早在1916年2月，尼古拉二世沒有把杜馬代表召到東宮——這是他罕有的幾次屈尊會見杜馬時的慣例——而是親自去了杜馬的塔夫利達宮。在感恩讚樂曲過後，尼古拉發表了講話（他說的話很多人都聽不到），之後，人們自發地唱起了俄國國歌《上帝保佑沙皇》。但尼古拉二世的姿態所營造的良好氣氛很快就消散了。羅將柯再次請求他成立一個「責任政府」。「這事我會考慮的」，尼古拉在離開時答覆說。Rodzianko, *Krushenie imperii*, 149–50; Dubenskii, *Ego Imperatorskoe Velichano Gosudar’ Imperator Nikolai Aleksandrovich*, IV: 221. 另見 Paléologue, *La Russie*, II: 196; 以及 Miliukov, *Vospominaniia*, II: 226.
- 184 Steinberg and Khrustalēv, *Fall of the Romanovs*, 103–5; Sergeev, “Fevral’skaia revoliutsiia 1917 goda,” 55–9.
- 185 Sergeev, “Fevral’skaia revoliutsiia 1917 goda,” 72–3.
- 186 Steinberg and Khrustalēv, *Fall of the Romanovs*, 93. 尼古拉起初沒有向亞歷山德拉提出退位，所以按照後者的理解，沙皇只是作了「讓步」（而讓步在她看來是可以收回的）。Fuhrmann, *Complete Wartime Correspondence*, 699–701. 「永遠別忘了，你是而且必須繼續做專制的皇帝。」她後來勸他說。Hynes, *The Letters of the Tsar*, 105.

- 187 Steinberg and Khrustal'ev, *Fall of the Romanovs*, 107; *Journal intime de Nicholas II*, 93. 卡特科夫的看法似乎很有道理：在尼古拉二世做出讓步，同意成立議會制政府，因而違背了君主專制原則的時候，他已經崩潰了，所以，與常理推斷的相反，退位本身就顯得沒那麼重要了。Katkov, *Russia, 1917*, 323.
- 188 Ol'denburg, *Gosudar' Imperator Nikolai II Aleksandrovich*, 29–31; Ol'denburg, *Last Tsar*, IV: 152–61; Voicikov, *S tsarem*, 207–19; Russky, "An Account of the Tsar's Abdication"; Danilov, "Moi vospominaniia," 223–4; Danilov, "How the Tsar Abdicated"; Bark, "Last Days of the Russian Monarchy." 正如有學者概括的，「事實上，就因為沒有保衛舊政權，軍隊的確是把它摧毀了」。Mayzel, *Generals and Revolutionaries*, 49.
- 189 到1917年秋天，俄國總共有至少100萬逃兵。Frenkin, *Russkaia armia*, 197.
- 190 Danilov, "Moi vospominaniia," 221; Sergeev, "Fevral'skaia revoliutsiia 1917 goda," 37–40; Wildman, *End of the Russian Imperial Army*, I: 120.
- 191 Airapetov, "Revolution and Revolt," 94–118 (at 114).
- 192 有人認為阿列克謝耶夫反對尼古拉二世的做法事實上相當於政變，參見Lohr, "War and Revolution," II: 658, 664–5. 關於軍人奪權，參見Trimberger, *Revolution from Above*.
- 193 Fuller, *Civil-Military Conflict*, 228, 262.
- 194 Mayzel, *Generals and Revolutionaries*, 78–9; Shulgin, *Days*, 180–3; Fuller, *Civil-Military Conflict*, 259–63. 另見Steinberg, *All the Tsar's Men*.
- 195 Shchegol'ev, *Padenie*, VI: 263–6 (Guchkov); de Basily, *Memoirs*, 127–31. 「誰會支持他？」舒利金對尼古拉二世已經不抱希望。「一個也沒有，一個也沒有。」Shul'gin, *Gody*, 459.
- 196 Steinberg and Khrustal'ev, *Fall of the Romanovs*, 96–100 (at 98).
- 197 Chamberlin, *Russian Revolution*, I: 85; Ostrovsky, *Kto stoial*, 418–23; Shveitzer, "V achinskoi ssylke"; Shveitzer, *Stalin v Turukhanskoi ssylke*, RGASPI, f. 558, op. 4, d. 662, l. 275 (Shveitzer); Baikalov, "Moi vstrechi s Osipom Dzhugashvili," 118; Baikaloff, *I Knew Stalin*, 27–30; Tutaev, *Alliluyev Memoirs*, 189–90; Shliapnikov, *Kanun semnadsatogo goda*, II: 444–6; Montefiore, *Young Stalin*, 304.

763

## 第六章 卡爾梅克救星

- 1 *Vis'ezd*, 111–2, 114.
- 2 Trotsky, *History of the Russian Revolution*, II: 150 (援引杜馬代表、立憲民主黨中央委員費奧多爾·I. 羅季切夫〔Fyodor I. Rodichev〕的話)。
- 3 Karpinskii, "Vladimir Il'ich za granitsei," II: 105–6; Figes, *A People's Tragedy*, 385. 一個月前，失去耐心的列寧在對瑞士青年社會主義者演講時還抱怨說：「我們這些老年人，也許看不到未來這次革命的決戰。」*JSS*, XXX: 328 (譯註：《列寧全集》第28卷，第333頁)；Tucker, *Lenin Anthology*, 292.

- 4 Kornakov, "Znamena Fevral'skoi revoliutsii," 12–26; 以及 Kornakov, "Opyt privlecheniia veksilologicheskikh pamiatnikov dlia resheniia geral'dicheskikh problem."
- 5 Keep, *Russian Revolution*, ix. 1917年10月之前，只有九分之一的村莊有蘇維埃。
- 6 White, "1917 in the Rear Garrisons," 152–68 (at 152–3).
- 7 Steinberg, *Moral Communities*, Steinberg, "Workers and the Cross."
- 8 Rosenberg, "Representing Workers."
- 9 Kolonitskii, "Anti-Bourgeois Propaganda."
- 10 Kizevetter, "Moda na sotsializm."
- 11 Sukhanov, *Zapiski*, II: 265–6. 被警方通緝的蘇漢諾夫就躲在首都，而且用的是他的真名(希默)。他用真名在農業部謀了一個差事，成為突厥斯坦的灌溉專家。
- 12 De Lon, "Stalin and Social Democracy," 198.
- 13 *Pravda*, April 18, 1917 (俄曆的五一節)，載於 *Sochineniia*, II: 37–8.
- 14 在列寧1917年7至10月的很多文章(《列寧全集》第34卷)中，斯大林的名字只提到過一次。McNeal, *Stalin's Works*, 51–7. 斯大林也參加了布爾什維克籌備立憲會議選舉的委員會，並出現在候選人名單上。(作為他名義上的選區之一的斯塔夫羅波爾，根據有關候選人登記的法律規定，寫信詢問了他的真實姓名、年齡、住址和職業。) McNeal, *Stalin* 35–6 (引自 *Perepiska Sekretariata TsK RSDRP (b)*, I: 378).
- 15 為應對查封，黨的機關報在1917年幾次改名：《工人和士兵報》(7月23日–8月9日)、《無產者報》(8月13–24日)、《工人日報》(8月25日–9月2日)以及《工人之路報》(9月3日–10月26日)。
- 16 「(威權主義的)早期版本是少數人以少數人的名義進行的統治；現代威權主義是少數人以多數人的名義進行的統治。」Perlmutter, *Modern Authoritarianism*, 2.
- 17 *Sobranie uzakonenii i rasporiashchenii pravitel'stva*, March 6, 1917, no. 54: 344; Golder, *Documents of Russian History*, 297–8; Shchēgolēv, *Otrechenie Nikolaia II*; Martynov, *Tsarskaia armiia*, 160; *Last Days at Tsarskoe Selo*, 46–7. 「我不能和他分開」，尼古拉在對舒利金和古契科夫談到阿列克謝時說道。Mel'gunov, *Martovskie dni*, 192 (引自普斯科夫會見的速記記錄); Steinberg and Khrustalēv, *Fall of the Romanovs*, 96–100.
- 18 De Basily, *Memoirs*, 119–20.
- 19 Mel'gunov, *Martovskie dni*, 226–7; Miliukov, "From Nicholas II to Stalin." 四個月後，克倫斯基以捏造的叛國罪名把大公投進監獄；大公在1918年6月12日被處決。
- 20 羅將柯，見於 Gessen, *Arkhiv russkoi revoliutsii*, VI: 62; Shul'gin, *Dni*, 295–307; Martynov, *Tsarskaia armiia*, 181; Miliukov, *Istoriia vtoroi*, I: 53–5; Miliukov, *Vospominaniia*, II: 316–8.
- 21 弗拉基米爾·納博科夫和鮑里斯·諾爾德兩人是法理學家。Vladimir Nabokov, "Vremennoe pravitel'stvo," 載於 Gessen, *Arkhiv russkoi revoliutsii*, I: 9–96 (at 17–22); Boris Nol'de, "V. D. Nabokov v 1917 g.," 載於 Gessen, *Arkhiv russkoi revoliutsii*, VII: 5–14 (at 6–8); Medlin and Powers, *V. D. Nabokov*, 17–28, 49–55; Mel'gunov, *Martovskie dni*, 356–7; Katkov, *Russia, 1917*, 409–15; Holquist, "Dilemmas." 從法律上講，杜馬也不能把最高權力移交給臨時政府：1906年的基本法甚至沒有授予杜馬完全的立法權，而且不管怎麼說，尼古拉二世已經讓這個立法機關休會了。

- 22 Miliukov, *Vospominaniia*, II: 299; Shul'gin, *Dni*, 182; Nabokov, *Vremennoe pravitel'stvo*, 67-8. 米留可夫似已自作主張，不把臨時政府的根基紮在杜馬，而這樣做的部分原因是為了排擠杜馬主席米哈伊爾·羅將柯。這也是立憲民主黨指責過的斯托雷平1907年搞選舉「政變」的那個杜馬。米留可夫後來在1920年對自己用無足輕重的李沃夫公爵代替羅將柯這一決定後悔不已。羅將柯在1920年移居到由塞爾維亞人、克羅地亞人和斯洛文尼亞人組成新王國。四年後，他在窮困潦倒中去世，時年64歲。
- 23 Kakurin, *Razlozhenie armii*, 25-7; Burdzhakov, *Russia's Second Revolution*, 179.
- 24 Storozhev, "Fevral'skaia revoliutsiia 1917 g.;" Nabokov, *Vremennoe pravitel'stvo*, 39-40; Startsev, *Vnutrenniaia politika*, 114-6. 結果，臨時政府保留了沙皇時代的全部法律，準備到召集立憲會議的時候才明確推翻或修正。
- 25 國家出資出版了幾十萬份杜馬「決議」。1917年6月的蘇維埃代表大會投票「取消」了杜馬；實際上，就像報紙上宣佈的那樣，臨時政府是在10月7日才正式取消杜馬的。Vladimirova, *Kontr-revoliutsiia*, 72; Drezen, *Burzhuaziia i pomeshchiki 1917 goda*, 4-5; Gal'perina, "Chastnye soveshchanii gosudarstvennoi dumy," 111-7.
- 26 Miliukov, *Istoriia vtoroi*, II: 51; *The Russian Revolution*, I: 36.
- 27 Browder and Kerensky, *Russian Provisional Government*, I: 135-6.
- 28 Kochan, "Kadet Policy in 1917." 另見 Miliukov, *Istoriia vtoroi*, II: 51; Miliukov, *The Russian Revolution*, I: 36.
- 29 Gaida, *Liberal'naia oppozitsiia*. 一本比較早的描寫戰時自由派的書，並沒有把他們說成是渴望權力的、怯懦的人，參見 Pearson, *The Russian Moderates*.
- 30 Hoover Institution Archives, Alexander F. Kerensky, Papers, box 1, folder 19: "The February Revolution reconsidered," March 12, 1957, with Leonard Schapiro (有刪割痕跡的打字稿)；夏皮羅比較欣賞克倫斯基。另見 Rogger, *Russia in the Age of Modernization*, 25. 最後一任保安處處長承認，他的手下已經開始監視克倫斯基，但「不幸的是」，他們的目標「作為杜馬成員受到豁免權的保護」；瓦西里耶夫寫信給沙皇司法大臣要求撤銷克倫斯基的豁免權，還沒有得到答覆，克倫斯基本人就已經成了司法部長並看到了瓦西里耶夫提出的請求。「以他的(新)身份，」瓦西里耶夫說，克倫斯基「注意到我此前提出的限制他的自由的建議」。Vasilyev, *Ochrana*. 213-4. 瓦西里耶夫1928年死於巴黎。
- 31 Zviagintseva, "Organizatsiia i deiatel'nost' militsii Vremennogo pravitel'stva Rossii"; Hasegawa, "Crime, Police and Mob Justice," 241-71. 保安處至少有一位負責破譯密碼和分析情報的重要人物逃到了英國，並在1920年代幫助倫敦破譯蘇聯的密碼。
- 32 Avdeev, *Revoliutsiia 1917 goda*, I: 73; Medlin and Powers, *V. D. Nabokov*, 62-3, 83-4; Dubentsov and Kulikov, "Sotsial'naia evoliutsiia vysshei tsarskoi biurokratii," 75-84; Orlovsky, "Reform During Revolution," 100-25; Rosenberg, *Liberals*, 59. 關於外省的二月革命，參見 Ferro, *La révolution de 1917*, 126-31. 莫斯科的情況參見 Burdzhakov, "Revolution in Moscow." 突厥斯坦的情況，參見 Khalid, "Tashkent 1917."

- 33 Kulikov, "Vremennoe pravitel'stvo," 81–3; Wildman, *End of the Russian Imperial Army*, I: 3. 關於政治危機和革命時期軍隊的情況，參見 Finer, *Man on Horseback*.
- 34 Melancon, "From the Head of Zeus."
- 35 Chernov, *Great Russian Revolution*, 103. 蘇維埃與政黨的聯繫不夠緊密，對此感到沮喪的不只是切爾諾夫。
- 36 Boyd, "Origins of Order Number 1"; Shlyapnikov, *Semnatsadnyi god*, I: 170; Wildman, *End of the Russian Imperial Army*, I: 189.
- 37 Hasegawa, *February Revolution*, 396.
- 38 *Izvestiia*, March 2, 1917; Golder, *Documents of Russian History*, 386–7; Browder and Kerensky, *Russian Provisional Government*, II: 848–9; Shliapnikov, *Semnatsadnyi god*, I: 212–3; Zlokazov, *Petrogradskii Sovet rabochikh*, 58–62; Miller, *Soldatskie komitety ruskoï armii*, 25–30. 一個略有不同的版本可見於 *Pravda*, March 9, 1917.
- 39 Medlin and Powers, *V. D. Nabokov*, 88; Shliapnikov, *Semnatsadnyi god*, II: 236; Gapenko, *Revoliutsionnoe dvizhenie*, 429–30. 古契科夫本人後來在5月辭職。
- 40 Golder, *Documents of Russian History*, 386–90; Browder and Kerensky, *Russian Provisional Government*, II: 851–4. 「二號命令」不是在蘇維埃的主要報刊上發佈的。「三號命令」發佈時重申了有關軍官選舉的禁令。*Izvestiia*, 8, 1917.
- 41 立憲民主黨成員、E. N. 特魯別茨科伊公爵也注意到了精英們的希望。他寫道，「所有人都參與了革命，所有人都製造了革命：無產者、軍隊、資產階級，甚至貴族」。*Rech'*, March 5, 1917. 關於精英們的擔心，參見 Pipes, *Russian Revolution*, 289.
- 42 Purishkevich, *Bez zabrala*, 3–4. 它也是在莫斯科和莫吉廖夫印刷的，並以打印稿的形式散發給陸軍和艦隊。
- 43 Purishkevich, *Vpered!*; *Moskovskie vedmoosti*, July 23, 1917: 1–3. 另見 P. Sh. Chkhartishvili, "Chernosotentsy v 1917 godu," *Voprosy istorii*, 1997, no. 8: 133–43.
- 44 Rendle, *Defenders of the Motherland*.
- 45 *Novaia zhizn'*, June 29, 1917. 高爾基在駁船上工作過。
- 46 Daulet, "The First All-Muslim Congress of Russia"; Davletshin, *Sovetskii Tatarstan*, 64–5; Rorlich, *Volga Tatars*, 127–9; Dimanshtein, *Revoliutsiia i natsional'nyi vopros*, III: 294–5.
- 47 「偉大的任務完成了！」1917年3月6日，臨時政府宣佈說，「一個自由的新俄國誕生了。」*Vestnik vremennogo pravitel'stva*, March 7, 1917, 載於 Browder and Kerensky, *Russian Provisional Government*, I: 158; *Rech'*, March 8, 1917: 5; Stepun, *Byvshee i nebyvshee*, II: 48–9.
- 48 Leonard Schapiro, "The Political Thought of the First Provisional Government," 載於 Pipes, *Revolutionary Russia*, 97–113; White, "Civil Rights," 287–312.
- 49 *Rech' A. F. Kerenskogo* (Kiev, 1917), 8. 1917年4月，克倫斯基對前線的士兵說：「如果我們能讓其他國家走我們的道路，我們就能在世界歷史上發揮巨大的作用。」*A. F. Kerenskii ob armii i voine* (Odessa, 1917), 10, 32; *Rech' A. F. Kerenskogo, voennogo i morskogo ministra, tovarishcha predsedatelia Petrogradskogo Soveta rabochikh i soldatskikh deputatov, proiznesennaia im 29 apreliia, v soveshchaniï delegatov fronta* (Moscow, 1917), 3.

- Fitcher, *Witnesses*, 61. 蘇維埃領導人伊拉克利·策列鐵里展望了「民主制度在國內外的最終勝利」。Tsereteli, *Vospominaniia*, I: 147.
- 50 「現在，」傑出的學者、立憲民主黨政治家弗拉基米爾·韋爾納茨基在1917年5月說道，「我們有了民主，但社會還沒有組織起來。」Holquist, *Making War*, 49 (引自 *Rech'*, May 3, 1917).
- 51 古典自由主義者很快也重新發現了「國家意識」的重要性。Rosenberg, *Liberals*, 134-69; Holquist, *Making War*, 49-51.
- 52 與科爾尼洛夫在哈布斯堡王朝的加利西亞並肩戰鬥的安東·鄧尼金評論說：「在採取最困難、甚至是注定要失敗的行動時，他極為果斷。他擁有罕見的勇敢精神，這一點給士兵留下了極其深刻的印象，也讓他非常受他們歡迎。」Denikin, *Ocherki russkoi smuty*, 145-6. 另見 Kerensky, *The Catastrophe*, 297.
- 53 Kerensky, "Lenin's Youth — and My Own," 69. 後來，克倫斯基甚至宣稱，「在老烏里揚諾夫死後，我父親因為和烏里揚諾夫家關係很近，就成了這家人的保護人」。Kerensky, *The Catastrophe*, 79.
- 54 Chernov, *Great Russian Revolution*, 174.
- 55 Kolonitskii, "Kerensky," 138-49; Kolonitskii, "'Democracy' in the Consciousness of the February Revolution"; Stankevich, *Vospominaniia*, 65.
- 56 Lauchlan, *Russian Hide-and-Seek*, 48; White, "Civil Rights," 295.
- 57 「誠實的人和不誠實的人、真摯的人和陰險的人、政治領導人、軍隊領導人還有冒險家都向他走去，」鄧尼金將軍寫道，「而且所有人都異口同聲地大喊：救救我們！」
- 58 Fitzpatrick, "The Civil War," 57-76 (at 74).
- 59 Daniels, *Red October*, 12-3.
- 60 Sigler, "Kshesinskaia's Mansion"; Hall, *Imperial Dancer*; Trotsky, *History of the Russian Revolution*, III; 58-61. 1917年3月，一些武裝團夥強佔了這所房子。克舍辛斯卡婭的律師向臨時政府上訴要求賠償未果，但她的確從法院贏得了有利的裁決（把布爾什維克趕出去的命令直到6月才下達，也沒有立即執行）。
- 61 Kshesinska, *Vospominaniia*, 191.
- 62 因為有傳言說，該別墅已經變成尋歡作樂、巫師夜半集會和囤積槍枝的巢穴，在徵得彼得格勒蘇維埃的同意後，警方把強佔者趕了出去。「他們總共大概有100人，是從彼得格勒的貧民窟出來的人渣，衣衫襤褸，一臉壞相，看上去就是些惡行累累的酒色之徒」，本身受到惡毒誹謗的反間諜局局長鮑里斯·尼基京(Boris Nikitin)回憶說。他還說：「他們中多數人顯然已經幾年沒有用過肥皂和水了……在這些囚犯中，大概有30個從衣着來看可能是女人。」Nikitin, *Fatal Year*, 82-98, Sukhanov, *Russian Revolution*, II: 386-8.
- 63 *Vestnik istorii*, 1957, no. 4: 26.
- 64 Bennigsen and Wimbush, *Muslim National Communism*, 16.
- 65 Wade, "Why October?"
- 66 臨時政府在3月的時候曾經討論過，如果列寧打算回國，是否允許他在國內逗留。Medlin and Powers, *V. D. Nabokov*, 143.

- 67 列寧穿過前線的行程是由一個叫做雅各布·菲爾斯滕貝格 (Jacob Fürstenberg)，又名加涅茨基 (Ganetsky) 的奧地利—波蘭社會主義者安排的。菲爾斯滕貝格是做走私生意的，他為人稱帕爾烏斯 (Parvus) 的亞歷山大·海爾普漢德 (Alexander Helphand) 工作，而帕爾烏斯是一個出生於明斯克的猶太人，德國社會民主黨黨員，擁有博士頭銜，在戰爭中發了財。1917年7月，被臨時政府反間諜機關逮捕的葉夫根尼婭·蘇緬松 (Yevgeniya Sumenson) 承認自己是管錢的，其中包括從加涅茨基那裏收到的共計二百多萬盧布。在1917年2月以後，據說列寧與加涅茨基的通信僅次於與伊涅薩·阿爾曼德的通信。Shub, *Lenin* 182; Mel'gunov, "Zolotoi nemetskii klyuchik," 157; Hahlweg, *Lenins Rückkehr nach Russland*, 15–6; PSS, XLIX: 406; Krupskaya, *Memories of Lenin*, II: 200–12. 布爾什維克上台後，加涅茨基繼續為列寧打理財務，但是在1937年，他遭到逮捕和嚴刑拷打，被當作波蘭和德國的間諜以及托洛茨基分子處決了；事實上，斯大林在1933年9月曾派加涅茨基去波蘭取回列寧的一份檔案。Volkogonov, *Lenin: Life and Legacy*, 127–8. 同德國人聯繫最初可能是馬爾托夫的主意。
- 68 Scheidemann, *Memoiren eines Sozialdemokraten*, 427–8; Freund, *Unholy Alliance*, 1.
- 69 在德國邊境，旅客們換乘一輛有兩節車廂的列車（一節是給俄國人的，另一節是給德國的護送人員的），開往波羅的海港口，上了一艘開往瑞典的瑞典輪船，從那裏乘火車前往芬蘭，乘雪橇越過芬蘭邊境，最後再乘20英里（編註：約32公里。）的火車前往彼得格勒。Platten, *Die Reise Lenins*, 56; Zinov'ev, *God revoliutsii*, 503; Hahlweg, *Lenins Rückkehr nach Russland*, 99–100; Shliapnikov, *Kanun semnadsyatogo goda*, II: 77–8; Karl Radek, *Living Age*, February 25, 1922: 451; Senn, *Russian Revolution in Switzerland*, 224–8. 拉狄克在斯德哥爾摩一直待到整個10月結束。
- 70 馬爾托夫和他的孟什維克同志在等待俄國外交部的正式許可，因此要比列寧晚一個月左右，在1917年5月9日回到俄國，這期間只能由已在國內的其他孟什維克去對付列寧〈四月提綱〉的挑戰。Getzler, *Martov*, 147–50.
- 71 Katkov, "German Foreign Office Documents."
- 72 G. Ia. Sokol'nikov, "Avtobiografiia," 載於 Sokol'nikov, *Novaia finansovaia politika*, 39–50 (at 42).
- 73 Paléologue, *La Russie*, III: 305, 307–8. 很長時間之後，米留可夫在回憶錄中寫道，他當時根本不瞭解列寧的「新」立場。Miliukov, *Vospominaniia*, I: 337.
- 74 Andreev, *Vospominaniia*, 52–5.
- 75 Pallot, *Land Reform in Russia*; Pozhigailo, *P. A. Stolypin*. 有人認為俄國的土地問題在戰爭前夕正得到改善，這不無道理。Frank, "The Land Question."
- 76 1914年，只有不到一半的貴族（每五個當中可能有一到兩個）是住在自己的領地上。Becker, *Nobility and Privilege*, 28.
- 77 有學者評論說：「那些將軍們的言行就像是革命者」。Yaney, *Urge to Mobilize*, 418.
- 78 Kotel'nikov and Mueller, *Krest'ianskoe dvizhenie*; Lohr, *Nationalizing the Russian Empire*; Ivan Sobolev, *Bor'ba s "nemetskim zasiliem"*. 東正教教會和皇室也有相當多的土地。
- 79 Shanin, *Awkward Class*, 145–61.
- 80 Keller and Romanenko, *Pervye itogi agrarnoi reformy*, 105.

- 81 "The Peasants' Revolution," 載於 Daniels, *Russian Revolution*, 87-91. 對農民革命最有趣的演繹或可見於扎米亞京的小說, Zamyatin, "Comrade Churygin Has the Floor," 193-203.
- 82 Antsiferov, *Russian Agriculture*, 290-6; John Keep, *Russian Revolution*, 211-2.
- 83 費吉斯提到, 對於一個以城市為基礎的、基本上沒有同情心的政府, 一種情形是地區性的, 各地自行其是。他還指出, 農民強佔土地, 趕走貴族, 但並沒有推翻傳統的地方治理機關。Figes, *Peasant Russia*, 42, 66-7.
- 84 Channon, "Tsarist Landowners." 到 1927 年底, 在俄羅斯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境內, 有超過 10,750 名前貴族仍住在自己的莊園, 但是為了把更多的土地交到農民手裏, 也有 4,000 多名貴族被趕了出去。Danilov, *Rural Russia*, 98.
- 85 Pipes, *Russian Revolution*, 717-8; Kim, *Istoria Sovetskogo krest'ianstva*, 16; Danilov, *Pereraspredelenie zemel'nogo fonda Rossii*, 283-7; Atkinson, *End of the Russian Land Commune*, 178-80; Maliavskii, *Krest'ianskoe dvizhenie*.
- 86 Harding, *Leninism*, 92-5.
- 87 "Protokoly i rezoliutsii Biuro TsK RSDRP (b) (mart 1917 g.)," *Vestnik istorii KPSS*, 1962, no. 3: 143; Tucker, *Stalin as Revolutionary*, 163; Ulam, *Stalin*, 132-4.
- 88 *Pravda*, March 15, 1917. 莫洛托夫後來回憶說, 加米涅夫和斯大林「把我趕走是因為他們威信更高, 而且比我大十歲」。Chuev, *Molotov Remembers*, 91.
- 89 Shliapnikov, *Semnadsatyi god*, I: 219-20; Slusser, *Stalin in October*, 46-8. 後來在 1917 年 3 月回到首都的時候, 斯大林為自己的「錯誤立場」道了歉。Sochineniia, VI: 333.
- 90 Raskol'nikov, *Krosnshtadt i pster*, 54.
- 91 Luh, "The Ironic Triumph of 'Old Bolshevism'."
- 92 Kamenev, *Mezhdru dvumia revoliutsiiami*.
- 93 Burdzhakov, *Vestnik istorii*, 1956, no. 4: 51; Poletaev, *Revoliutsionnoe dvizhenie*, 15-6; Tucker, *Stalin as Revolutionary*, 168.
- 94 *PSS*, XXXI: 72-8; Slusser, *Stalin in October*, 60; Trotsky, *History of the Russian Revolution* [1961], 312-3. 發表後的那天, 4 月 8 日, 彼得堡市的布爾什維克委員會以 13 票對 2 票拒絕接受列寧的觀點。(首都的布爾什維克委員會沒有把城市名改成彼得格勒。)
- 95 Tsapenko, *Vserossiiskoe soveshchanie soveta rabochikh*, Avdeev, *Revoliutsiia 1917 goda*, I: 114, 162-3. 「簡直是胡扯！」流亡中的列寧讀到彼得格勒蘇維埃主席齊赫澤的講話時大聲說道, 「弗拉基米爾, 注意措辭！」據說克魯普斯卡婭插話說。列寧: 「我重複一遍: 胡扯！」Futrell, *Northern Underground*, 154.
- 96 Sukhanov, *Zapiski*, III: 26-7, VII: 44.
- 97 「目前在世界各交戰國中,」列寧說, 「俄國是最自由的國家」, 因此, 革命者必須利用這種自由。 *PSS*, XXXI: 113-6 (譯註: 《列寧全集》第 29 卷, 第 105 頁。); Daniels, *Red October*, 4; Service, *Lenin*, II: 157.
- 98 *Leninskii sbornik*, VII: 307-8. 無論是發言還是討論都沒有留下文字記錄, 但我們有列寧為發言準備的筆記: *Leninskii sbornik*, XXI: 33. 另見 Raskol'nikov, *Na boevykh postakh*, 67.
- 99 Abramovitch, *Soviet Revolution*, 30.



- 100 Sukhanov, *Russian Revolution*, I: 287.
- 101 Uglanov, "O Vladmire Iliche Lenine." 還是在1905年的時候，馬爾托夫曾承認，在即將到來的資產階級革命中，社會主義者可以奪取政權，但只有在革命遭遇危險的時候才能這樣做。1917年，馬爾托夫自己也很糾結，試圖把權力之爭和政體之爭區別開來。Getzler, *Martov*, 167 (引自 *Iskra*, March 17, 1905, 以及 *Rabochaia gazeta*, August 22, 1917).
- 102 Service, *Bolshevik Party in Revolution*, 53–7. 許多外省代表根本不是列寧主義者，因此必須對他們進行威逼，好讓他們放棄重新和孟什維克派聯合的想法。
- 766 103 Ulricks, "The 'Crowd' in the Russian Revolution"; Trotsky, *History of the Russian Revolution* [1961], 124–66 (esp. 130–1).
- 104 從同時代人的材料來看，沒有誰說斯大林在那裏。當時還不是布爾什維克的托洛茨基也沒去。Slusser, *Stalin in October*, 49–52; Trotsky, *Stalin*, 194. 只是在後來斯大林才被加進去，要麼說他是在俄芬邊境俄國一側（別洛斯特羅夫）登上列寧列車的那群人當中，要麼說他是芬蘭車站歡迎會的領導者。參見Zinoviev, "O puteshestvii," *Pravda*, April 16, 1924; Yaroslavsky, *Landmarks*, 94; 以及 Chuev, *Molotov Remembers*, 93. 莫洛托夫晚年也許是「想起」了蘇聯時期的那幅畫：列寧從列車上下來，斯大林跟在他的後面。
- 105 「這是一個極端錯誤的立場，因為這種立場滋長了和平主義幻想，幫助了護國主義，阻礙了對群眾的革命教育。」*Sochineniia*, VI: 333 (譯註：《斯大林全集》第6卷，第289頁。).
- 106 轉載於 Volin, *Sed'maia*, ix–x.
- 107 Stalin, "Zemliu krest'ianam," *Pravda*, April 14, 1917, 轉載於 *Sochineniia*, III: 34–6.
- 108 Service, *Stalin*, 128; Service, *Lenin*, II: 223–8.
- 109 *VII aprel'skaia vserossiiskaia konferentsiia*, 225–8, 323.
- 110 Chuev, *Molotov*, 216–7, 297. 該書對丘耶夫的《同莫洛托夫的一百四十次談話》(*Sto sorok besed s Molotovym*) 稍稍作了擴充。Chuev, *Molotov Remembers*, 93.
- 111 Allilueva, *Vospominaniia*, 185–90.
- 112 Alliluyeva, *Twenty Letters*, 90–4; Tutaev, *Alliluyev Memoirs*, 131–45, 168–75, 211–15.
- 113 Vasileva, *Kremlin Wives*, 56–8; Allilueva, *Vospominaniia*, 183–91; Kun, *Unknown Portrait*, 211–5; Montefiore, *Young Stalin*, ch. 40.
- 114 Trotsky, *Stalin*, 207–9. 在別的地方，托洛茨基說斯大林是「一個得力的組織者，但理論水平和政治水平比較落後」。Trotsky, *History of the Russian Revolution*, I: 288.
- 115 *VII aprel'skaia vserossiiskaia konferentsiia; Petrogradskaia obshchegorodskaia konferentsiia RSDRP (bol'shevikov)*, 324; *Pravda*, April 24–May 2, 1917. 列寧在流亡時就聽說過斯維爾德洛夫這個人，布爾什維克領袖試圖與他通信並讓他參加在沙俄境外舉行的黨的會議，但兩人直到1917年才見面。Duvall, "The Bolshevik Secretariat," 47 (引自 L. D. Trotsky, *Selected Works*, II: 292).
- 116 "Iz perepiski Sverdlova," *Pechat' i revoliutsiia*, 1924, no. 2: 64; Trotsky, *Stalin*, 173; Wolfe, *Three Who Made a Revolution*, 623; *Iakov Mikhailovich Sverdlov* (1926).

- 117 *Perpiska sekretariata TsK RSDRP (b)*, I: v–ix; S. Pestkovskii, “Vospominaniia o rabote v Narkomnatse,” 126; Trotskii, *Sochineniia*, VIII: 251, XXI: 336; N. Bukharin, “Tovarishch Sverdlov,” *Pravda*, March 18, 1919: 1.
- 118 White, *Socialist Alternative to Bolshevik Russia*, 15.
- 119 Oskar Anweiler, “The Political Ideology of the Leaders of the Petrograd Soviet in the Spring of 1917,” 載於 Pipes, *Revolutionary Russia*, 114–28; Anin, “The February Revolution.” 關於聯合政府，參見 Tsereteli, *Vospominaniia*, II: 401–17.
- 120 Broido, *Lenin and the Mensheviks*, 14–5. 倫納德·夏皮羅認為溫和派社會主義者的弱點在於有所顧忌；參見 *Origin of the Communist Autocracy* (1956)。奧蘭多·費吉斯認為，堅持資產階級革命戰略不是找錯了風車（編註：「風車」(windmill) 出自《堂吉訶德》，此處指代鬥爭對象），而是毀掉了已經錯失的民主社會主義的成果：*A People's Tragedy*, 331.
- 121 Miliukov, *Istoriia vtoroi*, I/iii: 3–6; Miliukov, *The Russian Revolution*, III: 1–4. 5月22日，克倫斯基對彼得格勒蘇維埃說：「對我來說，現在不存在不同的黨派，因為我是俄國的部長；對我來說，只存在人民和一條神聖的法則——服從大多數人的意志。」Radkey, *Agrarian Foes*, 225. 在外省，「聯合」只在短期內起了作用：在自由派的支持下產生的公共組織地方委員會，承認代表工人、士兵和農民的各種組織的地位，有時還承認它們具有最高權威，但這些委員會很快就因為治理和經濟上的混亂垮掉了。階級之間的猜忌失去了控制。Rosenberg, *Liberals*, 59–66; White, “Civil Rights,” 290–3 (引自 GARE, f. 1788, op. 2, d. 64).
- 122 Figs and Kolonitskii, *Interpreting the Russian Revolution*, 102.
- 123 Mel'gunov, *Martovskie dni*, 105–13; Anin, “The February Revolution,” 441.
- 124 克倫斯基後來回憶起一開始在塔夫利達宮那段時期的「團結、友愛、彼此信任和自我犧牲的精神」，嘆息地說道，「後來……在我們當中，事實證明越來越多的人是帶有個人野心的，總想讓自己的利益最大化，或者就是純粹的冒險家」。事實上，當卡爾洛·齊赫澤根據蘇維埃的政策拒絕出任臨時政府的部長時，克倫斯基卻在中央執行委員會否決了自己到臨時政府任職的請求之後，在3月2日闖進蘇維埃會場，大聲喊道：「同志們！你們相信我嗎？」他裝出要暈倒的樣子，結果贏得一片歡呼，似乎是祝福他接受司法部長的職務。這樣，克倫斯基就成了唯一一個既在蘇維埃又在臨時政府任職的人。彼得格勒蘇維埃領導層從來沒有原諒克倫斯基近乎脅迫的行為。*Izvestiia revoliutsionnoi nedeli*, March 3, 1917; Sverchkov, *Kerenskii*, 21; Kerensky, *The Catastrophe*, 21, 52–61.
- 125 Keep, “1917.”
- 126 Browder and Kerensky, *Russian Provisional Government*, III: 1305. 在6月的蘇維埃代表大會上，大多數人贊成蘇維埃支持臨時政府的政策，贊成把戰爭打下去。時任郵電部長伊拉克利·策列鐵里說沒有哪個政黨準備獨自承擔治理的責任。「有的！」列寧反駁說。會場大笑。*PSS*, XXXI: 267 (譯註：《列寧全集》第30卷，第240頁)；Service, *Lenin*, II: 181.
- 127 Chamberlin, *Russian Revolution*, I: 159; Keep, *Russian Revolution*, 131–2.

- 128 社會主義者贊成和平這件事，是俄國自由派覺得和平難以接受的原因之一。「以國際社會主義中的人道主義及世界主義思想的名義……宣佈放棄戰爭這件最有價值的事情是荒謬的，是犯罪」，米留可夫說道。理查德·斯蒂茨的序言〈米留可夫與俄國革命〉（“Miliukov and the Russian Revolution”），參見 Miliukov and Scitz, *The Russian Revolution*, xii. 就像克勞塞維茨說的，戰爭和古典自由主義是很難調和的。Von Clausewitz, *On War*, 85.
- 129 米留可夫一如既往地表現了他作繭自縛般的固執，但克倫斯基承認自己對於「整個事件達到高潮」也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Kerensky, *The Kerensky Memoirs*, 246. 總理李沃夫公爵成立了「聯合政府」，也就是說，他讓（除克倫斯基之外的）一些蘇維埃領導人進入臨時政府，致使古契科夫辭職以示抗議，而影響最大的就是讓克倫斯基擔任陸海軍部長。Browder and Kerensky, *Russian Provisional Government*, III: 1045 (*Rech'*, March 28, 1917: 2), III: 1098 (*Rech'*, April 20, 1917: 4); Sukhanov, *Zapiski*, III: 254–443 (esp. 304–7); Miliukov, *Istoriia vtoroi, I/i*: 91–117; Wade, *Russian Search for Peace*, 38–48. Prince L'vov, *Rech'*, March 28, 1917: 2, in Browder and Kerensky, *Russian Provisional Government*, III: 1045. *Russkie vedomosti*, May 2, 1917: 5, in Browder and Kerensky, III: 1267. 「關於外交政策和一般政策應該採取甚麼路線的問題，克倫斯基和我在內閣會議上爭得沒完沒了」，米留可夫談到他擔任外交部長的兩個月時這樣寫道。Miliukov, “From Nicholas II to Stalin.”
- 130 Heenan, *Russian Democracy's Fatal Blunder*, 11–21. 另見 Rutherford, *The Tsar's War*.
- 767 131 Pedroncini, *Les mutineries de 1917*; Smith, *Between Mutiny and Obedience*. 那些認為協約國應該為布爾什維主義負責的人一定程度上是正確的，因為協約國堅持要求俄國發動攻勢。Wheeler-Bennet, *Forgotten Peace*, 51–2, 292.
- 132 4月中旬，阿列克謝耶夫將軍從前線回來向臨時政府匯報（會議地點是陸海軍部長古契科夫的私宅，因為他生病了），講到了軍隊的無政府主義情緒和軍紀的廢弛。Medlin and Powers, *V. D. Nabokov*, 135, 140.
- 133 Shliapnikov, *Semnadtsatyi god*, III: 291–3 (1917年3月30日，呈送古契科夫).
- 134 Brusilov, *Soldier's Note-book*. 另見 “The Diary of General Boldyrev,” 載於 Vulliamy, *From the Red Archives*, 189–26.
- 135 Heenan, *Russian Democracy's Fatal Blunder*, 51–2.
- 136 克倫斯基在某個版本的回憶錄中承認，在1917年視察前線時，他感到「經過三年的苦戰，幾百萬已經厭倦了戰爭的士兵正在捫心自問：『當更加自由的新生活在國內剛剛開始的時候，我為甚麼現在要死？』」他還聲稱在一些人當中發現了他想要鼓勵的「健康的愛國主義」。Kerensky, *The Kerensky Memoirs*, 276–7. 關於克倫斯基竭力在維持戰鬥力和對軍隊的「民主」作出必要讓步之間保持平衡，參見 Browder and Kerensky, *Russian Provisional Government*, II: 882.
- 137 Stankevich, *Vospominaniia*, 246. 另見 Heenan, *Russian Democracy's Fatal Blunder*, 54; 以及 Wilcox, *Russia's Ruin*, 196–7.
- 138 Pethybridge, *Spread of the Russian Revolution*, 154–0 (esp. 161).
- 139 Wildman, *End of the Russian Imperial Army*, II: 53 (拉德科—季米特里耶夫，第12集團軍司令).

- 140 Lewis, *Eyewitness World War I*, 279.
- 141 維克托·什克洛夫斯基 (Viktor Shklovsky)，臨時政府派到軍隊的一名政委，談到了在「戰壕裏的布爾什維主義」中逃避現實的情況。Shklovsky, *Sentimental Journey*, 60。「布爾什維克在前線取得的成就，」一位歷史學家寫道，「真的是非常驚人。」Wildman, *End of the Russian Imperial Army*, II: 264。另見Ferro, "The Russian Soldier in 1917."
- 142 Tsereteli, *Vospominaniia*, I: 364–681。1917年3月14日，彼得格勒蘇維埃通過了〈告各國人民書〉，譴責帝國主義戰爭和兼併主義目標。Izvestiia, March 15, 1917: 1, 載於Browder and Kerensky, *Russian Provisional Government*, III: 1077。
- 143 Fainsod, *International Socialism*; Forster, *Failures of the Peace*, 113–25; Wade, *Russian Search for Peace*, 17–25; Wade, "Argonauts of Peace"; Kirby, *War, Peace, and Revolution*; Sukhanov, *Zapiski*, II: 336–42。蘇漢諾夫對策列鐵里作了一番描繪 (*Zapiski*, III: 131–8)。
- 144 *Pravda*, April 29, 1917。另見Wildman, *End of the Russian Imperial Army*, I: 38。
- 145 彼得格勒蘇維埃迫使臨時政府做出承諾，不會（為了阻止革命的熱情）把部隊從首都調到前線。Brusilov, *A Soldier's Note-book*, 291。
- 146 Wade, "Why October?," 42–3。
- 147 Browder and Kerensky, *Russian Provisional Government*, II: 1120–1; Getzler, *Martov*, 149–52。現在還很難斷定，臨時政府在1917年6月3日公開表示想要組織一次協約國間的會議，審查戰爭條約，到底有多少誠意。
- 148 Ignat'ev, *Russko-angliiskie otnosheniia nakanune*, 42, 48, 50–1; *Berner Tagwacht* [Bern], October 11, 13, 14, 1916。另見Heenan, *Russian Democracy's Fatal Blunder*, 8–9。德方表示願意割讓哈布斯堡王朝的加利西亞和布科維納以及土耳其海峽，只要俄軍能夠佔領這些地方，但反過來，德國要得到庫爾蘭（拉脫維亞），並讓主要講波蘭語的地區接受它的保護。與之相比，要是協約國打敗了德國，俄國可以得到的更多——布科維納、土耳其亞美尼亞人居住的地區以及波斯的一些地方——而且沒有任何附加條件。
- 149 Browder and Kerensky, *Russian Provisional Government*, II: 967; Feldman, "The Russian General Staff." 就和1916年一樣，現在成了最高總司令的布魯西洛夫用「突擊部隊」打頭陣，跟在後面的是由徵召的農民組成的步兵。
- 150 Fuller, *Foe Within*, 237–8; Knox, *With the Russian Army*, II: 462。
- 151 關於六月攻勢，阿爾弗雷德·諾克斯爵士寫道，俄軍當時「潰不成軍」。Knox, *With the Russian Army*, II: 648。
- 152 「對於委員會來說，最糟糕的是一轉眼就和那些選出他們的人失去了接觸」，臨時政府派到前線的政委維克托·什克洛夫斯基寫道。他還寫道：「蘇維埃的（前線）代表一連幾個月不在自己的部隊露面。士兵們完全不知道蘇維埃正在發生的事情。」Shklovsky, *Sentimental Journey*, 18。
- 153 Figs, *A People's Tragedy*, 380。英國媒體巨頭比弗布魯克勳爵 (Lord Beaverbrook) 1931年6月問克倫斯基：「要是你單獨媾和，你會不會控制住布爾什維克？」克倫斯基回答說：「當然，那我們現在就會在莫斯科了。」比弗布魯克接着又問道：「那你

- 們為甚麼沒有那麼做？」「我們當時太天真了」，克倫斯基回答說。Lockhart, *British Agent*, 177.
- 154 達維德·勃朗施坦的家產後來在革命中被沒收了；托洛茨基讓他擔任了莫斯科附近一家徵用來的麵粉廠的廠長，但是在1922年，他因斑疹傷寒去世。
- 155 Ziv, *Trotskii*, 12. 另見 Carr, *Socialism in One Country*, I: 163; 以及 Volkogonov, *Trotsky*, 5.
- 156 “Terrorizim i kommunizm,” 轉載於 Trotskii, *Sochineniia*, XII: at 59.
- 157 Buchanan, *My Mission to Russia*, II: 120–1.
- 158 Reed, *Ten Days* [1919], 21. 「托洛茨基進入我黨的歷史讓人頗為意外，而且他馬上就顯露出了才華」，阿納托利·盧那察爾斯基後來寫道。 *Revolutionary Silhouettes*, 59.
- 159 Trotsky, *My Life*, 295–6.
- 160 莫伊謝伊·烏里茨基的話，引自 Lunacharskii, *Revoliutsionnye siluety*, 24.
- 161 *Leninskii sbornik*, IV: 303; Balabanoff, *Impressions of Lenin*, 127–8; Sukhanov, *Zapiski*, VII: 44; Raskol'nikov, “V tiur'me Kerenskogo,” 150–2; Slusser, *Stalin in October*, 108–14, Liberman, *Building Lenin's Russia*, 76.
- 162 Frenkin, *Zakhvat vlasti bol'shevikami*; Stankevich, *Vospominaniia*, 147–8; Denikin, *Ocherk russkoi smuty*, II: 127ff; Pipes, *Formation of the Soviet Union*, 52–6; Shankowsky, “Disintegration of the Imperial Russian Army,” esp. 321–2.
- 163 人們把切爾諾夫綁起來塞進一輛汽車，宣佈他「被逮捕了」。托洛茨基衝出來，把切爾諾夫放了。 Miliukov, *Istoriia vtoroi*, I/i: 243–4; Sukhanov, *Zapiski*, IV: 444–7; Vera Vladimirovna, “Iiul'skie dni 1917 goda,” *Proletarskaia revoliutsiia*, 1923, no. 5: 3–52 (at 34–5); Raskol'nikov, “V iul'skie dni,” 69–71; Rabinowitch, *Prelude*, 188. 據說，從附近的皇村派來抓捕蘇維埃領導人的那個團沒有奉命行事，反而決定保衛塔夫利達宮。 Sukhanov, *Zapiski*, IV: 448–9.
- 164 Sukhanov, *Zapiski*, IV: 511–2; Nikitin, *Rokovye gody*, 148; Zinoviev, *Proletarskaia revoliutsiia*, 1927, no. 8–9: 62; *Pravda*, July 17, 1927: 3 (F. F. Raskol'nikov); *Krasnaia gazeta*, July 16, 1920: 2 (Mikhail Kalinin); *Petrogradskaia Pravda*, July 17, 1921: 3 (G. Veinberg); *Shestoi congress RKP (b)*, 17 (Stalin); Trotsky, *History of the Russian Revolution*, II: 13; PSS, XXXII: 408–9; Drachkovitch and Lazitch, *Lenin and the Comintern*, I: 95 (引自 Trotsky, *Bulletin Communiste*, May 20, 1920: 6); Buchanan, *Petrograd*, 131–46 (布坎南是英國大使的女兒)。另見 Rabinowitch, *Prelude*, 174–5.
- 165 從7月7日至7月24日，布爾什維克在彼得格勒的報紙沒能出版。 Budnikov, *Bol'shevistskaia partiinaia*; Volkogonov, *cmc Trotsky*, 197; Kolonitskii, “Anti-Bourgeois Propaganda,” 184. 據說列寧讓人銷毀了臨時政府關於布爾什維克叛國罪的檔案材料。即便如此，保存下來的德方文件還是可以證明，德國提供經費是毋庸置疑的。 Zeman, *Germany and the Revolution in Russia*, 94; Latyshev, *Rassekrechennyi Lenin*; Volkogonov, *Lenin: politicheskii portret*, I: 220–2; Hahlweg, *Lenins Rückkehr nach Russland*. 不過，臨時政府司法部為1917年7月的審判所搜集的彼得格勒與斯德哥爾摩之間的66封電報現已被揭露是(由前保安處特工)偽造的。 Semion Lyandres, “The

- Bolsheviks' 'German Gold' Revisited: an Inquiry into the 1917 Accusations," Carl Beck Papers, 1995; Kennan, "The Sisson Documents"; Stone, "Another Look"; Hill, *Go Spy the Land*, 200-1.
- 166 Trotsky, *O Lenine*, 58; Trotsky, *History of the Russian Revolution*, III: 127. 據說最轟動的文件材料，臨時政府要到公審時才公佈。
- 167 Nikitin, *Rokovye gody*, 115-6, 122-3; Vaksberg, *Stalin's Prosecutor*, 13-27. 至於具體的指控，參見 *Rech'*, July 22, 1917, 譯文見於 Browder and Kerensky, *Russian Provisional Government*, III: 1370-7.
- 168 Allilueva, *Vospominaiia*, 181-90; Volkogonov, *Stalin: Triumph and Tragedy*, 24-6; Slusser, *Stalin in October*, 162-78, 139-50; Service, *Lenin*, 283-91; Kerensky, *The Catastrophe*, 229-44. 許多孟什維克強烈要求釋放布爾什維克，理由是今天是布爾什維克，明天就會輪到整個蘇維埃。
- 169 Polan, *Lenin and the End of Politics*.
- 170 在被公開指控拿了德國人的錢之後——列寧否認該項指控，認為那是無中生有的事情——他的確變得更加謹慎了。Volkogonov, *Lenin: Life and Legacy*, 116-21. 臨時政府中列寧的案子是由帕維爾·A. 亞歷山德羅夫 (Pavel A. Aleksandrov) 負責的，他後來在1939年被捕 (並關在布蒂爾卡監獄)。據說他作證表示，在列寧「叛國罪」和「間諜罪」一案中，他與克倫斯基有密切的聯繫。內務人民委員部的調查人員認為，亞歷山德羅夫針對布爾什維主義活動的調查工作是「憑空捏造」，而且據說貝利亞為了證明亞歷山德羅夫的工作是有罪的，曾讓手下找回了臨時政府的檔案文件。Volkogonov papers, Hoover Institution Archives, container 3, Postanovlenie from Kobulov, 16 April 1939.
- 171 *Novaia zhizn'*, August 5, 1917 (A. S. Zarudnyi); *Zhivoe slovo*, July 6, 1917: 1; Avdeev, *Revolutsiia 1917 goda*, III: 167; Polovtsoff, *Glory and Downfall*, 256-8.
- 172 Pol'ner, *Zhiznennyi put' kniazia Georgiia Evgenevicha Lvova*, 258. 同一天，克倫斯基下令把尼古拉二世和皇室轉移到西伯利亞關押 (實際轉移要到7月31日才開始)。7月15日，臨時政府宣佈，蘇維埃派往前線部隊的「政委」與政府派出的人一樣，都歸政府管轄。
- 173 Sanborn, "Genesis of Russian Warlordism," 205-6.
- 174 總參謀部會議要求在後方恢復死刑，把士兵委員會的作用限制在經濟和教育方面，同時約束政委在軍事方面的權力。Browder and Kerensky, *Russian Provisional Government*, II: 989-1010.
- 175 Denikin, *Ocherki russkoi smuti*, 446-7; Trotsky, *History of the Russian Revolution*, II: 570; Sukhanov, *Zapiski*, IV: 469-70.
- 176 *Ruskoe slovo*, July 21, 1917: 2.
- 177 克倫斯基最終在8月17日同意把總理令草案交由內閣決定。Martynov, *Kornilov*, 74-5, 100; Kerensky, *Prelude to Bolshevism*, 27. 科爾尼洛夫8月3日和8月10日兩次來到首都。8月3日，他和克倫斯基及臨時政府進行了討論 (有報紙報道說，「克倫斯基在科爾尼洛夫將軍面前深深地鞠了一躬」)，但證據顯示，當科爾尼洛夫開

始討論戰爭計劃的時候，克倫斯基和薩溫科夫 (Savinkov) 低聲對他說要小心。言外之意就是俄國秘密的戰爭計劃會被政府的某些部長洩露出去，就像被敵人的特工洩露出去一樣。Savinkov, *K delu*, 12–3; Lukomskii, *Vospominaniia*, I: 227; Loukomsky, *Memoirs of the Russian Revolution*, 99; *Russkoe slovo*, August 4, 1917: 2. 蘇維埃公開指責科爾尼洛夫和他的首都之行。 *Izvestiia*, August 4, 1917.

178 *Voprosy istorii*, 1966, no. 2: at 12–3 (引自 I. G. 科羅列夫).

179 *VI s'ezd RSDRP*, 250.

180 *VI s'ezd RSDRP*, 28, 30–6; *Sochineniia*, III: 17.

181 在布爾什維克黨代表大會期間，7月27日，正在就列寧有可能出庭受審一事進行談判的格魯吉亞布爾什維克格里戈里·「謝爾戈」·奧爾忠尼啟則，問聖彼得堡蘇維埃的代表們，對臨時政府把列寧當作德國間諜的逮捕令怎麼看。孟什維克本來可以進行甜蜜的復仇，欺騙布爾什維克談判人員說他們會誓死捍衛列寧，然後背叛他。但蘇維埃主席團主席、格魯吉亞孟什維克卡爾洛·齊赫澤——列寧在4月剛一回國就毫不留情地羞辱過他——是個有原則的人。「今天逮捕列寧，明天就會逮捕我，」他說，「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的領導者們不相信列寧有罪……他們本應該積極地要求調查列寧和季諾維也夫案件，但他們沒有……無論如何我們都不應該把列寧同志交出去……在保證他們會受到公正的審判之前，我們應該……保護我們的同志不要受到傷害。」 *VI s'ezd RSDRP*, 310–1.

182 Tyrkova-Williams, *From Liberty to Brest Litovsk*, 167; Orlovsky, "Corporatism or Democracy," 67–90. 8月8至10日，還是在莫斯科，召開了一次由實業家里亞布申斯基 (Ryabushinsky) 倡議、羅將柯主持的公眾人物會議。據說會議是商量暴動的事情。參加會議的約有400人，而且順便舉行了多次私人會晤。 *Moskovskie vedomosti*, August 11, 1917; Sevost'ianova, *Delo Generala Kornilova*, II: 223–4 (利沃夫的證詞); Katkov, *The Kornilov Affair*, 142–3 (引自馬克拉科夫).

183 *Izvestiia*, August 13, 1917. 相反的報道參見 *Russkoe slovo*, August 12, 13, 14, 15, and 17, 1917.

184 Pokrovskii and Iakovlev, *Gosudarstvennoe soveshchanie*, 335.

185 *Izvestiia*, August 13, 1917.

186 科爾尼洛夫那天夜裏還跟克倫斯基通了電話。 *Russkoe slovo*, August 15, 1917: 3–4. 據說科爾尼洛夫認為克倫斯基不想讓他參加國務會議。 Browder and Kerensky, *Russian Provisional Government*, III: 1546–54 (Lukomsky). 證據顯示，克倫斯基在8月14日會議之前召見了科爾尼洛夫。 Miliukov, *Istoriia vtoroi*, I/ii: 134–5; Miliukov, *Russian Revolution*, II: 108.

187 Holquist, *Making War*, 90–1, 引自 N. M. Mel'nikov, "A. M. Kaledin," *Donskaia letopi'*, 3 vols. (Vienna; Donskaia istoricheskaia komissiiia, 1923–4), I: 24–5.

188 科爾尼洛夫最後說：「我相信俄羅斯人民的天賦，我相信俄羅斯人民的理性，我相信國家能夠獲得拯救。我相信我們的祖國會有光明的未來，我相信我們軍隊的戰鬥力，相信它可以重整旗鼓。但我要說，決不能再浪費時間了……必須下定決心，必須嚴格、堅定地執行提出的那些措施 (掌聲)。」 Pokrovskii and Iakovlev,

- Gosudarstvennoe soveshchanie*, 60–6; Browder and Kerensky, *Russian Provisional Government*, III: 1474–8; Avdeev, *Revoliutsiia 1917 goda*, IV: 54–5.
- 189 Stalin, "Protiv moskovskogo soveshchaniia," *Rabochii i soldat*, August 8, 1917, 載於 *Sochineniia*, III: 193–5.
- 190 Stalin, "Kuda vedet moskovskoe soveshchane?," *Proletarii*, August 13, 1917, 載於 *Sochineniia*, III: 200–5 (at 201).
- 191 「國務會議是不是能堅持要求落實最高總司令的要求？」右翼的《新時報》起初擔心，「一切是不是還會跟以前一樣？」*Novoe vremia*, August 13, 1917: 5. 另見 *Rech'*, August 12–17, 1917. 關於新聞界對科爾尼洛夫講話的直接反應，參見 Browder and Kerensky, *Russian Provisional Government*, III: 1515–22. 後來仍然由羅將柯主持，在 10 月 12 至 14 日召開了第二次公眾人物會議。會議表示，「我國政局變得越發黯淡了……我們被稱作反革命分子，我們被稱作科爾尼洛夫分子。」*Russkie vedomosti*, October 13, 1917: 5; Browder and Kerensky, *Russian Provisional Government*, III: 1745–7.
- 192 Miliukov, *Russian Revolution*, II: 100; Savich, *Vospominaniia*, 247, 250–1.
- 193 Kerensky, *Delo Kornilova*, 81. 「科爾尼洛夫將軍派頭十足地來參加莫斯科會議，」克倫斯基後來寫道，「首都的全體精英在車站迎接他……莫斯科街頭在散發小冊子，標題為〈國家英雄科爾尼洛夫〉。」Kerensky, *The Catastrophe*, 315. 另見 Miliukov, *Istoriia vtoroi*, II: 133; Miliukov, *Russian Revolution*, II: 107.
- 194 Dumova, "Maloizvestnye materialy po istorii kornilovshchiny," 78; Savich, *Vospominaniia*, 246–50. 另見 Rosenberg, *Liberals*, 196–233, 羅森堡認為，立憲民主黨不僅捲入了可能發生的科爾尼洛夫獨裁，而且還因此發生了分裂。在科爾尼洛夫被監禁之後，米留可夫以度假為由，悄悄離開了首都。他主編的《言論報》此時受到臨時政府的審查。立場更右的《新時報》被徹底封掉了。
- 195 格奧爾吉·卡特科夫 (George Katkov) 提出有力的證據，證明克倫斯基煽風點火，但卡特科夫也承認，「可以假定，科爾尼洛夫考慮了某些計劃，以防政府不會如他所願採取行動。」科爾尼洛夫的心腹盧科姆斯基 (Lukomsky) 將軍承認，科爾尼洛夫方面確實有這樣的計劃。Katkov, *Russia, 1917*. Katkov, *The Kornilov Affair*, 65; Lukomskii, *Vospominaniia*, I: 228–9; Loukomsky, *Memoirs of the Russian Revolution*, 100–1.
- 196 總參謀部的有些成員儘管厭惡，但除了和這個不合口味的「民主」力量 (士兵委員會) 合作，就找不到別的辦法把戰爭進行到底，原因也在於此。Wildman, "Officers of the General Staff and the Kornilov Movement."
- 197 Lukomskii, *Vospominaniia*, I: 228, 232. 「先生們，」野蠻師師長恰瓦恰澤 (Chavachadze) 1917 年 6 月對自己的手下說，「我感到非常遺憾，最近加入我們部隊的年輕軍官們在開始他們的戰鬥生涯時，將不得不去做一件十分令人厭惡的督察工作。」Kournakoff, *Savage Squadrons*, 321.
- 198 Lih, *Lenin*, 140.
- 199 *Rabochii*, August 25, 1917, 載於 *Sochineniia*, III: 251–5.
- 200 有關綜述，參見 Munck, *Kornilov Revolt*. 對科爾尼洛夫事件的記錄大多出自克倫斯基及其屬下。但調查委員會成員 R. R. 勞帕赫 (R. R. Raupakh) 收集的證詞在一定



- 程度上保護了科爾尼洛夫。Allan K. Wildman, "Officers of the General Staff and the Kornilov Movement," 載於 Frankel, *Revolution in Russia*, 76–101 (at 101, n36). 科爾尼洛夫實際上是唯一沒有提供書面陳述的參與者 (他在第二年死了); 至於科爾尼洛夫 1917 年 9 月的證詞, 參見 Kackov, *Russia, 1917*, appendix.
- 201 「科爾尼洛夫事件一方面體現了舊軍隊瓦解造成的反響, 另一方面反映了兩起陰謀的結合, 這兩起陰謀不完全一致, 但卻緊密地交織在一起, 而且是朝同一個方向」——這說的是克倫斯基的陰謀和科爾尼洛夫的陰謀。Shklovsky, *Sentimental Journey*, 63. 現在還有第三種看法, 認為在這起事件中, 雙方都存在誤解; 誤解肯定很多, 但事情要更加隱晦。
- 202 *Russkoe slovo*, August 31, 1917 (N. V. Nekrasov); Martynov, *Kornilov*, 101. 由於紛紛傳說布爾什維克要發動政變, 8 月 27 日作為二月革命整整六個月的紀念日就顯得引人注目, 而它也許是科爾尼洛夫特意挑選的日子。
- 203 Avdeev, *Revoliutsiia 1917 goda*, IV: 98. 另見 Ukraintsev, "A Document on the Kornilov Affair" (烏克蘭采夫當時是克倫斯基成立的調查委員會成員, 他揭穿了克倫斯基話中的不實之詞)。另見 Pipes, *Russian Revolution*, 448–64; 以及 Rabinowitch, *Bolsheviks Come to Power*, 117–27.
- 204 Lukomskii, *Vospominaniia*, I: 242; Avdeev, *Revoliutsiia 1917 goda*, IV: 100–1; *Novaia zhizn'*, August 31, 1917; Kerenskii, *Delo Kornilova*, 104–5; Abraham, *Kerensky*, 277; Pipes, *Russian Revolution*, 457–9.
- 205 Chugaev, *Revoliutsionoe dvizhenie*, 446; Golovin, *Rossiiskaia kontr-revoliutsiia*, II: 37; Pipes, *Russian Revolution*, 460.
- 206 Trotsky, *My Life*, 331.
- 207 Rabinowitch, *Bolsheviks Come to Power*, 148–9.
- 208 據說克雷莫夫說過「拯救祖國的最後一張牌已經輸了——活着沒有甚麼意義了」, 而且據說他給科爾尼洛夫留了遺書, 但內容無人知曉。Martynov, *Kornilov*, 135–42, 14–51; Avdeev, *Revoliutsiia 1917 goda*, IV: 143, 343–50; Kerenskii, *Delo Kornilova*, 75–6; Browder and Kerensky, *Russian Provisional Government*, III: 1586–9.
- 209 Stalin, "Protiv soglasheniia s burzhuziei," *Rabochii*, August 31, 1917, 載於 *Sochineniia*, 236–7. 另見 Stalin, "My trebuem," *Rabochii*, August 28, 1917, 載於 *Sochineniia*, 256–60.
- 210 Gilliard, *Thirteen Years*, 243; Steinberg and Khrustal'ev, *Fall of the Romanovs*, 198 (尼古拉二世本人的日記).
- 211 首都的軍官曾經接到通知準備響應 (Rendle, *Defenders of the Motherland*, 182–3)。那些軍官幾乎沒有或根本沒有採取行動, 但另一方面, 當時也不可能採取甚麼行動: 克雷莫夫連彼得格勒都沒進, 事情就結束了。因此, 認為「骨幹分子的支持」[「微乎其微」]的說法並不正確 (Allan K. Wildman, "Officers of the General Staff and the Kornilov Movement," 載於 Frankel, *Revolution in Russia*, 98)。還有, 必須記住, 克倫斯基散佈謊言並對正在發生的事情故意混淆視聽, 讓有可能成為科爾尼洛夫支持者的那些人不敢輕舉妄動 (Pipes, *Russian Revolution*, 460–1)。至於精英集團對科爾尼洛夫態度的不確定性, 參見 Rendle, *Defenders of the Motherland*, 234. 不過, 懷爾

- proizvedennye*, II: 38, 48–9, 277; Schapiro, *Communist Party*, 173. 蘇漢諾夫的妻子加林娜在斯維爾德洛夫的書記處工作。
- 223 Sukhanov, *Zapiski*, I: 201.
- 224 Lih, “The Ironic Triumph of ‘Old Bolshevism,’” (引自 *Listovki Moskovskoi organizatsii bol'shevikov, 1914–1925 gg.* [Moscow: Politcheskaia literatura, 1954]).
- 225 Mel'gunov, *Bolshevik Seizure of Power*, 4.
- 226 Kerensky, *The Catastrophe*, 321; Trotskii, *Istoriia russkoi revoliutsii*, II: 136–40; Chamberlin, *Russian Revolution*, I: 277; Wildman, *End of the Russian Imperial Army*, II: 185, Kolonitskii, “Kerensky,” 146.
- 227 Stalin, “Svoim putem,” *Rabochii put'*, September 6, 1917, 載於 *Sochineniia*, III: 272–4.
- 228 Stalin, “Dve linii,” *Rabochii put'*, September 16, 1917, 載於 *Sochineniia*, III: 293–5.
- 229 V. I. Lenin, “Letter to the Bolshevik Central Committee, the Moscow and Petrograd Committees and the Bolsheviks Members of the Moscow and Petrograd Soviets,” 載於 *Selected Works*, II: 390. 另見 Volkogonov, *Lenin: Life and Legacy*, xxxi (RGASPI, f. 2, op. 1, d. 4269, l. 1); 以及 *PSS*, XXXIV: 435–6.
- 230 Browder and Kerensky, *Russian Provisional Government*, III: 1641–2.
- 231 「現在，俄國公共場合的所有話題都和食物有關」，一個在伏爾加河流域旅行過的外國人寫道。Price and Rose, *Dispatches from the Revolution*, 65. 到10月15日，首都的糧食儲備也許只夠三四天。 *Ekonomicheskoe polozhenie*, II: 351–2. 10月初，普梯洛夫工廠的主管報告說，煤已用光，廠裏13個車間要關掉。 *Ekonomicheskoe polozhenie*, II: 163–4.
- 232 Kitanina, *Voina, khleb i revoliutsiia* (Leningrad, 1985), 332–3 (October 13, 1917), Golovine, *Russian Army*, 175–6.
- 233 Abraham, *Kerensky*, 244.
- 234 Daniels, *Red October*, 61.
- 235 Stalin, “Kontrevoliutsiia mobilizuetsia — gotovtes' k otporu,” *Rabochii put'*, October 10, 1917, 載於 *Sochineniia*, III: 361–3.
- 236 Trotskii, *O Lenine*, 70–3; Trotsky, *History of the Russian Revolution [1961]*, 148–9; Slusser, *Stalin in October*, 226–36; *Protokoly Tsentral'nogo komiteta RSDRP (b)*, 55; Kudelli, *Perry legal'nyi Peterburgskii komitet bol'shevikov*, 316 (Kalinin); Abrosimova, *Peterburgskii komitet RSDRP (b)*, 508; Rabinowitch, *Bolsheviks Come to Power*, 209–16.
- 237 *Novaia zhizn'*, October 18, 1917: 3. 加米涅夫擔心那些據說組織良好而且忠於政府的部隊、哥薩克和士官生，因此警告說要是起義失敗，有可能會給黨帶來滅頂之災。拉斯科爾尼科夫聲稱自己和加米涅夫發生了爭論，但誰也說服不了誰。F. F. Raskolnikov, “Nakanune Oktiabr'skoi revoliutsii” (寫於1921–1922年), *RGVA*, f. 33 987, op. 2, d. 141, l. 463–500, Volkogonov papers, container 17.
- 238 *PSS*, XXXIV: 419–27; *Protokoly Tsentral'nogo komiteta RSDRP (b)*, 106–7. 在強迫黨發動政變的時候，列寧威脅說要退出中央委員會並發動基層公開反對它，這樣的權利他可沒有給過其他人 (*Protokoly Tsentral'nogo komiteta RSDRP (b)*, 74)。

- 239 *Novaia zhizn'*, October 18, 1917; *Protokoly tsentral'nogo komiteta RSDRP*, 106–18; Slusser, *Stalin in October*, 234–37.
- 240 M. V. Fofanova, "Poslednoe podpol'e V. I. Lenina."
- 241 *Izvestiia*, October 14, 1917: 5; Avdeev, *Revoliutsiia 1917 goda*, V: 70–1. 另見 Sukhanov, *Zapiski*, VII: 40–1; Gronsky, *The War and the Russian Government*, 112. 托洛茨基就軍事革命委員會問題向彼得格勒蘇維埃發表了講話，說「他們說我們在成立司令部，準備奪權。這一點我們並不隱瞞。」Trotsky, *Sochineniia*, III: 15.
- 242 當臨時政府最終宣佈在12月12日舉行立憲會議選舉的時候，蘇維埃中很多人都想取消蘇維埃第二次代表大會，但是在布爾什維克的影響下，它沒有被取消，而是把議程改為起草立憲會議的立法建議。
- 243 Avdeev, *Revoliutsiia 1917 goda*, V: 109; *Novaia zhizn'*, October 18, 1917: 3.
- 244 軍事革命委員會選舉產生了五人領導集體（三名布爾什維克和兩名左派社會革命黨人），並聲稱擁有對衛戍部隊的管轄權。Chugaev, *Petrogradskii voenno-revoliutsionnyi komitet*, I: 63.
- 245 Sukhanov, *Zapiski*, VII: 91; Volkogonov, *Trotsky*, 88.
- 246 Chugaev, *Petrogradskii voenno-revoliutsionnyi komitet*, I: 84, 86; Ditetrich Geyer, "The Bolshevik Insurrection in Petrograd," 載於 Pipes, *Revolutionary Russia*, 164–79.
- 247 托洛茨基對這群人也講了話，他證實了斯大林的說法，指出加強力量或採取守勢可以保障大會開幕。可以推測，屆時表決通過「全部政權歸蘇維埃」將輕而易舉。Rabinowitch, *Bolsheviks Come To Power*, 252–4; Alexander Rabinowitch, "The Petrograd Garrison and the Bolshevik Seizure of Power," 載於 Pipes, *Revolutionary Russia*, 172–91. 後來，托洛茨基和斯大林都聲稱，採取守勢是一種偽裝。Trotsky, *O Lenine*, 69; Mints, *Dokumenty velikoi proletarskoi revoliutsii*, I: 3 (Stalin).
- 248 「必須以新的工農政府來代替目前的地主資本家政府，」斯大林被沒收的社論指出，「……如果你們大家都同心協力、堅定不移地行動起來，那末誰也不敢抗拒人民的意志。」*Sochineniia*, III: 390（譯註：《斯大林全集》第3卷，第372、373頁。）。另見 *Rech'*, October 25, 1917: 2; Kerensky, *The Catastrophe*, 325–6; *Izvestiia*, October 25, 1917: 7.
- 249 Trotsky, *History of the Russian Revolution*, III: 121. 另見 Stankevich, *Vospominaniia*, 258. 10月17日，內務部長報告說，他手下有足夠多的可靠的部隊，可以擊退任何暴動，儘管還不足以採取先發制人的行動，鎮壓左翼分子。10月21日夜裏，克倫斯基向最高總司令杜鶴寧將軍保證，他仍會出來，到莫吉廖夫與他會面，不會因為「擔心騷亂、叛亂之類的事情」而被嚇住。Browder and Kerensky, *Russian Provisional Government*, III: 1744. 但他當時其實已經很緊張了。「我唯一希望的是（布爾什維克）會露面，好讓我把他們鎮壓下去」，克倫斯基對英國大使布坎南說。Buchanan, *My Mission to Russia*, II: 201. 在被宣佈為「彼得格勒蘇維埃節」的10月22日那天的群眾集會期間，蘇漢諾夫發現「有一種近乎狂喜的氣氛」。Sukhanov, *Russian Revolution*, II: 584.
- 250 「M. 克倫斯基政府在布爾什維克起義之前就垮掉了，」《曼徹斯特衛報》的記者說得很對，「因為在國內沒有人支持它。」M. Philips Price, *Manchester Guardian*,

- November 20, 1917, 轉載於 Price and Rose, *Dispatches from the Revolution*, 88. [列寧和托洛茨基那麼輕易地就推翻了克倫斯基最後一屆聯合政府，暴露出該政府本質上的無能。這種無能的程度在當時即便是消息靈通人士也非常驚訝。] Trotsky, *History of the Russian Revolution*, III: 870 (引用了納博科夫的話，未註明出處)。
- 251 Reed, *Ten Days* [1919], 73; Wade, *Red Guards and Workers' Militias*, 196–207.
- 252 Daniels, *Red October*, 166; “Stavka 25–26 oktiabria 1917 g.”
- 253 市裏的衛戍部隊有 16 萬人，駐紮在郊區的還有 8.5 萬人。蘇漢諾夫估計市裏參加起義的最多十分之一，而且「很可能更少」。Sukhanov, *Zapiski*, VII: 161; Solov'ev, “Samoderzhavie i dvorianskii vopros,” 77; Erykalov, *Oktiabr'skoe vooruzhennoe vosstanie*, 435.
- 254 Mel'gunov, *Kak bol'sheviki zakhvatili vlast'*, 87–9. 從彼得保羅要塞發射了大約 30 枚炮彈，有 2 枚擊中目標（其中 1 枚擊中了檐口）。沒有人受傷，更別說在炮擊中被打死。Avdeev, *Revoliutsiia 1917*, V: 189.
- 255 Milukov, *Istoriia*, III: 256.
- 256 Lutovinov, *Likvidatsiia miatezha Kerenskogo-Krasnogo*, 7.
- 257 Erykalov, *Oktiabr'skoe vooruzhennoe vosstanie*, 435; Rabinowitch, *Bolsheviks Come to Power*, 305. 切列米索夫將軍在 10 月 14 日那天發佈過一道命令，暗示會把彼得格勒衛戍部隊調往前線。
- 258 Rakh'ia, “Poslednoe podpol'e Vladimira Il'icha,” 89–90; Rakh'ia, “Moi predoktiabr'skie i posleoktiabr'skie vstrechi s Leninyim,” 35–6; Daniels, *Red October*, 158–61; Rabinowitch, *Bolsheviks Come to Power*, 266.
- 259 Kotel'nikov, *Vtoroi vserossiiskii s'ezd sovetov*, 144–53.
- 260 Kotel'nikov, *Vtoroi vserossiiskii s'ezd sovetov*, 4, 34–5; Sukhanov, *Zapiski*, VII: 198–9, Mstislavskii, *Piat' dnei*, 72; Mstislavskii, *Five Days*, 125.
- 261 Sukhanov, *Zapiski*, VII: 203; Trotsky, *History of the Russian Revolution*, III: 311 (引用了蘇漢諾夫的話)。
- 262 Nikolaevskii, “Stranitsy proshlogo,” *Sotsialisticheskii vestnik*, July–August 1958: 150. 馬爾托夫碰到的那名布爾什維克是伊萬·阿庫洛夫 (Ivan Akulov)。
- 263 Park, *Bolshevism in Turkestan*, 12–3; Khalid, “Tashkent 1917,” 279; Stalin, “Vsia vlast' sovetam!” *Rabochii put'*, September 17, 1917, 載於 Sochineniia, III: 297–99, Blank, “Contested Terrain.”
- 264 Daniels, *Red October*, 226; Wade, *Russian Revolution*, 302–3.
- 265 「我們離開了，既不知道去哪兒，也不知道為甚麼，」蘇漢諾夫在幾年後寫道，「結果把我們自己與蘇維埃分割開來並和反革命分子攪在一起，敗壞和貶低了我們在群眾眼中的聲譽和人格……而且因為離開，我們讓布爾什維克完全放開了手腳並徹底掌控了局勢。」Sukhanov, *Zapiski*, VII: 219–20. 另見 Schapiro, *Origins of the Communist Autocracy* [1965], 66–8. 退出大會的人成立了一個「挽救祖國和革命委員會」，但不具備蘇維埃那種巨大的吸引力。10 月 29 日，他們指揮的士官生奪取了電話局、國家銀行和阿斯托利亞飯店，然後又準備攻打斯莫爾尼宮，但軍事革

命委員會重新奪回了所有這些據點，沒費多大力氣就打散了士官生。*Novaia zhizn'*, October 30, 1917: 3.

266 究竟有多少代表離開會場，歷史上並沒有留下這方面的精確記錄。Kotel'nikov, *Vtoroi vserossiiskii s'ezd sovetov*, 53-4; Browder and Kerensky, *Russian Provisional Government*, III: 1797-8; *Dekrety Sovetskoi vlasti*, I: 1-2. 起義前夕，盧那察爾斯基曾與加米涅夫以及季諾維也夫一道撰文反對起義。

267 Kotel'nikov, *Vtoroi vserossiiskii s'ezd sovetov*, 164-5; *Izvestiia*, October 26, 1917: 5-6, October 27: 4, October 28: 4; Rabinowitch, *Bolsheviks Come to Power*, 273-304; Daniels, *Red October*, 187-96. 雖然大部分教科書都說被捕的地點是在內閣會議室(河邊的孔雀石大廳)，但政府的部長們當時已經轉移到沙皇尼古拉二世的私人餐廳，那裏正對着內院。M. Levin, "Poslednie chasy vremennogo pravitel'stva v 1917 g.," *Krasnyi arkhiv*, 1933, no. 56: 136-8 (P. I. Palchinsky notes).

268 Rabinowitch, *Bolsheviks Come to Power*, 269-92; Figes, *A People's Tragedy*, 485-95. 約翰·里德和他的妻子露易絲·布賴恩特(Louise Bryant)以及艾伯特·里斯·威廉姆斯(Albert Rhys Williams)剛好走進冬宮，希望採訪克倫斯基，但溜達了一圈之後又離開了，當時赤衛隊員就在外面；最後，赤衛隊員們從窗子和沒有上鎖的大門進去了。參見 *Delo naroda*, October 29, 1917: 1-2 (S. L. Maslov).

269 Trotsky, *Stalin*, 228-34; Radzinsky, *Stalin*, 115-19.

270 列寧在1917年4月到達芬蘭車站時戴的是一頂很考究的帽子(從他中途在斯德哥爾摩拍的照片中可以看出來)。Nikolai I. Podvoiskii, "V. I. Lenin v 1917," *Istoricheski arkhiv*, 1956, no. 6: 111-32 (at 115).

271 Reed, *Ten Days [1919]*, 125-7; Kotel'nikov, *Vtoroi vserossiiskii s'ezd sovetov*, 59, 165-6; Avdeev, *Revoliutsiia 1917 goda*, V: 179-80; *Izvestiia*, October 26, 1917: 7. 列寧(在托洛茨基之後)也出現在10月25日凌晨2:35左右由彼得格勒蘇維埃召開的並行會議上。

272 Volkogonov, *Lenin: Life and Legacy*, xxxvi (引自 *Obsheee delo* [Paris], February 21, 1921).

273 Volkogonov, *Lenin: Life and Legacy*, xxxvi, (引自 *Velikii Lenin* [Moscow, 1982]), 16-7.

274 Kotel'nikov, *Vtoroi vserossiiskii s'ezd sovetov*, 15-21, 59-68.

772

275 Kotel'nikov, *Vtoroi vserossiiskii s'ezd sovetov*, 22.

276 Sukhanov, *Zapiski*, III: 361.

277 Kotel'nikov, *Vtoroi vserossiiskii s'ezd sovetov*, 25-30, 82-7.

278 McCauley, *Russian Revolution*, 282-3, translation of K. G. Idman, *Maame itsenäistymisen vuosilta* (Porvoo-Helsinki, 1953), 216.

279 Fülöp-Miller, *Mind and Face of Bolshevism* [1927], 29. 羅伯特·瑟維斯認為，列寧「1917年(在俄國內)並不是一個無足輕重的人物；但他的出名還局限於俄國的地下政治集團」。Service, *Lenin*, I: 1.

280 1917年9月，剛剛擔任司法部長的帕維爾·馬良托維奇(Pavel Malyantovich, 孟什維克)給各省的檢察官簽署了一道命令，表示緝拿列寧的逮捕令仍然有效。他在1940年1月21日列寧忌日那天被槍決。

- 281 關於「天才的革命家」列寧，參見 Schapiro, "Lenin after Fifty Years," 8.
- 282 「即使 1917 年我不在彼得堡，十月革命仍然會發生——只要列寧在那裏負責指揮就行了，」1935 年 3 月底，托洛茨基在日記中說，「要是列寧和我都不在彼得堡，根本不會有十月革命。」*Trotsky's Diary in Exile* [1963], 53–4.
- 283 *Bolshevik Propaganda: Hearings before a Subcommittee on the Judiciary, United States Senate*, 790; Hard, *Raymond Robins' Own Story*, 52.
- 284 Waters, *Rosa Luxemburg Speaks*, 367.
- 285 Brinton, *Anatomy of Revolution*. 不過，布林頓提出的激進化過程——經過了三個階段（充滿光明、兩極對立、激進化）——最後以反革命（「熱月政變」）告終。
- 286 Lyttelton, *Seizure of Power*, 86.
- 287 Wildman, *End of the Russian Imperial Army*, II: xv. 在臨時政府存在的飽受煎熬的八個月中，俄國發生了一千多次罷工，遠遠超過君主制垮台前的罷工次數：1917 年 3 月有 4.1 萬名工人；7 月是 38.4 萬名工人；9 月是 96.5 萬名工人；而 10 月是 44.1 萬名工人。Orlovsky, "Russia in War and Revolution," 244. 但是，罷工沒有推翻臨時政府，就像它們沒有推翻君主制一樣。
- 288 Maklakov, "The Agrarian Problem."
- 289 "Okruzhili Mia Tel'tsy Mnozi tuchny," *Rabochii put'*, October 20, 1917, 轉載於 *Sochineniia*, III: 383–69.
- 290 *Protokoly Tsentral'nogo komiteta RSDRP (b)*, 107 (October 20, 1917).
- 291 Trotsky, *History of the Russian Revolution*, III: 211. 「我和加米涅夫在軍事革命委員會的辦公室一起度過了 10 月 25 日那具有決定意義的一夜，我在電話裏回答問題並發佈命令。」托洛茨基還說：「對於斯大林在那些具有決定意義的日子究竟發揮了甚麼作用的問題，我簡直無法回答。」Trotskii, *Stalinskaia shkola fal'sifakatsii*, 26. 就連斯大林的親友對他的評價也不高。「在那些日子裏，」費奧多爾·阿利盧耶夫寫道——他幾次目睹斯大林在他家裏打瞌睡，「斯大林同志只是在地下政治活動中與他有接觸的小圈子裏才真的有人認識。」RGASPI, f. 558, op. 4, d. 668, l. 30 (F. S. Alliluev, "V Moskve [Vstrecha s t. Stalinym]," 未註明日期的打字稿). 所有在十月革命時衝在前線的布爾什維克重要人物，比如拉斯科爾尼科夫、德賓科 (Dybenko)、波德沃伊斯基 (Podvoisky)、克雷連柯，後來都被斯大林政權殺害了。
- 292 「斯大林實在是不適合 1917 年那種紛亂的大眾政治」，斯大林 1905 年在奇阿圖拉的經歷表明，塔克的這個說法是站不住腳的。Tucker, *Stalin as Revolutionary*, 178.
- 293 De Lon, "Stalin and Social Democracy," 204. 立憲會議於 1918 年 1 月解散之後，薩吉拉施維里心灰意冷，離開彼得格勒回到了梯弗利斯。
- 294 Kotel'nikov, *Vtoroi vserossiiskii s'ezd sovetov*, 90, 174–5. 名單很可能是加米涅夫提交的。

## 第七章 1918：達達主義和列寧

- 1 Motherwell, *Dada Painters and Poets*, 78–9, 81.
- 2 Malkov, *Reminiscences*; Mal'kov, *Zapiski*.
- 3 米留可夫還說「經驗表明這種輕率的自信是一個嚴重的錯誤」。Miliukov, *Istoriia revoliutsii*, II: 179. 約翰·里德寫道，「也許除了列寧、托洛茨基、彼得堡工人和比較純樸的士兵，沒人能想到布爾什維克掌權的時間會超過三天」。Reed, *Ten Days* [1919], 117.
- 4 「我更喜歡列寧這個公開的敵人而不是克倫斯基這隻披着羊皮的狼」，1917年10月31日，有位官員寫道。Nielsen and Weil, *Russkaia revoliutsiia glazami Petrogradskogo chinovnika*, 21. 克倫斯基指責這類人是「右翼的布爾什維克分子」。
- 5 Trotsky, *On Lenin*, 114; Miliutin, *O Lenine*, 4–5; Rigby, *Lenin's Government*, 23.
- 6 Figs, "Failure of February's Men." 另見切爾諾夫言辭激烈的評論，Chernov, *Great Russian Revolution*, 256–7.
- 7 1918年，儒略曆要比格里高利曆晚13天；俄國的1918年1月31日星期三之後便是2月14日星期四。因此，二月革命的紀念日是3月13日（至少要到1927年，此後官方的二月革命紀念活動就停止了），十月革命的紀念日是11月7日。正教聖誕節變成了1月7日。
- 8 Larin, "Ukolybeli," 16–7; Stanisław Pestkowski, "Ob oktiabr'skikh dniakh v Pitere," *Proletarskaia revoliutsiia*, 1922, no. 10: 99–100; Mal'kov, *Zapiski* [1967], 42–7; Chugaev, *Petrogradskii voenno-revoliutsionnyi komitet*, I: 485.
- 9 Gil, *Shes' let s V. I. Leninyam*, 10–3. 列寧還有一輛當時很先進的六缸「德洛內一貝爾維爾」70型豪華轎車，它原先是為尼古拉二世買的。
- 10 Krupskaiia, "Lenin v 1917 godu," *Izvestiia*, January 20, 1960, 轉載於 *O Lenine*, 54. 她的這番話是在1934年說的。
- 11 Iroshnikov, *Sozdanie*, 156–61. 至於同時代人最好的描述，參見 M. Latsis, *Proletarskaia revoliutsiia*, 1925, no. 2: esp. 144.
- 12 1917年6月11日，彼得格勒蘇維埃成立過一個委員會，負責管理同烏克蘭拉達有關的事務（烏克蘭拉達當時正在要求自治）。
- 13 原計劃對於民族事務可能只打算設立一個「委員會」，而不是一個正式的人民委員會部。Gorodetskii, *Rozhdenie*, 158.
- 14 佩斯特科夫斯基用討好的口氣寫道，「列寧一天也離不開斯大林」。Pestkowski, "Vospominaniia o rabote v narkomnaste," 128.
- 15 Trotskii, *Moia zhizn'*, II; 62–4; Sukhanov, *Zapiski*, VII: 266; Zalkind, "N.K.I.D. v semnadsatom godu." 另見 Deutscher, *Prophet Armed*, 325.
- 16 *Izvestia TsK KPSS*, 1989, no. 5: 155 (1918年8月26日，給沃洛格達黨委的信)。據薩吉拉施維里推斷，斯大林想得到斯維爾德洛夫的位置，這是他從與斯大林過從甚密的奧爾忠尼啟則那裏聽說的。De Lon, "Stalin and Social Democracy," 199. 斯維爾德洛夫經常代表黨的書記處外出開會，因此很少去斯莫爾尼。

- 773 17 1918年，列寧的收入是24,683.33盧布，其中9,683.33盧布是人民委員會主席的工資，15,000盧布是稿費。這些錢都是邦契—布魯耶維奇經手的，他負責管理黨的經費。RGASPI, f. 2, op. 1, d. 11186, l. 2 (1919年9月20日)。
- 18 Bunyan and Fisher, *Bolshevik Revolution*, 185–7; *Sobranie zakononii i raspriazhenii rabocheho i krest'ianskogo pravitel'stva*, 1917, no. 1: 10–1; Goikhbarg [Hoichberg], *Sotsialnoe zakonodatel'stvo sovet'skoi respubliki*; Goikhbarg, *A Year in Soviet Russia*; Trotsky, *My Life*, 342
- 19 Magerovsky, "The People's Commissariat," I: 29–31.
- 20 Stanisław Petskowski, "Ob Oktiabr'skikh dniakh v Pitere," 104; Trotsky, *Stalin*, 245.
- 21 *Izvestiia*, November 27, 1917: 6. 佩斯特科夫斯基的銀行工作，是通過另一個擔任高級職務的波蘭人維亞切斯拉夫·明仁斯基安排的。
- 22 Codrescu, *Posthuman Dada Guide*, 11.
- 23 Sandqvist, *Dada East*; Dickerman, *Dada*.
- 24 Nielson and Boris, *Russkaia revoliutsiia glazami Petrogradskogo chinovnika*, 13 (1917年10月22日)。
- 25 簡·格羅斯說得對：「蘇維埃國家的締造者們早就發現，只要不讓他人染指，權力就可以不斷增加。」Gross, "War as Social Revolution," 32.
- 26 Marx and Engels, *Selected Correspondence [1965]*, 331, 338; Marx and Engels, *Selected Works*. 參見Gouldner, *The Two Marxisms*, 350–1. 作為列寧主義源頭之一的路易·奧古斯特·布朗基，整個巴黎公社時期都被關在監獄。
- 27 McLellan, *Karl Marx: Selected Writings*, 592–4; Marx and Engels, *The Civil War In France*, 載於 *Selected Works*, I: 473–545; 以及 Marx and Engels, *Selected Correspondence [1965]*, 318–20 (致庫格曼的兩封信，1871年4月12日和17日)。
- 28 *Zagranichnaia gazeta*, March 23, 1908.
- 29 Lenin, *Collected Works*, XXIV: 170, n24.
- 30 Lenin, *Collected Works*, XXVII: 135.
- 31 Sakwa, "The Commune State in Moscow."
- 32 Warth, *The Allies*, 159. 臨時政府秘書長在被問到能否為克倫斯基提供一輛汽車逃離俄國的時候，認為這是小偷為了偷車而要弄的伎倆！Startsev, "Begstvo Kerenskogo"; Medlin and Powers, *V. D. Nabokov*, 157–8. 在皇村（及其無線電台）已經伸手可及的時候，克倫斯基還是被迫撤退到普斯科夫（北方戰線司令部），尼古拉二世就是在那裏退位的。10月30日，在彼得格勒附近的普爾科沃高地有過短暫的戰鬥，但反布爾什維克武裝被輕易打退了，克倫斯基再也沒能回到彼得格勒。
- 33 P. N. Krasnov, "Na vnutrennom fronte," 載於 Gessen, *Arkhiv Russkoi revoliutsii*, I: 148–51; Kerensky, *The Catastrophe*, 340–3; Daniels, *Red October*, 205–6.
- 34 *Novaia zhizn'*, October 30, 1917: 3.
- 35 *Izvestiia*, November 3, 1917: 5; Kerensky, *Russia and History's Turning Point*, 443–6.
- 36 *Novaia zhizn'*, October 30, 1917: 3; *Delo naroda*, October 30, 1917: 2; *Izvestiia*, October 30, 1917: 2; Williams, *Through the Russian Revolution*, 119–49. 另見 Reed, *Ten Days [1919]*, 193–207; 以及 Gindin, *Kak bol'sheviki ovladeli gosudarstvennym bankom*.



- 37 Malyshev, *Oborona Petrograda*.
- 38 De Lon, "Stalin and Social Democracy," 257–8.
- 39 *Novaia zhizn'*, October 30, 1917: 2; Keep, *Debate on Soviet Power*, 44–5; Vompe, *Dni oktiabrskoi revoliutsii i zheleznodorozhniki*, 10.
- 40 *Izvestiia*, October 31, 1917: 7–8; Avdeev, *Revoliutsiia 1917 goda*, VI: 23, 45.
- 41 *Protokoly Tsentral'nogo komiteta RSDRP(b)* (Moscow: Politcheskaia literatura, 1958), 122–3. *The Bolsheviks and the October Revolution: Central Committee Minutes*, 127–8.
- 42 Avdeev, *Revoliutsiia 1917 goda*, IV: 22–3; *Protokoly Tsentral'nogo komiteta RSDRP(b)*, 271–2, n156; Vompe, *Dni oktiabr'skoi revoliutsii i zheleznodorozhniki*. 另見 Abramovitch, *Soviet Revolution*.
- 43 *Rabochii i soldat*, November 1, 1917. 另見 *Delo naroda*, October 31, 1917: 2.
- 44 1927年公佈的會議記錄刪掉了表揚托洛茨基的那段內容： *Pervyi legal'nyi Peterburgskii komitet bol'shevikov*. 托洛茨基拍照複製了1917年11月1日布爾什維克彼得堡委員會的會議記錄。 *Biulleten' oppozitsii*, 1929, no. 7: 30–2.
- 45 *Peterburgskii komitet RSDRP(b) v 1917 godu*, 546. 年輕的莫洛托夫也支持強硬路線（第544頁）。
- 46 "Zasedanie TsK 1 noiabria 1917 g.," *Protokoly tsentral'nogo komiteta RSDRP (b)*, 124–30. 斯大林不在與會者名單上。
- 47 *Protokoly Tsentral'nogo komiteta RSDRP (b)*, 272, n162; *Protokoly zasedanii VTsIK*.
- 48 *Oktiabr'skoe vosstanie v Moskve: Sbornik dokumentov* (Moscow: Gosizdat moskovskoe otdelenie, 1922), 97–8, 轉載於 Bunyan and Fisher, *The Bolshevik Revolution*, 179; Pipes, *Russian Revolution*, 501–3; Koenker, *Moscow Workers*, 332–4; Pethybridge, *Spread of the Russian Revolution*, 198. 另見 *Sovety v Oktiabre*, 31–86; Mel'gunov, *Kak bol'sheviki zakhvatili vlast'*, 277–382; Nikolai N. Ovsianikov (ed.); Ignat'ev, *Oktiabr' 1917 goda*; Grunt, *Moskva 1917-i*, ch. 6.
- 49 *Protokoly Tsentral'nogo komiteta RSDRP (b)*, 133–4; *The Bolsheviks and the October Revolution: Central Committee Minutes*, 138–40; *Lenin v pervye mesiatsy sovetsoi vlasti*, 46.
- 50 *Perepiska sekretariata TsK RSDRP(b)*, II: 27.
- 51 *Izvestiia*, November 4, 1917; Avdeev, *Revoliutsiia 1917 goda*, VI: 423–4; *Protokoly Tsentral'nogo komiteta RSDRP(b)*, 133–7; *Proletarskaia revoliutsiia*, 1927, no. 8–9: 321–51, no. 10: 246–98, no. 11: 202–14; 1928, no. 2: 132–69.
- 52 *Dekrety Sovetskoi vlasti*, I: 20.
- 53 Keep, *Debate on Soviet Power*, 86; Rabinowitch, *Bolsheviks in Power*, 48–9. 對表決過程略微不同的描述可見於 Pipes, *Russian Revolution*, 524–5.
- 54 *Protokoly Tsentral'nogo komiteta RSDRP(b)*, 146; *The Bolsheviks and the October Revolution: Central Committee Minutes*, 151–2; Bonch-Bruевич, *Na boevykh postakh*, 164; *Novaia zhizn'*, November 9, 1917.
- 55 Steklov, *Bortsy za sotsializm*, II: 400–1; Paustovsky, *Story of a Life*, 529, Trotskii, *Sochineniia*, VIII: 254. 斯維爾德洛夫有權自己做出決定，但他經常徵求列寧的意

- 見。Iroshnikov, *Predsedatel soveta narodnykh komissarov V. I. Ul'ianov (Lenin)*, 57 (引自帕紐什金 (Paniushkin) 未發表的回憶錄)。
- 56 關於任命格里戈里·皮達可夫為新政府首腦的傳言，參見 *Pravda*, December 15, 1923, December 16, 1923, and January 3, 1924; 以及 *Biulleten' oppozitsii*, April 1938, no. 65: 13–4.
- 57 Raleigh, *Revolution on the Volga*, 319.
- 58 *VII ekstremnyi s'ezd RKP (b), mart 1918 goda*, 6. 蘇聯的編輯們加了一條註釋，認為斯維爾德洛夫的確切陳述「不嚴密」(第 359 頁)。
- 59 Fel'shtinskii, *Bol'sheviki i levye esery*.
- 60 *Dekrety Sovetskoi vlasti*, I: 24–5.
- 61 Berlin and Jahanbegloo, *Conversations*, 4. 另見 Sorokin, *Leaves from a Russian Diary*, 105–6.
- 62 *Delo naroda*, November 25, 1917: 4.
- 63 *Izvestiia*, October 28, 1917: 2; Bunyan and Fisher, *Bolshevik Revolution*, 220.
- 64 Trotskii, *O Lenine*, 102.
- 65 Holquist, *Making War*, 130–1.
- 66 Colton, *Moscow*, 103 (季霍米羅夫，〈消息報〉1918年4月30日)。
- 67 McLellan, *Karl Marx: Selected Writings*, 592–4. 另見 V. I. Lenin, “Lessons of the Commune,” *Zagranichnaia gazeta*, March 23, 1908.
- 774 68 「對於我們部門的工作人員，」某財政官員記載說，「斯莫爾尼的布爾什維克始終以禮相待，只是在一無所獲的時候，他們才發出威脅，說要是我們不交出 1,500 萬現金，他們就奪取國家銀行，〔砸開金庫，〕要多少拿多少。」財政部人員(在莫伊卡河畔)繼續罷工。Nielsen and Weil, *Russkaia revoliutsiia glazami Petrogradskogo chinovnika*, 14–5 (October 25, 1917), 23 (November 6, 1917).
- 69 Bunyan and Fisher, *Bolshevik Revolution*, 225–31; *Vlast' soveto*v, 1919, no 11: 5; Trotskii, “Vospominaniia ob oktiabr'skom perevorote”; Trotsky, *My Life*, 293.
- 70 *Denezhnoe obrashchenie i kreditnaia sistema Soiuzna SSR za 20 let*, 1–2; Morozov, *Sozdanie i ukreplenie sovietskogo gosudarstvennogo apparata*, 52; *Novaia zhizn'*, November 16, 1917; *Ekonomicheskaiia zhizn'*, November 6, 1918: 2–3 (V. Obolensky-Osinsky). 明仁斯基的頭銜有時被說成是財政部「臨時」或「代理」人民委員。名義上的人民委員是斯克爾佐夫—斯捷潘諾夫 (Skortsov-Stepanov)。布爾什維克果真設法得到財政部官員和金庫主管 (P. M. 特羅希莫夫斯基 (P. M. Trokhimovsky)) 的配合。 *Proletarskaia revoliutsiia*, 1922, no. 10: 62–3; Iroshnikov, *Sozdanie*, 195.
- 71 Larsons, *Im Soujet-Labyrinth*, 61–6.
- 72 Nielsen and Weil, *Russkaia revoliutsiia glazami Petrogradskogo chinovnika*, 40 (December 29 and 31, 1917). 人民委員會頒佈法令，要求從 1918 年 1 月 11 日起中止此類支付業務。 *Obzor finansogo zakonodatel'stva, 1917–1921, gg.* (Petrograd, 1921), 15.
- 73 Schwittau, *Revoliutsiia i narodnoe khoziaistvo*, 337; D'iachenko, *Istoriia finansov SSSR*, 24–7; *Svoboda Rossii*, April 19, 1918: 5; Katzenellenbaum, *Russian Currency and Banking*, 55–

- 60; Bunyan and Fihser, *Bolshevik Revolution*, 607-9; *Papers Relating to th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Russia*, III: 32-3.
- 74 1909至1913年，每年的債息已高達3.45億盧布，到1918年，債息更是由於新的巨額戰時債務而呈現爆炸式增長。Dohan, "Foreign Trade," 218.
- 75 俄羅斯國家銀行(1891)壟斷了貨幣發行權。1917年11月的黃金儲備總量達12.6億盧布。Atlas, *Ocherki po istorii denezhnogo obrashcheniia*, 16-8; Carr, *Bolshevik Revolution*, II: 133-7.
- 76 Lenin, *Collected Works*, XLII: 64. 1918年2月，列寧估計國家支出有280億盧布，而收入是80億盧布，因為沒有人交稅。PSS, XXXV: 326-7, 331. 很快，布爾什維克又開始擔心，可以輕易獲得的紙幣會為反革命提供經費。Pravda, April 19, 1918. 明仁斯基在財政部門工作的時間很短；直到1918年4月，他是在契卡任職。
- 77 Owen, *Russian Peasant Movement*.
- 78 Brutzkus, "Die russische Agrarrevolution." 人們把在烏克蘭這個養活了數千萬人的大糧倉發生的農民革命比作旋風。Arthur Adams, "The Great Ukrainian Jacquerie," 載於Hunczak, *The Ukraine*, 247-70.
- 79 Pipes, *Russian Revolution*, 718-9. 另見Channon, "The Bolsheviks and the Peasantry."
- 80 反過來，通貨膨脹很快使他們放在國家儲蓄銀行或是埋在小屋附近地裏的存款蕩然無存。Pipes, *Russian Revolution*, 719-21.
- 81 Atkinson, *End of the Russian Land Commune*, 185.
- 82 *Novaia zhizn'*, December 31, 1917: 2 (Kolegaev). 臨時政府中的自由派認為，維克托·切爾諾夫，社會革命黨領袖兼臨時政府農業部長，是這場由奪取土地所引發的混亂的罪魁禍首，但在農村，切爾諾夫和社會革命黨卻因為反對立即重新分配土地而被視為叛徒。地方上的社會革命黨人與黨的中央高層斷絕關係，但整個黨並未因此獲得信任。切爾諾夫稱農民是「俄國政治史上的斯芬克斯」，但這種說法也適合他自己。Chernov, *Rozhdenie revoliutsionnoi Rossii*, 75. 布爾什維克借鑒的不只是社會革命黨的土地綱領。「我們得到了一份社會革命黨的地方自治綱領(我想這是他們在1905年制訂的)，於是就開始研究，制訂出我們的地方自治綱領，形式上跟前者差不多」，莫斯科的一位布爾什維克在談到1917年春的時候回憶說。Volin, "Vokrug Moskovskoi Dumy," 98.
- 83 「沒有哪部法律像土地法令那樣在那麼大的範圍廣而告之」，邦契-布魯耶維奇回憶說。參見*Na boevikh postakh*, 115. 日曆這件事在前一年的邦契-布魯耶維奇回憶錄第一版(Federatsiia, 1930, 125-127)中並沒有提到。另見Pethybridge, *Spread of the Russian Revolution*, 154.
- 84 Keep, *Russian Revolution*, 178.
- 85 Siegelbaum, "The Workers Group," at 155.
- 86 Gatrell, *A Whole Empire Walking*.
- 87 Chugaev, *Petrogradskii voenno-revoliutsionnyi komitet*, II: 111.
- 88 「淹死的人被抬出酒窖，在冬宮廣場上堆成幾排。」Antonov-Ovseenko, *Zapiski o grazhdanskoi voine*, I: 19-20.

- 89 *Izvestiia*, December 6, 1917; Bonch-Bruевич, *Na boevykh postakh*, 191. 邦契—布魯耶維奇還聽說偽裝的敵人正在儲備武器、偽造證件，他為此實施了緊急逮捕。Zubov, *F. E. Dzerzhinskii*, 161.
- 90 Iroshnikov, *Sozdanie*, 96, 201, 214–5; Z. Serebrianskii, “Sabotazh i sozdanie novogo gosudarstvennogo apparata,” 8–11.
- 91 GARE, f. 130, op. 1, d. 1, l. 29–30, 30 ob; *Izvestiia*, December 10, 1917; Tsvigun, *V. I. Lenin i VChK* [1975], 34, n1; Belov, *Iz istorii Vserossiiskoi Chrezvychainoi komissii*, 72–9; *Krasnyi arkhiv*, 1924, no. 5: xiv–xv; PSS, XXXV: 156–8; *Pogranichnye voiska SSSR 1918–1928*, 67; Chugaev, *Petrogradskii voenno-revoliutsionnyi komitet*, III: 663–4; Latsis, *Chrezvychainye komissii*, 7–8; Vladimir Bonch-Bruевич, “Kak organizaovalas VChK,” *Ogonek*, 1927, no. 3, 轉載於 *Vospominania o Lenine*, 134–9 (at 137), 擴充版見於 *Na boevykh postakh*, 193–203 (at 198–9); Carr, “Origins and Status.” 人民委員會對捷爾任斯基報告的討論在後來公佈時被說成是「法令」(並作了改動): Belov, *Iz istorii Vserossiiskoi Chrezvychainoi komissii*, 78–9. 另見 *Proletarskaia revoliutsiia*, 1924, no. 10 (33): 5–6 (Peterss) 及 1926, no. 9 (58): 82–3 (Väciētis); 以及 *Pravda*, December 18, 1927: 2. 列寧給捷爾任斯基的便條, 參見 PSS, XXXV: 156–8; Tsvigun, *V. I. Lenin i VChK* [1975], 37, and [1987], 19, 22 (譯註: 《列寧全集》第33卷, 第157–159頁。). 「無產階級雅各賓派」這個說法見於 Zubov, *F. E. Dzerzhinskii*, 162, 在早期的版本中叫「革命的雅各賓派」, 參見 *Feliks Edmundovich Dzerzhinskii: kratkaia biografiia*, 2nd ed. (Moscow: OGIz, 1942), 53. 嚴格來說, 契卡是取代了握有實權的革命軍事委員會, 交接是在1917年12月5日突然完成的。Rigby, “The First Proletarian Government”; Pietsch, *Revolution und Staat*, 44–66. 有一種觀點認為, 列寧匆忙成立契卡, 是因為他擔心已經同意加入政府的左派社會革命黨人會堅持溫和路線。這種觀點同列寧允許左派社會革命黨人加入契卡部務委員會的事實相矛盾。Latsis, *Otchet VChK za chetyre goda ee deiatel'nosti, 20 dekabria 1917–20 dekabria 1921 g.* Moscow: VChK, 1922, 8. I: 8; Rabinowitch, *Bolsheviks in Power*, 81–7, 103. 但參考 Pipes, *Russian Revolution*, 536–7.
- 92 RGASPI, f. 76, op. 2, d. 270, l. 32–33.
- 775 93 挫敗罷工的一個重要手段是查封彼得格勒市杜馬, 後者在政變中倖存下來並充當了一個集合點。 *Dekrety Sovetskoi vlasti*, I: 91.
- 94 Peters, “Vospominaniia o rabote VChK,” 10. 臨時政府辦成的少數事情之一就是成立了一個機構, 披露有關保安處骯髒把戲的秘密檔案, 既有系統性又聳人聽聞。Osorgin, *Okhrannoe otdelenie i ego sekrety*; Avrekh, “Chrezvychainaia sledstvennaia komissiiia vremennogo pravitel'stva; Peregodova, “Deitel'nost komissii Vremennogo pravitel'stva i soverskikh arkhivov,”; Ruud and Stepanov, *Fontanka 16*, 315–21. 警方的檔案遭到暴動人員的洗劫和焚毀; 有些保安處高級官員在離任時為了抹掉辦事不力和其他方面的許多痕跡, 把自己的檔案帶走了。不過, 這個由穆拉維約夫(他以前被保安處稱作「蒼蠅」)主持的委員會所做的工作, 後來以 GARE, f. 1647 (Avrekh, “Chrezvychainaia sledstvennaia komissiiia”) 為基礎, 出版了七卷(1927); Zhilinskii, *Organizatsiia i zhizn' okhrannago otdeleniia*, 4–6. 巴黎分部的檔案原來以為是被沙俄駐法大使銷毀了, 但在1957年又找到了(現藏於胡佛研究所)。

- 95 「蘇維埃政權的敵人，」捷爾任斯基解釋說，「既包括我們的政治對手，也包括所有的強盜、竊賊、投機分子以及其他犯罪分子。」*Novaia zhizn'*, June 9, 1918: 4.
- 96 Klement'ev, *V Bol'shevitskoi Moskve*, 53. 克列緬季耶夫 (Klement'ev)，俄羅斯帝國陸軍的炮兵軍官，之所以出現在莫斯科，或許是因為科爾尼洛夫將軍；那些聲稱跟科爾尼洛夫有聯繫的人曾命令克列緬季耶夫和一名上校 (佩爾胡羅夫 (Perkhurov)) 準備在莫斯科組織反布爾什維克武裝，但克列緬季耶夫說沒有人理睬他們。
- 97 Bunyan, *Intervention*, 229 (譯自 *Ezhedel'nik chrezvychainoi komisii*, 1918, no. 4: 29-30).
- 98 Leggett, *The Cheka*, 56.
- 99 從職業抱負——沒收者希望能更好地管理那些財產，進而出人頭地——到貪婪 (「有時候作為競爭對手的工廠主會帶着必要的禮物特意拜訪國民經濟臨時委員會」)，「國有化」 (掠奪，不要以為是國家控制) 的動機是多樣的。Gessen, *Arkhiv russkoi revoliutsii*, VI: 310-1 (Gurovich).
- 100 1918年1月1日，列寧在彼得格勒的天使長米哈伊爾騎術學校 (Archangel Michael Riding Academy) 對穿着五顏六色的衣服、即將開赴前線的「社會主義軍隊」發表演講之後，乘車返回斯莫爾尼。「他們的車剛走了幾碼 (編註：1碼約0.9米)，就遭到來自後面的機槍掃射。」《真理報》後來報道說。車內的瑞士社會主義者弗里茨·普拉滕 (Fritz Platten) ——他是德國人為布爾什維克提供經費的中間人，也是張羅將列寧用鉛封列車送回俄國的組織者——把列寧的頭摀低；據說普拉滕的一隻手被子彈擦破了。*Pravda*, January 3, 1918, January 14, 1925 (由於採用了新的曆法，這一事件的週年紀念日就晚了13天，成了1月14日), January 21, 1926; Zinoviev, "Piat' let," manuscript, RGASPI, f. 324, op. 1, d. 267, l.1-7, 見於 Volkogonov papers, Hoover Institution Archives, container 14; Bonch-Bruevich, *Tri pokusheniie na V. I. Lenina*, 3-77; *Sovetskaia Rossiia*, January 3, 1963; Volkogonov, *Lenin: Life and Legacy*, 229. 要到多年之後，列寧那天發表的講話才得以公開 (《真理報》，1929年1月17日)。還不能確定此次暗殺事件的幕後主使是誰。(右派) 社會革命黨人的報紙最先披露了這一事件，同時暗示這是布爾什維克策劃的，目的是嫁禍於社會革命黨人，但此次暗殺也有可能是右派社會革命黨人策劃，由其他人笨拙地實施的。
- 101 *Iz istorii VChK*, 95-6.
- 102 Rabinowitch, *Bolsheviks in Power*, 97 (引自 GARE, f. 130, op. 2, d. 1098, l. 8), 97 (引自 TsA FSB RF, f. 1, op. 2, d. 25, l. 1: report of Ivan Polukarov).
- 103 就在10月25日政變之後，列寧手下能幹的弗拉基米爾·邦契-布魯耶維奇到瑪麗宮會見了已經停止運轉的臨時政府的秘書長弗拉基米爾·納博科夫 (Vladimir Nabokov, 未來的小說家的父親)，後者曾經協助起草了不光彩的臨時政府成立文件，即米哈伊爾·亞歷山德羅維奇的「退位」宣言。「他像老朋友一樣向我問好，顯得特別禮貌，」納博科夫寫道，並「想讓我相信，即使布爾什維克當局的基礎不比臨時政府的基礎更合法，起碼也是同樣地合法」。Vergil D. Medlin and Steven L. Powers (eds.), *V. D. Nabokov and the Russian Provisional Government 1917*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1976), 170-2. 另見 *Izvestiia*, October 28, 1917: 2.
- 104 列寧起初也想過把選舉延期。Trotsky, *Lenin*, 110. 至於證實選舉會在11月12至14日如期舉行的1917年10月27日的法令，參見 *Dekrety Sovetskoi vlasti*, I: 25-6.

- Dan' proshlomu*, 365. 維什尼亞克 (Vishniak, 生於1883年) 是立憲會議的書記，他勇敢地記下了會議內容；他試圖與布爾什維主義作鬥爭，結果被關進了基輔的監獄，並於1919年移居巴黎。
- 124 Volkogonov, *Lenin: Life and Legacy*, 177–8, 引自 Arkhiv INO OGPU, 17 458, vol. II: 215.
- 125 「我們要召集立憲會議嗎？」負責監督會議的莫伊謝伊·烏里茨基問道。「是的。我們會解散它嗎？也許吧；那要看情況。」Chamberlin, *Russian Revolution*, I: 368.
- 126 Volkogonov, *Trotsky*, 121 (引自 Trotskii, *Sochineniia*, XVII/i: 201). 1917年12月19日，托洛茨基想到，要用「無產階級革命的鐵的壓路機壓碎孟什維主義的脊梁」。那些人不但以前跟托洛茨基是一派，還同為社會民主黨的夥伴。Volkogonov, *Trotsky*, 78.
- 127 拉德基認為，考慮到社會革命黨的軟弱性，立憲會議「本來會自行失敗」。Radkey, *Sickle Under the Hammer*, 466.
- 128 總共或許有1萬人的幾個近衛團保證說，如果要求他們帶着武器參加會議，那他們會照做，但社會革命黨的領導層不想用武力來保衛立憲會議。社會革命黨中央委員會甚至還成立了一個委員會，調查武力保衛立憲會議的事情。B. F. Sokolov, "Zashchita vserossiiskogo uchreditel'nogo sobraniia," 載於 Gessen, *Arkhiv russkoi revoliutsii XIII*: 5–70 (at 41–4), 50, 60–1; Bunyan and Fisher, *Bolshevik Revolution*, 380–4; *Istochnik*, 1995, 1: 25–40; Rabinowitch, *Bolsheviks in Power*, 95 (引自 Sokolov and Bakhmeteff Archive, Zenzinov Collection, SR Central Committee protocols, pp. 18–9). 可是在後來有位社會革命黨人聲稱，「在1月5日那天，沒有動用武力的企圖，不是因為我們不想，而是因為我們沒有實力。」*Pravda*, June 15, 1922 (Likhach). 孟什維克對於布爾什維克的專橫也沒有多少辦法。立憲會議召開前不久，在有大約100名代表參加的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孟什維克代表大會上，尤利·馬爾托夫提出一項決議（它得到多數代表的支持），準確地把布爾什維主義定義為「永久的無政府狀態的體制」。但馬爾托夫自己的立場也很難站得住腳：他敦促孟什維克黨人追求所有社會主義政黨的聯合，這當然也包括與布爾什維克聯合，儘管布爾什維克並打算分享權力，儘管在馬爾托夫自己看來，在目前的歷史階段，真正的社會主義在俄國還行不通。他贊成正在進行中的剝奪資產階級財產的做法，認為工人會設法幫助完成資產階級革命的歷史階段。Burbank, *Intelligentsia and Revolution*, 13–6 (引自 *Novyi luch*, December 3, 1917: 4); Haimson, "The Mensheviks."
- 129 Orlando Figes, *Peasant Russia, Civil War: The Volga Countryside in Revolution 1917–1921* (Oxford: Clarendon, 1989), 40–69.
- 130 1918年1月9日，在莫斯科有多達2,000人舉行了遊行示威活動，至少有30人被踩踏致死或者受到槍擊。*Pravda*, January 22, 1918: 3, 以及 January 24, 1918: 3; Yarkovsky, *It Happened in Moscow*, 267–75; Colton, *Moscow*, 87 (引自 Tsentral'nyi arkhiv obshchestvenno-politicheskoi istorii Moskvy [TsAOPIM], f. 3, op. 1, d. 46, l. 296).
- 131 Vishniak, *Dan' proshlomu*, 289; Gorkii, *Nesvoevremennye mysli I rassuzhdenii*, 110–1; Mal'chevskii, *Vserossiiskoe uchreditel'noe sobranie*, Radkey, *Sickle Under the Hammer*, 386–

- 416; *Novitskaia, Uchreditel'noe sobranie*; Rabinowitch, *Bolsheviks in Power*, 123–5; Bailey, “The Russian Constituent Assembly of 1918”; Avrich, *Anarchist Portraits*, 107–9. 熱列茲尼亞科夫 (Zhelznyakov) 據說參加過「猛攻」冬宮的戰鬥。他在1919年的內戰中被白軍的炮彈打死了，時年24歲。
- 132 列寧寫過兩套關於立憲會議的提綱，一套在會議解散之前，一套在解散之後。GARF, f.130, op. 1, d.7, l. 15–6, Volkogonov papers, Hoover Institution Archives, container 21; *Pravda*, January 12, 1917, 轉載於 *PSS*, XXXV: 162–6 (譯註：參見《列寧全集》第33卷，第163–167頁)。就像列寧和斯維爾德洛夫謀算的那樣，左派社會革命黨人在人民委員會中獲得了幾個次要的委員職位之後，在保衛立憲會議方面明顯變得不那麼堅定了。
- 133 *Keep, Debate on Soviet Power*, 247. 從1917年12月24日到27日，列寧曾短暫地去過附近的芬蘭度假 (斯大林「替人民委員會主席」簽署了12月27日關於將普梯洛夫工廠收歸國有的法令：Volkogonov papers, Hoover Institution Archives, container 14)。不過，列寧不是在休息，而是在忙着寫東西。不管怎樣，參加立憲會議的布爾什維克代表們沒有通知就出現在芬蘭並且找回了列寧。
- 134 一同召開的有兩個全國性的代表大會，一個是農民代表，一個是工人和士兵代表，兩者在1918年1月13日合併在一起。蘇維埃代表大會還重申了「各族人民的直到完全脫離俄羅斯的自決權」。 *Tret'ii vserossiiskii s'ezd sovetov rabochikh, soldatskikh i krest'ianskikh deputatov* (Petrograd, 1918), 73.
- 135 Oldenbourg, *Le coup d'état bolchéviste*, 169–70, 173–4. 當代表大會在第二天通過「和平法令」的時候，列寧重複了他的警告：「戰爭不能用拒絕的辦法來結束，不能由單方面來結束。」(譯註：《列寧全集》第33卷，第12頁) Kotel'nikov, *Vtoroi vserossiiskii s'ezd sovetov*, 62.
- 136 Avdeev, *Revoliutsiia 1917 goda*, IV: 285–6; Kennan, *Russia Leaves the War*, 75–6.
- 137 Bunyan and Fisher, *Bolshevik Revolution*, 268–75.
- 138 *Izvestiia*, November 10, 1917, 譯文見於 Bunyan and Fisher, *Bolshevik Revolution*, 242–4; Iroshnikov, *Sozdanie*, 166–7; *DVP SSSR*, I: 11–4.
- 139 Warth, *The Allies*, 168.
- 140 新的當局與軍隊的關係很怪誕，這被人稱「日內瓦人」(得名於他在革命前的流亡時期)的亞歷山大·伊利英 (Alexander Ilin, 生於1894年) 看了出來——他被任命為新的陸軍人民委員部書記，看到過聖彼得堡莫伊卡運河畔沙皇陸軍部的豪華辦公室：「絲滑的家具，絲滑的壁紙，門窗都有簾幕，各種鏡子，雕花的枝形吊燈和厚厚的地毯，腳踩在上面簡直會陷進去。」伊利英及其布爾什維克官員同事，堅持吃「跟士兵們一樣的白菜湯」，以顯示其權力機構的「民主性質」。同時，伊利英還回憶了克雷連柯在自己的權威沒有得到承認時是怎樣發火的(「他整個的矮小身形讓人感受到一種真正的威嚴」)。不過，這種專橫跋扈並沒有讓伊利英感到不安，儘管日常吃的都是「民主的」菜湯。「我們遇到的是謊言、誹謗還有某種程度上拒絕承認我們的權威。在這種情況下，」伊利英強調說，「保持堅定非常重要。不管怎麼說，只有權威確信自身的能力，並且通過自身的行為來讓人

- 相信這種能力的時候，才會得到承認。」Il'in-Zhenevskii, *Bol'sheviki u vlasti*; Il'in-Zhenevskii, *Bolshciviks in Power*.
- 141 Bunyan and Fisher, *Bolshevik Revolution*, 232–42, 264–8; Spiridovich, *Istoriia bol'shevizma v Rossii*, 406–7; Wildman, *End of the Russian Imperial Army*, II: 380–401. 777
- 142 *Novaia zhizn'*, December 13, 1917; *Russkoe slovo*, December 6, 1917; Bunyan and Fisher, *Bolshevik Revolution*, 267–8; Masaryk, *Making of a State*, 163–4. 杜鶴寧是在1917年11月3日才擔任代理最高總司令的，17天後被殺害。
- 143 Fischer, *Germany's Aims*, 477; Wildman, *End of the Russian Imperial Army*, II: 400–1; *Sovetsko-Germanskii otnosheniia*, I: 108; Niessel, *Le triomphe des bolschéviks*, 187–8.
- 144 *Pravda*, November 15, 1917: 1; Bunyan and Fisher, *Bolshevik Revolution*, 258–9. 另見 *Izvestiia*, December 2–6 and December 9, 1917; 以及 Kamenev, *Bor'ba za mir*. 如果實現了「普遍和平」，德國承諾說會放棄比利時、法國北部、塞爾維亞、羅馬尼亞、波蘭、立陶宛和庫爾蘭。德國想以此來打消協約國繼續戰鬥進而解放這些地區的念頭。但這種承諾是不真誠的。Wheeler-Bennett, *Forgotten Peace*, 136.
- 145 RGASPI, f. 17, op. 109, d. 9, l. 23.
- 146 Buchan, *History of the Great War*, IV: 135. 這幾個師是在1917年底剛從西線調到里加的。Ludendorff, *My War Memoires*, II: 34.
- 147 Freund, *Unholy Alliance*, 3. 拉狄克把自己的奧地利護照一直留到1918年。
- 148 Ottokar, *In the World War* [1920], 246; Wheeler-Bennett, *Forgotten Peace*, 113.
- 149 托洛茨基對此的描述略有不同，參見 *History of the Russian Revolution to Brest-Litovsk*, 5.
- 150 *Sovetsko-germanskii otnosheniia*, I: 194–6.
- 151 米夏埃爾·蓋爾 (Michael Geyer) 令人信服地指出，通過內涵式 (intensively, 比如俄羅斯帝國和德國) 而不是外延式 (extensively, 比如法國和英國，靠的是自己的殖民地以及來自美國的貸款) 的辦法進行動員的社會，所承受的動盪和社會變化是最大的。Geyer, "The Militarization of Europe," 65–102.
- 152 *Izvestiia*, March 2, 1922 (Ioffe).
- 153 *Proceedings of the Brest-Litovsk Peace Conference*, 82; Trotsky, *My Life*, 311, 319–20; Trotsky, *Lenin*, 128.
- 154 Pavliuckenkov, *Krest'ianskii Brest*, 22 (引自 GARF, f. 130, op. 2, d. 11, l. 20: 給人民委員會作報告的是米哈伊爾·邦契—布魯耶維奇，他以前是沙皇軍官，現在負責紅軍總參謀部)。
- 155 *Pravda*, February 24, 1918: 2–3 (1月7日宣佈，列寧的提綱); Bunyan and Fisher, *Bolshevik Revolution*, 500–5; PSS, XXXV: 243–51; Wheeler-Bennett, *Forgotten Peace*, 139. 來自全國各地的布爾什維克黨的官員都在城裏，準備參加即將召開的蘇維埃代表大會，而列寧希望利用他們作為施加壓力的集團，於是就讓近50名省級黨的領導人參加了中央委員會的會議。Debo, *Revolution and Survival* 72–90.
- 156 *Protokoly Tsentral'nogo Komiteta RSDRP (b)*, 171; *The Bolsheviks and the October Revolution: Central Committee Minutes*, 177.



- 157 *Protokoly, Tsentral'nogo Komiteta RSDRP (b)*, 173. 另見 *Sed'moi ekstremnyi s'ezd RKP (b), mart 1918 goda*, xxvi–xxvii; 以及 Krupskaya, *Reminiscences*, 448.
- 158 *PSS*, XXXV: 253–4.
- 159 *Pravda*, January 17 and 18, 1918; *Sochineniia*, IV: 36–7.
- 160 Price, *My Reminiscences*, 224–5.
- 161 *Protokoly Tsentral'nogo Komiteta RSDRP (b)*, 174–80; *The Bolsheviks and the October Revolution: Central Committee Minutes*, 185. 1月13日，布爾什維克中央委員會和左派社會革命黨中央委員會舉行聯席會議，結果大多數人都贊成托洛茨基的辦法——「停止戰爭，不簽和約」(283)。
- 162 Wargelin, “A High Price for Bread.”
- 163 Von Kühlmann, *Erinnerungen*, 531.
- 164 就像霍夫曼解釋的，「困難是暫時的；我們在任何時候都可以用武力支持(拉達)，讓它重新建立起來」。Hoffmann, *War Diaries*, II: 216.
- 165 Fedyshyn, *Germany's Drive to the East*, 65–86.
- 166 Fischer, *Germany's Aims*.
- 167 Ioffe, *Mirnye peregovory v Brest-Litovske*, I: 207–8; *Proceedings of the Brest-Litovsk Peace Conference*, 172–3; Hoffmann, *War Diaries*, II: 218–9; D. G. Fokke, “Na tsene I za kulisami Brestskoi tragikomedii (memuary uchastnika),” 載於 Gessen, *Arkhiv russkoi revoliutsii*, XX: 5–07 (at 207); Wheeler Bennett, *Forgotten Peace*, 227–9; Freund, *Unholy Alliance*, 6; *PSS*, XXII: 555–8.
- 168 Trotsky, *My Life*, 386. 「他多才多藝、有教養而且舉止優雅，心情好的時候很有魅力，」某個學者說起托洛茨基時評論道，「但他的態度通常都是傲慢易怒的，那時他就成了冷冰冰的火。」Wheeler-Bennett, *Forgotten Peace*, 152.
- 169 Il'in-Zhenevskii, *Bolsheviks in Power*, 21–2.
- 170 Ottokar, *In the World War* [1919], 328; Hoffmann, *War Diaries*, II: 219. 由於和烏克蘭單獨締結了和約，奧匈帝國與俄國甚至都不再接壤。(波蘭人脫離了奧地利軍隊體系，開進了烏克蘭以收復「波蘭的」領土。)
- 171 Fischer, *Germany's Aims*, 501–5; *Sovetsko-germanskii otnoshniia*, I: 328.
- 172 Magnes, *Russia and Germany*, 109–123.
- 173 Nowak, *Die Aufzeichnungen*, I: 187 (1918年2月22日的日記).
- 174 Khalid, “Tashkent 1917,” 279.
- 175 Chokaeiv, “Turkestan and the Soviet Regime,” 406.
- 176 Gordienko, *Obrazovanie Turkestanskoi ASSR*, 309–10.
- 177 Khalid, *Politics of Cultural Reform*, 273–4. 該書利用了同時代突厥語報紙的報道，這樣就糾正了薩法羅夫的說法。參見 Safarov, *Kolonial'naia revoliutsiia*, 64.
- 178 *Pobeda oktiabr'skoi revoliutsii*, II: 27.
- 179 Park, *Bolshevism in Turkestan*, 15–22.
- 180 Khalid, *Politics of Cultural Reform*, 277.
- 181 Chokaeiv, “Turkestan and the Soviet Regime,” 408.

- 182 Chaikan, *K istorii Rossiikoi revoliutsii*, 133.
- 183 Alekseenkov, *Kokandskaia avtonomiia*, 58.
- 184 Etherton, *In the Heart of Asia*, 154.
- 185 PSS, XXXV: 245–254; Wheeler-Bennett, *Forgotten Peace*, 217–39.
- 186 *The Bolsheviks and the October Revolution: Central Committee Minutes*, 206; *Protokoly Tsentral'nogo komiteta RSDRP (b)* (Moscow: Politicheskaiia literatura, 1958), 171–2, 199, 202–4, 212–3, 215–7; “Deiatel'nost' Tsentral'nogo komiteta partii v dokumentakh (sobytiia i fakty), *Izvestiia TsK KPSS*, 1989, no. 4: 142–4.
- 187 Trotsky, *My Life*, 382–4; Trotsky, *Lenin*, 106–10. 在1918年3月黨的第七次代表大會上，列寧透露了他和托洛茨基的約定。「當時我們之間曾經約定：德國人不下最後通牒，我們就一直堅持下去，等他們下了最後通牒我們再讓步。」PSS, XXXVI: 30 (譯註：《列寧全集》第34卷，第27頁)；Debo, *Revolution and Survival*, 80.
- 188 *Protokoly Tsentral'nogo komiteta RSDRP (b)*, 204; *The Bolsheviks and the October Revolution: Central Committee Minutes*, 210–1; *Sed' moi ekstrennyi s'ezd RKP (b), mart 1918 goda*, 197–201; PSS, XXXV: 486–7; Deutscher, *Prophet Armed*, 383, 390. 贊成的有列寧、斯大林、斯維爾德洛夫、季諾維也夫、索柯里尼柯夫、斯米爾加和托洛茨基；反對的有越飛、羅莫夫 (Lomov)、布哈林、克列斯廷斯基和捷爾任斯基。
- 189 *Pravda*, February 20, 1918.
- 190 Upton, *Finnish Revolution*, 62–144.
- 191 PSS, XXXVI: 10.
- 192 Wheeler-Bennett, *Forgotten Peace*, 254.
- 193 Trotsky, *My Life*, 333.
- 194 Trotsky, *My Life*[1930], 388–9.
- 195 *Protokoly Tsentral'ngo komiteta RSDRP(b)*, 211–8; *Pravda*, February 24, 1918; *Proceedings of the Brest-Litovsk Peace Conference*, 176–7; Wheeler-Bennett, *Forgotten Peace*, 255–7; Debo, *Revolution and Survival*, 142. 778
- 196 *Protokoly Tsentral'nogo komiteta RSDRP (b)*, 215; *The Bolsheviks and the October Revolution: Central Committee Minutes*, 223; *Pravda*, February 24, 1918; PSS, XXXV: 369–70, 490; Volkogonov, *Stalin: Politicheskii portret*, I: 86; Volkogonov, *Stalin: Triumph and Tragedy*, 36. 投棄權票的還有克列斯廷斯基、捷爾任斯基和越飛。布哈林投了反對票。
- 197 *Pravda*, February 26, 1918: 3.
- 198 PSS, XXXV: 381; Rabinowitch, *Bolsheviks in Power*, 172–8.
- 199 索柯里尼柯夫宣稱：「這次帝國主義分子和軍國主義分子對國際無產階級革命的勝利……只是暫時的和短暫的勝利。」*Proceedings of the Brest-Litovsk Peace Conference*, 180.
- 200 Bunyan and Fisher, *Bolshevik Revolution*, 521–3; Wheeler-Bennett, *Forgotten Peace*, 308.
- 201 Wheeler-Bennett, *Forgotten Peace*, 275–6. 在布爾什維克奪權之前，列寧拒絕討論革命的後果問題，有關這方面的分析參見Kingston-Mann, “Lenin and the Beginnings of Marxist Peasant Revolution.”

- 202 Hahlweg, *Diktatfrieden*, 51; *Novaia zhizn'*, April 30, 1918: 2 (S. Zagorsky).
- 203 Pipes, *Russian Revolution*, 595–7.
- 204 Dohan, “Soviet Foreign Trade in the NEP Economy,” 218.
- 205 有人認為，列寧拋棄諸如左派社會革命黨人之類的布爾什維克的左翼盟友，採取重視對德關係的策略，事實證明是有助於專政的，但是在一開始，重視對德關係差點兒毀掉布爾什維克。Wheeler-Bennett, *Forgotten Peace*, 345–8; Mawdsley, *Russian Civil War*, 39–44.
- 206 *VII ekstrennyi s'ezd RKP (b), mart 1918 goda*, 11–3, 127–9, 133, 176–7; PSS, XXXVI: 1–77. Kin and Sorin, *Sed'moi s'ezd*.
- 207 彼得格勒的工廠也將疏散到內地。Avdeev, *Revoliutsiia 1917 goda*, V: 23, 30–1; *Rabochii put'*, October 6, 1916; Pethybridge, *Spread of the Russian Revolution*, 188; Colton, *Moscow*, 96. 在克倫斯基的計劃中，彼得格勒蘇維埃及其中央執行委員會，還有各級蘇維埃本來就該自己保衛自己，因為嚴格來說，它們是「個人的」而不是政府的機構。Miliukov, “From Nicholas II to Stalin.”
- 208 10月9日，臨時政府宣佈，為了保衛彼得格勒，將把龐大的首都衛戍部隊（近20萬人）中的一半力量部署在通往這座城市的各個通道，結果此舉又招來指責，說這是想把（激進的）衛戍部隊派往前線以扼殺革命。Avdeev, *Revoliutsiia 1917 goda*, V: 52.
- 209 “Iz perepiski E. D. Stasovoi.”
- 210 邦契—布魯耶維奇後來聲稱，此前考慮搬到伏爾加河畔的下諾夫哥羅德是和社會革命黨人控制的鐵路工會（*Vikzhel*）精心策劃的一場騙局。Bonch-Bruевич, *Pereezd Sovetskogo pravitel'stva*. 另見 Malinovskii, “K perezdu TsK RKP (b).” 梁贊諾夫曾認為這與1871年巴黎公社的戰士有相似之處，可那些人是與巴黎城共存亡的。
- 211 Trotsky, *Kak vooruzhalas' revoliutsiia*, I: 105.
- 212 Sidorov, *Revoliutsionnoe dvizheniie*; Krastiņš, *Istoriia Latyšskikh strelko*; Ģērmanis, *Oberst Vāciētis*; “Iz vospominanii glavkorna I. I. Vatsētis.”
- 213 Rabinowitch, *Bolsheviks in Power*, 201 (引自 TsA VME, f. r-342, op. 1, d. 116, l.34–56ob.).
- 214 Mal'kov, *Zapiski komendanta* [1967], 133–5.
- 215 *Izvestiia*, March 17, 1918: 2. 蘇維埃事後批准了「臨時」遷都的計劃。季諾維也夫當時曾反對遷都莫斯科；他之所以主張遷到下諾夫哥羅德，就是因為後者會是臨時的。
- 216 直到1918年6月9日，為了「節約開支」，這個「莫斯科沙皇國」才正式取消。Lenin, *Leninskie dekrety o Moskve*, 62–3; Ignat'ev, *Moskva*, 85–7. 1918年8月，列寧設法取消了這個州（*oblast*）級的人民委員會，並讓加米涅夫作為莫斯科蘇維埃主席坐鎮莫斯科。
- 217 *Istoriia Moskvy*, II: 127.
- 218 大都會飯店成了蘇維埃2號樓；位於莫斯科市中心的神學院作為蘇維埃3號樓，成了各個機構的駐地。沃茲德維任卡大街黨的中央委員會所在的那幢樓稱為蘇維埃4號樓。蘇維埃5號樓是個綜合性的住宅大樓，在舍列梅捷夫大街（後更名為「格拉諾夫斯卡婭大街」）。莫斯科德累斯頓飯店也有一部分成了中央委員會辦公的地方。

- 219 *Krasnaia Moskva*, 347; *Izvestiia*, January 25, 1921: 4; *Narodnoe khoziaistvo*, 1918, no. 11: 11–14 (V. Obolensky-Osinsky).
- 220 1920年12月，契卡把總部搬到盧比揚卡廣場2號的俄羅斯保險公司大樓。Leggett, *The Cheka*, 217–20 (*Spravochnik uchrezdeniia RSFSR*, January 22, 1920, 215–28). 1918年3月搬到莫斯科後沒過幾個星期，契卡就對二十幾個「無政府主義」場所發動了大搜捕，包括著名的里亞布申斯基公館，那是由建築師費奧多爾·舍赫捷利 (Fyodor Shekhtel) 按照現代藝術風格設計的，在那裏，警察並沒有試圖驅散大批的圍觀者——讓群眾們看看契卡吧！*MChK*, 20; Klement'ev, *V Bol'shevistkoi Moskve*, 139.
- 221 Solomon [Isetskii], *Sredi krasnykh vozhdai*, I: 192–4. 格奧爾吉·伊謝茨基 (Georgy Isetskii, 1868–1934)，又名「所羅門」，出生於貴族家庭，跟列寧關係很近。伊謝茨基聲稱他當時開始在米柳京巷他所屬的(糧食)人民委員部大樓裏居住。
- 222 戰後的德國政府，即魏瑪共和國(在魏瑪成立)，把擁有1,200個房間的柏林霍亨索倫宮空着，就是為了避免讓人聯想起君主制和舊的軍國主義政權。後來的希特勒和納粹政權也因為不想讓人聯想起普魯士君主制而沒有進入霍亨索倫宮。
- 223 一個在1918年參加過人民委員會會議的人覺得，在這幢非常大的建築裏，列寧房間下面的兩層缺乏生氣。Bortnevskii and Varustina, "A. A. Borman," I: 115–49 (at 129).
- 224 Mal'kov, *Zapiski*, 116–20; Malkov, *Reminiscences*, 123–4. 在彼得格勒，新政權的官員們徵用過電車。Mal'kov, *Zapiski* [1967], 43.
- 225 Mal'kov, *Zapiski* [1967], 133–5.
- 226 Trotsky, *My Life*, 351–2; Trotskii, *Portrety revoliutsionerov*, 54–5.
- 227 Stanisław Petskowski, "Vospominaniia o rabote v narkomnaste (1917–1919 gg.)," *Proletarskaia revoliutsiia*, 1930, no. 6: 124–31 (at 130).
- 228 Golikov, *Vladimir Il'ich Lenin*, V: 307–8. 官方的材料來源沒有記載斯大林結婚的準確日期，在他的1918年大事記中也沒有提到，參見 *Sochineniia*, IV: 445–56. 斯大林在他後來的人生中只回過彼得格勒三次：1919年彼得格勒受到反布爾什維克武裝威脅的時候；1926年為了顯示徹底打垮了季諾維也夫集團；以及1934年基洛夫被謀殺的時候。McNeal, *Stalin*, 342, n1.
- 229 Alliluyeva, *Twenty Letters*, 104 (致阿利薩·拉德琴科 [Alisa Radchenko]).
- 230 Alliluev, *Khronika odnoi sem'i*, 27.
- 231 RGASPI, f. 558, op. 4, d. 668, l. 18 (E. S. Alliluev, "V Moskve [Vstrecha s t. Stalinym]," 未註明日期的打印文件); Alliluyeva, *Vospominaniia*, 187.
- 232 *Moskovskii Kreml'—tsitadel' Rossii* (Moscow, 2008), 185.
- 233 Trotskii, *Portrety revoliutsionerov*, 54–5.
- 234 Astrov, *Illustrated History*, II: 509.
- 235 V. I. Lenin, "Doklad o ratifikatsii mirnogo dogovora 14 marta." *Pravda*, March 16/17, 1918, 載於 *PSS*, XXXVI: 92–111. 779
- 236 這次代表大會還在1918年3月16日正式批准遷都莫斯科，儘管是在事後。關於代表人數的說法存在衝突：*Izvestiia*, March 17, 1918: 2.

- 237 *Chetvertyi Vserossiiskii s"ezd sovetov rabochikh*, 30–3; Bunyan and Fisher, *Bolshevik Revolution*, 532.
- 238 Warth, *The Allies*, 199–205, 235–41.
- 239 George, *War Memoirs*, II: 1542–3, 1550–1, 1891–2, 1901; Kettle, *Allies and the Russian Collapse*, 172–3. 英國對俄國的干涉讓人想到世界大戰中一次以小博大的嘗試——不幸的達達尼爾海峽戰役。
- 240 並非巧合的是，許多在俄國的英國情報人員之前都去過印度。Occleshaw, *Dances in Deep Shadows*.
- 241 GARF, f. R–130, op. 2, d. 1 (Sovnarkom meeting, April 2, 1918).
- 242 *Protokoly zasedanii Vserossiiskogo*, 263–70 (列寧在1918年5月14日的講話)。
- 243 *Pravda*, March 26, March 27, 1918.
- 244 *Pravda*, April 3, April 4, 1918.
- 245 A. Goldenweiser, “Iz Kievskikh vospominanii (1917–1921 gg.),” 載於 Gessen, *Arkhiv russkoi revoliutsii*, VI: 209–16; N. Mogilianskii, “Tragediia Ukrainy,” 載於 Gessen, *Arkhiv russkoi revoliutsii*, IX: 84–90; Bunyan, *Intervention*, 6–17.
- 246 Bunyan, *Intervention*, 4; Collin Ross, “Doklad . . . o polozhenii del na ukraine,” 載於 Gessen, *Arkhiv russkoi revoliutsii*, I: 288–92; Fedyshyn, *Germany's Drive to the East*, 133–83.
- 247 Martov, “Artileriskaia podgotovka,” *Vpered!*, March 18, 1918.
- 248 *Pravda*, April 1, 1918; *Zaria Rossii*, April 17, 1918.
- 249 RGASPI, f. 558, op. 2, d. 3, l.1–63; op. 2, d. 42. 審判中斯大林的主要辯護人、《真理報》編輯索斯諾夫斯基 (Sosnovky) 後來在大清洗中遇害。
- 250 Hoover Institution Archives, Nicolaevsky Collection, no. 6, box 2, folder 27; Grigorii Aronson, “Stalinskii protsess protiv Martova,” *Sotsialisticheskii vestnik*, 1917–8 (April 28, 1930): 84–9; *Vpered!*, April 14 and April 26, 1918; Wolfe, *Three Who Made a Revolution*, 470–1 (引自對尼古拉耶夫斯基、拉斐爾·阿布拉莫維奇 (Rafael Abramowich) 以及薩穆埃爾·列維塔斯 (Samuel Levitas) 的口頭採訪); Chavichvili, *Révolutionnaires russes à Genève*, 74–91; Trotsky, *Stalin*, 101–10; “Delo Iu. Martova v revoliutsionnyi tribunale,” *Obozrenie*, 1985, no. 15: 45–6, no. 16: 43–6; Kun, *Unknown Portrait*, 81–4. 後來，孟什維克尼古拉耶夫斯基對孟什維克黨人的回憶錄反應過度，錯誤地認為「斯大林在卡莫集團的活動中所起的作用後來被誇大了」。Nikolaevskii, *Tainye stranitsy istorii*, 88. 尼古拉耶夫斯基從幾個格魯吉亞人那裏搜集到的書面證詞出了甚麼問題，依然是個謎。
- 251 Okorokov, *Oktiabr' i krakh russkoi burzuazhnoi pressy*, 275–7.
- 252 這段經歷經常被篡改：Antonov-Ovscenko, *The Time of Stalin*, 3–7.
- 253 N. Rutysh (ed.), “Dnevnik, zapisi, pis'ma generala Alekseeva i vospominaniia ob otse V. M. Alekseevoi-Borel,” 載於 *Grani*, no. 125, 1982: 175–85.
- 254 Lincoln, *Red Victory*, 48 (引自 K. N. Nikolaev, “Moi zhiznennyi put',” 150–1, 載於 Bakhmeteff Archive, Columbia University, K. N. Nikolaev Collection).

- 255 S. M. Paul, "S Kornilovym," in *Beloe delo*, 7 vols. (Berlin: Miednyi vsadnik, 1926–1933), III: 67, 69.
- 256 Lincoln, *Red Victory*, 88 (引自 A. Bogaevskii, "Pervyi kubanskii pokkhod [Ledianoï pokkhod]," 82, 載於 Bakhmeteff Archive, Columbia University); Khan Khadziev, *Velkii boiar* (Belgrade, 1929), 369, 396.
- 257 Denikin, *Ocherki russkoi smuti*, II: 301.
- 258 "Rech' v Moskokskom sovete. . . 23 aprelia 1918 g.," *Pravda*, April 24, 1919; *Izvestiia*, April 24, 1919, 載於 PSS, XXXVI: 232–7.
- 259 Jaszi, *Dissolution*.
- 260 *Rossia v mirovoi voine 1914–1918*, 41.
- 261 Klante, *Von der Wolga zum Amur*, 318; Bradley, *Allied Intervention*, 65–105.
- 262 Fič, *The Bolsheviks and the Czechoslovak Legion*, 206, 242, 262, 307–8, 313. 捷克軍團主要駐紮在烏克蘭。1918年2月，當德奧軍隊入侵烏克蘭時，捷克軍團就退到蘇俄境內。
- 263 1918年3月，鄂木斯克蘇維埃表示，捷克軍團是一支反革命武裝，因而不想接受它：斯大林在1918年3月26日打電報通知他們，這是人民委員會的決定。Bunyan, *Intervention*, 81–2.
- 264 Maksakov and Turunov, *Khronika grazhdanskoi voiny*, 168. 托洛茨基此前收到過一份契卡的電報（1918年5月20–21日），跟捷克斯洛伐克軍團中一個名叫格奧爾吉·武克馬諾維奇（Georgy Vukmanović）的塞爾維亞軍官有關：「我確信，這些部隊的組織具有反革命性質，他們之所以被特別組建起來，是為了派往法國，但與此同時……他們打算把部隊集中在西伯利亞各個火車站的沿線，而一旦日本人發動進攻，他們就會把整個鐵路線掌握在自己手中。」在電報上連署的是捷爾任斯基，並附有一張手寫的便條，表示他對那位塞爾維亞人（「格言家」）以及他聲稱擁護布爾什維主義感到懷疑，但並非完全不屑一顧。RGASPI, f. 17, op. 109, d. 13, l. 1.
- 265 Bunyan, *Intervention*, 86–92.
- 266 Bullock, *Russian Civil War*, 46.
- 267 Bunyan, *Intervention*, 277, n1.
- 268 Stanisław Petskowski, "Vospominaniia o rabote v narkomnaste (1917–1919 gg.)," *Proletarskaia revoliutsiia*, 1930, no. 6: 124–31 (at 130).
- 269 Stalin, "O iuge Rossii," *Pravda*, October 30, 1918. 「在我們面臨的所有困難中，」托洛茨基在6月9日的一次講話中說，「最緊迫的……莫過於糧食問題。」他還舉例說，無數的電報提到了饑餓和斑疹傷寒。Bunyan, *Intervention*, 468; Trotskii, *Kak vooruzhalas' revoliutsiia*, I: 74–86 (at 74).
- 270 Israelin, "Neopravdavshisia prognoz graf Mirbakha."
- 271 *Pravda*, April 27, 1918. 拉狄克在文章中提到「今天莫斯科的所有勞動者用來迎接德國首都代表的那種仇恨」。 *Izvestiia*, April 28, 1918.
- 272 RGASPI, f. 17, op. 109, d. 4, l.10.
- 273 *Izvestiia TsK KPSS*, 1989, no. 4: 143–4.

- 274 *Nashe slovo*, May 15, 1918: 2.
- 275 Drabkina "Dokumenty germanskogo polsa v Moskve Mirbakha," 124; Pipes, *Russian Revolution*, 617, 引自 Winfried Baumgart, *Vierteljahreshefte für Zeitgeschichte*, 16/1 (1968): 80.
- 276 為了強調這一點，斯維爾德洛夫當月又給各個黨組織接連發過幾次通知。 *Pravda*, May 19, May 22, and May 29, 1918; *Perepiska sekretariata TsK RKP (b)*, III: 64, 72–4, 81–3; Sakwa, "The Commune State in Moscow," 443–7; 以及 Hegelsen, "The Origins of the Party-State Monolith."
- 277 *PSS*, L: 88.
- 278 Nicoalevskii, *Tainy stanitsy istorii*, 384–6 (庫爾特·里茨勒的話)。
- 279 Ludendorff, *My War Memories*, II: 658; Bunyan, *Intervention*, 177–9; Denikin, *Ocherki russkoi smuty*, III: 82–3. 魯登道夫在1918年6月9日給帝國總理轉交了一份長篇備忘錄。
- 280 再過不到六個月，就輪到威廉二世倒台了。 Zeman, *Germany and the Revolution in Russia*, 126–7, 137–9. 「投入的錢再多一些，」1918年5月18日，德國國務大臣給駐莫斯科的德國使節(大使)米爾巴赫伯爵寫道，「因為總的來說，要是布爾什維克生存下來，那是合乎我們利益的。」他還說：「如果錢不夠，請電報告知需要多少。如果布爾什維克倒台了，從這裏很難說去支持哪種勢力。」 Zeman, *Germany and the Revolution in Russia*, 128–9.
- 281 Wheeler-Bennet, *Forgotten Peace*, 348–55.
- 780 282 Baumgart, *Deutsche Ostpolitik 1918*, 84.
- 283 即便德國在簽訂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條約之後，還在繼續侵奪從前的沙俄領土(烏克蘭)，列寧仍請求德國國防軍，與他無法控制的紅軍部隊斡旋。 I. I. Vatssetis, *Pamiat'*, 1979, no. 2: 44.
- 284 N. Rozhkov, "Iskliuchenie oppozitsii iz TsIK," *Novaia zhizn'*, June 18, 1918; Drabkina, "Moskva 1918."
- 285 Häfner, *Die Partei der linken Sozialrevolutionäre*; Leont'ev, *Partiia levyykh sotsialistov-revoliutsionerov*. 從1917年11月開始，左派社會革命黨人才成為一個獨立的黨派。
- 286 Makintsian, *Krasnaia kniga VChK*, II: 129–30; Gusev, *Krakh partii levyykh eserov*, 193–4. 契卡那一卷不久就停止發行了；在改革期間它又重新發行(Moscow: Politizdat, 1989).
- 287 Litvin, *Levye esery i VChK*, 69–73 (TsA FSB, d. N–2, t. 2, l. 10). 這部文件彙編是 *Krasnaia kniga VChK* (Makintsian) 的擴充版。
- 288 *Piatyi Vserossiiskii s"ezd soviетov*, 5–37; Rabinowitch, "Maria Spiridonova's 'Last Testament'," 426; Rabinowitch, *Bolsheviks in Power*, 288 (引自 TsA SPb, f. 143, op. 1, d. 224, l. 75).
- 289 Bunyan, *Intervention*, 198, n57.
- 290 *Piatyi vserossiiskii s"ezd sovetov*, 22–3; Bunyan, *Intervention*, 200.
- 291 *Piatyi vserossiiskii s"ezd sovetov*, 50–61; *Izvestiia*, July 5, 1918: 5; Bunyan, *Intervention*, 207–9. 再次採用死刑也激怒了左派社會革命黨人，特別是在一個明顯體現了英雄

主義精神的例子中。當時，仍然完整的波羅的海艦隊駐紮在它的主要基地赫爾辛基，但是在1918年3月，德軍在芬蘭的西南部登陸，因而危及波羅的海艦隊和彼得格勒。英國人擔心德國人奪取波羅的海艦隊，就暗中和托洛茨基商量，擊沉那些艦船。1918年3至4月，艦隊司令阿列克謝·夏斯內 (Alexei Schastny) 用破冰船開路，奇蹟般地把艦隊安全地帶到喀琅施塔得。但托洛茨基錯誤地懷疑夏斯內不願執行他的準備毀掉艦隊的命令。5月，夏斯內辭職。仍不滿意的托洛茨基親自組織審判並讓人把他處死了，捏造的罪名是企圖推翻彼得格勒政府。當時托洛茨基是唯一獲允作證的證人。Rabinowitch, "Dos'e Shchastnogo."

- 292 *Piatyi vserossiiskii s"ezd sovetov*, 73; Bunyan, *Intervention*, 210.
- 293 *Piatyi vserossiiskii s"ezd sovetov*, 63, 69; Gogolevskii, *Dekrety Sovetskoi vlasti o Petrograde*, 171.
- 294 Makintsian, *Krasnaia kniga VChK*, I: 185.
- 295 Makintsian, *Krasnaia kniga VChK*, I: 201–6 (Blyumin), II: 224–33. 另見 *Neizvestnaia Rossiia: XX vek* (Moscow, 1992), II: 55.
- 296 M. Lācis, *Proletarskaia revoliutsiia*, 1926, no. 9: 90.
- 297 Sadoul, *Notes sur la révolution bolchevique*, 305; Lockhart, *British Agent*, 295. 薩杜爾和洛克哈特當時都是目擊者 (譯註: Jacques Sadoul, 法國人, 律師、政治家、第三國際創始人之一; R. H. Bruce Lockhart, 英國外交官兼特工)。
- 298 RGASPI, f. 4, op. 2, d. 527, l. 13 (達尼舍夫斯基 [Danishevsky] 回憶錄).
- 299 Strauss, "Kürt Riezler, 1882–1955"; Thompson, *Eye of the Storm*.
- 300 Erdmann, *Kurt Riezler*, 713–4 (1952年提供的書面證詞); von Bothmer, *Mir Graf Mirbach in Moskau*, 72, 78; Makintsian, *Krasnaia kniga VChK*, I: 196–7; Hilger and Meyer, *Incompatible Allies*, 5–6, 8–9; Jarausch, "Cooperation or Intervention?" 安德烈耶夫1919年死於斑疹傷寒。他們的證件上還有契卡書記克謝諾豐托夫的簽名。
- 301 德國大使館的武官博特默 (Bothmer) 已經趕到大都會飯店的外交人民委員部, 副人民委員列夫·加拉罕從那裏給列寧打了電話。Golikov, *Vladimir Il'ich Lenin*, V: 606.
- 302 Erdmann, *Kurt Riezler*, 715; Baumgart, *Deutsche Ostpolitik 1918*, 228, n71; Chicherin, *Two Years of Soviet Foreign Policy*; Sadoul, *Notes sur la révolution bolchevique*, 405. 有證據表明列寧在弔唁簿上簽了字。
- 303 *Pravda*, July 8, 1918, 轉載於 Dzierzynski, *Izbrannye proizvedeniia*, 111–6 (at 114). 這段引文在隨後的幾個版本中被保留了下來: (Moscow, 1967), I: 265; (Moscow, 1977), I: 176–9.
- 304 「他認為列寧是在暗中做着加米涅夫和季諾維也夫在十月革命中做過的事情,」布爾什維克黨的一次會議記錄了捷爾任斯基說過這樣的話,「我們是無產階級的政黨, 所以應該清楚, 如果我們簽了這份和約, 無產階級是不會跟着我們走的。」*Sed'moi ekstremnyi s"ezd RKP (b): mart 1918 goda*, 245.
- 305 Bonch-Bruevich, *Ubiistvo germanskogo posla Mirbakha I vostanie levykh eserov*, 27. 另見 Spirin, *Krakh odnoi aventiury*, 38. 阿布拉姆·別連基當時和捷爾任斯基一起被扣為人質。



- 306 Makintsian, *Krasnaia kniga VChK*, II: 194.
- 307 Litvin, *Levye esery i VChK*, 97 (Lācis: TsA FSB, d. N-8, t. 9, l. 8); Vladimirova, "Levye esery," 121.
- 308 Steinberg, "The Events of July 1918," 122.
- 309 Paustovskii, *Povest' o zhizni*, I: 422-24. Lockhart, *British Agent*, 294-300.
- 310 Litvin, *Levye esery i VChK*, 211-33 (Shliapnikov: *Za zemliu i voliu*, July 16-19, 1918).
- 311 Steinberg, "The Events of July 1918," 20.
- 312 PSS, L: 114.
- 313 "Pis'mo V. I. Leninu," *Sochineniia*, IV: 118-9; *Pravda*, December 21, 1929; Voroshilov, *Lenin, Stalin, i krasnaia armia*, 43; *Bolshevik*, 1936, no. 2: 74.
- 314 Vatsetis, "Grazhdanskaia voina: 1918 god," 26-7.
- 315 穆拉維約夫起先是在1917年負責彼得格勒的安全工作。接着，他又在1918年2月鎮壓了烏克蘭的拉達，此後便被派往比薩拉比亞。4月，捷爾任斯基讓人逮捕了穆拉維約夫，罪名是搶掠、隨便殺人、給蘇維埃政權抹黑以及勾結莫斯科無政府主義分子。但是在1918年6月13日，大本營任命無所畏懼、無法無天的穆拉維約夫為伏爾加河這一關鍵戰線上親布爾什維克武裝的總司令。在此期間，駐莫斯科的德國大使館官員庫爾特·里茨勒給穆拉維約夫行賄，要他接收捷克斯洛伐克軍團的叛軍。這件事被契卡知道了。左派社會革命黨人在莫斯科發動的叛亂被鎮壓下去之後，7月10日，穆拉維約夫宣佈自己將調轉槍口，向作為「世界帝國主義先鋒」的德國開戰，並邀請他之前的敵人捷克斯洛伐克人加入。他統領着當時最大的一支完整的紅色軍隊，因此，他的背叛可能會導致布爾什維克失去具有重要戰略意義的整個伏爾加河流域及其糧食供應，而這有可能會成為一個轉折點。辛比爾斯克城裏一位年輕的立陶宛工人、布爾什維克約納瓦·瓦雷基斯讓形勢轉危為安。是他誘使穆拉維約夫落入圈套，讓後者在7月11日被槍和刺刀殺死了。（瓦采季斯後來被派往東部解決問題。）Rabinowitch, *Bolsheviks in Power*, 25 (引自 *Izvestiia*, November 2, 1917); Savchenko, *Avantiuristy grazhdanskoi voiny*, 44-64 (at 56); Baumgart, *Deutsche Ostpolitik 1918*, 227; Erdmann, *Kurt Riezler*, 474, 711; Alfons Paquet, 載於 Baumgart, *Von Brest-Litovsk*, 76; Pipes, *Russian Revolution*, 631; *Dekrety sovetskoi vlasti*, III: 9-10; Vladimirova, "Levye esery," 120, 131; Lappo, *Iosif Vareikis*, 13-4; Spirin, *Klassy i partii*, 193-194; Mawdsley, *Russian Civil War*, 56-7.
- 316 Vatsetis, "Grazhdanskaia voina: 1918 god," 16. 許多拉脫維亞部隊都已被派往伏爾加河流域。
- 317 Rabinowitch, *Bolsheviks in Power*, 294 (引自 GARF, f. 130, op. 2, d. 1098, l. 2).
- 318 Vatsetis, "Grazhdanskaia voina: 1918 god," 40-1. 他聲稱戰鬥持續了七個小時，從凌晨5時直到中午，但這種可能性很小。另見 Makintsian, *Krasnaia kniga VChK*, I: 201-4 (Sablin).
- 781 319 Valdis Berzins, "Pervyi glavkomi eo rukopis," *Daugava*, 1980, no. 2-5 (瓦采季斯1919年以後的回憶錄); V. D. Bonch-Bruevich — I. V. Stalinu," *Izvestiia TsK KPSS*, 1989, no. 4: 199-201.

- 320 Leggett, *The Cheka*, 70–83; Steinberg, “The Events of July 1918,” 21–2 (援引拉齊斯的話); Steinberg, *Spiridonova*, 216.
- 321 *Izvestiia*, July 8, 1918. 即便是在這個時候，一位在現場的拉脫維亞指揮員報告說，他的許多同胞還是認為布爾什維克的日子不長了。Swain, “Vatssetis,” 77 (引自拉脫維亞國家檔案館，f. 45, op. 3, d. 11, l. 3).
- 322 D. A. Chudaev, “Bor’ba Komunisticheskoi partii za uprochnenie Sovetskoi vlasti: Razgrom levyykh eserov,” *Uchenye zapiski Moskovskogo oblastnogo pedagogicheskogo instituta*, XXVIII (Moscow, 1953), 177–226. 捷爾任斯基在被釋放的那天(7月7日)辭去了契卡首腦的職務。不同尋常的是，所有報紙都報道了他辭職的消息，而且首都到處都張貼了他辭職的佈告。取代他的，至少在表面上看來，是拉脫維亞人雅科夫·彼得斯，契卡的創始者之一，正是他從左派社會革命黨人控制的戰鬥小分隊手中奪回了盧比揚卡總部。(彼得斯不久之後對一份報紙誇口說，「我根本不像人們想像的那樣嗜血」。)不過，捷爾任斯基在整個夏天仍然留在莫斯科，而他究竟讓出了多少權力，現在還不清楚。他後來在8月22日正式官復原職，又成了契卡首腦。Tsvigun, *V. I. Lenin i VChK [AU: Year of edition needed]*, 69, 83; Bonch-Bruевич, *Vospominaniia o Lenine [1969]*, 316; *Utro Moskvy*, November 4, 1918. 另見La. Peters, “Vospominaniia o rabote v VChK v pervyi god revoliutsii,” *Proletarskaia revoliutsiia*, 1924, no. 10 (33): 5–32. *MChK*, 77–79; Leggett, *The Cheka*, 251. 對於捷爾任斯基辭職一事，過去說得比較含糊，參見Makintian, *Krasnaia kniga VChK* 直到1919年6月，也就是在左派社會革命黨人瓦解差不多一年之後，莫斯科市契卡還為它的最高決策機構——部務委員會證實了兩名前左派社會革命黨分子。*MChK*, 154.
- 323 Blium, *Za kulisami “ministerstva pravdy.”* 34.
- 324 Erdmann, *Kurt Riezler*, 715; *Izvestiia*, July 14, 1918: 4. 波波夫被缺席判處死刑；他要到1921年才被捉住。Litvin, *Levye esery i VChK*, 145–56 (Popov: TsA FSB, d. N-963, l.50–5).
- 325 *Piatyi Vserossiiskii s’ezd sovetov*, 108–28; Trotskii, *Sochineniia*, XVIII/i: 451–76; Trotskii, *Kak vooruzhalas’ revoliutsiia*, I: 266–74. 另見Zinoviev and Trotskii, *O miatazhe levyykh s. r.*; 以及Erde, “Azefi i Azefshchina,” *Izvestiia*, July 9, 1918. 瓦采季斯後來也堅持說左派社會革命黨人是打算發動政變的，只是行動不夠果斷：“Grazhdanskaia voina: 1918 god,” 19.
- 326 Litvin, *Levye esery i VChK*, 99 (Efretov: TsA FSB, D. n-8, t. 1, l. 177); Rabinowitch, *Bolsheviks in Power*, 294, 443, n48, 引自TsA FSB, no. N-8, vol. Ia: 58, 以及RGALI SPb, f. 63, op. 1, d. 4, l. 155 (Proshyan); Vladimirova, “Levye esery, 122–3; PSS, XXIII: 554–6; Makintian, *Krasnaia kniga VChK*, II: 148–55. 普羅相逃過了抓捕，但不久就因為患了斑疹傷寒而死在一所用假證件住進去的外省醫院。列寧為他寫了訃告！Litvin, *Levye esery i VChK*, 14; PSS, XXXVII: 385 (譯註：《列寧全集》第35卷，第379–380頁)。
- 327 Makintian, *Krasnaia kniga VChK*, II: 129–30, 186; Häfner, “The Assassination of Count Mirbach,” *Piatyi vserossiiskii s’ezd sovetov*, 132, 208; *Pravda*, July 9, 1918: 1, 3; *Izvestiia*,

- July 10, 1918: 5. 彼得·斯米多維奇 (Pyotr Smidovich) 當時就意識到它不是政變：*Izvestiia*, July 8, 1918: 5. 左派社會革命黨人後來還 (在 1918 年 7 月 13 日) 暗殺了駐烏克蘭的德軍總司令。
- 328 *Piatyi Vserossiiskii s'ezd sovetov*, 109.
- 329 Leonard Schapiro, *The Origin of the Communist Autocracy: Political Opposition in the Soviet State, First Phase 1917–1922* (London: LSE, [1977]), x.
- 330 Trotsky, *History of the Russian Revolution*, III: 305. 斯皮里多諾娃為左派社會革命黨人的瓦解而自責。Rabinowitch, *Bolsheviks in Power*, 308, 引自 TsA FSB, no. N-685, vol. 6, l. 35ob. (斯皮里多諾娃在獄中給左派社會革命黨第四次代表大會的信); Makintian, *Krasnaia kniga VChK*, 200–1.
- 331 Paquet, *Im kommunistischen Russland*, 26. 另見 Erdmann, *Kurt Riezler*, 467.
- 332 *Znamia truda*, April 19, 1918. 「我們反對戰爭，我們不鼓勵國家重新開戰，」斯皮里多諾娃在 1918 年 6 月的左派社會革命黨第三次代表大會上說，「我們要求撕毀和約。」引自 Vladimirova, “Levye esery,” 113.
- 333 在左派社會革命黨人引發的混亂中，庫爾特·里茨勒打電報給柏林並預言說，「憑藉迅速而無情的行動和良好的組織，布爾什維克將會佔據上風並再次取得成功，除非他們自己的部隊垮掉」。Jarausch, “Cooperation or Intervention?,” 388. 後來在 1937 年斯大林統治時期，斯皮里多諾娃在烏法再次被捕，當時她和其他十幾名左派社會革命黨人一起被流放在那裏。1941 年 9 月，在德國國防軍逼近的時候，內務部的人把她和一大群人槍殺在奧廖爾監獄外面的森林裏。
- 334 布爾什維克、前崩得分子 S. M. 納希姆松 (S. M. Nakhimson) 在 1918 年 6 月 (即他在左派社會革命黨人的雅羅斯拉夫爾暴動中被殺害前一個月) 給黨的書記處的信中說，「所有蘇維埃以及其他機構都只是黨的附屬機關」。納希姆松已於 1918 年 4 月在雅羅斯拉夫爾主持了對孟什維克和左派社會革命黨人的「審判」。D. B. Pavlov, *Bol'shevistskaia diktatura*, 3 (引自 RGASPI, f. 17, op. 4, d. 91, l. 24); I. Rybal'skii, “Iaroslavskii proletariiat na slam'e podsudimyykh,” *Vpered!*, April 25, 1918; G. B. Rabinovich, “Kto sudit iaroslavskikh rabochikh (otkrytoe pis'mo),” *Vpered!*, April 27, 1918.
- 335 Bykov, *Poslednie dni Romanovykh*, 121; Sokolov, *Ubiistvo tsarskoi sem'i*, 266; Smirnoff, *Autour de l'Assassinat des Grand-Ducs*; Crawford and Crawford, *Michael and Natasha [London]*, 356–61; Ioffe, *Revoliutsiia i sud'ba Romanovykh*, chap. 8. 在這起謀殺事件中領頭的是加夫里爾·米亞斯尼科夫 (Gavriil Myasnikov)。他在 1921 年被開除黨籍，在 1923 年因為加入黨的工人反對派而被逮捕。米哈伊爾·羅曼諾夫的兒子格奧爾吉 (布拉索夫伯爵 (Brasov)) 已被暗中帶出俄國；他在 1931 年 21 歲生日前夕死於車禍。1952 年，米哈伊爾的妻子娜塔莉亞·布拉索娃 (Natalia Brasova) 在窮困潦倒中死於巴黎的一家慈善醫院。
- 336 喬治五世擔心，被廢黜的君主來到英國會讓溫莎家族不得人心。Rose, *King George V*, 211–5.

- 337 Pipes, *Russian Revolution*, 745–88; Steinberg and Khrustal'ev, *Fall of the Romanovs*, 169–376.
- 338 Steinberg, *Spiridonova* 195; *Vechernii chas*, January 12, 1918; *Nashe slovo*, April 13, 1918; *Sovetskaia Rossiia*, July 12, 1987, 4 (G. Ioffe).
- 339 Pipes, *Russian Revolution*, 763 (引自托洛茨基的日記〔1935年4月9日〕, Trotsky Archive, Houghton library, Harvard University, bMS/Russ 13, T-3731, p. 110).
- 340 Pipes, *Russia Under the Bolshevik Regime*, 257n (引自 *Chicago Daily News*, June 23, 1920: 2 (援引了亞歷山德拉皇后的日記)). 這本書是在葉卡捷琳堡時從亞歷山德拉的物品中發現的: Sokolov, *Ubiistvo tsarskoi sem'i*, 281.
- 341 關鍵的原始文件以及分析可見於 Steinberg and Khrustal'ev, *Fall of the Romanovs*, 287–93, 310–5, 351–66.
- 342 至今沒有發現列寧或斯維爾德洛夫下達過任何處決的命令。一些二手的報道，這其中最有力的就是托洛茨基日記中記載的內容，暗示是列寧和斯維爾德洛夫給那些兇手下達了命令。Pipes, *Russian Revolution*, 770 (引自托洛茨基的日記〔1935年4月9日〕, Trotsky Archive, Houghton library, Harvard University, bMS/Russ 13, T-3731, p. iii). 就在斯維爾德洛夫向人民委員會匯報此事的當天，當地下達了處死尼古拉二世的命令。GARF, f. R-130, op. 2, d. 2 (Sovnarkom meeting, July 17, 1918). 在歐洲報刊提前報道了處死前沙皇的消息之後，列寧用英文寫了一封電報：「傳言不實，前沙皇是安全的，所有的傳聞都只是資本主義報刊的謊言。列寧。」幾個小時後，尼古拉就被處死了。Pipes, *Unknown Lenin*, 47.
- 343 *Izvestiia*, July 19, 1918; *Pravda*, July 19, 1918; *Dekrety*, III: 22.
- 344 Kokovtsov, *Out of My Past*, 522. 「秩序會得到重建，那些異想天開的社會主義觀念會被消滅，」前沙皇政府總理科科夫佐夫發現自己被帶到基斯洛沃茨克時回憶說，「志願軍正在組建，而且一直有傳聞說，國家即將獲得解放，擺脫布爾什維克的壓迫……根本沒有確切的消息，大家作的是最不可信的猜測，比如說德國人正在向前推進，準備解放基斯洛沃茨克。瑪麗亞·帕夫洛夫娜女大公 (Grand Duchess Maria Pavlovna) 」——亞歷山大二世的二兒媳——「十分認真地告訴我，她期待有列車會來把她接到彼得格勒，為了恢復舊秩序，那裏已經做好一切準備。」Kokovtsov, *Out of My Past*, 496.
- 345 Pipes, *Russian Revolution*, 654–5.
- 346 Chicherin, *Two Years of Soviet Foreign Policy*, 15–17.
- 347 Baumgart, *Deutsche Ostpolitik 1918*, 244; Freund, *Unholy Alliance*, 252–3; Mawdsley, *Russian Civil War*, 42–3.
- 348 *Pamiat'*, 1979, no. 2: 43–4; Erdmann, *Kurt Riezler*, 112–3.
- 349 大約六個月之後就開始了認真調查：白軍抓獲了一名之前的守衛並挖出了許多皇室物品。調查人員中為首的尼古拉·索科洛夫，在密碼專家的幫助下，查明了真相和沙皇全家被殺事件中罕見的殘忍。Sokolov, *Ubiistvo tsarskoi sem'i*, 247–53. 另見 Bulygin, *Murder of the Romanovs*; Mel'gunov, *Sud'ba Imperatora Nikolaia II*; Bruce Lockhart, *British Agent*, 303–4; Radzinsky, *Ubiistvo tsarskoi sem'i*; 以及 Rappaport, *Last Days of the Romanovs*.

- 350 「但是，」列寧讓蔡特金放心，「我們堅信，我們一定能度過這『尋常的』(如在1794年和1849年那樣)革命進程並戰勝資產階級。」*Leninskii sbornik*, XXI: 249 (July 26, 1918).
- 351 Mawdsley, *Russian Civil War*, 49–52. 另見 Fischer, *Soviets in World Affairs*, I: 128 (引自與契切林的交談)。
- 352 Viktor Bortnevski, “White Intelligence and Counter-intelligence during the Russian Civil War,” Carl Beck Papers, no. 1108, 1995, 16–7; Makintsian, *Krasnaia kniga VChK*, II: 120; Bortnevskii and Varustina, “A. A. Borman,” I: 115–49 (at 139).
- 353 Baumgart, *Deutsche Ostpolitik 1918*, 237–8; Pipes, *Russian Revolution*, 656.
- 354 Paquet, *Im kommunistischen Russland*, 54.
- 355 Hoover Institution Archives, Nicolaevsky Collection, 128, box 1, file 9: Karl Helfferich, “Moia Moskovskaia missiia,” 17; Jarausch, “Cooperation or Intervention?,” 392–4; Brovkin, *Mensheviks After October*, 272. 黑爾費里希一在莫斯科待了九天就被外交部召回了。
- 356 Pipes, *Russian Revolution*, 660–1; Helfferich, *Der Weltkrieg*, III: 653; PSS, L: 134–5; Baumgart, *Deutsche Ostpolitik 1918*, 108–10; Erdmann, *Kurt Riezler*, 472n.; G. Chicherin, “Lenin i vneshniaia politika,” *Mirovaia politika v 1924 godu* (Moscow, 1925), 5; Freund, *Unholy Alliance*, 23–4.
- 357 Chicherin, *Vneshniaia politika Sovetskoi Rossii za dva goda*, 5; Pearce, *How Haig Saved Lenin*, 71; Wheeler-Bennett, *Forgotten Peace*, 436.
- 358 *Dokumenty vneshnei politiki*, I: 467; “Geheimzusätze zum Brest-Litovsker Vertrag,” *Europäische Gespräche*, 4 (1926): 148–53; Pipes, *Russian Revolution*, 664–5.
- 359 在這封日期為1918年8月21日、給身在瑞典的瓦茨拉夫·沃羅夫斯基的信中，列寧還虛偽地說，「沒有人要德國人幫忙，但是關於他們，即德國人，會在甚麼時候和以甚麼方式實施計劃，向摩爾曼斯克和阿列克謝耶夫將軍發動攻擊，是在進行協商。」Volkogonov, *Lenin: Life and Legacy*, xxxiii; RGASPI, f. 2, op. 2, d. 122, l. 1.
- 360 Jarausch, “Cooperation or Intervention?,” 394.
- 361 Meijer, *Trotsky Papers*, I: 117. 紅軍於1918年9月初收復喀山。
- 362 Savel'ev, *V pervyi god velikogo oktiabria*, 109.
- 363 Service, *Spies and Commissars*, chapter 9 (引自斯蒂芬·阿利(Stephen Alley)給作者安德魯·庫克(Andrew Cook)的備忘錄)。阿利是在俄國的英國特工，1918年3月返回英國，在那裏，他最終被調到軍情五局。他還被懷疑策劃了謀殺拉斯普京的陰謀。他和高加索方面也有聯繫：在1917年革命之前，他曾經協助修建了黑海的輸油管道。
- 364 Zubov, *F. E. Dzerzhinskii*, 187.
- 365 PSS, XXXVII: 83–5 (*Izvestiia*, September 1, 1918); Bonch-Bruевич, *Pokushenie na Lenina*.
- 366 Kostin, *Vystrel v serdtse revoliutsii*, 84. 代替列寧發表演說的是左翼分子、布里斯特—里托夫斯克條約的反對者V. 奧辛斯基(奧博連斯基)。

- 367 Bonch-Bruевич, *Izbrannye sochinenii*, III: 275–90.
- 368 RGASPI, f. 4, op. 1, d. 91, l.1–3 (收據也在裏面).
- 369 McNeal, *Bride of the Revolution*, 209.
- 370 Bonch-Bruевич, *Tri pokusheniie na V. I. Lenina*, 79–80.
- 371 Gil', *Shest' let s V. I. Leninym*, 23–4.
- 372 Golinkov, *Krushenie antisovetskogo podpol'ia v SSSR*, I: 188–90.
- 373 Orlov, "Mif o Fanni Kaplan," : 70–1; *Fanni Kaplan*; Leskov, *Okhota na vozhdai*, 75. 卡普蘭在彼得斯主持的審訊中招供了。科諾普列娃並未參與，並在1921年加入了共產黨；她在1937年被槍斃。
- 374 *Izvestiia*, August 31, 1918: 1.
- 375 RGASPI, f. 17, op. 109, d. 18, l.3–5 (同時也發給了各前線指揮員：ll. 6–13).
- 376 Trotskii, "O ranenom," 載於 *O Lenine*, 151–6.
- 377 *Izvestiia*, September 4, 1918; Malkov, *Reminiscences*, 177–80; Mal'kov, *Zapiski* [1959], 160; Fischer, *Life of Lenin*, 282. 提到焚燒卡普蘭屍體細節的只有1959年版的《克里姆林宮衛戍司令筆記》。 *Istochnik*, 1993, no. 2: 73.
- 378 由於在蘇俄的遭遇，拉脫維亞步兵在遣返後沒有選擇保衛拉脫維亞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該國是在1919年1月成立，5月被推翻的。Swain, "The Disillusioning."
- 379 Baumgart, *Deutsche Ostpolitik 1918*, 315–6; Pipes, *Russian Revolution*, 661–2.
- 380 Bonch-Bruевич, *Vospominaniia o Lenine* [1965], 376–81.
- 381 PSS, L: 182; Tumarkin, *Lenin Lives!*, 67. 直到1920年5月1日才豎立第一座馬克思的紀念石碑。 *Krasnaia Moskva*, 568–9 (頁間插圖).
- 382 到1922年，更名的街道達到二百多條。Pegov, *Imena moskovskikh ulits*.
- 383 Lev Nikulin, in *Beliaev, Mikhail Kol'tsov*, 162; Dimitriev, *Sovetskii tsirk*, 29; Von Geldern, *Bolshevik Festivals*, 114; *Tsirk*. 1920年，斯坦涅夫斯基返回了他的家鄉波蘭(那時還不是一個獨立的國家)。拉敦斯基很快也步其後塵，但是在1925年，他回到蘇聯並與一名新比姆重建了比姆—博姆組合。
- 384 Zinov'ev, *N. Lenin*, 64.
- 385 Gil', *Shest' let s V. I. Leninym*, 27–8; Tumarkin, *Lenin Lives!*, 90.
- 386 *Dekrety Sovetskoi vlasti*, III: 291–2 (September 5, 1918); Bunyan, *Intervention*, 239.
- 387 *Izvestiia*, September 7, 1918: 3.
- 388 Berberova, *Zheleznaia zhenshchina*, 93. 「白衛軍稍有反抗或動作，就要全部處死，」內務人民委員(彼得羅夫斯基)在一份命令中寫道，「各省的地方執行委員會應當積極行動起來，做好榜樣。」 *Ezhenedel'nik chrezvychainykh komisii po bor'be s kontr-revoliutsiei i spekulatsiei*, September 22, 1918: 11.
- 389 *Izvestiia*, September 3, 1918: 1. 另見 *Krasnaia gazeta*, September 1, 1918.
- 390 Vadin, "Panika," 78–81.
- 391 Chamberlin, *Russian Revolution*, II: 453; Daniels, "The Bolshevik Gamble," 334, 339.

## 第八章 階級鬥爭與黨國

- 1 Peter Struve, "Razmyshleniia o russkoi revoliutsii," *Russkaia mys'*, 1921, no. 1-2: 6 (1919年11月).
- 2 *Protokoly zasedanii Vserossiiskogo*, 80. 另見 Trotskii, "O voennykh kommissarakh" (1918年秋), 載於 *Kak vooruzhalas' revoliutsiia*, I: 183-4.
- 3 Goulder, "Stalinism." 國家建設早已被認為是俄國內戰的一個主要結果, 但對於那種國家的具體特徵的認識卻不是那麼清晰。Moshe Lewin, "The Civil War: Dynamics and legacy," 載於 Koenker, *Party, State, and Society*, 399-423; Moshe Lewin, "The Social Background of Stalinism," 載於 Tucker, *Stalinism*, 111-36 (at 116).
- 4 布爾什維克黨人抱怨他們自己的宣傳工作缺乏成效, 而且只限於城市。Kenez, *Birth of the Propaganda State* 44-9, 53-6.
- 5 Tilly, *Coercion, Capital, and European States*; Tilly, "War Making and State Making as Organized Crime," 169-91.
- 6 有學者說得對:「內戰讓新政權接受了火的洗禮。看上去這正是布爾什維克黨人和列寧想要的那種洗禮。」Sheila Fitzpatrick, "The Civil War," 57-76 (at 74).
- 7 Fitzpatrick, "The Civil War," 57-76.
- 8 *PSS*, XXXVIII: 137-8.
- 9 有學者說得對, 彼得格勒政變「只是在內戰那幾年才變成一場全國範圍的革命」。Pethybridge, *Spread of the Russian Revolution*, 176-180. 另有學者認為,「(革命期間)行使權力的具體形式和方法同『正常』時期的做法區別很大」。確實是這樣, 但是在俄國革命中, 非常時期的統治被永久地制度化了。Kolonitskii, "Anti-Bourgeois Propaganda."
- 10 Holquist, *Making War*. 霍爾奎斯特在另一篇文章中為戰爭、革命及內戰提供了最出色的簡明論述, 他提出了一個很有啟發性的論點, 即俄國作為一個在國內殖民的帝國, 有自己的一套對付叛亂的辦法, 這些辦法是在1905至1907年的暴力事件中以及後來世界大戰的危機中形成的。此外, 他還對馬克思主義思想的關鍵作用提供了高明的論述。Holquist, "Violent Russia."
- 11 Reginald E. Zelnik, "Commentary: Circumstance and Political Will in the Russia Civil War," 載於 Koenker, *Party, State, and Society*, 374-81 (at 379).
- 12 例如, 托洛茨基以蘇維埃中央執行委員會的名義發佈的日期為1917年10月29日的命令: RGASPI, f. 17, op. 109, d. 1, l. 3
- 13 他還說,「每天都有20至35例斑疹傷寒」。Nielsen and Weil, *Russkaia revoliutsiia glazami Petrogradskogo chinovnika*, 46 (1918年3月12日).
- 14 Gerson, *The Secret Police*, 147-8 (引自 *Ezhedel'nik VCheka*, October 13, 1918: 25).
- 15 Raleigh, *Experiencing Russia's Civil War*, 262ff.
- 16 例如德米特里·奧西金 (Dmitry Oskin, 生於1892年)。他是莫斯科正南的工業城市圖拉附近的農民, 1913年自願加入了沙皇軍隊, 在前線由於作戰勇敢而得到過四枚聖格奧爾吉十字勳章, 並在他的上級——一群梅毒患者和懦夫——死亡或傷

- 殘的情況下，在軍隊中一路升遷。奧西金本人也截去了一條腿。整個1917年，他就像廣大群眾一樣，不斷地向左轉，結果到了1918年，他已成為圖拉的「政委」。他保衛「革命」，不惜一切代價打擊「反革命」。在反布爾什維克武裝逼近該城的時候，奧西金急切地實施軍事管制，強迫居民挖戰壕，表現得像暴君一樣。Figs, *A People's Tragedy*, 264–5; Os'kin, *Zapiski soldata*. 奧西金後來升為軍隊的一名高級官員。
- 17 *Pravda*, October 18, 1918: 1 (杜霍夫斯基〔Dukhovskii〕，從契卡分離出來的內務部的官員)。
- 18 Gerson, *The Secret Police*, 195.
- 19 轉引自 Stites, *Revolutionary Dreams*, 39. 伊薩克·施泰因貝格1919年在布爾什維克的監獄裏寫了一本書。他在書中稱革命是「一場大悲劇，在這場悲劇中，英雄和受害者似乎常常都是人民」。Ot fevralia po oktiabr' 1917 g., 128–9.
- 20 McAuley, *Bread and Justice*, 3–6, 427–8.
- 21 有位作家在日記中說：「哪怕是最優秀、最聰明的人，包括學者在內，都開始表現得像在院子外面有條瘋狗一樣。」Prishvin, *Dnevnik*, II: 169 (1918年9月)。
- 22 Holquist, “Information Is the Alpha and Omega”; Brovkin, *Behind the Front Lines*, 5–8, 104–5, 149–55. 另見 Voronovich, *Zelenaiia kniga*. 蘇維埃國家的專家很清楚，世界大戰期間，無論是協約國還是同盟國，各國都有徵糧的做法。Viz. Vishnevskii, *Printsipy*, 65.
- 23 *Novaia zhizn'*, November 2, 1917, 轉載於 Lelevich, *Oktiabr' v stavke*, 147–8.
- 24 列寧在《蘇維埃政權當前的任務》(寫於4月7日，發表於三週後)中提出，要在所有領域都「利用資產階級專家」。PSS, XXXVI: 178. 1920年，為了保證列寧的運行，托洛茨基想在鐵路上設立「政治部」，以取代黨小組，但他的建議未能通過。不過黨小組很快就開始變得與由上級任命的政治部一樣了。
- 25 *Otchet VChK za chetyre gody ee deiatel'nosti*, 82, 274.
- 26 Iu. M. Shashkov, “Model' chislennosti levykh eserov v tsentral'nom apparate VChk v 1918 g.,” *Aktual'nye problem politicheskoi istorii Rossii: tezisy dokladov i soobshchenii* (Briansk, 1992), II: 70.
- 27 *Iz istorii VChK*, 174.
- 28 他還提到契卡是如何「處理一批伏特加存貨的，那些伏特加能讓人在必要的時候鬆口」。Agabekov, *OGPU*, 3, 6–7, 10.
- 29 1918年7月25日，沃洛格達「革命特別司令部」主席(韋托什金〔Vetoshkin〕)向列寧反映，「同志們來的時候常常拿着特別委員會(契卡)的委任狀，這給了他們極其廣泛的權力，打亂了地方契卡的工作安排，有讓契卡成為凌駕於執行委員會之上的政治領導機關的傾向」。他們幹的事情，比如說在財政上搗鬼並逮捕任何妨礙他們的人，被認為損害了蘇維埃政權的名譽。他最後說：「願上帝使我們免遭這些革命性太強的朋友禍害，我們會自己對付敵人。」RGASPI, f. 17, op. 109, d. 13, l. 24–5.
- 30 「唯一心甘情願、堅持不懈地致力於這種『內部防衛』任務的是那些秉性多疑、心懷怨恨、殘酷無情而且有施虐傾向的人，」出生於比利時的俄國僑民家庭、人稱



維克托·謝爾蓋 (Victor Serge) 的維克托·基巴利契奇 (Victor Khibalchich)，對自己 1919 年在彼得格勒觀察到的秘密警察機關特工人員的心理作了分析，「積鬱已久的自卑情結以及對沙皇監獄裏的屈辱和苦難的記憶，讓他們變得難以駕馭，再加上職業性的腐化迅速產生的影響，使得契卡的工作人員總是一些變態的傢伙，習慣於認為陰謀無處不在，而且他們自身也總是生活在陰謀中。」Serge, *Memoirs of a Revolutionary*, 80; Leggett, *The Cheka*, 189.

- 31 Trotsky, *Stalin* [1968], 385.
- 32 Brinkley, *Volunteer Army*; Kenez, *Civil War in South Russia*; Lehovich, *White Against Red*.
- 33 Drujina, "History of the North-West Army," 133.
- 34 Guins, *Sibir'*, II: 368
- 35 Kvakin, *Okrest Kolchaka*, 124, 167–8. 另見 Berk, "The Coup d'État of Admiral Kolchak." 「《消息報》寫了一篇胡說八道的文章，說：『告訴我們，你這個卑鄙的傢伙，他們為此給了你多少錢？』」作家伊萬·蒲寧在日記中寫道，「我流着喜悅的淚水用手在胸前畫了十字。」Bunin, *Cursed Days*, 177 (June 17, 1919).
- 36 復辟作為實際的政治主張在當時仍然是行不通的。在白衛運動的某些軍官當中，可以發現一些擁護君主制的傾向。Ward, *With the "Die-Hards" in Siberia*, 160.
- 37 Kavtaradze, *Voennye spetsialisty*, 21–4.
- 38 Kavtaradze, *Voennye spetsialisty*, 176–7.
- 39 Golovine, *Russian Army*, 278; Kenez, "Changes in the Social Composition of the Officer Corps"; Bushnell, "Tsarist Officer Corps." 1917 年，俄國軍隊中受過教育的列兵差不多都是猶太人。由於受過教育，他們在士兵成立蘇維埃時便脫穎而出。Shklovsky, *Sentimental Journey*, 66–7.
- 40 Shklovsky, *Sentimental Journey*, 8.
- 41 John Erickson, "The Origins of the Red Army," 載於 Pipes, *Revolutionary Russia*, 224–58. 紅軍成立的官方日期後來被定在 1918 年 2 月 23 日，事實上，那只是一次失敗的嘗試。
- 42 Gorodetskii, *Rozhdenie*, 399–401; *Dekrety Sovetskoi vlasti*, II: 334–5.
- 43 Trotskii, "Krasnaia armiiia," 載於 *Kak vooruzhalas' revoliutsiia*, I: 101–22 (1918 年 4 月 22 日, 117–118 頁). 法國社會主義者讓·饒勒斯曾經在 1911 年斷言，民主的軍隊完全可以兼具戰鬥力。Jaurès, *L'Organisation socialiste*.
- 44 *Dekrety Sovetskoi vlasti* II: 63–70.
- 45 Trotsky, *History of the Russian Revolution*, I: 289.
- 46 Golub, "Kogda zhe byl uchrezhden institute voennykh kommissarov Krasnoi Armii?," 157.
- 47 *Rabochaia i Krest'ianskaia krasnaia armiiia i flot*, March 27, 1918; *Pravda*, March 28, 1918. 本章努蒂 (*Bolsheviks and the Red Army*, 29–30) 指出，托洛茨基在其內容廣泛的綱要性著作《革命是怎樣被武裝起來的》(*Kak vooruzhalas' revoliutsiia*) 當中刪掉了這次採訪。
- 48 Trotskii, "Vnutrennye i vneshnye zadachi Sovetskoi vlasti," 載於 *Kak vooruzhalas' revoliutsiia*, I: 46–67 (April 21, 1918: at 63–4).

- 49 V. I. Lenin, "Uderzhat li Bol'sheviki gosudarstvennuiu vlast?," 載於 PSS, XXXIV: 289–39 (at 303–11); Rigby, "Birth of the Central Soviet Bureaucracy." 雖然列寧在革命前大談砸爛國家，比如說他在《國家與革命》(1903)中指責認為「資產階級」國家可以被無產階級接管並利用的觀點是「機會主義的」，但他明確表示，布爾什維克應當設法保留有價值的「資產階級」的專門知識。
- 50 「蘇俄政府，」鄧尼金後來憤憤地說道，「或許會自鳴得意，因為它使用巧計征服了俄國將軍和軍官的意志和頭腦，使他們成為其不太情願但卻聽話的工具。」 Denikin, *Ocherki russkoi smuty*, III: 146.
- 51 *Istoriia grazhdanskoi voiny*, III: 226.
- 52 Kavtaradze, *Voennye spetsialisty*, 175–8, 183–96. 有多少將軍和參謀人員跑到白軍那邊或辭職並移居國外現在還不得而知。沙皇時代的軍官團(25萬)總共有大約70%在紅軍一邊(7.5萬)或白軍一邊(10萬)服役。
- 53 第二次蘇維埃代表大會——正是在此次會議當中宣佈奪權的——在1917年10月的時候已經要求更換政治委員了。Von Hagen, *Soldiers in the Proletarian Dictatorship*, 27. 布爾什維克的政治委員隸屬於人民委員會的全俄軍隊政治委員局，而不是布爾什維克黨(黨在當時還沒有官僚系統)。
- 54 實際上，軍隊的政治部在1919年1月已經取代了黨小組；他們是任命的而不是通過選舉產生的，因而屬於軍事專家的下級。Benvenuti, *Bolsheviks and the Red Army*, 52–64 (引自 *Pravda*, January 10, 1919); Petrov, *Partiinnoe stroitel'stvo*, 58–9.
- 55 *Voенно-revoliutsionnye komitety deistviiushchie armii*, 30–1, 75–6. 另見 Kolesnichenko and Lunin, "Kogda zhe byl uchrezhden institute voennykh kommissarov Krasnoi Armii?," 123–6.
- 56 「政治委員不對純粹軍事的、行動的或作戰的命令負責」，托洛茨基在一份為數很少的、用來解釋政治委員權力的中央指示(只有他一個人的署名)中寫道(1918年4月6日)。只有在覺察到「反革命意圖」的情況下，政治委員才可以阻止指揮員下達的軍事指令。 *Izvestiia*, April 6, 1918, 轉載於 Savko, *Ocherki po istorii partiinykh organiizatsii*, 73–4.
- 57 就像有學者說的，「憑藉審查和連署的權力，黨務工作者實際干預所有指揮事務的正式權利，增加了軍隊中混亂與衝突的可能性」。Colton, "Military Councils," 37, 56.
- 58 Argenbright, "Bolsheviks, Baggers and Railroaders."
- 59 Gill, *Peasants and Government*.
- 60 Lih, *Bread and Authority*, 95–6, 106–8, 95–6. 8月的早些時候，臨時政府曾經非常堅定地說，它不會提高國家收購糧食的價格。Pethybridge, *Spread of the Russian Revolution*, 99 (引自 *Vestnik vremennogo praveitel'stva*, August 5, 1917)
- 61 謝爾蓋·普羅科波維奇 (Sergei Prokopovich), 引自 Holquist, *Making War*, 81.
- 62 Carr, *Bolshevik Revolution*, II: 227–44; Malle, *Economic Organization of War Communism*, 322–6; Perrie, "Food Supply."
- 63 Holquist, *Making War*, 108–9, citing Kondrat'ev, *Rynok khlebov*, 222.

- 64 *Nash vek*, July 10, 1918: 4.
- 65 Mary McAuley, "Bread without the Bourgeoisie," 載於 Koenker, *Party, State, and Society*, 158–79
- 66 *Svoboda Rossii*, April 18, 1918: 5; Bunyan and Fisher, *Bolshevik Revolution*, 666–8.
- 67 Pavliuchenkov, *Krest'ianskii Brest*, 26–9 (引自 RGASPI, f. 158, op. 1, d. 1, l. 10). 瞿魯巴比托洛茨基更老謀深算，後者的特別委員會沒有發揮作用。
- 68 "O razrabotke V. I. Leninyam prodovol'stvennoi politiki 1918 g.," 77.
- 69 Gulevich and Gassanova, "Iz istorii bor'by prodovol'stvennykh otriadov rabochikh za khleb at 104; Lih, *Bread and Authority*, 126–37; Malle, *Economic Organization of War Communism*, 359–61.
- 70 *Protokoly zasedanii VsTsIK*, 47–8.
- 71 有學者認為「軍事上的必要性與意識形態上的激進主義之間的實際關係，恰恰和下面這種假定的因果聯繫相反：內戰的爆發導致有意識地放棄意識形態上的雄心」。這話說得漂亮，但實際情況並不盡然。Lih, "Bolshevik *Razvesrtka*," 684–5.
- 785 72 「現在只有一個辦法，」列寧在 1918 年春表示：「既然有餘糧的人用暴力對付饑餓的窮人，就應該用暴力對付有餘糧的人。」Strizhkov, *Prodovol'stvennye otriady*, 56. 「過去我們奪取地主的土地……和用武力扯下愚蠢的沙皇頭上的皇冠時沒有猶豫過，」托洛茨基大聲說道，「那現在我們在拿走富農的糧食時為甚麼要猶豫呢？」Trotskii, *Kak vooruzhalas' revoliutsiia*, I: 81–2. 另見 Iziumov, *Khleb i revoliutsiia*.
- 73 Figes, *Peasant Russia*.
- 74 Vodolagin, *Krasnyi Tsaritsyn*, 10; Raleigh, "Revolutionary Politics."
- 75 Kakurin, *Kak srazhalas'*, I: 261.
- 76 RGASPI, f. 2, op. 1, d. 6157; Iudin, *Lenin pisal v Tsaritsyn*, 3–12; *Pravda*, May 31, 1918; Genkina, *Tsaritsyn v 1918*, 73 (引自 GARF, f. 1235, op. 53, d. 1, l. 106), 75; Trotsky, *Stalin*, 283. 對斯大林的任命是在他剛剛贏得 1918 年 4 月訴孟什維克領導人尤利·馬爾托夫誹謗案的幾個星期之後。
- 77 RGASPI, f. 17, op. 109, d. 3, l. 5–10 (災難性的 1918 年 5 月 29 日，斯涅薩列夫和諾索維奇提交的 5 月的報告)，轉載於——沒有提到諾索維奇——Goncharov, *Vozvyshenie Stalina*, 361–7 (at 365). 後者是梅利科夫 (Melikov) 《英勇的察里津保衛戰》(*Geroicheskaia oborona Tsaritsyna*) 的重印版，並在附錄中增添了一些文件。另見 RGASPI, f. 17, op. 109, d. 3, l. 17–20 (1918 年 6 月 30 日，斯涅薩列夫提交的報告)；以及 Dobrynin, *Bor'ba s bol'shevizmom na iuge Rossii*, 111.
- 78 *Iz istorii grazhdanskoi voiny v SSSR*, I: 563–4 (引自 K. Ia. Zedin).
- 79 RGASPI, f. 558, op. 4, d. 668, ll. 35–9 (F. S. Alliluev, "Vstrechi s Stalinym").
- 80 *Pravda*, December 21, 1929; Voroshilov, *Lenin, Stalin, i krasnaia armia*, 43; "Pis'mo V. I. Leninu," *Sochineniia*, IV: 118–9.
- 81 *Pravda*, June 11, 1918.
- 82 *Pravda*, January 3, 1935; Genkina, *Tsaritsyn v 1918*, 87–8. 1918 年 5 月，剛剛逃到羅斯托夫的高加索布爾什維克謝爾戈·奧爾忠尼啟則，幫助鎮壓了察里津市內無政

- 府主義者的叛亂；他打電報給列寧說：「大部分決定性的措施都是必要的，但當地的同志太軟弱，每次提出幫忙都被認為是對地方事務的干預。」相比之下，斯大林是強制推行自己的意志。GARE, f. 130, op. 2, d. 26, l. 12; *Sergo Ordzhonikidze, Genkina, Tsaritsyn v 1918*, 59–64. 謝爾蓋·米寧是察里津布爾什維克的高層領導人，他害怕斯大林干預地方事務，但無法違拗斯大林的意志和權威。RGASPI, f. 558, op. 4, d. 668, l. 57 (F. S. Alliluev, “Obed u Minina”).
- 83 Gerson, *The Secret Police*, 139–43 (引自 Denikin Commission reports, U. S. National Archives, Washington, D. C., RG 59, roll 36, frames 0248–0250).
- 84 Bullock, *Russian Civil War*, 36.
- 85 Nevskii, *Doklad ot narodnogo kommissara putei soobshcheniia*. Gerson, *The Secret Police*, 142–3 (引自 U. S. National Archives, Washington, D. C., RG59, roll 36, frames 0248–0250).
- 86 在沙皇政權的統治下，切爾維亞科夫曾因參加政治活動而被聖彼得堡軍事醫學院開除，但他完成了在莫斯科大學法律系(!)的學業，並擔任過他的家鄉頓涅茨克盆地盧甘斯克貿易學校的學監。1918年，他在德國國防軍逼近之前逃出烏克蘭，向東來到察里津，並帶來了一位盧甘斯克的好友，後者成了當地契卡的「偵察員」。http://rakurs.myftp.org/61410.html; Argenbright, “Red Tsaritsyn,” 171. 察里津市的契卡首腦阿爾弗雷德·卡爾洛維奇·博爾曼(Alfred Karlovich Borman)讓人逮捕了切爾維亞科夫的好友伊萬諾夫，之後，切爾維亞科夫又把博爾曼抓了起來，把伊萬諾夫放了。Nevskii, *Doklad ot narodnogo kommissara putei soobshcheniia*, 28.
- 87 Raskol’nikov, *Rasskazy mikhmana Il’ina*, 31–3. 另見 Genkina, “Priezd tov. Stalina v Tsaritsyn,” 82.
- 88 「敵人包括科爾尼洛夫軍隊的殘部、哥薩克和其他反革命部隊，可能還有德國軍隊」，7月10日的一份報告說。RGASPI, f. 17, op. 109, d. 3, l. 23–5 (北高加索地區軍事督查 Z. 紹斯塔克 [Z. Shostak] 的第一手報告)。
- 89 “Pis’mo V. I. Leninu,” *Sochineniia*, IV: 120–1. 斯大林在一封給托洛茨基並抄送列寧的電報(1918年7月11日)中稱斯涅薩列夫是一個「軟弱無力的軍事領導人」，他還問：「難道你們沒有其他人選嗎？」Kvashonkin, *Bol’shevistskoe rukovodstvo*, 42–4 (RGASPI, f. 558, op. 1, d. 1812, l. 1–3). 斯大林向列寧和托洛茨基指出，斯涅薩列夫在前線視察時差點兒被抓起來。他這樣做似乎是替斯涅薩列夫的安危着想，實際上是在表示對他的懷疑。 *Bol’shevistskoe rukovodstvo*, 40–41 (RGASPI, f. 558, op. 1, d. 5404, l. 3). 另見 Kliuev, *Bor’ba za Tsaritsyn*.
- 90 托洛茨基進而同意可以把軍事指揮權交給一個新的軍事委員會。RGASPI, f. 17, op. 109, d. 3, l. 44. 7月18日，斯大林打電報給莫斯科，要求解除斯涅薩列夫的職務。RGASPI, f. 558, op. 1, d. 258, l. 1; Vodolagin, *Krasnyi Tsaritsyn*, 80 (RGVA, f. 6, op. 3, d. 11, l. 92 (1918年7月17日，在察里津形成的決議)。
- 91 Golikov, *Vladimir Il’ich Lenin*, V: 645–6. 原定的人選是斯大林、米寧和「由人民委員斯大林及軍事委員米寧推薦提名的軍事領導人」。那個人最初是 A. N. 卡瓦列夫斯基 (A. N. Kovalevsky)，但是從8月5日開始，就成了伏羅希洛夫。卡瓦列夫斯

基當時被捕了。Golubev, *Direktivy glavnogo komandovaniiai*, 74–5 (RGVA, f. 3, op. 1, d. 90, l. 268–9); RGASPI, f. 17, op. 109, d. 3, l. 14; Goncharov, *Vozvyshenie Stalina*, 391–2 (RGVA, f. 6, op. 4, d. 947, l. 71–71a); Kvashonkin, *Bol'shevistskoe rukovodstvo*, 40–41 (RGASPI, f. 558, op. 1, d. 5404, l. 3: June 22, 1918); Karaeva, *Direktivy komandovaniia frontov*, I: 289–90 (RGVA, f. 6, op. 4, d. 947, l. 71–71a). 共和國革命軍事委員會命令(電報)的日期是7月24日, 發佈該命令似乎和尼古拉·波德沃伊斯基領導的紅軍督察團的現場調查有關。

- 92 7月24日, 列寧在莫斯科用休斯電報機告訴斯大林, 「關於糧食, 應該說, 今天彼得格勒或莫斯科一點都發不出了。情況很糟。請告訴我, 能否採取一些緊急措施, 因為除了你那裏, 再也沒有其他來源了。」但是要運送糧食對斯大林來說很困難。白軍在收緊包圍圈。斯大林乘坐裝甲列車親自出去視察搶修鐵路線的工作。RGASPI, f. 558, op. 4, d. 668, l. 90 (F. S. Alliluev, "T. Stalin na bronepoezde"). 1918年7月26日, 經過對庫班地區的偵察(「以前我們只能得到一些未經證實的情報, 但現在瞭解了實際情況。」), 斯大林認為情況嚴重(「整個北高加索地區、購買的糧食和所有的關稅、千辛萬苦建立起來的軍隊, 都將無可挽回地失去»)並懇求立即派來一個師(這個師被指定派往巴庫)。「我聽候答覆。您的斯大林。」RGASPI, f. 17, op. 109, d. 3, l. 35. 邦契—布魯耶維奇從沃羅涅日派了一些部隊, 又從莫斯科派了一個師, 一直堅持到那個時候。RGASPI, f. 17, op. 109, d. 3, l. 37–8.
- 93 RGASPI, f. 17, op. 109, d. 3, l. 47. 第二台「雷明頓牌」打字機是用手寫加到清單上的。
- 94 Kvashonkin, *Bol'shevistskoe rukovodstvo*, 41, n2; Genkina, *Tsaritsyn v 1918*, 121.
- 95 K. E. Voroshilov, "Avtobiografia," in Gambarov, *Entsiklopedicheskii slovar'*, XLI/1: 96.
- 96 V. Pariiskii and G. Zhavaronkov, "V nemilost' vpavshii," *Sovetskaia kul'tura*, February 23, 1989.
- 97 *Leninskii sbornik*, XVIII: 197–99; *Sochineniia*, IV: 122–6.
- 98 Colton, "Military Councils," 41–50.
- 99 Chernomortsev [Colonel Nosovich], "Krasnyi Tsaritsyn." 沒有說明這封電報的日期。Khmel'kov, *K. E. Voroshilov na Tsaritsynskom fronte*, 64 (10月3日, 斯大林和伏羅希洛夫致列寧、斯維爾德洛夫及托洛茨基)。奧庫洛夫是察里津的南方戰線革命軍事委員會的委員(1918年10–12月); 「考慮到伏羅希洛夫與奧庫洛夫之間極為尖銳的關係」, 列寧把他召回了莫斯科。Volkogonov, *Triumf i tragediia*, I/1: 94 (引自RGASPI, f. 558, op. 1, d. 486).
- 100 Argenbright, "Red Tsaritsyn"; Golikov, *Vladimir Il'ich Lenin*, V: 630, 640; *Iz istorii grazhdanskoi voiny v SSSR*, I: 290; Iudin, *Lenin pisal v Tsaritsyn*, 61–2; *Sochineniia*, IV: 116–7; *Leninskii sbornik*, XXXVIII: 212.
- 101 Argenbright, "Red Tsaritsyn," 165.
- 102 Argenbright, "Red Tsaritsyn," 166 (引自Nevskii, *Doklad ot narodnogo komissara putei soobshcheniia*, 17–18). 交通人民委員(V. I. 涅夫斯基(V. I. Nevskii))報告的附錄, 馬赫羅夫斯基的報告被交給了列寧。

- 103 1918年8月27日，即在柏林與德國簽署附加條約的同一天，列寧命令地方契卡負責人釋放馬赫羅夫斯基和黨外專家阿列克謝耶夫，但契卡答覆說，後者已被槍斃。9月4日，斯維爾德洛夫再次下令釋放馬赫羅夫斯基；他在9月21日被中央燃料供應部的一名前巴庫契卡人員釋放了。Argenbright, "Red Tsaritsyn," 175-6 (引自 Sal'ko, "Kratkii otchet o deiatel'nosti Glavnogo Neftianogo Komiteta"). 1921年5月，馬赫羅夫斯基因為在燃料工業中貪污公款而受審，被判槍斃。該判決後來減為五年監禁。他的妻子（布爾奇娃 [Burtseva]）也被判入獄。Gudok, May 20, 1921.
- 104 察里津契卡在其內部簡報中聲稱逮捕了「大約3,000名紅軍士兵」，但只處死了23名領導人：Izvestiia Tsaritsynskoi gubernskoi chrezvychainoi komissii, October 1918: 16-22, 以及 November 1918: 36, 見於 Hoover Institution Archives, Nicholaevsky collection, series no. 89, box 143, folder 11.
- 105 Magidov, "Kak ia stal redaktorom 'Soldat revoliutsii'," 30.
- 106 Meijer, *Trotsky Papers*, I: 134-7; Trotsky, *Stalin*, 288-9.
- 107 要是察里津落到哥薩克手裏，那就把這條牢船炸沉——顯然是隨後一則傳言的來源：斯大林讓人故意把船弄沉，淹死那些犯人。Chernomortsev [Colonel Nosovich], "Krasnyi Tsaritsyn"; Khrushchev, *Memoirs*, II: 141, n2. *Izvestiia KPSS*, 1989, no. 11: 157, 161-2.
- 108 *Izvestiia Tsaritsynskoi gubernskoi chrezvychainoi komissii*, November 1918: 16, 見於 Hoover Institution Archives, Nicolaevsky Collection, series no. 89, box 143, folder 11; Genkina, *Tsaritsyn v 1918*, 126, 154.
- 109 在當時的一次報紙採訪中，斯大林表揚了「兩個令人高興的現象：第一、在戰線的後方，從工人中提拔了一批行政管理人員，他們不但善於為蘇維埃政權進行宣傳鼓動，而且能根據新的共產主義原則建設國家；第二、出現了一批士兵出身的在帝國主義戰爭中受過實際鍛煉的軍官——新的指揮人員，他們得到紅軍士兵的完全信任。」*Izvestiia*, September 21, 1918 (譯註：《斯大林全集》第4卷，第118頁)；*Sochineniia*, IV: 131.
- 110 這項任命（1918年9月6日）的起因是亞歷山大·葉戈羅夫在1918年8月23日的一份報告，報告講到統一指揮的必要性。Krasnov and Daines, *Neizvestnyi Trotskii*, 72-5.
- 111 Deutchser, *Prophet Armed*, 420. 由於決定成立永久性的常備軍，前沙皇海軍準尉尼古拉·克雷連柯辭去了紅軍最高總司令的職務；他去了司法人民委員部。
- 112 托洛茨基還命令，對於給紅軍立了書面誓言的白軍俘虜，只要把他們的家人扣為人質，就可以派他們上戰場。*Izvestiia*, August 11, 1918; Trotskii, "Prikaz" [August 8, 1932], in *Kak vooruzhalas' revoliutsiia*, I: 232-3. 1918年秋天，有人建議把沿伏爾加河溯流而上的運糧船掛上紅十字會的旗子，以確保它們不會被擊沉，托洛茨基對此勃然大怒。「自作聰明的蠢貨們，」他打電報給列寧說，「以為運送糧食意味着有和解的可能，以為內戰沒有必要。」Volkogonov, *Trotsky*, 125 (引自 RGVA, f. 4, op. 14, d. 7, l. 79).
- 113 Volkogonov, *Stalin: Triumph and Tragedy*, 40.

- 114 Chernomortsev [Black Sea Man], "Krasny Tsaritsyn," 轉載於Nosovich, *Krasnyi Tsaritsyn*. 確認黑海人就是「諾索維奇將軍〔原文如此〕」的是伏羅希洛夫。Voroshilov, *Lenin, Stalin, i krasnaia armia*, 45–7. 諾索維奇斷言，專家阿列克謝耶夫真的在和塞爾維亞軍官一起策劃陰謀，但他們並不十分瞭解。諾索維奇謊稱自己是打入紅色陣營的間諜，並非心甘情願的投敵者（白軍對他仍有疑心）。儘管他說話躲躲閃閃，但還是應該承認，他對世界歷史上最重要的人物之一率先作了準確的描寫。有關白軍對諾索維奇的懷疑，參見Meijer, *Trotsky Papers*, I: 178–9. 蘇聯的著作輕信了諾索維奇的說法：Genkina, *Tsaritsyn v 1918*, 126–7（引用了諾索維奇在1918年12月給鄧尼金的報告）；*Izvestiia TsK KPSS*, 1989, n0, 11: 177 no. 20. 諾索維奇很快就移居法國，活得很長，1968年在尼斯去世。Nosovich, *Zapiski vakhmistra Nosovicha*.
- 115 關於斯大林那時的心情，現在沒有發現任何保留下來的記錄。他、米寧還有伏羅希洛夫在察里津發佈公告說，「脫離白軍、自願放下武器的人不會被處死或受到虐待」——這是政權的政策，但顯然不是察里津的做法。RGASPI, f. 17, op. 109, d. 3, l. 114; *Soldat revoliutsii* (September 1, 1918).
- 116 鄧尼金後來寫道，1917年，瑟京找到他和其他的將軍，建議為了挽救俄羅斯，應該把土地——不管是貴族的、國家的還是教會的——無償交給正在作戰的農民。據說1918年初自殺的卡列金將軍回答道：「完全是蠱惑人心！」Denikin, *Ocherki russkoi smuty*, I: 93.
- 117 Kvashonkin, *Bol'shevistskoe rukovodstvo*, 51 (RGASPI, f. 558, op. 1, d. 5412, l. 2); Khmel'kov, *Stalin v Tsaritsyne*, 50–1; Lipitskii, *Voennaia deiatel'nost' TsK RKP (b)*, 126–9. 對於這些接連不斷的要求——不僅僅是要彈藥，還要槍炮、裝甲車、飛機、飛行員——托洛茨基的答覆總是會提到物資消耗方面的浪費，這說的有可能是實情，但根本解決不了當前的需要。Meijer, *Trotsky Papers*, I: 162; Golubev, *Direktivy glavnogo komandovaniia*, 89–90; *Velikii pokhod K. E. Voroshilova*, 175.
- 118 Volkogonov, *Trotsky*, 262（引自RGVA, f. 33987, op. 2, d. 19, l.16–7）。
- 119 Karaeva, *Direktivy komandovaniia frontov*, I: 345–8 (RGVA, f. 10, op. 1, d. 123, l.29–30); Volkogonov, *Triumfi tragediia*, I/1: 91.
- 120 Kolesnichenko, "K voprosu o konflikte," 44.
- 121 Sverdlov, *Izbrannye porizvedennye*, III: 28.
- 122 RGASPI, f. 17, op. 109, d. 4, l. 60.
- 123 Kvashonkin, *Bol'shevistskoe rukovodstvo*, 52–3 (RGASPI, f. 558, op. 1, d. 5413, l.1–2).
- 124 Knei-Paz, *Social and Political Social Thought*.
- 125 Meijer, *Trotsky Papers*, I: 134–6; Kvashonkin, *Bol'shevistskoe rukovodstvo*, 54, n2 (RGASPI, f. 5, op. 1, d. 2433, l. 33); Trotsky, *My Life*, 443. 托洛茨基的失望超出了斯大林的想像（「請派給我怎麼服從命令的共產黨人」，1918年他從前線打電報給列寧說）。Schapiro, *Communist Party*, 262.
- 126 Kenez, *Civil War in South Russia*, I: 176. 哥薩克首領克拉斯諾夫成立了「頓河共和國」，德國立即予以承認，但鄧尼金指責那是分離主義。當德國在1918年11月

投降時，克拉斯諾夫的軍隊瓦解了；他被迫投奔鄧尼金，但很快又離開南方，加入尤登尼奇的北方武裝，在愛沙尼亞境外作戰。他在1920年代移居西方，後來投靠了納粹。

- 127 RGASPI, f. 17, op. 109, d. 4, l. 64; Volkogonov, *Trotsky*, 132 (引自 RGVA, f. 33987, op. 2, d. 40, l. 29); Kvashonkin, *Bol'shevistskoe rukovodstvo*, 54 (RGASPI, f. 558, op. 1, d. 5414, l. 2-4: Oct. 5, 1918); Meijer, *Trotsky Papers*, I: 134-6. 另見 Trotskii, "Prikaz" [November 4, 1918], 載於 *Kak vooruzhalas' revoliutsiia*, I: 350-1. 托洛茨基後來寫道：「由於管理上的無政府狀態，游擊隊對中央的不尊重……對軍事專家挑釁似的粗魯態度，察里津的氣氛自然無助於贏得後者的好感，並使他們成為政權的忠實僕人。」Trotsky, *Stalin*, 273, 280-1, 288-9.
- 128 RGASPI, f. 17, op. 109, d. 4, l. 68. 托洛茨基在1918年10月5日向斯維爾德洛夫報告說：「昨天我用直通電話通了話，讓伏羅希洛夫擔任察里津集團軍司令員。米寧是在察里津第10集團軍革命軍事蘇維埃之中。我沒有提出斯大林的問題。」RGASPI, f. 17, op. 109, d. 4, l. 67.
- 129 RGASPI, f. 17, op. 109, d. 3, l. 46-7. 另見斯維爾德洛夫給列寧的便條(1918年10月5日)：Sverdlov, *Izbrannye proizvedeniia*, III: 36.
- 130 Golikov, *Vladimir Il'ich Lenin*, VI: 156; Genkina, *Tsaritsyn v 1918*, 183. 那天(1918年10月8日)，斯大林給伏羅希洛夫和米寧打了電報，表示一切都能「悄悄地」解決。Kolesnichenko, "K voprosu o konflikte," 45-6. 列寧認為，對斯大林隱瞞錢是不對的："L. A. Fotievoi i L. V. Krasinu," PSS, L: 187 (1918年10月9日)(譯註：《列寧全集》第48卷，第362頁)。
- 131 Danilevskii, *V. I. Lenin i voprosy voennogo stroitel'stva*, 37-8.
- 132 *Dekrety Sovetskoi vlasti*, V: 663; Trotsky, *Stalin*, 291-2; A. L. Litvin et al., "Grazhdanskaia voina: lomka starykh dogm i stereotipov," in *Istoriki sporiat* (Moscow, 1969), 63; *Iuzhnyi front*, 19.
- 133 RGASPI, f. 17, op. 109, d. 1, l. 20 (October 16, 1919).
- 134 Meijer, *Trotsky Papers*, I: 158-64, 196.
- 135 RGASPI, f. 17, op. 109, d. 4, l. 71; Golubev, *Direktivy glavnogo komandovaniia*, 84-5.
- 136 Trotskii, "Prikaz" [October 5, 1918], in *Kak vooruzhalas' revoliutsiia*, I: 347-8. 當時為了弄到一些補給，尤其是彈藥，就派了一個車隊去莫斯科。10月24日，由兩座工廠的工人組成的一個紅軍團從莫斯科趕來。第二天，莫斯科的中央委員會仔細考慮了斯大林的來信——要求審判阻撓察里津第10集團軍補給工作的南方戰線司令員(瑟京)以及其他(奧庫洛夫)；斯維爾德洛夫對此未予理睬。RGASPI, f. 17, op. 109, d. 4, l. 71, 79, 82; Volkogonov, *Triumfi tragediia*, II: 101. 在莫斯科，列寧在10月23日接待了斯大林，而且他顯然做了調解，由斯維爾德洛夫以列寧的名義給托洛茨基發了電報(譯註：《列寧全集》第48卷，第382-383頁)。Meijer, *Trotsky Papers*, I: 158-60; *Leninskii sbornik*, XXXVII: 106.
- 137 D. P. Zhloba, "Ot nevinnomyskoi do Tsaritsyna," 載於 Bubnov, *Grazhdanskaia voina*, I: 28-34, 32-4; Azovtsev, *Grazhdanskaia voina v SSSR*, I: 229; V. Shtyrliacv, "Geroi



- grazhdanskoi voiny Dmitrii Zhloba,” *Voенно-istoricheskii zhurnal*, 1965, no. 2: 44–6; Sukhorukhov, *XI Armia*, 81, 83–95. 關於軍事局勢，參見瓦采季斯給列寧的報告（1918年8月13日）：RGASPI, f. 17, op. 109, d. 8, l. 51–66.
- 138 P. N. Krasnov, “Velikoe voisko donskoe,” 載於 Gessen, *Arkhiv russkoi revoliutsii*, V: 190–320 (at 244–5).
- 139 *Izvestiia*, October 30, 1918; *Sochineniia*, IV: 146–7. 日洛巴（生於1887年）屬於斯大林通常會喜歡的那種農民出身、無師自通的指揮員。事實上，他是極少數無懼於同這位察里津軍閥爭辯的人之一，而這對於斯大林來說，是比日洛巴作為軍隊領導人很快暴露出的缺陷更為嚴重的罪行。Nosovich, *Krasnyi Tsaritsyn*, 60–1. 1918年結束之前，日洛巴的「鐵軍」被改編成由鮑里斯·杜緬科（Boris Dumenko）指揮的騎兵部隊，日洛巴當時曾密謀取代他的位置。（杜緬科被他自己那邊的人以顯然是捏造的謀殺罪罪名逮捕並處死了。）1920年，在與克里米亞的弗蘭格爾武裝作戰時，日洛巴的紅軍騎兵被包圍。1922年，他辭去在紅軍中的工作。1938年，斯大林讓人處死了日洛巴。
- 140 幾乎就在同時，隱藏在布爾什維克隊伍中的保安處奸細羅曼·馬林諾夫斯基也在1918年10月底以叛變的罪名受到革命法庭的審判。控方查明他向沙皇當局出賣了88位革命者，但被告只對兩人表示悔罪，「我最好的朋友斯維爾德洛夫和柯巴。這是我兩大真正的罪行。」六名法官判處馬林諾夫斯基死刑。11月6日，即奪取政權一週年紀念日的前一天凌晨，他被行刑隊處決。他是布爾什維克隊伍中最早的叛徒。Halfin, *Intimate Enemies*, 7–17, 引自 *Delo provokatora Malinovskogo* (Moscow: Respublika, 1992), 159, 216, 108. 米寧（《真理報》，1919年1月11日）開始把1918年察里津差點兒失守描寫成一場大勝，而這種說法要到斯大林統治時期才流行起來：Voroshilov, *Lenin, Stalin, i krasnaia armia*, 42–8; Melikov, *Geroicheskaia oborona Tsaritsyna*, 138–9; Genkina, “Bor’ba za Tsaritsyn v 1918 godu.”
- 141 關於德國軍方習慣性的高風險賭博，參見Hull, *Absolute Destruction*, 291ff.
- 142 Deist and Feuchtwanger, “Military Collapse of the German Empire.”
- 143 Lieven, “Russia, Europe, and World War I,” 7–47; Jones, “Imperial Russia’s Forces,” I; Pearce, *How Haig Saved Lenin*, 7.
- 144 Koehl, “Prelude to Hitler’s Greater Germany,” 65. 另見Liulevicius, *War Land on the Eastern Front*; Kitchen, *Silent Dictatorship*; Lee, *The Warlords*; 以及Ludendorff, *My War Memories*. 比較一下俄國軍隊1915年對加利西亞的佔領：Vonvon Hagen, *War in a European Borderland*.
- 145 轉引自Denikin, *Ocherki Russkoi smuty*, I: 48–9. 德國海軍總參謀長、海軍上將喬治·馮·米勒（Georg von Müller）在其同時期的日記中大罵興登堡和魯登道夫：「犯了一個又一個錯誤，尤其是在處理與俄國的和平問題時非常草率。俄國的崩潰對我們來說本來是件天大的好事，應該好好利用，以便把部隊調往西線。但我們非但沒有那樣做，反而佔領了拉脫維亞和愛沙尼亞，並與芬蘭糾纏在一起，這些都是過於狂妄自大造成的。」Von Müller, *The Kaiser and His Court*, 398 (September 29, 1918). 無獨有偶，霍夫曼少將後來在提到西線急需但卻被留在東線的部隊時

- 也抱怨說：「我們在東線取得勝利的軍隊受到了布爾什維主義的腐蝕。」Wheeler-Bennet, *Forgotten Peace*, 352 (引自 *Chicago Daily News*, March 13, 1919).
- 146 Wheeler-Bennet, *Forgotten Peace*, 327; Wheeler-Bennett, "The Meaning of Brest-Litovsk Today."
- 147 Geyer, "Insurrectionary Warfare."
- 148 PSS, XXXVII: 150, 164. 1918年11月7日，十月革命一週年紀念日，列寧特意參觀了契卡俱樂部（盧比揚卡街13號）。他的意外到來受到了熱烈的歡迎。第二天，列寧又回到那裏，回答了兩個小時的提問。 *Izvestiia*, 9 November 1918; Vinogradov, *Arkhiv VChK*, 92-3 (citing internal publication); Latsis, *Otchet Vserossiiskoi chrevzyvhanoi kommissi*, 81; *V. I. Lenin v vospominaniakh chekistov*, 111-2. 另見 *Pravda*, December 18, 1927; 以及 PSS, XXXVII: 174.
- 149 1918年11月18日，巴登親王、帝國總理馬克斯 (Max) 宣佈，德皇已在九天前退位。流亡荷蘭的威廉舒舒服服地度過了餘生，並在荷蘭被納粹德國佔領後的1941年6月自然死亡。Hull, *Entourage of Kaiser Wilhelm II*; Clark, *Kaiser Wilhelm II*. 788
- 150 Stevenson, *Cataclysm*, 379-406.
- 151 Wheeler-Bennet, *Forgotten Peace*, 370-1, 450-3.
- 152 「我國無產階級革命同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民主派斷然決裂的時期在歷史上是必需的，」列寧寫道，並且還說，「當局勢迫使小資產階級民主派轉向我們的時候，還一味對他們採取鎮壓和恐怖的策略，那同樣是（至少同樣是）荒唐可笑的。」（譯註：《列寧全集》第35卷，第190頁） *Pravda*, November 21, 1918. 另見 PSS, XXXVII: 207-33 (1918年11月27日的報告).
- 153 Broadberry and Harrison, *Economics of World War I*.
- 154 Bond, *War and Society in Europe*, 83-4.
- 155 Knobler, *Threat of Pandemic Influenza*, 60-1. 在這些估算中，俄國1,500萬，德國1,310萬，法國800萬（差不多佔戰前15至49週歲人口的80%），英國525萬（差不多佔戰前15至49週歲男性人口的一半）加上來自帝國的370萬，奧匈帝國780萬，意大利560萬，美國430萬，奧斯曼帝國290萬，羅馬尼亞75萬，保加利亞120萬。
- 156 陣亡的大概有77.5萬人，另有260萬人負傷，其中死亡多達97萬人。
- 157 大約有18.2萬俄國戰俘死亡。Peter Gatrell, *Russia's First World War*, 255, 259; *Rossia v mirovoi voine 1914-1918 goda*, 4 and 4n; Krivosheev, *Rossia i SSSR*, 101-96. 英、法、德三國總共有130萬人成為戰俘；奧匈帝國成為戰俘的有220萬。
- 158 PSS, XXXVII: 260.
- 159 PSS, XX VI: 16 (1918年3月15日).
- 160 「你們打算做的就是我們正在實行的；你們稱為『共產主義』的我們叫做『國家控制』」，1918年，德國的一名經濟談判代表在柏林對擁有蘇黎世大學經濟學博士學位（並曾陪同列寧一起乘坐由德國提供的鉛封列車從瑞士回到俄國）的布爾什維克、波蘭人梅奇斯拉夫·布龍斯基 (Mieczysław Broński) 說道。 *Trudy i Vserossiiskogo S"ezda Sovetov Narodnogo Khoziastva*, 157. (1882年出生於羅茲的布龍斯基是沃爾夫岡·萊昂哈德 (Wolfgang Leonhard) 的父親。) 魯登道夫接着又創造出

- 「總體戰」這個說法。Honig, "The Idea of Total War," 29–41; Chickering, "Sore Loser," esp. 176–7.
- 161 一名最初來自維爾納/維爾諾(譯註：即現在的立陶宛首都維爾紐斯)的帝俄猶太臣民回憶說：「德國人對待當地人就好像他們是牲口，對主人有用，但甚麼權利也沒有。」這種說法不僅適用於猶太人。在俄國人統治的地方，屠殺猶太人的現象在世界大戰期間和剛結束時是比較普遍的。Abramowicz, *Profiles of a Lost World*, 199; Roshwald, *Ethnic Nationalism*, 122–4.
- 162 Holquist, *Making War*, 205, 285–7.
- 163 Genkina, *Tsaritsyn v 1918*, 202. 第10集團軍是幾支紅軍中唯一一個在南方戰線作戰的。Nadia, *O nekotorykh voprosakh istorii grazhdanskoivoiny* 106–11.
- 164 RGASPI, f. 17, op. 109, d. 4, l. 93. 米寧在黨的第八次代表大會上說，托洛茨基「對我和伏羅希洛夫說：我把你們押到莫斯科去。」(譯註：《蘇聯歷史檔案選編》第4卷，第125頁。) *Izvestiia TsK KPSS*, 1989, no. 9: 153. 米寧很快被調到了內務人民委員部(1918年12月)。瑟京也被調到了莫斯科(11月中旬)。
- 165 RGASPI, f. 17, op. 109, d. 4, l. 117 (1918年12月12日)。
- 166 RGASPI, f. 17, op. 109, d. 14, l. 65, and RGVA, f. 33 987, op. 2, d. 96, l. 10, Volkogonov papers, Hoover Institution Archives, container 17 (庫爾斯克的皮達可夫給克里姆林宮的斯大林的電報，抄送列寧和斯維爾德洛夫); Kvashonkin, *Bol'shevistskoe rukovodstvo*, 75 (RGASPI, f. 17, op. 109, d. 12, l. 70: January 4, 1919).
- 167 對於烏克蘭，托洛茨基別的甚麼人都推薦了，甚至是(他也瞧不起的)莫伊謝伊·魯希莫維奇。結果，伏羅希洛夫和魯希莫維奇兩人都被派到了烏克蘭。多伊徹認為，托洛茨基會感到自責，因為他對於那些喜歡搞陰謀詭計的批評者，尤其是伏羅希洛夫，沒有採取更嚴厲的手段，可事實上托洛茨基是試圖對他們採取更嚴厲的手段的。Deutscher, *Prophet Armed*, 431–2 (未註明出處)。費奧多爾·謝爾蓋耶夫(「阿爾喬姆」)被任命為烏克蘭的政府首腦，代替皮達可夫，他寫信給托洛茨基問了這件事情：RGASPI, f. 17, op. 109, d. 14, l. 78. 費奧多爾·謝爾蓋耶夫1906年遇見了斯大林；他和斯大林(還有娜佳)在察里津曾經住在同一節列車車廂裏。亞歷山大·葉戈羅夫接管了察里津的第10集團軍。
- 168 Deutscher, *Prophet Armed*, 425–6.
- 169 *Pravda*, December 25, 1918.
- 170 Trotskii, "Po nauke ili koe-kak?" [January 10, 1919], 載於 *Kak vooruzhalas' revoliutsiia*, I: 169–73 (at 170–2).
- 171 羅伯特·麥克尼爾認為斯大林設法搞到了一些糧食，完成了對戰爭來說至關重要的任務；他還認為儘管托洛茨基堅持要求解除斯大林的職務，但列寧有點猶豫，而且列寧繼續重用斯大林去處理別的關鍵事務。McNeal, *Stalin*, 55–8. 相比之下，羅伯特·康奎斯特只是指責斯大林不服從命令和以自我為中心。Conquest, *Stalin*, 81, 85.
- 172 Benvenuti, *Bolsheviks and the Red Army*, 89–91. 這三份報告(1919年1月1日、1月13日和1月31日)可見於 *Sochineniia*, IV: 197–224; 以及 *Perepiska sekretariata TsK RKP (b)*, V: 182–3.

- 173 Volkogonov, *Lenin: Life and Legacy*, 230 (引自 RGASPI, f. 2, op. 1, d. 26388, l.1-2); Ul'ianova, *O Lenine i sem'e Ul'ianovykh*, 113-7; Gil', *Shest' let s V. I. Leninym*, 28-34; Malkov, *Reminiscences*, 190-2; "Kak grabili Lenina." 一個很有創意的版本可見於 Radzinsky, *The Last Tsar*, 247 (未註明出處)。這件案子被偵破了，當時，列寧的勞斯萊斯被人發現撞到了莫斯科救世主大教堂附近的牆上，契卡的特工們追蹤車旁雪地上留下的腳印，越過冰封的莫斯科河，把匪首亞什卡·科舍利科夫 (Yashka Koshelkov) 堵在了他的住處。科舍利科夫一夥自革命以來，已經殺害了二十多個民警和契卡人員。「他拼死抵抗，」克里姆林宮衛戍司令彼得·馬爾科夫後來寫道，「結果到他打光了毛瑟槍裏的子彈，無以為繼的時候才被抓住。」Mal'kov, *Zapiski*, 159。自從1918年8月發生了未遂的暗殺事件，就給列寧派了一支17人輪流值班的衛隊，但他不喜歡衛兵，所以那天只帶了一個。參加過未遂暗殺後的審訊工作的阿布拉姆·別連基是列寧的衛士長 (從1918年10月開始)，但他那天沒跟列寧在一起。據第13集團軍政治部1919年11月的報告，當時估計有12名特務被派來暗殺列寧：GARE, f.3, op. 22, d. 306, l. 4, Volkogonov papers, Hoover Institution Archives, container 21。
- 174 1919年的1,320億金馬克大約相當於2013年的4,420億美元 (2,840億英鎊)。德國人在1924年和1929年兩次為減少賠款金額進行了談判。1933年，希特勒單方面暫停支付賠款。2010年，德國終於還完了這筆錢。總的來說，考慮到通貨膨脹的因素，德國給英國和法國的賠款要少於法國在輸掉普法戰爭 (1870-1871) 後給德國的賠款。
- 175 MacMillan, *Paris 1919*。哈羅德·尼科爾森 (Harold Nicolson) 在《締造和平》 (*Peacemaking*) 中描寫了一群他無法理解的老人 (最後一章的標題是「失敗」)。
- 176 Steiner, *The Lights that Failed*, 772。
- 177 在一段很有代表性的話中，英國駐法大使在1916年4月的日記中寫道：「雖然俄國人每消滅一個德國人就有可能要犧牲掉兩個人，但俄國有足夠多的士兵去承受不成比例的損失。」轉引自 Karliner, "Angliia i Petrogradskaia konferentsiia Antany 1917 goda," 329。
- 178 Neilson, *Strategy and Supply*。
- 179 Thompson, *Russia, Bolshevism and the Versailles Peace*, 398。
- 180 Thompson, *Russia, Bolshevism and the Versailles Peace*, 310, 395。
- 181 約翰·梅納德·凱恩斯反對凡爾賽條約的一個理由是，被拋棄的德國和被拋棄的俄國有可能互相擁抱在一起；列寧留意到凱恩斯的看法並表示讚許。凱恩斯還警告說，德國有可能走向左傾。Keynes, *Economic Consequences*, 288-9; PSS, XLII: 67, 69, XLIV: 294-5。
- 182 薩杜爾津津有味地回憶說，「從頭至尾，代表們的情緒都非常高漲」，並指出，「列寧不斷發出洪亮的笑聲——這讓他的雙肩和肚子抖動起來——那是丹東或饒勒斯那樣的人發出的驕傲、威嚴的笑聲；托洛茨基犀利的嘲諷；布哈林惡作劇般的打趣；契切林挖苦人的幽默。這些俄國人高興起來的樣子各異其趣，又混入了幾個喝了啤酒吵吵鬧鬧、興高采烈的人——(弗里茨·) 普拉滕、(胡戈

- (Hugo)·埃伯萊因(Eberlein)、格魯貝爾(Gruber)〔·卡爾·施泰因哈特(Karl Steinhardt)〕的快活以及〔克里斯托·〕拉柯夫斯基的風趣，他更像是巴黎人而不是羅馬尼亞人〕(拉柯夫斯基是保加利亞人)。Sadoul, "La Fondation de la Troisième international," at 180. 另見Ransome, *Russia in 1919*, 215, 217.
- 183 Vatlin, *Komitern*, 57 (RGASPI, f. 488, op. 1, d. 13, l.13-9).
- 184 "Rozhdenie tret'ego internatsionala," *Pravda*, March 7, 1919 (Osinsky).
- 185 *Pravda*, March 6, 1919, 轉載於Trotskii, *Piat' let Komintern*, II: 28-30.
- 186 Riddell, *Founding the Communist International*, 8.
- 187 Schurer, "Radek and the German Revolution."
- 188 代表們還通過了托洛茨基闡述資本主義的墮落和共產主義的穩步發展的宣言。*Pervyi kongress Komintern*, esp. 250-1 (代表名單); Riddell, *Founding the Communist International*, esp. 18-9; Carr, *Russian Revolution*, 14.
- 189 關於重物造成的創傷，阿爾卡季·瓦克斯貝格(Arkadii Vaksberg)提供了一種不同的說法，說它是由斯維爾德洛夫的猶太血統引起的。Vaksberg, *Iz ada*, (引自RGASPI, f. 5, op. 1, d. 2159, l. 36-7).
- 190 托洛茨基，1925年3月13日，轉載於Iakov Mikhailovich Sverdlov (1926). *Fourth International*, 7/11 (1946): 327-30. 列寧在3月11日乘火車去彼得格勒參加了M.T. 葉利扎羅夫(M. T. Yelizarov; 譯註：1863-1919，列寧姐姐安娜的丈夫，蘇俄第一任交通人民委員)的葬禮，3月14日返回。
- 191 *Izvestia TsK KPSS*, 1989, no. 8: 164.
- 192 "VIII s"ezd RKP(b), 18-23 marta 1919g." 載於PSS, XXXVIII: 127-215 (列寧在代表大會上作了十次發言)。兩年後，在1921年黨的第十次代表大會上，克利斯廷斯基起身紀念斯維爾德洛夫，並在起立的全體代表面前回憶了他的重要貢獻。*X s"ezd* [1921], 267-70; *X s"ezd* [1933], 499-504.
- 193 蘇維埃俄國在大約40個省級黨組織中擁有8,000個黨委，黨員總數為220,495人。紅軍中的黨組織宣稱有29,706名黨員。另外，芬蘭、立陶宛、拉脫維亞、白俄羅斯和波蘭的黨組織也有63,565名黨員。*VIII s"ezd RKP (b)* [1959], 274. See also *Istoriia grazhdanskoi voyny*, III: 312-3 (Stasova).
- 194 另外，7%是拉脫維亞人，4%是烏克蘭人，3%是波蘭人，*VIII s"ezd RKP (b)* [1959], 451. 在1920年黨的第九次代表大會上，在五百多名與會者當中，除了俄羅斯人的比例上升到70%而猶太人的減少到14.5%外，這些數字幾乎沒有變化：*IX s"ezd RKP (b)*, 551. 關於猶太人問題，參見Pipes, *Russia Under the Bolshevik Regime*, 99-114.
- 195 倫敦的《泰晤士報》(1919年3月5日)宣稱，猶太人佔據了75%的高級職務。Medvedev, *Let History Judge*, 560; Trotsky, *History of the Russian Revolution*, I: 225-6.
- 196 大會的會議記錄公佈過三次(1919、1933、1959)，但每一次都不完整；它們都略去了3月20至21日單獨召開的軍事會議。不過，列寧在3月21日最後一次軍事會議上的講話被公佈了(*Leninskii sbornik*, XXXVII: 135-40) (譯註：參見《列寧全集》第36卷，第170-176頁)。斯大林講話的幾個片段也是在很久以後公佈的

- (Sochineniia, IV: 249–50). 另見 Benvenuti, *Bolsheviks and the Red Army*, 106. 軍事問題的討論最終是在「開放」時期公開的：*Izvestiia TsK KPSS*, 1989, no. 9: 134–90, no. 10: 171–89, no. 11: 144–78.
- 197 PSS, XXXVIII: 137–8.
- 198 Aralov, *Lenin vel nas k pobede*, 96–7. 阿拉洛夫是共和國革命軍事委員會委員。
- 199 托洛茨基寫道，在代表大會召開前夕，關於沙皇軍官叛變的流言四起，壓力之下，托洛茨基告訴列寧說，在紅軍中服役的前沙皇軍官至少有3萬人，叛變的比例相對來說是相當小的。據說列寧顯得十分驚訝。（他可能是假裝驚訝。）Deutscher, *Prophet Armed*, 429–30. Lenin, *Sobranie sochinenii [1920–26]*, XVI: 73.
- 200 Trotskii, *Sochineniia*, XVII/i: 362.
- 201 *Pravda and Izvestiia*, February 25, 1919, 轉載於 *Izvestiia TsK KPSS*, 1989, no. 9: 175–81. 軍事反對派包括斯米爾諾夫、格奧爾吉·薩法羅夫（沃爾金）、格里戈里·「尤利」·皮達可夫、安德烈·布勃諾夫、葉梅利揚·雅羅斯拉夫斯基、弗·戈·索凌、伏羅希洛夫、謝爾蓋·米寧、菲利普爾·戈洛曉金、亞歷山大·米雅斯尼科夫、N. G. 托爾馬喬夫、R. S. 薩莫伊洛娃（捷姆利亞奇卡）等人。
- 202 *Izvestiia TsK KPSS*, 1989, no. 8: 171–3.
- 203 有些人指出，解決問題的辦法是培養年輕的紅軍指揮員，但察里津的謝爾蓋·米寧反對說，白衛分子——指為紅軍服務的前沙皇軍官——壓制了年輕的無產階級指揮員。相反，莫斯科的革命軍事委員會委員謝苗·阿拉洛夫提出了反對意見：「不論哪個方面——供應、技術裝備、通訊、炮兵、浮橋和橋樑的修建——到處都需要專家，可是我們卻缺少專家。」（譯註：《蘇聯歷史檔案選編》第4卷，第125、173頁）*Izvestiia TsK KPSS*, 1989, no. 9: 153, 1989, no. 10: 183–9, 1989, no. 11: 156–9, 159–66; Danilevskii, *V. I. Lenin i voprosy voennogo stroitel'stva*, 76.
- 204 Pokrovskii and Iakovlev, *Gusdarstvennoe soveshchanie*, 61–6.
- 205 *Izvestiia TsK KPSS*, 1989, no. 11: 162–4.
- 206 托洛茨基也認為，農民自身的利益一旦得到保障，他們就會背叛革命。Meyer, *Leninism*, 142. 關於俄國社會民主黨對農民抱有的幾乎是普遍的敵意，參見 Deutscher, *Unfinished Revolution*, 17.
- 207 Aralov, *Lenin vel nas k pobede*, 101–2.
- 208 1919年8月，列寧指示突厥斯坦方面軍司令米哈伊爾·伏龍芝：「如果哥薩克放火燒毀石油，就把他們全部都消滅掉。」Pipes, *Unknown Lenin*, 69. 關於列寧的冷酷，另見 *Proletarskaia revoliutsiia*, 1924, no. 3: 168–9; 另見於 Pipes, *Unknown Lenin*, 50.
- 209 *Izvestiia TsK KPSS*, 1989, no. 11: 170; *Leninskii sbornik*, XXX: 138–9.
- 210 Danilevskii, *V. I. Lenin i voprosy voennogo stroitel'stva*, 88. 有些支持托洛茨基和索柯里尼柯夫立場的代表在格里戈里·葉夫多基莫夫發言後退出了會場。
- 211 *VIII s'ezd RKP (b) [AU: Please provide pub year]*, 273, 339–40, 412–23.
- 212 *Izvestiia TsK KPSS*, 1989, no. 9: 173.
- 213 季諾維也夫在大會發言中把托洛茨基當作一個有助於提升自己關注度的誘人的大靶子，予以猛烈的批評，而正是他打電報給托洛茨基說對軍事反對派已經做出讓

步，並囑咐托洛茨基要把這當作是一個「警告」。在（1919年3月29日的）一次對其手下的列寧格勒黨組織的講話中，季諾維也夫暗示說，托洛茨基需要明白，黨在軍隊中要發揮更大作用，因為「軍事專家」是不能信任的。*Izvestiia TsK KPSS*, 1989, no. 8: 185–98 (at 192–5).

- 214 *Pravda*, March 1, 1919; Benvenuti, *Bolsheviks and the Red Army*, 72–4.
- 215 *VIII s"ezd RKP (b)* [1959], 177. 關於缺糧問題，另見 Brovkin, “Workers’ Unrest.”
- 216 關於軍隊分到的份額（全部麵粉中的25%，草料的40%），參見 Osinskii, “Glavnyi nedostatok,” 236.
- 217 *Piat' let vlasti Sovetov*, 377; Malle, *Economic Organization of War Communism*, 407, 425.
- 218 Scheibert, *Lenin an der Macht*.
- 219 *Krasnaia Moskva*, 54. 過去由臨時政府開始採取的配給制此時是以階級為基礎的：從事重體力勞動的勞動者屬於最上層，其次是不從事體力勞動的勞動者（這其中包括官員），最後是非勞動人口或剝削分子，也就是那些依靠他人勞動為生的人（即資產階級），他們人數不多，但很有象徵意義。個人暗中提高自己的指標。在內戰結束前，「勞動口糧」——或者說領口糧的人最近付出了多少勞動——取代了「階級口糧」。
- 220 Borrero, *Hungry Moscow*. (1919年底之前，) 土豆是唯一沒有被政府宣佈壟斷的重要農作物。
- 221 Emmons, *Time of Troubles*, 237 (January 31, 1919), 392 (December 6, 1920).
- 222 *VIII s"ezd RKP (b)* [1933], 170.
- 223 *Istoriia grazhdanskoi voiny*, IV: 46.
- 224 弗朗切斯科·本韋努蒂表明了最初對托洛茨基的敵意有多麼深刻和寬泛。他寫道：「對於為創建蘇維埃武裝力量所作的貢獻，托洛茨基得到的回報是黨內許多同志的不信任和仇恨。」Benvenuti, *Bolsheviks and the Red Army*, 216.
- 225 Schapiro, *Communist Party*, 引自 Lenin, *Sochineniia*, XXV: 112.
- 226 到了1918年12月，政治局已經在運轉了；組織局是從1919年1月開始的。Golikov, *Vladimir Il'ich Lenin*, VI: 284, 319, 328, 435, 577, 588.
- 227 斯維爾德洛夫的保險櫃直到1935年才打開，並及時向斯大林作了匯報：“Kuda khotel bezhat' Sverdlov?,” *Istochnik*, 1994, no. 1: 3–4. 1919年，曾經有傳言說，布爾什維克正在把錢和黃金向國外轉移，似乎是為可能的逃跑做準備。Stasova, *Stranitsy zhizni i bor'by*, 103. 鮑里斯·巴扎諾夫聲稱，內戰時期，沒收的寶石都被秘密存放，以備萬一，而斯維爾德洛夫的遺孀克拉芙季婭·諾夫哥羅采娃 (Klavdiya Novgorodtseva) 是那些受託保管珠寶的人之一。她把珠寶鎖在辦公桌裏，其中有一些大鑽石，顯然是從國家鑽石收藏中心拿走的。Bazhanov, *Vospominaniia* [1990], 96.
- 228 Carsten, *Revolution in Central Europe*.
- 229 Nettl, *Rosa Luxemburg*.
- 230 Luxemburg, *Die russische Revolution*, 109.
- 231 Weitz, *Creating German Communism*, 93.

- 232 *Pravda*, April 22, 1930.
- 233 Mitchell, *Revolution in Bavaria*; Waite, *Vanguard of Nazism*.
- 234 Weitz, *Weimar Germany*; Mawdsley, *Russian Civil War*, 15.
- 235 Hoover Institution Archives, T. T. C. Gregory Papers, box 2: Hungarian Political Dossier, vol. 1: Alonzo Taylor to Herbert Hoover, March 26, 1919.
- 236 Degras, *The Communist International*, I: 52.
- 237 1919年2月2日和4月19日庫恩的電報：RGASPI, f. 17, op. 109, d. 46, l.1-2; 托洛茨基給Kh. G. 拉科夫斯基、N. I. 波德沃伊斯基和V. A. 安東諾夫—奧弗申柯的電報：RGASPI, f. 325, op. 1, d. 404, l. 86 (1919年4月18日); 列寧給S. I. 阿拉洛夫和J. 瓦采季斯的電報：I. 92 (1919年4月21日); J. 瓦采季斯和S. I. 阿拉洛夫給V. A. 安東諾夫—奧弗申柯的電報，op. 109, d. 46, l.3-5 (1919年4月23日)。
- 238 Mitchell, *1919: Red Mirage*, 221 (引用的是《曼徹斯特衛報》記者的話，未註明出處)。
- 239 Tokés, *Béla Kun*; Janos and Slottman, *Revolution in Perspective*.
- 240 Viktor Bortnevskii, "White Intelligence and Counter-Intelligence during the Russian Civil War," Carl Beck papers, no. 1108, 1995; Kenez, *Civil War in South Russia*, I: 65-78; Holquist, "Anti-Soviet *Svodki*."
- 241 Bortnevskii, "White Administration," 360 (引自N. M. Melnikov, "Pochemu belye na luge Rossiin e pobedili krasnykh?," 29, 載於N. M. Melnikov Collection, Bakhmetev Archives, Columbia University).
- 242 Mawdsley, *Russian Civil War*, 275-81.
- 243 Baron, *The Russian Jew*, 219.
- 244 引文和數據見於Budnitskii, *Rossiiskie evrei mezhdru krasnymi*, 275-6。反猶主義有利有弊，既吸引了一些追隨者（尤其是在烏克蘭），也引起了一些追隨者的反感。Kenez, "The Ideology of the White Movement," 83.
- 245 Kenez, *Civil War in South Russia*, I: 281-4; Filat'ev, *Katastrofa Belogo dvizheniia*, 144.
- 246 鄧尼金和高爾察克之間互通信息要花一個月時間。Denikin, *Ocherki russkoi smuty*, V: 85-90.
- 247 Kenez, *Civil War in South Russia*, II: xiii. 仍然住在各協約國首都的前沙皇外交官們——謝爾蓋·薩佐諾夫（巴黎）、鮑里斯·巴赫梅捷夫（華盛頓）、瓦西里·馬克拉科夫（倫敦）——把以前臨時政府帳上的資金轉給了白軍，雖然那些外交官認為反布爾什維克分子無能。
- 248 Erickson, *Soviet High Command*, 59-63.
- 249 Kenez, *Civil War in South Russia*, I: 90.
- 250 另見斯米爾加1919年10月給列寧和托洛茨基的關於挽救察里津戰線的電報：RGASPI, f. 17, op. 109, d. 3, l. 48-50.
- 251 Lincoln, *Red Victory*, 217 (引自"Rech' generala Denikina v Tsaritsyne, 20 iunია 1919 g.," Bakhmeteff Arkhive, Denikin Collection, box 20); Denikin, *Ocherki russkoi smuty*, V: 108-9; Piontkowski, *Grazhdanskaia voina v Rossii*, 515-6。白軍拒絕承認布爾什維克下令改成的格里高利曆，所以還是保持着13天的滯後。



- 252 Suvenirov, *Tragediiv, .RKKA 1937–1938*, Medvedev, *Oni okružhali Stalina*, 229–30; Rapoport and Geller, *Izmena rodine*, 385.
- 253 Trotskii, *Sochineniia*, VIII: 272–81.
- 254 Trotsky, *My Life*, 359.
- 255 Argenbright, “Documents from Trotsky’s Train,” 其中包括托洛茨基向列車工作人員的告別信(1924年7月15日)。
- 256 Trotsky, *My Life*, 411–22 (esp. 413); Volkogonov, *Trotsky*, 164 (引自RGVA, f. 33987, op. 1, d. 25, l.16–44)。乘務人員中有許多是拉脫維亞人，負責人是魯道夫·彼得松(Rudolf Peterson)。托洛茨基的裝甲列車最終不得不一分為二。
- 257 Tarkhova, “Trotsky’s Train,” 27–40.
- 258 Lunacharsky, *Revolutionary Silhouettes*, 68.
- 259 Argenbright, “Honour among Communists,” 50–1.
- 260 *Vospominaniia o Vladimire Il’iche Lenine* [1979], III: 446 (K. Danilevsky).
- 261 Benvenuti, *Bolsheviks and the Red Army*, 123–8。1919年5月17日，托洛茨基緊急給列寧寫信，要求解除安東諾夫、波德沃伊斯基和布勃諾夫的職務，不讓他們再負責監督烏克蘭的戰事。RGASPI, f. 17, op. 109, d. 12, l. 17 (由斯克良斯基轉交列寧)。
- 262 Meijer, *Trotsky Papers*, I: 578–80 (7月3日全會的會議記錄)。
- 263 *Sochineniia*, IV: 273; Kornatovskii, *Stalin—rukovoditel’ oborony Petrograda*; Kornatovskii, *Razгром kontrrevoliutsionnykh zagovorov*。斯大林曾經在6月要求立即召開全會。791 Naida, *O nekotorykh voprosakh*, 183–5。在彼得格勒期間，斯大林再次與阿列克謝·奧庫洛夫發生衝突，於是列寧再次召回奧庫洛夫(第一次是因為察里津的問題)。Volkogonov, *Triumfi tragediia*, I/i: 94–5。
- 264 Erickson, *Soviet High Command*, 63。另見那位犯了錯誤的短暫接任者的回憶錄，Samoilo, *Dve zhizni*, 250ff。
- 265 Trotsky, *Stalin*, 313–4。後來在進入烏拉爾地區追擊高爾察克時，紅軍有了意想不到的收穫：用烏拉爾的工廠工人擴充自己的隊伍。
- 266 被撤掉的托洛茨基的主要支持者有伊萬·斯米爾諾夫和阿爾卡季·羅森格爾茨；另外一個托洛茨基的人，費奧多爾·拉斯科爾尼科夫，已經在1919年5月被解除職務。其他被撤掉的還有康斯坦丁·梅霍諾申(Konstantin Mekhonoshin)、謝苗·阿拉洛夫、尼古拉·波德沃伊斯基、康斯坦丁·尤列涅夫(Konstantin Yurenev)、阿列克謝·奧庫洛夫。斯大林在1920年5月18日又恢復了職務(直到1922年4月1日)。邦契—布魯耶維奇對革命軍事委員會擴大會議的描述以想像的成分居多。Bonch-Bruevich, *Vsia vlast’ sovetam*, 351–2。邦契—布魯耶維奇和瓦采季斯不和(ibid., 334–5)。
- 267 Meijer, *Trotsky Papers*, I: 590–3; Trotsky, *My Life*, 453。
- 268 加米涅夫東方面軍司令員的職務由米哈伊爾·伏龍芝接任。
- 269 *Izvestiia*, July 8 and 10, 1919; Trotsky, *My Life*, 398, 452。
- 270 目前的材料顯示，托洛茨基當時拒絕繼續擔任軍事首腦，結果是在別人的懇求下才繼續工作的。RGASPI, f. 17, op. 3, d. 705 (1927年9月8日，政治局會議的速記記錄)。

- 271 這個消息有可能並不像托洛茨基說的那樣出人意料。Trotsky, *My Life*, 448–9.
- 272 PSS, XXXVII: 525–7; Bubnov, *Grazhdanskaia voina*, I: 246–9.
- 273 Deutscher, *Prophet Armed*, 413.
- 274 Benvenuti, *Bolsheviks and the Red Army*, 143–61, 216–7.
- 275 Gorky, *Lénine et la paysan russe*, 95–6. 這段話在蘇聯出版的高爾基著作中被刪掉了。
- 276 1919年春天，列寧流露過對於沙皇軍官的不屑，還打算讓一名黨的官員，米哈伊爾·拉舍維奇，擔任軍隊總司令，但是又對托洛茨基的要求作了讓步，讓真正的軍事專家擔任總司令。不過，現在列寧支持的是和托洛茨基有過衝突的謝爾蓋·加米涅夫。Mawdsley, *Russian Civil War*, 178–9.
- 277 斯大林很快就會掩蓋他早先所持的反對立場。(Stalin, “Novyi pokhod Antanty na Rossiia,” *Pravda*, May 26, 1920.) *Sochineniia*, IV: 275–7. 後來，為了減輕察里津的陷落所帶來的尷尬，斯大林主義史學利用了托洛茨基關於友好與不友好地域的理論——沒有提到托洛茨基的名字。Genkina, *Tsaritsyn v 1918*.
- 278 *Nash vek*, July 10, 1918: 4.
- 279 Williams, *The Russian Revolution*, 63.
- 280 他還說：「雖然作為政府官員我有特殊的口糧，但要是沒有黑市的骯髒交易，我也會餓死，我們在那裏用自己從法國帶來的一點點財物換取吃的東西。」Serge, *Memoirs of a Revolutionary*, 70–1, 79.
- 281 Deutscher, *Prophet Armed*, 442–3.
- 282 Pipes, *Russia Under the Bolshevik Regime*, 93–5.
- 283 Zinoviev, *Bor’ba za Petrograd*, 52–3. Deutscher, *Prophet Armed*, 445. 1925年，拉舍維奇成了陸海軍副人民委員，那年他是站在季諾維也夫一邊；而在1926年，他是站在聯合反對派（季諾維也夫和托洛茨基）一邊。斯大林把他作為蘇俄控制下的中東鐵路的代表（1926–1928）派到了哈爾濱。他在1927年黨的第十五次代表大會上被開除。次年，他神秘地死於中國哈爾濱。
- 284 流亡的尤登尼奇1933年在法國的里維埃拉平靜地死去。Rutych, *Belyi front generala Iudenicha*.
- 285 Trotsky, *Sochineniia*, XVII/ii: 196–7.
- 286 Kakurin, *Kak srazhalas’*, II: 242–5, 306.
- 287 Trotsky, *My Life*, 432–3; Trotsky, *Sochineniia*, XVII/ii: 310. 對於1919年11月的紅旗勳章一事，托洛茨基是唯一的資料來源；他對內戰的描述，在凡是可以其他文獻予以驗證的地方都是經得起推敲的。
- 288 Kvakin, *Okrest Kolchaka*, 175–6.
- 289 *New York Times*, September 30, 1919.
- 290 Budnitskii, *Den’gi russkoi emigratsii*.
- 291 Litvin, *Krasnyi i belyi terror*, 55–6; Holquist, “State Violence,” 19–45 (at 27, 引自 Kvashonkin, *Bol’shevistskoe rukovodstvo*, 150).
- 292 Krivosheev, *Grif sekretnosti sniat*, 54.

- 293 「我們所有的戰鬥、所有的戰爭和所有的戰役都花費了太長的時間」，托洛茨基承認。Trotskii, “Rech” (1921年11月2日), 載於 *Kak vooruzhalas' revoliutsiia*, III/i: 57–71 (at 60).
- 294 白軍破譯了截獲的紅軍無線電通訊，可還是輸了；雙方在對方陣營中都安插了間諜，但都難以搞清楚哪個——即便真的有——不是雙面間諜。
- 295 早在1918年9月托洛茨基就提出，由於一場新的而且有可能是持久的戰爭再次臨近，布爾什維克必須做好裝備軍隊的準備，讓所有現存的軍工工廠恢復生產，並動員社會力量滿足軍事需要。(RGASPI, f. 17, op. 109, d. 6, l. 10.) 有時候，地方上的人也設法恢復了一定的生產能力。Sokolov, *Ot voenproma k VPK*, 8–28.
- 296 Manikovskii, *Boevoe snabzhenie russkoi armii* [1930], II: 332–5.
- 297 Mawdsley, *Russian Civil War*, 184–5.
- 298 即使有了沙皇時代的物資儲備，紅軍要開展軍事行動還是很難。據說紅軍到1928年還在使用某些沙皇時代的儲備物資：A. Volpe, in Bubnov, *Grazhdanskaia voina*, II: 373.
- 299 Pipes, *Russia Under the Bolshevik Regime*, 89–90.
- 300 Mel'gunov, *Tragediia Admirala Kolchaka*, III/i: 69–70; Mawdsley, *Russian Civil War*, 214. 派普斯認為白軍的負擔是「難以克服的」，參見 *Russia Under the Bolshevik Regime*, 10.
- 301 Kakurin, *Kak srazahals'*, I: 135.
- 302 Von Hagen, *Soldiers in the Proletarian Dictatorship*, 69–79; Schapiro, “The Birth of the Red Army,” 24–32.
- 303 L. S. Gaponenko and V. M. Kabuzan, “Materialy sel'sko-khoziastvennykh perepisei 1916–1917 gg.,” *Voprosy istorii*, 1961, no. 6: 97–115 (at 102–3).
- 304 就布爾什維克而言，他們並沒有派出足夠多的部隊去贏得在波羅的海沿岸國家或芬蘭進行的內戰，但他們的確是派了部隊，而這一事實給紅色中心地區的防禦造成了不利影響。Mawdsley, *Russian Civil War*, 123.
- 305 Chamberlin, *Russian Revolution*, II: 268–9; Pipes, *Russia Under the Bolshevik Regime*, 119–21.
- 306 *Leninskii sbornik*, XXXVII: 167.
- 307 *Pravda*, September 23, 1919; *Izvestiia*, September 27, October 5 and October 12, 1919. 另見 Dzerzhinskii, *Izbrannye proizvedennye*, I: 197–8 (1919年9月24日在莫斯科黨委會上的講話); 以及 Fomin, *Zapiski staorog chekista*, 108.
- 308 Makintsian, *Krasnaia kniga VChK*, 315–6; *Iz istorii VChK*, 325–6, 349–54 (契卡的內部報告，1919年12月28日).
- 309 有一次，大概是在1919年12月11日之後的某一天，列寧在凌晨2時突然出現在最高總司令謝爾蓋·加米涅夫的辦公室，問了一些問題，通過直通電報與哈爾科夫談話，然後又返回了克里姆林宮。
- 310 在吹捧性的傳記中，內戰時期做出的重大決定，沒有哪個是跟列寧沒有關係的。Aralov, *Lenin i Krasnaia Armia*, 32.
- 311 沃爾科戈諾夫認為托洛茨基在軍事上只能說是一知半解。Volkogonov, *Trotskii*, I: 254. 米哈伊爾·邦契—布魯耶維奇，一位與托洛茨基過從甚密的前沙皇軍官，

- 認為他的上司對於軍事藝術的技術方面缺乏興趣，但卻是個卓有成效、引人注目的軍事發言人。Bonch-Bruевич, *Vsia vlast' sovetam*, 269-71.
- 312 托洛茨基與高爾察克之間的差異再鮮明不過了。「他迫不及待地要和人民在一起，和部隊在一起，」一位親歷者在提到高爾察克時評論說，「但是當他面對他們的時候，卻不知道要說甚麼。」Guins, *Sibir*, II: 367.
- 313 Trotsky, "Hatred of Stalin?" 載於 *Writings of Leon Trotsky*, 67-71; Medvedev, *Let History Judge*, 64-5 (譯者註釋, 72).
- 314 Trotsky, *Stalin*, 243, 270 (引用的是列昂尼德·謝列布里亞科夫的話).
- 315 Kenez, *Civil War in South Russia*, II: 61. E. H. 卡爾無情的判斷現在仍然是站得住的：「任何一個頭腦正常的人都會把高爾察克、尤登尼奇、鄧尼金和弗蘭格爾的幾次戰役看作是可悲的巨大錯誤。他們代表的是構想上的愚蠢和執行上的無能；他們直接和間接地犧牲了數十萬人的性命；除了加劇蘇維埃統治者對『白』俄以及三心二意地支持他們的協約國的怨恨之外，他們也許對歷史進程沒有絲毫影響。」要是卡爾對布爾什維主義一樣目光犀利就好了。Davies, "Carr's Changing Views," 91-108 (at 95).
- 316 從中國回去的蘇俄官員看到了類似的情形。《加拉罕宣言》(1919年7月25日)把高爾察克描寫成一個「依靠武力和外國資本鞏固其在俄國地位的反革命暴君」。Waldron, "The Warlord." 另見 Sanborn, "Genesis of Russian Warlordism."
- 317 心懷怨恨的阿列克謝耶夫1918年對英國特工布魯斯·洛克哈特說，他寧可與列寧和托洛茨基合作，也不與克倫斯基合作。Lockhart, *British Agent*, 288. 整個內戰期間，克倫斯基——他在蘇俄警察機關的代號是「小丑」——都躲在俄國國內或鄰近的芬蘭。1922年，他永遠離開了俄國，先是去了柏林，然後又去了巴黎。
- 318 Mawdsley, *Russian Civil War*, 99.
- 319 Pereira, *White Siberia*.
- 320 Budberg, "Dnevik," 269; Mawdsley, *Russian Civil War*, 155.
- 321 Denikin, *Ocherki russkoi smuty*, III: 262-3, IV: 45-8.
- 322 Mawdsley, *Russian Civil War*, 215 (引自 "Final Report of the British Military Mission, South Russia" [March 1920], PRO, WO 33/971: 29).
- 323 Ushakov, *Belyi iug*; Slashchov-Krymskii, *Belyi Krym*, 185-93. 弗蘭格爾的幾位文官部長包括彼得·司徒盧威和亞歷山大·克里沃舍因。農業部長克里沃舍因1910年陪同斯托雷平去過西伯利亞。
- 324 Lazarski, "White Propaganda Efforts." 仍然在華盛頓大使館裏的臨時政府駐美大使鮑里斯·巴赫梅捷夫，1920年1月19日給瓦西里·馬克拉科夫的信中說，反布爾什維克運動失敗了，因為它們缺少有力的意識形態與布爾什維主義抗衡。巴赫梅捷夫渴望一個以私有財產、真正的人民主權、民主、愛國主義和分權的政治體系為基礎的「俄羅斯民族和民主復興的平台」。對於這場失敗，古典自由主義的觀點就是如此。Budnitskii, "Sovershenno lichno i doveritel'no," I: 160-5 (at 161).
- 325 Denikin, *Ocherki russkoi smuty*, V: 118.

- 326 Pipes, *Russia Under the Bolshevik Regime*, 14 (引自 *Ruskaia mysl'*, May–July 1921: 214). 「無論如何國家都需要勝利，因此，為了得到勝利，必須竭盡全力，」高爾察克在臨死前對布爾什維克的審訊人員說，「我的確沒有任何明確的政治目標。」當然，只有借助於成功的政治鬥爭，才能取得軍事上的勝利。Varneck, *Testimony of Kolchak*, 187. 同樣，鄧尼金後來也寫道，他曾經試圖「讓我們自己以及軍隊不受狂暴而好鬥的政治激情的影響，並把意識形態建立在樸素的、無可爭辯的民族象徵的基礎上。事實證明這非常困難。『政治』突然成了我們的工作」。Denikin, *Ocherki russkoi smuty*, III: 129.
- 327 為在計劃於1922年12月召開的蘇維埃第十次代表大會上的講話所做的筆記：Getzler, “Lenin’s Conception”; “Za derev’iami ne vidiat lesa,” *PSS*, XXXIV: 79–85 (at 80); “Tretii vserossiiskii s’ezd sovetov rabochikh, soldatskikh i krest’ianskikh deputatov,” *PSS*, XXXV: 261–79 (at 268); “I vserossiiskii s’ezd po vneshkol’noy obrazovaniiu,” *PSS*, XXXVIII: 329–72 (at 339); “Konspekt rechi na X vserossiiskom s’ezde sovetov,” *PSS*, XLV: at 440–1 (440). 學者們通常會引用列寧指出的「官僚主義的弊病」和社會主義帶來的令人窒息的機關作風，但這種抱怨的話大多是在他因病無法視事的時候說的。列寧在內戰期間有關國家建設的觀點是充滿戰鬥精神的。那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在談到內戰時期的行政機構時他熱情地說。*PSS*, XLIV: 106 (譯註：《列寧全集》第42卷，第112–113頁)。
- 328 Keep, *Russian Revolution*, ix–x, 471.
- 329 McAuley, *Bread and Justice*.
- 330 Trotsky, *Terrorism and Communism* 162.
- 331 Thomas F. Remington, “The Rationalization of State Kontrol,” 載於 Koenker, *Party, State, and Society*, 210–31.
- 332 *MChK*, 247; Bazhanov, *Damnation of Stalin*, 136.
- 333 *Krasnaia Moskva*, 631.
- 334 Trotsky, *My Life*, 477.
- 335 孟什維克尤利·馬爾托夫在一封私人信件中刻意用舊社會的詞彙指出：「就『人民委員』的莊園而言，其優越的生活水平差不多是完全公開的。」Brovkin, *Dear Comrades*, 210 (馬爾托夫致戴維·舒帕克 (David Schupack), 1920年6月20日). 列寧對於人們的看法很敏感；在給莫洛托夫的信中 (1921年5月4日)，列寧說自己發現了一個特意打着人民委員會名義的休養所，「我恐怕這會引起人們的議論」。那個地方被更名為第九休養所，並準備與農業人民委員部合用。RGASPI, f. 2, op. 1, d. 18552, l.1–2.
- 336 同樣，1920年5月，阿道夫·越飛私下裏寫信對托洛茨基說：「不平等的現象很多，一個人的物質地位很大程度上取決於他在黨內的地位；你該承認這是一種危險的現象。」對於掌權的共產黨人，越飛還說：「以前黨內的那種精神，革命者無私的、同志式的奉獻的精神已經消失了。」那位圖拉省的布爾什維克的話和越飛的話轉引於 Figes, *A People’s Tragedy*, 695–6 (引自 GARF, f. 5972, op. 1, d. 245, l.397–8; RGVA, f. 33987, op. 3 d. 46, l. 143).

- 337 PSS, XVI: 14–15; Rykov, *Izbrannye proizvedeniia*, 10; Iroshnikov, “K voprosu o slome burzhuaznoi gosudarstvennoi mashiny v Rossii.”
- 338 Annenkov, *Dnevnikh moikh vstrech*, II: 120–8; Fülöp-Miller, *Mind and Face of Bolshevism* [1928], 136. 另見 Piotrovskii, *Za sovetskii teatr!*; Nikulin, *Zapiski sputnika*; Evreinoff, *Histoire du Théâtre Russe*; Petrov, *50 i 500*. 這次演出由紅軍政治局主辦，編舞是非布爾什維克尼古拉·葉夫列伊諾夫 (Nikolai Yevreinov)，他因為要大聲地喊口令，嗓子都啞了，但也得到了一件 (狐狸毛) 皮大衣作為獎品；其他人得到的是煙草或凍蘋果。按照安排，特意從喀琅施塔得開來的「阿芙樂爾號」巡洋艦應該鳴炮三聲，然後樂隊奏起勝利的樂曲，可儘管技術人員不停地按下停止開炮的按鈕，炮聲就是停不下來。葉夫列伊諾夫頓時哈哈大笑。
- 339 Trotsky, *Stalin*, 279.
- 340 1919年底，伊瓦爾·斯米爾加在軍隊政工人員的一次會議上提出：「我們現在必須考慮怎樣取消政委制度。」他的建議未獲採納。 *Prauda*, December 13, 1919; Benvenuti, *Bolsheviks and the Red Army*, 155–7. 793
- 341 Molotov, *Na shestoi god*.
- 342 塔克就接近於這種看法。他說「托洛茨基在 (國內) 戰爭中顯得榮譽很多，權力很小，而斯大林則顯得榮譽很少，權力很多」，但塔克低估了對托洛茨基的負面評價。塔克還使用了一條或許是虛假的標準：「雖然斯大林在內戰中獲得了寶貴的軍事經驗，可他在黨內並沒有因此而贏得擁有一流軍事頭腦的名聲。」但是有誰贏得了這樣的名聲呢？列寧？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甚至是托洛茨基？不過，塔克倒是強調了這一點，即斯大林「憑藉自己在戰時的工作經歷，自認為是一個強有力的領導人，能夠對形勢迅速作出評估並果斷採取行動」。Tucker, *Stalin as Revolutionary*, 209, 206.
- 343 1918年秋天，他對新的低級指揮員們說：「明天，你們會成為排長、連長、營長、團長，你們會成為新成立的軍隊中名副其實的典範。」Trotsky, “Unterofitsery” [fall 1918], 載於 *Kak vooruzhalas’ revoliutsiia*, I: 176–80.
- 344 Trotsky, *Stalin*, 279. 對於軍事專家持續佔有的比例，其他的估計要高一些。Bubnov, *Grazhdanskaia voina*, II: 95; Erickson, *Soviet High Command*, 33.
- 345 麥克尼爾認為斯大林「對於紅方勝利的貢獻僅次於托洛茨基」。McNeal, *Stalin*, 50. 在內戰中，摩西·盧因 (Moshe Lewin) 認為：「斯大林學會了在最惡劣的形勢下取勝的政治秘訣：國家的高壓是成功的訣竅；動員、宣傳、武力和恐怖是政權的構成要素。」當然，差不多所有的布爾什維克都吸取了這一教訓，有些人從世界大戰中就已經吸取了。Moshe Lewin, “Stalin in the Mirror of the Other,” 載於 Lewin, *Russia/USSR/Russia*, 214.
- 346 Valentinov, *Novaia ekonomicheskaiia politika*, 88.
- 347 Lockhart, *Memoirs of a British Agent*, 225.
- 348 Volkogonov, *Trotsky*, 23 (引自 RGVA, f. 33987, op. 1, d. 21, l.35–41). 那位叫做尼蓋 (Nigay) 的朝鮮族人建議，「建立一支強大的猶太人軍隊並將其武裝到牙齒」。
- 349 Kartevskii, *Iazyk, voina i revoliutsiia*, 36.

- 350 RGVA, f. 33987, op.3, d. 13s, Volkogonov papers, Hoover Institution Archives, container 19 (Otto von Kurfell). 納粹分子阿爾弗雷德·羅森堡在一本小冊子中寫道，「從其誕生之日起，布爾什維主義就是一項猶太人的事業」，而「對於昏頭昏腦、走投無路、饑腸轆轆的人民施行無產階級專政，是在倫敦、紐約和柏林的猶太人小屋裏想出來的」。Rosenberg, *Der jüdische Bolschewismus*. 另見Bazhanov, *Damnation of Stalin*, 144.
- 351 Carr, *Socialism in One Country*, I: 157.
- 352 烏里揚諾夫家族的猶太血統後來被列寧的姐姐安娜·烏里揚諾夫娜(1864–1935)發現了，她在1932年的一封信中告訴了斯大林，並強調說，如果把列寧有四分之一猶太血統的事實公之於眾，將會大有裨益。斯大林禁止公開提及此事。Volkogonov, *Lenin: Life and Legacy*, 9. 1972年，有關列寧出身的所有現存文件都被轉移到「特別檔案」中。
- 353 Volkogonov, *Stalin: Triumph and Tragedy*, 44–5.
- 354 Bortnevskii and Varustina, "A. A. Borman," I: 115–49 at 119. 博爾曼假道芬蘭逃走了。(他後來吹噓說，契卡人員「大部分都參與了對無辜人民的逮捕，但他們真正的敵人卻坐着人民委員的列車旅行，並在人民委員部和軍隊參謀部佔據重要職位。») Bortnevskii, "White Intelligence and Counter-intelligence," 16; GARF, f. 5881, op. 1, d. 81 (Borman, "V stane vragov: vospominaniia o Sovetskoi strane v period 1918 goda"), l. 42.

## 第九章 發現之旅

- 1 Gor'kii, "V. I. Lenin" [1924, 1930], 見於 *Sobranie sochinenii*, XVII: 5–46, 轉載於 Bialika, *V. I. Lenin i A. M. Gor'kii*, 238–78 (at 262). 1907至1913年，高爾基生活在卡普里島；列寧在1908年的時候和他住在一起。列寧1910年也拜訪過高爾基。
- 2 *X s'ezd* [1933], 573–83; *Vsesoiuznaia Kommunisticheskaia Partiiia (b) v rezoliutsiakh* [5th ed.], I: 393.
- 3 據經常向斯托雷平提供諮詢意見的一位地方自治機關的財政專家說，1911年5月，即斯托雷平被暗殺前四個月，斯托雷平曾經粗略地提出過一些關於國家整頓的想法。現在從國家檔案館裏沒能發現這些粗略的想法，而該顧問記載那次據說發生過的談話的筆記，也沒有保存下來；我們掌握的只是該顧問的回憶錄。按照他的說法，斯托雷平打算擴大並加強地方自治，擴大並改組中央部委體系，包括設立一些新的部委：勞動、社會保障、自然資源、宗教，以及很不尋常的是，民族事務。關於後者，據說斯托雷平的設想是，「居住在俄國境內的所有人，不分民族和宗教信仰，都應當是完全平等的公民」，而新的民族事務部「應當創造條件，在可能的情況下，充分滿足所有民族的文化和宗教願望」。但他也認為有些少數民族，比如波蘭人和烏克蘭人，因為有生活在相鄰國家的同族人而構成了一種特殊的威脅。因此，新的民族事務部「不應忽視所有那些想要肢解俄

- 國的內外敵人。對於那些受到俄國的敵人的宣傳影響的民族，政府的任何猶豫和動搖都容易在國內引發新的問題」。Aleksandr V. Zen'kovskii, *Pravda o Stolypine* (New York: Vseslovianskoe, 1956), 79—81, 一個不大好的譯本是《斯托雷平，俄國最後一位偉大的改革家》(*Stolypin, Russia's Last Great Reformer*, Princeton: Kingston Press, 1986), 33—4. 津科夫斯基從1903年到1919年一直擔任基輔自治機關的首席財政專家。
- 4 PSS, XXXVII: 153; Debo, *Revolution and Survival*, 408 (引自列寧在全俄蘇維埃第六次代表大會上的講話).
- 5 Carr, *Bolshevik Revolution*, III: 231—7.
- 6 White, *Siberian Intervention*; Teruyuki, *Shibberia shuppei*; Stephen, *Russian Far East*, 132, 142—5; Coox, *Nomonhan*, 9.
- 7 「紅白雙方的內戰一直是由數量相對很小的少數人進行的，全體人民則表現得極其消極」，彼得·司徒盧威評論說；派普斯也認同這一看法：*Russia Under the Bolshevik Regime*, 136—8 (引自 *Ruskaia mysl*, May—June 1921: 211). 相反，費吉斯認為：「只要農民害怕白軍，他們就會支持蘇維埃政權的要求，儘管不太情願……因此，布爾什維克專政是在農民革命過後不久慢慢地加強的。」Figes, *Peasant Russia*, 354.
- 8 Adelman, “Development of the Soviet Party Apparatus,” 97.
- 9 Laruelle, *L'idéologie eurasiiste russe*; Widerkehr, “Forging a Concept.”
- 10 *Iskhod k vostoku*, vii.
- 11 Riasanovsky, “The Emergence of Eurasianism,” 57. 另見 Glebov, “The Challenge of the Modern.” 自許的歐亞主義者的政治主張多種多樣，從國家布爾什維主義(彼得·薩維茨基(Petr Savitskii))到托洛茨基主義(彼得·蘇夫欽斯基(Petr Suvchinskii))再到反蘇維埃主義(尼古拉·特魯別茨科伊公爵(Prince Nikolai Trubetskoi))都有。
- 12 McNeal, “Stalin's Conception.” 斯大林關於俄國風俗習慣的論述，參見 Carr, *Bolshevik Revolution*, I: 102.
- 13 「必須使蘇維埃政權同樣成為俄國邊疆地區人民群眾所親近和愛戴的政權，」他在《真理報》上寫道(1920年10月10日)，「但是，蘇維埃政權要成為人民群眾所親近的政權，首先應該成為他們所瞭解的政權。因此，必須使邊疆地區的一切蘇維埃機關，即法院、行政機關、經濟機關、直接政權機關(以及黨的機關)盡可能由熟悉當地居民生活方式、風俗、習慣和語言的當地人組成。」“Politika sovetskoi vlasti po natsional'nomu voprosu v Rossii,” 見於 *Sochineniia*, IV: 351—63 (at 358—60) (譯註：《斯大林全集》第4卷，第317頁)。
- 14 Rieber, “Stalin: Man of the Borderlands.”
- 15 斯大林有關殖民地和民族問題的著述要早於列寧的相關著述。Boersner, *The Bolshevik*, 32—58.
- 16 Gellner, *Encounters with Nationalism*, 13, 引自 “Draft of an Article on Friedrich List's Book: *Das nationalische System der politischen Ökonomie*” (1845).
- 17 Smith, *Bolsheviks and the National Question*, 9.



- 18 盧森堡為自己設在克拉科夫的雜誌《社會民主黨評論》連寫了六篇文章，其中五篇的譯文可見於<http://www.marxists.org/archive/luxemburg/1909/national-question/>。
- 19 Bauer, "The Nationalities Question."
- 20 Rieber, "Stalin, Man of the Borderlands," n. 113. 對於奧地利人在文化自治上的立場，格魯吉亞人菲利普·馬哈拉澤提出過類似的批評。Jones, *Socialism*, 228. 斯大林的著作讓人想起荷蘭社會民主黨人安東·潘涅庫克 (Anton Pannekoek) 的著作。Van Ree, *Political Thought of Joseph Stalin*, 67.
- 21 在斯大林1913年初抵達克拉科夫並在那裏短暫停留的時候，他的文章還只是草案；他在維也納也只作了短暫的停留。Van Ree, "Stalin and the National Question," at 220-1. 列寧在私人信件中稱讚斯大林1913年的文章寫得「很好」，但是在他自己的文章中卻並未想到要提到它。PSS, XLVIII: 169 (February 25, 1913), 173 (March 29, 1913) (譯註：《列寧全集》第46卷，第254、262-263頁)。列寧一年後寫的另一篇關於民族問題的文章〈論民族自決權〉也絲毫沒有提到斯大林以及斯大林的文章，參見Lenin, *Sochineniia*, 2nd and 3rd eds., XVII: 427-74. 在斯大林的文章發表後，列寧寫信給在1906年發表過抨擊南高加索聯邦主義長文的斯捷潘·邵武勉 (Stepan Shaumyan) 說：「同時請不要忘記在高加索人中間物色能夠撰寫有關高加索民族問題的文章的同志……關於民族問題的通俗小冊子是很需要的。」(譯註：《列寧全集》第46卷，第321、381頁) 難以想像斯大林的文章如果不是「通俗小冊子」，那會是甚麼。Lenin, *Sochineniia*, XVII: 91.
- 22 V. I. Lenin, "O natsional'noi gordosti Velikorossov," *Sotsial-Demokrat*, December 2, 1924, PSS, XXVI: 106-10. 另見Smith, *Bolsheviks and the National Question*, 7-28. 對於列寧關於民族問題的著述，特別是在1915至1918年間的那些著述，多年來做過很多修改；對於他的著作，有時需要使用早期的版本，而不是《全集》。
- 23 Trotskii, *Literatura i revoliutsiia*, 68.
- 24 PSS, XXVI: 109.
- 25 "Rossiiskaia Sotsial- demokraticheskaia partiia i ee blizhaishie zadachi," *Sochineniia*, I: 11-31 (at 11, 22).
- 26 *Sochineniia*, I: 32-55; RGASPI, f. 558, op. 1, d. 7 (草案).
- 27 Van Ree, "Stalin and the National Question," 218 (引自RGASPI, f. 71, op. 10, d. 183, l. 106-7).
- 28 Smith, "Stalin as Commissar for Nationality Affairs," 54. 斯大林有時也會在口頭上支持大俄羅斯沙文主義。但比較典型的是，他在1921年1月1日對突厥斯坦的共產黨員的講話中稱大俄羅斯人是統治民族，對他們來說民族主義無關緊要。可是，突厥斯坦的共產黨員是「被壓迫民族的兒女」，必須對自己的民族主義情緒保持警惕，因為這種情緒「阻礙了我國東部共產主義的形成」。Pravda, January 12, 1921, 見於 *Sochineniia*, V: 1-3 (譯註：《斯大林全集》第5卷，第3-4頁)。
- 29 因為列寧在十月革命前的許多著述以及列夫·加拉罕向約翰·里德描述的布爾什維克的種種計劃根本沒有提到要設立一個負責民族事務的特別機構，對形勢發展瞭解得不充分的人們就覺得這件事情很神秘，而沒有認識到這顯然是形勢所

- 迫。Blank, *Sorcerer as Apprentice*; Tucker, *Stalin as Revolutionary*, 181. 另見 Rigby, *Lenin's Government*, 5; Reed, *Ten Days* [1960], 77.
- 30 Blank, *Sorcerer as Apprentice*, 13–6; Pestkovskii, “ob ktiabr’skie dniakh v Pitere,” 101–5; Pestkovskii, “Vospominaniia o rabote v Narkmonatse,” 124–31; *Istoriia natsional’nogosudarstvennogo stroitel’sтва*, I: 48; Manusevich, “Pol’skie sotsialdemokraticheskie,” 131–33.
- 31 *Pravda*, May 19, 1918; *Sochineniia*, IV: 88 ff.
- 32 Carr, *Bolshevik Revolution*, I: 135–6.
- 33 Carr, *Bolshevik Revolution*, I: 137.
- 34 “Protiv federalizma,” *Pravda*, March 28, 1917, 見於 *Sochineniia*, III: 23–8 (at 27).
- 35 *Sochineniia*, IV: 32–3, IV: 66–73, 79–80; Gurvich, *Istoriia sovetsoi konstitutsii*, 147–8 (斯大林的草案).
- 36 Gurvich, *Istoriia sovetsoi konstitutsii*, 33, 146–7 (斯大林的提綱).
- 37 Hardy, “The Russian Soviet Federated Socialist Republic”; Chistiakov, “Obrazovanie Rossiiskoi Federatsii, 1917–1920 gg.”; Chistiakov, “Formirovanie RSFSR kak federativnoe gosudarstvo.”
- 38 Carr, *Bolshevik Revolution*, I: 124–50, esp. 139.
- 39 “Oдна iz ocherednikh zadach,” *Pravda*, April 9, 1918, 見於 *Sochineniia*, IV: 74–8. 另見 “Organizatsiia Rossiiskoi federativnoi respubliki,” *Pravda*, April 3 and April 4, 1918, 見於 *Sochineniia*, IV: 66–73. Stalin, *Works*, IV: 372.
- 40 伊薩貝拉·克萊恩德勒提出了這一看法，但她把它的發現和實際應用錯誤地歸於列寧：Kreindler, “A Neglected Source of Lenin’s Nationality Policy.”
- 41 *VIII s’ezd RKP (b)* [1959], 46–48, 77–81. 另見 Nenarokov, *K edinstvu ravnykh*, 91–2 (拉齊斯), 92–3 (越飛); and Slezkine, “USSR as a Communal Apartment,” 420–1. 1917年以前，許多自由派人士也把建立聯邦的想法看作是烏托邦。參見 B. E. 諾爾德 (B. E. Nolde) 男爵的觀點，他的父親是波羅的海沿岸地區的德意志人，母親是烏克蘭人。1907至1917年，他幫助制定和實施了國家政策：Holquist, “Dilemmas,” 241–73. 斯大林尋求的是一種中間立場，他重申了讓民族服從階級的要求，認為民族自決的口號應該從屬於社會主義原則。 *Sochineniia*, IV: 158.
- 42 *VIII s’ezd RKP (b)* [1959], 55.
- 43 *VIII s’ezd RKP (b)* [1919], 343–4.
- 44 *VIII s’ezd RKP (b)* [1959], 425; *Izvestiia TsK KPSS*, 1989, no. 8: 177.
- 45 Davies, *White Eagle, Red Star*, 23.
- 46 De Gaulle, *Lettres*, II: 27–8 (1919年5月23日，給他母親的信).
- 47 1918年底，布爾什維克成立了不到1萬人的「西方面軍」。Kakurin, *Russkopol’skaia kampaniia 1918–1920*, 14. 大約在同一時期，一名德國將軍在拉脫維亞策劃了一場政變；芬蘭因為卡累利阿問題向俄國宣戰。
- 48 Debo, *Survival and Consolidation*, 191–212 (esp. 202), 191 (引自 *DBFP*, I: 694, 696–8, 689–91, 710–5); Davies, *White Eagle, Red Star*, 91; *Dokumenty i materialy po istorii sovetso-pol’skikh otnoshenii*, II: 339–43.

- 795 49 Carley, "The Politics of Anti-Bolshevism."
- 50 Debo, *Survival and Consolidation*, 191–212 (esp. 202), 404, 406. 另見Korbel, *Poland Between East and West*, 79–93.
- 51 Borzęcki, *Soviet-Polish Treaty of 1921*; Wandycz, *Soviet-Polish Relations*. 另見D'Abernon, *The Eighteenth Decisive Battle of the World*. 1918至1922年，波蘭軍隊同時打了六場戰爭：Pogonowski, *Historical Atlas of Poland*.
- 52 貝德克爾的《俄羅斯帝國指南》(1914)說，「西部各省(從前的波蘭王國)、波羅的海沿岸地區各省和芬蘭都保存了它們各自的民族習慣」，還說「嚴格意義的俄羅斯是從聖彼得堡經斯摩棱斯克和基輔到比薩拉比亞的這條線開始的」。事實證明這種看法有先見之明。Baedeker, *Russia, with Teheran*, xv.
- 53 V. I. Lenin, "Telegramma L. D. Trotskomu," *PSS*, LI: 145–6, February 27, 1919; Davies, *White Eagle, Red Star*, 98. Kostiuszko, *Pol'sko-Sovetskaia voina*, I: 40, 43, 47; Blank, "Soviet Nationality Policy." 1920年3月17日，一群由自由軍團和其他準軍事部隊組成的暴徒在保守的君主派分子沃爾夫岡·卡普(Wolfgang Kapp)的領導下，試圖在德國舉行暴動；列寧打電報給斯大林，要求儘快剿滅克里米亞的白軍，「以便把我們的手完全騰出來，因為德國的國內戰爭可能會使我們必須向西運動，以幫助共產黨人」。卡普暴動失敗了，而在列寧看來，它似乎是科爾尼洛夫事件的重演，預示着革命會發生決定性的左轉。Lenin, *V. I. Lenin*, 330–1 (1920年3月17日); Adibekov and Shirinia, *Politbiuro TsK RKP (b)—VKP (b) i Komintern*, 39; *PSS*, XL: 235–6 (1920年3月29日在黨的第九次代表大會上的講話), XL: 332 (1920年4月29日)。另見Balabanoff, *Impressions of Lenin*, 109–12; 以及Buber-Neumann, *Von Potsdam nach Moskau*, 8.
- 54 Chamberlin, *Russian Revolution*, II: 301; Wandycz, *Soviet-Polish Relations*, 94–100; Borzęcki, *Soviet-Polish Treaty of 1921*, 27–9. 另見Dziewanowski, *Joseph Pilsudski*. 為了支持自己對東部邊疆地區(在波蘭語中是「kresy wschodnie」)的領土要求，波蘭很快指出，1918年夏天，布爾什維克宣佈廢除了帝俄的所有條約，其中包括那些讓瓜分波蘭合法化的條約。Horak, *Poland's International Affair*, doc. 223.
- 55 Reshetar, *The Ukrainian Revolution*, 301–2; Wandycz, *Soviet-Polish Relations*, 191–2; Palij, *The Ukrainian-Polish Defensive Alliance*.
- 56 *Pravda*, April 23, 1920. 在莫斯科的集會上，有個叫米哈伊爾·奧利明斯基(維季姆斯基)(Mikhail Olminsky (Vitimsky))的發言者——他長期以來一直崇拜列寧——回憶了列寧在革命前引起的怨恨。「列寧那時(18歲)很有名，他熱衷權力、追求獨裁、拋棄社會民主運動中最優秀的老一輩領導人、批評所有人並與所有人開戰」，奧利明斯基強調說。之後他又說，列寧「在倡導非民主的組織原則和軍事組織原則方面是正確的」。Velikanova, *Making of an Idol*, 34 (引自Bukov, *Nedorisovannyi portret*, 1920)。另見Tumarkin, *Lenin Lives!*, 103.
- 57 Velikanova, *Making of an Idol*, 34 (引自 *Nedorisovannyi portret*, 1920)。
- 58 RGASPI, f. 44, op. 1, d. 5, l. 11 (列寧在黨的第九次代表大會上的政治報告)。
- 59 Borzęcki, *Soviet-Polish Treaty of 1921*, 63–8.

- 60 Trotskii, "Smert' pol'skoi burzhuazii" [1920年4月29日], 見於 *Kak vooruzhalas' revoliutsiia*, II: 91. 另見列寧在同一天對全俄玻璃瓷器業工人代表大會的講話: PSS, XI: 331-2.
- 61 Trotsky, *Stalin*, 328. 但另見 *Pravda*, May 6, 1920.
- 62 Stalin, "Novyi pokhod Antanty na Rossiiu," *Pravda*, May 25 and May 26, 1920; *Sochineniia*, IV: 319. 斯大林對波蘭民族主義的看法, 另見 *Pravda*, March 14, 1923, 見於 *Sochineniia*, IV: 167.
- 63 Tiander, *Das Erwachen Osteuropas*, 137
- 64 Zamoyski, *Warsaw 1920*, 25-6.
- 65 Budennyi, *Proidennyi put'*, I: 245.
- 66 Kuz'min, *Krushenie poslednego pokhoda Antanty*, 133-5; Yiulenev, *Sovetskaia kavaleriia v boiakh za Rodinu*, 169-74.
- 67 Davies, *White Eagle, Red Star*, 120.
- 68 *Dirketivy glavnogo komandovaniia Krasnoi Armii*, 735
- 69 Kantor, *Voina i mir*, 13-36.
- 70 Rubtsov, *Marshaly Stalina*, 72-3 (V. N. 波斯托龍金 (V. N. Postoronkin) 的回憶, 他後來加入了白軍).
- 71 他的介紹人之一是蘇維埃中央執行委員的秘書阿韋利·葉努基澤·V. O. Daines, "Mikhail Tukhachesvkii," *Voprosy istorii*, 1989, no. 10: day 41; Volkov, *Tragediia russkogo ofiserstva*, 314.
- 72 Easter, *Reconstructing the State*, 98, 引自 RGASPI, f. 124, op. 1, d. 302, l. 4.
- 73 Gul', *Krasnye marshaly*, 23. 在把高爾察克徹底消滅在西伯利亞的過程中, 伊萬·斯米爾諾夫起到了關鍵作用。
- 74 PSS, LI: 206-8.
- 75 RGASPI, f. 17, op. 109, d. 74, l. 28.
- 76 Zamoyski, *Warsaw 1920*, 60.
- 77 *Sochineniia*, IV: 336-41; Mikhutina, *Pol'sko-Sovetskaia voina*, 182-3.
- 78 見於 Skvortsov-Stepanov, *S Krasnoi Armiei*, 78.
- 79 Budennyi, *Proidennyi put'*, II: 168-210.
- 80 1920年7月17日, L. D. 托洛茨基致S. S. 加米涅夫, 抄送E. M. 斯克良斯基、列寧及中央委員會: Krasnov and Daines, *Neizvestnyi Trotskii*, 307.
- 81 Radek, *Voina pol'skikh belogvardeitsev protiv Sovetskoi Rossii*, 17; Karl Radek, "Pol'skii vopros i internatsional," *Kommunisticeskii internatsional*, 1990, no. 12: 2173-88; Zetkin, *Reminiscences of Lenin* (London: Modern Books, 1929), 20 (在隨後的幾個版本中刪掉了); Lerner, *Karl Radek*, 100-1; Carr, *Bolshevik Revolution*, III: 321. 事後看來, 拉狄克隱瞞了分歧, 站在了列寧一邊: "Session of the Zentrale with the Representative of the Executive Committee for Germany, Friday, January 28, 1921," 載於 Drachkovitch and Lazitch, *The Comintern*, 285. 另見 Radek, *Vneshniaia politika Sovetskoi Rossii*, 62.

- 82 *Pravda*, July 11, 1920; *Sochineniia*, IV: 324, 333, 336–41. 另見 Ullman, *Anglo-Soviet Accord*, 166.
- 83 Hooker, "Lord Curzon and the 'Curzon Line,'" 137.
- 84 Borzęcki, *Soviet-Polish Treaty of 1921*, 79–82; Wandycz, *Soviet-Polish Relations*.
- 85 Meijer, *Trotsky Papers*, II: 228–31; Trotsky, *My Life*, 455–7. 7月12–13日，列寧讓人打電話給斯大林，要求瞭解斯大林對寇松照會的意見，並說：「我個人認為，這完全是一個騙局，是要兼併克里木，這一點已在照會中無恥地提出來了。他們想用騙人的諾言奪走我們到手的勝利。」PSS, LI: 237–8 (譯註：《列寧全集》第49卷，第462頁)。
- 86 Babel, *1920 Diary*; Babel, *Konar-miia*.
- 87 Airapetian, *Legendarnyi Gai*, 51.
- 88 Pipes, *Unknown Lenin*, 85–8; Gerutis, *Lithuania*, 164–5; Debo, *Survival and Consolidation*, 222–3.
- 89 Senn, "Lithuania's Fight for Independence."
- 90 Airapetian, *Legendarnyi Gai*, 124.
- 91 Mikhutina, *Pol'sko-Sovetskaia voina*, 303–5 (AVP RF, f. 04, op. 32, d. 25, pap. 205, l. 30–1).
- 92 Meijer, *Trotsky Papers*, II: 228–31; Deutscher, *Prophet Armed*, 463–7.
- 93 *Izvestiia TsK KPSS*, 1991, no. 2: 117; *Dokumenty vneshnei politiki*, III: 47–53; Mikhutina, *Pol'sko-Sovetskaia voina*, I: 143, n1, 142–3.
- 94 PSS, LI: 240. 列寧打電報給在明斯克的溫什利赫特(1920年7月15日)，問他是否認為「蘇維埃在波蘭有可能奪權」？溫什利赫特以迎合的口氣回答說，他「認為隨着我們大兵壓境，蘇維埃最近在波蘭奪權是完全可能的」，但是他也承認，他不能肯定波蘭國內何時會發生起義。Mikhutina, *Pol'sko-Sovetskaia voina*, 173–4; Golikov, *Vladimir Il'ich Lenin*, IX: 102. 布爾什維克的宣傳堅持認為這不是入侵。「向西推進的目的不是為了征服波蘭、德國和法國，而是為了和波蘭、德國、法國的工人聯合起來——那是我們的主要目標，」《紅軍士兵報》對入侵的蘇俄士兵們解釋說，「之所以必須摧毀白色波蘭，是為了建立一個無產階級的波蘭，是為了讓紅旗飄揚在華沙上空。」引自 Wyszczelski, *Varshava 1920*, 67.
- 95 Golubev, *Direktivy glavnogo komandovaniia*, 643–4.
- 96 *Iz istoriia grazhdanskoi voiny v SSSR*, III: 326; Karaeva, *Direktivy komandovaniia frontov*, III: 225–6.
- 97 Karaeva, *Direktivy komandovaniia frontov*, III: documents 260, 227.
- 98 Borzęcki, *Soviet-Polish Treaty of 1921*, 87 (引自 RGASPI, f. 2, op. 1, d. 14673: Kamenev on July 13). 托洛茨基關於羅馬尼亞問題的便條，1920年7月17日。
- 99 Pipes, *Unknown Lenin*, 90–1; Kvashonkin, *Bol'shevistskoe rukovodstvo*, 148. 另見 Volkogonov, *Lenin: Life and Legacy*, 388 (引自 RGASPI, f. 2, op. 1, d. 348); Service, *Lenin*, III: 120.
- 100 1921年的統計數據表明，該城居民總數是79,792人，其中猶太居民是39,602人，佔總數的51.6%，而這個數據與之前相比被認為是下降了。波蘭人佔

- 46.6%，德意志人1.9%，俄羅斯人1.8%，白俄羅斯人0.8%。Bender, *Jews of Bialystok*, 18.
- 101 這個外來的革命委員會的主席是尤利安·馬爾赫列夫斯基 (Julian Marchlewski)，他沒能與城裏的波蘭共產黨 (有80名黨員) 建立聯繫。Mikhutina, *Pol'sko-Sovetskaia voina*, 190.
- 102 Lerner, "Attempting a Revolution"; Kostiushko, *Pol'skoe biuro TsK RKP (b); Materialy "Osoboi papki" Politbiuro TsK RKP (b)*; Ulam, *Expansion and Coexistence*, 109.
- 103 Skvortsov-Stepanov, *S Krasnoi Armiei*, 92-5. 斯克沃爾佐夫是目擊者，他實時記錄了自己的想法，強調當地的反猶情緒：「德佔期間，猶太人在鐵路工作。現在，比亞韋斯托克樞紐站的波蘭鐵路工人拒絕接納他們」(*S Krasnoi Armiei*, 29)。他沒有提到在紅軍到來之前以及進駐期間猶太人大批離開的情況、對波蘭人店舖和財產的剝奪，還有契卡解散猶太人的集體組織。Bender, *Jews of Bialystok*, 20 (引自 Heschel Farbstein, *Inwazja Bolszewicka a Zydzi: Zbior dokumentow* [Warsaw, 1921], I: 13-5).
- 104 Davies, "Izaak Babel's 'Konarmiya' Stories," 847; Golubev, *Direktivy glavnogo komandovaniia*, 643-4, 649.
- 105 Zamoyski, *Warsaw 1920*, 64, 69. 另見 Putna, *K Visle i obratno*, 31.
- 106 Erickson, *Soviet High Command* [1962], 101.
- 107 PSS, LI: 248.
- 108 *Iz istorii grazhdanskoi voiny v SSSR*, III: 338-9; Karaeva, *Direktivy komandovaniia frontov*, III: 244-5; Naida, *O nekotorykh voprosakh*, 224.
- 109 Mikhutina, *Pol'sko-Sovetskaia voina*, 196; *Iz istorii grazhdanskoi voiny v SSSR*, III: 336. *Leninskii sbornik*, XXXVI: 115-6.
- 110 Budennyi, *Proidennyi put'*, II: 281.
- 111 奉命轉向克里米亞同弗蘭格爾作戰的葉戈羅夫，想帶上布瓊尼的騎兵。布瓊尼、伏羅希洛夫和米寧在給托洛茨基的電報中 (8月10日)，試圖找藉口要求撤銷讓他們轉歸西方面軍的命令 (他們舉例說，補給問題越來越嚴重，情況十分危險)。在加米涅夫和圖哈切夫斯基通過直通電話進行的談話中，後者態度十分堅決：他想要得到第一騎兵集團軍。Kakurin and Melikov, *Voina s belopoliakami*, 504-6; Kuz'min, "Ob odnoi ne vypolnenoi direktive Glavkoma," 62.
- 112 Golubev, *Direktivy glavnogo komandovaniia*, 707-8.
- 113 圖哈切夫斯基和加米涅夫在8月9日午夜左右通過直通電話聯繫時，在波蘭軍隊主力的位置問題上產生了分歧：圖哈切夫斯基認為在布格河的北面，加米涅夫認為在布格河的南面。Golubev, *Direktivy glavnogo komandovaniia*, 650-2.
- 114 Brown, "Lenin, Stalin and the Failure."
- 115 Golubev, *Direktivy glavnogo komandovaniia*, 709-10; Karaeva, *Direktivy komandovaniia frontov*, III: 258-9 (葉戈羅夫與加米涅夫8月18日午夜剛過時用直通電報進行的談話)。
- 116 Tucker, *Stalin as Revolutionary*, 205.
- 117 Trotsky, *Stalin*, 329. 有文獻已經注意到這一點：Seaton, *Stalin as Military Commander*, 72.

- 118 Budennyi, *Priodennyi put'*, II: 204, 294.
- 119 Egorov, *L' vov-Varshava*, 97; Naida, *O nekotorykh voprosakh*, 226. 需要注意的是，8月12日那天，列寧表示諒解，並給斯克良斯基寫道：「是否需要指示斯米爾加，應(在糧食收完之後)徵集所有的成年男子入伍？需要。既然布瓊尼在南方，就得加強北方。」(譯註：《列寧全集》第49卷，第499-500頁) Naida, *O nekotorykh voprosakh*, 228; Golubev, *Direktivy glavnogo komandovaniia*, 615. 最終，在最高總司令的堅持下，葉戈羅夫聽從了命令，但作為委員的斯大林卻拒絕共同簽署葉戈羅夫調動第一騎兵集團軍的命令，結果布瓊尼選擇不接受命令。
- 120 Volkogonov, *Triumfi tragediia*, Ii: 103 (引自RGVA, f. 104, op. 4, d. 484, l. 11).
- 121 Davies, *White Eagle, Red Star*, 217; Budennyi, *Priodennyi put'*, II: 191-339; Egorov, *L' vov-Varshava*, 26-7. 參見Gerasimov, *First Cavalry Army*, vol. I, between 288-9.
- 122 引自 von Riekhoff, *German-Polish Relations*, 30.
- 123 Golubev, *Direktivy glavnogo komandovaniia*, 655; RGASPI, f. 5, op. 1, d. 2136 (維克托·科普 [Victor Kopp] 致列寧，1920年8月19日); Borzęcki, *Soviet-Polish Treaty of 1921*, 86; Himmer, "Soviet Policy," 672; Pipes, *Russia Under the Bolshevik Regime*, 189-90.
- 124 代表是217人，來自36個國家，其中的169名代表有表決權：Riddell, *Workers of the World*, I: 11.
- 125 PSS, XLI: 219.
- 126 *Kommunisticheskii trud*, July 29, 1920; Farbman, *Bolshevism in Retreat*, 137. 對共產國際第二次代表大會的帶有浪漫色彩的看法，參見Carr, *Bolshevik Revolution*, III: 196.
- 127 Pipes, *Russia Under the Bolshevik Regime*, 177; Degras, *Communist International* [London], I: 111-13.
- 128 F. Isserson, "Sud'ba polkovodtsa," *Druzhba narodov*, 1988, no. 5: 184, 187.
- 129 Golubev, *Direktivy glavnogo komandovaniia*, 662.
- 130 PSS, LI: 264.
- 131 PSS, LI: 266-7; Meijer, *Trotsky Papers*, II: 260-1.
- 132 Debo, *Survival and Consolidation*, 243 (引自Lloyd George Papers, F/203/1/ 9, F/203/1/10, August 24).
- 133 Putna, *K Visle i obratno*, 242. 在(兩次)請辭都被自己的同事拒絕之後，波蘭元帥開始了贖罪行動；在處於有利局面的關鍵時刻，一支紅軍暫時失去了無線電聯繫；圖哈切夫斯基卻沒有當回事；在一名波蘭戰俘那裏找回皮爾蘇茨基作戰計劃的副本；所有這些都一樣荒唐。
- 134 Borzęcki, *Soviet-Polish Treaty of 1921*, 95.
- 135 Brown, "Lenin, Stalin and the Failure," 43; Karacva, *Direktivy komandovaniia frontov*, IV: 180-2; Meijer, *Trotsky Papers*, II: 240; Melikov, *Srazhenie na Visle*, 125-7. 「前線這場災難的禍根早就埋下了，」一名指揮官向托洛茨基報告說，「在這次(華沙)行動中，波蘭軍隊的數量超過我們三倍，有些地方超過六倍。」Simonova, "Mir i schast'e na shtykakh," 63 (引用了N. 穆拉諾夫 [N. Muranov] 的話)。

- 136 *Kratkaia istoriia grazhdanskoi voiny v SSSR*, 444. 謝爾蓋·古謝夫接替斯大林擔任西南方面軍革命軍事委員會委員職務。 797
- 137 Sumbadze, *Sotsial'no-ekonomicheskie predposylki pobedy Sovetskoi vlasti*, 211 (米高揚致列寧), 212 (當地代表致斯大林); *Grazhdanskaia voina v SSSR*, II: 330.
- 138 Meijer, *Trotsky Papers*, II: 147 (托洛茨基致列寧和契切林, 1920年4月20日).
- 139 Reissner, *Oktober*, 163–5. 奧爾忠尼啟則參加過1906至1911年在伊朗北部大不里士的起義。
- 140 蘇俄人把庫丘克看作是民族主義分子, 而不是共產主義者。 *Izvestiia*, June 16, 1920 (沃日涅先斯基); *Krasnaia gazeta*, June 20, 1920 (蘇丹—加利耶夫).
- 141 Zabih, *Communist Movement in Iran*, 18; Lenczowski, *Russia and the West in Iran*, 9–10, 52–9; *Komintern i Vostok*, 75; Chaqué ri, *The Soviet Socialist Republic of Iran*, 166–213. 為了傳播革命, 蘇丹—加利耶夫想要在東部有一個獨立的共產國際和一支穆斯林紅軍, 同時把阿塞拜疆作為跳板。亞美尼亞共產黨人也希望把伊朗蘇維埃化。阿塞拜疆黨的領導人納里曼·納里馬諾夫(Nariman Narimanov)表示反對, 因為他認為伊朗的左翼力量薄弱, 主張與資產階級民族主義分子維持反帝同盟關係。
- 142 Volodarskii, *Sovety i ikh iuzhnye sosedi Iran i Afganistan*, 67–72.
- 143 Chaqué ri, *The Soviet Socialist Republic of Iran*, 214–75.
- 144 奧爾忠尼啟則和斯塔索娃幫助組織了此次大會。Gafurov, *Lenin i natsional'no-osvoboditel'noe dvizhenie*, 77.
- 145 季諾維也夫在別的地方承認, 出席大會的代表多數是黨外人士。 Carr, *Bolshevik Revolution*, III: 2 *ernatsional*, November 6, 1920). 另見 61, n1 (citing *Kommunisticheskii int Fischer, Soviets in World Affairs*, I: 283–4).
- 146 Riddell, *To See the Dawn*, 45–52, 231–2.
- 147 *Congress of the Peoples of the East. Baku, September 1920: Stenographic Report*, 21–3.
- 148 「穆斯塔法·凱末爾的運動是民族解放運動,」有位土耳其代表在巴庫說,「我們支持它, 但是, 一旦與帝國主義的鬥爭結束了, 我們相信這種運動就會轉向社會革命。」 *Peruyi s'ezd narodov vostoka*, 159.
- 149 季諾維也夫草率地號召對英帝國主義發動聖戰, 本有可能造成事與願違的後果: 它會把布爾什維克捲入到一場大範圍的戰爭中, 因為莫斯科控制不了穆斯林聖戰分子, 同時卻聽任泛突厥民族主義者和其他人追求自己的政治議題。 Blank, “Soviet Politics,” 187.
- 150 Smith, “Stalin as Commissar for Nationality Affairs,” 58; Smith, *Bolsheviks and the National Question*, 32–4.
- 151 Trotsky, *Stalin* [1968], 255–62.
- 152 1921年, 列寧對另外一位工作人員阿道夫·越飛寫道:「『機遇』使他(斯大林)在三年半來實際上從未擔任工農檢查人民委員, 也沒有擔任民族事務人民委員。」 PSS, LII: 99–101. 斯蒂芬·布蘭克根本沒有對擁有差不多資源的人民委員部的運行情況做過比較, 卻斷言斯大林想讓民族事務人民委員部運轉不下去, 以免



- 讓少數民族共產黨人擁有一個強大的工具，追求他們自己的議題。Blank, *Sorcerer as Apprentice*, 53, 64, 223–4.
- 153 Filomonov, *Obrazovanie i razvitie RSFSR*, 163. 1919年7月，民族事務人民委員部務委員會甚至建議自我解散，但人民委員會沒有同意。與此同時，有些省的蘇維埃已經關閉了轄區內民族事務人民委員部的分支機構。Smith, *Bolsheviks and the National Question*, 33 (引自 GARF, f. 1318, op. 1, d. 2, l. 104). 另見 Makarova, *Narodnyi Komissariat*. 斯大林後來繼續游說列寧，說「我堅持要求撤銷（因為在共和國聯盟成立之後，我們不需要民族事務人民委員部了）」，但列寧在斯大林的便條上寫道：「民族事務人民委員部對於滿足少數民族來說是必要的」。APRF, f.3, op. 22, d. 97, l. 136–7, 137ob., Hoover Institution Archives, Volkogonov papers, container 23.
- 154 Gizzatullin and Sharafutdinov, *Mirsaid Sultan-Galiev*, 386.
- 155 Gizzatullin and Sharafutdinov, *Mirsaid Sultan-Galiev*, 52.
- 156 Togan, *Vospominaniia*, 197. 內戰時期，斯大林還寫過另外幾篇關於民族問題的文章，並且常常是以一種拉攏的口氣。例如，在《消息報》（1919年2月22日）上，他重複了列寧兩個陣營的比喻，把世界分成「帝國主義陣營和社會主義陣營」，「美國和英國，法國和日本」屬於第一陣營，「蘇維埃俄國和一些年輕的蘇維埃共和國以及歐洲各國日益增長的無產階級革命」屬於第二陣營。斯大林相信帝國主義的「必然滅亡」，相信歐洲革命的成功具有最大的可能性，但他也指出，社會主義革命的「吼聲」在「被壓迫的東方各國發出了迴響」。（譯註：《斯大林全集》第4卷，第206–209頁）轉載於 Eudin and North, *Soviet Russia and the East*, 45–6.
- 157 Togan, *Vospominaniia*, 199, 229–30, 256.
- 158 1920年1月2日，由蘇丹—加利耶夫領導的東部各民族共產黨組織中央局向托洛茨基遞交了一份請願書，要求將斯大林從內戰前線召回，那樣他就可以「直接監督蘇維埃政權在東部的內部民族政策和對外政策」，以平息不滿、消除混亂。他們寫道：朱加什維利作為高加索人和民族問題專家，在東部人當中擁有「巨大的威信」。RGASPI, f. 17, op. 109, d. 76, l. 1–1ob.
- 159 Schafer, “Local Politics,” *passim*. 另見 Pipes, “First Experiment”; Zenkovsky, “The Tataro-Bashkir Feud”; Zenkovsky, *Pan-Turkism*, 161–9; 以及 Blank, “Struggle for Soviet Bashkiria.”
- 160 Togan, *Vospominaniia*, 193.
- 161 關於巴什基爾人，參見 Steinwedel, “Invisible Threads of Empire.”
- 162 即使斯大林在1918年沒有阻止成立大韃靼里亞，它在需要得到巴什基爾人效忠的內戰的緊急狀態中也難以生存下來。1918年3月要求成立韃靼—巴什基爾共和國的命令到1919年12月才正式取消。Iuldashbaev, *Obrazovanie Bashkirskoi Avtonomnoi Sovetskoi Sotsialisticheskoi Respubliki*, 423.
- 163 Schafer, “Local Politics,” 165–90.
- 164 Schafer, “Local Politics,” 176 (引自 GARF, f. 1318, op. 1, d. 45, l. 9, 44; RGASPI, f. 17, op. 65, d. 22, l. 218); Togan, *Vospominaniia*, 293; Sultan-Galiev, *Stat'i, vystupleniia, dokumenty*, 437.

- 165 Schafer, "Local Politics," 176; Kul'sharipov, *Z. Validov*, 128-39 (瓦利季致斯大林, 1919年5月); Murtazin, *Bashkiriia i bashkirskie voiska*, 207-11; Togan, *Vospominaniia*, 292-5.
- 166 Togan, *Vospominaniia*, 250-1.
- 167 Togan, *Vospominaniia*, 251.
- 168 *Izvestiia*, May 20 and May 29, 1920; *Pravda*, May 29, 1920; *Politika Sovetskoï vlasti*, 101-2; Batsell, *Soviet Rule in Russia*, 142.
- 169 Smith, *Bolsheviks and the National Question*, 47-8 (引自 RGASPI, f. 17, op. 3, d. 68, l. 4).
- 170 Magerovskii, *Soiuz Sovetskikh Sotsialisticheskikh Respublik*, 16n; Pipes, *Formation of the Soviet Union*, 247.
- 171 Rorlich, *Volga Tatars*, 137-8, 146-9.
- 172 *TsK RKP (b)—VKP (b) i natsional'nyi vopros*, 42-3 (RGASPI, f. 17, op. 112, d. 100, l. 83-83ob, 4).
- 173 據說斯大林在1919年對自己的副手謝苗·迪曼施泰因 (Semyon Dimanshtein) 說過：「蘇丹—加利耶夫長期斜着眼睛看我們，只是最近才老實了一點。」Blank, "Struggle for Soviet Bashkiria."
- 174 Dakhshleiger, *V. I. Lenin*, 186-7; Murtazin, *Bashkiria i Bashkirskie voiska*, 187-8; *Proletarskaia Revoliutsiia*, 1926, no. 12: 205-7; Zenkovsky, *Pan-Turkism*, 205-6.
- 175 Togan, *Vospominaniia*, 265-7.
- 176 Togan, *Vospominaniia*, 267-9. 瓦利季後來在1922年底寫信請求赦免；魯祖塔克同斯大林商量，斯大林表示同意，條件是瓦利季公開聲明放棄自己的主張，並在巴斯馬赤當中鼓動放下武器。據說從瓦利季那裏沒有再收到甚麼消息。*Tainy natsional'noi politiki TsK RKP*, 93. 在同蘇俄人打了幾年之後，瓦利季先是移居伊朗，後來又到了土耳其，他在那裏採用的姓是托安 (Togan)。
- 177 Bailey, *Mission to Tashkent*, 119-21. 這個叫做奧西波夫 (Osipov) 的陸軍人民委員逃到了伊朗。
- 178 *Zhizn' natsional'nostei*, March 2, 1919; *Sochineniia*, IV: 230-1.
- 179 Marshall, "Turkfront."
- 180 Frank, *Bukhara*.
- 181 *Dokumenty vneshnei politiki*, II: 657 (RGASPI, f. 2, op. 1, d. 14345, l. 13).
- 182 Eleuov, *Inostrannaia voennaia interventsiiia*, II: 513 (RGASPI, f. 2, op. 1, d. 14884, l. 1).
- 183 Litvak and Kuznetsov, "The Last Emir of Noble Bukhara and His Money." 另見 Becker, *Russia's Protectorates*, 273-95.
- 184 Genis, "S Bukharoi nado konchat'," 39-44, 49-56. Frunze: *Istochnik*, 1994, no. 5: 38-48.
- 185 Kvashonkin, *Bol'shevistskoe rukovodstva*, 245, n2 (RGASPI, f. 5, op. 2, d. 315, l. 83: Chicherin to Molotov).
- 186 *Gvardeitsy Oktiabria*, 269 (RGASPI, f. 124, op. 1, d. 1474, l. 3-5: 1928年的自傳材料); Beatty, *Red Heart of Russia*, 134-5. 彼得斯的妻子是英國人，所以他講的英語帶有倫敦口音。

- 187 彼得斯給莫斯科寫道：「我認為應該調查，讓那些沒有採取措施防止這些暴行的人負責。」Genis, "S Bukharoi nado konchat'," 49.
- 188 Genis, "S Bukharoi nado konchat'," 39-49 (引自 RGASPI, f. 76, op. 3, d. 234, l. 5; d. 357, l. 1); Plekhanov and Plekhanov, *F. E. Dzerzhinskii*, 596 (RGASPI, f. 76, op. 3, d. 357, l. 1: to Zinovy Katznelson, March 14, 1925).
- 189 Urazaev, *Turkestanskaia ASSR*.
- 190 Schapiro, "General Department."
- 191 *Istoricheskii arkhiv*, I (1992): 14-29, 譯文見於 Pipes, *Unknown Lenin*, 94-115 (派普斯把日期弄錯了). 另見 Westad, *Global Cold War*, 46. 在 1972 年發表的黨的第九次代表大會的速記記錄中，列寧的講話被刪掉了。
- 192 Service, *Lenin*, III: 140-5.
- 193 *Pravda*, September 29, 1920.
- 194 *IX konferentsiia RKP (b)*, 34-6 (拉狄克), 60-2 (斯大林), 75-9 (托洛茨基), 82 (斯大林), 372-3, n18. 另見 Trotsky, *Stalin*, 327-8; Tucker, *Stalin as Revolutionary*, 203.
- 195 「我們有勇無謀的先頭部隊，以為勝利在望，」列寧私下裏對德國共產黨人克拉拉·蔡特金說，「沒有任何人員和彈藥的補充，甚至沒有足夠的乾麵包」，他們只好去勒索「波蘭農民和市民」，結果「波蘭農民和市民」「把紅軍士兵視為敵人，而不是兄弟和解放者」。Zetkin, *Vospominaniia o Lenine*, 18-9; Zetkin, *Reminiscences of Lenin*, 20. 蔡特金在 1924 年首次出版了這些回憶錄。另見 *Pravda*, October 9 and October 10, 1920. 很快，列寧在黨的第十次代表大會上說：「在我們的進攻中，我們推進得太快——幾乎推進到華沙了；這毫無疑問是一個錯誤。我現在不想分析它是否是一個戰略性或政治性的錯誤，因為這樣會使我離題太遠。我想這會是未來歷史學家要做的事情。」V. I. Lenin, "Orchet o politicheskoi deiatel'nosti TsK RKP (b)" [1921 年 3 月 8 日], 見於 *PSS*, XLIII: 11.
- 196 Davies, *White Eagle, Red Star*, 208-10.
- 197 即使圖哈切夫斯基沒有被波蘭人趕出華沙，就像皮爾蘇茨基被趕出基輔一樣，難道英國和法國會袖手旁觀，任由波蘭被蘇維埃化？
- 198 紅軍士兵們聽蘇俄鼓動人員說自己是「解放者」，但他們發現迎接自己的是波蘭工人的滿腔怒火。Putna, *K Visle i obratno*, 137-8; Carr, *Bolshevik Revolution*, III: 215, n2; Mikhutina, *Pol'skaia-Sovetskaia voina*, 191-5.
- 199 「1920 年，還有 1921 年的部分時期，」一個匿名的波蘭共產黨人後來回憶說，黨是「在對革命發展速度的幻想中」工作的。Dziewanowski, *Communist Party of Poland*, 95 (引自 K., "Poland," *Communist International*, 1924, no. 1).
- 200 布爾什維克在比亞韋斯托克/別洛斯托克的存在從 1920 年 7 月 28 日持續到 8 月 22 日。就如當時一個熱情的目擊者記錄的，「波蘭革命委員會到來時帶了很少的工作人員。赤色波蘭在工作中會及時招募新人」。Skvortsov-Stepanov, *S Krasnoi Armiei*, 47.
- 201 Lerner, "Poland in 1920," at 410 (尤利安·馬爾赫列夫斯基). 另見 Suslov, *Politicheskoe obespechenie sovetsko-pol'skoi kampanii*.

- 202 在1920年秋天與德國共產黨人克拉拉·蔡特金的談話中，列寧承認：「波蘭發生的事情也許是注定要發生的……受到皮爾蘇茨基和(副總理伊格納齊·)達申斯基追隨者欺騙的農民和工人，保衛了他們的階級敵人，讓我們勇敢的紅軍士兵被餓死，把他們引進埋伏圈然後殺害他們。」Zetkin, *Vospominaniia o Lenine*, 18-9; Zetkin, *Reminiscences of Lenin*, 20. 另見 *Pravda*, October 9 and October 10, 1920.
- 203 Lerner, "Poland in 1920." 萊納錯誤地認為圖哈切夫斯基根本沒有下達向華沙進軍的命令。但他當然是下了命令：Mel'tiukhov, *Sovtesko-pol'skie voiny*, 74.
- 204 Tukhachevskii, *Pokhod za Vislu*, chapter 3, translated in Pilsudski, *Year 1920* (New York: Pilsudski Institute of New York, 1972), at 242-4. 後來各版刪掉了「來自國外的革命」一章。
- 205 他話裏有話地寫道，「由於一系列未曾料到的原因，大本營想把西南方面軍在盧布林突出部的主力重新編組，但這一努力沒有成功」。Tukhachevskii, *Izbrannye proizvedennye*, I: 154.
- 206 Shaposhnikov, *Na Visle*. 另見 McCann, "Beyond the Bug."
- 207 許多傳記作者都採取了斯大林抗命這條線索。Tucker, *Stalin as Revolutionary*, 203-5. 早期的一個例外是 Ulam, *Stalin*, 188-9. 列寧的門徒們為了保護他的名聲而犧牲了斯大林。「到底誰會從利沃夫到華沙去！」根據邦契-布魯耶維奇的一句顯然是編造的引文中，列寧說道。Na *boevykh postakh*, 283.
- 208 Kantor, *Voina i mir*, 206, 引自 Tukhachevskii's "zapiski o zhizni" (1921年9月9日)，見於他在警方那裏的卷宗：TsA FSB, ASD no. R-9000.
- 209 Lewis and Lih, *Zinoviev and Martov*.
- 210 Fischer, *Stalin and German Communism*, 146 (引自 Zinoviev, *Zwölf Tage*, 74).
- 211 Angress, *Stillborn Revolution*, 71-2; Carr, *Bolshevik Revolution*, III: 217-20; Debo, *Survival and Consolidation and Survival*, 308-9; Weitz, *Creating German Communism*, 98.
- 212 Broué, *German Revolution*, 502.
- 213 後來，蘇俄方面宣稱，比薩拉比亞的蘇俄領土被羅馬尼亞人佔領。美國和日本沒有批准該條約。1924年，作為回應，蘇聯在烏克蘭德涅斯特河的左岸成立了一個摩爾多瓦蘇維埃社會主義自治共和國。
- 214 Wyszczelski, *Varshava 1920*, 256.
- 215 Mel'tiukhov, *Sovtesko-pol'skie voiny*, 104-5.
- 216 Lenin, "Nashe vneshnee i vnutrennee polozhenie i zadachi partii," *PSS*, XLII: 17-38 (第 22 頁，1920年11月21日在俄共(布)莫斯科省代表會議上的講話)。 799
- 217 Pilsudski, *Year 1920*, 222.
- 218 *Pravda*, November 7.
- 219 Davatts and L'vov, *Ruskaia armiiia na chuzhbine*, 7. 弗蘭格爾聲稱有16萬名士兵：Hoover Institution Archives, Maria Dmitrevna Vrangeli' Collection, box 145, folder 28.
- 220 Zarubin, *Bez pobeditelei*; A. L. Litvin, "VChK v sovremennoi istoricheskoi literatury." 見於 Vinogradov, *Arkhiv VChK*, 51-70 (第59頁)。葉菲姆·葉夫多基莫夫是南方面軍特別部的首領。

- 221 Chamberlin, *Russian Revolution*, II: 431.
- 222 Kalyvas, *Logic of Violence*, 389.
- 223 Shklovsky, *Sentimental Journey*, 208.
- 224 Osipova, *Klassovaia bor'ba v derevene*, 315, 317, 321; Abramovitch, *Soviet Revolution*, 143–5; Iarov, “Krest'ianskoe vol'nenie na Severo-Zapade Sovetskoi Rossii,” 134–59; Arthur Adams, “The Great Ukrainian Jacquerie,” 見於 Hunczak, *The Ukraine*, 247–70; Graziosi, *Bol'shevikii i krest'iane na Ukraine*; Arshinov, *Istoriia makhnovskogo dvizheniia*; Danilov, *Nestor Makhno*; Aleshkin and Vasil'ev, *Krest'ianskie vosstaniia*; Raleigh, *Experiencing Russia's Civil War*.
- 225 *Novaia zhizn'*, March 26, 1918: 4 and April 19, 1918: 4, 見於 Bunyan and Fisher, *Bolshevik Revolution*, 664; *Pravda*, March 17, 1918.
- 226 Graziosi, “State and Peasants,” 65–117 (at 76–7, 87).
- 227 Landis, *Bandits and Partisans*; Danilov, *Krest'ianskoe vosstanie*. 以前的研究包括 Singleton, “The Tambov Revolt”; Radkey, *Unknown Civil War*; 以及 Delano DuGarm, “Local Politics and the Struggle for Grain in Tambov, 1918–1921,” 見於 Raleigh, *Provincial Landscape*, 59–81.
- 228 Baranov, *Krest'ianskoe vosstanie*, 79.
- 229 Aptekar', “Krest'ianskaia voina,” 50–55 (引自 GARF, f. 6, op. 12, d. 194; f. 235, op. 2, d. 56, l. 6; Shikunov).
- 230 *X s'ezd* [1921], 231.
- 231 Shishkin, *Sibirskaiia Vandeia*, II: 128.
- 232 Litvin, *Krasnyi i belyi terror*, 379 (1921年2月13日).
- 233 Landis, *Bandits and Partisans*, 165–6.
- 234 「國內外局勢已經惡化，必須扭轉這種局勢。」列寧在1921年2月24日對莫斯科黨組織說。「同波蘭至今尚未簽訂和約，在國內，盜匪活動日益猖獗，富農暴動多次發生。糧食及燃料情況大為惡化。」他把原因歸於社會革命黨人的影響，「他們的主要力量在國外；每年春天他們都夢想推翻蘇維埃政權。」Lenin, *Collected Works*, 42: 272–3 (譯註：《列寧全集》第40卷，第355–356頁)。
- 235 Maslov, *Rossia posle chetyrekh let revoliutsii*, II: 133.
- 236 *Pravda*, February 12, 1921.
- 237 列寧收到波羅的海沿岸地區工廠的九點決議：「一、打倒統治着俄羅斯社會主義共和國的共產主義和共產黨政權，因為它沒有實現俄羅斯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大多數勞動人民的利益。二、蘇維埃政權，也就是說，將會實現俄羅斯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勞動人民利益的政權萬歲……」等等。工人要求的是一個不流血的國家，並在決議最後高呼「真理萬歲，在自由的社會主義共和國中言論和新聞自由萬歲」。RGASPI, f. 2, op. 2, d. 561, l. 40.
- 238 “Doklad nachal'nika 1-go spetsial'nogo ordela VChK Fel'dmana v osobyi otdel VChK” [December 10, 1920], 見於 Avrich, *Kronstadt, 1921*, 19–23. 2月28日，在喀琅施塔得問題上，莫斯科的政治局決定採取強硬立場。契卡副主席克謝諾豐托夫在命令中說：「社會革命黨和孟什維克分子利用工人對生活條件艱苦所產生的本能的不

- 滿情緒，試圖煽動起有組織的、席捲全國的反對蘇維埃政權和俄國共產黨的罷工運動。」Prikaz VChK, “‘Ob usilenii bor’by s konterrevoliutsiie,” 見於 Avrich, *Kronstadt, 1921*, 36–7.
- 239 *Izvestiya Vremennogo revoliutsionnogo komiteta matrosov, krasnoarmeitsev i rabochikh*, March 3, 1921; Avrich, *Kronstadt, 1921*, 50–1; *Kronstadtskaia tragediia*, 114–5; Getzler, *Kronstadt*, 205–45 (esp. 213–4). 據說在聯邦安全局檔案館中收藏了三百多卷關於喀琅施塔得的檔案文件，這些是從包括契卡自身在內的許多機構和出版物中收集的：*Kronstadtskaia tragediia*, I: 30. 流亡巴黎的帕維爾·米留可夫給喀琅施塔得的口號是「沒有共產黨人的蘇維埃」，那原本是蘇維埃為防備水兵而作的宣傳，並且一再使用。*Poslednie novosti*, March 11, 1921.
- 240 *Pravda*, March 3, 1921; *Kronstadtskaia tragediia*, I: 130–1. 托洛茨基在3月1日那天抱怨說，自己無法獲得有關喀琅施塔得事態發展的可靠情報。第二天，季諾維也夫、加里寧和拉舍維奇打電話給托洛茨基的助手格魯申：「我們現在確信，在喀琅施塔得發生的一系列事件是要準備暴動……我們需要你們的幫助。」他們要求得到裝甲車和可靠的部隊（在用電報發出這些內容時，這幾個字被刪掉了）。Avrich, *Kronstadt, 1921*, 59. 在15人的革命委員會中，根本沒有從前的沙皇軍官，但有一些軍官受邀幫助制訂喀琅施塔得的防禦計劃。
- 241 Avrich, *Kronstadt, 1921*, 60, 68.
- 242 *Kronstadtskaia tragediia*, I: 215; Brovkin, *Behind the Front Lines*, 396–7. 被扣為人質的包括科茲洛夫斯基的所有親屬（27人，包括他的妻子和孩子）和佩特里琴科的所有親屬（包括沒有親屬關係而只是與他同名的人）。
- 243 Trotskii, *Kak vooruzhalas’ revoliutsiia*, III/ i: 202; Berkman, *Kronstadt*, 31–2. 報紙主編A. 拉馬諾夫（A. Lamanov）後來也被處決。在喀琅施塔得2,680名共產黨員和候補黨員中，至少有900人退黨，許多人要求在報紙上發表他們的退黨聲明。
- 244 Krasnov and Daines, *Neizvestnyi Trotskii*, 339–41.
- 245 *Kronstadtskaia tragediia*, I: 287.
- 246 Krasnov and Daines, *Neizvestnyi Trotskii*, 345.
- 247 讓圖哈切夫斯基震驚的是，有一個被認為絕對可靠的西伯利亞步兵師，是他特意選來執行任務的，竟然拒絕鎮壓水兵。「如果27師不願意幹，」政權的某位官員在3月14日表示，「那就沒有人願意幹了。」3月15日，革命法庭將許多不服從命令的士兵判處死刑，報紙報道了這個消息。Avrich, *Kronstadt, 1921*, 188 (V. Nasonov); Minakov, *Sovetskaia voennaia elita*, 269.
- 248 *X’ezd*, 750–65.
- 249 *Sotsialisticheskoe stroitel’stvo SSSR*, 2–3; Gladkov, *Sovetskoe narodnoe khoziaistvo*, 151, 316, 357; Klepikov, *Statisticheskii spravochnik po narodnomu khoziaistvu*, 26 (table 8); S. G. Wheatcroft, “Agriculture,” 見於 Davies, *From Tsarism to the New Economic Policy*, at 94.
- 250 RGASPI, f. 17, op. 109, d. 6, l. 80.
- 251 Gimpel’son, *Sovetskii rabochii klass*, 80–2; Selunskaiia, *Izmeneniia sotsial’noi struktury sovetskogo obshchestva*, 258. 迪亞娜·肯克譏諷說：「當布爾什維克的領導人看到支

- 持率下滑的時候，他們不是改變態度，而是怪罪支持者在肉體上消失了。」Diane Koenker, "Introduction: Social and Demographic Change in the Civil War," 載於 Koenker, *Party, State, and Society*, at 51.
- 252 Chamberlin, *Russian Revolution*, II: 431–6; Carr, *Bolshevik Revolution*, I: 197–200.
- 800 253 *XX s"ezd*, 98 (Rafail); Pavliuchenkov, "Orden mechenossev," 37–48.
- 254 Lenin, *Collected Works*, 32: 41, 43, 52, 86. 「把這些分歧交給黨內作廣泛的討論和交給黨的代表大會，是一個大錯」，他斷言，因為爭論顯露出「黨生病了」。Harding, "Socialist, Society, and the Organic Labour State," 33.
- 255 *X s"ezd* [1921], 1; *X s"ezd* [1933], 4. 工人反對派提交了他們自己的決議以供考慮（這是最後一次由組織以外的人提交決議），但是沒有對這些決議進行表決。
- 256 Lenin, *Collected Works*, 32: 206.
- 257 *X s"ezd* [1921], 207; *X s"ezd* [1933], 380–1. 在同一次演講裏一段經常被人斷章取義地引用的話中，列寧還說——他是指托洛茨基的勞動軍動員活動，「我們無論如何必須先說服，然後再強制。我們沒有能夠說服廣大群眾……」（譯註：《列寧全集》第41卷，第47頁）*X s"ezd* [1921], 208; *X s"ezd* [1933], 382.
- 258 該條約恰好是列寧親自簽署的。Carr, *Bolshevik Revolution*, I: 386; Arthur Adams, "The Great Ukrainian Jacquerie," 載於 Hunczak, *The Ukraine*, 247–70 (at 260).
- 259 Borys, *Sovietization of the Ukraine*. 另見 Wolfe, "The Influence of Early Military Decisions."
- 260 Magerovsky, "The People's Commissariat," I: 179–84.
- 261 "Ob ocherednykh zadachakh partii v natsional'nom voprose: tezisy k X s"ezdu RKP (b)," *Pravda*, February 10, 1921, 見於 *Sochineniia*, V: 15–29 (at 21–2). 外交人民委員格奧爾吉·契切林反對斯大林的提綱，聲稱斯大林把民族國家和多民族國家一分為二的觀點是過時的，因為現在由於帝國主義和全球性金融實體的影響，已經出現了超民族國家。因此，鬥爭不是強國與弱國、獨立國家與殖民地國家之間的鬥爭，而是革命的工人階級與超民族的資本主義托拉斯之間的鬥爭。Chicherin, "Protiv tezisov Stalina," *Pravda*, March 6, 8, 9, 1921.
- 262 Borys, *Sovietization of the Ukraine*, 343.
- 263 *X s"ezd* [1933], 184–91, *Sochineniia*, V: 33–44.
- 264 *X s"ezd* [1933], 191–2; *X s"ezd* [1963], 187.
- 265 *X s"ezd* [1933], 192–205; *X s"ezd*, [1921], 189–96. 這一大膽的說法——不是黨製造了突厥斯坦的革命，而是相反——成了他同年出版的一本書的基礎。Safarov, *Kolonial'naia revoliutsiia*, 最初是作為一篇短文發表於 *Kommunisticheskii Internatsional*, 1920, no. 14: 2759–2768. 薩法羅夫這人卓爾不群：曾經與列寧一起乘坐鉛封列車回國；1919年9月在列昂季耶夫大街的莫斯科黨組織遭到炸彈恐怖襲擊時受過傷。在與黨的突厥斯坦局負責人托姆斯基發生爭執之後，薩法羅夫和托姆斯基都被召回。
- 266 *X s"ezd* [1933], 210. 「有必要……考慮並適應當地的情況」，米高揚在黨的第十次大表大會上說。Massell, *Surrogate Proletariat*, 44.

- 267 *Xs'ezd* [1933], 214.
- 268 *Xs'ezd* [1933], 214–7; *Sochineniia*, V: 45–9.
- 269 *Xs'ezd* [1933], 573–83, 749; *Vsesoiuznaia Kommunisticheskaia Partiiia (b) v rezoliutsiakh* [5th ed.], I: 393.
- 270 RGASPI, f. 4, op. 2, d. 527, l. 38 (達尼舍夫斯基), f. 17, op. 84, d. 200, l. 18; Pavliuchenkov, *Krest'ianskii Brest*, 261.
- 271 *Xs'ezd* [1921], 327; *Xs'ezd* [1933], 856–7; *Izvestiia*, March 23, 1921.
- 272 *Xs'ezd* [1921], 222; *Xs'ezd* [1933], 406.
- 273 Malle, *Economic Organization of War Communism*, 446–7 (奧辛斯基).
- 274 Sakharov, *Na Rasput'e*, 12–3. 在黨的第十次代表大會上，托洛茨基提醒代表們注意，這些措施他在一年前已經建議過，只是在中央委員會裏被拒絕了(*Xs'ezd*, 349–50)。為了阻止「經濟的惡化」，他曾經建議「用固定比例的扣除，或者說實物稅，來代替徵收剩餘產品，那樣一來，地種得好仍然可以有利可圖」。他還進一步建議說，「交給農民的工業品的數量與所播種糧食的數量應該表現出一種更緊密的關係」。換句話說，要讓農民提高產量，就應該對農民採取激勵措施，要讓農民有更好的待遇。托洛茨基的建議，〈工業和農業政策中的根本問題〉發表於1926年。Trotsky, *Sochineniia*, XVII/ ii: 543–4. 托洛茨基在流亡時關於自己對新經濟政策的所謂預見性的描述，是非常不準確的。Trotsky, *Moia zhizn'*, II: 199. 另見 Pavliuchenkov, *Krest'ianskii Brest*, 158–9. 參見 Danilov, “We Are Starting to Learn About Trotsky.”
- 275 Baranov, *Krest'ianskoe vosstanie*, 14–5. 在1920年6至7月的糧食工作會議上，在某些官員的推動下，實物稅問題被擺上議事日程。列寧成立了一個政府委員會，檢查實物稅問題，包括對稅後的剩餘產品進行合法的私人貿易時帶來的後果問題。這一問題在《真理報》上(1921年2月17日和26日)展開了爭論。Genkina, “V. I. Lenin i perekhod k novoi ekonomicheskoi politike,” 11.
- 276 這是布爾什維克難以接受的：1920年12月，孟什維克費奧多爾·唐恩曾建議實行糧食供應稅，但否認他還希望實行自由貿易的說法。Lih, *Bread and Authority*, 220.
- 277 *Xs'ezd* [1921], 223–4; *Xs'ezd* [1933], 409.
- 278 「1920年秋天和1921年春天，內戰打贏了，而饑荒已經蔓延開來，為甚麼還允許繼續徵糧呢？」奧蘭多·費吉斯問道。他的回答是：地方上負責徵糧的官員要麼是些機械地執行中央政策的人，要麼本身就是狂熱分子，不管甚麼事，只要看來對捍衛新政權有必要，他們就樂意做。Figes, *Peasant Russia*, 271–2. 另見 Chamberlin, *Russian Revolution*, II: 375.
- 279 *Xs'ezd*, 224, 468; PSS, XLIII: 69–70. 梁贊諾夫曾在1917年11月幫助加米涅夫，想要組建一個完全由社會主義者組成的聯合政府。
- 280 *Xs'ezd* [1921], 281; *Xs'ezd* [1933], 523–4.
- 281 *Xs'ezd* [1933], 736. 只有「工人反對派」的成員——他們也不主張實行自由貿易——反對「關於黨的統一」的決議。來自盧甘斯克的五金工人、工聯主義者尤利·盧



托維諾夫 (Yuri Lutovinov, 生於1887年) 是「工人反對派」的主要領導人之一，他後來因為官僚主義和新經濟政策的擴散而在1924年自殺。他是第一個在新落成的列寧墓受到紀念的人 (1924年5月10日)，當時領導層爬上木梯，在高大的立方形建築上向人群發表講話。 *Izvestiia*, May 11, 1924. 斯大林很快就阻止用這樣的方式來紀念自殺者。

- 282 *Xs'ezd* [1921], 289; *Xs'ezd* [1933], 540; *Xs'ezd*, 533–4. 據後來叛逃的巴爾明說，拉狄克在1921年年初對莫斯科軍事學院的一群學生說，饑餓的、精疲力竭的工人沒有心情再作出犧牲了，但黨不會順從工人的 (實際) 意願，黨會為了勝利而繼續努力。學生們用步槍武裝起來，準備加入到與反革命的戰鬥中，但那可能意味着要去對付工人，而政權正是以這些工人的名義存在的，這將是對忠誠的極度考驗。 Barmine, *One Who Survived*, 94.
- 283 Zinov'ev, *Sochineniia*, VI: 626.
- 801 284 Pavlova, *Stalinism*, 47–8 (引自 PANO, f. 1, op. 2, d. 12a, l. 14, 18, 20: K. 達尼舍夫斯基致時任西伯利亞黨組織負責人的伊萬·斯米爾諾夫)。
- 285 Krasnov and Daines, *Niezvestnyi Trotskii*, 346; Voroshilov, "Iz istorii podavleniia Kronstadtskogo miatezha," 22. 政權散佈詆毀性的消息，說叛亂分子不是1917年的「有覺悟的」水兵，而是來自農村的新兵，包括從黑海艦隊調來的「烏克蘭」農民 (這是對一個民族的誹謗)。因此，對於屠殺他們，沒有哪個真正的社會主義者會感到良心不安。孟什維克曾在1917年使用這樣的指控來為工人支持布爾什維主義辯解。 Service, *Bolshevik Party in Revolution*, 44. 另見 Figs, *A People's Tragedy*, 830.
- 286 Mlechin, *Russkaia armia mezhdu Trotskim*, 194. 黨代表大會的代表們在途中遇到了到莫斯科向黨代表大會報告的季諾維也夫，他描述的喀琅施塔得的形勢不太樂觀。
- 287 在革命委員會的15名成員中，被俘的只有3人：彼得·米哈伊洛維奇·佩列皮奧爾金 (Petr Mikhailovich Perepelkin, 1890–1921)、謝爾蓋·斯捷潘諾維奇·韋爾希寧 (Sergei Stepanovich Vershinin, 1886–1921) 和弗拉季斯拉夫·安東諾維奇·瓦爾克 (Vladislav Antonovich Val'k, 1883–1921)。 Avrich, *Kronstadt, 1921*, 179. 大多數政治避難者後來都通過大赦回到國內。
- 288 Getzler, "The Communist Leaders' Role," 35–7.
- 289 Avrich, *Kronstadt, 1921*, 252–6 (APRF, f. 26, op. 1, d. 80, l. 26–34).
- 290 黨代表大會派去參加鎮壓的人員返回莫斯科的時候，列寧在3月21日接待了他們，並拍了一張集體紀念照，頒發了獎章。1930年代，這些領導鎮壓叛亂的人將會被處決。 Voroshilov, "Iz istorii podavleniia Kronshtadtskego miatezha."
- 291 Deutscher, *Prophet Unarmed*, 55–6; Trotskii, *Kak vooruzhalas' revoliutsiia*, III/ 1: 81.
- 292 DVP SSSR, III: 607–14; *Izvestiia*, May 7, 1921 (克拉辛); Krasin, *Voprosy vneshnei torgovli*, 286–8. 另見 Shishkin, *Stanovlenie vneshnei politiki postrevoliutsionnoi Rossii i kapitalisticheskii mir*, 101–16.
- 293 Glenny, "The Anglo-Soviet Trade Agreement." 迪博認為，李維諾夫與詹姆斯·奧格雷迪 (James O' Grady) 1920年在哥本哈根達成的協議「打開了通往之後更全面的談判的道路」。 Debo, "Lloyd George and the Copenhagen Conference."

- 294 Andrew, *Her Majesty's Secret Service*, 262–73; Andrew and Gordievsky, *KGB*, 76–9.
- 295 *Documents on British Foreign Policy*, VIII: 886–9.
- 296 「我們從哪裏得到商品？自由貿易需要商品，農民都是些非常聰明的人，而且他們極其擅長嘲笑別人。」*Xs"ezd* [1921], 227; *Xs"ezd* [1933], 413.
- 297 波蘭得到了西白俄羅斯和西烏克蘭的控制權，增加了5.2萬平方英里的領土，波蘭人也變成了佔人口總數30%的少數民族（500萬烏克蘭人、150萬白俄羅斯人、100萬德意志人，以及300萬猶太人），這一點成了國內潛在不穩定的根源。列強起初拒不承認波蘭在東部的新的邊界。協約國在1923年3月很不情願地接受了波蘭在東部的邊界線；德國繼續拒絕予以承認。Wandycz, *Soviet-Polish Relations*, 250–90.
- 298 由於蘇俄人與波蘭人之間玩弄的外交策略，像愛沙尼亞和拉脫維亞一樣，立陶宛的獨立地位也得到了再次確認。蘇維埃俄國曾經考慮把多數居民都講波蘭語的維爾諾/維爾紐斯交給立陶宛，想以此來削弱立陶宛民族國家，但在最後還是同意不干涉波蘭和立陶宛關於這座有爭議的城市的衝突，實際上就是保證波蘭在事實上的控制權。Boręzcki, *Soviet-Polish Treaty of 1921*, 220–1. 1923年，莫斯科出爾反爾，停止了遣返工作；此外還有一百多萬波蘭難民也不允許離開蘇聯。雙方為了波蘭（波蘭王國）在沙皇俄國的黃金儲備中佔有的份額針鋒相對；莫斯科從來沒有歸還已達成一致的3,000萬金盧布（是從原來要求的3億減少到3,000萬）。1927年，在收到用寶石償還的兩大筆款項之後，波蘭人對剩下的大部分錢不再抱有希望，而是退而求其次，要求歸還他們的文化珍寶。
- 299 Gruber, *International Communism*, 316; Angress, *Stillborn Revolution*, 109–10.
- 300 Angress, *Stillborn Revolution*, 163 (引自 *Rote Fahne*, April 4, 1921).
- 301 1921年6月25日，季諾維也夫在莫斯科向共產國際第三次代表大會作了總結報告。在接下來幾天時間的討論中，他、布哈林以及拉狄克為德國的「三月行動」進行了辯護；列寧、托洛茨基和加米涅夫指責此次行動。斯大林當時不在莫斯科，有位與會的德國人後來說，「1921年在莫斯科待上六個月都有可能不知道他的存在，」他還說，「列寧根本沒有甚麼驚人之處，沒有甚麼讓人印象深刻的東西……但在大會的分組討論中，他講道理的方式，他說話的語氣，他的結論的邏輯性，都讓人心悅誠服」。Reichenbach, "Moscow 1921," 16–17.
- 302 Angress, *Stillborn Revolution*, 137–196.
- 303 *Xs"ezd* [1933], 35; *PSS*, XLIII: 24.
- 304 Markina and Federovna, *Baltiiskie moriaki*, 322–3; Getzler, *Kronstadt*, 219. 另見 Getzler, "The Communist Leaders' Role."
- 305 Avrich, *Kronstadt, 1921*, 138–9 (March 5). 缺乏證據可以證明科茲洛夫斯基參與了喀琅施塔得事件，這一點被掩蓋了：3月25日，政治局成立了一個研究喀琅施塔得事件的委員會，負責該委員會的是人稱雅科夫·阿格拉諾夫 (Yakov Agronov) 的謝苗·索連松 (Semyon Sorenson, 生於1893年)，曾經的社會革命黨人和契卡特工人員，他的內部報告認為：「對於叛亂的快速清算顯然沒有給白衛分子和口號提供出現的機會。」*Kronstadtkaia tragediia*, II: 33–43 at 42–3 (TsA FSB RF, d. 114

728, t. 1A); Avrich, *Kronstadt, 1921*, 230–42. 契卡後來還盯上了俄國紅十字會，後者在3月8日取道芬蘭趕到喀琅施塔得，並設法帶去了100袋麵粉和一些醫療物資。紅十字會代表團成員包括從前的塞瓦斯托波爾要塞司令、已經移居芬蘭的帕維爾·維克托羅維奇·威爾肯 (Pavel Viktorovich Vilken) 男爵。水兵們對於是否讓紅十字會進城有過猶豫，雖然他們極度需要糧食和藥品。紅十字會代表團在到達第二天就離開了；威爾肯留了下來，但水兵們知道他是君主派，所以拒絕了他提出的提供800名武裝人員的建議。

- 306 PSS, LXIII: 130–43 (1921年3月27日對運輸工人的講話)。列寧明白喀琅施塔得水兵本身並不是白衛分子。他深信不疑地對第十次代表大會的代表們說(3月15日)，「稍微有點覺悟的農民都不會不理解」，「任何倒退都意味着恢復沙皇的舊政府。喀琅施塔得的經驗就表明了這一點。那裏不要白衛分子，也不要我們的政權，然而別的政權又沒有。因此，他們所處的情況就是一種最好的宣傳，這種宣傳有利於我們而不利於其他任何新的政府。」(譯註：《列寧全集》第41卷，第64–65頁)換句話說，大概布爾什維主義與白衛復辟之間的其他政治可能性根本不存在。可喀琅施塔得水兵並不是白衛分子。*Xs'ezd* [1921], 227–8; *Xs'ezd* [1933], 414.
- 307 契卡反倒是發佈了一則轟動一時的公告，〈關於在彼得格勒揭露反蘇維埃政權陰謀的通告〉，它提到在彼得格勒有個由V. N. 塔甘采夫 (V. N. Tagantsev) 教授領導的戰鬥組織(塔甘采夫已於1921年5月被逮捕)。 *Izvestiia*, August 31, 1921.
- 802 308 似乎對社會革命黨領袖維克托·切爾諾夫念念不忘的捷爾任斯基，援引切爾諾夫在愛沙尼亞塔林流亡時的出版物作為他與白衛分子合作的證據。Dzerzhinskii, "Doklad o vserossiiskoi chrezvychainoi komissii o raskrytykh i likvidirovannykh na territorii RSFSR zagorovakh protiv sovetskoï vlasti v period maia-iiunia 1921 goda," TsA FSB, f. 1, op. 5, d. 10, l. 1–20, 載於 Vinogradov, *Arkhiv VChK*, 593–612. 切爾諾夫根本沒有參與喀琅施塔得事件：他從愛沙尼亞派信使給喀琅施塔得革命委員會送了一張便條，指出他作為(被解散的)立憲會議主席，將會來到島上領導恢復立憲會議的鬥爭，但是在3月12日的會議上，只有一名水兵表示支持，結果該建議被擱置了。3月13日，佩特里琴科送了一張表示感謝的便條，但是被拒收了。*Kronstadtskaia tragediia 1921*, I: 403; Avrich, *Kronstadt, 1921*, 124–5.
- 309 *Sotsialisticheskii vestnik*, March 18, 1921: 6.
- 310 Martov, "Kronshtadt," *Sotsialisticheskii vestnik*, April 1921, no. 5: 5; Burgin, *Sotsial-demokraticheskaia menshevistskaia literatura*, 297.
- 311 Getzler, *Martov*, 204–17; Burbank, *Intelligentsia and Revolution*, 59.
- 312 PSS, XLIII: 241–2.
- 313 Esikov and Kanishev, "Antonovskii NEP," 60–72.
- 314 "Zapiska E. M. Sklianskogo 26 Aprelia 1921 g.," 見於 Lenin, *V. I. Lenin*, 428–9, 459–60. 列寧在莫斯科接見圖哈切夫斯基決不會晚於1920年12月19日，他們在那裏討論了南方面軍的形勢，列寧還要求把報告送一份給斯克良斯基。1921年4月底，列寧在圖哈切夫斯基被派去坦波夫的時候再次接見了他。Golikov, *Vladimir Il'ich Lenin*, VIII: 130.

- 315 *Kronstadtskaia tragediia*, I: 291 (季諾維也夫).
- 316 Baranov, *Krest'ianskoe vosstanie*, 147–8; Meijer, *Trotsky Papers*, II: 460–2 (托洛茨基後來在回憶時把時間誤記成6月；圖哈切夫斯基的任命在1921年4月28日得到了政治局的批准).
- 317 Landis, *Bandits and Partisans*, 209–41.
- 318 Aptekar', "Khimichistka po-Tambovskii," 56 (RGVA, f. 190, op. 3, d. 514; l. 73; f. 34228, op. 1, d. 383, l. 172–4; f. 7, op. 2, d. 511, l. 140, 151; 140, f. 235, op. 2, d. 82, l. 38; op. 3, d. 34, l. 1ob.); Baranov, *Krest'ianskoe vosstanie*, 179. 至於要查清楚氣氛使用範圍所存在的困難，參見Landis, *Bandits and Partisans*, 265–9.
- 319 "Sfotografirovannye rechi": govoriat uchastniki likvidatsii antonovshchiny," *Otechestvennye arkhivy*, 1996, no. 2: at 65 (chief of camps at Tambov, claiming 2,000 inmates); Werth, "A State Against Its People," 110–17. 圖哈切夫斯基很快就總結了他在鎮壓暴動的過程中得到的教訓：「如果驅逐不能立即組織起來，那就應當建立一大批集中營。」 Mikhail Tukhachevskii, "Bor'ba s kontrerevolutsionnymi vosstaniiami," *Voina i revoliutsiia*, 1926, no. 6: 6–9, no. 7: 11–13. 有些監獄是世界大戰時的集中營。
- 320 Baranov, *Krest'ianskoe vosstanie*, 223–4, 226–7. 在坦波夫，1922年3–9月，有217人自願退黨，新入黨的只有29人，而且他們中幾乎沒有人是出身於工人階級。 Pavliuchenkov, "Orden Mechenostsev," 275 (引自RGASPI, f. 17, op. 11, d. 110, l. 163).
- 321 Zdanovich, *Organy gosudarstvennoi bezopasnosti*, 236–8; Plekhanov, *VChK-OGPU*, 360; Landis, *Bandits and Partisans*, 277–9.
- 322 Mnatsakanian, *Poslantsy Sovetskoi Rossii*, 56–7.
- 323 King, *Ghost of Freedom*, 169.
- 324 Kazemzadeh, *Struggle for Transcaucasia*, 288–9; Iskenderov, *Iz istorii bor'by kommunisticheskoi partii Azerbaidzhana za pobedu sovetkoi vlasti*, 527–9.
- 325 就像饒爾丹尼亞在1918年把考茨基作為權威來引用時所解釋的那樣，「取得勝利的無產階級第一步不是社會改造，而是開始建立民主制度，實現黨的最低綱領，然後再逐步向社會主義最高綱領過渡。」Suny, *Georgian Nation*, 195.
- 326 Jordania, "Staline, L'écho de la lutte"; Vakar, "Stalin"; Kazemzadeh, *Struggle for Transcaucasia*, 184–210; Suny, *Transcaucasia*, 249.
- 327 「自由、獨立的格魯吉亞社會民主黨國家，」目睹過這個孟什維克共和國的一位有洞察力的人寫道，「將會作為帝國主義『小民族』的經典範例，永遠銘記在我的心頭。無論是對外的搶奪領土，還是對內的官僚主義暴政，它的沙文主義都無以復加。」Bechhofer, *In Denikin's Russia*, 14.
- 328 *Pravda*, May 8, 1920; *Mirnyi dogovor mezhdru Gruziei i Rossiei*. 格魯吉亞的秘密談判團隊包括格里戈爾·烏拉塔澤 (Grigol Uratadze)、達維德·薩吉拉施維里 (1917年在他曾流放過的察里津任蘇維埃主席) 和阿里斯托特爾·米爾斯基-柯巴希澤 (Aristode Mirsky-Kobakhidze)。派到格魯吉亞搞顛覆活動的米爾斯基-柯巴希澤或許是從麥捷希監獄的牢房開始實踐這一和平使命的。在去莫斯科的途中，這幾個人被奧爾忠尼啟則——他宣佈自己會進行談判——攔住了。米爾斯基-柯巴

希澤設法聯繫了列寧，列寧否決了奧爾忠尼啟則的說法。契切林讓自己的副手列夫·加拉罕簽了字；烏拉塔澤代表格魯吉亞政府簽了字。1921年5月10日，列寧在辦公室接待了烏拉塔澤。烏拉塔澤和薩吉拉施維里也得到斯大林的接待。在莫斯科的格魯吉亞人一起舉行了宴會。De Lon, "Stalin and Social Democracy." 烏拉塔澤在記述中沒有提到薩吉拉施維里和米爾斯基：Uratadze, *Vospominaniia*. 後來在1921年，契卡逮捕了薩吉拉施維里並把他（再次）關押到麥捷希；1922年11月，他和一大批人一起流亡德國。

329 至於這份秘密附件，參見 *Rossiiskaia Sotsialisticheskaia Federatiivnaia Sovetskaia Respublika*, 16.

330 *Gleb Maksimilianovich Krzhizhanovskii*, 33–4.

331 David Dallin, "Between the World War and the NER," 載於 Haimson, *The Mensheviks*, 191–239 (at 236). 達林是一個孟什維克，出席了那次代表大會。

332 Smith, *Bolsheviks and the National Question*, 4 (引自 RGASPI, f. 17, op. 3, d. 74, l. 3; d. 122, l. 2; d. 46, l. 3; d. 55, l. 5).

333 Boersner, *The Bolsheviks*, 63.

334 *Sochineniia*, IV: 408. 斯大林在《真理報》(12月4日)上把達什納克黨人說成是「協約國的代理人」。 *Sochineniia*, IV: 413–4 (譯註：《斯大林全集》第4卷，第364頁)。

335 *Sochineniia*, IV: 162, 237, 372. 進一步的推動力可能來自於陰魂不散的卡爾·考茨基，他是布爾什維主義的眼中釘和格魯吉亞孟什維主義的英雄。從1920年9月到1921年1月，他一直在那個非布爾什維克的社會主義共和國訪問。他發現獨立的「格魯吉亞甚麼也不缺，不僅可以成為世界上最美麗的國家之一，還可以成為世界上最富裕的國家之一」。 Kautsky, *Georgia*, 14.

336 Jones, "Establishment of Soviet Power," 620–1.

337 Smith, "The Georgian Affair of 1922," 523 (引自 RGASPI, f. 17, op. 3, d. 122, l. 2; op. 2, d. 46, l. 3; d. 55, l. 5; d. 56, l. 1); Makharadze, *Pobeda sotsialisticheskoi revoliutsii v Gruzii*, 420–3; Zhordania, *Moia zhizn'*, 109–12. 一直在烏拉爾的托洛茨基要求調查。1921年年底，馬哈拉澤對格魯吉亞駐莫斯科代表茨哈卡亞抱怨說：「高加索局的有些同志，即使到現在也不承認幾個外高加索共和國的正式存在，而是把它們看作俄羅斯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的幾個省。」 Smith, "The Georgian Affair of 1922," 524 (引自 RGASPI, f. 157, op. 1/c, d. 14, l. 1–5).

803

338 PSS, XLII: 367. 3月2日，列寧寫信給奧爾忠尼啟則，要求「必須採取對格魯吉亞的知識分子和小商人讓步的特殊政策……極其重要的是，尋找適當的妥協辦法，同饒爾丹尼亞或像他那樣的格魯吉亞的孟什維克結成聯盟……請記住，現在無論格魯吉亞所處的國內條件或國際條件都要求格魯吉亞的共產黨員不要硬搬取俄國的公式，而要善於靈活地制定以對各種小資產階級分子採取更大讓步為基礎的特殊策略。」 Lenin, *Collected Works*, 32: 362 (譯註：《列寧全集》第40卷，第378頁)。

339 Ordzhonikidze, *Stat'i i rechi*, I: 172.

340 就如奧爾忠尼啟則1921年11月底在梯弗利斯說的，他想用——按斯大林的話說——「燒紅的烙鐵」、「燒毀民族主義的殘餘勢力」。 Ordzhonikidze, *Stat'i i rechi*, I: 21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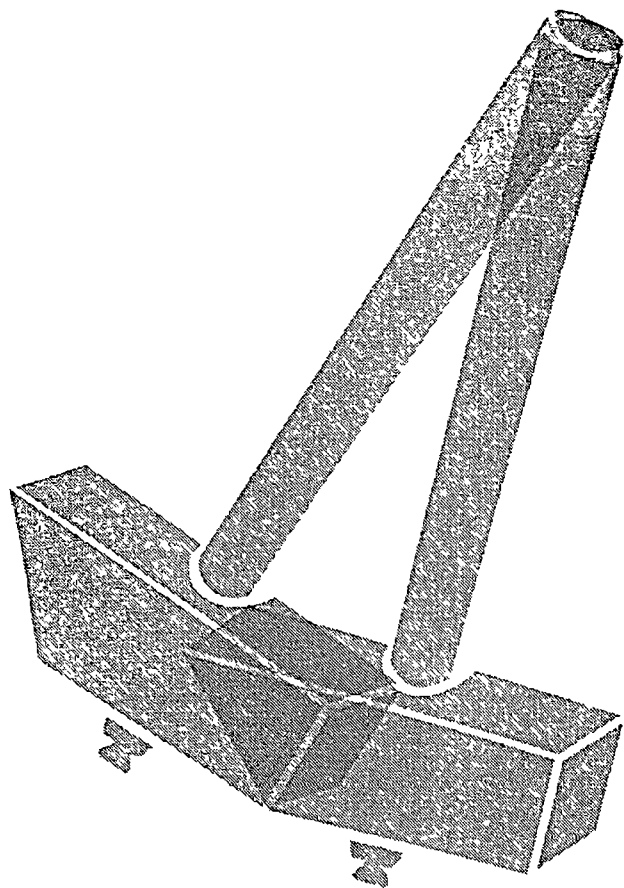
- 341 King, *Ghost of Freedom*, 173; Avalov, *Nezavisimosti Gruzii*, 285.
- 342 King, *Ghost of Freedom*, 171.
- 343 參見丘吉爾1919年8月16日的長篇備忘錄，其摘要見於Churchill, *World Crisis*, 251–3.
- 344 Avalov, *Nezavisimosti Gruzii*, 288–9; Avalishvili, *Independence of Georgia*, 266–8. 英國專員奧利弗·沃德羅普是研究格魯吉亞文學與歷史的學者。
- 345 *Dokumenty vneshnei politiki*, II: 755; Garafov, “Russko-turetskoe sblizhenie,” 247.
- 346 格魯吉亞人未能在海外創建一個文化中心。Rayfield, *Literature of Georgia*, 234.
- 347 世界大戰期間，在沙皇軍隊中參戰的格魯吉亞人有15萬多，但是，除去戰死的、被俘的和擅離職守的，克維尼塔澤將軍只召集了1萬人。吉奧爾吉·克維尼塔澤 (Giorgi Kvinitadze, 奇科瓦尼 (Chikovani) 將軍 (1874–1970)) 出生於達吉斯坦，先後畢業於聖彼得堡的聖康斯坦丁步兵學校和總參軍事學院。他不說格魯吉亞語。他與饒爾丹尼亞相處得不好，但後者請他擔任總司令。他反感格魯吉亞孟什維克利用社會主義和國際主義的動人言辭濫用權力，反感他們相信「民兵」而不相信真正的軍隊。他們任由他離開，接着到危急關頭又再次請他出馬。1922年他開始在巴黎寫回憶錄；後來他和饒爾丹尼亞葬在同一個墓地。Kvinitadze, *Moi vospominaniia*.
- 348 3月17至18日，饒爾丹尼亞派使者與就在巴統外面的布爾什維克黨人 (斯大林的妻兄阿廖沙·斯瓦尼澤、阿韋利·葉努基澤和馬米亞·奧拉赫拉施維里 (Mamiya Orakhelashvili)) 談判；孟什維克同意讓紅軍從巴統港進入，以防它被土耳其人奪走，並同意為德米特里·日洛巴的騎兵提供四輪馬車。布爾什維克承諾赦免孟什維克並在蘇維埃政府中為他們提供職位。孟什維克不相信這些承諾。
- 349 饒爾丹尼亞後來在巴黎南面安頓下來；最後他得到了皮爾蘇茨基的庇護。
- 350 Kuleshov, “Lukollov mir,” 72–3 (RGASPI, f. 78, op. 1, d. 46, l. 1, 3).
- 351 RGASPI, f. 558, op. 4, d. 675, l. 1–23.
- 352 RGASPI, f. 2, op. 1, d. 24278, l. 1–2.
- 353 Golikov, *Vladimir Il'ich Lenin*, VI: 390, IX: 348, 618, X: 348, 566, 588, 639, XI: 47, 113, 128; Meijer, *Trotsky Papers*, II: 26–9, 66–7; McNeal, *Stalin*, 50. 與此同時，托洛茨基也得到了八週的假期：RGASPI, f. 17, op. 112, d. 149, l. 93.
- 354 *TsK RKP (b)—VKP (b) i natsional'nyi vopros*, 47–9 (RGASPI, f. 558, op. 1, d. 3530, l. 1–2; *Kommunist* [Baku], July 31, 1921). 阿馬亞克·納扎列江是高加索局的五名成員之一，1922年在莫斯科成了斯大林的首席助理。
- 355 De Lon, “Stalin and Social Democracy,” 125.
- 356 Trotsky, *Stalin*, 359–60; Lang, *Modern History*, 238–9 (未註明出處，但顯然是依靠孟什維克流亡者的記述); Payne, *The Rise and Fall of Stalin*, 275–6 (重複了蘭的描述)。
- 357 Iremashvili, *Stalin und die Tragödie*, 57–62.
- 358 *Pravda Gruzii*, July 1921, 13; Stalin, “Ob ocherednykh zadachakh kommunizma v Gruzii i Zakavka'e,” 見於 *Sochineniia*, V: 88–100 (at 95).
- 359 Belov, *Baron Ungern fon Shternberg*; Palmer, *Bloody White Baron*.

- 360 Alioshin, *Asian Odyssey*, 167, 183–7. 關於這位男爵，鄂木斯克大學的一位波蘭教授寫了一部聳人聽聞的內幕紀實，暢銷一時：Ossendowski, *Beasts, Men, and Gods*.
- 361 Tornovskii, “Sobytiia v Mongolii-Khalkhe,” 168–328 (at 208–13); Alioshin, *Asian Odyssey*, 231.
- 362 Kuz'min, *Istoriia barona Ungerna*, 184–5.
- 363 Iuzefovich, *Samoderzhets pustyni*, 3, 133–7.
- 364 Kuz'min, *Istoriia barona Ungerna*, 410–13; Alioshin, *Asian Odyssey*, 229.
- 365 仇視英國的契切林當時起了領導作用，他堅持認為東方各民族不僅包括穆斯林，還有佛教徒。蒙古和西藏對英國人佔領的印度是潛在的威脅。Amur Sanai, “Kloiuchki k vostokou,” *Zhizn' natsional'nostei*, May 26, 1919.
- 366 至於蘇聯方面對他們的描述，參見 Genkin, *Severnaia Aziia*, 1928, no. 2: 79–81.
- 367 Baabar, *Twentieth-Century Mongolia*, 202; Roshchin, *Politicheskaia istoriia Mongolii*, 35–6.
- 368 Murphy, *Soviet Mongolia*, 13–4.
- 369 Rupen, *Mongols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I: 139; Sumiatskii, “Na zare osvobozhdeniia Mongolii,” *Pravda*, July 26, 1920, 見於 Eudin and North, *Soviet Russia and the East*, 203–4.
- 370 Baabar, *Twentieth-Century Mongolia*, 216; Rupen, *Mongols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I: 141, 155. 事後看來，此次大會成了第一次黨代表大會。
- 371 I. I. Lomakina, “Kommentarii,” 見於 Pershin, *Baron Ungern*, 189–259 (at 176–7).
- 372 Lepeshinskii, *Revoliutsiia na Dal'nem vostoke*, 429–32; Kuz'min, *Istoriia barona Ungerna*, 238.
- 373 出生於華沙的紅軍指揮官康斯坦丁·羅科索夫斯基（生於1896年）率領大批騎兵加入了由蘇赫—巴托爾領導的蒙古軍隊，但羅科索夫斯基受傷離開了戰場。Roshchin, *Politicheskaia istoriia Mongolii*, 20–1; Kuz'min, *Istoriia barona Ungerna*, 244–5, 263.
- 374 *Pravda*, July 9, 1921; Eudin and North, *Soviet Russia and the East*, 196–7. 在莫斯科召開的第三次代表大會時間是1921年6月22日至7月12日。斯大林未入選共產國際執委會的五個蘇俄人之列（季諾維也夫、布哈林、拉狄克、列寧和托洛茨基）。大會期間，他正在南方療養。
- 375 Morozova, *Comintern and Revolution in Mongolia*, 16 (引自 RGASPI, f. 495, op. 154, d. 20, l. 1–7).
- 376 Alioshin, *Asian Odyssey*, 266.
- 377 Kuz'min, *Istoriia barona Ungerna*, 287–8.
- 378 Palmer, *Bloody White Baron*, 228 (引自 GARF, f. 9427, op. 1, d. 392, l. 36). 另見 Kuz'min, *Baron Ungern v dokumentakh i memuarakh*, 199–242 (RGVA, f. 16, op. 3, d. 222, l. 123–4ob., 125, 1–19; f. 16, op. 1, d. 37, l. 128, 337, 333, 329; GARF, f. 9427, op. 1, d. 392, l. 7–13, 47–60, 35–46); *Sovetskaia Sibir'*, September 13, 1921 (伊萬·帕夫盧諾夫斯基 [Ivan Pavlunovsky]，西伯利亞契卡)。
- 379 Kuz'min, *Baron Ungern v dokumentakh i memuarakh*, 198–9 (RGASPI, f. 17, op. 3, d. 195, l. 1; op. 163, d. 178, l. 5; op. 163, d. 180, l. 3–3ob.). 為了保證不出差錯，莫斯科委派被稱為葉梅利揚·雅羅斯拉夫斯基的米涅伊·古別爾曼 (Minei Gubelman) 擔

- 任公訴人，而他恰好是猶太人，雖然這一點似乎並沒有被考慮進他將對那位瘋狂反猶的男爵做出的判決中，因為雅羅斯拉夫斯基來自東西伯利亞（他是流放犯的兒子），而且剛被任命為中央委員會書記。
- 380 *Sovetskaia Sibir'*, September 16, September 17, September 18, and September 20, 1921; *Da'nevostochnaia pravda*, September 25, 1921; Kuz'min, *Baron Ungern v dokumentakh i memuarakh*, 242–63; Kuz'min, *Istoriia barona Ungerna*, 294–304. 804
- 381 Kuz'min, *Baron Ungern v dokumentakh i memuarakh*, 263 (RGVA, f. 16, op. 1, d. 37, l. 330).
- 382 Misshima and Tomio, *Japanese View of Outer Mongolia*, 27.
- 383 Nyamaa, *Compilation of Some Documents*, 7–8.
- 384 Slavinskii, *Sovetskii Soiuz i Kitai*, 51–3 (AVP RF, f. 08, op. 5, psap. 3, d. 17, l. 1–2; d. 18, l. 4–5); Tsiun, “Sovetskaia Rossiia i Kitai,” 54–5.
- 385 Roshchin, *Politicheskaia istoriia Mongolii*, 37 (引自 RGASPI, f. 495, op. 152, d. 9, l. 12–4: 鮑里斯·舒米亞茨基致契切林，1921年8月12日); Kuz'min, *Baron Ungern v dokumentakh i memuarakh*, 264 (RGASPI, f. 5, op. 1, d. 145, l. 38: Joffe letter); Kuz'min, *Istoriia barona Ungerna*, 199. 另見 Murphy, *Soviet Mongolia*; Hammond, “Communist Takeover of Outer Mongolia.”
- 386 RGASPI, f. 495, op. 152, d. 11, l. 19–23. 契切林贊成會見。他寫信對列寧說，蒙古「革命政府是我們手中最大的牌。它的成立破壞了日本企圖建立一個從太平洋直到裏海的反革命陣線的計劃。有了友好的蒙古，我們的邊界就完全安全了」。
- Luzyanin, “Mongolia,” 76.
- 387 Roshchin, *Politicheskaia istoriia Mongolii*, 70 (引自 RGASPI, f. 495, op. 152, d. 9, l. 65); Baabar, *Twentieth-Century Mongolia*, 222 (引自外交關係中央檔案館, F-117, H/N-01); Morozova, *Comintern and Revolution in Mongolia*, 43, RGASPI, f. 495, op. 152, d. 9, l. 63–4).
- 388 北京政府到1922年1月初，即大約兩個月之後，才開始聽到有關蘇蒙條約內容的傳聞。Elleman, “Secret Sino-Soviet Negotiations.”
- 389 布爾什維克官員清楚，蒙古的階級差別很小，可剝奪的上層階級財富也很少（就像學者伊萬·麥斯基報告的，他曾是蘇俄派到外蒙古的遠征軍中的一員）。
- Maiskii, *Sovremennaia Mongoliia*, 127.
- 390 Malle, *Economic Organization of War Communism*, 506–11.
- 391 Lih, *Bread and Authority*; Narskii, *Zhizn' v katastrofe*, 5.
- 392 PSS, XLIII: 18, 24, XLIV: 159.
- 393 Vaisberg, *Den'gi i tseny'*, 10.
- 394 新經濟政策的法令一直持續到1923年，它們將出版、借款，以及儲蓄和貸款方面的私人活動合法化，允許從國家那裏租賃工廠，允許國營工廠與被蔑稱為「耐普曼」的私商做生意。
- 395 1921年10月17日的一則關於沒收和徵用的法令，要求在沒收貨物時寫一份記錄，上面要有貨物被沒收人的名字、執行沒收的人的名字、接受貨物存入倉庫的



- 人的名字，以及一份完整的貨物清單。記錄須有簽名，其中包括至少兩位目擊證人（通常是鄰居）。該法令還規定，原則上要對徵收進行補償，同時，沒收只允許用作合法的懲罰措施。*Izvestiia*, October 26, 1921; Timashev, *Publichnopravovoe polozhenie lichnosti*, I: 177–8. 有關如何落實的指示試圖對所有事情都劃定嚴格的界線，就此前針對沒收所提出的賠償訴訟，規定切勿白費工夫地下判斷。然而，1922年又發佈了一則有關沒收的法令，試圖繼續對1917至1922年旋風式的革命沒收活動劃定界線，允許擁有被沒收貨物的人保留這些貨物。*Izvestiia*, March 29, 1922.
- 396 Smith, “Stalin as Commissar for Nationality Affairs.”
- 397 *VIII s"ezd RKP (b)*, 82.
- 398 結束了波蘇戰爭的里加條約（1921）鞏固了通向聯邦結構的道路——白俄羅斯和烏克蘭都是簽約國。1919年在明斯克，斯大林和俄羅斯化的亞美尼亞布爾什維克亞歷山大·米亞斯尼科夫（Alexander Myasnikov，米亞斯尼基揚〔Myasnikyan〕）一道，在「兼併」白俄羅斯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的過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公告是用俄語、波蘭語和意第緒語發佈的，沒有用白俄羅斯語，那是農民的語言。*Izvestiia*, December 18, 1919; Kvashonkin, *Bol'shevistskoe rukovodstvo*, 71–5.
- 399 1920年10月，斯大林指出：「要求把邊疆地區同俄國分離……這種要求應當擯棄，因為它不僅同中部和邊疆地區之間建立聯盟這一問題的提法本身是抵觸的，而且首先因為它同中部和邊疆地區人民群眾的利益是根本抵觸的。」*Sochineniia*, IV: 352（譯註：《斯大林全集》第4卷，第313頁）。
- 400 PSS, LIII: 189–90. 這兩位發生衝突的官員是米哈伊爾·托姆斯基和格奧爾吉·薩法羅夫。9月13日的政治局會議討論了此事，不到一個月，突厥斯坦的人事就有了變動。
- 401 正是在這一背景下，加米涅夫在1922年（1923年又出了第二版）出版了一本厚厚的匯編——《兩次革命之間》（*Between Two Revolutions*）——裏面有他的各種報刊文章。雖然為時已晚，但看來加米涅夫是贏得了1917年4月與列寧那場著名的爭論，當時列寧結束了流亡生涯，回到芬蘭車站，他嚴厲斥責加米涅夫（和斯大林），因為加米涅夫反對奪權，認為「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還有很長的路要走。Lih, “The Ironic Triumph of ‘Old Bolshevism.’”
- 402 RGASPI, f. 558, op. 3, d. 299, l. 55.
- 403 RGASPI, f. 558, op. 3, d. 68, l. 47.
- 404 Tucker, *Stalin in Power*, 45–9.
- 405 Kvashonkin, *Bol'shevistskoe rukovodstvo*, 223–7 (RGASPI, f. 5, op. 2, d. 315, l. 252–3, 260).
- 406 *Sochineniia*, V: 117–27 (at 118–19); Carr, *Bolshevik Revolution*, III: 349–50.



# 斯大林

權力的悖論

1878-1928

斯蒂芬·科特金 著 李曉江 譯

下



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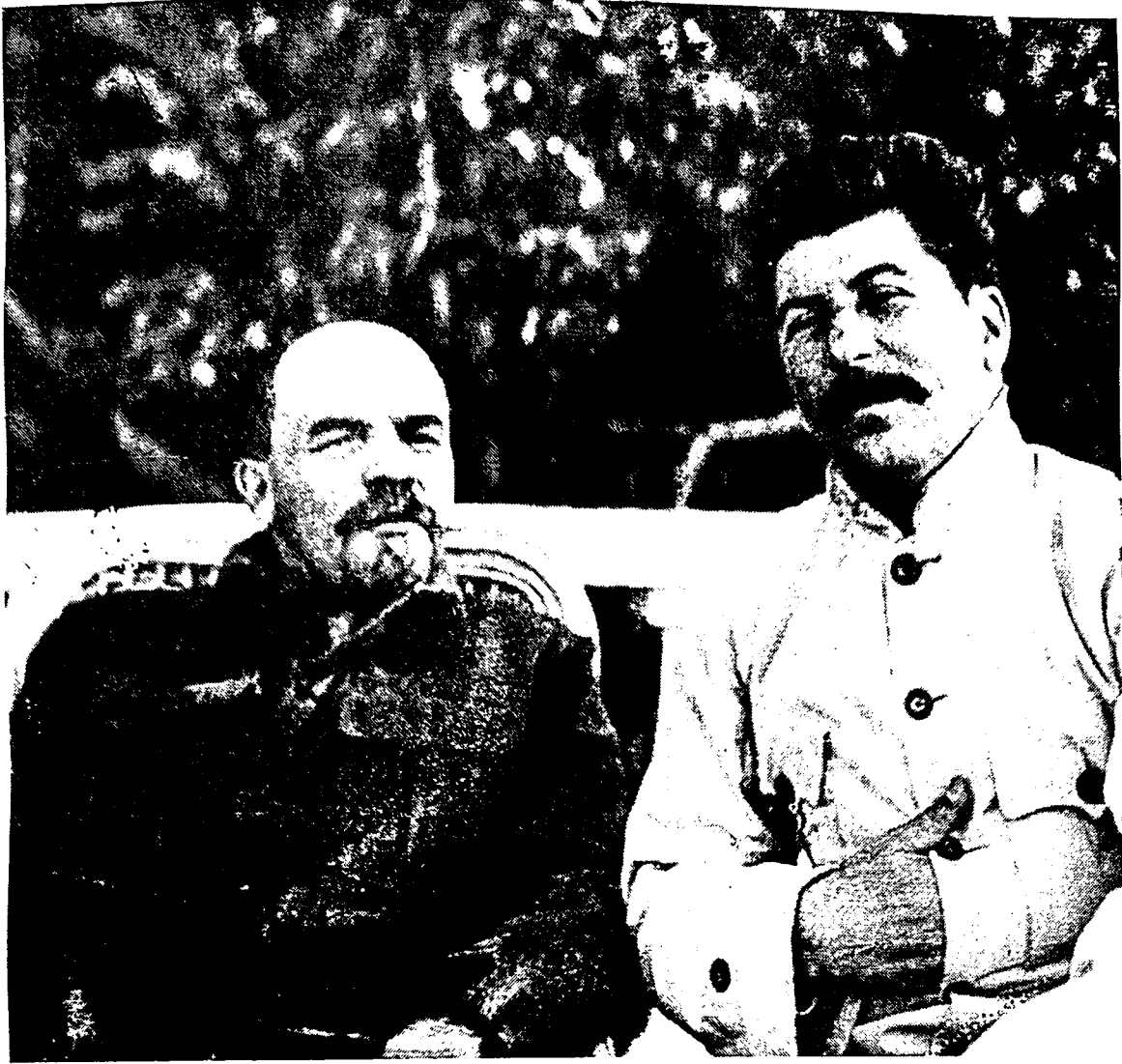
# 目錄

## 上冊

	中文版序	xi
	前言及致謝	xv
	地圖	xix
<b>第一部</b>	第1章 帝國子民	15
<b>雙頭鷹</b>	第2章 拉多的門徒	35
	第3章 沙皇制度最危險的敵人	65
	第4章 立憲專制	97
<b>第二部</b>	第5章 愚蠢還是叛國？	163
<b>杜爾諾沃的</b>	第6章 卡爾梅克救星	201
<b>革命戰爭</b>	第7章 1918：達達主義和列寧	257
	第8章 階級鬥爭與黨國	323
	第9章 發現之旅	379
	註釋	451

## 下冊

第三部 衝突	第10章 專政者	633
	第11章 「把斯大林調開」	685
	第12章 忠實的學生	745
	第13章 勝利中的失敗	811
	第14章 西伯利亞之行	881
尾聲	如果當初斯大林死了	947
	譯後記	965
	註釋	967
	參考文獻	1101
	圖片出處	1151
	索引	1153



39 斯大林和列寧在莫斯科郊外的哥爾克，1922年9月。由列寧的妹妹瑪麗亞·烏里揚諾夫娜拍攝。斯大林公佈了他探望列寧時拍攝的照片，以證明所謂的列寧正在康復——以及他自己與這位布爾什維克領袖的親密關係。這一姿勢的照片並未公開發表。



40 在有八百多人參加的黨的第十二次代表大會上，斯大林沒帶隨從，和一些與會者在一起，1923年4月，大克里姆林宮。列寧沒有參會。差不多在大會之後，克魯普斯卡婭馬上就拿出了據說是列寧口授的文件，要求解除斯大林的總書記職務。



41 列寧同醫生和護士在一起，1923年，哥爾克。這是他最後的照片之一，由瑪麗亞·烏里揚諾夫娜拍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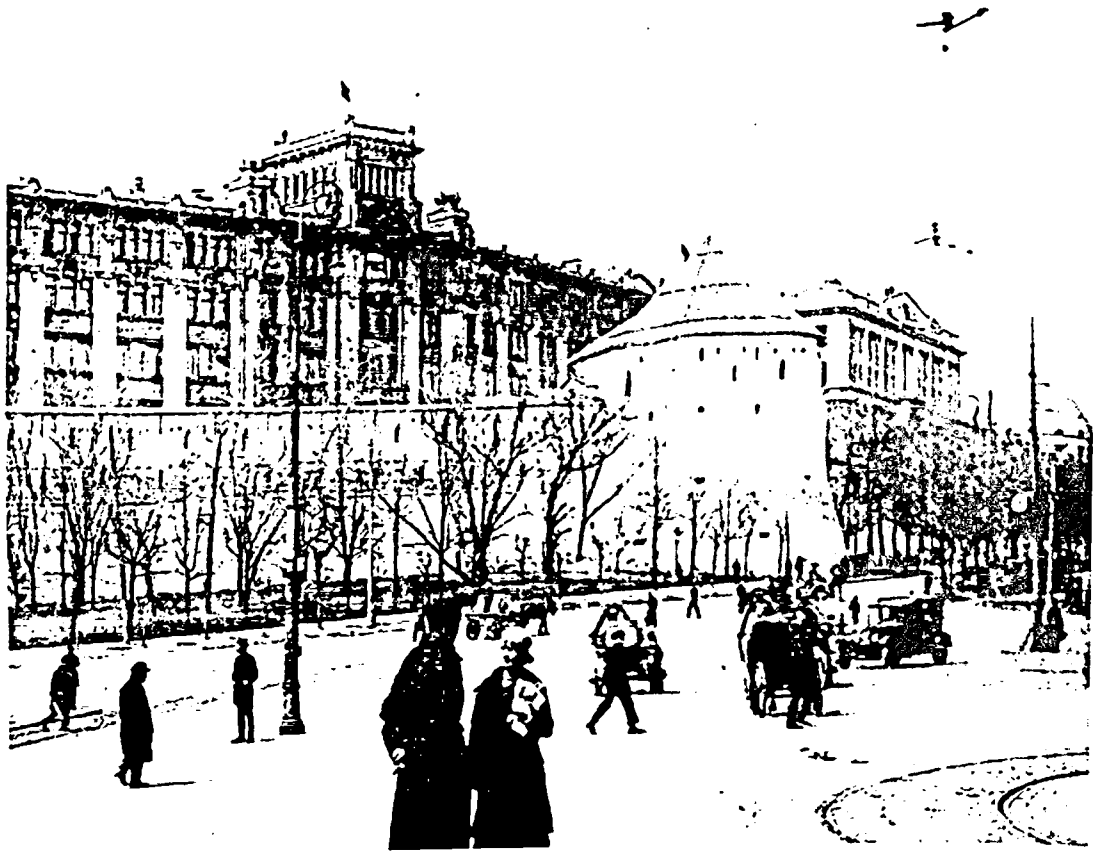
42 列寧的葬禮，斯大林和莫洛托夫抬着靈柩，1924年1月27日，天氣極其寒冷。



43 雕塑家謝爾蓋·梅爾庫羅夫正在製作列寧遺容的面模，這尊面模將會擺在斯大林的辦公室。



44 斯大林的暢銷書《論列寧和列寧主義》(莫斯科，1924)。不只是對機關的操控，還包括對意識形態的操控，鞏固了斯大林的權力。



45 老廣場街4號的共產黨總部(白色塔樓右側)和老廣場街8號的農業人民委員部(塔樓左側)，兩者都位於圍着莫斯科商業區的基泰哥羅德高牆的後面。除了黨，斯大林還在老廣場街4號控制着警察、軍隊和外交。



46 鐵匠橋街15號，外交人民委員部。



Москва. — Moscow. № 301.  
Александровское военное училище.  
Ecole Militaire d'Alexandre.



47 茲納緬卡街23號，亞歷山大軍事學校，後成為陸軍人民委員部和總參謀部所在地。



48 盧比揚卡街2號，契卡—格伯烏—奧格伯烏的總部。



49 和斯大林專政中的專政有關的最核心的工作人員，老廣場街，1924年：斯大林的高級助手阿馬亞克·納扎列江(前排右一)；另一名高級助手伊萬·托夫斯圖哈(左二站立者)；格里戈里·坎納(左一站立者)。儘管像是無政府主義者公社，但這些工作人員非常稱職。



50 斯大林和軍人：黨的第十四次代表大會，莫斯科，1925年4月。從左向右依次是：米哈伊爾·拉舍維奇(副陸軍人民委員)、米哈伊爾·伏龍芝(陸軍人民委員)、亞歷山大·斯米爾諾夫、阿列克謝·李可夫、克利門特·伏羅希洛夫(莫斯科軍區司令員)、斯大林、米科拉·斯克雷普尼克、安德烈·布勃諾夫(紅軍政治部負責人)、格里戈里·「謝爾戈」·奧爾忠尼啟則、約瑟夫·溫什利赫特(副陸軍人民委員)。取代托洛茨基的伏龍芝在這一年還未結束便去世了。斯大林後來提拔了自己的親信伏羅希洛夫。



51 費利克斯·捷爾任斯基，蘇聯秘密警察首腦，1922年在黑海岸邊阿布哈茲的蘇呼姆療養。由於長期患病和過度勞累，他在1926年夏天死於心臟病。



52 抬着捷爾任斯基的靈柩，1926年7月。  
從右向左依次是：走在前面的溫什利赫特、葉努基澤、布哈林、李可夫、斯大林和伏羅希洛夫(戴着帽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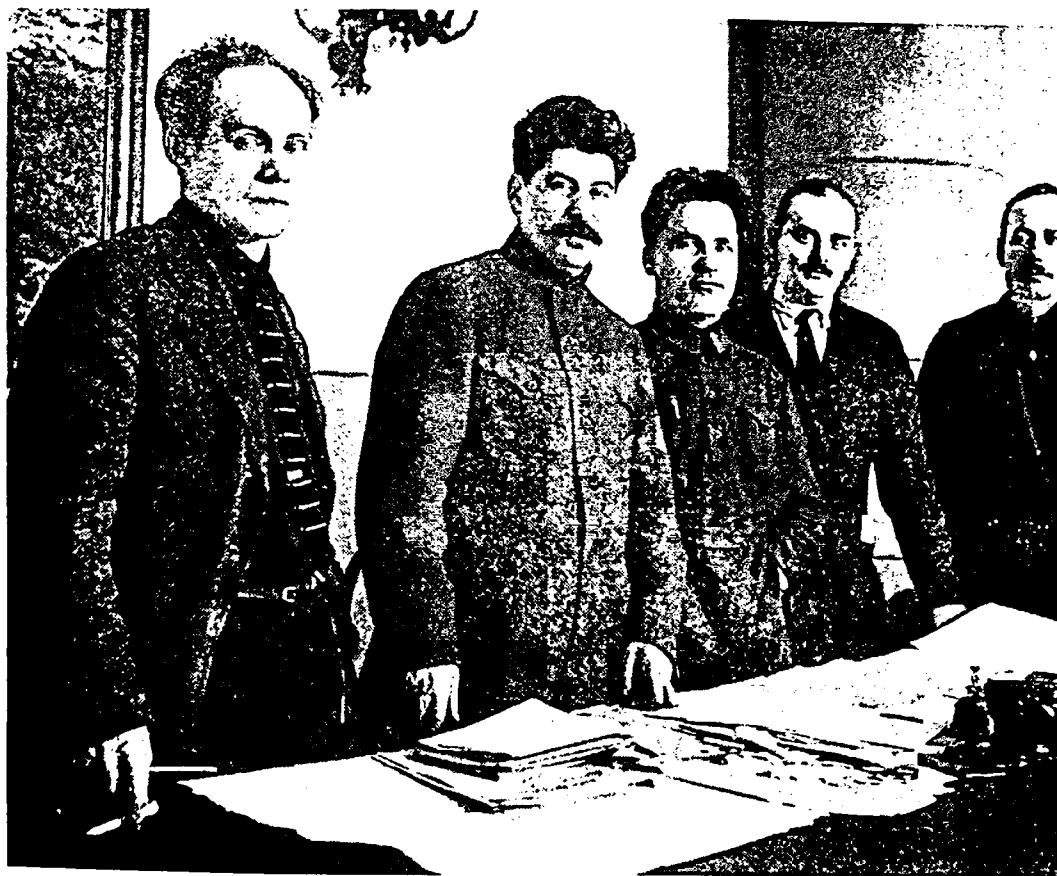


53 奧格伯烏的掌權者。上左：維亞切斯拉夫·明仁斯基，他接替了捷爾任斯基的職務，但他自己也病勢嚴重。上右：人稱亨里希·亞戈達的約諾霍姆·約胡達（新任第一副局長），斯大林在秘密警察中的秘密代理人。下左：亞戈達的死對頭阿爾圖爾·弗拉烏奇（反間諜機關負責人），人稱阿爾圖佐夫。捷爾任斯基稱阿爾圖佐夫是「絕對最乾淨的同志」。下右：北高加索奧格伯烏首腦葉菲姆·葉夫多基莫夫，他在到索契的別墅拜訪斯大林時送了一份大禮——編造的破壞工業生產的陰謀。



54 諷刺格里戈里·季諾維也夫的漫畫，說他對黨的新經濟政策的批評是出於所謂的機會主義，1925年12月。漫畫作者瓦列里·梅日勞克 (Valery Mezhlauk)。漫畫所配文字：「馬莎，今天晚上要開中央全會；把富農和耐普曼的木偶拿出來，我回來後再用衛生球把它們封起來，我們要到秋天才會用到它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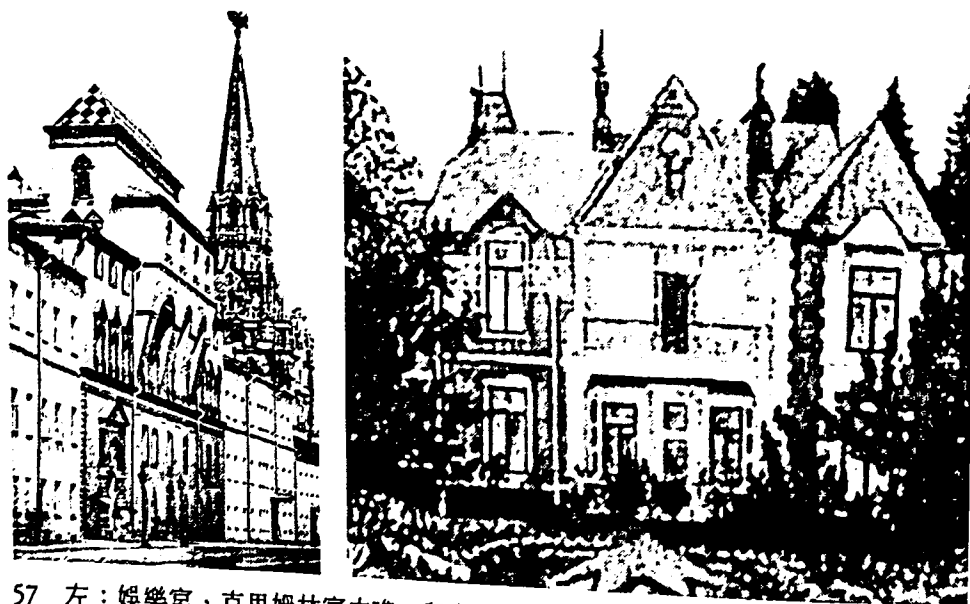
*Мама! Сегодня вечером пелеку 48,  
получишь кубатко в издике, а как  
в бернзе, переименуй, штаф партизанов,  
разит осца на колллективиза.*



55 斯大林和新上任的列寧格勒黨組織負責人謝爾蓋·基洛夫，後者接替了季諾維也夫的職務，斯莫爾尼宮，1926年4月。從左到右依次是：尼古拉·安季波夫(新任列寧格勒第二書記)、斯大林、基洛夫、尼古拉·什維爾尼克(即將離任並調往中央委員會機關的列寧格勒第二書記)、費奧多爾·索比諾夫(人稱尼古拉·科馬羅夫，列寧格勒蘇維埃負責人)。



56 高加索的「三個火槍手」，米高揚、斯大林、奧爾忠尼啟則，1926年夏。這是報紙上公佈的一幅經過修飾的合影。



57 左：娛樂宮，克里姆林宮中唯一留存的波雅爾居所，屋頂的三角形結構可追溯到17世紀。這是斯大林和家人居住的地方，阿列克謝·李可夫也曾住在這裏。克里姆林宮各座塔樓上的雙頭鷹標誌要到1930年代才拆除。

58 右：祖巴洛沃4號，在莫斯科西郊僻靜的茂林裏，從1919年起成了斯大林一家的別墅，從前屬於巴庫的石油大亨、格魯吉亞人列翁·祖巴拉施維里 (Levon Zubalashvili，俄羅斯化的名字是祖巴洛夫 (Zubalov))。



59 瓦西里·斯大林(生於1921年,左)和阿爾喬姆·謝爾蓋耶夫,雅爾塔,1926年。阿爾喬姆比瓦西里小幾個月,他的父親在內戰中死於一場事故,之後他就成為斯大林家非正式的養子。



60 娜佳和剛出生的斯維特蘭娜,1927年。由莫斯科著名的私人攝影師尼古拉·斯維曉夫-保拉(Nikolai Svishchov-Paola)拍攝。來自斯大林的岳父謝爾蓋·阿利盧耶夫的相冊。



61 左:雅科夫·朱加施維里(生於1907年),斯大林的長子,是斯大林和卡托·斯瓦尼澤所生,約1927年。



62 右:斯大林的管家卡羅利娜·季爾(左)和斯維特蘭娜的保姆亞歷山德拉·貝奇科娃。



63 蘇波戰爭的勝利者、波蘭元帥約瑟夫·皮爾蘇茨基在對波蘭的軍事盟友羅馬尼亞進行國事訪問，1922年9月。在蘇維埃軍事情報機關的報告中，波蘭，尤其是與羅馬尼亞結盟的波蘭，是最大的威脅。



64 蔣介石，1927年3月13日，在屠殺作為其政治盟友的中共前夕。在得悉自己的襲擊行動正在進行之後，蔣介石在日記中說，他「不能安眠」，但共產黨人「可殺」。可斯大林覺得必須繼續支持中國的這位強人，因為他要倚仗蔣介石去抵擋英國和日本在中國的影響。



65 騎着自行車的紅軍，在列寧墓前整齊地通過紅場，1926年5月1日。攝影：彼得·奧楚普 (Pyotr Otsup)。在演習中也騎着自行車的蘇聯軍隊，還沒有能力打一場大仗。





66 處在勝利的巔峰，黨的第十五次代表大會上，1927年12月。坐在斯大林左邊的是米涅伊·古別爾曼，人稱葉梅利揚·雅羅斯拉夫斯基，他是個全能的工作人員。就在代表大會前後，斯大林再次要求解除自己的總書記職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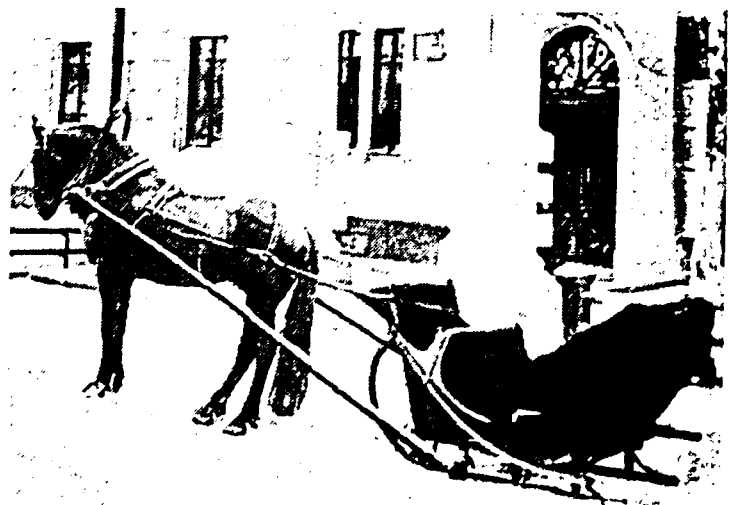


67 站成一排的敵人：1928年在紅場上參加五一閱兵的外國武官。



68 斯大林在西伯利亞的巴爾瑙爾，1928年1月22日。在這些西伯利亞的官員中，有許多人，其中包括地區黨組織負責人謝爾蓋·瑟爾采夫（坐在斯大林的右邊），都反對斯大林強制集體化的政策，這一政策是兩天前他在新西伯利亞一次極其重要的閉門講話中宣佈的。「現在，」斯大林就推行集體化問題對照片中的那些巴爾瑙爾人說，「我們會看到，誰是真正的共產黨員，誰只是講起話來像共產黨員……我們擁有我們想要的所有權力，但我們缺少運用權力的能力。」

69 斯大林從鐵路線的終點去巴爾瑙爾參加會議時乘坐的交通工具：一匹名叫「馬拉」的馬和一個帶有木筐的雪橇（裏面有件當毯子用的黑色斗篷）。巴爾瑙爾在1928年根本沒有汽車。





70 沙赫特審判，1928年春，工會大廈圓柱大廳中的外國記者。審判被拍成電影，並作了大量報道。斯大林利用沙赫特事件激起的狂熱氣氛把群眾發動起來。



71 審訊記錄，這是唯一在法庭上出示的「證據」。



72 農村中的階級，1928年維亞特卡省，打倒富農前夕：一個「富農」，腳上穿的是皮靴，被表現成盯着一個貧農幹活。貧農腳上裹着布，穿的是樹皮做的繫帶子的鞋。事實上，僱傭勞力的農民，大多數自己也勞動。



73 尼古拉·布哈林畫的斯大林漫畫，1928年2月20日。斯大林一度把政治盟友布哈林當作弟弟一樣對待，但在這一年結束以前，斯大林轉而開始對付他，並表現出自己在政治上的老道和異常的惡毒。「他正在耍弄手腕，想把我們打成分裂分子」，布哈林在1928年7月11日向加米涅夫抱怨斯大林說。

## 第三部 衝突

列寧是為革命而誕生的。他真正是組織革命爆發的天才和領導革命的偉大能手。他在革命動盪時代覺得比任何時候都自在、愉快。

——斯大林，1924年1月<sup>1</sup>

實際上，這場社會主義革命是以純粹的個人主義而告終的……布爾什維克階級最大的成就在於，造就了一個強烈地意識到土地私有的價值的農民階級。

——研究俄國農業的德國學者  
馬克斯·澤林，1921年<sup>2</sup>

未來偶爾會被言中——比如前沙皇內務大臣彼得·杜爾諾沃預言，萬一對德戰爭失敗，就會引發大規模的社會革命和災難——但未卜先知基本不可能。弗拉基米爾·列寧的健康狀況及其後果就屬於後者。他是個非凡的政治人物。噩夢般的世界大戰以及由此造成的全面崩潰，使得想用法治秩序來取代拒不妥協的沙皇專制變得越發不可能，但列寧的負面影響也不應低估。1917年8月，甚至在布爾什維克政變之前，他就挑釁說：「誰不知道世界上所有革命的歷史都表明，階級鬥爭轉變為國內戰爭不是偶然的，而是必然的。」<sup>3</sup> 剛一上台，列寧就把政治暴力提到原則的高度。<sup>4</sup> 在他眼裏，溫和派社會主義者要比公開的反革命更危險，因為他們會用「社會革命黨人和孟什維克的關於民權制度、立憲會議、自由等等的漂亮詞句」去煽動反革命，「誰沒有從整個19世紀的歷史中學會這一點，誰就是不可救藥的白癡」。<sup>5</sup>† 在尋常的分歧背後，他看到的不是合理的意見，而是邪惡的勢力。他對政治的構想甚至容不得政治。<sup>6</sup> 有人認為，每一個社會都是由各種各樣的利益集團組成的，應該讓它們各自有政治上的代表，彼此競爭，保持平衡。列寧把這一看法斥為向「不道德的」利益集團（「資產階級」或「小資產階級」）天真地發出邀請。<sup>7</sup> 他拒絕接受權力在行政、立法和司法三個部門中的

409

410

---

\* 譯註：《斯大林全集》第6卷，第55頁。

† 譯註：《列寧全集》第37卷，第152頁。

分立，認為那是資產階級的偽裝。<sup>8</sup>他拒絕法治，視之為階級統治的工具，而不是對抗國家的一種保護措施。<sup>9</sup>他拒絕考慮讓社會自行組織起來以約束國家。<sup>10</sup>結果，沙皇制度的許多削弱社會力量的特徵得到了野蠻的強化：議會成為擺設，國家工作人員變成寄生蟲，平民和私營企業家受到迫害和勒索——總而言之，就是不負責任的行政權力，在有關社會正義和進步的光芒四射的意識形態的照耀下，極大增強了其冷酷和武斷的一面。可列寧卻重病倒下了。

世界歷史上很少有人扮演了如此重要的角色之後卻突然退場。這樣的結局很像亞伯拉罕·林肯 (Abraham Lincoln)，雖然他們在政治上的行事方式迥然不同：林肯打贏了內戰，解放了奴隸，接着就被暗殺了。列寧過早的離去無意中引發的革命性震動僅次於布爾什維克奪權，出人意料地為斯大林掃清了通往最高權力的道路。

幾乎沒有人知道，列寧的健康狀況早就出了問題。他患有當時的多種常見病，不僅包括傷寒、流感和丹毒（一種皮膚病），還有偏頭痛、失眠和暈厥——例如，內戰期間，有一次打獵的時候，他突然倒在一根樹樁上，動彈不得（「感覺麻木了」，他說）。1920至1921年的冬天，他的失眠和頭痛越來越頻繁，令醫療小組一籌莫展。「很遺憾，我病得很重，」1921年2月，在坦波夫省叛亂和彼得格勒工人罷工最緊張的時候，列寧寫信給德國的克拉拉·蔡特金說，「我神經失調了 (*kaputt*)。」<sup>11</sup>在接下來那個月黨的第十次代表大會期間，他繼續抱怨感到很累。

411 1921年7月，他的神經十分緊張，當時他在克里姆林宮的住處正在改造：他要求房間之間的牆壁要「絕對隔音，地板絕對不能有咯吱咯吱的響聲」。<sup>12</sup>1921年夏天，政治局幾次要求列寧休息一個月，但他不聽；最後，列寧在8月作了讓步。<sup>13</sup>1921年9月中旬，列寧試圖重新開始滿負荷工作，但事實證明他做不到。10月，他幾次暈厥。<sup>14</sup>1921年12月，雖然工作量減少了很多，但結果還是不行；政治局要求他再休假六個星期，於是，列寧就在12月6日動身前往鄉下。在那裏，按照規定，他每天最多只能在電話裏就最重要的事情交談一個小時。1922年1月13日，他返回克里姆林宮，但身體狀況並未好轉，結果他又回到莫斯科鄉下，決定只有在參加政治局和政府會議的時候才去首都。但漸漸地，

就連這樣也做不到了。1922年3月1日，列寧回到克里姆林宮，但是在第二天，家人和身邊的工作人員注意到，他時不時地會喪失語言能力和身體右側的知覺。<sup>15</sup> 3月4日，列寧對一名醫生說，自己的歌唱完了，自己的角色演完了，現在他要把自己的事業交給其他人。<sup>16</sup>

列寧從未指定接班人。但是在1922年3月，他作出一個重大決定，為斯大林特設了一個新的崗位——黨的「總書記」。由於可以理解的原因，後來有傳言說，列寧從來沒有真的打算給斯大林那麼大的權力。然而這些傳言並不屬實。列寧在許多事情上一直很信任斯大林，而且早在1921年8至9月，他就讓斯大林幾乎專職地督辦黨務；斯大林開始負責準備政治局會議議程和任用官員的工作。<sup>17</sup> 不錯，中央委員會是還有兩名書記，但斯大林的資歷比他們老。儘管如此，列寧仍然在1922年3月27日至4月2日黨的第十一次代表大會上宣佈的任命中，特意強調了斯大林的領導地位，並在4月3日的中央委員會全會上正式通過——這兩次會議列寧都參加了。<sup>18</sup> 在代表大會上，斯大林以193票贊成、16票反對當選為「總書記」；其餘超過半數的有表決權的代表（273人）實際上都投了棄權票。<sup>19</sup> 這是列寧的動議，他當然清楚自己在做甚麼。就在第十一次代表大會在克里姆林宮開幕之前，他把自己最可靠的27名追隨者召集起來，在邊上的房間開了一個密謀性的會議，以確保選進中央委員會的是自己中意的候選人，而不是托洛茨基的追隨者；在列寧的名單上，斯大林的名字上註明的是「總書記」。<sup>20</sup> 列寧名單上的27人在代表大會上全都如願當選。大會上，有代表（普列奧布拉任斯基）質疑說斯大林怎麼能身兼那麼多職務，但列寧堅決為自己的門徒辯護。<sup>21</sup>

列寧絕對沒有打算把最高權力交給斯大林。他對於斯大林的新職務可能有着怎樣的設想，從這一事實中便可略知一二：政治局同意了季諾維也夫的要求，在共產國際設立一名管理日常事務的「總書記」，任命居住在莫斯科的芬蘭共產黨人奧托·庫西寧（Otto Kuusinen）擔任此職，而彼得格勒的季諾維也夫依舊擔任主席（*predsedatel'*）。<sup>22</sup> 按照類似的方式，列寧繼續擔任政府（人民委員會）主席，而斯大林則成為（黨的）機關的總書記。<sup>23</sup> 當然，作為權力基礎，俄國共產黨要比第三國際重要得多，何況斯大林的「主席」身體並不好。<sup>24</sup> 不過誰也沒有想到，列寧那



麼快就完全不能視事。1922年3月，斯大林以每人5萬金盧布的價格從德國請了兩名醫生，神經病專家奧特弗里德·弗爾斯特 (Otfried Förster) 和肺病專家費利克斯·克倫佩雷爾 (Felix Klemperer)。<sup>25</sup> 後者認為，列寧嚴重的頭痛，是四年前未遂的暗殺事件中留在他體內的子彈 (一顆在脖子裏，一顆穿透肺部嵌在鎖骨) 引起鉛中毒所造成。<sup>26</sup> 4月22日是列寧52歲生日。第二天，他做了手術，取出脖子裏的子彈：原來子彈離他的頸動脈只有3毫米。<sup>27</sup> 手術過後，5月19日，心情舒暢的列寧給斯大林寫便條，開起了玩笑。<sup>28</sup> 然而醫院醫生的記錄卻是「廣泛性的焦慮……神經衰弱」，他們認為那是「過度勞累」引起的。1922年5月23日，列寧回鄉下繼續術後恢復。<sup>29</sup> 在那裏，災難來襲：5月26日的夜裏，他的記憶力急劇下降並喪失部分語言能力，右腿和右臂出現局部麻痺。布爾什維克政權發佈公告，大意是說列寧胃部不適。<sup>30</sup> 事實上，他是患了大中風，而此時距離把斯大林提拔為總書記才過了七個星期。



413 列寧的患病成了斯大林和他拉近關係的又一契機。此次中風 (同皇太子阿列克謝的血友病一樣) 屬於國家機密，暴露出列寧身邊缺少親信和保護者的事實。他沒有孩子，否則就可以把孩子看作可能的繼承人；他也沒有古羅馬那種禁衛軍，要不然他們的首領或許就會像專制體制下經常發生的那樣，圖謀發動政變。他倒是有一個政治局，但是和列寧在工作上關係非常密切並且對他十分瞭解的莫洛托夫後來回憶說，「列寧在政治局裏一個朋友也沒有」。<sup>31</sup> 也許有一個原因是，列寧總是貶低自己的同事。<sup>32</sup> 他身邊的工作人員倒是忠心耿耿，包括一名管家和若干秘書，其中資歷最淺的是斯大林的妻子娜佳·阿利盧耶娃。<sup>33</sup> 但是在1920年秋天列寧的情婦伊涅薩·阿爾曼德去世之後，他只剩下兩個信得過的親信，一個是他未婚的妹妹、在《真理報》工作的瑪麗亞·烏里揚諾夫娜 (Maria Ulyanova，生於1878年)，另一個是他的妻子、在教育人民委員部工作的娜捷施達·克魯普斯卡婭 (生於1869年)，她倆都跟列寧住在一起。<sup>34</sup> 斯大林很好地充當了列寧的左膀右臂，為他平息所有事情。

在外界不知情的情況下，列寧退居到莫斯科東南郊的茂林，那裏坐落着哥爾克莊園。這是一處16世紀的花園住宅，幾經轉手後到1900年代初已經處於失修狀態。當時有位兩度孀居的貴婦（一次是嫁了個有名的藝術收藏家，一次是嫁給了倒數第二任莫斯科總督），讓人按照花哨的「帝俄」風格對該建築的主體部分進行了改造。結果就有了一座正面飾有六根白色圓柱的淡黃色豪宅，這座豪宅後來被布爾什維克收歸國有。列寧第一次去哥爾克莊園是在1918年9月25日，是在那次差點兒要了他性命的暗殺過後大約一個月。<sup>35</sup>（為了讓這位忙個不停的領袖有更多時間恢復，雅科夫·斯維爾德洛夫開始為列寧在克里姆林宮的帝國參政院裝修一處新住所：三間臥室，列寧、克魯普斯卡婭和烏里揚諾夫娜每人一間，還有廚房和用過道改成的小餐廳，但值得注意的是，根本沒有接待用的客廳。）<sup>36</sup> 隨着列寧健康狀況的進一步惡化，他在哥爾克莊園待的時間也越來越長：從他第一次去算起，之後五年中總共有兩年半的時間。哥爾克莊園配備了包括工人兼廚師斯皮里東·普金（Spiridon Putin，弗拉基米爾·普金（Vladimir Putin）的祖父）在內的工作人員、很大的圖書室和直通莫斯科的電話線路。列昂尼德·克拉辛在沙俄時代曾是德國西門子公司的高級銷售人員，現在是布爾什維克的對外貿易人民委員。他在1921年購買了一輛勞斯萊斯「銀魅」，那樣就可以帶着列寧四處走走，同時，放映機也可以讓列寧觀看報道布爾什維克革命紀念活動和亨利·福特（Henry Ford）流水線的新聞片。<sup>37</sup> 儘管如此，列寧在他的第二個家中還是覺得與世隔絕，像是因為生病喪失工作能力而被囚禁起來。<sup>38</sup> 核心圈中，斯大林到哥爾克莊園探望的次數比其他任何人都多，總共12次，而且列寧的妹妹瑪麗亞·烏里揚諾夫娜注意到，他為了讓列寧振作起來，會說俏皮話、模仿其他政府人員的樣子，講一些警方在監視列寧醫生時弄出的笑話。<sup>39</sup> 斯大林會利用這些探望的機會，從哥爾克莊園來到政治局會議上，傳達「伊里奇的問候」以及領袖的口頭指示。

列寧的健康問題並不是因為子彈中的鉛或過度勞累（同樣也不是因為梅毒：列寧的檢驗結果已經收到了，是陰性，但他還是注射了當時治療這種疾病的藥物——砷）。<sup>40</sup> 1922年5月27日，神經病理學專家

V. V. 克拉默教授 (V. V. Kramer) 得出最終的結論，列寧的偏頭痛、重度焦慮和失眠的原因是腦部疾病，「實際上他的主要病因不但在於大腦過於緊張，還在於腦血管病變」。診斷認為，纖維斑塊 (動脈硬化) 引起的動脈堵塞造成大腦供血不足。克拉默指出，自己的病人「即使還保有全部的智力，但已喪失了哪怕只是想起一些短語的能力」——這一殘酷的結論讓列寧更加擔心自己會癱瘓。<sup>41</sup>「在大腦疾病剛開始出現明顯症狀的時候，」烏里揚諾夫娜後來回憶說，「列寧就對斯大林說了，並向他要毒藥，因為繼續活下去會毫無意義。斯大林〔對這種可能性〕感到很懷疑，但還是答應，如果有必要，就滿足列寧的要求。」<sup>42</sup> 5月29日，因為做不出醫生要他做的12乘7，這位布爾什維克領袖「下了決心……自己該結束了，於是便要我們以最快的速度把斯大林叫來」。列寧的另一名俄國醫生 A. M. 科熱夫尼科夫 (A. M. Kozhenikov) 不贊成他們見面，但列寧的態度非常堅決。5月30日，斯大林和尼古拉·布哈林一起來了。布哈林留在房間外面，讓斯大林單獨和列寧一起待了大約五分鐘。斯大林和布哈林還有烏里揚諾夫娜一起走回轎車。他透露說列寧叫他不要忘了自己要的氰化物，「要是他癱瘓了就幫他離開舞台」，還說「現在時候已到」。根據現有的材料，這三人當時決定，讓斯大林回到列寧的房間，說他已經和醫生們談過了，醫生們認為列寧的病情還沒到無可挽回的地步——這顯然是在撒謊。<sup>43</sup> 科熱夫尼科夫在筆記中寫道：「斯大林來探視。談到了自殺 (*suicidium*)。」<sup>44</sup> 要是斯大林想毒死列寧，那布爾什維克領袖就親手給了他一個大好機會，而且是出於人道主義，還有可靠的目擊證人。斯大林根本沒有那樣做。

415

列寧的疾病對他和托洛茨基的關係也產生了影響。沒有哪個人給列寧造成的麻煩有托洛茨基那樣多。有一次在政治局會議上，托洛茨基正坐着學英語，然後停了一小會兒，開始批評政治局的組織工作做得很差，結果惹火了列寧。在另一次政治局會議上，據說托洛茨基罵布爾什維克領袖是「無賴」，使列寧臉色「蒼白」。<sup>45</sup> 列寧曾經在1921年3月斷定托洛茨基是「一個喜怒無常的人……在政策 (*politika*) 上他毫無頭緒」。<sup>46</sup> 1921年夏天，列寧參與了一個密謀，想把托洛茨基調到烏克蘭。托洛茨基不顧黨的紀律抵制這一調動，迫使列寧收回成命。<sup>47</sup> 但

列寧仍然提議——這樣做違反了黨的規定——「我們召開政治局會議時撇開托洛茨基，」莫洛托夫回憶說，「我們暗中商量反對他。」莫洛托夫還說——他的回憶同檔案記錄是一致的——「列寧同斯大林的關係更近，雖然都是些公事。」<sup>48</sup>但是現在，到了1922年，列寧曾經試圖調解和平衡斯大林與托洛茨基的關係。1922年夏天，列寧的健康狀況似乎在奇蹟般地好轉，《真理報》對此表示祝賀，斯大林也在7月11日探望了他。<sup>49</sup>「伊里奇友好地跟他打招呼，有說有笑，要我招待斯大林，於是我就拿來葡萄酒之類的東西，」烏里揚諾夫娜回憶說。她還說，「在這次以及隨後的幾次探望中，他們說到了托洛茨基……他們商量邀請托洛茨基來探望伊里奇。」她堅持認為邀請「帶有策略性質」，意思是只為了緩和一下關係，但現在看來邀請是誠心的。<sup>50</sup>托洛茨基真的收到了邀請，但是在1922年卻一次也沒到哥爾克看過列寧。<sup>51</sup>7月14日，斯大林打電報給奧爾忠尼啟則，說到他自己到哥爾克探望的事情：「一個半月以來，醫生們頭一次允許有人來探望列寧。今天我們收到了他的書面指示。醫生們認為，再過一個月，他就能回來像以前一樣工作了。」<sup>52</sup>斯大林是在寫信給一位密友，從中可以看出，他並不擔心列寧回來，這反映出他對於自己地位的自信，也許還有他對於列寧的愛，否則就說明他善於偽裝。7月18日，列寧高興地寫信給斯大林說：「請祝賀我已獲准看報了！」<sup>53</sup>同一天，列寧給斯大林還寫過一封信，要求後者為他自己和加米涅夫做個備忘錄，問問加米涅夫是否還記得——像他同意的那樣——就托洛茨基的問題給列寧一個答覆。<sup>54</sup>列寧可能是在敲打他們不要拉幫結派。

為了實現托洛茨基與斯大林之間的和解與平衡，列寧煞費苦心。由列寧創立而現在由斯大林領導的黨掌握了太大的權力。例如，7月20日，包括托洛茨基在內的整個政治局決定，如果沒有該統治機關的允許「列寧絕對不能和任何人見面」，他們把監督執行的任務交給了斯大林。<sup>55</sup>斯大林不想把事情做得太過。在黨的第十二次代表大會上（1922年8月4-7日）——那是他擔任總書記以來的第一次重大會議，是由他和手下的工作人員組織的——人們注意到他表現得特別謙遜。「這麼做提高了斯大林在代表們眼中的聲望」，大會代表阿納斯塔斯·米高揚回

憶說。<sup>56</sup> 列寧對於斯大林管理黨務一直非常信任，這一點得到了大量檔案材料的證明；在更寬泛的層面上，列寧同樣一直不遺餘力地為人民委員會和政權的未來做工作。1922年9月2日，證據顯示，列寧和妹妹瑪麗亞討論過主要人物的年齡，並指出中央委員會裏最好要有各種年齡層次的人，這樣才能長久。<sup>57</sup> 9月11日，列寧（代表整個政治局）寫信給斯大林，建議增加自己正式副手的人數，在人民委員會裏增加托洛茨基，勞動國防委員會（一個平行的最高執行機關，只是規模小一點）裏增選加米涅夫。<sup>58</sup> 列寧這樣做的目的現在還不清楚：他是在建議讓托洛茨基擔任政府的二把手，但是，列寧沒有讓托洛茨基去做他更願意做的、負責經濟的委員，而似乎想讓他接手意識形態和教育工作，以及排在第二位的國際事務問題。<sup>59</sup> 列寧剛剛迫使黨接受了新經濟政策中市場的合法化的做法，他是不是擔心托洛茨基執迷於國家計劃？或者是想提高托洛茨基的地位？這個問題還說不準，但可能列寧兩種考慮都有：遏制托洛茨基反對新經濟政策的衝動並平衡斯大林的權力。

列寧的建議提供了一個大好機會，可以讓托洛茨基開始要求繼承列寧在政府中的位置。<sup>60</sup> 斯大林把列寧的建議擺到政治局的七名委員面前（有可能就是在他收到建議的當天），讓他們通過電話表決。斯大林、李可夫和加里寧贊成列寧的建議（「不反對」）；加米涅夫和人稱托姆斯基（Tomsy）的米哈伊爾·葉夫列莫夫（Mikhail Yefremov）棄權。有一個人反對對於托洛茨基的任命，那就是托洛茨基本人：「我堅決拒絕。」<sup>61</sup> 最優秀的托洛茨基傳記作者推測，他之所以拒絕，是因為他「毫不懷疑，即使作為列寧的代理人，他的每一步也都得取決於總書記處的決定。而總書記處可以選派布爾什維克到政府各個部門，單憑這一點就能有效地控制這些部門」。<sup>62</sup> 受制於斯大林，這對於托洛茨基來說，實在是難以接受。但同樣重要的是，托洛茨基似乎一直堅持對行政機關進行徹底的改造，並由他來領導整個經濟的計劃工作。9月12日，斯大林到哥爾克去看望列寧，顯然是為商討形勢。托洛茨基的態度意味着，在9月14日的政治局會議上，在新增補的代表中，只有加米涅夫一人身兼人民委員會代表與勞動國防委員會代表，而這就意味着，他還要主持政治局會議。9月14日的會議紀要寫道：「政治局遺憾地記錄

了托洛茨基同志明確的拒絕。」<sup>63</sup> 托洛茨基的拒絕就像他在1922年沒有到哥爾克看望列寧一樣，是一種選擇。<sup>64</sup>

托洛茨基剛剛拒絕成為列寧在政府中的副手，由斯大林控制的黨的機關的喉舌《真理報》，就以配有插圖的增刊形式(9月24日)，集中報道了斯大林1922年9月幾次到哥爾克探望的情況，目的是證明列寧的身體恢復得很好。斯大林列舉了據說是自己和列寧討論過的諸多問題：「國內情況……收成……工業狀況……盧布匯率……預算……外部狀況……協約國……法國的行為……英國和德國……美國的作用……社會革命黨人和孟什維克……白匪報刊……亡命徒……列寧逝世的無稽的神話。」<sup>65</sup> 實際上，斯大林是在列舉自己無限的職責。另外，文章還配有一張烏里揚諾夫娜拍的照片：列寧高興地和斯大林一起，微笑着並肩坐在哥爾克莊園的外面。照片一方面是想說，列寧的氣色很好，另一方面也是要向全黨、全國和全世界表明，斯大林同他的關係很親密。<sup>66</sup> 接班人之爭正在進行，但列寧的康復也不是沒有可能。1922年10月2日，他回到了離開四個月之久的莫斯科，並於次日主持了人民委員會會議。「會上人很多，有54人出席，」列寧秘書處的負責人利季婭·福季耶娃(Lidiya Fotiyeva)回憶說，「大家都想盡可能早、盡可能近地看看列寧。」<sup>67</sup> 但托洛茨基的問題還是沒有解決。大概就是在這段時間，列寧嚴厲批評了加米涅夫和斯大林竭力削弱托洛茨基地位的做法。「你寫道，『(中央委員會)正在把或正準備把一門強力大炮扔下船，』」列寧在給加米涅夫的信中說道，「你在暗示的不是別的，就是要把托洛茨基扔下船。這一想法極其荒唐。要是你還認為我沒有蠢到不可救藥的地步，那你怎麼可能想出這樣的事情!!!」列寧最後甚至還引用普希金(Alexander Pushkin)的《鮑里斯·戈杜諾夫》中「眼前的血淋淋的孩子們」以示警告，這顯然是在影射出於政治野心的背叛會遭到怎樣的報應。<sup>68</sup>

10月31日，列寧戰勝疾病的希望增加了，當時他發表了自從發病以來的第一次公開講話，在蘇維埃中央執行委員會會議上致閉幕詞並

---

\* 譯註：《斯大林全集》第5卷，第111-112頁。

418 引起長時間的熱烈鼓掌。<sup>69</sup>然而這種幸福感並沒有維持很長時間。列寧謝絕了回到米歇爾遜工廠——1918年他曾在那裏遭到槍擊，而現在該廠以他的名字命名——參加1922年11月7日十月革命五週年紀念活動的邀請。<sup>70</sup>11月13日那天，他倒是在共產國際第四次代表大會上用德語講了一個小時，但弄得滿身大汗，還告訴人們說，他在講話時「忘記自己說了甚麼，還要說甚麼」。<sup>71</sup>11月20日，列寧在莫斯科大劇院對莫斯科蘇維埃發表了一次公開講話。觀眾們一看到他就高呼「伊里奇萬歲！」，鼓掌鼓到手疼。最後，當加米涅夫請列寧講話時，再次爆發了長時間的熱烈鼓掌。<sup>72</sup>但是，有位目擊者回憶說，列寧「在我看來，似乎比在共產國際第四次代表大會上還要疲憊」。<sup>73</sup>一位在場的法國共產黨人寫道：「那些頭一次見到他的人說，『這還是那個列寧！』但其他人決不會產生這樣的錯覺；現在在他們面前的這個人，不是他們所熟悉的那個機敏的列寧，而是一個被癱瘓嚴重影響的人，面部表情僵硬……他平常講話簡潔、快速而自信，現在卻吞吞吐吐、時斷時續。」<sup>74</sup>列寧自己在講話時也說，他「在相當長的時期內失去了工作能力」。<sup>75\*</sup>第二天（1922年11月21日），監督列寧情況的「值班秘書日誌」啟動，第一篇日誌是斯大林的妻子阿利盧耶娃記載的。<sup>76</sup>四天後，當列寧在走廊裏走動時，突發雙腿痙攣摔倒了。他費了好大的力氣才站起來。在徵求了醫生的意見後，他不得不取消了所有的會議和講話。列寧沒有出席11月30日的政治局會議。這一天，他在一份恩格斯的「政治遺囑」（莫斯科，1922）上寫道「擱在書架上」，意思是不要還給圖書館。<sup>77</sup>也許列寧要寫他自己的政治遺囑？



在蘇維埃的歷史上，幾乎沒有甚麼事情比所謂的列寧「遺囑」——日期為1922年12月至1923年1月——更撲朔迷離了，但正如我們將會看到的，與學界根深蒂固的看法相反，那些文件，列寧有可能並不是在

---

\* 譯註：《列寧全集》第43卷，第294頁。

那時候口授的，甚至有可能根本就沒有口授過。但是，不管這些文件的出處如何，它們都嚴重地威脅到了尚處於萌芽階段的斯大林的個人專政，並成為其統治中的一個糾纏不休的問題。「遺囑」常常被拿來說明斯大林作為列寧接班人的地位是不合法的，它對於理解斯大林的的心理和行為具有重要的意義。「遺囑」激活了他的心魔，使他覺得自己受了委屈，是受害者，使他不再相信任何人，同時也激起了他的命運意識和鐵一般的決心。這樣說決不是想要承認斯大林是列寧的合法接班人，而是要提醒人們，關於斯大林「篡奪」權力的說法是荒謬的。事實上，斯大林在政權內部地位的上升很大程度上要歸於列寧的提攜，此外，蘇俄共產黨政權就是靠政變起家的，而且它雖然是以無產階級的名義統治，卻要處死那些膽敢質疑該黨自封的壟斷地位的無產者。篡奪權力的正是這個黨。實際上，那些有意無意地重複托洛茨基及其支持者的說法的學者們，是在指責斯大林竊取已經遭竊的東西。<sup>78</sup>

419

同樣，聲稱在斯大林之前實行的是布爾什維克集體領導的說法也是空話。列寧的秘書處實際上創造了一個先例，那就是甚麼事情都管，所以說，在實行自上而下的個人統治這方面，列寧樹立了一個活生生的榜樣，沒有人做得比他多。（當其他「集體領導人」不同意列寧意見的時候，他就威脅要開除他們，而要是開除不了，就威脅要退黨並建立一個新的政黨。）除了關於斯大林的所謂篡權和據說是前所未有的單邊主義這些模糊焦點的話之外，托洛茨基以及斯大林政權的其他批評者還聲稱，他的勝利根本不是因為特殊的才能，只是因為特殊的環境。這種說法顯然是不對的。不過，我們仍需小心，不要反過來錯誤地去抬高他。他特別擅長管理與操控，可我們也應看到，斯大林是邊幹邊學，而且經常失敗。這不僅是因為他有很多缺點，還因為列寧幫助締造的意識形態上十分狹隘的專政制度和代價高昂的全球性對抗。在這個現在因為列寧主義的共產黨專政而變得更加複雜的世界上，要處理好俄國所面臨的極其困難的挑戰，無論由誰來做接班人，都會不知所措。斯大林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但結果顯然是有好有壞。

第三部將檢視斯大林在布爾什維克專政內部建立個人專政的過程，以及他行使那種巨大權力的方式。建立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



幫助實施恢復性的新經濟政策，並為廣大黨員闡明列寧主義本質的正是斯大林。斯大林不僅設法培植了大量的忠誠分子，而且還為自己發明了列寧的忠實學生這一角色。斯大林扮演的意識形態衛士這一角色同無情的官僚主義力量一樣，對於他能夠佔據上風非常重要。1920年代，共產黨的全會、代表會議和代表大會構成了蘇維埃政治生活的核心，也是斯大林傳記的核心；政治上的爭鬥不僅對於他的統治方式的形成產生了很大的影響，對於他的性格和形象也是如此。他和對手們之所以發生衝突，很大程度上並不只是因為個人權力，而是因為觀念，是為了爭奪正在進行的革命的解釋權。意識形態就是布爾什維克的現實：當時的文件不管是公開的還是秘密的，都充滿了馬列主義的思維方式和詞彙——無產階級、波拿巴主義、小資產階級、帝國主義、資本主義包圍、階級敵人、軍事專家、耐普曼分子(NEPman)、\* 富農、社會主義。事實證明，精通和控制意識形態是開啟終極權力的鑰匙，但與此同時，可悲的是，這種意識形態最終真的體現在了國內外事務中。

布爾什維克專政並不是革命和內戰的唯一結果。實際上，當時同時出現了兩場革命：一場是在北方的城市中，那裏日趨龐大的公職人員階級——政權的社會基礎——和數量激增、互相重疊的公共機構在為了權力和戰利品你爭我奪；另一場革命是在農村，那裏的小農戶奪取了土地，而土地依然是這個國家最主要的財富來源。（莫洛托夫晚年回憶說：「革命當初是在一個小資產階級國家發生的。」）<sup>79</sup> 這兩場革命的方向存在衝突。處於守勢的農民革命無法阻擋共產黨的專政，但是，它和國際環境一樣，強烈地制約了布爾什維克的雄心。另一方面，對於黨的許多忠實擁護者來說，要讓他們向農民妥協，其實也很困難。實際上，隨着時間的流逝，就如同激進分子所擔心的，新經濟政策中被迫的妥協將開始改變共產黨的成分和政治情緒，這一點讓斯大林非常擔心。他和托洛茨基在列寧生病後的衝突，事實上還只是前奏。影響更為深遠的是，俄國甚至世界歷史上一個真正包含了多方面

---

\* 編註：即新經濟政策 (NEP, New Economic Policy) 中的資本主義分子。

衝突的舞台已經搭好了，那是斯大林的個人專政與俄國全部歐亞農民之間的衝突。

斯大林最終會對農民革命發起暴力的顛覆，這簡直像天方夜譚。一位敏銳的德國學者、研究俄國農業的馬克斯·澤林 (Max Sering) 在 1921 年的一篇分析報告中認為：「在俄國那種政權的統治下，農民並不獨立擁有自己耕種的土地，這樣的政權現在是不可思議的。」<sup>80</sup> 澤林的錯誤在於，從法律上講，農民不擁有土地，但他們的確認為自己的使用權就相當於所有權，而要取消使用權的確似乎是不可思議的。然而斯大林將會證明，澤林以及共產黨中大部分抱着懷疑態度的人錯了。集體化以及對富裕農民的暴力剝奪 (去富農化) —— 斯大林在 1928 至 1930 年的革命性震動 —— 相對於 1917 年列寧那令人震驚的政變，後果其實要複雜得多。在斯大林採取的行動中，引人注目的不僅是他想對農村開展社會主義改造的願望 —— 那是所有布爾什維克最終都希望看到的 —— 還有如下事實：當這場賭博遇到大規模的抵抗並造成無數人破產的時候，斯大林將其進行到底。在布爾什維克領導層中，或者是接近布爾什維克領導層的，包括托洛茨基在內，沒有誰能夠把如此規模、如此血腥的社會工程大冒險堅持到底。從 1928 年 1 月開始，斯大林將會利用自己煞費苦心建立起來的個人專政，上演一齣想像中的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搏鬥，從而徹底改變和砸爛了歐亞大陸。



## 第十章

# 專政者

422

那段時間我們先是在沃茲德維任卡街工作，然後又搬到老廣場。我們總是一起工作到午夜，十二點半或是一點鐘，然後沿伊利英卡街步行回到克里姆林宮。我、莫洛托夫、古比雪夫，還有其他人。我記得有年冬天，我們在街上走，他〔斯大林〕戴了一頂有耳罩的帽子，好像兩隻耳朵在擺動……我們笑個不停，他會說點甚麼，我們再回兩句，互相鬧着玩笑……自由自在 (*volnitsa*)……一旁看的人總是問：這幫人是誰？我們實際上沒有衛兵。很少。也許有一兩個行人，就是這樣……那是一段快樂的時光。斯大林那時的心情很好。

——拉扎·卡岡諾維奇，對1922–1924年那段時期的回憶<sup>1</sup>

蘇聯的一切最後都取決於收成。

——英國外交官的報告，1924年12月<sup>2</sup>

斯大林出人意料地建立了專政中的專政。列寧是無可爭議的領袖 (*vozhd'*)，誰都沒有想到他會喪失工作能力。此事突然發生的時候，幾乎所有人都以為會實行集體領導：布爾什維克的其他高層人物打心底裏覺得自己和列寧不相上下，但他們也明白沒有誰會這麼看自己。再者，斯大林的很大一部分政治才能此時非但沒有得到賞識，甚至還被

423

人看不起。托洛茨基有個很巧妙的說法，說斯大林是「我黨傑出的庸才」。而據托洛茨基說，加米涅夫認為斯大林是個「小城市的政客」。<sup>3</sup>最後，還有一個不太為人所知的因素，使得斯大林顯得不大可能取得支配的地位：在他之前，已經有幾個人擔任過黨的負責人，而在第一位負責人去世後，人們就開始懷疑，是否有人能夠勝任那份工作，更不用說將其變成整個政權的焦點。

起初，最重要的黨務管理者或者說「書記」（從1917年4月起）是雅科夫·斯維爾德洛夫。他很有聲望，因為就像有位官員吹捧的，「他比其他任何人都更瞭解我們的黨」。<sup>4</sup>實際上，斯維爾德洛夫那時候非常忙碌，他手底下只有6名工作人員，而全國各地卻一下子冒出來很多黨委，1917年不到600個，到1919年已經有8,000個，而他同時還要兼任蘇維埃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國家元首），需要處理好與布爾什維克之外的社會主義者的關係。<sup>5</sup>當33歲的斯維爾德洛夫在1919年去世的時候——33年當中有12年是在沙皇的監獄和流放地度過的——列寧迫切地想要找一個接替者。<sup>6</sup>對於蘇維埃中央執行委員會，列寧甚至建議讓從1917年開始就被他調離該崗位的加米涅夫回去。最後被選中的是俄羅斯族人、貧苦農民的兒子而且看上去也像農民的米哈伊爾·加里寧，不過，這時候的蘇維埃中央執行委員會已經不再是權力的中心了。<sup>7</sup>在黨的機關，密碼專家葉蓮娜·斯塔索娃（Yelena Stasova）接任書記，但是在幾個月後，她「覺得自己在政治問題上能力不足」，於是便在1919年底讓出了位置。<sup>8</sup>接替她的人，即斯大林的前任中第三個擔任此職的，是尼古拉·克列斯廷斯基，他畢業於聖彼得堡大學法律系，擔任過財政人民委員。克列斯廷斯基是政治局和組織局最早的成員之一，他在接管書記處的同時——書記處是黨的頂層唯一的指揮機構——還在兼任這兩項職務。他擁有超強的記憶力，但要承受這項繁重的工作，似乎仍力不從心。<sup>9</sup>1920年4月，克列斯廷斯基身邊多了兩個人，列昂尼德·謝列布里亞科夫和葉夫根尼·普列奧布拉任斯基，他們負責改善與地方黨組織的聯繫。<sup>10</sup>但事實證明，這三個人既不內行，也不勤奮，這一點從黨媒的抱怨在迅速增加就可以看出來（克列斯廷斯基在財政人民委員部遇到的情況和這差不多）。<sup>11</sup>文件積壓，無人過問；官員們嘆息說，

骯髒的權力鬥爭 (*skloki*) 幾乎讓所有地方的黨務工作都陷入了癱瘓。<sup>12</sup> 不過，克列斯廷斯基、謝列布里亞科夫、普列奧布拉任斯基三人組之所以被拿掉，並不是因為不稱職，而是因為他們在1920至1921年的工會爭論中支持托洛茨基。列寧清理門戶，是要確保三人在黨的第十次代表大會上誰都不會再次當選為中央委員。<sup>13</sup>

被列寧提拔為黨的新的「責任書記」的是維亞切斯拉夫·莫洛托夫，他是斯大林的前任中第四個擔任此職的。「我沒有想到，」莫洛托夫後來回憶說，「1921年，我成了中央委員會的書記。」<sup>14</sup> 在他身邊的是葉梅利揚·雅羅斯拉夫斯基和瓦西里·米哈伊洛夫 (Vasily Mikhailov)。兩人都是能力普通的組織者，在書記處的位置上待的時間不長。書記處的工作時間長、任務重。它要處理很多的報告，其中既有反映官員酗酒、受賄和對政治無知的，也有請求提供稱職幹部的，同時，被任命的或有望被任命的幹部也在絡繹不絕地前來尋求指導，請求指示或希望得到關照。黨的書記處報告說，他們1921年為254,468名來訪者發放了通行證，包括週末在內，平均每天近700人。<sup>15</sup> 但1922年4月列寧任命斯大林為「總書記」——取代了雅羅斯拉夫斯基的位置，在莫洛托夫之上——他是在彌補令人敬畏的莫洛托夫政治分量不足的缺點，並希望提高領導工作的水平和效率。<sup>16</sup> 「中央委員會擁有巨大的權力 (*vlast'*)，」1922年春，就在提拔斯大林之前，列寧寫道，「……我們負責分配20萬至40萬黨的工作人員的工作，並且通過他們來分配千百萬非黨人員的工作。可是這個宏偉的共產主義事業卻被死氣沉沉的官僚主義徹底敗壞了！」列寧要求擺脫瑣碎的事務——「把它們交給助手或助手的助手去辦」——要求接受真正艱巨的挑戰。<sup>17</sup> 斯大林現在成了唯一身兼政治局、組織局和書記處三處職務的人，而且會一直如此。

斯大林的權勢為甚麼會擴張，現在的解釋都正確地指向了共產黨的一些顯著特點，特別是其集權化的人事任命和密謀性質的保密習慣，對於信息、議題、同基層群眾的聯繫以及對所有國家機關的監督都有着無

424

\* 譯註·《列寧全集》第42卷，第419頁。

可比擬的影響。<sup>18</sup> 這一切當然可以被用來擴張機構和個人的勢力，但那些機制必須得到進一步的加強和利用。托洛茨基有句名言：「不是斯大林創造了機關，而是機關創造了斯大林。」<sup>19</sup> 這話恰好倒過來了。斯大林創造了機關，而那是一個巨大的功績。<sup>20</sup> 誠然，我們應該看到，他是在邊幹邊學，因而犯了一些重大的錯誤，要想成為黨乃至全國公認的領導人，那還需要假以時日。但他展示了非凡的組織能力、極大的工作熱情、戰略頭腦以及和他的導師列寧相似的不擇手段。<sup>21</sup> 事實證明，斯大林不但能對自己繼承的各種槓桿運用自如，而且能發明新的槓桿。不可否認，他的權力，包括人事方面的權力，往往被視為出自一套非人格化的機構。托洛茨基等人所忽視或拒絕承認的是，斯大林擁有靈巧的政治手腕：他能記住別人的名字和生平經歷，會用自己的親切、關注和體貼給人們留下深刻的印象，而不管他們是屬於哪一層哪一級，哪怕只是服務人員。四十多歲的斯大林在黨的機關中找到了自己的事業：他喜怒無常，人緣卻像選區政客一樣好，雖然他掌握的工具是選區政客做夢也想不到的——共產黨管轄的範圍、紀律以及描繪了一幅光明前景的意識形態。

但斯大林之所以能夠佔據支配地位，最突出的原因是，組織結構給了他實行個人專政的可能性，而他正是通過履行總書記的職責才開始意識到那種可能性的。

斯大林幾乎是一下子就擁有了超乎尋常的權力。當他在1922年上任的時候，中央委員會機關、書記處和組織局的人數已經從兩年前的區區30人增加到大約600人。其他任何人的手下都沒有那麼多的工作人員：列寧在人民委員會的官署有102名工作人員。<sup>22</sup> 與政府不同，黨不僅是執行機構，還是群眾組織，一個刻意要把其他所有的公共機構都籠罩在自己陰影下的龐大組織。斯大林對這個機器的影響很直接。莫洛托夫做過一些重要的改進，比如對全體黨員進行初步的分類登記，但斯大林會把這一切極大地鋪開。<sup>23</sup> 整個1922年春天和夏天，他不斷從各省調進精幹人員，並且規定，各地方黨組織每兩個月就要以兩頁的私人信件的形式交一次報告。從1922年5月1日到1923年1月15日這六個月中，據記載，黨的機關共收到13,674份地方性的會議記錄，1,737

份總結報告，324份政治情緒報告和6,337份其他信息，同時它自己也發佈了141則指示性的通告。<sup>24</sup> 在黨的第十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上（1923年）——那是斯大林上任後的第一次——發言者都稱讚書記處取得的巨大進步。<sup>25</sup> 與克列斯廷斯基一樣，斯大林的記憶力驚人，而且他會敲腦袋，確立了秩序。他喜歡這項工作，尤其是，他做了這項工作。「毫無疑問，在伊里奇看來，他是最信得過的刻耳柏洛斯，<sup>\*</sup>無所畏懼地守衛着通往中央委員會的各個大門，」斯大林的第一位高級助手、被他從高加索調來的亞美尼亞人阿馬亞克·納扎列江（Amayak Nazaretyan）在寫給梯弗利斯的謝爾戈·奧爾忠尼啟則的信中說（1922年8月9日），「中央委員會的工作現在有了很大起色。過去這裏是一塌糊塗。過去地方上對中央委員會機關是甚麼看法？現在所有人都振作起來了。」<sup>26</sup>

政權的地理空間剛好證明了斯大林的位置具有極大優勢。那些地址本身似乎沒有甚麼意義——沃茲德維任卡街5號，然後是老廣場街4號；茲納緬卡街23號；大盧比揚卡街2號；鐵匠橋街15號；伊利英卡街9號——卻顯示了安全警察和軍方當中聯絡的關鍵線路。<sup>27</sup> 學者們早已證實，各省的黨的機器為中央機關輸送了大量新人，為斯大林在地方上培養了大量效忠者，但我們也應該看到，作為黨的負責人，斯大林很早就開始借助於秘密警察的力量來行使自己的權力。他讓他們中的某些人進入黨的機關，並且和盧比揚卡那邊的警察機關保持非常密切的聯繫。斯大林還有效地控制了軍隊。在政治局或中央委員會召開會議後，不管作出甚麼樣的決定，斯大林都會回到辦公室落實這些決定——或者選擇不那麼做。他從自己的辦公室，通過黨務人員和秘密警察的特工人員開始實施會議之外的計劃。他獲得了自行任命自己的工作人員的權力。<sup>28</sup> 但他在別的地方也到處安插忠於自己的人，並且還為他們尋找或培養敵人，目的是觀察前者。這大大超出了履行總書記職責所需，但又一次在結構上成為這個位置難以剝離的一味配方。斯大林必須表現得特別克制、恭順和安分守己，才能不去建立個人的專政中的專政。

426

---

\* 譯註：希臘羅馬神話中守衛冥府入口的猛犬，有三個頭。



但權力的地理分佈也反映了政權權力的限度和斯大林個人專政的限度，尤其是在生活着全國五分之四人口的廣大農村，黨近乎不存在。十月政變前夕，在這個橫跨兩大洲的國度，布爾什維克在農村的基層黨組織只有4個，農民黨員494人。<sup>29</sup>到1922年，在大批紅軍士兵復員返鄉之後，農村的黨員數量達到了20萬，而共產黨員的總數是51.5萬。<sup>30</sup>但是，在農村地區將近1.2億的總人口中，黨員的比例不到千分之一。大約每25個村子才會有一個黨的基層組織。省會城市中紅旗招展，到處都是共產黨的標語，但只要出城走上十分鐘，就很難再找到政權存在的明顯痕跡。<sup>31</sup>這不是說黨在城市的統治一切都很順利。在城市蘇維埃的選舉中，政權不得不把秘密投票改成公開投票，而且還有秘密警察在現場監督，於是選舉的結果便像1922年12月莫斯科古容(Guzhon)冶金廠(不久就被更名為「鐮刀錘子冶金廠」)那樣盡在掌握中：布爾什維克候選人以100票贊成2票反對當選，而棄權的有1,900票。<sup>32</sup>除了恫嚇，政權還對工人進行拉攏，讓他們進入管理層，給他們提供固定工資、住房、特供商店和其他津貼，但也指派他們訓斥那些被共產黨的特權和腐敗所激怒的工人。<sup>33</sup>共產黨政權的社會基礎就是它本身。也就是說，這個不斷擴大的政權本身就是一個社會，而這個社會的中心是斯大林。

與作為助手的納扎列江不同，幾乎所有在1920年代遇到過斯大林的人都只有粗略的印象。革命博物館奉命製作塑像的女雕塑家瑪麗娜·雷恩基翁斯卡婭(Marina Ryndzyunskaya)注意到，他「中等身材」，走起路來很奇怪。「他左手插在口袋裏，突然朝前走去，」她寫道，「當他轉身的時候，他不是頭、脖子、身體慢慢地轉過來，而是一下子全轉過來，像個士兵。」<sup>34</sup>但推動他的力量是甚麼？就連那些同斯大林一起工作的人也往往看不透他。1922年，23歲的總參謀部軍官亞歷山大·巴爾明(Alexander Barmine)，在克里姆林宮聖格奧爾吉大廳共產國際第四次代表大會上頭一次見到了斯大林。他聲稱，自己不僅看到斯大林在代表和觀眾面前出席閱兵式，而且看到他在辦公室工作。斯大林本人「看上去比較粗俗、比較普通，還比較矮」，巴爾明後來寫道，「他的臉上有麻子，臉色蠟黃……他的眼睛是深棕色的，同時又帶有一點

淡褐色。從他的表情看不出他在想甚麼。他讓我心裏有一種莫名其妙的沉重和悶悶不樂的感覺。這人似乎既不是歐洲人也不是亞洲人，而是歐亞混血人種。」在會議上，巴爾明注意到，斯大林坐在一旁抽着煙斗，心不在焉地寫寫畫畫，但他憑藉自己的「意志力、耐心、狡猾、洞察人性弱點並輕蔑地加以利用的能力，以及不屈不撓、毫無顧忌地追逐既定目標的極高天賦」，逐漸積累了權力。<sup>35</sup>這是個簡單化的論斷——心理學大師，鋼鐵般的意志——後來有很多人贊同，特別是在回顧往昔的時候，但它忽視了斯大林權力的一個重要來源，即他對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潛心鑽研。同時它不能解決這樣一個問題：為甚麼最後會有那麼多人容易受他影響？<sup>36</sup>赤裸裸的名利心是他們想要攀附總書記的一大原因，但也有許多人被斯大林吸引是因為他頑強地獻身於革命事業，獻身於國家的權力。

### 從沃茲德維任卡街到老廣場街

在列寧患病之前，他人在哪裏，政權就圍繞哪裏旋轉：哥爾克別墅或克里姆林宮帝國參政院的辦公室和住所。而位於帝國參政院的辦公室和住所之間的，就是政權的主要會議地點，那裏是人民委員會和政治局共用的。<sup>37</sup>中央委員會的辦公室都不太氣派，而且是在克里姆林宮的外面。起初，黨的工作人員是在一棟租來的房子裏面開張的，在那裏，「機關」都擠進了一個套間，儘管沒過多久就把牆敲掉，又連起一個套間。斯塔索娃，然後是克列斯廷斯基，再然後是莫洛托夫，辦公室都在這裏。機關位於沃茲德維任卡街——一條以克里姆林宮宮牆為起點的徑向大街，從聖三一塔樓開始向西到阿爾巴特街。（地址是沃茲德維任卡街4號，而在大樓的另一側，它是莫霍瓦婭街7號。）<sup>38</sup>1920年，不斷擴大的機關搬到了對面的沃茲德維任卡街5號，那是一座比較威嚴的建築，是克里姆林宮帝國參政院的建築師馬特維·卡扎科夫（Marvei Kazakov）在18世紀後期建造的，但只有帝國參政院幾分之一的大小。<sup>39</sup>「接待室裏擠滿了來訪者；數不清的職員，大多是年輕的姑娘，穿着短裙和油光錚亮的高跟鞋，抱着文件輕盈地走來走去」，1920年，一名到

訪的美籍俄裔無政府主義者寫道。他還說，那些工作人員「面色蒼白、眼窩深陷、顴骨高聳，可能是長期營養不良和操心勞碌造成的」。<sup>40</sup>沃茲德維任卡街5號的附近有一座古修道院遺址，修道院已經在幫助趕走拿破侖的那場大火中被焚毀，而在那之前，它曾經是「恐怖的伊萬」手下秘密警察的所在地。斯大林就任總書記後的辦公室就設在這裏，設在這座擁擠的新古典主義風格的大樓裏。<sup>41</sup>

原本具有服務性質的黨的機關變得擁有了無限權力，這種情況讓人感到意外，卻又事出有因。<sup>42</sup>列寧當初選擇了部長制的政府形式，但是，忙碌的人民委員們委託他人去參加據說是有審議之責的人民委員會會議，這些會議不管誰出席，總是由列寧控制。<sup>43</sup>更重要的是，列寧過去堅持主張，黨——主要是指政治局，但是在一定程度上也包括中央委員會——應該成為最高決策機構。而在當時，無論是人民委員會還是單個的人民委員部都沒有地方性的分支機構，因此都要依靠地方黨組織去落實決定和輸送忠實可靠的工作人員，這樣一來就進一步鞏固了上述選擇。<sup>44</sup>嚴格說來，黨並不是國家機構，所以它的決定必須通過人民委員會的法令或蘇維埃中央執行委員會的法律表達出來，這樣一來就容易造成混亂，於是有人建議取消黨，其他人則建議取消蘇維埃。<sup>45</sup>結果是哪一樣都沒有取消。黨的中央機關的各個部門與人民委員會的組織結構開始變成平行關係。中央委員會的職工並不全是訓練有素的工作人員（或負責人員（*otvetstvennye rabotniki*））；許多人是速記員、會計、司機——實際上，600名職工中大概有240人不是黨員，有340人是女性。<sup>46</sup>（在這裏就和在別的地方一樣，打字工作和大部分文件存檔工作都是由布爾什維克的妻子、情婦或「資產階級小姐」做的。）<sup>47</sup>雖然如此，這個以黨為中心的政權的機關還是吸引了有才幹的人，他們推動了需要專門知識的領域的發展，這些領域幾乎涉及行政管理的方方面面：人事、宣傳、通訊、陸軍、海軍、對外政策、安全、金融。<sup>48</sup>

由於空間不夠，1923年12月底，黨的中央機關搬進內城的基泰哥羅德貿易區（那裏的高牆和門樓可以追溯到中世紀），接管了那裏的老廣場街4號，它在1915年曾是前莫斯科商會的貿易大樓。<sup>49</sup>對於那次冬季的搬家，工作人員阿列克謝·巴拉紹夫（Alexei Balashov）回憶說：

「職工們親自用雪橇裝卸家具和文件，排成了一長列。」<sup>50</sup> 斯大林的辦公室設在這幢由商業資本建造的、兼具現代主義和新古典主義風格的建築的頂樓，要想進去，就要穿過另外兩間辦公室，那是他的幾個主要助手和一個傳遞文件的特別信使的。斯大林的套間寬敞而整齊，後面有扇門，通往一間大會議室，他和莫洛托夫經常在那裏商量事情（會議室另一面是莫洛托夫的辦公室）。<sup>51</sup> 在斯大林的辦公室，左邊是一張大桌子，可以坐得下20人；最右邊的角落裏是他的寫字檯，還有一張擺着幾部電話的小桌子和他的私人保險櫃。那時他還不像後來那樣是個夜貓子。「斯大林通常是在早上9點左右起床，11點以前趕到老廣場街的中央委員會，」據一位長期擔任警衛工作的人說，「他經常工作到深夜，尤其是在列寧去世後的那幾年，當時他不得不同托洛茨基分子作積極的鬥爭。」<sup>52</sup> 工作結束後，他經常和莫洛托夫一起——他也住在克里姆林宮——朝紅場方向走上一小段路，穿過救世主門（有大鐘的門）回家。

由於擔任政府職務（民族事務人民委員），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宮的帝國參政院大樓也有一間辦公室，但他似乎很少用。不過，克里姆林宮也是每週兩次政治局開會的地方。1922年的時候，政治局只有七名正式委員（列寧、斯大林、托洛茨基、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李可夫、托姆斯基）和三名候補委員或者說沒有表決權的委員（布哈林、加里寧、莫洛托夫），雖然斯大林很快又增加了一名候補委員（揚·魯祖塔克（Jānis Rudzutaks））。但政治局的會議內容很雜，參會的除了中央委員、中央監察委員以及根據相關議項獲邀出席部分會議的其他人士，還有很多來自機關的技術人員。中央全會的規模更大，而且每個月要召開一到兩次。<sup>53</sup> 組織局要處理人事方面的決定，會開得比黨的任何機構都多，有時甚至連開幾天——這些會議也被稱為狂歡。而黨的書記處實際上則是會議不斷。另外，中央的黨務官員可以要求各人民委員部的職工提供幫助，為斯大林搜集信息，準備政治局和中央委員會的議程、報告或建議。

斯大林專政中的專政正在出現，雖然從物質或人員方面與舊首都的舊政權沒有任何聯繫，但在一個重要的方面，同沙皇制度還是很像的。

1917年以前，權力中心是名義上作為服務機關的帝國總理府，直接對沙皇負責，並最終和沙皇自己的個人官署合併到一起。<sup>54</sup>「總理府的負責人是完全獨立的，」有位長期擔任此職的官員寫道，「並不需要聽命於大臣委員會主席。」<sup>55</sup>大臣們往往不如總理府的工作人員消息靈通，因為只有後者才瞭解國家的全貌，同時，由於國家的龐大和複雜，由於自身的抱負和才具，他們還積攢了巨大的權力。與人民委員會或蘇維埃中央執行委員會相比，共產黨中央機關的情況也是如此。但是，帝國總理府一直未能讓各部完全聽命於自己——官僚主義的內訌讓沙皇把總理府變成自己監管整個國家的機構這一努力化為泡影，而在蘇俄時期，除了農民村社之外的所有團體，都有黨組織，可以使黨成為國家和社會的監護人。<sup>56</sup>威力巨大的世界觀和信仰體系，讓無處不在的基層黨組織充滿了力量。換句話說，斯大林的機器不是沙皇專制制度的重現，而是現代的一黨專政。<sup>57</sup>

431 老廣場街4號，蘇維埃政權的心臟，對於那些瞭解1917年那種不拘小節的時光的人來說，開始呈現出令人生畏的對比。被叫做「日內瓦人」的亞歷山大·伊利英(Alexander Ilin)在回憶時說，中央委員會在彼得格勒原來的「總部」，那場面就「像一個寧靜的家庭」，「大家坐在餐桌旁喝着茶」。現在的是「一座巨大的建築，層層級級的部門像迷宮一樣。每層樓都有大量匆匆忙忙的工作人員」。<sup>58</sup>伊利英認為這種官僚主義的蛻變是不可避免的，但也是可悲的。他似乎沒有意識到，在這座新的「巨大的建築」裏，親密的關係和友情仍然存在。工作人員與斯大林一同乘電梯；有的人可以在走廊裏碰到他。他的辦公室是不鎖門的。「有時我從他的圖書室拿本書到休息室去看，」工作人員巴拉紹夫回憶說，「那裏面有幾櫃子的好書。中央的幾家出版社每出一本書都要給斯大林送兩冊，而且常常是簽了名的。許多作家自己也會把他們的書送來。斯大林會給我們一本，我們大家就把那些書分了。」斯大林的辦公桌是不鎖的。「晚上他就把所有的機密文件都還掉或者鎖進保險櫃，」巴拉紹夫解釋說，「在接待處有人值班，更遠一點的地方還有衛兵，所以他有甚麼要擔心的呢？」<sup>59</sup>

### 職務名冊與密謀性

斯大林的機關權力增大，首先在於對人事的影響。絕大多數黨員都有全職工作，不管是在工廠還是人民委員部，他們參加黨的活動被認為是自願的，但也有少數黨員是領有報酬、專門從事黨的工作的（黨務官員），比如黨組織的管理。這樣的官員理應是通過選舉產生的，但是在內戰中，選舉被放到次要位置。戰事平息後，許多官員堅持要求恢復選舉，結果列寧不得不在黨的第十一次代表大會上（1922年3—4月）反對說，「如果取消中央調配人員的權利，它就不能指導政治」。<sup>60</sup> 1922年6月6日，斯大林發佈通告稱，中央委員會的監督人員有權提名候選人（通常只有一個），參加地方黨組織職務的選舉。<sup>61</sup> 想要在某個地區大權獨攬的人，部分是出於個人野心，部分是出於紛紛冒出來的政府機構和權力中心所造成的挫敗感，試圖將自己的意志強加給別的地方官員，而中央機關無法做到不偏不倚，於是就換掉它不支持的那一方的地方官員。這讓某些地區的官員得以鞏固其作為省級黨組織負責人的權威，而這些人又可以將其權力集中化，插手下面的事務，讓自己的人「當選」為縣級黨組織的負責人。<sup>62</sup> 斯大林單憑自己永遠不可能對整個國家實行集權統治，但他可以對那些正在對他們各自的省份實行集權統治的黨的負責人實行集權統治。<sup>63</sup>

432

斯大林的成功仍然受限於國土的廣袤和裙帶關係（*semeistvennost'*），但中央機關通過周期性的審查或「清黨」，迫使地方交出更多的人事資料，並設法將國內的所有黨員都登記在冊。<sup>64</sup> 他的工作人員鼓勵地方黨務官員向中央互相檢舉揭發，並派巡視組打破或至少控制住地方集團。<sup>65</sup> 這是在四處擴張的俄國上演的古老的貓鼠遊戲——遠方的地方官員努力規避，或者反過來，努力對付中央的命令，但現在，中央有了黨和黨的紀律這一強有力的機制。值得注意的並不是地方黨組織經常拒不接受中央建議的黨的最高職務的人選，而是中央機關得以在很大程度上推行自己的意志。僅1922年4月到1923年3月，組織局就至少

\* 譯註：《列寧全集》第43卷，第120頁。

作了1,000項任命，其中包括不少於42名新的省級黨組織負責人。<sup>66</sup>對於那些被調來調去的幹部，斯大林幾乎不可能做到人人都瞭解。<sup>67</sup>為了升遷，要是騙不了斯大林，那省級官員就會一心巴結他。1922年9月，斯大林成立了一個委員會，準備把表現突出的地方工作人員提拔到莫斯科。在當年對47位省委書記的書面的秘密測評中，烏拉爾的一名官員(列昂尼德)被認為「沒有能力領導蘇維埃或黨的工作。經受不住外來的影響……是個低於省級水平的工作人員」。但另外一名官員，下諾夫哥羅德的尼古拉·烏格拉諾夫(Nikolai Uglanov)，則被說成是表現積極，「能夠把工作人員團結起來完成工作。有威信」。<sup>68</sup>1923年，斯大林讓烏格拉諾夫成了有表決權的中央委員，並在第二年把他提拔到首都，成為莫斯科黨組織第二書記，而且很快就成了第一書記。<sup>69</sup>

433 在斯大林的組織局的倡導下形成的「職務名冊」(*nomenklatura*，來自拉丁語 *nomenclatura*，意思是「名冊」)讓高級工作人員的任用與調動有了一套制度。進了職務名冊的工作人員，非經中央機關的批准，不得被解除職務。最初的名冊(1923年11月)含有4,000個職務或官員：各共和國、省、縣的第一書記；人民委員及其副手；各軍區司令；駐各國大使。<sup>70</sup>特別值得注意的是，由黨控制職務名冊的做法被應用到國營的工業部門。要弄清楚所有這些任命，絕對需要大量的工作，於是，斯大林就試圖減少中央機關負責的職務數量。<sup>71</sup>省級黨組織仿效中央的做法，對於可以控制的任命，也編制了自己的職務名冊。實踐中的任命制與原則上的選舉制之間，以及中央與地方的權利之間，關係是一如既往地緊張。但是，建立職務名冊制度並要求更新人員資料，這在精力旺盛者的手中，是一種非常有效的恩遇機制(*patronage mechanism*)。斯大林極為重視能力，但他對能力是從忠誠的角度理解的。我們「必須挑選工作人員，把善於執行指示、能夠理解指示，能夠把這些指示當做自己的東西並且善於貫徹這些指示的人安置在各種工作崗位上」，他在黨的第十二次代表大會上說(1923年4月)。<sup>72</sup>執行中央的指示成了斯大林的準則，而要是誰有不執行的嫌疑，就會讓他耿耿於懷。<sup>73</sup>

\* 譯註：《斯大林全集》第5卷，第171頁。

斯大林的機關還利用一些別的工具。契卡的創始人之一、內戰時負責監督最高革命法庭的伊萬·克謝諾豐托夫 (Ivan Ksenofontov)，被安排負責黨的事務管理局。事務管理局管理日常事務，比如黨費和黨的預算，也掌管辦公室以及家具和陳設、公寓、食品供應、醫療保障、小汽車和司機、出國旅行。<sup>74</sup> 事務管理局有權給予或不予關照，這就給斯大林提供了巨大的槓桿。然而，另外一個關鍵的手段是政府的電話系統。因為擔心打電話時會被接線員竊聽，政權研發了一種叫做「維爾圖什卡」(vertushka)\* 的電話。之所以取這樣的名字，是因為它有撥號盤，那在當時是個新鮮的東西。起初，接入這種可以自助撥號的政府網絡的約有60人，但很快就增加到幾百人，並成了權力的標誌(對那些沒有這種電話的人來說，就成了缺少權力的標誌)。<sup>75</sup> 有位叛逃者聲稱，斯大林監督了維爾圖什卡系統的安裝，也因此默許對它的監聽。<sup>76</sup> 這種說法貌似真實，但至少對於最初這段時期來說，還沒有得到其他證據材料的支持。<sup>77</sup> 我們現在可以說的是，那時的大多數維爾圖什卡電話都在老廣場街，因而加強了黨的機關作為節點的功用。<sup>78</sup> 政權還成立了一個特別的密碼單位，在名義上歸契卡領導，實際卻是獨立的，這樣一來，政治局的電報就不會經過秘密警察的領導層。<sup>79</sup> 在出生於梯弗里斯的烏克蘭人格列布·博基的管理下——他曾在聖彼得堡礦業學院學過數學和物理，還為換妻和縱酒建過一個聚居區，密碼專家們每天要為地區黨組織、駐外大使館和度假的官員們編碼、解碼幾百封電報。<sup>80</sup>

434

只有打着中央旗號的斯大林可以給所有地方和機構發佈指示，而各人民委員部、秘密警察或軍隊送給政治局或中央委員會的任何東西，都要經過黨的書記處。老廣場街的收發室就像是在搞軍事行動，秘密警察充當的信使對信封進行黏、縫、封、拆；信使們還必須攜帶擦得乾乾淨淨，上好了油而且填好彈藥的武器，必須反覆核實收件人的身份。<sup>81</sup> 但是，有關走漏消息和違反規定的投訴接連不斷，對官員的訓誡也是接連不斷。<sup>82</sup> 1922年7月，已被調到黨的西伯利亞局的雅羅斯拉夫斯基

---

\* 編註：俄語中的「旋轉式撥號盤」。



把自己的公文包弄丟了，而那裏面有密碼本和筆記本。當局懸賞1億盧布——顯然沒打算兌現，也沒有可能兌現；公文包找到了，可裏面的東西沒了。<sup>83</sup>從1923年4月開始，禁止把任何涉及國家安全的東西形諸文字；相反，安全事務要先在斯大林的書記處進行討論，然後提請政治局注意。<sup>84</sup>1924年8月19日，政治局頒佈了一項〈關於處理中央文件時的保密工作〉決議，並在附錄中列出了〈處理中央保密文件時的若干規定〉。許多指示都要求官員「在處理文件時要做到絕對保密」，要注意誰看過文件，以及文件是怎樣保管的；查閱機密文件的官員無論是誰都要簽名。許多文件都必須閱後歸還。

435 高度保密成了一種止不住的渴求，強化了斯大林的控制力。他和他的工作人員從事務管理局分出一個獨立的實體，名叫「保密部」，負責檢舉和調查、黨的檔案以及與秘密警察的聯絡。保密部起初規模不大，到1920年代中期擴大到幾百人，下屬機構擴展到黨的地方分支組織、軍隊、工廠和國家行政部門，最終，擴展到所有重要的公共機構。這些保密部構成了一個平行的情報系統——政權中的政權，可以起到震懾作用，因為官員們並不清楚在這些平行的渠道中，有甚麼會被記錄和上報。中央保密部的辦公地點由幾道鋼門隔開。「老廣場街那棟灰色大樓裏的至聖之所是保密部，」某蘇聯官員在叛逃後寫道，「從電梯上去，然後是一條似乎沒有盡頭的走廊。開會是在晚上。因此大樓在昏暗中，空空蕩蕩、寂靜無聲。每走一步都會發出響亮的、孤零零的回聲。接着要經過幾道內衛部隊的崗哨。要出示特別通行證。最後，穿過把這個部門同大樓中其他部門分開的鋼門。然後就到了最後那道門。」<sup>85</sup>

機關的權力在相當程度上來自它的神秘性。對於難得一見的老廣場街內部，女雕塑家雷恩基翁斯卡婭寫道：「在這座設施中，頭一件讓我感到吃驚的事就是非常整潔和某種沉默寡言——要是可以那樣說的話。言語動作都非常謹慎，沒有任何多餘的東西。」後來當她在自己的工作室見到斯大林的時候，她告訴他，在中央委員會總部受到的驚嚇 (*zhutko*) 讓她緊張不安。「我非常、非常滿意，」據說斯大林微笑着回答說，「就應該是這樣。」<sup>86</sup>但是在機關的所有秘密中，最大的秘密在於，不加節制的命令主義、對書面報告的強迫性需求以及沒完沒了的

巡視組，加劇了黨國各地令人不安的管理混亂，同時也把老廣場淹沒在文牘當中。專政在不知不覺中束縛了自己的手腳。組織局的人員研究了多產的普拉東·列別傑夫(Platon Lebedev)——人稱「克爾任采夫(Kerzhentsev)」——寫的幾本手冊，比如《組織原則》，它的頭兩版不到幾個月就銷售一空；第三版(1924)的印數達5,000冊。為了給「在任何領域工作的基層組織者提供簡明而實用的指導」，克爾任采夫引用了美國和英國的著作，並複製了英國的卡片式人事檔案系統的插圖。這套系統設有每個員工的索引卡片，而他主張，在編制這套系統的時候，不僅要按照字母順序，還要按照職業和籍貫。<sup>87</sup>但他關於指示要清晰具體、要貫徹到底，然後進行明智調整的主張，忽視了專政有一種趨勢，會導致甚或鼓勵管轄權重疊等有意造成的效率低下，這是確保政治控制的一種方式。

奪權時和掌權時的密謀表現得一樣。<sup>88</sup>對廣大黨員來說，機關在理論上應當是透明的；列寧曾經主張應當在黨的大樓內部掛一張按字母排序的簽到表，上面寫上斯大林的名字以及他的辦公時間。<sup>89</sup>不過，列寧在下發自己的書面命令時，常常要求把文件還給他或者是在看過之後立即銷毀。正如他在1919年談到布爾什維克對突厥斯坦的顛覆活動時寫的那樣，他總是主張，做事要「極端機密(因為我們知道在沙皇統治下怎麼工作)」。<sup>90</sup>換句話說，密謀的起源和延續，同斯大林的個性沒有甚麼關係，儘管斯大林是個天生的大陰謀家，儘管他現在是主要的受益者。

436

### 茲納緬卡街23號

克里姆林宮西側有一條同沃茲德維任卡街平行的茲納緬卡街，街名源自一座古老的教堂(「聖母顯靈教堂」)。茲納緬卡街23號原先是亞歷山大軍事學校，後被共和國革命軍事委員會、陸軍人民委員部和布爾什維克總參謀部佔用。<sup>91</sup>內戰時期，茲納緬卡街是權力中心，但隨着勝利和復員，其地位急轉直下，因為到1923年底，紅軍的數量已從500萬左右縮減到60萬。(數量減少的一個重要原因是擅離職守。)同樣重要的是，軍中所有的部隊都設立了共產黨的「政治部」，由獨立的紅軍政治

部管理——但它成了斯大林的目標。1923年，組織局要求對軍隊中黨的工作進行「研究」——表面上是為了查明這類工作是否符合組織局的規定；組織局還進一步要求，黨的機關的代表要參加各軍區黨組織活動的討論會，紅軍政治部要定期向中央匯報。到1923年秋天，組織局針對軍隊的高級職務制定了一份類似的、由黨控制的職務名冊，涉及對象包括中央和各軍區革命軍事委員會委員及其助手、主要的軍事指揮機構、紅軍政治部主要工作人員、軍事檢察官和軍事學院。<sup>92</sup> 布爾什維克的所有高級官員，包括陸軍人民委員托洛茨基，都認可黨的至高無上。

437 與大部分專政國家不同，在蘇俄的黨國體制中，軍隊在政治上的軟弱性還深受社會貧弱落後的影響。政權希望紅軍成為「社會主義學校」，因此，托洛茨基對於政治訓練非常積極。<sup>93</sup> 可以想見，斯大林試圖抓住這個問題。他在黨的第十二次代表大會上說，人們習慣於把軍隊看作防禦或進攻的機關，而他認為軍隊是「工人和農民的一個集合點」。<sup>94</sup> 1920年代，每年都會有大約有18萬農民應徵入伍。<sup>95</sup> 1924年的一項研究表明，入伍者對於「布爾什維克黨的路線、黨與孟什維主義以及其他異己集團的鬥爭」是一竅不通。<sup>96</sup> 另外一項調查表明，在軍隊的政治教育者當中，有近十分之九的人只受過不到兩年的小學教育。與此同時，報紙和講堂還充斥着難以理解的外來詞、新詞和術語。<sup>97</sup> 「老實說，」軍隊的一位教育者指出，「當我們說到銀行、股票交易、議會、托拉斯、金融大王和民主制的時候，別人聽不懂我們在說甚麼。」<sup>98</sup> 在某些方面，紅軍比為入伍的多民族群眾開的俄語補習班好不了多少，不完全是政治權力的基礎。軍隊也不像蘇俄安全的保障。<sup>99</sup> 「要是上帝不幫助我們……要是我們陷入戰爭，」斯大林在1924年說道，「我們就會被徹底擊潰。」<sup>100</sup> 不過，這位總書記試圖把軍隊置於黨的機關的領導下，這方面的工作還是取得了很大進展，只是托洛茨基依舊是軍隊名義上的領導人。然而在1923年底，斯大林控制下的工農檢查院就已正確地指出，托洛茨基實際上並未管理陸海軍人民委員部的日常工作。<sup>101</sup>

\* 譯註：《斯大林全集》第5卷，第167頁。

## 盧比揚卡街2號

盧比揚卡是莫斯科的一個街區，它的名字同中世紀的伊萬三世征服諾夫哥羅德有關（「盧比揚人」原本是諾夫哥羅德一個區的名字，結果被那些被迫搬遷的人帶到了莫斯科）。1918年春，中央契卡在從彼得格勒搬來後，徵用了毗鄰莫斯科主商業區的大盧比揚卡街11號（捷爾任斯基在莫斯科的第一個辦公地點）和13號。隨着工作人員數量的增加和1919年秋天成立了獨立的莫斯科地區契卡，監督軍隊安全工作的契卡特別部又佔據了大盧比揚卡街2號——從那裏出發，這條狹窄的街道可以通往盧比揚卡廣場。這幾個地方由一座優美的矩形的五層大樓組成——大樓正面頂端有全俄保險公司1900年製造的大鐘——它們和黨的機關在靠近老廣場處佔據的那棟堅固的大樓一樣，反映出莫斯科商業資本的財大氣粗。保險公司出租了大盧比揚卡街2號底層的店面（書店、縫紉機商店、床店、啤酒館）以及大約20套公寓房，每套都有9個房間，但公寓的住戶都已被趕走，店面也清空了，而在契卡闖入之前，這棟建築是預備給蘇俄工會的。1920年，這裏設立了一座內部監獄（後來擴大了，那時給這棟建築加蓋了兩層）。「從外面一點也看不出那是座監獄」，有囚犯報告說。此外，契卡還佔用了附近的幾棟建築，結果就像一位觀察家寫的，契卡「佔據了市中心整整一個街區……很多行政部門及其下屬單位都設在這裏：『秘密行動處』、『調查處』、『統計處』、『資料處』等等職能部門……它完全是一座城中之城，工作起來……沒日沒夜」。<sup>102</sup>

438

盧比揚卡街2號實際上並不隸屬於政府，而是隸屬於列寧和政治局，這就意味着這一工具也在斯大林這位黨的機關負責人的職權範圍內。<sup>103</sup>

契卡的工作人員沒有看起來那麼多。<sup>104</sup>從1921年3月開始，按照2,450名工作人員編入預算的盧比揚卡街2號竟然只用了1,415人，而真正的特工人員大概只佔總數的一半，雖然到1922年1月，中央契卡的工作人員已經增加到2,735人，但後來基本維持在這一水平。從1923年11月開始，秘密警察還掌握了3.3萬人的邊境部隊，2.5萬人的內衛部

隊和1.7萬人的護衛部隊。<sup>105</sup>名單上秘密線人的數量從1920年報告的6萬人減少到當年年底的1.3萬人。<sup>106</sup>各省契卡分支機構的工作人員數量各不相同，大多總數在40人左右，其中特工人員只佔一半。他們管轄的區域範圍很廣，而交通條件卻往往有限。契卡依靠的是令人生畏的名聲。《真理報》刊登過有關契卡受害者的報道：活活剝皮、釘在尖樁上、剝頭皮、釘十字架、綁在木板上再慢慢推到通紅的火爐或沸水鍋裏。在冬天，據說契卡把水澆到赤膊的囚犯身上，製造出冰雕，傳言還說有些囚犯脖子會被擰到斷掉。<sup>107</sup>不管是真是假，這些傳言增加了契卡的神秘感。不過，惡名在外可以增添力量，也會激起反感。<sup>108</sup>1919年5月，在捷爾任斯基的倡議下，契卡奉命每週向當時新成立的組織局，也就是向斯大林匯報一次。1920年，捷爾任斯基被增補進組織局。<sup>109</sup>捷爾任斯基還讓特工米哈伊爾·克德羅夫(Mikhail Kedrov)領導一個調查組乘坐裝甲列車巡視全國，肅清冒充契卡的騙子和瀆職行為。但是，因為敗壞政權的名聲而遭到清洗的施虐狂和地痞流氓又會出現在別的地方，出現在不同地區的分支機構。克德羅夫作為半吊子醫生和水平精湛的鋼琴演奏家，本人就因為嗜殺而臭名遠揚，據說他還短暫地尋求過精神治療。<sup>110</sup>

契卡毫不猶豫地啟用了沙皇時代遺留下來的監獄，重建了沙俄專門關押「政治犯」的上烏拉爾斯克的「隔離者」等監獄。傳說在契卡的隊伍中，很多人都是可惡的保安處的老手。此說不實，因為為了抓捕他們，契卡成立了追捕隊，但契卡的名聲還是因此而受到損害。<sup>111</sup>不管特工人員是甚麼出身，「人們都開始把我們看作是保安處的」，契卡副主席、拉脫維亞人馬丁·拉齊斯十分煩惱。<sup>112</sup>蘇俄的監獄看守、審訊人員和行刑人員很多都不是俄羅斯人，而往往是波蘭人和猶太人，可這種情況——其形成的原因部分在於那些民族在沙皇制度下屬於被壓迫民族，部分在於招募的方式(猶太人和波蘭人會招募他們同族的人)——對於契卡的名聲沒有幫助。<sup>113</sup>整個1921年都在討論限制契卡的權力和防止它濫用職權的問題——不管怎麼說，內戰已經勝利了，秘密警察為甚麼還在隨便殺人呢？政治局裏要求徹底整頓警察機關的主要是加米涅夫。他在一次五金工人會議上說：「人們有理由憎惡盧比揚卡。」<sup>114</sup>他建

議把契卡的管轄範圍限制在政治犯罪、間諜活動、匪患以及鐵路和倉庫的安全工作，其餘的都交給司法人民委員部。列寧支持加米涅夫的建議。<sup>115</sup> 斯大林也是。捷爾任斯基不想交出契卡四處擴張並超出了正常法律程序的權力。<sup>116</sup> 但列寧堅持自己的立場，結果在1922年2月6日，契卡被所謂的「國家政治保衛局」取代，職能範圍也受到適當的限制，儘管限制並沒有加米涅夫建議的那樣充分。<sup>117</sup>

在被認為暴動威脅太大的南高加索，向格伯烏的轉變在1922年2月並未獲得通過，這表明該項改革原本是真的打算削減權力，但這一初衷後來被推翻，而且是由列寧本人推翻的。<sup>118</sup> 1922年2月20日，他寫信給司法人民委員，要求「加緊懲治蘇維埃政權的政治敵人和資產階級代理人（特別是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要在大城市安排「一批示範性審判」，「在從速從嚴懲治方面，在法院和報刊向人民群眾說明這些審判的意義方面作出示範」。<sup>119</sup>† 當時已經有過各種各樣的公審，從對索菲婭·帕尼娜伯爵夫人(Sofia Panina)的公審(1918)到涉及國家銀行、國家百貨公司、紡織托拉斯的幾起案件，還有一些公審在工人數量很多的頓巴斯進行。旨在把無產階級召集起來，對經濟領域的黨外管理人員發出警告。<sup>120</sup> 但最近的這次審判是到當時為止最大的一次。住在哥爾克的列寧不願自己在1922年5月的中風，仔細查看了被捕人員的卷宗。<sup>121</sup> 從1922年6月8日至8月7日，34名所謂右派社會革命黨成員站在工會大廈圓柱形大廳的被告席上。他們過去全都因為從事革命活動而蹲過沙皇的大獄，而現在，據《真理報》說，他們是「背叛革命的資產階級奴僕」。格伯烏企圖利用繳獲的社會革命黨中央委員會的檔案來證實這些罪名。(濟加·韋爾托夫(Dziga Vertov)拍了一部宣傳片，名為《對社會革命黨人的審判》。)<sup>122</sup> 主審法官格里戈里·「尤利」·皮達可夫，宣佈了事先定好的判決結果——死刑。<sup>123</sup> 但國外輿論嘩然，於是，加米涅夫就找了一個巧妙的折衷的辦法，建議暫不執行死刑，而是等到社會革命黨有進一步

440

\* 譯註：首字母縮寫為GPU，下文凡提到GPU的地方都音譯為格伯烏，而國家政治保衛總局OGPU則音譯為奧格伯烏。

† 譯註：《列寧全集》第42卷，第424-425頁。

「犯罪」行為的時候再執行。<sup>124</sup> 關在盧比揚卡死牢裏的社會革命黨人實際上成了人質。<sup>125</sup>

列寧向其他社會主義者發動的討伐破壞了警務改革。1922年8月，格伯烏得到正式授權，無需經過審判或法庭裁決，即可將人流放或送進勞改營。11月，格伯烏又獲得授權，哪怕是對那種缺少明確的反蘇維埃行為而只是基於「可疑」的情況，也可以行使上述權力。<sup>126</sup> 無論如何，對秘密警察機關改革的破壞，到時候就可能發生：布爾什維主義帶有一種受圍攻的心理，而格伯烏的大樓與契卡的一樣，人員也相同。<sup>127</sup> 不過，列寧還是親自出馬，在1922年秋天驅逐了一批知識分子，其中有神學家、語言學家、歷史學家、數學家等等。他們被送上兩艘租來的德國輪船——後來被稱為「哲學家船」。對於他們，格伯烏的記載是：「懂外語」、「愛諷刺」。<sup>128</sup> 被《真理報》(1922年8月31日)稱為「思想上的弗蘭格爾分子和高爾察克分子」的那批人，數量要大得多，他們被趕到國內一些偏僻的勞改營，比如索洛維茨基勞改營，正式名稱是「北方特別勞改營」，那裏以前是修道院，在白海的一座島上。<sup>129</sup>

對世界作意識形態化的階級劃分讓秘密警察擁有無限的權力。「我們正在或將要處理的那些人，本身在政治上毫無價值，」托洛茨基告訴左翼外國記者、約翰·里德的遺孀露易絲·布萊恩特——布萊恩特在《真理報》上發表了這篇採訪(1922年8月30日)，「但他們是我們可能的敵人手中潛在的武器。要是在軍事上再次出現困難的局面……我們就不得不根據戰時條例槍斃他們。」這是後來被歸於斯大林的那種觀點，  
441 即蘇俄人民不會容忍他們當中潛在的敵人，因為這些敵人的存在會招來並助長外來的干涉。<sup>130</sup>

斯大林從秘密警察那裏獲得大量材料。格伯烏聲稱，1920年代中期，有200多萬蘇聯人長期受到監視。<sup>131</sup> 保安處曾編過一份「沙皇簡報」(*tsarskii listok*)，是關於「反對派」還有天災、爆炸及轟動性的非政治犯罪的觀察報告，每週一期，每年加起來多達600頁，尼古拉二世看過，還會在上面做批註。但是，蘇俄的秘密警察依靠幾乎遍佈所有公共機構和居民區、直到各個村莊的線人，編寫了更加及時、內容更加廣泛的政治情緒報告(*svodki*)。<sup>132</sup> 為蘇維埃國家檢查郵件的也有大約1萬人，相

比之下，1914年為沙皇國家檢查郵件的只有50人。<sup>133</sup> 秘密警察的每份政治情緒報告都有編號，並被送給列寧、斯大林、托洛茨基以及托洛茨基在軍隊中的副手斯克良斯基，但是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沒有，他們是在不久後才被添進去的。<sup>134</sup> 然而斯大林還以中央委員會的名義，打造他自己的線人網絡，試圖在正常的渠道之外獲得具體的第一手報告。

### 鐵匠橋街與柳克斯飯店

從盧比揚卡街的格伯烏總部再過去就是外交人民委員部大樓——鐵匠橋街15號。之所以叫「鐵匠橋」(*Kuznetskii most*)，是因為在早已填埋的涅格林納亞河上，原先有座石橋。革命前，這條漂亮的大街很出名，有時裝店、書店、照相館和餐廳。外交人民委員部的家是1918年從全俄保險公司手裏奪來的。那是一棟六層的手風琴式豪華建築，半新古典主義風格，建於1905至1906年，兩側有對稱的輔樓。<sup>135</sup> 除了辦公室，還帶有豪華的官邸(格伯烏副局長亞戈達恰好就住在這裏)。政變後，在沙皇政府各部中，外交部的變動最大，外交使團中既有返回國內的老布爾什維克流亡者，又有充滿幹勁的年輕人。「瞧，我們蘇維埃外交官都是些甚麼樣的人？」列昂尼德·克拉辛經常說，「我是工程師，克列斯廷斯基是教師。我們就是這樣的外交官。」蘇俄領導人拒絕使用「大使」這個「資產階級」的說法，稱自己的使節為「全權代表」，但是在1923年，外交人民委員部給各駐外使節下發了〈關於遵守資產階級社交禮儀的簡短命令〉。<sup>136</sup> 駐波蘭使節彼得·沃依柯夫(Pyotr Voikov)甚至想讓共事的年輕外交官們明白交際舞的重要性。「比如，他說外交上最偉大的勝利都是在舞廳裏贏得的，」有學生回憶說，「我不想引用他為了支持這種令人驚訝的理論而舉出的那些例子；說一下他最近提到的與〔1815年的〕維也納會議有關的例子就夠了。」<sup>137</sup> 從1924年開始，外交人民委員部把484人安排在負責崗位上，大學畢業生足足佔了33%，比例遠高於黨的中央機關。<sup>138</sup> 外交人民委員部的工作人員中，俄羅斯族的不到一半。<sup>139</sup>

442

離鐵匠橋街不遠就是柳克斯飯店——特維爾大街36號。在飯店被移交給共產國際之後就被不無諷刺地稱為「世界革命的總部」。這就是



那個所有的下屬政黨——只有一個例外——都可以被批評的地方。<sup>140</sup> 為召開共產國際第三次世界代表大會(1921年6-7月)，柳克斯飯店在其狹小的客房裏安排了來自52個國家的大約600名代表。<sup>141</sup> 飯店裏佈滿了格伯烏的密探，他們慫恿或欺騙外國人，讓他們互相檢舉。與蘇俄居民的接觸受到嚴格的控制。<sup>142</sup> 不過，柳克斯飯店裝修高雅，還有一週一次的熱水。共產國際的辦公地點本身是在別的地方，在金錢巷的一棟兩層的宅邸——那以前屬於糖業大亨謝爾蓋·貝格(Sergei Berg)，德國大使館(米爾巴赫就是在那裏被暗殺的)起先也設在那裏。1921年，列寧把芬蘭社會民主黨的前任主席和芬蘭共產黨的創始人奧托·庫西寧(生於1881年)從斯德哥爾摩召來，請他擔任總書記，整頓共產國際混亂的日常工作。芬蘭人又請了一位私人助手毛諾·海莫(Mauno Heimo，生於1896年)。海莫於1924年來到莫斯科並負責共產國際的日常運作。「共產國際根本沒有合適的組織，所以你我必須建一個，」據說庫西寧對他說，「根本沒有合適的工作人員，對於職責也未作合適的說明。領取報酬的人有150個，但沒有人知道自己的上級是誰，或者他有甚麼權力，或者他實際上該做甚麼。」<sup>143</sup> 海莫的頭等大事就是找到更好的房子。他無意中發現了莫霍瓦亞街6號(也稱沃茲德維任卡街1號)一棟五層的大樓，就在克里姆林宮聖三一塔樓的外面。<sup>144</sup> 大樓的頂層(五樓)上不去，那裏是格伯烏的地盤，他們在監督着真正的工作：把非法的金錢轉移給外國共產黨，偽造簽證，把偷來的外國護照篡改後再用。

共產國際的資金總是會突然消失，據說是被偷了；也有傳言說，共產國際遭到外國情報人員的滲透。蘇俄的其他特殊機構對於該組織往往持鄙視的態度(「蘇俄人供養的成千上萬的共產國際寄生蟲」，蘇俄情報機關的一名特工人員寫道。)<sup>145</sup> 「要想弄明白共產國際是怎麼運作的，必須認識到兩件事，」庫西寧的夫人寫道，「首先，它總是處在重組的過程中，其次，許多活動都是虛構的。」<sup>146</sup> 外交人民委員契切林要求把外交人民委員部的職能同共產國際的分開，而且後來還把共產國際稱作「內部的頭號敵人」(「格伯烏九頭蛇」只能排在其次)。可在1919年，不是別人，正是他邀請人們參加共產國際成立大會，而且他

還是大會的代表。<sup>147</sup> 按理說，只有共產國際的特工人員可以在國外從事非法活動，可實際上使館人員也在那樣做。<sup>148</sup> 共產國際的工作人員（被稱作「外國人」）通常會打着不太可信的幌子，在蘇俄大使館內設有辦事處，而蘇俄大使館內還有格伯烏（「近鄰」）和軍方的情報人員（「遠鄰」）。另外，蘇俄高層官員——包括擔任共產國際執委會委員的幾個政治局成員在內——的說辭，幾乎總是與「被壓迫者」站在一起，反對所謂的外交夥伴國的政府。不過，外交人民委員部呈交了很多備忘錄，提醒政治局說，共產國際的高調以及格伯烏的就地處決壓縮了蘇俄在國際社會中迴旋的餘地：外國政府不相信這樣的政權會從事合法的事務，若是它們真的冒險相信了，總是會有醜聞出現，暴露出蘇維埃國家與共產國際合謀的詭計。

為了在他們想要與之建立正常關係並開展貿易往來的國家挑起革命，莫斯科採取了雙面的對外政策，在這種政策的背後，則是那種會削弱其國際關係的、以階級觀念為基礎的世界觀。列寧認為世界「資產階級」不可能接受工人國家的永久性存在，可事實剛好相反：雖然西方頑固地敵視蘇維埃政權，而且有些西方人一心想要推翻它，但西方政府的敵意基本上就像喬治·凱南（George Kennan）說的，是「零星的、分散的、混亂的」。凱南還說，「西方政府中的許多人開始仇恨蘇俄領導人是因為他們做了甚麼」，共產黨「仇恨西方政府並不是因為他們做了甚麼，而是因為他們是甚麼」。<sup>149</sup> 因此，莫斯科往往認為，工黨政府和保守黨政府實質上是一回事：都是帝國主義的，因而也都是不講信譽的。換句話說，協約國的和解不會讓蘇維埃俄國變成友好和放手的態度，協約國對蘇維埃俄國的敵意也不會是布爾什維克與西方對抗的理由。列寧認為，假如資本主義分子在某些方面與蘇維埃政權妥協，那只是因為他們不得不那樣，不管是由於他們自己工人的鬥爭，還是因為他們要追逐新的市場（比如俄國的市場）。<sup>150</sup> 斯大林全盤接受了這種思考問題的方式，並解釋說，一旦時機成熟，資本主義分子就會為復辟資本主義而再次發動武裝干涉。<sup>151</sup> 與此同時，在為新的貿易協議和長期貸款進行談判時，資本主義分子總是有些前提條件：償還不被承認的沙皇時代的國家債務、賠償已被國有化的外國資產。<sup>152</sup> 列寧曾經讓外交人民委員部

宣佈，蘇維埃國家願意討論1914年前的沙皇時代的債務問題，但他後來放棄了由此帶來的機會。<sup>153</sup>

勞合一喬治首相屬於那種19世紀的古典自由主義者，信奉自由放任和自由貿易。他想出了一個辦法：召開國際會議，簽署經過完善的和平協議，讓俄國和德國恢復生氣，以重建歐洲經濟，那樣就既可以使英國受益，或許還能保住他搖搖欲墜的聯合政府。<sup>154</sup> 1922年初，蘇維埃領導人接受邀請，準備參加4月10日的熱那亞會議，屆時出席會議的有34個國家。<sup>155</sup> 據說出於安全原因，列寧不會親自參加（契卡報告說，波蘭人計劃在意大利暗殺他）；事實上，自從1917年結束流亡回國後，列寧再也沒有離開過俄國。<sup>156</sup> 不過，他控制着蘇維埃國家的立場。當正在準備熱那亞會議的外交人民委員格奧爾吉·契切林問他，「如果美國人在要求建立代議制機構上糾纏不休的話，您看是否可以為得到相當的補償而對我國的憲法作些小的改動……？」列寧在信上寫道「精神失常！！」，並讓人把信交政治局傳閱，還說「契切林的這封信以及下一封信清楚地證明他病了，而且病得很厲害」。<sup>157\*</sup> 「這是高度機密的，」稍後，列寧在給契切林的信中寫道，「熱那亞會議的破裂對我們是有利的……當然，破裂並不是因為我們。」<sup>158</sup> 列強的當權者最後是不是準備同莫斯科全面緩和，現在還不得而知。<sup>159</sup> 但列寧看到的不是他們顯而易見的矛盾心理，而是一致圖謀建立反對蘇俄人民的資本主義聯合陣線，儘管這次會議明確表示，想要幫助俄國獲得外交承認和建立貿易關係。<sup>160</sup>

破壞勞合一喬治的努力的，並非只有列寧。法國總理雷蒙·彭加勒 (Raymond Poincaré) 沒有賞光參加熱那亞會議。在他的壓力下，會議議程沒有讓德國人得到機會訴說他們在支付賠款時的苦衷。彭加勒認為勞合一喬治想要犧牲法國的利益去修訂凡爾賽條約（「既沒有勝利者也沒有失敗者」），但他堅持強硬路線的策略是適得其反。早在1919年

\* 譯註：《列寧全集》第52卷，第624頁，註257；第226頁。美國人最終拒絕參加熱那亞會議。

的凡爾賽會議上，法國就增加過一個條款，即第116條，規定俄國——假定為後布爾什維克俄國——有權獲得德國的戰爭賠款，而現在蘇俄人暗示他們將會那麼做。不過，新上任的德國外交部長、傾向於同西方恢復友好關係的瓦爾特·拉特瑙 (Walther Rathenau)，覺得應該同俄國舉行雙邊會談，把第116條這一達摩克利斯之劍拿走。<sup>161</sup> 當有傳言說，在熱那亞會議的頭幾次會議期間，蘇俄人在德國沒有參加的情況下，在勞合一喬治的私人別墅同英法進行了單獨會談時，拉特瑙請求會見英國首相，但是被拒絕了。4月16日凌晨1:15，蘇俄人接受德國人的建議，準備在當天進行會談。<sup>162</sup> 拉特瑙身邊的工作人員企圖再次向英國人示警，至少打了兩次電話，但勞合一喬治的助手都沒有接。英國首相在外交上的不專業，無意中放大了法國總理不切實際的僵化立場和列寧極度隱秘的背信棄義。<sup>163</sup> 德國代表團冒着大風大雨，驅車趕到蘇俄代表團在熱那亞的駐地——位於聖瑪格麗塔小小的利古雷海邊浴場與比較大的城市拉帕洛之間的皇家飯店，並於當天即復活節的傍晚簽署了一份雙邊條約。條約內容早在一週前就在德國定好了 (契切林是轉道柏林去熱那亞的)，只是拉特瑙到現在才同意。<sup>164</sup>

拉帕洛條約讓德國又一次成為首個正式承認蘇維埃國家的大國——第一次是已被廢除的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條約——而且這次恢復外交關係並不需要償還沙皇時代的債務或者是在內政方面作出讓步，比如緩和布爾什維克專政。德國人承認蘇俄沒收德國人財產的合法性，而蘇俄人則放棄第116條規定的所有權利。雙方同意按照後來所謂的最惠國待遇開展貿易。<sup>165</sup> 拉特瑙除了在政府中任職，還是德國電氣集團 (AEG) 的董事長。他十分清楚俄國作為原材料供應國和商品消費國對於德國的經濟價值，尤其是俄國實行了新經濟政策並恢復了市場。(作為第一個擔任德國外交部長的猶太人，拉特瑙在不到兩個月後就被右翼極端分子暗殺了。) 拉帕洛條約再次肯定了德國之於布爾什維克命運的核心作用，它似乎搶先打消了列寧的疑慮，即列強會全部聯合起來對付蘇維埃政權。法國人不願考慮德國人的苦衷，英國人說服不了法國人，蘇俄人利用了法國人想出來的第116條——這為法國帶來了惡夢，為列寧帶來了幻想：一個顯而易見的蘇德軸心。<sup>166</sup> 至於拉帕洛條約，

有傳言說它還附有秘密議定書，內容涉及相當於同盟關係的軍事義務，對此，契切林在給法國的照會中矢口否認。<sup>167</sup>事實上，紅軍同魏瑪防衛軍的聯繫非常緊密。1922年8月11日，兩國簽署了一項關於軍事合作的秘密的正式協議。為規避凡爾賽條約的限制，德國軍隊將獲得蘇俄境內的設施，用於訓練自己的空軍和坦克部隊，而作為交換，蘇方會從設在蘇俄境內的為兩國武裝力量提供裝備的工廠獲得德國的軍工技術。<sup>168</sup>無論如何，前景就是這樣。

列寧是把外交事務當成個人封地來管理的。他和契切林的通話可能比和其他任何人都多，而且他們倆還有相當多的直接接觸，但他對待外交人民委員就像是對待小聽差。甚至在拉帕洛條約之後，契切林和蘇俄代表團因為看不到除了獲得西方的幫助外，還有甚麼別的辦法可以重建滿目瘡痍的俄國，仍然想要簽署熱那亞協議，於是他們便開始稍稍越出自己得到的授權，準備討論被拒絕償還的戰爭時期的債務問題，但列寧強烈譴責談判人員的「聞所未聞的可恥而危險的動搖」。<sup>169\*</sup>最後，沙皇時代的債務和被國有化的財產完全沒有向協約國做出償還或補償，因此也沒有為俄國成立任何投資財團或者同俄國簽訂任何和約。<sup>170</sup>列寧認為，資本主義列強將不得不按照全球資本主義發展的邏輯復興俄國經濟，於是他聽任俄國失去了重新融入歐洲共同體的唯一一次機會。（對蘇俄或蘇聯人來說，下一次這樣的會議要等到1975年的赫爾辛基會議。）同時，魏瑪共和國和布爾什維克專政並不是兩個相似的政權，它們之間的合作將會隨着德國不斷尋求與西方的和解而變得困難重重。<sup>171</sup>

447 蘇俄人怎樣才能獲得大量的先進技術仍是一件沒有着落的事情。一旦列寧不能視事，斯大林就成了對外政策領域的核心人物，繼承了毫不妥協的列寧主義遺產中的所有這些挑戰。在國際關係方面，斯大林無論如何都算不上是一個專政者。

---

\* 譯註。《列寧全集》第43卷，第165頁。

## 老廣場街8號

當斯大林有了建立個人專政的機會時，不但列寧中了風，蘇俄也是破敗不堪，因為戰爭、政治恐怖和移民而失去了成百上千萬人口。讓這種極度混亂的局面變得越發嚴重的，先是布爾什維克毫無節制的徵糧，然後是大旱、酷熱和熱風，把黑土地變成了塵暴區。播種面積本來就減少了，可現在僅有的3,800萬畝播種的土地有1,400萬畝<sup>\*</sup>絕收，於是就出現了饑荒，其規模之大，自18世紀以來從未有過。農民只能以野草、磨碎的骨頭、樹皮或屋頂的麥稈，以及狗肉、貓肉、老鼠肉、人肉混在一起煮成的有毒的大雜燴充饑。<sup>172</sup> 在整個伏爾加河流域（那裏是饑荒的中心）、烏拉爾南部地區、韃靼共和國和巴什基爾共和國、北高加索、烏克蘭南部的大部分地區以及克里米亞，有超過3,500萬人遭受嚴重的饑餓。1921至1923年，估計有500萬至700萬人死於饑餓及相關疾病，相當於每週死亡5萬人。<sup>173</sup> 在饑荒最嚴重的地區，格伯烏要在墓地站崗，以防饑餓的人們把屍體刨出來吃掉。僅在伏爾加河流域和克里米亞，當局登記在冊的孤兒就有二百多萬——他們能活下來真是奇蹟，雖然常常是眼窩深陷，肚子臃脹，雙腿如同火柴桿一般。<sup>174</sup>

在否決了取消新經濟政策的要求之後，列寧現在派了一名糧食採購全權代表前往實行了軍事管制的草原地區。當這名代表表示，如果百分之百地完成糧食指標，那這些地區就連種子也不會剩下時，他得到的命令是繼續執行原指示。<sup>175</sup> 1922年初，列寧派費利克斯·捷爾任斯基到西伯利亞徵糧，那裏不像其他地方，沒有遇到嚴重的乾旱，收成基本正常。<sup>176</sup> 捷爾任斯基還像內戰時一樣，住在專列的車廂裏。他寫信給妻子索菲婭·穆什卡特（Zofia Muszkat），流露出對這項艱巨任務以及自己無法兼顧鐵道人民委員之職的絕望情緒（「現在到了冬天我才明白，必須在夏天就為冬天做好準備」）。他留在西伯利亞的時間被延長了——正是在捷爾任斯基在西伯利亞的時候，1922年2月6日，契卡被取消並代之以格伯烏，同時他也開了眼。「西伯利亞的經歷向我展示了

448

\* 編註：3,800萬英畝約1,539萬公頃，1,400萬英畝約567萬公頃。

我們的管理制度的根本缺陷，」2月，他再次給妻子寫信說，「哪怕是來自莫斯科的最好的思想和指示在這裏也行不通，不能被落到實處。」<sup>177</sup>與此同時，格伯烏從西伯利亞的某個省報告說（1922年2月14日）：「採購人員濫用職權已經到了令人瞠目的地步……各地抓來的農民被鎖進冰冷的穀倉，遭到鞭打（*nagaiki*）並受到槍斃的威脅。」逃往森林的農民「先是被馬追踏，然後剝光了關進沒有生火的穀倉。許多女人被打得不省人事，赤身裸體倒在雪地裏遭到強姦」。<sup>178</sup>

政權的注意力都放在為挨餓的西北各城市籌集糧食上面，對於饑荒肆虐的農村，它的反應遲緩而且無力。<sup>179</sup>列寧拒絕向「帝國主義」政府求助，但流亡作家馬克西姆·高爾基在列寧的默許下，以私人名義向「所有可敬的人們」呼籲，結果在兩天之後，美國商務部長赫伯特·胡佛便作出積極回應。胡佛（生於1874年）是教友會信徒的兒子，童年時成了孤兒。他作為斯坦福大學的首屆畢業生做過採礦工程師，並在世界大戰期間成立了美國救濟署（ARA）——起初是一個政府機構，後來又轉為由政府提供資金的私人機構。在聽從援助蘇俄的召喚時，他提出了兩個條件：要允許美國賑災人員獨立開展工作；釋放被關押在蘇俄監獄中的美國公民。列寧很不情願地答應了胡佛的要求。胡佛的募捐和組織工作大獲成功。他籌集到價值六千多萬美元的外國糧食援助，主要是玉米、小麥種子、煉乳和糖，其中許多都是美國國會捐贈的，有些是蘇維埃政權用稀缺的硬通貨和黃金（用沒收的教會物品和其他珍寶熔化而成）購買的。美國救濟署僱了300名野外工作人員，而他們又請了10萬名蘇俄的幫手，負責1.9萬座野外廚房，最多的時候每天要為將近1,100萬人提供食物。<sup>180</sup>高爾基寫信對胡佛說：「您的幫助將會作為一種獨特的、巨大的功德寫進歷史，它配得上最偉大的榮耀，它將長久地被無數俄國人銘記在心……是您把他們從死亡中拯救過來。」<sup>181</sup>

449

斯大林向外交人民委員部施壓，要求監督購買國外的糧食，並參與安排監視外國賑災人員。<sup>182</sup>他還建議，在蘇俄境內運輸應急糧食援助的開支讓美國救濟署出。<sup>183</sup>由於氣候好轉和農民的求生本能，再加上外國的捐助和從國外購買的糧食種子，1922年的收成非常不錯。新經濟政策對農民的刺激雖然見效晚了一些，但對於緩解災情仍然是有

用的，結果，從1923年起，經濟復蘇開始了。<sup>184</sup> 政府也勉強起了一部分作用，通過了《土地法典》。《土地法典》禁止買賣土地，並對土地租賃和僱傭家人之外的農業勞動力在合法性及一定程度的現實性上作了限制，但它允許農民合法地種植任何種類的莊稼，飼養任何類型的牲畜和在土地上建造任何類型的建築；承認婦女是農民家庭中平等的一員。特別是，《土地法典》允許農戶在法律規定的土地使用期限內行使真正的選擇權：村社和定期重新分配土地的形式，集體農莊的形式，甚至是合併起來的宅地形式（即斯托雷平主義）。<sup>185</sup> 《土地法典》沒有使用「村社」這個詞，用的是「土地社」，但政府不得不承認村社擁有自治權。<sup>186</sup> 政府還不得不大幅削減對於集體農莊的財政支持，而集體農莊所佔的耕地面積也縮小到很小部分（1%以下）。轉變十分驚人：不管是村社和定期重新分配土地的農民還是自耕農，都獲得了影響深遠的經濟自由。

收成的規模和及時的收割依然是國家安泰的關鍵，而且與布爾什維克奪權同時發生的農民革命十分強大，足以重塑蘇維埃國家。內戰時的糧食人民委員部，即「徵糧人民委員部」，將其主要職責交給了農業人民委員部，即無產階級專政內部的某種「農民的人民委員部」。為加強這一轉變，亞歷山大·斯米爾諾夫（Alexander Smirnov，生於1898年），一個對黨忠心耿耿的實幹家，從副糧食人民委員調任副農業人民委員——他在1923年開始承擔這個高級職務。「徵糧人民委員部」設在紅場的上商業街（Upper Trading Rows）；「農民的人民委員部」在很多地點中偏偏挑選了共產黨總部再過去一點的老廣場街8號，在從前的博雅爾斯基德沃爾飯店兼商業綜合體裏面，那是一棟1901至1903年建造的新藝術風格的建築。<sup>187</sup> 在大饑荒的時候，農業人民委員部的工作人員找到了饑荒存在的理由。他們的結論是，農民的耕作一直處於災難的邊緣，因為農民不懂得最好的現代耕作方式。因此，農民需要接受農學家等專家的教育。<sup>188</sup> 農業人民委員部後來成了最大的政府部門，有三萬多名中央和地方工作人員，另有四萬人從事林業工作。如此的規模就連由民警和格伯烏合併而成的內務人民委員部以及第二大的財政人民委員部都自嘆弗如。<sup>189</sup>



## 伊利英卡街9號

在共產黨政權的統治下，財政人民委員部的存在是個令人稱奇的事情。內戰期間，政權沒有任何稅收收入，只能通過印鈔票和沒收糧食等商品為自己籌集資金。<sup>190</sup>國家的貨幣基礎一片混亂。老百姓仍在使用的有尼古拉二世統治時期的盧布 (*nikolaevki*)、杜馬時期的盧布 (*dumskie*)、克倫斯基和臨時政府掌權時的盧布 (*kerenki*)——這種貨幣蘇維埃政權本身也印製了一段時間，只是在雙頭鷹上去掉了皇冠——以及外幣。外幣的流通是非法的，而且匯率在不斷快速上漲。<sup>191</sup>白軍在其控制的地盤承認蘇維埃政權印製的克倫斯基掌權時的盧布，但不承認蘇維埃盧布 (*sovznaki*)，並在蘇維埃盧布上蓋了「白癡錢」的戳子。<sup>192</sup>由此造成的物價飛漲讓伏特加成了流通和保值的主要方式，物物交換接管了經濟。情況還沒有壞到魏瑪德國的惡性通脹那樣的地步，在那裏，馬克對美元的匯率從1921年的60比1變成了兩年後的4.2萬億比1，但是，一位沙皇時代的頂級經濟學家估計，1914至1923年，盧布貶值5,000萬倍。<sup>193</sup>布爾什維克的一些狂熱分子聲稱，惡性通脹是階級鬥爭的形式之一；還有人稱印鈔機是「財政人民委員部的機關槍」。理論家們還斷言，「貨幣的終結」標誌着文明朝着共產主義階段的進步。<sup>194</sup>但是到了1924年，蘇聯的貨幣穩定下來，經濟再次貨幣化，這是重組後的財政人民委員部的一個驚人的轉變。

451

財政人民委員部佔據的是被沒收的聖彼得堡國際銀行莫斯科辦事處的大樓——伊利英卡街9號。伊利英卡街得名於古代一座以先知以利亞命名的修道院，但街上擠滿了封閉的貿易行、銀行和交易所，被高牆圍住的商業區名為基泰哥羅德，曾是革命前莫斯科的金融中心。在伊利英卡街上，還有對外貿易人民委員部(14號)和已被斯大林與中央監察委員會合併的工農檢查院(21號)，那是許多共產黨員被叫來接受紀律處分的地方。紅軍除了在茲納緬卡街的大樓外，還在伊利英卡街為紅軍政治部佔了一棟建築，即伊利英卡街2號。該建築原先是搞批發的中貿易行，就在紅場附近，紅軍政治部的報紙《紅星報》後來就是在那裏出版的。伊利英卡街連接着老廣場街和紅場，斯大林和他那些也住在克里姆林宮的

黨內同志，每天都要沿着這條街步行上下班。要是沒有伊利英卡街9號在宏觀經濟上取得的成就，蘇維埃政權就難以穩定，斯大林就難以集中精力建立他的個人專政。財政人民委員是格里戈里·索柯里尼柯夫（生於1888年）。1922年，他接替了不走運的尼古拉·克列斯廷斯基，而斯大林不久前剛接任了克列斯廷斯基在黨的機關中的領導職務。

索柯里尼柯夫擁有輝煌的革命履歷。<sup>195</sup> 他是在莫斯科猶太資產階級的特權家庭長大的：他的父親是內科醫生，有一棟樓，一家人住在樓上的八個房間，樓下開了一爿利潤豐厚的藥店。作為家裏的長子，格里戈里有德國和法國兩位女家庭教師，上的是阿爾巴特街區的一所古典中學（同尼古拉·布哈林以及鮑里斯·帕斯捷爾納克一起），1905年加入莫斯科的布爾什維克（他在革命中用的化名〔*nom de revolution*〕可能與莫斯科的索柯利尼基區有關）。最後他到了西伯利亞，然後又流亡國外。在國外，他拿到索邦大學的經濟學博士學位。索柯里尼柯夫同列寧一起乘鉛封列車返回俄國並在1917年7月入選了人數不多的布爾什維克中央委員會，同斯大林並肩工作，成為黨報的主要編輯之一，參加了贊成政變的那幾次關鍵性的投票，而且幫助發動了政變。<sup>196</sup> 後來，索柯里尼柯夫負責監督銀行的國有化。<sup>197</sup> 他在29歲時接替托洛茨基，擔任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代表團團長並簽署了條約。<sup>198</sup> 內戰期間，索柯里尼柯夫雖然沒有受過正規的軍事訓練，但他擔任的不是政委，而是指揮官，並贏得了紅旗勳章。<sup>199</sup> 1920年，斯大林請求把索柯里尼柯夫派給他，到南方戰線對付波蘭人。<sup>200</sup> 索柯里尼柯夫沒有被調去南方戰線，而是被派去征服突厥斯坦。在突厥斯坦，就像我們看到的，他組織反暴動，在全國率先實行新經濟政策的實物稅，把私人市場合法化，實施貨幣改革。<sup>201</sup> 在德國做了手術之後（他有肝病和其他疾病），索柯里尼柯夫在莫斯科依靠一支由革命前的財政專業人員組成的團隊，強行恢復了國家銀行，並且阻止了把列昂尼德·尤羅夫斯基教授（Leonid Yurovsky）驅逐出境。尤羅夫斯基力主創立名為「切爾沃尼茨」的新幣，一種發行量有限並以金條和外匯儲備為支撐的「硬」盧布。<sup>202</sup> 索柯里尼柯夫用鑄有遇害的尼古拉二世肖像的金幣作為切爾沃尼茨的輔幣。

索柯里尼柯夫不顧黨內普遍的抵觸和不解，完成了宏觀經濟的改革。<sup>203</sup> 當時的硬通貨和黃金儲備因為要用於緊急購買進口糧食，實際上已消耗殆盡，但1922年的大豐收使得出口又恢復了。出口帶來的大筆收入讓黃金儲備從1923年1月的1,500萬金盧布重新增長到一年後的1.5億金盧布，也讓開始採用切爾沃尼茨成為可能。<sup>204</sup> 常規的蘇維埃盧布(sovznaki)換了三次，每次貶值的幅度都很大，同時，通貨中切爾沃尼茨的比例也提高到80%左右。<sup>205</sup> 索柯里尼柯夫還加強了國際收支的紀律性，結果到1924年，蘇聯人竟然有了貿易順差。<sup>206</sup> 在索柯里尼柯夫的監督下，開始實行常規預算制度，國家的歲入來自關稅和運輸，特別是直接稅(農業領域的實物稅，那是一種收入稅)，也來自對普通商品新開徵的消費稅，比如火柴、蠟燭、煙草、酒、咖啡、糖和鹽。鹽稅早在1881年就取消了，可得到特別授權的索柯里尼柯夫又把它恢復了。1923年，政權還開始重新實行伏特加專營(沙皇時代被譏諷為「酒鬼預算」)，結果收入頗豐。<sup>207</sup> 格伯烏破壞了索柯里尼柯夫的工作——政治局批准了捷爾任斯基的建議，把所有「投機倒把分子」，包括倒賣外幣者，趕出莫斯科等大城市——但索柯里尼柯夫進行了反擊。<sup>208</sup> 「你的特工人員得到的經費越多，」據說，索柯里尼柯夫對捷爾任斯基說，「製造出來的案件就越多。」<sup>209</sup> 工業游說團體也激烈抨擊索柯里尼柯夫，說他緊縮銀根的政策正在扼殺蘇聯的工業。<sup>210</sup> 但索柯里尼柯夫毫不讓步，嘲笑他們說「印錢是經濟的鴉片」。<sup>211</sup> 1924年，人稱尤利·拉林(Yuri Larin)的評論家米哈伊爾·盧里耶(Mikhail Lurye)指控，財政人民委員部是在推行它自己的「專政」。<sup>212</sup> 實際上，索柯里尼柯夫幫助斯大林接受了宏觀經濟學以及貨幣供應、通貨膨脹、國際收支同匯率的關係等方面的教育。斯大林支持他。<sup>213</sup>

### 「在斯大林的羽翼下」

斯大林的權力不但源自對細節的關注，還源自對人的關注，但不是對隨便甚麼人，而往往是對新人。「老布爾什維克協會」成立於1922年1月28日，斯大林在成立大會上講了話。<sup>214</sup> 會員必須是1905年前入

黨的，他們希望自己在沙皇統治時期遭受的苦役和流放以及他們的資歷能夠得到認可。可是，政權雖然決定把省一級的黨的書記職務留給至少在二月革命前就已入黨的黨員，但這條指導思想在實踐中並沒有得到遵守。老布爾什維克在行政部門的比例很高，但主要擔任的是低級職務——政治局除外。<sup>215</sup> 老布爾什維克，尤其是過去僑居歐洲的那些老布爾什維克，常常對新人側目而視，認為他們是粗俗的笨蛋，而後者則認為老布爾什維克有資產階級的嫌疑。兩個集團都經歷過內戰的考驗，年輕一點的開始變得自信，認為自己用不着懂得多門外語和接受大學教育也可以把事情辦成。斯大林本人當然是一個老布爾什維克，但他卻支持那些新貴。新貴中工農出身的很多，但遠遠不是全部。<sup>216</sup> 1921年，承認自己出身白領的黨員足足有四分之一。不過，這些人過去主要不是服務於沙皇時代的公共機構，他們中的許多人都是二月革命的產物，加入過臨時政府的各種機構。十月革命後，他們歸附了新政權。<sup>217</sup> 「從出身上來說，新的政治精英主要不是無產者，而是平民。」有學者寫道。<sup>218</sup> 這些沒有接受過完整教育的人接過了革命的重擔，他們常常要在長時間的工作之後還在晚上繼續學習。<sup>219</sup> 斯大林支持他們；他們就像他年輕時的樣子。不過，同他關係最近的有各式各樣的人。

最重要的是維亞切斯拉夫·斯克里亞賓（生於1890年）——人們更熟悉的名字是莫洛托夫（「錘子」），他或許是政權中第一個純粹的黨務官員（克列斯廷斯基曾經同時擔任黨的書記和財政人民委員）。他是小店員的兒子，讀的是聖彼得堡綜合技術學院，但卻入了黨，《真理報》有段時間是合法報刊，他在那時成了它的編輯。1915年，他取了一個黨內的化名。後來他解釋說，對於有些像他那樣口吃的人，「莫洛托夫」的發音要比「斯克里—亞—賓」容易，而且「錘子」聽上去同無產階級以及工業有關，可以給工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因為他們不太喜歡知識分子黨員。<sup>220</sup>（和列寧一樣，莫洛托夫喜歡資產階級的西服和領帶。）和斯大林一樣，莫洛托夫革命前在沃洛格達流放過一段時間——他在那裏靠為餐館裏喝得醉醺醺的商人演奏小提琴謀生。他同斯大林的第一次見面可能是在1912年的聖彼得堡，是在一個牙醫的家裏——那是一處安全屋。<sup>221</sup> 身居要職的莫洛托夫兩次遭到斯大林的排擠（1917年在《真理

報》和1922年在黨的書記處)，他本有可能對斯大林懷恨在心，暗中使絆。可他並沒有那麼做，而是按照列寧的願望，承認斯大林資格老，參加革命比他早11年，跟在這位格魯吉亞人的後面。托洛茨基嘲笑莫洛托夫是「平庸的化身」，但列寧用讚賞的口吻稱自己的門徒是「俄國最好的檔案管理員」。<sup>222</sup> 1920年代早期在機關工作的鮑里斯·巴扎諾夫(Boris Bazhanov)離開時印象也很深。「他是一個非常認真的官員，不太有才華，但很勤奮，」他在談到莫洛托夫時寫道，「他很沉着、寡言少語……對所有接觸過他的人來說，他都是正確的，他這人很容易接近，一點也不粗暴、傲慢、殘忍，也不想羞辱或毀掉任何人。」<sup>223</sup> 巴扎諾夫說的是莫洛托夫，也是布爾什維克的政治文化。

瓦列里安·古比雪夫(生於1888年)，一個在西伯利亞土生土長的俄羅斯人，出身軍人世家。他先是進了鄂木斯克士官學校，後來又進了首都的軍事醫學院，1906年因為參加政治活動被開除，為避免被捕就逃走了。他設法進了托木斯克大學法律系，但一年後離開，開始從事布爾什維克的地下工作。他多次被捕和流放，包括被流放到納雷姆(從1910年開始)和圖魯漢斯克(從1915年開始)，斯大林也在這兩個地方流放過。古比雪夫和莫洛托夫一樣，是個技藝嫺熟的音樂家，又和斯大林一樣，是個詩人。1917年，他參加了伏爾加河畔的薩馬拉市的布爾什維克政變。內戰期間，他在南方戰線工作，接着又在被重新征服的突厥斯坦擔任過指揮職務。他具體是在甚麼時候首次引起斯大林注意的，現在還不清楚。1922年，斯大林讓他成了中央委員會的正式委員和中央委員會的書記。1923年底，斯大林推薦他擔任黨的中央監察委員會主席——中央監察委員會本來是作為一個中立的上訴法庭成立的，但是在斯大林當權的時候，卻成了懲處黨員的大棒。<sup>224</sup> 古比雪夫對於地方上抵制中央指示的力量——想像的和真實的——毫不留情，並把地方和中央的官員組織起來支持斯大林。<sup>225</sup> 托洛茨基給古比雪夫起了個綽號：「黨的法令及道德規範的最嚴重的違反者和腐蝕者」。<sup>226</sup> 古比雪夫對斯大林絕對忠誠。<sup>227</sup> 在把斯大林派的另一個不可或缺的工作人員拉扎·卡岡諾維奇調到莫斯科這件事上，他似乎也起了作用。

卡岡諾維奇(生於1893年)來自沙皇統治下的小城切爾諾貝利附近「猶太人定居區」的一個村子，是那種性格粗野的平民的代表。他的父親既種地也在工廠幹活，沒有受過教育；他的母親生了13個孩子，活下來6個。拉扎會說俄語和烏克蘭語，稍稍懂一點意第緒語，曾經在一所猶太會堂下屬的兒童學校短暫就讀。但他的家庭供不起他唸書，所以他只好跟當地一個鐵匠當學徒，然後又去了基輔，同他的一個兄弟一起撿破爛。14歲的時候，卡岡諾維奇開始在一家鞋廠做工——要是斯大林在哥里和梯弗里斯的選擇少一點，也會那樣。1912年，卡岡諾維奇在基輔入黨；他參加過世界大戰。布爾什維克政變後，1918年1月，24歲的卡岡諾維奇作為布爾什維克代表，曾經到彼得格勒參加過立憲會議。<sup>228</sup>內戰期間，他在下諾夫哥羅德和沃羅涅日服役，而那些地方主要是托洛茨基的人。但是在有關工會問題的爭論中，當時作為工聯主義者的卡岡諾維奇站在列寧一邊，反對托洛茨基。就在斯大林剛成為總書記兩個月後，卡岡諾維奇被調到中央機關，負責組織指導部——它很快就和登記分配部合併在一起——後來又負責監督職務名冊制度。卡岡諾維奇對充滿魅力的托洛茨基的崇拜有可能一直持續到內戰之後。(據機關中的一名助手說，卡岡諾維奇「很長時間以來，竭力模仿托洛茨基。後來大家都想要模仿斯大林」。)<sup>229</sup>但很快他就會用猛烈的人身攻擊激怒托洛茨基。他屬於無可爭議的無產者，而且同斯大林一樣，不信任知識分子和「資產階級專家」。<sup>230</sup>卡岡諾維奇口才好，是個天生的領導者，精力充沛，組織能力強。「他是個充滿活力的傢伙，很機靈，年輕、有幹勁」，巴扎諾夫寫道。<sup>231</sup>1924年，斯大林讓卡岡諾維奇成了中央委員會書記。<sup>232</sup>

斯大林派的觸手遍及全國。他挑選了許多心腹，這些人因為都在烏克蘭——僅次於俄羅斯的最重要的共和國——工作過或正在那裏工作而聯合起來。他身邊的其他人則來自高加索：格魯吉亞人奧爾忠尼啟則(生於1886年)，格魯吉亞黨組織負責人；俄羅斯人謝爾蓋·基洛夫(生於1886年)，阿塞拜疆黨組織負責人；亞美尼亞人阿納斯塔斯·米高揚(生於1895年)，北高加索黨組織負責人。另一位最終同專政者關係很近的人物是米哈伊爾·加里寧(生於1875年)，他比斯大林大三

456 歲，在地下歲月裏也在高加索待過。<sup>233</sup> 斯大林讓自己在內戰時的心腹克利姆·伏羅希洛夫擔任北高加索軍區司令(1921-1924)；事實上，他是仍然同斯大林保持密切聯繫的察里津「幫」中唯一的心腹。<sup>234</sup> 其他一些從內戰時期的南方戰線出來的人物，尤其是那些同第一騎兵集團軍有聯繫的，都會隨着斯大林一起官運亨通，這其中就包括亞歷山大·葉戈羅夫和第一騎兵集團軍司令謝苗·布瓊尼。不過，在1920年代早期，莫洛托夫、古比雪夫和卡岡諾維奇才是斯大林政治小集團中最核心的成員。觀察家們開始說這些人是「在斯大林的羽翼下」(*khodit' pod Stalinym*)行走。<sup>235</sup>

斯大林的助手隊伍能力很強。亞美尼亞人阿馬亞克·納扎列江是商人的兒子，曾經就讀於聖彼得堡大學法律系(但沒有在那裏畢業)，被認為是「一個很有教養、聰明伶俐、善良而且性情沉穩的人」，他也像伏羅希洛夫和奧爾忠尼啟則那樣，是極少數可以用熟稔的「你」(*ty*)對斯大林講話的人之一。<sup>236</sup> 另外還有伊萬·托夫斯圖哈(Ivan Tovstukha，生於1889年)，他曾留學國外，有學者風度；僑居巴黎期間，他在羅浮宮給一群布爾什維克講過藝術。(斯大林曾經對他說過——據巴扎諾夫講——「我母親養過一頭山羊，牠同你一模一樣，只是不戴夾鼻眼鏡。」)<sup>237</sup> 革命後，托夫斯圖哈在民族事務人民委員部為斯大林工作。1922年，斯大林剛成為總書記就把他調到黨的機關。托夫斯圖哈是出了名的寡言少語。他患有肺結核，而且只有一個肺，但他很快就取代納扎列江成為斯大林的高級助手。<sup>238</sup> 斯大林還調來敖德薩本地人列夫·梅赫利斯(Lev Mehklis，生於1889年)，沙皇時代的一個小官員的後代，本人在革命前加入過錫安工人黨。梅赫利斯是從工農檢查院過來的，斯大林在名義上擔任過那裏的領導；梅赫利斯在工農檢查院監督削減國家僱員和開支，尤其是硬通貨開支以及打擊貪污的工作，他在1922年的一份調查表中大談自己如何使「〔國家〕機關重回正軌」。<sup>239</sup> 梅赫利斯搬進了蘇維埃1號樓(在格拉諾夫斯基街)，離克里姆林宮的住所很近。他為人嚴肅，不喜社交。「梅赫利斯與下屬的談話是這樣進行的：『把下面這些事情做好。清楚了嗎？解散。』半分鐘。」機關人員巴扎諾夫回憶說。斯大林對托夫斯圖哈說話比較客氣，對梅赫利斯比較粗魯。「比

如，斯大林會說，『梅赫利斯，火柴！』或『鉛筆！』」巴拉紹夫說，「對托夫斯圖哈不會。〔斯大林〕對他非常尊重，也聽他的。〔托夫斯圖哈〕是個內斂的人，乾巴巴的，寡言少語，但非常聰明。他是一個很好的領導者。」但儘管「梅赫利斯不太容易相處，」巴拉紹夫最後說，「斯大林看重他的這些品質，認為梅赫利斯願意執行任何任務，不管是甚麼任務。」<sup>240</sup>

最初這些年，很多新人進入了斯大林的圈子，他們中有些人會被淘汰，有些人會飛黃騰達，比如鐵路公務員之子、馬其頓族的格奧爾吉·馬林科夫 (Georgy Malenkov, 1902–1988)——他先是上了一所古典中學，然後又在莫斯科技術學院讀書。還有謝爾蓋·瑟爾采夫 (Sergei Syrtsov, 生於1893年)，他來自烏克蘭，在聖彼得堡綜合技術學院上學時入的黨 (他沒有在該校讀完)，內戰時擔任過政治委員，負責強制驅逐哥薩克。瑟爾采夫作為黨的第十次代表大會的代表還參與了鎮壓1921年喀琅施塔得暴動，並在同年被任命為中央委員會機關的人事主管，之後在1924年調任宣傳鼓動部部長。<sup>241</sup> 斯大林手下的黨務官員還包括斯坦尼斯拉夫·柯秀爾 (Stanisław Kosior, 生於1889年)，他被總書記任命為全西伯利亞黨組織負責人；以及安德烈·日丹諾夫 (Andrei Zhdanov, 生於1896年)，他得到了下諾夫哥羅德省；還有安德烈·安德烈耶夫 (Andrei Andreyev, 生於1895年)，他被斯大林留在中央機關擔任中央委員會書記。這些以及其他的例子說明，斯大林提拔的不僅僅是沒有受過教育的人。閱歷豐富的索柯里尼柯夫的情況尤其如此。他精通俄語，懂六門外語，還是頗有造詣的音樂家，是個真正的知識分子，這一點與卡岡諾維奇剛好相反 (卡岡諾維奇在突厥斯坦工作時曾是索柯里尼柯夫的手下)。<sup>242</sup> 但索柯里尼柯夫還和卡岡諾維奇一樣，是個極為高效的組織者。<sup>243</sup> 在索柯里尼柯夫的幫助下，列寧的新經濟政策從口號變為現實，然而列寧總是貶低他。<sup>244</sup> 但斯大林對他比較關心。不錯，索柯里尼柯夫是不住在克里姆林宮 (他和年輕的第三任妻子——一名作家——在格拉諾夫斯基大街二流精英居住的大樓裏有套住房)，但是在1924年，斯大林把索柯里尼柯夫提拔為政治局的候補委員。



## 尋找槓桿

458 許多任命並不是斯大林做出的。例如，出身貴族、同亞歷山大·普希金是遠房親戚的格奧爾吉·契切林(生於1872年)是由列寧任命的。<sup>245</sup> 政權中的夜貓子一開始並不是斯大林，而是契切林：他住在鐵匠橋街15號辦公室附近的地方，要工作到凌晨，並以在早晨四五點鐘打電話給下屬詢問情況或傳達指示而著名。(放鬆的時候，契切林會用鋼琴彈奏莫扎特的曲子。)為了得到更多的權力，斯大林把希望寄託在契切林最主要的副手馬克西姆·李維諾夫(生於1876年)的身上。李維諾夫出生於比亞韋斯托克的一個富裕的銀行家庭，但因為是猶太人而先後被中學和大學拒之門外。<sup>246</sup> 李維諾夫有件事情一直耿耿於懷：契切林是在1918年1月才加入布爾什維克的，而他早在1898年俄國社會民主黨初創時就是黨員，但是被任命為外交人民委員的卻是契切林而不是他李維諾夫。(給契切林的調令到來時，兩人都在倫敦。)<sup>247</sup> 列寧對李維諾夫說他是部裏不可或缺的「黨的鬥士」，而李維諾夫因為長期為黨工作的確贏得了一些信任。<sup>248</sup> 但他也被認為生性多疑、釣名沽譽、裝腔作勢卻又十分自卑、渴望得到賞識、工於心計。<sup>249</sup> 他對契切林的敵意在當時是很有名的。「我沒有哪個月不從他們倆中的一個或另一個那裏收到便函，上面寫着『絕密，政治局委員親啟』，」斯大林辦公室的工作人員巴扎諾夫寫道，「在這些便函中，契切林指責李維諾夫墮落、無知，是個下流粗野的罪犯，不該讓他從事外交工作。李維諾夫則說契切林是個同性戀、白癡、瘋子，一個不正常的人。」<sup>250</sup>

政治局要求契切林把李維諾夫帶去參加有關西方議題的會議，結果契切林討價還價，把出生於梯弗利斯(1889)的亞美尼亞人、人稱加拉罕的列夫·加拉哈尼揚(Karakhanyan)提拔為自己的副手，負責東方事務。<sup>251</sup> 加拉罕過去屬於托洛茨基的國際派，1917年夏天和托洛茨基一起加入了布爾什維克。斯大林起初極力主張換掉這個亞美尼亞人，認為政權需要一個更容易接受東方各民族的穆斯林。然而斯大林與加拉罕的通信很快就開始充滿討好的意味。「您的身體怎樣？您感覺如何？您肯定想念〔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一刻也不要相信日

本的外交人員，那是最不可以信任的民族……向您的夫人問好。約·斯大林。又及：到目前為止，我一直很健康……」。加拉罕的回信也差不多（「緊握您的手。致以衷心的問候。您的列·加拉罕」）。看來加拉罕在巴結斯大林，而斯大林則想在外交人民委員部找個自己的人。但李維諾夫也想通過明顯模仿斯大林的觀點來爭取那個角色。<sup>252</sup> 這種互動在蘇維埃體系中隨處可見——斯大林想從人們的私人恩怨中坐收漁利；官員們想拉攏他對付競爭對手。

459

### 秘密武器

契卡和格伯烏有三個核心人物，而這三個人同斯大林的關係都很密切。首先是捷爾任斯基。1877年，他出生於立陶宛和白俄羅斯邊界地區的明斯克附近，是一個波蘭貴族地主家庭中的八個孩子之一。後來他成了孤兒，並為了成為天主教神職人員而狂熱地學習。<sup>253</sup>「上帝在我心中！」據說他對自己的哥哥說過，「要是有一天，我像你那樣開始認為上帝根本不存在，我就開槍自殺。沒有上帝，我就活不下去。」<sup>254</sup> 做學生時，他轉而信仰馬克思主義，並在離畢業還有兩個月的時候被維爾諾中學開除。結果，用他自己的話說，他變成了「一個成功的鼓動家」，「在社交晚會，在酒館，在工人聚會的不管甚麼地方，向完全處於蒙昧狀態的群眾講明道理」。<sup>255</sup> 但最後，他在沙皇的監獄、流放地和苦役中一共度過了11年，而且還染上了肺結核。<sup>256</sup>「他的雙眼看上去真的是充滿淚水，有無限的憂傷，但他的嘴巴露出了寬厚善良的微笑」，英國雕塑家克萊爾·謝里登（Clare Sheridan）說道——她在1920年為他做了一尊半身塑像。（捷爾任斯基對她說，「在監獄裏，人學會了保持耐心和平靜」。）<sup>257</sup> 捷爾任斯基在政治上有點容易遭人詬病。他是在1917年4月才加入布爾什維克的，然後又在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條約問題（1918）和工會問題（1921）上反對過列寧，但他之所以受人稱道，是因為他讓反革命分子聞風喪膽，而且過着革命苦行僧一般的生活——他睡的是鐵床，支在不生火的辦公室裏，吃的是茶和麵包皮。<sup>258</sup> 他親自向列寧匯報工作。在列寧因病不能工作之後，他與斯大林的關係越來越

近。斯大林既沒有受到捷爾任斯基的威脅，也沒有因為秘密警察的幫助而完全依賴他。

460 另一位波蘭人維亞切斯拉夫·明仁斯基成了捷爾任斯基的第一副手並管理着秘密警察，因為他的上司還要同時兼任鐵道人民委員（從1924年起又兼任最高國民經濟委員會主席）。他是一個皈依了東正教的波蘭貴族兼教師的兒子，出生於聖彼得堡，畢業於聖彼得堡大學法律系。他僑居歐洲達11年之久，在巴黎做過銀行職員，在博洛尼亞的布爾什維克學校教過書，同時還畫畫、出版詩集。據說他在1917年用從前淑女學校的三角鋼琴演奏過肖邦的華爾茲，而他要是穿上三件套，看上去就像一個銀行家或花花公子。明仁斯基曾經短暫擔任過最早的財政人民委員，然後又做了一些外交工作（他通曉的語言大概有十幾種）。之後，捷爾任斯基考慮到他生來就適合做特工工作，就把他提拔到契卡。<sup>259</sup>兩人都住在克里姆林宮，而且在阿爾漢格爾斯科耶的別墅也靠得很近（哥爾克6號）。關於明仁斯基的趣聞很多：躺在鋪着中國絲綢的長沙發上審問犯人，把自己手腳的指甲染成紅色，戴着金框的夾鼻眼鏡，娶的是從前諾貝爾家族的女家庭教師（她離開了他還帶走了孩子）。列寧稱他是「我的頹廢的神經質者」。<sup>260</sup>事實上，明仁斯基的確有過躺在沙發上接待人的事情。在巴黎時的一次車禍，嚴重地損害了他的聽力和神經，使他落下了退行性脊椎關節炎。此外，他年輕時還得過猩紅熱和白喉，28歲時得了斑疹傷寒，並患有急性咽喉炎、動脈硬化、心臟肥大、偏頭痛、心律不齊，有一隻腎受到感染。他身高5英尺9英寸，\*但體重有200磅，†每天要吸50至75支香煙，而因為失眠，睡眠時間不足五個小時。<sup>261</sup>雖然明仁斯基在內戰時就警告過托洛茨基，說斯大林在背後不停地搗鬼，但斯大林和明仁斯基這兩位曾經的詩人相處得還不錯。不管怎麼說，病怏怏的明仁斯基構不成威脅，斯大林辦事可以繞開他。

對斯大林來說，秘密警察中影響最大的官員是約諾霍姆·約胡達（Jenokhom Jehuda）——世人更熟悉的名字是亨里希·亞戈達（Genrikh

\* 編註：約1.75米。

† 編註：約91公斤。

Yagoda)。斯大林把亞戈達讀作「亞高達」(Yagóda)，戲稱他為「要戈達(Yágođa，漿果)」。(馬克西姆·高爾基稱他「小漿果」〔Yágodka，要戈達卡〕)。1891年，亞戈達出生於雅羅斯拉夫爾省的一個波蘭人和猶太人家庭，是家中的八個孩子之一，但是在第二年，他們家就搬到下諾夫哥羅德；他的父親是珠寶商，母親是鐘錶匠的女兒。亞戈達的父親是雅科夫·斯維爾德洛夫的父親的表兄弟。年輕的亞戈達上了高中，學了德語和統計，但是在1907年就開始積極參加革命政治活動，基本上屬於無政府主義者。他的姊妹當中有一個是無政府主義者，而且是藥劑師學徒，所以他也做了六個月的藥劑師學徒；1912年5月，他在莫斯科被捕，似乎是因為盜竊和窩贓，贓物中包括武器和炸藥。亞戈達還給老斯維爾德洛夫當過雕刻師學徒，據說偷走了所有的工具，想要自立門戶，失敗後又回去賠禮道歉，然後又再犯。世界大戰中，他應徵入伍(他的一個兄弟因為拒服兵役而被處決了)。1915年，他娶了斯維爾德洛夫的侄女，從而獲得了未來進入政府的機會：1919年11月，他成為契卡事務管理局局長，雖然他在黨內的自傳材料中強調自己「在幾乎所有的戰線」都取得過戰績，幹過「直到殺人在內的各種工作」。<sup>262</sup> 1920年底，亞戈達獲得了當捷爾任斯基不在時簽署命令的權利。1923年9月，他成為格伯烏第二副主席，填補了由於捷爾任斯基兼職過多和明仁斯基生病所留下的空白。亞戈達外語不行，但是在經濟管理和搞陰謀詭計方面很有一套。<sup>263</sup> 他可以直接向斯大林匯報工作是從1922年夏秋的時候開始的，這一方面是因為斯大林新擔任了總書記，另一方面也反映了斯大林對警方特工人員的栽培。<sup>264</sup>

461

亞戈達成了斯大林的秘密武器，但專政者決不是在碰運氣。他還培養了亞戈達在秘密警察內部的幾個對頭，比如阿爾圖爾·弗拉烏奇。弗拉烏奇1891年生於特維爾省，父親是意大利人，來自瑞士，是製作乾酪的，母親有愛沙尼亞和拉脫維亞血統，而他自己能說流利的德語和法語，中學畢業時得了金獎，之後又完成了在聖彼得堡綜合技術學院的學業。弗拉烏奇經常去歌劇院聽男低音歌唱家費奧多爾·夏里亞平的演唱，他自己除了唱歌還會彈鋼琴和繪畫。他改名為阿爾圖爾·阿爾圖佐夫(Artur Artuzov，俄羅斯人聽起來會容易些)，並通過關係進入了契卡

(他母親的一個姊妹嫁給了米哈伊爾·克德羅夫)，從1922年7月開始，負責反間諜工作。<sup>265</sup> 在盧比揚卡總部，契卡不同派系之間的鬥爭常常同對付「反對者」(反革命分子)的鬥爭一樣頻繁。阿爾圖佐夫和他的專業人員看不上亞戈達及其手下有限的反間諜技術。(更別說還有波蘭情報機關對蘇維埃情報機關的滲透，對於蘇維埃的人員以及從沙俄到蘇維埃時期的警察機關的手段十分瞭解。)<sup>266</sup> 除了阿爾圖佐夫，斯大林同後來管理軍隊情報機關的約瑟夫·溫什利赫特的關係也很密切。

亞戈達生活奢侈、行為不檢點，這讓斯大林很容易就控制了他。亞戈達向苦行僧似的捷爾任斯基抱怨說，警察機關的官員「既沒有錢也沒有功勞，缺吃少穿，連最基本的東西都沒有」，導致「士氣渙散，諸如受賄之類的事情盛行」。亞戈達特別指出，卡累利阿甚至連寫報告說明物資短缺的筆墨紙張都沒有。<sup>267</sup> 但亞戈達自己卻住在鐵匠橋街上層人物居住的大樓裏，並用國家的錢對其進行了改造。他還擁有一座很大的別墅。他在私人住所召開格伯烏會議時，是一邊喝着伏特加，一邊就着可麗餅和魚子醬。他還建立了一個小集團，裏面都是些名聲不好的人。有一次，亞戈達交給一個中間人看管的沒收來的白蘭地和朗姆酒一下子就少了二百多瓶。<sup>268</sup> 一個名叫亞歷山大·「薩沙」·盧里耶(Alexander "Sasha" Lurye)的同夥名聲更臭，把「沒收來的」珠寶拿到國外換取硬通貨——名義上是代表格伯烏，還從自己的鑽石生意中給亞戈達提成，並弄來上等的洋酒和假陽具。亞戈達沾上商人(*commerçant*)的臭味，於是，他的最高上司斯大林就可以緊緊地盯着盧里耶之流所搞的那些見不得人的勾當——那是專政者的保險措施。

### 「關鍵在於領導」

這話讓我們轉向了政權的焦點，即專政者本人。斯大林的性格將會成為世界歷史上的核心因素，並影響到對他的所有評價。有個學者的說法很有代表性。他認為，與戰爭、革命及內戰所造成的曠日持久的緊急狀態有關的那種政治鬥爭，其實非常適合斯大林個人的特點。這話的確有道理，但也適合絕大多數布爾什維克。<sup>269</sup> 事後對於斯大林

性格的「洞見」，可能會產生非常大的誤導。他的自我認知同高層的大多數革命者一樣：1920年，在黨的調查表中的「職業」一欄，斯大林填的是「作家(時評家) (*publitsist*)」。<sup>270</sup> 列寧在前一年類似的黨內調查表中寫的是「文學家」(*literator*)；托洛茨基在加入「前政治犯協會」時對自己的職業寫的是「作家和革命家」。<sup>271</sup> (當然，對於沙俄時期的革命者來說，寫作和編輯屬於為數不多的幾種合法活動。) 在斯大林身上，體現出馬克思主義和俄羅斯的知識分子傳統，可他還是一個獨樹一幟的實踐家 (*praktik*)，一個力行者，一個實幹家，是非無產者出身的革命家中最接近於擁有無產者身份的人。不過，斯大林仍然一再返回到列寧的著作這個試金石。同他有關的一個基本事實是，他是透過馬克思主義的理論來看世界的。

對於斯大林的描述，最普遍的——尤其是在知識分子當中——可能是說他有自卑感。「由於斯大林的嫉妒心和野心極其強烈，」托洛茨基後來聲稱，「他每一步都會不自禁地感覺到在知識和道德上的自卑。」<sup>272</sup> 托洛茨基把道聽途說的描寫斯大林自卑感的每一點東西都收集起來。「他要做我做的我做了，但他還是覺得不夠，」阿韋利·葉努基澤說——據列昂尼德·謝列布里亞科夫說，因為這話是他告訴托洛茨基的——「他要我承認他是一個天才。」<sup>273</sup> 但是，托洛茨基對斯大林有多瞭解，現在還很難說。這兩人並沒有甚麼交往。(托洛茨基承認自己「從來不去斯大林的家裏」。不過，這並不妨礙他自認為已經把斯大林看透了。)<sup>274</sup> 毫無疑問，斯大林的野心很大，想要成為舉足輕重的人物；事實上，他也在為此不懈地努力。斯大林訂閱了相當多的期刊，並在不久後指示托夫斯圖哈，按照不同的主題為他建立一個龐大的圖書室：哲學、心理學、社會學、政治經濟學、俄國歷史、其他國家的歷史、外交、軍事、文學、文學評論、回憶錄。這不是擺設，而是為了工作。<sup>275</sup>

斷言斯大林有自卑感，至少同樣暴露出其他人的優越感，而這不僅僅是說托洛茨基。比如鮑里斯·巴扎諾夫，他上過大學，自負甚高，移居國外後很是輕視斯大林的才智，說「他經常不知道做甚麼和怎麼做，但他不露聲色。我經常看到他猶豫不決，寧可跟在事件的後面而不去引導它們」。據說這種行為證明了斯大林沒有受過教育、沒文化、

不讀書。<sup>276</sup>然而，在一次採訪中，巴扎諾夫終於屈尊對斯大林細心謹慎的習慣作了正面的評價。「斯大林非常明智，在別人還沒有充分展開自己的論點前從來不說甚麼，」巴扎諾夫說，「他會坐在那兒，看看討論是怎麼進行的。在所有人都發言之後，他會說：好的，同志們，我想解決問題的辦法是如此這般——然後他就開始重複大多數人在不知不覺中得出的那些結論。結果，久而久之，人們在提到斯大林的時候就開始說……他擁有各種各樣基本的智慧，使他得以提出解決困難的正確辦法。」<sup>277</sup>

464 可以說明斯大林心胸狹窄的事例很多，但都沒有甚麼特別突出的。比如說下面的：1920年底，列寧也許在無意中幫了他在思想上的死對頭尤利·馬爾托夫一個忙，在馬爾托夫到德國參加完會議後不讓他回到蘇俄，使馬爾托夫躲過了孟什維克黨人後來受到的審判。不巧的是，馬爾托夫得了肺結核，兩年後，列寧要斯大林用黨的經費給馬爾托夫支付在柏林的醫藥費。斯大林無疑還記着馬爾托夫1918年指控他搶劫的事情，因為指控帶來了一場誹謗罪的官司，於是斯大林拒不同意。「甚麼，要把錢浪費在工人階級的敵人身上？」據說斯大林是這樣答覆列寧的，「這事您找〔黨的〕其他書記吧！」<sup>278</sup> 1923年4月4日，馬爾托夫去世；李可夫代表列寧出席了在柏林的葬禮。但是，從此事來看，很難說斯大林就特別喜歡報復。憎惡馬爾托夫的遠遠不止斯大林一個人。為《消息報》寫了訃告的拉狄克說，馬爾托夫是「從前革命的小資產階級的最真誠和無私的代表」。<sup>279</sup> 托洛茨基的評價也不怎麼樣，他稱馬爾托夫是「民主社會主義的哈姆雷特」。<sup>280</sup> 馬爾托夫的來自右翼的批評者，包括立憲民主黨人，甚至是他自己所在的孟什維克黨人，則正確地指責他犯了教條主義和政治上短視的錯誤。<sup>281</sup> 而列寧不但想從政治上，還想從肉體上消滅除馬爾托夫之外的孟什維克派社會民主黨人。

斯大林待人是有所區別的。有些人是他賞識的，也有很多人是他要對付的。（紅軍騎兵指揮官布瓊尼回憶說，斯大林會在私下裏對布瓊尼任命的這個那個人提出質疑。）<sup>282</sup> 但是並沒有可靠的證據可以證明，在1920年代初斯大林有甚麼了不起的墮落行為。托洛茨基講的下面這件趣聞顯然發生在1922年，說是布哈林告訴他的：「我剛剛看過柯巴。

您知道他是怎麼打發時間的嗎？他把週歲大的兒子從床上抱起來，從煙斗裏吸一口煙，再吐到孩子臉上。『這會讓他長得更壯實』，柯巴說……『那樣做很野蠻』，我說。您不瞭解柯巴。他就那樣——有點兒古怪。<sup>283</sup> 這故事聽上去像是真的，但在後來會從比較險惡的角度理解。據糧食人民委員部的一名高級官員說，在1921年的一次會議上，列寧對他說，「當我直視着你的時候，你似乎同意我的看法並說『是的』，但要是我轉過身去，你就會說『不』」。<sup>284</sup> 如果這事說的是斯大林，倒是臨床妄想症的主要證據。

最初很少有人看得懂斯大林。「我對自己的工作滿意嗎？」阿馬亞克·納扎列江寫信給回到梯弗利斯的密友奧爾忠尼啟則說（1922年6月14日）。「既滿意也不滿意。一方面，我經受了重大考驗，瞭解了全俄和世界事務，我還將經受紀律的磨練，學會在工作中保持嚴謹的態度，從這個角度說，我是滿意的。另一方面，我的工作完全是和文件打交道，很辛苦，主觀上沒有甚麼令人滿足的東西，純屬體力活，佔了那麼多時間，連打噴嚏和喘口氣都不行，尤其是在柯巴的鐵腕管理下。」納扎列江接着還說，「從他身上要學的東西很多。因為可以近距離地瞭解他，我對他產生了不尋常的敬意。他擁有的性格只能讓人羨慕。我不可能感到生氣。他對工作人員很嚴厲，同時也很關心。」<sup>285</sup> 納扎列江對斯大林的理解非常精確：體貼，苛刻，尤其是任勞任怨。那還不是全部。「他老奸巨猾，」納扎列江在給奧爾忠尼啟則的另外一封信中寫道（1922年8月9日），「很難對付，很難馬上就弄懂他。」<sup>286</sup> 可以想見，斯大林的對手們會如何用陰暗的眼光看待他既關心人又老奸巨猾的性格。<sup>287</sup>

465

斯大林既可以很封閉，讓人難以接近，但也可以變得很有魅力，而且事實證明，他對於那些在「其羽翼下」的人來說，是個忠實的靠山。<sup>288</sup> 1919年見過斯大林的米高揚很好地捕捉到了斯大林給那些他喜愛的人留下的印象。米高揚後來在回憶中提到，1922年，當時他擔任下諾夫哥羅德黨組織負責人，斯大林如何因為黨的第十一次代表大會地方代表選舉的事情把他叫到克里姆林宮的家中——以及列寧如何直接走了進來。「斯大林在我眼中的地位提高了，」米高揚回憶說，「我看得出，他在如此重要的黨內事務上是列寧的左膀右臂。」1922年夏天，斯大林將



米高揚調任黨的東南局負責人(總部在羅斯托夫)。「黨的第十一次代表大會之後，斯大林開始大力集中幹部，組織他們在各省和中央輪換，」米高揚繼續說道，「就我所知道的以及與我的工作有關的方面而言，我喜歡他的做法。」斯大林能夠迅速領會米高揚關心的問題，而且從不拒絕這個外省人的建議。「所有這些都增強了我對斯大林的信任，於是我開始經常向他請教，在去莫斯科的時候就會拜訪他。」米高揚接着還說，「斯大林那時一心撲在工作上……他的健康狀況很好，這很讓人佩服，而他的態度和行為也得到人們的贊同。」

466 出於仕途的考慮，野心勃勃的米高揚顯然正在密切關注着一股正在上升的政治力量。「1923年春天，大概是5月份，我正好在莫斯科，就順便去了他家，」他繼續說道，「他那時候住在從克里姆林宮的三一門進去右邊第一棟樓，在那棟兩層樓房的二樓。房間都很簡樸，除了餐廳之外都不太大。他的辦公室很小。」(後來，當斯大林提高了自己在克里姆林宮的住房待遇並把米高揚調到莫斯科時，他就把這套房子給了米高揚。)[斯大林胳膊上吊着三角巾走出了他家裏的辦公室。我頭一次見到這種情況，自然就問是怎麼回事。]斯大林說：「我的胳膊疼，尤其是在春天。好像是風濕。過段時間就好了。」斯大林的關節炎可能在童年的時候就有，後來變得嚴重了，特別是當他在西伯利亞流放的時候；這種病的週期性復發會伴有扁桃體發炎和流感。<sup>289</sup> (1904年斯大林26歲時，沙皇警察機關寫道，「一個明顯的特徵：很久以前的脫臼讓他左胳膊的活動受到限制」。這顯然是根據斯大林自己的話記錄下來的。)<sup>290</sup> 米高揚問斯大林為甚麼不去治，他回答說：「醫生有甚麼辦法？」但米高揚諮詢了醫生，並從1923年開始，讓斯大林到南方的馬采斯塔河附近接受藥浴治療。<sup>291</sup> 含有硫磺的礦泉水起了作用，緩解了斯大林的關節痛，於是他開始每年到南方度假。「斯大林太喜歡索契了，」米高揚認為，「甚至當他不再需要到馬采斯塔做藥浴的時候還去那裏。」<sup>292</sup> (實際上，斯大林的關節痛一直沒有消除。)

另外一個秘密的聚會地點是斯大林在莫斯科郊外的別墅。這座鄉間的房子位於梅德文卡河左岸的烏索沃，以前屬於列翁·祖巴洛夫(Levon Zubalov，祖巴拉施維里[Zubalashvili])，是那位已過世的巴庫石油大亨

在磚砌的高牆後面的茂林中，在一塊開闊土地上為自己和家人建造的四棟磚砌別墅之一。<sup>293</sup> 主建築（祖巴洛沃4號）有兩層；上面一層，斯大林和他的妻子各有一個房間，而且斯大林還有一間辦公室。娜捷施達（生於1901年），或者按照呢稱「娜佳」，是他的第二任妻子，年幼時被他抱在膝頭而到少女時卻成了他的新娘。她在列寧的秘書處工作。她想要一份事業，而不是被人稱作執政者的妻子，但她患有嚴重的頭痛，而且心情抑鬱。<sup>294</sup> 下面一層是絡繹不絕的親戚和逢迎拍馬者使用的：阿利盧耶夫家和斯瓦尼澤家（斯大林已故的第一任妻子的家人）這兩大幫人，還有姨娘姨夫、舅舅舅媽以及他們的孩子。瓦夏（Vasya）出生的那年，斯大林第一次婚姻的棄兒、當時14歲的雅科夫被人從梯弗利斯送到莫斯科，同他一起生活。斯大林之前是把他丟給格魯吉亞的姨媽和舅舅撫養；搬到莫斯科是一個艱難的轉變，因為他不懂俄語，因此也不懂他父親說的話。斯大林不喜歡雅科夫，在別人面前稱他是「我的傻瓜」。這其中的部分原因也許在於，他讓他的父親想起了失去的那位可愛的格魯吉亞妻子。有段時間，斯大林的家裏還有一位年輕的成員阿爾喬姆·謝爾蓋耶夫（Artyom Sergeyev）。他和瓦夏是在同一所醫院出生的，比瓦夏晚19天。他的父親是斯大林在內戰時的親密戰友，在對裝有飛機發動機的高速軌道車進行測試時撞車而死，之後斯大林就收養了他。

467

祖巴洛沃距離莫斯科足足有8英里，<sup>\*</sup>而且沒有直通的公路；冬天人們需要在汽車輪子上加裝防滑鏈或者需要汽車雪橇（車身裝有坦克履帶）。斯大林很少外出，即便出去也基本上是在週日。不過別墅裏有架自動鋼琴，是從老祖巴洛夫那時留下的，而令人驚嘆的是，它還能用。這架鋼琴斯大林非常喜歡，因為他特別喜歡音樂。另外，他在院子裏還種了塊菜地，養了些鵝、家雞和珍珠雞，弄了個小養蜂場。他偶爾會從附近的國營農場借一個馬拉的雪橇——就如同斯大林最喜歡的作家之一契訶夫小說中描寫的情景。「在晚上，斯大林特別喜歡駕雪橇」，

---

\* 編註：約13公里。

阿爾喬姆回憶說。<sup>295</sup>這是一個人們很少見到的斯大林。托洛茨基的別墅——人稱「總部」——要更加氣派，就在莫斯科北面阿爾漢格爾斯科耶被國有化的尤蘇波夫宮。那處莊園過去歸戈利岑家族所有，那之前則歸舍列梅捷夫家族。尤蘇波夫宮的藝術品仍然掛在牆上：提埃坡羅 (Giovanni Battista Tiepolo)、布歇 (François Boucher)、弗拉戈納爾 (Jean-Honoré Fragonard)；\* 這不是以社交聚會出名的地方。相比之下，奧爾忠尼啟則以及後來的謝爾蓋·基洛夫——他也許是斯大林最親密的朋友——總是到祖巴洛沃拜訪斯大林。米高揚夫婦和他們的四個孩子佔據了祖巴洛沃的一座更大的別墅 (祖巴洛沃2號)，伏羅希洛夫夫婦在那裏也有一棟別墅。<sup>296</sup>不過，斯大林到祖巴洛沃時有時情緒低落，並開始和娜佳吵架。他們的婚姻因為對於妻子角色的不同看法而變得緊張起來。

娜佳的上司利季婭·福季耶娃回憶說，斯大林的妻子「非常漂亮」，長着「格魯吉亞人的眼睛」(她的祖父是格魯吉亞人)，但福季耶娃也指出，「斯大林對她非常粗暴」，儘管他的嗓門不大(「斯大林說話總是輕聲細語」)。當娜佳在列寧的秘書處工作時，斯大林有時也會讓她記錄自己口授的內容，但多數情況下是要她好好招待來家裏的客人。在她懷瓦夏的時候(1920-1921)，斯大林下了決心要她辭去外面的工作。福季耶娃聲稱，當她向列寧匯報說斯大林對娜佳施壓要她辭職的時候，列寧要求有甚麼情況就告訴他；斯大林讓步了，列寧說了句「亞洲人」。1921年12月10日，瓦夏出生後八個月，娜佳這位政治局委員的妻子兼列寧的私人秘書，因為政治上「消極」在清黨時被開除了。<sup>297</sup>她寫信向列寧求助。誰會這麼冒失或者說有這樣的權力清洗她呢？只有一個人，他顯然是企圖逼迫自己的妻子回到家中。列寧通過電話向黨的中央監察委員會主席口授了一張便條，強烈要求恢復娜佳的黨籍。<sup>298</sup>娜佳恢復了候補黨員資格，但是要到1924年才能重新成為正式黨員。<sup>299</sup>她不想讓人知道並被當作總書記夫人看待，就在《真理報》下轄的《革命

\* 譯註：提埃坡羅 (1696-1770) 為意大利畫家，布歇 (1703-1770) 與弗拉戈納爾 (1732-1806) 均為法國畫家。

與文化》擔任秘書工作。由於有頭痛和抑鬱的毛病，娜佳的狀態可能極其艱難。斯大林同時是一個以自我為中心的、家長意識很強的丈夫和不稱職的父親。

因此，1920年代初，處於權力中心的就是這樣的一個人：有風度但行事詭秘，有魅力但表裏不一，關心人但要求苛刻，為人隨和但是對希望得到他的愛的妻子比較狠毒。可是，在由黨務人員組成的「家庭」中，斯大林是至高無上的守護神。「他的性格既聰明又野蠻，要是我可以這樣說的話，」納扎列江在提到斯大林的古怪性格時認為，「但他這人還是很溫和的，有同情心，能尊重人的價值」。<sup>300</sup>最後，斯大林最突出的一點就是他在機關內部的控制力。「同斯大林共事不容易，尤其是對書記處的領導們以及關係最密切的助手們來說，」工作人員阿列克謝·巴拉紹夫回憶說，「在他周圍會覺得非常緊張……毫不誇張地說，你必須夜以繼日地工作，回家只是睡個覺。」他們都覺得精疲力竭，渴望獲得允許去學習。據巴拉紹夫說，有一次，他們開了一個他們稱之為「真正的列寧主義者」的會議——又稱「二十人會議」——「斯大林說，『捷爾任斯基同志，這裏的〔格里戈里·〕坎納(Grigory Kanner)請求放他去學習。您認為如何？所有的助手們都靜了下來，注意聽着。『那太好了，』捷爾任斯基回答道，『我有空着的牢房。讓他在那裏學習。』我們都覺得涼颼颼的。』<sup>301</sup>（人稱「小個子」的坎納，長着「綿羊毛」一般的「黑色鬚髮」，是在1922年5月初進的斯大林機關，因為總是被分派別人最不願意幹的事情而出了名。）<sup>302</sup>巴拉紹夫還說，「當時根本不存在害怕。有的是對〔斯大林的〕堅韌、勤奮和嚴謹的尊重。我那時覺得，對於怎樣成為一個優秀的領導者和組織者，他身上有很多值得學習的東西。」<sup>303</sup>

不過，巴拉紹夫補充了一點：這位總書記活在機關的天地裏。「我不喜歡的一點是，斯大林是一個機關工作人員，一個黨務人員，」巴拉紹夫強調說，「我們按照官署的方式管理黨和國家，沒有考慮群眾的建議。當然，他〔斯大林〕會和很多不同的人見面，比如參加農村通訊員會議、專家會議。但那都是在辦公室。好像人們都在抽煙(*makhorka*)，結果呢，煙霧騰騰的，甚麼也看不見。」<sup>304</sup>但是，如果說斯大林同群眾

接觸的機會有限，他同政權中年輕的工作人員接觸的機會卻非常多。托洛茨基公開嘲笑工作人員把革命引入歧途，據說布哈林後來對孟什維克費奧多爾·唐恩說，斯大林「就如同黨的象徵，基層的人都相信他」。<sup>305</sup> 巴拉紹夫是卡岡諾維奇的門徒，但卻通過一個叔叔私下看望了托洛茨基。他說自己在中央機關的那些年（1922–1926），托洛茨基只去過一次。<sup>306</sup> 斯大林同這些人打成一片，傾聽他們的聲音，而且想辦法讓中低層工作人員能夠提高能力，掌握馬克思主義理論和管理的方法——雖然並不一定能夠達成真正的共鳴。對於蘇維埃制度，斯大林形成了一種他畢生都會堅持的羅曼蒂克的想法。「黨的專政必須是指甚麼？」他在列寧寫的一份1923年的文件上寫道，「國家政權要依賴於武力？不，那是廢話！依賴於黨的無限的權力？也不是！關鍵不在於權力，關鍵在於對黨的信任，而信任根本不以黨的無限權力作為必備的前提條件。關鍵在於領導。」<sup>307</sup> 掌握了權力後，斯大林終其一生所追求的不僅是個人的榮耀，還有破解統治的秘訣，擴大俄國在世界上的影響。



沃茲德維任卡街和老廣場街先後成了斯大林王國的巨大車輪的軸心。就像以前的俄羅斯帝國一樣，蘇維埃國家開始成為一座裙帶關係的迷宮，對正式的制度有着多方面的影響。但斯大林的裙帶關係是高度制度化的：共產黨這部機器儘管效率低下，而且有摩擦，卻正是沙皇政權所沒有的。由於有了黨，組成黨國的大批個體擁護者就可以向某個人看齊，這個人就是黨的領袖。<sup>308</sup> 在很短的時間內，斯大林在各個重要的部門都有了支持者。很多工作人員明白，自己既是在為事業服務，也是在為斯大林個人服務。之所以人們對這種驚人的影響力感到意外，是因為他們低估了斯大林。但即便是一個立刻被公認為史上最偉大政治人物之一的人，他如果能那麼快就確立了如此程度的政治控制力，也會讓同時代的人感到驚訝。當然，1922至1924年的專政能力還很有限，但要強於沙皇制度的專政能力，因為與君主專制不同，蘇維埃政權以群眾的名義積極發動群眾。然而，當時的蘇維埃國家還沒有找到竅門，把發動起來的群眾充分地整合到威權主義的政體中。

政權在政治上甚至空間上的安排，反映出1917至1918年的革命是一種雙重革命——布爾什維克革命和農民革命——兩者互相抱有戒心。另外，新經濟政策在政府部門的兩個支柱，老廣場街8號（農業）和伊利英卡街9號（財政），構成了黨的中央機關的兩翼。三個機構剛好都設在革命前莫斯科的商業和金融區（基泰哥羅德）的中心，三個機構的建築都是商業資本和商業抱負的化身。置身於革命前莫斯科的資本主義中心，同時卻管理着共產黨並主持共產黨對資本主義的赦免工作（新經濟政策），斯大林作何感想，現在還不清楚。清楚的是，他是浸泡在共產主義意識形態中的。很多政權都有秘密警察，都追捕敵人。這個政權的不同之處，在於其特殊的一黨制結構以及超驗的觀念，即對豐裕、公正、和平的新世界的幻想。在一黨制的框架內，很多人都堅定地建設那個世界，但其他人對於那個世界還沒有變為現實感到失望。有流言說新經濟政策是一次熱月——那是法國革命中對7月的稱呼，當時，即1794年7月，發生了反革命，雅各賓人被推翻。當然，實施新經濟政策的是布爾什維克自己，而且他們仍在台上。<sup>309</sup> 但仍有觀察家認為，工業領域肯定會被迫實行非國有化，政治制度也會有相應的變化。按照這種想法，新經濟政策只是讓步的開始。<sup>310</sup>

列寧在1922年11月坦承：「我們現在應該在甚麼地方和怎樣重整隊伍、適應情況、重新組織，以便在退卻之後開始極頑強地向前進攻，這一點我們還不知道。」<sup>311</sup> 給出答案的任務會落到斯大林頭上。儘管在那之前，他必須先解決掉托洛茨基。所有的專政都需要一個無處不在、從內部構成威脅的「敵人」。托洛茨基就是為此而量身定制的，是老天爺賜給斯大林的機會——只要他明白這一點。事實證明，將會對總書記職務所固有的絕對權力以及對斯大林的心理平衡構成最嚴重威脅的，不是托洛茨基，更不是季諾維也夫或加米涅夫，而是斯大林最重要的保護人列寧，或者至少可以說是所謂的列寧口授文件。

471

\* 譯註：《列寧全集》第43卷，第296頁。



## 「把斯大林調開」

斯大林同志當了總書記，掌握了無限的權力，他能不能永遠十分謹慎地使用這一權力，我沒有把握。

472

——據說由列寧在1922年12月24日口授的文件，  
轉交時間為1923年5月底<sup>1\*</sup>

斯大林太粗暴，這個缺點在我們中間，在我們共產黨人相互交往中是完全可以容忍的，但是在總書記的職位上就成為不可容忍的了。因此，我建議同志們仔細想個辦法把斯大林從這個職位上調開。

——據說由列寧在1923年1月4日口授的文件，  
轉交時間為1923年6月<sup>2†</sup>

在大多數人連斯大林都不瞭解，更別提瞭解斯大林的權力之前，他就處在了權力之巔。1922年秋，托洛茨基似乎率先認識到，由於列寧的退場，斯大林如何掌握了可怕的權力。到1923年夏天，正如我們將要看到的，季諾維也夫和布哈林對於斯大林可以動用的資源之多深感震

---

\* 譯註：《列寧全集》第43卷，第339頁。

† 譯註：《列寧全集》第43卷，第340頁。



驚。假如我們像上一章那樣，對斯大林在中央機關掌握的種種工具細究一番，那他通往絕對統治的道路就顯得易如反掌。但是，建立專政中的專政的手段雖然已經落到他的手中，最驚人的事情仍然發生了：列寧似乎要求解除斯大林的職務。就在斯大林緊鑼密鼓地鞏固自己權力的時候，他的巨大權力受到了圍攻。與其說是總書記辦事易如反掌，倒更像在敵人的地盤上露營那樣危機四伏。

473 有很長一段時間，列寧對托洛茨基十分惱火，這是有大量文獻可以證明的，但是，所謂的列寧對斯大林很憤怒，則是以神秘文件的形式在1923年春夏突然冒出來的。這些文件的核心部分後來被稱為「列寧遺囑」(zaveshchanie)，是由列寧妻子娜捷施達·克魯普斯卡婭在幾名為列寧工作的女性——特別是瑪麗亞·沃洛季切娃(Maria Volodicheva)和列寧秘書處負責人利季婭·福季耶娃——的幫助下，或者說合謀下產生的。那些據說是出自列寧的最重要的文件，現在並沒有原稿存世(文件也沒有「遺囑」之類的標題，在首次出現的時候實際上根本沒有標題)。就像有俄羅斯學者通過縝密而詳細的考察所顯示的，文件的真實性根本沒有得到證明。這位學者正確地指出，除非能拿出有說服力的文獻材料來證明這些文件是出自列寧之口，否則，我們就必須慎重對待他是否為作者的問題。<sup>3</sup>不過，不管這些文件是不是，如果是，又是以何種形式出自列寧本人之口，它們都成了蘇聯政治生活中，特別是斯大林生活中的一種現實。我們將不是根據這些被歸於列寧的文件的所謂口授日期，而是根據它們產生的時間和背景，尤其是根據它們產生的後果來分析。這些文件中的關鍵詞——「把斯大林調開」——最終會長期徘徊在蘇聯的歐亞大地以及蘇聯之外的世界，但首先是，將長期糾纏着斯大林本人。

1922至1923年形勢的發展非常奇怪。引發對斯大林而言可能是致命的政治麻煩的，不是別的地方，正是格魯吉亞，是他已經拋卻但又合謀讓布爾什維克政權再次征服的祖國。在莫斯科，反對斯大林繼續擔任共產黨總書記的陰謀之所以出現，是因為格魯吉亞有人挨了一記耳光。此事本來跟斯大林無關，因為他當時正在從事一項艱巨的工作，要把內戰中出現的各個蘇維埃共和國之間那種鬆散、模糊、就連邦聯也談不上的結構強行改造成一個可以正常運轉的國家。他之所以能擁有至高的地

位，關鍵在於諳熟全國錯綜複雜的形勢，而不僅在於他是總書記。但在這項打造日後的蘇聯的重要任務啟動不久，斯大林就趕上季諾維也夫策劃的一個瘋狂的陰謀，要在整個敵對的資本主義世界中唯一承諾與蘇聯進行秘密軍事合作和技術轉移的國家，挑起「德國的十月革命」，或者說共產黨政變。此外，聲稱在德國出現「革命形勢」的蘇維埃政權，自身也飽受工潮的襲擾，儘管政權是以工人的名義統治的。<sup>4</sup>還有新經濟政策，本來想讓國家恢復元氣，結果卻弄得人心惶惶，造成農村糧價與城市生產的製造品價格的巨大落差。這期間，列寧接連出現了大中風。

474

對於這一時期，人們經常從由斯大林、加米涅夫和季諾維也夫組成、反托洛茨基的三駕馬車\*的角度敘述。這樣做有其道理，只是多年來人們一直誤以為，斯大林是初級合夥人。但是，反托洛茨基的三駕馬車因為下列事實而蒙上了陰影：就在它開始運轉的時候，發生了一起針對斯大林的陰謀；策劃者是季諾維也夫和布哈林，而且後者還試圖在季諾維也夫與托洛茨基之間充當自薦的中間人，只是沒有成功。三駕馬車的敘事不應掩蓋遠比這重要的故事，即布爾什維克的核心圈子作了多次嘗試，以防止黨的總書記建立專政中的專政——這種能力難以預見但卻自有其內在結構上的淵源。這些努力造成了一種新的現實，疊加在第一個現實之上：斯大林覺得被冤枉和出賣了。假如說在上一章，他在行使權力時給人的印象是充滿魅力和自信——儘管有時也讓人覺得古怪——那在這一章，他在與季諾維也夫和托洛茨基作鬥爭，尤其是與被歸於列寧的口授文件作鬥爭時，給人的印象是多疑和自憐，是一個自視為受害者的統治者。

共產黨人的這種組織生活——代表大會、中央全會、政治局會議（斯大林的政治生活）——並沒有把哪怕是一小部分的普通黨員包括在內，更別說去規定這個幅員遼闊的國家的生活節奏。對於大部分農民來說

---

\* 編註：「三架馬車」原文為 *triumvirate*（三頭同盟，即三個有權人物佔主導地位的政體；與下一章的 *duumvirate*（二頭同盟）呼應）。俄語文獻中形容斯大林等執政三人的表述則是 *troika*，其本意為「三駕馬車」，故相關中譯本的慣用譯法即為「三駕馬車」，本書也採用此譯法。

——農民依然佔居民的壓倒多數——黨就是一個貪得無厭的敵人，打着言辭漂亮的幌子收稅徵兵。（黨的會議不對公眾開放，主要是擔心黨外群眾會從台下猛烈抨擊黨員。）農民一心想着怎樣度過饑荒和把地種好；想着怎樣把牲口養好，要是沒有牲口的話；想着除草和天氣；想着置辦和保養農具；想着抵擋疾病和老鼠；想着不讓老婆利用共產黨的新法律跟自己鬧離婚。這個實行了社會主義的國度非常貧窮，正在努力從嚴重的破壞中恢復過來。1920年代初，至少根據有案可稽的經濟活動來看，蘇俄的人均年收入大概不到70盧布。因此，接下來不是要描述這個國家的生活——斯大林基本上是通過電報和信使送來的那些扭曲的、高度機密的報告來認識它的——而是描述蘇聯的成立和所謂「德國的十月革命」，描述一種能力有限但目標遠大的專政制度，描述位於這一切的中心的那個人。那個人一面時刻保持警惕，一面巧妙地擴大國家的專政力量。

###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以及梯弗利斯的一記耳光

成立蘇聯的宏大故事充滿了誤解，列寧被當成了各民族的捍衛者，而斯大林則是俄羅斯沙文主義者和推行中央集權的頭號人物。<sup>5</sup> 斯大林的確主張讓俄羅斯社會主義聯邦蘇維埃共和國吸收其他各蘇維埃共和國，建立一個中央集權制的國家，但他也主張讓這些蘇維埃共和國在大部分內部事務上擁有「自治權」，列寧起初接受了斯大林的計劃。托洛茨基的反應也差不多：「斯大林同志的建議簡單易懂，很有吸引力。」<sup>6</sup> 1922年中期，推動這一框架的機會來了。當時，格魯吉亞共產黨允許英、法資本出資的奧斯曼銀行在梯弗利斯開設分行，蘇俄財政人民委員格里戈里·索柯里尼柯夫對此非常憤怒，要求吊銷該銀行在格魯吉亞的營業執照，結果觸怒了格魯吉亞共產黨的中央委員會。<sup>7</sup> 可是，被世界大戰釋放出來的民族國家這頭妖怪，還能放回到瓶子裏嗎？斯大林認為可以。

作為組織局解決國家結構問題的專門委員會的負責人，斯大林起草了提綱，要求「把〔各蘇維埃共和國〕統一成一個單一的聯邦，在軍事和經濟事務上，以及在外圍聯繫〔外交和對外貿易〕上融為一個整體，並

保留各共和國在內部事務上的自治權」。<sup>8</sup> 但是，對於俄羅斯社會主義聯邦蘇維埃共和國吸收烏克蘭、白俄羅斯、格魯吉亞、亞美尼亞和阿塞拜疆的正式提案，表示接受的只有阿塞拜疆和亞美尼亞兩個中央委員會。阿塞拜疆面對的是過去統治它的伊朗國家，亞美尼亞面對的是土耳其。亞美尼亞人在土耳其遭受過屠殺。格魯吉亞中央委員會只同意，「經濟力量和總體政策的統一，但要保留所有的獨立屬性」。白俄羅斯中央委員會要求得到與目前存在於蘇維埃烏克蘭和蘇維埃俄國之間同樣的條約關係——含糊不清加上事實上的獨立——而烏克蘭中央委員會甚至沒有討論新草案。<sup>9</sup> 只有非凡的人物通過非凡的努力，才會造就可以正常運轉的一體化國家。

476

一開始，斯大林最頑固的對手是當時的烏克蘭政府首腦、受人尊敬的克里斯托·斯坦切夫 (Kryasto Stanchev)，也叫做克里斯季安·拉柯夫斯基 (Cristian Rakovski)。他主張的盡可能最弱的中央權威相當於邦聯。不過，要阻止斯大林可不是那麼容易：9月23和24日，拉柯夫斯基等人剛好在度假，他讓委員會批准了他的計劃，成立一個具有自由意志的中央集權制國家。<sup>10</sup> 在莫斯科，黨的書記處甚至在政治局開會之前，就把文件立即傳達給蘇維埃俄國的中央委員。斯大林還私下裏游說列寧，說自己的計劃極為急迫，說俄羅斯社會主義聯邦蘇維埃共和國的機關發現，它對於各共和國的決定時常要重新考慮，而各共和國則抗議蘇維埃俄國的「非法」干預。他提出一種苛刻的選擇：要麼是真正的獨立（「分家」），「要麼是把各蘇維埃共和國真正統一成一個經濟整體，並把俄羅斯社會主義聯邦蘇維埃共和國的人民委員會、勞動國防委員會和中央執行委員會的權力範圍，正式擴大到高於各獨立共和國〔的那些權力〕之上」。後者「在語言、文化、司法、內務和農業領域」，他強調說，仍將保留「實際的自治權」。斯大林提醒列寧，由於內戰時期的「莫斯科自由主義」而膽大起來的「共產黨中的獨立派」，要是控制不住，勢力只會變大。<sup>11</sup> 列寧在9月25日收到斯大林的來信，那是在這封信已經獲得組織局委員會通過之後。第二天，斯大林前往哥爾克，與列寧私下會晤很長時間。後來他再也沒有去過哥爾克（列寧在接下來的那週回到了莫斯科）。據說有人看到斯大林在離開哥爾克時心情不好。<sup>12</sup>

列寧不贊成建立中央集權制國家，要求斯大林把「加入」俄羅斯社會主義聯邦蘇維埃共和國改成「同俄羅斯社會主義聯邦蘇維埃共和國一起正式聯合成歐洲和亞洲蘇維埃共和國聯盟」。<sup>\*</sup>列寧的方案意味着包括蘇維埃俄國在內的各成員國一律平等，意味着有更多國家發生社會主義革命後，它們也可以加入這個聯盟。對於這一修改，斯大林同意讓步，這使得列寧當天就很興奮地把斯大林作出「重大讓步」的消息告訴了加米涅夫。<sup>13</sup>列寧堅決認為，俄羅斯社會主義聯邦蘇維埃共和國的蘇維埃中央執行委員會不應該只管這一個國家，這一點和斯大林相反，但是斯大林建議的在共和國一級設立的人民委員部（財政、糧食、勞動），  
477 列寧建議在聯盟一級也要設立。<sup>14</sup>另外，從列寧作為俄羅斯社會主義聯邦蘇維埃共和國的政府首腦卻替所有的蘇維埃共和國做決定的行事方式來看，很難說他是一個真正的聯邦主義者。<sup>15</sup>但是在給加米涅夫的信中，列寧堅持說：「重要的是，我們不去助長『獨立分子』，也不取消他們的獨立性，而是再建一層新樓——平等的共和國聯邦」。<sup>†</sup>不過，斯大林也感到此事關係到原則問題，因此提出在列寧的計劃中，有些共和國——比如烏克蘭和白俄羅斯——已經獲得與俄國平等的待遇；但其他共和國，比如目前俄羅斯社會主義聯邦蘇維埃共和國內部的各個自治共和國，則沒有獲得。他認為自己提出的所有民族共和國自治的計劃，實際上更加公平。這無疑適用於巴什基爾、韃靼或突厥斯坦，而它們在斯大林的方案中是和烏克蘭或白俄羅斯平等的。此外，在斯大林的方案中，俄羅斯共和國將成為母艦，而這是列寧反對的。

列寧從來沒有為這件事去過格魯吉亞，連烏克蘭也沒有；對於這個各地情況差異很大的國家，斯大林的直接經驗要豐富得多，而且他知道，要得到政治上的擁護，就要遷就民族主義，但他也認識到，一個國家必須馴服民族主義。在列寧的眼中，格魯吉亞是個弱小民族，深受帝俄的壓迫；與列寧不一樣，斯大林瞭解格魯吉亞民族沙文主義壓迫高加索其他民族的情況。<sup>16</sup>不僅如此，斯大林還不無道理地懷疑，格

---

\* 譯註：《列寧全集》第43卷，第213頁。

† 譯註：《列寧全集》第43卷，第214頁。

魯吉亞共產黨實際上只是想通過結盟，謀求事實上的獨立。波利卡爾普·「布杜」·姆季瓦尼既是組織局的委員會委員，同時也是格魯吉亞的中央委員，他請人交給列寧一封信——布哈林轉交的——並在信中憤怒指責斯大林和奧爾忠尼啟則，後者是布爾什維克在南高加索的最高領導。<sup>17</sup> 9月27日，列寧剛接待過斯大林便又接待了姆季瓦尼。<sup>18</sup> 同一天，斯大林發作了。他給所有政治局委員寫了一封怒氣沖沖的信，指責列寧的「草率」以及「民族自由主義」。在黨的高級官員中，從來沒有誰使用如此激烈的語氣與這位布爾什維克領袖進行書面溝通。<sup>19</sup> 然而斯大林知道，列寧的想法前後不一：1922年初，這位布爾什維克領袖曾經指責烏克蘭共產黨人——「那裏管事的人很狡猾」——想要躲避黨的指示，抵制莫斯科的中央集權。<sup>20</sup> 而在斯大林看來，這恰恰就是他的格魯吉亞同志們現在幹的事情，所以他才會發作。儘管如此，斯大林給1922年10月5至8日的中央全會下發的計劃，與列寧提出的方案，即把各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組成一個聯邦制的聯盟，還是完全一致的。列寧因為病重沒能出席全會，但斯大林確保列寧的計劃獲得了通過。<sup>21</sup>

斯大林的併入俄羅斯這一提案面臨的重大阻礙，不但有列寧和有民族主義傾向的格魯吉亞共產黨人，還有烏克蘭的一些布爾什維克領導人，比如拉柯夫斯基，他是在羅馬尼亞長大的保加利亞族人，以及烏克蘭族的共產黨人，他們在組織局的專門委員會內部進行了堅決的鬥爭。<sup>22</sup> 實際上，在姆季瓦尼造成的混亂中，被忽略的一個事實是，反對建立中央集權制國家的人當時已經獲得了勝利。（人們對「歐洲和亞洲的」這個說法提出反對意見——要是在非洲或美洲發生了革命怎麼辦？——所以這種地理上的標識就被去掉了。）蘇維埃國家變成了聯邦。在這種紛亂中同樣被忽略的還有，斯大林是想在歐亞地區實行中央集權，但列寧是想要在全球實行中央集權。波蘭戰爭期間，他不但想要蘇維埃化，還想在紅軍揮師西向、進入歐洲之後，把一些國家合併進來。斯大林當時回應說，「對於組成舊俄國的各個民族來說，我們可以而且應該認為，我們

478

---

\* 譯註：《列寧全集》第43卷，第103頁。

這種形式的聯邦(蘇維埃)是通往國際性的聯合的一條合適的道路，」但是對「未來的蘇維埃德國、波蘭、匈牙利、芬蘭」來說，卻並非如此，「這些民族……決不會同意按照巴什基爾或烏克蘭的模式，直接和蘇維埃俄國結成聯邦性質的聯繫」。相反，他認為「邦聯(由一些獨立國家組成的聯盟)是結合的最佳形式」。<sup>23</sup> 斯大林還特別提及芬蘭和波蘭，認為它們雖然過去是「舊俄國」的一部分，但對於和蘇維埃俄國的結盟，卻不太容易接受。<sup>24</sup> 列寧的回信即使有，也已經遺失或毀掉，但是從斯大林那裏仍然可以瞭解到它的大致內容：列寧把斯大林建議的歐洲邦聯斥為「沙文主義、民族主義」，並堅決認為「我們需要一種中央集權的世界經濟，要單獨由一個機構管理」。<sup>25</sup> 斯大林沒有這樣的妄想。

在1922年格魯吉亞人製造的混亂中，過去人們沒有注意到的還有一個事實：歐亞地區任何一種聯邦性質的國家結構，哪怕還沒有誕生，都會被套上籠子。那是因為俄共當時雖然已經允許成立各民族的共產黨，但是在成立蘇聯的同時，1919年第八次代表大會定下的黨的非聯邦性質並未被取消。要在實踐中落實莫斯科對各共和國共產黨嚴格的上下級關係很困難，但歸根結底，正如馬克思主義者喜歡說的，黨戰勝了國家。對於姆季瓦尼那種有民族主義傾向的共產黨人，其實可以這樣來責問：他們要服從共產黨的紀律，也就是說，要服從斯大林控制的莫斯科機關的統治。

479

在烏克蘭人和格魯吉亞人竟然守住防線，不肯併入俄羅斯的同時，格魯吉亞人仍不滿意：他們在聯盟中沒有得到和烏克蘭一樣的地位，而造成這種結果的原因，他們認為在於奧爾忠尼啟則。謝爾戈·奧爾忠尼啟則，1922年的時候36歲，出身於格魯吉亞西部一個非農奴家庭，曾在梯弗利斯學過醫，有從事護理工作的資格，同時也加入了布爾什維克(1903)。1907年，他在巴庫監獄的3號牢房遇到了又名「柯巴」的斯大林。<sup>26</sup> 1920至1921年，奧爾忠尼啟則與斯大林合謀，用武力重新佔領了亞美尼亞、阿塞拜疆和格魯吉亞，結果引起格魯吉亞人的憤怒。只是由於列寧的強行干預才使奧爾忠尼啟則沒有被開除出中央委員會。「我能怎麼辦？」奧爾忠尼啟則辯稱，「我是個暴脾氣。也許到了50歲，我會變得溫和一點，但在這期間，我改不了。」<sup>27</sup> 此後不久，

1921年11月，奧爾忠尼啟則不願與其共事的格魯吉亞布爾什維克的反對，着手組建南高加索聯邦。<sup>28</sup> 格魯吉亞人當時正在把大批亞美尼亞居民直接或間接地強行趕出梯弗利斯，而且格魯吉亞人民委員會下達指示，規定蘇維埃格魯吉亞的公民身份要以種族標準為基礎。<sup>29</sup> 武裝的領土爭端、關稅壁壘以及其他帶有「沙文主義毒藥」性質的行動也是成立聯邦的理由。<sup>30</sup> 在奧爾忠尼啟則造成最新的既成事實之後，列寧給斯大林寫了張便條（1921年11月28日），認為建立南高加索聯邦的時機尚未成熟，不過還是接受了。<sup>31</sup> 建立南高加索聯邦的正式條約是在1922年3月12日簽訂的。

格魯吉亞中央委員會拒絕讓步。「親愛的約瑟夫！」斯大林已故的首任妻子卡托的哥哥阿廖沙·斯瓦尼澤絕望地寫信給他，「在最近召開的中央委員會會議上，謝爾戈和布杜沒有哪一次不是從頭吵到尾……教教他們互相尊重吧。又及：要是讓我擺脫這種環境並有機會到國外去工作，我將不勝感激。」<sup>32</sup> 姆季瓦尼同樣出身於格魯吉亞西部的貴族家庭。他為人固執，脾氣火爆。他和奧爾忠尼啟則對於格魯吉亞在聯盟中的地位問題存在嚴重的政策分歧，這讓兩人產生了強烈的敵意。<sup>33</sup> 在普通代表的支持下，奧爾忠尼啟則的聯邦計劃在格魯吉亞黨代表大會上獲得通過。<sup>34</sup> 奧爾忠尼啟則的背後還有斯大林。斯大林沒有像為巴什基爾人和韃靼人那樣，站在民族「平等」的立場上為格魯吉亞人說話。這其中的部分原因在於宿怨——斯大林和姆季瓦尼早就認識而且互相憎惡——但也是由於格魯吉亞地處邊疆。斯大林認為，就像格魯吉亞孟什維主義的例子所證明的，社會經濟狀況「落後」滋生了大量的「機會主義分子」，他們為了脫離蘇維埃俄國，有意無意地利用民族主義，結果讓國際資產階級趁機建立了「外國干涉和佔領區」。<sup>35</sup> 姆季瓦尼及其支持者向列寧反映過非格魯吉亞人湧入格魯吉亞、莫斯科把格魯吉亞領土割讓給土耳其，以及格魯吉亞放棄對亞美尼亞和阿塞拜疆的領土要求等問題。<sup>36</sup> 這在斯大林看來與格魯吉亞孟什維克的行為沒有甚麼兩樣。

由於成立蘇聯到了最後階段，奧爾忠尼啟則大怒，決心清洗格魯吉亞中央委員會中的「沙文主義敗類」。1922年10月21日凌晨2:55，姆季



瓦尼用休斯電報機從梯弗里斯打電報給莫斯科，對蘇維埃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團秘書、格魯吉亞人阿韋利·葉努基澤大罵奧爾忠尼啟則。葉努基澤十分震驚：要是格魯吉亞的形勢惡化，那這種「土壤是由格魯吉亞中央委員會的多數派準備的」。<sup>37</sup> 列寧此時對他們也受夠了。他在當天晚些時候的一封信中嚴厲斥責姆季瓦尼，維護奧爾忠尼啟則，並建議把爭端交由黨的書記處也就是斯大林處理。<sup>38</sup> 在梯弗里斯，當地的中央委員會當着奧爾忠尼啟則和李可夫（他碰巧在南方）的面召開了會議。然而與蘇維埃俄國中央委員會的決定相反，大多數人都贊成不以南高加索聯邦的形式而是作為格魯吉亞共和國加入蘇聯，這是在明目張膽地挑戰黨的紀律。那些格魯吉亞人被責令辭職，結果在10月22日，11名格魯吉亞中央委員有9人辭職。奧爾忠尼啟則清洗的目的達到了。<sup>39</sup> 但格魯吉亞人仍不肯罷休，姆季瓦尼的一名支持者正式在黨內指控奧爾忠尼啟則，說後者拿着大理石鎮紙和小刀追着他跑，威脅要槍斃他；奧爾忠尼啟則拒不承認這些指控。<sup>40</sup>

481 雖然南高加索聯邦問題已經在格魯吉亞人的投票中由多數票給解決了，但那些指控卻不能不管，於是，1922年11月25日，政治局決定派出一個三人調查小組，由格伯烏首腦捷爾任斯基負責，當時他正在黑海岸邊的蘇呼姆度假，離梯弗里斯不遠。<sup>41</sup> 不知是甚麼原因，在確認調查小組的人員構成時，列寧沒有參加電話表決，但他可能是讓李可夫替他去關注此事，因為李可夫也在蘇呼姆度假。李可夫住在奧爾忠尼啟則的梯弗里斯家中，並在那裏安排會見了曾經一起在西伯利亞流放過的阿卡基·卡巴希澤 (Akaki Kabakhidze)，後者這時屬於姆季瓦尼集團。聚會很有可能就是喝酒。卡巴希澤指控奧爾忠尼啟則用國家的錢養了一匹上等白馬。奧爾忠尼啟則的朋友米高揚後來解釋說，那匹馬是高加索山地部落的人送的禮物——這樣的禮物是不能拒絕的——而且奧爾忠尼啟則已經把牠交給了國家養馬場，只是偶爾騎一騎。<sup>42</sup> 奧爾忠尼啟則打了卡巴希澤。李可夫把兩人分開，並向莫斯科報告說是私人爭吵，與政治無關。<sup>43</sup> 但這記耳光的反響很大，會成為向斯大林的專政發起挑戰的基礎。

## 謀求經濟專政未果

就在斯大林忙於打造一個囊括整個歐亞地區的可以正常運轉的國家時，托洛茨基也在忙於奪取經濟的指揮權。就在1922年春天黨的第十一次代表大會之前——就是在那次大會上，斯大林被任命為共產黨的總書記——托洛茨基給列寧遞了一張批評性質的便條，抱怨各省黨組織都在關心諸如農業播種運動或工廠出租之類的經濟問題。「作為一個黨，如果黨不從直接的統治和監督工作中擺脫出來，就不可能清除黨內的官僚主義和經濟中的放縱」，托洛茨基寫道。他認為黨應該把注意力放在年輕一代的理論教育之類的事情上。<sup>44</sup> 列寧在便條上寫道：「存檔。」<sup>45</sup> 但托洛茨基繼續鬥爭，並為打造「經濟專政」而建議大力擴充那個小小的國家計劃委員會的權力範圍。國家計劃委員會並不制定經濟計劃，只是專門與管理人員磋商。<sup>46</sup> 但托洛茨基想要的那種計劃與新經濟政策不兼容。托洛茨基警告革命正淹沒在小資產階級農民的汪洋中，列寧警告說農民是布爾什維克的「法官」：農村的勞苦人是在延長布爾什維克的政治「貸款」，要是布爾什維克不能帶來生活水平的提高，他們就不幹了。<sup>47</sup> 列寧稱「只要還沒有可能去依靠獲勝的歐洲工人階級」，工人階級與農民的「同盟」(*smychka*)就是必需的。<sup>48</sup> 在列寧的倡議下，第十一次代表大會再次確認了新經濟政策以及黨在包括經濟在內的所有領域中的支配地位。

482

在第十一次代表大會上失敗之後，托洛茨基開始批評列寧，說他的建議對於改善國家的運行情況可能不起作用。<sup>49</sup> 兩人的交鋒變得激烈起來。1922年10月，托洛茨基在一次講話中宣佈，如果世界資本主義能夠再堅持十年，就會「強大到足以把全世界，當然也包括蘇維埃俄國的無產階級革命徹底地鎮壓下去」。<sup>50</sup> 毫無疑問，托洛茨基是想改變列寧版的新經濟政策，結果他激起了列寧的反應。1922年11月20日，列寧在莫斯科蘇維埃全會上——那是他最後一次公開露面——宣佈：「我們並不懷疑，我們……必須靠單獨幹來取得成就。」他想要強調「社會主義現在已經不是一個遙遠將來……的問題了」，並暗示資本主義列強之間的競爭會提供缺口，但總的來說，他是被難住了：「我們把社會主義

拖進了日常生活，我們應當弄清楚這一點。」\* 工人在工廠裏自行組織生產，農民在成立合作社，或許社會主義，至少是社會主義的種子，就在於此吧。<sup>51</sup> 托洛茨基執意揭露列寧立場中的絕望情緒，要求通過計劃立即實行工業化。列寧實際上是在說，要有耐心，政權暫時是充分安全的，只要做好自己的工作，控制好與資本主義的關係，就會取得最終的勝利。托洛茨基是在說，現在就應該建設社會主義經濟，否則就永遠失去機會了。<sup>52</sup>

## 第二次中風

在經過漫長、緩慢和部分的療養後，中風後的列寧重返公共生活的時間實際上非常短暫：只是從1922年10月2日到12月。<sup>53</sup> 在12月7日的政治局會議上提前離開後，他就被送回哥爾克。兩天後，剛從梯弗利斯回來的李可夫去那裏探望他。<sup>54</sup> 列寧堅持要求回到克里姆林宮，並在12月12日真的回去了，但是，白天在克里姆林宮的辦公室與政府的幾位副手討論問題，晚上又聽取捷爾任斯基對格魯吉亞事件的匯報，之後當列寧順着走廊回到自己的住處時，就感覺非常不好。<sup>55</sup> 結果這成了他在克里姆林宮辦公室的最後一個工作日。次日上午，他的病兩次發作。「弗拉基米爾·伊里奇……每天都出現麻痺症狀……」醫生日誌寫道。「他心情沮喪，為病情惡化而憂慮不安。」<sup>56</sup>† 儘管如此，列寧仍在住處接見了斯大林，從夜裏12:30開始，持續了兩個多小時。<sup>57</sup> 但就在同一天，他向幾位副手表示，「清理」完手頭的幾件事情，他不得不再次休假。<sup>58</sup> 12月14和15日，列寧繼續在自己的住處工作，同幾位官員談了話，包括托洛茨基，要他們不要放鬆國家的貿易壟斷。<sup>59</sup> 12月15日，列寧想要口授一封關於民族問題的信，但是沒有成功。<sup>60</sup> 不過，他給斯大林送了一封信，說他已經把幾件緊要的事情「清理」完畢，並提

\* 譯註：《列寧全集》第43卷，第297、302頁。

† 譯註：《蘇聯歷史檔案選編》第2卷，第284頁。

醒斯大林說，會讓托洛茨基在即將召開的全會上維護自己在貿易壟斷問題上的立場，同時警告，不能把這個問題拖下去。<sup>61\*</sup>

這封信後來在托洛茨基的回憶錄中成了證據，證明列寧當時提議，他和托洛茨基應該在貿易壟斷問題上組成一個「集團」，而列寧和斯大林除了在民族問題上的齟齬外，在這個問題上也出現了裂痕。<sup>62</sup>但是在這段時間的通信中，無論是列寧還是托洛茨基，都不僅強調了他們的部分一致（貿易壟斷），還有他們的持續分歧（計劃）。<sup>63</sup>此外，在貿易壟斷問題上，就像在蘇聯的結構問題上一樣，對於列寧所希望的東西，斯大林都欣然同意。集團和裂痕都是子虛烏有的事情。

在列寧可以動身前往哥爾克重新開始康復治療前，12月16日凌晨，他可能又經歷了一連串中度中風。「病情惡化……」醫生們寫道，「他費了九牛二虎之力寫的信，女秘書卻無法辨認……指尖摸不到鼻尖……」<sup>64†</sup>列寧再也沒能寫東西。<sup>65</sup>他不願偏頭痛、痙攣、失憶、語言功能受損、陣陣的麻痺，還有絕望的心情，勉強給三位副手口授了一封信（由克魯普斯卡婭記錄），指示把國家計劃委員會交給李可夫。<sup>66‡</sup>12月16至18日期間的某個時候，列寧口授了一封給斯大林的信，說就在幾天前（12月14日），他接待了加米涅夫，並有過「一次熱烈的政治談話。睡得香，感覺非常好。後來，星期五（12月15日）那天，麻痺。我要你馬上過來，要同你說些事情，以防病情加重」。<sup>67</sup>列寧害怕會完全癱瘓，於是想要毒藥。在列寧辦公室的訪客登記簿中沒有斯大林，但他有可能像加米涅夫一樣，是去了列寧的住處。<sup>68</sup>1922年12月18日，因為診斷的結果是過度勞累，遵照醫囑，中央全會通過表決，責成斯大林負責「斷絕弗拉基米爾·伊里奇同工作人員之間的個人聯繫以及信件往來」。<sup>69§</sup>除了直系親屬、醫生、護工和秘書，禁止探視列寧，少數允許接觸的人也禁止討論當前的事情，以免讓他激動。<sup>70</sup>

\* 譯註：《列寧全集》第43卷，第333-334頁。

† 譯註：《蘇聯歷史檔案選編》第2卷，第284-285頁。

‡ 譯註：《列寧全集》第52卷，第552頁。

§ 譯註：《蘇聯歷史檔案選編》第2卷，第232頁。

從醫生日誌來看，12月19至22日，列寧沒有任何活動。<sup>71</sup> 托洛茨基宣稱，12月21日，列寧通過克魯普斯卡婭給他口授了一封充滿溫情的信件（「致以最熱烈的同志般的問候」），感謝他贏得了對外貿易壟斷問題上的鬥爭。<sup>72</sup> 但是在托洛茨基的檔案中，這封可疑的信件並不是原件，而是副本的副本，而列寧檔案中的副本又是上述副本的副本。<sup>73</sup> 列寧當然有理由高興：12月18日的中央全會投票贊成他的意見，保持國家在對外貿易領域的壟斷地位，決議草案就在斯大林手裏。<sup>74</sup> 關於新的國家結構，全會還通過了列寧的更可取方案——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這事是斯大林安排的。最後，全會否決了托洛茨基的在國家計劃委員會的領導下整頓經濟管理的主張。<sup>75</sup> 對於12月21日口授信件的進一步懷疑，與克魯普斯卡婭編造的一起在12月22日發生的事件有關：據說斯大林在知道前一天列寧給托洛茨基口授所謂的賀信之後，打電話訓斥了克魯普斯卡婭。<sup>76</sup> 斯大林的確會對克魯普斯卡婭發火，但那要到一個月之後，而且，就像我們將會看到的那樣，時間上的差異至關重要。現在我們可以肯定的是，12月22日，列寧（通過利季婭·福季耶娃）勉強口授了一份正式的請求，向斯大林要氰化物，說「這種辦法是人道的」。<sup>77</sup> 就在那時，列寧最擔心的事情發生了：12月22日夜裏，他出現了第二次大中風。<sup>78</sup> 「右臂和右腿一動也不能動」，醫生們寫道。<sup>79</sup>

現在我們可以肯定的還有，12月23日晚上，列寧得到允許，可以對速記員口授五分鐘——據醫生日誌的記載——「因為有一個問題使他感到不安，他怕睡不着覺」。口授了一小會兒之後，他「安靜下來」。<sup>†</sup> 12月23日口授文件的原稿似乎在娜佳·阿利盧耶娃手裏。<sup>80</sup> 如果是那樣，那它就是斯大林妻子最後一次被叫來記錄口授內容。<sup>81</sup> 那份簡短的口授文件是給斯大林個人的一封信，這一點從它的稱呼是大寫（給某個人的）而不是小寫（給某個群體的）便可以看出來；信裏的主要內容符合斯大林作為黨的負責人的角色：即建議把中央委員會從當時的27人增加到50甚至100人。<sup>82</sup> 列寧給斯大林的口授信件還要求，不僅要賦予

485

\* 譯註：《蘇聯歷史檔案選編》第2卷，第287頁，註2。

† 譯註：《蘇聯歷史檔案選編》第2卷，第288頁。

國家計劃委員會以行政功能，還要賦予立法功能，並強調他準備「在一定程度上和一定條件下同意托洛茨基同志的意見」。<sup>\*</sup>列寧當時非常憤怒，堅持認為他能繼續口授，這讓政治局下設的負責他的事務的委員會（斯大林、加米涅夫、布哈林）不得和醫生們一起在12月24日開了一次會；他們決定「弗拉基米爾·伊里奇有權每天口授五到十分鐘，但這不能帶有通信的性質，而且弗拉基米爾·伊里奇也不可以接收任何回信。」這些限制非但沒有讓列寧消氣，反而激起了他的怒火，削弱了表面上的治療作用。<sup>83</sup> 限制令加重了列寧已經變得近乎偏執的疑心——政治局同事在對他隱瞞那些違背他指示的政治決定。

證據顯示，斯大林把列寧在12月23日的信——包括沒有具體說明的在經濟問題上對托洛茨基的讓步——直接告訴了托洛茨基。<sup>84</sup> 托洛茨基似乎受到了鼓舞，因為他在12月24日和26日兩次致信中央委員會，再次為他要求對行政機構進行大整頓的提案辯護，並堅決要求將此事納入即將召開的黨代表大會議程。<sup>85</sup> 在這兩封信中，托洛茨基實際上是想把國家計劃委員會和最高國民經濟委員會合併起來，由自己領導。<sup>86</sup> 列寧收到了這兩封信的副本，他明確反對托洛茨基要求成立一個綜合性部門來管理經濟的建議，反對托洛茨基提出的批評，並為國家計劃委員會主席格列布·克爾日扎諾夫斯基——一個受人尊敬、說話和聲細語的專家——辯護。<sup>87</sup> 列寧身邊的工作人員當即把他在12月27日口授的內容傳遞給斯大林，交由政治局討論。<sup>88</sup>

1922年12月30日，在莫斯科大劇院召開的第十次蘇維埃代表大會宣告蘇聯正式成立，這次大會現在成了蘇聯的第一次蘇維埃代表大會。加盟共和國獲得對司法、教育、土地、衛生及社會安全等人民委員部的控制權，而軍事、外交、外貿、財政以及格伯烏——它此時被冠以「聯合」之名，或者稱為「奧格伯烏」——則歸莫斯科的聯盟政府掌管。列寧缺席了討論新的國家形式的1922年10月和1922年12月的兩次中央全會，他也沒能參加蘇維埃第十次代表大會並在會上發表講話，但蘇聯的

---

\* 譯註：《列寧全集》第43卷，第337頁。

國家結構符合他的設想——一個由若干平等的成員國組成的聯邦。誠然，因為黨的緣故，蘇聯的聯邦性質實際上受到了踐踏，但正如列寧堅持的，像烏克蘭那樣的社會主義蘇維埃共和國和俄羅斯社會主義聯邦蘇維埃共和國一起組成一個共同的聯邦，這一事實終將帶來巨大的影響。蘇聯後來解體了，組成它的各共和國各自為政，但俄羅斯社會主義聯邦蘇維埃共和國依舊是完整的。列寧選擇了蘇聯這種形式，歸根結底，是把希望寄託於世界革命，而斯大林的方案——併入俄羅斯社會主義聯邦蘇維埃共和國——則是把希望放在具有重要歷史地位的俄羅斯身上，雖說並沒有把世界革命排除在外。

### 首次得到認可

根據醫生的建議，從1923年1月6日開始，托洛茨基請了六個星期的假，但他留在了莫斯科。同日，斯大林致信中央，建議讓托洛茨基擔任最高國民經濟委員會主席和政府副主席，而對於這個建議，斯大林如實說明是列寧的意見。<sup>89</sup> 托洛茨基堅辭不就。1月15日，托洛茨基作了詳細的解釋，說明自己為甚麼早在1922年9月就沒有接受列寧讓他擔任副主席的建議，說他既不喜歡「副主席團」的做法——它讓人無法去管理他們各自負責的人民委員部——也不喜歡（斯大林領導下的）黨的機關的政策。例如對於軍事問題，在做出決定時實際上是越過了有關的主管部門，甚至是背着它，所以「我認為自己不可能再去為其他機構承擔責任」。托洛茨基聲稱列寧曾打算成立一個委員會，檢查幹部的挑選、培養和提拔工作——那屬於斯大林的管轄範圍——但由於列寧的病情惡化，一直沒能成立。<sup>90</sup> 1月17日，斯大林建議讓托洛茨基擔任國家計劃委員會主席和政府副主席。<sup>91</sup> 對此，托洛茨基也拒絕了。<sup>92</sup> 在列寧病重的時候，托洛茨基拒絕成為列寧的高級副手，實際上就是在拒絕接手政府。這種做法令人費解。其中的原因部分在於，托洛茨基一直

\* 譯註：《蘇聯歷史檔案選編》第5卷，第448-449頁。

堅持要求用「工業專政」代替索柯里尼柯夫的「財政專政」（就像托洛茨基在這次通信中寫的），然而列寧堅決不同意。同樣重要的是，托洛茨基明白，作為黨的負責人，斯大林可以（通過職務名冊等手段）控制政府，而他根本不打算接受一個要服從斯大林領導的職務，雖然托洛茨基對此並沒有明說。

托洛茨基所要求的工業專政和結束黨對經濟工作的監管，既有政策的方面（計劃、超級工業化），也有政治的方面：這是他對付斯大林的黨的機關專政的辦法。但關鍵是，斯大林——他和托洛茨基一樣，不喜歡新經濟政策——和列寧一樣，並且由於列寧的緣故，懂得為了更大的事業，有必要採取靈活的策略，所以斯大林接受了新經濟政策。換句話說，在1922年，斯大林的黨專政能夠和新經濟政策共存，而托洛茨基的經濟專政不能和新經濟政策共存。這意味着斯大林提出的托洛茨基主義的指控，儘管有各種各樣的歪曲，還是有一些根據的：托洛茨基在經濟問題上堅決抵制列寧的基本政策。此事還表明，由於列寧喪失了工作能力，托洛茨基突然意識到斯大林的巨大權力。

但梯弗里斯的耳光讓斯大林一下子成了眾矢之的。現在，列寧從一個格魯吉亞人身上（奧爾忠尼啟則）和一個波蘭人身上（捷爾任斯基），看到了他最厭惡的東西——大俄羅斯沙文主義；他懷疑捷爾任斯基在掩蓋格魯吉亞事件的真相。<sup>93</sup> 1923年1月25日，在列寧缺席的情況下，其餘的政治局委員召開會議——就連正在休假的托洛茨基也參加了——聽取捷爾任斯基委員會和姆季瓦尼的匯報，接着又表決通過了捷爾任斯基的調查結果，宣佈奧爾忠尼啟則沒有過錯，並將格魯吉亞共產黨的四個主要人物調離格魯吉亞。<sup>94</sup> 按照醫囑，誰都不能把有關黨務的情況隨時告訴列寧，但是在1月24日，根據列寧秘書處的記載，列寧指示瑪麗亞·沃洛季切娃從斯大林或捷爾任斯基那裏把捷爾任斯基委員會的材料拿來，給秘書處研究並向他匯報，好讓他準備即將召開的黨的第十二次代表大會的報告（時間定在1923年春）。<sup>95</sup> 疾病和減少政治參與的療法，加重了列寧固有的猜忌心理。據醫生們說，他開始指責自己的秘書長福季耶娃「陰謀」反對他，因為她早就發現捷爾任斯基不在莫斯科卻報告說等他回來的時候會向他要材料。<sup>96</sup> 現在，大概在1月



底的某個時候，斯大林和克魯普斯卡婭在電話裏發生了爭吵。證據顯示，衝突的起因是調閱捷爾任斯基的報告，它是列寧的秘書處在1月29日向斯大林正式提出的。<sup>97</sup>

488 調閱捷爾任斯基報告這件事讓斯大林覺得，明擺着有人——很可能是克魯普斯卡婭——一直在違背政治局按照醫生的要求定下的嚴格禁令，把黨和國家的事務告訴列寧。莫洛托夫十分瞭解斯大林，他在晚年時回憶說：「斯大林被激怒了：『我為甚麼不能對她發火？和列寧睡在一起並不意味着一定就懂得列寧主義！』斯大林跟我是這樣說的：『就因為她跟列寧使用同一間浴室，我就該把她當列寧一樣敬着？』他當時太粗魯、太粗暴了。」<sup>98</sup> 克魯普斯卡婭後來說斯大林在電話裏極其粗暴，但此說無法得到他人的證實。瑪麗亞·烏里揚諾夫娜作為目擊者——哥爾克別墅的電話就在列寧房間外面的走廊裏——後來回憶說，斯大林「很嚴厲地」指責克魯普斯卡婭違反了政治局的決定，結果克魯普斯卡婭一下子變得歇斯底里：「她像是完全變了個人，大喊大叫，在地上打滾，等等。」也許克魯普斯卡婭是在故意製造一起難忘的事件。烏里揚諾夫娜在回憶時還說，「幾天後」，克魯普斯卡婭把這件事告訴列寧，並說她（克魯普斯卡婭）與斯大林已經和解了。<sup>99</sup>

粗暴對待克魯普斯卡婭這件事，不是像多數人說的那樣發生在12月22日，而是發生在1月底，而這就有助於說明，在1923年2月1日的政治局會議上，斯大林為甚麼要宣讀聲明，要求解除自己「對醫生們為列寧同志規定的飲食起居制度負有的監督之責」。政治局一致否決了他的請求。<sup>100</sup> 同一天，斯大林還把捷爾任斯基委員會的材料交給了列寧的秘書處。調閱捷爾任斯基委員會材料的做法於慣例不符，因為那些材料應該由一個新的「委員會」進行複查——不曾有黨的哪個機構批准過這個新的「委員會」——而且其成員只應該是不持任何立場的技術人員。<sup>101</sup> 第二天，政治局再次討論了托洛茨基堅持的把經濟權力集中在國家計劃委員會並打開金融業閘門的問題；這個問題被擺到了桌面上。<sup>102</sup> 他的建議移交給了整個中央委員會，並最終移交給黨的第十二次代表大會。<sup>103</sup> 托洛茨基堅持要求經濟專政，以反制斯大林的黨專政。

## 可疑的口授文件

列寧負責政治局事務的秘書瑪麗亞·格拉塞爾 (Maria Glasser) 回憶說，1922年12月至1923年3月，這位布爾什維克領袖「每天只有半個小時的時間——很少有超過的，有時還要少些——匆匆忙忙地交待和完成所有必要的事情」。<sup>104</sup> 但克拉默教授在1923年2月寫道：「弗拉基米爾·伊里奇發現，要麼是很難想起他要用的詞語，要麼是看不懂他對秘書口授的內容，要麼是他會開始說些完全語無倫次的東西。」<sup>105</sup> 向他傳遞政治信息雖然受到嚴格禁止，但政權的所有材料仍在送給他的秘書處，於是，被限制在克里姆林宮住處小房間裏的列寧，就用好話說服秘書們把事態的進展透露給他，並代表他打電話。正是這些忠誠的女人，福季耶娃、沃洛季切娃，尤其是克魯普斯卡婭，承擔起任務，去理解他那幾乎無法理解的講話和半癱瘓的手勢。<sup>106</sup> 2月14日，據說他指示秘書「轉告某個受到侮辱的〔格魯吉亞人〕，他站在他們那邊」。列寧還說，「斯大林知道嗎？他為甚麼沒有反應？」<sup>107</sup> 醫生的記載說，2月20日，克魯普斯卡婭把第十次蘇維埃代表大會的備忘錄壓着沒有交給列寧，而該備忘錄恰好表明，斯大林執行了列寧的遺囑。<sup>108</sup> 3月3日那天，福季耶娃記錄說，她把她們有關格魯吉亞事件的材料交給了列寧，那些材料逐條反駁了捷爾任斯基委員會的報告。<sup>109</sup>

這些反面材料帶有明顯的傾向性。僅舉一例：它遺漏了一個明顯的事實，即菲利普·馬哈拉澤給中央的密信，加上加米涅夫的答覆，已被泄露給孟什維克流亡者的《社會主義通報》，也就是說，有格魯吉亞人泄露了國家機密。<sup>110</sup> 這些反面材料還提供了對梯弗利斯耳光事件的政治意見（「分歧帶有政治性質，應該在下次黨的代表大會上提出來」）。現在還不清楚是誰把這些評價性質的內容塞進去的。有人說和托洛茨基有關。<sup>111</sup> 但他覺得有點不舒服，縮在克里姆林宮的住處沒有出來，而且他的住處和列寧的住處並不在同一棟建築。「列寧和我都無法接觸到電話；再說，醫生嚴格禁止列寧打電話」，托洛茨基後來寫道。他還說列寧的秘書們不停地在兩人之間往返傳遞消息。這其中包括一張據說是來自列寧的便條，日期是1923年3月5日，請托洛茨基「務必在黨中

央為格魯吉亞那件事進行辯護。此事現在正由斯大林和捷爾任斯基進行『調查』，而我不能指望他們會不偏不倚。甚至會完全相反。」<sup>112\*</sup> 同一天，托洛茨基打電話給列寧的秘書處，對沃洛季切娃說自己病得很重，無法執行列寧的要求。托洛茨基還說，奧爾忠尼啟則在這起事件中的行為是反常的。<sup>113</sup>

490 事實表明，是克魯普斯卡婭製造了反捷爾任斯基的材料和給托洛茨基的便條。另外一則據說是列寧口授的文件——據說也是由沃洛季切娃記錄的——是給斯大林的，並在第二天送到了他的手裏。<sup>114</sup> 它是打印的；沒有留下手寫的速記副本。列寧秘書處的工作人員也未做通常都有的記號，標明信已送出。那封打印的信件要求為對待克魯普斯卡婭的粗暴態度道歉，並威脅說要斷絕關係。†由於某種原因，信的副本也送給了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斯大林已經向克魯普斯卡婭道過歉了，但現在又舊事重提。3月7日，斯大林作了書面答覆：「大約5個星期前（即1月底），我同娜·康斯坦丁諾夫娜談過一次話，在我看來，她不僅是您的妻子，而且也是我在黨內的一位老同志。當時我（在電話裏）對她說了大致如下的話：『醫生禁止告訴伊里奇政治方面的消息，認為這種制度是治好他的病的一種極為重要的手段，然而您，娜捷施達·康斯坦丁諾夫娜，竟然破壞這個制度；不能拿伊里奇的生命開玩笑……』」斯大林繼續寫道：「我並不認為這些話裏有甚麼粗暴或不可容忍的地方和『反對』您的意思，因為除了願您儘早康復之外，我別無他求。此外，我把監督制度的執行視為自己的指責。我同娜·康交換過意見，已證實在這件事上除了一些不值一談的誤會外甚麼問題都沒有，也不可能。不過，既然您認為為了保持『關係』我應當『收回』上面那些話，我可以把它收回，但我弄不明白這是怎麼回事，我『錯』在哪裏，到底想要我怎樣。」<sup>115‡</sup>

\* 譯註：《列寧全集》第52卷，第554頁。

† 譯註：《列寧全集》第52卷，第555頁。

‡ 譯註：《蘇聯歷史檔案選編》第5卷，第493頁。

另外還有一份據說是列寧口授的文件，這份文件是一封電報，日期為3月6日，是發給姆季瓦尼和馬哈拉澤的：「我全神關注着你們的事。我對奧爾忠尼啟則的粗暴，對斯大林和捷爾任斯基的縱容感到憤慨。我正在為你們準備信件和發言稿。」<sup>116</sup> 僅僅在幾個月前，列寧還在嚴厲責備姆季瓦尼和馬哈拉澤。不知道列寧是在甚麼狀況下口授信件的。醫生在3月6日的記錄如下：「他醒來時叫來了一個護士，但他幾乎無法跟她交談，他想要護士去叫娜捷施達·康斯坦丁諾夫娜，但他說不出來她的名字……弗拉基米爾·伊里奇躺着，顯得很困惑，臉上露出害怕的表情，眼神悲傷，像是要詢問甚麼，淚水從他的眼裏淌了下來。弗拉基米爾·伊里奇變得狂躁起來，想要說話，但又忘了詞，結果他說道：『啊，見鬼！啊，見鬼！病成這樣，這是老毛病又犯了』等等。在採取了一些措施之後，『他說話清楚了一些』，弗·伊·列寧安靜下來，睡着了。」<sup>117</sup>

491

值得注意的是托洛茨基在後來寫道，「通過克魯普斯卡婭，列寧與格魯吉亞反對派領導人(姆季瓦尼、馬哈拉澤等)進行了秘密接觸，反對斯大林、奧爾忠尼啟則、捷爾任斯基的小集團」(粗體為後加)。<sup>118</sup> 也許克魯普斯卡婭篡改了列寧的意圖，3月的三封信全是她編造的。也許她把那些話先用口型默示列寧，然後列寧再用口型不出聲地把它們說出來。也許它們的內容是由他本人含糊不清地說出來的。我們可能永遠也無法知道。不管那些信的由來如何，它們都造成了影響。3月7日，加米涅夫寫信給斯大林，透露說列寧支持格魯吉亞的「民族傾向分子」；在給季諾維也夫的信中，加米涅夫把自己說成是和平的製造者。<sup>119</sup> 此時，列寧的病情已經急劇惡化：3月6日的夜裏，他突然發病。<sup>120</sup> (3月6日那天，由列寧的秘書們記錄的日誌，話沒寫完就中斷了。)<sup>121</sup> 對於斯大林3月7日因為克魯普斯卡婭的事情而回給列寧的道歉信，記錄是列寧「未閱」。按照3月那三封信的日期來看，它們將會成為被歸於列寧的最後的文件，但卻不是打着他的名義出現的最後的文件。

---

\* 譯註：《蘇聯歷史檔案選編》第5卷，第492頁。

### 第三次中風和偽造的文章

1923年3月9日的夜裏，列寧又一次大中風，結果，據神經病理學專家克拉默教授說，「語言功能完全喪失，右肢完全癱瘓」。<sup>122</sup> 3月11日的醫生值班日誌寫道：「他不斷想要說些甚麼，但只能發出一些輕微的、不連貫的聲音……今天，特別是傍晚時候，他對跟他說的話理解得很差，有時在該說『是』的時候他回答說『不』。」第二天，醫生們寫道：「他無法理解要他做甚麼。把鋼筆、他的眼鏡，以及裁紙刀給他看了。要他拿眼鏡的時候，他拿了眼鏡，要他拿筆的時候，他拿的還是眼鏡。」<sup>123</sup> 3月11日，斯大林給所有的省和共和國的黨組織發了一封密碼電報：「各省委需要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關注群眾的情緒，不允許出現任何混亂。」在1920年代的莫斯科，謠言和小道消息滿天飛，而且蘇聯報紙正在和流亡者的報刊進行論戰，因此，無論是甚麼事情，要想完全保密是不可能的。3月12日的《真理報》特刊披露了列寧的病情，儘管極為謹慎：「右手和右腿的運動功能受到削弱」，「說話有點混亂」。<sup>124</sup> 這份由德國醫生簽字並發表的說明，足以讓敏銳的讀者推斷出列寧已經局部癱瘓。<sup>125</sup>

492

同日，奧格伯烏給各地區分局發去密碼電報，命令它們加強活動：「列寧同志病情嚴重。有可能會去世。立即成立秘密的『三人小組』，以便採取一切必要措施，防止發生反蘇騷亂。」<sup>126</sup> 捷爾任斯基擔心在法國的流亡分子會游說法國，也許還有波蘭，趁機發動武裝干涉。政治局考慮實行軍事管制。3月14日開始進行局部動員。不久，在討論向公眾披露列寧病情時，托洛茨基在發言中表示：「我認為，同志們，你們可以想像一下這次政治局會議舉行時的氣氛……我們要真正地警覺起來，問一問自己，那些黨外的人——農民和紅軍士兵——是怎麼知道這些消息的。」<sup>127</sup>

所有事情都在通過繼承權這面棱鏡的透視。1923年3月14日，《真理報》開始發佈關於列寧健康狀況的特別通告。那期報紙恰逢黨正式成立25週年和黨的第二次代表大會20週年紀念日，而布爾什維克派正是在該次代表大會上形成的，因此它刊登了一些紀念文章。有一篇很突

出，題目是〈列夫·托洛茨基——勝利的組織者〉，作者卡爾·拉狄克認為托洛茨基是「第一領袖」。他高調讚揚托洛茨基的「天才」，甚至對一些有爭議的話題也是稱讚有加，比如「他的勇敢的決定，利用軍事專家創建軍隊」。<sup>128</sup> 有傳言說，列寧已經把托洛茨基指定為自己的接班人。<sup>129</sup> 不久，奧格伯烏提交了一份竊聽報告，範圍覆蓋城市工人和城市附近及鐵路沿線的農民，因為「列寧生病的消息幾乎還沒有開始傳到真正的農村」。有些人不相信有關列寧生病的報道，其他人則表現出對列寧的擔憂。據奧格伯烏說，人們指名道姓地談論誰會成為列寧的接班人，在提到托洛茨基的時候據說「並不特別同情」，奧格伯烏把這種態度歸結為「群眾的反猶情緒」。其他被認為有可能成為人民委員會主席的人包括加米涅夫、布哈林、季諾維也夫和捷爾任斯基。<sup>130</sup> 沒有提到斯大林。總的來說，在1923年春天，這個國家中知道他的人還很少。但奧格伯烏的報告是交給他的。

493

列寧此時正在焦急地想讓護士給他氰化物，或者讓斯大林給他氰化物。3月17日，星期六，克魯普斯卡婭親自把斯大林叫來，告訴他列寧的病情「很嚴重」，並再次要求得到毒藥。<sup>131</sup> 斯大林趕到列寧在克里姆林宮的住處，並在當天給加米涅夫和季諾維也夫寫了一張解釋的便條，接着在四天後又給全體政治局寫了一張便條。斯大林沒能進入列寧的房間；克魯普斯卡婭傳達了列寧想要毒藥的要求和斯大林的答覆——一個含糊的承諾：「必要的時候我會毫不猶豫地執行您的要求。」但他告訴政治局：「我沒有勇氣滿足弗·伊里奇的這一請求，因而必須拒絕這項任務，因為這不人道，也沒有必要。」政治局委員們支持斯大林的緩兵之計。<sup>132</sup> 還是在3月21日，列寧的秘書處不再收到政權的文件，而要停掉送給列寧的文件，只有在得到斯大林命令的情況下才可以。<sup>133</sup>

與此同時，加米涅夫自告奮勇地承擔起為格魯吉亞謀求和平的角色，和古比雪夫（中央監察委員會）一起參加了3月14日在梯弗利斯召開的格魯吉亞黨的第二次代表大會。<sup>134</sup> 在由25名委員組成的新的格魯吉亞中央委員會中，格魯吉亞黨的代表們拒絕恢復姆季瓦尼和另外7名「民族傾向分子」的委員資格，但莫斯科的特使們堅持要求那樣。<sup>135</sup> 謝爾戈·奧爾忠尼啟則覺得加米涅夫在耍兩面派。<sup>136</sup> 3月21日，斯大林

打電報給奧爾忠尼啟則，溫和地責備他說，他已從加米涅夫和古比雪夫那裏得知，南高加索聯邦憲法是「錯誤的和非法的」，因為那三個共和國的經濟人民委員部都缺乏真正的業務職能。「這個錯誤必須馬上糾正。」<sup>137</sup> 3月23日，托洛茨基突然對格魯吉亞中央委員會的事業來了興趣，建議政治局把奧爾忠尼啟則調走，但只有另外一名政治局委員支持他的建議。加米涅夫和古比雪夫返回莫斯科，並在3月26日向政治局匯報了格魯吉亞「雙方」的錯誤。托洛茨基繼續發動攻擊。<sup>138</sup> 4月1日，他試圖讓布哈林在黨的代表大會即將到來之前（大會已從3月30日推遲到4月17日），寫一篇有關民族問題的重要文章。《真理報》上沒有出現布哈林的文章，<sup>139</sup> 但發生了某件很不尋常的事情：4月16日，利季婭·福季耶娃打電話給加米涅夫，說列寧有篇關於民族問題的新文章。

494 福季耶娃接着又打電話給斯大林，匯報了同樣的事情。斯大林拒絕接收這篇「文章」，說他不想「摻和」。<sup>140</sup> 那篇題為〈關於民族問題的筆記〉\*的文章提倡聯邦制，嚴重偏離了列寧在民族問題上畢生堅持的觀點，甚至也偏離了他最近的觀點。<sup>141</sup> 「筆記」還借列寧之口說，「我想，斯大林的急躁和喜歡採取行政措施以及他對有名的『社會民族主義』的憤恨，在這件事情上起了決定性的作用」，這意思是說，帶着格魯吉亞事件引起的仇恨。「憤恨通常在政治上總是起極壞的作用。」<sup>142†</sup>

列寧的所謂「筆記」，標註的日期是1922年12月30至31日，但福季耶娃後來說，這篇長文是在兩個15分鐘的時間段裏口授的。<sup>143</sup> 打印稿上面沒有簽名或首字母縮寫。現存的證據強有力地表明，這是克魯普斯卡婭和列寧秘書處的工作人員玩弄的花招，是為了偽造她們理解中的列寧遺囑。她們知道他對格魯吉亞事件非常擔憂；實際上，在這件事情上，他受了她們的慫恿。到了這個時候，托洛茨基有可能也串通一氣。接着，對於他聲稱的，他在中央委員會收到之前——因而應該是在列寧第三次中風之前——就已經收到了列寧的〈關於民族問題的筆記〉，但卻令人費解地沒有把它們交出來的說法，又產生了爭議。<sup>144</sup> 據

\* 譯註：在《列寧全集》中文版中，這篇文章的名稱是〈關於民族或「自治化」問題〉。

† 譯註：《列寧全集》第43卷，第350頁。

說由列寧口授的那些內容，恰好和托洛茨基在《真理報》上發表的觀點（1923年3月20日）完全一致。<sup>145</sup>更耐人尋味的是，甚至在列寧第三次大中風並且永久喪失了語言能力之後，他的秘書們還一直在整理格魯吉亞問題的反面材料，為列寧準備在即將召開的黨的代表大會上的報告。她們的材料包括下面這張便條（日期為3月12日）：「搜集這些材料，與其說是為了給〔民族〕傾向分子辯護，不如說是為了批評大國沙文主義分子」——這意思指斯大林。實際上，她們的反捷爾任斯基委員會的材料讀起來就像是〈關於民族問題的筆記〉的初稿。4月16日，當福季耶娃拉開「筆記」的序幕時，托洛茨基這才拿出那封據說是列寧在3月6日口授的給姆季瓦尼的信。當時有傳言說，「列寧表達了對托洛茨基的信任並給予他某些重要的任務和特權」。<sup>146</sup>

### 缺席的列寧

1923年4月17至25日，黨的第十二次代表大會在莫斯科召開，出席大會的825名代表中，有表決權的代表408人。它是自1917年夏天——當時列寧處於地下狀態——黨的第六次代表大會以來，列寧頭一次沒有出席的黨代表大會。最初，政治局像以往一樣，指定列寧作最重要的政治報告，但現在，這項任務落到了季諾維也夫頭上。<sup>147</sup>「你們記得，我們過去總帶着怎樣的渴望聆聽這一講話，那種渴望就像一個人在炎炎夏日意外地發現了一潭清泉而想要痛飲一樣」，季諾維也夫說道——他吊起了人們的胃口，卻沒能滿足它們。<sup>148</sup>斯大林在組織工作報告中吹噓說「最近六年以來中央委員會籌備代表大會的工作從來沒有像這一次這樣民主」。<sup>149</sup>事實上，大會開幕的時間被推遲了，因為大會代表的選舉結果被宣佈無效，結果，偏遠地區重新選舉時有中央的「代表」在場。囉哩囉索的季諾維也夫後來承認：「人民會對我們說：就在中央委員會將遭到批評的代表大會召開之前，黨的中央委員會……已經把它自己的代

495

---

\* 譯註：《斯大林全集》第5卷，第181頁。



表集中起來，剝奪了黨員的選舉權……但是，從維護革命利益的觀點出發，我們必須這樣做。從維護革命利益的觀點出發，〔我們決定〕只讓那些真正捍衛黨的人擁有表決權。」<sup>150</sup> 言外之意就是要剔除托洛茨基的支持者。從下面這則軼事中，可以體會到當時那種唇槍舌劍的氣氛：當伏羅希洛夫在代表大會上看到拉狄克走在列夫·托洛茨基後面，他就開始大聲嚷嚷，大意是，「列夫(列昂)走在前，尾巴跟在後」。拉狄克也沒閒着，一會兒過後便巧妙地還擊說：「啊，克利姆，你腦袋空空，/塞滿大糞，/成為列夫的尾巴/好過做斯大林的屁股。」<sup>151</sup>

托洛茨基在耀眼的燈光和不停轉動的攝影機下亮相，引起雷鳴般的歡呼。<sup>152</sup> 他的講話又長又繁雜。為了說明正在擾亂政權經濟政策的重大危機，他用了一個巧妙的比喻。蘇聯的工業恢復得比農業慢，生產的產品量少價高(由於把工業經濟組織成托拉斯，托拉斯又利用壟斷價格進行敲詐，結果形勢進一步惡化)；與此同時，農產品的價格卻持續下跌，而這種價格差使得農民不願把自己的糧食拿到市場上出售。托洛茨基用了讓人一目了然的曲線圖，表現不斷上升的製造品價格和不斷下跌的農產品價格。他把這幅圖比做張開的剪刀。<sup>153</sup> 講話的高潮部分是稱頌計劃經濟。「我們的新經濟政策的確立是嚴肅的、長期的，但不是永久的」，他說。他把市場稱為「邪惡現象」，結果獲得了掌聲。<sup>154</sup> 托洛茨基沒有說明應該如何向計劃經濟過渡，但他倒是指出，為了向計劃經濟過渡，他會付出怎樣的代價：「也許有時候國家並沒有支付全部的工資，或者只付了一半，因此，你們工人是犧牲了自己的工資貸款給國家。」<sup>496</sup> 有些人向托洛茨基指出這是在號召剝削工人，但領導層的大部分成員並沒有批駁他的發言。發言贏得了掌聲。<sup>155</sup> 托洛茨基然後做了甚麼呢？「講話一結束他就離開了大廳，」一名學生崇拜者說，「在走廊裏沒跟任何人有過接觸。」<sup>156</sup>

斯大林作了第二個報告，即關於民族問題的報告。由於在戲劇效果上無法超越托洛茨基，他就把重點放在內容上，發表了直到當時為止他的革命生涯中最重要的講話。他沒提列寧〈關於民族問題的筆記〉是偽造的，但他倒是承認：「列寧同志忘記了，他近來忘記了很多事情。他忘記了我們和他一起通過了聯盟的基本章程(喊聲：他沒有出席那次

全會)。」<sup>157</sup> 斯大林繼續逐條反駁〈筆記〉的觀點。斯大林瞭解列寧。他竭力證明列寧本人曾唾棄邦聯論，為此他還引用了他自己與列寧的通信以及列寧的其他許多著述中的原文。斯大林證明說，列寧贊成成立聯邦，新成立的聯盟原來就是這樣設計並得到通過的；列寧贊成建立一個單一的、一體化的經濟體；「對列寧而言，民族問題和工人問題比較起來，只有從屬的意義。」<sup>158\*</sup> 斯大林進一步證明，列寧早就支持成立南高加索聯邦，以削弱過分的民族主義傾向。<sup>159</sup> 為了使人充分地理解這一點，斯大林強調說，格魯吉亞人壓迫各少數民族，而且不僅是各個部族(阿布哈茲人和奧塞梯人)，還包括亞美尼亞人——看看格魯吉亞官員是如何處心積慮地想把當地的亞美尼亞人趕走並「把梯弗里斯變成真正的格魯吉亞首都」的吧。<sup>160†</sup> 換句話說，沙文主義並不是大俄羅斯人獨有的。不管怎麼說，最突出的問題不是沙文主義，而是落後和如何發展的問題。為了使各民族能得到發展，黨需要採取區域自治和本地語言教育這兩種手段，它們現在會有助於各民族的聯合——大會通過了這項「本地化」(*korenizatsiia*) 政策。<sup>161</sup>

持不同意見的人試圖團結起來。拉柯夫斯基公開反對篡奪共和國的權利和在不知不覺中產生的「行政的、機關的和官僚的心理」，並試圖利用列寧去對抗斯大林，但斯大林作了有力的反駁，詳細描述了自己在1920年波蘭戰爭期間與列寧的爭論，援引自己說過的話和列寧的答覆，證明列寧是主張中央集權的主要人物；斯大林則是承認差異的人。<sup>162</sup> 烏克蘭的斯克雷普尼克說大俄羅斯沙文主義是「和他們母親的乳汁一起吸入的」，所以它已經成了「許許多多同志的本能」——某種程度上也包括那位格魯吉亞人斯大林——而姆季瓦尼則指責南高加索聯邦是「人為建立的」。沒有誰想要搬出所謂列寧致姆季瓦尼的信，托洛茨基沒有，甚至姆季瓦尼也沒有。姆季瓦尼倒是想搬出所謂列寧〈關於民族問題的筆記〉那篇文章，但主持大會的加米涅夫打斷了他的話。<sup>163</sup> 只有布哈林站在拉柯夫斯基一邊，贊成建立邦聯(在聯盟聯邦已經建立之

\* 譯註：《斯大林全集》第5卷，第215頁。

† 譯註：《斯大林全集》第5卷，第206頁。

後)。<sup>164</sup> 絕大多數代表都站在斯大林一邊。「可以聽到全場雷鳴般的掌聲，」布哈林承認。<sup>165</sup> 就連在一年前的代表大會上因為斯大林身兼數職而責難過列寧的葉夫根尼·普列奧布拉任斯基也承認，「斯大林同志的報告非常實在，我要說，它是一個很有思想的報告」。<sup>166</sup>

斯大林受到高度關注並贏得了一場壓倒性勝利。<sup>167</sup> 在新經濟政策和聯盟聯邦這兩個問題上，托洛茨基把是選擇擁護列寧的權威還是他的權威擺到黨的代表大會面前，結果給了斯大林機會，證明自己才是忠於列寧的那個人。加米涅夫也曾憤怒地說過，「新經濟政策可以被你們或蘇維埃政權的隨便哪個高級機構的一道命令終結掉，而且這樣做不會引起任何政治上的震動」，而季諾維也夫則說，「現在還沒輪到新經濟政策」。<sup>168</sup> 斯大林擔心「新經濟政策的因素帶來的腐蝕性影響」，甚至把大俄羅斯沙文主義以及格魯吉亞、阿塞拜疆、烏茲別克等民族主義的滋長歸咎於新經濟政策和私人資本，但是在政權的高層中，斯大林是列寧的新經濟政策的擁護者。<sup>169</sup> 他再次獲得批准擔任總書記。在新中央委員會的選舉中，托洛茨基總共得到的票數排在第35位，而不是像上次黨代表大會那樣排在第2。加米涅夫排在第24位，季諾維也夫第32位，斯大林和列寧並列第一（在全部386票中得到了384票）。<sup>170</sup> 要不是斯大林這時按照列寧在12月23日給他口授的信件中的建議，大幅增加中央委員會的人數，托洛茨基連中央委員的資格都保不住。

### 神奇的口授文件

498      1923年5月15日，列寧從克里姆林宮轉送到哥爾克，過程極其緩慢，隨行的有一個醫生團隊。除了癱瘓，列寧還患有失眠、厭食、胃痛、發熱和失憶。他急切地想要恢復語言能力——主要靠背字母表和唱《國際歌》。<sup>171</sup> 但他只能說出少數的幾個詞，如「大會」、「農民」、「工人」，而在他重複克魯普斯卡婭對他說的話時，不清楚他是不是明白其中的意思。醫生們注意到，在給他乾麵包片時，他花了很久都只能把手放到盤子周圍，無法直接伸到盤子裏。<sup>172</sup> 他有時會哭泣並對醫生發脾氣，就好像是他們的錯。很顯然，他再也不能在政治生活中發揮任何作

用了。從5月16日開始，官方不再發佈他的病情通告。克魯普斯卡婭的壓力巨大。<sup>173</sup> 列寧終身的事業和革命的命運必須要由其他人發揚光大，而在她陪伴一個沒有希望的病人期間，斯大林已經有了接班人的勢頭。

然而天空炸裂，一道閃電劃過：1923年5月底的某個時候，克魯普斯卡婭拿出一份很短的文件，說是列寧口授的。她將其交給季諾維也夫，因為她和季諾維也夫早在僑居瑞士時關係就比較密切。<sup>174</sup> 給口授做記錄的據說還是沃洛季切娃，而且記錄分成幾次，時間是1922年12月24至25日。<sup>175</sup> 但這份所謂的口授文件並沒有在列寧的秘書處做過登記。它是打印件；檔案中找不到速記的原稿。打印件上沒有列寧的首字母簽名，連他並未癱瘓的左手的簽名都沒有。<sup>176</sup> 據托洛茨基說，打印件沒有標題。<sup>177</sup> 列寧「遺囑」或「給代表大會的信」這樣的標題是後加的。人們還煞有介事地編造了一個神話，說口授文件被放在一個蠟封的信封裏，而且列寧有指示，信封只能在他死後打開。當然，克魯普斯卡婭是在列寧還活着的時候把打印稿給季諾維也夫的。

這幾張非同尋常的紙上有對六個人的尖刻評價。(據說斯大林拿到口授文件看了之後，驚呼說列寧「他糟蹋了自己，也糟蹋了我們！」<sup>178</sup>) 不過有幾名高層官員被漏掉了，包括李可夫、托姆斯基和加里寧，他們都是政治局的正式成員，還有莫洛托夫，他是政治局的候補委員，工作上同列寧的聯繫非常緊密。<sup>179</sup> 相比之下，倒是提到了另一名政治局候補委員布哈林，還有皮達可夫。列寧在哥爾克見過這兩人，他也很關心下一代幹部；這份所謂的口授文件稱他們是「最傑出的力量(在最年輕的力量中)」。不過，文件還是揭了兩人的短處：

499

布哈林不僅是黨最寶貴的和最主要的理論家，他也理所當然被認為是全黨喜歡的人物，但是他的理論觀點能不能說是完全馬克思主義的，很值得懷疑，因為其中有某種經院哲學的東西(他從來沒有學過辯證法，因而——我想——他從來沒有完全理解辯證法)……

其次是皮達可夫，他無疑是個有堅強意志和傑出才能的人，但是太熱中於行政手段和事情的行政方面，以致在重大的政治問題上是不能指靠他的。

口授文件敦促當時34歲的布哈林和32歲的皮達可夫有機會就要「充實自己的知識並改變自己的片面性」。這種看似慈父一般的建議肯定讓人感到芒刺在背。

但是在打印件中，前面緊挨着的幾句關於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的話更容易讓人身敗名裂：

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在十月的那件事當然不是偶然的，但是此事不大能歸罪於他們個人，正如非布爾什維主義不大能歸罪於托洛茨基一樣。

對於政權中兩位最重要的人物，這麼一句話就算完了——表面上是原諒了他們過去泄露消息、反對十月政變的行為。

但是在說到加米涅夫和季諾維也夫之前的內容堪稱驚天動地：

500

斯大林同志當了總書記，掌握了無限的權力，他能不能永遠十分謹慎地使用這一權力，我沒有把握。

斯大林不知怎的就掌握了「無限的權力」，好像當初不是列寧讓他做了總書記似的。緊接着下面的內容同樣令人瞠目結舌：

托洛茨基同志，正像他在交通人民委員部問題上反對中央的鬥爭所證明的那樣，不僅具有傑出的才能。他個人大概是現在的中央委員會中最有才能的人，但是他又過分自信，過分熱中於事情的純粹行政方面。<sup>180</sup>

口授文件警告說，「現時中央兩位傑出領袖的這兩種特點」——斯大林的草率，托洛茨基的自負和政治狂熱——「會出人意料地導致分裂，如果我們黨不採取措施防止，那麼分裂是會突然來臨的」。<sup>181</sup>

雖然這封信對所有六個人以及其他不值一提的人都表示懷疑，但托洛茨基還是作為中心人物顯現出來，被稱為最有才能的人，之前直到1917年為止的非布爾什維主義也得到了原諒，甚至在談到其他人時

<sup>180</sup> 譯註：《列寧全集》第43卷，第339頁。

也提到他。在黨的第十二次代表大會之前、期間和之後，托洛茨基都受到了污言穢語的無情攻擊。反對派的匿名小冊子要求把斯大林、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開除出中央委員會，但當時出現的攻擊托洛茨基的「地下」作品數量要多得多，比如《一個大人物的小傳》（有傳言說，它是出自斯大林的寵兒托夫斯圖哈之手）和《對於托洛茨基，伊里奇寫過甚麼和想過甚麼》（它把列寧以前那些難聽的話又翻了出來）。<sup>182</sup> 顯而易見，所謂1922年12月底的口授文件中的所有措辭，要麼與擁護托洛茨基的匿名印刷品一致，要麼與代表大會期間擁護和反對托洛茨基的發言一致：分裂的危險、要開除三駕馬車或者說領導小組、托洛茨基的非布爾什維主義（季諾維也夫提到過）、斯大林的粗暴。工聯主義者弗拉基米爾·柯秀爾（Vladimir Kosior，斯坦尼斯拉夫·柯秀爾的兄弟）的大會發言簡直就是口授文件的草稿。他指責「三駕馬車」、「書記處」和「黨的領導機構」有着與整個黨不一樣的利益，因而有分裂的危險。<sup>183</sup> 總的來說，現在可以強烈地感覺到，據說是在1922年12月形成的口授文件，其作者研究過1923年春天黨的第十二次代表大會上的發言。<sup>184</sup>

在4月25日結束的黨的代表大會上，沒有人，包括克魯普斯卡婭在內，暗示過有所謂列寧口授文件的存在。克魯普斯卡婭為甚麼沒有選擇向黨的第十二次代表大會出示這份文件呢？她當時已經拿出了〈關於民族問題的筆記〉，那份明顯是偽造的文件沒有引起任何關注。

501

儘管缺乏支持性的證據材料，但現在對於那份評價六人的沒有標題的打印文件，還不能排除列寧口授的可能性。同樣可能的是，某個瞭解列寧想法的人，把一些手勢和幾乎聽不見但確實由他所說的話以這種形式表達了出來。但也可能是中間人在沒有具體口授的情況下，在列寧的話裏插入了一些內容。1923年5月底這個時機的選擇，非常符合一個間接的事實，即所謂列寧口授文件的出現，是黨的第十二次代表大會的結果——斯大林大勝和托洛茨基大敗——所引發的黨內鬥爭的一部分。文件的出現也是在列寧從克里姆林宮搬到哥爾克和官方停止發佈他的健康狀況通告之後，而停止發佈他的健康狀況通告，意味着對於他的病情在某種程度上已經不抱多少希望。<sup>185</sup> 此外，1923年6月2日那天，或者就在那天之前，克魯普斯卡婭把據說是列寧口授的有關國家計

劃委員會的文件交給了季諾維也夫。令人驚奇的是，該文件現在支持托洛茨基一直想要實現的經濟專政，而就在列寧第二次大中風期間，他對此始終是激烈反對的。<sup>186</sup>

有件事情是沒有爭議的：要是沒有克魯普斯卡婭的介入，那份神奇的口授文件是不可能從列寧的內室傳出來的。<sup>187</sup>但她為甚麼會支持托洛茨基？她和斯大林劍拔弩張的關係已經持續一段時間了，而她與托洛茨基的不和卻可以追溯到更早的時候。<sup>188</sup>在1898年成為列寧的妻子兼秘書之後，她就捲入到將會造成布爾什維克和孟什維克分裂的激烈爭論中，而且她在當時的通信中言辭尖銳，不僅反對馬爾托夫，也反對托洛茨基，還把他的一本小冊子說成是「多年來革命運動中最可恥的變態行徑」。<sup>189</sup>近些年來，克魯普斯卡婭敏銳地覺察到列寧對於托洛茨基的憤怒，因為他在內戰期間和新經濟政策初期，總是公開與列寧爭辯。把她看作托洛茨基一方是錯誤的，正如把瑪麗亞·烏里揚諾夫娜看作斯大林一方是錯誤的一樣。<sup>190</sup>兩個女人想要做的都不是去支持某個人，而是維持平衡。<sup>191</sup>克魯普斯卡婭在列寧身邊生活了四分之一世紀，已經成了玩弄政治陰謀的老手，而且毫無疑問，她深信自己瞭解列寧的願望。她可以從政權的深處看到斯大林「無限的權力」，而她採取的策略——要是確實有的話——似乎就是，不讓這位格魯吉亞人成為列寧唯一的接班人。

## 第二院行動(蘇丹—加利耶夫主義)

502

黨的第十二次代表大會剛結束，斯大林就施展了他慣用的那套操縱手段，目標是黨的少數民族幹部，因為他懷疑他們不忠。首先行動起來的是奧格伯烏的東方部，它負責國外及蘇聯境內的穆斯林和佛教徒。由拉脫維亞人雅科夫·彼得斯成立並領導的東方部當時已經對蘇聯的穆斯林共產黨人進行嚴密的監視，從政見到私情，一切都跟蹤調查。在代號為「第二院」的行動中，具體的目標是韃靼人米爾賽義德·蘇丹—加利耶夫。他是斯大林的門徒，也是一個難得的人才。韃靼利亞只有3,483名黨員，其中韃靼人只佔28.5%。<sup>192</sup>蘇丹—加利耶夫是個有文化的穆斯

林共產黨人，他在一個難以開展工作的地區（這一點，斯大林從自己在巴統和巴庫做穆斯林的鼓動工作時起就十分清楚）贏得了大批追隨者，但他在黨的論壇上總是為了這樣一些事情批評斯大林，比如把穆斯林突厥斯坦納入俄羅斯社會主義聯邦蘇維埃共和國的一部分而不是成為聯盟中一個獨立的共和國。<sup>193</sup>他把伏爾加河流域、烏拉爾南部、中亞和高加索的穆斯林各民族稱為世界革命的跳板，反對俄羅斯社會主義聯邦蘇維埃共和國農業人民委員部有關韃靼利亞土地的法令，資助對中世紀韃靼可汗的美化，並強制推行韃靼語，作為蘇維埃俄國各地穆斯林的語言。1923年春天，斯大林偶然碰到蘇丹—加利耶夫並對他說，自己看到一封韃靼人寄給巴什基爾某同志的密信，從那封信來看，存在一個地下組織。斯大林還警告他要小心。不管警告是不是設計好的，總之蘇丹—加利耶夫在聽了之後就用密碼寫信給一個聯絡人，要求銷毀自己以前的信件。<sup>194</sup>這封信被奧格伯烏截獲並交給黨的中央監察委員會主席古比雪夫。1923年5月初，蘇丹—加利耶夫被召到中央監察委員會，以泛突厥主義、泛伊斯蘭主義和民族主義的罪名被開除黨籍並逮捕。<sup>195</sup>

雖然黨的第十二次代表大會剛剛深入討論過民族問題，但要開除一名中央政府（民族事務人民委員部部務委員會）成員，政治局還是覺得需要召集一次由各民族共產黨人參加的特別會議。出席會議的有58人，還有二十多名中央委員和候補中央委員。1923年6月9日，加米涅夫主持會議，與會的穆斯林知道蘇丹—加利耶夫正關在盧比揚卡的內部監獄。古比雪夫給這次為期四天的會議作了開幕報告，摘引了那封表明蘇丹—加利耶夫有罪的信中要求銷毀從前信件的內容，以及他供詞中的內容。古比雪夫聲稱，蘇丹—加利耶夫已經承認密信是他寫的，並稱自己的被捕是「合法的」，「對我處以最高的懲罰措施即槍斃也是合法的。這是我的真心話」。古比雪夫最後說蘇丹—加利耶夫已經承認犯了嚴重的罪行，但可以把他的放了，因為他承認了自己的所作所為；要不然，這個韃靼人可能會成為烈士，儘管有剛剛（在秘密會議上）公佈的證據。<sup>196</sup>在接下來的討論中，發言的基本上都是在工作中與蘇丹—加利耶夫關係密切的人，他們都竭力為自己辯解。但奧爾忠尼啟則說，在突厥斯坦——他最近去過那裏——內部糾紛的形式是遜尼派對什



葉派、突厥人對波斯人，不是民族共產主義，而在高加索，阿塞拜疆穆斯林教師學校的學生戴着刻有土耳其穆斯塔法·凱末爾頭像的徽章。他要求把少數民族的共產黨人培養成(他自己那樣的)國際主義者。與此形成鮮明對照的是，烏克蘭共產黨人斯克雷普尼克說，有人想利用這件事改變政策的方向，使之對各民族共產黨人變得更加強硬(托洛茨基大聲喊道：「完全正確」)。<sup>197</sup> 斯克雷普尼克，還有拉柯夫斯基，讓斯大林在最終確定聯盟治理結構的制憲委員會問題上大發脾氣。<sup>198</sup>

討論中，斯大林接着古比雪夫的報告作了發言，儘管他自己的報告安排在當天晚上。他把穆斯林民族主義者與孟什維克派等同起來，認為「民族主義是在各邊疆地區和各共和國培養馬克思主義幹部，培養馬克思主義先鋒隊道路上的主要思想障礙」，是「資產階級思想」和資產階級在新經濟政策條件下復活的平台。<sup>\*</sup> 在這次四天的會議之前，他可能一直在考慮成立一個革命法庭，甚至考慮將蘇丹—加利耶夫處以死刑。<sup>199</sup> 但現在，斯大林同意他的寵兒古比雪夫的意見，認為必須釋放蘇丹—加利耶夫。「這傢伙承認了他所有的罪行並希望得到寬恕，」斯大林說，好像很寬宏大量似的，「他已經被開除出黨，當然不會允許重新加入。但要是把他關起來有甚麼意義呢？」當有人插話問蘇丹—加利耶夫能幹甚麼工作時，斯大林回答說：「他不是我們的人，他是外人，但是，我向您保證，他決不比某些在重要崗位上從事非常重要的工作的軍事專家差。」<sup>200</sup> 把少數民族的共產黨人和沙皇時代的軍事專家相提並論，說明斯大林的疑心很重。他拿蘇丹—加利耶夫做典型，以便起到恫嚇和控制的作用。就在季諾維也夫在會上竟然疏忽大意地顯露出自己對於民族事務的無知時，加米涅夫——他清楚斯大林為了加強政治控制而施展的伎倆——結束了此次會議，並提醒與會者，像蘇丹—加利耶夫這樣的內部威脅可能會成為英國這個「最大的帝國主義國家」手中的武器。<sup>201</sup> 6月14日，奧格伯烏的明仁斯基讓人釋放了已關押45天的蘇丹—加利耶夫。(他最後受到降級處分，在國家狩獵協會工作。)<sup>202</sup> 斯大林讓人把會議的

504

---

\* 譯註：《斯大林全集》第5卷，第252頁。

速記記錄迅速分發下去，讓各民族共和國黨組織討論。韃靼斯坦黨組織的討論是由當地奧格伯烏負責人主持的。<sup>203</sup> 各民族幹部將會按照黨的第十二次代表大會的要求實行「本地化」，但還是要受奧格伯烏的監視。這些手段斯大林可不只是用在穆斯林共產黨人身上。

### 「山洞會議」

1923年7月10日，季諾維也夫和布哈林離開莫斯科，到基斯洛沃茨克度長假，那是俄國南方有名的礦泉城，擁有具藥用價值的「酸性礦泉水」(*kislye vody*)。<sup>204</sup> 兩人在出發前就已瞭解到另一份轟動一時的所謂列寧文件，叫做〈伊里奇關於書記的信〉。據說是這位布爾什維克領袖在1923年1月4日口授的，是對12月24日口授內容的補充；福季耶娃聲稱為補充口授做了記錄。<sup>205</sup> 克魯普斯卡婭又一次找了季諾維也夫。<sup>206</sup> 加米涅夫當時還在莫斯科，所以也知道這件事。信的內容是爆炸性的：

斯大林太粗暴，這個缺點在我們中間，在我們共產黨人相互交往中是完全可以容忍的，但是在總書記的職位上就成為不可容忍的了。因此，我建議同志們仔細想個辦法把斯大林從這個職位上調開，任命另一個人擔任這個職位，這個人在所有其他方面只要有一點強過斯大林同志，這就是較為耐心、較為謙恭、較有禮貌、較能關心同志，而較少任性等等。這一點看來可能是微不足道的小事。但是我想，從防止分裂來看，從我前面所說的斯大林和托洛茨基的相互關係來看，這不是小事，或者說，這是一種可能具有決定意義的小事。<sup>207</sup>

505

為斯大林特意設立總書記職務剛過15個月，列寧可能會想着要解除他的職務嗎？要是那樣，口授文件為甚麼不提出替代人選？還有，為甚麼這封信又提到了托洛茨基？

---

\* 譯註：《列寧全集》第43卷，第340頁。

現在沒有找到〈伊里奇關於〔總〕書記的信〉的速記原稿。在秘書處工作人員記錄列寧活動的日誌裏，沒有提到「伊里奇的信」之類的事情。1923年1月4日的醫生日誌記載說，列寧夜裏失眠，情緒「不很好」，「兩次口授並閱讀」，<sup>208</sup>但沒有哪個原始資料可以支持1月4日口授的內容。<sup>208</sup>令人奇怪的還有，5月底的時候，〈伊里奇關於〔總〕書記的信〉並沒有和對政權中六個人的評價一起讓季諾維也夫知道。新的打印件是6月才出現的。<sup>209</sup>

這份所謂的口授文件本該掀起更大的政治風浪，因為它也許是直到當時為止政權整個歷史上關係最為重大的文件。但季諾維也夫和布哈林在知道列寧顯然在下令設法解除斯大林總書記職務的情況下，卻沒有那樣做。兩人所做的就是，把其他幾名也在基斯洛沃茨克或者附近度假的官員暗中召集到懸崖峭壁上開了一次「山洞會議」。<sup>210</sup>與會者除了季諾維也夫和布哈林，還有格里戈里·葉夫多基莫夫(Grigory Yevdokimov)，他是彼得格勒工會的負責人，也是季諾維也夫最親密的盟友之一；米哈伊爾·拉舍維奇，西伯利亞軍區司令，季諾維也夫另外一個親密的支持者；以及克利姆·伏羅希洛夫，斯大林的忠實支持者，當地的北高加索軍區司令，司令部在大約300英里†外的羅斯托夫，他接到電報，要求他趕到基斯洛沃茨克。<sup>211</sup>「洞人」總共是五個。正在25英里‡外的熱列茲諾沃德斯克度假的烏克蘭和克里米亞軍區司令米哈伊爾·伏龍芝也收到邀請，但他在第二天才到。<sup>212</sup>

506 托洛茨基碰巧也在基斯洛沃茨克度假，但大家都說他沒有參加山洞會議。<sup>213</sup>當然，對於斯大林管理黨的書記處的方式，他和季諾維也夫或布哈林一樣感到不滿，但托洛茨基此時正在與這兩位潛在的盟友論戰，擺出一副敬而遠之的樣子。因而，不管是誰想要同他結盟都很困難。那年夏天，他基本上都在專心寫作，不過倒是同意了接待美國的左翼作家馬克斯·伊斯特曼(Max Eastman)——後者在蘇聯待了21個月，這次

\* 譯註：《蘇聯歷史檔案選編》第2卷，第293頁。

† 編註：約483公里。

‡ 編註：約40公里。

到基斯洛沃茨克是為了同托洛茨基商量給他寫傳記的事情（「當今世界上擁有最廣泛才華的人」，伊斯特曼後來寫道）。<sup>214</sup>

季諾維也夫後來解釋說，「所有參加會議的人都明白，列寧領導下的書記處是一回事，但沒有了列寧，書記處完全是另外一回事」。推動山洞會議進程的可能是布哈林，他建議說，他們應該把書記處「政治化」，也就是說，（在斯大林之外）再增添季諾維也夫和托洛茨基，或者托洛茨基和加米涅夫，或者托洛茨基和布哈林，把它變成一個小政治局。「對於這個問題，爭議很大，」季諾維也夫繼續解釋說，「許多人（包括我自己在內）都認為，托洛茨基同志願意和我們共事，而我們在一起，就會成功地創造出一種穩定的均勢。」<sup>215</sup>

1923年夏，反托洛茨基的牢固的「三駕馬車」還沒有形成；相反，由於列寧的三次中風，當前最讓人擔心的不是托洛茨基的權力，而是斯大林的權力。

山洞會議之後又過了幾天，梯弗利斯南高加索地區黨委負責人謝爾戈·奧爾忠尼啟則——他之前就安排好轉道莫斯科前往柏林治病——中途在基斯洛沃茨克停留。季諾維也夫向被認為是斯大林心腹的奧爾忠尼啟則簡要介紹了山洞會議討論的內容，並請他給斯大林和加米涅夫轉交一封信（日期為7月29日）。<sup>216</sup>不出所料，斯大林勃然大怒。在此期間，季諾維也夫收到斯大林的兩封信（日期為7月25日和27日），報告了斯大林作為總書記所採取的各種行動。<sup>217</sup>對季諾維也夫而言，最重要的就是斯大林決定取消要求德國共產黨採取更冒險的行動，這是季諾維也夫的共產國際的指示。此舉激怒了季諾維也夫。7月30日，怒氣沖沖的季諾維也夫從基斯洛沃茨克匆匆寫了一封信給莫斯科的加米涅夫，責備後者在斯大林獨斷專行的決策中與之串通一氣。「你就在莫斯科，」季諾維也夫寫道，「你的影響不算小。而你卻任憑斯大林公然捉弄人。」季諾維也夫在舉了一些例子後說道：「斯大林在確定這些任命時徵求過誰的意見嗎？當然沒有徵求過我們的意見。」即便在季諾維也夫（和布哈林）領導的共產國際會議上，斯大林也頗指氣使：「斯大林到這兒一看便做出了裁決！我和布哈林活像兩具『殭屍』——用不着徵求我們的意見。」接着，季諾維也夫說出了最關鍵的話：

07 我們對此再也不會容忍了。如果黨注定要經歷一段斯大林的專制統治 (*edinoderzhavie*) 時期(也許是非常短暫的時期)，那就任其自然吧。但我至少不想把這一切不像話的行為掩蓋起來……其實根本沒有甚麼「三駕馬車」，有的只是斯大林的獨裁。伊里奇的話千真萬確。

最後那句指的只能是〈伊里奇關於書記的信〉。<sup>218</sup>

季諾維也夫提醒加米涅夫說「你自己就不止一次地說過同樣的話」，同時還表達了憤怒(「要是這次你再不回信，那我們就再也不通信了」)和希望：「但使我吃驚的是，伏羅希洛夫、伏龍芝和謝爾戈幾乎也是這麼想的。」但是在這裏，季諾維也夫也許沒完全講實話。對於斯大林的掌權，伏龍芝態度如何我們並不清楚，雖然他有可能傾向於採取「尋求均勢」的策略，而奧爾忠尼啟則——斯大林剛剛在格魯吉亞事件中保住了他的政治生命——卻有自己的主張，不但把自己在黨內的高位歸於斯大林，也歸於列寧。<sup>219</sup>可是，不管伏龍芝和奧爾忠尼啟則的傾向如何，伏羅希洛夫肯定是反對季諾維也夫的。<sup>220</sup>在此期間，布哈林自己也給加米涅夫寫過信(7月30日)，抱怨說當他(布哈林)不在的時候，斯大林沒跟他商量就任命了一個臨時的編輯集團來監督《真理報》的工作。實際上，政治局曾經任命托洛茨基的擁護者普列奧布拉任斯基為臨時主編，但他因為重新實行伏特加專營(這種利用酗酒的惡習來增加國庫收入的做法在沙皇時代就飽受批評)而辭職，這讓斯大林措手不及，只好在布哈林度假回來之前採取別的臨時措施。<sup>221</sup>在這個例子以及其他例子中，斯大林尋常的行動權似乎給布哈林和季諾維也夫兩人造成極大的震動。他們發現斯大林確實擁有「無限的權力」。

季諾維也夫認為自己的行為合情合理。「不要把它當成壞事，也不要往壞的方面去想。請冷靜地思考一下」，他在7月31日給斯大林的信中寫道。†因為有所謂的列寧口授文件，要求把斯大林調開，而季諾維也夫僅僅是在要求斯大林分享權力。<sup>222</sup>但斯大林並不領情。再說，他

\* 譯註：《蘇聯歷史檔案選編》第2卷，第310-314頁。

† 譯註：《蘇聯歷史檔案選編》第2卷，第316頁。

沒有看到那份所謂的列寧口授文件，所以他肯定十分急切地想知道整個文件可能包含哪些內容，或許還很害怕。奧爾忠尼啟則寫信對伏羅希洛夫說（1923年8月3日），斯大林認為季諾維也夫和布哈林的建議是要任命「一些政治委員」去監視他，好像他和從前那些沙皇將軍一樣不值得信賴。同一天（8月3日），斯大林開始反擊。他寫信對季諾維也夫和布哈林說：「你們（7月29日）的來信收到了。我已同謝爾戈談過話。我不明白，我究竟應該怎樣做才會使你們不罵人，這到底是怎麼回事？」斯大林建議當面談一談——「這當然都要看你們是否認為今後有可能齊心協力地工作（因為通過同謝爾戈談話我才明白，你們看來真要準備決裂，認為這是不可避免的）。」<sup>223</sup>。

508

斯大林不會讓他們用他剛剛對付韃靼人米爾賽義德·蘇丹—加利耶夫的辦法來對付自己。在收到季諾維也夫和布哈林8月6日用安撫的口氣（「您談到了『決裂』——這肯定是由於您累了。不可能發生這樣的事。」）寫的另一封信之後，斯大林爆發了。「何必引用一封我並不知道的伊里奇談（總）書記問題的信呢——難道沒有證據說明我並不看重地位，因而也就不怕甚麼信嗎？」斯大林在8月7日寫道，「小組的成員都在想方設法相互恐嚇……該如何稱呼這樣的小組呢？」斯大林還說，決定並不是書記處不和其他部門商量就獨自做出的，議事日程也不是不聽取書記處以外的任何人的意見就定下的。他把自己描寫成一個受害者：「你們畢竟是有福之人：能夠在閒着沒事幹的時候想入非非，琢磨種種不切實際的東西，等等。可我卻在這裏沒完沒了地工作，像一條被鏈子拴住的狗，苦悶不堪，而且還成了『有罪的人』。所有的工作都是他在做！他嘲笑他們假裝友好，說他們騙人：「我同意撤換（總）書記，但我反對實行政委制（政委已經不少了：組織局的、政治局的，全會）。」<sup>224</sup>†

斯大林的回信充滿自憐，但卻很有力量——而且明確提出辭職——導致季諾維也夫和布哈林寫了直到當時為止最尖銳的一封信。

\* 譯註：《蘇聯歷史檔案選編》第2卷，第320頁。

† 譯註：《蘇聯歷史檔案選編》第2卷，第320-325頁。

「是的，是有弗·伊的一封信，他在信中建議(第十二次代表大會)不要選您當(總)書記，」他們在8月10日寫道，「我們(布哈林、加米涅夫和我)決定暫時不對您提這封信的事。其原因是不難理解的：您對於同弗·伊的分歧的認識本來就極為偏執，所以我們不想使您心煩。」當然，他們已經讓他心煩了，緩和關係的嘗試也不尷不尬：

509 根本問題是伊里奇不在。因此，從客觀上說(拋開您的險惡的意願不談)中央書記處在中央已開始起着任何一個省委書記處所起的那種作用，也就是說它實際上(不是形式上)決定了一切。這是不可否認的事實。誰也不願意設政委(您甚至把組織局、政治局和全會都算作政委!)……情況(既是指托洛茨基，也是指各種各樣的「網領」)變得越來越複雜，黨內的不滿情緒也在增長(不要看表面)。由此可見，要尋找最佳的合作形式。

此信由布哈林執筆，但署名的只有季諾維也夫。信的最後說：「我們一刻也不懷疑：我們一定會取得諒解的。好好地休息吧。祝一切都好！格·季諾維也夫。」<sup>225</sup>但這封信根本沒有送出去。<sup>226</sup>原本安排斯大林在1923年8月15日到基斯洛沃茨克度假，時長一個半月，但他延期了。<sup>227</sup>

## 譫妄

讓斯大林推遲度假的一個關鍵議題是，幻想德國會發生十月式的革命。<sup>228</sup>德國是世界上對蘇聯最最重要的國家，可是由於惡性通貨膨脹，它已淪落到公然拖欠戰爭賠款的地步。法國在世界大戰中元氣大傷(戰爭是在法國國土上進行的)，但讓法國人憤怒的是，英國人想要削減德國的債務。賠款委員會宣佈德國拖欠賠款，於是，法國和比利時派出軍隊，佔領了生產德國80%鋼鐵和煤炭的魯爾區。<sup>229</sup>此舉導致德國市場的崩潰，加劇了四處蔓延的通貨膨脹(到1923年11月，1美元可兌換1,300億馬克)。<sup>230</sup>為了顯示與拉帕洛夥伴休戚與共，蘇聯直接警告死

▪ 譯註：《蘇聯歷史檔案選編》第2卷，第329-330頁。

敵波蘭，不要乘人之危，不要去佔領凡爾賽條約製造出來的位於波蘭走廊另一端的東普魯士。<sup>231</sup> 莫斯科還敦促拉脫維亞和立陶宛同意採取不干涉德國事務的政策。與此同時，季諾維也夫和布哈林決定，對蘇聯來說，策劃共產黨人政變、干涉德國事務的時機已經成熟。當兩人正在基斯洛沃茨克考慮如何限制斯大林的權力時，他們收到海因里希·布蘭德勒(Heinrich Brandler，生於1881年)的一封信(日期為7月11日)——布蘭德勒是德國共產黨的領導人，做過泥瓦匠，有四分之一世紀的革命鬥爭經驗。他報告說德共很快將策劃一次大型的反法西斯日集會，「每當有一個共產黨人遇害，我們就殺掉十個法西斯分子」。<sup>232</sup>

510

卡爾·拉狄克警告布蘭德勒，要避免發生衝突，以免貽人口實，對共產黨人進行大鎮壓。季諾維也夫則認為布蘭德勒的來信反映了新的決心，拉狄克的行為屬於不服從命令，因為共產國際是由季諾維也夫領導的。斯大林支持拉狄克，在和季諾維也夫的通信中對德國的形勢表示懷疑，就像他在1920年對所謂的波蘭革命時機已經成熟表示懷疑一樣。布蘭德勒沒有理會拉狄克的警告，而是在7月31日公開宣告，德國共產黨人的目的是要「贏得政治權力」。幾天後，他宣佈，「資產階級秩序」即將垮台，「內戰」即將開始。<sup>233</sup> 斯大林仍然感到懷疑。儘管在1923年的德國，工人階級的數量要遠遠超過1917年的俄國，但斯大林在8月7日給季諾維也夫的信中，列舉了1917年對布爾什維克有利的種種具體條件。他強調的不僅是，甚至主要不是，工人對布爾什維主義的支持，還有布爾什維克面對的是極度渴望和平的人民和急於奪取地主土地的農民。「德國共產黨人現在毫無這些條件。」他指出，「當然，他們毗鄰蘇維埃國家，這一點是我們不曾有的，可我們當前又能給予他們甚麼呢？如果德國的政權馬上——比如說——就垮台，而共產黨人接管了它，那他們將一敗塗地。這種情況還是『最好的』。最糟的情況是：他們將被徹底打垮並被拋到後面去……我認為，應當阻止德國人，而不是鼓勵他們。」<sup>234</sup>

---

\* 譯註：《蘇聯歷史檔案選編》第2卷，第326頁。



這種分歧無法通過電報解決，於是，斯大林在8月9日讓政治局正式要求各個委員結束休假，回來進行面對面的討論。8月12日，從季諾維也夫和布哈林那裏傳來肯定的答覆。托洛茨基提出的條件是，中斷他的治療時間「不超過一個星期」。<sup>235</sup>

511 群眾性的罷工席捲德國，參加罷工的工人有300萬，這樣的規模就連德國共產黨中的好鬥分子也感到吃驚，結果在倒霉的德國中央政府辭職後，取代其位置的是古典自由主義政治家古斯塔夫·施特雷澤曼(Gustav Stresemann)的大聯合政府，德國社會民主黨也在其中。社會民主黨中的左派甚至在此之前就進入了圖林根和布蘭德勒的家鄉薩克森的地方政府。德國明顯的激進化點燃了季諾維也夫最初的熱情；斯大林警告說，法國和波蘭有可能會對德國的工人政府發動武裝干涉，繼而殃及蘇聯。<sup>236</sup>8月21日，政治局決定通過地下渠道給德國人送去100萬金馬克——這是那個貧窮、荒蕪、仍然飽受饑餓之苦的國家源源不斷地輸送金錢的開始。<sup>237</sup>兩天後，政治局進行了緊張激烈的討論，\*斯大林在會上表示，支持政變，但認為此事應高度保密。「斯大林的觀點是正確的——」托洛茨基指出，「不能讓人看出是我們在領導；不僅俄共，就連共產國際也不行。」托洛茨基顯得疑慮重重，要求暴動有詳細的計劃，而斯大林則豪邁地說道：「或者是德國革命失敗，我們被打倒，或者是革命獲得成功，一切順利，從而我們地位得到保障。」這裏可能存在某種冷酷的算計：要是德國真的成了共產黨掌權的國家，因為記錄表明斯大林曾經是不支持德國革命的，那他最後就會像1917年的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一樣。不過，斯大林的轉變也反映出一定程度的熱情，不像是刻意證明甚麼。他狂熱地表示，蘇聯需要「一條同德國接壤的邊界」，而「推翻各資產階級邊境國家中的一個」就可以做到這一點。†當

\* 譯註：參見《蘇聯歷史檔案選編》第5卷，第621-624頁。對於此次會議的時間，作者的說法與《蘇聯歷史檔案選編》第5卷的說法不一致。

† 譯註：在此次會議記錄的中譯本中，這一觀點表述如下：「有一小塊同德國的共同邊界對我們很重要，也很必要。應當力求在某一個資產階級緩衝國打開一個窗口，從而形成一個通往德國的走廊。」《蘇聯歷史檔案選編》第2卷，第624頁。

契切林問蘇聯是打算聯合捷克斯洛伐克和南斯拉夫這兩個國家還是準備在那裏發動起義時，有人大聲喊道，「當然，兩個都要」。<sup>238</sup>

8月25日，共產國際向全世界形形色色的工聯主義者和社會主義者發出呼籲，要他們在「法西斯主義」的威脅面前採取統一行動，結果無人響應。<sup>239</sup> 同日，托洛茨基指示共和國革命軍事委員會的副手埃夫拉伊姆·斯克良斯基，讓紅軍做好準備，以防協約國發動進攻。<sup>240</sup> 三天後，中央書記魯祖塔克給各省黨委發了一封密碼電報，大意是，在德國即將發生革命，估計德國會像蘇俄以前那樣遭到資產階級的武裝干涉。<sup>241</sup>

### 揮之不去的恐懼

斯大林知道他的眾多黨羽會竭力維護自己。當他把情況告訴忠於自己的另外兩名中央書記古比雪夫和魯澤塔克的時候，據說他們嘲笑了季諾維也夫的陰謀。<sup>242</sup> 但是，政治局委員們手裏有列寧的明確指示，要求調開斯大林，這可不是鬧着玩的。在《無產階級革命》雜誌上，可以找到有力的間接證據，證明斯大林的內心惶恐不安。9月出版的這份雜誌的1923年第9期，刊登了列寧在1917年春天給卡爾賓斯基 (Karpinsky) 和加涅茨基 (Ganetsky) 的信。正是這些信件被臨時政府的警察機關截獲，在1917年7月用來指控列寧是德國間諜因而犯有叛國罪。<sup>243</sup> 這種依據警察機關的副本公佈的帶有罪證性質的文件，要是為了抹黑列寧而出現在流亡者雜誌上，那還說得過去，但為甚麼會出現在蘇聯的雜誌上呢，而且雜誌原本是打算在1923年8月出版的？這有可能是個奇怪的巧合。但現在看來，這件事很有可能是斯大林策劃的——他掌管列寧的檔案——目的是敗壞列寧的名聲。<sup>244</sup> 果真如此，那這就是一種絕望之舉。斯大林究竟是在甚麼時候第一次看到了「伊里奇的信」，現在還不清楚。人們以為可以在他的檔案中找到帶有他的鉛筆記號的信件抄本，但現在沒有發現這樣的抄本。是誰把信給他看的，是甚麼時候，在甚麼情況下，他的反應如何，這些或許永遠都無從知道。不過，我們可以猜測，在季諾維也夫和布哈林1923年8月20日左右返回莫斯科的時候，斯大林要求看到那封信。但有可能克魯普斯卡婭並沒

有把信件的副本給季諾維也夫，而只是讓他看了那封信，這會讓斯大林更加提心吊膽。

斯大林用了一個比較聰明的、能夠被其他人接受的建議化解了山洞會議的攻勢：在組織局——起初建議的是書記處——增加兩名政治局委員季諾維也夫和托洛茨基作為正式委員，同時增加伊萬·科羅特科夫 (Ivan Korotkov, 被提拔到莫斯科的一名地區黨委負責人) 和布哈林 (排在第二位) 作為新的候補委員。可想而知，在勞動密集型的組織局，托洛茨基和布哈林後來一次會議也沒有參加；季諾維也夫說他參加過一兩次。<sup>245</sup>

山洞會議的陰謀沒有成功，部分原因在於托洛茨基的表現。布哈林後來解釋說：「從個人來講，我當初是想把那幾個最重要的人物——斯大林、托洛茨基和季諾維也夫——聯合成中央的上層……我竭盡全力調和黨內的矛盾……季諾維也夫同志猶豫不決，但他很快就開始向托洛茨基發起無情的進攻，從而破壞了這個計劃。托洛茨基同志用盡辦法去破壞關係。」<sup>246</sup>的確如此，但是還有一個更重要的因素，就是加米涅夫的態度。<sup>247</sup>加米涅夫因為會議組織得好，漸漸有了做事幹練、講究實際的名聲，但那些對他比較熟悉的人都知道，他是個積習難改的陰謀家。他當時是怎麼想的，現在還無法從文獻中得到證實。他對季諾維也夫非常瞭解，但他對季諾維也夫也許並不像季諾維也夫對他那樣有很高的評價。同樣，加米涅夫認識斯大林的時間也很長，從1900年代初在梯弗利斯的時候就認識，而且1917年他們是一起從西伯利亞的流放地回到彼得格勒，然後又一起共事的。加米涅夫當然明白，斯大林絕對不是甚麼天使——他敏感、表裏不一，是個卑鄙的挑唆者——但加米涅夫顯然沒把斯大林看得特別危險，要不然，他就會參與到反對斯大林的行動中。這就說明，至少在1923年的時候，後期那個怪物一般的斯大林尚不存在，或者說，對於某些和他一起共事而且關係非常密切的人來說，還看不出來。相反，加米涅夫似乎認為可以控制住斯大林。他告訴奧爾忠尼啟則，季諾維也夫和布哈林的不滿是誇大其詞。<sup>248</sup>加米涅夫對於斯大林作為總書記所肩負的重擔可能還是很理解的。1923年7月6日，蘇聯憲法草案在大克里姆林宮象徵性地獲得蘇維

埃中央執行委員會的通過——民族事務人民委員部被撤銷，因此斯大林不再擔任正式的政府職務——但蘇聯的組織結構仍然有待落實，而斯大林在這方面是不可或缺的。<sup>249</sup> 不管加米涅夫究竟有甚麼算計或誤判，他站在斯大林一邊都是經過慎重考慮的，這對那位總書記政治生命的延續來說是至關重要的。

季諾維也夫和布哈林看錯了加米涅夫，加米涅夫又看錯了斯大林，但季諾維也夫的行為最讓人不可思議。所有人都明白，季諾維也夫野心勃勃，想成為一號人物。<sup>250</sup> 而且在1923年那個夏天，克魯普斯卡婭曾交給他一封列寧的信，信裏建議他們把斯大林調開。但季諾維也夫對此沒有採取任何行動。他有了改變歷史進程的機會，但沒抓住。當然，李可夫、加里寧、托姆斯基還有莫洛托夫的意見也要考慮，但就連跟調離沒甚麼關係的建議，加米涅夫都是站在斯大林一邊，這讓季諾維也夫十分意外。而且，對於季諾維也夫通過布哈林做出的尚屬初步的試探，托洛茨基抱着一貫的孤高態度。儘管如此，季諾維也夫本來仍然可以要求執行列寧的遺囑，強行提出把斯大林從總書記的中樞位置上調開這一問題。他本可以要求召開中央全會、甚至黨的特別代表大會來討論這個問題。可他非但沒有那樣，反而召開了山洞會議，然後在布哈林寫給斯大林的幾封信上簽署自己的名字，再然後甚至都沒把那幾封信發出去。斯大林的性格到最後起了重要的作用，而季諾維也夫卻沒能按照他自己露骨的野心行事，強行提出把斯大林調開的問題，這可以說是在列寧不可逆轉地退場之後，一個政治局委員後果最嚴重的作為（或不作為），甚至比加米涅夫躊躇於僅僅想要約束斯大林的某些權力還嚴重。

514

克魯普斯卡婭在1923年夏天策劃的〈伊里奇關於〔總〕書記的信〉，到頭來沒能扭轉局面。但是對於斯大林來說，這事沒有完。他可能擔心季諾維也夫會再次利用所謂的列寧口授文件，也許會把它透露給中央委員會，也許還不止那樣。難道托洛茨基不會也參與進來？加米涅夫能支持多久呢？對於布哈林在山洞陰謀中的突出作用怎麼辦？不過，斯大林最擔心的還是列寧，雖然這位布爾什維克領袖現在既不能說也不能寫。在莫斯科郊外的哥爾克，他坐在進口的輪椅上，被人推着在院

子裏散步，一邊用自己的左手勉強寫出幾個詞（「媽媽」、「爸爸」），一邊聽克魯普斯卡婭像對幼兒一樣給他讀書。<sup>251</sup> 列寧再也不會重返公共生活了。但是，一些據說是由他口授的文件，在口授出來幾個月後，被陸陸續續地拿了出來。斯大林可以通過奧格伯烏，以安全為由，密切監視進出哥爾克的情況，但他控制不了克魯普斯卡婭，所以他沒有辦法確定還會不會有其他據說是「伊里奇」指示的文件被拿出來。最後，斯大林似乎是在8月底動身去了基斯洛沃茨克。<sup>252</sup> 但讓人好奇的是，有達摩克利斯之劍懸在頭頂，那會是一種甚麼樣的「度假」呢。不管怎麼說，這種充滿了不確定性的喘息期是短暫的，因為到9月的第三週，他就要到首都出席會議了。

## 羞辱

1923年9月，莫斯科陷入革命的狂熱。布蘭德勒8月底就來了，到9月中旬其他德國共產黨人到來的時候，他們發現這座城市到處都是旗幟，宣告「德國的十月革命」即將到來，而工廠則召開會議，討論蘇聯工人該如何為德國工人提供幫助。<sup>253</sup> 但德共內部發生了激烈的爭論，分裂成左、中、右三派，所以布蘭德勒懇求要麼由季諾維也夫，要麼由托洛茨基領導暴動。同年9月，在共產國際的推動下，保加利亞爆發起義，目標是推翻原本也是剛剛因政變上台的政府。在起義遭到鎮壓後，保加利亞維護秩序的力量開始瘋狂報復，殺害了2,000名共產黨積極分子和農民運動成員，但這絲毫沒有放慢德國計劃的步伐。<sup>254</sup> 季諾維也夫希望在德國取得突破，以洗刷1917年十月革命中反對奪權的污點。斯大林不甘落後。「德國即將到來的革命是當今最重要的世界性事件，」9月20日，他在答覆德共喉舌《紅旗報》編輯的約稿時寫道，「革命如能在德國取得勝利，那對於歐美無產階級來說將比六年前俄國革命的勝利意義更加重大。毫無疑問，德國無產階級的勝利會把世界革命的中心從莫斯科轉移到柏林。」<sup>255</sup>

政治局的或者說政治局德國委員會的會議從9月21日一直開到23日。<sup>256</sup> 一項關鍵的議程是如何對待德國社會民主黨。斯大林認為，要

是他們同意成為共產黨的小夥伴，那麼，同他們合作是有幫助的；要是他們拒絕，那就更好，因為這會讓他們在德國工人面前暴露出社會民主黨的真面目。<sup>257</sup>就在這些會議期間，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團的秘書阿韋利·葉努基澤正式批准了蘇聯國徽的設計圖案：旭日照耀下的地球上，有錘子和鐮刀，還有用六種文字（俄文、烏克蘭文、白俄羅斯文、格魯吉亞文、阿塞拜疆文、亞美尼亞文）寫成的「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sup>258</sup>季諾維也夫詳細說明了建立歐洲工農共和國聯邦的可能性。<sup>259</sup>托洛茨基在《真理報》上（1923年9月23日）發表文章，總結了法國和俄國革命中的革命策略——他打算用這些去指導德共的軍事力量。柏林用德文轉載了這篇文章。現在還不清楚文章對於德共的組織者們起了甚麼作用，但卻引起了德國駐莫斯科大使的正式抗議。<sup>260</sup>處於狂熱狀態的季諾維也夫和托洛茨基一起，整夜整夜地守在後者位於茲納緬卡街23號的陸軍人民委員部辦公室，向紅軍總司令謝爾蓋·加米涅夫提出各種與德國有關的行動問題。<sup>261</sup>在莫斯科近郊召開的波蘭共產黨代表大會上，布蘭德勒吹噓說德共有超過35萬黨員，能把20萬武裝工人、可供應15個師（每個師5,000人）的武器和330個敵後游擊小組投入戰場——這些數字是為了鼓舞人的，或者說是為了哄人的。<sup>262</sup>

9月23至25日在大克里姆林宮召開了中央全會，與會者有52人。<sup>516</sup>會議開始那天有兩個報告，一個是季諾維也夫關於國際形勢的，和德國有關；另一個是政府第一副主席李可夫關於國防和建立特別儲備金的。<sup>263</sup>全會把德國政變的日期定在11月9日，即德皇退位和「資產階級」革命（即成立共和國）的週年紀念日。<sup>264</sup>古比雪夫的報告談的是改變托洛茨基領導下的革命軍事委員會的人員構成。換句話說，全會非但沒有討論列寧明確要求解除斯大林職務的問題，沒有討論〈伊里奇關於（總）書記的信〉，托洛茨基還被打成了伏擊，在沒有徵求他意見的情況下，就提出一個方案，要用斯大林、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的黨羽去擴充革命軍事委員會。托洛茨基宣佈，他打算辭去自己擔任的所有職務，包括政治局委員和中央委員，還請求把自己作為一名「革命戰士」派到國外，在計劃發動的政變中給德共提供幫助。<sup>265</sup>當一位來自彼得格勒的與會者、被稱作尼古拉·科馬羅夫（Nikolai Komarov）的費奧多

爾·索比諾夫 (Fyodor Sobinov)——他父親是個貧苦的農民，而他本人以前是工廠工人——突然問托洛茨基為何「如此做作」的時候，托洛茨基爆發了。他跳了起來，說道，「請你們把我從這種丟人把戲的演員名單中劃掉」，然後就跺着腳走出去，還想摔一下門，但那扇巨大的鑄鐵門不太適合作宣洩感情的摔門之用，他只能讓門慢慢關上，因而在不經意間顯露了自己的無能。<sup>266</sup>

不管是有意的還是趕巧了，總之，斯大林、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羞辱了托洛茨基。

有幾個人被派到托洛茨基在附近的住處，想勸他回來，但他拒絕了。於是全會繼續進行，並正式譴責了他的行為。<sup>267</sup> 會議備忘錄還強調：「把摘要立即送給托洛茨基同志。」在他缺席的情況下，全會經過表決，給革命軍事委員會增加幾名中央委員。<sup>268</sup> 這是不顧托洛茨基的反對，第二次改變委員會的人員構成；第一次是列寧決定的，是在1919年3月，那次也使得托洛茨基突然宣佈辭職。那時候，他的辭職沒有被接受，列寧安撫了他的情緒。這一次，托洛茨基的辭職也沒有得到批准，但卻沒有列寧來平息事態和平衡各人之間的關係。

517

直到現在，政治局的另外三名高級成員才開始作為三駕馬車，步調一致地行動起來。在隨後召開的一次政治局會議上，托洛茨基和季諾維也夫吵了起來，後者脫口而出：「沒看出來你在籬子 (*obruch*) 裏嗎？……你的把戲不管用了，你是少數，你是一個人。」從此以後，每到要召開政治局會議的時候，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就偷偷地到書記處斯大林那裏，預先安排好議題，他們的三方秘密聚會獲得了「籬子」這個暗中流行的稱呼。<sup>269</sup> 托洛茨基被身邊的這個籬子激怒了。

## 左派反對派

新經濟政策下市場交易勉勉強強的合法化，對於緩解工人的赤貧——政權正是以他們的名義統治的——沒有任何作用。工業被改組為巨型的托拉斯 (金屬加工、紡織)，那些被認為最重要的企業，所謂「制高點」，都被置於國家的保護下，可這沒能阻止許多工廠的倒閉或租

讓，有時就出租給從前擁有它們的資本家。多餘的工人要被解僱，那些沒被解僱的工人，工資要和舊政權統治時一樣，同產量掛鉤。<sup>270</sup> 與此同時，工程師和「專家」則享有明顯的特權，也好像沒有發生過任何革命一樣。「專家生活得更好，得到的報酬更高，他發號施令；專家是外人，十月革命不是專家發動的」，工會負責人米哈伊爾·托姆斯基在總結工人的看法時解釋說。<sup>271</sup> 當有人說國家現在很窮的時候，工人們厲聲說，當官的該去城裏的餐館看看，那裏面的黨的頭頭們可不像是在體驗貧窮。<sup>272</sup> 從1923年春天開始，這種危險的局勢終於在幾個最大的工廠引發了罷工浪潮，並一直持續到秋天。<sup>273</sup> 蘇聯和英國的情報機關分別指出，在戰爭臨近和蘇維埃政權垮台這兩種充滿希望的傳言之間存在聯繫。<sup>274</sup> 奧格伯烏進行了大逮捕，但是根據送給黨的總部的秘密報告，工人們為了解救自己的同志，往往會再次罷工。情況同喀琅施塔得暴動時一樣：只有狂熱分子（「特種部隊」）才會狠狠地打擊無產者。<sup>275</sup>

布爾什維克的宣傳機器試圖為工人的騷亂辯白，說無產階級已經被婦女和從農村來的新人「稀釋」了；或者乾脆詭辯。「現在，工人政黨雖然有幾個，但無產階級政黨只有一個」，1923年，在紀念建黨25週年的黨史系列演講中，季諾維也夫言之鑿鑿地說。他還表示，「一個政黨從其人員構成來說可能是工人的政黨，但是從方向、綱領和政策來說，卻不是無產階級的政黨」。<sup>276</sup> 換句話說，這個政權的「無產階級」甚至都不再是具有某種程度的社會學意義的存在，而完全是意識形態的產物。

518

秘密警察竭力查禁獨立工會和非共產黨的工人團體，但是在這個唯一的政黨的內部，圍繞托洛茨基卻出現了一個表面上的另類選擇，人稱「左派反對派」。1923年秋天，托洛茨基開始要求「黨內民主」，指責「黨的機關憑藉書記選拔（任命）這種手段，將官僚化發展到前所未聞的程度」，指責「非常廣泛的工作人員階層已被製造出來，這些人一進入黨的政府機關，就立刻完全放棄了他們自己對黨的意見，至少是不再公開表達自己對黨的意見」。<sup>277</sup> 當然，毫不奇怪，布爾什維克對私有財產和法治的攻擊並沒有造就出一個靈活、高效、反應迅速的行政機關。不可能指望黨的官員一方面用就地處決的方式進行無情的階級戰爭，另一



方面又為某種希臘式的城邦讓路。不負責任的官僚統治、政治恐嚇和無法控制的假公濟私，是托洛茨基自己所信奉的共產主義的必然結果。此外，就在他反對官僚主義「退化」的同時，他也在建議成立一個由各種專家組成的超級官僚機構（最好由他來領導），以便對經濟進行「計劃」。左派反對派的建設性綱領幾乎沒有給罷工的勞動人民帶來甚麼希望。1917年秋天，托洛茨基的表現就像是政治魔法師，能把哪怕是最艱深的思想變得讓勞動者易於接受，能把龐大的人群引向癡狂，對他主張的立場立下神聖的誓言，但是在1923年秋天，他在寫作中關心的不是真正的工人及其家人的困境，不是他們需要工作或住房，而是抽象地談論「危機」。拖欠工資和為認購國債而強行扣除工資，特別適合於民粹主義者的訴求，但托洛茨基沒有盡力去煽動他們。

519 但托洛茨基的批評對機關產生了相當大的影響。1923年10月12日，也就是在托洛茨基給中央委員會遞交了一封措辭嚴厲的信件之後僅僅過了四天，莫洛托夫就給所有黨組織下發了一則秘密通告，列舉了「豪華」住所、「養有比賽及騎乘用馬的馬場」、「在飯店大吃大喝」等現象。「交給中央處理的一系列事實表明，無論是中央還是各省黨組織……都養着與工作需要無關的汽車隊和馬車隊，」通告寫道，「我們注意到，經常有一些特別列車被派往南方的度假勝地，目的只是為了送一名乘客……用國家的錢，派出整趟的貨運列車將汽車運往南方的度假勝地。」<sup>278</sup> 機關收到大量的報告，反映官員酗酒、貪權和盜竊，那些官員就像行話說的「脫離了群眾」——除非是他們想要掠奪群眾。<sup>279</sup>

1923年秋天，托洛茨基向三駕馬車主動挑起公開的爭論，但內容非常狹隘——它由憤怒的論戰組成，主要關於在用階級的方法（而不是人類普遍情感）討論現代社會的複雜性時，一個處於壟斷地位的黨應該採取何種程序。<sup>280</sup> 在黨外群眾看來，左派反對派不但綱領缺乏新意，政權的組織結構也讓它非常吃虧。布爾什維主義自身無非是一個派別，一個少數派。早在1903年，它就脫離出來並自稱多數派（布爾什維克），而把自己的對手稱為少數派（孟什維克），但是，自從黨的第十次代表大會通過了有關黨的統一的決議後，意見相似的黨員要想批評政權的政策，就必須冒着被開除的風險。所謂的「四十六人聲明」——

「四十六人」是一群身份各異的政策批評者——想要扭轉局勢，要求黨的中央機關的「派別制度應該由同志團結和黨內民主制度來取而代之」。<sup>281</sup> 托洛茨基和他那幾名身居高位的支持者都沒有在聲明上簽名。但三駕馬車仍然發動黨的機構，譴責該文件以及托洛茨基本人的信件是非法的派別活動。<sup>282</sup> 可政權的失敗已是昭然若揭，結果在莫斯科基層黨組織的會議上，對左派反對派的決議進行了投票，以示抗議。斯大林的高級助手納扎列江把獲勝方的計票結果扔進了垃圾堆，並在《真理報》上公佈了虛假的投票結果。但納扎列江的助手覺得良心不安，吐露了真相。兩人後來都被調出中央機關，但做了手腳的投票結果卻沒能改正過來。<sup>283</sup> 批判托洛茨基的鬥爭令黨對自身原則的背離更快地實現了制度化。<sup>284</sup> 當法國和波蘭共產黨抗議對托洛茨基的污蔑時，斯大林讓人指控托洛茨基，說他企圖分裂共產國際。<sup>285</sup> 法國人此舉的主要倡議者、人稱「蘇瓦林」(Souvarine) 的波里斯·利夫希茨 (Boris Lifschitz) 後來寫了一本優秀的斯大林傳記譴責他。<sup>286</sup>

520

## 交鋒

個性倨傲的托洛茨基沒能分化自己的對手，反倒讓他們聯合起來。<sup>287</sup> 他天性孤高，即便在事後也對這樣的後果渾然不覺。就像他後來回憶時說的，他之所以拒絕與統治集團中的其他人交往，是因為「不願勉強自己做這種無聊的事情。到彼此的家中拜訪、兢兢業業地觀看芭蕾舞演出、缺席者要被撕成碎片的酒會，這些對我來說毫無吸引力……正因為如此，我一出現，許多原本湊在一起的談話就會停下來」。<sup>288</sup> 不過，托洛茨基有時候倒是很拼命。<sup>289</sup> 但他的身體受不了。就像他後來講的，1923年10月的一個星期天，在莫斯科北面特維爾省的沼澤地裏，為了捕到大雁、白腰杓鹬、半蹼鹬和野鴨子，他跳進冰冷的深水，結果到了車裏身體還沒有暖過來，出現了流感症狀。<sup>290</sup> 總而言之，他

---

\* 譯註：《蘇聯歷史檔案選編》第5卷，第549頁。

是真的發燒了，而且醫生讓他臥床休息。考慮到這一情況，在加米涅夫的建議下，10月16日的政治局會議是在克里姆林宮騎兵大樓托洛茨基住處的書房裏召開的。命令中央監察委員會立刻調查托洛茨基「派別活動」的正是這次會議。據這位陸軍人民委員的妻子說，他「走出書房時渾身濕透了，脫了衣服就睡了。他的床單和衣服都得弄乾，就好像他淋了暴雨一樣」。<sup>291</sup>

托洛茨基在發燒的同時還要承受政治上的攻擊，而恰好在這個時候出了一件怪事。1923年10月18日，列寧出現在他已經五個月沒來過的克里姆林宮。<sup>292</sup>事情是這樣的：那天傍晚，列寧在哥爾克像往常一樣用餐之後，讓人用輪椅把他推到車庫，穿着矯正鞋爬進了那輛「銀魅」，堅決表示——從他的舉動來看——他要去莫斯科。工作人員勸他換了一輛封閉的車子，於是，大約在下午4點，他和克魯普斯卡婭、瑪麗亞以及幾名護理人員一起出發了，而其他人員，包括他的幾名醫生——奧西波夫教授、羅扎諾夫教授(V. N. Rozanov)、普利奧羅夫教授——和一隊衛兵，也坐上了隨行車輛。一到帝國參政院，列寧就把自己在克里姆林宮的住處看了一遍，還用了茶和晚飯。夜裏他住下了。10月19日，他看了看自己在克里姆林宮的辦公室，從圖書室取了幾本書（三卷本的黑格爾，還有普列漢諾夫的著作）。他堅決要求讓人推着自己在克里姆林宮的院子裏轉一轉——在那裏，人們當然認出了他——但驟降的大雨讓他只能坐車在莫斯科市中心到處看看，包括去全俄農業和手工業展覽會參觀，展覽會很快就要結束了，列寧已經通過報紙饒有興趣地瞭解過情況，但因為下着大雨，此時他只能透過車窗來看了。到了傍晚，他感覺疲憊，同意返回哥爾克。<sup>293</sup>「弗拉基米爾·伊里奇到來的消息傳遍了克里姆林宮，人們正在從所有的門窗向外張望」，列寧的司機回憶說。<sup>294</sup>斯大林不可能不知道，因為奧格伯烏的渠道肯定已經把列寧的活動報告了黨的書記處。再者，列寧的司機們也要向特別車隊的負責人報告，而後者主要就是給斯大林開車的。作為陸軍人民委員的托洛茨基會從克里姆林宮衛戍部隊和莫斯科軍區得到消息。然而奇怪的是，從所有的記述來看，列寧並沒有同斯大林、托洛茨基、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或領導層的其他任何人會面。

10月18日和19日(星期四和星期五)，列寧辦公室和住處旁邊通常用來召開政治局會議和人民委員會會議的地方實際上是空着的。列寧是不是希望趕上開會的時候現在還不得而知。「他〔列寧〕此行是不是想見哪個同志呢？」瑪麗亞·烏里揚諾夫娜後來在回憶時寫道，「我想不是。我的判斷是基於這樣一個事實，即在此行之前不久，當時他想要甚麼東西，結果，不管我們如何絞盡腦汁也弄不明白他想要甚麼，我問他，是不是想見哪個同志。我說了幾個名字，但他痛苦地搖了搖頭——他根本沒有理由見他們，因為他已經被剝奪了工作的機會。」<sup>295</sup> 就算那樣，一些材料稱，當哥爾克開來的、載着列寧的小汽車剛剛能夠看到莫斯科金色穹頂的天際線時，他興奮地用手指着——這個手勢此時人們都熟悉，意思是說：「是它，是它，是它，是……它！」<sup>296</sup> 列寧在莫斯科的整個過程都非常亢奮，回到哥爾克後就明顯變得悲傷了。他此行似乎是實現了一個存在已久的願望，是為了再看一眼莫斯科。後來他再也沒有踏入過克里姆林宮。

如果列寧是在尋找布爾什維克的「權力陰謀」，那他並沒有找到，因為10月18日那天，政治局雖然開了會，但卻陰差陽錯，是在騎兵大樓正在發燒的托洛茨基的住處召開的，那裏和列寧在參政院的住處不是同一棟樓。(還有，在列寧從哥爾克到來之前，會議可能已經結束。)會議討論的內容是，急需把糧食運往德國——因為計劃中的共產黨政變可能會引發內戰——以及德國的幾個鄰國有可能採取的行動。「我認為最好不要去試探波蘭人，而是去試探拉脫維亞人——拉脫維亞人可以被嚇住，可以被控制等等」，會議期間，斯大林在一張紙上寫道。「對波蘭人那樣不行。必須把波蘭人孤立起來，我們將不得不同他們戰鬥。從他們那裏，我們永遠探聽不到甚麼，只會暴露我們的底牌……波蘭人要孤立。拉脫維亞人要收買(和恐嚇)。羅馬尼亞人要收買。但是對波蘭人，我們要等一等。」<sup>297</sup> 對斯大林而言，德國那樣的革命，拋開其他不談，還可以成為一種手段，用以對付那些曾經完全或部分屬於沙俄的新獨立的國家。

10月19日，當列寧在克里姆林宮的院子裏散步而托洛茨基待在騎兵大樓沒有出來的時候，政治局在一篇主要是出自斯大林之手的長文

中——文章由沃茲德維任卡街的書記處打印並分發——以集體的名義答覆了托洛茨基致中央的批評信。「如果我們黨不能迫使托洛茨基同志放棄他在1923年10月8日的『信件兼提綱』中所犯的那些可怕的錯誤，那不但是俄國共產黨，蘇聯和德國革命也會蒙受巨大損失」，政治局回應說。<sup>298</sup> 政治局（在托洛茨基的住處）又安排了一次會議，同時準備在10月25至27日召開中央委員會和中央監察委員會聯席全會。在10月25日會議開始的那天晚上，托洛茨基緊接着斯大林的報告作了45分鐘的發言。所謂的聯席全會有點像是斯大林的又一個伎倆，是想多增加一些來自機關的忠誠分子。他做的手腳不止這個。他不僅邀請了現在懲罰性的（而不是主持公道的）中央監察委員會的人員，還邀請了十個主要「工業部門」的黨組織代表。那些代表實際上都是各省的黨組織負責人，都是斯大林的組織局任命的。與此同時，在「四十六人聲明」的簽署者當中，獲准參會的只有12人，而且只是在第二天。<sup>299</sup> 第二天是用來討論的，高潮出現在總結發言的時候，先是托洛茨基（晚上10:33至11:25），然後是斯大林（晚上11:25至凌晨12:10）。斯大林讓政治局負責記錄的秘書鮑里斯·巴扎諾夫偷偷整理了發言摘要，因為他預計要用摘要去對付托洛茨基。<sup>300</sup>

這是在列寧缺席的情況下，斯大林和托洛茨基在黨的論壇上首次正面交鋒，那些在場的人必須明白其中的利害。

作為進攻方，托洛茨基承認，由於自己在兩年前工會問題的爭論中扮演的角色，他被指控為屢教不改的慣犯，但他也指責說，現在，「政治局裏還有一個政治局，中央委員會裏還有一個中央，所以實際上在討論該問題時，我被排斥在外……因此我只剩下這一條路」。在試圖解釋那件看似令人費解的事情，即他先前為甚麼拒絕列寧的要求、不肯擔任政府副首長時，他透露說，1917年他就謝絕了列寧的要求，沒有擔任內務人民委員。「事實是，同志們，關於我的工作，有一個個人因素，雖然在我的個人生活和我的日常生活中不起甚麼作用，但在政治上卻影響很大，」他說道，「這就是我的猶太人出身……我堅決拒絕了他的建議，理由和以前一樣，就是我們不能讓敵人有機會說我們的國家正在被猶太人統治。」<sup>301</sup> 不久前，當列寧建議托洛茨基做他的政府副首長時，

托洛茨基說，他基於同樣的理由拒絕了。這些話很難讓人相信。托洛茨基當時接受了政府中的其他幾個高級職務。

在全會的發言中，托洛茨基承認，他和列寧在經濟政策上存在分歧，兩人的關係也因此而變得緊張了。但他再次強調，黨應該抓思想工作和黨組織生活，經濟應該交給經濟領域的專家去管理。「如果解除我的其他工作，安排我到國家計劃委員會去，我是不會反對的。」他說，「國家計劃委員會是我們極其重要的部門」，但目前的制度結構不適合他。「我回到下面的問題：『如果不對這個委員會進行改組，我在人民委員會裏怎麼辦？』」他聲稱他的性格就是如此，「容不得懶散和馬虎」。最後，托洛茨基懇求與會者不要譴責他搞派別活動。「同志們……請試着想一想並理解我的處境。我曾處於非常悲慘的境地」——黨的報刊和流言蜚語指責他反列寧，指責他製造了「托洛茨基主義」；其他人背着他開會，他被圈在一個籠子中：「我必須突圍。」<sup>302</sup>

524

斯大林在發言中表現得不屑一顧。「難道有誰反對改組國家計劃委員會嗎？」他說，「制定一個必須改組國家計劃委員會的行動綱領是可笑的……你們不去幫助討論這些嚴重問題，卻糾纏不休地要制定行動綱領。在反對派的所有發言中我沒有聽到一條具體建議。」對於他們明確要求的黨內民主，他回答說：「中央正在執行代表大會的決議」。他還說：「民主派們，請告訴代表大會，這種使黨免受新經濟政策影響的做法是不必要的。讓我們看看代表大會會不會答應你們」。至於有與會者抱怨的「沒有討論」，斯大林把他比作「契訶夫筆下的女性，『給我空氣』。\*有些時候，問題不是出在討論上」。他還厚着臉皮說，「從未發生過有人向中央建議就某個問題進行爭辯而遭中央拒絕的情況」。他指責四十六人集團和托洛茨基沒有通過合適的黨內途徑，就將其指控中央「錯誤」的聲明直接向黨員呼籲。斯大林斷言：「現在中央進行爭論是非常危險的。無論是農民，還是工人都會對我們失去信任，敵人會把這看做是我們的軟弱。1921年我們經歷過這樣的爭論。當時我們遭到巨

---

\* 編註：《契訶夫獨幕劇集》（李健吾譯，上海譯文出版社，1997），第135頁。這是《結婚》中史麥由金娜的一句台詞。

大損失……當時是托洛茨基挑起爭論，他拒不執行列寧關於在代表大會工會委員會中解決問題的建議……托洛茨基再次採取行動，造成了使我們面臨分裂威脅的氣氛。」<sup>303</sup> 實際上，1921年，列寧是有意挑動托洛茨基進行公開爭論的，而現在，1923年，托洛茨基沒有向廣大黨員呼籲——他沒有這樣做的可能性，因為斯大林控制了黨的報刊。

斯大林發言後，沒有允許別人反駁。雖然托洛茨基對於自己為甚麼會拒絕擔任列寧的副手、為甚麼會繼續執迷於計劃手段作了冠冕堂皇的解釋，可他並未訴諸赤裸裸的謊言。斯大林急於編造虛假的理由，但表現得心浮氣躁，像個有知識的流氓。當然，機會已經準備好了：在對譴責托洛茨基和左派反對派的派別活動及分裂活動的長篇決議進行表決時，記錄表明，贊成的有102票，棄權的有10票，反對的只有2票。違背黨的原則的是，一些並非中央委員的人——斯大林邀請的十個  
525 主要「工業部門」黨組織的20名代表——也被允許參加表決。<sup>304</sup> 這樣的小動作是心虛的標誌。至於暗中記錄下來的有關此次與托洛茨基交鋒的文字整理稿，斯大林根本沒用上。

斯大林的另外一個主要的對手是克魯普斯卡婭，她也參加了此次「聯席」全會，並在10月31日送給季諾維也夫一封措辭強烈的責備信。她在表決時和大多數人一起反對托洛茨基，但現在，她又在私下裏堅決認為，托洛茨基不是唯一應該對黨內分裂負責的人，工人們雖然不知道黨內發生了甚麼，但將來他們「要嚴厲審判的不只是托洛茨基，還有我們」。「這個時刻關係重大，不能製造分裂，不能讓托洛茨基在心理上拒絕工作。」她批評了「過激的語言」以及「私人的爭吵和鬥嘴」，而她尤其不滿的是「濫用弗拉基米爾·伊里奇的名義……提到伊里奇的時候都是沒有必要的、不真誠的……他們只是做做樣子」。對於有人暗示說托洛茨基寫給黨內機構的信誇大了列寧的病情，她似乎特別憤怒（「我該大聲地說這是撒謊」）。她提醒季諾維也夫，列寧在口授文件中警告過有可能因為斯大林而造成分裂。<sup>305</sup> 然而，克魯普斯卡婭作為唯一有資格

\* 譯註：參見《蘇聯歷史檔案選編》第2卷，第332-342頁。作者引用的托洛茨基的發言與會議記錄中譯本的內容稍有出入。

表達列寧心願的人，在全會上對此卻隻字未提，而要是全會上說出來，那會產生重要的影響。她指望季諾維也夫，但季諾維也夫醉心於世界革命，完全沒有把約束斯大林的權力放在心上。

奧格伯烏和共產國際向德國派去了大批特工並資助了大量金錢，還和外交人民委員部密切合作，得到契切林的批准，借用它的密碼和外交郵袋。<sup>306</sup> 但布蘭德勒吹噓的德共掌握的龐大武裝現在已真相大白：派駐德國的共產國際特工、匈牙利人拉科西·馬加什（生於1892年）向莫斯科報告說，統治勢力與共產黨武裝人員的比例是20：1。與布蘭德勒之前吹噓的相反，薩克森只有800支步槍，而不是20萬支。<sup>307</sup> 應該購買並儲備武器的共產國際特工，要麼是沒能完成這項艱巨的任務，要麼是盜用了經費。但最嚴重的缺陷在於，1,400個地方性的工會委員會中只有200個，70,000個工廠委員會中只有5,000個是由德共佔據多數的。<sup>308</sup> 德國工人絕大多數都是社會民主黨成員。實際上，1923年秋天在德國有兩起共產黨陰謀：一起是針對德國政府，一起是針對德國社會民主黨。為了分裂德國社會民主黨並抹黑他們中的左派，進而把整個革命空間留給共產黨，斯大林曾經建議，成立一個純粹策略性的、反對德國右翼勢力的「統一戰線」。就像共產黨發現並向莫斯科報告的，德國社會民主黨在秘密組建戰鬥隊以防備共產黨人發動進攻的同時，還發佈秘密通告，要求只有在迫不得已要反對右翼勢力的情況下才可以和德共合作。<sup>309</sup> 斯大林假的「統一戰線」，非但沒能像他預計的那樣抹黑工人眼中的左派社會民主黨人，反而徹底暴露了德國共產黨。<sup>310</sup>

526

缺少武器、德共的準備不足以及社會民主黨的冷眼，促使現場的蘇聯人在最後一刻取消了起義。「我記得很清楚，〔1923〕10月22日晚上，在柳克斯飯店我們的住處，奧托〔·庫西寧〕、〔奧西普·〕皮亞特尼茨基（Osip Pyatnitsky）和〔德米特里·〕馬努伊爾斯基（Dmitry Manuilsky）在等候柏林通知革命爆發的電報，」庫西寧的妻子艾諾（Aino Kuusinen）回憶說——她是受共產國際掩護的眾多蘇聯軍事情報官之一，「他們抽着煙，喝着咖啡，在奧托的書房待了幾個小時。當時有一條電話線路，可以直通列寧在哥爾克的病床，這條電話線路通宵都保持暢通：列寧不能說話，只能冒出幾個音節，但他的思維是完全敏捷的。」柏林沒來電



報，三人在黎明時散去，「共產國際的幾位領導人非常憤怒和沮喪，迫不及待地想要查清楚哪裏出了差錯，還有，是誰的錯。」<sup>311</sup> 可是，在德國的第二大城市漢堡，300名共產黨人在1923年10月23至25日自行發動了起義。他們襲擊警察局並繳獲了大量的武器，但在後來被援兵鎮壓了；打死的估計有90人，受傷的有幾百人。<sup>312</sup> 在莫斯科，政治局對起義延期和起義者遭到屠殺深感震驚。<sup>313</sup> 在德國，蘇聯特工對國內造成分裂的反托洛茨基政治鬥爭深感震驚，並威脅說要放棄他們在德國的工作。<sup>314</sup> 斯大林想要弄明白發生了甚麼。「要是伊里奇在德國，他會說：『我想，革命的主要敵人是社會民主黨人，尤其是他們的左派。』」，他給在柏林的蘇聯特工小組寫道（1923年11月8日）。<sup>315</sup> 就在第二天，不知所措的他又推翻了自己原先的想法，認為社會民主黨的「左派在許多方面是正確的」：德共沒有工人的支持，想要奪權就會失敗。<sup>316</sup> 然而，

527 遭遇慘敗的政治集團不只是共產黨。11月8日，阿道夫·希特勒，加上赫爾曼·戈林（Hermann Göring）、魯道夫·赫斯（Rudolf Hess）以及一個中隊的褐衫軍，在朝着慕尼黑的市民啤酒館進軍。<sup>317</sup>



布爾什維克政權正在把國家和自身扼殺在文牘和官僚作風之中。它不願貧困大肆侵佔財物，敵視但又依賴市場，不但懼怕農民的政治傾向，也懼怕工人的政治傾向。然而，在這種混亂的局面下，斯大林正在建立個人的專政。他的生活就是提綱和反提綱，編寫和傳達會議備忘錄，組織局緊張乏味的人事工作，審閱奧格伯烏、軍隊、外交使館、報紙記者轉交的和關於它們的檢舉材料及秘密報告。他對成立蘇聯的貢獻無人能及。用計謀迫使人口眾多的東部穆斯林共產黨人聽從命令的是他。為列寧惹人反感的新經濟政策辯護的是他。客觀地說，就日常的管理而言，對於共產黨的事業，沒有人比他更重要，而斯大林自己多半也這麼認為。可是在這幾年，要求解除其職務的一紙文件對他的權力構成了嚴重威脅。沃洛季切娃和福季耶娃在斯大林死後寫的回憶錄——原因顯而易見——包含了許多不太可信或完全不可能的細節。列寧的幾個醫生也從未說清楚口授文件的由來。<sup>318</sup> 從有關記錄來看，克

魯普斯卡婭從來沒有公開解釋過口授文件產生的具體情況。莫洛托夫後來回憶說：「克魯普斯卡婭非常憎惡斯大林。但斯大林也憎惡她，因為列寧在遺囑上的簽名據說是在克魯普斯卡婭的影響下添上去的。或者說，斯大林相信是這樣。」<sup>319</sup>這是個奇怪的說法，因為口授文件沒有列寧的簽名，但這說明斯大林相信口授文件的內容，甚至口授文件的存在本身，同克魯普斯卡婭有關。

瑪麗亞·烏里揚諾夫娜同那份關鍵的口授文件似乎沒有任何直接的關係，但她在哥哥生病期間幾乎天天去看他，而且她提到，列寧感到不安的有兩件事，都和斯大林有關。一件事是在1921年，當時孟什維克領導人尤利·馬爾托夫病了，列寧要求給馬爾托夫撥付治療經費，斯大林沒有執行。另一件是1922年的格魯吉亞事件，其影響要大得多。「一天早上，斯大林把我叫到列寧的辦公室，」她在幾年後解釋說，「他的表情非常沮喪和難過。『我一夜沒睡，』他對我說，『伊里奇把我當甚麼人了，他怎樣對我的！好像我是叛徒似的。我全心全意地愛他。哪天把這告訴他。』」烏里揚諾夫娜回憶說，她「對斯大林感到抱歉。在我看來他是真的覺得受了委屈」。斯大林的巨大權力受到了威脅。烏里揚諾夫娜向她的哥哥轉達了斯大林的口信，說他愛他，但她回憶說，列寧對此反應冷淡。烏里揚諾夫娜接着告訴她的哥哥說，「不管怎樣，斯大林很聰明」，這讓列寧不高興了，說，「他一點也不聰明」。烏里揚諾夫娜還說，這話不是氣話，而是就事論事，據她所知，是她哥哥一貫的看法——這話的殺傷力太大了。她還說——她是想緩和一下，結果帶來了更沉重的打擊——列寧「從實用的角度看重斯大林」。這話聽起來肯定很扎心。烏里揚諾夫娜稱讚斯大林的奉獻精神和勤奮，可結論卻是，列寧想過要約束斯大林的怪脾氣，而這就是他為甚麼會要求解除斯大林總書記職務的原因。<sup>320</sup>

528

烏里揚諾夫娜決不是斯大林的對頭，她既沒有證明口授文件的作者是她的哥哥，也沒有證明口授文件產生的準確日期，她只是證明，口授文件反映了列寧的某些看法。同樣能夠說明問題的是，作為畢生忠於和崇拜斯大林的人，莫洛托夫認為口授文件中的批評是合理的。「我認為列寧對斯大林的評價是正確的，」莫洛托夫回憶說，「列寧剛剛去世的時

候，我自己就在政治局的會議上說過。我想斯大林記得這件事情，因為在列寧去世後，我們曾經到季諾維也夫在克里姆林宮的家中討論過「遺囑」問題，大概有五個人，包括斯大林和我。當時我說，我認為列寧對斯大林的所有評價都是對的。斯大林當然不喜歡這樣說。不過，我們仍然保持了多年的親密關係。我想，他之所以欣賞我，是因為我對有些事情直言不諱，不像別人那樣言不由衷、避而不談，所以他任由我直截了當地談論「遺囑」問題。」<sup>321</sup> 對於列寧口授文件的真實性，斯大林本人從來沒有公開地表示懷疑。他無法迴避一個事實，即列寧的口授文件不管是怎樣產生的，都符合對於自己性格的普遍看法。換句話說，即使口授文件有一部分或者完全是捏造的，聽上去也都是真的。就像我們在上一章看到的，斯大林的領導對於把這個四處擴張的政權捏合為整體起了很大的作用，但他也有可能居心叵測，而且擁有過大的權力。

斯大林把口授文件歸咎於克魯普斯卡婭，可文件還是會影響他對列寧的感情。對於斯大林在1922至1923年的情緒狀態，現有的直接證據很少。他的幾個最親密的同事，比如卡岡諾維奇，回憶起在黨的總部的那些日子總是滿懷深情，說喜歡結交朋友的斯大林愛說愛笑，讓人覺得很溫暖（「那是生命中一段幸福的時光。斯大林那時的心情很好」）。<sup>322</sup> 但現有的記錄還包括斯大林的一些書面言論——這些得到了他當時核心圈子中其他人的進一步證實——他在寫給基斯洛沃茨克的季諾維也夫的信中，覺得受了傷害和委屈。口授文件的作用才剛剛開始顯露出來。

## 第十二章 忠實的學生

列寧同志和我們永別時囑咐我們要珍重黨員這個偉大稱號，並保持這個偉大稱號的純潔性。列寧同志，我們謹向你宣誓：我們一定要光榮地執行你的這個遺囑！

530

列寧同志和我們永別時囑咐我們要保護我們黨的統一，如同保護眼珠一樣。列寧同志，我們謹向你宣誓：我們也一定要光榮地執行你的這個遺囑！

——斯大林，1924年1月26日<sup>1</sup>

斯大林地位的迅速上升，包含了如下看似矛盾的地方：從1922年春天開始，他便早早擁有了「無限的權力」，當時他被任命為黨的總書記，而列寧在接下來的那個月發生了第一次嚴重的中風，但僅僅過了一年，1923年春天，突然冒出一紙文件，要求把斯大林調開。大權在握卻缺乏安全感，定義了他的內心秩序，對他的性格產生了重要影響。與之相似，布爾什維克專政本身與外部世界的關係也令人擔憂：危機四伏的資本主義包圍與所謂的革命事業在全球的必然性。當然，這種既雄心勃勃又感到四面受敵的心態，在俄國漫長的歷史中是人所共知

---

• 譯註 《斯大林全集》第6卷，第42-43頁。

的——作為一個大國，俄國在錯綜複雜的歐亞地區的野心，似乎總是超出自身能力。但這種困境也是源自列寧的傑作，亦即一黨壟斷所有權力，用爾虞我詐的方式處理國際關係。整個革命以及斯大林在革命內部的個人專政，都患上了一種內在的、結構性的多疑症，在獲勝的同時卻感到被不懷好意的人和敵人給包圍了。革命的困境與斯大林的性格開始互相強化，並在列寧口授文件帶來的壓力下，形成了某種莫比烏斯環。<sup>\*</sup> 在斯大林的生命中，列寧獨一無二，永遠佔據着最重要的位置。斯大林是列寧的門徒，而且不僅事實上如此，關鍵是在自我認知上也是如此。就像我們將會看到的，1924年，斯大林在確立其列寧繼承人地位這方面做得非常成功，但事情又一次露出了看似矛盾的一面：這種成功只會增加口授文件的威脅。

幫助斯大林擺脫困境的不是別人，正是托洛茨基。在政權最高層的那些人中，只有托洛茨基不是老布爾什維克，他加入布爾什維克的時間較晚（1917年7月），使他很容易被說成是外人，是孟什維克，不是真正的列寧主義者。托洛茨基本人的文章為這種指控提供了大量的證據。1904年8月，在布爾什維克與孟什維克分裂後，托洛茨基指責列寧是個「馬虎的律師」，是「羅伯斯庇爾」式的人物，想實行「對無產階級的專政」。攻擊性的說法還包括「可怕」、「肆無忌憚」、「有煽動性」、「居心叵測而且道德上令人厭惡」。托洛茨基這種縱然準確卻有點過分的指責持續了數年。<sup>2</sup> 同樣，列寧在以往的著作中也對托洛茨基作了猛烈的回擊。「不久前出版了托洛茨基的一本新的小冊子……滿紙無恥譎言」，列寧在1904年10月寫道。<sup>3</sup>† 1909年8月，他寫道：「托洛茨基的行為表明他是一個最卑鄙的野心家和派別活動者……嘴上滔滔不絕地談黨，而行動卻比所有其他的派別活動者還壞。」<sup>4</sup>‡ 同年10月，列寧

---

\* 編註：將紙條的一端旋轉180度，再把兩端黏連起來，就形成了莫比烏斯環。它不分正反，只有一個面。

† 譯註：《列寧全集》第44卷，第478頁。

‡ 譯註：《列寧全集》第45卷，第241頁。

在私人書信中發明了「托洛茨基主義」這個帶有貶義的說法。<sup>5\*</sup> 1911年1月，他提到「猶杜什卡·托洛茨基」。<sup>6†</sup> 直到1917年初，他還(給伊涅薩·阿爾曼德)寫道：「好一個托洛茨基！！他總是搞他那一套＝搖擺，欺詐，裝成左派，其實一有可能就幫助右派……」<sup>7‡</sup> 斯大林在中央機關的手下掌握着列寧的檔案，他們不費甚麼力氣就找出了列寧批評托洛茨基的寶貴材料。<sup>8</sup> 沒有甚麼是無中生有的，儘管有許多是在脫離語境的情況下編造或挖掘的。但托洛茨基把自己描寫成與列寧不相上下甚至在某些方面比列寧還要優秀的做法，卻放大了那些材料的效果。托洛茨基似乎沒有明白，他和列寧的關係不是事實的問題，而是把自己擺到甚麼位置的問題。<sup>9</sup>

人們早就意識到，斯大林很幸運，碰到的對手是托洛茨基等人。<sup>10</sup> 當然，加米涅夫和季諾維也夫——兩人都比斯大林小五歲——擁有比人們通常認為的更成熟的政治技巧，尤其是季諾維也夫，他在列寧格勒打造了一部令人生畏的政治機器。不過，學者們正確地指出，當時人們普遍認為，按照能力來說加米涅夫適合做副手而不是領袖，而季諾維也夫的性格則樹敵過多(意大利共產黨人安傑莉卡·巴拉巴諾夫〔Angelica Balabanoff〕認為，他是「繼墨索里尼之後……我遇到的最卑鄙的傢伙」)。<sup>11</sup> 但人們可能沒太意識到，實際上，托洛茨基與其說是斯大林擴充權勢的障礙，不如說是工具。正如布爾什維克政權為了建立國家而需要內戰一樣，斯大林為了鞏固其個人專政也需要而且找到了「反對派」。托洛茨基喜歡對政權的這個那個政策說三道四——這就給人留下話柄，說他搞分裂和派別活動——與之相比，斯大林把自己打扮成中央委員會以及列寧遺產的忠實維護者。同時，明明斯大林才是那個有着鮮明身體特徵的人，包括突出的鼻子、濃重的口音，而結果托洛茨基卻成了外人。<sup>12</sup> 和顧影自憐的托洛茨基相比，斯大林就像任勞任怨的革命步兵。托洛茨基精通多種歐洲語言，文筆曉暢，寫過多部文化和政治

\* 譯註：《列寧全集》第45卷，第283頁。

† 譯註：《列寧全集》第20卷，第96頁。

‡ 譯註：《列寧全集》第47卷，第550頁。

著作，在俄國少數見多識廣的知識分子中很有人氣，相比起來，斯大林是眾多才智平平者的代表，他像音叉一樣捕捉到了這些人的渴望。<sup>13</sup> 斯大林撞到一個大好的機會，可以和舉世聞名的托洛茨基交手並打敗他，從而成為正統的列寧主義者和家喻戶曉的人物。

斯大林無疑非常狡猾。他總是設法佔據正統的中間立場，迫使自己的批評者成為明顯的分裂分子和宗派分子，同時採取傳統的手段，讓政治上的同盟關係變得對自己有利，但這些教科書上的花招終究有限度。繼位之爭不僅關乎赤裸裸的權力，還關乎思想與敘事。沒有甚麼比扣人心弦的故事，特別是在革命框架內的扣人心弦的故事更有力了，而這勢必會引發創造新的符號、新的詞彙、新的看世界的方式、新的身份和新的神話的鬥爭。<sup>14</sup> 斯大林在1924年寫的東西甚至比1917年還多。他在那年比較重要的作品，也是他到當時為止比較重要的作品，〈論列寧主義基礎〉，是抄襲他人的。<sup>15</sup> 其實這是一部非常成功的作品，不僅折射出不誠實，還折射出勤奮甚至敏銳的判斷力：他選了一個很好的底本，而且似乎將其改得更好了。此外，斯大林還出了第二重要的作品，〈論一國社會主義〉。這本書是他自己的思想，而且和人們普遍接受的觀點相反，它同放棄世界革命毫無關係，倒是關於設想一種切實可行的馬克思主義地緣政治的方法。1924至1925年，自稱是列寧忠實學生的斯大林，以一個理論家（「資本」、「資產階級」、「帝國主義」）和尚未成熟的地緣戰略思想家的形象出現在世人面前。

## 啟示

533 1924年1月8日，《真理報》披露說托洛茨基病了，而據奧格伯烏的線人說，普通群眾認為這種說法是個訊號，說明他即將被解除職務。<sup>16</sup> 他當時正在生病：高燒，偏頭痛，胸痛，上呼吸道發炎，支氣管淋巴結腫大，厭食，消瘦。有些專家認為他是傳染了副傷寒；克里姆林宮的醫生們診斷是流感。<sup>17</sup> 托洛茨基的支持者還在繼續戰鬥。<sup>18</sup> 但當托洛茨基到莫斯科郊外的一個村子養病時，斯大林在為期兩天的中央全會上（1924年1月14-15日）對他進行了猛烈的抨擊，而且在黨的第十三次代

表會議(1月16-18日)的報告中，他的批評更是毫不留情——出席那次會議的代表有350人，其中大多沒有表決權，這顯然是為了把會場塞滿，以便最大程度地製造敵對氣氛。<sup>19</sup> 斯大林責備黨員們把民主「偶像化」，把民主看作是「某種在一切時間和一切條件下都一成不變的東西」，「似乎只是『機關工作人員』的惡意妨礙着民主的實行」。他要求知道為甚麼普通工人就得服從紀律，而托洛茨基卻「自命為站在中央委員會上面、站在它的法規上面、站在它的決議上面的超人」。<sup>20</sup> 然後，斯大林抽出了棍子：「我認為已經到了我們應當公佈關於統一的決議中的一項條文的時候了，這項條文根據列寧同志的提議，由我們黨的第十次代表大會通過，當時並沒有公佈。」<sup>†</sup> 那就是，只要有三分之二的代表贊成，就可以把組織非法派別的人開除出中央委員會。<sup>21</sup> 斯大林似乎覺得，趁托洛茨基不在的時候打敗他要容易很多。<sup>22</sup> 第十三次代表會議把左派反對派妖魔化，說他們「不僅直接脫離了列寧主義，而且明顯表現出小資產階級傾向」。<sup>23</sup> 當斯大林用聲色俱厲的講話結束了此次會議後，一名意大利記者注意到大部分人都認為「托洛茨基同志的政治角色結束了」。<sup>24</sup>

接連不斷的羞辱加上污蔑似乎讓托洛茨基變得消沉，而且這種羞辱和污蔑恰恰來自那個他為之獻出整個生命的黨。當然，以前在譴責和污蔑孟什維克、社會革命黨人或喀琅施塔得革命水兵的時候，他也很賣力，但那並沒有減輕對他的衝擊。<sup>25</sup> 「《真理報》沒完沒了，每一行，甚至每一個詞都是謊言，」他的妻子娜塔莉亞·謝多娃(Natalya Sedova)說，「列·達·保持沉默……在家裏，我們避免談論受到的迫害，可別的也沒甚麼可談。」<sup>26</sup> 托洛茨基最信任的醫生費奧多爾·蓋捷(Fyodor Guetier)建議到蘇聯的亞熱帶地區長期休養，因此，1924年1月18日，即斯大林在黨的代表會議上作總結發言的同一天，托洛茨基避居南方的黑海。事實證明，這一時機的選擇關係重大。

534

列寧雖然還活着，但對於政權來說他已經死了。關於他的結局，蘇聯報紙還在散佈各種虛幻的希望。<sup>27</sup> 第十三次代表大會的會議間歇，

\* 譯註：《斯大林全集》第6卷，第9、12、14頁。

† 譯註：《斯大林全集》第6卷，第22頁。



瑪麗亞·烏里揚諾夫娜告訴她周圍的代表們說，他已經好轉了，還參加了在哥爾克舉辦的正教聖誕節的慶祝活動。<sup>28</sup>在此期間，克魯普斯卡婭為了緩解丈夫的痛苦，在1月19日為他讀了傑克·倫敦《熱愛生命》(1906)中的一則故事，說的是一位加拿大的淘金者，在荒野中沒有吃的，身後還跟了一頭狼，狼在等待他死去。第二天，列寧醒來時感覺很差；當天晚上，他開始指着自己的眼睛。10點左右，從莫斯科召來的眼科醫生到了，但除了一隻眼睛近視外沒有查出別的問題。1月21日，星期一，醫生們給列寧做了檢查；他們剛離開幾分鐘，他就開始抽搐。像往常一樣，布哈林一直留在列寧莊園附近，在莫斯科黨組織設在哥爾克的機構裏。通常情況下，他只能從遠處看一看列寧，但這一次，似乎是醫生把他叫來的。<sup>29</sup>「當我急匆匆地走進伊里奇滿是藥品和醫生的房間時，他已經快要咽氣了，」布哈林後來說，「他的頭向後扭着，臉色蒼白，可以聽到喘息的聲音，兩隻手在顫抖。」<sup>30</sup>克魯普斯卡婭回憶說，因為列寧的胸腔有咯咯聲，他的衛兵兼護士就用雙臂托着他，列寧「有時會輕輕地呻吟，渾身顫抖，起初我握着他那又熱又濕的手，但後來只能眼看着毛巾被鮮血染紅，死亡的印記落在他毫無血色的臉上」。<sup>31</sup>醫生們做了人工呼吸。下午6:50，列寧去世了。<sup>32</sup>

瑪麗亞·烏里揚諾夫娜打電話給克里姆林宮，電話又被轉給第十一次全俄蘇維埃代表大會主席團，他們在莫斯科大劇院中較小的貝多芬廳；她要求找斯大林或季諾維也夫。證據顯示，是斯大林接的電話。<sup>33</sup>列寧去世的消息讓大廳裏的人們深感震驚。「我從來沒有見過那麼多痛哭流涕的男人」，當時在大劇院的一名17歲的共青團員回憶說。<sup>34</sup>核心圈子的成員集中在克里姆林宮季諾維也夫的住處，於當晚9:30左右乘着裝有履帶的汽車出發前往哥爾克。<sup>35</sup>李可夫病了，托洛茨基正在前往蘇聯亞熱帶地區的路上。莫洛托夫和魯祖塔克留在黨的總部準備發表公開聲明；捷爾任斯基也留在莫斯科負責公共秩序。在哥爾克，很有戲劇性的是，據說第一個走進房間的是斯大林。「他步履沉重、嚴肅而堅定，右手別在他那類似軍隊制服的上衣後面」，有目擊者寫道。他還說，在告別的時候，「斯大林突然激動地、深情地挨近列寧的頭：『永別了，一路走好，弗拉基米爾·伊里奇……一路走好！』他面色蒼

白，用雙手抱着列寧的頭，托起它，幾乎靠到自己的胸口，靠到自己的心上，並用力地、用力地吻了吻列寧的面頰和雙唇……他揮揮手，快步退了出去。」<sup>36</sup> 加米涅夫、季諾維也夫和布哈林也都道了別，雕塑家謝爾蓋·梅爾庫羅夫 (Sergei Merkulov) 製作了列寧雙手和遺容的石膏模型，那尊石膏面模後來就擺放在老廣場街斯大林的辦公室。<sup>37</sup>

1月22日凌晨2:30返回莫斯科後，核心圈子召集蘇維埃執行委員會的主席團開會，成立治喪委員會商討安排後事。<sup>38</sup> 在哥爾克，醫生們開始解剖列寧的遺體。他們在切開列寧大腦後發現，脂肪沉積物堵塞了本該給大腦供應血液(和氧氣)的動脈，這種病在當時是沒有辦法治療的。有些動脈鈣化得很嚴重，連人的頭髮絲都無法穿過。血壓不斷升高，最終血管破裂，導致腦部大出血。破裂的血管恰好處在大腦中控制呼吸功能的那部分，所以列寧就停止了呼吸。<sup>39</sup> 公開的報道有點過分詳細，甚至提到列寧大腦重量的精確數據(1,340克)。<sup>40</sup> 私下裏，神經病理學專家克萊默教授記載說，列寧的病「前後總共約兩年半時間，而在病情的總體特徵中，有一些表現，無論是俄國還是外國的神經病理學專家，全都認為不同於平常的神經系統疾病」。<sup>41</sup> 列寧的父親在五十出頭的時候很顯然是因為腦溢血病逝，或許就是動脈堵塞引起的。疾病影響了列寧的情緒：興高采烈很快就變成鬱鬱寡歡；無緣無故地大笑；極為易怒。<sup>42</sup>

列寧因病不能視事已一年多，但現在，政權必須面對他永遠不在的事實。1月22日，當樂隊演奏葬禮進行曲的時候，加里寧請出席第十一屆全俄蘇維埃代表大會的代表們起立。「同志們，」他流着淚說道，「我不得不向你們報告一個非常不好的消息。弗拉基米爾·伊里奇的健康狀況……」淒厲的叫聲響徹大廳。有些代表忍不住發出抽泣聲。加米涅夫、季諾維也夫、布瓊尼以及主席團的其他成員都哭了起來。蘇維埃中央執行委員會書記阿韋利·葉努基澤插話要求大家安靜，可加里寧再一次失聲痛哭。米哈伊爾·拉舍維奇走上講台宣佈弔唁和葬禮的詳細安排。代表大會暫時休會。<sup>43</sup> 對於斯大林此時的心情，目前缺乏可靠的記錄。在列寧突然去世的前一天，一名造訪過大克里姆林宮附樓中斯大林那狹小的克里姆林公寓的工作人員寫道，「到處都是書」。<sup>44</sup> 著

述既是斯大林之前以及今後把自己和列寧聯繫在一起的方式，也是斯大林自我表達的方式。1月23日上午，列寧的靈柩從哥爾克莊園起運，下午1時左右，在莫斯科大劇院樂隊演奏的哀樂聲中，靈柩抵達莫斯科。迎接的隊伍有5英里長，裹着紅布的靈柩被安放在工會大廈的圓柱大廳（那裏也曾是斯維爾德洛夫的遺體供人瞻仰的地方）。<sup>45</sup> 靈床設在大廳中央，四周是無數的花圈、芬芳的百合和輪值的儀仗隊。當晚7時，靈堂開始對公眾開放。早在1923年春天列寧病危的時候，各地區的軍事指揮官就接到秘密電報，要求做好鎮壓暴動的準備。<sup>46</sup> 現在，捷爾任斯基通過奧格伯烏的渠道下達指示，要求「主要注意黑色百人團、君主派和白衛分子」，同時一定要「保持完全鎮定和預防恐慌，不要用招搖的行為或毫無事實根據的大逮捕搞得人心惶惶」。<sup>47</sup>

如果人們像斯大林那樣看過奧格伯烏交給黨部的那些政治情緒報告，就會以為蘇聯到處都是君主派和舊社會的殘餘勢力、神父和毛拉、懷有敵意的知識分子、悶悶不樂的工人、愛財的農民、紅軍中的不滿分子。<sup>48</sup> 捷爾任斯基多次向亞戈達表達過自己的不滿，說「這些報告造成了一種令人非常沮喪的印象，一片黑暗，沒有一絲光亮」。（亞戈達總是回答說：「我們的任務就是揭示陰暗面……因此，我們的報告造成悲觀的印象是正常的。」）<sup>49</sup> 1924年1月，來自農村的報告表示，列寧不在了，農民們盼望政權垮台，盼望帝國主義列強趁機再次干涉。<sup>50</sup> 因此，對於下面說的這種情感流露，蘇維埃政權確實完全沒有準備：三天時間，就有50萬至100萬人從工會大廈圓柱大廳中敞開的列寧靈柩旁走過，隊伍絡繹不絕，在零下28華氏度的室外溫度下排了1.5英里長。<sup>†</sup>（黨政部門的代表團可以在指定的時間弔唁，不用排隊。）肯定有很多人看到列寧死了感到很高興。但也有很多人似乎認為，單憑實行新經濟政策——一項勇於承認錯誤的人性化政策——他就好過其他共產黨人。<sup>51</sup> 「全國的絕大部分人，」一位並不在體制內的人目睹了這一場景後寫道，「都對列寧的去世極為悲痛。」<sup>52</sup>

537

\* 編註：約8公里。

† 編註：分別約為零下33.3攝氏度和2.4公里。

## 政治癱瘓與神聖誓言

離開莫斯科朝着蘇聯的亞熱帶地區阿布哈茲的方向行駛了四天後，1月22日星期二一早，托洛茨基的列車停靠在梯弗利斯車站，那裏離黑海海岸還有一段路程。但一名信使帶着一封已經譯好的、通過秘密警察的渠道發來的電報，來到他的車廂：「請告訴托洛茨基同志。1月21日下午6:50，列寧同志不幸去世，因為他的呼吸中樞癱瘓。葬禮定於1月26日星期六。斯大林。」托洛茨基回電說：「我認為必須返回莫斯科。」列車留在車站。一個小時後，斯大林的回覆到了：「葬禮將於星期六舉行，你無法及時趕到。政治局考慮到你的健康狀況，認為你應該繼續前往蘇呼姆。斯大林。」<sup>53</sup> 托洛茨基聲稱，一到蘇呼姆，裹着毯子在屋外的陽台上休養時，他就得知葬禮推遲了一天，直到星期天才舉行，這證明斯大林騙了他。<sup>54</sup> 沒錯，斯大林是很狡詐。但當時的特別列車正在源源不斷地駛進首都，有些還是來自比梯弗利斯更遠的地方，捷爾任斯基主持的治喪委員會因此才在1月25日宣佈列寧的葬禮將於一天後的星期天（1月27日）舉行。<sup>55</sup>（此外，工人已經用炸藥炸開了克里姆林宮宮牆前面冰凍的地面，同時在趕工建造臨時的木製墓穴。）即使按照斯大林原定的時間，托洛茨基也有差不多100個小時，可以折回1,000英里\*外的莫斯科。1918年9月，在列寧遭到槍擊後，斯大林繼續留在察里津，但托洛茨基卻從內戰中遙遠的東部前線火速返回，在第二天到了莫斯科。也就是在那一天，政權成立了共和國革命軍事委員會，托洛茨基直到1924年1月仍是其領導。要是他擔心自己的列車不能及時趕回莫斯科，其實也可以徵用軍用或是民用飛機，南高加索軍區就在身邊，司令部就設在梯弗利斯。

沒有參加葬禮的高層官員並非只有托洛茨基一人：李可夫因為患上流感，早在幾個月前就和妻子一起，用化名到意大利療養去了，但他的缺席對於自己的政治生涯沒有影響；畢竟只有從官階職銜的角度看，李可夫才是列寧的副手和潛在的繼承人。莫斯科的所有人都在盼望托洛

538

---

\* 編註：約1,609公里。

茨基。「最後三天一直有消息說，他正從高加索返回——他在那裏生病了，」《紐約時報》的記者寫道，「為了迎接他，一撥一撥的人不止一次地聚集在車站，而官方的攝影師也被派到圓柱大廳的前面，在寒風中等了幾個小時，要拍攝他進入大廳的情景。直到最後還有許多人相信他會來。」<sup>56</sup> 托洛茨基17歲的兒子、憂愁的列夫·謝多夫(Lev Sedov)自己也在發着高燒，遠高於華氏100度，<sup>\*</sup>但依然從莫斯科的病床上爬起來，到圓柱大廳向列寧致敬。他不能理解自己父親的缺席。<sup>57</sup> 在給民眾和世界播放的新聞片中也沒有見到托洛茨基。<sup>58</sup> 幾十年後，他充滿悔恨地說，「我無論如何都該來的」。<sup>59</sup> 的確是這樣，但他後來還寫道，1月22日那天，當他的列車在接到列寧去世的噩耗後停在梯弗利斯車站的時候，他曾經想一個人待着。在一群當地官員的懇求下，托洛茨基匆匆寫了一篇簡短的悼文：「現在，弗拉基米爾·伊里奇沒有了。黨成了孤兒。工人階級成了孤兒。這就是我們的導師和領袖去世的噩耗給人帶來的感受。我們將怎樣向前走，我們會找到路嗎？我們會不會迷失呢？……我們的內心無比沉痛，我們大家有幸成為和列寧同時代的人，有幸和他一起工作，有幸向他學習……我們該怎樣前進呢？高舉列寧主義的明燈。」<sup>60</sup> 很動人，或許也同時表明，托洛茨基感覺自己成了孤兒。

斯大林使詐在1924年1月操縱黨的會議指責托洛茨基搞派別活動，從此以後托洛茨基變得意志消沉。列寧的去世為他提供了一個潛在的機會，可以突圍而出，扭轉在閉門會議上受到的挫折，在紅場這個最大的舞台戰勝他們所有人。本來托洛茨基可以像列寧到達芬蘭車站那樣，以戲劇性的方式從遠方突然降臨莫斯科，並利用自己的影響力，抓住列寧去世造成的普遍的悲痛心理，把人們的情緒調動起來，成為下一階段中革命的化身。曾經以扣人心弦的筆法寫下「起義的藝術」的不是別人，正是托洛茨基，而現在他就可以嘗試一下，使用這種藝術去粉碎那些被他視為侏儒的人在周圍形成的「籠子」。本來他可以用保衛革命這項更偉大事業的名義，不去顧及黨的紀律，在紅場上

\* 編註：約37.8攝氏度。

大聲宣讀所謂的列寧口授文件，把列寧要求解除斯大林總書記職務的命令當作自己的法寶，然後像1917年那樣迅速地在一間間工廠召集工人，讓他們去逮捕斯大林。當然，如果是那樣，就需要托洛茨基把列寧的去世看作是一次戰略機會，需要他用一種有說服力的方式，說明可以怎樣復興社會主義的宏偉夢想，說明他和列寧有過的所有那些激烈爭吵為甚麼都是偶然的，說明他（托洛茨基）為甚麼是把神聖的列寧主義事業進行下去的唯一合格人選。說得好聽點，這些要求有點太高了。但是，如果是列寧發現有人在陰謀反對他，誰會懷疑他不會對自己的黨發動政變呢？斯大林要是處在托洛茨基的位置，是沒有能力採取大規模街頭行動把群眾爭取過來的。當然，斯大林用不着那麼做：他已經掌握了隱藏在老廣場街的那些權力槓桿。實際上，斯大林正是在1924年1月搬到了老廣場街的新黨部。

對斯大林來說，列寧的去世代表了一種不同的機會，而且他抓住了這個機會。1月26日，有二千多名代表參加的全蘇蘇維埃第二次代表大會在莫斯科大劇院開幕，大會第一天安排的是悼念列寧。在加里寧（國家元首）和克魯普斯卡婭（遺孀）之後發言的是季諾維也夫。他對人們成群結隊地前來致敬感到驚訝，並建議大家永遠要想着，「要是列寧同志處在我的位置會怎麼做？」但是，如果季諾維也夫處在列寧的位置會怎麼做？不知道。接下來是斯大林，他描繪了一種神秘的衝動。「同志們，我們共產黨人是具有特種性格的人，」他在悼念列寧的那篇有名的講演的第一段說道，「我們是由特殊材料製成的。偉大的無產階級戰略家的軍隊，列寧同志的軍隊，就是由我們這些人組成的。在這個軍隊裏做一個戰士，是再光榮不過的了。以列寧同志為創始人和領導者的這個黨的黨員稱號，是再高尚不過的了。並不是任何人都能做這個黨的黨員。」現在，那些得到這種榮譽的人要經受考驗了。「列寧同志和我們永別時囑咐我們要珍重黨員這個偉大稱號，並保持這個偉大稱號的純潔性。列寧同志，我們謹向你宣誓：我們一定要光榮地執行你的這個遺囑！」斯大林說道，「列寧同志和我們永別時囑咐我們要保護我們黨的統一，如同保護眼珠一樣。列寧同志，我們謹向你宣誓：我們也一定要光榮地執行你的這個遺囑！」一次次的集體宣誓：保衛無產

540 階級專政，保衛新經濟政策的工農聯盟，保衛共和國聯盟，保衛共產國際。每次他都莊重地作出集體承諾：「我們一定要光榮地執行你的這個遺囑！」<sup>61</sup> 斯大林那些禮拜儀式中的疊句，效果不但明顯好過季諾維也夫乾巴巴的講話——按說他是個很出色的演說家——也好過所有人的發言。<sup>62</sup> 可當斯大林這些講話發表在《消息報》上的時候，編輯去掉了其中的宗教氣息。<sup>63</sup> 也許是因為這傷害了某種共產黨人的感情。但是在三天後，作為總書記的斯大林讓《真理報》重新全文發表了這些講話。<sup>64</sup> 在列寧去世的那幾天，這位曾經的神學院學生暴露出他將要運用的取勝之道：讓自己和全黨滿懷熱情地致力於執行神聖的列寧「遺囑」。

蘇維埃代表大會的代表通過表決，將「彼得格勒」更名為「列寧格勒」，在蘇聯各地為列寧立碑，大量出版列寧的著作，然後，代表們休會，參加在室外舉行的葬禮。葬禮是在第二天即1月27日舉行的，在零下30華氏度<sup>†</sup>的嚴寒中持續了六個小時。<sup>65</sup> 下午4時，當靈柩被安放在臨時的木製墓穴中的時候，所有的無線電和電報都播發了一條消息：「同志們，請起立。伊里奇的遺體正在緩緩地放入墓穴！」隨着整個國家突然安靜下來，所有的工廠和運輸工具也都停了下來，默哀五分鐘。無線電在4:06播送了一條新的消息：「列寧已經去世了，但列寧主義還活着！」

在緬懷列寧的時候，人們爭相拉近與逝者的關係。<sup>66</sup> 1月28日，斯大林又作了一次演講，這次是對克里姆林軍校的學員。在演講中，他聲稱在1903年收到過列寧的一封信「簡單而內容豐富的信」——他沒有把信拿出來，但那封信把他們實際相識的時間提前了兩年。<sup>67</sup> ‡ 托洛茨基的支持者此時正在複印所謂的列寧口授文件，打算發給從全國各地趕到莫斯科參加葬禮的黨員。托洛茨基的人添加了「遺囑」這個書面的名稱，那是這份書面文件第一次被冠以這樣的名稱。中央監察委員會在1月30日明令禁止傳播列寧的這些文件。<sup>68</sup> 同一天晚上，全蘇蘇維埃第二

\* 譯註：《斯大林全集》第6卷，第42-43頁。

† 編註：約零下34.4攝氏度。

‡ 譯註：《斯大林全集》第6卷，第48頁。

次代表大會復會，並於次日通過了新的蘇聯憲法。<sup>69</sup> 李可夫被正式任命為蘇聯人民委員會主席，但是在過去參政院三樓開會的地方，列寧的椅子還空着，那把椅子正對着列寧從前的辦公室。<sup>70</sup> 不過，有很多細節證明了斯大林佔據優勢，其中包括他掌握着政府的特別車隊。能夠分配稀缺的政府汽車最能顯示權力了。從給尼古拉二世的母親在英國購買的1914年產6缸沃克斯豪爾(二月革命後由保羅·米留可夫使用)，到斯大林在察里津用的12缸帕卡德(原來是為沙皇軍隊買的)，汽車剛好也是斯大林特別感興趣的。斯大林很快決定為政府購買一批美國車：林肯、凱迪拉克、別克，而給他自己買的是一輛帕卡德。此後的幾十年，帕卡德一直是斯大林喜歡的車，車身重但速度快。<sup>71</sup> 與此同時，在列寧下葬後，1924年2月初，斯大林去度假了。

541

說來也怪，正是托洛茨基的度假證明了斯大林的優勢。1924年冬天是托洛茨基第一次去阿布哈茲和它的首府、位於溫暖的黑海岸邊的蘇呼姆。避居此地似乎讓托洛茨基很愜意。他們住在郊外的一座山間別墅，名叫希諾普(希諾普季克)，別墅四周是植物園，園裏有各種各樣的植物和動物，都是園子的主人革命前從世界各地進口的。<sup>72</sup> 「在別墅餐廳的牆上有兩幅肖像，一幅用黑布蒙着，是弗拉基米爾·伊里奇，另一幅是列·達·(托洛茨基)」，娜塔莉亞·謝多娃寫道。<sup>73</sup> 他們的東道主是小個子涅斯托爾·拉柯巴(Nestor Lakoba)——他差不多是個聾子，助聽器也不太管用——但托洛茨基喜歡這位受到自己的阿布哈茲(被戲稱為「拉柯巴斯坦」)同胞愛戴的共產黨人的平民作風。<sup>74</sup> 拉柯巴差不多天天都去看望托洛茨基，給他帶橙子、柑橘和檸檬，進行長時間的討論。不過，他那種高加索人的熱情好客還有別的意圖：捷爾任斯基在托洛茨基離開莫斯科的當天就給他發了電報，說這位陸海軍人民委員要到蘇呼姆休假，這事「知道的人很多，就連國外也知道，所以我擔心白衛分子會不會企圖搞暗殺」。啊，是的，那些白衛恐怖分子：捷爾任斯基要求把托洛茨基完全隔離起來。同一天，拉柯巴還收到從梯弗利斯發來的信，是南高加索黨組織負責人奧爾忠尼啟則寫的，信裏要拉柯巴「照顧」好托洛茨基，還說在梯弗利斯「事情進展得很順利。左派反對派已被徹底粉碎」。<sup>75</sup>



典型的高加索式熱情好客紓緩了托洛茨基的心情，他似乎並沒有懷疑在這背後還有甚麼不可告人的目的，儘管自己是在斯大林的地盤上。<sup>76</sup> 早在托洛茨基踏上蘇呼姆的那天，1月23日，警察機關一位年紀輕輕卻已成為格魯吉亞契卡副首腦的特工人員（生於1899年）寫信給莫斯科的亞戈達，說自己已經看望過托洛茨基。這表面上是要通知他作一次演講（仍然發着高燒的托洛茨基答應寫篇文章），實際上是想親自探查一下托洛茨基的想法。「伊里奇的去世對他影響很大，」這位實為秘密警察的談話人報告說，「他認為目前需要的是緊密團結起來（*splochennost'*）……代替列寧的只能是一個集體。托洛茨基同志身體不太舒服。」<sup>77</sup> 這位年輕老成的格魯吉亞契卡人員謙卑地請求自己在莫斯科的上級亞戈達，把情況立即轉告斯大林。這位秘密警察的特工人員名叫……拉夫連季·貝利亞。

托洛茨基的政治隔離狀態被克魯普斯卡婭打破了。她送來一張暖心的便條（1月29日）告知，大概在一個月前，「弗拉基米爾·伊里奇在翻閱您的書時，在您概括馬克思和列寧思想的地方停住了，要我再讀給他聽一聽：他聽得非常專心，然後自己又看了一遍。我想告訴您的還有一件事：在您從西伯利亞前往倫敦找到我們的時候，弗·伊對您的態度一直到他去世都沒有改變。我祝願您，列夫·達維多維奇，保持強壯和健康，我會熱情地擁抱您。」<sup>78</sup> 同樣是這個克魯普斯卡婭，在同一個月的早些時候，曾經反駁托洛茨基最近的文章，否認黨脫離群眾，指出他在批評官僚主義的同時沒有拿出切實可行的解決辦法——除非是用托洛茨基的支持者取代現任官員。<sup>79</sup> 但是現在，為了制約斯大林，克魯普斯卡婭打出了感情牌。<sup>80</sup> 然而斯大林派出了一個以米哈伊爾·伏龍芝為首的代表團，通知托洛茨基說，準備由他伏龍芝來接替托洛茨基在陸海軍人民委員部忠實的第一副手埃夫拉伊姆·斯克良斯基。<sup>81</sup> 在阿布哈茲，托洛茨基的身體養得很好，都可以去打獵了——這項嗜好從一開始就讓他迫不及待。頂級射手拉柯巴向當地的主要報紙《東方欲曉報》誇讚道，托洛茨基能「射中飛在空中的野鴨子；在蘇呼姆郊外，沒有哪個藏有獵物的湖泊或沼澤能逃過他的眼睛」。<sup>82</sup> 1924年4月中旬以前，逃不過拉柯巴眼睛的正是托洛茨基，之後，托洛茨基終於回到了莫斯科。

## 列寧主義

把列寧遺體製成木乃伊安放在克里姆林宮牆邊的墓穴供人瞻仰，現在看來也許是順理成章的，但在當時，核心圈中的許多人，也許是大多數人，都反對這個想法；力主作出這一決定的是治喪委員會主席、曾經努力學習想要成為天主教神父的捷爾任斯基，而他還得到斯大林這位曾經的神學院學生的支持。捷爾任斯基的理由是，「如果科學可以長期保存人的遺體，那為甚麼不呢」。他還說，「沙皇的遺體做防腐處理，僅僅因為他們是沙皇。我們這樣做是因為他是一個偉人，和其他任何人都不一樣」。<sup>83</sup> 把列寧的遺體當作供人瞻仰的聖物來保存，需要極其高超的科學技術，而這種科學技術並不會馬上出現；領頭的科學家最後想出了一個妙招，把甘油、酒精、水、乙酸鉀和奎寧混合在一起，可以勉強讓屍體保持原貌。<sup>84</sup> 至於用一座更耐久的陵墓來代替原先倉促建成的墓穴，政府把這項工作交給了因其新藝術風格的莫斯科喀山火車站而出名的建築師阿列克謝·休謝夫 (Alexei Shchusev)，他以古代瑪雅人的圖案為基礎，提出了一個很有吸引力的設計方案，將三個立方體水平排列，用走廊連接起來。<sup>85</sup> 在陵墓內部的禁入區，列寧被安放在用玻璃密封起來的一副環以紅線的石棺中，穿的不是他通常穿的資產階級西服，而是卡其布的緊身短上衣，胸前別着死後獲得的紅旗勳章。<sup>86</sup> 列昂尼德·克拉辛提議加設一個平台，從那上面可以對群眾發表講話，休謝夫採納了這個意見，只不過是設在兩側，而不是在正面的頂層。<sup>87</sup> 陵墓正式對公眾開放是在1924年的晚些時候。<sup>88</sup> 「遺體保存得很好」，《紐約時報》的沃爾特·杜蘭蒂 (Walter Duranty) 興奮地說。他還提到蘇聯的幾位教授對他誇口說，和埃及法老的木乃伊不一樣，不僅是軀幹，整個臉部都保存完好。杜蘭蒂還說，「給遺體做防腐處理的人甚至製造出微笑的效果」。<sup>89</sup> 事實證明，由一個聖徒般的人物做成的這具栩栩如生的木乃伊，對於政權來說具有不可估量的價值。

蘇維埃政權出人意料地在紅場上獲得了一塊聖地。(許多參觀列寧陵墓的人都擺出一副迷信的樣子。)<sup>90</sup> 在此期間，列寧博物館已經建成。<sup>91</sup> 那裏有些物品並不公開展出。被請來為一本書挑選照片的藝術家

尤利·安年科夫注意到有一隻玻璃罐子，裏面是「浸泡在酒精中的列寧的大腦……一半是健康的，大小正常，盤繞的形狀清晰可辨；另一半可以說是靠一根帶子吊着的，已經起皺變形，擠成一團，不會比胡桃更大」。<sup>92</sup> 在對公眾開放的區域，博物館把列寧人性化了，除了革命的英雄事跡外，還展出了他童年的照片。「在玻璃櫃中有1918年擊中他的那把左輪手槍，」早期參觀過博物館的一位芝加哥教授寫道，「一同展出的還有取出的子彈，以及手術醫生簽署的報告。」<sup>93</sup> 對列寧留存的文字的編纂工作也在緊張地進行。在莫斯科黨組織的倡議下，非正式的列寧研究院成立了，不過，斯大林將其置於中央機關的領導下，而他之所以這樣做，部分是為了讓該院得到更充分的財政支持，但主要還是想確保自己的控制力。<sup>94</sup> 他安排自己的助手、馬克思主義學者伊萬·托夫斯圖哈主持日常工作。<sup>95</sup> 斯大林後來讓人在蘇維埃廣場（從前的特維爾廣場）1/3號新建了一座現代主義風格的五層大樓，那也是革命後建造的首批公共建築之一。<sup>96</sup> 加米涅夫依然是列寧《全集》的主編，但列寧的一些重要文件是出版還是封鎖則受托夫斯圖哈監督。<sup>97</sup> 所有過去認識列寧的人都要給列寧研究院交回憶文章。<sup>98</sup> 克魯普斯卡婭把自己的回憶文章送給斯大林徵求意見；對她的文章，斯大林未作修改就發表了。<sup>99</sup>

《真理報》的描述——多半是布哈林寫的——體現出正在形成之中的正統說法：列寧為人謙遜、嚴謹、忠於原則、相信群眾、意志堅定、不屈不撓。<sup>100</sup> 沒有提到他極端的殘忍。列寧只是「在一般意義上」愛人民，自我流放的作家馬克西姆·高爾基在1924年的一本小書中精闢地概括說，「他的愛無遠弗屆，穿透了仇恨的烏雲。」<sup>101</sup> 莫洛托夫在工作上與列寧和斯大林的關係都很密切，他後來對列寧的評價很有名：「比較苛刻」、「比較嚴厲」。<sup>102</sup> 列寧喜歡把自己與馬克思相提並論（有一次，有個工人向他要張照片作為會面的紀念，列寧便從自己的口袋裏掏出一枚小徽章，上面有馬克思的肖像）。不過，雖然每逢重大節日列寧和馬克思兩人的巨幅肖像會並排懸掛在紅場上，許多人還是把馬克思稱作理論家，把列寧（只是）稱作實踐家。<sup>103</sup> 後來正是斯大林解決了這個問題。1924年4月，他深入虎穴，去了斯維爾德洛夫共產主義大學，即托洛茨基的左派反對派1923年秋天在黨的會議上進行表決的地

方。<sup>104</sup> 斯大林的演講在1924年4月和5月連載時的標題就是〈論列寧主義基礎〉。<sup>105</sup>

長期以來，斯大林一直被認為是組織家，而不是理論家。<sup>106</sup> 很少有人知道他以前的〈無政府主義還是社會主義？〉(1906–1907)完全是從已故的格里戈里·捷里亞那裏抄來的。現在，他的〈論列寧主義基礎〉抄襲的是《列寧的革命學說》，那是依然健在的菲利普·克謝諾豐托夫(Filipp Ksenofontov)的手稿(他和契卡特工伊萬·克謝諾豐托夫無關，不要混淆)。作為記者兼編輯的克謝諾豐托夫(生於1903年)被突然打發到塔什干，同時有傳言，說他曾經就斯大林借鑒其作品一事提出過抗議。(在一封致克謝諾豐托夫的私人書信中，斯大林對他的幫助表達了謝意；後來，斯大林不讓克謝諾豐托夫援引這封信的內容。)<sup>107</sup> 在塔什干期間，克謝諾豐托夫於1924年出版了一本紀念世界大戰十週年的書，名叫《列寧與1914–1918年的帝國主義戰爭》，他在書中對列寧主義的描述和那本以斯大林名義出版的書籍非常相近。<sup>108</sup> 克謝諾豐托夫寫道，與許多人想像的不一樣，列寧主義並不只是實踐中的馬克思主義，而是「工人階級在帝國主義條件下的革命的政治科學，即無產階級革命的理論與實踐」。<sup>109</sup> 斯大林在〈論列寧主義基礎〉中說得更加簡潔：「列寧主義是帝國主義和無產階級革命時代的馬克思主義。」<sup>110</sup>† 斯大林還十分清楚地表明，1917年的勝利，原因在於列寧，而不是托洛茨基(也不是他自己)。

545

托洛茨基也作了類似的努力，在1924年5月把一些老的材料和現有的回憶文章彙編成冊，只不過斯大林是把自己放在門徒的位置上，而托洛茨基採取了很不一樣的立場。<sup>111</sup> 他的《論列寧》就像意料中的那樣，對列寧說得很少，對他和列寧的所謂特殊的親密關係說得很多(托洛茨基的一名支持者在吹捧性的書評中也指出了這一點)。<sup>112</sup> 但托洛茨基把自己說成是革命事業的共同領導者，當列寧還健在的時候，這種立場就曾讓他一再陷入麻煩。事實上，1917年10月的列寧，被描述成是在聽從托洛茨基的建議。這種說法引起了強烈的憤慨。莫洛托夫抨擊托洛

\* 譯註：《斯大林全集》第9卷，第137–138頁。

† 譯註：《斯大林全集》第6卷，第63頁。

茨基，說他把列寧描寫成容易犯錯的人。<sup>113</sup> 季諾維也夫攻擊托洛茨基，因為他(托洛茨基)把自己在1918年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談中犯下的大錯與列寧在1920年波蘭戰爭中的失利相提並論。<sup>114</sup> 但是在虛榮方面，季諾維也夫或許比托洛茨基還要過分，他的回憶錄中有幾段話，沒有人會蠢到想把它們發表出來。「在巴黎，有一次我們喝酒慶祝他的新書取得成功，我們在咖啡館一直坐到後半夜(雖然除了少數幾個社會民主黨人，老實說，我想像不出誰會讀那本書)」，他寫道。<sup>115</sup> 在大多數情況下，季諾維也夫是走向了另一個極端，他那些吹捧的話即便是按照正在出現的聖徒式傳記的標準也讓人覺得臉紅：「如同海洋一般浩瀚；如同勃朗峰一般峻拔和難以企及；如同南方的太陽一般和煦；如同世界一般偉大；如同兒童一般善良。」<sup>116</sup> 季諾維也夫很善於演講，但他的文字往往比較難懂，這和斯大林剛好相反。

1924年春天，形勢已經明朗了：斯大林贏得了爭奪列寧主義表述權的鬥爭。<sup>117</sup> 「斯大林的書無疑是到目前為止論述列寧主義的最佳文本，雖然它不像其他類似的出版物那樣，有一個響亮而做作的標題」，《布爾什維克》雜誌上的一篇署名評論文章寫道。評論者亞歷山大·斯列普科夫(Alexander Slepko，生於1899年)是斯維爾德洛夫共產主義大學以及紅色教授學院(1924)培養出來的學生——斯維爾德洛夫共產主義大學是斯大林發表演講的地方，而紅色教授學院則是第一所以馬克思主義為基礎、涵蓋從文學批評到自然科學的所有學科的高等教育機構。他代表了斯大林的目標受眾。<sup>118</sup> 斯列普科夫對總書記的作品提出了一些批評，但他特別稱道該書整體上概念明確、佈局嚴謹、表達簡練，並把黨的核心原則清晰地表述為「代表無產階級的歷史利益」。<sup>119</sup>

### 〈給代表大會的信〉

1924年5月23至31日在大克里姆林宮召開了黨的第十三次代表大會，出席大會的代表1,164人(有表決權的748人)，他們代表了73.6萬黨員。只有大約15萬黨員不是生活在城市，而在這當中，有6.1萬人是生活在俄羅斯共和國和烏克蘭的中部地區。整個蘇維埃白俄羅斯的黨

員只有大概3,000人，蘇維埃遠東共和國的黨員數量也差不多。<sup>120</sup>雖然政權還在壯大，但基礎依然相當狹窄。對於此次代表大會，三駕馬車絲毫不敢大意：左派反對派受到限制，只能成為沒有表決權的代表，而在他們當中，只有托洛茨基被選進了42人的大會主席團。<sup>121</sup>

由於列寧的離開，所有人都知道此次大會不同尋常，但代表們仍然免不了大吃一驚。幾個月來，克魯普斯卡婭一直在協商公佈列寧的口授文件——此時被稱為〈給代表大會的信〉。<sup>122</sup>已故的列寧的有些口授文件已經公佈，但是對於六位可能的繼承人的爆炸性評價，或者是要求解除斯大林職務的那封〈伊里奇關於書記的信〉還未公開。<sup>123</sup>只有托洛茨基一個人主張公佈，他還對討論的過程做了筆記。加米涅夫說：「不能公佈：這不過是一篇沒有在政治局會議上發表的講話。」季諾維也夫說：「娜·康·〔克魯普斯卡婭〕當時也是這個意見，認為它只應該交給中央委員會。我當時並沒有過問公佈的事情，因為我認為（現在也這樣想），那不在考慮範圍內。」斯大林說：「我認為沒有必要公佈，尤其是因為列寧並沒有說可以公佈。」<sup>124</sup>5月21日的晚上，在按照慣例於代表大會前夕召開的中央全會上，加米涅夫代表負責列寧文件的特別委員會作了報告。<sup>125</sup>現在沒有任何文字記錄存世。據黨務官員巴扎諾夫說，當時加米涅夫宣讀了口授文件，之後季諾維也夫起身為斯大林辯護，加米涅夫在主持討論時也強調了這一信息。<sup>126</sup>

547

斯大林主動提出下台。「好吧，是的，我確實比較粗魯，」托洛茨基引用了斯大林的說法，「伊里奇建議你們另外找人，他只要在外在的禮貌方面和我不同就行。好吧，試試去找個這樣的人吧。」但是，在這個滿是斯大林支持者的會堂裏，有個聲音高喊道：「沒關係。我們不怕粗魯，我們整個黨就是粗魯的、無產階級的。」<sup>127</sup>手段漂亮，不過，這個時刻還是不比尋常。早在1923年夏天山洞會議期間，斯大林就很惱怒地表示他可以放棄總書記的職務，但那只是在私人信件裏。<sup>128</sup>這可是中央全會，全會是有權免去他的職務的。但斯大林逃過了一劫：這次在代表大會之前召開的全會保留了他的職務。<sup>129</sup>

5月23日，黨的第十三次代表大會開幕，少年先鋒隊——年齡為十至十六歲的兒童組織——在紅場上木製的列寧墓旁邊接受檢閱。<sup>130</sup>那

天，在送給阿塞拜疆黨委書記的一本自己寫的有關列寧的書上，斯大林用他對其他任何人都不曾用過的語言寫道：「贈給我的朋友和親愛的兄弟基洛夫。」季諾維也夫就像在黨的第十二次代表大會上一樣作了主政治報告，並要求左派反對派公開宣佈放棄自己的主張。<sup>131</sup> 托洛茨基起身發言，而他的出現就像在之前的那次代表大會上一樣，引起了長時間的鼓掌。托洛茨基得到了一個繼續發動進攻和宣讀列寧口授文件的機會，但他並沒有那樣做。他也沒有公開宣佈放棄自己的主張，而是想用和解讓自己的批評者放下武器。「同志們，我們誰都不希望，也不可能與我們的黨針鋒相對」他說，「不管怎麼說，黨永遠是正確的，因為黨是無產階級用來完成自己根本任務的唯一工具……我知道反對黨不可能是正確的。只有和黨在一起並通過黨才可能是正確的，因為要實現正確的東西，歷史並沒有創造別的道路。」托洛茨基最後把英國的格言「不管對錯，都是我的祖國」換了個表述，說「這仍然是我的黨」。<sup>132</sup> 這種姿態的效果適得其反。就連克魯普斯卡婭都指責他，說黨如果永遠都是正確的，那他就不該挑起眼下這場持續了半年之久的關於新方針的爭論。<sup>133</sup> 正式的決議再次譴責左派反對派的「小資產階級傾向」。有傳言說，托洛茨基在被選進新的中央委員會的52名委員中排在第51位，這有可能是斯大林唆使的，為的是中傷托洛茨基，因為政權明顯違反常規，沒有宣佈各人的總得票數。<sup>134</sup>

548 代表大會前的全會決定分別向各代表團出示〈給代表大會的信〉，而不是在代表大會的會議上。<sup>135</sup> 這意味着代表大會的速記記錄——那是斯大林的書記處控制的——可以把那些討論是怎麼進行的省略掉。不過，回憶錄仍然提供了一些暗示。「他們讀了信，大家都覺得很震驚，」共青團官員亞歷山大·米爾恰科夫 (Alexander Milchakov，生於1903年) 回憶說，而且他還強調自己所在的北高加索代表團要求把原文再讀一遍，「又讀了一遍後，讀的人提出下面的建議：考慮到黨和國家的困難形勢，考慮到共產國際的情況和斯大林同志答應接受列寧同志批評的事實，建議要求斯大林留在總書記的崗位上。北高加索代表團同意了這一建議。」<sup>136</sup> 類似的一幕也出現在5月25日中部工業區代表團和伏爾加河流域代表團聯合舉行的會議上 (由斯大林的兩名支持者伊賽·「菲

利普]·戈洛曉金(Isai “Filipp” Goloshchokin)和尼古拉·烏格拉諾夫主持)，出現在5月26日烏拉爾、西伯利亞、遠東、巴什基爾和維亞特卡省各代表團聯合舉行的會議上(由忠實的季諾維也夫分子米哈伊爾·拉舍維奇主持)。這些經過精心策劃的會議接受了關於斯大林同意列寧的批評並承諾改正自己行為的保證，接受了有關他已經有所改進而且在承受巨大的負擔，以及不管列寧有甚麼樣的擔心，畢竟時間已經表明斯大林並沒有因為其性格而濫用權力等說法。<sup>137</sup> 代表大會之後，新的中央委員會一致同意再次選舉斯大林為總書記。<sup>138</sup> 就連山洞會議上增補季諾維也夫和托洛茨基為組織局委員的決定也正式取消了。

儘管和謠傳的相反，列寧的口授文件在很大範圍內作了宣讀和討論，但很多揭示實情的文件依舊禁止公開。例如，一群失業工人曾經給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和斯大林三位同志(按照俄語字母順序)寫過一封信，說「同志們，沒有人在認真討論上百萬失業大軍的問題」。<sup>139</sup> 寫信者徒勞地要求在大會上宣讀他們的來信，同時還說，「我們要求，給我們工作，給我們麵包，讓我們能夠謀生，那樣，我們的家人就不會在充滿『光輝』的地方餓死」。<sup>140</sup> 農村的人們也一樣憤怒。「你們這些赤色屠夫要知道，農民的耐心這座鍋爐總有一天會爆炸的，」據警察機關的報告，1924年，有個憤怒的村民對鼓動人員大聲喊道，「你們要知道，農民在晨禱時詛咒你們這些篡位者……哪裏有真理？哪裏有公義？你們為甚麼要用自由、土地、和平、平等之類的字眼愚弄我們？」<sup>141</sup>

549

### 法西斯主義的教訓

世界大戰的時代，除了布爾什維主義之外，另一個比較大的反對憲政自由秩序的群眾運動是法西斯主義。早在1922年，法西斯黨在表現最好的這次公開選舉中僅贏得500個席位中的35席，貝尼托·墨索里尼卻罔顧這一事實，要求當總理，否則他就帶領黑衫軍(*squadristi*)向羅馬進軍。隊伍隨便武裝了一下，人數也誇大了。<sup>142</sup> 所謂「進軍」，不過是虛張聲勢和心理戰，國王維托里奧·埃馬努埃萊三世(Vittorio Emanuele III)似乎準備召集軍隊驅散這些暴徒。但一想到要流血，這位



國王就退縮了，而裝備精良的軍隊也沒有自行採取行動。<sup>143</sup>相反，將軍們以及有影響的工商界人士、教皇，甚至一些憲政主義者都認為，應該將墨索里尼當作左翼的解藥，給他一個「恢復秩序」的機會。搖擺不定的國王打電報給墨索里尼，要他成為聯合政府的總理（眾議院只有35個法西斯分子）。<sup>144</sup>1922年10月30日，這位39歲的法西斯領袖坐着豪華臥鋪車來了，他在抵達羅馬前的最後一站下了車，然後再好似進軍一般來到羅馬。墨索里尼差點就失去了勇氣，結果是一位同志讓他下了決心。<sup>145</sup>直到他被任命為總理之後，才有2萬名法西斯分子進軍羅馬。他們中的許多人都沒能在指定地點集合，而在真正來到指定地點的那些人當中，許多都缺少武器或食物。在黑衫軍像征服者一樣在羅馬到處遊行並向無名烈士墓以及王宮致敬之後——他們按照古羅馬的方式（伸直右臂）向國王敬禮——墨索里尼把他們送回了家。<sup>146</sup>但他們能夠在羅馬出現卻創造了一個政變成功的神話。

550 法西斯主義讓莫斯科的共產黨人大惑不解。檢察官葉梅利揚·雅羅斯拉夫斯基審理過想要成為蒙古征服者的施虐狂馮·溫格恩—什捷爾恩貝格男爵，他在1922年10月3日從羅馬寫信給列寧，預言說意大利的法西斯主義即將奪取政權，並指出他們的組織能力正在影響到「被法西斯分子的力量所打動的」工人，還說「我們的意大利同仁」（即意大利共產黨）「有些東西是要向法西斯分子學習的」。<sup>147</sup>但雅羅斯拉夫斯基很有預見性的猜測——法西斯主義是能夠吸引住工人和農民的右翼運動——在莫斯科並沒有受到重視。相反，《消息報》從10月31日開始，連續幾天轉載了共產國際的講話，強調墨索里尼出身社會黨（不是共產黨），並將意大利社會黨與法西斯主義的勝利聯繫起來。<sup>148</sup>變節的社會黨人墨索里尼很快就像資產階級敵人一樣，用燕尾服、翼領和鞋罩把自己裝扮起來，從而加強了社會主義者與法西斯分子在表面上的聯繫。德國工人對社會民主黨人的忠誠，強化了共產黨人思維中的這種與墨索里尼的生平及衣着相關的膚淺印象，尤其是在1923年秋天共產黨人暴動失敗期間。但是，法西斯主義和社會民主主義實際上是不共戴天的敵人。（事實上，就像有歷史學家說的，布爾什維主義和法西斯主義都是「社會主義中的異端」。）<sup>149</sup>此外，當共產黨人在意大利和德國造成左

翼的分裂並使右翼行動起來的時候，在意大利把法西斯主義扶上台的是傳統的右翼，而不是社會民主黨人。

斯大林很顯然沒能理解法西斯主義。他接受的是列寧的觀點，認為在布爾什維克之外的那些左翼力量，比如孟什維克、社會革命黨以及其他溫和派，是所有反革命中最危險的，因為他們隱藏在社會主義的面具背後。左翼的這種分裂不但加深了對法西斯主義的誤解，還在共產國際第五次代表大會上在全球範圍內被制度化了——那次大會是1924年6月17日至7月8日在大克里姆林宮華麗的安德烈耶夫廳召開的，出席大會的有來自46個政黨和49個國家的504名代表。代表大會是在「布爾什維克化」這個明確的口號下舉行的，這意味着各個成員黨要按照列寧主義的路線組織起來，要與「小資產階級傾向」作鬥爭，同時也意味着俄國化，從而有助於擴大斯大林在共產國際的影響（他不會說德語）。<sup>150</sup> 斯大林接替了托洛茨基在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的位置。<sup>151</sup> 在沒完沒了地控訴托洛茨基及其外國「走狗」的時候，一名來自法屬印度支那\*的代表插話說：「我覺得同志們還沒有充分領會到全世界無產階級的命運……是和各殖民地被壓迫民族的命運緊密相連的。」他名叫阮愛國，通常被稱為胡志明。<sup>152</sup> 儘管會議的氣氛比較激烈，但代表們在議程結束時仍然集體唱起了《國際歌》。大會代表還瞻仰了列寧的遺體，而且大會期間有次會議就是在紅場上進行的，發言者就坐在立方形陵墓的頂端。<sup>153</sup> 但第五次代表大會最突出的就是讓季諾維也夫在講話中說的「法西斯分子是資產階級的右手，社會民主黨人是資產階級的左手」成了一種約定俗成的分析。斯大林在講話中重申了這一觀點，認為共產國際需要的「不是和社會民主主義聯合，而是要把它當作法西斯化的政權的支柱進行殊死鬥爭」。<sup>154</sup>

551

如果說意大利的法西斯主義提供了一個重要的教訓，說明斯大林的思維方式存在重大的局限，那它的故事還提供了一個絕好的教訓，說明專政體制是如何紮根的。1924年4月，總理墨索里尼的「國家名單」

---

\* 編註：今越南、老撾與柬埔寨。

贏得了66.3%的選票，而社會黨和共產黨只有14.6%，天主教人民黨9.1%。這讓法西斯分子得到了535席中的374席。5月30日，賈科莫·馬泰奧蒂(Giacomo Matteotti)——威尼托一個富裕家庭的兒子、博洛尼亞大學法律學院畢業生、統一社會黨領導人，他一貫批評墨索里尼並且擁有巨大聲望——指責法西斯分子有恐嚇和公然舞弊的行為，要求宣佈選舉結果無效。「我要講的話都講了，」他在最後說，「你們為我準備悼詞吧。」<sup>155</sup> 11天後，他被人塞進一輛小車，用木工刀捅了很多次，然後被人打死。兩個月後的8月16日，他的屍體在離羅馬大約20英里\*遠的一座淺墳裏被人發現。殺害他的動機是甚麼，現在仍不太清楚。<sup>156</sup> 但此事和法西斯分子有關是早已有了定論的：與法西斯秘密警察有聯繫的五個兇手在當時差不多立即遭到逮捕。說墨索里尼參與或至少知情，那是推測；這從來沒有得到證明或證偽，但謀殺事件對於他擴大自己聯盟的密謀起了破壞作用，還差點使他的政府倒台。街頭發生了反法西斯示威活動，還有傳聞說要舉行總罷工，議會中墨索里尼的許多溫和派支持者都摘掉了他們的法西斯黨徽。(托斯卡尼尼以這裏不是「啤酒園」為由，拒絕在斯卡拉歌劇院演奏法西斯青年的黨歌《青年》。)<sup>157</sup> 受到質疑的墨索里尼有點躲躲閃閃。到了1924年12月，人們普遍認為他會被迫辭職。國王拒絕解除墨索里尼的職務，於是，反法西斯議員為了向他施壓，離開議會退往阿文提諾山，那裏是古羅馬的平民對貴族進行復仇的地方。<sup>158</sup> 他們的愚蠢行為讓人想起了1917年10月退出蘇維埃代表大會的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

552 有歷史學家解釋說，意大利參議院反法西斯議員的領袖，「主張用突然襲擊(*coup de main*)的方式逮捕墨索里尼」，但是，大部分反法西斯議員都拒絕使用非法的手段。<sup>159</sup> 與此同時，強硬派法西斯分子也在向墨索里尼施壓。他們指責對馬泰奧蒂的謀殺太愚蠢，要求自上而下革新法西斯主義，並威脅他說要發動政變，再一次向羅馬進軍。<sup>160</sup> 1925年1月3日，墨索里尼在議會發表講話時說：「我在此宣佈，在這莊嚴的

\* 編註：約32公里。

會議前面，在所有的意大利人民面前，我，而且是我獨自一人，為已發生的一切承擔政治的、道義的和歷史的責任。」他想看看那些在場的人敢不敢起訴他。他們不敢。1月10日，他發佈法令，宣佈除法西斯黨之外，所有政黨都不受法律保護，而且他還開始控制報刊。他拒絕讓對手們回到議會，並宣佈由於退出議會，他們已失去議員資格。直到這個時候，意大利才從君主立憲變成了一黨專政。法西斯黨的黨員證成了在大、中、小學獲得教職的先決條件。很快，墨索里尼便開始自稱為領袖 (*duce*)。讓法西斯奪得政權的不是1922年的向羅馬進軍，而是在馬泰奧蒂危機中擊敗反對者，一舉扭轉局面。

在歷史上，有些時刻本來可以卻沒有成為轉折點，或者是轉向了相反的方向，就像1924年在法西斯意大利和蘇聯同時發生的那樣——前者是因為反對派退出了議會以及國王的原因，後者是因為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代表大會是斯大林有軟肋的少數時刻之一，而且他在大會召開前的全會上已經提出解除自己的職務，因此，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本來可以把該項措施列入大會議程。他們不可能察覺不到斯大林的野心。<sup>161</sup> 也許他們以為披露口授文件，讓他受傷就可以了。不過，單是從機會主義的立場出發，他們就該利用所謂的列寧口授文件去拿下這位總書記。在意大利，如果墨索里尼的政治生命毀滅，風雨飄搖的議會制度本有可能在街頭戰鬥隊的壓力和國王的軟弱無能中倖存下來，儘管也有可能推動法西斯中最強硬、最卑鄙的地方首領羅伯托·法里納奇 (Roberto Farinacci) 之流崛起，而此人或將推動更激進的法西斯主義社會革命。在蘇聯，由於斯大林的競爭對手都很平庸，解除他職務的結果有可能只是暫時的；基於同樣的原因，也有可能會加速由他所維持的一黨統治的最終瓦解。

就像墨索里尼克服了馬泰奧蒂危機一樣，斯大林也克服了列寧口授文件所引發的危機，不過，斯大林沒有能夠全身而退。出席黨的第十三次代表大會的近1,200名代表見證了他所受到的羞辱。其中許多人無疑又把情況講給了他們所代表的75萬黨員。巴黎的孟什維克流亡分子的報紙《社會主義通報》(1924年7月24日)，提到了列寧的口授文件。<sup>162</sup> 漸漸地全世界都知道了：列寧曾要求解除斯大林的職務。

## 蘇聯的地緣政治理論

在莫斯科，很難用幾句話說清楚這樣一種局面：蘇聯有意成為全球秩序的新選項，而現存的秩序又並未消失。<sup>163</sup> 到1920年代中期，約有20個國家——這其中不止日本和波蘭，還包括幾乎所有的主要國家，例如德、英、法、意（美國除外）——都承認了蘇維埃國家，但誰都沒有把這個共產黨專政的國家看作是一個親密而又可信賴的夥伴。鑒於蘇聯的行為，它們怎麼可能這麼看呢？<sup>164</sup> 在某種意義上，蘇聯與當時的其他任何國家沒甚麼兩樣，都在設法攔截和破譯外國人的無線電信號和郵件。事實上，從1921年開始，一個特別的密碼部門就能讀懂外國使館從莫斯科發往柏林和安卡拉的加密電報，波蘭的密碼也在1924年得以破譯（日本的密碼在1927年破譯）；這進一步加深了蘇聯本來就很深重的懷疑心理，認為「外交關係」就是同敵人打交道。<sup>165</sup> 同時，英國人也破譯了蘇方的密碼，因而可以對共產黨在內部和外部說的話進行比較，結果失去了對蘇方本就很薄弱的信任。然而斯大林和他那些好管閒事的外國同行不一樣，他不太理解，或者說沒甚麼興趣，為甚麼在外交事務中還要同時建立信任關係。在蘇聯領土上的外國使館被當作帝國主義的特洛伊木馬——就連至關重要的貿易條約也被當作「帝國主義代理人」的刺探和顛覆活動——另一方面，蘇聯也在一邊與外國進行外交和經濟的往來，一邊利用自己的駐外使館煽動這些國家的共產黨發動政變。<sup>166</sup>

作為蘇聯之外唯一發生過共產黨式的「革命」的國家，蒙古有着特殊的地位。列寧去世的時候，德國大使烏爾里希·馮·布羅克多夫-蘭曹伯爵（Ulrich von Brockdorff-Rantzau）以駐莫斯科全體外交官的名義敬獻花圈，但蒙古大使本人向「全世界勞苦大眾的領袖、弱小民族的朋友和捍衛者」專門送了花圈。<sup>167</sup> 1924年，類似於君主的首領博克多格根去世，時年55歲。當時沒有按照傳統的方式確定他的轉世化身，而是在蘇聯人的監督下成立了「蒙古人民共和國」。<sup>168</sup> 蘇聯「顧問」已經在牽着蒙古名義上的領導人背後的繩子。<sup>169</sup> 在蒙古版的奧格伯烏成立後，蒙古黨的黨員數量因清洗而減少了一半；接着又發生了多起神秘的死亡事件，死者包括幾位最早的蒙古革命家，而他們還向蘇聯尋求過幫助。

德國外交部一名官員在訪問時發現，蒙古「實際上正在變成俄國的一個省」。<sup>170</sup> 儘管由蘇聯領導的建立單一中央集權的貿易合作社的嘗試失敗了，儘管蒙古的入學兒童只有400人，可政治洗腦的工具依然出現了：1924年11月10日，在西伯利亞的伊爾庫茨克出版了第一期蒙語報紙，那是蒙古人民黨的喉舌。<sup>171</sup> 要在一個牧人和僧侶的國度建立社會主義秩序，這給共產主義的實踐和理論提出了一些深刻的難題。不過，衛星國蒙古最直接的作用，是作為亞洲民族解放的前出基地為蘇聯的安全利益服務。

至於歐洲，再次發動共產黨政變的夢想並未因為在德國和保加利亞的失敗而破滅。人稱揚·別爾津(Jan Berzin)的蘇聯軍事情報機關負責人、前拉脫維亞步槍團成員彼得里斯·庫濟斯(Pēteris Kuzis)，在1924年春天派遣大概60名特工人員潛入愛沙尼亞，準備和愛沙尼亞共產黨一起奪取政權。<sup>172</sup> 但愛沙尼亞反間諜機關加快滲透當地共產黨地下組織，結果在1924年11月10至27日的審判中，有149名當地共產黨人受到指控，罪名是參加秘密的共產黨組織(該黨已遭到取締)，是蘇聯的奸細。7人被判無罪，但是對於那些被判有罪的人，處罰很嚴厲：1人死刑；39人終身監禁；28人15年監禁。

無論如何，莫斯科還在繼續準備暴動。<sup>173</sup> 12月1日星期一，拂曉時分，幾百名波羅的海沿岸地區的地下黨員、蘇聯商船上的武裝裝卸工人和蘇聯領事館的工作人員分成若干小分隊，襲擊了愛沙尼亞首都塔林的各個戰略要點。<sup>174</sup> 黑暗中，暴動人員在兵營裏四處追逐衣衫不整的士兵，扔手榴彈——保險栓沒拔——還爬進坦克，卻沒想到坦克車庫的出口被堵住了。<sup>175</sup> 儘管如此，這些小分隊還是把最主要的火車站佔據了兩小時，他們在那裏殺死了鐵道部長(他是趕來調查情況的)。他們還佔領了政府首腦(州長老)的宅邸和一處軍用機場。但原計劃一同進行的工人起義並未實現。到上午10時，政變結束。<sup>176</sup> 按照官方的統計，250多名暴動人員有12人在交火中身亡；後來又死了一些，而在長達數月的搜捕中，被捕的約有2,000人。有些人逃到了蘇聯。蘇聯的報紙想當然地寫道，愛沙尼亞的工人起義遭到了「資產階級白衛分子集團」的鎮壓。<sup>177</sup>

就在這個時候，斯大林在《真理報》上又發表了一篇猛烈抨擊托洛茨基的文章（1924年12月20日），並把它作為自己的文集《走向十月革命的道路》（1925年1月）的序言，標題是〈論一國社會主義〉，\*認為社會主義能夠在一國建成。<sup>178</sup>同樣的話斯大林在1917年8月黨的第六次代表大會上也說過，現在實際上只是在肯定蘇聯這七年的存在。列寧之前已經悄悄地接受了這一觀點，認為如有必要社會主義是可以在一國建成的。<sup>179</sup>就連托洛茨基也在1923年春天，在斯維爾德洛夫共產主義大學的一次非公開演講中認為，「如果除俄國之外的整個世界都崩潰了，我們會不會毀滅？……不會，我們不會毀滅，因為我們的資源，因為我們佔地球的六分之一」。<sup>180</sup>誠然，當斯大林的〈論列寧主義基礎〉在1924年4月和5月在《真理報》上連載並以《論列寧和列寧主義》為題出版單行本（1924年5月）的時候，裏面有段話否認了在一國建成社會主義的可能性，但是在1924年底再版的時候，那段話被刪掉了。<sup>181</sup>而且斯大林只是宣佈率先在一國建成社會主義的可能性，因為他強調社會主義的「最後」勝利，需要幾個國家的無產階級的幫助，強調世界革命仍會發生，最有可能是因為受帝國主義壓迫的那些國家發生起義，而那些國家有望得到蘇聯的幫助。這意味着社會主義在一國的勝利實際上「具有國際性質」，意味着俄國負有特殊的使命，而這種使命現在披上了革命的外衣。<sup>182</sup>在他的著述中，這篇文章受到的誤解最多，但在最初發表的時候，並未引起甚麼爭議。<sup>183</sup>

歐洲的孟什維克報紙《社會主義通報》把斯大林的立場誇張地說成是「歐洲算得了甚麼——我們自己能行」。<sup>184</sup>這種觀點在俄國的確是根深蒂固。過去帝俄的國際姿態搖擺不定，一方面想和西方建立同盟，另一方面，作為拜占庭帝國和蒙古人宏偉的歐亞帝國的繼承人，又想在一個完全屬於自己的空間，擔負起拯救世界的特殊使命。斯大林對「一國社會主義」的論述，表面上看來就像是這樣的一篇獨立宣言——蘇聯用不着等待西方的革命也可以前進——也因此像是耽溺於那空間不斷擴張卻又自我設限的老調陳腔之中。但是，擺好防禦的架勢，實際上並不

\* 譯註：在《斯大林全集》第6卷中的標題是〈十月革命和俄國共產黨人的策略〉。

能讓俄國擺脫西方：西方仍然很強大，在地緣政治上仍然是一種威脅，況且它們還擁有對俄國（以及現在的蘇聯）來說不可或缺的先進機器。把俄國視為堡壘的態度雖然有誘惑力，卻根本不管用，這一點別說是托洛茨基，連斯大林也很清楚。他的〈論一國社會主義〉一文的關鍵，不在於對西方的那種有些想當然的輕蔑態度，而在於有段話中他認為，布爾什維克取得勝利之所以相對容易是和三個外部情況有關，而那三個外部情況又都和世界大戰有關：存在「兩個帝國主義集團，即英法集團和德奧集團」，它們忙於殊死搏鬥，無暇認真關注俄國的革命；可惡的戰爭在俄國激起了對和平的渴望，這讓無產階級革命似乎成了擺脫戰爭的唯一出路；戰爭在各帝國主義國家引發了強大的工人運動，而那些工人對俄國革命抱着同情的態度。<sup>185</sup> 換句話說，就在斯大林用階級分析的方法對法西斯主義作出淺陋理解的同時，他在思想上也取得了突破，把革命與戰爭——而不僅僅是階級——聯繫起來。

另外，斯大林還承認，世界革命給蘇聯提供了工具，可以承擔起全球性的特殊使命，突破受到圍困的地緣政治空間。從古莫斯科大公國開始，俄國總是以邊界敞開、缺乏安全感為由，通過犧牲較弱的鄰國（瑞典、波蘭、奧斯曼帝國、中國）來擴大自己的疆域。闖入中亞和滿洲，在那裏修築鐵路，以縮短到符拉迪沃斯托克的路程，過去這些帶有純粹冒險主義色彩的行為，現在可以看作是一種合乎邏輯的進步，不這麼做的話進步就會半途而廢。<sup>186</sup> 布爾什維克煽動世界革命，在某種程度上是終極的「防禦性」擴張主義。但是，沙皇時代的邊疆地區容易受到外國勢力的影響，與國內沙皇制度的反對者一起惹是生非，而現在的邊疆地區則有許多羽翼豐滿的反蘇國家：愛沙尼亞、拉脫維亞、立陶宛、芬蘭、波蘭、羅馬尼亞。按照蘇聯人的說法，這些國家被稱為「邊陲國家」。它們要求列強擔負起重任，確保小國間的合作，以備再次對蘇聯發動武裝干涉，可在蘇聯人眼中，這些小國不過是世界帝國主義陰謀中的玩物。斯大林之所以要在愛沙尼亞發起暴動，部分原因就是為了不讓反蘇武裝在波羅的海沿岸地區獲得採取行動的基地。<sup>187</sup> 蘇聯的情報分析報告稱，1924年，芬蘭與波羅的海三國召開過一次會議，交換了有關蘇聯的情報——那些情報是靠設在赫爾辛基、里加、塔林（列



維爾)、利沃夫和維爾諾的監聽站得到的——並準備在希望與移居國外的親人團聚的流亡者家屬中間招募特務。<sup>188</sup> (這類情報更容易使人把前帝俄領地的獨立看作是非法的。)<sup>189</sup> 斯大林如此熱衷於在德國發動共產黨政變，也是出於對俄國國際處境的考慮，因為在他看來，政變是對獨立的波蘭以及波羅的海國家的打擊，否則沒有辦法解釋那種狂熱。

在1925年1月19日討論國防預算的中央全會上，斯大林關於在愛沙尼亞政變失敗的講話很能說明問題。他在會議議程中增加了讓托洛茨基繼續擔任陸海軍人民委員和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的議題。<sup>190</sup> 托洛茨基不想等別人來解除自己的職務，就在1月15日提交辭呈，然後再次前往南方的阿布哈茲。<sup>191</sup> 加米涅夫順水推舟，建議由斯大林接替托洛茨基的軍事職務，但斯大林不想放棄或放鬆他對黨的機關的控制。<sup>192</sup> 剛被任命為政治局候補委員、已經在負責陸海軍人民委員部日常工作的米哈伊爾·伏龍芝，從第一副手晉升為人民委員。<sup>193</sup> 但是全會對於愛沙尼亞事件的分析同樣值得注意。斯大林認為：「那裏的人民開始行動起來了，製造出一些聲音，並試圖得到某些東西，但所有的事實表明，如果沒有紅軍的存在，如果不能團結一致、提高警惕並〔在民眾中〕造成事實，那就做不成甚麼重要的事情。」他還說：「我們的旗幟依然是和平的旗幟。但是，如果戰爭一旦爆發，我們就不應該坐着不動。我們必須行動，但我們是最後行動。我們行動的目的是為了把有決定性的砝碼、把能夠舉足輕重的砝碼放在天平盤上。由此應該得出結論：要準備對付一切，要準備好自己的軍隊，要供給軍隊鞋子和衣服，要訓練軍隊、改進技術裝備，要改進化學部隊和空軍，要把我們紅軍的水平普遍提到應有的高度。這就是國際形勢要求我們做的事。」<sup>194\*</sup>

在列寧去世的週年紀念日(1925年1月21日)之後，斯大林重申了自己關於戰爭與革命的主題，當時，紅軍政治部在停止向托洛茨基匯報後，沒過幾天就下發了一張推薦讀物清單，排在首位的是斯大林的《論列寧和列寧主義》。<sup>195</sup> 「同志們，這似乎很奇怪，但這是事實，」斯大林

\* 譯註：《斯大林全集》第7卷，第14-15頁。

在1月27日莫斯科黨組織代表會議上說，「如果資本主義國家的兩個主要聯盟在1917年帝國主義大戰中不互相進行殊死的鬥爭，如果它們不互相扼住喉嚨，如果它們不是自顧不暇，沒有工夫來反對蘇維埃政權，蘇維埃政權當時就未必站得住腳。重複一遍，我們敵人之間的鬥爭、衝突和戰爭是我們極大的同盟者。」<sup>196</sup> 蘇聯的地緣政治理論誕生了。

558

## 拒絕與歐洲和解

斯大林幻想資本主義內部會發生戰爭，從而使自己坐收漁利，這一點是可以理解的。共產黨人似乎陷入了過去困擾沙俄外交政策的兩難境地：是像杜爾諾沃主張的那樣面向德國，還是像倒臺的沙皇政權選擇的那樣面向英法。<sup>197</sup> 與列寧一樣，斯大林也把英國視為世界帝國主義的主要支柱，這是透過馬列主義稜鏡折射出的那種在帝俄時代就很常見的恐英情緒。此外，重建法俄同盟的可能性之所以變小，不只是因為法國人憎惡共產黨政權，也是因為波蘭國家在德國另一側的復活削弱了俄國的戰略價值；為了遏制柏林，巴黎的目標轉向了與華沙的夥伴關係。就斯大林而言，他主要操心的倒不是遏制德國，那是沙皇時代與法國結盟的理由，他考慮的主要是從德國那裏得到好處：可以和它團結起來反對凡爾賽體系，也從德國得到轉讓的技術。但斯大林一定會大吃一驚，因為兩大敵對集團曾為沙皇俄國提供一個攸關生死的選擇，而蘇聯連這個選擇也被奪走了。

蘇聯率先採取了某些措施。斯大林鄙視資本主義列強的要求，尤其是英國人的要求，即在雙邊協議中須有不得進行宣傳之類的條款——英國人不停在宣傳，指責蘇聯的內政，比如說鎮壓活動，就好像他們的警察沒有毆打罷工工人似的——但蘇聯人忍氣吞聲，象徵性地宣佈放棄共產國際在英帝國的宣傳。<sup>198</sup> 這讓蘇聯在1924年2月從英國那裏得到了夢寐以求的外交承認，接着又在1924年8月8日，與英國歷史上的首

---

\* 譯註：《斯大林全集》第7卷，第26-27頁。

559

屆工黨政府就簽訂商務條約草案一事達成協議。該條約草案為英國商品提供最惠國待遇，而作為交換，蘇聯將會獲得大筆貸款，雖然只是在成功解決沙皇時代債務法律地位問題的談判之後。<sup>199</sup> 後一個交易尚未得到確認，英國就在10月29日舉行議會選舉，結果工黨選舉失敗（由於英國情報機關的暗中破壞）。保守黨的斯坦利·鮑德溫（Stanley Baldwin）成為首相。新任英國外交大臣奧斯丁·張伯倫（Austen Chamberlain）向莫斯科遞交了官方照會，說「陛下的政府認為，不能把這些條約推薦給議會考慮或者是提交給國王陛下批准」。當時出現了一封偽託季諾維也夫之名的信件，似乎證實了共產國際在不列顛群島從事顛覆活動以及工黨與莫斯科在政治上的眉來眼去。<sup>200</sup> 當反共利益集團在英國活動的時候，在蘇聯，遠遠不是所有的共產黨人都能認識到，給英國吸血鬼資本家償還淌血的沙皇政權欠下的債務具有重要意義。<sup>201</sup> 不過，各個主要的資本主義國家的力量不容小覷。<sup>202</sup> 西方擁有技術。

莫斯科還實現了與柏林的商業往來——其意義被外交承認掩蓋了——因而有望在德國的幫助下，推動蘇聯工業的現代化，但是在這裏，共產國際也產生了持久的影響，特別是共產黨人在德國發動的未遂的暴動。<sup>203</sup> 柏林方面指責德共勾結德國右翼民族主義分子反對魏瑪共和國，蘇聯人則對德國謀求與西方的和解極為憤怒。在蘇聯軍方情報機關截獲的一份秘密文件中，德國國內的親西方分子斷言，「毫無疑問，莫斯科準備犧牲德國的利益」。<sup>204</sup> 但是在德國的外交界也有一個「東方派」，其代表人物就是德國駐莫斯科大使烏爾里希·馮·布羅克多夫—蘭曹伯爵。他支持過高爾察克和其他反布爾什維克武裝，但在他們最終失敗之前，他就準備充分利用布爾什維克政權。<sup>205</sup> 在擔任魏瑪共和國首任外交部長的時候，布羅克多夫—蘭曹率領德國代表團參加過1919年的凡爾賽條談，公開宣稱如果只有德國認罪，那無異於說謊。他還警告，凡爾賽條約的內容會讓德國的民族主義與社會主義聯合起來。<sup>206</sup> 之所以要同蘇聯人建立緊密的關係，在他看來是為了對付法國的凡爾賽投降令，並讓德國再次擔負起在世界上的特殊使命。當然，他厭惡布爾什維主義，但也憎恨法國除干邑白蘭地之外的一切，而且他擔心自己在柏林的同事會讓德國與英國結盟，從而把蘇聯人推向法

國的懷抱，那就是在重複世界大戰中兩線作戰的錯誤。這位伯爵與同樣是貴族出身的契切林有了共同的追求，他們甚至都習慣於在夜間工作（兩人常常在午夜過後會晤）。<sup>207</sup> 最重要的是，契切林和布羅克多夫—蘭普的雙人舞，符合斯大林恐英親德的列寧主義傾向。

560

蘇德關係中的一個隱藏維度是秘密的軍事合作，那在列寧執政時就開始了。<sup>208</sup> 凡爾賽條約對德國軍隊的規模、訓練、武器生產甚至是否可以在國外派駐武官，都有嚴格的規定，但蘇聯人表示德國可以不遵守這些規定。大型的德國製造商（比如布洛姆—福斯公司、克虜伯公司、信天翁飛機製造廠）可以在蘇聯境內生產潛艇、飛機和大炮，而魏瑪防衛軍也獲得了秘密的訓練設施。至於蘇聯人，他們是想吸引德國公司以租賃或特許經營的方式，接管並振興瀕臨倒閉的武器工廠。莫斯科歡迎「非官方」德國軍事代表團，該團打的旗號是核實德國在蘇聯境內的經濟特許權，在秘密文件中被稱為「莫斯科中心」，為首的是一位「阿拉伯的勞倫斯」式的人物，名叫奧斯卡·馮·尼德邁爾（Oskar von Niedermeyer）。他曾在世界大戰中率領代表團出使過阿富汗和奧斯曼帝國，號召各個部落反對英國人。除了合作，德國人還利用「莫斯科中心」搜集情報，但容克公司的確重新開了一家飛機廠，就在莫斯科郊外（菲利）。<sup>209</sup> 同時，德國還有望在財政上為蘇聯遠遠超出軍事範圍的工業採購提供巨大的便利。契切林知道馮·布羅克多夫—蘭普直接聽命於德國總理，於是就在1924年秋天向這位大使提出，把拉帕洛夥伴關係擴大為「大陸集團」，與法國一起對抗英國；他還強調說，蘇聯與英國在亞洲存在利益衝突。<sup>210</sup>

再說柏林，那裏對蘇聯人的懷疑仍然沒有消除，人們普遍認為德國需要英國的支持，以便同法國作鬥爭，修正凡爾賽條約；德國拒絕了蘇聯的建議。<sup>211</sup> 在大陸集團議題上受挫後，契切林在政治局的全力支持下，提議建立蘇德雙邊同盟。<sup>212</sup> 德方沒有馬上就拒絕這一想法，因為雙方都對波蘭存在敵意和領土要求，但是對於後者，至少從契切林表達的意思來看，蘇方還在猶豫，因為契切林想要的不是重新瓜分波蘭，而是不要經由波蘭領土或從波蘭領土出發侵犯蘇聯的安全保證。<sup>213</sup> 蘇聯人沒有忽視法國的作用，而法國也承認了蘇聯（1924年10月），但法國

561

的保守分子極為憎惡飄揚在重新建立的大使館上方的紅旗。共產國際官員卡爾·拉狄克在德國報紙上談到蘇聯與法國的談判，但這並沒有觸動柏林。雖然有拉帕洛條約的突破，但德蘇間的逢場作戲就像是形式婚姻，雙方互相欺騙。斯大林這時正在大談「英美之間由於石油，由於加拿大，由於銷售市場等等而引起的鬥爭；英美集團和日本之間由於東方市場而引起的鬥爭；英法之間由於爭奪歐洲的勢力而引起的鬥爭；以及被奴役的德國和佔統治地位的協約國之間的鬥爭，——這些大家都知道的事實表明，資本的成就是不鞏固的，資本主義『恢復健康』的過程裏隱藏着它內部衰朽和瓦解的前提」。<sup>\*</sup>接着，德國外交部長古斯塔夫·施特雷澤曼伸出了觸角，想要實現與協約國關係的正常化。<sup>214</sup>

英國優先考慮的是自己的帝國，它不想在歐陸投入過多的資源，因而迫切希望在政治上和經濟上整合德國，以消除想像中的戰爭基礎，甚至也許可以讓德國去控制蘇聯。英國外交大臣奧斯丁·張伯倫對於法國在安全上的關切十分敏感，這在倫敦的高級官員中十分難得，但他一心想把德國從蘇聯那裏撬走。然而就施特雷澤曼來說，他仍想保持蘇德間的軍事合作。1925年4月15日簽訂了開辦航校的協議，並在蘇聯的利佩茨克市破土動工（不到兩年航校就會全面啟用）。<sup>215</sup> 1925年8月，魏瑪防衛軍軍官首次觀摩了紅軍演習（他們到達時假扮成德國工人共產黨員）。一群裝扮成保加利亞人的紅軍軍官回訪德國，觀摩了秋季軍演。「德軍指揮機構想方設法不讓我們和士兵接觸」，1925年10月3日，代表團團長米哈伊爾·圖哈切夫斯基向莫斯科匯報說。而且他還說，「秘密觀摩是被接受的」。（可以想見，為蘇聯人開車的德國司機其實懂俄語，卻假裝不懂。）令圖哈切夫斯基印象特別深刻的是：「士兵們紀律嚴明。我沒有看到軍官粗暴對待士兵的現象，但我的確看到了中士粗暴對待士兵的現象……有人注意到，在野戰指揮部和總參謀部的軍官中貴族的比例很高。」<sup>216</sup> 可就在此時，施特雷澤曼與西方的接觸有了結果。

<sup>\*</sup> 譯註：《斯大林全集》第7卷，第47頁。

洛迦諾公約包括七個協議，是英國、法國、意大利、比利時與德國及波蘭和捷克斯洛伐克之間在度假勝地馬焦雷湖畔通過談判達成的（1925年10月5-16日）。德國承認它在西部的邊界（萊茵蘭），實際上就是把阿爾薩斯和洛林割讓給法國，並同意對其東部邊界含糊的仲裁結果，其實就是為將來的修正留下餘地。德國有了加入國際聯盟的機會，從而可以擺脫自己低下的地位。「戰爭的大門關上了」，法國外交部長阿里斯蒂德·白里安（Aristide Briand）宣佈（以前在凡爾登受到圍攻時他曾擔任過政府首腦）。但是對於德國與其東部幾個鄰近小國的關係，當時並未作出類似的不侵犯保證或共同擔保。波蘭外交部長約瑟夫·貝克（Józef Beck）後來抱怨說，「那是正式要求德國進攻東方，以換取西方的和平」。已退休的前國家元首約瑟夫·皮爾蘇茨基評論說，「所有誠實的波蘭人聽到這個詞〔洛迦諾〕都會啐一口」。<sup>217</sup> 儘管如此，三個主要的人物（白里安、施特雷澤曼和張伯倫）後來全都得了諾貝爾獎。沒有接到邀請的蘇聯人驚恐地發現，德國顯然已被拖回到西方的軌道，成了據信以英國為首的反蘇同盟的一分子。契切林倒是讓施特雷澤曼作出承諾，說德國不會參與對蘇聯的制裁，也不會謀求與波蘭恢復邊境友好關係。<sup>218</sup> 但是對德國動機的懷疑仍然沒有打消。蘇聯報刊談到了「一個聯合起來的帝國主義反蘇集團」。<sup>219</sup>

洛迦諾公約意味着兩個資本主義集團達成了協議，這就讓斯大林的理論——蘇聯可以從即將發生的資本主義的內部戰爭中坐收漁利——有了破產的危險。這是資本主義的「穩定」嗎？<sup>220</sup> 在準備1925年底的講話時，斯大林在筆記中苦苦思考洛迦諾公約的意義。「他們想要重複普法戰爭前存在的『保證條約』的歷史，」他寫道，「無論是過去還是現在，為了準備新的戰爭而對各種力量進行編組的活動都是隱藏在保障和平的說法（和平的保證）下面的。」但是在過去，斯大林繼續寫道，俄國是帝國主義小集團的炮灰，而現在「俄國不可能也不願意要麼成為資產階級國家的武器，要麼是後備軍，要麼是炮灰」。他還着重提到了英國保守黨人的花招，因為他懷疑他們正在陰謀利用波蘭對付蘇聯。<sup>221</sup> 在1925年的其他講話中，斯大林認為國際形勢的特點與世界大戰即將爆發的那段時間很相似。<sup>222</sup> 換句話說，他拒絕接受資本主義能夠持久穩定的觀

念。洛迦諾公約雖然讓斯大林很是震驚，但他仍然堅持認為，帝國主義集團之間肯定會發生自相殘殺的戰爭，蘇聯有可能因此而獲益，革命有可能因此而爆發。要是作出相反的判斷，那就意味着蘇聯必須在核心原則上對資本主義列強作出重大的讓步，直至同意在國內實行政治多元主義。要麼是資本主義列強因在市場和殖民地上固有的矛盾而開闢戰端、自相殘殺，要麼是列寧主義錯了而蘇聯陷入困境。

## 二頭同盟

斯大林的機關，還有季諾維也夫在列寧格勒的機關，向公眾印發了大量帶有傾向性的小冊子，抹殺托洛茨基在十月政變和內戰中的功績，抹黑他的形象（「擁護列寧主義，反對托洛茨基主義」）。<sup>223</sup> 斯大林有辦法讓這句話在各省報刊上出現。<sup>224</sup> 但他在繼續詆毀托洛茨基的聲譽，尤其是國際聲譽方面，也很有一套：在1925年2月的一份被奧格伯烏截獲的報告中，有英國外交官認為，托洛茨基在被解除職務之後仍是「俄國布爾什維主義最有影響力的人物」，甚至是「歐洲社會主義革命中最重要的人」。報告副本送給了斯大林。<sup>225</sup> 不過，托洛茨基不再是斯大林唯一的目標。早在1924年底，斯大林就開始對他的兩位盟友加米涅夫和季諾維也夫採取行動。他用剛成為自己心腹的尼古拉·烏格拉諾夫取代了加米涅夫的一個門徒，擔任莫斯科黨組織負責人和中央委員會書記。<sup>226</sup> 烏格拉諾夫原先是在列寧格勒季諾維也夫的手下工作，但兩人發生了衝突，而斯大林發現了烏格拉諾夫，並把他從下諾夫哥羅德提拔到首都；在莫斯科，烏格拉諾夫拒絕了季諾維也夫的拉攏。<sup>227</sup> 最重要的是，尼古拉·布哈林已經進入政治局，填補了列寧去世空下的位置，讓正式（有表決權的）委員繼續保持七名，而斯大林對他變得十分關心。從1924年8月起，三駕馬車在政治局會議之前的集會擴大為「七重奏」：除了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和斯大林，還有布哈林、李可夫、托姆斯基和古比雪夫，也就是除托洛茨基之外的所有政治局委員，再加上中央監察委員會負責人（古比雪夫）。<sup>228</sup> 但斯大林已在着手重新佈局，與36歲的布哈林以及李可夫和托姆斯基建立同盟。<sup>229</sup>

對於斯大林的計謀，托洛茨基無意中幫了大忙。1924年底，再次從高燒中康復的托洛茨基從溫泉城基斯洛沃茨克又引爆了一顆文字炸彈——〈十月的教訓〉。<sup>230</sup> 它描述了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反對1917年政變的經過，托洛茨基給這件事情貼上的標籤是「擅離職守」和「當然不是意外」——這個說法直接出自列寧的口授文件。（沒有提到斯大林，就好像他1917年沒有露面似的。）托洛茨基本性難移，又說到自己幾次糾正列寧的錯誤。儘管如此，他還是讓三駕馬車受到了沉重打擊。斯大林發動了所有反對托洛茨基的力量：兩個月時間，《真理報》刊登了至少30篇譴責「托洛茨基主義」的文章，其中包括布哈林、加米涅夫、季諾維也夫甚至索柯里尼柯夫的文章。<sup>231</sup> 單是在同一期《真理報》上，就刊登了加米涅夫一篇冗長、拖沓的抨擊文章和斯大林一篇犀利的短文。<sup>232</sup> 克魯普斯卡婭的反駁文章稱讚了托洛茨基的「巨大能量」，但認為他用馬克思主義分析問題的能力「薄弱」，往往從「純粹『行政的』和完全表面的」角度理解黨的作用——這也和列寧口授文件的說法相似。<sup>233</sup> 但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的形象嚴重受損：大部分黨員都沒有聽說過兩人曾反對1917年政變，而且托洛茨基還把它和1923年德國政變的失敗聯繫起來，警告說，要是任由這種「怯懦行為」發展下去，那會很危險。

564

先與季諾維也夫以及加米涅夫聯合起來反對托洛茨基，再與布哈林、李可夫、托姆斯基聯合起來反對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斯大林這種為了削弱競爭對手而不斷改換政治同盟的做法，幾乎算不上甚麼特殊的本領：這不過是「個人專政課101」。可他那些初級的伎倆仍然讓昔日的夥伴大吃一驚。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和克魯普斯卡婭——她仍然住在以前和列寧一起住的地方——三人開始單獨開會。與此同時，斯大林也開始明目張膽地向他們挑釁：書記處的莫洛托夫不再邀請季諾維也夫的支持者參加沒有了托洛茨基的黨的半閉門會議，這或許是想誘使「列寧格勒幫」獨自開會，那樣一來，就會讓它顯得像是一個非法的派別組織。另外，托洛茨基後來聲稱——聽起來像真的似的——當時斯大林的手下散佈謠言說，他們的頭領正打算與托洛茨基和解，甚至在1925年3月派了幾名使者去阿布哈茲找他。（搭載那幾名使者的飛機墜毀了。）「斯大林並不是亂了方寸，」托洛茨基寫道，「他只是想在『托洛茨基分



子』中引起幻想，在季諾維也夫分子中引起恐慌。」<sup>234</sup> 想來最後一擊嗎？後來，當季諾維也夫及其在列寧格勒黨組織中的支持者強烈要求取消托洛茨基政治局委員和中央委員的資格甚至黨籍的時候，斯大林在他們的攻擊面前為托洛茨基作辯護。<sup>235</sup> 至於布哈林，他在撕咬過托洛茨基之後，便開始利用自己流暢的文筆，幹勁十足地向加米涅夫和季諾維也夫發起兇狠的攻擊。完全處於斯大林庇護下的布哈林，成了正在形成的二頭同盟中的另一半。

### 「發財吧」

565

使新經濟政策發揮作用的不是布哈林這位意識形態理論家，而是格里戈里·索柯里尼柯夫這位財政人民委員。索柯里尼柯夫沒有擺出布爾什維克身穿皮衣的典型姿態。「他是個外表有些柔弱的紳士，有一張印度王公似的臉，」他的妻子加林娜·謝列布利亞科娃 (Galina Serebryakova) 寫道，「他那優雅的姿態，純潔高貴的面龐，直挺高傲的鼻子，橢圓形的黑眼睛，高挑的身材，輪廓鮮明的嘴唇和漂亮的耳朵——他的風度舉止就像一個發育良好、身體強健的英國貴族。」<sup>236</sup> 但索柯里尼柯夫其實很強硬。他雷厲風行，提高黨務官員的工資，並且取消紅包（「獎金」、特殊食品袋、特殊的時裝工作室、國家提供的別墅、個人小汽車等其他所有待遇。這些額外的好處哪怕是漲工資也很難取消，但索柯里尼柯夫在竭力防止黨務官員利用國家預算中飽私囊的同時，自己就過着他所倡導的生活。「他不會接受不認識的人的禮物，下屬的東西也堅決不要。」他的妻子強調說，「他為蘇維埃政權節約每一個戈比，他不但不花給他在國外出差的錢，而且一般情況下會把很大部分預支的錢又還回去。」他在國外出差的時候總是坐三等座，住最便宜的旅館。<sup>237</sup>

索柯里尼柯夫從戰後歐洲的資本主義經驗中為蘇聯吸取了教訓。例如，在1924年7月的一次講話中，他認為在法國和德國，「資產階級」利用通貨膨脹，犧牲工人和農民的利益支持私有工業。他相信國有工業更好，但仍然警告，國有工業的利益有可能與「作為一種政治組織的國家」的利益發生衝突。換句話說，如果國有工業自主行事，造成的通

貨膨脹的代價就要由農民來承擔，因為他們是不可能讓自己的資金快速周轉的，結果只能眼睜睜地看着資金貶值。索柯里尼柯夫還根據歐洲的通貨膨脹推斷，由於缺少穩定的貨幣，蘇維埃國家可能會陷入政治危機，就像法國所發生的那樣，更別說魏瑪德國了。索柯里尼柯夫得出結論，儘管蘇維埃國家試圖利用通貨膨脹來支持工業，可它會像歐洲「資產階級」那樣，不得不放棄這種打算。<sup>238</sup> 但許多共產黨人依然不相信在社會主義條件下黃金可以保值，不相信蘇聯需要積累資本主義國家的貨幣作為儲備，儘管他們對於黨控制着「制高點」（重工業、鐵路、對外貿易）的事實頗感欣慰。<sup>239</sup> 蘇聯工業部門的托拉斯連支付拖欠的工資都很困難，更談不上投資未來。「蘇聯存在非常大的資金缺口，」1924年12月，英國外交部門的一份秘密報告說，「工廠急需更新設備，但哪裏有資源可以支付這些設備的費用呢？」<sup>240</sup>

566

1925年的工業平均產量不到1913年的一半，索柯里尼柯夫在蘇聯工業游說團體中的對手們驚呼，他正在扼殺國家建設社會主義的「物質基礎」。最突出的是，左派經濟學家葉夫根尼·普列奧布拉任斯基提交了一篇系統考察的論文，標題是〈社會主義積累的基本規律〉。它根據馬克思關於資本主義原始積累的思想，主張存在一個強制「徵收剩餘產品」的階段，也就是以低價大量抽取農村和手工業勞動的資源。<sup>241</sup> 但索柯里尼柯夫的貨幣改革和嚴格控制預算的做法收到了回報——到1924年，貨幣稅取代實物稅，經濟重新貨幣化——可是在國有工業中，成本上升，勞動生產率卻沒有提高。同時，管理不善和浪費的現象非常突出。國有托拉斯在很大程度上不受市場規律的約束：那些經營狀況較好的，分配到的預算反而少，差的卻可以得到緊急財政撥款從而免於破產。<sup>242</sup> 索柯里尼柯夫的猶豫是完全有道理的。他著書立說，堅持認為蘇聯制度的特點是「國家資本主義」，認為要在過渡時期維護無產階級利益，就必須採取資本主義的方法，認為國家要想振興經濟，就只有與世界經濟重新結合起來。<sup>243</sup>

但是，導致索柯里尼柯夫受挫的原因在於1924年的收成很差，而且有些地區的饑荒沒有結束。為了獲得外匯而出口糧食的做法在那個饑餓的夏天完全中止了。<sup>244</sup> 政府首腦阿列克謝·李可夫和奧格伯烏的

亞戈達在記者的陪同下巡視了伏爾加河流域。（「亞戈達同志，」蘇聯記者米哈伊爾·柯爾佐夫 (Mikhail Koltsov) 說，「您有沒有想過，要是沒有角，您看上去就不像是您了？」包括亞戈達在內的所有人都大笑起來。）李可夫在自己的家鄉薩拉托夫市中心的廣場對一大群人發表了講話——12年前，在舊制度統治的時候，他在參加五一示威活動時在廣場上挨過打。「就是這些石頭曾經被我們的鮮血染紅了，」他說，「在那些日子裏，我們夢想着一個擺脫沙皇制度的禍害而獲得拯救的俄羅斯。這個夢想現在實現了。但是，摧毀專制制度只是我們任務的一部分。我們現在的目標是建設一個真正自由的社會主義俄羅斯。」廣場上爆發出熱烈的掌聲。但是當李可夫來到農村的時候，農民問他：「甚麼人算是富農？會不會一個農民 (*muzhik*) 擁有一匹馬、一頭牛和幾隻家禽就算是？」李可夫想要安撫那些農民，但卻回答說：「如果我們讓富農日子好過，我們很快就會回到舊社會——每個村子都有少數富有的農民，其他的都是窮人。你們想要那些剝削分子嗎？」<sup>245</sup> 當然，李可夫十分清楚，危險在於治理上的無能和腐敗。<sup>246</sup> 但是，報告都在聲稱富農已經奪取了合作社和農村蘇維埃的控制權，在這種情況下，黨內有關農業政策的爭論都集中在階級劃分問題上。<sup>247</sup>

與沙皇時代一樣，國家不可能向下一直「看」到實行自治的農村。農民革命強化了村社的力量，並讓「土地社」獲得新生，而「土地社」在政權的眼中是落後時代的殘餘。在村社制度下，牲畜雖然常常是群體放牧，但一般來說都是個體擁有的（按家庭計算），而且土地也是由各家各戶而不是集體耕種的（除了草地上一些割草的活兒）。但作為集體，村社授予土地使用權，並給各家各戶劃撥若干塊大小和位置各異的條田，那些條田要根據家庭人口數量變化等因素定期重分。用施肥等辦法來改進自己分到的條田的地力沒有甚麼意義，因為它們會被重新分配。在黑土地區，每戶家庭的條田數量一般在20至30塊；在非黑土地區是50至80塊。有些條田很窄，只有7至15英尺寬，長度只有70英尺。它們會在10英里\*外甚至更遠的地方，所以有時候農民就把田地撿荒了。有些耕

\* 編註：寬約2.1至4.6米，長約21.3米，10英里約16公里。

地因為沒有路可以進去而被浪費了，重新分配又可能耗費時間，需要在原來的位置丈量，需要召集情況難料的會議。蘇維埃立法機關因為重新分配的效率低下而試圖對其加以限制，但是把村社置於農村蘇維埃領導下的努力常常是失敗的。村社有自己的收入，因為它們收稅，而農村的蘇維埃需要上面的補貼（並把經費用於支付行政人員的工資）。<sup>248</sup> 就像斯托雷平時期一樣，農民可以退出村社，同時在西北部地區、烏克蘭或白俄羅斯，佔支配地位的是一些私有農莊而不是村社，可是在那裏，黨和蘇維埃也都只是偶爾出現。1924年，黨的理論雜誌用挖苦的語氣稱新經濟政策不但是「富農傾向」，還是新的「斯托雷平—蘇維埃」政策。<sup>249</sup>

索柯里尼柯夫堅持認為，與「富農危險」作鬥爭的主要手段只能是經濟的，比如說累進稅，但布爾什維克需要更多的糧食，而且馬上就要。無奈之下，政治局只好同意動用寶貴的硬通貨去進口糧食。儘管如此，有幾個省的農民，包括李可夫視察過的伏爾加河流域的農民，直到1925年還在吃替代糧。牲畜的數量在增加，消費也在上升，播種面積最終達到了1913年的水平，但畝產量低了不少，糧食的總交易量似乎也在下降。<sup>250</sup> 農產品價格急劇上漲，每普特 (*puđ*, 36磅\*) 黑麥從102戈比漲到206戈比，有報告說富農因為預計價格還會繼續上漲而大量收購和囤積糧食。《真理報》指責私人資本「擾亂」了國內的糧食市場。<sup>251</sup> 政權不得不花費更多的預算收入，給國營工廠工人支付更高的工資，好讓他們可以買到麵包。與此同時，糧食進口對索柯里尼柯夫的強勢貨幣和預算紀律構成了威脅：糧食進口會讓國家重新陷入貿易赤字。很多問題，比如氣候惡劣、治理不善、政策失誤，都被歸咎於農業的「落後」。

斯大林的態度就是像列寧那樣，把靈活的策略與毫不動搖的核心信念結合起來。他嚴格按照已故的列寧關於新經濟政策的教導，敦促黨的官員要爭取除富農之外的其他農民的信任。他還斷定，如果採取資本主義的發展道路，那會讓蘇聯農民陷入貧困，並製造出一個由工資的奴隸組成的下層社會，被迫在大莊園裏勞作；他斷定私商會欺詐農民，

---

\* 編註：約16千克。

所以強調要讓大多數農民加入農業和供銷合作社，而這也符合列寧對於新經濟政策的看法。<sup>252</sup>但是在1924年11月7日，即革命七週年紀念日那天，斯大林參觀了莫斯科狄納莫工廠，讓人稍稍看到了他更深層的思維方式。「我對『狄納莫』工廠的工人和全俄國的工人的希望是，」他在參觀者的留言簿中寫道，「使我國工業向前發展，使俄國無產者的人數在最近時期內增加到兩千萬至三千萬，使農村的集體經濟繁榮並使個體經濟接受它的影響……」<sup>253</sup>斯大林那天的話作為左傾宣言，直到幾年後才公開。<sup>253</sup>1925年1月，這次是一個公開場合，斯大林真的透露了他原本閉口不談的觀點。「〔農民〕就在我們的身邊，我們和他們生活在一起，和他們一起建設着新生活，好也罷，壞也罷，總是和他們在一起。」他在莫斯科黨組織的一次會議上說，「你們都知道，這個同盟者不十分堅強，農民這個同盟者不像資本主義發達的國家中的無產階級那樣可靠。」但斯大林也在一直指責托洛茨基低估了農民的力量，並在講話中稱「托洛茨基主義」的實質就是「不相信我國革命的力量，不相信工農同盟」，而工農同盟對於新經濟政策的成功，對於革命的最終勝利是必不可少的。<sup>254</sup>換句話說，對托洛茨基的抨擊變成了對新經濟政策的堅定支持。

這就是1925年4月召開黨的第十四次代表會議的背景，當時斯大林負責監督更加堅決地執行新經濟政策的租讓政策，他一面繼續按照索柯里尼柯夫的建議，保證財政紀律和貨幣穩定，同時也在遷就布哈林在農民問題上極力主張的調和立場。中央委員會削減了農業稅和農業機械的費用，擴大了租賃土地和僱傭勞動力的權利，增加了貸款項目，放鬆了對於小型貿易的限制。<sup>255</sup>採取這些措施，是希望它們能夠帶來豐收，既可以讓國人吃飽肚子，又可以通過出口為高速工業化提供資金。<sup>256</sup>

斯大林喜歡展示其高超的領導技巧，尤其是因為高層中的其他人把他看作後生晚輩。比如說有一次，政治局討論把對外和對內貿易的兩個人民委員部合併起來並任命列寧從前的副手亞歷山大·瞿魯巴為唯一

<sup>252</sup> 譯註：《斯大林全集》第6卷，第278頁。

<sup>253</sup> 譯註：《斯大林全集》第7卷，第28、30頁。

的負責人，於是加米涅夫就找瞿魯巴談話。「他搖着手，臉色發白，顯然非常憤怒，我趕緊停止了對話」，放棄談話的加米涅夫寫信給斯大林說。但斯大林回信稱：「我也跟他談過了(他自己要求的)。表面上他反對把自己列為候選人，但眼中充滿笑意。我告訴他，由此看來，他很顯然是同意的。他沒做聲。我想他會同意的。」<sup>257</sup> 在國際政治經濟事務方面，斯大林也證明自己上手很快。蘇聯在資本主義的金融世界中運行，不管這個世界是好是壞，已經重新開始實行準金本位，建立了可兌換貨幣的儲備制度，但是在中央委員會裏，幾乎沒有人領會到這些問題的重要性。<sup>258</sup> 斯大林總是在發言中用自己特有的方式去解釋問題(一點，兩點，三點)。例如，在有關物價的講話中，他闡述了貿易利潤為甚麼仍然是起作用的，儘管這是社會主義貿易。他還強化了索柯里尼柯夫的觀點，認為在貨幣發行量與通貨膨脹之間存在着因果關係，並告誡說對於開支必須加以控制，而這就意味着長期的高失業率和低速經濟擴張，就像資本主義分子出於相同的原因所做的那樣。<sup>259</sup> 但是，在解釋對於新經濟政策的深化這方面，焦點人物是得到斯大林支持的布哈林。

1925年4月17日，在對莫斯科黨積極分子會議發表的一次令人難忘的演講中，布哈林嚴厲斥責了那些對農村不屑一顧的人，因為他們「不懂得我國工業取決於農民市場的道理，是最有害的事情」，那就是說取決於農民的需求和對製造品的購買力。但他感嘆，「富裕的上層農民和渴望成為富裕農民的中農，現在不敢積累。在這種情況下，農民不敢蓋鐵皮屋頂，因為怕被宣佈為富農；如果他買機器，他就不讓共產黨員看到。高級的技術變成了秘密的技術」。與此同時，貧農也有怨言，說蘇維埃政權阻撓他們去為殷實的農民幹活。(僱傭勞力的農民大多自己也勞動；他們並非靠收租生活的地主。)黨的態度是要保住生產，因為那是國家富裕和工業化的希望。布哈林認為集體農莊的想法行不通，因為農民是不會願意加入的。「我們的確應該在農民中採取各種辦法宣傳成立集體農莊，但要是以為農民群眾奔向社會主義的道路有捷徑可走，那就錯了」，他說。相反，答案在於從經濟的激勵措施中得到好處。「應當對全體農民，對農民的所有階層說：『發財吧，積累吧，發展自己的經濟吧，』」他對黨的積極分子說，「只有白癡才會說，我們永遠應當貧窮；

現在我們應當採取的政策，是要能在我國消除貧窮的政策。」<sup>260\*</sup>

雖說布哈林的言論帶有他那種特有的煽動性，可他不過是在得出政權自身政策的邏輯結論：難道共產黨希望收成少一點？難道只為了不讓農民變成富農，就應該鼓勵他們生產得少一點？但是對於布哈林咄咄逼人的邏輯，有人怒不可遏。此外，就在這時，斯大林的「一國社會主義論」也開始受到猛烈抨擊，說斯大林的觀點是反對世界革命——少見的自嘗苦果。<sup>261</sup> 布哈林輕率的講話，再加上被有意歪曲的斯大林的文章，給新的二頭同盟的批評者提供了大好機會。1925年5月，季諾維也夫說，「在一個革命政黨身上所能發生的最糟糕的事情，就是喪失它的(革命)立場」。<sup>262</sup> 按照他對於列寧格勒的瞭解——那裏的工人一再舉行怠工和罷工活動——他敏銳地意識到，人們對於財富和特權的懸殊越來越感到不滿，在這種背景下，更加堅定地執行新經濟政策，將被視為而且實際上就是在把賭注押在富農身上。<sup>263</sup> 他認為布哈林的主張是在無意中為資本主義復辟張目，而這恰恰是流亡的批評者所預言的，當時他們說布爾什維克將被迫對資本主義作出更大的讓步。季諾維也夫後來說，14%的農民生產了60%的糧食，掙了5億盧布。<sup>264</sup> 1925年6月，斯大林在非公開場合表示，「『發財吧』不是我們的口號」，還說「我們的口號是社會主義的積累」。<sup>265†</sup> 布哈林只好公開聲明，而且一次又一次地公開聲明，放棄自己發出的發家致富的號召，但反對派不依不饒。

關於新經濟政策的全部問題還是沒有得到解決。列寧本人就曾發出過警告，說「農民的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條約」有自作自受的危險，可能帶來資本主義復辟，可是，由於德國在西線的失敗，原來的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條約被推翻，那甚麼東西——如果說有的話——會推翻新經濟政策呢，這在當時還不清楚。退卻要持續多長時間？列寧的說法非常模糊（「認真地和長期地」、「若干年內長期實行的」、「至少需要十年」、「25年是太悲觀了」）。<sup>266</sup> 唯一清楚的是，當時並沒有打算讓新經濟政策永遠實行下去。再者，它是在導向社會主義，還是導向

\* 譯註：《布哈林文選》（人民出版社，2014），第213-215頁。

† 譯註：《斯大林全集》第7卷，第128頁。

資本主義的全面復辟？新經濟政策又是在如何促進工業化的必備條件的呢？普列奧布拉任斯基之類的左派堅持認為，新經濟政策永遠不會產生可以為工業化提供資金的「剩餘產品」；所以，為甚麼還要對富農採取姑息的態度呢？<sup>267</sup> 斯大林本人在1925年5月的《真理報》上也寫道，「我們要有一千五百萬到兩千萬工業無產者」，而當時俄國只有差不多四百萬。<sup>268</sup> 這是否可行？利用帝國主義分子之間的矛盾，聽上去不錯，可要是沒有現代的機器工業，社會主義怎麼生存？要是富農農莊受到打擊和遏制，那麼在資本主義包圍的條件下，小農經濟如何為國家的強大而服務？新經濟政策的俄國如何變成社會主義的俄國？與季諾維也夫的路線相反，斯大林在1925年5月黨的第十四次代表會議的總結報告中指出，「現在主要的問題完全不是挑起農村中的階級鬥爭」，同時還空泛地說，「工人階級的領導是使建設沿着社會主義道路前進的基本保障」。<sup>269†</sup>

警察機關的、黨的和新聞媒體的渠道在繼續報告農村存在嚴重的仇富心理，而對於針對官員的憤怒情緒基本上避而不談。<sup>270</sup> 政權把怒火發泄到被貶稱為「耐普曼」的私商頭上。絕大多數私商都是些小商小販，賣的是自家種的或製作的東西（或者是自己的財物），但奧格伯烏的特工會定期對巴扎進行突擊檢查。「那時候在可以允許的利潤與非法的投機之間有一條非常細微的界線，」有位目睹過抓人場面的人寫道——抓人被說成是撇去新經濟政策表面的雜質——「廚子知道怎樣撇去浮在魚湯上面的雜質，但我不能肯定耐普曼們全都明白他們屬於哪種，是泡沫還是魚。」<sup>271</sup> 少數耐普曼的確做得很大，用自己的財富開飯店、檯球室、浴室和娛樂設施，換句話說就是公共場所，人們可以在那兒交換消息、流言和想法，而且少數人還對重要的鐵路網施加影響，給收入不高的官員行賄。當時甚至還有一家私人航空公司，總部在烏克蘭，是國內僅有的三家航空公司之一，為哈爾科夫（首府）、羅斯托夫、敖德薩、基輔和莫斯科提供服務。<sup>272</sup> 但是，如果不和當局尤其是奧格伯烏合作——奧格伯烏在那些飯店徵用了上等的房間——那就沒有哪個耐普曼

572

\* 譯註：《斯大林全集》第7卷，第112頁。

† 譯註：《斯大林全集》第7卷，第105頁。



可以出人頭地。<sup>273</sup>除了說不清道不明的意識形態難題，蘇聯最大的挑戰既不是富農，也不是耐普曼，而是官員為了「發財」而敲詐勒索和大肆貪污的行為。<sup>274</sup>

## 拒不執行的遺囑

斯大林還有一件要操心的事情：列寧那該死的口授文件，托洛茨基的支持者把它稱為「遺囑」。有人把一份副本給了作家馬克斯·伊斯特曼，他認識一些俄國人，還娶了尼古拉（後來成了副司法人民委員）的妹妹葉蓮娜·克雷連柯（Yelena Krylenko）。1925年春，伊斯特曼出版了《列寧死後》，該書轉述了托洛茨基對於在斯大林領導下發生的官僚主義蛻變的分析，引用了所謂的列寧口授文件中的一些片段，並提到克魯普斯卡婭在列寧剛去世後給托洛茨基的那封讓人感到溫暖的私人信件。由於蘇聯駐法使節（某種形式的流放）克里斯季安·拉柯夫斯基讀過伊斯特曼的手稿，那個美國人就以為得到了托洛茨基的允許。那年5月在莫斯科，托洛茨基在試圖為自己辯解時，聲稱他已有超過一年半的時間沒跟伊斯特曼聯繫，也沒給過他任何機密文件。但「資產階級」報刊都在引用伊斯特曼書中的說法，該書也引起了身在國外的共產黨人的疑問。<sup>275</sup>斯大林的機關把它譯成俄文，結果，斯大林在1925年6月17日寫了一封長信，引用了許多段落的具體內容，作為「誹謗」列寧和黨的證據，並要求托洛茨基撰文對那些內容予以批駁。第二天，政治局把托洛茨基召去，命令他公開譴責伊斯特曼的書。托洛茨基回應文章的初稿未能得到斯大林的通過，卻被共產國際特工和斯大林的心腹馬努伊爾斯基泄露出去，在法國發表了，目的是用更多的泄密事件抹黑托洛茨基。

對於托洛茨基最終拿出的文章，斯大林親自作了修改。<sup>276</sup>托洛茨基的長篇聲明用英文刊登在《星期日工人報》上（7月19日），然後又用俄文刊登在蘇聯黨的主要理論刊物上。「伊斯特曼的書裏有幾個地方談到中央對黨『隱瞞了』列寧在逝世前不久寫的許多極其重要的文件，」托洛茨基的文章說道，「這無非是對我們黨中央的污蔑。」托洛茨基的文章進而斷定，與伊斯特曼的說法相反，列寧原本就沒有打算公佈那些文

件，它們只是提出了「組織內部建議」，甚至「弗拉基米爾·伊里奇沒有留下任何『遺囑』，無論就他對黨的關係來說，還是就黨本身的性質來說，都不可能會有這種『遺囑』」。<sup>277</sup> 托洛茨基的文章還說，列寧的文件並沒有被隱瞞，而是「由黨的第十三次代表大會作了最仔細的檢查」。<sup>278</sup> 托洛茨基最後說，伊斯特曼的「小書只能為共產主義和革命的最卑鄙的敵人服務，結果在客觀上充當了反革命的武器」。<sup>279</sup> 一直在冒着風險偷偷傳播「遺囑」的托洛茨基支持者們被弄得目瞪口呆。「他讓自己成了一個卑鄙小人」，有人在評論那篇托洛茨基署名的在他看來滿紙謊言的文章時說道。<sup>280</sup> 但政治局已經對這些說法作了表決，托洛茨基要服從黨的紀律。<sup>281</sup>

列寧的遺孀克魯普斯卡婭也被召去要求駁斥伊斯特曼的說法，她的看法發表在《星期日工人報》（1925年8月2日）以及黨的理論刊物上。<sup>282</sup> 「就像列寧想要的那樣，所有參加代表大會的代表們都熟悉這些信件，」她的文章斷言，「把它們稱為『遺囑』是不對的，因為真正意義上的列寧遺囑要廣泛得多——包括他最後的那些文章以及有關黨和蘇維埃工作基礎的論述。」她指責「俄國共產黨的敵人正試圖利用『遺囑』抹黑現在的黨的領導人，抹黑黨本身」。對於伊斯特曼利用了她1924年1月寫給托洛茨基的私人信件的做法，她也表示不能接受：「那封信無論如何不應該像馬克斯·伊斯特曼那樣去解讀。從那封信中不能得出列寧把托洛茨基看作自己的副手這一結論。」<sup>283</sup> 至於斯大林作何反應，現在還看不到任何記錄。<sup>284</sup> 但要是他以為，自己敵人送來的這份大禮已經解決了「遺囑」問題，那他就錯了。這個問題永遠也不會結束。

574

## 伏羅希洛夫的高升

斯大林的地緣政治理論要以強大的紅軍為前提，但這個工具給政權招來了麻煩。早在升任人民委員之前，伏龍芝就領導過軍隊的一個委

譯註：《斯大林全集》第10卷（第150-151頁）所引托洛茨基〈關於伊斯特曼〈列寧死後〉一書〉與此處略有出入，譯文從英文原書。

員會，在1925年9月之前推動了一項改革，把現存的（並且是不充分的）地方民兵制度與和平時期的常備軍結合起來，改善生活條件和補給，增加軍隊中黨員和共青團輔助組織的數量。<sup>285</sup> 伏龍芝想用（他自己那樣的）紅軍指揮官把前沙皇軍官全部換掉，並希望通過快速的工業化徹底改變軍隊的物質基礎，因為令人痛心的是，西方的軍工生產已經取得了進步，而蘇軍的物質基礎還趕不上1916年（布魯西洛夫攻勢期間）。可是在新經濟政策的條件下，伏龍芝很難保住專門的軍工廠：紅軍軍事主義這個字眼非但不好聽，還費錢。<sup>286</sup> 與此同時，圍繞前沙皇軍官的陰謀沒有消停過，雖然他們的數量已從高峰時的75,000人（包括士官）減少到不足2,000人。<sup>287</sup> 前沙皇軍官在包括總參軍事學院在內的軍事院校佔據了主導地位，而紅軍中的黨員數量大概還不到6%。<sup>288</sup> 就連托洛茨基——最主要的就是因為他，才會把前沙皇軍官大量招進紅軍——也在1925年的文章中把前沙皇軍官區分為自覺選擇與白軍戰鬥的少數人以及「不堅定的、缺乏信仰的和膽怯的」多數人，後者站到了布爾什維主義一邊，但也有可能改變立場，回到另一邊。<sup>289</sup> 很難說在當時哪一種情況對軍隊的威脅更大，是簡陋的物質基礎還是多疑的階級政治。

575 奧格伯烏的報告把前沙皇軍官描寫成一個組織嚴密、擁有共同的價值觀、有能力採取集體行動並在等待時機的社會集團，而蘇聯開展的對外情報工作，目的幾乎都在於打入流亡分子的小圈子，尤其是那些帶有軍事性質的小圈子。<sup>290</sup> 奧格伯烏特別部在軍隊策劃了一個假的反蘇陰謀，利用為契卡工作的前白軍軍官挑事，揭發軍中的反蘇傾向；而在國外，奧格伯烏圍繞一個虛構的地下君主派「中心」，精心組織了一次代號為「托拉斯」（或辛迪加）的行動。據說這個「中心」聯合了從前的沙皇軍官、沙皇政府的高級官員以及被剝奪了財產的實業家，他們一面為布爾什維克政權服務，一面暗中策劃反對它。<sup>291</sup> 「托拉斯」行動中的政府特工人員把一些真實的文件偷偷帶到國外，由此漸漸贏得了信任，使他們得以散佈有關紅軍現狀和計劃的假情報。<sup>292</sup> 就連對奧格伯烏的手法有所瞭解而心存疑慮的流亡者也想要相信，可以設法從不信神的、野蠻的布爾什維克手中把祖國奪回來。因此，他們總是幻想會有一個拿破侖式的人物來領導一場衛國運動，而他們提及最多的是米哈伊爾·圖哈

切夫斯基：出身高貴，野心勃勃，而且據說「處處模仿拿破侖，一直在讀他的傳記和歷史」。<sup>293</sup> 有流亡分子的出版物嘲笑圖哈切夫斯基，說他是「一個典型的冒險家，自戀、自負，只追求一樣東西：事業和權力」。該出版物承認他「有可能決心」去效仿那位屠殺過巴黎公社社員的法國將軍。無論如何，在喀琅施塔得對水兵和在坦波夫對農民，圖哈切夫斯基就是那麼幹的，共產黨人對他來說算得了甚麼？<sup>294</sup> 蘇聯情報機關通過多種渠道為這些異想天開的說法推波助瀾，說圖哈切夫斯基實際上不忠於布爾什維克政權，比如，由奧格伯烏贊助的柏林俄文雜誌《戰爭與和平》就把他吹捧為與外國情報機關有聯繫的反布爾什維克的民族主義救星。<sup>295</sup> 在國內，圖哈切夫斯基受到警察機關的嚴密監視。<sup>296</sup>

伏龍芝的健康狀況不佳也是一件令人擔憂的事情。1916年，他曾因潰瘍穿孔做過一次手術，可慢性炎症並未消除，而且醫生警告說，他的內臟器官已完全損壞，建議切除，那是當時知道的唯一辦法，但他只同意採取不太需要手術的治療手段。結果事情拖了好幾年，直到1925年夏天，當時他的內出血已相當嚴重；9月初，政治局批准了七週的假期。伏龍芝和妻子索菲婭一起動身前往雅爾塔，但在9月29日，他又回來住進了克里姆林宮醫院。至少有12位著名的內外科醫生給他做了兩輪檢查，一致認為需要進行外科手術。<sup>297</sup> 「我現在覺得身體很好，別說是做手術，哪怕是考慮做手術都是可笑的，」10月26日，伏龍芝寫信給還在克里米亞的索菲婭說，「不過，兩次會診都決定要做手術。我個人對於這一決定感到滿意。就讓他們徹底弄清楚那裏是怎麼回事並做一次真正的治療吧。」<sup>298</sup> 兩天後，他被轉到國內設施最好的索爾達瓊科夫醫院，列寧也曾在那裏做過手術。第二天下午，以給列寧看過病的V.N. 羅扎諾夫醫生為首的團隊進行了手術。一天半後，1925年10月31日凌晨，伏龍芝去世。據報紙報道，他是死於麻醉導致的心臟衰竭。<sup>299</sup> 他當時使用的氯仿劑量過大，由此可能引發了重要器官的肌肉麻痺。<sup>300</sup> 11月3日，伏龍芝被埋葬在克里姆林宮宮牆附近。<sup>301</sup> 他成長的地方，吉爾吉斯的比什凱克，被更名為「伏龍芝市」。

576

有傳言說，是托洛茨基的人害死了這位無產階級的指揮官，以報復他搶走了托洛茨基的位置，而托洛茨基的手下也反過來把矛頭指向斯大

林。<sup>302</sup>除了這些不實的指控，布爾什維克容易生病的現象也成了日常閒談資，當時有位神經精神病學家提交了一份可怕的報告，談到革命者普遍覺得疲憊不堪，身體每況愈下。<sup>303</sup>前去就診的黨內高層，差不多有一半都是因為神經失調（患肺結核的要少很多，約佔四分之一）。<sup>304</sup>兩位德國專家受邀給50名政要做檢查，從捷爾任斯基和明仁斯基開始，一直檢查到李可夫和斯大林。檢查的結果如何現在還不清楚，但內部的討論表明，包括托洛茨基在內，大家都接受了伏龍芝死於自然原因的事實，雖然如果得到更好的治療是有可能挽救他的生命的。<sup>305</sup>對斯大林來說，伏龍芝的死亡又提供了一次機會。圖哈切夫斯基在一次尋常的談話中表示支持謝爾戈·奧爾忠尼啟則——此事當然得到了匯報——但一個不祥的預兆是，斯大林任命了自己的親密夥伴伏羅希洛夫。<sup>306</sup>

經歷過內戰中的起伏後，伏羅希洛夫寫信給斯大林，懇求他讓自己離開軍隊（「您要可憐可憐我」），但斯大林未予理睬。<sup>307</sup>1924年5月，斯大林把他提拔為莫斯科軍區司令，取代了托洛茨基的夥伴尼古拉·穆拉洛夫（Nikolai Muralov）。由於伏龍芝不在，伏羅希洛夫成了「無產階級」最高指揮官中排名第二的。季諾維也夫一派的米哈伊爾·拉舍維奇成了第一副陸海軍人民委員。<sup>308</sup>圖哈切夫斯基成了所謂軍隊大腦的總參謀部首腦，也是伏羅希洛夫有力的競爭對手，於是，伏羅希洛夫便開始限制總參謀長的權力，把軍事情報機關劃出他的職權範圍。圖哈切夫斯基作了言辭激烈的書面申訴，但伏羅希洛夫不為所動。<sup>309</sup>伏羅希洛夫對托洛茨基的鄙視很可能無人能及，哪怕是斯大林本人也比不上，但伏羅希洛夫與圖哈切夫斯基的不和後來達到了戲劇性的程度。這加強了斯大林的控制力，但對於提升戰鬥力沒有任何好處。「紅軍的處境非常困難，」圖哈切夫斯基報告說，「要是敵人瞭解到這種情況，他們或許會想做點甚麼。」<sup>310</sup>

### 捷爾任斯基的困惑

加米涅夫和斯大林的關係很近，可是卻加入了季諾維也夫的列寧格勒反對派，結果從1925年9月開始，報刊甚至黨的會議的「速記」記錄

上，就見不到他的講話了。<sup>311</sup> 與列寧格勒的季諾維也夫不同，加米涅夫沒有任何政治機器和出版社，但他詭計多端，設法拉攏了財政人民委員索柯里尼柯夫，抗議斯大林和布哈林的二頭同盟領導。他們和克魯普斯卡婭一起拿出了一份〈四人綱領〉，沒有公佈但發給了中央委員會和中央監察委員會的委員們，在10月3至10日的全會上進行了討論。<sup>312</sup> 索柯里尼柯夫與其他署名者不同，他支持新經濟政策對農民採取的安撫政策，但反對壓制黨內爭論，反對恃強凌弱。狡猾的加米涅夫甚至還想拉攏奧格伯烏的負責人捷爾任斯基，而且並不是沒有效果：10月5日的夜裏，捷爾任斯基給斯大林以及奧爾忠尼啟則送去一封低聲下氣的信（但最後沒有給克魯普斯卡婭，這表明她可能在拉攏他的過程中也扮演了某種角色）。「我請求你們在列寧主義派的會議上說一說我下面的這封信」，捷爾任斯基以這句話開頭，揭發了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的「陰謀」，一次「在我們黨內的新的喀琅施塔得暴動」。他指出這起陰謀特別令人震驚，因為「大多數農民雖說不反對我們，可也不支持——我們還沒有把農民組織起來站到我們一邊」。在解釋了黨內的分裂會給敵人敞開大門並使得熱月不可避免之後，捷爾任斯基坦白說，自己糊裏糊塗地也參與了這起陰謀。「我不是政治家，我找不到解決問題的辦法，也提不出甚麼辦法，也許在審判我的時候，你們會找到一點解決問題的辦法。但我要離開這個〔反對〕派，繼續做一個列寧主義者，因為我不希望捲入分裂，分裂會把黨帶向死亡。」預計會被解除職務的捷爾任斯基表示，無論交給他甚麼工作，他都願意接受。<sup>313</sup>

斯大林肯定想知道，在奧格伯烏，還有誰有可能已經被拉到反對派一邊。捷爾任斯基作為政治警察的首腦，作為一個擁有很高聲望因而不會被輕易調開的人，佔據的位置舉足輕重。斯大林當然沒有提出要解除他的職務；要是把他們之間的裂痕公之於眾，那會帶來毀滅性的後果。

578

捷爾任斯基過去是個堅定的左派共產黨人，他在自己的盧比揚卡辦公室懸掛着德國左翼的波蘭裔烈士羅莎·盧森堡的肖像，但同時兼任最高國民經濟委員會主席的實際工作經歷——在他的最高國民經濟委員會裏聘用了一大批「資產階級」經濟學家——又讓他成了新經濟政策的堅定捍衛者。<sup>314</sup> 早在1923年，他就公開指責「層出不窮的新機關、形形色

色的醜陋的官僚作風、堆積如山的文件和無數敷衍了事的文員、搶佔大樓和設施、汽車氾濫」，以及他稱之為「合法的供養制 (*kormlenie*)」的現象，即工作人員像在中古莫斯科大公國一樣，寄生於他們本該服務的那些人。<sup>315</sup> 他預言不可一世的官僚機構和中飽私囊會使蘇維埃制度破產，卻也想不出甚麼切實可行的辦法。<sup>316</sup> 斯大林在給莫洛托夫的機密信件中稱捷爾任斯基為「費利克斯」(當時他對其他所有人都是稱呼姓氏)，他知道捷爾任斯基的工作負擔很重而且心臟不好。捷爾任斯基第一次心臟病發作是在1924年底，醫生要他限制自己的工作時間，可他沒當回事。<sup>317</sup> 1925年夏天，捷爾任斯基曾經要求辭職。<sup>318</sup> 當時斯大林已經動身前往索契，但仍然給他寫了信(1925年7月25日)——「我懇求您別那樣」——並要他保持耐心。<sup>319</sup> 同一天，斯大林寫信給布哈林：「捷爾任斯基十分不安，他快淹死了。事情會過去的。」<sup>320</sup> 1925年8月，當托夫斯圖哈打電報給斯大林，問正打算到南方度假的捷爾任斯基可否到索契去看他時，斯大林回答說：「我很樂意接待休假的捷爾任斯基和他的朋友們。斯大林。」<sup>321</sup> 此後不久，加米涅夫就開始同捷爾任斯基接觸，因為他發現奧格伯烏對經濟政策的不滿。

雖然捷爾任斯基很快就背離了加米涅夫和季諾維也夫，但反對派並沒有收手，而是在對抗性的黨的地區代表會議上發起了進攻，包括莫斯科黨組織的一次代表會議，那是在1925年12月5日召開的(一直開到13日)，還有列寧格勒黨組織的一次代表會議，開始和結束都要早些。在列寧格勒，代表們猛烈指責布哈林及其「發財吧！」的口號；在莫斯科，布哈林大肆嘲諷季諾維也夫及其支持者，說他們是「歇斯底里的小姐」，並強行通過一項決議，譴責列寧格勒黨組織的「反黨」行為。<sup>322</sup> 除了因為新經濟政策似乎有支持富農的傾向而產生的政策爭論外，列寧格勒黨還在力爭維護它的自主權。但就像孟什維克流亡分子的報紙所指出的，新反對派把一些相互矛盾的傾向都混合在一起。<sup>323</sup> 索柯里尼柯夫在演講中讚美市場關係，認為它不同於資本主義，讚美有教養的農民，認為他們不同於富農。這種說法的言外之意是市場與社會主義是可以兼容的，至少在農村是可以的。不過，索柯里尼柯夫也明確指出，新經濟政策的根本難題在於：「我們先鼓勵中農上升到一定程度，然後我

們就開始掐死他們。」換言之，政治限制了經濟增長。另一名發言者、《農民報》的創始人兼主編雅科夫·雅科夫列夫(Yakov Yakovlev)，乾脆建議政權應該允許農民把自己耕種的土地變成私有財產，可以買賣和繼承。他認為，合法的所有權，而不僅僅是使用權，可以提高產量，因為那樣一來，農民就可以把辛苦勞動的果實傳給他們的兒女。<sup>324</sup>

至於捷爾任斯基，他在12月12日給斯大林送去了一封長信，列舉了經濟方面的種種難題，表示自己沒有能力把這些處理好，並強調自己身體不好、神經緊張，要求允許自己辭去最高國民經濟委員會的職務：「要是弗拉基米爾·伊里奇還活着，他肯定會尊重我的要求。」<sup>325</sup> 斯大林再次拒絕了捷爾任斯基的要求。但他也發現，1925年底的某個時候，隨着黨的第十四次代表大會召開在即，一些重要人物開始出入於烏克蘭共產黨人彼得羅夫斯基的家中——捷爾任斯基沒有參加——商量由捷爾任斯基接替斯大林的總書記職務。<sup>326</sup> 但捷爾任斯基和大多數專政制度下的秘密警察首腦不一樣，他並不渴望最高權力。實際上，捷爾任斯基後來在第十四次代表大會上並沒有發言。

## 生日當天的彈劾

黨的第十四次代表大會被斯大林兩次延期，結果等到召開的時候(1925年12月18-31日)，距離上次代表大會已經過去了一年半，這是到當時為止間隔時間最長的一次。列寧格勒代表團在12月14日就到了，他們分頭到工廠和市里各區的黨組織為自己的問題申辯。早在上一次代表大會——當時斯大林還在和季諾維也夫結盟——兩人就曾約定，下次代表大會在列寧格勒舉行，可是在1925年10月，斯大林在政治局的新的多數派宣告，這個約定「過時了」。代表大會召集了1,306名代表(其中有表決權的665名)，代表108.8萬名黨員和候補黨員。從革命前算起，斯大林第一次作了主政治報告。但在開幕那天，季諾維也夫搶先在《列寧格勒真理報》上開了一炮。「他們與富農作鬥爭，但他們提出了『發財吧！』的口號，」他指責說，「他們宣佈實行新經濟政策的俄國是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為了讓人以為是反對派在製造不和，斯大



林在講話中巧妙地避開了與季諾維也夫以及加米涅夫的分歧。果不其然，列寧格勒的代表們請求讓季諾維也夫作副報告。報告在第二天晚上進行，持續了四個小時，矛頭直指布哈林。<sup>327</sup>短暫的休息過後，輪到布哈林發言，他喋喋不休地講了更長的時間。<sup>328</sup>當時的氣氛火藥味很濃。代表反對派的克魯普斯卡婭沒有提到斯大林，但她指責布哈林的「發財吧！」不是社會主義口號，同時也責備代表們對季諾維也夫的起哄是「可恥的」。她舉了黨的1906年斯德哥爾摩代表大會的例子，孟什維克當時佔據了多數，意思是現在的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和克魯普斯卡婭集團雖然屬於少數，但卻是真正的布爾什維克和列寧主義者。<sup>329</sup>不過，在所有參加代表大會的人當中，引起轟動的卻是加米涅夫。他說話一向模稜兩可，但12月21日的發言卻措辭尖銳。<sup>330</sup>那天剛好是斯大林的生日（按照官方的說法，他當時46歲）。

加米涅夫先是談了自己作為列寧研究院名義上的院長的職責——此舉意在表明自己在列寧主義上的發言資格——然後就把矛頭指向對列寧的新經濟政策所作的「玫瑰色的」描述。<sup>331</sup>「在許多會議上我都責備過斯大林同志，在這次的代表大會上我還要這樣做：『你並不是真的贊成這一（支持新經濟政策的）路線，但你維護它，而這就是你作為黨的領導人錯誤的地方，』」加米涅夫說，「『你是個堅決的人，但你不允許黨堅決地放棄這條路線，這條黨內大多數人都認為是錯誤的路線。』」他稱斯大林是「這條錯誤路線的囚徒，而這條錯誤路線的制定者和真正的代表是布哈林同志」。但加米涅夫所做的遠不只是把斯大林和布哈林拆分開來。

我們反對創立一種「領袖」理論，我們反對樹立一個「領袖」。我們反對認為書記處因為在實踐上把政策和組織工作結合起來，地位就應該高於最重要的政治機構，即政治局……我個人認為我們的總書記不是個有能力把在他周圍的各個老的布爾什維克機關統一起來的人……恰恰因為我已經跟斯大林同志說過多次，恰恰因為我已經跟列寧的一群老同志說過多次，我要在這兒，在代表大會上說：我得出的結論是，斯大林同志不可能履行把各個布爾什維克機關統一起來

在發出這些驚人之語的過程中，加米涅夫的講話一再被人打斷，譏諷聲幾乎震耳欲聾：

「不對！」「胡說。」「這就是他們在搞的名堂。」「斯大林！斯大林！」代表們站起來，向斯大林同志致敬。暴風雨般的掌聲……「斯大林同志萬歲。」經久不息的暴風雨般的掌聲。「烏拉」的歡呼聲。一片沸騰。

公佈的速記記錄繼續寫道：

葉夫多基莫夫從自己的座位上喊道：「俄國共產黨萬歲！烏拉！烏拉！」（代表們站起來高呼「烏拉！」喧鬧聲。暴風雨般的長時間的掌聲）（葉夫多基莫夫從自己的座位上喊道）「我們的黨中央萬歲！烏拉！」（代表們高喊「烏拉！」）「黨高於一切！理所當然！」（掌聲和喊聲，「烏拉！」）<sup>332</sup>

斯大林從未以這樣的方式過生日（後來也沒有）。

托姆斯基作了批駁性的發言：「某些同志在這裏的那些講話是荒謬的，他們想說，有人把權力都集中在自己手裏……這怎麼可能呢？」<sup>333</sup>托姆斯基的問題的答案，有一部分就在於加米涅夫本人，斯大林一路上幾乎每一步都得到了他的支持。

斯大林的慶生活動還沒完：當天晚上，索柯里尼柯夫發表講話。斯大林完全倚仗他來支持新經濟政策。「加里亞和斯大林的關係……是友好的，」索柯里尼柯夫的妻子加林娜·謝列布利亞科娃後來回憶說——她在說起丈夫時用的是他真名（吉爾希（Gersh））的呢稱，「我聽到他們經常用內部電話交談。在語氣上或相互關係上從來沒有任何緊張或不平等……在代表大會之前，據加里亞對我說，斯大林跟他碰過面，懇求他不要支持克魯普斯卡婭和克拉夫季婭·尼古拉耶娃（Klavdiya Nikolaeva），不要提列寧『遺囑』和另選總書記。但加里亞是不會同意的。『你會後悔的，格里戈里』，斯大林警告他，在那天深夜還給他打了內部電話，要求得到他的支持以及發言時別提『遺囑』。」索柯里尼柯夫拒絕讓步。<sup>334</sup>在代表大會上，他講了差不多一個小時，引用列寧的話反對布哈林，說蘇聯是「國家資本主義」，呼籲不要剝奪富農的財產而

要提高農業的水平，那樣才能有更多的糧食可供出口，才能有進口機械設備的資金，而進口的機械設備反過來又可以發展農業，從而形成良性循環，這是唯一符合實際的工業化道路。可索柯里尼柯夫雖然在經濟政策上支持以斯大林和布哈林為首的中央委員會的多數派，不同意反對派的主張；但是在反對派批評的缺乏黨內民主和斯大林權力高度集中的問題上，他卻支持反對派，反對中央委員會。<sup>335</sup>

公佈的速記記錄上只有索柯里尼柯夫講話的梗概，但未公佈的版本包含了細節內容。對於正式決議和黨的報刊上關於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充滿偏見的描述，他說：「你們是從甚麼時候開始亂用這樣的罪名的？」索柯里尼柯夫的發言一再被人打斷——「把事實拿出來！」——但他並沒有停下來，而是繼續說道，他覺得沒有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的政治局是不可想像的，並且要求由政治局而不是書記處來管理國家。他還說，斯大林作為總書記不該同時列席政治局會議。「無論是從個人還是政治的角度，我對斯大林同志都絕對沒有任何敵意，絕對沒有，」索柯里尼柯夫說，「我必須表明這一點，因為有人說我們之間的關係充滿了個人層面或者政治層面的敵意。不是這樣的，而且我毫不懷疑，斯大林同志的工作為全黨帶來的好處是最大的。」索柯里尼柯夫反對把討論更換總書記等同於政變。他說，事實上，「我們怎麼就不能在代表大會上討論任何一個省級黨組織都可以討論的問題，即誰將成為書記的問題呢？」索柯里尼柯夫最後質問說：要是「斯大林同志」想要享有「列寧同志享有的那種信任」，那就請「斯大林同志贏得那種信任吧！」<sup>336</sup>

大會剩下的大部分時間，主要討論了斯大林的權力問題，也就是它的範圍以及合法性問題。伏羅希洛夫說：「很顯然，要麼是天性，要麼是命運，讓斯大林同志能夠把問題講得比政治局的其他任何成員都好。斯大林同志是最重要的政治局委員，這我可以肯定。」<sup>337</sup> 季諾維也夫再次發言並搬出了「遺囑」。「當時大家很清楚，要是弗拉基米爾·伊里奇不在了，中央書記處就會獲得絕對的決定性地位，」他用山洞會議時送給斯大林的那幾封信中的語言說，「大家就想，我們可以怎麼做事……好讓我們達到眾所周知的力量平衡，不去犯大的政治錯誤……那時候，與斯大林同志的某種個人衝突，而且是相當尖銳的衝突，就顯露

出來了。」<sup>338</sup> 這讓斯大林有了一語雙關的機會：「我過去不知道我們黨內到如今還有『洞人』！」

一些馬屁精跳了出來，要求別再討論斯大林的個人專政。<sup>339</sup>「好了，關於書記處和總書記『無限的權力』，」中央機關中由斯大林任命負責監管報紙的部門領導謝爾蓋·古謝夫說，「看看經驗對此說了些甚麼。過去是否存在濫用這種權力的事情呢？證明一下哪怕是一件濫用這種權力的事實嘛。誰能舉出這種濫用權力的事實？我們這些出席政治局會議的中央監察委員會委員，有條不紊地監督着政治局書記處的工作，某種程度上也監督着總書記的工作。我們看到濫用這種『無限的權力』了嗎？沒有，我們沒有看到這種濫用權力的事情。」<sup>340</sup> 當一位來自列寧格勒的代表提出，檢舉揭發盛行，以至於「最親密的朋友之間都不能傾訴心中的想法」時，古謝夫反駁道：「列寧教導過我們，所有的黨員都應該是契卡人員，也就是說，都應該監督和檢舉揭發……如果我們感到痛苦，那不是因為檢舉揭發，而是因為沒有檢舉揭發。」<sup>341</sup>

重大的政策議題也談到了。斯大林的報告提到，要與資本主義國家「和平共處」。這種說法是和政權本身一起出現的，有些人，比如副外交人民委員李維諾夫，認為它意味着要共同努力以防止任何戰爭，以為社會主義是所有人的和平，與他們不同，斯大林之所以主張「和平共處」，是因為國際衝突說到底是經濟衝突，他預計——實際上是希望——資本主義列強之間會發生衝突。大會決議提到的只是資產階級世界和無產階級世界之間的「一個『和平共處』時期」。<sup>342</sup> 在此期間，為了進口機械設備和糧食，為了維持盧布的匯率，蘇聯正在大量輸出黃金，但這些都不是可持續的政策；斯大林扮演了兩個相反的角色，既贊成索柯里尼柯夫堅決主張的「貿易順差、控制工業化的速度和避免通貨膨脹的重要性」，也指責財政人民委員部想讓蘇聯在經濟上繼續依賴西方。<sup>343</sup> 對於布哈林大會報告的內容，斯大林作了糾正，並籠統地強調說，由於採用了機器，由於農民對集體化農業的「全面支持」，農業的技術改進

\* 譯註：《斯大林全集》第7卷，第218頁。

就要開始了。斯大林的說法得到了大會的批准。<sup>344</sup> 大會還決定設法創建世界級的軍事工業。<sup>345</sup>

斯大林12月23日的總結發言非常有意思。他斷言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想要布哈林同志流血」，但「我們不會把那血給你們」。他繼續說道：「我們所以沒有同意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的建議，是因為我們知道，割除政策對黨是很危險的，割除的方法，流血的方法——而他們正是要求流血——是危險的，是有傳染性的；今天割除一個人，明天割除另一個人，後天再割除第三個人——那在我們黨內還會留下甚麼人呢？（鼓掌）」<sup>346</sup>。

大會決議譴責列寧格勒代表團「企圖破壞我們列寧主義政黨的團結」。<sup>347</sup> 大會代表之所以支持斯大林，不僅因為他們由他任命以及他選區政客一般的作風，所以承認他有發號施令的權力，而且因為他們在各自的地盤有共同的敵人，即「反對派分子」（那是他們的競爭對手），而斯大林主動出擊，幫助他們鞏固在地方上的權力。<sup>348</sup> 在選舉新的中央委員會時，反對加米涅夫的有217票，反對季諾維也夫的有224票，反對斯大林的有87票，反對布哈林的有83票。<sup>349</sup> 托洛茨基不在候選人名單上。後來他也沒再出席過黨的代表大會。他的一些支持者事先一直主張與季諾維也夫以及加米涅夫聯合起來反對斯大林——不管怎麼說，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現在承認，「托洛茨基分子」一直都是正確的——但另外一些忠於托洛茨基的人堅決主張，和這兩人當中的任何一個都要保持距離。托洛茨基曾經秘密會見過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但沒有取得任何結果。<sup>350</sup> 有傳言說，斯大林為了徹底打敗季諾維也夫，在大會即將開始的時候曾經尋求托洛茨基派的幫助。<sup>351</sup> 即使真有那回事，那也不是因為斯大林需要托洛茨基幫忙，而是為了進一步離間反對派。在代表大會上，斯大林的心腹們（米高揚、雅羅斯拉夫斯基）稱讚托洛茨基與季諾維也夫及加米涅夫的鬥爭。至於托洛茨基，他在季諾維也夫重提列寧「遺囑」時甚麼也沒說。作為大會主席團成員，他甚至在有

---

\* 譯註：這裏的引文與中文版的內容略有不同，參見《斯大林全集》第7卷，第317頁。

人直接對他說話時也是一言不發。在近兩個星期的會議中，他只介入過一次。最突出的是，在加米涅夫大膽地、無畏地譴責斯大林的個人專政時，托洛茨基沒有任何反應。「那種爆發絕對出乎我的意料，」托洛茨基後來寫道，「大會期間，我在不安地等待着，因為整個形勢已經發生了改變。對我來說完全看不清楚。」<sup>352</sup>

### 現在，一人當權

1926年1月，沒有做過政治局候補委員的伏羅希洛夫一下子成了正式委員，而且是斯大林統治時期絕無僅有的軍人出身的政治局委員。莫洛托夫和加里寧也被提拔為正式委員，這樣一來，有表決權的委員就增加到九個。加米涅夫被降為候補委員，和捷爾任斯基以及斯大林的三個門徒（魯祖塔克、彼得羅夫斯基、烏格拉諾夫）一樣了。斯大林解除了索柯里尼柯夫政治局候補委員和財政人民委員的職務。索柯里尼柯夫的妻子謝列布利亞科娃表示，「斯大林沒有完全斷絕與索柯里尼柯夫的關係。他們不太經常見面了」。<sup>353</sup> 在政治局會議上，索柯里尼柯夫收緊貨幣和增加黃金儲備的政策再次得到正式確認，但由於沒有了他與工業游說團體的堅決鬥爭，貨幣發行量似乎增加了很多。<sup>354</sup> 加米涅夫因為發表了言辭尖銳的講話而被任命為貿易人民委員，儘管他本人強烈反對（「我不懂這個東西」，他寫信給中央說）。<sup>355</sup> 季諾維也夫在列寧格勒的機器是個更大的威脅，所以斯大林就派去了一個由莫洛托夫和伏羅希洛夫領導的擴大的調查組以及幾組共青團積極分子。在列寧格勒的大學和大型工廠中召開了幾次鬧哄哄的黨的會議。「昨天我在三角工廠，那是一個擁有2,200人的集體，」1月16日，由斯大林任命接管列寧格勒黨組織的謝爾蓋·基洛夫寫信對自己的密友奧爾忠尼啟則說（他用的還是印有阿塞拜疆黨組織抬頭的信箋）：「吵得很厲害，（1917年）10月以後我就沒見過。我沒想到黨員會議會開成那個樣子。有幾次差點真的動手。告訴你，我沒有誇大。」<sup>356</sup> 為了確保批判季諾維也夫的決議獲得通過，莫洛托夫威脅說：「婊子養的、工賊、反革命，我要滅了你們，我要把你們交給中央監察委員會。」<sup>357</sup>

基洛夫請求斯大林讓他回巴庫，但他是斯大林在列寧格勒不可或缺的人物。<sup>358</sup>在那裏的第一年，基洛夫幾乎跑遍了列寧格勒的所有工廠——總共一百八十多間。由於理論底子薄，他就用簡單、直接的講話贏得人們的好感。「我頭一次發現基洛夫是個了不起的演說家」，有目擊者寫道。而且他還說，基洛夫的演講「並不特別深刻，但用了很多寓言、比喻、對照、俗語。我感到他講得很誠懇」。<sup>359</sup>

586 加米涅夫還在妄想斯大林一方會作出妥協。1926年3月18日，他在政治局會議上說：「在代表大會上，當我說斯大林不能把布爾什維克的總參謀部團結在他的周圍時，當代表大會亂哄哄地抗議這一說法並為斯大林起立鼓掌時，要是我說，我只是在重複伊里奇的話，那我本來是可以打斷這種掌聲的。」斯大林插話說：「那你為甚麼不說？」加米涅夫說：「因為我不想用這樣的辦法。」<sup>360</sup>簡直想不到這就是在1904年給過斯大林一本俄文版馬基雅維利作品的那位布爾什維克。加米涅夫差不多和托洛茨基一樣，讓斯大林輕輕鬆鬆就打敗了，在這一點上，他們連季諾維也夫都不如。

為了進一步製造不和，就在斯大林控制的黨報連篇累牘地中傷托洛茨基的時候，他還和托洛茨基進行了一對一的會面。<sup>361</sup>與此同時，加米涅夫也邀請托洛茨基到自己在克里姆林宮的家中與季諾維也夫一起召開私下的會議——那是三年來他們頭一次這樣聚會——並且奉承他說：「有您和季諾維也夫出現在同一份綱領中就夠了，黨會找到真正的中央的。」<sup>362</sup>他們從模仿斯大林的口音和肢體動作中找到了共同語言，並互相寫了一些可以算是道歉的話。但有個托洛茨基的支持者在回首往事時反對說：「我們怎麼可能和圍捕並污蔑過我們的官僚分子坐在同一張桌上呢？他們可是糟蹋了黨的原則和思想的。」<sup>363</sup>至於托洛茨基，他打點行裝，去柏林做了兩個月的治療——他出行時用的是假身份（刮掉了山羊鬍子）。<sup>364</sup>多年之後，在提到1926年初的陰謀時，他引用一位支持者的話說：「既不要和斯大林在一起，也不要和季諾維也夫在一起；斯大林會騙人，季諾維也夫會逃跑。」<sup>365</sup>

斯大林親自前往獲得解放的列寧格勒，並在4月12日給當地黨組織作了一次關於最近召開的中央全會的報告。人稱恰金(Chagin)的記

者彼得·博爾多夫金 (Pyotr Boldovkin) 被叫到基洛夫的住處，結果發現斯大林也在那裏。恰金在給出自己校對的斯大林講話的校樣後想要離開，但基洛夫和他的妻子瑪麗亞·馬庫斯 (Maria Markus) 請他留下來和其他人一起吃飯。據恰金回憶說，基洛夫說道：「『列寧不在了，事情當然很難，但我們有黨，有中央，有政治局，它們會帶領全國沿着列寧主義的道路前進』。斯大林在房間裏走來走去，說：『是的，的確是這樣——黨、中央、政治局。但是要想到，人民在這方面是不太理解的。俄國人民被沙皇統治了幾百年。俄國人民習慣了專制。幾百年來，俄國人民，尤其是俄國的農民，已經習慣了有一個領頭的人。所以現在也該有一個。』」<sup>366</sup>

### 危險的轉折

與德國的三年秘密軍事合作對於提升蘇聯武器生產的水平作用很小，但是為了再次取得突破，1926年春天，負責裝備的副陸海軍人民委員約瑟夫·溫什利赫特，一個會講德語的波蘭人，率領代表團訪問柏林，試圖把蘇聯境內的蘇德聯合生產擴大到很廣的範圍：坦克、重炮、機槍、精密光學儀器、野戰電話、無線電。<sup>367</sup> 但據蘇方的報告說，1926年3月30日，位於菩提樹下大街的蘇聯大使館召開的盛大招待會上——出席招待會的有德國總理、外交部長和陸軍總司令——德國政府似乎有點猶豫，想要「淡化他們的作用，只在德國的私人公司與蘇聯的各個組織之間充當中間人」。<sup>368</sup> 德國的私人公司則更願意出售武器，而不是幫助潛在的競爭對手製造武器。德國外交部官員赫伯特·馮·迪克森 (Herbert von Dirksen) 警告自己的政府，莫斯科把加強軍事合作視為「我們希望繼續與之交往的最有力的證據」。<sup>369</sup> 但是，雖然德國的統治集團對於英國會在多大程度上允許修訂凡爾賽條約已不抱多少希望，德國政府仍然不想與莫斯科達成有可能被視為反英的交易；同時，儘管莫斯科政權實行了新經濟政策，可骨子裏仍是不開明的，這在德國也引起了人們的反感。<sup>370</sup> 不過，德國也擔心在失去東方的同時卻沒有贏得西方的歡心，結果就有了一個折中方案：1926年4月24日的《蘇德中立



和互不侵犯條約》，也稱為「柏林條約」，該條約肯定了早先的拉帕洛條約的內容：兩國保證要在一方遭到第三方的無端進攻時保持中立。這聽起來很像那麼回事，其實沒甚麼作用，實際上，它就是德國做出的保證，不給敵視蘇聯的其他國家過境權。<sup>371</sup> 只要德國對和西方恢復友好關係還抱有希望，蘇聯就只是達到這一目的的手段。<sup>372</sup>

588 斯大林把英國視為世界帝國主義秩序的支柱，但他並沒有排除與英國達成交易的可能性，只是全球的政治經濟形勢影響了已經重啟的貿易談判。歐洲的集體決定——按照第一次世界大戰前英鎊的金平價恢復金本位制——意味着恢復英鎊對美元的匯率（4.86美元），那樣一來，英國出口商品的價格就提高了。貨幣價值的高估會造成國際收支赤字和黃金外流，進而抑制國內經濟的活躍度。批評者認為這是為了金本位而犧牲工業，但是讓英鎊貶值這個明顯的辦法，在倫敦的金融區看來無異於申請破產或對債權人的欺詐。財政大臣溫斯頓·丘吉爾（Winston Churchill）想不通英格蘭銀行行長為甚麼「對於英國擁有世界上最好的信用，同時又有125萬人失業這種奇觀十分滿意」，並聲稱自己「寧可看到金融界少一些得意而工業界多一些滿意」。<sup>373</sup>（這讓我們對於蘇聯國內的索柯里尼柯夫——有斯大林支持——與皮達可夫的工業游說團體之間的爭論有了更深的瞭解。）金本位和財政緊縮對於英國礦業的打擊尤為嚴重。世界大戰阻礙了出口並讓其他國家有了發展本國煤炭工業的機會，同時，德國也在出口「免費」煤炭，以償還凡爾賽條約規定的債務，結果導致國際價格也在下跌，而這段時間英國因為煤層的過度開採，生產率正持續下滑。為了去掉過剩的產能，必須作出重大的結構調整，但礦工及其家屬或許佔到英國總人口的10%，而且他們的工資已經下降了。有些礦主準備妥協，其他的則一心想要廢除第一次世界大戰時制定的全國性的協商制度並強迫工人接受條件；保守黨政府最終與那些不肯讓步的礦主串通一氣，結果在1926年5月1日，約有100萬礦工被關在門外。英國礦工拿到了一手沒甚麼勝算的牌，他們決心鬥爭而不是和解。<sup>374</sup> 其他150多萬工人團結一致，在5月3日發動了英國歷史上的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總罷工，整個國民經濟一片混亂，包括食品的生產和分配。<sup>375</sup> 5月4日，政治局決定給英國工人提供資金援助，同時在報刊上發佈公告。<sup>376</sup> 季諾

維也夫在《真理報》上對英國發生的「偉大事件」表現出極大的熱情。<sup>377</sup>但總罷工失敗了，礦工的罷工雖然又持續了幾個月，最後也以適當降低工資而告終。蘇聯陷入尷尬的境地，重啟談判以改善雙邊貿易的希望也面臨破滅的危險。

波蘭的事態發展構成了最直接的威脅。到1926年5月波蘭貨幣茲羅提崩潰為止，議會制的波蘭接連更換了不下14屆不同的內閣。<sup>378</sup>蘇德柏林條約儘管低調，但華沙仍然憂心忡忡，害怕再次被強鄰瓜分。捷爾任斯基在5月初的度假結束後，準備到烏克蘭視察一個月。由於要離開，他指示留在莫斯科的亞戈達要盯緊那個微不足道的流亡分子、前臨時政府陸海軍部長亞歷山大·古契科夫。5月12日早晨，一介平民、已經卸任的波蘭元帥約瑟夫·皮爾蘇茨基也離開家，和忠於自己的部隊會合後一起向附近的華沙進軍。<sup>379</sup>這位元帥想通過展示自己的實力和巨大的聲望，迫使總統解散剛剛成立一個星期的中間偏右的政府；但總統沒有這樣做，而是趕到通往華沙的橋上攔住了皮爾蘇茨基。原本打算不流血的政變演變成了一場小規模的衝突。底氣不足的皮爾蘇茨基交了好運：5月13日，政府軍司令沒有乘勝追擊，而是坐等援兵，結果釀成大錯，讓皮爾蘇茨基從前在社會黨內的夥伴——不是他所仰仗的軍隊——與鐵路工人合謀，護送忠於皮爾蘇茨基的援軍通過，並阻止忠於右翼政府的部隊到來。5月14日，總統和總理下台。皮爾蘇茨基過去對於政變的想法不屑一顧。5月27日發表的評論指出，幾年前他對記者說過，「要是我違反法律，我就是在為各種各樣的冒險家打開政變和暴動的大門」。<sup>380</sup>現在他再次成了波蘭的主人。波蘭議會把他選為總統，但他拒絕了，他以總司令和陸海軍部長的身份進行統治。在波蘭由半民主制變成溫和的專政制度時，新聞界以及各政黨和工會都選擇了容忍。

英國政府沒有參與政變，但對此基本持歡迎態度。<sup>381</sup>已經很緊張的蘇波關係變得更加緊張了。<sup>382</sup>圖哈切夫斯基和亞歷山大·葉戈羅夫分別被派到明斯克和哈爾科夫，以防皮爾蘇茨基像幾年前那樣突然揮師東進，與此同時，蘇聯的新聞機構塔斯社則否認紅軍部隊在向波蘭邊境大規模集結的傳言，認為那是波蘭人典型的挑釁言論。<sup>383</sup>那位元帥向蘇聯駐華沙的使節強調，要是俄國人以為他想發動戰爭，那一

590 定是把他當成了蠢貨，因為波蘭從戰爭中不會得到任何東西。<sup>384</sup> 這說的是實話，波蘭的確不太可能扮演一個重要的歐洲國家的角色，它夾在德、蘇這兩個懷有敵意的國家之間，與立陶宛不和，看不起捷克斯洛伐克，哪怕是對盟友法國的態度也很冷淡，歧視自己國內人數眾多的烏克蘭人和白俄羅斯人，同時又對蘇聯境內的烏克蘭和白俄羅斯抱有領土野心。但是，外交人民委員契切林認為，皮爾蘇茨基「不可預測」。大羅馬尼亞也讓人頭疼，因為在世界大戰之後，隨着許多少數民族的加入，羅馬尼亞的國家方案變得激進起來。它的法西斯運動聲勢浩大，僅次於意大利和德國而排名第三，而在它的反城市和反猶太人的民族主義意識形態中，也夾雜着反布爾什維主義的成分。<sup>385</sup> 羅馬尼亞甚至拒絕在外交上承認蘇聯。誠然，羅馬尼亞只是一個1,700萬人的農民國家，而波蘭是一個3,200萬人的農民國家。但它們在1926年簽訂了互助條約，這兩個對蘇聯抱有刻骨仇恨的國家的聯合，以及與法國結為同盟——或是受到其他更為詭秘的帝國主義陰謀的慫恿——讓莫斯科如坐針氈。

斯大林還要擔心東方暴露的側翼。日本在1925年同意，在繼續佔有薩哈林島南部並延長薩哈林島北部的租借期用於石油和煤炭開採的同時，在外交上承認蘇聯並讓出薩哈林島的北部，而蘇聯則承認日本在滿洲的霸權。<sup>386</sup> 但曠日持久的漁業公約談判和木材特許權談判，反映出雙方從根本上來說缺乏禮讓，而且在莫斯科，幾乎沒有人懷疑，一旦蘇聯在國際上遇到困難，日本就會乘人之危。在蘇聯的遠東地區，到1926年，朝鮮族——其祖國被日本帝國吞併——人口幾乎翻了三倍，差不多有17萬，在蘇聯具有重要戰略價值的符拉迪沃斯托克地區，他們佔到總人口的四分之一。<sup>387</sup> 蘇聯人知道，日本人在他們境內的這個龐大的東亞人口中培養了間諜。斯大林允許設立一個朝鮮民族區域和幾十個設有朝鮮語學校的朝鮮民族城市，但布爾什維克政權也開始討論，要把這些集中居住的朝鮮人趕到遠離邊境的地方——這表明他們缺乏安全感。<sup>388</sup> 在蘇聯的歐洲部分，據估計波蘭族人口數量在250萬至400萬之間，而在他們之中許多人心懷不滿，其中至少有一些被認為與波蘭情報機關合作。<sup>389</sup> 另外，在與芬蘭接壤的邊境，蘇聯一側有

芬蘭族人。蘇聯並不是唯一懷疑自己國內的少數民族居民與國境線對面的同族人勾結的國家，但蘇聯的邊境極為廣闊。<sup>390</sup>



對於政權，特別是對於斯大林來說，列寧的去世也就是列寧的復活。托洛茨基的政治地位顯然要有列寧在身邊才有保障。<sup>391</sup> 但是，哪怕托洛茨基再善於搞政治，他的經歷（曾經的孟什維克派和知識分子）、他的個性（孤高）以及他的職務（陸海軍人民委員），也讓他幾乎沒有可能成為列寧的接班人，特別是他還有個很難對付的競爭對手。當然，在托洛茨基看來，斯大林是「厭倦的激進派、官僚、耐普曼、富農、暴發戶、卑鄙的人，從施了肥的革命的反過來的土壤中爬出來的一切蟲豸」招來的畸形人物。<sup>392</sup> 當然，斯大林恰好也這樣描述自己的宿敵。即使沒有托洛茨基，斯大林也要虛構出一個托洛茨基。或者更準確地說，斯大林虛構出了他所需要的那個托洛茨基，這是一項只有在事後看來才顯得簡單的任務。斯大林是在意識形態層面打敗托洛茨基的，而在這方面，這位格魯吉亞人看似不堪一擊，實際上卻非常強大。他所宣傳的那種通俗易懂的列寧主義是有效的，這也讓他扮演了擔保人的角色，雖然他在這方面的剽竊顯得肆無忌憚。斯大林自然是集中並且巧妙利用了他在政府中的所有優勢條件，但他在學習上仍舊非常刻苦。「我要再說一說作為作家和演說家的斯大林為甚麼能夠打動人，這使他勝過了其他更老練的演說家和作家，」有位同時代的蘇聯文學評論家說道，「加米涅夫、季諾維也夫、布哈林，甚至托洛茨基，對於列寧著作的熟悉程度都比斯大林差遠了……和他們不同，斯大林研究列寧的文本，諳熟列寧發表的文字。如有需要，他可以毫不費力地去引用列寧的原話。」<sup>393</sup>

591

斯大林把自己擺在列寧「遺囑」執行人的位置上。本來，他可以像托洛茨基一樣作出不同的選擇，把自己與列寧相提並論。斯大林也很

---

\* 編註：托洛茨基《斯大林評傳》（齊干譯，東方出版社，1998），第551頁。

自負。但他選擇了一種更聰明的姿態，裝作十分謙卑的樣子，只把自己當作列寧的學生，而且很善於把這一點表現出來。<sup>394</sup>說來也怪，斯大林還展示出比托洛茨基強得多的移情能力。後來，托洛茨基會惡毒地嘲笑作為官員和斯大林心腹的拉扎·卡岡諾維奇，他未能看到沒受過甚麼教育的卡岡諾維奇具有傑出的組織才能和洞察力。一度崇拜過托洛茨基的卡岡諾維奇是個非常敏銳的人，他認為托洛茨基在演講甚至組織方面(指的是內戰時期)都極有天賦，只可惜謀略不如斯大林。<sup>395</sup>斯大林的確是個謀略家，能在突如其來的機會面前，比如在卡岡諾維奇之類憑藉自身努力爬上來的無數新人所帶來的巨大機會面前，通過巧妙應對而佔據上風。但斯大林最後成了一個充滿怨氣的勝利者，自憐，忿忿不平，覺得受了虧欠。許多學者把這樣的感受歸結為自卑，這樣說可能正確，也可能不正確。但可以肯定的是，他是在一種深刻的結構性的敵意中實行個人專政的：斯大林是一個似乎曾要求解除他職務的人的追隨者。這種受到圍攻的狀況與整個革命的形勢非常相似。

兩大資本主義集團的關係在洛迦諾的明顯好轉，以及新近獨立的波蘭、芬蘭、愛沙尼亞、拉脫維亞和立陶宛，擴大了的羅馬尼亞，還有日本，這些國家所擺出的敵對姿態，對斯大林在地緣政治上的想像——蘇聯能夠避免陷入在他看來必然發生並且會引發新的革命的下一場帝國主義內戰——提出了挑戰。近鄰的敵意，更別說還有新經濟政策的模糊的發展方向，讓斯大林憂心忡忡地迎來1926年夏天。而可惡的「遺囑」問題仍在繼續糾纏着他。

## 勝利中的失敗

同志們！三年了，我一直要求你們解除我的總書記職務。全會每次都拒絕了我的要求……我承認，儘管有列寧同志那封大家都知道的信，但還是有必要讓我留在總書記的位置上。但現在條件不同了。條件不同，是因為反對派被打垮了……在我看來，現在是聽從列寧指示的時候了。因此我要求全會解除我的中央總書記職務。我向你們保證，同志們，這樣做對黨只會有好處。

593

——斯大林，中央委員會全會，1927年12月19日<sup>1</sup>

斯大林住在克里姆林宮的娛樂宮二樓。那是一棟不起眼的三層建築，緊挨着聖三一塔樓，曾經是波雅爾居住的地方，不久前還做過克里姆林宮衛戍司令的住處。斯大林的住所有六個房間，包括一間橢圓形的餐廳、兩間兒童臥室、一間主臥室，一間辦公室，以及一間小的電話室。斯大林住在主臥室，他的妻子娜捷施達·「娜佳」·阿利盧耶娃住在一間兒童臥室。五歲的瓦西里（「瓦夏」）和同年的阿爾喬姆——他的父親在內戰中死了——合住在另一間兒童臥室。斯大林的長子、當時19歲的雅科夫睡在餐廳。從娜佳房間的窗子可以看到外面的亞歷山大花園和庫塔菲婭塔樓，那是克里姆林宮唯一還保留吊橋的塔樓。<sup>2</sup>但總的來說，斯大林住得並不闊綽。不過也算是改善了，因為這是他家在克里姆林宮住過的第二處寓所，先前住在大克里姆林宮的附樓，那裏非常

594 嘈雜。<sup>3</sup> 在斯大林向列寧反映後，負責領導人警衛工作的阿布拉姆·別連基 (Abram Belenky) 建議斯大林搬到大克里姆林宮的房間。托洛茨基的妻子、博物館館長娜塔莉亞·謝多娃堅決反對，認為大克里姆林宮屬於博物館管轄的範圍。<sup>4</sup> 後來她心軟了，表示可以把博物館的幾間辦公室騰出來作為住房，但斯大林卻讓衛戍司令挪了地方。<sup>5</sup> 後來，別連基想討好斯大林，結果卻適得其反。「在搬到新住處的時候，中央執行委員會事務處有人——也許是格伯烏的別連基同志——擅自動用國家的錢為我的住處訂購了新家具，」斯大林反映說，「我明確表示過，舊家具完全可以滿足需要，這種任性的做法卻反着來。」他要求中央監察委員會負責人調查並處罰相關責任人，新買的家具要立即搬到倉庫或有需要的地方。<sup>6</sup> 斯大林誠心想住得簡單一點，可他周圍的人想拍馬屁，這讓政府的工作人員很難處理。

斯大林沒有承擔太多家長的責任。克里姆林宮的住處顯然太侷促了。莫斯科郊外祖巴洛沃兩層的哥特式別墅有 5,000 平方英尺，\* 12 個房間，但斯大林在星期天的時候並不經常去那裏，哪怕在夏天也是如此。他的寡母凱克·格拉澤仍然住在格魯吉亞，沒有到莫斯科來；娜佳和她保持着聯繫（「我們在莫斯科向您問好。我們生活得很好，身體全都很健康。孩子們在長大……」）。<sup>7</sup> 娜佳的父母謝爾蓋和奧爾加·阿利盧耶娃已經搬到列寧格勒。斯大林和已故的卡托·斯瓦尼澤的第一次婚姻的姻親們住在莫斯科，偶爾會看到他，至於見面的頻率還不清楚；他很少看到自己的妻子。斯大林的婚姻生活不太幸福。他似乎愛過娜佳，但有點漫不經心，哪怕是他確實在乎她的時候，對她也是經常惡聲惡氣，肆意謾罵，或者是更令人難以忍受的，根本不和她說話。<sup>8</sup> 她患上了偏頭痛，身體虛弱，還要忍受孤獨的折磨。「很顯然，我在莫斯科和誰都不相干，」1926 年初，娜捷施達寫信給斯大林第一任妻子的弟媳瑪麗亞·斯瓦尼澤 (Maria Svanidze) 說——後者當時在柏林，正抱怨感到無聊，「有時候甚至很奇怪：這麼些年過去了，一個親密的朋友都沒

---

\* 編註：約 465 平方米。

有，但很明顯，這是性格問題。奇怪的是，我感到和黨外的人更親近（當然是和女人）。這顯然是因為她們更單純。」娜捷施達對領導夫人的角色以及隨之而來的好處毫無興趣。相反，她擔心的是，如果不去工作，她就不會被當回事，但與此同時，她希望能夠勝任所得到的任何職務。在寫信給斯瓦尼澤時，她正懷着他們的第二個孩子而且離生產不遠，所以她接着說，「非常遺憾，又一副家庭的枷鎖把我困住了」。<sup>9</sup>

595

1926年2月18日，女兒斯維特蘭娜 (Svetlana) 出生；嬰兒室就設在娜佳的房間。在斯大林留下的大量文件證據中，沒有任何有關他作何反應的記錄。他對孩子們可能非常關心，當他在家——通常是吃得很晚的午餐——和有空的時候，他會瞭解他們的情況，送書給他們，帶他們去劇院，用傳授人生經驗的方式管教他們。照料孩子和家庭的責任主要交給了服務人員的負責人卡羅利娜·季爾 (Karolina Til)，她還要負責從克里姆林宮的食堂取回全家的飯菜。由於斯大林的家長作風和他作為領導人的地位，不管他以前有多愛娜佳，這個十幾歲就成了他妻子的女人並不是他現在想要的那種快活而恭順的女主人。至少有一回，娜佳帶着瓦西里和斯維特蘭娜跑回了列寧格勒的娘家。<sup>10</sup> 克里姆林宮的長舌婦們都說是她「拋棄了」斯大林。<sup>11</sup> 彷彿是命中注定，她又回來了。雅科夫的善良讓他和同父異母的弟弟妹妹們以及自己的繼母（只比他大六歲）關係很親近，他和娜佳一同承受着斯大林在家中的專橫與暴虐。<sup>12</sup> 雅科夫從一所機電高中畢業後並沒有進入大學，而是宣佈要和16歲的同学卓婭·古尼娜 (Zoya Gunina) 結婚，斯大林對此大發雷霆。在克里姆林宮娛樂宮斯大林家中的廚房裏，雅科夫趁沒人的時候用槍對準了自己的心臟，結果打偏了幾英寸，只是受了傷。斯大林寫信給娜佳，說雅科夫是「一個小無賴，敲詐勒索，他和我再沒有任何關係了，也不可能有任何關係了」。<sup>13</sup> 在斯大林的眼中，雅科夫的行為不是因為絕望，不是因為自己無情地反對他的婚事，而是想對自己施壓。不過，雅科夫還是和卓婭結了婚，娜佳讓夫婦倆住進了她父母的房子。卓婭後來生了個女兒，那也是斯大林的長孫女，但她因為肺炎夭折了。<sup>14</sup>

絕對的權力並沒有帶給斯大林絕對的歡樂。他為之欣喜，又因之自憐。他興奮的是自己成了關注的中心，成了決策者，成了列寧的繼



596

承人，成了領導者，但所有人都知道，列寧在遺囑中要求解除他的職務，這讓他寢食難安。令人眩暈的滿足與折磨，長期的野心與眼前的重擔，權力所帶來的這些悖論都壓在他的身上。在完成黨的第十四次代表大會繁瑣的籌備工作以及其他許多事務後，他感到累了。「我在考慮休兩個星期的短假，我真的累了」，1926年2月1日，他寫信對梯弗里斯的奧爾忠尼啟則說。但是，不受約束的權力還在繼續圍困着斯大林：國家銀行主席、國家統計局的工作人員、中央消費合作社主席、鐵路部門、烏克蘭的官員、巴什基爾的官員、白俄羅斯的官員、達吉斯坦人、哈薩克斯坦人、布里亞特蒙古人、衛生人民委員、國營托拉斯的管理人員、這個那個地方黨組織的首腦、工人代表、工會工作人員、報紙編輯、大學校長、外交人員、大使、外國共產黨人、秘密警察、軍隊將領、青年組織家、為了令人失望的對德條約而進行的最後談判、婦女組織家、五一遊行和招待會、英國史上第一次總罷工等各方面的會議。但他最後還是逃跑了。「再過幾天我就到索契了」，5月16日，他再次寫信給奧爾忠尼啟則。「你打算怎麼度假，柯巴？」<sup>15</sup> 5月23日，斯大林抵達目的地。他幾乎是立刻就給留在莫斯科看家的莫洛托夫發了一封加密電報（5月24日，星期一）：「我在星期天晚上到了這裏。天氣很差……別連基告訴我說（1）托洛茨基早在星期三早晨就〔從柏林〕回到了莫斯科；（2）普列奧布拉任斯基在柏林時去看過他（秘密會面？）。有意思。」<sup>16</sup> 是的，就連度假的時候都這樣。

在擔任總書記後的大約四年時間，即便是遠離莫斯科，斯大林的個人統治也是牢固的。不過，要想保住自己的權力，仍需保持在政治局的多數地位。到1926年1月為止，該機構（有表決權的）成員的組成罕有變動：葉蓮娜·斯塔索娃只是在斯維爾德洛夫去世後，在1919年7至9月短期擔任過政治局委員；列寧在1921年免去了尼古拉·克列斯廷斯基的委員職務，讓季諾維也夫代替了他；布哈林在1924年接替了已經去世的列寧的位置。直到1926年，季諾維也夫和托洛茨基仍然是正式成員。但是在1926年1月，斯大林把加米涅夫降為（沒有表決權的）候補委員，同時把伏羅希洛夫、莫洛托夫和加里寧提拔為正式委員。在這個由九人組成的機構中，斯大林的有表決權的多數除了這三個人

之外，還包括李可夫、布哈林和托姆斯基三人。身體不好的捷爾任斯基是五名候補委員之一，而候補委員還包括斯大林的幾個門徒：莫斯科黨組織負責人尼古拉·烏格拉諾夫，老廣場街的中央委員會書記揚·魯祖塔克，以及烏克蘭的政府官員彼得羅夫斯基——該國第十大城市葉卡捷琳諾斯拉夫就是為了表彰他而在1926年被更名為第聶伯羅彼得羅夫斯克。換句話說，許多斯大林的親信都得到了沒有表決權的委員職務。誠然，從1926年夏天開始，他還會讓政治局的人員構成變得對自己更加有利。但是他要等到1927年底最終召開黨的第十五次代表大會的時候，才會把季諾維也夫—托洛茨基反對派全部開除出黨並且在國內流放。險惡的政爭會在黨的一個又一個論壇上繼續下去，把斯大林身邊的人全部捲進去，也衝擊着斯大林的心靈。

597

此外，從1927年12月斯大林在政治上完勝反對派之後，他的政策就接二連三地遭遇慘敗。幾乎所有的問題都可以追溯到政權的力量之源：共產主義意識形態。布爾什維克的社會主義（反資本主義）讓作為突擊隊的積極分子們覺得有吸引力和意義，給黨內外成百上千萬的人提供了話語和世界觀，並實現了對公共領域的壟斷，但同樣是這種可以在政治上給人以力量的意識形態，對國際局勢或國內不穩定的準市場經濟卻沒有任何幫助。相反，這種意識形態讓那些難以克服的挑戰變得更加不易處理。奪權的結果，是要在十分有限的選擇空間中管理俄國在世界上的權力，使之在全然不同於國外列強及國內佔人口多數的農民的新維度上展開。個人動力強化了這種包圍意識：政治上取得的勝利只會激起斯大林證明自己的渴望。他不懂得甚麼是仁慈。對於被打敗的對手，他只表現出虛假的大度。忠誠的革命者，長期共事的老同志，因為質疑他個人的統治或政權的政策就成了所謂的叛徒。當然，這種妖魔化的做法是布爾什維主義所固有的，也和列寧的行為非常相似，可斯大林卻更進一步，把它用在共產黨人身上。黨內對手在被斯大林打敗之後，就成了陰謀殺害他並勾結外國勢力的所謂恐怖分子。

革命中遇到的問題激發了斯大林身上的多疑症，而斯大林又激發了革命所固有的多疑症。1926至1927年，由於事態的發展和反對派聲勢的逐漸增大，兩者相互刺激，越演越烈。然而斯大林周圍知道內情的

598

人，似乎並沒有把他看作是有罪的暴君。當然，他們開始看出，這個人臉皮薄，愛記仇，但他們也看到了一個鏗而不捨又不知疲倦的、強硬而且老練的、馱馬一般的黨和事業的領導人，對於他的情緒和任性，他們希望以政治局作為主要的機制加以約束。可即便到了1927年12月，黨內是否有人真正看透他的性格，仍然是個問題。

## 遊覽高加索

斯大林剛到索契，聰明的阿納斯塔斯·米高揚就在5月26日找到他，後者30歲，是鄰近的北高加索地區黨的負責人。米高揚——他在信封上寫的收信人名字是「親愛的索索」，那是斯大林的母親用來稱呼兒子的昵稱——就是先前勸說斯大林到索契附近的馬采斯塔嘗試藥用硫磺浴的那個人，結果斯大林每年都要到南方度一次假。<sup>17</sup>現在，米高揚勸說斯大林放鬆一下，到他的家鄉南高加索轉一轉。他們當天就乘列車從黑海海岸出發，前往梯弗利斯。斯大林隨身只帶了內衣和一把獵槍。「我先要痛快地玩一玩，然後再考慮健康和休養」，斯大林說。<sup>18</sup>托夫斯圖哈在5月28日打電報說，在政治局的一次會議上，托洛茨基和莫洛托夫為了一份對外租賃合同弄得劍拔弩張，莫洛托夫覺得那份合同吃虧了；那是幾個月前托洛茨基簽的，但直到現在才公開細節。好吧，就讓莫洛托夫去和托洛茨基鬥吧。同一天，斯大林的一名隨行人員給托夫斯圖哈回話說，「主人的心情很好」。<sup>19</sup>

「主人」(*khoziain*) 這個源於莊園領主的帶有家長專制色彩的稱呼，逐漸成了斯大林的外號，但是到了南方，在自己相識多年的老鄉面前，他還是那個復仇者柯巴。他和米高揚參觀了以礦泉水出名的博爾若米、庫塔伊西，甚至還有哥里。(對於他引起的騷動，我們只能想像了。) 遊覽途中，斯大林接見了佩季·「彼得」·卡帕納澤，那是他從梯弗利斯神學院的時候就認識的一位老朋友，後來居然做了神父，他的照片一度掛在斯大林的牆上。<sup>20</sup>在梯弗利斯，斯大林觀看了歌劇，還像他喜歡做的那樣，去後台問候了演員和導演。在格魯吉亞首府，他和米高揚住在奧爾忠尼啟則的住處，謝爾戈的哥哥康斯坦丁記得，斯大林在

那裏唱了一首粗俗的格魯吉亞歌曲。<sup>21</sup> 斯大林喜歡跟他們在一起。只有他們共同的密友兼「名譽高加索同胞」基洛夫<sup>\*</sup> 缺席了——後者此時在列寧格勒。

在莫斯科，在斯大林缺席的情況下，政治局於1926年6月3日開會討論了英國的罷工。托洛茨基公開反對蘇聯繼續支持英國現存的工會組織，因為要是這樣，與資產階級政權合作的勢力就會加強，英國共產黨的力量就會削弱，對於即將到來的可以實現革命性突破的危機一機會，英國工人階級就會缺乏準備。<sup>22</sup> 這次有43人參加的政治局會議，持續了6個小時。開會當天，在給莫洛托夫的電報中，斯大林憑直覺正確地預見到總罷工是「由英國保守黨挑起的」，也就是說，「是資本而不是革命在發動進攻」。他還說：「所以，我們並不是到了一個革命發起暴風雨般的猛攻的新階段，而是持續的穩定，暫時的，不是永久的，但畢竟是穩定，儘管資本會千方百計再次對工人發動新的進攻，工人仍將被迫保護自己」。他譴責托洛茨基和季諾維也夫擺出的激進姿態，認為在革命不會很快到來的情況下，這種姿態只會令英國工會運動有分裂的危險。<sup>23</sup> 斯大林認為，蘇聯支持英國的工會和罷工工人可以起到威懾作用，防止他們再次入侵蘇聯。儘管如此，他仍然想完成一直被擱置的1924年的雙邊貿易談判。總罷工期間，英國駐莫斯科代辦再次私下向倫敦提出請求，希望重啟談判，以便「和俄國達成這樣那樣的協議」。<sup>24</sup> 但是，由於蘇聯不但暗中向殖民地輸出革命，還宣佈給罷工者撥款，英國政府凍結了重啟貿易談判的計劃。<sup>25</sup>

無論是想讓蘇俄與德國重新融入國際秩序的熱那亞會議(1922)，還是想要與德國建立互相利用的特殊關係的拉帕洛條約(1922)，都沒有讓蘇俄形成切實可行的安全政策。而現在，雖然總罷工已經以失敗而告終，英國保守黨仍然帶頭發動了一場聲討蘇聯的公共運動。托洛茨基在政治局會議上指責說，在內部從來沒有討論過總罷工問題，這種說法不對：政治局在5月4日、6日和14日討論過這個問題，並專門成立了一

---

\* 編註：斯大林、米高揚和奧爾忠尼啟則都出身高加索地區(三人在政治局被稱為「高加索小集團」)，基洛夫並不是，此處為戲稱。

個由蘇聯工會負責人托姆斯基領導的委員會（托洛茨基不是該委員會的成員）。6月3日的與會者否決了季諾維也夫的共產國際關於英國罷工的教訓的提綱。差不多是一刻不停的冷嘲熱諷讓本已十分緊張的氣氛變得越發緊張。加米涅夫用譏諷的口氣質問那些在他發言時出語威脅的人：「你們為甚麼全都在幫我？」托洛茨基插嘴說：「『集體領導』恰恰就是在大家互相妨礙或互相攻擊的時候。（笑聲）」托洛茨基也許是想要緩和一下緊張的氣氛。<sup>26</sup> 集體領導，哈！斯大林會得到一份全面的報告。

斯大林在高加索，某種程度上就是闊別多年之後回到自己的地盤。6月8日，他接見了梯弗利斯鐵路總廠的代表團，二十多年前，他曾是那裏的一個年輕的鼓動家。「同志們，我應當告訴你們，憑良心說，這裏對我的頌揚，我連一半也不敢當。」據當地的報紙報道，他謙遜地表示：「原來我又是十月革命的英雄，又是蘇聯共產黨的領導者，又是共產國際的領導者，又是神奇的勇士，又是甚麼等等。同志們，這都是無謂的話，都是絕對不必要的誇張。這種話通常是在革命烈士靈前講的。但是我還不打算死呢……我過去的確是而且現在仍然是梯弗利斯鐵路工廠先進工人的一個學生。」在保持這種假惺惺的謙卑姿態的同時，斯大林接着就大致講述了他的地位是如何在地下革命鬥爭中逐步上升的：從他1898年成為「工人的學生」時的第一個工人「小組」開始，到1917年成為「我的偉大導師列寧」的學生為止。呈現在大家面前的不是一個高高在上的知識分子，而是一個與工人以及「奠基人」緊緊地聯繫在一起的埋頭苦幹的革命者。「從學徒的稱號（梯弗利斯），經過幫工的稱號（巴庫）而到我國革命的一個師傅的稱號（列寧格勒），——同志們，這就是我學習革命的經歷……如果毫不誇大地憑良心說，我原來是怎樣一個人以及我成了怎樣一個人的真正情形就是如此。（掌聲，轉為熱烈歡呼。）」<sup>27</sup>。

這和五年前斯大林在梯弗利斯得到的噓聲和謾罵完全不同，那時他是灰溜溜地離開會場的。這次，奧爾忠尼啟則及其手下顯然沒有掉以

---

\* 譯註：《斯大林全集》第8卷，第154-155頁。

輕心，而是清除了所有阻力。但斯大林那天在鐵路工廠就自己的成長經歷所說的話，並未發表在全國性的報刊上，他附帶着對外交事務所講的內容也沒有。特別突出的是他對前一個月在波蘭發生的政變的評論。他在回顧該事件時，先是用煽動性的語言指責波蘭共產黨支持皮爾蘇茨基（推翻保守派政府）的行動，然後又扼要說明了支持皮爾蘇茨基的力量與其在國內的右翼競爭對手國家民主黨之間的政治分歧，並預言說，儘管前者在軍事上更為強大，但後者會贏得最終的勝利：波蘭會進一步向右，轉向沙文主義。不過，斯大林稱皮爾蘇茨基是「小資產階級」而不是法西斯主義，後來，皮爾蘇茨基的立場轉向了被斯大林歸於這位陸海軍部長在國內的對手的那種立場時，斯大林改變了自己的看法。<sup>28</sup> 因此，就在格魯吉亞民族主義情緒似乎開始平息的時候，在獨立的波蘭，民族情緒完全是另外一番情形。

601

在莫斯科，鬥爭越演越烈。在7月14日斯大林缺席的另一次政治局會議上，從烏克蘭回來的捷爾任斯基聲稱記錄他們內部討論過程的做法（這是反對派提出的一個合法要求）是「犯罪」，托洛茨基回擊說：「我們應該指示格伯烏阻止我們說話；這樣一切都簡單了。」<sup>29</sup> 捷爾任斯基對令人窒息的官僚體制十分憤怒，他在那年6月對自己在最高國民經濟委員會的下屬說，蘇聯的行政機器是「以普遍的不信任為基礎的」，並且認為「我們必須拋棄這種體制」。他還說，不斷轉移的機關癌細胞正在「吃光工人和農民的家當，他們用勞動創造了真正有價值的東西」。<sup>30</sup> 他給李可夫寫信說：「政府的政策沒有我的份。我不理解它，我也看不出它有甚麼意義。」<sup>31</sup> 在給古比雪夫的信中，他寫道，就連優秀的行政管理者都「淹沒在不同部門間的協調工作以及各種報告、文件和委員會當中。每一個資本家都有自己的方法和主要的職責。我們現在是由勞動國防委員會和政治局總管一切……這不是工作，這是受罪」。與此同時，捷爾任斯基擔心自己的批評可能會「被那些把國家拖進深淵的人，比如托洛茨基、季諾維也夫和皮達可夫利用……如果我們找不到正確的路線和發展的步調，我們的反對派就會壯大，國家就會出現專政者，那是革命的掘墓人，儘管他衣服上有漂亮的羽毛。墨索里尼、皮爾蘇茨基，當今幾乎所有的專政者都曾經是赤色分子」。<sup>32</sup>

## 疾病纏身

602 高加索的「三個火槍手」慢慢結束了遊覽：奧爾忠尼啟則陪同斯大林和米高揚登上了返程的列車，直到黑海的港口城市波季，斯大林和米高揚從那裏乘船，於1926年6月15日抵達索契。有人覺得，要是斯大林可以一年到頭都待在索契，在那裏管理政府，或許他就滿足了。他看看文件——為了消遣而不只是工作——玩玩九柱戲 (*gorodki*)，搞搞園藝。「他喜歡野餐，」斯大林的衛士長、立陶宛人伊萬·尤西斯 (Ivan Jūsis) 的女兒說，「通常我們是去爬山，找個有意思的地方，然後在那裏安排歇腳。我們總是帶上一塊白色的桌布。烤肉串和各種單片三明治肯定是要有的：上面碼着魚子醬和魚——鱒魚、鮭魚。還有奶酪和香草，特別是香菜。我父親知道怎樣做熊肉香腸，立陶宛風味的，那是斯大林喜歡的。」<sup>33</sup> 看來，尤西斯那時與斯大林特別親近。在莫斯科，他已經從 (盧比揚卡大街附近) 契卡精英們居住的瓦爾索涅夫耶夫巷搬進了大克里姆林宮裏從前侍從女官住的地方。捷爾任斯基住在同一條走廊的盡頭；著名的無產階級詩人傑米揚·別德內住在樓上，住處很豪華，和伏羅希洛夫的一樣。在索契，尤西斯不僅是衛士，還是遊伴。

斯大林因為吃了腐爛變質的魚而食物中毒，醫生要他按規定飲食。他們還認真檢查了他的身體，做了到當時為止或許是最詳細的健康記錄。索契附近馬采斯塔療養院新上任的科學主管伊萬·瓦列京斯基 (Ivan Valedinsky) 和另外三名醫生在斯大林住的四號別墅的一個小房間裏為他做了檢查。「斯大林同志從陽台一側進來，坐在我們醫生對面，沒有一點架子，」瓦列京斯基回憶說，「我們醫生也感到放鬆了。」檢查結果發現，斯大林患有慢性的、儘管是非活動期的肺結核。他的腸道也有問題，好像以前中過毒。(實際上，他年輕時得過斑疹傷寒，在胃壁上留下了潰瘍。) 他還患有持續性腹瀉。胸部因為心臟供血不足而疼痛，他自己用檸檬治過。他抱怨說左手的指尖疼。他的關節發炎、紅腫。醫生們提到，他的左前肩的肌肉開始萎縮了。「左上肢肌肉疼痛和關節炎」，他們寫道。(肌肉疼痛如果不是外傷造成的，往往就是病毒感

染引起的。)醫生們還注意到慢性扁桃腺炎的發作(扁桃體周膿腫)，而慢性扁桃腺炎的發作又引發喉嚨疼痛和腫脹。斯大林的呼吸沉重，但作為病因的右肺病變(胸腔積液)要到多年之後才被發現。他說話的聲音很小，可能也是因為這個緣故：即使開始使用麥克風，他的講話有時候也不太聽得清楚。

瓦列京斯基後來寫道，在對斯大林的內部器官作客觀檢查期間，沒有發現任何病變的成分。不過，檢查似乎得出了患有埃爾布—沙爾科綜合症(Erb-Charcot syndrome)的診斷結果——疲勞、痙攣，並且越來越消瘦。<sup>34</sup> 不管正確的診斷結果是甚麼，斯大林左臂肘部潰爛的情況還在繼續惡化，幾乎無法使用。他還覺得自己的兩個膝蓋總是嘎吱嘎吱作響，當他轉動脖子的時候也是這樣。他疼痛的肌肉露出某些營養不良的跡象，或許也是埃爾布—沙爾科綜合症的症狀，儘管這有可能是一種遺傳病。<sup>35</sup> 醫生們推薦了十幾種馬采斯塔硫磺浴。「檢查結束離開時，斯大林問我，『來點白蘭地怎麼樣？』」瓦列京斯基回答說：「星期六可以稍微喝點，星期天才真正可以放鬆，但是在星期一上班的時候要保持清醒。」他接着又用共產黨人指代酒宴的暗語說：「斯大林同志對這一回答十分滿意，結果下次他就組織了一場讓我非常難忘的『星期天義務勞動』(subbotnik)。」<sup>36</sup> 斯大林顯然很喜歡瓦列京斯基。瓦列京斯基是神父的兒子，他本人也讀完了神學院，在得到父親的允許後，又去托木斯克接受了醫學訓練，之後他得到博士學位，參加了世界大戰，並就職於克里姆林療養院。斯大林要是願意的話，也可以表現得特別有魅力，尤其是和服務人員在一起的時候。索契和馬采斯塔的放鬆可能讓斯大林的心情好了很多。

爛魚的影響還沒有消除就傳來了好消息：受到圍攻的反對派無意中又給他們鄙視的這位專政者送了一份大禮。設法保住了職務的左派反對派成員、莫斯科紅色普列斯尼亞區區委書記格里戈里·別連基(Grigory Belenky)，在莫斯科郊外約20英里<sup>\*</sup>處的一座林中別墅組織了

---

\* 編註：約32公里。



一次會議。參加會議的可能有70人。他們打算把大工廠、高校和國家機構中的支持者組織起來。<sup>37</sup>「哪怕只有百分之一的機會使革命及其工人民主制獲得新生，也要不惜一切代價抓住這個機會」，一名與會者堅定地說。<sup>38</sup>別連基估計會得到自己區的62個黨支部的支持。據說，他認為「要是我們能拿下紅色普列斯尼亞區，我們就能拿下所有的地方」。<sup>39</sup>這完全是自欺欺人。格伯烏的人就坐在各黨支部的會議廳裏，而且表決用的是公開舉手的方式，這種情況下誰願意為他們出頭呢？別連基邀請了第一副陸海軍人民委員米哈伊爾·拉舍維奇參加樹林會議。當有人問拉舍維奇軍隊裏的反對派是否正在組織起來的時候，據說他回答道，「哦，形勢很好」。<sup>40</sup>至少有一個與會者檢舉了這個小集團，於是，  
604 審訊在6月8至9日就開始了。<sup>41</sup>反對派的秘密的樹林會議牽扯到第一副陸海軍人民委員，這真是天賜良機。

6月24日，托夫斯圖哈給索契發來電報說，由於斯大林還沒有回來，他將把在莫斯科召開的中央全會推遲到7月12日，於是，為了充分利用反對派的最新「陰謀」，斯大林行動起來，在6月25日給「莫洛托夫、李可夫、布哈林及其他朋友」回信說，「季諾維也夫集團」肯定參與了此次「拉舍維奇事件」。季諾維也夫那天沒去樹林，但不管怎麼說，事物是普遍聯繫的。斯大林還說了一些帶有傾向性的話，說「忠誠的」反對派如何頭一次越出了界限，他不但要求把拉舍維奇趕出陸海軍人民委員部，還要把季諾維也夫趕出政治局，甚至趕出共產國際。「我向你們保證，」斯大林最後用明顯很得意的口氣說，「在黨和國家中，沒有哪個人會為季諾維也夫感到惋惜，因為他們太瞭解他了。」<sup>42</sup>

純粹的快樂。一名陪同斯大林的工作人員向自己在莫斯科的上級匯報說，詩人傑米揚·別德內「經常過來，給我們講些下流的笑話」。不過，早就該把這位專政者哄回首都了。1926年7月1日，莫洛托夫在信中很堅決地寫道，「我們認為您必須在7月7日到達」。莫洛托夫的來信反映出對於斯大林的堅強領導的欣賞與愛戴。斯大林動身回莫斯科的時間不早於7月6日。<sup>43</sup>他剛剛回到首都，捷爾任斯基就寫信說，波蘭皮爾蘇茨基政變的幕後支持者是英國。「（對我來說）整個材料都無可置疑地表明，波蘭正準備對我們發動軍事進攻，目的是讓白俄羅斯和烏

克蘭脫離蘇聯，」捷爾任斯基肯定地說，「皮爾蘇茨基的所有工作都集中在這一點……羅馬尼亞很快就會從意大利那裏收到包括潛艇在內的一大批武器。」他同時還強調說，在芬蘭、愛沙尼亞、拉脫維亞、立陶宛和波蘭這些「邊陲國家」，「白衛分子又活躍起來了」。皮爾蘇茨基政變後，蘇聯幾乎是馬上就提議，與愛沙尼亞和拉脫維亞簽訂互不侵犯條約，但它們誰都沒有作出肯定的回應。<sup>44</sup>捷爾任斯基堅持認為，皮爾蘇茨基的猶豫不決只是因為顧及國內的政治狀況，而他要發動入侵，需要的只是鼓動公共輿論。捷爾任斯基要求中央委員會檢查紅軍的戰備、補給、動員和疏散能力。<sup>45</sup>歡迎回到莫斯科，斯大林同志！（每次遇到人，他耳邊總是響起這句問候。）

### 遺囑問題又來了

推遲後的中央全會於7月14日召開（一直開到23日）。第二天，在全會之外，捷爾任斯基命令亞戈達轉移距離波蘭和羅馬尼亞最近的邊境地區的奧格伯烏地方機關的檔案資料。他還要求把關押在西部邊境附近監獄中的特務、白衛分子和土匪運走。<sup>46</sup>7月20日，捷爾任斯基向全會作了報告。最近剛指示亞戈達清理莫斯科及其他城市投機倒把分子的捷爾任斯基，現在就指責說各省的奧格伯烏「逮捕、流放、監禁、壓迫和敲詐私商（在此期間，他們準備每天工作14至16個小時）」。<sup>47</sup>他稱托洛茨基的支持者、國家計劃委員會副主席皮達可夫「對工業的擾亂最嚴重」。對於曾經拉攏過捷爾任斯基的加米涅夫，他說，「你是在搞陰謀（*politikantsvo*）而不是幹工作」。捷爾任斯基說，要是他事先知道反對派在莫斯科郊外召開秘密會議，他會「毫不猶豫地帶領兩個連的奧格伯烏部隊，用機槍解決問題」。他汗水漣漣，面色蒼白，勉強講完後才回到自己的座位上。很快，人們幫助他離開大廳，讓他躺在會議廳外面的沙發上。有人給他用了樟腦藥。捷爾任斯基想要走回他在大克里姆林宮附近的住處，但卻頹然倒下。49歲的他去世了。在全會發言過程中，他顯然是心臟病發作。屍檢顯示，他的動脈硬化已經到了晚期，尤其是流向心臟的血管。<sup>48</sup>「繼伏龍芝之後，捷爾任斯基又逝世了，」在

7月22日葬禮上的簡短講話中，斯大林說，「『資產階級的大災星』——當時人們這樣稱呼費里克斯·捷爾任斯基。」<sup>49\*</sup>

全會繼續進行。托洛茨基代表他本人、季諾維也夫以及加米涅夫宣讀了一份聲明，宣佈他們要一起與機關的暴政作鬥爭，要反對新經濟政策，維護工人的利益，要增加對富農的稅收，要實行農業的集體化和快速的工業化。†斯大林的手裏有「拉舍維奇事件」，可反對派正在散佈列寧的遺囑，還把裏面談到托洛茨基非布爾什維主義的那幾行刪掉了。對於遺囑問題，斯大林沒有迴避，而是完整地宣讀了遺囑的內容。托洛茨基後來寫道，當時斯大林忍氣吞聲，而且還不斷地有人打斷他，說他歪曲列寧的意思。「到最後，他完全失去了平靜，跼着腳，扯着嗓子，舉起一隻手，聲嘶力竭地大喊，胡亂指責和威脅，讓整個大廳的人都愣住了，」托洛茨基聲稱，「以前和此後我都沒有看到他如此失態。」<sup>50</sup>但是，已經解密的有關此次爭論的記錄表明，當時反對派處於守勢，斯大林處於攻勢。

「把列寧的信稱為遺囑是不對的，」斯大林在7月22日的長篇講話中指出，他還繼續說道，「列寧的信提到了六位同志。對於托洛茨基、加米涅夫和季諾維也夫三位同志，信裏說他們犯過原則性的錯誤，而且那些錯誤並不是偶然的。我想，要是我在這裏說，『遺囑』裏隻字未提斯大林的原則性錯誤，那並不是不謙虛。伊里奇責備斯大林並指出他的粗暴，但在信裏絲毫沒有提到斯大林有原則性錯誤。」<sup>51</sup>斯大林還說，對於這些批評，他已經作了反省，而托洛茨基、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卻充耳不聞。托洛茨基攻擊人的方式，斯大林聲稱，就是散佈謠言，尤其是把一切都說成是性格問題。「信裏說我們不能把托洛茨基的非布爾什維主義歸罪於他『個人』……由此可以得出結論，說托洛茨基同志需要改正『非布爾什維主義』，」斯大林說，「但是由此不能得出結論，說托洛茨基同志有權利去修正列寧主義，說當他修正列寧主義的時候我

\* 譯註·《斯大林全集》第8卷，第173頁。

† 譯註·參見〈托洛茨基等13人致中央七月聯席全會〉，《蘇聯歷史檔案選編》第9卷，第7-25頁。

們應當點頭同意。」托洛茨基插話說，非布爾什維主義指的是「過去」，對此，斯大林回答說，「信裏並沒有說『過去』，只是說非布爾什維主義……兩者不是一回事。托洛茨基的『非布爾什維主義』是事實。不能把托洛茨基同志的非布爾什維主義歸罪於他『個人』也是事實。但托洛茨基的非布爾什維主義是存在的，與之作鬥爭是必要的——這也是事實，毋庸置疑。列寧的意思不容歪曲。」<sup>52</sup> 斯大林把列寧〈關於民族問題的筆記〉當作這位領袖記憶力衰退的產物而不予考慮，並聲稱姆季瓦尼和那幾位格魯吉亞人應該得到比他（斯大林）給予的更嚴重的處罰：不管怎麼說，他們拉幫結派了，而這是非法的。斯大林除了承認自己的粗暴外，甚麼也不承認，而這種粗暴比起與托洛茨基似是而非的非列寧主義的鬥爭，實在算不了甚麼。<sup>53</sup>

斯大林也沒有放過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在十月的那件事」。他仿照遺囑中的說法，說它「不是偶然的」，而是一種長期存在的、習慣性的、特有的、關鍵性的特徵，就像托洛茨基的非布爾什維主義一樣。「這種『事件』可能會再次發生。難道你們認為，同志們，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在黨的第十四次代表大會上，在我們面前，不是重複了十月革命時的錯誤，而且可以說是屢次犯下這些錯誤嗎？」斯大林自問自答：「這是真的。由此可以得出結論，加米涅夫同志和季諾維也夫同志沒有把列寧的指示當回事。」<sup>54</sup> 季諾維也夫在輪到自己發言時承認，「我犯過許多錯誤……我在1917年的第一個錯誤大家都知道……我的第二個錯誤我認為更危險，因為1917年的錯誤是在列寧同志領導時犯下的，所以列寧糾正了它，而在他的幫助下，我們在幾天後也糾正了它，但我在1923年的錯誤在於……」這時，奧爾忠尼啟則打斷他的話：「你在幹甚麼，把全黨都當傻瓜嗎？」奧爾忠尼啟則自己也捲入了1923年夏天山洞會議的陰謀，他不想讓參加全會的人知道。

就這樣，斯大林不僅讓他們的主要武器——該死的遺囑——失去了作用，而且還利用它去攻擊他們。<sup>55</sup> 他一直都是謙卑的僕人和黨的意志的執行人。「第十三次代表大會的各個代表團討論過這個問題，要是我報告說當時所有的代表團都無一例外地贊成讓斯大林留在總書記的崗位上，我認為這並不是不謙虛。我這裏就有這些決議，如果需要，我可

以把它們念給你們聽聽。」下面的聲音：「沒有必要。」斯大林說道：「不過，黨的第十三次代表大會剛結束，我就在中央的第一次全會上提出辭職。雖然我請求解除我的職務，但全會決定，而且我記得還是全體一致決定，讓我留在總書記的崗位上。我能怎麼辦呢，同志們？我不能按照自己的意志行事，我要服從全會的決定。」<sup>56</sup>

通過投票，季諾維也夫被徹底趕出政治局。「打倒派別和派別鬥爭，」決議說，「列寧主義政黨的統一和團結萬歲。」<sup>57</sup>然而，斯大林竟然還裝成溫和派的樣子，強調說他曾經不顧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的堅決要求，拒絕把托洛茨基開除出政治局。

斯大林把魯祖塔克晉升為政治局委員，接替季諾維也夫的職務，而米高揚和奧爾忠尼啟則這兩個高加索人則和列寧格勒的基洛夫、卡岡諾維奇以及安德烈·安德烈耶夫一起成了政治局的候補委員。幾天後，斯大林通知北高加索黨委書記米高揚，準備把他調到莫斯科，接替加米涅夫擔任貿易人民委員。米高揚有點猶豫，但斯大林要他服從安排。<sup>58</sup>斯大林任命瓦列里安·古比雪夫接替捷爾任斯基的最高國民經濟委員會主席職務，這樣一來就在黨的中央監察委員會留下一個空缺。斯大林把奧爾忠尼啟則從梯弗里斯調來領導它，並警告他「不要違抗命令」，但調動還是費了一些周折。<sup>59</sup>在這一年結束前，斯大林在首都擁有了兩位重要的新盟友（米高揚和奧爾忠尼啟則），在列寧格勒也有一位重要的盟友（基洛夫）。<sup>60</sup>

捷爾任斯基的辦公室成了不會被腐蝕的苦行者的聖地。「一張簡樸的書桌，一塊舊簾子遮着一張小鐵床……除了假期，他從不回家」，他的一位老同學說。<sup>61</sup>這位曾經堅持保存列寧遺體的人，有幸享受到稍低一點的待遇：根據捷爾任斯基去世後的臉和雙手的模型製作的塑像被套上制服，放在奧格伯烏軍官俱樂部的一個玻璃櫃下面。<sup>62</sup>後來，對捷爾任斯基的崇拜成了蘇聯警察制度的支柱。據說他在摘花的時候都小心翼翼，以免踩到近旁的螞蟻窩，但是對於革命的敵人來說，他卻是災星。<sup>63</sup>明仁斯基被正式提拔為奧格伯烏的主席。「所有人都感到意外，他身上沒有任何軍人氣質，」特工人員賴扎·索博利(Raisa Sobol)回憶說，「他說話輕聲細語，之所以能夠聽得到，只是因為大廳裏氣氛緊

張，十分安靜。他講話的方式不是命令式的，而是沉思式的。奇怪的是，這位主席像個教師。」<sup>64</sup> 但有病在身的明仁斯基——也是因為捷爾任斯基的去世而感到情緒低落——去了南方的馬采斯塔洗了六個星期的硫磺浴。

遺囑風波的影響超出了全會的範圍。季諾維也夫曾經指控說，「在給斯大林的一封私人信件中，列寧和他斷絕了同志關係」。<sup>65</sup> 斯大林則作了書面回應，「列寧從來沒有和我斷絕同志關係——這是一個昏了頭的人在誹謗。列寧生病期間，幾次找我交代了非常重要的任務，而那些任務，他從來沒有想到要交給季諾維也夫或加米涅夫或托洛茨基。從這一事實大家就可以判斷出列寧和我的私人關係。政治局的成員以及克魯普斯卡婭同志、瑪麗亞·伊里奇娜（烏里揚諾夫娜）同志都瞭解這些任務。」<sup>66</sup>（斯大林沒有說明那些任務是要毒藥的。）1926年7月26日，烏里揚諾夫娜利用她作為列寧妹妹的權威地位在遺囑之爭中為斯大林辯護，給剛剛閉幕的聯席全會主席團簽發了一封正式信件；檔案中有布哈林為她寫的草稿（她在《真理報》工作，而布哈林是該報編輯）。「弗·伊·列寧對斯大林的評價很高，」她在信中說——用的是她哥哥的首字母，「弗·伊·常給他打電話，給他最親密的指示，那樣的指示只能給特別信任的人，只能給知道是真心實意的革命者的人，知道是一個親密同志的人……事實上，在他整個生病期間，只要他有可能看到自己的同志，他最經常邀請斯大林同志，而在他的病情最嚴重的時候，斯大林是他邀請的唯一的中央委員。」她承認發生過一件「與政策無關、純屬個人性格方面的」小事，因為斯大林支持醫生禁止列寧在生病期間處理政務的規定。「斯大林同志道了歉，於是，那件事情就過去了……關係過去是，並且仍然是最親密和最同志式的。」<sup>67</sup>

609

此後不久，顯然是受負罪感的折磨，烏里揚諾夫娜寫了第二封信——沒有人為這封信提供草稿——說她這些天來一直在作更廣泛的反思，而不只是在制止加米涅夫和季諾維也夫的陰謀的背景下，結果發現，她起初的那封信是不完整的：列寧的確想過要約束斯大林的權力，認為斯大林的個性特點不適合擔任總書記的職務。<sup>68</sup> 但是和第一封信不同，烏里揚諾夫娜的第二封信是私人信件，沒有在聯席全會的

與會者當中傳閱。克魯普斯卡婭作為聯席全會的與會者之一，照理說會收到烏里揚諾夫娜的第一封信，可她似乎並沒有站出來反駁她的說法。<sup>69</sup> 克魯普斯卡婭仍想發表遺囑，但斯大林指出，只有代表大會，即黨的最高機關，有權解除黨的第十三次代表大會通過的出版禁令。「我很遺憾，中央委員會和中央監察委員會聯席全會並沒有權利決定在報刊上發表這些信件，」他說，「我對此非常遺憾，我會在我們黨的第十五次代表大會上解決這個問題。」<sup>70</sup> 在發給全國各地的黨組織的全會文字記錄中提到了遺囑問題。<sup>71</sup> 對反對派取得的每一步進展都來之不易，伴隨着陰霾。

### (關注美國的)俄國新統治者

名義上，季諾維也夫仍是共產國際的主席，但斯大林早就和他共同處理共產國際的事務了。背後把季諾維也夫稱為總督的共產國際秘書長庫西寧，所有的重要事務一直都是向斯大林匯報。<sup>72</sup> 斯大林讓加米涅夫擔任駐意大利大使。這位短命的貿易人民委員暗中拿了60萬金盧布資助意大利共產黨。在加米涅夫和墨索里尼已知的一次會晤中，那位領袖很討厭接待這樣一名外交官，他不但是共產黨員，而且還遭到自己的政府貶黜。加米涅夫則告訴墨索里尼，說他「很高興能離開俄國和斯大林」。<sup>73</sup> 在放逐加米涅夫的前一天，斯大林平生第一次接受了一位美國記者的採訪。採訪者名叫傑羅姆·戴維斯(Jerome Davis)，曾是在俄國的基督教青年會的領導人，勞工活動家，耶魯大學神學院教授，他跟隨一個由大約20名所謂進步人士組成的美國代表團來到了俄國。戴維斯設法獲得了斯大林的接見，條件是能夠幫助蘇維埃國家獲得美國的外交承認。<sup>74</sup> 戴維斯在保守派威廉·倫道夫·赫斯特(William Randolph Hearst)旗下的《紐約美國人報》上發表了一篇轟動性的文章，名為〈俄國的新統治者〉——這是他對斯大林的稱呼。「在熱情地握手之後，」戴維斯寫道，「我就在桌旁坐下了，對面是一個大權在握、充滿魅力的人物——黑色鬚髮，棕色眼睛，留着充滿男子漢氣概的八字鬚，帶有明顯天花印記的臉上露出友好的微笑，表示歡迎。」<sup>75</sup>

戴維斯填補了一項空白。但是，美國的其他報刊大多沒有關注赫斯特旗下報紙的專訪。據塔斯社紐約分社的負責人說，如果是美聯社或《紐約時報》的專訪，那這種情況就不會發生——斯大林在這段話的下面劃了線。<sup>76</sup>不過，不管沒有在國際上引起反響是多麼令人失望，發表的採訪還是為雙方提供了某些東西：它把斯大林描寫得能言善辯（這對蘇聯是有利的）；其中有斯大林生活中的一些有趣的細節，有他的明確的政治觀點（這是戴維斯的功勞）。

採訪中，當戴維斯請求給他一份斯大林的個人簡介時，專政者遞給他一張附有簡短說明的照片。「太少了，」戴維斯回應說，「您是怎樣成為一個共產主義者的？」斯大林說：「很難說。一開始，人們投奔反對派，然後他們成了革命者，然後他們為自己選擇了一個政黨。我們有很多政黨——社會革命黨、孟什維克、無政府主義者、布爾什維克。」戴維斯繼續問道：「為甚麼要成為一個共產主義者？」斯大林說：「我們有很多共產主義者，因為俄國的資本主義是最野蠻的……我們的政治制度是最嚴酷的，結果連最溫和的人都變成了反對派；因為單純的反對對於反對黨人來說沒有幫助。從富人到勞工，他們都被流放到西伯利亞，〔於是〕他們就努力建立一個政黨，這個政黨站在最尖銳的反政府的立場上，而且行動起來最堅決。因此，所有那些傾向於反政府的人都同情布爾什維克，把他們看作英雄。」斯大林講述了他那據說是因為閱讀馬克思著作而被神學院開除的故事。他還提出一套統治理

611

論，說共產黨——它是戰鬥組織，不是討論問題的俱樂部——有100萬黨員，但一個組織即便是擁有100萬成員，也無法統治這麼大的國家：決定一旦做出，就必須得到執行。為此，政權就需要有一種共同的使命感。戴維斯指出布爾什維主義帶有密謀性質，而斯大林則提到英國政壇的「影子委員會」，並聲稱政治局每年都要重新選舉。<sup>77</sup>在戴維斯談到農民時，斯大林說：「光靠宣傳，你甚麼事也做不了。我們希望我們會吸引農民，因為我們創造了把農民推向布爾什維克這邊的物質條件。」農民需要能買得起的消費品、貸款以及在遇到饑荒時的救助。「我不想說他們有了布爾什維克就高興得不得了。但農民是講究實際的，他們把不跟他們商量而又剝削他們的資本主義分子和跟他們商量、說



服他們並且不會掠奪他們的共產黨人作了比較，最後得出結論，認為和我們在一起更好。他們並不認為我們是最好的，但他們認為我們比其他的要好。」<sup>78</sup>

在竭力使蘇維埃國家的形象變得溫和的同時，斯大林主要關心的是獲得美國的外交承認、貿易和對外投資，以推動蘇聯的經濟。他抱怨說仍然不清楚他具體還能做甚麼；蘇聯已經多次公開聲明，表示想要實現關係正常化。戴維斯指出，蘇維埃國家要想得到承認，斯大林就該考慮承認沙皇和克倫斯基政府的債務；對於大部分財產被沒收的美國人的損失要作出補償；不要再利用蘇聯的駐外代表搞宣傳。斯大林反駁說，針對美國的任何鼓動都是因為它沒有像其他大國一樣承認蘇維埃國家。在商業方面，他談到埃夫里爾·哈里曼 (Averell Harriman) 在勒拿金礦獲得的利潤，因為蘇聯的工資水平在國際上是比較低的。戴維斯問斯大林，蘇聯人是否遵守他們的協議。「關於布爾什維克有各式各樣的神話，說他們不吃不喝，說他們不是人，說他們沒有家庭，說他們除了內訌和互相罷免之外甚麼也不幹 (結果他們仍然全都在那裏)，說他們夜以繼日地向全世界發送指示，」他回應說，「在這裏，那樣說只會讓人發笑。」斯大林不承認，美國政府也許是基於道義原因才拒絕與共產主義打交道的；無論如何，帝國主義分子甚麼時候有道德？「德國在技術水平和文化方面不如美國，但德國得到了更多的租約〔特許權〕，它對市場更瞭解，介入得更深……為甚麼？」斯大林問道，「德國給我們提供貸款。」斯大林同樣渴望美國的貸款。「美國有技術，有充足的剩餘資本，」他說，「因此，世界上沒有哪個國家更適合幫助俄國……如果它們合作，美國無與倫比的技術加上俄國的需求和龐大的人口，會為美國人帶來巨大的利潤。」

不難理解斯大林看中美國的是甚麼：美國在全球產值中所佔的份額很快將達到驚人的三分之一。就拿亨利·福特的T型車來說，那簡直是供不應求。當福特在高地公園開辦一座新的工廠時，他利用機械化的輸送裝置沿着生產線運送汽車框架，生產線上的每一名工人都被分配了一項簡單的、重複性的裝配工作，要在一種被稱作大生產的制度中完成這項工作。它涉及到產品核心部件的標準化，需要對不同車間之間

的產品流動進行重組，需要用機器來代替人力。在底特律附近，福特的胭脂河工廠每隔十秒鐘就有一輛整車下線，而整個經濟和成千上萬的社區都可以感受到它的影響。單是胭脂河工廠的員工就有6.8萬人，這讓它成了世界上最大的工廠，但比這更重要的是，它的車需要數百萬噸的合金鋼，以及大量的玻璃、橡膠、紡織品和汽油。汽車還需要有公路和服務站。由4,500萬工人組成的勞動大軍中，總共有將近400萬個工作崗位直接或間接地和汽車有關。美國在生產和商業領域的組織水平令世界着迷。<sup>79</sup>但這只是事情的一個方面。美國在1925年的時候，每六個人當中就有一輛汽車，而在洛杉磯，每兩個人就有一輛，這是因為標準化讓T型車的價格從850美元降到290美元。為了進一步拓寬市場，福特給自己的工人支付每天5美元的工資，約為美國製造業平均工資的兩倍。「大生產必須具備的先決條件是，」福特寫道，「潛在的或已經形成的大規模消費的能力，即吸收巨大產量的能力。二者密切相關，而前者的原因就在於後者。」<sup>80</sup>美國家庭的平均收入在1920年代提高了25%。到1920年代中期，1,100萬家庭都有自己的住房。斯大林不太明白這個消費者共和國超乎尋常的力量。美國工業的現代化能給蘇聯帶來甚麼好處依然不得而知。

## 革命的掘墓人

1926年8月，當斯大林在莫斯科的時候，老廣場大街各方面的人是絡繹不絕：地方黨組織負責人、黨的中央監察委員會委員、中央消費合作社負責人、勞動人民委員部和貿易人民委員部的工作人員、蘇聯駐波斯的使節、《布爾什維克》雜誌的編輯、青年共產國際的執行主席、副陸海軍人民委員，甚至還有斯大林〈列寧主義基礎〉的原作者菲利普·克謝諾豐托夫。<sup>81</sup>這種情形日復一日，直到8月底，再到9月底，斯大林返回他鍾愛的索契。他在那裏表示，從英國發來的有關礦工罷工的報道傳遞速度太慢，令人失望。在莫斯科，一個英國代表團即將到達。8月27日，斯大林通過電報要求給罷工的英國礦工提供一筆可觀的資金——多達300萬盧布。<sup>82</sup>9月5日，莫洛托夫告訴斯大林，蘇聯調撥

了300萬盧布。這筆錢來自蘇聯國營托拉斯工人的工資，據說是為了體現團結一致的精神，結果在英國激起了反共的喧囂。<sup>83</sup>但斯大林是不會被「金融資本」嚇住的。

托洛茨基此時匆匆寫下了一些反思性的文字。他寫道，「黨的統一——這一口號越來越成為執政派手中意識形態的恐怖武器」，壓制黨內的批評意見。不僅如此，他還覺察到一個明確的戰略意圖，那就是要「徹底消滅不久前被叫做老列寧近衛軍的核心力量，由斯大林一人領導，而他所依靠的是一批總是對他言聽計從的同志」。托洛茨基預見到「斯大林及其小集團稱之為『黨的統一』的黨的管理的獨裁制，不僅要求消滅、罷免和除掉現在的聯合反對派，而且要求逐步罷免現執政派中較有威信和有影響的代表人物的領導職務。顯而易見，不論是托姆斯基，還是李可夫，或是布哈林，從他們的過去和他們的威望來看，都不可能也不能夠在斯大林手下發揮出烏格拉諾夫、卡岡諾維奇、彼得羅夫斯基等人在斯大林手下所發揮的作用」。托洛茨基預言說卡岡諾維奇等人追擊李可夫、布哈林和托姆斯基的時期即將到來。他甚至預言說「黨內的機會主義分子也會對斯大林開火，說他『左的』偏見中毒太深，妨礙他們更迅速、更不加掩飾地上升」。<sup>84</sup>值得注意的是，事實證明托洛茨基能夠而且幾乎只有他能夠辨別政治鬥爭的動向，但更值得注意的是，他只是把斯大林看作官僚勢力擴張過程中更大的社會力量的工具，而沒有看出斯大林可以自主地駕馭個人專政。

614

托洛茨基、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組成了他們自稱的聯合反對派，並於1926年10月初在克里姆林宮加米涅夫的住處再次聚在一起商討對策，而季諾維也夫此時已經被趕出了政治局。托洛茨基繼續向季諾維也夫發難，因為季諾維也夫先前曾經猛烈地攻擊過「托洛茨基主義」，造成了難以彌合的嫌隙。<sup>85</sup>但三人鑒於實力對比，決定向斯大林求和，並承諾停止反對活動。<sup>86</sup>斯大林提出的條件是，他們要承認中央所有決定的約束力，要公開聲明放棄一切派別活動，並拒絕為他們在外國共產黨中的支持者（露特·菲舍爾〔Ruth Fischer〕、阿爾卡季·

\* 譯註：參見《蘇聯歷史檔案選編》第9卷，第101-104頁。最後一句引文的內容略有不同。

馬斯洛夫 (Arkadi Maslow)、波里斯·蘇瓦林) 承擔責任。10月17日,《真理報》發表了他們的聯合聲明,一同署名的還有索柯里尼柯夫和皮達可夫。<sup>87</sup> 然而就在第二天,馬克斯·伊斯特曼恰好在《紐約時報》全文發表了列寧的遺囑,除蘇聯之外,全世界的報紙都轉載了這個爆炸性消息。<sup>88</sup> 10月19日,斯大林再次提出辭職,而且這次是以書面形式。「在列寧退出然後又去世之後,與季諾維也夫以及加米涅夫兩位同志在政治局一年半的共事讓我完全明白了,與這兩位同志一起在委員會的小範圍內,誠實而真摯地一同從事政治工作是不可能的,」他在給即將召開的中央全會的便條中寫道,「因此,我請你們考慮讓我離開政治局。」他還說,因為非政治局成員不能領導書記處和組織局,應當考慮讓他一併離開這些崗位。他要求給他兩個月假,然後把他派到西伯利亞荒涼的圖魯漢斯克——革命前他曾在那裏流放過,或者是遙遠的雅庫特,或者也許是國外。<sup>89</sup>

斯大林給人留下了很好的印象,覺得他受了委屈。從他的觀點來看,《紐約時報》發表遺囑,強化了他帶有偏見的看法,即反對派是背信棄義的敵人。當然,無論是他在政治局的多數——包括托洛茨基私底下預言很快會失勢的那些人——還是他在中央委員會的多數,都沒有接受他的辭呈。相反,《真理報》在10月22日發表了斯大林譴責反對派的「提綱」,正好趕上黨的第十五次代表會議。<sup>90</sup> 第二天,他讓中央委員會和中央監察委員會聯席全會召開會議,以最終確定黨的代表會議的議程,插入一個將由他親自來作的關於反對派的「特別報告」: 實行了不到一個星期的停戰結束了。<sup>91</sup>

615

10月26日,黨的第十五次代表會議開幕了(它一直開到11月3日),出席大會的人很多,有194名有表決權的代表,640名沒有表決權的代表。托洛茨基到了這個時候才指責斯大林的「一國社會主義」是對世界革命的「背叛」,是資本主義在俄國復辟的罪魁禍首。<sup>92</sup> 季諾維也夫也抓住這個問題大做文章。「在一國取得最終勝利的理論是錯誤的,」他寫道,「我們會贏得最終的勝利,是因為在其他國家中的革命是不可避免的。」<sup>93</sup> (當然,斯大林說過,在一個國家中的最終勝利是不可能的。) 克魯普斯卡婭保持沉默,她顯然是放棄了反對派的事業。11月1日,斯

大林作了報告，從自己的角度敘述了反對派的整個歷史，並嘲笑托洛茨基著作中所謂的音樂性。「把列寧主義看做『體力勞動中肌肉的感覺』。」斯大林語帶譏諷地援引托洛茨基的話說，「這豈不是又新鮮，又奇特，又深奧。你們懂得一點甚麼了吧？（笑聲）這些話都很漂亮，很像音樂，還可以說，甚至很雄壯。只是缺少一點『小東西』：簡單而又人人懂得的列寧主義定義。」<sup>94</sup>。

托洛茨基站起身來，轉向這位格魯吉亞人，用手指着，大聲說道：「第一書記擺出了他要做革命的掘墓人的架勢！」斯大林氣得滿臉通紅，摔門而出。會議在一片混亂中結束。

在騎兵大樓托洛茨基的住處，在他之前就趕到那裏的幾個支持者對他的爆發表示擔憂。皮達可夫說：「唉，列夫·達維多維奇為甚麼要那麼說呢？哪怕過了三四代之後，斯大林都不會原諒他！」<sup>95</sup> 托洛茨基讓斯大林惱羞成怒，可不管他有感到多麼滿足，這種滿足都不會長久；第二天，在黨的代表會議繼續召開的時候，斯大林通過投票把托洛茨基趕出了政治局。加米涅夫被取消了政治局候補委員的資格，而且斯大林還把解除季諾維也夫共產國際首腦的職務列入了該機構執行委員會接下來的會議議程。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責怪托洛茨基惹惱了斯大林。面對專政者的污蔑，他們都試圖為自己辯護，但他們的發言被毫不客氣地打斷了。尤利·拉林指出，我們革命中最富戲劇性的一幕是「革命的發展讓一些革命領導人跟不上形勢了」。<sup>96</sup> 布哈林的發言哪怕是按照他本人的標準也稱得上非常惡毒。為了扭轉局面，他用挖苦的口吻援引了托洛茨基「革命的掘墓人」的說法。<sup>97</sup> 對於布哈林那些能讓人氣得口吐白沫的評論，斯大林非常高興，不由得插嘴說，「說得好，布哈林。說得好，說得好。他不跟他們爭辯，他抽他們！」<sup>98</sup>

啊，猛烈的指責是多麼令人快意。11月3日，斯大林作了代表會議的總結發言。他不厭其煩地奚落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和托洛茨基，引起陣陣的哄笑。<sup>99</sup> 與此同時，1926年11月的新選舉法反對新經濟政

\* 譯註 《斯大林全集》第8卷，第244-245頁。

策的傾向更加明顯，它剝奪了更多富農和私商的投票權。在黨的代表會議上，有幾位發言者警告說，戰爭迫在眉睫。

### 分析戰略形勢

甚麼也不能保證蘇聯的安全。布爾什維克政權嘴巴很硬，也經常有些侵略性的行動，但它依然覺得自己很脆弱。從莫斯科拒絕償還沙皇時代的貸款或者提供足夠的原材料，到西方急於繼續瓦解俄國，讓烏克蘭、高加索以及中亞分離出來，蘇聯對於可能的開戰理由的推測不一而足。由於物資封鎖可以掐住蘇聯的脖子，於是就有傳言說，帝國主義分子甚至用不着發動進攻，只需要勒索就可以迫使布爾什維克政權就範。<sup>100</sup> 儘管不能排除真正的戰爭，奧格伯烏報告說，在英、法的挑唆和支持下，它可能會採取波蘭和羅馬尼亞聯合入侵的形式，進而把所有的「邊陲國家」，即拉脫維亞、立陶宛、愛沙尼亞和芬蘭，都捲進來。<sup>101</sup> 契切林一再警告，波羅的海沿岸國家甘願充當西方列強的爪牙，結為反蘇同盟，但總有一天會自食其果，喪失自己的獨立。他對波蘭也發出類似的警告。<sup>102</sup> 奧格伯烏還相信，外國敵對勢力計劃把蘇聯境內的不滿分子召集起來——不管怎麼說，協約國以前就利用過代理人（俄國內戰期間的白軍）。

即使沒有英國的挑唆，華沙獨裁政府也在垂涎它尚未控制的歷史上屬於烏克蘭和白俄羅斯的那些地區，這一點已經不是甚麼秘密。<sup>103</sup> 斯大林接到大量的報告，談到波蘭對蘇維埃烏克蘭和蘇維埃白俄羅斯的滲透，並準備在蘇聯境內從事破壞活動。為了緩和蘇聯波蘭族人的反蘇情緒，他在白俄羅斯成立了一個做過大量宣傳的波蘭民族地區，但那樣做是否有幫助，仍然不確定。<sup>104</sup> 為了考驗皮爾蘇茨基，1926年8月，蘇聯人恢復了年初開始的簽訂互不侵犯條約的談判，但談判沒有取得任何進展。波蘭本打算同時與莫斯科和柏林簽訂兩份可以保持均勢的協議，但是與德國的談判甚至還沒有開始。到處都在傳說波蘭即將入侵立陶宛，那裏的左翼政府釋放了包括共產黨人在內的全部在押政治犯，並於1926年9月28日與蘇聯簽訂了互不侵犯條約，從而壯大了「布爾什維主義」的

聲勢，儘管立陶宛之前的右翼基督教民主黨政府已經開始與莫斯科談判。蘇聯—立陶宛條約有對付波蘭的意思。<sup>105</sup> 在蘇聯東方的側翼，蘇聯軍事情報機關繼續鼓噪，說日本有可能再次發動武裝干涉。日本撤出他們在內戰期間佔領的蘇聯領土的時間，要比其他任何干涉勢力都晚。日本當時已經吞併了朝鮮，還把滿洲甚至蒙古（蘇聯的衛星國）視為自己的勢力範圍。1926年8月，東京拒絕了蘇方簽訂中立條約的要求。西伯利亞奧格伯烏首腦、化名列昂尼德·扎科夫斯基（Leonid Zakovsky）的拉脫維亞人亨里希·什圖比斯（Henriks Štubis，生於1894年），向明仁斯基報告說「中國境內的俄國白衛分子十分活躍」，這在他看來，不是證明了流亡分子的活力，而是證明了日本打算向北入侵。扎科夫斯基建議在邊境的蘇聯一側準備好游擊戰的部隊，以對付日本人的軍事佔領。<sup>106</sup>

不過，英國才是一直以來的心腹之患。英國武官在英國駐莫斯科的大使館多次宴請紅軍將領，就像奧格伯烏向斯大林報告的，裝作熱情好客，利用「我們的話多和嘴巴不嚴……我們的同志在這些宴會上經常喝醉」。喝醉了的蘇聯官員談到在中國執行的秘密任務，這些任務就像俗話說的公牛面前的紅布一樣，刺激了本就疑心重重的英國人。<sup>107</sup> 在倫敦，「東方動亂問題跨部門委員會」把布爾什維克在土耳其、阿富汗、中國、波斯以及王冠上的明珠印度所策劃的陰謀逐一登記。<sup>108</sup> 1926年12月3日，英國的《曼徹斯特衛報》利用泄露的情報，曝光了德蘇之間違反凡爾賽條約的秘密軍事合作。兩天後，德國社會民主黨的報紙轉載了這一報道。<sup>109</sup> 德國國會隨即發生爭吵，其中的社會民主黨人指責德國軍隊的非法活動。契切林剛好在柏林療養。為了平息事態，他在12月6日和克里斯廷斯基大使一起，拜訪了德國總理威廉·馬克思（Wilhelm Marx）。《真理報》到12月16日才承認了這起醜聞，並將泄密歸咎於「德國社會民主黨中協約國的聽差們」。蘇聯報紙承認德國人在特許權（租賃）的基礎上，在蘇聯境內幫助建造了一些設施，用來生產飛機、毒氣和彈藥，但重申蘇聯有防衛權。<sup>110</sup> 英國國內考慮斷絕外交關係，但外交部基於實用主義的理由認為暫時不能那麼做，因為那樣非但不能改變蘇聯的行為，反而會給柏林那些想要「面向東方」的人幫忙。儘管如此，英蘇關係仍然十分危險。「蘇聯實際上和大英帝國處於戰爭狀態，只是沒有發生直接

的武裝衝突，」1926年12月10日，英國外交部的一名官員寫道，「不管是插手英國國內的罷工還是煽動中國的反英勢力，蘇聯在世界各地的行動，從里加到爪哇，事實上都是把摧毀英國作為其首要目標。」<sup>111</sup>

一個星期後，立陶宛軍隊推翻了通過民主選舉產生的政府——由社會民主黨、農民人民聯盟以及德國人、波蘭人、猶太人等幾個少數民族的小政黨組成的左翼同盟。暴亂分子扶植了以安塔納斯·斯梅托納(Antanas Smetona)為首的右翼獨裁政府，他所領導的立陶宛國民聯盟在全國有2,000名成員，在國會有3個代表席位。在導致左翼同盟上台的那次選舉中，基督教民主黨第一次未能獲得多數，因此也支持暴亂。在宣佈軍管之後，幾百名立陶宛共產黨人被捕。立陶宛和波蘭現在必須在繼續互相敵視與團結一致反對共產主義之間作出選擇。

蘇聯軍事情報機關的負責人揚·別爾津總結了到1926年底為止蘇聯的國際處境，他承認緊張的程度增加了，但在1927年不可能發生反蘇的軍事行動。<sup>112</sup>不過，除了與土耳其、波斯以及中國發展友好關係外，別爾津的建議幾乎是完全被動的：阻撓波德解決但澤和上西里西亞問題，破壞波蘭與波羅的海沿岸國家的同盟關係，防止德國轉向西方，加劇英法和德國之間、英法之間以及美國和日本之間的緊張關係。<sup>113</sup>共產黨人關於資本主義穩定的「脆弱性」以及關於歐洲和殖民地世界革命運動風起雲湧的陳詞濫調遭遇到嚴峻的現實。蘇聯1926至1927財年的軍費開支只有1913年的41%。<sup>114</sup>除了內戰時從白軍手中繳獲的西方製老式坦克外，紅軍基本上沒有坦克。<sup>115</sup>紅軍士兵在假日的紅場閱兵和軍事演習中騎的是自行車。三分之一的入伍士兵連制服都沒有。<sup>116</sup>據伏羅希洛夫說，1926年，蘇聯甚至沒有一份全面的戰爭計劃，以應對各種突發狀況。<sup>117</sup>作為戰爭計劃制定工作的一部分，副國防人民委員米哈伊爾·圖哈切夫斯基在1926年12月26日強調說，萬一發生戰爭，「我們可以調動的極少的作戰資源，恐怕連第一階段的作戰都撐不下來」。圖哈切夫斯基此時正在謀求擔任國家計劃委員會防務部門的負責人，所以就得到了編制計劃的任務。不過，他講的是對的。「我們的處境只會更糟，特別是在受到封鎖的情況下，」他繼續說道，「無論是紅軍還是國家，都沒有做好戰爭的準備。」<sup>118</sup>



突然間，斯大林再次提出辭職。12月27日，他寫信給李可夫說，「我請求您解除我的中央委員會總書記職務。我認為我再也不能在這個崗位上工作了，我的身體狀況不再適合在這個崗位上工作了。」<sup>119</sup> 斯大林最近這次自憐，還不清楚確切原因。就在四天前，斯大林還寫信給正在南方度假的莫洛托夫，說「你不用急着回來——你可以輕鬆地再待一個星期（甚至更長時間）……我們這裏一切都很順利。」<sup>120</sup> 斯大林的情緒幾乎就像蘇聯的外部敵人的意圖一樣，正在變得捉摸不定。

## 圍攻

沒有一支真正的軍隊，沒有一個盟友，蘇聯的大戰略要想成功只能碰運氣（資本主義世界內部的戰爭）。由於外部形勢的明顯惡化，1927年1月初，伏羅希洛夫在莫斯科省黨的代表會議上說——《真理報》刊登了這篇講話——「我們不要忘了我們處在戰爭的邊緣，不要忘了這場戰爭可不是鬧着玩的」。<sup>121</sup> 李可夫和布哈林這段時間也發表了類似的講話，說戰爭即將來臨，可能在幾天內，可能到春天，也可能到秋天。<sup>122</sup> 這樣的警報聲之所以響起，不是由於確鑿的情報，而是由於不斷加深的憂慮，再加上總是把一些完全不相干的事情聯繫在一起，並把它們歸結為某種陰謀。<sup>123</sup> 「情況越來越明朗了，」駐莫斯科的一名英國外交官在1927年初表示，「現在的這種恐慌——這從公眾人物的每一次講話中都可以聽出來，從每一篇社論中都可以讀出來——並不是『假裝的』……而是確實反映了共產黨和蘇聯政府的感受和情緒。」<sup>124</sup>

蘇聯國內談論的並不都是與資本主義包圍有關的問題。從1927年1月中旬一直到3月底，流亡巴黎的謝爾蓋·普羅科菲耶夫 (Sergei Prokofyev) 返回國內，在莫斯科、列寧格勒以及他出生的烏克蘭 (哈爾科夫、基輔、敖德薩) 舉辦了令人疲憊不堪的巡迴音樂會。他之前在1918年離開了俄國，娶了一位西班牙歌唱家，並在國際上贏得了聲譽，雖然他在歐洲從來沒有像斯特拉文斯基 (Igor Stravinsky) 那樣星光奪目。(斯特拉文斯基認為，普羅科菲耶夫是繼他之後俄國最偉大的作曲家。) 回到祖國後——普羅科菲耶夫一直保留着自己的蘇維埃護照——他在—

位青年作曲家的晚會上聽到20歲的德米特里·肖斯塔科維奇(Dmitry Shostakovich)演奏了他自己的《第一鋼琴奏鳴曲》。在蘇聯，音樂會的現場其實是活潑而熱烈的，普羅科菲耶夫的歌劇《三個橙子的愛情》讓蘇聯觀眾如癡如醉。與此同時，他的電話卻遭到竊聽；他未能解救出被捕的表兄弟(童年的玩伴)；排練、演出、崇拜者、演出經辦人和騙子弄得他焦頭爛額(「如果事情就是這樣，」他對一個洗衣工說，「也許你能告訴我，為甚麼整個莫斯科的人不是在靠熨褲子為生?」)。舞台設計師伊薩克·拉比諾維奇(Isaak Rabinovich)對普羅科菲耶夫說，「莫斯科看上去一點也不像個樣子」。考慮到完全重建要花很長時間，他透露了一項個人計劃，要把一條街整個刷成藍色，而把與之交叉的另一條街刷成兩種顏色。在離開蘇聯去波蘭的路上，就連蘇聯的海關官員也認識普羅科菲耶夫，問他：「箱子裏是甚麼，橙子嗎？」<sup>125</sup>

斯大林沒有接見普羅科菲耶夫。實際上，1927年斯大林辦公室的日誌中沒有出現任何音樂家、演員、導演、舞蹈家、作家或畫家的名字。當然，他對藝術尤其是音樂懷有濃厚的興趣，但只是到了後來才有隨意召見藝術家的權威。現在，他是在出去觀看演出的時候看到他們。斯大林喜歡去劇院，那裏令人驚奇的表演接連不斷：由弗謝沃羅德·梅耶爾霍里德(Vesvolod Meyerhold)出品的亞歷山大·奧斯特洛夫斯基(Alexander Ostrovsky)的《森林》和尼古拉·埃德曼(Nikolai Erdman)的《委任狀》；還有米哈伊爾·布爾加科夫(Mikhail Bulgakov)的《圖爾賓一家的命運》，而他是斯大林喜愛的劇作家。斯大林偶爾也會從克里姆林宮沿特維爾大街去尼爾恩澤劇院頂樓那家有名的電影院。尼爾恩澤劇院是莫斯科當時最高的建築，位於大格涅茲得尼科夫巷10號。<sup>126</sup>(在那裏還可以看到布爾加科夫和莫斯科上流社會的其他名人。)在普羅科菲耶夫舉辦巡迴音樂會期間，斯大林抽空接待了革命前在圖魯漢斯克流放時的熟人康斯坦丁·格魯萊季斯—斯捷普羅，他不是黨員，而是為「個人的事情」在辦公時間到老廣場街來的。他失業了，其生活軌跡與同樣來自冰冷的西伯利亞沼澤地區卻一路高升的斯大林形成鮮明對比。<sup>127</sup>

621

然而，消遣活動是件奢侈的事情。斯大林知道，英國正在懲患德國控制但澤和波蘭走廊，並用立陶宛的部分領土(甚至是全部)補償波

蘭。<sup>128</sup> 德國讓他很失望。就在《曼徹斯特衛報》曝光蘇德秘密合作的當天，德國軍方高層終於同意在莫斯科簽署協議，在喀山共同開辦一所秘密的坦克學校。不過，這與莫斯科所希望的相距甚遠。溫什利赫特用悲觀的口氣向斯大林描述了各層面合作的大致情況——航校（利佩茨克）、代號「托姆科」的化學戰試驗場（薩馬拉）、德賴澤機槍、貝爾索爾公司的化學儀器、容克飛機生產特許權（菲利）以及坦克學校（喀山）——但在最後表示，「我們想通過經濟部門吸引德國投資我國軍工的嘗試失敗了」。溫什利赫特建議，「繼續我們在坦克學校和航校以及在化學戰試驗方面的合作」。<sup>129</sup> 蘇聯統治集團中的其他人堅持這種交流。「凡到這兒來參加演習或學習的同志全都發現，德國軍隊展示的技术創新非常有用，」從柏林回來的克列斯廷斯基在1927年1月18日同李維諾夫爭辯說，「我們現在向德國人提供的東西並不需要花費甚麼，因為是他們承擔一切費用，而在蘇聯腹地為他們的學校和其他較小的軍事機構尋找秘密地點毫無困難。」<sup>130</sup> 不過，加強紅軍物質基礎的目標仍然不易實現。<sup>131</sup>

在此期間，蘇聯反間諜機關截獲了一份日本人的文件，名為〈對俄總體戰略措施〉，在2月7日將其譯成俄文。該文件主張加劇「蘇聯國內的種族鬥爭、思想鬥爭和階級鬥爭，特別是共產黨內部的緊張關係」，並主張把蘇聯領土上的所有亞洲民族聯合起來，反對俄國的歐洲部分。作為目標，它列出了軍隊中非俄羅斯族軍人的名單，因為從他們那裏可以得到與蘇聯在遠東的軍事計劃和軍事行動有關的秘密情報。它還建議煽動蘇聯西部和南部邊境各國，先發制人，防止蘇聯向東調動部隊，並破壞蘇聯的運輸和基礎設施以及電報和電話聯絡。<sup>132</sup>

斯大林非常不安。馬克西姆·李維諾夫曾在1927年1月中旬的外交人民委員部部務委員會會議上發表講話，對蘇聯在國際關係中的立場提出嚴厲批評，結果有人暗中寫信揭發，把具體情況告訴了斯大林。據說李維諾夫認為，「英國對我們採取了敵對政策，因為我們對他們也採取了敵對政策」，還有，「英國是一個大國，而在英國的對外政策中，我們扮演的是一個相對次要的角色」。據說，李維諾夫最標新立異的說法在於，他聲稱「我們在歐洲的利益與英國的利益並沒有衝突，到處都

看到『英國之手』是一個大的錯誤」。他舉出的例證是波蘭的皮爾蘇茨基政變。這違背了斯大林的整個世界觀。甚至在亞洲，揭發者指出，李維諾夫認為英蘇雙方的利益也是相容的，認為蘇聯的對英政策是在製造噪音，是自己拆自己的台。他認為蘇聯軍方情報機關以及外交部門情報機關的報告，99%都是假情報或特工人員的幻想。揭發者指出，「李維諾夫同志一直強調，他在表達他個人的看法，而他個人的看法是與我們官方的政策相矛盾的」，還說那位副外交人民委員甚至警告說，蘇聯在犯下走向戰爭的大錯。<sup>133</sup> 在1927年2月12日的中央全會上，伏羅希洛夫匯報了蘇軍的備戰情況；政治局批評了他的提綱草案，認為「對於使全部工業和一般經濟適應戰爭的需要說得太少」。<sup>134</sup> 李維諾夫在發言中對國際形勢作了評估。對於李維諾夫的一貫主張，斯大林當然早就知道了。他在全會期間用鉛筆給莫洛托夫寫了一張便條，問是否應當發表一個糾正性的聲明。莫洛托夫回答說遇到一些冷嘲熱諷可能是正常的，建議讓這件事過去算了。李可夫寫道，「也許，斯大林應該發表一個警告性的聲明」。

但李維諾夫對此事揪住不放。1927年2月15日，他給斯大林寫了一封信，所有的政治局委員也都有一份。這位副外交人民委員在信中大膽地聲稱，外交人民委員部部務委員會「至少有95%的人，也許是100%，包括契切林在內」，都同意他的分析。李維諾夫承認，不存在來自東部的戰爭威脅，只是萬一西部發生戰爭，蘇聯在東部的後方存在一定的脆弱性。他還認為西部的威脅來自皮爾蘇茨基、波蘭的盟友羅馬尼亞，以及除（波蘭的敵人）立陶宛之外的所有「邊陲國家」。他強調說，波蘭是一個獨立的行動者，不是西方手中的玩物，不過他也承認，波蘭可能會利用蘇聯與西方的戰爭。因此，蘇聯的政策不僅應該儘量阻止波蘭與波羅的海沿岸國家結盟，還要爭取避免造成戰爭的一般條件，比如說人為造成的、會讓蘇聯在經濟上付出代價的英蘇衝突。還有，因為法國對波蘭的影響很大，李維諾夫強烈建議要更加努力，在拒不償還帝俄債務的問題上作出讓步，以便與巴黎達成協議。李維諾夫在原來的信件之外又加了幾頁（至少在存檔的卷宗裏是放在一起的），進一步談到對德國的看法，強調德國不再出於權宜之計敷衍蘇聯並轉投西

方的可能性及其不良後果。他還把信的複印件給了外交人民委員部部務委員會的部分成員(鮑里斯·斯托莫尼亞科夫〔Boris Stomonyakov〕、特奧多爾·羅茨泰因〔Teodor Rotstein〕、拉柯夫斯基、克列斯廷斯基)。「我強烈要求政治局討論上述問題並向外交人民委員部指出哪些結論是不正確的」,李維諾夫在最後大言不慚地說——就好像他剛剛親自對政策作了全面的評論。

斯大林顯然非常憤怒。他給政治局起草了一份好幾頁內容的備忘錄,日期為2月19日,最終完成是在四天後,用的全都是紅色鉛筆。他開頭就指出,和李維諾夫的說法相反,他(斯大林)在全會上就反駁了李維諾夫的觀點,不是以自己的名義,而是代表整個政治局;而李維諾夫說得到了外交人民委員部部務委員會100%的支持,這和列夫·加拉罕(李維諾夫沒把自己的信給他)在全會上的話是矛盾的。關於問題的實質,斯大林再次強調頭號敵人是「英國的金融資產階級和保守黨政府」,他們「在執行的政策是要從東面(中國、阿富汗、波斯、土耳其)和西面(各邊陲國家等)把蘇聯包圍起來」。他嘲笑李維諾夫說的「如果關係惡化,那首先是錯在我黨的報刊和演說家,好像要不是因為這些罪惡(報刊和演說家的極端言論),我們就會跟英國簽了條約」。英國竭力阻撓蘇聯在中國的革命的和進步的政策,而這樣的政策,斯大林堅持認為,對蘇聯的安全和世界的解放至關重要。斯大林進一步指出,李維諾夫錯誤地理解了蘇聯的對德政策,「把所有資產階級國家都混為一談,沒有把德國同其他『大國』區分開來」。斯大林自己似乎就是這樣做的。他強調中央十分清楚蘇聯的經濟發展必然會引起與資本主義國家的衝突。「我們不能抱有幻想,以為可以同『所有』資產階級國家建立『良好的』和『友好的』關係,」他寫道,「在將來的某個時刻,與那些眾所周知最敵視我們的資產階級國家發生嚴重的衝突,這種必然性既不可能靠報刊上溫和的語調,也不可能靠外交人員充滿洞察力的經驗去避免。」一個社會主義國家,斯大林最後說,「必須實行社會主義的外交政策」,而這就意味着「與各個所謂的大國的帝國主義政策」沒有共同的利益,只是「利用帝國主義分子之間的矛盾」。

不出所料，政治局在2月24日通過了領導人關於蘇聯外交政策的設想與目標的聲明，決定要求外交人民委員部必須服從中央的指示，不要再糾纏於英國人是不是「主要敵人」的問題。巧合的是，英國外交大臣同日向莫斯科遞交了一份措辭嚴厲的照會，裏面摘錄了很多蘇聯領導人的講話，要求蘇聯立即停止反英宣傳，停止為國外的革命提供軍事援助。從英國政治人物的演講中，也可以收集到有關蘇聯的一模一樣的「宣傳」言論，然而英蘇關係還是像李維諾夫警告的那樣處在刀鋒之上。不過，外交人民委員部在受到斯大林的嚴厲批評後，仍然用威脅對倫敦作出了回應。<sup>135</sup>

斯大林顯然在無意中讓蘇聯陷入了一種受到圍攻的境地。在英國遞交照會的第二天，列寧格勒幾個工廠的工人舉行罷工，不滿分子還在該市的瓦西里島策劃了示威活動，要求言論和新聞的自由，要求自由選舉工廠委員會和蘇維埃。政權非但沒有把它看作是表現了工人的強烈願望，反而認為無產者們主動充當了國際資產階級外來干涉的幫兇。<sup>136</sup> 奧格伯烏報告說社會上出現了各種各樣的失敗主義言論，在這種情況下，斯大林開始試圖打壓造謠行為。「無論今年春天還是秋天，我們這裏都不會有戰爭，」按照《真理報》（1927年3月3日）刊登的內容，他對莫斯科鐵路工廠的工人說，「今年不會有戰爭，是因為我們的敵人還沒有作好戰爭準備，是因為我們的敵人比誰都懼怕戰爭的後果，是因為西方工人不願和蘇聯作戰，而沒有工人，作戰就不可能，最後是因為我們堅定不移地執行和平政策，這種情況使敵人難以和我國作戰。」<sup>137</sup> 但他收到的報告不斷提出蘇聯的大後方問題。「一旦外部出現困難，」中央消費合作社的一名高級官員在那年春天寫信給斯大林和政治局說，「我們在農村並沒有一個安全的後方。」他主要是認為，目前農產品和原材料的出口水平——「不到戰前的一半」——無法承擔勢在必行的工業化費用。<sup>138</sup>

625

---

\* 譯註：《斯大林全集》第9卷，第155頁。

## 內爆

列寧曾經教導，如果能夠切斷資本主義與它從中獲得廉價勞動力、原材料和市場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聯繫，那麼它的力量就會被削弱，也許還是致命的削弱。他還認為殖民地人民是歐洲先進國家無產階級革命的「戰略後備」。<sup>139</sup> 因此，蘇聯的戰略不會僅僅依靠，甚至不會主要依靠亞洲的共產黨人，而是要把階級敵人——民族資產階級政黨——當作朋友一樣對待，並制止外國共產黨人建立蘇維埃。印度共產黨人羅易反對列寧的觀點，並要求在殖民地世界也建立蘇維埃，列寧仍堅持認為，總的來說，殖民地的工人數量太少，力量太弱，不足以奪取政權，但他也承認，在某些情況下，蘇維埃是合適的。這樣一來，無論是反對建立蘇維埃還是建立蘇維埃，都完全符合列寧主義。

斯大林對亞洲的看法是在列寧主義的模式下逐步形成的。他認為殖民地的共產黨和工人應該支持各獨立的「革命民主主義的民族」國家聯合起來反對「帝國主義力量」，這種鬥爭不同於布爾什維克革命，而是類似於俄國1905年和1917年2月的事件。「1917年10月，國際條件對於俄國革命極為有利，」他在1926年對印度尼西亞共產黨人說，「現在不存在這樣的條件，因為沒有帝國主義戰爭，帝國主義分子之間沒有分裂……因此，你們必須從革命民主主義的要求開始。」<sup>140</sup> 但斯大林也建議說，所謂的殖民地世界與資產階級的同盟必須是一個「革命陣營」，是「共產黨與資產階級革命政黨」的聯合。他考慮的模式是中國。

626 1920年代的中國仍然處於1911年帝制垮台和共和國創立後的四分五裂的狀態。首都北京的準政府得到了國際社會的承認。但它其實只是地方性的軍閥政府，是全國眾多掌握了區域性政權的軍閥政府之一。南方的廣州有一個與北京敵對的政府，那是國民黨人建立的，這一運動試圖吸引社會下層，但並非以階級為基礎；相反，國民黨是一個吸納了三教九流的民族主義運動，吸引力很大，但也很散漫。與此同時，在中國有大量的蘇聯顧問，在他們的幫助下，一個由富有戰鬥精神的知識分子組成的鬆散的集體轉變成了中國共產黨。中國共產黨把自己與棉紡廠、碼頭、發電廠、鐵路和電車公司、印刷廠、精密機械製造廠的勞

工運動結合起來，在傳播民族主義思想的同時也在傳播有關階級的政治詞彙和世界觀。<sup>141</sup> 當1921年7月中國共產黨在上海法租界的一所女校召開成立大會的時候，出席大會的有兩名共產國際的官員、中國共產黨中一位不能參加會議的重要人物的特使，以及代表了總共53名黨員的12名代表。<sup>142</sup>（毛澤東作為內地湖南省的代表出席了大會。）到1926年中期，中國共產黨已經發展到大約2萬人。到1926年7月為止，名冊上專職的黨務人員只有120人，大多是在上海、廣州和武漢。<sup>143</sup> 不過，從1926年7月開始不到一年的時間，黨員人數就增加了三倍，達到近6萬人。<sup>144</sup> 國民黨也在蘇聯顧問的幫助下，從鬆散的人際網絡轉變為一個同樣帶有列寧主義特色的層級制軍事化政黨。國民黨黨員的數量大約比共產黨多出五千餘人，而且他們受過更好的教育，有五分之一的人讀過大學。但是在國民黨中，黨員常常只是一種身份的標誌：在一份調查表中問及他們參加與黨有關的活動的情況時，超過三分之一的人回答「無」。另有50%的人聲稱做過一些宣傳工作。只有6%的人參加過群眾活動。<sup>145</sup> 共產黨員是一群活動家。不過，兩個政黨誰都不是真正的群眾性的政黨：中國有將近5億人口。

共產國際的政策迫使中國共產黨人成為與國民黨的聯合政府中的初級合夥人，目的是強化後者「反帝」（英國的影響）的堡壘角色。為此，蘇聯顧問不僅在中國建立了兩個存在激烈競爭關係卻被迫結為同盟的平行政黨，還建立了一支有紀律的真正的軍隊。<sup>146</sup> 蘇聯人拒絕了國民黨創始人孫中山提出的把紅軍部隊派到滿洲的請求，認為那帶有危險的挑釁性質，有可能招來「日本的干涉」。<sup>147</sup> 但蘇聯人確實為他提供了武器、資金和軍事顧問。蘇聯人每年為中國共產黨送去一筆可觀的援助，大約10萬美元，但每年給國民黨的軍事援助達到一千多萬盧布。<sup>148</sup> 這其中有一部分用於1925年在廣州附近開辦的黃埔軍校，該校由孫中

627

\* 編註：中共一大會址為法租界望志路106號（李漢俊私宅）。博文女校是會議代表的臨時寓所，他們在此召開「預備會」。兩名共產國際官員是馬林和尼克爾斯基。包惠僧受陳獨秀委派參會，也是廣東代表，算他在內，一共有13位中共黨代表出席會議。詳見石川慎浩《中國共產黨成立史》（增訂版）（袁廣泉、翟艷丹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21），頁1-2，243-249。



山的門徒兼參謀長、曾在日本受過訓練的蔣介石(生於1887年)領導。<sup>149</sup> 1925年3月12日,孫中山因肝癌去世,享年58歲。此後,蔣贏得了繼位之爭。一位顧問稱他「自負、矜持,而又野心勃勃」。不過,這位蘇聯顧問認為他還是有用的,只要他能得到「恰當的表揚」和「平等」對待,「而且絕不表現出想要奪取他哪怕是一丁點的權力」。<sup>150</sup> 事實上,那裏的蘇聯顧問往往一邊高估了自己的專家意見和建議,一邊看不起中國軍官,並且經常侵佔名義上由中國人負責的職務。不過,黃埔軍校仍然幫助造就了由蔣介石指揮的中國最強大的軍隊。<sup>151</sup>

從思想上來說,列寧主義中反帝國主義和反資本主義的成分兼而有之,但中國的許多知識分子,包括那些成為馬克思主義者的知識分子,都認為由於中國遭受外國列強的蹂躪,所以反帝的任務才是根本。<sup>152</sup> 托洛茨基在一條給自己的筆記中稱,「〔在中國,〕對我們來說,主要的特點不是民族壓迫這個一貫存在的事實,而是不斷改變的階級鬥爭的進程」——這和中國國內的情緒恰好相反。<sup>153</sup> 斯大林認為世界革命需要所謂的「資產階級的」國民黨打敗軍閥以及為他們出錢的帝國主義分子,進而統一中國,認為共產黨應該同「革命的資產階級」聯合起來,但也要準備好在某個時刻最終採取獨立的行動。<sup>154</sup> 因此,對斯大林而言,中國共產黨與國民黨的聯合本身就預設了背叛:共產黨要在共同開展的運動的基層贏得地位,然後像力學中一樣,自下而上地撬動。<sup>155</sup> 這會讓中國共產黨能夠從內部奪取「革命」。蘇聯的政策要求共產黨和國民黨的聯合是一種「黨內合作」。

628 與在德國、保加利亞以及愛沙尼亞的失敗相比,中國一直是共產國際成功的典範。<sup>156</sup> 但實際上,共產國際的眾多顧問都支持他們自己的門徒互相拆台,令中國政壇四分五裂。「日前在和斯大林長談的時候情況變得很明顯了,他以為共產黨已經融入到國民黨中,以為他們缺少獨立的、固定的組織,以為國民黨在『虐待』他們,」被稱作沃伊京斯基(Voitinsky)\*的格里戈里·扎爾欣(Grigory Zarkhin) 1925年4月25日對蘇

\* 編註:又譯作維經斯基,中文名吳廷康。

聯駐北京大使列夫·加拉罕說，「斯大林同志在對共產黨的依附地位表示遺憾的同時，顯然認為這樣的狀況從歷史的角度來說，是目前不可避免的。當我們解釋說共產黨有自己的組織而且比國民黨更有凝聚力，說共產黨在國民黨內部有批評的權利，說國民黨自身的工作很大程度上是由我們的同志在做的時候，他感到非常意外。」沃伊京斯基認為斯大林的看法是受到人稱鮑羅廷(Borodin)的米哈伊爾·格魯森貝格(Mikhail Grusenber)的報告所誤導。鮑羅廷是白俄羅斯猶太人，在拉脫維亞受的教育，在芝加哥做過一所學校的校長。<sup>157</sup>但是，照理說應該支持內部聯合的沃伊京斯基卻竭力主張共產黨獨立。事態也在朝着這個方向發展。

潛在的最嚴重的矛盾或許是蔣介石對共產黨的不信任，雖然他很想得到蘇聯的軍事援助。1923年，蔣曾經以孫中山的名義率代表團訪問莫斯科。「根據我看到的來判斷，要信任俄共是不可能的，」他在一封私人信件中寫道，「在蘇維埃俄國的時候，對於他們告訴我們的，大概只能相信30%。」<sup>158</sup> 1926年3月20日，他強行逮捕了軍隊裏的所有政治委員——他們大多是共產黨員——並軟禁了蘇聯顧問，解除了工人罷工委員會的武裝。蔣想要鎮壓工會，想要出兵撲滅農民騷亂(並搶走他們儲備的糧食去養活軍隊)。他還讓他的憲兵嚴刑拷打中國共產黨人，以獲得有關各種密謀的情報。中共再次正式要求莫斯科同意退出黨內合作並對蔣介石予以回擊，但斯大林不同意。1926年5月，蔣指使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開除了所有擔任高級職務的共產黨人，雖然他的確釋放了被關押的蘇聯顧問。在莫斯科，政治局的一個委員會在5月20日聽取了有關蔣介石「政變」的報告。<sup>159</sup> 但斯大林贊成黨內合作。<sup>160</sup>

托洛茨基不太關注中國。<sup>161</sup> 他倒是主持了一個委員會，該委員會因為擔心英日結盟而主張搶先一步，宣佈滿洲「自治」，實際上就是給日本行賄，主動送上一個衛星國，就跟蘇聯人得到外蒙的方式一樣。<sup>162</sup> 但托洛茨基要去柏林治病，所以在公開場合依舊對中國問題保持沉默。

629

\* 編註：蔣介石書信原文為：「以弟觀察，俄黨殊無誠意可言，即弟對兄言俄黨所言只有三分可信者，亦以兄過信俄人，而不能盡掃兄之興趣也。」與此處略有出入。見〈蔣介石致廖仲愷函〉，1924年3月14日，載於《蔣介石年譜初稿》(中國檔案出版社，1992)，第167頁。

但季諾維也夫引發了爭吵，這激怒了斯大林。長期以來，季諾維也夫一直是共產國際中黨內合作政策的主要支持者，甚至說過國民黨是「工農的(多階級)政黨」。直到1926年2月，季諾維也夫仍然竭力主張，接受國民黨加入共產國際的請求。<sup>163</sup>

1926年7月，為把國民黨的統治範圍擴大到全中國，在南京國民黨政府的蘇聯首席軍事顧問瓦西里·布柳赫爾(Vasily Blyukher)的策劃下，蔣介石發動了北伐。1926年7至12月，當統一中國的攻勢正在激烈進行的時候，國民黨發生了分裂：左派以上海西邊長江流域的中心城市武漢——由漢口等城市組成的城市群——為根據地建立了自己的軍隊。北伐期間，蔣不顧鮑羅廷的強烈反對，決定向東部的上海推進。在他的軍隊到達該市外圍的時候，共產黨影響下的上海市工會號召舉行總罷工並動員了糾察隊，第三次試圖把上海從軍閥統治者手中奪過來。到1927年3月底，在這個擁有近300萬人口的城市，罷工工人已達50萬。上海的起義超出了「黨內合作」政策的範圍；當地中共領導人的目的是成立一個能夠管理該市的蘇維埃。但共產國際命令上海的共產黨人收起自己的武器，不要反對蔣的軍隊，結果，蔣的軍隊在4月1日順利進入上海。「蔣介石在遵守紀律，」4月5日，在莫斯科工會大廈的圓柱大廳，斯大林對與會的大約3,000名工作人員說，「為甚麼要搞政變？為甚麼要在我們擁有多數而右派也聽從我們的時候趕走右派？」斯大林承認「蔣介石也許並不同情革命」，但又說這位將軍在「領導軍隊，而且除了反對帝國主義分子，不可能做出別的事情」。斯大林強調說，國民黨右派「與富商們有聯繫，因此可以從他們那裏籌錢。所以，對他們要一直利用到最後，要把他們像檸檬一樣榨乾，然後扔掉」。<sup>164</sup>

不過，災難來臨的徵兆隨處可見。1927年4月6日上午11時，一大群人襲擊了蘇聯駐北京大使館，該市警察在徵得外國駐華公使團同意後，進入蘇聯大使館院內，拉走了可以證明蘇聯在中國支持顛覆活動

---

\* 編註：1926年仍是漢口、武昌、漢陽三鎮分立；1927年1月，國民政府將三者合併為武漢市。

的罪證文件。<sup>165</sup>與此同時，在上海，蔣介石手下的特務處處長\*正在同一些幫派老大商量，如何對赤色分子發動襲擊。4月12日，幫會和國民黨軍隊招募的非正規武裝人員摧毀了中共在上海的總部。†接下來的兩天，他們在上海的幾個主城區，在傾盆大雨中用機槍和步槍屠殺共產黨人和勞工積極分子。被殺害的有數百人，或許更多；從工人那裏沒收的步槍有幾千支；共產黨人遭到挨家挨戶的搜捕。<sup>166</sup>共產國際命令該市工人避免與正在屠殺他們的蔣介石部隊發生衝突。命令沒有執行，可不光彩的是，也一直沒有取消。<sup>167</sup>倖存的共產黨人逃到了農村。

4月13日，原計劃為期三天的蘇聯中央全會在莫斯科召開。激烈的爭論大多圍繞經濟問題。但季諾維也夫的一位支持者提出增加一項議程，檢討在中國革命問題上的政策；斯大林不停地打斷他的發言，但接着又答應討論這個問題。然後，季諾維也夫突然向全會提交了五十多頁「提綱」，指責斯大林在中國問題上犯下的錯誤，認為在中國工農被迫揭竿而起，同國民黨戰鬥的時候，中國社會主義革命的時機已經成熟，而蔣介石領導下的國民黨注定會實行阿塔圖爾克在土耳其實行的那種反社會主義的獨裁制度。<sup>168</sup>圍繞蔣的襲擊，托洛茨基和斯大林在4月15日的會議上進行了交鋒。

托洛茨基：到現在為止，這件事一直得到了你的幫助。

斯大林（插話說）：得到了你的幫助！……

托洛茨基：我們並沒有提高蔣的地位，我們並沒有把自己親筆簽名的肖像送給他。

斯大林：哈，哈，哈。

事實上，蔣介石是共產國際執委會的名譽委員，而且就在他4月12日對中共發動襲擊的幾天前，布爾什維克上層還收到過共產國際分發的由他親筆簽名的相片（很快就有來信要求歸還那些相片）。<sup>169</sup>斯大林派大叫大嚷，要求暫停全會的速記記錄，結果全會沒有答覆反對派的指

---

\* 編註：即楊虎，時任總司令部特務處處長。

† 編註：即「四一二事件」。

控就休會了。斯大林倒是允許把季諾維也夫的提綱附在會議記錄的後面，但中央委員會的新聞部門下發的秘密通告警告，全會禁止公開討論中國事件；與此同時，有幾個省的黨報刊登文章，針對在中國的失敗，  
631 試圖駁斥反對派的觀點。<sup>170</sup>

從馬列主義理論來看，蔣和資產階級「背叛」了中國革命，與封建勢力以及為封建勢力撐腰的帝國主義者站到了一起。實際上，蔣並不是出於金錢利益的考慮，他只是反對共產主義。蔣不讓鮑羅廷和布柳赫爾「逃跑」，而且即便是在屠殺事件發生後還在繼續向莫斯科邀寵。說實話，對斯大林而言，強大的國民黨軍隊似乎依然是實現中國的統一與穩定的最佳選擇。為了打倒軍閥和趕走帝國主義者，蔣不惜付出巨大的代價，繼續向北推進。1927年五一節當天，蔣的肖像和列寧、斯大林、馬克思的肖像一起，並排通過紅場。但有人指責斯大林，說他站在「反動的」資產階級一邊，背叛了中國革命。到1927年3月31日才第一次公開批評中國政策的托洛茨基，開始主張——主要是針對過去的事情——蘇聯應該允許中共退出黨內合作並成立蘇維埃。<sup>171</sup>但中共直到國民黨掃除軍閥、統一中國的北伐期間，才成了一支全國性的政治力量。反對派的批評雖然為時已晚而且是紙上談兵，卻反映了一點，即本以為會由中共從內部接管的黨內合作，反而讓國民黨接管了。由於蘇聯，國民黨有了軍隊，而中共卻沒有。直到很晚的時候，國民黨軍隊才有了共產黨的基層組織，而即便到那個時候，基層組織的力量仍然很弱。<sup>172</sup>

斯大林曾誇口說黨內合作埋藏着最終的背叛，他說對了，但他不是那個背叛者。蔣介石比他搶先一步，而與此同時，斯大林還在完全依靠蔣，把他作為工具，以削弱英國在中國的影響（「帝國主義」）。

蘇聯的對外政策看來陷入了自己造成的死胡同。契切林長期在法國的里維埃拉和德國療養，想要治好自己的病——不都是由於心理原因造成的（糖尿病、多神經炎）。他寫信給斯大林和李可夫，說布哈林在蘇聯報刊發表的反德文章很白癡，造成了很大損失，「我正在返回莫斯科，以請求解除我在外交人民委員部的職務」。<sup>173</sup>不過，眼前更讓人擔憂的是英國。1927年5月12日，倫敦的英國警察對全俄合作社的駐地  
632

(沼澤門49號)開始了持續四天的大搜查，而此次行動依據英國的法律進行；蘇聯官方的貿易代表團的辦事處也設在同一棟建築。保險櫃和保險箱被風鑽破開，文件被拉走。<sup>174</sup> 密碼人員挨了打，密碼本被沒收；列寧的肖像受到污損。<sup>175</sup> 幾年前類似的事件曾經嚴重損害了蘇德貿易；這一次，莫斯科也沒有「示弱」。5月13日，政治局決定發動媒體戰並舉行公開的示威活動，譴責英國的戰爭販子行徑。<sup>176</sup>

幾乎就在此時，日本拒絕了蘇聯為簽訂互不侵犯條約而再次作出的試探。<sup>177</sup> 好像這還不夠讓斯大林操心似的，蔣介石的行動又給托洛茨基的誇誇其談增添了新的內容。「斯大林和布哈林在背叛布爾什維主義最核心的東西，在背叛無產階級革命的國際主義精神」，托洛茨基向克魯普斯卡婭申訴說(1927年5月17日)。「1923年德國革命的失敗，在保加利亞和愛沙尼亞的失敗，英國(1926年)總罷工的失敗，以及4月份中國革命的失敗，全都嚴重削弱了國際共產主義運動。」<sup>178</sup> 第二天，共產國際第八次擴大全會開幕，斯大林決心讓自己在中國問題上的路線再次得到確認。<sup>179</sup> 在5月24日的演說中，他奚落托洛茨基，聲稱「與其說他像個英雄，不如說像個演員，把演員和英雄混為一談無論如何是不行的」，而在談到英國的首相時，他還說，「正在建立一種從(奧斯丁·)張伯倫到托洛茨基的統一戰線之類的東西」。<sup>180</sup> 托洛茨基回擊道：「沒有甚麼比斯大林的錯誤政策，尤其是在中國的錯誤政策，對張伯倫的工作促進更大了。」<sup>181</sup>

感受到威脅的斯大林採取了行動。不出所料，共產國際全會通過決議，「宣佈反對派(托洛茨基、季諾維也夫)的提議明顯帶有機會主義和投降主義性質」。<sup>182</sup> 但在5月27日，英國保守黨政府宣佈斷交，給了蘇聯專政者當頭一棒。<sup>183</sup> 斯大林大怒：帝國主義者庇護反蘇流亡組織，資助蘇聯領土上(烏克蘭和高加索)反蘇的民族地下運動，派遣大量特務，還裝模作樣，指責共產國際的所謂顛覆活動？！但這畢竟是個打擊。英國已經成為蘇聯最重要的貿易夥伴之一。<sup>184</sup> 看來英國保守黨有

\* 譯註：《斯大林全集》第9卷，第258、282頁。

可能正在動員他們的工人階級與蘇聯人開戰。蘇聯報刊紛紛警告說戰爭即將來臨，同時召開群眾大會，討論備戰問題，結果適得其反，引發失敗主義言論。<sup>185</sup> 斯大林知道英國並沒有準備入侵，但他仍然認為，帝國主義分子肯定會挑起代理人戰爭。李可夫的看法似乎也一樣。<sup>186</sup> 據說英國一面努力促成德國與波蘭的和解，一面忙於建立一個由羅馬尼亞、芬蘭以及波羅的海沿岸國家組成的廣泛的反蘇集團。<sup>187</sup>

迫於當前的壓力，斯大林在中國問題上開始變臉。1927年6月1日，他給駐在國民黨左派根據地武漢的幾名共產國際代表發了一封長篇電報，指示他們組建一支5萬人的革命軍隊，把「反動」軍官送交軍事法庭，禁止所有與蔣介石的接觸——蔣介石是現有軍隊的總司令，所有士兵和軍官都對他宣誓——並約束農民的「過火行為」。<sup>188</sup> 這樣的命令沒有辦法執行。收到電報的馬納本德拉·納特·羅易把它給國民黨左派的領袖看了，而這位領袖已經在考慮同南京的國民黨右派和解，此時他看到了莫斯科自身背叛的證據。<sup>189</sup>

## 恐怖主義

儘管形勢嚴峻，斯大林依然在1927年6月5日開始了夏季度假，地點是他鍾愛的索契，而這次是住在比較豪華的七號別墅——按照前主人的名字被叫做「普扎諾夫卡」，位於索契和馬采斯塔之間的一個懸崖上。「當我們醫生到達別墅時，娜捷施達·謝爾蓋耶夫娜·阿利盧耶娃招待了我們，她是個非常可愛而好客的女人，」伊萬·瓦列京斯基回憶說，「那年我給斯大林做過三次檢查，分別是在他開始做馬采斯塔浴療之前、期間和結束的時候。就和上一年一樣，斯大林說他四肢肌肉酸痛。」斯大林還做了X光和心電圖檢查，未發現任何異常。就連血壓的測量結果也是正常的。「從這次檢查的情況來看，總的來說，斯大林的身體非常健康，」瓦列京斯基回憶說，「我們發現他性格開朗，表情專注

\* 編註：即汪精衛。

而且充滿活力。」泡了溫泉後，還要躺很長時間，光着身子，只裹一條浴巾，好讓血液流向皮膚、肌肉和四肢。「這種治療方法讓斯大林的手腳變得暖和起來」，瓦列京斯基寫道。在做了浴療後，斯大林請瓦列京斯基和其他醫生在星期六喝了「白蘭地」，一直喝到星期天凌晨。聚會開始時，瓦夏和斯維特蘭娜出現在露台上。「約瑟夫·維薩里奧諾維奇」變得活躍起來，開始和他們玩打仗的遊戲，對着目標射擊，事實上，斯大林打得非常準。」<sup>190</sup>

在斯大林開始度假的第二天，俄羅斯社會主義聯邦蘇維埃共和國的刑法典新增了一項關於反革命罪的法律條文。對於反革命罪，過去的定義籠統而模糊，而現在，其範圍擴大了。哪怕是試圖「削弱」而不是推翻蘇維埃制度都是反革命；針對政權工作人員或工人運動代表的「恐怖主義行為」，與武裝暴動同等對待，要被處以死刑；對反革命罪行知情不報的懲罰從一年提高到十年。<sup>191</sup>這是斯大林的建議，而導致他這樣做的原因是奧格伯烏誘捕流亡分子的雙面遊戲「托拉斯」行動的曝光，隨後在6月3日有幾名雙面間諜受流亡分子的逼迫，試圖在莫斯科奧格伯烏的宿舍（在小盧比揚卡街3/6號）引爆炸彈，結果沒有成功。<sup>192</sup>但是在6月7日，一個奧格伯烏所不知道的、由流亡分子組成的單獨的恐怖小組真的在位於莫伊卡運河59號列寧格勒黨組織的中心俱樂部引爆了炸彈，至少炸傷26人，其中1人不治身亡。參與行動的3名恐怖分子設法回到了芬蘭。<sup>193</sup>同一天，在華沙火車站的站台上，發生了一起更大的恐怖行動：在獨立的立陶宛國內一家白俄羅斯語報紙工作的記者鮑里斯·科韋爾達（Boris Koverda）槍擊了蘇聯駐波蘭使節彼得·沃依柯夫。逃亡的君主派分子盯上沃依柯夫，是因為他曾經是殺害羅曼諾夫全家的烏拉爾蘇維埃的主席。<sup>194</sup>但至今仍然讓人想不通的是，一個反共流亡分子19歲的兒子如何避開車站裏穿着制服和便衣的眾多警察；實際上，科韋爾達是怎樣知道沃依柯夫那天早晨要到車站的，現在也還是一個謎。<sup>195</sup>（沃伊柯夫到車站去，是為了給被逐出倫敦後途徑那裏返

634

\* 編註：即斯大林，他的本名是約瑟夫·維薩里奧諾維奇·朱加施維里。



回莫斯科的蘇聯外交人員送行。)一小時後，39歲的沃依柯夫死於波蘭一家軍醫院。

對斯大林來說，在波蘭領土上的這起可疑的暗殺，是緊跟在英國人在倫敦的突擊搜查、英國人的斷交，以及中國的國共關係破裂——為了不讓帝國主義者立足，蘇聯調整了在那裏的政策——後面的。「我覺得是英國在操縱，」他在莫洛托夫6月8日發來的報告沃伊柯夫遇害的密碼電報的背面寫道，「他們想挑起(我們)與波蘭的衝突。他們想再來一次薩拉熱窩事件。」斯大林建議搞一兩次對英國間諜的審判，並且還命令說，「立即宣佈把關在我們監獄和集中營裏的重要的君主派分子當作人質」，要槍斃「五到十個」，同時在報刊上發佈公告。<sup>196</sup>莫洛托夫把斯大林的指示變成了政治局的命令。那天，奧格伯烏又增加了一些超出常規司法程序的權力，包括為加快案件審理速度而重新啟用被稱作「三人小組」的緊急特別法庭(只在某些省份得到正式批准，以幫助平定叛亂)。<sup>197</sup>莫洛托夫在6月9日回覆說：對於發佈採取報復性鎮壓措施的政府公報的必要性，少數同志有過猶豫，「但現在大家都認為那正是時候」。<sup>198</sup>6月9日的夜裏，不久前作為君主派「組織」成員被捕的大約20名貴族被控圖謀對蘇聯領導人採取「恐怖行動」，未經審判就被處決了。據說有5個是英國情報機關的特務。<sup>199</sup>為了肯定那些處決，黨組織在許多工廠發動了集會，據說工人們以讚許的口氣說：「契卡終於幹事了。」<sup>200</sup>

「我個人的看法是，」斯大林在從索契發給明仁斯基的電報中寫道，「倫敦在這裏的特務隱藏得比看起來要深，不過他們會現身的。」他要求反間諜機關的阿爾圖佐夫把逮捕英國特務的事情公之於眾，以粉碎英國人招募特務的活動並鼓勵蘇聯青年加入奧格伯烏。<sup>201</sup>7月，《真理報》報道說，處決了一幫「白衛恐怖分子」，據說他們是由列寧格勒的一名英國間諜指導的。<sup>202</sup>1926年下半年一起間諜案都沒有的西伯利亞，1927年卻出了很多間諜案。<sup>203</sup>明仁斯基暗中向政治局報告說，奧格伯烏進行了2萬次挨家挨戶的搜查，在全聯盟逮捕了9,000多人。<sup>204</sup>「恐懼的烏雲籠罩着整個社會，一切都陷入了癱瘓」，瑞典的一名外交官向斯德哥爾摩報告說。<sup>205</sup>斯大林的想法正在同國家的政治氣氛融合在一起。

## 皇帝沒有穿衣服

持續的戰爭流言引發了搶購和囤積，還有人放話說，要是發生衝突，就拒絕作戰或者搞破壞，這些都是奧格伯烏的政治情緒報告中經常提到的，也是政權最擔心的。<sup>206</sup> 6月15日前後，契切林結束了他在歐洲的長期療養，返回莫斯科。「莫斯科的所有人都在談論戰爭，」他後來告訴美國的駐外記者、同情蘇聯的路易斯·費希爾(Louis Fischer)說，「我想勸他們不要相信。我堅持認為『沒有人打算進攻我們』。然後就有同事開導我。他說：『噓。我們知道。但我們需要用它來對付托洛茨基。』」<sup>207</sup> 契切林想要緩和國際緊張局勢的努力是可以理解的，但當時出現戰爭恐慌的直接原因在於革命所固有的多疑症(資本主義包圍)，再加上政權那帶有挑釁性質的外交政策。<sup>208</sup> 與敵人(資本主義列強)的交往只是權宜之計；國內的批評者，不管他們聲稱抱着甚麼樣的意圖，總是在破壞團結，削弱了受到包圍的蘇聯的力量，並會招引外部的敵人。黨內的官員在馬列主義理論修養上，並非全都很紮實，容易受到不良言論的影響。

636

當斯大林從索契寫信給莫洛托夫(6月17日)說「為了鞏固後方，我們必須立即阻止反對派」的時候，他不只是為自己着想，而毫無憤世嫉俗。<sup>209</sup> 與托洛茨基的鬥爭一如既往地帶有過多的個人恩怨，同時，在斯大林看來，這種鬥爭現在更是關係到國家安全的問題。在仔細看了中央監察委員會作出處罰決定的會議記錄後，斯大林憤怒地寫信給莫洛托夫(6月23日)說：「進行審判和作為原告的是季諾維也夫和托洛茨基，不是委員會的委員們。奇怪的是，委員會有些委員沒有到場。謝爾戈在哪裏？他去哪裏了，他為甚麼要躲起來？他真丟人……真的要把這份『記錄』交給托洛茨基和季諾維也夫散發出去嗎！我們正需要這個。」<sup>210</sup>

其實奧爾忠尼啟則當時是在場的：托洛茨基的長篇發言有一部分就是針對他的。「我認為，你們堅持的是於官僚和官員有利，而於群眾不利的方針。」他說道，不願有人一再打斷自己的話，「在這些機構中，你們彼此得到有力的內部支持，互相包庇……」<sup>211</sup> 但奧爾忠尼啟則並不

\* 譯註：《蘇聯歷史檔案選編》第9卷，第482頁。

太贊成採取嚴厲的措施。在提到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時，他說：「他們為我黨作了很多貢獻。」<sup>212</sup>贊成和反對開除的票數幾乎相等。奧爾忠尼啟則、加里寧，甚至是憎惡托洛茨基的伏羅希洛夫都認為，把反對派委員開除出中央委員會這件事應該等到即將召開的黨的代表大會再決定。莫洛托夫讓加里寧改變了立場，同時斯大林堅持要求把自己缺席的一票算進去，從而形成贊成開除的多數。<sup>213</sup>可奧爾忠尼啟則還是認為應該用訓誡代替開除。不過，托洛茨基告訴他，「消滅反對派只是時間問題」。<sup>214</sup>

斯大林抽空從索契與一位名叫謝拉菲姆·坡克羅夫斯基 (Serafim Pokrovsky, 出生於1905年) 的年輕教師通了幾封信，後者與這位專政者就黨在1917年的政策是傾向於與全體農民聯盟還是僅僅與貧農聯盟這一問題進行了書面爭論。「在開始和你通信的時候，我以為是和一個追求真理的人來往，」這位專政者在1927年6月23日憤怒地指責這位教師的妄自尊大，「要兼有無知之徒的無賴手段和本領有限的賣藝者的自滿心理，才能像你這位可敬的坡克羅夫斯基一樣隨意的顛倒是非。我想，已經到了和你斷絕書信往來的時候了。約·斯大林。」<sup>215</sup> 斯大林厭惡有人指出他在理論問題上自相矛盾。

中國問題上的失敗有可能成為即將召開的黨的第十五次代表大會上最重要的議題，斯大林之所以要搶在大會前面開除托洛茨基等人，原因就在這裏。6月27日，托洛茨基寫信給中央委員會說：「這是革命以來最嚴重的危機。」<sup>216</sup> 斯大林路線的支持者抱着武漢的國民黨左派不放——共產黨在那裏佔據了兩個部長職務（農民和勞工）——但是在同一天，斯大林寫信給莫洛托夫說，「我擔心武漢方面會失去勇氣，結果投靠南京」（即蔣介石）。不過，斯大林仍抱有希望：「只要還有機會堅持，我們一定要堅決要求武漢方面不要向南京屈服。失去武漢這個獨立的中心，意味着至少失去革命運動的某個中心、失去工人自由集合和

---

\* 譯註：《斯大林全集》第9卷，第285、290頁。

集會的可能性、失去共產黨公開存在的可能性、失去公開出版革命報刊的可能性——一句話，失去把無產階級和革命公開地組織起來的可能性。」他建議向武漢方面行賄。「我向你保證，額外給武漢方面300萬至500萬是值得的。」<sup>217</sup>但莫洛托夫一反常態，變得驚慌起來。「只要一次投票就能決定性地結束這件事，」他在7月4日寫信給斯大林說，「我很想知道你是否可以提前回莫（斯科）。」莫洛托夫向斯大林告密說伏羅希洛夫——忠於斯大林的人的典範——「太過分了，竟然把『你在過去兩年的領導工作』說得一錢不值」。<sup>218</sup>

由斯大林任命的省級黨組織負責人在中央委員會有表決權的委員中要佔三分之二，但假如他明顯不能保衛革命，該機構仍會起來反對他。<sup>219</sup>不過他並不驚慌。「我生病了，躺在床上，所以我說得簡單點，」1927年7月初的某個時候，他從索契給莫洛托夫寫道，「要是有必要，而且要是你把它延期，我可以來參加全會。」接着，國民黨左派的武漢政府解除了市裏工人的武裝，此事成為斯大林的又一把柄。不過，他繼續擺出一副泰然自若的樣子，在7月8日寫道：「我們盡可能地利用了武漢的領導層。現在到了拋開他們的時候了。」他是不是得了妄想症？「我並不擔心小組（他的派別）內部的狀況。至於為甚麼，我來的時候會解釋的。」但第二天，可能是充分領會了這一消息的含義，斯大林突然暴怒，指責莫洛托夫和布哈林在欺騙他（沒有提供武漢方面的全部的壞消息），指責伏羅希洛夫找藉口停掉了國防人民委員部給武漢的經費。「我聽說有人對我們在中國的政策感到後悔，」他在7月11日寫道，「在我來的時候，我會證明我們的政策過去是、現在依然是唯一正確的政策。」到7月15日，當武漢政權也對共產黨採取恐怖手段的時候，斯大林仍然拒絕承認錯誤。要是承認錯誤，實際上就是承認被妖魔化的反對派是有道理的，就是承認他們對政策的看法並不是出於對他個人的憎惡，因而不能說是叛國。證據顯示，斯大林當時為了把托洛茨基弄走，正在考慮把他送到國外，擔任駐日大使。但要是那樣，就會讓托洛茨基有機會利用斯大林在亞洲政策上的失敗，所以這位專政者很快就打消了這個念頭。<sup>220</sup>不過，斯大林仍然拼命地想要除掉自己的死對頭。

## 變臉

1927年春天，伏羅希洛夫憂心忡忡地報告說，蘇聯現有的工業別說是先進武器，就連步槍和機槍也滿足不了紅軍的需要。<sup>221</sup> 上述事實  
在當時並不是甚麼機密。<sup>222</sup> 據警察機關的秘密報告說，有人聽到一名  
入伍的紅軍士兵說，「我們怎麼比得了」帝國主義者，「他們有軍艦、飛  
機、大炮，而我們甚麼都沒有」。<sup>223</sup> 難怪在1927年7月，當斯大林還在  
索契的時候，溫什利赫特為了爭取簽訂共同發展工業生產的協議而再次  
跑到柏林，告訴德國人說蘇聯預計會遭到波蘭和羅馬尼亞的進攻。蘇  
聯人的提議發展到驚人的規模，結果令德國人謹慎起來。英蘇關係破  
裂在德國外交部內部引發爭論，爭論的問題就如一名參與者寫的，是  
「對我們目前和將來的政治利益而言，德俄聯繫的意義是否大到值得讓  
德國去承擔維持這些聯繫所需付出的政治代價和風險」。有些德國人感  
到絕望。「蘇聯政府正在考慮不久的將來的大災難」，一貫持同情態度的  
德國駐莫斯科大使布羅克多夫—蘭曹伯爵報告說。<sup>224</sup> 柏林沒有接受溫  
什利赫特的提議。同沙皇時的情況相似，德國當時已經成為蘇聯最重  
要的兩個貿易夥伴之一（另一個是英國），但是和蘇聯的需要相比，這  
還差得很遠，而且在政治方面，事實證明莫斯科還無法把柏林從倫敦和  
巴黎那裏撬走。可要是看到與德國的雙邊關係完全破裂，蘇聯人也受  
不了。<sup>225</sup> 而且，哪怕是到了現在斯大林也不願放棄讓德國幫助蘇聯發  
展軍工生產的想法。不過，黨的報刊仍在猛烈地指責德國。

斯大林提前結束度假，於7月23日星期六那天抵達莫斯科。<sup>226</sup> 按  
照計劃，全會將於六天後召開。在這危急關頭，7月28日，全會召開  
前夕，《真理報》刊登了斯大林一篇囉哩囉嗦的抨擊反對派的文章。「新  
的帝國主義戰爭的威脅這一問題是現時的基本問題，這是幾乎不能懷  
疑的了。」他強調說，「這裏所說的不是甚麼不固定的無形的新戰爭『危  
險』，而是一般新戰爭特別是反蘇戰爭的真正的實在的威脅……爭奪  
銷售市場、爭奪輸出資本的市場、爭奪通向這些市場的海陸道路，爭  
取重新分割世界的瘋狂鬥爭正在進行。」阻止帝國主義分子的，他斷  
言，是在面對蘇聯和國際無產階級所代表的革命的可能性時，懼怕會

彼此削弱。「蘇聯人永遠不會忘記幾年前我國因英國資本家的恩賜而遭到的暴行、掠奪和軍事侵犯。」斯大林繼續說道，「但是英國資產階級是不喜歡用自己的手來作戰的。它總是寧願借別人的手來進行戰爭」，即尋找「甘願為它火中取栗的傻瓜」。因此，他得出的結論是，我們的「任務就是要鞏固我們的後方並清除其骯髒東西，毫不躊躇地懲辦『顯貴的』恐怖分子和縱火焚燒我們工廠的人，因為沒有鞏固的革命後方，就不可能有我國的國防」。斯大林斷言，英國人在資助烏克蘭和高加索、列寧格勒和莫斯科的反蘇地下組織，在資助「間諜恐怖集團炸壞蘇聯橋樑、燒毀蘇聯工廠、恐嚇和刺殺蘇聯駐外使節」。<sup>227</sup>這就是看待反對派問題的背景。

在全會上，莫洛托夫指控托洛茨基和加米涅夫在外敵雲集時破壞國家的後方，說這種人「應該關起來」。伏羅希洛夫的發言最嚴厲，他一度轉向季諾維也夫說，「你絕對甚麼都不懂」。托洛茨基當即反駁說：「你這話是在說自己。」托洛茨基指責伏羅希洛夫參與了貶黜自己上級（普里馬科夫、普特納）的陰謀。伏羅希洛夫反唇相譏，說托洛茨基在內戰中處死過共產黨員。托洛茨基：伏羅希洛夫「撒起謊來像個無賴」。伏羅希洛夫：「你才是無賴，是自封的我黨的敵人。」<sup>228</sup>就這樣，會議連着開了幾天。13名中央委員遞交了一份「反對派綱領」，要求在即將召開的黨的第十五次代表大會上討論，但反對派中的阿道夫·越飛等人反對說，該文件沒有在他們當中商量過就交上去了——這種行為正是托洛茨基一直批評的「機關」作風。<sup>229</sup>雖然斯大林強烈要求以派別活動為由驅逐季諾維也夫和托洛茨基，但全會採納了黨的中央監察委員會負責人奧爾忠尼啟則的建議，允許兩人在表態保持忠誠後留了下來。

640

中國政策依然是斯大林一方最棘手的問題。7月底，《真理報》表示，「〔建立〕蘇維埃的口號現在是正確的」。<sup>230</sup>現在，共產國際批准在中國展開一系列的武裝行動，即後來所說的「秋收起義」。托洛茨基的批評戳到了斯大林的痛處，因為斯大林在中國資產階級成為反革命時，

---

\* 譯註：《斯大林全集》第9卷，第291-297頁。

還以為它能夠領導革命。在聯席全會的發言中，斯大林說他沒有指示中共屈從於國民黨，也沒有不讓農民開展土地鬥爭。<sup>231</sup> 莫斯科全會期間，8月7日，中共在漢口召開緊急會議；為了挽救局勢，斯大林已經派去了格魯吉亞共產黨員和共青團工作人員貝索·羅明納茲 (Besarion "Beso" Lominadze)。布哈林通過電報發去指示，批評中共領導層犯了「機會主義錯誤」。整個事情是一團糟：即將離職的中共中央未能預見黨內合作之中國國民黨一方的背叛，因而受到指責，而這一合作是中國共產黨人不想參加卻被莫斯科逼着參加的；莫斯科不允許中國共產黨人建立蘇維埃，又指責他們解除了工農的武裝。最奇怪的是，中國共產黨人遭遇的國民黨「清黨」被說成是加快了中國革命中資產階級民主主義階段的進程。

損失慘重的中共現在只好準備發動自殺性的大暴動。<sup>232</sup> 蘇聯政治局——其中不再包括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和托洛茨基——暗中指示共產國際把30萬美元的硬通貨偷偷地帶給中國共產黨人，而且斯大林還下令運去15,000支槍和1,000萬發子彈。<sup>233</sup> 就像毛澤東（生於1893年）在羅明納茲主持的漢口會議\*上說的，「槍桿子裏面出政權」。但因為斯大林的緣故，國民黨掌握的槍桿子要多得多。

## 荒誕劇

641 短缺成了普遍現象，結果在警察機關的監視報告中，到處都反映出群眾與執政黨之間對社會主義的理解有分歧：對群眾而言，社會主義意味着自由、豐裕和社會正義；而對執政黨來說，社會主義意味着更嚴密的政治控制和為工業化作出的犧牲。「我們需要的是黃油，不是社會主義」，列寧格勒普梯洛夫工廠的工人在9月6日要求說。<sup>234</sup> 兩天後，因為反對派計劃將自己的「綱領」交給即將召開的黨的代表大會，政治局和中央監察委員會主席團召開聯席會議。已被開除出政治局的托洛茨

---

\* 編註：即「八七會議」。

基和季諾維也夫又被召到那裏。季諾維也夫指出，在黨的全會上，當加米涅夫建議他們要拿出一份綱領的時候，沒有人表示反對，但現在又說這樣做是犯罪。當季諾維也夫和他以前的手下烏格拉諾夫爭吵起來而斯大林再次打斷發言的時候，季諾維也夫對他說：「你對我們幹盡了壞事。」莫洛托夫以嘲諷的口氣問季諾維也夫他和加米涅夫在1917年10月表現得「勇敢」嗎？季諾維也夫提醒他們說，1918年反對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條約的不僅有托洛茨基，還有布哈林，對此，卡岡諾維奇插話，「布哈林不會重複自己的錯誤」。托洛茨基的支持者尼古拉·穆拉洛夫把譴責反對派綱領的決議稱作連載小說，問他們敢不敢讓全體黨員都讀到它並由全體黨員自己作出決定。「母親們抱着孩子來〔參加黨的會議〕，宣讀決議的聲音被孩子喝奶的聲音打斷了，」他寫道，「孩子們把這種對反對派的仇恨和着母親的乳汁一起吸了下去。」布哈林責備受害者們說：「我認為是黨在遭到反對派有組織、有計劃的攻擊和侵犯。」季諾維也夫：「你不是黨。」布哈林：「賊總是喊『抓賊！』季諾維也夫總是做這種事。（大廳裏一片混亂。會議主持人搖鈴。季諾維也夫的驚叫都聽不見了。）」<sup>235</sup>

托洛茨基表現得也很兇猛。在輪到斯大林的心腹阿韋利·葉努基澤發言時，托洛茨基打斷了他的話，說葉努基澤在1917年「當我把你拉進黨內的時候，你一直是反對布爾什維克的」。托洛茨基堅持這樣說，結果葉努基澤爆發了：「聽着，從黨成立的時候開始，我就一直在黨內，而且比你早14年成為布爾什維克。」後來當魯祖塔克在這次會議上發言的時候，托洛茨基打斷他的話並指出，斯大林在背後貶低他的行政能力。「你是在夢裏看到的」，斯大林插話說。魯祖塔克回答說：「我知道你，托洛茨基同志。你專門誹謗別人……你忘記了號稱是斯大林在你家裏裝的那個著名的電話了。你撒起謊來〔關於竊聽的事〕就像個小孩子或小學生，而且拒絕做技術檢查。」托洛茨基：「電話被偷聽是事實。」在布哈林發言時，托洛茨基也打斷他的話，說布哈林在1918年與德國進行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談判期間曾想把列寧抓起來。「好極了，」布哈林回擊說，「你說那個時期很美好，說在布列斯特和約談判期間有廣泛討論和派別自由。而我們認為那是犯罪。」<sup>236</sup>托



洛茨基發言時也揪住斯大林的短處，談到國內戰爭時的事情。「列寧和我兩次把他從紅軍調走，當時他執行了不正確的政策，」托洛茨基說，「我們把他從察里津調走，然後又把他從南方戰線調走，他在那裏執行了不正確的政策。」當斯大林打斷他的講話時，托洛茨基提到他從列寧那裏得到一份文件：「列寧寫道，斯大林頂撞最高總司令是錯誤的，他找茬是任性。事情就是這樣！」斯大林再次打斷他的講話。「斯大林同志，不要打斷我的講話，你照例會有最終決定權的。」斯大林：「為甚麼不呢。」<sup>237</sup>

輪到斯大林發言了。他否認自己兩次被調離前線，聲稱被召回的是托洛茨基，這讓托洛茨基不得不打斷他的話。斯大林：「你說的不是事實，因為你是一個可憐的懦夫，害怕事實。」托洛茨基：「你讓自己顯得很可笑。」托洛茨基指出，是黨讓他在國內戰爭中擔任而且一直擔任紅軍領導人的，斯大林實際上就是在誹謗黨。「你是一個可憐的人，」斯大林又一次說道，「喪失了基本的實話實說的意識，一個懦夫和破產的人，無恥而卑鄙，完全沒影子的事情也說得出。」托洛茨基：「那整個就是斯大林：粗暴而且不忠誠。是誰呀，領導人還是小販。」斯大林把規定的發言時間用完了，托洛茨基建議再給他五分鐘。斯大林：「托洛茨基同志要求中央與反對派平等，中央執行的是黨的決定，而反對派破壞這些決定。真是怪事！你以甚麼組織的名義有權用如此無禮的態度跟黨說話？」當季諾維也夫回應說在代表大會之前黨員有說話的權利時，斯大林威脅說要把他們趕出黨。季諾維也夫：「請不要趕，不要威脅。」斯大林：「他們說在列寧的領導下，政權是不一樣的，說在列寧的領導下，反對派成員沒有被扔到別的地方，沒有被流放等等。你們的記性不好，反對派的同志們。你們不記得列寧曾經建議把托洛茨基流放到烏克蘭了嗎？季諾維也夫同志，是不是有這麼回事？你為甚麼不吭聲了？」季諾維也夫：「我不是在受審。(笑聲，喧嘩聲，會議主持人的鈴聲。)」<sup>238</sup>

然後，爭吵突然又開始了。托洛茨基：「你們是不是隱瞞了列寧的『遺囑』？列寧在他的『遺囑』中揭露了斯大林的一切。沒有甚麼可以增減的。」斯大林：「要是你說有人在隱瞞列寧的『遺囑』，你就是撒謊。你很清楚全黨都知道這件事。就像黨清楚一樣，你也清楚，列寧的『遺

囑]毀了你這位當前的反對派領導人……你很可憐，沒有實話實說的意識，一個懦夫，一個破產的人，無禮而且粗魯，竟然說些完全不符合實際的事情。」<sup>239</sup>

令人不解的是，斯大林當時為甚麼要把托洛茨基和季諾維也夫召到政治局，讓自己經受這一番唇槍舌劍？政治局的決議再次聲稱，反對派的提綱是要「建立一個托洛茨基分子的政黨，以取代列寧主義的政黨」。<sup>240</sup>對於季諾維也夫反覆提出的公佈他們綱領的要求，斯大林的答覆顯然底氣不足：「我們不想把黨變成爭論俱樂部。」<sup>241</sup>

第二天，1927年9月9日，斯大林接待了一個由美國工人代表組成的代表團。他們想知道列寧是否以某種方式修正了馬克思主義，共產黨是否控制了蘇聯政府和工會，在缺乏政黨競爭的情況下，怎麼知道共產黨得到群眾的擁護。「代表團對於蘇聯無產階級剝奪了資產階級和地主的工廠、土地、鐵路、銀行和礦山大概不會表示反對吧。(笑聲)可是我覺得代表團有點想不通為甚麼無產階級不到此為止，還要更進一步，剝奪了資產階級的政治權利，」斯大林回應並反問他們說，「難道西方執政的資產階級對工人階級表示過一點點寬大嗎？難道他們不是正在把真正革命的工人階級政黨驅入地下嗎？有甚麼理由要求蘇聯無產階級對自己的階級敵人寬大呢？我以為邏輯上一定是這樣。」美國人還問到斯大林和托洛茨基的意見分歧。斯大林回答說意見分歧並不是個人的，而且已經在一些報告中得到了詳細的說明。<sup>242</sup>

9月12日，托洛茨基前往高加索休假，但就在當晚，斯大林有了讓他意想不到的卑鄙行為。反對派當時決定，擅自散發為即將召開的黨的代表大會準備的綱領，於是其中有些人就用碳式複寫紙偷偷印出一些副本，但奧格伯烏的線人和密探已經滲透到這群人當中，並在9月12日和13日的夜裏突擊搜查了「地下印刷所」。<sup>243</sup>涉事者當中有一個曾經是弗蘭格爾男爵手下的軍官，與「白衛分子」有關聯，又擁有軍官身份，結果此事被說成是有計劃的暴動。<sup>244</sup>還有一個捲入「印刷所」醜聞的人

644

\* 譯註：《斯大林全集》第10卷，第100、105頁。

信口開河，「供認」說自己原本打算像波蘭的皮爾蘇茨基那樣發動軍事政變。斯大林讓中央機關在9月22日政治局和中央監察委員會的會議上散發了很多份奧格伯烏的這些材料，然後又把「供詞」發給全體中央委員、共產國際執委會和各省的黨委書記。<sup>245</sup> 後來，在把人抓捕起來之後，有些中央委員還是不相信軍事政變的指控。<sup>246</sup> 而且，就像明仁斯基甚至斯大林後來承認的，那個白衛軍官正是奧格伯烏的線人。<sup>247</sup>

托洛茨基中斷了他避居南方的行程，返回莫斯科應戰，但等待他的是共產國際執委會9月27日的會議。在會上，由斯大林任命的全體外國共產黨的打手們先是用言語攻擊他，然後又把他從該機構開除了。布哈林在托洛茨基的面前一本正經地說：「對你來說，沒有共產國際，只有斯大林，最多是斯大林和布哈林，其餘的都是僱工。」斯大林總結說，「今天發言的人講得都很好，尤其是布哈林同志，我沒有甚麼要補充的」，而托洛茨基插話說，「你在撒謊」。斯大林：「這麼嚴厲的話你留着對自己說吧。你這樣罵人是在丟你自己的臉。你是個孟什維克！」只有青年共產國際的負責人、南斯拉夫人沃亞·烏約維奇 (Voja Vujović) 站在托洛茨基一邊，結果也被開除。<sup>248</sup> 9月底，《真理報》報道了一起已經破獲的、與英國和拉脫維亞情報機關指使的「君主派—恐怖分子」有關的案件：這裏出現了新的模因。<sup>249</sup> 以瓦西里·布柳赫爾為首的蘇聯軍事顧問從中國回來了，他們親眼看到所謂革命鬥爭搞砸之後會發生甚麼——蔣介石那樣的武夫奪權。<sup>250</sup> 在中共軍隊開始同國民黨開展游擊戰之後，斯大林正式改變政策，不再主張「資產階級」革命階段。《真理報》在社論(1927年9月30日)中對於成立「中國工農革命軍隊」表示歡迎。這看上去就像是偷偷接受了被打敗的反對派路線。<sup>251</sup> 它對中國會有甚麼影響——如果有的話——也需要拭目以待。

## 法蘇分裂

645 沙皇時代的財政大臣謝爾蓋·維特用舉借外債(長期貸款)的方式為1890年代俄國工業的快速發展(進口西方的機器設備)籌措資金，他  
要靠農民去償還這些外債(出口糧食)，同時還要在政治上加強與法國

(提供貸款的主要國家)的同盟關係，但是在1918年，布爾什維克拒不償還沙皇時代的債務，而且還不得已(無力償還)做了宣傳。<sup>252</sup>此後，在與資本主義國家的幾乎所有的談判中，總是會提到償還這些債務的問題。從1926年起，莫斯科開始與巴黎進行秘密談判，提出每年償還6,000萬金法郎(約合1,200萬美元)，連續還62年，以換取現在的2.5億美元的貸款。法國政府對於補償債券持有人、出售法國的資本貨物以及進口蘇聯的石油很感興趣，但是對於用納稅人的錢資助一個共產黨政權不感興趣。法國的保守派強烈反對。法國聯合政府因為別的原因倒台後，其繼任者增加了一個要求，賠償在俄地產被國有化的法國業主。1927年4月，在一起廣泛報道、轟動一時的案件中，法國反間諜機關抓獲了一百多名蘇聯軍事情報機關的特工人員，他們仰賴法國共產黨出謀劃策，而後者自然是處於警方的嚴密監視下。「發現的文件表明，」法國當局說道，「現在存在一個龐大的間諜組織，比戰爭以來發現的任何間諜組織都大得多。」<sup>253</sup>醜聞發生的時候，蘇聯駐法使節克里斯季安·拉柯夫斯基所面對的就是這種令人擔憂的局面；他寫過一本關於政治家克萊門斯·馮·梅特涅親王(Klemens von Metternich)的小書，當上大使是因為支持托洛茨基而被變相流放。<sup>254</sup>

在1927年8月返回莫斯科磋商時，拉柯夫斯基在一份抗議聲明上簽了名；聲明呼籲「資本主義國家所有正直的無產者」要「積極致力於打敗自己的政府」，呼籲「所有不希望為自己國家的奴隸主效勞的外國士兵過來投奔紅軍」。<sup>255</sup>通常，大使們是不會公開號召駐在國的群眾進行反叛的。但拉柯夫斯基這樣做遠遠不是出於他個人的喜好，而是涉及扭曲的蘇聯外交政策邏輯的核心——既要參與到資本主義世界的秩序中，又要努力推翻這種秩序。<sup>256</sup>

很快，拉柯夫斯基又說他的反叛號召不適用於法國(仍然適用於其他所有國家)，並承諾簽訂相互「不干涉」條約，但法國國內反對恢復友好關係的人表示強烈譴責。「一個在家裏暫住的客人會承諾不偷銀器嗎？」報紙上問道。<sup>257</sup>1927年9月，為了挽回局勢，蘇聯人竟然提出建議，要簽訂正式的互不侵犯條約——就差結盟了。他們甚至對蘇聯公眾說，會給持有沙皇時代債券的法國人支付大筆的補償款。「我們購買的

是與一個歐洲資本主義國家進行和平經濟交往的可能性，法國把這種可能性賣給了我們」，《真理報》解釋說。<sup>258</sup>但一切都無濟於事。拉柯夫斯基被宣佈為不受歡迎的人，於是，他在10月中旬上了自己的小車，返回蘇聯。<sup>259</sup>當他在巴黎的時候，莫斯科對自己的代表是全力支持的，可一旦回到國內，馬上就因為托洛茨基主義而將其開除出黨。「法國人把我趕出巴黎是因為我在抗議聲明上簽了字，」穿着一件漂亮的西式運動夾克的拉柯夫斯基對法國作家皮埃爾·納維爾(Pierre Naville)解釋說，「斯大林把我趕出外交人民委員部也是因為我在那份聲明上簽了字。但兩次他們都讓我留下了這件夾克。」<sup>260</sup>(在回國時，蘇聯外交官需要交出除衣服之外所有在國外得到的東西。)漫長的法蘇談判破裂了。法國差點兒像英國那樣斷絕外交關係，但並沒有真的這麼做。接任的蘇聯大使會來到巴黎，可別說是法蘇條約，就連貸款協議的前景也是黯淡的。

### 最後的面對面鬥爭

1927年9月政治局會議上的激烈衝突在10月21至23日的中央委員會和中央監察委員會聯席全會上再次出現了。托洛茨基為了回擊擬議中的將他和季諾維也夫開除出中央委員會的決議，援引列寧遺囑說，「把斯大林調開，此人會把黨引向分裂和滅亡」。斯大林的親信們大聲起哄，說他是「騙子」、「叛徒」、「人渣」，當然，還有「革命的掘墓人」。托洛茨基伸出一隻手臂，在辱罵聲中繼續讀發言稿，「首先我想就所謂的『托洛茨基主義』問題講兩句。」他說，「為了製造『托洛茨基主義』，造假工廠開足馬力、晝夜不停地生產。」他還說：「列寧曾提到的粗暴和不忠順已不光是個人的品質，這已成了當權派別及其政策和制度的品質。」<sup>261</sup>他說的對。當托洛茨基揭露與反對派「印刷所」有聯繫的那位前弗蘭格爾手下的軍官實際上是奧格伯烏特工時，有人大喊「這不在會議議程的範圍」。卡岡諾維奇大叫道：「孟什維克！反革命！」會議主持人

647

\* 譯註：《蘇聯歷史檔案選編》第10卷，第390-393頁。

一次又一次地搖鈴。<sup>262</sup>有人把用來別住門的一卷經濟統計資料扔向托洛茨基；另外一個人潑了一杯水（就像沙皇時代杜馬中的右翼分子普利什凱維奇對待立憲派自由主義者米留可夫那樣）。速記員記錄了如下內容：「口哨聲再次響起。混亂越來越嚴重。甚麼也聽不到。會議主持人要求安靜。更多的口哨聲。『從台上下來』的叫喊聲。會議主持人宣佈休會。托洛茨基同志繼續讀他的發言稿，但一個字也聽不清。參加會議的人離開座位，陸續走出大廳。」<sup>263</sup>

斯大林做了充分準備。10月23日，他用他此時慣用的受了委屈的口氣開始發言：反對派在對他進行謾罵，「斯大林算得了甚麼，斯大林是個小人物。拿列寧來說，誰不知道以托洛茨基為首的反對派在八月聯盟期間曾經對列寧進行更無賴的攻訐。」接着他宣讀了托洛茨基1913年給卡爾洛·齊赫澤的不光彩的私人信件，其中指責了列寧「同志們，請注意字眼，是甚麼樣的字眼！這是托洛茨基寫的，而且寫的是列寧。連列寧的一隻靴子都不如的托洛茨基，對於偉大的列寧尚且如此放肆地藐視，現在他對列寧的許多學生之一的斯大林同志破口大罵，那又有甚麼奇怪呢！」

明仁斯基在發言中提到反對派的犯罪活動，援引被捕的那位弗蘭格爾手下的軍官和黨外知識分子的證詞，內容是關於反對派的非法印刷所以及他們同反蘇分子組成的「集團」，現在斯大林又提到了明仁斯基：「為甚麼需要明仁斯基同志做一個關於托洛茨基分子反黨非法印刷所的部分『工作人員』所聯繫的那些白衛分子的報告呢？第一、為了揭穿反對派在他們的反黨傳單上對這個問題所散佈的謊話和誹謗……從明仁斯基同志的報告中可以得出甚麼結論呢？……反對派建立非法印刷所，跟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發生聯繫，而這些知識分子中的一部分人又跟策劃軍事陰謀的白衛分子有聯繫。」

斯大林談到了遺囑問題，提醒大家已經對參加黨代表大會的代表們宣讀過遺囑，而托洛茨基也公開發表過聲明，否認伊斯特曼所謂隱瞞了遺囑的說法。他讀了一段托洛茨基1925年聲明中的話，並說：「看來是很清楚了吧？寫這篇文章的是托洛茨基。」然後他讀了遺囑中提到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和托洛茨基的那段要命的話，「看來是很清楚的了。」

他說「列寧在『遺囑』中斥責托洛茨基為『非布爾什維主義』，而關於加米涅夫和季諾維也夫在十月革命期間所犯的錯誤，則說這個錯誤不是『偶然的』，這的確是事實。這是甚麼意思呢？這就是說在政治上決不能信任托洛茨基……也決不能信任加米涅夫和季諾維也夫。」然後，斯大林讀了遺囑中關於他本人的那段內容，「一點不錯。是的，同志們！我對待那些粗暴而陰險地破壞並分裂黨的人是粗暴的。這一點，我過去和現在都沒有掩飾過。」斯大林的粗暴是服務於革命事業的。他的粗暴是熱忱。至於遺囑中要求的把他調開，「我在第十三次代表大會後的中央全會第一次會議上就請求中央全會解除我的總書記職務。代表大會本身就討論過這個問題。每一個代表團都討論過這個問題，所有代表團，連托洛茨基、加米涅夫、季諾維也夫也在內，都一致責令斯大林留在自己的崗位上。我有甚麼辦法呢？從崗位上溜掉嗎？這不合我的性格，我從來沒有從任何崗位上溜掉過，也沒有權利溜掉……只要黨責令我，我必定服從。一年以後，我又向全會提出辭職，但是全會又責令我留在崗位上。」<sup>264</sup> 是的，他們像以往一樣，讓這位忠誠、謙卑的僕人留在了崗位上。當斯大林問，就同意許多同志提出的取消季諾維也夫和托洛茨基中央委員資格的要求，是不是還沒到批准的時間，在場的人們爆發出熱烈的掌聲。後來，《真理報》斷章取義地發表了托洛茨基的講話。同一天，它也發表了斯大林的講話，包括他讀到的列寧遺囑中談到自己的那幾段內容。<sup>265</sup>

斯大林和托洛茨基在黨的會議上的第一次直接衝突恰好是在四年前；1927年10月23日是他們最後一次碰面。第二天，按照黨的規定，有人交給托洛茨基一份「記錄稿」，要他修改或補充，托洛茨基不滿地說：「記錄中沒有顯示……主席團有人向我潑了一杯水……沒有顯示會上有人拽着我的胳膊想把我從台上拖走……當我發言的時候，雅羅斯拉夫斯基同志把一本統計手冊向我扔過來……使用的手段只能叫做法西斯無賴的手段。」<sup>266</sup>

\* 譯註：《斯大林全集》第10卷，第148-160頁。

政權的幾百名人員，從地區黨委書記到軍人和駐外大使，都看到了這次會議的文字記錄。這些官員轉而又要和自己的下屬討論其中的內容，因為文字記錄就是要起教育作用的。但是，正在努力讓工人得到溫飽、盡力勸說農民賣糧和竭力維護蘇聯在國外的利益的官員們，會怎麼理解這些高層會議的實質呢？誰在管理國家呢？當然，考慮到斯大林逐漸強化的互相監視的網絡和極度多疑的氣氛，官員們不管有甚麼想法，都必須小心謹慎，以免把想法流露出來。與此同時，全會已按照斯大林的授意通過決議，要求「更堅決地向富農進攻」以及「有可能進一步向更加嚴密和持久地限制富農和私商過渡」。<sup>267</sup> 由於天氣不好，某些地區的莊稼歉收，1926至1927年度的收成要比1925至1926年度少幾百萬噸。更糟的是，1927年10月的糧食收購量急劇下滑，不到上年同期收購量的一半。農民們在用糧食飼養牲畜和奶牛，兩者的產品可以賣出更高的價錢，不過在戰爭恐慌的氣氛中，他們也在囤積糧食。他們手頭有足夠多的錢可以用來交稅並等待農產品的價格上漲。如果再弄不到糧食，北方城市和紅軍到開春的時候就會挨餓。貿易方面的主要刊物在1927年10月預言說，可能需要把配給制的範圍擴大到全部人口。<sup>268</sup>

649

### 革命十週年：鎮壓的藉口

斯大林曾提出這樣的理論，即反對派的行動證明了內部的分裂和虛弱，因此，他們客觀上就成了叛徒，不管願不願意，都是在招惹外來的干涉，但現在，又出現了一種險惡的新花樣。1927年11月1日，莫洛托夫在《真理報》上稱反對派對斯大林的「迫害」是為了掩蓋對黨的惡毒攻擊。「用對個人的人身攻擊和指責來加劇鬥爭，」他一本正經地寫道，「可以直接誘發針對黨的領導人的恐怖主義的犯罪圖謀。」這可能是第一篇指責黨內反對派想要成為刺客的文章。11月5日，莫洛托夫在《真理報》上繼續仿照斯大林的口氣說道，「從反對派的污水坑裏散發出某種左派社會革命黨人的氣味」。<sup>269</sup> 在布爾什維克的敘事中，左派社會革命黨人是搞政變的陰謀分子。



650 同一天，由於臨近革命十週年，斯大林接待了一個由來自多國的外國人組成的80人代表團，代表團成員是同情蘇聯的，不料，他們卻向他問起了蘇聯秘密警察的權力問題。按照刊登在《真理報》上的話說，斯大林認為奧格伯烏「和法國大革命時期成立的社會保安委員會多少有些相似」，並表示外國資產階級是在誹謗蘇聯的秘密警察。他承認「從國內情況來看，革命的局勢已十分穩固和不可動搖，沒有國家政治保衛局也是可以的」，但又說「我們是一個被資本主義國家包圍着的國家。我國革命的國內敵人是世界各國資本家的代理人。資本主義國家是我國革命的國內敵人的基地和後方。我們同國內敵人作戰，也就是同世界各國的反革命分子進行鬥爭。現在請你們自己判斷一下，在這種情況下，沒有國家政治保衛局這樣的懲罰機關可以不可以」。據說那些外國人都熱烈鼓掌。<sup>270</sup>

政治制度明顯收緊。當加米涅夫和拉柯夫斯基想要對莫斯科黨組織發表演說時，他們被轟了下來。針對他們的表決經過精心安排，結果據說是2,500：1。<sup>271</sup> 在這樣的背景下，1927年11月7日革命十週年紀念日的上午10點，斯大林和領導層的其他人登上列寧墓的頂層，參加一年一度的檢閱。紅軍部隊和各大工廠的工人按照事先排好的方陣先後通過，攝影機轉個不停。莫斯科市中心戒備森嚴，以防反對派在紅場或附近舉行反對遊行的活動。那天參加遊行的反對派不是很多，而且斯大林和奧格伯烏已經安排了便衣特工等人，隨時準備對付反對派的旗幟或演說。少數夾在自己單位隊伍中的反對派成員試圖舉起托洛茨基和列寧的肖像。在這個大型的公共空間的一角，他們中的一些人用即興演說和旗幟（「打倒富農、耐普曼和官僚分子！」）短暫打斷了紅場的官方活動。但是在奧格伯烏便衣的指引下，治安人員毆打並拘押了他們。<sup>272</sup> 尚不明確有多少遊行的人知道正在發生的事情。沒有非官方的報紙，也就無法報道反對派的行動。<sup>273</sup> 托洛茨基和加米涅夫坐着小汽車在莫斯科的街道上四處察看，但是在靠近革命廣場的一條小巷，迎

---

\* 譯註·《斯大林全集》第10卷，第199、201-202頁。

接他們的是表示反對的口哨聲；有人朝天開槍。政權的治安人員砸爛了車窗玻璃。<sup>274</sup> 當天晚上，斯大林預先觀看了謝爾蓋·愛森斯坦(Sergei Eisenstein)關於1917年革命的電影《十月》，責令他刪去帶有托洛茨基的畫面，並修改對列寧的描寫（「列寧的自由主義現在不合時宜」）。<sup>275</sup>

651

在中國，國民黨挑選這個紅色假日襲擊了蘇聯駐上海領事館；一個星期後，南京政府與蘇聯斷交。在莫斯科，斯大林利用反對派堂吉訶德式的反示威活動迅速採取行動——這一活動讓他得以不顧政權核心中其他人的反對，堅持對黨內反對派進行鎮壓。在1927年11月14日中央委員會和黨的監察委員會聯席全會上，托洛茨基和季諾維也夫因煽動反革命活動而被開除出黨；加米涅夫、拉柯夫斯基等人被逐出中央委員會。<sup>276</sup> 第二天，朋友們幫助托洛茨基搬出了他在克里姆林宮的住處，把他安頓在宮牆外不遠處的格拉諾夫斯基大街，和一位支持者在一起。<sup>277</sup> 從11月16日開始，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拉狄克等人都被趕出了克里姆林宮。很快，這座城堡的大門就對政權之外的人員徹底關上了，而且不再允許參觀。<sup>278</sup>

當晚，在後半夜，蘇聯外交官阿道夫·越飛開槍自殺。越飛的妻子、在《信號報》編輯部工作的瑪麗亞(Maria Joffe)接到了電話。他因為在日本得了多神經炎而臥床不起，之前到奧地利治療過，可最近政治局卻拒絕出資讓他到德國就醫；越飛表示可以自費，斯大林仍不放行。越飛從1910年起就認識托洛茨基，與他一同在1917年夏天加入布爾什維克，而且曾以列寧的名義簽發電報，任命托洛茨基為陸軍人民委員。越飛留下了一份十頁的遺書，其中的要點是說，「熱月開始了」；瑪麗亞·越飛通過可靠的中間人把遺書交給了托洛茨基。<sup>279</sup>「我的死是一名戰士的抗議，他陷入如此的境地，無法用別的方式回擊這樣的羞辱，」越飛寫道，而且還提到托洛茨基，「你總是正確的，但你也總是在退讓……我總是覺得你缺乏列寧主義者不屈不撓的精神，不像他那樣，哪怕孤身一人也準備好去堅持自己選擇的道路，創建一個未來的多數派，令其道路的正確性在未來得到承認。」<sup>280</sup>

在以前從事地下革命活動時，為鬥爭中失去的同志舉行葬禮曾經是一種神聖的儀式，但這次是在他們自己政權的統治下。越飛的葬禮是

652 11月19日舉行的。那天是工作日，但參加葬禮的人很多。外交人民委員部的契切林、李維諾夫和加拉罕，以及反對派中的托洛茨基、季諾維也夫和拉舍維奇隨着送葬的隊伍一同去了新聖母公墓，那是僅次於克里姆林宮宮牆的榮耀之地。「送葬隊伍的成分令人感慨，因為那裏面沒有一個工人，」有親歷者回憶說，「聯合反對派沒有得到無產者的支持。」<sup>281</sup>在許多稱頌性的發言中，托洛茨基的發言最後也最短。「鬥爭還在繼續，」他說，「人人都要堅守自己的崗位。誰也不得離開。」這些話成了他在蘇聯的最後一次公開演說。人們圍住托洛茨基，久久地堵住他的出口，想把葬禮變成政治示威。但他們被驅散了。<sup>282</sup>當天晚上，托洛茨基接到李可夫的來信，他被解除了最後一項正式行政職務（特許經營委員會主席）。<sup>283</sup>

第二天，李可夫在烏克蘭共產黨第十次代表大會上發言並指責反對派使用的「專政者斯大林」和「斯大林主義的方式」這些說法。「所有這些都是對全黨和對斯大林同志惡毒而卑鄙的誹謗」，李可夫說道。他還說在政治局「沒有一個問題是由一個委員單方面決定的」。<sup>284</sup>他的話既是真的也是假的。在斯大林成為總書記的同一天，李可夫進了政治局。他是政治局中牢固的多數派的核心成員。但他比幾乎所有人都更瞭解，很多事情都是斯大林在政治局之外，在老廣場大街、在他克里姆林宮的住所、在他索契的別墅以及在電話裏和奧格伯烏一起事先定下的。

### 黨的第十五次代表大會（1927年12月2-19日）

黨的第十五次代表大會是到當時為止規模最大的一次黨的會議，與會代表1,669人（有表決權的代表898人）。托洛茨基和季諾維也夫不在其中。反對派連一個有表決權的代表都沒有。<sup>285</sup>開幕式後，斯大林作了他擔任總書記以來的第二次政治報告。剛報出他名字的時候，代表們就沸騰了（「雷鳴般的經久不息的掌聲；『烏拉』聲響徹整個會堂」）。「同志們，我國是在資本主義包圍的環境中生存和發展的，」他開始說道，「我國的外部狀況不僅以我國內部力量為轉移，而且以這種資本主義包圍的情況、以包圍着我國的各資本主義國家的狀況為轉移，以這些

國家力量的強弱、以全世界被壓迫階級力量的強弱、以這些階級的革命運動力量的強弱為轉移。」由此，他對世界的經濟、貿易、國外市場，以及他所謂的為重新瓜分世界而進行的新帝國主義戰爭的準備情況作了詳細的評估。他得出的結論是，「世界資本主義最深刻的危機和日益加劇的不穩定狀態的一切徵象已經出現了」，並稱資本主義的穩定「日益動搖」，反殖民主義運動和工人運動在「增長」。接着，斯大林分析了蘇聯在工農業領域的經濟發展、工人階級隊伍的壯大、國家總體文化水平的提高，認為「蘇維埃政權是世界上現存一切政權中最鞏固的政權（熱烈鼓掌）」。<sup>286</sup> 午飯過後，斯大林回到講台，開始憤怒地指責反對派。他總共講了四個小時。

斯大林作報告的當天（12月3日），加米涅夫遞交了一份有121名反對派成員簽名的申訴書，這些成員被列入開除的名單，但表示服從黨的決定。<sup>287</sup> 斯大林取笑他們，像季諾維也夫以前要求托洛茨基那樣要求：「他們必須在全世界面前公開地老老實實地放棄自己的反布爾什維主義的觀點……他們必須在全世界面前公開地老老實實地痛斥他們自己所犯的那些已經成為反黨罪行的錯誤……或者是這樣做，或者是叫他們出黨。如果他們不肯出去，就把他們趕出去。」會場大亂。<sup>288</sup> 討論中，少數有發言機會的反對派成員，比如格里戈里·葉夫多基莫夫和尼古拉·穆拉洛夫，遭到無情的嘲笑，然後，他們在離開講台後，又受到言語的侮辱。「不能相信黨內的這些騙子，」來自車里雅賓斯克的代表（和那裏未來的黨組織負責人）庫茲馬·倫金（Kuzma Ryndin）拖長了聲音說，「黨受夠了這種愚弄，黨和無產階級不會容忍它的……所有那些想要妨礙我們工作的人，同他們一起滾出黨去！」菲利普·戈洛曉金說：「如果我們對反對派猶豫不決，我們就是在自尋死路。」當加米涅夫說反對派成員因為其政治觀點已經被關押起來時，李可夫回答說：「雖然反對派造成了這樣的局面，關起來的也只是少數。我想我不能保證在最近的將來，關在監獄裏的人不會增加。（代表席上傳來聲音：『對！』）」<sup>289</sup>

\* 譯註：《斯大林全集》第10卷，第231-277頁。

† 譯註：《斯大林全集》第10卷，第302頁。

654

加米涅夫得到允許，以沒有表決權的代表身份出席大會，不過，他說的話雖然和兩年前完全不同——那時候他說斯大林沒有能力把黨統一起來——也還是值得記住。「擺在我們面前的問題，是要在兩條路當中選一條，」加米涅夫現在解釋說，不顧有人幾乎在不停地打斷他的講話並指控他犯了托洛茨基主義、撒謊甚至更嚴重的罪行，「其中的一條路是另外組建一個政黨。這條路在無產階級專政的條件下，會對革命造成極大的危害。這是政治和階級墮落的道路。對我們來說，這條路是禁止的，是我們的整個觀點和列寧的所有教導不能允許的……那就剩下第二條路……徹底地和完全地服從黨。我們選擇這條路，是因為我們深信，正確的列寧主義的政策會在我們黨內並且憑藉黨，而不是在黨外並且反對黨，來取得勝利。」<sup>290</sup> 其實不管怎麼樣，斯大林已經把黨統一起來了，加米涅夫的發言就是證明。

在12月7日總結有關自己報告的討論時，斯大林在講話中得意地表示，「關於葉夫多基莫夫和穆拉洛夫兩人的發言，我沒有甚麼重要的話要講，因為他們的發言沒有提供可講的材料。關於他們的發言只能說一句話，願上天寬恕他們的罪過」。代表們又是大笑，又是鼓掌。他說加米涅夫表示投降認輸的發言是騙人的。斯大林稱黨是一個活的機體：「舊的、腐朽着的東西衰亡下去（鼓掌），新的、成長着的東西生長和發展起來（鼓掌）。上上下下都有人衰亡下去，上上下下都有新的人成長起來，把事業推向前進……如果現在某些不願意穩穩地坐在車子上的首領從車子上摔下去，那是沒有甚麼奇怪的。這只會使黨擺脫那些妨害和阻礙黨前進的分子。」對於那些「從車子上摔下去」的人，「那麼就讓他們下去吧！（熱烈鼓掌多時。全場起立向斯大林同志歡呼致敬。）」<sup>291</sup>。

一項譴責反對派的決議立即付諸表決並得到一致通過。接着，該死的遺囑問題又一次冒了出來。

早在1926年7月，斯大林就向自己的批評者提出挑戰，要求在下次（即現在這次）黨的代表大會上公佈列寧的遺囑。12月9日，奧爾忠尼

---

• 譯註：《斯大林全集》第10卷，第305、320頁。

啟則為此提了一個正式的提案，推翻了黨的第十三次代表大會的決定。李可夫建議將已故列寧的口授文件全部公開，而不只是公開被稱作遺囑的那一部分，同時建議把遺囑寫進黨的第十五次代表大會的會議公報。李可夫的建議得到一致通過。<sup>292</sup>但遺囑並沒有出現在發表的會議公報中。<sup>293</sup>相反，斯大林在大會期間讓人把它印了13,500份——9倍於代表人數——作為單獨的通告，「僅限黨員閱覽」。遺囑是怎麼發的，多少人看到它，現在還不清楚。<sup>294</sup>

大會上的很多東西都經過了粉飾。關於「商品荒」和民眾普遍感到憤怒的告急報告，當時正經由秘密警察的渠道源源不斷地傳來。「除了聚眾鬥毆，購買吃穿用品的長隊也成了（中部地區、白俄羅斯、伏爾加河流域、南高加索的）日常現象，」奧格伯烏報告說，「已有過婦女暈倒的情況。」歷史的前車之鑒讓警察機關特別關注排隊購買食品的婦女，聽到她們埋怨說花了一整天時間才弄到麵粉，說她們的丈夫們正下班回家結果卻找不到任何吃的。<sup>295</sup>為了安撫工人的情緒，政府宣佈每天工作七小時，而這對於迫切需要製造品的農民來說就不太能接受了。據1927年12月奧格伯烏的國內情緒報告，有個農民說：「現在商店裏沒有貨，要是一天工作七小時，那商店裏就絕對甚麼都沒有了。」據說有個「富農」講，「要是農民能設法組織起來並用同一個聲音說，我們不會按照這樣的價格把糧食賣給你們，那工人就會守着他們的貨物餓得哇哇叫，然後他們就會忘記一天七小時」。<sup>296</sup>布爾什維克革命看起來越來越像是勝利中的失敗。

655

斯大林的中國政策的內爆還沒有結束。就在莫斯科的黨代表大會期間，1927年12月11日，中共終於在廣州成立了蘇維埃；在國民黨軍隊消滅蘇維埃的支持者之前，它存在了60個小時。中共在1927年總共損失了大約85%的黨員。「革命不可能在廣州、上海、天津、漢口或任何工業最發達的地區發展起來，因為帝國主義和中國資產階級在那裏的勢力比較強大」，蘇聯的中國問題專家、化名帕維爾·米夫(Pavel Mif)的米哈伊爾·福爾圖斯(Mikhail Fortus)認為。他主張撤到遙遠的西北地區，共產黨人可以在那裏積聚力量，然後打擊「帝國主義分子的據點」。<sup>297</sup>毛澤東一直在強烈主張，建立農村根據地和農民軍隊，而不要試圖奪取城市。但是，是蔣介石把作為一種城市運動的共產黨人趕到了農村。同時，據

奧格伯烏說，蘇聯農民在聽人讀到報紙上講1927年12月共產黨在中國大敗的消息時，以為這說的是莫斯科共產黨的失敗。一廂情願的想法。<sup>298</sup>

656 聯合反對派發生了分裂。12月10日，加米涅夫和葉夫多基莫夫以及巴卡也夫(Bakayev)這兩位季諾維也夫分子再次以書面形式提起申訴，承諾解散自己的派別，請求恢復黨籍並釋放被捕的反對派成員。<sup>299</sup>但是在同一天，托洛茨基的支持者穆拉洛夫和拉柯夫斯基在宣佈他們同意組建第二個政黨行不通的同時，堅持認為自己擁有在這個單一政黨中繼續維護反對派觀點的權利。<sup>300</sup>斯大林決定，不接受季諾維也夫分子的投降。他現在不像一開始那樣，只是要求他們閉嘴，而是命令他們公開放棄自己的主張，並在那個星期餘下的時間裏老老實實。12月17日，在上一次全會上已經表決通過的將托洛茨基和季諾維也夫等人開除黨籍的決定得到批准。<sup>301</sup>兩天後，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等總共23人，聯名向大會遞交了一份有損人格的請願書——他們甚至沒有獲允進入會堂當面遞交——宣佈放棄他們「錯誤的、反列寧主義的觀點」。斯大林再次拒絕恢復他們的黨籍。<sup>302</sup>奧爾忠尼啟則就幾位最引人關注的托洛茨基分子的處置問題進行了談判，因為那些人想要以某種身份繼續工作，但斯大林很快就把他們拆散並在國內流放。<sup>303</sup>之前，在1924年中期的政治局，大俄羅斯人佔46%，猶太人佔三分之一，剩下的三個當中，一個是波蘭人，一個是拉脫維亞人，一個是格魯吉亞人，而現在的政治局，三分之二都是俄羅斯人（而且此後一直是俄羅斯人佔多數）。<sup>304</sup>代表大會上有句話是，「摩西帶着猶太人出了埃及，斯大林帶着猶太人出了中央委員會」。<sup>305</sup>

代表大會結束的前一天（12月18日），蘇聯秘密警察舉行了成立十週年的慶祝活動，騎兵部隊和裝甲車列隊通過紅場，接受第一副主席和事實上的首腦亞戈達的檢閱，莫斯科大劇院的慶祝晚會展示了革命的「劍與盾」。舞台上擺放着一把由莫斯科迪納摩工廠的工人製作的金屬巨劍，參加儀式的工人要求等到「資產階級的所有殘餘分子都成為過去」的時候，再把劍拔出來。那天早晨，《真理報》宣佈，向「所有不堅持無產階級革命道路的人——投機倒把分子、破壞分子、土匪、白衛分子、特務，以及昨天的同志而今天成為最可惡的叛徒和敵人的人」開戰。<sup>306</sup>在莫斯科大劇院，伏羅希洛夫和布哈林發表了演說。卡岡諾維奇說「階

級鬥爭」正在採取新的形式，尤其是經濟上的壓力，說新經濟政策引起了對無產階級的階級仇恨。<sup>307</sup> 仍然重病纏身的奧格伯烏負責人維亞切斯拉夫·明仁斯基作了簡短的講話。講述秘密警察豐功偉績的照片和故事，連續三天登上了各個報紙頭版的顯著位置。「如果說現在有甚麼後悔的，」一名資深的契卡人員寫道，「那不是我們過去對敵人太殘酷，而是太仁慈。」<sup>308</sup> 參加慶典的人被分別安排在首都的幾家高級飯店，國家大飯店、巴黎大飯店和薩沃伊飯店，亞戈達在每一處都露過面，被吹捧為「偉大的契卡人員」。<sup>309</sup> 不僅是他，該組織幾乎所有的高級官員都獲得了國家最高獎章紅旗勳章；唯一被漏掉的或許是亞戈達最討厭的阿爾圖佐夫，他失去了對反間諜機關的控制權。

657

斯大林取得了最徹底的勝利，可他還覺得自己受了委屈。12月19日，在代表大會剛批准的中央委員會的第一次全會上，他再次提出列寧遺囑中要求解除自己總書記職務的問題。他承認黨以前沒有遵照列寧的要求或許是有理由的，因為以前有反對派存在。可現在反對派沒了。「反對派以前從來沒有經受過這樣的失敗，因為它不僅被打垮了，而且還被開除出黨了，」斯大林得意地宣稱，「現在，全會用來拒絕我提出的解除我總書記職務的請求的那些理由，已不再存在了。再說，我們有列寧的指示，這是不能不考慮的，而且在我看來是必須執行的。」組織局工作人員亞歷山大·多加多夫(Alexander Dogadov)也許是為了讓大家免於不得不爭相歌功頌德，就插話建議說，不用討論了，直接對斯大林的提議進行表決。伏羅希洛夫當即建議，拒絕斯大林的請求。作為政府首腦主持這些會議的李可夫採納了多加多夫的建議。舉手表決——哪些是贊成斯大林繼續擔任總書記的？哪些是反對的？表決結果是一致贊成，只有一人棄權，姓名不詳。<sup>310</sup>

李可夫巧妙地壓制了可能爆發的不滿情緒。但接着斯大林又提出一個新的建議：「也許中央可以考慮取消總書記制度。在我黨的歷史上，有段時期並不存在這個職位。」伏羅希洛夫再次插話。但斯大林簡要回顧了黨在其他幾位為中央服務的書記之上設置總書記職位之前的歷史，他以這種方式作了回答。「我不知道為甚麼還要保留這項已經過時的制度，」他說，「在上面，總書記實際上沒甚麼特殊的權利或特殊的職



658 責，而在地方上則花樣百出，在各個省，這項制度在被稱為書記的同志當中引發了矛盾，例如在民族中央委員會當中。現在出現了很多總書記，在地方上擁有特權。我們為甚麼需要這項制度呢？」他要求取消這一職位，「這很容易做，因為黨章中沒有這個規定。」

難題再次落到李可夫頭上。他毫不含糊地表示，中央將保留總書記職位，它是由列寧設置的，斯大林擔任總書記是所有人投票決定的，包括現在被開除黨籍的反對派在內。李可夫聲稱斯大林通過他所做的工作，無論是在列寧去世前還是去世後的工作，充分證明了這一任命的合理性。此次表決獲得一致通過。就像在剛剛召開的烏克蘭黨的代表大會上的講話一樣，李可夫的做法表明，他要麼是超級自信，以為自己能夠駕馭得了斯大林；要麼是明白，哪怕是他那樣的大人物，唯一的選擇就是討得斯大林的歡心，並且希望萬事大吉。要麼，李可夫或許同從前的加米涅夫一樣，沒有看清楚斯大林。加米涅夫當初放過了解除斯大林職務的機會。斯大林的威脅現在明顯多了。但這些威脅也是完全用政權的詞彙和世界觀——資本主義包圍、無處不在的敵人、警惕、無情——包裹起來的，而且李可夫同樣擁有這些詞彙和世界觀，他自己一邊在安撫富農之外的農民，一邊就是一直用它們來對付反對派的。



沒有人強迫斯大林一次又一次地提出辭職。他一再提出辭職，很可能會讓那些當事人感到厭煩。要是不算1923年8月7日給布哈林和季諾維也夫的信中私下的暗示——這和布哈林和季諾維也夫在山洞會議後首次驚驚扭扭地透露〈伊里奇關於書記的信〉有關——已知的明確提出的辭職共有五次：1924年5月黨的第十三次代表大會召開前夕和剛剛結束的時候；1926年8月19日給中央委員會的信；1926年12月27日以中央委員會的名義給李可夫的信；再加上現在1927年12月19日的這次。在列寧的遺囑問題浮出水面後的三次黨代表大會上，只有一次（黨的第十四次代表大會）斯大林沒有提出辭職，然而此事已經演變成圍繞他的「無限的權力」問題的激烈爭吵。現在，在黨的第十五次代表大會後的第一次全會上，儘管李可夫堅持保留總書記的職位，斯大林仍然沒有

罷手。「同志們，在關於免去我的書記職位的第一次投票中，我沒有投票，我忘記投票了，」他插話說，「我請求你們考慮我的反對票。」<sup>311</sup>

這是不是在表達一種深切的怨恨？是不是在表達他最隱秘的恐懼，即害怕被中央委員會解除職務？是不是在有意考驗政權的核心集團？是不是斯大林以這種奇特的方式來品嚐自己獲勝和反對派被開除的滋味？是不是一個以黨的謙卑卻不可或缺的僕人自居的人擺出假謙虛的姿態？上面這些都有可能——擁有無上的權力卻感覺受到圍攻，志得意滿卻自憐自傷，這就是斯大林權力的悖論。

659

斯大林得到的職位，其權力之大，或許除了他自己，任何人都無法想像，可對他而言，權力也意味着責任，要把國內外的共產主義事業推向勝利。1927年沒有戰爭，但是有流言說，那只是因為蘇維埃政權暗中作了讓步：交出糧食、黃金、馬匹、港口、煤礦和領土。（有些風趣的人猜測說，西方列強之所以還沒有掀翻蘇維埃政權，是為了讓世界各地的社會主義者有更多的時間看到他們的妄想是多麼愚蠢。）黨的第十五次代表大會通過了一項關於工業化的決議，要求——用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的話說——生產生產資料，同時，進口蘇聯沒有生產的機械設備。<sup>312</sup> 這樣做的資金從哪裏來？秘密警察報告說，針對蘇聯官員的襲擊事件增加，甚至出現了謀殺，而國家收購到的糧食卻在減少。1927年12月12日，被稱作奧辛斯基 (Osinsky) 的左派共產黨人瓦列里安·奧博連斯基 (Valerian Obolensky) 給李可夫和斯大林寫信，反駁李可夫在代表大會報告中關於糧食收購不存在全面危機、只存在局部危機的說法。在中央統計局工作而且對農業十分瞭解的奧辛斯基，稱這一年的糧食收購是「徹底失敗的」——驚人之語——「即便是打算提高收購價。這樣的提高也已是一種失敗，尤其是因為這有可能進一步造成由於指望糧價繼續上漲而不肯賣糧的情況」。奧辛斯基曾經多次（1927年1月、1927年夏、1927年秋）勸說米高揚等高層官員提高收購價並為農民降低工業品的價格。「我認為我們收購量下降（到如今已經下降了一半）的更根本的原因——這種下降會演變為深刻的、全面的困難——在於我們生產的發展速度和方向不符合我國的實際情況。」<sup>313</sup> 奧辛斯基在信中暗示，對於糧食收購工作必須作出重大調整，否則工業化就會落空。

660 前財政人民委員索柯里尼柯夫再次堅持說，只有發展農業，美國那樣的工業化速度才有可能實現，而且他認為把農民儲存糧食說成富農對抗蘇維埃政權是愚蠢的。他呼籲使用經濟槓桿而不是重新徵糧。<sup>314</sup>最後，黨的第十五次代表大會按照斯大林的吩咐通過了一項「關於農村工作」的決議，要求「利用經濟機關的全部力量、仍舊依靠貧中農群眾來繼續向富農展開進攻，並能採取各種限制農村資本主義發展的新辦法而引導農民經濟走向社會主義」。<sup>315</sup>這些「新辦法」會帶來甚麼後果，當時不清楚。但就在代表大會快要結束，在對有關農村問題的最終決議進行表決的時候，出現了一項帶有修正性質的決議：「現在，必須把小的個體農莊轉變、合併成大型集體農莊的任務作為黨在農村的根本任務。」<sup>316</sup>現在就要搞集體化嗎？據會議記錄記載，在宣讀修正決議時，「會場一片喧嘩」；會議主席強調距離大會結束只剩下20分鐘，要求代表們繼續坐在座位上。據說這份補充決議獲得一致通過。<sup>317</sup>

辭職遭拒以後，按照官方認定的日期，斯大林在12月21日度過了牠的48歲生日。<sup>318</sup>照理說，近半個世紀的時間應該足以讓觀察家們把斯大林看明白了，但他仍舊像幽暗遼闊的西伯利亞森林一樣，讓人捉摸不透。就連美國基督教青年會會長傑羅姆·戴維斯那篇關於斯大林生平的傑出報道也受到懷疑：斯大林禁止重新發表俄文原文，並在1927年12月指示外交人民委員部的一名工作人員，試圖讓美聯社不要相信戴維斯的採訪，說那是編造的。<sup>319</sup>不過，這次因為過生日，斯大林的高級助手伊萬·托夫斯圖哈重新整理了中央機關集體搜集的斯大林生平資料，而且居然獲得他的同意，1927年發表在收錄了約250名革命者的《格拉納特百科辭典》中，只是要以托夫斯圖哈的名義。這份斯大林的資料還出了單行本，首次印數5萬冊。終於有了斯大林的傳記。該傳記恭恭敬敬地把他苦難的革命歷程分成幾個階段：發現馬克思、從事地下鬥爭、早期的幾次代表大會、流放和其他的政治懲罰。內容一共有14頁，用的是大號黑體字。<sup>320</sup>

<sup>314</sup> 譯註：《蘇聯共產黨代表大會、代表會議和中央全會決議彙編》（第三分冊）（人民出版社，1956），第409頁。

## 第十四章

# 西伯利亞之行

我們不能像茨岡人那樣過日子，沒有糧食後備……

661

——斯大林，中央委員會全會，1928年7月9日<sup>1</sup>

斯大林是個很注重思想意識的人。對他來說，思想是最重要的事情。

——拉扎·卡岡諾維奇<sup>2</sup>

1928年1月15日，星期天，<sup>3</sup>斯大林登上一輛戒備森嚴的列車，駛往西伯利亞。哪怕目的地是在國內，他也很少出行，除非是為消除肌肉和關節的疼痛到黑海洗硫磺浴。不過，對於西伯利亞，他在1917年革命前就十分瞭解。他曾多次被沙皇政權趕到那裏，最近的一次是在世界大戰期間，當時斯大林是在與「蚊蟲和無聊」搏鬥的戰線上，就是說，他在遙遠的北方，在時而冰凍時而融化的沼澤地帶，作為政治流放犯享了幾年清福。但他1928年去的是西伯利亞南部：新西伯利亞和西西伯利亞的糧食主產區阿爾泰，還有東西伯利亞的克拉斯諾亞爾斯克——就是在那裏，1917年初，沙皇徵兵局拒絕了他，因為他的左腳是

---

<sup>1</sup> 譯註：《斯大林全集》第11卷，第153頁。

蹣跚狀，而且左肘潰爛，無法正常彎曲。現在，11年後，他要作為國家的統治者和共產黨的總書記重返那些偏遠地區。在新西伯利亞，在和當地要員見面的時候，斯大林要求採取強制措施，解決國家的糧食收購危機。他還出人意料地宣佈，立即推進農業集體化勢在必行。幾天後，為了和基層官員見面，他從支線前往西伯利亞最富裕的產糧區的行政中心巴爾瑙爾。與擁有2,000萬輛汽車的美國相比，蘇聯當時的轎車和卡車大概只有5,500輛，巴爾瑙爾一輛也沒有。斯大林開會時是從終點站坐了一輛原始的木製雪橇，而這樣的運輸工具也表明，要在兩個大陸上改造農民生活和國家政權有多麼艱巨。

### 說危機，危機到

掛着蘇維埃招牌的現代俄國，照舊要依賴小麥和黑麥。儘管懷着種種現代化夢想，儘管一直在利用憑藉新經濟政策半合法化的市場交易休養生息，可到了1928年，工業才剛剛恢復到1913年沙皇時代的水平。<sup>4</sup>相比之下，英國和德國的工業比1913年增長了10%；法國，40%；美國達到驚人的75%。<sup>5</sup>俄國退步了。與此同時，新經濟政策以為，農民不但會願意把自己的「剩餘產品」——也就是，作為食物或自釀酒而消耗的份額之外的糧食——賣給私商（耐普曼分子），而且會願意按照國家規定的價格賣給國家的糧食收購部門。俄國的農業年從7月算起，直到來年6月，因此，莊稼收割和國家的糧食收購都是從夏天開始。1927年，從7月到12月，蘇維埃國家只收到540萬噸糧食。而該時段的目標是770萬噸，由此產生的缺口讓莫斯科、列寧格勒以及紅軍，在來年春天有挨餓的危險。1927年11月和12月的收購量加起來只有上年同期的一半，尤其令人擔憂。<sup>6</sup>從遙遠的蘇維埃烏茲別克斯坦也傳來令人不安的報告，那裏的棉農因為缺糧而堅決要求改種可以填飽肚子的莊稼，官員們則開始沒收糧食，不管誰種的，一律沒收。<sup>7</sup>在莫斯科，當局承受不了嚴重的騷亂——麵包短缺引發的街頭示威曾經導致沙皇政權垮台，糧食匱乏過去也削弱了臨時政府的力量。

要是考慮得再遠一點，那就更讓人不安了。過去，沙皇俄國為英、德兩國供應糧食，1913年的糧食出口一度達到900萬噸左右，但是在1927年，只有區區220萬噸，這就少了一大筆可以用來進口機械設備和實現工業化的硬通貨。與此同時，斯大林還收到一張報表；報表顯示，自沙皇時代以來，收成上市銷售的比例出現大幅下滑，（在收成較差的年頭）從26%減少到13%。<sup>8</sup> 農民革命使得過去一些用於商品生產的土地被沒收，現在種的是用來維持基本生存的作物，即便收成還不錯，能拿到村子以外的地方出售的糧食也很少。<sup>9</sup> 不錯，與中國以及印度相比，蘇聯的農業水平要高一些。但蘇聯的競爭對手是英國、法國和德國，而它在農具和機器、信貸以及銷售合作社方面雖然有所改善，可耕作方式仍然非常落後。全部糧食中有四分之三是人工播種的，近一半是靠鐮刀和鋤刀收割的，有五分之二是用鏈式打穀機之類的手動裝置打下的。<sup>10</sup> 俄國的農業完全停滯不前，而在各個大國中，機械化正處於發展的高潮。怎樣提高糧食的總產量是個很受關注的問題。在新經濟政策的刺激下，1925至1926年度的收成達到了最高峰（7,700萬噸），過後，1926至1927年度的收成就令人失望了，大約是7,300萬噸，1927至1928年度的收成同樣令人失望，官方的估計也是7,300萬噸，但很可能不超過7,000萬噸。<sup>11</sup> 對於這些不爭的事實，俄國無論是甚麼政府都會覺得棘手，但布爾什維克採取的措施無情地削弱了新經濟政策下的準市場。<sup>12</sup>

當時，蘇聯的私人工業已被壓縮到不足總產值的10%，而且這一比例還在不斷下滑，但主要的生產者——被組織成巨型托拉斯的國營工廠——幾乎沒有動力去降低自身過高的生產成本，甚至也沒有動力去生產出適合銷售的產品。1927年關於托拉斯的政令強調要以生產指標而不是利潤作為指導原則，結果，業績越差補貼越多的現象越來越嚴重。<sup>13</sup> 為了提供工業擴張所急需的資金，政權只好多印鈔票；多印鈔票造成通貨膨脹，而為了遏制通貨膨脹，又出台了各種笨拙的辦法來控制物價，結果，市場運行情況惡化。換句話說，用行政手段去管理經濟，只會使失衡更加嚴重，造成惡性循環，進一步助長採取更多行政措施的傾向。<sup>14</sup> 「如果要在工業化計劃與市場的平衡之間作出選擇，那市場必須

讓路]，1928年1月，最高國民經濟委員會主席瓦列里安·古比雪夫對自己部門的黨組織咆哮道。他承認市場「可能是一股潮流，但共產黨人和布爾什維克一向能夠而現在也能夠逆流而上」，因此，他的結論是，「雖然存在所有這些市場現象，但黨的意志能夠創造奇蹟……而且現在正在創造奇蹟，將來也會創造奇蹟」。<sup>15</sup> 僅僅過了幾個星期，古比雪夫就在最高國民經濟委員會主席團會議上宣佈，「國家的意志已經粉碎了〔市場〕危機」。<sup>16</sup> 如此大言不慚，不經意間暴露出國家糧食收購量的急劇下滑在多大程度上是由自身造成的。

有些農民不肯賣糧是因為擔心再次發生饑荒，但專家們大多認為，市面上糧食減少是因為農民的人均產量較低而人均消費較高，尤其是因為在糧食（低價）與農民所需要的製造品（高價）之間存在巨大的價格差——按照托洛茨基的比喻，就是有名的「剪刀差」，刀片張開的剪刀。<sup>17</sup> 要是大幅提高糧食的收購價並嚴格限制貨幣的投放量，就會把張開的剪刀合上，但要是採取前一種措施，賣給工人的麵包的價格就要提高，同時還會損害工業化（國內糧食的收購價高了，出口獲得的收入就少了）；要是採取後一種措施，則必須相應地減少工業擴張的規模。<sup>18</sup> 斯大林不願再在政治上對農民作出此類的讓步，因為如果那樣做，政權仍會陷入同樣的境地。於是，政治局就在1927年想出了另外一個辦法，要求大幅降低製造品的價格——斯大林把此舉說成是「把漲價的幅度降下來，減少漲價，不惜代價打破合作社和其他貿易機關的阻撓」。<sup>19</sup> 在還沒有採取上述做法的那幾年，還存在有待恢復、尚未利用的工業產能，但現在，即便處在較高的價格水平，需求也因為有限的供給而一直得不到滿足，價格降低後——居然是在夏季工人度假、生產照例受到影響的時候——商店裏貨物供給不足的趨勢更加嚴重。<sup>20</sup> 「有些地區的農民，」在1927年12月的國內政治情緒調查中，秘密警察報告說，「天天到合作社問貨物到了沒有」。<sup>21</sup> 誠然，為了給糧食產區生產製造品，莫斯科地區的各個紡織廠在1928年的整個1月就連星期六也在開工，但商品荒依然在繼續。<sup>22</sup>

戰爭即將來臨的傳聞也是農民不願賣糧的原因之一；西伯利亞黨組織要求停止「報刊上愚蠢的鼓動」，不要講外敵即將入侵。<sup>23</sup> 最嚴重的問

題在於黨的官員人心渙散。從1927年11月7日十月革命十週年開始，先是沒完沒了的飲酒慶祝，然後是選舉參加黨的第十五次代表大會的代表，再然後，12月的大部分時間都在召開黨的第十五次代表大會。「當權的沒有誰操心收購糧食的事情，」一個以記者身份為掩護的德國間諜在談到西伯利亞農村的官員時寫道，「所有當權的黨的領導都在莫斯科參加黨的代表大會，參加十月革命十週年紀念活動，參加蘇維埃的會議等活動，而黨的基層領導、青年組織和農村通訊員，頭腦裏只有革命十週年。」<sup>24</sup>但代表大會一結束，政治局就召開特別會議，專門討論糧食收購問題。<sup>25</sup>《真理報》也開始吹風。突然間，就像倫敦《泰晤士報》駐莫斯科記者說的（1928年1月3日），公眾開始討論起了「讓農民把糧食交出來的最嚴厲的措施」。

665

斯大林有兩種途徑可以加大壓力。一是秘密警察，他們獲得了在司法渠道之外生殺予奪的特權。1月4日，奧格伯烏副局長亞戈達指示各地區秘密警察的下屬機構，「立即逮捕最大的私人糧食貿易商……調查工作要迅速，要有說服力。案件要移交給各特別委員會。立即報告由此對市場造成的影響」。<sup>26</sup>斯大林要求秘密警察盡量減少公開插手（「停止發表關於我們在糧食收購中採取的行動的公報」，1928年1月，奧格伯烏局長維亞切斯拉夫·明仁斯基這樣指示烏克蘭奧格伯烏首腦弗謝沃羅德·巴利茨基〔Vsevolod Balytsky〕）。<sup>27</sup>另一種途徑涉及黨的機關：從12月14日開始（黨代表大會期間），一個月之內給所有主要的黨組織連發四則措辭嚴厲的秘密通告。<sup>28</sup>通告把農村地區匯出捐稅的截止日期（從1928年4月1日）提前到1928年2月15日，匯出保險費的截止日期（從1928年的1月31日）提前到1月15日，當局強迫農民在群眾大會上通過這兩項變更。<sup>29</sup>但農民用出售肉類、牛奶或獸皮所得的現金交稅，因為那些商品的價格主要由市場決定，而且因為供不應求，價格較高。糧食容易保存，他們就留着。<sup>30</sup>秘密警察關於國內形勢的報告警告，「富農加強了鼓動」——就是說，農民中間有議論說，熬到春天估計就能賣個好價錢。<sup>31</sup>

想到要是糧食供應不上，開春就會發生饑荒和城市騷亂，而且因為沒有糧食出口還會損害工業化，政治局委員們就謹慎地同意了斯大林



堅持採取的「非常措施」。他在1928年1月6日下發的第三則黨內秘密通告中承認，「雖然中央兩次明確指示加強糧食收購工作，但迄今為止仍然毫無進展」。他還宣佈成立中央委員會的糧食工作小組，由他親自負責，這不僅給了他事實上的權威，也給了他法理上的權威，去落實他認為勢在必行的非常措施。有了這種額外的權威，斯大林便把奧格伯烏用來打擊私商的反投機倒把的法律，即刑法第107條的適用範圍，擴大到「不肯出售商品」的種糧農民。<sup>32</sup> 僅僅因為不肯出售私人種植的糧食就要受到三年監禁的處罰，而且財產還要充公。在烏克蘭和北高加索，公開宣傳的逮捕有數百起，同時還有報道公佈說發現了很多「囤積」糧食的倉庫。<sup>33</sup> 在這些地方，斯大林依靠的是幾個信得過的副手，比如烏克蘭黨組織負責人卡岡諾維奇和他的另一個門徒安德烈·安德烈耶夫，他剛被任命為遼闊的北高加索地區黨組織負責人。但就連他們也需要他施壓（1928年1月，初來乍到的安德烈耶夫寫信給妻子說：「說真的，現在我必須下令制止狂熱分子」。這並不是斯大林的意思）。<sup>34</sup> 斯大林派米高揚到北高加索，但加上烏克蘭，這兩個地區收到的糧食遠遠低於它們在全國的商品糧中通常佔到的三分之二的份額，所以斯大林就把烏拉爾和西伯利亞看作他所謂的「最後的後備」。1月9日，政治局決定把他的兩位高級別同事派出去：維亞切斯拉夫·莫洛托夫被派到烏拉爾，謝爾戈·奧爾忠尼啟則被派到西伯利亞。可是在1月12日，據說奧爾忠尼啟則病了，結果行程取消。<sup>35</sup> 第二天，斯大林召見了農業、供應以及貿易方面的官員。<sup>36</sup> 他決定親自去西伯利亞。<sup>37</sup>

1928年1月，斯大林不是唯一在忙碌的人。在一起令人震驚的事件中，老廣場大街那個最隱秘的地方的一名前高級助手鮑里斯·巴扎諾夫趁邊境守衛還在歡度新年的時候出逃國外（1月1日），成為蘇聯第一位叛逃的重要人物。巴扎諾夫此前由於未能歸還所借的進口體育裝備，已被調出老廣場大街；後來，他又和兩個情婦都有了私生子，還把其中一個說成是「妻子」，用公款帶到國外。他考慮過偷渡到羅馬尼亞、芬蘭或波蘭，後來設法把自己調到土庫曼斯坦的阿什哈巴德，那裏距離比較容易通過的伊朗邊境只有幾英里。年僅27歲的巴扎諾夫為了證明自己的誠意，還帶上了政治局的秘密文件。他在越境時是否得到

過外國情報機關的幫助，尚不清楚，但證據顯示，他剛進入波斯，就有人幫助他翻山越嶺去了印度，又從那裏坐船去了馬賽。只是他的情婦被拋下了，她在準備獨自越過蘇伊邊境時被抓。<sup>38</sup> 巴扎諾夫十幾歲的時候就在自己的家鄉烏克蘭入了黨，22歲時竟然一下子進了組織局。他的叛逃令人難堪——當時這事是瞞着蘇聯公眾的，但表明對於光明未來的夢想，不僅是這一體制的力量源泉，也是其主要弱點：人民會因為自己早先的幻想而變得十分憤怒。從1月2日開始，被稱為阿加別科夫(Agabekov)的亞美尼亞人、蘇聯情報機關東方處處長格奧爾吉·阿魯季諾夫(Georgy Arutyunov)就領導了一個境外追捕小組(直到阿加別科夫自己也叛逃了)。<sup>39</sup> 巴扎諾夫後來受到法國情報機關的反覆盤問，涉及範圍很廣，他為此寫了幾百頁的材料，揭發蘇聯為了削弱西方列強而秘密策劃的各種陰謀以及斯大林政權的內幕。例如，他告訴法國人，斯大林「極其狡猾，非常善於掩飾自己，尤其是非常狠毒」。<sup>40</sup> 不久，巴扎諾夫便在法國發表了一篇揭露文章，文中認為斯大林「在沉默上的天賦很高，就此而言，在一個人人都說得很多的國家是獨一無二的」。<sup>41</sup>

667

巴扎諾夫關於斯大林的說法基本上都是錯誤的，比如他說這位蘇聯領導人「甚麼也不讀，甚麼也不感興趣」，說他「只有一種愛好，絕對的、貪得無厭的愛好，那就是追逐權力」。<sup>42</sup> 斯大林是為革命和俄羅斯國家的權力而生的，這也是促使他重返西伯利亞的原因所在。借助於電報、電話、報紙、電台和共產主義意識形態，他在當時的權力已經遠遠超出了老廣場大街的範圍，但這些手段的影響尚未深入到農村。那種權力也沒有延伸到國外。蘇聯拒絕放棄支持國外的工人運動和民族解放運動，拒絕放棄讓革命走向國際化，從而使得列寧主義的對外關係——與敵人打交道——的核心思想，變成了一種說甚麼就來甚麼的預言，但是，如何從資本主義列強那裏得到先進的工業技術，這在當時仍是一個需要解決的難題。令蘇聯的立場更加糾結的是，1927至1928年全球小麥市場的價格大幅下挫，這種不景氣的狀況也影響到蘇聯的其他出口商品(木材、石油和糖)。同時，雪上加霜的是，國外的關稅還在不斷上漲。<sup>43</sup> 無情的全球政治經濟形勢給所有的初級產品生產者造成的困境在於：蘇聯要得到購買機器所需的硬通貨，就要虧本出售自己的商

品。<sup>44</sup>另外，蘇聯人雖然從奧地利政府和德國政府那裏得到了一些短期和中期貸款，可以購買設備和填補貿易赤字，但他們沒能從巴黎、倫敦甚至柏林那裏獲得長期的資金支持。為了生存，蘇維埃政權竟然要匍匐在國際資產階級面前而不是依靠國際無產階級，這一事實是斯大林無法接受的。就像農民拒絕賣糧一樣，為了扼殺紅色政權，外國資本家至少會拒絕出售先進的技術。

斯大林活在奧格伯烏陰鬱的國內政治情緒報告中。他是按照自己的世界觀去理解那些報告的。其中有很多偷聽到的反政府言論，還有些內容會讓人聯想到蘇聯處於敵對勢力的包圍中，而且國內也到處都是敵人。<sup>45</sup>蘇聯的邊疆地區是可疑的：警方的報告寫道，在烏克蘭、北高加索和南高加索、白俄羅斯以及遠東，「一旦外部形勢變得複雜，我們當中有些人就會成為國外反革命勢力的依靠對象」。<sup>46</sup>沙皇時代的工業專家和軍事專家是可疑的：「蘇維埃政權的垮台是必然的，因為這種制度的根基不牢」，據為警方提供消息的人告知，在紅軍軍需管理局工作、貴族出身並在沙皇時代擔任過空軍少將參謀長的尼古拉·普涅夫斯基(Nikolai Pnevsky)在談到英俄斷交時說。他還認為，「這種破裂是戰爭的序幕，而戰爭會把布爾什維主義徹底消滅掉，因為蘇聯的軍事技術水平低下，同時，戰爭會造成國內政治經濟的困難」。<sup>47</sup>農村是可疑的：「我曾經和許多農民交談過，因此我可以坦率地說，萬一和外國發生衝突，相當一部分農民都不會充滿熱情地保衛蘇維埃政權，據說軍隊也有這種情況」，米哈伊爾·加里寧裝作老農民的樣子告訴政治局。<sup>48</sup>俄國的流亡者報刊刊登了被泄露出去的情報，談到蘇維埃政權內部的秘密運作方式。<sup>49</sup>對斯大林來說，他的核心圈子也變得可疑了。他沒有徵求他們的意見，只憑模糊的想法就在1928年開始了政治生涯中最大的賭博。

## 驚天動地的講話

斯大林要來了。西伯利亞黨組織負責人謝爾蓋·瑟爾采夫迅速行動起來，閃電般地視察了西西伯利亞的糧食主產區——巴爾瑙爾、比斯克、魯布佐夫斯克——以確保官員們做好接待總書記的準備。<sup>50</sup>瑟爾采

夫在斯大林的莫斯科核心機關幹過多年，他在那裏受到過密謀大師班的培訓。兩年前，當斯大林把西伯利亞交給他的時候（取代了季諾維也夫的支持者米哈伊爾·拉舍維奇），他才33歲。1928年1月17日，就在斯大林抵達前的幾個小時，瑟爾采夫指示西伯利亞黨組織通過了一項具體的計劃，落實中央的指示，使用第107條打擊「囤積」糧食的人：西伯利亞秘密警察逮捕富農分子的指標是，當地每個生產糧食的地區都要逮捕四至十名，罪名是「持有大量的糧食儲備，利用食物短缺進行投機倒把，哄抬物價」。「立即行動！」西伯利亞奧格伯烏首腦扎科夫斯基命令道。<sup>51</sup> 1月18日，斯大林與他龐大的助手隊伍，還有他提前派來的官員，一起出現在代表黨的地方局和當地糧食收購人員的大約60名西伯利亞高級官員面前。<sup>52</sup> 他對他們說西伯利亞取得了大豐收，因此要拿出一百多萬噸的糧食運往中部，這樣一來，給西伯利亞自己留下的只有40萬噸。<sup>53</sup> 他還要求他們把各縣負責落實的具體人選定下來，並確保鐵路運輸的通暢——不得有任何藉口。<sup>54</sup> 不出所料，斯大林要求把第107條的適用範圍進一步擴大到任何拒絕出售存糧的人。瑟爾采夫表示，西伯利亞已經（從前一天開始）開展了打擊囤糧的行動。<sup>55</sup> 斯大林對此非常滿意，但為了表現得溫和一點，他把落實該措施的工作從政治警察那裏移交給檢察機關，由檢察機關在當地報刊上解釋政策，並遵照相關法律（*v zakonnom poriadke*），準備採用簡化過的程序公開審判富農，好讓其他農民出售糧食。<sup>56</sup>

在列車漫長的旅途中，斯大林閱讀了助手們搜集的西伯利亞黨組織近幾年出版的一大堆關於當地農村的小冊子和其他資料。<sup>57</sup> 在中途停靠的城市，他讓人找來新出版的報紙，並強調有些報紙，比如斯維爾德洛夫斯克出版的《烏拉爾工人報》，對糧食收購工作「隻字未提」；後來他在秋明發現，當地的《紅旗報》刊登了大量有關糧食收購工作的內容，不過說的都是烏克蘭。奧格伯烏後來在1928年1月的政治情緒報告中，在談到西伯利亞的時候講了許多所謂的富農「鼓動」（「你們想要像1920年那樣，搶走大夥的糧食，但你們不會得逞，牛我們會賣掉一頭兩頭，但糧食我們不會給」）。這份全面的報告還附了一些反蘇維埃的傳單。<sup>58</sup> 在新西伯利亞，斯大林仔細閱讀了《蘇維埃西伯利亞報》在1月份出版的

670 各期報紙，結果發現這份當地最大的報紙，只是在最近才開始關注糧食收購問題。他得出的結論是，西伯利亞黨組織「沒有執行階級路線」。<sup>59</sup>不過，由於瑟爾采夫事先迅速採取的措施，斯大林在離開時似乎對1月18日新西伯利亞的會議印象不錯。<sup>60</sup>在給留在後方老廣場大街幫着看家的中央委員會書記斯坦尼斯拉夫·柯秀爾（他擔任過西伯利亞黨組織負責人）的密碼電報中（1月19日上午8時），斯大林寫道：「對於此次會議的主要印象是：糧食收購開展得太晚了；很難把失去的奪回來；要奪回來，只有依靠強大的壓力和領導技巧；工作人員都在準備靠踏實工作來挽回局面。」<sup>61</sup>

是不是一廂情願？斯大林發了一些威脅性的秘密通告，政策上也作了調整（擴大了懲罰性的第107條的適用範圍），而且還親自出馬（「強大的壓力」），可是給城市和軍隊的糧食會滾滾而來嗎？麻煩的跡象已經顯露出來：新西伯利亞會議的與會者之一、新上任的蘇聯農業銀行西伯利亞支行行長謝爾蓋·查古明尼（Sergei Zagumyonny）居然敢質疑斯大林的權威。查古明尼的口頭反對並不是那天唯一的反對聲音；西伯利亞消費合作聯社主席要求採取巧妙的鼓動，而不是強制。<sup>62</sup>但是在第二天（1月19日），查古明尼覺得還是以書面的形式向斯大林以及瑟爾采夫詳細說明自己的反對意見比較合適。他認為如果富農只因為拒絕出售自己的存糧被抓起來，那中農和貧農就會以為新經濟政策結束了，國家收到的糧食就會更少，這就違背了政策的初衷。「我不想做預言家」，在預言災難之前，查古明尼寫道。他甚至認為自己比包括斯大林在內的上級更瞭解情況：「我對農村非常熟悉，一方面是因為在農村長大，另一方面是因為最近收到了我父親——一個貧農的幾封來信。」<sup>63</sup>斯大林拿起鉛筆，在信中的幾段話下面劃了線，或者添上一些帶有嘲諷的批語（「哈哈」）。現在還不清楚，斯大林當時有沒有充分地意識到，查古明尼的想法其實也是與會的或沒有與會的其他官員共同的想法，但是在1月20日，斯大林決定在更小的範圍內再次對黨的西伯利亞局發表講話。

斯大林先是對透露查古明尼——他沒有獲邀參加這次會議——私人信件的存在及其內容表示歉意，接着他強調說：「前天我建議的那些措施會打擊壟斷市場的富農，那樣就不會出現漫天要價了。而且農

民會明白，價格不會再漲了，必須把糧食拿去賣了，要不然會進監獄……查古明尼同志說這樣做的結果會讓收購的糧食減少。怎麼會那樣呢？」斯大林所理解的「市場」，不是指供給與需求，而是指國家能夠把農民生產的東西弄到手。斯大林說，在烏克蘭，「他們打碎了投機倒把分子的腦袋，然後市場就恢復健康了」。<sup>64</sup>他說自己並不是想要取消新經濟政策，但是又提醒在場的人說，「我們不是資本主義國家，而是社會主義國家，它允許新經濟政策，同時還為國家保留了最終的決定權，所以我們要採取的做法是正確的」。他還說，「用武力論證和用經濟手段論證同樣重要，有時武力甚至更重要，比如說在市場（糧食收購）遭到破壞而且他們想把我們的整個經濟政策轉到資本主義軌道上的時候，而我們不會這樣」。不久，為了進一步反駁查古明尼所說的中農甚至貧農會站在受到打擊的富農一邊的觀點，斯大林和黨的西伯利亞局規定，從公審中沒收的富農糧食中抽出25%分給貧農和「力量單薄的」中農，從而把他們和黨的糧食收購運動結合起來。<sup>65</sup>查古明尼的反對讓政策變本加厲，但起到的積極作用也許更多。通常不會輕易讓人知道自己底牌的斯大林，暴露了內心深處的想法。<sup>66</sup>

671

斯大林突然直截了當地對西伯利亞的官員們說，蘇聯的農業發展走進了死胡同。他講到了貴族階級是如何在革命中被剝奪的，他們的大莊園是如何被分掉的，但大多是分給了小農戶，不能做到專業化，甚麼都種一點，比如糧食和向日葵，也會養幾頭牛。他認為「這種混合經濟，小農戶的混合經濟，對於一個大國來說是一種不幸」，是一個巨大的難題，因為如果說在革命前就有大約1,500萬個體的農民業主 (*edinolichniki*)，那現在這個數字已經達到2,500萬。他們基本上不懂得如何使用機器、科學知識或化肥。<sup>67</sup>「富農的力量是從哪裏來的？」斯大林問道，「不是因為他生來就強大，不是那麼回事，而是因為他的耕作方式是大規模的。」規模大，富農就可以利用機器和現代的方法。「我們能像富農那樣，按照個體農莊的形式，沿着匈牙利、東普魯士和美國等地的大規模農莊和大莊園的道路發展農業嗎？」斯大林問道，「不，我們不能。我們是一個蘇維埃國家，我們要培植集體經濟，而且不單單是在工業領域，還包括農業領域。我們需要走那條道路。」而且，斯大

672

林解釋說，即便蘇維埃政權想要沿着個體業主的大規模富農農莊的道路發展，也行不通，因為「整個蘇維埃制度，我們所有的法律，我們所有的財政措施，所有為農村提供農業設備的措施，現有的一切都是朝着限制個體業主的大規模農業的方向發展的。」蘇維埃制度「在所有方面都翦除了富農，結果我們的農業現在陷入了死胡同」。要走出死胡同，他的結論是，「只剩下發展集體類型的大規模農莊這條路」。準確地說，就是集體農莊，不是小農們採用的合作社：「把農戶的小微農莊聯合成大集體農莊 (*kolkhozy*) …… 對我們來說是唯一的道路。」<sup>68</sup>

唯一的道路——斯大林不是一個喜歡信口開河的人。在1920年代的大部分時間裏，新經濟政策在共產黨內部先後遭到左派反對派和聯合反對派的猛烈抨擊。面對左派的抨擊，斯大林為了維護新經濟政策而鬥爭過。<sup>69</sup>但這些問題不只是在黨的正式會議上一直在討論。許多個夜晚，當斯大林派在下班後到克里姆林宮碰頭的時候——斯大林、莫洛托夫、奧爾忠尼啟則等人沿着伊利英卡街從老廣場大街過來，伏羅希洛夫沿着茲納緬卡街過來——他們就會到某個人在克里姆林宮的家裏集中，經常是伏羅希洛夫家(那是最氣派的)，有時也到斯大林家，並在那裏反覆討論停滯不前的收成和實現農業現代化所急需的措施，敵人多而盟友少，軍隊缺少現代化武器等問題。斯大林派的幾個強硬人物指望他想出一個切實可行的辦法。新經濟政策的困境不僅在於工業增長率似乎太低，讓人懷疑這一政策究竟要實行多長時間才能讓蘇聯成為一個真正的工業國；也不僅在於蘇聯的農業技術水平落後，土地被分成很多小塊，收成不夠用來出口，以換取包括農用機器在內的機器進口所必需的資金；甚至也不僅在於政權對糧食供應和農村的控制力不夠，聽憑農民為所欲為。所有這些問題都很重要，但新經濟政策的困境根本上在於意識形態：實行新經濟政策七年了，社會主義(非資本主義)還遙遙無期。在這個發生了打着社會主義或反資本主義旗號的革命的國家，新經濟政策其實就是勉強被容忍的資本主義。

673 斯大林究竟是在何時得出結論，認為現在到了推動農村走上社會主義道路的時候了，目前還不清楚。加里寧後來在回憶時把政治局1927年成立的、由莫洛托夫領導的集體農莊委員會稱為「思想上的革

命]。<sup>70</sup>但在去西伯利亞之前不久，斯大林在莫斯科黨組織代表會議上說(1927年11月23日)，「實行同多數農民鬧翻的政策也就是在農村中掀起內戰，阻礙我們以農民生產的原料(棉花、甜菜、亞麻、皮革、羊毛等等)供應我國工業，打亂工人階級的農產品供應，破壞我國工業的基礎本身。」<sup>71</sup>實際上，斯大林在新西伯利亞的講話是在反對他自己。有這種看法的並不是只有他一個人。莫斯科黨組織的高級官員、人稱卡爾·鮑曼(Karl Bauman)的拉脫維亞人卡爾利斯·包馬尼斯(Kārlis Baumanis，生於1892年)在莫斯科省組織的同一次會議上(11月27日)也強調，「不可能有兩種社會主義，一種是農村的，一種是城市的」。<sup>72</sup>不過，當時這還沒有被當作官方的政策。不錯，在1927年12月黨的第十五次代表大會臨近結束的時候，開除托洛茨基、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等左派黨籍的決議甚至墨跡未乾，但一項關於「農村工作」的決議還是得到了意味深長的修正：把建立大規模集體農莊確立為黨在農村的基本任務。這項在斯大林的倡議下通過的決議說得很籠統，也沒有時間表。對於該決議的重要性，別說是全國，就連黨內可能也有很多人沒有太在意。在12月14日至1月14日斯大林以中央名義給所有地方黨組織下發的關於糧食收購工作的四則危言聳聽的通告中，也沒有提到大規模集體農莊，而最後一則通告是在他去西伯利亞的前一天才下發的。<sup>73</sup>莫洛托夫和斯大林兩人的辦公室挨在一起，共用一間會議室，最常與總書記見面和交談的就是他，但莫洛托夫給中央的長篇報告(1928年1月25日)講的都是自己到烏拉爾以及在那之前到烏克蘭監督糧食收購的情況，對強制推行全盤集體化隻字未提。<sup>74</sup>而即便是在西伯利亞，斯大林1月20日那天的講話也只有極少數人知道。就連他的西伯利亞之行本身也是保密的，蘇聯的任何報紙都沒有提及此事。<sup>75</sup>但未經公開發表的西伯利亞講話仍然引起了很大的震動。

---

\* 譯註：此處按作者的引文譯出，中文版《斯大林全集》中的相關內容是：「實行同多數農民鬧翻的政策也就是在農村中掀起內戰，阻礙我們以農民生產的原料(棉花、甜菜、亞麻、皮革、羊毛等等)供應我國工業，打亂工人階級的農產品供應，摧毀我國輕工業的基礎，破壞我國的整個建設工作，破壞我們整個國家工業化的計劃。」(第10卷，第220頁)。



差不多18年前的1910年8月，沙皇時代最偉大的官員彼得·斯托雷平曾在西西伯利亞草原來回奔波，有時要從鐵路終點或者有河流的地方騎馬走500英里\*去見農民，而農民也會熱烈地歡迎他。<sup>76</sup> 674 斯托雷平寫信給妻子說：「至少我看到了也學到了無法從文件中瞭解到的東西。」<sup>77</sup> 為了消除他所理解的農民騷亂的根源，這位沙皇的總理鼓勵農民脫離村社，把土地合併成彼此相連的農莊，把這些較大的土地轉變成私人財產。他大膽地改革，目的只為了對俄羅斯實行全盤改造。不過，與歐俄不同，西伯利亞沒有村社，但是，由於（1910年6月14日提出的）把宅地私有化的範圍擴大到西伯利亞的法律未獲通過，斯托雷平擔心他在同一時期鼓勵農民移民到西伯利亞開闢地的計劃，到頭來會把村社制度也移植到那裏。<sup>78</sup> 他還擔心在西伯利亞農民身上發現的強烈的平等主義精神會抵消自己想要灌輸的個人主義的、然而也是威權—君主主義的價值觀。<sup>79</sup> 在公開發表的視察報告中，斯托雷平建議，西伯利亞地區的土地私有權不但應該在事實上，還應該在法律上得到保護。他還強調，西伯利亞需要的不只是小規模農業（那是當時盛行的），還包括「私人佔有更多的土地」。<sup>80</sup> 不過，等到報告發表的時候，斯托雷平已死，他在基輔歌劇院遭人暗殺。

斯大林並沒有打算去斯拉夫哥羅德附近的阿爾泰西北部地區，斯托雷平曾在那裏受到在露天場合的數千名農民的歡迎，1912年，他們還在那裏為他立了一座石頭的方尖碑。<sup>81</sup> 斯大林是不會看到那座碑的，它已經在1918年農民奪取土地的革命中被拆掉了，斯托雷平為了合併農莊所採取的大部分做法也被推翻了，土地被分割成條狀，村社的力量得到了加強。<sup>82</sup> 但是在新經濟政策下，斯托雷平的自耕農又出現了。蘇維埃政權支持向合併農莊的轉變，多片土地輪作可以提高效率，不過，它不支持把合併的農莊變成合法的私有財產。但是，承擔整個蘇聯土地重組工作的只有11,500名土地測量人員和其他技術人員，這不禁令人想到，某種程度上正是因為缺乏人手才阻礙了斯托雷平改革的步伐。<sup>83</sup>

---

\* 編註：約805公里。

以多片土地合併起來的農莊，1922年所佔的耕地不足2%，到1925年是15%，而到1927年則有25%左右。<sup>84</sup>可即便進行了合併，多半也沒有實現機械化，而且不斷有人反映，富裕農民因為有能力賄賂當地的官員，幹的都是對自己有好處的工作。別說是像斯托雷平那樣見到成群結隊的農民了，在西伯利亞，現在還說不好斯大林有沒有見過真正的農民。<sup>85</sup>可以確定的是，斯大林雖然瞧不上斯托雷平，可現在也遇到了他遇到過的挑戰——農村是俄國命運的關鍵，農民被假定為反對現政權的一大政治難題。但斯大林準備推行全然相反的政策：消滅個體自耕農，建立集體勞動、集體所有的農莊。

675

有些學術爭論認為當時不存在對蘇聯的歐洲部分實行集體化的「計劃」，這是沒有抓住問題的要害。<sup>86</sup>不可能存在任何計劃，這是因為要真的實現近乎徹底的集體化，在當時其實是不可想像的。要在佔地球面積六分之一的地方進行集體化？怎樣進行？用甚麼辦法？就連極左的托洛茨基在幾年前的一次講話中也說，農業「向集體化的過渡」是「一兩代人」的事情，「在比較近的階段，我們必須重視小農的個體農業的巨大意義」。<sup>87</sup>到1928年為止，農民們仍然沒有自願加入集體農莊。商貿合作社吸收了約55%的農戶，而生產合作社卻很少。集體農莊在總數中所佔的比例不到1%，平均只吸收15到16戶農民，而且每個集體農莊只有8匹馬和8到10頭牛——經濟規模很小。<sup>88</sup>與此同時，從行政管理上來看，政權在農村只有最低限度的存在：在省會之外，紅旗、標語以及新秩序的各種象徵物都沒有了蹤影，忠誠的工作人員也少得可憐。根據1922年的黨員統計數據，農民中的黨員比例只有0.13%；到了1928年，這一比例翻了一番，但仍然只佔農村居民的0.25%，1.2億農村人口中只有30萬黨員。<sup>89</sup>西伯利亞4,009個村級蘇維埃甚至只有1,331個黨小組（而且遠不是說每個村子都能有一個正常運轉的蘇維埃）。<sup>90</sup>此外，「黨小組」裏面都有些甚麼人，當時也不清楚：西西伯利亞的一個東正教教會蘇維埃公開指責當地的黨小組玩牌、追逐名利；還有一個農村黨小組被人發現在搞降神會，想和馬克思的亡靈交流。<sup>91</sup>這些為了收到最低限度的糧食已經被弄得焦頭爛額的幹部，能夠迫使1.2億農村居民加入集體農莊嗎？

即便在高層，斯大林的全盤集體化計劃就能通過嗎？他要說服的不但有政治局中支持新經濟政策的對手，比如布哈林、托姆斯基和李可夫，甚至還有他自己那一派的親信，因為他們對這樣的計劃仍然覺得不太有把握。當時，斯大林自己也不知道怎樣去實現以及由誰去實現全盤集體化。去做不可能做到的事情還會有「計劃」嗎？不過，斯大林同時也已經得出結論——就像他在新西伯利亞的講話所證明的——不可能做到的事情也必須做到。在他看來，政權已經陷入到某種比剪刀差還要糟糕得多的境地：具有階級基礎的惡性循環。布爾什維克迫切需要農民生產出更多的糧食，但農民打下的糧食越多，他們就越是變成階級敵人，也就是說，變成富農。換言之，只有農民貧窮了，不實行集體化的農村在政治上才沒有威脅，但要是農民貧窮了，他們生產的糧食就不夠養活北方的城市和紅軍，不夠出口。忽視了斯大林集體化中的馬克思主義動機的那些學者，和那些要麼大談沒有「計劃」、要麼認為集體化「必要」的學者一樣，最終都是錯的，其原因就在這裏。<sup>92</sup> 斯大林當時已經把意識形態的一個一個小點聯綴成了一幅完整的、具有階級基礎的邏輯圖景。當然，一切都會是即興之作。但斯大林不會即興實行法治和建立憲政秩序，不會即興賦予農民自由，不會即興限制警察機關的權力。他的即興之作是建設社會主義：強制推行大規模集體農莊，沒有私有財產。我們不但要明白斯大林為甚麼要這樣做，還要明白他是怎麼做的。

### 放逐左派，走向左傾

斯大林是1928年1月15日出發的，而托洛茨基也差不多同時被趕出了莫斯科。<sup>93</sup> 兩人都開始借助對方來定義自己：兩個列寧的門徒，都來自帝國的邊疆地區，卻有着截然不同的才能，一個是書生氣十足，擁有烏克蘭一所大學的學位；另一個在格魯吉亞的正教神學院讀過幾年書，很大程度上是靠自學成才。托洛茨基當時住在一個叫做亞歷山大·別洛博羅多夫(Alexander Beloborodov)的支持者家裏，而此人就是曾經簽署命令處決尼古拉二世的那位布爾什維克，但後來作為反對派成員被開除黨籍(他的心絞痛這時也發作了)。起初，斯大林建議把托

洛茨基流放到南方城市阿斯特拉罕，但托洛茨基反對，因為那裏氣候潮濕，他怕會對他的慢性瘧疾有影響，於是，斯大林就把流放地改成阿爾馬—阿塔，<sup>94</sup>一個省級定居點，在東南部乾燥的哈薩克斯坦。有一種說法，是布哈林打電話將流放地點通知了托洛茨基。<sup>94</sup>另外還有一些說法，說托洛茨基被叫到奧格伯烏，那裏的一位下級官員宣讀了命令：流放國內，出發時間定在1月16日，上車時間是晚上10點。不管怎樣，他開始打包一輩子的政治活動的資料，一共裝了大概20箱。1月15日，一份德國報紙的記者設法採訪了托洛茨基：「走廊和過道裏一堆堆的除了書還是書，那可是革命者的養分。」<sup>95</sup>1月16日，體格粗壯、頭髮幾乎全白的托洛茨基面帶病容，與妻子娜塔莉亞·謝多娃以及兩個兒子一起等候秘密警察。他的長子列夫打算把妻子和孩子留在莫斯科，自己陪父親一起流放，做他的聯絡和外交「人民委員」。<sup>96</sup>

677

約定的時間過了，但奧格伯烏還沒有出現。新近失勢的蘇聯駐法使節、堅決擁護托洛茨基的克里斯季安·拉柯夫斯基突然來到別洛博羅多夫家中，告知有一群人聚集在喀山火車站，他們把托洛茨基的肖像掛在列車的車廂上，而且挑釁似地反覆高呼口號（「托洛茨基萬歲！」）。最後，奧格伯烏打來電話，說出發時間推遲兩天。有趣的是，那位秘密警察搞錯了（把正確的出發日期和時間通知了托洛茨基）。留下看家的斯坦尼斯拉夫·柯秀爾向（正在駛往西伯利亞途中的）斯大林專列發了電報，報告說在1月16日那天有3,000人聚集在莫斯科的車站，還說托洛茨基的妻子病了（謝多娃的確在發燒），他們不得不把放逐托洛茨基的時間推遲兩天。<sup>97</sup>柯秀爾接着又告訴斯大林，「那群人想要扣下列車，高喊『打倒憲兵！』、『打倒猶太人』、『打倒法西斯』」。19人被拘留。「他們打了幾個奧格伯烏特工」，柯秀爾寫道，好像武裝的秘密警察在當時受到了威脅似的。據柯秀爾說，有一名示威者得知要推遲兩天，就號召人們在1月18日那天再次集中。這似乎讓奧格伯烏變得聰明了，因為特工人員在次日（1月17日）早晨就來到別洛博羅多夫家中。感覺上

---

\* 譯註：阿拉木圖。

了當的托洛茨基拒絕讓步，但奧格伯烏給穿着睡衣和拖鞋的他強行穿上皮毛大衣、戴上帽子，迅速把他帶到雅羅斯拉夫爾車站。<sup>98</sup>在給斯大林的密碼電報中，柯秀爾還說：「我們不得不把他抬起來強行帶走，因為他不肯自己走，還把自己反鎖在房間裏，所以不得不把門砸開。」<sup>99</sup>

678

托洛茨基這整件事對斯大林的性格產生了嚴重的影響。有誰真正理解斯大林在這種長期的爭鬥中所經受的一切？在中國政策慘遭失敗之後，他僥倖逃過一劫。可幾個政治局委員不願托洛茨基造成的麻煩，對流放托洛茨基的決定還不太支持，甚至反對。<sup>100</sup>斯大林給柯秀爾的回電很短：「我收到了關於托洛茨基及托洛茨基分子的滑稽表演的電報。」<sup>101</sup>

這一次，柯秀爾和奧格伯烏把車站徹底清空了，所有通道都佈置了裝甲車和帶着機槍的士兵。即便如此，事情也不太順利。「忘不了我在前線在他手下的那些日子」，負責驅逐工作的契卡高級官員格奧爾吉·普羅科菲耶夫在中午喝得醉醺醺的，據說他對一位同情蘇聯的外國記者說，「多好的人哪！我們多麼愛他！他創造了奇蹟，是奇蹟，我告訴你……而且永遠是用言語……每一個字都是一顆炸彈，一顆手榴彈。」但現在，這位曾經叱咤風雲的領導人多可憐。據那位記者說，托洛茨基被一名奧格伯烏軍官雙臂托着，「就像從醫院病床上抱起來的病人。在皮毛大衣下面，他只穿了睡衣和襪子……托洛茨基就像行李一樣被裝上了列車。」<sup>102</sup>單獨一節車廂，載着他和他的家人，還有奧格伯烏的護送人員，駛離了莫斯科。那20箱書和報紙沒有帶走，那裏面有很多絕密的政治局備忘錄。差不多30年前，一個名叫勃朗施坦的青年，在從敖德薩的一座監獄前往流放地西伯利亞的途中，從押送囚犯的列車車廂裏，第一次見到了莫斯科。現在，他也是從押送囚犯的列車上，最後看了一眼莫斯科。<sup>103</sup>托洛茨基很快就到了中亞鐵路線的最後一站——吉爾吉斯斯坦的伏龍芝市（比什凱克）；難以置信的是，裝着他的書籍甚至還有檔案的箱子又和他會合了。一輛汽車帶着他們還有行李，翻越雪山，走完了最後的150英里，\* 在1月25日的下午3時到達

---

\* 編註：約241公里。

了阿爾馬—阿塔。他和家人被安頓在果戈理大街的七條河旅店——也沒別的地方。<sup>104</sup>

被放逐的不只是托洛茨基。1月20日，即斯大林突然向西伯利亞的高級官員吐露其集體化想法的那天，蘇聯報紙刊登了一則佈告，宣佈把幾十名反對派成員從莫斯科流放到國內其他地方。斯大林將這些「左派空談家和神經衰弱者」——按照他喜歡的說法——分別趕到了東部（烏拉爾斯克、謝米帕拉京斯克、納雷姆、托博爾斯克、巴爾瑙爾）、北方（阿爾漢格爾斯克）或南方（阿斯特拉罕、亞美尼亞）。<sup>105</sup>已經到了西伯利亞托博爾斯克的拉狄克，給托洛茨基寄了一封信，那是托洛茨基在阿爾馬—阿塔收到的第一封信。<sup>106</sup>斯大林起初沒有阻止托洛茨基分子的內部通信，因為秘密警察已經作了徹底的檢查，他可以看到通信的內容。托洛茨基在給拉狄克回信時提了一些建議：「我強烈要求你不管怎樣一定要採取合適的生活方式來保護你自己。我們依然有很大、很大的用場。」<sup>107</sup>1928年的時候，托洛茨基還不知道自己的著述將會為人們瞭解斯大林提供巨大的幫助，會對人們關於這位專政者的看法產生深刻而全面的影響。他也不知道斯大林將會在他的身上發現特別陰險的「用場」。在斯大林的內心中，托洛茨基佔據了很大的空間，而且斯大林最終會在蘇聯的政治想像中，把托洛茨基放大為萬惡之源。與此同時，剛剛驅逐了黨內「左派空談家和神經衰弱者」長期以來的領導人，斯大林就在西伯利亞開始讓黨和國家強行左轉了。

679

### 負責監督的共產黨

斯大林及其隨從人員在西伯利亞到處視察。1月20日在新西伯利亞發表了令人震驚的講話之後的第二天，也就是列寧去世四週年的紀念日，同時也是國家的法定假日，他出發前往巴爾瑙爾——一座以開採銀礦為主的小城，位於通往阿爾泰山區的幾條道路的交匯處，最初由農奴建成，以滿足帝俄的軍事需要。夏季，嚴酷的大陸性氣候從亞洲沙漠地區吹來的風炎熱而乾燥，而在漫長的冬季，從北極地區吹來的風寒冷而潮濕，積雪能超過人的身高。可那裏的土壤，哎喲，是黑色或栗褐

色的，這讓它成了俄國農民的天堂。<sup>108</sup> 1月22日，巴爾瑙爾官方組織了一大批人到站台去迎接斯大林和瑟爾采夫。（奧格伯烏的扎科夫斯基也來了，他是在斯大林到地方視察時負責安全的。）車站前的廣場停滿了帶有木筐的雪橇。據一位目擊者回憶，給斯大林準備的雪橇「墊了一張熊皮和一件大衣，那樣，這位領導人就不會凍着了」。拉雪橇的馬名叫「馬拉」（以那位法國革命者的名字命名），趕雪橇的是當地奧格伯烏的指揮官，他後來成了一名獲獎的劊子手。<sup>109</sup> 斯大林答應了合影的請求，但不允許舉行宴會。他在講話中承認，糧食收購危機的「原因之一」，在於「（同反對派的）爭論分散了我們的注意力，還有在代表大會上輕鬆獲得的勝利和那些會後回家的同志過節一般的心情」。但他到那裏並不是要讓人找藉口的。他毫不理會地方上流行的對收購的糧食數量不足各種解釋——嚴重的暴風雪、缺乏可以出售的製造品、大概收成不好——而是堅持認為，「原因在我們自身，在我們的組織」。「我們晚了，同志們，」他溫和地責備那些官員，「有些工作人員甚至覺得奇怪：『怎麼回事，』他們說，『我們運了許多糧食出去，而在莫斯科，他們還在叫喚。』……在目標面前，不允許有任何藉口和退縮！……對此，要用布爾什維克的方式施加壓力（鼓掌）。」<sup>110</sup>

在斯大林講完後，瑟爾采夫又作了補充：「中農」在1928年1月的糧食銷售中所佔的比例，與上一年相比從60%下降到30%。換句話說，囤積糧食的不單是富農。斯大林之所以要逮捕富農，就是要向中農傳遞一種信號：囤積糧食是不會被容忍的。<sup>111</sup> 第二天，在另一個縣的縣治所在地魯布佐夫斯克——謝米帕拉京斯克的官員們也被叫到那裏——斯大林的到來激起了熱烈的掌聲，對此，他回應說：「你們這些優秀的西伯利亞人，你們有能力整齊一致地鼓掌，但你們沒有能力做好工作！」<sup>112</sup> 據一位參加會議的人說，會後，斯大林喝了一些家釀的白蘭地，理由顯而易見，天氣太冷。這位參加會議的人還說，雖然「風雪很大」，斯大林還是「願意步行」回到他那輛戒備森嚴的專列。他是在專列上過的夜。<sup>113</sup>

這位蘇聯專政者的視察，目的不是要弄清事實，而是要解釋採取強制措施的根據並確保落實那些措施，但西伯利亞之行實際上也有一些

意外的發現。比如，他發現富農似乎要比他原先理解的強大得多。沒關係，農民的財富是周期性的，幾代人過後，很少有家庭還能保持富裕從而形成一個明顯的資本家階級，再說，富農在任何時候都有。西伯利亞農村是富裕的農業區之一，那裏「資本的進攻」曾經是托洛茨基分子的心病。瑟爾采夫以前並沒有重視這樣的說法，認為那是「歇斯底里的叫嚷」，但他委託進行的反向研究(counterstudy)表明，農業機械和信貸都掌握在富裕農民的手裏。<sup>114</sup>現在，斯大林獲得第一手證據，證明了這一點。此外，他還瞭解到，西伯利亞黨組織非但沒有和這些新的動向作鬥爭，反而與其同流合污，而這一點也曾是左派反對派所擔心的。流放到巴爾瑙爾的左派反對派、記者列夫·索斯諾夫斯基(Lev Sosnovsky)寫信給身處哈薩克斯坦的托洛茨基，告訴他斯大林秘密視察西伯利亞的消息(這封信後來被偷偷地帶到境外，發表在國外流亡者的報刊上，它是當時唯一公開確認斯大林視察西伯利亞的文件)。索斯諾夫斯基最後說，西伯利亞的黨的機關「不能勝任這項採取新辦法的任務」(對農民採取強制措施)。<sup>115</sup>西伯利亞的共產黨員有一半是在1924年之後實行新經濟政策期間入的黨，並且有三分之一仍在務農——這一比例相當驚人；西伯利亞黨組織的領導層甚至認為工業化要服務於農業的需要，並要求把農具、糧食儲藏和食品加工放在優先地位。<sup>116</sup>說來也怪，在放逐了托洛茨基分子之後，斯大林發現，自己的難題並不在於少數的反對派分子，而在於全黨。<sup>117</sup>

681

西伯利亞的機關因為酗酒早就臭名遠揚。「酗酒成了日常現象，他們和妓女一起喝得醉醺醺的，然後坐上車揚長而去，就連黨的基層人員也是如此，」扎科夫斯基在西伯利亞奧格伯烏內部的黨支部會議上說，並強調他在莫斯科的上級已經向他指出了這一點。扎科夫斯基本人也喜歡這種奢靡的享樂生活，他同時擁有多個情婦，而且幾乎離不開酒。他的結論是，「喝酒可以，但只能在契卡人員的小圈子裏，不能在公共場合」(大概還包括帶着妓女，坐着罕見因而很容易認出的汽車兜風)。<sup>118</sup>不過，斯大林之所以責備他們，並不是因為酗酒。「難道你們怕擾亂富農老爺的安寧嗎？」他用威脅的口氣向西伯利亞的官員們問道。<sup>119</sup>他發現，西伯利亞的許多工作人員都「住在富農的家裏，在富農家裏做食



客」，因為，他們告訴他，「富農的住宅乾淨些，吃得好些」。<sup>120</sup> 農村的黨的官員一心想着娶富農的女兒。這樣的傳聞激起了斯大林的階級感情：蘇維埃官員在物質上，因而——照他的馬克思主義眼光看來——也在政治上，正在變得越來越依賴於農村的富人。

斯大林希望通過自己採取的措施，激起所謂農村中普遍存在並且越來越嚴重的階級對立。「如果我們發出信號，增加壓力並向富農發動進攻，（農民群眾）對於這件事就會十分熱情」，在西伯利亞視察期間，他私下裏對瑟爾采夫說。<sup>121</sup> 表面上，他的強制措施的確像是成功了。早在1月24日，西伯利亞就按照第107條在巴爾瑙爾縣進行了首次公審（對象是三個富農），並在第二天的報紙上作了廣泛的報道。<sup>122</sup> 在有可能是最轟動的一起案件中，魯布佐夫斯克縣的富農捷爾洛夫（Теплов），  
682 一個大家庭的七十多歲的家長，據說擁有3處住宅、5座穀倉、50匹馬、23頭牛、108隻羊和12頭豬，同時還「囤積」了242噸糧食。「蘇維埃政權不賣給我機器，我憑甚麼要把糧食賣給他們，」有人引用他的話說，「要是他們願意賣給我一台好的拖拉機，那就是另一回事了。」捷爾洛夫被判了11個月並失去了213噸糧食；剩下的大多是霉爛的。<sup>123</sup> 在1928年1月和2月，西伯利亞受到審判的富農總共有差不多1,400人。報紙的報道千篇一律，總是說旁聽的農民擠滿了法庭。<sup>124</sup> 當局從這些被判有罪的農民那裏只沒收到12,000噸糧食（不到那年該地區糧食收購量的1%），但在當時，這一情況並未公開。<sup>125</sup> 與此同時，西伯利亞檢察機關還拖拖拉拉，對扎科夫斯基根據第58條（反革命罪）——處罰要比犯下投機倒把罪嚴厲得多——要求逮捕的監視名單上的人，即前沙皇軍官和國內戰爭中的白軍，多數都沒有批准。<sup>126</sup> 當斯大林還在西西伯利亞的時候，當地黨組織的刊物《走在列寧主義道路上》承認，司法機關成員不僅「缺乏熱情」，甚至還出現了「抗議浪潮」，反對黨要求把第107條擴大到種糧農民的指示，認為那違反了蘇維埃法律。據說斯大林的回答是，「不能把布爾什維克寫的法律拿來反對蘇維埃政權」。<sup>127</sup>

\* 譯註：《斯大林全集》第11卷，第4-5頁。

當然，斯大林想要做的遠不只是動用第107條。他當時對新經濟政策的命運依然抱着非常謹慎的態度。當有人問及此事時，他堅持說會繼續下去，這讓大家鬆了口氣。但參加談話的那些人沒有意識到，他其實已經回到對新經濟政策的最初的提法，認為那是暫時的退卻，結合了社會主義的進攻。將第107條的適用問題的分歧公開化的同一期《走在列寧主義道路上》(1928年1月31日)寫道，「小規模的分散的個體農莊，按其本性來說是反動的。要想在這一基礎上進一步發展我國的生產力是不可能的，而這對我們來說又是絕對必要的」。社論的結論是：「農村要向大規模的集體農業前進。」<sup>128</sup>這也許是蘇聯第一篇提到即將展開的重大轉折的社論。

但是，如果西伯利亞黨組織連沒收富農的糧食都做不到，那它又怎麼能夠實行農村向全盤社會主義的過渡呢？西伯利亞黨組織的掌權者們確實上演了一齣聲勢浩大的動員秀，他們報告說，在1928年1至3月召開的「貧農」代表會議共計達到驚人的12,000次(參加會議的估計有382,600人)。<sup>129</sup>這一切的高潮是，1928年3月1日在新西伯利亞召開了有史以來的首次西伯利亞「貧農」代表會議，與會代表102人，而且全聯盟都作了報道。「我們要向農村的所有人表明，」《真理報》援引一名代表的話說，「富農是大肆聚斂糧食的壞傢伙，是國家的敵人」。<sup>130</sup>但是在前線，在西伯利亞的縣級黨組織當中，黨的官員命令，為了加快糧食收購的進展而成立的新「三人小組」只能在黨的辦公場所辦公，要避免暴露自己的存在，「以免引起居民和部分基層黨員的誤解」。<sup>131</sup>斯大林想讓嚴厲的強制措施引起廣泛的注意，而農村地區的黨組織則想要瞞着。

683

對於進行一場新的革命的質疑，在瑟爾采夫身上表現得最為突出。在鄂木斯克黨的會議之後，他送走斯大林就回到了新西伯利亞的西西伯利亞總部。1月31日，他在那裏向西伯利亞黨組織重申了斯大林作出的保證，說不會取消新經濟政策。<sup>132</sup>瑟爾采夫決不是主張自由化——內戰期間，在自己的家鄉烏克蘭血腥驅逐哥薩克的過程中，他是衝在前面的——但他認為，集體化只適合靠個人力量無法生活的不幸的貧農。在斯大林視察的前一年，一次有關農村議題的代表會議上，瑟爾采夫勸告：「對中農、殷實的農莊和富裕的農民，我們要說，『發家致富吧，祝你

們好運」。]<sup>133</sup> 即便是在斯大林視察過後，瑟爾采夫仍然認為個體農民的成功對於國家是有好處的。就像他後來在1928年3月西伯利亞地區的另一次黨的大會上對黨員們說的，「蜘蛛在吸蒼蠅血的時候，他也在努力工作」。<sup>134</sup> 這是在為富農辯護，而且是出自斯大林的門徒之口。有這種想法的並不只是瑟爾采夫。西伯利亞另一位高級官員、出身貧苦農民家庭、早年在內戰時的糧食收購人民委員部工作的拉脫維亞人羅伯特·埃赫 (Roberts Eihe, 生於1890年) 早在1927年的一次地區黨代表會議上就表達過瑟爾采夫的那種觀點 (「那些同志擔心富農，認為毀掉殷實的農莊，我們就可以加快社會主義建設步伐的觀點……是非常錯誤的」)。<sup>135</sup> 可現在，埃赫也開始附和斯大林的解釋，大談富農到處都在搞破壞。埃赫那樣的官員還會向上升，因為他們不僅對人民流血無動於衷，而且能見風使舵。事實上，埃赫很快就取代瑟爾采夫，成了西伯利亞黨組織的首腦。扎科夫斯基的輝煌事業也會更進一步。<sup>136</sup> 旺盛的野心再摻上野獸一般的恐懼，將成為斯大林手中可怕的工具。不過，要實現蘇聯歐亞地區的整體改造，需要的遠不只是抱着投機心理的高級官員。

684 當斯大林從巴爾瑙爾和魯布佐夫斯克一路到達鄂木斯克，然後又折向東，前往克拉斯諾亞爾斯克的時候 (提建議的是瑟爾采夫，但陪同的是埃赫)，他給莫斯科打電報說的仍然是在當前目標上取得的進展 (「收購工作已經有了生氣。1月底、2月初的時候應該會有重大突破」)。但他沒有像以前那樣，表揚當地官員的認真態度，而是強調自己如何「讓大家按照應有的樣子鼓足幹勁」。<sup>137</sup> 在克拉斯諾亞爾斯克，1月31日深夜，他在這個區的秘密警察大樓會見了從東西伯利亞各地召來的黨內高級官員。斯大林勉勵他們要搞好糧食收購，但也明確地將「約束富農」的必要性與「資本主義包圍」聯繫起來，並說「未來的戰爭有可能突然爆發，它將是長期的，因而需要龐大的軍隊」。會見大約在2月1日早晨6點結束。斯大林打電報給 (仍在北高加索的) 米高揚，把西伯利亞2月份的糧食收購指標從23.5萬噸提高到32.5萬噸。「這會促進收購，」他寫道，「而現在這樣做是必要的。」<sup>138</sup> 2月2日，斯大林向莫斯科方向出發。<sup>139</sup> 第二天，克拉斯諾亞爾斯克的報紙號召民眾「打擊富農」。<sup>140</sup> 在

他回到首都之前，西伯利亞的「糧食工作三人小組」就已經把他們在2月份的指標提高到40萬噸。不過當時還不能確定，斯大林走了之後當地的情況會怎樣。結果，該地區2月份收購的糧食是1月份的1.5倍，但不是40萬噸。3月份的指標後來定在37.5萬噸，但西伯利亞的官員覺得，一個月只能交出21.7萬噸。<sup>141</sup>

1928年2月6日，經過三個星期的旅程，斯大林返回莫斯科。回到老廣場大街後，他不但可以從黨內的渠道，還可以從秘密警察的報告中瞭解自己此行的反響。比如，2月10日奧格伯烏送來的政治情緒報告就帶來了不好的消息：在西伯利亞「許多區的黨員對加強糧食收購的措施的認同情況，與其他廣大農民幾乎沒甚麼兩樣」。那些拒絕轉向強制措施的人的名字，一個縣一個縣地被列了出來，而且還引述了某些人的話，大意是說，反對派是對的，中央正在把國家引向危機。<sup>142</sup> 2月13日，斯大林從老廣場大街給全聯盟各個黨組織又下發了一則秘密通告，承認「我們的糧食收購發生了極嚴重的危機」，<sup>\*</sup>但也聲稱，黨忽視了「同富農和富農危險作鬥爭」，結果黨內出現了很多想要「同富農和睦相處」的人。他把他們稱作帶引號的「共產黨員」，而這可不是甚麼好兆頭。他要求他們做工作「不是為了應付差事，而是為了革命」，要求黨的高層領導「在收購運動的進程中檢查並堅決清洗黨的、蘇維埃的和合作社的組織，把異己分子和混進來的驅逐出去，以堅定的黨員和經過審查的非黨工作人員代替他們」。<sup>143†</sup> 但是，如果新經濟政策中的資本主義因素和富農對黨的影響那麼大，那可靠的幹部從何而來？

685

讓政權更為困惑的是，事實證明農村的衝突並不是以階級為基礎，而是基本上以代際和性別為基礎；政權指責說，它所謂的中農甚至貧農都聽從富農的「擺佈」，同樣也間接地承認了這一點。<sup>144</sup> 農村中較大規模的「階級鬥爭」，看來需要由外人來強行發動。與斯大林的西伯利亞之行有聯繫的一件事情是，當時已經動員了100名莫斯科和列寧格勒工人黨員中的積極分子，到西伯利亞加強對富農的搜查。在全聯盟範

\* 譯註：《斯大林全集》第11卷，第11頁。

† 譯註：《斯大林全集》第11卷，第11-18頁。

園內，斯大林很快就動員了約4,000名來自城市的省級和縣級黨的官員——「最堅定和最有經驗的布爾什維克」——以及2.6萬名最基層的「積極分子」投入糧食收購工作。<sup>145</sup> 那些被派去的人在地方上也找了一些積極分子。出生於敖德薩並從列寧格勒搬到西伯利亞的共青團積極分子兼記者奧列格·巴拉巴舍夫(Barabashev Oleg, 生於1904年)，在(他主編的)《西伯利亞報》上寫道，「斯大林說得對，黨為打倒富農的口號做好了準備」。巴拉巴舍夫指的是工人出身的黨員。在觀察了鄂木斯克附近一個鐵路交匯點的黨支部會議後，他在文章中談到工人階級在面臨物資短缺和物價上漲時的擔憂，談到他們渴望看到逮捕「投機倒把的富農分子」。<sup>146</sup> 巴拉巴舍夫本來還可以指出，當時存在對沙皇時代的工程師和專家們的刻骨仇恨，他們依然享有明顯的特權和權力。對斯大林而言，事實證明，滿足這些怨恨心理的想法是難以抗拒的，而那些反對他政策的人是無法阻止他的。

### 李可夫左右為難

管理政府日常事務的阿列克謝·李可夫沒有出去到某個地區強行收購糧食。(托姆斯基和布哈林也沒有。)對於新經濟政策，他認為雖然有不足，但要好過破壞穩定的那種選項。李可夫(生於1881年)祖上是農民，俄羅斯族人，來自薩拉托夫，斯托雷平曾做過那裏的省長。他是一個堅定的布爾什維克，並且得到了列寧留下的職位——人民委員會主席。(奇怪的是，李可夫沒能像列寧那樣在喀山大學完成學業並拿到法律學位。)<sup>147</sup> 李可夫的年齡和斯大林差不多，兩人住在克里姆林宮的同一棟樓裏，但實際上沒有甚麼交往。在與反對派的內鬥中，李可夫從來沒有動搖過，但他雖然贊成斯大林為了填滿國家的糧庫而採取強制措施，卻震驚於斯大林在視察了西伯利亞之後仍然想要堅持「非常狀態」。<sup>148</sup> 不管怎麼說，托洛茨基和聯合反對派剛被清除，難道斯大林現在就要實行他們的綱領嗎？<sup>149</sup> 在主張取消強制措施方面，李可夫可以指出，斯大林自己的有力舉措已經避免了當前的危機：實際上，2月的收購量在當時是單月最高的(190萬噸)，1927至1928年度的收成的總

收購量因而一下子超過了上年。李可夫同樣也反對古比雪夫堅持的越來越不切實際的工業化目標。1928年3月7日，莫洛托夫受斯大林指使，在政治局會議上指責李可夫，說他1927至1928年度的工業和財政計劃草案決心不夠。之後，李可夫仿照斯大林的做法，給斯大林、莫洛托夫和布哈林送去了辭職信。就像斯大林之前要求把自己派到曾經流放過的西伯利亞荒涼的圖魯漢斯克一樣，李可夫要求調到烏拉爾。同一天，為了表示自己是認真的，李可夫還送去了第二封信。<sup>150</sup>

斯大林沒有為了給自己除掉一個表面上的潛在競爭對手而急於接受李可夫的辭呈。他當時非常倚重李可夫，特別是在經濟管理上，而經濟管理可不是小事。於是，斯大林就像李可夫為他做過的那樣，努力安撫這位政府首腦。「人不能像那樣擺出問題：我們需要聚一聚，喝點酒，敞開心扉談一談，」他在回覆李可夫的辭職信時寫道，「那樣我們就會化解所有的誤會。」不但是布哈林，就連莫洛托夫也覺得李可夫不能辭職。看來李可夫是贏了。<sup>151</sup> 在作出重大的經濟決定，尤其是和工業及預算有關的重大決定時，他的權威不會再受到輕視了，要不然，他們就得另請高明，來挑起首席執政的重擔。不過李可夫在政治上的弱點很多，首要的情況是，他的投票陣營當中的關鍵人物布哈林這個人既不強悍也不敏銳，最後是斯大林有許多辦法盯緊並且制約李可夫，而李可夫除了以辭職相威脅，沒有任何有效的手段可以對付斯大林。

政治局雖說有決策權，但委員們誰也沒有辦法保證斯大林會執行它的正式決定（而不是執行其他的決定）。在兩次會議之間，大部分重大事務形式上都由斯大林負責，比如監督所有黨組織和國家機構；實踐當中，由於蘇維埃政權的權力佈局、溝通體制和高度保密的特點，他的特權實際上要廣泛得多。<sup>152</sup> 米高揚講過1920年代末的一件事，當時他因為處理問題的方式同斯大林爭辯起來：政治局支持斯大林的立場，不過，政治局的決定並沒有得到落實，而這顯然是因為斯大林改了主意；但政治局從來沒有取消那項正式決定。<sup>153</sup> 還有一次，高加索發生暴亂，持續了幾個星期，而斯大林直到暴亂鎮壓下去之後才把事情告訴李可夫。<sup>154</sup> 斯大林掌握了所有的官方渠道和現有的非正規信息來源，儘管他的工作人員執行的常常不是正式規定的任務。<sup>155</sup> 沒有其他人能夠說

清楚，有哪些材料中央收到或收集到了但政治局委員們又沒有看到，或者是以中央的名義給政府各部門下達過甚麼樣的指示。最重要的是，對於其他高層官員，只有斯大林一個人有辦法為了他們自身的「安全」而對其進行秘密監視並讓他們的下屬檢舉揭發，因為，只有他一個人可以用中央的名義與奧格伯烏聯繫。

### 名叫「礦井」(沙赫特)的小城

李可夫辭職遭拒才過三天，1928年3月10日，警察機關就傳來爆炸性的消息。當時《真理報》在頭版一篇未署名的社論中吹噓，奧格伯烏如何揭露了一起由沙皇時代培養起來的「資產階級專家」策劃的反革命陰謀，這些專家據說是在為現在生活在國外的革命前的「資本家」礦主工作，目的是破壞蘇維埃政權和復辟資本主義。<sup>156</sup> 他們的所謂破壞活動發生在一個擁有33,000人口，名為沙赫特或「礦井」的礦業小城。<sup>157</sup> 但沙赫特煤礦毗鄰烏克蘭具有重要戰略價值的頓涅茨克盆地，而且「調查」會牽扯到烏克蘭甚至莫斯科經濟部門的高官，還有與德國的關係。李可夫在《真理報》上的一篇總結沙赫特事件的文章中(3月11日)，支持所有的指控，但他也發出警告，反對對專家過分的「折磨」。他還寫道，「糧食危機問題已經不在議事日程中了」。可是對斯大林來說，沙赫特事件和在農村的「非常狀態」是一個整體。他要發動一場新的轟轟烈烈的階級鬥爭，以擴大政權的社會基礎和他自己的政治影響，加快工業化的步伐，實現農業的集體化。關於沙赫特事件起源的報告呈給了斯大林。他當時正在索契，在俯瞰黑海的懸崖上——那是他放鬆的地方，陪伴他的是裝滿了絕密文件的文件袋和男性服務人員。斯大林在那裏看到了長期擔任北高加索奧格伯烏首腦的葉菲姆·葉夫多基莫夫(Yefim Yevdokimov)，他在專政者一年一度到南方小住期間負責他的安全。這是一個令人垂涎的好機會。

葉夫多基莫夫是個現象級的人物。他(1891)出生在哈薩克草原上的一個小城，小城有兩座教堂和一座清真寺，他的農民父親就在那裏的沙皇軍隊中服役，但他是在西伯利亞的赤塔長大的，他在那裏完成了五

年的小學教育。接着，他成了一個無政府主義的工團主義者，然後又到了莫斯科，在那裏參加了1917年秋天曠日持久的革命性政變。第二年，在政權將首都遷到莫斯科後，葉夫多基莫夫加入了布爾什維克和紅軍。1919年夏天，捷爾任斯基派他負責警察機關在紅軍中的所有特別部。葉夫多基莫夫很快被派到內戰中的烏克蘭，在那裏他因為對白衛分子的屠殺而出了名。在他的送別宴會上，接替葉夫多基莫夫的弗謝沃羅德·巴利茨基在敬酒時稱他是「共和國秘密部門的頭號特工」，並給他頒發了他的第二枚紅旗勳章，以表彰「與匪幫的勇猛戰鬥」。<sup>158</sup> 葉夫多基莫夫稱讚在場的人是一部「組織得很好的機器」，稱自己僅僅是「這部機器的槓桿，控制着它的運轉」。在1923年調到遼闊的北高加索邊疆區的時候，葉夫多基莫夫還把他的一幫兄弟也帶到了羅斯托夫，那些人把他當作仁慈的教父或哥薩克首領(阿特曼)一樣崇拜。<sup>159</sup> 與在後方的盧比揚卡總部處理案頭工作不同，在北高加索，內戰從來沒有結束，因此，葉夫多基莫夫需要同崇山峻嶺中的「土匪」進行無情的、極其殘暴的較量。通過「大規模行動」在車臣收繳了約2萬支步槍，在印古什和奧塞梯收繳的槍數量相似，在卡拉恰伊一切爾克斯和巴爾卡爾—卡巴爾達收繳了1.2萬餘支槍。在這之後，葉夫多基莫夫寫信給亞戈達說，「這裏的人武裝到了牙齒而且非常愚昧」。<sup>160</sup> 北高加索培養了一代格伯烏特工和大批邊境守衛隊，他們防止平民暴動的本領十分驚人。

早在1927年夏天，葉夫多基莫夫就給在索契的斯大林帶過一份禮物。斯大林「像往常一樣，問我情況怎麼樣」，葉夫多基莫夫後來在莫斯科的一次大型會議上回憶說，「我跟他詳細講述了這起事件」——弗拉季高加索市傳說中的「反革命陰謀」。「他聽得非常仔細並且問了幾個細節問題。在談話結束時，我是這樣說的：『對我來說，很顯然，我們是在和一些蓄意破壞生產的人打交道，但我還沒有搞清楚他們的首領是誰。要麼是〔幾個外國的〕總參謀部，尤其是波蘭的總參謀部，要麼是過去擁有這些企業並且能夠從破壞生產中獲益的公司，即比利時人的公司。』」據葉夫多基莫夫說，斯大林「對我說，『到你調查結束的時候，把材料交到中央』」——意思是通過奧格伯烏的正常渠道。「我回去後就把下流社會的那幫人(*bratva*)——請原諒我的這個說法——也就是同志



們(笑聲)召集起來，下令開始行動。」<sup>161</sup> 在和斯大林有過幾次面對面的會議之後，葉夫多基莫夫倍受鼓舞，他把內戰時期生活在高加索境內的79名「白衛分子」的臉部照片編成相冊，送給當地黨組織的首腦，要求允許清算他們——不是因為他們做過的，而是因為他們有可能做的。「消滅他們非常重要」，葉夫多基莫夫在給這位黨的首腦的信中寫道，因為萬一發生國際衝突，他們就可能充當「反對我們的實際力量」。<sup>162</sup> 葉夫多基莫夫以相冊的方式執行快速處決以絕後患的辦法是一種創新。他得到了此前幾乎沒有人得到過的第三枚紅旗勳章。在此期間，1918年斯大林曾發現過由「階級異己分子」策劃的反革命陰謀並處死了大約二十多名「間諜」和「破壞分子」的城市察里津，被更名為斯大林格勒。

葉夫多基莫夫捏造的弗拉季高加索事件沒有成功，但他把另一起事件，即煤炭小城沙赫特事件交給了斯大林。這一事件起源於1927年的戰爭恐慌，當時奧格伯烏對一些工業事故進行了複查，想看看有沒有可能是故意破壞。這次得到了一些「坦白材料」。<sup>163</sup> 沙赫特事件的材料在斯大林從西伯利亞回去後不久就到了他的手裏，這些材料證實了他的懷疑，即富農正在變得猖狂起來，而農村的共產黨人與階級敵人睡一張床。<sup>164</sup> 1928年3月2日，在他收到帶有亞戈達附函的沙赫特事件長篇報告的同一天，這位專政者接待了葉夫多基莫夫，亞戈達也在場。<sup>165</sup> 3月8日，政治局批准進行公審。<sup>166</sup> 第二天，政治局的一個小組審查了起訴書的草案，並對其作了徹底的修改(該文件的大部分內容都被劃掉了)，改動了日期和其他所謂的事實。在公開宣佈提出指控後，蘇聯總檢察長尼古拉·克雷連柯被派到俄羅斯社會主義聯邦蘇維埃共和國的第三大城市羅斯托夫，以及烏克蘭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首府哈爾科夫，並且要在一個月內完成所有的工作。<sup>167</sup> 政權選定了53名被告，他們多數(35人)都是在革命前培養出來的採礦工程師；其他的是一些機修工或電工。為了達到最大的效果，審判奉命從頓涅茨克礦區轉移到莫斯科。

沙赫特事件把事實、捏造以及歪曲的法律攪和在一起。對沙赫特黨組織的調查發現，它對於工業生產(它的主要任務)漫不經心，卻把精力放在頓河(俄羅斯族人)和庫班(烏克蘭族人)兩派之間的內訌上——庫班一派佔了上風。<sup>168</sup> 不過，截止到1927至1928年，總部設在烏

克蘭首府的頓涅茨克煤炭托拉斯仍然開採了250萬噸煤，超過了1913年的水平，顯然已經從內戰造成的崩潰中恢復過來。在全聯盟的煤炭產量中，機械化開採的數量只有15.8%，但是在沙赫特—頓涅茨克地區，該比例卻達到45%。要不是因為工人以及熟練的工程師和管理人員，就不可能取得這些重要的成就。與此同時，昂貴的進口設備常常使用不當，這其中部分是因為它不太適合現有的工藝，或者是因為缺少熟練的安裝和操作人員。片面追求煤炭產量，再加上管理不善，意味着違反安全程序、礦井佈置不當、透水和爆炸。沙赫特事件的一些被告承認，存在壓低工人工資和提高工作定額的情況——這是政權的政策——而且事情和從前的礦主有關：蘇維埃政權招募了僑居在外的他們，把他們的財產又回租給他們，讓他們重振旗鼓。一名受到指控的採礦工程師承認為了炸毀礦井而收了「外國的資金」，但他說的那口礦井（諾沃—阿佐夫）在1921年就按照煤炭托拉斯的指示炸毀了，因為當時的煤炭托拉斯能力不足，無法讓所有的礦井都恢復生產，於是就出於安全考慮封掉了一些。流言蜚語增加了指控的可信度。波蘭大使相信，德國專家是在為德國從事間諜活動（搜集情報），儘管不是搞破壞，但立陶宛大使告訴德國同行，一個由波蘭資助的龐大的組織在沙赫特附近進行了破壞活動。<sup>169</sup>

按照蘇聯的法律，破壞活動不一定必須是故意的：如果某人的指示或行動造成了事故，那就可以假定他帶有反革命目的。<sup>170</sup>但是政權斷定沙赫特事件是有意的，這就意味着奧格伯烏必須讓被告坦白交代。為了完成這項艱巨的任務，秘密警察使用的手段包括將被告單獨關在冰冷的屋子裏，連續幾夜不讓睡覺（連軸轉的「審訊」），以及承諾會從輕判罰。結果催生了滑稽的原地打轉：有個被告甚麼都交代了，在向自己的辯護律師預言說他只會坐幾個月牢的時候，律師說他會被判死刑，結果他翻供了。但「調查人員」拒絕記錄改口了的供詞，而共同被告則擔心翻供到頭來會把兩人都毀了。（那位辯護律師辭職了。）<sup>171</sup>斯大林堅持認為被告的邪惡企圖是奉了國際上的操縱者的命令，這讓審訊人員的任務更加艱巨了，因為審判將會是公開的，外國人也可以看到。忍受着強烈的疼痛而且患有流感的奧格伯烏首腦明仁斯基不久便動身去了

馬采斯塔，接受硫磺浴的治療，問題沒有落到他頭上。<sup>172</sup> 亞戈達只好在莫斯科主持工作。無論是他還是葉夫多基莫夫都不是傻瓜，他們明白，根本就不存在蓄意的破壞。<sup>173</sup> 不過，斯大林施加的壓力很大，於是，葉夫多基莫夫和亞戈達就給了斯大林他想要的東西：從所謂的在頓涅茨克煤炭托拉斯「活動多年的強大的反革命組織」，到所謂的「德國人和波蘭人的相互勾結」。<sup>174</sup>

### 外國的「經濟」干涉

在沙赫特事件中，有五名德國工程師被捕，其中四人是德國AEG公司安裝渦輪機和採礦機器的僱員。（政治局決定，對英國專家要在審訊後釋放。）蘇聯的報道解釋說，歐洲的工人階級敬佩蘇聯的成就，阻止了資產階級戰爭販子的武裝入侵，但帝國主義分子轉向了看不見的戰爭，轉向了一種新的反蘇鬥爭方式，即經濟反革命或「破壞」(vreditel'stvo)。<sup>175</sup> 3月10日，AEG公司董事會主席從柏林外交部打電報給駐莫斯科大使布羅克多夫—蘭曹，讓他傳話，要是不放人，該公司就會停止一切合作並撤回所有員工；第二天，大使向契切林讀了這份電報。3月12日，副外交人民委員李維諾夫從柏林打電報給斯大林和契切林，講到逮捕德國專家對蘇德關係的惡劣影響。<sup>176</sup> 為了把損害限制在一定的範圍內，契切林事先就警告過德國駐莫斯科大使即將有不愉快的事件發生，而他希望可以共同應對這一事件。<sup>177</sup> 但對於德國來說，事件發生的時間有點詭異。就在宣佈這起「陰謀」一個月之前，蘇聯人在柏林啟動了新的雙邊貿易談判，承諾了包括6億馬克訂單在內的諸多誘人的條件，以換取6億馬克的賒欠和長期貸款。蘇聯人還請求由德國的金融市場來操作蘇聯的政府債券。<sup>178</sup> 德國的工業家和金融家也提出了他們自己的要求，但現在，一切似乎都成了泡影。由於蘇聯使節克里斯季安·拉柯夫斯基的行為所造成的慘敗，斯大林失去了法國的貸款，但現在他卻在故意挑釁德國人。在1928年3月2日給政治局其他成員的便條中，斯大林和莫洛托夫寫道，「如果在德國舉行選舉的時候組織相應的審判，情況就可能變得非常有趣」。<sup>179</sup>

由於五位國民遭到帶有挑釁性質的逮捕，1928年3月15日，德國宣佈無限期暫停雙邊的貿易及貸款談判。<sup>180</sup> 塔斯社把談判破裂歸咎於柏林，而蘇聯報刊則在斯大林的機關的慫恿下，大肆抨擊德國的背信棄義。3月17日，蘇聯駐德使節尼古拉·克列斯廷斯基從柏林寄信給斯大林(抄送契切林)，請求釋放一個名叫弗朗茨·戈爾德施泰因(Franz Goldstein)的被捕的德國國民。盛怒之下的斯大林在四天後作了回覆(抄送契切林)，指責克列斯廷斯基可恥地唆使德國人，利用逮捕事件「把談判破裂的責任加到我們頭上」。這位專政者還說：「一個主權國家的代表不能用你認為有必要的那種語氣去談判。德國人在用最傲慢無禮的方式干涉我國內部事務，而你非但沒有中止與德國人的談判，反而繼續對他們示好，這不是很難理解嗎？這件事做得太過了，《法蘭克福報》已經公佈了你在被捕的幾個德國人這一問題上與莫斯科存在分歧。不能比這更過分了。致以共產黨人的問候。斯大林。」<sup>181</sup>

不過，戈爾德施泰因和海因里希·瓦格納(Heinrich Wagner)都被突然釋放了，兩人都是為AEG公司工作的。據反間諜專家阿爾圖爾·阿爾圖佐夫寫給明仁斯基的便條說，戈爾德施泰因曾主動向奧格伯烏的審訊人員交代，他認識三名流亡的白衛分子，他們都在德國AEG公司的俄國部工作，都極端反蘇，而且他還看到他們拿了一大筆錢。為了進一步討好蘇聯人，他還表示自己願意回到蘇聯工作。<sup>182</sup> 然而，在外交部向回到柏林的戈爾德施泰因瞭解情況的時候，他矢口否認蘇方宣稱的破壞活動，認為設備故障的原因在於工人缺乏責任心、黨外專家害怕被抓、黨的監管不力以及普遍的混亂。對於自己在努力挽救蘇聯工業的時候因莫須有的罪名遭到逮捕，他公開表示憤怒，並警告其他德國人不要把「他們的知識和才能」貢獻給蘇維埃政權，而且他還詳細描述了自己一開始被關押在蘇聯的一座省級監獄(斯大林諾)時的惡劣條件，結果鬧得沸沸揚揚。<sup>183</sup> 在此期間，尚未獲得釋放的三個德國人(他們為科納普(Knapp)礦業公司工作)——馬克斯·邁爾(Max Maier，生於1876年)、恩斯特·奧托(Ernest Otto)和威廉·巴德施蒂貝爾(Wilhelm Badstieber)——都被禁止與外界接觸，而這一做法違反了規定德國領事官員有權探視的雙邊條約。不僅如此，契切林還遞過一張便條，是亞

戈達給布羅克多夫—蘭曹的，那上面詳細說明了一個德國僑民的所謂罪行，而這個人的名字與蘇聯境內任何德國人的名字都對不上號；有個與被指控者姓名相近的人，最後一次到蘇聯去的時間是在1927年，這讓德國人更加懷疑奧格伯烏的這起「事件」。<sup>184</sup>

逮捕德國僑民也波及法蘇關係，它讓許多法國人更加堅定地認為，莫斯科不是一個做生意的地方。像法國一樣，德國還不至於斷絕外交關係，但有些德國公司開始撤出它們餘下的工程師。<sup>185</sup> 斯大林仍然渴望得到德國的專家、德國的技術、德國的資本，但是要按照他的條件。3月22日，AEG公司決定將其在蘇聯境內的多個建設項目繼續下去。一個星期後，也就是逮捕事件發生22天後，蘇維埃政權通知德國大使館，駐哈爾科夫的領事可以探視那幾個（被關押在羅斯托夫的）德國僑民了；德國大使堅持要求允許莫斯科大使館派人探視，得到批准。4月12日，在三名奧格伯烏特工在場的情況下，每個被關押的人員得到了十分鐘的傾訴機會。<sup>186</sup> 五天後，為了準備審判，三名德國人被轉移到莫斯科的布爾特卡監獄。

## 鼓動階級鬥爭

694 斯大林在玩火。整個蘇聯的煤礦開採工業約有1,100名受過教育的工程師，結果僅僅在一起案件中就要讓其中的50人受到審判，這從經濟的角度來說很冒險，尤其是，這讓其他許多人都嚇得不敢有所作為，而且還鼓動工人進行羞辱和打罵。<sup>187</sup>「我知道，只要想幹，人們就能指控無辜的人，時代就是這樣，」某個工程師跟沙赫特事件無關，但卻被說成「沙赫特分子」，他在受到逮捕的威脅之後自殺了，留下的遺書寫道，「我不想受到誹謗，我不想平白無故地遭罪並且不得不為自己辯護，我寧可死也不願受到誹謗和折磨。」<sup>188</sup> 整個列寧格勒工業部門中每1,000個工人所對應的工程師是11個；莫斯科9個，烏拉爾4個。<sup>189</sup> 除了莫洛托夫之外，支持對農民採取強制手段的斯大林的親信們，都竭力想要控制住斯大林在沙赫特問題上挑起的那種歇斯底里的氣氛。<sup>190</sup> 負責中央監察委員會和工農檢查院的奧爾忠尼啟則3月26日對一群剛畢業

的大學生說，沙赫特的工程師屬於特殊情況，工程師對於蘇聯的工業至關重要，應當允許外國專家在蘇聯工業部門工作，蘇聯專家也應當到國外去。<sup>191</sup> 此時的最高國民經濟委員會主席、內戰時曾作為「左派共產黨人」反對起用沙皇時代的「軍事專家」的古比雪夫，在工業部門的管理人員會議上說——講話刊登在他屬下的《貿易和工業報》上——「所有的錯誤論斷，所有被誇大的不公正的指控，都在製造一種非常困難的工作氛圍，而這樣的批評已經不再具有建設性」。<sup>192</sup> 3月28日，他向一群莫斯科的工程師和科學家保證，沙赫特事件並不預示着對技術專家會採取新的政策，而且「在沙赫特事件上，政府會採取一切辦法，確保不讓任何一個無辜的工程師受到影響」。<sup>193</sup>

斯大林派對沙赫特事件持反對態度，而他在政治局的那些對手們，雖然反對他的強制性的農民政策，卻支持指控有關人員進行破壞活動。伏羅希洛夫(3月29日)稍顯驚慌地寫信給剛從礦區回來的工會領導人米哈伊爾·托姆斯基：「米沙，坦率地告訴我，沙赫特事件的審判開始了，我們不會出甚麼事吧？在這件事情上，當地官員，包括地區的奧格伯烏在內，是不是做得過火了？」托姆斯基以前做過平版印刷工，身材不高但很結實，滿嘴爛牙，一隻耳朵聾了，酗酒並患有抑鬱症，粗暴但很有魅力，言語尖刻而機智，是政治局裏唯一工人出身的(農民出身的加里寧也在工廠幹過)，在工人當中的人氣要遠遠超過斯大林。<sup>194</sup> 長期以來，為了同官僚主義作鬥爭，托姆斯基一直熱衷於機關的「工人化」，而且政權讓工人積極行動起來的號召也對托姆斯基有利。<sup>195</sup> 托姆斯基告訴伏羅希洛夫，資產階級專家「幹得比我們好多了！」憑藉工程師們在國外的關係，蘇聯的礦業建設計劃「得到了法國人的贊同」。「情況很清楚，」他安慰伏羅希洛夫說，「重要的人物都已經招認了。我的看法是，要是半打黨員被關進監獄，情況就不會太壞。」<sup>196</sup> 布哈林在對列寧格勒黨組織的講話(1928年4月13日)中，不但支持斯大林的路線，認為在煤炭工業中普遍存在破壞活動，而且認為在其他工業部門很可能也存在類似的搞破壞活動的「組織」，同時他還贊成，需要以生產會議的形式實行「無產階級民主」。布哈林認為蘇聯保持警惕是正確的，理由是，在逮捕了幾個德國人後西歐突然出現了反蘇的聲浪，與德國的關

係也急劇惡化。<sup>197</sup> 布哈林就像他和普列奧布拉任斯基合著的《共產主義ABC》中所寫的那樣，一直傾向於把「資產階級工程師」視為叛徒。布哈林也不希望讓斯大林找到藉口，指責自己搞分裂和派別活動。但沙赫特事件與其說是向黨內新經濟政策的擁護者發動的政治攻勢，不如說是斯大林想要降服他自己那一派的人。

斯大林也在直接求助於工人，想把他們爭取過來，動員他們支持工業化和集體化。工業領域中分散在近2,000家國有工廠、靠工資為生的人，1928年的總數終於超過1913年(260萬)，達到了270萬。<sup>198</sup> (另有50萬工人受僱於建築領域。)但無產者們仍然蝸居在狹小的集體宿舍和棚戶，無家可歸的也不在少數。日常的開銷(吃、穿、住)要佔到工人工資的四分之三，要是他或她有工資的話——在新經濟政策期間，失業人數從來沒有少於100萬，佔健壯勞動人口的20%。就連首都工業部門的工人，每四個當中也有一個失業，這種不光彩的情況急需解釋或者找到替罪羊。<sup>199</sup> 與此同時，工人的眼前就有奢靡的夜生活——在這個無產階級的國度，那都是因為誰？<sup>200</sup> 革命出了甚麼狀況？打內戰並贏得內戰難道是為了把政權交給耐普曼分子和投機倒把分子？為甚麼歷史的「普遍等級」在挨餓而富農囤積了大量糧食卻不受懲罰？工人要下到礦井，被壓在塌方的礦井下，這一切難道只是意外？為甚麼「資產階級專家」和工廠老闆住得那麼豪華，有五個甚至更多的房間，有自來水，有電，還有傭人和司機？<sup>201</sup> 這個國家自稱是工人的國家，但它為工人做了甚麼？由於懷疑無產者的堅定性，黨的官員往往寄望自身，即黨的專職工作人員，成為政權的社會基礎，即使沒有托洛茨基分子對「官僚主義」的批評，這樣的情況也很尷尬。此外，一種帶有惡意的公共運動一直在把工人描寫成偷奸耍滑、只顧自己的人，描寫成酒鬼和逃兵，而工會組織的由工人參加的「生產會議」，實際上只是一種手段，為的是推行更高的生產指標。可是在1928年，黨委會奪走了這些會議的控制權，因為這些會議現在成了車間工人揭露以權謀私、管理不善以及浪費等現象的地方。<sup>202</sup>

沙赫特事件的材料實際上宣佈老闆們有可能是叛徒。<sup>203</sup> 《真理報》的揭露文章也聲稱，破壞活動「在『共產黨領導人』的鼻子底下」存在多

年了。在這種言論的刺激下，年輕一些的黨員抓住機會利用年輕的無產者滿腔的階級仇恨和階級抱負——更別說他們自己的階級仇恨和階級抱負了。根據警察機關的情緒報告，沙赫特事件後，工人們常常指出在工作的地方也存在類似的現象。「在我們工廠，經濟上管理不善的情況非常嚴重，好端端的機器就被扔進了倉庫，」根據日期為1928年3月24日的報告，有人聽到列寧格勒布爾什維克工廠的一名工人說，「這是第二個〔沙赫特〕。」<sup>204</sup> 這樣的情緒也傳到了農村。「黨、工會、奧格伯烏都在哪裏，讓我們被牽着鼻子走了十年？」有個農村通訊員在給《農民報》的信中寫道，同時他還投訴當地的調查機關同樣也沒能懲罰禍害農民的「官老爺」和「異己分子」。<sup>205</sup>

工人想要成立獨立組織的努力繼續受到無情的壓制，但工人的怨恨情緒現在被點燃了——不是偶然地，而是在反對國內外敵人的轟轟烈烈的運動中。<sup>206</sup> 會議一個接着一個，「討論」煤炭工業以及其他領域中存在的破壞活動，有些工人在會上要求把「破壞分子」處以死刑；工程師和管理人員稱沙赫特事件是捏造的，是為了找替罪羊，結果加劇了人們的懷疑，覺得沒有受到指控的專家也可能有罪。<sup>207</sup> 在沒有科技知識分子的地方，比如伏爾加河畔落後的馬里埃爾自治州，奧格伯烏就把目標對準人文知識分子（大多是農民子弟），罪名是研究和教授自己地區和民族的歷史。<sup>208</sup> 階級鬥爭回來了。斯大林忘記列寧是把賭注押在貧農身上，更不用說斯托雷平是把賭注押在殷實的農民身上，他準備把賭注押在城市中來自社會底層的年輕男性奮鬥者身上，讓他們在農村的社會主義改造中充當先鋒，而他們中的許多人不過是剛剛脫離了農村。這樣做可以一舉多得：「鬥爭」針對的不僅是農村中囤積糧食的富農，還有城市中作為階級異己分子的「資產階級」專家，以及黨內甘願與敵人同流合污的官員，或對敵人掉以輕心，而掉以輕心就相當於同流合污。這是大規模的動員，所傳遞的信息是誘人的：政權不會允許工人的夢想被放棄，不會允許因為缺乏警惕而喪失工人的夢想，不會允許為了猶大的銀幣而出賣工人的夢想。但這場運動要冒着造成巨大分裂的危險，而結果卻很難預料。<sup>209</sup>



## 戰術撤退（1928年4月）

斯大林絲毫不擔心針對農民的強制政策會產生甚麼惡劣的影響，就像他絲毫不擔心工業領域中工程師的被捕和自殺事件會產生甚麼惡劣的影響一樣。在離開莫斯科到西伯利亞去的前一天，他寫信給在烏克蘭的卡岡諾維奇，警告說不要害怕動用武力。「許多共產黨人都認為自己既不能碰商販，也不能碰富農，因為這樣可能會把中農從我們身邊嚇走，」他解釋說，「這是在某些共產黨人頭腦中存在的所有糟糕想法中最糟糕的一種。情況恰恰相反。」高壓政策有望在富農和中農之間製造分裂，斯大林認為：「只有在這種政策下，中農才會認識到，提高糧價的可能性是投機倒把分子臆想出來的……認識到把自己的命運和投機倒把分子以及富農的命運拴在一起是危險的，認識到自己作為中農必須履行工人階級同盟軍的職責。」<sup>210</sup> 但是，即使是按照奧格伯烏自身的統計數據，在被捕者當中，真正的富農也是少數，而逮捕並不是富農的人對高壓政策產生了巨大的壓力。<sup>211</sup> 司法人民委員尼古拉·揚松 (Nikolai Yanson) 下發了一則通告，把非常措施說成是「臨時的」，暗示它們將會在目前這個農業年的年底（1928年6月）到期。<sup>212</sup> 但是有許多官員——不僅僅是李可夫——都要求立即結束「非常狀態」。這便是在4月6日至11日召開的中央委員會和中央監察委員會聯席全會的背景。會議開始當天，政權宣佈了「索契事件」：三年來，據說這個黑海度假勝地的黨和蘇維埃的領導人一直在盜用國家財產，以權謀私，過着荒淫的生活。調查的結果非常驚人，700人被開除，差不多佔黑海黨組織的12%。有些內戰時的英雄也被開除了。<sup>213</sup> 農民並不是斯大林想要恐嚇的唯一對象。

698

列入全會議程的有關於糧食收購工作的報告（米高揚）和關於沙赫特事件的報告（李可夫），而把這兩個話題聯繫在一起，證明了斯大林的老奸巨猾。4月9日，李可夫為了平息對沙赫特事件的懷疑，舉例說檢察院的尼古拉·克雷連柯已經檢查過奧格伯烏的工作（這兩個組織是競爭對手），而托姆斯基、莫洛托夫和雅羅斯拉夫斯基也親自到頓巴斯檢查過。「主要的結論是，這起案件不但沒有被誇大，而且要比一開始揭露出來時所能預料的更大、更嚴重」，李可夫強調說。他還說，有些

被告已經招認：在為鄧尼金效力後，他們就在為蘇維埃政權工作，但用的卻是兩面派的方式，儘管他們享有巨大的特權。還不清楚他是相信沙赫特事件確有其事還是僅僅認為它有利用價值，但他當時正在努力控制它。「要是沒有專家，我國就實現不了工業化，」他繼續說道，「這方面我們非常落後，我們對這個問題的關注也非常不夠。」<sup>214</sup> 60人參加了討論，古比雪夫在討論中還發了言，反對攻擊專家，而莫洛托夫在回應時則堅持斯大林的強硬路線。<sup>215</sup>

4月10日上午，斯大林發言。他斷定沙赫特事件中的資產階級專家是由俄國僑民和西方資本家組織資助的，還稱這樣的行為是「經濟干涉的嘗試」，不是工業事故。他說，由於反對派已經粉碎，黨變得掉以輕心了，但是，它必須保持警惕。「如果以為國際資本會讓我們安靜地過日子，那就愚蠢了，」他表示，「不，同志們，這是不對的。階級還存在，國際資本還存在，它是不會平心靜氣地看着一個正在建設社會主義的國家發展的。」他認為蘇聯有兩條路可走：要麼繼續執行革命政策，把全世界的工人階級和殖民地人民團結在蘇聯周圍，那時國際資本就會千方百計地阻撓；要麼就作出讓步，那時國際資本就「不會反對『幫助』我們把我們的社會主義國家變為『和善的』資產階級共和國」。英國建議把波斯、阿富汗和土耳其劃分為兩個勢力範圍，但蘇聯能作出這種讓步嗎？「全場高喊：不！」美國要求蘇聯放棄世界革命的政策，但蘇聯能作出這種讓步嗎？「全場高喊：不！」如果蘇聯同意和日本瓜分滿洲，就可以同日本建立「友好」關係，但蘇聯能作出這種讓步嗎？「不！」於是，斯大林接着說了下去。能同意結束對外貿易的國家壟斷，並償還沙皇和臨時政府的帝國主義戰爭債務嗎？「不！」正是因為蘇聯拒絕作出諸如此類的讓步，斯大林聲稱，國際資本才利用國內的敵人進行「經濟干涉」，結果就有了沙赫特事件。<sup>\*</sup> 這樣一來，一切都明白了。

699

斯大林提到自己看過的一部戲，名叫《繁忙的鐵路》，是年輕的「無產階級」劇作家弗拉基米爾·基爾雄(Vladimir Kirshon，生於1902年)所

---

<sup>\*</sup> 譯註：《斯大林全集》第11卷，第46—48頁。

寫。戲裏的主人公是個從工人中提拔上來的黨員廠長，他在試圖重組自己的巨型工廠時，發現需要對包括他自己在內的人進行重組。「去看看這部戲，你們就會明白，那個工人廠長是個獻身於理想的人，他應該得到各方面的支持」，斯大林建議，還說「耐普曼分子伏擊那位工人廠長，這個那個的資產階級專家對他暗中使壞，他的妻子攻擊他，儘管如此，他還是堅持鬥爭」。<sup>216</sup>

全會通過了一項決議，一字不差地支持斯大林在沙赫特事件上的路線，「為針對蘇聯的干涉和戰爭做好準備」。<sup>217</sup> 黨的警察機關完全贊成：烏克蘭奧格伯烏首腦巴利茨基暗中寫信給亞戈達說，沙赫特事件的審訊結果充分證實了斯大林同志在全會報告中關於「為干涉做好準備」的結論。<sup>218</sup> 烏克蘭黨組織的首腦卡岡諾維奇得出了和斯大林一樣的結論，並竭力主張黨應該在各個工業托拉斯當中「加強格伯烏的作用」，要安插「奧格伯烏的全權代表，就類似於運輸部門的那種（獨立的）格伯烏機構」。<sup>219</sup> 卡岡諾維奇太瞭解斯大林了。

700 作為徹底的列寧主義者，斯大林在沙赫特問題上毫不留情，堅持發動攻勢，可在糧食收購問題上卻作了戰術撤退。<sup>220</sup> 他在當時的地位仍然要依靠在政治局投票中獲得多數，因此，他對李可夫讓步——無論如何，李可夫接受了沙赫特事件的結論——目的是保住伏羅希洛夫、奧爾忠尼啟則和加里寧這幾票。全會關於農村工作的決議提到富農對糧食收購的影響，但也明確指出「產生這些困難的原因，是市場平衡遭到猛烈的破壞」，而這就是李可夫的路線。人們紛紛指責與非常措施有關的過火行為：到4月中旬，全聯盟範圍內被捕的總計有16,000人，其中，根據第58條（反革命罪）逮捕的有1,864人，所以全會的決議決定，第107條不再適用於不出售糧食的農民。<sup>221</sup> 不僅如此，懲罰過富農以外的農民的官員（「違反階級路線」），自己也會受到懲罰；有些官員受到了審判，甚至被處死。<sup>222</sup> 這是一種驚人的反轉。

---

\* 譯註：《蘇聯共產黨代表大會、代表會議和中央全會決議彙編》（第三分冊），第424頁。

黨的基層官員在報紙上尋找幾個最高領導人講話中的微妙差別，並開始在私下裏議論斯大林和李可夫的分裂。「關於李可夫派和斯大林派的事情，我認為是（隱藏的）反對派分子寫的，他們總是混進黨的積極分子會議」，1928年4月的一次政治局會議上，斯大林在給伏羅希洛夫的便條中寫道。<sup>223</sup> 也許就是同一次會議上（1928年4月23日），斯大林拋出了要在哈薩克斯坦北部、烏拉爾地區、西伯利亞南部、北高加索甚至烏克蘭的處女地建立大型「國營農場」的問題，那是這些地方此前不曾有過的新農場。他把托馬斯·坎貝爾（Thomas Campbell）在蒙大拿州的大規模機械化農場（95,000英畝\*）當作模板，而那也許是世界上最大、產量最高的農場。<sup>224</sup> 當國營農場的支持者加里寧說它們將會成為現有農莊（這些農莊最終都會被集體化）的補充時，斯大林插了（兩次）話。<sup>225</sup> 換句話說，斯大林的撤退只是局部的。他讓全會承認黨有權在形勢需要的時候再次採取非常措施。全會之後，他對莫斯科黨組織說（4月13日），危機雖然已經消除，但如果「資本主義分子又『掉起花槍』來」，那第107條就會重新出現。<sup>226†</sup>

斯大林不需要等待很長時間：4月的糧食收購量只有3月的五分之一和2月的十分之一；農民們躲開政府官員，把糧食拿到巴扎上出售，價格是國家給出的五倍。由於政權的失誤以及市場經濟與社會主義體制之間更大的矛盾，蘇聯經濟犯錯誤的餘地小了。有些地區，特別是烏克蘭和北高加索，遭遇乾旱和歉收。在哈薩克斯坦北部，惡劣的天氣和歉收讓許多家庭不得不試圖從市場上獲取供自己消費的糧食，從而抬高了糧價；但是在收穫季節開始收糧的時候，市面上又見不到出售的糧食。為了防止糧食流入到這些歉收地區，路上設立了檢查站，而日子好過的農民——也就是有糧食的農民——既不願意按照國家規定的低價把糧食賣出去，也害怕按照市場的高價把糧食賣出去。有些貧農在問，為甚麼不讓富農多交些糧食。<sup>227</sup> 在莫洛托夫和米高揚的主持和策劃下，從4月24日起緊急召開了一連串的代表會議，參加的有各省

701

\* 編註：約38,400公頃。

† 譯註：《斯大林全集》第11卷，第40頁。

黨組織負責人：有些地區的負責人要求重新動用第107條，把界定富農的標準從擁有36噸糧食放低到12噸甚至7噸，並批評要求放過農民的建議和對有辦法收到糧食的官員的迫害。某個省的書記要求不要再在報刊上議論「過火行為」，他認為那種議論造成了「消極情緒」。<sup>228</sup> 莫洛托夫一如既往地附和斯大林，他對他們說，「富農常常假裝成貧農寫信給莫斯科。你們知道，富農比其他任何人都更瞭解如何在莫斯科四處活動」。<sup>229</sup> 並不是所有人的看法都一致：規定要收購到的糧食是不是現成的，只等去拿呢，有些地區的黨的負責人對此表達了有充分根據的懷疑，而在這一幕幕的背後，為了不再採取高壓政策，也在上演着一場搏鬥。<sup>230</sup> 但是，由於糧食收購量減少，迫於壓力，政治局在4月26日決定，對農民恢復使用第107條。<sup>231</sup>

1928年是對斯大林會作出讓步還抱有希望的一年，但表明他心意已決的跡象隨處可見。就在此時，秘密警察關於農村地區的情緒報告的內容，開始從價格剪刀差、工業品赤字等事實，逐漸轉向「破壞活動」和「階級敵人」的死灰復燃。<sup>232</sup> 可笑的是，有時候斯大林炫耀力量的那些信號並不是故意的。例如，當時奧格伯烏的地方機關會給所在地區的黨委和蘇維埃呈送一些政治情緒報告，但是在1928年5月16日，亞戈達發佈了一則註明「絕密」的通告，痛心她表示，在給地方機構傳閱的政治情緒報告中，有人指名道姓地貶損工作人員，這就造成了一種「錯誤印象」，以為那些工作人員在說些甚麼，對誰說的，都受到嚴密的監視。「不僅在給外面的政治情緒報告中不允許提到任何工作人員，就是在給內部的報告中也要避免這樣。」<sup>233</sup> 政府工作人員受到秘密警察的監視，顯然，這是一種假象。

## 作秀公審

702

在工會大廈飾有大理石牆面的圓柱大廳，從1928年5月18日開始、持續了41天的沙赫特事件的審判場面盛大，在當時的蘇聯是前所未有的。<sup>234</sup> 這是自1922年以來全聯盟範圍內首次重要的公審，但影響要遠遠超過那次事件。1928年進行的另一些審判，也是以汲取政治教訓

為目的，例如軍事法庭審判的所謂列寧格勒邊境地區英一芬「間諜網」案，但在關注度和重要性上卻無法與沙赫特事件的審判相提並論。<sup>235</sup> 審判安排在莫斯科，就是為了引起最大程度的關注；近100名經過挑選的國內外記者報道了審判的過程。<sup>236</sup> 到掛着紅布的法庭旁聽的蘇聯居民——工人、共青團積極分子和外地的代表——有三萬多（黨後來聲稱有十萬人）。「成群結隊的人們吵吵嚷嚷地湧了進來，互相推搡，搶佔有利的座位，」一名美國駐外記者寫道，「包廂裏漸漸擠滿了外交官、有影響的官員以及其他有特權的觀眾，他們又是鞠躬又是握手。」<sup>237</sup> 穿着西服、戴着夾鼻眼鏡的審判長安德烈·維辛斯基顯得很突出；檢察長尼古拉·克雷連柯穿着獵裝、馬褲和裹腿。沙赫特事件的審判過程被拍成很多新聞片和一部獨立的紀錄片，朱庇特鏡頭下閃耀着克雷連柯的光頭。<sup>238</sup> 無線電廣播了審判的過程。全國都在議論沙赫特事件。

當然，資本主義分子沒有了，革命前的工程師和管理人員就必須承擔他們的角色。<sup>239</sup> 在53名被告中，20人認罪，11人部分認罪，其餘的則堅稱自己是無辜的。那些否認指控的人並不隱瞞自己對蘇維埃政權的厭惡，並不隱瞞自己不相信建設社會主義的夢想，但也表示，作為專業人員，他們仍會以負責任的態度做好自己的工作；然而，他們承認持有敵對的觀點，這被當成了從事破壞活動的證據。克雷連柯引用據說是工人的話，談到了在「工人階級的吸血鬼」手下受到的虐待。<sup>240</sup> 他「從頭到尾都在對着旁聽席演戲」，一位親蘇的外國記者後來回憶說，「他抓住一切機會向警察機關挑選出來的旁聽人員高談闊論，贏得他們的掌聲。有些被告有時候也和歡呼的群眾一起鼓掌。」<sup>241</sup> 但在供詞中對於成立反革命「組織」的時間說法不一。當德國技術員馬克斯·邁爾告訴維辛斯基，自己只是因為每天夜裏都受到審訊，撐不住了才在供詞上簽的名，而且自己並不懂俄語（因此他也不知道自己是在甚麼文件上面簽的名）的時候，表演就越發混亂了。在維辛斯基要求邁爾指證蘇聯居民阿布拉姆·巴什金有罪時，邁爾聲稱巴什金是他在蘇聯認識的最負責的工程師，一心撲在進口渦輪機上，而坐在被告席上的巴什金也突然高喊，自己之前（幾分鐘前）的供述都是假話。維辛斯基宣佈休庭。大約40分鐘過後，巴什金再次承認了自己先前承認的罪行。<sup>242</sup>

當時普遍認為，如果一個人是無辜的，那他就不會招認。再說了，在人為操縱的跡象背後，有些事情並不是空穴來風。早在1927年3月，空軍外租部門的負責人被捕，罪名是故意購買容克公司的劣質飛機部件，而且價格虛高，讓德國公司狠賺了一筆，還有就是私吞了大量回扣和損害了蘇聯安全。這名官員還被控在自己的私人住處向德方員工泄露蘇聯航空工業的狀況，在專業人員中間或許像是談論工作，但的確出格了，有間諜活動的嫌疑。這名空軍外租部門的負責人在被捕兩個月後與幾個所謂的同夥一起被處決了。哪怕是出於尋常的金錢方面的動機，與外國人勾結的沙皇時代的專家，也可能鑽蘇聯監管人員的空子，因為後者沒有受過良好的教育，不懂技術，或者容易受賄。當然，斯大林這個人非常多疑，他認為他們的動機還包括敵對的階級利益。不管怎麼說，資產階級工程師掌握着潛在的廣泛影響力，而斯大林除了嚴厲恫嚇，找不到別的辦法。<sup>243</sup>

被稱作「莫斯科中心」的核心人物有：前立憲民主黨的杜馬代表拉扎·拉比諾維奇(Lazar Rabinovich，生於1860年)；頓巴斯煤炭托拉斯駐莫斯科代表所羅門·伊梅尼托夫(Solomon Imenitov，生於1865年)，他受到的指控是對反革命活動知情不報；以及最高國民經濟委員會官員尼古拉·斯科魯托(Nikolai Skorutto，生於1877年)，他當時正從美國轉道柏林回國，在看到有關自己幾名同僚被捕的報道後仍回到了莫斯科。斯科魯托對法庭說他已經招認了，但是，據一位在場的記者說，「從犯人家屬的旁聽席傳出可怕的尖叫聲，震驚了法庭……『科里亞』，那個女人哭着說，『親愛的科里亞，別說謊，別說！你知道你是清白的。』」斯科魯托崩潰了。維辛斯基宣佈休庭。十分鐘後，斯科魯托再次開口，說他決定撤回自己的供詞。「我原本希望如果我認罪並指控他人，這個法庭會對我寬大一點」，他說道。<sup>244</sup>拉比諾維奇像伊梅尼托夫一樣否認對自己的指控。「我絕對沒有罪，我沒有甚麼要悔改的，我也不會乞求甚麼」，他說。從前讓拉比諾維奇負責全蘇煤炭工業，並使內戰中遭到破壞的礦井恢復生產的，不是別人，正是列寧。「在過去50年的公私生活中，我得到了完全的信任、尊重和榮譽。我對所有人都開誠佈公。在我的能力範圍內，我為無產階級的事業服務，而無產階級也給

了我完全的信任並幫助我建立了良好的工作氛圍。我的工作一直都認真負責。對於破壞活動，我甚麼都不知道。」<sup>245</sup>但拉比諾維奇是畢業於聖彼得堡礦業學院並且是在1884年開始其職業生涯的，還曾經是沙皇時代立憲民主黨的杜馬代表，所以明擺着他是維護敵對階級利益的。拉比諾維奇請求判自己死刑。他被判了六年：「我睡在監獄裏就跟睡在自己的床上一樣踏實。我沒做虧心事，也沒有甚麼要害怕的。」<sup>246</sup>（他後來死於獄中。）

德國大使馮·布羅克多夫—蘭曹，據說因為身材高大而成了外國人席位上「最顯要的」人物，其實他當時正受到喉癌的折磨，但他拒絕離開莫斯科進行緊急治療（他的確戒了干邑白蘭地）。<sup>247</sup>這位伯爵非常憤怒，因為被告席上沒有法國和波蘭的國民，只有德國人。他感到痛心的是，自己歷經艱難，力主維持兩國關係，反而使自己的國家被蘇聯利用，受此大辱。但至少《消息報》（5月29日）在努力緩和斯大林的咄咄逼人。它寫道：「被告並不是德意志帝國，也不是德國工業和德國公司本身，只是個別的德國公民。」審判期間，德國舉行了選舉，這件事斯大林在批准逮捕德國人時就非常關注。社會民主黨得票最多，920萬（佔投票數的30%）；德國共產黨也贏了，得到320萬，佔投票數的10%，排第四。啤酒館暴動後對納粹黨的禁令已經解除，但他們只得到2.6%的選票。5月31日，伏羅希洛夫寫信給斯大林，說德軍指揮部建議這年再派八名蘇聯軍官訪學；德國人也會派出包括馮·布隆貝格（von Blomberg）將軍在內的六名觀察員觀摩蘇聯軍演。伏羅希洛夫認為這說明德國想要繼續監視紅軍不斷增強的實力，並且寫道：「德國人認為紅軍的力量強大了，足以應對與波蘭以及羅馬尼亞的衝突。」他建議接受德國人的邀請，並附上推薦出國的紅軍軍官的名單。斯大林同意了。<sup>248</sup>這一切並沒有讓他獲得實現工業化和購買最先進的技術所需要的資金。

705

### 恃強凌弱者的講壇（1928年5-6月）

春季開始的新一波強制徵購，導致糧價猛漲，人們排起長隊，有些地方還鬧起了饑荒。大城市不得不實行配給制。<sup>249</sup>當武裝小分隊短期



內第二次來尋找「隱藏的」糧食時，烏拉爾的一名官員試圖表達自己的絕望和憤怒，講述了一個老漢上吊自盡的故事：「他的兒子讓調查組看了他們儲備的所有糧食。給他們14口人只留了2普特〔72磅〕<sup>\*</sup>糧食。那位80歲的老人覺得他這張嘴會吃得太多……我最擔心的是孩子們。當蘇維埃政權的代表帶來的只有恐懼和淚水時，這個政權會給他們留下甚麼印象？」<sup>250</sup>

奧格伯烏指示在農村的線人——他們在全聯盟的數量達到8,596人——密切注意農村的私人小酒館和任何排隊婦女中的「反蘇維埃鼓動」。<sup>251</sup> 有些地方對於自己手頭有的，不管是甚麼糧食，都臨時實行了配給制。瑟爾采夫從西伯利亞寫信（1928年5月24日）說，農民再也沒有糧食了，西伯利亞自身的幾個城市都可能要挨餓了。<sup>252</sup> 斯大林把斯坦尼斯拉夫·柯秀爾派到新西伯利亞，柯秀爾則把自己的助手、很快又成為斯大林高級助手的亞歷山大·波斯克列貝舍夫帶在身邊。6月3日，西伯利亞黨委召開了「糧食討論會」，出席會議的有西伯利亞各個地區的官員，還有哈薩克斯坦和烏拉爾的官員。柯秀爾在會上強調，要用第107條保持對富農的壓力。<sup>253</sup> 到1928年6月為止，在這個農業年中，全國的糧食收購量（1,038.2萬噸）只是略低於上年（1,059萬噸）。<sup>254</sup> 但是乾旱再加上4月底重新採取的「非常措施」，加劇了國內糧食市場的混亂。<sup>255</sup> 到6月，政權再次開始進口糧食。最麻煩的是，許多農民無法得到播種的種子。<sup>256</sup> 其他人乾脆對秘密通告和報刊上的勸告置之不理，拒絕種糧。<sup>257</sup>

706 斯大林是不會被嚇住的。1928年5月28日，他來到紅色教授學院，它位於從前的皇太子尼古拉學校，在奧斯托任卡街53號；接到邀請的還有一些從斯維爾德洛夫共產主義大學、共產主義科學院以及社會科學研究院的俄羅斯協會挑選出來的外校學生，但演講者是誰沒有提，這讓人充滿了期待。在準備過程中，「清潔工特意擦洗了地面，工人們打掃了院子，圖書管理員擺出了最好的書籍，掃煙囪的人爬上屋頂，教授們排

---

\* 編註：約33公斤。

着隊理了髮」，據學院中一位年輕的車臣共產黨員說。他還說，官方在大廳裏懸掛了一幅斯大林的全身油畫像，但是，「用不鋒利的工具很粗糙地剪成的頭部，還攤在附近的地面上」。有人故意搗亂，在畫面上斯大林的胸部貼了一句話，上面的字母是從報紙上剪下來的：「除了斯大林的頭顱，無產階級沒有甚麼可失去的。全世界無產者，歡呼吧！」<sup>258</sup>

一幅替換的肖像畫很快就掛好了，那上面畫的是斯大林1922年在哥爾克坐在列寧的身旁。現在還不清楚搗亂的是甚麼人。在這所學院，過去托洛茨基和左派是很受歡迎的，而現在大部分左派學生已經被開除了。但學生們可能沒想到，斯大林即將發表他一生中最咄咄逼人的充滿左傾色彩的講話。斯大林的題為〈在糧食戰線上〉的講話，再次展示了1月20日他在新西伯利亞的講話中展示的，此前還不為人知的美麗新世界。

斯大林再次描繪了一幅激動人心的圖景：朝着大規模農莊的方向——不是個體富農的，而是集體化的那種大規模農莊——立刻實現農業的全盤現代化。在沒有現成的農莊可以實行集體化的地方，會有新成立的大規模的國營農場。「斯大林講話的聲音很輕，比較單調，還有長時間的停頓，」那位車臣共產黨員回憶說，「當然，斯大林帶有格魯吉亞口音，那種口音在他感到不安的時候顯得尤為明顯。」他「連續講了大概兩個小時。他不時端起玻璃瓶喝水。有一次，他拿起水瓶，瓶子已經空了。大廳裏發出笑聲。主席團裏有個人給斯大林又遞了一瓶。他幾乎喝完了一整瓶，然後轉向觀眾，頑皮地笑着說：『瞧，你們知道，誰笑到最後，誰笑得最好！無論如何，我有好消息給你們：我的講話完了。』掌聲。」休息十分鐘後，斯大林回答了書面提問，其中有些很冒失：根據現有的材料，有個學生問的是托洛茨基的支持者阿道夫·越飛自殺時的遺書問題，另外一個學生問的是奧格伯烏為甚麼要在普通黨員中安插告密者的問題（這些問題都沒有回答）。開會的學生還問到斯大林的講話對新經濟政策的影響；斯大林在回答時提到了列寧的教導，涉及辯證法和策略。「事實上，我們見證了一起歷史事件，」那位車臣共產黨員後來恍然大悟，「斯大林第一次闡明了他對未來的『集體農莊革命』的計劃。」<sup>259</sup> 講話刊登在《真理報》上（1928年6月2日）。<sup>260</sup>

青年再加上工人階級，是斯大林加速躍向社會主義的主要支持力量。共青團的成員總數從（1918年底的）2.2萬增長到（近三千萬條件合格者中的）二百多萬，這讓共青團成了一個龐大的組織。到1920年代末，約三分之一的黨員都曾經是共青團員。<sup>261</sup> 斯大林的機關把武裝的共青團積極分子和其他人一起派到農村，他們在那裏憑目測估算「餘糧」，用左輪手槍砸農民的頭，把農民關進茅房，直到他們交出儲存的糧食。與此同時，警察根據第107條和第58條抓人的事情在5月和6月又突然增多，結果就出現了自發的「打倒富農」現象。許多農民逃到附近的城市或其他地區；有些甚至加入了集體農莊，因為他們擔心不這麼做就會餓死。但有些農民開始組織抵抗。「不能把村裏備用的糧食交給政府」，西西伯利亞比斯克縣的一群農民作出了決定——斯大林年初曾經秘密地視察過那裏。黨的官員試圖阻止農民集會，但是在比斯克，有個貧農跑去對村裏的蘇維埃主席講：「把糧食給我們貧農。要不然，我們就把它搶走。我們會先找黨的書記，如果他不肯乖乖把糧食交出來，我們就殺了他。我們必須拿到所有的糧食，建立一個乾淨的、沒有共產黨員的蘇維埃政權。」據說在別的地方有些人說：「讓我們拿起長矛打游擊吧。」<sup>262</sup> 流言四起，說外國入侵了，白軍回來了。「農民處在強盜斯大林的壓迫下，」1928年6月，李可夫政府收到的一封信中說，「最貧窮的農民和工人是你的敵人。」<sup>263</sup>

當奧格伯烏報告說，「富農」情緒、烏克蘭「民族主義分子」情緒以及「農民」情緒正在軍隊中蔓延時，斯大林發動的圍剿反過來又製造出證據，證明圍剿是必要的。<sup>264</sup> 李可夫擔心的總危機來了。

就像斯大林經常拒絕和自己的妻子娜佳說話一樣，他此時也不再跟布哈林說話，這讓認為布哈林和斯大林關係很近的人非常不解，也非常憤怒。<sup>265</sup> 1928年5月，接着又在6月初，布哈林寄了幾封信給「柯巴」，想要談一談。「我認為國內外的形勢非常嚴峻」，他寫道，並且還說在稅收、製造品、物價或進口問題上，他看不出有任何經過深思熟慮的行動計劃。下一個收穫季節又要到了。令人難以置信，布哈林着重提到了被他視為誹謗的一件事情，即受人尊敬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家揚·斯騰（Jan Sten）說的「黨的第十五次代表大會是錯誤的，托洛茨基的信徒事實上是

正確的，而且是被歷史所證實的」。布哈林寫道，事實上，「從思想上來說，我們的（必要的）非常措施已經在轉變成一種新的政治路線。」最後他建議說，在即將到來的莫斯科共產國際代表大會和中國共產黨代表大會之後，「我準備去一個地方，不管哪裏，只要沒有吵鬧，沒有爭鬥」。布哈林的信表明，他簡直無法相信斯大林會急劇左傾，義無反顧地改變整個戰略圖景。「集體農莊只能在幾年之後建起來，幫不上我們，」布哈林寫道，「我們也不可能馬上為農莊提供啟動資金和機器。」<sup>266</sup>

斯大林沒有回應。<sup>267</sup>但是在6月27日的政治局會議上，爭吵發生了。當時，布哈林、托姆斯基和李可夫宣稱黨的政策存在斷裂，而莫洛托夫則指責他們的言論「反黨」——這是一個不祥的說法。<sup>268</sup>就是在這次或接下來那次斯大林成立了一個折衷性的委員會——由他自己和李可夫組成——的政治局會議上，在斯大林和布哈林之間可能發生了直到當時為止最嚴重的衝突。最後，斯大林屈尊在自己的辦公室接待了布哈林。布哈林妻子的回憶錄提到，當時斯大林奉承布哈林說，「我們倆是喜馬拉雅山，其他人都微不足道」。後來在一次政治局會議上，當斯大林嚴厲指責布哈林時，布哈林把斯大林恭維他的話說了出來，包括說其他人「微不足道」的那句。斯大林臉色鐵青，大聲說：「你撒謊。你編造出這個故事是要挑唆其他的政治局委員反對我。」<sup>269</sup>

## 第二次戰術撤退（1928年七月全會）

農民的怒火繼續在暗中燃燒。「最高層政府是以欺詐為基礎的，這就是下面所有人的看法」，1928年7月4日，一位農民寫信對《農民報》說。而且他還說，「可惜列寧同志去世了。他死得太早，沒能把他的事業進行到底。所以，你們政府的同志要是發生戰爭，不要太指望農民……我們的糧食被拿去養活英國、法國和德國了，而農民們卻被晾着餓了一週。」<sup>270</sup>同一天，中央委員會和中央監察委員會再次召開聯席全會，起初幾天討論的是共產國際的事務。接着，米高揚在7月6日作了一個不太樂觀的報告。對外貿易的「形勢非常緊張，比前兩年還要緊張」，他說。石油產量比國內的消費超出了很多，但石油出口沒能帶

來以前糧食出口所帶來的收入(木材、皮毛、糖和棉花的出口也一樣)。過去在沙皇時代，工業化的迅猛發展就是由糧食出口支撐的。米高揚心情沉重地指出，真正能夠達到的出口水平或許還不到沙皇時代的三分之一，除非蘇聯的糧食收成出現奇蹟，呈跳躍式增長。<sup>271</sup> 不安的情緒掠過黨內上層人物的心頭。<sup>272</sup>

那天深夜，7月7日的凌晨1:30，安德烈·維辛斯基在圓柱大廳宣讀了沙赫特事件的判決書。53名被告中有4人被判無罪，其中包括兩名德國人恩斯特·奧托和馬克斯·邁爾。另有4人被判有罪但緩期執行，包括威廉·巴德施蒂貝爾(按照第58條他被判無罪，但按照第53條則犯有行賄罪)。奧托和邁爾在不到兩小時之後就被釋放了，他們去了大使的官邸；巴德施蒂貝爾也被釋放了，但因為已被Knapp公司解聘而拒絕返回德國。布羅克多夫—蘭曹伯爵終於離開了莫斯科；外交人民委員部的人一個也沒有到車站為他送行。<sup>273</sup> 總檢察長克雷連柯曾要求將22人處以死刑，在他的總結陳詞中，他在每個名字的後面都大聲說「死刑」；結果有11人被判死刑，但有6人被減為徒刑。總共有近40人被關進監獄，多數刑期為4到10年，不過，許多人只坐了1到3年牢。即便有書報檢查制度，即便外國人只有獲得邀請才能旁聽，但事實上要安排這樣的公審決不是件容易的事情：關於這一不完美的場面，政權從未公佈過獨立的文字記錄。<sup>274</sup> 不過，供鼓動人員介紹審判基本情況的小冊子仍然強調，破壞活動如何由於無產階級的強大而最終被挫敗。它還敦促黨要讓工人與生產更加緊密地結合起來，要加強自我批評，以便和官僚主義作鬥爭，要做更好的「政委」，密切監視資產階級專家，並培養蘇維埃的新的工程師幹部。<sup>275</sup> 斯大林後來聲稱，沙赫特審判對於「加強工人階級的行動意願」起到了積極作用。<sup>276</sup>

710 在7月9日晚間的全會上，斯大林沒有給批評者發言的機會。他說政治局採取非常措施只是因為出現了真正的非常情況——「我們沒有後備」——而他認為強制政策可以拯救國家。「認為非常措施在任何情況下都是不好的那些人是不對的。」<sup>277</sup> 然後他直接轉向宏大的戰略問題。英

\* 譯註 《斯大林全集》第11卷，第150-151頁。

國的工業化靠的是殖民地，德國靠的是在1870至1871年的普法戰爭中索取的戰爭賠款，美國利用了從歐洲得到的貸款，而蘇聯沒有殖民地、戰爭賠款或國外的長期貸款，只能依靠國內的資源。在這一點上，沒有哪個布爾什維克能輕易表示異議。但斯大林想要得出布爾什維克立場的完整的邏輯。「農民不僅向國家繳納一般的稅，即直接稅和間接稅，而且他們在購買工業品時還要因為價格較高而多付一些錢，這是第一；而在出賣農產品時多少要少得一些錢，這是第二。」他實話實說。「這是為了發展為全國（包括農民在內）服務的工業而向農民徵收的一種額外稅。這是一種類似於『貢稅』（dan）的東西，是一種類似超額稅的東西；為了保持並加快工業發展的現有速度，保證工業滿足全國的需要……我們不得不暫時徵收這種稅。」斯大林沒想要掩飾：「這件事是令人不愉快的。但是，如果我們抹殺這個事實，如果我們閉眼不看當前的情況，即我們的工業和我們的國家可惜暫時不能不向農民徵收這種額外稅，那我們就不成其為布爾什維克了。」<sup>278</sup> 雖然邏輯很有力，但他用的「貢稅」這個說法在當時沒有發表——這讓大廳中的人們議論紛紛。<sup>279</sup>

斯大林排除了政策上的其他選項，比如出席全會的索柯里尼柯夫提出的把購買農民糧食的價格提高25%。「應不應當消除城鄉間的『剪刀差』，消除所有這些少得多付的現象呢？」斯大林用他此時特有的方式問道，「是的，無疑是應當消除的。我們能不能立刻就消除這些現象，而又不致削弱我國工業，因而也不致削弱我們的國民經濟呢？不，不能。」<sup>280</sup> 表面上，加快工業化步伐的殘酷「邏輯」就是如此：徵收「貢稅」要比市場上的讓步更有效，至少暫時是這樣。「貢稅」會不會一直繳下去？斯大林沒說。不過他倒是說前面的路會更難走。「隨着我們的進展，資本主義分子的反抗將加強起來，階級鬥爭將更加尖銳，而日益強大的蘇維埃政權將執行孤立這些分子的政策……鎮壓剝削分子反抗的政策，」他聲稱，「從來沒有過而且將來也不會有這樣的事情：垂死的階級自願放棄自己的陣地而不企圖組織反抗……向社會主義的前進不能

711

---

\* 譯註：《斯大林全集》第11卷，第139-140頁。

不引起剝削分子對這種前進的反抗，而剝削分子的反抗不能不引起階級鬥爭的必然的尖銳化。」<sup>281</sup>。

列寧在內戰期間有過這樣的想法：勢不兩立的敵人的反抗，會隨着失敗的臨近而變得越來越激烈。<sup>282</sup> 而在那之前，在還沒有人聽說過斯大林的名字之前，俄國的馬克思主義之父格奧爾吉·普列漢諾夫就曾指出，一旦資本主義分子意識到自己是歷史上注定要滅亡的階級，他們就會作出更大的反抗。<sup>283</sup> 不過，斯大林聲稱的「階級鬥爭將更加尖銳」，就像他使用的字眼「貢稅」一樣，語驚四座，留下了非正統的印象。但是，斯大林指出，農民決定不把他們的產品以固定的低價賣給國家是「糧食罷工」，是「農村資本主義分子在新經濟政策條件下所發動的第一次反對蘇維埃政策的嚴重進攻」。<sup>284</sup> 多年來，對於資本主義的包圍、蘇聯國內資本主義分子的敵意以及新經濟政策時期新資產階級（富農）帶來的危險、國內外敵人的關聯、捲土重來的「干涉」的威脅，簡單來說，沙赫特事件的威脅，斯大林談得比誰都多。沙赫特事件作為既成事實，其意義之大，決不亞於西伯利亞之行。在諸多總是伴隨着妥善執行的戰略——即在特定戰略方向上的即興之作——的神秘巧合中，有一個便是斯大林在全會發表演說的當天，對沙赫特事件中的五個人執行了死刑。

不過，沙赫特審判結束了，從「非常狀態」返回的路還存在。7月10日上午，布哈林緊接着斯大林發表了演說。布哈林依然非常害怕讓斯大林抓住把柄，指責他「反對」中央的路線，所以他拒絕表達不同的意見，根本就沒有向包括嘉賓在內的多達160人的龐大的高層聽眾發出呼籲。<sup>285</sup> 布哈林曾經認為，富農是個威脅，因而需要壓制，甚至剝奪——換句話說，農村的強制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是合適的。他曾經認為建設社會主義是必須的，實現國家的工業化是必須的，保持警惕、與破壞行為作鬥爭也是必須的。而斯大林，作為一個謀略家，在1928年的四月全會上曾經用自己的退卻化解了布哈林的批評，結果由於隨後的事態發

\* 譯註：《斯大林全集》第11卷，第149-150頁。

† 譯註：《斯大林全集》第11卷，第148頁。

展(強制政策帶來的收益逐漸減少)和人為的操縱(沙赫特審判)，斯大林甚至不用等到最後就得到了人們的稱讚。發言時，布哈林不願斯大林支持者的干擾，堅持要求全會討論事實。他談到全國發生的150次較大規模的抗議，談到「謝米帕拉京斯克的叛亂，列寧格勒和莫斯科勞動力交易所的暴力衝突以及卡巴爾季亞的暴動」——凡此種種，都是當時確實發生的事情。<sup>286</sup>事實上，從1928年5月20日至6月15日，在不同城市的勞動力交易所，記錄在案的暴力衝突有13起。<sup>287</sup>名義上仍是《真理報》主編的布哈林引用了顯然是該報收到的農民和工人的來信，但他也聲稱，對於這些令人不安的社會騷亂事件，有許多他只是剛剛知道，而且只是因為他親自去了奧格伯烏並在那裏待了兩天，仔細看了政治情緒報告(正常情況下，那些報告應該呈交政治局)。柯秀爾大聲嚷道：「你們因甚麼把他〔布哈林〕送進國家政治保衛局？(笑聲)。」明仁斯基回答說：「因張皇失措行為。(笑聲)。」

布哈林以社會中的不滿和動盪為由，堅持要求取消非常措施。「永遠嗎？」有人喊道。布哈林承認，非常措施有時可能是必要的，但不應成為永久性的，否則「你們就會有莊稼漢的起義，富農則讓莊稼漢承擔責任；富農組織他們，領導他們。小資產階級自發勢力起義反對無產階級，給以迎頭痛擊，結果是一場殘酷的階級鬥爭，無產階級專政消失。」對於布哈林描繪的社會危機和農民叛亂的圖景，斯大林大聲說道：「一場惡夢，願上帝保佑。(笑聲。)」<sup>288†</sup>

在這種恃強凌弱的氣氛中，7月11日，加里寧作了關於國營農場的報告，反對強行流放富農，因為那樣一來就有危險，在找到新的來源之前可能失去他們的糧食。「有人，哪怕是一個人，能說糧食夠了嗎？」他說道，「所有這些談論，說富農隱瞞糧食，說有糧食，但他不肯交出來——這都是些談論，僅僅是談論而已……只要富農有許多糧食，我們就會擁有它。」這是李可夫、托姆斯基、布哈林在政治局有可能拉到的一張主張取消非常措施的票。但加里寧的看法在一定程度上又是和

\* 譯註：《蘇聯歷史檔案選編》第8卷，第290頁。

† 譯註：《蘇聯歷史檔案選編》第8卷，第295頁。



斯大林一致的，他稱糧食不足是因為「生產力不高」，這就「促使我們要組織國營農場」。<sup>289</sup>

那天下午斯大林再次發言，並與其他發言者，特別是托姆斯基，進行了辯論。（在看到斯大林對托姆斯基的言語攻擊後，索柯里尼柯夫再次私下會晤加米涅夫，並在會晤中說斯大林「臉色陰沉、鐵青，露出兇相，怒氣沖沖。給人一種壓抑感……其粗魯的態度令人吃驚」。<sup>290</sup>像布哈林（和李可夫）一樣，托姆斯基也建議從懸崖邊後退。「你們今天後退，明天後退，後天後退，沒完沒了地後退——這就是他說的將會加強工農聯盟的東西，」斯大林說，「不，同志們，這是不對的……永遠讓步的政策不是我們的政策。」<sup>291</sup>然後，斯大林在震驚之餘屈服了：全會一致同意，取消「非常措施」。<sup>292</sup>糧價很快就調高了。<sup>293</sup>為了弄到糧食而擅自搜查、抓人以及關閉巴扎的做法成了要受到懲罰的犯罪行為；針對貧農和中農的涉及第107條的案件中止了，那些被關起來的農民也得到赦免和釋放。<sup>294</sup>斯大林在全會上的種種干預行為清楚地表明，他堅持自己在新西伯利亞宣佈並在紅色教授學院重申的路線。<sup>295</sup>但他再次作了戰術撤退。也許他是不想強行製造分裂。斯大林想必也知道，布哈林已經和包括奧爾忠尼啟則、伏羅希洛夫以及加里寧在內的其他政治局成員談過要在全會上解除自己的總書記職務這一問題，這就要求斯大林謹慎行事。<sup>296</sup>儘管如此，撤退還是比較輕鬆的，因為他知道，自己只要回到老廣場大街給奧格伯烏打個電話就行了。

## 計中計？

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和托洛茨基組成了短命的聯合反對派，他們所取得的成果無非是加劇了彼此之間原本就很尖銳的矛盾。<sup>297</sup>1928年初，斯大林把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流放到距離莫斯科約110英里†的卡盧加。季諾維也夫繼續懇求恢復自己在黨內的職務，還在1928年5

\* 譯註·《蘇聯歷史檔案選編》第8卷，第311頁。

† 編註·約177千米。

月的《真理報》上寫了一篇低三下四的文章，招來托洛茨基無情的嘲諷——「季諾維也夫就像一隻濕漉漉的鳥，他從《真理報》上發出的聲音聽起來就像磯鶻從沼澤地裏發出的唧唧聲」。<sup>298</sup> 最後，1928年6月，斯大林允許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連同大約40名反對派成員一起恢復原有的職務。<sup>299</sup> 但斯大林的僕從似乎在背地裏散佈謠言說，布哈林及其盟友在表決時反對重新接納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可以想見，這樣的謠言讓布哈林十分不安。格里戈里·索柯里尼柯夫與加米涅夫以及布哈林的關係都很密切，有一次，加米涅夫從卡盧加到莫斯科的時候，似乎把上述傳聞告訴了索柯里尼柯夫，而索柯里尼柯夫又單獨對布哈林講了此事，於是布哈林就請索柯里尼柯夫充當調解人。索柯里尼柯夫給身在卡盧加的加米涅夫寄了一封信，提供了自己在莫斯科的電話號碼；當加米涅夫在7月9日打電話時，索柯里尼柯夫就把他叫到首都與布哈林見面。

這件事在多大程度上是由狡猾的斯大林一手策劃的，又在多大程度上是被他利用的偶然事件，現在還不清楚。現在清楚的是，斯大林並沒有採取措施去平息這種挑撥離間的傳言。現在同樣清楚的是，在當時，與流放中的加米涅夫的任何接觸都要受到奧格伯烏的嚴密檢查或竊聽。不過，索柯里尼柯夫不是那種願意捲入斯大林的陰謀詭計的人。但加米涅夫呢？他能夠去莫斯科，而且沒有受到阻撓。斯大林甚至沒有收走他在克里姆林宮的住所——在那裏，7月11日上午，全會還在進行，加米涅夫再次接到索柯里尼柯夫的電話。「事態急轉直下，布哈林同斯大林徹底決裂了。」索柯里尼柯夫說，「撤職問題已經具體提出。加里寧和伏羅希洛夫背叛了〔布哈林〕。」這是個爆炸性的消息，是一個中央委員不計後果、不顧危險地對一個非中央委員在一條受到竊聽的線路上說出的。索柯里尼柯夫和加米涅夫有聯繫——他們是僅有的兩個曾經在黨的代表大會上要求解除斯大林總書記職務的人，而且索柯里尼柯夫可能還沒有放棄那個打算。加米涅夫很可能也還堅持那個想法，但他似乎也像季諾維也夫那樣，非常渴望自己能夠再次受寵，恢復與他的自我認知以及他的過去相稱的高位。在第二次通話後不久，索柯里尼柯夫就和布哈林一起出現在加米涅夫的家裏。（索柯里

尼柯夫是在布哈林之前離開的。)把自己與索柯里尼柯夫帶有密謀性質的談話記錄下來的加米涅夫，再次這樣做了，還說布哈林情緒激動，大罵斯大林。

「我們認為，斯大林的路線對於整個革命是致命的，」根據筆記，布哈林對加米涅夫說，「我們同斯大林之間的分歧，比我過去同您之間的所有分歧要嚴重許多倍。我、李可夫和托姆斯基對局勢的一致看法是：『如果我們現在在政治局裏有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而不是斯(大林)，那就會好得多。』」布哈林還說，他同李可夫以及托姆斯基開誠佈公地談過這一點，而他和斯大林已經幾個星期不說話了。「這是一個毫無原則的陰謀家，他把保持自己的權勢看得高於一切。他的理論變化總是服務於眼前要除掉甚麼人。」一起共事多年，布哈林仍然不知道斯大林既是一個堅定的左派，又是一個策略靈活的列寧主義者。但至少，布哈林明白的是，斯大林在七月全會上「作了讓步」，目的是「要置我們於死地」，而且斯大林「正在耍弄手腕，想把我們打成分裂分子」。布哈林還揭露說，斯大林裝成溫和派，「建議對沙赫特事件的當事人一個也不槍斃」，讓別人替他幹這件事，自己在一旁看着，同時還在所有的談判中作了表面上的讓步。不過，布哈林嘲笑斯大林在全會上的兩個重要的提法是「白癡那樣的無知」：從農民那裏收取的「貢款」和社會主義越是發展階級鬥爭就越是尖銳。加米涅夫要布哈林說明他的力量有多大，布哈林說有他自己、托姆斯基、李可夫、尼古拉·烏格拉諾夫以及一些列寧格勒人，但不包括那些烏克蘭人(斯大林用調走卡岡諾維奇的辦法「收買」了他們)，並說奧格伯烏的「亞戈達和特里利塞爾(Trillisser)是我們的人」，但「伏羅希洛夫和加里寧在最後關頭背叛了我們」。他還說，奧爾忠尼啟則「不是騎士。曾常來找我，破口大罵斯(大林)，而到關鍵時刻卻背叛了」，而「彼得格勒(列寧格勒)人……一談到有可能撤換斯大林便害怕了……非常害怕分裂」。<sup>300</sup>

\* 譯註：《蘇聯歷史檔案選編》第8卷，第300、303-305、309頁。

布哈林究竟是為甚麼要把如此機密、如此重要的事情告訴加米涅夫這樣一個不是政治局成員而且正在流放的人？布哈林並不幼稚。他坦率地警告加米涅夫不要給他打電話，因為知道自己的電話已被竊聽（證據顯示，斯大林有次給他看過季諾維也夫與妻子的親密談話的文字記錄）。<sup>301</sup> 他還告訴加米涅夫有人在跟蹤他們。但布哈林似乎已經絕望了。加米涅夫寫道，布哈林「常常因激動而雙唇顫抖。時常給人一種明知注定要失敗的人的印象」。<sup>302</sup> 因此，布哈林就冒險一搏。但他的行動也表明，他沒有放棄希望。他的主要目的似乎是要撇清說他反對加米涅夫復職的謠言，以便先發制人，防止加米涅夫和季諾維也夫被斯大林拉過去對付自己、托姆斯基以及李可夫。認為斯大林需要那兩個卡盧加的流放者，因此會讓他們復職，這個看法讓人想不通，但布哈林顯然以為，斯大林僅憑自己無法管理國家。<sup>303</sup> 布哈林也不相信斯大林派裏面有甚麼高人（他對加米涅夫提到「笨蛋莫洛托夫，他竟想給我上馬克思主義的課，而我們稱他為『石頭屁股』」）。因此，要是明顯在向左轉的斯大林準備拋棄布哈林、托姆斯基和李可夫，那在布哈林看來，這位格魯吉亞人別無選擇，只能召回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甚至也許還有托洛茨基。他們的會晤是基於可悲的誤會。

加米涅夫可能抱有類似的幻想，以為斯大林在左轉後需要他的幫助，但是對於加米涅夫而言，布哈林很可能被當成了達到目的的工具。<sup>304</sup> 布哈林告訴加米涅夫，「斯（大林）熟悉一種手段——報復，而且是從背後捅上一刀。可以回憶一下『甜蜜的報復』理論」。<sup>\*</sup> 後者指的是加米涅夫轉述的一件斯大林軼事，據說源自1920年代初的一次集體野餐，當時有人問世上最好的東西是甚麼——這屬於那種酒喝多了提出來的問題。據說加米涅夫的回答是「書」，拉狄克說是「女人，你的女人」，李可夫說是「干邑白蘭地」，而斯大林說是對敵人進行報復。<sup>305</sup> 顯然，在這件有着很多不同說法的軼事中，每個人都是公式化的：書生氣的加米涅夫、風流幽默的拉狄克、據說是酒鬼的李可夫、有仇必報的斯

716

---

\* 譯註：《蘇聯歷史檔案選編》第8卷，第306-307、309頁。

大林。但是，如果加米涅夫當時自己就在報復布哈林呢？畢竟布哈林在黨的第十四、十五次代表大會上猛烈地攻擊過他。如果加米涅夫當時自己就在討好斯大林呢？加米涅夫是個一流的陰謀家。他曾多次和斯大林聯手，包括巧妙地對付米爾賽義德·蘇丹—加利耶夫和穆斯林共產黨人的時候。加米涅夫構陷布哈林是可能的。他不僅把秘密會晤的內容記了下來，而且還把它們寄給了卡盧加的季諾維也夫。<sup>306</sup>

加米涅夫後來聲稱，他當時打算在莫斯科待一段時間，但卻迫不及待地要親自告訴季諾維也夫。也許真的如此。但是，像加米涅夫那樣的人，幹過15年布爾什維克的地下工作，並且諳熟蘇聯秘密警察的做法，難道會以為這樣的一封信，給季諾維也夫的一封信，不被會攔截並報告嗎？還有，加米涅夫說到布哈林的那些話，對布哈林來說極為不利。布哈林後來指責說，加米涅夫的筆記，「說得好聽點，寫的是片面的、有傾向性的，省略和竄改了許多重要的思想」。<sup>307</sup>索柯里尼柯夫後來說得比較準確：加米涅夫的筆記，「對於評估內部關係的尖銳性和尖銳化，表現出一種特別的興趣」。<sup>308</sup>

717 我們或許永遠也無法知道，加米涅夫是不是想用這樣一個古怪的、有傾向性的文件，去報復布哈林並修復自己同斯大林的關係。就算是那樣，主動提出在受到嚴密監視的克里姆林宮進行那種荒唐的密談的，也不是加米涅夫。布哈林和加米涅夫的密謀——加米涅夫當時顯然並不知道李可夫和托姆斯基是布哈林的盟友——是給斯大林送的一份厚禮。布哈林向非政治局委員泄露政治局的秘密，承認在設法解除斯大林的職務，而且是指名道姓。被叫去和斯大林私下會晤的李可夫發現，布哈林正在和已被罷黜的前托洛茨基同謀加米涅夫商討政治局的機密事務，要把總書記搞下台。李可夫跑到布哈林在克里姆林宮的住處，罵他是個「傻女人，不是政治家」。<sup>309</sup>斯大林可以依靠莫洛托夫，還有卡岡諾維奇，他們都是幹練而冷酷的組織者，是斯大林意志的執行者；李可夫有甚麼？托姆斯基是個堅強的鬥士，但已無招架之力，而布哈林，很可惜，對於他在政權中佔據的關鍵位置來說，缺乏足夠的政治謀略。由於加米涅夫的筆記，奧爾忠尼啟則也受到布哈林的連累——奧爾忠尼啟則忠於斯大林，但他或許並不討厭布哈林。奧爾忠尼啟則不得不在柯

巴面前為自己辯解。亞戈達也以書面的形式向斯大林解釋了布哈林提到的奧格伯烏支持解除總書記職務一事。這一切都源自有關布哈林反對加米涅夫和季諾維也夫復職的謠言。

### 未來的磚頭，現在的狠毒

劇變的跡象十分明顯。7月12日，莫洛托夫在蘇聯黨的全會結束時作了關於培養新專家的報告，指出蘇聯在科學實驗室和學習技術方面的落後狀況，而且還舉例說，莫斯科有一所學校的設備還是1847年的，教科書是1895年的。他透露說廣袤的俄羅斯社會主義聯邦蘇維埃共和國只有117名學生在攻讀技術學科的博士學位。當然了，秘密警察以及新聞界此時正在和莫洛托夫串通一氣，圍攻寥寥幾個真正合格的資產階級專家。<sup>310</sup>但斯大林並不算打算繼續受制於這些階級異己分子。在蘇聯黨的全會期間，中國共產黨結束了在莫斯科召開的第六次代表大會，那是中共首次在中國之外的地方召開的代表大會。84名代表出席了大會（毛澤東留在國內）。莫斯科正式同意建立獨立的中共軍隊——這件事其實已經在做了——但斯大林不願蔣介石發動的大屠殺，仍然堅持這些軍隊必須打着國民黨的旗號。蔣在繼續進行武力統一運動，並於7月6日從一個土匪出身的軍閥（指望得到日本人保護的張作霖已經向滿洲撤退，但在途中被炸死了）手中奪取了北京。斯大林仍在撲滅中共內部的托派觀點，儘管他此時正在國內推行某種托派觀點。<sup>311</sup>

718

只有最最敏銳的蘇聯政治研究者才能看透這個政權的迷霧。在讀了公開發表的斯大林對共產主義科學院的講話後——講話重複了這位專政者在西伯利亞秘密會議上所講的基本內容——被免職的臨時政府駐美大使鮑里斯·巴赫梅捷夫（Boris Bakhmeteff）1928年8月寫信給流亡的立憲民主黨同仁瓦西里·馬克拉科夫說，「這個獨裁政權不可能覺得穩固和安寧，因為國家經濟生活的主要領域，也就是農業，最終要依賴無數個體農民業主的善意」。巴赫梅捷夫認為，斯大林是「剩下的少數無可爭辯的狂熱分子之一……儘管大多數外國作家往往只是把他看作正在帶領俄國回到資本主義的投機分子」。他還指出，斯大林已經認識到，

就像對待工業一樣，「蘇維埃政權必須把農業生產掌握在自己手中」。巴赫梅捷夫進一步指出，被稱為富農的農民——「雖然他們實質上不過是擁有兩匹馬和兩三頭牛的傢伙，不是剝削者」——已經漸漸承擔起從前貴族農業的功能，生產統治當局急需的剩餘產品。巴赫梅捷夫對斯大林先前在1920年代中期與托洛茨基等人圍繞新經濟政策的爭論一笑了之，因為現在斯大林本人也開始打壓這些作為生產者的富農了。巴赫梅捷夫指出，這樣的做法從「馬克思主義的邏輯和共產主義學說」的觀點來看是正確的：需要由「麵包廠，也就是集體農莊和國營農場」來代替私人業主，「提供足夠的糧食，不讓政權受制於農民大眾一時的興致和情緒」。巴赫梅捷夫甚至明白，「可以察覺到黨內有一股反對斯大林新方針的潮流，這股潮流要比我想像的兇猛和湍急得多」。<sup>312</sup>

719 但是，就連巴赫梅捷夫，事實上就連政權內部的人，也沒有預見到斯大林向強制集體化和迅速工業化的大轉變會把重點放在對布哈林的百般羞辱上。7月17日，共產國際第六次代表大會在莫斯科召開（會議一直持續到9月1日），出席大會的有來自世界各地五十多個共產黨的五百多名代表。從1924年以來就沒有召開過共產國際代表大會，中斷的時間長得讓人尷尬。沒關係，斯大林又操起了一根棍子，對付自己的二頭同盟中的夥伴。早在斯大林剛從西伯利亞回來的時候，共產國際執委會的全體會議就揭露了所謂的右傾傾向。對於這種骯髒的活動，作為靶子的托姆斯基說，「每天抹上幾筆——這兒一點，那兒一點。啊哈！……憑藉這種聰明的把戲，他們把我們變成了『右派』」。<sup>313</sup> 布哈林已經不再去共產國際總部了，雖然他實際上仍是名義上的負責人。現在，斯大林的代理人在代表大會的走廊裏散佈流言說，布哈林待在領導崗位上的日子屈指可數了，他接下來也要被流放到阿爾馬—阿塔。為了報復布哈林這麼多年來的惡意中傷，托洛茨基在阿爾馬—阿塔也火上澆油，說布哈林在代表大會上發言時間的長短和他的決策權成反比。<sup>314</sup> 代表大會拖拖拉拉開了一個夏天。1928年8月，斯大林把莫洛托夫安插到共產國際執委會，以加強與「右傾主義趨勢」的鬥爭。<sup>315</sup>

對於布哈林為了限制自己的權力，甚至解除自己的總書記職務而作出的努力——那要追溯到1923年的山洞會議——斯大林感到不快，但

布哈林不是托洛茨基，對托洛茨基的敵意從1917年夏天托洛茨基加入布爾什維克的那一刻起就非常強烈，並且還變成了仇恨。斯大林一直把布哈林當作自己不曾有過的弟弟，甚至是當作兒子來看待，雖然他們之間只相差不到十歲。<sup>316</sup> 當布哈林和自己的鰥夫父親（一名退休的數學教師）一起住在有三間房的蘇維埃2號樓（大都會飯店），並把那裏變成年輕支持者和政治盟友的聚會場所時，斯大林也去過。1927年，斯大林讓布哈林搬進了克里姆林宮。布哈林的第二任妻子埃斯菲里·古爾維奇，一個擁有聖彼得堡大學學位的拉脫維亞猶太女子，從住在大都會飯店時就跟他分居了，但她當時和斯大林的妻子娜佳·阿利盧耶娃的關係變得密切起來。兩家的女兒都叫斯維特蘭娜，她們在祖巴洛沃4號別墅成為好夥伴。布哈林享有一項前所未聞的特權：來去祖巴洛沃都和斯大林一起乘坐他的帕卡德車。不錯，對於斯大林虐待娜佳，布哈林和古爾維奇非常瞭解，因此後來有傳言說，因為古爾維奇太瞭解斯大林的私生活，所以斯大林就離間她與布哈林的關係。（夫妻倆很快就分手了。）<sup>317</sup> 但這裏面的原因要深刻得多，涉及社會主義建設的戰略問題。儘管如此，他們之間的怨恨仍非同一般。斯大林強迫「理論家」布哈林撰寫代表大會的綱領性文件，然後為了羞辱他，又全都推倒重寫。共產國際的左轉是以布哈林的名義宣佈的。<sup>318</sup> 斯大林的狠毒是明面上的。

世界各地的左翼分子不可調和的分裂與內訌表現得也很可怕。將社會黨（非共產黨）污衊成法西斯分子幫兇的做法，在共產國際第六次代表大會上完全制度化了。意大利共產黨領導人帕爾米羅·陶里亞蒂（Palmiro Togliatti）不喜歡社會民主主義，但認為它的階級基礎（勞動群眾）與法西斯主義的階級基礎（小資產階級和資產階級巨頭）截然不同，因而反對「社會法西斯主義」的口號（「我們認為這種提法是絕對不可以接受的。我們代表團堅決反對這種對現實的歪曲」）。<sup>319</sup> 布哈林也說，「要是把社會民主主義和法西斯主義混為一談，那是錯誤的。」<sup>320</sup> 但是在莫洛托夫和斯大林的其他手下所控制的那種帶有脅迫性質的氣氛中，「社會法西斯主義」被其餘的左翼分子強行通過，與共產黨內部的「右傾」相互補充。<sup>321</sup>



共產國際代表大會期間，斯大林把自己原定於6月10日開始的定期到索契度假的時間推遲到8月2日。關於他在1928年的度假情況，現在還缺乏足夠的文獻資料。<sup>322</sup>我們知道的是，瓦列京斯基醫生帶來了著名的神經病理學專家瓦西里·韋爾濟洛夫(Vasily Verzilov)和治療專家弗拉基米爾·休羅夫斯基(Vladimir Shchurovsky)，但我們現在沒有他們的診斷報告。斯大林似乎經常抱怨肌肉和關節疼痛，這種疼痛在溫暖的硫磺浴中得到了緩解。他還跟這些醫生談到過農業和需要加強國營農場的問題，而這些顯然都是他當時正在考慮的事情。<sup>323</sup>

加米涅夫與布哈林至少又會晤了三次，儘管是為了他自己還是作為斯大林的雙面間諜，或者兩者都是，現在還不清楚。<sup>324</sup>國營農場的支持者加里寧，最終在全會上站到斯大林一邊，由此引發的傳言說，斯大林用一些不大光彩的材料威脅他(加里寧和一些芭蕾舞女演員私通，這是當時大家都知道的事情)。斯大林得知托姆斯基正在設法爭取總書記門下猶豫觀望的安德烈耶夫等人。證據顯示，斯大林在1928年8月寫信對莫洛托夫說，「無論如何都不能讓托姆斯基(或其他任何人)去『威脅』古比雪夫或米高揚」。<sup>325</sup>

721 由於在1928年7至9月恢復了糧食進口，蘇聯流失了大量黃金(價值1.45億盧布)和其他貴金屬(價值1,000萬盧布)。外匯儲備減少了約30%，只剩下3.3億盧布。沒有人會給蘇聯長期貸款，因此，日益嚴重的貿易失衡只能靠短期貸款來支撐，短期貸款續簽的代價很大而且沒有保證。蘇聯的外債攀升至3.7億盧布。<sup>326</sup>德國銀行開始懷疑延長短期貸款的期限是否明智；德國自身也遇到美國資本流的減少所帶來的麻煩。「外匯外貿和糧食收購這兩條危險的戰線上都出現了困難」，1928年8月23日，米高揚給在索契的斯大林(「親愛的索索」)寫信說。他聲稱，德國、美國和法國開始對蘇聯實行「貸款封鎖」，同時政界和工業界人士也因為形勢不明朗而在鼓動反對在蘇聯做生意。「這就要求必須削減進口計劃；我們得把疼的地方砍掉，」米高揚寫道，「就進口而言，我們今年發展的速度會大幅降低。」他要求更多地關注除糧食之外別的出口項目。至於「糧食戰線」，他認為收購情況非常緊張。<sup>327</sup>

當時，總危機的意識十分明顯。地球化學家兼礦物學家弗拉基米爾·韋爾納茨基 (Vladimir Vernadsky, 生於1863年) 1928年8月在日記中寫道：「從國外回來的人感到驚訝的是對戰爭的預期以及報刊上相應的宣傳」，「在農村裏他們說，戰爭就要來了，我們要對共產黨員、知識分子，一句話，要對城裏人進行報復。」<sup>328</sup>

斯大林活在自己的世界裏。「我認為貸款封鎖是事實！」8月28日，他給米高揚回信，「在糧食困難的情況下，我們本來應該估計到這一點。德國人對我們尤為有害，因為他們想要看到我們被徹底孤立，好讓他們更容易地壟斷我們與西方(包括與美國)的交往。」<sup>329</sup> 幾個星期後(9月17日)，或許是心情比較好，斯大林再次寫信給米高揚：「我在阿布哈茲。我們為你的健康乾了杯。」<sup>330</sup> 對於米高揚發出的警報的嚴重性，斯大林是不是完全清楚，現在還不明確。米高揚9月19日還給也離開莫斯科去度假的李可夫寫了信，談到開始出現的國際金融封鎖以及因此而不得不減少進口的情況。米高揚報告說，由於農民都湧到城裏來找吃的，列寧格勒排起了長隊，而烏克蘭的局部地區歉收也波及所有的相鄰地區，農民在到處尋找食物。長信的最後說，奧爾忠尼啟則的健康狀況惡化，醫生們甚至不能在診斷上達成一致。<sup>331</sup> 奧爾忠尼啟則被送到了德國治療。<sup>332</sup> 李可夫在月底前去了烏克蘭，檢查那裏的糧食救濟工作。「四年多來，我們一直在和烏克蘭的乾旱作鬥爭，」他在刊登在當地報紙上的一篇講話中說道，「我們所付出的顯然還不能被視為足夠有效。」<sup>333</sup>

722

但同樣是在9月19日，工業化的狂熱支持者瓦列里安·古比雪夫，在列寧格勒黨組織會議上說，工業的五年計劃即將開始，而且步子很大。「有人對我們說，我們在『過分工業化』，『咬得太多嚼不碎』，」對於李可夫等人的批評，他顯得不屑一顧，「但是，歷史不允許我們慢騰騰的朝前走，否則，明年就會引起一系列更加嚴重的反常現象。」<sup>334</sup> 憤怒的布哈林在《真理報》(1928年9月30日)上發表了題為〈一個經濟學家的札記〉的回應文章。文章表面上是不點名地針對「托洛茨基分子」，實際上是針對古比雪夫及其身後的黨的總書記。在要求均衡的、「避免

產生危機的]工業化的同時，布哈林預言說，完全取消市場再加上農民的強制集體化會造成不可測度的官僚習氣，結果會使黨垮掉。對於工業化「計劃」，布哈林用諷刺的口氣寫道，「不能用『未來的磚頭』建造『現實的』工廠」。<sup>335</sup>

然而，用未來的磚頭建造現在，正是斯大林的主張。他動筆寫了一篇文章，想要反駁布哈林的〈一個經濟學家的札記〉，但沒有寫完。<sup>336</sup>大概是他認為，跟布哈林進行公開的討論更好一些。斯大林從索契一回來，就因為李可夫、托姆斯基和布哈林的反對言論，讓政治局責備《真理報》未經中央同意就擅自發表文章。<sup>337</sup>布哈林指出的問題也無法緩和斯大林的態度。「不管糧食收購進行得多好，它們都不會消除我們困難的基礎——它們可以讓傷口癒合（我想，它們今年就可以讓傷口癒合），但它們不能把病治好，除非機械化提高了我們土地的生產率，並把農業在新的基礎上組織起來，」9月26日，斯大林從索契給米高揚寫道，「許多人以為取消非常措施和提高糧價會成為消除困難的基礎。布爾什維克中空虛的自由主義分子的空想！」<sup>338</sup>

1928年秋天，農村開始第三波強制的糧食收購，力度比第一波（1-2月）和第二波（4月底-7月初）還大。<sup>339</sup>這種壓力所激起的農民的抗議活動規模之大令政權始料未及。到這一年結束之前，政權正式宣佈，在大城市開始實行配給制。<sup>340</sup>預期的由於種子、化肥、拖拉機以及其他機械方面的改進所帶來的更高的產量，以及認為集體化的農業會勝過私人的個體農業的看法都不見了蹤影。斯大林繼續拒絕布哈林關於辭職的牢騷，同時公開抹黑右傾分子，說他們對黨構成了嚴重的威脅。「不是直截了當地對我說，『我們不信任你布哈林，我們覺得你推行不正確的路線，讓我們分手吧！』——我也建議這麼做——，然而採取的是另一種做法。」布哈林在不久後猜測說，「因為首先必須羞辱、侮辱、敗壞名譽、踩在腳下，然後問題就不是滿足辭職的要求，而是『因怠工』而『解職』。這裏的遊戲是絕對清楚的。」<sup>341†</sup>

\* 譯註：《布哈林文選》，第394頁。

† 譯註：《布哈林文選》，2014年版，第512頁。



調解人奧爾忠尼啟則從德國治療回來後，於1928年11月給情緒低落、再次想要辭職的李可夫寫了一封長信。「在跟您還有其他同志(斯大林)談過之後，我覺得不存在根本的分歧，而這是最主要的」，奧爾忠尼啟則寫道——真是荒唐。更荒唐的是，他還說，「我坦率地懇求您促成布哈林與斯大林的和解」——就好像那是李可夫權力範圍內的事情似的。李可夫怎麼想？奧爾忠尼啟則是個強硬的布爾什維克，一個完全按照高加索的習慣做事的格魯吉亞人，一個在無父無母的環境下成長起來的人，一個出了名的容易發火、脾氣暴躁的人，但是，在他身上一點也沒有斯大林那種極端的報復心理。而且奧爾忠尼啟則雖然和大家一樣，跟斯大林關係很近，但此時卻似乎並不理解他，或者說不想去理解他。他以為政治局內部難以消弭的不和只是因為最近的糧食收購運動，而沒有意識到如此沉重的高壓政策是新的永久性的現實，沒有意識到斯大林把該政策的批評者一律視為敵人。<sup>342</sup>

斯大林沒有放過尼古拉·烏格拉諾夫。烏格拉諾夫曾經是斯大林的門徒，是斯大林把他提拔到莫斯科黨組織首腦的位置，而且他還是迫害托洛茨基分子的不可或缺的人物，但烏格拉諾夫公開站在布哈林一邊，結果全能的莫洛托夫在11月底頂替了他的職務。就在那個月，布哈林終於得到了與斯大林會晤的機會，他對此期盼已久。會晤持續了六個小時。據米高揚說，布哈林對斯大林講，他「不想爭鬥，因為那樣會對黨造成傷害。假如開始爭鬥，你們就會宣佈我們背叛了列寧主義」。布哈林還說：「但我們會把你們稱作饑荒的組織者。」<sup>343</sup>然而斯大林是不會動搖的：在到西伯利亞視察的時候，他就宣佈自己的目的是要把國家推向反資本主義的方向，而自從回到莫斯科，他就對一些親密的政治盟友和朋友表現出令人不寒而慄的狠毒。



尾聲

如果當初斯大林死了



他後來是這麼辦的。他會在1928至1933年，在擁有一億多人口的蘇聯農村和遊牧民族生活的草原強制推行集體化——這是在第二卷講的故事。至少有500萬人，其中許多都是俄國最能生產的農民或牧民，會被當作富農「打倒」，也就是關進牛車，扔到遙遠的、荒無人煙的地方，而且往往是在冬季；那500萬人中，有些人為了免遭驅逐，趕緊自己打倒自己，變賣或放棄財產。那些被迫加入集體的人，則燒毀莊稼、宰殺牲口和暗殺官員。<sup>1</sup>政權的城市突擊部隊粉碎了農民的抵抗，但全國的馬匹存欄數從3,500萬驟降到1,700萬，牛從7,000萬頭降到3,800萬頭，豬從2,600萬頭降到1,200萬頭，綿羊和山羊從1.47億隻降到5,000萬隻。在哈薩克斯坦，損失更為驚人：牛從750萬頭減少到160萬頭，羊從2,190萬隻減少到170萬隻。全國有近4,000萬人遭受嚴重的饑餓或饑荒，有500萬至700萬人死於可怕的饑荒，政權不承認有過的饑荒。<sup>2</sup>「狗都被吃光了，」在烏克蘭的一個村子，有人對一位目擊者說，「我們吃掉了所有能弄到的東西——貓、狗、田鼠、鳥。明天天亮，你會看到樹皮被人剝了，那也是被吃掉了。馬糞都吃。是的，馬糞。我們還搶呢。有時候那裏面有整粒的糧食。」<sup>3</sup>

要推動一個農業國家進入現代社會，斯大林就必須實行集體化，持這種觀點的學者完全是錯誤的。<sup>4</sup>同帝俄一樣，蘇聯要想在殘酷無情的國際秩序中生存下來，就必須現代化，但事實證明，市場制度與快速的工業化是完全兼容的，即便在農民國家也是如此。只有從共產主義意



識形態和反資本主義的角度來看，強制的全盤集體化才似乎是必要的。而且從經濟上來說，集體化並沒有收到預期的效果。斯大林以為，集體化既可以讓國家收購到更多低價的糧食，又可以提高總收成，但收購的糧食雖然迅速翻了一番，可收成卻減少了。長遠來看，集體農業其實並不比大規模的資本主義農業更優越，甚至都比不上小規模的資本主義農業，只要給後者提供機器、化肥、農學知識以及暢通的銷售渠道。<sup>5</sup>短期來看，集體化對蘇聯工業的增長沒有任何實質貢獻。<sup>6</sup>

集體化對於維持專政也沒有必要。私人資本和專政是完全可以兼容的。在法西斯意大利，實業家保留了巨大的自主權。同斯大林一樣，墨索里尼不願對國內就業的負面影響，支持消除通貨膨脹和國際收支逆差，因為他也認為，政權聲譽的關鍵在於「強」通貨。對墨索里尼來說，經濟學也要服從他的政治權力，可他並不信奉階級鬥爭之類的左翼意識形態。他要的只是實業家認可自己在政治上的最高權威。雖然里拉在1927年12月21日升值了（實業家對此曾堅決反對），出口也減少了（失業率一下子上升到至少10%），但墨索里尼仍然得到了認可，因為他拒絕了法西斯工團派的要求，沒有把生產和消費強行置於國家的保護下。相反，法西斯政權降低了國內工業的稅負和運輸成本，提高了對折舊和攤銷的補貼，政府合同優先考慮國內生產商，鼓勵工業集中以減少競爭和維持利潤水平，提高關稅，並分擔與意大利海外工業負債有關的匯率風險。<sup>7</sup>意大利的專政並沒有着手摧毀國內在經濟上取得成功的人。如果那些人愚蠢到露出要充當政治反對派的苗頭，很快就會被關進監獄。這樣說決不是要把意大利法西斯主義奉為楷模，只是想表明，當時並沒有任何東西妨礙共產黨專政接納私人資本——除了一些頑固的成見外。

726 世界經濟形勢的逆轉也沒有使集體化成為迫不得已的選擇。<sup>8</sup>全球商品價格的下跌對蘇聯的打擊確實很大，因為它減少了蘇聯糧食、石油、木材和糖的出口收入，但是在1928年1月20日的西伯利亞重要講話中，斯大林沒有提到此類情況並且指出那是令自己作出決定的一項原因。如果全球貿易狀況對初級產品的生產者有利，難道斯大林那天在新西伯利亞就會說讓我們發展使用私人僱傭勞動的、大規模私有富農農

莊嗎？看看全球糧食的高價吧，我們永遠也不會讓農民集體化！如果蘇聯在1927至1928年從國外獲得充足的長期貸款，難道斯大林就會說讓我們大力發展國內市場嗎？即使黨的壟斷地位受到威脅又怎樣！一種有害的看法認為，國際資本主義導致斯大林訴諸極端暴力並建立殘酷的命令體制，以實施對商品出口的控制，從而為工業化提供資金。這種看法忽視了大量豐富的證據指向了意識形態的顯著性，包括一開始意識形態在惡化蘇聯國際地位方面的影響。1920年代的蘇聯國內對於如何實現現代化有過爭論，但爭論的內容非常有限。在爭論中，一些重要的選項被排除了。<sup>9</sup>

因此，不能簡單地認為，集體化不過是俄羅斯國家臭名昭著的鐵腕統治的又一實例，因為這是一個以農民為主的國度——屬於和加拿大差不多的北方氣候——農業季節只有125天，時長大概是歐洲農業季節的一半，而歐洲的畝產更高。認為幾百年來俄羅斯國家在國內一直是野蠻的軍事佔領者，這樣的看法是片面的：亞歷山大解放了農奴，斯托雷平的農民改革是自願的。斯大林的動機不只是要和更幸運的歐洲對手競爭。同斯托雷平一樣，斯大林要的是合併的、彼此相連的農莊，不是村社那種小而分散的條地，但他不是像斯托雷平那樣，把寶押在獨立的自耕農（富農）身上。國外的布爾什維主義的批評者敦促舊政權的專業人員為蘇維埃政權服務，目的正是要從內部去改造它，建立俄國的民族主義秩序並全面復辟資本主義。<sup>10</sup>這樣的希望是斯大林所擔心的。集體化會讓共產黨人控制住廣大的農村，這在以往的俄國政權是想都不敢想的事情。但更重要的是，集體化就像國營和國有的工業一樣，構成了某種形式的表面上的現代化，否定了資本主義。因此，斯大林的確是「解決」了布爾什維克的難題——用列寧在最後一次公開演講中的話說就是，怎樣把新經濟政策的俄國變成社會主義的俄國。<sup>11</sup>

727

---

<sup>9</sup> 譯註：《列寧全集》第43卷，第302頁。



歷史總是存在不同的選項。因此，問題在於，列寧主義革命的內部是否存在不同的選項？尼古拉·布哈林在和斯大林走得很近、結成政治同盟的時候，考慮過新經濟政策背後這個有趣的問題。「過去我們認為，我們可以一舉消滅市場關係，」布哈林在《到社會主義之路和工農聯盟》中寫道，「而實際情況表明，我們恰恰要通過市場關係走向社會主義。」甚麼，再說一遍？「這些市場關係將由於其自身的發展而被消滅。」<sup>12</sup> 確切地說，怎麼消滅呢？好的，布哈林解釋說，在資本主義條件下，大的實體在市場競爭中最終會壓垮小的實體，因此，按照蘇聯的情況，國家控制的大公司以及合併起來的農民合作社，會擠垮小型的私人農莊。<sup>12</sup> 這一咒語的某種版本——說蘇聯可以通過新經濟政策以某種方式「長進社會主義裏面」——在黨內的許多小集團中生了根。但是，號召農民「發財吧！」，因而不經意間表明，通過市場不可能長入反資本主義(anticapitalism)的那個人也是布哈林。<sup>13</sup> 當然，就像任何農民都會告訴他的，就像許多人寫信給《真理報》——那是布哈林主編的——以及其他報紙說的，農民剛取得一點成功，就要受到懲罰性稅收的無情壓榨。而在1928年，由於糧食收購不足，勤勞的農民還受到了刑事處罰。當武裝徵糧隊從阿克秋賓斯克省的B. 邦達連科(B. Bondarenko)那裏沒收了8頭公牛、7頭母牛、4頭牛犢、3匹馬、36噸小麥、1輛馬車、1台打穀機和1座磨坊，同時還判了他一年監禁時，邦達連科要求主審法官說明定罪的依據，因為他沒有犯罪。「我們的目標就是要打倒你這種富農」，法官呵斥道。<sup>14</sup> 這就是那個改變了許多人命運的提法。

通過自身不大不小的成功，新經濟政策在製造富農，而富農進而又帶來豐收。1928年7月11日，加米涅夫在與布哈林見面時，尖銳地問他準備怎樣搞到糧食，記錄下來的回答是：「富農消滅多少都可以，但必須同中農和解。」<sup>†</sup> 但在官員們按照相同的階級分析作出這樣決定的農

\* 譯註：《布哈林文選》2014年版，第280頁。

† 譯註：《蘇聯歷史檔案選編》第8卷，第305-306頁。

村，一個農民，1925年有3頭牛，1928年有了6頭牛，就一下子成了登記在冊的「階級敵人」。在乳品業中心沃洛格達——沙皇時代，斯大林在那裏流放過幾年——單是在1927至1928年，富農的數量就從6,315猛增到8,462，新的「吸血鬼」有二千多，而當時該省的農村黨員只有2,500人。<sup>15</sup>政權的商品糧依靠的只是200萬農戶，他們每戶耕種的土地超過8公頃。<sup>16</sup>這是很大一部分人口——不是布哈林說的只佔富農的3%到4%——他們因為自己的辛勤勞動而很容易被再次劃為階級敵人。包括布哈林在內的所有布爾什維克高層都贊同的那種階級分析，事實上保證了新經濟政策要是成功，就必定失敗。

布哈林沒有提出真正有別於斯大林的選項，他甚至沒有考慮到自己缺乏政治影響力，缺乏有組織的權力基礎。名望更高也更有能力的人物是新經濟政策最重要的支持者阿列克謝·李可夫。主持政治局會議並在黨的第十五次代表大會上作開、閉幕講話的正是這位有權威的李可夫。作為一個有天賦的行政管理者，他的才能令加米涅夫相形見绌，季諾維也夫和托洛茨基也望塵莫及。李可夫「合群而且熱心，經常到下屬的家裏拜訪，哪怕他們並不是共產黨員，」從1906年起就認識他而且革命後在他手下工作的西蒙·利伯曼(Simon Liberman)說，「他喜歡和他們一邊喝酒，一邊海闊天空地聊天。輕微口吃讓他比他的大多數令人生畏的同事隨和了很多。」<sup>17</sup>利伯曼想像中的那個熱心而親切的外省醫生，不是那個一心想報復托洛茨基，並在與反對派的內鬥中從不猶豫動搖的李可夫。據說李可夫經常喝酒喝多了——就像一則惡毒的笑話說的，「托洛茨基在遺囑中要求，等他死了，要把腦子保存在酒精中，腦子給斯大林，酒精給李可夫」——可該傳言是否屬實，現在並不清楚。李可夫是個強硬的布爾什維克，但屬於比較穩健的那種，贊成財政紀律，主張量入為出。對於小規模農業最終必然會被大規模的機械化農莊取代，對於現代化農莊會是「社會主義的」(集體化的)農莊，他沒有懷疑，但他也很看重新經濟政策階級調和的主張所帶來的穩定局面。他的立場，與其說是新經濟政策會把資本主義冶煉成社會主義(布哈林)，不如說是強制集體化根本做不到，因為任何那樣的企圖都只會毀掉自內戰和饑荒以來取得的進步，帶來新的災難。

事實證明，李可夫對強制集體化破壞穩定的可怕後果是有先見之明的，但他除了堅持正在走下坡路的新經濟政策，不知道還有甚麼別的辦法。不過，在李可夫手下工作多年的另外一個人倒是知道一點，他就是格里戈里·索柯里尼柯夫。與布哈林是高中同學的索柯里尼柯夫以溫和、理智著稱。在布爾什維克當中，他屬於出身比較富裕的那一群，比如克拉辛、契切林、拉柯夫斯基，而這在政治上會有點問題。但他的財政人民委員的工作事實上幹得很好。在布哈林和斯大林聯手重創聯合反對派時，索柯里尼柯夫與專政者發生了衝突，因為他堅持要求在處於壟斷地位的共產黨內部進行公開的辯論，包括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也有公開辯論的權利，雖然索柯里尼柯夫在經濟政策上根本不同意他們的主張。即便在布哈林「發財吧」的講話引發了風波之後，索柯里尼柯夫也沒有縮回去不再稱頌市場關係。當然，和《農民報》的創辦者兼主編雅科夫·雅科夫列夫不同，索柯里尼柯夫走得不算遠，還沒有鼓吹政權應該讓農民把他們實際擁有的土地登記為私有財產，可以買賣或繼承。但索柯里尼柯夫堅持認為，市場，至少是農村地區的市場，可以和社會主義兼容——不但在目前這一艱難形勢下是兼容的，而且永遠是兼容的。他還堅持認為，所謂的富農是好農民，不是敵人。

索柯里尼柯夫贊成李可夫和布哈林堅持的與市場均衡兼容的工業化方式，但他走得遠多了，以至於明確拒絕了誘惑着幾乎所有共產黨人的那種幻想，即包羅一切的經濟計劃在實踐上是可以做到的。（索柯里尼柯夫考慮到保持協調不太可能。）<sup>18</sup> 當然，財政人民委員部和其他部門幾乎所有的非布爾什維克專家都在這麼說，可索柯里尼柯夫是中央委員。他不是主張搞資本主義——很難想像那時怎麼可能會有布爾什維克這麼做還能留在領導崗位上——而要實行他的市場社會主義也不會容易。蘇聯的黨國體制在制度上不具備靈活管理市場經濟所必需的很多能力（索柯里尼柯夫除外）。新經濟政策的混合市場經濟尤其如此，它需要對價格管制和利用國家權力打擊私商對國家宏觀經濟造成的影響有敏銳的理解。<sup>19</sup> 但是，除了1928年1月斯大林在新西伯利亞宣佈的道路，其他任何選項的必備前提都是：接受市場，拋棄計劃的幻想。

在1926年初把索柯里尼柯夫趕出政治局和財政人民委員部的時候，斯大林任命他為國家計劃委員會副主席——儘管斯大林明明知道他不相信計劃——但索柯里尼柯夫的事業並未到此為止。1927年5月，他作為蘇聯代表團的成員參加了國際聯盟在日內瓦召開的世界經濟會議，並在會上實事求是地獨立發表了關於蘇聯經濟和社會主義的講話。很顯然，這次講話至少給一些外國聽眾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索柯里尼柯夫擁有巴黎大學博士學位，法語講得比布哈林還好。）索柯里尼柯夫認為，蘇聯的工業化模式在協調性和群眾參與方面獨具一格，但他呼籲加強資本主義世界與蘇聯之間的貿易和合作，尤其是以外國投資的形式來加強。<sup>20</sup> 據《真理報》報道，一名瑞士記者兼左翼同情者評論說，從「這個資本主義經濟體的國會的所有席位」上，都傳來了掌聲，「就連英國人也鼓掌贊成索柯里尼柯夫的演說。」<sup>21</sup> 在黨報的這種正面評價之後，1927年夏天，索柯里尼柯夫與反對派決裂。<sup>22</sup> 1927年12月，斯大林在第十五次代表大會上讓索柯里尼柯夫重新當選為中央委員，這對於一名曾經的反對派成員來說，可謂是絕無僅有。1928年春天，斯大林讓索柯里尼柯夫改任石油托拉斯主席；石油出口開始帶來大量的預算收入。

不過，索柯里尼柯夫畢竟是個人，不是派別。軍隊高層沒有一個是忠於他的；格伯烏高級特工沒有一個是為他工作的；他沒有歸自己掌握的克里姆林宮的電話網絡（維爾圖什卡），除非有電話找他；他是中央的一員，卻無權以中央的名義發佈指示。索柯里尼柯夫在斯大林的庇護下，一度享有最大的影響力，而現在，他贊成市場、反對計劃的立場也需要有個政治上得力的庇護者，比如李可夫。由李可夫和索柯里尼柯夫組成的領導集體，既有政治影響又不缺乏才智，本可以成為在斯大林之外真正的替代選擇，只要李可夫和執政聯盟中的其他人轉變看法，在農村的反資本主義問題上作出讓步。這樣的一種可能性會帶來一些重要的疑問：政權能在城市實行一種制度（社會主義），而在農村又實行另外一種制度（小資產階級的資本主義）嗎？這樣一種安排能容得下城市的社會主義嗎？到頭來，共產黨會不會被迫放棄自己的政治壟斷，而且，要是那樣的話，李可夫—索柯里尼柯夫的領導集體會不會答應，或者能不能留下來？李可夫和斯大林的關係比和索柯里尼柯夫近

得多，而且根本不理解市場的意義，那他會接受索柯里尼柯夫作為夥伴嗎？<sup>23</sup>

當然，斯大林個人專政的存在，意味着在他偏好的道路之外任何實際的而不只是在頭腦中思考的選項，都得要戰勝他的權力才行：要麼是由於他那一派成員的背叛而在投票中擊敗他，要麼是解除他的職務。布哈林試過這樣的辦法但沒有成功，李可夫在斯大林提出辭職從而出現機會的時候沒有抓住。李可夫的行為大概是出於政治上的自保，是忌憚斯大林的權力和有仇必報的性格。不過，李可夫和政治局的其他人開始明白，斯大林這人不僅脾氣暴躁、自以為是、陰沉和愛記仇，而且是個內心強大、從不屈服的共產黨人和領導者，完全忠於列寧的思想，能夠肩負起整個機關，肩負起這個國家，肩負起世界革命的事業。<sup>24</sup>斯大林有戰略頭腦。這種戰略頭腦有其殘酷之處，比如出於政治和施虐的目的而試探布哈林的弱點，但對於管理民族事務和地區性的黨的機器也能收到很好的效果。再說，斯大林周圍的那幫人都比不上他。奧爾忠尼啟則不是戰略家，況且身體一直不好；伏羅希洛夫根本不像軍人，他也明白這一點；基洛夫有公共政治家的風度，但為人懶散而好色；卡岡諾維奇有組織才能，可幾乎沒有受過教育；米高揚崇拜斯大林，不只是因為他想要向上爬，還因為年輕；加里寧被低估了，但也決不能和斯大林相提並論；莫洛托夫在政治上有些能量，但就連他也活在斯大林的陰影中。斯大林的缺點決非小事，但完全沒有他的領導能行嗎？

732 最後，李可夫或許是希望斯大林會明白，強制轉向是愚蠢的。但斯大林會指控布哈林和李可夫沒能接受他們自己的列寧主義邏輯。如果蘇聯需要在合併農莊的基礎上實現農業的機械化（它的確需要），如果認為這一點最終應當在社會主義（非資本主義）的框架內進行（高層幾乎所有人都這麼想），如果農民不肯自願加入集體農莊（他們不肯），那列寧主義的結論是甚麼？要麼沒收農村的生產資料，要麼，從長遠來看，準備放棄黨的壟斷地位，因為按照馬克思主義學說，階級是政治的決定因素，而新資產階級的迅速發展必將帶來政治上的後果。「在階級問題上，他是毫不動搖、勢不兩立的，」斯大林到西伯利亞視察的時候，正在烏克蘭的黨的機關中不斷高升的官員尼基塔·赫魯曉夫

(Nikita Khrushchev) 後來回憶說，「這是他最堅強的品質之一，為此他受到人民極大的尊敬。」<sup>25</sup>



歸根結底，不同於斯大林的主要選項是，主動放棄布爾什維克政權，或者不得已讓布爾什維克政權陷入混亂——斯大林自己就差點兒引起這種混亂，並且不只是因為集體化。

世界各地的威權主義統治者幾乎都不會膽大到跟列強對抗，從而將其個人的政權置於危險之中。他們追逐私利，任人唯親，妻妾成群，表面上鼓吹民粹主義，說是要維護祖國的利益，背地裏卻把祖國出賣給歐洲人或外國佬，中飽自己和下屬的私囊。例如拉丁美洲的獨裁者就是這方面的典型。當然，蘇聯自以為是世界強國，世界革命的中心，但它也是一個農民國家，內戰和饑荒的傷痛猶在，卻要對抗整個世界。布爾什維克通過政變創造了被資本主義包圍的條件，接着繼續用一種把自身處境變得越發艱難的方式行事，在他們通過艱苦鬥爭才贏得外交承認並且尋求更廣泛貿易往來的國家發動政變。但如果說，俄國在世界上面臨的挑戰一向很大，在既沒有盟友也沒有真正朋友的共產黨政權的統治下變得艱巨了，那由於斯大林強硬的挑釁姿態，挑戰會變得更加艱巨。

除了之前俾斯麥統一德國和日本明治維新所帶來的震撼——日本的挑戰增加了——除了與全球性的英帝國的長期競爭，當時還出現了一系列令人震撼的新情況：在從前的帝俄版圖內，出現了若干個反蘇國家，即波蘭、芬蘭、波羅的海國家以及大羅馬尼亞這些「邊陲國家」。此外，德、美、英、法甚至意大利都擁有世界領先的工業技術，而蘇聯一直想要利用資本主義分子的貪婪，以技術援助合同的形式，花大價錢換取先進的機器以及在安裝和操作這些機器上的幫助。這其實沒起作用。斯大林考慮過承認沙皇時代的債務，以便同法國達成協議，但他不喜歡依賴外國的銀行家或是為了讓步而改變蘇聯國內的政治安排。在為了得到大額貸款和投資而剛剛重啟與德國的談判之際，他如同要挑釁似的，逮捕了沙赫特這一捏造的事件中的德國工程師，震驚了柏林和其他國家的政府。1928年夏末，《真理報》以冷峻的語氣寫道，沒有外



國的幫助，蘇聯將不得不依靠「我們自己的力量」。<sup>26</sup> 可單憑自己的力量是一種妄想，紅軍會被更先進的技術打垮。

在集體化的過程中，斯大林不但失去了大量最高產的農民和一半的牲畜，而且沒能把蘇聯工業化所急需的包括農用拖拉機在內的機器設備騙到手，可他要是不這麼做，他的統治就有斷送列寧主義革命的危險。但是，一起偶然事件挽救了他輕率的賭博。1929年9月4日，紐約股價開始下跌；10月29日，市場崩潰。諸多結構性因素以及政策失誤將這場金融混亂演變為大蕭條。到1933年，美國的工業產值下降了46%，德國41%，英國23%。美國的失業率達到25%，別的國家更高。國際貿易量減少一半。建設實際上陷入停頓。全世界的不幸成了斯大林未曾料到的大好機遇。

當然，按照馬克思主義思想，這決不是偶然的：資本主義按其本性來說就容易大起大落，市場經濟造成了蕭條、資本配置不當和大規模的失業，而對於這些問題，據說解決的辦法就是計劃。可大蕭條這種規模的資本主義危機是前所未有的（而且在那以後再沒有發生過）。此外，大蕭條發生的時間剛好是在集體化和打倒富農運動開始之後，這對斯大林來說，是好得不能再好了。這一結果是意外的收穫。新建或徹底翻修的一千多座工廠的圖紙和先進的機器，幾乎都來自國外。<sup>27</sup> 大蕭條讓斯大林有了巨大的優勢：蘇聯人需要資本主義分子的先進技術，而資本主義分子突然間同樣需要蘇聯的市場。要是沒有大蕭條，資本主義分子難道還會那樣不顧一切地想要得到蘇聯的市場嗎？實際上，資本主義列強不僅把最好的技術賣給了這個共產黨政權，甚至在發現蘇聯人違反合同，把為一個工廠購買的設計用於其他工廠後——外國公司的內部記錄以氣憤的語氣記載了大量諸如此類的欺詐行為——列強還繼續這麼做；資本主義分子大量的資本貨物 (capital goods) 找不到其他買主。有些學者恰好把事情顛倒了，認為莫斯科當時面對的是「不願合作的世界經濟」。<sup>28</sup> 意識形態和黨的壟斷是限制條件，而使事情得以可能的則是當時的全球經濟。實際上，全球性的經濟危機乃是雙重的大禮。沒有甚麼比它對斯大林體制的合法化幫助更大了。但斯大林根本沒有料到大蕭條即將來臨，沒有料到大蕭條會讓外國資本主義分子屈服。

大蕭條讓我們忘記了斯大林的賭博究竟有多麼瘋狂——那是和列寧的十月政變、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條約以及新經濟政策一樣大的，甚至更大的賭博。對於強制的全盤集體化，別說是這個國家，就連共產黨都沒有做好準備。當然，斯大林可以利用警察機關的力量讓黨服從，但他還需要組織一場高調的公審，把「階級鬥爭」之火煽動起來。隨着沙赫特審判而開展的大規模動員運動，導致很多合格的工程師被捕，而工程師在當時是非常緊缺的，是政權雄心勃勃的工業化所急需的人才。<sup>29</sup> 清理掉據說是對抗當局或故意破壞生產的工程師所造成的混亂，要比這些所謂的破壞分子可能造成的混亂還要嚴重。無論是集體化還是階級鬥爭運動，斯大林都需要得到他自己的核心圈子的支持，而這一點只是在事後看起來才好像比較容易。

沙赫特審判以及相關的舉措，似乎為斯大林的個人專政提供了權力，一方面可以克服集體化在黨的官員中的阻力，另一方面可以鞏固政權的基礎。這項任務的緊迫性不僅在於要駁斥托洛茨基的批評——托洛茨基說斯大林的政權是工作人員的政權——還在於斯大林真的相信社會的基礎是工人階級。此外，許多年輕人，尤其是斯大林正在試圖團結的那些年輕人，還在暗中同情托洛茨基。<sup>30</sup> 總的說來，由於革命並沒有帶來富足與公正，蘇聯社會已經瀰漫着失望的情緒。警察機關的報告中記載的「反蘇維埃」事件，實際上絕大多數都是老百姓在要求或希望政權實現社會主義目標。對「國父列寧」的懷念，從渴望兌現革命承諾的角度來說是可以理解的，儘管這忽視了列寧統治時期的一些殘酷的事實。沙赫特審判有望成為一個契機，找回人們從前的熱忱。不過，從農村到廠礦的所有這些重大的變化，未必都是對斯大林有利的。他在用所有的一切，包括他的個人權力，來冒險。

735



對於傳主的描述，常常說他們的個性，包括他們關於權威與服從——也就是，關於權力——的看法，是在童年而且特別是在家庭中形成的。但是，我們真的需要把斯大林的政治觀點，甚至是他苦惱的靈魂的源頭，追溯到據說他童年時在哥里挨揍的經歷嗎？挨揍很可能是根

本沒有過的事情，通常描述的那種程度的挨揍肯定是沒有，但即便有過那又怎樣？同樣，梯弗利斯神學院令人難以忍受的監視、告密與專橫，是不是斯大林一生中對其個性的形成有着重要影響的經歷呢？那種培養神職人員的地方也是暴君和告密者的溫床，但君主專制下的整個俄國都是如此，而且格魯吉亞的許多最溫和的孟什維克和斯大林是出自同一所學校。不可否認，他和勇敢的拉多·克茨霍維里的深厚感情以及後者過早地死於沙皇獄卒之手，對他的影響很深，幫助他堅定了對於馬克思主義的終身信仰。作為一名忠於列寧的布爾什維克，斯大林與格魯吉亞社會民主黨內佔壓倒多數的孟什維克的長期鬥爭也對他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並喚醒了他心中的魔鬼。換言之，斯大林那些明顯的、影響他作出重大政治決定的個性特徵，是政治鬥爭的結果。用政治鬥爭來解釋斯大林的個性，並不只是因為這樣做比較方便（因為關於他的早年生活和內心世界，缺少充足而可靠的資料）。斯大林從列寧那裏繼承了個人專政的可能性，但他在成為列寧繼承人的鬥爭中經受了嚴峻的心理考驗。

為了除掉托洛茨基，斯大林多年來煞費苦心——他們之間的激烈競爭始於1917年，內戰期間變本加厲，近乎水火不容，而在列寧重病後則左右了黨內的思想生活。與托洛茨基的鬥爭對斯大林的性格影響很深。圍繞列寧口授文件的鬥爭對斯大林的影響同樣也很深刻。從1923年5至6月開始，斯大林捲入了為期數年的內鬥，在此期間還突然冒出了所謂的列寧「遺囑」，而且它一再出現，不肯消停。他利用自己掌握的多種權力工具，對那些與自己意見不合的人窮追猛打，可他總覺得自己是受害者。這是否與某種由來已久或者新近產生的被害妄想症有關，鑒於現有的資料來源，目前還無法確定。但我們可以肯定地說，與反對力量——不僅指托洛茨基、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還包括遺囑——的自相殘殺的政治鬥爭，揭示了這種行為的根源。

說到底，「繼位之爭」就是與一紙文書的鬥爭——幾行打印的話，沒有署名，也沒有確認身份的首字母縮寫。斯大林挫敗了遺囑提出的建議，但遺囑引起的反響是壓制不了的：斯大林這人是危險的；應該想辦法解除斯大林的職務。他只好一次又一次地提出辭職。他和他們達

成了停火協議，可他們卻讓遛囉登上了《紐約時報》。他無法相信任何人。儘管這樣，所有的事情仍然要他負責。所有的事情都扛在他的肩上。但他們領他這個情嗎？讓他們去做得更好吧。他們再次確認了他的領導地位。但這絕對不夠。

封閉而又愛好交際、記仇而又懂得關心人的斯大林，粉碎了想把他的限制在二元結構內的所有企圖。他生性專橫，但要是願意，也會表現得很有魅力。他是理論家，卻很靈活務實。他對受到的輕慢耿耿於懷，可他是一個早熟的地緣政治思想家，在布爾什維克當中獨一無二，不過卻容易犯下嚴重的戰略錯誤。作為統治者，斯大林精明而又心胸狹窄，勤奮卻往往適得其反，世故可又有真信仰。冷酷的算計與荒誕的妄想都是同一個頭腦的產物。他的精明足以把人看透，卻不足以擺脫虛妄的信條。最重要的是，他在1920年代越來越沉溺於陰謀。但斯大林日益嚴重的、嚴重到近乎偏執的多疑症，在根本上與政治有關，而且與布爾什維克革命所固有的結構性偏執，與共產黨政權在資本主義佔壓倒優勢的世界中被敵人包圍和滲透時所面臨的困境密切相關。



俄國革命——反對暴政和腐敗，特別是反對沙皇統治的無能——激起了人們對富足、公正、和平的新世界的渴望。但所有這一切都因為布爾什維克而化為泡影，他們在不經意間採用新的形式，無情地複製了舊政權的病態和掠奪性（甚至超過了他們的法國革命先驅，就如同亞歷克西·德·托克維爾為法國證明的那樣）。原因不在於客觀環境，而在於共產主義信念和有意的政治壟斷，它們使每況愈下的經濟形勢進一步惡化，而經濟形勢的每況愈下則被用來當作更進一步的國有化和暴力的理由。社會經濟地位上的階級差別，過去是（而且現在仍然是）不容否認的。但把政治秩序建立在階級差別而不是共同的人性和個體自由的基礎上，過去是而且將來也永遠是毀滅性的。到頭來，所有非列寧主義的社會主義者發現，如果想要真正的民主，他們就得拒絕馬克思的召喚，即否定並超越資本主義和市場。就蘇聯而言，對於任何還沒有無可救藥地陷溺於意識形態的人來說，事態的發展給反思提供了充分的機

會，認識到急需走出列寧主義的死胡同：放棄適得其反的階級鬥爭；接受市場，承認它並非天生邪惡；鼓勵富裕起來的農民繼續發家致富，並帶動其他人也富裕起來。但要承認這些，實際上對於幾乎所有的布爾什維克重要人物來說，都是太難了。

不過，即便在列寧主義的框架內，蘇聯領導人本來仍然可以採用迂迴的方式，減少政權在處理內外關係時的偏執。蘇聯領導人本來可以接受部分和解，因為在全球範圍內，資本主義事實上並非處於垂死階段，資本主義列強事實上並沒有想要不顧一切地推翻革命政權。但斯大林不是這樣的領導人。當然，所有的極權主義政權，為了鎮壓異己和蠱惑群眾，都需要製造出大量的「敵人」。但除此之外，斯大林還由於信念和個人性格的緣故，加劇了列寧主義中固有的瘋狂，把與整個世界的永久的戰爭狀態引向了與國內大多數人口的戰爭狀態，並把列寧主義的綱領推向了反資本主義的最終目標。

斯大林一度和托洛茨基一樣，不喜歡新經濟政策，儘管斯大林又像列寧一樣，而且因為列寧，懂得為了更偉大的事業而採取實用主義態度。但是到1928年，就在托洛茨基被趕到哈薩克斯坦的時候，斯大林按照自己由來已久的左傾的核心信念採取了行動，因為就像1921年剛開始實行新經濟政策時的列寧一樣，斯大林覺得革命到了生死關頭，覺得自己在政治上有採取行動的餘地。斯大林永遠不可能承認，在他看來，托洛茨基和左派反對派對新經濟政策的批評是正確的：寬宏大量不是斯大林的性格，而且那樣一來，流放托洛茨基的理由就顯得不夠充分，從而會激起要為他平反的呼聲。但要是認為托洛茨基可能也會採取與斯大林一樣的做法，那就錯了。托洛茨基並不是人們所想像的那種領導人，也不是斯大林後來成為的那種領導人。

738

沒有列寧，托洛茨基再也沒有表現出他在1917年和內戰時期在列寧領導下表現出的那種領導才能。列寧的中風讓斯大林憑藉總書記的職務優勢繼承了個人專政。在這個極不對等的賽場上，托洛茨基依舊可以進行出色的論戰，但是卻無法建立一個範圍不斷擴大的派別，分化對手，並將自己的信念與必要的策略性考慮相結合。更主要的是，托洛茨基從來就不是一個勤勉而又注重細節的行政管理者，不是一個能夠

果斷地隨機應變的戰略家。不管他在核心信念上和斯大林有多少相似的地方，斯大林的能力和決心都要大得多。

但是，如果當初斯大林死了會怎麼樣？<sup>31</sup>他在1921年就得過急性闌尾炎，需要手術。「當時，手術的結果很難保證，」V. N. 羅扎諾夫醫生回憶說，「列寧早上和晚上都打電話到醫院找我。他不僅詢問了斯大林的健康情況，還要求作最詳細的報告。」<sup>32</sup>做了局部麻醉後，斯大林仍然很疼，於是，羅扎諾夫就給了大劑量的氯仿，和他後來在1925年給伏龍芝用的劑量一樣大，而伏龍芝在術後不久就死了。<sup>33</sup>斯大林也許還患有潰瘍（有可能是因為斑疹傷寒），所以在術後按照政治局的命令，從1921年5月到8月，在北高加索的納爾奇克療養。<sup>34</sup>1921年12月，他又一次病倒了。<sup>35</sup>

後來，克里姆林宮醫生的記錄說，斯大林年輕時得過瘧疾。1909年流放時，他在維亞特卡醫院得了斑疹傷寒。那是舊病復發，因為他小時候就得過。斯大林的二哥格里戈里——斯大林並不知道他的情況——就死於斑疹傷寒。1915年在西伯利亞流放的時候，斯大林得了風濕病——這種病會周期性地發作——以及扁桃體周膿腫和流感。<sup>36</sup>革命前，斯大林還得過肺結核。他的第一任妻子卡托就死於肺結核或斑疹傷寒。斯大林在西伯利亞流放時的室友雅科夫·斯維爾德洛夫患有肺結核，結果斯大林搬了出去。1919年，斯維爾德洛夫似乎就死於肺結核。肺結核本來也可能要了斯大林的性命。

斯大林本來還可能被暗殺掉。檔案中記錄了一些拐彎抹角的例子，當時，潛在的刺客是可以接近他或者在他很可能出現的地方動手的。比如有一天晚上，捷爾任斯基在劇院裏注意到有人在入口裏面看張貼的佈告；當斯大林出來的時候，又有一個人站在同樣的地方，做同樣的事。「如果他們不是我們的人，」他在那天夜裏寫的一張便條上指示說，「那肯定要注意了。把情況搞清楚然後報告。」<sup>37</sup>

墨索里尼此時已經遭遇過四次暗殺，剛剛發生的一次是一個博洛尼亞少年差點開槍打中他。<sup>38</sup>1928年7月6日，在蘇聯黨的全會期間，一顆炸彈扔向了莫斯科負責辦理出入奧格伯烏的通行證的辦公室。兇手與流亡的恐怖分子有聯繫。<sup>39</sup>負責領導人安全的白俄羅斯貧苦農民之子

尼古拉·弗拉西克(Nikolai Vlasik，生於1896年)正在度假，他被召回莫斯科加入了一個工作小組，負責整頓契卡、克里姆林宮、政府別墅以及領導人外出時的安全保衛工作。據後來成為斯大林終身衛士長的弗拉西克說，這位專政者在1928年只有立陶宛人衛士尤西斯；斯大林到祖巴洛沃和索契的別墅，以及步行往返老廣場大街，路上都由尤西斯陪伴。<sup>40</sup>別說政權內部的人，就是一個下定決心的刺客，想要暗殺斯大林也是可以做到的。

1928年夏天，索柯里尼柯夫在和加米涅夫見面時引用布哈林的話說，托姆斯基有次喝醉了，曾經湊近斯大林的耳朵小聲地說，「我們的工人要開槍打死你」。<sup>41</sup>在其他版本中，這件事常常被說成是在索契斯大林的別墅發生的。說是在某人生日的那天，一幫人一邊喝酒、吃烤肉串，一邊唱着俄羅斯民歌和革命歌曲。<sup>42</sup>不管詳情如何，政治局不是沒有考慮過暗殺斯大林。

斯大林當初要是死了，強制的全盤集體化的可能性——那是集體化的唯一形式——就幾乎為零，蘇維埃政權改弦易轍或瓦解的可能性就會很大。「環境造就了人，而不是人造就了環境，」歷史學家E. H. 卡爾(E. H. Carr)寫道，「歷史上的那些大人物們，幾乎沒有人比斯大林更適合作為這一命題的明證。」<sup>43</sup>這個說法完全是錯誤的，永遠是錯誤的。斯大林創造了歷史，改變了六分之一個地球的整個社會經濟面貌。大叛亂、大饑荒、人吃人、農村的牲畜遭受滅頂之災，以及前所未有的政治動盪，都沒有讓斯大林退縮。即便政權內部的官員當面告訴他災難正在臨近，他還是繼續前進，全速奔向社會主義，儘管有幾次他也佯裝撤退。這需要非凡的手腕、威嚇和暴力。它還需要深刻的信念，認為必須要這麼做。斯大林非常善於建立令人生畏的個人專政，可他也是個笨拙的人，對法西斯運動看走了眼，在外交政策上磕磕絆絆。但他意志堅定。1928年1月他去了西伯利亞，而且毫不猶豫。不論是好是壞，歷史都是那些永不放棄的人創造的。

---

\* 譯註，《蘇聯歷史檔案選編》第8卷，第310頁。

## 譯後記

相對於大多數讀者來說，譯者的角色有一個好處，那就是可以對原作先睹為快。斯蒂芬·科特金的這部《斯大林》有個表面上似乎矛盾的特點：它本該寫的是某個人的歷史，但讀起來卻像是關於這人生活於其中的世界的歷史，而且在那幅徐徐展開的世界畫卷中，傳主本人有時在畫面中只佔據了一個不起眼的位置。

起初我覺得這種寫法有點奇怪，但看了作者寫的中文版序言之後就明白了。重要歷史人物的傳記怎麼寫，牽涉到作者對人與歷史關係的理解。斯大林是20世紀的焦點人物之一，也是最具爭議的人物之一。給這樣一個人物貼上標籤，再從他的生平事跡中選擇一些佐證材料，這樣做當然很容易，但沒有太多的意義。舉凡一段重大的歷史，儘管它可能帶有濃厚的個人色彩，卻不能把這段歷史完全歸於這個或那個歷史人物。就像人們常說的，時勢造英雄，歷史人物歸根結底只能借勢而為。如果說他能給歷史打上一點自己意志的烙印，必定是因為他先做了時代中某些強大潮流的代表。不管他個人是如何突出，在他的身後，總有無數的其他人和事。從這個意義上說，重要歷史人物的傳記不過是為我們提供了觀察和理解更廣闊世界的窗口，提供了可以順藤摸瓜的線索。

斯大林傳第一卷的翻譯，花了整整兩年時間。由於原作涉及俄國革命前後大量的人物和事件，翻譯的過程對於譯者來說也是一個不斷學習和瞭解的過程。



原作引用了很多斯大林和列寧的話。關於這些內容，我盡量在現有的權威中文文獻中找到它們的可靠翻譯。這方面主要引用和參考的是人民出版社《斯大林全集》第1版和《列寧全集》第2版的譯文，還有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的《蘇聯歷史檔案選編》以及人民出版社的《蘇聯共產黨代表大會、代表會議和中央全會決議彙編》。對於原作的引文與相應的中文文獻偶有出入的，會在譯註中予以說明。對於原作中沒能從上述中文文獻檢查到的引文，則由譯者自行譯出。

翻譯時經常碰到的一件麻煩的事情是，書中一些專有名詞，如人物、國家、區域、地點、組織、機構、政治集團、建築物等，在現有的中文文獻中有時會有不同的譯名，這會給讀者帶來不便和困惑。例如「伊凡」和「伊萬」、「左派共產黨人」和「左派共產主義者」、「土耳其斯坦」和「突厥斯坦」、「保安處」和「暗探局」或「保安局」等。就連斯大林的名字也有不同的譯法：「朱加施維里」和「朱加什維利」。亂上加亂的，還有翻譯之外的因素，例如，十月革命後，蘇維埃政權的某些機構經常改組，結果這些機構的名稱會變來變去，而在這些機構任職的同一個人，其職務的名稱也會隨之變化。這其中的典型，就是蘇維埃政權的軍事領導機關。它時而分成「陸軍人民委員部」和「海軍人民委員部」，時而又合併為「陸海軍人民委員部」。另外，對於書中提到的一些地名，採用甚麼樣的譯名，需要結合當地的歷史，例如「梯弗利斯」和「第比利斯」，「蘇呼米」和「蘇呼姆」。在本書中為了儘量做到譯名的統一，採用了兩個標準，一是商務印書館的姓名譯名手冊，二是《列寧全集》中文第2版。

這本書從翻譯到出版差不多有四年半。期間除了出版上的波折所耗去的時間之外，編輯的過程就有一年半。感謝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甲骨文工作室邀請我翻譯這部書。也要特別感謝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的陳甜和胡召洋兩位編輯，他們耐心細緻的工作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另外還要感謝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給了這本書盡早出版面世的機會；要消弭地球上不同國家、不同地區間的分歧與隔閡，最終還是要靠交流和對話。

李曉江於常州

2022年4月30日

## 第三部 衝突

- 1 Stalin, "O Lenine," 轉載於 *Sochineniia*, VI: 52–64 (at 61). 804
- 2 Sering, *Die Unwaltung des osteuropaischen Agrarverfassung*, 5–6; Antsiferov, *Russian Agriculture during the War*, 382–3.
- 3 對於列寧這些以及其他許多偏狹的言論，參見 Getzler, "Lenin's Conception" (引自 *PSS*, XXXV: 268, XXXVIII: 339)。當然，在 1921 年中期發生饑荒而列寧呼籲國際社會援助糧食的時候，他堅稱國內戰爭是「各國地主資本家強加給工農的」。Lenin, *Collected Works*, 32: 502 (譯註：《列寧全集》第 42 卷，第 81 頁)。
- 4 Lenin, "O vremennom revoliutsionom pravitelstve [May 1905]," *PSS*, X: 227–50; "Sed'maia (aprel'skaia) vesrossiiskaia konferentsiia RSDRP (b)" [April 1917], *PSS*, XXXI: 339–81 (esp. 353–4)。令人難以置信的是，拉比諾維奇(再次)提出列寧和布爾什維克的專政是不得已而為之，即便拉比諾維奇一再表示，專政是為了應對一次次的危機——這些危機往往是布爾什維克自己引發的——他們採取的辦法卻是抓人和骯髒的把戲(即選舉舞弊)，而且總是拿「階級鬥爭」和與「反革命」(即任何反對他們的人)的戰鬥來為此辯護。Rabinowitch, *Bolsheviks in Power*。
- 5 *Pravda*, August 28, 1919; Lenin, *Collected Works*, 29: 559.
- 6 Polan, *Lenin and the End of Politics*.
- 7 馬克思也從未形成一種關於政治的理論。他從未有過這樣明確的想法——讓幾個相互對立的政治綱領在公開的政治活動中互相競爭；當一些批評者，比如米哈伊爾·巴枯寧，指出這樣的立場可能帶來的後果時，馬克思沒有回應。對馬克思來說，唯一要考慮的是代表無產階級的「利益」，而他(和恩格斯)是無產階級「利益」的代言人；他們譴責其他那些聲稱以不同方式表達無產階級利益的社會主義者。對馬克思而言，政治本身從來不是合理的事業，更不用說必要的活動。
- 8 *PSS*, XXXIII: 109; *Pravda*, January 15, 1919 (「左派共產主義者」奧辛斯基)。在列寧自己準備的筆記中(當時他已經掌權)，他寫道，國家是「無產階級進行階級鬥爭

- 的工具，一根特殊的棍棒，如此而已！」“O diktature proletariat,” *Leninskii sbornik*, III (1925), 載於 *PSS*, XXXIX: 261–9 (at 262) (譯註：《列寧全集》第37卷，第254頁)。列寧從來沒有寫完〈論無產階級專政〉的小冊子，儘管他為此做了這些筆記。
- 9 Carr, *Bolshevik Revolution*, I: 155 (引用的是司法人民委員部一名官員的話)。
  - 10 Polan, *Lenin and the End of Politics*, esp. 91–2.
  - 11 *Voprosy istorii KPSS*, 1988, no. 10: 6. 另見 *Izvestiia TsK KPSS*, 1991, no. 2: 128.
  - 12 Volkogonov, *Lenin: Life and Legacy*, 410.
  - 13 RGASPI, f. 17, op. 2, d. 21, l. 18; d. 71, l. 2; op. 3, d. 174, l. 5; *Izvestiia TsK KPSS*, 1991, no. 2: 129, 130, 137; Golikov, *Vladimir Il'ich Lenin*, XI: 47.
  - 14 RGASPI, f. 17, op. 3, d. 240, l. 1.
  - 15 *Ogonek*, 1990, no. 4: 6 (Doctor Osipov). 另見 *PSS*, LIV: 203 (列寧致瓦爾加) (譯註：《列寧全集》第52卷，第342–343頁)。
  - 16 *Izvestiia, TsK KPSS*, 1991, no. 2: 131–2 (達爾克舍維奇)。3月6日，列寧在五金工人工會代表大會上對共產黨黨團說，「我的病已經好幾個月使我不能直接參與政務……」——這是在泄露國家機密。*PSS*, XLV: 6 (譯註：《列寧全集》第43卷，第5頁)。
  - 17 Sakharov, *Politicheskoe zaveshchanie*, 160 (RGASPI, f. 5, op. 2, d. 263, l.1; d. 265, l.1–2), 162–7. 斯大林先是在1921年8月22日被派去負責宣傳鼓動部，然後在1921年9月13日，政治局又決定讓他把四分之三的時間花在黨務工作上，四分之一的時間花在工農檢查院。*RGASPI*, f. 17, op. 3, d. 193, l. 2; d. 201, l.5–6. 另見 Chuev, *Sto sorok*, 181, 229–30.
  - 18 RGASPI, f. 17, op. 2, d. 78, l. 7; Golikov, *Vladimir Il'ich Lenin*, XII: 267; Sakharov, *Politicheskoe zaveshchanie*, 170–1; Chuev, *Sto sorok*, 181. 關於另外幾位所謂總書記人選 (伊萬·斯米爾諾夫、揚·魯祖塔克、米哈伊爾·伏龍芝) 的幻想，參見 Pavlova, *Stalinizm*, 56. 另見 Trotskii, *Stalin*, II: 173–4.
  - 19 Sakharov, *Politicheskoe zaveshchanie*, 172–7.
  - 20 Chuev, *Sto sorok*, 181; Sakharov, *Politicheskoe zaveshchanie*, 170–1 (引自 RGASPI, f. 48, op. 1, d. 21, l.1–469); Sakharov, *Na rasput'e*, 95–6 (RGASPI, f. 17, op. 2, d. 78, l.2, 6–7ob.; 以及 *PSS*, XLV: 139). 在莫洛托夫和古比雪夫的名字後面，列寧寫的是「書記」。在對這27人的投票中，按照斯大林所得到的反對票數量，他是排在第10位。在第十一次代表大會上，新的中央委員會的得票數很能說明問題：總共478票，列寧得到477票；托洛茨基票數一樣 (這將是最後一次)；斯大林463票；加米涅夫454票；季諾維也夫448票。可見，說加米涅夫和季諾維也夫在黨內的地位高於斯大林是不對的。
  - 21 *XI s'ezd VKP (b)*, 84–5, 143; *PSS*, XLV: 122.
  - 22 RGASPI, f. 17, op. 3, d. 241, l. 2. 「赤色工會國際」在1922年2月有了「總書記」(魯祖塔克)。*RGASPI*, f. 17, op. 3, d. 361, l. 15. 列寧拒絕了季諾維也夫把第三國際遷到彼得格勒的要求；任命 (在莫斯科的) 庫西寧是一個折衷的辦法。
  - 23 有人——顯然是列寧——反對在4月3日中央全會上提出的，在總書記之上設立一個中央常務主席的建議，這項建議未能通過。*RGASPI*, f. 17, op. 2, d. 78, l.2, 6.

- 24 在任命斯大林為總書記的決定正式通過三天後，列寧從克里姆林宮的藥店訂購了一整盒德國產的佐姆納策酞 (Somnacetin) 和佛羅拿 (Veronal)。V. I. Lenin: *neizvestnyye dokumenty*, 529 (RGASPI, f. 2, op. 1, d. 23036).
- 25 Volkogonov, *Lenin: Life and Legacy*, 412–3. 打算在高加索或烏拉爾給列寧找個療養場所的計劃最終沒能實現。Lenin, V. I. *Lenin*, 379, 537; *Leninskii sbornik*, XXXVI: 468–9; PSS, LIV: 229–30; *Izvestiia TsK KPSS*, 1991, no. 2: 133–4 (RGASPI, f. 16, op. 3, d. 20); PSS, LIV: 241–2; Tsvigun, *V. I. Lenin i VChK* [1987], 536. 高加索的老強盜卡莫 (捷爾一彼得羅相) 突然冒了出來，發誓說願意在該地區保衛和照顧列寧。PSS, LIV: 230–1.
- 26 克倫佩雷爾告訴《紐約時報》列寧「病了，但並不嚴重」，不過他沒有透露自己對病情的診斷情況。New York Times, April 4, 1922. 衛生人民委員在報紙上說射向列寧的子彈是在箭毒馬錢子裏泡過的，這是美洲土著塗在箭上的一種毒藥。要真是那樣，列寧在1918年就會被殺死了。Tumarkin, *Lenin Lives!*, 114 (引自 *Bednota*, April 22, 1922: Semashko). 關於列寧「中毒」的消息，不管是來自克倫佩雷爾不實的診斷結論還是來自謝馬什柯不實的斷言，在國外都引起了很大反響：Rul', March 26, March 29, June 13, June 15, June 18, June 21, July 19, August 1, and August 2, 1922.
- 27 *Pravda*, April 28, 1922.
- 28 列寧的便條說要在莫斯科周圍500英里 (編註：約805公里) 範圍內建一些模範療養院。他還故作神秘地加了一條指示 (「又及：保密」)，要求做好祖巴洛沃的糧食供應和運輸工作——斯大林和加米涅夫在那裏有政府別墅，列寧的也在建。Volkogonov, *Lenin: politicheskii portret*, II: 34 (APRF, f. 45, op. 1, d. 694, l. 2). 據說加米涅夫和捷爾任斯基在祖巴洛沃也都有別墅。
- 29 *Vospominaniia o Vladimir Il'iche Lenine* [1956–61], II: 342 (V. Z. Rozanov, "Zapiski vracha").
- 30 官方把列寧此次發病的時間記成是5月25至27日：Golikov, *Vladimir Il'ich Lenin*, XII: 349. 另見 *Vospominaniia o Vladimire Il'iche Lenine* [1979], III: 320; *Molodaia gardiia*, 1924, no. 2–3: at 113; Fotieva, *Iz zhizni*, 178–9; *Ogonek*, 1990, no. 4: 6; PSS, LIV: 203; *Izvestiia TsK KPSS*, 1989, no. 1: 215; *Izvestiia TsK KPSS*, 1991, no., 2: 130–6; Trotsky, *My Life* [1930], 475.
- 31 Chuev, *Sto sorok*, 193.
- 32 例如，對於加米涅夫，列寧在1921年年底寫道，「可憐的傢伙，軟弱、害怕而又膽怯」——而列寧對加米涅夫的評價是相對較高的，而且 (就像莫洛托夫回憶的) 相比於對季諾維也夫是「更喜愛他的」。Pipes, *Unknown Lenin*, 138 (December 1, 1921); Chuev, *Sto sorok*, 183. 另見 Volkogonov, *Lenin: politicheskii portret*, II: 61. 他曾在自己一部文集的序言中加入了指責季諾維也夫的內容，只是在臨出版前才刪掉 (當時斯大林強烈建議列寧不要刪)。Sakharov, *Politicheskoe zaveshchanie*, 143–6.
- 33 利季婭·福季耶娃在1918年8月接手列寧的私人秘書處；到1920年，它總共有七名工作人員 (連她本人在內)：五名助理和兩名文員。福季耶娃的兩名重要下

屬是格拉謝爾和沃洛季切娃。其他人包括 N. S. 克拉辛娜 (N. S. Krasina) 和 N. S. 勒柏辛斯卡婭 (N. S. Lepeshinskaya)。斯大林的妻子娜佳·阿利盧耶娃有段時間負責列寧的檔案和最機密的文件。Rigby, *Lenin's Government*, 103–5; Kolesnik, *Khronika zhizni sem'i Stalina*, 28; Rosenfeldt, *The "Special" World*, I: 123. 戈爾布諾夫 (Nikolai Gorbunov, 他取代了邦契—布魯耶維奇) 會一直擔任人民委員會事務管理局局長和李可夫手下的私人秘書。

- 806 34 據說列寧對他身邊的一個工作人員說過，「我不太懂得人民，我不理解他們」。這名工作人員說「列寧想要和一些共事多年的同志，和娜捷施達·康斯坦丁諾夫娜以及瑪麗亞·伊里奇娜商量」。雅科夫·沙圖諾夫斯基 (Yakov Shatunovskiy)，引自 Shatunovskaia, *Zhizn' v Kremle*, 36–7。「在私人依附關係是社會組織中一個有機組成部分的社會裏，列寧的超然態度在文化上是革命性的。」Jowitt, *New World Disorder*, 7.
- 35 Mal'kov, *Zapiski*, 150–2, 154, 181; Bonch-Bruевич, *Tri pokusheniie na V. I. Lenina*, 102; McNeal, *Bride of the Revolution*, 185–6. 正是 1918 年秋天在哥爾克莊園樹林中短暫的休養期間，列寧撰文對考茨基作了尖銳的反駁。
- 36 要是沒有客人，一家人就在廚房吃飯。餐廳的門正對着列寧的房間。房裏有一張寫字檯，放在窗子前面——從窗子向外看，可以看到參政院廣場——還有桌子和一張小床。克魯普斯卡婭的秘書薇拉·德里德佐 (Vera Dridzo) 是少數可以在那裏和列寧一家一起吃飯的人之一。Dridzo, *Nadezhda Konstantinova Krupskaiia*.
- 37 Zdesenko, *Gorki Leninskie*, 115, 144 (照片中的那輛勞斯萊斯安裝了雪天用的牽引履帶)。
- 38 和季諾維也夫以及加米涅夫一夥的托洛茨基後來聲稱，斯大林曾想把列寧隔離起來 (許多學者都採納了這一說法)。事實上，安排列寧住在哥爾克，這件事是政治局集體決定的，包括托洛茨基在內。
- 39 1922 年，斯大林到哥爾克探望列寧的時間分別是 5 月 30 日、7 月 10 日、7 月 30 日、8 月 5 日、8 月 9 日、8 月 15 日、8 月 19 日、8 月 23 日、8 月 30 日、9 月 12 日、9 月 19 日和 9 月 26 日。Ul'ianova, "ob otnoshenii V. I. Lenina i V. Stalina," 198; Ul'ianova, "O Vladimire Il'iche," no. 4: 187. 加米涅夫去了 4 次：7 月 14 日、8 月 3 日、8 月 27 日和 9 月 13 日；布哈林 4 次：7 月 16 日、9 月 20 日、9 月 23 日和 9 月 25 日；季諾維也夫 2 次：8 月 1 日和 9 月 2 日。Izvestiia TsK KPSS, 1989, no. 12: 200–1.
- 40 Valentinov, *Novaia ekonomicheskaiia politika*, 46–53.
- 41 Izvestiia TsK KPSS, 1991, no. 3: 183–7; Volkogonov, *Lenin: Life and Legacy*, 411–2 (引自 APRE, f. 3, op. 22, d. 307, l. 136–7).
- 42 Izvestiia, TsK KPSS, 1991, no. 3: 185.
- 43 據瑪麗亞的描述，列寧說：「你在耍滑頭吧？」「您甚麼時候見我要過滑頭？」斯大林反駁說。Izvestiia TsK KPSS, 1989, no. 12: 197–8.
- 44 Izvestiia TsK KPSS, 1991, no. 3: 198.
- 45 Sakharov, *Politicheskoe zaveshchanie*, 132–3; Ivestiia TsK KPSS, 1991, no. 3: 121 (1923 年 12 月 31 日政治局的集體信); RGASPI, f. 17, op. 2, d. 209, l. 9–11 (1926 年 1 月 1 日的

- 全會)。“M. I. Ul'ianova ob otnoshenii V. I. Lenina i I. V. Stalina,” *Izvestiia TsK KPSS*, 1989, no. 12: 196–9 (at 197); RGASPI, f. 14, op. 1, d. 398, l.1–8. 忠於斯大林的葉梅利揚·雅羅斯拉夫斯基回憶說，列寧「煩透了」托洛茨基及其在理論和政策上沒完沒了的公開辯論。 *Izvestiia TsK KPSS*, 1989, no.4: 189.
- 46 Pipes, *Unknown Lenin*, 124 (1921年3月13日)。
- 47 1921年6月16日，政治局開始研究把托洛茨基調到烏克蘭擔任糧食人民委員。托洛茨基拒絕接受政治局的決定，結果中央委員會為了討論這個問題，不得不提前召開全會。在此期間，托洛茨基給烏克蘭黨組織負責人克里斯季安·拉柯夫斯基打了電話。據說後者告訴他，已經採取各種措施把糧食運進烏克蘭。可列寧當時收到的文件與這一說法相反。列寧同托洛茨基在7月16日到23日之間見過面，並作了一系列廣泛的討論。1921年7月27日，列寧在再次接待托洛茨基時收回成命了。兩人就托洛茨基的行為達成了某種妥協。托洛茨基仍舊負責蘇維埃的軍事工作。Sakharov, *Politicheskoe zaveshchanie*, 135–42 (引自 *Izvestiia TsK KPSS*, 1990, no. 7: 187; RGASPI, f. 17, op. 3, d. 190, l. 4; *Voprosy istorii*, 1989, no. 8: 138–9; Golikov, *Vladimir Il'ich Lenin*, XI: 105–6; *Leninskii sbornik*, XXXIX: 359; RGASPI, f. 17, op. 2, d. 71, l. 5, 24; f. 2, op. 1, d. 200015, l.1–1ob, 5, 24–5; 以及 PSS, LIV: 148)。
- 48 Chuev, *Sto sorok*, 193. 另見 Ulam, *Stalin*, 207–9; 以及 Service, *Stalin*, 189–90.
- 49 Golikov, *Vladimir Il'ich Lenin*, XII: 357; Fotieva, *Iz zhizni*, 183–4. 1922年6月13日，列寧顯然好多了，可以讓人把自己從莊園的輔助建築搬到主樓房子裏，但是在第二天，他頭部的血管痙攣，於是，他對科熱夫尼科夫說：「好了，就這樣了。要發病了。」Golikov, *Vladimir Il'ich Lenin*, XII: 353–4; Volkogonov, *Lenin*, 414. 6月18日，《真理報》刊登公告，暗示他感覺很好，只是對醫生在飲食起居上的限制很不滿意。
- 50 *Izvestiia TsK KPSS*, 1989, no. 2: 198–200; Volkogonov, *Lenin: politicheskii portret*, II: 23–5.
- 51 *Izvestiia TsK KPSS*, 1989, no. 12: 197–8; Volkogonov, *Trotskii*, II: 23.
- 52 RGASPI, f. 558, op. 1, d. 2397, l. 1.
- 53 PSS, LIV: 273 (譯註：《列寧全集》第52卷，第464頁)；Golikov, *Vladimir Il'ich Lenin*, XII: 359. 7月18日給斯大林的信開頭讓人看不懂：「我非常認真地考慮了您的答覆，但不同意您的意見。」尚不清楚這說的是甚麼。
- 54 Lenin, *V. I. Lenin*, 547; Volkogonov, *Lenin: Life and Legacy*, 257 (引自 RGASPI, f. 2, op. 1, d. 25996, l. 1)。
- 55 Volkogonov, *Lenin: Life and Legacy*, 416 (引自 APRF, f. 3, op. 22, d. 307, l. 23). 出席會議的有加米涅夫、托洛茨基、斯大林、托姆斯基、莫洛托夫、季諾維也夫、李可夫、拉狄克、布哈林和丘巴爾。
- 56 Mikoyan, “Na Severnom Kavkaze,” 202. 另見 *Pravda*, August 6, 1922.
- 57 Fotieva, *Iz zhizni*, 285–6.
- 58 Lenin, *V. I. Lenin*, 548–9 (RGASPI, f. 2, op. 1, d. 26002); RGASPI, f. 5, op. 2, d. 275, l.4–6; *XII s'ezd RKP (b)*, 198; RGASPI, f. 558, op. 11, d. 816, l.37–43, 49. 作為莫斯科蘇維埃主席和莫斯科黨組織負責人，加米涅夫已經是列寧在政府中非正式的主要替代人選。Rigby, *Lenin's Government*, 201.

- 59 RGASPI, f. 5, op. 2, d. 275, l.4–6; Fel'shtinskii, *Kommunisticheskaia oppozitsiia v SSSR*, I: 11.
- 60 沃爾科戈諾夫推測，列寧預計並希望托洛茨基會拒絕，尤其是考慮到，在托洛茨基拒絕後列寧並未讓政治局做出決定並（在這件事情上）對他執行黨的紀律。Volkogonov, *Trotsky*, II: 23–4. 薩哈羅夫 (Sakharov) 原本是細心的學者，他也認為列寧當時是希望托洛茨基拒絕，但這一猜測目前沒有文獻證明。Sakharov, *Naraspuz'e*, 98; Sakharov, *Politicheskoe zaveshchane*, 190–1.
- 61 Lenin, *V. I. Lenin*, 548–9; Pipes, *Unknown Lenin*, 171, 174 (列寧給斯大林的信，上面有記號，收錄的是副本，172–3); Pipes, *Russia Under the Bolshevik Regime*, 464, 466–7.
- 62 Deutscher, *Prophet Unarmed*, 30–1.
- 63 RGASPI, f. 17, op. 3, d. 312, l. 4; f. 5, op. 2, d. 275, l.4–6.
- 64 斯大林很快在第十二次代表大會上公開了托洛茨基拒絕接受任命的情況：*XII s'ezd RKP (b)*, 198.
- 65 *Sochineniia*, V: 134–6.
- 66 Karaganov, *Lenin*, I: 382; Golikov, *Vladimir Il'ich Lenin*, XII: 371.
- 67 列寧慨然應允人們的請求，在會議議程結束後，讓攝影師 (P. A. 奧楚普 (P. A. Otsup)) 用一組照片為後人記錄下了這一事件。Karaganov, *Lenin*, I: 400–2; *Vospominaniia o Vladimire Il'iche Lenine*, IV: 446; *Pravda*, October 4, 1922.
- 807 68 Naumov, “1923 god,” 36; Volkogonov, *Lenin: Life and Legacy*, 257 (引自 RGASPI, f. 2, op. 2, d. 1239, l. 1); Volkogonov, *Lenin: politicheskii portret*, II: 24. 列寧的回信沒有註明日期；瑯莫夫推斷它是在1922年10月2日以後寫的，當時列寧回到了莫斯科。
- 69 *PSS*, XLV: 245–51; *Izvestiia*, November 1, 1922; Fotieva, *Iz zhizni*, 231–2. 1922年11月1日，列寧在克里姆林宮的辦公室同三駕馬車召開會議：斯大林 (黨的機關)、加米涅夫 (政府) 和季諾維也夫 (第三國際)。 *Leninskii sbornik*, XXIX: 435; Golikov, *Vladimir Il'ich Lenin*, XII: 454.
- 70 *PSS*, XLV: 270. 在莫斯科大劇院舉行的官方週年慶祝儀式上，列寧得到了一件禮物：馬克思和恩格斯的鋁質肖像，由莫斯科一座工廠製造。 *Izvestiia*, November 9, 1922; Golikov, *Vladimir Il'ich Lenin*, XII: 466–7.
- 71 *PSS*, XLV: 278–94; *Leninskii sbornik*, XXXIX: 440; *Vospominaniia o Vladimire Il'iche Lenine* [1979], V: 452, 459–61, 462–3, 468–9, 472–3; *Voprosy istorii KPSS*, no. 9: 41–3.
- 72 Pavliuchenkov, “*Orden mechenostsev*,” 195–6 (引自 RGASPI, f. 4, op. 2, d. 1197, l. 1); *PSS*, XLV: 30–9; *Leninskii sbornik*, XXXIX: 440; *Vospominaniia o Vladimire Il'iche Lenine* [1979], IV: 452–3; Kvashonkin, *Bol'shevistskoe rukovodstvo*, 268–9 (RGASPI, f. 85, op. 1/5, d. 13, l. 8–9; Nazaretyan to Orjonikidze, Nov. 27, 1922).
- 73 Chervinskaia, *Lenin, u rulia strany Sovetov*, II: 240–1 (B. M. Bolin).
- 74 Rosmer, *Moscou sous Lenine*, 231. 另見 Lewin, *Lenin's Last Struggle*, 33–4.
- 75 *Pravda*, November 21, 1922; *PSS*, XLV: 300–1; Lenin, *V. I. Lenin*, 566–73 (完整的文字記錄).
- 76 *PSS*, XLV: 457.

- 77 *Pravda*, January 21, 1927; Golikov, *Vladimir Il'ich Lenin*, XII: 509; PSS, XLV: 463; Bessonova, *Biblioteka V. I. Lenina*, 56; Fotieva, *Iz zhizni*, 240; *Izvestiia*, December 1, 1922.
- 78 Boffa, *The Stalin Phenomenon*.
- 79 Chuev, *Sto sorok*, 381.
- 80 Sering, *Die Unwaltung des osteuropischen Agrarverfassung*, 5–6.

## 第十章 專政者

- 1 Chuev, *Tak govoril Kaganovich*, 190–1; Chuev, *Kaganovich*, 263.
- 2 他繼續指出，「今年的收成不太平衡，總的來說，要比期望的低很多：哪怕是幾個月前估計的數值都有可能被證明太高了。明年的情況不容樂觀。」 Bourne and Watt, *British Documents on Foreign Affairs*, VII: 376 (未註明日期，日期是根據內容推斷的)。
- 3 L. D. Trotskii, “Kak moglo eto sluchit'sia?” 見於 Trotskii, *Chto i kak proizoshlo*, 25–36 (at 25); Trotsky, *Stalin*, 393. 另見 Trotsky, *My Life*, 512. 持同情態度的美國左傾記者尤金·萊昂斯 (Eugene Lyons) 認為，斯大林只具有「選區政客那種華而不實的才能，卻被抬高到近乎天才的地步」——他沒有意識到這是一種很高的讚賞。 Lyons, *Stalin*, 159.
- 4 E. O. Preobrazhenskii, “Stranitsa iz ego zhizni,” *Pravda*, March 18, 1919: 2. 另見 Duval, “The Bolshevik Secretariat”; Duval, “Yakov M. Sverdlov.”
- 5 關於從各地區黨委到中央的各種各樣的需要，參見 Service, *Bolshevik Party in Revolution* 277–95.
- 6 1919年3月18日，即斯維爾德洛夫的骨灰安放在克里姆林宮宮牆裏的那天，列寧在大都會飯店召開的會議上說：「現在要擔負起他一個人在組織方面，在挑選和按專長任用人才方面所做的工作，只有把整批整批的人派到斯維爾德洛夫同志過去一個人所管的各個重要部門中去，而且要踏着他的足跡前進，才能勉強完成他一個人所做的工作。」 PSS, XXXVIII: 79 (譯註：《列寧全集》第36卷，第73頁)。另見列寧為斯維爾德洛夫所寫的訃告： *Pravda*, March 20, 1919.
- 7 托洛茨基說加里寧是他提名的。 Trotskii, *Portrety revoliutsionerov*, 182 (托洛茨基給盧那察爾斯基的信，1926年4月14日)。一年一度的蘇維埃代表大會的權威性甚至還趕不上沙皇時代的杜馬。對於這個新權威的真實結構，最為透徹的分析見於 Vishniak, *Le regime sovietiste*. 理論上，人民委員會對蘇維埃中央執行委員會負責，後者在形式上擁有組織人民委員會及其各部的權力 (1918年七月憲法的第35條)。人民委員會的任務是頒佈法令和指示 (第37、38條)，但這樣的法令要得到中央執行委員會的批准；人民委員會還應每週向中央執行委員會報告其活動。(Avdeev, *Revoliutsiia 1917 goda*, VI: 167.) 在實踐中，人民委員會發揮主權實體的作用。斯維爾德洛夫曾在中央執行委員會的一次會議上說——出言不夠謹慎，但很準確——人民委員會「不是像宣稱的那樣，只是執行機構；它是立法、執行和行政集於一身的。」 *Zasedanie vserossiiskogo tsentral'nogo ispolnitel'nogo komiteta 4-go sozyva*,



66–77. 1919年3月16至30日，擔任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的是米哈伊爾·弗拉基米爾斯基 (Mikhail Vladimirovsky)。

- 8 Stasova, *Vospominaniia*, 161. 另見 Isbakh, *Tovarishch Absolut*.
- 9 尼古拉·奧辛斯基寫信給列寧 (1919年10月16日)，建議「由三位中央委員，也是三位最著名的組織者，組成一種有組織的專政」，並提名斯大林、克列斯廷斯基和列昂尼德·謝列布里亞科夫 (同時認為捷爾任斯基也行)。RGPSI, f. 5, op. 1, d. 1253, l. 6. 奧辛斯基在黨的第八次代表大會上對斯維爾德洛夫的評價：VIII s'ezd RKP (b), 165. 自從奧辛斯基反對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和約，列寧就沒再讓他擔任高級職務。
- 10 Schapiro, *Origin of the Communist Autocracy* [1977], 266.
- 11 Daniels, "The Secretariat," 33. 克列斯廷斯基承認存在不足：Deviatyi s'ezd RKP(b), 41.
- 12 例如參見季諾維也夫在第十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講話：Pravda, April 2, 1921.
- 13 雖然在列寧的阻撓下，克列斯廷斯基沒有被列入候選人名單，但是在479名有表決權的代表中，還是有161人寫上了他的名字，這是黨的歷史上絕無僅有的事情。X s'ezd [1963], 402. 克列斯廷斯基還丟掉了在政治局的位置 (1921年3月16日)，作為蘇俄代表被派駐德國。列寧沒有念及舊情：1918年，當列寧遭到槍擊的時候，克列斯廷斯基的妻子是第一個救治列寧的醫生。
- 14 Nikonov, *Molotov*, 517–8; Zelenov, "Rozhdeniie partiinoi nomenklatury," 4. 另見 Ali, "Aspects of the RKP(b) Secretariat."
- 15 1920年發放的通行證是82,859張：Izvestiia TsK, no. 3 (39), March 1922: at 55.
- 16 Harris, "Stalin as General Secretary: the Appointment Process and the Nature of Stalin's Power," 69 (引自 RGASPI, f. 17, op. 2, d. 78, l. 2); Pravda, April 2, 1922 [季諾維也夫]); Izvestiia TsK KPSS, 1990, no. 4: at 176.
- 17 PSS, XLIV: 393–4. 莫洛托夫後來回憶說，當他1921年開始負責黨的書記處時，列寧告訴他說，「作為中央委員會的書記，你應該抓政治工作 (政策)，要把所有的技術性工作交給副手和助理」。Chuev, *Sto sorok*, 181.
- 808 18 Daniels, "Stalin's Rise to Dictatorship," Rosenfeldt, *Knowledge and Power*. 另見 Daniels, "The Secretariat"; Rigby, "Early Provincial Cliques"; Rosenfeldt, *Stalin's Special Departments*; 以及一些被錯誤地否定的評論，如 Gábor Rittersporn, *Russian History/Histoire Russe*, 17/4 (1990), 468, 以及 J. Arch Getty, *Russian Review*, 50/3 (1991), 372–74.
- 19 "Iosif Stalin: opyt kharakteristiki (September 22, 1939)," 見於 Trotskii, *Portrety revoliutsionerov*, 46–60 (at 59), 351, n35 (費爾什京斯基註，引用了托洛茨基1930年代的筆記)。托洛茨基還在別處寫道，「斯大林之所以能夠掌權，不是憑藉個人的品質，而是憑藉非個人的機器。而且不是他創造了這個機器，是這個機器創造了他」。Trotsky, *Stalin*, xv.
- 20 Avtorkhanov, *Tekhnologija vlasti*, 5; McNeal, *Stalin*, 82.
- 21 「斯大林在二十年代的上升根本就不是一個『自動』的過程，」塔克在1973年正確地指出，「一個天賦出眾的人需要具備他在那些年裏顯示出來的技巧，才能通過像布爾什維克政壇那種變化莫測的水域」。Tucker, *Stalin as Revolutionary*, 392.

- 22 列寧個人的秘書處同時也是人民委員會的秘書處。它收集了每一份1918至1922年的政治情緒報告和荒唐的政策提案。
- 23 1920年3月31日，捷爾任斯基建議制定兩份工作人員名單，一份按字母排序，一份按地區排序，這個建議立即獲得採納。RGASPI, f. 17, op. 112, d. 14, l. 183.
- 24 RGASPI, f. 17, op. 11, d. 114, l. 14.
- 25 *XII s'ezd RKP (b)*, 62–3, 180 (維克托·諾金 [Viktor Nogin]，黨的第十二次代表大會修訂委員會成員)。諾金於1924年5月去世。
- 26 Kvashonkin, *Bol'shevistskoe rukovodstvo*, 262–3 (RGASPI, f. 85, op. 1/S, d. 13, l. 10).
- 27 這一章利用了 *Vsia Moskva* (Moscow: Moskovskii rabochii, 1923) 以及 *Vsia Moskva v karmane* (Moscow-Leningrad: Gosizdat, 1926) 等原始資料。
- 28 斯大林曾向列寧反映工作過於繁重，請求減輕一些任務——這樣說不是沒有根據的，雖然他很少去工農檢查院或民族事務人民委員部。斯大林放棄了在政府中的這兩項職務，為的是把全部時間都用在黨的機關，不過，他在克里姆林宮的帝國參政院仍然保留了一間政府辦公室。
- 29 Sharapov, *Razreshenie agrarnogo voprosa*, 174.
- 30 這是在政權的整個歷史上農村黨員佔比最高的時候。Rigby, *Communist Party Membership*, 135.
- 31 Pethybridge, *One Step Backwards*. 1924年，作為農業省的斯摩棱斯克在每1萬名達到勞動年齡的農村人口中，只有16名共產黨員。Fainsod, *Smolensk Under Soviet Rule*, 44. 季諾維也夫在1923年黨的代表大會上乾脆說共產黨是城市的政黨。*XII s'ezd RKP (b)*, 39.
- 32 Pirani, *Russian Revolution in Retreat*, 155.
- 33 Pirani, *Russian Revolution in Retreat*, 101.
- 34 "Menia vstretil chelovek srednego rosta . . ."
- 35 Barmine, *Vingt ans au service de l'U.R.S.S.*, 256–60.
- 36 列寧懂得「政策是要由人去執行的」。PSS, XLV: 122–3. 這是斯大林在1935年提出的口號「幹部決定一切」的一種早期的說法。
- 37 Shefov, *Moskva, kreml', Lenin*; Volkogonov, *Lenin: Life and Legacy*, 230; Duranty, "Artist Finds Lenin at Work and Fit."
- 38 這棟出租屋實際上匯聚了不同的部門：同人民委員會副主席阿列克謝·李可夫一樣，蘇維埃中央執行委員會負責人加里寧也在這裏的二樓設了幾間辦公室，儘管他們的主要辦公室會設在帝國參政院，跟列寧在同一樓層。沃茲德維任卡街3號以前是保管沙皇外交部檔案的，現在變成了蘇維埃國家檔案館（後來為了擴建列寧圖書館，這棟建築被拆掉了），而沃茲德維任卡街6號以前是一家私人診所，現在成了克里姆林宮醫院。Barmin, *Sokoly Trotskogo*, 155. 這棟被稱作「彼得戈夫」的出租屋建於1877年，1902年加蓋了第四層。它被指定為蘇維埃4號樓。中央委員會的出版部門位於沃茲德維任卡街9號，而莫斯科軍區的軍官經濟協會修建的沃茲德維任卡街10號將成為軍需庫；那裏還有共青團中央的辦公室、青年近衛軍出版協會和集體宿舍。貝拉·庫恩1923至1937年一直住在這裏，而不是

柳克斯飯店。沃茲德維任卡街再往前是莫羅佐夫公館以及舍列梅捷夫家族在莫斯科的宅院，人稱「街角之宅」。沃茲德維任卡街和克里姆林宮垂直；莫霍瓦亞街和克里姆林宮平行。沃茲德維任卡街在1935年更名為共產國際大街；莫霍瓦婭街更名為卡爾·馬克思大街。Sytn, *Iz istorii Moskovskikh ulits* [1948].

- 39 *IX s'ezd RKP (b)*, 357, 610, n118; Pavliuchenkov, *Rossia Nepovskaia*, 61; Pavliuchenkov, "Orden mechenostsev," 213–27. 沃茲德維任卡街5號後來成為國家建築博物館，直到如今。
- 40 Berkman, *Bolshevik Myth*, 46, 36–7. 全俄共產黨(布)中央委員會書記處婦女部的總部——被戲稱為「芭芭中心」(譯註：「芭芭」(Baba)是俄語中對婦女的貶稱)——也在沃茲德維任卡街5號。
- 41 卡扎科夫的建築在1898年加了第三層。在斯大林被派去差不多專門負責黨務工作但還沒有成為總書記的時候，他在書記處的第一個辦公室於1921年9月26日設在特魯布尼科夫斯基街19號2樓，至少通訊地址是這樣。RGASPI, f. 558, op. 1, d. 4505, l. 1, 3; d. 1860, l. 1–4.
- 42 「我們(黨)變成了國家」，在1919年第八次黨的代表大會上，一名代表說。VIII s'ezd [1959], 178 (瓦爾拉姆·阿瓦涅索夫(Varlam Avanesov)). 「大家知道，在俄國，蘇維埃政權的領導者實際上是中央委員會，這對任何人來說都不是秘密」，季諾維也夫在第八次代表大會上對列寧格勒黨組織的報告中說。Izvestiia TsK KPSS, 1989, no. 8: 187.
- 43 列寧的政府實際上是一個內閣，但不屬於(英國那樣)以議會多數為基礎的內閣制。Rigby, *Lenin's Government*, 230.
- 44 Rigby, *Lenin's Government*, 176–86. 地方蘇維埃當然是有的，但這些草根機構基本上都是招募新的政治精英進來，其中許多人都升遷離開了地方蘇維埃。Abrams, "Political Recruitment and Local Government." 地方自治人民委員部於1918年3月20日正式併入內務人民委員部；期間，政權取消了地方自治機關(地方自治機關的歷史可以追溯到俄國1860年代的大改革，臨時政府對它實行了民主化並使其名義上的規模得到很大擴充)。Gronsky, "The Zemstvo System."
- 45 葉夫根尼·普列奧布拉任斯基在黨的第九次代表大會(1920年3月)上注意到，有些代表「甚至建議說可以取消黨，因為我們有蘇維埃，而在蘇維埃當中，共產黨人佔多數」。但當時的黨的書記克利斯廷斯基則相反，他建議取消各省的蘇維埃。IX s'ezd RKP (b), 68; Izvestiia TsK KPSS, 1990, no. 7: 160.
- 46 *Izvestiia TsK KPSS*, 1921, no. 28 (March 5): 23–4; no. 29: at 7; 1922, no. 3 (39): 54. 另見 Schapiro, *Communist Party*, 250.
- 47 Sakwa, *Soviet Communists*, 49–53, 191–3; Figes, *A People's Tragedy*, 688.
- 48 Rosenfeldt, *The "Special" World*. 到1924年，黨的中央機關的人數已經增加到將近700人。
- 809 49 Sytn, *Iz istorii moskovskikh ulits* [2000], 70. 「基泰」(Kitai)在俄語中可以指中國，但莫斯科的基泰哥羅德顯然不是這個意思。到底是甚麼意思，這一點還沒人能確定。Kolodnyi, *Kitai-gorod*, 5–16. 沃茲德維任卡街5號交給了國家計劃委員會。首都獨立

- 的莫斯科黨組織機關已經準備就緒：在其位於列昂季耶夫巷18號的總部在1919年9月25日遭炸彈襲擊後，它就搬到了大德米特羅夫卡街15a號，那裏在革命前曾經是一個富人俱樂部，有飯店、展廳和音樂廳、檯球室和紙牌室，一度以藝術沙龍出名。在中央書記拉扎·卡岡諾維奇兼任莫斯科黨組織負責人(1930)，並且為了能夠緊挨着(老廣場街4號的)中央機關和斯大林而把老廣場街6號從勞動人民委員會那裏奪來之前，莫斯科黨組織一直留在大德米特羅夫卡街。
- 50 Balashov and Markhashov, "Staraiia ploshchad", 4 (20-e gody)," no. 5: 192.
- 51 *Bazhanov, Damnation of Stalin*, 38–9.
- 52 Loginov, *Teni Stalina*, 95. 弗拉西克對妻子瑪麗亞口授了回憶錄；他們的養女娜捷施達把回憶錄交給了格奧爾吉·葉格納塔施維里。葉格納塔施維里的父親亞歷山大曾在弗拉西克手下工作，擔任政治局委員尼古拉·什維爾尼克(Nikolai Shvernik, 生於1888年)的衛隊長。
- 53 政治局一般在星期二和星期四開會；人民委員會是在星期三。
- 54 Lieven, "Russian Senior Officialdom"; Armstrong, "Tsarist and Soviet Elite Administrators." 監管皇帝地產(被稱為內閣地產，它是俄國最大的土地擁有者)的皇家事務部(Ministry of the Imperial Household)承擔了沙皇秘書處的某些職能。
- 55 Remnev, *Samoderzhavnoe pravitel'stvo*, 83 (引自未發表的A. N. 庫洛姆津(A. N. Kulomzin)回憶錄)。帝國總理府所做的不只是總結；其工作人員還會重寫和修改會議記錄，甚至把爭論的內容去掉，以便流暢地敘述政策出台的過程，好讓沙皇讀起來更容易明白。對於各省的報告，總理府常常「抽出來」，不交給沙皇。帝國總理府各部門的負責人對法律進行最後的修改，而總負責人則監督人事任命並出席幾乎所有特別委員會的會議。Remnev, *Samoderzhavnoe pravitel'stvo*, 68–110; Shepelev, *Chinovny mir Rossii XVIII-nachalo XX v.*, 47–55.
- 56 亞歷山大三世曾試圖讓自己的官署在某種程度上成為幫他個人監督官員的看門狗，但沒有成功。大臣們指責並阻撓這一改變，結果專制君主對於國家無法獲得操作上的控制權。Lieven, *Russia's Rulers*, 286–7.
- 57 E. H. 卡爾在其關於革命頭12年的14卷歷史著作中，探討了政治上的偶然性(斯大林的專政)與他眼中的首要結構性因素(俄國的落後)之間的關係。越往後讀，俄國的過去給讀者留下的印象就越深刻，就像它曾經給許多布爾什維克革命者留下的印象一樣。但是在1978年出版的最後一卷，卡爾重新作了考慮——他寫道，強調沙皇制度「儘管沒錯，但我現在看來，似乎有點過頭了」。Carr, *Foundations of a Planned Economy*, III/iii: viii.
- 58 Ilin-Zhenevskii, "Nakanune oktiabria," 15–6; Rabinowitch, *Bolsheviks Come to Power*, 57–9.
- 59 Balashov and Markhashov, "Staraiia ploshchad", 4 (20-e gody)," no. 5: 191–2.
- 60 PSS, XLV: 123. 正如1919年第八次黨的代表大會所強調的，全體黨員都必須嚴格服從黨的紀律，「黨的工作人員的全部分配工作由黨中央委員會掌握……它的決議大家都必須執行……責成中央委員會最堅決地反對這些問題上的各種地方主義和分立主義」。責成中央委員會「有步驟地把黨的工作人員從一個工作部門調

到另一個工作部門，從一個地區調到另一個地區，以便最有效地使用他們」。(譯註：《蘇聯共產黨代表大會、代表會議和中央全會決議彙編》(第一分冊)，第568頁。) *VIII s'ezd RKP (b)* [1959], 426–8; *Kommunisticheskaia partiia Sovetskogo Soiuzu*, I: 444.

- 61 從1922年夏天開始直到1923年秋，191名地方黨組織的書記中有97人是選舉產生的；其餘的是由莫斯科「推薦」或直接任命的。Tsakunov, *V labirinte*, 93 (引自RGASPI, f. 17, op. 68, d. 484, l.170–85); Rigby, “Early Provincial Cliques,” 15–19.
- 62 「中央委員會，」1922年的一則政策聲明宣佈，「把持續關注地方黨組織的內部事務視為分內之事，並要想盡一切辦法消除地方黨組織中被稱作「爭吵」的那些矛盾和糾紛。」*Izvestiia TsK*, March 1922: at 13. 例如，1920年4月，烏克蘭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的全體成員都被調往俄羅斯。Ravich-Cherkasskii, *Istoriia kommunisticheskoi partii*, appendix 12. 另見Service, *Bolshevik Party in Revolution*.
- 63 RGASPI, f. 17, op. 84, d. 147, l. 150; *Spravochnik partiinogo rabotnika*, vyp. 3: 108, 118. 關於彼得格勒在季諾維也夫主政期間集權化的過程，參見McAuley, *Bread and Justice*, 145.
- 64 Daniels, “The Secretariat”; Moore, *Soviet Politics*, 290. 在1921年秋天的清黨之後——那是三年中的第三次，針對的目標是野心家和「偽裝的」階級敵人，結果在65.9萬名黨員中有近四分之一被開除（許多是主動退黨的）——1922年又對剩下的50萬共產黨員進行重新登記；這是黨內的「人口普查」，在此過程中，中央機關收集了幾乎所有黨員和候補黨員的調查表。 *Spravochnik partiinogo rabotnika*, vyp. 3, 128–30; Service, *Bolshevik Party in Revolution*, 164; Gimpel'son, *NEP*, 329 (引自RGASPI, f. 17, op. 34, d. 1, l. 19); *Izvestiia TsK RKP (b)*, March 5, 1921. 1921年，黨的許多委員會邀請黨外群眾發表他們對黨員個人的意見。在莫斯科衛戍區的一支部隊裏，400名黨外士兵把36名黨員從會上轟走並自行決定誰應該受到清洗，這一結果後來被宣佈為無效。 *Izvestiia MK RKP (b)*, 1922, no. 1: 6. 到1922年春天第十一次代表大會召開的時候，中央機關顯然沒能把所有黨員都編入索引。 *Pravda*, September 10, 1921; *Protokoly XI*, 52; Leonard Schapiro, *Origin of the Communist Autocracy*, 1977, 337–8.; Gimpel'son, *NEP*, 329 (引自RGASPI, f. 17, op. 34, d. 1, l. 19); *Izvestiia TsK RKP (b)*, March 5, 1921.
- 65 莫洛托夫在黨的第十一次代表大會(1922)上說過，派到薩馬拉省的三人委員會發現那裏「完全缺乏紀律性」，黨員人數從13,000人減少到4,500人(此說忽略了大饑荒肆虐的事實)，使得莫斯科不得不重新任命人員，替換整個薩馬拉省的領導層。 *XI s'ezd RKP (b)*, 57–8; *Izvestiia TsK*, March 1922: at 35. 當時的許多秘密傳單——包括一份日期為1922年11月30日的秘密傳單——都提到，在工作人員中間存在的「極為普遍的受賄現象」正在給「工人國家的機關帶來墮落和毀滅」的危險，並呼籲每個地區都安排一個人或委員會，負責同這種禍害作鬥爭。受賄的原因被歸結為「普遍缺乏文化和國家在經濟上的落後」。RGASPI, f. 17, op. 11, d. 100, l. 234; op. 84, d. 291 a, l. 282.
- 810 66 *Izvestiia TsK*, no. 42, June 1922, no. 43, July 1922, no. 9 (45), September 1922, no. 11–12.

- 67 Harris, "Stalin as General Secretary." 部分原因是人員增加太快，部分原因是人員的變動，黨代表大會的代表中只有20%至40%能夠留任到來年的大會。在參加第七次大會的106名有或沒有表決權的代表中，有38%出現在第八次大會上；在參加第八次大會的442名代表中，有23%參加了第九次大會；在第九次大會的593名代表中，有22%參加了第十次大會；在第十次大會的1,135名代表中，只有15%參加了第十一次大會；參加第十二次大會的只有36%。不過，中央委員會中留任的相當多，雖然該機構的人數也增加了（從1918年的23名正式的和候補的委員增加到1922年46人）。Gill, *Origins*, 58, 61.
- 68 RGASPI, f. 17, op. 112, d. 370, l. 2; Pavliuchenkov, *Rossia Nepovskaia*, 70 (引自 RGASPI, f. 17, op. 11, d. 142, l. 4).
- 69 Merridale, *Moscow Politics*, 29.
- 70 *Izvestiia TsK VKP (b)*, January 1924, no. 1 (59): 64–7, April 1924, no. 4 (62): 41, January 18, 1926, no. 1 (122): 22–4; Balashov and Markhashov, "Staraiia ploshchad", 4 (20-e gody)," no. 4: 186; RGASPI, f. 17, op. 68, d. 139, l. 74; Rigby, "Origins of the Nomenklatura System," 241–54; Rigby, "Staffing USSR Incorporated"; Korzhikhina and Figatner, "Sovetskaia nomenklatura."
- 71 *XII s'ezd RKP (b)*, 704–5; RGASPI, f. 17, op. 69, d. 259, l. 101. 不過，中央委員會機關還採取主動，登記黨外國家官員，挫敗了蘇維埃中央執行委員會對這一職能的覬覦。Pavliuchenkov, *Rossia Nepovskaia*, 69; Pavliuchenkov, "Orden mechenostev," 227–53. 不久，在聯盟的所有共和國中都要求實行職務名冊制度。Daniels, "The Secretariat," 37–8; Rigby, "Staffing USSR Incorporated," 529–30. 到1924年，名冊被分成兩部分，1號名冊上有3,500個職務，另外1,500個在2號名冊上。1號名冊上的職務必須由政治局提名並得到中央委員會的批准。RGASPI, f. 80, op. 19, d. 1, l. 6–14.
- 72 *XII s'ezd RKP (b)*, 63.
- 73 從名義上來說，地方黨委是有一定權威的。1922年11月的一份分發給所有黨組織的中央委員會通告明確規定，地方黨組織無權改變黨的通告中實質性的內容。不過，就像是承認確有其事一樣，通告又強調說，任何打算增添的內容都必須和中央委員會的意見保持一致。通告由莫洛托夫和卡岡諾維奇簽發。Pavlova, *Stalinism*, 73 (引自 PANO, f.1, op. 2, d. 238, l. 32).
- 74 Nikolaev, *Chekisty*, article by Velidov with Ksenofontov bio; Parrish, *Soviet Security*, 219–20. 1924年底或1925年初，克謝諾豐托夫下令工人們在後半夜去修理斯大林的辦公室；剛好值夜班的巴拉紹夫沒有接到通知，拒絕讓工人進入斯大林的辦公室。克謝諾豐托夫在電話裏又喊又叫；第二天，巴拉紹夫把情況告訴斯大林，斯大林支持他的做法。克謝諾豐托夫要求辭職；斯大林不想接受，但前者非常堅持。他調到俄羅斯社會主義聯邦蘇維埃共和國的社會福利部。Balashov and Markhashov, "Staraiia ploshchad", 4 (20-e gody)," no. 5: 191. 克謝諾豐托夫於1926年3月23日在極度痛苦中死於胃癌，時年42歲。訃告稱他是「契卡的創始人和組織者之一」，儘管他曾被調到中央機關三年。

- 75 Psurtsev, *Razvitie sviazi v SSSR*. 列寧對這種電話用得很多；例如，他開始實行新經濟政策的指示草案就是通過電話傳達給政治局的。P. I. Makrushenko, "Voploshchenie mechty," *Promyshlennno-ekonomicheskaiia gazeta*, April 20, 1958: 3. 因為投入不足，除工作人員之外，使用那種電話的人並不多，但各人民委員部和其他官方機構也建立了自己的電話網絡，因此這些都是封閉的系統（蘇俄官員之所以在辦公桌上擺那麼多電話，原因就在這裏）。Solnick, "Revolution, Reform, and the Soviet Telephone Network," 172-3; Lewis, "Communications Output in the USSR," at 413.
- 76 鮑里斯·巴扎諾夫聲稱，他有一次撞見斯大林正在偷聽電話，用的是一種特殊的儀器，連在一根通到他寫字檯抽屜裏的電線上。Bazhanov, *Damnation of Stalin*, 39-41. 在巴扎諾夫更早的著作中沒有提到這件事：*Avec Stalin dans le Kremlin*.
- 77 1920年代，到蘇聯旅行的人們確信所有事情都在被偷聽——「據說在莫斯科，人們要是通過電話說話，那他們也許就是在直接與格伯烏通話」——但當時全世界的所有電話當然都要通過電話交換機的接線員。Lawton, *The Russian Revolution*, 282. 另見Hullinger, *Reforging of Russia*, 114.
- 78 在斯大林的接待室和辦公室之間有個小房間，裏面有一台電話交換機。1925年中期，那裏始終有兩名女電話接線員輪班工作，後來接替她們的是男警衛，而且人數翻了一倍。當時老廣場街的固定電話數量從250部左右迅速增加到500部。Balashov and Markhashov, "Staraiia ploshchad", 4 (20-e gody)," no. 5: 192.
- 79 *Izvestiia TsK RKP (b)*, September 18, 1920; Pavlova, *Stalinizm*, 46-7 (引自RGASPI, f. 17, op. 84, d. 171, l. 2); G. A. Kurnenkov, "Organizatsiia zashchity informatsii v strukturakh RKP (b) — VKP (b), 1918-1941 gg.: avtorefat kandidatskoi dissertatsii," RGGU, 2010; Anin, *Radioelektronnyi shpionazh*, 24-32. 博基從1921年1月到1937年年中一直負責密碼部門。
- 80 博基的別墅村社位於莫斯科東面的庫奇諾村，對會員的收費是他們每月薪水的10%。「喝酒的時候通常會伴以放蕩的流氓行為和互相羞辱：醉酒的人在自己的私處刷上顏料和芥子醬，」蘇俄對外情報人員葉夫多基婭·卡爾采娃(Yevdokia Kartseva)回憶說，「那些被逼着喝酒的人就像死人一樣被埋起來……這一切都是用神父的行頭來做的，而這身行頭是從索洛維茨基修道院勞改營搞來的（博基為建立那座勞改營出過力）。通常有兩三個人穿着法衣醉醺醺地做着禮拜儀式。他們喝的是以技術需要為藉口從化學實驗室弄來的實驗酒精。」[http://www.solovki.ca/camp\\_20/butcher\\_bokii.php](http://www.solovki.ca/camp_20/butcher_bokii.php); Shambarov, *Gosudarstvo i revoliutsiia*, 592.
- 81 Rosenfeldt, *The "Special" World*, I : 141-4.
- 82 *XII s"ezd RKP (b)*: 70, 71, 74.
- 83 Pavlova, *Stalinizm*, 90 (引自PANO, f. 5, op. 6, d. 142, l. 11).
- 84 Pavlova, "Mekhanizm politicheskoi vlasti," 63. 據1919年11月8日的政治局會議記錄，斯大林反映說：「某些涉及中央委員會會議的情報——雖然其中有錯誤，不知怎麼回事，竟然到了我們的敵人那裏。」他建議設立一道手續，「只允許少數同志查看會議記錄」。這就形成了一套規定，說明甚麼人可以收到政治局的會議

摘要，而那些會議摘要是用來作為指示或命令的。RGASPI, f. 17, op. 3, d. 37; *Archives of the Soviet Communist Party and Soviet State: Catalog of Finding Aids and Documents* (Hoover Institution Archives, 1995). 1923年6月14日，政治局決定對主要的報告和有關重大議項的總結發言做速記記錄，以便給那些沒有參會的同志提供教益。Adibekov, *Politbiuro TsK RKP (b)-VKP (b): povestki dnia zasedanii*, 1: 223. 不過，速記記錄做得很少，原因顯然在於這樣的工作需要大量的人力：會議往往很長，而記錄下來的發言必須發給各人進行修改並得到他們的認可。結果打印出來的「紅皮書」——這麼說是因為封面是粉色的——可能會同原來手工記錄的口頭講話存在很大的差異。1923年12月8日，政治局做出決定，在其會議記錄中「除了政治局的決定，不記錄任何別的東西」。Istochnik, 1993, no. 5-6: 88-95 (at 91).

811

- 85 Dmitrievskii, *Sovetskie portrety*, 108-9. 德米特里耶夫斯基是蘇聯駐瑞典大使館的僱員，1930年叛逃。
- 86 "Menia vstretil chelovek srednego rosta . . ."
- 87 Kerzhentsev, *Printsipy organizatsii*. 克爾任采夫也是一名劇作家和大眾戲劇的支持者。1923至1925年，他在工農檢查院工作，寫過幾本關於對工作進行科學管理（泰勒制）、時間管理以及如何召開會議的小冊子：*Nauchnaia organizatsiia truda (NOT) i zadacha partii* (St. Petersburg, 1923); *Bor'ba za vremia* (Moscow, 1923); *Organizui samogo sebja* (Moscow, 1923); *Kak vesti sobranie*, 5th ed. (Moscow, 1923).
- 88 莫斯科的某個布爾什維克說，政變成功之後，「有些同志不太適應地下狀態終於結束了這一想法」。實際上，要想在一個充滿敵意的國家和充滿敵意的世界保住政權，化名和密碼電報似乎仍然是必要的。Smidovich, "Vykhod iz podpol'ia v Moskve," 177. 斯米多維奇當時是莫斯科軍事革命委員會的主席。
- 89 1922年，列寧堅持要求把中央委員會三個書記的上班時間公之於眾——後來公佈在《真理報》上——並要準確地說明，書記處何時會開放並接待官員、工人、農民，或者是誰會到場。這就是斯大林辦公室日誌的起源（它起初不是為他在克里姆林宮的辦公室，而是為他在沃茲德維任卡街以及後來老廣場街的辦公室準備的）。後來，斯大林取消了這種開放的辦公時間，只在自己召見別人時才接待官員和其他人。
- 90 Pipes, *Unknown Lenin*, 74.
- 91 1918年，茲納緬卡街被更名為紅旗大街，但在口頭語言中仍沿用原來的名字。茲納緬卡街23號在1926年重新編號時改成了19號。
- 92 RGASPI, f. 17, op. 11, d. 186, l. 129, 108; d. 171, l. 232, 167; op. 112, d. 474, l. 11; op. 11, d. 171, l. 198; op. 68, d. 49, l. 116.
- 93 1921年8月5日，托洛茨基命令紅軍政治部在內戰勝利後要繼續加強自身的工作。他視察了霍德因斯克軍營和一所培養年輕指揮官的學校。他要求出版更好的報紙，並組織集體閱讀：「在36師的紅軍戰士中有許多烏克蘭人。他們中不少人在很長時間裏都是波蘭資產階級的戰俘。他們在囚禁期間受到過虐待。當提到囚禁的話題時，以前的戰俘們就活躍起來。報紙有必要花上幾天來討論這個



- 問題。」他建議找個記者，引述他們的話並選出比較好的故事。他警告他們不要忘了制服和靴子，也不要忘了槍，要注意他們的需要，不要讓他們淹沒在八股套話和陳詞濫調中。托洛茨基要求確保服役宣誓受到認真對待，而不是走過場。托洛茨基還表示他是按照列寧的教導行事。他在1921年11月23日討論正在進行的時候向列寧要過他在軍事理論方面的著作 (l. 173)。前一天，托洛茨基讓人給自己找來其他國家在世界大戰後的新軍事條例——「尤其是法國的」 (l. 182)。他想要寫兩本以實際情況為根據的大眾書籍，一本關於波蘭，一本關於羅馬尼亞，用於紅軍士兵的培訓和宣傳，而且這兩本書必須寫得通俗易懂。他下令把《軍事科學與革命》雜誌更名為《戰爭與革命》。RGVA, f. 33 987, op. 1, d. 448, l. 84-6, Hoover Institution Archives, Volkogonv papers, container 17.
- 94 *XII s'ezd RKP (b)*, 59.
- 95 Shanin, *Awkward Class*, 190-2.
- 96 Zibert, "O bol'shevistskom vospitanii."
- 97 Shpilrein, *Iazyk krasnoarmeitsa*. 由於政治原因，政權就同過去的沙皇政權一樣——儘管出於不同的政治觀點——不信任應該教育農民的農村教師。Pethybridge, *One Step Backwards*, 79.
- 98 Von Hagen, *Soldiers in the Proletarian Dictatorship*, 271-9, 288.
- 99 「目前，」某特別委員會在1924年1月指出，「紅軍還不是一支有組織、訓練有素、接受過政治教育並可以從動員起來的資源中獲得補給的力量。按照目前的狀況，紅軍還沒有做好戰鬥的準備。」Berkhin, *Voennaia reforma*, 60.
- 100 Von Hagen, *Soldiers in the Proletarian Dictatorship*, 183.
- 101 Berkhin, *Voennaia reforma*, 60.
- 102 Harrison, *Marooned in Moscow*, 227; Leggett, *The Cheka*, 34, 165.
- 103 關於斯大林早期對秘密警察的「強烈興趣」，參見Gerson, *The Secret Police*, 28.
- 104 關於它的人員配備，目前還有點令人費解，部分原因在於對人員進行統計的方式。早期的時候，契卡很少做記錄——「所有事情都是按照作戰模式匆忙完成的，只有在可能的時候他們才會把事情寫下來」，有歷史回憶錄講到。Lais, *Otcheta VChK za chetyre goda ee deiatel'nosti (20 dekabria 1917 g—20 dekabria 1921 g.* [內部使用]，13，轉引自V. K. Vinogradov, "Istoriia formirovaniia arkhiva VChK," 見於Vinogradov, *Arkhiv VChK*, 5-50 (at 5).
- 105 Vinogradov, *Genrikh Iagoda*, 295-305 (TsA FSB, f. 2, op. 1, d. 138, l. 176-9). 很快就有許多備忘錄要求取消繁文縟節和開支。「我們需要消除文件亂飛的現象，需要削減人員」，捷爾任斯基給自己的一名副手寫道(1921年7月4日)。V. K. Vinogradov, "Istoriia formirovaniia arkhiva VChK," 見於Vinogradov, *Arkhiv VChK*, 9, 引自TsA FSB, f. 66, op. 1, d. 55, l. 108-108ob. 在聯邦安全局檔案館裏有三百多卷關於喀琅施塔得的檔案文件，這些是從許多機構和出版物中，包括從契卡內部搜來的：*Kronstadtskaia tragediia*, 1: 30.
- 106 Leonov, *Rozhdeniu sovetskoi imperii*, 298-300; Baiguzin, *Gosudarstvennaia bezopasnost' Rossi*, 436.

- 107 *Pravda*, February 22, 1919 (弗拉基米爾契卡); *Sotsialistichesii vestnik*, September 21, 1922 (斯塔夫羅波爾契卡).
- 108 流亡的馬克西姆·高爾基寫得很生動：契卡人員「追逐權力的時候像狐狸，使用權力的時候像狼，到被逮住的時候，就像狗一樣死去」。Gorky, *Untimely Thoughts*, 211.
- 109 也是在1920年，斯大林取代布哈林成為政治局在契卡會務委員會的代表。Leggett, *The Cheka*, 132–45, 159, 165. 直到1918年11月，按照尼古拉·克雷連柯的看法，契卡都是在沒有任何法律法規的情況下存在的，更不用說監督了。Krylenko, *Sudoustroistvo RSFSR*, 97.
- 110 Rayfield, *Stalin and His Hangmen*, 67–8.
- 111 Popoff, *The Tcheka*; Dmitrievskii, *Sud'ba Rossii*, 214. 沙皇時代的警察大多被契卡拒之門外，而他們中間也很少有人想要加入契卡。在契卡工作的有三位有名的保安處特工：一個是製作內部通行證的，一個是在巴黎幫助招募特工的，還有一個是舊政權頂尖的密碼專家伊萬·A. 齊賓 (Ivan A. Zybin)，從前沙皇密碼部門的負責人。Soboleva, *Istoriia shifroval'nogo dela*, 417–9. 與之形成鮮明對照的是，在布爾什維克政權的國家監察委員會，90%的成員都是原沙皇檢察部門的工作人員。Remington, "Institution Building in Bolshevik Russia." 為最高領導層準備的有關格伯烏活動的1923至1924年度總結報告指出，在吸收沙皇時代留下的外國特工人員方面取得了一些成功。Istochnik, 1995, no. 4: 72–80. 1925年，奧格伯烏把保安處中央機關的中央檔案館搬到了莫斯科 (在巴黎的國外檔案據說是丟了，但實際上它們是被偷走並存放在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所)。奧格伯烏很快就公佈了一份在保安處秘密特工或線人卡片索引中的名單，累計差不多有1萬人。Spisok sekretnykh sotrudnikov, osvedomiteli, vspomogatel'nykh agentov byv. Okhrannykh otdelenii i zhandarmykh upravlenii, 2 vols. (Moscow, 1926–9).
- 112 Leggett, *The Cheka*, 190. Latsis, *Chrezvychainye komisii*, 11.
- 113 Kapchinskii, *Gosbezopasnosti iznutri*, 256–7.
- 114 當有人大聲質問說雖然有證據可以證明自己的清白卻還是被關進過監獄時，加米涅夫承諾說「(莫斯科)蘇維埃會處理這種不公正的事情」，結果引起一片噓聲。Pirani, *Russian Revolution in Retreat*, 39 (引自TsGAMAO, f. 180, op. 1, d. 236, l. 9, 11, 21, 28, 46–7).
- 115 「加米涅夫同志：我比較傾向於您的意見 (和捷爾任斯基的意見相比)。」列寧寫道 (1921年11月29日)。「我勸您不要讓步，要把問題提到政治局去。」PSS, LIV: 39 (譯註：《列寧全集》第52卷，第73頁)。
- 116 由捷爾任斯基、加米涅夫和司法人民委員 (1918–1928) 兼總檢察長德米特里·庫爾斯基 (Dmitry Kursky) 組成的另外一個特別委員會 (成立於1921年12月1日) 卻陷入了僵局。捷爾任斯基一面做庫爾斯基的工作，建議在逮捕、搜查和拘留方面開始採用更明晰的程序，一面指示自己的新任第一副手約瑟夫·溫什利赫特在不引起列寧反感的情況下，設法得到契卡想要得到的東西。Plekhanov and Plekhanov, *F. E. Dzerzhinskii*, 339–40; D. B. Pavlov, *Bol'shevistskaia diktatura*, 54–5, 引自RGASPI, f. 5, op. 1, d. 2558, l. 50; Zhordaniia, *Bol'shevizm*, 71. 庫爾斯基 (生於1874年)

- 後來成了蘇聯駐意大利的使節(1928–1932)並於1932年12月自殺。Voloshin, "Dmitrii Ivanovich Kurskii"; "Dmitrii Ivanovich Kurskii: k 100-letiiu so dnia rozhdeniia," *Sotsialisticheskaia zakonnost'*, 1974, no. 11: 48–9.
- 117 為了完成轉變，當時又成立了一個委員會，成員有斯大林、加米涅夫和庫爾斯基，但這次為捷爾任斯基殿後的還是溫什利赫特。Plekhanov, *VChK-OGPU*, 108–11. 為了避免敗壞格伯烏的名聲，捷爾任斯基當然希望更大程度地依法行事。參見他在1923年4月2日給曾經做過溫什利赫特秘書的安德烈耶娃(Andreeva)的信。他在信中認為，在沒有起訴的情況下，嫌疑人關押的時間不應超過兩週：RGASPI f. 76, op. 3, d. 49, l. 117. 政治局下達的撤銷契卡的命令說，新機構應當「將重點放在檢舉工作和國內情報(搜集工作)的制度化，以及說明各領域所有反革命和反蘇維埃行為方面」。該指示確切的措辭出自1921年年底由政治局成立的針對社會革命黨人和孟什維克黨人的委員會。D. B. Pavlov, *Bol'shevistskaia diktatura*, 53 (引自APRF, f. 3, op. 59, d. 16, l. 1–2, 4).
- 118 *Vsyilka vmesto rasstrela*, 11. 早在1921年初，就有兩千多名孟什維克黨人被關押在蘇維埃監獄和勞改營。Plekhanov, *VChK-OGPU*, 400 (TsA FSB, f. 1, op. 6, d. 138, l. 100). 南高加索地區的契卡在1926年改成了格伯烏。令人困惑的是，契卡中央機關在梯弗里斯設立的全權代表辦事處在1922年就改為格伯烏的全權代表辦事處，而且南高加索契卡的負責人也是南高加索格伯烏的全權代表。Waxmonsky, "Police and Politics in Soviet Society," 126; *Organy VChK-GPU-OGPU na Severnom Kavkaze i v Zakavkaz'e, 1918–1934 gg.* [https://www.kavkaz-uzel.ru/system/attachments/000/3107/%D0%9E%D1%80%D0%B3%D0%B0%D0%BD%D1%8B\\_%D0%92%D0%A7%D0%9A-%D0%93%D0%9F%D0%A3-%D0%9E%D0%93%D0%9F%D0%A3\\_%D0%BD%D0%B0\\_%D0%A1%D0%B5%D0%B2%D0%B5%D1%80%D0%BD%D0%BE%D0%BC\\_%D0%9A%D0%B0%D0%B2%D0%BA%D0%B0%D0%B7%D0%B5\\_%D0%B8\\_%D0%B2\\_%D0%97%D0%B0%D0%BA%D0%B0%D0%B2%D0%BA%D0%B0%D0%B7%D1%8C%D0%B5\\_\\_1918-1934\\_%D0%B3%D0%B3\\_.pdf](https://www.kavkaz-uzel.ru/system/attachments/000/3107/%D0%9E%D1%80%D0%B3%D0%B0%D0%BD%D1%8B_%D0%92%D0%A7%D0%9A-%D0%93%D0%9F%D0%A3-%D0%9E%D0%93%D0%9F%D0%A3_%D0%BD%D0%B0_%D0%A1%D0%B5%D0%B2%D0%B5%D1%80%D0%BD%D0%BE%D0%BC_%D0%9A%D0%B0%D0%B2%D0%BA%D0%B0%D0%B7%D0%B5_%D0%B8_%D0%B2_%D0%97%D0%B0%D0%BA%D0%B0%D0%B2%D0%BA%D0%B0%D0%B7%D1%8C%D0%B5__1918-1934_%D0%B3%D0%B3_.pdf).
- 119 PSS, XLIV: 396–400 (*pis' mo D. I. Kurskomu*). 另見Pavliuchenkov, "Orden mechenostsev," 131 (引自RGASPI, f. 5, op. 2, d. 50, l. 64). 斯大林讓人把列寧的信發表在1937年1月15日的《布爾什維克》上。政治局早在1921年12月28日就同意了捷爾任斯基的建議，準備安排對社會革命黨人的公審，雖然捏造這起案子還需要時間。Tsvigun, *V. I. Lenin i VChK* [1987], 518.
- 120 Argenbright, "Marking NEP's Slippery Path"; Hiroaki Kuromiya, *Freedom and Terror*, 143. 在承認私人貿易合法化之後沒過幾個星期，1921年4月，伊瓦爾·T. 斯米爾加就建議對石油工業領域的幾名工程師進行公審。1921至1922年冬天，列寧催促司法人民委員部準備對一些經濟管理人員進行作秀公審。RGASPI, f. 17, op. 3, d. 155, l. 4; Rees, *State Control in Soviet Russia*, 35.
- 121 Volkogonov, *Lenin. Life and Legacy*, 359.
- 122 Pethybridge, *One Step Backwards*, 206.

- 123 高爾基曾經寫信給李可夫(1922年7月1日)，說「如果對社會革命黨人的審判以謀殺而告終——它將是一場預先策劃好的謀殺，一場罪惡的謀殺！我請您向列昂·托洛茨基等人轉達我的看法」，他在這裏提到的不只是政治上的權宜之計，還有原則問題。他譴責這種「對我們這個無知無識的國家中知識分子力量的無意義的、罪惡的謀殺」。他提到托洛茨基而沒有提到斯大林，這一點意味深長。*Shpion*, 1993, no. 1: 36 (RTSKHIDK, f. 7, op. 2, d. 2600, l. 11). 還是在1919年，列寧在寫信回應高爾基提出的批評時提到，「那些自詡為民族的大腦的知識分子、資本的奴僕……而那些人實際上並不是甚麼大腦，而是……」(譯註：《列寧全集》第49卷，第89頁) Koenker, *Revelations*, 229–30 (RGASPI, f. 2, op. 1, d. 11164, l.1–6: Lenin letter, September 15, 1919).
- 124 *Vinogradov, Pravoesserovskii politicheskii protsess; Jansen, Show Trial; Morozov, Sudebnyi protsess sotsialistov-revoliutsionerov*; Shub, “The Trial of the SRs.”
- 125 死刑判決要到1924年1月才得到正式減刑。托洛茨基把加米涅夫的建議說成是自己的功勞：*Moia zhizn'*, II: 211–2. 1922年3月1日，格伯烏的明仁斯基下令說，「所有線人要集中力量防止社會革命黨的小集團統一起來」，要「打碎他們為統一所做的努力」。 *Sbornik tsirkuliarnykh pisem VChK-OGPU*, III/i: 301. 格伯烏聘請了研究社會主義政黨的專家擔任顧問，那些人為公開的誹謗活動出謀劃策。這樣的工作是由龐大的秘密行動部領導的，格伯烏的十個部足足有六個都參與了對社會主義者以及無政府主義者的鎮壓。
- 126 *Sbornik zakonodatel'nykh i normativnykh aktov o repressiiakh*, 12.
- 127 Gerson, *The Secret Police*, 222. 1922年12月，在莫斯科大劇院紀念蘇俄秘密警察成立五週年的大會上，季諾維也夫說國外無產者在聽到「VChK」——全俄契卡——這幾個字母時「非常羨慕」，而資產階級「在聽到這三個可畏的字母時就發抖」(編註：「Ch」對應俄語字母「ч」，所以「VChK」是三個字母)。人們大笑。*Pravda*, December 19, 1922: 3.
- 128 據說碼頭上的格伯烏押送人員時曾脫帽致敬。Chamberlain, *Lenin's Private War*, 139 (引自 Vera Ugrimova, 204).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那些被驅逐出境的人，許多都比驅逐他們的人壽命長。
- 129 Robson, *Solovki*; Ascher, “The Solovki Prisoners”; Beliakov, *Lagernaia sistema*, 385–91. 當時一共有三個特別勞改營：阿爾漢格爾斯克、霍爾莫戈爾斯基和佩爾托明斯基。
- 130 捷爾任斯基建議說「應該為每個知識分子都開設一個卷宗」——因為他們天生有罪。但為了監視，他把知識分子大致分為：「(1)小說家，(2)時評家和政治家，(3)經濟學家〔這裏我們要細分成更小的集團：金融、燃料、運輸、貿易、合作社等方面的專家〕，(4)技術人員〔這裏也要細分成子集團：工程師、農學家、醫生、總參謀部的人員等等〕，(5)教授和教師等等。」他還說：「所有集團和子集團都應由合格的同志從各方面加以教育，應當由我們的部門把那些集團分配到合格的同志中間。要多方面核實信息，那樣我們的結論才能正確無誤、不可推翻，而到目前為止，由於教育上的草率和片面，情況還不是這樣。」Plarova, *Zhizn' studenchestva Rossii*, 134. 作為格伯烏第一副主席，溫什利赫特所採取的最後

- 的行動之一，就是寫信給黨的書記處（1923年3月17日），認為需要「增強與我們為敵的政黨隊伍中的分裂和分歧趨勢」——這是指非布爾什維克的社會主義者。D. B. Pavlov, *Bol'shevistskaia diktatura*, 3 (引自APRF, f. 3, op. 59, d. 14, l. 38). 關於溫什利赫特，另見Weiner, "Dzerzhinskii and the Gerd Case."
- 131 Izmozik, *Glaza*, 115 (RGASPI, f. 76, op. 3, d. 306, l. 156).
- 132 S. A. Krasil'nikov, "Politbiuro, GPU, in intelligentsia v 1922–1923 gg.," 載於 *Intelligentsia, obshchestvo, vlast'*, 53. 黨也成立了一個「情報部」，並且從1924年起（作為與托洛茨基鬥爭的一部分）就不斷得到加強，但它搜集的情報不僅是有關黨的基層組織的，也有關於工人、農民、工業、農業、各民族和各地區的。 *KPSS v rezoliutsiakh* [1984], III: 159. 事實上，從紅軍到共青團，幾乎所有的組織都在搞監視和編寫情緒報告。
- 133 臨時政府保留了編寫陸、海軍情緒報告的做法，彼得格勒的布爾什維克為跟蹤瞭解士兵和工人的情緒，沿用了這一做法。實際上，政變後沒幾天，彼得格勒的布爾什維克就給各地區黨小組發了一張調查表，調查群眾對「奪權」的態度。Izmozik, *Glaza*, 50;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英國和德國除了書報檢查和宣傳，還對郵件進行檢查。到1918年的時候，英國使用的書報檢查人員按照人均比例來說同1920年代的蘇聯是一樣的。Holquist, "Information is the Alpha and Omega," 422, 440. 英國人也試圖不僅記錄而且塑造前線的情緒。Englander, "Military Intelligence." 法國和德國軍隊也沒甚麼不同。Becker, *The Great War*, 217–9.
- 134 RGASPI, f. 17, op. 84, d. 176, 196; Sakharov, *Politicheskoe zaveshchanie*, 131, 142–3.
- 135 大樓編號也是5/21。外交人民委員部前面的廣場後來更名為瓦茨拉夫·沃羅夫斯基 (Waclaw Worowski) 廣場，沃羅夫斯基是一位通曉多種語言的文學批評家和蘇維埃外交官，1923年5月在瑞士被一名和弗蘭格爾男爵的白軍一起從克里米亞撤走的反蘇流亡分子暗殺。瑞士的法庭判暗殺者無罪，認為兇手報復蘇維埃政權暴行的行為是合法的。Chistiakov, *Ubit' za Rossiu!*. 基輔市中心的主幹道赫雷夏蒂克街在1923至1937年也改名為沃羅夫斯基大街。
- 136 Liadov, *Istoriia Rossiiskogo protokola*, appendix document 2.
- 137 Besedovskii, *Revelations of a Soviet Diplomat*, 78–9.
- 138 Magerovsky, "The People's Commissariat," I: 246–53. 一份蘇聯的原始材料給出的數據是，從1924年1月開始，工作人員總數為1,066： *Desiat' let sovetskoi diplomatii*.
- 139 Uldricks, *Diplomacy and Ideology*, 97–115.
- 140 俄國人之外的共產國際代表——行話稱「工人階級的優秀代表」——私下裏被說成是「俄國黨的最好的朋友」。Jacobson, *When the Soviet Union Entered*, 39 (引自Kuusinen to Herbert Droz, February 5, 1923: archives de Jules Humbert Droz, I: 143).
- 141 Von Mayenburg, *Hotel Lux* [1978]. 魯特·馮·邁恩伯格男爵夫人 (Baroness Ruth von Mayenburg) 為蘇俄軍事情報機關工作。另見Vaksberg, *Hôtel Lux*; Von Mayenburg, *Hotel Lux* [1991]). 1933年，這棟原本四層的飯店擴建為六層，房間增加到300個，住滿了來自共產主義已被取締的那些國家的官員和避難者。（原來的特維爾大街36號改成了高爾基大街10號。）

- 142 蘇俄人要進入柳克斯飯店必須留下身份證並填寫兩張調查表，而且午夜之前必須全部離開。Kennel, "The New Innocents Abroad," 15.
- 143 Kuusinen, *Rings of Destiny*, 44. 除了庫西寧，共產國際的高級工作人員還包括人稱「皮亞特尼茨基 (Pyatnitsky)」的奧西普·塔爾希斯 (Osip Tarshis, 生於1882年)，立陶宛猶太人，曾經做過木匠；最後還有德米特里·馬努伊爾斯基 (Dmytro Manuilsky, 生於1883年)，烏克蘭農村正教神父的兒子，烏克蘭共產黨第一書記，效忠於斯大林。
- 144 參見 Heimo and Tivel, *10 let Komintern*. (貝格的故居在1924年2月成了恢復外交關係後的意大利大使館。) 共產國際的圖書檔案當時存放在地下室——開會也在那裏，在那個被稱為俱樂部的房間。「一連幾小時坐在窄凳上可不是鬧着玩的，尤其是在上了八小時班之後，大家都很疲勞，」庫西寧的妻子阿爾沃 (Arvo) 指出，「不懂俄語的外國人尤其難受，結果就會忍不住打哈欠。但是沒有人敢提出抗議，甚至不敢提從來都看不到執委會的人開會這件事。」Kuusinen, *Rings of Destiny*, 55. 圖書館由芬蘭人阿蘭·瓦勒紐斯 (Allan Wallenius) 負責，他在紐約公共圖書館學過圖書管理；管檔案的是鮑里斯·賴因施泰因 (Boris Reinstein)。
- 145 Krivitsky, *In Stalin's Secret Service*, 47.
- 146 Kuusinen, *Rings of Destiny*, 39, 41, 59–60. 除了皮亞特尼茨基，邁耶·特里利謝爾 (Meyer Trilliser) 在調到對外情報部門之前也在國際關係部工作。
- 147 "Posledniaia sluzhebnaia zapiska Chicherina," *Istochnik*, 1995, no. 6: 108–10; Kennan, *Russia and the West*, 177.
- 148 Adibekov and Shirinia, *Polisbiuro TsK RKP(b)—VKP(b) i Komintern*, 76 (RGASPI, f. 17, op. 3 d. 164, l. 2). 可以證明使館人員違反禁令從事非法活動的是，政治局在兩年後做出規定，除非是得到 (契切林的) 明確允許，否則禁止蘇聯外交人員傳播革命材料。RGASPI, f. 2, op. 1, d. 24 539; f. 17, op. 3, d. 158, l. 2 and d. 173, l. 2; Drachkovitch and Lazitch, *Lenin and the Comintern*, 534. 共產國際真的從外交人民委員部那裏接管了為外國共產黨提供經費的工作，並開始培養出它自己的一批獨立的國際信使，這讓季諾維也夫十分高興。Adibekov and Shirinia, *Polisbiuro TsK RKP(b)—VKP(b) i Komintern*, 25–6; Carr, *Bolshevik Revolution*, III: 67.
- 149 「在莫斯科看來，」凱南繼續說道，「共產黨之外的政治家是不可能有意去做好事的。」Kennan, *Russia and the West*, 181–5.
- 150 Carr, *Bolshevik Revolution*, III: 67–8; Jacobson, *When the Soviet Union Entered*.
- 151 Stalin in *Pravda*, December 18, 1921, 見於 *Sochineniia*, V: 118–20.
- 152 蘇俄人在談判時明白，對他們想吸引的資本主義國家而言，他們的採購將令其經濟和重要選民受惠。Kennan, *Russia and the West*, 189–95.
- 153 *Pravda*, October 29, 1921.
- 154 Orde, *British Policy*; Maier, *Recasting Bourgeois Europe*. 關於蘇俄參會的情況，參見：*Genuevskaia konferentsiia: Materialy i dokumenty* (Moscow: NKID, 1922); Ioffe, *Genuevskaia Konferentsiia*; Liubimov and Erlikh, *Genuevskaia konferentsiia*.

- 155 Degras, *Soviet Documents on Foreign Policy*, I: 270–2, 287–8. 當俄國單方面宣佈在熱那亞會議上可以代表全部六個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時，烏克蘭的幾位領導人勃然大怒（新的聯盟條約要到那年的晚些時候才簽署）。
- 156 APRE, f. 3, op. 22, d. 306, l. 8–9, Volkogonov papers, Hoover Institution Archives, container 23: Cheka note to Molotov, January 23, 1922. 布爾什維克的高層人物一個都沒去。契卡的報告提到的另外一個暗殺對象是格奧爾吉·契切林，他將率領蘇俄代表團，代表團中還包括馬克西姆·李維諾夫、阿道夫·越飛、克里斯季安·拉柯夫斯基、列昂尼德·克拉辛、瓦茨拉夫·沃羅夫斯基、揚·魯祖塔克（當時32歲）以及亞歷山大·別克扎江（Alexander Beksadyan，亞美尼亞外交人民委員）。
- 157 Lenin, “V. M. Molotovu dlia chlenov politbiuro TsK RKP (b),” PSS, LIV: 136–7.
- 158 列寧以他一貫的方式接着說道：「當然，即使是在秘密文件中都不要提這些。」 Pipes, *Unknown Lenin*, 144–5. 契切林還接到列寧的嚴格指示，讓他不要提到新的帝國主義戰爭不可避免和推翻資本主義等等。Carr and Davies, *Foundations of a Planned Economy*, III: 120.
- 159 White, *Origins of Détente*; Fink, *The Genoa Conference*.
- 160 在英國，寇松勳爵和溫斯頓·丘吉爾堅定地反對布爾什維克，他們抵制勞合一喬治的倡議，但列寧認為勞合一喬治才是英帝國主義的先鋒。DBFP, VIII: 280–306. 另見O'Connor, *Engineer of Revolution*; 以及Khromov, *Leonid Krasin*, 64–82.
- 161 關於熱那亞會議，參見Ernest Hemingway, “Russian Girls at Genoa,” *Toronto Daily Star*, April 13, 1922, 轉載於 *Hemingway By-Line: 75 Articles and Dispatches of Four Decades* (London: Penguin, 1968), 46–7. 另見Eastman, *Love and Revolution*, 285–90; Degras, *Soviet Documents on Foreign Policy*, I: 298–301 (契切林的演講). 蘇德雙邊談判實際上是從遣返俄國戰俘問題着手的。Williams, “Russian War Prisoners”; Shapiro, *Soviet Treaty Series*, I: 40–1. 監督戰俘遣返工作的古斯塔夫·希利格爾(Gustav Hilger)在俄國和德國的學校都接受過教育，1919年24歲時作為機器製造工程師返回蘇俄：Hilger and Meyer, *Incompatible Allies*, 25. 被遣返回國的遠遠不是全部戰俘；到1921年的時候，僑居歐洲的人數在50萬左右。
- 162 Peter Krüger, “A Rainy Day, April 16, 1922: the Rapallo Treaty and the Cloudy Perspective for German Foreign Policy,” 載於Fink, *Genoa, Rapallo, and European Reconstruction*, 49–64.
- 163 Kennan, *Russia and the West*, 198–21; Fink, *Genoa Conference*. 另見White, *Origins of Détente*.
- 164 *Dokumenty vneshnei politiki*, V: 226 (李維諾夫).
- 165 *Izvestiia*, May 10, 1922; *Sbornik deistvuiushchikh dogovorv soglashenii*, III: 36–8. 列寧還要求務必通過談判單獨與意大利簽訂條約，以便在列強中製造不和，但是在那個條約簽訂之後（1922年5月），他卻沒有批准。
- 166 1920年12月6日，列寧對莫斯科黨組織積極分子說：「德國本身是個帝國主義國家，然而是一個被征服了的國家，所以它必然要尋找同盟者來反對全世界的帝國主義。這就是我們應當加以利用的一個情況。」“Doklad o kontsessiakh,” PSS, 55–78 (at 68) (譯註：《列寧全集》第40卷，第71頁)。

- 167 Sandomirskii, *Materialy Genuevskoi konferentsii*, 327–8; Eudin and Fisher, *Soviet Russia and the West*, 202 (契切林致巴爾圖〔Barthou〕, 1922年4月29日).
- 168 Gorlov, *Sovershennko sekretno, Moskva-Berlin 1920–1933*; Müller, *Das Tor zur Weltmacht*; Zeidler, *Reichswehr und Rote Armee* [1993]; Erickson, *Soviet High Command* [1962], 247–82. 1922年8月19日, 新任命的蘇俄駐柏林外交使節克列斯廷斯基寫信給托洛茨基並抄送斯大林, 要求派一名伏龍芝或圖哈切夫斯基那樣的軍方人物到柏林。RGASPI, f. 558, op. 11, d. 755, l. 1. 在1922年11月的共產國際代表大會上, 布哈林發表了一般性的講話。他說, 就像可以接受貸款一樣, 工人國家也可以同資產階級強國建立軍事同盟。IV *Vsemirnyi kongress*, 195–6, Eudin and Fisher, *Soviet Union and the West*, 209–10.
- 169 White, *Origins of Détente*, 181.
- 170 Jacobson, *When the Soviet Union Entered*, 90–98 (quote at 98).
- 171 從1922年4月開始, 德國花了一小筆錢, 把世界大戰歸咎於彭加勒和法國(據說是為了報復1870年失去的阿爾薩斯和洛林)。這是一場宣傳領域的閃電戰。為了進一步抹黑尼古拉二世, 蘇俄人急切地參與其中, 把那場戰爭說成是法國和沙俄聯手發動的侵略戰爭。Keiger, *Raymond Poincaré*, 288–91; Mombauer, *Origins of the First World War*, 200.
- 172 Fisher, *Famine*, 300; *Golod 1921–1922*; Lubny-Gertsyk, *Dvizhenie naseleniia na territorii SSSR*; 以及 Adamets, *Guerre civile et famine en Russie*. 《真理報》(1921年6月30日)早就對災難發出過警告。糧食人民委員部預計, 災難性的收購量是不到430萬噸(1920年已經收購了540萬噸); 實際的稅收量會是270萬左右。Piat' let vlasti Sovietov, 373; Genkina, *Perekhod*, 302. 1928年, 一名外國專家估計, 1916至1924年, 死於各種流行疾病的有800萬至1,000萬人。Grant, *Medical Review of Soviet Russia*, 15.
- 173 Fisher, *Famine*, 96. 另見 Pethybridge, *One Step Backwards*, 91–119. 挪威賑災協調員弗里喬夫·南森(Fridtjof Nansen)對於極度饑餓的人口有不同的估計, 分別是2,000萬到3,000萬(1921年9月)和5,000萬(1922)。League of Nations, *Records of the . . . Assembly*, II: 545, III: 59. 另見 Graziosi, "State and Peasants," 65–117 (at 100).
- 174 Wehner and Petrov, "Golod 1921–1922 gg.," 223 (引自 GARF, f. 1065, op. 1, d. 86, l. 12). 有些人利用危機牟利: 1922年, 一面是吵着要上車而不讓上車的乘客, 一面是特快列車上的警衛把整節的車廂還有廁所都用來堆放可以當錢使的食鹽, 讓自己的老婆在列車停靠時進行交易——「多少鹽換一隻鵝, 多少鹽換一隻小豬」——而那些鵝和小豬又可以在列車途經的災區以天價出售。Mackenzie, *Russia Before Dawn*, 229.
- 175 Logachev, "V khlebnom raioine Zapadnoi Sibiri': ot prodraverstka k golodu," 36–43.
- 176 Beisembaev, *Lenin i Kazakhstan*, 325–6.
- 177 Dzerzhinskii, *Feliks Dzerzhinskii: dnevniki zakliuchennogo*, 229–30; Tishkov, *Dzerzhinskii* [1976], 335–8; Bartashevich, "Moskva zhdet . . . khleba," 34–7; Plekhanov and Plekhanov *F. E. Dzerzhinskii*, 368–9.
- 178 Berelowich and Danilov; *Sovetskaia derevnia glazami*, I: 572–4 (TsA FSB, 1, op. 6, d. 461, l. 69–76).



- 815 179 Edmondson, "The Politics of Hunger."「農民沒能救濟城市，」有歷史學家巧妙地總結說，「成百上千萬的農民自己反倒成了救濟的對象。」Siegelbaum, *Soviet State and Society*, 89.
- 180 Patenaude, *Big Show in Bololand; Itogi posledgol s 15/X-1922 g. 1/VIII-1923 g.* (Moscow: Tsentral'naia komissiiia pomoshchi golodayushchim, 1923), 65. 美國救濟署送來了78.4萬噸糧食援助。進口的糧食總量超過200萬噸，其中包括從國外購買的糧食。Fisher, *Famine*, 298n, 554.
- 181 轉引自H. Johnson, *Strana i mir*, 1992, no. 2: 21. 美國救濟署得益於布爾什維克對鐵路工人等採取的嚴厲的防範措施。政權動用紅軍士兵守衛一列列準備運往災區的救濟糧(士兵們都發了口糧，但要是運糧列車最終花的時間比預期的長，許多士兵在到達終點時已是奄奄一息)。Fisher, *Famine*, 181, 191.
- 182 PSS, XLV: 122, 127, L: 187, 388-9; Golikov, *Vladimir Il'ich Lenin*, VIII: 366, XI: 509; McNeal, *Stalin*, 48; Volkogonov papers, Hoover Institution Archives, container 23.
- 183 布爾什維克以為美國救濟署會優先給政權的「階級敵人」提供糧食。實際上，別說是搞政治組織，就連賑災人員議論政治，胡佛都不允許。因為他相信，美國救濟署在效率上的榜樣作用，會激發俄國人民去推翻布爾什維主義。有些觀察家想知道，這樣一個過程是否可能已經開始了。1923年5月28日，臨時政府駐美國大使鮑里斯·巴赫梅捷夫(Boris Bakhmeteff)寫信給一位密友(葉卡捷琳娜·庫斯科娃(Yekaterina Kuskova))，提到了與胡佛的談話。「不久前，他非常令人信服地對我說，在他看來，農民中出現餘糧，會導致與現存的布爾什維克統治制度的衝突，」巴赫梅捷夫寫道，「(美國救濟署的)工作人員已經如實告訴胡佛，那些餘糧在價格上受到壓力，以及自然有越來越多農民想把糧食拿到市場上儘量買個好價錢。由於這種現象越來越普遍，也就是說，由於餘糧越來越多，土地的擁有人自然想以最高的價格出售餘糧，而最高的價格就意味着自由的世界貿易的環境。我認為胡佛是對的，這種想把自己糧食賣出最高價錢的天生的、無法克服的衝動所造成的敵意，會成為布爾什維克制度最強大的、不可征服的敵人之一。」Pavel Nikolaevich Miliukov Papers, ca. 1879-1970, Columbia University, box 1. 另見Budnitskii, "Boris Bakhmeteff's Intellectual Legacy"; 以及Engerman, *Modernization*, 116.
- 184 新經濟政策要想穩固下來還需要假以時日。就連「新經濟政策」的說法也是在這項政策實施了兩個月之後才使用的。在烏克蘭，新經濟政策是推遲實行的；在西伯利亞，只有少數幾個區開始從攤派改為實物稅。*Izvestiya*, March 23, 1921; PSS, XLIII: 62; *Pravda*, March 21, 1921; Chamberlin, *Russian Revolution*, II: 502-3; A. M. Bol'shakov, "The Countryside 1917-1924," 載於Smith, *Russian Peasant*, 48. 某個省級黨組織的官員強烈主張「應該像戰爭時期——在這個詞的完整的意義上——那樣開展」稅收工作。轉引自Radkey, *Unknown Civil War*, 366-7. 新經濟政策時期的稅收人員往往就是之前武裝徵糧隊的人。Gimpel'son, *Sovetskie upravleniia*.
- 185 Carr, *Bolshevik Revolution*, II: 289, 295-6.
- 186 Atkinson, *End of the Russian Land Commune*, 235.

- 187 1928年，阿列克謝·休謝夫 (Alexei Shchusev) 在奧爾利科夫巷1號按照構成主義風格，為農業人民委員部的新總部設計了一座巨型建築。同年，斯米爾諾夫被解除職務。第二年，蘇聯農業人民委員部成立。休謝夫的傑作要到1933年才完工。
- 188 Heinzen, *Inventing a Soviet Countryside*, 104–35.
- 189 到1927年，農業人民委員部只留用了五分之一蘇俄時代的人員。Heinzen, *Inventing a Soviet Countryside*, 93–4; *Gosudarstvennyi apparat SSSR*, 16, 104–5. 統計人民委員部是第四大部。
- 190 即便這樣也沒有哪個人民委員部可以得到它所要求的全部經費：陸軍人民委員部1919年只得到要求得到的37%。Malle, *Economic Organization of War Communism*, 172–82. 印製紙幣的染料必須用黃金從國外購買。
- 191 從1918年初開始，1英鎊可以兌換45盧布；一年後，這個數字是400，而到了1920年中期，1英鎊值1萬盧布，上漲了222倍；同一時期，德國馬克對盧布從1比1上漲到大約100比1。到1921年秋天，在實行了新經濟政策之後，貨幣黑市已完全開放，儘管這樣的交易要到1922年4月才會正式合法化。Feitelberg, *Das Papiergeldwesen*, 50.
- 192 Aliamkin and Baranov, *Istoriia denezhnogo obrashcheniia*, 194–5.
- 193 Katsenellenbaum, *Russian Currency*, 10.
- 194 Preobrazhenskii, *Bumazhnye den'gi*, 4. 另見Arnold, *Banks, Credit, and Money*, 95–6; Feldman, *The Great Disorder*; Ferguson, *When Money Dies*.
- 195 G. Ia. Sokol'nikov, "Avtobiografiia," 見於Gambarov, *Entsiklopedicheskii slovar'*, XLI/iii: 73–88, 轉載於Anfert'ev, *Smerch*, 190–205, 以及Sokol'nikov, *Novaia finansovaia politika*, 39–50; Oppenheim, "Between Right and Left"; Carr, *Bolshevik Revolution*, II: 351. 克列斯廷斯基被任命為駐柏林的使節。
- 196 *Pravda*, February 14, 1919 (Stalin); Genis, "G. Ia. Sokolnikov." 關於鉛封列車，可參見索柯里尼柯夫的說法，Anfert'ev, *Smerch*, 193. 最初建議把1917年十月政變放在蘇維埃第二次代表大會開幕期間的可能是索柯里尼柯夫而不是托洛茨基。Rubtsov, "Voенно-politicheskaia deiatel'nost' G. Ia. Sokol'nikova," 47.
- 197 *Pravda*, December 10, 1917; Sokol'nikov, *K voprosu o natsionalizatsii bankov*; Sokolov, *Finansovaia politika Sovetskoi vlasti*, esp. 22–27.
- 198 季諾維也夫拒絕去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結果這項任務就落到了索柯里尼柯夫頭上。Ivan A. Anfert'ev, "Vozvrashchenie Sokol'nikova," 載於Anfert'ev, *Smerch*, 158–89, 以及 "Neizvestnyi Sokol'nikov," *Vozvrashchenye imena* (Moscow: Novosti, 1989), II: 223–42 (at 224–5); Sokol'nikov, *Brestskii mir*.
- 199 在1919年黨的第八次代表大會上，列寧委託他提出反對伏羅希洛夫等人的「軍事反對派」及其游擊戰策略的問題。回到前線後，索柯里尼柯夫寫信揭發第一騎兵集團軍在一次打了勝仗之後違反紀律、喝得醉醺醺地搶劫頓河流域平民的事情，結果使謝苗·布瓊尼長期懷恨在心。1920年7月，托洛茨基請索柯里尼柯夫在總參軍事學院作系列講演，為的是「除了講演之外，社會主義文學也會因為一本關於軍事問題的好書而得到豐富」。VIII s'ezd RKP (b) [1959], 144–52, 273 (對索

- 柯里尼柯夫提綱的表決); Sokol'nikov, "Avtobiografiia," 見於 Anfert'ev, *Smerch*, 190-205 (at 200); Budennyi, *Proidennyi put'*, I: 374-406. Chigir, "Grigorii Iakovlevich Sokol'nikov," 63 (引自 RGASPI, f. 760, op. 1, d. 71, l. 124).
- 200 Golikov, *Vladimir Il'ich Lenin*, IX: 108, 159.
- 201 G. Ia. Sokol'nikov, "Liquidatsiia Turkestanskogo rublia," *Pravda*, December 30, 1920.
- 202 Arnold, *Banks, Credit and Money*, 126; Iurovskii, "Arkhitektork denezhnoi reformy," at 141; Katzenellenbaum, *Russian Currency and Banking*, 149-52; Nikolaev, "Na puti k denezhnoi reforme 1922-1924 godov," 89. 卡策內倫鮑姆在索柯里尼柯夫手下工作。私人銀行的恢復工作實際上在1919年秋天就開始了，但要到1921年才見到成效，當時政權試圖重建正常的貿易關係，這就需要為沙皇政府的債務確定一個總額。關於索柯里尼柯夫的健康問題，參見 V. Rozanov, "Vladimir Il'ich Lenin," *Krasnaia nov'*, 1924, no. 6: at 153. 國家銀行設在涅格林卡街12號一棟堅固的兩層建築裏，建築的正面刻有一些寓言人物；它過去是俄羅斯帝國國家銀行的莫斯科分行，1894年修建在沃龍佐夫家族花園的位置。金庫設在納斯塔辛斯基巷從前的莫斯科財政大樓裏，那棟建築是按照17世紀的風格（名為莫斯科巴洛克風格或新拜占庭風格）在1913至1916年間修建的。
- 203 Al'tman, "Lichnost' reformatora: narkom finansov G. Ia. Sokol'nikova 1888-1939," 159. 貨幣改革的詳情可見 *Finansovaia politika Sovetsko;* and Sokolov, *Finansovaia politika Sovetskogo gosudarstva; Denezhnaia reforma;* Atlas, *Ocherki po istorii denezhnogo obrashcheniia*. 阿特拉斯（生於1903年）在講金融改革時沒有提到索柯里尼柯夫的名字，這樣的怪事跟他的書的出版時間（1940）有關。他是蘇聯科學院經濟研究所研究資本主義國家和蘇聯貨幣流通及信貸問題的頂級人物（教授）。
- 204 Atlas, *Ocherki po istorii denezhnogo obrashcheniia*, 196（他還是沒有提到索柯里尼柯夫）；Goland, "Currency Regulation"; David Woodruff, "The Politburo on Gold, Industrialization, and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y, 1925-1926," 載於 Gregory and Naimark, *Lost Politburo Transcripts*, 199-223. 當赫伯特·胡佛1923年獲悉蘇聯恢復了糧食出口之後——他不知道的是，恢復糧食出口是為了支付進口步槍和機槍的費用——他就中止了美國救濟署的活動。Pipes, *Russia Under the Bolshevik Regime*, 418-9.
- 205 Katzenellenbaum, *Russian Currency and Banking*, 84-8, 105, 145. 新舊盧布的兌換比率分別是1:10,000（1922年1月1日）、1:100（1923年1月1日）、1比50,000（1924年3月7日）。Lawton, *Economic History of Soviet Russia*, I: 151.
- 206 Goland, *Diskusii ob ekonomicheskoi politike*. 1924年是最後一次出現這種由新經濟政策帶來的貿易順差。
- 207 1924至1925年，伏特加為預算帶來了5億盧布，這是一筆很大的收入，是不得已恢復舊政權「酒鬼預算」的結果。Carr, *Interregnum*, 43, n5.
- 208 Kvashonkin, *Bol'shevistskoe rukovodstvo*, 278 (RGASPI, f. 76, op. 3, d. 231, l. 2).
- 209 Galina Serebriakova, "Iz vospominanii," 載於 Anfert'ev, *Smerch*, 230-49 (at 234).
- 210 Mau, *Reformy i dogmy*, 137-51.
- 211 *XI s'ezd RKP (b)*, 360-1. 1920年代中期，拉林完全放棄了自己的主張：「我認為完全可以這麼說，首先，這是我們各個人民委員部中最聰明的，其次，它是唯一

- 個在任何時候都有着清晰的經濟路線的人民委員部。」轉引自 Genis, "Upriamyi narkom s Il'sinki," 載於 Sokol'nikov, *Novaia finansovaia politika*, 5-38 (at 19).
- 212 Carr, *Socialism in One Country*, I: 490. 工農檢查院為了自身的特權而對財政人民委員部展開了鬥爭。
- 213 年輕有為的記者米哈伊爾·科利佐夫 (Mikhail Koltsov) 給索柯里尼柯夫起了個綽號，叫「伊利英卡街的固執的人民委員」。索柯里尼柯夫推行了各種各樣的稅收和限制政策，不過，這些政策帶來了貨幣和經濟的真正穩定。Koltsov, *Izbrannoe*, 39.
- 214 協會起初有 64 名成員，他們參加紀念晚會，出版回憶錄。與此同時，「老布爾什維克」的概念以及較長的黨齡應否被當作某種資歷的問題，造成了政權內部的緊張關係。到 1925 年，黨的規模幾乎翻了一番、黨員和候補黨員有 110 萬，其中 1917 年之前入黨的只有 8,500 人 (0.8%)，1905 年之前的只有 2,000 人 (0.2%) (想要成為合資格的黨員，這是最早的時間)。XIV s'ezd VKP (b), 460; Korzhikhina, "Obshchestvo starykh Bol'shevikov," 50-65. *Ustav obshchestva starykh bol'shevikov; Rezoliutsii i postanovleniia pervoi Vsesoiuznoi konferentsii Obshchestva starykh bol'shevikov; Spisok chlenov Vsesoiuznogo obshchestva starykh bol'shevikov*.
- 215 Rigby, "The Soviet Political Elite," 419-20. 里格比指出，出席第九次代表大會的代表中，只有 13% 的人參加過十月革命前的黨的代表大會；在第十次代表大會中，該比例下降到 5%。IX s'ezd RKP(b), 483; X s'ezd RKP(b), 762.
- 216 列寧像他慣常那樣，擔心接收太多的工人會削弱黨的隊伍，因為許多工人都是剛脫離農村「小資產階級的」環境不久。他對莫洛托夫抱怨說，「目前黨的無產階級政策不是取決於黨員成分，而是取決於堪稱黨的老近衛軍的那一層為數不多的黨員所獨有的巨大威信。」但是，在一個工人政黨中，工人黨員明顯不足，這件事讓其他大部分高級官員都覺得比較尷尬。PSS, XLV: 17-20 (譯註：《列寧全集》第 43 卷，第 19 頁)；Kvashonkin, *Bol'shevistskoe rukovodstvo*, 239-41 (RGASPI, f. 5, op. 2, d. 27, l.9-10).
- 217 從 1921 年開始，工廠中的黨員大多是管理人員和行政人員，不是無產者。黨的第十次代表大會把招募工人黨員重新作為優先考慮的事項，黨的第十一次代表大會再次確認了這一目標。Chase, *Workers, Society, and the Soviet State*, 50-1; X s'ezd, 236-41, 284, 564; Rigby, *Communist Party Membership*, 93-5.
- 218 Rigby, "The Soviet Political Elite." 另見 Raleigh, *Experiencing Russia's Civil War*, 132.
- 219 「中低階層的人明顯受到重用，因此，有必要重新思考革命中的許多問題，」有學者正確地指出，「這就像一塊拼圖不見了，在它的位置上，許多新的聯繫成為可能。」Daniel T. Orlovsky, "State Building in the Civil War Era: The Role of the Lower Middle Starta," 載於 Koenker, *Party, State, and Society*, 180-209 (at 203, n3). 另見 Buldakov, *Bor'ba za massy*, 164-256; 以及 Hunt, *Politics, Culture, and Class*.
- 220 "Moi ded, Viacheslav Molotov, ne platil Leninu gonorarov," *Rodnaia gazeta*, May 20, 2005 (對維亞切斯拉夫·尼科諾夫 [ Viacheslav Nikonov ] 的採訪).
- 221 Nikonov, *Molotov*, 88, 91-2, 109-13.
- 222 Watson, *Molotov and Soviet Government*, 43.
- 223 Bazhanov, *Vospominaniia* [1990], 179.

- 224 Kuibyshev, *Epizody iz moei zhizni*; Elena Kuibysheva, *Valerian Vladimirovich Kuibyshev*; Berezov, *Valerian Vladimirovich Kuybyshev*; G. V. Kuibysheva, *Valerian Vladimirovich Kuybyshev*; Khromov and Kuibysheva, *Valerian Vladimirovich Kuybyshev*; Flerov, V. V. *Kuibyshev*; Buzurbaev, *Kuibyshev v Sibiri*; Erofeev, *Valerian Kuibyshev v Samare*.
- 225 Schapiro, *Communist Party of the Soviet Union*, 260–2; Schapiro, *Origin of the Communist Autocracy* 1977 ed., 288–9. 古比雪夫已經取代了米哈伊洛夫在黨的書記處的職務。
- 226 Trotsky, *Stalin School of Falsification*, 126.
- 227 古比雪夫出現在當時的政權高層名錄中，那裏面主要是些政治局委員和候補委員（莫洛托夫不在其中）。Volin, *12 biografii*. 按照俄文字母的順序，這12個人分別是：布哈林、捷爾任斯基、季諾維也夫、加里寧、加米涅夫、古比雪夫、李可夫、斯米爾諾夫、斯大林、托姆斯基、托洛茨基和伏龍芝。
- 228 Rees, “*Iron Lazar*,” 1–59.
- 229 「我總是嘲笑那種做法。比如，我當着所有人的面對馬霍韋爾(Makhover)說，「你永遠不會像斯大林，你的腦子不一樣，而且不管怎樣，主要是你沒有小鬍子。」」 Balashov and Markhashov, “*Staraiia ploshchad'*,” 4 (20-e gody),” no. 5: 195. 巴拉紹夫身材矮小，只有1.53米(約5英尺)。
- 230 1923年，卡岡諾維奇指出，工業的各個部門都集中在來路不明的黨外人員手中，有時甚至不是集中在優秀的黨外專家手中，而是在「圓滑的野心家」手中。因此，他堅持認為，黨必須進行干預並安插自己人。Pavliuchenkov, *Rossiiia Nepovskaia* “*Orden mechenostsev*,” 68 (引自 f. 17, op. 68, d. 49, l.28–31).
- 231 Bazhanov, *Avec Staline dans le Kremlin*, 58.
- 232 1925年4月7日，斯大林任命卡岡諾維奇擔任烏克蘭黨的負責人，那是三個具有戰略意義的黨組織之一，另外兩個是莫斯科和列寧格勒。Rees, “*Iron Lazar*,” 17. 卡岡諾維奇沒有被收錄到1925年的格拉納特蘇聯240名高級領導人傳記中，但他屬斯大林派的核心成員。Gambarov, *Entsiklopedicheskii slovar'*.
- 233 「加里寧是個好人，對我們來說是不可替代的，」在1923年春天視察了北高加索各地(達吉斯坦、車臣、弗拉季高加索、納爾奇克)之後，伏羅希洛夫寫信給奧爾忠尼啟則說，「為了對他有個正確的判斷，需要和他一起到農村走走，聽他和農民的交談；在這方面，他是很有魅力和——坦率地說——力量的。在我們黨內像他那樣的找不到第二個。很少有人能像他那樣對農民闡明我們的理論和實踐……我原以為他是個笨蛋，但現在我感到後悔並懇求安拉原諒我的罪過。我建議加里寧到梯弗利斯拜訪您，但他明確地跟我解釋說，未經中央委員會的許可，他不能那麼做。」Kvashonkin, *Bol'shevistskoe rukovodstvo*, 274 (RGASPI, f. 85, op. 24, d. 150, l.1–2).
- 234 察里津布爾什維克的最高領導人謝爾蓋·米寧在1925年黨的第十四次代表大會上與反斯大林的反對派站在一起。1927年的時候，他似乎病倒了，是精神方面的疾病。米寧在恐怖時期逃過一劫，並一直活到1962年。Pravda, June 29, 1962. 擔任察里津契卡負責人的頓巴斯礦工亞歷山大·切爾維亞科夫，在1919年烏克蘭重新建立了布爾什維克政權之後回到了自己的故鄉，擔任烏克蘭契卡的副主

席。1921年他被降級，擔任日托米爾黨組織的職務，還在扎波羅熱的反饑荒委員會工作過一段時間。1922年，他被調到烏克蘭蘇維埃執行委員會。他也逃過了恐怖時期。後來，戰火逼近莫斯科，他自願要求到前線去，但因為大部分時間都待在後方而活了下來。戰後他從事教學和寫作，並於1966年去世。不要把這個切爾維亞科夫（亞歷山大·切爾維亞科夫）同亞歷山大·格里戈里耶維奇·切爾維亞科夫（Alexander Grigoryevich Chervyakov, 1892–1937）混淆，後者幫助創立了白俄羅斯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並在蘇聯中央執行委員會工作，1937年6月16日在白俄羅斯黨的代表會議中途休息時自殺身亡。

235 Nazarov, *Stalin i bor'ba za liderstvo*, 93.

236 為斯大林給列寧（或托洛茨基）的私人信件充當信使的是納扎列江，斯大林還把中央委員會許多通告的起草工作也交給他。Bazhanov, *Vospominaniia* [1983], 53. Kun, *Unknown Portrait*, 286–8.

237 Rusanova, "I. P. Tovstukha." 1924至1926年，托夫斯圖哈被斯大林派去列寧研究所擔任所長助理，負責列寧的檔案和《全集》。1930至1931年，他又被斯大林派去馬克思恩格斯列寧研究所擔任副所長和檔案館館長。他死於1935年8月，骨灰被安葬在克里姆林宮宮牆內。

238 在代表斯大林到《真理報》工作過一段時間後，抱怨說工作太累的納扎列江回到了格魯吉亞。Proletarskaia revoliutsiia, 1935, no. 6: 129–31.

239 Rubtsov, *Iz-za spiny vozhdia*, 33.

240 Balashov and Markhashov, "Staraia ploshchad', 4 (20-e gody)," no. 6: 184–5.

241 Demidov, *Politicheskaia bor'ba i oppozitsiia*, 61–72; Medvedev, *On Stalin and Stalinism*, 25. 馬林科夫1921年進入莫斯科的一所技術大學並成為該校的黨委書記；他的妻子瓦萊麗亞·戈盧布佐娃（Valeria Golubtsova，她的姑媽認識列寧）在組織局工作，並在靠近克里姆林宮的商業街上從前的洛斯庫特娜婭飯店（蘇維埃5號樓）得到一套住房，那裏住了許多年輕的黨務官員。1924年，馬林科夫被調到中央機關，成為波斯克列貝舍夫的手下，負責保管人事記錄的工作。1927年，尼古拉·葉若夫（Nikolai Yezhov，生於1895年）進入斯大林的機關，並在波斯克列貝舍夫不斷高升後成為馬林科夫的新上司。Danilov, *Tragediia Sovetskoi derevni*, III: 850; Petrov, *Kto rukovodil NKVD*, 184–6; Rosenfeldt, *Knowledge and Power*, 131–2. 1930年代初期，洛斯庫特娜婭飯店成了莫斯科地鐵建設指揮部；1938年，為了給莫斯科重建工程中一個比較大的廣場騰地方，這座飯店被拆掉了。

242 Rees, "Iron Lazar," 33–5.

243 「最有才華和最傑出的布爾什維克領導人之一，」巴扎諾夫寫道（他既在斯大林書記處的卡岡諾維奇手下工作，又在財政人民委員部索柯里尼柯夫手下工作），「不管交給他甚麼工作，他都會把它們處理好。」Bazhanov, *Vospominaniia* [1990], 122.

244 「我們親愛的、有才華的、最寶貝的索柯里尼柯夫同志在貿易實踐上一竅不通。如果放手讓他去做，他會把我們毀掉的。」列寧在信中對加米涅夫抱怨說。同時，列寧又認為索柯里尼柯夫的書《國家資本主義和新財政政策》寫得「很成功」。Lenin, *PSS*, XLIV: 428, LIV: 90（譯註：《列寧全集》第42卷，第460頁；第52卷，

- 第153頁)。列寧的《全集》(第54卷)中收錄了很多1921至1922年間同索柯里尼柯夫的通信。
- 245 1908年，契切林與列寧吵翻後轉投孟什維克。1917年，英國人以反戰和宣揚社會主義為由將他投入監獄(他們認為他那樣做是支持德國而反對協約國)。托洛茨基以恢復辦理簽證和允許外交信使出入作為交換條件，讓英國人釋放了契切林。他成為托洛茨基在外交事務上的副手，然後很快又接替了他的位置。Debo, *Revolution and Survival*, 34–41. 另見Debo, “The Making of a Bolshevik”; O’Connor, *Diplomacy and Revolution*. 契切林屬左派。例如，1922年1月，他發出警告稱，有人正在從國外郵寄報紙給私人。要是允許這種做法，就等於是讓利用報紙攻擊我們的鼓動活動死灰復燃。莫斯科就會出現明目張膽的白衛報紙。Goriaeva, *Istoriia sovetskoi politicheskoi tsenzury*, 427–8.
- 246 李維諾夫的視力不好，但仍然加入了軍隊。之後他掌握了俄語並逐步接觸到地下革命文學。1898年駐紮在巴庫時，他拒絕向罷工工人開槍並脫離了軍隊。Georgii Cherniavskii, “Fenomenon Litvinova,” *XX Vek: istoriia Rossii i SSSR*, January 22, 1924.
- 247 1918年9月8日，李維諾夫在英國被捕，罪名是支持布爾什維克的宣傳；十天後，為了交換被監禁的英國間諜布魯斯·洛克哈特(Bruce Lockhart)，他被釋放。Pope, *Maksim Litvinoff*, 129–30.
- 248 Sheinis, “Pervye shagi diplomaticheskoi deiatel’nosti M. M. Litvoinov,” 153; Hilger and Meyer, *Incompatible Allies*, 110–2.
- 818 249 伏羅希洛夫厭惡李維諾夫。Dullin, *Men of Influence*, 13 (引自 *Zvezda* [Odessa], September 21, 1928).
- 250 Bazhanov, *Bazhanov and the Damnation of Stalin*, 88–9.
- 251 “Posledniaia sluzhebnaia zapiska Chicherina,” *Istochnik*, 1995, no. 6: 100.
- 252 Georgii Cherniavskii, “Fenomenon Litvinova,” *XX Vek: istoriia Rossii i SSSR*, February 4, 1924. 叛逃者德米特里耶夫斯基(德米特里耶夫)對李維諾夫的描寫特別無情，參見 *Sovetskie portrety*, 240–52, translated as *Dans les coulisses du Kremlin* (Paris: Plon, 1933), 182–207.
- 253 Ivanov, *Neizvestnyi Dzerzhinskii*; Plekhanov, *Dzerzhinskii*; Plekhanov and Plekhanov, *Zheleznyi Feliks*.
- 254 Sinyavsky, *Soviet Civilization*, 126 (未註明出處)。被逮捕的基督教哲學家尼古拉·別爾嘉耶夫(Nikolai Berdyaev)在盧比揚卡內部監獄的一次審訊後寫道：「捷爾任斯基給人留下的印象是，他是一個有著極其堅定和虔誠信仰的人。他是一個狂熱分子……他曾想做一個天主教修士，結果他把自己狂熱的信仰轉向了共產主義。」Berdiaev, *Samopoznanie*, 215.
- 255 *Dvadsat’ let VChK-OGPU-NKVD*, 20–3; Blobaum, *Feliks Dzierzjinski*.
- 256 Tishkov, *Dzherzhinskii* [1976], 75, 78. 據說有一次，儘管他自己也很虛弱，但還是在得到允許後，把一名生病的獄友背到監獄的院子裏。Dmitriev, *Pervyi chekist*, 53–62.
- 257 Sheridan, *From Mayfair to Moscow*, 95.

- 258 Plekhanov, *VChK-OGPU*, 227 (未註明出處); Shteinberg, *Yekab Peters*, 119; Viktor Baklanov, "Slovo Dzherzhinskomu," *Gazeta "Dose"*, November 3, 2002. 維克托·切爾諾夫稱捷爾任斯基是「一個真正的修士和苦行者，也是一個真正的好人。」D. A. Lutokhin, "Zarubezhnye pastyri," *Minushee*, 1997: 71.
- 259 明仁斯基以防止泄密為名，指示奧格伯烏官員不要把任何涉及政治犯罪的文件移交給檢察部門，以此阻撓檢察部門對逮捕活動的監督。Kvashonkin, *Bol'shevistskoe rukovodstvo*, 305; Zdanovich, *Organy gosudarstvennoi bezopasnosti*, 142–3, 引自 TsA FSB, f. 2, op. 3, d. 60, l. 40.; Fomin, *Zapiski starogo chekista*, 214. 福明是北高加索邊境守衛隊的負責人，因此他見過許多光顧基斯洛沃茨克礦泉療養地的契卡人員。一名駐柏林的蘇聯外交官的女兒回憶說，明仁斯基「不愛說話，神情憂鬱，但非常有禮貌——他甚至用正式的『您』對我說話（她當時12歲）」。Ioffe, *Vremia nazad*, ch. 2.
- 260 Deacon, *History of the Russian Secret Service*, 286–7 (未註明出處).
- 261 Fomin, *Zapiski starogo chekista*, 220–1; Mozokhin and Gladkov, *Menzhinskii*, 166–74.
- 262 Vinogradov, *Genrikh Iagoda*, 17.
- 263 Plekhanov, *VChK-OGPU*, 278–9. 亞戈達後來對盧比揚卡大樓進行了改造。他創建了內務人民委員部俱樂部，為警察機關贊助的運動隊建造了迪納摩體育場，還監督過許多利用苦役進行大型建築工程。
- 264 Vinogradov, *Genrikh Iagoda*, 273–5.
- 265 Gladkov, *Nagrada za vernost'—kazn'*; Kuvarzin, *Dorogami neskonchaemykh bitv*, 53; Tumshis and Papchinskii, *1937, bol'shaia chistka*, 295.
- 266 伏龍芝說：「我有資料表明，紅軍參謀人員的機密情報正在泄露到國外。比如說，對於一些指令的情報，我從波蘭收到的要比從莫斯科收到的還早。」Mikhaleva, *Revoensoviet Respubliki*, 335.
- 267 Vinogradov, *Genrikh Iagoda*, 312–7 (TsA FSB, f. 1, op. 6, d. 37, l.102–3). 另見 Plekhanov, *VChK-OGPU*, 228; 以及 *Istochnik*, 1995, no. 6: 154–5 (APRF f. 32, op. 1, d. 1, l.27–27ob: Unszlicht, April 21, 1922).
- 268 特工人員揚·別爾津被關過一段不長的時間。捷爾任斯基承認後者喜歡金戒指和手錶之類的小玩意，但還是讓人把他放了。Gerson, *The Secret Police*, 69–70 (引自 *Pravda*, December 25 and December 26, 1918).
- 269 Ward, *Stalin's Russia*, 36–7.
- 270 RGASPI, f. 558, op. 1, d. 1594, l. 3; Gromov, *Stalin*, 72.
- 271 *Leninskii sbornik*, XXXVI: 122; *Biulleten' oppositsii*, 1933, no. 36–7: 10.
- 272 Trotsky, *My Life*, 477.
- 273 Trotsky, *Stalin*, 389 (引用了謝列布里亞科夫的說法，而謝列布里亞科夫聲稱是從葉努基澤那裏聽說的).
- 274 Trotskii, *Portrety revoliutsionerov*, 54–5.
- 275 Ilizarov, "Stalin"; Gromov, *Stalin*, 57–9; Volkogonov, *Triumf i tragediia*, I/ii: 118.
- 276 Bazhanov, *Damnation of Stalin*, 105–6.
- 277 "Stalin Closely Observed," 載於 Urban, *Stalinism*, 6–30 (at 8).



- 278 Ul'ianov, "Ob otnoshenii V.I. Lenina i V. Stalina," 197.
- 279 *Izvestiia*, April 5, 1923.
- 280 *Sochineniia*, VIII: 66–8; Trotsky, *History of the Russian Revolution*, III: 1156. 另見 Sukhanov, *Zapiski*, IV: 32–4.
- 281 Getzler, *Martov*, 218, 引自 *Poslednye novosti*, April 11, 1923, 以及 *Sovremennye zapiski*, 1923, vol. 15: 368–70.
- 282 Budennyi, *Proidennyi put*, I: 339.
- 283 Trotsky, *Portraits*, 217.
- 284 Mikhail S. Gorbachev, "Slovo o Lenine," *Pravda*, April 21, 1990 (引用了阿列克謝·斯維傑爾斯基 (Alexei Svidersky) 的說法)。戈爾巴喬夫之所以對這件事感興趣，是把它當作在機關中存在所謂的蓄意破壞活動的一個例證。在斯大林統治時期，斯維傑爾斯基在工農檢查院和農業人民委員部工作；在1933年自然死亡後，他的骨灰被安葬在克里姆林宮的宮牆裏。另見 *PSS, spravochnyi tom, chast' II*: 471.
- 285 Kvashonkin, *Bol'shevistskoe rukovodstvo*, 256–7 (RGASPI, f. 85, op. 1/S, d. 13, l. 6). 納扎列江還說自己從克里姆林宮的衛戍司令阿韋利·葉努基澤那兒得到了一套住房。「那套房子很棒。」(波瓦爾街11號)。1922年8月9日之後，他寫信給奧爾忠尼啟則說：「柯巴正在大力培養我。我正在接受全面但極其乏味的教育。目前他們正在試圖把我變成一個完美的工作人員，落實政治局、組織局和書記處決議的最完美的控制者。」納扎列江說服斯大林把自己調離了繁重的文書崗位。Kvashonkin, *Bol'shevistskoe rukovodstvo*, 262–3 (RGASPI, f. 85, op. 1/S, d. 13, l. 10).
- 286 Kvashonkin, *Bol'shevistskoe rukovodstvo*, 262–3. 另見 Chevychelov, *Amiaik Nazaretian*.
- 287 「我們常常看到斯大林，」瑪麗亞·越飛(她是阿道夫·越飛(生於1883年)的妻子，而他是與托洛茨基關係最密切的人之一)回憶說，「在莫斯科大劇院舉行首演的時候，我們總是會在劇院管理層預留的包廂裏碰到他。斯大林去的時候通常會帶着他的幾個親密的夥伴，其中有伏羅希洛夫和卡岡諾維奇……非常隨和，跟大家說話時很友好，但這其中沒有一點誠意……斯大林具有罕見的演員才能，能根據不同的情況變換自己的面具。而他最喜歡的面具恰恰就是下面這個：樸實而普通的好人，心裏想的都放在臉上。」"Mariia Ioffe, Nachalo," *Vremia i my*, 1977, no. 20: 163–92 (at 178). 瑪麗亞1975年移居以色列。
- 288 這一點得到了里格比的證實，他的〈斯大林是否是個信不過的靠山？〉對相關文獻做了重大的修正。
- 289 RGASPI, f. 558, d. 1279, d. 1482.
- 290 RGASPI, f. 558, op. 11, d. 1289, l. 22
- 291 Mikoyan, *Tak bylo*, 357.
- 292 Mikoyan, *Tak bylo*, 351–2.
- 293 1930年，這塊地的一部分用來為上層人物建造了名為巴爾維哈的療養院。
- 294 Alliluev, *Khronika odnoi semi*, 29; *Iosif Stalin v ob"iatiakh semi*, 177.
- 295 Sergeev and Glushik, *Besedy o Staline*.

- 296 斯大林的別墅是祖巴洛沃4號，捷爾任斯基的別墅是哥爾克2號，他在那裏建了格伯烏的國營農場，為上層人物提供食品。莫洛托夫的也是哥爾克2號（從1920年代後期開始）。
- 297 <http://protown.ru/information/hidden/6965.html> (亞歷山大·貝克對福季耶娃的採訪)。
- 298 “K istorii poldednikh Leninskikh dokumentov: Iz arkhiva pisatel'ia Aleksandra Beka, besedovavshego v 1967 godu s lichnyimi sekretariami Lenina,” *Moskovskie novosti*, April 23, 1989: 8–9.
- 299 McNeal, *Stalin*, 46–7.
- 300 Kvashonkin, *Bol'shevistskoe rukovodstvo*, 262–3. 另見Chevychelov, *Amiaik Nazaretian*.
- 301 Balashov and Markhashov, “Staraia ploshchad”, 4 (20-e gody),” no. 5: 193–5. 1926年秋天，斯大林讓巴拉紹夫進了紅色教授學院。
- 302 Bazhanov, *Damnation of Stalin*, 93.
- 303 Balashov and Markhashov, “Staraia ploshchad”, 4 (20-e gody),” no. 5: 194. 有學者寫道：「斯大林在黨內的權力基礎並不是畏懼，而是魅力……當他決定對一個人施展魅力的時候，他是不可抗拒的。」魅力是很大，但畏懼也如此。Montefiore, *Stalin*, 41–2.
- 304 巴拉紹夫還說：「斯大林應該親眼看看人們是怎樣生活的，花時間親自和群眾在一起，傾聽人民的聲音，但我們所做的就是給那些人下達命令和指示。我認為，斯大林以及其他領導人最大的不幸就在於，他們把時間花在理論鬥爭上，所有的精力都用到那上面，而很少關心活着的人。在一國有可能建成社會主義，在一國不可能建成社會主義，這就是他們從早到晚反覆念叨的東西。」在巴拉紹夫提出要是突然遇到一個活生生的農民他們會說些甚麼的問題之後，他們開始戲稱他為「富農」。A. P. Balashov and Iu. S. Markhashov, “Staraia ploshchad”, 4 (20-e gody),” no. 5: 194–5.
- 305 Dan, “Bukharin o Staline,” 182.
- 306 Balashov and Markhashov, “Staraia ploshchad”, 4 (20-e gody),”no. 4: 182. 巴拉紹夫恰好的確經常看到托洛茨基：他和薇拉·因貝爾(Vera Inber)以及她的父親住在一起，而薇拉的父親是托洛茨基的叔叔(譯註：應為托洛茨基的表兄)。「托洛茨基和他的孩子們(謝多夫及其兩個女兒)常過來看他，再加上其他同志，大家齊聚一堂」(no. 5: 193)。巴拉紹夫是在突厥斯坦遇到卡岡諾維奇的，但是在1922年3月並沒有立即隨他到莫斯科。巴拉紹夫在撒馬爾罕得了瘧疾，這促使他要求調到俄羅斯；他一被調到俄羅斯，從1922年6月1日開始，卡岡諾維奇就把他招至麾下。在卡岡諾維奇被斯大林任命為烏克蘭黨組織負責人的時候，巴拉紹夫也調離了卡岡諾維奇的組織指導部，成了托夫斯圖哈的同事。接着，巴拉紹夫又接替瑪麗亞·布拉科娃(Maria Burakova)，成為政治局負責記錄的秘書。
- 307 RGASPI, f., 558, op. 3, d. 131, l. 270–1. Van Ree, *Political Thought of Joseph Stalin*, 148.
- 308 關於蘇維埃制度中的「大批個體擁護者」，參見Armstrong, *Soviet Bureaucratic Elite*, 146. 有位傑出的學者認為「裙帶關係」是帝俄、蘇聯以及後蘇聯時代歷屆政府的

典型特徵，但他並沒有對其他看上去極為相似的制度進行比較。Hosking, "Patronage and the Russian State," 這篇文章實質上是對 M. N. 阿法納西耶夫的書所做的註解，參見 M. N. Afanas'ev, *Klientelizm i Rossiiskaia gosudarstvennost'* (Moscow: Tsentr konstitutsionnykh issledovani, 1997). 另見 Orlovsky, "Political Clientelism in Russia," 174–99; 以及 Ransel, "Character and Style of Patron-Client Relations in Russia," 等等。

309 Pipes, *Russia Under the Bolshevik Regime*, 368–9.

310 Iu. A. Shchetinov, "Rezhim lichnoi vlasti Stalina," 載於 Kukushkin, *Rezhim lichnoi vlasti Stalina*, 19 (引自 GARF. F. 5865, op. 1, d. 41: letter to Yekaterina Kuskova).

311 PSS, XLV: 302.

## 第十一章【把斯大林調開】

1 PSS, XLV: 345.

2 PSS, XLV: 346.

3 Sakharov, *Politicheskoe zaveshchanie*.

4 1923年8至12月，一共發生了217次罷工，其中有51次在莫斯科。Mozokhin, VChKOGPU, 26 (引自 TsA FSB, f. 2, op. 1, por. 794, l. 141).

5 非常重要的例外是 Smith, *Bolsheviks and the National Question*, 172–212, 以及 van Ree, "Stalin and the National Question."

6 RGASPI, f. 558, op. 1, d. 2479, l. 159–60, 272–4.

7 *Izvestiia TsK KPSS*, 1989, no. 9: 199.

8 Sakharov, *Politicheskoe zaveshchanie*, 646–7 (RGASPI, f. 5, op. 2, d. 278, l. 2; f. 558, op. 1, d. 2479, l. 262–5). 組織局委員會的成員包括斯大林、古比雪夫、拉柯夫斯基、奧爾忠尼啟則、索柯里尼柯夫，以及各共和國的代表：亞歷山大·切爾維亞科夫 (Alexander Chervyakov, 白俄羅斯)、格里戈里·彼得羅夫斯基 (烏克蘭)、亞歷山大·米亞斯尼基揚 (Alexander Myasnikyan, 亞美尼亞)、S. A. 阿加—馬雷—奧格雷 (S. A. Aga-Maly-Ogly, 阿塞拜疆) 以及波利卡爾普·「布杜」·姆季瓦尼 (格魯吉亞) 等。

9 *Izvestiia TsK KPSS*, 1989, no. 9: 192–3, 196. 斯大林手寫的正式提案參見 Sakharov, *Politicheskoe zaveshchanie*, 647–8 (RGASPI, f. 558, op. 1, d. 2479, l. 241).

10 PSS, XLV: 556–8, n136.

11 *Izvestiia TsK KPSS*, 1989, no. 9: 198–9 (RGASPI, f. 5, op. 2, d. 28, l. 23–4; September 22, 1922); *TsK RKP (b)—VKP (b) i natsional'nyi vopros*, 78–9; Smith, *Bolsheviks and the National Question*, 181–4 (引自 RGASPI, f. 5, op. 2, d. 28, l. 19–21).

12 Fotieva, *Iz zhizni*, 220.

13 *Leninski sbornik*, XXXVI; PSS, XLV: 211–3. 關於列寧的喜悅之情，參見 Lewin, *Lenin's Last Struggle*, 60

- 14 Lenin, *PSS*, XLV: 211–3.
- 15 正如有蘇聯學者很客氣地指出的，「作為俄羅斯社會主義聯邦蘇維埃共和國的政府首腦，弗·伊·列寧不止一次地在講話中表示，俄羅斯社會主義聯邦蘇維埃共和國在內外政策上還代表着與之結為聯邦的各蘇維埃共和國的利益」。Filimonov, *Vozniknovenie i razvitie RSFSR kak federativnogo gosudarstva*, 22.
- 16 據估計，馬克思的著作有2%是論述民族主義的，列寧的有25%，斯大林的有50%。Munck, *Difficult Dialogue*, 76.
- 17 Kun, *Bukharin*, 130–1.
- 18 姆季瓦尼告訴列寧，格魯吉亞人會同意在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中以平等的方式形成的「聯盟」，而不是併入俄羅斯社會主義聯邦蘇維埃共和國——這一點，就像政治局給列寧的便條所證實的，斯大林已經承認了。Kharmandanian, *Lenin i stanovlenie Zakavkazskoi federatsii*, 344; *Izvestiia TsK KPSS*, 1989, no. 9: 208.
- 19 Pospelov et al., *Vladimir Il'ich Lenin*. 列寧在早前的一封信中指責過斯大林的「草率」。在9月28日的政治局會議上，斯大林和加米涅夫交換了便條。加米涅夫：「為了維護獨立，伊里奇已經決定開戰。他建議我和格魯吉亞人見面。」斯大林：「我們需要堅定地反對伊里奇的意見。」加米涅夫：「我認為既然伊里奇堅持自己的看法，抵制會更糟。」斯大林：「我不知道。你看着辦。」*Izvestiia TsK KPSS*, 1989, no. 9: 206, 208–9; *PSS*, XLV: 214. 托洛茨基的假期是從1922年9月13日開始的，但他仍然待在莫斯科；加米涅夫按照規定也在度假。 820
- 20 Reshetar, “Lenin on the Ukraine”; Szporluk, “Lenin, ‘Great Russia,’ and Ukraine.”
- 21 *Izvestiia TsK KPSS*, 1989, no. 9: 205. 1922年10月6日，列寧給加米涅夫寫了張便條，說「我宣佈要同大俄羅斯沙文主義決一死戰」，並要求蘇聯蘇維埃中央執行委員會的主席職務要由各成員國輪流擔任，不能由俄羅斯社會主義聯邦蘇維埃共和國把持。斯大林也贊成這一點（斯大林在列寧的便條上寫道：「對」）（譯註：《列寧全集》第43卷，第216頁）。*PSS*, XLV: 214, 559, n136; Lenin, *Sochineniia*, XXXIII: 335.
- 22 Borys, *Sovietization of the Ukraine*.
- 23 *PSS*, XLI: 161–8 (at 164); Lenin, *Sochineniia*, XXV: 624; “Iz istorii obrazovanii SSSR,” 見於 *Izvestiia TsK KPSS*, 1989, no. 9: 191–218; 1991, no. 3: 169–82; no. 4: 158–76; no. 5: 154–76. 在後來編輯列寧的著作時，對斯大林的這封信作了大幅的刪減。另見 van Ree, *Political Thought of Joseph Stalin*, 209.
- 24 Smith, “Stalin as Commissar for Nationality Affairs, 1918–1922,” 見於 Davies and Harris, *Stalin*, 51–2.
- 25 *Izvestiia TsK KPSS*, 1991, no. 4: 171. 正如傑里米·史密斯指出的（差不多只有他這麼認為），列寧作為中央集權的主要支持者，實際的做法與其學術觀點完全相反 (Pipes, Lewin, Carrère d’Encausse). Smith, *Bolsheviks and the National Question*, 179.
- 26 Orakhelashvili, *Sergo Ordzhonikidze*; Kirillov and Sverdlov, *Grigorii Konstantinovich Ordzhonikidze*, *Ordzhonokidze*, *Put’ Bol’shevika*; Dubinskii-Mukhadze, *Ordzhonikidze*.

- 27 Khlevniuk, *In Stalin's Shadow*, 14, 19–20.
- 28 1921年11月2至3日，高加索局正式作出成立聯邦的決定；11月8日，奧爾忠尼啟則打電報給斯大林，告訴他程序開始啟動，並要求莫斯科的中央委員會作出回應。Smith, *Bolsheviks and the National Question*, 198–9 (引自 Ordzhonikidze, *Stat'i i rechi*, I: 208; RGASPI, f. 17, op. 2, d. 231, l. 2; op. 3, d. 237, l. 2; f. 64, op. 1, d. 61, l. 16; PSS, XLIV: 255; 以及 Kharmandarian, *Lenin i stanovleniie*, 96–8, 202–3).
- 29 Smith, "The Georgian Affair of 1922," 528 (引自 RGASPI, f. 5, op. 2, d. 32, l. 61). 布爾什維克剛奪取了孟什維克控制的格魯吉亞，布爾什維克駐阿塞拜疆的全權代表(別伊布德·阿加·沙赫塔赫廷斯基 (Behbud aga Shakhtakhtinsky)) 就建議成立南高加索聯邦，以管控紛亂的領土爭端。
- 30 Gornyi, *Natsional'nyi vopros*, 144–5. 奧爾忠尼啟則已採取單方面措施，想在推行政治聯合之前，就把南高加索的鐵路系統和經濟統一起來。Jones, "Establishment of Soviet Power," 622, 引自 *Comunisti*, the party organ in Georgia (September 1921).
- 31 Smith, "The Georgian Affair of 1922," 529–30 (引自 Ordzhonikidze, *Stat'i i rechi*, I: 208); RGASPI, f. 17, op. 2, d. 231, l. 2. 政治局在得到列寧的批准後發佈命令：「承認建立南高加索共和國聯邦在原則上是絕對正確的，也是絕對應該實行的。」PSS, XLIV: 255 (譯註：《列寧全集》第42卷，第282頁)。1922年9月27日，即列寧在哥爾克接待姆季瓦尼的當天，加米涅夫給這位布爾什維克領袖送去了一張蘇聯同南高加索聯邦的組織結構圖。按照斯大林原來的俄羅斯社會主義聯邦蘇維埃共和國的自治計劃，格魯吉亞是作為同烏克蘭一樣有自治權的獨立單位加入的。Smith, *Bolsheviks and the National Question*, 186 (RGASPI, f. 5, op. 2, d. 28, l. 13–4).
- 32 Kharmandarian, *Lenin i stanovleniie*, 218. 菲利普·馬哈拉澤是格魯吉亞布爾什維克中的元老級政治家，到當時為止，一直以其國際主義思想著稱。1921年12月6日，他向莫斯科的中央委員會反映說，紅軍的到來「造成了外國佔領的外觀……我們必須認識到，格魯吉亞民眾已經習慣於認為，格魯吉亞是個獨立的國家」——這意思是說，不應強迫格魯吉亞加入南高加索聯邦。Lang, *Modern History*, 240 (未註明出處)。斯大林當時把斯瓦尼澤派到了柏林。Tucker, *Stalin as Revolutionary*, 257.
- 33 Smith, "The Georgian Affair of 1922."
- 34 Suny, *Georgian Nation*, 214–5; Ordzhonikidze, *Stat'i i rechi*, I: 226ff.
- 35 *Sochineniia*, IV: 162, 237, 372.
- 36 帝俄軍隊反對成立單獨的民族部隊，甚至堅持要求，東斯拉夫人在所有部隊裏都必須佔四分之三。1918至1919年，托洛茨基歡迎在紅軍中成立「民族」部隊。但烏克蘭的經驗改變了他的想法，因為烏克蘭的民族部隊只想追求自己民族的目標。但要想在這個新國家的邊疆地區建立一支單獨的一體化的紅軍，並擁有單獨的指揮結構，事實上很難做到。為了消除政治上的不滿情緒，1922年8月建立了一支格魯吉亞紅軍。Kudriashev, *Krasnaia armia*, 17 (APRF, f. 3, op. 50, d. 251, l. 158). 軍官團中大約有97%的成員都是從前的孟什維克。1923年，他們制定了一項屬於「勞苦階級」的草案，明確提出要在黨外群眾尤其是農村居民中擴大黨的

- 影響。截止到1925年，他們在格魯吉亞部隊裏有4萬名士兵。Kacharava, *Bor'ba za uprochenie sovetsskoi vlasti v Gruzii*, 51–3; RGASPI, f. 5, op. 2, d. 32, l.7–17.
- 37 Sakharov, *Politicheskoe zaveshchaniye*, 244–7 (引自 RGASPI, f. 5, op. 2, d. 26, l.10–12).
- 38 PSS, XLIV: 299–300; XLV: 595, n210; Pipes, *Formation of the Soviet Union*, 274. 列寧把斥責格魯吉亞人的電報抄送給奧爾忠尼啟則。1922年10月21日，斯大林打電話給奧爾忠尼啟則和格魯吉亞黨委書記馬米亞·奧拉赫拉施維里(Mamia Orakhelashvili)，告訴他們列寧很生氣，並指出格魯吉亞的中央委員們沒有給自己的通訊加密，容易被外國人截聽。這些人後來受到嚴厲的懲罰。RGASPI, f. 558, op. 1, d. 2441, l.1–2; d. 2491, l.1–1ob. 包括馬哈拉澤在內的其他格魯吉亞人撇開斯大林，通過加米涅夫和布哈林與列寧進行了私下的溝通，同時還再次謀求讓格魯吉亞按照同烏克蘭或白俄羅斯同樣的地位加入聯盟。加米涅夫和布哈林此時都給梯弗里斯的馬哈拉澤等人發了電報，要求他們抵制。 *Sotsialisticheskii vestnik*, January 17, 1923.
- 39 Kharmandarian, *Lenin i stanovleniye*, 351–4.
- 40 Smith, *Bolsheviks and the National Question*, 201 (引自 RGASPI, f. 5, op. 2, d. 32, l.49–50; Mikhail Okujava).
- 41 現在挑選的另外兩個人是立陶宛共產黨人溫察斯·米茨基亞維丘斯—卡普蘇卡斯(Vincas Mickevičius-Kapsukas，短命的立陶宛社會主義蘇維埃共和國在1918年的首腦)和托洛茨基的擁護者、記者列夫·索斯諾夫斯基，但姆季瓦尼反對索斯諾夫斯基，斯大林趁機換上自己的心腹、主張中央集權的烏克蘭人德米特里·曼努伊爾斯基。Kharmandarian, *Lenin i stanovleniye*, 369–70; *XII s'ezd RKP (b)*, 541, 551. 現在存有一張這段時間的捷爾任斯基、李可夫、亞戈達和拉柯巴一起在蘇呼姆的祖格季德斯基植物園的合影。早在1922年5月就委派了一個伏龍芝領導的類似的委員會，調查烏克蘭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提出的正式抗議，說蘇維埃俄國侵犯了它的主權。該委員會既維護烏克蘭的存在也維護中央委員會的權利。 *TsK RKP (b)—VKP (b) i natsional'nyi vopros*, 64–6 (RGASPI, f. 17, op. 112, d. 338, l.122–3), 67–9 (RGASPI, f. 17, op. 84, d. 326, l. 1). 另見Pentkovskaia, "Rol' V. I. Lenina," 14–5; Iakubovskaia, *Stroitel'stvo soiuznogo sovetsskogo sotsialisticheskogo gosudarstva*, 139–40; 以及 Gililov, *V. I. Lenin*, 145–6.
- 42 Mikoyan, *Dorogoi bor'by*, 433; Kharmandarian, *Lenin i stanovleniye*, 370.
- 43 Sakharov, *Politicheskoe zaveshchaniye*, 250–1 (RGASPI, f. 5, op. 2, d. 32, l.43–43ob.); Kirillov and Sverdlov, *Grigory Konstantinovich Ordzhonikidze*, 174–7.
- 44 Sakharov, *Na rasput'e*, 41 (引自 RGASPI, f. 325, op. 2, d. 50, l.35–8); *Pravda*, March 17, 1922 (季諾維也夫的提綱); *XI s'ezd RKP (b)*, 680–7. 列寧承認托洛茨基的意見有道理：列寧當時已經不能像以前那樣工作了，所以斯大林的擔子就加重了。Lenin, PSS, XLV: 103–4, 113–4, 122.
- 45 *V. I. Lenin: neizvestnye dokumenty*, 513–5. 里格比有個很有影響的說法，認為列寧在生病後，曾經企圖阻止黨的支配性的影響，但這一說法同許多內部的消息來源存在矛盾。Rigby, *Lenin's Government*, 207–22.

- 46 Fel'shtinskii, *Kommunisticheskaia oppozitsiia v SSSR*, 1: 16–7; RGASPI, f. 325, op. 1, d. 88, l.1, 2, 5. 國家計劃委員會實質上是國家電氣化委員會的延續，約有40名工作人員，成立的時間差不多跟實行新經濟政策同時。 *Piat' let vlasti Sovetov*, 150–2. 從1921年8月起，克爾日扎諾夫斯基開始負責國家計劃委員會，到1923年12月——當時有幾百名工作人員——由瞿魯巴接着又幹了大概兩年（之後克爾日扎諾夫斯基又回來了）。皮達可夫（從1923年開始）是副主席。托洛茨基差不多從國家計劃委員會剛成立的時候就指責它無能；列寧對季諾維也夫說，「托洛茨基現在是加倍的咄咄逼人」。 Deutscher, *Prophet Unarmed*, 42; *Leninskii sbornik*, XX: 208–9. 在核心圈子中，除了托洛茨基，沒有誰想讓國家計劃委員會掌握特別的專政權力。1921年3月，斯大林在給列寧的信中嘲笑托洛茨基，說托洛茨基號召計劃，就像「一個把自己想像成易卜生戲劇中男主角的中世紀手工業者，他利用古代的傳說，呼籲人們『拯救』俄國」。 *Kalinin, Stalin: sbornik statei*, 轉載於 *Sochineniia*, V: 50–1 (譯註：《斯大林全集》第5卷，第40頁)。
- 47 *Izvestiia*, March 28 and March 29, 1922; *PSS*, XLV: 69–116 (at 77, 81–2).
- 48 因此，按照列寧的邏輯，一旦社會主義革命在西歐成功，布爾什維克接下來就可以無視蘇維埃俄國絕大多數人口的願望了。 *XI s'ezd RKP (b)*, 130.
- 49 Sakharov, *Na rasput'e*, 43–4.
- 50 *V Vserossiiskii s'ezd RKSM, 11–19 oktiabria 1922 g.*, 31–2.
- 51 列寧還說：「讓我在結束講話時表示一個信念：不管這個任務是多麼困難，不管它……是多麼生疏，不管它會給我們帶來多少困難，只要我們大家共同努力，不是在明天，而是在幾年之中，無論如何會解決這個任務，這樣，新經濟政策的俄國將變成社會主義的俄國。」 *PSS*, XLV: 309 (譯註：《列寧全集》第43卷，第302頁)； Sakharov, *Na rasput'e*, 33–4.
- 52 Sakharov, *Na rasput'e*, 30–1.
- 53 從1922年10月2日返回莫斯科到1922年12月16日，列寧總共寫了224封信和便函，接待了171位有記錄可查的來訪者，主持了32場會議。 Golikov, *Vladimir Il'ich Lenin*, XII: xviii; *Voprosy istorii KPSS*, 1957, no. 4: at 149 (福季耶娃)。
- 54 *PSS*, XLV: 469. 現在還無法從文件中瞭解到列寧和李可夫那次談話的內容，但至少有一部分可能跟格魯吉亞事件有關。福季耶娃的回憶錄沒有提到與李可夫的這次會面，參見 Fotieva, *Iz zhizni*, 249.
- 55 Golikov, *Vladimir Il'ich Lenin*, XII: 534; Fotieva, *Iz zhizni*, 250–1; *PSS*, XLV: 596.
- 56 Volkogonov, *Lenin: Life and Legacy*, 416.
- 57 Fotieva, *Iz zhizni*, 261.
- 58 *PSS*, LIV: 331–2.
- 59 國家從1918年開始壟斷了對外貿易，但是隨着向新經濟政策的轉變，大部分布爾什維克的高級領導人，包括斯大林，都認為這種做法是不可持續的，已經過時了，但列寧把它看作是一種保護措施（「不然，外國人會把一切貴重物品都買走，運走」(譯註：《列寧全集》第42卷，第459頁)）和國家收入的重要來源。 *PSS*, XLIV: 427, 548, LIV: 325–6, 338.

- 60 PSS, XLV: 596, n210.
- 61 PSS, XLV: 338–9.
- 62 Trotskii, *Stalinskaia shkola fal'sifikatsii*, 74–5; Trotskii, *Portrety revoliutsionerov*, 279. 事實上，為了保持貿易壟斷，列寧依靠的有好幾個人。Sakharov, *Politicheskoe zaveshchanie*, 203–22; Lenin, PSS, XLV: 471 (譯註：《列寧全集》第43卷，第462頁)。
- 63 Sakharov, *Politicheskoe zaveshchanie*, 207–22.
- 64 RGASPI, f. 16, op. 2, d. 13, l. 180–90.
- 65 PSS, XLV: 472; LIV: 325–6.
- 66 PSS, LIV: 327.
- 67 列寧的這封信沒有收入《列寧全集》。參見 Volkogonov, *Lenin: politicheskii portret*, II: 329 (APRE, f. 3, op. 22, d. 307, l. 19); 以及 Sakharov, *Politicheskoe zaveshchanie*, 201 (他確定了這封信的日期)。據瑪麗亞·烏里揚諾夫娜說，列寧「叫來斯大林並給他交待了幾件最私密的任務」。Izvestiia TsK KPSS, 1989, no. 12: 196.
- 68 斯大林上一次見到列寧可能是在1922年12月13日。Golikov, *Vladimir Il'ich Lenin*, XII: 537–43
- 69 "O zhizni i deiatel'nosti V. I. Lenina (vospominaniia, pis'ma, dokumenty)," *Izvestiia TsK KPSS*, 1989, no. 12: 189–201 (at 191).
- 70 列寧定了這條規矩，即政治局委員的健康問題是黨管轄範圍內的事情。Ulam, *The Bolsheviks*, 560.
- 71 *Voprosy istorii KPSS*, 1991, no. 9: 44–5.
- 72 PSS, LIV: 327–8, 672. 托洛茨基提到了給加米涅夫的信，而加米涅夫按照托洛茨基的請求通知了斯大林。1922年12月20日，奧特弗里德·弗爾斯特醫生從德國趕來並在當天檢查了列寧的病情，但是對於他在12月21日(或22日)為列寧看病的情況，現在沒有任何記錄，醫生日誌中也看不出有關列寧飲食起居的規定有甚麼改變，能夠允許他進行口授。Izvestiia TsK KPSS, 1989, no. 12: 191–2; Fotieva, *Iz zhizni*, 274.
- 73 奇怪的是，1923年，列寧給托洛茨基的信件刊登在國外的孟什維克刊物《社會主義通報》上。而且它的署名是列寧早就不用的「N. 列寧」，記錄者「N. K. 烏里揚諾夫娜」，這個名字克魯普斯卡婭從來沒有用過。列寧檔案中的副本有一張手寫的便條，是克魯普斯卡婭給托洛茨基的，要求給列寧回電話，但那是甚麼時候寫的，現在還不清楚(把它放進去也許是為了說明，為甚麼沒有托洛茨基的書面答覆)。Sakharov, *Politicheskoe zaveshchanie*, 387; Trotsky archive, Houghton Library, Harvard University, T 770; Fel'shtinskii, *Kommunisticheskaia oppositsiia v SSSR*, I: 72; PSS, XLIV: 327–8, 672; Golikov, *Vladimir Il'ich Lenin*, XII: 545.
- 74 簽署文件的有斯大林、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斯大林可能在全會前讓列寧看過這份文件。Sakharov, *Politicheskoe zaveshchanie*, 215–6 (引自 RGASPI, f. 17, op. 2, d. 86, l. 7–7ob.). 學者們一直在聽信托洛茨基關於保持對外貿易壟斷的謊言，以為代表列寧參加全會的那天，只有他取得了勝利。Viz. Kumanev and Kulikova, *Protivostoianie*, 14–5. 事實上，由於12月16日那天列寧的病情惡化，克魯普斯卡婭



代表列寧給雅羅斯拉夫斯基(托洛茨基的一個對頭)也寫了信,要求他找人代替列寧參加1922年12月18日全會的討論。值得注意的是,當時並沒有把寫好的關於貿易壟斷問題的會議備忘錄給托洛茨基一份,他也沒有索要。對外貿易壟斷問題——據說正是因為這個問題列寧開始疏遠斯大林——再也沒有出現在後來的文件中。Sakharov, *Politicheskoe zaveshchanie*, 203–22.

- 822 75 RGASPI, f. 17, op. 2, d. 87, l. 1–2. 托洛茨基在回憶錄中謊稱與列寧有過一次談話,談的是消除國家機關和黨的機關中的官僚主義,具體目標是組織局,那是斯大林權力的源頭。據托洛茨基說,列寧最後表示,「那我就和你結為一個集團,反對一般的官僚機構,特別是反對組織局」。托洛茨基聲稱,他把此次與列寧的談話告訴了自己的擁護者:「拉柯夫斯基、I. N. 斯米爾諾夫、索斯諾夫斯基、普列奧布拉任斯基等等」——據說這種重複有助於他的記憶。Trotsky, *Moia zhizn'*, II: 215–7; Trotsky, *My Life*, 78–9.
- 76 克魯普斯卡婭為了讓斯大林動粗的事件有案可稽,就寫信給加米涅夫:「因為列寧在醫生的許可下口授了一封很短的信,斯大林昨天竟然以最粗暴的方式指責我……我和斯大林一樣珍視黨和伊里奇的利益。」給加米涅夫的這封信現在是有的,但上面沒有日期;過去添加的日期是1922年12月23日。PSS, LIV: 674–5 (RGASPI, f. 12, op. 2, d. 250); *Izvestiia TsK KPSS*, 1989, no. 1: 192; Lewin, *Lenin's Last Struggle*, 152–3. 加米涅夫轉而給斯大林寫了一張便條,透露說托洛茨基告訴他收到了列寧的一封信沒有註明日期的信;檔案管理人員後來補註的日期是「不晚於12月22日」,但它提到的是「代表大會」,不是全會,而代表大會是在1923年3至4月召開的。斯大林給加米涅夫的回答是:「『老頭子』怎麼可能和托洛茨基通信呢,這是弗爾斯特絕對禁止的。」斯大林的回信現在一般認為是在12月22日——還不清楚這個日期對不對。斯大林在12月22日並沒有打電話給克魯普斯卡婭,也沒有咒罵她。中央委員會禁止討論政治問題,但並沒有禁止與領導層的成員接觸;政治局是在12月24日才執行上述禁令的。 *Izvestiia TsK KPSS*, 1991, no. 6: 193.
- 77 *Voprosy istorii KPSS*, 1991, no. 9: 43–5; PSS, XLV: 474; Volkogonov, *Lenin: politicheskii portret*, II: 337–8; *Izvestiia TsK KPSS*, 1991, no. 6: 191; 1989, no. 12: 196; Sakharov, *Politicheskoe zaveshchanie*, 202.
- 78 Golikov, *Vladimir Il'ich lenin*, XII: 542–6.
- 79 *Voprosy istorii KPSS*, 1991, no. 9: 45.
- 80 薩哈羅夫複製了許多文件,其中包括他認為出自阿利盧耶娃的那份手寫的文件: *Politicheskoe zaveshchanie*, 352–53 (plates). 那封信有兩種形式,手寫的和打印的。手寫的上面有標題:〈給代表大會的信〉。標題顯然是後加的(因為它明顯不是那樣的一封信)。很能說明問題的是,那封打印的信並沒有指定要給誰。兩者的內容也不太一致。福季耶娃在12月29日寫信給加米涅夫說,當時沃洛季切娃在場。沃洛季切娃後來說她把信給了斯大林,但此話是否屬實,現在還不清楚,不過在福季耶娃給加米涅夫的信中(12月29日)是這麼說的。娜佳當時有可能已把此事透露給斯大林。關於沃洛季切娃的故事,參見 *Izvestiia TsK KPSS*, 1989, no. 12: 191–2, 198; Genrikh Volkov, “Stenografistka Il'icha,” *Sovetskaia kul'tura*, January

- 21, 1989 (手稿註明的日期是1963年12月18日，引自與沃洛季切娃的談話); 以及 PSS, XLV: 343; “K istorii poslednikh Leninskikh dokumentov: Iz arkhiva pisatel'ia Aleksandra Beka, besedovavshee v 1967 godu s lichnymi sekretar'iami Lenina,” *Moskovskie novosti*, April 23, 1989: 8–9. 另見 PSS, XLV: 474. 當沃洛季切娃 (或代表她的某個人) 異想天開，說在毫不知情的情況下把信給了斯大林時，除她之外的所有當事人都已經過世了。值得注意的是，黨的第十五次代表大會的公告，並沒有把12月23日的口授文件作為所謂的列寧〈給代表大會的信〉或「遺囑」的一部分公佈出來。這份文件也沒有像後來那樣做編號。Fel'shtinskii, *Kommunisticheskaia oppositsiia v SSSR*, I: 73–8.
- 81 福季耶娃寫道，從1922年12月23日開始，除了她自己和沃洛季切娃、格拉塞爾 (一次)、醫生、護理員以及克魯普斯卡婭之外，沒有人和列寧接觸過。但這一說法不對 Fotieva, *Iz zhizni*, 275.
- 82 VSakharov, *Politicheskoe zaveshchanie*, 278–89 (esp. 282–3); *Otechestvennaia istoriia*, 2005, no. 2: 162–74.
- 83 *Voprosy istorii KPSS*, 1963, no. 2: 68; Ulam, *The Bolsheviks*, 560.
- 84 *Izvestiia TsK KPSS*, 1990, no. 1: 57.
- 85 Sakharov, *Politicheskoe zaveshchanie*, 653–8 (RGASPI, f. 5, op. 2, d. 305, l. 1–5; d. 301, l. 1–2).
- 86 Sakharov, *Politicheskoe zaveshchanie*, 459.
- 87 PSS, XLV: 349–53 (譯註：參見《列寧全集》第43卷，第344–348頁。); Sakharov, *Politicheskoe zaveshchanie*, 375 (RGASPI, f. 5, op. 4, d. 10, l. 13ob).
- 88 Sakharov, *Na raspu't'e*, 58–9, n33 (引自 RGASPI, f. 5, op. 4, d. 98, l. 114–45); *XIV s'ezd VKP (b)*, 453–4).
- 89 Sakharov, *Politicheskoe zaveshchane*, 557–60 (引自 RGASPI, f. 5, op. 1, d. 274, l. 1–2); Fel'shtinskii, *Kommunisticheskaia oppositsiia v SSSR*, I: 9–11.
- 90 Sakharov, *Politicheskoe zaveshchane*, 660–2 (引自 RGASPI, f. 5, op. 1, d. 275, l. 2–3); Fel'shtinskii, *Kommunisticheskaia oppositsiia v SSSR*, I: 9–11.
- 91 *Izvestiia TsK KPSS*, 1990, no. 10: 178–9 (托洛茨基給中央監察委員會的信，1923年10月).
- 92 1月20日，托洛茨基在另一封信中抱怨說最近的共產國際代表大會讓自己脫不開身。Sakharov, *Politicheskoe zaveshchane*, 660–72 (RGASPI, f. 5, op. 1, d. 275, l. 2–3; d. 307, l. 5; d. 308, l. 1–5); Fel'shtinskii, *Kommunisticheskaia oppositsiia v SSSR*, I: 12–5.
- 93 1922年12月21日，組織局討論並通過了捷爾任斯基委員會報告的結論。捷爾任斯基委員會報告的最終草案證實，奧爾忠尼啟則確實打了一名格魯吉亞共產黨員，但沒有要求採取紀律處分，反而建議把格魯吉亞的各位 (前) 中央委員調到蘇維埃俄國。最終草案在1923年1月13日的組織局會議上獲得通過並呈送政治局；結論的副本送交列寧。政治局批准了組織局的決定以及格魯吉亞中央委員會的新人選。1月18日，為了讓姆季瓦尼等人有時間熟悉材料，政治局決定將討論推遲一個星期。RGASPI, f. 17, op. 3, d. 330, l. 3.

- 94 RGASPI, f. 17, op. 3, d. 331, l. 1. 捷爾任斯基委員會的報告：RGASPI, f. 5, op. 2, d. 32, l. 69–73.
- 95 PSS, XVI: 476; Fotieva, *Iz zhizni*, 300; Golikov, *Vladimir Il'ich Lenin*, XII: 568–9.
- 96 Fotieva, *Iz zhizni*, 301. Sakharov, *Politicheskoe zaveshchanie*, 276–7 (引自 RGASPI, f. 5, op. 4, d. 10, l. 23–23ob.). 有一點也許值得注意：福季耶娃承認，她首先問了捷爾任斯基，而捷爾任斯基告訴她斯大林有那些材料。
- 97 莫洛托夫提供了另外一種可能性：「斯大林開始執行書記處的決定，不讓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去探望列寧，因為醫生禁止這樣的接觸。他們向克魯普斯卡婭反映。她十分生氣，就跟斯大林說了，而斯大林回答她，『中央委員會做出的決定，而且醫生也認為不能讓人去探望列寧』。『但這是列寧自己要求的！』『要是中央委員會做出這樣的決定，就連你去看他我們也會禁止。』」Chuev, *Sto sorok*, 212.
- 98 Chuev, *Sto sorok*, 212–3; Chuev, *Molotov Remembers*, 132.
- 99 1926年的回憶：*Izvestia TsK KPSS*, 1989, no. 12: 196, 198.
- 100 PSS, LIV: 329; RGASPI, f. 17, op. 3, d. 332, l. 5.
- 101 *Kentavr*, October–December 1991, 100–1; Sakharov, *Politicheskoe zaveshchane*, 392.
- 823 102 「在上述的分析中，工人階級要維護和加強自身的引領地位，不是要通過政府機關，不是要通過軍隊，而是要通過工業，是工業再生產了無產階級本身，」托洛茨基在有關工業的文章中寫道，「黨、工會、共青團、我們的學校等，都負有教育和培養新一代工人階級的任務。但事實將會證明，要是它下面沒有一個不斷發展的工業基礎，所有這一切都是建立在沙灘上的。」他強烈建議要把國家財政花在國家工業上。Daniels, *Documentary History of Communism*[1960], I: 234–6 (引自 Trotsky archives, Houghton Library, Harvard University: March 6, 1923).
- 103 斯大林贏得了這場鬥爭，並且像在1923年夏天的中央全會上批准的那樣，根據他的建議進行了改組。Sakharov, *Politicheskoe zaveshchanie*, 663–71; RGASPI, f. 17, op. 3, d. 363, l. 2; d. 364, l. 5; d. 369, l. 5.
- 104 Naumov and Kurin, “Leninskoe zaveshchanie,” 36.
- 105 Volkogonov, *Lenin: Life and Legacy*, 421 (引自 APRE, f. 3, op. 22, d. 307, l. 138–9).
- 106 *Izvestia TsK KPSS*, 1989, no. 12: 198. 在人民委員會秘書處的這幾名女性對斯大林顯然沒有好感。例如，她們後來受前同事娜佳·阿利盧耶娃的邀請，在小斯維特蘭娜出生的時候(1926年2月28日)到斯大林的家中拜訪。當時斯大林打開門，娜佳對他說把門關上，要不然孩子會受風感冒，據說他帶着他那奇怪的幽默感回答說：「要是得了感冒那就死得更快了」。Genrikh Volkov, “Stenografistka Il'icha,” *Sovetskaia kul'tura*, January 21, 1989: 3 (手稿註明的日期是1963年10月18日)。
- 107 “Dnevnik dezhurnykh sekretarei V. I. Lenina,” PSS, XLV: 607. 另見 Lewin, *Lenin's Last Struggle*, 96. 這也許是在格魯吉亞事務上第一個能得到文件材料有力證明的例子：列寧不僅對奧爾忠尼啟則和捷爾任斯基表示懷疑，還對斯大林表示懷疑。
- 108 醫生們還說：「弗拉基米爾·伊里奇對不把備忘錄給他感到很生氣，說他已經看過備忘錄，只是因為有個問題還需要再看一下」。Sakharov, *Politicheskoe*

- zaveshchanie*, 276. 格拉塞爾拒絕把「中央給各省黨委的關於格魯吉亞共產黨內部衝突問題的短信」副本交給列寧。 *Izvestiia TsK KPSS*, 1990, no. 9: 153nl, 162–63.
- 109 Golikov, *Vladimir Il'ich Lenin*, XII: 589 (RGASPI, f. 5, op. 2, d. 32, l. 53–73); Fotieva, *Iz zhizni*, 315. 這些檔案材料現在保存在：RGASPI, f. 5, op. 2, d. 32, d. 33, d. 34. 格拉塞爾對布哈林說，列寧「對我們的工作已經預先有了看法，他實際上是覺得，同時也非常擔心，我們在報告中無法證明他所需要的東西，而他又沒有時間去準備代表大會的講話」。 *Izvestiia TsK KPSS*, 1990, no. 9: 163.
- 110 Sakharov, *Politicheskoe zaveshchanie*, 501 (引自 RGASPI, f. 5, op. 2, d. 31, l. 1, 3, 4).
- 111 Sakharov, *Politicheskoe zaveshchanie*, 345–62.
- 112 RGASPI, f. 5, op. 2, d. 34, l. 15; Trotsky, *My Life*, 482–8.
- 113 Smith, “The Georgian Affair of 1922,” 538 (引自 RGASPI, f. 5, op. 2, d. 34, l. 3); Smith, *Bolsheviks and the National Question*, 208. 托洛茨基和列寧（以及李可夫）的醫生都是德國人 F. A. 蓋捷 (F. A. Guetier)，所以托洛茨基可以得到關於列寧身體狀況的第一手信息，並可以利用這種額外的渠道與布爾什維克領袖溝通。
- 114 PSS, XLV: 329–30.
- 115 *Izvestiia TsK KPSS*, 1989, no. 12: 192–3 (RGASPI, f. 2, op. 1, d. 26004, l. 3); Volkogonov, *Stalin: politicheskii portret*, II: 384–5; Volkogonov, *Lenin: Life and Legacy*, 274 (引自 APRE, f. 3, op. 22, d. 307, l. 27–9). 註：「大約在五個星期之前」——意思是 1 月底，不是 12 月 23 日。克魯普斯卡婭的私人秘書 (1919–1939) 薇拉·德里德佐突然想起斯大林在 1923 年 3 月是如何打電話向克魯普斯卡婭道歉的；德里德佐在其出版於勃列日涅夫時代的回憶錄中沒有提到這件事。V. Dridzo, 105; cf. Dridzo, *Nadezhda Konstantinovna*.
- 116 Trotsky, *Between Red and White*, 81.
- 117 *Kentavr*, 1991, Oktiabr'—dekabr': 109–12. 〈寧肯少些，但要好些〉也被認為是列寧口授的（日期是 3 月 2–9 日），它猛烈批評了國家機關的管理和理應改善國家機關管理的工農檢查院。托洛茨基聲稱他召集了一次會議，力主在《真理報》上發表這篇口授的文章。Trotsky, *Stalin School of Falsification*, 72.
- 118 Trotskii, “Zaveshchanie Lenina [Portrety],” 280.
- 119 *Izvestiia TsK KPSS*, 1990, no. 9: 151. 同一天，斯大林打電報給奧爾忠尼啟則，提到了列寧的幾封信。托洛茨基聲稱他把給姆季瓦尼和馬哈拉澤的信告訴了加米涅夫，但信上寫的是「抄送」加米涅夫和托洛茨基。加米涅夫和托洛茨基有沒有像托洛茨基聲稱的那樣在 3 月 6 日的夜裏碰過面，現在還不清楚；在加米涅夫的秘書處，沒有登記過這封由托洛茨基給加米涅夫的信，而加米涅夫說，與托洛茨基的會面是在後來發生的，是在列寧的身體狀況已經變得顯然沒有希望之後。
- 120 PSS, LIV: 329–30 (RGASPI, f. 2, op. 1, d. 26004, l. 1–3 (附有斯大林的回信); *Izvestiia TsK KPSS*, 1989, no. 12: 192–3. 現在存有一份斯大林回信的副本，是由沃洛季切娃手寫的，上面沒有斯大林的簽名；第二份副本顯然是斯大林寫的，有他的簽名，但這份副本看上去像是模仿的。檔案封面上有一則說明，是斯大林的筆

- 跡：「列寧同志要求斯大林親收。」不過，現在不清楚這則說明是不是為這封信寫的。Sakharov, *Politicheskoe zaveshchanie*, 395–7.
- 121 *Voprosy istorii KPSS*, 1963, no. 2, 轉載於 *PSS*, XLV: 455–86 (列寧秘書的「日誌」, 1922年11月21日–1923年3月6日)。
- 122 Volkogonov, *Lenin: politicheskii portret*, II: 343.
- 123 3月17日：「等了一小會兒，他想要表達某個想法或願望，但無論是護士、瑪麗亞·伊里奇娜還是娜捷施達·康斯坦丁諾夫娜，都不明白他要說甚麼。」Sakharov, *Politicheskoe zaveshchanie*, 497. 另見 Volkogonov, *Lenin: politicheskii portret*, II: 343.
- 124 *Pravda*, March 12 and March 14, 1923; *Izvestiia*, March 14, 1923.
- 125 Valentinov, *Novaia ekonomicheskaiia politika*, 33–40.
- 126 Velikanova, *Popular Perceptions*, 27 (引自 RGASPI, f. 76, op. 3, d. 287, l. 6–7, 13); Izmozik, *Glaza*, 84.
- 127 Trotskii, “O bol’nom” (1923年4月5日) 見於 *O Lenine*, 159–61.
- 128 Karl Radek, “Trotskii, organizator pobedy,” *Pravda*, March 14, 1923, 轉載於他的 *Portrety i pamflety* (Moscow and Leningrad: Gosizdat, 1927), 但在隨後的版本中(1930年和1933–1934年)被刪掉了。
- 129 Valentinov, *Novaia ekonomicheskaiia politika*, 54; Valentinov, *Nasledniki Lenina*, 13–4.
- 130 Sevoštianou, “Sovershenno sekretno”: *Lubianka—Stalinu*, VI: 51–2 (TsA FSB, f. 2, op. 1, d. 42: March 24, 1923). 編者們沒有轉載這份文件的全文，而只是少數幾個片斷，對於沒有提到斯大林的名字也未作評論。
- 131 1922年5月30日和1922年12月22日，列寧向斯大林要過毒藥。
- 132 *Sochineniia*, XVI: 25. 收到斯大林信件的有托姆斯基、季諾維也夫、莫洛托夫、布哈林、托洛茨基和加米涅夫；李可夫和加里寧不在。Volkogonov, *Lenin: politicheskii portret*, II: 347–50 (APRF, f. 3, op. 22, d. 307, l. 1–2). 斯大林死後，福季耶娃沒有否認要毒藥的事情，至於在日誌中為何沒有提到，她說是自己「忘記」做記錄了。*Izvestiia TsK KPSS*, 1991, no. 6, 217; Fotieva, *Iz zhizni*; “K istorii poslednikh leninskikh dokumentov,” *Moskovskie novosti*, April 23, 1989: 8–9 (在亞歷山大·貝克去世後發表的貝克在1960年代對福季耶娃和沃洛季切娃的採訪：按照貝克的說法，列寧的中風奇蹟般地拯救了斯大林); Ulyanova, “O zhizni i deiatel’nosti V. I. Lenina (vospominaniia, pis’ma, dokumenty),” *Izvestiia TsK KPSS*, 1989, no. 12: 189–201 (at 199). 列寧早些時候索要毒藥的事情(1922年12月22日)在值班日誌中沒有記載。*Izvestiia TsK KPSS*, 1991, no. 6: 217.
- 133 Sakharov, *Politicheskoe zaveshchane*, 273n.
- 134 在3月16日的電報中，斯大林試圖讓奧爾忠尼啟則放心：「我認為，事情在(格魯吉亞)代表大會上會得到順利解決，俄國共產黨第十二次代表大會也會支持南高加索黨委的政策。」RGASPI, f. 558, op. 1, d. 2518, l. 1.
- 135 Sakharov, *Politicheskoe zaveshchanie*, 505 (引自 RGASPI, f. 5, op. 2, d. 33, l. 50).
- 136 梯弗利斯的奧爾忠尼啟則給羅斯托夫的伏羅希洛夫和米高揚發了一封電報，透露說季諾維也夫正在路上，並說季諾維也夫「似乎有點偏向(民族)分離分子，但還

- 不如加米涅夫，加米涅夫給分離分子提供了不同的建議。我跟季諾維也夫談了。你們兩個也會跟他談的。目前他們的所有企圖都不會有甚麼收穫，只會使我們的同志反對加米涅夫，並在參加代表大會的南高加索代表團中造成分裂」。RGASPI, f. 85, op. 24, d. 2479, l. 1–1ob.
- 137 *TsK RKP (b)—VKP (b) i natsional'nyi vopros*, 106 (RGASPI, f. 558, op. 1, d. 2522, l. 1). 在3月22日的政治局會議上，斯大林為即將召開的黨的代表大會準備的有關民族問題的提綱獲得了通過。*XII s"ezd RKP (b)*, 816–9.
- 138 托洛茨基指責說成立蘇聯這件事是在書記處決定的，不是政治局。3月29日政治局致托洛茨基的集體信駁斥了這一謊言。接下來的兩天，托洛茨基在中央全會上再次要求解除奧爾忠尼啟則的職務，結果除了他自己之外，得到的贊成票還是只有一張。Smith, *Bolsheviks and the National Question*, 210. 卡岡諾維奇回憶說，托洛茨基給了格魯吉亞「民族傾向分子」充分的支持。Kaganovich, *Pamiatnye zapiski*, 282.
- 139 Kun, *Bukharin*, 130–1.
- 140 打了電話之後，福季耶娃給斯大林寫了一張便條，詳細說明了文章「寫作」(原文如此!)的日期和弗拉基米爾·伊里奇是如何「建議發表」的，但「我沒有弗拉基米爾·伊里奇的正式指示」。福季耶娃沒有把附信送給斯大林：「沒送，因為斯大林同志說他不想摻和。」福季耶娃倒是給加米涅夫送了一封寫給政治局的信——同時抄送托洛茨基——說「在他上次發病前不久，他對我說他想要發表這篇文章，但是要在晚些時候。那以後他就病了，也沒有給出最後的指示」——這個說法超出了她對斯大林所說的內容。她還說，文章已經給托洛茨基送去了。加米涅夫表示，托洛茨基在一個多月前就把文章給他看過了，因此，按照正常程序，他會把信轉交給黨的書記處(也就是交給斯大林)。*Izvestiia TsK KPSS*, 1990, no. 9: 155–6, 161.
- 141 後期的口授材料中其他所有被歸於列寧的想法，比如十月道路的正確性、加強黨的權威和改善機關職能的必要性、小資產階級敗壞革命的危險性、農民有望通過合作社的道路戰勝市場邁向社會主義，都和他的觀點是一致的。Lih, "Political Testament."
- 142 *Kommunist*, 1956, no. 9, 轉載於 *PSS*, XLV: 356–62.
- 143 Fotieva, *Iz zhizni*, 286.
- 144 Sakharov, *Politicheskoe zaveshchaniye*, 514–8; Sakharov, *Na raspu'e*, 136–44; *Izvestiia TsK KPSS*, 1990, no. 9: 151, 158; *Tainy natsional'noi politiki TsK RKP*, 97.
- 145 Sakharov, *Politicheskoe zaveshchaniye*, 329–30, 335–6.
- 146 Valentinov, *Nasledniki Lenina*, 17.
- 147 斯大林的任務是作組織工作報告，布哈林是代替季諾維也夫作有關共產國際的報告，而交給托洛茨基的是工業報告(但只是在政治局對他有關國家在經濟方面的角色的提綱進行修改之後)。加米涅夫的任務是代替生病的索柯里尼柯夫作有關稅收政策的報告。RGASPI, f. 17. op. 3, d. 329, l 203; op. 2, d. 96, l. 1; op. 3, d. 346, l. 5. 比較有趣的是，按照巴扎諾夫的說法，當時斯大林建議由托洛茨基作有關政治

- 形勢的主報告，托洛茨基不同意，並反過來推薦斯大林，結果加米涅夫採取了一個折衷的辦法，選擇了季諾維也夫，而這正是季諾維也夫朝思暮想的角色。  
*Bazhanov, Damnation of Stalin*, 30.
- 148 *XII s'ezd RKP (b)*, 8–9. 季諾維也夫在政治報告中說道：在黨和國家的關係問題上，「存在勞動的劃分，但不存在權力的劃分」。這顯然是針對托洛茨基的。*XII s'ezd RKP (b)*, 41–2. 卡爾在提到季諾維也夫時說得比較刻薄：「他想接過列寧衣鉢的野心表現得那麼天真，結果讓他的虛榮顯得十分可笑。」Carr, *Socialism in One Country*, I: 170. 相比之下，加米涅夫找到了一種合適的姿態，在提到列寧時說：「每當我們遇到這樣那樣的問題和這樣那樣的困難時，他的教導就成了我們的試金石。在內心裏，我們每個人都問過自己，『弗拉基米爾·伊里奇會怎麼解決這個問題？』」*XII s'ezd RKP (b)*, 523.
- 149 *Dvenadtsatyi s'ezd RKP (b)*, 199.
- 150 *Pravda*, December 7, 1923.
- 151 Valentinov, *Novaia ekonomicheskaiia politika*, 54[1991], 99.
- 152 Daniels, *Conscience of the Revolution*, 205; *Izvestiia*, April 7, 1923 (彼得羅夫斯基). 另見 Barmine, *One Who Survived*, 212; 以及 Deutscher, *Prophet Unarmed*, 94.
- 153 *XII s'ezd RKP (b)*, 393. 莫里斯·多布 (Maurice Dobb) 刊印了一幅摘自斯特魯米林 (Strumilin) 著作的不同版本的曲線圖：Dobb, *Russian Economic Development*, 222.
- 154 *XII s'ezd RKP (b)*, 306–22 (at 321).
- 155 Carr, *Interregnum*, 32–4.
- 156 Barmine, *One Who Survived*, 93–4.
- 157 與斯大林關係密切的阿韋利·葉努基澤提出了一種稍帶惡意的解釋。「列寧同志成了一邊倒的錯誤信息的受害者，」葉努基澤推測道，「當他們接近一個人，這個人因為生病而無法跟蹤瞭解日常發生的事情，他們就說某某同志受了侮辱、挨了打、被趕走了、丟了職務等等，他當然有可能寫出一封措辭如此尖銳的信。」*XII s'ezd RKP (b)*, 541. 4月18日，黨的代表大會的主席團做出決定，向元老委員會公開〈關於民族問題的筆記〉。
- 158 *Izvestiia TsK KPSS*, 1991, no. 4: 171–2.
- 159 *Sochineniia*, V: 257.
- 160 *XII s'ezd RKP (b)*, 449.
- 161 *Dvenadtsatyi s'ezd VKP (b)*, 31.
- 162 *Izvestiia TsK KPSS*, 1991, no. 4: 171.
- 163 *Dvenadtsatyi s'ezd RKP (b)*, 571, 650–2.
- 164 *XII s'ezd RKP (b)*, 561–4; Sakharov, *Politichskoe zaveshchane*, 521–34. 約有100人參加了4月25日大會特設的「民族問題分會場」的討論；這其中有24人不是大會代表，而是特意請來參加這次討論的。斯大林向大會匯報了討論的結果。*Dvenadtsatyi s'ezd RKP (b)*, 649–61.
- 165 *XII s'ezd RKP (b)*, 564. 不過，布哈林還是強調指出了大俄羅斯沙文主義問題。他說：「我明白，我們親愛的朋友柯巴同志沒有嚴厲批評俄羅斯的沙文主義，而是

- 作為一個格魯吉亞人批評了格魯吉亞的沙文主義。] *XII s'ezd RKP (b)*, 614. 格魯吉亞人忿忿不平：奧爾忠尼啟則和斯大林事先在代表方面做了手腳，九個有表決權的格魯吉亞代表中只有馬哈拉澤維護格魯吉亞的民族路線；姆季瓦尼和科捷·欽察澤 (Cote Tsintsadze, 格魯吉亞契卡的首任人民委員) 持有相同的觀點，但沒有表決權。馬哈拉澤宣佈，格魯吉亞中央委員會——那裏面集中了很多奧爾忠尼啟則的擁護者——「有毛病」。奧爾忠尼啟則指責姆季瓦尼和菲利普·馬哈拉澤在孟什維克主政格魯吉亞時 (1918–1920) 與孟什維克合作，包庇格魯吉亞黨內的階級敵人 (地主)，是「左傾主義」和「冒險主義」。拉狄克抱怨說「黨內的大多數同志都不理解 (民族) 問題的重要性」。 *XII s'ezd RKP (b)*, 615.
- 166 *XII s'ezd RKP (b)*, 113. 季諾維也夫稱讚說：「斯大林同志和中央委員會的提綱好極了，透徹，深思熟慮，圓滿，沒人能說裏面有一處錯誤。」 *XII s'ezd RKP (b)*, 557, 607.
- 167 Volkogonov, *Stalin: politicheskii portret*, I: 160.
- 168 Shvetsov, *Diskussia v RKP (b)*, 10.
- 169 斯大林把新經濟政策比作參加1905年之後的杜馬選舉而不是繼續進行革命鬥爭。 *Sochineniia*, V: 215, 238–40, 244–5, 248–9; Himmer, “The Transition from War Communism.”
- 170 Nazarov, *Stalin i bor'ba za liderstvo*, 85 (引自 RGASPI, .f 50, op. 1, d. 58, l. 17). 拉柯夫斯基、奧爾忠尼啟則、烏哈諾夫 (Ukhanov)、扎盧茨基 (Zalutsky) 和哈里托諾夫 (Kharitonov) 只得到很少的選票，而哈里托諾夫是當選者中得票最少的 (264票)。
- 171 「他已經從感覺性失語中恢復過來並開始學習說話了」，科熱夫尼科夫醫生滿懷希望地寫道。 Volkogonov, *Lenin: Life and Legacy*, 429, (引自 APRE, f. 3, op. 22, d. 307, l. 140).
- 172 Volkogonov, *Lenin: Life and Legacy*, 430.
- 173 安熱莉卡·巴拉巴諾娃曾在1918年秋天列寧遭遇未遂暗殺之後到哥爾克去看望過他，而她在那時就注意到克魯普斯卡婭：「我覺得從上次看到她之後，她顯得蒼老憔悴了許多。過去幾個月的壓力在她身上比在她丈夫身上反映得更明顯。」 Balabanoff, *My Life as a Rebel*, 186–7.
- 174 克魯普斯卡婭喜歡季諾維也夫的第二任妻子茲拉塔·利林娜·伯恩斯坦 (Zlata Lilina Bernstein)；列寧夫婦和季諾維也夫夫婦在流亡時互相拜訪過。
- 175 PSS, XLV: 343–8, 593–4, n208; Fotieva, *Iz zhizni*, 279–82. 這份所謂口授文件的打印稿有幾處令人費解的地方，或者說有幾處奇怪的錯誤：在沒有上文的情況下卻說「我上面說到的」；說到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兩人的時候用的代詞是單數的「他」 (「於他」 [emu])。 PSS, XLV: 474–6, 482. 從現在保存着速記記錄的口授文件來看，福季耶娃往往會保留原來用詞上的混亂，而沃洛季切娃則會改正有語法錯誤的地方。
- 176 秘書日誌中有很多天的記錄都不見了：12月17日、12月19至22日 (據說是斯大林給克魯普斯卡婭打電話的那天)；從12月25日到1月16日記錄的只有兩條內容，其中有一條提到，列寧正在讀蘇漢諾夫的書。這應該就是列寧口授那些極



其重要的文件的時候。“Dnevnik dezhurnykh sekretarei Lenina,” *PSS*, XLV: 457–86; 608, n297. 1967年，80歲的福季耶娃告訴亞歷山大·貝克說：「我們不會把所有的事情都寫在日誌裏。」“K istorii poldednikh Leninskikh dokumentov: Iz arkhiva pisatelja Aleksandra Beka, besedovavsheo v 1967 godu s lichnyi sekretariami Lenina,” *Moskovskie novosti*, April 23, 1989: 8–9. 1929年，沃洛季切娃聲稱，她先是把口授的內容記下來，然後重寫五份，接着再重新打印一份沒有錯誤的送到《真理報》。因此，至少應該有三個版本。*PSS*, XLV: 592. 但現在既沒有最初的手寫版（速記），也沒有重寫版。在口授材料中，人們理應看到多份底稿以及在比如說列寧檢查過謄寫稿後修改和插入文字的地方。口授材料很少是一氣呵成的。

- 177 Fel'shtinskii, *Kommunisticheskaia oppozitsiia v SSSR*, I: 73. 福季耶娃寫道，在被列寧叫去之後，人民委員會秘書處的工作人員都焦急地等待她或沃洛季切娃回去，以便瞭解列寧看起來如何，感覺怎樣。「有時候在我們從弗拉基米爾·伊里奇那兒回來之後，娜捷施達·康斯坦丁諾夫娜（克魯普斯卡婭）或瑪麗亞·伊里奇娜（烏里揚諾夫娜）會把他的口授內容讀一下並分享她們對他病情的看法。」*Fotieva, Iz zhizni*, 281. 弗拉基米爾·瑙莫夫（Vladimir Naumov）認為，斯大林和其他所有人當時馬上就知道了所謂的「遺囑」。*Pravda*, February 26, 1988. 但斯大林所知道的——就如福季耶娃給加米涅夫的信（12月29日）所證實的——只是12月23日的口授內容，那實際上是給斯大林的信；當時沒有人知道12月24日或12月25日的口授內容，因為有可能就沒有發生過那回事。
- 178 Kuromiya, *Stalin*, 64（引自托洛茨基1933年7月7日給馬克斯·伊斯特曼的信：Trotsky manuscripts, Lily Library, Indiana University, Bloomington）。另見Bazhanov, *Vospominaniia*[1990], 107.
- 179 Sakharov, *Politicheskoe zaveschane*, 311–3.
- 180 1922年中期，當時捷爾任斯基是鐵路人民委員，政治局成立了一個委員會，調查從國外採購的情況，而這實際上是為了審查托洛茨基之前擔任鐵路人民委員時的工作。斯大林、李可夫、托姆斯基和加米涅夫投了贊成票；托洛茨基投了反對票。列寧缺席，但他在得知這一情況後並沒有想要推翻政治局的決定。*RGASPI*, f. 17, op. 3, d. 298, l.1, 6; *Izvestiia TsK KPSS*, 1991, no. 3: 189–90; Sakharov, *Politicheskoe zaveschchanie*, 368–9.
- 181 *PSS*, XLV: 345. 沃爾科戈諾夫認為，托洛茨基作為一個極其關注自身利益的人，有可能以為〈給代表大會的信〉意味着列寧已經把他——「大概是現在的中央委員會中最有才能的人」——指定為接班人，而且也許還以為列寧批評了他幾句，只是為了減輕他的升遷給其他人帶來的打擊。*Volkogonov, Trotsky*, 264–5.
- 182 *XII s'ezd RKP (b)*, 122, 136, 139; Valentinov, *Novaia ekonomicheskaiia politika*, 57–8; Tucker, *Stalin as Revolutionary*, 335. 在這次的代表大會上，三駕馬車讓自己手下開始拿托洛茨基的所謂波拿巴主義大做文章。*Deutscher, Prophet Unarmed*, 94–5; *Deutscher, Stalin*, 273. 所有這一切根本不是在暗中進行：1923年4月19日（黨的第十二次代表大會的第二天），《經濟生活報》就重新刊登了列寧在1921年對托洛茨基有關國家計劃委員會的建議的強烈批評。*Sakharov, Politicheskoe zaveschchanie*, 543–4.

- 183 *XII s"ezd RKP (b)*, 47, 92–95, 121–2, 136–7, 139, 151; Sakharov, *Politicheskoe zaveshchanie*, 418–27. 弗拉基米爾·柯秀爾——西伯利亞黨組織的領導人、斯大林的手下之一——斯坦尼斯拉夫·柯秀爾的弟弟——在1928年作為托派分子被開除黨籍。
- 184 Sakharov, *Politicheskoe zaveshchanie*, 423.
- 185 Sakharov, *Politicheskoe zaveshchanie*, 427. 沃爾科戈諾夫正確地指出，「值得注意的是，列寧竟然能在那麼短的時間內口授這麼些冗長的文件，尤其是他在12月16日和22日的夜裏病情還急劇惡化了」——對於病情的惡化，所有醫生都說過，如克拉默、科熱夫尼科夫、弗爾斯特、施特林普費爾(Strumpfell)、亨切爾(Henschell)、農內(Nonne)、布姆克(Bumke)和葉利斯特拉托夫(Yelistratov)。但沃爾科戈諾夫沒能把這些細節聯繫起來：列寧實際上不可能口授所有那些文件。Volkogonov, *Lenin: Life and Legacy*, 419.
- 186 Fel'shtinskii, *Kommunisticheskaia oppozitsiia v SSSR*, I: 56 (季諾維也夫給斯大林的附函日期為1923年6月2日)。摩西·盧因正確地領會到所謂的列寧「遺囑」的要旨，即它實質上是贊成國際主義，反對民族主義、官僚主義——尤其是黨內領導層的官僚主義，以及解除斯大林的職務，但盧因沒有對文件的合法性提出質疑，不管怎麼說那些文件都是發表在馬克思列寧主義研究院出版的《列寧全集》中的。Lewin, *Lenin's Last Struggle*, 132–3.
- 187 後來，托洛茨基親自對認為他跟口授事件有關的懷疑作了解釋。據他所說，口授文件「充實並澄清了列寧和我的最後一次談話中提出的建議」。據托洛茨基說，列寧「當時正在做系統的準備，要在黨的第十二次代表大會上把斯大林作為官僚主義、官官相護、獨斷專行和粗魯無禮的典型，對他發起毀滅性的打擊」。托洛茨基還很可笑地說道，「組成一個『列寧和托洛茨基集團』，反對機關人員和官僚，當時完全瞭解這個想法的只有列寧和我」。其他人都不知情的原因在於，那是托洛茨基臆想出來的。Trotsky, *My Life*, 479–81. 托洛茨基沒有說明這次所謂的與列寧談話的日期。
- 188 例如，1921年11月，斯大林給列寧寫了一封很氣憤的信，訴說克魯普斯卡婭如何「再次」自以為是。RGASPI, f. 558, op. 1, d. 2176, l.1–5ob. 關於克魯普斯卡婭與斯大林的不和，另見Bazhanov, *Bazhanov and the Damnation of Stalin*, 31 (它支持托洛茨基)。
- 189 McNeal, *Bride of the Revolution*, 117.
- 190 不喜歡瑪麗亞·烏里揚諾夫娜並稱她是「老姑娘」的托洛茨基猜測，是克魯普斯卡婭排擠烏里揚諾夫娜，把她推向了斯大林陣營，而學者們也往往按照這一說法，認為烏里揚諾夫娜站在斯大林一邊，克魯普斯卡婭站在托洛茨基一邊。Trotsky, *Diary in Exile* [1963], 33; Trotskii, *Dnevnik i pisma* [1986], 76; Trotskii, *Stalin*, II: 254–5.
- 191 「要在托洛茨基和其他政治局委員之間，尤其是在托洛茨基和斯大林之間維持平衡是極其困難的，」烏里揚諾夫娜寫道，「他們兩個都屬於非常看重自身利益而又沒有耐心的人。對他們來說，個人的利益高於事業的利益。」“M. I. Ulianova ob otnoshenii V. I. Lenina i I. V., Stalina,” *Izvestiia TsK KPSS*, 1989, no. 12: 196–9 (at 197).

- 192 Blank, *Sorcerer as Apprentice*, 157–8 (引自 K. A. Khasanov, “Tatariia v bor’be za Leninskuiu natsional’nomu politiku,” *Revoliutsiia i natsional’nosti*, 1933, no. 11: 30).
- 193 Bennigsen and Wimbush, *Muslim National Communism*, 51–7.
- 194 Tagirov, *Neizvestnyi Sultan-Galiev* 44–5 (TsGA IPD RT, f. 8237, op. 1, d. 2, l.112). 安東諾夫—奧弗申柯斷言，這封信是因為斯大林的話起了作用，讓蘇丹—加利耶夫中了圈套。其他人也都接受了這一說法。Antonov-Ovseenko, *Stalin bez maski*, 40–3; Landa, “Mirsaid Sultan-Galiev.”
- 195 Bulat Sultanbekov, “Vvedenie,” 載於 *Tainy natsiona’noi politiki TsK RKP*, 4–11. 另見 Sultanbekov, *Pervaia zhertva Genseka*. 當時還有幾份告密者的秘密報告，大意是，蘇丹—加利耶夫正在組織蘇聯各地的東部共產黨人召開一次秘密的代表大會。Tagirov, *Neizvestnyi Sultan-Galiev*, 32–4 (TsGA IPD RT, f. 8237, op. 1, d. 5, l.22–3). 抱怨說工作負擔過重的捷爾任斯基把這個案子交給了明仁斯基。Tagirov, *Neizvestnyi Sultan-Galiev*, 71 (TsA IPD RT, f. 8237, op. 1, d. 2, l. 117).
- 196 *Tainy natsiona’noi politiki TsK RKP*, 15–23. 供詞沒有提到請求被處決的事情，參見 Tagirov, *Neizvestnyi Sultan-Galiev*, 74–5 (TsGA IPD RT, f. 8237, op. 1, d. 20, l.103–4, d. 2, l. 121).
- 197 斯克雷普尼克還說，當時公開要求一位穆斯林民族主義者作出解釋，但卻沒有這樣要求眾多持俄羅斯沙文主義想法的共產黨人中的任何一個。托洛茨基的發言滔滔不絕，認為蘇丹—加利耶夫的問題不在於民族主義，而在於叛變，這種叛變不是因為土耳其大使館的蠱惑，而是因為從民族主義而來的政治演變，這種演變「沒有受到那些和他關係密切的共事者的必要的抵制」——事到如今，韃靼的同志還在試圖保護他，說對他的信件翻譯得不好。 *Tainy natsiona’noi politiki TsK RKP*, 54–7 (奧爾忠尼啟則), 61 (斯克雷普尼克，托洛茨基), 74 (托洛茨基).
- 198 拉柯夫斯基和斯克雷普尼克提交了他們自己的憲法草案，並強烈主張各個共和國要有自己負責外交和對外貿易的人民委員部。Davletshin, “The Federal Principle in the Soviet State,” at 24, Sullivant, *Soviet Politics and the Ukraine*, 65–76; *TsK RKP (b)–VKP (b) i natsional’nyi vopros*, 120–9 (RGASPI, f. 558, op. 1, d. 3478, l.20–25, 30–7: commission meeting of June 14, 1923). 在莫斯科的少數民族共產黨人會議結束之前，拉柯夫斯基和斯克雷普尼克要求斯大林加以說明，在描述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時使用的兩個說法「統一的」和「不可分的」是甚麼意思；他作了言辭尖銳的回擊，說他們的指責和要求相當於邦聯，而不是已經達成一致的聯邦。 *Tainy natsiona’noi politiki TsK RKP*, 270–2 (拉柯夫斯基和斯大林).
- 199 有種說法(1926年從加米涅夫的秘密處傳出的)認為，只是因為加米涅夫和季諾維也夫出手相助，蘇丹—加利耶夫才免於一死。更令人信服的是，有一張明仁斯基寫的便條，對線人有關蘇丹—加利耶夫與土耳其、波斯及阿富汗駐莫斯科外交人員進行秘密接觸的說法表示懷疑——對於這種牽涉到叛國罪的審判，需要諸如此類的材料。(斯大林在黨的會議上把這樣的接觸當作事實提了出來。) *Tainy natsiona’noi politiki TsK RKP*, 64.

- 200 *Tainy natsiona'noi politiki TsK RKP*, 85. (刊載於《斯大林全集》中的文稿稍有不同：*Sochineniia*, V: 301–12.) 1923年6月6日，格伯烏的明仁斯基也建議釋放。Tagirov, *Neizvestnyi Sultan-Galiev*, 76–80 (at 80: TsGA IPD RT, f. 8327, op. 1, d. 5, l.91–5). 在6月10日晚的主報告中，斯大林用了很長時間說明俄國共產黨是如何在沙皇制度下形成的，首先是在反對孟什維主義、資產階級傾向、右派分子的鬥爭中，後來是在反對左派共產黨人的鬥爭中，而在少數民族地區的黨內正在發生相似的一幕。但是，他繼續說道，各邊疆地區的黨不可能像俄國黨以前那樣，在一方的幫助下去反對另一方，先和右傾主義，繼而又和左傾主義作鬥爭，而是必須同時與兩者作鬥爭。*Tainy natsiona'noi politiki TsK RKP*, 99–106.
- 201 *Tainy natsiona'noi politiki TsK RKP*, 270–2 (加米涅夫), 273–4. 在這次為期四天的會議當中的某個時候，季諾維也夫給斯大林遞了一張便條，建議說「在中央委員會設立一個負責民族事務的永久性委員會是絕對必要的」。斯大林回答說：「這件事很複雜：我們需要有來自所有或主要民族的人……要是沒有各民族的中央委員會和省黨委的參與，就在莫斯科把事情定下來，他們會不高興的……此外，他們的人本來就很少，不會把最好的派來這樣的委員會（就是派，也會把最差的派過來）。」斯大林建議他們問一下少數民族的共產黨人自己，是否想要這樣的委員會。斯大林最後沒有接受成立這樣的委員會的想法（「……從烏克蘭派兩三個人來代替不了烏克蘭共產黨中央委員會」）。*TsK RKP (b)—VKP (b) i natsional'nyi vopros*, 119 (RGASPI, f. 558, op. 11, d. 734, l.15–6); *Sochineniia*, V: 338–9.
- 202 1928年，他因為民族主義思想和從事反蘇活動而再次被捕，並於1930年7月判處槍決，但是在1931年1月，他被減刑為十年。1934年，他被釋放並獲准居住在薩拉托夫省。1937年，他又一次、也是最後一次被捕；1940年1月28日，他在莫斯科被處決。 827
- 203 Tagirov, *Neizvestnyi Sultan-Galiev*, 81–184 (TsGA IPD RT, f. 15, op. 1, d. 857, l.1–249). 韃靼共和國的格伯烏首腦是謝爾蓋·施瓦茨 (Sergei Shwartz)。
- 204 7月3日，政治局給季諾維也夫批了六個星期的假，給布哈林批了兩個月的假。RGASPI, f. 17, op. 3, d. 362, l. 5. 哈佛大學研究俄羅斯的歷史學家理查德·派普斯恰好在山洞會議的次日 (7月11日) 出生於波蘭。
- 205 Fotieva, *Iz zhizni*, 295.
- 206 這段內容基本上是按照薩哈羅夫的說法，但有一個關鍵的地方和他的看法不同：1923年夏天，根本不存在以解除斯大林職務為目標的密謀，只是想遏制他。參見 Sakharov, *Politicheskoe zaveshchenia*, 547–66. 另見 Chuev, *Sto sorok*, 183.
- 207 PSS, XLV: 343–8. 所謂1922年12月口授的給代表大會的信是想讓廣大黨員看的；1月4日的「補充」似乎是給較小範圍內的人看的：僅僅是合謀反對斯大林的人。Sakharov, *Politicheskoe zaveshchane*, 563–5. 這份所謂的「補充」可見於 PSS, XLV: 346.
- 208 *Voprosy istorii KPSS*, 1991, no. 9: 45, 47.
- 209 Sakharov, *Politicheskoe zaveshchanie*, 538–9.
- 210 莫洛托夫在回憶時認為此次密謀的發起人是季諾維也夫。Chuev, *Sto sorok*, 183.

- 211 伏羅希洛夫在黨的第十四次代表大會上解釋說：「我在羅斯托夫接到季諾維也夫同志發來的電報，要我到基斯洛沃茨克。當時季諾維也夫、布哈林、葉夫多基莫夫、拉舍維奇等同志都在那裏（的礦泉療養地）。我到了基斯洛沃茨克，並在和季諾維也夫、布哈林、葉夫多基莫夫以及拉舍維奇等同志一起參加的一個私人會議上討論了集體領導問題。」*XIV s"ezd VKP (b)*, 398–9. 隨後，伏羅希洛夫在給代表大會的信中澄清了山洞會議問題：「在前面提到的在『山洞』裏舉行的會議上，只有五個人，即季諾維也夫同志、布哈林同志、葉夫多基莫夫同志、拉舍維奇同志和我。」*XIV s"ezd VKP (b)*, 950.
- 212 伏羅希洛夫已經離開了。*XIV s"ezd VKP (b)*, 950.
- 213 *Izvestiia TsK KPSS*, 1991, no. 4: 196. 由於生病，托洛茨基獲准從1923年6月15日休假到9月7日。莫洛托夫也去了基斯洛沃茨克度假。
- 214 Eastman, *Leon Trotsky*. 那年夏天的基斯洛沃茨克很熱鬧：美國舞蹈家伊莎朵拉·鄧肯 (Isadora Duncan) 帶著她的養女也在那裏；伊斯特曼在火車站碰到了她們。對於這種人來人往的情況，斯大林可能已有所耳聞：莫斯科秘密警察的高級官員葉菲姆·葉夫多基莫夫剛剛成為格伯烏在北高加索的全權代表 (1923年6月22日)，而在羅斯托夫的葉夫多基莫夫也許在照管前往基斯洛沃茨克度假的政治局委員和其他要員的安全這方面扮演了某種角色，雖然現在還不清楚他是否向斯大林提供過偷偷召開的「山洞會議」的情報。
- 215 *XIV s"ezd VKP (b)*, 455–7. 由於托洛茨基和斯大林之間眾所周知的敵意，季諾維也夫或許以為自己可以輕而易舉地充當仲裁人的角色。
- 216 *XIV s"ezd VKP (b)*, 953 (奧爾忠尼啟則).
- 217 *Izvestiia TsK KPSS*, 1991, no. 4: 192–5, 198; Sakharov, *Politicheskoe zaveshchanie*, 557.
- 218 "Il'ich byl tysiachu raz prav," *Izvestiia TsK KPSS*, 1991, no. 4: 192–208 (at 197–9).
- 219 奧列格·赫列溫尤克 (Oleg Khlevniuk) 指出，奧爾忠尼啟則聽憑自己捲入了這起陰謀。Khlevniuk, *In Stalin's Shadow*, 18–9. 莫洛托夫在晚年回憶說，奧爾忠尼啟則有一次稱讚季諾維也夫是真正的列寧主義者，而當莫洛托夫不同意的時候，兩人差點兒打起來 (基洛夫把他們分開了；後來是布哈林充當了調解人)。Chuev, *Sto sorok*, 190–1.
- 220 中央委員、「山洞會議」所在地北高加索黨組織負責人米高揚，通過伏羅希洛夫的來信知道了這件事，他表示自己以及中央委員會的其他委員堅決反對季諾維也夫努力削弱斯大林地位的做法。Mikoian, *Tak bylo*, 110.
- 221 *Izvestiia TsK KPSS*, 1991, no. 4: 196–7; Sakharov, *Politicheskoe zaveshchanie*, 554–5.
- 222 *Izvestiia TsK KPSS*, 1991, no. 4: 199–200.
- 223 *Izvestiia TsK KPSS*, 1991, no. 4: 201–2.
- 224 斯大林的信註明了要「抄送伏羅希洛夫」。*Izvestiia TsK KPSS*, 1991, no. 4: 203–4. 「如果同志們在那時準備堅持他們的計劃，我願意離開，不需要大驚小怪，不需要討論，不管是公開的還是秘密的」，斯大林後來解釋說。*XIV s"ezd VKP (b)*, 506.
- 225 *Izvestiia TsK KPSS*, 1991, no. 4: 205–6.
- 226 Sakharov, *Politicheskoe zaveshchanie*, 561 (引自 RGASPI, f. 17, op. 2, d. 246, IV vyp., s. 104: 布哈林在1926年七月全會上的發言).

- 227 RGASPI, f. 17, op. 3, d. 370, l. 7 (8月9日，政治局批准了一個半月的假期，從8月15日開始)。
- 228 Sakharov, *Politicheskoe zaveshchanie*, 565 (RGASPI, f. 17, op. 3, d. 374, l. 1; d. 375, l. 6).
- 229 Fischer, *The Ruhr Crisis*. 早在1922年9月至10月，里昂市長、法國激進黨領袖愛德華·埃里奧 (Édouard Herriot) 及其副手愛德華·達拉第 (Édouard Daladier) 就訪問過蘇聯。那次非官方的行程是想考察一下修復商業和外交關係的可能性，雖然當時還存在障礙，即沒有償還沙皇政府的債務。「(法國)對它的敵人太過寬大了，」埃里奧在莫斯科對契切林和列昂尼德·克拉辛 (對外貿易人民委員) 說，「這種寬宏大量的代價就是所有人都憎恨我們，德國也不向我們交付賠款。賠款問題很快就會得到解決。它會有兩個階段。第一個階段：德國太弱，沒有辦法賠償；第二個階段：德國太強，不願意賠償。我絕對相信德國會在15年內再次向我們發起進攻。」Carley, "Episodes from the Early Cold War," 1277 (引自 AVPRE, f. 04, o. 42, d. 53619, l. 259, 11, 23–25; 布龍斯基 (Bronsky) 給魏因施泰因 (Veinshtein) 的報告，1922年9月22日；以及 l. 45: 契切林致托洛茨基，1922年10月9日)。另見 Williams, *Trading with the Bolsheviks*, 111–2; 以及 Namier, "After Vienna and Versailles," 19–33.
- 230 Feldman, *The Great Disorder*.
- 231 「波蘭帝國主義分子並沒有企圖隱瞞他們想要奪取俄國和德國領土的計劃，」蘇聯報紙的社論指出，「他們正在千方百計地想要拆散各社會主義蘇維埃共和國結成的統一的聯盟，並把其中的某些國家，比如白俄羅斯和烏克蘭，置於他們的直接影響下。」*Izvestiia*, January 21, 1923, 譯文見於 Eudin and Fisher, *Soviet Russia and the West*, 200–1; Ruge, *Die Stellungnahme*, 32–59; Eichwede, *Revolution und Internationale Politik*, 154–75.
- 232 Adibekov and Shirinia, *Politbiuro TsK RKP (b)—VKP (b) i Komintern*, 155–6, n2 (RGASPI, f. 495, op. 2, d. 28, l. 45–6), 157–8; Babichenko, "Politbiuro TsK RKP (b)," 126–7. 季諾維也夫在匯報與布羅克多夫—蘭普的會談時警告過季諾維也夫，要他提防共產黨在德國搞顛覆活動的不良後果。Sevost'ianov, *Moskva-Berlin*, I: 165–7 (RGASPI, f. 359, op. 1, d. 7, l. 95; June 5, 1923). 早在1918年的年底，拉狄克就向列寧誇口說革命的浪潮正在席捲德國，而事實證明這種說法是錯誤的。Drabkin, *Komintern i ideia mirovoi revoliutsii*, 90–8 (RGASPI, f. 2, op. 2, d. 143, l. 22–6; January 24, 1919). 1919年2月12日，拉狄克在德國被捕。
- 233 Orlova, *Revoliutsionnyi krizis*, 264; Gintsberg, *Rabochee i kommunisticheskoe dvizhenie Germanii*, 117.
- 234 Adibekov and Shirinia, *Politbiuro TsK RKP(b)—VKP(b) i Komintern*, 159–60, 162–4; Babichenko, "Politbiuro TsK RKP (b)," 129–30 (RGASPI, f. 17, op. 2, d. 317, l. 22). 托洛茨基轉載了斯大林給季諾維也夫的信：*Stalin*, 368–9. 另見 Deutscher, *Stalin*, 393–5.
- 235 *Istochnik*, 1995, no. 5: 116.
- 236 "Naznachit' revoliutsiii v Germaniiu na 9 noiabria'," *Istochnik*, 1995, no.5: 115–39 (at 115–7). 在基斯洛沃茨克，季諾維也夫起草了激進的共產國際章程，論述了德國在8月頭幾個星期的革命形勢，當時他準備在8月中旬返回蘇聯首都。關於他的

- 情緒，參見 Kuusinen, *Neudavsheesia izobrazhenie "nemetskogo Oktiabria"*, 10. 拉狄克在 8 月 13 日的信中建議布蘭德勒要冷靜、謹慎。Adibekov and Shirinia, *Politbiuro TsK RKP(b)—VKP(b) i Komintern*, 165, n1 (RGASPI, f. 495, op. 18, d. 175a, l. 275ob.).
- 237 Adibekov and Shirinia, *Politbiuro TsK RKP(b)—VKP(b) i Komintern*, 166.
- 238 *Istchnik*, 1995, no. 5: 120–7 (RGASPI, f. 17, op. 3, d. 375, l.1–6). 巴扎諾夫編寫了這些討論的註釋。另見 *Bazhanov, Damnation of Stalin*, 46–50.
- 239 *Kommunisticheskii internatsional*, 196.
- 240 Adibekov and Shirinia, *Politbiuro TsK RKP(b)—VKP(b) i Komintern*, 168–9 (RGASPI, f. 325, op. 1, d. 518, l. 90).
- 241 *Istchnik*, 1995, no. 5: 115–39 (at 128). 政治局還採納了托洛茨基的建議，讓共產國際邀請法國、波蘭、捷克斯洛伐克以及比利時的共產黨代表和德國共產黨的代表，一起在莫斯科共商大計。Adibekov and Shirinia, *Politbiuro TsK RKP(b)—VKP(b) i Komintern*, 168, n1 (RGASPI, f. 495, op. 2, d. 17, l. 163); Babichenko, "Politbiuro TsK RKP (b)," 131 (RGASPI, f. 495, op. 2, d. 19, l. 161–162ob.)
- 242 *Izvestiia TsK KPSS*, 1991, no. 4: 201.
- 243 *Proletarskaia revoliutsiia*, 1923, no. 9: 227–32.
- 244 1923 年 12 月 11 日，列寧要求工作人員把 9 月份的那期雜誌拿給他；很顯然，已經有人把這事告訴了他。Golikov, *Vladimir Il'ich lenin*, XII: 650.
- 245 *XIV s'ezd VKP (b)*, 456. 托洛茨基慶幸自己和布哈林有「遠見和想像力」，「遠離」組織局的會議。Trotsky, *Stalin*, 368.
- 246 Sakharov, *Politicheskoe zaveschanie*, 550 (引自 RGASPI, f. 17, op. 2, d. 246, IV vyp, s. 104: 1926 年 7 月中央委員會和中央監察委員會聯席全會)。
- 247 要麼是受季諾維也夫的委託，要麼是自作主張，布哈林似乎在 7 月 29 日聯名致信斯大林和加米涅夫之前，就給加米涅夫寫過信，想動員他支持當時還沒有作出明確說明的「組織方法」上的改變。毫無疑問，布哈林在 7 月 29 日的信中採取了更尖銳、直接的立場。*Izvestiia TsK KPSS*, 1991, no. 4: 206–7. 薩哈羅夫解釋了為甚麼沒有按照順序刊登那幾封信（見於 *Izvestiia TsK KPSS*）的原因：*Politicheskoe zaveschanie*, 553–4.
- 248 在 8 月 3 日致伏羅希洛夫的信中，奧爾忠尼啟則寫道，他已經跟加米涅夫說了——這也許表明，奧爾忠尼啟則對斯大林的态度搖擺不定——加米涅夫認為季諾維也夫和布哈林的不滿是誇大其詞。*Izvestiia TsK KPSS*, 1991, no. 4: 201.
- 249 Hirsch, *Empire of Nations*. 在 7 月 13 日的公告中規定，「將來有可能成立的所有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都有「自願加入聯盟」的選擇權——這令人聯想到世界革命。同一天，斯大林解除了托洛茨基的支持者克里斯季安·拉柯夫斯基烏克蘭政府首腦的職務，並計劃打發他到國外從事外交工作。
- 250 Chuev, *Sto sorok*, 182–3.
- 251 Krupskaiia, "Poslednie polgoda zhizni Vladimira Il'icha (3 fevralia 1924 goda)," *Izvestiia TsK KPSS*, 1989, no. 4: 169–78. 葉夫根尼·普列奧布拉任斯基去了哥爾克，結果卻大吃一驚。負責列寧安全的阿布拉姆·別連基打着手勢告訴他，「在那兒，他們在推着他」。1923 年 7 月 29 日，普列奧布拉任斯基私下裏寫信對布哈林解釋說：

- 「我去了，不知道該怎麼辦，實際上甚至也不知道我該看誰……他緊緊地按住我的手，我本能地擁抱了他。可他的臉！我費了很大的勁才沒有像小孩子一樣哭起來。」*Izvestiia TsK KPSS*, 1989, no. 4: 186–7.
- 252 1923年8月31日，他在基斯洛沃茨克接到消息說，英國人已經同意由拉柯夫斯基代表蘇聯就外交承認問題進行談判；斯大林在7月份剛剛把拉柯夫斯基調離烏克蘭，目的是減少一個支持托洛茨基的基地。RGASPI, f. 558, op. 11, d. 67, l. 1. 在烏克蘭，取代拉柯夫斯基的是弗拉斯·丘巴爾。
- 253 Fischer, *Stalin and German Communism*, 312.
- 254 參加起義的保加利亞共產黨的主要領導人都逃走了，這其中包括格奧爾吉·季米特洛夫 (Georgi Dimitrov)，他先是去了南斯拉夫，然後去了蘇聯，在那裏住進柳克斯飯店。
- 255 RGASPI, f. 558, op. 11, d. 139, l. 11 (斯大林致奧古斯特·塔爾海默 (August Thalheimer))。《紅旗》報在1923年10月10日刊登了斯大林的來信；契切林從無線電廣播中聽說了此事，他寫信給莫洛托夫說：「無線電報道的是完全捏造的還是背後確有其事？」莫洛托夫把這封信轉給了斯大林。Adibekov and Shirinia, *Politbiuro TsK RKP(b)—VKP(b) i Komintern*, 169–70 (RGASPI, f. 558, op. 11, d. 139, l. 31).
- 256 與此同時，由共產國際主辦的俄國、德國、波蘭、捷克斯洛伐克和法國共產黨的大會也在莫斯科開幕。發言者在會上一個接一個地反覆鼓吹德國革命。Adibekov and Shirinia, *Politbiuro TsK RKP(b)—VKP(b) i Komintern*, 172–85 (RGASPI, f. 495, op. 19, d. 68, *passim*).
- 257 Firsov, “K voprosu o taktike edinogo fronta v 1921–1924 gg.” 118. 政治局一致通過了季諾維也夫的經過修改的共產國際章程——該章程規定，德國革命即將到來，世界帝國主義預計會採取敵對行動，但是「由於蘇維埃德國與蘇聯之間的同盟」，「德國共產黨仍然會掌握政權」。章程還暗示，德國革命的成功會讓蘇聯放棄討厭的新經濟政策。Pavlova, *Stalinism*, 208 (未註明出處)。
- 258 Luppol, “Iz istorii sovetskogo gosudarstvennogo gerba.”
- 259 *Istochnik*, 1995, no. 5: 130–5. 相形之下，《真理報》(1923年9月22日)在評論德國時說，「我們認為……奪權並不困難，而是一個完全可以實現的任務。更為複雜和困難的是掌握政權」。
- 260 *Internationale Presse Korrespondenz*, October 6, 1923: 957–9.
- 261 加米涅夫曾讓總參軍事學院評估協約國要佔領德國需要動用多少個師。Babichenko, “Politbiuro TsK RKP (b),” 131 (RGASPI, f. 325, op. 1, d. 41, l. 47–50), 135 (f. 17, op. 2, d. 109, l. 15, 18, 19).
- 262 Babichenko, “Politbiuro TsK RKP(b),” 132, n32; Iwań ski, *II Zjazd Komunistycznej Partii Robotniczej Polski*, I: 156, 162–3.
- 263 RGASPI, f. 17, op. 2, d. 101, l. 15–15ob.
- 264 RGASPI, f. 17, op. 2, d. 103. 全會第二和第三天作了關於合作社、工資、黨的職務的任命制與選舉制 (報告人是捷爾任斯基) 以及剪刀差的報告。捷爾任斯基報告的內容在會議備忘錄中未作具體說明。RGASPI, f. 17, op. 2, d. 102.



- 265 據多伊徹說，季諾維也夫提出，自己作為共產國際的領導人，願意代替托洛茨基前往德國，但斯大林做出一副輕鬆愉快的樣子插話說，政治局不可能放棄兩位最受愛戴的委員中的任何一個，此外，也沒有打算要接受托洛茨基的辭職。按照這一說法，斯大林還主動提出，為了保持和諧，自己不加入革命軍事委員會。Deutscher, *Prophet Unarmed*, 111–2 (未註明出處)。難以想像托洛茨基此時知道〈伊里奇關於〔總〕書記的信〉並對此保持沉默。
- 266 Bazhanov, *Damnation of Stalin*, 50–1; Bazhanov, *Vospominaniia* [1980], 67–8; *Izvestia TiK KPSS*, 1991, no. 3: 216.
- 267 「中央委員會認為，托洛茨基同志因為科馬羅夫同志的發言而離開會場讓中央委員會十分為難。中央委員會認為科馬羅夫同志的發言並無任何冒犯托洛茨基同志的地方。中央委員會認為托洛茨基同志拒絕接受中央委員會回來開會的請求這種行為是不對的，結果使中央委員會只能在他缺席的情況下討論了革命軍事委員會的人員構成問題。」RGASPI, f. 17, op. 2, d. 102.
- 268 決議增加兩名托洛茨基的擁護者(皮達可夫、尼古拉·穆拉洛夫)、一名季諾維也夫的擁護者(米哈伊爾·拉舍維奇)和斯大林一邊的三個人(奧爾忠尼啟則、伏羅希洛夫和斯大林)。RGASPI, f. 17, op. 2, d. 103, l. 2–3. 最終，皮達可夫、穆拉洛夫和斯大林沒有成為委員，但伏羅希洛夫、奧爾忠尼啟則和拉舍維奇倒是成了委員，對於他們以及另外兩個人(安德烈·布勃諾夫和阿利蓋達爾·卡拉耶夫(Ali Heydar-Karæv))的任命在1924年2月生效。Nenarokov, *Revvoensovet Respubliki*. 他們開始和斯克良斯基(托洛茨基的左膀右臂)、安東諾夫—奧弗申柯(托洛茨基派的狂熱分子)以及加米涅夫和伏龍芝共事；委員會最近還增補了謝苗·布瓊尼和幾名非俄羅斯族的委員(沙爾瓦·埃利阿瓦〔Shalva Eliava〕、瓦茨拉夫·博古茨基〔Vatslav Bogutsky〕、蓋達爾·韋濟羅夫〔Heydar Vezirov〕、伊納加丹·黑迪爾—阿利耶夫〔Inagadan Hydyr-Aliev〕和溫什利赫特)。
- 269 Volkogonov, *Trotsky*, 241 (引用了巴拉紹夫的話); Volkogonov, *Trotskii*, II: 8–9. 巴拉紹夫沒有說明這一事件發生的時間。
- 270 Chase, *Workers, Society, and the Soviet State*, 231–2.
- 271 *XI s'ezd VKP (b)*, 279 (托姆斯基)。另見Chase, *Workers, Society, and the Soviet State*, 231–2.
- 272 Brovkin, *Russia after Lenin*, 176–7, 引自 *Golos rabochego* [Sormovo], September 1923 (地下刊物)。
- 273 *Pravda*, December 13 and December 21, 1923.
- 274 Velikanova, *Popular Perceptions*, 34–5.
- 275 Brovkin, *Russia after Lenin*, 175 (引自RGASPI, f. 17, op. 87, d. 177, l. 5)。
- 276 Zinov'ev, *Istoriia Rossiiskoi kommunisticheskoi partii*, lecture 1; Pethybridge, *One Step Backwards*, 270 (引自Zinoviev, *History of the Bolshevik Party: A Popular Outline* [London: New Park, 1973], 10)。
- 277 Trotsky and Shachtman, *The New Course*, 154.
- 278 Gimpel'son, *NEP*, 347–8 (引自RGASPI, f. 17, op. 84, d. 467, l.128–9); Brovkin, *Russia After Lenin*, 38 (引自RGASPI, f. 17, op. 84, d. 467, l. 2)。早在10月14日，托洛茨基10

- 月8日的信就在莫斯科黨組織（托洛茨基的基層黨組織）核心部門的會議上受到了譴責，促使書記處的莫洛托夫指責托洛茨基散發信件時超過了政治局的許可範圍；托洛茨基反過來指責書記處傳播了這份文件。第二天，在中央監察委員會主席團特別會議上，托洛茨基的信受到嚴厲的批評，認為是在黨內搞派別活動。托洛茨基當時只把他措辭嚴厲的提綱送給黨的核心機構（但卻很快在國外發表了）。RGASPI, f. 17, op. 2, d. 685, l. 53–68; *Izvestia TsK KPSS*, 1990, no. 5: 165–73; *Izvestia TsK KPSS*, 1990, no. 10: 184. 信件的摘要發表在 *Sotsialisticheskii vetsnik*, May 24, 1924. 另見 Eastman, *Since Lenin Died*, 142–3. Vil'kova, *RKP (b), vnutripartiinaia bor'ba*, 174–5 (RGASPI, f. 17, op. 2, d. 685, l. 93–5), 176–7 (ll. 91–2), 178–80 (ll. 96–7), 222.
- 279 Brovkin, *Russia After Lenin*, 44–5. 另見 RGASPI, f. 17, op. 87, d. 177, l. 5 (亞戈達關於頓巴斯的報告); Kvashonkin, *Bol'shevistskoe rukovodstvo*, 282–6 (at 284: RGASPI, f. 558, op. 1, d. 2565, l. 2–7: 馬吉多夫 (Magidov) 關於頓巴斯的報告); 以及 Vil'kova, *RKP (b), vnutripartiinaia bor'ba*, 55–61 (RGASPI, f. 17, op. 87, d. 177, l. 93–94, d. 178, l. 15, 18–19, 22–9), 61–2 (op. 84, d. 531, l. 97–97ob.), 63 (l. 63).
- 280 Vil'kova, *RKP (b), vnutripartiinaia bor'ba*, 409–14 (RGASPI, f. 76, op. 3, d. 318, l. 60–9); *Pravda*, November 7, 1923 (季諾維也夫). 1923年11月，阿納斯塔西·米高揚從北高加索來到莫斯科並按照要求參加各大學黨組織的會議，以感受當時的氣氛；他聲稱自己當時對反對派學生的強烈情緒感到非常震驚。Mikoyan, *Tak bylo*, 111. 另見 Daniels, “The Left Opposition.”
- 281 *Izvestia TsK KPSS*, 1990, no. 6: 189–93; Fel'shtinskii, *Kommunisticheskaia oppositsiia v SSSR*, I: 83–8; Carr, *Interregnum*, 367–73; Fel'shtinskii, *Kommunisticheskaia oppositsiia v SSSR*, I: 83–8.
- 282 Ivanov and Shmelev, *Leninizm i ideino-politicheskii razgrom trotskizma*, 343. 現在並沒有清楚的證據可以證明四十六人聲明是托洛茨基寫的。Vil'kova, *RKP (b), vnutripartiinaia bor'ba*, 212. 另見 Carr, *Interregnum*, 303–7, 374–80.
- 283 Balashov and Markhashov, “Staraiia ploschad', 4 (20-e gody),” no. 6: 181. 另見 Bazhanov, *Damnation of Stalin*, 57–8. 同時，托洛茨基、拉狄克和皮達可夫也正式提出抗議，反對納扎列江在會議上「做記錄」並「篡改官方文件的原文」。RGASPI, f. 323 [Kamenev], op. 2, d. 64. 另見 Graziosi, “New Archival Sources,” 40.
- 284 也許，托洛茨基本人並不是沒有考慮過在鬥爭中採取非常手段：在托洛茨基手下的革命軍事委員會工作並經常接受特殊任務的前沙皇軍隊上尉 E. A. 貝倫斯 (E. A. Berens) 與流亡巴黎的亞歷山大·古契科夫——他擔任過臨時政府的首任陸軍軍部長並支持過白軍——有過接觸。現在還不清楚貝倫斯是自作主張還是得到托洛茨基的授意，但斯大林當時並沒有想要利用這種接觸去敗壞托洛茨基的名聲，這表明貝倫斯不是在受格伯烏的指派進行挑撥離間。Volkogonov, *Trotsky*, 329 (引自 RGVA, f. 33987, op. 3, d. 1049, l. 96; GARF, f. 5868, op. 1, d. 15: 古契科夫致 N. N. 切貝紹夫 (N. N. Chebyshev)，他稱後者為「海軍上將 B」).
- 285 *XIII s'ezd RKP (b) [1924]*, 371–3 (波里斯·蘇瓦林); Deutscher, *Prophet Unarmed*, 140–1.

- 286 Souvarine, *Staline*. 當流亡莫斯科的波蘭共產黨致信蘇共中央譴責對托洛茨基的迫害時，斯大林也沒有裝模作樣地召開波蘭的黨代表大會，而是換掉了整個波蘭中央委員會。Dziewanowski, *Communist Party of Poland*, 103–10. 另見 *Bol'shevik*, September 20, 1924; *Sochineniia*, VI: 264–72.
- 287 Liberman, *Building Lenin's Russia*, 79; Lunacharsky, *Revolutionary Silhouettes*, 43, 62; Lunacharskii, *Revoliutsionnye siluety*, 27; Eastman, *Heroes*, 258–9. 就像卡爾說的，托洛茨基確實「無法在同事中間通過謙遜的說服藝術，或者是通過對才智不如他的人的觀點抱以同情的關注，來建立自己的權威」。Carr, *Socialism in One Country*, I: 166. 多伊徹錯誤地認為，人們討厭托洛茨基的性格，原因在於「自卑感」而不是憤慨。Deutscher, *Prophet Unarmed*, 34.
- 288 Trotsky, *My Life*, 504. 雖然托洛茨基在寫信時的稱呼是「親愛的弗拉基米爾·伊里奇」而斯大林寫的是「列寧同志」，可他和斯大林或布哈林不一樣，他不去列寧家裏拜訪。Volkogonov, *Lenin: Life and Legacy*, 256.
- 289 Trotsky, *My Life*, 481; Eastman, *Since Lenin Died*, 17; Daniels, *Conscience of the Revolution*, 206–7.
- 290 Trotsky, *My Life*, 498.
- 291 Trotsky, *My Life*, 500.
- 292 V. Doroshenko and I. Pavlova, “Poslednaia poezdka,” *Altai*, 1989, no. 4: 3–18. 有關列寧此次出人意料的行程，詳情來自他的護理員（濟諾維·佐爾科—里姆沙〔Zinovy Zorko-Rimsha〕）、妹妹瑪麗亞、妻子克魯普斯卡婭和當時記載下來的目擊者報告。
- 293 Volkogonov, *Lenin: Life and Legacy*, 431–2（引自 RGASPI, f. 4, op. 1, d. 142, l. 406–7）; “Zapis' Z. I. Zor'ko Rishmi,” *Izvestiia TsK KPSS*, 1991, no. 8 (RGASPI, f. 16, op. 2, d. 17, l. 857–76: October 18, 1923; ll. 877–88: October 19, 1923); “Poslednyi priedz Vladimira Il'icha v Moskvu: vospominaniia M. I. Ul'ianovoi,” RGASPI, f. 16, op. 3, d. 37, l. 1–3 (1930s); Krupskaiia, “Poslednie polgoda zhizni Vladimira Il'icha (3 fevralia 1924 goda),” *Izvestiia TsK KPSS*, 1989, no. 4: 169–78 (at 174). See also *Kul'tura i zhizn'*, 1975, no. 1: at 11 (G. P. Koblov); *Gudok*, April 23, 1924; Golikov, *Vladimir Il'ich lenin*, XIII: 638–9.
- 294 *Izvestiia TsK KPSS*, 1991, no. 8: 177 (RGASPI, f. 4, op. 2, d. 1744, l. 7–8: V. I. Ryabov, August 16, 1940).
- 295 “Poslednyi priedz Vladimira Il'icha v Moskvu: vospominaniia M. I. Ul'ianovoi,” RGASPI, f. 16, op. 3, d. 37, l. 1–3 (1930s). 後來，有位《真理報》記者也提到列寧那天的另外一名護理員回憶錄中的一段內容，說列寧感到很失望，沒有遇到領導層當中的成員，但在剛才提到的那份回憶錄的現存檔案中並沒有這段文字。*Kul'tura i zhizn'*, 1975, no. 1: at 11 (D. I. Novoplianskii, 引自 V. A. Rukavishnikov).
- 296 據護理員 V. A. 盧卡維什尼科夫 (V. A. Rukavishnikov) 說，俄語是「沃特，沃特，沃特，沃特！」(RGASPI, f. 16, op. 2, d. 91, l. 37–8: October 19, 1923).
- 297 RGASPI, f. 558, op. 11, d. 25, l. 110; RGASPI, f. 17, op. 162, d. 1. ll. 21–2.
- 298 *Izvestiia TsK KPSS*, 1990, no. 7: 176–89; Vil'kova, *RKP (b), vnutripartiinaia bor'ba*, 197–220 (RGASPI, f. 51, op. 1, d. 21, l. 51–4). 回應者按（俄語）字母順序是布哈林、季諾

- 維也夫、加里寧、加米涅夫、莫洛托夫、李可夫、斯大林和托姆斯基；列寧和魯祖塔克沒有署名。布哈林當時在列寧格勒，他打電報堅持要求對文章作出修改，斯大林沒有接受他的意見，可還是把他的名字添上了。 *Izvestiia TsK KPSS*, 1990. no. 7: 190.
- 299 Vil'kova, *RKP (b), vnutripartiinaia bor'ba*, 266–271. 46人當中獲准在10月26日參會的，包括柯秀爾、洛巴諾夫 (Lobanov)、穆拉洛夫、奧辛斯基、普列奧布拉任斯基、謝列布里亞科夫和謝苗諾夫。參加討論的包括普列奧布拉任斯基、奧辛斯基、加米涅夫、李可夫、雅羅斯拉夫斯基、布馬日內 (Bumazhny) 和捷爾任斯基。
- 300 Sakharov, *Politicheskoe zaveshchanie*, 478. Fel'shtinskii, *Kommunisticheskaia oppositsiia v SSSR*, I: 9, 18–19; RGASPI, f. 5, op. 2, d. 305, l. 2–4. 1924年1月之前，政治局的會議沒有做速記記錄。
- 301 另見 Carr, *Socialism in One Country*, I: 157.
- 302 Vil'kova, *RKP (b), vnutripartiinaia bor'ba*, 255–65 (RGASPI, f. 17, op. 2, d. 685, l. 39–49); Ivanov and Shmelev, *Leninizm i ideino-politicheskii razgrom trotskizma*, 344 (引自 RGASPI, f. 17, op. 2, d. 104, l. 46). 不太詳細的巴扎諾夫版托洛茨基講話見於 RGASPI, f. 17, op. 2, d. 104, l. 31–8. 這些也刊登在 *Izvestiia TsK KPSS*, 1990, no. 10: 183–7; 以及 *Voprosy istorii KPSS*, 1990, no. 5: 33–9.
- 303 Vil'kova, *RKP (b), vnutripartiinaia bor'ba*, 250–5 (RGASPI, f. 17, op. 2, d. 104, l. 31–8).
- 304 Vil'kova, *RKP (b), vnutripartiinaia bor'ba*, 266–8 (RGASPI, f. 17, op. 2, d. 104, l. 1–4); Koloskov, *XIII konferentsiia RKP (b)*, 14.
- 305 *Izvestiia TsK KPSS*, 1989, no. 2: 201–2.
- 306 Babichenko, “Politbiuro TsK RKP (b),” 136 (RGASPI, f. 495, op. 19, d. 362, l. 117). 契切林雖然不是政治局委員，但也參加政治局會議。
- 307 露特·菲舍爾 (Ruth Fischer) 是布蘭德勒的左派競爭對手，她在書中說布蘭德勒和季諾維也夫相互憎惡，並聲稱布蘭德勒和托洛茨基當時的關係已變得密切。Fischer, *Stalin and German Communism*, 318, 323. 另見 *Lessons of the German Events*, 36–7; *XIII konferentsiia RKP (b)*, 158–78.
- 308 蘇聯記者格里戈里·N. 卡明斯基 (Grigory N. Kaminsky, 出生於1895) 和他那些胡亂吹噓德國無產階級實力的同事不一樣，他在10月15日從德累斯頓 (在薩克森) 報告了真相：德國共產黨戰鬥準備的情況很差，範圍只限於那些已經加入的工人。Babichenko, “Politbiuro TsK RKP (b)” 135 (RGASPI, f. 495, op. 293, d. 673, l. 58; op. 18, d. 182, l. 10–1).
- 309 Babichenko, “Politbiuro TsK RKP (b),” 134–5 (RGASPI, f. 495, op. 293, d. 14, l. 177).
- 310 即便在薩克森的聯合政府中，共產黨的精力也不是花在發展運動，而是指責社會民主黨並對他們耍陰謀，由此暴露出哪怕是按照上級命令採取的真誠的「統一戰線」策略的有限性。Babichenko, “Politbiuro TsK RKP (b),” 143 (RGASPI, f. 17, op. 2, d. 109, l. 22; Pyatakov, January 15, 1924). 更糟糕的是，柏林的左派共產黨人把精力更多地投入到對自己黨內其他人的鬥爭中，而不是準備暴動。Babichenko,

- “Politbiuro TsK RKP (b),” 151 (RGASPI, f. 558, op. 2—e, d. 6968, l. 3: 瓦西里·施密特 [Vasily Shmidt] 致斯大林和季諾維也夫)。
- 311 Kuusinen, *Rings of Destiny*, 63–5.
- 312 Voss, *Von hamburger Aufstand zur politische Isolierung*, 13; Babichenko, “Politbiuro TsK RKP (b),” 139–40 (RGASPI, f. 495, op. 293, d. 14, l. 37).
- 313 11月3日，政治局決定把派到德國的小組召回莫斯科。Adibekov and Shirinia, *Politbiuro TsK RKP(b)—VKP(b) i Komintern*, 216.
- 314 斯大林可以得到皮達可夫從柏林定期送來的報告，大多是抱怨策劃革命的難處，同時也間雜着對國內造成分裂的政治鬥爭的擔憂（皮達可夫跟托洛茨基的關係比較近）：「又及：我對蘇聯國內我黨內部的衝突十分擔憂……看在老天的份上，千萬不要鬥起來，不然我們就放棄在這兒的工作。」RGASPI, f. 558, op. 11, d. 785, l. 1–8ob.
- 315 RGASPI, f. 558, op. 11, d. 785, l. 23–6.
- 316 RGASPI, f. 558, op. 11, d. 785, l. 28. 拉狄克寫信給莫斯科說，革命的時機「尚未成熟」。Adibekov and Shirinia, *Politbiuro TsK RKP(b)—VKP(b) i Komintern*, 209–13; *Komintern i ideia mirovoi revolutsii. dokumenty*, 428–35. 皮達可夫試圖讓斯大林關注德國共產黨，便在11月14日寫信對他說，「你們大家顯然沒有注意到，這樣一個政黨以目前的樣子是不可能吸引工人階級參加武裝起義的」。政治局決定就德國的事態發展發表一封公開信，但未能就內容達成一致。Babichenko, “Politbiuro TsK RKP (b),” 145 (RGASPI, f. 495, op. 293, d. 638, l. 20–2). Adibekov and Shirinia, *Politbiuro TsK RKP(b)—VKP(b) i Komintern*, 218–20. 正是在1923年11月，即剛剛慶祝過第一個自治州成立五週年之後，伏爾加河流域的德意志人的領導層就建議成立一個「伏爾加德意志人蘇維埃社會主義自治共和國」。GARF, f. 58s, op.1, d. 9, l. 14–10, Volkogonov papers, Hoover Institution Archives, container 21.
- 831 317 Gordon, *Hitler and the Beer Hall Putsch*.
- 318 Sakharov, *Politicheskoe zaveshchanie*, 311.
- 319 Chuev, *Molotov Remembers*, 135.
- 320 “M. I. Ul’ianova ob ornoshenii V. I. Lenina k I. V. Stalinu,” *Izvestiia TsK KPSS*, 1989, no. 12: 196–201 (ar 198–9: RGASPI, f. 14, op. 1, d. 398, l. 1–8). 烏里揚諾夫娜指的是她在1926年7月26日對中央全會說的話，參見第十三章。
- 321 Chuev, *Molotov Remembers*, 212.
- 322 Chuev, *Tak govoril Kaganovich*, 190–1; Chuev, *Kaganovich*, 263.

## 第十二章 忠實的學生

- 1 “Po povodu smerti Lenina,” *Pravda*, January 30, 1924, 轉載於 *Sochineniia*, VI: 46–51.
- 2 最好的托洛茨基傳記的作者說過：「幾乎沒有哪個孟什維克作家對列寧用過那麼多人身攻擊的惡毒語言。」Deutscher, *Prophet Armed*, 93.

- 3 V. I. Lenin, "Letter to Yelena Stasova and Others," 載於 Lenin, *Collected Works*, 42: 129.
- 4 V. I. Lenin, "Letter to Grigory Zinoviev," 載於 Lenin, *Collected Works*, 34: 399–400.
- 5 *Kommunist*, 1988, no. 6: 3–5 (致戈爾登貝格, 1909年10月28日).
- 6 V. I. Lenin, "Judas Trotsky's Blush of Shame," *Collected Works*, 18: 45. 「托洛茨基這個下流傢伙」, Lenin, *Collected Works*, 39: 290 (譯註:《列寧全集》第47卷, 第547頁).
- 7 PSS, XLIX: 390.
- 8 Trotskii, *Trotskii o Lenine i Leninizme; Lenin o Trotskom i trotskizme*.
- 9 關於斯大林把自己視為列寧副手的情況, 參見民族事務人民委員部的一份很能說明問題的打印件, 日期是1923年, 標題是〈斯大林的生平細節〉, 該文件可見於 Volkogonov, *Stalin: Triumph and Tragedy*, 512 (RGASPI, f. 1318, op. 3, d. 8, l. 85).
- 10 Carr, *Socialism in One Country*, I: 151–202 (對托洛茨基、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和斯大林的描寫).
- 11 Balabanoff, *My Life as a Rebel*, 243–4. 但卡爾對季諾維也夫的描述有錯誤, 既低估了他(認為他「缺乏頭腦」、「信念不堅定」)又高估了他(錯誤地認為他是三駕馬車時期「黨內最重要的人物」)。 *Socialism in One Country*, I: 165, 169. 另見 Lih, "Zinoviev."
- 12 連沃爾特·杜蘭蒂都看出了這一點。他寫道:「可我想, 托洛茨基在布爾什維克當中有點格格不入。他本質上是個知識貴族, 即便不能說他在知識上自視高人一等。」Duranty, *I Write as I Please*, 199.
- 13 1923年, 為紀念紅軍建軍五週年, 尤利·安年科夫被派去給托洛茨基畫像。他發現, 托洛茨基不僅「身材健碩、肩膀寬闊、肌肉發達」, 而且也很熟悉安年科夫最近出版的肖像畫冊, 並且瞭解馬蒂斯和畢加索。Annenkov, *Dnevnik moikh vstrech*, II: 286–7. 另見 Annenkov, *Semnadsat' portretov*, II: 295–6. 安年科夫的這本書中有托洛茨基、季諾維也夫及加米涅夫等人的肖像畫。1928年, 蘇聯的全部圖書館和商店都奉命撤下這本書, 私人收藏也不允許。安年科夫還以辛辣的筆觸把列寧描寫成一個不信任知識分子的人: *Dnevnik moikh vstrech*, II: 268–70. 安年科夫1921年畫的那幅列寧肖像, 用在蘇聯的郵票上並成為1925年巴黎博覽會蘇聯展館中的重要展品。
- 14 勞倫斯·弗里德曼要我們把「戰略」理解為「從一個最重要的人物的視角, 用將來時講述的關於權力的故事」, 而這恰恰是斯大林在刻板的馬克思主義框架內取得的成就。Freedman, *Strategy*.
- 15 斯大林以幾次公開演講為基礎的小冊子《論列寧》是和他對克里姆林軍校學員的演講同時問世的。季諾維也夫在自己的列寧格勒出版社(Priboi)也出版了這本書。此書還有烏克蘭語(Kharkov: Derzhavne vyd-vo Ukraïny)、德語(Vienna: Verlag für Literatur und Politik)和法語(Paris: Bureau d'éditions)等多種版本出版。
- 16 Vil'kova, *RKP (b), vnutripartiinaia bor'ba*, 409–14 (RGASPI, f. 76, op. 3, d. 318, l. 60–9).
- 17 *Pravda*, January 8, 1924.
- 18 1月12日, 黨報報道說, 在莫斯科高等教育機構的72個黨支部中, 有32個(總共是2,790名黨員)支持中央委員會, 有40個(有6,594名黨員)支持左派反對派: 這是那個要求立即工業化、立即社會主義的迫不及待的方案受歡迎之處。

*Moskovskie Bol'sheviki*, 83 (引自 MPA, f. 3, op. 5, d. 2, l. 200); Abramovich, *Vospominaniia i vzgliadi*, I: 22, 36.

- 19 當格里戈里·索柯里尼柯夫(財政紀律先生)迎戰葉夫根尼·普列奧布拉任斯基(印鈔扶持工業先生)時，激烈的爭論開始了。布哈林和尼古拉·烏格拉諾夫等人對後者進行粗暴的反駁，而有表決權的大多數與會者暗中受到控制，都支持他們。Fel'shtinskii, *Kommunisticheskaia oppozitsiia v SSSR*, II: 34, 101; *XIII konferentsiia RKP (b)*; Vil'kova, *RKP (b): vnutripartiinaia bor'ba*, 390–406.
- 20 Vil'kova, *RKP (b), vnutripartiinaia bor'ba*, 385–93 (RGASPI, f. 17, op. 2, d. 109, l.6ob–7ob); RGASPI, f. 17, op. 2, d. 107, l.14–7 (中央全會的速記記錄始於1924年1月14–15日的這次會議); *XIII konferentsiia RKP (b)*, 95. 黨的監察委員會在各省的下屬機構都被發動起來對付反對派：Olekh, *Povorot, kotorogo ne bylo*, 146 (引自 *Dni*, December 19, 1923).
- 21 RGASPI, f. 17, op. 2, d. 107, l. 100–1; *X s'ezd*, 524; *Sochineniia*, VI: 15. Schapiro, *Origin of the Communist Autocracy* [1977], 317–8. 拉狄克的反對理由說得對，沒有哪次黨的代表大會公開過這項處罰條款，但沒有人能使斯大林承擔責任。Daniels, *Conscience of the Revolution*, 230; Vil'kova, *RKP (b), vnutripartiinaia bor'ba*, 403–8 (RGASPI, f. 17, op. 2, d. 109, l.13ob.–14).
- 22 當拉狄克說托洛茨基在受到「攻擊」時，斯大林抓住了機會，在1924年1月18日的閉幕會議上講述了1923年9月發生的事件，當時「托洛茨基……站起來就退出了全會會議。你們記得，中央全會當時派了一個『代表團』到托洛茨基那裏去，請求他回到全會會議上來。你們記得，托洛茨基拒絕接受全會的請求」(譯註：《斯大林全集》第6卷，第35頁)。“Zakliuchitel'noe slovo (18 ianvaria [1924 g.])” *Sochineniia*, VI: 27–45 (at 38–39). 但指責已經變得十分粗暴無情，讓斯大林覺得不得不就他沒能預先禁止托洛茨基12月11日發表有關《新方針》的文章的批評作出回應：「這是一種對中央委員會非常危險的步驟。請你們試試禁止已經在莫斯科各區發表的托洛茨基的文章吧！」(譯註：《斯大林全集》第6卷，第31頁)。
- 23 *Pravda*, January 26, 1924. 另見 Halfin, *Intimate Enemies*; Robert Service, “How They Talked: The Discourse of Politics in the Soviet Party Politburo in the 1920s,” 載於 Gregory and Naimark, *Lost Politburo Transcripts*, 121–34. 斯大林還讓黨的第十三次代表會議任命了一個軍事改革委員會，由黨的中央監察委員會委員謝爾蓋·古謝夫負責，而該委員會由斯大林的人控制，是翦除異己的工具。代表大會批准了12月5日的決定，準備吸收10萬名新的工人黨員。
- 24 Sakharov, *Polucheskoe zaveshchanie*, 576 (引自 RGASPI, f. 16, op. 1, d. 98, l. 107).
- 25 斯大林是主導者，但並不是唯一對缺席大會的托洛茨基提出嚴厲批評的人。工聯主義者、一度成為非法的工人反對派共同領袖的亞歷山大·施略普尼柯夫因為托洛茨基和左派反對派在1921年的時候合夥鎮壓過工人反對派而把他們批得體無完膚。Shliapnikov, “Nashi raznogliasiia,” *Pravda*, January 18, 1924.
- 26 Trotsky, *My Life*, 515.
- 27 直到1923年8月底，當列寧的情況稍有好轉後，政權才披露了其病情的嚴重性，但是，即便是在此之後，官方的報道依然保持毫無根據的樂觀態度(「大幅

- 的……根本性的好轉」)。 *Pravda*, August 30, 1923; *Pravda*, October 21, 1923 (衛生人民委員謝馬什柯)。另見 Volkogonov, *Lenin: Life and Legacy*, 414 (引自 RGASPI, f. 16, op. 3, d. 6. L. 7), 430 (引自 APRE, f. 3, op. 22, d. 307, l. 410); Golikov, *Vladimir Il'ich Lenin*, XII: 646, 650; 以及 Tumarkin, *Lenin Lives!*, 115-7。加米涅夫指示畫家尤利·安年科夫驅車到哥爾克畫出被認為是最後一幅的肖像。克魯普斯卡婭「說畫肖像沒有問題」，安年科夫回憶說，「實際上，列寧能展示的只有他的病，倚靠在躺椅上，裹着毯子，似看非看地望着我們，臉上帶着又回到嬰兒期的男人那無助、扭曲、稚氣的微笑。」Annenkov, *Dnevnykh moikh vstrech*, II: 271; Annenkov, "Vospominania o Lenine," 141-9。
- 28 Golikov, *Vladimir Il'ich Lenin*, XII: 658-9. Krupskaja, "Chto nraivos' Il'ichu iz khudozhestvennoi literatury," *Narodnyi uchitel'*, 1927, no. 1: 4-6. 1月19日，在第十一屆全俄蘇維埃代表大會上，米哈伊爾·加里寧對代表們說，在列寧戰勝疾病、重返工作崗位的戰鬥中，「已經看到希望的曙光」。「烏拉！」大會發出了歡呼。*Izvestiia*, January 20, 1924.
- 29 布哈林幾乎每個星期六都過來。*Izvestiia TsK KPSS*, 1989, no. 4: 174-5.
- 30 Volkogonov, *Lenin: Life and Legacy*, 299-301; Kun, *Bukharin*, 135. 後來，列寧去世時布哈林出現在他床前的這一幕被斯大林的黨羽抹去了：Mikoan, *Mysli i vospominaniia*, 235-6. 即便是在克魯普斯卡婭沒有發表的回憶錄中，她也堅持說，布哈林當時沒有獲允入內。Volkogonov, *Lenin: Life and Legacy*, 433 (引自 APRE, f. 3, op. 22, d. 307, l. 175).
- 31 Volkogonov, *Lenin: politicheskii protret*, II: 361 (引自 APRE, f. 3, op. 33, d. 307, l. 175-6); Volkogonov, *Lenin: Life and Legacy*, 435.
- 32 Golikov, *Vladimir Il'ich Lenin*, XII: 662, 664; Prof. V. Osipov, "Bolezn' i smert' V. I. Lenina," *Ogonek*, 1990, no. 4; Ul'ianova, "O Vladimire Il'iche," no. 3; N. Petrenk [B. Ravdin], "Lenin v Gorkakh: bolezn' i smert'," *Minuvshee: Istoricheski almanakh*, 1986, no. 2: 189-91.
- 33 米高揚寫道，1月21日下午，自己到斯大林的住處商討對策，「我們談了大概三四十分鐘過後，布哈林情緒激動地闖了進來，不是說而是尖聲叫道，瑪麗亞從哥爾克打來電話，說「就在下午的6:50，列寧去世了」」。這是謊言，是想掩蓋列寧臨死時布哈林在哥爾克的事實；通知列寧死訊的電話沒有打到斯大林的住處，而是打給了正在開會的蘇維埃代表大會。Mikoyan, *Tak bylo*, 113.
- 34 Ioffe, *Vremia nazad*, chapter 4.
- 35 弗拉基米爾·邦契—布魯耶維奇還為衛生人民委員以及負責屍體解剖和防腐的醫生團隊，包括尚未趕到哥爾克的家庭成員（列寧的姐姐安娜和弟弟德米特里），準備了一趟兩節車廂的專列。Bonch-Bruevich, "Smert' i pokhorony Vladimira Il'icha"; *Pravda*, January 21, 1925; *Otchet Komissii TsIK SSSR*, 5.
- 36 Bonch-Bruevich, "Smert' i pokhorony Vladimira Il'icha," 189-90. 請注意，邦契—布魯耶維奇並未提到布哈林乘坐履帶汽車或列車到哥爾克，但提到他和其他人一起在房間裏向列寧告別。



- 37 *Izvestiia*, January 24, 1922.
- 38 Sakharov, *Politcheskoe zaveshchanie*, 576 (引自 RGASPI, f. 16, op. 1, d. 44, l. 1).
- 39 *Izvestiia*, January 25, 1924; *Pravda*, January 26, 1924. 蘇聯衛生人民委員尼古拉·謝馬什柯說，列寧的顫腦血管「用鑷子敲擊時，聽上去就跟石頭一樣」。 *Pravda*, January 24, 1924; Semashko, *Otchego bolel*, 35. 另見 Fischer, *Life of Lenin*, 672. 公開報道中說到的「無法治癒的血管疾病」，似乎是在說，醫生們沒有辦法幫助列寧；他們救不了他，因此不能責怪他們。但謝馬什柯強調的是，列寧「超出常人的腦力活動和始終過着操心勞碌的生活」，而阿布里科索夫 (Abrikosov) 醫生強調的是列寧動脈硬化中的遺傳因素。 *Izvestiia*, January 25, 1924; Tumarkin, *Lenin Lives!*, 172, n34.
- 40 Valentinov, *Novaia ekonomicheskaiia politika*, 87.
- 41 Volkogonov, *Lenin: Life and Legacy*, 409 (引自 APRE, f. 3, op. 22, d. 307, l. 135: 1935年12月，克里姆林宮醫療管理部門負責人霍多羅夫斯基 (Khodorovsky) 找到了醫生的記錄並將其存入秘密檔案)。
- 42 Service, *Lenin*, III: 255–62. 至少在1900年，當列寧還在德國的時候，他就諮詢過神經失調方面的專家。 RGASPI, f. 2, op. 1, d. 385, l. 1.
- 43 Duranty, “Lenin Dies of Cerebral Hemorrhage”; *Pravda*, January 24, 1924. 代表大會後來又繼續召開，在1月29日通過了新的蘇聯憲法，然後結束了。 *XI Vserossiiskii s'ezd Sovetov*.
- 44 Maksimov, “U tovarshcha Stalina (po vospominaniam byvshego detkora),” *Raboche-Krestianskii korrespondent*, 1934, no. 10: RGASPI, f. 558, op. 4, d. 649, l. 208 (維克托·馬克西莫夫 (Viktor Maksimov))。
- 45 Ia. G. Zimin, “Sklianskii Efraim Markovich,” 見於 Nenarokov, *Revvoensovet Respubliki*, 56–70 (at 68); Zetkin, *We Have Met Lenin*, 73–5; Gil', *Shest' let s V. I. Leninym*, 100–1; Golikov, *Vladimir Il'ich Lenin*, XII: 664–79.
- 46 Izmozik, *Glaza*, 84.
- 47 Sevost'ianov, “Sovershenno sekretno,” *I/i*: 52–3 (TsA FSB, f. 2, op. 2, d. 1, l.).
- 48 Izmozik, *Glaza*, 160–1. 伊茲莫齊克堅持認為，與黨和蘇維埃的官員不一樣，契卡人員並不會粉飾自己地盤上的形勢，儘管他認為他們的報告到1920年代末的時候開始變得「不太客觀」。
- 49 RGASPI, f. 76, op. 3, d. 325, l. 4–6.
- 50 Von Hagen, *Soldiers in the Proletarian Dictatorship*, 291–2.
- 51 Bazhanov, *Damnation of Stalin*, 63.
- 52 Valentinov, *Novaia ekonomicheskaiia politika*, 88–9.
- 53 Volkogonov, *Trotsky*, 266 (引自 RGVA, f. 33987, op. 3, d. 80, l. 587; RGASPI, f. 2, op. 1, d. 27088, l. 1; RGASPI, f. 558, op. 11, d. 816, l. 75–6).
- 54 Trotsky, *My Life*, 508; Deutcher, *Prophet Unarmed*, 131–4.
- 55 *Izvestiia*, January 25 and January 26, 1924.
- 56 *New York Times*, January 28, 1924 (沃爾特·杜蘭蒂). 後來，杜蘭蒂再現了一段與法國《時報》駐莫斯科記者的談話。「天哪，多好的機會錯過了！阿喀琉斯在自己的

- 帳篷裏生着悶氣。真是個白癡。他似乎不明白，他的地位的整個力量就在於他的聲望，群眾把他看作是列寧的首席助手和支持者……要是他來到莫斯科……就像你在美國說的，整個風頭就會在他這邊。」Duranty, *I Write as I Please*, 225-6. 杜蘭蒂沒有提到（或不認識）的這位記者是亨利·路易-維克托-馬爾斯·羅蘭（Henri Louis-Victor-Mars Rollin），法國外交部認為他是布爾什維克的奸細。羅蘭寫了幾十年來關於《錫安長老會紀要》最重要的研究著作（*L'apocalypse de notre temps*, 1939）。
- 57 娜塔莉亞·謝多娃的母親在談到她們收到的列夫從莫斯科寄來的郵件時說，「從信中可以感受到他的迷惘和自慚形穢」。Trotsky, *My Life*, 511. 另見Patenaude, *Stalin's Nemesis*, 170-3.
- 58 RGAKFD, ed. khr. 1-14097 (1924).
- 59 Trotsky, *Stalin*, 381.
- 60 《列寧的去世》通過電報傳給莫斯科，發表在《真理報》和《消息報》上：*Pravda*, January 24, 1924; *Izvestiia*, January 24, 1924; Volkogonov, *Trotsky*, 266 (引自RGASPI, f. 2, op. 1, d. 27088, l. 1).
- 61 "Po povodu smerti Lenina," *Pravda*, January 30, 1924; *Sochineniia*, VI: 46-51. 政治局會議定下來的發言者名單起初並沒有斯大林的名字；他是作為「視情況而定」的發言者加進後來的名單的。現在還不清楚為甚麼會這樣。兩份發言者名單上都沒有克魯普斯卡婭的名字，但是很顯然，她肯定是要發言的（而她也的確發言了）。RGASPI, f. 16, op. 2s, d. 47, l. 1-4. 1924年1月28日，斯大林給克里姆林軍校學員又作了一次演講。
- 62 《列寧的囑咐》是1924年1月24日《消息報》頭版文章的標題。
- 63 *Izvestiia*, January 27, 1924. 一般來說，烏拉姆是個敏銳的分析家，但他錯誤地認為這篇演講不合時宜。Ulam, *Stalin*, 235.
- 64 *Pravda*, January 30 and January 31, 1924.
- 65 Golikov, *Vladimir Il'ich Lenin*, XII: 678. 1929年7月，政治局決定用花崗岩代替原來的木製結構，建造一座永久性的陵墓；陵墓於1933年竣工。
- 66 與托洛茨基關係很近的阿道夫·越飛寫信給季諾維也夫，建議不要把列寧留下的人民委員會主席的職務交給哪一個人，而是由托洛茨基、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組成一個委員會；不過，要是他們堅持認為政府首腦只能是一個人，越飛建議就選托洛茨基。現在還不清楚越飛是自作主張還是把信給托洛茨基看過。Vasetskii, *Trotskii*, 193.
- 67 *Pravda*, February 12, 1924, 見於 *Sochineniia*, VI: 52-64.
- 68 *Izvestiia TsK KPSS*, 1990, no. 6: 200 (RGASPI, f. 16, op. 2, d. 48, l. 41).
- 69 為期三天的中央全會在1月31日結束時決定，把10萬工人入黨的計劃更名為「為紀念列寧而吸收新黨員運動」。Golikov, *Vladimir Il'ich Lenin*, XI: 679. 後來，這項計劃聲稱招募了24萬新黨員。
- 70 Shelestov, *Vremia Alekseia Rykova*, 222-3. 列寧擔任的另一項行政職務是勞動國防委員會主席，這個職務給了加米涅夫。列寧的妹妹和妻子仍然住在克里姆林宮(直

到1939年)，列寧的房間原封不動地保存下來。斯大林按照規定把克魯普斯卡姬和烏里揚諾夫娜趕出了列寧在哥爾克的別墅。起初斯大林自己想住進去，但後來別墅變成了博物館。1955年4月，赫魯曉夫下令對公眾開放列寧在克里姆林宮的住處（參觀者超過200萬人）；1994年，列寧在克里姆林宮的住處兼博物館的物品被搬到他以前在哥爾克的別墅，參政院再次對公眾關閉。1994至1998年，帝國參政院進行了較大規模的內部翻修，幾乎完全變了樣。

- 71 Artamonov, *Spetsob"ekty Stalina*, 33–4; Korotyshevskii, "Garzh osobogo znacheniiia." 特別車隊原來是由列寧的首席司機斯捷潘·吉利負責，但在列寧還在世的時候，主要給斯大林開車的帕維爾·烏達洛夫 (Pavel Udalov) 就取代了吉利。斯大林的另外一名司機尼古拉·索洛維約夫 (Nikolai Solovyov) 過去給布魯西洛夫將軍開過車。1922至1925年，蘇維埃政權在英國為列寧和其他上層人物購買了73輛「銀魅」（該車型在1925年停產）。雖然蘇聯的氣溫很低，而且經常下雪，他們還是更喜歡敞篷車。
- 72 別墅建於1922至1923年，但之前產權屬於尼古拉·斯梅茨科耶 (Nikolai Smetskoi, 有時也寫作斯梅茨基 (Smetskii))；該設施過去登記為「中央執行委員會三號療養院」。一號是在庫爾斯克省 (伊萬諾夫—利戈夫斯基縣)，二號是在克里米亞 (古爾祖夫)。Artamonov, *Spetsob"ekty Stalina*, 128.
- 73 Trotsky, *My Life*, 509.
- 74 Rikhter, *Kavkaz nashikh dnei*.
- 75 Hoover Institution Archives, Lakoba Papers, 1–23. 另見Lakoba, "Ia Koba, ty Lakoba," 50–4. 托洛茨基是和幾名衛兵一起來的，這仍然是為了他的「安全」。1924年1月6日，列寧的衛隊長阿布拉姆·別連基寫了一封信給拉柯巴，上面有「絕密」標記，而且沒有抬頭：「醫生們禁止托洛茨基同志工作並〔囑咐〕他立即出發，到南方休養兩個月。在我看來，我們找不到比您在蘇呼姆找的更好的地方，尤其是醫生們也認為蘇呼姆比較合適。我想最好是把他安頓在斯米茨科沃別墅，也就是您以前安排捷爾任斯基和季諾維也夫住過的地方。」別連基強調說，醫生們的要求是徹底靜養，所以「我請您，親愛的拉柯巴同志，要保持密切關注，把他置於您的保護之下，那樣我們在這裏就完全放心了」。考佐夫 (Kauzov) 將負責托洛茨基的飲食和安全。「我肯定您完全明白我的意思。很顯然，不應該有集會和遊行……考佐夫同志會把我在祖巴洛沃拍的照片帶給您。捷爾任斯基和亞戈達兩位同志向您表示誠摯、熱情的問候。」Lakoba Papers, 1–28.
- 76 在夫婦倆去蘇呼姆的路上，托洛茨基的妻子娜塔莉亞·謝多娃的筆端流露出了忐忑不安的心情：「在蘇呼姆的生活會怎樣？在那裏，我們的周圍會是敵人還是朋友？」Trotsky, *My Life*, 508.
- 77 Vinogradov, *Genrikh Iagoda*, 307–8 (TsA FSB, f. 3, op. 2, d. 9, l. 247).
- 78 Volkogonov, *Trotsky*, 267 (引自Trotsky Archive, Houghton library, Harvard University, bMS.Russ.13.1, 8967–86, folder 1/2, 1–2); Fel'shtinskii, *Kommunisticheskaia oppozitsiia v SSSR*, I: 89; Trotsky, *My Life*, 511.

- 79 *Pravda*, January 3, 1924. 克魯普斯卡婭還代表執政的三駕馬車，在莫斯科鮑曼區的黨組織會議上作了一次與黨代會選舉有關的演講（她只點名稱讚了季諾維也夫），演講的內容發表在1924年1月11日的《真理報》上。McNeal, *Bride of the Revolution*, 233-4.
- 80 「在托洛茨基的朋友中所有人都知道，」馬克斯·伊斯特曼寫道，「列寧去世後，他收到了列寧妻子的一封信，請他不要忘了他們早年的友誼。」Eastman, *Since Lenin Died*, 13.
- 81 Kudriashov, *Krasnaia armia*, 96-102 (APRF, f. 3, op. 50, d. 254, l. 77, 83-84ob., 99-99ob., 103-7). 伏龍芝正式接替斯克良斯基的職務是在1924年3月11日。RGASPI, f. 17, op. 3, d. 424, l. 8. 最高國民經濟委員會的捷爾任斯基收留了斯克良斯基，讓他負責莫斯科的紡織托拉斯。RGASPI, f. 17, op. 3, d. 424, l. 8.
- 82 Lakoba, "‘Ia Koba, a ty Lakoba’," 55.
- 83 Velikanova, *Making of an Idol*, 52-3 (引自 RGASPI, f. 16, op. 2s, d. 49, l. 2-4; d. 48, l. 12; op. 3, d. 412, l. 1; op. 2s, d. 49, l. 37); Bonch-Bruevich, *Vospominaniia o Lenine* [1965], 435; *Izvestiia*, January 26, 1924. 克魯普斯卡婭強烈反對把列寧遺體做成木乃伊，反對用宗教方式去崇拜他。*Pravda*, January 30, 1924. 有學者指出，1922年在盧克索一個未遭洗劫的地方發現埃及法老圖坦卡蒙的木乃伊，不僅吸引了全世界的關注，蘇維埃的報刊也作了大量的報道。Tumarkin, *Lenin Lives!*, 179-80. 恰好蘇俄在1924年還沒有火葬場。
- 84 當列寧在1918年遭到槍擊時，帶有宗教色彩的描述就已經出現了。當時擔任農民積極分子報紙（《貧窮報》）編輯的列夫·索斯諾夫斯基把列寧描寫成一個基督式的人物，並斷言「列寧是殺不死的……因為列寧是受壓迫者的復活……」Tumarkin, *Lenin Lives!*, 83-4 (引自 L. Sosnovskii, "K pokousheniiu na tov. Lenina," *Petrogradskaia Pravda*, September 1, 1918).
- 85 Kotyrev, *Mavzolei V. I. Lenina*.
- 86 1月22日，政府的事務管理局局長尼古拉·戈爾布諾夫把自己的紅旗勳章別在去世的列寧的衣服上。第二天，列寧得到了他自己的紅旗勳章。但是，大約在1943年以前，戈爾布諾夫的勳章似乎一直戴在列寧身上。頒給列寧的那枚勳章有可能給了戈爾布諾夫。
- 87 Krasin, "Arkhitekturnye uvekovechenie Lenina," *Izvestiia*, February 3, 1924; Ennker, *Die Anfänge des Leninkults*, 234. 另見 Ennker, "The Origins and Intentions of the Lenin Cult," 118-28.
- 88 *Izvestiia*, August 2, 1924.
- 89 *New York Times*, August 4, 1924.
- 90 「只要他在那裏，只要他沒有改變，共產主義就是安全的，新俄國就會繁榮昌盛，」來訪的美國作家西奧多·德萊塞 (Theodore Dreiser) 寫道，「但——小點聲——要是他逐漸褪去光澤，或是被毀掉，啊，那就會出現很大的令人遺憾的變化，他的善良的夢想就會終結。」Dreiser, *Dreiser Looks at Russia*, 31.
- 91 *Pravda*, July 8, 1923. 列寧博物館在1925年的頭七個月就吸引了37,000名參觀者，大多是有組織的。Aroseev, "Institut V. I. Lenina"; Tumarkin, *Lenin Lives!*, 125; Holmes and Burgess, "Scholarly Voice or Political Echo?," 387.

- 92 Annenkov, "Vospominaniia o Lenine," 144. 博物館在1924年1月25日收藏了列寧的大腦和心臟。
- 93 這位教授試圖說明列寧「崇拜」的作用在於激勵黨的「積極分子表現得更加積極」。對他們來說，「列寧是導師，是要學習和追隨的，他的教導是要忠實執行的」。對廣大群眾來說，列寧被描寫成似乎帶有超自然的力量，是「衝破雲層、光芒四射的太陽」。Harper, *Civic Training*, 39–40.
- 94 *Izvestiia*, August 22, 1923, 以及 September 28, 1927; *Pravda*, October 27, 1923; *Proletarskaia revoliutsiia*, 1923, no. 11: 269–74.
- 95 加米涅夫在1927年1月被解除了院長職務。
- 96 *Izvestiia*, January 21, 1927; *Vestnik Kommunisticheskoi akademii*, 1928, no. 27: at 298; *Zapiski Instituta Lenina*, 1927, no. 1: 176; "IML k 100-letiiu so dnia rozhdeniia V. I. Lenina." *Kommunist*, 1968, no. 17. 當時還採取了其他一些舉措：一是啟動黨史（在俄語中稱作 *Istpart*）編撰工程，這項工程起源於列寧確信十月政變證明了自己的政黨組織理論的正確性；二是把馬克思陳列室——任務是搜集並研究有關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文獻，以及馬克思和恩格斯留下的文獻——改成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這兩項措施最後在列寧研究院合二為一了。PSS, XLI: 176 (Mikhail Pokrovsky and Vladimir Adoratsky); Komarov, "Sozdanie i deiatel'nost' Istparta 1920–1928 gg.;" Volin, "Istpart i Sovetskaia istoricheskaia nauka," 189–206; Burgess, "The Istpart Commission"; Komarov, "K istorii instituta Lenina," 181–91; Ivanova, "Institut Marksa-Engelsa-Lenina," IV: 214–23.
- 97 Lenin, *Sobranie sochinenii*; Lenin, *Sobranie sochinenii*, 2nd and 3rd eds. 1925年有6,296種關於列寧的出版物。Karpovich, "Russian Revolution of 1917," 258.
- 98 *Ochet 15 s'ezdu partii*, 71.
- 99 Velikanova, *Making of an Idol*, 110–1 (引自 RGASPI, f. 12, op. 2, d. 41, l. 1–1ob). 1925年2月19日，政治局請克魯普斯卡婭撰寫列寧的傳記材料。RGASPI, f. 17, op. 3, d. 489, l. 4.
- 100 *Pravda*, February 12, 1924.
- 101 Gor'kii, *Vladimir Ilich Lenin*, 10. 流亡的前社會革命黨領袖維克托·切爾諾夫在美國《外交事務》雜誌上發表了一篇文章，眼光銳利，認為列寧是個「終生的分裂派」，但卻極為害怕黨內的分裂。「列寧才智過人但又冷酷無情……是一個憤世嫉俗的知識分子，喜好嘲笑和挖苦別人，」他還說，「對他來說沒有甚麼比感傷更糟糕了，他喜歡把這個詞用於政治中所有道德和倫理的顧慮。」Chernov, "Lenin." 曾經作為一個共產主義者到過俄國但卻產生了懷疑的伯特蘭·羅素 (Bertrand Russell) 在提起列寧時寫道，「要是我在不知道他是誰的情況下碰到他，我想我不會猜到牠是一個偉人；他給我的印象是過於固執和死板」。Russell, *Practice and Theory of Bolshevism*, 42.
- 102 Chuev, *Sto sorok*, 184.
- 103 *Soldatskaia Pravda*, May 1917, 轉載於 *Zapiski instituta lenina*, 1927, no. 2: 24–33, *Pravda*, April 16, 1927, 轉載於 PSS, XXXII: 21; Savitskaia, "Razrabotka nauchnoi

- biografi V. I. Lenina,” 4. 到1924年夏天，「馬克思列寧主義」這個說法開始出現在許多文件中。Sheherbakov, “A kratkii kurs blagoslovl,” *Pravda*, September 13, 1990. 另見Nikolai Babakhan [Sisak Babakhanyan], “Marksizim i leninizm,” *Pravda*, April 6, 1923.
- 104 斯維爾德洛夫卡——按當時的稱呼——位於米烏斯卡婭廣場6號，在以前的沙尼亞夫斯基莫斯科城市人民大學裏，是蘇俄所有高等教育機構中設施最好的。Reznik, *Trotskyizm i Levaia oppositsiia*, 38; *Desiat' let Kommunisticheskogo universiteta*; Ovsianikov, *Miuskaia ploshchad'*, 6; Harper, *Civic Training*, 285. 起初，共產主義大學設法得到了位於馬拉亞·德米特羅夫卡大街6號、按照現代派藝術風格建造的（就連燈具、家具和窗簾也是）前莫斯科商會俱樂部的房子，但是在1923年，那裏開了一家影院、一家爵士舞廳。
- 105 *Sochineniia*, VI: 52–64, 69–188. 斯維爾德洛夫共產主義大學最終讓位於高級黨校（成立於1939年）。
- 106 Mikoyan, *Tak bylo*, 370. 早在1918年黨的第七次代表大會安排斯大林加入撰寫新黨綱的委員會時，就有人反對說他沒有任何理論著述，但會議主席指出斯大林寫過民族問題的文章，這才平息了反對的聲音。VII *ekstrennyi s'ezd RKP (b)*, mart 1918 goda, 163.
- 107 1926年12月30日，斯大林在另外一封私人信件中拒絕克謝諾豐托夫引用1924年那封信中的內容。 *Sochineniia*, IX: 152.
- 108 *Uchenie Lenina o revoliutsii*. Medvedev, *Let History Judge*, 821–2.
- 109 *Ksenofontov, Lenin i imperialisticheskaia voina 1914–1918 gg.*, 16. 菲利普·克謝諾豐托夫後來在1929年成了《伏爾加公社報》的編輯，但很快被當成右派解除了職務；1930年秋，他去了莫斯科的紅色教授學院。1937年3月16日，他在薩馬拉被捕，罪名是托洛茨基主義。古比雪夫省國家安全部門的傑特金 (Detkin) 中尉寫道：「1929年，他在擔任地區報紙編輯期間，在自己周圍組織了一個由報紙工人中的托洛茨基分子組成的集團。」克謝諾豐托夫拒不認罪，結果被送到莫斯科，但在列福爾托沃監獄，克謝諾豐托夫仍不認罪。按照官方的記載，他於1938年1月1日在審訊時死亡。
- 110 Stalin, *O Lenine*, *Sochineniia*, VI: 69–71.
- 111 Trotskii, *O Lenine*. 另見Tucker, *Stalin as Revolutionary*, 356.
- 112 *Kraskaia nov'*, 1924, no. 4: 341–3.
- 113 *Za leninizm*, 186.
- 114 *Leningradskaiia Pravda*, June 13, 1924; Carr, *Socialism in One Country*, II: 14.
- 115 Zinoviev, “O zhizni i deiatel'nosti V. I. Lenina,” *Izvestiia TsK KPSS*, 1989, no. 7: at 178. 伊萬·邁斯基 (Ivan Maisky) 當時在前首都工作，他寫信給莫洛托夫 (1924年3月10日) 說，「季諾維也夫同志在列寧格勒沒有花很多時間」。但是在1924年4月16日，即列寧抵達芬蘭車站的紀念日（按照新曆）那天，季諾維也夫在那裏出席了列寧紀念碑的奠基儀式。 *Pravda*, April 18, 1924; *U Velikoi mogily*, 517–9.
- 116 季諾維也夫還寫道：「列寧是列寧主義的守護神。」Volkogonov, *Lenin: Life and Legacy*, 281 (引自RGASPI, f. 324, d. 246, l. 2; d. 267, l. 4–7), 285 (引自RGASPI, f.

324, op. 1, d. 490, l. 2). 季諾維也夫關於列寧的最主要的著述是他在黨的第十三次代表大會上所作的報告，他把報告作為書籍出版了：*Po puti Il'icha* (Leningrad. Priboi, 1924). 另見 Zinov'ev, *Leninism*.

117 Rosenfeldt, *Knowledge and Power*, 170–1.

118 紅色教授學院成立於1921年，在1924年培養出了第一屆畢業生——105名入學者中的51人(最初的三年學制在那年延長到四年)；超過三分之二的學生是白領，只有很少一部分是工人。學院起初設在從前一座名為「耶穌受難」(Sratnoi)的女修道院裏，這座修道院在1919年被陸軍人民委員部徵用，但在1921至1922年間又被修女們重新收回(她們住在學生們的旁邊)；不久，學院又搬到位於奧斯托任卡街51號的前卡特科夫公立中學。到1929年為止，236名畢業生中有19名是工人。1928年4月，那所修道院成了中央檔案館；1937年，它被拆掉，建了一座普希金雕像，後來又建了一家影院。與此同時，奧斯托任卡街的紅色教授學院也在1932年有了集體宿舍。

119 針對斯大林有關列寧新經濟政策的描述(在「農民問題」那章)，斯列普科夫提出了質疑，認為工農「聯盟」並不是事後想出來的，因為在1917年，「農民如果想要得到土地，就必須支持無產階級反對資本的鬥爭」。Bol'shevik, 1924, no. 9 (August 5): 102–5. 接下來的那個月，斯列普科夫成了主編布哈林庇護下的《布爾什維克》雜誌的副主編。斯列普科夫在1924年還被任命為《真理報》編委會成員，那也是由布哈林領導的。1925年，他又同時兼任《共青團真理報》編輯。

120 Carr, *Socialism in One Country*, II: 332–3.

121 XIII s'ezd VKP (b), mai 1924 g., 749–66.

122 長期擔任克魯普斯卡婭秘書的忠誠的薇拉·德里德佐回憶說，克魯普斯卡婭與三駕馬車之間的協商「持續了三個半月，直到大會召開前夕的5月18日」，她才「移交了『遺囑』，並同意向出席代表大會的代表宣讀『遺囑』」。Dridzo, "O Krupskoi," 105. 在顯然無法戰勝執政的三駕馬車的情況下，她試圖強迫他們採取行動：5月18日，大會召開在即，她交給中央委員會一封手寫的信件。薩哈羅夫指出，記錄表明克魯普斯卡婭早在一年前就把文件交給了季諾維也夫，而這份被稱作《移交工作備忘錄》的文件跟當時中央委員會的典型的同類文件不像，它涉及的不是移交，而是公佈和分發。Sakharov, *Politcheskoe zaveshchanie*, 535; PSS, XLV: 594.

123 托洛茨基後來斷言斯大林當着他的兩個助手即列夫·梅赫利斯和謝爾蓋·瑟爾采夫的面打開了文件袋並詛咒列寧，但即便真有這回事，現在還不清楚托洛茨基是怎麼知道的。Trotsky, *Stalin*, 37.

124 托姆斯基、布哈林、莫洛托夫和古比雪夫(中央監察委員會主席團)意見是一致的。托洛茨基只說，是政治局和中央監察委員會的會議，但並未指明這次討論是在何時進行的。Fel'shtinskii, *Kommunisticheskaia oppositsia v SSSR*, I: 56.

125 RGASPI, f. 17, op. 2, d. 129, l. 1–3. 斯大林讓書記處把克魯普斯卡婭交來的文件袋交給由他本人、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加里寧和亞歷山大·謝苗諾夫(農業人民委員)組成的中央委員會的特別委員會，特別委員會決定「把這些文

- 件的情況通報給中央全會，同時建議通報給黨的代表大會」。Sakharov, *Politicheskoe zaveshchanie*, 579 (引自 RGASPI, f. 17, op. 2, d. 246 IV vyp., s. 65).
- 126 德國作家埃米爾·路德維希援引與拉狄克的談話，錯誤地斷言斯大林宣讀了「遺囑」，這一說法遭到托洛茨基的否認。托洛茨基錯誤地宣稱，反對派是在5月22日大會代表的元老委員會上才第一次聽說了「遺囑」的事情。Trotsky, "On The Testament of Lenin" [December 31, 1932], 載於 Trotsky, *Suppressed Testament*, 11-3; Sakharov, *Politicheskoe zaveshchanie*, 577-8; Trotskii, "Zaveshchanie Lenina," 267-8.
- 127 Trotskii, "Zaveshchanie Lenina," [*Gorizont*], 38-41.
- 128 *XIV s'ezd VKP (b)*, 398-9, 455-7, 506; *Izvestiia TsK KPSS*, 1991, no. 4: 192-207; Chuev, *Sto sorok*, 183.
- 129 巴扎諾夫說是季諾維也夫建議繼續選舉斯大林擔任總書記的，托洛茨基的反對沒起作用，有些人投了反對票，少數人投了棄權票（巴扎諾夫聲稱他當時負責計票），但這種說法似乎有點混亂：在黨的代表大會之前，即將卸任的中央委員會是無權投票重新選舉總書記的；只有代表大會上新選出的中央委員會才可以在黨的代表大會之後那樣做。有可能是巴扎諾夫把代表大會之前和之後的中央委員會會議混淆了。Bazhanov, *Damnation of Stalin*, 75-6; Bazhanov, *Vospominaniia* [1980], 106-7; Bazhanov, *Avec Staline dans le Kremlin*, 43-5; Bazhanov, *Stalin*, 32-4. 其他的說法見於 Eastman, *Since Lenin Died*, 28-31; Wolfe, *Khrushchev and Stalin's Ghost*, 258-9; McNeal, *Stalin*, 110; 以及 Stalin, "Trotskistkaia oppositsiia prezhde i teper': rech' na zasedanii ob' edinennogo plenuma TsK I TsKKK VKP (b) 23 oktiabria 1927 g.," 見於 *Sochineniia*, X: 172-205. 斯大林的心腹雅羅斯拉夫斯基回憶說，「在向中央委員宣讀列寧寫的那幾頁文字時，人們的反應是不解和驚慌」。
- 130 成立於1922年的少年先鋒隊當時在整個蘇聯只有16.1萬人；那天在紅場上，他們背誦了一段經過修改的新誓詞，表示要「堅定不移地遵守少先隊的法律、習俗和伊里奇的教導」。XIII s'ezd RKP (b) [1924], 629-33. 另見 Balashov and Nelepin, *VLKSM za 10 let v tsifrakh*, 34-7.
- 131 XIII s'ezd RKP (b), 106-7. 他把它作為一本小冊子出版了：Zinov'ev, *Po puti Il'icha: politicheskii otchet TsK XIII-mu s'ezdu RKP (b)* (Leningrad: Priboi, 1924). 斯大林讓季諾維也夫打頭陣，然後自己作了關於組織工作的報告，而且報告的內容顯得合情合理。（後來在會議進程中斯大林就不管托洛茨基了。）*Sochineniia*, VI: 220-23; XIII s'ezd RKP (b), 259-67.
- 132 XIII s'ezd RKP (b) 153-68 (at 158, 165-6); XIII s'ezd RKP (b) [1924], 372; XIII s'ezd RKP (b) [1963], 167.
- 133 *Sochineniia*, VI: 227; Medvedev, *Let History Judge*, 127-8.
- 134 *Sotsialisticheskii vestnik*, July 24, 1924: 13. 斯大林的人發起了進攻。尼古拉·烏格拉諾夫說在索爾莫沃工廠，工人們支持「中央委員會」，而被留用的舊政權工程師則支持托洛茨基，這表明反對派的階級基礎是異己的；莫洛托夫重複了這種說法，斷言反對派是紮根在階級異己分子中的。XIII s'ezd RKP (b), 169, 523.



- 135 Sakharov, *Politischeskoe zaveshchanie*, 584–5 (引自 RGASPI, f. 17, op. 2, d. 246 IV vyp., 62, 64: 1925年7月17日斯大林給政治局的信，信中要求托洛茨基公開否認馬克斯·伊斯特曼在1925年的書中的說法，後來托洛茨基照做了)。
- 136 *Komsomol'skaia Pravda*, June 11, 1988. 米爾恰科夫在諾里爾斯克和馬加丹的勞改營度過了16年，並於1973年去世。
- 137 Sakharov, *Politischeskoe zaveshchanie*, 582–3 (引自 RGASPI, f. 17, op. 1, d. 57, l. 184–6). 赫魯曉夫在1956年2月的蘇共二十大秘密報告中證實，列寧的「遺囑」[向出席黨的第十三次代表大會的代表們公開了，代表們討論了把斯大林調離總書記崗位的問題]。Khrushchev, "Secret Speech," 7.
- 138 RGASPI, f. 17, op. 2, d. 130.
- 139 根據勞動人民委員部管理的勞動力交易所登記的數據，當時的失業人數已從1922年1月的16萬人急劇上升到1924年1月的124萬人。Rogachevskaia, *Likvidatsiia bezrabotitsy*, 76–7.
- 140 APRE, f. 3, op. 27, d. 13, l. 53–4, 見於 *Istochnik*, 1995, no. 3: 132–3.
- 141 RGASPI, f. 17, op. 16, d. 175, l. 165; Rozhkov, "Internatsional durakov," 61–6.
- 142 1922年，意大利法西斯黨有一半黨員甚至都沒有重新登記。Bosworth, *Musolini's Italy*, 152.
- 143 當時，為表示抗議，意大利政府辭職了。它既沒有成立一個廣泛的反法西斯同盟——那樣一來，就必須把改革派社會黨人包括在內——也沒有以法西斯分子放棄議會外的非法行為作為條件，讓他們加入政府。不過，只有通過分裂法西斯主義運動，籠絡其政治上較為負責的那一部分人，才有可能做到後者，而當時並沒有那麼做。Lyttelton, *Seizure of Power*, 79.
- 144 「所有的權力都依賴於信心，」研究意大利法西斯主義運動的偉大的歷史學家阿德里安·利特爾頓 (Adrian Lyttelton) 解釋說，「而過於理性並且總的來說對人評價不高的國王卻一點信心沒有。他退縮了……唯一那個甚麼事情都可以做到的人認為自己無能為力。」Lyttelton, *Seizure of Power*, 93. 國王當時還要擔心寄望他更有魄力的堂兄的宮廷陰謀。
- 145 Lyttelton, *Seizure of Power*, 85 (Michele Bianchi).
- 146 Berezin, *Making the Fascist Self*, 81.
- 147 Kvashonkin, *Bol'shevistskoe rukovodstvo*, 263–5 (RGASPI, f. 5, op. 2, d. 326, l. 20–2). 布哈林有段幾乎沒有引起關注的話也對意大利法西斯主義表示驚嘆。「法西斯主義者的鬥爭方式的特點是，他們比其他任何政黨都更注重吸收和實際地運用俄國革命的經驗，」他對出席黨的第十二次代表大會的代表們說，「如果從形式的角度看待他們，也就是說，從其政治鬥爭方式的技巧這一角度看待他們，那就會發現，他們完全是運用了布爾什維克的策略，尤其是俄國布爾什維主義的策略，意思是說迅速集中力量並由結構嚴密的軍事組織採取有力的行動，意思是說力量調配、人員—任務—機構、動員之類的事情要形成一個具體的制度，還有就是要無情地打擊敵人，只要這樣做有必要，是形勢所迫。」*XII s'ezd RKP (b)*, 273–4.
- 148 *Pravda*, October 31, November 1, 1922.

- 149 Pipes, *Russia Under the Bolshevik Regime*, 253.
- 150 *Vsemirnyi kongress*, I: 156–7, 175–92; *Diskussiiia 1923 goda*, 262 (由李可夫作為倡議者的共產國際決議，1924年6月27日)。
- 151 Deutscher, *Prophet Unarmed*, 141–51.
- 152 Boersner, *The Bolsheviks*, 152 (引自 *Protokoll des Fuenften Kongresses der Kommunistischen International. I.*, 2 vols. [Hamburg: Carl Hoym, 1924], I: 237)。
- 153 *Izvestiia*, June 19, 1924; *New York Times*, June 20, 1924; Tumarkin, *Lenin Lives!*, 193–4。早在1924年5月，參加黨的第十三次代表大會的代表們在列寧墓竣工前，也提前瞻仰了列寧的遺體。*Pravda*, June 13, 1924; Zbarskii, *Mavzolei Lenina*, 41。
- 154 Firsov, “Nekotorye voprosy istorii Kominterna,” 89; Claudin, *Communist Movement*, 152–3。斯大林還寫了一張令人費解的便條：「德國革命的失敗是走向與俄國開戰的一步。」RGASPI, f. 558, op. 11, d. 25, l. 101 (沒有日期)。斯大林和季諾維也夫一起採取了進一步的行動，秘密會晤德國的兩個極左分子阿爾卡季·馬斯洛夫 (Arkadi Maslow) 和露特·菲舍爾——他們的破壞行動給政變幫了倒忙。但二人很快得到了提拔，因為他們是蘇聯三駕馬車在左派反對派中的敵人 (拉狄克和皮達可夫) 的敵人。
- 155 Matteotti, *Un anno di dominazione fascista*.
- 156 Canali, *Il delitto Matteotti*, 218.
- 157 Bosworth, *Mussolini's Italy*, 197.
- 158 De Felice, *Mussolini il fascista*, I: 632–6.
- 159 Lyttelton, *The Seizure of Power*, 242–3.
- 160 Bosworth, *Mussolini's Italy*, 212–3.
- 161 在就一份把托洛茨基稱為「紅軍領袖」的文件與伏龍芝交換意見時，斯大林建議說，「我認為我們只有在談到黨的時候才說『領袖』比較合適」——這意思是說他自己。Kvashonkin, *Bol'shevistskoe rukovodstvo*, 298–9 (RGASPI, f. 558, op. 1, d. 5254, l. 1: Dec. 10, 1924)。
- 162 *Sotsialisticheskii vestnik*, July 24, 1924: 11–2.
- 163 列寧去世後，契切林或許以為自己會享有更大的行動自由，但他很快就在抱怨斯大林對外交事務的「干涉」了。Debo, “G. V. Chicherin,” 27–8; Kvashonkin, *Bol'shevistskoe rukovodstvo*, 295。
- 164 到1924年，阿爾巴尼亞、奧地利、丹麥、希臘、挪威、瑞典、阿富汗、伊朗、中國、墨西哥和土耳其也都已承認蘇聯，以及曾經屬於沙皇領土的愛沙尼亞、拉脫維亞、立陶宛和芬蘭。
- 165 Anin, *Radioelektronnyi shpionazh*, 24.
- 166 有關斯大林和列寧把對外貿易代表團看作是進行偵察活動的觀點，參見 *Sochineniia*, V: 117–20; 以及 Carr, *Bolshevik Revolution*, III: 349–50。
- 167 *Izvestiia*, January 26, 1924.
- 168 契切林讓蘇聯外交人員耍兩面派，對中國鄭重宣佈，蘇聯「承認外蒙是中華民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尊重中國在那裏的主權」，並承諾在即將召開的中蘇會議上一旦在時間表上達成一致就會撤出蘇聯軍隊。Elleman, *Diplomacy and Deception*。

- 169 Ballis, "The Political Evolution of a Soviet Satellite"; Thomas T. Hammond, "The Communist Takeover of Outer Mongolia: Model for Eastern Europe," 載於 Hammond and Farrell, *Anatomy of Communist Takeovers*; Barany, "Soviet Takeover."
- 837 170 這位德國人警告說，「俄國人會對中國繼續採取舊沙皇政府的帝國主義政策」。轉引自 Elleman, "Secret Sino-Soviet Negotiations," 546. 另見 Tang, *Russian and Soviet Policy*, 388-9; 以及 Rupen, *How Mongolia is Really Ruled*, 44.
- 171 Murphy, *Soviet Mongolia*, 89-90.
- 172 此次行動只有極少數人知道，即便在斯大林的機關中，大部分官員也毫不知情。Balashov and Markhashov, "Staraiia ploshchad', 4 (20-e gody)," no. 6: 187.
- 173 季諾維也夫顯然已經從較早的幾次失敗中得出結論，認為罷工和大規模的公開抗議活動只會讓當局有所戒備，所以共產國際這次就策劃了一次閃電式政變，這可能會激起工人的起義，支持愛沙尼亞社會主義蘇維埃共和國。Fischer, *Stalin and German Communism*, 463; Krivitsky, *I Was Stalin's Agent*, 64-5; Leonard, *Secret Soldiers*, 34-7.
- 174 Saar, *Le 1-er décembre 1924*; Kuusinen, *Rings of Destiny*, 66.
- 175 "The Reval Uprising," 見於 Neuberg [假名], *Armed Insurrection*, 61-80.
- 176 Pil'skii, "Pervoe dekabrai," I: 218-9.
- 177 Rei, *Drama of the Baltic Peoples*, 180-6; Sunila, *Vosstanie 1 dekabria 1924 goda*. 另見 Krivitsky, *In Stalin's Secret Service*, 48.
- 178 Stalin, *Na piutiakh k Oktiabriu; Sochineniia*, VI: 348-401. 馬克思和恩格斯明確否認革命可以在單獨一個國家取得成功，但他們在歐洲的社會民主黨追隨者修正了這一觀點。巴伐利亞一位民主社會主義者在1878年認為「社會主義在單獨一個國家或幾個國家的最終勝利」是可能的。參見 von Vollmar, *Der isolierte sozialistische Staat*, 4. 1891年，考茨基的德國社會民主黨的愛爾福特綱領採取了類似的立場。參見 Kautsky, *Das Erfurter Programm*, 115-6.
- 179 PSS, XLV: 309; van Ree, "Socialism in One Country," 這篇文章勝過 Carr, *Socialism in One Country*, II: 49-50; 以及 Tucker, *Stalin as Revolutionary*, 368-94. 針對一張送給自己的、對〈論一國社會主義〉一文提出批評的便條，斯大林在日期為1925年1月25日的私人信件中作出回應，稱自己的觀點是根據列寧的著述，儘管缺乏清晰的例證。Stalin, *Sochineniia*, VII: 16-8 (譯註：《斯大林全集》第7卷，第17-19頁)。
- 180 Tsakunov, *V Labirinte*, 143-4 (引自 RGASPI, f. 325, op. 1, d. 108, l.44-5).
- 181 McNeal, *Stalin's Works*, 110-1; *Sochineniia*, VI: 61-2.
- 182 斯大林的「一國社會主義論」後來成了共產國際的慣用說法。Claudin, *Communist Movement*, 76-7.
- 183 加米涅夫在他1924年11月批判托洛茨基主義的文章中抓住了要害，指出托洛茨基的不斷革命論「把俄國的工人政府置於完全依靠即將到來的西方無產階級革命的境地」。Kamenev, "Leninizm ili Trotskizm (Uroki partiinoi istorii)," *Pravda*, November 26, 1924, 轉載於 Kamenev, *Stat'i i rechi*, 188-243 (at 229); Carr, *Socialism in One Country*, II: 57.
- 184 *Sotsialisticheskii vestnik*, June 20, 1925: 21.

- 185 *Sochineniia*, VI: 358–9.
- 186 Le Donne, *Russian Empire and the World*, 222.
- 187 1921年3月10日，時任蘇俄駐愛沙尼亞大使的馬克西姆·李維諾夫給愛沙尼亞外交部長送去照會，抗議由原來把守喀琅施塔得的西北軍舊部在愛沙尼亞的領土上組建部隊（「那樣一來，犯罪分子就想把愛沙尼亞變成對俄羅斯共和國採取敵對行動的基地」）。那位愛沙尼亞部長明確否認他們的存在。 *Kronstadtskaia tragediia*, I: 348–9, 371. 證據顯示，在從1922年開始的五年時間裏，蘇聯反間諜機關扣押了一百多名愛沙尼亞特工人員以及同他們合作的人，他們中有35人被處決或者在抓捕時被契卡人員打死。 Tumshis and Papchinskii, *1937, bol'shaia chistka*, 307–8.
- 188 Litvinov and Sidunov, *Shpiony i diversanty*, 39.
- 189 「在偉大的蘇聯周圍，形成了由一些小國組成的包圍圈，那些小國的資產階級在西歐的掠食者國家的支持下堅持了下來」，教育人民委員阿納托利·盧那察爾斯基在談到愛沙尼亞和其他曾經歸沙皇統治的國家時寫道。他把那些國家稱為「不過幾小塊地方」。 A. V. Lunacharskii, “Okrovavlennaia Estoniia” [1925], 見於 Lunacharskii, *Sobranie sochinenii*, II: 308.
- 190 1925年初，斯大林給由自己任命為烏克蘭黨組織負責人的埃馬努伊爾·奎林 (Emanuel Kwiring) 發過一封密碼電報，在提到托洛茨基時說「必須把他趕出革命軍事委員會」，但斯大林又表示，現在大多數人還認為「不宜把托洛茨基趕出政治局，但是可以給一個警告」，以便在再次違反中央政策的時候，政治局可以「立即把他開除出政治局，撤銷他在中央委員會的工作」。「少數人，」據斯大林說，贊成「立即把他趕出政治局但把他留在中央委員會」。斯大林把自己也算在這少數人之列。 *Izvestiia TsK KPSS*, 1991, no. 7: 183.
- 191 *Pravda*, January 20, 1925. 按照官方的說法，托洛茨基是在1925年1月26日根據蘇維埃中央執行委員會的決議被解除職務的。托洛茨基辭職的長信，英譯文可見於 Eastman, *Since Lenin Died*, 155–8. 涅斯托爾的兄弟同時也是阿布哈茲副內務部長的米哈伊爾·拉柯巴 (Mikhail Lakoba)，被安插到托洛茨基的衛隊。格魯吉亞契卡的沙爾瓦·策列鐵里 (Shalva Tsereteli) 也是。 Hoover Institution Archives, Lakoba Papers, 1–47, 1–37.
- 192 *XIV s'ezd VKP (b)*, 484.
- 193 從契卡調到陸海軍人民委員部負責補給的約瑟夫·溫什利赫特成了伏龍芝的第一副手。 *Pravda*, February 7, 1925.
- 194 RGASPI, f.17, op.2, d.162, l.62; *Sochineniia*, VII: 11–4.
- 195 “Literatura po leninizmu,” *Sputnik politrabotnika*, 1925, no. 8–9: 24–40. 另見 “Pomoshch' samoobrazovaniu: kratkaia programma po izucheniiu leninizma po skheme Stalina,” *Krasnyi boets*, 1924, no. 13: 58. 斯大林那天還寫信給《工人報》編委會，稱列寧為「導師」並號召蘇聯人民要愛戴和學習這位已經去世的「領袖」。 *Rabochaia gazeta*, January 21, 1921, 見於 *Sochineniia*, VII: 15 (譯註：《斯大林全集》第7卷，第16頁)。
- 196 *Pravda*, January 30, 1925, 見於 *Sochineniia*, VII: 25–33 (at 27).

- 197 有些觀察家認為契切林當時有強烈的親德傾向，與之聯繫在一起的是一種魯莽的反對英帝國的政策，即支持東方各國的共產黨和爭取民族獨立的鬥爭，而契切林的第一副手馬克西姆·李維諾夫則堅決主張面向英法。Haslam, *Soviet Union and the Threat from the East*, 17.
- 198 參見1923年的爭論：DBFP, VIII: 280–306.
- 199 *Izvestiya*, August 10, 1924; *Dokumenty vneshnei politiki*, VII: 609–36; *Adibekov, Politbiuro TSK RKP (b)—VKP (b) i Evropa*, 48–9.
- 200 *DVP SSSR*, VII: 556–60, 560–1; Jacobson, *When the Soviet Union Entered*, 136–9.
- 201 白俄羅斯有個團體表示反對。他們給《真理報》送去了一篇日期為1924年8月18日的文章（〈論英國條約〉），引用了拉柯夫斯基的話，大意是說，「我們償還舊債」只是為了讓英國提供新的貸款。「因此，我們必須清算十月革命對外國資產階級的幾乎所有的影響，」他們寫道，「沒有人問我們簽訂條約的事情。」他們稱條約是「革命不戰而敗」，因而要求發起全黨的討論。Khromov, *Po stranitsam*, 216–7 (RGASPI, f. 558, op. 11, d. 290, l. 5–7). 在這篇文章上署名的有N. 馬卡羅夫 (N. Makarov)、P. 列布列夫 (P. Leblev) 和A. 瓦西列夫 (A. Vasilev)，他們來自明斯克省的一個村子。《真理報》把文章底稿送給了斯大林。1924年8月25日，斯大林把它交給白俄羅斯中央委員會（黨組織負責人是阿薩特金 [Asatkin]）：「必須查清楚提到名字的那些人是不是黨員，他們有沒有在文章上署名，如果署了名，為甚麼要寫這些東西。對作者不要採取任何鎮壓措施」（l. 3）。換句話說，英國保守黨人和白俄羅斯左傾的共產黨人立場一致。
- 202 事實上，蘇聯對於和英國的關係還是非常重視的，這從派去的使節就可以看出來：克拉辛、拉柯夫斯基、多夫加列夫斯基 (Dovgalevsky) 和邁斯基。
- 203 Hilger and Meyer, *Incompatible Allies*, 124.
- 204 親西方的德國人承認「拉帕洛協定給了我們許多，在國際政治上也提供了某種砝碼，但布爾什維克利用得更多」，而且他們反對共產國際的特工。D'iakov and Bushueva, *Fashistskii mech kovalsia v SSSR*, 60–4 (RGVA, f. 33987, op. 3, d. 98, l. 153–7; February 5, 1925).
- 205 這位伯爵曾經為1919年卡爾·拉狄克在德國出獄幫過忙。Debo, *Survival and Consolidation*, 67–70.
- 206 Ulrich Brockdorff-Rantzau, *Dokumente*, 146ff.
- 207 Rosenbaum, *Community of Fate*; O'Connor, *Diplomacy and Revolution*, 95–6.
- 208 Volkogonov, *Lenin: Life and Legacy*, xxxiii (RGASPI, f. 2, op. 2, d. 515, l. 1)
- 209 Akhmatzian, "Voennoe sotrudnichestvo SSSR," Zeidler, *Reichswehr und Rote Armee* [1994].
- 210 Dyck, "German-Soviet Relations," 68 (引自德國外交部檔案, L337/L000564–68: 蘭曹致施特雷澤曼, 1925年3月9日).
- 211 Dyck, "German-Soviet Relations," 69 (引自德國外交部檔案, 5265/E317849–52: 蘭曹致外交部, 1924年12月1日).
- 212 Carr, *Socialism in one Country*, III: 257.
- 213 Jacobson, *When the Soviet Union Entered*, 156–8.

- 214 “K mezhdunarodnomy polozheniiu i zadacham kompartii,” *Pravda*, March 22, 1925, 見於 *Sochineniia*, VII: 52–9 (53).
- 215 到1933年為止，在利佩茨克共培養了450名德國空軍飛行員。
- 216 Gorlov, *Sovershenno sekretno: al'ians Moskva-Berlin*, 146.
- 217 Schroeder, “The Lights that Failed.” Beck, *Dernier rapport*. 另見 Salzman, *Great Britain, Germany and the Soviet Union*; Johnson, *Locarno Revisited*; Wright, “Locarno: a Democratic Peace?”
- 218 Jacobson, *When the Soviet Union Entered*, 174. 就像雅各布森在別的地方所概括的，「法國的安全是德國的不安全；德國的安全是波蘭的不安全」。Jacobson, “Is There a New International History of the 1920s?,” 620.
- 219 *Pravda*, October 20, 1925; *Izvestiia*, November 24, 1925 (李維諾夫)。
- 220 為蘇聯工作的頂級分析師、匈牙利經濟學家葉尼奧·瓦爾加 (Jenő Varga, 生於1879年) 擔任過短命的貝洛·庫恩的匈牙利蘇維埃政府財政部長，他在共產國際代表大會上作過關於「資本主義危機」的長篇報告，但是隨着洛迦諾公約的簽訂，瓦爾加等人也開始談論「資本主義的穩定化」了。1926年，瓦爾加站在斯大林一邊，反對托洛茨基和季諾維也夫的聯合反對派；瓦爾加很快成為斯大林在對外政策方面的高級助手之一，負責1925年成立的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他取代了費奧多爾·A·羅特施泰因 (Fyodor A. Rothstein) ——羅特施泰因出生於沙皇時代的立陶宛，在英國生活了30年——但在研究所的刊物上發表過托洛茨基的文章。Eran, *The Mezhdunarodniki*, 32; Duda, *Jenő Varga*, 37, 85, 97–8; Mommen, *Stalin's Economist*.
- 221 RGASPI, f. 558, op. 11, d. 23, l.126–7: 為1925年12月黨的第十四次代表大會主報告所做的筆記，至於他所作的報告，參見 *Sochineniia*, VII: 273–4.
- 222 *Sochineniia*, VII: 12–13, 28, 280.
- 223 White, “Early Soviet Historical Interpretations.” 1925年2月，謝爾蓋·基洛夫對自己領導下的巴庫黨組織作了關於托洛茨基的〈十月的教訓〉的報告。他說，「這裏的問題不在於某些簡單的理論上的鬥爭，相反，不誇張地說，這裏的問題是我們的黨和我們的革命的命運問題」——這也許是承認，理論上的爭論消耗了大量的精力，已讓人精疲力竭。 *Bakinskii rabochii*, February 5, 1925.
- 224 Lenoe, “Agitation, Propaganda, and the ‘Stalinization’ of the Soviet press,” 6.
- 225 Volkogonov, *Trotsky*, 207. 在1923年紀念紅軍建軍五週年的展覽中，用了整整一個房間來陳列傳說中托洛茨基內戰時期乘坐的列車，但這輛在1922年進行了最後一次旅行的列車在1924年7月正式退役了。 *Iubileinaia vystavka Krasnykh*; Argenbright, “Documents from Trotsky’s Train.”
- 226 Medvedev, *Let History Judge*, 145. 伊薩克·則連斯基 (Isaac Zelensky) 1924年6月才被任命為中央委員會的書記之一；8月，他被派往塔什干。
- 227 烏格拉諾夫後來說，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接連找我談話，從談話中我明白了，他們繞來繞去是想把他們與斯大林的不和強加到我的身上」，但他「謝絕了他們的邀請」。 *XIV s'ezd VKP (b)*, 193. 早在列寧格勒時，當烏格拉諾夫和黨的許

- 多年輕官員與季諾維也夫發生衝突時，列寧，還有斯大林和莫洛托夫，都支持那些年輕人。Merridale, *Moscow Politics*, 29 (引自 *Moskovskaia Pravda*, February 12, 1989). 另見 Bazhanov, *Damnation of Stalin*, 142; 以及 Carr, *Socialism in One Country*, II: 62.
- 228 Nadocheev, “‘Triumvirat’ ili ‘semerka’?” 61–82. 這個集團也被稱為「領導集體」。托洛茨基肯定懷疑人們在背着他開會。1926年，季諾維也夫在斯大林欺負到自己頭上之後，也對托洛茨基承認了「七重奏」的存在。但托洛茨基直到1927年才對「七重奏」的做法提出抗議。Fel’shtinskii, *Kommunisticheskaia oppositsiia v SSSR*, III: 87; Lars Lih, “Introduction,” 見於 Lih, *Stalin’s Letters to Molotov*, 5.
- 229 斯大林和布哈林的同盟似乎在1924年底就開始形成，而且是斯大林倡議的：XIV s’ezd VKP (b), 136, 397–8, 459–60, 501; Cohen, *Bukharin*, 429, n1. 關於三駕馬車的解體，參見 Daniels, *Conscience of the Revolution*, 235–7; Carr, *Socialism in One Country*, II: chapter 13.
- 230 Trotskii, *Sochineniia*, III/i: xi–lxvii; *Uroki Oktiabria*; “Lessons of October,” 見於 Trotsky, *The Essential Trotsky*, 125, 157, 172, 175. 另見 Deutscher, *Prophet Unarmed*, 151ff; 以及 Pavluchenkov, *Rossia Nepovskaia*, 97 (引自 RGPASI, f. 325, op. 1, d. 361, l. 3). 早在1924年10月16日，斯大林、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就在加米涅夫家中開過會，商量怎樣利用《真理報》和其他言論陣地追擊並打敗托洛茨基——但他伏擊了他們。托洛茨基寫的〈十月的教訓〉是其《全集》第三卷的長篇導言，這一卷講的是1917年，並不是按照發表時間排序。到1927年，《全集》一共出了21卷，比包括列寧在內的其他任何一位高級領導人都多。Trotskii, *Sochineniia*. 另見 *Ekonomicheskaiia zhizn’*, December 10, 1924. 和托洛茨基一樣，季諾維也夫也有幾位助手記錄他的言論，以備隨後發表。1924年出版了6卷季諾維也夫的「著作」（第一卷序言的日期為1923年10月）：Zinov’ev, *Sobranie sochinenii*, I, II, III, V, XV, XVI. 編輯《列寧全集》的加米涅夫沒有出版自己的全集；他在1907年曾試圖出一套三卷版（簽了合同可是不了了之），但他在1924年出版了自己演講集中的3卷（第一、十、十二卷）。出版工作很快就停止了。
- 839 231 *Pravda*, November 2, 1924 (布哈林), 轉載於 *Za leninizm*, 9–25; *Trotskizm i molodezh’*, 41–7 (季諾維也夫); *Bol’shevik*, 1925, no. 14 (November 5): 105–13 (索柯里尼柯夫); *Za leninizm*, 28–30, 60–2 (加米涅夫).
- 232 *Pravda*, November 26, 1924. 另見 Kamenev, *Stat’i i rechi*, I: 188–243; *Za leninizm*, 87–90, 94–5; 以及 Stalin, *Sochineniia*, VI: 324–57. 另見 Zinoviev, *Bol’shevizm ili trotskizm?*.
- 233 *Pravda*, December 16, 1924, 見於 Krupskaiia, *Izbrannye proizvedeniia*, 142–3; McNeal, *Bride of the Revolution*, 249. 還不清楚是誰把這些尖銳言詞插入克魯普斯卡婭比較溫和的原文中的。
- 234 “Yenukidze” [January 8, 1938], 見於 Trotskii, *Portrety revoliutsionerov* [1991], 233–44 (at 241), [1984], 251–72 (at 264–6). 1925年3月22日，南高加索人民委員會副主席、被叫做米亞斯尼科夫 (Myasnikov) 的亞歷山大·米亞斯尼基揚 (Alexander Myasnikyan) 和南高加索契卡負責人索羅門·莫吉列夫斯基 (Solomon Mogilevsky),

乘坐的一架容克飛機起飛後在梯弗利斯機場附近墜毀。兩天後，另一架飛機帶着托洛茨基的兩位朋友兼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來了：蘇聯駐法大使拉柯夫斯基和郵政人民委員斯米爾諾夫。斯米爾諾夫聲稱，斯大林的親密夥伴、中央執行委員會書記阿韋利·葉努基澤為他們提供了飛機。失事飛機在空中已經着火，而起火原因根本沒有找到。兩名飛行員也死了。貝利亞是第一個調查小組的負責人，沒有得出甚麼結果；由莫斯科過來的卡爾·保克爾(Karl Pauker)領導的第二個以及後來的第三個調查小組也根本沒有查明事故的真相。托洛茨基懷疑是格魯吉亞的孟什維克幹的，他從蘇呼姆去梯弗利斯參加了葬禮。*Trudovaia Abkhazia*, March 25, 1925; *Proletarskaia revoliutsiia*, 1925, no. 6: 234–6; *Biulleten' oppozitsii*, January 1939: 2–15.

- 235 Nazarov, *Stalin i bor'ba za liderstvo*, 108–9 (引自RGASPI, f. 17, op. 2, d. 179, l. 105).
- 236 Anfert'ev, *Smerch*, 233. 索柯里尼柯夫遇到加林娜(生於1905年)時她17歲，正準備進入莫斯科大學醫學系讀書——他們在大都會飯店住的地方要從同一個入口進去(她住在他樓上)；他經常在晚上過來和她的第一任丈夫列昂尼德·謝列布里亞科夫下棋，她是在1923年嫁給謝列布里亞科夫的，但到了1925年就離開他嫁給了索柯里尼柯夫。Galina Serebriakova, “Iz vospominanii,” 見於Anfert'ev, *Smerch*, 235.
- 237 Anfert'ev, *Smerch*, 233–4.
- 238 Woodruff, *Money Unmade*, 27; Sokol'nikov, *Novaia finansovaia politika*, 200–1.
- 239 Johnson and Temin, “The Macroeconomics of NEP,” 753. 關於那種懷疑態度，參見Barmine, *One Who Survived*, 125; 以及Serge, *Ot revoliutsii k totalitarizmu*, 177.
- 240 Bourne and Watt, *British Documents on Foreign Affairs*, VII: 376 (未註明日期，日期是根據內容推斷的)。
- 241 *Vestnik Kommunisticheskoi Akademii*, 1924, no. 8: 47–116, 轉載於*Novaia ekonomika* (1926), 52–126. 布哈林反駁文章的標題是〈怎樣破壞工農聯盟〉(《真理報》，1924年12月12日)。另見Carr, *Socialism in One Country*, I: 219–26.
- 242 L. A. Neretina, “Reorganizatsiia gosudarstvennoi promyshlennosti v 1921–25 godakh: pronsipy i tendentsii razvitiia,” 見於Davies, *NEP*, 75–87; Brovkin, *Russia After Lenin*, 179–81. 私人貿易比私人工業普遍得多，但反覆受到打擊。Davies, *Soviet Economy in Turmoil*, 76–9.
- 243 Sokol'nikov, *Gosudarstvennyi kapitalizm; Leninskii sbornik*, XXIII: 192–3.
- 244 季諾維也夫企圖控制農業政策，呼籲黨要「面向農村」，此舉一定程度上是一種策略，是為了提高他作為列寧接班人的地位。不過，季諾維也夫的無知是顯而易見的：到1924年7月3日，他控制的《列寧格勒真理報》還在說會大量出口糧食。*Pravda*, July 30, 1924; *Leningradskaia pravda*, July 30, 1924; Zinov'ev, *Litsom k derevne*.
- 245 *Izvestiia*, September 3, 1924 (李可夫); Reswick, *I Dreamt Revolution*, 84–96. (雷齊克是在俄國出生的美國公民，他情願為蘇維埃政權所用，以換取無可比擬的權限。)
- 246 中央委員會書記安德烈·安德烈耶夫視察了西伯利亞、烏拉爾和北高加索，並看到了問題的核心。「行政部門開始採取的規則放大了我們制度中可怕的繁文縷



節，主要的問題就在這裏，」他說，「我們蘇維埃和黨的工作人員很少關心農民提出的小而具體的問題，而是把大量時間用於給出一般性的答案。種地的人問的是具體的問題，得到的回答卻是關於國家和國際大事的空話。」Gimpel'son, *NEP*, 384 (引自 RGASPI, f. 17, op. 112, d. 733, l. 170).

- 247 在1925年1月3日的政治局會議上，斯大林要求與會者讀一讀達維德·達林 (David Dallin) 在孟什維克流亡報紙上分期連載的小說，因為「它含有豐富的資料，涉及農民對農業合作社是怎樣想的，以及他為甚麼更喜歡合作社」。斯大林不同意索柯里尼柯夫說的「消費合作社是向未知領域的飛躍」，但他同意後者所強調的需要把關注的焦點放在農業合作社上。斯大林認為應該允許富農成為社員：「這樣做意義重大，因為它會產生刺激作用，讓整個村子加入合作社。」與此同時，他不同意俄羅斯社會主義聯邦蘇維埃共和國的農業人民委員亞歷山大·斯米爾諾夫所建議的，要允許富農不僅加入，而且還管理合作社。「在對社會的管理方面，哪怕是一個富農都會是危險的，」斯大林說，「富農都是些聰明人，見過世面。要是擔任管理職務，他能把十個不是富農的人爭取過去。」他回憶起列寧的指示，說的是在內戰結束後可以讓富農參加蘇維埃的選舉，可打敗白軍已經五年了，斯大林仍然說「我們離完全消除內戰還有很長的路要走，我們還不會很快到達那裏」。Vadin, *Stenogrammy zasedanii Politburo*, I: 305–7, 314–5; *Sotsialisticheskii vestnik*, 1925, no. 20, 21, 23, 24. 另見 Plekhanov, *VChK-OGPU*, 91 (引自 *Nashe otechestvo* [Moscow: Terra, 1991], II: 197).
- 248 Male, *Russian Peasant Organization*.
- 249 *Bol'shevik*, 1924, no. 3–4: 23, 25 (斯列普科夫).
- 250 Gladkov, *Sovetskoe narodnoe khoziaistvo*, 73, 343.
- 251 *Pravda*, December 19, 1924; Carr, *Socialism in One Country*, 208–11.
- 252 *Sochineniia*, VI: 135, 243–4.
- 253 *Pravda*, June 4, 1930, 見於 *Sochineniia*, VI: 321.
- 254 *Pravda*, January 30, 1925, 見於 *Sochineniia*, VII: 25–33 (at 28).
- 255 *XIV konferentsiia VKP (b)*.
- 256 參見斯大林對新經濟政策的讚揚，那是在莫斯科黨組織會議上關於黨的第十四次代表會議的報告中說的：*Pravda*, May 12 and May 13, 1925, 轉載於 *Sochineniia*, VII: 90–132 (at 128–9). 另見 Graziosi, “Building the First System.”
- 257 RGASPI, f. 558, op. 11, d. 23, l. 45. 後來這兩個人民委員部 (1926) 合併時，斯大林任命了米高揚為貿易人民委員。
- 258 Eichengreen, *Golden Fetters*, 4–5; Pittaluga, “The Genoa Conference.” 有人認為，在經濟領域為控制物價而採取威權主義的干預政策，其原因還在於金本位及其所要求的平抑物價。Polanyi,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233–4.
- 840 259 Vadin, *Stenogrammy zasedanii Politbiuro*, I: 379 (1925年11月2日), I: 533 (1925年12月12日), II: 507 (1927年1月3日). 感謝保羅·格里戈里 (Paul Gregory) 教授給我指出斯大林在黨的論壇上對政治經濟問題表現出的洞察力。
- 260 Bukharin, “O novoi ekonomicheskoi politiki i nashikh zadachakh,” 3–15.

- 261 為強調這一主題，布哈林寫了一本小冊子——《在西歐無產階級尚未取得勝利的情況下我們能否在一國建設社會主義？》（1925年4月）。因為要召開黨的第十四次代表會議（1925年4月27–29日），斯大林對季諾維也夫的提綱草案作了修改，刪掉了某些段落，插入了另外一些段落，結果就有了如下內容：「列寧主義教導說，從完全防止資產階級關係復辟的意義上來講，社會主義的最終勝利只有在世界範圍內（或者是在幾個具有決定作用的國家中）才有可能。」斯大林還進一步說道：「總的來說，社會主義在一國的勝利（不是指最終的勝利）是絕對可能的。」RGASPI, f. 558, op. 1, d. 3359, ll.11, 6, 15. 1925年9月，季諾維也夫在其有關列寧主義的著作中，對斯大林的觀點進行了批判，但他的批判在思想上缺乏連貫性（在某個地方他寫道，「如果有人問我們是否能夠並且必須在一國建立社會主義，我們會回答說，我們能夠並且必須在一國建立社會主義」）。Van Ree, “Socialism in One Country,” 107. 1925年9月，黨的書記處的新聞部門負責人約納瓦·瓦列伊基斯出版了一本小冊子《能否在一國實現社會主義？》（Moscow: Molodaia gvardiia, 1925），稱讚斯大林1924年12月的文章是列寧逝世以來對列寧主義唯一的重大貢獻！
- 262 Lih, “Zinoviev.” 利赫正確地指出，卡爾誤以為1924年1月（黨的第十三次代表會議）之後「可以清楚地看到，問題在於性格而不是原則」。Carr, *Interregnum*, 340.
- 263 Black, “Zinoviev Re-Examined.”
- 264 Brovkin, *Russia After Lenin*, 160（引自RGASPI, f. 17, op. 16, d. 766, l. 253）.
- 265 *Sochineniia*, VII: 153. 卡爾在自己的書中談到了這個插曲，參見Carr, *Socialism in One Country*, I: 260, 284.
- 266 PSS, XLIII: 330, 333, 357, XLIV: 325, XLV: 372.
- 267 Carr, *Socialism in One Country*, II: 79.
- 268 *Pravda*, May 13, 1925; *Sochineniia*, VII: 132.
- 269 *Sochineniia*, VII: 111, 123–4.
- 270 「從這些信中可以感受到那麼多的憤怒和失落，真讓人覺得不知所措，」《新農村》期刊的編輯報告說，「我們以前收到的來信對於日子紅火的新農戶從來沒有像現在這樣顯得那麼不滿、仇恨和嫉妒。饑餓貧窮的農民開始仇恨日子興旺、辛苦勞動的農民，甚至想毀掉他們。」Brovkin, *Russia After Lenin*, 159（引自RGASPI, f. 17, op. 87, svodka 45），160.
- 271 Ehrenburg, *Memoirs*, 68.
- 272 Sutton, *Western Technology and Soviet Economic Development*, I: 256（引自U.S. State Department Decimal File, 316–164–205）.
- 273 有位稱新經濟政策「最多是武裝停火」的美國記者，在談到耐普曼時寫道，它是「一個勉強被容忍的、被所有人看不起和侮辱的、受政府壓迫的階級。它成了一出資本主義的鬧劇，扭捏、善變、膽怯、荒唐的鬧劇。」Lyons, *Assignment in Utopia*, 84–5. 1925年，對耐普曼徵收的，僅正式的稅費就超過了戰前對商人徵收的稅費。但官員們還要對「奢侈品」額外徵收「懲罰性」稅費，而對「奢侈品」的界定隨意性很大。Trifonov, *Ocherki istorii klassovoi bor'by*, 84.

- 274 受賄和其他形式的腐敗早就出現了，而且一直存在：Epikhin and Mozokhin, *VChK-OGPU v bor'be s korruptsiei*, 312 (TsA FSB, f. 66, op. 1, por. 36, l. 324), 315–17 (TSA FSB, f. 66, op. 1, po. 106, l. 64–64ob), 334–35 (TSA FSB, f. 66, op. 1, d. 108, l. 83), 339 (APRF, f. 3, op. 58, po. 187, l. 16), 482–4 (TsA FSB, 2, op. 4, por. 32, l. 5–6); Plekhanov and Plekhanov, *F. E. Dzerzhinskii*, 442–3 (TsA FSB, f. 66, op. 1–T.D. 100v, l. 6).
- 275 Deutscher, *Prophet Unarmed*, 202, n1.
- 276 Lih, *Stalin's Letters to Molotov*, 69–84; Kosheleva, *Pisma I. V. Stalina V. M. Molotovu*, 13–26.
- 277 *Bol'shevik*, 1925, no. 16 [September]: 67–70. 另見 Carr, *Socialism in One Country*, II: 74–7; Deutscher, *Prophet Unarmed*, 169–70, 247–8; Eastman, *Love and Revolution*, 442–55, 510–16.
- 278 斯大林後來引用了托洛茨基的話：「關於隱瞞或違背『遺囑』的一切論調，都是惡意的捏造，完全違反弗拉基米爾·伊里奇的本意和他所建立的黨的利益。」*Sochineniia*, X: 175 (譯註：《斯大林全集》第10卷，第151頁)。
- 279 *Bol'shevik*, 1925, no. 16 [September]: 67–70. 《布爾什維克》一期的印數有4萬份。加米涅夫、布哈林和雅羅斯拉夫斯基都是五人編委會的成員。
- 280 Valentinov, *Novaia ekonomicheskaia politika* [1991], 295.
- 281 托洛茨基後來聲稱，聲明是「政治局的多數派強加給我的」。 *Biulleten' oppozitsii*, March 19, 1931 (1928年9月11日的信)。
- 282 她的批駁文章提出的問題有，她是否捲入了伊斯特曼事件，是否有可能與托洛茨基有聯繫。 Shvetsov, "Lev Trotskii i Maks Istmen," 141–63.
- 283 *Bol'shevik*, 1925, no. 16: 71–3 (克魯普斯卡婭的信註明的日期是1925年7月7日)。
- 284 有些人認為拉柯夫斯基是中間人，而另一些人說是克魯普斯卡婭。據說是克魯普斯卡婭把它交給了一位準備到國外參加國際債務會議的反對派成員，而後者又在巴黎把它交給了法國的左翼分子波里斯·蘇瓦林。 McNeal, *Bride of the Revolution*, 258; Trotsky, *The Real Situation in Russia*, 320–3.
- 285 伏龍芝還免除了許多類型的群體服兵役的義務，而且他稱讚民族部隊在世界大戰中的表現。 Berkhin, *Voennaia reforma*, 116–45; Erickson, *Soviet High Command* [2001], 164–213; Von Hagen, *Soldiers in the Proletarian Dictatorship*; Von Hagen, "The levée en masse," 159–88. 改革背後的許多爭論是在1921年3月黨的第十次代表大會的一次閉門會議上開始的，謝爾蓋·古謝夫和米哈伊爾·伏龍芝主張按照新的「全國性防禦戰爭」的戰略對紅軍進行重組，而托洛茨基則認為紅軍應該遵照「輸出革命」的戰略。 Simonov, *Voenno-promyshlennyi kompleks SSSR*, 22.
- 286 Sokolov, *Ot voenproma k VPK*, 39–42 (引自 RGAE, f. 2097, op. 1, d. 64, l. 8–24: 1924年3月2日的報告)。
- 287 Kavtaradze, *Voennye spetsialisty*, 174. 到了1921年1月1日，在紅軍各級指揮官中，沙皇軍官已佔到34%，總共約1.2萬人。1921年，特別部對紅軍的人員狀況作了系統的調查，收集了大約40萬份包含15個問題的調查表，目的是查找那些內戰期間曾在白軍或民族軍隊服役的人。 Zdanovich, *Organy gosudarstvennoi bezopasnosti*, 337 (引自 TsA FSB, f. 1, op. 6, d. 670, 216–216ob)。

- 288 Kavtaradze, *Voennye spetsialisty*, 174; Zdanovich, *Organy gosudarstvennoi bezopasnosti*, 342 (引自 Arkhiv UFSB po Omskoi oblasti, f. 39, op.3, d. 4, l. 77); Zdanovich, *Organy gosudarstvennoi bezopasnosti*, 269 (引自 TsA FSB, f. 2, op. 3, d. 674, l. 5); Antonov-Ovschenko, *Stroitel'stvo Krasnoi armii*, 31.
- 289 Trotskii, *Kak vooruzhalas' revoliutsiia*, II: 92–3.
- 290 Zdanovich, *Organy gosudarstvennoi bezopasnosti*, 102, 引自 TsA FSB, f. 2, op. 3, d. 773, l. 2 (A. 斯涅薩列夫)。蘇聯的國外情報機關設法在 27 個國家招募了代理人或代表。Plekhanov, *VChK-OGPU*, 283; Kapchinskii, *Gosbezopasnosti iznutri*, 115 (引自 GARF, f. 130, op. 5, d. 89, l. 565–6), 117 (引自 RGASPI, f. 17, op. 84, d. 227, l. 57)。革命和內戰期間離開俄國的有 200 萬人，此時仍在國外的可能有 120 萬人。在沒有離開的人中間，很多都有「國外的」親戚，而那些親戚往往生活在從前屬於俄羅斯帝國的領地上，他們和這些親戚有書信往來，結果成了全面審查的對象。V *Zhernovakh revoliutsii*; RGASPI, f. 76, op. 3, d. 331, l. 1–2 (March 30, 1924).
- 291 關於「托拉斯」行動的緣由，有兩種不能同時成立的說法。按照有些說法，成立地下的反蘇兄弟會起初是波蘭情報機關幹的：1920 年春，據說波蘭地下軍事組織的秘密成員維克托·基亞科夫斯基—斯捷茨克維奇 (Wiktor Kijakowski-Steckiewicz, 生於 1889 年) 接到任務，要潛入蘇聯，在彼得格勒建立情報網，但他被捕了，而根據有些說法，他同意合作。(後來，在妻子離開之後，他因為絕望而企圖自殺，不再為反間諜機關工作。1932 年，他被調到對外情報機關，被派往蒙古，結果在那裏的一次暴動中身亡。) 另外一個故事的主角是亞歷山大·亞庫舍夫 (Alexander Yakushev)，他是交通人民委員部的官員，也是堅定的君主派，在被截獲的郵件中有他的名字。格伯烏沒有把他那幾個零星的同夥抓起來，而是說服他合作，成立了「俄羅斯中部君主派組織」，代號「托拉斯」(就像在公司一樣)。參見 Voitsekhovskii, *Trest*.
- 292 Fleishman, *V tiskakh provokatsii*; Gilensen, “V poednike s pol'skoi ‘dviukoi’ pobedili sovetskie ‘monarkhisty’,” 75; Gaspar'ian, *Operatsiia Trest*; Seregin, “Vyshii monarkhicheskii sovet i operatsiia ‘Trest’,” 67–72; 以及 Pares, *My Russian Memoirs*, 595.
- 293 Minakov, *Sovetskaia voennaia elita*, 58 (引自 GARF, f. 5853, op. 1, d. 1–24: 來自柏林移民的秘密分析報告，1922 年 2 月 15 日)。弗蘭格爾駐柏林的代表馮·蘭珀 (von Lampe) 將軍在日記中提到圖哈切夫斯基時，說他是一個「革命的波拿巴」。Zdanovich, *Organy gosudarstvennoi bezopasnosti*, 280–1, 引自 GARF, f. 5853, op. 1, d. 2, l. 422.
- 294 “Glavkoverkh Tukhachevskii,” *Rul'*, October 1922 (作者是化名為安塔爾 (Antar) 的 F. 卡薩特金—羅斯托夫斯基 (F. Kasatkin-Rostovsky) 公爵); Minakov, *Sovetskaia voennaia elita*, 60–2.
- 295 雜誌背後的支持者是 B. 博爾特諾夫斯基 (B. Bortnovsky) 和 G. 泰奧多里 (G. Teodori)，雖然雜誌的編輯是 M. I. 特莫諾夫 (M. I. Tmonov) (然後是 A. K. 克利切夫斯基 (A. K. Kelchevsky)、再然後是 V. 科洛索夫斯基 (V. Kolossovsky))。泰奧多里想為圖哈切夫斯基在華沙的失利開脫，說當時他的側翼由於另外一支蘇軍未能



- 趕到而暴露（這是影射斯大林）；泰奧多里在蘇聯報刊上提出了同樣的看法。另見前布拉格檔案館評論家N. 科爾熱涅夫斯基 (N. Korzhenevsky) 的隨筆：Ioffe, “Trest’: legendy i fakty.”
- 296 西部軍區演習期間，特別部懷疑圖哈切夫斯基對波蘭復仇心切，有可能擅自發動戰爭：他的所有命令和行動在1923年夏天都突然受到極其仔細的調查。演習結束後，1923年9月29日，對與波蘭有關的任何事情都非常關心的捷爾任斯基命令奧格伯烏中央特別部對圖哈切夫斯基進行更加徹底的調查。知道結果後，捷爾任斯基在1924年1月寫信給維亞切斯拉夫·明仁斯基，下令立即採取行動。「不能被動等待斯摩棱斯克（西部軍區司令部）對克里姆林宮發號施令。」Zdanovich, *Organy gosudarstvennoi bezopasnosti*, 285–7（引自 TsA FSB, f. 2, op. 1, d. 882, l. 829; op. 2, d. 27, l. 1; d. R-9000, t. 24, l. 165）。1925年在明斯克舉行的白俄羅斯第七次蘇維埃代表大會上，圖哈切夫斯基說白俄羅斯政府「應該把（與波蘭的）戰爭問題納入議事日程」。VII Vsebelorusskii s’ezd sovetov, 231.
- 297 10月8日（星期四），醫生們做出決定，他必須進行手術；內出血讓伏龍芝很擔心，但他仍然猶豫不決。斯大林先是派米高揚去催促伏龍芝進行手術，然後又親自去了他那裏。伏龍芝寫信給留在雅爾塔的妻子索菲婭說：「我還在醫院。星期六（1925年10月10日）將再次會診。不知怎麼的，我恐怕手術會遭到拒絕。」Kanonenko, “Kto ubil Mikhail Frunze”（引自 RGVA, f. 32392, d. 142, l. 3–5）.
- 298 沃爾科戈諾夫對這封信的解讀斷章取義：Volkogonov, *Triumfi tragediia*, II: 127–8. 信的全文可見於 Kanonenko, “Kto ubil Mikhaila Frunze.”
- 299 *Pravda*, October 29 以及 October 31, 1925; *Pravda*, November 1, 1925（做屍檢的是亞·伊·阿布里科索夫，整個醫療團隊都簽了名）.
- 300 Bazhanov, *Damnation of Stalin*, 100–2; Bazhanov, *Vospominaniia* [1990], 141; Gamburg, *Tak eto bylo*, 181–2.
- 301 *Pravda*, November 3, 1925.
- 302 托洛茨基的一位支持者對作家鮑里斯·皮利尼亞克 (Boris Pilnyak) 講的伏龍芝被謀殺的說法很快被整理成中篇小說〈不滅的月亮的故事〉，發表在期刊《新世界》上；書報檢查人員後來沒收了所有印好的雜誌。Ulam, *Stalin*, 260–1; Carr, *Socialism in One Country*, II: 123–4. 在老布爾什維克協會的支持下，伏龍芝的戰友們要求專門進行調查。衛生人民委員尼古拉·謝馬什柯證實說，中央醫療調查小組當初並沒有潰瘍方面的專家，而在調查小組作出裁決之前，羅扎諾夫教授已經跟斯大林和季諾維也夫講了。調查可能頂多就是這樣。Medvedev, *Let History Judge*, 156–8. 後來，斯大林還被指控為安排謀殺了托洛茨基從前在陸海軍人民委員部的第一副手埃夫拉伊姆·斯克良斯基。斯克良斯基是在1925年8月在紐約州最北部的一座湖上划船時發生事故身亡的，那座湖在曼哈頓北面350英里（編註：約563公里），當時他是在拜訪蘇美貿易公司（阿姆托爾戈）負責人以賽亞·胡爾金 (Isaiah Hoorgin)。兩人在等待返回紐約的列車時，為了打發時間就划起了小船，沒想到來了一陣大風把船打翻了。兩人都不是划船的好手，而其他幾條小船上隨行的工作人員又離得太遠（也可能是酒喝多了），沒能救得

了他們。胡爾金38歲，斯克良斯基33歲。L. Trotskii, "Sklianskii pogib," *Pravda*, August 29, 1925; *New York Times*, August 30, 1925; *Time*, September 14, 1925; *Pravda*, September 22, 1925. 巴扎諾夫提出了謀殺指控；死亡事件是發生在他不再為斯大林工作之後：Bazhanov, *Damnation of Stalin*, 65-6. 失去胡爾金的影響很大。1925年底李維諾夫寫信給斯大林，催促任命「一位有威信的同志，他要能立即承擔起政治工作的領導任務，與美國政府的官方代表會晤並進行非正式的談判，主動示好，對對方類似的友好姿態作出回應等」。Gaiduk, "Sovetsko-Amerikanskii otnosheniia" (引自RGAE, f. 413, op. 2. d. 2040, l. 144-5). 胡爾金的副手彼得·齊夫(Pyotr Ziv)臨時接管了工作。阿姆托爾戈很快被交給紹爾·布龍(Saul Bron)。

303 Zal'kind, "O zabolevaniikh partaktiva." 1925年11月，列昂尼德·克拉辛得了重病；血液檢查表明是患了嚴重的貧血。一直在做輸血試驗的亞歷山大·波格丹諾夫(Alexander Bogdanov)建議輸血，克拉辛在親自查看了這項研究後表示同意，結果他似乎變得年輕了——當時紛紛說這是一種神奇的療法，據說斯大林還召見了波格丹諾夫。波格丹諾夫拜訪斯大林(1925年12月底)的事情在前者的日記中有記錄，但是在斯大林辦公室的日志裏沒有；他們討論的內容現在還不清楚。1928年，波格丹諾夫因為實驗失敗而死亡：他在又一次進行輸血實驗時使用了一名患有瘧疾和肺結核的學生的血液；有可能血型不匹配。Krementsov, *A Martian Stranded*, 61 (引自GARE, f. A-482, op. 42, d. 590). 1936年，扎爾金(Zalkind)在回家的路上死於心臟病，時年48歲。

842

304 RGASPI, f. 17, op. 84, d. 704, l. 27.

305 參見Adibekov, *Politbiuro TsK RKP (b)—VKP (b): povestki dnia zasedanii*, I: 421; RGASPI, f. 17, op. 3, d. 533, l. 10; Kremntsov, *A Martian Stranded*, 66 (引自RGASPI, f. 17, op. 84, d. 701, l. 73-95); *Izvestiia*, February 28, 1926: 5. 兩名德國專家是弗里德里希·克勞澤(Friedrich Krause)和奧特弗里德·弗爾斯特。

306 Teplianikov, "Vnikaia vo vse," 169-70. 奧爾忠尼啟則被任命為共和國革命軍事委員會委員。

307 *Voennye arkhivy Rossii*, vyp. 1: 406.

308 *Pravda*, November 7, 1925.

309 圖哈切夫斯基寫道(1926年1月31日)：「我已經向您口頭匯報過紅軍參謀部是在不正常的條件下工作的，在那種條件下不可能進行富有成效的工作，參謀人員也難以承擔交給他們的職責。」Minakov, *Stalin i ego marshal*, 356-7.

310 Samuelson, *Soviet Defense Industry Planning*, 41.

311 Merridale, *Moscow Politics*, 260. 加米涅夫多次提出要把工人工資提高20%，雖然他作為勞動國防委員會(與政府平行的執行機構)主席，知道沒錢去實行。他還提議應該讓工人分享工廠的利潤(幾乎所有的工廠都不盈利)。Moskovskie Bol'sheviki, 128-9 (引自MPA, f. 3, op. 6, d. 28, l. 45; XIV Moskovskaia gubpartkonferentsiia: biulleten' no. 1, 133).

312 Carr, *Socialism in One Country*, II: 66. 陰謀升級為這些委員的幾次「私人會議」：Dmitrenko, *Bor'ba KPSS za edinstvo svoikh riadov*, 211.

- 313 *Politicheskii dnevnik*, 238–41; Kvashonkin, *Bol'shevistskoe rukovodstvo*, 309–12 (RGASPI, f. 76, op. 2, d. 28, l.1–8); Kun, *Bukharin*, 159–61.
- 314 Blobaum, *Feliks Dzierzynski*, 231. 關於捷爾任斯基為奧格伯烏所作的辯護，尤其是反對布哈林的情況，參見 Koenker, *Revelations*, 18–9 (RGASPI, f. 76, op. 3, d. 345, l.1–1ob, 2–2ob); 以及 Kvashonkin, *Bol'shevistskoe rukovodstvo*, 297–98, 302–6. 經濟部門的工作人員認為捷爾任斯基是個「右傾的」布爾什維克。Valentinov, *Novaia ekonomicheskaiia partiia*, 23, 102–6; Izmozik, *Glaza* 11, 131.
- 315 Khelemskii, “Soveshchanie v Sovnarkome o gosapparate [1923 g.],” 113–4, 118: RGAE, f. 3429, op. 6, d. 86, l.12–31: 1923).
- 316 到 1925 年為止，至少有 185 萬白領工作人員。Gimpel'son, *NEP*, 386 (引自 GARE, f. 374, op. 171, delo omitted, l.14–15). 如果說革命前在政府部門就有 600 種具體的職務頭銜，那此時則有 2,000 多種。 *Tekhnika upravleniia*, 1925, no. 1: 23–4.
- 317 「即使在星期天，在城外的別墅，」他的妻子索菲婭·穆什卡特回憶說，「他也不休息，而是在看文件，核實最高國民經濟委員會的各個部門交來的所有資料表格，檢查密密麻麻的數據。」Mozokhin and Gladkov, *Menzhinskii*, 174.
- 318 1924 年 1 月 9 日，捷爾任斯基寫信給斯大林：「斯大林同志親啟。黨的討論認為，在中央交給我的格伯烏和鐵道人民委員部這兩個機構中，黨和政治方面的形勢最嚴峻。這讓我非常擔憂，尤其是因為我忙於蘇維埃的工作，不能在黨的工作上投入足夠的時間去戰勝邪惡的勢力，甚至不能及時去揭露它。」除了其他的幫手之外，捷爾任斯基還要求給自己派兩名書記（斯大林在信中這一行下面劃了線），一個給格伯烏，一個給鐵路，他們將負責那裏的黨務工作。斯大林同意了這些要求，這樣一來他就可以安插自己的人。RGASPI, f. 558, op. 11, d. 726, l. 28–9.
- 319 RGASPI, f. 3, op. 1, d. 527, l. 1.
- 320 Khromov, *Po stranitsam*, 92 (未註明出處); Plekhanov, *VChK-OGPU*, 277.
- 321 RGASPI, f. 558, op. 11, d. 35, l. 43, 見於 Liubianka, *Stalin i VChK*, 108.
- 322 *Pravda*, December 10, 1925 (布哈林的講話); *Rabochaia Moskva*, December 13, 1925 (加米涅夫的講話); *Pravda*, December 20, 1925 (莫斯科黨委給列寧格勒幫的答覆); *Novaia oppositsiia* (Leningrad, 1926) (列寧格勒幫的小冊子，逐條反駁了有關的指控). 莫斯科黨委在 1925 年 12 月 20 日的《真理報》上公佈了給列寧格勒幫的答覆，內容是維護新經濟政策和「一國社會主義論」。Carr, *Socialism in One Country*, II: 133–43; Merridale, *Moscow Politics*. 卡爾對新的反對派不屑一顧，他錯誤地認為他們不過是因為個人恩怨和野心。
- 323 *Sotsialisticheskii vestnik*, 1926, no. 17–18: 5.
- 324 Brovkin, *Russia After Lenin*, 156 (引自 RGASPI, f. 17, op. 16, d. 533, l. 199).
- 325 *Kommunist*, 1989, no. 8: 82–4. 他早先給斯大林寫過一張便條，日期是 1925 年 12 月 6 日，談到了泯滅人的主動精神的國家機關，但那張條子他沒有送出去。Plekhanov, *VChK-OGPU*, 278.
- 326 Plekhanov, *VChK-OGPU*, 278. 列寧剛去世的時候就有傳言說捷爾任斯基會接管政府（流言的產生似乎是由於害怕，因為他被認為是那種無情的人）。Velikanova, “Lenina v massovom soznanii,” 182.

- 327 *XIV s'ezd VKP (b)*, 99–130.
- 328 *XIV s'ezd VKP (b)*, 130–53. 和布哈林一樣，斯大林使用當時的套話打發了季諾維也夫：「這是歇斯底里，而不是政策。」*Sochineniia*, VII: 378 (譯註：《斯大林全集》第7卷，第316頁)。「當季諾維也夫有多數支持的時候，他就贊成鐵的紀律，贊成服從，」米高揚說，「當他失去多數的時候……他就反對(鐵的紀律)。」*XIV s'ezd VKP (b)*, 186.
- 329 *XIV s'ezd VKP (b)*, 158–66. 斯大林不同意克魯普斯卡婭把新經濟政策稱為資本主義，而且還禮貌地加了一句「請她原諒我」。不過他後來就變得話裏帶刺了：「克魯普斯卡婭同志究竟和其他任何的負責同志有甚麼區別呢？」*Sochineniia*, VII: 364–5, 383–4 (譯註：《斯大林全集》第7卷，第303、320頁)。直到1927年12月黨的第十五次代表大會，克魯普斯卡婭才正式退出反對派。從來沒有人逼着她公開放棄自己的主張，她也沒有被逮捕。1927年，她只是發表了一個講話，大意是，1925年的時候，必須要「證明在我們的結構中有足夠多的社會主義成分」，而現在，她認為這種社會主義的確是真的，因此她就不再是反對派了。事實上，她一年前就不再支持反對派了。*Pravda*, November 5, 1927.
- 330 參加了代表大會的莫洛托夫說，加米涅夫總是喜歡「用討論的方式」來談問題，似乎他在剛開始就做好了退讓的準備。*XIV s'ezd VKP (b)*, 484–5. 關於對加米涅夫性格「溫和」的印象，另見Sukhanov, *Zapiski*, II: 243–5.
- 331 *XIV s'ezd VKP (b)*, 96, 246. *Leninskii sbornik*, V: 8–11.
- 332 *XIV s'ezd VKP (b)*, 18–31 dekabria 1925 g., 273–5; Daniels, *Documentary History of Communism* [1984], I: 183–6.
- 333 *XIV s'ezd VKP (b)*, 289–92.
- 334 Genis, “G. Ia. Sokolnikov,” 80 (引自當時沒有出版的G. I. 謝列布利亞科娃的傳記); Galina Serebriakova, “Iz vospominanii,” 見於Anfert'ev, *Smerch*, 230–49 (at 241).
- 335 *XIV s'ezd VKP (b)*, 327–35.
- 336 Chigir, “Grigorii Iakovlevich Sokol'nikov,” 119–32 (引自AlphaRGASPI, f. 54, op. 1, d. 13, 176–117, esp. 111–2, 114–5). 官方的速記記錄刪去了所有被認為會削弱斯大林權威的句子，修改了索柯里尼柯夫的原話，以拉開他和斯大林的距離；索柯里尼柯夫的講話中被插入了一些詞語，有時甚至是整段的內容。李可夫嘲笑反對派內部的分歧：克魯普斯卡婭從窮苦人的觀點出發支持季諾維也夫，而索柯里尼柯夫「從右派的立場出發」支持他們(主張深化市場關係)。*Carr, Socialism in one Country*, II: 156.
- 337 *XIV s'ezd VKP (b)*, 397.
- 338 *XIV s'ezd VKP (b)*, 455–6.
- 339 *XIV s'ezd VKP (b)*, 508.
- 340 *XIV s'ezd VKP (b)*, 601.
- 341 *XIV s'ezd VKP (b)*, 570, 600–1.
- 342 *Sochineniia*, VII: 262; Carr, *Socialism in One Country*, III: 491; Carr and Davies, *Foundations of a Planned Economy*, III/i: 3–5.
- 343 David Woodruff, “The Politburo on Gold, Industrialization, and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y, 1925–1926,” 載於Gregory and Naimark, *Lost Politburo Transcripts*, 214–5.



- 344 Kuz'min, *Istoricheskii opyt sovestkoi industrializatsii*, 28–9. 斯大林不接受索柯里尼柯夫把國有鐵路、對外貿易和銀行稱為「國家資本主義」的說法。「也許我們的蘇維埃機關也是國家資本主義而不像列寧所認定的那樣是無產階級類型的國家機關吧？」斯大林嘲諷說。(譯註：《斯大林全集》第7卷，第306頁。) RGASPI, f. 54, op. 1, d. 13, l. 82; f. 558, op. 3, d. 33; *Chetyrnadsyati s'ezd*, 14.
- 345 *Resolutions and Decision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II: 258–60.
- 346 *Pravda*, December 29, 1925; *XIV s'ezd VKP (b)*, 504–5. 在公佈的速記記錄中，斯大林的許多講話內容在經過處理後都變得尖銳多了：RGASPI, f. 54, op. 1, d. 13, l. 60; f. 558, op. 3, d. 33; *Chetyrnadsyati s'ezd*, 8. 在轉載斯大林的講話時，這段要讓布哈林流血的內容被刪去了。*Sochineniia*, VII: 363–91 (at 379–80).
- 347 *XIV s'ezd VKP (b)*, 710–1.
- 348 Harris, "Stalin as General Secretary: the Appointment Process and the Nature of Stalin's Power."
- 349 Mawdsley and White, *Soviet Elite*, 36–9.
- 350 Trotsky, *My Life*, 521–2. 謝列布里亞科夫在第十四次代表大會上講到，「季諾維也夫建議和托洛茨基同志聯合起來」，但托洛茨基「明確拒絕聯合成一個集團」。當時在場的托洛茨基沒有否認這一說法。*XIV s'ezd VKP (b)*, 455–6.
- 351 據說斯大林親自找了列昂尼德·謝列布里亞科夫。當謝列布里亞科夫回答說他們沒有派別的時候——搞派別活動是非法的——據說斯大林說道，「列昂尼德，我找你來是要認真談談的。把我的建議帶給『老頭子』(starik)」(指托洛茨基)。Tsakunov, *V labirinte*, 169 (引自與I. 弗拉切夫的談話，弗拉切夫和列昂尼德·謝列布里亞科夫住在同一棟樓)。
- 352 Dewey, *The Case of Leon Trotsky*, 322–3; Trotskii, *Moia zhizn'*, II: 273; Deutscher, *Prophet Unarmed*, 248–9.
- 353 V. L. Genis, "Upriami narkom s Il'inki," 見於 Sokol'nikov, *Novaia finansovaia politika*, 5–38 (at 23); Genis, "G. Ia. Sokolnikov," 80 (引自當時沒有出版的G. I. 謝列布利亞科娃的傳記); Galina Serebriakova, "Iz vospominanii," 見於 Anfert'ev, *Smerch*, 230–49 (at 241).
- 354 RGASPI, f. 17, op. 3, d. 680. 另見 *XIV s'ezd*, 323–36 (esp. 335–6).
- 355 斯大林可能還考慮過讓加米涅夫擔任農業人民委員。在政治局會議上，季諾維也夫給加米涅夫遞過一張條子：「(除了別的)你還要說如果索柯里尼柯夫不能做財政人民委員，那我(加米涅夫)也不能做農業人民委員。」季諾維也夫的條子還包含了一種暗示：他們需要把托洛茨基拉到他們一邊。但季諾維也夫覺得希望不大，因為托洛茨基對莫斯科強行撤換《列寧格勒真理報》編輯一事沒有反應。Nazarov, *Stalin i bor'ba za liderstvo*, 138 (引自 RGASPI, f. 17, op. 2, d. 210, l. 101–229; f. 323, op. 2, d. 29, l. 59–60, 73).
- 356 Kvashonkin, *Bol'shevistkoe rukovodstvo*, 318 (RGASPI, f. 85, op. 25, d. 118, l. 2–3).
- 357 Nazarov, *Stalin i bor'ba za liderstvo*, 143–4 (引自 RGASPI, f. 324, op. 1, d. 540, l. 37–38ob.). 關於莫洛托夫參加這些會議的情況，另見 Grigorov, *Povoroty sud'by i proizvol*, 413–9; 以及 *Leningradskaiia Pravda*, January 22, 1926.

- 358 Kvashonkin, *Bol'shevistkoe rukovodstvo*, 319 (RGASPI, f. 558, op. 1, d. 2756, l. 1), 323-4. (RGASPI, f. 85, op. 25, d. 120, l. 1-2).
- 359 Grigorov, *Povoroty sud'by i proizvod*, 420. 基洛夫在1926年2月列寧格勒省的代表會議上被正式任命為黨組織的新負責人，當時捷爾任斯基也出席了會議。*Leningradskaja pravda*, February 12, 1926. 列寧格勒的第二書記是曾經的電話廠工人尼古拉·什維爾尼克，能力上沒有辦法和基洛夫相比。斯大林很快就把什維爾尼克調回了黨的中央機關。
- 360 Nazarov, *Stalin i bor'ba za liderstvo*, 150 (未註明出處)。
- 361 1926年3月27日，列昂尼德·謝列布里亞科夫寫信給斯大林，表示願意配合他的提議，在中央委員會提供比較正常的工作條件，但不明白為甚麼報刊上還在繼續詆毀1923年的反對派。「誰都不會相信這一做法沒有得到書記處的授權，」謝列布里亞科夫寫道，「我跟托洛茨基、皮達可夫和拉狄克都談過了。他們表示完全願意把托洛茨基和布哈林、和你，以及你我之間有過的談話繼續進行下去。」Kvashonkin, *Bol'shevistkoe rukovodstvo*, 324-5 (RGASPI, f. 85, op. 1/s., d. 171, l. 1). 托洛茨基寫信(1926年4月2日)給謝列布里亞科夫，說斯大林在已經和自己直接說過之後還用「迂迴的方式」(通過謝列布里亞科夫)作進一步的討論，令他覺得很奇怪。Fel'shtinskii, *Kommunisticheskaia oppositsiia v SSSR*, I: 188.
- 362 Trotsky, *Stalin*, 417; Trotskii, *Moia zhizn'*, II: 265-6. 另見Fischer, *Stalin and German Communism*, 547-8 (引自與季諾維也夫的談話)。
- 363 Serge, *Memoirs of a Revolutionary*, 212; Deutscher, *Prophet Armed*, 267.
- 364 托洛茨基得的是甚麼病，現在還不清楚，但他按照醫生的建議做了扁桃體切除手術。Trotskii, *Moia zhizn'*, II: 266-8. 托洛茨基一直住在一家私人診所，後來德國警方傳話說，流亡的白衛分子可能要暗殺他，於是他就搬到蘇聯大使館(他的支持者克列斯廷斯基被外放為大使)。Deutscher, *Prophet Unarmed*, 265-6.
- 365 *Biulleten' oppositsii*, March 1937, no. 54-5: 11 (引用了謝爾蓋·姆拉奇科夫斯基(Sergei Mrachkovsky)的話)。
- 366 對於這件趣聞，雖然恰金是我們唯一的信息來源，卻似乎比較真實。恰金還說：「這種讓人意想不到的說法讓我很驚訝，所以我幾乎記得一字不差。」APRF, f. 3, op. 24, d. 493, l. 1-2 (1956年3月14日恰金給赫魯曉夫的信), Volkogonov papers, Hoover Institution Archives, container 23. 當時在基洛夫家裏的還有N. P. 科馬羅夫、N. K. 安季波夫(N. K. Antipov)和I. P. 朱可夫(I. P. Zhukov)。恰金(1898-1967)在阿塞拜疆擔任過基洛夫手下的第二書記。
- 367 Zakharov, *Voennye aspekty* (RGVA, f. 33988, op. 3, d. 78, l. 67-76); Akhtamzian, "Soviet-German Military Cooperation," 100.
- 368 Akhtamzian, "Voennoe sotrudnichestvo," 12.
- 369 引自Dyck, *Weimar Germany and Soviet Russia*, 76.
- 370 Korbel, *Poland Between East and West*; Dyck, "German-Soviet Relations," 81 (引自德國外交部檔案, K281/K097454-60: 迪克森的備忘錄, 1927年9月19日)。
- 371 Dyck, *Weimar Germany and Soviet Russia*, 13, 68-72; Kennan, *Russia and the West*, 208-23; Carr, *Socialism in One Country*, III: 438-9.

- 372 「自從到這裏上任以來，憑藉與蘇俄的親密關係，我一直努力想要制衡西方，為的是不再仰仗協約國的慈悲——這是我非常反感的一個說法——和好惡」，德國大使馮·布羅克多夫—蘭曹在4月條約簽訂之後寫信給馮·興登堡總統說。「我們與蘇俄的關係……某種程度上永遠依賴於虛張聲勢，也就是說，它的用處在於面對所謂我們曾經的敵人，製造出一種印象，使得與俄國的關係顯得比實際存在的要親密很多。」Carr and Davies, *Foundations of a Planned Economy*, IIIi: 36 (引自 Brockdorff-Rantzau Nachlass, 9101/24038–224046)。
- 373 Moggridge, *The Return to Gold*, 45–6.
- 374 McIlroy, *Industrial Politics*; Robertson, “A Narrative of the General Strike of 1926.”
- 375 同一天，斯大林把英國礦工罷工的消息告訴了李可夫和布哈林，徵求他們的看法。RGASPI, f. 558, op. 11, d. 34, l. 68.
- 376 Adibekov, *Politbiuro TsK RKP (b)—VKP (b) i Evropa*, 117–20, 123–7.
- 377 G. Zinov'ev, “Velikie sobytia v Anglii,” *Pravda*, May 5, 1926; Carr, *Socialism in One Country*, III: 494. 季諾維也夫公開把英國提高到取代德國並成為在歐洲先進國家發動無產階級革命的首選地位。
- 378 Rothschild, *Pilsudski's Coup d'Etat*, 20–1; Rothschild, *East Central Europe Between the World Wars*, 46, 54–5.
- 379 Kvashonkin, *Bol'shevistkoe rukovodstvo*, 329–30 (RGASPI, f. 76, op. 3, d. 390, l. 3–4). 捷爾任斯基寫信給亞戈達說，波蘭很可能發動戰爭，目的是奪取烏克蘭和白俄羅斯。RGASPI, f. 76, op. 3, d. 364, l. 55.
- 380 Rothschild, *Pilsudski's Coup d'Etat*, 47–64, 360–1 (引自 Kurjer Poranny, May 27, 1926).
- 381 Wandycz, *Twilight of French Eastern Alliances*, 48. 與此同時，英國官員懇懇德國收復但澤和波蘭走廊，並建議用作為獨立國家的立陶宛的部分甚至全部領土補償波蘭。Von Riekhoff, *German-Polish Relations*, 248–55.
- 382 卡爾·拉狄克在《真理報》上對波蘭軍隊與社會的分歧作了詳細的分析。他可以嘲笑皮爾蘇茨基（「波蘭民族主義的最後的莫西干人」），但無法否認他取得了勝利。Pravda, May 15, May 18, May 22, and June 2, 1926.
- 383 Pravda, May 16, 1926; Korbel, *Poland Between East and West*, 205.
- 384 Wandycz, *August Zaleski*, 35.
- 385 Livezeanu, *Cultural Politics in Greater Romania*.
- 386 *Dokumenty vneshnei politiki*, VIII: 72–6; Lensen, *Japanese Recognition of the USSR*.
- 387 Anosov, *Koreitsy v ussuriiskom krae*, 7–8; Brianskii, *Vsesoiuznaia perepis' naseleniia 1926 goda*, VII: 8.
- 388 Gelb, “The Far-Eastern Koreans”; Martin, “The Origins of Soviet Ethnic Cleansing,” 835 (引自 GARF, f. 1235, op. 140, d. 141, l. 144).
- 389 Iazhborovskaia and Papsadanova, *Rossia i Pol'sha*, 83.
- 390 有學者指出，「優勢民族之所以會懷疑被動員起來的僑民，最主要的原因是，他們在優勢民族的精英們所控制的領土之外還有自己的『祖國』」，而且「優勢民族的精英們的懷疑往往會自我應驗」。Armstrong, “Mobilized and Proletarian Diasporas,” 400–2.

- 391 Medvedev, *Let History Judge*, 111–2.
- 392 Trotsky, *Stalin*, 215; Trotskii, *Predannaia revoliutsiia* [1937], 25–7.
- 393 Medvedev, *Let History Judge*, 90–1 (伊戈爾·薩茨 [Igor Sats], 盧那察爾斯基的首席助手).
- 394 有學者說,「斯大林最終能夠成功的一個原因,就是相對於他的對手而言,他能夠把自己和列寧的關係塑造得更能吸引普通黨員」。Graeme Gill, “Political Myth and Stalin’s Quest for Authority in the Party,” 99.
- 395 “Dve besedy s L. M. Kaganovichem,” 114. 另見 *Bazhanov, Damnation of Stalin*, 114–7, 122.

### 第十三章 勝利中的失敗

- 1 Cherniavskii, “Samootvod,” 68–69 (RGASPI, f. 17, op. 2, d. 335, l.4–8: 準備給李可夫修改的速記記錄副本)。另見 Murin, “Eshche raz ob otstavkakh I. Stalina,” 72–3.
- 2 這是1932年她自殺的地方。這棟建築現在還在：從國會大廈售票處向右看，可以看到娜佳以前的房間。
- 3 關於斯大林起初在克里姆林宮住的地方，參見 Mikoyan, *Tak bylo*, 351.
- 4 從1921年11月到1922年2月，列寧三次寫信給克里姆林宮的官員，催促他們給斯大林安排新的住所。PSS, LIV: 44; Golikov, *Vladimir Il’ich Lenin*, V: 622–3; Shturman, *Mertvye khvataiut zhivyykh*, 23; Alliluyeva, *Twenty Letters*, 108. 別連基曾經在1918年和捷爾任斯基一起被左派社會革命黨人扣押。從1919年到1924年，他是列寧的衛隊長，而且從1921年開始直到1928年1月，他還負責所有領導人的警衛工作。1938年，斯大林讓人逮捕了別連基並在1940年把他槍斃了。
- 5 「斯大林同志是一個活人，不是博物館的稀有藏品，他本人也不想住在博物館，所以就拒絕了準備給他的住房，去年季諾維也夫也拒絕了那同一處住房，」謝多娃寫信給列寧說，「斯大林同志想要弗拉克謝爾曼 (Flakserman) 和馬爾科夫現在住的房子。」Sakharov, *Politcheskoe zaveshchanie*, 150 (引自 RGASPI, f. 5, op. 1, d. 1417, l. 1–1ob.); PSS, XLIV: 162. 托洛茨基以為是黨的書記處的工作人員列昂尼德·謝列布里亞科夫 (他和托洛茨基的關係很近) 把自己的住房給了斯大林，從而結束了這場爭吵。Trotskii, *Portrety revoliutsionerov* [1991], 54–5. 因為二戰後要建國會大廈，斯大林起先住的附樓最後拆掉了。
- 6 RGASPI, f. 558, op. 11, d. 753, l. 3 (1925年6月12日)。
- 7 *Iosif Stalin v ob’iatiakh sem’i*, 14 (1927年9月9日之後的某個時候寫的信)。阿爾喬姆後來回去跟自己母親伊麗莎白 (Elizaveta) 一起住了，她在莫斯科國家大飯店有個房間。
- 8 Shatunovskaia, *Zhizn’ v Kremle*, 188; Bazhanov, *Vospominaniia* [1983], 154.
- 9 *Iosif Stalin v ob’iatiakh sem’i*, 154 (APRE, f. 44, op. 1, d. 1, l.417–9)。
- 10 Alliluyeva, *Dvadsat’ pisem*, 98; Alliluyeva, *Twenty Letters*, 103.
- 11 *Iosif Stalin v ob’iatiakh sem’i*, 177.

- 12 Sergeev and Glushik, *Besedy o Staline*, 19–20.
- 13 *Iosif Stalin v ob"iatiakh sem'i*, 22 (APRE, f. 45, op. 1, d. 155, l. 5, now RGASPI f. 558, op. 11: 斯大林致娜佳, 1928年4月9日)。另見 Alliluev, *Khronika odnoi sem'i*, 179; 以及 Allilueva, *Dvadsat' pisem*, 124.
- 14 這個孩子(加林娜, 生於1929年2月7日)八個月時夭折, 此後夫婦倆就分手了; 從法律上講仍是雅科夫妻子的卓婭跟一個名叫季蒙·科濟列夫(Timon Kozyrev)的民警(*militia*)同居了。雅科夫經過培訓成了電工, 得到了一份裝配的工作。  
*Komsomol'skaia Pravda*, December 20, 2005.
- 15 RGASPI, f. 558, op. 11, d. 34, l. 21.
- 845 16 Lih, *Stalin's Letters to Molotov*, 103; *Pisma Stalina Molotovu*, 55. 1926年, 索契一馬采斯塔成了特別的「國家度假區」。當時那裏有6間一般的國家療養院, 465張床位; 另有21間由各國家部門專門為其工作人員辦的療養院, 有1,175張床位。
- 17 Mikoyan, *Tak bylo*, 351–2.
- 18 Khromov, *Po stranitsam*, 10 (引自 RGASPI, f. 558, op. 11, d. 69, l. 23–24ob.).
- 19 RGASPI, f. 558, op. 11, d. 69, l. 5 (M. 戈爾巴喬夫)。
- 20 “Neopublikovannye materialy iz biografii tov. Stalina,” *Antireligioznik*.
- 21 Medvedev, *Let History Judge*, 590–1 (引自 K. K. 奧爾忠尼啟則未發表的回憶錄)。
- 22 Trotsky, *Where is Britain Going?*
- 23 Lih, *Stalin's Letters to Molotov*, 108 (RGASPI, f. 558, op. 1, d. 3266, l. 1–2).
- 24 Carr and Davies, *Foundations of a Planned Economy*, III/i: 18 (引自 DBRFP, series I A, ii [1968], 724–9).
- 25 Gorodetsky, “The Soviet Union and Britain's General Strike of May 1926.”
- 26 *Vaslin, Stenogrammy zasedanii Politburo*, I: 743–827 (at 743, 780: RGASPI, f. 17, op. 163, d. 686, l. 146–51, 152–6); Nazarov, *Stalin i bor'ba za liderstvo*, 152 (引自 RGASPI, f. 323, op. 2, d. 22, l. 47)。另見斯大林的指示: *Pisma Stalina Molotovu*, 55–69.
- 27 *Zaria vostoka*, June 10, 1926; *Sochineniia*, VIII: 173–5.
- 28 *Sochineniia*, VIII: 168–72.
- 29 *Vaslin, Stenogrammy zasedanii Politburo*, II: 109.
- 30 Adibekova and Latsis, “V predchuvstvii pereloma,” 85–6; Plekhanov and Plekhanov, *F E Dzerzhinskii*, 654–5 (RGASPI, f. 76, op. 2, d. 257, l.46–8); Gimpel'son, *NEP*, 382, 384.
- 31 RGASPI, f. 76, op. 2, d. 270. 1926年4月5日, 捷爾任斯基寫信給李可夫要求換一個第一副手來幫他管經濟, 並表示與皮達可夫的分歧越來越大。李可夫回信說皮達可夫和托洛茨基正在同加米涅夫以及季諾維也夫一起策劃陰謀, 如果讓皮達可夫卸掉行政上的擔子, 他就會有更多的時間去搞政治陰謀了。李可夫是不想找人換呢, 還是他心裏真的是那麼考慮的, 現在還不清楚。Kvashonkin, *Bol'shevistskoe rukovodstvo*, 326 (RGASPI, f. 76, op. 2, d. 168, l. 11).
- 32 捷爾任斯基最後說:「我也被這些矛盾搞得筋疲力盡了。」*Kommunist*, 1989, no. 8: 87–8; Plekhanov and Plekhanov, *F E. Dzerzhinskii*, 659–60 (RGASPI, f. 76, op. 2, d. 270, l.29–30: July 3, 1926)。紅—褐色的轉變(譯註: 紅色和褐色分別象徵不同性質的政

- 權，褐色政權的典型就是後來的納粹政權。紅—褐色的轉變就是由原來的紅色政權轉變為表面上紅色，但又出現很多褐色特徵的政權。)是他一再提到的老問題：1924年7月9日，捷爾任斯基曾經寫信給斯大林和其他政治局委員，警告說如果形勢沒有好轉，就會有專政者出現，而專政者會葬送革命，「不管他衣服上插着甚麼樣的紅色羽毛」。Plekhanov, *VChK-OGPU*, 277 (引自 TsA FSB, f. 2, op. 2, d. 746, l.14, 17).
- 33 <http://kremlin-9.rosvesty.ru/news/111/>.
- 34 RGASPI, f. 558, op. 11, d. 1289, l.6, 6 ob.
- 35 Ilizarov, *Tainaia zhizn'*, 113.
- 36 Valedinskii, "Organizm Stalina vpolne zdorovyi," 68.
- 37 Merridale, *Moscow Politics*, 38. 這裏提到的會議是在1926年6月6日召開的，不過也有可能當時的會議不止一個。
- 38 Serge, *Memoirs of a Revolutionary*, 220.
- 39 *Moskovskie Bol'sheviki*, 189–90 (引自 MPA, f. 69, op. 1, d. 374, l. 107).
- 40 Zdanovich, *Organy gosudarstvennoi bezopasnosti*, 316–7 (引自 TsA FSB, f. 2, op. 4, d. 145, l. 15: V. Vasilev).
- 41 Lih, *Stalin's Letters to Molotov*, 100 (引自 RGASPI, f. 613, op. 1, d. 46, l.21–2).
- 42 Lih, *Stalin's Letters to Molotov*, 115–7; *Pisma Stalina Molotovu*, 72–5. 斯大林還預言說「托洛茨基會重新成為一個忠誠的人」，並建議對他要寬大。托洛茨基和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克魯普斯卡婭等人一起（一共是13人）向1926年7月的全會提出書面抗議，但他們的聲明沒有被收在記錄中。Lih, *Stalin's Letters to Molotov*, 116, n1.
- 43 Kvashonkin, *Bol'shevistskoe rukovodstvo*, Khromov, *po stranitsam*, 1—1 (RGASPI, f. 558, op. 11, d. 69, l. 53).
- 44 Carr and Davies, *Foundations of a Planned Economy*, III/i: 76–80.
- 45 *F. E. Dzerzhinskii—predsetael'*, 663–4 (RGASPI, f. 76, op. 3, d. 364, 57–8, 70); Khromov, *Po stranitsam*, 326 (citing RGASPI, f. 558, op. 11, delo unspecified, l. 56–56ob.). 7月18日，捷爾任斯基寫信給亞戈達，詢問為了加強對波蘭、白俄羅斯、烏克蘭和羅馬尼亞的反間諜工作採取了哪些措施：*F. E. Dzerzhinskii—predsetael'*, 668 (RGASPI, f. 76, op. 3, d. 364, l. 62).
- 46 Plekhanov and Plekhanov, *F. E. Dzerzhinskii*, 665 (RGASPI, f. 76, op. 3, d. 88, l. 37).
- 47 Shishkin, *Vlast', politika, ekonomika*, 296.
- 48 *F. E. Dzerzhinskii—predsetael'*, 670 (RGASPI, f. 76, op. 4, d. 30, l.50–1); *Pravda*, August 1, 1926; Dzerzhinskii, *Izbrannye proizvedennia*, II: 381–92; Dzerzhinskaia, *V gody velikikh boev*, 400–3.
- 49 *Pravda*, July 22, 1926, 載於 *Sochineniia*, VIII: 192–3. 另見 *Torgovo-promyshlennaia gazeta*, August 1, 1926.
- 50 Trotskii, *Stalin*, II: 184. 據托洛茨基說，斯大林的意思是說，這是一個病人的信，是病話，而且列寧受了女人們 (*baby*) 過多的影響，言外之意就是指克魯普斯卡婭，或許還有福季耶娃和沃洛季切娃。Trotskii, *Stalin*, II: 253.

- 51 RGASPI, f. 17, op.2, d. 246, IV vyp., s. 62, 66–7 (*Steonograficheskii otchet Ob' edinnogo plenuma TsK i TsKK VKP (b)*, 14–23 iuinia 1926 g.).
- 52 RGASPI, f. 17, op. 2, d. 246, IV vyp., s. 105.
- 53 Medvedev, *Let History Judge*, 85–6.
- 54 RGASPI, f. 17, op.2, d. 246, IV vyp., s. 66.
- 55 Sakharov, *Politicheskoe zaveshchanie*, 599–601.
- 56 RGASPI, f. 17, op.2, d. 246, IV vyp., s. 66.
- 57 *Pravda*, July 25, 1926; *KPSS v rezoliutsiakh* [1970], III: 332–54.
- 58 RGASPI, f. 558, op. 11, d. 69, l. 89, 102, 105.
- 59 奧爾忠尼啟則拒絕說：「我不適合那種工作，因為我特別暴躁和粗魯，沒受過甚麼教育——一句話，我不會寫東西……不要忘了我因為動手打人而在報刊上受過公開批評。」這說的還是1923年那次有名的耳光事件。相反，他推薦了魯祖塔克、卡岡諾維奇或安德烈耶夫。Kvashonkin, *Bol'shevistskoe rukovodstvo*, 39, 323–4 (RGASPI, f. 85, op. 25, d. 120, l. 1–2: March 17, 1926); Khlevniuk, *In Stalin's Shadow*, 23–4.; RGASPI, f. 558, op. 1, d. 34, l. 84, 87; *Pisma Stalina Molotovu*, 82–6.
- 60 Khlevniuk, *In Stalin's Shadow*, 23–4. 事後，斯大林在1926年8月30日寫信給莫洛托夫，要求修改命令的措辭；莫洛托夫在1926年9月9日的一封信給「親愛的謝爾戈」的信中承擔了責任，並說，「從我這方面來說，我希望你不要繼續留在北高加索很長時間，希望在不久的將來你會調到莫斯科」。 *Pisma Stalina Molotovu*, 82–6; Kvashonkin, *Bol'shevistskoe rukovodstvo*, 336–7 (RGASPI, f. 85, op. 25, d. 151, l. 1–3: Sept. 9, 1926).
- 61 Sinyavsky, *Soviet Civilization*, 128 (未註明出處); Polikarenko, *O Felikse Edmundoviche Dzerzhinskom*; “Nad grobom Dzerzhinskogo,” *Pravda*, July 23, 1926: 1. 另見 Pavlov, *Chekisty*, 12. 捷爾任斯基的去世讓檔案又增多了。當局按照處理列寧檔案的方式收集了捷爾任斯基的「個人卷宗」。黨的檔案中捷爾任斯基的個人卷宗 (RGASPI, f.76) 有五千多個文件夾。新招募的對外情報人員會在他生日 (9月11日) 那天宣誓入職。後來，所有契卡人員的工資都在每月的11日發放。Leonov, *Likholet'e*, 354; Andrew and Mitrokhin, *Mitrokhin Archive*, 30.
- 846 62 Andrew and Gordievsky, *KGB*, 42 (引自對叛逃人員彼得·傑里亞賓 (Peter Deriabin) 的採訪，他曾經是近衛軍的成員之一)。關於捷爾任斯基崇拜的宗教方面，參見 Sinyavsky, *Soviet Civilization*, 125–34.
- 63 Fedor, *Russia and the Cult of State Security*, 11–29; Hingley, *The Russian Secret Police*, 130. 另見 Mikoyan, *Feliks Dzerzhinskii*.
- 64 Mozokhin and Gladkov, *Menzhinskii*, 353 (未註明出處)。索博利成了一名作家，筆名伊琳娜·古羅 (Irina Guro)。關於明仁斯基，曾經發生過一件不為人知的趣事。還是在1915年6至7月，他曾用化名在總部設在巴黎的一份俄文報紙 (《我們的回聲》) 上猛烈地攻擊列寧。「列寧認為自己不僅是俄國皇位的唯一繼承人——只要它出現空缺——還是『國際』的唯一繼承人，」明仁斯基敏銳地寫道，而且他還說，「列寧……是政治上的耶穌會會士，多年來都在為了他當前的目標而歪曲馬

克思主義，結果陷入了無可救藥的混亂……列寧主義者甚至算不上一個派別，而是一幫子聚在一起的吉普賽人，他們大嗓門，動不動就揮舞鞭子，自以為擁有成為工人運動推動者的無可爭議的權利。」因為有人揭發，斯大林很可能知道了明仁斯基用化名寫的這篇指責性的長文，於是就保留了一份，想要威脅明仁斯基。S. D., "Lenin," *Nashe ekho*, June 19, 1915: 6–7, July 15: 6–7.《我們的回聲》出版於1915年4至8月。學者們在引用這篇文章和指明它的日期時經常有誤，例如，可參見Rayfield, *Stalin and His Hangmen*, 110. 明仁斯基後來在1927年12月成了中央委員；他沒能再升為政治局委員。

65 RGASPI, f. 17, op.2, d. 246, IV vyp., s. 32.

66 RGASPI, f. 17, op.2, d. 246, IV vyp., s. 105.

67 *Izvestiia TsK KPSS*, 1989, no. 12: 194–6. *Izvestiia TsK KPSS*, 1991, no. 4: 78. 關於托洛茨基稱她是「老處女」的信件和筆記，參見Trotskii, *Dnevnik i pisma* [1990], 76–7.

68 "M. I. Ul'ianova ob otnoshenii V. I. Lenina k I. V. Stalinu," *Izvestiia TsK KPSS*, 1989, no. 12: 196–201 (at 198–9: RGASPI, f. 14, op. 1, d. 398, l. 1–8).

69 托洛茨基聲稱克魯普斯卡婭1926年私下裏在朋友中說過，「要是沃洛佳（譯註：弗拉基米爾的呢稱）還活着，他現在就會在監獄裏」。Trotskii, *Moia zhizn'*, II: 219; Trotskii, *Portrety revoliutsionerov* [1984], 56.

70 RGASPI, f. 17, op. 2, d. 246, IV vyp., s. 64. 後來在黨的第十五次代表大會的特別公告以及在斯大林死後新版的常規會議記錄中都公佈了遺囑。XV s'ezd VKP (b), II, 1477–8. 後來有幾千人因為試圖傳播遺囑而遭到逮捕，其中包括1929年被捕的22歲莫斯科學生瓦爾拉姆·沙拉莫夫 (Varlam Shalamov)。

71 *Moskovskie Bol'sheviki*, 174–5.

72 Kuusinen, *Rings of Destiny*, 78. 但斯大林可能是個沒有耐心的工頭。在從庫西寧那裏收到共產國際有關阿爾薩斯—洛林地區自治問題的文本草案時——那是法國根據凡爾賽條約從德國收回的領土——斯大林在1926年8月14日嚴厲地寫道：「你應該加一段內容……說明爭取自治的鬥爭並不意味着削弱了阿爾薩斯—洛林地區的無產階級和法國無產階級的聯繫，而是相反，大大加強了這些聯繫。」斯大林對文本的語氣也表示反對，覺得有點居高臨下，並建議加以精簡，刪去重複內容。RGASPI, f. 558, op. 11, d. 755, l. 114, 118–20.

73 Pogorelskin, "Kamenev in Rome," 102 (引自ACDS, Busta, 15 Fasciola: Kameneff, Mussolini: colloquio con Kameneff, February 3, 1927), 103.

74 *Na prieme*, 765. 戴維斯帶着美國參議院外交事務委員會主席威廉·博拉 (William Borah) 的介紹信。他還讓1924至1925年出訪過美國的奧辛斯基給斯大林寫了信，說戴維斯將會發表一篇關於美國代表團蘇聯之行的報道，可以用來獲得美國對蘇維埃國家的承認。RGASPI, f. 558, op. 11, d. 726, l. 95–95ob, 96. 戴維斯以書面形式事先準備了幾個問題 (l. 89–90).

75 Davis, "Stalin, New Leader." Russian translation: RGASPI, f., 558, op. 11, d. 726, l. 119–32. 戴維斯聲稱他聽得懂斯大林講的俄語；接見時的翻譯是季維爾 (Tivel)。交談的內容由蘇方記錄。斯大林禁止公開俄文譯文，說其中十分之九都和他說的不



- 一致，而且謊稱當時並沒有人記錄。RGASPI, f. 558, op. 11, d. 726, l. 139. 在斯大林的克里姆林宮日誌中並沒有戴維斯的名字；採訪是在老廣場大街的辦公室進行的。第二年，戴維斯在莫斯科的時候還想採訪斯大林，但是被拒絕了。另見 Harper and Harper, *The Russia I Believe In*, 234–5; Hollander, *Political Pilgrims*, 162, 165.
- 76 RGASPI, f. 558, op. 11, d. 726, l. 148.
- 77 RGASPI, f. 558, op. 11, d. 726, l. 97–105; Khromov, *Po stranitsam*, 249–57.
- 78 關於農民：「我們希望農民最終會和我們在一起……我們正在創造這樣的物質條件，把他們推向我們一邊。農民是講究實際的。他需要甚麼呢？必須給他供應價格合理的製造品，他需要貸款，他需要感受到政府會考慮他的利益，在遇到饑荒時會及時地幫助他，迫切地想要和他一起並且為了他而工作……農民們意識到我們保護了他們，不讓以前的地主收回他們的土地。我們在給予他們此前從未有過的文化生活。」戴維斯還聲稱他1927年在梯弗利斯見到了斯大林的母親。
- 79 Nolan, *Visions of Modernity*.
- 80 Henry Ford, "Mass Production," *Encyclopedia Britannica* (13th ed.), XV: 38–41.
- 81 *Na prieme*, 759–66. 做過黨的事務管理局局長的伊萬·克謝諾豐托夫1926年3月23日因胃癌去世，時年42歲。
- 82 Lih, *Stalin's Letters to Molotov*, 119–20; RGASPI, f. 558, op. 11, d. 34, l. 98–101.
- 83 RGASPI, f. 558, op. 11, d. 70, l. 20.
- 84 "Ob edeintsve partii," 見於 Fel'shtinskii, *Kommunisticheskaia oppositsiia v SSSR*, II: 77–82 (at 79–80).
- 85 Trotsky, *Stalin School of Falsification*, 89–90 (托洛茨基給中央委員會的信，信上註明的日期是1927年11月22日)。
- 86 1926年10月9日，聯合反對派的13名「積極分子」在其中伊萬·巴卡也夫 (Ivan Bakayev) 位於莫斯科索科利尼基區的家中聚會，經過仔細討論拿出了一份由托洛茨基和季諾維也夫聯合署名的關於停止從事反對活動的文本。 *Moskovskie Bol'sheviki*, 205 (引自 MPA, f. 85 op. 1, d. 318, l. 228)。
- 87 *Pravda*, October 17, 1926.
- 88 1956年，伊斯特曼寫信給伊薩克·多伊徹說，他是通過一名特使從克魯普斯卡婭那裏得到遺囑全文副本的，那名特使把文件帶給了在巴黎的波里斯·蘇瓦林。 Carr and Davies, *Foundations of a Planned Economy*, II: 16, n2.
- 89 Murin, "Eshche raz ob otstavkakh I. Stalina," 72–3 (APRF, f. 45, op. 1, d. 126, l. 69–9; 日期被誤記為1924年)。
- 90 *Sochineniia*, VII: 233.
- 91 *Pravda*, October 24, 1926; *KPSS v rezoliutsiiakh*, III: 360–1.
- 92 *XV konferentsiia VKP (b)*, 531–3. 另見 Trotskii, *Kommunisticheskie internatsional posle Lenina*, 109–10.
- 93 *XV konferentsiia VKP (b)*, 564, 566.
- 94 "O sotsial-demokraticheskom uklone v nashei partii," *Pravda*, November 5–6, 1926, 見於 *Sochineniia*, VIII: 234–97 (at 276)。

- 95 Serge, *La vie et la mort*, 180–1 (引自托洛茨基妻子娜塔莉亞·謝多娃的回憶錄，她把這件事發生的時間記錯了，以為是1927年); Deutscher, *Prophet Unarmed*, 296–7; Carr and Davies, *Foundations of a Planned Economy*, II: 16–17. 另見RGASPI, f. 323, op. 2, d. 98, l. 304.
- 96 *XV konferentsiia VKP (b)*, 535.
- 97 *XV konferentsiia VKP (b)*, 578.
- 98 *XV konferentsiia vsesoiuznoi kommunisticheskoi partii (b)*, 599, 601. 另見Deutscher, *Prophet Unarmed*, 305; 以及Cohen, *Bukharin*, 240.
- 99 *Pravda*, November 12, 1926, 見於 *Sochineniia*, VIII: 298–356.
- 100 Simonov, “Strengthen the Defense of the Land of Soviets,” 1357.
- 101 Golubev, *Esli mir obrushitsia na nashu Respubliku*, 98–104; Samuelson, *Soviet Defence Industry Planning*, 40–4.
- 102 O'Connor, *Diplomacy and Revolution*, 131–2.
- 103 Golubev, *Esli mir obrushitsia na nashu Respubliku*, 98–104.
- 104 Ken and Rupasov, *Politbiuro TsK VKP (b)*, 484–5, 491, 497.
- 105 Wandycz, *Twilight of French Eastern Alliances*, 50.
- 106 Plekhanov, *VChK-OGPU*, 305: 扎哈羅夫斯基致明仁斯基，1927年1月31日。
- 107 Plekhanov, *VChK-OGPU*, 318 (引自TsA FSB, f. 2, op. 5, d. 32, l.16. 19).
- 108 Neilson, *Britain, Soviet Russia and the Collapse*, 52–3.
- 109 Melville, *Russian Face of Germany*.
- 110 *Pravda*, December 16, 1926, 見於Eudin and Fisher, *Soviet Union and the West*, 208–9.; Fischer, *Stalin and German Communism*, 529–36.
- 111 Neilson, *Britain, Soviet Russia and the Collapse*, 53 (引自FO 371/11787/N5670/387/38: J.D. 格里戈里 (J. D. Gregory) 備忘錄)。
- 112 Samuelson, *Plans for Stalin's War Machine*, 36 (引自RGVA, f. 33987, op. 3, d. 128, l. 24: 1927年1月29日)。
- 113 D'iakov and Bushueva, *Fashistskii mech kovalsia v SSSR*, 80 (RGVA, f. 33987, op. 3, d. 128, l. 26: 揚·別爾津致伏羅希洛夫，1927年1月29日); Duraczyński and Sakharov, *Sovetsko-Pol'skie otnosheniia*, 63.
- 114 Davies, review of David Stone (引自 *Vestnik finansov*, 1927, no. 8: 140–1).
- 115 Erickson, *Soviet High Command* [2001], 301–4.
- 116 Stone, *Hammer and Rifle*, 22.
- 117 Erickson, *Soviet High Command* [2001], 288.
- 118 Sokolov, *Ot voenproma k VPK*, 62–3 (引自GARF, f. 8418, op. 16, d. 3, l. 355); Ken, *Mobilizatsionnoe planirovanie*, 21.
- 119 Murin, “Eshche raz ob otstavkakh I. Stalina,” 73 (APRE, f. 45, op. 1, d. 131, ll.64–5).
- 120 Lih, *Stalin's Letters to Molotov*, 131–2.
- 121 *Pravda*, January 9, 1927.
- 122 *Pravda*, January 9, January 13, January 14, and January 20, 1927.

- 123 神話般的操縱論是把問題看得太膚淺：L. N. Nezhinskii, "Byla li voennaia ugroza SSSR v kontse 20-x—nachale 30-x godov?," *Istoriia SSSR*, 1990, no. 6: 14–30; Velikanova, "The Myth of the Besieged Fortress."
- 124 Samuelson, *Plans for Stalin's War Machine*, 35 (引自 PRO, Foreign Office, N530/190/38: January 26, 1927). 有些學者作了正確的推斷，認為戰爭恐慌是真實的：Schapiro, *Communist Party*, 303–4.
- 125 Prokofiev, *Soviet Diary 1927*, 43–4, 59, 66, 106, 156. 1930年代初，普羅科菲耶夫返回斯大林統治下的蘇聯定居，與從來沒有離開過蘇聯的肖斯塔科維奇一起工作。
- 126 Loginov, *Teni Stalina*, 95.
- 127 *Na prieme*, 766–73.
- 128 Von Riekhoff, *German-Polish Relations*, 248–55.
- 129 D'iakov and Bushueva, *Fashistskii mekh kovalsia v SSSR*, 71–6 (RGVA, f. 33987, op. 3, d. 151, l. 18–23).
- 130 Akhtamzian, "Voennoe sotrudnichestvo," 14–5; Akhtamzian, "Soviet-German Military Cooperation," 105. 另見 Dyck, *Weimar Germany and Soviet Russia*, 96–7; 以及 Jacobson, *When the Soviet Union Entered*, 227–9.
- 131 Samuelson, *Plans for Stalin's War Machine*, 32–3 (引自 RGASPI, f. 17, op. 3, d. 611, l. 18: January 13, 1927).
- 132 Plekhanov, *VChK-OGPU*, 53–4 (TsA FSB, f. 2, op. 6, d. 110, l. 114–5).
- 133 APRF, f. 3, op. 63, d. 137, l. 23–47 (承蒙謝爾蓋·庫德里亞紹夫 (Sergei Kudryashov) 的好意)。揭發者的報告有可能是米奇斯瓦夫·洛加諾夫斯基 (Mieczysław Loganowski, 生於 1895 年) 撰寫並/或提供的，洛加諾夫斯基是外交人民委員部的工作人員，有人用紅色鉛筆把他名字的大寫字母寫在那份打印材料上。洛加諾夫斯基是紅軍情報機關的老特工，之前曾以外交人員身份為掩護，同時兼任政府 (格魯烏) 和軍方 (格魯烏) 駐華沙情報站的負責人，他在那裏組織了幾支搞武裝破壞的小分隊，並策劃了對皮爾蘇茨基的暗殺行動。作為兩位波蘭同胞捷爾任斯基尤其是溫什利赫特的門徒，洛加諾夫斯基接着又在奧地利扮演了類似的角色，然後才被安排到莫斯科的外交人民委員部。蘇聯駐華沙的一位外交官記得他「這個人有着堅強的意志、鐵一般的耐力和動物般的野蠻」。Besedovskii, *Na putiakh k terimodoru*, 92–3; Sever and Kolpakidi, *Spetsnaz GRU*. 斯大林知道洛加諾夫斯基，是因為由溫什利赫特協調的在多個國家從事破壞和政變活動的小分隊與他自己有密切的關係。文件上洛加諾夫斯基的名字可能是指文件是他寫的，也有可能是提醒後續要和他聯繫。
- 134 Samuelson, *Plans for Stalin's War Machine*, 39 (引自 RGASPI, f. 74, op. 2, d. 39, l. 6).
- 135 *Anglo-Sovetskie otnosheniia*, 100–4; *DVP SSSR*, X: 6–62.
- 136 Chernykh, *Stanovlenie Rossi sovetskoi*, 13. 1927 年，莫斯科得到消息說，有幾十人在雅庫特煽動人們反對蘇維埃政權並預言說蘇維埃政權要垮台了。由於春雨連綿，道路泥濘，直到 9 月份才派去一隊警察，趕在陰謀分子發動「起義」前把他們抓了起來。Plekhanov, *VChK-OGPU*, 386 (TsA FSB, f. 2, op. 4, d. 204, l. 19).

- 137 *Pravda*, March 3, 1927, 見於 *Sochineniia*, IX: 170.
- 138 *Izvestiia TsK KPSS*, 1989, no. 8: 199–201 (A. G. 戈爾布諾夫：1927年4月16日)。有些來自農村方面的報告認為農民在政治上的忠誠是堅定的。「我們不想要戰爭——我們還沒有從上次的戰爭中恢復過來——但我們無論如何不會放棄蘇維埃政權」，一份來自烏里揚諾夫斯克的報告說。萬一發生戰爭，這些農民保證，「我們每個人都會戰鬥到最後」。Penner, “Stalin and the Ital’ianka,” 53 (引自 RGASPI, f. 17, op. 32, d. 110, l. 10: July 20, 1927).
- 139 Lenin, *Collected Works*, 30: 93–104 (1919年9–10月)。
- 140 Van Ree, *Political Thought of Joseph Stalin*, 222 (引自 RGASPI, f. 558, op. 4, d. 598, l. 5–8)。
- 141 Smith, *A Road is Made*.
- 142 Smith, *A Road is Made*, 28.
- 143 Wilbur and How, *Documents on Communism*, 733.
- 144 Smith, *A Road is Made*, 168.
- 145 Smith, *A Road is Made*, 171.
- 146 斯大林非常重視國民黨軍隊。1926年11月，他把中國的革命運動比作1905年俄國的革命運動，但又說「在中國，和舊政府的軍隊對抗的，不是沒有武裝的人民，而是以革命軍隊為代表的武裝的人民。在中國，是武裝的革命反對武裝的反革命」。 *Sochineniia*, VII: 357–8, 363 (譯註：《斯大林全集》第8卷，第326頁)。
- 147 VKP (b), *Komintern i natsional’no-revoliutsionnoe dvizhenie v Kitae*, I: 64.
- 148 VKP (b), *komintern i natsional’no-revoliutsionnoe dvizhenie v Kitae*, I: 494.
- 149 Michael Weiner, “Comintern in East Asia, 1919–39,” 見於 McDermott and Agnew, *Comintern*, 158–190 (第164頁，未註明出處)。
- 150 Wilbur and How, *Missionaries of Revolution*, 248–50.
- 151 Liu, *Military History of Modern China*, chap. 2.
- 152 Karl, *Staging the World*, 195 (引用了陳獨秀1904年寫的話)。
- 153 Evans and Block, *Leon Trotsky on China*, 113–5.
- 154 *Pravda*, May 25, 1925; RGASPI, f. 558, op. 1, d. 2714, l. 17, 轉載於 *Sochineniia*, VII: 133–52 (但沒有「仿照國民黨的模式」這一句)。在中國，斯大林被視為左派，即便他看起來不那麼左的時候也是。Pantsov, *Bolsheviks and the Chinese Revolution*, 86–9, 129; Kara-Murza, *Strategiia i taktika Kominterna v natsional’no-kolonial’noi revoliutsii*, 112.
- 155 Brandt, *Stalin’s Failure in China*, 44–5.
- 156 Kartunova, “Kitaiskii vopros.”; Kartunova, “Novyi vzgliad na razryv s Chan Kaishi. . .”; Peskova, “Stanovleniie diplomaticheskikh otnoshenii mezhdu Sovetskoi Rossiiei i Kitaem”; Peskova, “Diplomaticheskie otnosheniia mezhdu SSSR.”
- 157 VKP (b), *Komintern, i natsional’no-revolutsionnoe dvizhenie v Kitae*, I: 549–53; Pantsov, *Tainaia istoriia*, 126; Pantsov, *Bolsheviks and the Chinese Revolution*, 84–5.
- 158 Slavinskii, *Sovetskii soiuz i Kitai*, 101, 引自 Tszian Chzhun-chzhen [蔣介石], *Sovetskii Soiuz v Kitae*, 26 (1924年3月14日)。

- 159 RGASPI, f. 17, op. 3, d. 561, l. 1.
- 160 RGASPI, f. 17, op. 162, d. 3, l. 55 (1926年4月29日).
- 161 Brandt, *Stalin's Failure in China*, 155–60; Pantsov, *Bolsheviks and the Chinese Revolution*, 101–23.
- 162 Brandt, *Stalin's Failure in China*, 73 (引自 Trotsky archives: “Voprosy nashei politiki v otnoshenii Kitaia i Iaponii”). 伏羅希洛夫也是該委員會的成員。
- 163 VKP (b), *Komintern i natsional'no-revoliutsionoe dvizhenie v Kitae*, II: 36–40; Pantsov, *Tainaia istoriia*, 163 (引自 RGASPI, f. 495, op. 1, d. 73, l. 15: Zinoviev to Hu, February 8, 1926, and f. 514, op. 1, d. 233, l. 33); Pantsov, *Bolsheviks and the Chinese Revolution*, 111–2.
- 164 Isaacs, *Tragedy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 162, 351–2, n12.
- 165 *Izvestiia*, April 8, 1927; Wilbur and How, *Documents on Communism*, 8–9.
- 166 Slavinskii, *Sovetskii soiuz i Kitai*, 131–3; Kapitsa, *Sovetsko-kitaiskie otnosheniia*, 177–81; Schwartz, *Chinese Communism*, 42–60.
- 167 Wilbur, *Nationalist Revolution in China*, 108.
- 168 Paul R. Gregory, Hsiao-ting Lin, Lisa Nguyen, “Chiang Chooses His Enemies,” *Hoover Digest*, 2010, no. 2; RGASPI, f. 17, op. 2, d. 279, l. 1–7, 10, 12, d. 280, l. 2–17, d.281, l. 1–17, d. 282, l. 94–154 (季諾維也夫的提綱), d. 283, l. 259–60, d. 284 (經修改和刪減後公佈的全會記錄, 4月15日的記錄被刪掉了), l. 22–30 (附有季諾維也夫提綱的會議記錄); Golubev, ‘*Esli mir obrushitsia na nashu Respubliku*,’ 49 (引自 TsDOOSO, f. 4, op. 5, d. 448, l. 20).
- 169 Brandt, *Stalin's Failure in China*, 115 (引自托洛茨基檔案, 1927年4月18日的信件).
- 170 Slavinskii, *Sovetskii soiuz i Kitai*, 155–6.
- 171 Deutscher, *Prophet Unarmed*, 327. 「早在1926年初, 我們與政治局目前的領導核心在中國問題上就有了最初的分歧」, 季諾維也夫和托洛茨基在1927年5月底寫道。托洛茨基和季諾維也夫認為中共應該與國民黨決裂的提議在1926年7月的全會上得到了布哈林和斯大林的證實。Pantsov, *Tainaia istoriia*, 162 (RGASPI, f. 495, op. 166, d. 189, l. 2; *Ob'edeninennyi plenum TsK i TsKK VKP (b), 14–23 iulia 1926 g.* Vyp. 1, l. 15, 75).
- 172 Brandt, *Stalin's Failure in China*, 90.
- 173 Vygodskii, *Vneshniaia politika SSSR*, 292, 145 (引自 *Izvestiia*, December 4, 1962).
- 174 *Lubianka: Stalin i VChk-OGPU-NKVD*, 133–4; (RGASPI, f. 17, op. 162, d. 5, l. 35). Gorodetsky, *Precarious Truce*, 221–31; Fischer, *Soviets in World Affairs*, 500–10; Fischer, *Russia's Road from Peace to War*, 169.
- 175 Khinchuk, *K istorii anglo-sovietskikh otnoshenii*, 46; *Izvestiia*, May 18, 1927 (米高揚).
- 176 *Lubianka: Stalin i VChK-OGPU-NKVD*, 131.
- 177 1928年3月再次拒絕了蘇聯的建議。Slavinsky, *Japanese-Soviet Neutrality Pact*.
- 178 Fel'shtinskii, *Kommunisticheskaia oppozitsiia v SSSR*, III: 57–9; Volkogonov, *Trotsky*, 287.
- 179 VKP (b), *Komintern i natsional'no-revoliutsionnoe dvizhenie v Kitae*, II/ii: 763–4.

- 180 *Bol'shevik*, May 31, 1927, 見於 *Sochineniia*, IX: 311–2.
- 181 Deutscher, *Prophet Unarmed*, 336–7.
- 182 托洛茨基和季諾維也夫與八十多名支持者一起向中央遞交了一份長篇文件——按照最初簽名的人數，它被稱為〈八十四人聲明〉（這個數字後來增加到三百多）——要求召開一次秘密的中央會議，討論中國革命運動失敗的問題。它還歷數了斯大林在國內農民政策、工業化、就業、工資、住房等方面的失敗。總之，這是一份竭力反對新經濟政策並主張革命的左派宣言。“Declaration of the 84,” 見於 *Trotsky, Challenge of the Left Opposition*, II: 224–39.
- 183 Gorodetsky, *Precarious Truce*; Jacobson, *When the Soviet Union Entered*, 222. Henderson and Dovgalevsky, “Anglo-Soviet Relations.” 直到1929年秋天，雙方的關係才得以恢復。
- 184 自從1921年恢復貿易關係以來，莫斯科向倫敦出售了價值7,000萬英鎊的貨物，同時也購買了2,430萬英鎊的貨物——棉花、羊毛、機械設備、橡膠和工具。Velikanova, *Popular Perceptions*, 54 (引自 *Foreign Office 371*, 1927, vol. 12595: 191, 193; vol. 12593: 161).
- 185 Werth, “Rumeurs défaitistes et apocalyptiques”; Viola, “The Peasant Nightmare.” 另見 Simonov, “Strengthen the Defense of the Land of Soviets,” 1355–6; *Lubianka: Stalin i VChK-OGPU-NKVD*, 117. 倫納德·夏皮羅推測，蘇聯領導層也許是真的擔心——事實就是如此。Schapiro, *Communist Party*, 303–4. 另見 Sontag, “Soviet War Scare”; Meyer, “The Soviet War Scare of 1927”; 以及 Romano, “Permanent War Scare,” 103–20.
- 186 Rykov, *Angliia i SSSR*, 4–5, 21–31, 36.
- 187 Von Riekhoff, *German-Polish Relations*, 248–55.
- 188 Eudin and North, *Soviet Russia and the East*, 303–4; *Sochineniia*, X: 31–3; Brandt, *Stalin's Failure in China*, 133.
- 189 Wu, “A Review of the Wuhan Débâcle.”
- 190 Valedinskii, “Organizm Stalina vpolne zdorovyi,” 69.
- 191 刑法典都是在共和國而不是全聯盟的層面上頒佈的。在1926年的俄羅斯社會主義聯邦蘇維埃共和國刑法典中，一個人即便沒有實施犯罪，也會僅僅因為「和有罪的環境有聯繫」或者因為「過去的活動」而被作為「危險分子」判刑（第7條）。該法典還有一個特殊的條款（第58條），是針對反對蘇維埃政治秩序的罪行的，這種罪行被認為「最危險」，因而要處以死刑。Goliakov, *Sbornik dokumentov po istorii ugolovnogo zakonodatel'stva SSSR*, 220–3, 267–9, 293–7; Berman, *Soviet Criminal Law*, 23–4; *Lubianka: Stalin i VChK-OGPU-NKVD*, 796–8, n61. 「天底下沒有甚麼舉措、思想、行動，或者不行動，」亞歷山大·索爾仁尼琴後來寫道，「是不可以用第58條予以嚴懲的。」Solzhenitsyn, *The Gulag Archipelago*, I: 60.
- 192 “Sovetskii Azef,” *Segodnya* [Riga], May 9, 1927. 奧格伯烏之前已經決定取消以俄國流亡分子為目標的代號「托拉斯」的重大行動。波蘭情報機關已經把它識破了：從「托拉斯」得到的情報和波蘭人從其他渠道得到的情報不吻合。「托拉斯」還以時機不成熟為由，不斷拖延計劃中的反對蘇維埃政權的起義時間，結果引起進一步的懷疑。遊戲基本已經玩完了。很多人都掉進了圈套，但秘密警察未能

將庫捷波夫 (Kutepov) 將軍引誘回國——他是「全俄軍事聯盟」的首領。對軍官們來說，「全俄軍事聯盟」是最重要的流亡者組織，同時也是蘇聯對外情報機關的主要目標。但雙面間諜、拉脫維亞人亞歷山大·烏佩尼努什 (Alexander Upeninysh, 烏佩林茨 (Upelints))——他也用過亞歷山大·奧佩爾普特 (Alexander Opperput) 和愛德華·斯陶尼茨 (Eduard Staunitz) 的名字——等人，未經許可，就在1927年4月12日的夜裏越過蘇聯邊境進入芬蘭投降了，並在一份俄文的流亡者出版物上曝光了「托拉斯」計劃。他的曝光給人的印象是格伯烏無處不在，無所不知，已經滲透到所有的人和事中。不過，對於格伯烏來說，他的曝光很麻煩。庫捷波夫趕到芬蘭，堅決要求奧佩爾普特—斯陶尼茨以及庫捷波夫的外甥女瑪麗亞·扎哈爾琴科—舒爾茨 (Maria Zakharchenko-Shultz) 潛回蘇聯，實施恐怖行動，以證明他們真心與格伯烏決裂。這些特工人員別無選擇，為了證明自己的誠意，只好執行庫捷波夫的指示，但是後來在斯摩棱斯克附近，當他們試圖逃跑時，奧佩爾普特—斯陶尼茨被打死；扎哈爾琴科稍後也死了，可能是在交火中被打死的，也可能是自殺。Andrew and Gordievsky, *KGB*, 150.

- 193 Plekhanov, *VChK-OGPU*, 323–4. 1930年1月26日，奧格伯烏特工在巴黎設法綁架了庫捷波夫。他因心臟病發作身亡，有可能是死在巴黎，也可能死在從馬賽駛往新俄羅斯 (編註：18世紀末沙俄征服的黑海北岸地區) 的蘇聯船隻「斯巴達克號」上。Sudoplatov, *Special Tasks*, 91; *Nedelia*, 1989, no. 49.
- 194 Arsen'ev, *Podzhigateli voiny*, 21–2; *Dokumenty i materialy po istorii sovetsko-pol'skikh otnoshenii*, V: 151–2; Zhukovskii, *Polnomochnyi predstavitel' SSSR*, 202–5; Shishkin, *Stanovlenie vneshnei politiki postrevliutsionnoi Rossii i kapitalisticheskii mir*, 283–91; Blackstock, *Secret Road to World War Two*, 136–61; Korbelt, *Poland Between East and West*, 217–20. 波蘭法庭判處刺客鮑里斯·科韋爾達終身監禁，但是在1937年6月15日，波蘭政府赦免了他。
- 195 Shishkin, *Stanovlenie vneshnei politiki postrevliutsionnoi Rossii i kapitalisticheskii mir*, 289–90. Soviet protest: Degras, *Soviet Documents on Foreign Policy*, II: 220–1, 228–31.
- 196 *Lubianka: Stalin i VChK-OGPU-NKVD*, 133 (RGASPI, f. 558, op. 11, d. 71, l.2–3); *Pravda*, June 8, 1927. 另見 Shishkin, *Stanovlenie vneshnei politiki postrevliutsionnoi Rossii i kapitalisticheskii mi*, 283–91; Degras, *Soviet Documents on Foreign Policy*, II: 220–1, 228–31; *Dokumenty i materialy po istorii sovetsko-pol'skikh otnoshenii*, V: 151–2; Zhukovskii, *Polnomochnyi predstavitel' SSSR*, 202–5; Blackstock, *Secret Road to World War Two*, 136–61; Korbelt, *Poland Between East and West*, 217–20.
- 197 *Lubianka: Stalin i VChK-OGPU-NKVD*, 137–8 (APRF, f. 3, op. 58, d. 3, l. 113–113ob.), 796, n60.
- 198 RGASPI, f. 558, op. 11, d. 767, l.35–6.
- 199 *Pravda*, June 10, 1927. 根據斯大林的指示，奧格伯烏為了加強自己的特工網絡，還在舊社會那些有頭有臉的人 (沙皇時代上層社會的人和神職人員) 中招募人手。Plekhanov, *VChK-OGPU*, 313.

- 200 Plekhanov, *VChK-OGPU* 130 (引自 TsA FSB, f. 2, op. 5, d. 136, l. 10; d. 36, l. 3). 6月19日，明仁斯基把(夏季)要處決的犯人限制在一個相對較少的數量。Danilov, *Tragediia sovetskoi derevni*, I: 24. 明仁斯基承認(1927年7月19日)：「在白俄羅斯、斯摩棱斯克、莫斯科、列寧格勒等地，幾乎沒有發現活躍的君主派集團。」Vinogradov, “Zelenaia lampa,” 5.
- 201 *Lubianka: Stalin i VChK-OGPU-NKVD*, 135 (RGASPI, f. 558, op. 11, d. 71, l. 29). 就在此時，斯大林接到秘密報告說，破獲了英國人在列寧格勒的間諜網——有些特工人員是在芬蘭境內——據說該間諜網的目標是要弄清楚紅軍及其艦隊的作戰水平，包括化學武器的能力；大約有二十幾人被捕。Plekhanov, *VChK-OGPU, 1921–1928*, 285 (引自 TsA FSB, f. 2, op. 5, d. 136, l.26–9).
- 202 *Pravda*, July 10, 1927.
- 203 Tepliakov, “*Nepronizaemye nedra*,” 194.
- 204 Zdanovich, *Organy gosudarstvennoi bezopasnosti*, 299 (引自 TsA FSB, f. 2, op. 5, d. 269, l. 9).
- 205 Velikanova, *Popular Perceptions*, 74–5. 另見 Simonov, “*Krepit’ oboronu stranam sovetov*,” 157; 以及 Solomon, *Soviet Criminal Justice*, 66–7.
- 206 Sevost’ianov, “*Sovershenno sekretno*,” V: 362–78, 401–8, 411–83, 484–584, 855–906 (TsA FSB, f. 2, op. 5, d. 385, l.256–361, 422–81; op. 4, d. 386, l.45–84; op. 5, d. 394, l.99–108; op. 6, d. 394, l.109–12). Werth, “*Rumeurs défaitistes et apocalyptiques*”; Viola, “*The Peasant Nightmare*.”
- 207 1929年8月，費希爾和契切林一起在德國的威斯巴登度過了幾天時間。Fischer, *Russia’s Road from Peace to War*, 172; 關於戰爭恐慌的整體情形，參見165–79. 契切林的副手李維諾夫打心底裏反對政治局的做法。Sheinis, *Maxim Litvinov*, 194. 「他們說我們反對派在利用戰爭威脅，」托洛茨基在1927年6月的中央委員會會議上說，「是你們在利用戰爭威脅迫害反對派並準備摧毀反對派。」Fel’shtinskii, *Kommunisticheskaia oppositsiia v SSSR*, III: 96.
- 208 Velikanova, *Popular Perceptions*, 47, 76–7; M. M. Kudiukhina, “*Krasnaia armia i ‘voennye trevogi’ vtoroi poloviny 1920–kh godov*,” 以及 A. V. Baranov, “*Voennaia trevoga’ 1927 g. kak faktor politicheskikh nastroyenii v neposvskom obshchestve (po material iuga Rossii)*,” *Rossia i mir glazami druga druga: iz istorii vzaimovospriiatiia* (Moscow: IRI RAN, 2007), 153–74, 175–93.
- 209 Danilov, *Tragediia sovetskoi derevni*, I: 25.
- 210 Lih, *Stalin’s Letters to Molotov*, 135. 6月24日，斯大林讓托洛茨基來到中央監察委員會主席團(阿龍·索爾茨(Aaron Solts))前面；他們就法國革命問題進行了爭論！
- 211 Fel’shtinskii, *Kommunisticheskaia oppositsiia v SSSR*, III: 126–7.
- 212 Deutscher, *Prophet Unarmed*, 388–9.
- 213 RGASPI f. 558, op. 11, d. 767, l.35–9, 45–8, 56–60; Gorlizki and Khlevniuk, “*Stalin and his Circle*,” III: 243–67; *Pravda*, June 26, 1927.
- 214 Trotsky archives, T 965 (1927年6月28日).
- 215 *Sochineniia*, IX: 315–21. 1934年1月16日，坡克羅夫斯基(生於1905年)因為反革命煽動罪而被逮捕。他被判處到烏法流放三年。他後來在「大恐怖」中逃過一劫。



- 216 Deutscher, *Prophet Unarmed*, 339.
- 217 Lih, *Stalin's Letters to Molotov*, 136–7.
- 218 Khlevniuk, *Master of the House*, 3–4. RGASPI, f. 558, op. 4, d. 767, l. 56–60.
- 219 Rigby, *Communist Party Membership*, 113.
- 220 Lih, *Stalin's Letters to Molotov*, 138–9, 141–3.
- 221 Samuelson, *Plans for Stalin's War Machine*, 40–1 (引自 RGVA, f. 33987, op. 3, d. 250, l. 60). 據絕密的備忘錄記載，伏羅希洛夫在 1927 年對軍事改革的成就和軍隊的狀況是肯定的，但是對國防工業不滿意。Kudriashov, *Krasnaia armia*, 161–71 (APRE, f. 3, op. 50, d. 257, l. 98–119).
- 222 Ken, *Mobilizatsionnoe planirovanie*, 21.
- 223 Velikanova, *Popular Perceptions*, 93.
- 224 Dyck, "German-Soviet Relations," 80 (引自德國外交部檔案，L337/L100554–60：馮·布羅克多夫—蘭曹的備忘錄，1927 年 7 月 24 日)。
- 225 Dyck, *Weimar Germany and Soviet Russia*, 96–7; Dyck, "German-Soviet Relations," 67 (引自迪克森 (Dirksen) 備忘錄，1927 年 9 月 19 日)，83。另見 Dyck, *Weimar Germany and Soviet Russia*, 66–107; 以及 Erickson, *Soviet High Command* [1962], 144–63, 247–82.
- 850 226 奧格伯烏向他報告說，流亡的孟什維克黨人認為共產黨會因為他而垮台。實際上，流亡的孟什維克黨人正確地預測到托洛茨基和反對派會被鎮壓。Volkogonov, *Trotsky*, 293–4 (Arkhiv INO OGPU, d. 672, tom 1, l. 196); *Sotsialisticheskii vestnik*, August 1, 1927.
- 227 "Zametki na sovremennye tenmy," *Pravda*, July 28, 1929, 見於 *Sochineniia*, IX: 322–61 (at 322, 327–30).
- 228 Nazarov, *Stalin i bor'ba za liderstvo*, 162 (引自 RGASPI, f. 17, op. 2, d. 317, vyp. 1, l. 76, 50, 81).
- 229 Nazarov, *Stalin i bor'ba za liderstvo*, 163 (未註明出處)。
- 230 *Pravda*, July 25, 1927.
- 231 *Sochineniia*, X: 3–59 (at 51).
- 232 Boersner, *The Bolsheviks*, 244–6.
- 233 RGASPI, f. 17, op. 162, d. 5, l. 74–9, 86–8 (1927 年 8 月 17 日)。共產國際代表鮑羅廷在離開中國時對某個外國人說，「在下一個中國將軍到莫斯科去並高喊『革命萬歲』的時候，最好馬上把他交給格伯烏。他們想要的只是步槍而已」。Strong, *China's Millions*, 242。鮑羅廷還對老布爾什維克協會說，讓他感到後悔的是對待蔣介石不夠堅決：「這是個致命的錯誤。由於我們的失誤，在佔領南京後錯過了清算蔣介石的機會。」VKP (b), *Komintern i natsional'no-revoliutsionnoe dvizhenie v Kitae*, II/ii: 926.
- 234 Plekhanov, *VChK-OGPU*, 90.
- 235 Vadin, *Stenogrammy zasedanii Politbiuro*, I: 579–80.
- 236 Vadin, *Stenogrammy zasedanii Politbiuro*, II: 566, 573–4, 582。9 月 12 日，托洛茨基讓自己的支持者葉利欽 (Yeltsin) 去調查葉努基澤在 1917 年 4 至 10 月的時候屬於哪個黨派：Fel'shtinskii, *Kommunisticheskaia oppositsiia v SSSR*, IV: 176–7.

- 237 Vatlin, *Stenogrammy zasedanii Politbiuro*, II: 586.
- 238 Vatlin, *Stenogrammy zasedanii Politbiuro*, II: 593–6.
- 239 Vatlin, *Stenogrammy zasedanii Politbiuro*, II: 597. (RGASPI, f. 17, op. 3, d. 705).
- 240 RGASPI, f. 17, op. 3, d. 650, l.1–2.
- 241 Vatlin, *Stenogrammy zasedanii Politbiuro*, I: 579–80, 595.
- 242 他們問完之後，斯大林也提了一個問題：在美國1,800萬至1,900萬產業工人中，為甚麼加入工會的只有350萬，勞聯產聯為甚麼不支持承認蘇聯？「美國的工人階級，」有一個人回答說，「對於國際事務不感興趣。」*Pravda*, September 15, 1927; *Sochineniia*, X: 92–148; *Na prieme*, 25.
- 243 Serge and Trotsky, *Life and Death*, 148; *Pravda*, September 29 and October 1, 1927; Carr and Davies, *Foundations of a Planned Economy*, II: 35–6. 國家縫紉機托拉斯主席姆拉奇科夫斯基 (Mrachkovsky)，連同普列奧布拉任斯基和列昂尼德·謝列布里亞科夫一起——他們是集體負責的——被立即開除黨籍。
- 244 Zdanovich, *Organy gosudarstvennoi bezopasnosti*, 289–93, 382–3.
- 245 Fel'shtinskii, *Kommunisticheskaia oppositsiia v SSSR*, IV: 189; Zdanovich, *Organy gosudarstvennoi bezopasnosti*, 320 (引自 TsA FSB, delo R-8209, l. 69; f. 2, op. 5, d. 98, l. 43, 98). 早在1927年8月的中央委員會和中央監察委員會聯席全會上，托洛茨基就承認「軍隊的一些工作人員因為受到潛在的戰爭威脅的影響，近來交換了意見，談到我們武裝力量的情況……在這些同志中，我要提到的有穆拉洛夫同志 (陸海軍督察)、普特納同志和普里馬科夫同志 (都是軍長)，他們都因為持反對派觀點而被解除了職務，還有姆拉奇科夫斯基同志和巴卡也夫同志」。他們形成了一份文件，談到了對於國防、對於提高軍隊的革命精神和戰鬥精神來說的必要措施；托洛茨基本來是打算把這份文件交給政府首腦李可夫在政治局討論的。這是指控托洛茨基準備發動軍事政變的依據，而這個罪名是托洛茨基已經預見到了的。Fel'shtinskii, *Kommunisticheskaia oppositsiia v SSSR*, IV: 44.
- 246 明仁斯基在1927年10月的全會上作了發言。他對他們說，9月底，奧格伯烏逮捕了五名準備發動軍事政變的參與者：有兩人是中級指揮官，其他的最近已經復員。他說他們是在地下印刷所行動中被發現的。實際上，他們最初是在印刷所事件之前被發現的，但直到該事件發生後才受到關注。斯大林的代理人、中央監察委員雅羅斯拉夫斯基指示明仁斯基，那些抓起來的人不用審問；有軍事政變的計劃就夠了，不需要詳細情況，不要把問題複雜化。Zdanovich, *Organy gosudarstvennoi bezopasnosti*, 321 (引自 TsA FSB, f. 2, op. 5, d. 54, l. 88, 93–4).
- 247 Deutscher, *Prophet Unarmed*, 357–8; *Sochineniia*, X: 187.
- 248 Volkogonov, *Trotsky*, 291–3 (引自 RGASPI, f. 505, op. 1, d. 65, l. 1–35). 把托洛茨基開除出共產國際的動議是由約翰·墨菲 (John Murphy) 提出來的，他自己也很快退黨了：Murphy, *New Horizons*, 274–7.
- 249 *Pravda*, September 23 and October 25, 1927.
- 250 V. Ia. Bliukher v Kitae.
- 251 Pantsov, *Bolsheviks and the Chinese Revolution*, 156.

- 252 到1914年，俄國已經佔到全球跨境借款的11%，絕對數額僅次於美國，而由於美國借出的數量也很大，所以俄國就成了全球唯一的最大淨借入國。Cameron and Bovykin, *International Banking*, 13.
- 253 Dallin, *Soviet Espionage*, 32–41 (引文來自第36頁，係轉引1927年4月11日《紐約時報》)
- 254 Rakovskii, *Kniaz' Metternikh*. 拉柯夫斯基撰文向美國讀者簡要介紹了蘇聯在外交政策上的習慣做法：“The Foreign Policy of Soviet Russia,” *Foreign Affairs*, 4/4 (July 1926): 574–84.
- 255 *Izvestiia*, August 11, 1927. 駐意大利大使加米涅夫也在宣言上簽了名，但墨索里尼和意大利政府並未理會。
- 256 Jacobson, *When the Soviet Union Entered*, 273–80.
- 257 *Le Matin*, September 13, 1927.
- 258 *Pravda*, September 16, 1927 (李維諾夫); *Izvestiia*, September 16, 1927; “Novaia ugroza franko-sovetskomu soglasheniiu,” *Kommunisticheskii internatsional*, October 7, 1927: 7–8, Senn, “The Rakovski Affair”; Carley, “Episodes from the Early Cold War.” 儘管蘇聯人開出了更高的價碼並減少了要求得到的貸款數額，結果還是沒有成功。Degras, *Soviet Documents on Foreign Policy*, II: 248–54.
- 259 Conte, *Christian Rakovski*, 196–204.
- 260 Naville, *Trotsky Vivant*.
- 261 Fel'shtinskii, *Kommunisticheskaia oppositsiia v SSSR*, IV: 219–24.
- 262 Nazarov, *Stalin i bor'ba za liderstvo*, 164–5 (RGASPI, f. 17, op. 2, d. 321, l.4–5).
- 263 Fel'shtinskii, *Kommunisticheskaia poppozitsiia v SSSR*, IV: 223, 230–1; Miliukov, *Vospominaniia* II: 19–20.
- 264 “Trotskistskaia oppositsiia prezhde i teper',” *Pravda*, November 2, 1927, 見於 *Sochineniia*, X: 172–205 (at 172–6).
- 265 *Pravda*, November 2, 1927, 見於 “Trotskistskaia oppositsiia prezhde i teper',” *Sochineniia*, X: 172–205; Stalin, *Ob oppositsii*, 723. 後來出版的《斯大林全集》刪掉了直接引自遺囑的內容。Carr, *Interregnum*, 267.
- 266 Fel'shtinskii, *Kommunisticheskaia poppozitsiia v SSSR*, IV: 230–1; Kun, *Bukharin*, 208–9 (未註明出處).
- 267 *KPSS v rezoliutsiakh* [1984], IV: 210–49.
- 268 *Voprosy torgovli*, 1927, no. 1: 63.
- 269 Carr and Davies, *Foundations of a Planned Economy*, II: 41.
- 851 270 Stalin, *Beseda s inostrannymi rabochimi delegatsiiami*, 44–8; *Pravda*, November 13 and November 15, 1927, 轉載於 *Sochineniia*, X: 206–38 (at 237). 在斯大林辦公室的日誌中沒有關於此次會議的記載，這顯然是因為代表團人數太多，無法在他的辦公室接待。
- 271 Daniels, *Conscience of the Revolution*, 314 (引自 *Inprecor*, November 3, 1927).
- 272 Fel'shtinskii, *Kommunisticheskaia oppositsiia v SSSR*, IV: 254–6. (托洛茨基致政治局和中央委員會的信，1927年11月9日); Carr and Davies, *Foundations of a Planned Economy*, II: 42–3.

273 「雷聲大，雨點小」，一名支持政權的外國記者用農民的俗語輕蔑地寫道。

Reswick, *I Dreamt Revolution*, 205. 雷斯維克明白這種堂吉訶德式的行動給了斯大林加強鎮壓的藉口 (207–208 頁)。反對派採取的最聰明的行動，是斯米爾加、普列奧布拉任斯基等人在從前的巴黎大飯店的陽台上，對朝着紅場方向遊行的人們大聲疾呼，因為那棟三層建築的位置較好，處於克里姆林宮對面的獵手街和特維爾大街的轉角處，而斯米爾加在那裏有一套房子。斯米爾加在1917年曾率領波羅的海艦隊駛入涅瓦河支援十月政變，而此時他和他的幫手們展開了列寧、托洛茨基、季諾維也夫三人的肖像，還有一幅標語——「執行列寧的『遺囑』」。證據顯示，有些遊行的人發出了歡呼。但是，紅色普列斯尼亞區的區委書記坐着自己的小汽車和赤衛隊一起趕來了。那些赤衛隊員一邊向陽台上扔磚頭，一邊大喊「揍那些猶太佬反對派」。與此同時，馬路對面六層的國家大飯店裏擁護政權的工作人員，開始朝斯米爾加的陽台扔土豆和冰塊。很快，15到20個軍校生和警校生破門而入，搶走標語，並搗毀了那個地方。Fel'shtinskii, *Kommunisticheskaia oppositsiia v SSSR*, IV: 250–2 (穆拉洛夫、斯米爾加和加米涅夫寫的便條，1927年11月7日)，258–60 (斯米爾加的信，1927年11月10日)。1920年代末，國家大飯店又恢復了飯店的功能；巴黎大飯店在1935年因為特維爾大街要拓寬而拆掉了，在它的舊址附近，建了一座新的人民委員會大樓。有位歷史學家說反對派的幾個重要人物是在沃茲德維任卡街和莫霍瓦婭街轉角處的大樓陽台上發表演說的，那棟大樓可能是共產國際的總部或者是曾經的黨部，是蘇維埃中央執行委員會辦公的地方。Medvedev, *Let History Judge*, 173.

274 Volkogonov, *Trotsky*, 300–1. 另見Fel'shtinskii, *Kommunisticheskaia oppositsiia v SSSR*, IV: 256–7 (尼古拉耶夫給中央委員會和中央監察委員會的信，1927年11月10日)。在列寧格勒冬宮附近也發生了相似的一幕。在那裏，季諾維也夫從窗口發表了簡短的演說，而列寧格勒反對派的其他成員則試圖干擾冬宮廣場上官方的遊行隊伍。士兵和水兵騎着馬趕來，驅散了舉行反示威活動的人群。前革命軍事委員會副主席拉舍維奇和前列寧格勒格伯烏首腦巴卡也夫穿着撕掉領章的士兵大衣，大喊警察們應該感到害臊。至少有81人被捕。第二天的情況更亂，被捕的人更多。Velikanova, *Popular Perceptions*, 183 (引自TsGAIPD SPb, f. 16, op. 1, d. 8485, l.258–9); Trotskii, *Moia zhizn'*, II: 280; Serge, *Memoirs of a Revolutionary*, 226–7. 為防止失業工人的遊行隊伍與反對派的遊行隊伍匯合，所有參加遊行的方陣都要事先得到批准並接受監督。Velikanova, *Popular Perceptions*, 181–2 (引自TsGAIPD SPb, f. 24, op. 5, d. 75, l. 69)。李可夫被派到列寧格勒參加此次週年紀念活動，在以前的塔夫利達宮，他在蘇維埃中央執行委員會的慶祝會議上發表演說時，展開了一幅以V形曲線顯示經濟復蘇的巨型圖表，1921年和1927年的低點都明顯超過1913年的水平。L'zvestiia, October 19, 1927; Rykov, *Ten Years of Soviet Rule*. 學校作業方法協會 (Institute of School Work Methods) 做過一個12萬人的大型社會學研究，搜集了150萬份與革命十週年紀念活動有關的口述材料。Kozlov and Semenova, "Sotsiologiia detsstva," 47–8.

275 Chertok, *Stop-Kadr*, 54. 在人民委員會紀念革命十週年的展覽會上發現了反對派成員的肖像並很快把它們撤掉了。中央監察委員會的馬特維·什基里亞托夫

- (Marvei Shkiriyatov) 讓人撤掉了那些肖像，但他還要想辦法把一尊由幾位象徵性的人物而不是由斯大林等同志抬着列寧棺材的雕塑弄走，所以他就寫信給斯大林，抱歉地請求他的干預（此事被列入政治局會議議程）。 *Voprosy istorii*, 2004, no. 11: 16–7 (RGASPI, op. 11, d. 826, l.1–2), 轉載於 Pikhovoi and Zelenov, *I. V. Stalin: istoricheskaia ideologiia*, I: 44–7.
- 276 *Pravda*, November 16, 1927.
- 277 Fel'shtinskii, *Kommunisticheskaia oppositsiia v SSSR*, IV: 264
- 278 1925年夏天，國家工作人員之外的克里姆林宮住戶全都必須在一個星期之內搬走；允許參觀的範圍也縮小了。更多關於布爾什維克進駐克里姆林宮的情況，參見 Rolf, *Sovetskie massovy prazdniki*, 149.
- 279 “Mariia Ioffe, Nachalo,” *Vremia i my*, 1977, no. 20: 163–92 (at 178–82). Joffe, *One Long Night*. 另見 Joffe, *Back in Time*.
- 280 Trotskii, *Portety revoliutsionerov*, 396–8; Deutscher, *Prophet Unarmed*, 381–2; Volkogonov, *Trotsky*, 303.
- 281 Medvedev, *Let History Judge*, 174 (這話出自米哈伊爾·雅庫博維奇 (Mikhail Yakuobovich)，他在監獄和勞改營待了24年，後來在哈薩克斯坦卡拉干達的一所殘疾人之家度過餘生)。雅庫博維奇聲稱，在送葬的人群中見到了斯大林的妻子娜佳·阿利盧耶娃默默地走在棺材的後面，但這一說法現在不能得到證實。 Medvedev, *Let History Judge*, 174 (引自米哈伊爾·雅庫博維奇未出版的回憶錄)。亞戈達和葉努基澤都在現場。在莫斯科黨組織1927年開除的143名反對派中，學生82人，白領僱員41人，工人16人。 Merridale, *Moscow Politics*, 44. 「反對派主要由知識分子構成，知識水平要高於其他黨員，這種情況也造成了他們對後者產生某種程度的不信任，」捷克斯洛伐克外交使團的團長I. 吉爾斯 (I. Girs) 寫道，「斯大林主義的立場的強大之處在於，它代表了黨內佔有數量優勢的那部分人，即中等知識水平的人。」 Shishkin, *Vlast', politika, ekonomika*, 149.
- 282 Fischer, *Men and Politics*, 94; Deutscher, *Prophet Unarmed*, 383–4; Shishkin, *Stanovlenie vneshnei politiki postrevoliutsionnoi Rossii i kapitalisticheskii mir*, 282. N. P. 柳金 (N. P. Ryutin) 和 A. M. 列扎娃 (A. M. Lezhava) 代表莫斯科黨委也參加了葬禮。
- 283 Volkogonov, *Trotsky*, 279, 303 (GARF, f. 5446, op. 2, d. 33, l. 19).
- 284 *Pravda*, November 25, 1927.
- 285 *Moskovskie Bol'sheviki*, 106 (引自 MPA, f. 63, op. 1, d. 153, l. 75; f. 3, op. 5, d. 2, l. 200: *Pravda*, December 2, 1927).
- 286 *XV s"ezd VKP (b)*, I: 43–74.
- 287 *XV s"ezd VKP (b)*, II: 1596–8.
- 288 *XV s"ezd VKP (b)*, I: 89–90; *Sochineniia*, X: 351.
- 289 *Piatnadsatyi s"ezd VKP (b)*, I: 291. Medvedev, *Let History Judge*, 175.
- 290 *XV s"ezd VKP (b)*, I: 279–85.
- 291 *XV s"ezd VKP (b)*, I: 411–21; *Sochineniia*, X: 354–71 (at 371).
- 292 *XV s"ezd VKP (b)*, I: 623; Medvedev, *Let History Judge*, 86.

- 293 *Pravdatnyi s"ezd VKP (b)*.
- 294 Bulletin no. 30, supplement no. 1: 35–7. Medvedev, *Let History Judge*. 在一個後斯大林時代版本的會議記錄中公佈了遺囑：*XV s"ezd VKP (b)*, II: 1477–8. 852
- 295 Danilov, *Tragediia sovetskoi derevni*, I: 119–35 (TsA FSB, f. 2, op. 5, d. 386, l.1-3, 15–45). 當時流傳着一個冷笑話：「他們在說他們取消了字母『M』，因為沒有肉 (miaso)，沒有黃油 (maslo)，沒有做衣服的材料 (manufaktura)，沒有肥皂 (mylo)，所以沒有理由僅僅因為米高揚 (Mikoyan) (蘇聯貿易部長) 這一個姓而保留『M』。」另外有句俏皮話同樣充滿了苦澀的意味：「革命給工人的是報告 (doklad)，給工作人員的是工資 (oklad)，給工作人員妻子的是珠寶箱子 (klad)，給農民的是地獄 (ad)。」Ivanova, *Gulag v sisteme totalitarnogo gosudarstva*, 30.
- 296 Sevost'ianov, "Sovershenno sekretno," V: 675.
- 297 Mif, "Kitaiskaia Kommunisticheskaia partiia v kriticheskie dni," 106.
- 298 "Iz istorii kollektivizatsii 1928 god: poezdka Stalina v Sibir," *Izvestiia TsK KPSS*, 1991, no. 7: 182–6.
- 299 *XV s"ezd VKP (b)*, II: 1599. 另見 Deutscher, *Prophet Unarmed*, 385–9.
- 300 *XV s"ezd VKP (b)*, II: 1599–1600.
- 301 *XV s"ezd VKP (b)*, II: 1398–1400.
- 302 由中央監察委員會主席奧爾忠尼啟則正式提出的一項大會決議要求開除 75 個著名的反對派；決議獲得一致通過。*XV s"ezd VKP (b)*, II: 1468–70. 反對派被正式指控為產生了失敗主義的「思想方針」，這種思想方針「已使托洛茨基反對派在蘇聯內部變成小資產階級民主派的工具，在國外變成國際社會民主主義的輔助部隊」。Pravda, December 20 and December 21, 1927 (譯註：《蘇聯共產黨代表大會、代表會議和中央全會決議彙編》(第三分冊)，第 417 頁)；*KPSS v rezoliutsiakh*, IV: 13–74. 代表大會後，約有 1,500 名黨員被開除黨籍，約有 2,500 名黨員簽署了宣佈放棄自己主張的書面聲明。Popov, *Outline History of the C.P.S.U.*, II: 327; Conquest, *The Great Terror*, 11 (未註明出處)。
- 303 Trotsky, *My Life*, 521.
- 304 中央委員中，從 1917 年到 1923 年，大俄羅斯人只佔 49%；1934 年，該比例達 54%，而到了 1939 年，大部分都是大俄羅斯人。Evan Mawsdley, "An Elite within an Elite: Politburo/Presidium Membership under Stalin, 1927–1953," 74.
- 305 Grigorov, *Povoroty sud'by i proizvol*, 507. 托洛茨基 (·勃朗施坦) 認為，他和季諾維也夫以及加米涅夫的猶太人身份對於他們的失敗關係很大。Trotsky, *Stalin: Volume Two*, 224–5.
- 306 Pravda, December 18, 1927.
- 307 Mozokhin, *VChK—OGPU*, 24 (TsA FSB, f. 2, op. 5, por. 1, l. 31).
- 308 Gerson, *The Secret Police*, 269.
- 309 Shreider, *NKVD iznutri*, 22.
- 310 Cherniavskii, "Samootvod," 67–70 (RGASPI, f. 17, op. 2, d. 335, l.4–8: 供李可夫修改的速記記錄的副本)。另見 Murin, "Eshche raz ob otstavkakh I. Stalina," 72–3.

- 311 RGASPI, f.17, op. 2, d. 335, l.3–7. 另見 Cherniavskii, “Samootvod.”
- 312 *KPSS v rezoliutsiakh* [1970], III: 247; Carr and Davies, *Foundations of a Planned Economy*, I: 710.
- 313 Kvashonkin, *Bol'shevistskoe rukovodstvo*, 357–61 (GARF, f. R-5446, op. 55, d. 1338, l.1–4)
- 314 *Piatnadsyati s'ezd VKP (b)*, II: 1132.
- 315 *XV s'ezd VKP (b)*, II: 1454–68; *Pravda*, December 20, 1927.
- 316 *Piatnadsyati s'ezd VKP (b), dekabr' 1927 goda*, I: 66–7, II: 1419. 有學者斷言，即便是密切觀察黨的第十五次代表大會的人，也不可能想到農村會首當其衝，成為革命改造的對象。Pethybridge, *One Step Backwards*, 230.
- 317 *XV s'ezd VKP (b)*, I: 63, 66–7, II: 1419–22.
- 318 生日那天，斯大林在他的辦公室召開了幾場會議：*Na prieme*, 773.
- 319 *Pravda*, December 18, 1927; Reswick, *I Dreamt Revolution*, 210–9. 1926年11月6日，斯大林寫信給《列寧格勒真理報》，不讓發表他與戴維斯談話的俄文版。
- 320 Ivan P. Tovstukha, “Stalin,” 載於 Gambarov, *Entsiklopedicheskii slovar'*, XLI/iii: 107–10; Tovstukha, *Iosif Vissarionovich Stalin*. 1929年斯大林生日那天，它略作擴充，發表在《真理報》上。另見 *Proletarskaia revoliutsiia*, 1935, no. 6: 130; 以及 Tucker, *Stalin as Revolutionary*, 428.

## 第十四章 西伯利亞之行

- 1 *Sochineniia*, XI: 170 (1952年第一版); Viola, *War Against the Peasantry*, 101.
- 2 Chuev, *Tak govoril Kaganovich*, 1.
- 3 *Sochineniia*, XI: 369–70. 據辦公室日誌記載，1月17日，斯大林在辦公室接待了兩名來訪者，安季波夫 (Antipov) 和日本的後藤 (Goto)，但也可能是斯大林辦公室的其他人接待的，因為他不在。斯捷茨基被列為1928年1月28日接待的來客，而當時斯大林還在西伯利亞。*Na prieme*, 26, 768, 774, 781.
- 4 Paul R. Gregory, “National Income,” 見於 Davies, *From Tsarism to the New Economic Policy* [1990], 247.
- 5 Kindleberger, *World in Depression*, 46.
- 6 Carr and Davies, *Foundations of a Planned Economy*, II:943 (表7).
- 7 Koniukhov, *KPSS v bor'be*, 66 (引自 RGASPI, f. 17 op. [沒有編號], d. 95, l.29–30).
- 8 Jasny, *Socialist Agriculture*, 223–7; Dohan, “The Economic Origins of Soviet Autarky,” 605; Davies, *Socialist Offensive*, 419 (表1); Carr and Davies, *Foundations of a Planned Economy*, 698, 916–9, 1027 (表38). 革命後實行新經濟政策時收成的最高紀錄是1925至1926年的7,680萬噸。
- 9 Davies, *Socialist Offensive*, 1–18.
- 10 *Itogi vypolneniia pervogo piatiletnego plana*, 135.

- 11 Davies and Wheatcroft, *Years of Hunger*, 446; Davies, *Socialist Offensive*, 4, 13. 1920年代蘇聯的收成數據是估計值：統計人員要求參加抽樣的農民在收割前估計自己的收成，等級是從一到五，然後得到預計平均值的百分比，再乘以革命前的平均值。最後，統計人員會把估計值提高一點，因為他們認為農民會為了逃稅而低估產量。官方的數據有可能會高估收成。1929年，統計人員宣佈，使用革命前平均值的做法無效，因此也就宣佈他們對1920年代收成的估計無效。Tauger, "Statistical Falsification in the Soviet Union." 集體化使得準確估計蘇聯的糧食產量成為可能，雖然那並不意味着報道的都是準確結果。
- 12 在斯大林去西伯利亞之前，無論是當局的政策還是把經濟理解為支持工業化——作這種理解的遠不只是斯大林派——都是和新經濟政策不相容的。Davies and Wheatcroft, "Further Thoughts," 798. 有學者生動地寫道，「新經濟政策是建在沙灘上的房子」。但只是出於政權的反市場行為。Pethybridge, *One Step Backwards*, 250.
- 13 L. A. Neretina, "Reorganizatsiia gosudarstvennoi promyshlennosti v 1921–25 godakh: pronsipy i tendentsii razvitiia," 見於 Davies, *NEP*, 75–87 (at 84).
- 14 Davies and Wheatcroft, "Further Thoughts," 798; Dmitrenko, "Chto takoe NEP?," 46. 本意為幫助農民而採取的打擊私商和強行控制物價的做法，在破壞貨幣穩定的同時，實際上也以布爾什維克所不能理解的一種相互作用的方式把貿易條件變得對農民不利了。要是讓市場去決定價格，對農民和整個宏觀經濟來說會更好。Johnson and Termin, "The Macroeconomics of NEP"; Gregory and Mokhtari, "State Grain Purchases."
- 15 "V. V. Kuibyshev i sotsialisticheskaiia industrializatsiia SSSR," *Istoricheskii arkhiv*, 1958, no. 3: 56.
- 16 轉引自 Bogushevskii, "Kanun piatiletki," 478. 另見 Kuromiya, *Stalin's Industrial Revolution*, 7.
- 17 Carr, *Interregnum*, 20–2; Barsov, *Balans stoimostnykh obmenov mezhdu gorodom*, 23; Millar and Nove, "A Debate on Collectivization," 57; S. G. Wheatcroft, "Agriculture," 見於 Davies, *From Tsarism to the New Economic Policy* [1990], 79–103; Gregory, *Russian National Income*, 102–21, 194. 對於農民惜售原因的調查結果，參見 *Statistika i narodnoe khoziaistvo*, 1928, no. 2: 146.
- 18 Dohan, "Soviet Foreign Trade in the NEP Economy," 343–5. 在早先的1925年糧食收購危機中，當局曾經提高糧食收購價格。Davies, *Socialist Offensive*, 37–41. 另見 David Woodruff, "The Politburo on Gold, Industrialization, and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y, 1925–1926," 載於 Gregory and Naimark, *Lost Politburo Transcripts*, 199–223 (at 206–8).
- 19 Harrison, "Prices in the Politburo, 1927," 224–46. 黨的第十五次代表大會期間，李可夫接見了產糧區的官員，要他們對糧食提價的問題提都不要提，這一態度在1927年12月24日的政治局決議中得到了明確的說明。Danilov, *Tragediia sovetskoi derevni*, I: 112.



- 20 Carr and Davies, *Foundations of a Planned Economy*, I/i: 46, 724–30. 夏季的生產率問題令人困惑。例如，有人對1927年的紡織工人做了研究並聲稱在5、6、7三個月，工人的平均生產率都提高了，而這段時間，有地的工人一般都放假回了農村。Antropov, “Sviaz’ teksti’nykh rabochikh,” 4–7. 不過，即使平均生產率提高了，絕對產量還是下降了。
- 21 Sevost’ianov, “Sovershenno sekretno”: *Lubianka—Stalinu*, VI: 58–60 (TsA FSB, f. 2, op. 6, d. 575, l. 1–58).
- 22 同一時期的分析家們認為，商品短缺的原因在於沒有足夠的資金去購買進口的輕工業原料（棉花、布匹、羊毛、皮革）。Dohan, “Foreign Trade,” 223. 在貿易部門，政權試圖通過合併和裁減人員來降低成本、提高效率。Koniukhov, *KPSS v bor’be*, 95 (引自 *Molot*, February 1, 1928), 131–2 (引自 *Izvestiia Sibkraikoma*, 1928, no. 4: 4–5)
- 23 Danilov, *Tragediia sovetskoi derevni*, I: 27, 108. 另見 *XVI s’ezd VKP (b)*, 762–3, 975–7; Velikanova, *Popular Perceptions*, 86–8.
- 24 Cleinow, *Neue Sibirien*, 408. 米高揚或許是高層中注意瞭解情況的主要官員。他在1927年12月初說：「我們相信糧食收購量的下滑是暫時的，而且近期就會出現上揚的趨勢。」*Ekonomicheskaiia zhizn’*, December 3, 1927. 一個星期後，李可夫認為形勢出現「危機」，但樂觀地強調，通過增加製造品的供應可以克服危機。*XV s’ezd VKP (b)*, II: 859–60.
- 25 Danilov, *Kak lomali NEP*, I: 9 (RGASPI, f. 17, op. 3, d. 662, l. 3).
- 26 Danilov, *Tragediia sovetskoi derevni*, I: 136 (TsA FSB, f. 2, op. 6, d. 982, l. 99). 從1927年開始，動用第107條打擊私商的呼聲就特別一致。1927年10月29日，亞戈達寫信給政府首腦阿列克謝·李可夫，警告說「為了讓市場馬上好轉，我們需要迅速採取鎮壓措施」。他還呈上一份關於「投機倒把分子」（私商）的政令草案，準備以政府的名義頒發。Danilov, *Tragediia sovetskoi derevni*, I: 100–1 (TsA FSB, f. 2, op. 6, d. 567, l. 1–5). 奧格伯烏當時擁有在司法渠道之外對某些罪行進行調查和判決（直至處決）的特權，比如奧格伯烏人員在執行公務時犯下的罪行，以及搗假和打家劫舍；另外，對於一些特殊案件，奧格伯烏也可以要求得到這樣的特權，但對於經濟案件通常不行。參見 Nove,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USSR*, 137.
- 27 Mozokhin and Gladkov, *Menzhinskii*, 257 (未註明出處).
- 28 “Iz istorii kollektivizatsii 1928 god,” no. 5: 193–5; Viola, *War Against the Peasantry*, 32–4, 45–7.
- 29 Egorova, “Khlebozagotovitel’naia kampaniia 1927–1928,” 262 (PANO, f. 2, op. 1, d. 2571, l. 310–1), 264–5.
- 30 Carr and Davis, *Foundations of a Planned Economy*, I/i: 44–6. 關於布爾什維克對農民的市場行為的理解，參見 Larin, *Sovetskaia derevnia*, 217.
- 31 Danilov, *Tragediia sovetskoi derevni*, I: 105–8 (at 107: TsA FSB, f. 2, op. 6, d. 53, l. 32–49).
- 32 *Ugolovnyi Kodeks RSFSR* [1926], 31; *Ugolovnyi Kodeks RSFSR* [1927], 178; *Ugolovnyi kodeks RSFSR* [1929], 64–5. 關於向採取強制措施的轉變，參見 Manning,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Extraordinary Measures’.”

- 33 *Pravda*, January 8, 1928.
- 34 Andreev, *Vospominaniia*, 168–9 (日期為1928年1月27日的信)。《真理報》(1927年12月24日)已經宣佈，中央官員要下到糧食主產區——安德烈·日丹諾夫到伏爾加河流域，尼古拉·什維爾尼克到烏拉爾，阿納斯塔西·米高揚到北高加索。
- 35 *Izvestiia TsK KPSS*, 1991, no. 5: 193. 有歷史學家聲稱，關於奧爾忠尼啟則生病的報道僅僅是斯大林要親自出馬的藉口。當然，斯大林本可以不需要找藉口就把自己派過去。Shishkin, “Poездka I. V. Stalina v Sibir’,” 44.
- 36 *Izvestiia TsK KPSS*, 1991, no. 5: 193–5; *Na prieme*, 779.
- 37 Pavlova, “Poездka Stalina v Sibir’,” 133–55; Kosachev, “Nanakune kollektivizatsii,” 101–5; Chuev, *Sto sorok*, 377. 潘克拉托夫和中央組織局機關工作人員亞歷山大·多加多夫這兩名特使已經到了新西伯利亞，並在1928年1月6日和1月9日會見了西伯利亞的領導層；1月10日，西伯利亞官方成立了一個三人特別小組，指導糧食收購行動，帶有軍事色彩的總部就設在新西伯利亞市；三人小組的成員包括瑟爾采夫，西伯利亞蘇維埃執行委員會主席、拉脫維亞人羅伯特·埃赫，以及西伯利亞負責貿易工作的A. N. 茲洛賓(A. N. Zlobin) (GANO, f. 47, op. 5, d. 68, l. 197–9)。到1月底，全國各地的基層紛紛跟風，成立了加快糧食收購進展的三人小組。Danilov, *Tragediia sovetskoi derevni*, I: 780, n55; Shishkin, “Poездka I. V. Stalina v Sibir’,” 196–9; Gushchin, *Sibirskaiia derevnia*, 185; Egorova, “Khlebozagotovitel’naia kampaniia 1927–1928,” 262 (引自 PANO, f. 2, op. 1, d. 217, l. 229); Gushchin and Il’nykh, *Klassovaia bor’ba*, 172. 1928年1月12日，新西伯利亞700名鐵路系統的官員和工人開會討論了勞動紀律和加快糧食運輸的問題；為起到警示作用，有幾名領導被開除。Hughes, *Stalin, Siberia*, 136. 多加多夫很快就加入所謂的右派(1928–1929)，並在1931年被貶到外高加索。
- 38 巴扎諾夫1922年加入組織局，並曾代替瑪麗亞·格里亞澤爾(Maria Glyasser)，短暫擔任過政治局的技術秘書(1923年8月–1924年5月)。1927年11月28日，他被任命為土庫曼斯坦黨的書記處事務管理局局長。RGAE, f. 7733, op. 18, d. 527, l. 1–25 (巴扎諾夫的個人檔案)。巴拉紹夫說巴扎諾夫當時是懇求英國駐阿什哈巴德的領事安排他越境逃跑的，他那已婚的情婦從莫斯科趕來，想一起逃走，但她在試圖越過邊境時被抓了。
- 39 Agabekov, *OGPU*, 132–8, 234; Bazhanov, *Damnation of Stalin*, 191. 另見Bortnevskii, “Oprichnina.” 1930年6月13日，阿加別科夫在派駐伊斯坦布爾期間叛逃；1937年夏，他在靠近法國與西班牙邊境的地方被發現並處死。
- 40 Brook-Shepherd, *Storm Petrels*, 19–84, 107–8 (無腳註)。1937年1月12日，巴扎諾夫給了波蘭情報機關一份情況簡介，在1939年蘇聯人佔領波蘭東部(西白俄羅斯)的時候，這份文件落到了他們手裏。Duraczyński and Sakharov, *Sovetsko-Polskie otnoshenii*, 65–6 (RGANI, f. 453, op. 1, d. 54, l. 25–33)。
- 41 *Stalin, der rote Diktatur* (Berlin: Aretz, 1931), 21.
- 42 Bazhanov, *Damnation of Stalin*, 105–6.
- 43 Kindleberger, *World in Depression*, 73–4; Malenbaum, *World Wheat Economy*.

- 44 這也意味着要把國內的緊缺商品，比如棉布，賣到國外。Dohan, "Soviet Foreign Trade in the NEP Economy," 482–3; Dohan, "Foreign Trade," 223.
- 45 Rieber, "Stalin as Foreign Policy Maker: Avoiding War, 1927–1953," 141–2.
- 46 轉引自 Danilov, "Vvedenie," 見於 Danilov, *Tragediia sovetskoi derevni*, I: 25 (1927年6月)。另見 Ken and Rupasov, *Politbiuro TsK VKP (b)*, 484–5, 491, 497.
- 47 Zdanovich, *Organy gosudarstvennoi bezopasnosti*, 382 (引自 TsA FSB, d. PF 10289, t. 2, l. 393, 395)。和在紅軍中服役的其他大多數前沙皇軍官不一樣，普涅夫斯基(生於1874年)是在1928年自然死亡的。
- 48 RGASPI, f. 17, op. 163, d. 103 (1927年1月3日)。
- 49 Nazarov, *Missiia Russkoi emigratsii*, I: 43–4.
- 50 有位蘇聯的流亡者根據道聽途說，把瑟爾采夫的努力說成是搭建波將金村莊(編註：指用於營造虛假形象的建築或舉措)，就好像這對於有奧格伯烏做耳目的斯大林來說行得通似的。Avtorkhanov, *Stalin and the Communist Party*, 11–2.
- 51 扎科夫斯基是和瑟爾采夫同時被安排到新西伯利亞的。他取代了伊萬·帕夫盧諾夫斯基(Ivan Pavlunovsky)的位置，後者不幸被調往南高加索，並在那裏成了一個叫做拉夫連季·貝利亞的青年政治野心家的盤中餐。
- 52 RGASPI, f. 558, op. 11, d. 119, l. 1–2.
- 53 蘇聯的計量單位是普特(1普特約等於36磅〔編註：約16千克〕)。斯大林要求把8,200萬普特中的6,000萬調往中心地區。
- 54 1928年1月9日，A. N. 茲洛賓，西伯利亞負責糧食收購的三人小組中的第三個成員，向多加多夫匯報說，西伯利亞的收成屬於平均水平。據西伯利亞黨組織的M. 巴索維奇(M. Basovich)說，西伯利亞的人均收成是6.9普特，烏拉爾地區7.5，伏爾加河中游地區12，伏爾加河下游地區13.3，烏克蘭13.9，北高加索14。Pavlova, "Pozzdka Stalina v Sibir'," 134 (未註明出處)。1913至1925年，西伯利亞的糧食幾乎沒有出口；它被運到了莫斯科和列寧格勒這兩個工業區以及俄國的遠東地區。1926至1927年出口了34.5萬噸西伯利亞小麥，但是在1927至1928年只出口了5,700噸。Gushchin, *Siberiskaia derevnia*, 108; *Vneshniaia torgovlia SSSR*, 94, 110.
- 55 *Izvestiia TsK KPSS*, 1991, no. 5: 196–9; Danilov, *Tragediia sovetskoi derevni*, I: 152–4 (GANO, f. 2, op. 4, d. 24, l. 26–28ob); Viola, *War Against the Peasantry*, 69–71; *Za chetkuiu klassovuiu liniuu*, 76 (瑟爾采夫1928年3月在西伯利亞黨的全會上的報告); Gushchin and Il'inykh, *Klassovaia bor'ba*, 172–3.
- 56 RGASPI, f. 558, op. 11, d. 121, l. 6–7, 47–9.
- 57 RGASPI, f. 558, op. 11, d. 121, l. 2. 記錄斯大林視察過程(包括他說的話)的隨行助手康斯坦丁·謝爾蓋耶夫(生於1893年)列出了下面這些小冊子：*Rodinskii raion Slavgorodskogo okruga: materialy obsledovaniia sibiriskoi derevni* (Novosibirsk, 1927); *Men'shikovskii raion Barabinskogo okruga: materialy obsledovaniia sibiriskoi derevni* (Novosibirsk, 1927); *Abakinskii raion Minusinskogo okruga: materialy obsledovaniia sibiriskoi derevni* (Novosibirsk, 1927)。謝爾蓋耶夫起初來自圖拉，從1925年1月到1928年6月一直擔任斯大林的助手。

- 58 Sevost'ianov, "Sovershenno sekretno": *Lubianka—Stalinu*, VI: 58–60 (TsA FSB, f. 2, op. 6, d. 575, l. 1–58).
- 59 RGASPI, f. 558, op. 11, d. 121, l. 4–4ob., 9.
- 60 「我們冒着風險發佈了一道指示，要求在所有糧食收購地區鎮壓富農，」瑟爾采夫後來吹噓說，「我們下達了地區委員會的指示，認為我們不能再耽擱了，雖然已經知道斯大林同志在路上。」Demidov, "Khlebozagotovitel'naia akampaniia 1927/28 g. v sibirskoi derevne," 126. 在1928年1月初的一份給瑟爾采夫的電報中，斯大林把黨內幹部提出的在西伯利亞用糧食換取製造品的要求輕蔑地稱為「通往恐慌的道路」。Za chetkuiu klassovuiu liniuu, 75–6.
- 61 *Izvestiia TsK KPSS*, 1991, no. 5: 201–2; Viola, *War Against the Peasantry*, 74–5. 在1月19日(早晨)的同一封電報中，斯大林還命令把莫洛托夫派到中部黑土地區。那天的晚些時候(下午5:35)，斯大林又發了一封電報，這次是給莫洛托夫和柯秀爾的，說困難或許較大，但也重申他預計會取得成功。應當指出，西伯利亞的糧食收購運動通常在9月才開始(西伯利亞的糧食收割開展得晚一點，從8月到9月初)。另外，在1928年，由於從革命前開始就投入不足，全西伯利亞能用的糧倉只有四座，而且都不夠大，但是有幾座新的正在興建。Lebedev, "Sostoianie i perspektivy razvitiia elevatornogo khoziaistva," 34.
- 62 RGASPI, f. 558, op. 11, d. 121, l. 11.
- 63 *Izvestiia TsK KPSS*, 1991, no. 5: 193–204 (199–201); Danilov, *Tragediia sovetskoi derevni*, 154–6; Viola, *War Against the Peasantry*, 71–4. 1930年，查古明尼(生於1897年)因為病弱得到一筆退休金，但後來被選為一個集體農莊的主席並繼續工作，最後成了他家鄉薩拉托夫省某國營農場的負責人，並於1937年8月5日在那裏被捕。1938年5月他受到公審，1938年11月28日被處決。Gusakova, "Veril v luchshuiu zhizn' naroda."
- 64 "Iz istorii kollektivizatsii 1928 god," no. 6: 212. 另見 *Sochineniia*, XI: 3. 1928年1至3月，北高加索有3,424人被定罪，其中有2,000多人是中農和貧農(據政權的統計數據)。Osklokov, *Pobeda kolkhoznogo stroia*, 134.
- 65 該決定是在1928年1月26日的一次「糧食工作三人小組」會議上做出的，斯大林參加了那次會議。Papkov, *Obyknovnyi terror*, 33 (引自 GANO, f. P-20, op. 2, d. 176, l. 92–3); *Sovetskaia sibir'*, January 29, 1928; *Sochineniia*, XI: 4.
- 66 RGASPI, f. 558, op. 11, d. 118, l. 1–74 (stenogramma zasedaniia Sibkraikoma ot 20 ianvaria 1928 g.).
- 67 1928年，全西伯利亞大概只有700名農學家，而且他們中多數都沒有接受過高等教育。*Sibir'skaia Sovetskaia entsiklopediia*, I: 17–8.
- 68 *Izvestiia TsK KPSS*, 1991, no. 6: 203–5; RGASPI, f. 558, op. 11, d. 118, l. 23–6.
- 69 *Sochineniia*, VII: 122–29 (1926年4月), 286–7 (1926年11月).
- 70 *XVI partiinaia konferentsiia VKP (b), april' 1929 g.*, 293. 布哈林在1925年4月黨的第十四次代表大會上說過，「集體農莊固然很有力量，但不是通往社會主義的康莊大道」。XIV konferentsiia RKP (b), 188.

- 855 71 “Partiia i oppozitsiia,” *Pravda*, November 24, 1927, 轉載於 *Sochineniia*, X: 252–68 (at 259).
- 72 *XVI Moskovskaya gubernskaia konferentsiia VKP (b)*, no. 10: 88; *Stenograficheskiĭ ocheĭ*, 492–520, 544–7. 斯大林在1928年4月把鮑曼調進了黨的書記處。1929年，鮑曼接手了莫洛托夫的工作，被提拔為莫斯科第一書記，接着又在1930年讓位於卡岡諾維奇。1931至1934年，鮑曼負責中亞局。
- 73 *Izvestiia TsK KPSS*, 1991, no. 5: 194–6.
- 74 Danilov, *Tragediia sovetskoi derevni*, I: 172–92 (RGASPI, f. 82, op. 2, d. 137, l.1–55).
- 75 當然，當時有傳言說總書記來了。克拉斯諾亞爾斯克的一個黨委書記寫信給斯大林，轉達了工人們的請求，請他到他們的工廠講話。對此，斯大林回覆說，他「是以非官方身份來接受同志們的內部教誨的。在群眾大會上講話超出了我得到的授權的範圍，屬於欺騙黨中央」。RGASPI, f. 558, op. 11, d. 119, l.1045.
- 76 Donald Treadgold, *Great Siberian Migration*, 155–83.
- 77 Ascher, *P. A. Stolypin*, 323.
- 78 斯托雷平從西伯利亞回去後，私下裏寫信對尼古拉二世說（1910年9月26日），「我的總體印象是感到非常欣慰」。但他也警告說，「我們正在原先習慣於誰佔了土地就把它收作私產的地方建立村社……這一切以及其他的很多事情都是迫在眉睫的問題。否則就會在混亂中不知不覺地出現一個龐大的、帶有粗野的民主色彩的地區，而它很快就會勒住歐俄的脖子」。“Iz perepiski P. A. Stolypina s Nikolaem Romanovym,” *Krasnyi arkhiv*, 1928, no. 5: 82–3. 另見 Syromatnikov, “Reminiscences of Stolypin,” 86; 以及 Pokrovsky, *Brief History of Russia*, II: 291. 在西伯利亞，過去有土地的「自由」保有權，憑藉這種「自由」保有權，農民只要到那裏耕種就可以了，但是，隨着各地的耕地全都開始被佔用，向土地的「平等」保有權的過渡，對土地的分配和重新分配——也就是說村社——就開始出現了。這樣的過渡往往並不是突如其來或一蹴而就的。而且它只是發生在人口稠密的地區（大多是在離歐俄較近的托博爾斯克省），但這對於斯托雷平來說，可是個不好的跡象，因為他當時想得比較遠，認為會有更多的人移民去那裏。Soldatov, “Izmeneniia form obshchinnogo zemlepol’zovaniia,” 36; Kocharovskiy, “Aleksandr Arkadievich Kaufman,” VIII: 550. 在土地和移民部部長克里沃舍因的陪同下，斯托雷平視察了西伯利亞，想看看是不是所有的耕地真的都有人定居。1910年的歉收的確讓很多移民又回到了歐俄。Robinson, *Rural Russia*, 250–1; Pavlovskiy, *Agricultural Russia*, 177–8; Treadgold, *Great Siberian Migration*, 34.
- 79 Ascher, *P. A. Stolypin*, 325; Treadgold, *Great Siberian Migration*, 182–3.
- 80 *Poezdka v Sibir’ i povol’zhe*, 114, 117; Antsiferov, *Russian Agriculture*, 340–3; “Zemel’nye poriadki za uralom,” I: 537. 在西伯利亞，土地屬於國家、皇室或哥薩克所有，但農民認為自己根據用益權（*zemlepol’zovanie*）做了登記的土地就相當於財產。農民覺得土地事實上就是他們的，但他們需要對土地進行測量和登記，才能夠合法地再次出售，特別是在有些地方，最初的移民申領的土地太多，自己耕種不了，想把它們租給後來的移民。Treadgold, *Great Siberian Migration*, 182–3; *Poezdka v Sibir’ i povol’zhe*, 55–6, 64–5. 1917年，臨時政府把「內閣土地」（屬於皇室所有）移交給財

政部，再由地方官員分配財政部下撥的土地。Brike, "Ekonomicheskie protsessy," 13-4.; Zhidkov, "Krest'iane Altaia ot fevralia k Oktiabriu," vyp. 2: 92-110.

81 Voshchinin, *Na sibirskom prostore*, 47-8.

82 截止到1927年1月，俄羅斯社會主義聯邦蘇維埃共和國有95%的耕地，約6.3億英畝(2.33億俄畝；編註：約2.55億公頃)，是村社控制的；3.4%的耕地屬於個人的私有財產。Carr, *Socialism in One Country*, I: 214; Thorniley, *Rise and Fall of the Soviet Rural Communist Party* [Basingstoke], 10. 相比之下，在白俄羅斯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1917年之前的合併農莊有很大比例留了下來。Persin, *Uchastkovoie zemlepol'zovanie Rossii*, 46-7.

83 Danilov, *Rural Russia*, 160; Atkinson, *End of the Russian Land Commune*, 246.

84 Danilov, *Rural Russia*, 169.

85 認為斯大林可能視察過村莊的看法源自這樣一句話，那是經過合併和編輯的西伯利亞講話的速記記錄中的一句：「我在你們邊區各地走了一趟。」(*Sochineniia*, XI: 2) (譯註：《斯大林全集》第11卷，第3頁)但這並不能證明他參觀了任何村子。阿夫托爾漢諾夫憑藉(索羅金[Sorokin]的)道聽途說就認為斯大林和農民交談過了。Avtorkhanov, *Stalin and the Communist Party*, 12.

86 例如，摩西·盧因就說斯大林是想尋找辦法解決自己引起的危機，並沒有強制推行一種有預謀的、帶有意識形態意圖的集體化計劃：Lewin, *Russian Peasants*, 107-16, 296-302. 與此類似，卡爾和戴維斯寫道：「從斯大林和莫洛托夫這一時期的言論來看，他們不像是深思熟慮之後決定左轉，更不是認為農民的大規模集體化是為期不久就可以行得通的政策，倒像是在棘手的難題面前猶猶豫豫、不知所措，但仍然希望能夠想辦法對付過去。」Carr and Davies, *Foundations of a Planned Economy*, II: 85. 許多重要的文件盧因、卡爾和戴維斯當時都看不到；要是看到，不知道另外那些文件是否會讓他們改變自己的觀點，如果是，會朝着甚麼方向。

87 Pavliuckenkov, *Krest'ianskii Brest*, 158 (引自RGASPI, f. 325, op. 1, d. 67, l. 5: March 1920).

88 Danilov, *Sovetskoe krest'ianstvo*, 233.

89 每140戶農民中，擁有1名黨員的只有不到1戶。*Izvestiia Tsk RKP (b)*, 1928, no. 23 (255): at 9; Rigby, *Communist Party Membership*, 418. 就像有學者寫的，「不管黨是想控制還是想拉攏農民，人手和聯絡點對於該任務來說都嚴重不足」。Carr and Davies, *Foundations of a Planned Economy*, II: 188. 關於農村黨員的數量，另見Thorniley, *Rise and Fall of the Soviet Rural Communist Party* [New York], 11-7, 200-4.

90 *Izvestiia Sibkraikoma VKP (b)*, 1928, no. 7-8: 1-2.

91 Pethybridge, *One Step Backwards*, 306-7.

92 例如，卡爾就錯誤地認為斯大林的馬克思主義是「膚淺的」。Carr, *Russian Revolution*, 163.

93 從《真理報》以〈托洛茨基分子顛覆共產國際的活動〉為題刊登的奧格伯烏截獲的信件就可以看出這個時間(1月15日)。

94 Fel'shtinskii, *Razgovory s Bukharinym*, 14 (引自娜塔莉亞·謝多娃1960年2月29日的信件：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History, Amsterdam, papers of Sara Jacobs-Weber).

- 95 Scheffer, *Sieben Jahre Sowjetunion*, 158–61.
- 96 Serge, *Le tournant obscur*, 155. 當時在場的還有阿道夫·越飛的寡妻和阿布拉姆·別連基的一個姊妹(別爾塔(Bertha))。關於別連基, 參見貝利亞1940年9月6日給斯大林的便條: <http://stalin.memo.ru/spravki/13-038.HTM>.
- 97 Trotsky, *My Life*, 539–50; Deutscher, *Prophet Unarmed*, 391–4.
- 856 98 Trotsky, *My Life*, 539–42; Serge and Trotsky, *Life and Death* 155–7; Patenaude, *Stalin's Nemesis*, 88–9; Volkogonov, *Trotsky*, II: 92–5.
- 99 *Izvestiia TsK KPSS*, 1991, no. 5: 201, n2.
- 100 政治局多次商討過流放托洛茨基的問題, 尼古拉·布哈林和阿列克謝·李可夫反對, 斯大林和伏羅希洛夫最贊成, 其餘的同意。Volkogonov, *Trotsky*, 308 (引自APRE, f. 45, op. 1, d. 19, 20).
- 101 *Izvestiia TsK KPSS*, 1991, no. 5: 201. 當被派往哈巴羅夫斯克的遠東計劃部門工作的伊瓦爾·斯米爾加在1927年6月9日到達雅羅斯拉夫爾車站時, 他的告別會變成了反對派的公開示威; 托洛茨基和季諾維也夫發表了演說。斯大林迅速採取行動, 指責其行為違背了他們在1926年10月16日作出的不再參加派別活動的承諾。Trotsky, *My Life*, 530–1.
- 102 Reswick, *I Dreamt Revolution*, 226–9. 托洛茨基被驅逐的那天, 雷瑟克得到了蘇聯方面安排的專訪機會; 雷瑟克是唯一根據自己親眼所見進行報道的記者, 所以在這一年, 他憑藉出色的工作獲得了美聯社的獎項。
- 103 Deutscher, *Prophet Unarmed*, 394.
- 104 經過不斷的抗議, 托洛茨基一家很快就搬到一處有四個房間的住所。
- 105 關於這一說法, 參見Baumont, *La faillite de la paix*, I: 370.
- 106 Lerner, *Karl Radek*, 150. 拉狄克很快就被換了地方, 轉到了托木斯克。
- 107 Volkogonov, *Trotsky*, 280, 引自RGASPI, f. 326, op. 1, d. 113, l. 72: 1928年2月27日。對長期的流放生活感到絕望的拉狄克, 很快開始寫信批評托洛茨基, 想借此討好斯大林並乞求能給自己平反。
- 108 *Pravda*, January 31, 1928; Koniukhov, *KPSS v bor'be*, 146–7.
- 109 Bezrukov, “Za chem Stalin priezhal na Altai?”; Bezrukov, *Priezd I. V Stalina na Altai*; Dmitrieva, *Barnaul v vospominaniakh starozhilov*, 97 (P. I. Zakharov). 趕雪橇的是伊萬·謝爾戈萬采夫(Ivan Sergovantsev)。
- 110 “Iz istorii kollektivizatsii 1928 god,” no. 6: 212–4; RGASPI, f. 558, op. 11, d. 118, l. 78–84.
- 111 Kavraiskii and Nusinov, *Klassy i klassovaia bor'ba*, 78 (引自PAAK, f. 4, op. 2, d. 27, l. 48).
- 112 RGASPI, f. 558, op. 11, d. 119, l. 35.
- 113 “Stalin v Rubtsovsk,” *Khleborod Altaia*, December 28, 1991 (L. A. 涅丘納耶夫(L. A. Nechunaev)的回憶); Popov, *Rubtsovsk 1892–2000*, 107–8.
- 114 *Bol'shevik*, 1927, no. 15–16: 90–9, 100–16. 作者格奧爾吉·薩法羅夫(·沃爾金)在1917年和列寧一起乘鉛封列車回到俄國, 成了一名共青團的領導。Hughes, *Stalin, Siberia*, 88–96.
- 115 Sosnovskii, “Chetyre pis'ma iz sylvki,” 27. 索斯諾夫斯基那年給在哈薩克斯坦的托洛

茨基寫了三封信。(日期為1928年5月30日的第四封信寄到了瓦爾丁(Vardin))。隨後索斯諾夫斯基就被逮捕並關到車里雅賓斯克隔離起來。

- 116 Hughes, *Stalin, Siberia*, 58.
- 117 參見克里斯季安·拉柯夫斯基對左派反對派失敗原因的分析, Trotskii, *Predannaia revoliutsiia segodnia* [1990], 61 (從阿斯特拉罕寄給在阿爾馬—阿塔的托洛茨基的信, 1928年8月6日)。
- 118 Isaev and Ugrovatov, *Pravokhanitel'nye organy Sibiri*, 150–1; Tepliakov, "Nepronitsaemye nedra," 262–4 (引自 GANO, f. 1204, op. 1, d. 4, l.57–8); Tumshis and Papchinskii, *1937, bol'shaia chistka*, 7–78 (at 23–4).
- 119 *Sochineniia*, XI: 3–4.
- 120 *Sochineniia*, XI: 4. 另見 *Pravda*, July 3, 1928, 轉載於 *Sochineniia*, XI:105. 那年晚些時候, 他指責這樣的官員「不瞭解我們階級政策的原則, 企圖這樣來進行工作: 在農村中不得罪任何人」。 *Sochineniia*, XI: 235 (1928年10月19日在黨的莫斯科委員會和監察委員會會議上的講話; 譯註:《斯大林全集》, 第11卷, 第13頁)。
- 121 *Za chetkuiu klassovuiu liniuu*, 56 (1928年2月17日瑟爾采夫對黨的積極分子的講話)。「斯大林說得對, 黨對於打倒富農的口號做好了準備。」被流放到西伯利亞的前季諾維也夫分子、左派奧·巴拉巴舍夫在當地的報紙上得出了結論,「對富農的施壓讓執政黨的普通黨員充滿幹勁, 準備用老辦法打倒富農。」 *Sovetskaia Sibir'*, January 28, 1928.
- 122 *Sovetskaia Sibir'*, January 25, 1928. 1月22日, 西伯利亞總檢察長(I. D. 庫諾夫(I. D. Kunov))在當地報刊上發表文章, 試圖解釋第107條如何不僅可以適用於販賣製造品的私商, 而且還適用於拒絕出售糧食的農民在法律上具有正當性, 自己把自己繞糊塗了。 *Sovetskaia Sibir'*, January 22, 1928.
- 123 *Stepnoi pakhar'*, February 8, 1928; Kavraiskii and Nusinov, *Klasy i klassovaia bor'ba*, 82; Koniukhov, *KPSS v bor'be*, 101.
- 124 *Soverskaia Sibir'*, January 27 and January 29, 1928 (關於審判比斯克縣14名富農的報道, 他們的罪名是以倒賣為目的在鄰省大量收購糧食)。
- 125 當局還沒收了78座磨坊和68座穀倉, 並關掉了1,500個皮革作坊。 *Pravda*, February 14 and February 29, 1928 (瑟爾采夫); *Za chetkuiu klassovuiu liniuu*, 251; Gushchin, *Sibirskaiia derevnia*, 186, 190. 到5月底, 被逮捕的達到1,748人, 其中有92%的人都被定了罪。在西伯利亞, 許多「中」農和貧農也被按照第107條定了罪。 Egorova, "Khlebozagotovitel'naia kampaniia 1927–1928," 269 (引自 PANO, f. 2, op. 2, d. 217, l. 744). 到1928年5月, 西伯利亞約有8,000戶農民被當作富農打倒了。 *Istochnik*, 2001, no. 1: 64.
- 126 1928年, 格伯烏在西伯利亞將36,674人列入監視名單。 Ugrovatov, *Krasnyi banditizm v Sibiri*, 187. 到1928年2月29日為止, 西伯利亞格伯烏根據第58條(反革命罪)逮捕了123人, 其中有64人按照要求被移送檢察機關進行核實(被批准的只有20人)。 Tepliakov, "Nepronitsaemye nedra": 222–3.



- 127 Leonidov and Reikhsbaum, "Revoliutsonnaia zakonnost' i khlebozagotovskii," 36–40. 另見 Hughes, *Stalin, Siberia*, 211.
- 128 *Na Leninskoi puti*, January 31, 1928: 3.
- 129 *Izvestiia Sibkraikoma VKP (b)*, 1928, no. 13: 10.
- 130 據說還有一個代表要求在春天降低糧食的收購價。 *Pravda*, March 2, 1928.
- 131 *Altaiskaia pravda*, December 8, 1988.
- 132 Gushchin, *Sibir'skaia derevnia*, 188 (RGASPI, f. 17, op. 67, d. 365, l. 9). 關於瑟爾采夫，參見 Hughes, "Patrimonialism and the Stalinist System"; Hughes, *Stalin, Siberia*, 200–4. 在政策方面，瑟爾采夫與右派是一致的，但是在與右派的鬥爭中，他是支持斯大林的。
- 133 Moletotov, *Sibkraikom*, 24.
- 134 *III Sibir'skaia partiinaia kraevaia konfeterentsiia VKP (b)*, 33.
- 135 *III Sibir'skaia partiinaia kraevaia konfeterentsiia VKP (b)*, 30–1, 43–4, 197; Hughes, *Stalin, Siberia*, 62.
- 136 1932年4月，扎科夫斯基被調到明斯克，成為白俄羅斯格伯烏的負責人，他還把自己在西伯利亞的大隊人馬帶到了那裏。
- 137 "Iz istorii kollektivizatsii 1928 god," no. 6: 214–5.
- 138 RGASPI, f. 558, op. 11, d. 119, l. 97, 112.
- 139 "Iz istorii kollektivizatsii 1928 god," no. 7: 178–92.
- 857 140 Papkov, *Obyknovnyi terror*, 34–5 (引自 Tsentr khraneniia i izucheniia dokumentov noveishei istorii Krasnoiarskogo kraia, f. 42, op. 1, d. 435, l.2–2ob.; d. 438, l.1–8 (親歷者的回憶，採訪並記錄於1953至1954年)), 36 (引自 *Krasnoiarskii rabochii*, February 2, 1928).
- 141 Il'nykh, *Khroniki khlebnogo fronta*, 143 (引自 GANO, f. P–2, op. 2, d. 217, l. 151), 158 (引自 GANO, f. P–2, op. 2, d. 217, l. 472).
- 142 "Iz istorii kollektivizatsii 1928 god," no. 7: 179–82. 另見 *Pravda*, February 10, 1928 (米高揚).
- 143 *Sochineniia*, XI: 10–19. 《真理報》(2月15日)上發表的一篇未署名文章重複了秘密通告中的許多內容(「農村經濟已經增強並且興旺起來了。最重要的是，富農已經增強並且興旺起來了」)。1928年2至5月，有1,434名共產黨官員受到處分(其中有278人被開除)，而這才剛剛開始。Ikonnikova and Ugrovatov, "Stalinskaia repetsitiia nastupleniia na krest'ianstvo," 74–7.
- 144 Shanin, *Awkward Class*, 1–2, 46–74; Fainsod, *Smolensk Under Soviet Rule*, 239.
- 145 *Izvestiia TsK VKP (b)*, 1928, no. 12–13: 1; *Istoriia kommunisticheskoi partii Sovetskogo Soiuza*, 544–5. 僅派往烏克蘭一地的就多達1萬人。Koniukhov, *KPSS v bor'be*, 118 (引自 *Visti*, March 28, 1928).
- 146 *Sovetskaia Sibir'*, January 28, 1928. Barabashev, "Isil'kul'skie zheleznodorzhniki o khebe," 47–8; Carr, *Socialism in One Country*, II: 118, 177. 巴拉巴舍夫接着被調到伊爾庫茨克，然後又到了克里米亞，1937年在那裏被捕並處死。"Kak skladyvalas' zhizn' O. V. Rissa": [www.oleg-riss.ru/files/Riss\\_part01.doc](http://www.oleg-riss.ru/files/Riss_part01.doc).

- 147 Senin, *A. I. Rykov*.
- 148 Trotsky archives, Houghton Library, Harvard University, T 1106; *Sotsialisticheskii vestnik*, July 23, 1928: 15; *XVII s'ezd VKP (b)* [1934], 210; Carr and Davies, *Foundations of a Planned Economy*, I/i: 61; "Materialy fevral'sko-martovskogo plenuma TsK VKP (b) 1937 goda," 19 (布哈林/皮達可夫)。另見Medvedev, *Let History Judge*, 194-5; Lewin, *Russian Peasants*, 218-20; Cohen, *Bukharin*, 278, 444, n31.
- 149 只有莫洛托夫和古比雪夫毫無保留地支持斯大林。李可夫後來承認他低估了危機的程度；莫洛托夫承認低估了危機持續的時間。Lewin, *Russian Peasants*, 217-9.
- 150 *Kvashonkin, Sovetskoe rukovodstvo*, 22-4.
- 151 Danilov, *Kak lomali NEP*, I: 29-30.
- 152 Khlevniuk, *Stalinskoe politburo*, 113 (編者按)。另見一篇富有洞察力的文章, E. A. Rees, "Stalin, the Politburo, and Rail Transport Policy," 104-33.
- 153 Mikoian, *Tak bylo*, 292.
- 154 Rosenfeldt, *Knowledge and Power*, 34.
- 155 Rosenfeldt, *The "Special" World*, I: 468-74.
- 156 *Pravda*, March 10, 1928: 1. 在3月16日北高加索黨的書記處會議上, 安德烈耶夫指示葉夫多基莫夫「按照《真理報》社論的精神和莫斯科對問題的提法」寫一篇當地的社論。Kislitsyn, *Shakhtinskoe delo*, 30-1. 政治局成立了一個調查小組, 成員有莫洛托夫(被派往斯大林諾)、托姆斯基(被派往沙赫特)和雅羅斯拉夫斯基(被派往阿爾捷莫夫斯克)。雅羅斯拉夫斯基的講話非常偏激, 結果斯大林為了不讓尚未進行的審判名聲掃地, 不得不發電報制止他。Kukushkin, *Rezhim lichnoi vlasti Stalina*, 96.
- 157 該定居點原來叫「格魯舍夫卡」(當地河流的名字), 但為了紀念被暗殺的沙皇亞歷山大二世, 更名為亞歷山德羅夫斯克—格魯舍夫斯基, 這個名字一直沿用到1920年2月。1923年11月, 沙赫特的1萬名工人——幾乎是全部的勞動力——舉行罷工。他們解除了礦上衛兵的武裝, 並向當地的格伯烏大樓進發, 要求提高工資和遵守安全規範。士兵們朝人群開火, 打死了幾名抗議者, 驅散了其他人。格伯烏封了礦井, 逮捕了所有被認為是積極分子的人。尼古拉·克雷連柯在11月4日到達那裏。當他要求遭到鞭打的工人站出來的時候, 沒有人上前, 他們或是因為害怕, 或是因為不信任。 *Sotsialisticheskii vestnik*, 1924, no. 1: 7.
- 158 *Z arkhiviv VUChK-GPU-NKVD-KGB*, 1997, no. 1-2: at 321.
- 159 葉夫多基莫夫的親信包括米哈伊爾·弗里諾夫斯基 (Mikhail Frinovsky)、福明·埃爾扎·格倫德曼 (Elza Grundman)、尼古拉·尼古拉耶夫—茹伊德 (Nikolai Nikolayev-Zhuid)、V. 庫爾斯基 (V. Kursky) 等人。
- 160 Plekhanov, *VChK-OGPU*, 382-5; *Istochnik*, 1995, no. 5, 140-51 (APRE, f. 3, op. 61, d. 648, l.9-14).
- 161 *Voprosy istorii*, 1995, no. 2: 3-7. 葉夫多基莫夫和斯大林的關係很近, 這在秘密警察內部人人皆知。Orlov, *Secret History*, 28.
- 162 Plekhanov, *VChK-OGPU*, 130 (引自 TsA FSB RF f. 2, op. 5, d. 29, l. 1)。另見 Wheatcroft, "Agency and Terror," 30.

- 163 葉夫多基莫夫在1930年黨的第十六次代表大會上得到了表揚：*XVI s'ezd VKP (b)*, 538ff; Ordzhonikidze, *Stat'i i rech'i*, II: 230. 第一次逮捕人——明顯是由於有工人告發——是在1927年6月14日，而這件案子起初牽涉到六個人。格伯烏在處理案件時顯然遇到了麻煩，所以只好不斷請求正式延長最後期限，以便判斷是提起訴訟還是釋放被調查人員。直到1928年1月16日，案件的處理方式仍不明確。但是在1928年2月9日，奧格伯烏向李可夫通報了案情。到那時候，「調查」已經進行了將近六個月。Krasil'nikov, *Shakhtinskii protsess*, 822, n1 (TsA FSB, f. r-49447, t. 26, ch. 1, ll., 213-4, 608-9), n2. 另見Avtorkhanov, *Stalin and the Communist Party*, 26-30 (引自與列茲尼科夫(Rezhnikov)的交談); Bailes, *Technology and Society*, 69-94; Solzhenitsyn, *The Gulag Archipelago*, 44-5; 以及 Carr and Davies, *Foundations of a Planned Economy*, I: 584-90.
- 164 在北高加索剛剛上任的安德烈·安德烈耶夫接過了沙赫特案這個燙手的山芋，他寫信給斯大林(1928年2月27日)，說葉夫多基莫夫會親自過來，直接匯報。Andreev, *Vospominaniia*, 209; Krasil'nikov, *Shakhtinskii protsess*, I: 72.
- 165 Danilov, *Kak lomali NEP*, I: 348-400 (RGASPI. f. 558, op. 11, d. 132, l.3-18); *Na prieme*, 27. 葉夫多基莫夫還把北高加索奧格伯烏經濟部的負責人、沙赫特案的始作俑者康斯坦丁·I. 佐諾夫也帶去了莫斯科：GARF, f. 3316, op. 2, d. 628, l. 20. 另見Starkov, "Perekhod k 'politike razgroma'," vyp. 2: 260-1; Iu. A. Shchetinov, "Rezhim lichnoi vlasti Stalina," 見於Kukushkin, *Rezhim lichnoi vlasti Stalina*, 9-97 (at 68, 引自GARF, 具體情況未作說明).
- 166 Krasil'nikov, *Shakhtinskii protsess*, 163-4, 177-81.
- 167 克雷連柯出席了3月30日北高加索黨委的全體會議，葉夫多基莫夫在會上作了主報告。克雷連柯說「專家問題大家應該都很清楚，沒有他們，我們是應付不了的」。安德烈耶夫回應說：「僅憑我們自己，我們是建設不了社會主義的，我們需要利用專家……我覺得在我們當中，在管理人員當中，內心裏存在對我們格伯烏機構的不信任，認為後者忙着發現犯罪行為，認為他們做得太過了等等。這樣的不信任是存在的。我覺得我們需要消除這種不信任。」Mozokhin and Gladkov, *Menzhinskii*, 267-93.
- 168 Kislitsyn, *Shakhtinskoe delo*, 51-2.
- 169 Mikhhutina, "SSSR glazami pol'skikh diplomatov," 58; Rosenbaum, *Community of Fate*, 248.
- 170 1928年1月發佈了一條有關破壞活動的刑法規定(第58條第7款)的司法解釋，大意是起訴時不需要提供存在「反革命意圖」的證據。Solomon, *Soviet Criminal Justice*, 139-40. 奧格伯烏在1927年的一則通告就已認為，如果由於玩忽職守而導致火災、塌方或爆炸，不管有沒有犯罪意圖，都等同於蓄意破壞。該通告賦予了奧格伯烏在正常司法渠道之外進行審判的權力。Viktorov, *Bez grifa "sekretno"*, 147.
- 171 Kuromiya, "The Shakhty Affair," 46-7 (引自GARF, f. 1652, d. 49, l. 1-9 [no opis]).
- 172 明仁斯基的腿疼得到了緩解，可他的聽力卻下降得厲害，據說是由於動脈硬化引起的；醫生說他的心臟和主動脈有點肥大。Mozokhin and Gladkov, *Menzhinskii*, 345-6 (未註明出處).

- 173 在亞戈達倒台的時候，葉夫多基莫夫1937年說了這樣的話：「我問你，亞戈達，你那時是我的上司，當時從你的方面提供了甚麼幫助嗎？（亞戈達：「是在沙赫特事件中嗎？你那時自己並不相信它。」）別給我說那些沒用的。」*Voprosy istorii*, 1995, no. 2: 6–7.
- 174 *Lubianka: Stalin i VChK-GPU-OGPU-NKVD*, 148–52 (APRF, f. 3, op. 58, d. 328, l. 20–5).
- 175 *Lubianka: Stalin i VChK-GPU-OGPU-NKVD*, 148–61; Krylenko, *Ekonomicheskaiia kontr-revoliutsiia*. 據說葉夫多基莫夫握有工程師與國外人員的「被截獲的信件」，他還聲稱那些信件中無傷大雅的內容實際上是密碼，但這些文件後來在審判時沒有提到。Avtorkhanov, *Stalin and the Communist Party*, 28–29. 早在1927年，見風使舵的拉狄克也許是察覺到了政治風向，也許是出於信念，在批評背離政權工業化運動的腐敗的「右傾」官僚和工人時，就指名道姓地譴責過資產階級專家。Graziosi, "Stalin's Antiworker Workerism," 252.
- 176 Rosenbaum, "The German Involvement in the Shakhty Trial." 李維諾夫曾建議單獨成立一個有威望的委員會，以確定德國人是否有罪，並在審訊時要保證有德國外交部的代表在場。並未成立這樣的特別委員會；3月13日，政治局沙赫特事件委員會增補了負責蘇德軍事關係的伏羅希洛夫。
- 177 Krasil'nikov, *Shakhtinskii protsess*, I: 164–5; *ADAP*, Serie B, VIII: 300–1; Dyck, *Weimar Germany and Soviet Russia*, 129–30 (引自德國外交部檔案，2860/D559468–70: 蘭曹致施特雷澤曼，1928年3月6日，以及2860/D559755–6: 蘭曹致施特雷澤曼，1928年3月16日); Hilger and Meyer, *Incompatible Allies*, 217–8.
- 178 Akhtamzian, "Sovetsko-Germanskie ekonomicheskie otnosheniia," 53; Dyck, *Weimar Germany and Soviet Russia*, 119–29.
- 179 Krasil'nikov, *Shakhtinskii protsess*, I: 163–4.
- 180 *Torgovaia promyshlennaia gazeta*, March 17, 1928: 1; Dyck, *Weimar Germany and Soviet Russia*, 131 (引自5265/E319203–5: 施特雷澤曼致蘭曹，關於和李維諾夫的談話).
- 181 RGASPI, f. 558, op. 11, d. 824, l. 54–64.
- 182 Kislitsyn, *Shakhtinskoe delo*, I: 218–9 (1928年3月19日).
- 183 Kislitsyn, *Shakhtinskoe delo*, I: 231–3, 239–41; Rosenbaum, *Community of Fate*, 254–5. 對蘇聯煤礦工業中存在的混亂和管理不善的詳細描述，見於"Report of Stuart, James & Cooke, Inc. to V.S.N.H.," chapter 1, p. 2, Hoover Institution Archives, Charles H. Stuart Collection, box 1. 1980年代末，蘇聯檢察機關以證據不足為由，宣佈對故意破壞或者為流亡的前礦主及外國情報機關效勞的指控無效。Mozokhin, *VChK-OGPU, karaiushchii mech diktatury proletariat*, 315.
- 184 Kislitsyn, *Shakhtinskoe delo*, I: 839, n48. 3月21日，政治局作出決議，由格伯烏核實被捕和在押人員的「確切名單」。*Lubianka: Stalin i VChK-OGPU-NKVD*, 153–4 (APRF, f. 3, op. 58, d. 328, l. 195); Kislitsyn, *Shakhtinskoe delo*, I: 222–3.
- 185 契切林寫信給斯大林(1928年3月12日)，報告說國外的反應很強烈，而且不僅是在德國。他建議成立一個委員會，直接處理受到指控的德國公民，但斯大林

- 拒絕了。駐柏林的蘇聯使節克列斯廷斯基給斯大林寫了一封哀愁的長信(1928年3月16至17日)，談到了對蘇德關係的影響(「我們在朝着與德國工業界，因而也與德國政府，與德國公眾輿論陷入艱難而持久的衝突方向發展」)。Krasil'nikov, *Shakhtinskii protsess*, I: 203-4, 210-1, II: 856-61.
- 186 Rosenbaum, *Community of Fate*, 258-63.
- 187 Terpigorev, *Vospominaniia gornogo inzhenera*, 183; Starkov, "Perekhod k 'politike razgroma'," 255-6 (1928年3月15日警察機關的情緒報告).
- 188 遺書還說：「列寧的事業會不會死去？」Mozokhin and Gladkov, *Menzhinskii*, 291-2 (鮑里斯·瑟索耶夫(Boris Sysoev), 1928年6月9日)。烏克蘭政府首腦弗拉斯·丘巴爾把這份遺書交給了斯大林，斯大林又把它分發給政治局。
- 189 Bailes, *Technology and Society*, 79.
- 190 *Sovetskoe rukovodstvo: perepiska*, 28 (伏羅希洛夫致托姆斯基，1928年3月29日); Kuromiya, *Stalin's Industrial Revolution*, 30-1. 伏羅希洛夫從內戰時期擔任南方戰線軍事委員以及後來擔任北高加索軍區司令(1921-1924)開始就認識葉夫多基莫夫。關於李可夫和沙赫特事件，參見 *Pravda*, March 11, 1928; 以及 Reswick, *I Dreamt Revolution*, 246-51.
- 191 *Pravda*, March 28, 1928. 政治局已經有了一個常設的委員會，負責政治案件，但它仍然成立了一個專門負責沙赫特事件的委員會，成員有李可夫、奧爾忠尼啟則、莫洛托夫、古比雪夫和斯大林；負責蘇德軍事合作的伏羅希洛夫也很快加入了。
- 192 *Torgovo-promyshlennaia gazeta*, March 6, 1928. 在發表有關沙赫特事件的聲明時，古比雪夫屬下的報紙語氣和緩了許多。*Torgovo-promyshlennaia gazeta*, March 10 and March 11, 1928; Khavin, *U rulia industrii*, 79-81.
- 193 *Torgovo-promyshlennaia gazeta*, March 29, 1928.
- 194 *Trotskii, Portrety revoliutsionerov*, 228.
- 195 *Stenograficheskii otchet pervoi Leningradskoi oblastnoi konferentsii VKP (b)*, 19.
- 196 *Kvashonkin, Sovetskoe rukovodstvo*: 28 (RGASPI, f. 74, op. 2, d. 45, l. 4-4ob., 6-60b.).
- 197 *Pravda*, April 19, 1928; Danilov, *Kak lomali NEP*, I: 417-37. 另見 Bukharin, *Izbrannye proizvedenie*, 376.
- 198 *Trud v SSSR*, 61; Schwarz, *Labor in the Soviet Union*, 6-7. 另見 Krzhizhanovskii, *Desiat' let khoziastvennogo stroitel'stva*.
- 199 Merridale, *Moscow Politics*, 18, calculating from *Statisticheskii spravochnik goroda Moskvy i Moskovskoi gubernii* (Moscow: Mosgorkomstat, 1927); Davies,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of the Soviet Union*, 84
- 200 Duranty, *I Write as I Please*, 145-7.
- 201 Kuromiya, *Freedom and Terror*, 104-5 (引自 GARE, f. 9474, op. 7, d. 259, l. 110), 141.
- 202 Chase, *Workers, Society, and the Soviet State*, 278-82; Chase, "Workers' Control and Socialist Democracy," 235-6.
- 203 Graziosi, "Stalin's Antiworker Workerism," 228.
- 204 Kislitsyn, *Shakhtinskoe delo*, II: 943-6.

- 205 Storella, *Voice of the People*, 244–5 (RGAE, f. 396, op. 6, d. 114, l. 748–50).
- 206 Kuromiya, “The Shakhly Affair,” 51 (引自 GARF, f. 5459, op. 9, d. 354, l. 5); Lyons, *Assignment in Utopia*, 116.
- 207 Kislitsyn, *Shakhtinskoe delo*, II: 940–2.
- 208 Sanukov, “Stalinist Terror in the Mari Republic.”
- 209 Kuromiya, “Crisis of Proletarian Identity.”
- 210 *Izvestiia TsK KPSS*, 1991, no. 5: 195–6 859
- 211 烏克蘭1928年頭幾個月逮捕的1,017人當中，富農只有452人；同期在北高加索逮捕的2,661人中，富農有1,087人；烏拉爾逮捕的903人中，富農有272人。就連最初的被捕者數據中以「富農」為主的西伯利亞，按照官方標準劃分為中農的那些人，被逮捕的數量也開始上升了。Manning,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Extraordinary Measures’,” 15 (引自 TsA FSB, f. 2, op. 6, d. 567, l. 498–504).
- 212 Manning,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Extraordinary Measures’,” 15 (引自 GARF, fond 353s, op. 16s, d. 6, 16–7: February 23, 1928). 米高揚在之前2月12日的《真理報》上承認存在「不正常的現象」，要求把逮捕對象限制在真正的富農，而富農是指至少擁有36噸糧食(2,000普特)的農民，結果政治局在第二天就敦促官員們要嚴格遵守這些指導方針。
- 213 Shemelev, *Bor’ba KPSS*. 另見 Brower, “The Smolensk Scandal and the End of NEP.”
- 214 Danilov, *Kak lomali NEP*, I: 156–68. 另見 Lutchenko, “Rukovodstvo KPSS formirovaniem kadrov tekhnicheskoi intelligentsia,” 29–42 (at 33, 另見 RGASPI, f. 17, op. 2, d. 354, l. 790); 以及 Gimpel’son, *NEP*, 254 (引自 *Pravda*, October 3, 1988).
- 215 Danilov, *Kak lomali NEP*, I: 203, 214–24.
- 216 Danilov, *Kak lomali NEP*, I: 233–5.
- 217 *KPSS v rezoliutsiiakh* [8th ed.], IV: 84.
- 218 *Lubianka: Stalin i VChK-GPU-OGPU-NKVD*, 158–61 (APRF, f. 3, op. 58, d. 329, l. 32–7: 1928年4月25日).
- 219 *Lubianka: Stalin i VChK-GPU-OGPU-NKVD*, 156–8 (APRF, f. 3, op. 58, d. 329, l. 28–31).
- 220 說到1928年4月，卡爾和戴維斯認為，「要是以為此時的大多數領導人，尤其是斯大林，贊成強制措施，或者已經決定放棄市場手段，支持採取直接行動的政策，那還為時過早」。但是從斯大林採取的所有行動來看，情況恰恰相反。Carr and Davies, *Foundations of a Planned Economy*, I: 65–6.
- 221 *KPSS v rezoliutsiiakh* [1984], IV: 315–6; Manning,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Extraordinary Measures’,” 13.
- 222 就如布哈林後來在列寧格勒黨組織全會的報告中指出的：Bukharin, *Put’ k sotsializmu*, 284.
- 223 Danilov, *Kak lomali NEP*, II: 6 (RGASPI, f. 74, op. 2, d. 38, l. 30).
- 224 坎貝爾在全世界都非常受歡迎，他兩次來到蘇聯，第一次是在1929年1月，當時他會見了斯大林，第二次是在1930年6月。他參觀了北高加索幾個大型的機械化農場。Campbell, *Russia: Market or Menace*.

- 225 Danilov, *Kak lomali NEP*, II: 462–5.
- 226 *Pravda*, April 18, 1928, 轉載於 *Sochineniia*, XI: 54 (at 46, 48). 另見 Fitzpatrick, “The Foreign Threat during the First Five Year Plan.”
- 227 Zima, *Chelovek i vlast' v SSSR*, 77–8 (引自 GARF, f. 5446, op. 89, d. 11, l.94–5: F. Cherepanov).
- 228 Manning,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Extraordinary Measures’,” 22 (引自 RGASPI, f. 17, op. 165, d. 13, l. 5).
- 229 RGASPI, f. 17, op. 3, d. 683, l. 89.
- 230 *Moskovskie B'olsheviki*, 251 (引自 *Ob"edinennyi plenum MK i MKK VKP (b), 23–25 aprelia 1928 g.: doklady i rezoliutsii. Moscow, 1928*, 34–5).
- 231 Danilov, *Tragediia sovetskoi derevni*, I: 236 (RGASPI, f. 17, op. 3, d. 683, l.1–2), 261–2 (d. 684, l.18–20), 255–62. 4月21日，政權用農業收入的累進稅取代了人頭稅，它包括對高收入徵收的「個人稅」和對最頂層的人或富農精英徵收的財富附加稅，此舉符合使用經濟手段打擊富農的觀點。Atkinson, *End of the Russian Land Commune*, 329. 1928年4月25日，前白衛軍軍官彼得·弗蘭格爾因為患上了一種嚴重的肺結核病而在布魯塞爾突然去世，時年49歲。根據多人所說，他從來沒有得過這種病。家人認為他是被有蘇聯特工嫌疑的人毒死的，要麼是在家裏，要麼是該特工假裝成一名前傳令兵，此人在他去世前十天來看過他。 *Bolezn', smert' i pogrebenie general-leitenanta barona Petra Nikolaevicha Vrangelia*.
- 232 Ugrovatov, *Informatsionnaia deiatel'nost organov bezopasnosti*, 82–4; *Sovetskaia derevnia glazami VChK-OGPU-NKVD*, II: 7–8, 21, 38, 46; Krasil'nikov, *Shakhtinskii protsess*, I: 242–83.
- 233 Plekhanov, *VChK-OGPU, 1921–1928*, 420–1 (引自 TsA FSB, f. 66, op. 1, d. 187, l.227ob). 同一天，斯大林在共青團代表大會上說，「不，同志們，我們的階級敵人還存在。不僅存在，而且還在增長，企圖進行反對蘇維埃政權的發動」。他敦促他們「組織自下而上的群眾性的批評」。 *Pravda*, May 17, 1928, 見於 *Sochineniia*, XI: 66–77 (at 69) (譯註：《斯大林全集》第11卷，第58頁)。
- 234 *Izvestiia*, May 19, 1928. 在此期間已經有過一些審判：1925年，一些工程師和從前在外國人冶金廠工作的僱員受到審判並被判犯有間諜罪。 *Pravda*, June 4–16, 1925. 1926年，頓巴斯煤礦約有50%的技術人員因生產事故而受到審判。 Kuromiya, *Freedom and Terror*, 143 (引自 GARF, f. 5459, op. 7, d. 2, l. 139, 150), 144–5.
- 235 Ivanovich, “Finliandskie shpioni,” 193–7; *Vozrozhdenie*, January 6, 1928; *Pravda*, January 1, 1928.
- 236 Markova, “Litso vraga,” 79–99 (at 80–1).
- 237 Lyons, *Assignment in Utopia*, 42.
- 238 Bailes, *Technology and Society*, 90.
- 239 有學者估計斯大林的目的是要煞一煞技術專家的威風，防止他們在政治上團結起來。 Bailes, “Politics of Technology,” 464.
- 240 Bailes, *Technology and Society*, 91–2.

- 241 Reswick, *I Dreamt Revolution*, 247.
- 242 Hilger and Meyer, *Incompatible Allies*, 219–20. 希爾格 (Hilger) 出席了審判。巴什金曾在德國接受過教育。
- 243 Mozokhin, *VChk—OGPU*, 274–75 (TsA FSB, f. ugovnoe delo N-3738). 蘇聯人還在沙皇時代的檔案中發現了容克特許工廠中德國技術主管的名字，他在世界大戰中擔任過東線德軍情報機關的負責人。之前的這段歷史，就像不可改變的物理特性一樣，被人當作他從事間諜活動的初步證據。
- 244 Lyons, *Assignment in Utopia*, 125–6.
- 245 *Torgovaia promyshlennaiia gazeta*, July 4, 1928.
- 246 Kuromiya, “The Shakhty Affair,” 48–9 (引自 GARE, f. 9474, op. 7, d. 253, l. 106–16).
- 247 Walter Duranty, *New York Times*, May 19, 1928.
- 248 Kvashonkin, *Sovetskoe rukovodstvo*, 29–31 (RGASPI, f. 78, op. 7, d. 120, l. 1–3; f. 17, op. 162, d. 6, l. 100, 113).
- 249 Carr and Davies, *Foundations of a Planned Economy*, II ii: 702–4.
- 250 Zima, *Chelovek i vlast' v SSSR*, 78 (引自 GARE, f. 5446, op. 89, d. 11, l. 110: A. Lesnikov).
- 251 Plekhanov, *VChK—OGPU, 1921–1928*, 420 (引自 TsA FSB, f. 66, op. 1, d. 187, l. 8, 15, 280).
- 252 Papkov, *Obyknovennyi terror*, 39 (引自 GANO, f. P-2, op. 2, d. 289A, l. 69ob). 1928年3月，新西伯利亞瑟爾采夫的手下、伊爾庫茨克地區黨委負責人尼古拉·濟明 (Nikolai Zimin) 向莫斯科告發瑟爾采夫，說他沒有執行政權的政策，結果引發了後來所說的伊爾庫茨克事件。Moletotov, *Sibkraikom*, 44; Hughes, “The Irkutsk Affair.”
- 253 Gushchin, *Sibirskaiia derevnia*, 187 (引自 PANO, f. 2, op. 2, d. 279, l. 6); Il'inykh, *Khroniki khlebnogo fronta*, 165–6 (引自 GANO, f. P-2, op. 2, d. 217, l. 738); Rosenfeldt, *The “Special” World*, I: 164. 860
- 254 1927至1928年度的收成至少比1926至1927年度少了500萬噸，但截止到1928年6月30日，國家收購的小麥和黑麥數量與1926至1927年度的一樣多。Carr, “Revolution from Above,” 321.
- 255 Bordiugov and Kozlov, “The Turning Point of 1929.”
- 256 該刊物把信轉給了政府首腦李可夫。Zima, *Chelovek i vlast' v SSSR*, 75 (引自 GARE, f. 5446, op. 89, l. 12–15, 25, 56–64: V. Repin).
- 257 Carr and Davies, *Foundations of a Planned Economy*, I: 67. 有學者說得對，繳納糧食的指標帶來的危險在於，會導致農民採取「兩種傳統的應對方法」：「短期的應對方法是隱瞞存糧，長期的應對方法是拒絕播種超過養活自己家人所需的土地。」Carr, *Bolshevik Revolution*, II: 154.
- 258 Avtorkhanov, *Tekhnologiia vlasti*, 7–11.
- 259 Avorkhanov, *Tekhnologiia vlasti*, 11–2.
- 260 *Pravda*, June 2, 1928, 見於 *Sochineniia*, XI: 81–97.
- 261 Carr, *Socialism in One Country*, II: 106–7 (引自 Shokhin, *Kratkaia istoriia VLKSM*, 115–6); Kenez, *Birth of the Propaganda State*, 168–9; Balashov and Nelepin, *VLKSM za 10 let v tsifrakh*, 21–2.



- 262 Manning,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Extraordinary Measures,'" 30 (引自 TsA FSB, f. 2, op. 6, d. 599, l. 385-7).
- 263 Zima, *Chelovek i vlast' v SSSR*, 81-2 (引自 GARE, f. 5446, op. 89, d. 9, l. 9-10).
- 264 Zdanovich, *Organy gosudarstvennoi bezopasnosti*, 306 (引自 TsA FSB, f. 2, op. 6, d. 48, l. 15-6).
- 265 Kun, *Bukharin*, 229-34, 引自弗魯姆金信件的副本，見於 Trotsky archive, Houghton Library, Harvard University; *Sochineniia*, XI: 116-23.
- 266 在一本已經出版的文獻集中，給布哈林的信註明的日期是1928年8月，但是在1929年4月，當布哈林在全會宣讀這封信的時候，他給它註明的日期是1928年6月1至2日。Kvashonkin, *Sovetskoe rukovodstvo*, 38-40 (RGASPI, f. 329, op. 2, d. 6, l. 58-60); Bukharin, *Problemy teorii i praktiki sotsializma*, 298-99.
- 267 對於副農業人民委員莫伊謝伊·「米哈伊爾」·弗魯姆金的來信(1928年6月15日)，斯大林倒是回覆了。弗魯姆金在信中激烈批評了斯大林在農村實行的高壓路線，認為這種路線是在幫國際資產階級的忙。按照黨的規定，這樣的信應該在一個星期之內由政治局集體回覆。斯大林在盛怒之下以自己的名義立即作了回覆。 *Sochineniia*, XI: 116-26.
- 268 1928年6月27日，李可夫收到烏克蘭切爾尼戈夫省農村一個有名的熟人的來信。「阿列克謝！在從列寧那裏繼承了如此豐富的實驗方面的財富之後，你和你虛偽的機關正在把國家引向毀滅……你要知道，我們這些老革命需要跑到森林裏去發動另一場革命了。」Zima, *Chelovek i vlast' v SSSR*, 79 (引自 GARE, f. 5446, op. 89, d. 9, l. 5-6; T. S. Tregubov).
- 269 Danilov, *Kak lomali NEP*, IV: 558-63 (RGASPI, f. 84, op. 2, d. 40, l. 2-11); Larina, *This I Cannot Forget*, 117.
- 270 Storella, *Voice of the People*, 235-6 (RGAE, f. 396, op. 6, d. 114, l. 747-8).
- 271 Danilov, *Kak lomali NEP*, II: 184-7, 448. 另見 "Foreign Trade," 225-6.
- 272 7月1日，關於年初開始採取非常措施一事，中央監察委員會主席團成員阿龍·索爾茨寫信給奧爾忠尼啟則說，「莫洛托夫和斯大林的視察，不管他們是不是有意的，都引發了普遍的專橫和對法律的蔑視」。Kvashonkin, *Sovetskoe rukovodstvo*, 31-4 (RGASPI, f. 85, op. 1/s, d. 156, l. 2-15; July 1, 1928).
- 273 Scheffer, *Sieben Jahre Sowjetunion*, 323. 1928年9月8日，布羅克多夫—蘭曹在伯林去世。
- 274 未公佈的文字記錄見於 GARE, f. 9474sch, op. 7s, d. 181-261.
- 275 Krumin, *Shakhtinskii protsess*. 克魯明 (Krumin, 1894-1943) 是克魯明什 (Kruminsh) 的縮寫，他畢業於彼得格勒大學歷史系 (1916)，是《經濟生活報》的編輯，1928年加入《真理報》編委會。
- 276 *Sochineniia*, XI: 47. 有關工人階級對沙赫特審判的熱情以及1928至1931年對「階級敵人」採取恐怖政策的證據材料，參見 Kuromiya, "The Shakhty Affair," 51, 56.
- 277 Danilov, *Kak lomali NEP*, I: 361; *Sochineniia*, XI: 158-87. 在交給自己修改的文字記錄稿上，斯大林加了一句：「在發生了糧食收購危機的時候，我們遭到了農村資本主義分子……第一次反對蘇維埃政策的嚴重進攻，這難道不是事實嗎？」接着他

援引列寧的話反問道：「列寧提出的依靠貧農、聯合中農、反對富農的口號是……我們農村工作的基本口號，這難道不對嗎？」（譯註：《斯大林全集》第11卷，第148頁）（I: 360）。

278 *Danilov, Kak lomali NEP, II: 354, 513.*

279 *Sochineniia, XI: 159, 188–9*（初版於1949年）。

280 *Danilov, Kak lomali NEP, 354–5.* 後來在討論時，斯大林說道，若是為了讓農民願意賣糧而把糧價提高40%，那每年就要花3億盧布，而「為了得到這筆錢，那就要麼從工業，要麼從貿易中拿走一些東西」（II: 519, 未修改的文字記錄）。

281 *Danilov, Kak lomali NEP, II: 360–1; Sochineniia, XI: 170–1.*

282 1919年9至10月，在準備一本論無產階級專政的小冊子時，列寧草草地在筆記中寫道：「階級鬥爭特別〔愈發〕殘酷和與資本主義及其最高階段相適應的新的反抗形式〔陰謀+怠工+對小資產階級的影響，等等，等等〕……剝削者的反抗在他們被推翻之前就已經開始，被推翻後更從兩方面加劇。」「O diktature proletariata,」*PSS, XXXIX: 261–3.* 同樣，例如捷爾任斯基和莫洛托夫共同下發的一則通告（1921年2月）聲稱：「在輪掉外部戰線的戰鬥後，反革命正在致力於從內部推翻蘇維埃政權。為了達到這個目的，它會不擇手段，利用所有經驗，所有的背叛的本領。」Lauchlan, “Young Felix Dzerzhinsky,” 1–19（引自RGASPI, f. 17, op. 84, d. 228, l. 52）。

283 *Van Ree, Political Thought of Joseph Stalin, 114–5.*

284 *Sochineniia, XI: 45; Kuromiya, Stalin's Industrial Revolution, 6*（引自Trotsky archive, Houghton Library, Harvard University, T-1835）。

285 *Kun, Bukharin, 233–4.*

286 *Danilov, Kak lomali NEP, II: 380.*

287 4月19日，2,000名失業人員打砸了列寧格勒勞動力交易所；5月3日，1萬人在莫斯科勞動力交易所發生暴亂，讓民警流了血，並且打砸貨攤；5月15日，在（哈薩克斯坦的）謝米帕拉斯克，3,000人闖進了市政廳，搶劫了商店。*Danilov, Kak lomali NEP, II: 5–6*（RGASPI, f. 17, op. 85, d. 307, l. 28–31, 41–5）。

288 *Danilov, Kak lomali NEP, II: 382–7.*

289 *Danilov, Kak lomali NEP, II: 460–1.*

290 Fel'shtinskii, *Razgovory s Bukharinym, 43.* 另見Lewin, *Russian Peasants, 306*

291 *Danilov, Kak lomali NEP, II: 516–7.*

292 *KPSS v rezoliutsiakh [1984], IV: 351; KPSS v rezoliutsiakh [1984], II: 516–7.*

293 *Pravda, August 5, 1928*（莫洛托夫）。

294 與此同時，總檢察長克雷連柯指示司法部門準備把第107條大量用於打擊投機倒把分子和那些試圖壟斷糧食市場的人。*Pravda, July 20, 1928; Danilov, Kak lomali NEP, III: 6.* 法因博利特的赦免被逮捕農民的要求通過得比較晚，司法人民委員揚松到8月7日才下令釋放所有根據第107條被判刑的貧農和中農。Manning,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Extraordinary Measures,’” 41（引自TsA FSB, f. 66, op. 1, d. 243, l. 243）。*Fainblitt, Amnistiia i sudebnyi prigovor.*

- 295 在關於全會的一次總結性的報告中，斯大林對列寧格勒黨組織說，「但糧食必須收購」。Pravda, July 15, 1928, 見於 *Sochineniia*, XI: 204–18.
- 296 Kumanev and Kulikova, *Protivostoianie*, 142–4.
- 297 托洛茨基後來寫道，「1927年初，季諾維也夫本來準備投降認輸」，後來，中國的事態發展將他從軟弱無用之中救了出來，但只是暫時的，因為在托洛茨基及其支持者在黨的第十五次代表大會上拒絕放棄自己的主張時，托洛茨基指出，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已經跑回去乞求斯大林。Trotskii, *Moia zhizn'* [1991], 502.
- 298 Nazarov, *Stalin i bor'ba za liderstvo*, 119–20 (引自 RGASPI, f. 326, op.1, d. 99, l. 12). 1928年1月，季諾維也夫說自己的小集團曾經和托洛茨基作過「鬥爭」。Nazarov, *Stalin i bor'ba za liderstvo*, 119 (引自 RGASPI, f. 324, op. 1, d. 363, l. 7).
- 299 Medvedev, *Let History Judge*, 196–8.
- 300 Danilov, *Kak lomali NEP*, IV: 558–63 (RGASPI, f. 84, op. 2, d. 40, l. 2–11). 另見 Daniels, *Documentary History of Communism* [1960], I: 308–9 (出自 Trotsky archive, Houghton Library, Harvard University, T-1897); 以及 Kun, *Bukharin*, 251–61.
- 301 Larina, "Nezabyvaemoe," 120; Larina, *This I Cannot Forget*, 118.
- 302 Danilov, *Kak lomali NEP*, IV: 561.
- 303 「他瘋了，」據說布哈林在托洛茨基被流放到哈薩克斯坦之前當着他的面說斯大林，「他認為自己能把一切都做了，一個人就能扛起一切，其他所有人都是障礙。」Trotsky, "Iz chernovikov nezakonchennoi Trotskim biografii Stalina" [1939?], 見於 Trotskii, *Portrety revoliutionerov* [1991], 180–1 (at 181); [1988], 141.
- 304 證據顯示，對於托洛茨基不斷責備自己和季諾維也夫的「投降」，加米涅夫感到很沮喪。他在1928年9月對莫斯科大劇院外面的一些托洛茨基的支持者說，托洛茨基是個「固執的人」，還說托洛茨基永遠不會像加米涅夫和季諾維也夫那樣，要求把自己召回莫斯科工作，而是會「待在阿爾馬—阿塔，直到他們給他派輛專列，但他們只有在國內形勢到了克倫斯基逼到門口的地步時才會派出那輛列車。」"Vstrecha i razgovor tr. K. I P. s Kamenevym 22 sentiabria 1928 goda," 見於 Fel'shtinskii, *Razgovory s Bukharinym*, 51–4 (at 53).
- 305 這話據說是斯大林說的，它在傳播時有多種說法：*Trotsky's Diary in Exile* [1958], 64; Ioffe, *Odna noch'*, 33–4; Serebriakova, "Oni delali v chest' idee," 3.
- 306 加米涅夫後來被迫堅持說，他和季諾維也夫當時贊成給他們恢復黨內職務的條件。RGASPI, f. 84, op. 2, d. 40, l. 12–3.
- 307 布哈林還說，「總的來說，這份文件是不可靠的，是假的」。Danilov, *Kak lomali NEP*, III: 572–6 (RGASPI, f. 84, op. 2, d. 40, l. 25–31: 致奧爾忠尼啟則的信，1929年1月30日)。
- 308 索柯里尼柯夫還說，布哈林想要的不是與加米涅夫和季諾維也夫組成一個集團，而是讓他們在與斯大林的鬥爭中保持中立。Danilov, *Kak lomali NEP*, IV: 564–5 (RGASPI, f. 84, op. 2, d. 40, l. 14–5: 致奧爾忠尼啟則的信，1929年1月28日)。
- 309 Larina, *This I Cannot Forget*, 115–7. 此事發生的時候，拉莉娜15歲。
- 310 Danilov, *Kak lomali, NEP*, II: 531, 535

- 311 McDermott and Agnew, *Comintern*, 70.
- 312 Budnitskii, "Sovershenno lichno i doveritel'no," III: 404–10 (1928年8月16日).
- 313 Vatkin, "Goriachaia osen' dvadtsat vos'mogo," 103.
- 314 在將近200名被流放的反對派成員的支持下，托洛茨基給代表大會送去了一篇批評綱領草案的文章。Degras, *The Communist International* [London], II: 446–55.
- 315 Adibekov and Shirinia, *Politbiuro TsK RKP (b)—VKP (b) i Komintern*, 541–3 (RGASPI, f. 17, op. 3, d. 700, l. 1–2), 551–2 (RGASPI, f. 495, op. 19, d. 228, l. 129); McDermott and Agnew, *Comintern*, 68–90.
- 316 據布哈林的第三任妻子安娜·拉莉娜說，斯大林有一次對布哈林的父親說，「你是怎麼培養兒子的？我想學學你的辦法。啊，多好的兒子，多好的兒子！」 Larina, *This I Cannot Forget*, 221–3.
- 317 Alliluyeva, *Twenty Letters*, 31; 以及 Gregory, *Politics, Murder, and Love*, 16–8; Young, "Bolshevik Wives."
- 318 除了蘇聯黨之外，綱領草案未經其他任何黨的討論；同樣很能說明問題的是，在大會開幕的時候，將要表決通過的提綱甚至都沒準備好。Eudin and Slusser, *Soviet Foreign Policy*, I: 106–20; Carr and Davies, *Foundations of a Planned Economy*, III/i: 193–222.
- 319 Firsov, "N. I. Bukharin v Kominterne," 189–90; *International Press Correspondence*, August 23, 1928: 941.
- 320 *International Press Correspondence*, September 4, 1928: 1,039.
- 321 英國代表團發表了一則聲明（1928年8月22日），反對所謂的右傾：「我們希望對庫西寧及其他某些同志挑起爭論的時機和方法表達鄭重的抗議」，尤其是「急於給持有不同意見的同志貼標籤的做法」。 *International Press Correspondence*, December 27, 1928: 1,743–4; McDermott and Agnew, *Comintern*, 233–4.
- 322 莫洛托夫沒有交出斯大林那年的信件。Lih, *Stalin's Letters to Molotov*, xiv. 斯大林在莫斯科的最有一次有記載的會晤是8月1日（美國共產黨人傑伊·洛夫斯通 [Jay Lovestone]）；他在回到莫斯科後的第一次有記錄的會晤是在1928年10月5日（作家法捷耶夫）。 *Na prieme*, 28, 774, 780–1.
- 323 Valedinskii, "Organizm Stalina vpolne zdorovy," 68–73.
- 324 Danilov, *Kak lomali NEP*, IV: 689; Trotskii, *Moia zhizn'*, II: 111.
- 325 Khlevniuk, *Politbiuro*, 22 (未註明出處，也沒有給出日期).
- 326 Dohan, "Foreign Trade," 223.
- 327 Danilov, *Kak lomali NEP*, III: 591–3 (at 592: RGASPI, f. 558, op. 11, d. 765, l. 48–49ob).
- 328 Vernadskii, *Dnevnik*, 76, 87. 加里寧領導下的蘇維埃執行委員會的土地和選舉委員會主席 V. G. 雅科文科 (V. G. Yakovenko)，於1928年6至8月實地考察過西伯利亞農村之後，在1928年10月3日寫信給斯大林說：「農民們執意認為蘇維埃政權不想讓他們活得體面。」 *Izvestiia TsK KPSS*, 1991, no. 7: 186–90.
- 329 Pribytkov, *Apparat*, 87–90 (附有從米高揚檔案中複製的副本). 斯大林在信末詢問了奧爾忠尼啟則的健康狀況。

- 330 Pribytkov, *Apparat*, 100 (附有副本：98–9).
- 331 Kvashonkin, *Sovetskoe rukovodstvo*, 44–8 (RGASPI, f. 669, op. 1, d. 30, l. 124–9).
- 332 Danilov, *Kak lomali NEP*, III: 591–3 (at 592–3: RGASPI, f. 558, op. 11, d. 765, l. 48–49ob).
- 333 Tauger, “Grain Crisis or Famine?,” 167 (引自 *Visty*, September 27, 1928: 2).
- 334 *International Press Correspondence*, October 19, 1928: 1337–8, October 26, 1928: 1383, 見於 Daniels, *Documentary History of Communism* [1993], I: 164–6.
- 335 Daniels, *Documentary History of Communism* [1993], I: 166–9. 另見 Cohen, *Bukharin*, 295–6.
- 336 Danilov, *Kak lomali NEP*, III: 12.
- 337 Vaganov, *Pravyi uklon v VKP (b)*, 161–3, 174–5.
- 338 Pribytkov, *Apparat*, 108.
- 339 Danilov, “Vvedenie,” in Danilov, *Tragediia sovetskoi derevni*, I: 59. 另見 Carr and Davies, *Foundations of a Planned Economy*, II i: 237.
- 340 *Izvestiia*, February 7, February 19, and February 22, 1929.
- 341 Bukharin, *Problemy teorii i praktiki sotsializma*, 306–7 (1929年4月18日).
- 342 Kvashonkin, *Sovetskoe rukovodstvo*, 58–9 (RGASPI, f. 669, op. 1, d. 30, l. 133–42).
- 343 Danilov, *Kak lomali NEP*, III: 16 (RGASPI, f. 17, op. 2, d. 417, l. 125).

## 尾聲 如果當初斯大林死了

- 1 Viola, *Peasant Rebels*, 238; Danilov, *Tragediia sovetskoi derevni*, II: 787–808 (TsA FSB, f. 2, op. 8, d. 679, l. 36–72: March 15, 1931).
- 2 Nove, *The Soviet Economy*, 186; Courtois, *Black Book of Communism*, 167–8.
- 3 Kravchenko, *I Chose Freedom*, 67.
- 4 Alec Nove, “Was Stalin Really Necessary?,” 86–92, 轉載於 Nove, *Was Stalin Really Necessary?*, 17–39, 以及對諾烏的書的評論，Gregory Grossman, *Europe-Asia Studies*, 17/ 2 (1965): 256–60; von Laue, *Why Lenin?*; Hobsbawm, *Age of Extremes*. 另見 Kotkin, “Left Behind.”
- 5 Nove, “The Peasants, Collectivization, and Mr. Carr”; Lih, “Bukharin’s ‘Illusion’.”
- 6 Davis,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11–13.
- 7 Cohen, “The 1927 Revaluation of the Lira.”
- 8 Sloin and Sanchez-Sibony, “Economy and Power in the Soviet Union.” 這是以多漢的〈新經濟政策時期蘇維埃經濟中的對外貿易〉(“Soviet Foreign Trade in the NEP Economy”) 為基礎的；Dohan, “The Economic Origins of Soviet Autarky.”
- 9 除了意識形態的狹隘性問題，對蘇聯國內爭論的分析是有說服力的：Ehrlich, *The Soviet Industrialization Debate*; Lewin, *Political Undercurrents*.
- 10 Ustrialov, *Pod zankom revoliutsii*; Bukharin, *Tsezarizm pod maskoi revoliutsii*.

- 11 Sakharov, *Politcheskoe zaveshchanie*, 645.
- 12 Bukharin, *Izbrannye proizvedeniia*, 146–230 (at 196–7). 另見 Siegelbaum, *Soviet State and Society*, 228.
- 13 Bukharin, “O novoi ekonomicheskoi politike,” 3–15.
- 14 Manning,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Extraordinary Measures,’” 15 (引自 GARF, f. 374, op. 217, d. 1556, l. 22–8).
- 15 Brovkin, *Russia After Lenin*, 168. 關於布哈林對富農的輕視，參見 Cohen, *Bukharin*, 187–92.
- 16 Davies, *Socialist Offensive*, 27.
- 17 Liberman, *Building Lenin's Russia*, 65–8.
- 18 Carr and Davies, *Foundations of a Planned Economy*, I/ ii: 733–5. R. W. 戴維斯對新經濟政策及其困境的分析最為出色，他堅持認為蘇聯的工業化計劃注定了新經濟政策失敗的命運。這種說法可能正確，也可能不正確。但是，工業化計劃以及布爾什維主義實際推行的一切，背後都是因為信奉社會主義（反資本主義）。這就是意識形態。Davies, *Socialist Offensive*, 36–7. 另見 Carr, *Socialism in One Country*, I: 520.
- 19 Johnson and Temin, “The Macroeconomics of NEP”; Chaudhry, “The Myths of the Market.”
- 20 Sokol'nikov, *Finansovaia politika revoliutsii*, II: 479–90.
- 21 *Pravda*, May 8, 1927. 其他人覺得蘇聯代表團的表現令人失望：Runciman, “The World Economic Conference at Geneva.”
- 22 *Pravda*, August 3, 1927.
- 23 1926年，斯大林以破壞外匯市場為由，強行將財政人民委員部的一名官員定罪並且處死，而他這樣做的目的，部分就在於抹黑索柯里尼柯夫；實際上，在逮捕和處決這名官員的情況公開後，外匯市場基本就凍結了，李可夫對此是拍手稱快。「外匯黑市是索柯里尼柯夫的產物，他把它生出來，給它滋養，自始至終都在愛護它，」李可夫在1926年7月黨的全會上說，「我們消滅了索柯里尼柯夫製造出來的這個東西……我們不需要花更多的錢」（去支持可自由兌換的盧布匯率）。Mozokhin, *VChK-OGPU*, 208–10 (引自 APRE, f. 3, op. 57, d. 91, l. 58; TsA FSB, f. 2, op. 5, pro. 581, l. 121–2); RGASPI, f. 17, op. 2, d. 246, l. 53.
- 24 Stephen F. Cohen, *Bukharin*, 329.
- 25 *Khrushchev Remembers*, 222.
- 26 *Pravda*, August 10, 1928.
- 27 Sutton, *Western Technology and Soviet Economic Development*, vol. II. 有理由懷疑，要是沒有大規模的西方技術援助，蘇聯當時還行不行，而除了相關的政治因素外，這種情況不是蘇聯獨有的。Keller, *Ost minus West = Null*.
- 28 Sanchez-Sibony, “Depression Stalinism.”
- 29 奧格伯烏不久便在監獄裏為「資產階級」專家成立了若干研究所（實驗設計局）。Viktorov, *Bez grifa "sekretno,"* 108, 146–7.
- 30 Avtorkhanov, *Tekhnologiya vlasti*, 26.

- 31 摩西·盧因提出了要是斯大林當初死了會怎樣的問題，但他沒有充分地回答這個問題： *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 47/ 2 (1975): 364–72 (關於塔克的《革命者斯大林》 (*Stalin as Revolutionary*) 的評論)。
- 32 列寧在寫給秘書福季耶娃的信 (1921年12月28日) 中說：「我要會見斯大林，並請事先替我接通奧布赫 (醫生) 的電話，以便詢問斯大林的情況。」 *PSS*, LIV: 99 (譯註：《列寧全集》第52卷，第166頁)；Golikov, *Vladimir Il'ich Lenin*, IX: 565, 52. 有關斯大林的闌尾炎，參見現存的首批關於其健康狀況的文件：RGASPI, f. 558, op. 4, d. 675, l. 1–23 (1921年3月25日)。
- 33 Nikolai Nad, “Kto ubil Mikhaila Frunze,” *Izvestiia*, October 26, 2010.
- 34 Golikov, *Vladimir Il'ich Lenin*, VI: 390, IX: 348, 618, X: 348, 566, 588, 639, XI: 47, 113, 128; Meijer, *Trotsky Papers*, II: 26–9, 66–7; McNeal, *Stalin*, 50.
- 35 Golikov, *Vladimir Il'ich Lenin*, IX: 565, 572.
- 36 RGASPI, f. 558, d. 1279, d. 1482.
- 37 Plekhanov and Plekhanov, *F. E. Dzerzhinskii*, 583 (TsA FSB, f. 2, op. 3, d. 4, l. 2: February 8, 1925).
- 38 Bosworth, *Mussolini's Italy*, 240.
- 39 Tumshis and Papchinskii, *1937, bol'shaia chistka*, 52. 時任莫斯科軍區奧格伯烏特別部部長的米哈伊爾·弗里諾夫斯基 (生於1898年) 在15英里 (編註：約24公里) 外的謝爾普霍夫公路上抓住了那些恐怖分子。被抓獲的兇手是格里戈里·拉德科維奇 (Georgy Radkovich) 和德米特里·莫諾馬霍夫 (Dmitri Monomakhov)。1928年11月，弗里諾夫斯基被亞戈達提拔為克里姆林宮衛戍司令。
- 40 Loginov, *Teni vozhdin*.
- 41 Fel'shtinskii, *Razgovory s Bukharinym*, 43. 另見Deutscher, *Prophet Unarmed*, 442.
- 42 “Samoubiistvo ne opravdanie,” 93. 托姆斯基後來再也沒提過這件事 (除了在1936年8月22日自殺時給斯大林的遺書中)，但他的助手們 (A. 斯列普科夫、D. 馬列茨基 [D. Maretsky] 和 L. 金茲堡 [L. Ginzburg]) 講過托姆斯基1929年秋天威脅斯大林的事。
- 43 「很少有偉人」，卡爾還寫道，「作為他們所在的時間和空間的產物，表現得像斯大林這樣明顯。」Carr, *Socialism in One Country*, I: 151, 192.

## 參考文獻

在多年的研究和教學生涯中，下面列出的檔案館我大多都花過一些時間（除了前克格勃檔案館這個重要的例外，該館對幾乎所有的研究者都不開放）。我在前蘇共檔案館和胡佛研究所檔案館（該館藏有大量蘇聯檔案的副本以及豐富的原始資料）進行過全面的研究。自從有了掃描和數字化技術，很多檔案都不必親身前往查閱（特別是在俄國同行共享充分的訪問權限的情況下）。但是，考慮到這項工作涉及的範圍，最有效的研究策略似乎是既盡可能地在檔案館工作，也對已出版的檔案彙編以及廣泛而可靠地採用了未刊原始資料的學術論著進行詳盡研究。檔案彙編以及極少數有權查閱保密檔案的研究者的成果，對於瞭解秘密警察和軍隊的情況特別重要。我還認真梳理了同期的大量期刊文獻，確保不會遺漏那些或許已經年代久遠的學術成果。請讀者留意，本項研究是在不同時間、不同地點進行的，有些資料館碰巧擁有，比如說，某個版本的黨的代表大會文件或者公開出版的回憶錄，而別的地方則擁有其他版本，這在尾註中就可以看出。讀者還會發現，有些人名有不同的拼寫方式，比如托洛茨基，如果參考的是其作品的英文版，在正文和參考文獻中寫作「Trotsky」，而如果是俄文著作，則寫作「Trotskii」（按照美國國會圖書館的拼法）。這些都屬於音譯方面不能令人滿意的地方。同時，非俄羅斯人的名字在正文中是按照原有的拼法，因此，波蘭族的捷爾任斯基的名字寫成「Dzierżyński」，只有在註釋和參考文獻中才按照俄羅斯化的拼法寫成「Dzerzhinskii」。

APRF: Russian Presidential Archive (former politburo archive) [俄羅斯總統檔案館(前政治局檔案館)]

AVP RF: Foreign Policy Archive of the Russian Federation [俄羅斯聯邦外交政策檔案館]

GANO: State Archive of Novosibirsk [新西伯利亞國家檔案館]

GARF: State Archive of the Russian Federation [俄羅斯聯邦國家檔案館]

GF IML: Georgian Affiliat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Archive [蘇共檔案館格魯吉亞分館]

GIAG: Georgia State Historical Archive [格魯吉亞國家歷史檔案館]

Hoover Institution Archive, Stanford University [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所檔案館]



- RGAE: Russian State Economic Archive [俄羅斯國家經濟檔案館]  
 RGAKFD: Russian State Archive of Photographs and Film [俄羅斯國家影像資料檔案館]  
 RGALI: Russian State Archive of Literature and Art [俄羅斯國家文學藝術檔案館]  
 RGASPI: Russian State Archive of Social and Political History (former central party archive) [俄羅斯國家社會及政治歷史檔案館(前蘇共中央檔案館)]  
 RGIA: Russian State Historical Archive [俄羅斯國家歷史檔案館]  
 RGVA: Russian Military Archive [俄羅斯軍事檔案館]  
 TsA FSB: Central Archive of the Federal Security Service (former KGB) [聯邦安全局中央檔案館(前克格勃檔案館)]  
 TsGAKFFD SPb: Central State Archive of Photographs, Film, and Phonographic Documents, St. Petersburg [聖彼得堡國家影音文獻中央檔案館]

- Abraham, Richard. *Alexander Kerensky: The First Love of the Revolution*.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7.
- Abramovich, Isai L. *Vospominaniia i vzgliadi*, 2 vols. Moscow: KRUK-Prestizh, 2004.
- Abramovitch, Raphael R. *The Soviet Revolution, 1917–1939*. New York: International Universities Press, 1962.
- Abramowicz, Hirs. *Profiles of a Lost World: Memoirs of East European Jewish Life before World War II*. Detroit: Wayne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99.
- Abrams, R. "Political Recruitment and Local Government: The Local Soviets of the RSFSR, 1918–1921," *Soviet Studies*, 19/4 (1968): 573–80.
- Abrosimova, T. A., et al., eds. *Peterburgskii komitet RSDRP (b) v 1917 godu: protokoly imaterialy zasedanii*. St. Petersburg: Bel'veder, 2003.
- Adamets, Serguei. *Guerre civile et famine en Russie: le pouvoir bolchevique et la population face à la catastrophe démographique, 1917–1923*. Paris: Institut d'études slaves, 2003.
- Adelman, Jonathan R.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oviet Party Apparatus in the Civil War: Center, Localities, and Nationality Areas," *Russian History* 9/1 (1982): 86–110.
- Adibekov, G. M., and Shirinia, K. K., eds. *Politbiuro TsK RKP(b)—VKP(b) i Komintern, 1919–1943: dokumenty*. Moscow: Rosspen, 2004.
- Adibekov, G. M., et al., eds. *Politbiuro TsK RKP (b)—VKP (b) i Evropa: resheniia 'osoboi' papki', 1923–1939*. Moscow: Rosspen, 2001.
- . *Politbiuro TsK RKP (b)—VKP (b): povestki dnia zasedanii 1919–1952*, 3 vols. Moscow: Rossen, 2000–1.
- Adibekova, Zh., and Latsis, O. "V predstavstvii pereloma: poslednye pis'ma i zapiski F. E. Dzerzhinskogo," *Kommunist*, 1989, no. 8: 79–88.
- Agabekov, Georges. *OGPU: The Russian Secret Terror*. New York: Brentano's, 1931.
- Agafonov, V. K. *Zagranichnaia okhranka*. Petrograd: Kniga, 1918.
- Agursky, Mikhail. "Stalin's Ecclesiastical Background," *Survey* 28/4 (1984): 1–14.
- Airapetian, G. A. *Legendarnyi Gai*. Moscow: Voenizdat, 1965.
- Airapetov, Oleg. "Revolution and Revolt in the Manchurian Armies, as Perceived by a Future Leader of the White Movement," in *The Russian Revolution of 1905: Centenary Perspectives*, edited by Jonathan D. Smele and Anthony Heywood.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5.
- Akhramzian, Abdulkahn. "Voennoe sotrudnichestvo SSSR i Germanii v 1920–1933 gg.," *Novaia i noveishaia istoriia*, 1990, no. 5: 3–24.
- . "Soviet-German Military Cooperation, 1920–1933," *International Affairs [Moscow]* (1990), no. 7: 95–113.
- . "Sovetsko-Germanskii ekonomicheskie otnosheniia v 1922–1932 gg.," *Novaia i noveishaia istoriia*, 1990, no. 5: 42–56.
- Albertini, Luigi. *The Origins of the War of 1914*, 3 vol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2–57.
- Aldanov, Mark. "Durnov6: Prophet of War and Revolution," *Russian Review*, 2/1 (1942): 31–45.
- Aleksandrov, G. F. *Iosif Vissarionovich Stalin: kratkaia biografia*, 2nd ed. Moscow: OGIZ, 1947.
- Alekseenkov, P. *Kokandskaia avtonomlia*. Tashkent: Uzgiz, 1931.
- Aleshkin, P. F., and Vasil'ev, Iu. A., eds. *Krest'ianskie vosstaniia v Rossii v 1918–1922 gg.: ot makhnovshchiny do antonovshchiny*. Moscow: Veche, 2012.
- Alfred Rosenberg, *Der jüdische Bolschewismus*. N.p., 1921.
- Ali, J. "Aspects of the RKP(b) Secretariat, March 1919–April 1922," *Soviet Studies*, 26/3 (1974): 396–416.
- Aliamkin, Andrei V., and Baranov, Aleksandr G. *Istoriia denezhnogo obrashcheniia v 1914–1924 gg.: po materialam Zaural'ia*. Ekaterinburg: Ural'skii gos. universitet, 2005.
- Alioshin, Dmitri. *Asian Odyssey*. New York: Henry Holt, 1940.
- Allen, W.E.D. "The Caucasian Borderland," *Geographical Journal*, 9/15–6 (1942): 225–37.
- . *A History of the Georgian People from the Beginning Down to the Russian Conquest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London: K. Paul, Trench, Trubner, 1932.
- Alliluev, Sergei. "Moi vospominaniia," *Krasnaia letopis'*, 1923, no. 5: 169–81.
- . "Vstrechi s tovarishchem Stalinym," *Proletarskaia revoliutsiia*, 1937, no. 2.
- . *Proidennyi put'*. Moscow: OGIZ, 1946.
- Alliluev, Vladimir. *Khronika odnoi semi: Alliluevy-Stalin*. Moscow: Molodaia gvardiia, 1995.
- Allilueva, Anna S. *Vospominaniia*. Moscow: Soevskii pisatel', 1946.
- Allilueva, Svetlana. *Dvadsat' pisem k drugu*.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1967.
- Alliluyeva, Svetlana. *Only One Year*.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1969.
- . *Twenty Letters to a Friend*.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1967.
- Alstadt, Audrey. "Muslim Workers and

- the Labor Movement in Pre-War Baku," in *Turkic Culture: Continuity and Change*, edited by S. M. Akural.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87.
- Al'tman, M. M. "Lichnost' reformatora: narkom finansov G. Ia. Sokol'nikova 1888-1939," in *Denezhnaia reforma v Rossii, istoriia i sovremennost': sbornik statei*. Moscow: Drevlekhranilishche, 2004.
- Amelung, Heinz. *Bismarck-Worte*. Berlin: Deutsches Verlagshaus Bong, 1918.
- Anan'ich, Boris V., and Gancelin, R. Sh. "Nikolai II," *Voprosy istorii*, 1993, no. 2: 58-76.
- . "Opyt kritiki memuarov S. Iu. Vitte," *Voprosy istoriografii i istochnikovedeniia istorii SSSR: sbornik statei*. Moscow-Leningrad: Akademiia nauk SSSR, 1963.
- Anchabadze, I. D., and Volkova, N. Ia. *Stary Tbilisi: Gorod i gorozhane v XIX veka*. Moscow: Nauka, 1990.
- Anderson, K. M., ed. *Stenogrammy zasedanii politbiuro Tsk RKP (b)—VKP (b) 1923-1938 gg.*, 3 vols. Moscow: Rosspen, 2007.
- Andreev, A. A. *Vospominaniia, pis'ma*. Moscow: Politicheskaiia literatura, 1985.
- Andrew, Christopher M. *Her Majesty's Secret Service: The Making of the British Intelligence Community*. New York: Viking, 1986.
- , and Gordievsky, Oleg. *KGB: The Inside Story of its Foreign Operations from Lenin to Gorbachev*. New York: HarperCollins, 1990.
- , and Mitrokhin, V. M. *The Mitrokhin Archive*. London: Allen Lane, 1999.
- Anfert'ev, I. A., ed. *Smerch*. Moscow: DOSAAF SSSR, 1988.
- Anglo-sovetskie otnosheniia so dnia podpisaniia torgovogo soglasheniia do razryva (1921-1927 gg.): noty i dokumenty*. Moscow: Litizdat narkomindela, 1927.
- Angress, Werner T. *Stillborn Revolution: The Communist Bid for Power in Germany, 1921-1923*.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3.
- Anin, Boris Iu. *Radioelektronnyi shpiornazh*. Moscow: Tsentropollgraf, 2000.
- Anin, David S. "The February Revolution: Was the Collapse Inevitable?" *Soviet Studies*, 18/4 (1967): 435-57.
- Anisimov, Evgeny. *The Reforms of Peter the Great: Progress through Coercion*. Armonk, NY: M. E. Sharpe, 1994.
- Annenkov, Iurii. "Vospominania o Lenine," *Novyi zhurnal*, no. 65, 1961.
- . *Dnevnikh moikh vstrech: tskl tragedii*, 2 vols. New York: Inter-Language Literary Associates, 1966.
- . *Semnadtsat' portretov*, 2 vols. Leningrad: Gosizdat, 1926.
- Anosov, S. D. *Koreity v ussuriiskom krae*. Khabarovsk-Vladivostok: Knizhnoe delo, 1928.
- Anstiferov, Alexis, et al. *Russian Agriculture During the War*.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30.
- Antonov-Ovseenko, Anton. *Stalin bez maski*. Moscow: Vsiia Moskva, 1990.
- . *The Time of Stalin: Portrait of a Tyranny*.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1981.
- . *Stroitel'stvo Krasnoi armii v revoliutsii*. Moscow: Krasnaia nov', 1923.
- Antonov-Ovseenko, Vladimir. *Zapiski o grazhdanskoi voine*, 4 vols. Moscow: Gosizdat/Ordal voennoi literatury, 1924-33.
- Antropov, S. V. "Sviaz' tekstil'nykh rabochikh s zemleiu i iul'skie otpuska," *Izvestiia tekstil'noi promyshlennosti i torgovli*, 1927, no. 23-24.
- Antsiferov, Alexis N., et al. *Russian Agriculture During the War: Rural Economy*.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30.
- Aptekar', Pavel A. "Khimchistka po-Tambovskii," *Rodina*, 1994, no. 5: 56-7.
- . "Krest'ianskaia voina," *Voenno-istoricheskii zhurnal*, 1993, no. 1: 50-55.
- Aralov, Semen I. *Lenin i Krasnaia armia: vospominania*. Moscow: Znaniie, 1958.
- . *Lenin vel nas k pobede: vospominaniia*. Moscow: Gospolitizdat, 1962.
- Arenshtein, A. "Tipografiia Leninskoi 'Iskry' v Baku," *Voprosy istorii*, 1956, no. 11: 105-12.
- Argenbright, Robert. "Bolsheviks, Baggers and Railroaders: Political Power and Social Space, 1917-1921," *Russian Review*, 52/4 (1993): 506-27.
- . "Documents from Trotsky's Train in the Russian State Military Archive: A Comment," *Journal of Trotsky Studies*, 4/1 (1996): 1-12.
- . "Honour among Communists: 'The Glorious Name of Trotsky's Train,'" *Revolutionary Russia*, 11/1 (1998): 45-66.
- . "Marking NEP's Slippery Path: The Krasnoshchekov Show Trial," *Russian Review*, 61/2 (2002): 249-75.
- . "Red Tsaritsyn: Precursor of Stalinist Terror," *Revolutionary Russia*, 4/2 (1991): 157-83.
- Arkomed, S. T. *Rabochee dvizhenie i sotsial-demokratiia na Kavkaze: s 80-kh godov po 1903 g.*, 2nd ed. Moscow-Leningrad: Gosizdat, 1923.
- Armstrong, John. "Mobilized and Proletarian Diasporas,"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70/2 (1976): 393-408.
- Armstrong, John A. "Tsarist and Soviet Elite Administrators," *Slavic Review*, 31 (1972): 1-28.
- . *The Soviet Bureaucratic Elite: A Case Study of the Ukrainian Apparatus*. New York: Praeger, 1959.
- Arnold, Arthur Z. *Banks, Credit and Money in Soviet Russia*.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37.
- Arosev, A. "Instruc' V. I. Lenina," *Proletarskaia revoliutsiia*, 1923, no. 11: 269-74.
- Arsen'ev, E. *Podzhigateli voiny*. Moscow: Moskovskii rabochii, 1931.
- Arsenidze, Razhden. "Iz vospominanii o Staline," *Novyi zhurnal*, no. 72 (1963): 218-36.
- Arshinov, Petr. *Istoriia makhnovskogo dvizheniia, 1918-1921 gg.* Berlin: Izd. Gruppy russkikh anarkhistov v Germanii, 1923.
- Artamonov, Andrei. *Spetsob'ekty Stalina: ekskursiia pod grifom "sekretno."* Moscow: Algoritm, 2013.
- Ascher, Abraham. "Prime Minister P. A. Stolypin and his 'Jewish' Adviser,"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History*, 30/3 (1995): 515-32.
- . "The Coming Storm: The Austro-Hungarian Embassy on Russia's Internal Crisis, 1902-1906," *Survey*, 53 (1964): 148-64.
- . "The Solovki Prisoners, the Mensheviks and the Socialist International," *Slavonic and East European Review*, 47 (1969): 423-35.
- . *P. A. Stolypin: The Search for Stability in Imperial Russia*.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 . *The Revolution of 1905*, 2 vols.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8-1992.
- Askew, William C. "An American View of Bloody Sunday," *Russian Review*, 11/1 (1952): 35-43.
- Asprey, Robert B. *The German High Command at War: Hindenburg and Ludendorff Conduct World War*. New York: W. Morrow, 1991.
- Astaf'ev, I. I. *Russko-germanskie diplomaticheskie otnosheniia, 1905-1911 gg.: ot Portsmutskogo mira do Potsdamskogo soglasheniia*. Moscow: Moskovskii Universitet, 1972.
- Astrov, W., et al., eds. *An Illustrated History of the Russian Revolution*, 2 vols. 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1928.
- Atkin, Muriel. "Russian Expansion in the Caucasus to 1813," *Russian Colonial Expansion to 1917*, edited by Michael Rywkin. London: Mansell, 1988.
- Atkinson, Dorothy. *The End of the Russian Land Commune, 1905-1930*.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3.
- Atlas, Zakharii V. *Ocherki po istorii denezhnogo obrashcheniia v SSSR 1917-1925 gg.* Moscow: Gos. finansovoe izdatel'stvo, 1940.
- Avalov, Z. D. *The Independence of Georgia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1918-1921*. London: Headley Brothers, 1940.

- . *Prisoedinenie Gruzii k Rossii*. St. Petersburg: A. S. Suvorin, 1901.
- . *Nezavisimost' Gruzii v mezhdunarodnoi politike 1918–1921 gg: vospominaniia, ocherki*. Paris: Imprimerie de Navarre, 1924.
- Avdeev, N., et al. *Revolutsiia 1917 goda: khronika sobytii*, 6 vols. Moscow: Gosizdat, 1923–30.
- Avrekh, A. Ia. "Chrezvychainaia sledstvennaia komissiiia Vremennogo pravitel'stva: zamysl' i ispolnenie," *Istoricheskie zapiski*, 118 (1990): 72–101.
- Avrich, Paul. *Anarchist Portraits*.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8.
- . *Kronstadt, 1921*. New York: W. W. Norton, 1974.
- Avtorkhanov, Abdurakhman. *Proiskhozhdenie partokratii*, 2 vols. Frankfurt-am-Main: Posev, 1973.
- . *Stalin and the Communist Party: A Study in the Technology of Power*. New York: Praeger, 1959.
- . *Tekhnologiya vlasti*. Munich: Tsentral'noe ob'edinenie politicheskikh emigrantov iz SSSR, 1959.
- Aydin, Cemil. *The Politics of Anti-Westernism in Asia: Visions of World Order in Pan-Islamic and Pan-Asian Thought*.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7.
- Azhavakov, A. "Gorod Gori," in *Sbornik materialov dlia opisaniia mestnosti i plemen Kavkaza*. Tiflis: Upravlenie Kavkazskogo uchebnogo okruga, 1883.
- Azotsev, N. K. *Grazhdanskaia voina v SSSR*, 2 vols. Moscow: Voenizdat, 1980–5.
- Baabar, C. *Twentieth-Century Mongolia*. Cambridge: White Horse, 1999.
- Babel, I. *1920 Diary*.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5.
- . *Konarmiiia*. Moscow: OGIZ, 1926.
- Babichenko, Leonid G. "Politbiuro TsK RKP (b), Komintern i sobytia v Germanii v 1923 g.: novye arkhivnye materialy," *Novaia i noveishaia istoriia*, 1994, no. 2: 125–57.
- Babkov, Andrew. "National Finances and the Economic Evolution of Russia," *Russian Review*, 1/3 (1912): 170–91.
- Baddley, John F. *The Russian Conquest of the Caucasus*. London: Longmans, Green, 1908.
- Badriashvili, N. I. *Tiflis*. Tiflis: Tifsovet, 1934.
- Baedeker, Karl. *Russia: A Handbook for Travelers*. New York: C. Scribner's Sons, 1914. New York: Arno Press, 1971.
- Bagilev, K. N. *Putevoditel' po Tiflisu*. Tiflis: K. N. Begichev, 1896.
- Baiguzin, R. N. *Gosudarstvennaia bezopasnost' Rossii: istoriia i sovremennost'*. Moscow: Rosspen, 2004.
- Baikaloff, A. *I Knew Stalin*. London: Burns Oates, 1940.
- . "Moi vstrechi s Osipom Dzhughashvili," *Vozrozhdenie*, 1950, no. 3–4.
- Bailes, Kendall E. "The Politics of Technology: Stalin and Technocratic Thinking among Soviet Engineers,"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79/2 (1974): 445–69.
- . *Technology and Society Under Lenin and Stalin: Origins of the Soviet Technical Intelligentsia, 1917–1941*.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8.
- Bailey, F. M. *Mission to Tashkent*. London: J. Cape, 1946.
- Bailey, Sydney D. "The Russian Constituent Assembly of 1918," *Parliamentary Affairs*, VII/3 (1953): 336–44.
- Balabanoff, Angelica. *Impressions of Lenin*.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64.
- . *My Life as a Rebel*. New York: Greenwood Press, 1938.
- Balashov, A. P. and Markhashov, Iu. S., "Staraia ploshchad', 4 (20-e gody)," *Polis*, 1991, no. 1: 180–7, no. 2: 166–74, no. 4: 182–8, no. 5: 189–96, no. 6: 180–7.
- Balashov, A. P. and Nelepin. *VLKSM za 10 let v tizfakh*. Moscow: Molodaia gvardiia, 1928.
- Ballis, William B. "The Political Evolution of a Soviet Satellite: The Mongolian People's Republic," *Western Political Quarterly*, 9/2 (1956): 293–329.
- Barabashev, O. "Isil'kul'skie zheleznodorozhniky o khebe," *Na leninskom puti*, 1928, no. 1 (January 31).
- Baranov, A. V. "Voennaia trevoga' 1927 g. kak faktor politicheskikh nastroyenii v neposvskom obshchestve (po materialu iuga Rossii)," *Rossia i mir glazami druga druga: iz istorii vzaimospriiatiiia*. Moscow: IRI RAN, 2007, 175–93.
- Baranov, Valentin. *Krestianskoe vostanie v Tambovskoi gubernii: 1920–1921 gg.* Tambov: n.p., 1991.
- Barany, Zoltan. "Soviet Takeover: The Role of Advisers in Mongolia and in Eastern Europe after World War II," *East European Quarterly*, 28/4 (1994): 409–33.
- Bark, Sir Peter. "The Last Days of the Russian Monarchy: Nicholas II at Army Headquarters," *Russian Review*, 16/3 (1957): 35–44.
- Barmin, A. G. *Sokoly Trotskogo*. Moscow: Sovremennik, 1997.
- Barmine, Alexandre. *Vingt ans au service de l'U.R.S.S.: souvenirs d'un diplomate sovietique*. Paris: Albin Michel, 1939. Translated as *One Who Survived: The Life Story of a Russian Under the Soviets*. New York: G. P. Putnam's Sons, 1945.
- Baron, Salo W. *The Russian Jew under Tsars and Soviets*. New York: Macmillan, 1964.
- Baron, Samuel H. "Between Marx and Lenin: G. V. Plekhanov," *Soviet Survey*, 32 (1960): 94–101.
- . *Plekhanov: Father of Russian Marxism*.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3.
- Barradough, Geoffrey. *An Introduction to Contemporary History*. New York: Basic Books, 1964.
- Barrett, Thomas M. *At the Edge of Empire: The Terek Cossacks and the North Caucasus Frontier, 1700–1860*. Boulder, CO: Westview, 1999.
- Barsov, A. A. *Balans stoisimostykh obmenov mezhdu gorodom i derevnei*. Moscow: Nauka, 1969.
- Bartashevich, K. M. "Moskva zhdet . . . khleba," *Pogranichnik*, 1967, no. 16: 34–37.
- Batenina, E. S. *Kavkaz*. Moscow: Transpechat' NKPS, 1927.
- Batsell, Walter Russell. *Soviet Rule in Russia*. New York: Macmillan, 1929.
- Batumskaia demonstratsiia 1902 goda*. Moscow: Parizdat, 1937.
- Bauer, Otto. "The Nationalities Question and Social Democracy" [1907], in *The Nationalism Reader*, edited by Omar Dabbour and Micheline R. Ishay. Atlantic Highlands, NJ: Humanities Press, 1995.
- Baumgart, Winfried, ed. *Von Brest-Litovsk zur deutschen Novemberrevolution*. Göttingen: Vandenhoeck & Ruprecht, 1971.
- . *Deutsche Ostpolitik 1918: Von Brest-Litovsk bis zum Ende des Ersten Weltkrieges*. Vienna and Munich: Oldenbourg, 1966.
- . *The Crimean War 1853–1856*.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 Baumont, Maurice. *La faillite de la paix, 1918–1939*, 2 vols. Paris: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1951.
- Bazhanov, Boris. *Avec Staline dans le Kremlin*. Paris: Les Éditions de France, 1930.
- . *Bazhanov and the Damnation of Stalin*, edited by David W. Doyle. Columbus: Ohio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90.
- . *Bajanov révèle Staline: souvenirs d'un ancien secrétaire de Staline*. Paris: Gallimard, 1979.
- . *Stalin: der Rote Diktator*. Berlin: P. Aretz, 1931.
- . *Vospominaniia byvshego sekretaria Stalina*. Paris: Tre'tia vol'na, 1980. 2nd ed. Paris and New York: Tre'tia vol'na, 1983. Moscow: SP Sofinta, 1990.
- Beatty, Bessie. *The Red Heart of Russia*. New York: Century Co., 1918.
- Bechhofer, Carl Eric. *In Denikin's Russia and the Caucasus, 1919–1920*. London: W. Collins Sons, 1921.
- Beck, Hermann. *The Origins of the Authoritarian Welfare State in Prussia:*

- Conservatives, Bureaucracy, and the Social Question, 1815–70*.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95.
- Beck, Josef. *Dernier rapport: Politique polonaise 1926–1939*. Neuchâtel: Editions de la Baconnière, 1951.
- Beckendorff, Paul. *Last Days at Tsarskoe Selo: An Inside Account*. Found at <http://www.alexanderpalace.org/last-days/intro.html>.
- . *Last Days at Tsarskoe Selo*. London: W. Heinemann, 1927.
- Becker, Jean-Jacques. *The Great War and the French People*. Dover, NH: Berg, 1985.
- Becker, Seymour. *Nobility and Privilege in Late Imperial Russia*. Dekalb: Nor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Press, 1985.
- . *Russia's Protectorates in Central Asia: Bukhara and Khiva, 1865–1924*.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8.
- Beer, V. A. *Kommentarii novykh provintsial'nykh uchrezhdenii 12 iulia 1889 goda*. Moscow: Tip. A. I. Mamontova, 1894.
- Beisembaev, S. *Lenin i Kazakhstan*, 2nd ed. Alma-Ata: Kazakhstan, 1987.
- Beletskii, Stepan P. "Grigorii Rasputin: Iz vospominanii." *Byloe*, no. 20 (1922), no. 21, 22 (1923).
- Beletskii, S. P. *Grigorii Rasputin: iz zapisk*. Petrograd: Byloe, 1923.
- Beliaev, N. Z., et al. *Mikhail Kol'tsov, kakim on byl*. Moscow: Sovetskii pisatel', 1989.
- Beliakov, L. P. *Lagernaia sistema i politicheskie represii, 1918–1953*. Moscow-St. Petersburg: VSEGEI, 1999.
- Belov, Evgenii. *Baron Ungern fon Shternberg: biografiia, ideologiia, voennye pokhody, 1920–1921 gg.* Moscow: Agraf IV RAN, 2003.
- Belov, G. A., ed. *Iz istorii Vserossiiskoi Chrezvychainoi komissii, 1917–1922 gg.: sbornik dokumentov*. Moscow: Politicheskaiia literatura, 1958.
- Bender, Sara. *The Jews of Bialystok during World War II and the Holocaust*. Hanover, MA: University Press of New England, 2008.
- Bennigsen, Alexandre S., and Wimbush, S. Enders. *Muslim National Communism in the Soviet Union: A Revolutionary Strategy for the Colonial World*.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9.
- Benvenuti, Francesco. *The Bolsheviks and the Red Army, 1918–1922*.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8.
- Berberova, Nina. *Zheleznaia zhenshchina*. Moscow: Knizhnaia palata, 1991.
- Berdiaev, Nikolai. *Samopoznanie*. Moscow: Mysl', 1991.
- Berdzenishvili, V. "Iz vospominanii." *Zaria vostoka*, February 28, 1938.
- Berelowich, A., and Danilov, V. P., eds. *Sovetskaiia derevnia glazami* VChK-OGPU-NKVD: dokumenty i materialy, 1918–1939, 4 vols. Moscow: Rosspen, 1998.
- Berezin, Mabel. *Making the Fascist Self: The Political Culture of Interwar Italy*.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7.
- Berezov, Pavel I. *Valerian Vladimirovich Kuibyshev, 1888–1935*. Moscow: Molodaia gvardiia, 1958.
- Berghahn, Volker R. *Germany and the Approach of War in 1914*, 2nd ed.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93.
- . *Imperial Germany, 1871–1914: Economy, Society, Culture, and Politics*. Providence, RI: Berghahn Books, 2005.
- Beria, Sergy. *Beria My Father: Inside Stalin's Kremlin*. London: Duckworth, 2001.
- Beriia, L. P., and Broido, G., eds. *Lado Ketskhoeli: sbornik*. Moscow: Partizdat, 1938.
- Berk, Stephen M. "The Coup d'État of Admiral Kolchak: The Counter-Revolution in Siberia and Eastern Russia, 1917–1918." Phd diss., Columbia University, 1971.
- Berkhin, I. B. *Voennaia reforma v SSSR 1924–1925*. Moscow: Voenizdat, 1958.
- Berkman, Alexander. *Kronstadt*. Berlin: Der Syndikalist, 1922.
- . *The Bolshevik Myth: Diary 1920–1922*. London: Hutchinson, 1925, 1925.
- Berlin, Isaiah, and Jahanbegloo, Ramin. *Conversations with Isaiah Berlin*. New York: Scribner's, 1991.
- Berman, Harold J. *Soviet Criminal Law and Procedure: The RSFSR Codes*, rev. ed.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2.
- Bernstein, Herman. *The Willy-Nicky Correspondence*. New York: Knopf, 1918.
- . *Na putiakh k terimodoru*. Paris: Mishen, 1931.
- Besedovskii, Grigorii. *Revelations of a Soviet Diplomat*. London: Williams and Norgate, 1931.
- Bessonova, A. M., et al. *Biblioteka V. I. Lenina v Kremle*. Moscow: Vsesoiuznaia knizhnaia palata, 1961.
- Best, Geoffrey. "The Militarization of European Society, 1870–1914," in *The Militarization of the Western World*, edited by John Gillis. New Brunswick, NJ: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1989.
- Bestuzhev, I. V. *Bor'ba v Rossii po voprosam vneshnei politiki 1906–1910*. Moscow: Akademiia nauk SSSR, 1961.
- Bezobrazov, Vladimir Mikhailovich. *Diary of the Commander of the Russian Imperial Guard, 1914–1917*. Edited by Marvin Lyons. Boynton Beach, FL: Dramco, 1994.
- Bezrukov, Grigorii N. "Za chem Stalin priezhal na Altai?" *Altaiiskaia pravda*, December 8, 1988.
- . *Priезд I. V. Stalina na Altai: lanvar' 1928 g.: materialy k seminariskim zaniatiiam po politistorii dlia studentov*. Barnaul: BGPU, 1997.
- Bialika, B. A., et al., eds. *V. I. Lenin i A. M. Gorkii: pis'ma vospominanii, dokumenty*, 2nd ed. Moscow: Akademiia Nauk, 1961.
- Bibineishvili, B. *Kamo*. Moscow: Staryi bol'shevik, 1934.
- Biggart, John. "Kirov before the Revolution," *Soviet Studies*, 23/3 (1972): 345–72.
- Black, Clayton. "Zinoviev Re-Examined: Comments on Lars Lih's 'Populist Leninist,'" in *The NEP Era: Soviet Russia, 1921–1928*, 2 (2007): 25–38.
- Blackstock, Paul W. *The Secret Road to World War Two: Soviet Versus Western Intelligence, 1921–1939*. Chicago: Quadrangle Books, 1969.
- Blainey, Geoffrey. *The Causes of War*. New York: Free Press, 1973.
- Blank, Stephen. "Soviet Nationality Policy and Soviet Foreign Policy: the Polish Case, 1917–1921," *International History Review*, 7/1 (1985): 103–28.
- . "Soviet Politics and the Iranian Revolution 1919–1921," *Cahiers du monde russe et soviétique*, 21/2 (1980): 173–94.
- . "The Contested Terrain: Muslim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in Soviet Turkestan, 1917–19," *Central Asian Survey*, 6/4 (1987): 47–73.
- . "The Struggle for Soviet Bashkiria, 1917–1923," *Nationalities Papers*, 11/1 (1983): 1–26.
- . *The Sorcerer as Apprentice: Stalin as Commissar of Nationalities, 1917–1924*. Westport, CT: Greenwood, 1994.
- Blum, Arlen V. *Za kulisami "ministerstva pravdy": tainaia istoriia sovetsskoi tsenzury 1917–1929*. St. Petersburg: Akademicheskii proekt, 1994.
- Blobaum, Robert E. "To Market! To Market! The Polish Peasantry in the Era of the Stolypin Reforms," *Slavic Review*, 59/2 (2000): 406–26.
- . *Feliks Dzierżyński and the SDK-PiL: A Study of the Origins of Polish Communism*. Boulder, CO: East European Monographs, 1984.
- Blum, Jerome. *Lord and Peasant in Russia from the Ninth to the Nineteenth Centur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1.
- Boersner, Demetrio. *The Bolsheviks and the National and Colonial Question 1917–1928*. Genève: Librairie E. Droz, 1957.
- Boffa, Giuseppe. *The Stalin Phenomenon*.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2.
- Bogdanovich, A. V. *Tri poslednikh samoderzhavitsa: dnevniki*. Moscow and Leningrad, L. D. Frenkel', 1924, No-

- vosti, 1990.
- Bogushhevskii, V. "Kanun piatiletki," in *God vosemnadtsyati: al'manakh voimoi*, edited by M. Gor'kii. Moscow: Khudozhestvennaia literatura, 1935.
- Bohn, T. M. "'Dummheit oder Verrat' — Gab Miljukov am 1. November 1916 das 'Sturmsignal' zur Februarrevolution?" *Jahrbucher fur Geschichte Osteuropas*, 41/3 (1993): 361–93.
- Bohon, J. W. "Reactionary Politics in Russia: 1905–1909." Phd diss.,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at Chapel Hill, 1967.
- Bolezni, smert' i pogrebenie general-leitnantsa barona Petra Nikolaevicha Vrangelia*. Brussels: Soiuz gallipoliitsev v Belgii, 1928.
- Bolsheviks and the October Revolution: Central Committee Minutes of the Russian Social-Democratic Labour Party (bolsheviks), August 1917–February 1918*. London: Pluto, 1974.
- Bolshevik Propaganda: Hearings before a Subcommittee on the Judiciary, United States Senate, Sixty-fifth Congress, third session and thereafter, pursuant to S. Res. 439 and 469: February 11, 1919, to March 10, 1919*. Washington, D.C.: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19.
- Boltinov, S. "Iz zapisnoi knizhki arkhivista: novye dannye ob ubiistve Lado Ketskhoveri." *Krasnyi arkhiv*, 91 (1938): 271–75.
- Bompard, M. "Le traite de Bjoerkoe," *Revue de Paris*, 25 (1918): 423–48.
- Bonch-Bruевич, Mikhail D. *Vsia vlast' sovetam: vospominaniia*. Moscow: Voenizdat, 1957, 1958, 1964.
- Bonch-Bruевич, Vladimir D. "Smert' i pokhorony Vladimira Il'icha (po lichnym vospominaniiam)," *Krasnaia nov'*, 1925, no. 1: 186–91.
- . *Izbrannye sochinenii*, 3 vols. Moscow: Akademiia nauk SSSR, 1959–63.
- . *Na boevykh postakh fevral'skoi i oktiabrskoi revoliutsii*, 2nd ed. Moscow: Federatsiia, 1931.
- . *Perezhd Sovetskogo pravitel'stva iz Petrograda v Moskvu (po lichnym vospominaniiam)*. Moscow: Zhizn' i znanie, 1926.
- . *Pokushenie na Lenina 30 Avgusta 1918 g.: po lichnym vospominaniiam*. Moscow: Zhizn' i znanie, 1924.
- . *Tri pokusheniia na V. I. Lenina*. Moscow: Federatsiia, 1930.
- . *Ubiistvo germanskogo posla Mirbakha i vossitanie levyykh eserov (po lichnym vopsominaniiam)*. Moscow: Gudok, 1927.
- . *Vospominaniia o Lenine*. Moscow: Akademiia nauk, 1963. Nauka, 1965. Nauka, 1969.
- Bond, Brian. *War and Society in Europe, 1870–1970*.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84.
- Bordiugov, G. A., ed. *Neizvestnyi Bogdanov*, 3 vols. Moscow: Airo-XX, 1995.
- Bordiugov, G. A., and Kozlov, V. A. "The Turning Point of 1929 and the Bukharin Alternative," *Soviet Studies in History*, 28 (1990): 8–39.
- Borges, E. "The New Czar and What We May Expect from Him," *Harper's*, June, 1895: 129–38.
- Borodin, A. P. "P. N. Durnovó: Portret tsarskogo sanovnika," *Otechestvennaia istoria*, 2000, no. 3: 48–69.
- . *Gosudarstvennyi sovet Rossii, 1906–1917*. Kirov: Viatka, 1999.
- Borrero, Mauricio. *Hungry Moscow: Scarcity and Urban Society in the Russian Civil War, 1917–1921*. New York and Oxford: Peter Lang, 2003.
- Bortnevskii, V. G. "White Administration and White Terror: the Denikin Period," *Russian Review*, 52/3 (1993): 354–66.
- . "Oprichnina: nevozvrashchenets Grigorii Agabekov i sekretnaia sluzhba Stalina," *Sobesednik*, 1989, no. 34 (August): 12–3.
- . "White Intelligence and Counter-Intelligence During the Russian Civil War," *Carl Beck Papers*, no. 1108, 1995.
- , and Varustina, E. L., eds. "A. A. Borman: Moskva 1918 (iz zapisok sekretnogo agenta v Kremle)," in *Russkoe proshloe*. Leningrad: Svelen, 1991.
- Borys, Jurij. *The Sovietization of the Ukraine, 1917–1923: The Communist Doctrine and Practice of National Self-Determination*. Edmonton: Canadian Institute of Ukrainian Studies, 1960, 1980.
- Borzecki, Jerzy. *The Soviet-Polish Treaty of 1921 and the Creation of Interwar Europe*.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8.
- Borzunov, V. F. "Istoriia sozdaniia transsibirskoi zhelezno-dorozhnoi magistrali — nachala XX. vv.," 3 vols, Phd diss., Tomsk, 1972.
- Bosworth, R. J. B. *Mussolini's Italy: Life under the Fascist Dictatorship, 1915–1945*. New York: Penguin, 2006.
- Bourne, Kenneth, and Watt, D. Cameron, eds. *British Documents on Foreign Affairs: Reports and Papers from the Foreign Office Confidential Print, Part II, From the First to the Second World War. Series A, the Soviet Union, 1917–1939*, 17 vols. Bethesda, MD: University Publications of America, 1984–92.
- Boyd, John. "The Origins of Order Number 1," *Soviet Studies*, 19/3 (1967): 359–72.
- Brackman, Roman B. *The Secret File of Joseph Stalin: A Hidden Life*. London and Portland, OR: Frank Cass, 2001.
- Bradley, James F. N. *Allied Intervention in Russia*. New York: Basic, 1968.
- Bradley, Joseph. *Voluntary Associations in Tsarist Russia: Science, Patriotism, and Civil Society*.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 Brandt, Conrad. *Stalin's Failure in China, 1924–1927*.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8.
- Brewer, John. *Sineus of Power: War, Money, and the English State, 1688–1783*.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 Breyfogle, Nicholas. *Heretics and Colonizers: Forging Russia's Empire in the South Caucasus*.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9.
- Brianskii, A. M., et al. *Vsesoiuznaia perepis' naseleniia 1926 goda*. Moscow: TsSU SSSR, 1928.
- Bridge, F. R. *Great Britain and Austria-Hungary 1906–1914: A Diplomatic History*. London: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Political Science; Weidenfeld and Nicolson, 1972.
- Brike, S. "Ekonomicheskie protsessy v sibirskoi derevne," *Zhizn' sibir*, 1927, no. 1.
- Brinkley, George A. *The Volunteer Army and the Allied Intervention in South Russia, 1917–1921*. South Bend, IN: 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Press, 1966.
- Brinton, Crane. *Anatomy of Revolution*. New York: W. W. Norton, 1938.
- Broadberry, Stephen, and Harrison, Mark, eds. *The Economics of World War*.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
- Brock, J.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the Union of the Russian People, 1905–1907." Phd diss., University of Michigan, 1972.
- Broido, Vera. *Lenin and the Mensheviks: The Persecution of Socialists under Bolshevism*. Aldershot, England: Gower/M. Temple Smith, 1987.
- Brook-Shepherd, Gordon. *Storm Petrels: The First Soviet Defectors, 1928–1938*. London: Collins, 1977.
- Broue, Pierre. *The German Revolution, 1917–1923*. Leiden, Netherlands: Brill, 2005.
- Brovkin, Vladimir N. *The Mensheviks After October: Socialist Oppression and the Rise of the Bolshevik Dictatorship*.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7.
- . "Workers' Unrest and the Bolsheviks' Response in 1919," *Slavic Review* 49/3 (1990): 350–73.
- . *Behind the Front Lines of the Civil War: Political Parties and Social Movements in Russia, 1918–1922*.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4.
- , ed. *Dear Comrades: Menshevik Reports on the Bolshevik Revolution and the Civil War*. Stanford, CA: Hoover Institution Press, 1991.
- . *Russia after Lenin: Politics, Cul-*

- ture, and Society, 1921–1929.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8.
- Browder, Robert Paul, and Kerensky, Alexander F., eds. *The Russian Provisional Government: Documents*, 3 vols. Stanford, CA: Hoover Institution Press, 1961.
- Brower, Daniel R. "The Smolensk Scandal and the End of NEP," *Slavic Review*, 45/4 (1986): 689–706.
- Brown, Stephen. "Lenin, Stalin and the Failure of the Red Army in the Soviet-Polish War of 1920," *War and Society*, 14/2 (1996): 35–47.
- Brunck, Helma. *Bismarck und das preussische Staatsministerium, 1862–89*. Berlin: Duncker and Humboldt, 2004.
- Brunn, Geoffrey, and Mamatey, Victor S. *The World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4th ed. Boston: Heath, 1962.
- Brusilov, A. A. *A Soldier's Note-book, 1914–1918*. London: Macmillan, 1930.
- . *Moi vospominaniia*. Moscow: Voenizdat, 1963.
- Brutzkus, B. D. "Die russische Agrarrevolution," *Zeitschrift für die gesammte Staatswissenschaft*, 78 (1924): 301–45.
- Buber-Neumann, Margarete. *Von Potsdam nach Moskau: Stationen eines Irrweges*. Stuttgart: Deutsche Verlags-Anstalt, 1957.
- Bublikov, A. A. *Ruskaia revoliutsiia*. New York: [s.n.], 1918.
- Bubnov, Andrei, et al., eds. *Grazhdanskaia voina 1918–21*, 3 vols. Moscow: Voennyi vestnik, 1928–30.
- Buchan, John. *A History of the Great War*, 4 vols.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1922.
- Buchanan, Sir George. *My Mission to Russia and Other Diplomatic Memories*, 2 vols. Boston: Little, Brown, 1923.
- Buchanan, Meriel. *Petrograd: The City of Trouble, 1914–1918*. London: Collins, 1918.
- Budberg, Aleksei. "Dnevnik," in *Arkhiv russkoi revoliutsii*, ed. Gessen. XV (1924): 254–345.
- Budennyi, S. M. *Proidennyi put'*, 3 vols. Moscow: Voenizdat, 1958–1973.
- Budnikov, V. P. *Bol'shevistskaia partiinaia pečat' v 1917 g.* Kharkov: Kharkovskii universitet, 1959.
- Budnitskii, O. V. *Rossiiskie evrei mezhdu krasnymi i belymi (1917–1920)*. Moscow: Rosspen, 2006.
- Budnitskii, Oleg, ed. *Sovershenno lichno i doveritel'no! B. A. Bakhmetev–V. A. Maklakov: perepiska 1919–1951*, 3 vols. Moscow and Stanford: Rosspen and the Hoover Institution Press, 2001–2.
- . "Boris Bakhmetev's Intellectual Legacy in American and Russian Collections," *Slavic and East European Information Resources*, 4/4 (2003): 5–12.
- . *Den'gi russkoi emigratsii: kolchakovskoe zoloto 1918–1957*. Moscow: Novoe literaturnoe obozrenie, 2008.
- Bukharin, N. K. "O novoi ekonomicheskoi politiki i nashikh zadachakh," *Bol'shevik*, 1925, no. 9–10 (June 1): 3–15.
- . *Izbrannye proizvedeniia*. Moscow: Politicheskaiia literatura, 1988.
- . *Problemy teorii i praktiki sotsializma*. Moscow: Politizdat, 1989.
- . *Put' k sotsializmu v Rossii: izbrannye proizvedeniia*. Novosibirsk: Nauka, Sibirskoe otdelenie, 1990.
- . *Tsezarizm pod maskoi revoliutsii: po povodu knigi prof. N. Ustrialova Pod znakom revoliutsii*. Moscow: Pravda, 1925.
- Bukhnikashvili, G. *Gori: Istoricheskii ocherk*. Tblisi: Zaria vostoka, 1947.
- Bukov, K. I., et al., eds. *Nedorisovannyi portret, 1920: 50-letie V. I. Lenina v rechakh stat'iakh, privetstviakh*. Moscow: Moskovskii rabochii, 1990.
- Buldakov, V. P., et al. *Bor'ba za massy v trekh revoliutsiakh v Rossii: proletariat i srednie gorodskie sloi*. Moscow: Mysl', 1981.
- Bullock, David. *The Russian Civil War, 1918–1921*. Oxford: Osprey, 2008.
- Bulygin, Paul. *The Murder of the Romanovs*. London: Hutchinson, 1935.
- Bunin, Ivan. *Cursed Days: A Diary of Revolution*. Chicago, Ivan R. Dee, 1998.
- Bunyan, James. *Intervention, Civil War, and Communism in Russia, April–December 1918: Documents and Materials*.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1936.
- , and Fisher, Harold H., eds. *The Bolshevik Revolution, 1917–1918: Documents and Materials*.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34.
- Burbank, Jane. *Intelligentsia and Revolution: Russian Views of Bolshevism, 1917–1922*.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6.
- Burdzhalov, E. N. "Revolution in Moscow," *Soviet Studies in History*, 26/1 (1987–8): 10–100.
- . *Vtoraiia ruskaia revoliutsiia: vostanie v Petrograde*. Moscow: Nauka, 1967. Translated as *Russia's Second Revolution: The February 1917 Uprising in Petrograd*.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87.
- Burgess, William Francis. "The Istpart Commission: The Historical Department of the Russian Communist Party Central Committee, 1920–1928." Phd diss., Yale University, 1981.
- Burgina, Anna. *Sotsial-demokraticheskaia menshevistskaia literatura*. Stanford, CA: Hoover Institution Press, 1967.
- Bushkovitch, Paul. "Princes Cherkasskii or Circassian Murzas: The Kabardinians in the Russian Boyar Elite, 1560–1700," *Cahiers du monde russe*, 45/1–2 (2004): 9–30.
- . *Peter the Great: The Struggle for Power, 1671–1725*.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
- Bushnell, John. "The Tsarist Officer Corps 1881–1914: Customs, Duties, Inefficiencies,"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86/4 (1981): 753–80.
- . *Mutiny amid Repression: Russian Soldiers in the Revolution of 1905–1906*.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85.
- Buzurbaev, G. U. *Kuibyshev v Sibiri*. Novosibirsk: Novosibirskoe obl. gosizdat, 1939.
- Bykov, P. M. *Poslednie dni Romanovykh*. Sverdlovsk: Ural-kniga, 1926.
- Cameron, G. Poulet. *Personal Adventures and Excursions in Georgia, Circassia, and Russia*, 2 vols. London: Henry Colburn, 1845.
- Cameron, Rondo, and Boykin, V. I., eds. *International Banking, 1870–1914*.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 Campbell, T. D. *Russia: Market or Mercantile*. London: Longman, 1932.
- Canali, M. *Il delitto Matteotti: affarismo e politica nel primo governo Mussolini*. Bologna: Il Mulino, 1997.
- Carley, Michael Jabara. "Episodes from the Early Cold War: Franco-Soviet Relations 1917–1927," *Europe-Asia Studies*, 52/7 (2000): 1275–1305.
- . "The Politics of Anti-Bolshevism: The French Government and the Russo-Polish War, December 1919 to May 1920," *Historical Journal*, 19/1 (1976): 163–89.
- . *Silent Conflict: A Hidden History of Early Soviet-Western Relations*. Lanham, Md.: Rowman & Littlefield, 2014.
- Carr, Edward Hallett. "Revolution from Above: Some Notes on the Decision to Collectivize Soviet Agriculture," in *The Critical Spirit: Essays in Honor of Herbert Marcuse*, edited by K. H. Wolff and Barrington Moore, Jr. Boston: Beacon (1967): 313–27.
- . "The Origins and Status of the Cheka," *Soviet Studies*, 10/1 (1958): 1–11.
- . *Socialism in One Country 1924–1926*, 3 vols. New York: Macmillan, 1958.
- . *The Bolshevik Revolution, 1917–1923*, 3 vols. New York: Macmillan, 1953.
- . *The Interregnum, 1923–1924*. New York: Macmillan, 1954.
- . *The Russian Revolution from Lenin to Stalin, 1917–1929*. New York: Macmillan, 1979.
- , and Davies, R. W. *Foundations of a Planned Economy, 1926–1929*, 3 vols. London and Basingstroke: Macmillan, 1969–1978.
- Carsten, Frederick L. *Revolution in Central Europe, 1918–1919*.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2.
- Chaikan, Vadim A. *K istorii Rossiiskoi*

- revoliutsii, vyp. 1. Moscow: Grzhebin, 1922.
- Chakhvashvili, I. A. *Rabochee dvizhenie Gruzii, 1870–1904*. Tbilisi: Sabchota Sakartvelo, 1958.
- Chamberlain, Lesley. *Lenin's Private War: The Voyage of the Philosophy Steamer and the Exile of the Intelligentsia*.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2006.
- Chamberlin, William Henry. *The Russian Revolution*, 2 vols. New York: Macmillan, 1935.
- Channon, John. "The Bolsheviks and the Peasantry: The Land Question during the First Eight Months of Soviet Rule," *Slavonic and East European Review*, 66/4 (1988): 593–624.
- . "Tsarist Landowners After the Revolution: Former Pomeschchiki in Rural Russia during the NEP," *Soviet Studies*, 34/4 (1987): 575–98.
- Chaquëri, Cosroe. *The Soviet Socialist Republic of Iran, 1920–1921: Birth of the Trauma*. Pittsburgh: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Press, 1995.
- Chase, William J. *Workers, Society, and the Soviet State: Labor and Life in Moscow, 1918–1929*.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87.
- . "Workers' Control and Socialist Democracy," *Science and Society*, 50/2 (1986): 226–38.
- Chaudhry, Kiren Aziz. "The Myths of the Market and the Common History of Late Developers," *Politics and Society*, 21 (1993): 245–74.
- Chavchavadze, David. *The Grand Dukes*. New York: Atlantic International Publications, 1990.
- Chavichvili, Khariton A. *Patrie, prisons, exil—Stalin et nous*. Paris: Defense de la France, 1946.
- . *Revolutionnaires russes à Geneve en 1908*. Geneva: Poesie vivante, 1974.
- Chelidze, Karlo S. *Iz revoliutsionnogo proshlogo Tbilisskoi dukhovnoi seminarii*. Tbilisi: Tbilisskoi universitet, 1988.
- Chermenskii, E. D. "Nachalo vtoroi rossiiskoi revoliutsii," *Istoriia SSSR*, 1987, no. 1.
- . *IV Gosudarstvennaia Duma i sverzhenie tsarizma v Rossii*. Moscow: Mysl', 1976.
- Cherniavskii, Georgii. "Samoovod: kak Stalin sam sebja s genseka snimal," *Rodina*, 1994, no. 1: 67–69.
- Cherniavsky, Michael, ed. *Prologue to Revolution: Notes of A. N. Iakhontov on the Secret Meetings of the Council of Ministers, 1915*.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Hall, 1967.
- . *Tsar and People: Studies in Russian Myths*.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9.
- Chernina, Eugenia, Dower, Paul Casteñeda, and Markevich, Andrei. "Property Rights, Land Liquidity, and Internal Migration," working paper.
- Chernomortsev A. "Krasnyi Tsaritsyn," *Donskaia volna (ezhedel'nik istorii, literatura i satiri)*, February 3, 1919: 6–10.
- Chernov, Victor M. "Lenin: A Contemporary Portrait," *Foreign Affairs* (March 1924): 366–372.
- . *The Great Russian Revolution*.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36.
- Chernov, V. M. *Rozhdenie revoliutsionnoi Rossii (fevral'skaia revoliutsiia)*. Paris, Prague, New York: Iubeleyni komitet po izdaniiu trudov V. M. Chernova, 1934.
- Chernykh, Alla I. *Stanovlenie Rossii sovetskoi: 20-e gody v zerkale sotsiologii*. Moscow: Pamiatniki istoricheskoi mysli, 1998.
- Chertok, Semen. *Stop-Kadr*. London: OPI, 1988.
- Chervinskaia, N. S. *Lenin, u rulia strany Sovetov: po vospominaniam sovremennikov i dokumentam, 1920–1924*, 2 vols. Moscow: Politicheskaiia literatura, 1980.
- Chevychelov, Viacheslav Ia. *Amaiak Nazaretian*. Tbilisi: Sabchota Sakartvelo, 1979.
- Chicherin, G. *Two Years of Soviet Foreign Policy: The Relations of the Russian Socialist Federal Soviet Republic with Foreign Nations, from November 7, 1917, to November 7, 1919*. New York: The Russian Soviet Government Bureau, 1920.
- Chicherin, G. V. *Vneshniaia politika Sovetskoi Rossii za dva goda: ocherk, sostavlennyi k dukhlesnei godovshchine raboche-krestianskoi revoliutsii*. Moscow: Gosizdat, 1920.
- Chickering, Roger. "Sore Loser: Ludendorff's Total War," in *The Shadows of Total War: Europe, East Asia, and the United States, 1919–1939*, edited by Roger Chickering and Stig Forster.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 Chigir, Olesia Ia. "Grigorii Iakovlevich Sokol'nikov: lichnost' i deiatel'nost'." Phd diss., Ryazan, 2009.
- Chistiakov, K. *Ubit' za Rossiiu! Iz istorii Russkogo emigrantskogo "aktivizma," 1918–1939 gg.* Moscow: Ippolitov, 2000.
- Chistiakov, O. I. "Formirovanie RSFSR kak federativnoe gosudarstvo," *Vo-prosy istorii*, 1968, no. 8: 3–17.
- . "Obrazovanie Rossiiskoi Federatsii, 1917–1920 gg.," *Sovetskoe gosudarstvo i pravo*, 1957, no. 10: 3–12.
- Chkhetia, Shalva K. *Tbilisi v XIX stoletii (1865–1869)*. Tbilisi, 1942.
- Chmielski, E. "Stolypin's Last Crisis," *California Slavonic Papers*, 3 (1964): 95–126.
- Chokaiev, Mustapha. "Turkestan and the Soviet Regime," *Journal of the Royal Central Asian Society*, 18 (1931): 403–20.
- Christensen, Thomas J., and Snyder, Jack. "Chain Gangs and Passed Bucks. Predicting Alliance Patterns in Multipolarity,"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44/2 (1990): 137–68.
- Chudaev, D. A. "Bor'ba Komunisticheskoi partii za uprochnenie Sovetskoi vlasti: razgrom levykh eserov," *Uchenye zapiski Moskomkogo oblastnogo pedagogicheskogo instituta*, XX-VII/ii (Moscow, 1953), 177–226.
- Chuev, Feliks. *Kaganovich, Shepilov*. Moscow: Olma, 2001.
- . *Molotov: poludnerzhavnyi vlastelin*. Moscow: Olma, 1999.
- . *Molotov Remembers: Inside Kremlin Politics*. Chicago: I. R. Dee, 1993.
- . *Sto sorok besed s Molotovym*. Moscow: Terra, 1991.
- . *Tak govoril Kaganovich: isповед' stalinskogo apostola*. Moscow: Otechestvo, 1992.
- Chugaev, D. A. *Revolutsionnoe dvizhenie v Rossii v avguste 19–17 g.: razgrom kornilovskogo miatzezha*. Moscow: Akademiia nauk SSSR, 1959.
- , et al., eds. *Petrogradskii voenno-revolutsionnyi komitet: dokumenty i materialy*, 3 vols. Moscow: Nauka, 1966–67.
- Chulok, I. S. *Ocherki istorii batumskoi kommunisticheskoi organizatsii 1890–1921 gody*. Batum: Sabtsota Adzara, 1970.
- Churchill, Rogers Platt. *The Anglo-Russian Convention of 1907*. Cedar Rapids, IA: The Torch, 1939.
- Churchill, Winston. *The World Crisis: The Aftermath*. London: T. Butterworth, 1929.
- Clark, Christopher. *Kaiser Wilhelm II*. Harlow: Longman, 2000.
- . *The Sleepwalkers: How Europe Went to War in 1914*. New York: Penguin, 2012.
- Claudin, Fernando. *The Communist Movement: from Comintern to Cominform*.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75.
- Cleinow, Georg. *Neue Sibirien (Sib-krai): eine Studie zum Aufmarsch der Sowjetmacht in Asien*. Berlin: R. Hobbing, 1928.
- Codrescu, Andrei. *The Posthuman Dada Guide: Teara and Lenin Play Chess*.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9.
- Cohen, Jon S. "The 1927 Reevaluation of the Lira: A Study in Political Economy,"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25/4 (1972): 642–54.
- Cohn, Norman. *Warrant for Genocide: The Myth of the Jewish World-Conspiracy and the Protocols of the Elders of Zion*. London: Eyre & Spottiswoode, 1967.
- Colton, Timothy J. "Military Councils and Military Politics in the Russian Civil War," *Canadian Slavonic Papers*, 18/1 (1976): 36–57.
- . *Moscow: Governing the Socialist*



- Metropolis. Cambridge, MA: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1995.
- Conant, Charles A. *Wall Street and the Country: A Study of Recent Financial Tendencies*. New York and London: G. P. Putnam's Sons, 1904.
- Conquest, Robert. *Stalin: Breaker of Nations*. New York: Viking, 1991.
- . *The Great Terror: A Reassessment*.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1990.
- Conrad, Sebastian. *Globalisation and Nation in Imperial Germany*.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
- Conte, Francis. *Christian Rakovski, 1873–1941: A Political Biography*. Boulder, CO: East European Monographs, 1989.
- Cook, Andrew. *To Kill Rasputin: The Life and Death of Gregori Rasputin*. London: Tempus, 2006.
- Coox, Alvin D. *Nomonhan, Japan against Russia, 1939*.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5, 1990.
- Cotton, Sir Henry. *New India, or India in Transition*. London: Kegan Paul, Trench, Trübner, 1907.
- Courtois, Stéphane, et al. *The Black Book of Communism*.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 Crampton, R. J. "The Balkans, 1914–1918," in *The Oxford Illustrated History of the First World War*, edited by Hew Stracha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 Crawford, Rosemary A., and Crawford, Donald. *Michael and Natasha: The Life and Love of Michael II, the Last of the Romanov Tsars*. London: Weidenfeld & Nicolson, 1997.
- Crisp, Olga. "The State Peasants under Nicholas I," *Slavonic and East European Review*, 37, no. 89 (1959): 387–412.
- . *Studies in the Russian Economy Before 1914*. New York: Barnes and Noble, 1976.
- D'Abernon, Edgar V. *The Eighteenth Decisive Battle of the World: Warsaw 1920*. London: Hodder & Stoughton, 1931.
- Dakhshleiger, G. F. V. I. *Lenin i problem kazakhstanskoi istoriografii*. Alam-Ata: Nauka KSSR, 1973.
- Dallin, David J. *Soviet Espionage*.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55.
- Daly, Jonathan W. *Autocracy Under Siege: Security Police and Opposition in Russia, 1866–1905*. DeKalb: Nor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Press, 1998.
- . *The Watchful State: Security Police and Opposition in Russia, 1906–1917*. DeKalb: Nor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Press, 2004.
- Dan, Lidija. "Bukharin o Staline," *Novyi zhurnal*, 1964, no. 75: 181–2.
- Dan, Theodore. *The Origins of Bolshevism*.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1964.
- Daniels, Gordon, et al. "Studies in the Anglo-Japanese Alliance (1902–1923),"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Suntory and Toyota International Centres for Economics and Related Disciplines, Paper No. IS/2003/443, January 1903. Found at <http://sticerd.lse.ac.uk/dps/is/is443.pdf>.
- Daniels, Robert V. "Stalin's Rise to Dictatorship," in *Politics in the Soviet Union*, edited by Alexander Dallin and Alan F. Westin.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and World, 1966.
- . "The Bolshevik Gamble," *Russian Review*, 26/4 (1967): 331–40.
- . "The Left Opposition as an Alternative to Stalinism," *Slavic Review*, 50/2 (1991): 277–85.
- . "The Secretariat and Local Organizations in the Russian Communist Party, 1921–1923," *American Slavic and East European Review*, 16/1 (1957): 32–49.
- . *Conscience of the Revolution: Communist Opposition in Soviet Russia*.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0.
- . *Red October: The Bolshevik Revolution of 1917*. New York: Scribner's, 1967.
- . *The Nature of Communism*.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62.
- , ed. *The Russian Revolution*.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 Hall, 1972.
- , ed., *A Documentary History of Communism*, 2 vols.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60. rev. ed., 2 vols. Hanover, NH: University Press of New England for University of Vermont, 1984, 3rd ed. Hanover, NH: University Press of New England for University of Vermont, 1993.
- Danilevskii, A. F. V. I. *Lenin i voprosy voennogo stroitel'stva na VIII s'ezde RKP (b)*. Moscow: Voenizdat, 1964.
- Danilov, G. "How the Tsar Abdicated," *Living Age*, no. 336 (April 1929): 99–104.
- Danilov, Iu. N. *Rossia v mirovoi voine, 1914–1915 gg.* Berlin: Slovo, 1924.
- . "Moi vospominania ob imperatore Nikolae II-om i vel. kniaze Mikhaile Aleksandroviche," in *Arkhiv russkoi revoliutsii*, edited by Gessen. XIX, 1928.
- Danilov, V. P. "We Are Starting to Learn about Trotsky," *History Workshop*, 29 (1990): 136–46.
- . "Pereraspredelenie zemel'nogo fonda Rossii v rezul'tate Velikoi Oktiabr'skoi revoliutsii," in I. I. Mints, ed., *Leninskii dekret 'o zemle' v deistvii; sbornik statei*. Moscow: Nauka, 1979, 261–310.
- . *Rural Russia under the New Regime*.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88.
- , and Khlevniuk, Oleg, eds. *Kak lomali NEP: stenogrammy plenumov TsK VKP(b) 1928–1929 gg.*, 5 vols. Moscow: Demokratiia, 2000.
- , ed. *Nestor Makhno, krest'ianskoe dvizhenie na Ukraine, 1918–1921: dokumenty i materialy*. Moscow: Rosspen, 2006.
- , et al., eds. *Krest'ianskoe vstanie v Tambovskoi gubernii v 1919–1921 gg., "Antonovshchina": dokumenty i materialy*. Tambov: MINTS, 1994.
- . *Sovetskoe krest'ianstvo: kratkii ocherk istorii, 1917–1970*, 2nd ed. Moscow: Politizdat, 1973.
- . *Tragediia sovetskoi derevni: kollektivizatsiia i rashkulachivanie, dokumenty i materialy, 1927–1939*, 5 vols. Moscow: Rosspen, 2000.
- Darlington, Thomas. *Education in Russia*. London: Wyman and Sons, 1909.
- Daulet, Shafiga. "The First All-Muslim Congress of Russia, Moscow, 1–11 May 1917," *Central Asian Survey*, 8/1 (1989): 21–47.
- Davatts, V. K., and L'vov, N. N. *Russkaia armia na chuzhbine*. Belgrad: Russkoe izdatel'stvo, 1923.
- Davies, Norman. "Izaak Babel's 'Konarmiya' Stories, and the Polish-Soviet War," *Modern Language Review*, 67/4 (1972): 845–57.
- . *White Eagle, Red Star: The Polish-Soviet War, 1919–1920*. London: Macdonald, 1972.
- Davies, R. W. "Carr's Changing Views of the Soviet Union," in *E. H. Carr A Critical Appraisal*, edited by Michael Cox. London: Palgrave, 2000.
- Davies, Robert W. *From Tsarism to the New Economic Policy: Continuity and Change in the Economy of the USSR*. Basingstoke: Macmillan, 1990.
- . *From Tsarism to the New Economic Policy: Continuity and Change in the Economy of the USSR*.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1.
- . Review of David Stone, *International History Review*, 23/3 (2001): 699–701.
- . *The Socialist Offensive: The Collectivization of Soviet Agriculture, 1929–1930*.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0.
- . *The Soviet Economy in Turmoil, 1929–1930*.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 , and Wheatcroft, Stephen G. "Further Thoughts on the First Soviet Five-Year Plan," *Slavic Review*, 34/4 (1975).
- . *The Years of Hunger: Soviet Agriculture, 1931–1933*.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1994.
- Davies, Robert W., et al. *The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of the Soviet Union, 1913–1945*.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4.
- , eds. *NEP: priobreteniia i poteri*. Moscow: Nauka, 1994.
- Davies, Sarah, and Harris, James, eds. *Stalin: a New History*.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
- Davis, Jerome. "Stalin, New Leader, Ex-



- plains Aims and Policies of Soviets," *New York American*, October 3, 1926: 1-2.
- . *Behind Soviet Power: Stalin and the Russians*. West Haven, CT: Reader's Press, 1949.
- Davis, Mike. *Late Victorian Holocausts: El Niño, Famines, and the Making of the Third World*. London and New York: Verso, 2001.
- Davletshin, Tamurbek. "The Federal Principle in the Soviet State," *Studies on the Soviet Union*, 6/3 (1967).
- . *Sovetskii Tatarstan: teoriia i praktika Leninskoi natsional'noi politiki*. London: Our World, 1974.
- Davydov, Mikhail A. *Vserossiiskii rynek v kontse XIX-nachale XX vv i zheleznodorozhnaia statistika*. St. Petersburg: Aleteia, 2010.
- Dawrichewy, Joseph. *Ah: ce qu'on rigolait bien avec mon ami Staline!* Paris: Jean-Claude Simoen, 1979.
- de Basily, Nicolas. *Diplomat of Imperial Russia, 1903-1917: Memoirs*. Stanford, CA: Hoover Institution Press, 1973.
- de Bagnac, Yvon. *Palazzo Venezia: storia di un Regime*. Rome: La Rocca, 1950.
- de Felice, Renzo. *Mussolini il fascista*. Turin: G. Einaudi, 1966-68.
- . *Mussolini il rivoluzionario, 1883-1920*. Turin: G. Einaudi, 1965.
- de Gaulle, Charles. *Lettres, notes et carnets*, 12 vols. Paris: Plon, 1980-88.
- de Groot, Gerard J. *Douglas Haig, 1861-1928*. London: Unwin Hyman, 1988.
- De Lon, Roy Stanley. "Stalin and Social Democracy: The Political Memoirs of David A. Sagirashvili." Phd diss., Georgetown University, 1974.
- de Madariaga, Isabel. *Russia in the Age of Catherine the Great*.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1.
- De Michelis, Cesare G. *The Non-Existent Manuscript: A Study of the Protocols of the Sages of Zion*. Lincoln, NB: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2004.
- de Taube, Michel. *La politique russe d'avant-guerre et la fin de l'empire des tsars (1904-1917): memoires*. Paris: E. Leroux, 1928.
- Deacon, Richard. *A History of the Russian Secret Service*. New York: Taplinger, 1972.
- Deal, Zack. *Serf and Peasant Agriculture: Khar'kov Province, 1842-1861*. New York: Arno, 1981.
- Debo, Richard K. "G. V. Chicherin: A Historical Perspective," in *Soviet Foreign Policy, 1917-1991: A Retrospective*. London: Frank Cass, 1994, ed. by Gabriel Gorodetsky.
- . "Lloyd George and the Copenhagen Conference of 1919-1920: The Initiation of Anglo-Soviet Negotiations," *The Historical Journal* 24/2 (1981): 429-41.
- . "The Making of a Bolshevik: Georgii Chicherin in England, 1914-1918," *Slavic Review*, 25/4 (1966): 651-62.
- . *Revolution and Survival: The Foreign Policy of Soviet Russia, 1917-18*.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1979.
- . *Survival and Consolidation: The Foreign Policy of Soviet Russia, 1918-21*. Montreal and Buffalo: McGill-Queen's University Press, 1992.
- Dedijer, Vladimir. *The Road to Sarajevo*.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1966.
- Degocev, Vladimir V. *Kavkaz i velikie derzhavy, 1829-1864 gg.: Politika, voina, diplomatiia*. Moscow: Rubezhi XXI, 2009.
- Degras, Jane, ed. *Soviet Documents on Foreign Policy*, 3 vols. London an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1-53.
- . *The Communist International, 1919-1943: Documents*, 3 vol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6-65.
- . *The Communist International, 1919-1943: Documents*, 2 vols. London: Frank Cass, 1971.
- Deist, Wilhelm, and Feuchtwanger, E. J. "The Military Collapse of the German Empire: The Reality behind the Stab in the Back Myth," *War in History*, 3/2 (1996): 186-207.
- Dekrety Sovetskoi vlasti*, 16 vols. Moscow: Gosizdat/Rosspen, 1957.
- Demidov, V. V. "Khlebozagotovitel'naia kampaniia 1927/28 g. v sibirskoi derevne," in *Aktual'nye problemy istorii sovetskoi Sibiri*, edited by V. I. Shishkin. Novosibirsk: Nauka, sibirskoe otdelenie, 1990.
- . *Politicheskaia bor'ba i oppozitsiia v Sibiri, 1922-1929 gg.* Novosibirsk: Sibirskii kadrovyy tsentr, 1994.
- Denezhnaia reforma 1921-1924 gg., sozdanie tverdoi valiuty: dokumenty i materialy*. Moscow: Rosspen, 2008.
- Denezhnoe obrashchenie i kreditnaia sistema Soiuza SSR za 20 let: sbornik vazhneishikh zakonodatel'nykh materialov za 1917-1937 gg.* Moscow: Gosfinizdat, 1937.
- Denikin, A. I. *Ocherki russkoi smuty: Krushenie vlasti i armii*, 5 vols. Paris and Berlin: J. Povolozky & cie, 1921-26.
- Desiat' let Kommunisticheskogo universiteta im. Ia. M. Sverdlova: 1918-1928 gg.* Moscow: Kommunisticheskii universitet, 1928.
- Desiat' let sovetskoi diplomatii: akty i dokumenty*. Moscow: Litizdat narkominda, 1927.
- Deutscher, Isaac. *Stalin: A Political Biography*, 2nd e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7.
- . *The Prophet Armed: Trotsky, 1879-1921*.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4.
- . *The Prophet Unarmed: Trotsky, 1921-1929*.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9.
- . *The Unfinished Revolution: Russia, 1917-1967*.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7.
- Dewey, John, et al. *The Case of Leon Trotsky: Report of Hearings on the Charges Made Against Him in the Moscow Trials, by the Preliminary Commission of Inquiry*.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1937.
- D'iachenko, V. P. *Istoriia finansov SSSR 1917-1950 gg.* Moscow: Nauka, 1978.
- Diakin, V. S. "Stolypin i dvoriantsvo (Proval mestnoi reformy)," in *Problemy krest'ianskogo zemlevladieniia i vnutrennei politiki Rossii: dooktiabrskii period*. Leningrad: Nauka, 1972, 231-74.
- . "The Leadership Crisis in Russia on the Eve of the February Revolution," *Soviet Studies in History*, 23/1 (1984): 10-38.
- . *Burzhuaziia, dvoriantsvo i tsarizm v 1911-1914 gg.* Leningrad: Nauka, 1988.
- . *Ruskaia burzhuaziia i tsarizm: v gody pervoi mirovoi voiny (1914-1917)*. Leningrad: Nauka, 1967.
- D'iakov, Iu. L., and Bushueva, T. S., eds. *Fashistskii mekh kovalsia v SSSR. Krasnaia Armia i Reikhsver, rainoe sotrudnichestvo 1922-1933: neizvestnye dokumenty*. Moscow: Sovetskaiia Rossiia, 1992.
- Dickerman, Leah, ed. *Dada*. Washington, D.C.: National Gallery of Art, 2006.
- Dickinson, G. Lowes. *The International Anarchy, 1904-1914*. New York: The Century Co., 1926.
- Dickson, P. G. M. *Finance and Government under Maria Theresa 1740-1780*. Oxford: Clarendon, 1987.
- Dillon, Emile Joseph. *The Eclipse of Russia*. London and Toronto: J. M. Dent & Sons, 1918.
- Dimanshtein, S. M., ed. *Revoliutsiia i natsional'nyi vopros*. Moscow: Kommunisticheskaiia akademiia, 1930.
- Dimitriev, Iu. A. *Sovetskii tirk: ocherki istorii, 1917-1941*. Moscow: Iskusstvo, 1963.
- Dirketivny glavного komandovaniia Krasnoi Armii (1917-1920)*. Moscow: Voenizdat, 1969.
- Diskussiiia 1923 goda: materialy i dokumenty*. Moscow: Gosizdat, 1927.
- Dmitrenko, Sergei L. *Bor'ba KPSS za edinstvo svoikh riadov, oktiabr' 1917-1937 gg.* Moscow: Politizdat, 1976.
- Dmitrenko, V. P. "Chto takoe NEP?" *Voprosy istorii*, 1988, no. 9: 44-7.
- Dmitriev, Iurii. *Pervyi chekist*. Moscow: Molodaia gardiia, 1968.
- Dmitriev, V. K. *Kriticheskie issledovaniia o potreblenii alkogolii v Rossii*. Moscow: V. P. Riabushinskii, 1911.
- Dmitrieva, L. M., ed. *Barnaul v vospominaniakh starozhilov: XX vek*. Barnaul:

- Altaiskii gos. universitet, 2007.
- Dmitrievskii, Sergei V. *Sovetskie portrety*. Berlin: Strela, 1932.
- . *Sud'ba Rossii: pisma k družiam*. Stockholm: Strela, 1930.
- Dnevnik imperatora Nikolaia II, 1890–1906 gg. Berlin: Slovo, 1923. Moscow: Polistar, 1991.
- Dobb, Maurice. *Russian Economic Development since the Revolution*, 2nd ed. London: Routledge, 1929.
- Dobrorolski, S. K. *Die Mobilmachung der russischen Armee 1914*. Berlin: Deutsche Verlagsgesellschaft für Politik und Geschichte m.b.h., 1922.
- Dobrynin, V. V. *Bor'ba s bol'shevizmom na iuge Rossii: uchastie v bor'be donskogo kazachestva*. Prague: Slovianskoe izdatel'stvo, 1921.
- Doctorow, Gilbert S. "The Russian Geny and the Coup D'État of 3 June 1907," *Cahiers du monde russe et soviétique*, 17/1 (1976): 43–51.
- Doctorow, G. S. "The Fundamental State Law of 23 April 1906," *Russian Review*, 35/1 (1976): 33–52.
- . "The Introduction of Parliamentary Institutions in Russia during the Revolution of 1905–1907." Phd diss., Columbia University, 1975.
- Documents on British Foreign Policy, 1919–1939*, 62 vols. London: H. M. Stationery Office, 1946–. Cited as *DBFP*.
- Dohan, Michael R. "Soviet Foreign Trade in the NEP Economy and Soviet Industrialization Strategy." Phd diss., 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1969.
- . "Foreign Trade," in *From Tsarism to the New Economic Policy: Continuity and Change in the Economy of the USSR*, ed. by R. W. Davies.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1991, 212–34.
- . "The Economic Origins of Soviet Autarky, 1927/18–1934," *Slavic Review*, 35/4 (1976): 603–35.
- "Dokladnaia zapiska Vitte Nikolaiu II," *Istorik-Marksist*, 1935, no. 2–3: 130–39.
- Dokumenty i materialy po istorii sovetsko-pol'skikh otnoshenii*, 12 vols. Moscow: Akademiia nauk SSSR, 1963–1986.
- Dokumenty vneshnei politiki SSSR*, 21 vols. Moscow: Politicheskaiia literatura, 1957–77. Cited as *DVP SSSR*
- Dolbilov, Mikhail. "Rozhdenie imperatorskikh reshenii: monarch, sovetnik i 'vysochaishaia volia' v Rossii XIX v.," *Istoricheskie zapiski*, 9 (2006), 5–48.
- Dower, Paul Casteñeda, and Markevich, Andrei. "Do Property Rights in Russia Matter? The Stolypin Tiding Reform and Agricultural Productivity," working paper, New Economic School, Moscow, Russia (2012).
- Dowling, Timothy C. *The Brusilov Offensive*.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2008.
- Drabkin, Iakov S., et al., eds. *Komintern i ideia mirovoi revoliutsii: dokumenty*. Moscow: Nauka, 1998.
- Drabkina, E. "Moskva 1918," *Novyi mir*, 1958, no. 9: 156–57.
- Drabkina, S. M. "Dokumenty germanskogo polsa v Moskve Mirbakha," *Voprosy istorii*, 1971, no. 9: 120–30.
- Drachkovitch, Milorad M., and Lazitch, Branko, eds. *The Comintern: Historical Highlights, Recollections, Documents*. New York: Praeger, 1966.
- . *Lenin and the Comintern*. Stanford, CA: Hoover Institution Press, Stanford University, 1971.
- Dreiser, Theodore. *Dreiser Looks at Russia*. New York: H Liveright, 1928.
- Drezen, A. K. *Burzhuaziia i pomeschiki 1917 goda: chastnye soveshehaniia chlenov Gosudarstvennoi Dumy*. Moscow-Leningrad: Partizdat, 1932.
- Dridzo, Vera. *Nadezhda Konstantinovna*. Moscow: Politicheskaiia literatura, 1958.
- . "O Krupskoi: pis'mo v redaktsiiu," *Kommunist*, 1989, no. 5: 105–6.
- Drujina, Gleb. "The History of the North-West Army of General Iudenich." Phd diss., Stanford University, 1950.
- Dubenskii, D., ed. *Ego Imperatorskoe Velichestvo Gosudar' Imperator Nikolai Aleksandrovich v desiatvuiushchei armii*, 4 vols. Petrograd: Ministerstvo Imp. Dvora, 1915–16.
- Dubentsov, B., and Kulikov, A. "Sotsial'naia evoliutsiia vysshei tsarskoi biurokratii vo votroi polovine XIX-nachale XX v.," in *Problemy sotsial'no-ekonomicheskoi i politicheskoi istorii Rossii XIX-XX vekov: sbornik statei*, edited by Boris Ananich et al. St. Petersburg: Aleteiia, 1999.
- Dubinskii-Mukhadaze, Ilya Moiseevich. *Ordzhonikidze*. Moscow: Molodaia gvardiia, 1963, 1967.
- Dubrovskii, Sergei M. *Stolypinskaia zemel'naia reforma: iz istorii sel'skogo khoziaistva i krest'ianstva Rossii v nachale XX veka*. Moscow: Akademiia nauk, 1963.
- Duda, Gerhard. *Jeno Varga und die Geschichte des Instituts für Weltwirtschaft und Weltpolitik in Moskau 1921–1970: zu den Möglichkeiten und Grenzen wissenschaftlicher Auslandsanalyse in der Sowjetunion*. Berlin: Akademie, 1994.
- Dullin, Sabine. *Men of Influence: Stalin's Diplomats in Europe, 1930–1939*.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2010.
- Dumova, N. "Maloizvestnye materialy po istorii kornilovshchiny," *Voprosy istorii*, 1968, no. 2: 69–93.
- Duraczynski, E., and Sakharov, A. N., eds. *Sovetsko-Pol'skie otnosheniia v politicheskikh usloviakh Evropy 30-x godov XX stoletii: sbornik statei*. Moscow: Nauka, 2001.
- Duranty, Walter. "Artist Finds Lenin at Work and Fit," *New York Times*, October 15, 1922.
- . "Lenin Dies of Cerebral Hemorrhage; Moscow Throngs Overcome With Grief; Trotsky Departs III, Radek in Disfavor," *New York Times*, January 23, 1924.
- . *I Write as I Please*.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1935.
- Durnovo, Nikolai. *Sud'ba gruzinskoi tsarkvi*. Moscow: Russkii stiag, 1907.
- Duval, Jr., Charles. "The Bolshevik Secretariat and Yakov Sverdlov: February to October 1917," *Slavonic and East European Review*, 51, no. 122 (1973): 47–57.
- . "Yakov M. Sverdlov and the All-Russian Central Executive Committee of Soviets (VTsIK): A Study in Bolshevik Consolidation of Power, October 1917–July 1918," *Soviet Studies*, 31/1 (1979): 3–22.
- Dvadsat' let VChK-OGPU-NKVD*. Moscow: OGIZ, 1938.
- "Dve besedy s L. M. Kaganovichem," *Novaia i noveishaia istoriia*, 1999, no. 2: 101–22.
- Dyck, Harvey L. "German-Soviet Relations and the Anglo-Soviet Break 1927," *Slavic Review*, 25/1 (1966): 67–83.
- . *Weimar Germany and Soviet Russia, 1896–1933: A Study in Diplomatic Instabilit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66.
- Dzerzhinskaiia, S. *V gody velikikh boev*. Moscow: Mysl', 1964.
- . *Izbrannye proizvedeniia*. Moscow: OGIZ, 1947.
- Dzerzhinskii, F. E. *Feliks Dzerzhinskii: dnevniki zakliuchennogo, pis'ma*. Minsk: Belarus, 1977.
- Dziewanowski, M. K. *Communist Party of Poland: An Outline of History*.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9.
- . *Joseph Pilsudski: A European Federalist, 1918–1922*. Stanford: Hoover Institution Press, 1969.
- Easter, Gerald M. *Reconstructing the State: Personal Networks and Elite Identity in Soviet Russia*.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 Eastman, Max. *Heroes I Have Known: Twelve Who Lived Great Lives*.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1942.
- . *Leon Trotsky: The Portrait of a Youth*. New York: Greenberg, 1925.
- . *Love and Revolution: My Journey through an Epoch*.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64.
- . *Since Lenin Died*. New York: Boni & Liveright, 1925.
- Edgerton, David. *The Shock of the Old: Technology and Global History since 1900*.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 Press, 2006.
- Edmondson, Charles M. "The Politics of Hunger: The Soviet Response to the Famine of 1921," *Soviet Studies*, 29/4 (1977): 506-18.
- Egorov, Aleksandr. *L'vov-Varshava, 1920 god: vzaimodeistvie frontov*. Moscow-Leningrad: Gosizdat otdel voennoi literatury, 1929.
- Egorova, L. P. "Khlebozagotovitel'naia kampaniia 1927-1928 gg i bor'ba s kulachestvom v zapadnosibir'skoi derevne," *Voprosy istorii Sibiri*, Tomsk: Tomskii gosudarstvennyi universitet, 1967, vyp. 3: 255-70.
- Ehrenburg, Ilya. *Memoirs: 1921-1941*. Cleveland, OH: World Pub., 1968.
- Ehrlich, Alexander. *The Soviet Industrialization Debate, 1924-1928*.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0, 1967.
- Eichengreen, Barry J. *Golden Fetters: The Gold Standard and the Great Depression, 1919-1939*.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 Eichwede, Wolfgang. *Revolution und Internationale Politik: zur kommunistischen Interpretation der kapitalistischen Welt, 1921-1925*. Cologne: Böhlau, 1971.
- Einaudi, Luca. *Money and Politics: European Monetary Unification and the Gold Standard, 1865-1873*.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 Ekonomicheskoe polozenie Rossii nakanune Velikoi Oktiabr'skoi sotsialisticheskoi revoliutsii: dokumenty i materialy*, 3 vols. Moscow: Akademiia nauk, 1957; Leningrad: Nauka, 1967.
- Eleuov, T. E. *Inostrannaia voennaia interventsiia i grazhdanskaia voina v Srednei Azii i Kazakhstane: dokumenty i materialy*. Alma-Ata: Akademiia nauk Kazakhskogo SSR, 1964.
- Elleman, Bruce A. "Secret Sino-Soviet Negotiations on Outer Mongolia, 1918-1925," *Pacific Affairs*, 66/4 (1993-4): 539-63.
- . *Diplomacy and Deception: The Secret History of Sino-Soviet Diplomatic Relations, 1917-1927*. Armonk, NY: M. E. Sharpe, 1997.
- Ellis, John. *Social History of the Machine Gun*.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76, 1986.
- Elpatievskii, S. Ia. *Vospominaniia*. Leningrad: Priboi, 1929.
- Elwood, Ralph Carter. *Roman Malinovsky: A Life without a Cause*. Newtonville, MA: Oriental Research Partners, 1977.
- . *Russian Social Democracy in the Underground. A Study of the RSDRP in the Ukraine, 1907-1914*. Assen: Van Gorcum, 1974.
- Ely, Christopher. "The Question of Civil Society in Late Imperial Russia," in *A Companion Volume to Russian History*, edited by Abbott Gleason. Oxford: Blackwell, 2009.
- Emmons, Terrence, ed. *Time of Troubles: The Diary of Iurii Vladimirovich Gof'e*.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8.
- . *The Formation of Political Parties and the First National Elections in Russia*.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3.
- Engel, Barbara. "Not By Bread Alone: Subsistence Riots in Russia During World War I," *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 69/3 (1997): 696-721.
- Engelstein, Laura. *Moscow 1905: Working Class Organization and Political Conflict*.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2.
- Engerman, David C. *Modernization from the Other Shore: American Intellectuals and the Romance of Russian Development*.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 Englander, David. "Military Intelligence and the Defence of the Realm," *Bulletin of the Society for the Study of Labour History*, 52/1 (1987): 24-32.
- Ennker, Benno. "The Origins and Intentions of the Lenin Cult," in *Regime and Society in Twentieth Century Russia*, edited by Ian Thatcher. London: Macmillan Press, 1999, 118-28.
- . *Die Anfänge des Leninkults in der Sowjetunion*. Cologne: Böhlau, 1997.
- Enukidze, A. *Nashi podpol'nye tipografii na Kavkaze*. Moscow: Novaia Moskva, 1925.
- Epikhin, A. Iu., and Mozokhin, O. B. *VChK-OGPU v bor'be s korruptsiei v gody novoi ekonomicheskoi politiki, 1921-1928*. Moscow: Kuchkovo pole, 2007.
- Erdmann, Karl Dietrich, ed. *Kurt Riezler: Tagebücher, Aufsätze, Dokumente*. Göttingen: Vandenhoeck & Ruprecht, 1972.
- Erickson, John. *The Soviet High Command: A Military-Political History, 1918-1941*. New York: St. Martin's, 1962. 3rd ed. London and Portland, OR: Frank Cass, 2001.
- Erikson, Erik H. *Young Man Luther: A Study in Psychoanalysis and History*. New York: W. W. Norton, 1958.
- Erofeev, Valerii. *Valerian Kuisbyshv v Samare: mif stalinskoi epokhi*. Samara: Samarskoe otdelenie Litfonda, 2004.
- Eroshkin, N. P. *Ocherki istorii gosudarstvennykh uchrezhdenii dorevoliutsionnoi Rossii*. Moscow: Gos. Uchebno-pedagogicheskoe izdatel'stvo, 1960.
- Erykalov, E. F. *Oktabr'skoe vooruzhennoe vosstanie v Petrograde*. Leningrad: Lenizdat, 1966.
- Esadze, Semen. *Istoricheskaiia zapiska ob upravlenii Kavkazom*, 2 vols. Tbilisi: Guttenberg, 1907.
- Esikov, S. A., and Kanishev, V. V. "Antonovskii NEP," *Otechestvennaia istoriia*, 1993, no. 4: 60-71.
- Esthus, Raymond A. "Nicholas II and the Russo-Japanese War," *Russian Review*, 40/4 (1981): 396-411.
- Etherton, P. T. *In the Heart of Asia*. London: Constable and Co., 1925.
- Eudin, Xenia, and Fisher, Harold T., eds. *Soviet Russia and the West, 1920-1927: A Documentary Survey*. Stanford, CA: Hoover Institution Press, 1957.
- , and Slusser, Robert, eds. *Soviet Foreign Policy, 1928-1934: Documents and Materials*. University Park, PA: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67.
- Eudin, Xenia Joukoff, and North, Robert C., eds. *Soviet Russia and the East, 1920-1927: A Documentary Survey*.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7.
- Evans, Les, and Block, Russell, eds. *Leon Trotsky on China*. New York: Monad, 1976.
- Evreinoff, N. *Histoire du Théâtre Russe*. Paris: du Chene, 1947.
- Faerman, E. "Transportirovka 'Iskry' iz za granitsy i rasprostranenie ee v Rossii v 1901-1903 gg.," *Muzei revoliutsii SSSR: pervyi sbornik*. Moscow, 1947.
- Fainblitt, S. *Amnistiia i sudebnyi prigovor: s prilozheniem vazhneishikh aktov ob amnistii za 10 let*. Moscow: Gosizdat, 1928.
- Fainsod, Mesle. *International Socialism and the World War*.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35.
- . *Smolensk Under Soviet Rule*.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8.
- Falasca-Zamponi, Simonetta. *Fascist Spectacle: The Aesthetics of Power in Mussolini's Ital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7.
- Fallows, T. "Governor Stolypin and the Revolution of 1905 in Saratov," in *Politics and Society in Provincial Russia: Saratov, 1590-1917*, edited by Rex A. Wade and Scott J. Seregny. Columbus: Ohio University Press, 1990.
- Farbman, M. *Bolshevism in Retreat*. London: Collins, 1923.
- Fay, Sidney B. "The Kaiser's Secret Negotiations with the Tsar, 1904-1905,"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2/1 (1918): 48-72.
- . *The Origins of the World War*, 2 vols. New York: Macmillan, 1929.
- Fearon, James D. "Rationalist Explanations for War,"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49/3 (1995): 379-414.
- Fedor, Julie. *Russia and the Cult of State Security: The Chekist Tradition, from Lenin to Putin*. Abingdon, Ox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11.
- Fedyshyn, Olch S. *Germany's Drive to the East and the Ukrainian Revolution, 1917-1918*. New Brunswick, NJ: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1971.
- Feigina, L. A. *B'orskoe soglasenie*. Mos-

- cow: Izd. M. i S. Sabashnikovych, 1928.
- Fets, Herbert. *Europe: The World's Banker 1870-1914: An Account of European Foreign Investment and the Connection of World Finance with Diplomacy before the War*.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30.
- Feitelberg, M. *Das Papiergeldwesen in Rate-Russland*. Berlin: Praeger, 1920.
- Feldman, Gerald D. *The Great Disorder: Politics, Economics, and Society in the German Inflation, 1914-1924*.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 Feldman, Robert. "The Russian General Staff and the June 1917 Offensive," *Soviet Studies*, 1914 (1968): 526-42.
- Fel'shtinskii, Iurii, ed. *Kommunisticheskaia oppozitsiia v SSSR, 1923-1927: iz arkhiva L'va Trotskogo*, 4 vols. Benson, VT: Chalidze, 1988.
- Fel'shtinskii, Iurii. *Bol'sheviiki i levye esery, oktiabr' 1917-iuin' 1918: na puti k odnoi partiinnoi diktatury*. Paris: YMCA, 1985.
- . *Brestskii mir, oktiabr' 1917 goda-noiabr' 1918 g.* Moscow: Terra, 1992.
- . *Razgovory s Bukharinym*. New York: Telex, 1991.
- Ferguson, Niall. "Political Risk and the International Bond Market between the 1848 Revolution and the Outbreak of the First World War,"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59/1 (2006): 70-112.
- . *The Pity of War*. New York: Basic Books, 1999.
- Fergusson, Adam. *When Money Dies: The Nightmare of Deficit Spending, Devaluation, and Hyperinflation in Weimar Germany*. New York: Public Affairs, 2010.
- Feris, John. "Turning Japanese: British Observations of the Russo-Japanese War," in *Rethinking the Russo-Japanese War, 1904-05*, 2 vols., edited by Rotem Kowner. Folkstone: Global Oriental, 2007.
- Ferro, Marc. "The Russian Soldier in 1917: Undisciplined, Patriotic, and Revolutionary," *Slavic Review*, 30/2 (1971): 483-512.
- . *La revolution de 1917: la chute du tsarisme et les origines d'Octobre*. Paris: Aubier, 1967.
- . *The Great War*. London: Routledge and Keegan Paul, 1973.
- "Fevral'skaia revoliutsiia i okhrannoe ordelenie," *Byloe*, 1918, no. 1: 158-76.
- Fič, Victor M. *The Bolsheviks and the Czechoslovak Legion: The Origins of Their Armed Conflict*. New Delhi: Abinav, 1978.
- Field, Daniel, trans. "Petition Prepared for Presentation to Nicholas II." Documents in Russian History. Found at: [http://academic.shu.edu/russianhistory/index.php/Workers'\\_Petition,\\_January\\_9th,\\_1905\\_\(Bloody\\_Sunday\)](http://academic.shu.edu/russianhistory/index.php/Workers'_Petition,_January_9th,_1905_(Bloody_Sunday)).
- Figes, Orlando, and Kolonitskii, Boris. *Interpreting the Russian Revolution: The Language and Symbols of 1917*.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9.
- Figes, Orlando. "The Failure of February's Men," *The Historical Journal*, 31/2 (1988): 493-9.
- . *A People's Tragedy: The Russian Revolution, 1891-1924*. London: Jonathan Cape, 1996.
- . *Peasant Russia, Civil War: The Volga Countryside in Revolution, 1917-1921*.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89.
- Filat'ev, D. F. *Katastrofa Belogo dvizheniia v Sibiri, 1918-1922 gg.: vpechatleniia ochevidtsa*. Paris: YMCA-Press, 1985.
- Filimonov, V. G. *Vozniknovenie i razvitie RSFSR kak federativnogo gosudarstva: material v pomoshch' lektoru*. Moscow: Obshchestvo po rasprostraneniuiu politicheskogo i nauchnogo znaniu, 1958.
- . *Obrazovanie i razvitie RSFSR*. Moscow: Iuridicheskaiia literatura, 1963.
- Finansovaia politika Sovetskoi vlasti za 10 let: sbornik statei*. Moscow: Moskovskii rabochii, 1928.
- Finer, Samuel E. *The Man on Horseback: The Role of the Military in Politics*, 2nd ed. New York: Penguin, 1976.
- Fink, Carole. *The Genoa Conference: European Diplomacy, 1921-1922*.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84.
- , et al., eds. *Genoa, Rapallo, and European Reconstruction in 1922*.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1.
- Firsov, F. I. "K voprosu o taktike edinogo fronta v 1921-1924 gg.," *Voprosy istorii KPSS*, 1987, no. 10: 113-27.
- . "N. I. Bukharin v Kominterne," in *Bukharin: chelovek, politik, uchenyi*, edited by V. V. Zhuravlev and A. N. Solopov. Moscow: Politicheskaiia literatura, 1990.
- Firsov, Fridrikh I. "Nekotorye voprosy istorii Kominterna," *Novaia i noveishaia istoriia*, 1989, no. 2: 75-107.
- Fischer, Conan. *The Ruhr Crisis, 1923-1924*.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 Fischer, Fritz. *Germany's Aims in the First World War*. New York: W. W. Norton, 1967, 1976.
- . *War of Illusions: German Policies from 1911 to 1914*. London: Chatto & Windus, 1975.
- Fischer, George. *Russian Liberalism: From Gentry to Intelligentsia*. Cambridge, MA: Harvard, 1958.
- Fischer, Louis. *Men and Politics: Europe Between the Two World Wars*. New York: Harper & Row, 1946.
- . *Russia's Road from Peace to War: Soviet Foreign Relations 1917-1941*. New York: Harper & Row, 1969.
- . *The Life of Lenin*. New York: Harper & Row, 1964.
- . *The Soviets in World Affairs: A History of Relations between the Soviet Union and the Rest of the World, 1917-1929*, 2 vols.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51.
- Fischer, Ruth. *Stalin and German Communism: A Study in the Origins of the State Party*.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48.
- Fisher, Harold H. *The Famine in Soviet Russia, 1919-1923: The Operations of the American Relief Administration*. New York: Macmillan, 1927.
- Fitzpatrick, Sheila. "The Civil War as Formative Experience," in *Bolshevik Culture: Experience and Order in the Russian Revolution*, edited by Abbott Gleason et al.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85.
- . "The Foreign Threat during the First Five Year Plan," *Soviet Union/Union sovietique*, 5/1 (1978): 26-35.
- Fleer, M. G., ed. *Rabochee dvizhenie v gody voiny*. Moscow: Voprosy truda, 1925.
- Fleischhauer, Ingeborg. *Die Deutschen im Zarenreich: Zwei Jahrhunderte deutsch-russische Kulturgemeinschaft*. Stuttgart: Deutsche verlags-Anstalt, 1986.
- Fleishman, L. *V tiskakh provokatsii: operativnaia "Trest" i russkaia zrubezhnaia pechat'*. Moscow: Novoe literaturnoe obozrenie, 2003.
- Flerov, Vasilii S. *V. V. Kuibyshev—vydaishchiisia proletarskii revoliutsioner i myslitel': stat'i, vospominaniia, dokumenty*. Tomsk: Tomskii gosudarstvennyi universitet imeni V. V. Kuibysheva, 1963.
- Fofanova, M. V. "Poslednoe podpol'e V. I. Lenina," *Istoricheskii arkhiv*, 1956, no. 4: 166-72.
- Fokke, D. G. "Na tse ne i za kulisami Brestskoi tragikomedi i tmemuary uchastnika," ed. by Gesseu, *Arkhiv russkoi revoliutsii*, 1930, no. 20, 5-207.
- Fomin, Fedor T. *Zapiski starogo chekista*, 2nd ed. Moscow: Politicheskaiia literatura, 1964.
- Forster, Kent. *The Failures of the Peace: The Search for a Negotiated Peace During the First World War*. Washington, D.C.: American Council on Public Affairs, 1942.
- Forster, Stig. "Dreams and Nightmares: German Military Leadership and the Images of Future War," in Manfred F. Boemke, et al., eds. *Anticipating Total War: The German and American Experiences, 1871-1914*. Washington, D.C.: German Historical Institute, 1999, 343-76.
- Fotieva, L. A. *Iz zhizni V. I. Lenina*. Moscow: Politicheskaiia literatura, 1967.
- Frank, Allen J. *Bukhara and the Muslims*

- of Russia: *Sufism, Education, and the Paradox of Prestige*. Leiden and Boston: Brill, 2013.
- Frank, V. S. "The Land Question and the 1917 Revolution," *Russian Review*, 1/1 (1945): 22–35.
- Frankel, Edith Rogovin, et al., eds. *Revolution in Russia: Reassessments of 1917*.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2.
- Freedman, Lawrence. *Strategy: A Histor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 Freeze, Gregory L. "Reform and Counter-Reform 1855–1890," in *Russia: A History*, edited by Gregory L. Freez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 French, David. *British Strategy and War Aims, 1914–1916*. London: Allen & Unwin, 1986.
- Frenkin, Mikhail. *Zakhuat vlasti bol'shevikami v Rossii i rol' tylovykh garnizonov armii: podgotovka i provedenie Otkabir'skogo miatezha, 1917–1918 gg.* Jerusalem: Stav, 1982.
- Frenkin, Mikhail S. *Russkaia armia i revoliutsiia, 1917–1918*. Munich: Logos, 1978.
- Freund, Gerald. *Unholy Alliance: Russian-German Relations from the Treaty of Brest-Litovsk to the Treaty of Berlin*.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1957.
- Fridenson, Patrick. "The Coming of the Assembly Line to Europe," in *The Dynamics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edited by Wolfgang Krohn et al. Dordrecht, Holland, and Boston: D. Reidel Publishing Company, 1978.
- Frierson, Cathy A., ed. *Aleksandr Nikolaevich Englehardt's Letters from the Country, 1872–1887*.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 Fuhrmann, Joseph T. *Rasputin: A Life*. New York: Praeger, 1990.
- . ed. *The Complete Wartime Correspondence of Tsar Nicholas II and the Empress Alexandra: April 1914–March 1917*. Westport, CT: Greenwood, 1999.
- Fuller, Jr., William C. "The Russian Empire," in *Knowing One's Enemies: Intelligence Assessments before the Two World Wars*, edited by Ernest F. Ma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5.
- . *Civil-Military Conflict in Imperial Russia, 1881–1914*.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5.
- . *Strategy and Power in Russia 1600–1914*. New York: Free Press, 1992.
- . *The Foe Within: Fantasies of Treason and the End of Imperial Russia*.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6.
- Fulop-Miller, Rene. *Rasputin: The Holy Devil*. New York: Viking Press, 1928.
- . *The Mind and Face of Bolshevism: An Examination of Cultural Life in Soviet Russia*. London and New York: G. P. Putnam's Sons, 1927.
- . *The Mind and Face of Bolshevism: An Examination of Cultural Life in Soviet Russia*. New York: Knopf, 1928.
- Futrell, Michael. *Northern Underground. Episodes of Russian Revolutionary Transport and Communication through Scandinavia and Finland*. New York: Praeger, 1963.
- Gafurov, B. G. *Lenin i natsional'no-osvoboditel'noe dvizhenie v stranakh vostoka*. Moscow: Vostochnaia literatura, 1970.
- Gagliardo, J. *From Pariah to Patriot: The Changing Image of the German Peasant, 1770–1840*. Lexington: University Press of Kentucky, 1975.
- Gaida, Fedor A. *Liberal'naiia oppozitsiia na putiakh k vlasti (1914—vesna 1917 g.)*. Moscow: Rosspen, 2003.
- Gaiduk, Il'ia "Sovetsko-Amerikanskii ot-nosheniia v pervoi polovine 20-x godov i sozdanie 'Am'torga,'" *Russkii vopros*, 2002, no. 2.
- Galai, Shmuel. *The Liberation Movement in Russia, 1900–1905*.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3.
- Galoian, G. A. *Rabochee dvizhenie i natsional'nyi vopros v Zakavkaz'e, 1900–1922*. Erevan: Aistavan, 1969.
- Gal'perina, B. D., et al., eds. *Sovet ministrov Rossiiskoi imperii v gody Pervoi mirovoi voiny: Bumagi A. N. Iakhontova*. St. Petersburg: Bulanin, 1999.
- . "Chastnye soveshchaniia gosudarstvennoi dumy—tsentr splocheniia burzhuznykh partii Rossii," in *Neproletarskie partii Rossii v trekh revoliutsiakh: sbornik statei*, edited by K. V. Gusev. Moscow: Nauka, 1989.
- Gambarov, Iu. S., et al., eds. *Entsiklopedicheskii slovar' russkogo bibliograficheskogo instituta Granat*, 58 vols. Moscow: Russkii biograficheskii institut Granata, 1922–48.
- Gamburg, Iosif K. *Tak eto bylo: vospominaniia*. Moscow: Politicheskaiia literatura, 1965.
- Gammer, Moshe. *Muslim Resistance to the Tsar: Shamil and the Conquest of Chechnia and Dagestan*. London and Portland, OR: F. Cass, 1994.
- Ganelin, Rafail. "The Day Before the Downfall of the Old Regime: 26 February 1917 in Petrograd," in *Extending the Borderlands of Russian History: Essays in Honor of Alfred J. Rieber*, edited by Marsha Siefert. New York: Central European University Press, 2003.
- Ganelin, Rafail, et al. "Vospominaniia T. Kirpichnikova kak istochnik po istorii fevral'skikh revoliutsionnykh dnei 1917 g. v Petrograde," *Rabochii klas Rossii, ego soizuzniki i politicheskie protivniki v 1917 godu*. Leningrad: Nauka, 1989.
- Gann, Lewis H. "Western and Japanese Colonialism: Some preliminary Comparisons," in *The Japanese Colonial Empire, 1895–1945*, edited by Ramon Meyers et al.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4.
- Gapon, George. *The Story of My Life*. London: Chapman and Hall, Ltd., 1905.
- Gaponenko, L. S., ed. *Revolutsionnoe dvizhenie v Rossii posle sverzheniia samoderzhaviiia*. Moscow: Akademiia nauk SSSR, 1958.
- , and V. M. Kabuzan. "Materialy sel'sko-khoziastvennykh perepisei 1916–1917 gg.," *Voprosy istorii*, 1961, no. 6: 97–115.
- Garafov, Vasif. "Russko-turetskoe sblizhenie i nezavisimost' Azerbaidzhan 1919–1921 gg.," *Kavkaz i globalizatsiia*, 4/1–2 (2010): 240–48.
- Gaspar'ian, Armen. *Operatsiia Trest: Sovetskaia razvedka protiv russkoi emigratsii, 1921–1937 gg.* Moscow: Veche, 2008.
- Gatrell, Peter. *Government, Industry, and Rearmament in Russia, 1900–1914: The Last Argument of Tsarism*.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4.
- . *Russia's First World War: A Social and Economic History*. Harlow, England: Pearson-Longman, 2005.
- . *The Tsarist Economy, 1857–1914*. New York, 1986.
- . *A Whole Empire Walking: Refugees in the Russian Empire during the First World War*.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9.
- Gegeshidze, Zinaida T. *Georgii Telia: biograficheskii ocherk*. Tbilisi: Sabchota Sakartvelo, 1958.
- Geifman, Anna. *Entangled in Terror: The Azef Affair and the Russian Revolution*. Wilmington, DE: Scholarly Resources, 2000.
- . *Revolutsionnyi terror v Rossii, 1894–1917*. Moscow: Kton Press, 1997.
- . *Thou Shalt Kill: Revolutionary Terrorism in Russia, 1894–1917*.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3.
- Gelb, Michael. "The Far-Eastern Koreans," *Russian Review* 54/3 (1995): 389–412.
- Gellner, Ernest. *Encounters with Nationalism*. Oxford: Blackwell, 1994.
- Genis, Vladimir L. "G. Ia. Sokolnikov," *Voprosy istorii*, 1988, no. 12: 59–86.
- . "S Bukharoi nado konchat": *k istorii butaforskikh revoliutsii, dokumental'naia khronika*. Moscow: MNPI, 2001.
- Genkina, Esfir' B. "Bor'ba za Tsaritsyn v 1918 godu," *Proletarskaia revoliutsiia*, 1939, no. 1: 75–110.
- . "Priezd tov. Stalina v Tsaritsyn," *Proletarskaia revoliutsiia*, 1936, no. 7: 61–92.
- . "V. I. Lenin i perekhod k novoi

- ekonomicheskoi politike," *Voprosy istorii*, 1964, no. 5: 3-27.
- , *Perekhod sovetskogo gosudarstva k novoi ekonomicheskoi politike, 1921-1922*. Moscow: Politicheskaiia literatura, 1954.
- , *Tsarityn v 1918 godu*. Moscow: Politizdat pri TsK VKP(b), 1940.
- George, David Lloyd. *War Memoirs*, 2 vols. London: Odhams Pm, 1942.
- Gerasimov, Aleksandr V. "Na lezvii s terroristami," in *Okhranka: vospominaniia rukovoditelia politicheskogo sistema*, 2 vols, edited by Z. I. Peregudova. Moscow: NLO, 2004.
- , *Na lezvii s terroristami*. Paris: YMCA, 1985.
- Gerassimoff, Alexander. *Der Kampf gegen die erste russische Revolution: Erinnerungen*. Frauenfeld: Leipzig, 1934.
- Germanis, Uldis. *Oberst Vacietis und die kritischen Schutzen im Weltkrieg und in der Oktoberrevolution*. Stockholm: Almqvist & Wiksell, 1974.
- Gershchenkron, Alexander. "Agrarian Policies and Industrialization in Russia 1861-1917," in *The Cambridge Economic History of Europe*, edited by H. J. Habakkuk and M. Postan.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1: 706-800.
- Gerson, Lennard D. *The Secret Police in Lenin's Russia*.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1976.
- Gerutis, Albertis, ed. *Lithuania: 700 Years*. New York: Manyland Books, 1969.
- Gessen, I. V., ed. *Arkhiv russkoi revoliutsii*, 22 vols. Berlin: Slowo, 1921-37.
- Getzler, Israel. "Lenin's Conception of Revolution As Civil War," *Slavonic and East European Review*, 74/3 (1996): 464-72.
- , "The Communist Leaders' Role in the Kronstadt Tragedy of 1921 in the Light of Recently Published Archival Documents," *Revolutionary Russia*, 15/1 (2002): 24-44.
- , *Kronstadt, 1917-1921: The Fate of a Soviet Democracy*.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
- , *Martov: A Political Biography of a Russian Social Democrat*.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7.
- Geyer, Dietrich. *Russian Imperialism: The Interaction of Domestic and Foreign Policy 1860-1914*.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7.
- Geyer, Michael. "Insurrectionary Warfare: The German Debate about a *Levee en masse* in October 1918," *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 73/3 (2001): 459-527.
- , "The Militarization of Europe," in *The Militarization of the Western World*, edited by John Gillis. New Brunswick, NJ: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1989.
- "Gibel' tsarskogo Petrograda: fevral'skaia revoliutsiia glazami gradonach'l'nika A. P. Balka," *Russkoe proshloe: Istoriko-dokumental'nyi almanakh*, 1991, no. 1: 7-72.
- Gil', Stepan K. *Shes' let s V. I. Leniny: vospominaniia lichnogo Shofera Vladimira Il'icha Lenina*, 2nd ed. Moscow: Molodaia gardiia, 1957.
- Gilensen, V. M. "Neizvestnoe iz zhizni spetsshluzb: 'dviuikoi' pobedili sovetskie 'monarkhisty,'" *Voenna-istoricheskii zhurnal*, 2001, no. 6: 71-76.
- Gililov, Solomon S. *V.I. Lenin, organizator Sovetskogo mnogonatsional'noe gosudarstva*. Moscow: Politicheskaiia literatura, 1960.
- Gill, Graeme J. *Peasants and Government in the Russian Revolution*. New York: Barnes and Noble, 1979.
- , "Political Myth and Stalin's Quest for Authority in the Party," in *Authority, Power, and Policy*, ed. by T. H. Rigby. New York: St. Martin's, 1980, 98-117.
- , *The Origins of the Stalinist Political System*.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 Gilliard, Pierre. *Thirteen Years at the Russian Court*. London: Hutchinson, 1921.
- Gimpel'son, Efim G. *NEP i Sovetskaia politicheskaiia sistema 20-e gody*. Moscow: Institut Rossiiskoi istorii RAN, 2000.
- , *Sovetskie upravleniia, 1917-1920 gg.* Moscow: Institut Rossiiskoi istorii RAN, 1998.
- , *Sovetskii rabochii klass, 1918-1920 gg.* Moscow: Nauka, 1974.
- Gindin, Aron M., ed. *Kak bolsheviki ovladeli gosudarstvennym bankom: fakty i dokumenty oktiabr'skikh dnei v Petrograde*. Moscow: Gosfinizdat, 1961.
- Gintsberg, L. I. *Rabochee i kommunisticheskoe dvizhenie Germanii v bor'be protiv fashizma, 1929-1933*. Moscow: Nauka, 1978.
- Gippius, Zinaida. *Sniata kniga: Peterburgskii dnevnik, 1914-1918*. Belgrade: Radenkovich, 1929.
- Gizzatullin, I. G., and Sharafudinov, D. R., eds. *Mirsaid Sultan-Galiev: stati, vystupleniia, dokumenty*. Kazan: Tartarskoe knizhnoe izd-vo, 1992.
- Gladkov, I. A. *Sovetskoe narodnoe khoziaistvo 1921-25 gg.* Moscow: Akademiia nauk SSSR, 1960.
- Gladkov, Teodor. *Nagrada za vernost'—kazn'*. Moscow: Tsentrpoligraf, 2000.
- Gleason, William. "Alexander Guchkov and the End of the Russian Empire," *Transactions of the American Philological Society*, New Series, 73/3 (1983): 1-90.
- Gleb Maksimilianovich Krzhizhanovskii: *zhizn' i deiatel'nost'*. Moscow: Nauka, 1974.
- Glebov, Serguei. "The Challenge of the Modern: The Eurasianist Ideology and Movement, 1920-1929." Phd diss., Rutgers University, 2004.
- Glenny, M. V. "The Anglo-Soviet Trade Agreement, March 1921,"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History*, 5/2 (1970): 63-82.
- Glinka, Ia. V. *Odinnadnat' let v Gosudarstvennoi Dumy, 1906-1917: dnevnik i vospominaniia* (Moscow: NLO, 2001
- Glurdzhidze, G. "Pamiatnye gody," *Rasskazy starykh rabochikh Zakavkazia o velikom Staline*. Tblisi: Molodaia gardiia, 1937: 17-21.
- Gogokhiia, D. "Na vsiu zhizn' zapomnilis' eti dni," *Rasskazy starykh rabochikh Zakavkazia o velikom Staline*, 2nd ed. Tblisi: Molodaia gardiia, 1937: 7-16.
- Gogolevskii, A. V., et al., eds. *Dekrety Sovetskoi vlasti o Petrograde, 25 oktiabria (7 noiabria) 1917 g.—29 dekabria 1918 g.* Leningrad: Lenizdat, 1986.
- Goikhbar, A. G. *A Year in Soviet Russia: A Brief Account of the Legislative Work of 1917-1918*. London: People's Information Bureau, 1929.
- , *Sotsial'noe zakonodatel'stvo sovetskoi respublikii*. Moscow: Narodnyi kommissariat iustitsii, 1919.
- Goland, Iurii. "Currency Regulation in the NEP period," *Europe-Asia Studies*, 46/8 (1994): 1251-96.
- , *Diskussii ob ekonomicheskoi politike v gody denezhnoi reformy, 1921-1924*. Moscow: Ekonomika, 2006.
- Golder, Frank A., ed. *Documents of Russian History, 1914-1917*. New York and London: The Century Co., 1927.
- Goliakov, Ivan T. *Sbornik dokumentov po istorii ugolovnogo zakonodatel'stva SSSR i RSFSR, 1917-1952 gg.* Moscow: Iuridicheskaiia literatura, 1953.
- Golikov, Georgii N., ed. *Vladimir Il'ich Lenin: biograficheskaiia khronika*, 12 vols. Moscow: Politicheskaiia literatura, 1970-82.
- Golinkov, D. L. *Krushenie antisovetskogo podpol'ia v SSSR*, 2 vols. Moscow: Politizdat, 1978.
- Golod 1921-1922: *sbornik*. New York: Predstavitel'stvo Rossiskogo obshchestva Krasnogo kresta v Amerike, 1923.
- Golovin, N. N. *Rossiiskaia kontr-revoliutsiia v 1917-1918 gg.*, 5 vols. Paris: Ilustrirovaniia Rossiia, 1937.
- , *The Russian Army in the World War*.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31.
- , *Voennye usilia Rossii v mirovoi voine*, 2 vols. Paris: Tovarishchestvo ob edinennykh izdatelei, 1939.
- Golub, P. A. "Kogda zhe byl uchrezhden institute voennykh kommissarov Krasnoi Armii?" *Voprosy istorii KPSS*, 1962, no. 4: 155-60.
- Golubev, A. V. *Etil mir obrushitsia na nashu Respubliku: sovetskoe obshchest-*

- vo i vnesniaia ugroza. Moscow: Kuchkovo pole, 2008.
- , et al., eds. *Direktivny glavnoho komandovaniia Krasnoi Armii, 1917–1920: sbornik dokumentov*. Moscow: Voenizdat, 1969.
- Goscharov, V. L., ed. *Vozvyshenie Stalina: oborona Tsaritsyna*. Moscow: Veche, 2010.
- Goodwin, Barry K., and Grennes, Thomas. "Tsarist Russia and the World Wheat Market," *Explorations in Economic History* 35 (1998): 405–30.
- . *Vladimir Ilch Lenin*. Leningrad: Gosizdat, 1924.
- Gordienko, A. A. *Obrazovanie Turkestanskoi ASSR*. Moscow: Iuridicheskaiia literatura, 1968.
- Gordon, Jr., Harold J. *Hitler and the Beer Hall Putsch*.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2.
- Gorgiladze, "Rasprostranenie marksizma v Gruzii," in *Ocherkii istorii Gruzii*, V (1990), ch. 15, edited by M. M. Gaprindashvili, and O. K. Zhordaniia. Tbilisi: Metsniera, 1990.
- Goriachkin, F. T. *Pervyi russkii fashist: Petr Arkadievich Stolypin*. Kharbin: Merkurii, 1928.
- Goriacheva, T. M. *Istoriia sovetskoi politicheskoi tsenzury: dokumenty i kommentarii*. Moscow: Rosspen, 1997.
- Gor'kii, A. M. "Prazdnik shiitov," *Nizhegorodskii listok*. June 28, 1898.
- . *Nesovremennnye mysl'i i rassuzhdenii o revoliutsii i kul'ture 1917–1918 gg.* Moscow: Interkontakt, 1990.
- Gor'kii, Maksim. *Sobranie sochinenii*, 2nd ed., 25 vols. Moscow-Leningrad: Khudozhestvennaia literatura, 1933.
- Gorky, Maxime. *Lenine et la paysan russe*. Paris: Editions du Sagittaire chez Simon Kra, 1925.
- . *Untimely Thoughts: Essays on Revolution, Culture, and the Bolsheviks, 1917–1918*. New York: P. S. Eriksen, 1968.
- Gorlizki, Yoram, and Khlevniuk, Oleg. "Stalin and His Circle," in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Russia*, edited by Ronald Grigor Suny.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6.
- Gorlov, S. A. *Sovershenno sekretno: al'ians Moskva-Berlin, 1920–1933*. Moscow: Olma, 2001.
- Gorlov, Seregi A. *Sovershenno sekretno, Moskva-Berlin 1920–1933: (Voenno-politicheskie otnosheniia mezhdu SSSR i Germaniei)*. Moscow: IVI RAN, 1999.
- Gornyi, V. A., ed. *Natsional'nyi vopros v perekreske mnenii, 20-e gody: dokumenty i materialy*. Moscow: Nauka, 1992.
- Gorodetskii, E. N. *Rozhdenie Sovetskogo gosudarstva (1917–1918 gg.)*. Moscow: Nauka, 1965.
- Gorodetsky, Gabriel. "The Soviet Union and Britain's General Strike of May 1926," *Cahiers du monde russe et sovietique*, 17/2–3 (1976): 287–310.
- . *Precarious Truce: Anglo-Soviet Relations, 1924–1927*.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7.
- Gosudarstvennyi apparat SSSR, 1924–1928 gg. Moscow: Tsentral'noe statisticheskoe upravlenie SSSR, 1929.
- Gosudarstvennyi Sovet: stenograficheskie otechy, thirteen sessions. St. Petersburg: Gosudarstvennaia tip., 1906–17.
- Gouldner, Alvin. "Stalinism: A Study of Internal Colonialism," *Telos*, no. 34 (1977–8): 5–48.
- . *The Two Marxisms: Contradictions and Anomalies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ory*. London: Macmillan, 1980.
- Gourko, Basil. *War and Revolution in Russia*. New York, Macmillan, 1919.
- Graf, D. W. "Military Rule behind the Russian Front, 1914–1917: The Political Ramifications," *Jahrbucher fur Geschichte Osteuropas*, 22/3 (1974): 390–411.
- Grant, S. "The Peasant Commune in Russian Thought, 1861–1905." Phd diss., Harvard University, 1973.
- Grant, W. Horsley. *A Medical Review of Soviet Russia*. London: British Medical Association, 1928.
- Grave, Berta, ed. *Burzhuaziia nakanune fevral'skoi revoliutsii*. Moscow: Gosizdat, 1927.
- Grazhdanskaia voina v SSSR*. Moscow: Voenizdat, 1986.
- Graziosi, Andrea. "Building the First System of State Industry in History: Piatkov's VSNKh and the Crisis of the NEP, 1923–1926," *Cahiers du monde russe et sovietique*, 32/4 (1991): 539–80.
- . "Stalin's Antiworker Workerism, 1924–1931,"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Social History*, 40/2 (1995): 223–58.
- . "State and Peasants in the Reports of the Political Police, 1918–1922," in *A New, Peculiar State: Explorations in Soviet History, 1917–1937*, edited by Andrea Graziosi. Westport, CT: Praeger, 2000.
- . "The New Archival Sources: Hypotheses for a Critical Assessment," *Cahiers du monde russe*, 40/1–2 (1999): 13–64.
- . *Bol'sheviki i krest'iane na Ukraine, 1918–1919 gg.* Moscow: Airo-XX, 1997.
- Gregor, A. James. *The Fascist Persuasion in Politics*.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4.
- . *Young Mussolini and the Intellectual Origins of Fascism*.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9.
- Gregory, Paul R. "Grain Marketings and Peasant Consumption, Russia, 1885–1913," *Explorations in Economic History* 17/2 (1980): 135–64.
- . *Before Command: An Economic History of Russia from Emancipation to the First Five-Year Plan*.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4.
- . *Politics, Murder, and Love in Stalin's Kremlin: The Story of Nikolai Bukharin and Anna Larina*. Stanford, CA: Hoover Institution Press, 2010.
- . *Russian National Income, 1885–1913*.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3.
- , and Naimark, Norman. *The Lost Politburo Transcripts: From Collective Rule to Stalin's Dictatorship*.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8.
- Gregory, Paul, and Mokhtari, Manouchehr. "State Grain Purchases, Relative Prices, and the Soviet Grain Procurement Crisis," *Explorations in Economic History*, 30/2 (1993): 182–94.
- Grigorov, Grigorii I. *Povoroty sud'by i proizvol: vospominaniia, 1905–1927 gody*. Moscow: OGI, 2005.
- Grinevetskii, V. I. *Poslevoennye perspektivy Russkoi promyshlennosti*, 2nd ed. Moscow: Vserossiiskii tsentral'nyi soiuz potrebitel'skikh obshchestv, 1922.
- Gromov, Evgenii S. *Stalin: iskustvo i vlast'*. Moscow: EKSMO Algoritm, 2003.
- Gronsky, Paul P. "The Zemstvo System and Local Government in Soviet Russia, 1917–1922,"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38/4 (1923): 552–68.
- , and Astrov, Nicholas J. *The War and the Russian Government*.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20.
- Gross, Jan. "War as Social Revolution," in *The Establishment of Communist Regimes in Eastern Europe, 1944–1949*, edited by Norman Naimark and Leonid Gibianskii. Boulder, CO: Westview Press, 1997.
- Gruber, Helmut. *International Communism in the Era of Lenin: A Documentary History*.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67.
- Grunt, A. Ia. *Moskva 1917–i: Revoliutsiia i kontrrevoliutsiia*. Moscow: Nauka, 1976.
- "Gruzinskii ekzarkhat," *Pravoslavnaia bogoslovnaia entsiklopediia*, ed. by A. P. Lopukhin. St. Petersburg: Milshstein, Nevskaiia, Rossiia, 1900–11.
- Guins, George Constantine. *Sibir, soiuzniki i Kolchak, povorotnyi moment russkoi istorii, 1918–1920: vpechatleniia i mysl'i chlena Omskogo pravitel'stva*, 2 vols. Pekin: Russkaia dukhovnaia missiia, 1921.
- Gul', Roman B. *Krasnye marshaly: Tukhachevskii, Voroshilov, Bliukher, Katovskii*. Moscow: Molodaia gvardiia, 1990.
- Gulevich, K., and Gassanova, R. "Iz istorii bor'by prodovol'stvennykh otriadov rabochikh za khleb i ukreplenie sovetskoi vlasti (1918–1920 gg.),"



- Krasnyi arkhiv, 89–90 (1938): 103–54.
- Guliev, A. *Muzhestvennyi borets za kommunizm: Lado Ketskhoverli*. Baku: Arzemesir, 1953.
- Gumz, Jonathan E. *The Resurrection and Collapse of Empire in Habsburg Serbia, 1914–1918*.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9.
- Gurko, Vladimir Iosifovich. *Features and Figures of the Past: Government and Opinion in the Reign of Nicholas II*.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39.
- Gurvich, Georgy S. *Istoriia sovetskoi konstitutsii*. Moscow: Sotsialisticheskaia akademiia, 1923.
- Gusakova, Z. "Veril v luchshuiu zhizn' naroda," *Gazeta nedeli* (Saratov), November 20, 2012.
- Gusev, K. V. *Krakh partii levyykh eserov*. Moscow: Sotsial'no-ekonomicheskaya literatura, 1963.
- Gushchin, N. Ia. *Sibirskaia derevnia na puti k sotsializmu: sotsial'no-ekonomicheskoe razvitiie sibirskoi derevni v gody sotsialisticheskoi rekonstruktsii narodnogo khoziaistva 1926–1937 gg.* Novosibirsk: Nauka, sibirskoe otdelenie, 1973.
- , and Il'nykh, V. A. *Klassovaia bor'ba v sibirskoi derevne, 1920-e-seredina 1930-x gg.* Novosibirsk: Nauka, 1987.
- Guardeitsy Oktiabria: rol' korennykh narodov stran Baltii v ustanovlenii i ukreplenii bol'shevistskogo stroia*. Moscow: Indrik, 2009.
- Gvosdev, Nikolas K. *Imperial Policies and Perspectives towards Georgia, 1760–1819*.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2000.
- Haber, Ludwig F. *The Poisonous Cloud: Chemical Warfare in the First World War*. Oxford: Clarendon, 1986.
- Hafner, Lutz. "The Assassination of Count Mirbach and the 'July Uprising' of the Left Socialist Revolutionaries in Moscow, 1918," *Russian Review* 50/3 (1991): 324–44.
- . *Die Partei der linken Sozialrevolutionare in der russischen Revolution von 1917/18*. Cologne: Bohlau Verlag, 1994.
- . *Gesellschaft als lokale Veranstaltung: Die Wolgastadte Kazan und Saratov (1870–1914)*. Cologne: Bohlau Verlag, 2004.
- Hahlweg, Werner. *Der Diktatfrieden von Brest-Litovsk 1918 und die bolschewistische Weltrevolution*. Munster: Aschendorff, 1960.
- . *Lenins Ruckkehr nach Russland, 1917: die deutschen Akten*. Leiden: E. J. Brill, 1957.
- Haimson, Leopold H. "The Mensheviks after the October Revolution. Part II: The Extraordinary Party Congress," *Russian Review*, 39/2 (1980): 181–207.
- . "The Problem of Social Stability in Urban Russia, 1905–17," *Slavic Review*, 23/4 (1964): 619–42, and 24/1 (1965): 1–22.
- . "The Workers' Movement After Lena: The dynamics of labor unrest in the wake of the Lena goldfield massacre (April 1912–July 1914)," in *Russia's Revolutionary Experience, 1905–1917: Two Essay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5.
- , ed. *The Mensheviks: From the Revolution of 1917 to the Second World War*.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4.
- Halevy, Élie. *The World Crisis of 1914–1918: An Interpretation*. Oxford: Clarendon, 1930.
- Halfin, Igal. *Intimate Enemies: Demonizing the Opposition, 1918–1928*. Pittsburgh: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Press, 2007.
- Hall, Coryne. *Imperial Dancer: Mathilde Kschessinskaya and the Romanovs*. Thrupp, Stroud, Gloucestershire: Sutton, 2005.
- Hamilton, Richard F., and Herwig, Holger H. *Decisions for War, 1914–1917*.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 Hammond, Thomas T. "The Communist Takeover of Outer Mongolia: Model for Eastern Europe?," *Studies on the Soviet Union*, 11/4 (1971): 107–44.
- , and Farrell, Robert, eds. *The Anatomy of Communist Takeovers*. Munich: 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the USSR, 1971.
- Harcave, Sidney. *Count Sergei Witte and the Twilights of Imperial Russia: A Biography*. Armonk, NY: M. E. Sharpe, 2004.
- Hard, William. *Raymond Robins' Own Story*. New York and London: Harper & Bros., 1920.
- Harding, Neil. *Leninism*.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6.
- Hardy, Eugene. "The Russian Soviet Federated Socialist Republic: The Role of Nationality in its Creation." Phd dis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1955.
- Harper, Samuel N. *Civic Training in Soviet Russia*.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29.
- . *The New Electoral Law for the Russian Duma*.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08.
- , and Harper, Paul V. *The Russia I Believe I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45.
- Harris, James. "Stalin as General Secretary: The Appointment Process and the Nature of Stalin's Power," in *Stalin: A New History*, ed. by Davies and Harris, 63–82.
- Harrison, Marguerite. *Marooned in Moscow: The Story of an American Woman Imprisoned in Russia*. New York: Doran, 1921.
- Harrison, Mark. "Prices in the Politburo, 1927: Market Equilibrium Versus the Use of Force," in *Lost Politburo Transcripts*, ed. by Gregory and Naimark, 224–46.
- Hart, B. H. Liddell. *The Real War: 1914–18*. Boston: Little, Brown and Co., 1930.
- Hasegawa, Tsuyoshi. "Crime, Police and Mob Justice in Petrograd During the Russian Revolution of 1917," in *Religious and Secular Forces in Late Tsarist Russia: Essays in Honor of Donald W. Treadgold*, edited by Charles E. Timberlake.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92.
- . *The February Revolution: Petrograd, 1917*.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81.
- Haslam, Jonathan. *The Soviet Union and the Threat from the East, 1933–41: Moscow, Tokyo, and the Prelude of the Pacific War*. Houndmills, Basingstoke: Macmillan, 1992.
- Headrick, Daniel R. *The Tools of Empire: Technology and European Imperialism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1.
- Heenan, Louise Erwin. *Russian Democracy's Fatal Blunder: the Summer Offensive of 1917*. New York: Praeger of Greenwood, 1987.
- Hegelsen, M. M. "The Origins of the Party-State Monolith in Soviet Russia: Relations between the Soviets and the Party Committees in the Central Provinces, October 1917–March 1921." Phd diss., University of New York at Stony Brook, 1980.
- Heimo, M., and Tivel, A. *10 let Komintern v resheniakh i sifrakh*. Moscow: Gosizdat, 1929.
- Heinzen, James W. *Inventing a Soviet Countryside: State Power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Rural Russia, 1917–1929*. Pittsburgh: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Press, 2004.
- Helfferich, Karl. *Der Weltkrieg*, 3 vols. Berlin: Ullstein & Co, 1919.
- Hellie, Richard. "The Structure of Russian Imperial History," *History and Theory*, 44/4 (2005): 88–112.
- Henderson, Arthur, and Dovgalevsky, V. "Anglo-Soviet Relations, 1918–1929," *Bulletin of International News*, 6/7 (October 10, 1929): 3–12.
- Hennock, E. P. *The Origin of the Welfare State in England and Germany, 1850–1914: Social Policies Compare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7.
- Herwig, Holger H. "Germany and the 'Short War' Illusion: Toward a New Interpretation," *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 66/3 (2002): 681–93.
- Hewitson, Mark. "The Kaiserreich in Question: Constitutional Crisis in Germany before the First World War," *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 73/4 (2001): 725–80.



- . *Germany and the Causes of the First World War*. New York: Berg, 2004.
- Hickey, Paul C. "Fee-Taking, Salary Reform, and the Structure of State Power in Late Qing China, 1909–1911," *Modern China*, 17/3 (1991): 389–417.
- Hilger, Gustav, and Meyer, A. G. *The Incompatible Allies: A Memoir-History of German-Soviet Relations, 1918–1941*. New York: Macmillan, 1953.
- Hill, George. *Go Spy the Land*. London: Cassell, 1932.
- Hillis, Faith. "Between Empire and Nation: Urban Politics, Violence, and Community in Kiev, 1863–1907." Phd diss., Yale University, 2009.
- Himmer, Robert. "First Impressions Matter: Stalin's Brief Initial Encounter with Lenin, Tammfors 1905," *Revolutionary Russia*, 14/2 (2001): 73–84.
- . "Soviet Policy toward Germany during the Russo-Polish War, 1920," *Slavic Review*, 35/4 (1976): 665–82.
- . "The Transition from War Communism to the New Economic Policy: An Analysis of Stalin's Views," *Russian Review*, 53/4 (1994): 515–29.
- Hindus, Maurice. *The Russian Peasant and the Revolution*. New York: Holt, 1920.
- Hingley, Ronald. *The Russian Secret Police: Muscovite, Imperial Russian, and Soviet Political Security Operations*.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1971.
- Hirsch, Francine. *Empire of Nations: Ethnographic Knowledge and the Making of the Soviet Union*.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2005.
- Hitler Trial Before the People's Court in Munich*. The Arlington, VA: University Publications of America, 1976.
- Hoare, S. *The Fourth Seal. The End of a Russian Chapter*. London: W. Heinemann Ltd, 1930.
- Hobsbawm, Eric. *Age of Extremes: A History of the World, 1914–1991*.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1994.
- Hoch, Steven L. *Serfdom and Social Control in Russia: Petrovskoje, a Village in Tambov*.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1986.
- Hochschild, Adam. *King Leopold's Ghost: A Story of Greed, Terror, and Heroism in Colonial Africa*. New York: Houghton Mifflin, 1998.
- Hoetzsch, Otto. *Rusland*. Berlin: G. Reimer, 1915.
- Hoffmann, Max. *War Diaries and other Papers*, 2 vols. London: M. Secker, 1929.
- Hollander, Paul. *Political Pilgrims: Western Intellectuals in Search of the Good Society*. New Brunswick, NJ: Transaction, 2004.
- Holmes Larry E., and Burgess, William. "Scholarly Voice or Political Echo? Soviet Party History in the 1920s," *Russian History/Histoire Russe*, 9/1–2 (1982): 378–98.
- Holquist, Peter. "Information Is the Alpha and Omega of Our Work': Bolshevik Surveillance in Its Pan-European Context," *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 69/3 (1997): 415–50.
- . "Anti-Soviet Svodki from the Civil War: Surveillance as a Shared Feature of Russian Political Culture," *Russian Review*, 56/3 (1997): 445–50.
- . "Dilemmas of a Progressive Administrator: Baron Boris Nolde," *Kritika*, 7/2 (2006): 241–73.
- . "State Violence as Technique: The Logic of Violence in Soviet Totalitarianism," in *Modernity and Population Management*, edited by Amir Weiner.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 . "Violent Russia, Deadly Marxism? Russia in the Epoch of Violence, 1905–21," *Kritika*, 4/3 (2003): 627–52.
- . *Making War, Forging Revolution: Russia's Continuum of Crisis, 1914–1921*.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 Hone, Joseph N., and Dickinson, Page L. *Persia in Revolution: With Notes of Travel in the Caucasus*. London: T. Fisher Unwin, 1910.
- Honig, Jan Willem. "The Idea of Total War: from Clausewitz to Ludendorff," in *The Pacific War as Total War*. Tokyo: NIDS International Forum on War History, National Institute for Defence Studies, 2012.
- Hooker, James R. "Lord Curzon and the 'Curzon Line,'" *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 30/2 (1958).
- Horak, Stephen, ed. *Poland's International Affairs, 1919–1960. A Calendar of Treaties, Conventions, and Other International Acts, with Annotations, References, and Selections from Documents and Texts of Treaties*.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64.
- Home, John, ed. *A Companion to World War I*. Chichester, U.K., and Malden, MA: Wiley-Blackwell, 2010.
- Horney, Karen. *Neurosis and Human Growth: The Struggle toward Self-Realization*. New York: W. W. Norton, 1950.
- . *The Neurotic Personality of our Time*. New York: W. W. Norton, 1937.
- Hosking, Geoffrey A. *The Russian Constitutional Experiment: Government and Duma, 1907–1914*.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3.
- . "Patronage and the Russian State," *Slavonic and East European Review*, 78 (2000): 306–13.
- . *Russia: People and Empire, 1552–1917*.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 Hounshell, David. *From the American System to Mass Production, 1800–1932*. Baltimore, MD: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4.
- Howard, Michael. *The Causes of War*.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3.
- . *The First World War*.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 Hughes, J. R. "The Iktusk Affair: Stalin, Siberian Politics and the End of NEP," *Soviet Studies*, vol. 41/2 (1989): 228–53.
- . *Stalin, Siberia, and the Crisis of the New Economic Policy*.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1.
- . "Patrimonialism and the Stalinist System: the Case of S. I. Syrtsov," *Europe-Asia Studies*, 48/4 (1996): 551–68.
- Hughes, Lindsey. *Peter the Great: A Biography*.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2.
- Hull, Isabel V. *Absolute Destruction: Military Culture and the Practices of War in Imperial Germany*.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5.
- . *The Entourage of Kaiser Wilhelm II, 1888–1918*.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2.
- Hullinger, Edward Hale. *The Reforging of Russia*. New York: E. P. Dutton, 1925.
- Hunczak, Taras, ed. *The Ukraine, 1917–1921: A Study in Revolution*. Cambridge, MA: Harvard Ukrainian Research Institute, 1977.
- Hunt, Lynn. *Politics, Culture, and Class in the French Revolutio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4.
- Hynes, A. L., et al., eds. *Letters of the Tsar to the Tsaritsa, 1914–1917*. New York: Dodd, Mead, 1929.
- Iakov Mikhailovich Sverdlov: sbornik vospominanii i statei*. Leningrad: Gosizdat, 1926.
- Iakubovskaia, S. I. *Stroitel'stvo souznogo sovetskogo sotsialisticheskogo gosudarstva, 1922–1925 gg.* Moscow: Akademiia nauk SSSR, 1960.
- Iaroslavsky, E. O. *Tovarišche Staline*. Moscow: OGIZ, 1939.
- Iarov, S. V. "Krest'ianskoe vol'nenie na Severo-Zapade Sovetskoi Rossii v 1918–1919 gg.," in *Krest'ianovedenie, teoriia, istoriia, sovremennois': ezhegodnik*, edited by P. Danilov and T. Shanin. Moscow: Aspekt, 1996.
- Iazhborovskaia, I. S., and Papsadanova, V. C. *Rossia i Pol'sha: sindrom voiny 1920 g.* Moscow: Academia, 2005.
- Ignat'ev, Anatolii V. *Rusko-angliiskie otnosheniia nakanune Oktiabr'skoi revoliutsii, fevral'-oktiabr' 1917 g.* Moscow: Nauka, 1966.
- Ignat'ev, Gennadii S. *Moikva v pervyi god prolesarskoi diktatury*. Moscow: Nauka, 1975.
- . *Oktiabr' 1917 goda v Moikve*. Moscow: Nauka, 1964.

- III *Sibir'skaia partiinaia kraevaiia konferentsiia VKP (b): stenograficheskii otcet*. Novosibirsk: Sibirskraikom VKP (b), 1927.
- Ikonnikova, I. P., and Ugrovatov, A. P. "Stalinskaia repetitsiia nastupleniia na krest'ianstvo," *Voprosy istorii KPSS*, 1991, no. 1: 68–81.
- Ilinikh, Vladimir A. *Khroniki khlebnogo fronta: zagotovitel'nye kampanii kontsa 1920-kh gg. v Sibiri*. Moscow: Rosspen, 2010.
- Ilin-Zhenevskii, Aleksandr F. "Nakanune oktiabria," *Krasnaia letopis'*, 1926, no. 4 (19): 5–26.
- . *The Bolsheviks in Power: Reminiscences of the Year 1918*. London: New Park, 1984.
- Iltarov, B. S. *Tainaia zhizn' Stalina*. Moscow: Veche, 2002.
- Iltarov, S. "Stalin, Strikhi k portretu na fone ego biblioteki i arkhiva," *Novaia i noveishaia istoriia*, 2000, no. 3: 182–205, and no. 4: 152–66.
- Ioffe, A. A. (V. Krymskii). *Genuezskaiia Konferentsiia*. Moscow: Krasnaia nov', 1922.
- . *Mirnye peregovory v Brest-Litovske s 22/9 dekabria 1917 g. po 3 marta (18 fevralia) 1918 g.* Moscow: NKID, 1922.
- Ioffe, Genrikh. "Trest': legendy i fakty," *Novyi zhurnal*, 2007, no. 2047.
- . *Revolutsiia i sud'ba Romanovykh*. Moscow: Respublika, 1992.
- Ioffe, Mariia. *Odna noch': povest' o pravde*. New York: Khronika, 1978.
- Ioffe, Nadezhda. *Vremia nazad: moia zhizn', moia sud'ba, moia epokha*. Moscow: Biologicheskie nauki, 1992.
- Iosif Stalin v ob'iatyakh sem'i: iz lichnogo arkhiva. Moscow: Edition q, 1993.
- Iremashvili, Joseph. *Stalin und die Tragodie Georgiens*. Berlin: Verfasser, 1932.
- Iroshnikov, M. P. "K voprosu o slome burzhuaznoi gosudarstvennoi mashiny v Rossii," in *Problemy gosudarstvennogo stroitel'stva v pervye gody Sovetskoi vlasti: sbornik statei*. Leningrad: Nauka, 1973, 46–66.
- . *Predsedatel' soвета narodnykh komissarov V. I. Ul'ianov (Lenin): ocherki gosudarstvennoi deiatel'nosti v 1917–1918 gg.* Leningrad: Nauka, 1974.
- . *Sozdanie sovetskogo tsentral'nogo gosudarstvennogo apparata*. Moscow: Nauka, 1966.
- Izacs, Harold R. *The Tragedy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 rev. ed.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1.
- Izaev, V. I., and Ugrovatov, A. P. *Pravokhanitel'nye organy Sibiri v sisteme upravleniia regionom, 1920-e gg.* Novosibirsk: Nuaka-Tsentr, 2006.
- Izakh, Aleksandr A. *Tovarishch Absolut*. Moscow: Znanie, 1963, 1973.
- Izkenderov, M. S. *Iz istorii bor'by kommunisticheskoi partii Azerbaidzhana za pobedu sovetskoi vlasti*. Baku: Azer-
- baidzhanskii gosizdat, 1958.
- Iskhod k vostoku*. Sofia: Rossiisko-Bolgarsko knigo, 1921.
- Iskrov, M. V. "O razrabotke V. I. Leninyim prodovol'stvennoi politiki 1918 g.," *Voprosy istorii KPSS*, 1963, no. 7: 74–86.
- Israelin, V. L. "Neopravdavshiisia prognoz graf Mirbakha: Iz istorii antisovetskoi politiki germanskogo imperializma v 1917–1918 gg.," *Novaia i noveishaia istoriia*, 1967, no. 6: 56–65.
- Istoricheskie mesta Tblisi: putevoditel' po mestam sviazannym s zhizn'u i deiatel'nost'u I. V. Stalina*. 2nd ed. Tblisi: GF IML, 1944.
- Istoricheskii ocherk razvitiia tserkovnykh shkol za istekshee dvadsatipiatiletie, 1884–1909*. St. Petersburg: Uchilishchnyi sovet pri Sviateishem synode, 1909.
- Istoriia grazhdanskoi voiny v SSSR*, 5 vols. Moscow: Gosizdat, 1935–60.
- Istoriia kommunisticheskoi partii Sovetskogo Soiuza*. Moscow: Politizdat, 1970.
- Istoriia Moskvy*, 6 vols. Moscow: Akademiia nauk, 1952–59.
- Istoriia natsional'no-gosudarstvennogo stroitel'stva v SSSR 1917–1972*, 2 vols. Moscow: Mysl', 1972.
- Iswolsky, A. P. *Recollections of a Foreign Minister*. New York: Doubleday, 1921.
- Itogi vypolneniia pervogo piatiletnego plana razvitiia narodnogo khoziaistva Soiuza SSR*. Moscow: Gosplan SSSR, 1933.
- Iubileinaia vystavka Krasnykh Armii i Flota, 1918–1923: kratkii putevoditel'*. Moscow: Muzei Krasnykh Armii i Flota, 1923.
- Iudin, V. N. *Lenin pisal v Tsaritsyn: Dokumental'no-publitsisticheskie ocherki*. Volgograd: Nizhne-Volskoe knizhnoe izdatel'stvo, 1985.
- Iuldashbaev, B. Kh., ed. *Obrazovanie Bashkirskoi Avtonomnoi Sovetskoi Sotsialisticheskoi Respubliki: Sbornik dokumentov i materialov*. Ufa: Bashkirskoe knizhnoe izdatel'stvo, 1959.
- Iurovskii, V. E. "Arkhitekto denezhnoi reform 1922–1924," *Voprosy istorii*, 1995, no. 2: 138–43.
- Iurtaeva, E. *Gosudarstvennyi sovet v Rossii (1906–1917 gg.)*. Moscow: Editorial URSS, 2001.
- Iuzefovich, L. *Samoderzhets pustyni: fenomenon sud'by barona R. F. Ungern-Shternberga*. Moscow: Ellis-Bak, 1993.
- Iuzhnyi front (mai 1918–mart 1919), bor'ba sovetskogo naroda s interventami i belogardeitsami na iuge Rossii: sbornik dokumentov*. Rostov-na-Donu: Rostovskoe knizhnoe izd-vo, 1962.
- Ivanov, Anatolii. *Neizvestnyi Dzerzhinskii: fakty i vymysly*. Minsk: Valev, 1994.
- Ivanov, I. E. *Podpol'nye tipografii Leninskoi "Iskry" v Rossii: 1901–1903 gody*. Kishinev: Shtintsia, 1962.
- Ivanov, N. Ia. *Kornilovshchina i ee razrom*. Leningrad: Leningradskii universitet, 1965.
- Ivanov, Vsevolod M., and Shmelev, A. N. *Leninizm i ideino-politicheskii razrom trotskizma*. Leningrad: Lenizdat, 1970.
- Ivanova, Galina M. *Gulag v sisteme totalitarnogo gosudarstva*. Moscow: Moskovskii obshchestvennyi nauchnyi fond, 1997.
- Ivanova, L. V. "Institut Marksa-Engelsa-Lenina: Komissiia po istorii oktiabr'skoi revliutsii i istorii kommunisticheskoi partii (Istpart)," in *Ocherki istorii istoricheskoi nauki v SSSR*, edited by M. V. Nechkina. Moscow: Nauka, 1966.
- Ivanovich, P. "Finliandskie shpioni: delo Pauku i drugie v Voennom tribunale Leningradskogo voenogo okruga," *Sud idet* [Leningrad], 1928, no. 4.
- Iwanski, Gereon, et al., eds. *II Zjazd Komunistycznej Partii Robotniczej Polki, 19.IX–2.X.1923: Protokoly, Obrady, i Uchwaly*. Warsaw: Ksiazka i Wiedza, 1968.
- I Leningradskaiia oblastnaia konferentsiia VKP (b), 15–19 noiabria 1927 goda: stenograficheskii otcet*. Leningrad: VKP (b), 1929.
- III *versossiiskii s'ezd sovetov rabochikh, soldatskikh i krest'ianskikh deputatov*. Petrograd: TsIK, 1918.
- IV *Vsemirnyi kongress Kommunisticheskogo Internationala, 5 noiabria–3 dekabria 1922 g.: izbrannye doklady, rechi i rezolutsii*. Petrograd: Gosizdat, 1923.
- IV *Vserossiiskii s'ezd sovetov rabochikh, soldatskikh, krest'ianskikh, i kazachikh deputatov: Stenograficheskii otcet*. Moscow: Gosizdat, 1919.
- IX s'ezd RKP (b), mart-aprel' 1920: Protokoly*. Moscow: Politicheskaiia literatura, 1960.
- IX konferentsiia RKP (b), sentiabr' 1920 goda: protokoly*. Moscow: Politicheskaiia literatura, 1972.
- "Iz besedy tovarishcha Stalina s nemetskim pisatelem Emilem Liudvigom, 13 Dekabria 1931 g.," *Bol'shevik*, 1932, no. 8: 33–42.
- Iz istorii grazhdanskoi voiny v SSSR: sbornik dokumentov i materialov*, 3 vols. Moscow: Sovetskaia Rossiia, 1960–1.
- "Iz istorii kolektivizatsii 1928 god: poezdka Stalina v Sibir," *Izvestiia TsIK KPSS*, 1991, no. 5: 193–204, no. 6: 202–16, no. 7: 179–86.
- Iz istorii VChK: sbornik dokumentov, 1917–1921 gg.* Moscow: Politizdat, 1958.
- Iziumov, Aleksei S., ed. *Khleb i revoliutsiia: prodovol'stvennaia politika kommunisticheskoi partii i sovetskogo pravitel'stva v 1917–1922 gg.* Moscow: Sovetskaia Rossiia, 1972.
- Izmozik, Vladen S. *Glaza i ushi rezhima: gosudarstvennyi politicheskii kontrol'*

- za naseleniem sovetskoi Rossii v 1918–1928 godakh. St. Petersburg: Sankt-Peterburgskii universitet ekonomiki i finansov, 1995.
- <sup>12</sup> perepiski E. D. Stasovoi i K. T. Novgorodtsevoi (Sverdlovoi), mart-dekaibr' 1918 g., "Voprosy istorii, 1956, no.10, 91–2.
- Izvol'sky, Alexander. *The Memoirs of Alexander Izvol'sky*. London: Hutchinson, 1920.
- "Iz vospominanii I. I. Vatssetsa," *Voenno-istoricheskii zhurnal*, 1962, no. 4.
- "Iz zaiavleniia uchashchikhsia tifliskoi dukhovnoi seminarii ekzarkhu Gruzii, 1 dekabria 1893," in *Lado Ketsokhevi: sbornik dokumentov i materialov*. Tblisi: Sabchota sakartvelo, 1969.
- Jablonowski, Horst. "Die Stellungnahme der russischen Parteien zur Aussenpolitik der Regierung von der russisch-englischen Verständigung bis zum ersten Weltkrieg," in *Forschungen zur osteuropaischen Geschichte*, 5, (1957): 60–92.
- Jacobson, Jon. "Is There a New International History of the 1920s?"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88/3 (1983): 617–45.
- . *When the Soviet Union Entered World Politic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4.
- Jahn, Hubertus F. *Patriotic Culture in Russia during World War I*.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5.
- Janos, Andrew C., and Slottman, William, eds. *Revolution in Perspective: Essays on the Hungarian Soviet Republic of 1919*.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1.
- Jansen, Marc. *A Show Trial Under Lenin: The Trial of the Socialist Revolutionaries, Moscow, 1922*. The Hague and Boston: M. Nijhoff and Kluwer, 1982.
- Jarusch, Konrad H. "Cooperation or Intervention? Kurt Riezler and the Failure of German Ostpolitik, 1918," *Slavic Review*, 31/2 (1972): 381–98.
- . *The Enigmatic Chancellor: Bethmann Hollweg and the Hubris of Imperial Germany*.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2.
- Jasny, Naum. *The Socialized Agriculture of the USSR: Plans and Performance*.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49.
- Jászi, Oscar. *The Dissolution of the Habsburg Monarch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29.
- Jaures, Jean. *L'Organisation socialiste de la France: l'armée nouvelle*. Paris: L'Humanité, 1911.
- Jersild, Austin. *Orientalism and Empire: North Caucasus Mountain Peoples and the Georgian Frontier, 1845–1917*. Montreal. McGill-Queen's University Press, 2002.
- Jervis, Robert. *Perception and Misperception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6.
- Joffe, Maria. *One Long Night: A Tale of Truth*. London: Clapham, 1978.
- Joffe, Nadzhda. *Back in Time: My Life, My Fate, My Epoch*. Oak Park, MI: Labor Publications, 1995.
- Johnson, Gaynor, ed. *Locarno Revisited: European Diplomacy 1920–1929*. London: Routledge, 2004.
- Johnson, Simon, and Temin, Peter. "The Macroeconomics of NEP,"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46/4 (1993): 750–67.
- Jones, David R. "Imperial Russia's Armed Forces at War, 1914–1917: An Analysis of Combat Effectiveness" (1986), in *Military Effectiveness*, ed. by Millet, A. R. and Murray, W., 3 vols. Boston: Allen and Unwin, 1988, I: 249–328.
- . "Nicholas II and the Supreme Command: An Investigation of Motives," *Study Group on the Russian Revolution: Sbornik*, no. 11 (1985): 47–83.
- Jones, Stephen F. "Russian Imperial Administration and the Georgian Nobility: The Georgian Conspiracy of 1832," *Slavonic and East European Review*, 65/1 (1987): 55–76.
- . "The Non-Russian Nationalities," in *Society and Politics in the Russian Revolution*, edited by Robert Service.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92.
- . *Socialism in Georgian Colors: The European Road to Social Democracy, 1883–1917*.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 . "The Establishment of Soviet Power in Transcaucasia: The Case of Georgia, 1921–1928," *Soviet Studies*, 40/4: 616–639.
- Jordania, N. N. "Staline, L'Écho de la lutte" [October 1936], unpublished manuscript in Hoover Institution Archives, Boris Nicolaevsky Collection, box 144, folder 3, 1–2.
- Journal intime de Nicholas II (juillet 1914–juillet 1918). Paris: Payot, 1934.
- Jowitt, Ken. *New World Disorder: The Leninist Extinctio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2.
- Kabuzan, Vladimir M. *Russkie v mire: dinamika chislennosti i rasseleniia (1719–1989): formirovanie etnicheskikh i politicheskikh granits ruskogo naroda*. St. Petersburg: BLITS, 1996.
- . *Izmenenie v razmeshchenii naseleniia Rossii v XVIII-pervoi polovine XIX vv.* Moscow: Nauka, 1971.
- Kacharava, Iu. M., ed. *Bor'ba za uprochnenie sovetskoi vlasti v Gruzii: sbornik dokumentov i materialov (1921–1925 gg.)*. Tblisi: Sabchota Sakartvelo, 1959.
- Kaganovich, L. M. *Pumiatnye zapiski rabocheho, kommunista-bol'shevika, prof-*
- soiuznogo, partinogo i sovetsko-gosudarstvennogo rabotnika*. Moscow: Vagrius, 1996.
- Kahan, Arcadius. *The Plow, The Hammer and the Knout: An Economic History of Eighteenth-Century Russia*.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5.
- Kahn, David. *The Codebreakers: The Story of Secret Writing*. New York: Macmillan, 1967.
- Kak russkii narod zavoerval svobodu: Obzor revoliutsionnykh sobytii*. Petrograd. S. Samoilov, 1917.
- Kakurin, N. E. *Kak vrazhalas' revoliutsiia*, 2 vols. Moscow-Leningrad. Gosizdat, 1925–6.
- . *Russko-pol'skaia kampaniia 1918–1920: politiko-strategicheskii ocherk*. Moscow: Vysshii voenno-redaktsionnyi sovet, 1922.
- . *Razlozhenie armii v 1917 godu*. Moscow-Leningrad: Gosizdat, 1925.
- , and Melikov, V. A. *Voina s belopoliakami 1920 goda*. Moscow: Voenizdat, 1925.
- Kalinin, M. I. *Stalin: sbornik statei k pitaidetiletiu so dnia rozhdeniia*. Moscow-Leningrad: Gosizdat, 1929.
- Kalyvas, Stathis N. *The Logic of Violence in Civil War*.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6.
- Kamenev, Lev B. *Bor'ba za mir: otchet o mirnykh peregovorakh v Breste*. Petrograd: Zhizn' i znanie, 1918.
- . *Sta'i i rech'i*. Leningrad: Gosizdat, 1925.
- Kamenev, Lev. *Mezhdum dvumia revoliutsiiami: sbornik statei*, 2nd ed. Moscow: Novaia Moskva, 1923.
- Kaminskii, V. and Vereshchagin, I. "Detstvo i iunost' vozhdia," *Molodaiia Gvardiia*, no 12, 1939.
- Kann, S. K. "Opyt zheleznodorozhnogo stroitel'stva v Amerike i proektirovanie Transsiba," in *Zarubezhnye ekonomicheskie i kul'turnye svyazi Sibiri (XVII–XX vv.)*, edited by L. M. Goriushkin. Novosibirsk: RAN, Sibirskoe otdelenie, 1995.
- Kanonenko, Veronika. "Kto ubil Mikhail Frunze," *Shpion*, 1994, no. 1 (3): 78–81.
- Kantor, Iulia. *Voina i mir Mikhaila Tukhachevskogo*. Moscow: Ogon'ek, 2005.
- Kantor, R. "K istorii chernykh kabinetov," *Katarga i sylka*, XXXVII (1927).
- Kantorovich, V., and Zaslavskii, D. *Khronika fevral'skoi revoliutsii: fevral'mai 1917*. Moscow: Byloe, 1924.
- Kapchinskii, Oleg. *Gosbezopasnosti iznuzhri: Nacional'nyi i sotsial'nyi sostav*. Moscow: Iauza-Ekmo, 2005.
- Kapitsa, Mikhail S. *Sovetsko-kstaiiskie ornosheniia*. Moscow: Politicheskaiia literatura, 1958.
- Kappeler, Andreas. *The Russian Empire: A Multiethnic History*. Harlow, U.K.:

- Longman, 2001.
- Karacva, T. F., ed. *Direktivny komandovaniia frontov krasnoi armii, 1917-1922 gg.: sbornik dokumentov*, 4 vols. Moscow: Voenizdat, 1971-8.
- Karaganov, A. V. *Lenin: sobranie fotografii i kinokadrov*, 2nd ed., 2 vols. Moscow: Iskusstvo, 1980.
- Kara-Murz, G. S., et al. eds. *Strategiia i taktika Komintern v natsional'no-kolonial'noi revoliutsii na primere Kitaia: sbornik dokumentov*. Institut MKh i MR, 1934.
- Karl, Rebecca. *Staging the World: Chinese Nationalism at the Turn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2.
- Karlner, M. M. "Angliia i Petrogradskaia konferentsiia Antanty 1917 goda," in *Mezhdunarodnye otnosheniia, politika, diplomatiia XVI-XX veka: Sbornik statei k 80-letiiu akademika I. M. Maikogo*, edited by V. V. Al'tman. Moscow: Nauka, 1964.
- Karpinskii, V. A. "Vladimir Il'ich za granitse v 1914-1917 gg.," in *Zapiski instituta Lenina*, 3 vols. Moscow: Institute Lenina pri TsK VKP (b), 1927-8.
- Karpov, Nikolai. *Krestianskoe dvizhenie v revoliutsii 1905 goda v dokumentakh*. Moscow: Gosizdat, 1926.
- Karpovich, Michael. "The Russian Revolution of 1917," *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 2/2 (1930): 258-80.
- . "Two Types of Russian Liberalism: Maklakov and Miliukov," in *Continuity and Change in Russian and Soviet Thought*, edited by Ernest J. Simmon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5.
- Kartevskii, S. I. *Iazyk, voina i revoliutsiia*. Berlin: Russkoe universal'noe izdatel'stvo, 1923.
- Kartunova, A. I. "Kitaiskii vopros v perepiske G. V. Chicherin i L. M. Karakhana," *Novaia i noveishaia istoriia*, 1998, no. 6: 3-18.
- . "Novyi vzgliad na razryv s Chan Kaishi," *Vostok*, 1997, no. 1.
- Katalog Tifliskoi deshevoi biblioteki*, chast' 1. Tiflis, 1896.
- Katkov, George. "German Foreign Office Documents on Financial Support to the Bolsheviks in 1917," *International Affairs*, 32/3 (1956): 181-9.
- . *Russia, 1917: The February Revolution*. New York: Harper & Row, 1967.
- . *The Kornilov Affair: Kerensky and the Breakup of the Russian Army*. New York: Longman, 1980.
- Katsenellenbaum, S. S. *Russian Currency and Banking, 1914-1924*. London: P. S. King, 1925.
- Kaufman, A. E. "Cherry iz zhizni gr. S. lu. Vitte," *Istoricheskii vestnik*, no. 140 (April 1915).
- Kautsky, Karl. *Das Erfurter Programm in seinem grundsatzlichen Teil erlautert*. Berlin-Bad-Godesberg: Verlag J.H.W. Dietz Nachf., 1974.
- . *Georgia, A Social-Democratic Peasant Republic: Impressions and Observations*. London: International Bookshops, 1921.
- Kavkaz: Opisanie kraia i kratkii istoricheskii ocherk ego prisoiedineniia k Rossii*, 3rd ed. Moscow: I. V. Leon't'eva, 1911.
- Kavkaz: spravocnaia kniga storozhila*, 2nd ed., chast' 1. Tiflis: E. G. Meskhi, 1889.
- Kavraiskii, V., and Nusinov, I. *Klasy i klassovaia bor'ba v sovremennoi derevne*. Novosibirsk: Sibkraiizdat, 1929.
- Kavtaradze, A. G. *Voennye spetsialisty na sluzhbe Respubliki sovetov, 1917-1920 g.* Moscow: Nauka, 1988.
- Kazemzadeh, Firuz. *The Struggle for Transcaucasia, 1917-1921*. New York: Philosophical Library, 1951.
- Keegan, John. *The First World War*. New York: Knopf, 1999.
- Keep, John L. H. *The Russian Revolution: A Study in Mass Mobilization*. New York: W. W. Norton, 1976.
- . *The Rise of Social Democracy in Russia*. Oxford: Clarendon, 1963.
- . "1917: The Tyranny of Paris over Petrograd," *Soviet Studies*, 20/1 (1968-9): 22-35.
- . "Light and Shade in the History of the Russian Administration," *Canadian-American Slavic Studies*, 6/1 (1972): 1-9.
- . *Soviet Studies*, 18/3 (1967): 376-80.
- , ed. and trans. *The Debate on Soviet Power: Minutes of the All-Russian Central Executive Committee, Second Convocation*. Oxford, 1979.
- Keiger, John F. V. *Raymond Poincar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
- Keller, V., and Romanenko, I. *Pervye itogi agrarnoi reformy*. Voronezh: Gosizdat, Voronezhskoe orделение, 1922.
- Keller, Werner. *Ost minus West = Null der Aufbau Russlands durch den Western*. Munich-Zurich: Dromersche Verlag-sanstalt Th. Knauer Nachfolger, 1960. Translated as *East minus West = Zero: Russia's Debt to the Western World, 1862-1962*. New York: Putnam, 1962.
- Ken, O. H. *Mobilizatsionnoe planirovanie i politicheskie resheniia, konets 1920-beredina 1930-kh godov*. St. Petesburg: Evropeiskii universitet, 2002.
- Ken, O. N., and Rupasov, A. I. *Politbiuro TsK VKP (b) i otnosheniia SSSR s zapadnymi sosednimi gosudarstvami (konets 20-30-kh gg.): problemy, dokumenty, opyt kommentariia*. St. Petersburg: Evropeiskii dom, 2000.
- Kendirbai, Gulnar. "The Alash Movement," in *The Turks*, edited by Hasan Celal Guzel et al. Ankara: Yeni Turkiye, 2002.
- Kenez, Peter. "Changes in the Social Composition of the Officer Corps during World War I," *Russian Review*, 31/4 (1972): 369-75.
- . "The Ideology of the White Movement," *Soviet Studies*, 32/1 (1980): 58-83.
- . *Civil War in South Russia*, 2 vol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1, 1977.
- . *The Birth of the Propaganda State: Social Methods of Mass Mobilization, 1917-1929*.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5.
- Kennan, George F. "The Sisson Documents," *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 37/2 (1956): 130-54.
- . *Russia and the West Under Lenin and Stalin*. Boston: Little, Brown, 1961.
- . *Russia Leaves the War*.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56.
- . "The Breakdown of the Tsarist Autocracy," in *Revolutionary Russia*, Richard Pipes ed., 1-15.
- . *The Fateful Alliance: France, Russia and the Coming of the First World War*. New York: Pantheon, 1984.
- Kennedy, David. *Over Here: The First World War and American Societ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0.
- Kennedy, Paul M. *The Rise of the Anglo-German Antagonism, 1860-1914*. Boston: George Allen and Unwin, 1980.
- Kennel, Ruth. "The New Innocents Abroad," *American Mercury*, XVII (May 1929).
- Kerenskii, A. F. *Delo Kornilova*. Ekaterinoslav, 1918. Translated as *The Prelude to Bolshevism: The Kornilov Rising*. New York: Dodd, Mead, and Company, 1919.
- Kerensky, Alexander F. "Lenin's Youth — and My Own," *Asia*, 34/2 (1934): 69-74.
- . *The Catastrophe: Kerensky's Own Story of the Russian Revolution*. New York: D. Appleton, 1927.
- . *The Kerensky Memoirs: Russia and History's Turning Point*. New York: Duell, 1965.
- Kern, Stephen. *The Culture of Time and Space, 1880-1918*.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3.
- Kerzhentsev, P. M. *Printipy organizatsii*, 3rd ed. Moscow-Petrograd: Gosizdat, 1924.
- Ketskhoveli, Vano. "Druz'ia i soratniki tovarishcha Stalina," *Rasskazy o Velikom Staline*, kn. 2. Tblisi: Zaria vostoka, 1941.
- . "Iz vospominanii o Lado Ketskhoveli," *Zaria vostoka*, August 17, 1939.
- . "Na zare sozdania partii rabochego klassa," *Zaria vostoka*, July 17, 1939.

- Keyes, Ralph. *The Quote Verifier: Who Said What, Where, and When*. New York: Macmillan, 2006.
- Keynes, J. M. *The 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the Peace*. London: Macmillan, 1919.
- Khachapuridze, G. "Gruzii vo vtoroi polovine XIX veka." *Istoriik Marksist*, 1940, no. 8: 46-66.
- Khadzhev, Khan. *Velikii boiar*. Belgrade: M. A. Suvorin, 1929.
- Khalid, Adeeb. "Tashkent 1917: Muslim Politics in Revolutionary Turkestan." *Slavic Review*, 55/2 (1996): 270-96.
- . *The Politics of Cultural Reform: Jadidism in Central Asi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8.
- Kharmandanian, Segvard V. *Lenin i stanovlenie Zakavkazskoi federatsii, 1921-1923 gg.* Yerevan: Aiasgan, 1969.
- Khaustov, V.N., et al., eds. *Lubianka: Stalin i VChK-GPU-OGPU-NKVD, ianvar' 1922-dekabr' 1936*. Moscow: Mezhdunaordnyi fond demokratsii, 2003.
- Khavin, A. F. *U rulia industrii*. Moscow: Politizdat, 1968.
- Khelemskii, Iu. S.. "Soveshchanie v Sovnarkome o gosapparate [1923 g.]." *Sovetskoe gosudarstvo i pravo*, 1990, no. 9: 111-12.
- Khinchuk, L. M. *K istorii anglo-sovieskikh otnošenii*. Moscow: Gosizdat, 1928.
- Khlevniuk, Oleg V. *In Stalin's Shadow: The Career of "Sergo" Ordzhonikidze*. Armonk, NY: M. E. Sharpe, 1995.
- . *Master of the House: Stalin and His Inner Circle*.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9.
- . *Politbiuro: mekhanizmy politicheskoi vlasti v 30-e gody*. Moscow: Rosspen, 1996.
- , et al., eds. *Stalinskoe politburo v 30-e gody: Sbornik dokumentov*. Moscow: AIRO-XX, 1995.
- Khmel'kov, Andrei I., ed. *K. E. Voroshilov na Tsaritsynskom fronte: sbornik dokumentov*. Stalingrad: Stalingradskoe oblastnoe knizhnoe izdatel'stvo, 1941.
- , ed. *Stalin v Tsaritsyne: sbornik statei i dokumentov*. Stalingrad: Stalingradskoe oblastnoe knizhnoe izdatel'stvo, 1939.
- Khoshtaria-Brose, Edisher V. *Ocherki sotsial'no-ekonomicheskoi istorii Gruzii: promyshlennost', goroda, rabochii klass (XIX v.-nachalo XX v.)*. Tblisi: Metsniereba, 1974.
- Khromov, S. S. *Po stranitsam lichnogo arkhiva Stalina*. Moscow: Moskovskii gos. universitet, 2009.
- Khromov, S. S., and Kuibysheva, G. V. *Valerian Vladimirovich Kuibyshev: biografii*. Moscow: Politicheskaiia literatura, 1988.
- Khromov, Semen S. *Leonid Krasin: neizvestnye stranitsy biografii, 1920-1926 gg*. Moscow: Insitut Rossiiskoi istorii RAN, 2001.
- Khrushchev, Nikita. *Khrushchev Remembers*. Boston: Little, Brown, 1970.
- . *Memoirs*, 4 vols. University Park, PA: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2004-7.
- . "Secret Speech to 20th Congress CPSU," in *The Anti-Stalin Campaign and International Communism: A Selection of Document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Russian Institute, 1956.
- Kilcoyne, Martin. "The Political Influence of Rasputin." Phd diss.,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1961.
- Kim, M. P., ed. *Istoriia Sovetskogo krest'ianstva i kolhoznoho stroitelstva v SSSR: materialy nauchnoi sessii, sostoiavsheia 18-21 aprilia 1961 g v Moskve*. Moscow: Akademiia nauk SSSR, 1963.
- Kimitaka, Matsuzato. "Soryokusensoto chihorochoi: daichiji sekaitaisenki roshia no shokuryojigyo to nojishido." Phd diss., Tokyo University, 1995.
- Kin, D., and Sorin, V., eds. *Sedmoi izhd. mart 1918 goda*. Moscow: Gosizdat, 1928.
- Kindleberger, Charles P. *The World in Depression, 1929-1939*.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6.
- King, Charles. *The Ghost of Freedom: A History of the Caucasu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 Kingston-Mann, Esther. "Deconstructing the Romance of the Bourgeoisie: A Russian Marxist Path Not Taken."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10/1 (2003): 93-117.
- . "Lenin and the Beginnings of Marxist Peasant Revolution: The Burden of Political Opportunity July-October, 1917." *Slavonic and East European Review*, 50 (1972): 578-88.
- Kirby, D. G. *War, Peace, and Revolution: International Socialism at the Crossroads, 1914-1918*. Aldershot, UK: Glower, 1986.
- Kir'ianov, Iu. I. *Pravye partii v Rossii, 1911-1917*. Moscow: Rosspen, 2001.
- , ed. *Pravye partii: dokumenty i materialy, 1905-1917*, 2 vols. Moscow: Rosspen, 1998.
- Kirilina, Alla. *Neizvestnyi Kirov: mify i real'nost'*. Moscow: Olma, 2001.
- Kirillov, V. S., and Sverdlov, A. Ia. *Grigorii Konstantinovich Ordzhonikidze (Sergo): biografii*. Moscow: Politicheskaiia literatura, 1962.
- Kirion, Episkop. *Kratkii ocherk istorii Gruzinskoii tserkvi i ekzharkhata*. Tiflis: K. P. Kozlovskii, 1901.
- Kislitsyn, S. A. *Shakhtinskoe delo: nachalo stalinskikh represii protiv nauchno-tekhnikeskoi intelligentsia v SSSR*. Roston-na-Donu: NMTs Logos, 1993.
- Kitanina, T. M. *Voina, khleb i revoliutsiia. Prodovol'stvennyi vopros v Rossii 1914-oktiabr' 1917 g.* Leningrad: Nauka, 1985.
- Kitchen, Martin. *The Silent Dictatorship: The Politics of the German High Command under Hindenburg and Ludendorff, 1916-1918*. New York: Holmes & Meier, 1976.
- Kizevetter, A. A. "Moda na sotsializm." *Russkie vedomosti*, June 25, 1917.
- Klante, Margarete. *Von der Wolga zum Amur: Die tschechische Legion und der russische Burgerkrieg*. Berlin: Ost-Europa Verlag, 1931.
- Klement'ev, Vasilii F. *V Bol'shevitskoi Moskve (1918-1920)*. Moscow: Russkii put', 1998.
- Klemm, Max, ed. *Was sagt Bismarck dazu?*, 2 vols. Berlin: A Scherl, 1924.
- Klepikov, S. A. *Statisticheskii spravochnik po narodnomu khoziaistvu*, vyp. 2. Moscow: Gosudarstvennoe izdatel'stvo, 1923.
- Klier, John Doyle. *Russia Gathers Her Jew: The Origins of the "Jewish Question" in Russia, 1772-1825*. Dekalb: Nor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Press, 1986.
- Kliuev, Leonid. *Bor'ba za Tsaritsyn 1918-1919 gg.* Moscow-Leningrad: Gosizdat, otdel voennoi literatury, 1928.
- Klyuchevskiy, Vasilii. *Peter the Great*. Boston: Beacon, 1958.
- Knei-Paz, Baruch. *The Social and Political Thought of Leon Trotsky*. Oxford: Clarendon, 1978.
- Knobler, S., et al., eds. *The Threat of Pandemic Influenza: Are We Ready? Workshop Summary*. Washington, D.C.: The National Academies Press, 2005.
- Knox, Alfred. "General V. A. Sukhomlinov." *Slavonic Review*, 5/13 (1926): 148-52.
- . *With the Russian Army, 1914-1917: being chiefly extracts from the diary of a military attaché*, 2 vols. New York, Dutton, 1921.
- Kochan, Lionel. "Kadet Policy in 1917 and the Constituent Assembly." *Slavonic and East European Review*, 45 (1967): 183-92.
- Kocharovskiy, K. "Aleksandr Arkadievich Kaufman," in *Encyclopedia of the Social Sciences*, edited by Edwin Seligman and Alvin Johnson. New York: Macmillan, 1948.
- Koda, Yoiji. "The Russo-Japanese War: Primary Causes of Japanese Success." *Naval War College Review*, 58/2 (2005): 10-44.
- Koehl, Robert Lewis. "A Prelude to Hitler's Greater Germany."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59/1 (1953): 43-65.
- Koenker, Diane. *Moscow Workers and the 1917 Revolution*.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1.
- , et al., eds. *Parry, State, and Society in the Russian Civil War: Explora-*

- tions in Social History.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0.
- . ed. *Revelations from the Russian Archives: Documents in English Translation*. Washington, D.C.: Library of Congress, 1997.
- Kofod, A. A. *Russkoe zemleuстроitvo*, 2nd ed. St. Petersburg: Sel'skii vestnik, 1914.
- Kokovtsov, Vladimir N. *Iz moego proshlogo: vospominaniia, 1903–1919*, 2 vols. Paris: Privately published, 1933.
- . *Out of My Past*. Stanford, CA: Hoover Institution Press, 1935.
- Kol'tsov, M. E. *Izbrannoe*. Moscow: Moskovskii rabochi, 1985.
- Kolesnichenko, I. "K voprosu o konflikte v Revvoensovete Iuzhnogo fronta (sentiabr'—oktiabr' 1918 goda)," *Voenno-istoricheskii zhurnal*, 1962, no. 2.
- , and Lunin, V. "Kogda zhe byl uchrezhden institut voennykh komissarov Krasnoi Armii?" *Voenno-istoricheskii zhurnal*, 1961, no. 9.
- Kolesnik, Aleksandr. *Khronika zhizni sem'i Stalina*. Moscow: IKRA, 1990.
- Kolodnyi, Lev. *Kitai-gorod: avtorskii putevoditel'*. Moscow: Golos-Press, 2004.
- Kolonitskii, Boris I. "'Democracy' in the Consciousness of the February Revolution," *Slavic Review*, 57/1 (1998): 95–106.
- . "Anti-Bourgeois Propaganda and anti-'Burzhui' Consciousness in 1917," *Russian Review*, 53/2 (1994): 183–96.
- . "Kerensky," in *Critical Companion to the Russian Revolution 1914–1921*, ed. by Edward Acton, et al.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7.
- . "Pravoekstremistskie sily v marte-oktiabre 1917 g. (na materialakh petrogradskoi pečati)," *Natsional'naiia pravuaia prezhde i teper': istoriko-sotsiologicheskie ocherki*, edited by O. T. Vite. 3 vols. in 7. St. Petersburg: Institut sotsiologii Rossiiskoi Akademii nauk, Sankt-Peterburgskii filial, 1992.
- . *Symvoly vlasti i bor'ba za vlast': K izucheniiu politicheskoi kul'tury Rossiiskoi revoliutsii 1917 goda*. St. Petersburg: Dmitrii Bulanin, 2001.
- Koloskov, V. V. *XIII konferentsiia RKP (b)*. Moscow: Vysshiaia shkola, 1975.
- Komarov, N. S. "K istorii instituta Lenina i tsentral'nogo partiinogo arkhiva 1919–1931 gg.," *Voprosy istorii*, 1956, no. 10: 181–91.
- . "Sozdanie i deiatel'nost' Istparta KPSS, 1958, no. 5: 153–65.
- Komintern i Vostok: bor'ba za leninskuiu strategiiu i taktiki v natsional'no osvoboditel'nom dvizhenii*. Moscow: Vostochnaia literatura, 1969.
- Kommunisticheskaia partiia Sovetskogo Soiuza v rezoiliussiiakh i resheniiakh s'ezdov, konferentsii i plenumov TsK, 1898–1986*, 15 vols., 9th ed. Moscow: Politicheskaiia literatura, 1983–.
- Kommunisticheskaiia partiia Sovetskogo Soiuza v rezoliutsiiakh i resheniiakh s'ezdov, konferentsii i plenumov TsK*, 8th ed., 13 vols. Moscow: Politicheskaiia literatura, 1970.
- Kommunisticheskii internatsional: kratkii istoricheskii ocherk*. Moscow: Politizdat, 1969.
- Kondratenko, E. *Kratkii ocherk ekonomicheskogo polozenia Kavkaza po noveishim ofitsial'nym i drugim ochemam: prilozhenie k Kavkazskomu kalendaru (na 1888 g.)*. Tiflis: [s.n.], 1888.
- Kondrat'ev, Nikolai. *Rynok khlebov i ego regulirovanie vo vremia voiny i revoliutsii*. Moscow: Novaia derevnia, 1922.
- Koniukhov, Grigorii A. *KPSS v bor'be s khlebnymi zatrudneniami v strane 1928–1929 gg.* Moscow: Sotsial'no-ekonomicheskaiia literatura, 1960.
- Korbel, Josef. *Poland Between East and West: Soviet and German Diplomacy toward Poland, 1919–1933*.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3.
- Korbut, M. "Uchet departamentom politicii opyta 1905 goda," *Krasnyi arkhiv*, 18 (1926): 219–27.
- Korkunov, N. M. *Russkoe gosudarstvennoe pravo*. St. Petersburg: M. M. Stasiulevich, 1901.
- Kornakov, P. K. "Opyt privlecheniia veksilologicheskikh pamiatnikov dlia resheniia geraldicheskikh problem," *Novye numizmaticheskie issledovaniia*, no. 4, Trudy Gosudarstvennogo Istoricheskogo muzeia, 1986, vyp. 61: 134–48.
- . "Znamena Fevral'skoi revoliutsii," *Geraldika: materialy i issledovaniia: sbornik nauchnykh trudov*, edited by G. V. Vilinbakhov Leningrad: Gos. Ermitazh, 1983.
- Kornatovskii, Nikolai A. *Razgrom kontr-revoliutsionnykh zagovorov v Petrograde v 1918–1919 gg.* Leningrad, Lenizdat, 1972.
- . *Stalin—rukovoditel' oborony Petrograda, vesna-letu 1919 goda*. Leningrad: Gazetno-zhurnal'noe i knizhnoe izd-vo Leningradskogo soveta RK i KD, 1939.
- Koroleva, V. V. "Deiatel'nost' V. I. Lenina po organizatsii dostavki 'Iskry' v Rossiui (dekabr' 1900 g.—noiabr' 1903 g.)," *Trudy Kazanskogo aviatsonnogo instituta*, vyp. 54 (1962). 17–30.
- Korotyshevskii, Viktor. "Garazh osobogo znachenii," *Proza*, May 27, 2009. Found at <http://www.proza.ru/2009/05/27/581>.
- Korros, Alexandra. *A Reluctant Parliament: Stolypin, Nationalism, and the Politics of the Russian Imperial State Council, 1906–1911*. Lanham, MD: Rowman and Littlefield, 2002.
- Korzikhina, T. P., and Figatner, Iu. "Sovetskaiia nomenklatura: stanovlenie, mekhanizmy, deistviia," *Voprosy istorii*, 1993, no. 7: 25–38.
- Korzikhina, T. Z. "Obshchestvo starykh Bol'shevikov (1922–1935)," *Voprosy istorii KPSS*, 1989, no. 11: 50–65.
- Kosachev, V. G. "Nanakune kollektivizatsii: poezdka I. V. Stalina v Sibir'," *Voprosy istorii*, 1998, no. 5.
- Kosheleva, L., et al. *Pisma I. V. Stalina V.M. Molotovu, 1925–1936 gg.: sbornik dokumentov*. Moscow, Rossiia molodaia, 1995.
- Kostin, N.D. *Vystrel v serdtshe revoliutsii*. Moscow: Politizdat, 1989.
- Kostiushko, I. I. *Pol'koe biuro TsK RKP (b) 1920–1921 gg.* Moscow: RAN Institut slavianovedeniia, 2005.
- Kostiushko, Ivan, ed. *Pol'ko-Sovetskaiia voina 1919–1920 gg.: ranee neopublikovanye dokumenty i materialy*, 2 vols. Moscow: Institut slavianovedeniia i balkanistiki RAN, 1994.
- Kostrikova, A. M., and Kostrikova, E. M. *Eto bylo v Urzhume*. Kirov, 1962.
- Kotel'nikov, K. G., ed. *Vioroi vershiiskii s'ezd sovetov R i S.D.* Moscow-Leningrad: Gosizdat, 1928.
- Kotel'nikov, K. G., and Mueller, V. L., eds. *Krest'ianskoe dvinzhenie v 1917 godu*. Moscow-Leningrad: Gosizdat, 1927.
- Kotkin, Stephen. "Left Behind: Is Eric Hobsbawm History?" *New Yorker*, September 29, 2003.
- . "Modern Times: the Soviet Union and the Interwar Conjunction," *Kritika*, 2/1 (2001): 111–64.
- . *Magnetic Mountain: Stalinism as a Civilizatio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1995.
- Kotsonis, Yanni. *Making Peasants Backward: Managing Populations in Russian Agricultural Cooperatives, 1861–1914*.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90.
- Kotyrev, Andrei N. *Mavzolei V. I. Lenina: proektirovanie i stroitel'stvo*. Moscow: Sovetskii khudozhnik, 1971.
- Kournakoff, Sergei. *Savage Squadrons*. Boston and New York: Hale, Cushman, and Flint: 1935.
- Kozhevnikova, V. "Gody staroi Iskry: 1901–1902 gg.," *Proletarskaia revoliutsiia*, 1924, no. 3 (26): 133–41.
- Kozlov, V. A., and Semenova, E. A. "Sotsiologiiiia detstva: obzor sotsial'no-pedagogicheskikh obsledovani 20-x godov," *Shkola i mir kul'tury etnosov*. Moscow, 1993, vyp. 1.
- Kramer, Alan. *Dynamic of Destruction: Culture and Mass Killing in the First World War*.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 Krasil'nikov, S. A., ed. *Shakhtinskii prot-*

- ses 1928 g: podgotovka, provedenie, itogi, 2 vols. Moscow: Rosspen, 2011.
- , et al., eds. *Intelligentsia, obshchestvo, vlast': opyt vzaimootnosheni, 1917-konets 1930 gg.* Novosibirsk: RAN, Sibinskoe otdelenie, 1995.
- Krasin, Leonid. *Voprosy vneshnei torgovli* Moscow: Gosizdat, 1928.
- Krasnaia Moskva, 1917–1920 gg. Moscow: Moskovskii sovet, 1920.
- Krasnov, Valerii G., and Daines, V., eds. *Neizvestnyi Trotskii: krasnyi Bonapart: dokumenty, mneniia, razmyshleniia.* Moscow: Olma, 2000.
- Krastins, J. ā nis, ed. *Istoriia Latvishkikh strelkov, 1915–20.* Riga: Zinatne, 1972.
- Kratkaia istoriia grazhdanskoi voiny v SSSR. Moscow: Politicheskaiia literatura, 1962.
- Kravchenko, Victor. *I Chose Freedom: The Personal and Political Life of a Soviet Official.* New York: Scribner's, 1947.
- Kreindler, Isabelle. "A Neglected Source of Lenin's Nationality Policy," *Slavic Review*, 36/1 (1977): 86–100.
- Krementsov, Nikolai. *A Martian Stranded on Earth.*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1.
- Krivitsky, Walter G. *In Stalin's Secret Service.* New York: Harper & Bros., 1939.
- . *I Was Stalin's Agent.* London: H. Hamilton, 1939.
- Krivoshchev, G. F., ed. *Grif sekretnosti sniat.* Moscow: Voennoizdat, 1993.
- . *Rossii i SSSR v voynakh XX veka: Poteri voozruzhennykh sil, statisticheskoe issledovanie.* Moscow: Olma, 2001.
- Kronstadtskaia tragediia 1921 g: dokumenty, 2 vols. Moscow: Rosspen, 1999.
- Krumin, Garal'd I. *Shakhtinskii protest.* Moscow-Leningrad: Moskovskii rabochii, 1928.
- Krupskaia, N. K. *Izbrannye proizvedeniia.* Moscow: Politicheskaiia literatura, 1988.
- . *O Lenine: sbornik statei i vystuplenii.* Moscow: Politicheskaiia literatura, 1965.
- . "Poslednie polgoda zhizni Vladimira Il'icha (3 fevralia 1924 goda)," *Izvestsia TiK KPSS*, 1989, no. 4: 169–78.
- Krupskaya, N. K. *Memories of Lenin.* 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n.d. [1930]
- . *Reminiscences of Lenin.* Moscow: Progress, 1959.
- Krylenko, Nikolai V. *Sudoustroistvo RSFSR. lektsii po teorii i istorii sudoustroistva.* Moscow: Iuridicheskoe izdatel'stvo NKIU, 1924.
- , ed. *Ekonomicheskaiia kontr-revolutsiia v Donbasse: itogi shakhtinskogo dela, star'i i dokumenty.* Moscow: Iuridicheskoe izdatel'stvo NKIU RSFSR, 1928.
- Kryzhanovskii, Sergei E. *Vospominaniia iz bumag S. E. Kryzhanovskogo, posledniogo gosudarstvennogo sekretaria Rossiiskoi imperii.* Berlin: Petropolis, 1938.
- Krzhizhanovskii, G. M. *Desiat' let khoziaistvennogo stroitel'stva v SSSR, 1917–1927.* 2nd ed. Moscow: Gosplan, 1927.
- Ksenofontov, F. A. *Lenin i imperialisticheskaia voina 1914–1918 gg.: k desiatiletiiu imperialisticheskoi voiny.* Tashkent: Sredne-aziatskoe biuro, 1924.
- Kshesinskaia, M. *Vospominaniia.* Moscow: ART, 1992.
- Kudelli, Praskov'ia. F., ed. *Pervyi legal'nyi Peterburgskii komitet bol'shevikov v 1917 godu: sbornik materialov i protokolov zasedanii.* Moscow and Leningrad: Gosizdat, 1927.
- Kudiukhina, M. M. "Krasnaia armiiia i 'voennye trevogi' vtoroi poloviny 1920-kh godov," *Rossii i mir glazami druga druga: iz istorii vzaimovospriiatii.* Moscow: IRI RAN, 2007, 153–74.
- Kudriashov, Sergei, ed. *Krasnaia armiiia v 1920-e gody.* Moscow: Vetsnik arkhiva prezidenta Rossiiskoi Federatsii, 2007.
- Kuibyshev, V. V. *Epizody iz moei zhizni.* Moscow: Staryi bol'shevik, 1935.
- Kuibysheva, Elena. *Valerian Vladimirovich Kuibyshev, 1888–1935: iz vospominanii sestry.* Moscow: Politicheskaiia literatura, 1938.
- Kuibysheva, G. V. *Valerian Vladimirovich Kuibyshev: biografiia.* Moscow: Politicheskaiia literatura, 1966.
- Kukushkin, Iu. S. *Rezhim lichnoi vlasti Stalina. k istorii formirovaniia.* Moscow: Moskovskii universitet, 1989.
- Kuleshov, Sergei. "Lukolov mir." *Rodina*, 1991, no. 9–10: 72–5.
- Kulikov, S. "Vremennoe pravitel'stvo i vysshiaia tsarskaia biurokratiia," *The Soviet and Post-Soviet Review*, 24/1–2 (1997): 67–83.
- Kul'sharipov, M. M. Z. *Valudov i obrazzovanie Bashkirskoi Avtonomnoi Sovetskoi Respubliki (1917–1920 gg.)* Ufa: Bashkirskoe knizhnoe izdatel'stvo, 1992.
- Kumanev, V. A., and Kulikova, I. S. *Prosvostoianie: Krupskaiia-Stalin.* Moscow: Nauka, 1994.
- Kun, Miklos. *Bukharin: ego družia i vragi.* Moscow: Respublika, 1992.
- . *Stalin: An Unknown Portrait.* Budapest: Central European University Press, 2003.
- Kuromiya, Hiroaki. "The Crisis of Proletarian Identity in the Soviet Factory, 1928–1929," *Slavic Review*, 44/2 (1985): 280–97.
- . "The Shakhty Affair," *South East European Monitor*, 4/2 (1997): 41–64.
- . *Freedom and Terror in the Donbas: A Ukrainian-Russian Borderland, 1870–1990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 . *Stalin.* New York: Pearson/Longman, 2005.
- . *Stalin's Industrial Revolution: Politics and Workers, 1928–1932.*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8.
- Kuropatkin, A. N. *The Russian Army and the Japanese War*, 2 vols. London: J. Murray, 1909.
- Kurtzman, Charles. *Democracy Denied, 1905–1915: Intellectuals and the Fate of Democracy.*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 Kuusinen, Aino. *Rings of Destiny: Inside Soviet Russia from Lenin to Brezhnev.* New York: Morrow, 1974.
- Kuusinen, Otto. *Neudavshetsia izobrazhenie "nemetskogo Oktjabria": po povodu "Uroki Oktjabria" Trotskogo.* Leningrad: Gosizdat, 1924.
- Kuvazhin, A. I. *Dorogami neskonchaemykh bitv.* Kiev: Politicheskaiia literatura Ukrainy, 1982.
- Kuz'min, N. F. *Krushenie poslednego pokhoda Antanty.* Moscow: Politicheskaiia literatura, 1958.
- . "Ob odnoi ne vypolnennoi dikertive glavkoma," *Voenno-istoricheskii zhurnal*, 1962, no. 9: 49–66.
- Kuz'min, S. *Pod gnetom svobod (Zapiski nationalisty).* St. Petersburg: M. Alekneva, 1910.
- Kuz'min, Sergei L., ed. *Baron Ungern v dokumentakh i memuarakh.* Moscow: KMK, 2004.
- . *Istoriia barona Ungerna: opyt rekonstruktskii.* Moscow: KMK, 2011.
- Kuz'min, V. I. *Istoriicheskii opyt sovetskoi industrializatsii.* Moscow: Mysl', 1969.
- Kvakin, A. V., ed. *Okrest Kolchaka: dokumenty i materialy.* Moscow: AGRAF, 2007.
- Kvashonkin, A. V., ed. *Bol'shevitskoe rukovodstvo: perepiska, 1912–1927.* Moscow: Rosspen, 1996.
- Kvinitadze, G. I. *Moi vospominaniia v gody nezavisimosti Gruzii 1917–1921.* Paris: YMCA, 1985.
- Lado Ketskhoveli: *Sbornik dokumentov i materialov.* Tblisi: Sabchota Sakartvelo, 1969.
- LaFeber, Walter. *The Clash: A History of U.S.-Japanese Relations.* New York: W. W. Norton, 1997.
- Lakoba, Stanislav. "La Koba, a ty Lakoba," in *Moe serdse v gorakh ocherki o sovremennoi Abkhazii*, edited by Fasil Iskander. Ypskar Ola, 2001: 50–78.
- Lambert, Nicholas A. *Planning Armageddon. British Economic Warfare and the First World War.*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2.
- Lamzdorf, V. N. *Dnevnik, 1891–1892.* Moscow: Akademiia, 1934.
- Landa, R. G. "Mirsaid Sultan-Galiev," *Voprosy Istoriia KPSS*, 1999, no. 8: 53–70.

- Landis, Erik C. *Bandits and Partisans: The Antonov Movement in the Russian Civil War*. Pittsburgh: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Press, 2008.
- Lang, D. *Roots of Russian Communism: A Social and Historical Study of Russian Social-Democracy, 1898–1907*. Assen: Van Gorcum, 1969.
- Lang, David Marshall. *A Modern History of Soviet Georgia*. New York: Grove Press, 1962.
- . *The Last Years of the Georgian Monarchy, 1658–1832*.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57.
- Lapin, N., ed. "Progressivnyi blok v 1915–1917 gg.," *Krasnyi arkhiv*, 56 (1933): 80–135.
- Laporte, Maurice. *Histoire de l'Okhrana, la police secrète des tsars, 1880–1917*. Paris: Payot, 1935.
- Lappo, D. *Iosif Vareikis*. Moscow: Politicheskaiia literatura, 1966.
- Larin, Iurii. "Ukolybeli," *Narodnoe khoziaistvo*, 1918, no. 11.
- . *Sovetskaia derevnia*. Moscow: Ekonomicheskaiia zhizn', 1925.
- Larina, Anna. "Nezabyvaemo," *Znamia*, 1988, no. 11.
- . *This I Cannot Forget: The Memoirs of Nikolai Bukharin's Widow*. New York: W. W. Norton, 1993.
- Larsons, M. J. *Im Sowjet-Labyrinth*. Berlin: Transmare Verlag, 1931.
- Laruelle, Marlene. *L'ideologie eurasiiste russe, ou Comment penser l'empire*. Paris: L'Harmattan, 1999.
- Latsis, M. *Chrezvychainye komissii po bor'be s kontr-revoliutsiei*. Moscow: Gosizdat, 1921.
- . *Ochet VChK za chetyre goda ee deiatel'nosti, 20 dekabria 1917–20 dekabria 1921 g.* Moscow: VChK, 1922.
- . "Vozniknoveniie Narodnogo kommissariata vnutrennikh del i organizatsiia vlasti na mestakh," *Proletarskaia revoliutsiia*, 1925, no. 2 (37): 136–59.
- Laryshev, A. G. *Rassekrechennyi Lenin*. Moscow: Izd-vo Mart, 1996.
- Lauchlan, Iain. "The Accidental Terrorist: Okhrana Connections to the Extreme-Right and the Attempt to Assassinate Sergei Witte in 1907," *Revolutionary Russia*, 14/2 (2001): 1–32.
- . "Young Felix Dzerzhinsky and the Origins of Stalinism." [http://www.ed.ac.uk/polopoly\\_fs/1.124547!/fileManager/wp-iain-lauchlan-YoungFelix.pdf](http://www.ed.ac.uk/polopoly_fs/1.124547!/fileManager/wp-iain-lauchlan-YoungFelix.pdf)
- . *Russian Hide-and-Seek: The Tsarist Secret Police in St. Petersburg, 1906–1914*. Helsinki: Suomalaisen Kirjallisuuden Seura/Finnish Literature Society, 2002.
- Lawton, Lancelot. *An Economic History of Soviet Russia*, 2 vols. London: Macmillan, 1932.
- . *The Russian Revolution, 1917–1926*. London: Macmillan, 1927.
- Lazarski, Christopher. "White Propaganda Efforts in the South during the Russian Civil War, 1918–19: The Alekseev-Denikin Period," *Slavonic and East European Review*, 70/4 (1992): 688–707.
- League of Nations, *Records of the . . . Assembly, Plenary Meetings*, 26 vols. Geneva: Publications Department of the League of Nations, 1920–46.
- Lebedev, M. "Sostoianie i perspektivy razvitiia elevatornogo khoziaistva v sibkrae," *Zhizn' sibiri*, 1928, no. 2.
- Le Donne, John P. *The Russian Empire and the World 1700–1917: The Geography of Expansion and Containment*.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 . *Absolutism and Ruling Class: The Formation of the Russian Political Order, 1700–1825*.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 . *The Russian Empire and the World, 1700–1917: The Geopolitics of Expansion and Containment*.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 Lee, Hermione. *Virginia Woolf's Nose: Essays on Biography*.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5.
- Lee, John. *The Warlords: Hindenburg and Ludendorff*. London: Weidenfeld & Nicolson, 2005.
- Leggett, George. *The Cheka: Lenin's Political Police*. Oxford: Clarendon, 1981.
- Lehovich, Dimitry V. *White Against Red: The Life of General Anton Denikin*. New York: W. W. Norton, 1974.
- Lelashvili, G. "Lado Ketskhoveli, besstrashnyi revoliutsioner," *Rasskazy o Velikom Staline*, kn. 2. Tblisi: Zaria vostoka, 1941.
- Lelevich, G. (L. G. Kal'manson.) *Oktiabr' v stavke*. Gomel: Ispart, 1922.
- Lemke, Mikhail. *250 dnei v tsarskoi stavke (25 sentabria 1915–2 iiulia 1916)*. Petersburg: Gosudarstvennoe izdatel'stvo, 1920.
- Lenzowski, George. *Russia and the West in Iran, 1918–1948*.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49.
- Lenin v pervye mesiatsy sovetsskoi vlasti: sbornik statei i vospominanii. Moscow: Partizdat, 1933.
- Lenin v vospominaniiakh chekistov. Moscow: Pogranchnik 1969.
- Lenin, V. I. *Collected Works*, 45 vols. Moscow: Foreign Languages Pub. House, 1960–70.
- . *Lenin o Trotskom i trotskizme*. Moscow: Novaia Moskva, 1925.
- . *Leninskie dekrety o Moskve*. Moscow: Moskovskii rabochii, 1978.
- . *Pol'noe sobranie sochinenii (PSS)*, 5th ed., 55 vols. Moscow: Politicheskaiia literatura, 1958–65. Cited as PSS (author understood).
- . *Sobranie sochinenii*, 20 vols. Moscow-Leningrad: Gosizdat, 1920–6.
- . *Sobranie sochinenii*, 2nd and 3rd eds., 30 vols. Moscow-Leningrad: Gosizdat, 1925–32.
- . *Sobranie sochinenii*, 4th ed, 45 vols. Moscow: Politicheskaiia literatura, 1941–67.
- . *V. I. Lenin: neizvestnye dokumenty: 1891–1922*. Moscow: Rosspen, 1999.
- . *Selected Works*, 3 vols. Moscow: Progress, 1975.
- Leninskii sbornik, 40 vols. Moscow: Gosizdat, 1924–85.
- Lenoe, Matthew E. "Agitation, Propaganda, and the 'Stalinization' of the Soviet Press, 1922–1930," *Carl Beck Papers*, no. 1305, 1998.
- Lensen, George A. "Japan and Tsarist Russia: The Changing Relationship," *Jahrbucher fur geschichte Osteuropas*, 10/3 (1962): 337–49.
- Lensen, George Alexander. *Japanese Recognition of the USSR: Japanese-Soviet Relations, 1921–1930*. Tallahassee, FL: Diplomatic Press, 1970.
- Leonard, Raymond W. *Secret Soldiers of the Revolution: Soviet Military Intelligence, 1918–1933*. Westport, CT: Greenwood Press, 1999.
- Leonidov, I., and Reikhsbaum, A. "Revoliutsionnaia zakonnost' i khlebozagorovski," *Na leninskoi puti*, 1928, no. 1–2 (January 31).
- Leonov, Nikolai S. *Likhole'te*. Moscow: Mezhdunarodnye otnosheniia, 1994.
- Leonov, S. V. *Rozhdenie sovetsskoi imperii: gosudarstvo i ideologiya, 1917–1922 gg.* Moscow: Dialog-MGU, 1997.
- Leont'ev, Iaroslav V., ed. *Partiia levnykh sotsialistov-revoliutsionerov: dokumenty i materialy, 1917–1925 gg.*, 3 vols. Moscow: Rosspen, 2000.
- Leontovitch, Victor. *Geschichte des Liberalismus in Russland*. Frankfurt am Main: Vittorio Klostermann, 1957.
- Lepeshinskii, I. *Revoliutsiia na Dal'nem vostoke*. Moscow: Gosizdat, 1923.
- Lerner, Warren. "Attempting a Revolution from Without: Poland in 1920," *Studies on the Soviet Union*, 11/4 (1971): 94–106.
- . "Poland in 1920: A Case Study in Foreign-Policy Decision Making under Lenin," *South Atlantic Quarterly*, 72/3 (1973): 406–14.
- . *Karl Radek: The Last Internationalist*.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0.
- Leroy-Beaulieu, Anatole. *The Empire of the Tsars and Russians*, 3 vols. New York and London: G. P. Putnam's Sons, 1898.
- Leskov, Valentin. *Okhota na vozhdai: ot Lenina do Trotskogo*. Moscow: Veche, 2005.
- Lessons of the German Events. London: London Caledonian Press, 1924.
- Levine, Isaac Don. *Stalin's Great Secret*. New York: Coward-McCann, 1956.
- Lewin, Moshe. *Lenin's Last Struggle*. New



- York: Pantheon, 1968.
- . *Political Undercurrents in Soviet Economic Debates: From Bukharin to the Modern Reformers*.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4.
- . *Russia/USSR/Russia: The Drive and Drift of a Superstate*. New York: New Press, 1995.
- . *Russian Peasants and Soviet Power: A Study of Collectivization*. New York: W. W. Norton, 1968.
- Lewis, Ben, and Lih, Lars, eds. *Zinoviev and Martov: Head to Head in Halle*. London: November Publications, 2011.
- Lewis, J. Patrick. "Communications Output in the USSR: A Study of the Soviet Telephone Systems," *Soviet Studies*, 28/3 (1976): 406–17.
- Lewis, Jon E. *The Mammoth Book of Eyewitness World War I: Over 280 First-Hand Accounts of the War to End All Wars*. Philadelphia: Running Press, 2003.
- Liadov, M. "Zarozhdenie legal'nogo i revoliutsionnogo marksizma v Rossii," *Front nauki i tekhniki*, 1933, no. 2.
- Liadov, P. F. *Istoriia Rossiiskogo protokola*. Moscow: Mezhdunarodnye otnosheniia, 2004.
- Liberman, Simon. *Building Lenin's Russia*.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45.
- Liebich, Andre. "Menshevik Origins: The Letters of Fedor Dan," *Slavic Review*, 45/4 (1986): 724–8.
- Lieven, Dominic C. B. "Bureaucratic Authoritarianism in Late Imperial Russia: The Personality, Career, and Opinions of P. N. Durnov," *Historical Journal*, 26/2 (1983): 391–402.
- . "Dilemmas of Empire 1850–1918: Power, Territory, Identity,"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History*, 34/2 (1999): 163–200.
- . "Pro-Germans and Russian Foreign Policy 1890–1914," *International History Review*, 2/1 (1980): 34–54.
- . "Russia, Europe, and World War I," in *Critical Companion to the Russian Revolution, 1914–1921*, edited by Edward Acton et al.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7.
- . "Russian Senior Officialdom under Nicholas II: Careers and Mentalities," *Jahrbucher fur Geschichte Osteuropas*, 32/2 (1984): 199–223.
- . *Empire: The Russian Empire and its Rivals*.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2.
- . *Nicholas II: Twilight of the Empire*.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94.
- . *Russia and the Origins of the First World War*.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83.
- . *Russia's Rulers under the Old Regime*.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9.
- . *The Aristocracy in Europe, 1815–1914*.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2.
- , ed. *British Documents on Foreign Affairs: Reports and Papers from the Foreign Office Confidential Print Part I, Series A, Russia, 1859–1914*, 6 vols. Frederick, MD: University Publications of America, 1983.
- Lih, Lars. "The Ironic Triumph of 'Old Bolshevism'," *Weekly Worker*, November 25, 2010. Found at <http://www.cpgb.org.uk/home/weekly-worker/843/the-ironic-triumph-of-old-bolshevism>.
- Lih, Lars T. *Lenin Rediscovered. What is to be Done? in Context*. Leiden: Brill, 2006.
- . "1912: 'A faction is not a party,'" *Weekly Worker* 912, May 3, 2012.
- . "Bolshevik Razverstka and War Communism," *Slavic Review*, 45/4 (1986): 673–88.
- . "Bukharin's 'Illusion': War Communism and the NEP," *Russian History/Histoire Russe*, 27/4 (2000): 417–59.
- . "Political Testament of Lenin and Bukharin and the Meaning of NEP," *Slavic Review*, 50/2 (1991): 240–52.
- . "Zinoviev: Populist Leninist," *The NEP Era: Soviet Russia, 1921–1928*, 2 (2007): 1–23.
- . *Bread and Authority in Russia, 1914–1921*.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0.
- . *Lenin*. London: Reaktion Books, 2011.
- , et al., eds. *Stalin's Letters to Molotov*.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5.
- Lincoln, W. Bruce. *Passage Through Armageddon: The Russians in War and Revolution, 1914–1918*.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1986.
- . *Red Victory: A History of the Russian Civil War*.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1989.
- Lipatnikov, Iu. "Byl li agentom okhranki Sverdlov?" *Situatsii*, 1991, no. 1.
- Lipitskii, S. V. *Voennaia deiatel'nost' TiK RKP (b), 1917–1920*. Moscow: Politizdat, 1973.
- Litvak, Dmitriy, and Kuznetsov, Alexander. "The Last Emir of Noble Bukhara and His Money," *International Bank Note Society journal*, 50/3 (2011).
- Litvin, Al'ter, ed. *Levye esery i VChK: sbornik dokumentov*. Kazan: NKT, 1996.
- . *Krasnyi i belyi terror v Rossii, 1918–1922 gg.* Kazan: Tatarskoe gazetno-zhurnalnoe izd-vo, 1995.
- Litvinov, M. Iu., and Sidunov, A. V. *Shpiony i diversanty: bor'ba s pribalitskim spionazhem i natsionalisticheskim bandformirovaniiami na Severo-Zapade Rossii*. Pskov: Pskovskaia oblastnaia tipografiia, 2005.
- Liu, F. F. *A Military History of Modern China, 1924–1929*.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56.
- Liubimov, Nikolai Nikolaevich, and Erlikh, Aleksandr Nikolaevich. *Grunezskaiia konferentsiia: vospominaniia uchastnikov*. Moscow: Institut mezh-dunarodnykh otnoshenii, 1963.
- Liubosh, S. *Russkii fashist: Vladimir Purishkevich*. Leningrad: Byloe, 1925.
- Liulevicius, Vejas Gabriel. *War Land on the Eastern Front: Culture, National Identity, and German Occupation in World War I*.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 Livezeanu, Irina. *Cultural Politics in Greater Romania: Regionalism, Nation Building, and Ethnic Struggle, 1918–1930*.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5.
- Lobanov, M. P. *Stalin v vospominaniakh sovremennikov i dokumentakh epokhi*. Moscow: Eksmo-Algorithm, 2002.
- Lockhart, R. H. Bruce. *British Agent*. New York: G. P. Putnam's Sons, 1933.
- . *Memoirs of a British Agent: Being an Account of the Author's Early Life in Many Lands and of His Official Mission to Moscow in 1918*. New York: G. P. Putnam's Sons, 1932.
- Loewe, Heinz-Dietrich. *Antisemitismus unter reaktionaere Utopie: Russischer Konservatismus um Kampf gegen Wandel von Staat und Gesellschaft, 1890–1917*. Hamburg: Hoffmann und Campe, 1978.
- Logachev, Vladimir A. "V khlebnoe raio-ne Zapadnoi Sibiri: ot prodraverstka k golodu," *Vestnik Tomskogo gosudarstvennogo universiteta: Istoriia*, 2012, no. 3.
- Loginov, V. T. *Leninskaia "Pravda" 1912–1914 gg.* Moscow, 1962.
- Loginov, Vladimir. *Teni Stalina: General Vlasik i ego sotratniki*. Moscow: Sovremennik, 2000.
- Lohr, Eric. "War and Revolution, 1914–1917," in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Russia*, edited by Dominic Lieven.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6.
- . *Nationalizing the Russian Empire: The Campaign Against Enemy Aliens During World War I*.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 Loukianov, Mikhail. "Conservatives and 'Renewed Russia,' 1907–1914," *Slavic Review*, 61/4 (2002): 762–86.
- Loukomsky, A. S. *Memoirs of the Russian Revolution*. London: Fisher, Unwin, 1922.
- Low, Heinz-Dietrich. "Political Symbols and Rituals of the Russian Radical Right, 1900–1914," *Slavonic and East European Review*, 76/3 (1998):

- 441-66.
- Lubny-Gertsyk, I. L. *Dvizhenie naseleniia na territorii SSSR za vremia mirovoi voiny i revoliutsii*. Moscow: Planovoe khoziaistvo, 1926.
- Luchinskaia, A. V. *Velikii provokator Evno Azef*. Petrograd: Raduga, 1923.
- Ludendorff, Erich. *My War Memories, 1914-1918*, 2 vols. London: Hutchinson, 1919.
- Lukomskii, A. S. *Vospominaniia*. Berlin: Otto Kirchner, 1922.
- Lunacharskii, A. V. *Sobranie sochinenii*, 8 vols. Moscow: Khudozhestvennaia literatura, 1963-67.
- . *Revoliutsionnye siluety*. Moscow: Deviatoe Ianvaria, 1923.
- Lunacharsky, Anatoly. *Revolutionary Silhouettes*. New York: Hill and Wang, 1967.
- Luppol, A. P. "Iz istorii sovetskogo gosudarstvennogo gerba," in *Ezhegodnik Gosudarstvennogo istoricheskogo muzeia*. Moscow: Sovetskaia Rossiia, 1960.
- Lutchenko, A. I. "Rukovodstvo KPSS formirovaniem kadrov tekhnicheskoi intelligentsiia, 1926-1933 g.," *Voprosy istorii KPSS*, 1966, no. 2: 29-42.
- Lutovinov, I. S. *Likvidatsiia miatezha Kerenskogo-Krasnogo*. Moscow and Leningrad: Voenizdat, 1965.
- Luxemburg, Rosa. *Die russische Revolution: eine kritische Würdigung*. Berlin: Gesellschaft und Erziehung, 1920.
- Luzyanin, S. G. "Mongolia: Between China and Soviet Russia (1920-1924)," *Problems of the Far East*, 1995, no. 2.
- Lyandres, Semyon. "On the Problem of 'Indecisiveness' among the Duma leaders during the February Revolution: The Imperial Decree of Prorogation and the decision to Convene the private meeting of February 27, 1917," *The Soviet and Post-Soviet Review*, 24/1-2 (1997): 115-27.
- . "Progressive Bloc Politics on the Eve of the Revolution: Revisiting P. N. Miliukov's 'Stupidity or Treason' Speech of November 1, 1916," *Russian History*, 31/4 (2004): 447-64.
- , ed. "O Dvortsovom perevorote ia pervyi raz uslyshal posle revoliutsii . . .": Stenogramma besedy N. Z. Bazili s A. S. Lukomskim (parizh, 24 fevralia 1933 g.)," *Russian History*, 32/3-4 (2005): 215-58.
- Lyons, Eugene. *Assignment in Utopia*.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1937.
- . *Stalin: Czar of All the Russias*. Philadelphia: J. B. Lippincott, 1940.
- Lytelton, Adrian. *The Seizure of Power: Fascism in Italy 1919-1929*, 2nd ed.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7.
- Macey, David A. J. *Government and Peasant in Russia, 1861-1906: The Prehistory of the Stolypin Reforms*. DeKalb: Nor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Press, 1987.
- Machiavelli, Niccolo. *Gouudar'*, edited by N. Kurochkin. St. Petersburg, 1869.
- MacKenzie, David. *Apis: The Congenial Conspirator. The Life of Colonel Dragutin T. Dimitrijević*. Boulder, CO: East European Monographs, 1989.
- Mackenzie, F. A. *Russia Before Dawn*. London: T. F. Unwin, 1923.
- MacMillan, Margaret. *Paris 1919: Six Months that Changed the World*. New York: Random House, 2002.
- Magerovskii, D. A. *Soiuz Sovetskikh Sotsialisticheskikh Respublik: obzor i materialy*. Moscow: NKID, 1923.
- Magerovsky, E. L. "The People's Commissariat for Foreign Affairs, 1917-1946." Phd diss., Columbia University, 1975.
- Magidov, B. "Kak ia stal redaktorom 'Soldat revoliutsii'," *Bol'shevistskaia pechat'*, 1936, no. 11: 30-3.
- Magnes, Judah L. *Russia and Germany at Brest-Litovsk*. New York: Rand School of Social Science, 1919.
- Maier, Charles S. *Recasting Bourgeois Europe: Stabilization in France, Germany, and Italy in the Decade after World War I*.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5.
- Maiskii, Ivan. *Sovremennaia Mongoliia*. Irkutsk: Irkutskoe otdelenie, 1921.
- Makarov, S. V. *Sovet ministrov Rossiiskoi Imperii 1857-1917*. St. Petersburg: St. Petersburg University Press, 2000.
- Makarova, G. P. *Narodnyi Komissariat po delam natsional'noei RSFSR 1917-23 gg*. Moscow: Nauka, 1987.
- Makeev, N. Ia. "Bakinskaia podpol'naia tipografiia 'Nina' (1901-1905)," *Trudy Azerbaidzhanskogo filiala IML pri TsK KPSS*. Baku, 1952.
- Makharadze, F. K. *tridsatiletiu suschestvovaniia Tiflsskoi organizatsii: podgotovitel'nyi period, 1870-1890. Materialy*. Tiflis: Sovetskii Kavkaz, 1925.
- Makharadze, F. E., and Khachapuridze, G. E. *Ocherki po istorii rabocheho i krest'ianskogo dvizheniia v Gruzii*. Moscow: Zhurnal'no-gazetnoe obidneniie, 1932.
- Makharadze, Filipp. *Ocherki revoliutsionnogo dvizheniia v Zakavkaz'e*. Tblisi: Gosizdat Gruzii, 1927.
- Makharadze, N. B. *Pobeda sotsialisticheskoi revoliutsii v Gruzii*. Tblisi: Sabchota Sakartvelo, 1965.
- Makintian, P., ed. *Krasnaia kniga VChK*, 2 vols. Moscow: Gosizdat, 1920.
- Maklakov, V. A. "The Agrarian Problem in Russia before the Revolution," *Russian Review*, 9/1 (1950): 3-15.
- . *Pervaia Gosudarstvennaia Duma: vospominaniia sovremennika*. Paris: L. Beresniak, 1939.
- Maksakov, B., ed. "Iz arkhiva S. Iu. Vitte" and "Doklady S. Iu. Vitte Nikolaiu II," *Krasnyi arkhiv*, 11-12 (1925): 107-43, 144-58.
- Maksakov, V., and Turunov, A. *Khronika grazhdanskoi voiny v Sibiri 1917-1918*. Moscow and Leningrad: Gosizdat, 1926.
- Mal'chevskii, I. S., ed. *Vserossiiskoe Uchreditel'noe Sobranie*. Moscow-Leningrad: Gosizdat, 1930.
- Male, Donald J. *Russian Peasant Organization Before Collectivization: A Study of Communes and Gathering, 1925-1930*.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1.
- Malenbaum, Wilfred. *The World Wheat Economy, 1885-1939*.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3.
- Malia, Martin. *Alexander Herzen and the Birth of Russian Socialism, 1812-1855*. Cambridge, MA: Harvard, 1961.
- Maliavskii, A. D. *Krest'ianskoe dvizhenie v Rossii v 1917 g. (mart-oktiabr)*. Moscow: Nauka, 1981.
- Malinovskii, Iu. P. "K pereczdu TsK RKP (b) i Sovetskogo pravitel'stva iz Petrograd v Moskvu (mart 1918 g.)," *Voprosy istorii*, 1968, no. 11: 99-103.
- Mal'kov, Pavel D. *Zapiski komendanta Moskovskogo Kremliia*, 3rd ed. Moscow: Molodaia gardiia, 1959, 1967.
- Mal'kov, V. L., ed. *Pervaia mirovaia voina: prolog XX veka*. Moscow: Nauka, 1998.
- Malkov, Pavel D. *Reminiscences of a Kremlin Commandant*. Moscow: Progress, 1960.
- Malle, Silvana. *The Economic Organization of War Communism, 1918-1921*.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5.
- Malozemoff, Andrew. *Russian Far Eastern Policy, 1881-1904, with Special Emphasis on the Causes of the Russo-Japanese War*.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58.
- Malyshev, M. O. *Oborona Petrograda i izgnanie nemetskikh okkupantov s severozapada v 1918 godu*. Leningrad: Leningradskii universitet, 1974.
- Mamontov, V. I. *Na Gosudarevoi sluzhbe: vospominaniia*. Tallinn: Tallinna Eesti Kirjastus-Ühisuse trükikoda, 1926.
- Manchester, Laurie. *Holy Fathers, Secular Sons: Clergy, Intelligentsia, and the Modern Self in Revolutionary Russia*. DeKalb: Nor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Press, 2008.
- Manikovskii, A. A. *Boevoe snabzhenie russkoi armii, 1914-1918 gg*. Moscow: Voennyi Redaksion, 1923.
- Manikovskii, Aleksei A. *Boevoe snabzhenie russkoi armii v mirovoi voinu*, 2 vols. Moscow: Voennaia literatura, 1930.
- Manning, Roberta T.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Extraordinary Measures', January-June 1928: Towards a Reexamination of the Onset of the Stalin Revolution," *Carl Beck Papers*, no. 1504, 2001.
- Manuil (Lemeshevskii), Metropolitan. *Die Russischen orthodoxen Bischöfe von*

- 1893 bis 1965: *Bio Bibliographie*, 6 vols. Erlangen: Lehrstuhl für Geschichte und Theologie des Christlichen Ostens, 1979–89.
- Manusevich, A. Ia. "Pol'skie sotsial-demokraticheskie i drugie revoliutsionnye grupy v Rossii za pobedu v uprochenie sovetsoi vlasti (oktiabr' 1917–ianvar' 1918 gg.)," in *Iz istorii pol'skogo rabocheho dvizheniia*. Moscow: Sotsial'no-ekonomicheskaiia literatura, 1962.
- March, G. Patrick. *Eastern Destiny Russia in Asia and the North Pacific*. Westport, CT: Praeger, 1996.
- Markina, N. A., and Federovna, T. S., eds. *Baltiiskie moriaki v bor'be za vlast' Sovetov v 1919 godu: dokumenty i materialy*. Leningrad: Nauka, 1974.
- Markov, Evgenii. *Ocherki Kavkaza: Kartiny kavkazskoi zhizni, prirody i istorii*, 2nd ed. St. Petersburg and Moscow: M. F. Vol'f, 1904.
- Markov, Nikolai E. *Voiny temnykh sil*. Paris: Doloi zlo, 1928–30.
- Markova, Liliana. "Litso vraga," in *Kinopolitika i ljudi, 30-e gody*. Moscow: Materik, 1995.
- Marks, Steven. *Road to Power: The Trans-Siberian Railroad and the Colonization of Asian Russia, 1850–1917*.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1.
- Marshall, Alexander. "Turkfront: Frunze and the Development of Soviet Counter-insurgency in Central Asia," in *Central Asia: Aspects of Transition*, edited by Tom Everett-Heath. London: Routledge-Curzon, 2003.
- Martin, Terry. "The Origins of Soviet Ethnic Cleansing," *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 70/4 (1998): 813–61.
- Martov, L. *Spasiteli ili uprazdniteli? Kto i kak razrushal R.S.D.R.P.* Paris: Golos Sotsialdemokrata, 1911.
- Martynov, A. "Or abstraktisii k konkretnoi deiateli'nosti," *Nashe slovo*, September 16, 1915.
- Martynov, A. P. *Moia sluzhba ot del'nom korpuse zhandarmov. Vospominaniia*. Stanford, CA: Hoover Institution Press, Stanford University, 1972.
- Martynov, Evgenii I. *Kornilov: popytka voennogo pervorota*. Leningrad-Moscow: Izdatel'stvo voennoi tip. upr. delami Nkvm. i RVS SSSR, 1927.
- . *Tsarskaia armiiia v fevral'skom perevode*. Leningrad: Izd. Voennoi Tip. upr. delami narkomvoenmor i RVC SSSR, 1927.
- Marx, Karl, and Engels, Friedrich. *Selected Correspondence of Karl Marx and Friedrich Engels. A Selection with Commentary and Notes*. London: M. Lawrence, 1944.
- . *Selected Correspondence*. Moscow: Progress, 1965.
- . *Collected Works*, 50 vols. 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1975–2004.
- . *Selected Works*. London: Lawrence and Wishart, 1968.
- . *The Communist Manifesto*, with a new afterword by Stephen Kotkin. New York: Signet, 2010.
- Masaryk, T. G. *The Making of a State*. London: Allen and Unwin, 1927.
- Maslov, P. *Agrarnyi vopros v Rossii*, 2 vols. St. Petersburg, 1905–8.
- Maslov, S. S. *Rossiiia posle chetyrekh let revoliutsii*. Paris: Russkaia pechat', 1922.
- Masolov, Aleksandr. *Pri dvore imperatora*. Riga: Fillin, n.d.
- Massell, Gregory J. *The Surrogate Proletariat: Moslem Women and Revolutionary Strategies in Soviet Central Asia, 1919–1929*.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4.
- Massie, Robert K. *Nicholas and Alexandra*. New York: Atheneum, 1967.
- "Materialy fevral'sko-martovskogo plenuma TsK VKP (b) 1937 goda," *Voprosy istorii*, 1992, no. 2–3.
- Materialy "Osoboi papki" Politbiuro TsK RKP (b)—VKP (b) po voprosu sovetko-pol'skikh otnosheniii 1923–1944 gg.* Moscow: RAN Institut slaviano-vedeniia, 1997.
- Matteotti, Giacomo. *Un anno di dominazione fascista*. Rome: Ufficio stampa del Partito Socialista Unitario, 1924.
- Mau, Vladimir. *Reformy i dogmy, 1914–1929. ocherki istorii stanovleniia khoziaistvennoi sistemy sovetikogo totalitarizma*. Moscow: Delo, 1993.
- Mawdsley, Evan, and White, Stephen, eds. *The Soviet Elite from Lenin to Gorbachev: The Central Committee and Its Members, 1917–1991*.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 . *The Russian Civil War*. Boston: Allen & Unwin, 1987.
- . "An Elite Within an Elite: Politburo/Presidium Membership under Stalin, 1927–1953," in *The Nature of Stalin's Dictatorship: The Politburo, 1924–1953*, E. A. Rees, ed.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4, 59–78.
- Maylunas, Andrei, and Mironenko, Sergei, eds. *A Lifelong Passion: Nicholas and Alexandra, Their Own Story*. New York: Doubleday, 1997.
- Mayzel, Matitihu. *Generals and Revolutionaries: The Russian General Staff During the Revolution A Study in the Transformation of Military Elites*. Osnabruck: Biblio, 1979.
- McAuley, Mary. *Bread and Justice: State and Society in Petrograd, 1917–1922*. Oxford: Clarendon, 1991.
- McCann, James M. "Beyond the Bug: Soviet Historiography of the Soviet Polish War of 1920," *Soviet Studies*, 36/4 (1984): 475–93.
- McCauley, Martin, ed. *The Russian Revolution and the Soviet State 1917–1921: Documents*. London and Basingstoke: Macmillan, 1975.
- McClelland, Charles E. *The German Historians and England: A Study in Nineteenth-Century View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1.
- McCullough, David. *The Path Between the Seas: The Creation of the Panama Canal, 1870–91*.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1977.
- McDermott, Kevin, and Agnew, Jeremy. *The Comintern: A History of International Communism from Lenin to Stalin*. Houndmills, Basingstoke: Macmillan, 1996.
- McDonald, David MacLaren. "A Lever without a Fulcrum: Domestic Factors and Russian Foreign Policy, 1905–1914," in *Imperial Russian Foreign Policy*, edited by Hugh Ragsdale. Washington, D.C., and New York: Woodrow Wilson Center an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3.
- . "The Durnovo Memorandum in Context: Official Conservatism and the Crisis of Autocracy," *Jahrbucher fur Geschichte Osteuropas*, 44/4 (1996): 481–502.
- . "United Government and the Crisis of Autocracy, 1905–1914," in *Reform in Modern Russian History*, edited by Theodore Taranovskii. Washington, D.C., and New York: Woodrow Wilson Center an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5.
- . *United Government and Foreign Policy in Russia, 1900–1914*.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 MCChK: *iz istorii Moskovskoi chrezvychainoi komissii (1918–1921)*. Moskva: Moskovskii Rabochii, 1978.
- McIlroy, John, et al., eds. *Industrial Politics and the 1926 Mining Lockout*, 2nd ed. Cardiff: University of Wales Press, 2009.
- McKean, Robert. *The Russian Constitutional Monarchy, 1907–1917*.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77.
- McKean, Robert B. "Constitutional Russia," *Revolutionary Russia*, 9/1 (1996): 33–42.
- . *St. Petersburg Between the Revolutions: Workers and Revolutionaries, June 1907–February 1917*.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0.
- McLellan, David, ed. *Karl Marx: Selected Writing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 McNeal, Robert H. "Stalin's Conception of Soviet Federalism," *Annals of the Ukrainian Academy of Arts and Sciences in the United States*, 9/1–2 (1961): 12–25.
- . *Brade of the Revolution: Krupikaya and Lenin*.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72.
- . *Stalin: Man and Ruler*.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1988.
- . *Stalin's Works: An Annotated Bib-*

- liography*. Stanford, CA: Hoover Institution Press, 1967.
- McReynolds, Louise. "Mobilising Petrograd's Lower Classes to Fight the Great War," *Radical History Review*, 57 (1993): 160–80.
- Medish, Vadim. "The First Party Congress and its Place in History," *Russian Review*, 22/2 (1963): 168–80.
- Medlin, Vergil D., and Powers, Steven L., eds. *V. D. Nabokov and the Russian Provisional Government 1917*.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6.
- Medvedev, Roy. "New Pages from the Political Biography of Stalin," in *Stalinism: Essays in Historical Interpretation*, edited by Robert C. Tucker. New York: W. W. Norton, 1977.
- . *Let History Judge: The Origins and Consequences of Stalinism*.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9.
- . *On Stalin and Stalinism*. Oxford an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9.
- Medvedeva Ter-Petrosyan, S. F. "Tovariishch Kamo," *Proletarskaia revoliutsiia*, 1924, no. 8–9 (31–32): 117–48.
- Mehlinger, Howard D., and Thompson, John M. *Count Witte and the Tsarist Government in the 1905 Revolution*.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72.
- Meijer, Jan M., ed. *The Trotsky Papers, 1917–1922*, 2 vols. The Hague: Mouton, 1971.
- Meir, Natan. *Kiev, Jewish Metropolis: A History, 1859–1914*.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2010.
- Mel'tiukhov, Mikhail. *Sovetsko-pol'skie voiny: voenno-politicheskoe protivostoianie 1918–1939 gg.* Moscow: Veche, 2001.
- Melancon, Michael S. *The Lena Goldfields Massacre and the Crisis of the Late Tsarist State*. College Station: Texas A&M University Press, 2006.
- . *The Socialist Revolutionaries and the Russian Anti-War Movement*. Columbus: Ohio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90.
- . "From the Head of Zeus: The Petrograd Soviet's Rise and First Days, 27 February–2 March 1917," *Carl Beck Papers*, no. 2004, 2009.
- Mel'gunov, Sergei P. "Zolotoi nemetskii kliuch" k bolshevitskoi revoliutsii. Paris: Dom knigi, 1940.
- . *Kak bol'sheviki zakhvatili vlast': oktiabr'skii perevorot 1917 goda*. Paris: La Renaissance, 1953.
- . *Martovskie dni 1917 goda*. Paris: Editeurs reunis, 1961.
- . *Sud'ba Imperatora Nikolaia II posle otracheniiia*. Paris: La Renaissance, 1951.
- . *Tragediia Admirala Kolchaka: iz istorii grazhdanskoi voiny na Volge, Urale i v Sibiri*, 3 vols. Belgrade: Russkaia tipografia, 1930–1.
- Melgunov, Sergei P. *The Bolshevik Seizure of Power*. Santa Barbara, CA: ABC-Clío, 1972.
- Melikov, V. A. *Geroicheskaia oborona Tsaritsyna v 1918 godu*. Moscow: Voenizdat, 1940.
- . *Srazhenie na Visle v svete opyta maisko-avgustskoi kampanii 1920 goda: politiko-strategicheskii i operativnyi ocherk*. Moscow: Krasnoznamennaia voennaia akademiia R.K.K.A. im. M. V. Frunze, 1931.
- Melville, Cecil F. *The Russian Face of Germany: An Account of the Secret Military Relations Between the German and Soviet-Russian Governments*. London: Wishardt and Co., 1932.
- Mendel, Arthur. "Peasant and Worker on the Eve of the First World War," *Slavic Review*, 24/1 (1965): 23–33.
- . "Menia vsretit chelovek srednego rosta . . ." *Iz vospominaniia skul'ptura M. D. Ryndiuksoi o rabote nad biustom I. V. Stalina v 1926 g.*, "Golosa istorii: muzei revoliutsii. Sbornik nauchnykh trudov", vyp. 23 kn. 2 (Moscow, 1992): 111–8.
- Menning, Bruce W. *Bayonets Before Bullets: The Imperial Russian Army, 1861–1914*.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2.
- Merridale, Catherine. *Moscow Politics and the Rise of Stalin: The Communist Party in the Capital, 1925–32*.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90.
- Meyer, Alfred G. "The Soviet War Scare of 1927," *Soviet Union*, 5/1 (1978): 1–25.
- Meyer, Alfred. *Leninism*.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7.
- Mgaloblishvili, Sofron. *Vospominaniia o moei zhizni: Nezabyvaemye vstrechi*. Tblisi: Merani, 1974.
- Mgeladze, Akaki. *Stalin, kakim ia ego znal: stranitsy nedavnogo proshlogo*. Tblisi, 2001.
- Michel Kettle, *The Allies and the Russian Collapse, March 1917–March 1918*.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81.
- Mif, Pavel. "Kitaiskaia kommunisticheskaia partiia v kriticheskie dni," *Bol'shevik*, 1927, no. 21, 23–24.
- Mikhailovich, Alexander. *Once a Grand Duke*. New York: Farrar and Rinehart, 1932.
- Mikhailovich, Velikii kniaz' Aleksandr. *Kniga vospominanii*, 2 vols. Paris: Biblioteka illiustrirovanoi Rossoi, 1933.
- Mikhaleva, V. M., ed. *Revvoensovet Respubliki: protokoly 1920–1923 gg.* Moscow: Editorial URSS, 2000.
- Mikhhutina, I. B. "SSSR glazami pol'skikh diplomatov (1926–1931 gg.)." *Voprosy istorii*, 1993, no. 9: 45–58.
- Mikhhutina, I. V. *Pol'sko-Sovetskaia voina, 1919–1920 gg.* Moscow, Institut slavianovedeniia i blakanistiki, 1994.
- Mikoian, A. I. "Na Severnom Kavkaze," *Novyi mir*, 1972, no. 12.
- . *Dorogoi bor'by: kniga pervala*. Moscow: Politizdat, 1971.
- . *Feliks Dzerzhinskii*. Moscow: Partizdat, 1937.
- . *Myli i vospominaniia o Lenine*. Moscow: Politizdat, 1970.
- . *Tak bylo*. Moscow: Vargrius, 1999.
- Mill'chik, I. I. "Fevral'skie dni," *Lenin-gradskaia pravda*, February 28, 1917.
- Miliukov, P. N. "From Nicholas II to Stalin: Half a Century of Foreign Politics," typescript (n.d.), Hoover Institution Archives (the manuscript appears to date from 1942).
- . *Istoriia vtoroi ruskoj revoliutsii*, 3 vols. in 1. Sofia: Rossiisko-Bolgarskoe izd-vo, 1921–4.
- . *Ocherki po istorii Ruskoj kul'tury*. St. Petersburg: I. N. Skorokhodov, 1904.
- . *Vospominaniia, 1859–1917*, 2 vols. New York: Izd-vo im. Chekhova, 1955.
- . *Vtoraia Duma: publiistskaia khronika 1907*. St. Petersburg: Obshchestvenaia polza, 1908.
- , and Sities, Richard. *The Russian Revolution*. Gulf Breeze, FL: Academic International Press, 1978.
- Miliukov, Paul, et al. *Histoire de Russie*, 3 vols. Paris: E. Leroux, 1932–3.
- Miliutin, Vladimir. *O Lenine*. Leningrad: Gosizdat, 1924.
- Millar, James R., and Nove, Alec. "A Debate on Collectivization: Was Stalin Really Necessary?" *Problems of Communism*, 25/4 (1976): 49–62.
- Miller, Viktor I. *Soldatskie komitety ruskoj army v 1917 g.: vozniknovenie i nachal'nyi period deiatel'nosti*. Moscow: Nauka, 1974.
- Minakov, S. T. *Sovetskaia voennaia elita*. Orel: Orelizdat, 2000.
- . *Stalin i ego marshal*. Moscow: Yauza Eksmo, 2004.
- Minczeles, Henri. *Histoire generale du Bund: un mouvement revolutionnaire juif*. Paris: Editions Austral, 1995.
- Ministerstvo finansov, 1802–1902*, 2 vols. St. Petersburg: Ekspeditsiia zagotovleniia gosudarstvennykh bumag, 1902.
- Ministerstvo vnutrennykh del: istoricheskii ocherk*, 2 vols. St. Petersburg, 1902.
- Mints, I. I. *Dokumenty velikoi proletarskoi revoliutsii*, 2 vols. Moscow: Gosizdat, 1938, 1948.
- Mintslov, S. R. *Peterburg v 1903–1910 godakh*. Riga: Kniga dlia vsekh, 1931.
- Mirnyi dogovor mezhdru Gruziei i Rossiei*. Moscow: Proput', 1920.
- Mironov, Georgii E. *Gosudari i gosudarevy liudi: gosudari i gosudarevy liudi, rssiiskie reformatory i kontrreformatory XIX-nachala XX veka*. Moscow: Mart, 1999.
- Misshima, Yasuo, and Tomio, Goto. A

- Japanese View of Outer Mongolia*. New York: 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 1942.
- Mitchell, Allan. *Revolution in Bavaria, 1918–1919. The Eisner Regime and the Soviet Republic*.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6.
- Mitchell, David J. *1919. Red Mirage*. New York: Macmillan, 1970.
- Mitchell, Mairin. *The Maritime History of Russia, 848–1948*. London: Sidgwick and Jackson, 1949.
- Mlechin, L. M. *Russkaia armia mezhdu Trotskim i Stalinym*. Moscow: Tsentrpoligraf, 2002.
- Mnatsakanian, A. *Poslanyty Sovetskoi Rossii v Armenii*. Erevan: Aipetrat, 1959.
- Moggridge, D. E. *The Return to Gold, 1925: The Formulation of Economic Policy and Its Critics*.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9.
- Moletotov, I. A. *Sibkraikom: partiinoe stroitel'stvo v Sibiri 1924–1930 gg*. Novosibirsk: Nauka, 1978.
- Molotov, V. M. *Na shestoii god*. Moscow: Gosizdat, 1923.
- Mombauer, Annika. "A Reluctant Military Leader? Helmuth von Moltke and the July Crisis of 1914," *War in History*, 6/4 (1999): 417–46.
- . *Helmuth von Moltke and the Origins of the First World War*.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
- . *The Origins of the First World War*. London: Longman, 2002.
- Mommen, Andre. *Stalin's Economist: The Economic Contributions of Jeno Varga*.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11.
- Monas, Sidney. "The Political Police: The Dream of a Beautiful Autocracy," in *The Transformation of Russian Society*, edited by Cyril Black.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7.
- . *The Third Section: Police and Society in Russia under Nicholas I*.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1.
- Montefiore, Simon Sebag. *Young Stalin*. New York: Knopf, 2007.
- . *Stalin: Court of the Red Tsar*. London: Weidenfeld, 2003.
- Moore, Barrington. *Soviet Politics: The Dilemma of Power*.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0.
- Morozov, K. N. *Sudebnyi protsess sotsialistov-revolutsionerov i tiuremnoe protivostoianie (1922–1926). etika i taktika protivobor'stva*. Moscow: Rosspen, 2005.
- Morozov, V. M. *Sozdanie i ukreplenie sovetskogo gosudarstvennogo apparata, noabr' 1917 g—mart 1919 g*. Moscow: Politicheskaia literatura, 1957.
- Morozova, Irina Y. *The Comintern and Revolution in Mongolia*. Cambridge: White Horse, 2002.
- Morris, Edmund. *Colonel Roosevelt*. New York: Random House, 2010.
- Moskalev, M. A. *Bol'shevistskie organizatsii Zakavkazia pervoi russkoi revoliutsii i v gody stolypinskoi reaktzii*. Moscow, 1940.
- Moskovskie Bol'sheviki v bor'be s pravyim i "levym" opportunizmom, 1921–1929 gg*. Moscow: Moskovskii rabochii, 1969.
- Moskvich, Grigorii. *Putevoditel' po Kavkazu*, 20th ed. St. Petersburg: Putivoditeli, 1913.
- Mostashari, Firouzeh. *On the Religious Frontier: Tatars Russia and Islam in the Caucasus*. London and New York: I. B. Tauris, 2006.
- Mostiev, B. M., ed. *Revolutsionnaria publiitsitika Kiroma, 1909–1917 gg*. Ordzhonokidze: Ir, 1971.
- Motherwell, Robert. *Dada Painters and Poets: An Anthology*. New York: Wittenborn, Shultz, 1951.
- Motojiro, Akashi. *Rakka ryusui: Colonel Akashi's Report on His Secret Cooperation with the Russian Revolutionary Parties during the Russo-Japanese War*. Translated [abridged] by Inaba Chi-haru. Helsinki: Suomen Historiallinen Seura, 1988.
- Mozokhin, O. *VChK-OGPU, karaiushchii mech diktatury proletariata: na zashchite ekonomicheskoi ezopasnosti gosudarstva i v bor'be s terrorizmom*. Moscow: Iauza-Eksmo, 2004.
- Mozokhin, Oleg, and Gladkov, Teodor. *Menzhinskii: intelligents i Lubianki*. Moscow: Iauza, 2005.
- Mstislavskii, Sergei D. *Five Days Which Transformed Russia*. Bloomington, Indiana: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88.
- . *Piat' dnei: nachalo i konets Fevral'skoi revoliutsii*, 2nd ed. Berlin: Z. I. Grzhebin, 1922.
- Muller, Rolf-Dieter. *Das Tor zur Weltmacht: Die Bedeutung der Sowjetunion für die deutsche Wirtschafts- und Rüstungspolitik zwischen den Weltkriegen*. Boppard am Rhein: Harald Boldt, 1984.
- Munck, J. L. *The Kornilov Revolt: A Critical Examination of the Sources and Research*. Aarhus, Denmark: Aarhus University Press, 1987.
- Munck, Ronaldo. *The Difficult Dialogue: Marxism and Nationalism*. London: Zed, 1986.
- Murin, Jurii. "Eshche raz ob ostavkakh I. Stalina," *Rodina*, 1994, no. 7: 72–3.
- Murphy, George G. S. *Soviet Mongolia: A Study of the Oldest Political Satellit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6.
- Murphy, J. T. *New Horizons*. London: J. Lane, 1941.
- Murtazin, M. L. *Bashkiria i bashkirskie voiska v grazhdanskoi voine*. Moscow: Voennaia tipografiia upr. delami Narkomvoenmor i RVS, 1927.
- Nabokov, V. D. *Vremennoe pravitel'stvo: vospominaniia*. Moscow: Mir, 1924.
- . "Vremennoe pravitel'stvo," in *Arkhiv russkoi revoliutsii*, ed. by Gessen, I: 9–96.
- "Nachalo voiny 1914 g: podennaia zapis' b. ministerstva inostrannykh del," *Krasnyi arkhiv*, 1923, no. 4: 3–62.
- Nad, Nikolai. "Kto ubil Mikhaila Frunze," *Izvestiia*, October 26, 2010.
- Nadezhdin, P. P. *Kavkazskii kraj: priroda i ludi*, 2nd ed. Tula: E. I. Druzhinina, 1895.
- Nadtochev, Valerii. "'Triumvirat' ili 'semerka'? Iz istorii vnutripartiinoi bor'by v 1924–1925 godakh," in *Trudnye voprosy istorii: poiski, razmyshleniia, novyi vzglad na sobytia i fakty*, edited by V. V. Zuravlev. Moscow: Politicheskaia literatura, 1991.
- Nafziger, Steven. "Communal Institutions, Resource Allocations, and Russian Economic Development, 1861–1905." Phd diss., Yale University, 2006.
- Naida, S. F. *O nekotorykh voprosakh istorii grazhdanskoivoiny v SSSR*. Moscow: Voensizdat, 1958.
- Naibandian, E. N. "Iskra" i tipografiia "Nina" v Baku," *Trudy Azerbaizhanskogo filiala IML pri TsK KPSS*. Baku, 1960.
- Namier, Lewis. "After Vienna and Versailles," in *Conflicts: Studies in Contemporary History*, edited by Lewis Namier. London: Macmillan, 1942.
- Na prieme u Stalina: setradi (zhurnaly) zapisei lits, priniatykh I.V. Stalinym: 1924–1953 gg*. Moscow: Novyi khronograf, 2008.
- Narskii, I. V. *Zhizn' v katastrofe: budni naseleniia Urala v 1917–1922 gg*. Moscow: Rosspen, 2001.
- Nash, Ian Hill. *The Anglo-Japanese Alliance: The Diplomacy of Two Island Empires 1894–1907*. London: Athlone, 1966; Curzon reprint, 2004.
- Naumov, A. N. *Iz usulevshikh vospominanii, 1868–1917*, 2 vols. New York: A. K. Naumova and O. A. Kusevitskaia, 1954–5.
- Naumov, V. and Kurin, L. "Leninskoe zaveshchanie," in *Urok daet istoriia*, edited by V. Afanas'ev and G. Smirnov. Moscow: Politizdat, 1989.
- Naumov, Vladimir. "1923 god: sud'ba leninskoi al'ternativy," *Kommunist*, 1991, no. 5: 30–42.
- Naville, Pierre. *Trotsky vivant*. Paris: Juillard, 1962.
- Nazanski, V. I. *Krushenie velikoi Rossii i doma Romanovykh*. Paris, 1930.
- Nazarov, Mikhail. *Missiia Russkoi emigratsii*. Stavropol: Kavkazskii kraj, 1992.
- Nazarov, O. G. *Stalin i bor'ba za liderstvo v bol'shevistskoi partii v usloviakh NEPa*. Moscow: IVI RAN, 2002.
- Neilson, Keith. *Britain and the Last Tsar: British Policy and Russia, 1894–1917*.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5.

- . *Britain, Soviet Russia and the Collapse of the Versailles Order, 1919–1939*.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6.
- . *Strategy and Supply: The Anglo-Russian Alliance, 1914–1917*. London: George Allen & Unwin, 1984.
- Nekliudov, M. A. "Souvenirs diplomatiques: l'Entrevue de Bjoerkoe," *Revue des deux mondes*, 44 (1918): 423–48.
- Nenarokov, A. P. *K edinstvu ravnykh: kul'turnye faktory ob"edinitel'nogo dvizheniia sovetskikh narodov, 1917–1924*. Moscow: Nauka, 1991.
- Nenarokov, Al'bert P., ed. *Revvoensovets Respubliki, 6 sentiabria 1918 g.–28 avgusta 1923 g.* Moscow: Politizdat, 1991.
- "Neopublikovannye materialy iz biografii tov. Stalina," *Antireligioznik*, 1939, no. 12: 17–21.
- Nettl, J. P. *Rosa Luxemburg*.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6.
- Neuberg, A. *Armed Insurrection*. London: NLB, 1970.
- Nevskii, V. I. *Doklad ot narodnogo kommissara putei soobshcheniia predesdatel'iu soveta narodnykh komissarov tov. Leninu*. Moscow: Narkomput, 1919.
- Newstad, E. R. W. "Components of Pessimism in Russian Conservative Thought, 1881–1905." Phd diss., University of Oklahoma, 1991.
- Newton, Lord Thomas. *Lord Lansdowne: A Biography*. London: Macmillan, 1929.
- Nicolaevsky, Boris. *Aseff: The Russian Judas*. London: Hurst and Blackett, 1934.
- Nicolson, Harold. *King George V: His Life and Reign*. London: Constable, 1952.
- . *Peacemaking 1919: Being Reminiscences of the Paris Peace Conference*. New York: Houghton Mifflin, 1933.
- Nielsen, Jes Peter, and Weil, Boris, eds. *Ruskaia revoliutsiia glazami Petrogradskogo chinovnika: dnevniki 1917–1918 g.* Oslo: Representralen Universitetet i Oslo Slavisk-Baltisk Institut, 1986.
- Niessel, Henri A. *Le triomphe des bolcheviki et la paix de Brest-Litovsk: Souvenirs, 1917–1918*. Paris: Plon, 1940.
- Nikolaevskii, Boris. *Tainye stranitsy istorii*, ed. by Iu. Fel'shtinskii. Moscow: Gumanitarnaia literatura, 1995.
- Nikolaev, A. N. *Chekisty: sbornik*. Moscow: Molodaia gvardiia, 198.
- Nikolaev, M. G. "Na puti k denezhnoi reforme 1922–1924 godov: chetyre arestov N. N. Kutlera," *Otechestvennaia istoriia*, 2001, no. 1.
- "Nikolai II — imperatritse Marii Fedeorovne, 12 ianvaria 1906," *Krasnaia nov'*, 1927, tom 3 (22).
- Nikolai-on [Danielson]. *Ocherki nashego poreformennogo obshchestvennogo khoziaistva*. St. Petersburg: A. Benke, 1893.
- Nikol'skii, B. V. "Iz dnevnikov 1905 g.," in *Nikolai II. Vospominaniia. Dnevnik*, edited by B. V. Anan'ich and R. Sh. Ganelin. St. Petersburg: D. Bulanin, 1994.
- Nikonov, V. A. *Molotov: molodost'*. Moscow: Vagrius, 2005.
- Nikul'in, Lev. *Zapiski sputnika*. Leningrad: Izd. Pisatelei, 1932.
- Nish, Ian. "The Clash of Two Continental Empires: the Land War Reconsidered," in *Rethinking the Russo-Japanese War, 1904–05*, 2 vols, edited by Rotem Kowner. Folkstone: Global Oriental, 2007.
- . *The Origins of the Russo-Japanese War*. London: Longman, 1985.
- Nolan, Mary. *Visions of Modernity: American Business and the Modernization of German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 Nol de, Boris. "Tseli i real'nost' v velikoi voine," in *Dalekie i blizkie: istoricheskie ocherki*. Paris: Sovremennye zapiski, 1930.
- Nosovich, A. L. *Krasnyi Tsaritsyn, vzgliad iznutri: zapiski belogo razvedchika*. Moscow: AIRO-XXI, 2010.
- . *Zapiski vakhmistra Nosovicha*. Paris: self-published, 1967.
- Nove, Alec. "The Peasants, Collectivization, and Mr. Carr," *Soviet Studies*, 10/4 (1958–9): 384–9.
- . *An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USSR*. London: Allen Lane, 1969.
- . *The Soviet Economy: An Introduction*, 2nd ed. New York: Praeger, 1969.
- . "Was Stalin Really Necessary?" *Encounter*, April 1962: 86–92.
- . *Was Stalin Really Necessary? Some Problems of Soviet Political Economy*. New York: Praeger, 1964.
- Novitskaia, T. E. *Uchreditel'noe sobranie, Rossiia, 1918: stenogrammy i drugie dokumenty*. Moscow: Nedar, 1991.
- Nowak K. E., ed. *Die Aufzeichnungen des Generalmajors Max Hoffmann*, 2 vols. Berlin: Kulturpolitik, 1929.
- Nyamaa, D., ed. *A Compilation of Some Documents Relating to th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Mongolian People's Republic*. Ulaanbaatar: State Publishing House, 1964.
- O'Brien, Phillips Payson. *The Anglo-Japanese Alliance, 1902–1922*. London: RoutledgeCurzon, 2004.
- Occleshaw, Michael. *Dances in Deep Shadow: The Clandestine War in Russia, 1917–20*. New York: Carroll and Graf, 2006.
- O'Connor, Timothy. *The Engineer of Revolution: L. B. Krasin and the Bolsheviks, 1870–1926*. Boulder, CO: Westview Press, 1992.
- . *Diplomacy and Revolution: G. V. Chicherin and Soviet Foreign Affairs, 1918–1930*. Ames: Iow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88.
- Odet Eran, *The Mezhdunarodniki*. Ramat Gan: Turtledove Publishers, 1979.
- Offer, Avner. "Going to War in 1914: a Matter of Honour?" *Politics and Society* 23/2 (1995): 213–41.
- . *The First World War: An Agrarian Interpretation*. Oxford: Clarendon, 1989.
- Okorokov, A. Z. *Oktiabr' i krakh ruskoj burzuzhnoi preny*. Moscow: Mysl', 1970.
- Oldenbourg, Serge, ed. *Le coup d'etat bolcheviste, 20 octobre–3 decembre 1917*. Paris: Payot, 1929.
- Ol'denburg, Sergei S. *Gorudar' Imperator Nikolai II Aleksandrovich*. Berlin: Sitag i fond po izdaniiu tsarskikh portretov, 1922.
- . *Istoriia tsarstvovaniia Imperatora Nikolai II 1894–1917*, 2 vols. Belgrad: Obshchestvo rasprostraneniia russkoi natsional'noi i patrioticheskoi literatury, 1938.
- . *Last Tsar: Nicholas II, His Reign, and His Russia*, 4 vols. Gulf Breeze, FL: Academic International Press, 1975–8.
- Olekh, G. L. *Povorot, kotorogo ne bylo*. Novosibirsk: Novosibirsk universiteta, 1992.
- Omissi, David. *The Sepoy and the Raj: The Indian Army, 1860–1940*. Basingstoke: Macmillan, 1994.
- Oppenheim, Samuel A. "Between Right and Left: Grigorii Yakovlevich Sokolnikov an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oviet State, 1921–1929," *Slavic Review*, 48/4 (1989): 592–613.
- Orakhelashvili, Marnia. *Sergo Ordzhonikidze: biograficheskie ocherki*. Leningrad: Partizdat, 1936.
- Orde, Anne. *British Policy and European Reconstruction after the First World War*.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 Ordzhonikidze, G. K. *Stat'i i rechi*, 2 vols. Moscow: Politicheskaiia literatura, 1956–7.
- . "Bor'ba s men'shevikami," in *Dvadsat' piat' let bakinskoi organizatsii bol'shevikov*. Baku: 1924.
- Ordzhonokidze, Zinaida G. *Pur' Bol'shevik: stranitsy iz zhizni G. k. Ordzhonikidze*. Moscow: Politicheskaiia literatura, 1956, 1967.
- Orlov, Alexander. *Secret History of Stalin's Crimes*.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53.
- Orlov, Boris. "Mif o Fanni Kaplan," *Istochnik*, 1993, no. 2: 70–1.
- Orlova, M. I. *Revoliutsionnyi krizis 1923 g. v Germanii i politika kommunisticheskoi partii*. Moscow: Moskovskii universitet, 1973.
- Orlovsky, Daniel. "Corporatism or Democracy: The Russian Provisional Government of 1917," in *Landscaping the Human Garden: Twentieth Century Population Management in a*

- Comparative Framework*, edited by Amir Weiner.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 . "Political Clientelism in Russia: The Historical Perspective," in *Leadership Selection and Patron-Client Relations in the USSR and Yugoslavia*, edited by T. H. Rigby and B. Haraszyni. London and Boston: Allen & Unwin, 1983.
- . "Reform During Revolution: Governing the provinces in 1917," *Reform in Russia and the USSR: Past and Prospects*, edited by Robert O. Crummey.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89.
- . "Russia in War and Revolution," in *Russia: A History*, edited by Gregory Freez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 Osipova, T. V. *Klassovaia bor'ba v derevne v period podgotovki i provedeniia oktiabr'skoi revoliutsii*. Moscow: Nauka, 1974.
- O'Rourke, Kevin, and Williamson, Jeffrey. *Globalization and History: The Evolution of a Nineteenth-Century Atlantic Economy*. Cambridge, MA: 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Press, 1999.
- Osinskii. "Glavnyi nedostatok," in *Prodovol'stvennaia politika v svete obshchego khoziaistvennogo stroitel'stva sovetskoi vlasti: sbornik materialov*. Moscow: Gosizdat, 1920.
- Os'kin, D. P. *Zapiski soldata*. Moscow: Federatsiia, 1929.
- Osklov, E. N. *Pobeda kolkhoznoho stroia v zernoykh raionakh Severnogo Kavkaza*. Rostov-na-Donu: Rostovskii universitet, 1973.
- Osorgin, M. A. *Okhrannoe otdelenie i ego sekrety*. Moscow: Griadushchee, 1917.
- Ossendowski, Ferdinand. *Beasts, Men, and Gods*. New York: E. P. Dutton, 1922.
- Ostal'tseva, Alevtina F. *Anglo-russkoe soglasenie 1907 goda: vliianie russko-iaponskoi voiny i revoliutsii 1905–1907 godov na vneshniuiu politiku tsarizma i na peregruppirovku evropeiskikh derzhav*. Saratov: Saratovskii universitet, 1977.
- Ostrovskii, Aleksandr V. "Predki Stalin," *Genealogicheskii vestnik*, no. 1. 2001.
- . *Kto stoial za spinoi Stalina?* Moscow: Tsentropoligraf-Mim Delta, 2004. (Earlier edition, Olma 2002.)
- Otchet 15 s'ezdu partii*. Moscow: VKP (b), 1925.
- Otchet Komissi TsIK SSSR po uvekovecheniiu pamiati V. I. Ul'ianova (Lenina)*. Moscow: Tsik SSSR, 1925.
- Otchet po revizii Turkestanskogo kraia*. St. Petersburg: Senatskaia tip., 1910.
- Ottokar (Theobald Otto Maria) Czernin von und zu Chudenitz, Graf. *In the World War*. New York: Harper & Brothers, 1920.
- Ovsiannikov, A. A. *Miusskaia ploshchad'*, 6 Moscow: Moskovskii rabochii, 1987.
- Owen, Launcelot A. *The Russian Peasant Movement, 1906–1917*. London: P. S. King & Son, 1937.
- Paleologue, Maurice. *An Ambassador's Memoirs*, 3 vols. Paris: Plon, 1921–2.
- . *La Russie des Tsars pendant la grand guerre*, 3 vols. Paris: Plon, 1921–2.
- Palij, Michael. *The Ukrainian-Polish Defensive Alliance, 1919–1921: An Aspect of the Ukrainian Revolution*. Edmonton: Canadian Institute of Ukrainian Studies, 1995.
- Pallot, Judith. *Land Reform in Russia, 1906–1917: Peasant Responses to Stolypin's Project of Rural Transformati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 Palmer, James. *Bloody White Baron: The Extraordinary Story of the Russian Nobleman Who Became the Last Khan of Mongolia*. New York: Basic Books, 2009.
- Pankratova, A. N., et al., eds. *Revoliutsiia 1905–1907 gg. v Rossii: Dokumenty i materialy*, 5 vols. Moscow: Akademia nauk, 1955–61.
- Pantsov, Alexander. *Tainaia istoriia sovetsko-kitaiskikh otnoshenii: bol'sheviki i kitaiskaia revoliutsiia 1919–1927*. Moscow: Muravei-Gaid, 2001. Translated as *The Bolsheviks and the Chinese Revolution, 1919–1927*. Richmond, Surrey: Curzon, 2000.
- Papers Relating to th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Russia, 1918*, 3 vols. Washington, D.C.: Department of State, 1931–2.
- Papkov, Sergei. *Oblyknovenyi terror: politika Stalinizma v Sibiri*. Moscow: Rosspen, 2012.
- Paquet, Alfons. *Im kommunistischen Russland: Briefe aus Moskau*. Jena: E. Diederichs, 1919.
- Pares, Bernard, ed. *Letters of the Tsaritsa to the Tsar, 1914–1916*. Westport, CT: Hyperion, 1979.
- . *My Russian Memoirs*. London: J. Cape, 1931.
- . *The Fall of the Russian Monarchy: A Study of Evidence*. New York: Knopf, 1939.
- Park, Alexander G. *Bolshevism in Turkestan, 1917–1927*.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57.
- Parkadze, G. "Boevye bol'shevistskie družiny v Chiature v 1905 gody," *Rasskazy o Velikom Staline*, kn. 2. Tblisi: Zaria vostoka, 1941.
- Parrish, Michael. *Soviet Security and Intelligence Organizations, 1917–1990: A Biographical Dictionary and Review of Literature in English*. New York: Greenwood Press, 1992.
- Parsons, J. W. R. "The Emergence and Development of the National Question in Georgia, 1801–1921." Phd diss., University of Glasgow, 1987.
- Pashukanis, S., ed. "K istorii anglo-russkogo soglaseniia 1907 g.," *Krasnyi arkhiv*, 69–70 (1935): 3–39.
- Patenaude, Bertrand. *A Wealth of Ideas: Revelations from the Hoover Institution Archives*. Stanford, CA: Stanford General Books, 2006.
- . *Stalin's Nemesis: The Exile and Murder of Leon Trotsky*. London: Faber and Faber, 2009.
- . *The Big Show in Bololand: The American Relief Expedition to Soviet Russia in the Famine of 1921*.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 Paustovskii, Konstantin. *Povest' o zhizni*. Moscow: Sovremennyi pisatel', 1993, 1966–7.
- Paustovsky, Konstantin. *The Story of a Life*.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1967.
- Pavel Sudoplatov, *Special Tasks: The Memoirs of an Unwanted Witness, a Soviet Spymaster*. Boston: Little, Brown, 1994.
- Pavlovsky, George. *Agricultural Russia on the Eve of the Revolution*. London: G. Routledge and Sons, 1930.
- Pavliuchenkov, Sergei A. "Orden mechnostev": *Partiia i vlast' posle revoliutsii 1917–1929*. Moscow: Sbranie, 2008.
- . *Krestianskii Brest, ili predystoriia bol'shevistskogo NEPa*. Moscow: Russkoe knigoizdatel'skoe t-vo, 1996.
- . *Rossiiia Nepovskaia*. Moscow: Novyi khronograf, 2002.
- Pavlov, A. A., ed. *Chekisty: sbornik dokumental'nykh rasskazov i povesti*. Gorky: Volgo-Vyatskoe knizhnoe izdatel'stvo, 1968.
- Pavlova, Irina V. "Mekhanizm politicheskoi vlasti v SSSR v 20–30-e gody," *Voprosy istorii*, 1998, no. 11–12: 49–66.
- . "Poezdka Stalina v Sibir': pochemu v Sibir'?" *Eko*, 1995, no. 2.
- . *Stalinizm: Stanovlenie mekhanizma vlasti*. Novosibirsk: Sibirskii khronograf, 1993.
- Pavlovich, M. "SSSR i vostok," *Revoliutsionnyi vostok*. Moscow-Leningrad, 1927.
- Payne, Robert. *The Rise and Fall of Stalin*.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1965.
- Pearce, Brian. *How Haig Saved Lenin*.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87.
- Pearce, Cyril. *Comrades in Conscience: The Story of an English Community's Opposition to the Great War*. London: Francis Boutle, 2001.
- Pearson, Raymond. *The Russian Moderates and the Crisis of Tsarism, 1914–1917*. New York: Barnes and Noble, 1977.
- Pedroncini, Guy. *Les mutineries de 1917*, 2nd ed. Paris: Publications de la Sorbonne, Presse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1983.
- Pegov, A. M., et al. *Imena moskovskikh ulits*. Moscow: Moskovskii rabochii,



- 1979.
- Penner, D'Ann R. "Stalin and the Italian-ka of 1932-1933 in the Don Region," *Cahiers du monde russe*, 39/1-2 (1998): 27-67.
- Pentkovskaia, V. V. "Rol' V. I. Lenina v obrazovanii SSSR," *Voprosy istorii*, 1956, no. 3: 13-24.
- Peregudova, Z. I. "Deitel'nost komissii Vremennogo pravitel'stva i sovetских arkhivov po raskrytiiu sekretnoi agentury tsarskoi okhranki," *Otechestvennye arkhivy*, no. 5 (1998): 10-22.
- . *Politicheskii sysk Rossii, 1880-1917*. Moscow, 2000.
- Pereira, Norman G. O. *White Siberia: The Politics of Civil War*. Montreal and Kingston: McGill-Queen's University Press, 1996.
- Perepiska sekretariata TsK RSDRP (b) s mestnymi partiinymi organizatsiiami: sbornik dokumentov, 8 vols. Moscow: Politicheskaiia literatura, 1957-74.
- Perepiska V. I. Lenina i rukovodimyykh im uchrezhdenii s partiinymi organizatsiiami, 1903-1905 gg. Moscow, 1975.
- Perlmutter, Amos. *Modern Authoritarianism: A Comparative Institutional Analysis*.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1.
- Perric, Maureen. "Food Supply in a Time of Troubles: Grain Procurement and the Russian Revolution," *Peasant Studies*, 17/3 (1990): 217-25.
- . "The Russian Peasant Movement of 1905-1907: Its Social Composition and Revolutionary Significance," *Past and Present*, 57 (1972): 123-55.
- . *The Agrarian Policy of the Russian Socialist-Revolution Party: From its Origins through the Revolution of 1905-1907*.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6.
- Pershin, D. P., ed. *Baron Ungern: Urga i Altan-Bulak*. Samatra: Agni, 1999.
- Pershin, P. N. *Uchastkovoe zemlepol'zovanie Rossii: khutora i otraba, ikh rasprostranenie za desiatiletie 1907-1911 gg. i sud'by vo vremia revoliutsii (1917-1920 gg.)*. Moscow: Novaia derevnia, 1922.
- Pervaia vseobshchaia perepis' naseleniia Rossiiskoi imperii, 1897 g., LXIX* (Tifliskaia guberniia). St. Petersburg: Tsentral'nyi statisticheskii komitet MVD, 1905.
- Pervyi kongress Komintern na mart 1919 g.* Moscow: Partizdat, 1933.
- Pervyi legal'nyi Peterburgskii komitet bolshevikov v 1917 godu: sbornik materialov i protokolov zasedanii*. Moscow and Leningrad: Gosizdat, 1927.
- Pervyi s'ezd narodov vostoka, Baku, 1-8 sentiabria, 1920 g.: stenograficheskie otchety*. Petrograd: Kommunisticheskii internatsional, 1920.
- Peskova, G. N. "Diplomaticheskie otnosheniia mezhdru SSSR i Kitaem, 1924-1929 gg." *Novaia i noveishaia istoriia*, 1998, no. 1, 2.
- . "Stanovlenie diplomaticheskikh otnoshenii mezhdru Sovetskoi Rossiie i Kitaem, 1917-1924 gg." *Novaia i noveishaia istoriia*, 1997, no. 4: 105-34, 1998, no. 1: 106-19, no. 2: 66-88.
- Pestkovskii, S. S. "Ob oktiabr'skie dniakh v Pitere," *Proletarskaia revoliutsiia*, 1922, no. 10: 94-104.
- . "Vospominaniia o rabote v Narkomnase," *Proletarskaia revoliutsiia*, 1930, no. 6: 124-31.
- Peters, [Ja]. "Vospominaniia o rabote VChK v pervyi gody revoliutsii," *Proletarskaia revoliutsiia*, 1924, no. 10 (33): 5-32.
- Peterson, Claes. *Peter the Great's Administrative and Judicial Reforms: Swedish Antecedents and the Process of Reception*. Stockholm: A.-B/ Nordiska Bokhandeln, 1979.
- Pethybridge, Roger. *One Step Backwards, Two Steps Forward: Soviet Society and Politics in the New Economic Policy*. Oxford: Clarendon, 1990.
- . *The Spread of the Russian Revolution: Essays on 1917*.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72.
- Petrogradskaia obshchegorodskaia konferentsiia RSDRP (bol'shevikov), april' 1917 goda: protokoly*. Moscow: Politicheskaiia literatura, 1958.
- Petrov, Iurii P. *Partiinoe stroitel'stvo v Sovetskoi armii i flote: deiatel'nost' KPSS po sozdaniiu i ukrepleniiu politorganov, partiinykh i komsomolskikh organizatsii v vooruzhennykh silakh (1918-1961 gg.)*. Moscow: Voenizdat, 1964.
- Petrov, Nikolai. *50 i 500*. Moscow: Vserossiiskoe teatral'noe obshchestvo, 1960.
- Pfanzte, Otto. *Bismarck and the Development of Germany*, 2nd ed., 3 vols.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0.
- Piaskovskii, A. B., ed. *Vosstanie 1916 goda v Srednei Azii i Kazakhstane: sbornik dokumentov*. Moscow: Akademiia Nauk, 1960.
- Piat' let vlasti Sovetov*. Moscow: TSIK, 1922.
- Pietsch, Walter. *Revolution und Staat: Institutionen als Trager der Macht in Sowjetrusland 1917-1922*. Cologne: Verlag Wissenschaft und Politik, 1969.
- Pikhoia, R. G., and Zelenov, M.V., eds. *I. V. Stalin: istoricheskaiia ideologiia v SSSR v 1920-1950-e gody: perepiska s istorikami, stati i zametki po istorii, stenogrammy vystuplenii. Sbornik dokumentov i materialov*. St. Petersburg: Nauka-Piter, 2006.
- Pilenko, Aleksandr, ed. *As the Court of the Last Tsar: Being the Memoirs of A. A. Mossolov, Head of the Court Chancellery, 1900-1916*. London: Methuen, 1935.
- Pi'lskii, P. M. "Pervoe dekabral," in *Baltiiskii arkhiv: russkaia kul'tura v Pribaltike*, edited by Irina Beloborovaeva, et al. Tallinn: Avenarius, 1996.
- Piontkowski, S. *Grazhdanskaia volna v Rossii: khrestomatiiia*. Moscow: Kommunisticheskii universitet im. Ia. M. Sverdlova, 1925.
- Pilsudski, Josef. *Year 1920*. New York: Pilsudski Institute of New York, 1972.
- Piotrovskii, Adrian. *Za sovetkii teatr!* Leningrad: Akademiia, 1925.
- Pipes, Richard. "The First Experiment in Soviet Nationality Policy: the Bashkir Republic, 1917-1920," *Russian Review*, 9/4 (1950): 303-9.
- . *Peter Struve*, 2 vol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0, 1980.
- . *Russia Under the Bolshevik Regime*. New York: Knopf, 1994.
- . *The Degeev Affair: Terror and Treason in Tsarist Russia*. New Haven, CT,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3.
- . *The Formation of the Soviet Union: Communism and Nationalism, 1917-1923*.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3.
- . *The Russian Revolution*. New York: Knopf, 1990.
- Pipes, Richard, ed. *The Unknown Lenin: From the Secret Archive*.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6.
- . *Revolutionary Russia*.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8.
- Pirani, Simon. *The Russian Revolution in Retreat, 1920-24: Soviet Workers and the New Communist Elite*. London: Routledge, 2008.
- Pitcher, Harvey J. *Witnesses of the Russian Revolution*. London: John Murray, 1994.
- Pitaluga, Giovanni B. "The Genoa Conference: Was it Really a Failure?" Found at [http://dev3.cepr.org/meets/wkcn/11/1671/papers/The\\_Genoa\\_Conference\\_finale.pdf](http://dev3.cepr.org/meets/wkcn/11/1671/papers/The_Genoa_Conference_finale.pdf).
- Platova, E. E. *Zhizn' studenchestva Rossii v perekhodnoi epokhu, 1921-1927 gg.* St. Petersburg: SPbGUAP SPbGU, 2001.
- Platten, Fritz. *Die Reise Lenins durch Deutschland in plombierten Wagen*. Berlin, 1924.
- Plekhanov, A. A., and Plekhanov, A. M. *Zheleznyi Feliks: Belye piatna v biografii chekista*. Moscow: Olma, 2010.
- , eds. *F. E. Dzerzhinskii—predsedatel' VChK-OGPU: sbornik dokumentov, 1917-1926*. Moscow: Mezhdunarodnyi fond Demokratiia, 2007.
- Plekhanov, A. M. *VChK-OGPU v gody novoi ekonomicheskoi politiki 1921-1928*. Moscow: Kuchkovo pole, 2006.
- . *VChK-OGPU, 1921-1928*. Moscow: X-History, 2003.



- Mekhanov, Aleksandr. *Dzerzhinskii: Per-  
vyi chekist Rossii*. Moscow: Olma,  
2007.
- Pobeda oktiabrskoi revoliutsii v Uzbekis-  
tane: sbornik dokumentov*, 2 vols.  
Tashkent: Fan, 1963-72.
- Podbolotov, Sergei. "Monarchists Against  
their Monarch: The Rightists' Criti-  
cism of Tsar Nicholas II," *Russian  
History*, 31/1-2 (2004): 105-20.
- "Podpol'naiia tipografiia 'Iskra' v Baku  
(Materialy Vano Sturua)," in *Iz pro-  
shlogo: Stat'i i vospominaniia iz istorii  
Bakinskoi organizatsii i rabocheho  
dvizheniia v Baku*. Baku: Bakinskii  
rabochii, 1923.
- Podvoiskii, N. I. *Krasnaia guardiia v ok-  
tiabr'skie dni*. Moscow-Leningrad:  
Gosizdat, 1927.
- Porzka v Sibir' i povel'zhe: zapiska P. A.  
Stolypina i A. V. Kriosekhina*. St. Pe-  
tersburg: A. S. Suvorin, 1911.
- Pogreelskii, Alexis. "Kamenev in Rome,"  
*The NEP Era: Soviet Russia, 1921-  
1928*, 1 (2007): 101-81.
- Pogrebinskii, A. P. "Voenno-promyshlen-  
nye komitety," *Istoricheskie zapiski*,  
11 (1941): 160-200.
- . *Ocherki istorii finansov dorev-  
oliutsionnoi Rossii, XIX-XX vv.* Mos-  
cow: Gosfinizdat, 1954.
- Pokhlebin, V. V. *Velikii pseudonim*. Mos-  
cow: Iudit, 1996.
- Pokrovskii, M., and Gelis, I. R., eds.  
"Politicheskoe polozenie Rossii na-  
kanune fevral'skoi revoliutsii v zhan-  
darmskom osveshchenii," *Krasnyi  
arkhiv*, 17 (1926): 3-35.
- Pokrovskii, M. N., and Iakovlev, Ia. A.,  
eds. *Gosudarstvennoe soveshchanie*.  
Moscow-Leningrad: Gosizdat, 1930.
- Pokrovsky, M. N. *A Brief History of Rus-  
sia*, 2 vols. London: Martin Law-  
rence, 1933.
- Polan, A. J. *Lenin and the End of Politic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4.
- Polanyi, Karl.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Boston: Beacon, 1957.
- Poletaev, V. E. et al. *Revoliutsionnoe  
dvizhenie v Rossii: aprel'skii krizis*.  
Moscow: Akademiia nauk, 1958.
- Polikarenko, I. E., ed. *O Felikse Edmun-  
doviche Dzerzhinskom: vospominani-  
ia, stat'i, ocherki sovremennikov*. Mos-  
cow: Politizdat, 1977.
- Politicheskii dnevniki, 1964-1970*. Am-  
sterdam: Fond Imeni Gertsena,  
1972.
- Politika Sovetskoi vlasti po natsional'nym  
delam za tri goda. 1917-1920 gg.*  
Moscow: Gosizdat, 1920.
- Polivanov, A. A. *Iz dnevnikov i vospomi-  
naniia po dolzhnosti voennogo ministra  
i ego pomoshchnikov, 1907-1916 gg.*  
Moscow: Vysshii voen. redaktsionnyi  
sovet, 1924.
- Pollock, Troy E. *Creating the Russian Per-  
il: Education, the Public Sphere, and  
National Identity in Imperial Germa-  
ny, 1890-1914*. Rochester, NY:  
Camden House, 2010.
- Pol'ner, T. I. *Zhiznennyi put' kniazia  
Georgiia Evgenevicha Lvova*. Paris:  
[s.n.], 1932; Moscow: Russkii put',  
2001.
- Polnoe sobranie zakonov Rossiiskoi imperii*,  
series 3. St. Petersburg: Tipografiia II  
Otdieleniia Sobstvennoi Ego Impera-  
torskago Velichestva Kantseliarii,  
1830-1916.
- Polovtsoff, Peter A. *Glory and Downfall:  
Reminiscences of a Russian General  
Staff Officer*. London: G. Bell, 1935.
- Polovtsov, A. A. *Dvenik gosudarstvennogo  
sekretaria*, P. A. Zaionchkovskii, ed. 2  
vols. Moscow: Nauka, 1966.
- Pope, Arthur. *Maksim Litvinoff*. New  
York: I. B. Fischer, 1943.
- Popoff, George. *The Tcheka: The Red In-  
quisition*. London: A. M. Philpot,  
1925.
- Popov, M. A. *Rubtsovsk 1892-2000: is-  
toricheskie ocherki*. Rubtsovsk: [s.n.],  
2004.
- Popov, Nikolai. *Outline History of the  
C.P.S.U.*, 2 vols. New York: Interna-  
tional Publishers, 1934.
- Pospelov et al., Petr N. *Vladimir Il'ich Le-  
nin; biografiia*. Moscow: Politich-  
eskaia literatura, 1960, 1963.
- Pozhigailo, P. A., ed. *P. A. Stolypin -pro-  
gramma reform: dokumenty i materi-  
aly*, 2 vols. Moscow: Rosspen, 2003.
- Pravilova, Ekaterina. *Zakonnost' i prava  
lichnosti: administrativnaia iustitsiia v  
Rossii, vtoraiia polovina 19 veka-ok-  
tiabr' 1917*. St. Petersburg: Obrazo-  
vanie-Kultura, 2000.
- Preobrazhenskii, Evgenii. *Bumazhnye  
den'gi v epokhu proletarskoi diktatury*.  
Moscow: Gosizdat, 1920.
- Pribytkov, Viktor. *Apparat*. St. Petersburg:  
VIS, 1995.
- Price, M. Philips. *My Reminiscences of the  
Russian Revolution*. London: G. Allen  
& Unwin, 1921.
- Price, Morgan Philips, and Rose, Tania,  
eds. *Dispatches from the Revolution:  
Russia 1916-1918*. London and Chi-  
cago: Pluto, 1997.
- Prior, Robin, and Wilson, Trevor. *The  
Somme*. New Haven, CT: Yale Uni-  
versity Press, 2005.
- Prishvin, Mikhail M. *Dnevnik*, 11 vols.  
Moscow: Moskovskii rabochii,  
1991-2012.
- Proceedings of the Brest-Litovsk Peace Con-  
ference [electronic resource]: the peace  
negotiations between Russia and the  
Central Powers 21 November, 1917-3  
March, 1918*. Washington, D.C.: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18.
- Prokofiev, Sergei. *Soviet Diary 1927 and  
Other Writings*. London: Faber and  
Faber, 1991.
- Protasov, L. G. *Verosiiskoe Uchreditol'noe  
Sobranie: istoriia rozhdeniia i gibeli*.  
Moscow: Rosspen, 1997.
- Protokoly Tsentral'nogo komiteta RSDRP  
(b), August 1917 g.—fevral' 1918 g*  
Moscow-Leningrad. Gosizdat, 1929.  
Moscow: Politicheskaiia literature,  
1958.
- Protokoly zasedanii Vserossiiskogo Tsen-  
tral'nogo Ispolnitel'nogo Komiteta V-go  
sozyva: stenograficheskii otchet*. Mos-  
cow: VTsIK, 1919.
- Protokoly zasedaniia VTsIK Sovetov rabo-  
chikh, soldatskikh, krest'ianskikh i ka-  
zachikh deputatov II sozyva*. Moscow:  
VTsIK, 1918.
- Psurtsev, N. D. *Razvitie sviazi v SSSR*.  
Moscow: Sviaz', 1967.
- Purishkevich, V. M. *Bez zabrala: otkrytoe  
pis'mo bol'shevikam Soveta Petro-  
gradskikh rabochikh deputatov*. Har-  
bin: Bergut, syn i ko., 1917.
- . *Vpered! Pod dvukhsvetnym flag-  
om (Otkrytoe pis'mo russkomu obsh-  
chestvu)*. Petrograd, 1917.
- Putintsev, N. D. "Statisticheskii ocherk  
Tomskoi gubernii," *Otchet po kom-  
mandovaniiu predsedatelia ot voennogo  
ministrstva v ekspeditsiiu dlia izy-  
kaniia Zapadno-Sibirskoi Zheleznoi  
dorogi*. Samara, 1892.
- Putna, Vitovt. *K Vile i obratno*. Moscow:  
Voennyi vestnik, 1927.
- Rabinowitch, Alexander. "Dos'c Shchast-  
nogo: Trotskii i delo gerioia Baltiisko-  
go flota," *Otechestvennaia istoriia*,  
2001, no. 1: 61-81.
- . "Maria Spiridonova's 'Last Tes-  
tament'," *Russian Review*, 54/3  
(1995): 424-44.
- . *Prelude to Revolution: The Petro-  
grad Bolsheviks and the July 1917 Up-  
rising*.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  
sity Press, 1968.
- . *The Bolsheviks Come to Power:  
The Revolution of 1917 in Petrograd*.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76.
- . *The Bolsheviks in Power: The First  
Year of Soviet Rule in Petrograd*.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2007.
- Radek, Karl. *Vneshniaia politika sovetskoi  
Rossii*. Moscow-Petrograd: Gosizdat,  
1923.
- . *Voina pol'skikh belogardeitsev  
protiv Sovetskoi Rossii (Doklad na so-  
branii agitatorov Moskovskikh organi-  
zatsii kommunisticheskoi partii 8 maia  
1920 g.)* Moscow: Gosizdat, 1920.
- Radkey, Oliver H. *Agrarian Foes of Bolshe-  
vism*.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  
sity Press, 1968.
- . *Russia Goes to the Polls: The Elec-  
tion to the Russian Constituent Assem-  
bly of 1917*. Ithaca, NY: Cornell Uni-  
versity Press, 1989.
- . *The Sickle Under the Hammer:  
The Russian Socialist Revolutionaries  
in the Early Months of Soviet Rul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63.
- . *Unknown Civil War in Soviet  
Russia: A Study of the Green Move-*

- ment in the Tambov Region, 1920–1921. Stanford, CA: Hoover Institution Press, 1976.
- Radzinskii, Edvard. *Ubiistvo tsarskoi sem'i*. Moscow: Novosti, 1991. Translated as *The Last Tsar: The Life and Death of Nicholas II*. New York: Doubleday, 1992.
- Radzinsky, Edvard. *Stalin: The First In-depth Biography Based on Explosive New Documents from Russia's Secret Archives*. New York: Doubleday, 1997.
- . *The Rasputin File*. New York: Nan A. Talese/Doubleday, 2006.
- Raeff, Marc. *Understanding Imperial Russia*.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4.
- . "Some Reflections on Russian Liberalism," *Russian Review*, 18/3 (1959): 218–30.
- . "The Bureaucratic Phenomenon of Imperial Russia, 1700–1905,"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84/2 (1979): 399–411 (esp. 405–6).
- . "The Russian Autocracy and its Officials," *Harvard Slavic Studies*, 4 (1957): 77–91.
- Rakh'ia, Eino. "Poslednoe podpol'e Vladimira Il'icha," *Krasnaia letopis'*, 1934, no. 1 (58): 79–90.
- . "Moi predoktiabr'skie i posleoktiabr'skie vstrechi s Leninyim," *Novyi mir*, 1934, no. 1:24–39.
- Rakovskii, Kh. *Kniaz' Metternikh: ego zhizn' i politicheskaia deiatel'nost'*. St. Petersburg: Iu.N. Erlikh, 1905.
- Raleigh, Donald J. "Revolutionary Politics in Provincial Russia: the Tsaritsyn 'Republic' in 1917," *Slavic Review*, 40/2 (1981): 194–209.
- . *Experiencing Russia's Civil War: Politics, Society, and Revolutionary Culture in Saratov, 1917–22*.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2.
- . *Revolution on the Volga: 1917 in Saratov*.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4.
- , ed. *Provincial Landscapes: Local Dimensions of Soviet Power, 1917–1953*. Pittsburgh: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Press, 2002.
- Randolph, John. *The House in the Garden: The Bakunin Family and the Romance of Russian Idealism*. Ithaca: Cornell, 2007.
- Rank, Otto. *The Trauma of Birth*.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1929, 1973.
- Ransel, David. "Character and Style of Patron-Client Relations in Russia," in *Klientelsysteme im Europa der Fruhen Neuzeit*, edited by Antoni Maczak. Munich: R. Oldenbourg, 1988.
- Ransome, Arthur. *Russia in 1919*. New York: B. W. Heutsch, 1919.
- Rapoport, V. N., and Geller, Iu. *Izmena rodine*. Moscow: Pik strelets, 1995.
- Rappaport, Helen. *The Last Days of the Romanovs: Tragedy at Ekaterinburg*.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2009.
- Raskol'nikov, F. F. "V iul'skie dni," *Proletarskaia revoliutsiia*, 1923, no. 5: 53–101.
- . *Krosnshadt i piter v 1917 godu*. Moscow and Leningrad: Gosizdat, 1925.
- . *Na boevykh postakh*. Moscow: Voerilzdat, 1964.
- . *Rasskazy michmana Il'ina*. Moscow: Sovetskaia literatura, 1934.
- . "V tiur'me Kerenskogo," *Proletarskaia revoliutsiia*, 1923, no. 10 (22): 150–2.
- Ravich-Cherkasskii, M. *Istoriia kommunisticheskoi partii (bol'shevikov) Ukrainy*. Kharkov: Gosizdat Ukrainy, 1923.
- Rawson, Don C. *Russian Rightists and the Revolution of 1905*.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5.
- Rawson, Donald. "The Death Penalty in Tsarist Russia: An Investigation of Judicial Procedures," *Russian History*, 11/1 (1984): 29–52.
- Rayfield, Donald. "Stalin as Poet," *PN Review*, 41 (1984): 44–7.
- . *Stalin and His Hangmen: An Authoritative Portrait of a Tyrant and Those who Served Him*. New York: Viking, 2004.
- . *The Literature of Georgia: A History*, 3rd ed. London: Gannett, 2010.
- . *The Literature of Georgia: A History*. Oxford: Clarendon, 1994.
- Reed, John. *Ten Days That Shook the World*. New York: Boni and Liveright, 1919. New York: Vintage, 1960.
- Rees, E. A. *"Iron Lazar": A Political Biography of Lazar Kaganovich*. London and New York: Anthem Press, 2012.
- . "Stalin, the Politburo, and Rail Transport Policy," in *Soviet History 1917–1953: Essays in Honour of R. W. Davies*, edited by Julian Cooper, Maureen Perrie, and E. A. Rees.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95.
- . *State Control in Soviet Russia: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Workers' and Peasants' Inspectorate, 1920–1934* (1987)
- Rei, August. *The Drama of the Baltic Peoples*. Stockholm: Kirjaustus Vaba Eesti, 1970.
- Reichenbach, Bernard. "Moscow 1921: Meetings in the Kremlin," *Survey*, 53 (1964): 16–22.
- Reiss, Tom. *The Orientalist*. New York: Random House, 2005.
- Reissner, Larisa. *Oktober, ausgewählte Schriften*. Berlin: Neuer deutscher Verlag, 1927.
- Remak, Joachim. *Sarajewo: The Story of a Political Murder*. New York: Criterion, 1959.
- Remington, Thomas. "Institution Building in Bolshevik Russia: The Case of 'State Kontrol'," *Slavic Review*, 41/1 (1982): 91–103.
- Remnev, Anatolii V. *Samoderzhavnoe pravitel'stvo: komitet ministrov v sisteme vysshnego upravleniia Roslitskoi imperii (vtoraia polovina XIX-nachalo XX veka)*. Moscow: Rosspen, 2010.
- Rendle, Matthew. *Defenders of the Motherland: The Tsarist Elite in Revolutionary Russia*.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0.
- Reshetar, John. *The Ukrainian Revolution, 1917–1920*.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52.
- . "Lenin on the Ukraine," *Annals of the Ukrainian Academy of Arts and Sciences in the United States*, 9/1–2 (1961): 3–11.
- Resolutions and Decision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the Soviet Union*, 5 vols. Toronto and Buffalo, NY: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1974.
- Reswick, William. *I Dreamt Revolution*. Chicago: H. Regnery Co., 1952.
- Rezanov, A. S. *Shturmovoii signal P. N. Miliukova: s prilozheniem pol'nago teksta rechi, proiznesennoi Miliukovym v zasiedanii Gosudarstvennoi Dumi I noiabria 1916 g.* Paris: self-published, 1924.
- Reznik, Aleksandr V. *Trotskizm i levaia oppozitsiia v RKP (b) v 1923–1924 gody*. Moscow: Svobodnoe maksiatskoe izdatel'stvo, 2010.
- Rezoliutsii i postanovleniia pervoi Vsesoiuznoi konferentsii obshchestva starykh bol'shevikov (25–28 ianv. 1931)*. Moscow, 1931.
- Riabushinskii, V. P., ed., *Velikaia Rouiia*, 2 vols. Moscow: P. P. Riabushinskii, 1911
- Riasanovsky, Nicholas V. "The Emergence of Eurasianism," *California Slavic Studies* 4 (1967): 39–72.
- . *The Teaching of Charles Fourier*.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1969.
- Riddell, John, ed. and trans. *Workers of the World and Oppressed Peoples, Unite!: Proceedings and Documents of the Second Congress, 1920*, 2 vols. New York: Pathfinder Press, 1991.
- , ed. *Founding the Communist International: Proceedings and Documents of the First Congress, March 1919*. New York: Pathfinder Press, 1987.
- . *To See the Dawn: Baku 1920—First Congress of the Peoples of the East*. New York: Pathfinder Press, 1993.
- Rieber, Alfred, ed. *The Politics of Autocracy: Letters of Alexander II to Prince A. I. Bariatinskii, 1857–1864*. Paris: Mouton, 1966.
- Rieber, Alfred J. "Stalin: Man of the Borderlands,"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106/5 (2001): 1651–91.
- . "Alexander II: A Revisionist View," *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 43/1 (1971), 42–58.
- . "Persistent Factors in Russian

- Foreign Policy: An Interpretive Essay," in *Imperial Russian Foreign Policy*, edited by Hugh Ragsdale. Washington, D.C.: Wilson Center Press, 1993.
- . "Stalin as Foreign Policy Maker: Avoiding War, 1927–1953," in *Stalin: A New History*, Davies and Harris, ed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 140–58.
- . "Stalin as Georgian: The Formative Years," in *Stalin: A New History*, Davies and Harris, ed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 18–44.
- Rigby, T. H. "Birth of the Central Soviet Bureaucracy," *Politics* [Sydney], 7/2 (1972): 121–135.
- . "Early Provincial Cliques and the Rise of Stalin," *Soviet Studies*, 33/1 (1981): 3–28.
- . "Staffing USSR Incorporated: The Origins of the Nomenklatura System," *Soviet Studies*, 40/4 (1988): 523–37.
- . "The First Proletarian Government,"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4/1 (1974): 37–51.
- . "The Origins of the Nomenklatura System," in *Felder und Vorfelder russischer Geschichte*, edited by Inge Auerbach, et al. Freiburg (im Breisgau): Rombach, 1985.
- . "The Soviet Political Elite, 1917–1922,"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1/4 (1971): 415–36.
- . "Was Stalin a Disloyal Patron?" *Soviet Studies*, 38/3 (1986): 311–24.
- . *Communist Party Membership in the U.S.S.R., 1917–1967*.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8.
- . *Lenin's Government: Sovnarkom, 1917–1922*.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9.
- , et al., eds. *Authority, Power, and Policy in the USSR: Essays Dedicated to Leonard Schapiro*. London: Macmillan, 1980.
- Ruha, Thomas. *A Russian European: Miliukov*. South Bend, IN: 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Press, 1969.
- Rikhter, Zinaida. *Kavkaz nashikh dnei*. Moscow: Zhizn' i znanie, 1924.
- Robbins, Jr., Richard G. "Choosing the Russian Governors: The Professionalization of the Gubernatorial Corps," *Slavonic and East European Review*, 58 (1980): 541–60.
- . *The Tsar's Viceroys: Russian Provincial Governors in the Last Years of the Empire*.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7.
- Robertson, D. H. "A Narrative of the General Strike of 1926," *Economic Journal*, 36 (1926): 375–93.
- Robinson, Geroid T. *Rural Russia under the Old Regim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34.
- Robson, Roy P. *Solovki: The Story of Russia Told Through its Most Remarkable Islands*.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4.
- Rodzianko, M. V. *Krushenie imperii*. Leningrad: Priboi, 1929.
- . *Reign of Rasputin: An Empire's Collapse*. Gulf Breeze, FL: Academic International Press, 1973.
- Rodzyanko, Mikhail V. *The Reign of Rasputin*. London: Philpot, 1927.
- Rogachevskaiia, L. S. *Likvidatsiia bezrabotitsy v SSSR 1917–1930 gg.* Moscow: Nauka, 1973.
- Rogger, Hans. "Russia in 1914,"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History*, 1/4 (1966): 95–120.
- . "Russia," in *The European Right: A Historical Profile*, edited by Hans Rogger and Eugen Weber.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5.
- . "The Formation of the Russian Right: 1900–1906," in *California Slavic Studies*, III, edited by Nicholas Riasanovsky and Gleb Struve. Berkeley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4.
- . "Was There a Russian Fascism? The Union of Russian People," *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 36/4 (1964): 398–415.
- . *Russia in the Age of Modernization 1881–1917*. London and New York: Longman, 1983.
- . *Jewish Policies and Right-Wing Politics in Imperial Russia*. London: Macmillan, 1986.
- Rohl, John C. G., and Sombart, Nicolaus, eds. *Kaiser Wilhelm II, New Interpretations: The Corfu Paper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2.
- Rolf, Matte. *Sovetskie massovy prazdniki*. Moscow: Rosspen, 2009.
- Rollin, Henri. *L'apocalypse de notre temps: les dessous de la propagande allemande d'après des documents inédits*. Paris: Gallimard, 1939.
- Romano, Andrea. "Permanent War Scare: Mobilization, Militarization, and Peasant War," in *Russia in the Age of Wars, 1914–1945*, edited by Andrea Romano and Silvio Pons. Milan: Feltrinelli, 2000.
- Romanov, B. A. "Rezensiia: Graf S. Iu. Vitte, Vospominaniia tsarsrovaniia Nikolaia II," *Kniga i revoliutsiia: ezhesiachnyi kritiko-bibliograficheskii zhurnal*, 1923, no. 2 (26): 54–6.
- . *Rossiiia v Man'chzhurii 1892–1906*. Leningrad: Institut Dal'nego vostoka, 1928.
- Ronaldshay, Earl of. *The Life of Lord Curzon: Being the Authorized Biography of George Nathaniel, Marquess Curzon of Kedleston*, K. G., 3 vols. London: Ernest Benn, 1928.
- Ropponen, Risto. *Die Kraft Russlands*. Helsinki: Historiallisia tutkimuksia, 1968.
- Rorlich, Azade-Ay e. *The Volga Tatars: a Profile in National Resilience*. Stanford, CA: Hoover Institution Press, 1986.
- Rose, Kenneth. *King George V*.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84.
- Rosenbaum, Kurt. "The German Involvement in the Shakhty Trial," *Russian Review*, 26 (1962): 238–60.
- . *Community of Fate: German-Soviet Diplomatic Relations, 1922–1928*. Syracuse, NY: Syracuse University Press, 1965.
- Rosenberg, Alfred. *Der jüdische Bolschewismus*. [s.l.] [s.n.], 1921.
- Rosenberg, William G. "Representing Workers and the Liberal Narrative of Modernity," *Slavic Review*, 55/2 (1996): 245–69.
- . *Liberals in the Russian Revolution: The Constitutional Democratic Party, 1917–1921*.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4.
- Rosenfeldt, Nils Erik. *Knowledge and Power: The Role of Stalin's Secret Chancellery in the Soviet System of Government*. Copenhagen: Rosenkilde and Bagger, 1978.
- . *Stalin's Special Departments: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Key Sources*. Copenhagen: C. A. Reitzels Forlag, 1989.
- . *The "Special" World: Stalin's Power Apparatus and the Soviet System's Secret Structures of Communication System*, 2 vols. Copenhagen: Museum Tusulanum, 2009.
- Roshchin, S. K. *Politsicheskaia istoriia Mongolii, 1921–1940 gg.* Moscow: Institut vostokovedeniia RAN, 1999.
- Roshwald, Aviel. *Ethnic Nationalism and the Fall of Empires: Central Europe, Russia and the Middle East, 1914–1923*.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1.
- Rosmer, Alfred. *Moscou sous Lenine*. Paris: Pierre Horay, 1953.
- Rossiiia: entsiklopedicheskii slovar'*. St. Petersburg: Brokgauz i Efron, 1898.
- Rossiiia v mirovoi voine 1914–1918 (v triakh)*. Moscow: Tip. M.K. Kh. imeni F. Ia. Lavrova, 1925.
- Rossiiskaia Sotsialisticheskaia Federativnaia Sovetskaia Respublika i Gruzinskaia demokraticheskaia respublika, ikh vzaimootnoshenii*. Moscow: Gosizdat, 1922.
- Rostunov, I. I. *General Brusilov*. Moscow: Voensizdat, 1964.
- . *Russkii front pervoi mirovoi voiny*. Moscow: Nauka, 1976.
- Rothschild, Joseph. *East Central Europe Between the World Wars*.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74.
- . *Pilsudski's Coup d'Etat*.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66.
- Rozhkov, A. "Internatsional durakov," *Rodina*, 1999, no. 12: 61–66.
- Rubakin, N. A. *Rossiiia v tsifakh*. St. Petersburg, 1912.
- Rubtsov, Iurii. *Iz-za spiny vozhdia: poli-*

- nicheskaiia i voennaia deiatel'nost' L.Z. Mekhlisa.* Moscow: Ritm Esteit, 2003.
- . *Marshaly Stalina.* Moscow: Feniks, 2002.
- Rubtsov, V. I. "Voenna-politicheskaia deiatel'nost' G. Ia. Sokol'nikova, 1917–1920 gg.," kandidatskaia dissertatsiia, Moscow, 1991.
- Ruge, Wolfgang. *Die Stellungnahme der Sowjetunion gegen die Besetzung des Ruhrgebiets: zur Geschichte der deutsch-sowjetischen Beziehungen von Januar bis September 1923.* Berlin: Akademie-Verlag, 1962.
- Runciman, W. Leslie. "The World Economic Conference at Geneva," *Economic Journal*, 37 (1927): 465–72.
- Rupen, Robert. *How Mongolia is Really Ruled—A Political History of the Mongolian People's Republic 1900–1978.* Stanford, CA: Hoover Institution Press, 1979.
- . *Mongols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2 vols.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64.
- Rusanova, I. B. "I. P. Tovstukha: k 80-letiiu so dnia rozhdeniia," *Voprosy istorii KPSS*, 1969, no. 4: 128–30.
- Russell, Bertrand. *Justice in War Time.* Chicago: Open Court, 1916.
- . *The Practice and Theory of Bolshevism.*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and Howe, 1920.
- Rusky, N. S. "An Account of the Tsar's Abdication," *Current History*, 712 (1917): 262–4.
- Rutherford, Ward. *The Tsar's War, 1914–1917: The Story of the Imperial Russian Army in the First World War*, rev. ed. Cambridge, U.K.: Ian Faulkner, 1992.
- Rutych, Nikolai N. *Belyi front generala Iudenicha: biografiia chinov Severo-Zapadnoi armii.* Moscow: Russkii put', 2002.
- Ruud, Charles A., and Stepanov, Sergei A. *Fontanka 16: The Tsar's Secret Police.* Montreal: McGill-Queen's University, 1999.
- Rykov, A. I. *Angliia i SSSR: doklad na plenum Moskenskogo soveta 1 i iunია 1927 g.* Moscow: Gosizdat, 1927.
- . *Izbrannye proizvedeniia.* Moscow: Ekonomika, 1990.
- . *Ten Years of Soviet Rule: An Economic, Social and Political Survey of the Soviet Government's Achievements from 1917 to 1927.* London: National Committee of Friends of Soviet Russia by the Labour Research Dept, 1928.
- Saar, Juhan (Eduard Laaman). *Le 1-er décembre 1924: l'échec du coup d'état tenté par les communistes à Tallinn (Estonie).* Tallinn: Walwur, 1925.
- Sadikov, P., ed. "K istorii poslednikh dni tsarskogo rezhima (1916–1917 gg.)," *Krasnyi arkhiv*, 14 (1926): 227–49.
- Sadoul, Jacques. "La Fondation de la Troisième internationale," *La Correspondance internationale*, 4/17 (March 12, 1924).
- . *Notes sur la révolution bolchevique, octobre 1917–janvier 1919.* Paris: Éditions de la Sirène, 1919.
- Safarov, Georgii I. *Kolonial'naiia revoliutsiia: opyt Turkestana.* Moscow: Gosizdat, 1921.
- Sagan, Scott D. "1914 Revisited: Allies, Offense, and Instabilit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11/2 (1986): 151–76.
- Sakharov, Valentin A. *Na raspuťe: diskussii po voprosam perspektiv i putei razvitiia sovetskogo obshchestva, 1921–1929.* Moscow: Akva-Term, 2012.
- . *Politicheskoe zaveshchanie Lenina: real'nost' istorii i mify politiki.* Moscow: Moskovskii universitet, 2003.
- Sakwa, Richard. "The Commune State in Moscow in 1918," *Slavic Review*, 46/3–4 (1987): 429–49.
- . *Soviet Communists in Power: A Study of Moscow During the Civil War, 1918–21.*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88.
- Sal'ko, S. V. "Kratkii otchet o deiatel'nosti Glavnogo Nefianogo Komiteta za pervyi god ego sushchestvovaniia," *Izvestiia Glavnogo Nefianogo Komiteta*, no. 213 (1919): 77.
- Salzmann, Stephanie C. *Great Britain, Germany and the Soviet Union: Rapallo and After, 1922–1934.* Rochester, NY: Boydell Press, 2003.
- Samoilov, A. A. *Due zhizni*, 2nd ed. Leningrad: Lenizdat, 1963.
- Samoilov, F. *Pervyi sovet rabochikh deputatov.* Leningrad: Molodaia gvardiia, 1931.
- "Samoubiitstvo ne opravdanie: predsmertnoe pis'mo Tomskogo Stalinu," *Rodina*, 1996, n. 2: 90–93.
- Samuelson, Lennart. *Plans for Stalin's War Machine: Tukhachevskii and Military Planning, 1925–1941.*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2000.
- . *Soviet Defence Industry Planning: Tukhachevskii and Military-Industrial mobilization.* Stockholm: Stockholm Institute of East European Economics, 1996.
- Sanborn, Joshua. "The Genesis of Russian Warlordism: Violence and Governance during the First World War and the Civil War," *Contemporary European History*, 19/3 (2010): 195–213.
- Sanchez-Sibony, Oscar. "Depression Stalinism: the Great Break Reconsidered," *Kritika*, 15/1 (2014): 23–39.
- Sandomirski, German, ed. *Materialy Genezskoi konferentsii: podgotovka, otchety zasiedanii, raboty komissii, diplomaticheskaiia perepiska i pr.* Moscow: Izd. pisatelei, 1922.
- Sandqvist, Tom. *Dada East: The Romanians of Cabaret Voltaire.* Cambridge, MA: 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Press, 2006.
- Santoni, W. "P. N. Durnovo as Minister of the Interior in the Witte Cabinet." Phd diss., University of Kansas, 1968.
- Sanukov, Ksenofont. "Stalinist Terror in the Mari Republic: the Attack on 'Finno-Ugrian Bourgeois Nationalism'," *Slavonic and East European Review*, 74/4 (1996): 658–82.
- Sapir, Boris, ed. *Fedor Il'ich Dan: pisma (1899–1946).* Amsterdam: Stichting Internationaal Instituut voor Sociale Geschiedenis, 1985.
- Sarkisov, A. *Bakinskaiia tipografiia leninskoi "Iskra."* Baku, 1961.
- Savchenko, Viktor A. *Avanturiury grazhdanskoi voiny: istoricheskie rassledovaniia.* Kharkov: Folio; Moscow: AST, 2000.
- Savel'ev, Iu. S. *V pervyi god velikogo oktiabria.* Moscow: Mysl', 1985.
- Savich, G. G., ed. *Novyi gorudarstvennyi stroi Rossii: spravochnaia kniga.* St. Petersburg: Brokgauz-Elfron, 1907.
- Savich, N. *Vospominaniia.* St. Petersburg and Dusseldorf: Logos and Gluboi vsadnik, 1993.
- Savinkov, B. S. *K delu Kornilova.* Paris: Union, 1919.
- Savitskaia, R. M. "Razrabotka nauchnoi biografii V. I. Lenina," *Voprosy istorii*, 1971, no. 4: 120–30.
- Savko, N. *Ocherki po istorii partiinykh organizatsii v Krasnoi Armii, 1917–1923 gg.* Moscow and Leningrad: Gosizdat, 1928.
- Sazonov, S. D. *Vospominaniia.* Paris: E. Sial'skaia, 1927.
- Sbornik deistvuiushchikh dogovorov soglasheniia i konventsii, zakliuchennykh R.S.F.S.R. s inostrannymi gosudarstvami*, 5 vols. St. Petersburg: Gosizdat, 1921–23.
- Sbornik tirkuliarnykh pisem VChK-OG-PU.* Moscow, 1935.
- Sbornik zakonodatel'nykh i normativnykh aktov o repressiakh i rehabilitatsii zhertzv politicheskikh repressii.* Moscow: Respublika, 1993.
- Schafer, Daniel E. "Local Politics and the Birth of the Republic of Bashkortostan, 1919–1920," in *A State of Nations: Empire and Nation-Making in the Age of Lenin and Stalin*, edited by Ronald Grigor Suny and Terry Marti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 Schapiro, Leonard. "Lenin after Fifty Years," in *Lenin, the Man, the Theorist, the Leader: a Reappraisal*, edited by Leonard Schapiro and Peter Reddaway. New York: Praeger, 1967.
- . "The Birth of the Red Army," in *The Red Army*, edited by Liddel Hart.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1956.
- . "The General Department of the CC of the CPSU," *Survey*, 21/3 (1975): 53–65.
- . *The Origin of the Communist Au-*

- ocracy: *Political Opposition in the Soviet State, First Phase 1917–1922*.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1955; New York: Praeger, 1965; London: LSE, 1977.
- . *Soviet Treaty Series: A Collection of Bilateral Treaties, Agreements, and Conventions, Etc., Concluded Between the Soviet Union and Foreign Powers*, 2 vols. Washington, D.C.: Georgetown University Press, 1950.
- Scheffer, Paul. *Sieben Jahre Sowjetunion*. Leipzig: Bibliographisches Institut Ag., 1930.
- Scheibert, Peter. *Lenin an der Macht: Das Russische Volk in der Revolution 1918–1924*. Weinheim: Acta Humaniora, 1984.
- Scheidemann, Philipp. *Memoiren eines Sozialdemokraten*. Dresden: Reissner, 1930.
- Schimmelpenninck van der Oye, David. *Toward the Rising Sun: Russian Ideologies of Empire and the Path to War with Japan*. DeKalb: Nor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Press, 2001.
- Schleifman, Nurit. *Undercover Agents in the Russian Revolutionary Movement: The SR Party, 1902–14*. Basingstoke, Hampshire: Macmillan, 1988.
- Schneiderman, Jeremiah. *Sergei Zubatov and Revolutionary Marxism: The Struggle for the Working Class in Tsarist Russia*.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76.
- Schorske, Carl. *Fin-de-Siècle Vienna: Politics and Culture*. New York: Knopf, 1980.
- Schroeder, Paul W. "Stealing Horses to Great Applause: Austria-Hungary's Decision in 1914 in Systemic Perspective," in *An Improbable War: The Outbreak of World War I and European Political Culture before 1914*, edited by Holger Afflerbach and David Stevenson. New York: Berghahn Books, 2007.
- . "The Lights that Failed—and Those Never Lit," *International History Review*, 28/1 (2006): 119–26.
- Schurer, H. "Radek and the German Revolution," *Survey*, 53 (1964): 59–69, 55, (1965): 126–40.
- Schwartz, Benjamin I. *Chinese Communism and the Rise of Mao*.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1.
- Schwarz, Solomon. *Labor in the Soviet Union*. New York: Praeger, 1952.
- Schwittau, G. G. *Revoliutsiia i narodnoe khoziaistvo v Rossii 1917–1921*. Leipzig: Tsentral'noe t-vo kooperativnogo izdatel'stva, 1922.
- Scott, James C. *Seeing like a State: How Certain Schemes to Improve the Human Condition have Failed*.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8.
- Seaton, Albert. *Stalin as Military Commander*. New York: Praeger, 1976.
- VII (aprel'skaia) Vserossiiskaia konferentsiia RSDRP (bol'shevikov). Moscow: Politicheskaia literatura, 1958.
- VII ekstrennyi s'ezd RKP (b), mart 1918 goda: stenograficheskii otechet. Moscow: Politicheskaia literatura, 1962.
- Selected Correspondence of Karl Marx and Friedrich Engels: *A Selection with Commentary and Notes*. London: Lawrence, 1944.
- Sel'skokhoziaistvennoe vedomstvo za 75 let, 1837–1912. St. Petersburg: Kantselariia Glavnoupravleniia zemleustroitsom i zemledeliiem, 1914.
- Selunskaiia, V. M. *Izmeneniia sotsial'noi struktury sovetskogo obshchestva: oktiabr' 1917–1920*. Moscow: Mysl', 1974.
- Semashko, Nikolai. *Otchego bolet i umer V. I. Lenin*. Leningrad: Gosizdat, 1924.
- Semevskii, V. P. *Monarkhiia pered krusheniem*. Moscow-Leningrad, 1927.
- Senin, A. S. A. I. *Rykov: stranitsy zhizni*. Moscow: Rosvuznauka, 1993.
- Senn, Alfred Erich. "Lithuania's Fight for Independence: The Polish Evacuation of Vilnius, July 1920," *Baltic Review*, 23 (1961): 32–9.
- . "The Rakovski Affair: A Crisis in Franco-Soviet Relations, 1927," *Études Slaves et Est-Européennes/Slavic and East-European Studies*, 10/3–4 (1965–6): 102–17.
- . *The Russian Revolution in Switzerland, 1914–1917*. 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71.
- Seraphim, Ernst. *Russische Portrats: die Zarenmonarchie bis zum Zusammenbruch 1917*, 2nd ed., 2 vols. Zurich-Leipzig-Vienna: Almathea, 1943.
- Serebriakova, Galina. "Oni delali v chest' idee, kotoroi sluzhili," *Izvestiia*, January 30, 1989.
- Serebrianskii, Z. "Sabotazh i sozdanie novogo gosudarstvennogo apparata," *Proletarskaia revoliutsiia*, 1926, no. 10: 5–17.
- Seregin, A. V. "Vyshii monarkhicheskii sovet i operatsiia 'Trest'," *Voprory istorii*, 2012, no. 11.
- Serge, Victor. *La vie et la mort de Leon Trotsky (avec Natalya Sedova)*. Paris: Amiot-Dumont, 1951.
- . *Le tournant obscur*. Paris: Îles d'or, 1951.
- . *Memoirs of a Revolutionary, 1901–1941*.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3.
- . *Or revoliutsii k totalitarizmu: vospominaniia revoliutsionera*. Orenburg: Praksis, 2001.
- Serge, Victor, and Trotsky, Natalya Sedova. *The Life and Death of Leon Trotsky*. New York: Basic Books, 1975.
- Sergeev, A. A., ed. "Fevral'skaia revoliutsiia 1917 goda," *Krasnyi arkhiv*, 21 (1927): 3–78.
- Sergeev, A. F., and Glushik, E. F. *Besedy o Sraline*. Moscow: Krymskii most, 2006.
- Sergeev, Evgeny. *Russian Military Intelligence in the War With Japan, 1904–5. Secret Operations on land and at Sea*. New York: Routledge, 2007.
- Sergo Ordzhonikidze v Tsaritsyne i Stalingrade. Stalingrad: Obl. kn-vo, 1937.
- Sering, Max. *Die Umwälzung der osteuropäischen Agrarverfassung*. Berlin: Deutsche Landbuchhandlung, 1921.
- Service, Robert. *Lenin: A Political Life*, 3 vols.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85.
- . *Spies and Commissars: Bolshevik Russia and the West*. London: Macmillan, 2011.
- . *Stalin: A Biography*. Cambridge, MA: Harvard Belknap, 2005.
- . *The Bolshevik Party in Revolution: A Study in Organizational Change, 1917–1923*. New York: Barnes and Noble, 1979.
- Seton-Watson, Hugh. *The Russian Empire, 1801–1917*. Oxford: Clarendon, 1967.
- Sever, Aleksandr, and Kolpakidi, Aleksandr. *Spetsnaz GRU: samaia pol'naia entsiklopediia*. Moscow: Eksmo-Iauza, 2012.
- Sevost'ianov, G. N., ed. *Moskva-Berlin, politika i diplomatiia Kremliia, 1920–1941: sbornik dokumentov*, 3 vols. Moscow: Rosspen, 2011.
- . "Sovershenno sekretno": *Lubianka—Stalinu o polozhenii v strane (1922–1934 gg.)*, 10 vols. Moscow: IRI RAN, 2001–13.
- . *Delo Generala Kornilova, materialy Chrezvychainoi komisii po rassledovaniu dela o byvsheem Verkhovnom glavnokomanduiushchem generale L. G. Kornilove i ego souchastnikakh, avgust 1917—iiun' 1918: dokumenty*, 2 vols. Moscow: Mezhdunarodnyi fond Demokratsiia, 2003.
- Shagrin, Boris, and Todd, Albert, eds. *Landmarks: A Collection of Essays on the Russian Intelligentsia*. New York: Karz Howard, 1977.
- Shambarov, Valerii. *Gosudarstvo i revoliutsiia*. Moscow: Algoritm, 2001.
- Shanin, Teodor. *Late Marx and the Russian Road: Marx and the Peripheries of Capitalism*.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83.
- . *The Awkward Class: Political Sociology of Peasantry in a Developing Society*.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72.
- . *The Rots of Otherness: Russia's Turn of the Century*, 2 vols. New Haven, CT,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6.
- Shankowsky, Lew. "Disintegration of the Imperial Russian Army in 1917," *Ukrainian Quarterly*, 13/4 (1957): 305–28.
- Shaposhnikov, B. M. *Na Vist: k istorii kampanii 1920 g.* Moscow: Voennizdat, 1924.
- Sharapov, German V. *Razreshenie agrar-*

- ...ogo voprosa v Rossii posle pobedy ok  
nabritskoi revoliutsii, 1917–1920 gg.  
Moscow: VPSH i AON pri TsK  
KPSS, 1961.
- Shasilko, K. F. "Delo polkovnika Miasoe-  
dova." *Voprosy istorii*, 1967, no. 4:  
103–16.
- Sharunovskaia, Lidiia. *Zhizn' v Kremle*.  
New York: Chalidze Publications,  
1982.
- Shchegolev, P. E. *Okhranniki i avanti-  
urnyye sekretnyye sotrudniki i provokato-  
ry*. Moscow: GPIB, 2004.
- \_\_\_\_\_, ed. *Padenie tsarskogo rezhima:  
demograficheskie otchety doprosov i po-  
kazanii, dannykh v 1917 g. v Chrez-  
vychainoi sledstvennoi komissii Vre-  
mennogo pravitel'stva*, 7 vols. Lenin-  
grad: Gosizdat, 1924–7.
- \_\_\_\_\_. *Orrechenie Nikolaia II*. Lenin-  
grad: Krasnaia gazeta, 1927.
- Shelov, A. N. *Moskva, kremli', Lenin*. Mos-  
cow: Politizdat, 1969.
- Sheinis, Z. "Pervye shagi diplomatich-  
eskoj deiatel'nosti M. M. Litvinov,"  
*Novaia i noveishaiia istoriia*, 1988, no.  
1: 152–69.
- Sheinis, Zinoviy. *Maxim Litvinov*. Mos-  
cow: Progress Publishers, 1990.
- Shestov, Dmitrii. *Vremia Alekseia Ryko-  
na*. Moscow: Progress, 1990.
- Shelokhaev, V. V. *Politicheskie partii Ros-  
sii, konets XIX–pervaia tret' XX veka:  
entsiklopediia*. Moscow: Rosspen,  
1996.
- \_\_\_\_\_, ed. *Russkii liberalizm: istoriches-  
kie sud'by i perspektivy. Materialy me-  
zhdunarodnoi nauchnoi konferentsii,  
Moskva, 27–29 maiia 1998 g.* Mos-  
cow: Rosspen, 1999.
- Shepelev, L. E. *Chinovny mir Rossii  
XVIII–nachalo XX v.* St. Petersburg:  
Iskurstvo-SPB, 1999.
- Sheridan, Clare. *From Mayfair to Moscow:  
Clare Sheridan's Diary*. London: Boni  
and Liveright, 1921.
- Shestakov, Andrei V. *Krest'ianskaia  
revoliutsiia 1905–1907 gg. v Rossii*.  
Moscow: Gosizdat, 1926.
- Shevtsov, A. V. *Iz dasei'kaia deiatel'nost'  
russkikh nesotsialisticheskikh partii na-  
chala XX veka*. St. Petersburg: Rossi-  
skaia Natsional'naia Biblioteka,  
1997.
- Shkman, A. P. *Deiateli otechestvennoi isto-  
rii: Biograficheskii spravochnik*. Mos-  
cow, 1997.
- Shin, Peter Yong-Shik. "The Otsu inci-  
dent: Japan's Hidden History of the  
Attempted Assassination of Future  
Emperor Nicholas II of Russia in the  
town of Otsu, Japan, May 11, 1891  
and its Implication for Historical  
Analysis." Phd diss.,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1989.
- Shipov, D. N. *Vospominaniia i dumy o pe-  
rezhitom*. Moscow: M. I. S. Sabash-  
nikov, 1918.
- Shishkin, V. I. "Poczdka I. V. Stalina v Si-  
bir' (15 ianvaria–6 fevralia 1928 g.)."  
in *Problemy agrarnogo i demografich-  
eskogo razvitiia Sibiri v XX–nachale  
XXI vv.: materialy vserossiiskoi nauch-  
noi konferentsii*, edited by V. A. Il'ia-  
ykh. Novosibirsk: Institut istorii SO  
RAN, 2009.
- \_\_\_\_\_, ed. *Sibir'skaia Vandeia, 1920–  
1921*, 2 vols. Moscow: Mezhdun-  
arodnyi fond Demokratia, 2000–01.
- Shishkin, Valerii A. *Stanovlenie vneshnei  
politiki postrevoliutsionnoi Rossii i kapi-  
talisticheskii mir 1917–1930 gody: ot  
revoliutsionnogo "zapadnichestva" k  
"natsional-bol'shevizmu," ocherk isto-  
rii*. St. Petersburg: Dmitrii Bulanin,  
2002.
- \_\_\_\_\_. *Vlast', politika, ekonomika: Pos-  
lerevoliutsionnaia Rossiia (1917–1928  
gg.)* St. Petersburg: Dmitrii Bulanin,  
1997.
- Shklovsky, Viktor. *A Sentimental Journey:  
Memoirs, 1917–1922*.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4.
- Shliapnikov, A. G. *Kanun semnadsatogo  
goda: vospominaniia i dokumenty o  
rabochem dvizhenii i revoliutsionnom  
podpol'e za 1914–1916 gg.*, 2 vols.  
Moscow: Gosizdat, 1923.
- Shliapnikov, Aleksandr G. *Nashi razno-  
glasiia*, "Pravda", January 18, 1924.
- \_\_\_\_\_. *Semnadsyatyi god*, 4 vols. Mos-  
cow and Leningrad: Gos. Sots-ekon.  
izd., 1923–31.
- Shmelev, N. N. *Bor'ba KPSS za razvitiie  
tiazheloi promyshlennosti na Severnom  
Kavkaze, 1926–1932 gg.* Ros-  
tov-na-Donu: Rostovskii universitet,  
1981.
- Shokhin, Andrei. *Kratkaia istoriia  
VLKSM*, 2nd ed. Moscow: Molodaia  
gvardiia, 1928.
- Showalter, Dennis E. *Tannenberg: Clash  
of Empires*. Hamden, CT: Archon,  
1991.
- Shpilrein, I. N., et al. *Iazyk krasnoarmeit-  
sa*. Moscow-Leningrad: Gosizdat,  
1928.
- Shreider, Mikhail. *NKVD iznutri: zapiski  
cheshkista*. Moscow: Vozvrashchenie,  
1995.
- Shteinberg, Valentin. *Ekab Peters*. Mos-  
cow: Politicheskaiia literatura, 1989.
- Shturman, D. *Mertvye khvataiut zhivyykh:  
chitaia Lenina, Bukharina, i Tratsko-  
go*. London: Overseas Publication In-  
terchange, 1982.
- Shtyrliaev, V. "Geroi grazhdanskoj voiny  
Dmitrii Zhloba," *Voенно-istorich-  
eskii zhurnal*, 1965, no. 2: 44–46.
- Shub, David. "The Trial of the SRs," *Rus-  
sian review*, 23/4 (1964): 362–9.
- \_\_\_\_\_. *Lenin: A Biography*. Garden City,  
NY: Doubleday, 1949.
- Shukman, Harold. *Lenin and the Russian  
Revolution* (New York: Putnam,  
1967; 1981).
- Shul'gin, V. V. *Chto nam v nih ne nravis-  
ia: ob antisemitizme v Rossii*. Paris:  
Russia Minor, 1929.
- \_\_\_\_\_. *Dni*. Belgrad: M. A. Suvorin,  
1925.
- \_\_\_\_\_. *Gody Dni*. 1920. Moscow: No-  
vosti, 1990.
- \_\_\_\_\_. *Days of the Russian Revolution:  
Memoirs from the Right, 1905–1917*.  
Gulf Breeze, FL: Academic Interna-  
tional Press, 1990.
- Shveitzer, V. I. "V achinskoi sylke," *Iz-  
vestiia*, March 12, 1937.
- Shveitzer, Vera. *Stalin v turkhar'skoi syl-  
ke: vospominaniia starogo podpol'shchi-  
ka* Moscow: Molodaia gvardiia,  
1943.
- Shvetsov, V. V. "Lev Trouskii i Maks Ist-  
men: istoriia odnoi politicheskoi dru-  
zhby," *Novaia i noveishaiia istoriia*,  
1990, no. 6: 152–69.
- \_\_\_\_\_. *Diskussii v RKP (b) 1923 goda:  
k 70-letiu nepa*. Moscow: Znanie,  
1991.
- Sibir' i velikaia zheleznaia doroga. St. Pe-  
tersburg: L. A. Efron, 1896.
- Sibir'skaia Sovetskaia entsiklopediia, 3 vols.  
Novosibirsk: Sibirskoe kraevoe izd.,  
1929–32.
- Sidorov, Arkadii L., ed. *Revoliutsionnoe  
dvizhenie v armii i na flote v gody  
pervoi mirovoj voiny, 1914–fevral'  
1917*. Moscow: Nauka, 1966.
- Sidorov, Vasilii. *Po Rossii. Kavkaz. Putevye  
zametki i vpechaleniiia*. St. Peters-  
burg: M. Akhieiev i I. Leontiev, 1897.
- Sidorovnin, Gennadii, ed. *Stolypin, zhizn'  
i smert': sbornik*, 2nd ed. Saratov:  
Sootchestvennik, 1997.
- Siegelbaum, Lewis H. "The Workers  
Group and the War-Industries Com-  
mittees: Who Used Whom," *Russian  
Review*, 39/2 (1980).
- \_\_\_\_\_. *Soviet State and Society Between  
Revolutions, 1918–1929*.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2.
- \_\_\_\_\_. *The Politics of Industrial Mobili-  
zation in Russia, 1914–1917*.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83.
- Sigler, Krista Lynn. "Kshesinskaia's Man-  
sion: High Culture and the Politics  
of Modernity in Revolutionary Rus-  
sia." Phd diss., University of Cincin-  
nati, 2009.
- Simonov, N. S. "Strengthen the Defense  
of the Land of Soviets: The 1917  
'War Alarm' and its Consequences,"  
*Europe-Asia Studies*, 48/8 (1996).
- \_\_\_\_\_. "Krepiť oboronu stranam sove-  
tov (voenna trevoga 1927 i ee posled-  
stviia)," *Otechestvennaia istoriia*,  
1996, no. 3: 155–61.
- \_\_\_\_\_. *Voенно-promyshlennyi kompleks  
SSSR v 1920–1950-e gody: tempoy  
ekonomicheskogo rosta, struktura, orga-  
nizatsiia proizvodstva i upravlenie*.  
Moscow: Rosspen, 1996.
- Simonova, T. "Mir i schast'e na shtyka-  
kh," *Rodina*, 2000, n. 10: 60–64.
- Sinel'nikov, S. S. *Kirov*. Moscow, 1964.
- 222
- Singleton, Seth. "The Tambov Revolt,"  
*Slavic Review*, 25/3 (1969): 497–  
512.

- Sinyavsky, Andrei. *Soviet Civilization: A Cultural History*. New York: Arcade, 1990.
- Skobelev, M. "Gibel' tsarizma," *Ogonek*, March 13, 1927: 1–2.
- Skvortsov-Strepanov, Ivan I. *S Krasnoi Armiei na panskuiu Pol'ihu: vpechatleniia i nabliudeniia*. Moscow: Gosizdat, 1920.
- Slashchov-Krymskii, Ia. S. *Belyi Krym 1920 g.* Moscow: Nauka, 1990.
- Slavinskii, Dmitrii B. *Sovetskii Soiuz i Kitai: istoriia diplomaticheskikh otnoshenii, 1917–1937 gg.* Moscow: Iaponiia segodnia, 2003.
- Slavinsky, Boris N. *The Japanese-Soviet Neutrality Pact: A Diplomatic History, 1941–1945*.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Curzon, 2004.
- Sletov, S. *K istorii vozniknoveniia partii sotsialistov revoliutsionerov*. Petrograd: P. P. Soikina, 1917.
- Slezkine, Yuri. "The USSR as a Communal Apartment, or How a Socialist State Promoted Ethnic Particularism," *Slavic Review*, 53/2 (1994): 414–52.
- Sloin, Andrew, and Sanchez-Sibony, Oscar. "Economy and Power in the Soviet Union, 1917–39," *Kritika*, 15/1 (2014): 7–22.
- Slusser, Robert. *Stalin in October: The Man Who Missed the Revolution*.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7.
- Smidovich, P. G. "Vykhod iz podpol'ia v Moskve," *Proletarskaia revoliutsiia*, 1923, no. 1 (13): 171–77.
- Smirnoff, Serge. *Autour de l'assassinat des Grand-Ducs*. Ekaterinbourg, Alapaievsk, Perm, Pétrograd. Paris: Payot, 1928.
- Smirnov, N. *Repressirovanoe pravosudie*. Moscow: Gelios ARV, 2001.
- Smith, Edward Ellis. *The Young Stalin: The Early Years of an Elusive Revolutionary*. New York: Farrar, Strauss and Giroux, 1967.
- Smith, Jeffrey R. "The Monarchy Versus the Nation: The 'Festive Year' 1913 in Wilhelmine Germany," *German Studies Review*, 23/2 (2000): 257–74.
- Smith, Jeremy. *The Bolsheviks and the National Question, 1917–1923*. New York: Macmillan, 1999.
- . "The Georgian Affair of 1922—Policy Failure, Personality Clash or Power Struggle?" *Europe-Asia Studies*, 50/3 (1998): 519–44.
- . "Stalin as Commissar for Nationality Affairs, 1918–1922," in *Stalin: A New History*, Davies and Harris, eds., 45–62.
- Smith, Leonard V. *Between Mutiny and Obedience: The Case of the French Fifth Infantry Division during World War I*.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4.
- Smith, R. E. F., ed. *The Russian Peasant 1920 and 1984*. London: Cass, 1977.
- Smith, Steve A. *A Road is Made: Communism in Shanghai 1920–1927*.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00.
- Snyder, Jack. *Ideology of the Offensive: Military Decision Making and the Disasters of 1914*.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4.
- Sobolev, Ivan. *Bor'ba s "nemetskimi zasil'em" v Rossii v gody Pervoi Mirovoi Voiny*. St. Petersburg: Rossiiskaia natsional'naia biblioteka, 2004.
- Soboleva, T. A. *Istoriia shifroval'nogo dela v Rossii*. Moscow: OLMA, 2002.
- Sokol'nikov, G. Ia. *Brestskii mir*. Moscow: Gosizdat, 1920.
- . *Finansovaia politika revoliutsii*, 2 vols. Moscow: Nauka, 2006.
- . *Gosudarstvennyi kapitalizm i novaia finansovaia politika*. Moscow: NKF, 1922.
- . *K voprosu o natsionalizatsii bankov*. Moscow, 1918.
- . *Novaia finansovaia politika: na puti k tverdoi valyute*. Moscow: Nauka, 1995.
- Sokolov, A. K. *Ot voenproma k VPK: sovetskaia voennaia promyshlennost' 1917–iiun' 1941 gg.* Moscow: Novyi khronograf, 2012.
- Sokolov, Aleksandr S. *Finansovaia politika Sovetskogo gosudarstva 1921–1929 gg.* Moscow: Zvedopad, 2005.
- Sokolov, E. N. *Finansovaia politika Sovetskoi vlasti (oktiabr' 1917–avgust 1918 gg.)*. Ryazan: Riazanskii gos. universitet im. S. A. Esenina, 2008.
- Sokolov, Nikolai A. *Ubiistvo tsarskoi sem'i*. Berlin: Slomo, 1925.
- Soldatov, V. V. "Izmeneniia form obshchinnogo zemlepol'zovaniia v Sibiri," *Voprosy kolonizatsii*, 1910, no. 7.
- Solnick, Steven L. "Revolution, Reform and the Soviet Telephone System, 1917–1927," *Soviet Studies*, 43/1 (1991): 157–76.
- Solomon [Isetskii], Georgii. *Sredi krasnykh vozhdai: lichno perezhitoie i vidennoe na sovetskoii sluzhbe*, 2 vols. Paris: Mishen, 1930.
- Solomon, Jr., Peter H. *Soviet Criminal Justice Under Stalin*.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 Solov'ev, E. D., and Chugunov, A. I. *Pogranichnye voiska SSSR, 1918–1928: sbornik dokumentov i materialov*. Moscow: Nauka, 1973.
- Solov'ev, Iu. G. "Samoderzhavie i dvorianskii vopros v kontse XIX v." *Istoriicheskie zapiski*, 1971, no. 88: 150–209.
- Solzhenitsyn, Aleksandr. *The Gulag Archipelago*, 3 vols. New York: Harper & Row, 1973.
- Sontag, John P. "The Soviet War Scare of 1926–1927," *Russian Review*, 34/1 (1975): 66–77.
- Sontag, Raymond James. *Germany and England: Background of Conflict, 1848–1894*. New York and London: D. Appleton-Century, 1938.
- Sorokin, Pitirim A. *Leaves from a Russian Diary*. New York: E. P. Dutton & Co., 1924.
- Sosnovskii, L. S. "Chetyre pis'ma iz ssylki," *Biulleten' oppozitsii*, September 1929, 3–4: 15–29.
- Sotsialisticheskoe stroitel'stvo SSSR*. Moscow, 1923.
- Souvarine, Boris. *Stalin: A Critical Survey of Bolshevism*. New York: Longman, Green, 1939.
- . *Staline; aperçu historique du bolchévisme*. Paris: Plon, 1935.
- Sovetsko-Germanskie otnosheniia ot peregovorov v Brest-Litovke do podpiianiia Rapall'skogo dogovora: sbornik dokumentov*, 2 vols. Moscow: Politicheskaiia literatura, 1968–71.
- Sovety v Oktiabre: sbornik dokumentov*. Moscow: Kommunisticheskaiia akademiia, 1928.
- "Sovremennoe pravosudie," *Dym otechestva*, 1914, no. 22: 1–2.
- Spiridovich, Aleksander I. *Istoriia bol'shevizma v Rossii: ot vozniknoveniia do zakhvata vlasti, 1883–1903–1917*. Paris: Franko-Russkaia pechat', 1922.
- . *Zapiski zhandarma*. Kharkov: Proletarii, 1928.
- . *Raspoutine 1863–1916, d'apres les documents russes et les archives privées de l'auteur*. Paris: Payot, 1935.
- . *Velikaia voina i fevral'skaia revoliutsiia 1914–1917 gg.*, 3 vols. New York: Vseslavianskoe izd., 1960–2.
- Spirin, L. M. *Klasy i partii v grazhdanskoi voine v Rossii*. Moscow: Mysl', 1968.
- . *Krakh odnoi aventiury, miatezh levyykh eserov v Moskve 6–7 iuliia 1918 g.* Moscow: Politicheskaiia literatura, 1971.
- . *Krushenie pomeschchikikh i burzhuaznykh partii v Rossii nachalo XX v-1920 g.* Moscow: Mysl', 1977.
- Spisok chlenov Vsesoiuznogo obshchestvo starykh bol'shevikov na 1 ianv. 1933*. Moscow: 1933.
- Spring, D. W. "Russia and the Coming of War," in *The Coming of the First World War*, edited by R. J. W. Evans and Hartmut Pogge von Strandmann. Oxford: Clarendon, 1988.
- Stalin, I. V. *Beseda s inostrannymi rabochimi delegatsiiami*. Moscow-Leningrad: Gosizdat, 1927.
- . *Na piutiakh k Oktabriu*. Moscow: Gosizdat, 1925.
- . *Ob oppozitsii: stat'i i rechi, 1921–1927*. Moscow: Gosizdat, 1928.
- . *Na putiakh k Oktabriu: stat'i i rechi, mart-oktiabr' 1917*. Moscow: Gosizdat, 1925.
- . *O Lenine i o leninizme*. Moscow: Gosizdat, 1924.
- . *Sochineniia*, 13 vols. Moscow: Politicheskaiia literatura, 1946–51. vols. 14–16, Robert H. MacNeal, ed. Stanford, CA: Hoover Institution,

1967. Cited as *Sochineniia* (author understood).
- Stafinas, Darius. *Making Russians: Meaning and Practice of Russification in Belarus and Lithuania After 1863*. Amsterdam: Rodopi, 2007.
- Stankovich, V. B. *Vospominaniia 1914–1919 gg.* Berlin: J. Ladyschnikov, 1920.
- Starkov, Boris A. "Perekhod k 'politike razgroma': shakhtinskoe delo," in *Istoriki otvechali na voprosy*, ed. by N. N. Maslov and A. N. Svalov. Moscow: Moskovskii rabochii, 1988.
- Starr, S. Frederick. *Decentralization and Self-Government in Russia, 1830–1870*.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2.
- Starsev, Vitalii I. "Begstvo Kerenskogo," *Voprosy istorii*, 1966, no. 11: 204–5.
- . *Vnutrenniia politika Vremennogo pravitel'stva: pervogo sostava*. Leningrad: Nauka, 1980.
- Stasova, E. D. *Vospominaniia*. Moscow: Mysl', 1969.
- Stasova, Elena. *Stranitsy zhizni i bor'by*. Moscow: Politizdat, 1957.
- "Stavka 25–26 oktiabria 1917 g.," in *Arkhiv russkoi revoliutsii*, ed. by Gessen, VII: 279–320.
- Stead, W. T. *Truth About Russia*. London and New York: Cassell & Company, 1888.
- Steinetz, George. *Regulating the Social: The Welfare State and Local Politics in Imperial Germany*.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3.
- Steinberg, Isaac. "The Events of July 1918," undated manuscript, Hoover Institution Archive.
- . *Spiridonova: Revolutionary Terrorist*. London: Methuen, 1935.
- . *Ot fevralia po oktiabr' 1917 g.* Berlin-Milan, Skify, 1919.
- Steinberg, John W. *All the Tsar's Men: Russia's General Staff and the Fate of Empire, 1898–1914*. Washington, D.C., and Baltimore: Woodrow Wilson Center/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2010.
- Steinberg, Jonathan. *Bismarck: A Lif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 . *Yesterday's Deterrent: Tirpitz and the Birth of the German Battle Fleet*. London: Macdonald, 1965.
- Steinberg, Mark. "Revolution," in *The Fall of the Romanovs: Political Dreams and Personal Struggles in a Time of Revolution*, edited by Mark D. Steinberg and Vladimir M. Khrustal'ev.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5.
- . "Workers and the Cross: Religious Imagery in the Writings of Russian Workers 1910–1924," *Russian Review*, 53/2 (1994): 213–39.
- . *Moral Communities: The Culture and Class Relations in the Russian Printing Industry 1867–1907*.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2.
- , and Khrustal'ev, Vladimir M., eds. *The Fall of the Romanovs: Political Dreams and Personal Struggles in a Time of Revolution*.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5.
- Steiner, Zara S. *The Lights that Failed: European International History 1919–1933*.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 Steinwedel, Charles Robert. "Invisible Threads of Empire: State, Religion, and Ethnicity in Tsarist Bashkiria, 1773–1917." Phd diss., Columbia University, 1999.
- Steklov, Iu. M. *Borty za sotsializm*, 2nd ed., 2 vols. Moscow-Leningrad: Gosizdat, 1923–24.
- Stephan, John J. "The Crimean War in the Far East," *Modern Asian Studies*, 3/3 (1969), 257–77.
- . *The Russian Far East: A History*.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 Stepnaov, S. A. *Chernaia sotnia v Rossii 1905–1914 gg.* Moscow: Rosvuznauka, 1992.
- Stepun, Fedor. *Bynshee i nebysheshaia*, 2 vols. New York: Izd-vo im. Chekhova, 1956.
- Stevenson, David. *Armaments and the Coming of War: Europe, 1904–1914*. Oxford: Clarendon, 1996.
- . *Cataclysm: The First World War as Political Tragedy*. New York: Basic Books, 2004.
- Stites, Richard. *Revolutionary Dreams: Utopian Vision and Experimental Life in the Russian Revoluti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 Stockdale, Melissa Kirschke. *Paul Milukov and the Quest for a Liberal Russia*.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6.
- . "Politics, Morality and Violence: Kadet Liberals and the Question of Terror," *Russian History*, 22/1 (1995): 455–80.
- Stone, David R. *Hammer and Rifle: The Militarization of the Soviet Union, 1926–1933*. Lawrence: University Press of Kansas, 2000.
- Stone, Helena M. "Another Look at the Sisson Forgeries and their Background," *Soviet Studies*, 37/1 (1985): 90–102.
- Stone, Norman. *The Eastern Front, 1914–1917*. New York: Scribner's, 1975.
- Storella, Carmine J., and Sokolov, A.K., eds., *The Voice of the People: Letters from the Soviet Village, 1918–1932*.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3.
- Storozhev, V. N. "Fevral'skaia revoliutsiia 1917 g.," *Nauchnye izvestiia* (Moscow, 1922), sbornik 1: 142–3.
- Strachan, Hew. *The First World War*.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 . *The First World War*. New York: Viking, 2004.
- Strauss, Leo. "Kurt Riezler, 1882–1955," *Social Research*, 23/1 (1956): 3–34.
- Srzhizkov, Iu. K. *Prodovol'stvennye otriady v gody grazhdanskoi voiny i inostranoi interventsii, 1917–1922*. Moscow: Nauka, 1973.
- Strong, Anna Louise. *China's Millions: The Revolutionary Struggles from 1927 to 1935*. New York: Knight Publishing Co., 1935.
- Struve, P. V. "Istoricheskiy smysl russkoi revoliutsii i natsional'nye zadachi," in *Iz glubiny: sbornik statei o russkoi revoliutsii*, Moscow: Moskovskii universitet, 1990.
- , ed. *Food Supply in Russia During the War*.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30.
- . "Witte und Stolypin," in *Menschen die Geschichte machten: vier-tausend Jahre Weltgeschichte in zeit- und lebensbildern*, 3 vols, edited by Peter Richard Rohden and Georg Ostrogorsky. Vienna: L. W. Seiden & Sohn, 1931.
- Sukennikov, M. *Krest'ianskaia revoliutsiia na iuge Rossii: s pismami L. N. Tol'stogo tsariu*. Berlin: Ioann Rede, 1902.
- Sukhanov, Nikolai. *The Russian Revolution, 1917: Eyewitness Account*, 2 vols.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1962.
- . *Zapiski*, 7 vols. Berlin: Z. I. Grzhebin, 1922–23.
- Sukhorukhov, V. T. *XI Armia v boiakh na Severnom Kavkaze i Nizhnei Volge, 1918–1920 gg.* Moscow: Voenizdat, 1961.
- Suliashvili, David. *Uchenicheskie gody*. Tbilisi: Zarya vostoka, 1942.
- Sullivan, Robert S. *Soviet Politics and the Ukraine, 1917–1957*.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62.
- Sultanbekov, Bulat. *Pervaia zherstva Genuska: Mirsaid Sultan-Galiev, sud'ba, liudi, vremia*. Kazan: Tatarskoe knizhnoe izdatel'stvo, 1991.
- Sultan-Galiev, Mirsaid. *Stari, vystupleniia, dokumenty*. Kazan: Tatarskoe knizhnoe izdatel'stvo, 1992.
- Sumbadze, A. S. *Sotsial'no-ekonomicheskie predposylki pobedy Sovetskoi vlasti v Azerbaidzhane*. Moscow: Nauka, 1972.
- Sunila, August A. *Vostanie 1 dekabria 1924 goda: opyt kommunisticheskoi partii Estonii v podgotovke i provedenii vooruzhennogo vosstaniia estonskogo proletariata 1924 goda i ego istoricheskoe znachenie*. Tallinn, Eesti Raamat, 1982.
- Suny, Ronald Grigor, ed. *Transcaucasia, Nationalism, and Social Change: Essays in the History of Armenia*, 2nd ed.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96.
- . "A Journeyman for the Revolution: Stalin and the Labor Movement in Baku, June 1907–May 1908," *Soviet Studies*, 23/3 (1972): 373–94.



- . "Beyond Psychohistory: The Young Stalin in Georgia," *Slavic Review*, 50/1 (1991): 48–58.
- . "Tiflis, Crucible of Ethnic Politics, 1860–1905," in *The City in Late Imperial Russia*, edited by Michael F. Hamm.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86.
- . *Looking Toward Ararat: Armenia in Modern History*.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3.
- . *The Making of the Georgian Nation*, 2nd ed.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4.
- Suslov, P. V. *Politicheskoe obespechenie soversko-pol'skoi kampanii 1920 g.* Moscow: Gosizdat, 1930.
- Sutton, Antony C. *Western Technology and Soviet Economic Development*, 3 vols. Stanford, CA: Hoover Institution on War, Revolution, and Peace, Stanford University, 1968–73.
- Suvorin, A. S. *Dnevnik*. Moscow-Petrograd, 1923.
- Suvorin, S. A. *Chetvertyi (ob'edinitel'nyi) s'ezd RSDRP: Aprel' (aprel'-mai) 1906 goda: protokoly*. Moscow, Politicheskaja literatura, 1959.
- Suvorov, N. I., ed. *Trekhosletie doma Romanovykh 1613–1913: istoricheskie ocherki*. Moscow: A. I. Mamontov, 1913.
- Sverchkov, Dmitrii F. *Kerenskii*, 2nd ed. Leningrad: Priboi, 1927.
- Sverdlov, Iakov Mikhailovich. *Izbrannye proizvedennye*, 3 vols. Moscow: Politicheskaja literatura, 1957–60.
- Sverdlova, K. T. *Iakov Mikhailovich Sverdlov*. Moscow: Molodaia Gvardiia, 1957, 1960, 1976. 4th ed. Moscow: Molodaia gvardiia, 1985.
- Sviatitskii, N. V. *Kogo russkii narod izbral svoimi predstaviteliami*. Moscow: Zemlia i volia, 1918.
- Svod zakonov Rossiiskoi imperii*, 16 vols. St. Petersburg: Obshchestvennaia pol'za, 1897.
- Swain, Geoffrey. "The Disillusioning of the Revolution's Praetorian Guard: Latvian Riflemen Summer-Autumn 1918," *Europe-Asia Studies*, 51/4 (1999): 667–86.
- . "Vaciētis: The Enigma of the Red Army's First Commander," *Revolutionary Russia*, 16/1 (2003): 68–86.
- Syromatnikov, Sergius. "Reminiscences of Stolypin," *Russian Review*, 1/2 (1912): 71–88.
- Syrtsov, V. A. *Skazanie o Fedorovskoi Chudotvornoj ikone Bozhei materi, chto v g. Kostrome*. Kostroma, 1908.
- Sytin, P. V. *Iz istorii Moskovskikh ulits*. Moscow: Moskovskii rabochii, 1948. Sovremennik, 2000.
- Szefel, Marc. *The Russian Constitution of April 23, 1906. Political Institutions of the Duma Monarchy*. Brussels: Éditions de la Librairie encyclopedique, 1976.
- Szporluk, Roman. "Lenin, 'Great Russia,' and Ukraine," *Harvard Ukrainian Studies*, 28/1–4 (2006): 611–26.
- Tagantsev, N. A. *Perezhitoe: uchrezhdenie Gosudarstvennoi Dumy v 1905–1906 gg.* Petrograd: Gos. Tip. 1919.
- Tagirov, I. R., ed. *Neizvestnyi Sultan-Gaiev: rasskrebennye dokumenty i materialy*. Kazan: Tatarskoe knyzhnoe izdatel'stvo, 2002.
- Tainy natsional'noi politiki TiK RKP: chetvertoe soveshchanie TiK RKP (b) s otvestvennymi rabotnikami natsional'nykh respublik i oblastei v Moskve 9–12 iunija 1923 g.* Moscow: IN-SAN, 1992.
- Talakavdze, Sevastii. *K istorii kommunisticheskoi partii Gruzii*. Tiflis: Glavpolitprosvet, 1926.
- Tang, Peter S. H. *Russian and Soviet Policy in Manchuria and Outer Mongolia, 1911–1931*.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59.
- Taranovski, Theodore. "The Politics of Counter-Reform: Autocracy and Bureaucracy in the Reign of Alexander III, 1881–1904." Phd diss., Harvard University, 1976.
- Tarasiuk, D. A. *Pozemel'naiia sobstvennost' poreformennoi Rossii: istochnikovedchestvennoe issledovanie po perepisi 1877–1878 gg.* Moscow: Nauka, 1981.
- Taratuta, V. K. "Kanun revoliutsii 1905 g. na Kavkaze (iz vospominaniia)," *Zaria vostoka*, December 19, 1925.
- Tarkhova, N. S. "Trotsky's Train: An Unknown Page in the History of the Civil War," in *The Trotsky Reappraisal*, edited by Terry Brotherstone and Paul Dukes.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1992.
- Tarle, E. V. "Germanskaia orientatsiia i P. N. Durnovó v 1914 g.," *Byloe*, 1922, no. 19: 161–76.
- . "Zapiska P. N. Durnovó Nikolaiu II: Fevral 1914 g.," *Krasnaia nov'*, 1922, no. 10: 178–99.
- Tatishchev, S. S. *Imperator Aleksandr Vtoroi*, 2 vols. St. Petersburg: A. S. Suvorin, 1903.
- Tauger, Mark B. "Grain Crisis or Famine? The Ukrainian State Commission for Aid to Crop-Failure Victims and the Ukrainian Famine of 1928–1929," unpublished paper courtesy of the author.
- Tauger, Mark B. "Statistical Falsification in the Soviet Union: A Comparative Case Study of Projections, Biases, and Trust," Donald Treadgold Papers,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2001.
- Taylor, A. J. P. *The First World War: An Illustrated History*. London: H. Hamilton, 1963.
- . *The Struggle for Mastery in Europe*. Oxford: Clarendon, 1963.
- . *War by Timetable*. London: Macdonald, 1969.
- Tepliakov, Aleksei G. "Neproniznaemye nedra": VChK-OGPU v Sibiri 1918–1929 gg. Moscow: AIRO-XXI, 2007.
- Teplianikov, I. A. "Vnukaia vo vse," in *Marshal Tukhachevskii: vospominaniia družei i sotratnikov*, edited by Nikolai Koritskii, et al. Moscow: Voenizdat, 1965.
- Terpigorev, Aleksandr M. *Vospominaniia gornogo inzhenera*. Moscow: Akademiia nauk SSSR, 1956.
- Teruyuki, Hara. *Shibberia shuppei: kakumei to kanshō, 1917–1922*. Tokyo: Chikuma Shobō, 1989.
- Thaden, Edward, ed. *Russification in the Baltic Provinces and Finland, 1855–1914*.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1.
- Thatcher, Ian D. "Trotskii, Lenin, and the Bolsheviks, August 1914–February 1917," *Slavonic and East European Review*, 72/1 (1994): 72–114.
- . *Leon Trotsky and World War One: August 1914–February 1917*.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2000.
- Thompson, John M. *Russia, Bolshevism and the Versailles Peace*.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6.
- Thompson, Wayne C. *In the Eye of the Storm: Kurt Reizler and the Crisis of Modernity*. Ames: University of Iowa Press, 1980.
- Thorniley, Daniel.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Soviet Rural Communist Party, 1927–1939*. New York: Macmillan, 1988.
- Thun, Alphons. *Istoriia revoliutsionnykh dvizhenii v Rossii*. St. Petersburg: Ligi Russk. Revoliuts. Sots.-Dem., 1906.
- Tiander, Karl. *Das Erwachen Osteuropas: Die Nationalbewegung in Russland und der Weltkrieg*. Vienna and Leipzig: Wilhelm Braumueller, 1934.
- Tikhomirov, L. A. "Nuzhny li printsipy?," in *K reforme obnovennoi Rossii: Stati 1909, 1910, 1911 gg.*, edited by Tikhomirov. Moscow: V. M. Sablina, 1912.
- Tilly, Charles. "War Making and State Making as Organized Crime," in *Bringing the State Back In*, edited by Peter B. Evans et al.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5.
- . *Coercion, Capital, and European States, AD 990–1990*. Cambridge, MA: Blackwell, 1990.
- Timashev, N. S. *Publichno-pravovoe polozenie lichnosti. Pravo Sovetskoi Rossii*. Prague: Plamia, 1925.
- Tishkov, A. V. *Felix Dzerzhinskii: Commemorating the Centenary of His Birth*. Moscow: Novosti Press Agency Publishing House, 1976.
- Togan, Zaki Validi. *Vospominaniia: bor'ba musul'man Turkestana i drugikh vo-stochnikh tuurok za natsional'noe sushchestvovanie i kul'turu*. Moscow: [s.n.], 1997.
- Tokés, Rudolf L. *Béla Kun and the Hungarian Soviet Republic: The Origins and Rol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 Hungary in the Revolutions of 1918-1919*. New York: Praeger, 1967.
- Toll, Robert W. *The Russian Rockefellers: The Saga of the Nobel Family and the Russian Oil Industry*. Stanford, CA: Hoover Institution Press, 1976.
- Tork, Hans-Joachim. "Das Russische Beamtenum in der ersten Hälfte des 19. Jahrhunderts," *Forschungen zur europäischen Geschichte*, 13 (1967): 7-345.
- Toronskii, M. G. "Sobytiia v Mongolii-Khalkhe v 1920-1921 godakh: voenn-istoricheskii ocherk (vospominaniia)," in *Legendarnyi baron: neizvestnye stranitsy Grazhdanskoi voiny*, edited by Sergei L. Kuz'min. Moscow: KMK, 2004.
- Tovarisch Kirov: *rasskazy rabochikh, inzhenerov, khoziaistvennikov, uchennykh, kolkhoznikov i detei o vstrechakh s S. M. Kirovym*. Moscow: Profizdat, 1935.
- Tovstukha, I. P., ed. *Iosif Vissarionovich Stalin: kratakaia biografiiia*. Moscow: Gosizdat, 1927.
- Treadgold, Donald. *The Great Siberian Migration*.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57.
- Trepov, "Vespoddaneishaia zapiska D. F. Trepova (16 oktiabria 1905)," *Byloe*, 1919, no. 14: 109-11.
- Trifonov, Ivan Ia. *Ocherki istorii klassovoi bor'by v SSSR, 1921-1937 gg.* Moscow: Politicheskaiia literatura, 1960.
- Trimberger, Ellen Kay. *Revolution from Above: Military Bureaucrats and Development in Japan, Turkey, Egypt and Peru*. New Brunswick, NJ: Transaction, 1978.
- Troitskii, S. M. *Russkii absolutizm i dvoiansvo v XVIII veke: Formirovanie biurokratii*. Moscow: Nauka, 1974.
- Troitskii, L. "Vospominaniia ob oktiabr'skom perevorote," *Proletarskaia revoliutsiia*, 1922, no. 10: 59-61.
- . "Zaveshchanie Lenina [December 1932]," in *Portrety revoliutsionerov* [1991], 265-91. Also in *Gorizont*, 1990, no. 6: 38-41.
- . *Chto i kak proizoshlo: shes' statei dlia mirovoi burzhuaznoi pechatii*. Paris: Navarre, 1929.
- . *Dnevniki i pisma*. Tenafly, NJ: Ermitage, 1986, 1990.
- . *Kak vooruzhalas' revoliutsiia (na voennoi rabote)*, 3 vols. Moscow: Vysshii voennyi redaktsionnyi sovet, 1923-25.
- . *Kommunisticheskii internatsional posle Lenina: velikii organizator porazhenii*. Moscow: Spartakovets-printima, 1993.
- . *Literatura i revoliutsiia*. Moscow: Kranaia nov', 1923.
- . *Moia zhizn': opyt avtobiografii*, 2 vols. Berlin: Granit, 1930. Moscow: Panorama, 1991. Note: All endnote citations refer to the 1930 edition unless otherwise indicated.
- . *O Lenine: materialy dlia biografii*. Moscow: Gosizdat, 1924.
- . *Piat' let Kominternu*. Moscow: Gosizdat, 1924.
- . *Portrety revoliutsionerov*, ed. Ju. Fel'shtinski. Benson, VT: Chalidze, 1984 and 1988. Moscow: Moskovsky rabochii, 1991.
- . *Predannaia revoliutsiia*. Moscow: NII kul'tury, 1991.
- . *Sochineniia*, 21 vols. Moscow: Gosizdat, 1920-27.
- . *Stalin*, 2 vols. Benson, VT: Chalidze, 1985. Moscow: Politicheskaiia literatura, 1990.
- . *Stalinskaia shkola fal'sifikatsii: popravki i dopolneniia k literature epigonov*. Berlin: Granit, 1932.
- , and Safarov, G. I. *Troitskii o Lenine i leninizme: sbornik materialov*. Leningrad: Priboi, 1925.
- Trotskizm i molodezh': sbornik materialov*. Leningrad: Priboi, 1924.
- Trotsky, Leon. 1905. Moscow: Gosizdat, 1922.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71.
- . *Between Red and White: a Study of Some Problems of Revolution, with Particular Reference to Georgia*. London: Communist Party of Great Britain, 1922.
- . *Challenge of the Left Opposition, 1926-27*, 2 vols. New York: Pathfinder Press, 1975, 1980.
- . *Lenin*. New York: Garden City Books, 1959.
- . *On Lenin: Notes Toward a Biography*. London: Harrap, 1971.
- . *My Life: An Attempt at an Autobiography*. New York: C. Scribner's Sons, 1930. New York: Pathfinder Press, 1970. Note: All endnote citations refer to the 1970 edition unless otherwise indicated.
- . *Stalin: An Appraisal of the Man and His Influence*. New York: Harper and Brothers, 1941. New York: Stein and Day, 1946. London: Macgibbon and Kee, 1968. Note: All endnote citations refer to the 1941 edition unless otherwise indicated.
- . *Terrorism and Communism: A Reply to Karl Kautsky*.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61.
- . *The Essential Trotsky*. New York: Barnes & Noble, 1963.
- . *The History of the Russian Revolution to Brest-Litovsk*. London: Socialist Labour Party, 1919.
- . *The History of the Russian Revolution*, 3 vols.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1932.
- . *The History of the Russian Revolution*.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61.
- . *The Real Situation in Russia*. London: Allen & Unwin, 1928.
- . *The Stalin School of Falisfication*. New York: Pioneer, 1937.
- . *The Suppressed Testament of Lenin*. New York: Pioneer Publishers, 1935.
- . *Trotsky's Diary in Exile, 1935*.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1958. New York: Atheneum, 1963.
- . *Where Is Britain Going?* London: Communist Party of Great Britain, 1926.
- . *Writings of Leon Trotsky, 1936-1937*. New York: Pathfinder Press, 1978.
- , et al. *Portraits: Political and Personal*. New York: Pathfinder Press, 1977.
- , and Shachtman, Max. *The New Course*. New York: New International, 1943.
- Trud v SSSR: ekonomiko-statisticheski spravochnik*. Moscow: Ekonomgiz, 1932.
- Trudy i Vserossiiskogo S'ezda Sovetov Narodnogo Khoziaistva, 25 maia-4 iunlia 1918: Stenograficheski ochet*. Moscow: Vysshii sovet narodnogo khoziaistva, 1918.
- Trusova, N. S., ed. *Nachalo pervoi ruskoii revoliutsii: ianvar'-mart 1905 goda*. Moscow, 1955.
- Tsakunov, S. V. *V labirinte doktriny: iz opyta razrabotki ekonomicheskogo kursa strany v 1920-e gody*. Moscow: Rossiia molodaia, 1994.
- Tsapanko, M. N. *Vserossiiskoe soveshchanie sovetov rabochikh i soldatskikh deputatov*. Leningrad: Gosizdat, 1927.
- "Tsenzura," *Bo'lskaia svenkaia entsiklopediia*, 1st ed., LX.
- Tsereteli, I. G. *Vospominaniia o fevral'skom revoliutsii*, 2 vols. Paris: Mouton, 1963.
- Tsirk: malenkaia entsiklopediia*, 2nd ed. Moscow: Sovetskaia entsiklopediia, 1979.
- TsK RKP (b)—VKP (b) i natsionalnyi vopros. Moscow: Rosspen, 2005.
- Tsvigun, S. K., et al., eds. *V. I. Lenin i VChK: sbornik dokumentov 1917-1922 gg.* Moscow: Politizdat, 1975.
- Tsiun, Lin. "Sovetskaia Rossiia i Kitai v nachale 20-x godov," *Novaia i noveishaia istoriia*, 1997, no. 3: 46-57.
- Tuchman, Barbara Wertheim. *Guns of August*. New York: Macmillan, 1962.
- Tucker, Robert C. "A Case of Mistaken Identity: Djughashvili-Stalin," *Biography*, 5/1 (1982): 17-24.
- . "A Stalin Biography's Memoir," in *Psychology and Historical Interpretation*, edited by William McKinley Runyan. New York and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 . *Stalin as Revolutionary, 1879-1929: A Study in History and Personality*. New York: W. W. Norton, 1973.
- . *Stalin in Power: The Revolution from Above, 1929-1941*. New York: W. W. Norton, 1990.

- , ed. *Stalinism: Essays in Historical Interpretation*. New York: W. W. Norton, 1977.
- . *The Lenin Anthology*. New York: W. W. Norton, 1975.
- Tukhachevskii, M. N. *Izbrannye proizvedeniia*. Moscow: Voenizdat, 1964.
- . *Pokhod za Vislu: lektzii, prochtannye na dopolnitel'nom kurse Voennoi Akademii RKKA 7–10 fevralia 1923 goda*. Smolensk: Tipografiia Zapfronta, 1923.
- Tumarkin, Nina. *Lenin Lives! The Lenin Cult in Soviet Russia*.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3.
- Tumshis, Mikhail, and Papchinskii, Aleksander. *1937, bol'shaia chistka: NK-VD protiv ChK*. Moscow: Iauza-EKS-MO, 2009.
- Turner, L. F. C. "The Russian Mobilization in 1914," in *The War Plans of the Great Powers, 1880–1914*, edited by Paul M. Kennedy. Boston: George Allen and Unwin, 1979.
- Tutaeu, David, Alliluyev, Sergei, and Alliluyeva, Anna. *The Alliluyev Memoirs: Recollections of Svetlana Stalina's Maternal Aunt Anna Alliluyeva and her Grandfather Sergei Alliluyev*. New York: Putnam, 1968.
- Tyrkova-Williams, Ariadna. *From Liberty to Brest Litovsk: The First Year of the Russian Revolution*. London: Macmillan, 1919.
- Uchenie Lenina o revoliutsii i diktature proletariata*. Moscow: Gosizdat, 1925.
- Uglanov, N. A. "O Vladimire Il'iche Lenine (v period 1917–1922 gg.)," *Izvestiia TsK KPSS*, 1989, no. 4: 192.
- Ugolovnyi Kodeks RSFSR*. Moscow: NKJu, 1926, 1927, 1929.
- Ugrovatov, A. P. *Krasnyi banditizm v Sibiri, 1921–1929 gg.* Novosibirsk: IJKEA, 1999.
- Ukhtomskii, E. E. *Puteshestvie na Vostok ego imperatorskogo vnochestva gosudaria naslednika tsarevicha, 1890–1891*, 3 vols. St. Petersburg, 1893–97.
- Ukrain'tsev, N. "A Document on the Kornilov Affair," *Soviet Studies*, 25/2 (1973): 283–98.
- Ulam, Adam B. *Expansion and Coexistence: The History of Soviet Foreign Policy*. New York: Praeger, 1968.
- . *Stalin: The Man and His Era*. New York: Viking Press, 1973.
- . *The Bolsheviks: The Intellectual and Political History of the Triumph of Communism in Russia*. New York: Macmillan, 1965.
- Uldricks, Teddy. *Diplomacy and Ideology: The Origins of Soviet Foreign Relations 1917–30*. London: Sage, 1979.
- Ul'ianova, M. I. *O Lenine i sem'e Ul'ianovykh: vospominaniia, ocherki, pisma*. Moscow: Politicheskaiia literatura, 1978.
- . "O Vladimire Il'iche (poslednie gody zhizni)," *Izvestiia TsK KPSS*, 1991, no. 1: 127–38, no. 2: 125–40, no. 3: 183–200, no. 4: 177–91.
- . "Ob omoshenii V. I. Lenina k I. V. Stalinu," *Izvestiia TsK KPSS*, 1989, no. 12: 196–99.
- Ullman, Richard H. *The Anglo-Soviet Accord*.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2.
- Ulrich Brockdorff-Rantzau, Graf. *Dokumente*. Charlottenburg: Detusche Verlags, 1920.
- Ulricks, T. J. "The 'Crowd' in the Russian Revolution: Towards Reassessing the Nature of Revolutionary Leadership," *Politics and Society*, 4/3 (1974): 397–413.
- Upton, Anthony F. *The Finnish Revolution, 1917–1918*.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80.
- Uratazde, Grigorii I. *Vospominaniia gruzinskogo sotsial-demokrata*. Stanford, CA: Hoover Institution Press, 1968.
- Urazaeu, Sh. Z. *Turkestanskaia ASSR—pervoe sotsialisticheskoe gosudarstvo v Srednei Azii*. Moscow: Politicheskaiia literatura, 1961.
- Urban, G. R. *Stalinism: Its Impact on Russia and the World*. London: Maurice Temple Smith, 1982.
- Uroki Oktiabria*. Berlin: Berlinskoe knigoizd-vo, 1924.
- Urusov, S. D. *Zapiski tri goda gosudarstvennoi sluzhby*. Moscow: NLO, 2009.
- Ushakov, A. I. *Belyi iug: noiabr' 1919–noiabr' 1920 gg.* Moscow: AIRO-XX, 1997.
- Ustav obshchestva starykh bol'shevikov: Instruktsiia po organizatsii filial'nykh otdelenii. Spisok chlenov Obshchestvo i anketa*. Moscow, 1928.
- Ustrialov, Nikolai. *Pod zankom revoliutsii*. Harbin: Russkaia zhizn', 1925.
- U Velikoi mogily*. Moscow: Krasnaia zvezda, 1924.
- V Vserossiiskii s'ezd RKSM, 11–19 oktiabria 1922 g.: stenograficheskii ocherk*. Moscow-Leningrad: [AU: Please provide publisher], 1922.
- V zhenovakh revoliutsii: ruskaia intelligentsiia mezhdru belymi i krasnymi v porevoliutsionnye gody, sbornik dokumentov i materialov*. Moscow: Russkaia panorama, 2008.
- V. I. Lenin: neizvestnye dokumenty, 1891–1922*. Moscow: Rosspen, 1999.
- V. Ia. Bliukher v Kitae 1924–1927 gg.: novye dokumenty glavnogo voennogo sovetnika*. Moscow: Natalis, 2003.
- Vaganov, F. M. *Pravyi uklon v VKP (b) i ego razgrom, 1928–1930*. Moscow: Politicheskaiia literatura, 1970.
- Vaisberg, Roman E. *Den'gi i tseny: podpol'nyi rynok v period "voennogo kommunizma"*. Moscow: Gosplan SSSR, 1925.
- Vakar, N. "Stalin: Po vospominaniiam N. N. Zhordaniia," *Poslednie novosti*, December 16, 1936.
- Vaksberg, Arkadii. *Hôtel Lux: les partis frères au service de l'Internationale communiste*. Paris: Fayard, 1993.
- . *Iz ada v rai i obratno*. Moscow: Olimp, 2003.
- . *Stalin's Prosecutor: The Life of Andrei Vyshinsky*. New York: Grove Weidenfeld, 1991.
- Valedinskii, Ivan Aleksandrovich. "Organizm Stalina vpolne zdorovyi," *Istochnik*, 1998, no. 2: 68–73.
- Valentinov, N. *Nasledniki Lenina*. Moscow: Terra, 1991.
- . *Novaiia ekonomicheskaiia politika i krizis partii posle smerti Lenina*. Stanford, CA: Hoover Institution Press, Stanford University, 1971. Moscow: Sovremennik, 1991. Note: All endnote citations refer to the 1971 edition unless otherwise indicated.
- Valliant, Robert Britton. "Japan and the Trans-Siberian Railroad, 1885–1905." Phd diss., University of Hawaii, 1974.
- Valuev, P. A. *Dnevnik P. A. Valueva*, 2 vols. Moscow: Akademiia nauk SSSR, 1961.
- van de Ven, Hans J. "Public Finance and the Rise of Warlordism," *Modern Asian Studies*, 30/4 (1996): 829–68.
- Van Evera, Stephen. "The Cult of the Offensive and the Origins of the First World Wa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9/1 (1984): 58–107.
- . "Why Cooperation Failed in 1914," *World Politics*, 38 (1985): 80–117.
- Van Halen, D. J. *Memoirs of Don Juan Van Halen*, 2 vols. London: Henry Colburn and Richard Bentley, 1830.
- van Ree, Erik. "Reluctant Terrorists? Transcaucasian Social-Democrats 1901–9," *Europe-Asia Studies*, 60/1 (2008): 127–54.
- . "Socialism in One Country: a Reassessment," *Studies in East European Thought*, 50/2 (1998): 77–117.
- . "Stalin and the National Question," *Revolutionary Russia*, 7/2 (1994): 214–38.
- . "The Stalinist Self," *Kritika*, 11/2 (2010): 257–82.
- . *The Political Thought of Joseph Stalin: A Study in Twentieth-Century Revolutionary Patriotism*. New York: RoutledgeCurzon, 2002.
- Varneck, Elena, ed. *The Testimony of Kolchak and Other Siberian Materials*.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35.
- Vasetskii, N. A. *Troiskii: opyt politicheskoi biografii*. Moscow: Respublika, 1992.
- Vasil'chikov, Boris. *Vospominaniia*. Moscow-Pskov: Nashe nasledie, 2003.
- Vasileva, Larisa. *Kremlin Wives*. New York: Arcade, 1994.
- Vasilyev, A. T. *The Ochrana: The Russian Secret Police*. Philadelphia: Lippincott, 1930.
- Vatkin, Iu. "Goriachaia osen' dvadtsat vos'mogo (k voprosu o stalinizatsii

- kominternu)" in *Oni ne molchali*, ed. by A. V. Afanas'ev. Moscow: Politizdat, 1991.
- Vadin, A. "Panika: Sovetskaia Rossiia oseni 1918 goda glazami nemtsa," *Rodina*, 2002, n. 9: 78–81.
- Vadin, Aleksandr. *Komitern: idei, resheniia, sud'by*. Moscow: Rosspen, 2009.
- , et al., eds. *Stenogrammy zasedanii politburo TsK RKP (b), 1923–1938*. Moscow: Rosspen, 2007.
- Vatsetis, J. "Grazhdanskaia voina: 1918 god," in *Pamiat': istoricheskii sbornik* (Moscow 1977, Paris 1979), no. 2.
- Velikanova, O. V. "Lenina v massovom soznanii," *Otechestvennaia istoriia*, 1994, no. 2.
- Velikanova, Olga. "The Myth of the Besieged Fortress: Soviet Mass Perception in the 1920s–1930s," Stalin-Era Research and Archives Project, University of Toronto Centre for Russian and East European Studies, working paper no. 7 (2002).
- . *Popular Perceptions of Soviet Politics in the 1920s. Disenchantment of the Dreamers*. Basingstoke: Palgrave Macmillan, 2013.
- . *The Making of an Idol: On Uses of Lenin*. Gottingen: Muster-Schmidt, 1996.
- Velikii pokhod K. E. Voroshilova os Luganska k Tsaritsynu i geroicheskaia oborona Tsaritsyna. Moscow: Gos. voen. izd-vo Narkomata Oborony Soiuz SSSR, 1938.
- Vereshchak, Semyon. "Stalin v tiur'me (vospominaniia politicheskogo zakliuchennogo)," *Dni*, January 22, 1928.
- Vernadskii, V. I. *Dnevnik, 1926–1934*. Moscow: Nauka, 2001.
- Vemer, Andrew. *The Crisis of Russian Autocracy: Nicholas II and the 1905 Revolution*.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0.
- V Vsemirnyi kongress Kommunisticheskogo Internatsionala 17 i iunia–8 i iulia 1924 g.: stenograficheskii otchet, 2 vols. Moscow: Gosizdat, 1925.
- V Vserossiiskii s'ezd soviетov rabochikh, krest'ianskikh, soldatskikh i kazach'ikh deputatov. Moskva, 4–10 i iulia 1918 g.: stenograficheskii otchet. Moscow: VTsIK, 1918.
- VI s'ezd RSDRP (bol'shevikov), avgust 1917 goda: protokoly. Moscow: Politicheskaiia literatura, 1958.
- VI (Parizhskaiia) Vserossiiskaia konferentsiia RSDRP, 18–30 (5–17) apreliia 1912 g.: sbornik statei i dokumentov. Moscow: Politicheskaiia literatura, 1952.
- VII Vsebelorusskii s'ezd sovetov: stenograficheskii otchet. Minsk: TsIK BSSR, 1925.
- VIII s'ezd RKP (b), mart 1919 goda: protokoly. Moscow: Politicheskaiia literatura, 1933. Politizdat, 1959.
- VIII s'ezd RKP (b), 18–28 marta 1919 goda: stenograficheskii otchet. Moscow: Kommunist, 1919. Partizdat, 1933. Politicheskaiia literatura, 1959.
- Viktorov, B. V. *Bez grifa "sekretno": zapiski voennogo prokurora*. Moscow: Iuridicheskaiia literatura, 1990.
- Vil'kova, V. P., ed. *RKP (b), vnutripartiinaia bor'ba v dvadtsatye gody dokumenty i materialy*. Moscow: Rosspen, 2004.
- Vinogradov, V. K. "Zelenaia lampa," *Nezavisimaia gazeta*, April 20, 1994.
- , ed. *Genrikh Iagoda: narkom vnutrennykh del SSSR, general'nyi komissar gosudarstvennoi bezopasnosti: sbornik dokumentov*. Kazan: [s.n.], 1997.
- . *Arkhiv VChK: sbornik dokumentov*. Moscow: Kuchkovo Pole, 2007.
- , et al. *Fanni Kaplan, ili kto strelal v Lenina: sbornik dokumentov*, 2nd ed. Moscow: X-History, 2003.
- Vinogradov, V. K., et al. *Pravooservovskii politicheskii protsess v Moskve, 8 iiunia–4 avgusta 1922 g.: stenogrammy sudebnykh zasedanii*. Moscow: Rosspen, 2011.
- Viola, Lynne. "The Peasant Nightmare: Visions of Apocalypse in the Soviet Countryside," *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 62/4 (1990): 747–70.
- . *Peasant Rebels Under Stalin: Collectivization and the Culture of Peasant Resistanc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 , ed. *The War Against the Peasantry, 1927–1930: The Tragedy of the Soviet Countryside*.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5.
- Viroubova, Anna. *Memories of the Russian Court*. New York: Macmillan, 1923.
- . *Souvenirs de ma vie*. Paris, 1927.
- Vishnevskii, N. M. *Prinsipy i metody organizirovannogo raspredeleniia produktov proizvodstva i predmetov pervoi neobkhodimosti*. Moscow: VSNKh, 1920.
- Vishniak, Mark. *Dan' prashlomu*. New York: Chekhov, 1954.
- . *Le regime sovietiste*. Paris: Union, 1920.
- . *Vserossiiskoe uchreditel'noe sobranie*. Paris: Sovremenniaia zapiski, 1932.
- Vitte, S. Iu. *Samoderzhavie i zemstvo: konfidencial'naiia zapiska ministra finansov stats-sekretaria S. Iu. Vitte (1899 g.)*, 2nd ed. Stuttgart: J. H. W. Sietz Nachf., 1903.
- . *Vospominaniia: tsarstvovanie Nikolaiia II*, 3 vols. Moscow-Leningrad: Gosizdat, 1923–4. Moscow: Izd. sotsial'no-ekonomicheskoi literatury, 1960. Moscow: AST, 2000.
- VKP (b), *Komintern i natsional'no-revolutsionnoe dvizhenie v Kitae: dokumenty*, 4 vols. Moscow: Bukler, 1994–2003.
- Vladimirova, Vera. *Kontr-revolutsiia v 1917 g.: kornilovshchina*. Moscow: Krasnaia nov', 1924.
- . "Levyi esery v 1917–1918 gg." *Proletarskaia revoliutsiia*, 1927, no. 4: 101–40.
- . "Iul'skie dni 1917 goda," *Proletarskaia revoliutsiia*, 1923, no. 3: 3–52.
- Vneshniaia torgovlia SSSR za 1918–1940 gg.: statisticheskii obzor. Moscow: Vneshtorgizdat, 1960.
- Vodolagin, Mikhail A. *Krasnyi Tsaritsyn*. Volgograd: Nizhne-Volzhskoe knizhnoe izd-vo 1967.
- Voicikov, Vladimir N. *S nararm i bez zaria: vospominaniia poslednego Dvortsovogo Komendanta Gosudaria Imperatora Nikolaiia II*. Helsinki: [s.n.], 1936.
- Voitsekhovskii, Sergei L. *Tret: vospominaniia i dokumenty*. Ontario, Canada: Zaria: 1974.
- Volin, B. M. *12 biografii*. Moscow: Rabochaia Moskva, 1924.
- , ed. *Sedmaia (aprel'skaia) konferentsiia RSDRP (b)*. Moscow: Politicheskaiia literatura, 1955.
- Volin, M. S. "Istpart i Sovetskaia istoricheskaiia nauka," in *Velikii oktiabr': istoriia, istoriografiia, istochnikovedenie: sbornik statei*, edited by Iu. A. Poliakov. Moscow: Nauka, 1978.
- Volin, S. Iu. "Vokrug Moskovskoi Dumy," *Proletarskaia revoliutsiia*, 1922, no. 6.
- Voline (Vsevolod Mikhailovich Eichenbaum), *The Unknown Revolution, 1917–1921*. New York: Free Life Editions, 1974.
- Volkogonov, D. A. *Lenin: politicheskii portret*, 2 vols. Moscow: Novosti, 1994.
- . *Stalin: politicheskii portret*, 4th ed., 2 vols. Moscow: Novosti, 1996.
- . *Stalin: Triumph and Tragedy*. New York: Grove Weidenfeld, 1991.
- . *Triumf i tragediia: politicheskii portret I. V. Stalina*, 2 vols. Moscow, Novosti, 1989.
- . *Trotskii: politicheskii portret*, 2 vols. Moscow: Novosti, 1992.
- Volkogonov, Dmitrii. *Lenin: Life and Legacy*. London: HarperCollins, 1994.
- . *Trotsky: The Eternal Revolutionary*.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1996.
- Volkov, S. V. *Tragediia ruskogo ofitsera*. Moscow: Tsentropoligraf, 2002.
- Volobuev, Pavel. *Ekonomicheskaiia polinka Vremennogo Pravitel'stva*. Moscow: Nauka, 1962.
- Volodarskii, M. I. *Sovety i ikh izuzhnye sosedi Iran i Afganistan 1917–1933*. London: Overseas Publications Interchange, 1985.
- Voloshin, F. F. "Dmitrii Ivanovich Kurskii (k 100-letiiu so dnia rozhdeniia)," *Sovetskoe gosudarstvo i pravo*, 1974, no. 12: 98–102.
- Vompe, P. *Dni oktiabrskoi revoliutsii i zheleznodorozhniki: Materialy k izucheniuiu istorii revoliutsionnogo dvizheniia na zheleznykh dorogakh*. Moscow: TsK zheleznodorozhnikov,

- 1924.
- von Borchmer, Karl Freiherr. *Mit Graf Mirbach in Moskau: Tagebuch-Aufzeichnungen und Aktenstrucke vom 19 April bis 24 August 1918*, 2nd ed. Tübingen: Osiander'sche Buchhandlung, 1922.
- von Clausewitz, Carl. *On War*. New York: Knopf, 1993.
- Von Geldern, James. *Bolshevik Festivals, 1917-1920*.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3.
- Von Hagen, Mark. "The levee en masse from the Russian Army to the Soviet Union, 1874-1938," in *People in Arms: Military Myth and National Mobilization since the French Revolution*, edited by Daniel Moran and Arthur Waldron.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 . *Soldiers in the Proletarian Dictatorship: The Red Army and the Soviet Socialist State, 1917-1930*.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0.
- . *War in a European Borderland: Occupations and Occupation plans in Galicia and Ukraine, 1914-1918*.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2007.
- von Hindenburg, Paul. *Out of My Life*, 2 vols. New York: Harper and Brothers, 1921.
- von Korostowetz, W. K. *Graf Witte, der Steuermann in der Not*. Berlin: Brückenverlag, 1929.
- von Kuhlmann, Richard. *Erinnerungen*. Heidelberg: L. Schneider, 1948.
- von Laue, Theodore H. "A Secret Memorandum of Sergei Witte on the Industrialization of Russia," *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 26/1 (1954): 60-74.
- . "The Fate of Capitalism in Russia: The Narodnik Version," *American Slavic and East European Review*, 13/1 (1954): 11-28.
- . "The High Cost and the Gamble of the Witte System: A Chapter in the Industrialization of Russia,"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13/4 (1953): 425-48.
- . *Sergei Witte and the Industrialization of Russia*.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63.
- . *Why Lenin? Why Stalin? A Reappraisal of the Russian Revolution, 1900-1930*. Philadelphia, Lippincott: 1964, 1971.
- von Mayenburg, Ruth. *Hotel Lux: Das Absteigequartier der Weltrevolution*. Munich: Piper, 1991.
- . *Hotel Lux: Mit Dimitroff, Ernst Fischer, Ho Tchi Minh, Pieck, Rakosi, Slansky, Dr. Sorge, Tito, Togliasti, Tichou En-lai, Ulbricht und Wehner im Moskauer Quartier der Kommunistischen Internationale*. Munich: Bertelsmann, 1978.
- von Moltke, Helmuth. *Erinnerungen, Briefe, Dokumente 1877 bis 1916*. Stuttgart: Der kommende Tag Verl., 1922.
- von Müller, Georg. *The Kaiser and His Court*. London: MacDonald, 1961.
- von Riekhoff, Harald. *German-Polish Relations, 1918-1933*.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Press, 1971.
- von Vollmar, Georg. *Der isolierte sozialistische Staat: eine sozialökonomische Studie*. Zurich: Volksbuchhandlung, 1878.
- von Zwehl, Hans. *Erich von Falkenhayn: General der Infanterie: eine biographische Studie*. Berlin: E. S. Mittler, 1926.
- Voronin, E. P., et al., eds. *Voенно-revolyutsionnye komitety deistvuiushchei armii, 25 oktiabria 1917-mart 1918 g.* Moscow: Nauka, 1978.
- Voronovich, N., ed. *Zelenai kniga: istoria krest'ianskogo dvizheniia v chernomorskoii gubernii*. Prague: Chernomorskaia krest'ianskaia delegatsiia, 1921.
- Voroshilov, K. E. "Iz istorii podavleniia Kronshtadtskego miatezha," *Voенно-istoricheskii zhurnal*, 1961, no. 3: 15-35.
- . "Iz istorii podavleniia Kronshtadtskego miatezha," *Voенно-istoricheskii zhurnal*, 1961, no. 3: 15-35.
- . *Lenin, Stalin, i krasnaia armii: stat'i i rechi*. Moscow: Partizdat, 1934.
- . *Rasskazy o zhizni (vospominaniia)*. Moscow: Politizdat, 1968.
- Voshchinin, V. P. *Na sibirskom prostore: kartiny pereselen'tsev*. St. Petersburg: Nash vek, 1912.
- Vospominaniia o Vladimire Il'iche Lenine*, 3 vols. Moscow: Politicheskai literatura, 1956-61. 2nd ed, 5 vols. Moscow: Politicheskai literatura, 1979.
- Voss, A., et al. *Von hamburger Aufstand zur politische Isolierung: kommunistische Politik 1923-1933 in Hamburg und in deutschen Reich*. Hamburg: Landeszentrale für politische Bildung, 1983.
- Vsesoiuznaia Kommunisticheskaia Partiiia (b) v rezoliutsiiaakh s'ezdov, konferentsiis i plenumov TsK, 1898-1935*, 5th ed., 2 vols. Moscow: Partizdat, 1935-6.
- Vsesoiuznaia Kommunisticheskaia Partiiia (b) v rezoliutsiiaakh s'ezdov, konferentsiis i plenumov TsK, 1898-1939*, 6th ed., 2 vols. Moscow: Partizdat, 1940-41.
- Vucinich, Wayne S. "Mlada Bosna and the First World War," in *The Habsburg Empire in World War I: Essays on the Intellectual, Political, Military and Economics of the Habsburg War Effort*, edited by Robert A. Kann et al. Boulder, CO: East European Quarterly, 1977.
- Vulliamy, C. E., ed. *From the Red Archives*. London: Geoffrey Bles, 1929.
- Vygodskii, Semen Iu. *Vneshnaia politika SSSR, 1924-1929*. Moscow: Politicheskai literatura, 1963.
- Vyylka vmesto rastrela 1921-1923: deportatsiia intelligentsii v dokumentakh VChK-GPU. Moscow: Russkii put', 2005.
- "Vystuplenie N. I. Bukharina posviashchennoe pamiati Skvortsova-Stepanova," *Voprosy istorii*, 1988, no. 5: 75-84.
- Wade, Rex A. "Argonauts of Peace: The Soviet Delegation to Western Europe in the Summer of 1917," *Slavic Review*, 26/3 (1967): 453-67.
- . "Why October? The Search for Peace in 1917," *Soviet Studies*, 20/1 (1968): 36-45.
- . *Red Guards and Workers' Militias in the Russian Revolution*.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4.
- . *The Russian Revolution, 1917*.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 . *The Russian Search for Peace: February-October 1917*.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9.
- Wagner, Moritz. *Travels in Persia, Georgia and Koordistan*, 3 vols. London: Hurst and Blackett, 1856.
- Waite, Robert G. L. *Vanguard of Nazism: The Free Corps Movement in Post-War Germany, 1918-1923*. New York: W. W. Norton, 1952.
- Waldron, Arthur. "The Warlord: Twentieth-Century Chinese Understandings of Violence, Militarism, and Imperialism,"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96/4 (1991): 1073-1100.
- Waldron, Peter. *Between Two Revolutions: Stolypin and the Politics of Renewal in Russia*. London: UCL, 1998.
- Walkin, Jacob. *The Rise of Democracy in Pre-Revolutionary Russia: Political and Social Institutions Under the Last Three Czars*. New York: Praeger, 1962.
- Waller, Bruce. *Bismarck at the Crossroads: The Reorientation of German Foreign Policy After the Congress of Berlin, 1878-1880*. London: Athlone, 1974.
- Wandruszka, Adam. *House of Habsburg: Six Hundred Years of a European Dynasty*. New York: Doubleday, 1964.
- Wandycz, Piotr S. *August Zaleski: Minister Spraw Zagranicznych RP 1926-1932 w Swietle Wspomnien i Dokumentow*. Paris: Instytut Literacki, 1980.
- . *Soviet-Polish Relations, 1917-1921*.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9.
- . *Twilight of French Eastern Alliances, 1926-1936: French-Czechoslovak-Polish Relations from Locarno to the Remilitarization of the Rhineland*.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8.
- Ward, Chris. *Stalin's Russia*. New York: Routledge, Chapman and Hall, 1993.

- Ward, John. *With the "Die-Hards" in Siberia*. London: Cassell, 1920.
- Wargelin, Clifford F. "A High Price for Bread: The First Treaty of Brest-Litovsk and the Break-Up of Austria-Hungary, 1917-1918," *International History Review*, 1914 (1997): 757-88.
- Warth, Robert D. *Nicholas II: The Life and Reign of Russia's Last Monarch*. Westport, CT: Praeger, 1997.
- . *The Allies and the Russian Revolution*.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54.
- Waters, Brenda Meehan. *Autocracy and Aristocracy: The Russian Service Elite of 1730*. New Brunswick, NJ: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1982.
- Waters, M. A., ed. *Rosa Luxemburg Speaks*. New York: Pathfinder Press, 1970.
- Watson, Derek. *Molotov and Soviet Government: Sovmarkom, 1930-41*.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96.
- Waxmonsky, Gary Richard. "Police and Politics in Soviet Society 1921-1929." Phd diss., Princeton University, 1982.
- Wislo, Francis W. *Reforming Rural Russia: State, Local Society and National Politics, 1855-1914*.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0.
- . *Tales of Imperial Russia: The Life and Times of Sergei Witte, 1849-1915*.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 Weeks, Theodore. *Nation and State in Late Imperial Russia and Russification on Russia's Western Frontier, 1861-1914*. De Kalb: Nor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Press, 1994.
- Wehner, Markus, and Petrov, Iu. A. "Golod 1921-1922 gg. v Smarskoi gubernii i reaktsiia sovet'skogo pravitel'stva," *Cahiers du monde russe*, 38/1/2 (1997): 223-41.
- Weiner, Douglas. "Dzerzhinskii and the Gerd Case: The Politics of Intercession and the Evolution of 'Iron Felix' in NEP Russia," *Kritika*, 7/4 (2006): 759-91.
- Weisman, Neil. "Regular Police in Tsarist Russia, 1900-1914," *Russian Review*, 44/1 (1985): 45-68.
- Weisman, Neil B. *Reform in Tsarist Russia: The State Bureaucracy and Local Government, 1900-1914*. New Brunswick, NJ: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1981.
- Weitz, Eric D. *Creating German Communism, 1890-1990: From Popular Protest to Socialist State*.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7.
- . *Weimar Germany: Promise and Tragedy*.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7.
- Werth, Nicolas. "Rumeurs defeatistes et apocalyptiques dans l'URSS des années 1920 et 1930," *Vingtième siècle, revue d'histoire*, 71 (2001): 25-35.
- Westad, Odd Arne. *The Global Cold War: Third World Interventions and the Making of Our Tim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
- Westwood, J. N. *A History of Russian Railways*. London: G. Allen and Unwin, 1964.
- . *The Historical Atlas of World Railroads*. Buffalo, NY: Firefly, 2009.
- . *Russia Against Japan, 1904-5: A New Look at the Russo-Japanese War*.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1986.
- Wheatcroft, Stephen G. "Agency and Terror: Evdokimov and Mass Killing in Stalin's Great Terror," *Australian Journal of Politics and History*, 53/1 (2007): 20-44.
- Wheeler-Bennett, John. *The Forgotten Peace: Brest-Litovsk, March 1918*. London: Macmillan, 1938.
- . "The Meaning of Brest-Litovsk Today," *Foreign Affairs*, 17/1 (1938): 137-152.
- Wheen, Francis. *Karl Marx*. London: Fourth Estate, 1999.
- White, Elizabeth. *The Socialist Alternative to Bolshevik Russia: The Socialist Revolutionary Party, 1921-1939*.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11.
- White, Howard J. "1917 in the Rear Garisons," in *Economy and Society in Russia and the Soviet Union, 1860-1930: Essays for Olga Crisp*, edited by Linda Edmondson and Peter Waldron.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92.
- . "Civil Rights and the Provisional Government," in *Civil Rights in Imperial Russia*, edited by Olga Crisp and Linda Edmondson.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89.
- White, J. D. "The Kornilov Affair: A Study in Counter Revolution," *Soviet Studies*, 20/2 (1968): 187-205.
- White, James D. "Early Soviet Historical Interpretations of the Russian Revolution, 1918-1929," *Soviet Studies*, 37/3 (1985): 330-52.
- White, John Albert. *The Diplomacy of the Russo-Japanese War*.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4.
- . *The Siberian Intervention*.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50.
- White, Stephen. *The Origins of Detente. The Genoa Conference and Soviet-Western Relations, 1921-1922*.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5.
- Widerkehr, Stefan. "Forging a Concept: 'Eurasia' in Classical Eurasianism," paper presented at the 2007 Annual Soyuz Symposium, Princeton University, April 2007.
- Wilbur, C. Martin. *The Nationalist Revolution in China, 1923-1929*.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4.
- , and How, Julie Lien-ying. *Documents on Communism, Nationalism, and Soviet Advisers in China, 1918-1927: Papers Seized in the 1927 Peking Raid*.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56.
- . *Missionaries of Revolution: Soviet Advisers and Nationalist China, 1920-1927*.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 Wilcox, E. H. *Russia's Ruin*. London: Chappell & Hall, 1919.
- Wildman, Allan K. *The End of the Russian Imperial Army*, 2 vols.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0, 1988.
- . "Officers of the General Staff and the Kornilov Movement," in *Revolution in Russia*, Frankel, ed., 76-101.
- Williams, A. R. *Through the Russian Revolution*. New York: Boni and Liveright, 1921. Williams, Andrew J. *Trading with the Bolsheviks: The Politics of East-West Trade, 1920-1939*.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92.
- Williams, B. J. "Great Britain and Russia, 1905-1907 Convention," in *British Foreign Policy under Sir Edward Grey*, edited by F. H. Hinsley.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7.
- Williams, Beryl. *The Russian Revolution, 1917-1921*. Oxford: Basil Blackwell, 1987.
- Williams, Robert C. "Russian War Prisoners and Soviet-German Relations, 1918-1921," *Canadian Slavonic Papers*, 9/2 (1967): 270-95.
- Williamson, Jeffrey G. "Globalization, Factor Prices and Living Standards in Asia before 1940," in *Asia Pacific Dynamism 1550-2000*, edited by A. J. H. Latham et al. London: Routledge, 2000.
- Williamson, Jr., Samuel. *Austria-Hungary and the Origins of the First World War*. Houndmills and London: Macmillan, 1991.
- Wilson, Keith, ed. *Decisions for War, 1914*.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95.
- Wohlforth, William C. "The Perception of Power: Russia in the Pre-1914 Balance," *World Politics*, 39/3 (1987): 353-81.
- Wolfe, Bertram D. "Lenin and the Agent Provocateur Malinovsky," *Russian Review* 5/1 (1945): 49-69.
- . "The Influence of Early Military Decisions upon the National Structure of the Soviet Union," *American Slavonic and East European Review*, 9/3 (1950): 169-79.
- . *Three Who Made a Revolution*. New York: Dial Press, 1948.
- , ed. *Khrushchev and Stalin's Ghost*. New York: Praeger, 1957.
- Woodruff, David. *Money Unmade: Barter and the Fate of Russian Capitalism*.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9. "The Politburo on Gold, Industrialization, and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y, 1925–1926," in *Lost Politburo Transcripts*, ed. by Gregory and Naimark, 199–223.
- Woodworth, Bradley. "Civil Society and Nationality in the Multiethnic Russian Empire: Tallinn/Reval, 1860–1914." Phd diss., Indiana University, 2003.
- Wortman, Richard. "Nicholas II i obraz samoderzhaviia," *Istoriia SSSR*, 1991, no. 2: 119–28.
- . "Russian Monarchy and the Rule of Law: New Considerations of the Court Reform of 1864," *Kritika*, 6/1 (2005): 145–70.
- . *Scenarios of Power: Myth and Ceremony in Russian Monarchy*, 2 vol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0.
- . *The Crisis of Russian Populism*.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7.
- Wright, Jonathan. "Locarno: a Democratic Peace?"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26/2 (2010): 391–411.
- Wu, Tien-wci. "A Review of the Wuhan Debate: The Kuomintang-Communist Split of 1927,"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29/1 (1969): 125–43.
- Wyszczelski, Lech. *Varshava 1920*. Moscow: Astrel', 2004.
- X s'ezd RKP (b), mart 1921 goda: stenograficheskii otchet. Moscow: Gosizdat, 1921. Moscow: Partizdat, 1933. Moscow: Politicheskaiia literatura, 1963.
- XI s'ezd RKP (b): protokoly. Moscow: Partizdat, 1936. *Stenograficheskii otchet*. Moscow: Politicheskaiia literatura, 1961.
- XI Vserossiiskii s'ezd Sovetov: stenograficheskii otchet. Moscow: VTSIK SSSR, 1924.
- XII s'ezd RKP (b): stenograficheskii otchet. Moscow: Politizdat, 1968.
- XIII konferentsiia RKP (b): biulleten'. Moscow: Krasnaia nov', 1924.
- XIII s'ezd VKP (b), mai 1924 g.: stenograficheskii otchet. Moscow: Politizdat, 1963.
- XIV konferentsiia RKP (b): stenograficheskii otchet. Moscow-Leningrad: Gosizdat, 1925.
- XIV s'ezd VKP (b): stenograficheskii otchet. Moscow-Leningrad: Gosizdat, 1926.
- XV konferentsiia VKP (b), 26 oktiabria–3 noiabria 1926 g.: stenograficheskii otchet. Moscow and Leningrad: Gosizdat, 1927.
- XV s'ezd VKP (b): stenograficheskii otchet, Moscow, Gosizdat, 1928. 2 vols. Moscow: Politicheskaiia literatura, 1961–2.
- XVI Moskovskaia gubernskaia konferentsiia VKP (b). Moscow: MGK VKP (b), 1927.
- XVI partiinaia konferentsiia VKP (b), april' 1929 g.: stenograficheskii otchet. Moscow: Politicheskaiia literatura, 1962.
- XVI s'ezd VKP (b): stenograficheskii otchet. Moscow: Partizdat, 1935.
- XVII s'ezd VKP (b): stenograficheskii otchet, 26 ianvaria—10 fevralia 1934 g. Moscow: Partizdat, 1934.
- Yancy, George L. "Some Aspects of the Imperial Russian Government on the Eve of the First World War," *Slavonic and East European Review*, 43/1 (1964): 68–90.
- . "The Concept of the Stolypin Land Reform," *Slavic Review*, 23/2 (1964): 275–93.
- . *The Systematization of Russian Government: Social Evolution in the Domestic Administration of Imperial Russia, 1711–1905*.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73.
- . *Urge to Mobilize: Agrarian Reform in Russia, 1861–1930*.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82.
- Yanov, Alexander. *The Origins of Autocracy: Ivan the Terrible in Russian Histor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1.
- Yarkovsky, Jan M. *It Happened in Moscow*. New York: Vantage Press, 1961.
- Yaroslavsky, E. *Landmarks in the Life of Stalin*. Moscow: Foreign Publishing House, 1940.
- Yevtuhov, Catherine. *Portrait of a Russian Province: Economy, Society, and Civilization in Nineteenth-Century Nizhni Novgorod*. Pittsburgh: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Press, 2012.
- Yiulenev, I. V. *Sovetskaia kavaleriia v boiakh za Rodinu*. Moscow: Voenizdat, 1957.
- Young, Harry F. "The Misunderstanding of August 1, 1914," *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 48/4 (1976): 644–65.
- Young, James. "Bolshevik Wives: A Study of Soviet Elite Society." Phd diss., Sydney University, 2008.
- Za chetkuiu klassovuiu liniuu: sbornik dokumentov kraikoma VKP (b) i vystuplenii rukovodiashchikh rabotnikov kraia*. Novosibirsk: Sibkraikom VKP (b), 1929.
- Za leninizm: sbornik statei*. Moscow and Leningrad: Gosizdat, 1925.
- Zabih, S. *The Communist Movement in Iran*.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6.
- Zagorsky, S. O. *State Control of Industry in Russia During the War*.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28.
- Zaionchkovskii, P. A. *Pravitel'stvennyi apparat samoderzhavnoi Rossii v XIX v. Moscow: Vysl'*, 1978.
- Zakharov, Vladimir V. *Voennye aspekty vzaimootnosheniia SSSR i Germanii: 1921–iiun' 1941*. Moscow: Gumanitarnaiia Akademiia vooruzhennykh sil, 1992.
- Zal'kind, Aron B. "O zabelevaniiakh partaktivna," *Krasnaia nov'*, 1925, no. 4: 187–203.
- Zalkind, I. A. "N.K.I.D. v semnadsatom godu," *Mezhdunarodnaia zhizn'*, 1921, no. 10.
- Zamoyski, Adam. *Warsaw 1920: Lenin's Failed Conquest of Europe*. London: HarperCollins, 2008.
- Zamyatin, Yevgeny. "Comrade Churygin Has the Floor," in *The Fatal Eggs and Other Soviet Satire 1918–1963*, edited by Mirra Ginsburg. New York: Grove, 1964.
- Zarubin, V. G. *Bez pobeditelei: iz istorii grazhdanskoi voiny v Krymu*. Simferopol: Tavriia, 1997.
- Zasedanie vserossiiskogo tsentral'nogo ispolnitel'nogo komiteta 4-go sozyva: protokoly*. Moscow: Gosizdat, 1920.
- Zashikhin, A. N. "O chisle zhertv krovvavogo voskresen'ia," *Vestnik pomorskogo universiteta*, 2008, no. 3: 5–9.
- Zbarskii, B. I. *Mavzolei Lenina*. Moscow: Politicheskaiia literatura, 1945.
- Zdanovich, A. A. *Organy gosudarstvennoi bezopasnosti i Krasnaia armia: deiatel'nost' organov VChK-OGPU po obespecheniiu bezopasnosti RKKKA, 1921–1934*. Moscow: Kuchkovo pole/ Iks-Khitori, 2008.
- Zdesenko, V. I. *Gorki Leninskie*. Moscow: Moskovskii rabochii, 1985.
- Zeidler, Manfred. *Reichswehr und Rote Armee 1920–1933: Wege und Stationen einer ungewohnlichen Zusammenarbeit*. Munich: R. Oldenbourg, 1993; 2nd ed., 1994.
- Zelenov, M. V. "Rozhdeniie partiinoi nomenklatury," *Voprosy istorii*, 2005, no. 2: 3–24.
- Zeman, Z. A. B. *The Break-Up of the Habsburg Empire, 1914–1918*.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1.
- . ed. *Germany and the Revolution in Russia 1915–1918: Documents from the Archives of the German Foreign Ministr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8.
- "Zemel'nye poriadki za uralom," in *Aziatskaia Rossiia*, 3 vols, edited by G. V. Glinka. St. Petersburg: A.F. Marks, 1914.
- Zen'kovskii, Aleksandr V. *Pravda o Stolypine*. New York: Vseslovianskoe, 1956.
- Zenkovsky, Serge. "The Tataro-Bashkir Feud of 1917–1920," *Indiana Slavic Studies*, 2 (1958): 37–61.
- . *Pan-Turkism and Islam in Russia*.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7.
- Zetkin, Klara. *Reminiscences of Lenin*. New York: International, 1934.
- . *Vospominaniia o Lenine*. Moscow: Politicheskaiia literatura, 1955.
- , et al. *We Have Met Lenin*. Moscow: Foreign Languages Publishing House, 1939.
- Zhidkov, G. P. "Kres'tiane Altaia ot fevralia k oktiabriu: k istorii krakha kabinetskogo zemlevladieniia," in *Voprosy istorii sotsial'no-ekonomicheskoi*

- kul'turnoi zhizni Sibiri i Dal'nego Vostočka*. Novosibirsk: Nauka, Sibirskoe otdelenie, 1968.
- Zhilinskii, V. B. *Organizatsiia i zhizn' obkhannago otdeleniia vo vremia tsarskoi vlasti*. Moscow: T-vo Riabushkinskiikh, 1918.
- Zhitkov, N. "Prodfurazhnoe snabzhenie russkikh armii v mirovuiu voinu," *Voenno-istoricheskii zhurnal*, 1940, no. 12: 65-81.
- Zhordaniia, N. *Moia zhizn'*. Stanford, CA: Hoover Institution Press, 1968.
- . *Bol'shevizm*. Berlin: TsK sotsial-demokraticheskoi rabochei partii, no date.
- Zhukov, G. K. *Vospominaniia i razmyshleniia*, 3 vols. Moscow: Novosti, 1995.
- Zhukovskii, N. P. *Polnomochnyi predstavitel' SSSR*. Moscow: Politizdat, 1968.
- Zhvaniia, G. K. *Bol'shevistskaia pečat' Zakavkaz'ia nakanune i v period pervoi Russkoi revoliutsii*. Tblisi: Tsentral'nyi komitet Kommunisticheskoi partii Gruzii, 1958.
- Zibert, V. "O bol'shevistskom vospitanii," *Na strazhe*, 1924, no. 25: 9-10.
- Zima, V. F. *Chelovek i vlast' v SSSR v 1920-1930e gody: politiki represii*. Moscow: Sobranie, 2010.
- Zimmerman, Joshua D. *Poles, Jews, and the Politics of Nationality: The Bund and the Polish Socialist Party in Late Tsarist Russia, 1892-1914*. 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2005.
- Zinov'ev, G. *Leninizm: vvedenie v izuchenie Leninizma*. Leningrad: Gosizdat, 1925.
- . *Litsom k derevne!* Leningrad: Gosizdat, 1925.
- . *N. Lenin*. Petrograd: Petrogradskii Sovet, 1918.
- . *God revoliutsii: fevral' 1917—mart 1918*. Leningrad: Gosizdat, 1925.
- . *Istoriia Rossiiskoi kommunisticheskoi partii (bol'shevikov)*. Yekaterinburg: Ural-kniga, 1923.
- . *Bol'shevizm ili trotskizm?* Leningrad: proletarii, 1925.
- . *Bor'ba za Petrograd, 15 oktiabre—6 noiabria 1919*. Petrograd: Gos. sotsial'no-ekonomicheskoe izd., 1920.
- . *Zwölf Tage in Deutschland*. Hamburg: C. Hoym Nachf. L. Cahnbley, 1921.
- . and Trotskii, L. *O miatezhe levyykh s. r.* Moscow: Petrogradskii Sovet, 1918.
- Zisser, Ernest A. *The Transfigured Kingdom: Sacred Parody and Charismatic Authority at the Court of Peter the Great*.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4.
- Ziv, G. A. *Trotskii: kharakteristika (po lichnym vospominaniiam)*. New York: Narodopravstvo, 1921.
- Zlokazov, G. I. *Petrogradskii Sovet rabochikh i soldatskikh deputatov v period mirovogo razvitiia revoliutsii*. Moscow: Nauka, 1969.
- Znamenskii, Oleg N. *Vserossiiskoe Uchreditel'noe Sobranie: istoriia soznya i politicheskogo krusheniia*. Leningrad: Nauka, 1976.
- Zohrab, Irene. "The Socialist Revolutionary Party, Kerensky and the Kornilov Affair: From the Unpublished papers of Harold W. Williams," *New Zealand Slavonic Journal* (1991): 131-61.
- Zuber, Terence. *Inventing the Schlieffen Plan: German War Planning, 1871-1914*.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 Zubov, Nikolai. *F. E. Dzerzhinskii: biografiia*, 2nd ed. Moscow: Politicheskaiia literatura, 1965.
- Zubov, Platon. *Kartina Kavkazskogo kraia prinallezhashchago Rossii, i soprediel'nykh onomu zemel': v istoricheskoi, statisticheskoi, etnograficheskoi, finansovoi i torgovoi otosheniakh*, 4 vols. St. Petersburg: Konrad Vingeber, 1834-5.
- Zuckerman, Fredric S. *The Tsarist Secret Police in Russian Society, 1880-1917*. Basingstoke, Hampshire: Macmillan, 1996.
- Zviagintseva, A. P. "Organizatsiia i deiatel'nost' militsii Vremennogo pravitel'stva Rossii v 1917 g.," Phd diss., Moscow State University, 1972.





## 圖片出處

AGKM: Altai State Regional Museum [國立阿爾泰地區博物館]

RGAKFD: Russian State Archive of Photographs and Film [俄羅斯國家影像資料檔案館]

RGKFD SPb: Russian State Archive of Films and Photographs, St. Petersburg [聖彼得堡俄羅斯國家影像資料檔案館]

RGASPI: Russian State Archive of Social and Political History (former central party archive)[俄羅斯國家社會及政治歷史檔案館(前蘇共中央檔案館)]

TsGAKFFD SPb: Central State Archive of Photographs, Film, and Phonographic Documents, St. Petersburg [聖彼得堡國家影音文獻中央檔案館]

1. RGAKFD, albom, 1068, no. 80
2. 俄羅斯國家政治史博物館(State Museum of Political History of Russia)
3. RGAKFD, albom 830, no. 20
4. *Adskaiia pochta*, 1906, no. 3
5. RGAKFD, ed. khr. 5-4736
6. TsGAKFFD, E-6486
7. RGAKFD, albom 1057, foto 2
8. Getty Images
9. 哥里斯大林博物館(Stalin Museum Gori)
10. RGASPI, f. 558, op. 11, d.1671, l. 01
11. RGAKFD, ed. khr. 4-8936
12. 哥里斯大林博物館
13. 哥里斯大林博物館
14. 哥里斯大林博物館
15. Ostrovskii, *Kto stoial za spinoi Stalina*
16. 胡佛研究所檔案館(Hoover Institution Archives)
17. RGAKFD, ed. khr. 0-44748
18. RGAKFD, ed. khr. 2-19694
19. 格魯吉亞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檔案館(Georgian Soviet Socialist Republic Archive) (II), fond no. 6, I. 斯大林檔案
20. RGAKFD, ed. khr. V-2
21. 薩拉熱窩歷史檔案館(Sarajevo Historical Archives)
22. 波斯尼亞和黑塞哥維那國家檔案館(National Archive of Bosnia and Herzegovina)
23. RGAKFD, ed. khr. 4-8391;
24. RGAKFD, ed. khr. 0-140426



25. Kornilov (系列: *zhizn' zamechatel'nykh liudei*);
26. 左: RGAKFD, ed. khr. 2-30761; 右: The Granger Collection, New York
27. TsGAKFFD, d. 19316
28. Jonathan Sanders
29. RGAKFD, ed. khr. V-2410
30. 胡佛研究所檔案館
31. RGASPI, f. 393, op. 1, d. 26
32. RGAKFD, ed. khr. 58898
33. RGASPI, f. 558, op. 11, d. 1651, l. 18, 19
34. RGAKFD, ed. khr. G-343
35. Vladimir Genis, *S Bukharoi nado konchat': k istorii butaforskikh revoliutsii: dokumental'naia khronika*
36. S. L. Kuz'min, *Istoriia barona Ungerna: opyt rekonstruktsii*
37. David King Collection, London
38. 胡佛研究所檔案館
39. RGASPI, f. 393, op. 1, d. 32, l. 3
40. RGAKFD, ed. khr. V-1438
41. RGASPI, f. 393, op. 1, d. 39, l. 7
42. RGAKFD, ed. khr. 4-8538
43. RGASPI, f. 394, op. 1, d. 30, l. 4
44. David King Collection, London
45. 舒謝夫建築博物館 (Shchusev Museum of Architecture), 莫斯科
46. RGAKFD
47. 俄羅斯國立圖書館 [列寧圖書館, Russian State Library (Leninka)], 明信片
48. David King Collection, London
49. David King Collection, London
50. RGAKFD, ed. khr. V-20
51. Alexander Plekhanov et al., *Feliks Dzerzhinskii: k 130-letiiu so dnia rozhdeniia*
52. RGAKFD, ed. khr. V-3334
53. 左上: RGAKFD; 右上: Artuzov (系列: *zhizn' zamechatel'nykh liudei*);
- 左下: Artuzov (系列: *zhizn' zamechatel'nykh liudei*); 右下: 公共領域
54. RGASPI, d. 74, op. 2, d. 168, l. 21
55. RGAKFD, ed. khr. 5-10767
56. RGASPI, ed. khr. G-21
57. 舒謝夫建築博物館, 莫斯科
58. Sergei Deviatov et al., *Blizhnaia dacha Stalina*
59. Artem Sergeev, *Besedy o Staline*
60. RGASPI, f. 558, op. 11, d. 1651 albom l. 9, foto 27
61. The Granger Collection, New York
62. 阿利盧耶夫家庭影集
63. Bettmann/CORBIS
64. Bettmann/CORBIS
65. RGAKFD
66. RGAKFD, ed. khr. V-40
67. RGAKFD, ed. khr. 2-54874
68. AGKM, nvf 2032
69. AGKM, of 2627
70. RGAKFD, ed. khr. 2-54971
71. RGAKFD, ed. khr. 2-53820
72. FotoSoyuz
73. RGASPI, f. 74, op. 2, d. 169, l. 22

# 索引

本索引中頁碼為英文原書頁碼，即本書邊碼

1917年法軍中的兵變 197  
1921-1922年的饑荒 447-49；與徵糧  
447-48；與列寧 447-48；與美國的  
救濟 448-49  
1929年的股市暴跌 7331

## 一劃

《一個大人物的小傳》(*Small Biography of a  
Big Man, A*) 500  
《一個經濟學家的札記》(布哈林) (“Notes  
of an Economist”) 722  
一號命令 (Order No. 1) 181-82, 200, 297

## 二劃

二月革命 (February Revolution) 168-76,  
182-83, 188, 194, 290, 297, 453；軍  
隊 169, 172, 175；資產階級革命 175,  
195, 199；自由派政變 180, 223；海  
軍 172, 175  
《人民事業報》(*People's Cause*) 237  
人民委員會 (Council of People's  
Commissars) 227-29, 233-34, 236,  
241-42, 263, 266, 270, 278, 280, 350,  
412, 416-17, 425, 428, 476, 492,

686；複製中央委員會機關的職能  
428-29；左派社會革命黨人 237,  
265, 273；列寧對它的控制 229, 236  
《十月》(電影) (*October*) 651  
《十月的教訓》(托洛茨基) (“Lessons of  
October”) 563-64  
《十月宣言》(*October Manifesto*) 82, 84-5,  
90, 92  
十月革命 (October Revolution) 215-23,  
354, 418；革命後政治權威的空缺  
230-31；中央委員會 214, 216；反  
對彼得格勒蘇維埃的政變 223；與  
加米涅夫 214, 224, 499, 563-64, 606,  
641, 648；列寧 220-22, 278；軍事  
革命委員會 215-17；預言它會失  
敗 227-28；赤衛隊 216, 219；斯  
大林 224-25；十週年紀念 650-52,  
664-65；托洛茨基 215, 219-22；  
與季諾維也夫 214, 224, 499, 515,  
563-64, 606, 641, 648  
十月黨人 (Octobrists) 98

## 三劃

三帝同盟 (Three Emperor's League) 109  
三國同盟 (Triple Alliance) 6, 110

- 三國協約 (Triple Entente), 參見: 協約國 (同盟)
- 三駕馬車 (triumvirate) 512, 517, 519-20, 546, 563
- 上海 629-30
- 下諾夫哥羅德 (Novgorod, Nizhny) 59
- 凡爾登戰役 (Verdun, Battle of) 150, 162, 310
- 凡爾賽秩序 (Versailles Order) 352-53, 363, 380
- 凡爾賽條約 (Versailles, Treaty of, 1919) 150, 315-17, 445, 559-60, 588; 與德國的戰爭罪 315-16, 559; 重新劃分版圖 315-16
- 土地平分社 (Black Repartition) 189
- 土耳其 391, 395, 398
- 土耳其海峽 (Turkish Straits) 136, 145
- 土庫曼人 (Turcomans) 372
- 《士兵報》 (*Soldier*) 216
- 大改革 29, 59-60, 66, 85
- 大俄羅斯沙文主義 (chauvinism, Great Russian) 348, 407, 487, 496-97
- 《大流放, 1906-1916》 (斯維爾德洛夫) (*Mass Exile, 1906-1916*) 154
- 大蕭條與蘇聯 733-34
- 小毛奇, 赫爾穆特·馮 (Moltke, Helmuth von [the Younger]) 141, 145, 147-48
- 《小報》 (*Little Newspaper*) 210-11
- 工人, 參見: 俄國無產階級
- 《工人之路報》 (*Workers' Path*) 177, 216; 斯大林任編輯 212, 259
- 工人反對派 (Workers' opposition) 385, 389
- 《工人和士兵報》 (*Worker and Soldier*) 207
- 工會 (trade unions) 518; 黨的第十次代表大會關於工會問題的爭論 385, 390, 423, 455, 459
- 工業化 725; 德國 18, 65, 70; 全球的一分為二 63-65; 日本 65; 與新經濟政策 571, 672; 原材料 63; 索柯里尼柯夫的看法 659-60; 蘇聯 565-66, 571, 574, 582-83, 587, 605, 625, 638, 659, 662-64, 686, 694-95, 698, 710, 722, 725, 733; 梯弗里斯 30; 沙俄 65, 67, 69-70, 91-92, 141, 645; 美國 19
- 工業革命 39-40
- 工農檢查院 (workers' and peasants' inspectorate) 451, 456

## 四劃

中日戰爭 (1894-1895) 72

- 中央委員會 123, 154, 191, 214, 233-35, 255, 271, 321-22, 328-29, 350, 385, 390, 426, 430, 434, 476, 488, 502, 577, 637, 730; 布爾什維克接管 122-24, 133; 布哈林的三頭同盟計劃 512; 授予列寧核心圈專政的權力 243; 經濟上的幼稚 569; 選舉 193, 322, 497, 547, 584; 與德國的和談 250-51, 256-57; 與糧食短缺 665-66, 669, 673, 684; 與中央監察委員會聯席全會 522-25, 608-9, 614, 640, 646-49, 651, 698-700, 709-11; 加米涅夫辭職 235-36; 列寧的批評 192; 列寧提議擴大委員數 485; 與十月革命 214, 216; 中央全會 123, 328, 362, 411, 430, 477, 484-85, 515-16, 522, 533, 546, 557, 586, 604-5, 614, 622, 630-31, 639; 作為決策機構 428-29; 與波蘇戰爭 359, 362; 書記處, 參見: 書記處保密部 434-35; 批准蘇維埃聯盟計劃 477, 484; 斯大林 123-24, 132-33, 193; 忠於斯大林的人 454-55; 斯大林權勢的擴張 497; 斯大林向中央委員會提出辭職 224, 508, 607, 614, 619, 648, 657-60; 贊成貿易壟斷 484; 托洛茨

- 基擔任主席 214-15；托洛茨基分子被開除 390, 411-12, 423, 584, 651；否決托洛茨基的經濟計劃 484；開除托洛茨基 648；開除季諾維也夫 648
- 中央委員會機關 (Central Committee apparatus) 428-29, 433, 438；腐敗和數量過多 518-19；複製了人民委員會的職能 428-29；要求的報告太多 435；走漏消息和違反安全規定 434；莫洛托夫的批評 518-19；神秘性 435；老廣場街的辦公室 429-31；忠於斯大林的人 453-57, 469-70；斯大林的 control 力 478, 486-87；斯大林勢力的擴張 425-26；斯大林極為看重執行中央機關的指示 433；托洛茨基的指責 518-19, 522；另見：組織局；政治局；書記處
- 中央監察委員會 (Central Control Commission) 375, 430, 451, 454, 502-3, 522, 577, 583, 594, 607-8, 614, 636, 640；禁止傳播列寧「遺囑」, 540；與中央委員會的聯席全會，522-25, 608-9, 614, 640, 646-49, 651, 698-700, 709-11；對托洛茨基的調查 520
- 中亞 372-76；穆斯林 373-74；俄國的擴張 67-68, 111
- 中國 63, 67, 364；與共產國際 626-30, 640；共產黨人，參見：中國共產黨；饑荒 63-64；民族主義者，參見：國民黨；清朝 4, 64, 66, 401；1911年革命 131-32, 625-26；蘇俄顧問 626-29；與蘇俄 404-5；與蘇聯 617, 623, 625-33, 651, 655；與斯大林 625, 627-33, 640, 655；與托洛茨基 627-32；與季諾維也夫 629-31
- 中國民族主義者，參見：國民黨
- 中國共產黨 640；與國民黨合作 626-27；蔣介石的不信任 628；國民黨的背叛 637-38, 640, 655；在上海遭屠殺 629-30；第六次代表大會 717；蘇聯的援助 627, 640；斯大林論中共的策略 627-28；斯大林的背叛 631
- 丹尼爾遜，尼古拉·F. (Danielson, Nikolai F.) 42, 65-66
- 丹增 (Danzan) 346, 402, 404
- 五一遊行 (May Day marches) 49-50, 79, 106, 126
- 五人委員會 (Council of Five) 211-12
- 什克洛夫斯基，維克托 (Shklovsky, Viktor) 380
- 內戰中的白色恐怖 405
- 切列米索夫，V. A. (Cheremisov, V. A.) 217
- 切爾沃尼茨 (chervonets) 452
- 切爾維亞科夫，亞歷山大·I. (Chervyakov, Alexander I.) 302-4
- 切爾諾夫，維克托 (Chernov, Victor) 135, 164, 185, 198, 202, 228, 234, 279
- 反革命 (counterrevolution) 183, 186；布爾什維克一直受其困擾 233-34, 241, 244, 287-88, 290-91, 392-93；科爾尼洛夫未遂的政變 207-12, 219；莫斯科國務會議 207；蘇聯打擊反革命的法律 634；斯大林論反革命 207, 209, 213-14；斯大林把它用作政治標籤 305-7
- 反猶主義 (anti-Semitism) 19, 99-100, 326；《錫安長老會紀要》100, 129；斯大林的 112；白軍中的 325-26
- 〈反對聯邦制〉(斯大林) ("Against Federalism") 350
- 少先隊 (Young Pioneers) 547
- 尤西斯，伊萬 (Jüsis, Ivan) 602, 739
- 尤登尼奇，尼古拉 (Yudenich, Nikolai) 295, 326, 330-31, 335, 358
- 尤羅夫斯基，列昂尼德 (Yurovsky, Leonid) 452
- 尤羅夫斯基，雅科夫 (Yurovsky, Yakov) 281

- 尤蘇波夫公爵，費利克斯 (Yusupov, Prince Felix) 163
- 巴什基爾人 (Bashkirs) 368-69, 479
- 巴什基爾革命委員會 (Bashkir Revolutionary Committee) 370
- 巴什基爾第一騎兵團 (Bashkir First Cavalry regiment) 370
- 巴什基爾蘇維埃社會主義自治共和國 (巴什基里亞) (Bashkir Autonomous Soviet Socialist Republic [Bashkiria]) 370-72, 447
- 巴扎諾夫，鮑里斯 (Bazhanov, Boris) 454-56, 458, 463, 523, 666-67
- 巴比斯，亨利 (Barbusse, Henri) 1
- 巴卡也夫，伊萬 (Bakayev, Ivan) 655
- 巴伐利亞蘇維埃共和國 (Bavarian Soviet Republic) 323-24
- 巴別爾，伊薩克 (Babel, Isaac) 359
- 巴利茨基，弗謝沃羅德 (Balytsky, Vsevolod) 665, 688, 699
- 巴甫洛夫，伊萬 (Pavlov, Ivan) 37
- 巴拉巴舍夫，奧列格 (Barabashev, Oleg) 685
- 巴拉巴諾夫，安傑莉卡 (Balabanoff, Angelica) 531-32
- 巴拉姆揚茨，約瑟夫 (Baramyants, Iosif) 15-16
- 巴拉紹夫，阿列克謝 (Balashov, Alexei) 429, 431, 456-57; 論斯大林 468-69
- 巴枯寧，米哈伊爾 (Bakunin, Mikhail) 41-42, 191
- 巴庫 (Baku) 12, 50, 55, 266, 301; 東方各民族代表大會 367; 巴庫的石油業 115, 283; 巴庫的無產階級 366; 紅軍佔領巴庫 366; 斯大林在巴庫 112, 114-117, 121, 123; 巴庫的罷工 144
- 巴庫—巴統石油管道 (Baku-Batum pipelines) 51
- 《巴庫無產者報》 (*Baku Proletarian*) 106, 112
- 巴統 (Batum) 77, 301; 工人遭到屠殺 52-53; 斯大林 51-52
- 「巴斯馬赤」 ("Basmachi") 371-72
- 巴爾扎克，奧諾雷·德 (Balzac, Honoré de) 36
- 巴爾克，亞歷山大 (Balk, Alexander) 167-69
- 巴爾明，亞歷山大 (Barmine, Alexander) 427
- 巴爾幹 (Balkans) 141, 143
- 巴爾幹戰爭 (Balkan wars, 1912-13) 142-43
- 巴爾瑙爾 (Barnaul) 661-62, 668, 679, 681-82
- 巴赫梅捷夫，鮑里斯 (Bakhmeteff, Boris) 718
- 巴黎公社 (Paris Commune, 1871) 232-33, 318; 五十週年慶祝活動 391
- 戈林，赫爾曼 (Göring, Hermann) 527
- 戈洛曉金，伊賽·「菲利普」 (Goloshchokin, Isai "Filipp") 548, 653
- 戈格利奇澤，西蒙 (Goglichidze, Simon) 21
- 戈蒂爾，尤利 (Gothier, Yuri) 322
- 戈爾德施泰因，弗朗茨 (Goldstein, Franz) 692-93
- 扎戈爾斯基，弗拉基米爾 (Zagorsky, Vladimir) 334
- 扎科夫斯基，列昂尼德 (Zakovsky, Leonid) 617, 669, 679, 681-83
- 日丹諾夫，安德烈 (Zhdanov, Andrei) 457
- 日本：反蘇政策 621-22; 與英國 111; 東亞貿易 71-72; 帝國主義 71, 151; 工業化 65; 吞併朝鮮 617; 明治維新 4, 18, 732; 現代化 18; 海軍 72, 111, 140; 入侵西伯利亞 343-44; 與蘇聯 590, 617, 621-22, 632; 與沙俄 72-75, 109, 111-12; 入

侵符拉迪沃斯托克 266  
 日洛巴，德米特里 (Zhloba, Dmitry) 310  
 比利時：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 145-47,  
 152；與《洛迦諾公約》561  
 比約克條約 (Björkö, Treaty of) 110, 139  
 毛澤東 626, 640, 655  
 水兵奪取「波將金」號 74  
 《火星報》 (*Iskra* [*Spark*]) 45, 50-51, 78  
 《火星報》 (*Spark*) 393

## 五劃

世界大戰 2-3, 129, 136-37, 185, 556, 562,  
 588；後果 150-51, 312, 323-24,  
 343；協約國的戰略 197-99；根  
 源在於英德對抗 141；停戰協議  
 311-12；奧匈帝國 162, 185, 197,  
 200, 248-49, 269；與布爾什維克政  
 權 247；英國 150, 152, 156, 197-99,  
 312, 316-17；傷亡 150, 152, 166,  
 312；俄國專制制度的崩潰 173；與  
 殖民主義 151-52；徵兵 156；達達  
 主義 230；與二月革命 175；德俄和  
 談 247-52；德國再次對俄發動攻勢  
 253, 259；與德國 150, 152, 156-57,  
 197-98, 206-7, 231, 247-53, 310,  
 312；與民族主義 475；與1917年  
 俄軍的攻勢 196-200, 204, 212, 219,  
 224；爆發 141-49；與波蘭 355；與  
 臨時政府 187, 194-95, 196-200；與  
 俄國 150, 156-57, 162, 166, 206-7,  
 212, 219, 224, 231, 247-53, 296, 312,  
 316-17；僵局 149-50；與美國 248,  
 310-11  
 世界革命：列寧的首要目標 407；與蘇  
 維埃聯盟 555-56；斯大林的看法，  
 407-8, 555-58, 562-63, 570, 592,  
 698-99, 731  
 世界經濟 64-65；二分 64-65；蘇聯的集

體化 726；斯大林對世界經濟的看法  
 569  
 丘巴爾，弗拉斯 (Chubar, Vlas) 390  
 丘吉爾，溫斯頓 (Churchill, Winston) 398  
 冬宮 (Winter Palace) 70, 73, 90, 102,  
 126-27, 186；臨時政府搬到冬宮  
 213-14, 216-17, 219-20；所謂的猛  
 攻冬宮 219-20, 338-39  
 加伊·德米特里耶維奇·加伊 (布日什  
 基揚，蓋克) (Gai Dmitrievich Gai  
 [Bzhishkyan, Haik]) 345, 359-61, 365, 370  
 加米涅夫，列夫 (·羅森菲爾德)  
 (Kamenev, Lev [Rozenfeld]) 53, 80,  
 121, 132-33, 135, 153, 173, 190, 203,  
 221, 224, 226, 279, 322, 331, 341, 360,  
 365, 385, 416, 440, 471, 490-91, 493,  
 497, 504, 531, 544, 557, 596, 599, 605,  
 615, 650, 712, 739；任駐意大利大使  
 609-10；試圖把其他社會主義者吸  
 收進布爾什維克政權 233-36；與布  
 哈林 727；在人民委員會 416-17；  
 任《真理報》編輯 190-91, 193；被  
 逐出中央委員會 651；未能在黨的  
 第十三次代表大會上把斯大林調  
 開 552；與黨的第十五次代表大會  
 653-54；在黨的第十四次代表大會  
 上 580-81, 586；監禁 204, 212；流  
 放 713；作為陰謀家 512；與列寧  
 476-77；與列寧之死 535；作為列寧  
 可能的接班人 492；與列寧「遺囑」  
 499, 606-7, 648；與十月革命 214,  
 224, 499, 563-64, 606, 641, 648；與  
 陰謀解除斯大林總書記職務 714-17,  
 720；謀求警務改革 439；辭去在中  
 央委員會的職務 235-36；辭去在  
 蘇維埃中央執行委員會的職務 236,  
 423；與索柯里尼柯夫 713-14；論斯  
 大林 422；與斯大林 192, 512-14；  
 與接班人之爭 563-64, 577-78, 580-



- 81, 582, 584, 586, 605–6, 614–15, 636, 639, 641, 653–56, 713, 729, 736; 任貿易人民委員 585; 與斯大林和季諾維也夫的三頭同盟 517, 563; 與托洛茨基 224–25, 474
- 加米涅夫, 謝爾蓋 (Kamenev, Sergei) 328–30, 356, 359–63, 365, 371, 377, 381, 384, 394, 515
- 加利西亞 (Galicia) 353, 360
- 加里寧, 米哈伊爾 (Kalinin, Mikhail) 50, 214, 322, 331, 383, 423, 455, 498, 513, 585, 668, 673, 700, 712; 與列寧之死 535–36; 與陰謀解除斯大林總書記職務 713–15; 在政治局 596; 效忠斯大林 731
- 加斯普林斯基, 伊斯梅爾 (Gasprinski, Ismail) 368
- 包馬尼斯, 卡爾利斯 (鮑曼, 卡爾) (Baumanis, Kārlis [Bauman, Karl]) 673
- 北高加索 (North Caucasus) 447, 666, 688–89, 700
- 北高加索軍事人民委員部 (Military Commissariat of the North Caucasus) 301, 303
- 卡巴希澤, 阿卡基 (Kabakhidze, Akaki) 481, 487, 489
- 卡巴爾達—巴爾卡爾 (Balkaro-Kabarda) 688; 作為布爾什維克堡壘的波羅的海艦隊 187; 德國佔領波羅的海沿岸地區 243, 283
- 卡岡諾維奇, 拉扎 (Kaganovich, Lazar) 321, 376, 422, 529, 613, 641, 647, 656, 661, 666, 697, 699; 背景 455, 457; 任中央委員會書記 455; 任組織指導局局長 455; 效忠斯大林 456, 731; 與托洛茨基 455, 591
- 卡帕納澤, 佩季·「彼得」 (Kapanadze, Peri "Pyotr") 35, 38, 598
- 加拉罕, 列夫 (加拉哈尼揚) (Karakhan, Lev [Karakhanyan]) 366, 458, 623, 628, 651
- 卡茲別吉, 亞歷山大 (Qazbegi, Aleksandre) 23–24
- 卡普蘭, 范尼 (羅伊德曼, 費佳) (Kaplan, Fanya [Roidman, Feiga]) 285–86
- 卡爾, E. H. (Carr, E. H.) 739
- 卡爾梅克人 (Kalmyks) 174
- 卡盧加 (Kaluga) 238
- 古比雪夫, 瓦列里安 (Kuibyshev, Valerian) 375, 390, 493, 502–3, 511, 516, 563, 601, 663–64, 686, 694, 698, 720, 722; 任中央監察委員會首腦 454; 效忠斯大林 454–56; 任最高國民經濟委員會主席 607
- 古尼娜, 卓婭 (Gunina, Zoya) 595
- 古里安共和國 (Gurian Republic) 67, 86
- 古契科夫, 亞歷山大 (Guchkov, Alexander) 166, 173, 182, 588–89
- 古爾科, 弗拉基米爾 (Gurko, Vladimir) 87
- 古爾維奇, 埃斯菲里 (Gurvich, Esfir) 719
- 古爾維奇, 費奧多爾 (Gurvich, Fyodor) 參見: 唐恩, 費奧多爾
- 古謝夫, 謝爾蓋 (德拉布金, 雅科夫) (Gusev, Sergei [Drabkin, Yakov]) 328, 583
- 右派社會革命黨人 (Right Socialist Revolutionaries) 273, 279, 285, 396, 440
- 司徒盧威, 彼得 (Struve, Pyotr) 45, 289, 336
- 〈四十六人聲明〉 (Declaration of the 46) 519, 522–24
- 〈四月提綱〉 (列寧) ("April Theses") 191
- 外交人民委員部 (foreign affairs commissariat) 229, 441–43, 622, 624
- 外高加索鐵路 (Transcaucasus Railway) 14, 51
- 尼古拉一世, 沙皇 (Nicholas I, tsar) 59, 89

- 尼古拉二世，沙皇 (Nicholas II, tsar) 60, 62, 65, 70-2, 75, 82, 85, 89-92, 101, 122, 127, 131, 157, 160-61, 163, 186, 197, 209, 223, 441；退位 3, 171-72, 178, 230, 258；試圖返回彼得格勒未能成功 170-71；貴族陰謀反對尼古拉二世 166；承諾的憲法 84-85；下令鎮壓 1917 年的抗議活動 167-68；與杜馬 74, 82-83, 90-91, 93-94, 101, 127-28, 158, 163, 166, 169, 171；與杜爾諾沃 134；遠東政策 72-73；任前線司令 158-59, 167；頒佈基本法 85；對尼古拉二世越來越失望 126-28；被軟禁 280；遇害 281；頒佈《十月宣言》82, 84-85, 90, 92；與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爆發 144-45；政治陰謀 120, 127；與德國的秘約 109-10, 139；與斯托雷平的關係 92, 119-20；與維特的關係 70, 72, 84, 91；工人向尼古拉二世請願 73-74
- 尼古拉大公，「尼古拉沙」(Nicholas, Grand Duke "Nikolasha") 82, 158, 159, 166
- 尼古拉耶夫斯基，鮑里斯 (Nikolaevsky, Boris) 218, 267
- 尼古拉耶娃，克拉夫季婭 (Nikolaeva, Klavdiya) 581
- 尼德邁爾，奧斯卡·馮 (Niedermeyer, Oskar von) 560
- 左派反對派 (Left opposition) 518-19, 524, 533, 541, 544, 546-47, 603-4, 672, 678-80, 737
- 左派共產主義者 (Left Communists) 265, 314, 385, 578
- 左派社會革命黨人 (Left Socialist Revolutionaries) 234-35, 242, 244, 257, 265, 273, 649；加入人民委員會 237；扣押捷爾任斯基 276；遭到大批處決 278；策劃暗殺米爾巴赫 274-75；第三次代表大會 273-74
- 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 (Brest-Litovsk) 249, 354, 361
- 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條約 (Brest-Litovsk, Treaty of) 257-58, 264-65, 269, 272-73, 315, 389, 451, 459, 642；補充條約 283；左派社會革命黨人的指責 273-74；俄國廢除該條約 312
- 布克哈特，雅各布 (Burckhardt, Jacob) 144
- 布哈拉 (Bukhara) 90, 255, 342；遭紅軍洗劫 373-75
- 布哈拉人民蘇維埃共和國 (Bukharan People's Soviet Republic) 375
- 布哈林，尼古拉 (Bukharin, Nikolai) 133, 246, 250, 256-57, 259, 262, 276, 314, 322, 331, 334, 351, 354, 385, 389, 392, 414, 464, 469, 493, 497, 512, 535, 596, 608, 613, 619, 631, 632, 640, 656, 676, 686, 695, 708, 739；作為蘇聯領導人入選 728-29；與「山洞會議」505-6, 658；擔任共產國際首腦 719；對「非常措施」的看法 711-12；德國共產黨的政變圖謀 509-10；〈伊里奇關於書記的信〉504-9, 512；論工業化 722；與加米涅夫 727；與列寧之死 534；作為列寧可能的接班人 492；與列寧遺囑 499；與新經濟政策 569-71, 727；與密謀解除斯大林總書記職務 713-17, 720；在政治局 596；與斯大林 615-16, 707-8, 714-15, 718-19, 723；論斯大林的專政 472, 474, 507-9, 513, 731；與接班人之爭 563-64, 578, 580, 584, 641-42, 644
- 布柳姆金，雅科夫 (Blyumkin, Yakov) 274-75
- 布柳赫爾，瓦西里 (Blyukher, Vasily) 629, 631, 644
- 布洛克，伊萬 (Blok, Ivan) 74

- 布洛克，亞歷山大 (Blok, Alexander) 130
- 布朗基，路易·奧古斯特 (Blanqui, Louis Auguste) 79
- 布朗基主義 (Blanquism) 79–80
- 布格河 (Bug River) 358
- 布爾什維克，布爾什維主義 (Bolsheviks, Bolshevism) 3, 79, 103, 106, 108, 114, 118, 124, 137, 176；世界秩序的選項 343；預料中的資產階級歷史階段 190；與立憲會議選舉 244–45；反對殖民主義 368–69；被排除在莫斯科國務會議之外 206；蘇維埃第一代表大會 196；因為科爾尼洛夫的政變圖謀而獲得新生 212–13, 225；克倫斯基指控布爾什維克犯有叛國罪 202–3；批評列寧的狂熱 191–92；喪失信心 213；與孟什維克的分裂 78–81, 103, 108, 114, 122–24, 137；十月政變，參見：十月革命；忽視農民 237, 426；彼得格勒總部 186–87, 190–91, 203, 215；控制彼得格勒蘇維埃 212–13, 218–19；樂見政治上的兩極分化 208；布拉格代表會議 122–23；與臨時政府 177–78, 208；俄國局 190, 222；在俄國軍隊中的鼓動工作 198；俄羅斯化 348；黨的第七次 (緊急) 代表大會 259；黨的第六次代表大會 204–5, 212；斯大林成為布爾什維克 112, 176–77；搶劫梯弗里斯銀行 113–14；托洛茨基加入布爾什維克 200, 202；邦契—布魯耶維奇，米哈伊爾 (Bonch-Bruевич, Mikhail) 250, 328
- 《布爾什維克》(出版物) (*Bolshevik*) 545
- 布爾什維克政權 (1918–1922)：反對它的武裝暴動 2311；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條約 257–58, 264–65, 269, 272–73, 283, 312, 315, 642；混亂 230–33；內戰，參見：俄國內戰；金融體系的崩潰 238–39, 242；反革命的幽靈 233–34, 241, 244, 287–88, 290–91, 392–93；與達達主義相比 230, 232；勞動力的減少 385；專政 231；被排除在凡爾賽和談之外, 317；聯邦制 343；食品短缺 290, 299–302, 307, 321–22；燃料短缺 321；糧食壟斷 299；徵糧 380, 389, 447；把草根組織當作靶子 336–37；與世界大戰 231, 247；意識形態的狂熱 292–93, 597；政權中的猶太人 340–41；加米涅夫試圖吸收其他社會主義者 233–36；米爾巴赫談布爾什維克政權倒台的可能性 271–72；缺乏全國性的權威地位 254–55；黨國 339, 345, 469；與同盟國的和談 249–50；撤離彼得格勒 259–61；治安力量不足 240；宣傳機器 289–90；沒收財產 241–42；1918年的紅色恐怖 287–88；將羅曼諾夫家族的財產國有化 281；遭圍攻的心態 338；斯大林成為支配力量 295；斯大林派 390；國家建設，參見：蘇維埃國家建設；割讓領土 258；托洛斯基派 390；拒絕償還沙皇政府的債務 239；普選 243；另見：共產黨；人民委員會；俄羅斯社會主義聯邦蘇維埃共和國
- 布爾什維克政權 (1918–1922) 的官僚政治 289–90, 427；腐敗 292, 322, 337–38, 527；精英集團的額外好處 338；擴張 385, 578, 601；財政負擔 337–38；等級制 337；無能 292, 424；內訌 420；人浮於事 428–29；布爾什維克革命 137, 233；作為資產階級民主革命 407；革命中的斯大林 138, 177；斯大林對它的看法 555–56；另見：二月革命；十月革命
- 布爾什維克奪取存放在銀行的財物

- 238-39  
 布爾加科夫，米哈伊爾 (Bulgakov, Mikhail) 620  
 布魯西洛夫，阿列克謝 (Brusilov, Alexei) 162-64, 166, 185, 196-97, 199, 248  
 布魯茨庫斯，鮑里斯 (Brutzkus, Boris) 239  
 布賴恩特，露易絲 (Bryant, Louise) 440  
 布瓊尼，謝苗 (Budyonny, Semyon) 345, 355-59, 362-63, 365, 456, 464  
 布羅伊多，格爾什 (Broido, Gersh) 373  
 布羅克多夫—蘭曹伯爵，烏爾里希·馮 (Brockdorff-Rantzau, Ulrich, Count von) 553, 559, 638, 691, 693, 704, 709; 與契切林 559-60  
 布蘭德勒，海因里希 (Brandler, Heinrich) 509-10, 514-15, 525  
 弗拉西克，尼古拉 (Vlasik, Nikolai) 739  
 弗朗茨·約瑟夫，奧匈帝國皇帝 (Franz Josef, kaiser of Austria-Hungary) 14-44  
 弗朗茨·斐迪南大公 (Franz Ferdinand, Archduke) 遭暗殺 142-43, 149, 269  
 弗爾斯特，奧特弗里德 (Förster, Otfried) 412  
 弗蘭格爾男爵，彼得 (Wrangel, Baron Pyotr) 332, 335, 357-58, 361-62, 374, 379  
 打倒富農 (dekulakization) 421, 685, 707, 724, 727  
 本地化 (indigenization) 496, 504  
 正教 (Orthodox Christianity) 99, 118-20, 125, 129, 351  
 「民族中心」(National Center) 333-34  
 民族主義 119, 342, 345-49, 359, 370, 475, 502; 在歐亞大陸 406; 在格魯吉亞 400, 601; 在德國 34-35; 與本地化政策 496, 504; 列寧的觀點 347-48, 351; 據說是出自列寧的有關文章 493-94, 501; 在俄國 118-19, 125, 202; 斯大林的觀點 153-54, 347-48, 406, 477-78, 496, 503  
 民族事務人民委員部 (nationalities commissariat) 228, 238, 251, 254, 264, 266, 349, 368, 429, 456  
 〈民族問題和社會民主黨〉(斯大林) ("National Question and Social Democracy, The") 347  
 民意黨 (People's Will) 60  
 民粹派，民粹主義 (Populists, Populism) 38, 42-43  
 瓦列伊基斯，約納瓦·「約瑟夫」(Vareikis, Jonava "Iosif") 356  
 瓦列京斯基，伊萬 (Valedinsky, Ivan) 602-3, 633, 720  
 瓦西里奇科夫，鮑里斯·A. (Vasilchikov, Boris A.) 58  
 瓦利季，艾哈邁德-扎基 (Validi, Akhmetzaki) 346, 368; 斯大林對他的庇護 369-72  
 瓦采季斯，約阿基姆 (Váciets, Jukums) 261, 277, 282, 284, 310, 313-14, 330; 被捕 329; 任紅軍總司令 286, 306, 328  
 白里安，阿里斯蒂德 (Briand, Aristide) 562  
 白俄羅斯，白俄羅斯人 (Belorussia, Belorussians) 98, 119, 125, 157, 353-54, 388, 475, 546; 作為獨立的共和國 343, 368; 與波蘭 352, 616-17; 與蘇維埃聯盟計劃 475  
 白俄羅斯蘇維埃共和國 (Belorussian Soviet Republic) 406  
 白軍 (White armies) 300, 330, 350, 356, 369-70; 反猶 325-26; 瓦解 331-32; 在克里米亞 357, 379; 組織渙散 335; 協約國的補給 326, 352; 前沙皇軍官 297-98; 1919年的攻勢 326-28, 335, 370-71; 圍攻並奪取察里津 305-6, 310, 326-27; 另見：哥

- 薩克；志願軍
- 白軍(反布爾什維克分子)(Whites [anti-Bolsheviks]) 282-83, 292, 295-96, 298, 325, 335, 344, 379-80
- 白衛分子(White Guards) 604, 635
- 皮亞特尼茨基，奧西普(Pyatnitsky, Osip) 526
- 皮達可夫，格里戈里·「尤利」(Pyatakov, Grigory "Yuri") 237, 351, 440, 605, 614-15；與列寧「遺囑」499
- 皮爾蘇茨基，約瑟夫(Pilsudski, Józef) 333, 345, 352, 377, 379, 562, 617, 622；向右轉 600-1；在1926年政變中 589, 600, 622；在波蘇戰爭中 353-55, 364-65
- 立陶宛 91, 249, 283, 353-54, 509, 589, 604, 623；獨立 232-33, 238；軍事政變 618；民族主義者 359；波蘭人的入侵 352；與蘇聯簽訂互不侵犯條約 617-18
- 立陶宛國民聯盟(Lithuanian National Union) 618
- 立頓勳爵(Lytton, Lord) 64
- 立憲主義(constitutionalism) 56, 60, 78-79, 82, 84-85, 90, 92-94, 98-100, 103, 109, 122, 127-28, 131-32, 137, 157, 171, 173, 175-76, 178-80, 207, 223
- 立憲會議(Constituent Assembly) 242-47, 251, 279
- 六劃**
- 《伊比利亞報》(*Iveria*) 33, 38, 44
- 伊列馬施維里，約瑟夫·「索索」(Iremashvili, Iosif [Ioseb] "Soso") 23, 31, 38, 399
- 伊利英，亞歷山大(「日內瓦人」)(Ilin, Alexander ["The Genevan"]) 431
- 伊利英卡街9號(Ilinka, 9) 426, 450-52, 470
- 伊利諾伊州芝加哥的秣市騷亂 49-50
- 〈伊里奇關於書記的信〉("Ilich's letter about the secretary") 504-9, 511-14, 546, 658；與斯大林 512, 514；與托洛茨基 516；另見：列寧「遺囑」
- 伊帕季耶夫，尼古拉(Ipatyev, Nikolai) 280
- 伊朗(波斯) 12, 109, 145, 344；英國在伊朗 366；立憲革命 131-32；蘇俄入侵 366；蘇俄與伊朗的條約 391
- 伊朗人 29-30, 344
- 伊梅尼托夫，所羅門(Imenitov, Solomon) 703-4
- 伊斯特曼，馬克斯(Eastman, Max) 506, 572-73, 647-48；發表列寧「遺囑」 614
- 伊萬諾夫，尼古拉(Ivanov, Nikolai) 170-71
- 伊麗莎白，女皇(Elizabeth, tsarina) 88
- 伊麗莎白施維里，格里戈里(Elisabedashvili, Grigory) 7
- 伏爾加河流域(Volga valley) 270, 300, 326, 447, 566, 568
- 伏龍芝，米哈伊爾(Frunze, Mikhail) 326, 346, 505, 507, 738；在克里米亞 374, 379；病逝 575-76；在突厥斯坦 373-75, 387；任陸海軍人民委員 557；任副陸海軍人民委員 542, 574
- 伏羅希洛夫，克利門特·「克利姆」(Voroshilov, Klimenty "Klim") 104, 308, 310, 320, 327-28, 355, 357, 390-91, 456, 495, 507, 582, 585, 596, 602, 619, 622, 656-57, 694-95, 700, 704；「山洞會議」505-6；保衛察里津 303-4；與密謀解除斯大林總書記職務 713-15；成為斯大林的門徒 303, 306, 313, 320-21, 387, 627, 731；與托洛茨基 309, 313-14；與圖

- 哈切夫斯基的競爭 576-77；任陸海軍人民委員 576, 638-39
- 休謝夫，阿列克謝 (Shchusev, Alexei) 543
- 休羅夫斯基，弗拉基米爾 (Shchurovsky, Vladimir) 720
- 全俄合作社 (All-Russia Cooperative Society) 631-32
- 全俄第一次農民代表大會 (All-Russia Congress of Peasants' Deputies, First) 187
- 全俄穆斯林代表大會 (All-Russia Congress of Muslims) 183
- 共和國革命軍事委員會 (Revolutionary Military Council of the Republic) 286, 307-9, 328, 335, 436, 557；托洛茨基擔任主席，286, 341, 516, 537
- 共青團 (Communist Youth League) 548, 574, 585, 707
- 共產主義 40, 190, 336, 597；另見：列寧主義；馬克思主義，馬克思主義者
- 《共產主義ABC》(布哈林和普列奧布拉斯基) 695
- 共產主義科學院 (Communist Academy) 706, 718
- 《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列寧) ("Left-Wing" Communism: An Infantile Disorder) 363-64
- 共產國際 (Communist International [Comintern]) 392, 412, 510；第一次代表大會 317, 347, 369；第二次代表大會 41, 318, 363-64；第三次代表大會 403, 442；第四次代表大會 418, 427；第五次代表大會 550-51；第六次代表大會 718-20；與巴庫代表大會 367；布哈林擔任首腦 719；對中國採取的政策 626-30, 640；殖民主義 367-68；德國共產黨的政變圖謀 511, 525-26, 559；格伯烏特工 442-43；無能和腐敗 442-43；庫西寧擔任首腦 442；蒙藏部 401-2；與蘇維埃外交關係 558-59；斯大林對它的控制 506, 609；托洛茨基被趕出共產國際 644；季諾維也夫擔任首腦 609, 615
- 共產黨 259, 265, 271-72, 297, 339；第九次代表會議 376-77；第十三次代表會議 533-34；第十四次代表會議 569, 571；第十五次代表會議 614-15；第六次代表大會 555；第八次代表大會 318-22, 329, 369-70, 396；第十次代表大會 344, 384-91, 405-6, 410, 423, 455, 459；第十一次代表大會 411, 431, 465, 481-82；第十二次代表大會 415-16, 425, 433, 436, 488, 494-95, 502；第十三次代表大會 546-49, 552, 573, 607, 609；第十四次代表大會 579-84, 586；第十五次代表大會 597, 640-41, 643-44, 652-56, 659-60, 664-65, 673, 730；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參見：中央委員會；建議實行集體領導 422-23；壯大 344；層級制結構 289, 432, 469；地方組織 432-33；穆斯林 502-3, 527, 716；民族主義 345；新經濟政策 420；斯大林被任命為總書記 411-12, 424, 481, 486, 530；斯大林的民族問題報告 496；斯大林的組織報告 495；斯大林在中央委員會內打敗托洛茨基 501；開除托洛茨基和季諾維也夫 651, 656；托洛茨基在中央委員會 495-96；托洛茨基分子被排擠出中央委員會 495；與季諾維也夫 495
- 《共產黨宣言》(馬克思和恩格斯) 39-40, 43, 45, 99, 107, 151
- 刑法第107條 666, 669-70, 681-82, 700-01, 705, 707, 713
- 《列夫·托洛茨基——勝利的組織者》(拉

- 狄克) (“Lev Trotsky—Organizer of Victory”) 492
- 列寧，弗拉基米爾 (Lenin, Vladimir) 9, 45, 73, 79, 81, 124, 135, 192, 226, 228, 231, 260, 266, 280, 322, 324, 334, 342, 350, 354, 365, 392, 407, 411, 424, 493, 544, 550；據說出自列寧的論民族問題的文章 493-94, 501；〈四月提綱〉 191；遭通緝 222；針對列寧的暗殺圖謀 231, 285, 307, 413；對列寧遺體的解剖 535；背景 185；布爾什維克對列寧的批評 191-92, 385；布爾什維克與孟什維克的分裂 79-80, 108, 124；與布爾什維克接管格魯吉亞 396, 397；與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條約 257, 259, 265, 642；對資本主義的看法 151, 291, 403, 444, 446, 625；停火建議 247-49；個人魅力 221-22；把階級鬥爭作為核心原則 291, 443-44, 737；與共產國際第二次代表大會 363-64；康復 307；擔任人民委員會主席 229；論反革命 392, 550；與成立蘇聯 475, 480；索要氰化物 414, 483, 493；去世 3, 534-37；口授 483-85, 489-91, 501, 504-5, 527-28, 546-47；專政者 238, 245, 419；健康狀況惡化 409-18, 422, 489-94, 498, 501, 505, 535；與 1921-1922 年的饑荒 447-48；二月革命 174；對外政策 443-47；葬禮 537-38, 540；熱那亞會議 444-45；格魯吉亞人的抗命 480, 487, 489-91；對德和談 249-51, 255；對德政策 272, 282-84；在高爾克莊園 413-14, 416-17, 428, 440, 476, 482；反對大俄羅斯沙文主義 348, 407, 487；與第一次世界大戰 151, 312-13；成為布爾什維克黨的領袖 186；論內戰的影響 336；失眠和頭疼 410；主張建立以知識分子為核心的政黨 51, 79, 107；《火星報社論》50-51；隔離 487-88；從蘇黎世返回彼得格勒的旅程 187-88；與加米涅夫 234-36, 476-77；與克倫斯基 195-96, 200, 205；與喀琅施塔得起義 392；土地法令 220-21；盧森堡的批評 323；與馬爾托夫 78, 267, 393；列寧的馬克思主義 151；與暗殺米爾巴赫事件 275-76；搬到克里姆林宮 263；將列寧遺體製成木乃伊 542-43；論民族主義和自決權 347-48, 351；主張土地國有化 103；論爭取當地人民支持的必要性 407；與新經濟政策 344, 388-89, 405-6, 408, 416, 447, 449, 457, 473-74, 481-82, 487, 527, 568, 571, 580；1917 年逃離彼得格勒 203, 260；十月革命中返回彼得格勒 214, 222；1923 年 10 月重訪克里姆林宮 520-22；十月革命 220-22, 278；調整革命軍事委員會 328；與黨的統一 389-90；不瞭解農民 299-300；外貌特徵 220；破壞警務改革 440；與波蘇戰爭 353-54, 359-60, 362-63, 376-78；政治局與列寧的關係 413, 415, 484, 489；以政治暴力為原則 409-10；採用書報檢查制度 237, 245；論國際關係的首要地位 343；臨時政府指控列寧犯有叛國罪 203；與紅軍 297；拒絕法治 410；逝世傳言 287；在蘇維埃第二次代表大會上 220；自我流放, 104, 114, 135, 152-53, 164, 173, 187, 196, 204-5, 212-13, 222, 230；在人民委員會控制權問題上的攤牌 236；下令進行作秀公審 439-40；流放西伯利亞 45；以歐洲的蘇維埃化為目標 360-61, 364；列寧的蘇維埃聯盟計劃 476-78, 484-86, 496；

- 與斯大林，參見：列寧與斯大林的關係；斯大林未被認為是他可能的接班人 422-23；斯大林最初瞭解到列寧的思想 50-51；忘記斯大林的眞名 152-53；與斯大林托洛茨基的關係 415；中風 3, 412, 440, 447, 474, 482-84, 491, 494, 530；反對支持臨時政府 190；與斯維爾德洛夫 193-94, 234, 318-19；「遺囑」，參見：列寧「遺囑」在共產國際第三次代表大會上 403；與梯弗里斯銀行搶劫案 113-14；與托洛茨基 202, 214, 221-23, 234, 256, 341, 357, 385-86, 390, 414-415, 472, 481-82, 523, 531, 647；托洛茨基作為列寧可能的接班人 416-17；與「工人反對派」 385；以世界革命為目標 407；狂熱 191-92, 194-95, 200, 213-14, 217, 232, 258, 278-79
- 列寧「遺囑」(Lenin's Testament) 418-19, 472-73, 498-501, 527-29, 530-31, 581-82, 608；中央全會關於列寧「遺囑」的報告 546-47；伊斯特曼公佈列寧「遺囑」 614；與加米涅夫 499, 606-7, 648；與克魯普斯卡婭 473, 498, 500-1, 527-28, 609；與斯大林 547, 552-53, 592, 605-7, 614, 643, 647-48, 657, 735-36；「遺囑」中對斯大林的描述 499-500；斯大林限制「遺囑」的發表 654；在第十三次黨的代表大會上宣讀「遺囑」 548；與托洛茨基 500, 572-73, 605-7, 643, 646-48；托洛茨基派傳播列寧「遺囑」 540, 573, 605；不能斷定它的作者 473, 489；與季諾維也夫 498-99, 606-7, 648
- 列寧主義 (Leninism) 190-91, 533, 563, 627；斯大林的擁護 205, 419-20, 544-45, 591, 615, 699；托洛茨基轉
- 向列寧主義 202；另見：馬克思主義；馬克思主義者
- 《列寧死後》(伊斯特曼) (*Since Lenin Died*)：斯大林的反應 572-73
- 《列寧的革命學說》(克謝諾豐托夫) (*Lenin's Doctrine of Revolution*) 544
- 列寧研究院 (Lenin Institute) 543-44, 580
- 列寧格勒 540, 586；糧食短缺 721；罷工和工人抗議活動 570, 624；季諾維也夫在列寧格勒的政治機器 577-78, 584-85；另見：彼得格勒
- 《列寧格勒真理報》(*Leningrad Pravda*) 580
- 《列寧與1914-1918年的帝國主義戰爭》(克謝諾豐托夫) (*Lenin and the Imperialist War 1914-1918*) 545
- 列寧與斯大林的關係 121, 133, 335；對波蘭戰爭的失敗負有責任 377；通信 155, 301-2, 308-9, 362, 364, 483-85；聯邦制是共同的議程 346；與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第五次代表大會 108；與列寧的所謂關於民族問題的文章 494；與列寧之死 534-36；列寧的導師作用 81, 419, 471, 531, 600；列寧對此的認識 341, 412；列寧對斯大林的信賴 229, 465, 608；列寧索要氰化物 414, 493；與列寧的中風 412-15；與列寧「遺囑」，參見：列寧「遺囑」；彼此的忠誠 192-93, 226, 234, 250, 255, 257, 341, 390, 735；蘇維埃聯盟計劃 476-77；與斯大林1921年的患病 398-99；斯大林成為中央委員 123-24；與斯大林權勢的擴張 411-12, 417；斯大林願意批評列寧的看法 192-93；斯大林願意接受任何任務 232；與繼承問題 418；與塔姆爾福斯代表大會 80-81；烏里揚諾夫娜對此的看法 527-28, 608-9
- 匈牙利 316, 324-25, 336



- 匈牙利共產黨 324–25  
 匈牙利赤衛隊 (Red Guards, Hungarian) 325  
 匈牙利社會民主黨人 (Social Democrats, Hungarian) 324  
 匈牙利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 (Hungarian Soviet Socialist Republic) 324–25  
 印度 64  
 吉布拉澤，西爾韋斯特爾·「席爾瓦」 (Jibladze, Silibistro "Silva") 33, 43–44, 48, 114, 267  
 吉利，斯捷潘 (Gil, Stepan) 228, 285, 314  
 吉利亞爾，皮埃爾 (Gilliard, Pierre) 210  
 同盟國 (Central Powers) 140, 157, 196–97；列寧的停戰建議 247–49；與布爾什維克的和談 249–50  
 在《格拉納特百科辭典》中公開的斯大林生平資料 660  
 《在路上》 (*En Route*) 327  
 在熱那亞召開的討論俄國和德國問題的國際會議 444–45, 599  
 〈在糧食戰線上〉 (斯大林) (“On the Grain Front”) 706  
 地緣政治：對歷史的推動作用 4–5；對現代性的影響 4–5, 62–65  
 多加多夫，亞歷山大 (Dogadov, Alexander) 657  
 多帕特 (尤里耶夫) 大學 (Dorpat [Yurev] University) 38  
 安東諾夫，亞歷山大 (Antonov, Alexander) 346, 381, 394  
 安東諾夫—奧弗申柯，弗拉基米爾 (Antonov-Ovseyenko, Vladimir) 346, 381, 394  
 安娜女皇 (Anna, tsarina) 88  
 安德烈耶夫，尼古拉 (Andreyev, Nikolai) 275  
 安德烈耶夫，安德烈 (Andreyev, Andrei) 457, 607, 666, 720  
 成吉思汗 346, 374, 400  
 托夫斯圖哈，伊萬 (Tovstukha, Ivan) 456–57, 463, 544, 598, 604, 660  
 托姆斯基，米哈伊爾 (葉夫列莫夫) (Tomsky, Mikhail [Yefremov]) 416, 498, 513, 517, 563, 581, 596, 599, 613, 676, 694–95, 698, 712, 719, 739；與密謀解除斯大林總書記職務 714–17, 720；與接班人之爭, 563–64  
 托洛茨基，列夫 (勃朗施坦) (Trotsky, Lev [Bronstein]) 9, 62, 80–82, 86, 108, 114–15, 143, 158, 182, 193, 221, 226, 235, 245, 263, 274, 322, 354, 358, 420, 424, 454, 464, 467, 469, 510, 545, 596–98, 605, 615, 686, 715, 734, 737；流放阿爾馬—阿塔 676–79；被憎惡 322, 340–41, 390, 500, 505, 512, 516–17, 520, 531–33；裝甲列車 327–28, 331, 339；遭遇未遂暗殺 286；背景 200–1；論布爾什維克的官僚 314；加入布爾什維克 200, 202；力主布爾什維克接管格魯吉亞 396–97；與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條約 257；與英國的總罷工 598–99；公開指責中央機關 518–19, 522；任中央委員會主席 214–15；被開除出中央委員會 648；受到中央監察委員會的調查 520；拒絕擔任國家計劃委員會主席職務 486；拒絕擔任最高國民經濟委員會主席 486；與中國 627–32；論集體化 675；被開除出共產黨 651, 656；在立憲會議上 246；拒絕擔任人民委員會成員 416–17；與成立蘇聯 475；論其他社會主義政黨的危險性 396；與保衛彼得格勒 330–31；為驅逐出境和流放的做法辯護 440–41；拒絕擔任蘇聯副主席 486；論無產階級專政 337；被開除出第三國際 644；擔任糧食和運輸特別委員會主席 299；

類似流感的發燒 520, 522, 533；擔任外交人民委員 229；與格魯吉亞人抗命引發的危機 489-91, 493；與德國共產黨的政變圖謀 511；與德國的和談 249-51, 255-56, 258；擔任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 286, 341, 516, 537；與〈伊里奇關於書記的信〉 516；專橫的態度 322, 328-29；被囚禁 204, 212；論政委制 339；流放 737；作為猶太人 340-41, 523；與越飛 651-52；討論其派別活動的聯席全會 522-25, 646-47；與卡岡諾維奇 455；與加米涅夫 224-25, 584；與喀琅施塔得叛亂 384, 387；與克魯普斯卡婭 501, 542, 547, 572-74, 632；與左派反對派 518, 529；與列寧 202, 214, 221-34, 238, 256, 341, 357, 385-86, 390, 414-15, 472, 481-82, 523, 531, 647；與列寧的所謂關於民族問題的文章 494；與列寧之死 534, 537-39；作為列寧可能的接班人 416-17, 492, 494；與列寧「遺囑」 500, 546, 572-73, 605-7, 643, 646-48；與新經濟政策 481-82, 495, 497；在十月革命中 215, 219-22；《論列寧》 545；作為演說家 215, 221, 250-51；擔任彼得格勒蘇維埃主席 212-13；相貌 340；論波蘇戰爭 354；被開除出政治局 615；尋求經濟專政 481, 484-88, 501, 518；與協約國的秘密談判 265；自願的流亡 152-53, 164, 201；駁斥《列寧死後》 573；論斯大林 8, 295, 422, 463；寫了斯大林傳記 37；斯大林對他的敵視 224, 306-10, 313-14, 329, 334, 339-41, 357, 369, 377, 385, 390, 415-16, 460, 470-71, 474, 505, 719；反對斯大林的專政 472, 486-87, 613-14；與斯大林在察里津所扮演

的角色 302-3, 642；與接班人之爭 416-17, 519-20, 522-25, 532-34, 540, 555, 563-64, 572-73, 584, 586, 590-91, 605-6, 614-15, 636-39, 641-44, 646-48, 713, 735-36；在蘇呼姆養病 534, 537, 541-42；與斯維爾德洛夫 318-19；與保衛察里津 307-10；在黨的第十二次代表大會上 495-96；主張起用前沙皇軍官 319-20, 329；與伏羅希洛夫 309, 313-14；擔任陸海軍人民委員 258, 289, 297, 306-10, 313-14, 319-20, 326-31, 339-40, 356, 359, 391, 436, 542；辭去陸海軍人民委員職務 557；與季諾維也夫 474, 525, 545

托洛茨基分子 (Trotskyites) 341 390, 411-12, 423, 429, 540, 656

托爾斯泰，列夫 (Tolstoy, Lev) 67

朱加施維里，扎扎 (Jughashvili, Zaza) 15

朱加施維里，瓦諾 (Jughashvili, Vano) 15

朱加施維里，約瑟夫，參見：斯大林，約瑟夫

朱加施維里，雅科夫 (Jughashvili, Yakov) 106, 114, 116, 466, 593, 595

朱加施維里，葉卡捷琳娜·「凱可」

(Jughashvili, Ketevan "Keke") 16,

19, 25, 48-49, 105, 594；嫁給貝索

16-17, 20；幹雜活 21, 26；放蕩的傳聞 20；斯大林對她的愛 23；努力讓

斯大林接受教育 21；要求斯大林回

到哥里 22-23

朱加施維里，維薩里昂·「貝索」

(Jughashvili, Besarion "Beso") 107；

酗酒 20, 24；長相 19-20；過去拖欠

的稅款 48-49；去世 116-17；落魄

25, 28；迎娶凱可 16-17, 20；做

鞋匠 15-16, 20；斯大林和他的關係

22, 24

朱可夫，格奧爾吉 (Zhukov, Georgy) 356

- 米夫，帕維爾 (Mif, Pavel) 655
- 米拉波伯爵 (Mirabeau, Comte de) 185–86
- 米哈伊洛夫，瓦西里 (Mikhailov, Vasily) 424
- 米哈伊洛夫斯卡婭，普拉斯科維亞·格奧爾吉耶夫娜·「帕沙」 (Mikhaiklovskaya, Praskovya Georgievna "Pasha") 46
- 米哈伊爾·亞歷山德羅維奇大公 (Mikhail Aleksandrovich, Grand Duke) 126, 160–61, 166, 170–71；遇害 280, 403；被指定為尼古拉二世的繼承人 178
- 米高揚，阿納斯塔西·「阿納斯塔斯」 (Mikoyan, Anastasy "Anastas") 387, 415–16, 455, 684, 687, 701, 709, 720；忠於斯大林 455, 465–66, 584, 608, 731；與斯大林的高加索之旅 598, 600–1；與斯大林的通信 684, 721–22；任貿易人民委員 607–8
- 米歇爾遜機器廠 (Mikhelson Machine Factory) 284–85, 307, 418
- 米寧，謝爾蓋 (Minin, Sergei) 303, 308–9, 313–14
- 米爾巴赫伯爵，威廉 (Mirbach, Count Wilhelm) 270–71, 273–74；串通反布爾什維克分子 271；遭到暗殺 274–75, 442；談到布爾什維克有可能垮台 271–72
- 米爾恰科夫，亞歷山大 (Milchakov, Alexander) 548
- 老毛奇，赫爾穆特·馮 (Moltke, Helmuth von [the Elder]) 4
- 老布爾什維克協會 (Society of Old Bolsheviks) 453
- 〈老妮妮卡〉 (索謝洛) ("Old Ninika" [Soselo]) 34
- 老廣場街4號 (Old Square, 4) 426, 429–30
- 考茨基，卡爾 (Kautsky, Karl) 43, 79, 133, 151, 201, 347
- 自由 (liberty) 131–32
- 自由派，自由主義 (liberals, liberalism) 132, 223
- 自由軍團 (Freikorps) 323–24
- 自由貿易，新經濟政策的讓步 (free trade, NEP as concession to) 389, 406, 416
- 自決 (self-determination) 343, 346–48, 351, 419
- 艾斯納，庫爾特 (Eisner, Kurt) 323–24
- 西伯利亞 (Serbia) 141–44, 148–50, 173
- 西伯利亞 (Siberia) 15, 41, 68, 97, 132, 244, 270, 372, 381, 402–3, 447；共產黨 680–81, 683–84；日本入侵 343–44；勒拿金礦大屠殺 125–26, 135；斯大林1928年的視察 661–66, 668, 674–76, 679, 684, 739；斯大林被流放到西伯利亞 9, 53, 133, 152–53, 173
- 西南非洲赫雷羅人起義 151–52
- ## 七劃
- 亨利，E. R. (Henry, E. R.) 61
- 伯恩斯坦，愛德華 (Bernstein, Eduard) 78–79
- 但澤 (Danzig) 315, 363–64, 621
- 作秀公審 (show trials) 464；列寧的要求 439–40；沙赫特事件 702–4, 709, 711, 734
- 克列孟梭，喬治 (Clemenceau, Georges) 315, 317
- 克列斯廷斯基，尼古拉 (Krestinsky, Nikolai) 322, 390, 423, 425, 428, 441, 451, 453, 596, 621, 692
- 克里米亞 (Crimea) 332, 357–59, 362, 365, 374, 379, 447
- 克里米亞戰爭 (Crimean War) 59, 66–67, 91
- 克里姆林宮 (Kremlin) 262；1923年10月

- 列寧的到訪 520-22；成為布爾什維克的新總部 263；斯大林的房間 262, 593-94
- 克拉辛，列昂尼德 (Krasin, Leonid) 50, 55, 113, 413, 441, 543
- 克拉科夫 (Krakow) 133
- 克拉斯諾夫，彼得 (Krasnov, Pyotr) 305
- 克拉斯諾亞爾斯克 (Krasnoyarsk) 173, 661, 684
- 克拉默，V. V. (Kramer, V. V.) 414, 489, 491, 535
- 克舍辛斯卡婭，馬蒂爾達 (Krzysińska, Marylda) 127, 186
- 克柳切夫斯基，瓦西里 (Klyuchevsky, Vasili) 121
- 克倫佩雷爾，費利克斯 (Felix Klemperer) 412
- 克倫斯基，亞歷山大 (Kerensky, Alexander) 3, 126, 178, 180-81, 184, 202, 213, 228, 233, 259, 278, 338-39；作為左右兩翼都憎惡的人物 195, 211；下令逮捕布爾什維克領導人 216；背景 185-86；指控布爾什維克黨人叛國 202-3；成立五人委員會 211-12；擔心克倫斯基捲土重來 234-35；與科爾尼洛夫 204-5, 208-10, 212, 219；與列寧 195-96, 200, 205；發動 1917 年俄軍攻勢 196-200, 212, 219, 224, 269；在臨時政府中 185-86；擔任最高總司令 211；與羅曼諾夫家族 280；召集國務會議 205-7
- 克留科娃，索菲婭 (Kryukova, Sofia) 121
- 克茨霍維里，弗拉基米爾·「拉多」 (Ketskhoveli, Vladimir "Lado") 33, 50；死亡 55；作為斯大林導師 30-31, 38, 44, 47-48, 50, 55, 735
- 克雷扎諾夫斯基，謝爾蓋 (Kryzhanovskiy, Sergei) 83, 100
- 克雷莫夫，亞歷山大 (Krymov, Alexander) 166, 208-9, 233
- 克雷連柯，尼古拉 (Krylenko, Nikolai) 248, 690, 698, 702, 709
- 克雷連柯，葉蓮娜 (Krylenko, Yelena) 572
- 克爾日扎諾夫斯基，格列布 (Kryzhanowski, Gleb) 220, 485
- 克德羅夫，米哈伊爾 (Kedrov, Mikhail) 438-39
- 克魯舍萬，帕維爾 (克魯舍維阿努，帕瓦拉奇) (Krushevan, Pavel [Cru eceanu, Pavalachii]) 100
- 克魯普斯卡婭，娜捷施達 (Krupskaya, Nadezhda) 114, 188, 192, 228, 314, 413, 483, 489, 498, 504, 520, 534, 608, 615；與反捷爾任斯基材料 490；回憶列寧 544；與所謂的列寧口授文件 484, 490-91, 494, 501, 512-14；與列寧之死 534；列寧索要氰化物 493；與列寧「遺囑」 473, 498, 500-1, 527-28, 609；反駁《列寧死後》 573-74；與斯大林 487-88, 490, 514, 527-28, 544；與接班人之爭 564, 577, 580；與托洛茨基 501, 525, 542, 547, 572-74, 632
- 克謝諾豐托夫，伊萬 (Ksenofontov, Ivan) 433
- 克謝諾豐托夫，菲利普 (Ksenofontov, Filipp) 544-45
- 別佐布拉佐夫，亞歷山大 (Bezobrazov, Alexander) 72
- 別洛博羅多夫，亞歷山大 (Beloborodov, Alexander) 676
- 別羅斯托茨基，伊萬·「弗拉基米爾」 (Belostotsky, Ivan "Vladimir") 124
- 別連基，阿布拉姆 (Belenky, Abram) 593-94
- 別連基，格里戈里 (Belenky, Grigory) 603
- 別爾津，揚 (庫濟斯，彼得里斯) (Berzin, Jan [Kuzis, Pēteris]) 554, 618
- 別德內，傑米揚 (普里德沃羅夫，葉

- 菲姆) (Bedny, Demyan [Pridvorov, Yefim]) 260, 602, 604
- 利伯曼, 西蒙 (Liberman, Simon) 728
- 利沃夫 (利維夫, 利沃夫) (Lwów [Lviv, Lvov]) 249, 353, 360, 362, 365; 紅軍未能佔領, 362-63
- 利特爾頓, 阿德里安 (Lyttelton, Adrian) 223-24
- 利奧波德, 巴伐利亞大公 (Leopold, Prince of Bavaria) 249
- 坎貝爾, 托馬斯 (Campbell, Thomas) 700
- 坎納, 格里戈里 (Kanner, Grigory) 468
- 希瓦 (Khiva) 90, 342, 373
- 希法亭, 魯道夫 (Hilferding, Rudolf) 151, 378, 392
- 希特勒, 克拉拉 (Hitler, Klara) 23, 35
- 希特勒, 阿洛伊斯 (Hitler, Alois) 34-35
- 希特勒, 阿道夫 (Hitler, Adolf) 23; 啤酒館暴動 527; 民族主義 34-35; 崛起 2-3
- 志願軍 (南俄武裝力量) 268, 270, 295-96, 332; 1919年志願軍的攻勢 326-28; 另見: 白軍
- 〈我們在東部的任務〉 (斯大林) (“Our Tasks in the East”) 369
- 《我們的意見分歧》 (普列漢諾夫) (*Our Differences*) 42
- 李卜克內西, 卡爾 (Liebknecht, Karl) 323
- 李可夫, 阿列克謝 (Rykov, Alexei) 236, 328, 394, 464, 480-83, 498, 513, 516, 534, 538, 563, 566-67, 596, 613, 619, 633, 652, 654, 676, 685-86, 707-8, 721, 723; 作為蘇聯領導人人選 730-31; 蘇聯人民委員會主席 540, 657, 658, 686; 與糧食短缺 721-22; 與新經濟政策 685, 728-29; 與密謀解除斯大林總書記職務 714-17; 與沙赫特事件 687-88, 698; 與斯大林 658, 686-87, 699-700; 與接班人之爭 563, 564
- 李沃夫公爵, 格奧爾吉 (Lvov, Prince Georgy) 166, 203, 207
- 李嘉圖, 大衛 (Ricardo, David) 40
- 李維諾夫, 馬克西姆 (芬克爾施泰因, 梅厄; 瓦拉赫, 馬克斯) (Litvinov, Maxim [Finkelstein, Meir; Wallach, Max]) 108, 114, 458, 583, 621-23, 651, 692
- 村社 (commune) 41-42, 65-66, 95-97, 189-90, 299, 430, 449, 567
- 杜馬 (Duma) 82-85, 90-91, 93, 99, 109, 113, 119, 136, 144-45, 157, 163, 168, 179, 181, 223; 對勒拿金礦的調查 126; 尼古拉二世 74, 82-83, 90-91, 93-94, 101, 127-28, 158, 163, 166, 169; 臨時委員會 170-73; 臨時政府 179-80; 右翼 101-2; 斯大林對杜馬的看法 105; 斯托雷平 94, 97, 101
- 杜爾諾沃, 彼得 (Durnovó, Pyotr) 85-87, 90, 92, 102, 125, 129-30, 146, 149, 157, 167, 173, 187, 408-9, 558; 對民主的看法 136; 尼古拉二世 134; 政治洞察力和預見 135-37; 論與德國開戰可能造成的後果 131, 135; 辭職 91; 在國務會議中 134
- 杜蘭蒂, 沃爾特 (Duranty, Walter) 543
- 杜鶴寧, 尼古拉 (Dukhonin, Nikolai) 248
- 汽車 612; 斯大林特別感興趣 540-41
- 沃伊京斯基, 格里戈里 (Voitinsky, Grigory) 628
- 沃依柯夫, 彼得 (Voikov, Pyotr) 442, 634
- 沃洛季切娃, 瑪麗亞 (Volodicheva, Maria) 473, 487, 489-90, 527
- 沃洛格達 (Vologda) 260; 斯大林在沃洛格達 121-22, 124
- 沃倫近衛團 (Volhynian Guards) 169
- 沃格羅夫, 莫爾傑哈伊·「德米特里」 (Bogrov, Mordekhai “Dmitry”) 122
- 沃茲德維任卡街4號 (Vozdvizhenka, 4)

- 428  
沃茲德維任卡街5號 (Vozdvizhenka, 5)  
426, 428  
沙波什尼科夫，鮑里斯 (Shaposhnikov,  
Boris) 378  
沙俄：農業，參見：俄國的農業；貴族  
57-58, 69, 84；專制政治制度，參  
見：俄國專制制度；與英國 108-9,  
110, 135-36, 140；在克里米亞戰爭  
中 59, 91；經濟 141, 161-62；教育  
制度 66-67, 74；擴張主義政策 1,  
3, 12, 66-68, 71, 111, 127, 140, 145,  
556；沙俄的二月革命，參見：二月  
革命；糧食短缺 165, 189；外債 66,  
69；對外政策 6, 71-73, 108-12, 129,  
139, 144；疆域 1, 11, 56, 68, 342；  
糧食出口 67, 662, 709；大改革 29,  
59-60, 66, 85；在第一次世界大戰  
中 150, 156-57, 162, 166, 206-7, 212,  
219, 224, 231, 296, 312, 316-17；工  
業化 65, 67, 69-70, 91-92, 141, 645；  
與日本 72-75, 109, 111-12；猶太人  
12, 129；擁有土地的人 11, 16, 97,  
188-89；馬克思主義 42-45, 54, 74,  
78-79, 93, 137；現代性 92, 94, 97,  
119, 129；民族主義 118-19, 125；  
海軍 73, 75；與第一次世界大戰的  
爆發 144-49；農民，參見：俄國的  
農民；政治精英 65, 70-71, 92-93,  
95, 128-29, 136, 223；政治恐怖主  
義 59-61, 74, 88-89, 94, 99, 101, 115,  
134；人口 175；無產階級，參見：  
俄國的無產階級；右翼 98-102, 118,  
122, 126, 157；慶祝羅曼諾夫家族統  
治三百週年 126-29, 132, 134；社會  
主義 41, 176；國務會議 82-83, 129,  
134, 179；選舉權 82, 94, 97, 109,  
113；與三國協約 140, 147；普遍徵  
兵 155-56；1905-1906年的起義 3,  
81-87, 92；西化 56  
沙皇「恐怖的伊萬(四世)」(Ivan IV "the  
Terrible," tsar) 7, 11-12, 27  
沙皇亞歷山大一世 89  
沙皇亞歷山大二世 59-60, 89；遭暗殺 60,  
134；大改革 29, 59-60, 66, 85  
沙皇亞歷山大三世 60, 85, 89, 120, 158,  
353  
沙皇財政部：內務部與財政部的競爭  
69；維特任財政部長 69-70  
沙皇警察機關 (police, tsarist) 49, 61, 69,  
85, 130, 164；解散 180, 223；警力不  
足 103-4；逮捕斯大林 48-49, 52；  
斯大林檔案 49, 52, 76；另見：保安  
處  
沙赫特，所謂蓄意破壞 (Shakhty, alleged  
sabotage in) 687-96, 699  
私商 (耐普曼) (private traders [NEPmen])  
299-300, 568, 571-72, 605, 616, 649,  
662, 665-66, 695, 730  
肖凱一貝格，穆斯塔法 (Choqai-Beg,  
Mustafa) 253  
肖斯塔科維奇，德米特里 (Shostokovich,  
Dmitry) 620  
貝克，約瑟夫 (Beck, Józef) 562  
貝利亞，拉夫連季 (Beria, Lavrenti) 8, 395,  
542  
貝奈斯，愛德華 (Beneš, Edvard) 316  
貝塞爾，利季婭 (Besser, Lidiya) 154  
貝當，菲利普 (Pétain, Philippe) 197  
赤衛隊 (Red Guards) 213, 216, 219, 233,  
240, 242, 252, 256, 303, 339  
《走向十月革命的道路》(斯大林) (*On the  
Path to October*) 555  
《走在列寧主義道路上》(*On the Leninist  
Path*) 682  
車臣，車臣人 304, 688  
辛比爾斯克 (Simbirsk) 356  
邦契-布魯耶維奇，弗拉基米爾 (Bonch-

- Bruevich, Vladimir) 240, 250, 260, 275-76, 285, 287
- 邦契—布魯耶維奇，薇拉 (Bonch-Bruevich, Vera) 285
- 里加條約 (Riga, Treaty of, 1921) 392
- 里茨勒，庫爾特 (Riezler, Kurt) 275, 282-83
- 里德，約翰 (Reed, John) 201, 220, 246, 367
- ## 八劃
- 亞戈達，亨里希 (約胡達，約諾霍姆) (Yagoda, Genrikh [Jehuda, Jenokhom]) 441, 461, 536, 541-42, 566, 588, 605, 656-57, 665, 689, 701, 717; 背景 460-61; 成為格伯烏第二副局長 461-62; 與密謀解除斯大林總書記職務 715; 與沙赫特事件 691, 693, 699
- 亞洲：日本帝國主義 111; 民族解放運動 554; 俄國的擴張 68, 111, 554; 斯大林對亞洲革命的看法 625
- 亞美尼亞 (Armenia) 238, 343, 365, 395, 397, 400, 475, 480
- 亞美尼亞人 (Armenians) 115, 479; 格魯吉亞的 15, 496; 梯弗利斯的 29, 49, 479; 土耳其對亞美尼亞人的種族滅絕政策 150
- 亞美尼亞蘇維埃共和國 (Armenian Soviet Republic) 395
- 亞瑟港 (旅順)，中國 (Port Arthur [Lushun], China) 71, 73, 111
- 亞歷山大·米哈伊洛維奇大公 (Alexander Mikhailovich, Grand Duke) 163
- 亞歷山德拉皇后 (Alexandra, tsarina) 89-90, 119, 128, 159, 163, 166-68, 170, 172, 280; 被殺害 281; 與拉斯普京 159-61
- 佩列普列基娜，利季婭 (Pereprygina, Lidiya) 155
- 佩特里琴科，斯捷潘 (Petrichenko, Stepan) 383
- 佩特留拉，西蒙 (Petliura, Symon) 353
- 佩斯特科夫斯基，斯坦尼斯拉夫 (Pestkowski, Stanislaw) 264, 270, 349, 368; 擔任斯大林的副手 228-30
- 佩爾斯，伯納德 (Pares, Bernard) 94
- 《到東方去》 (*Exodus to the East*) 345
- 《到社會主義之路和工農聯盟》 (布哈林) (*Path to Socialism and the Worker-Peasant Alliance, The*) 727
- 協約國 (同盟) (Entente [Allies]) 140, 147, 221, 247, 256, 258, 273, 364, 561; 布爾什維克佔領格魯吉亞 397; 希望東線繼續展開軍事行動 265; 與列寧向同盟國提出停火建議 247-48; 給白軍提供軍事援助 296; 瓜分奧斯曼帝國 367; 與波蘇戰爭 353, 355, 359; 與羅馬尼亞 378-79; 目標是徹底打敗德國 258; 與托洛茨基的秘密談判 265; 為白軍提供補給 326, 352
- 命令主義 (decreism) 435
- 坡克羅夫斯基，謝拉菲姆 (Pokrovsky, Serafim) 636-37
- 坦波夫農民暴動 380-82, 389, 393-94, 410, 575
- 奇日科夫，彼得 (Chizikov, Pyotr) 121
- 奇阿圖拉 (Chiatura) 86, 301; 斯大林 76-77, 81
- 奉天會戰 (Mukden, Battle of) 73, 75
- 「妮娜」 (地下印刷所) (Nina [underground printing press]) 50
- 姆季瓦尼，波利卡爾普·「布杜」 (Mdivani, Polikarp "Budu") 346, 399, 477-80, 487, 490-91, 493, 497, 606
- 《委任狀》 (埃德曼) (*Mandate, The*) 620
- 孟什維克 (Mensheviks) 103-4, 106, 108,

- 114, 123-24, 133, 137, 188, 195-96, 198, 201, 212, 221, 226, 234, 242-44, 257, 265, 273, 279, 297, 312, 351, 382, 385, 393, 439, 735；布爾什維克與孟什維克的分裂 78-81, 103, 108, 114, 122-24, 137；在高加索 112, 124；在歐洲 393, 489, 553, 555；在格魯吉亞 103, 106, 108, 123, 133, 244, 395-97, 399-400；孟什維克中的猶太人 112；與十月革命 218；支持臨時政府 195；作秀公審 464
- 季季利洛村 (Didi Lilo) 15, 25, 48
- 季爾，卡羅利娜 (Til, Karolina) 595
- 季諾維也夫，格里戈里 (拉多梅斯利斯基) (Zinoviev, Grigory [Radomylsky]) 104, 121, 123, 152, 188, 193-94, 203, 224, 226, 234, 236, 261, 287, 318, 322, 330, 341, 354, 367-68, 378, 382, 385, 387, 392, 407, 412, 471, 490-91, 495, 497, 501, 512, 517-18, 531-32, 596-97, 599, 636, 652, 715；野心 513；試圖把其他社會主義者吸收進布爾什維克政權 235；「山洞會議」 505-6, 513, 658；與中國 629-31；任共產國際主席 510, 609, 615；與德國共產黨的政變圖謀 509-11, 514-15；與〈伊里奇關於書記的信〉 504-9, 512-13；流放 713；回憶列寧 545；與列寧之死 534-35；與列寧「遺囑」 498, 499, 606-7, 648；對新經濟政策的批評 570-71；與十月革命 214, 224, 499, 515, 563-64, 606, 641, 648；流亡 204-5, 212；與斯大林的專政 472, 474, 506-9, 513；與接班人之爭 493, 525, 552, 563-64, 577-78, 580, 582, 584, 586, 604-7, 614-15, 636, 641-43, 648, 651, 656, 713, 716, 729, 736；與加米涅夫及斯大林的三頭同盟 517, 563；與托洛茨基 474, 525, 545
- 季霍米羅夫，列夫 (Tikhomirov, Lev) 139
- 屈爾曼男爵，理查德·馮 (Kühlmann, Richard, Baron von) 249
- 帕夫洛夫斯基近衛後備營 (Pavlovsky Guards) 169
- 帕夫洛娃，安娜 (Pavlova, Anna) 127
- 帕夫洛維奇大公，德米特里 (Pavlovich, Dmitri, Grand Duke) 163
- 帕尼娜，索菲婭 (Panina, Sofia) 439
- 帕紹，德國 (Passau, Germany) 35
- 帕萊奧洛格，莫里斯 (Paléologue, Maurice) 163
- 帕維爾·米留可夫 (Miliukov, Paul) 90, 132, 139, 157, 163, 178-81, 188, 194-96, 201, 207, 227-28
- 彼得一世「大帝」，沙皇 (Peter I "the Great," tsar) 56-57, 88
- 彼得二世，沙皇 (Peter II, tsar) 88
- 彼得三世，沙皇 (Peter III, tsar) 89
- 彼得格勒 (Petrograd) 159, 173, 214, 235, 298；「流血的星期日」大屠殺 73-74, 126, 164；布爾什維克撤離 259-61；布爾什維克總部 186-87, 190-91, 203, 215；契卡 382；食品短缺 270；德軍的推進 259, 271；士兵和水兵起義 202；斯大林在彼得格勒 117, 121-22, 132-33, 186, 190；再現「猛攻冬宮」 338-39；罷工和抗議 81-82, 144, 164, 166, 167, 382-83, 410；駐軍 168；維堡區 186-87, 204；白軍的推進 330；婦女的麵包遊行 165, 167；另見：列寧格勒
- 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蘇維埃 (Petrograd Soviet of Workers' and Soldiers' Deputies) 170, 182, 198, 202, 206, 247；布爾什維克對它的控制 212-13, 218-19；中央執行委員會，參見：蘇維埃中央執行委員會；取代杜馬 181；軍事革命委員



- 會，參見：軍事革命委員會；十月革命是推翻蘇維埃的政變 223；與臨時政府 181–82, 191；托洛茨基擔任主席 212–13；另見：莫斯科蘇維埃
- 彼得堡蘇維埃 (Petersburg Soviet) 81–82, 84–86
- 彼得斯，雅科夫 (Peterss, Jēkabs) 287, 346, 374–75, 502
- 彼得羅夫斯卡婭，斯特凡尼婭 (Petrovskaya, Stefania) 121
- 彼爾姆 (Perm) 314, 403
- 拉扎德兄弟公司 (Lazard Brothers) 148
- 拉比諾維奇，伊薩克 (Rabinovich, Isaak) 620
- 拉比諾維奇，拉扎 (Rabinovich, Lazar) 703–4
- 拉米施維里，伊西多爾 (Ramishvili, Isidor) 51, 267, 399
- 拉米施維里，諾伊 (Ramishvili, Noe) 78
- 拉狄克，卡爾 (Radek, Karl) 188, 249, 250, 258, 275, 315, 318, 358, 365, 367, 376–77, 390, 407, 464, 492, 495, 510, 560, 678–79
- 拉帕洛條約 (Rapallo, Treaty of, 1922) 445–46, 473, 509, 560–61, 599
- 拉林，尤利 (盧里耶，米哈伊爾) (Larin, Yuri [Lurye, Mikhail]) 452, 615
- 拉舍維奇，米哈伊爾 (Lashevich, Mikhail) 331, 505–6, 536, 548, 576, 603–4, 652
- 拉柯夫斯基，克里斯季安 (克里斯托·斯坦切夫) (Rakovski, Cristian [Stanchev, Kryastro]) 476, 478, 496–97, 503, 572, 645–46, 650–51, 656, 677, 692
- 拉柯巴，涅斯托爾 (Lakoba, Nestor) 541–42
- 拉科西，馬加什 (Rákosi, Mátyás) 325, 525
- 拉特瑙，瓦爾特 (Rathenau, Walther) 445–46
- 拉脫維亞 98, 249, 509, 556–57, 604；與德國共產黨的未遂政變 522；成為獨立國家 238, 342–43
- 拉脫維亞步兵 260–61
- 拉脫維亞社會民主黨人 (Social Democrats, Latvian) 103
- 拉脫維亞旅 261, 276, 281–82；對契卡的攻擊 277–78
- 拉莉娜，安娜 (Larina, Anna) 262
- 拉敦斯基，伊萬 (Raduński, Iwan) 286
- 拉斯科爾尼科夫，費奧多爾 (伊利英) (Raskolnikov, Fyodor [Ilin]) 302, 306, 366, 393
- 拉斯普京，格里戈里 (Rasputin, Grigory) 159–60, 167–68；被謀殺 163, 182
- 拉齊斯，馬丁 (蘇德拉布斯，亞尼斯) (Lācis, Mārtiņš [Sudrabs, Jānis]) 276, 278, 439
- 拉德琴柯，斯捷潘 (Radchenko, Stepan) 44n
- 明仁斯基，維亞切斯拉夫 (Meżyński, Wiaczesław) 238–39, 250, 329, 504, 617, 635, 647, 656, 665, 691, 712；背景 459–60；擔任格伯烏副局長 459, 461；擔任奧格伯烏主席 608
- 明治維新 (Meiji restoration) 4, 18, 732
- 明斯克 354, 358, 360；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的成立 44–45
- 東方各民族代表大會 (Congress of the Peoples of the East) 367, 372, 395
- 東正教 (Eastern Orthodox Christianity) 10, 12–13
- 林肯，亞伯拉罕 (Lincoln, Abraham) 410
- 果戈理，尼古拉 (Gogol, Nikolai) 58
- 武爾費爾特，娜塔莉亞 (Wulfert, Natalya) 161
- 法西斯主義 (fascism) 123, 549–52, 725；與羅馬尼亞 589–90；斯大林的錯誤理解 550–51
- 法貝爾熱，彼得·卡爾 (Fabergé, Peter

- Carl) 127
- 法里納奇，羅伯托 (Farinacci, Roberto) 552
- 法國 83；反布爾什維克政策 247, 343；  
殖民帝國 4, 151, 316；與俄國結成防禦同盟 109-10；德國的備戰 509；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 150, 152, 156, 197-99；《洛迦諾公約》561-62；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爆發 147；波蘭 558, 589, 623；對蘇關係 560, 645, 693, 733；三國協約 140, 147；凡爾賽條約 315-16, 559
- 法國共產黨 519-20, 645
- 法國革命 (French Revolution) 95, 186, 196, 233, 349, 650
- 《法蘭西內戰》(Civil War in France) 232
- 泛伊斯蘭主義 (pan-Islamism) 386-87, 502
- 波波夫，德米特里 (Popov, Dmitri) 277-78
- 波將金公爵 (Potemkin, Prince) 90
- 波斯，另見：伊朗
- 波斯尼亞青年黨 (Young Bosnia) 142-43
- 波斯尼亞—黑塞哥維那 (Bosnia-Herzegovina) 110, 142, 144
- 波斯克列貝舍夫，亞歷山大 (Poskryobyshev, Alexander) 375-76, 705
- 波斯帝國 (Persian Empire) 12
- 波斯語 (Persian language) 12, 344
- 波斯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 (Persian Soviet Socialist Republic) 366-67
- 波爾科夫尼科夫，格奧爾吉 (Polkovnikov, Georgy) 216
- 波蘇戰爭 (Polish-Soviet War, 1919-20) 352-65, 376-79, 406；斯大林的看法 354-55, 357-58；斯大林的角色 361-63, 365, 377-78
- 波蘭，波蘭人 (Poland, Poles) 98, 119, 157, 249, 258, 271, 315, 344, 349, 377, 406, 478, 522, 556-57, 560, 588, 605；與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後果 352；與白俄羅斯 616-17；與法國 558, 589, 623；被德國佔領 243, 283, 352；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 355；作為獨立國家 238, 342-43；洛迦諾公約 561-62；與蘇聯的新的戰爭威脅 622-23；皮爾蘇茨基政變 589, 600, 604, 622；與羅馬尼亞 590, 616；與蘇聯的談判 392；與蘇聯的關係 589；與烏克蘭，352-54, 616-17
- 波蘭共產黨 349, 515, 519-20, 600
- 波蘭走廊 (Polish Corridor) 315, 363-64, 509, 621
- 波蘭社會民主黨人 (Social Democrats, Polish) 103
- 波蘭社會黨 (Socialist Party, Polish) 137
- 波蘭革命委員會 (Polish Revolutionary Committee) 360-1, 365, 377
- 波蘭國家民主黨 (National Democrats, Polish) 600
- 知識分子 (intelligentsia) 37, 41
- 社會主義 (socialism) 3, 39-40, 176, 190；  
右翼接受社會主義 210-11；在俄國 41, 132, 231；成為斯大林的人生使命 9, 31；另見：具體的政黨
- 《社會主義通報》(Socialist Herald) 393, 489, 553, 555
- 《社會主義與政治鬥爭》(普列漢諾夫) (Socialism and Political Struggle) 42
- 《社會主義積累的基本規律》(普列奧布拉任斯基) ("Fundamental Law of Socialist Accumulation, The") 566
- 社會民主黨人 (Social Democrats) 9, 151, 195, 336, 397, 550
- 《社會民主黨怎樣理解民族問題？》(斯大林) ("How Social Democracy Understands the National Question") 77
- 社會科學研究院俄羅斯協會 (Russian Association of the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Institute) 706
- 社會革命黨 (Socialist Revolutionary Party,

- SRs) 79, 98, 103, 113, 117, 133, 135, 137, 176, 185, 187, 195-96, 198, 212, 217-18, 221, 234-35, 239-40, 242-44, 246, 381-82, 392-93, 439; 另見: 左派社會革命黨人
- 社會革命黨人的土地法令 (Socialist Revolutionary Land Decree) 239-40
- 《股市報》(*Stock Market Gazette*) 176
- 芬蘭 90, 478, 556-57, 604; 德國佔領 243; 成為獨立國家 238, 342-43; 為喀琅施塔得叛亂分子提供政治庇護 391; 列寧在芬蘭 114, 213, 222; 蘇聯與芬蘭 590
- 芬蘭內戰 256
- 芬蘭社會主義工人共和國 256
- 花刺子模人民蘇維埃共和國 (Khorezm People's Soviet Republic) 373
- 金融業 63
- 門捷列夫, 德米特里 (Mendeleev, Dimitri) 37, 91
- 阿巴希澤, 達維德 (Abashidze, David) 36-37, 46
- 阿加別科夫, 格奧爾吉 (·阿魯季諾夫) (Agabekov, Georgy [Arutyunov]) 667
- 阿布拉米澤—齊哈塔特里施維里, 馬紹 (Abramidze-Tsikhitrashvili, Masho) 17
- 阿布哈茲, 阿布哈茲人 15, 496, 541, 557, 564
- 阿列克謝皇太子 (Alexei, tsarevich) 90, 126, 128, 158-59, 166, 170-71; 血友病 160-61, 178; 被殺害 281
- 阿列克謝耶夫, N. P. (Alekseev, N. P.) 304-5
- 阿列克謝耶夫, 米哈伊爾 (Alexeyev, Mikhail) 159, 163, 166, 170-72, 182, 197, 207, 211, 228, 248, 268, 282, 295
- 阿克雪里羅得, 帕維爾 (Axelrod, Pavel) 45, 135, 188
- 阿利盧耶夫, 謝爾蓋 (Alliluyev, Sergei) 53, 55, 117, 264, 594
- 阿利盧耶夫家族 (Alliluyev family) 155, 193, 466
- 阿利盧耶娃, 安娜 (Alliluyeva, Anna) 193, 314
- 阿利盧耶娃, 娜捷施達·「娜佳」 (Alliluyeva, Nadezhda "Nadya") 264, 301, 314, 398, 593, 633; 頭痛及抑鬱症 466, 468, 594; 在列寧秘書處 413, 466-67, 484; 清黨及恢復候補黨員資格 467-68; 斯大林對她的追求 193; 與斯大林的婚姻 117, 264, 466-67, 594-95, 707, 719
- 阿利盧耶娃, 斯維特蘭娜 (Alliluyeva, Svetlana) 10, 595, 633, 719
- 阿利盧耶娃, 奧莉加 (Alliluyeva, Olga) 193, 594
- 阿傑利哈諾夫皮革廠 (Adelkhanov Tannery) 22, 25, 43, 48
- 阿富汗 109, 391
- 阿塞拜疆 (Azerbaijan) 343, 365-66, 368, 395, 397, 400, 475, 480
- 阿爾馬—阿塔 (Alma-Ata) 676-79, 719
- 阿爾曼德, 伊涅薩 (Armand, Inessa) 151, 188, 285, 413, 531
- 阿爾圖佐夫, 阿爾圖爾 (Artuzov, Artur) 461, 635, 657
- 阿爾漢格爾斯克 (Arkhangelsk) 269; 英軍登陸 282-83
- 阿維洛夫, 鮑里斯 (Avilov, Boris) 221, 258
- 阿澤夫, 葉夫諾 (Azef, Evno) 117
- 雨果, 維克多 (Hugo, Victor) 36
- 青年土耳其黨革命 (Young Turk Revolution) 131-32
- 青年共產國際 (Communist Youth International) 613, 644
- 非工業化國家的饑荒 63-64
- 非洲 65, 71, 316

## 九割

- 俄土戰爭 66
- 俄日戰爭 (1904–1905) 73, 75–76, 81, 109, 134, 167, 185
- 俄軍, 13, 15–16; 布爾什維克鼓動人員 198; 崩潰 248, 252; 與立憲會議選舉 244; 復員 258; 擅離職守 172, 197; 與二月革命 169, 172, 175; 糧食短缺 164, 166; 物資匱乏 156, 162; 兵變 163, 200; 民族主義分裂 202; 1917年的攻勢 196–200, 204, 212, 219, 224; 與一號命令 181–82, 200; 與二號命令 182; 臨時政府對軍隊的破壞 181; 激進化 223–24; 斯大林被免除兵役 155; 另見: 紅軍
- 俄國大臣會議 (Council of Ministers, Russian) 60, 86, 179
- 俄國內務部 (Internal Affairs Ministry, Russian): 與財政部的競爭 69; 另見: 保安處; 沙皇警察
- 俄國內戰 (civil war, Russian) 231, 269, 282–83, 298, 325–29, 350, 356–60, 369, 380, 436, 642; 後果 405–6; 易貨經濟 450; 布爾什維克的優勢 332–33; 布爾什維克政權的鞏固 290, 336–37; 傷亡 332; 經濟戰 406; 糧食短缺 405; 通貨膨脹 450; 列寧 334; 內戰期間專業人員的大量外流 405; 民族主義 345–46; 1919年攻勢 335, 370–71; 宣傳戰 335–36; 斯大林的角色 295, 297, 302–10, 314, 320, 327–28, 332, 334–35, 339, 379; 托洛茨基的角色 284–86, 289, 297–98, 302–4, 306–10, 313–14, 319–21, 325–31, 334–35, 339–40; 溫格恩—什捷爾恩貝格 400–1; 白軍的決定性的失敗 379
- 俄國正教會 (Russian Orthodox Church) 13–14; 另見: 東正教
- 俄國立憲民主黨 (卡傑特) (Constitutional Democrats [Cadets], Russian) 90, 93–94, 98, 105, 109, 130, 132, 136–37, 157, 175, 178, 180, 184, 195–96, 199, 202, 205, 239, 242–44, 343, 464
- 俄國的君主專制體制 (autocratic system, Russian) 3, 10, 57–60, 88, 125; 農業 65; 官僚制 57–59, 69–71, 83, 120; 總理府 430; 立憲主義 56, 60, 78–79, 82, 84–85, 90, 92–94, 98–100, 103, 109, 122, 127–28, 132, 137, 157, 171, 173, 223; 大臣會議 60, 86; 杜馬, 另見: 杜馬; 第一次世界大戰與俄國君主專制的崩潰 173; 工業化 65; 爭鬥 54, 66–67, 74, 137, 157–58; 討厭大眾政治 130; 現代性 62–63, 65–67; 與彼得大帝 56–57; 對政黨的鄙視 137, 157; 與政治恐怖主義 101–4; 總理制 83–85; 與 1905–1906年的暴動 81
- 俄國的無產階級 (proletariat, Russian) 25, 40, 42–44, 54, 115, 169, 349; 「流血的星期日」73–74; 布爾什維克的鼓動 186; 共產黨人在無產階級中的根基不牢 426–27; 無產階級專政 203, 225, 232, 337; 對蘇維埃政權日漸不滿 695–97; 勒拿大屠殺 125–26, 135; 大逮捕 164; 1905–1906年的起義 73–74, 76, 92, 104, 130, 132, 167; 農民的支持 205; 與沙赫特事件 696; 罷工和抗議 43–44, 48, 67, 73–74, 79, 81–82, 84–86, 125–26, 144, 164, 166–67, 382–83, 410, 517–18, 570; 要求成立工會 385; 失業 548
- 《俄國的新統治者》(戴維斯) (“Russia’s New Ruler”) 610

- 俄國的農民 (peasants, Russian) 11, 37-38, 42-43, 93, 100, 409; 布爾什維克起初對農民忽視 237, 426; 與集體化, 另見: 集體化; 村社 41-42, 65-66, 95-97, 189-90, 299, 430, 449, 567; 對共產黨人的看法 474, 548-49, 570, 611, 625, 655, 675; 在立憲會議選舉中 243-44; 糧食短缺 165; 不懂得最好的耕作方式 449-50; 強佔土地 189-90, 220-21, 239, 296, 420-21, 449; 列寧不瞭解農民 299-300; 作為工業品的市場 570, 664, 681; 與新經濟政策, 參見: 新經濟政策; 農民黨員的數量 426; 對無產階級的支持 205; 叛亂 67, 75, 84, 132, 135, 224, 379-80, 388-89, 393-94, 405, 410, 470, 575; 與斯大林 103, 320, 568-69; 另見: 集體化; 與斯托雷平 95-96; 與1920-1921年的冬天, 379-82; 另見: 俄國農業; 富農
- 俄國社會民主工黨 (Russian Social Democratic Workers' Party, RSDRP) 45, 51-52, 76, 98, 107, 114, 118, 130, 259; 第一次代表大會 (明斯克) 44-45; 第二次代表大會 (倫敦), 78-80, 201; 第三次代表大會 (塔墨爾福斯), 80-81; 第四次代表大會 (斯德哥爾摩), 102-3; 第五次代表大會 (倫敦), 108, 112-113; 採取反恐怖主義政策, 113-14; 布爾什維克與孟什維克的分裂, 78, 79-81, 103, 108, 114, 122-24, 137; 中央委員會, 參見: 中央委員會; 布拉格代表會議, 122-24, 132, 154; 參見: 俄國社會民主黨人
- 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布拉格代表會議 122-24, 132, 154
- 俄國社會民主工黨高加索支部 50-51; 斯大林與之結怨 52-53, 78; 布爾什維克與孟什維克的分裂 78, 80-81, 114
- 俄國社會民主黨人 (Social Democrats, Russian) 50-51, 82, 98, 102, 125, 129, 135, 242-44, 458, 464
- 《俄國信使報》(*Russian Messenger*) 198
- 俄國革命: 邊疆省份 183; 公民自由 183-84, 186; 糧食短缺 240, 298-99; 缺少中央權威 238; 語言和階級 175, 187; 穆斯林 183-84; 民族主義分裂活動 202, 238; 社會主義 231; 暴力和無政府狀態 239-40, 242; 另見: 布爾什維克政權; 布爾什維克革命; 二月革命; 十月革命; 臨時政府
- 俄國海軍 11, 224; 與立憲會議選舉 244; 復員 258; 與二月革命 172, 175
- 俄國貴族 57-58, 69, 84; 佔有的土地 188-90
- 俄國農業 65, 93, 298-300; 合併 674; 出口 93, 136, 164; 「非常措施」政策 697, 705, 709-10, 712-13, 722; 1921-1922年的饑荒 447-49; 現代化不足 449-50, 663, 671-72; 產量低 93, 447, 566, 568, 649, 659, 662-64, 680, 700-1, 721-23; 斯托雷平改革 95-97; 戰時沒收土地的做法 189; 另見: 俄國的農民
- 俄羅斯人民同盟 (Union of the Russian People) 98-101, 118, 137, 163, 182
- 俄羅斯化 348
- 俄羅斯社會主義聯邦蘇維埃共和國 (RSFSR; 蘇俄) (Russian Soviet Federated Socialist Republic [RSFSR; Soviet Russia]): 入侵亞美尼亞 395; 與民族自治共和國 371; 與英國的貿易協議 391-92; 中央執行委員會 476; 與中國 404-5; 與建立蘇維

- 埃聯盟 475；外交關係 391-92；經濟，參見：蘇維埃經濟；1921-1922年饑荒，參見：1921-1922年饑荒；成立 251, 350；第四次代表大會 580；與喀琅施塔得叛亂 383-84, 387；與蒙古獨立 404-5；穆斯林 368-69；在波蘭戰爭中，參見：波蘇戰爭 (1919-1920)；與德國的拉帕洛條約 445-46, 473, 509, 560-61, 599；斯大林制訂憲法草案 266；與坦波夫叛亂 380-82；貿易壟斷 483-84；兼併突厥斯坦 388；與烏克蘭 386, 475-76；在 1920-1921 年冬季 379-82；另見：布爾什維克政權
- 俄羅斯國家銀行 238-39
- 俄羅斯聯邦民主共和國 (Federal Democratic Russian Republic) 254
- 保加利亞 316；共產黨政變失敗 514-15
- 保守主義 39
- 保安處 (政治警察) (*okhranka* [*Okhrannoe otделение, political police*]) 61-62, 67, 69, 71, 75-76, 79, 93, 104, 114-15, 126, 130, 160, 439, 441；與二月革命 168-69；臨時政府解散保安處 180；對革命組織的滲透 117-18, 133, 164；與右翼 100；逮捕斯大林 133；監視斯大林 117, 121；與斯托雷平被刺事件 122；另見：沙皇警察機關
- 保羅一世，沙皇 (Paul I, tsar) 89-90
- 《信仰告白》(斯大林) (*Credo*) 77
- 勃朗施坦，阿涅塔 (Bronstein, Aneta) 200
- 勃朗施坦，達維德 (Bronstein, David) 200
- 南高加索，參見：高加索
- 南高加索社會民主黨人 (Social Democrats, South Caucasus) 53
- 南高加索聯邦 (South Caucasus Federation) 479-80, 496-97
- 南斯拉夫 511
- 南滿鐵路 (Southern Manchurian Railway) 111
- 哈巴洛夫，謝爾蓋 (Khabalov, Sergei) 167-70, 203, 382
- 哈里曼，埃夫里爾 (Harriman, Averell) 611
- 哈爾季施維里，達維德·「莫赫韋」 (Khartishvili, David "Mokheve") 52
- 哈爾科夫 (Kharkov) 15, 79, 266, 326-27, 355
- 哈薩克斯坦 (Kazakhstan) 677, 700-1
- 契切林，格奧爾吉 (Chicherin, Georgy) 262, 275, 283, 359, 366, 386, 392, 404, 443-44, 446, 511, 525, 560, 562, 589, 616-18, 622, 631, 635-36, 651, 692-93；與布羅克多夫-蘭曹 559-60；與李維諾夫的關係 458；由斯大林任命 457；與斯大林的通信 407-8；工作習慣 457-58
- 契卡 (Cheka) 237, 262, 264, 273, 291, 374-75, 384, 433；與米哈伊爾大公被害 280；腐敗 294；成立 241；在格魯吉亞 399, 541-42；與喀琅施塔得叛亂 393；拉脫維亞步兵的進攻 277-78；逮捕左派社會革命黨人 278；地方支部 293-94；盧比揚卡總部和監獄 437-38；暗殺米爾巴赫的陰謀 275-76；殺死沙皇尼古拉及其家人 281；揭露「民族中心」陰謀 333；在彼得格勒 382；沒收財物 241-42；建議限制契卡權力 439；被格伯烏取代 439, 448；暴虐的名聲 438；斯大林對它的控制 438；就地槍決 294；在察里津，參見：察里津契卡；對契卡的普遍憎惡 241
- 契訶夫，安東 (Chekhov, Anton) 10
- 威爾遜，伍德羅 (Wilson, Woodrow) 315, 343
- 封建主義 (feudalism) 40, 190

- 《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列寧) (*Imperialism: The Highest Stage of Capitalism*) 151, 154
- 帝國參政院 (Imperial Senate) 89, 263–64, 278, 285, 317, 319, 334, 413, 428–29, 521–22, 540
- 《怎麼辦?》(列寧) (*What Is to Be Done?*) 51, 79, 287
- 恰夫恰瓦澤, 伊利亞 (Chavchavadze, Ilya) 32–33, 36, 38, 43–44
- 恰金, 彼得 (博爾多夫金) (Chagin, Pyotr [Boldovkin]) 586
- 恰爾克維阿尼, 克里斯托弗爾 (Charkviani, Kristopore) 16, 20–21
- 政委 (commissar): 作用的增大 339; 在紅軍中 339, 351
- 政治局 (politburo [political bureau]) 322, 330, 390–91, 423–24, 426, 428, 430, 582, 585, 607, 615, 652, 730; 與英國的大罷工 598–99; 與集體化, 675–76; 為德共的政變提供幫助 511, 515; 成為斯大林專政的關鍵 596; 與列寧即將去世的問題 492–93; 與列寧的關係 413, 415, 484, 489; 俄羅斯人佔多數 656; 特別密碼單位 433–34; 與斯大林的專政 687, 699–700; 斯大林向政治局要求辭職 508, 607, 614; 列寧領導下的最高決策機構 428–29; 與托洛茨基 414–15, 488, 520, 522, 615; 季諾維也夫被逐出政治局 607
- 施利芬伯爵, 阿爾弗雷德·馮 (Schlieffen, Alfred, Count von) 145
- 施利芬計劃 (Schlieffen Plan) 145, 147, 310
- 施泰因貝格, 伊薩克 (Steinberg, Isaac) 292–94
- 施特雷澤曼, 古斯塔夫 (Stresemann, Gustav) 510, 561–62
- 施略普尼柯夫, 亞歷山大 (Shlyapnikov, Alexander) 190, 222, 300, 346, 385
- 施魏策爾, 薇拉 (Schweitzer, Vera) 155, 173
- 《星期日工人報》(*Sunday Worker*) 573
- 柏林條約 (Berlin, Treaty of, 1926) 587–88
- 查古明尼, 謝爾蓋 (Zagumyonny, Sergei) 670–71
- 查拉, 特里斯唐 (Tzara, Tristan) 227, 230
- 查蘇利奇, 維拉 (Zasulich, Vera) 45
- 柯秀爾, 弗拉基米爾 (Kosior, Vladimir) 500
- 柯秀爾, 斯坦尼斯拉夫 (Kosior, Stanislaw) 457, 670, 677–78, 705, 712
- 柯倫泰, 亞歷山德拉 (Kollontai, Alexandra) 346, 385
- 柯爾佐夫, 米哈伊爾 (Koltsov, Mikhail) 566
- 洛迦諾公約 (Locarno Peace Pact, 1925) 561–62
- 流血的星期日 (Bloody Sunday) 73–74, 126, 164
- 《為沙皇獻身》(格林卡) (*Life for the Tsar, A*) 127
- 皇村 (Tsarskoe Selo) 74, 86, 92, 167, 170–72; 被白軍佔領 330
- 科科夫佐夫, 弗拉基米爾 (Kokovtsov, Vladimir) 281
- 科韋爾達, 鮑里斯 (Koverda, Boris) 634
- 科特拉列夫斯基, S. A. (Kotlarevsky, S. A.) 183
- 科索沃戰役 (Kosovo, Battle of, 1389) 142
- 科茲洛夫斯基, 亞歷山大 (Kozlovsky, Alexander) 346, 392–93
- 科馬羅夫, 尼古拉 (Komarov, Nikolai) 516
- 科爾尼洛夫, 拉夫爾 (Kornilov, Lavr) 174, 177, 184–86, 200, 228, 248, 320, 356; 未遂政變 207–12, 219; 死亡 268, 295; 與克倫斯基 204–5, 208–10, 212, 219; 在莫斯科國務會

- 議上 206-7；任彼得格勒軍區司令 203-4, 211；任「志願軍」司令 268
- 科熱夫尼科夫，A. M. (Kozhenikov, A. M.) 414
- 科諾普列娃，利季婭 (Konopleva, Lidiya) 285
- 科羅特科夫，伊萬 (Korotkov, Ivan) 512
- 突厥斯坦 (Turkestan) 58, 145, 243, 253-54, 266, 371-72, 387, 407, 451-52；伏龍芝在突厥斯坦 373-75, 387；突厥斯坦的穆斯林 253-54, 502-3；紅軍在突厥斯坦 372-74；瓦利季逃往突厥斯坦 371-72
- 突厥斯坦社會主義自治共和國 (Turkestan Autonomous Socialist Republic) 375, 388
- 突厥語 12, 344
- 紅色百人團 (Red Hundreds) 77, 81
- 紅色恐怖 (Red Terror) 287-88, 373, 405
- 紅色教授學院 (Institute of Red Professors) 545-46, 705, 713
- 《紅色莫斯科》(Red Moscow) 337
- 《紅色騎兵軍》(巴別爾) (Red Cavalry) 359
- 《紅星報》(Red Star) 451
- 紅軍 (Red Army) 266, 268, 277, 286, 289, 293, 343, 366, 451, 642, 688；佔領阿塞拜疆 395；進攻布哈拉 373-74；與羅馬尼亞的衝突 360；沒有做好戰鬥準備 557, 604, 619, 621-22, 638；政委制 339, 351；在克里米亞 379；復員 344, 426, 436；與糧食短缺 649, 662；紅軍中的前沙皇軍官 297-98, 306, 309, 314, 319-21, 329, 339-40, 351, 356-57, 393, 574-75；入侵格魯吉亞 397, 398；與工業化 574, 587；與德國的軍事合作協議 446, 561, 587, 617-18, 621, 638, 704-5；職務名冊 436；與奧格伯烏 574-75；紅軍中的黨員數量 344, 574；紅軍中的農民 297, 344；入侵波蘭 361；紅軍中的政治委員 298, 320, 339, 351；紅軍中的政治部 436；糧食供應 299；奪回烏克蘭 386；改革 574；斯大林要求在紅軍中加強紀律 320；斯大林排斥紅軍中的軍事專家 297；斯大林利用紅軍進行政治教育 436-37；與坦波夫暴動 394；托洛茨基要求紅軍中要有紀律和專家 297；從沙皇政權獲得的武器 332-33；在察里津 302, 305；在突厥斯坦 372-74；佔領庫倫 403
- 紅軍政治部 (Red Army Political Administration) 557
- 《紅旗報》(Rote Fahne, Die) 515
- 美國：經濟增長 18-19, 612；1914年金融危機 148；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 248, 310-11；工業化 19, 662；自由主義 132；大生產 612；鐵路泡沫 64；第17修正案 83；奴隸制 19；與蘇聯的關係 611-12；鋼鐵生產 63；凡爾賽條約 315-16
- 美國內戰 (Civil War, U.S.) 18-19
- 美國的第17修正案 (Seventeenth Amendment, U.S.) 83；其中的作秀公審 702-4, 709, 711, 734；與斯大林 689, 691, 694, 698, 709, 711, 714-15, 733
- 美國國會與賑濟俄國饑荒 (Congress, U.S., Russia famine relief and) 448-49
- 美國救濟署 (American Relief Administration ARA) 448-49
- 耐普曼，參見：私商 (NEPmen, *see private traders*)
- 《耶穌傳》(勒南) (Life of Jesus) 37
- 胡佛，赫伯特 (Hoover, Herbert) 組織賑濟俄國饑荒活動 448
- 胡志明 550
- 胡特希施維里，瓦諾 (Khutsishvili, Vano) 19



- 《英俄協約》(Anglo-Russian Entente, 1907) 109-10, 135-36, 140  
 英帝國 4, 141, 151, 316  
 英軍在摩爾曼斯克登陸 265-66, 282  
 英國(大不列顛): 反共政策 247, 343-44, 558-59, 624; 阿爾漢格爾斯克登陸 282-83; 把俾斯麥視為威脅 6; 遠征高加索 270, 397-98; 克里米亞戰爭 59, 67; 經濟狀況 7, 148, 587-88; 英俄協約 109-10, 135-36, 140; 對外貿易 108-9, 139, 146; 大罷工 588, 598-99, 613; 德國的戰爭賠款 509; 英德關係 139-40, 560-61, 587, 621; 成為全球性的大國 108-9;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 150, 152, 156, 197-99, 312, 316-17; 工業革命 40; 英日關係 111; 自由主義 132; 《洛迦諾公約》561; 海軍 111, 140; 與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爆發 146-49; 與波蘭的關係 616; 警方搜查蘇聯駐英辦事處 631-32; 與波蘇戰爭 355, 358-59; 首相職務 83-84; 對俄政策 265-66; 秘密情報局 284; 破譯蘇聯密碼 553; 與蘇聯的關係 617-18, 622-24, 632, 638; 對蘇貿易 391-92, 599, 632; 承認蘇聯 558; 斯大林對英國的看法 558; 斯大林把英國視為頭號敵人 623-24, 631-35; 鋼產量 63; 工會 599; 三國協約 140, 147; 與沙俄的關係 108-9; 與凡爾賽條約 315-16  
 英國情報機關破譯俄國密碼 391-92  
 軍事爭論 (military controversy) 319-21  
 軍事革命委員會 (Military Revolutionary Committee, MRC) 215-17, 219, 233, 511  
 迪克森, 赫伯特·馮 (Dirksen, Herbert von) 587  
 《革命士兵報》(*Soldier of the Revolution*) 305  
 革命特別法庭 (Revolutionary Tribunal) 381-82  
 《革命與文化》(*Revolution and Culture*) 468  
 韋爾托夫, 濟加 (Vertov, Dziga) 440  
 韋爾納茨基, 弗拉基米爾 (Vernadsky, Vladimir) 721  
 韋爾霍夫斯基, 亞歷山大 (Verkhovsky, Alexander) 293  
 韋爾濟洛夫, 瓦西里 (Verzilov, Vasily) 720
- ## 十劃
- 俾斯麥, 奧托·馮 (Bismarck, Otto von) 4, 70, 72, 83, 94-95, 109, 113, 119, 139-41; 論政治的藝術 5-6; 與俄國 5, 7; 統一德國 4-7, 18, 732  
 倫金, 庫茲馬 (Ryndin, Kuzma) 653  
 哥里 (Gori) 2, 8-9, 14-15, 20-21, 23-26, 28, 36, 53  
 哥爾克莊園 (Gorki estate): 列寧在哥爾克莊園 413-14, 416-17, 428, 440, 476, 482; 斯大林的探望 413-14, 416-17, 476  
 哥薩克 (Cossacks) 13, 254, 268, 270, 296, 304-5, 310, 326, 356, 401  
 唐恩, 費奧多爾 (Dan, Fyodor) 137, 396, 469  
 埃塞俄比亞 64  
 埃赫, 羅伯特 (Eihe, Roberts) 683  
 埃德曼, 尼古拉 (Erdman, Nikolai) 620  
 孫中山 626-27  
 庫扎科娃, 瑪特廖娜 (Kuzakova, Matryona) 121  
 庫丘克汗, 米爾扎 (Kuchek Khan, Mirza) 346, 366  
 庫列伊卡 (Kureika) 154, 194  
 庫西寧, 艾諾 (Kuusinen, Aino) 526  
 庫西寧, 奧托 (Kuusinen, Otto) 412, 442, 526, 609

- 庫倫 (Urga) 401-3  
 庫恩, 貝拉 (Kun, Béla) 324-25, 367  
 庫班 (Kuban) 268, 270, 297  
 庫普林, 亞歷山大 (Kuprin, Alexander) 220  
 恩格斯, 弗里德里希 (Engels, Friedrich) 8, 39, 151, 232  
 拿破侖一世, 法國皇帝 (Napoleon I, emperor of France) 2, 4, 185-86  
 拿破侖三世, 法國皇帝 (Napoleon III, emperor of France) 7  
 書記處 (secretariat) 423-5, 430, 434  
 格伯烏 (國家政治保衛局) (GPU [State Political Administration]) 439, 448, 459-62; 腐敗 461-462; 驅逐和流放 440; 超出法律之外的權力 440; 與作秀公審 440; 另見: 奧格伯烏  
 格里戈里·彼得羅夫斯基 (Petrovsky, Hryhory "Grigory") 390, 579, 596, 613  
 格拉塞爾, 瑪麗亞 (Glasser, Maria) 488-89  
 格拉德斯通, 威廉 (Gladstone, William) 19  
 格拉澤, 吉奧 (Geladze, Gio) 28  
 格拉澤, 桑德拉 (Geladze, Sandala) 28  
 格拉澤, 葉卡捷琳娜 (Geladze, Ketevan) 參見: 朱加施維里, 葉卡捷琳娜·「凱可」  
 格林卡, 米哈伊爾 (Glinka, Mikhail) 127  
 格奧爾吉大公 160  
 格雷, 愛德華 (Grey, Edward) 146-47, 149  
 格魯吉亞 86, 342, 366, 473, 475; 格魯吉亞的亞美尼亞人 496; 格魯吉亞的布爾什維克 106, 267; 布爾什維克接管格魯吉亞 396-400; 成為獨立的共和國 238, 343, 395; 格魯吉亞馬克思主義 30, 38, 43-44; 格魯吉亞孟什維克 103, 106, 108, 123, 133, 244, 395-97, 399-400; 格魯吉亞穆斯林 13, 24; 格魯吉亞民族主義 9-10, 30, 32, 400, 601; 農民叛亂 67; 紅軍入侵 397-98; 宗教和種族構成 13-14; 俄語 14; 蘇維埃聯盟計劃 475-76, 478-80; 土耳其入侵 398  
 格魯吉亞共產黨: 中央委員會 475, 477, 480, 493; 捷爾任斯基的調查 480-81, 487; 抗命 479, 487, 489-90, 493-94; 第二次代表大會 493  
 格魯吉亞社會民主黨人 (Social Democrats, Georgian) 37, 49-50, 67, 77-78, 98, 395, 735  
 格魯吉亞掃盲協會 32, 36, 38  
 格魯吉亞蘇維埃共和國 397  
 格羅德諾省 (Grodno) 91, 354, 360  
 《泰晤士報》(倫敦) (*Times* [London]) 340  
 浩罕 (Qoqand) 254-55  
 浩罕自治政府 (Qoqand Autonomy) 254-55, 373  
 海軍, 美國 (Navy, U.S.) 140  
 海莫, 毛諾 (Heimo, Mauno) 442  
 《消息報》(*Izvestiya*) 206, 288, 293, 464, 540, 550, 704  
 烏克蘭, 烏克蘭人 41, 98, 125, 200, 342, 475, 546, 666, 687, 700; 反猶主義 326; 糧食豐收 721-22; 德國佔領 253, 265-67, 270, 272-73, 283, 301, 303; 作為獨立的共和國 238, 343, 368; 民族主義分子 119, 351, 400; 1921-1922年的饑荒 447; 與波蘭 353-54, 616-17; 波蘭入侵 352, 354; 紅軍的重新征服 386; 與德國單獨媾和 252; 與蘇俄的關係 475-76; 與蘇維埃聯盟計劃 475-76, 478-79; 白軍佔領 330  
 烏克蘭中央拉達 (Ukrainian Central Rada) 252, 258, 266-67  
 烏克蘭共產黨中央委員會 476  
 烏克蘭社會主義革命 (Socialist Revolutionaries of Ukraine) 244-45

- 烏克蘭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 (Ukrainian Soviet Socialist Republic) 386, 406
- 烏里茨基, 莫伊謝伊 (Uritsky, Moisei) 284
- 烏里揚諾夫, 弗拉基米爾, 參見: 列寧, 弗拉基米爾
- 烏里揚諾夫, 亞歷山大 (Ulyanov, Alexander) 60, 185
- 烏里揚諾夫娜, 瑪麗亞 (Ulyanova, Maria) 413-17, 488, 501, 520-21, 527, 608; 與列寧之死 534; 論列寧與斯大林的關係 608-9
- 烏里揚諾夫家族 (Ulyanov family) 185
- 烏拉爾蘇維埃 (Urals Soviet) 280
- 烏法 (Ufa) 238, 269, 326, 368, 371
- 烏法蘇維埃 (Ufa Soviet) 266
- 烏約維奇, 沃亞 (Vujović, Voja) 644
- 烏格拉諾夫, 尼古拉 (Uglanov, Nikolai) 432, 548, 563, 596, 613, 723; 與接班人之爭 563, 641, 715
- 烏爾里希, 瓦西里 (Ulrich, Vasily) 381-82
- 烏魯塔澤, 格里戈里 (Urutadze, Grigol) 123
- 特列波夫, 德米特里 (Trepov, Dmitry) 82
- 特希恩瓦列利, 基塔 (Tkhinvaleli, Kita) 105
- 特里亞農宮條約 (Trianon, Treaty of, 1920) 316
- 班禪喇嘛 (Panchen Lama) 401
- 《真理報》(Pravda): 刊登批判托洛茨基的文章 564; 加米涅夫任編輯 190-91; 發表列寧的〈四月提綱〉191; 報告列寧的病情 492; 抨擊臨時政府的政策 199; 遭到臨時政府查封 203; 斯大林任編輯 193; 刊登的斯大林的文章 177, 266-67, 555, 564, 639
- 祖巴洛夫, 列翁 (祖巴拉施維里) (Zubalov, Levon [Zubalashvili]) 466
- 祖巴洛沃別墅 (Zubalovo dacha) 466-67, 594
- 神聖羅馬帝國 (Holy Roman Empire) 18
- 秣市騷亂 (Haymarket riots) 49-50
- 納扎列江, 阿馬亞克 (Nazaretyan, Amayak) 425, 427, 456, 464-65, 468, 519
- 納尼, 阿戈斯托 (Nani, Agosto) 1
- 納伊條約 (Neuilly, Treaty of, 1919) 316
- 納普拉夫尼克, 愛德華 (Napravnik, Eduard) 127
- 納粹 (Nazis) 704
- 納維爾, 皮埃爾 (Naville, Pierre) 646
- 《紐約美國人報》(New York American) 610
- 《紐約時報》(New York Times) 538, 543, 614
- 《紐約論壇報》(New York Tribune) 18
- 索比諾夫, 列昂尼德 (Sobinov, Leonid) 127
- 索里維切戈茨克 (Solvychevodsk) 116, 121
- 索姆河戰役 (Somme, Battle of the) 150, 152, 162
- 索契, 斯大林在那裏度假 (Sochi, Stalin's holidays in) 596, 598, 601-2, 613, 633, 636-37, 720
- 索契事件 (Sochi affair) 698
- 索柯里尼柯夫, 格里戈里 (布里連特, 吉爾希·「加里亞」) (Sokolnikov, Grigory [Brilliant, Girsh "Garya"]) 257, 271, 320, 376, 475, 486, 567, 614, 710, 712, 716, 739; 作為蘇維埃領導人人選 729-31; 背景 451, 457; 論資本主義 565-66; 經濟改革 452, 566, 568-69, 583; 擔任財政人民委員 451-52, 565, 729; 在黨的第十四次代表大會上 581-82; 論工業化 659-60; 與加米涅夫 713-14; 他設想的市場社會主義 729-30; 與新經濟政策 564, 577, 579; 與密謀解除斯大林總書記職務 714; 認為計劃經濟行不通 729-30; 被趕出政治局和

- 財政人民委員部 585, 730; 與接班人之爭 564, 577, 729; 在突厥斯坦 451-52
- 索柯里尼柯夫恢復蘇聯國家銀行 452
- 索科洛夫, 尼古拉 (Sokolov, Nikolai) 200
- 索博利, 賴扎 (Sobol, Raisa) 608
- 索斯諾夫斯基, 列夫 (Sosnovsky, Lev) 680-81
- 索菲婭·穆什卡特 (Muszkat, Zofia) 447
- 茨哈卡雅, 米霍 (Tskhakaya, Mikho) 81, 105
- 茲納緬卡街 23 號 (Znamenka, 23) 426, 436-37
- 財政人民委員部 (finance commissariat) 450-52, 470, 730; 索柯里尼柯夫擔任財政人民委員 565
- 馬克拉科夫, 瓦西里 (Maklakov, Vasily) 224, 718
- 馬克思, 卡爾 (Marx, Karl) 5, 7-8, 18, 39, 57, 65-66, 88, 99, 107, 151, 232; 階級鬥爭 291-92, 737; 民族主義 346-47
- 馬克思, 威廉 (Marx, Wilhelm) 618
- 馬克思主義, 馬克思主義者 (Marxism, Marxists) 30, 38-40, 44, 78-79, 151, 544; 奧地利的 347-48; 對資產階級的看法 292-93; 對資本主義的看法 78-79, 292; 對歷史的看法 39, 42, 78, 190; 在俄國 42-45, 54, 74, 78-79, 93, 137; 對自決權的看法 347; 斯大林為之獻身 10, 88, 93, 107, 137, 307, 676; 國家理論 232; 另見: 共產主義; 列寧主義
- 《馬克思主義和民族問題》(斯大林) ("Marxism and the National Question") 133, 153
- 《馬克思主義者》(Communist) 259
- 馬努伊爾斯基, 德米特里 (Manuilsky, Dmitry) 526, 573
- 馬林科夫, 格奧爾吉 (Malenkov, Georgy) 457
- 馬林諾夫斯基, 羅曼 (Malinowski, Roman) 133, 154
- 馬哈拉澤, 菲利普 (Makharadze, Pilipe) 346, 397, 399, 489-91
- 馬庫斯, 瑪麗亞 (Markus, Maria) 586
- 馬泰奧蒂, 賈科莫 (Matteotti, Giacomo) 551-52
- 馬特克瓦里河 (Mtkvari River) 14, 22
- 馬基雅維利, 尼科洛 (Machiavelli, Niccolò) 53
- 馬斯洛夫, 阿爾卡季 (Maslow, Arkadi) 614
- 馬爾托夫, 「尤利」(策傑爾包姆, 尤利烏斯) (Martov, "Yuly" [Tsederbaum, Julius]) 45, 78, 80, 108, 113, 135, 164, 188, 198, 218, 228, 265, 267, 273, 279, 378, 385, 393, 463-64, 527
- 馬爾科夫, 帕維爾 (Malkov, Pavel) 227, 263, 285-86
- 馬蒙托夫, 薩瓦 (Mamontov, Savva) 262
- 馬赫羅夫斯基, K. E. (Makhrovsky, K. E.) 304-5
- 馬薩里克, 托馬斯 (Masaryk, Tomáš) 316
- 高加索 16, 43, 365, 439, 700; 布爾什維克 108, 266; 英國軍隊 270, 397-98; 孟什維克 112, 124; 政治恐怖主義 115; 俄國的征服 3, 12-13; 斯大林 1926 年的高加索之行 598, 600-1
- 高加索社會民主黨人 (Social Democrats, Caucasus) 103, 113; 與斯大林之間的嫌隙 52-53, 78
- 高爾基, 馬克西姆 (Gorky, Maxim) 133, 183, 329, 448, 544
- 高爾察克, 亞歷山大 (Kolchak, Alexander) 207, 210, 297, 300, 314, 328, 330, 355-58, 369, 559; 獨裁 335; 被處決 331; 成為西伯利亞哥薩克領袖 295-96; 1919 年的攻勢 326, 335,

370-71；在西伯利亞 372；搶走的沙皇政府黃金 331-32  
《鬥爭報》(*Brdzola [Struggle]*) 50, 55, 348

## 十一劃

勒南，埃內斯特 (Renan, Ernest) 37  
勒拿金礦大屠殺 (Lena goldfields massacre) 125-26, 135  
《啟蒙》雜誌 (*Enlightenment*，斯大林在上面發表的文章) 133  
國民黨 (Guomindang) 640, 651, 717；國共聯盟 626-27；軍隊 626-27；對共產黨人的進攻 655；背叛共產黨人 637-38, 640；左派 (武漢) 629, 633, 637-38；作為民族主義運動 626；北伐 629, 631；蘇聯的軍事援助 626-28, 640  
國家 (*gosudarstvennost*) 343  
國家計劃委員會 483, 501, 523；與托洛茨基 485-86  
《國家與革命》(列寧) (*State and Revolution*) 135, 203  
國務會議 99, 129, 134, 136, 179  
《國富論》(斯密) (*Wealth of Nations*) 39  
國際工人協會 40-41  
《國際歌》41, 176, 220  
國際聯盟 (League of Nations) 315, 562, 730  
國營工業 433  
基本法 85, 94, 97, 179  
基列耶夫，亞歷山大 (Kireev, Alexander) 127  
基季阿施維里，瑪麗亞 (Kitiashvili, Maria) 48  
基洛夫，謝爾蓋 (Kirov, Sergei) 27-28, 117-18, 304, 390, 455, 467, 585-86, 607, 731  
基爾雄，弗拉基米爾 (Kirshon, Vladimir) 699

基爾塔娃—西哈魯利澤，娜塔莎 (Kirtava-Sikharulidze, Natasha) 53  
基輔 15, 252, 258, 330；波蘭人佔領 354-55, 357, 377；紅軍收復 357  
寇松勳爵 (Curzon, Lord) 358-60, 397-98  
將殺害沙皇一家的責任歸咎於烏拉爾布爾什維克 281  
張伯倫，奧斯丁 (Chamberlain, Austen) 559, 561-62  
《捷列克報》(*Terek*) 118  
捷克斯洛伐克 316, 325, 511, 561-62, 589  
捷克斯洛伐克軍團 (Czechoslovak Legion) 269, 280, 282-83, 296, 331；叛亂 269-70, 277  
捷里亞，格里戈里 (Teliya, Giorgi) 106-7, 544  
捷爾任斯基，費利克斯 (Dzierżyński, Felix) 104, 121, 235, 241, 250, 257, 260, 275-76, 278, 284, 300, 314, 333, 352, 358, 360, 365, 375, 393, 396, 438, 459, 452, 468, 482, 579, 588, 596, 602, 688, 738；背景 459；任契卡和格伯烏首腦 459；去世 605；論官僚主義蔓延 601；1921-1922年的饑荒 447-48；調查格魯吉亞人抗命事件 480-81, 487, 489；任奧格伯烏首腦 577-78；監禁和流放 459；被左派社會革命黨人扣留 276；與列寧之死 492-93, 534-35, 536；與列寧遺體的處理 542-43；作為列寧可能的接班人 493；與明仁斯基 460；與新經濟政策 578；擔心波蘭再次發動進攻 604-5；與接班人之爭 577-78；任最高國民經濟委員會主席 578-79, 601；與托洛茨基在蘇呼姆的養病 541  
捷爾—彼得羅相，西蒙·「卡莫」(Ter-Petrosyan, Simon "Kamo") 113-14  
敖德薩 (Odessa) 15, 74, 264

- 曼納海姆，卡爾·古斯塔夫 (Mannerheim, Carl Gustav) 256, 330
- 曼塔舍夫，亞歷山大 (Mantashov, Alexander) 51
- 《曼徹斯特衛報》(*Manchester Guardian*) 617, 621
- 梁贊諾夫，達維德 (Ryazanov, David) 389
- 梅耶爾霍里德，弗謝沃羅德 (Meyerhold, Vesvolod) 620
- 梅爾庫羅夫，謝爾蓋 (Merkulov, Sergei) 535
- 梅赫利斯，列夫 (Mehklis, Lev) 456-57
- 梯弗里斯 (第比利斯) (Tiflis [Tbilisi]) 15, 20, 29-30, 49, 53, 105-6, 537; 亞美尼亞人 29, 49, 479; 布爾什維克的銀行劫案 8-9, 113-14, 267; 種族多樣性 29-30; 政府 29-30; 五一遊行 49-50; 奧斯曼銀行分行 475; 紅軍佔領 397; 斯大林 22, 47-50, 113-14, 121, 125, 267-68, 399, 600; 罷工 43-44, 48, 600
- 梯弗里斯劫案 113-14
- 梯弗里斯神學院 (Tiflis Theological Seminary) 43; 禁書, 36-37, 45; 斯大林 2, 26-27, 30-38, 44-47
- 清朝 4, 64, 66, 401
- 《犁溝報》(格奧爾吉) (*Kvali [The Furrow]* [Giorgi]) 34, 43-44, 48, 50, 55
- 《現代民族》(考茨基) ("Modern Nationality") 347
- 現代性 (modernity) 92, 119, 132, 134; 作為地緣政治過程 4-5, 62-65; 在俄國 65-67, 94, 97, 119, 129
- 符拉迪沃斯托克 (Vladivostok) 269, 344, 590; 日軍登陸 266
- 第一次世界大戰，參見：世界大戰
- 第一國際 (First International) 317, 347
- 第一騎兵集團軍 (紅軍) (First Cavalry Army [Red]) 259, 355-57, 359, 362, 456
- 第二次世界大戰 4
- 「第二院」行動 (Parliament-2, Operation) 502
- 第三 (共產主義) 國際 (共產國際) (Third [Communist] International [Comintern]) 317-18
- 「第三小組」(麥撒墨達西社) (Third Group [Mesame Dasi]) 43-44, 51
- 第三騎兵軍 (紅軍) 359
- 組織局 (orgburo [organization bureau]) 322, 423-25, 430, 432, 435, 438, 512, 522, 548
- 組織指導部 (Organization and Instruction Department) 455
- 《組織原則》(克爾任采夫) (*Principles of Organization*) 435
- 《統一》(*Unification*) 101
- 莫吉廖夫 (Mogilyov) 158, 167, 354
- 莫洛托夫，維亞切斯拉夫 (斯克里亞賓) (Molotov, Vyacheslav [Skryabin]) 121, 190, 193, 339, 375, 390, 413, 420, 423-25, 428-29, 488, 499, 513, 527, 564, 666, 673, 692, 698, 708, 719, 723; 背景 453-54; 對中央機關的批評 518-19; 論列寧的嚴厲 544; 與列寧之死 534; 論列寧「遺囑」528; 在政治局 585, 596; 下令進行報復性的處決 634-35; 成為忠於斯大林的人 454, 456, 528, 639, 672, 686, 694, 701, 715, 717, 720, 731; 與斯大林的通信 578, 596, 599, 604, 613, 619, 622, 634-37; 與接班人之爭 644, 649; 與托洛茨基 545, 598, 639
- 莫斯科 235, 238; 布爾什維克向莫斯科的疏散 259-61; 二月革命 172; 食品短缺 270, 321; 燃料匱乏 304; 基泰哥羅德街區 450-51; 1905年起義 86; 街道更名 286; 罷工 206
- 莫斯科人民委員會 (Moscow Council of People's Commissars) 238, 261

「莫斯科中心」(Moscow Center) 560  
 莫斯科國務會議 (Moscow State  
 Conference) 205-7, 218, 320  
 莫斯科蘇維埃 (Moscow Soviet) 261-62,  
 310, 482  
 莫諾謝利澤，米哈伊爾 (Monoselidze,  
 Mikheil) 105  
 貧苦農民聯盟 (Union of the Toiling  
 Peasantry) 381  
 陶里亞蒂，帕爾米羅 (Togliatti, Palmiro) 720  
 麥捷希監獄 (Metekhi Prison) 48, 55

## 十二劃

傅立葉，夏爾 (Fourier, Charles) 39-40  
 傑夫達里阿尼，賽義德 (Devdariani, Seid)  
 35, 38, 104  
 凱末爾，穆斯塔法 (Kemal, Mustafa) 398,  
 503  
 凱南，喬治 (Kennan, George) 443-44  
 勞合一喬治，戴維 (Lloyd George, David)  
 315-17, 392, 444-45  
 勞動國防委員會 (Council of Labor and  
 Defense) 416-17, 476  
 博多 (Bodoo) 402  
 博克多格根 (Gegen, Bogd) 401-2, 404-5,  
 553-54  
 博基，格列布 (Boki, Gleb) 375, 433  
 博爾曼，阿爾卡季 (Borman, Arkady) 341  
 喀山 74, 238, 282, 284, 306, 326, 331, 369,  
 371  
 喀山聖母大教堂 (Our Lady of Kazan  
 Cathedral) 126-28  
 喀山蘇維埃 266  
 喀琅施塔得海軍基地 182, 187, 202,  
 218; 1921年水兵叛亂 383-84, 387,  
 390-93, 457, 575  
 喬治一世，英國國王 (George I, king of  
 England) 83  
 喬治五世，英國國王 (George V, king of  
 England) 90, 147, 280  
 媒體：列寧的書報檢查制度 237, 245  
 富農 (kulaks [rich peasants]) 42, 300, 567,  
 570-71, 579, 582, 616, 649, 669-71,  
 676, 680, 684, 711-12; 逮捕和審判  
 669-71, 680-82, 697, 705; 與集體  
 化 421; 共產黨人容忍的限度 300,  
 389, 578, 582, 681, 683-85, 689; 強  
 行流放 712; 囤積糧食, 568, 66-71,  
 680, 682, 695-96; 富農的大農場  
 671-72; 與新經濟政策 727-28; 與  
 實物稅政策 389  
 彭加勒，雷蒙 (Poincaré, Raymond) 445  
 揚松，尼古拉 (Yanson, Nikolai) 697  
 斯大林，瓦西里·「瓦夏」(Stalin, Vasily  
 "Vasya") 10, 466-67, 593, 595, 633  
 斯大林，約瑟夫 (朱加施維里) (Stalin,  
 Iosif [Jughashvili]): 權勢擴張 334,  
 341, 390, 424, 469, 532; 抱負 21, 38,  
 54-55, 463, 469; 被任命為黨的總書  
 記 411-12, 424, 481, 486, 530; 對藝  
 術的興趣 620-21; 自學成才 21, 30,  
 117, 676; 背景 2, 8-10; 力主布爾  
 什維克接管格魯吉亞 396-97; 個人  
 魅力 465, 603, 736; 童年 17, 20-28,  
 735; 信奉階級鬥爭 306-7, 308-9,  
 345, 444, 681, 688, 698, 710-11, 732,  
 734; 好勝 331; 狡猾 4, 424, 427,  
 465, 502, 532, 537; 假謙虛 600,  
 659; 聯邦主義議程 346, 349-51; 擔  
 任特命全權南俄糧務總領導者 270,  
 300-310; 行事風格 54-55, 124, 307,  
 335, 341, 462, 465, 468, 597, 739;  
 怨恨 9, 591; 染病 17, 20, 398-99,  
 602, 738; 專橫 9; 被囚禁 116-17,  
 121-22; 才智 7; 流放 9, 53, 116,  
 121-22, 133, 152-55, 173; 綽號「柯  
 巴」24, 52, 598; 與列寧，參見：

- 列寧與斯大林的關係；馬克思列寧主義世界觀 10, 88, 93, 107, 137, 307, 341, 419-20, 427, 462, 470, 622, 676, 699, 731, 737；在軍事上的無知 297, 306；辭去軍事職務 365；擔任民族事務人民委員 228, 238, 251, 254, 264, 266, 349, 368, 429, 456；1928年的西伯利亞之行 661-66, 668, 674-76, 679, 684；組織能力 4, 55, 390, 424-25；正教信仰 28；偏執 597-98, 723, 736；悲觀 407-8；身體疾病 20-22, 465-66, 602-3, 633, 661, 720；寫的詩 33-34；論波蘇戰爭 354-55, 357-58；政治才能 7, 422, 424-25, 739；作為宣傳家 48, 115, 177, 187, 193, 225, 259, 305-6, 462；在宗教上的覺醒 36-37；學校教育 21, 25-26, 28；以自我為中心 155, 468；自我完善 4, 7, 10, 21, 117；自憐 474, 508, 528, 591, 595, 614, 619, 647, 657, 659, 735-36；作為神學院學生 2, 26-27, 30-38, 44-47；遭圍攻心態 591-92, 597, 659, 736；以社會主義為人生使命 9, 31；與接班人之爭 416-17, 522-25, 532-34, 540, 555, 563-64, 572-73, 577-78, 580, 582, 584, 586, 590-91, 597, 604-6, 614-15, 636-39, 641-44, 646-48, 653-56, 713, 735, 736；在梯弗利斯 8-9, 22, 113-14, 121, 125, 267-68, 399, 600；過分敏感 116, 597；虛榮 362；愛報復 597-98, 615-16, 715-16, 719, 723, 731, 736；作為如饑似渴的讀者 32, 36-37, 45, 47-48, 116-17, 153, 155, 463, 536, 669；女色 3, 8, 121, 155
- 《斯大林》(巴比斯) (*Stalin*) 1
- 斯大林不再使用格魯吉亞文 112-13
- 斯大林的專政 419-20, 422-71, 527, 586, 652；不同的選項 727-32；黨務人員 426, 430-32；布哈林的反對 472, 474, 513, 731；黨的第十四次代表大會的有關爭論 580-84；總書記職務是其中的關鍵 425-26；情報網 441；加米涅夫的看法 512-14；與列寧之死 539；反對派的「陰謀」 603-4；與農民，參見：集體化；俄國的農民；與政治局 426, 596, 687, 699-700；與李可夫 658；斯大林對此的矛盾心理 595-96；取勝 659-60；與托洛茨基 472, 486-87, 532, 613-14；黨的領導集體未曾預料到 422-23；與季諾維也夫 472, 474, 506-9, 513
- 斯大林致力於加強中央集權 346
- 斯巴達克聯盟 (Spartacus League) 272, 323
- 斯瓦尼澤，阿廖沙 (Svanidze, Alyosha) 105, 479
- 斯瓦尼澤，葉卡捷琳娜·「卡托」 (Svanidze, Ketevan "Kato") 114, 594；去世 115-16, 738；嫁給斯大林 105-6
- 斯瓦尼澤，瑪麗亞 (Svanidze, Maria) 594-95
- 斯瓦尼澤—莫諾謝利澤，亞歷山德拉·「薩希科」 (Svanidze-Monoselidze, Alexandra "Sashiko") 105-6
- 斯皮里多諾娃，瑪麗亞 (Spiridonova, Maria) 246, 274-76, 278-79
- 斯列普科夫，亞歷山大 (Slepkov, Alexander) 545-46
- 斯托雷平，彼得 (Stolypin, Pyotr) 100-1, 118, 125, 134, 136, 167, 179, 239, 343, 726；對他的暗殺圖謀 102；被暗殺 122, 674；專制君主對他的阻撓 128-29；與杜馬 94, 97, 101, 119；被提拔為總理 91-92；失敗的政府改革 92-93, 120, 129-30；對外政策 108-12, 129；擔任薩拉托夫總



- 督 91-92, 95; 大逮捕和處決 104, 106; 以現代化為目標 92, 94, 97, 119, 129; 與尼古拉二世的關係 92, 119-20; 與正教會 118-19, 129; 社會改革 95-97, 673-74
- 斯米爾加, 伊瓦爾 (Smilga, Ivar) 328, 358, 359
- 斯米爾諾夫, 弗拉基米爾 (Smirnov, Vladimir) 320
- 斯米爾諾夫, 伊萬 (Smirnov, Ivan) 306, 390, 404
- 斯米爾諾夫, 亞歷山大 (Smirnov, Alexander) 449
- 斯克良斯基, 埃夫拉伊姆 (Sklyansky, Yefraim) 262, 327-28, 394, 511, 542
- 斯克雷普尼克, 米科拉 (Skrypnyk, Mykola) 346, 387, 497, 503
- 斯坦涅夫斯基, 梅奇斯拉夫 (Staniewski, Mieczysław) 286-87
- 斯科魯托, 尼古拉 (Skorutto, Nikolai) 703-4
- 斯涅薩列夫, 安德烈 (Snesarev, Andrei) 301-4
- 斯特拉文斯基, 伊戈爾 (Stravinsky, Igor) 620
- 斯密, 亞當 (Smith, Adam) 39-40
- 斯梅托納, 安塔納斯 (Smetona, Antanas) 618
- 斯莫爾尼宮 (Smolny) 216, 226, 228
- 斯莫爾尼學院 (Smolny Institute) 215
- 斯塔索娃, 葉蓮娜 (Stasova, Yelena) 423, 428, 596
- 斯維爾德洛夫, 揚克爾·「雅科夫」 (Sverdlov, Yankel "Yakov") 204, 212-14, 226, 228, 235, 237, 251, 256, 260, 262-63, 271-72, 275, 280, 285-86, 307, 313, 398-99, 413, 738; 去世 318-19, 423; 與列寧 193-94, 234, 318-19; 與馬爾托夫案件 267-68; 在十月革命中 224; 組織能力 194, 212, 236, 319, 423; 流放西伯利亞 154-55, 194; 擔任蘇維埃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 236, 274, 423; 與斯大林的關係 154-55, 194; 與斯大林和托洛茨基的衝突 308-10; 與托洛茨基 318-19; 斯維爾德洛夫共產主義大學 544-45, 555, 705-6
- 斯德哥爾摩 (Stockholm) 102-3
- 斯摩棱斯克 (Smolensk) 355, 358
- 斯潘達良, 蘇倫 (Spandaryan, Suren) 106, 124, 155, 173
- 斯騰, 揚 (Sten, Jan) 708
- 普列韋, 維亞切斯拉夫·馮 (Plehve, Vyacheslav von) 100
- 普列奧布拉任斯基, 葉夫根尼 (Preobrazhensky, Yevgeny) 205, 390, 412, 423, 497, 507, 566, 695
- 普列漢諾夫, 格奧爾吉 (Plekhanov, Georgi) 42-43, 45, 78, 80, 711
- 普利什凱維奇, 弗拉基米爾 (Purishkevich, Vladimir) 99, 163, 182-83
- 普希金, 亞歷山大 (Pushkin, Alexander) 417
- 普林西普, 加夫里洛 (Princip, Gavrilo) 143, 149, 268-69
- 普金, 斯皮里東 (Putin, Spiridon) 413
- 普涅夫斯基, 尼古拉 (Pnevsky, Nikolai) 668
- 普梯洛夫工廠 (Putilov Works) 164
- 普斯科夫 (Pskov) 173
- 普魯士 (Prussia) 5-6, 58, 83-84, 95
- 普魯士與丹麥的戰爭 5-6
- 普羅托波波夫, 亞歷山大 (Protopopov, Alexander) 167-68
- 普羅相, 普羅什 (Proshyan, Prosh) 278
- 普羅科菲耶夫, 謝爾蓋 (Prokofyev, Sergei) 620-21, 678
- 最高革命法庭 (Supreme Revolutionary Tribunal) 433

- 最高國民經濟委員會 (Supreme Council of the Economy) 242, 262, 264, 459, 485-86, 578-79, 601, 607, 663-64, 694
- 朝鮮, 朝鮮人 (Korea, Koreans) 111, 364, 590, 617
- 《森林》(奧斯特洛夫斯基) (*Forest, The*) 620
- 《欽差大臣》(果戈里) (*Inspector General*) 58
- 殖民主義 (colonialism) 62, 65-66, 343, 364, 653; 布爾什維克反對殖民主義 368-69; 資本主義 625; 共產國際 367-68; 饑荒 63-64; 世界大戰 151-52; 國家主義 96; 凡爾賽條約 316
- 無政府主義、無政府主義者 39, 334
- 無政府主義者和共產主義者同盟 187
- 〈無政府主義還是社會主義?〉(斯大林) (“Anarchism or Socialism?”) 107-8, 544
- 《無產者報》(*Proletariat*): 斯大林在上面發表的文章 177
- 《無產階級革命》雜誌 (*Proletarian Revolution*) 512
- 《無產階級鬥爭報》(*Proletariats Brdzola*) 348
- 猶太人 12, 101, 112, 129, 182-83, 316; 布爾什維克政權中的猶太人 340-41; 猶太人托洛茨基 340-41, 523
- 猶太人居住區 (Pale of Settlement) 12, 44, 99-100, 112, 200, 249, 455
- 猶太人社會民主工黨 (錫安山工人黨) (Jewish Social Democratic Workers' Party [Poale-Zion]) 137
- 猶太工人總聯盟 (Jewish Labor Bund) 37, 44, 80, 98, 103, 137, 351
- 策列鐵里, 伊拉克利 (Tsereteli, Irakli) 192, 198-99
- 策列鐵里, 阿卡基 (Tsereteli, Akaki) 32, 34
- 策列鐵里, 格里戈里 (Tsereteli, Giorgi) 34, 43
- 〈給代表大會的信〉, 參見: 列寧「遺囑」 (“Letter to the Congress”)
- 肅清反革命、怠工和投機特別委員會 (Extraordinary Commission for Combating Counter-revolution, Sabotage, and Speculation) 293
- 腓特烈二世, 「大帝」, 普魯士國王 (Frederick II, “the Great,” king of Prussia) 59
- 舒米亞茨基, 鮑里斯 (Shumyatsky, Boris) 404
- 舒利金, 瓦西里 (Shulgin, Vasily) 173
- 華沙 15-16, 355; 紅軍向華沙的推進 361-64; 華沙條約 (1920) 353
- 菲舍爾, 露特 (Fischer, Ruth) 620
- 菲格納, 尼古拉 (Figner, Nikolai) 127
- 萊茵蘭成為非軍事區 315
- 費希爾, 路易斯 (Fischer, Louis) 635
- 費奧多羅夫斯卡婭聖母像 (Our Lady of St. Theodore,) 127
- 越飛, 阿道夫 (Joffe, Adolf) 249, 322, 407, 640; 自殺 651-52
- 越飛, 瑪麗亞 (Joffe, Maria) 651
- 階級鬥爭 (class warfare): 作為列寧思想的核心原則 291, 443-44, 737; 作為蘇維埃國家的基礎 291-92; 作為大批處決的理由 293-94; 馬克思的觀點 291-92, 737; 與農民叛亂 381; 與蘇維埃外交政策 443-44; 斯大林的篤信 306-9, 345, 444, 681, 688, 698, 710-11, 732, 734
- 雅科夫列夫, 雅科夫 (Yakovlev, Yakov) 579, 729
- 雅羅斯拉夫斯基, 葉梅利揚 (古別爾曼, 米涅伊) (Yaroslavsky, Yemelyan)

- [Gubelman, Minei] 390, 424, 434, 549-50, 698
- 集體化 (collectivization) 103, 420-21, 449, 570, 584, 660, 674-75, 682-83, 695, 722-23, 725, 733, 739; 布哈林的看法 708; 不比資本主義農業優越 725; 與共產主義意識形態 724-27; 與打倒富農 421; 與饑荒 724; 與全球經濟 726; 與工業化 725; 低產量 725; 農民的抵制 724; 與政治局 675-76; 與李可夫 731; 作為斯大林的豪賭 734-35; 斯大林的講話 671-73, 676, 679, 706-7, 713, 718; 托洛茨基的看法 675
- 黑色百人團 (「聖戰旅」) (Black Hundreds [Holy Brigades]) 77, 86, 99, 182
- 黑衫軍 (Blackshirts [*squadristi*]) 549
- 黑格, 道格拉斯 (Haig, Douglas) 152
- 黑格爾, 喬治·威廉·弗里德里希 (Hegel, G. W. F.) 40
- 黑海 (Black Sea) 12, 14
- 黑爾費里希, 卡爾 (Helfferich, Karl) 283
- ### 十三劃
- 塔什干 (Tashkent) 254, 372-73
- 塔什干蘇維埃 218, 253-55, 266, 373
- 塔什干蘇維埃代表大會 253
- 塔墨爾福斯, 芬蘭 (Tammerfors, Finland) 80-81
- 塞夫勒條約 (Sèvres, Treaty of, 1920) 316, 367
- 塞瓦斯托波爾海軍基地 (Sevastopol Naval Base) 271
- 奧匈帝國 (Austria-Hungary) 2, 5-6, 34-35, 109, 343; 與巴爾幹 141; 兼併波斯尼亞 110, 142, 144; 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條約 258; 在世界大戰中 140, 162, 185, 197, 200, 248-249, 269; 另見: 同盟國; 與世界大戰的爆發 143-44, 148-49; 戰時食品短缺 251-52
- 奧地利 316, 347-48
- 奧地利社會民主黨人 (Social Democrats, Austrian) 43
- 奧托, 恩斯特 (Otto, Ernest) 709
- 奧努夫里耶娃, 佩拉格婭 (Onufrieva, Pelageya) 121
- 奧拉赫拉施維里, 馬米亞 (Orakhelashvili, Mamiya) 399
- 奧倫堡 (Orenburg) 238
- 奧倫堡蘇維埃 (Orenburg Soviet) 266
- 奧庫洛夫, 阿歷克謝 (Okulov, Alexei) 304
- 奧格伯烏 (OGPU) 504, 577, 616, 688-89; 捷爾任斯基任首腦 577-78; 東方部 502; 超出正常法律程序的權力 635, 650; 有關糧食和商品短缺的報告 655; 與德國共產黨的政變圖謀 525; 代替格伯烏 485; 與徵糧 665-66, 669; 與列寧之死 492-93, 536; 明仁斯基任主席 608; 與耐普曼 572; 與紅軍 574-75; 斯大林的 control 687; 逮捕罷工者 517; 十週年慶祝活動 656-57; 恐怖 634; 與托洛茨基的流放 677-78; 擔心西方的進攻 616
- 奧斯特洛夫斯基, 亞歷山大 (Ostrovsky, Alexander) 620
- 奧斯曼帝國 (Ottoman empire) 1-2, 49, 59, 66, 82, 110, 258, 343, 365; 對亞美尼亞人的種族屠殺 150; 與巴爾幹 141;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 150; 被瓜分 367; 與俄國的擴張 12-13, 15, 51; 青年土耳其黨革命 131-32, 172
- 奧塞梯, 奧塞梯人 (Ossetia, Ossetians) 15, 496, 688
- 奧辛斯基, 瓦列里安 (Osinsky, Valerian) 659

- 奧廖爾戰役 (Orjol, Battle of) 330-31, 357  
 奧爾忠尼啟則, 格里戈里·「謝爾戈」  
 (Orjonikidze, Grigol "Sergo") 116, 124,  
 366-67, 395, 399, 425, 464-65, 477,  
 493, 503, 507, 513, 541, 576-77, 585,  
 598, 600-1, 654, 656, 666, 694, 700,  
 721, 723; 背景 28, 479; 與布爾什  
 維克接管格魯吉亞 396-97, 401; 擔  
 任中央監察委員會首腦 607-8, 636,  
 640; 打了卡巴希澤 481, 487, 489;  
 與姆季瓦尼 479-80; 與陰謀解除斯  
 大林總書記職務 713, 715, 717; 與南  
 高加索聯邦 479, 493; 忠於斯大林  
 390, 455-56, 467, 506, 731; 與斯大  
 林的通信 415, 493, 596
- 《弑父》(卡茲別吉) (*Patricide, The*) 23-24  
 意大利 110, 336; 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後  
 果 324; 反法西斯主義示威活動  
 551-52; 共產黨 550-51; 法西斯主  
 義 549-52, 725; 加米涅夫任駐意大  
 使 609-10; 《洛迦諾公約》561; 三  
 國同盟 6
- 意大利共產黨 550-51, 609, 720  
 意大利社會黨大表大會 (Italian Socialist  
 Party Congress, 1912) 123
- 愛沙尼亞 283, 295, 330-31, 604; 流產的  
 共產黨政變 554-57; 成為獨立國家  
 238, 342-43
- 愛森斯坦, 謝爾蓋 (Eisenstein, Sergei) 651  
 新尼古拉耶夫斯克 (Novonikolaevsk)  
 403-4
- 新西伯利亞 (Novosibirsk) 661, 669-70,  
 673, 713
- 《新時報》(*New Times*) 73
- 新經濟政策 (New Economic Policy, NEP)  
 344, 376, 388-89, 405-6, 408, 416,  
 420, 446-47, 449, 457, 470, 473-74,  
 481-82, 495, 497, 517, 524, 527, 578,  
 580, 616, 656, 662-63, 670, 674, 681,  
 695, 727; 作為對資本主義的讓步  
 571, 672, 711; 與工業化 571, 672;  
 與富農 727-28; 與李可夫 685,  
 728-29; 與索柯里尼柯夫 565, 577,  
 579; 與斯大林 419, 487, 497, 527,  
 568-69, 571, 592, 671-72, 682-83,  
 706, 711, 737; 季諾維也夫的批評  
 570-71
- 溫什利赫特, 約瑟夫 (Unszlicht, Józef)  
 345, 358, 360, 461, 587, 621, 638
- 溫格恩—什捷爾恩貝格男爵, 羅曼·馮  
 (Ungern-Sternberg, Roman, Baron von)  
 346, 400-4, 549
- 瑞士: 列寧在瑞士 135, 173, 187
- 瑟京, 帕維爾 (Sytin, Pavel) 308-10
- 瑟爾采夫, 謝爾蓋 (Syrtsov, Sergei) 457,  
 668-70, 679-80, 683, 705
- 義和團起義 (Boxer rebellion) 64
- 聖日耳曼條約 (St. Germain, Treaty of,  
 1919) 316
- 聖—西門伯爵, 亨利·德 (Saint-Simon,  
 Count Henri de) 39-40
- 聖彼得堡 (St. Petersburg) 參見: 彼得格勒
- 聖彼得堡帝國大學 (St. Petersburg Imperial  
 University) 91
- 「聖戰旅」(「黑色百人團」) (Holy Brigades  
 [Black Hundreds]) 77, 86, 99, 182
- 葉夫多基莫夫, 格里戈里 (Yevdokimov,  
 Grigory) 505-6, 653-55
- 葉夫多基莫夫, 葉菲姆 (Yevdokimov,  
 Yefim) 688-89
- 葉戈羅夫, 亞歷山大 (Yegorov, Alexander)  
 357, 361-62, 365, 378, 456, 589
- 葉卡捷琳娜一世, 女皇 (Catherine I,  
 tsarina) 88
- 葉卡捷琳娜二世, 「大帝」, 女皇  
 (Catherine II, "the Great," tsarina)  
 89-90, 263
- 葉卡捷琳堡 (Yekaterinburg) 280-82

葉努基澤，阿韋利 (Yenukidze, Avel) 50, 55, 463, 480, 515, 535, 641

葉里斯塔維，拉斐爾 (Eristavi, Rapiel) 34

葉格納塔施維里，雅科夫·「柯巴」  
(Egnatashvili, Yakov "Koba") 16, 20, 23-25, 46, 106

葉格納塔施維里太太 (Egnatashvili, Mrs.) 17

葉格納塔施維里家族 (Egnatashvili family) 17, 28

葛蘭西，安東尼 (Gramsci, Antonio) 123-24

蒂爾皮茨，阿爾弗雷德·馮 (Tirpitz, Alfred von) 148

資本主義 39, 190, 482, 733；與殖民主義 625；列寧論資本主義 151, 291, 403, 444, 446, 625；馬克思主義對它的看法 39-40, 78-79, 151, 190, 288, 292, 347；與民族主義 347；俄國的 42, 195；索柯里尼柯夫的看法 565-66；斯大林的看法 107, 444, 561, 562-63, 583, 653, 698-99

《資本論》(馬克思) (*Kapital, Das*) 40, 88；俄文譯本 42-43, 65-66

資產階級 40；馬克思主義對它的看法 190, 292-93；俄國的 66；取代農奴主 42

資產階級革命 42, 78, 175, 195, 199, 407

跨西伯利亞鐵路 (Trans-Siberian Railway) 68, 71, 75, 173, 270

《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馬克思) (*Eighteenth Brumaire of Louis Bonaparte, The*) 107

路易十四，法國國王 (Louis XIV, king of France) 18

路德維希，艾米爾 (Ludwig, Emil) 11

農奴，農奴制 8, 11, 15-16, 57

農奴的解放 16, 23, 37-38, 41-42, 59-60, 726

農業人民委員部 (agriculture commissariat) 449-50, 470

達什納克 (亞美尼亞革命聯盟) (Dashnaks [Revolutionary Armenian Federation]) 115, 137, 351, 395, 400

達夫里舍維，約瑟夫·「索索」  
(Davrishevi, Iosif "Soso") 25

達夫里舍維，達米安 (Davrishevi, Damian) 20

達吉斯坦 12

達達主義 (Dadaism) 230, 232

《達達宣言》(查拉) ("Dada Manifesto" [Tzara]) 227

達維塔施維里，米哈伊爾·「米霍」  
(Davitashvili, Mikheil "Mikho") 37-38, 47-48

達賴喇嘛 (Dalai Lama) 401

雷恩基翁斯卡婭，瑪麗娜 (Ryndzyunskaya, Marina) 427, 435

雷傑恩斯，斯坦尼斯拉夫 (Redens, Stanislaw) 314

頓河 (Don River) 268, 296, 300, 310, 330

頓河蘇維埃共和國 (Don Soviet Republic) 238

頓涅茨克煤炭托拉斯 (Donetsk Coal Trust) 690-91, 703

## 十四劃

圖哈切夫斯基，米哈伊爾 (Tukhachevsky, Mikhail) 345, 357, 360, 561, 576, 589, 619；佔領巴庫 366；擔任總參謀長 576；在世界大戰中被俘 356；與喀琅施塔得叛亂 384, 391, 575；與格伯烏的監視 575；在波蘇戰爭中 361-65, 377-78；在俄國內戰中 356-60；與坦波夫叛亂 394, 575；與伏羅希洛夫的競爭 576-77

圖恰普斯基，帕維爾 (Tuchapsky, Pavel) 447

- 《圖爾賓一家的命運》(布爾加科夫) (*Days of the Turbins*) 620
- 圖魯漢斯克 (Turukhansk) 454, 614, 621, 686; 斯大林在那裏流放 152-55, 173
- 察里津 (Tsaritsyn) 283, 300, 330, 357, 642; 紅軍 302, 305; 革命軍事委員會 303; 更名為斯大林格勒 689; 斯大林在察里津 270, 276, 291, 300-10, 313-14, 320, 340; 斯大林被召回 309-10, 314, 642; 白軍的圍攻和佔領 305-6, 310, 326-27
- 察里津河 (Tsaritsa River) 300
- 察里津契卡 302, 304; 馬赫羅夫斯基徵糧隊遭其破壞 304-5
- 對外貿易人民委員部 (foreign trade commissariat) 451
- 《對於托洛茨基, 伊里奇寫過甚麼和想過甚麼》 (*What Ilich Wrote and Thought About Trotsky*) 500
- 《對社會革命黨人的審判》 (電影) (*SR Trial, The*) 440
- 對馬海峽之戰 (Tsushima Strait, Battle of) 73
- 《旗幟報》 (*Znamya*) 100
- 滿洲 (Manchuria) 71-73, 111, 400-01, 590, 628-29
- 福季耶娃, 利季婭 (Fotiyeva, Lidiya) 417, 467, 487, 489, 504, 527; 與列寧的所謂關於民族問題的文章 493-94; 與列寧「遺囑」473; 〈論列寧主義基礎〉 (斯大林) ("Foundations of Leninism") 532, 544-45, 555
- 福特, 亨利 (Ford, Henry) 612
- 福煦, 斐迪南 (Foch, Ferdinand) 311, 315, 317
- 維多利亞女王, 英國 (Victoria, queen of England) 89, 128
- 維托里奧·埃馬努埃萊三世, 意大利國王 (Vittorio Emanuele III, king of Italy) 549, 551
- 維辛斯基, 安德烈 (Vyshinsky, Andrei) 203, 702-3, 709
- 維特, 謝爾蓋 (Witte, Sergei) 75-76, 82-83, 85, 95, 110, 118-19, 126, 129; 針對他的暗殺圖謀 102; 背景 68-69; 任財政大臣 69-70, 645; 與尼古拉二世的關係 70, 72, 84, 91; 與《十月宣言》84, 92; 任總理 84-85, 86; 辭職 90-91; 與跨西伯利亞鐵路 68, 71
- 維爾納 (維爾諾) (Vilna [Wilno]) 354, 359, 378
- 蒙古, 蒙古人 145, 344, 401-2, 553-54, 617; 中國軍隊被趕出蒙古 403-4
- 蒙古人民共和國 (Mongolian People's Republic) 553-54
- 蒙古人民黨 (Mongolian People's Party) 402, 405, 554
- 蒲魯東, 皮埃爾-約瑟夫 (Proudhon, Pierre-Joseph) 39
- 「蓄意破壞」 ("wrecking") 691, 694-96, 709, 711, 734
- 蓋捷, 費奧多爾 (Guetier, Fyodor) 534
- 赫岑多夫男爵, 弗朗茨·康拉德·馮 (Hötendorf, Franz Conrad, Baron von) 148
- 赫斯, 魯道夫 (Hess, Rudolf) 527
- 赫斯特, 威廉·倫道夫 (Hearst, William Randolph) 610
- 赫雷羅人 (Herrero) 151-52
- 赫爾岑, 亞歷山大 (Herzen, Alexander) 41-42
- 赫魯曉夫, 尼基塔 (Khrushchev, Nikita) 732
- 齊夫, G. A. (Ziv, G. A.) 201
- 齊赫澤, 尼古拉·「卡爾洛」 (Chkheidze, Nikoloz "Karlo") 51, 191, 647

## 十五劃

- 墨西哥革命 131-32
- 墨索里尼，貝尼托 (Mussolini, Benito)  
123-24, 552, 610, 725；未遂暗殺  
738-39；馬泰奧蒂被害 551-52；成  
為總理 549, 551
- 徵收俄國農民的糧食 447, 662-66,  
669-72, 679-80, 682, 684-86, 698,  
700-1, 705, 709-13, 721-22, 727；  
與「非常措施」697, 705, 709-10,  
712-13, 722；囤積糧食 649, 659,  
664-66, 668-69, 680, 700, 711-12；  
抗議 707-9, 722；代之以糧食稅 376,  
380, 382, 388-89, 393, 405, 449
- 德米特列夫斯基，彼得·亞歷山德羅維  
奇 (Dmitrievsky, Pyotr Alexandrovich)  
276, 278
- 德皇威廉一世 (Wilhelm I, kaiser of  
Germany) 6, 119
- 德皇威廉二世 (Wilhelm II, kaiser of  
Germany) 89, 134, 136, 139, 159,  
253；退位 311；海軍建設 139-40；  
與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爆發 143-47；  
與俄國的秘密條約 109-10, 139
- 德格布阿澤，亞歷山大 (Dgebuaдзе,  
Alexander) 399
- 德國共產黨 318, 323, 378, 704
- 德國共產黨的政變圖謀 392, 473, 550；布  
哈林 509-10；共產國際 511, 525-26,  
559；缺乏工人的支持 525-26；政治  
局的援助 511, 515；斯大林 510-11,  
515, 522, 525-26, 557；托洛茨基  
511；季諾維也夫 509-11, 514-15
- 德國佔領里加 206, 208
- 德國社會民主黨人 (Social Democrats,  
German) 41, 43, 78-79, 113, 129, 201,  
272, 318, 323, 378, 510, 515, 525-26,  
550, 617-18, 704
- 德國獨立社會民主黨 (Independent Social  
Democrat Party, German) 378, 392
- 德意志帝國：勾結反布爾什維克分子  
272；奧匈帝國的戰俘 269；巴爾幹  
141；佔領波羅的海沿岸地區 243,  
283；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條約  
257-58, 264-65, 269, 272-73, 283,  
315, 642；與英國 139-40；政府官  
員 58-59；同盟國 140；經濟增長  
7；擴張 145；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  
150, 152, 156-57, 197-98, 206-7, 231,  
247-53, 310, 312；另見：同盟國；  
工業化 18, 65, 70；列寧的對德政策  
272, 282-84；民族主義 34-35；海軍  
建設 139-40, 150；1918年的西線攻  
勢 310-11；佔領敖德薩 264；第一  
次世界大戰的爆發 143-49；佔領波  
蘭 243, 283；與俄國的「再保險條約」  
6；重新開始對俄攻勢 253, 255-56,  
259, 271；「施利芬計劃」145, 147；  
佔領塞瓦斯托波爾海軍基地 271；鋼  
產量 63, 141；三國同盟 6；與沙俄  
109, 139；佔領烏克蘭 253, 265-67,  
270, 272-73, 283, 301, 303；統一  
4-7, 18, 732；戰時的糧食短缺和罷  
工 165, 251
- 德薩特勳爵 (Desart, Lord) 146-47
- 慕尼黑啤酒館暴動 (Munich Beer Hall  
Putsch) 2, 527
- 摩爾曼斯克鐵路 265
- 歐文，羅伯特 (Owen, Robert) 39
- 歐亞地區 (Eurasia) 1, 138, 243, 343-44,  
349；內戰 294, 345；多樣性 56；穆  
斯林 349, 366-72；民族主義 406；  
無產階級佔少數 349；該術語的用法  
345
- 歐洲：對布爾什維主義的恐懼 336；俄國  
僑民 104, 393, 489, 553, 555, 557, 575
- 潛艇戰 (U-boat warfare) 310

蔡特金，克拉拉 (Zetkin, Clara) 282, 410  
 蔣介石 185, 627, 631-32, 644, 655, 717;  
 不相信共產黨人 628; 下令屠殺上  
 海共產黨人 629-30; 斯大林的支持  
 630-31

《論一國社會主義》(斯大林) ("Socialism  
 in One Country") 555

《論一國社會主義》(斯大林) (*Socialism in  
 One Country*) 532

《論列寧》(托洛茨基) (*On Lenin*) 545

《論列寧和列寧主義》(斯大林) (*On Lenin  
 and Leninism*) 555, 557

《論糧食稅》(列寧) (*On the Tax in Kind*) 393

鄧尼金，安東 (Denikin, Anton) 297, 300,  
 329-30, 335-36, 352-53, 355-58,  
 366, 386; 哥薩克的擁護 296; 進攻  
 莫斯科失敗 331; 佔領基輔 330;  
 1919年的攻勢 326, 328; 撤到克里  
 米亞 332; 擔任「志願軍」首腦 295,  
 325-26

魯希莫維奇，莫伊謝伊 (Rukhimovich,  
 Moisei) 327

魯祖塔克，揚 (Rudzutaks, Jānis) 511, 534,  
 596, 607, 641-42

魯茲斯基將軍 (Ruzsky, General) 171-72

魯斯塔維利，紹塔 (Rustaveli, Shota) 10,  
 16

魯登道夫，埃里希 (Ludendorff, Erich)  
 172, 248, 272-73, 282, 311, 313, 352

## 十六劃

《戰爭與和平》(托爾斯泰) (*War and  
 Peace*) 575

《戰爭與社會主義運動中的危機》(季諾維  
 也夫) (*War and the Crisis in Socialism*)  
 407

樸茨茅斯條約 (Portsmouth, Treaty of,  
 1905) 75, 81

歷史：受地緣政治的驅動 4-5; 馬克思主  
 義的觀點 40, 78

澤林，馬克斯 (Sering, Max) 409, 420-21  
 盧比揚卡街2號 (Lubyanka, 2) 426,  
 437-41

盧布林 (Lublin) 362

盧布林—華沙突出部 (Lublin-Warsaw  
 salient) 360

盧那察爾斯基，阿納托利 (Lunacharsky,  
 Anatoly) 225, 227, 300

盧里耶，亞歷山大·「薩沙」(Lurye,  
 Alexander "Sasha") 462

盧森堡，羅莎 (Luxemburg, Rosa) 80, 223,  
 318, 578; 遇害 323; 對列寧和布爾  
 什維主義的抨擊 323; 論民族主義  
 347-48

盧森堡主義 (Luxemburgism) 347, 349,  
 351, 369

穆拉洛夫，尼古拉 (Muralov, Nikolai) 576,  
 641, 653-54, 656

穆拉維約夫，米哈伊爾 (Muravyov,  
 Mikhail) 277

穆索爾格斯基，莫傑斯特 (Mussorgsky,  
 Modest) 134

穆斯林：在中亞 373-74; 在共產黨中  
 502-3, 527, 716; 在歐亞大陸 349,  
 366-72; 在格魯吉亞 13, 24; 奧格伯  
 烏的監視 502; 浩罕大屠殺 255; 在  
 俄國 12-13, 183-84, 368-69; 斯大林  
 對穆斯林的培養 368; 遜尼派和什葉  
 派的分裂 503; 在突厥斯坦 253-54,  
 502-3

興登堡，保羅·馮 (Hindenburg, Paul von)  
 162, 253, 311

諾夫哥羅采娃，克拉夫季婭  
 (Novogorodtseva, Klavdiya) 154

諾克斯，阿爾弗雷德 (Knox, Alfred) 223

諾貝爾兄弟 (Nobel brothers) 51, 115

諾金，維克托 (Nogin, Viktor) 322



諾索維奇，阿納托利 (Nosovich, Anatoly)  
305-7

賴斯納，拉里莎 (Reisner, Larissa) 366  
鋼產量 63, 76, 141

錫安工人黨 (Paole Zion party) 456

《錫安長老會紀要》(*Protocols of the Elders of Zion*) 99-100, 129, 281, 295

霍夫曼，馬克斯 (Hoffmann, Max) 249,  
252, 255-56, 258-59

霍布森，約翰 (Hobson, John) 151

霍爾蒂，米克洛什 (Horthy, Miklós) 325

霍羅舍尼娜，謝拉菲瑪 (Khoroshenina,  
Serafima) 121

鮑里索夫，謝爾蓋 (Borisov, Sergei) 401-2

鮑威爾，奧托 (Bauer, Otto) 133, 347-48

鮑德溫，斯坦利 (Baldwin, Stanley) 559

鮑羅廷，米哈伊爾 (·格魯森貝格)  
(Borodin, Mikhail [Grusenberg])  
628-29, 631

## 十七劃

戴高樂，夏爾 (de Gaulle, Charles) 352

戴維斯，傑羅姆 (Davis, Jerome) 610-11,  
660

總參軍事學院 (General Staff Academy) 574  
《繁忙的鐵路》(基爾雄) (*Rails Are Buzzing  
The*) 699

聯合反對派 (United opposition) 613-14,  
652, 655-56, 672, 686, 713, 729

聯邦制 (federalism) 343；斯大林致力於聯  
邦制 346, 349-51

臨時政府 (Provisional Government) 174,  
177-78, 183, 213, 223-24, 230, 242,  
259, 272, 280, 296, 298, 338-39, 383,  
453；擔心布爾什維克政變 208；  
指控布爾什維克叛國 202-3；作為  
資產階級機構 176；秩序的瓦解  
180-81；立憲民主黨的退出 202；

崩潰 216-18；與立憲主義 175-76,  
178-80；與杜馬 179-80；糧食壟  
斷 298-99；與第一次世界大戰 187,  
194-200；抵制重新分配土地 189；  
大批辭職 209；獲得孟什維克的支持  
195；發動1917年攻勢 196-200；  
一號命令 181-82, 200, 297；二號  
命令 182；與彼得格勒蘇維埃 19,  
181-82；把「全部權力」轉讓給臨時  
政府 178；解散警察機關和保安處  
180, 223；遷往冬宮 213-14, 216-17,  
219-20；與右翼 182-83；成為社會  
主義的 176；與斯大林 190, 205；另  
見：克倫斯基，亞歷山大

臨時革命委員會 (Provisional Revolutionary  
Committee) 383-84, 393, 402

講突厥語的民族 (Turkic peoples) 29,  
183-84, 344

謝列布里亞科夫，加林娜 (Serebryakova,  
Galina) 565, 581, 585

謝列布里亞科夫，列昂尼德 (Serebryakov,  
Leonid) 390, 423, 463

謝多夫，列夫 (Sedov, Lev) 538

謝多娃，娜塔莉亞 (Sedova, Natalya) 533,  
541, 593-94, 677

謝里登，克萊爾 (Sheridan, Clare) 459

謝爾蓋·涅恰耶夫 (Nechayev, Sergei) 53

謝爾蓋大公 (Sergei, Grand Duke) 61

謝爾蓋耶夫，阿爾喬姆 (Sergeyev, Artyom)  
466-67, 593

賽義德·加利耶夫，薩希卜·加列伊  
(Said-Galiev, Sahib Garci) 345-46, 371

邁爾，馬克斯 (Maier, Max) 702-3, 709

## 十八劃

瞿魯巴，亞歷山大 (Tsyurupa, Alexander)  
299, 569

禮薩汗 (Reza Khan) 346, 391

糧食人民委員部 (food supply commissariat) 449  
 糧食和運輸特別委員會 (Extraordinary Commission for Food and Transport) 299  
 「職務名冊」(“nomenklatura”) 432-33, 436  
 薩文科, A. I. (Savenko, A. I.) 88  
 薩吉拉施維里, 達維德 (Sagrashvili, David) 177, 225-26, 233  
 薩拉托夫 (Saratov) 91-92, 95, 381  
 薩拉熱窩 (Sarajevo) 142-43  
 薩法羅夫, 格奧爾吉 (沃爾金) (Safarov, Georgy [Voldin]) 346, 387  
 薩哈林島 (Sakhalin Island) 75, 590  
 薩馬拉 (Samara) 291, 326  
 魏瑪共和國, 參見: 魏瑪德國  
 魏瑪德國 293; 與英國 560-61, 587, 621; 共產黨的政變圖謀, 參見: 德國共產黨的政變圖謀; 大罷工 323; 惡性通貨膨脹 450, 509; 《洛迦諾公約》561-62; 群眾罷工 510; 與紅軍的軍事合作協議 446, 561, 587, 617-18, 621, 638, 704-5; 與波蘇戰爭 363; 與蘇俄的拉帕洛條約 445-46, 473, 509, 560-61, 599; 尋求與西方和解 446; 蘇德互不侵犯條約 587, 588; 蘇德關係 558-61, 611, 623, 638-39, 692, 704; 凡爾賽條約 315; 拖欠戰爭賠款 509

## 十九劃

扎諾夫, V. N. (Rozanov, V. N.) 576, 738  
 明納茲, 維薩里昂·「貝索」  
 (Lominadze, Besarion “Beso”) 640  
 易, 馬納本德拉·納特 (Roy, Manabendra Nath) 367-68, 625, 633  
 賈, 伯特蘭 (Russell, Bertrand) 151  
 玄, 塞西爾 (Rhodes, Cecil) 71

羅馬尼亞 316, 343-44, 352, 556, 604-5;  
 兼併比薩拉比亞 378-79; 與紅軍的  
 衝突 360; 法西斯主義 589-90; 在  
 第一次世界大戰中 162; 入侵匈牙利  
 325; 與波蘭 590, 616; 與蘇聯的戰  
 爭威脅 622-23  
 羅將柯, 米哈伊爾 (Rodzyanko, Mikhail,) 157, 166, 168-69, 171, 178, 207  
 羅曼諾夫, 米哈伊爾·費奧多羅維奇  
 (Romanov, Mikhail Fyodorovich) 127  
 羅曼諾夫家族 (Romanov family) 88-89,  
 280-81; 羅曼諾夫家族統治三百  
 週年慶典 (tercentenary of rule by)  
 126-29, 132, 134  
 羅斯托夫 (Rostov) 271  
 羅斯柴爾德家族 (Rothschild brothers) 51,  
 115  
 羅斯福, 西奧多 (Roosevelt, Theodore) 75,  
 139  
 羅森格爾茨, 阿爾卡季 (Rozengolts,  
 Arkady) 306  
 羅森堡, 阿爾弗雷德 (Rosenberg, Alfred)  
 340  
 羅豪, 奧古斯特·馮 (Rochau, August  
 von) 6  
 邊陲國家 (limitrophe) 556, 604, 616, 623,  
 723, 732  
 〈關於民族問題的筆記〉(列寧) (“Notes on  
 the Question of Nationalities”) 493-94,  
 497, 501, 606; 斯大林的反駁 496-97

## 二十劃

蘇丹—加利耶夫, 米爾賽義德  
 (Soltangaliyev, Mirsäyet) 345-46,  
 368-69, 371-72, 502-4, 716  
 蘇瓦林, 波里斯 (Souvarine, Boris) 520  
 蘇沃林, 阿列克謝·A. (Suvorin, Aleksei  
 A.) 210

- 蘇呼姆 (Sukhum) 534, 537, 541-42
- 蘇漢諾夫, 尼古拉 (Sukhanov, Nikolai) 176, 215
- 蘇維埃大使館: 共產國際辦事處 443; 格伯烏 443
- 蘇維埃中央執行委員會 (Soviet Central Executive Committee) 200, 215, 221, 226, 233, 235-36, 247, 257, 260, 262-65, 268, 273-74, 285-86, 423, 429, 535; 斯大林反對各蘇維埃共和國的獨立 386, 388, 390
- 蘇維埃代表大會 (Congress of Soviets) 350, 354; 第一次 196; 第二次 215, 217, 219-20, 225, 233, 247, 258, 396; 第三次 247, 251; 第四次 264-65; 第五次 273-76, 278-80; 第六次 311; 第十次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第一次) 485-86; 第十一次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第二次) 534-35, 539-40
- 蘇維埃外交政策 558, 698-99; 階級鬥爭 443-44; 列寧的控制 446-47; 李維諾夫的批評 622-23; 斯大林 553, 583, 623-24; 兩面性 443, 645, 667
- 蘇維埃的國家建設 289-92, 343
-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 (Union of Soviet Socialist Republics, USSR) 參見: 蘇聯
- 蘇維埃俄國, 參見: 俄羅斯社會主義聯邦蘇維埃共和國
- 蘇維埃經濟 408; 內戰時期 450; 貨幣 450, 452; 外債 720-21, 733; 通貨膨脹 450, 583, 663; 貨幣發行量 569, 585, 664; 貨幣改革 376, 451-52, 566, 568-69, 583, 585; 1924年的豐收 566; 托洛茨基要求實行經濟專政 481, 484-88, 501, 518; 失業 695; 另見: 財政人民委員部; 新經濟政策
- 蘇赫—巴托爾 (Sukhbaatar) 346, 402-5
- 蘇黎世 (Zurich) 187-88, 230
- 蘇霍姆利諾夫, 弗拉基米爾 (Sukhomlinov, Vladimir) 159, 161, 163
- 蘇霍娃, 塔季亞娜 (Sukhova, Tatyana) 116
- 蘇聯: 與邊境國家 556, 732; 與英國 558, 617-18, 622-24, 631-35; 支持英國的總罷工 588, 598-99, 613; 與中國 617, 623, 625-33, 651, 655; 憲法 513, 540; 經濟, 參見: 蘇維埃經濟; 食品短缺 164-65, 189; 對外政策 558, 698-99; 外國對它的承認 553, 558; 外貿 599, 632, 709, 720, 733-34; 正式成立 485-86; 與法國 560, 645-46, 693, 733; 與德國的互不侵犯條約 587-88; 與德國的關係 558-61, 611, 623, 638-39, 692, 704; 商品短缺 654-55; 糧食出口 662, 665, 667; 糧食進口 568, 720; 糧食短缺 641, 649, 654-55, 659, 661-66, 669-72, 679-80, 682, 684-86, 698, 700-1, 705, 709-13, 721-22, 727-28; 與大蕭條 733-34; 工業化 517, 565-66, 571, 574, 582-83, 587, 605, 625, 638, 659, 662-64, 672, 686, 694-95, 698, 710, 722, 725, 733; 與日本 517, 590, 621-22, 632; 列寧的打算 476-78, 485-86, 496; 洛迦諾公約 562; 1923年的罷工 517-18; 石油出口 709; 斯大林在創建蘇聯過程中的作用 419, 475, 478, 486; 與羅馬尼亞的戰爭 622-23; 拒絕償還沙皇政府遺留的債務 611, 616, 623, 645; 與美國的關係 611-12; 戰爭恐慌 619-25, 635-36, 639, 649, 659, 664, 668, 721, 736-37; 需要西方技術 558-59, 667-68, 693, 705, 732-33; 與世界革命 555-56
- 蘇聯人民委員會 (Council of People's Commissars, USSR) 540

饒爾丹尼亞，諾伊 (Jordania, Noe) 43-44,  
48, 50-51, 54, 74, 80, 108, 113, 395  
黨務人員 (apparatchiks) 426, 430-32  
《櫻桃園》(契訶夫) (*Cherry Orchard, The*)  
10

## 二十一劃

辯證唯物主義 (dialectical materialism) 107  
鐵木辛哥，謝苗 (Timoshenko, Semyon)  
356  
鐵匠橋街 15 號 (Blacksmith Bridge, 15  
[*Kuznetskii most*]) 441  
鐵路工會 (Union of Railroad Employees)  
231, 234, 237

## 二十二劃

韃靼人 183, 368, 370-71, 401, 479  
韃靼里亞，韃靼共和國 371, 447, 502  
韃靼蘇維埃社會主義自治共和國 371